# 中央日报社：《蒋总统秘录》

编者前言

新增人工校对版：《蒋总统秘录、俄帝侵略中国史、中共编写中华民国史真相探讨》三书合编.txt

这套电子书，叫做“蒋总统秘录(中央日报社)”，由民国派前辈“自由人”（刘鑫汉先生）对文字扫描和上传至网络，但是每行文字都有换行符，阅读十分不便，而且有大量多余的标点符号。我对此初步做了修缮，删除了所有多余的换行符，将错乱的标点符号改成顿号、点号，或者删除，又将生僻字悉数矫正，把“石奇”改成“碕”，把“永日”改成“昶”，把“辶入”改成“込”，把“玉奉”改成“琫”，把“麻吕”改成“麿”，把“金间”改成“锏”，把“木式”改成“栻”，把“土反”改成“坂”，把“火田”改成“畑”，把“田井”改成“畊”，把“久米”改成“粂”，把“金英”改成“锳”，把“伐土”改成“垡”，把“尸九”改成“尻”，多亏原制作者将生僻字都标有记号。人工校对版实际上是《蒋总统秘录》、《俄帝侵略中国史》、《中共编写“中华民国史”真相探讨》三本书混合编成。

自注：本书内未见《俄帝侵略中国史》内容，《中共编写“中华民国史”真相探讨》一书也只是节录部分相关内容。

维基百科

《蒋总统秘录》，日文版题为《蒋介石秘录》（日语：蔣介石秘録），是日本产经新闻社于1970年代依据中国国民党及中华民国政府各有关机关现存官方资料，所汇编而成的一套叙述中华民国故总统蒋中正生平的书籍，由古屋奎二主笔，总连载期间2年4个月，总连载篇数650篇[1]:200。1974年8月15日起在《产经新闻》以日文连载，以蒋中正之勋业为中心，对八十年来之中日关系重作历史衡量，每周刊载6天，每天平均字数约2500字，一年以上刊完。[2]:225直至1976年12月25日为止。同一时期《中央日报》也做中文连载，副标题为《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日中関係八十年の証言）。

依据《产经新闻》的说明，《蒋总统秘录》的连载经过如下。

《蒋总统秘录》的连载企画，着手于1973年5月；经过三个月的准备，《产经新闻》在1973年8月上旬请日华协力委员会（当时会长是石井光次郎）通过中日合作策进会（当时会长是谷正纲），正式向中华民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党提出协助采访取材的要求。中华民国方面，由中日合作策进会与有关机关及总统府资政张群等人商洽，乃确立党和政府的协力体制，中国国民党副秘书长秦孝仪负其总责，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当时主任委员是杜元载）为中心。1973年11月1日，《产经新闻》与中国国民党举行会谈，张群主持，双方原则同意正式展开取材活动。

《产经新闻》更访问第一夫人宋美龄、行政院院长蒋经国等蒋家关系者，及始终追随蒋中正的张群与何应钦，及曾为重要事件当事人的魏道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顾祝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抗日战争第三战区司令）、石觉（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军长）、黄杰（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方先觉（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冷欣（中华民国陆军副参谋长）、钮先铭（陆军总司令部第二处处长）、石美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庭长、审判长）、徐焕昇（国民革命军空军第二路军副司令）、王铁汉（九一八事变时沈阳警备团团长）、祁国轩（芦沟桥事变时担任排长）等人。

中国国民党无条件提供党史官方纪录、总统府公文书、外交文书、战史资料、蒋中正讲词、蒋中正日记、蒋中正回忆录等过去从未公开过的重要文献，《产经新闻》采取以这些资料为准据的方式加以编撰。这个方式的优点是能够将过去所发生的事件，一一根据官方文献，对于当时蒋中正与中华民国政府如何考虑、如何行动，不再站在日本人已耳熟能详的日本立场，而是从中华民国的立场、根据官方纪录叙明事实。

在提供资料中，包括原来被列为“极机密”的外交文书原文复印本，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苏联的活动、《雅尔塔协定》强迫中国牺牲等内幕、足以传达中华民国与苏联外交谈判真实气氛的问答纪录；因为这些文件不允许被携往国外，《产经新闻》乃于1974年2月在台北市设立“执笔室”，担任执笔者为编辑委员古屋奎二，担任采访者为岩野弘、下室进、住田良能及照相部次长间山公麿，连载体制为之齐备。

目录

前言（缺）

第一章：战争结束前后

第二章：辛亥革命与日本(上)

第二章：辛亥革命与日本(中)

第二章：辛亥革命与日本(下)

第三章：中华民国之诞生(上)

第三章：中华民国之诞生(下)

第四章：袁世凯窃国(上)

第四章：袁世凯窃国(下)

第五章：磨炼和考验时代(上)

第五章：磨炼和考验时代(下)

第六章：共产党的始动

第七章：北伐的进击(上)

第七章：北伐的进击(下)

第八章：全国统一

第九章：孕育危机的东北

第十章：九一八事变(上)

第十章：九一八事变(下)

第十一章：敌乎？友乎？

第十二章：西安事变(上)

第十二章：西安事变(下)

第十三章：卢沟桥事变

第十四章：泥沼战线

第十五章：大东亚的奢望

第十六章：抗战的破坏者

第十七章：美日战争

第十八章：美国的失策

第十九章：对日宽大政策

第二十章：胜利的后遗症

第二十一章：从忧患中新生

执笔者结语

插图（略）

第一章：战争结束前后

日本投降

一九四五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日本昭和二十年）八月十日，中华民国陪都—重庆。白昼骄阳的灼热未敛，在灯火管制下的傍晚，显得分外地宁静。

突然间，响出了出人意外的欢呼声，冲破静寂—时针指在下午七时五十分。原来是从盟军总部一带发出的英语吼声，夹杂着“顶好”“好啊”的欢呼，激荡在薄暮的长空。

日本投降（接受菠茨坦宣言）—这是由东京的英语国际广播最初传送到重庆的一个瞬间。（注一）

这个瞬间，相信不仅是在重庆、同时也是在华盛顿、在伦敦所有爱好自由、和平的人们衷心盼望着的时刻。在二十世纪历史中，用鲜血写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总算是面临了最终的时刻。

在重庆山洞的国民政府主席官邸，（蒋总统是当时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正在欢宴新到任的墨西哥大使易斯加兰特。日本投降的正式报告还没有到达宴席上，但是潮涌般的欢声所表达的是什么意义？无待报告，谁都能够凭自己的听觉判断出来—除非是日本投降，还会有什么原因能让人们兴奋到如此程度？

宴会在平静的气氛中继续进行。宴后，接着就召集了军事干部紧急会议。其实，就在这一天的中午，才举行过军事会报，预料到日本将会投降，对于若干的准备措施，已经有所研讨。

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很快地开始转播日本投降的第一次报导，广播员激动得声调颤抖，而且屡次停顿。胜利的好消息，随着电波立即传遍全国。凡有人烟之处，都响起了沸腾的欢声。

投降广播避过日阀检查

根据日本方面的资料：东京发出的英语国际广播，因为预料会受到阻碍，所以并未通过军事当局的检查，而是由外相东乡茂德核发。因为日本军事当局、尤其是陆军方面，主张决战到底，不肯让步。就在这个广播的不久之前，陆军大臣阿南惟几还在向国内广播说：“就算是嚼草根、啮土壤、伏尸原野，也要战斗到底！”他要大家相信：“置之死地而后生。”他号召全体官兵“誓为玉碎，决不投降。”

可是国际广播，却已经飞越过前线日军的头顶，被同盟国方面所收录，以致正在和日军交战中的中国军、美、英军反而在先得到了日本投降的新闻。

就连日本的“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也都漏听了本国广播；还是在稍后从外国广播中才收听到这个消息。

在中华民国来说：这真是一个感慨无量的胜利。自九一八事变算起，已经是十四年，不用说东北三省，就连华北、华中、华南许多地方，也都久已沦于日本军阀的铁蹄蹂躏之下。像这样广大的区域遭受到如此漫长岁月的侵略，在近代战史上，不能不说是极其罕见的。中华民国多年来被迫承受的耻辱、牺牲和痛苦，其既深且锯的程度，的的确确是笔墨和言辞所难以罄述的。

但是，回忆过去，沉浸在感慨之中，总得要告一段落。现在，面临了日本投降的新情势，需要赶快解决的问题，实在是太多太多。

蒋总统的日记

‘惟有虔诚感谢上帝赐给我的伟大恩典和智慧。特别是圣经诗篇第九篇的一字一句，都得到了不可思议的验证。每一念到上帝降临给我的伟大祝福，更当奋勉戒惧。作为神的使徒，不能不善尽职责……’像这样的感慨，蒋总统写在日记上的时候，是从收到广播以来，经过四天不眠不休、夜以继日的会议等等，好不容易才得告一段落之后的十五日深夜。

圣诗上是这样地记载着：

“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罗里缠住了。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他已施行审判。他叫恶人落入自己手作的圈套。”

恰好，帝国主义日本肇因于自己所犯的错误，接受了审判。

然而，如果站在历史观点瞻望前景，则日本战败的“不幸”，却未必只是那样就能成为中华民国之“幸”。

不幸而言中

‘在中华民国建国的当初，我们就主张：中国和日本是“同文同种”的国家，假定兄弟阋墙，自相残杀，结果只是“同归于尽”。在亚洲如果没有独立自由的日本，中国不可能单独生存；同样地如果没有独立自由的中国，日本也不能单独生存。日本因八年战争而失败了，可是获得胜利的中国，后来由于受苏联指使的共匪作乱，也同样地遭遇到了失败。同归于尽，真是不幸言中了。’（注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乍看起来，好像是走近了世界和平的大门；可是实际上却是造成国际间更大紧张、不安的出发点。

注一：菠茨坦宣言一九四五年七月廿六日，美、英、中三国为号召日本无条件投降而发表的共同声明。苏联于八月八日对日宣战，同时也加入了这个宣言的行列。菠茨坦在柏林的郊外，为同盟国首脑会议的地点。

注二：革命实践研究院演讲（一九五○五）。

共匪扩大叛乱

在处理日本投降的事务方面，摆在眼前有三个重大的问题：

“接受日军投降和解除其武装的办法”、“战后日本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天皇制的问题”、“对于中共及其背后的操纵者苏俄的对策”。这三个问题互相有着深切的关联，分不开来；现在只得姑且按照各个问题进展的经过来作一点追叙。

双方均未曾有过经验

当时，日本在中国战区（东北三省除外）以及台湾、澎湖、越南北部所部署的军队，总数达一百二十八万三千二百四十人。其主力为：华北方面军三十二万多，华中第六方面军二十九万多，京沪地区第六、十三两军三十三万多，广东第二十三军十三万多，台万第十方面军十六万多。必须尽速和平解除武装，由国军接收沦陷区防务。

实际说来：中华民国接受他国投降，未曾有过经验；相对地，素称无敌的日本军队向对方臣服，也是第一次，双方面都没有可资借镜的前例可循。

再从两国军力比较，也有些异乎寻常。因为一般的受降，必然是在胜利者完全压制住战败者之后才会进行的。这也就是说：如果占领军的指挥官已经掌握住了占领地区，自然其受降便不会发生困难；可是日本投降的情况却并非如此。现在日军仍然占领着一大片中华民国领土，她的军力虽衰，但是还没有受到决定性的损害，由国军前去接收在日本支配之下的沦陷区，当然不是简单的问题。何况自动屈膝的日军会不会在面临国军解除其武装时，一变而作殊死的抗拒，也不能不预先顾虑周到。

共匪一直在窥伺着时机

再说：在国军接收之前的沦陷区，眼前的治安维持，也是一个难题。尤其是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唆使之下的共军，一直在窥伺着对国民政府扩大叛乱的时机，不断地派遣共党分子潜入各地扰乱治安，一旦日军降伏，对于共党来说，可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当八月十日得到日本投降消息的那天夜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对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发布了下面的训令，可以看出当时的困难情况：

委员长的训令

“一、敌已无条件投降。

“二、命令敌军驻华最高指挥官（日方的官衔是：“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维持现状，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严禁破坏物资、交通及扰乱治安秩序行为。听候中华民国总司令或各战区长官的处置。

“三、在各战区应注意下列事项：

“（甲）敌军可能抵抗、阻扰，必须有应战准备。

“（乙）警告辖区敌军，除接受政府指定之军事长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缴械。

“（丙）命令伪军（南京汪政权军队）投诚，并确保联络；同时把握机宜，包围暂时集中的敌军，及陆续控制敌军撤退后的要点、要线，等候国军到达。

“（丁）禁止加害投降后的敌军俘虏，特别晓喻所属官兵严格遵守。

“（戊）各战区除均应派遣主力部队挺进，负责解除敌军武装外，同时应留驻必要部队，维持后方治安。

“（己）国军整编事宜，得由各战区长官依据实际情况，暂行延缓执行。

“四、着何总司令立即拟具接受沦陷区要点、要线，以及分区集中敌军、并监视其解除武装的详细计划呈核。”

（译注：本连载所引用中华民国官方文书，由于产经新闻系根据中文意译，现回译为中文，自与原文不尽吻合，但其中大意，要仍正确无误。）

这个训令的第三部分乙项，是为预料共军将会抢先缴收日军武装，而预为禁止日军应承。共军亟希望攫夺日军武装的目的，当然是基于对国军挑衅的需要。

还有丙项的措施，是为了收编原为日本军阀傀儡的伪军，以封锁共党分子的活动。

日军拒绝向共匪缴械

关于对共军的对策，在日军方面，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在当时有许多共军分子或自称是共军派来的人士，向日军要求投降缴械的情况，层出不穷。

“支那派遣军”因而在八月十八日决定了向国军投降的方针，和十一项的“对支处理纲要”，以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名义于二十日通令全体官兵遵照。纲要内容略为：“以深明大义的态度，为支那繁荣衷诚协力，实践几年来的对支道义……”、“对于支那方面，应该畏如秋霜，衷心爱敬……”、“首先协助重庆中央政府（国民政府）容易达成统一……”、“进一步有助于中央政府充实武力……”、“延安方面（中共）如有袭日、侮日态度，则断然加以讨伐……”

依据这个纲要，日军官兵友善地向国军缴械；但是相反地由于拒绝了中共的要求而受到了共军的攻击。在终战后的两个月之间，日军官兵牺牲了一千五百人之多。情况比较严重的地区是除了在苏联部队压制之下的东北三省之外的华北、华中沿海，特别是在山东地区。小林浅三郎后来于一九四六年（昭和二十一年）七月三十一日上奏：“基于共军对日军报复心理，故不得不处于为自卫而战斗的状况之下。主要交通线及重要都市依然能够确保无恙。”

天皇制的存废

当时，何应钦为了和美军洽商作战事宜，还在离重庆南方约八百公里的广西南宁。

骤然面临到接受日本投降的任务，何应钦的确是最适当的负责人选。何应钦自一九○八年以来两度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二十二期步科），和日本军方人士多有交往；尤其是和冈存宁次在一九三三年签订塘沽停战协定时，曾经几度会谈。自古英雄相惜，纵使是两军敌对、兵戎相见，也会互存敬意。何应钦和冈村两位将军，恰好就是这样的关系。因之后来在日军解除武装、复员等工作方面，何应钦总是不失宽大而能接受意见的态度；冈村也是真诚相对，故而一切进行得很顺利。

遣返两百余万日军日侨

就以日本人的遣送问题来说：一百二十多万部队和九十万侨民，合计二百十三万人，在战后混乱情形之下，仅仅十个月就已经全体遣返日本。中华民国政府停止了必须调运国军的列车，拨出了载运粮食的轮船，尽力于日本人的集中和遣送。我们认为战争罪恶不属于日本民众，而应该由驱使他们的日本军阀负责。军阀既已经崩溃，那么在中国的日本人，不问军民，都应该尽早回国，好让他们能为建设新日本而尽力。因为民主日本如果能够早日再建，则“同舟”的中国也同样地会早点安定。这和被苏联所扣留的日本军民在酷寒的西伯利亚强迫劳动达五年之久的事实比较，实在是极端强烈的对照。

何应钦的回忆

何应钦（八五岁）目前还在担任着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会长的职务，和日本的要人们多有交往。他回忆当时的情形说：“从悠长的历史观点着眼，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是一种割断不了的兄弟关系，兄弟纵有阋墙之争，但一转身就会携手和好。在我们来说，仗打完了之后，就得尽快地把日本青年送回本国，让他们肩负起复兴的任务，而不仅是基于同情因战争失败被遗留下来人们的境遇。为了日军复员，中华民国拨出了百分之八十的船舶（三十万吨）和百分之七十乃至八十的列车，以致国内的紧急运输活动受到了影响，确属事实。”

战后，东北三省很快地被中共控制的原因之一，也可以说就是为了遣送日本人而拨用颇多的运输力量，以致迟误了国军的部署。

天皇问题议论纷纭

日本政府表示接受菠茨坦宣言的公文，是在较东京广播迟了数小时之后，经由瑞士政府于十日深夜送达，其内容则和宣言所提示“无条件投降”的意旨稍有距离——就是对于天皇的问题附带地提出了一点希望；在公文上，日本政府表示：“基于了解了在菠茨坦宣言的各项条件中并未含有要求日本变更天皇的国家统治大权，而接受同盟国的召降。”（译注：言外之意是希望不变更天皇制度。）

在菠茨坦宣言中提到将来日本所应具备的政府体制是：“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第十二条）并没有直接涉及到天皇的问题。

然而日本的天皇制度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呢？同盟国之间在终战以前就已经是议论纷纭，甚至有提出：“放逐西伯利亚”、“判处绞刑”等极端意见，也都是事实。

开罗会议讨论到有关日本投降后的问题之中有：“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归还中华民国”、“永久剥夺日本在太平洋上所占领的一切岛屿”、“使朝鲜自由独立”、“在中国的日本公私有财产由中国政府接收”等四点，顺利达成协议。

但是，唯有对于天皇制度问题，究竟应不应该废除，使罗斯福总统踌躇难决，而会议程序又非常紧迫，乃在晚餐中提出来征求意见。

蒋总统的卓见

如果依照安格鲁萨克逊民族的见解来做，则日本天皇应该是战争的罪魁祸首，可以说是处在非被废除不可的立场；然而蒋总统的意见则并不相同：

“发动战争的人，只是一小撮日本军阀，我以为必需的条件是根本铲除军阀，不能让他们再起干政；至于日本的国体应该如何，最好待战争结束之后由日本人民自己来决定。由于一时的战争而干涉他国的国体，将会造成民族间永远的错误。”

蒋总统的主张，迅即为罗斯福所接纳。于是“政府体制自决”的原则，便孕育在后来的菠茨坦宣言之中。

天皇的存在

天皇制之所以成为日本国民精神的支柱，在中国人衡诸东方道义的传统精神，是可以理解的。假定说：在战后的混乱时期，就凭占领军的一纸命令废止了天皇制度，则日本国内必将陷入难以名状的混乱情况。天皇的存在，对于化为废墟的日本，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所发生的复兴作用有多么大，从后来的历史事实中，该可以说是得到了证明。

苏俄野心暴露

同盟国方面，接到日本的公文之后，由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担任起草复文，甚为急迫。可是对于日本政府的有关“天皇制”希望，如何处理，不无问题。然而，鉴于如果在这个时候对日本让步，则反而会对将来的和平复兴留下弊害，故不准备考虑日本的意见。

日皇裁决投降纷争

日本政府将“政府体制自决”集中在“天皇制问题”一点，特别加以重视。

在九日深夜的御前会议中，讨论菠茨坦宣言内容，关于“天皇制”、“军队解除武装”、“战犯”、“日本被占领”四点，引起了问题。

高呼决一死战的陆军大臣阿南惟几主张在“天皇制”之外，还要加上“自主撤退后再解除武装”、“战犯由日本政府处罚”、“拒绝盟军占领日本”，共为四个附带条件。

针对着陆相的主张，外相东乡茂德则认为如果提出这样的四个问题，则根本不能交涉，因而表示反对。结果，由天皇裁决：“只提出天皇制一个条件”。这一晚的御前会议，由下午十三时三十分开到第二天（十日）上午二时三十分，纷争了三个小时之久。

盟国接受日本投降草案

同盟国复文的第一次草案，由美国白宫以三二一号密电发给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于十一日上午六时四十五分亲自送达中华民国政府。电文的内容是这样的：“下列各项，请立即送达蒋委员长或请外交部长转达，告知务必迅速答复；并请得到答复立即回电。

“第一项美国政府提议针对日本政府对菠茨坦宣言业已明白表示接受，请依照第三项所1[19]19提意见，惠予回答。

“第二项为了终止敌对行动、防止生命牺牲扩大，希望中国政府能够迅速对于对日本复文的作成，惠予协力。

“第三项关于日本政府认为菠茨坦宣言并无损害于天皇统治权的要求，而基于此一谅解，明白表示接受，我们（美国）的立场是这样的……（现在摘录第三项中有关“天皇问题”的规定如次：）

“天皇及日本政府的国家统治权力，隶属于同盟国统帅之下。同盟国统帅为投降条款之实施，得采取必要措施。

“天皇应和日军最高指挥官同在投降条款上署名。

“最后的政府体制，遵照菠茨坦宣言，必须依据日本国民自由表示之意志以决定之。”

这个最后的一点（政府体制），就是蒋总统站在代表中华民国的立场，老早就向同盟国家表示过的一贯主张。

英国方面，对于“天皇制”也有修正的提议，其内容是“要天皇本人在投降文书上署名，有欠稳妥。”因此，第一次复文草案便依据英国的提议加以修正，最后发给日本政府的复文如左：

“天皇应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和帝国大本营在必要的投降条款上签署，并应发布命令饬知所有日本军队遵命投降，解除武装。”

俄图取得占领军统帅

问题在于苏联的态度。苏联表示：“日本的投降通告，说不上是无条件投降”，故而藉口“在没有得到明确澄清之前，难以接受”的理由，拖延了几个小时之后，才提出答复，其内容则充满着对于日本的野心。

“关于天皇制以及占领日本的盟军最高统帅（一人或复数），在苏联的立场要求协议和签订协定。同时并推荐远东地区总司令官巴提里耶夫斯基为最高统帅的候选人……”

美国当局对此当然感到激愤，乃由驻莫斯科大使哈里曼向苏联政府外交人民委员（外长）莫洛托夫表示：“美军对日作战已历四年，在太平洋地区付出了极大的牺牲。苏俄参战只有两天，最高统帅一职，理应属于美军。”好不容易才迫使苏联撤回了原议。

俄尽量利用日战败机会

苏联在这个时候，已经是在阴谋策划利用日本的战败使成为苏联向远东扩张的好机会，因而第一：苏联认为有必要延迟结束战争的时日，由于只参战两天，所能得到的战果当然不够满足；为了希望能让刚刚开始进攻东北三省的苏军支配更广阔的区域，获致更大的既成事实，即使是延迟停战一个小时，也会是于己有利的。

第二：在欧洲已有东西德分疆的先例，因而也希望置日本于分割占领之下。关于这一点，请看后来苏军企图进驻北海道北部，但由于蒋总统的反对，才死了这个念头，可知是非常明显的一回事。

由于苏联的延迟回答，以致盟军方面给予日本的正式复文，拖到了十二日。尽管如此，但其最终定案因为在盟国之间还是来不及详加研讨，关于细节的修正，唯有采取事后征求追认的方式，而由美国先行直接通知日本。

同盟国方面，尽管是亟待有所决定，但日本的反应，却是姗姗来迟。东京方面对于盟国的等待，竟然通过国际广播谎称：“因为瑞士驻日大使赴轻井泽避暑旅行，以致耽误了日本收到盟国复文的时间。”

虽然只不过拖延了两天，但由于有上述情况，竟然招致了盟国对于日本的诚意发生怀疑；再加上苏联的企图一并衡量，则拖延的结果，在日本方面而论，实在并非得策。

“以德报怨”

国民政府外交部于十四日午夜接到了由中立国家瑞士转来日本正式回答。

日本方面接到同盟国的复文（即所谓贝尔纳斯复文），是在十二日上午零时四十五分。不出预料关于天皇的地位问题引起了议论，而耽误了对同盟国最后回答的时间，那就是所谓“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Ｏ”的问题。

按照原文（英文），“天皇统治权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Ｏ盟军最高统帅”。在国际法上这一句话含有“受支配”、“隶属”的意义，外务省预料到如果照原意翻译出来，必然引起军部的强烈反对，于是故意将文意改缓和一点译成“限制之下”，掩饰成为像是国体还能够维持之意。并且将盟国复文业已来到的实情保密十二小时以上，以图争取对各方面疏通说服的时间。

可是，军部方面却已经从别的途径得到了贝尔纳斯复文，迳照原文译成“隶属”。这样看来，等于是受宣告国体灭亡，军方态度因之硬化，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都上奏誓愿战争到底。最后在十四日上午十一时，天皇召集御前会议，断然表示：“非常决心绝不改变。至于国体问题，相信已经得到敌方的认可，毫无不安。”决定“无条件投降”。

再就中国文的正文来看，所成问题的“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Ｏ”一语，在第一次草案中的译文是“隶属”二字，但后来则改为“即须听从最高统帅之命令”。后者的语气较为缓和。可1[23]23是在英文文件方面，却一直是使用“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Ｏ”，而日本的官方文书直到今天还是照旧译为“限制之下”。

向日军发出第一道命令

虽说是日本已经正式投降，可是不能不考虑到其投降命令下达到前线部队的下层组织，还得要有一些时间。然而在目前就得要尽速停战、尽量减少牺牲，实在是当务之急。为了要和日军司令部打开联络路线，乃采取非常手段，由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和国际广播电台用日语广播，向日军发出第一道命令：

“紧急通知在南京的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将军：

“一、日本政府已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二、该指挥官应即命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派代表到达玉山飞机场（后来改为芷江）机场，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命令。

“三、军事行动停止之后，日军在目前应保护武器、装备、维持现状，并维护所在地的秩序和交通，听候何总司令的命令。

“四、所有飞机、船舰停留于所在地点；但长江内的船舰应在宜昌、沙市集中。

“五、不得破坏任何物资及设备。

“六、以上各项命令，由日军司令部及所属官员负责执行，并盼迅速答复。”

日军方面，立即收听到这个广播。但由于在日本投降报道出来的同时，国军和共军都有潜伏在各地区的各种地下工作组织的无线电台统统开始广播，日军方面无法判断其孰为正统，故而在两天之后，才能有正式回答。

向全世界发表的“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

向全世界发表的“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是在第二天——十五日的上午十时开始广播的：

‘我们的抗战，在今天获得了胜利。正义战胜强权，在这里得到了最后的证明……

‘我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们和我国的同胞，相信这个战争是世界上文明国家所参加的最后一次战争。我们所受到的凌虐和耻辱，非笔墨和言语所能罄述。但是，如果这个战争能够成为人类历史上的最后战争，那么对于凌虐和耻辱的代价的大小和收获的迟早，是无须加以比较的……

‘我相信今后地无分东西、人不论肤色，所有的人们都一定会像一家人一样亲密地携手合作。这个战争的结束，必然会使人类发扬互谅互敬的精神，树立相互信赖的关系……’

抑制着激动、蕴涵着就像对上帝祈祷的心情，继续地广播下去

‘中国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是我们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到今天一贯地祇认黩武的日本军阀为敌，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

‘我们更不可以对敌国的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和罪恶。我们必须切记，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将成为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广播的时间，达十一分钟。一方面用中波对国内、一方面用短波（一一九ＭＣ）由重庆向全世界播出。

蒋总统亲自执笔

这一篇广播稿，是由蒋总统亲手起草，现在才为我们所知道。

蒋总统在十四日的深夜，闭居一室，亲自执笔。通常，蒋总统的演讲词，都是由身边的文案家草拟（当时是陈布雷担任），可是只有这一次的一字一句都不曾假手他人。据说连陈布雷都是在听到广播的时候，才晓得内容，惊异之下，为之色变。

“以德报怨”思想，是古代孔子（注）的名言（论语宪问篇）。是依据儒家的四书五经所教导的“人的道理”。这是我们东方人的荣誉，蒋总统以此为对付敌人的基本精神。譬如对日本放弃要求赔偿、从宽判处战犯等措施，一切都是渊源于此。

魏道明的回忆

这个“以德报怨”的广播，在全世界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根据当时驻美大使魏道明的回忆：“从美国人所接触来的多是‘感到意外’的反响。如果不是东方文化孕育出来的人，对于像这样国家百年耻辱的老帐，能够爽爽快快地一笔勾销的心境，是很难理解的。”和这个情况恰好对照的是杜鲁门总统的胜利演说。（同年九月二日投降文书签字时）“我们不会忘记珍珠港，日本军阀的罪恶绝对不能涤清，也绝对不会被忘记。如果和在恐怖战争中牺牲的美国男女生命比较，任何胜利都是渺小的。”

注：孔子中国春秋时代的思想家，儒家之祖。目前在中国大陆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使孔子也受到了激烈的批判。

日本一错再错

同是渊源于东方思想而被联系起来的中国和日本，在西洋人看来，其间似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缘由。几千年历史所酝酿成的“同文同种”、“同舟共济”的重要性，虽想割裂也是不可能割裂得开的。

‘本来，在国家和国家之间，没有百年解不开的仇恨；敌友、离合的关系，更绝不是由于一时的感情或是局部的利害而形成。’（注一）

真正的兄弟之邦

更何况，中国和日本是兄弟关系的国家，互相敌视、互相轻蔑，都是不可能的。固然像战争那样不幸的历史事实，不容否定；然而大多数的日本人，不已经是在经过这一次的战争中，憬悟到中国毕竟是真正的兄弟之邦了吗？

‘我从前是向慕日本尽忠报国的传统精神，亦受日本孝亲、尊师、尚侠、重义的民族性。日本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注二）

所谓第二故乡，实在并非过甚其辞。在中华民国建国之初，我们从日本的“明治维新精神”、“武士道”、“大和魂”的哲学实在学到了不少。故当日本投降时，蒋总统特别强调“以德报怨”，也是基于这些历史的缘由。

未必是日本所能理解

拿现在来看一看，成为东方文化真髓的“德的精神”，却未必是日本所能理解。战后还没有经过三十年，田中角荣政权就和北平勾结，而将中华民国的友好关系弃如敝屣。

‘日本国民如果不能行由正道，就该了解将会面临潜在的危机。一部分自称为自由民主的份子们，受了认识不够和观念错误的影响，对于国际共产党及其爪牙的阴谋毒计，不但不能保持高度的警觉，反而希图与虎谋皮。’（注三）

“以怨报德”的日本

‘日本的田中政府，公然不顾道义法理，和共匪这个战争贩子搞不正常的外交关系……由于短视近利，却硬把非法说成合法，把反常说成正常。……像这种开门揖盗的外交，这样饮鸩止渴的贸易，自然只有愈来愈不正常，也只有愈来愈带给日本政府与人民以更大更深、掺砂子、甩石头、挖墙角的危险！’（注四）

忘记了道路，“以怨报德”的日本，竟然硬是“一错再错”！

注一：五全大会演说（一九三五五）

注二：接见外籍记者（一九七○一）

注三：接见日本记者团（一九五八二）

注四：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一九七二十）

雅尔达密约—贻害无穷

与日本投降有关系的第三个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在其背后的苏联的活动”。在这里得稍微详细一点加以探究。因为这是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情势的一个重大关键。

八月八日，苏联突然对日本宣战，向东北三省开始进攻。苏联的参战，固然是给予日本军阀以决定性的打击，能够迫使日本政府决意投降；然而不应忽略的是：苏联却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参战？

予侵略者以助力

如果先从结论来说：苏联的真正意图，就是为了要跻身为战胜国的一员，才好分得到一份利益。这份利益，就是以共产主义向中国侵略，进而为向亚洲、向世界侵略打开一个缺口。

对苏联的野心给予助力的，是这一年的二月在雅尔达（苏联黑海的军港）所举行的美、英1[30]30、苏三国首脑会议。在这个会议中，苏联以对日参战为条件，达成了有利于其向东北三省伸展侵略魔掌的若干约定，这就是所谓“雅尔达密约”，成为大战之后世界情势多次发生动乱的原因。中国大陆之落入共产主义者的手心，固不待言；甚至于推衍到韩战、越战，追根究底，即使说都是“雅尔达密约”的副产品，也非过甚之辞。

雅尔达的首脑会议，由二月四日到十一日，罗斯福（美国总统）、邱吉尔（英国首相）、史达林（苏联主席）三人聚会一堂，主要议题是关于德国投降后的欧洲问题；可是当会谈近于结束时，在罗斯福和史达林之间，秘密地讨论到日本问题。

罗斯福是为了要尽可能地减少美军官兵的牺牲，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因而计划向日本本土登陆作战，但对于驻屯在东北三省的日本关东军的存在，颇为顾虑，因为在美军当局的分析中，有点过于高估了日军的战力，认为即使能将日本本土完全占领，但日军还会在中国大陆负隅固守，至少可以抵抗两年。

另一方面，史达林正在窥伺着侵略亚洲的机会。苏联对日宣战，在东北三省开启战端，把关东军钉牢；同时美国在太平洋作战，美苏两国的利害可以做到完全一致。

不过，在美国方面，对于苏联的参战，也并不是没有疑问，然而由于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等人一贯提倡苏联参战而左右了罗斯福。

以中国主权为牺牲品

至于史达林，当然没有忘记藉对日宣战搬出政治条件来，那就是“收回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取得不冻港大连、旅顺”、“取得南满铁路的经营和使用权”、“外蒙古独立”等项要求。

除库页岛之外，史达林的提案都是牵涉到中国主权的问题，然而罗斯福却对史达林让步，一一予以承认。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为了诱导苏联对日参战，而提供了中国的主权作为牺牲品。

雅尔达协定有关条文（日本外务省译文）如次：

三大国（美英苏）的领导者协议：当德国投降、欧洲战争结束后，经过二至三个月之内，苏联依据左列条件，必须协助同盟国参加对日本的战争：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必须维持。

二、在一九○四年由于日本背信攻击（日俄战争）所受侵害的帝俄旧有权利，应予恢复如左：

１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的一切岛屿，都必须还给苏联。

２维护苏联在大连商港的优先利益，并应使该港国际化；以及恢复作为俄国海军基地的旅顺港口租借权。

３东清铁路（满周里——绥芬河之间的横断线）、南满铁路（长春——大连之间的纵贯线）应由中苏设立合办公司，共同经营，但须保障苏联的优先利益。同时则使中华民国在满洲保有完整的主权。

史达林步步紧逼

史达林早就预料到中华民国会反对，故而要求在协定上记入“依据史达林的通知，由罗斯福采取获得蒋介石主席同意的措施。”把说服中国的责任强加于美国。并且又明订：“苏联表明为了帮助中华民国解放于日本的羁绊，可用俄国军队给予支援，为此，并准备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这一项，到了后来，竟然发挥了很大的威力。

真相渐渐揭露

“雅尔达密约”，只是罗斯福和史达林两人密谈决定。其原草案由苏方拟订，美方并未作提出对案的准备。完全是在史达林的引导之下，很快地便达成了协议。

邱吉尔的表白

邱吉尔是在成为定案之后被征求签字而表示同意的。邱吉尔在他的大战回忆录中提到

：“我代表英国参加了协定，但是并没有参与案文的制订。我必须说明：那是美国的问题，与美国的军事作战有关。我们没有插嘴的权利，他们也未曾征求我的意见，只不过是要我承认而已。后来，在美国有的人认为对苏联过分让步，引起了很大的非难，这个责任应该属于他们自己的代表者。”

罗斯福秘而不宣

雅尔达会议的结果，于二月十二日发表。可是公布出来的只是关于欧洲的问题；有关苏联对日参战部分，都被列为极机密。美国方面，将协定原件深藏在白宫罗斯福专用的保险柜里，连副总统杜鲁门都未让知道。

三大首脑在雅尔达集会，却未曾涉及到亚洲问题，在任何人看来，都会感到奇怪的。

蒋总统的忧虑

‘只有苏联一国蒙受实利；美国徒获虚名，英国毫无所得。我（蒋总统）认为雅尔达会议惨遭失败。尤其在宣言中，对于远东问题丝毫没有说明，颇令人疑惧。’（二月十八日日记）

‘苏联在三巨头会议之后，显然对我们表示出接近的态度；美、英两国也是一样。然则他们在作何打算？实在难明真相，令人惶惑不置。这个问题，实为我国外交成败得失的一大关键。’（二月二十八日反省录）

这个忧虑，不久便被证实了。

赫尔利私人透露

最初指出“雅尔达密约”所涉及问题的严重性者，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雅尔达会议刚刚结束之后，赫尔利返国述职，罗斯福向其说明密约内容，赫尔利大为吃惊，指出其中某些条款侵害了中国的主权；开始，罗斯福还不以为然，但旋即接受了赫尔利的劝告，改变了主意，指示赫尔利往见邱吉尔和史达林，谋求善后之策。赫尔利于四月初前往英国，见到了邱吉尔要提请商量，但邱吉尔本来就未曾参加制订原案，故而不得要领。于是乃转赴莫斯科，不幸，尚在途中，罗斯福病故，杜鲁门升任总统，同时国务卿史退汀纽斯去职，由贝尔纳斯继任，贝尔纳斯对赫尔利发出“雅尔达协定无须改变”的新训令，以致赫尔利的工作为之措折；而美国也就这样地失掉了最后的机会。后来赫尔利以私人情报的方式，向中华民国政府传达了密约的片断内容；在华盛顿方面，也向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等人非正式地透露了这个情报。

惊人的密约真相，便渐渐地揭露出来了。

中国不能让步

中华民国所绝对不能让步的一点，是关于租借旅顺的问题。因为旅顺、大连自“甲午”、“日俄”战争以来，经常成为在亚洲地区发生纷争的导火线，现在为了不要给后世再留祸根，就必须要和苏联进行交涉，使他断绝这个念头。故而也有必要让业经在雅尔达密约上签了字的美国有所了解，于是蒋主席便于五月二十三日电令当时由于参加旧金山会议（注）恰好还在美国的代理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特别指示：‘请见杜鲁门，表示反对“租借”的名称。’

对俄交涉方针

六月十一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以有要事，请求接谈。蒋主席已经料想到了他来求见的目的，因此，再对宋子文发出如下的电报，告知对苏联着手交涉的方针：

‘宋院长……暂以兄个人意见对美表示“租借地”名称为我国之历史耻辱，今后不能再有此污点之发现，非设法除去不可……至于整个方案，须待兄回国详商方能提出，故此时不作肯定为妥。俄使今约谒见，谅亦为此，中已定明日约见也。在俄方间接表示，愿中俄两方直接商谈，必易解决云。推彼之意，东北有关问题，最好不牵涉第三国或国际机构，关系愈少愈好，故吾人不能不审慎计议也。’

注：旧金山会议同盟国方面五十个国家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开始举行的会议。在战局已形成决定性的有利背景之下，商讨战后有关问题。

俄提先决条件

第二天（六月十二日），彼得罗夫来官邸晋谒，一开始就出示一个为进行中苏交涉的“五项先决条件”的文件，其内容是这样的：

“一、恢复旅顺港的租借，建立苏联海军基地。

“二、大连商港国际化；同时保证苏联在该港有优势的权利。

“三、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中苏组织合办公司，共同使用。

“四、维持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古）现状，使成为独立国家。

“五、库页岛南部以及与其邻接诸岛暨千页群岛归属苏俄。

“如果蒋主席同意这几项基本条件，苏联准备即刻开始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交涉。”

俄欲造成“既定事实”

这五项条件，用不着说明便知道是从雅尔达密约中依样葫芦照抄过来的。可是中华民国接触到传达密约内容的公式文书，在这个时候才是开始；而且最初寓目的这个密约，还没有正式交涉之前，就被称作“先决条件”而要造成“既定事实”，重重地压在中国人的头顶上。

在彼得罗夫方面也就是说在苏联方面，到这个时候为止，对于雅尔达密约的内容，大概还没有透露过。根据美国方面的资料，在蒋主席接见了彼得罗夫的三天之后，赫尔利才初次正式通告中国政府。据说在当时赫尔利对于中国政府已经详细得知密约内容的情况颇为惊讶，但是中国方面究竟用什么方法得到了这个情报，直到今天还是一个谜团。

与俄使会谈记录

至于蒋主席和彼得罗夫会谈的情况，请看下面的记录：

“彼得罗夫大使苏联关于开始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谈判，已经有所准备。关于中苏合作问题，欢迎中国方面提出任何具体性的建议。不过，在讨论之先，还有几项必须提出来的‘先决条件’。（彼得罗夫颂读书面事项）

“蒋主席那几个条件，可以记录下来吗？

“大使当然可以。

“主席关于各项条件，待研讨之后再行会谈。在这里，有一些话要提出来谈谈，就是在以前曾经谈到过的，我们中国人民对于‘租借地’的名词认为是国家的耻辱，不好再使用。如果再使用的话，有失条约的原意。即使不使用‘租借地’的名义，但军港还是可以共同使用，像这样做的话，就可以因而和苏联合作，对于两国来说，同样是有益的。

“大使但是这一次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缔结，等于是苏联对日宣战。

“主席本人当然欢迎苏联对日作战，和希望两国合作；如果为了‘租借地’这个名义使不使用的问题，而丧失了两国人民的感情，那不是苏联的意思。

“大使‘租借地’和‘租借’不同，‘租借’的意思包含着领事裁判权等特权，‘租借地’则没有这些特权。

“主席这不希望用，而且这问题不仅在苏联一国。

“大使问题当然不在于‘租借’一个名词，苏联租借旅顺自应规定租借期间，而且领土与主权完全属于中国，对中国并无损害。

“主席如果成为‘租借地’，便谈不上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因为中国的军港，自己不能管理，也不能使用。就苏联而论，也是以不用这一类的用语为有利。

“大使主席的意见，当报告本国政府。

中国人民最反对的事

“主席务必请你提出报告。在历史上一八九八年中国的旅顺、大连被帝俄租借（注）之后，继之有青岛之于德国、威海卫之于英国、广州湾之于法国，陆续都被租借。这是民族的耻辱，是中国人民最反对的事情。

“大使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中国也必须要考虑到苏联是太平洋沿岸的一个国家，在太平洋需要有不冻港。

“主席苏联要在太平洋寻求安定，中国也是如此。

“大使所提的几项先决条件，邱吉尔首相和已故罗斯福总统都晓得的。

“主席是不是在雅尔达谈过的？

“大使是在雅尔达谈过的。从这件事的过程来说，苏联不可能利用旅顺来和中国敌对，1[40]40问题并不在‘租借’，而是在共同使用武力对现在的侵略国家（日本）或将来有侵略可能的国家作战。

不能坠入不平等条约

“主席中国并不反对这个意见，但是反对可能会使中国坠入不平等国家的条约。

（上楼后，回到客厅，继续谈话。）

“主席刚才已经谈到过关于历史的事实，中国曾经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是由于帝俄租借旅顺所造成。但是，到了苏联时代，在一九二四年率先废弃了对华不平等条约，为其他国家所效法。前一段是帝俄的历史，后一段是苏联的历史，像这样的史实，是相当重要的。

“大使以前中国所处的环境，和现在不同。还有，和帝俄时代也有所不同的是中苏两国正在商讨缔结友好条约……”

注：一八九八年条约清朝承认帝俄租借旅顺、大连，及给予南满铁路的筑路权。以此为契机，列强侵略中国，使成为次殖民地化的竞争，日渐激烈。

世界重蹈覆辙

三天后的六月十五日。这一次是由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送来了杜鲁门总统的极机密备忘录——“关于中国国民政府和苏联协定纲要的说明”，附有雅尔达密约的全文。在中国未曾与闻的情况之下所拟订的这个密约，不知不觉地被变成中国非缔结不可的“协定纲要”。本来，中国并没有参与这个密约，在国际法上，丝毫没有非遵守不可的义务。

杜鲁门送来的备忘录

在杜鲁门的备忘录中记载着“史达林所表示的明确意志”，内容是这样的：

“一、史达林尽全力促进由蒋主席领导的中国统一。

“二、战事结束后，中国应由蒋主席继续领导。

“三、史达林期待中国达成统一、安定，希望满洲为统一中国的一部分。

“四、对于中国没有领土的要求，为了和日军作战而进入中国领土的苏联军队，尊重中国主权。

“五、为使中国便于在满洲组织行政组织，欢迎蒋主席的代表和苏联军队同行进入满洲。

“六、史达林同意美国对于中国所提倡的门户开放主义。

“七、史达林同意朝鲜由中、美、英、苏四国托管。

“美国依据这个外交文书，认为是史达林对于中国没有存丝毫野心的‘背书保证’。”

根据杜鲁门回忆录，由杜鲁门总统发给赫尔利的电令很明显地表示出基于在雅尔达协定中会商决定“由罗斯福总统通知蒋介石主席，让他了解。”因而指示赫尔利“要尽最大的努力得到蒋介石主席的认可。”

蒋总统的日记：‘……就只这一些问题，已经是足以置我们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的境地。不仅此也，就连美国本身而论，在今后百年之间，也将很难探寻到在亚洲安全与和平的日子。……’‘未来的世界情势，又在重蹈第一次大战后霸道竞争的历史覆辙！’

‘看过了备忘录之后，不仅止于悲愤而已；我（蒋主席）所耽心的是这个备忘录还未必就是“雅尔达密约”的全部内容，是不是还会有其他的问题？然而，就只这一些问题，已经是足以置我们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的境地。不仅此也，就连美国本身而论，在今后百年之间，也将很难探寻到在亚洲安全与和平的日子。到了如此地步，只有努力奋斗，自立自强，除此而外，别无善策可以冲破这个最黑暗的时代。想来，这并不是赫尔利的错误，对赫尔利仍然应该加以礼遇。’

在赫尔利送来备忘录的六月十五日日记中，蒋主席留下了非常激烈的愤怒和深切的悲痛：

‘未来的世界情势，又在重蹈第一次大战后霸道竞争的历史覆辙。呜呼！人类何时才能得到光明和安息？’

史达林狰狞面目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开始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交涉。

交涉代表，经派召令匆促由美归国的宋子文（赴俄出发之前任命为行政院长）和曾经留学苏俄的蒋经国（当时为干部学校教育长，现任行政院长）担任。在代表团出发前一天的六月二十六日，蒋主席再度召见彼得罗夫，出示美国的备忘录，然后当面通知他说：

“美国方面表示，这些问题在雅尔达业经讨论，故罗斯福总统同意，杜鲁门总统也赞成。但是，我认为处理中苏两国的关系，必须中苏双方直接磋商。

“这一次，宋子文代表和史达林统帅会晤，对于中苏两国密切合作的根本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希望开诚恳谈，不必拘于外交形式。在条约一经签订之后，相互之间，就得彻底谅解。将来中苏国境，如果可能的话，希望能像美国和加拿大一样地无须设防。

“南库页岛、千岛以及朝鲜等问题，彼此意见没有多大距离。

“旅顺问题，绝对不能使用‘租借’等类的名称。

“对于外蒙古，可以赋予高度自治，在外交和军事上都能让其相对于独立；但宗祖权必须属于中国。不过，这个问题，现在还不宜提出去。”

这个通知，因为考虑到对外交上的影响，故而用“个人谈话”的方式，向彼得罗夫率直地表明了真意所在。

与史达林的晤谈

二十七日，宋子文等人由重庆出发，到七月十二日为止，在和史达林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中曾经六度晤谈。至于当时的情况，首先从同席的蒋经国所保留下来的记录中摘出一些资料来看看，这个纪录（注），颇能反映出会谈当时的微妙气氛：

“我们到达莫斯科，第一次和史达林见面的时候，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在第三天开始正式谈判，他的狰狞面目立即就显露出来了。史达林将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态度傲慢地说：

“‘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

“宋院长一看，知道就是雅尔达协定，便回答：‘我知道大概的内容。’史达林又强调地说：‘商谈条约是可以的；但是，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不能不忍耐着谈下去。

会谈陷入险恶状态

“会谈非常剧烈，经过再三地交涉，后来史达林同意不用‘租借’两个字，对于中东铁路和大连问题也肯让步；但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俄并吞外蒙古的问题，他坚决不退让，会谈陷入险恶的状态。

“这时，我的父亲（蒋主席）打电报给我们，要我们不限于正式谈判方式，叫我以个人资格去看史达林，告诉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道理。

“我遂以个人资格去见史达林。”

文字稍稍长了一点，但是暂时还得引用一些蒋经国的证辞。因为蒋经国和史达林的争论，不仅止于中苏之间的问题，而且涉及中美、中日、日苏的关系，以及对于史达林的世界观和人品，都有深刻的描写。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战后国际情势的动态，被一一料中了的地方颇为不少。

蒋经国据理力争

“史达林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他独立。

“我（蒋经国）我们中国八年抗战的目的在收复失地，现在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和台湾还在敌人手中，在这个时候，反而把这样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是违背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的，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势之下，我们就会失掉了支持抗战的凭藉；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苏联。

史达林的蛮横

“史达林也许你说得很对，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需要我的帮忙。倘使你的国家有力量，自己可以打倒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我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呢？那里地广人稀，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

“史达林老实告诉你，站在军事战略的观点，我需要外蒙古。

“史达林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队，由外蒙向苏联进攻，切断西伯利亚铁路，苏俄就完了。

“我现在，你用不着再有那样的忧虑。你如果对日参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不可能再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苏联的根据地。照这样，像你所顾虑的从外蒙进攻苏联的，除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二十五年，我们再加五年，在三十年内，不可能来攻击你们，况且你们是知道的，中国还没有这个力量。“史达林你这话说得不对，第一：日本虽然一时被打败，但并非永久如此，日本这个民族，还是要起来的。

“我为什么呢？

“史达林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尤其像日本这个民族，更消灭不了。

“我德国投降了，你占领了一部分，是不是德国还会再起来？

“史达林当然，德国也要起来的。

“我日本即使会起来，也不会这么快，这几年的时间，你可以不必防备日本。

“史达林慢也好、快也好，日本终究会起来的。倘使把日本交给美国人管理，五年以后就会起来。

“我倘使给你来管，又会怎么样呢？

“史达林由我来管，最多也不过管五年。

苏俄是“不择手段，用尽千方百计来压迫、分化和离间我们。”

“终于，史达林不耐烦起来，直接了当地表示：我拿不到外蒙，是不能甘心的。

“接着，史达林又很正经地对我说：你今天不是以外交官身分，而是以个人身分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苏联，今天可以这样讲，但是当中国达到统一的时候，会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这的确是史达林的肺腑之言，他害怕我们中国强大起来，因此，不择手段，用尽千方百计来压迫、分化和离间我们。……”

蒋经国的证言，继续引用下去。

“史达林还是接着说：‘你说日本和中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来打苏联，但是，可不能断言就不会有第三个力量出来这样做。’

“第三力量是谁，史达林先故意不说出来。

“我就反问他：

“‘是不是美国？’

“‘当然！’

史魔以美国为敌人

“我的心里暗暗地想，美国人订下了雅尔达协定，给他这许多便宜和好处，可是在史达林的心目中，还是忘不了把美国看成是他的敌人。

“就有关美国的问题而言：史达林想离间中美关系，确属事实。在以后的会谈中，史达林1[50]50的发言有‘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如果能保证不让美国在东北得到利益，苏联可以让步。’‘希望千万不要信赖美国’等等。苏联帝国主义者征服中国、垄断整个亚洲的阴谋，可以说展露出轮廓来了！

“我的父亲（蒋总统）很早就注意到史达林的狡诈。

“后来，曾经这样地告诉我：

“‘俄帝本是中国的世仇大敌！’”

注：蒋经国着“风雨中的宁静”。

宋子文六次会谈

在蒋经国以个人资格谈话的另一方面，宋子文六次会谈的情况，每次都曾经以一问一答的方式作成官式报告。从这些保存在中华民国外交部被列为正式外交档案的报告内容看来，苏联的最终目的何在？以及中苏间的协议后来是怎么样地被毁弃掉？其情况是非常明显的。

在雅尔达密约中，作为苏联对日宣战的条件，除外蒙问题之外，诸如要求获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归还、大连商港的优先利益、旅顺口的租借权，以及南满铁路、中东铁路的共同经营权等各项利权，使得美、英两国首脑予以承认的情况，都已经在前面叙述过了。

现在，再就各别的问题，根据档案资料逐一披露于后：

对日参战问题

“史达林我们对于外蒙、库页岛、旅顺、铁路等等的要求，是为了加强对抗日本战略地位的需要，不是基于意图追求任何利益。苏联已经在欧洲作战四年，流过很多血，苏联的人民都知道在受到攻击的时候，一定要奋起抗战，但是，我们要是先下手去攻打他国，就不可能像受到攻击、奋起抗战那么热烈。现在我虽然想攻击日本，可是日本并没有攻击我们，日本目前非常驯良，对于苏联正表示好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我去攻击日本，人民会怎么说呢？他们会说：‘日本并没有侵犯苏联，而你却去攻击日本。’那么，我对于攻击日本的‘正当性’，如何能够提出证明呢？别无其他藉口，我只能说：是为了强化我们的力量。这一点，希望加以考虑。

“宋子文你不明白中国的立场。事实上我们是处在困难的境地。在我们来说，总不能够对人民宣布放弃一部分的领土。

“史达林前面所提的那一点，希望能再加考虑。

“宋子文阁下直到如今曾经多次说过希望维持中国的统一，务请不要提出使中国丧失领土的难题。

“史达林（沉思片刻）先签订秘密协定，等打败了日本之后再行公布，不可以吗？”

大连商港问题

“宋子文大连商港‘国际化’，这句话怎么解释？

“史达林是说具有国际性的商业港，各国船舶都可以进港；只是要保障苏联船舶的优越地位。

“宋子文是作为自由港吗？

“史达林如果中国想要那样做，也好。

“宋子文所谓苏联的优越地位，作如何解释？

“史达林以一八九八年的条约为根据，加以改善，在港口管理方面，最好特别作为是苏联所使用的港湾。

“宋子文旧的条约已经满了期，而且是帝俄时代所宣布的；到了今天，已经没有根据该条约的必要。

“史达林那么，另外有草案吗？

“宋子文我们认为自由港的意义，是为对各国贸易而开放。阁下如果希望满洲的主权归1[53]53中国掌握，那么，我觉得港口的管理权，就应该属于中国。

“史达林那就有问题了。如果为贸易打算，则无须缔结条约，其所以有缔结条约的必要者，是为了更多的权益；我们不仅要使港口对各国开放，而是需要对我们的‘优越地位’得到保障。

“宋子文所谓‘优越’，是指比较中国更优越吗？

“史达林是指与中国以及与其他国家作比较而言。

“宋子文苏联要获得较比中国更多的权利吗？

“史达林可能是这样的，我们需要不冻港。”

（以上民国三十四年七月二日第二次会谈）

铁路问题

宋子文和史达林会谈的状况，继续披露下去：

“宋子文所谓组织中苏合办公司经营之，其意义如何？

“史达林共同经营。

“宋子文所有权呢？

“史达林应该归属于建设铁路者所有。

“宋子文有没有利用铁路运输苏联军队的意图

“史达林在对日作战时有之。

“宋子文在平时怎么样？

“史达林无此需要。阁下害怕我们要进入北平吗？”

（以上七月二日第二次会谈）

“史达林我们在计划进驻旅顺，我们有需要运输武器、弹药及接防的军队。我以前所说过的不运军队，是指不运预定之外的军队而言。

“宋子文这与上一次的谈话不同（宣读上次‘平时不运军队’的纪录）。中国人民对于外国军队公然存在于我国的国土上，会有疑惧的。

“史达林仅只是在铁路上通过，也不可以吗？

“宋子文仅是通过，也是一样的。

“史达林可以限制军队的通过量。

“宋子文这于阁下在以前所说的不同，我相信阁下、相信阁下所说的话，我们对于外蒙古已经作了最大的让步。

“史达林那么就单运军需品，不运军队。

“宋子文同意。

“史达林战争结束后，将最初的驻军运往旅顺可以吗？

“宋子文可以。但只能以这一次为限。

“史达林如果每次限制一个师乃至两个师，不是可以吗？

“宋子文那不能接受。

“史达林使部队穿便服如何？

“宋子文作统帅者不能说出这种遁词。

“史达林这种变通办法，也是为了尊重中国的主权。由双方协议，每次以一个师为限，运输一定数量的军队，也不考虑予以同意吗？

“宋子文阁下不是说过要消除纠纷和磨擦的原因吗？我认为军队由海上运输最好。

“史达林这样说来，铁路运输就以军用物资为限吧！

“宋子文铁路的保护，由我们来负责。我们不愿意在中国领土内有武装的外国人存在。

“史达林铁路警察不是军队，既没有大炮，也没有坦克。我看归苏联铁路警察管理，不也是可以吗？

“宋子文我们有能力保护铁路的能力，我可以向阁下保证。

“史达林日本指使许多爪牙，会图谋破坏。

“宋子文击退日本之后，日本就不会再有军队了。

“史达林德国人已经战败，可是仍然有数十万人在从事地下工作。

“宋子文在中国方面，足以对付进行这种破坏工作的日本人。”

（以上民国三十四年七月十一日第五次会谈）

朝鲜问题

“宋子文关于朝鲜的托管问题，以前在旧金山会议中，各国之间的意见并不相同，阁下的意思如何？

“史达林请向莫洛托夫（外长）询问。

“莫洛托夫美国建议由四国托管，可是那样将会很复杂，而且没有前例，不能不寻求切实可行的方法。

“史达林不能同意向朝鲜派遣军队，最终目的该是独立。

“宋子文那么，谁维持治安？

“史达林朝鲜人自己。

“宋子文警察之类，自必有其需要。

“莫洛托夫国际警察吗？

“宋子文总归要有足够维持治安的警察。日本从朝鲜撤退后，想必会有一段混乱的时期。

“史达林朝鲜应不应该独立呢？

“宋子文当然应该独立。

“史达林朝鲜的语言和中国一样吗？

“宋子文文字相同。

“史达林满洲人和朝鲜人的差别，比较满洲人和中国南方人的差别还要大些吗？

“宋子文是的。在中国由于小学教育的成果，国语可以在各地通用。

“史达林中国没有并吞朝鲜的企图吗？

“宋子文绝对没有。两国人民不相同，历史也有差异。

“史达林以前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吗？

“宋子文我们不需要朝鲜。

“史达林我反对在朝鲜驻军和设置警察。在旧金山会议中讨论托管问题时，苏联和美、英意见不同，苏联的意思是以托管为走向独立的过程，英国则认为是以之为到达殖民地的阶段。当时，罗斯福和我的意见相近；现在的美国则接近英国。

“莫洛托夫在旧金山，只有苏联和中国提到过托管的最终目的是独立。

“宋子文我在一九四二及四三年，曾经两度和罗斯福会谈。他主张所有的殖民地都应该置于托管制度之下，包括有越南及荷属东印度在内。

“史达林罗斯福在德黑兰作此建议的时候，邱吉尔为之争持到流泪，而将此议打消。”

（七月二日第二次会谈）

苏俄军队自东北撤退问题

“史达林在你提出的草案中，有一节是：‘苏联军队在三个月内撤退’，使我非常不愉快。对于解放一个国家的军队，要求其在一定的时间内撤退，像这样的国家，在那里见到过？如果法国在美、英两军登陆之前提出这样的问题来，请问，会发生怎样的后果呢？

“宋子文这样说来，我倒要重新请教，当日本被打败之后，苏联军队还要在东北逗留多久？

“史达林在日本投降之后，想必还得要有两三个星期。

“宋子文撤退行动完全结束，所需要的时日呢？

“史达林要看铁路的运输量和军队的数量。我相信日本会在满洲作大规模的战斗，所以我们需要集中足够的军力。然而，在两个月以内，总可以撤退完毕。

“宋子文阁下能否声明，的确能够在两个以内撤退？

“史达林若无意外事件发生，相信不会要三个月。”

（以上民国三十四年七月十一日第五次会谈）

中国共产党问题

“史达林中国可能接受若干自由分子参加政府吗？

“宋子文说老实话，希望能有实际点的方法洽商。我们曾经试图协调，在三月间，已经决定接纳中共在内成立战时内阁。听美国赫尔利大使说，阁下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土地改革者……

“史达林他们能不能算共产党，颇成疑问。

“宋子文那个时候，我曾经提出飞往延安一行的希望，但他们不愿意我去。我们希望有一个统一的军队和一个中央政府，不希望有像从前张作霖那样的军阀，或是另外拥有一个政府和军队的割据性政党。如果中共（注：中共是唯一拥有军队和政权的政党）有意和我们合作，当然要请他们参加战时内阁。在我们这方面来说，绝对没有压迫他们的意思。

“史达林我不是单指共产党而言，我是说在对日作战时，应该要有若干自由分子参加。在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固然很好；但是单凭国民党会对付不了这个局面。如果非国民党人士也能在国民党的领导之下参加政府，我想该是极有利益的。本来，这是中国自己的问题，我们只不过是顺便提一提而已。

“宋子文说老实话，中国政府的确在期待着国民党以外的人士参加政府；不过，国民党是不希望组织联合政府的。因为联合政府的体制是一旦有他党退出的情况发生，便会立即倾倒。

“史达林这实在是国民党的正常愿望，从中国的历史观察，就会知道这是很明显的。”

（以上七月二日第二次会谈）

我为情势所迫与俄签约

中苏会议，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之下，继续谈到了七月十二日。

在这个时期内，中国政府曾经拍发电报给杜鲁门，促请雅尔达密约的当事者美国注意。电文是这样的：

“这个交涉，不仅是中苏之间的问题；进而言之，是深切关联到全世界安全和利益的问题。务请阁下继续对于这个交涉的趋向，特别加以注意。”

经过了六度谈话的第一次中苏会议，中国方面对于外蒙古问题，以取决于人民投票为条件而作了不得已的让步；史达林方面，也对于旅顺问题决定不使用“租借”的语句。双方互相在某些问题上获致了妥协。

投下原子弹俄始参战

这一次的中苏会议，由于史达林赴菠茨坦出席美、英、苏首脑会议而一度中止；第二次会议是在八月八日举行。此时，美国已经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就在当天的夜晚，苏联对日本宣战。

双方谈判，一直执拗到最后的问题有下列三点：外蒙古境界线。（中国主张事前在地图上确定，苏联要求维持现状。）南满铁路局局长人还。（双方都主张用本国人。）旅顺问题。（中国主张组织中苏军事委员会，共同使用；苏联反对。）

俄军大量开进东北

问题都已经谈到了这样的程度，不得不迅速签订条约。因为苏联在宣告对日参战的同时，向东北地区投入了大量的军队，开始深入中国领土。中国政府鉴于在打败日本之后如果让这些部队老是停留不走，等于是将东北地区交给了中共军去掌握，故而认为签订中苏友好条约，可能有对苏交涉的根据，作为遏阻苏联的防波堤。再者，如果中苏之间的谈判，闹成僵局1[62]62，也恐怕会波及中美关系，发生不良影响；能够和在雅尔达协定上签了字的美、英两国保持协调，也是牵制苏联动向的一个条件。

我国不得不忍痛牺牲

基于以上几点因素，在中华民国方面，乃不得不对于前述执拗未决问题之中的两项忍痛牺牲，而委屈在雅尔达密约所造成的国际情势之前。

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时候，正好是日本接近正式投降的最好时刻——八月十四日的夜晚。民国三十四年

俄从未履行盟约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全部条文八条。在前三条之中所规定和日本有关的部分，摘录于次：

“缔约国协同其他盟国对日本作战，直到获得最后胜利为止。缔约国在此次战争中，互相给予一切必要之军事及其他援助和支持（第一条），缔约国不与日本军单独谈判；非经彼此同意不与现在日本政府、或在日本成立而未明白放弃一切侵略企图之任何其他政府或政权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第二条）。缔约国在对日本作战终止以后，共同采取其力所能及之一切措施，使日本无再事侵略及破坏和平之可能（第三条）。”

还有，在第五条强调尊重两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至于苏军撤退期限，则在条约的付属文书中有如下的纪述：

“史达林统帅不愿在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之协定内加入‘在日本战败后三个月内将苏联军队撤退。一节；但声明：当于三星期内开始撤退。宋院长询问：到撤退完毕需要多少时间？史达林统帅答复：可在不超过两个月的期间内完竣。宋院长续询：是否确定在三个月内撤完？史达林统帅答复：至多三个月足可完成撤退。（签名）”

俄甫签约即行背信

尽管这个条约的缔结，并非出于中华民国之所乐意，但是中国政府对它还是寄托着一线希望，就是说如果史达林还能够在“道义”上尊重这个条约的话，则至少在亚洲地区也还能有二十年左右的和平保障。

谁知道，史达林就在签署条约的同时，却已表现出毫不顾惜地毁弃这个条约的背信行为。

在八月九日拂晓展开攻击行动的苏军，迅速将日军压制；仅仅在两个星期之内，差不多已经占领了整个的东北地区。苏联凭藉了他的实力，造成了正中下怀的“既成事实”。

日迄未见俄宣战通知

根据日本方面的资料，苏联对日宣战是在八日下午十一时，由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当面通告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而在一小时之后，便展开攻击行动。可是佐藤大使发出向日本外务省报告的电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竟然没有到达。故而在日本而言，苏联的攻击是一种未经预告的偷袭行为。

当时，日苏之间订立有“中立条约”，虽然在那一年的四月，苏联已经通知日本政府“在一年后条约满期时即行废止”，但是在国际法上，应该是仍然还在有效期间。还有，日本曾经请托苏联为向同盟国家斡旋停战（苏联拒绝），由于有这些原委存在，所以日本总是寄望于苏联在道义上维持中立的立场。

防守满洲（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曾经一时夸耀是世界上最强的部队，但日本大本营为了加强南方战力和部署本土决战，而将常备部队调离满洲，由装备和训练都不够充分的新军接替防务，当时兵力有七十八万人。至于苏联方面，根据日本关东军的推断，在七月底已调集了一百三十万苏军在国境边界。

在苏军出动进入东北地区作战的那一天，中华民国以蒋主席名义对史达林发出佩慰的电报，电文如下：

“贵国对日本宣战，使全体中国人民奋起……贵国的英勇部队在阁下的领导之下，清除暴虐纳粹势力，攻下柏林，带给欧洲和平。这一次贵国趁战胜余威，基于促进世界全面和平的观点，对世界的侵略者宣战……本人相信由于贵国压倒性的力量加入，日本的抵抗必会迅速崩溃。”

蒋主席预感到危机

当然，电文的内容，只不过是“外交辞令”；而在内心，则由于从“雅尔达密约”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交涉原委，未来的不安，是难以拂拭得掉的。

‘中国的存亡，外蒙同胞的祸福，乃至于东方民族的盛衰强弱，都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不得不满怀戒惧！’

这是蒋主席在九日夜晚的日记中，预感到将来的危机，而留下的一段文字。

一如预感，“世界全面和平”并没有来临！

苏联助长中共叛乱

苏联帝国主义者在东北地区，不仅未在三个月内撤退，反而将之完全移交中共军队接收，助长对国民政府的叛乱，造成了战后亚洲国际情势的紧张根源。

苏联不遵守条约义务、违背国际信义的行为，后来被中华民国向联合国提出控诉，列入议程，在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的第六次大会中确定了下述罪行：

“苏联在日本投降之后，对于中国政府努力恢复东三省的主权，始终加以妨害；并且给予中国共产党以军事、经济上的援助，助长了对于国民政府的反抗。本大会断定苏联直到今天都没有履行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缔结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中华民国接到了这个决定，乃于同年二月十五日正式宣告该条约无效。

然而，由于大国之间在雅尔达的秘密交易而被牺牲者，并非仅止于一个中华民国；对于全世界凡是爱好自由主义的国家，也都不能不说是招致了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共匪伪装归顺

促成国军和共军合作抗日的契机，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芦沟桥事变。

事变的第二天，由毛泽东、朱德、贺龙、林彪等共军打来的电报表示：“全体红军官兵，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献出生命、与敌人周旋到底，务期达成守土卫国的目的。”同时，共产党也发出宣言，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新的侵略行动，把日寇赶出去。”

国家濒临存亡危急之秋，国民政府接纳了这个请求。自一九三○年以来的剿共战争，到此告一段落。

中共的四项“保证”

在这以前，共军已因被追剿而困处在陕西省的延安边区，濒临了即将崩溃的危机。故而在这一年的二月，中共就已经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陈述希望“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并提出了下列四项保证，表示归顺。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方针。

“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共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的指挥。

“三、在特区内实施普选的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中共“承诺”四个条件

针对这个情况，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根绝赤祸案”，要求共党承诺以下四个条件：

“一、彻底取消所谓红军。

“二、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

“三、根本停止赤化宣传。

“四、根本停止阶级斗争。”

用不着等到芦沟桥事变的发生，共产党已经向国民党屈服。

故而这一次的合作，在“抗日御侮”的大前提之下，立刻活动的相当积极。继七月八日的宣言之后，九月二十二日，共党又发表“共赴国难宣言”，对国民党的四个条件全部接受，并愿“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统辖之下，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的职责。”

政府开诚接纳

第二天——二十三日，国民党蒋总裁发表“不咎既往，使有效忠国家机会”的谈话，其内容是这样的：

‘……此数年间，中央政府无日不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相号召，而国人昔日之怀疑三民主义者，亦均放弃异见，共趋一致……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此次，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且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一致……今日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任何党派，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旗帜之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在本党领导之下，一致努力……’（注）

基于此，成立了国共合作的“协定”。周恩来以中共代表的身分，由延安派来驻在汉口。国民政府任命周恩来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其后周恩来便为担任联络工作而经常往来于延安之间。及至国民政府迁移重庆时，也随同前往。

毛泽东的亲笔信

在当时，周恩来携来毛泽东的亲笔信，对国民政府表达崇敬之意，这封信可以说是毛泽东的“投降誓文”，现在初次将原文公开于后：

“介石先生惠鉴：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既。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战争，凡在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一方面将更加困难，然一方面必更加进步。必须实行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吾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战争反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除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心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专此布臆，敬祝健康并致民族革命之礼。毛泽东谨启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共产党徒们，表面上伪装“归顺”，但实际上却隐藏着什么呢？不问可知是打着抗战的旗号，在发展其自己的势力而活动。

注：蒋总裁谈话“集中力量，挽救危亡”。（一九三七九）

共匪的阴谋毒计

国民政府改编“红军”（共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来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辖三个师，兵额约二万人，林彪、贺龙、刘伯承为师长。此外，散在江南各地共军，交叶挺、项英收集（约一万人），改编为新四军，都在中央统辖之下，参加抗日战争序列。

然而，真实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呢？

共匪通敌利敌，勾结苏俄，恶意进行宣传，诽谤诬陷国民政府。

共产党在表面上说是放弃了共产主义的组织和叛乱活动，但实则在八年抗战的整个过程中从没有积极参加战斗；非但如此，而且在军事、政治各方面，阴谋从事发展共产势力和反政府的活动。

在军事方面：将国军部署或作战计划供给日军，通敌利敌；并制造各种藉口向国民政府强索装备、经费，只顾作充实本身力量的打算。在这个以—一致抗日“为掩护而获得国军停止剿共战争的时期，对于共产党来说，实在是他的势力复苏乃至成长的绝好机会。

至于在政治方面，则勾结苏联等外国力量，恶意进行国际宣传，对于国民政府极尽其诽谤诬陷之能事。

共军像这样表面归顺，而实际上自一开始就怎样地在充分玩弄着欺骗的把戏，从下面的事实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共匪的“一分抗日”

在前面叙述过的“协定”刚刚成立之后，由朱德担任总指挥的八路军部队以国民革命军一分子的身份准备出发之际，毛泽东集合官兵早就作了如左的讲话：

“中日战争，是共产党发展的绝好机会，共产党决定的政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党），一分抗日。’现在特别要向大家说明的是：我们的同志要好好地认清自己的职务，即使和组织失去联络，也还是能够朝向共同的目标前进。在现阶段，我们放弃苏维埃运动和赤化政策，只是战术的转变，而非战略的转变。”

共匪的“三个阶段”

毛泽东进一步并就将来的政策，分为三个阶段，作了更详细的说明：

“第一阶段对于国民党，应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迎合其上层，打击其下层，造成其内部互相嫉视，利用他们上下争论是非的期间，进行策略运用。”

在这个阶段，共军分为两路由山西省西北部向前发展；然后一路横断雁门、五台，深入河北省中部；另一路由山西省南部的太行地区，经河南、河北，深入山东，分别截断中央军的联系，建立山地平原根据地。

“第二阶段为继续努力阶段，需要两、三年工夫在各地建立军事、政治根据地；清除国民党在黄河以北（华北）的势力。这个阶段，虽给予日军一些便宜，也未尝不可；因之，就得要能把握住日军的动态，才好决定我们（共军）的斗争方式。

“第三阶段就是本党（共党）的势力向华中伸展，在各地建立像华北地区一样的根据地1[74]74，分段遮断中央军的联系，制造他们内部的分裂瓦解，巩固我们（共党）的基础，进而取代国民党的领导权。”

自承伪装欺骗手段

同时，共产党为了防止干部们心理动摇，更公然说明“国共协定”只不过是伪装欺骗的统战手段，要点如下：

“一、和国民党的合作，只是暂时性的妥协，不是投降。

“二、以前走的是没有成功希望的道路；今后要寻求能走得通的、容易达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

“三、暂时放弃革命制度，只是放弃名义，仍旧保存实质，而以将来的大胜利为目标。

“四、‘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只是改番号，不是改编。外表虽涂上白色，里面仍旧是红色。‘红军’的独立性不仅可以保存，而且更能扩大和巩固。

“五、苏维埃政府暂时取消，改为特区政府，但实质与本性没有改变，无产阶级政权的势力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转变外战为内战”

这个阴谋毒计，在整个抗战期间，切实地进行不辍，不用说对于中央违命反抗，同时向国军挑衅滋事，更是层出不穷。

‘共匪向国军投降宣言，墨沈未干，就公然扬言要“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及至抗战中期，更变本加厉，强调“放手发展”，一面扩大所谓“野战军”、一面扩展所谓“解放区”；不断袭击国军，裹胁民众。抗战后期——湘西及鄂西之战以及平汉路南段之战，共匪更窃取了国军的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交给日军特务机关；而且敝开了其所谓解放区，引使日军长驱直入，与之呼应，共同夹击国军，企图“转变外战为内战”，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注）

虽然是在受到日本侵略的国难期间，但仍然对于中华民国不惜通敌倒戈的共军，在日军投降的时候，当然是策划发动全面叛乱的最好机会。

注：蒋总统“告全国同胞书”。（一九六五十）

朱德悍然抗命

抗战期间的事态，在后面将会另有章节，重新详加叙述；现在，仍旧回复到一九四五年的时候。

日本投降消息，最初传来的八月十日夜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主席兼任委员长）对全国各部队发出“应就原地驻防待命”的电令，尤其是对于朱德所统辖的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下达了特别命令，详加指示。

朱匪指挥全面暴动

然而朱德竟然不理中央的命令，以“延安总部”的僭称，迅速指示属下军队及地下组织，全面暴动。在这个时期，有如下的电报往返交涉，很明显地表现出朱德违信背义、投机取巧的狡诈善变态度。

蒋委员长八月十一日电：

‘延安第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现在日本已正式宣告向四大盟国投降，关于盟邦受降各项问题，正在交换意见，即将作最后决定。本委员长经电令各部队一律听候本会命令，根据盟邦协议执行受降之一切决定。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在各战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共同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勿再擅自行动为要！除分令外，希即严饬所部一体遵照。’

强词夺理公然反叛

朱德八月十六日复电：

“……你的命令是完全错误的。你在八月十一日叫我的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打敌人了。但是直到今天，日本事实上没有投降，英国在十一日宣布‘对日战争在进行中；’苏联也在十五日声明‘日本的投降，并非无条件投降，日本军还在继续抵抗。在日本天皇发出投降命令和执行之前，继续作战。’在同盟国统帅中，只有你一个人，下了这个错误的命令，你的命令有利于敌人，你如果不公开承认你犯的错误，并公开撤回你这个错误命令，我便彻底反对你的命令。我请求你早日回答。”

匪军向华北东北进袭

在此同时。朱德对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热河、山东各省共军以及朝鲜共军的地下组织发出七道命令，指使“配合苏联红军及外蒙军进入中国作战而向华北、东北进袭。”“占据及破坏全国各地交通要道。”“收缴日军武装。”“将反抗的中国人当作汉奸处分。”等等，策划进行全国性的暴动。并且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名义擅自指定受降地点，命令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向共军投降。

此外，更复向国民政府提出“在接受日军投降时，须事先和解放区抗日人民武装力量协议，和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六项强硬要求。

在朱德指使所属部队发动叛乱的命令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号召他们配合苏联和外蒙军作战。

和苏联勾结的中共，当然有必要选择和苏联最接近的东北地区为“赤色据点”。在国军来说是距离辽远、鞭长莫及，在苏联来说是近在咫尺，预定要将之占领的东北地区——作为共产党的温床实在是最适合不过。而且就在那个地区更有特别为共军所需要的东西——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

蒋主席邀毛匪赴渝

在军事动态的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对于说服延安的工作，并没有疏忽。蒋主席和毛泽东之间，自八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的十天内，有过五次电报的往返，内容如下：

蒋主席八月十四日去电：

‘万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

毛泽东八月十六日复电：

“重庆蒋主席勋鉴：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面的问题。”

蒋主席八月二十日再度去电：

‘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来函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果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特再电奉邀，务请惠诺。’

毛匪多变背信

第二次的复电来的很快。也许是劝说工作发生了效果，所以前次来电用“你”字的不礼帽1[80]80称呼，现在改用“先生”的敬语。

毛泽东八月二十二日复电：

“重庆蒋主席勋鉴：从中央社二十日新闻电中，得读先生覆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到后希予接洽为恳。”

蒋主席八月二十三日三度去电：

‘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二十二日函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周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能迅速解决。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像这样地电报往返交涉结果，毛泽东本人终于勉强决定前来重庆。

毛匪胆小无耻

在他预定来重庆的前两天，盟军参谋长魏德迈收到了一封奇突的电报，是毛泽东打来的，说是为了他的安全保证，请派美军飞机载乘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前往延安迎接。

‘此事最足贻笑大方，共党胆小无耻，到了这种程度。三天以前，共党报纸、广播几乎每天讽刺笑骂赫尔利是反动的帝国主义者，可是现在却要求这个人来做保护……’（蒋主席日记）

依照毛泽东的要求，赫尔利忍着苦笑前往迎接。二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偕同到达重庆。蒋主席和他的见面，已经是隔别了十八年之久了。

毛泽东到达重庆之后，发表的谈话如下：

“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

蒋主席以诚恳待之

蒋主席当天晚上在林园官邸召宴毛泽东，表示欢迎。当时的情况，有六个字留在日记上：

‘一以诚恳待之。’

在这一次协商中，中共的要求全部提出来的时候，是在九月三日。由于前一天在米苏里军舰举行日本投降仪式，故而中华民国将这一天（三日）定为“同盟国胜利日”，举行了庆祝活动。

共毛提出荒谬要求

中共的要求列出了八条，由周恩来、王若飞向国民政府代表张群、王世杰等人提出。其中包括有将共军扩编为四十八个师等等只顾自己发展的要求。

‘当此万众腾欢的胜利时日，共毛态度又变，贪得无餍。我以至诚待他，但他竟然利用我的精诚之言，反而要求将华北五省主席和北平行营主任都任用共毛分子，并要编组共军四十八万人，这是我所提出十二个师案的四倍之数，真是不可理喻。唯有仰赖上帝成全，痛心至极！’

这是蒋主席当天留在日记中的感想。

毛匪高呼万岁

在表面上，毛泽东总是含笑肆应；尤其是在九月十八日举行的“九一八纪念茶会”中，更曾自动地高呼“三民主义万岁！”“蒋主席万岁！”

问题的交涉情况，容俟在以后的章节中再作详细叙述。总之，这次协商连续进行了四十天以上，结果，在十月十日才签字发表了众所周知的“国共会谈纪要”——“双十协定”。这个文件，被称为是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宣示“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

这个基本方针，实为决定中国前途的重要关键。中共完全同意，而且毛泽东本人在协定签署的第二天启程返回延安之际，发表谈话，还曾再度表示：“在蒋主席领导、彻底实现三民主义的方针之下，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会议结果瞬成废纸

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就在协定的期间，共党便指使所属在各地继续不断地制造动乱，的确是摆在眼前的事实。而且，这个“会谈纪要”，又由于中共的背信，在签署当时的一瞬之间，就已经成了一张废纸。漫长时间的谈判，在毛泽东来说，不过是叛乱斗争的一个手段而已。赤化中国的阴谋，即使是在和平谈判的阶段，也无非是转移到幕后，而仍旧毫不顾忌地在进行不辍。

俄阻我收复东北

‘我们国民革命最重大的目标和最迫切的工作，有三件事。第一：恢复东三省的领土主权及行政的完整。第二：收复台湾和澎湖的失土。第三：高丽的自由和独立。这几件事如不能实现，则抗战的目标亦无由达成。为此我国父创造国民革命的一贯方针，亦即我全国国民不惜牺牲数千万生命以对日抗战之最大目的。在此期间，我们唯有团结国内各民族共同奋斗，以完成这三个重大任务，而后国家之独立自由可期。’

日本投降后不久的八月二十四日，蒋主席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和中央常务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作了这样的宣示。诚然，东北三省的恢复，是最迫切的工作，同时更是最困难的工作。其困难的因素，当然是由于有苏联军队及受其援助的中共军队的存在。

和国民政府特别重视东北地区一样，在共军方面为着要建立其赤化据点，也是以东北为目标。

俄军占领整个地区

苏联军队，在八月八日对日本宣战的同时，开始向东北三省及热河、察哈尔两省进攻。大致作战计划是：左翼兵团沿中东铁路攻击前进，以长春、沈阳为目标，然后兵分两路，一路趋大连、旅顺，一路向山海关；中央兵团突入热河承德；右翼兵团则指向察哈尔的张家口。

苏军对日军的攻击，在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投降之后，仍然继续不停。八月二十三日，莫斯科宣称“苏军已占领了整个东北地区，并继而控制了朝鲜北部的清津、罗南、元山等港口和市区。”参战仅仅两个星期之间，便轻而易举地占有了如此庞大的一份利益。

匪军与俄军会合

和苏军配合行动的中共军队，由山西北上，在张家口、承德和苏军会合，由苏军向导，很轻易地进入了东北地区。

相反地，主力在华中以南的国军，要向东北推进，显然是伴随着极大的困难。

在东北三省，七十八万日本关东军的投降，基于同盟国之间的协商，是由苏军担当受降任务。故而中华民国只能等苏军受降事毕之后，才可以进驻东北，接受苏联的移交。可是苏联和中共勾结，却将一度占领之后的地区，都交给了共军接管。

然而，我们只有相信“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规定的“苏军在打败日本两星期之后开始撤退，三个月内撤退完毕。”同时，国民政府对于悍然抗命、公然谋叛的共军，避免正面追究，而希望通过和毛泽东等人的会谈，循政治途径解决。

在国共会谈继续进行中的十月一日，国民政府得到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的照会：“苏军在十月下半月开始撤退，请在十日以前派遣代表前往长春，和苏军代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交涉。”基于此，国民政府决定由九龙以船舰载运国军赴大连登陆，接收东北。并立即通知苏联方面。

俄拒绝国军在大连登陆

可是料想不到，到了十月五日苏联的答复是拒绝国军在大连登陆，其理由为“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大连港限于商品运输，不能承认军运。”

按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附属文书“关于大连的协定”，固然规定大连为自由港，在苏联货物输出入时给予特权，但是，东北三省的一切主权属于中国，也有明文规定。苏联拒绝国军在大连登陆的立场，实在是毫无根据。因此，由外交部长王世杰向彼得罗夫说明事理，但结果没有得到答复；不得已，只有不再寄望于大连而变更决定由辽东湾西岸的葫芦岛及湾内的营口两处登陆。

国军面临登陆作战

二十七日，国军先遣部队抵达葫芦岛，但是受到了来自岸上的拦阻攻击，因为苏军撤退之后，已有共军占据，共军不愿意国军向东北推进，故而公然开火，阻碍登陆。

先遣部队一度折回青岛，决定另改由秦皇岛登陆。二十九日，再度面临登陆作战。秦皇岛在山海关（临榆）以南，不属于东北境内。以致接收东北的部队，终于未能在东北地区登陆。假定说登陆的地点是在营口，则到达东北三省心脏部位的沈阳，只有一百五十公里的平原路程；可是由秦皇岛前往，则有将近三倍于营口的距离，而且自秦皇岛到锦州之间约二百公里的海岸线，是从热河绵亘而来的山脉陡然入海，形成天然隘路。大军投入这个地带，集中作战与展开作战，都不可能，从战略观点看来，是易守难攻的地形。然而，由关内循陆路向东北地区推进，却只有通过这个山海之间关山难越的唯一走廊。

匪军盘据山海关

不出所料，在这里，共军早已经摆开阵势，以逸待劳。向国军开火的是林彪的直属部队第七师（杨果夫指挥）及李运昌率领的第二旅（邱阜指挥）、第三旅（费文劲指挥）等约二万五千人，都是由山西、察哈尔向东北进击而来，盘踞在位当要冲、自古就为兵家必争之地的山海关。国军自海滨登陆，还没有推进到三十公里的行程，就遭遇到了顽强的抗阻。

不幸的连锁反应

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所率领的国军第十三军，于十一月五日推进到山海关下，但因共军防守坚固，难以突破，停滞在胶着状态，等待五十二军增援到来，于十六日以一部分兵力循山边迂回，突击敌军侧背，发动总攻，才拿下了山海关；尾随着向东北逃亡的共军追击前进，所过城市，多曾遇到抵抗。

国军时间损失太大

在国军方面的困难是补给线过长，加上装备方面也有所不利，因为由亚热带华南广东出发的部队，不大适应在关外已经进入初冬的寒冷气候。

自山海关开始，连续收复六个城市，最后攻下了敌军主力约三万人负隅固守的锦州。等到打开了通往东北地区的“天然走廊”，已经是十一月二十九日。虽只前进了两百公里，但差不多就耗费了将近一个月的作战时间。

国军虽然好不容易打通了遵循陆路进入东北三省的途径，但是时间的损失太大，因为在这个时候，业已完全控制了东北三省的苏军，接应陆续抢先到达的共军，对于培植共党势力，给予了很大的助力。

俄培养匪军并掠取物资

在这个军事行动之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东北行营已于十月十日在长春成立。主任熊式辉、外交特派员蒋经国到任，力谋对苏军交涉，但苏军绝无诚意，历时一个月，没有丝毫进展；直到国军在山海关遭遇共军抗阻的十一月五日，才第一次接到通知说：“苏军自葫芦岛及营口撤退，因为两地区都在共军占领之下，对于国军登陆，不能负责。”还有，国民政府为了恢复地方行政权而提出的编组地方部队以及由政府派遣主要都市的接收人员等提案，一概都被拒绝；乃至于依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应该接手管理的经济机构和交通机构，也完全不能实现。为此，国民政府特于十一月七日对于苏联这种态度提出正式抗议；同时于八日以空运载送部队进驻长春，并向苏联提议进行交涉。然而，在十一日，共军也进入了长春，开始凭藉武力进行叛乱活动，于是情势益趋恶化。在这个时候，国民政府通知苏联，要将东北行营自长春撤退到山海关。苏联面对着中华民国政府的强硬措施，一时不得不改变态度，表示完全履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然而这只是口头上的承诺，实际上还是没有任何改善。不仅如此，而且苏军司令官马林诺夫斯基向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提出要求，在东北三省价值一百亿美元以上的工业设备，说应该全部视为苏联的战利品，并开列出多达一百五十四个公司的详细目录，建议由中苏两国共同管理。苏联的不守信约，在任何人看来，都会是一目了然的了。

赫尔利洞澈实情

正在这个当口的十一月十四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新墨西哥州发表了呼吁美国了解实际情况的声明如次：

“菠茨坦宣言及远东盟军总部的第一号命令规定，中国境内的日军，都向蒋委员长所代表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投降。但是中国的武装共产党不顾此一规定，强迫一部分日军向共产党投降，其目的在取得日方武器，使武装的共产党能藉此另行树立一政府或推翻国民政府。现在，关于中国的内情，有许多故意歪曲的错误情报在美国发表。譬如说：‘在华美军目前在协助中国军队；对于蒋委员长及中国国民政府接受日军投降及解除其武装事项，美军正在协同接收日军所有武器、装备，并担任接收工厂设备，准备移交给中华民国。’因之，有人责难‘像这样的作法简直是战争的一部分，而非和平的一部分’，就是那一类的情报。”

赫尔利遭中伤而去职

赫尔利的声明，实在是洞澈实情的卓见，但是美国当局却在两星期之后要他辞职。因为在美国的外交人员中，自战时以来，就有和共产党互通款曲的人，实则在赫尔利任内，美国驻华大使馆职员中，已有亲共倾向者十一人先后被调回本国；而赫尔利的辞职，则是受到了以他为敌的国际共产主义者们的中伤。

匪获得武装进行叛乱

中共军经由俄军转手而获得日军武器，早就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后来在一九六七年九月，更由塔斯社不打自招地予以公开，正式承认了这一回事。据塔斯社所暴露的主要内容是：有步枪七十万支、轻机关枪一万一千挺．重机关枪三千挺、大炮一千八百座、迫击炮二千五百座、战车七百辆，飞机九百架等类。共军以这些武器装备武装起来，对中华民国进行了叛乱斗争。

战后国际重蹈覆辙

东北三省，自八十年以前的“甲午战争”以来，就是中日、亚洲、甚至于世界纷争的导火线，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依旧又一仍前辙、不能免于成为战后国际情势紧张的出发点。在以往所经历的任何一个场合，都曾有过大国外力的介入，这尤其是我们应该铭记在心的。

连锁反应贻患无穷

由于日本的战败，“帝国主义”虽然从中华民国被驱逐出去，然而取代的是“鹊巢鸠占”住进来不走的“共产主义”，不仅给中国带来祸患，而且给全世界流布毒害。由于一个国家争逐霸业的邪恶意图，虽其后遭遇败北，但因而招致了接踵而来的，不幸的连锁反应，使万劫不复的灾难波及到后世子孙，而贻患无穷！

第二章：辛亥革命与日本(上)

主题

八十年前的中国清廷专横腐败日本要求特权清廷颟顸失策清末的洋务运动中日变法维新之成败仁道与霸道朝鲜的政情天津条约丧权东学党之乱日本意在与清廷一战黄海战役日军转向大陆日提苛刻条件签订马关条约日本走上霸道日本割取台澎列强进行瓜分义和团之乱俄军霸占东北日俄战争中国民情激愤日俄战争以中国为战利品日本独占东北美日关系革命组织强化民族的觉醒

八十年前的中国

中华民国，发表开国宣言、奠定近代国家的基础，是在一九一二年的元旦。

前一年的十月十日，武昌起义——辛亥革命成功，揭开了中华民国新生的序幕。

国父亲自发动革命

在此之前，推翻满清、创造共和政府的革命运动，是由国父孙中山先生亲自发动，按照计划切实进行。

孙先生最初创建的革命组织——兴中会（中国国民党的前身），在檀香山成立的时候，是在一八九四年，距离现在刚好是八十年。孙先生所领导的国民革命，以在第二年——一八九五年十月的第一次广州起义为嚆矢，虽经过了十次的策划进行，但全都归于失败；直到十一次辛亥革命，才得成功。

当兴中会创立的那一年，碰巧清廷和日本之间发生了“甲午之战”。

决定了中华民国进程的兴中会之创立和决定了日本前途的“清日战争”，同在甲午年发生1[94]94，并不单纯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是在当时的亚洲存在着形成这个历史趋势的必然性。

现在，在谈到辛亥革命之前，得先回顾一下导向于辛亥革命的世界情势，和当时中日两国的关系。

清末五次对外战争

清朝末年的中国，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连续遭逢了五次失败的对外战争：

中英鸦片战争（一八四○～～四二）英法联军战争（一八五八～～六○）中法安南战争（一八八四～～八五）中日甲午战争（一八九四～～九五）八国联军战争（义和团事件、一九○○年）

战争的结果，中国丧失了属地，割让了国土，损害了利权，国家经济濒临破产状态；在不平等条约的桎梏之下，中华民族承受着空前未有的忧患。

帝国主义争夺侵略

‘十九世纪，对于东亚民族而言，可以说是一个最危险的世纪，却也是一个复兴最良好的契机。尤其是自一八四○年之后，西方列强割据非洲殖民地，争夺分赃，叶已近于餍足的地步，因此，他们就把注意力向东方转移倾注，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和日本。中国因为地大、物博、与人众，乃又为列强侵略亚洲的第一目标。所以十九世纪的中国历史，简直就是一部帝国主义争夺侵略的历史，而十九世纪下半个世纪的亚洲国家，乃就发生了幸与不幸的天壤之分；幸运的国家，复兴起来，日本就是一例；不幸的国家，频遭侵略、蒙受耻辱，中国就是一例。’（注）

英国的鸦片贸易

十八世纪后期，在英国发生的产叶革命洪流，也是在这个时候（十九世纪）逐渐激荡到了东方。因产业革命应运而生的资本主义经济，为了确保工业原料和开拓贸易市场，而使先进国家对于后进国家的支配体制，进入了新的时代。

中国（满清）在当时，也和日本一样实行着“闭关政策”，是因为恐惧国内的封建经济会被外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冲垮。故而中国的对外贸易，仅限于广州一个港口，由获得满清政府许可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担任着主要的交易通商事务。

中国的输出为茶叶和丝绸等，输入为印度棉花和英国的毛织品、棉制品等类。但因为中国国内保留着自给自足的经济秩序，不需要很多的输入品，以致中国方面一直维持着出超状态，因之，作为支付货款的通货——白银，便单方面地向中国流入。

东印度公司为了改善这个状态，乃考虑到“鸦片贸易”的办法——就是在英属印度栽种鸦片，自十八世纪末叶开始，对中国输出，因此而为双方贸易的差额带来了戏剧性的逆转现象。一八三一年，终于使中国出现了入超，白银倒流出去，有一个时期，流往外国的白银，据说约为国家岁入的百分之八十，中国经济因而面临危机，国民生活陷入苦境；加之，吸鸦片的毒害，也逐渐严重到了教人不能忽视的程度。

本来，满清政府在形式上虽然禁止输入和抽吸鸦片（一七九六年），但实际上是到了一八三八年才开始行使实力，加以取缔。

由清廷派到广州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在第二年～～一八三九年的三月，监禁了英国领事和鸦片商人，焚毁了鸦片三万多箱（将近全年交易量的一半）。英国面对着这一事件，乃于下一年派遣远征军，自一八四一到四二年之间，攻占了厦门、舟山、宁波、上海、镇江等地，而迫近到南京——这就是所谓“鸦片战争”，清廷战败，签订了“南京条约”。

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在中国来说，成为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的“南京条约”（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签订），其内容如次：

“一、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商埠，并许可英国派驻领事。

“二、割让香港给英国。

“三、中国赔款二千一百万两，分四年交清。

“四、废止行商制度。（只有得到特别许可的商人，才可以从事对外贸易的制度。）

“五、在战时期间中，与英人有往来者，一律免罪。

“六、英商缴纳进口税后，运往中国其他各地关税，不得加重税例。

“七、中英两国官方往来文书，概用平行款式。”

注：蒋总统——“十九世纪以来的亚洲形势和我们复国建国的要道”。（一九六七十一）

清廷专横腐败

由于“南京条约”的签订，迫使中国的自给自足经济——农业经济体制，在本质上发生了急遽的变化。

丧失关税自主权

造成决定性的不利，是放弃了关税的自主权，在输出入两方面一律规定值百抽五（百分之五）的“协定关税”；尤其是海关总税务司都由英国人来担任，给予外国人以减免关税便宜的弊害，逐渐显著，而且，英国人只要缴纳一次关税之后，在国内就无须再事纳税，相反地，中国人在内地则必须要缴纳二重乃至三重的税金，故结果是只有输入被保护，由中国的输出，则蒙受了妨害。失掉了自主权的“协定关税”，当然也就失掉了保护关税的功能，更使中国的重要产业受到压迫，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再加上外国资本在开放通商的五个口岸构成了商业区，作为他们的商工业根据地，而中国陈陈相因的旧式商工业经营，乃被压迫到陷于困境，失业人口因之增加。列强进行蚕食

从外界方面来说，“南京条约”正好替列强提供了对中国要求援例签订“不平等条约”的藉口和蓝本。一八四四年，美国由于“望厦条约”（注一）、法国由于“黄埔条约”（注二）的签订，都相继获得了和英国同样的特权。一八四五年，英国在上海最初开设租界，各国也继踵效尤，租界固然是中国的国土，但中国的主权（行政权、司法权等）却不可能到达，等于是外国的领土。其后，又由于赓续签订了“天津条约”（一八五八年对英、法、美、俄）、“北京条约”（一八六○年对英、法、俄），以致天津、南京和汉口乃又不能避免不开为商埠；而列强的租界，也就成了蚕食中国的基地。

中国自从纪元前的古代秦汉以来，对外的基本政策是“抚近以礼、怀远以德。”中国的世界观是以“天朝自居”，视外国为夷狄、藩属，根本不明白西欧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都与中国完全不同，也没有海洋的东西两方是“观念对立的世界”的认识；可以说是对于世界的情势一无所知，而只知闭关自守，禁止和外国往来，不重视外国的优秀文化，甚至连外国使节也不允许其入境。故而在这个时代的许多外交问题，都是让分布在地方上的下级机关，酌量处理，多数没有上达到朝廷。

因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打破了闭关政策，直接受到了西欧文明冲击的满清政府，由于无知而在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遭遇失败，造成了对外被摒于世界潮流之外，对内被民众所厌弃的局面！

清朝（一六一六年～～一九一二年），是发祥于南“满洲”的王朝，乘前一朝代——明朝（一三六八年～～一六四四年）的内乱，出兵入关，攻陷北京，自一六四四年以来支配着中国。

对汉人采高压手段

清朝的国家体制，差不多完全因袭着明朝的成规，但是君主专制政治则更加强化，加上褊狭的种族观念甚强，作为支配者的满人和被支配者的汉人，区别甚严，以满人为中心，掌握着军事权力，压制着各民族，对汉人的活动，全以高压手段控驭。殊不知，像这样的政治，是不可能长期延续下去的，到了末年，由于政治、官吏的腐败，以致民力衰颓，军队也随之腐化，加上战祸频仍，国家只有迅速走上微弱的道路，故而满清政府对于“南京条约”所加之于本身的国耻、外侮，已经是失去了抵抗的能力。

在这样的时候，签订了“南京条约”，当然会引起民众的不满，地方上对于入侵的英国势力，凭藉民间武力不断抵抗，满清政府却反而出动军队，加以镇压。其结果是充满在民间的抵御外侮声浪，逐渐转变为指谪清廷帝制专横的呼号。

兵连祸结十三年之久的“太平天国之乱”（一八五一～～一八六四年），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产生的。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打着“人人平等”的旗号，占领了南京，声势浩大；但由于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背景的认识错误，结果没有得到民众的拥护而归于失败。

英法联军之役

在这个期间，对外又因为“亚罗号帆船事件”（注三）而爆发了“英法联军之役”，中国又吃了败仗，由“天津条约”（注三）紧接上“北京条约”（注三），中国的对外地位，乃更为低下。

由于天津、北京两个条约相继签订，中国被迫对列强大事让步，除长江沿岸各港口开设商埠之外，对英国割让九龙，允许基督教传道，甚至连鸦片输入也正式加以认可。

注一：望厦条约～～一八四三年，美国派顾盛为驻华全权公使。翌年五月十八日与两广总督耆英在澳门之望厦村签订（中美五口贸易章程“，除没有割地赔款的条件之外，所有在”南京条约“中规定英人应享的特权，都被援例列入。

注二：黄埔条约～～一八四四年六月，法国公使剌□尼率兵船到澳门。九月十三日，与耆英在停泊于黄埔之法舰上签订条约，给予相同于英美之特权，并准许法人在华传教，中国政府须负责保护教士及教堂。

注三：亚罗号事件、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一八五六年九月十日，有“亚罗号商船”插英国旗驶泊黄埔，中国巡警侦知系奸民借英旗掩护，登船逮捕，英国以此一事件为藉口，交涉未遂，英军乃炮轰广州寻衅。同时因有法国神父在广西遇害，以致英法联军攻占广州，美、俄两国也参加交涉。一八五八年四月，联军攻陷大沽炮台，近迫天津，清廷派大学士桂良等分别与英法两国公使签订“天津条约”，及与美俄分别签订“商约”。但不久衅端再起，清廷遂拒绝批准“天津条约”，联军攻陷北京。一八六○年十月，在“天津条约”上增加条款又签订了“北京条约”。

日本要求特权

在这个时候，满清政府和日本签订了“修好条约”，其过程是这样的：

一八七○年，日本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来访清廷，提出十六条的条约草案。清廷态度是：目前状况只要对于两国通商并无什么特殊不便，则没有从新缔结条约的必要。虽经柳原再三恳请，但清廷未肯答应。

第二年六月，日本以大藏卿伊达宗城为全权大臣，柳原前光为副，组织交涉团，再度派遣前来，和李鸿章进行交涉。清廷便根据上年日方的提案为基础，拟出条约草案，提供商讨。

日本看透清廷弱点

就在这一年之间，环绕着中国的国际情势，发生了变化。日本看透了清廷向欧洲列强屈服而签订了某些不平等条约的弱点，故而单方面将上年提出的草案大幅修改，要求给予和西欧国家相等的特权。

于是，柳原前光便向担任李鸿章对日交涉帮办的应宝时、陈钦两人送达了一封书信，以唯恐引起西欧各国干涉为藉口，而要求签订和西欧相等的不平等条约。其大意如下：

“……国际间交际之道，对于任何国家应该划一，不宜自破条规，而被他国抓住机会，请开特例……且各项条规章程内容，不管如何拟订，但总不能和已经与西欧各国所签订者有轻重之别，因为重则引起西欧各国的嫉妒、妨害，轻则将被西欧各国侮蔑、诋责。现两国的交涉，正在西欧各国注视之下，如有轻重之差，将会发生许多问题……”

对日交涉人员的反驳

应宝时、陈钦两人，当然立即复信，加以反驳：

“……条规之所以和西欧各国所签订者内容不能划一，是因为贵国（日本）和中国处在最近的位置，在两国之间，不仅日本船舶航行，而中国船舶也常有往来；和辽远的泰西各国只有船来，我方无船前往的状态，颇有不同，故条规综括，希望能公平商订……中国对此原无成见，如果人以诚求我，自当以诚应之，是为中国的态度。这个条规，并非中国之所希望，而是贵国特意以十六条见示，要求商讨，其中虽有若干条未能妥洽，但也还有可采之处。然而这一次送来的案文，只是汇集西欧各国和中国所签条约而自其中撷取有利之点，全面改写，和去年所提前案，完全自相矛盾。贵国上次自动提出的前案，未经讨论，是否就打算作为废纸？倘属如此，则是尚未交涉，已先失信。”

一八七一年的修好像这样地折冲结果，才接受了中国的意见，于一八七一年九月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日文名称为“大日本大清国修好条规”）。这个条规表现的是自公元八九四年日本中止派遣“遣唐使”以来，约经一千年之间，正式恢复了中日两国的邦交。

这个条规的第一条“嗣后大清国和大日本国倍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的确是贯彻了平等互惠的精神。这种精神，如果能够始终存在，善加运用，则理当成为中日两国的友好合作基础。

在日本方面，却反而认为这个条规是“对清国过于让步”，形成了政治问题，故而虽已签署，但当其批准却要大费周折；尤其成为问题的是：整个案文，被指谪是以清廷的草案为依据；第二条“缔约国倘被他国轻藐，彼此互助……”被挑剔有“日中军事同盟”的嫌疑；第十一条“往来者禁止携带刀剑”，被认为是“对日本人的侮辱”。因此，在第二年再派柳原前光前来交涉修订，但被拒绝，于是，双方对于批准书的交换，也就迁延到了再下一年（一八七三年）。

日本制造侵台藉口

在中日之间所发生的台湾问题，也是属于这一个时期。

一八七一年秋天，琉球渔民六十六人因遭遇台风飘流到了台湾，其中五十四人被牡丹社生番杀害。日本便以“日本国民被害”为理由向清廷提出抗议，而竟图制造向台湾出兵的藉口。当时，琉球受清廷册封，向清廷朝贡；同时又暗属日本岛津藩，处于微妙立场。

日本岛津藩征服琉球，是在一六○九年，自那时以来，琉球内政在岛津藩制下，并向之缴纳年贡，民间风俗也逐渐日本化。但另一方面，琉球早自一三七二年即以中国为宗主国，两年一度向清廷朝贡，所使用的琉球国王印信，也是由清廷所铸颁，并且刊有满文。

琉球和日本的关系，由于琉球和岛津藩都不希望因而和中国之间发生纠纷，故而对中国保守秘密。据流传下来的故事说：当时在有中国使者访问流球时，便将岛津藩方面的人士隐藏山中，并停止使用日本通货和禁止日语交谈。

清廷颟顸失策

日本关于台湾生番事件的抗议，是在一八七三年六月，由来华为“中日修好条规”换文的柳原前光向总理衙门大臣（掌理外交事务）毛昶熙提出，毛昶熙对之答复如下：

毛昶熙的一句话

“生番杀害琉球人，已有所闻，但绝对没有听说杀害了贵国（日本）人。本来，两个岛都是我国的属地，属地人民相杀，自当由我国处置，我们对于琉球人已有偿恤，与贵国无涉，没有详为过问的必要。”

柳原前光追问：“何以不惩罚生番？”毛昶熙索性答称：

“杀人者都是生番，故而置之‘化外’，未加彻底追究。日本的虾夷、美国的红番等类，也都是不服王化，任何国家不也是有这样的事吗？”

柳原前光最后表示：

“生番杀人，贵国说是不能究治，就像赤子被害，父母却置之不问，赤子能安心依于膝下吗？因此，我国要迳行对台湾岛民调查之后，加以处理。为对贵国表示友好邦谊，故而事先照会。”

日本官方的纪录

在日本外务省，也留存有这一次的谈话纪录。据该纪录索载关于“化外”一点，有过如下的议论：

“毛昶熙说：‘台湾岛民有生番、熟番两种，一向服我王化者谓之熟番，置府县加以治理；未服王化者谓之生番，只有置之化外，完全不受绳墨。’

“针对毛昶熙的谈话，柳原前光一方面责难以往放任生番不能给予制裁的情况，同时并举出：‘万一像这样的事件，发生在和他国之间，不一定那一个国家也许就会以之为藉口而将台湾占领，成为南方海上的祸患’的理由，而接着向毛昶熙通告：‘为此，我国政府打算立即前往征讨。’更且反过来抓住‘化外’这一句话强调表示‘对于化外之地的究治，完全不是干涉贵国的事务，无劳过于关注。本来，像这样的事并没有照会贵国的必要，但基于好意特为说明。’毛昶熙乃提议：‘对于文件须再加调查，希望稍作等候。’但柳原前光则认为：‘文件已经读过，既属化外孤立番夷，则唯有让我以独立国的立场处置。’而拒绝了毛昶熙的要求。”

在日本国内，对于向台湾出兵，有赞成与反对两说，再三反覆决定之后，卒依据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的强硬主张，于一八七四年五月派兵开赴台湾登陆。

清廷两大失策：断送琉球关系、开对敌赔款先例。

日本对台湾出兵事件，当时由于英国派驻北京公使威妥玛出面调停，签订了“中日北京专约”，大致获得解决。

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妄加杀害，日本国终于出兵向该生番等诘责”为前文的“专约”，承认“日本出兵为保民义举”。并且规定“由中国方面赔偿白银五十万两”。

这个“专约”，清廷犯下了两大失策。第一：在前文中的“日本国属民”一语，表示承认了琉球是日本的属国。第二：承认了“保民义举”的诡辩，而对于凭藉武力侵入自国领土的敌人，开下了给予赔款的先例。

这在日本方面，当然是外交上的一次胜利。其后，日本便命令琉球禁止对清廷派遣朝贡使及受其册封，乃至要求断绝和清国的关系。一八七九年，更肃清了琉球藩属内部的反对势力，废止了藩封，改设为冲绳县。

日本续谋夺取朝鲜

对于另一个也是以清廷为宗主国的国家——朝鲜，日本的侵略野心，也逐渐公然地显露出来了。

一八六八年，日本派遣对马藩主宗重正为第一次使节，前往朝鲜，告以日本王政复古，并求“修好”。当时，朝鲜执政大院君正执行闭关政策而予以拒绝，并且因为见到日本使节所齎来的国书中有“大日本皇帝”及“奉敕”等类抹煞了朝鲜和清国宗属关系的词句，乃引为拒绝日本修好提议的理由。

其后，日本复于一八七○年及七二年，再度、三度派遣使节试探“修好”，也都未偿所愿。因而在日本国内乃有西乡隆盛等人“征韩论”的兴起。

一八七五年九月，日本军舰“云扬号”航行到朝鲜西南海岸的江华岛附近，藉口测量海岸而实则是示威，朝鲜炮台开炮射击，日军还击，反而攻下了炮台，乃乘此时机派遣参议黑田清隆为全权代表，率同军舰六艘前往，强迫朝鲜“修好”，然而大院君还是表示：“朝鲜是中国的藩属，不能任意商订协约。”仍旧加以拒绝。于是，日本便转移目标，改以清廷为交涉对象。

恭亲王又有重大失言

第二年六月，日本外务省大辅森有礼访问北京，在总理衙门与恭亲王奕诉会面，谈判朝鲜问题，当时，恭亲王曾经有过重大的失言。

恭亲王对于有关朝鲜的地位，作了这样的回答：

“朝鲜虽然是中国的属国，但其疆土本来不属于中国，所以中国过去并没有干涉他的内政。至于其对外国的交涉，听任朝鲜自主，不加强制。”

森有礼抓住这个话柄，向总理衙门递送了一个正式照会，声言：“朝鲜是独立国，在日本和朝鲜之间的事态，不受清日修好条规的约束。”恭亲王乃强调自己发言的前断“朝鲜是中国的属国”，主张适用清日修好条规第一条“两国所属邦土，以礼相待，不得稍有侵越”的规定。双方往返多次交涉，最后森有礼主张：“朝鲜固然不是独立国，但却是自主的国家，自当认为其在内政、外交各方面悉由自主，直接谈判。”终于达到了日本的要求，和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江华为地名。日文的正式名称是“日鲜修好条规”。）

这个条规的要点是：第一款“朝鲜国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这就是正式否定了中国的宗主权。并且开釜山、仁川、元山三港为商埠，承认日本有领事裁判权，及免除其贸易关税等。就像清廷受到列强压迫的情形一样，朝鲜也是在日本的强迫之下，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就是这个“日鲜修好条规”，产生了日本侵略朝鲜的绪端；如果要追溯后来“甲午战争”的远因，该以这个条规为其出发点。

俄以诈骗手段掠我国土

当时的中俄关系，在这里也得简单的加以提及：

清廷与俄国之间，最初签订的条约，是在一六八九年的“尼布楚条约”（注一），以这个条约为根据，两国国境，尚能相安；后来俄国看到清廷败于鸦片战争后的表现，也萌露了领土野心，一八五八年强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瑷珲条约”（注二），以黑龙江为国境线，在乌苏里江以东的地区，由中俄共同管理，清廷原有不予批准之意，但在两年后所签订的“北京条约”（注三）中，终于不能不加以承认，其结果，使中国丧失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合共二百七十万平方公里（日本总面积的七倍多）的广大国土。俄国在当时的外交手段，并不使用像英、法那样地出动武力、迫订城下之盟的战争方式，而是以恫吓诈骗的伎俩，使人在不易察觉中造成“既成事实”，而逐渐积累其成果。譬如说：利用清廷对于英、法的仇恨心和恐怖感，而自居于调停的地位，顺便要求清廷对自己让步，就达成了目的。

注一：尼布楚条约——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年）签订，规定以外兴安岭为两国国界。其后在雍正五年（一七二九年）又签订“恰克图条约”，规定恰克图互市，西自沙弼奈岭、东至额尔古纳河设立界碑，南属中国，北属俄国。

注二：瑷珲条约——鸦片战争后，俄国亟谋侵华，一八五八年四月，正当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之际，俄军在黑龙江发炮示威，压迫新任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瑷珲条约，规1[115]115定黑龙江以北割让给俄国，乌苏里江以东两国共管。

注三：北京条约——俄国利用英法联军之役，一面怂恿英法对清廷增加压力，一面故示调停、趁火打劫，一八五八年六月和清廷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开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琼州、台湾为对俄通商口岸，准俄人设领事馆，并给予领事裁判权及最惠国待遇。一八六○年十一月，再签订中俄北京条约，规定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完全划给俄国。

清末的洋务运动

以上是中国被位置在国际情势之中的概略状况。

至于中国国内，在太平天国之乱的前后，陆续发生有捻军之乱（山东、江苏、安徽、河南各省）、回民之乱（新疆等地）、苗族之乱（西南地区），自一八五○年至七三年的二十三年之间，全国在当时的十八个行省，都蒙受了战争的破坏。清廷不仅对外政策失败，并且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逐渐面临到了重大的困难。

在这样的时期，进行了“自强运动”（洋务运动），由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所推进。

其直接动机，是由于在英法联军战役中，打到了眼前来的西欧国家军事力量——特别是船舰的速度、枪炮的射程等等性能优越的新兵器，发挥了和中国土制械弹根本不能比拟的威力。为了要抑制西欧猖獗之风，首先考虑到必须持有优越的舰艇和枪炮，于是便喊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亟谋导入西洋的事物和学术。

师夷长技三个阶段

这个自强运动大致可以区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一八六二年开始约十二年之间，导入科学技术和制造武器。在北京设立同文馆（公立外语学校），开始向欧、美派遣留学生，在上海创设广方言馆（外语学校）、译书局，福州设造船厂，天津、江南设兵工厂、大沽设炮台，以及开采煤矿。

第二阶段一八七五至八四年，实施西式军事训练，和以国防为目的而配置铁路和通讯网的建设。

在旅顺开设军港，输入定远、镇远等大型军舰，向英、法、德等国家派遣留学生，重视军事、造船等学科。

第三阶段自一八八五年到“甲午战争”（一八九四年）期间，增强国力，尤其是致力于轻工业的发展，诸如设立缫丝、纺织等工厂。北洋舰队也建立了起来。

像这些措施的自强运动，在表面上看来是导入新知识、新科学技术的成功。

基本缺陷并无改变

然而，基本的缺陷，则是对于新国家体制的认识。两千多年来，故步自封的保守思想，并没有改变，作为一个近代国家在制度上的根本改革，在当时一点也没有做。谫陋顽固的领导者们，虽能知悉武器的优势，可是对于西欧各国步上富强之道的政治、法律、教育、思想等范畴，却完全没有能领会得到。

当时吸收西欧知识，是怎么样地半生不熟、东拼西凑的，请看下面一些小故事，当可了然：

譬如说，在美国留学的某一个留学生，因为未向清廷派来担任学监的委员行跪拜礼，便被勒令立即归国。又如上海译书局在三十多年之间，译印的书籍不过几百种，而销售出去的也只有一万三千册的纪录。

培育了地方军阀

对于这个自强运动，从结果论来课算他的遗产，却有一点不能忽略而必须加以指出——就是培育了地方军阀。

因为在清廷统治力量式微的过程中，地方上有些强宗豪族，为自卫而豢养私兵，逐渐而连1[118]118武器弹药等类也都慢慢具备了自力供应的体制。列强对于这些豪族也就暗中给予助力，以谋交换到在他们所控制的区域内能容许本国势力的滋长。后来，中华民国成立，在全国统一方面招惹了莫大困难的地方军阀割据，就是早在那个时候播种萌芽起来的。

日本当时的情况

中国的“洋务运动”时期，和日本的“文明开化”时期刚好一致；并且同因怀于欧美凭藉武力侵入亚洲的威胁，为其出发点。

当太平天国的新闻传播到来不久的一八五三年，日本也面临了“黑船来航”（注一）。在第二年，日本和美国、英国、一八五五年和俄国、一八五六年和荷兰先后分别缔结了“和亲通好条约”，而不得不将原来的“锁国（闭关）政策”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时，在中国方面发生了“亚罗号战争”（英法联军），继之是太平天国灭亡之后，在日本则实施了“明治维新”（注二）。接着就有“清日修好”（一八七一年）、“出兵台湾”（一八七四年）、“日朝（鲜）修好”（一八七六年）。

在此期间，日本人对于中国的看法，固然因为时期的不同而有其流动性；但如果提纲挈领地分析一下，则大致可以区别为“日清团结论”和“日本盟主论”两个方面：

“团结论”对于清国受欧美列强压迫的痛苦状况，认为是整个亚洲的问题，因而主张清国、日本、朝鲜必须一致协力，对抗欧美国家。

“盟主论”主张日本应向海外发展，为此，莫如效法欧美各国的作为，力图向大陆方面扩张势力，不落欧美之后。

不过，以上两论究其根底，都是在为日本的利害打算，其动机是以保障日本安泰的国家利益为中心。故而无论其为“团结论”或“盟主论”者，在国家利益方面，是站在共通的、举国一致的立场。

起初，基于对清国的同情，“团结论”较为流行；但后来“盟主论”逐渐抬头，政府的政策也开始倾向于这一方面。

注一：黑船来航——十七世纪，日本江户幕府恐怖西欧教会传教，不利于其封建统治，乃于一六三九年下令禁止与外国交通，进入所谓“锁国（闭关）时代”，达二百余年之久。一八五三～～四年，美国海军上校培里两度率领军舰驶达日本，强迫缔结“和亲条约”，打破了日本的“锁国政策”，日本社会称之为“黑船来航”。

注二：明治维新——一八六七年，江户幕府尊王还政，明治天皇宣布王政复古，建立统一领导的新政权，其后废藩置县，开设国会，树立立宪政府，推进由封建制度进入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改革，开创了富国强兵的基础。

中日变法维新之成败

蒋总统对于中国的“洋务自强”和日本的“维新”的差别，作了如下的分析：

‘甲午战争以前的日本，还是一个非常积弱的国家，外国在日本都有领事裁判权，当时连庸懦无能的满清政府派驻日本的领事馆，也同样享有此项特殊的权益。日本人和我国（中国）在日侨民发生纷争，如果是日本人违法，我国领事馆就可以直接将该日本人逮捕、处罚。

‘当时，日本就是这样半殖民地的国家，根本没有独立自主的权力，可以说是和我国由清末到民初的国际地位一样。’（注一）

‘日本的德川幕府还政以后，由“明治维新”开始推进的现代化建国建军运动，是在一八七○年代。其时，正当我国清廷的同治、光绪年间维新自强、建设新军的洋务时代。中日两国推进西化、富国强兵的出发时期，大致相同，过程也很相似，但是为什么日本能够一跃而成为当时在亚洲的唯一强国，我们则始终积弱不振，而且被列强分割的灾祸接踵而来，其原因何在？’（注二）

领导人的认识不同

中国和日本祸福殊途的理由之一，是两国领导人的认识不同，该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日本领导维新的主要人物伊藤博文（注三），于考察各国军政归国之后，组成内阁、实行宪政、建立军制。此时，我国的李鸿章也正为洋务重臣，曾以大学士的身分考察外国情势。

‘伊藤博文的着眼点，在与建国建军久远的规模有关联的问题—政治、宪法、经济、社会的组织，军事的制度，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因为伊藤博文知道“先立乎其大者远者”，所以日本的建国建军，自始即着眼于基本精神，故其维新的基础颇为深厚。’（注四）

‘相反的是，我国（清廷）李鸿章则是深受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只知道西方国家“大炮之精纯、子弹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以为“中国但有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而对于立国建军的大政方针，和科学文化的根本之图，尤其科学的基本精神，则不闻不问。

‘因此，他主持洋务几十年，亦仅止于聘请顾问、训练洋枪、抽取关税厘金、设立机器制造局、造船厂、招商局、矿务局，求其“船坚炮利”而已。

‘其结果，海军毁于中日黄海之战，陆军败于中日朝鲜之役，关税主权

内忧外患，祸乱纷乘。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优劣，即于此判若云泥了！’（注五）

精神方面三个要素

在像这样的领导人问题之外，如果站在历史观点加以回顾，则两国情况的不同，尤其是应该归着于精神方面。

如就此点加以探究，则可大别为下述三个要素——“日本民族为纯一民族，举国一致体制，容易达成。”“日本的维新，本于科学精神，可以制订一贯计划，据以实行。”“日本虽以欧美为模范，但并不向之乞援，坚持自立求新精神。”

‘第一，日本民族为纯一民族。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在政治上尽管有新旧不同的意见，也有“攘夷派”和“开国派”的争执，但那只是对于自强维新的见解和手段不同而已，其目的在于求国家的复兴富强，则毫无二致。因此，新派既不怀疑旧派，旧派也并不嫉忌新派，尤其是他们没有民族的畛域，用能诚心公道，共赴国家之急。’

奴视汉人无所不至

就这一点来加以比较，在中国的情况则存在着民族之间互相仇视的困难问题：

‘当时满汉的民族界限，十分严格，满人认汉人为“非我族类”之奴隶，排挤之、嫉忌之、奴视之，无所不至！唯有光绪特别重视汉人，而汉人亦乐为之用，但光绪受制与慈禧，形同傀儡，虽有其“重用汉人、变法自强”之心，而却无自主施政之权；并不如日本明治，于推倒幕府之后，亲政用贤，无人挚肘者可比。总理曾经说过：“当满清政府末年，他们知道自己不能有为，恐怕天下失到汉人手里，所以他们主张宁赠朋友，不与家奴。把中国的领土主权，都送给许多外国人……”徐桐（注七）就明白表示：“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当时并到处流言“变法者汉人之利，满人之害。”说光绪“破坏中国礼法，使满人之权势处于危险地位。”在这样的情势之下，满人自然嫉视汉认，特别是排斥汉族的人才，以致李鸿章主张大办理洋务，立即被指为汉奸。’（注八）

整体计划与科学态度

第二点，一如在前面已经指出的、就两国的领导人伊藤博文和李鸿章比较而言，其差别在于有无整体计划和科学态度的问题：

‘日本的维新自强，自始对于政治、经济、财政、军事、交通以及科学发展等，即有通盘整套的计划，脚踏实地，贯彻始终的来做。明治维新之始，就举国上下一心并力，对内则依据立国之精神与民族之传统，以立宪、举才、建军、废阶级、兴实业、办学校，同时而并举之。对外则保持“东方精神、西方技术”之原则，派遣留学生学习实用科学，彻底放弃旧式土法，整个吸收工业生产技术。且与列强通聘修好，相互通商，减少外来压力。复以民心为后盾，以交涉为手段，历经无数次之困难谈判，在三十年以内，就全部解除了美、义、英、俄、丹麦、荷兰、瑞士……十余国之不平等条约，成为自由平等的独立国家——这就是日本“学习彻底、维新亦彻底的精神”所造成的业绩！’（注九）

这种“彻底精神”，在中国方面是比较欠缺的：

‘反过来看我们中国方面，所倡导的维新格致之道，却无一而非因陋就简，看来像是改革，实际是半新半旧、不新不旧的一种皮毛的改革，根本没有通盘的计划，也没有一定的目标；不但没有科学的知识，也不认识政治、经济、教育、军事与外交要和时代配合同时进步的常识。……中国维新变法的重大缺失，乃在于没有认识“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之重要，不仅没有人能如俄国大彼得那样，以帝王之尊化装为工人，到英国去学造船、学机械，也很少有人如日本学者一样，对西方科学的技术和方法日以继夜的悉心研究，一意模仿。

‘中国人对他中国自己古代的科学成就，因不重视，甚至还鄙视西方科学，说“圣朝崇本德，奇技绌重洋”、说“天文算学，为益甚微”、说“文儒近臣，不当崇尚技能，师法夷裔”。结果，我们即不得不被讥、被侮为“顽固愚昧之一老大守旧的帝国”。所以日本维新则1[128]128日强，中国变法则日削，而且落后如故，变乱如故。’（注十）

自立自强精神

第三、是日本的自立自强精神：

‘日本的维新，虽事事以欧洲为师，也可以说是以敌为师；但是日本始终坚持自立求新的精神，并不依赖外援。……大家知道，日本自始就想侵略中国大陆，同时也是以俄国为其假想敌的；明白的说：日本的“攘夷”思想，除侵略中、韩以外，主要就在对付北方俄国的压迫，这就是后来日本国防政策北进路线的由来。所以日本人自己都公开的说：“世界各国唯有俄国是顶可怕的，是顶能够妨害日本在大陆发展的。”可知日俄战争的爆发，绝非偶然。而且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他们的外交政策，即使是在明治三十五年（一九○二年）和英国订立了对俄国的攻守同盟条约以后，也始终是以日本自己的国力对俄独立作战，不依赖英国为构想的。

清廷的联俄制日

‘但是清廷则毫无独立自主的精神和意识。学习外国的技术，就丢弃了自己传统的优点；接受外国的观念，就忘记了自己立国的精神；而且事事都想依赖外人，单以外交来说，就一如日本人所讥刺我们的，始终玩的是战国策那一套手法，今天联这一国，明天联那一国，联此以制彼，联彼以制此，本来列国并争，都有联络与国的手段，不过这种联络，是要有其可以自立之道的联络、是要致人而不致于人的联络才成。

‘可是清廷的外交政策，绝无自立自强的意图，只是仰赖这一个大国，对付另外一个大国。譬如说：在日本维新造成了对我们的威胁之后，重臣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主张联俄；李鸿章更加是以“联俄制日”为其远交近攻的外交主要手段。到了甲午战后，慈禧不思奋发自强，更一意于结好俄国，根本就想把自己置于俄国的保护之下！于是，一八九六年特派李鸿章访俄，订立了“中俄密约”（注十一），让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得以横贯于中国东北地区，东北从此即成为了俄国侵略中国的根据地！

引进俄帝势力，贻国家以无穷之戚，应世代引为鉴戒！

‘这个密约，并且在日俄战争的时候，又招致了让日俄双方公然以中国领土为其战场的后果；日本势力，并由此迅速伸入东北，此后双方即于此共同角逐，也于此不断冲突，其目的即在其各要独占中国。这就是说：当时清廷颟顸的、愚昧的联俄制日政策，不惟未能制止日本的侵略凶焰，反而同时引进了帝俄的势力，贻国家以无穷之戚！

‘从那时候以来，经过了半个世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130]130，墨沈未干，俄共即已公然卵翼共匪，侵据了我们的东北，又进而攘窃了我们整个大陆，这一段惨痛的历史，更是大家所要世代引为鉴戒的！

‘所以，我以为要了解日本和中国同时维新与变法，结果却一成一败，以上各点，乃是重要的关键之所在。’（注十二）

注一：蒋总统——“实践与组织”。（一九五○六）

注二：蒋总统——“建军事业要从头做起”（一九六六九）

注三：伊藤博文——（一八四一～一九○九年）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一八八五年制定宪法，建立新内阁，出任第一任首相，一九○九年在哈尔滨车站被狙击殒命。

注四：蒋总统——“建军事业要从头做起”（一九六六九）

注五：蒋总统——（同右）

注六：蒋总统——“十九世纪以来的亚洲形势和我们复国建国的要道”（一九六七十一）。

注七：徐桐——光绪年间清廷保守派领袖之一，反对光绪变法维新，支持义和团扶清灭洋，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自杀。

注八：蒋总统——“十九世纪以来的亚洲形势和我们复国建国的要道”（一九六七十一）。

注九：蒋总统——（同右）

注十：蒋总统——（同右）

注十一：中俄密约——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李鸿章访俄，六月三日与俄国外相罗拔洛夫签订密约，要点为“日本如侵略中、俄、朝鲜，两国相互援助”“紧急时，中国所有口岸准俄国兵船驶入”“允许在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威”“准俄国在此铁路运过境兵粮”。

注十二：蒋总统——“十九世纪以来的亚洲形势和我们复国建国的要道”（一九六七十一）。

仁道与霸道

‘当我早年留学日本的时候，不论在火车上、电车上或在轮渡上，凡是在旅行的时候，总看到许多日本人都在阅读王阳明“传习录”（注一），且有很多人读了之后，就闭目静坐，似乎是在聚精会神，思索这个哲学的精义；特别是陆海军官，对于阳明哲学，更是手不释卷1[132]132的在那里拳拳服膺。后来到书坊去买书，发现关于王阳明哲学一类的书籍很多，有些还是我们国内所见不到的：我于是将阳明哲学有关的各种书籍，尽我所有的财力都买了来，不断的阅读研究，到了后来对于这个哲学真是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一种心领神驰的仰慕，乃知日本以蕞尔小国，竟能强大至此，实得力于阳明“致良知”“即知即行”哲学的结果。’（注二）

日本得力于阳明哲学

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强力支柱，就是王阳明的“即知即行”“知行合一”哲学；而且，这个阳明学说实际就是形成“大和魂”“武士道”的根基，更衔接上日本的立国精神。

‘日本人把“武士道”看作是国家民族的灵魂所在，称之为“大和魂”，笃信不疑。他们实践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所谓“即知即行”，就是对于道德、知识和文化，第一步苦心孤诣以求其了解。第二步笃实践履以求其实现，毫不因循迟疑、敷衍懈怠。所以他们在明治维新之后，亦能接受西方的物质文明，迎头赶上与列强并驾齐驱。’（注三）

‘日本的“武士道”，在我们的宋代——就是日本的源赖朝时代，已经存在，但是兴盛风行，却是在德川幕府之后，明治维新的时候。他们是拿“武士道”来提倡日本的民族精神，1[133]1331[134]134造成了他们的“大和魂”——民族的灵魂。所以“武士道”就是他们国家民族的真精神。’（注四）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一切东西都是由我们中国学得去的，就是连“武士道”也是如此。他们的“武士道”是采取了我们中国一部分的固有道德，和一部分固有的军人精神。

仁是中国一切固有道德的一个中心

‘我们要晓得：中国古人所谓“智、仁、勇”——三达德，还有中国古来军人精神的“智、信、仁、勇、严”——五种基本德性，两者都是一个仁字在中间。这就是说“仁性”是我们军人精神的基本，也是我们中国一切固有道德的一个中心，又可以说是统摄诸德的一个最重要的“元德”，为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直传下来的基本伦理，也就是数千年以来道统相承的中心。如果没有仁，一切的精神和道德就不能整个的连贯起来，不能完成高尚纯洁圆满无缺的人格与至大至刚的气节；因为道本唯一，德必求全，一有偏缺，必至走入歧途，得此失彼。

日本人忽视了仁字，以霸道立国。

‘日本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也没有认识我们中国全部的固有道德，所以他们的“武士道”将中国固有道德最中心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智、仁、勇”的“仁”字完全丢了，而且在1[135]135“智”“勇”两方面偏重于“勇”，连“智”也不十分重视。’（注五）

‘我们中国的儒道，曾经教给日本的东西，本来只有“士道”两个字，然而“士道”原本是读书人的道理，可是他们没有能够深究它的道理。到了后来，日本国内的藩阀武士们，演变成为尽量拿武力去做割据分争害国殃民的事情，于是他们就在“士道”之上特地加一个“武”字，以示武人也都应该懂得“士道”，所以他们在“士道”之外，乃又制造出一个“武士道”。总而言之：是恐怕武人不懂道理，故而不仅是读书人、就连武人也必须要晓得“士道”，因此便出现了“武士道”这个名词。简单地说：日本所谓“士道”就是中国的“儒教”，士是指儒，道就是教，日本片段地截取了“儒教”中的一部分，作为他们霸道的立国精神。尽管“儒教”本是我们整个的中国王道的民族精神，但是我们自己却对那个民族精神的所在之处，丝毫不加注意。

‘日本的武士道，照说并不是日本固有的宝物，而是被他们窃取去了的中国东西。日本人拿着它作为民族精神，而且居然用这种精神来侵略我们中国。’（注六）

‘日本武士的必修信条，分为二途，一为练武，一为学文。武士以实践儒家的主张为重。德川家康说：“武将虽长于武事，如拙于学，不明圣贤大道，则匹夫之刚而已，武将务必力学，方为入德之门。”由于像这样地尊重“武士道”的精神，于是儒道对于武士，自然具有特别权威。所有武士，无不了解忠孝的大义，由尽忠、死难、武侠、忠君等道德的实践，而完成幕府末世尊王的大业。’（注七）

当然，对于从立国精神而联接上侵略行动的“武士道”，是不应该一味地加以称赞的；不过，在我们中国方面，也确有必要对于“武士道”底流的王阳明哲学—“知行合一”“致良知”的精神，加以认识：

王阳明提倡实践的哲学

‘王阳明看到当时（十五世纪末期到十六世纪初头）的中华民族麻木、消沉、散漫、萎靡，只讲玄学玄教，尽是讲而不去行，实在是亡国灭种的现象。他认为民族思想的衰弱、精神的消沉、颓唐，将来一定要使中国崩溃。当时的儒教，只注重静的一方面，不提倡实践的动的哲学，大家伏在桌子上翻死书本，门户之见，非常之深。因此，他专事提倡动的哲学，但是中国的陈腐理学，积重难返；他的哲学，依然不能实行，倒反而被日本人发现了。’（注八）

日本武士道的所谓“文武两道”，在中国也有“文武合一”“出将入相”的成语，虽然在文义上都是表示具备“完整的素养”，但是两者的基本理论是有其差别的。

盖日本的“文武两道”，是以武为优先，提倡的是“武人之道”；可是在中国方面，则侧重于“文（德）”，讲求的是“文人之道”。

至于一般行政官员，可以从“科举制度”来了解，是以衡量其古籍知识的有无，而为仕宦荣达的条件，通过科举而中式的“文官”，掌握着行政上的实力；如果仅仅是“一介武夫”，则被看做是只能以征战为职业，得不到较高的评价。

日本在精神上学中国

‘日本人除了现代科学同枪炮以外，所有的东西，完全是从中国学去的，尤其是在精神方面，更是学中国的，而且是拿着学自中国的东西，想要来消灭中国。他们最大的武器，与其说是由西欧学得来的有形的枪炮，却莫如说是由中国学到的无形精神。’（注九）（译注）

注一：王阳明—（一四七二～一五二八年）名守仁，明代大儒，平宸濠之乱，又兼有武功。尝筑室讲学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其学以“知行合一”“致良知”为中心。弟子徐爱就阳明与门人论学答问之语，辑为“传习录”。

注二：蒋总统—“总理知难行易学说与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之综合研究”（一九五○七）

注三：蒋总统—“实践与组织”（一九五○六）

注四：蒋总统—“中国的立国精神”（一九三二六）

注五：蒋总统—“革命军人的哲学提要”（一九三四七）

注六：蒋总统—“中国的立国精神”（一九三二六）

注七：蒋总统—（同右）

注八：蒋总统—（同右）

注九：蒋总统—“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一九三二五）

译注：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蒋委员长深知对日抗战终难避免，但我军战斗力弱于日军，必须积极加强军人精神教育。二十一年六月六日，在中央军官学校讲演“中国的立国精神”—副题为“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先要抵抗日本武士道的精神”，剖析日本“武士道”精神是渊源于王阳明“知行合一”“即知即行”的动的哲学，指出‘阳明哲学本是中国王道的民族精神的一部分，被日本人片段地截取了去，作为他们霸道的立国精神，用来侵略中国。我们必须拿几千年遗留下来中国固有的民族道德，以阳明“知行合一”动的精神加上国父“知难行易”行的哲学，来阐明融合为一种新的立国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三民主义”。我们要打破日本，先要打破他的“武士道”；要打破他的“武士道”，唯有“三民主义”的立国精神。’

朝鲜的政情

现在，请把历史舞台转移到朝鲜。因为在当时的朝鲜，是中日之间纠纷的根源。后来的“甲午战争”，也就是由于朝鲜问题而引发的。

由于在一八七六年签订的“江华条约”中，日本否定了中国所持有对于朝鲜的历史性的宗主权，朝鲜国内的舆论，因而形成了两派乃至三派。

开化派与保守派

有一派是欢迎和日本通商的“开化派”，他们的意见是为了谋求朝鲜转变为近代国家，有必要开放门户；不过，在这个“开化派”之中，又分立为两派，一方面是“亲日派”，另一方面是“事大派”（忠于清廷）。此外，和“开化派”对抗的还有一个“保守派”。

加上在朝鲜李王朝的内部，更有大院君和闵妃的对立。大院君是当时李朝第二十六代国王——高宗（太王）李熙的生父，当初，曾以摄政的地位掌握着实权，可是到了高宗迎娶闵妃之后，闵氏一族势力伸展，终于以高宗亲政的理由，剥夺了大院君的权力。

闵氏一族掌权之后，曾经多次派人到中国和日本考察政治、军事。一八八一年，以清廷为范本，实行政治大改革；同时在军事方面，则效法日本的制度，改编军队，延聘日本驻朝鲜公使馆护卫堀本礼造中尉担任教练，选拔优秀青年百余人，称为“士官生徒”，接受日本式的军事教育。

由于这个改革，使朝廷重要职务，都落到了闵氏一族和“开化派”的掌握之中。

然而，这个改革却招致了军队的反感。因为当时国库空虚，积欠军队粮饷达十三个月，加以因军队改编而被动退役的军人们，多数对闵氏一族怀恨，而且闵妃等人只顾生活豪奢，对于军中的怨望和国家穷困的状况，不闻不问。

形成壬午之变

一八八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拨发了已经是好久以来未曾发放的一个月军粮，可是仓吏却还要从中克扣，斤两不足，更掺入沙土，军人愤怒，和仓吏冲突，各军响应，立即形成暴动—这就是所谓“壬午之变”。

变成了暴徒的军队，打开军械库，取出武器，杀死日本教练堀本礼造，袭击日本公使馆，公使花房义质放火自焚使馆，逃往仁川，登上英国测量船而得救。

第二天，乱军杀死首相李最应；闯入宫中，又杀死御林军大将闵谦镐；再打算杀害闵妃，闵妃化装由后门逃走，幸免于难，遣使向清廷求助；大院君则乘此机会，受王命镇抚乱军，重握政权，恢复政、军旧制，将闵氏一族及开化派分子排除于权力地位之外。

日军登陆，清军平乱

花房义质于七月三十日回到长崎，立即奉外务卿井上馨之命，组织“朝鲜问罪军”，率领金刚号等三军舰，驶达仁川登陆；八月十六日，领兵五百人驰入汉城。

在另一方面，清廷得讯告急，也立即派遣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率领超勇、扬威、威远三艘军舰到达仁川，调查实情，结果，判断事端出于大院君的阴谋；清廷乃决定派兵四千五百人开赴朝鲜，并逮捕大院君。八月二十六日，清军将大院君逮到，送往中国保定拘禁，并将首谋者十人定罪，才算平息了叛乱。

种下日本侵朝祸根

于是，日本方面便以公使馆被焚毁等理由向朝鲜提出七项要求；朝鲜政府虽曾一度予以拒绝，但因受清廷劝告，乃于八月三十日和日本签订了“济物浦条约”（济物浦为仁川旧港的名称），日方鉴于兵力少于清军，唯恐清军干涉，因而将当初所提七项要求中的“割让土地”、“内陆通商”等项撤回，而只限于“严究犯人”、“赔偿被杀害日人遗族五万元”、“赔偿日本国家损失五十万元”（分五年付清）各款为主要条件；但是，有一个问题条款（第五条）——就是允许日本留驻若干兵员为公使馆的警卫。这一条孕育了两年之后“甲申之变”（由亲日派——“独立党”发动的政变）的因素，种下了朝鲜被日本侵略的祸根。

根据日本方面资料：日本对于清廷出兵的真正意图，直到最后，还是难以判断。因此，井上馨在八月二十日发出的训令中揣测清廷一方面可能是“为了保护属邦、协助朝鲜平定内乱，而善意地介入在日本和朝鲜之间，促成和议，谋使日军早期撤回。”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还有台湾和琉球的问题存在，清廷或许会乘此时机藉平定朝鲜之名而向日本挑战，兼以保护属邦了湔雪对日本的积愤。”故而认为清廷在和战两方面都有可能，所以命令应作两面应战的准备。日本最恐惧的是清廷会介入日本和朝鲜之间的交涉，所以一再指示“要尽可能地做到和朝鲜直接谈判”。不过对于朝鲜则须明白表示出极其强硬的态度；假定朝鲜方面无意媾和，日本就要发出最后通牒：“日本依据公理，尽到所有的力量，惩创凶暴，洗雪损毁我国国旗的耻辱，除此而外别无途径，两国之间已经迫近了最严重的关头。”

还有，在井上训令之中，有在两年之后发动“甲申之变”的主角金玉均、徐洪范（中国资料为徐光范）等人的名字出现，颇值顽味。盖当时金玉均等人已经得到了日本的援助，正在策划政变，而日本的福泽谕吉、井上馨、后藤象二郎等政界和知识界人士，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给予了援助。

亲日派发动了甲申之变

一八八四年，由于对安南（越南）支配权的争执，爆发了“中法战争”，清廷为了向华南调集兵力，而将驻在朝鲜的军队由六营减为三营。金玉均等独立党人乘这个隙缝，乃和日本密谋发动了“甲申之变”。

十二月四日，汉城邮政局举行落成典礼，当天夜晚，该局局长洪英植（独立党）招宴各国公使及朝廷高官，各国公使都应邀出席，唯独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称病未到。下午十时，举火为号，暴徒冲入，宴会混乱；同时，金玉均等闯入宫中，伪称清兵作乱，请召日军入宫警卫。国王李熙虽然予以拒绝，可是在竹添进一郎指挥之下的日军，这时已经包围了宫廷，把李王软禁起来。第二天，金玉均等人假传王命，宣召“事大派”（亲请廷）领袖闵泳穆、闵台镇、尹泰骏、赵宁夏以及被指为“亲俄派”的韩圭稷、李祖渊等人，加以杀害。独立党人最初的打算是将国王幽禁于江华岛，但日本方面则主张送往东京，另立国王的九岁庶子为新王；尚未达成协议，而民间已经传说纷纭，王宫被数万民众包围；同时，清军为了防范国王被带往东京，也采取了断然行动，派三营军队进攻王宫，但恐伤及国王，故而不敢大规模攻击；然而兵力薄弱的日军，终于解围而去，国王乃被夺回。

日本的竹添进一郎等人偕同金玉均等再度放火焚烧使馆，于三天之后的十二月七日率领日军逃离了朝鲜。

天津条约丧权

袁世凯（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在这个时候，向国内发出急电，请求李鸿章速派援军；同时，朝鲜国王李熙也向清廷要求派兵协助防卫。于是，在第二年的一月一日，援军便开到汉城，但兵力却只有四百多人。

清廷懦弱误事

袁世凯在向清廷请援时，说明“示以必战，则和局可成；示以必和，则战事必开。”强调对于日本有在军事上加以示威镇慑的必要性。但是清廷和李鸿章对于袁的复示是：“定乱为主，绝勿与日人发生流血冲突。”基于这个懦弱的决策，故而只派了四百多人前来，孕育了后来在交涉中让步的因素。

当增援的清军抵达汉城的那一天，日军也有两千多人在仁川登陆。日本外务卿井上馨以全权代表大臣的身分，在第二天随军进入汉城，向朝鲜国王李熙提出要求：“派遣使节齎国书前往日本谢罪”、“惩罚元凶”、“抚恤被害日本人十一万元”、“赔偿使馆修理费二万元”。仅仅经过了一个星期的交涉，朝鲜政府便屈服在以武力为后盾的强迫要求之下，全面承认，而于一八八五年一月九日签订了“汉城条约”。

丧失对朝鲜的宗主权

日本的意图，是在切断清廷对于朝鲜的支配力，故而以“汉城条约”压迫朝鲜屈服之后，便立即派遣伊藤博文为全权代表，前往天津，和清廷全权代表李鸿章为朝鲜问题展开谈判。

根据井上馨于一八八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发给伊藤博文的训令看来，日本方面的说辞是：“我国（日本）公使是基于朝鲜国王的请托，为尊重友好邦谊而保护王躬，考信玺书，现有存案可稽。然而公使不意为外兵所侵，不得已乃致立于防守之地……”强调“甲申政变”时，日军的行动是基于朝鲜国王的要求，造成纠纷事态的责任，属于清军；并且举出“日本人被清军杀害”、“瞄准公使馆发炮”等情况，要求清军自朝鲜撤退。

于是，清日之间的“天津条约”，便于一八八五年四月十八日签订，其主要的内容是：“清日两国军队在四个月以内撤退”、“当有事对朝鲜出兵时，应在事前照会对方”。由于这个条约的签订，中国便丧失了对朝鲜的宗主权。这就是说：即使朝鲜国王提出要求，但已不可能独自派兵平乱。

闵氏一族与俄勾结

中国对朝鲜支配力渐弱的情况，在日本以外的列强国家，当然不会保持缄默，置之不问。故而俄国和闵氏一族深相结纳，签订了“俄朝秘密协定”，获得朝鲜东海岸不冻港——永兴湾；英国也以武力占领了朝鲜南部的巨文岛，改名为汉密顿港；德国更分别向朝鲜和清廷要求使朝鲜为“永久中立国”。

日本为了对于列强的活动有所牵制，乃建议李鸿章对朝鲜的内政和人事，稍稍加以干涉，企图借清廷对于朝鲜的支配力，以排斥西欧的势力；因此，李鸿章乃将软禁在保定的前摄政大院君送还朝鲜；未料却反而刺激了闵氏一族，促使他们所统治的朝鲜政权更加倾向于“亲俄抗清”的立场。一八八六年，闵妃用原为“事大派”（亲清廷）的“总理内务府事”沈舜泽的名义，附具盖有国玺及总理大臣印信的文书，对俄国发出密函，请求保护，内容如下：

“密启……敝邦偏在一隅，过去虽独立自主，但终未免受辖于他国，我国君主深为耻闷，今欲力加振兴，悉改前制，永不受他国管制，但不免有所忧忌。敝邦与贵国睦谊尤笃，有唇齿相依关系，与他国情况不同。为此，深望贵政府默允助力，赐予竭力保护。我国君主愿与各国一律平等，但或有他国未能协和，望贵国派兵舰相助，期保敝国安全。谨布景仰贵国诚意……”

俄乘机索取权利

这封信立即被清廷获知，国王李熙在被清廷盘诘时，诿称出于伪造，俄国方面也声明并无其事，一时风波平息；但实际上闵氏一族对俄国的接近，仍旧是在循序推进，其结果是：一八八八年和俄国签订了为俄方要求多年的“陆路通商条约”，开放了西北边境的庆兴府，让俄国获得借地权和工厂建设权，以及准许俄国船舶在中朝国境的图门江自由航行。

朝鲜也像进入了末年的清廷一样，外侮频仍，内乱如麻——这样的状态，对于自一八七六年签订了“江华条约”以来，锐意向朝鲜发展、而且每遇事故就能采取必要措施、逐步前进的日本来说，真是得到了天赐的良机。

“甲午战争”，不能不说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终于发生了必然会发生的战事！

东学党之乱

导发“甲午战争”的直接因素，是朝鲜的东学党之乱。（一八九四年）

东学党是在甲午年之前三十四年，由庆州没落贵族崔济愚所倡导的一种排外宗教，是将朝鲜固有的天神崇拜和儒释道三教的思想以及谶纬、符咒术等等掺合在一起，以对抗“西学”（天主教）为号召而自称“东学”的一种教派，标榜“地上天国”，吸引愚民信仰。但朝鲜国王则指其为邪教，而加以禁止。一八六三年将教主崔济愚处死，教徒四散，教会本部藏入江原道山中，秘密活动。

治安混乱生活困苦

后来，朝鲜内政、外交日益恶化，国民激愤逐渐高涨，东学党势力乃死灰复燃，以崔时亨为第二代教主，积极展开活动。

一八九二年，东学党人掀起“教祖申冤运动”。翌年，多数教徒齐集汉城，在宫廷门前哀诉，为教主伸冤，并陈请承认该教为合法宗教，但被政府拒绝。

当时，正值朝鲜国内治安混乱，生活困苦的农民，纷纷暴动，东学党人便和农民结合，于一八九四年二月十五日袭击全罗道古阜郡官署；这个第一次暴动的结果，朝鲜政府对于东学党取缔更加严格、处置过于残酷，凡是参加暴动的人，不但将之斩首，且更捕杀其妻子，焚烧其庐舍；于是东学党人和农民的叛乱行动，乃更加激烈。

清廷出兵正中日本下怀

三月二十九日，东学党再度在全罗道掀起暴动，蔓延到忠清道、庆尚道，终于席卷了全罗道一带。朝鲜国王——太王李熙鉴于本国的力量镇压不了，不得已乃向清廷请求派遣援兵，清廷于六月四日命令水师（海军）提督丁汝昌以保护在朝鲜居留的中国人之理由，派遣济远、扬威二舰开赴仁川，六月九日，更有由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领的部队一千五百人在牙山湾登陆。

这个行动，对于日本来说，实在是正中下怀。日本在接到依据天津条约告知清军向朝鲜派遣部队的照会时，乃以之为藉口，也自动地对朝鲜出兵。

日本唯恐朝鲜不乱

究其真相，日本是为了制造藉口，自始就在幕后协助东学党，不断地进行着导致事态恶化的阴谋。执行这个阴谋的，是内田良平等所谓“大陆浪人”的组织——“天佑侠团”。内田等人受了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的密命，和东学党人接触，不断地煽诱他们叛乱。四月二十八日，洪启勋所率领的朝鲜政府军队在全州南山打败了东学党，然后与该党议和，已谈判到将近成功的阶段，“天佑侠团”的日本浪人竟将政府使者斩首，于是两军都为之激愤，再度展开激烈战争。对于日本来说，事态的越发混乱，却正是他的目的所在。

日军这种谋略，不仅用之于这个事件；后来，自九一八事变乃至在东北、内蒙、华北等地，只要一有情况发生，就可以看到他们施展像这样的一贯技俩。

日本的“大陆浪人”

在分析日本的大陆政策方面，不能忽视的是“玄洋社”、“黑龙会”这两个国家主义团体的存在。

玄洋社是以在明治十年（一八七七年）以福冈藩士为中心而设立的“开垦社”为其前身，初代社长平冈浩太郎（甲午战争时为日本国会议员）。被称为“大陆浪人”（无固定职业而侈谈大陆问题的日本人）的幕后人物及右翼重镇的头山满和内田良平，都参加了这个社。

“黑龙会”是“玄洋社”的后身，由内田良平于明治三十四年（一九○一年）创立。

这两个团体都是提倡“天皇中心主义”、“扩张国势主义”及“大陆发展论”，而和军阀结合，自明治经大正到昭和年间，对于日本的大陆政策给予了极大的影响。

帮助东学党叛乱的“天佑侠团”，是依据平冈浩太郎和川上操六之间“必须讨伐清廷”的默契，而由内田良平、铃木力（号天眼）等十四个“志士”所组成，和东学党领袖全琫准直接来往，互相呼应，劝诱他们起事。

头山满、内田良平等人，对于孙总理蒋总统等人的中国革命运动，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也都有援助。

但是，由于“玄洋社”、“黑龙会”大部分“大陆浪人”的主义、主张，逐渐倾向于一味尊重日本的国权．国益，作为侵略大陆先锋的行为日益显著，因而中华民国方面固然感谢他们以往对于中国革命的援助，但最后还是只有给予“侵略中国的秘密组织”的评价。（此项在后面将另有叙述）

清廷依据“天津条约”，由驻日公使汪凤藻于六月六日照会日本政府：“基于朝鲜的请求，中国依据保护属邦的惯例，出兵前往镇压叛乱、安定属邦。”同时并声明：“叛乱平定后立即撤兵”。正在期待着会有这个行动到来的日本政府，第二天答复汪凤藻：“不能承认朝鲜是中国的属邦”；同时命令派驻北京的日本代理公使小存寿太郎照会清廷：“日本也出兵”。

然而，日本这个出兵照会，只不过是外交上的一个手续而已，实则早在五天之前的六月二日，已经命令常备舰队集中仁川、釜山待命；并且在接到清廷照会的前一天——六月五日，已经迅速组成了大本营，完成了动员的准备；八日，开始输送第五师第九旅（旅长大岛义昌）约五千人；十六日，进驻汉城、仁川一带，行动非常迅捷。

日方拒绝撤兵

清廷和朝鲜政府，以东学党的叛乱已经平定，要求日本撤兵，但日方拒不接受；清廷为了避免两军冲突，不得已而命叶志超军撤退到汉城南方约八十公里的牙山，待命归国。虽然清军有了像这样的行动，但日军之输送朝鲜，却仍然是继续不断。

日本意在与清廷一战

六月十九日，日本突然提出中、日两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要求。本来，在“江华条约”（一八七六年）早已正式承认朝鲜是“自主国家”的日本，对于朝鲜内政，在道理上实在没有插嘴的权利，清廷当然加以拒绝，同时再三要求日本撤兵；然而日军却在二十三日包围王宫，赶走卫队，耍出了强硬的手段。

日本早已决定强硬态度

日本政府在出兵之初，就已经决定了强硬的态度，外相陆奥宗光在得到清廷出兵的消息之后，立即和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见面，听取意见，川上进言：“与其姑息徒留后患，莫如决心采取一刀两断的重大措施。”同时海军大臣西乡从道也答称：“一切请悉评尊意，当尽可能地承担下来。”陆奥宗光得到了这些支持意见，乃决心采取强硬政策。（东亚同文馆出版“对支（那）回顾录”）

日本内阁，在六月五日阁议中决定了“朝鲜内政改革”的议案，首相伊藤博文所提原案是：“日清两国协力平定朝鲜内乱。为改革其内政，由两国各派常任委员若干名前往朝鲜，担任调查财政、整顿中央及地方吏制、部署警备部队、为振兴公益而发行公债等事项的审查研究工作。”但是陆奥宗光则主张在外交作战方面应该表示出更强硬的态度，所以建议增加两项：“在和清廷的交涉没有结束以前，绝不撤兵。清廷如不同意这个意见，日本就以单独的力量促使朝鲜改革政治。”这样的阁议决定，实则等于最后通牒。

当这个改革案被拒绝之后，日本乃于六月二十二日向清廷提出照会：“业经披沥肝胆，倾吐衷忱，即使和贵国意见有所违迕，帝国政府也绝不撤回朝鲜驻军。”明白地表示出：“此事与清廷无关，而依日本独自主张处理”的方针。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自始就抱着挑动中日战争为目标的强硬态度，从他后来手着的“蹇蹇录”中所叙述的一些事实，可为明证。这些叙述的内容是：“朝鲜有没有实行改革的能力，颇成疑问；不过我们朝野的议论是不问事态如何，就已经达于一致。因为这是促使日清两国关系破裂的最后题目。”以及训令（七月十二日）驻清、驻韩全权公使大岛圭介：“现在只要断然处置，不管利用如何藉口，希即开始实际行动。”继之，又对紧急派往朝鲜的外务省参事官本野一郎电令（七月十三日）：“今天的当务之急，是促成日中之间的冲突，为了决心实行，可以不择任何手段，一切责任，由我（陆奥）承担。”

清军被分割孤立

期待开战的日军，继续不断地增强兵力，七月中旬，在仁川一带的部队已经超过一万人；海军也编成联合舰队，由海军中将伊东亨佑担任司令官，集中仁川附近，俟机歼灭中国北洋舰队。

清军为了对这个紧张的情势有所戒备，乃调遣卫汝贵指挥的盛军六千人进驻平壤，马玉菎指挥的毅军二千人进驻义州。可是由于日军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兵力，各部队被分隔孤立，以战斗力而言，实在是处于极端不利的状态之下。

俄英调停各怀鬼胎

在这个时期，俄、英两国正努力进行着调停的工作。

俄国的调停，是受了李鸿章的请托，曾经两度照会日本，劝告撤兵；只是在俄国本身，并无向远东调移兵力的意图，终于态度不够积极，最后答复李鸿章说：“只是基于友谊作了劝告。”

至于英国的调停，是由驻清廷公使欧格钠担任，欧格钠已经了解日本决心作战，同时清廷也坚持日军如不撤走，绝不先撤。所以在进行调停的中途，便放弃继续努力；而且更改变了态度，和日本秘密约定：“如果打起仗来，不以长江流域为战场，以免损害到英国的利益。”

依据日本方面资料：俄国的“劝告”是在六月三十日，日本接到后，认为是受到了“警告”。至于对英国的调停，日本虽然一再表示不接受，但实则已有谈判的意向，但由于清廷严峻拒绝，反而刺激了日本，故而在给予清廷的通牒中即有：“漠视英国调停好意，依然继续固执日军撤退的主张，杜绝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其责任属于清廷”的表示。

朝鲜“王宫之变”

包围王宫的日军，直接向朝鲜国王李熙提出“改革内政”要求，但是李熙国王也和清廷同样的答复：“先决条件在撤退日军”。日本终于在七月十二日提出“驱逐清军于国外”、“废弃清韩条约”（注）的最后要求，并限十天内答复；及至十天期满的二十三日，便发动了“王宫之变”，表现出要和清军诉诸武力决一胜负的态度，甚为明显。

二十三日的“王宫之变”，是由日本驻朝鲜公使大岛圭介所指挥。日军占领了王宫，迫使李熙国王给予“讨伐清军的委托书”，并将政务委任大院君，大院君立即宣告废弃“清韩条约”，日军算是准备好了对清军开火“师出有名”的行动根据。

甲午战争揭开序幕

清日两军最初的正式战争，是七月二十五日在仁川港外丰岛附近的海上。

埋伏在那里的日本联合舰队第一邀击队所属“吉野”、“秋津洲”、“浪速”三舰，向载运清廷援军前往牙山的“济远”、“广乙”二舰及运输轮船“操江”、英籍租船“高升”四艘船舰发炮轰击；结果，“高升”被击沉，“操江”被俘、“广乙”触礁。

这是比邻的中、日两国之间，最初点燃的炮火。

“甲午战争”，就这样地揭开了序幕，在今天屈指算来，正好是八十年前的事。

注：清韩条约一八八二年，清廷与朝鲜签订“中韩商务章程”，规定两国互派商务委员；两国人民可以互在内地贸易，他国人民则以釜山、元山、仁川三港为限。表示中韩之间的特殊关系与他国不同。

黄海战役

陆上的绪战，是在七月二十八日的“成欢之役”。成欢是由韩城到达牙山（清军根据地）之间的冲要之地，这一仗，得胜的是日本。

八月一日，中日两国同时发出宣战通告。

主力部队决战

继之进行的“平壤攻防战”，是中、日两国主力部队的决战。清军一万四千人，日本方面动员了超过三万人的大部队，（据清军将领业志超的报告；但另据日本方面的资料则为一万二千人。）两军正面对抗，结果清军再遭败绩，在这一次战役中，清军倚为主力的盛军（卫汝贵指挥）、毅军（马玉昆指挥）、奉军（左宝贵指挥）、奉天盛军（丰升阿指挥）、芦防淮勇（叶志超指挥）都被消灭，新式装备的北洋陆军损失了半数以上。

据说，当时驻在平壤的清军，纪律废弛，连总指挥人选也没有能决定，各营都派不出斥候，诸将每天在营中置酒高会。

军队的士气，当然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腐败达于极点的清末社会风气，一模一样地在军队中反应了出来，政府发给士兵的待遇被吃缺克扣已经是公开的秘密，高级将领中嗜好鸦片成瘾者大有人在；民间流行着“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口头禅，军队素质日益低落。

日军装备虽差，组训、士气则优于清军。

以清日两军的装备来作比较，则清军占有部份优势，譬如说：日军使用村田式单发步枪，清军则为连发的毛瑟枪，并配备有机关枪和大炮；日军用国产铜炮，清军为新式铸铁技术的德国克鲁伯炮，射程和连发努力都是日军劣于清军；不过清军的优越武器并非全军普遍配备，而旧式小铳、甚至刀剑、戈矛、弓箭等古董装备，也不算少。

如果把武器的优越性除外，衡量军队的组织、训练、士气各项条件，则日军就要比清军好得多。譬如军队组织，清军虽说是采用西洋编制，但缺乏工兵、通讯、卫生、辎重等兵种，不能适应近代化的战争。还有士兵的素质，日军为征兵制，清军为募兵制，故而老兵较多，训练不够，士气低落。

当时，有一个住在沈阳的英国医生屈芮斯蒂，曾经对其目击清军新兵训练情景作过如下的描绘：“谈到新兵，颇多是来自乡村的农夫、游民等类，装备也不一样，有的扛着生满了铁锈的抬枪（由人抬着点火发射），有的拿着弓箭；他们每天的操练，就只是拿起红缨长枪一齐向前冲刺，大声喊‘杀’！问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地喊叫，他们说：可以威吓敌人，将之击退。像这样训练两个星期之后，他们就穿起前后胸都背了个大圆圈的制服，披上大红坎肩，打着红旗，兴高彩烈地出发。”

平壤败绩的第三天——九月十七日，进行了决定制海权归趋的“黄海战役”。

丁汝昌所率领的北洋舰队，以“定远号”为旗舰，计十二艘战舰；（其中两艘中途参加战斗序列）日本联合舰队由伊东亨佑率领，也是有十二艘战舰，旗舰为“松岛号”。

海战进行六个小时

连续进行了六个小时的海战，北洋舰队损失◎８８０５１０１７３８电话三响后停止。了经远、致远、扬威、超勇、广甲五艘，其余七艘也受到损伤，在其后的一个月之间不能上阵。当时，据北洋舰队向李鸿章报告：击沉了日舰三艘，但实则是误报，因为所报击沉的日舰，后来都曾参加了攻打威海卫之战和台澎战役。

北洋旗舰定远和同型的镇远两舰，是世界有数的巨舰（七三○○吨），在黄海之役的八年之前，曾经驶达长崎修理，当时日本只有三千吨级的军舰，使日本人大为惊骇，火力方面配备有三十公分口径的克鲁伯炮四门，具有很大的威力。但是拥有这一些军舰的北洋舰队，是在甲午战争的七年前编成之后，就没有补充新舰，因而被造船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时代所遗弃，在航行速度方面沦为迟缓落后的庞然大物！然而就在这个期间，日本已经能够凭自己的力量建设造船厂，开始制造二千吨级军舰，可是清廷却以为“日本还不会有这个条件”，而加以讪笑。

结果，新造的日本军舰竟然有最快二十三海里的速度，定远却只不过是十四五海里，而瞠乎其后矣！

在甲午之战的三个月之前，有参观北洋舰队演习的某英国人，指出速度赶不上日本海军，劝说购买英国新造军舰二艘（二百万元），当时，清廷为筹备慈禧太后寿诞庆典费钱，故而未能成交，反被日本买去，其中一艘命名为“吉野号”，在这一次的“黄海战役”中，为日本的快速主力舰，大为活跃，使北洋舰队吃了苦头。

清军失败的症结

从上面所述陆战、海战的情况，来观察其所以失败的因素，则清廷自强运动．洋务运动的缺陷，越发浮雕得分外鲜明——这就是说，虽然购买了新式武器，但是组织和训练不够彻底，则在精神方面依然故我，毫不长进，吸收科学技术更不能持之以恒，则一时到手的“坚船利炮”，不旋踵又会被抛弃在时代的后面。

胜败荣辱的区别，就是在于当时中日两国精神方面和政治、社会结构方面的差异。

日军转向大陆

‘我（蒋总统）认为甲午之战在中国来说，该是最大的耻辱。在和日本一开战的同时，北洋舰队立即溃败；可是同属中国的南洋舰队却不仅袖手旁观，而且还宣告中立。这是在向国内外显然表示中国人没有民族思想了国家观念，也暴露了没有团结一致的精神，像这样的情况，怎能不受外国欺侮？如何能免于失败？’（注一）

清廷蒙受了失败的屈辱，可以说是当然的归结。

相对地，在平壤和黄海两度大捷的日本，则乘势指向中国大陆。

日本大本营最初的作战计划，是要首先打垮中国的海军，夺得渤海的制海权；使陆军从距离北京最近的渤海湾登陆，在直隶平原和清军决战；然后进逼北京，迫使清廷订城下之盟。

日军侵入渤海湾

然而，在黄海战役中，中国虽说已经打败，可是还有残余的舰艇，仍然掌握着渤海的制海权。北洋舰队隐藏在威海卫，维持着向旅顺方面输送兵力，于是日本大本营便因而变更了作战计划——决定先夺取旅顺和威海卫两个军港，以打开侵入渤海湾的进路。

占领了朝鲜的日本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由义州、新义州渡过鸭绿江，侵入安东、岫严，在辽东半岛构筑了桥头堡。同时以大山岩为司令官的第二军于十月二十四日从花园口、貔子窝登陆，攻陷金州、大连，十一月二十一日占领旅顺，继之拿下盖平、营口，控制了辽东半岛。这个时候，日军在旅顺不问军民男女大事残杀，当时据英国泰晤士报报导，旅顺市内的中国人只剩下了三十六个，此外都被杀光了。

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日军为了攻打威海卫而在山东半岛的登陆作战，从第二年一月十九日开始，动员了“吉野”“高千穗”等军舰，连续两天由海上发炮轰击蓬莱地区，佯动作战之后，而实则以三万人在距离该处约一百七十公里的山东半岛东端的荣成附近登陆，指向威海卫。丁汝昌的北洋舰队和地面部队呼应作战，由海上炮击日军，日军以鱼雷艇封锁湾口，将北洋舰队堵塞在湾内，并攻占沿岸陆上炮台，反而用之向北洋舰队轰击，结果，旗舰“定远号”因受重创而自行凿沉，其余舰艇或被击沉、或被俘虏，丁汝昌自杀，北洋舰队于二月十二日，全军覆没。

根据二月十七日松达日本大本营的报告，日方接收了镇远、济远、平远、广丙等十二艘舰艇，而依军礼遣“广济”舰送还丁汝昌遗体，以赞扬其殉国的军人精神。

当宣战的同时，和日本朝野一致协力的情况比较，清廷内部则有“主战派”和“主和派”之分。“主和派”以李鸿章为首，仅有兵部尚书系毓汶、军机大臣徐用仪等少数人，稍能得到慈禧太后的消极支持，不过，慈禧主和的理由，却只不过是为了她在十月十日的六十寿诞庆典希望能够平平安安地按照预定计划举行而已。

这时李鸿章已经秘密地和俄、英两国联络，打算请托斡旋和谈，在这里特别交待的是俄国的活动。

俄图利用清日纷争

俄国在东学党事件时，曾经对日本提出撤兵劝告之后，一时好像是在缩手观望，然而伴随着事态紧张程度的高涨逐渐改变了态度。在清日两军“成欢之战”的七月二十九日及两国宣战翌日的八月二日，俄国驻北京公使喀西尼两度告诉李鸿章：“已经和本（俄）国政府联络，请迅速派兵前往朝鲜驱逐日军；还有俄、英两国并已要求汉城日军退往仁川，如果不接受劝告，则关于采取必要措施方面，两国业已意见一致。”后来，虽然没有发展到派兵的程度，但是在甲午战争期间，将陆海军兵力向远东移动，而有侵入朝鲜和东北地区的意图，则确属事实；而李鸿章本人也有请托俄国斡旋停战的“联俄制日”意向；俄国为了要利用清日纷争，成为自己向远东发展的最好机会，乃对李鸿章鼓舞激励，因为中国方面如果避免对日应1[166]166战，而使好不容易点燃了的战火平熄下去，则对于俄国并非有利；当然因此而对于日本也就保留余地而不会表示出强烈的反对态度。总之让清日两方面打起来，不管其胜败如何，两国的损失都不会小，因此而坐获渔人之利，这才是俄国的立场。这样的态度，后来在“三国干涉”（注二）的时候，便显露了出来。

慈禧起用主和派

九月二十九日，慈禧起用“主和派”的恭亲王，因之而使清廷的和平工作迅速具体化，当时清廷请托了英、俄、美、法、德、义六国调停，其中最积极而摸到了头绪的则是美国。

十一月二十七日，由美国转来了日本外务省的备忘录，告诉清廷如有求和诚意，首先派全权代表前来，然后当可提示讲和条件。清廷通过美国想试探条件如何，但在这时日军已经攻下了旅顺，毫无商量余地，对于清廷希望在烟台或上海谈和的要求，也立即予以拒绝。

结果，清廷只有依循日本的提议，派户部侍郎张荫恒、湖南巡抚邵友濂两人为代表，决定前往日本大本营所在地的广岛，但是，由于清廷迟疑不决而拖延过了新年，就在此时，战火又蔓延到了山东半岛，使清廷的立场陷于更艰苦的境地。

注一：蒋总统—“拥护公理与抗御强权”（一九三一一○）

注二：三国干涉在马关条约交涉时，日本要求割让辽东半岛，清廷已经同意，但因俄、法、德三国干涉，日本屈于外交压力而归还中国（后面将另有详述）。

日提苛刻条件

清廷的全权代表张荫恒等人于一月三十一日到达广岛。

日本方面，以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为全权代表。二月一日，首先向张荫恒等询问清廷有否给予全权，要求书面答复；这一点，实则是张荫恒等的弱点所在，因为清廷并未给予多大的权限，光绪的谕旨只是限于“日本的要求，均须先行呈奏，候旨遵行。其与国体有碍及中国力有未逮之事，不得擅行议定。”于是张荫恒等答称：“签署条约有经清廷许可之必要，故须将条约暂时携回去，候皇帝批准施行。”伊藤博文则表示“这点权限，够不上是全权”，而拒绝任何谈判，然后并要求必须恭亲王或李鸿章亲自前来。

拖延时间扩大压力

日本找这样的藉口拖延时间，却另有一个阴谋，就当张荫恒等人即将到达之前的一月二十七日，在广岛所举行的御前会议中，曾经决定了“秘密政策”，其详情固然不得而知，但只要从后来的军事行动和外交活动看来，至少可以揣测得到其意图是在将中国的海军歼灭之后，需要争取一点时间，好将兵力调往台湾方面。当时日本的第二军已经在山东登陆，迫近威海卫；如果更进一步扩大到对于台湾、澎湖一带广大区域伸展压力，则可以拿出更苛刻的条件来向清廷作强迫性的要求。

据日本方面的资料，在上年十月中旬所举行的有关阁僚会议中，已经决定了割让领土的要求，在旅顺、大连之外，更包括台湾在内。一月二十七日的御前会议，又正式决定稍稍扩大，而且具体地划出了范围——台湾全岛暨其所属各岛、澎湖群岛，以及包括辽东半岛在内的奉天省（现在的辽宁、安东两省）南部地区。

清廷派李鸿章赴日

由于北洋舰队在威海卫覆没（二月十二日），清廷的“主战派”也为之倾向于和谈，于是决定了派遣李鸿章为全权代表前往日本。在日本方面，因为已掌握了胜利的形势，当然不会放弃机会，故而开始明白地表示出割让领土的要求；在清廷方面最初的方针是对于这一点不能同意，但因为战局不利，终于坚持不下去，而给予李鸿章以割让领土的全权。

谈判于三月二十日在马关（日本的下关）春帆楼开始。

苛刻的停战条件

在二十一日的第二次会谈中，因李鸿章要求停战，伊藤博文乃提出限三天答复的停战条件其要点如次：

一、大沽、天津、山海关的所有城池堡垒，一律由日本军队占领，所有清军的军需品，都交给日军暂管。

二、天津——山海关铁路交由日军管辖。

三、停战期限内，日本军费由中国负担。

四、停战日期及两军境界线等细目，俟中国同意上述各项后再议。

根据日本方面纪录：李鸿章颜面苍白，连呼：“苛刻！苛刻！”盖当时日军虽已占领了威海卫，但并没有攻占到山海关、大沽、天津各地，实在是过于超越了现状的蛮横要求。

在日本方面，如果立即同意李鸿章的停战要求则有困难，因为这时已经在秘密发动“台湾作战”的动员工作。

由“松岛”、“桥立”等十一艘军舰编成的“南方派遣舰队”，在伊东亨佑的指挥之下，三月十五日自佐世保出港，二十日到达澎湖群岛南边的“将军澳屿”，等待天气恢复正常，攻击澎湖本岛，二十三日开始登陆，二十四日便控制了澎湖全岛。

李鸿章就有关停战条件向清廷请示结果，决定将停战问题搁置，直接谈判媾和，于是二十四日第三次会谈，便要求日方提出议和条款，这时，伊藤博文才表明占领了澎湖的事实，至于详细条件，要等到明天再提出来，第三次会谈就这样地结束。

李鸿章遇刺

会后，李鸿章在返回旅舍的途中，发生了被日本人小山丰太郎（又名小山六之助）行刺，左颧骨中弹重伤的事件。

日本政府大为狼狈。内外情势，都在朝着停战的方向推动，假定李鸿章以负伤为理由而回国，则使停战交涉碰上了暗礁；而注视着交涉动向的列强，会有群起非难日本，并加以干涉的可能性，因此，日本的态度突然转变，对李鸿章殷勤道歉，同时断然决定了无条件停战。

在日本方面当时的情况是：“朝野人士大为惊愕，由全国而来的慰问团体涌到下关。”明治天皇以诏敕表达遗憾之意，并送来皇后手制的绷带。在另一方面，日本政府虽然决定了无条件停战，但恐怕被指为是由于李鸿章负伤而对之让步的交换条件，将会引起军部的反对，特别履行了请求天皇裁可的手续。

至于列强的动态，这时已经接到俄国（二月十六日）、德国（三月八日）送来对于领土要求的警告，日本政府也佐表现出慎重将事的意向。

李鸿章负伤之后，乃山以参议身分同行的长子李经方为之代理，于三月三十日签订了停战协定。就在这一天，行刺犯小山丰太郎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签订马关条约

停战条约的内容是：“停战地区只限奉天（辽宁）、直隶（河北）、山东三省，台湾、澎湖除外。”“停战期限二十一天，届期和议不成，停战条件即行中止”两项。

继之，日本方面又于四月一日提出了“媾和条款”，其主要项目如次：

“一、清廷承认朝鲜为完全无缺的独立国家。

“二清廷因战败结果，将奉天省南部地方及台湾全岛、澎湖群岛让给日本。

“三、清廷赔偿日本军费三万万两，分五年支付。

“四、清廷以和欧洲各国所签订的条约为范本，与日本缔结和对欧洲各国同等待遇的‘修好通商条约’。

“五、在过去已开通商口岸之外，应增加开放北京、沙市、湘潭、重庆、梧州、苏州、杭州各地，以便日人居住及营业。

“六、为保证履行条约，允许日本暂时占领奉天及威海卫，并支付其军费。”

李鸿章的说帖

李鸿章对于日本的条款，提出四点意见作成说帖（意见书），答复日方，加以辩驳：

“一、第一条关于承认朝鲜完全独立，应该增加日本也承认其独立。

“二、日本在开战时，曾经通告各国，是为了维护朝鲜自主而战，并非贪图中国的土地；希望不失初心，对于要求领土问题应该加以修正。

“三、关于军费一节，实际费用不至有如此之多，并且中国也没有那么多的支付能力，希望重行考虑。

“四关于通商权利等项，逐条答辩，请再作考虑。”

这个说帖，全文二千余言，特别强调不应有为中日两国将来种下祸根的条约，其大意是：

“如果强迫中国任凭摆布，则不仅不能防止争执，反而会使两国纷争因而层出不穷，子子孙孙永为雠仇。

“倘为两国人民深谋远虑，则应缔结为图永久和好、互相援助的条约，彼此合作，在亚洲筑一长城，抵御欧洲列强的欺侮。日本如不此之图，而徒逞一时之强，需索无餍，则中国人民势必要卧薪尝胆，湔雪国仇。东方两国如果愚蠢至于同室操戈，不相互助，则徒然都会招至外人的攘夺！

“深愿各项条文都能妥善，而不宜遗留丝毫弊害，两国国民数代以后的百年幸福和命运，系于当前双方全权代表的掌握之中，今日赔偿数额的多寡、得地以扩充幅员的广狭等问题，都非关紧要；而最重大的是要能有在将来两国之间不生嫌隙，永远和平互助的条约。”

在日本的资料中，对于这个说帖的旨趣，只简单的提到一点。唯关于军费问题，则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李鸿章当时曾经提出反论：“据新闻报导，直到今天军费未达一亿五千万两，如将军舰及其他战利品加算在内，毋宁说应该减为一亿两，始属允当。”然而日本方面则认为李鸿章的主张“只是外交上讨价还价的拖延策略”。

伊藤博文一味恫吓

伊藤博文在表达主张的时候，始终带有胁迫、侮辱的语气，他说：“日本是战胜国，清廷是战败国，这是战争的结果，不是通常的谈判；如果不幸而谈判破裂，只要一声令下，六、七十艘运输船舰出动，北京的安全，便无法保障。”一味恫吓，毫不接纳中国方面的意见。最后，李鸿章追问：“何以要如此折磨中国？”伊藤竟然信口开河地答称：“一切都是中国的责任，还有什么办法好想！”

十四日，传闻日本小松宫彰仁亲王被任命为日军“征清大总督”，已有三十几艘船舰运兵前往大连。结果，李鸿章只争到了赔款减额和割让辽东半岛的范围缩小，而终于签订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污点的“马关条约”（日本的正式名称是“日清媾和条约”又称“下关条约”）——时间是在一八九五年的四月十七日上午十时。

当时，日本曾将李鸿章和清廷之间往返通讯的电报密码差不多完全能够破译出来（东亚同文馆版“对支回顾录”），所以对于清廷在开始一直拒绝日本要求，后来被李鸿章说服、打算承认赔款的数额及割地范围等情况，暸如指掌，故而谈判的一切过程，都是依循日本的步调进行。

中国地位一落千丈

清廷自因“鸦片战争”签订“南京条约”（一八四二年）以来，连续不断地订立了“不平等条约”，固然逐渐有损于他的国际地位，可是直到“甲午战争”之前，虽不能算是世界上的一大强国，但毕竟还是个一等国家；然而由于“马关条约”的签订，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值得危虑；而列强对于中国的观念也大为改变，蚕食、瓜分的侵略野心都越发露骨地表现了出来。

民心仇日自此开始

在中国国内，无论朝野官民，对于“马关条约”无不切齿腐心，深为愤慨，纷纷责骂李鸿章出卖了国家；从这里开始，在中国滋生了“仇日”的民心士气。“马关条约”，对于往后的中日关系，投下了不幸的阴影！

日本走上霸道

“马关条约”彻头彻尾地摧毁了一八七一年“清日修好条约”的平等互惠精神，仅仅是在四分之一世纪之间，日本便转变成了一个侵略的国家，走上了霸道的途径！

在这里，要将“马关条约”以及有联带关系的“中日通商行船条约”（简称“中日商约”。日文名称为“通商航海条约”）的主要内容及问题之点，列举如下：

断送朝鲜割让台澎

朝鲜问题中国明确地承认了朝鲜是完整无缺的独立自主国家。因此，凡是以往朝鲜对于中国所实行的朝贡、礼仪等事项，便因有损其独立自主的体面，一概废止；中国对于朝鲜的宗主权，也就见诸明文而被完全取消。

割让领土被割让的领土为“奉天省南部（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属岛屿”“澎湖群岛”，但后来辽东半岛却成了俄、法、德三国干涉的原因。

赔款等于日本四年岁入

赔款库平银二万万两，分七年支付。相当于当时日币三亿六千万元，又等于日本政府四年岁入总和的钜额，也是后来日本政府所公布的军费二亿零四十七万元的一点八倍。这一笔钜款，和鸦片战争赔偿英国的二千一百万两、英法联军各八百万两等情形比较，可以说是金额太钜，过于苛刻的赔偿。

日藉赔款奠定经济基础

日本以这个赔款为基金，将日本货币由原来的银本位制转换为所期望的金本位制，加强了在经济方面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信用程度。

在国内，则奖励工业、特别是军需工业的发展，完成了落后于欧洲列强的产业革命，奠定了后来成为经济强国、军事强国的基础。一八九七年所设立的国营八幡制铁所，也是以这个时候的赔款为资本而达成的。八幡制铁所后来由中国购买便宜的矿砂和煤炭，规模越发扩大，成为日本工业了核心，台湾以及朝鲜、中国，都成了工业国家——日本的原料供应地，也成了工业产品的市场。

航行权远达重庆

通商日本获得了和欧洲各国同样的最惠国待遇；新签订了“通商行船条约”；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在过去业已开设商埠的十三个口岸之外，续有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处开放通商；以及抵达重庆的长江航行权和由上海到苏州、杭州的吴淞江、运河航行权，在航运方面，原先自明治初年（一八七○年代）以来，日本邮船公司业已开设了中日航运路线，继之在马关条约的再下一年，大阪商船公司又在长江开设航路，以及大东汽船、湖南汽船等公司也都加入了中日航路；日本对中国的航运，在战后的十年之间，增加了一倍。

工商业进入中国大陆

由于在关税方面的特惠措施，日本的工商企业逐渐进入中国大陆。一八九五年，在上海建设纺织厂，到了一九○七年已达一千一百四十九家。此类对华投资事业，半数以上都是日本政府所直接经营，在经济方面，开启了对中国的支配头绪。

租界在“通商行船条约”即将换文之前，依据日本提出的要求，以文书规定在上海、天津、厦门、汉口四处设日本专管租界；后来，租界又增设到苏州、沙市、福州、重庆各地。

三国干涉割让辽东半岛

关联到割让辽东半岛问题的所谓“三国干涉”事件，自其结果衡量，对于中国来说，却是很大的损失。

当时，俄国正进入朝鲜北部，构成了向中国东北地区伸展的基础。在远东觅求不冻港，是俄国的国策，故而辽东半岛的旅顺、大连，对于俄国来说，实在是梦寐求之的港口。所以，李鸿章在伊藤博文正式提出割让的要求之初，马上电达清廷总理衙门告知俄国公使喀西尼，俄国一得到报告，果如李鸿章的心意，立即号召列强，协同对日本加以压力，企图迫使放弃攫取辽东半岛的野心。

对于俄国的号召，英美两国反应冷淡，法国由于站在和俄国是同盟国的立场而赞同，德国则因为在过去他的势力还没有达到中国，为了想在远东能够得到殖民地和市场，认为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故而参加。

根据日本资料，俄国于四月三日得知其事，俄皇尼古拉二世立即召集御前会议，研讨之后认为：“如果让日本领有辽东半岛，则损害到俄国的利益、威胁到远东的和平。”故而决定了强硬方针，劝告日本放弃。倘使日本拒绝，则“自由行动、任意采取维护利益的适当措施。”俄国为此对法国展开活动，再由法国的提议而拉到了德国。四月二十一日在伦敦发布了消息，日本政府则于四月二十三日接到三国公使送来的劝告。

日本有三个方案

日本在四月二十四日的御前会议中，提出了三个方案：“拒绝三国要求，不惜与三国开战。召开列强会议，由包括其他列强国家在内的国际场合，解决辽东问题。接受三国劝告，将辽东还给中国，以示恩惠。”以上三案经研究之后，一时决定实行第二案。因为日本所恐惧的是三国出动武力干涉，当时，日本的精锐部队陆军派遣在辽东，海军派遣在澎湖，本土防卫则近乎空白状态。

然而，当时因病未曾出席御前会议的外相陆奥宗光对于业已决定采取的第二案却有意见，他认为“如果召开列强会议，则各国都会为其本国利益打算，不易收拾，马关条约将有被搞1[180]180到支离破碎之虞。”由于陆奥的反对，后来改采了第三案。

不过，在立场方面，只是对三国让步，而对于中国绝不退让的基本路线则丝毫没有改变。

在这个时候，俄国以海军中将契尔托夫为东洋舰队司令官和德、法两国海军编组联合舰队，在山东芝罘集中二十几艘军舰，向日本示委。又据说在西伯力亚方面紧急召集预备兵，和现役兵合计集结了五万兵力，准备向东三省及朝鲜出兵。

日本割取台澎

当接受了三国提案，决定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之际，日本再次威迫清廷，增加三千万两赔款，作为赎回辽东的代价。而且三国干涉，与其以为是帮了中国的忙，则毋宁说是在各为其本国的利益打算，故而在不久之后，便向清廷索取“酬劳”——俄国对于大连和旅顺、德国对于胶州湾、法国对于广州湾、连英国也对于威海卫和九龙，都各自提出了租价的要求。所以三国干涉的结果，反而徒使国际瓜分中国的活动，更加激化起来。

朝鲜与清廷联俄受害

三国干涉的结果，对于朝鲜的政局也发生了影响。闵氏一族看到日本屈服在三国的压力之下，于是便迅速对俄国接近，一八九五年七月六日发动政变，将政府内部的亲日派排除，同时起用了亲俄派。针对这个行动，在日本公使三浦梧楼的策划之下，有二十多个日本人协同朝鲜的亲日派分子拥护大院君，于十月八日发动了又一次的政变，将闵妃杀害。未料此一事件，反而煽起了朝鲜民众的反日感情，亲日政变又立即被推翻，日本并且同意了俄国在朝鲜的驻兵权。

今年（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五日，在汉城发生了行刺朴正熙总统的事件，朴夫人中弹殒命之后，韩国的新闻报导，都指称为“第二闵妃事件”，给予世人一个新的印象。

在那个时候，不仅是朝鲜，就连清廷方面也兴起了联俄制日的活动，于是签订了所谓“中俄密约”（李鸿章、罗拔诺夫协定，已见前述），清廷为了要藉以牵制日本，乃允许俄国的势力进入了东北地区；而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更是诱引俄国向远东发展的契机，又为造成下一个国际紧张局面——日俄战争的远因。

国人开发台湾

现在，对于另一个被割让的地区——台湾、澎湖，在这里也必须加以提及：

‘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发现台湾，已经是一千七百二十多年前的事。我们中国人自那时以来的长时期中，辛勤开发，努力前进，从洪荒进入到文明，从乡村发展到城市，都是我们中华民族血汗的成绩。在明代末期的一六四二年，台湾为荷兰所占据，凡三十八年；郑延平王奋勇驱除，竟告光复。这时期，大陆上志士仁人渡海来台，为反清复明而奋斗，不但经济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赶上了中原，并且使民族大义和祖国感情深植于民心。然而及至清代末期，台湾先为法国所袭击，后为日本所割取。’（注一）

割让予日激起民愤

当割让给日本的消息传到台湾的时候，激愤的居民涌到巡抚衙门，要求废止协约，街头鸣锣罢市，哭声震天。

巡抚唐景崧向北京报告了民情，但清廷并无答复；并且请求援军，也被漠视。不仅如此，当马关条约换文之后的五月二十日，清廷更命令唐景崧解职，以及在台驻军全部撤退。

最后，台湾除凭藉地方力量抗日之外，别无办法。于是乃以丘逢甲为统领，编组义勇军，制定蓝地黄虎旗，宣言彻底抗战。在台南方面，总兵刘永福也率领黑旗军与台北互相呼应。

日本方面，任命海军大将桦山资纪为台湾总督，并出动北白川宫能久亲王所率领的近卫师团，进行武力镇压。

五月二十九日，日军由台湾东北边的澳底登陆，攻下了基隆、台北；循西海岸南下，经过五个月的攻击前进之后，于十月二十一日夺得台南，掌握了全岛。丘逢甲、刘永福脱走厦门，但其后义勇军的抵抗并没有终止，一直继续进行了七年之久。在上述五个月的战斗中，日军死伤五千多人，患病二万七千多人（其中多数病死），能久亲王也没有能够生还，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和在辽东、山东方面损失一万七千多人比较，其牺牲率实在是相当的高。

在日本方面的资料，据说死伤者七百多人，病兵二万人（病死人数不详）。

能久亲王于十月二十八日殁于台南，据日本官方发表死因为“水土不服”，但在台湾的说法是“八月二十六日在八卦山侦察之际，被炮击受伤不治。”

日本据台进行侵略

日军付出了这样大的牺牲，来占领台湾，是基于军事上的需要，所以在后来，日本南进作战的时候，台湾便成了预先部署好的极重要的一步棋子。

‘台湾是我们大陆东方唯一的门户，是东海与南洋岛屿中间的锁钥；而在亚洲东南诸岛里面，气候最为适中，特产也最称丰富；所以帝国主义者要吞蚀我们中国的领土，要完成西1[185]185太平洋的控制，比先劫夺我们台湾的土地，奴役我们台湾的同胞。被日本掠夺的台湾，在后来的五十年之间，作为西窥大陆的基地，南进海洋的跳板，我台湾同胞的膏血和天然的资源竟成了日本军阀高呼着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牺牲品。’（注二）

注一：蒋总统—“台湾光复五周年纪念告全省同胞书”（一九五○一○）

注二：蒋总统—“台湾光复四周年纪念告全省同胞书”（一九四九一○）

列强进行瓜分

自南京条约开始到马关条约之前，可以作为列强侵略中国的第一期；由马关之后到八国联军（义和团之乱），该算是第二期。

所谓划分势力范围

马关之后，列强的侵略方式为之一变，乃由在此之前的追求利权（领事裁判权：关税协定权、内河航行权等），变为更进一步以设立租界、铁路借款、划分势力范围等瓜分中国领土的要求为目标。

所谓“势力范围”，就是某一个国家指定特定区域，要求清廷不得出让给他国，这可以说是瓜分中国领土的准备阶段。

现在自蒋总统手着‘中国之命运’（一九四三年）一书中引用外国侵略的第二期资料，列表附录于本篇之末。

士大夫的醒悟

‘列强乘日寇欺我之余，竞取中国的领土为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或修盖兵营、或建筑军港、或取得铁路建筑权、或取得矿山开采权。琉球、香港、台湾、澎湖、安南、缅甸、朝鲜沦亡的惨剧，尚在眼前，领土全部瓜分的大患，复迫于眉睫。于是雪耻图强的运动，奋起于中国国民之间。在此时期，士大夫亦渐知中国之所以衰敝，不单由枪炮轮船不如西洋，其主要原因，在于政治的积习腐败。要怎样才可以改革政治？见到这一个问题的人士，答案又各有不同。惟我国父顺应时代与民族的要求，主张革命，乃组织兴中会于檀香山，招集同志，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以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积极推进革命。’（注一）

戊戍政变失败

当时，在中国国内，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中心的“变法运动”，正在进行。这个运动，反对只知道吸收“船坚炮利”的西洋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而主张效法日本的明治维新，将清廷改为“君主立宪”政体的运动。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启用康有为，下诏变法，着手改革国政——这就是“戊戍政变”。然而当时的清廷，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人士掌握着实权，由于他们的反击，“变法运动”昙花一现，仅仅一百零三天便失败了；光绪被幽禁，康有为赖伊藤博文之助亡命日本，在日本试图扩大保皇党的组织，但终于脱离不了“维护清朝”和“君主政体”的范畴，而和国父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对立。

发生义和团之乱

继之，发生的是“义和团之乱”（一八九九——一九○○年），由于清廷偏袒“义和团”，结果爆发了“八国联军战役”，招致了更严重的国耻——“辛丑条约”（一九○一年）的签订。

“辛丑条约”以后，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国家，以中国为对抗的舞台，由亚洲向全世界扩展的祸患，就是由这里开始的。

附表：

一、势力范围、租借地等

（一）英国

一八四六年明定“舟山群岛不得给予他国”。（开划分势力范围的先例）

一八九四年明定“孟连与江洪不得让与他国”。

一八九八年租借威海卫及九龙。

一八九九年英俄两国相约划长江流域为英国建筑铁路的范围（交换条件是俄国获得长城以北的路权）。英商福公司取得山西、河南两省的采矿权。

（二）法国

一八九七年海南岛不得割让给他国。

一八九八年广东、广西、云南三省不得割让给他国。取得延长龙州铁路权、建筑滇越铁路权，及广东、广西、云南的采矿权。

一八九九年租借广州湾。

（三）德国

一八九八年租借胶州湾。取得建筑胶济铁路及沿线三十里（约十七公里）以内的采矿权。

（四）俄国

一八九六年划东三省为其势力范围。

一八九八年租借旅顺、大连湾。取得旅大一带铁路、矿山、工商各特权。

一八九九年和英国相约决定长城以北为其建筑铁路的范围。

（五）日本

一八九八年福建省及其沿海不得割让给他国。

二、租界

一八九五年德国——天津、汉口。

一八九六年俄国——汉口。法国——汉口。日本——杭州。

一八九七年日本——苏州。

一八九八年日本——天津、沙市、汉口。

一八九九年日本——厦门、福州。（译注）

三、外国军队驻扎权

一八九六年承认了俄国在中东铁路一带的驻兵权。（开列强驻兵权的先例，其后各国都援例驻兵。）

四、邮政洋员任用权及外国邮局

一八九九年法国要求在邮政局内任用洋员，各国援例效尤。其后，列强各在中国设置邮局控制了中国的通信事业。

五、设厂制造权

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规定：“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得任便从事工艺制造，并得自由进口机器（但应缴纳进口税）。”这些口岸工厂的制品对中国输出（实际是就地卖给中国）时，在各种税法上都有减免其税捐的规定。于是，其他各国便援用最惠国条款，也都获得了和日本同样的特权。

注一：蒋总统—“中国之命运”（一九四三三）

译注：列强在中国设立租界，以一八四五年在上海划定“公共租界”开始；其后，陆续在上海设法租界，营口、汉口、九江、镇江、厦门设英租界，广州沙面设英、法租界，烟台设公共租界。以上系在马关条约之前，非属于列强侵略中国的第二期，不在本文范围内，特为附注。

义和团之乱

要是探究“义和团之乱”的起源，应当归着于无知的民众对于基督教、天主教的反对。

虽然清廷已经在一八五八年签订“天津条约”时，许可了西洋教会在中国国内传教，但是在民间视教会为邪教的人仍然不少，地方上纵火焚烧教堂的事件，时有所闻。

在民智闭塞的中国社会看来，西洋教会是有悖于中国传统风俗的，他们对于诸如禁止祭祀祖先、男女同做礼拜、教会医院的外科手术，都不习惯；甚至还有“教会诱拐儿童挖眼剖心制药、敲骨髓榨油”等等的传说。

本来，教会在各地传教，确实也有兼负推动侵略性的贸易和促进西洋化的尖兵任务；故而一次又一次地招致国耻接踵而来的清廷，在生活日益贫困的群众心目中，简直就是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的帮凶。

打着扶清灭洋旗号

“义和团”是在山东承袭了自元朝传布下来的白莲教流派而组成的一种宗教团体，自称天降神兵，娴习拳棒，狂信神符神咒护体，刀枪不入；打着“扶清灭洋”旗号，以教会为仇敌，在山东肇乱。清廷虽曾一度派遣袁世凯前往镇压，但祸乱却蔓延到了京畿所在的直隶省（河北），而且连慈禧太后不久也被说服，反而站在支持他们“扶清灭洋”的立场。于是，得到了清廷支持的“义和团”，对于洋人便更加肆无忌惮、极尽其暴虐之能事。

袭击各国公使馆

一九○○年五月，义和团暴徒进入北京，治安混乱，各国公使再三要求清廷镇压，清廷置之不理。最后，各国只有决定派遣军队进驻北京，护卫公使馆。五月三十一日，英、法、俄、美、义、日六国（德、奥两国后来加入）军队四百九十人进入京城，然而“义和团”却在六月八日将天津到北京之间的铁路和电讯线路破坏，使在北京的外国使馆和驻军陷于孤立状态；于是，各国乃推举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薛摩尔为总指挥，率领由各国军队约二千人所编成的“解围纵队”，六月十日，自天津向北京出发；这个部队受到“义和团”的阻挡，未能到达北京，“义和团”则在京城内为所欲为，各国公使馆受到群众袭击，日本公使馆书记杉山彬、德国公使克林德都在这个时候遇难。

各国联军乃以攻占北京为目标，而正式采取武力的措施，首先由军舰炮轰大沽炮台并将之占领；继之，增援部队陆续登陆。清廷面临这个情况，乃于六月二十一日下诏对各国宣战，命令“义和团”攻击各国公使馆和天津租界。在这个宣战诏书中，只提到“远人”，至于究竟以那个国家为敌，却没有交待明白，真是古今所未有的奇文。

日本乘此机会，打算大规模出兵，以图扩大对清廷以及对各国的发言权。六月十一日，外相青木周藏对驻英国代理公使松井庆四郎发出密电，告知日本打算增派军队，指示松井探询英国政府的意向，当时英国政府的答覆是“希望和各国一致行动”而予以谢绝。

可是战局日益激烈，开向北京的各国联军——解围纵队，也在途中被包围而陷于苦战，因之，事态急遽变化，英国政府反而于六月二十三日请求日本出兵，青木周藏立即决定派遣第五师团一个师（师团长山口素臣）兵力一万五千人前往大沽；但在这个当口，却又因未能得到俄、德两国的积极赞成而一时作罢；然而，北京的情势越发恶化，英国终于提出愿意负担军费，恳请日本派兵，日本允诺所请，兵增派七千人，合计二万二千人，于七月六日出发。

当时，英国政府照会日本，关于增派二万军队，由英国支援军费一百万镑。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

经过了两个月的战争之后，八国联军于八月十四日攻陷北京，慈禧太后等人逃亡西安，清廷这才决定求和，于是便签订了“辛丑条约”。（在参战国之外，又有比利时、西班牙、荷兰加入，合计十一国。）

‘义和团事件，是我们中国继甲午战争之后的最大国耻，不辨国籍，不分恩怨，仇视所有的外国人，充分表示中国人没有国际知识，而招致了外国人的轻蔑欺侮；是当时国民知识程度的象征。’（注一）

钜额赔款国穷民困

“辛丑条约”的赔款，达到了四万万五千万两，日本分到其中的百分之七点七，计三千四百七十九万余两。中国由于支付如此钜额的赔款，国家财政大为艰苦，人民生活陷于极端贫困。

尤其是依据条约将对外收入来源之协定关税的税则税率变更，并以关税收入抵付赔款，给予国家财政经济的影响更大。

具体地说：就是协定关税在变更之后，外国商品更增加了减免的特权；本来，在中国的立场，因为要赖以支付赔款，毋宁说是应该加重关税才成，然而变更的结果与目的恰好相反，于是对外国商品的减免税额，都只有加重到国货的税收上面，以致国货连在中国领土内，也不可能和外国货竞争，国内产业因之更加衰退。

此外，为了管理抵付赔款的关税，乃由外国人担任总税务司，负责支配。关税摊还赔款之后如有余额，也要存入外国银行，让人家保管。

由惧外转而媚外

‘不独中国经济的精华，为帝国主义者所吸收；即帝国主义者的馂余，亦为其所并蓄兼收，点滴无余了……中国在此险恶的瓜分潮流之中，虽因列强国际政策的转变，徼幸于形式上的不亡，然而清廷惧外的心理，达于极点，且因之进而发展其媚外的心理。’（注二）

注一：蒋总统—“拥护公理与抗御强权”（一九三一一○）

注二：蒋总统—“中国之命运”（一九四三三）

俄军霸占东北

义和团之乱，在另一方面，又被俄国利用为向远东发展的好机会。

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在奉天省（辽宁）发生了焚烧教堂事件，俄国便以此为藉口，诡称保护铁路，出动了十五万大军，将东三省一带占领。及至义和团之乱平息，清廷和八国联军议和之际，俄国方面竟然主张“东三省应该单独缔结地区性的协定”，拒绝撤退俄军。

然而却因此引起了国际责难，日、美、英、德等国相继对俄国提出抗议，清廷也通过外交途径交涉撤兵；但俄国则始终坚持漫天要价的撤兵条件，难以达成协议。直到“辛丑和约”缔结后第七个月的一九○二年四月，终于才勉强地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

俄军竟提担保条件

在这个条约中，规定俄军分为三期撤退，每半年为一期，依奉天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的顺序先后撤退完毕。其后，第一期撤兵，没有发生波折；但到了第二期的时候，俄国突然改变态度，提出了如下所述的担保条件，胁迫清廷非承认不可，否则便不再撤兵。

所谓“担保条件”是：“俄军退出的地方不得割让给他国”、“在东三省如不先得俄国的同意，不得开辟新商埠，亦不得让他国增设领事馆”、“不得聘请外人参与东三省行政”、“凡在占领期间俄国所得权利，皆应照旧保留”……等项，企图置整个东北地区于俄国的“保护”之下，并且很露骨地表现出要将他国摒除在外而独占东北利益的意向。

清廷对于这些条件断然拒绝，同时日、英、美各国也都提出抗议，但俄国却不仅一点也不以为意，而且更将自奉天撤退的军队集结在韩国（一八九七年十月朝鲜改国号为大韩）国境的鸭绿江一带，并在韩国境内的龙岩浦建筑营房，向韩国提出租借该地区的要求；同时，又集合其太平洋舰队的船舰于旅顺，在黄海举行大演习，摆开了示威的态势。八月，更任命原为东三省占领军司令的阿莱克塞夫为“远东大总督”，具备了企图对于东三省施行军事管理的体制。

由于一八九六年签订了“中俄密约”（李鸿章、罗拔诺夫协定）而使清廷寄望于“联俄制日”的愚蠢政策，其结果是开门揖盗，让俄国势力进入东三省，导致俄罗斯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企图变成了现实的行动。

日俄形成“利权”对立

面对着俄国这样的活动，在日本方面也怀有危机感而萌生了加以遏阻的意图。自一八八五年闵妃事件之后，俄国驻朝鲜公使韦伯将朝鲜国王迎入公使馆加以保护，增强了俄国的影响力，促使将在朝鲜政府担任财政、军事顾问的日本人解职，军队的训练也改采俄国式。一八九九年，俄国为了太平洋舰队的需要，更租借了韩国南端马山浦的煤炭基地；在日本来说，更感到面临了军事威胁。日本为谋抑制俄国在韩国的发展，在清日交绥（甲午战争）之后，便已经就有关驻韩兵力及对韩国政府援助等问题，和俄国三度签订过备忘录、议定书。

及至义和团之乱以后，日本为了对付俄军盘据东三省拒绝撤退的情势，乃和英国结纳，以俄国为假想敌，而在一九○二年一月签订了“第一次日英同盟协约”，为共同防卫两国在中国及韩国境内的利益，攻守同盟。这个同盟，曾经一度发挥了迫使俄国同意自东三省撤兵的外交压力。

然而，日俄两国在环绕着东三省和韩国的利权对立，已经是迫近了危险的边缘，阿莱克塞夫之所以被任命为“远东大总督”，也就是俄国已有军事决心的一种表现；又据当时担任俄国财政大臣的微德在他的自传中便曾明白地提到俄国的态度是“迫使日本站出来，唯有诉诸武力决一胜负。”

日本对俄国交涉的最后一着，就是所谓“满韩交换论”——希望俄国承认日本在韩国的特殊利益，而日本则以承认俄国对于东三省铁路的特权，作为交换条件。

可是俄国却小看了日本，不予理会。俄国认为日本在韩国的利权，固然可以承认；但在东北三省方面，则与日本无关，故而正面予以拒绝。

日俄之间关于东三省和韩国问题的协商，在日本方面，于一九○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举行的御前会议中，决定了一个“大纲”，从这个时候开始到日俄开战（一九○四年二月）为止，双方进行过十三次的交涉。

下面引述在御前会议之后的内阁会议所决定的文件，从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到对于日俄协商日本方面的背景；实际上在那个时候日本已经了解不可能有和平解决的希望，而坚定了诉诸一战的决心

“韩国半岛险峻突出，恰似由大陆伸出的一柄利刃，对准帝国（日本）要害，其尖端和对马相距，只不过是一衣带水。倘使其他强国奄有该半岛，则帝国安全当在其威胁之下，终归难保无虞，似此情况，绝非帝国所能容忍，故须加以预防，实为帝国世代相传的政策……”“俄国不仅已在辽东租借大连、旅顺，并且实际还在继续占领满洲；更进而向韩1[200]200国境内试图进行各种设施。若听任其如此发展下去，则不仅俄国在满洲的地位绝对不能动摇，而且其影响必将立即延伸到三韩半岛………是则多年以来扶助该半岛的帝国势力和利益，不仅无法维持，甚至其结果将会演进到使帝国的存在发生危殆，应属无容置疑。”

日俄战争

当时，日本的军事力量与十年前“甲午战争”时代比较，已经大不相同——陆军由七个师扩编到十三个师，增加了一倍，拥有出兵二十万人的能力；海军更是飞跃发展，增加了四倍，总吨位达到二十五万八千吨，在日本海海战（日俄战争）中活跃的三笠号，总排水量一万五千三百六十二吨，配备有十二吋口径的重炮六门，为世界上最新锐的战舰之一。

日本之所以拥有这样的战力，是因为预料到为谋对于韩国和东三省的控制，终将难免和俄国一战，故而一意力谋扩充的结果。

此外，外交方面和在威海卫建有海军基地的英国“攻守同盟”，因而也可以不致有受到列强干涉的顾虑。

日有独占野心

在对于列强的关系方面，日本非常谨慎。

当日俄开战之前约一个月的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在日本内阁会议所决定的“对俄交涉决裂之后，日本应采取的对清韩方针”文件之中，认为使清廷守“局外中立”较为得策。其理由是：如果清廷和日本协同对俄宣战，则将回招致亚洲人和欧洲人对立的情势。又在阁议中并且研讨到：激愤的中国人，可能发生对欧洲人加暴事件，而耽心惹起像义和团之乱一样，给予列强以介入干涉的口实。

尽管阁议如此，但实则是为了战后的交涉而别有用心。因为如果单独作战，则胜利之果也就可以单独地任意处置。从中国的领土上（东三省）把俄国势力赶走，然后由日本独占的野心，可以说是表现得很明显。

关于对韩国问题的决定，则更为厉害——“不管面临任何情况，必须凭实力将韩国置于我方（日本）权势之下，固不待言；但唯一应该做到的，是要尽可能地选择正当理由，师出有名，是为得策。”“最后成效，当然要看实力如何而定；总之对韩国的政策，直接间◎８８０５１３１７０５电话三响后停止。接都与军事方面有着很大的关系……确定了凭藉武力控制韩国的方针；同时，等待着时机成熟，和韩国缔结“保护性的协约”，并且显然是不断地在采取各种手段，以谋达到此一目的。

这个“保护性的协约”，就是在日俄开战后不到两个星期之间，所成立的“日韩议定书”（一九○四年二月二十三日签订），韩国同意了依赖日本的军事力量保障安全；相对地，则对日本的军事行动给予便利。这个议定书，在后来便成了日本并吞韩国极其重要的一个事先部署。

在我国领土上交战

一九○四年二月六日，日本宣布和俄国断交，八日在仁川、九日在旅顺进行海战；十日，两国同时宣战——日俄两个帝国主义是在中国的领土上，为争夺中国的领土而冲突起来。

清廷于十二日宣布“局外中立”，对各国发出内容如左的照会：

“东三省为中国疆土，该三省城池、衙署、民命、财产，日俄两国均不得损伤；驻在当地的中国军队，维持中立，对日俄两国军各不相犯。辽河以西，俄已退兵之地，由北洋大臣派兵驻扎，各省及沿边内外蒙古，均按照‘局外中立’例办理，两国军队不得稍有侵越。但在东三省地方，尚有外国驻扎军队未经退出地区，实际上中国力有未逮，恐难实行局外中立之例。然而东三省疆土权利，两国无论胜负，均不得占据，仍归中国自主。”

在沈阳地区，虽然有奉天将军增祺率领中国军队驻扎，但是俄军已经掌握了吉林、黑龙江两省全境及奉天省的大部分地区，以致清廷方面实际上不可能实行“局外中立”；在奉天省境内则划定了日俄两国的“战争区域”。

对于清廷的照会，日本方面复文颇有“诚意”，开头是“对于贵国中立，表达敬意”，继之说明“日本和俄国干戈相见，是为保护我国（日本）的权势和利益，战争结束之后，并无占领大清国土地的意图。”其实，这个“诚意”，在后来的历史过程中得到证明，只不过是一种伪装的姿态而已。

俄国的态度，和日本比较，则极其蛮不讲理。他的回答是：“不能承认东三省地方局外中立”、“辽河以西当然属于东三省境内，不能说是局外”、“关于不得占据东三省疆土一节，目下不能谈论，应俟事后再承前议协商。”在俄国国内，外交部的复文也是：“因为关系到军务之事，由阿莱克塞夫全权处理。”而阿莱克塞夫却反覆地对沈阳的增祺发出照会：“东三省所有铁路的保护责任，属于中国；如被破坏而使俄军蒙受损失，不用说所有修理费用、就连因而受到的军事损失，都应该由中国赔偿。”

俄国已经把东三省完全当做自己的属地处理，为了要制造既成事实以打破清廷的“局外中立”，表现得非常急躁。

美国警告俄国

俄国这个阴谋，反映在外交活动方面也很积极，他向有关国家发出照会、散布流言“中国没有保持中立，是在偏袒日本”、“中国民心激动，仇视白种人”等等，俄国的目的是想把中国卷入战争，藉以使日俄两国的战争演变为白种人和黄种人、西方人和东方人的对立，如果得心应手的话，则很可能会造成全世界的战乱状态。所幸美国警告俄国“不要侵犯中国的局外中立”，而粉碎了他的外交阴谋。

中国民情激愤

对于日俄战争，中国民意比较同情日本。

这是由于对俄国横暴态度的愤慨而起。俄国以义和团之乱为藉口，赖在东三省不走，中国要求他撤兵，反而提出蛮不讲理的要求，漫天要价；日俄开战后，俄国军舰更把中国港口视同俄国领土，任意进出，中国人怒目而视，可以说是必然的倾向。

焚掠淫凶不堪言状

尤其是俄军不断加之于中国人民的残暴行为，叫人无法容忍。义和团事件初期，在东北国境瑷珲附近大屠杀五千人，以及在各地和土匪勾通，任意掠夺；又当和日本的战争逐渐失利之际，失去了统驭的部队，简直变成了暴徒集团。奉天将军增祺在战事进入末期时向清廷报告：“日军占领地区，约束颇严；但俄军溃败之余，焚掠淫凶，不堪言状。”

对于俄国的愤恨，连在海外的中国人也传播得很普遍。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为准备对俄作战而组织义勇军，各地华侨纷纷电请清廷对俄宣战，并捐献军费。

然而，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民间的愤恨不仅止于对俄国，而是同时也朝向眼看着国家受到如此奇耻大辱竟然一筹莫展的清廷。例如正当日俄交战的高潮时刻，革命志士万福华便曾在上海暗杀“亲俄派”的前任广西巡抚王之春未遂（手枪故障），而当时上海市民对于这一个事件的动向，就是具体的表现。因为清廷逮捕了万福华等志士多人，于是早就对于任凭俄人暴虐而庸弱无能的官吏大为不满的市民们，便酝酿罢工罢市，向清廷抗议，藉以要求释放志士们。

日俄交战经过

关于日俄战争经过，现在依据日本方面的资料，约略加以追溯于后：

日本陆军是以辽东半岛和辽阳、奉天（沈阳）为目标。第一军（司令官黑木为桢）越过韩国国境，指向安东、凤城；第二军（司令官奥保巩）在辽东半岛貔子窝附近登陆（五月五日），对大连、辽阳方面展开攻势；第三军（司令官乃木希典）由张家屯登陆（六月六日）进扑旅顺。五月二十七日、九月四日先后攻下大连、辽阳，而旅顺攻防战则为留下了历史性纪录的大消耗战，自日军开始进攻到夺得城池为止，耗费了四个半月的时间（八月十九日到次年一月二日），当旅顺开城签署降书时，乃木希典和俄方将领斯德色尔在水师营见面，日本的小学课本曾经制成歌词：“旅顺开城，条约成立，敌将斯德色尔，会见乃木大将军，场所在何处——水师营……”

最大、最后的决战，为奉天（沈阳）大会战，日军二十五万，俄军三十六万，经过两个星期的激战之后，于三月十日打下了奉天。在整个日俄战役日军死伤十一万八千人中，占了百分之六十的七万零二十八人，是在奉天战场一地的牺牲。

海战方面，有封锁旅顺港口战役（一九○四年二月）、黄海战役、蔚山冲战役（八月），而以次年五月二十七、八两日的日本海战役最为著名。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东乡平八郎悬起Ｚ旗，号召“皇国兴废在此一战”，结果，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三十八艘战舰之中，被击沉及俘虏三十三艘，以戏剧性的大捷而终场，无可置疑地决定了胜负的归趋。

就在这一年的一月二十二日，俄国的首都圣彼德堡爆发了第一次革命，工人罢工罢市，波及全国；日本也到了战力穷尽的境地，日俄媾和的活动，乃见实现。

老罗斯福出面调停

日俄媾和的调停，是由美国老罗斯福总统于六月二日倡议；八月，在美国朴资茅茨举行会谈。清廷在日俄和谈开始之前，就已经得知在日本方面所提条件之中，包括有“俄国将辽东租借权、南满铁路（长春——旅顺之间）所有权等让给日本”的要求；于是，乃对日俄两国及欧美各国严正声明：“凡有牵涉中国事项，未经中国商定者，概不承认。”表明对于本来与中国有关的租借权等问题，不容许他国之间擅自作为交易材料。

日本政府早在日俄战争爆发之初，就已经研讨到媾和条件，其基本方针是要使俄国自满洲和韩国敛手，而由日本承受俄国的权益。日本方面最后的媾和条件，是在一九○五年六月三十日内阁会议中，以给予媾和谈判全权委员的训令方式，做了正式的决定。

依据这个训令，其绝对必要的条件俄国签约承诺将韩国交日本自由处置。两国军队撤离满洲。辽东半岛租借权已经哈尔滨——旅顺之间的铁路让给日本等三项。此外，比较重要的条件赔偿军费。将逃亡中立港的俄国船舰交给日本。割让库页岛。获得俄国滨海省沿岸的渔业权等四项。附加条件限制俄国在远东地区的海军力量。撤除海参威军事设施改为商业港等两项。

这个阁议决定，于七月五日经天皇裁决。但是在第二天，清廷就已经发出了如前所述的严正声明，对于日本的日俄媾和条件表明了不承认的态度。

日俄战争以中国为战利品

中国的严正声明，完全被日俄两国所抹煞。两国的媾和谈判，只为两国的利益争议，而于一九○五年九月五日签订了朴资茅茨条约。

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如次：

日俄媾和条约内容

一、俄国政府承认日本在韩国政治、军事、经济上均有卓越的利益，并且不阻碍、干涉日本在韩国的指导、保护、监理措施。（第二条）

二、除租借权效力所及地域之外，在东三省的日俄两国军队，均在十八个月以内完全撤退。（第三条及补充条文第一项）

三俄国政府经由中国政府的允许，将旅顺口、大连港的租借权以及有关一切特权转让给日本政府。（第五条）

四、俄国政府允将长春至旅顺口之间的铁路和所有支路、以及附属的一切权利财产、暨为1[209]209该铁路利益而经营之煤矿，经由中国政府允许，转让给日本政府。（第六条）

五、俄国政府将北纬五十度以南的库页岛南部永远让给日本。（第九条）

六、日俄两国在东三省各为保护其铁路，得有留置守备兵的权利，但每一公里不得超过十五人。（补充条文第一项）

根据这些条文可以了解，日本战胜俄国所斩获的利益，并非由俄国得来，而是自中国所夺取。

依据参加朴资茅茨媾和谈判的日本全权代表小村寿太郎后来在一九○八年公开的“对外政策方针”，可以明了日本政府的目的，是要获取南满的铁路、矿山、森林三大利权；可是由于当初要求割让库页岛全岛，结果只得到了南半部，和赔偿战费条件之被撤回，以致在日本国内形成指责“怯懦外交”的舆论，各地纷纷举行反对媾和的集会，而且在东京、神户、横滨还发生了纵火骚动事件，逼迫着当时的第一次桂太郎内阁（桂太郎曾经三度组阁）于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总辞职。

日本转而要胁清廷

1[210]210日本在日俄朴资茅茨条约签订之后，便据以向清廷要求签订“满洲善后协约”。这个谈判是在北京举行，清廷方面由庆亲王奕劻、外务部尚书瞿鸿禨、直隶总督袁世凯和日本的全权代表小村寿太郎、驻华公使内田康哉，自十一月十七日开始至十二月二十二日签约为止，先后进行了二十二次交涉，日本方面坚持强硬意见，一步不让；清廷毫无办法，终于被迫同意。由于这个“协约”，清廷对于朴资茅茨条约完全承认，除了原来俄国所据有在“南满洲”的一切权益不折不扣地转让给日本之外，还新加上了辽阳、长春、哈尔滨、满洲里等十六的都市开埠通商、和准许外国人居住，并允许采伐鸭绿江右岸森林，以及承认日本政府经营安东至奉天之间的铁路。

中俄密约被深藏

在日本方面相当坚持地认为：“日俄战争，是因为清廷对于盘据在东三省的俄国，拱手旁观，无能为力，而由日本代劳，将之驱逐出去，所以清廷给予日本以报酬，是理所当然的事（小村寿太郎在谈判中的发言）。”而且，日本阁议已经决定，万一和清廷的善后谈判得不到协议，便停止交涉，日军则照现状继续占领下去。

不过，当时还有为日本所不知道的情况之一，就是“中俄密约”（一八九六年李鸿章和罗拔诺夫签订）的存在。这个密约，是清廷和俄国共同以日本为假想敌而订立的十五年“攻守同盟”，日俄战争正发生在它的有效期间之内，然而清廷不仅严守局外中立，没有履行同盟义务，却反而对日本同情。

后来，在一九三一年，币原喜重郎（日本外相）和陈友仁（广东地方政府外交代表）会谈，提到这个往事，币原说：“当时日本认为清廷是中立国，所以也把满洲当作中立地带，故在日俄战后，也还尊重其为中国的领土；可是，那时日本如果已经知道清廷是俄国的秘密盟国，那么关于对满洲问题的处理，想必就会拿出别的解决方法来了。”

当时，日本政府的态度，虽然是图谋自清廷夺取利权，但却并没有把清廷看作正面的敌人；假定中俄密约的存在被暴露出来，则很可以想像得到日本的舆论必然会更加激烈。

这个密约，被深藏在清廷的宫禁之中，一时，曾有中国报纸登载了被称为是全文的一篇文章，可是看起来却不太像是那么一回事，反而使人怀疑究竟有没有这个密约存在？到了一九二一年，中华民国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中提议废除不平等条约时，根据中国外交部的调查，这个密约才在被密藏了二十五年之后而被发现出来。

在“满洲善后协约”的交涉过程中，应该特别一提的，是日本方面详细发表了交涉的内容1[212]212。在第一次会谈时，日本方面提议每次都作成“会议节录”，两国代表都在上面签字，并约定节录不对外公开；然而日本方面却在“善后协约”成立的同时，把这些节录编列为十六条的“秘密议定书”（日本方面名称为“关于满洲问题的日清条约附属协定”），分送美、英等有关国家。

南满铁路的后果

在“秘密议定书”中特别成问题的，是第十一号（即第八条、日方为正文第三项）：

“中国政府，为保护南满铁路的利益起见，在未收回该铁路之前，允于该路附近不筑并行干路，及有损于该路利益的支线。”

这个并行线问题，一直成为后来许多纠纷的根源，对于中日关系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后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导火线的“九一八事变”的原因，也与这个问题有关。

日本独占东北

一九○五年九月，日本在辽阳设置“关东总督府”，以陆军大将大岛义昌为总督，将“南满”一带置于军政管理之下，树立了独占性的支配体制。军政管理的目的，是在遮断列强伸向“南满”的影响力，对于日本以外的国家，在关税、运输、通信等所有各方面，都加以差别性的限制。

针对着日本的措施，美、英等国乃以一向所主张的“门户开放主义”、“通商机会均等主义”为理由，抗议日本继续实施其军政管理（一九○六年三月），同时，清廷只要一有机会也就劝告日本改变其态度。

东北形同割让

据日本方面资料：在“关东总督府”的“实施军政纲要”中，订有“施政方针和我国（日本）领土相同”（细则一之十），“凡有能为我国获得利权的良机，应予把握。有益于达成军事目的之事，必须断然施行”（纲领之三）。实际上，是以相等于业已割让的态度在统治着。

日本的方针虽然如此，但毕竟屈于国际压力，在第二年（一九○六年）的八月一日，将“总督府”改称为“关东都督府”，移归民政管理；东三省的行政，也移交给清廷。清廷废除了过去所分别设置的吉林、黑龙江、奉天三省将军制度，而改设东三省总督，诏令徐世昌担任，并任命唐绍仪为奉天巡抚。然而，日本的移归民政管理，彻头彻尾只是表面文章，实际在占领期间培植完成的日军统制力量毫未动摇；而且在后来更以“改建铁路”、“保护铁路”等藉口，增加驻兵，以致南满铁路沿线，可以说已经变成了日本的租借地。

在移归民政管理之前，日本以天皇的敕令，于一九○六年六月设立了“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股份有限公司）。“满铁”（简称）并非专事经营铁路，而是具备了在东三省执行侵略政策的大本营职务——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国策会社”。

“满铁”垄断东北经济

“满铁”是以二亿日元资本设立的（日本政府和民间各投资一半）。一开始就赋予了大陆发展政策先锋机关的特性；预定公开招募十万股，但受到日本民间狂热支持，蜂涌枪购，请购者达一亿股以上。当时在日本，实际已经把“南满洲”看作属地，由“台湾总督府”的民政长官转任第一任满铁总裁的后藤新平，在他就职的“情由书”（致送日本政府有关人士的报告书）中，便曾使用了“殖民地行政”的语句。

作为一个“国策机关”，特别发挥了功能的组织是“地方部”和“东亚经济调查局”。“地方部”在实质上可以说是铁路沿线附属地区的行政官署，执行“都市开发”、“农业开发”、“居民教育”等工作；“调查局”负责情报活动；此外，并出资经营煤井、矿山、港湾、电力以及其他各种旁系公司，振兴产业，成为在东三省唯一而最大的垄断性联合企业，发挥了经济支配力量。

日俄战争，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更为各国在亚洲纵横捭阖的外交斗争，带来了一个大的转变。

日本与英法关系

日本和英国，在义和团之乱时，缔结了“第一次日英同盟”，发挥过自东三省把俄军驱逐出去的作用；但在日俄战后即将媾和的一九○五年八月所签订的“第二次日英同盟”，则是对于日本在中国和韩国的特殊权利和英国在印度的特殊权利，互相承认，可以说是作了一次双方有利的殖民地交易。但是，这个同盟关系并没有能够长期维持下去；不久，英国便对于日本的独占东三省不满。其后（一九一一年），英国和美国缔结了“仲裁条约”，于是在签订“第三次日英同盟”时，便有所修改，就是英国要求日本同意“对于仲裁国家没有交战的义务”。于是英日两国的“攻守同盟”，在对美国而言，已经是没有了效率，可见英国是在对美国接近。

在另一方面，日本和法国于一九○七年六月缔结了“日法协约”，这也是“两国为了保护在亚洲大陆的地位和领土主权而互相支持”的约定，同样地拿中国来作交换材料；而且据说当时甚至已有密约—“日本以东三省和福建、法国以两广和云南三省各为其势力范围。”

日俄转而成为友好

日本和俄国的关系也有些微妙，日俄战争之后，双方却立即握手言和，成了“友好国”，而于一九○七年七月签订了“日俄密约”，作了一次对于俄国在外蒙古的特殊权利和日本在韩国的特殊权利互不干涉的交易；又在密约中，双方商定在东三省设定“分界线”，分割为南北两个领域，由两国分别独占其利益。其后，在一九一○年，日俄密约第二次签订时，更进展到：“为保护两国特权，在必要时得采取共同防卫措施”的程度。

日本和西方列强缔结了像这样的一些条约，是基于和各国利益均沾、不落人后的意图，来瓜分中国领土。日本也达成了跻身西方列强阵营的目的，开始走向后来的霸业途径。

日本终于并吞韩国

在这个时期，日本并吞了韩国。依据在日俄战争开始之后便立即签订了的“日韩议定书”，韩国事实上已经被当成了日本的“保护国”；其后，日本和英、法、俄等国缔结了交易性的条约，封锁住列强的干涉，复依据一九○五年所成立的“日韩协约”，在汉城设置“统监府”，任命伊藤博文为第一任“统监”；一九○七年使李熙国王退位，一九一○年终于并吞了汉国。当时，在韩国国内曾经进行着全国性大规模的“抗日救国”斗争活动，但日本军阀将之彻底镇压了下去。

日本为镇压韩国的义兵运动（抗日战争），动员了两个师团，在各村落都部署有兵力，彻底扫荡作战。自一九○七年强制解散韩国军队的四年之间，发生了超过二千八百多次的战斗记录。

美日关系

美国方面，在这个时候，也把目标放在亚洲。美国对于有关中国问题的态度，是希望“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而始终站在反对一个国家独占支配的立场。

美国迟了一世纪

和西欧各国相比，美国的进入亚洲较为落后。像英国早自十八世纪以来，就已经在印度构筑了强有力的根据地，而美国则迟慢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然而，在一八六七年，以七百二十万美元自俄国购买了阿拉斯加；一八九八年，并吞了夏威夷；同一年对西班牙战争结果，获得了原为西班牙殖民地的菲律滨和关岛；为了保护这些利权，所以在日俄战后即将举行媾和谈判的一九○五年七月，由美国陆军部长塔虎脱（第一任菲律滨总督，后来膺选第二十七任美国总统）和日本首相兼外相桂太郎交换协定文书，确定“日本承认美国在菲律滨的支配权；同时，美国也承认日本对于韩国的保护权”。美国对于有关中国问题虽然提倡“门户开放”，但是在美日之间，就菲律滨和韩国的殖民地化，已经是做成了一笔交易。

在日俄战争期中，美国国内的舆论则对日本表示同情。日本的战费（十五亿日元）差不多都是靠的向外国发行公债，这种公债——在美国市场极受欢迎，每当日军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便因而上涨。然而，当日俄战后，逐渐演进到日本独霸东三省权益的时候，美国便开始了对日本的责难；其焦点，是在东三省的铁路问题。

美欲经营东北铁路

正当在美国朴资茅茨进行日俄媾和谈判的一九○五年八月，美国的铁路大王哈里曼带着“世界一周线路”的计划来到日本访问，且于十月十二日和日本首相桂太郎之间签署了收购“南满铁路”的临时协定备忘录，因为当时日本正苦于庞大的战费负担，哈里曼则是购买了日本在外国所发行的大量公债持有人，故而受到日本朝野一致的欢迎。可是，自朴资茅茨归国的外相小村寿太郎则以“将会造成外国资本在东三省竞争因素”的理由，表示反对，于是日本便单方面地取消了备忘录的约定。然而，美国对于铁路问题并不死心，另行通过驻奉天总领事司戴德计划在东三省建筑纵贯线——“新法铁路”（新民至法库之间，其后更扩大计划将之延长到锦州至瑷珲之间，又被称为“锦瑷铁路”），在中日和日美之间，激起了涟漪。

美国发生金融危机

清廷是为了希望不让日俄两国霸占东北，故而欢迎第三国投资，奉天巡抚唐绍仪和司戴德一度作成了备忘录，决定由美国投资二千万美元，设立东三省银行，敷设“新法铁路”。但是没有料到刚巧会碰上美国遭遇到金融危机，这个计划乃由英国接了下来；而日本方面是在一九○七年八月得知此事，于是便指称其抵触了在“满洲善后协约”中所订“禁止建筑满铁并行线”的条款，提出抗议；而英国则由于受到“日英同盟”的束缚，以致踌躇难决；日本并且更进一步表示出“对于妨害南满铁路利益的行为，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压迫清廷将这个计划搁置起来。

在此之前，正当美国对日感情恶化的时候，美国国内又发生了排斥日本移民的问题；同时更传出了“中、美、德三国已经结成同盟”、“日美即将开战”的风声。

美国排斥日本移民，虽然是由于低廉工资的日本劳工进入美国，和当地美国人工会的利害对立而产生，但背后的问题，则是对于东方人的种族歧视。例如旧金山教育局就曾以“我们的儿童不应受蒙古人种的影响”的说法，决议使日本人、中国人的儿童送入隔离学校容纳。

这个排日运动，由于美国第二十六任老罗斯福总统批判其为“对日本最无礼的态度”，并且行使总统职权，采取对加州直接干预的措施，才渐渐抑制下去；一九○七年八月，日美之间成立了“绅士协定”，表面上看来算是解决了问题。

所谓“日美开战”的传说，是德国意图离间日美关系而故意散播出来的留言；不过清廷的袁世凯和驻清廷德国公使赖克斯等人，策划“中、美、德三国同盟”，则确属事实。

一九○八年，由于司戴德的运用，铁路问题（锦瑷铁路）再度登场，但又因日本反对而打消；第二年，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再提出“东三省铁路中立化”的计划，日本复指其为“政治性提案”，予以拒绝。并且反而促成日本和俄国缔结“攻守同盟”（第二次日俄密约），踏出了由两国霸占东三省的进一步行动。

美日自此发生裂痕

如上所述，日俄战争，使在亚洲的各国关系完全发生了变化；不用说，所有变化的起源之处，就是在于中国的东三省。由于这个契机，不仅中日关系更加恶化，而且日美关系也发生了裂痕。

如果一直展望到后来第二次大战的历史过程，来探索在亚洲重大转变的起点，还必须找回到这个位置。

革命组织强化

‘我现在再来谈谈日本侵略我们中国的历史。由于甲午战争，日本割取了台湾，并吞了硫球，于是，中国南部便完全受到他的控制。

‘后来，日本又策划向我国大陆发展，为此，首先不能不占领旅顺、大连；要夺取旅顺、大连，则最要紧的是非先占领朝鲜不可。所以，在日俄战争之后，夺取了旅顺、大连，又乘势并吞了朝鲜。

‘其结果是我们中国自南到北都受到了日本的紧密包围，从华北的门户——旅顺、大连，乃至于渤海湾，都被日本霸占去了；因之，我们中国的所谓国防，已经是不复存在；还不仅如此，后来，日本连中国的国防建设都不允许了。

‘日本已经到了随时可以威胁我们、灭亡我们的地步。’（注一）

国父成立同盟会

这是蒋总统在民国二十三年七月的讲话。处于这样的危机感之下，早在和日俄战争结束差不多是同一时间的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国父孙中山先生就结合以“兴中会”为中心的同志们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甲午战争时（一八九四年）在檀香山诞生的最初革命组织——兴中会，经过了“日俄战争”那样国际激流的洗礼，脱胎换骨，成长为更加坚强的革命组织！

清廷的“新政运动”

日暮途穷的清廷，在这个时期，又酝酿实行“新政运动”——就是要将在一八九八年仅仅维新一百零三天的“戊戍变法”之一部分，重行考虑实施。这是因为在日俄战争之后，中国国内要求改革政治的声浪，日益高涨；以前曾经反对变法的慈禧太后，这时也被迫不得不采取改革的途径了。

一九○八年，清廷公布了“宪政大纲”，宣示在九年内施行宪政。这个宪法，完全是日本宪法的翻版，例如：“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久尊戴（第一条）、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第二条）”等词句。

清廷为了制订宪法，曾经派遣官员前往日本、英国、德国，分别考察宪政。奉派前往日本的戴泽（皇族），从伊藤博文那里听到日本天皇大权在握，铭记在心，于是便打算那样原封不动地给搬回中国来。

清廷仿效日本到了这样的程度，是因为日本的距离最近，学习起来也最便捷。而且第一：两国体制相似，日本虽然说是立宪国家，但是宪法赋予天皇的权能颇大，议会的权力则受有限制，容易为清廷所接受；还有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制度，毋宁说多半是由中国学去的，由于维新而迅速成为世界强国，可见其变革的过程，非常值得参考。

语文方面的方便

第二：是语文的问题，和西洋国家的ＡＢＣ比较，同样是使用汉字的日本语文，假定在文法方面得到点门径，纵使是不够完全，但也勉强可以阅读。一水之隔的日本，无论前往留学或考察，都是居于最方便的位置。

过去在“戊戍政变”失败的康有为，便曾汇集日文书籍，汇编“书目志”，他在序文中提1[225]225到：“泰西诸学之书，都曾由日本人详加翻译，我们不妨利用日本人的成果。是则泰西为耕牛，日本为农夫，他们耕耘，我们是坐享其成。”

的确，翻译日本书籍的热潮是在直线上升；不久之后，连学校的教科书，也都使用了译自日本的课本。日本译自欧洲的学术用语，也照样地搬过来使用，像“哲学”（中文原译“智学”）、“经济学”（中文原译“资生学”）、社会学）中文原译“群学”（等词汇，都是由日本流传而来，也成了中国的固定名词。

尤其是在军事方面，受到日本的影响更大，不仅有关军事学的论文、就连军事教程也是由日本导入，这个倾向一直延续了很久；一九二八年，国民政府统一了全中国，当时所制订的“陆军典范令”，也还是来自日本的复制品。

依据日文译本转译为中文而导入西洋文化，倒是发挥了一定的启蒙作用；然而，另外的一面，就是连在东洋史、中国史方面，也都发生有倚重日本人著作、而使一部分的中国历史学者受到日本学者影响的现象。

在这样的风气之下，前往日本的留学生急遽增加。中国最初东渡的留学生，是在签订“马关条约”之年的一八九五年，只有四十四个人；但由于在日俄战争结束的一九○五年，修改了科举制度，回国留学生可以经过考试而给予“进士”“举人”的出身，敞开了入仕发迹的途径，所以留学生在日本最多的时候，据说超过了十万以上。

据日本资料，自一九○五年起，留学生人数激增，估计一时达八千人。蒋总统到日本留学是在一九○八年，留日热潮已经越过了高潮的时期。

美国鼓励留学生

美国在这个时候，拨出了义和团之乱所获庚子赔款的半额，作为奖励中国留学生的基金，也展开了对中国的文化交流活动关系。因此，在一般学术的范围内，美国的影响逐渐增加；但军事方面，日本的影响仍然居于压倒性的优势地位。

注一：蒋总统—“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一九三四七）

民族的觉醒

日本经济向中国的伸展，在日俄战争之后，迅速增长。据统计，在甲午战争时，两国的全年贸易总额仅约四百万两，但在十六年之后辛亥革命的一九一一年，则增加了三十五倍，达到一亿四千万两。中国的输出为农产品（大豆、芝麻、棉花）、煤炭、铁砂等类；来自日本的商品，以棉制品、面粉、砂糖为主。砂糖是日本自中国割去的台湾所出产；大豆则为东三省的特产，日本将之推销贩卖到欧洲市场。

日本的经济侵略

在中国的日本投资，也有所增加，尤其是原料（棉花）和劳工容易就地获得的纺织业界之进展，非常显著，特别是上海地区，于一八九五年在杨树浦创办上海纺织公司第一厂，其后三十年之间，开设了二十六个工厂，占了整个上海地区所有纺织厂的三分之二。在这些工厂中，有六万以上的中国劳工，可是，日本则以低廉工资换得其工时较长的劳动，酷虐使用；直到一九二○年代中期，日本纺织厂的待遇，还是只有一般工厂的四分之三；而且为了束缚因对待遇不满可能有意离职的工人，乃建立了一个按月预扣其百分之五的薪金作为储蓄，十年之后一次付给得到制度。

日本商社（贸易公司），在中国开始伸展势力，也是在这个时期。三井物产、大仓组、三菱合资（现在名称为三菱商事）等公司，积极向大陆进展。此外，横滨正金银行（现在的东京银行）、台湾银行等金融事业，也在大陆开设有办事处及分行；其中，横滨正金银行且曾于一九○六年九月，发行纸币，在东三省流通使用，因此，东三省的金融，差不多为横滨正金银行所垄断。

抵制日货运动萌芽

像这样地对华投资和企业进展，一直与日本政府的军事和外交政策保有着密切关系，充分利用条约上的特权；并且和清廷的官僚势力勾结，操纵广大的中国市场，掠夺中国的权益。中国民众，对于像这样的经济独占行为，受到民族主义觉醒的鞭策，抵制日货运动因而萌芽。

抵制日货的典型事例是“辰丸事件”。一九○八年二月，日本商船“第二辰丸”走私武器弹药，在澳门海面上被清廷军舰捕获，日本方面不仅不承认走私的过错，反而以国旗被侮为藉口，向清廷提出抗议，以武力为背景，强迫清廷释放了“第二辰丸”。中国民众对于事件演变的结果激愤不平，于是在广东便发生了火烧日本商品的行动，而排斥日货运动，和呼号恢复中国主权、收回被外国掠夺去的权利，再加上对于清廷“媚外外交”批评的声浪，便一齐扩展到了中国各地。

日本借款掠夺利权

假藉“借款”之名而实则掠夺利权的行动，在日俄战争之后也逐渐显著。最初成为对象的是设在湖北省的钢铁事业——也就是后来的“汉冶萍煤铁公司”，该公司的前身，是由热心洋1[229]229务运动、促进产业政策的张之洞所创办的“汉阳铁厂”和“大冶铁厂”两个公营事业，一八九六年被盛宣怀向政府购买下来，其后在一九○八年和萍乡煤矿（在邻近的江西省境内）合并。

一九○二年，向日本大仓组初次借款二十五万日元，为汉阳铁厂事业资金；一九○四年，增加了三百万日元（大冶铁厂向日本兴业银行所借），一九○八年，又增加了一百五十万日元（汉冶萍公司向横滨正金银行所借）。结果，该公司和日本方面所签订的契约，是在五十年之内，不得计较国际价格的变动，而长期间以固定的低廉价格供给日本大量的生铁和铁砂。以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一九一四～～一八年），仅及于国际价格八分之一以下的“不平等价格”，对日输出，为日本的重工业发展而牺牲贡献。

‘国际贸易入超的趋势，与年俱进，中国经济只有枯竭，民生凋敝，国民经济都受到外国的操纵。’（注一）

帝国主义者的象征

到这个时期为止，列强各国所设的租界，达到了共同租界三处、专管租界二十六处之多，租界上驻有各国军警，呈现出“国家之内还有国家”的现象。

‘在中国领土上，帝国主义者的军警，可以向中国的军警商民任意开枪，但是中国军警却不能对之还击。如果是还了手，则帝国主义者们就以战争相恫吓，军队、军舰立即出动，最后通牒也送了过来。中国政府和民众都恐惧外国，奸吏愚民更乘机活动，有钱的人都将资产移往租界，托庇于外国军警保护之下；总之，中国的银行、仓库、贪吏、巨商全都以租界为安身立命之地。本来，少数的外国军警，只不过是帝国主义者的象征，但对于中国的社会政治，竟有搤吭扼喉的威力。’（注二）

‘清廷已经感觉到革新的潮流不可以强遏，乃不得不施行新政，而以新政来粉饰政治的腐败，外交的屈辱，欺骗国民；但是国民知道国家的外患是怎样地迫切，清廷又是如何地无能，于是国父所倡导革命主义，才在愚昧无知的、无民族思想的社会中植其根柢。’（注三）

怒潮澎湃武昌起义

为了对抗帝国主义和专制政治的双重压迫，革命行动，日益增高，终于发展向辛亥年——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

注一：蒋总统—“中国之命运”（一九四三八）

注二：蒋总统—（同右）

注三：蒋总统—（同右）

第二章：辛亥革命与日本(中)

主题

总统的家世祖父和父亲童年与慈母慈母的督教报国与思亲追求革新的精神初闻国父革命首次东渡日本进入保定军校反击日籍教官留日学习军事首次会见国父国父伦敦蒙难研究革命理论国父青年时代习医交结同志志在打倒满清创立兴中会决定青天白日旗首次广州起义先烈慷慨成仁揭橥三民主义

总统的家世

在这里，让我们把话题转移到蒋总统的故乡。

一八九五年，中国败于甲午战争，对汉民族来说，真正是奇耻大辱的新闻。这个事件的报导带同人们的激愤，一时传遍了中国全土。蒋总统的故乡——溪口镇（浙江省奉化县武岭），也听到了战事失败的原委和马关条约的屈辱种种情况。

那个时候，蒋总统虽然还只是虚岁九岁的少年，但是看到了村镇上的许多人充满着愤怒在互相谈论“四千万平方里的领土，四万万人民的大国，输给只有三个小岛的日本（在中国没有考虑到北海道是日本的领土），倒是怎么一回事？”在幼小的心版上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国家”“民族”等言词所具有的意义，虽然还模模糊糊，但已经是受到启发而懂得运用思考去寻根究底的一个开端。

一如前面所述，清廷自十九世纪以来，对外屡战屡败，于是签订不平等条约、割让领土、开设租界……堕落到在列强为所欲为的侵略之下。曾经是“世界帝国”的国家，如今竟落得连国家的生存都面临到了值得危惧的情势！

故乡溪口的环境

溪口镇固然是一个山野的村落，可是对于外界却畅通无阻。循剡溪四十公里而下，便可到达宁波港口，宁波在南京条约中就被开辟为对外通商口岸，是最早接触到西洋文明的一个城市；而且乘船前往上海，也只不过是一、两天的行程。

沿海一带的人们和山僻地区的天台、新昌等地居民往来时，必定在溪口中途落脚，所以，在停船码头上，每天早晨人群攒动和物资集散，颇为繁盛；新时代的气息，随着往来的人潮，非常敏感地散播在这个镇市上。

在另一方面，古旧风俗的遗痕也还留存着颇为浓厚的色彩。特别是给予人们痛苦的所谓“土豪劣绅”，横行不法，随着清廷的纪纲日益废弛，地方秩序也越发混乱，贪官污吏为所欲为，人民深受涂炭之苦。

在这样的环境中，自幼感受到国家的耻辱和切身体验到社会的腐败，却正好是培育自立自强，不屈不挠——战斗精神的土壤。

父亲肃庵公的训示

当甲午战争开始不久的一八九四年十二月，祖父玉表公八十一岁寿终；翌年七月，父亲肃庵公五十四岁相继谢世；不到一年之间，栋折榱崩，遗留下来的重担，便由母亲王太夫人纤弱的双手承接下来。一家连续惨遭不幸，王太夫人频呼“所天”，伤心痛哭，不能自已。

‘我在九岁失去了父亲，到今天没有一刻忘记父亲临终的遗言；父亲去世的时候，母亲随侍在傍，父亲凝视着我和幼妹手指着哥哥缓慢地说：“你的弟妹都还幼小，我死后，你的母亲必定承担不了哀痛，你年纪较大，希望能对你母尽孝，对弟妹友爱，以安慰我的心灵。”哥哥含泪点头承诺，父亲才停止了呼吸……

‘在此之前，当我初入学时，父亲把我叫到面前，给我训示：“我自从年轻时候继承家业，没有能替国家效力，但仍希望在地方上办点教育，改正社会风气；现在我要尽力使亲族敦睦，地方平安。你们应该专心读书，将来如果有点成就，也可以稍稍补偿我生平的缺憾。”’（注一）

上面这一段话，是朱执信先生于一九一八年替肃庵公撰写的墓志铭中，所引述蒋总统的回忆。

胥吏豪绅凌虐胁迫

肃庵公逝世后，长兄分家另立门户，一家的财产正好成了土豪劣绅觊觎的目标。

‘中正九岁丧父，一门孤寡，无可依靠。当时清廷政治腐败，胥吏豪绅依附权势作恶，我家人丁单薄，遂成为凌虐胁迫对象，没有一日安宁，曾经为田赋征收，被强迫摊派役使。’（注二）

在二十岁那一年（一九○六年）的一月，蒋总统遭受到了有理说不清的侮辱。

当时的田赋，照规定每一乡镇应该缴纳一定数量的钱粮，但是在地方上如果有人家离散或者迁往他处的住户，以致出现无法催缴的情况，县知事便将这一份欠粮摊派给同一乡镇生活余裕的人代缴。

在这个时候，地方土豪便和胥吏勾结，摊派给王太夫人代缴的数额很多，实在无力缴纳；但最后仍然将蒋总统传唤了去，勒令承担。这个事件，是促成蒋总统献身革命的直接因素——立定志向，东渡日本，就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不久之后。

悲苦情况无法比喻

‘产业被夺，先人的田地不能保全，甚至于被诬陷到公堂，受到很多胁迫和侮辱。

‘地方上没有仗义执言的人，族人和亲戚们也多袖手旁观，我家母子含愤忍痛，悲苦情况，无法比喻。’（注三）

注一：朱执信—“蒋肃庵先生墓志铭”（一九一八八）原文如下：“吾友蒋子中正为余言曰：‘吾九岁而丧父，今几二十年，未尝须臾忘吾父未殁时之言也。吾父之殁也，吾母王太君在侧，吾父顾吾及幼妹指谓吾兄曰：尔弟、妹幼，吾死后，尔母必哀痛不自胜，尔年长，其能尽孝致友，以慰吾心耶？吾兄承涕自任，乃瞑。……方吾始就傅时，吾父引而训之曰：吾少承先人业，不克服劳于国，然犹冀于乡党施教育，矫去敝俗。今者吾当尽力，使亲族敦睦，闾闬无惊；而尔辈得一意读书，异日倘有所成，亦可稍补吾憾也已！’”

注二：蒋总统—“报国与思亲”（一九三六十）原文如下：‘中正九岁丧父，一门孤寡，茕孑无依。其时清政不纲，吏胥势豪，夤缘为虐；吾家门祚既单，遂为觊觎之的，欺凌胁迫，靡日而宁，尝以田赋征收，强令供役。’

注三：蒋总统—“报国与思亲”（一九三六十）原文如下：‘产业被夺，先畴不保，甚至构陷公庭，迫辱备至；乡里既无正论，戚族亦多旁观，吾母子含愤茹痛，荼糱之苦，不足以喻。’

祖父和父亲

溪口蒋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纪元前十二世纪，巩固周朝基础的周公旦第三子伯龄。至于移居奉化，是在十三世纪的元朝开始。到了十七世纪，有一位名叫仕杰的族祖，定居溪口，为溪口蒋氏的起源；自此之后，蒋氏族人不出仕满清朝庭，而一直保持着汉人的立场。

祖父玉表公以商业起家

‘我们蒋家自从仕杰公迁居锦溪以来，历代勤劳务农，敦崇礼让，在清朝三百年之间，没有一个出仕做官的人。祖父玉表公以商业起家，并经营盐铺，家庭经济日渐富裕。’（注一）

玉表公经营的盐铺，字号“玉泰”。在清朝时代，盐是专卖的商品，所以盐铺的利益，比较稳定。

总统诞生取名瑞元

蒋总统于一八八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午，出生在盐铺内的一间房子里，祖父欣喜得到男孙，因此取名“瑞元”。

今年（一九七四年）十月三十一日，为蒋总统的米寿～～八十八岁华诞，当天，以台北为中心，中华民国全体国民将举行祝寿活动。

玉表公慈爱宽恕

玉表公于一八九四年去逝。死别的时候，蒋总统虽然还只有八岁幼儿，但所受到祖父的薰陶，还很鲜明地留在记忆之中：

‘祖父生性慈善，待人宽恕，但教训子孙则很严格。布衣素食，喜欢研究佛教经典，能够辨明其宗支流派，且曾手抄佛经多种，可惜已经散失……

‘剡溪北面，有武岭庵，旅客往来经过这里，虽然饥渴，但是得不到饮食；玉表公布施茶饭，赒济行人，有六、七年之久。

‘亲友们有婚丧大事无力举办，或者因困难前来告贷，必然尽力帮助、满足其要求；地方上有修庙、建祠、开路、筑堤等等公共建设的捐募，毫不吝惜……博爱情怀，充满其人生境界……’（注二）

后来在西安事变时殉难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邵元冲（注三），知道玉表公的行状甚为详细，他写过追念玉表公的文章：

“玉表公是乐善好施的长者，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会为对方解决困难……玉表公还通医道，经他的手治好过不少病人；性好研究佛教，抱持仁慈博爱的精神，以济度人世为职志，但治家颇严。”

肃庵公努力进取

蒋总统的父亲肃庵公，比玉表公更严肃，而且是一个努力进取的人。

一八六二年，由于太平天国之乱，奉化也成了战场；蒋家蒙受到兵祸，辛辛勤勤地建立起来的家产，差不多完全毁于战火。

战乱平定之后，玉表公要二十岁左右的肃庵公开设了一家盐铺；结果，在几年之后，蒋家便复兴起来，当然是受到勤勉之所赐。

邵元冲就肃庵公的情况和玉表公对照比较，作了如左的评论：

“蒋介石先生的父亲肃庵公，秉性刚直，处事公正，待人诚挚，而自持勤勉；容貌刚毅厚重，比之玉表公，更有一种刚强之感。好排解乡里纷争，力持公道正义，热心公益事业，尽力地方教育，凡资力贫乏的学生，无不乐于资助学费。

“肃庵公对于晚年所生的幼子，特别怜爱，但并没有疏忽于严格监督，而且对于他的期许很大。介石先生后来在学问和国事方面的努力，和肃庵公的家庭教育有重大关系。”

蒋总统的慈爱为怀，是得自玉表公，刚毅耐劳的精神，是得自肃庵公的陶冶。

由任介眉先生开蒙

在严格的教育方针之下，蒋总统于一八九二年入私塾就读，当时才虚岁六岁，还没有达到学龄，就由任介眉先生开课，读了两年。

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开始，人心动摇，但是王太夫人并没有让蒋总统中断学业。当时，追随的业师，是在浙江一带驰名的汉学家蒋谨藩先生，攻读四书中的“大学”“中庸”及“神童诗”等古籍。

第二年春天，回到任介眉先生那里就业，熟读了四子书，但不久，任先生病倒，六月间骤然逝世；于是再从蒋谨藩先生受教，从“礼记”、“千家诗”里涵泳中国人的心性；此外，对于中国历史、社会，乃至于世界情势以及“平等”“民主”等新概念，也是在这个时期得到了一些知识。

注一：蒋总统—“玉表公行状”（一九一八四）原文如下：‘吾族自仕杰公迁居锦溪以来，累世历勤穑事，敦崇礼让，胜清三百年间，未有一人求通仕籍者，至公以货殖起家，兼居积盐鹾生计日见饶裕。’

注二：蒋总统—“玉表公行状”（一九一八四）原文如下：‘性慈善，待人以恕；而教子孙则严。衣布茹素，耽好内典，辨晰宗派，尝手钞贝编若干种，今皆散佚……溪北有庵，名曰五岭，行旅往来，多有饥弗得食、渴弗得饮者，公乃施茶给食以济之，凡六、七年。亲友有婚丧不举，缓急相告者，必餍其所求而去。乡中饰庙、构祠、开道、筑堤诸公共建设，捐输无所吝……而博爱之旨趣，充然溢乎事境如此也……’

注三：邵元冲（一八九○—一九三六年）浙江人，早年参加革命运动，留学日本，和蒋总统同样地因得到辛亥革命消息回国。国民党一全大会当选中央委员，后来曾任黄埔军校教官、中央常务委员等职。西安事变时中流弹殉难。

童年与慈母

‘我（蒋总统）幼年，身体多病，常常徘徊于生死边缘；然而，只要病痛一好，马上就会兴高彩烈地跑出去玩耍跳跃，水淹、火烫以及刀棒创伤，连续不断，总是让慈母耽心。’（注一）

故乡溪口镇，是一个安宁舒畅的自然环境。老家靠近镇市的中心区，南边是剡溪（别名锦溪，为甬江的上游），溪流较宽的地方差不多有一百五十公尺宽；北面群山起伏，间隔着桑园、水田、樟木林，以大自然为伴侣的玩耍场所，真是地阔天高，毫无拘束。

童年的小故事

蒋总统在幼小的时候，个性坚毅，是一个顽强儿童，流传了如下面所引述的一些小故事：

三岁（虚岁四岁）的时候，忽然想到要试试自己的喉咙有多么深，于是拿起筷子就向喉咙里面插，忍住疼痛，使劲地插进，几乎全部插了进去，被母亲发现，赶快拔出来，但已经晕了过去。第二天早晨，祖父来到床边，很耽心地盯着他的睡脸说：“会不会戳坏了嗓门？”他却已经毫无病痛，而且满不在乎地回答：“没啥事体。”

七岁，随同祖父到山上的法华寺去拜佛，一时玩得起劲，从陡坡上向下面快跑，脚底一滑，摔到崖下，右额碰伤，遍身是血。

然而，还有更使母亲耽惊受怕的事情，就是在溪流里玩水。自幼生长在水边的蒋总统，差不多每天在溪流里嬉游；有时大雨涨水，溪流湍急，也毫不在乎地跳下去，很多次危险到几乎灭顶。

在五岁的一个冬天早晨，发现庭院中水缸里的水结成了冰，像一面圆圆的大镜子，非常好看，于是扒在缸边，伸下半个身子，想把大镜子取出来，不料用力过猛，一个倒栽葱，掉到缸里去了。等到家人发现，救助出来，已经奄奄一息，要是差一点就为时已晚了。

同伴游戏做指挥官

蒋总统小时候最喜欢的游戏，是模仿打仗，村子里的儿童们集合在一起，拿着木棒竹道，突击冲锋；这个时候玩在一起的孩子们，不管是比他年长还是年幼，如果不是由他来做指挥官，战事就结束不了。而且他总是带头拼战。

‘开始入学之后，更加顽皮，母亲严厉训斥，时加责罚。’（注二）

力气好像也满大的，在蒋谨藩老师的学塾里读书的时候（八岁），有一个粗野同学，欺侮弱者；受到正义感所驱使的蒋总统，某一天放学回家，等在路上，将那个粗野的家伙摔倒在地，村子里有人看到当时打架的情形，向蒋老师告发，因而受到了老师的严厉训责，但他一点也不申辩。

慈母为子取名中正

据说：母亲王太夫人为他取名“中正”，就是因为耽心他过于顽皮，希望他不要一味豪爽、奔放，而在将来要能够有“中庸”做到“公正”。

当王太夫人逝世的时候，朋友们的悼诗中有下述意义的词句：“介石之性，举动异乎常人，如出地蛟龙，脱羁神骏；母爱之教之，故名之曰中正。”

蒋总统原名“周泰”、号“瑞元”、学名“志清”、字“介石”。在日本多叫他“介石”，但他在青年期以后，用“中正”为本名。

王太夫人虔诚信佛教

蒋母王太夫人，出生于一八六四年（民前四十八年），二十二岁和肃庵公结婚。肃庵公在先已有一位元配一位继配去世，王太夫人是第二次的继配。

王太夫人虔诚信奉佛教，能够背诵多种佛经，长斋茹素，二十多年。

蒋总统是王太夫人的第一个孩子，下面还有妹瑞莲、瑞菊，和弟瑞青。瑞菊、瑞青夭折。

此外，尚有异母兄、姊锡侯、瑞春，幼时都共同生活在一起。

长兄锡侯，历任浙江省台州地方法院、广州地方审判厅推事，广东省英德县知事，一九二六年任国民政府参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殁于故乡，是在病中因得到“西安事变”的消息而惊忧早逝。

胞妹瑞莲，于一九○六年与竺芝珊结婚，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病故。独子培风（蒋总统外甥）抗战期间在四川上空战死。妹夫竺芝珊后来曾经担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日在台北去逝。

保家育子训迪不倦

刚过三十岁，就成了未亡人的王太夫人，凄凉孤苦的景况，实在非笔墨言词所能形容。

王太夫人在镇上的商店区，开了一爿小店，维持生计。

凭着一个女性竭力经营谋生的一家人，却受到了地方上有权有势的土豪劣绅欺凌，这已经在前面提到过；甚至于有时候连亲戚、邻居和往日的朋友们对于这个孤儿寡妇的家庭也不来理睬，或有意加以虐待，王太夫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保家育子，孤苦零仃，毫无依靠。到了晚年，曾经痛切地说：“所有的只是痛苦，而且痛苦只有一个人来承担，有时候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注一：蒋总统—“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一九二一六）原文如下：“中正幼年多疾病，且常危笃，及愈则又放嬉跳跃，凡水火刀棓之伤，遭害非一，以此倍增慈母之劳。”

注二：蒋总统—“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一九二一六）原文如下：“及六岁就学，顽劣益甚，而先妣训迪不倦，或夏楚频施，不稍姑息。”

慈母的督教

母亲勤勉刻苦的状态，使幼小的心灵深深地受到感动：

‘我（蒋总统）是在孤儿寡妇的家庭中长大的，受到过很多委屈，饮泣吞声，无可申诉。母亲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把我抚育成人。母亲的忍耐力是难以想像的，我也深受影响，我的个性就是在这种压迫环境中所形成；坚忍不拔的毅力，就是这样地锻炼出来的。’（注一）

王太夫人生存的意义，只有一条道路—就是抚育孤子、督励向学、重振家声；所以对于修身和力学的教养非常严格，经常勖勉伏案勤学，并且对他说：“你父亲是一个有品德的人—严正果决，宽厚慎重。你要继承父亲的人格志向，不可以丢祖上的脸。”这些话总是挂在嘴边，都成了口头禅了。

洒扫应对勤劳俭约

‘母亲深深地抚爱着我，一直就像看待婴孩一样；而其督教，却比老师还严厉。

‘当我出门或回家，必定要查看我所携带的东西；出外旅行或寄宿，必定查问我去那里；放学归来，必定考验我的课业；日常更谆谆教导洒扫应对的礼节和刻苦自立的道理，以及督2[20]250饬我亲自做佣仆们所做的劳苦工作，磨励我的身心免于怠惰。

‘母亲迟睡早起，无时无刻不在倾注她的全力，期望抚养我这个失去了父亲的孤子长大成人。’（注二）

虽然是一个没有男主人的家庭，但是每当家里来了宾客的时候，如何款待客人的一些礼节，幼年的蒋总统就曾受到这种教养。譬如说，对客人劝酒，就得要让对方能在轻松愉快的心情之下尽兴地一醉，这都是得自王太夫人的家教。

早晚，养成了用冷水洗脸的习惯。从当时一般中国人都是用热水洗脸的情况看来，倒是相当稀有的教养。

家庭的事业，也被督促到懂得自动帮忙。就像为了烧饭而帮助劈柴；撩起蚊帐就叠好床上的被子；甚至采桑喂蚕，也成了分内的工作。

为了耕作园地，也曾挑过施肥的粪桶，而且做起来好像还是相当地愉快。总之，不耻恶衣恶食、尊重勤劳俭约的精神，就是诸如此类地在日常家庭生活中所培养出来的。

这个精神，也是后来（一九三四年）推展为全民规模的“新生活运动”的基本理念。

“新生活运动”—是在日常生活中讲求“礼、义、廉、耻”；在修身、待人、接物各方面发挥人类的高度德性。举个例来说：禁绝随地吐痰的恶习，其目的就是在革新中国人的社会风气。

为国家自爱自重

然而王太夫人的教养方针，却并不仅仅是寄望于自己的儿子飞黄腾达、光大门楣而已。

‘我（蒋总统）在十三岁的时候，离家就学，母亲含着眼泪对我说：

‘“自从你父亲去逝之后，我辛辛苦苦地让你读书，并非贪图你去做高官、发大财、而是希望你能为国家自爱自重……”

‘在清朝末年，青年中的有心人，都提倡“留学救国”，我在十八岁的时候，便希望到日本去留学，志愿是学陆军；但是反对的人很多，然而母亲却欣然筹集学费，促使实现。故而自那个时候开始，母亲更是辛苦逾恒，勤俭积蓄，为我准备费用。

忧喜祸福处之若素

‘辛亥年（一九一一年），革命军起义，我在上海和杭州战线指挥作战，亲戚朋友们听到这个消息都惊愕失色；但是母亲则说：“男儿报国，死了也就算了，有什么好怕的！”

‘然而，等到捷报传来，亲友们又兴高彩烈地前来道贺；可是母亲则和平常一样，不变词色，并且还写信来要我知道警惕。

‘民国建立以后，我在上海练兵，迎奉母亲来上海就养；但母亲只来住了十天，临别的时2[22]252候训诫我说：“你应该念念不忘穷苦节约的时候。只要你能够谨慎处事，为国尽力，即使我一个人住在家乡，也不会感觉到孤寂不安的。”

‘及至癸丑（一九一三年）义师失败（为讨伐袁世凯而攻打江南制造局），我亡命海外，家乡亲友唯恐大祸临头，但母亲还是安之若素。我因公私窘迫，写信向母亲求助，胆小的人怕事，劝母亲不要理我，但是母亲说：

‘“天下那里会有儿子危急，母亲不管的道理；先人的遗产，如果不是有儿子在，还有什么可留恋的？”

‘所以，我在外面凡是有求助于母亲的时候，从来没有不答应的。’（注三）

注一：蒋总统—“在中国国民党六全大会代表晚餐会演讲”（一九四五五）

注二：蒋总统—“报国与思亲”（一九三六十）原文如下：‘于中正抚爱之深，常如婴孩；而督教之严，甚于师保。出入必检其所携，游息必询其所往，罢读归来必考其所学；而又课以洒扫应对之仪，教以刻苦自立之道，督令躬亲佣保猥贱之工作，以励其身心。夜寐夙兴，无时不倾注其全力，期抚孤子于成立。’

注三：蒋总统—“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一九二一六）原文如下：‘中正年十三，出外就傅时，先妣垂泪而教之，曰：“自汝父之殁，吾辛辛苦苦，使汝读书者，非欲攫显宦、拥厚资也；所望为国自爱……”有清之季，举国士夫盛倡留学救国之说，中正年十八，蓄志东渡习陆军，人有尼之者，先妣则深为嘉许，筹集资斧，力促就道。然先妣自是益勤俭逾平时，盖将以其所余，资中正学费也。辛亥民军起义，中正督战沪杭间，戚党闻之，多惊愕失色，而先妣则曰：“男儿报国，死则死耳，何足为虑！”及捷报至，亲友皆欣喜相庆，而先妣则又处之若素，且时以书加警惕焉。民国肇造，中正练兵海上，思迎养，而先妣仅许为旬日留；濒行，特训之曰：“汝须念念勿忘穷约时，且须谨慎将事，为国尽力，则吾虽家居，意之适犹愈于迎养也……”癸丑义师败衄，中正亡命海外，戚里惊惧，以为大祸将临，而先妣仍处之如素。中正尝以公私之急，驰书白母，怯者惧祸劝弗应，先妣则谊然曰：“天下安有其子危急而母乃漠然不顾者，吾若无儿，于先人遗产复何爱！”故中正在外，所求未尝不应。’

报国与思亲

中华民国的标语之一～～“自立自强”，也就是王太夫人以身作则教导给蒋总统的信2[24]254念之一。所谓“自立自强”所必须遵循的途径，是自己努力站起来，自己刻苦图强，除此而外，没有别的路好走。

‘母亲曾经孤苦伶仃地“保家教子”，力谋刻苦自强……到了我（蒋总统）矢志革命的时候，对我说：“应该记住我家以往摇摇欲坠，不保朝夕的苦状，努力使人世间不再有强凌弱、众暴寡的悲惨事件发生……”

国肇于家自立自强

‘先哲有言：“国肇于家”。家庭兴废的道理，可以和国家相通，是否会因受不了打击挫折而灭亡，是否能够坚决地站起来致于富强，要看国民的觉悟和努力而定。

‘以我亲自的体验来说：地方上的豪强曾经陷我母子于困厄境地，但却不能挫折我母亲“保家教子”的志节，也不能阻绝我家自求多福的途径。故而天下的安危祸福，无不是由自己造成的；转弱为强，也就必须依赖自己的力量，其道理是非常明显的。’（注一）

这是蒋总统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一日—五十岁生日，所倾吐的感言中之一节。这一年，是芦沟桥事变——进入全面战争的前一年，实在是被压迫得非常痛苦的一年；一方面是日本的侵略意图表现的更加露骨，一方面是中共匪军利用抗战的气势、策划内部叛乱激化的时期。

‘我（蒋总统）以为一时的困难和国力的薄弱，都不足忧虑；存亡兴废的关键，只在于我们国民有没有励精知耻、刻苦自强的决心。假定我们全国二万万女同胞，都能像我寡母一样“保家教子”；为人子者，都能保卫自己的国家，岂有不能使我华夏复兴的道理！’（注二）

慈母去逝抱恨终天

王太夫人在一九二一年和病魔搏斗了一些时候，终于在六月十四日长辞人世，享寿五十七岁。蒋总统抱恨终天，写出了如下泪血交迸的哀痛文字：

‘悲莫悲于死别！痛莫痛于家难！哀莫哀于亲丧！苦莫苦于孤子！……犹忆当时吾母呼吸迫促，儿乃趋拊母背，以冀挽危亡于顷刻，然竟因是不获睹最后慈容之悲戚！’（注三）

王太夫人之丧，国父孙中山先生及林森、胡汉民、邵元冲等革命同志都曾寄来吊唁文字。

灵榇安葬于溪口老家西边距离约两公里处的飞凰山山腰。随后建立的墓碑，有国父所题“蒋母之墓”和“壶范足式”。

据传说，蒋母之墓已经在一九六六年大陆“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王太夫人百岁冥诞，蒋总统在台湾亲撰纪念文，由夫人宋美龄女士书写，遥献太夫人在天之灵，现在摘录一段于左：

‘……今则大陆焚如，岁时且不得一展拜于松楸之间，方号泣攀慕于海峤之上。年齿日增，悔累益深，瞻望父母……唯当益励志节，相与全国军民，光复汉业，重整山河，雪庐墓所蒙腥膻秽污之耻，俾人民早解倒悬陷溺之痛；期毋负于先妣之鞠育顾复劬劳恩情，则幸矣！呜呼！中正不肖，回顾先妣逝世以来四十三年间，国事杌陧，至今未靖，革命挫折，亟待奋励；夙夜蹉跎，而亲恩罔极。今仅以此孤臣孽子耿耿赤心，为先妣百岁诞辰纪念，未能仰答慈教于万一，不孝之罪，终身之痛，其可追耶！其不可赎也！’

武岭苍苍无限仰止

溪口镇，是一个美丽的乡村，这个乡村的象征是武岭。虽然只有海拔一二六公尺的高度，但在儿童时代的心目中，却是令人无限仰止的名山。

一九二五年，蒋总统撰写过一篇“武岭乐亭记”。读之，如历其境：

‘武岭突起于剡溪九曲之口，独立于四明群峰之表，作中流之砥柱，为万山所景仰……岭之上，古木参天，危崖矗立。其下有溪，流水潆洄，游鱼可数……隔溪之绿竹与岭上之苍松2[27]257，倒影水心，澄澈皎洁，无异写真……’

以拥有“禅宗十刹”之一的雪窦寺而闻名之雪窦山，也在附近。一九二○年，蒋总统一时归乡韬光养晦，曾经作过七言绝句一首，寄托心境：

雪山名胜东南最，不到三潭不见奇；我与林泉盟在夙，功成退隐莫迟迟。

故国河山啊！现在你是一个什么光景了呢？

注一：蒋总统—“报国与思亲”（一九三六十）原文如下：‘……吾母夙昔保家教子，孤苦成立，刻苦自强……及中正矢志革命，吾母又尝勉以大孝报国之义，谓追念吾家往昔岌岌不保之苦状，即当推而广之，俾人世无复有强凌众暴之惨史……先哲有言：“国肇于家”，故家庭兴废之理，可通于国；国之盛衰靡常，正犹家之兴废无定，其或不胜摧折，而终于败亡；或蹶然兴起，以自致富强，则悉视其国民之觉悟及努力与否以为断……以中正所躬自体验者言，吾家当中正幼时，孤弱艰危，可以至矣！然而豪强至侵逼，能陷吾母子于困厄；而不能挫吾母保家教子之志节，亦不能阻吾家自求多福的途径。则知天下事安危祸福，罔非自致；而转弱为强，必资自力，明矣！’

注二：蒋总统—“报国与思亲”（一九三六十）原文如下：‘……然中正犹以为一时之艰危不足忧，公理之消沉不足惧，国力之薄弱亦不足患；而存亡兴废所系，唯问吾国民有无励精知耻、刻苦自强之决心……苟吾全国二万万女同胞皆能如吾寡母之保家教子，使为人子者皆能保卫其国，岂有不能致华夏于复兴之理！’

注三：蒋总统—“哭母文”（一九二一六）

追求革新的精神

蒋总统在十三岁（一八九九年）的时候，第一次离开溪口，去到距离约五十公里的王太夫人出生地——嵊县葛溪，进入有名的姚宗元先生私塾“溯源堂”就学。

乍到一个新地方，触目风光都有一种新鲜的印象。根据姚先生的命题，做过一首咏“竹”的诗，下面的两句，描写出当时的心境：

一望山多竹，能生夏日寒！

在这个少年时代的蒋总统，从一方面看，也许是盛气凌人；从另一方面看，是具有批判精神，不肯妥协。当时留传有这么一个小故事：私塾里面悬挂有“冰清玉洁”的匾额，意思是说在宁静的环境中，琢磨澄澈晶莹的品德；蒋总统则对于这四个字发表他的议论说：‘即使是在哄哄乱乱的环境中，只要是想求学问，也没有做不到的理由。’——小孩子纯真直觉的评论，反映出学问不一定是在书案上得来的意见。

先辈同学竺绍康

在这个私塾里，有过一位先辈同学，后来成为浙江省革命运动的中心人物，他就是竺绍康。

六年后的一九○五年，竺绍康和徐锡麟等革命同志在绍兴府创设鼓吹革命的“大通学堂”，他是一位培育革命思想青年的志士。一九○七年，在嵊县最初打着革命军的旗帜起义，但败于清军而逃亡国外，也曾经到过日本。可惜在辛亥革命前一年的一九一○年十二月，以三十四岁的壮年病死于上海。

这位竺绍康，在私塾读书时代，就有作为革命领导人物的风范。一找到空隙，就来和姚先生一个劲地大声交谈，他那种意气轩昂、神彩飞扬的气概，对于青少年们实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某一天，竺绍康骑了一匹马来访姚先生，蒋总统便乘着他们俩人谈得正对劲的时候，拉着那匹马到外面去戏耍，想不到马会突然发狂，结果，背部被马咬伤，又被摔倒在地面，受伤很重。这是由于不懂得控驭就伸手拉马的原故，这一次经验，却成了后来有兴趣学习照料军马的动机。

追求名师专心学问

一九○○年，十四岁，转移到榆林村，随毛凤美先生受读难解的“易经”。翌年，去岐山下村，从竺景崧先生受业，开始作“策论”。十六岁，到岩溪村，追随毛思诚先生，温习“左传”、圈点“纲鉴”。这一段时期，都是在追求名师，专心学问。

当时，有关蒋总统的情况，据毛思诚所著“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书中，有如下的纪述：

“蒋公当下课休息的时候，在教室里跑动不停，连地方都显得狭小，不断地找同学开玩笑，高兴起来，甚至演出恶作剧。然而，一旦开始用功，不管周围如何吵闹，还是能够埋头读书或奋笔书写，丝毫不受影响；像这样地在一刹那之间，静躁转换，简直不能相信是同一个人。”

应童子试弃笔罢去

十六岁的夏天，在奉化应“童子试”。考场舞弊行为，公然肆无忌惮；满清官吏对童生态度，尤极其苛辱。因而认为像这样的考试，倒不如没有的好，于是毅然决然弃笔罢去。后来清廷废止科举，大为赞成，就是因为有过这样的体验。

和学问的进步齐头并进的，是追求革新的精神也在逐渐高涨。最初居于领导者地位的活动，乃关于“改良校务”的问题，是在一九○四年—十八岁，肄业奉化凤麓学堂的第二年。

这个学堂的教学科目，包括有英语、数学，在当时实施的是最新式教育。共聚一堂的青年学子，对于大厦将倾的中国，都充满着如何去追求近代化的热情。

在学堂担任总教习的，是清廷的翰林竺麟祥；其次，教习有周凤祺等著名学者。但正因为多数老师是绩学恂儒，反而在推进新式教育方面便有了障碍；外表虽然具备新的型式，但内容则不脱偏重旧学的故态，和学塾不同的地方仍然很少。

率先提出改革方针

像这样的旧式教育，当然不能为追求中国近代化改革的青年们所接受，于是便发动了“改革教育方针”的要求，而由蒋总统率先向学堂当局提出意见。

学堂方面，意图把问题高压下去，故而给蒋总统扣上“首谋捣乱分子”的帽子，要开除他的学籍，并打算将他当作“革命分子”送官究办。

于是，同学们大为激愤，群起抗议，酿成了全校不安的形势；学校当局因而让步，撤回“退学处分”，平息了这场风波。

就在此时，同学们送给蒋总统一个“红脸将军”的绰号。“红脸”是形容精神焕发，“将军”是指他一直站在同学们的前面。

初闻国父革命

后来曾经在国民政府担任过外交部长的王正廷（注一），虽然比蒋总统年长六岁，但在凤麓学堂同学；彼此之间，还有过一个很有趣味的小故事：

有一天，王正廷和同学们登上奉化县城墙游览，脚底下一滑，倒栽葱跌了下去。

同学们惊骇莫名，四散逃走。想不到王正廷在跌下去的时候，却正好被一棵大树的枝桠挂住了衣服，很幸运地没有摔到地面上去，吊在半空中连声大叫救命，好不容易让过路人给救了下来。

后来，蒋总统知道了这回事，要教训教训那些见到同学跌下去竟然弃之而逃的胆小鬼；但是王正廷则极力加以劝止，他说：“不要这样，这不是同学们的过失，问题出在城墙，如果没有城墙，就不会吃到这个苦头了。”

“如果没有城墙！”听到这一句话之后，忽然在蒋总统的脑海里浮现出另外一个念头：

在盗匪横行、战乱频仍的中国，一般城市周围都筑有坚固的城墙，这是为了保护城内居民安全；然而对于住在城外的人，却不就是毫无道理地迫使他们处在不平等的境地吗？

像城墙这样的东西，本来是如果没有它也就可以的话，实在是最好不过。所以，在一九二六年率领国民革命军，为统一全中国而北伐的时候，将有些光复后城市的城墙拆除，据说就是贯彻了这一个念头。

顾清廉先生讲述革命

一九○五年，结束了在凤麓学堂两年的学生生活，转到被称为浙东第一的箭金学堂肄业。

在这个学堂里，有一位顾清廉先生。蒋总统受到顾先生的陶冶颇为不少。

顾先生是一个同情革命的人，一面讲授经史古籍，一面忧心中国前途，热情洋溢地畅论国是，宣传“独立”、“自立”等民族大义。

同时，并劝导蒋总统说：“一个国家想要独立生存，就不可以缺少军事力量；为了将来有一天能够担当捍卫国家的任务，就得要学习军事。”于是自动地为他讲解孙子兵法，并且强调：“要想懂得兵法、获得新的知识、保卫自己的国家，就应该到外国去留学。”

还有，有关于青年革命家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存在，也是从顾先生那里最初听得来的。

顾先生对于孙先生的革命理论和行动，尽其所知，都告诉了蒋总统；尤其是在伦敦被清廷驻英公使馆逮捕监禁的事件，给予了很深的印象。关于这个事件，后方继续连载之中，还会有详细叙述；在这里要说明蒋总统在当时深受感动的是：第一，在先进国家的英国，是由“平等”的观念挽救了孙先生的生命。第二，革命志士们甘冒生命危险为挽回国家的命运、拯救国家于混乱而献身革命，在海外活动的情况。

决心留学研究军事

就是这样地在顾清廉先生的诱导之下，形成了“留学→研究军事→献身革命”——确立不移的人生南针。

留学的目标，首先就是邻国——日本。选择日本的理由，是因为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得到了胜利。自明治维新以来不过三十几年，就打败了大国俄罗斯，国力和军力都达到了迅速成长的要求；于是，“向日本看齐”的呼声，在忧心中国前途的青年们之间，已经成了一致的口号。

第二年～～一九○六年，也就是蒋总统二十岁这一年的正月，暂且进入奉化龙津中学；可是留学日本的愿望则更加浓厚，因而对于像这样在地方上的一个学堂里消磨时光，未免有点焦躁不安。虽然，在这里和英文一样地也有日文可以学习，不过，还是没有肄业多久。

‘我在本县龙津中学肄业的当时，因为痛恨乡里土豪劣绅的横行，目击我们国家遭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尤其是在那时看到日本以一个弱小的国家，能够奋发图强，战败帝俄，予我精神上以最大的刺激。所以我在龙津中学肄业不到半年，就请求家母准许我到日本去学军事，来尽到我国民一分子的义务，促成我们国家的雪耻自强。’（注二）

董显光先生的印象

在龙津中学时代，担任英语教师的董显光（注三），对于蒋总统有过如下的回忆：

“他（蒋总统）的寝室，和我在同一层楼上，因此我有很多机会观察到这位未来的中国领袖在课堂以外的活动。

“他是一位起身很早的青年，每天梳洗之后，经常站在宿舍的洋台上差不多要有半个小2[37]267时光景。那时候，他紧闭着嘴唇、交叉着双臂，充分表现出一种沉思与坚定的姿态。

“当然，没有人能推断他这个时候在想些什么，不过很明显地他是在计划未来。

“还有一件使我至今难忘的深刻印象，是他每天等着上海送到报纸的那种热切期待的表情。奉化是一个小地方，上海的报纸并不是经常能够送到的，当然大家都要抢着看；龙津中学的阅览室狭窄得容纳不下几个人，但是他总是能够抢先到手，热心阅读，这表现了他对时事的关心程度不是普通人可以相比的。”（注三）

注一：王正廷（一八八一～～一九六一年）早岁留学日本、美国。归国后，参加革命运动。一九二八～～一九三一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一九三六～～一九三八年任驻美大使。

注二：蒋总统—“对从军学生训话”（一九四四一）

注三：董显光（一八八七～～一九七一年）早岁留美归国后，从事新闻工作。抗战期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战后历任行政院新闻局局长，驻日、驻美大使。本篇引用之资料，出于“董显光自传”。

首次东渡日本

蒋总统自从进入龙津中学（一九○六年一月）之后，没有过三个月，就下定了决心到日本去留学。

可是，家乡的亲戚朋友们却一致表示反对。在保守的家乡人看来，如果是去上海或北京的话，倒也还无可厚非；然而远渡到东海彼岸的外国——日本，则未免是一个不计后果的鲁莽行动。

毅然剪下辫子

为了要表示决心，唯有采取非常手段，于是毅然把辫子剪了下来，托付给朋友，带到溪口送给母亲。

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缠足，是当时中国的坏风俗。

辫子本来是满族等北方民族的传统，是将脑袋周围剃得精光，剩下头顶和后脑的头发，蓄长起来编成辫子垂在脑后的一种发型。满洲民族自从统治中国以来，便强迫汉人接受这种发型，作为一种表示服从的象征。

如果说缠足是女人隶属于男人的表记，那么梳辫子便是汉民族屈服于满清的证明。所以，谁要是把辫子剪下来，就等于是在向清廷发表反抗宣言。家乡的人认为这种行为是“大不敬”——“那个孩子终于把辫子剪掉啦！是不是想要做革命党啰？”“革命党”的罪行是要株连到全族的，许多人只要是提到革命党三个字，都会心惊肉跳的。

慈母支持首次东渡

然而王太夫人对于来自周围的反对声浪，毫不在意，自动地为他准备留学费用，让他达成留学日本的心愿，这已经是在前面叙述过了的。

一九○六年四月，蒋总统第一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

‘在东渡日本的轮船上，有一位同船的中国学生，吐了一口痰在甲板上；被一位中国船员看到，就告诉他：“一般日本人是不会随地吐痰的；要吐痰、就吐在手帕上或卫生纸上，然后折起来放回口袋里，带回去洗涤或是扔掉。”这一件事，给予我的印象很深，所以至今不忘。’（注一）

确实，在当时日本人是持有着中国所没有的东西：

日俄战争，归结于日本得胜，因而签订了朴资茅茨条约、转让“南满铁路”和割让南库页岛给日本的决定，才经过了不过半年多的时光，充沛的活力，便已经洋溢在整个日本国土上——近代建筑陆续出现，象征工业力的烟囱冒起黑烟。同样是一个东方国家，但日本却能不为西方列强的压力所屈，而循着自立途径迈进的民族力量，使人有一种深刻的印象和紧迫的感受。

在充满着活力的东京，国父孙中山先生已经于前一年的八月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革命运动，比起她的前身——“兴中会”时代，更加强了组织性能，更发挥了活动效力。

然而，蒋总统满怀学习陆军的热望，却立即遭遇到了挫折。

‘我到了日本，就想进日本的军队；但当时日本规定中国学生要入日本军队受训，必须由中国陆军部保送。我既非政府保送，自然不能入伍。’（注二）

无可奈何，只有进入东京的清华学校，学习了一些日本语文之后，就在那一年的冬季返回到国内。

结识陈其美先生

在日本停留的时间虽然短暂，可是却有很大的收获，那就是和革命志士陈其美（英士）结识，建立了革命同志的亲切友谊。陈其美也是在同一年（一九○六年）刚刚来到日本。

陈其美于一八七七年出生于同属于浙江省的吴兴县。在后来，为建立国民党组织而有贡献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就是他的胞侄。

陈其美从甲午战争的失败体察到中国的危机，他认为凭清廷的能力已经不可能挽救这个国家，故而参加了革命运动；尤其是在一八九八年，他又看到列强倚仗武力背景相继租借了胶州、大连等主要港口，更想到国家的保卫和重建，非得要强化军事力量不可。然而，他本人因为协助家业（商家），非常忙碌，于是便劝导胞弟陈其采（蔼士）去日本流学，进入了陆军士官学校。

陈其采在日本留学四年，于一九○二年归国，向乃兄详细报告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如何达成了富国强兵的目的。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陈其采自日本携回了一些关于“阳明学说”的书籍，同时并把有关日本建国精神——武士道的知识，告诉了陈其美。

陈其美被这些话所打动，在第二年，便不顾父亲陈延佑（春仓）谆嘱继承家业的期望，迁居上海，积极从事革命运动。更且于一九○六年，前往日本留学，先后学习警察和军事，同时为发动中国革命而在日本展开活动。所以，他在当时已经和很多革命志士有所接触。蒋总统留日期间虽然短暂，但是却能够认识了很多的革命家，就是因为有陈其美的关系；后来，在第二次去日本，便参加了同盟会。而且能和国父结识，也是出于陈其美的引见。

陈其美先生行动果敢

陈其美自许“以冒险为天职”，是一个兼备奔放热情和果敢行动的“天才革命家”。

陈其美后来成为孙先生最信赖的同志之一，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在关系到革命成败的一个重要场面——“光复上海”运动中，担负着领导任务。

中华民国建国以后，陈其美为抵抗袁世凯的祸国行为，曾经先后指挥一九一三年突击上海江南制造局、一九一五年袭取江阴要塞的殊死战斗。一九一六年被袁世凯所派遣的刺客以手枪暗杀。关于这一类的事，在后面将另有叙述。

总之，蒋总统由于和陈其美的遇合，得以投身于实际革命运动；可见第一次的东渡日本，虽说是没有能够达成进入军队受训的愿望，但却是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捩点。

注一：蒋总统—“革命历史的启示和革命责任的贯彻”（一九六九三）

注二：蒋总统—“对从军学生的训话”（一九四四一）

进入保定军校

一九○六年的冬天，蒋总统结束了第一阶段在日本的留学，返回国内。

料想不到，在故乡却有得偿夙愿的机会在等待着。

‘到了第二年（一九○七年），清廷陆军部在保定创立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向各省招考学生，规定每省考选四十人；可是浙江省的四十人名额，大多数已被清廷为实施军事教育而设立的武备学堂与弁目学堂保送入学的学生所占去，剩下来只有十四个名额，全省青年千余人在杭州报名投考，我（蒋总统）就是在这十四个名额中考取的一个人。于是，在二十岁的夏季，就进了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但是，我的目的是要藉此机会东渡日本，去学陆军。因为在保定军校，才能有机会达成去日本学习陆军的希望。’（注一）

中国最初的军官学校

“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以下简称保定军校），是因为受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冲击而体会到建军之重要性的清廷，在日俄战后的第二年（一九○六年）所设立，是中国最初的军官学校。

在此之前——当义和团之乱刚过去的一九○一年，慈禧太后诏命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着手编练新军。其构想是：在每一省各设武备学堂等训练机构，负责军事学生的养成教育。保定军校则是由各省选拔优秀人材，集中在中央实施干部教育；毕业后，任用为陆海军干部，分发各地，作为建设新军的骨干。基于这个需要，清廷每年支付经费十多万元，自欧、美、日聘来许多教官任教，并建立了向各国派遣军事留学生的制度。

保定军校，固然符合了清廷的期待，训练出毕业生造就成优秀的军人；但在同时，国父孙中山先生所提倡的革命运动，也开始通过留学生们渗透到军队的内部，后来，在配属为军队干部的军校毕业生之中，挺身而出打倒清廷的，却是大有人在。所以，对于革命势力的培养，也发生了相当作用。

进入保定军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一方面如前所述，竞争者太多，录取率甚微；另一方面民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轻视军人的偏见，根深蒂固，所以应考军校者往往被旁人嘲笑、或是被迫打消念头。而且，在蒋总统来说，还有一点困难，就是在临考之前，突然生了病，必须勉强抱病参加。

说服考官方获录取

考试的当天，又因为年龄未满二十岁，口试官员便以这个理由不考虑予以录取，但经蒋总统说明虚岁到了二十岁，体力已够充足，可以胜任为一个报效国家的成年军人，才终于说服了考官，突破了难关。

为了赴军校入学，由奉化到保定要纵贯半个中国大陆，这是蒋总统在广大国土上最初阅历长途旅行。保定又名清苑，在北京之南约一百四十公里。由故乡溪口到达保定的直径距离，就超过了一千一百公里，需要一个月以上的漫长跋涉

亲身阅历民间疾苦

在这一次旅程中，对于中国国民被压迫到什么样的生活、被屈辱在什么样的地位之下的情况，随时随地都呈现在眼前，了然于胸中。

在上海，乃至在其他都市或港口，外国人过的是王侯贵族一样的生活，中国人则呻吟在外国人的侮辱、压迫、榨取之下，还不得不苟延残息，简直没有被当作人来看待。

至于在河北省等北方乡村的民众，也是过的穷困生活，唯有和清廷有血缘关系、亲属关系的满族人，才享有各种特权，受到优越照顾，贪恋着安逸的境遇。在这里的中国人，也是在被榨取膏血，也是隐忍在酷虐的待遇之下。

蒋总统到了保定军校，进入炮兵科肄业。

炮兵科在当时的陆军中，是需要具备有最新知识和技术的兵种，而且对于战争的胜败，具有能够发挥决定作用的威力。

譬如说：在甲午战役中，日军给予清军的致命打击，是在一八九五年一月山东半岛的威海卫之战。威海卫是清军北洋舰队的军港，有以二十四公分克鲁伯大炮为主的十几座炮台为之防卫；因此，日军乃从要塞背后的陆地发动攻击，先将炮台占领，反过来利用夺取到的大炮集中火力轰击港内的北洋舰队，将之歼灭。

又如日俄战争时，在最高潮的旅顺攻防战中，日军两次总攻击，都被俄军的优势火力所遏阻，付出了重大的牺牲。日军为谋增强火力，乃将安装在国内海岸要塞的十八门旋转式二十八公分榴弹炮拆卸下来，运到战场，用作攻城大炮，这才转为优势；所以在第三次的总攻击时，占领了二○三高地，俯轰旅顺港内的俄国太平洋舰队，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以致战局对于日本非常有利。

清廷方面，也按照其“船坚炮利”的口号，急切考虑充实炮兵。

蒋总统之所以选择了炮兵，也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决定的。

没有辫子受人注意

蒋总统在保定军校入学之后，最引人注目的是剪掉了辫子，在同学中没有第二个没有辫子的人；因而受到学校当局和满族同学们的特别注意，他们纷纷议论“会不会是革命党啰？”“要留意他一点”——白眼交集，简直成了一个问题人物。

于是，对于日常的言行举止，自我克制，极力慎重，即使是受到侮辱，忍了一肚子的气，也装作毫不介意的样子，表面上和一般同学的态度毫无不同。因为，万一接受挑衅，就很可能断送了去日本留学的希望。

注：蒋总统—“对从军学生的训话”（一九四四一）

反击日籍教官

保定军校时代的蒋总统，在中华民国小学三年级的教科书里，也记载着这么一个有名的故事，现在来介绍一下：

某一天，有日本军医教官上卫生学的课，带来一块泥土放在桌上。

“这块泥土，大约有一立方英寸（约十六立方公分），这里面有四亿个微生虫”——就这样地打开了话匣子，接下去又说：

“这可以拿来比譬中国，中国有四亿人口，就像这四亿个微生虫寄生在这块泥土中一样。”

把中国人比作微生虫？蒋总统按捺不住气愤，离开了座位，跑到讲台上，把那块泥土分成八块，拿起其中的一块，送到日本教官的面前说：

‘日本的人口有五千万，在这个八分之一立方英寸的泥土中寄生的微生虫，也可以说就是日本人吗？’

根本就瞧不起中国人的日本教官，真是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受到这样的反击，在一瞬间，目瞪口呆，面红耳赤，对着蒋总统大声咆哮：

“你！你！你是革命党？”

他以为像这样说，可以把蒋总统唬倒；然而蒋总统却毫不害怕地接着说：

‘我只是想问问老师的比喻是不是恰当，请不要说些不相干的话。’

日本教官当时没有再争论下去，但离开了教室之后，马上找到军校总办赵理泰，要求严重处分蒋总统；按照保定军校校规，反抗教官的学生，是要受到开除学籍或禁闭的严厉处分的。

但是，赵理泰知道错在日本教官，所以只是将蒋总统申斥了事，并且反而对他流露出了同情之意。

申请特准参加考试

一九○七年冬季，陆军部公布自保定军校学生中选派留日陆军学生，但是规定应考资格以在该校日文班学日文的人为限。于是，日文班以外的学生都不得其门而入。

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是蒋总统并非属于日文班，当然就没有报名的资格；因此便越级向总办赵理泰直接呈送了一个报告，内容是：‘去年在日本学过日语，所以没有参加日文班，请特准给予应考资格。’

报告送上去之后，直到考试的前一天，都还没有批复回来；已经不再存希望，便躺到床上去睡觉。

到了深夜，忽然就是像在做梦一样，有一个手里拿着提灯自称是“赵总办派来的人”，通知特准参加考试。

第二天，和日文班的同学们一起堂堂正正地进入考场，结果被录取了。

‘这一次被录取的，连我在内共有四十人，张群同志也是其中的一人，我们都被保送到日本振武学校。’（注一）

出发前往日本，是在过了年～一九○八年蒋总统二十二岁的时候，匆忙启程，都没有来得及向家乡亲友们告别。

蒋总统和张群

蒋总统和张群（注二）成为最要好的朋友，就是从这里开端。张群自从进入保定军校，到留学日本振武学校学生生活、新泻（县名）高田（地名）野炮兵联队实习，乃至于参加辛亥革命的青春时代，一直是和蒋总统生活与共；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还是蒋总统一位得力的好帮手。两个人的友谊，被认为是超过了兄弟一般的感情。现在也住在台北市士林蒋总统官邸的比邻，可以从庭院里面通过栅门往来。

虽然是由中国陆军部派遣留学，但是在前往日本的时候，由于中国还没有开设中日之间的定期航运，故而乘的是日本商船。在这个商船上，由船员到服务生、厨师差不多都是日本人，中国籍的服务人员只不过两、三个人而已。只要举出乘船旅行一点为例，就可以体会到自己的国家是在外国的支配之下。

张群在接受笔者（译注：产经新闻编辑委员古屋奎二）采访时，回忆当时东渡的情形如下：

“留日考试合格的学生，好像有六十人左右。能够畅通日本话的人，由保定起程直接前往日本，我们（包括蒋总统在内）虽然能够阅读日文，但因为说得不好，暂且先到东北的陆军部集合，然后由大连乘船前往神户，换乘火车到达东京……”

注一：蒋总统—“对从军学生的训话”（一九四四一）

注二：张群（一八八九年出生）字岳军，四川人。历任上海市长、四川省主席、行政院院长、总统府秘书长等职，现任总统府资政。对中华民国的内政和外交方面有相当的影响力。早在战前、战时，从事对日交涉。战后，尽力于缔结中、日和约；其后，周鸿庆事件、维尼龙工厂输出问题，都担当中、日之间的协调任务。这个连载秘录自企划之初，即参与其事。

留日学习军事

到了日本，进的是“振武学校”。这个学校可以说是清廷为派遣留日军事学生而专门设立的“陆军预备学校”。蒋总统是第十一期学生。在这里大约受训三年，毕业之后，以见习军官身分，分发日本国内各联队（团）实习。

振武学校的设立

振武学校，是在一九○三年由日本方面将座落于东京牛□区河田町、原为日本士官学校的临时校舍，提供满清政府所设立的。除了给予激增的军事留学生以方便之外，也兼有便于当局对留学生管理、约束的目的。这是因为自义和团事件之后，革命运动开始在留学生群中流行起来，这种情况，在清廷方面乃至在日本政府方面都不以为然，所以有必要把留学生集中在一起加以管理。

促成设立振武学校的契机，是发生了所谓“吴孙事件”（一九○二年六月）和“拒俄义勇队事件”（一九○三年四月）。

“吴孙事件”

在此之前，日本政府于一八九八年设立了接受委托管理留学生的制度。在当时最为军事留学生向往的是成城学校（私立中学），这个学校重视军事训练，已有定评；在该校毕业的学生，如果志愿学习陆军，一切都会无条件通过，故而被认为是造就侯补军官学生的捷径。只是留学生要想进入这个学校，则必需清廷官方的身分保证。

一九○二年六月，清廷驻日本公使蔡钧对于希望进入成城学校的私费留学生钮瑗等九人，以“私费留学不能作保”的理由拒绝保证，因这样不公平的对待而激愤起来的留学生们，乃由素孚众望的吴敬恒（稚晖），孙揆均二人领导包括被拒绝保证的九人在内共计二十六人，跑到公使馆坐着不走，强迫蔡钧作保；于是蔡钧便请求日本警视厅派来警察将吴孙两人逮捕，以妨害治安罪名驱逐出境—这就是“吴孙事件”。

“拒俄义勇队事件”

至于“拒俄义勇队事件”，是因为俄国乘义和团之乱进军东三省拒不撤退；于是在一九○三年四月，约有留学生五百人集会抗议俄国暴行，并组成“学生军”，以在陆军士官学校肄业的蓝天蔚为队长，甚至具备有由女留学生十二人组成的“看护队”。在这个时候，蔡钧又要求日本政府取缔，乃由神田警察署发出警告，促使“学生军”解散（改称“军国民教育会”）。

在清廷而言：为了建军，有必要尽可能地造就大量的留学生，故而采取奖励政策；可是另一方面，却又对于参加革命运动的留学生不断出现，极为头痛。因此，清廷陆军部丞参良弼便和日本参谋本部福岛安正中将、青木宣纯少将等人成立了一个“清国留日陆军学生委员会”，协商结果决定成立“振武学校”。学校规模以及教育内容大致都和成城学校差不多；日本文部省（教育部）也都承认其为志愿学习陆军的预备学校。

据日本方面所保存的资料，振武学校设在东京都新宿区河山町二十一番地，现在为东京女子医科大学校舍。当时由福岛安正担任清国陆军学生监理委员长，木村宣明中校担任学生监，曾任武昌武备学堂教习的野村岩藏担任舍监；此外，自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幼年学校请来的兼任教官颇多。至于该校出身的留学生，除蒋总统、张群之外，还有阎锡山（后来曾任国防部长、行政院长）、蒋作宾（第一任驻日大使）、孙传芳（北洋军阀之一，和蒋总统的国民革命军敌对）等人。

规定章程加紧管制

清廷和日本政府，藉上述一些事件的发生，越发对留学生加紧管制。由清廷和日本驻清公使内田康哉取得协议，一九○二年派遣“游学生监督”赴日，第二年更制定了“约束游学生章程”（留学生管理规则）等三个规章。这个章程规定：“不准擅自外出、妄发议论”、“不准发行有关政治性的印刷品”，内容相当严厉。同时日本政府也接受了清廷的意旨，由文部省发布了一个被称为“取缔规则”的省令，自一九○六年一月施行，着手取缔校外活动。尤其是在一九○五年八月，“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于东京，使清廷特别神经过敏，对留学生压迫更严。因此发生了陈天华为抗议日本文部省命令而于一九○五年十二月在大森海岸蹈海自杀事件。

秘密团体“丈夫团”

蒋总统于一九○八年进入振武学校的时候，正是越发加强取缔。然而，在到达日本之后，便立即和陈其美重逢，因他的介绍加入同盟会，挺身参加了革命活动，并且和张群都加入了在同盟会会员中的军事留学生们所组成的一个秘密团体—“丈夫团”。这个团体，是由后来在辛亥革命中担任沪军参谋长、甚为活跃的黄郛所组织。团名取“丈夫”两个字，是从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而来。

蒋总统还和黄郛一同创办过“武学杂志”。这个杂志，也是留学军事的革命青年们的重要言论机关。

当蒋总统进入振武学堂之后，革命志士们发动了广东的钦州、上思之役（三月）和云南河口之役（四月），这是国父孙先生所策划进行的第七次、第八次的革命起义行动，但都归于失败。其后，大约有两年，是进入蓄积革命活动力量的时期。

注一：吴敬恒（一八六五～一九五三年）字稚晖。江苏人。自日本遣送回国后，曾在上海并赴法国从事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后归国，一度出任唐山大学校长，提倡推广注音符号，致力于国语统一运动。晚年任总统府资政，在台逝世。遗言为期待反攻大陆而在金门海葬。

注二：黄郛（一八八○～一九三六年）字膺白。浙江人。辛亥革命及第二次革命时（打倒袁世凯），担任沪军参谋长；讨袁失败，亡命日本，袁死后归国。历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一九三三年中日塘沽协定之后，曾在北平致力于对日本的折冲工作。

首次会见国父

在同盟会会员之中，浙江和邻近的江苏两省人士颇多。每逢星期日聚首交谈，意气投合：议论所及的范围，经常是痛恨清廷压迫汉人，以及被列强夺去主权的中国现状。

留学生活回忆

蒋总统最要好的朋友—张群，对于那一段时间的学生生活状况，有如下的回忆：

“在振武学校留学的时候，只有星期天才可以外出；我们租了一间只有在星期天才使用的房子，有十二个榻榻米那么大，大家都在那里聚集谈话。

“有兴趣的事情之一，是自己做饭吃。在那个时候，日本人还没有吃猪内脏的习惯，一头猪的内脏全部买下来，记得只要八角钱，非常便宜。我们每人每月可以领到日元十三块钱（政府发给十元、学校发给三元），在一顿早餐只要花四分钱的时代，相当宽裕。用炭炉生上炭火烧饭，大伙吃在一起。当然蒋总统也会上街买菜和做菜。

“记得还有过这么一回事，由于取缔留学生的规则太严厉，为了抗议，我和蒋总统俩个人扔下了退学报告，拔腿便走，跑到神田的中国料理店—龙涛馆，仅是啃面包和饮水，死守着不出去，差不多有一个月，严峻的学校当局终于软化，结果只给予我们俩人稍稍扣分的处分，要我们回学校恢复学业。

“就这一点，可以了解蒋总统在当时的革命青年面目，真正是呼之欲出；是一个正义感很强，性格很激烈，对于不合理的事情便会大发雷霆的人。

“蒋总统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自保定时代以来就很投契；我最初的志愿是学习步兵，但因为受到他的影响，中途改学了炮兵。

“当时，我每个月总要抽三块钱的香烟，但是蒋总统却烟酒不沾，生活规律非常严格。

“不过，在畅谈革命之余，也会抽暇乘电车在市内游览，或是到江之岛一带游泳，也曾度过欢畅的学生生活。”

此外，根据日本方面留下来的纪录，在一九○八年八月至十月之间，曾发生留学生集体退学事件，有张群在内，但并未见到蒋总统的名字。

随身携带“革命军”

在这一段时间，蒋总统有一本经常携带在身边的小册子，就是邹容烈士在一九○三年所撰写的“革命军”。

邹容认清了使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是满洲朝廷。他激昂地呼吁“要使中国为中国人的中国”“打倒满洲人所树立的北京野蛮政权”“诛杀满洲皇帝”“把满洲人从中国赶出去”“以杀报仇”“创立中华共和国”“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的国家”……就是因为发表了这些文字，邹容被捕下狱瘐死，所以是一本具有特殊意义的书。这本小册子虽然已经发行几年，但其论点仍然新颖。蒋总统对于它的一字一句都熟读到能够背得出来，连在梦寐之间都好像是和邹容一起在对满洲人作战。

这样高涨的民族意识，当时寄托于一首七言绝句，写在寄表兄单维则的照片上：

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首次和国父见面

一九一○年六月，在振武学校求学的最后一年。第一次和国父孙先生见了面，这也是由陈其美所介绍。国父在这个当口自檀香山来到日本，清廷指他为危险人物，要求日本政府将他驱逐出境；因此，只停留了两个星期，便离开日本前往新加坡，在极其匆忙之中腾出了一点空档，约见了蒋总统。

蒋总统和国父的第一次见面，在中华民国的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其时日、场所、谈话内容等情况，无从稽考；唯一的纪录，是国父在晤面之后向引见者陈其美表示初步对于蒋总统的印象是：“我们的革命运动，实在需要像这样的人，在同盟会来说，是很难得的人材，他一定会成为革命实行家。”

蒋总统提到过第一次听到国父对党员训话的内容：

‘我还牢牢地记得总理说：“革命党的青年，应该不计名位，而要为革命任务牺牲奋斗。美国建国英雄华盛顿，也并不是由他一个人的力量造成的，而是由于千千万万无名的华盛顿共同奋斗，为他们的领袖华盛顿牺牲而造成的。我们革命者，不是要成为有名的华盛顿，而是要成为无名的华盛顿——无名的英雄。”我听了这个训示以后，就立定了志愿，要实践这个训示，决不辜负总理对党员的期勉。’（注）

由于和国父的见面，蒋总统走向革命的路线，更加明确地做了决定；尽管等待着革命时机成熟的心境已经到了非常焦灼的程度，但仍然在这一年的十二月，进入了新泻县高田（现在的上越市）的野炮兵第十九联队。

注：蒋总统—“我们复国的精神志节和建国的目标方略”（一九六三十一）

国父伦敦蒙难

现在将话题转移到国父孙中山先生。

孙文这个姓名，以一个革命家的身分扬名于世界，是由于甲午战争结束后一年～～一八九六年在伦敦被清廷驻英公使馆监禁事件所造成。这个事件，不仅使孙先生声名远扬，也不仅使有志于革命的中国青年们热血沸腾，而尤其重要的是英国在当时为了迫使清廷公使馆释放孙先生所采取的行动，告诉了人们什么叫做近代国家，什么叫做正义。

如前所述，蒋总统也是由于听到这个事件，才晓得有孙文其人的一个青年。这个扣人心弦的真实故事，是在他十九岁肄业于箭金学堂时，从汉学家顾清廉老师那里听来的。

孙先生于一八九四年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之后，下一年的十月，在广州发动第一次革命起义失败；其后，经日本避往美国，再下一年～～一八九六年九月三十日，由纽约首途，前往英国。

清廷通令一体缉拿

在这个时候，清廷已经给孙先生扣上了“粤省要犯”的帽子，指为首谋叛乱，通令驻外使馆一体缉拿。所以，当孙先生离美赴英之时，清廷驻美公使便立即通知了驻英公使龚照瑗，龚照瑗乃委托司奈特侦探社跟纵调查，策划逮捕。

这个侦探社，在孙先生到达的第二天～～十月一日，便迅速地向公使馆参赞马格里（英国人）提出了如下的报告：

“九月三十日中午，在普灵斯码头下船，只有一件行李，从利物浦密德兰车站乘下午四时四十五分火车，当晚九时五十分抵达伦敦圣班克拉斯车站下车，改乘一二六一二号马车，投宿于斯屈朗路之赫胥旅馆。目下，在我们的监视之中。”

对于这一情况，孙先生当然是朦在鼓里，一点也不知道，只顾参观大英博物馆，游览名胜古迹，以及前往在覃文省的康德黎老师家中访问，经常埋头于阅读康氏的藏书。康德黎曾经是孙先生以前在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医学部前身）肄业时的老师，其后，为营救孙先生脱险，尽了很大的力量。

被挟持禁闭于公使馆

孙先生坠入清廷驻英公使馆的陷阱，是在十月十一日的星期天。

上午十点半左右，走出大门打算到教堂去，在路上碰到三个中国人，以请往喝茶为由，相偕进入公使馆，一直走进了大门，还没有察觉到就是使馆，随即便被挟持禁闭在三楼一个窗子上装有铁栅的小房间里。

当时的情况，在孙先生手着的“伦敦被难记”（原着为英文，有日译本）里面，记载被诓骗进入使馆的情形很详细；但清廷公使馆员吴宗濂（后来曾任驻荷兰大使）留下来的“随轺日记”，则稍有不同。据说孙先生在被监禁的前一天，自行到过使馆，遇到随馆学生宋芝田，询问：“有没有广东人？”于是有广东出身的四等翻译官兼警务官邓廷铿出来答话，谈得很起劲；孙先生自称姓陈，名载之。在告辞的时候，拿出金表看看时间，邓廷铿要过表来看了一下，发现上面刻有罗马字ＳＵＮ（孙），邓廷铿心里在想：“这下可太好了！”但却丝毫不动声色地说：“明天还来不来？一起到码头上做生意的广东人那里去玩玩吧！”孙先生很高兴地答应了。

第二天，孙先生如约到来，吃饭之后，马格里假装介绍参观馆内状况，而将他引诱进了事先准备好了的空房间。

不过，这个公使馆方面的记录，一般认为是为了掩饰强迫诱拐的事实，而故意制造出来的。

被监禁着的孙先生，为了想和外界联络，潦草地写了几句话交给看守人；又把写好的纸条裹着硬币，试图从窗子上丢出去，但都没有如愿。

监禁到了第六天的十六日，由清廷发来电报给公使龚照瑗，对于将孙先生解送回国之事指示如下：

“为了租用驶往广州的商船，望采取最佳办法。缺款七千镑，即由银行拨汇。”

因目击公使馆的卑劣行为，反而对于孙先生寄予同情的公使馆女管家霍维夫人，通过使馆的佣人柯尔将电文的内容告诉了孙先生。

第二天（十七日）早晨，柯尔将孙先生的书信藏在搬送火炉用煤的篓子里带出去，替孙先生担任了和外界的联络工作。

康德黎展开营救活动

康德黎的家里，在这一天的晚间十一点左右，接到了一封匿名书信，内容是：“你的友人，在礼拜天被清廷公使馆所监禁；公使馆要将他解送回国，大概会判处死刑……这个朋友的名字，好像是叫做孙逸先。”这封匿名信，比孙先生自己写的信到得快一点，这是柯尔要他太太写去的第一次情报。

康德黎接到这封信之后，便从第二天早晨起展开了营救活动。

首先，去到马格里家里拜访，马格里不在；于是，马上转往就在附近的梅尔蓬巷警署，说明有这么一回事；继之，又跑到苏格兰场警署，向主管警官告发。

康德黎顺便又去拜访孟生博士，孟生也是孙先生在香港时代的老师。在孟生那里刚好遇到柯尔，柯尔原先是去康宅，未遇，听说在孟生这里，故而赶往见面，给带到了孙先生的两张名片，潦草地写着请托营救的传言，柯尔并且告知：“公使馆指孙文是疯子，要在两天之后的星期二，雇船护送前往中国。”

于是，康德黎和孟生两人，再去苏格兰场警署，并且进一步向英国外交部及伦敦泰晤士报申诉。孟生更往清廷公使馆拜访，但在门口被挡了驾；两人乃雇请侦探，在公使馆外面加以监视。

研究革命理论

孙先生的老师康德黎和孟生两人，向英国外交部报告监禁事件，是在此事发生后一个星期的星期天～～一八九六年十月十八日。

由于碰到了星期假日，加上又拿不出确实证据，所以警察当局最初是疑信参半，因而嘱康德黎于第二天～～十九日，提出案情报告，据以展开调查。结果，查出公使馆已经包租了解送孙先生的船舱，确属事实，于是立即报告外相沙里士堡侯爵。

此后，英国政府的行动，确实是表现得非常高明。

孙先生在他手着的“伦敦被难记”中，说得很真切：

“余初不料竟被幽于伦敦中国使馆；更不料因此轰动政界，甚且由英政府出面干涉，以要求彼使馆之保释。”

英国政府采取行动

实则，在此之前，情廷驻英公使馆曾经根据“香港缅甸交犯约定”和“中英条约”，照会英国外交部，谓有重要人犯孙文前来英国，要求逮捕。但英国外交部则以条约的范围只限于缅甸等地区为理由，予以拒绝；因为有这一段过节，所以清廷便采取了自行加以监禁的行动，硬干到底。

英国政府认为这个事件侵犯了国家主权，并认定是涉及基本人权问题，所采取的措施虽然很审慎，但是态度却极其强硬。

第一个步骤是为谋不让事态扩大而能达到促使释放的目的，所以采取非正式折冲途径。但是等到了解了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的时候，便打算依据国内法（人权保障法），由法院命令强制释放。在这个期间，并派出六名官员配置在公使馆的周围，对于附近一带警察，都发给了孙先生的照片，防范从公使馆将孙先生带出去。

然而二十二日，中央刑事法庭拒绝了行使“人权保障法”，结果，外交部只有当作正式外交问题来处理，由外交部次长致函公使馆参赞马格里，命令其提出报告，同时并通告：“公使馆擅自逮捕、监禁政治犯，超越了外交特权范围，外交部要采取必要的干涉措施。”

针对这个通告，清廷公使馆提出了反驳意见：“公使馆内，是大清国的领土。孙文是自动进入使馆，使馆将他拘留，英国当局没有干涉的权利。”

社会舆论发生作用

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决定性作用的是社会舆论。

“地球报”记者，于二十二日访问了康德黎，晚刊对于孙先生被监禁的消息发表了特稿，加以报导，激烈的大标题——“惊人的重大新闻”“革命家在伦敦被诱拐，监禁在公使馆”，社会舆论为之沸腾。

“中央新闻”和“每日邮报”记者，在访问了康德黎之后，直接前往公使馆，要求访问孙先生，由警务官邓廷铿出见，力辩没有这个人，并指“地球报”的报导是造谣：“中央新闻”记者告诉他说：“如果还不释放的话，将会有几千个人包围公使馆。”

国父终于获得释放

二十三日，英国外相沙里士堡照会清廷公使龚照瑗，请从速释放孙先生；下午四时半，外交部有关官员进入使馆，才将孙先生释放出来。这时，在使馆周围，已经围拢了很多激动的市民。

清廷公使馆收到国内汇来租船经费七千镑，是在孙先生被释放的第二天，这个钱如果早点汇到，则孙先生也许已经被解送回国去了，这真是间不容发。

益知文明国人真价值

孙先生在事件之后，向各报投书说：

“……余于英人之崇尚公德，力持正义，素所钦仰；身受其惠，益堪征信。且余从此益知立宪政体及文明国人之真价值，敢不益竭其愚，以谋吾祖国之进步，并谋所以开通吾横被压抑之同胞乎？”

把国家权益出卖给列强而恬不知耻的清廷，假定说在当时有类似事件发生在他的国内，恐怕不会有这样的正义行动。孙先生把清廷堕落的现状联想在一起，深深受到近代国家——英国和其国民表现的态度所感动。

埋首图书馆精研勤究

自此之后，孙先生每天都去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由政治、经济到近代思想，精研勤究；至于清廷公使馆在释放了孙先生之后，每天还是派有侦探跟踪调查他的活动，只是所提出来的报告，千篇一律都是“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阅览室研究，没有什么特殊变化。”

在当时，西欧列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虽然还在继续扩张，但已经开始受到了被侵略国家的抵抗；同时在其国内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受到了劳资之间阶级斗争等社会不安定的困扰。

三民主义形成体系

孙先生一面在博物馆研究，一面冷静地观察这些现实情况，于是，成为革命指导理论的“三民主义”，就在这个时候酝酿出来，而逐渐形成体系。

孙先生其后在他自着的“孙文学说”中，这样地说过：

“伦敦脱险后，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余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

这个事件，和去年（一九七三年）在日本发生的金大中（韩国反对党人士）事件一样，涉及到国家主权问题，而造成了国际性的话题。孙先生手着的“伦敦被难记”在各国出版，日本的犬养毅、宫崎涛天等人得知有孙文其人，乃至于后来和他接触，就是由于阅读了这一本书而为其机缘。

国父青年时代

国父孙中山先生，于一八六六年十一月诞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现名中山县）翠亨村的一个农家。是在他父亲达成公（名观林、号道川）五十四岁，母亲杨太夫人三十九岁时所诞生的孩子。

自幼个性倔强无畏

他自幼就具有倔强无畏的个性，小朋友们替他取了一个绰号——“石头仔”。

翠亨村，在珠江三角洲西岸，南方距葡属澳门五十公里，东南方距英属香港一百公里，很幸运地容易得到外来的刺激。比他年长十二岁的长兄德彰（名眉、号寿屏），憧憬着海外雄飞的远景，在孙先生六岁的时候，远涉重洋，到了檀香山（当时尚为独立的夏威夷王国，而非美国的属地），经营畜牧和粮食商业，相当成功。

长兄在孙先生十三岁的时候，回国结婚。翌年（一八七九年）六月，孙先生因长兄之命随侍太夫人前往檀香山；初次航海出国，给予他的心理影响很大，后来，在自传中曾经提到“始见轮船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这次旅程的感受，成了后来走向革命道路的起点。

檀岛就读成绩优异

到了檀香山，最初在长兄的米店中帮忙记帐。长兄知道他有志求学，于是不久，就让他进入意奥兰尼书院就读，学业成绩非常优异；三年后毕业，“英文法”在几百个同学中得到第二名，夏威夷王加剌鸠曾经颁给中国书籍，以示奖励。继之，在一八八三年十八岁的时候，升学檀岛最高学府奥阿厚德学院肄业；但是长兄耽心他会成为基督徒，曾命令辍学归国。

据孙先生的美国友人林百克所著“孙逸先传记”中记载有孙先生在这一次归国途中所发生的一个插曲：

“从香港搭乘沙船回翠亨村，船行不久，停泊在清廷设有关卡的一个小岛附近，首先，关吏上船检查行李，继之，厘捐局官吏、查禁鸦片官吏、查禁私运火油官吏，一批又一批地都要乘客打开行李，接受检查，乘客们对于每来一批人，就得行一次贿赂。

“孙先生基于正义感而拒绝行贿，于是官吏们便不准沙船启航；僵持到第二天，由感到为难的船长行贿之后，才得到放行。

“在沙船被扣不能启航时，孙先生对乘客们说：‘现在的中国，就是在这么一些腐败官吏的掌握之下，各位能够忍受得下去吗？’”

回到家乡言论惊人

回到家乡，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般情况和以往丝毫没有不同，贪官污吏横行无忌，乡民们都是默默地在承受着。然而受过了西洋学识薰陶的孙先生，便感到无法忍耐。

因此，他便在行人麇集的地方奔走演说：

“清廷官吏，重税勒索，丝毫不替地方谋求福利，不兴建学校，不修筑道路桥梁，不考虑福国利民，只注意他自己一族一姓的尊荣，像这样的皇帝，能够算是中国的元首吗？”

这样热情洋溢的言论，在乡下人听起来却感到很不稳当，而唯恐被官吏们风闻了去会招来祸灾。孙先生乃想到村民们的愚昧守旧风气是阻碍进步的原因，于是在某一天便做出了破坏村民顶礼膜拜的“北帝庙”神像事件。

拧下神像手臂

这个事件，在有关孙先生传记的著述中，有着各式各样的说法，现在举出一个来介绍于后：

某一天，孙先生和朋友们走过供奉“北帝”的庙前，当时，同行的朋友中就有总角之交而后来成为革命同志的陆皓东在内。大家看到村民们在向木偶叩拜，孙先生说：“如果北帝像有肉，便是真的神体，否则就是假的。”说着说着，便拧下神像的一个手臂来，并且又用小刀把北帝像旁边的“金花夫人”手指切断。

迷信极深的村民们大为震惊，立即鸣罗聚众，涌到孙家责问达成公说：

“你的儿子读洋书读疯了吗？竟然伤害到了菩萨的金身，这个报应要是降临到大家头上，你说怎么办？”

于是，由杨太夫人和村民们谈判；结果，拿出十两纹银，设坛打醮，才算了事。

由于这一事故，使孙先生在家乡不能再待下去，于是便在这一年秋天（由檀香山回国只不过四个月）前往香港，入拔萃书院就学。在这里认识了美国牧师喜嘉理，便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

在拔萃书院只读了一个月，便于第二年～～一八八四年春天转学香港政府公立的中央书院，这个学校，上午四小时教授中文，下午四小时教授英文，教学非常严格。

就在这一年五月，孙先生奉父母之命回乡和十八岁的卢慕贞女士结婚；三个月之后，卢夫人留在家里，孙先生只身再去香港，继续学业。

再度前往檀香山

十一月，长兄德彰来信要他再去檀香山，是因为听到他在村子上毁渎了神像，接受了基督教洗礼。当时，孙先生本想在香港继续学业，但因为兄命难违，不得不去。

到了檀岛之后，长兄大事责备，并收回以前分给他的财产。孙先生在退回财产之后表示：

“财富不可能影响到我的心理。金钱是中国的祸害之一，金钱可以用之于正当，也可以用之于不当。”

习医交结同志

孙先生的长兄为了要磨练他血气方刚、意气用事的个性，所以把他带到茂宜岛，要他帮忙在那里的店务；但他只待了半年，就感到不惯，向老师和牧师们借到旅费，于第二年～～一八八五年四月回国。

由檀香山归国的孙先生，当时是虚岁二十岁。

这一年，清廷因“中法战争”的结果，丧失了对于安南（越南）的宗主权。

安南在很早以来就是中国的藩属，但是法国自一八五八年开始侵略，一八八三年以武力征服了安南人，被称为法国的“保护国”，清廷则不予承认。于是，中法双方的武力冲突，乃于一八八四年六月，在国境附近的谅山爆发。

在海战方面，清军失利，木制战舰十一艘在闽江口刚一开战的七分钟之间，便被击沉；继之，台湾的基隆港和澎湖岛也都被法军占领。

相反地，在陆战方面，由冯子材所率领的清军自广西进击，在国境的镇南关打败法军而进入安南，其后，更在各地击破法军；因而连法国的内阁都受到影响，为之改组。

这一些战况，不断地传播开来，使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觉醒；在基隆受损伤的法国战舰送到香港来修理的时候，中国的工人们都拒绝做工。

清廷愚昧腐败无能

然而，清廷方面却没有能够正确地掌握战局，而只过于重视海军的失败。于是便由李鸿章通过英国调停，和法国进行和平谈判，一再让步，结果于一八八五年六月，在天津签订了有十条内容的中法和约；从此，清廷不仅正式放弃了对安南的宗主权，而且还给予法国在中国南部地区经商和建设一条铁路的特权。

不断阅读英文报纸、密切注意战争过程、以及和平谈判进展情形的孙先生，由这个屈辱的条约而把愚昧腐败的清廷看得非常清楚；后来，他在手着的“孙文学说”中便曾提到：

“余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

翌年～～一八八六年秋间，孙先生进入了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医科学校。这个学校最初将麻醉方法、剖腹手术等西洋近代医学介绍进入中国，也是中国最早男女同校的学校。

孙先生在学习初级医学的同时，每当课余之暇，便阅读中国的经济、历史书籍，宿舍里置有全部二十四史，据说来访的朋友得知他差不多已经熟读了这些史籍，大为惊讶。

郑士良与三合会

在医科学校结识了一位运动健将，同为广东人、后来成为革命同志的郑士良，他向孙先生吐露了和秘密帮会——“三合会”（注）的关系，并且约定将来孙先生如果有所行动，可以号召会员同心协力迅赴机宜。这个约定，后来在第一次广州起义、第二次惠州起义的时候，见诸实现。

第二年（一八八七年）孙先生转学香港新设的西医书院（现在香港大学医学部的前身），据他后来在自传中提到当时所以转学的理由，是鉴与“西医书院的教授优越、以及香港是自由地区，便于鼓吹革命。”

蒋总统就是诞生于这一年的十月三十一日，比孙先生小二十一岁。

深得老师们的器重

孙先生在这个英才荟萃的学校中，表现出尤其优异的成绩。例如在二年级的成绩：化学九二、物理学八二五、生理学八一五、临床诊察七○、解剖学六五、植物学六三、药物学三九～～合计四九三分；化学和生理学为全班第一，总平均成绩为同班十三人之中的第三名。在课业成绩之外，英语也非常流畅，在同学之中宛如鹤立鸡群，深得老师们的器重。初入学时，教务长为孟生博士；其后，继任者为康德黎博士，并兼外科主任。后来孙先生在伦敦蒙难（前面已经提到），就是由孟、康两位发挥了超越国境的师弟之情，使孙先生得到了救助。

这个时候孙先生对于中国的地理也特别关心，在房间里悬挂有巨幅中国大陆地图，每当面壁看图的同时，就筹思着一旦发动革命，何处宜攻、何处宜守的作战部署。据说凡有同学来到他的房间，便指着地图对同学们发问：

“如此江山，被异族统治，像这样，能忍受得下去吗？”

被人称为“四大寇”

在西医书院时代，是孙先生从自己的交游关系中发掘有志革命的人物而吸引为同志的时代。其中，意气最为投合的为陈少白、杨鹤龄、尤烈三人，都是广东人，尤其陈少白，比孙先生小四岁，是受孙先生之劝入学的低年级同学，而又为同学中的第一个革命同志，后来一直帮助孙先生，对于革命很有贡献。

杨鹤龄的家庭在香港歌赋街经营有一爿大商店，他在店内腾出一个房间，提供这些朋友们作为聚会场所；孙先生和他们三人朝夕共处，肆无忌惮地高谈革命，意气轩昂，因而被人称为“四大寇”。“寇”的说法，可指外来的敌人，也可指内在的叛乱分子，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秀全就曾被称为“寇”，陈少白后来曾经追述这个称号的由来说：“我们打倒满清的志向，比洪秀全更坚强，所以被称为‘大寇’。”

注：“三合会”清末，在华南地区活动的秘密团体，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在两广以及东南亚的华侨社会中有相当势力。

志在打倒满清

在西医书院时代，留下了这样一个话题：

同学关景良常常邀孙先生到关家去，和家人们一同吃饭，关母黎式在西医书院担任英文翻译工作，她听到孙先生的言论十分激烈，就问：

“你志高言大，要是做官的话，做广东制台吗？”

“不是。”

“那么，想做钦差大臣吗？”

“也不是。”

“这么说，你要做皇帝吗？”

“都不是。我只是想推翻满清政府，还我汉族山河。这个事业，比做皇帝还要大些！”

听到了这些话之后，关母发愣地说：“简直是孙悟空嘛！”在那个时代，开口就说打倒满清，一般人听来，都认为是无稽之谈，不合时宜。

游三元宫得遇隐士

就在这前后，“四大寇”去到广州，游览观音山的三元宫，他们不管在什么场所，都大放厥词，攻击清廷；有一个八十岁的老人走到旁边，自称姓郑名安，曾经做过林则徐的幕宾，由于清廷不能有所作为而心灰意冷，退隐在三元宫。

郑安在称赞过孙先生等人的反满志气之后，劝告他们不宜轻举妄动，要结合反满同志们组织会党，相互联络活动，才会发生效果；并且就组织的方式和中国各地反满组织的分布情形，详加介绍。孙先生将他所说的话笔记下来，后来在武装起义的时候，很发生了一些作用。

一八九二年七月，孙先生二十七岁，在西医书院五年毕业，毕业考试总平均八十三分，得到了第一名。

行医蜚声内外

五个月之后，前往澳门，在中国人所经营的镜湖医院（中医）租借着一个房间，开设“中西药局”。

孙先生最精到的医术，是外科及助产科，曾经替病人开刀取出肾脏结石，大如鸡卵，在当时是非常稀罕的事。并且，在大手术的时候，也曾邀请西医书院的老师康德黎博士由香港专程前来指导，于是，颇多病人涌来中西药局求诊，营业鼎盛。

由于“中西药局”大行其道的结果，乃使开业在先的一些葡萄牙人医院营业大受影响。葡萄牙医生们对孙先生甚为妒忌，阴谋将他赶走，于是运动澳门政府首先不准孙先生替葡萄牙人看病，然后进一步规定，凡未经葡萄牙政府发给医师执照的人，禁止执业。孙先生无可奈何，只得在一八九三年春间，将医院迁往广州，改称“东西药局”。

这个时期，孙先生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二点之间，在医院门诊，午后出诊，东奔西走，极其繁忙。难产、服毒、急症等各种病患甚多，孙先生不问贫富，一律应诊。当时在东西药局的广告文中有：“午后出诊，诊费近处一元，远处二元。本局医生早为蜚声内外的国手。”

进行革命两个意见

医业固然鼎盛，然而在孙先生说来，只不过是披上了一件医生的外衣，而实际则是一面2[87]317行医，一面和“三合会”的郑士良、由上海回来的总角之交陆皓东、以及“四大寇”的陈少白、尤烈等人多次聚会于文人雅集之地的广雅书局，讨论革命的基本方针。

在他们之间，关于革命进行的方式，有两个意见：陆皓东认为外患日益迫切，必须首先谋求对策；但孙先生则引证英国的君主立宪政府和美国的民主主义，申论必须以打倒满清为革命的根本任务。结果，采纳了孙先生的主张。

对于革命行动的具体计划，也是在这个时候作了决定。就是通过郑士良的关系，积极拉拢反满的各会党人士；同时策动驻屯广州清军防营，以谋在其内部建立呼应关系。

虽然，在当时还未看到有正式的革命组织，但是具体活动却已经渐渐地推展出来了。

上书李鸿章未被采纳

孙先生在第二年～～一八九四年，进入革命行动之前，向李鸿章上书申论救国大计，提出要求反省改革的方案。

在这个健议书中，孙先生论述：“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这个建议书，结果未被采纳。因此，孙先生便和陆皓东由天津前往北京，探究清廷虚实；然后更溯长江，深入武汉一带，观察山川形势，为将来革命行动作准备。

这一次“视察敌情”的结果，在孙先生手着“伦敦被难记”中有如下分析：

“中国现行政治，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其身为官吏者，操有审判之全权，人民身受冤枉，无所吁诉。且官场一语，等于法律……贪婪勒索之风，已成习惯，卖官鬻爵，贿赂公行。”

甲午战争爆发，正是孙先生旅行经过上海途次之时。中日两国于一八九四年八月一日宣战，情军一再败绩。

孙先生目击如此情势，判断革命的大好时机已经到来，于是，立即远涉重洋前往火奴鲁鲁，着手结成革命组织——当时，孙先生是二十九岁。

创立兴中会

“甲午之后（一八九四年），前赴檀岛、美洲，纠合华侨，创立兴中会，此为以革命主义立党之始。”

上面一节，是孙先生写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几句话。

揭开迈向中华民国开国历史的第一页，就是“兴中会”的创立，日期是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今天屈指算来，刚好是八十年前的往事。

成立兴中会的第一次会议，是在卑涉银行经理何宽的寓所。

当天参加者，除何宽而外，有李昌（公务）、刘祥（商业）、程蔚南（商业）、邓荫南（农业）、郑金（公务）、许直臣（教育）等二十多人，差不多都是孙先生的广东同乡。

振兴中国挽救危亡。

孙先生担任主席，决定设立兴中会的主旨是：振兴中国，挽救危亡。会员都将左手按在圣经之上，高举右手，举行宣誓。

继之，通过了可以称为是最初革命宣言的“兴中会章程”（后来称为成立宣言），其要旨如左：

“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强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拊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仰诸同志，盍自勉旃！”

在这个“兴中会章程”之中，并未使用“起义”（革命）、“打倒满清”等词句，是为了预防被一般人看成危险团体，故而装作只为谋求中国富强之道的民间集团。同时，在这个会议中为筹集革命资金，决定发行“革命军债”，但也为避免用“军债”的名义，而改称为办理公共事业的“股科银”，并规定“成果之日，十倍偿还”。孙先生长兄德彰及邓荫南等人当场凑出数百元。德彰当时在茂宜岛有牛数千头、土地数百顷，被称为“茂宜王”，因为有他的经济援助，所以孙先生的胆子较大。又在“军债”之外，规定会员每人缴纳“会底银”（会费）五元，在会后的两天之间，收到二百八十八元。

最初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就是这样强有力地迈出了她的第一步。

关于兴中会的创立，在以上所述业已被确定了的说法之外，还有一说是一八九二年在澳门成立。

这个说法的根据，是孙先生于一八九七年手着的“伦敦被难记”的中文译本（原着为英文）上提到“余在澳门（一八九二年）始知有一种政治组织，其宗旨在改造中国，故名之曰兴中会”。“兴中会总部设上海，而会员用武之地，则定为广州。”如果此说属实，则在檀香山设立的两年以前，就已经有了兴中会的存在。

然而，经查阅英文原着，相当于“兴中会”的文字，只有Ｙｏｕ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ｒｔｙ，毋宁说是译为“青年中国党”比较正确；于是，又经调查结果，并无“青年中国党”实际存在的证明。再根据后来孙先生自着的“中国革命史”和“孙文学说”里的文字，都足以证实兴中会是于一八九四年在檀香山成立。

归根到底，就被难记中所说“在澳门已知道有兴中会”和“总部设上海”的一些叙述排比看来，可以认为孙先生是为了掩蔽兴中会的活动和其根据地而故意那样写出来的。

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华民国根源，一九五四年，中国国民党经过了两个月的查证，然后由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认定一八九四年在檀香山成立。

入会者逐渐增加

当时，由于夏威夷国王欢迎中国移民，故而在夏威夷群岛居住的华侨，达到了四万之众。孙先生打算首先纠合这些人，然而因为他们缺乏政治意识，对于孙先生热忱号召，响应的很少。虽然如此，但因为对于兴中会的宗旨抱有同感而入会者，逐渐增加，在一个月之后2[92]322，已经由最初的二十几个会员发展到一百二十六人。

正当这个时候，甲午战争的战局日益恶化，攻陷旅顺的日军，乘势由山东指向天津和北京。

清廷威信扫地，人民愤慨达于极点，革命的时机也就应运而生。

孙先生为了扩大兴中会组织，计划前往美国；但因为接到上海方面的同志来信促请回国，于是匆遽中止美洲之行，而与邓荫南等几位同志折回香港，是在兴中会结成之后的一个月～～十二月的下旬。

这一次旅程，中途经过了横滨，这是孙先生第一次到达日本，虽然没有上岸，但是和旅日华侨取得了联络，成为后来在日本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发端。

决定青天白日旗

由檀香山回国，在太平洋航行的旅途中，孙先生对同船的中国同胞发表演说，宣传打倒满清，拯救中国。

在听到演说而深受感动的同胞之中，有一位在日本横滨经营杂货店的陈清，到了横滨下船之后，立即告诉了他的朋友冯镜如、冯紫珊兄弟及谭有发等人。冯氏兄弟在横滨山下町五十三番地经营“文经印刷店”，冯镜如因痛恨清廷腐败而剪去了辫子，是一个富有反清思想的人。谭有发则在距离冯家不远的八十一番地开设“均昌号”洋服店。

陈清陪同谭有发登上停泊在港口的轮船，拜会孙先生，敦请上岸演讲。

孙先生因为急于要去香港，虽然未肯答应，但却给予了兴中会的章程，谭有发允诺全力协助建立组织，并相约再会。

于是，冯氏兄弟和谭有发等人，后来便成了孙先生的有力后援。第二年～～一八九五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孙先生经过横滨，冯氏兄弟便纠合了住在横滨的同志二十多人，设立了兴中会横滨分会。

孙先生回到香港之后，邀集所谓“四大寇”的老朋友们，并且和郑士良的三合会乃至于其他在香港已有的革命组织取得联系。

在这些组织之中，有一个“辅仁文社”，是由杨衢云（名飞鸿）于一八九二年三月组成，其宗旨在改造中国，打倒满清政府。

杨衢云，福建人。在香港攻读机械学和英语，有作为首领的气质，曾经娴习武术。早在设立“辅仁文社”的当初，就和孙先生相识，故而欣然响应孙先生邀请参加兴中会的号召，因之“辅仁文社”的成员数十人，都相继加入了兴中会。

总机关设于香港

孙先生鉴于扩大革命组织的条件业已具备，于是便将兴中会的总机关设于香港，地点在中环士丹顿街十三号，托名“干亨行”，表面上是用商号名义，以躲避官方耳目。

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举行新组织的成立会议，决定继续使用兴中会会名。

与会人举行宣誓，誓词为：

“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同时并经一致通过“宣言”，其内容是就檀香山宣言增加了“庶我子子孙孙或免奴隶于他族”等语。

决定攻夺广州

三月十六日，孙先生和陆皓东、杨衢云、陈少白、郑士良几位主要人物举行干部会议，决定攻击广州为革命根据地。

同时，在这次会议中，又决定了青天白日图案的革命军旗，这是陆皓东所设计，也就是后来中华民国国旗的雏形。

革命任务，终于面临了实行的阶段。

对外工作，也作了周详的准备。因为，即将成为革命舞台的广州，近接香港，当起义之后，万一清廷和英国联合起来，则革命军将会陷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因此，特地策动香港2[96]326议政局议员、并且也是孙先生的母校——西医书院创办人的何启，在当地发行的德臣西报上发表申论中国必须改革的文章。

同时，该报主笔黎德及士蔑西报主笔邓肯也因同情革命，而和何启合作起草在革命发难时对外发表的英文宣言。

橡这样的革命组织，继檀香山、香港之后，最初进入中国大陆，而在广州成立的日期，是这一年的十月六日。为了掩护其为革命团体的真面目，故而托名“农学会”，在该会的缘起书中指出：中国农业落后，呼吁采用西欧国家进步的农业知识技术。以致在清廷的官吏之中，也有人因不知其为革命团体而列名会员，甚至还为之赞助。

当距离预定起义日期只有半个月的十月十日，兴中会投票选举总办，名之曰“伯理玺天德”（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如果成立革命政府，这个职务就是总统的地位。投票结果，孙先生当选；可是杨衢云不服，第二天往见孙先生，强迫相让，事为郑士良和陈少白所闻，大为愤怒，极力反对，郑士良甚至气唬唬地说要将杨除名。然而，在这一天的晚间再度举行干部会议，经孙先生提案重行选出杨衢云为总办。可是，就只由于有这么一点步调不一致，便关联到后来起义的失败。

当时广州的情形

清廷方面，由于甲午战争败北，和日本签订了丧劝辱国的马关条约而被夺去台湾、澎湖，在群情激愤的情势之下，处理善后问题。当时在广州的两广总督李瀚章（李鸿章的长兄）曾经募集了很多士兵，因战事结束无需派兵，故而遣散四分之三，但却不发给资遣费，因之多数沦为窃盗；至于留用的士兵，却因未被遣散也忿忿不平。连负责维持治安的巡防营士兵，也脱下军服去抢劫，老百姓到巡抚衙门去告状，反而将代表关进牢房。

还有，在当时中国的官场，凡上司生日，部下就得有送礼的陋规，故当李瀚章生日的时候，两广官吏在地方上为之聚敛了百万两纹银的寿仪。

正当人民愤怒激越的时候，李瀚章刚巧奉到清廷的诏命调走。

陷入无秩序状态的广州，正好是革命起义的天赐良机。

首次广州起义

起义的日期，定在一八九五年的重阳节日，阳历是十月二十六日。因为在这一天，有附近数以千计的人们成群结队地来到广州扫墓的习惯，利用这个当口送敢死队进城，是最好的时机。

孙先生最初策划发动广州起义，原是打算采取少数精锐主义，因为鉴于在太平天国的时候，曾有刘丽川只凭七个人就占领了上海的先例，虽然广州和当年上海的情况并不相同，但是如果能有一百名敢死队，应该可以攻占下来。攻击的目标，集中于总督、巡抚等行政及巡警机关，武装的敢死队五个人一组，由后门冲进去，将在签押房或宿舍内的首长们杀死或逮捕，造成指挥系统混乱；其余二、三十人，则占领市内的重要地区加以固守，并纵火助长声势，即使清军增援部队由城外向城内进攻，也会让他们误认为革命军人多势众，而将之遏阻于城外。

决定分道攻城计划

不过，这个构想过于冒险，同志们未能接受；结果，乃采取了分道攻城的正面攻击部署。

最后决定的作战计划，是这样的：

在起义发难的前一天～～十月二十五日晚间，孙先生和陈少白指挥的少数敢死队和陈清（横滨华侨）率领的爆破班潜伏在广州市内。三合会会员等约三千人的主力部队，在兴中会干部朱贵全指挥之下，由香港向九龙集合，当日夜晚分乘小船出发，在发难日的上午六时到达广州。

潜伏市内的敢死队，估计在主力部队到达的时候，分成四队，袭击市内重要机关；爆破班也出动爆炸市内重要场所；乘船到达的主力部队，则乘混乱之际冲入市内。

革命军全体佩带红色袖章，联络暗号为“除暴”“安良”。

停泊在省河的清军军舰之中，最大的是“镇涛”、“安澜”两艘。镇涛舰长陈奎光是兴中会会员，已经在策动革命工作。

不幸被朱湘冒名告密

像这样周密的起义计划，却不幸因被人告密而崩溃。

事缘在参加起义的人士之中，有位叫朱淇的，担任起草“讨满檄文”，可是被他的哥哥朱湘得知这回事，唯恐受到株连，故而冒用朱淇的名义，在起义的前两天，向缉捕委员李家焯自首。

李家焯接到密告之后，立即派人监视孙先生等人的行动，同时向李瀚章的后任——两广总督谭钟麟报告。

谭钟麟问：“谁是主谋人？”李家焯答称：“孙文。”谭大笑地说：

“孙文是个行医不走运的狂士，并且是发起农学会的人，他那里会造个什么反？”

想不到没有好久，派在香港的密探打来急电，证实了李家焯的报告没有错；于是谭钟麟乃自长州急调一千五百兵员到广州驻防、镇压。

自港运送军火迟误

在革命军方面，到了这个时候，却连续出现了配合不够周密的紊乱情况，由香港开来的船只，直到较预定时间迟了两个小时的二十六日上午八时还未见到踪影；陈少白、郑士良等敢死队干部们聚集在农学会，正等的焦躁不安，孙先生拿着在香港负责运送武器的杨衢云的电报跑来，电文是：

“货物因故要迟两天送到。”

由于杨衢云在自己身边集合亲信，优先分配武器，有欠公平，因而失掉了部下的信仰，这个问题，在起义日期即将来临的时候，公开地闹起来，终于没有能够按照预定计划如时开船出港。

敢死队的干部们，接到电报之后，立即举行紧急会议。

陈少白主张慎重，他认为如果将起义日期延后两天，恐怕计划将会泄漏出去，而且香港来船又不敢保证一定就会到达；不宜过于轻举妄动，不要怕失败，不妨暂时让主力部队恢复原来状态，等待再决定发难时期。孙先生也赞成这个意见。

于是，便由孙先生向杨衢云发出急电：

“货物不需要，请候后命。”

同时，孙先生更发钱给各会党领袖，命令他们暂且将部队撤回去。

十月二十七日的晚间，接到了杨衢云的复电：

“来电太迟，货物已上船运出，请接。”

主力部队之中的四百人，已经出发，无法挽回。

清廷采取掩袭行动

出乎意料，清廷方面的镇压行动，却来得非常之快。在广州市内的两处秘密机关，都被缉捕委员李家焯率领巡防部队迅速掩袭，查获青天白日军旗、武器、军服、刀斧等类；陆皓东．程耀宸、程奎光、刘次、粱荣、程怀等六同志被捕。

另一方面，已经由九龙乘船出发的约四百人，一点情况也不知道，继续向广州航行；当他们在十月二十八日早晨抵达广州码头的时候，李家焯率领的巡防部队正好埋伏在那里，革命分子们虽有心抵抗，可是在香港装进船舱的武器，隐藏在行李货物的最下层，来不及开火交战，船上的人们便四散逃走，这个时候，有丘四、朱贵全等约四十位同志被捕。

丧失多数优秀同志

准备了半年的兴中会第一次广州起义，便以完全失败而结束，丧失了多数优秀同志，孙先生本人也被指为“造反者”而成了被通缉的人。

先烈慷慨成仁

广州起义（一八九五年）失败之后，清廷的追查，极其严厉。

两广总督谭钟麟，立即着手搜索漏网起义分子，并宣布缉拿首谋者十七人的赏格，由百元至千元不等。

“孙文即孙逸仙香山县东乡翠微人。额角不宽。年约二十九岁。花红银（悬赏金额）一千元。

“杨衢云香山人，本籍福建。右手缺三指。年约三十九岁。花红银一百元。”

同时，并张贴韵文告示，摘要如左：

“现在匪党名曰孙文结有匪党曰杨衢云起义谋叛扰乱省城………………

“借名招勇煽惑愚民每人每月十块洋银…………”

留下成仁取义典型

至于业已被捕的陆皓东等人，则受到残酷审讯，但他们毫不屈服，陆皓东甚至索取纸笔，直书供状，言词激烈，痛骂清廷：

“……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非诛除汉奸，又不足以废灭满清。故吾等尤欲诛一、二狗官，以为我汉人当头一棒。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起者不可尽杀。公羊既殁，九世含冤；异人归楚，吾说自验。吾言尽矣，请速行刑！”

清廷乃处以极刑，以示报复——陆皓东、丘四斩首，朱贵全剐死，程奎光死于六百军棍之下，程耀宸冻死狱中。

‘陆皓东等先烈在革命旗帜——青天白日旗之下，流血牺牲，为创造中华民国奠立了第一个基石；为本党、为中华民族留下了第一个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典型。’（注一）

检讨起义失败原因

检讨这一次起义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得想到中国人的弱点：

‘我（蒋总统）看朱淇兄弟告密一事，是我们中国人大都只知道顾到他家族亲友的私利，而不顾国家民族的生死。有此自私自利的一念横在心头，所以革命不能成功，国家不能建立。外国人则不然，他们是真能慷慨仗义，公而忘私，看到人家落在水里，就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拯救；看到人家失火，就不顾一切帮人家去扑灭。而我们中国人遇到这种场合，大抵是袖手旁观，有的人甚至于落井下石，乘火打劫。日本人看透了我们民族这个弱点，所以他敢于来侵略我们。’（注二）

起义失败之后，孙先生在广州稍事停留，隐藏在友人王煜初牧师家中，观察风色；旋即2[105]335雇小汽船潜赴澳门北面的唐家湾，换乘轿子由澳门转达香港。郑士良、陈少白、邓荫南等同志也躲过了清廷的缉捕，潜行脱险抵港。

在当时，由于清廷和英国已在一八五八年签订有“香港缅甸交犯约定”，因而顾虑到清廷可能向香港政府要求引渡，于是由孙先生的老师康德黎介绍与达尼斯律师研商结果，听从律师的建议离港，前往日本。其后，香港政府在一八九六年三月四日宣告：“孙文、杨衢云、陈少白三人在五年之内，不准入境。”

孙先生偕同郑士良、陈少白乘日本货船“广岛丸”，于十一月十二日到达神户。

当时，日本报纸在关于孙先生来到日本的新闻报导中，有“中国革命党孙逸仙”的字句。

汤武革命顺天应人

在此之前，孙先生只习惯于使用“起义”等词汇，而采用“革命”二字，则是从这里开始。据说孙先生在阅报之后，很高兴地对陈少白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与我们的排满宗旨正相符合，我们的党可以用革命相称。”

十七日，由神户抵达横滨。前次，孙先生在火奴鲁鲁设立兴中会之后返回香港途中，只经过了横滨港口，到这一次才是踏上了陆地。孙先生到达横滨之后，便去山下町“文经印刷店”拜访冯镜如；冯镜如万分高兴，立即请孙先生住进印刷店二楼，并邀乃弟冯紫珊及友人谭有发、黎达卿、赵明乐、赵峄琴等十余人，组成兴中会横滨分会，这是谭有发曾经和孙先生约定了的，这个分会选出冯镜如为会长，并决定以赵明乐为管库、赵峄琴为书记等工作人员。孙先生在日本的活动，就是从这里开始迈出了第一步。

半个月后，分会会所移设于山下町一百七十五番地，继续加盟者有温芬等十余人；其中最年少的冯自由（名懋龙）只有十四岁。

国父经日转美赴英

这时，甲午战后的议和条件已经成立，清廷和日本的外交关系，也已经恢复原有状态。于是，有些人便在传说：当清廷派遣新的公使来到日本履任之后，恐怕会马上要求日本政府引渡革命同志，是则日本也很难说是安全之地；加上当时的日本情况，作为“革命后方基地”的条件也还没有成熟。

因此，在横滨只停留了两个月的孙先生，便买了几套西服，换下了中装；留着嘴唇上的八字髭须，把辫子剪下来；口袋里装了冯紫珊筹集的五百元，为期革命运动再接再厉而离开了日本，重游兴中会发祥地的檀香山。郑士良则返回香港，收拾余众。陈少白留在日本，一意继续活动，后来，居于孙先生和日本方面的联络岗位，甚为活跃。

孙先生于一八九六年一月到达火奴鲁鲁，其后，经过美国，而在这一年的九月底转赴英国。前面已经叙述过在伦敦被清廷驻英公使馆所监禁的事件，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

注一：蒋总统—“总理第一次起义纪念日之感想”（一九四四.九）

注二：（同右）

第二章：辛亥革命与日本(下)

主题

大同社会的理想与日本志士交往得到犬养毅帮助国父与康、梁会党的合作部署惠州起义起义功败垂成各地革命活动组织同盟会民报宣扬革命制定国旗国名编订革命方略华侨踊跃输将发动多次起义日本民间志士国父亲上前线法国的态度再赴欧美活动筹划十次起义总统在日入伍从驾驭军马学起军事教育要诀日本人刻苦勤俭体验军事教育军队精强的要素第十次起义保路运动成都民众请愿武汉准备起义总统归国效命

揭橥三民主义

孙先生于一八九六年在伦敦被清廷驻英公使馆监禁而又安全释放之后，经常前往大英博物馆图书馆阅览书籍，潜心研究。在这个时候，结识了两位朋友，一位是日本生物学家南方熊楠，一位是爱尔兰独立党员军事学家摩根。

南方在哲学和物理学方面给予孙先生以影响，摩根后来在一九○○年孙先生发动惠州起义时，曾到香港，协助革命运动。

孙先生和南方的遇合，留下了一段轶事：

南方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州立农业大学之后，应大英博物馆之聘，在该馆东方图书部主任道格拉斯之下，编纂中国和日本书籍的目录。孙先生最初和南方见面，就是在道格拉斯主任的办公室，孙先生发问：“人生的目的何在？”南方答称：“但愿我们东方人一举而将西方人赶出国境之外。”接着更补上一句：“当然也要把英国人赶出东方。”孙先生和道格拉斯听了都大感惊讶。自此之后，孙先生和南方两人便完全投契。

在英国产生构想

在这个时代的孙先生，最大的收获是涵濡了“三民主义”的构想。

三民主义，是孙先生遗教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中华民国建国的最高理念。

孙先生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产生了这个构想之后，经过了很长时间使之理论化和体系化，直到一九○五年春季，当他四十岁的时候，才在比利时国都布鲁塞尔所举行的留学生革命团体成立会上，向三十多人首次公开阐述有关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构想；继之，复于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发刊时，于所撰发刊词中，才具体地揭橥出“三民主义”（当时称为三大主义）：

“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

“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

孙先生在这一篇文章里指出：中国为了要解放于千年帝制及挣脱满清异族统治和列强侵略，最迫切的有效方法，是首先确立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同时关于民生主义则在中国方面更可以较西欧国家领先一步，故应在革命行动中一举而确立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锤炼近三十年岁月

不过，在当时孙先生所发表的还只是基本构想而已；直到一九二四年自一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之间，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所连续举行的演讲中，才对于三民主义作了具备理论体系的提示——这是在那一年国民党改组的时候所发表的。

实际上，孙先生自抱有这个构想以来，差不多已经锤炼了将近三十年的岁月。

在这一段有体系的连续讲演中，对于“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预定各作六讲；“民族”“民权”都经讲演完毕，但“民生”只作了四讲，便因为了统一全国决心北伐离开广州而中断。

总统撰育乐两篇补述

民生主义尚未完成的最后二讲，后来，由蒋总统撰成“育”“乐”两篇补述，于一九五三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中发表。

三民主义要旨

关于“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国父在他手着的三民主义中说明其要旨如下：

“我可以用一句简单话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外国旁观的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强大，往往因为保护宗族起见，宁肯牺牲身家性命。……对于国家，从没有一人具极大精神去牺牲的。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

“什么叫做民权主义呢？大凡有团体、有组织的众人就叫做‘民’；‘权’就是理论，就是威势。那些力量大到同国家一样，有行使命令的力量，有制服群伦的力量，就叫做‘权’。把‘民’和‘权’合拢起来，民权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

“什么叫做民生主义呢？民生两个字是中国向来用惯的一个名词，……拿这个名词来用于社会经济上，就觉得意义无穷了。我今天就拿这个名词来下个定义，可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

指出马克思的错误

在这里的所谓“共产主义”，是以“均贫富”的理想社会为目标的广义“社会主义”；和以“阶级斗争”为手段的“马克思主义”有着根本上的差异。对于这一点，孙先生在“民生主义”中继续有过明确的阐释：

“社会制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相冲突……马克思的所谓阶级斗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所有的心得，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所以马克思只可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家’。”

大同社会的理想

民族主义为了使中国脱离列强在政治上、外交上、经济上的压迫，而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列强平等，必须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认清国家的处境，以振奋中华民族精诚团结的精神。

民权主义基于自由平等的精神，以建立共和国家为目标。扩大国民参加政治的权利，在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外，加上考试、监察两权，形成中华民国“五权宪法”理念的基础。

民生主义以创造经济平等的社会为目标——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公平分配。本于孟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理想。

孙先生说：

“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人民对于国家，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

由此而建立的社会，就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所谓“大同社会”，出于孔子礼记的礼运大同篇，是中华民族的理想，也是值得夸耀的世界。

孔子是这样地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匪迫联合国演出缪行

最近，在联合国的舞台上，围绕着这个“大同社会”演出了一场闹剧：

中华民国于一九六八年，将孔子的礼运大同篇刻成石碑，寄赠给设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未料现在据有联合国议席的中共政权竟然加以干涉，使联合国在今年（一九七四年）的九月十六日将这一块石碑拆除。

中共方面对于孙中山先生，基于将他解释为容共者，而称之为“国民先进”；但对于孔子，则从其“批林批孔”的运动中可以知道已经是根本予以否定。所以，用孔子言词所刻制的石碑之存在，对于中共来说，是不能置之不问的。

针对这个情况，以绍承孔孟之道的三民主义为立国精神的中华民国，则表示出激烈的抗拒反应，蒋总统为之亲自发表了如左的声明：

‘这个行为，是共匪自绝于历史，自绝于文化……孔子礼运大同的理想，不仅为中华民族之所托命，且为世界每一个有良知、爱自由的人所笃信、所尊崇、所确认。共匪此种狂悖卑劣的手段，徒然表示其胆寒心怯，欲盖弥彰而已……孔孟之道的精神，就是一个仁字，教人以仁修身，以仁齐家治国……现在，我们国家施行以三民主义为建国准绳的宪政之治，尊重人民的愿望，维护人民的权益，增进人民的福利，壹是皆以仁为本，以仁为归。’（注一）

此外，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也对于联合国的态度加以责难说：“不是联合国，是不合国。”

蒋总统的声明，又被提出于美国的众议院。民主党议员费希尔在众议院演说：“石碑文字所表达的思想，和联合国宪章的精神相符，拆除这个石碑的行为，就是在向联合国宪章挑战。”并且由于费希尔的提议，而将蒋总统声明全文列入众议院纪录。

中国正统思想的渊源

孙先生思想的渊源，是继承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而来的中国正统思想。

‘我认为孔子“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哲学思想，实以科学的精神来建立其哲学的基础，复以科学的方法来建立其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此种以伦理、民主、科学为哲学的思想，就是我们今日三民主义思想教育的基础。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精神，自从这孔孟学说的启示以来，就发为牺牲自我、保卫民族、爱国救民的伦理思想。’（注二）

不同于共产主义

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不能相容的：

‘总理是社会国家的生理学家，应用生理学的道理，根据社会进化的原则，来救社会国家，所以一切的方法是仁爱的、积极的、而适合于社会国家之生存发展的。马克思则仅为社会的病理学家，只见到社会进化的病理，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生理，所以他定的一切方法，是残忍的，是消极的，只有阻碍社会的进化，甚至破坏社会的生存，结果离开他的目的愈弄愈远。这是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根本不同的地方，我们大家务必认识清楚。’（注三）

注一：蒋总统—“对孔孟学会训词”（一九七四九）

注二：蒋总统—“对孔孟学会成立大会致词”（一九六○四）

注三：蒋总统—“国父遗教概要”（一九三五九）

与日本志士交往

在伦敦精思构想三民主义的孙先生，其后由英国首途，经过加拿大，乘印度皇后号轮船于一八九七年八月十六日黎明抵达横滨港，这是第二次来到日本，有同志陈璞在港口迎接。

孙先生到达横滨外国人居留地一三七番落脚，行装甫卸，立即就去陈少白寓处访晤。陈少白自广州起义失败，和孙先生同来日本，后来便一直待在这里。

受到日本与清廷监视

孙先生这次来日，完全落于日本和清廷的监视之下。据当时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属神奈川县）知事中野健明于八月二十三日发给外相大隈重信的报告（秘甲字第四一○号）提到孙先生自英国出发时开始，就被清廷方面派人跟踪，为了希望在日本不致发生第二伦敦监禁事件，故有加以警戒之必要。这个报告的内容如下：

“清廷驻英公使馆三等书记官曾广铨，追踪孙逸仙由英国来日，目前寄宿于二百二十一番馆中国人曾卓轩处。又据报当孙逸仙到达横滨之际，听说由东京派有驻日公使馆书记官某人来此，认明孙逸仙登陆，然后发出一通不知给予何人的电报，立即返回东京。

“再者，孙逸仙本人于十七日下午三时左右，由现住于居留地一百十九番的陈璞介绍，来加贺町警察署长官舍拜访。据称：‘此次因事乘英国印度皇后号轮船于本月十六日到达本地，现寄寓陈璞处。但清廷方面派有官吏一名自英国跟踪来此。是故本人在日本帝国居留期内，固然确信日本国国权，不致有被清廷官吏非法逮捕或妨害自由等情况发生，但仍请明了上情，直接间接加以保护。实则在英国居留时，也曾受到保护。’等语。”

陈少白在和孙先生来日再会之前，与日本志士的交往业已逐渐加深。

他在某一天，受到孙先生在火奴鲁鲁时代所结识的日本人牧师菅原传的邀约，前往东京芝（芝为东京市内的地名）“东京红叶馆”，认识了曾任海军上尉的曾根俊虎。根据陈少白的记述，曾根曾在中国北方居留多年，对于中国问题特别关心，能说一些中国话，爱读中国书，而且很能做点中国诗。曾根家住东京大森，由横滨乘火车前往，只有三、四十分钟的距离，陈少白常常到曾根家中畅谈到深夜。

与宫崎寅藏见面

和曾根结识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个日本人来访陈少白，带着曾根的介绍信，他的姓名是宫崎寅藏（号滔天）。

宫崎是熊本县人，有兄长八郎、民藏、弥藏三人，在当时都是富有革新思想，主张自由民权和社会改革运动的人，对于中国问题也都寄予深切关注。宫崎寅藏受到兄长们的影响，一时曾经想到协助中国的革命运动，需要集聚资金，因而一度率领农业移民，前往泰国。

在此之前，日本外务省曾经委托宫崎和平山周、可儿长一三人去中国调查秘密结社及社会情势；唯独宫崎因病尚未成行，而偶然因曾根的介绍得和陈少白交往。

陈少白赠给宫崎“伦敦被难记”一册，并告诉他“兴中会的领导者就是此人”。

宫崎在他手着的“三十三年落花梦”中，叙述当时的状况是这样的：

“我的陈白（陈少白）君一见如故，都是亡二兄和亡长兄的朋友曾根君之所赐。然而他对于兴中会的内情总还是不便和盘托出，只是透露党内尊戴孙逸仙为首领，并出示了一个小册子，指称就是这个人。”

宫崎阅读了“伦敦被难记”之后，对于孙先生大感兴趣。其后，追踪平山周两人前往中国，当转赴澳门的时候，得到孙先生已去日本的情报，于是匆促返回日本，无论如何都希望能和孙先生见到一面。

九月间，宫崎再到陈少白寓处拜访，这时，陈少白为策划成立新的革命组织，已经去了台湾；住在陈寓的孙先生，穿着睡衣，走出来应接。

宫崎不明实情，只是听到对方答称陈少白离开日本，而显露出大为失望的表情，于是顺口询问：

“请问是否晓得孙文这个人？”

“我就是孙文。”

交谈之下心悦诚服

后来，孙先生便向宫崎宣传中国革命的宗旨，但因宫崎不懂中国话，所以两人用纸笔交谈，孙先生说：

“余以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共和一名，为三代所诞育；中国村落间，立尊长而听诉讼，置乡兵而御强暴，即共和制之雏型。但此岂唾手可得？必也革命；余因是负革命之责。”

孙先生接着又指出：“共和者，我国家治世之神髓……”并说明用革命的手段建立共和体制，可以遏阻住中国连续不断的祸乱之源，剖析义理甚为详尽。

宫崎大为感动，对孙先生心悦诚服。

2[122]352宫崎奉为东亚瑰宝

宫崎在手着的“三十三年落花梦”中，记述有对于孙先生当时睡衣出见的印象如左：

“其人举止动作颇为飘逸，有欠稳重，使人产生些微失望的心情……此人能够担当四百州的任务吗？能够在四亿万众之上掌握政权吗？我们协助此人，能够终于完成志愿吗？”然而这只是一面之识、徒为皮相之论；不久之后，宫崎便有所反省，极端称赞“像孙逸仙这样的人，实际已经进入了返乎天然的境地；在我国（日本）人士中像他这样的能有几人？他真正是东亚的瑰宝，老实说，我在这时已经是许为驱驰了。”

得到犬养毅帮助

宫崎寅藏成了孙先生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非常重要的第一着棋子。

被孙先生谈话所感动的宫崎，立即往见其受知的进步党重要人物犬养毅（号木堂），建议他和孙先生见面。犬养毅在很早以来就非常关心亚洲的民族主义运动，故而频频点头答2[123]353称：“很不错的礼物嘛！好歹，碰碰头再说吧！”于是，就在这一年～～一八九七年的九月见了面。

与犬养毅谈天下事

在宫崎和平山周、可儿长一三人的伴同之下，孙先生到了东京牛込区马场下町的犬养寓处访问。当时的情况，孙先生在“孙文学说”中，有这样的记述：

“一见如旧识，抵掌谈天下事，甚痛快也。时日本民党初握政权（第二次松方正义内阁），大隈（重信）为外相，犬养为之运筹，能左右之。”

犬养毅所获印象

据“犬养木堂传”，犬养谈到过对于孙先生的印象如下：

“那时，孙文约三十四、五岁，正当壮年（实际虚岁卅二岁）。相貌端正，未梳辫子，头发平分，很像日本人。平时很文静，但一提起清廷腐败等话头，便是一个非常议论纵横、辞锋犀利的人物。在逐渐交往之中，我也看出他会是一个大人物。”

这一次的见面，两人都触摸到了对方的心曲。自此之后，犬养便曾或明或暗地给予支持；由于得到了在中央政界有相当分量的犬养帮助，使孙先生在心理上着实有了一点凭藉。

投宿署名中山樵

犬养在谈话之后，命平山周安排住处，平山便向导孙先生到东京京桥的对鹤馆投宿。

旅馆账房把登记簿拿进房间，但因不敢使用孙先生的本名，于是平山说：等一会再登记；让账房先回楼下。

两人想起刚才来对鹤馆的途中，曾经走过日比谷公园附近中山（忠能）侯爵公馆的门前，因之平山乃以“中山”的姓氏写在登记簿上，孙先生就把毛笔接过来加上一个“樵”字，并且说：“这是中国的山野樵夫。”孙先生使用“中山”的名字，也就是自这个时候开始。

当时，亡命到日本的中国革命家们为了隐蔽真实身分，多使用日本姓名。譬如说：在日本居留颇久的陈少白，便曾自称为“服部次郎”。梁启超模拟幕府末年的先觉者吉田松荫，而自称“吉田晋”。孙先生本人在秘密信件中都是签署中山两字；后来，又曾取法同为幕府末年的志士高野长英，而自称“高野长雄”。现在，中华民国以孙中山为惯称，远较孙文的本名普遍。

在尊称孙先生为国父的中华民国，为了表示纪念而使用“中山”为名称的范围颇广，譬如说：哀悼孙先生逝世，将他的故乡香山县改名“中山县”；台北等台湾各都市的大马路，取名“中山路”的例子很多；国立故宫博物院，一般也称之为“中山博物院”；还有台湾银行的纸币，也都印有孙先生的遗像。

逐渐推广交往关系

孙先生由于认识了犬养毅，乃逐渐推广了和日本朝野有力人士的交往关系——大隈重信、大石正己、尾崎行雄等政治家，都是由犬养所介绍；接着又和日本政界的元老、而且与民间志士关系颇深的东亚同文馆副会长副岛种臣相知；更由副岛的介绍，得和头山满（玄洋社干部）、平冈浩太郎（曾任玄洋社长）、秋山定辅（后来曾任国会议员）、中野德次郎（煤矿老板）、铃木久五郎（股票经纪人）、安川敬一郎、犬冢信太郎（后来曾任满铁理事）、久原房之助（久原矿业创办人）、山田良政（后来曾任南京同文书院教授）、萱野长知、菊池良士等志士及财界人士接近。

山田为中国革命牺牲

在这些人之中，久原房之助和犬冢信太郎在革命活动资金方面，给予了颇大的支援；而山田良政则更献身于革命行动～～一九○○年参加了惠州起义，是最初为中国革命而牺牲的日本人。

还有，平冈浩太郎则对于孙先生在日本的生活有所照顾。首先，和孙先生同住于东京曲町区平河町五丁目三十番地，一切生活费用由平冈支付。

当时，外国人在日本居留，有特别指定居住地区的规定。孙先生为了能够在东京居住，则必须要得到东京府发给的居留许可。但是由于所住的地点（曲町）和清廷驻日公使馆距离太近，外务省乃以对清廷外交上的顾虑而表示有困难，以致东京都的许可发不下来，引起了一些争执。

这件事的过程，平山周在“犬养木堂传”中曾有一段纪录如下：

关于居留许可的问题，平山和犬养谈及，犬养说：“去找小村（寿太郎，时任外务次官）商量商量看。”于是，平山便在向外务省提出报告时，顺便见到小村，向他说明：“孙某现在来到了这里，我们想把他安置在东京。”小村的回答是：“不要找麻烦，这是不可以的。”接着又说：“现在是在日清战争（甲午战争）之后，友好邦交才将恢复之际，日本如被认为是援助革命党而摆脱不了干系，是很困扰的。请不要找麻烦。”平冈则说：“我们不是奉命调查中国会党情况的吗？（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这是一个诱饵，把他安顿在这里，慢慢地查探下去，就可以了解中国的情况，务必请照这样做，不是很好吗？”但小村还是说：“不！不可以！怎么样也办不到。”

最后，乃由犬养和大隈外相直接谈判，结果，孙先生被当作是招聘来的中文教师名义，住到距离公使馆稍远的早稻田鹤卷町。这个地点离犬养住宅很近，比较方便；并有平山周、可儿长一同住。

由东京府正式发下居留许可的时候，是在十月十二日。

国父与康、梁

对于在广州第一次起义失败后的孙先生来说，最急迫的工作，是扩大兴中会的组织。

工作之一，是和以“保皇”自居的康有为派合作的问题。康有为在甲午战争刚结束之后，立即提倡模仿强国日本，主张“君主立宪论”的政治改革运动（变法运动），着手在国内外建立组织。他这个主张，和以三民主义为基本方针的兴中会的革命思想，是根本不相容的。

“中西学校”问题

双方最初的对立，是因横滨“中西学校”问题而表面化。

当时，旅居在日本的华侨超过了一万二千人，但多数是一听到革命就显得胆怯，所以横滨兴中会虽已成立了两年，而参加者才只不过一百多人。陈少白为了要在华侨社会扩展革命思想，乃在横滨中华会馆开办华侨学校，教育侨胞子弟，请刚刚是第二次来到日本的孙先生主持，孙先生为之命名“中西学校”。就在这个时候，由曾受委托在国内代为招聘教师的梁启超自上海推荐康有为的门生徐勤等人前来，徐勤等秉承康有为的意旨，将校名改称“大同学校”，诱使学生们排斥兴中会，并将孙先生排挤出去，而夺取了这个学校。

犬养毅劝说合作

已经和孙先生建立了深厚友谊的犬养毅，为谋泯除两派如此对立的情势，乃密令宫崎寅藏、平山周两人于翌年～～一八九八年八月赴中国内地，策动维新各派合作。

刚好在这个当口，康有为的变法主张被光绪皇帝所采纳，康有为成了领导变法自强、改革运动的风云人物，正在踌躇满志之际，故而对于宫崎所提和兴中会合作的建议，只是付之一笑。

未料，转眼之间出现了“戊戌政变”事态已急遽变化。

反对光绪推行新政的慈禧太后，于九月二十一日幽禁光绪，压制维新派；于是，康有为的改革运动，只进行了一百零三天，就遭遇到了挫折。垮台后的康有为，乘英国军舰逃亡香港，幸免于难，希望亡命日本，倚仗当时在香港的宫崎寅藏护送抵达东京。康有为一系的人物梁启超、王照两人藏匿于日本驻北京公使馆，得平山周之助，也逃亡到日本。

于是，犬养毅便劝说同时在日本的孙先生与康有为合作。孙先生和陈少白鉴于为了中国的革新，和康派方法虽异，但目标相同，故而首肯；可是康有为则以不应和革命党首领见面而拒绝。

康有为只图起兵勤王

犬养毅且曾在其东京牛込的自宅，邀请孙先生、陈少白和康有为、梁启超四人，制造见面机会，但康有为还是没有到场。

康有为表示“今上（光绪）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之危，其他非余所知。”对于打倒为中国祸患根源——清廷的意见，根本听不进去。

梁启超欺骗国父

这个合作工作，在康有为于翌年～～一八九九年六月离开日本前往加拿大之后，乃由于和保皇派的梁启超接近，而好像有进展的趋势，甚至一时都曾讨论到建立以孙先生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的组织问题；然而归根结底保皇派不可能脱出维护清廷的范畴，当然也就不可能达成合作。而且梁启超终于欺骗了孙先生，事缘在这一年的十二月，梁启超拿了孙先生的介绍信前往檀香山，遍访兴中会同志，宣称“保皇”与“革命”名称虽异，但宗旨相同，拉拢到一些兴中会员在火奴鲁鲁设立了非革命团体的“保皇会”。

像这一类的“合作工作”——也就是“扩大组织工作”，在和基本立场相异的保皇派之间，虽然未能实现，但和志趣相投的其他各派，则逐渐产生了引为同志的联系结合关系。

香港拒国父居留

不过，在这个时期，孙先生是处于公开活动颇为困难的境地——在一八九七年，孙先生为谋重建因第一次起义失败（一八九五年）受到打击的香港和广州方面的革命组织，而请求回香港居留，但香港政府的答复却是：“目的在解除国民所受鞑虏（清廷）的羁绊，是凡类此活动，有碍邻国邦交，自非本政府所能容许。”而予以拒绝。

至于在日本，也经常受到其政府官员的跟踪调查，所以不仅要依赖陈少白等在日同志的联络活动，并且连犬养毅等日本人的助力，对于建立组织也发生了重要的作用。

据日本方面资料，神奈川县知事浅田德则于一八九八年八月三十日以秘甲字第七○○号公文向外相大隈重信报告有关孙先生当时的行动如下：

“原居住在横滨外国人居留地一百三十七番馆内的亡命者清国人孙逸仙，已在该居留地一百二十一番内租借一户，于昨日（二十九日）迁居上址。

“该孙某很少外出，经常闭居一室，专心读书。目下，似乎无人造访，不过和在东京的宪政党员犬养毅之间，则有一、两次书信往返。”

张群提议先夺取海军，控制上海附近的水路，然后向陆上进攻。但是，蒋总统的意见与张群不同。蒋总统建议首先应该攻击上海制造局（江南制造局），因为这个制造局是中国有数的兵工厂，在这样的时期，进行了“自强运动”（洋务运动），由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所推进。

师夷长技三个阶段

这个自强运动大致可以区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一八六二年开始约十二年之间，导入科学技术和制造武器。在北京设立同文馆（公立外语学校），开始向欧、美派遣留学生，在上海创设广方言馆（外语学校）、译书局，福州设造船厂，天津、江南设兵工厂、大沽设炮台，以及开采煤矿。

————————————————————————————————————————————————————————

陆皓东设计党旗献身革命

陆皓东(1867-1895)与中山先生(1866-1925)同为香山县翠亨村人，幼时一起在陆氏祖祠读书，是中山先生少年时期的玩伴。两人曾因毁损北极殿神像，遭受村民指摘，远别家乡各奔前程。后来陆皓东在上海电报学堂学习，毕业后转至芜湖电报局服务，至一八九○年始回到乡里，开始与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尢列、杨鹤龄、程奎光及周昭岳等人往来，秘密集会讨论时局。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国近代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在檀香山组成，第二年总部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成立，开始发动袭取广州，作为革命基地之计划。他们对外以“干亨行”为名号，同时以陆皓东所创制的“青天白日旗”为革命军旗。后因起义计划泄露而告失败，陆皓东等人殉难，中山先生则被迫亡命海外。

“青天白日旗”先后在第一次广州起义、庚子惠州之义及尢列在南洋创立中和堂时使用过，但此旗之正确图案未有统一规定，以致旗上所排列的光芒多寡不一，缝制者无所依从，后经中山先生将光芒解释为干支之数，应排十二以代表十二时辰，自是旗上光芒之数，始确定不移。

————————————————————————————————————————————————————————

孙中山主张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中华民国国旗

青天白日旗帜虽首度揭开革命行动序幕，然一九○五年成立的中国同盟会，在讨论中华民国国旗形式时，出席的会员却议论纷纷，提出各式革命旗帜，有(一)代表十八行省的十八黄星旗(孙武、焦达峰提议)；(二)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宋教仁、陈其美主张)；(三)以井田制度象征社会主义的井字旗(黄兴、廖仲恺主张)；(四)象征国权独立的金瓜斧钺旗；(五)中山先生所坚持的以青天白日二色旗，再加上红色为底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中华民国国旗，以纪念陆皓东及兴中会诸烈士流血献身之精神。虽然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未在会议中通过，但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诸战役中如潮州黄冈、惠州七女湖、钦州防城、广州镇南关、云南河口、广州新军及黄花冈之役，皆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来号召。史实昭然，其来有自。

民国元年中华民国诞生，中山先生再度主张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我国国旗，惟南京临时政府已定五色旗(红、黄、蓝、白、黑代表汉满蒙回藏)为国旗，并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定为海军军旗，十八黄星旗定为陆军军旗。不久，袁世凯称帝窃国，中山先生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展开讨袁行动。在中华革命党的“革命方略”中，再度规定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中华民国的国旗，青天白日旗为军旗。但此旗始终没有机会飘扬在神州上空，直到民国十年五月五日中山先生以维护法统之决心，重返广州，就职非常大总统，再度努力促使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中华民国之国旗。可是这面旗帜的命运却随陈炯明叛变而下旗，民国十二年陈炯明叛变败走，中山先生自上海重返广州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凡中山先生所到之处皆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虽然如此，各地仍悬挂五色旗。

————————————————————————————————————————————————————————

北伐成功

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旗飘全国

民国十五年蒋中正继承中山先生遗志，率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至民国十七年十二月，东北张学良通电易帜，归顺中央，北伐大业始告完成。当时，除台湾尚在日本统治下，中国每一寸领土均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而全国人民才普遍认知这面象征先烈血泪交织、千辛万苦得来不易的国旗。

自从陆皓东创制青天白日旗以后，旗帜上的规格，虽经中山先生润饰、修正，但仍不为多数人所了解。民国三十二年九月九日，先总统蒋公有感于若干国旗滥造，有失庄严神圣之义，在中国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的演讲中，再次阐明国旗之十二道光芒的排列，要如同时钟上所绘制十二小时的位置一样均匀、对称。同时昭示大家要对党旗、国旗格外尊重，一切悬挂方式或升降旗仪式，都要依照规定，确实作到。民国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在修正公布的“中华民国国徽国旗法”中，对国徽、国旗之式样，就其位置、尺寸、比例、使用及制作、管理等方面，更作了明确的规定。民国六十七年五月，再度透过台湾省政府公报之公告，要求各有关单位一体遵行。同时省教育厅也对国旗和国父孙中山先生、先总统蒋公遗像的制作、悬挂等事项，作了明确的规定。

————————————————————————————————————————————————————————

歌词为中山先生之训词

中华民国的国歌，歌词为：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这是出自民国十三年六月十六日，中山先生在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开学典礼中，对该校师生之训词。北伐成功以后，戴传贤建议将此训词，采为中国国民党之党歌歌词。其后经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并公开征求乐谱，最后以程懋筠所作的一首，拔得头筹，民国十八年一月十日中央常务委员决议：采程懋筠所谱者为党歌。因该歌词极富爱国思想，且曲调庄严和平，雄壮有力，有激发民族意识之效能。民国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行政院明令全国在国歌未制定前，一般集会场合，均唱这首党歌代替国歌。

其后社会人士认为党歌是勉励党员之训词，只能代表党不能代表国，且全体国民不全然为党员，实有制定国歌之必要。于是教育部行文通令全国，征求国歌歌词，欲以当选的国歌颁行全国。经教育部多次的审查，均未能作出最后决定。民国二十五年再组成“国歌编制研究委员会”，专门负责主持国歌编制研究事宜，并正式登报公开征求国歌歌词。爰征集国歌歌词多达三千余首，经审慎审查，结果仍无合格者。经过“国歌编制研究委员会”研究结果：认为黄埔军校训词，充分表现革命建国精神，不但合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且代表中华民国立国精神。乃向中央建议，以中山先生对黄埔军校之训词，作为正式国歌。民国二十六年六月三日，中央常务委员会终于通过以党歌作为国歌。国歌征选案至此遂告确定，自此，党歌正式变成国歌。

————————————————————————————————————————————————————————

程懋筠为国歌谱曲

民国十七年，为响应中国国民党征求党歌配曲活动，程懋筠以曲调优异，在一百三十九件作品中，荣获第一，成为中华民国国歌的谱曲人。程懋筠，江西新建人，官宦世家，幼时尤好音律，先后在江西省立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音乐学校(日本上野音乐学院)等校深造，专攻小提琴，后来改修声乐与作曲。返国后，任国立中央大学、杭州社会大学等校，教授声乐与作曲。民国三十六年来台湾小游时，曾接受台湾省立师范学院音乐系萧而化主任之请，留台湾任教。可惜他选择了大陆未能成行。最后因曾为国歌作曲，而遭中共清算牺牲。

————————————————————————————————————————————————————————国旗歌的作曲与作词

国旗是用颜色来表示建国的历史与精神，国旗歌则是用声音来赞美国旗，称颂国土。每当听到：“山川壮丽，物产丰隆，炎黄世胄，东亚称雄。毋自暴自弃，毋故步自封，光我民族，促进大同。创业维艰，缅怀诸先烈，守成不易，莫徒务近功。同心同德，贯彻始终，青天白日满地红。”随之仰望到的是随风飘扬、冉冉上升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不禁让人对国家生命和国民精神所寄托的这面国旗，产生无比的景仰。这首含义深长，深具警惕国人的歌词，是来自戴传贤先生之手笔；歌曲则为黄自先生的创作。

戴传贤(1891-1949)浙江吴兴县人，字季陶，笔名天仇；留学日本时，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从事报社工作。先后创立民权报、星期评论、中央通讯社等。或抨击袁世凯，或介绍世界局势。自民国元年起追随中山先生，不但记述其言论且与其共进退，是中国国民党的理论家。他热爱国家，忠于革命，故能将国旗的精神写成动人的歌词，永垂不朽。

黄自，江苏沙县人，自幼饱学诗书，尤爱音乐。曾赴美学习西洋音乐的理论与作曲，但其作品却充满中国音乐风采。其“天伦歌”、“踏雪寻梅”、“花非花”、“采莲谣”、“本事”等作品，不但旋律婉美流畅，且富民族特性；抗战时所作的“旗正飘飘”，更能激发国人敌忾同仇之心。惜界三十四岁，即与世长辞。

————————————————————————————————————————————————————————中国国民党党歌的制定

北伐军兴后，十七年底定平津，是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戴传贤先生、建议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将国父孙中山先生于民国十三年六月十六日，在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开学典礼中的训词，采为中国国民党的党歌歌词，其词为：“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经会议通过后，乃公开征求制谱，应征作品多达一百三十九件，审查结果，程懋筠所作的一首，当选第一，经中国国民党公布后，在一般集会的场合均应用到它，无形中成为我们思想信仰的目标，代表全国国民的意志，遂于民国十八年一月十日、颁行全国各地，从此，大家开会的时候，都唱这个党歌。

————————————————————————————————————————————————————————党歌演变为国歌的经过

该歌词意，极富爱国思想，曲调庄严和平，雄壮有力，有激发民族意识之效能，使歌者莫不精神奋发，闻者无不肃然起敬，所以行政院根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复于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明令全国在国歌未制定以前，即以党歌代国歌。

其时，社会人士认为：中国国民不尽为党员，党歌既然是勉励党员的训词，不只能代表党，不能以之代表国，所以认为有从速制定国歌的必要，因此，十九年五月二十四日起，至次年六月底止的一段时间内，教育部曾先后行文三次，通令全国，征求国歌歌词，欲以当选的国歌，颁行全国。闻当时所投国歌的稿件，有二千多首，经教育部初次审查，选出数十首，但一时并未做最后的决定。

其后，政府当局又有人提议赶快制定国歌，否则在国际上便无国歌以代表国家。但又有人提议：与其采用不完全的新歌词，不如采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是谓大同。”一段，较为概括，并可代表国父的全部思想。

民国二十二年，起草中华民国宪法初稿时，张知本（怀九）先生、曾拟国歌三章，其词为：“三民主义，四海从风，以建民国，以进大同；五权宪法，合作分工，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以建民国，以进大同。”这一首歌词，系仿照诗经体裁撰拟的，文句通俗，极为大众化。不论知识水准的高低，都很容易领会到它的精义，可谓雅俗共赏的作品，虽未获采纳为国歌，但后来却将它改为“行宪纪念歌”。

民国二十五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及内政部等有关单位，又联合组成“国歌编制研究策员会”，专门负责主持国歌编制研究事宜，并正式登报公开征求国歌歌词。经过四个月的时间，应征作品达三千多件。该委员会复将教育部于民国十九年至二十年间，所征得的二千多首歌词中，选出二百余首，一并加以审查研究。当时担任研究会委员的党国先进，计有吴敬恒、叶楚伧、叶公绰、黄侃、汪东、高荫祖等十五位；他们在中国文艺社举行了三次会议，两个多月的审查、研究，仍认为：应征者虽伙，但均未符合标准，兹举出一首落选的歌词，以见一斑，其词为：“唯我中华，雄踞亚东，山河万备，气候三通，地大物博，人众智充，历史悠久，文化高峰，民性坚强，宅心谦冲，愿与世界，共进大同。”由这一首歌词的内容看，充分流露了民族独立的风格，足见当时落选的歌词中，亦有不少佳构。然国歌之含义，必合乎中国历史与国情，又能代表中华民国立国精神。依此标准，则六千余首应征歌词中，没有一首为尽善尽美的作品，因此，未能产生新的国歌。

经过“国歌编制研究委员会”研究结果，认为国父对黄埔军校训词，实充分表现革命性的建国精神，且词意庄严和平，更合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乃由中央宣传部向中央建议，请以国父对黄埔军校训词，作为正式国歌，以崇体制。当年五月二十八日，经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当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议决：“将该案交中央宣传部并吴委员敬恒提议，再行研究。”

此后又经过一年的研究，中央宣传部再度向当局提出研究报告，于民国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经第五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议决：“关于国歌歌词编制案，由中央执监委员会常务委员及五院院长另行审议编制。”至六月三日，中央常务委员向第五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提议：以党歌作为国歌。经议决通过，并由国民政府明令公布。从此，党歌正式变成国歌，而所投寄的三千余首国歌歌词，虽各有所长，而亦各有所短，因未尽理想，于是全部落选，当时各地报纸，均刊登其事。

至于以党歌作为国歌的理由，根据当时报上发表的专论加以区分，约有下述的几个原因：（一）一国之国歌，必有其历史。现行党歌，为国父训词，自民国十三年以来，始用于国民革命军，继已普及于全国，各友邦亦皆已惯用，一时骤难改革。（二）教育部所选国歌，虽各有所长，而亦各有所短。（三）吾党二字的解释，有广义狭义之分；虽然可以解作“本党”，但依广义解释，与“吾人”同义，吾人就是我们的意思，说者有谓：“吾党二字，是指本党而言，所以有取销党歌，另制国歌的主张。”今按吾党即吾人之意，可以代表国民，则党歌自得采作国歌。因为有上述种种原因，所以当局才主张以党歌作为国歌，而由国民政府明令公布之。根据上文所述的国歌演进的史实观之，就可以明了中央当时对于国歌歌词的编制，是经过再三的磋商和研究，方才决定以总理黄埔军官学校的训词为正式国歌的，其对国歌之重视，亦于此可见。

————————————————————————————————————————————————————————国歌作曲者程懋筠先生的生平

国歌作曲者为程懋筠先生。程先生、江西新建人。祖先系官宦世家，着有政声。先生幼时即天资敏悟，尤喜音律，好学深思，卓然有志。自小学毕业后，即就读江西省立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东渡日本，入日本东京音乐学校（即后来日本上野音乐学院）深造。先生专攻小提琴，旋发现手指稍短，而改修声乐与作曲，成綪斐然，别有心得。返国后，即任国立中央大学、杭州社会大学等校教授，教授声乐与作曲。

民国十七年，响应中国国民党征求党歌配曲，卒以曲调优异特出，于一百三十九件作品中，荣获第一，因是名传遐迩。熊式辉先生主持赣省时，闻其名，乃指示教育厅程时煌厅长（即程先生之叔父）谓：“党歌作曲者程懋筠先生系江西籍，不在江西执教，实为最大之遗憾。”故邀其归，并成立音乐机构——江西省教育厅音乐教育推行委员会，任程氏为主任委员，凡九年之久。其间，并出版“音乐教育”月刊，动员全国乐人，为我国发行最多、维持最久、内容最丰富之音乐杂志。抗战期间，并应当时蒋经国先生之邀，兼任江西省夏令营音乐总教官（此时，营主任为蒋经国先生，大队长为蒋纬国先生），主持音乐教育，工作谨严，而声乐尤为其特长。

程先生作曲不多，但风格特殊，往往沉思终日，不发一言；一旦乐曲灵感到来，辄彻夜不眠。程先生于民国三十六年暑假，曾来台小游，并寓省立师范学院（今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系系主任萧而化先生府。萧主任商请程先生留台任教，并面致聘书，程先生虽面允返沪考虑，后因上海国立幼稚师范专科学校留任，而未能来台，实为吾音乐界之一大损失。大陆沦陷，程先生因曾为国歌作曲，被匪共清算，早已牺牲，令人悲痛！

————————————————————————————————————————————————————————

会党的合作

一八九七年，在割让给日本未久的台湾，建立了兴中会的组织。

当孙先生亡命日本的几天之后，陈少白便衔命前往台湾，在台北组织兴中会分会。因为台北有一个名叫杨心如的青年，是曾经被称为“四大寇”之一的杨鹤龄的亲属，并且早已参加了兴中会，又在台南方面得到一位律师的协助。

进入一八九九年，以第二次革命为目标的活动，顿形繁忙，最初的根据地是横滨，因为在上一年日本政府准许外国人自由卜居，孙先生乃利用这个机会迁移到华侨较多的横滨居住（原住东京），就在清廷领事馆的近邻，孙先生本人虽然深居简出，但同志们的来往，显然多了起来。

日本官方，从孙先生等人的动态，很快地就判断出快要有革命的行动出现。据一八九九年三月八日报告：“居住在横滨居留地一二一番地的孙逸先、陈少白等人，近来好像非常繁忙，听说彼等最近将要返国，如果时机成熟，就会在广东‘造反’。在该居留地八十一番地的均昌号店东（谭有发）已在秘密制作军旗。”实际上，第二次的起义，是在翌年的十月发生。

三个组织合成兴汉会

一八九九年秋天，陈少白衔孙先生之命前往香港，在此之前，已经由犬养毅派往香港的宫崎寅藏之关系和广东的秘密社团——三合会重行取得了联络。三合会是孙先生的至友郑士良所统率，过去就与兴中会的关系非常密切，也就是在一八九五年第一次起义时率先参加的团体。陈少白于是便加入了三合会，不久就膺任“龙头”之一的“白扇”地位，白扇负责军事上的任务，握有对会员下达动员命令的权力，在革命之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因此而与三合会的合作，达到了不可动摇的程度。

和其他会党的合作，也进行得很积极，其中最大的组织，是在长江流域拥有很大势力的哥老会。

陈少白在某一天，因熟识的日本人高桥谦（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长）介绍，和一位名叫史坚如的青年见面。史坚如加入兴中会之后，便为谒见孙先生而往日本，途经上海时，结识了一位哥老会的龙头毕永年，立即意气相投，遂偕往汉口和其他湖北、湖南等地区，会晤当地志士，然后才去日本和孙先生见面。毕永年就在东京参加了兴中会，旋即带同平山周回到两湖地区，开始进行和兴中会合作的活动。

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兴中会、三合会、哥老会的代表在香港集合，日本人宫崎寅藏、平山周也参加了这一次的聚会。

在此之前，兴中会的活动是以广东、香港为中心，和大陆内地缺乏联络组织；自从“三派联合”之后，才打开了向内地深入推展的途径。

三个组织，在这一次的会议中，决定“合并”，定名“兴汉会”，并推举孙先生为“总会长”，而且刻制了总会长的印信，由宫崎寅藏带回日本，转达孙先生。

陈少白创办中国日报

这一年的十二月，陈少白在香港中环士丹利街二十四号设置发行所，创办“中国日报”（2[136]366旬刊），这在兴中会来说是值得纪念的第一个机关报，所有印刷机器和铅字，由孙先生在横滨购办，装置齐备。发行之初，因为不敢预料英国方面将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故而论调颇为稳健，避免使用“革命排满”等文字；但在半年之后，呼吁革命，日渐激烈，并力辟保皇党的错误路线。

就是这个日报的发行所，在后来成了策动第二次起义——惠州之役的参谋本部。

在这个时期，发生了一个与孙先生和日本人有关系的国际事件——就是与菲律宾独立运动有关联的“布引丸”事件。

对与自己的国家自十六世纪以来就成为西班牙殖民地的菲律宾人，不断的在进行着独立运动。及至一八九八年，美国和西班牙之间发生了“美西战争”，结果美国胜利，乃在是年的十二月决定将菲律宾割让给美国；于是当初协助美军对西班牙战争的菲律宾独立军，接着便以美国为新的敌人，展开了独立斗争。

当时，有独立军的代表彭西（后来为独立军外务总长）在香港和宫崎寅藏结识，因宫崎的引介于一八九八年六月到横滨访问孙先生；因为彼此都是以民族独立为目的的革命同志，所以便请托孙先生协助采购菲律宾独立斗争所需使用的武器弹药。

孙先生为之转托犬养毅，犬养毅又为转托同属宪政本党的国会议员中村弥六，中村乃通过大仓组商事会社社长大仓喜八郎的路线，向日本陆军省购买到数千挺枪枝和弹药。

这些械弹，由三井船舶会社的“布引丸”轮船装载，于一八九九年七月十九日自长崎出港，秘密驶往菲律宾。

未料，在航行途中，忽遇暴风，轮船失去控驭，漂流到宁波海外的鞍山岛触礁沉没。

由于这一事故，遂被美国得知有日本人在支援菲律宾的独立斗争，于是美国政府便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并追查与此事有关的平山周行踪。

“布引丸”沉没半年之后的一九○○年一月，彭西再度请托孙先生代购武器。孙先生又转托中村，购买到六万发弹药及枪枝，准备运往菲律宾，但因日本政府受美国警告而加以阻挠，以致包装完妥后，隐藏在仓库中，而无法运送出去。

于是，缺乏武器补给的菲律宾独立运动，虽经孙先生等人为之协助，但还是徒劳无功，而终归败北。

而且，这一事件，和孙先生等人在其后发动的第二次起义之败衄，也有所关联。

部署惠州起义

孙先生的第二次起义——惠州之役，得从和清廷重臣李鸿章的“合作”来谈起。

一九○○年五月前后，李鸿章调任两广总督，由北京赴广州就任。

两广独立胎死腹中

当时，中国的北方，义和团正在大显神通；于是有些人便秘密计议，乘混乱之际一举而使两广独立，其中心人物为香港总督卜力、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等人，并打算推载新任总督李鸿章。

这个计划，经由前次广州起义曾经帮助过孙先生的香港议政局议员何启通过陈少白转达在东京的孙先生，碰巧刘学询和孙先生为旧识，也打来有“请即前来”的电报。

孙先生乃予应允，并率同主要干部郑士良、杨衢云以及日本人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清藤幸七郎等人乘法国轮船烟打士号于六月十七日抵达香港。

然而，孙先生因为是被香港政府放逐出境的身分，所以在香港方面的接头商洽，只能托付宫崎寅藏等日本友人办理，自己则乘原船前往西贡。

宫崎寅藏被广东派来的海军军舰安澜号迎往广州，在刘学询寓处密谈；可是李鸿章却尚在观望情势，没有决定态度。

就在这个酝酿的时候，事态发生了变化——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清廷发表李鸿章为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着其北上，进行对列强的议和交涉；于是，推戴李鸿章的独立构想，便轻易的胎死腹中。

但是，革命起义的准备工作已经是在进行之中，孙先生决心以兴汉会的组织力量来执行这个任务。

由西贡乘日本轮船“佐渡丸”折回香港的孙先生，召集了主要同志在船上举行作战会议，是在七月十七日的晚间。除兴汉会的主要成员之外，宫崎寅藏等日本志士们也都参加了这个会议。

起义地点，选定广东省南部的惠州。作战计划是以郑士良为起义部队的司令官，孙先生则以台湾为基地指挥作战；郑士良部沿海岸东上，控制厦门之后，孙先生则率领援军渡过台湾海峡，担任总指挥。

人事部署为：外务部长平山周、参谋长原桢、内务部长毕永年。史坚如、邓荫南则潜入广州，在内策应。杨衢云、李纪堂、陈少白留在香港，担任补给任务。

设革命总部于台湾

孙先生本人一度回到日本，九月十九日由神户乘“台南丸”轮船前往台湾，设立“革命总司令部”，同行者有内田良平、平冈浩太郎、山田良政、平山冈等人。

选定台湾为基地的理由，是因为当时日本的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和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与孙先生之间有援助起义的密约。

儿玉等人很早就对于孙先生的运动寄予同情，于赴台湾就任之前，曾和孙先生在东京数度见面，有过给予援助的约定。

孙先生于九月二十八日抵达基隆，进入台北，在新起町（现在的长沙街）设立指挥所，迅即和儿玉、后藤见面，洽商援助武器弹药及军事人员。

同时，并准备将以前为菲律宾独立军购买的武器等类也运往惠州。

起义的地点为惠州归善县三洲田，海拔约三百公尺，群山环绕，形势险峻；东南接近大鹏湾，距香港的轮船航程约为一天的距离；向西北推进，通往惠州；由东江出发，可以一直抵达广州。

郑士良开始活动

郑士良在这一年早已聚集了志士约六百人，以在三洲田附近马兰头村山中油房为秘密基地，开始活动。

可是，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他们的武器却仍只有三百枝洋枪及每枝枪三十发子弹；而且时日已久，粮食也渐感缺乏；因此，郑士良只留下精锐人员八十人，其余则脱下军装，权充樵采，或就食于同志家中，熬过困难。

由于必须要保持机密到起义之日，故而将接近到秘密基地附近的人全部扣留，可是这个举动却反而招致了地方人士的怀疑。

因为进入山区的人，都未见回来，当然会引起疑念，于是“三洲田山中聚集数万人马将要造反”的流言，便越传越广。

署理两广总督德寿，于十月初听到这个传说，乃令调水师提督何长清所率领的虎门防军四千多人进驻深圳，又令陆军提督邓万林的惠州防军千人驻扎淡水、镇隆，从三方面将三洲田包围起来。

不过，由于恐惧“数万造反人马”，而趑趄不前，未敢发动攻势。

被包围的郑士良，乃派遣传令人员发电报给在台湾的孙先生，要求迅速补给武器。然而在孙先生那一方面却还没有准备好。孙先生为了避免和优势的清军正面冲突，一度命令暂将部队解散，等待时机；可是解散命令的电报还没有到达，而清军却已经先有了行动——何长清调动二百人的部队进驻新安县的沙湾，摆开了攻击态势。

郑士良为了打开一条血路，决定奇袭进攻，先发制人；十月八日深夜，由黄福率领的敢死队八十人突击沙湾，未有准备而受到偷袭的清军，立即败退；革命军所获战果为击毙清军四十人，俘虏约三十人，夺得洋枪四十枝及弹药数箱。

这就是惠州之役，最初点燃的战火。

起义功败垂成

郑士良继头一仗旗开得胜之后，由沙湾西向挺进，打算以广州为进袭目标，因为在往广州途中的新安、虎门有同志数千人，已经准备好一俟郑部到达，即行蜂起接应。可是正当这个时候，接到孙先生自台湾发来电报“希先攻占沿海地区，在厦门接收由台湾运去的军械。”因此，乃匆遽掉转头来，改取东北进路，挥军指向厦门。结果使新安、虎门的同志未能和起义部队合流。

革命军连战连胜

在清军方面，还有何长清所率领的三千多主力及邓万林所统驭的一千多人。而郑士良则在进袭的过程中，招募了一千多人，增强兵力，于一九○○年十月十五日攻下了镇隆。这一仗，又是乘清军之虚，攀登后山，从背后杀入清军阵地的奇袭战术所奏功，俘虏了数十人，夺得枪械七百多枝，马十余匹，子弹五万多发，大获胜利。

郑士良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是淡水。另一方面，清军则因镇隆之败，而派来了一万多人的增援部队。两军于十七日在永湖遭遇，又是革命军得胜。

淡水布阵的清军有五、六千人，而革命军则只有洋枪一千多枝，展开突袭，搏战数小时之后，再将清军打败，又夺得洋枪六百枝，子弹数万发，马数十匹，俘虏百余人，剪去辫子，全部使充军役。

十九日，进抵崩冈垆，与清军六、七千人隔河对峙，又施展拿手的夜战奇袭战术击败清军。二十一日进军三多祝。自三洲田出发以来，不到两星期，推进了一百四十公里，连战连胜，势如破竹，控制了惠州一带的沿海地区。

所过之处民众欢迎

革命军所过村落，受到了鸣放爆竹欢迎，及箪食壶浆的接待，四乡志士陆续投效，此时革命军全军已达二万多人。

然而，武器弹药则无从补充，非常缺乏。

在接到郑军举义报告的同时，孙先生对在日本的宫崎寅藏发出电报，请迅将菲律宾独立军留在日本的武器运来台湾。

宫崎为了慎重起见，特地检查一下存放在仓库里的武器，不料打开箱盖一看，发现都是些废枪、废铁，大为吃惊；原来是经手购买的中村弥六向日本陆军方面买进了一些废枪，而中饱了差额，中村虽然因此被宪政本党开除了党籍，然而已经是于事无补了。

再有可以作为依赖的，就是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所约定给予武器和干部的援助。

孙先生一意等待着儿玉的回音，结果，等到了总督府派来的人表示：

“依照内地（日本）发来的电报，要革命党人离开台湾。我来这里，就是为了通知你（孙先生）搭乘明天启航的轮船回日本。”

日阁改组政策转变

孙先生要求儿玉再作考虑，但白费心力，因为日本的政权于十月十九日由山县有朋内阁改组成伊藤博文内阁，外交政策一百八十度地转变，对于中国不革命派禁止给予任何援助。

情况已经演变到了最坏的状态，孙先生乃派遣山田良政等几位同志，经由香港前往海丰附近的革命军阵地，告知武器补给，已经绝望。

于是只有将部队解散的一条路可走，郑士良则和黄福等人脱身抵达香港——“惠州起义”，便以失败的结果而收场。

在退却途中，山田良政迷失了道路，被清军补获杀害。山田蓄发梳辫，能说中国话，在西服的外面罩有中国服装，所以清军没有察觉到他是日本人——山田是第一位为中国革命而牺牲的日本人，时年三十三岁。

孙先生对于山田之死，颇为悲痛，于一九一三年在东京谷中全生庵建立纪念碑，一九一八年复为撰“建碑纪念辞”，有下列内容：

“论者皆曰：惠州之无功，非战之罪；使日本政府仍守前内阁方针，则儿玉氏不至中变……而革命军无此挫折，则君断不以不幸而被戕。然君曾不以政府忻厌为意……以殉其主义……愿斯人为中国人民自由平等奋斗之精神，尚有嗣于东。”

史坚如被补斩首

为策动建立兴汉会有功的史坚如，也是一位牺牲者。史坚如为了响应郑士良的主力部队，担当策动广州蜂起的任务，然而由于经费不够，不能按照计划进行，连兵员也召集不起来。

因此，史坚如乃计划暗杀署理两广总督德寿。他和同志们租借了总督官邸后面的民房，掘地下道，于十月二十七日在官邸地下安装二百磅炸药，未料因药线受潮湿，未能爆发；第二天夜晚，换装药线，再度点燃，勉强爆发，可是因为雷管太少，只引爆了一部分炸药，爆炸力不够，未能达到炸死德寿的目的。史坚如因密告而被捕斩首，年仅二十二岁。

杨衢云郑士良遭暗杀

自广州起义乃至惠州起义担任领导人之一的杨衢云，于失败之后留居香港，在结志街教授英语，赡养妻子。署理两广总督德寿悬赏三万元购其首级，杨衢云则表示：“男子汉怕什么死”，不作逃避的打算。结果于翌年～～一九○一年一月十日被德寿派来的刺客陈林在教室内以手枪狙击，次日死亡。

郑士良也于一九○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在香港酒楼与中国日报副主笔郑贯公饮酒时倒地死亡。警察局因没有外伤，认为系中风病故，但另一说法是被清廷爪牙所毒杀。

各地革命活动

惠州起义失败之后的孙先生，一度亡命日本，继之周游东南亚、美国、欧洲各地。直到一九○五年为止的五年之间，是为了发动下一次革命行动的准备时代。

自旅程的起点日本出发，第一站在一九○二年一月到达香港。虽然从广州起义失败以来被宣告五年之间不准入境的限期已经届满，但还是被警察当局所跟踪调查，乃于第六天离开香港，返回日本；此时，香港政府再度宣布禁止入境。

国父至各国鼓吹革命

第二站，是在一九○二年十二月的安南（越南）之行，在安南首都河内建立了兴中会分会。后来在一九○七年，孙先生因日本政府受到清廷的抗议而被自日本遣送出境之后，这个河内分会便成了革命的机关部，从事更重要的活动。

孙先生在河内居留了半年左右，然后往西贡转泰国。一九○三年七月，折回日本，停留了两个月，随后在九月末，前往檀香山，这是曾经渡过少年时代和创建兴中会而值得回忆的地方；可是兴中会的组织则已经于孙先生没有在这里的时候被康有为的保皇会所侵蚀破坏了。于是，孙先生乃将在当地发行的“隆记报”改组为兴中会的机关报，向广东华侨们剖析“革命的目的在倒满兴汉，保皇的目的在扶满臣清，两者如水火之不能相容。”从这里着手再度纠合同志，设立了“中华革命军”。

继之，前往美国，发行“革命军需债券”，约定“革命成功，十倍偿还。”筹募到美金四千元。

一九○五年春，越大西洋，访问欧洲；在欧洲最初公开发表“三民主义”纲要。并先后在布鲁塞尔（比利时）、伯林、巴黎三处成立了中国留学生的革命组织。

当孙先生周游国外这一段期间，在中国国内也有多方面的革命运动在进行之中。

民众反清呼声沸腾

清廷的统治，已经堕落到绝望的深渊，由于“八国联军止役”（义和团事件）败北的结果，而在一九○一年九月签订了包括为担保赔款乃将关税、盐税管理权出让给列强，简直是和殖民地同等地位的“辛丑和约”。还有，联带地发生了俄军以义和团骚乱为藉口，进入东北地区盘据不走的事故。

更且在一九○四年爆发了“日俄战争”——双方为了争夺在中国的权利，而把中国的领土当作了演出全武行的舞台；至于清廷则连面对如此的情况也都失掉了自主国家的发言权。

民众对于清廷的反对呼声，沸腾而又沸腾，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一切主要革命运动，则有如下述：

由吴敬恒等人于一九○二年十一月在上海结成“爱国学社”。这个学社是以中国教育会的名义所发起的组织，而实际则为在东南各省的革命团体。

接着，是吴敬恒、冯镜如（横滨华侨，曾接应孙先生组织兴中会）等人为要求俄帝自东北撤军，而于一九○三年四月在上海举行的“拒俄大会”。

由黄兴、宋教仁等人于一九○四年一月在长沙组成“华兴会”。

由胡锳、吕大森、宋教仁等人于一九○四年六月在武昌组成的“科学补习所”。

继之，有蔡元培等人于一九○四年八月在上海组成的“光复会”。

科学补习所曾经和黄兴等人结合，策划起义；虽被查封镇压，但是后来成了在武昌对清军进行渗透工作的中心，对于辛亥革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留日学生活动积极

在另一方面，形成革命根据地的日本，以中国留学生为中心的革命活动，也相当地积极。

早在一八九九年，就有杨廷栋等人以住在东京、横滨的留学生为对象，刊行“译书汇编”、有卢骚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等著作，以中文介绍给留学青年，启发思想。在第二年，又有冯自由（冯镜如之子）等在横滨创办的“开智录”（旬刊），专事发挥自由平等的学说。

一九○一年春季，由两广留日学生在横滨组成“广东独立协会”，孙先生也曾参加。紧接其后，又有沈翔云、杨廷栋、张继等人创刊“国民报”，为最早在日本发行的“革命机关报”。

面对着这一些革命运动，日本官方接受了清廷的要求，开始严加监视。

一九○二年四月，为纪念汉民族国家——明朝的灭亡，由章炳麟、秦鼎彝、冯自由等人发起在东京上野精养轩举行“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以及次年四月为抗议俄帝占据东北而结成的“拒俄义勇队”（后改称“军国民教育会”）等活动，都有过被日本官方命令中止或解散的痛苦遭遇。

由吴敬恒等中国留学生责问清廷驻日公使蔡钧的事件，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一九○二2[154]384年七月。吴敬恒在此一事件之后，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回到上海，尽力于组织前述的“爱国学社”。

曾经密设军事学校

还有一件为孙先生所亲自进行的活动，就是一九○三年七月在东京青山开办的“革命军事学校”。由于清廷公使馆恐惧留学生参加革命运动，而将私费学生摒绝在日本陆军的大门之外，于是孙先生乃以这些学生为对象，开办了这么一个秘密学校。入学学生十四人，聘请由犬养毅介绍的日本骑兵少校小室友次郎、步兵上尉日野熊藏担任教官，躲过警察的注意，实施一种游击战术的军事训练。尤其日野熊藏，就是日野氏自动手枪的发明人。

开始的时候，学生们在东京牛込租赁房屋上课，后来迁移到青山练兵场附近，白天观察日本近卫师团的训练，晚间则在日野的寓处学习战术。然而，在不久之后，孙先生一离开了日本，学生们之间意见分裂，只进行了六个月便解散了。

组织同盟会

一九○五年夏季，孙先生由法国乘法轮ＴＯＮＫＩＮ号，于七月十九日抵达横滨。

这个时候，在孙先生的脑子里已经规划好了以三民主义建设中华民国的蓝图。

欢迎国父盛况空前

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达到了八千人。自第一次广州起义以来的十年之间，革命运动的幅度日见扩展，留学生们都在延颈跂望着领导者孙先生的到来。八月十三日，东京的留学生在曲町区饭田河岸的富士见楼餐馆为孙先生举行欢迎会，蜂涌而来的听众约有一千三百人，会场挤不下去，有几百人待在场外，一时始交通为之阻塞。孙先生举出以独立精神而强国的日本和在清廷统治之下日趋衰弱的中国作比较，同时呼吁“要凭我们的力量，使中国成为共和国；使中国重建。”

这个时候的情况，日本警视总监安立纲之曾向内相、文相、外务次官、神奶川县知事以甲秘字第二四八号公文作了如下的报告：

“昨日（十三日）一时开始，在曲町区饭田河岸富士见楼举行清国亡命者孙逸仙的欢迎大会。发起人为清国留学生程家柽、田桐、彭启策三名，到会该国留学生约一千一百名，四时三十分宣告开会，孙逸仙站起来，发表了如左的演说：

“‘我曾在五、六年之前来游日本，（中略）目前的境遇，是不能回到自己的国家，已为各位之所了解。我深切盼望于各位的，是要奋勉力学，使今后脱离列强干涉，而保持独立国家的体制。’云云。”

结识黄兴与宋教仁等

孙先生这次来到日本所结识的人们，有华兴会的组织人黄兴、宋教仁……都是革命同志，不仅参加了后来的辛亥革命，而且是孙先生的左右手，都成了领导中华民国的得力人才。

黄、宋两人，曾经计划于一九○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旧历十月十日）慈禧太后七十岁的“万寿节日”，在长沙祝寿会场万寿宫安置炸弹，炸死全省祝寿文武官员。但因计划被泄漏而失败，乃亡命日本，发行革命杂志—“贰拾世纪之支那”。

黄兴后来在辛亥革命时，成为战时总司令，担任前线军事作战的总指挥。革命成功，孙先生出任临时大总统，组织政府，黄兴就任陆军总长，担任一部门的责任。及至第二次革命，起兵讨伐袁世凯，失败后，遂亡命美国。

宋教仁于辛亥革命时，以督战身分和黄兴等人并肩作战；在革命后的临时政府，以留学日本所得学识受到重视，而被任为法制局长；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采用他的提案。其后，为了封锁袁世凯阴谋，乃提倡将同盟会和其他革新党派合并，改组为“国民党”（和现在的“中国国民党”名称有别），并在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八月组成国民党时，担负了主要任务。但及至一九一三年三月，竟被袁世凯所派遣的刺客在上海暗杀；而此一事件，遂成为第二次革命的导火线。

汪兆铭（字精卫）也是在这个时候和孙先生结识，他后来在一九三八年膺选中国国民党副总裁，一九四○年却背叛了中华民国，和日本军阀勾结，在南京制造傀儡政权，担任主席。

在当时，孙先生曾对黄、宋两人强调：“现在的中国，内部纷争比列强瓜分更值得忧虑。如果每省各自任意发动革命，则反而予各国以干涉之机，是则中国将必亡无疑；故而目前革命同志必须联系合作。”黄、宋等人也同意这一论点，所以这一次谈话，便成了导致建立中国革命同盟会，领导革命成功的起点。

日本治安机关对于孙先生等人的积极活动，并没有怠慢其警戒工作。

八月十六日，神奈川县知事周布公平以秘甲字第二○四七号公文向内相报告：“未见有客人访问来往，但屡屡上京（由横滨到东京），只不过是与在东京的本国留学生聚会。然而，其本人（孙先生）最近颇为意气昂扬，似乎是自己感觉到贯彻宿志的时期业已接近，而甚为得意。”

又在八月三十日以和十六日同一发文号码报告：“昨日（二十九日）所发行的二六新闻杂报栏内，载有广东陆军提督派遣刺客要暗杀孙逸先，经秘密调查结果，并非事实。”

号召各派组同盟会

孙先生号召各派联合的主张，很快地得到了收获。七月三十日，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地黑龙会本部（内田良平宅）举行由各派统一组成新秘密革命团体的筹备会。当时的参加者，有孙先生、冯自由、梁慕光等横滨兴中会同志，黄兴、宋教仁等华兴会成员，以及汪兆铭、朱执信（大符）、李文范暨日本人内田良平、宫崎寅藏等全体约七十人；以籍贯而论，除未派留学生来日的甘肃省缺席之外，其他十七省的代表都齐集一堂。

有这么一个小插曲：由于盛况过于热烈，会议中途，室内有地板塌倒。孙先生很高兴地说：“这就是颠覆满清的预兆。”

新秘密组织，定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对外则省略“革命”二字，只简称“中国同盟会”。

继之，决定了同盟会的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民族），创立民国（民权），平均地权（民生）。”表示出三民主义的思想。

全体会员签名之后，孙先生领头举右手向天宣誓，全体依照宣誓毕。接着孙先生将每人叫入别室，教以独特的握手方法，及三句问答暗语：“那里人？”“汉人。”“什么物事？”“中国物事。”“什么事？”“天下事。”

民报宣扬革命

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大会，于议九○五年八月二十日下午二时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本国会议员阪本金弥的别邸举行，到会三百多人。

国父任同盟会总理

同盟会会章，经讨论而作部分修正之后通过；继之，由黄兴提议：“推举孙中山先生为本党总理”，全体举手赞成。并决定执行部人员为黄兴、陈天华、程家柽、廖仲恺等；评议部为汪兆铭（议长）及冯自由、胡汉民（衍鸿）、朱执信等；司法部为邓家彦（部长）及宋教仁等人。

同盟会的成立，对于革命运动，不能不说是一个最大的转捩点。贯彻革命使命、肩负新中国责任的主要领导人物都汇聚在一起，具有了担当政权的基础准备。

在这次大会中，本已决定以由黄兴等人前在五月发行了第一号的月刊“贰拾世纪之支那”为同盟会的机关报；不料在预定八月二十八日出刊的第二号上载有“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被日本政府检查而惹上了麻烦，刚印好的杂志被全部没收，并且由警察追查经办人员。这是由于同盟会成立，使非常敏感的清廷，策动日本政府加强弹压措施的影响。

民报发刊由张继负责

然而，孙先生和黄兴、宋教仁等人并没有放弃发行机关报的意图，经过多次召开干部会议之后，定名为“民报”，改头换面，重新发刊。

民报创刊号的发行日期为十一月二十六日，发行所在东京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第一任编辑人兼发行人为同盟会司法部判事张继（注）。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孙先生在创刊号的发刊词中，揭橥了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当时称为三大主义）。扉页并刊有被推崇为三民主义先觉者的黄帝、卢骚、华盛顿等人的画像。胡汉民、廖仲恺、陈天华、汪兆铭等同盟会重要干部都挥舞健笔，担任撰述。

宣示民报六大主义

民报的任务，在宣扬同盟会的革命理论，并为革命同志的行动指针，流传下来以孙先生在创刊号揭橥三民主义为首的重要论文多篇。在一九○六年四月发行的第三期上，更经胡汉民明白地宣示“民报六大主义”：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建设共和政府。土地国有。维持世界真正之和平。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要求世界各国赞成中国革新之事业。在这六大主义之中，特别值得注目的是在第五项触摸到了中、日两国基本关系的应有状态。

胡汉民指出日本对中国的态度有两派，一派为凭藉武力的“侵略主义”，一派为通过清廷而谋取利益的“吸收主义”，相对地，在中国方面也有一味拒斥日本的“排日派”和希望依赖日本助力的“亲日派”。

胡汉民认为这些态度都和中、日两国国民真正的友谊联系不上，他的主张大致如下：

“吾人所谓两国国民的结合，则为两方之交谊。为中国者，讲求实力，以保其对等之资格；而日人亦当泯厥雄心，推诚相与……中国国民非满洲（清廷）也，如大隈（当时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之论，满洲政府既不可信，而日本亦不乐为以狐猾手段为目前之外交，然则舍政府而结国民……”。

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预感到了中、日之间“不幸历史”的阴影。而且胡汉民更认为像这样相互尊重的关系，其必要性不仅是中、日之间的问题，于是乃在第六项中提出警戒的意见说：列强之中，也有很多有意帮助中国革命的，但如是则恐反将徒然造成对中国干涉的藉口，并进而有招致瓜分中国领土的后果之可虑。所以我们所希求于外国人的，只是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宣告中立。

革命思潮日益壮阔

民报问世之后，她的读者、共鸣者、着实不断增加，未到一年之间，发行量已超过了一万份。翌年～～一九○六年十二月，在东京神田锦辉馆举行民报一周年纪念会，到场留学生达六、七千人，为空前未有的盛况。这个刊物并且被秘密带进中国国内，革命思潮，日渐壮阔，成为在各省组成同盟会秘密分会的原动力。

孙先生后来在“孙文学说”中对于民报的功绩作了极高的评价：“民报鼓吹三民主义，遂使革命思潮弥漫全国，自有杂志以来，可谓成功最著者。”

各地宣传革命的报刊

当时，在民报之外，宣传革命的报刊甚多。东京有“复报”、“云南杂志”、“洞庭波杂志”、“汉帜杂志”、“汉风”等类；至于海外各地，香港有“中国日报”、“世界公益报”、“有所谓报”；新加坡有“中兴报”、“图南报”；檀香山有“自由新报”、“民生日报”；温哥华有“大汉报”、“华英日报”；旧金山有“少年中国晨报”；缅甸有“缅甸报”；摈榔屿有“光华报”……

在中国国内，亦复如是，上海有于右任发行的“民呼报”（后名“民立”）；广州有“平民报”、“齐民报”；北京有“国民报”；天津有“大公报”……对于传播革命思想都有所贡献。

注：张继（一八八二～～一九四七年）河北人。十六岁东渡日本，曾和留日同志组织“励志会”，发行“译书汇编”，介绍西方思想。其后负笈早稻田大学。在担任民报编辑人时，并兼任留学生总干事。后赴巴黎，创刊“新世纪”。辛亥革命后归国，晚年任国史馆馆长，及民国大学、辅仁大学董事长。

制定国旗国名

中国革命同盟会的重要议题，有中华民国的“国旗”和“国名”。

提议用“青天白日”徽志的人，是孙总理。这个青天白日徽志，是早在兴中会成立之后举行第一次起义～～一八九五年广州之役牺牲的陆皓东之所设计，并且在第二次起义～～一九○○年惠州之役，已使用为“革命旗”，是有相当来历的旗帜。

天青的底色表示澄澈的天空，白色的太阳放射出十二道光芒（义光），天青色象征平等，白色象征博爱，十二道光芒表示一年十二个月、一天十二个时辰。

最初将国旗提案列入议程时，是在同盟会组成的第二年～～一九○六年冬天、为研讨“革命方略”而举行的干事会中。

实则，孙先生在向此次会议提出这个议案之前，就已经于这一年的元月在横滨印刷的“革命军债”（英文）券面上，印有这个徽志。

青天白日满地红

在孙先生提案之外，还有其他不止一个提案——诸如表示田地的“井字旗”，表示武器的“金瓜斧钺旗”，象征十八行省的“十八星旗”等等。对于“青天白日”的提案，黄兴提出“和日本国旗有点相似，而且太朴素”的意见，议论相当激烈；于是，孙先生乃将之加上红底，成为“青天白日满地红”，再行提出。红，是表示为争自由而洒下的鲜血——现在中华民国国旗的原型，就是在那个时候最初出现。

在那一次会议中，作为国旗的提案虽因意见不一，未作正式决定，但是在革命时的军用票（军用纸币）上，已经采用。而且，在一九○七年春天，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冯自由的夫人李自平便依照孙先生所绘图案缝制了四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送给革命军东军都督许雪秋和东军惠州区司令邓子瑜各两面。而在潮州黄冈的第三次起义时，且曾高扬过其中的一面；自此之后，便在这个旗帜之下，聚集革命志士。这一年的十二月，在黄明堂率领的革命军占领广西镇南关炮台的第六次起义中，有一位少年为了取回遗留在炮台上的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就曾勇敢地单身冒险冲进敌军阵地。

还有，在一九一一年三月，孙先生在美国为筹集军费而由“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发行的“中华民国金币券”，表面印有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背面印有青天白日旗，都是孙先生亲自所绘制的图案。

不过，在当时倒也并不是所有的革命团体都采用同一旗帜～～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共进会在湖北用的是“十八星旗”，陈炯明等在惠州用“井字旗”，陈其美等在上海用“五色旗”；及至南京政府成立之后，各省也都还不能统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则在广东、广西、福建、云南、贵州等省被当作国旗使用。

直到一九二○年，孙先生才正式制定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民政府的国旗，而陆皓东最初所设计的青天白日旗则成为中国国民党的党旗，一直到今天。

保护这个旗帜

‘自从陆皓东先烈到今天，我们无数同志与前方将士慷慨赴义，蹈死不顾。现在他们的躯体虽已牺牲，而他们的灵魂是寄托在这个旗帜上面，得以永垂不朽。我们中华民族千秋万世的子孙，都要永远不忘先烈为这个旗帜牺牲的历史，因而尊敬这个旗帜，保护这个旗帜。’（注）

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确是民族的鲜血所染成，为守护中华民国的自由和独立，而一直升起晴空，迎风飘扬。

不惜与日断航

日本政府，在今年（一九七四年）春天和中共缔结航空协定的时候，由外相大平正芳发表谈话，公开表示对于代表中华民国的中华航空公司飞机上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不认为是国旗；中华民国认为这是对国家的最大侮辱，而于四月二十日以断绝航空路线为报复。

在这个时候，中国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揭载了如下的社论：

“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为革命先烈的丹心热血所染成，代表国家的独立主权与光荣的革命历史，神圣庄严，实为立国精神的具体表征。现在，大平公开对我国旗加以侮衊，严重损害我国家尊严；是可忍，孰不可忍！”

中华文化普被各族

“中华民国”的国名，也是在那个时候所决定。

中华是中国的古称，是指以黄河流域为中心而发展的汉民族；亦称为“中原”、“华夏”，都是含有“文化中心”意义的词汇。关于这一点，在一九○七年七月发行的第十五号民报，章炳麟曾有大致如下的说法：

汉民族自称中华，视其周围的异族为蛮夷戎狄，这些异族因汉民族的伸展，而吸收其文化；又因被汉民族的文化所同化，而被同一语言文字和共通伦理观念所浸润，不久便超越了种族的界限，扎下了文化共同性的根基，形成走向中华民族成长发展的途径。——这也就是说：中华民国是包容文化相同的各种族的国家。

注：蒋总统—“总理第一次起义纪念日的感想”（一九四三九）

编订革命方略

成为革命具体指导方针的“革命方略”，也是在这个时候编订完成。这个方略最初明确地规定了在革命起义时的组织形态和运行方法等事项。

革命活动制度化

在此之前的革命活动，并没有统一的规定为其基准，而是由各地的革命组织各自为政，所以发生过一些意想不到的错误和混乱。孙先生于是乃制定这个“革命方略”，用以使之制度化。革命方略于一九○六年底完成，颁发给中国各省的同盟会会员。

“革命方略”分为下述十五个项目：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处国民军之条件，军队之编制，将官之等级，军人之俸给，战士赏恤，军律，招军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条件，略地规则，因粮规则，安民布告，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

军政府宣言

军政府宣言，是在革命成功的同时，用革命军政府的名义发表，预防人心动摇。其内容为首先确定革命的定义是国民革命，明白表示出三民主义的理念——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以及变更国体，改革民生。并且在具体政治型态方面分为三期，第一期（三年）为“军法之治”，由军政府指导国民扫除旧污。第二期（六年）为“约法之治”，军政府以地方自治权归之人民。第一、二两期都是过渡时期的政治型态，到了第三期则为“宪法之治”，和国民约定在共和宪法之下，达到由国家机关分掌国事的最终目标。

对外宣言

对外宣言，是为防范预料得到的外国干涉，故而表示对外国承诺：清廷和各国曾经缔结的条约继续有效。清廷应该偿付的赔款和外债，由新政府负责继续支付。保护外国人的一切既得权利。同时并宣言如有帮助清廷妨害革命军政府者，则视同敌人。

国民军条件

国民军条件的各项规定，是对于军队的组织、规律、活动、管理方法等的细节。

步兵八人一排、三排为一列、四列为一队、四队为一营。每营在列兵之外，有营长以下的指挥官员和军乐长、营旗手、号兵、信号兵、及主计、书记等员额，合计四百四十八人（相当日本的大队）。又四营为一标（相当日本的联队），并另设炮队、工兵队、辎重队。军饷则规定列兵每人每月由十元起，最高为标统（相当日本联队长）月薪五百元。军纪严格，不要说违反命令，就连强奸和抢劫等情形，也都要处以死刑。

招降布告

此外，还在招降布告上宣布：携械投降者，纪录其功绩，并按值价的四倍收购其武器。投降后和革命军同等待遇，每月薪饷十元，并供给被服、食粮。揭橥论功行赏、升职加俸、革命成功终身给养的条件，以号召来归，削弱清军，策动对革命向心的内应关系。

这个革命方略，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肇端的武昌起义中，发挥了相当威力。

这次起义，最初预定在宋教仁等同盟会领袖策划之下，由孙武等人指挥发难；不料，被清廷官署事先察觉，以致在当地的领导人孙武等或被逮捕，或已逃亡，加以宋教仁等又未能如期赶到，以致革命军不得不在没有人领导的情况之下蜂起，而此时的革命军，就是依据“革命方略”的规定，才能够迅赴机宜，号召国民，并向外国领事馆发出宣言，成功地防止了社会混乱。

向华侨筹集革命资金

由于同盟会的组成和展开活动，在革命资金方面也跨进了一步。

同盟会初期的经费来源，以每人十元的入会费为主。

但是，不管怎么说所能期待的多额援助，还是在华侨方面。同盟会为此特发行“革命军债券”，其条件是待军政府成立，在一年内四倍偿还；又如有提出希望者，还可以给予特别权利，藉以加强向华侨筹集资金。孙先生本人并立即于一九○五年十月前往西贡，推行劝募。

在这个时候，所发行的债券，系假托“广东债券总局”的名义进行，不使用任何具有革命军资金意义的名称。

债券的面额是“公债本息一千元券”（实际只付二百五十元），并有孙先生署名；背面说明：“中华民国兴利公司”经协议结果，“为获得大利，利益均沾，决定特向外界募集公债二百万元，以充资本。自公司开办生意之日起，五年之内偿还本息……”所谓进行新事业的公司，只不过是一个伪装，实际则是以革命成功的那一天作为“开业之日”。

孙先生用这种债卷，在大约两个月之间，募到了一百三十五件。

明白地记载着这些资金使用途径的重要文件——“收支决算书”的一部分，直到现在还留存着。

冯自由保藏决算书

这是冯自由在一九一○年辞卸同盟会香港分会长而离港时，为避免被官方所注意，乃将这个文件放在枕头里带出来。这一份决算书载明自一九○八年开始的两年之间，募款收入四万八千六百九十二元一角七分，支出四万九千二百三十四元六角九分，两抵尚有赤字五百四十二元五角二分。

支出的项目是：付萱野长知购买武器价款及旅费一万二千元为最高，许雪秋两次支领起义费用七千元，余纪成诉讼费六千元，余绍卿起义费一千二百元，邓子瑜起义费三千一百元，曾仪兴等人起义费六百元，邓耀南五百元，电汇黄兴一千元，汇宫崎寅藏三百元，池亨吉九百五十元，电汇孙先生四千三百元，汇越南海防的毛瑟枪和制弹机价款九百五十元等项。

华侨踊跃输将

孙先生为弥补革命军资金的赤字，不得不继续东奔西走，由东南亚远至于欧洲、美国，席不暇暖，为的是实践革命和建立组织，以及筹集经费。

国父邂逅张人杰

一九○五年冬季，孙先生在西贡募集资金以后，转往法国，遇到同船的浙江人富豪张人杰（静江），他是清廷驻法公使馆的商务随员，同时也在上海和巴黎之间从事古董商品贸易，致富钜万。和孙先生邂逅相遇的张人杰，自我介绍，同时询问：“你就是革命家孙某人吗？我也认为除革命之外别无方法能救中国；我这几年积聚了一些钱，如需钱用，请来电报，不管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应命。”张人杰伸出了援助之手，孙先生也就接纳了他的厚意，约好了借钱电报的暗号：Ａ为一万元、Ｂ为两万元、Ｃ为三万元、Ｄ为四万元、Ｅ为五万元。后来，孙先生曾经多次向张人杰求援，其总额达六、七万元之钜。孙先生为酬答他的功勋，在辛亥革命后成立的南京政府中有意任命他为财务部长，但他却辞谢未就。

东南亚侨胞大力支援

孙先生于一九○六年四月自欧洲航行到新加坡，组织同盟会分会（翌年成为南洋支部），就便遍历吉隆坡、西贡、河内、庇能（槟榔屿）、曼谷等东南亚都市。由于此行，而使东南亚成了有力的资金供给来源，仅就已经判明的来说，到辛亥革命为止所募集的起义经费，就有来自荷属南洋（现在的印尼等地）约三万二千元，英属南洋（马来亚及其他地区）约四万七千元；并且还得到了像越南的黄景南、李卓峰、曾锡国、马培生等每人各达数万元的大力支援。

一九○九年，再由东南亚到法国、比利时、英国等欧洲各国周游，在这年的十一月到了美国。

在旧金山设筹饷局

这个时候，在美国的纽约、芝加哥、旧金山三处成立了同盟会分会，而以旧金山分会为美国的总机关。在美国奋斗成功的华侨很多，所以筹集到了七万七千元。当时，孙先生为谋开拓资金来源，打算在美国设立贸易公司，贩卖马来半岛的“锡”，使不再经过英国的掮客而直接运售给美国，但却没有成功。

当辛亥革命即将面临的一九一一年，孙先生再度前往美国，和冯自由、陈耀垣、黄魂苏等人到各地筹款，当时，在美国可以观测到革命机运已经接近，华侨们继踵响应，总额达到十万元之钜。

这一年的六月，在旧金山设立了“洪门筹饷局”，作为专事筹募资金的负责机关，这是和排满组织“洪门会”所设在美国各地的机关——“致公会”合作组成的。第一次发行了冠有中华民国名义的“金币券”，照券面金额的半额推出，并规定在中华民国成立的同时，就可以作为国家货币正式使用，因而在短期间内获得了总额十四万四千一百三十元的大量资金。

到中华民国成立之时，以诸如上述的各种方法自世界各地筹集到的资金总额达一百四十万元。后来，在孙先生担任临时大总统时代，偿还了其中的五十万元左右；其余尚未偿还部分，应由继孙先生之后秉持国钧的袁世凯承担，但袁世凯则冷酷地置之不理，辜负了海外同胞的爱国热忱。

和筹措资金齐头并进的，是革命举义也在不断地进行。

萍醴之役的发难

由同盟会员最初所发动的起义，是在一九○六年十二月的“萍醴之役”；不过，这个行动并非东京同盟会本部所策划，而是由会员自发地进行，可惜结果归于失败。

萍醴之役，是由自日本留学归国的刘道一、蔡绍南等和当地的李金其、龙春台、姜守旦等人结合，在湖南、江西两省的萍乡、醴陵、浏阳等地发难。当时，在中国的中部地区天灾歉收，赣南、鄂西、湘北各地哀鸿遍野，不仅贫苦大众、就连地方官吏对于清廷不满的情形也越来越严重。

刘道一先烈就义

革命军的战略是分成三队，第一队占据浏阳，窥伺长沙；第二队占领萍乡安源煤矿；第三队攻入瑞昌、南昌。然而，事先泄漏了机密，清廷出动数万大军镇压，被捕者数百人，刘道一被逮到长沙，判处死刑，时年二十二岁。

清廷加紧取缔

清廷注意到这个起义的背景，是在东京的同盟会。由于这次起义为契机，增加了清廷对日本的工作，强烈要求其政府对于在日本以同盟会为首的革命活动加强取缔。

清廷首先以孙先生为攻击标的，驻日公使杨枢于翌年～一九○七年春季，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孙先生出境，日本政府已予同意，但外务省则认为孙先生仍然有其利用价值，于是，乃在取得孙先生的谅解之下，不作公式的遣送出境处置，而只悄悄地赠给程仪五千日元，并且为之设宴饯别，送出国外。另有东京的股票经纪人铃木久五郎，也赠送孙先生一万日元，以示好感。

此时，清廷方面对于同盟会的秘密侦察，相当详细，在十七省的分会之中有七省分会长的姓名都被查出；对主要干部的动态，归国会员的活动，也都获有资料。在日本的情报员向清廷送达的报告，并且提到了日本人干部宫崎寅藏、平山周、未永节；以及“北一辉派遣三名部下赴俄国学习制造炸弹技术”，“包括有中校阶级在内的日本陆军军官十多人与同盟会有关”等情况。

发动多次起义

被遣送出境的孙先生，偕同胡汉民等人于一九○七年三月离开日本，避往安南。

此后，清廷还是锲而不舍地要求日本政府彻底取缔同盟会。

所谓“间岛问题”

当时，中国和日本之间成为外交悬案的，有一个“间岛问题”。间岛是在韩国北面和中国东北地区（满洲）国境线——图门江上的三角洲，清廷以其为祖宗发祥之地，特别重视；而韩国方面移往间岛的人民也颇为不少，在中韩之间，一向就为了它的归属而有所争执。另一方面，在一九○五年设置了统监府，实际已经统治着韩国的日本，为了导致韩国国民感情对于日本有利，故在是年八月派遣了三百多名日军将间岛占领，并向清廷提出保有领事裁判权和警察权的要求；清廷不只予以拒绝，而且要求日本撤兵，双方形成对立。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清廷和美国之间缔结同盟关系的交涉。清廷鉴于东北地区被俄、日两国所霸占，故而意图和一向主张中国应采门户开放主义的美国接近。这个当口，碰巧正是日本又由于移民问题而和美国有所龃龉的时期；日本为了维持在东三省的独占态势，乃有阻止清廷和美国同盟的必要。

日本查禁民报

一九○八年十月，为协商同盟条约访问美国的清廷官员唐绍仪，归途就便经过日本，通过驻日公使馆要求日本政府查禁同盟会喉舌——民报；日本政府因而意图以此为折冲“间岛”、“清、美同盟”等问题的交换材料，俾能达到在外交交涉上于己有利，乃接受了唐绍仪的要求，着手弹压民报。十月十九日，警视总监龟井英三郎秉承内相平田东之助之命，下令将十月十日出刊的民报第二十四号没收，禁止发行。

禁止的理由，是这一号的第二十九页揭载有伯夔（本名汤增壁）的“革命之心理”一文，认为是鼓吹暗杀骚乱，影响社会治安。

黄兴、宋教仁以及当时的发行人兼编辑人章炳麟等人，乃请托宫崎寅藏为之提起诉讼，希望取消禁令，但结果败诉。

翌年，汪兆铭虽以在法国巴黎发行为名，实际还是在日本秘密印刷出版，不过只继续发行两期就停止了。

蒋总统为进入振武学校而第二度来到日本，就是在民报被禁止发行的一九○八年春季。也正是日本管制当局对于中国留学生开始采取严厉态度的时候。但蒋总统到日不久之后，便加入了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

再者，关于民报之被禁刊，在新加坡发行的同盟会机关报——“中兴日报”则于翌年（一九○九年）一月三十日登载有如下的报导：

“日本政府下令禁止民报出版之后，使曾经和同盟会有关的铁路技师高桥孝之助来民报发行所访问。高桥对章炳麟作了这样的辩解：

“高桥查禁民报并非日本政府本意，乃唐绍仪以之为间岛问题的诱饵而提出来的，日本是在外交政策上并非得已的。

“章然而这总是贵国政府的责任。

“高桥政治家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日本是新兴国家，外交方针还没有确定；日本政府虽然阻止民报发行，但是实际在赞助革命方面，却还没有其他国家能够比得上日本。”

至于“间岛问题”，其后在清廷和日本之间进行了所谓“六大悬案”的外交交涉中，于一九○九年九月，作为对满洲（东北）铁路问题的交换条件，由日方让步，签订了“间岛协约”。不过，间岛又和俄国领土邻接，为军事要冲；后来，日本复于一九二○年出兵间岛，再度引起纠纷。

抵达河内的孙先生，立即在甘必街六十一号设置了“同盟会机关部”。

这个机关部发动了以在是年五月为首的“潮州黄冈之役”（第三次起义），以及其后连续多次的革命行动。

潮州黄冈之役

一九○七年五月，由余既成、陈涌波领导，在广东省潮州饶平县黄冈举兵发难，革命军已经占领了黄冈，但受到清军的反攻而归于失败。

惠州七女湖之役（第四次起义）

同年六月，由邓子瑜在惠州附近的七女湖举义，但仍然失败。

钦廉防城之役（第五次起义）

九月，由王和顺等乘民众反对糖税和米价上涨的机会，在广东钦州的王光山起义，占领了廉州府的防城，但因武器补给不上而又失败。

镇南关之役（第六次起义）

十二月，由孙先生亲自指挥在广西镇南关起兵，革命军攻占了镇南关炮台，高悬青天白日旗，血战七日而终于失败。

此役之后，孙先生因法国政府接受了清廷的紧迫要求又被遣送出境，乃在东南亚各地奔波不定。但黄兴和胡汉民则仍然以安南为根据地，衔孙先生之命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钦廉上思之役（第七次起义）

翌年～～一九○八年三月，黄兴指挥两百多人，由安南国境向广东钦州挺进，事先曾和清军统领郭人漳约好倒戈响应革命军，但未能实现；以致革命军在占领了几十个村落之后，终于解散。

河口之役（第八次起义）

同年四月，革命军再由安南国境向云南河口进攻，清军管带黄元贞倒戈投顺，占领了河口炮台和南溪等地，但受到清军增援部队的压制，退入安南境内，被法军解除了武装。

日本民间志士

和日本政府公然表现出弹压同盟会的意图、并且逐渐加强严厉取缔程度所背道而驰的，是日本民间志士对于同盟会的援助协力日益密切。他们往来频繁，对孙先生在河内乃至在东2[186]416南亚所领导的第三次到第八次起义，为之购买武器，加入战斗，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其事。

一九○七年六月，第四次起义的惠州七女湖之役，孙先生由河内机关部致电平山周，要求援助武器和军费，其内容如左：

“两广义师已起，急需武器供给，日本义士如能援助，可电寄河内，用ＬＯＮＧＳＡＮＧ名收，同时电告ＣＨＡＮＴＵＮＧ（均为化名）。若助武器，可托三上船运来，得回电，再告授受之地。孙文。六月七日。”

继之于六月十四日再度发电：

“订购一万；先送枪二千，弹二百万发。”

然而，这一次的起义，已经在前一天失败收场。

委任宫崎寅藏筹资购械

对于宫崎寅藏，也于一九○七年九月寄给一封信提到“平山北（指平山周、北一辉）等不能保密而失败，不再信用这些人；关于在日本的运动，委托足下全权办理，请不必和本部（同盟会）商议”，并附寄有全权委任状如左：

中国革命同盟会总理孙文逸仙

委任宫崎寅藏君在日本全权办理筹资购械，接济革命军。所有与资主交涉条件，悉便宜行事。此委。

天运岁次丁未年（一九○七年）九月十三日

在寄给宫崎寅藏的这一封信中，并附有给日本宪政本党耆宿犬养毅的信，同时告诉宫崎“在日本之助力，以犬养君最为适宜，同封致犬养之函，请即转交，并望相与谋议。”

为协助调度武器而活动的另一位日本志士为萱野长知。此时，萱野在日本聚集大量武器，为运往广东而发生了“幸运丸事件”，这个事件，与犬养毅也有关系。

请托萱野采购军火

事件开端，是在这一年的春天，孙先生在河内请托来访的萱野长知代为采购武器弹药，计划秘密运送给在广东汕尾的革命军。

萱野回到日本之后，便接到了在香港的冯自由汇来一万元日币。得到宫崎寅藏、前田九二四郎（宫崎内弟）、三上丰夷（山下汽船）等人的协助，向大阪兵器商人采购到明治三十八年式村田步枪二千枝以及每枝附带子弹六百发合计一百二十万发，暨刺刀、革囊等类附属品；又有日本刀五十把，军官用指挥刀二十把，短枪三十枝，每枝子弹一百发。总计价款超过了一万日元，不足之数，由三上丰夷担保后付。在这个时候，犬养毅特地将他自己藏有的日本古刀三把赠给萱野，以壮行色。

犬养毅赠送军刀

据萱野长知手着的“中华民国革命秘笈”，犬养赠送了五十把日本刀。现在将这一段记述节录于后：

某日，萱野前往牛込区马场下町的犬养公馆，商谈受托购买武器之事，提到价款不敷，犬养表示军刀部分可以承担，但叮嘱小心不要让盯梢的特务警察发觉，可等深夜来取；因为当时萱野已被跟踪监视，于是乃在深夜溜出旅馆后门，坐上人力车，直奔犬养公馆。犬养自寓内后面房间里进出多次，搬出了大大小小五十把新刀古刀，指指点点地说明这是“关孙六”、这是“佑定”……萱野用毯子将之包裹起来，雇人力车运会旅馆，当晚加以包装，第二天，便载上开往神户的火车。

武器购妥之后，决定交给从门司出发的幸运丸轮船（二八○○吨）装运。幸运丸为和歌山县的藤冈幸十郎所有，由山下汽船租借。刚巧这条船被三井洋行雇用载运煤炭前往香港，乃由三上丰夷帮忙接恰将武器同船载去，并且由广东派遣海丰籍的陈二九等两人来日本担任领航的工作。

革命军方面，以许雪秋为在汕尾接受武器的总负责人，并指派许仙童、范妈鲁、林鹤松、李子伟等人到达当地担任接收的准备工作，其计划是预先调度二十艘大型渔船，在汕尾附近接受幸运丸交纳武器；革命军则在海岸附近待命，一俟武器到手，立即发难。

军火运抵汕尾海面

幸运丸于十月八日只将煤炭装载入舱，由门司出港，在港外六连岛附近避开海关的监视，由小汽艇运来武器转载上船，一路南下。萱野长知以及前田九二四郎、定平伍一（陆军上尉）、三原千寻（军人）、松方寿彦（军人）、金子克己（长崎东洋日之出新闻社长）等人随船同行。

幸运丸按照预定计划，于十二日黎明之前，驶达距离汕尾约十华里（约五公里半）的海面，这时是在第五次起义——钦廉防城之役失败之后的四星期左右。当时，照事先约定的联络方法，朝上陆地点用红色灯光发出信号，想不到却毫无回应。

许雪秋迟误了太久，等到插着白旗为信号的小船姗姗而来靠近幸运丸时，已经是上午十点钟。萱野通知他：“等到下午四点以前，接运的船只和人员如果还不能到来，幸运丸就得要撤离此地。”

可是，就在两小时之后，清廷方面的巡逻艇破浪疾驶而来，侦察情况。因为这个水域并不是港口，却有外国轮船久停不动，当然会感到可疑，而加以监视。

国父亲上前线

幸运丸船长深感不安，乃匆遽启航，开往香港。

在香港的胡汉民、冯自由等人和萱野协商结果，决定变更计划——将煤炭起卸上岸之后，遂即乘载革命军士兵五百人前往福建平海登陆，起兵发难。

然而，幸运丸的动态，在香港已经引起很盛的流言，传播开了。

香港政府根据来自清廷的紧急联络，照会日本领事馆——“幸运丸有载运违禁品嫌疑，应予扣留检查。”日本领事馆乃将港府意旨通知山下汽船驻港代理人，命令该轮船即刻离开香港；于是，托由幸运丸密运武器的行动，便徒劳无功，终归失败。并且连合法载运的煤炭都没有能够起卸，就离岸返航回到日本；武器等类，则被日本警察所没收。

接济军火屡遭挫折

七年前（一九○○年），第二次起义（惠州之役）时，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爽约；现在又发生幸运丸事件，日本民间志士先后所给予的援助，到最后都是遭遇到挫折而功亏一篑。

然而，孙先生还是不放弃从日本置办武器的打算，当幸运丸事件不久之后，再度致函萱野长知，指出失败责任在许雪秋，并且再度请托：“现时经济问题虽未解决，然欲商请为由日本运至澳门附近之海面，由他人请员（承包）转运至目的地；如此，则日船之再度运来，无何等危险，其事较易。今虽未商定何处之海面地点，为中途第一次接收之处，然望一得日本之消息，电知弟等，俾易于商量如何再求他举之计划。”

在“幸运丸事件”的四个月之后，又发生了所谓“辰丸事件”——日本密运武器的轮船第二辰丸，在澳门附近被清廷军舰逮捕，清廷提出抗议，但日本政府却指称侮辱了日本国旗，造成了对此愤慨的中国民众排日运动的开端。当时传说这一次的秘密运输也是同盟会所进行，但并非事实；不过，同盟会倒的确知道是澳门商人所为，曾经一度打算在海上掩袭第二辰丸，夺取这一批武器，后来为了避免因此造成和葡萄牙当局的磨擦而中止。

黄明堂夜袭镇南关

在这一年（一九○七年）十二月的第六次起义——镇南关之役，日本志士池亨吉等人参加了实际战争，孙先生本人也上了前线。

镇南关是广西省和安南国境的冲要所在，中法战争（一八八四～五年）时，曾经击退十万法军的攻势，其固若金汤的程度，有“东方第二旅顺”之称。

十二月一日的夜晚，黄明堂率领敢死队八十人，只带了四十二枝步枪，攀援绳索，越过巉岩绝壁，由要塞背后展开了奇袭，夺下了四个炮台，在河内机关部担任策划指挥的孙先生，即偕同黄兴、胡汉民等同盟会首脑及日本人池亨吉、法国协力者炮兵上尉狄氏男爵驰赴前线；此行，对于孙先生来说，是自一八九五年第一次起义由广州逃脱出来之后，历时十二年，才又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可是，在这些炮台上所储存的武器弹药，却比预料的要少得多，而且这些炮的方位都是朝向安南方面，背对中国国内，发挥不出对内作战的作用，因而被清廷派来约四千人的压制部队所包围。

孙先生在前线只待了两天，便回到河内，急于调度武器的补给；但此时据守炮台的革命军，在青天白日的旗帜之下，血战了七昼夜方始撤退。

池亨吉着实见记

在这次战役中，和孙先生同行参加的池亨吉，受孙先生的请托着有“支那革命实见记”，对于当时的详细情况有很明白的记载。直到今天，在中华民国还是被视为珍贵的史料，政府和中国国民党的正式纪录中，都曾经一再引用过。

国父在安南不能容身

在这次起义之后，孙先生被法国政府自安南遣送出境。事缘清廷派遣的密探，一直紧盯着孙先生的行踪，查出河内机关部所在地，清廷乃据以向法国提出外交交涉，要求驱逐出境；但是法国的安南总督对孙先生同情，特地派书记送孙先生前往西贡。

这样一来，孙先生既已在创立同盟会之地的日本被遣送出境，又在安南面临了不能容身的境遇。

本来，在法国政府方面对于孙先生是采取暗中支持的态度；当然，其意图是为了乘中国内乱，以攫取邻近安南的两广地区利权。不过这个意图有时和同样以侵略中国为目标的日本、英国会发生利害对立的情况，惹起了不止一次的事件。例如一九○六年所发生的武昌“日知会”之被弹压，就曾牵连到法国驻天津的武官和英国的海关人员。

日知会被弹压的前一年十月，孙先生在前往东南亚而经过上海吴淞港口的旅途中，受到法国驻天津部队参谋长布加卑的访问。布加卑告知孙先生，法国政府有支援中国革命的意向，并且约定由天津参谋部派遣武官七人协助调查、联络各省革命势力；孙先生接受了他的意见，于这一年的年底由同盟会派遣胡毅生、黎仲实等同志会同法国武官赴南京、南昌、广州、贵州各地从事调查。

日知会之被弹压，是发生在一九○六年六月第二次中法联合调查的时候。法国的天津驻军参谋部派遣武官欧极乐到达武昌，同盟会方面派乔义生予以协力，乔义生则系和吴昆、刘静庵、季雨霖等人常在设于武昌天主教圣公会内的日知会中，从事宣传革命的活动。

法国的态度

乔义生等同志，在日知会为欧极乐举行了欢迎会，并有潜伏在清廷新军内部的同志多人参加，欧极乐即席大事鼓吹革命。

不料，新军统制张彪、巡警道冯启钧派遣密探混入了这次聚会。湖广总督张之洞得到密探的报告之后，便委托在海关工作的某英国人尾随欧极乐之后，与其同船并对之亲近，在谈话中故示同情中国革命，欧极乐以其同为来自欧洲的英国人，因而对之疏与提防，此人乃得伺隙将其所携带的“革命情况调查纪录”偷走。

清廷抓到了法国的正规武官和革命运动有关联的证据之后，乃向驻北京的法国大使提出抗议。大使毫不知情，便向其本国政府请示如何处分布加卑（法国驻天津部队参谋长，欧极乐为其部属。请参阅前篇。）法国政府一度打算不理会这回事，但就在不久之后，法国内阁更迭，改变了原先的中国政策，因而令召布加卑归国。

因为发生了这一件事，清廷对于日知会加强监视，终于在翌年（一九○七年）一月搜查该会，没收党员名册。在新军中从事革命运动的同志朱子龙、胡锳、季雨霖等人被捕，日知会被封闭而瓦解。

在前述的国际关系之下，所以孙先生以河内机关部为据点，连续不断地在安南和中国国境附近发动起义，法国方面的国境警备部队，对于革命军不仅毫不加以干涉，甚至拍手欢迎；在安南发行的报纸，也对革命军有所称赞。

法国受清廷压力转变

然而，及至法国由于受到清廷的压力，将孙先生遣送出境之后，风向便稍稍转变。一九○八年四月，第八次起义的河口之役，将革命军六百人全体解除武装，并予拘留；不过，其处理方法还算是比较同情，特地包租了一条船，将他们统统送往新加坡。

这时，新加坡的英国当局认为革命军就是乱民，不准入境；但法国政府则主张“实际上已经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而说服了英国当他们为政治犯，准予入境。

国父对各国政策的批评

据池亨吉“支那革命实见记”引述孙先生于一九○八年二月八日的一封信（原文为英文），大致批评日、英、法三国的中国政策如左：

“听说清廷畏惧英国是最强最硬的国家，敬佩法国是强而多智的国家，轻视日本是很好对付、很好哄骗的国家。其理由则相当滑稽——因为英国政府顽固地拒绝清廷要求，以亡命客待我（孙先生）而加以保护，所以是强国。法国最初也是加以拒绝，但慢慢地向清廷索取很大的报酬，作为交换条件，才接受清廷的要求，玩弄着强而多智的外交手段。至于日本则唯唯诺诺，听到清廷一句话，就望风辟易，遣送我出境。日本的外交手段拙劣，政府当局愚昧，其军力强大的程度也还不足畏惧……清廷就是把日、英、法三个强国作了这样的比较。”

当时，在日本和英国之间，一方面基于牵制俄国的策略，一方面基于互相承认日本对韩国的权益和英国对印度的权益，而缔结了攻守同盟，维持着友好关系。

在日本和法国方面，虽然也由于签订有日法协约，而彼此承认尊重对方在亚洲的权益；但是急于要独占安南和在两广地区培植势力的法国，则不声不响地对日本存有戒心。当第八次起义的河口之役时，革命军总司令黄兴就曾在安南被误认为是日本人，以有煽动安南人的嫌疑而遭逮捕。

在“支那革命实见记”中，也曾提到当时日法关系的一个小故事。著者池亨吉随同孙先生在前往镇南关途中，同行的法国上尉狄氏男爵，曾经一再地发问：“日本是不是会乘中国革命的混乱情势，和在国境邻接之安南的法国制造事端，而要将法国从安南赶出去？我们虽然还只不过是听到很多像这样的流言，但如果此话当真，则日本可实在是极其阴险恶毒的敌人……”

池亨吉并且指出当时在安南法国人的对日感情是：“用猜疑的目光，注视着日本人的一举一动。日俄战争之后，法国人的神精极端敏锐，已不仅是喊出‘黄祸论’；尤其是近年来日本人在重庆府（安南北部）开始种植赛璐珞原料樟木以来，因恐惧日本侵略而显著地表现出厌恶的态度。”

自河内被遣送出境的孙先生，到了新加坡，暂时安顿下来；可是清廷又在策划将他赶走，所以命令驻新加坡领事和英国提督交涉，不过那位提督并未加以理睬，而准许孙先生居留下去。

国父致力扩大组织

当一九○八年四月第八次起义失败之后，革命军的行动暂时休止，孙先生则致力于在东南亚的扩大组织工作；同年秋季，在新加坡设立同盟会南洋支部，派胡汉民为支部长，统辖东南亚的联络活动。这时在东南亚已有二十个分会，同志达到三千人。

其后，孙先生历游吉隆坡、庇能、曼谷等地；但在曼谷又因清廷的要求而被暹罗政府禁止政治性的演说，并限于一星期内出境；此时，由于美国驻暹罗大使的斡旋，得以延长居留期限，在曼谷组成同盟会暹罗分会。

以新加坡为中心的活动，经过了一年多之后，孙先生于一九○九年五月其行旌又复指向欧洲。

再赴欧美活动

孙先生到欧洲的目的，是要在各地筹募革命经费。由于接连不断的起义失败，同盟会的财政极其穷困，连筹措旅费也并非容易；孙先生住的旅馆都是单间的小房间，而且到了衣服也要自己洗涤的景况。

在法磋商借款未成

一九○九年六月到十月，待在法、英两国，看不出有多大希望，乃渡越大西洋转往美国。在旅欧期间，虽曾得到法国前任安南总督的协助而和某实业家磋商钜额借款，已经到了快要达成协议的阶段；但因支持中国革命的法国克里孟梭内阁倒台，遂得不到其政府的核准而前功尽弃。

孙先生抵达美国之后，赓续在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地组成同盟会支部，檀香山的兴中会也改组为同盟会。相对地，清廷的妨碍工作也非常厉害，驻旧金山总领事许炳榛所派的密探，潜入孙先生寄住的旅馆房间，意图将皮包中的秘密文件盗走；还有，驻美公使张荫棠则秉承清廷之命向美国政府交涉驱逐孙先生出境，但被美国当局所拒绝。

孙先生在这次旅美期间，第一次使用了“中华革命党”的名词；表面上还是同盟会会员，但实则自此之后多以党员相称。不过“中华革命党”却是到了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才在东京正式组成。

检讨过去失败因素

在这个时期，对于过去革命失败的因素，也作了反省、检讨。结果决定暂行中止长江流域及华南地区准备未周的起义，等到蓄积了实力之后，再一鼓作气发动大规模的行动，以及将在美国训练的军官若干人送往当地，加强军事力量。此外，为了向纽约财团借贷革命必需经费三百五十万美元，特委任一向同情中国革命的美国军事研究家波司为同盟会的“国外财务代办人”。

第九次起义失败

这一段期间中，中国国内在一九一○年二月发动了第九次起义——“广州新军之役”。这次的行动，是潜伏在新军内部的革命分子和警察之间因偶然的冲突而爆发，革命军的支援未能及时衔接得上，以致失败。

再者，汪兆铭、黄复生对于清廷宣统皇帝（溥仪）的摄政——醇亲王载沣暗杀未遂事件，也是在这一年的四月发生。汪兆铭潜入北京宣武门外开设“守真照相馆”，作为根据地，制造地雷，打算装置在醇亲王马车所必经的桥下，将其炸死。但因为引火用的电线不够，于半夜再往重新埋设，不料被野犬穷吠不舍，惊觉附近居民，汪兆铭因而被捕，判处终身监禁，到辛亥革命后才获释放。

日本政府当时对于已经成为被国际监视的人物——孙先生，派有密探在檀香山跟纵，调查其动态，这是由于预料到孙先生由欧洲经美国必然会再回到日本来。而日本方面，则是在三年之前因清廷的压力，将孙先生遣送出境，前往檀香山的。

日本驻火奴鲁鲁总领事上野习一于一九一○年四月九日以机密第二十二号文书向外相小村寿太郎报告如下：

“被称为清国革命派首领的孙逸仙，由旧金山乘高丽号轮船于上月二十八日抵达本地。现住学院街，受到清国人的欢迎，鼓吹革命思想。由于孙某本是当地出生的关系，故在部分清国人之中一向拥有势力。本月五日，在支那人剧场所举行的欢迎演说会，到有约二千听众；明天（十日）将在原址再度举行公开演说会……据探悉：孙某此次来到檀岛的直接目的，是在向志同道合的人筹集捐款；在本地居留数周之后，将会去温哥华、西雅图方面，向清国人之间游说……”

国父使用化名赴日

然而，孙先生实则自始就是以回到日本为目的。在此之前，当甫抵美国之后，就已经寄信给在东京的黄兴说“如果化名来日，日本政府能否默认，请为打探实情”；又在自檀香山动身之前，对池亨吉也曾有过同样的请托，池亨吉已经代为向日本外务省提出准予入境的交涉。

孙先生自檀香山乘蒙古号轮船于一九一○年六月十日抵达横滨。横滨水上警察署派主管警官登上在检疫锚地停泊的轮船，调查船内状况时，认明孙先生业已随船到达。

当孙先生尚在美国活动的一月间，日本政府就已经接到清廷引渡孙先生的要求。

另据神奈川县知事周布公平于六月十一日以神高秘字第九七○号文书向外相小村寿太郎报告当时的情况是“……登船调查结果，认为在一登客舱登记为艾斯高野的乘客必然是孙逸仙，经监视其举动，及至轮船拢岸，在西边海关码头上陆……”此时，警检人员例行查询，孙先生坦承“艾斯高野”为假托的姓名；于是，水上警察署长乃以私人立场对孙先生说：为你本身考虑，登陆并非相宜，而力劝回船；但孙先生则答称：“为了要让孩子在东京读书，打算立即通知在香港的妻子来此。”而恳请准予暂时停留。结果，水上警察署长乃作了一个很妙的决定：“以孙逸仙的身分不能认可；如果为艾斯高野则允许逗留。”并准予逗留到开往新加坡的轮船启碇出发时为止。

清廷方面，也已经得知孙先生来到，乃向日本外务省要求驱逐出境并引渡归国；日本方面暂时诿称“不知道有这么回事”，而予以拒绝；然后举行内阁会议协商对策，在阁议中，陆军大臣寺内正毅的同情论获得通过，决定暂时默认孙先生在日本逗留。

筹划十次起义

孙先生为了躲避清廷密探盯梢，在横滨只住了一晚，便寄居到东京小石川区原町三十一番地宫崎寅藏家中，姓名又变为“ＡＲＡＢＡ博士”。这一次的旅程，是和长兄德彰同行，德彰在檀香山所有的资产，都已经为革命运动耗费罄尽，此行是前往香港，途经日本。

宫崎夫人所述窘况

据宫崎寅藏夫人后来于一九二九年在东京每夕新闻所口述的连载文章——“支那革命的追忆”中，提到过孙先生当时的景况，现在节录于后：

“孙先生脱下了汗渍斑斑的高领西服，换上带来的浴衣，那还是我在五年前把自己的和服送进当铺，才替他缝制的，已经洗到变了颜色。孙先生想必很贫穷，我们也很贫穷，为了接待远来的客人，虽想烧点洗澡水给他洗尘，但却没有煤炭或柴草，只得叫孩子们到隔壁空房子里检得一些木片来，才烧热了一点水。在那个时候，有位常常来访的小石川富坂警署高等刑警北村利吉，他后来看到我们贫困的景况，于心不忍，每次来时，都会提来一点茶叶，我们家里来了客人是连茶都端不出来的。过了十天左右，富坂警署的部长前田佐门和北村刑警一起拿了遣送孙先生出境的命令来到我家……”

蒋总统和孙先生的最初见面，就是在这一段时期。据当时日本警察当局所纪录下来和孙先生见过面的人，在六月十七日只有萱野长知、池亨吉、清国革命党员何天炯、谭立人、服部某、柳某、杨某等七人（向外务省提出的乙秘字第一一五四号报告）。如果这个报告正确，则蒋总统和孙先生的见面，应该是在自六月十八日到孙先生二十五日离开日本为止的几天之间。不过，在中国和日本双方面的资料中都没有确定的记载。

清廷又向日提出要求

孙先生当初预定在日本停留三个月左右，但由于被清廷方面查出了寄居的地点，代理驻日公使吴振麟向外务省提出“不应准许孙文居留”的要求，外相小村寿太郎终于唯恐酿成外交问题，遂促请孙先生出境。孙先生在日本只待了十五天乃决心离去，而于六月二十五日前往新加坡。

清廷的情报活动，也做得很积极。日本警视厅于六月十三日以乙秘字第一一三六号向外务省提出的报告中也曾提到：“有清廷间谍嫌疑的孙竹潭其人，曾到宫崎寅藏家中访问，但被拒绝见面。”

在槟榔屿会商大计

孙先生由新加坡前往庇能（槟榔屿），集合党的首脑黄兴、赵声、胡汉民、孙德彰、邓泽如等人举行会议，决定了第十次起义——“黄花冈之役”（一九一一年四月）的计划。需要经费十万元，首次以五百人在广州发难，占领广州之后，由黄兴率领一军出湖南，趋湖北；赵声率领一军进入江西，指向南京。是一个大规模的行动计划。这是最后一次失败的起义，继此之后的第十一次革命行动——“武昌首义”，也就是“辛亥革命”，才得成功。

国父亦不见容于马来

不料，第十次起义的筹划工作正进行到半途，孙先生又面临了被马来亚联邦遣送出境的窘况。这是由于孙先生在演说中有一段批评英国东南亚政策的话，被指为“扰乱马来亚治安”。到了这步田地，在亚洲已经是没有了孙先生的容身之处。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筹款的需要，于是，孙先生乃又走上去欧洲转美国的征途。翌年七月，在美国组成革命团体——“洪门会”，并设立了在美筹款机关——“洪门筹饷局”。孙先生有感于因清廷的干涉一再遭遇放逐，乃于一九一一年七月十六日对日本志士宗方小太郎发出“我视日本无异第二母邦，然而……”的书信，其大略如左：

“……去年（一九一○年）六月，亲回日本，欲有所献议于贵国在野人士，以联两国民党之交，提携共图亚东之进步。乃甫抵江户（东京），则为贵国政府所挠，不克久居，有志未果，不胜浩叹！在远方欧美各国，我革命党已陆续设立机关部，得多数人之理解；但却不能为贵国政府所同情，此为弟每念而不能自安者也。深望结合所识名士，发起提倡日本、支那人民之联络，启导贵国之舆论，游说贵国之政府，使表同情于支那革命事业，幸为图之。”（译注）

日本友人的真心期望

对于中国的革命运动，日本政府态度另当别论；实则日本民间人士乃至于政、财、军界等个人性质的援助，的确很大。孙先生期待于这些人能够影响日本政府，然而日本政府却一向不加理睬，不仅对于革命的冷淡反应毫未改变，而且就在其后不久的“辛亥革命”时，甚至还在打算施展出积极妨碍革命军的策略。

在这里得顺便提到一些有关情况～～一九七一年，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整理了一分援助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名册，总数二百三十二人，其中有参加革命，流血于中国大地的先烈，也有匿名捐献钜金的人士。

这些友人们，是真心地期望着中国和日本永远友好；然而，他们的努力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奢望之下，终于成为泡影！其后，中日两国所经历的艰难过程，无待回头细数，的确不能不说是一条非常不幸的道路。

译注：按国父致宗方小太郎之函，中间一段自“不胜浩叹”之下到“此为弟每念而不能自安者也”之上，产经新闻为便于日本读者阅读而将之节译，言简意赅。兹回译为中文，为供我国读者得窥全豹计，特照录此段原文于下：“……不胜浩叹！弟既不能居留贵国，不得已远适欧美，以联络欧美之人士，并结合其舆情，故特设支那革命党机关部于美国之三藩市（旧金山）、芝加哥、纽约等地；并欧洲之伦敦、巴黎、柏林及布鲁塞尔等处。自各机关部设立以来，日与彼都人士往还，彼都人士之知支那实情者日多，而渐表同情于是举者，亦大有人矣！他日革命一起，可保必无藉端干涉者矣！此有吾人外交上之得手者也。然独有所憾者，则尚未得贵国政府之同情，此为弟每念而不能自安者也……。”

总统在日入伍

现在将历史舞台转移到日本新泻县高田町（现名上越市）。

一九一○年的十二月，已经面临了白雪漫漫的季节。

‘我（蒋总统）在二十四岁，就派到日本野炮兵联队，入伍了一年。这一年的中间，所过的完全是士兵生活。’（注一）

蒋总统从留学的振武学校毕业，以“士官候补生”身分，分发到驻屯高田的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联队长飞松宽吾）入吾，十二月五日报到。多年盼望着实际参加日本陆军学习的时刻终于到来，而且如愿以偿地配属在野炮兵联队。

分发到第十三师团的留学生，是振武学校第十一期的全体六十二人；不过，在野炮兵第十九联队入伍的只有十六人，其余则分别进入了骑兵第十七联队、步兵第五十八联队等七个部队。

高田市史的记载

根据后来在一九五八年所编纂的“高田市史”记载，蒋总统等一行清国留学生于十二月四日穿着卡其制服乘二等火车到达高田车站，在上职人町的三友旅馆住宿一晚，第二天（五日）分别向各队报到入伍。

又据十二月六日“高田新闻”标题“清国学生入队”的报导之中，提到野炮兵第十九联队的入伍状况如左：

“上午九时许，由须藤少尉率领入伍，接受体格检查，并即编入第三中队六名、第四五中队各五名。

“伙食方面，和骑兵队一样，给予特别待遇。（骑兵队的伙食，是在一般士兵的食品之外，每人给予适合于中国人胃口的副食一盘。）

“当天午饭后，由飞松联队长恳切训话。”

“正因为是被分发到野炮兵部队的入伍者，所以看来体格都非常良好，除其中一人病后体弱外，没有带着病患的人；其姓名及身高、体重纪录如左：

“四川张群——五三九尺（一六三三公分），一五六六○贯（五八七公斤）。

“浙江蒋志清——五五九尺（一六九四公分），一五七八○贯（五九二公斤）。（志清为蒋总统学名）”

当时的高田町，对于清国的留学生全体分发在以高田为基地的第十三师团入伍，引为非常的荣誉，曾经指导居民对他们不要表现出腼腆的态度。

影响一生革命意志

在兵营中的生活固然非常严格；不过，实际体验的收获，的确很大。

‘纪律的拘束，和生活的单调、干燥无味，使我当时感觉得太不合理了。但是我今天回忆起来，我生平生活之能够简单、工作之能够有恒，四十年如一日，确是由于这一年士兵生活的训练所奠立的基础。我以为我一生革命的意志和精神，能有今日这样的坚忍，不怕一切，亦完全是受这一年士兵生活的影响。如果我没有这一年当兵的经历，不受过那样士兵的生活，我相信我或许不会有今天这样的革命事业。’（注二）

感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立国精神，接触到和武士道精神相通的生活，就是在这些地方；所以后来提到过对日本的认识是：‘我从前向慕日本的传统精神，亦爱日本的民族性，日本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注三）就是在这个时期所体察到的。

‘我进了日本联队以后的生活情形，绝对不是我们国内一般青年学子所能想像得到的。

二等兵的生活

‘当时我们入伍以后，是在联队里面当一个二等兵。日本新兵入伍，大概都是在冬季，而我们入伍的地点，是在高田。高田是在相近北海道的一个新泻县所管辖的村镇。这一带地方，天气严寒，每年冬季总下着很厚的大雪；这样大雪，在我国塞北，亦是很少看到的。

‘但无论他天气如何寒冷，无论他雪下得怎样大，我们每天早晨五点钟以前就得起床；起床之后，就得自己拿着面盆，到井旁提水来洗脸。’（注四）

‘我少年时的体格就不好。在高田联队入伍的时候，自己才加意锻炼，在雪很厚的地方，2[215]445我自己用雪满身洗擦，或是用冷水——这样洗澡刻苦锻炼，后来身体才能够慢慢强健起来。我根据自己的经验，就可以断言；好的身体，天生成的只有三分，其余七分全靠锻炼。’（注五）

高田以大雪闻名

蒋总统指新泻县相近北海道，大概是基于大陆性的地理感觉。不过，高田是位于日本海方面有名的豪雪地带，在积雪覆盖之下，整个的镇市都会看不出来。甚至传说那里竖立有一个牌子——“在这下面就是高田”。

清国留学生们对于大雪惊奇的情形，“高田新闻”也曾有过报导——“向他们详细说明豪雪的情况时，他们更加表现出大为惊讶的神色。正因为他们的家乡也并不是不下雪，所以对于像高田这样的大雪感到惊异，才是有理由的。还有，他们觉得此地的寒冷程度也是出乎意料之外。”

此外，日本的第十三师团设置于高田，是在蒋总统入伍的两年之前～～一九○八年。自那时以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高田以被称“军都”为荣。很多军事设施的旧址，现在还是为日本自卫队所继续管理使用。

注一：蒋总统—“对青年远征军退伍士兵训词”（一九四六四）

注二：蒋总统—（同右）

注三：蒋总统—“接见外籍记者谈话”（一九七○一）

注四：蒋总统—“对从军学生训话”（一九四四一）

注五：蒋总统—“合作人员的革命责任”（一九三三九）

从驾驭军马学起

当时的第十三师团长为长冈外史（注一），野炮兵第十九联队长为飞松宽吾，负责直接指导留学生的是陆军上尉小山田三郎。他们在训练和纪律方面督教綦严，毫不宽容姑息；但日常的接触，则相当和融。

长冈师团长的回忆

在那个时候的蒋总统，并不怎么引人注意。据师团长长冈外史后来回忆：“留学时代的蒋君，才能胆略，内蕴不露，说不出有出人头地的表现。”长冈外史对于蒋总统的重新评价，是在一九二七年。当时，蒋总统已经出任了统一全中国任务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因对共产党问题而下野，来日本访问。

这时，长冈与他见面，感到和以前大不相同——“英姿焕发，像是一个青年外交官”。蒋总统对于长冈外史仍旧和以往一样尊称“师团长阁下”，并且亲自挥毫写出“不负师教”四字。长冈外史的评论是“像蒋君这样不忘恩义的人，实在是非常难得。在日本留学时代，未见放射任何异彩；而今天跻于这样的地位，就是基于这种茁长自心地上的美德。我对于不忘恩义的蒋君，怀有无限的尊敬。”

还有，长冈外史的长女朝吹矶子（现年八十四岁）在她所著的“八十岁生涯”中，对于当时的印象，也有如下的纪述：

“来原宿（长冈东京住宅的所在地）访问的客人，使我留有清晰记忆的是蒋介石，他曾受家父在高田任师团长时代的薰陶。他于一九二七年来日，到父亲家里拜候，我正好也在原宿家中，他写字时，我替他研墨，在绢纸上写了‘不负师教’。欢谈了一些时间归去。”

一天要做两次擦马

在野炮兵时代的重要日课之一，是照料军马。野炮兵战斗能力的优劣，在于机动性；这也就是说，要看如何能够迅速地将战炮运送到目的地为定；而在那个时代的战炮，是要靠军马来搬运的。然而在中国，一般人平时和马接触的机会不多，所以必须要从驾驭和照料军马的初步知识学起。

‘我们（蒋总统）洗了脸之后，官长就带领我们进到马厩去擦马，要从马蹄、马腿擦到马背，经过马背擦到马头、马尾；这马的每一个关节、每一部肌肉，都要用禾草来尽力的磨擦。这样大概经过一小时，将马的浑身擦热了，马的血脉流通了，而我们的本身，亦因用劲擦马，虽在这样冷天，不仅不觉得寒冻，而且身上和手足都发热，有时候还要流汗。

‘这是我生平最大的学业。到如今仍觉以苦为乐、不畏艰险的精神，自认为完全得力于此。

‘等到马擦完了之后，再将它牵到厩外雪地里马槽去饮水和喂料。等到马喂好了，我们自己才能回营房去吃早饭。到了傍晚，再要同样的到马厩去擦马一次，然后才吃晚饭。’（注二）

据一九一○年十二月六日“高田新闻”以“初次驭马”为标题，作了如下的报导：

“他们（清国留学生）在振武学堂的时候，固然大致钻研了一些军事学，可是就连进入骑兵队的学生在内，没有一个娴熟驭马的人，因此之故，他们全体在目前都得要有忍耐的决心；”

提到了马，蒋总统有一个不愉快的童年回忆，就是在十三岁的时候，因挑弄马而被咬倒，受了重伤。这一次的经验，倒是在学习照料马匹方面的一个教训，因为马是绝对不能任性驱策，而是要加以爱护的动物。

爱护骡马的道理

‘我常常看见骡马在路边停息的时候，所有驮载仍旧压在它的背上，不替它卸下来；这在外国就不然，他们的骡马走了一段距离的路程，就要卸下驮载，且必放松肚带，让它休息，恢复它的疲劳……所以人家的骡马走一星期的路程不觉得疲劳，而我们的骡马只走一天路程就要倒下来；人家骡马用上一年二年不会生病，我们的骡马用不到一月就病倒了……爱护骡马和爱护士兵，实在是同样的重要！’（注三）

马的问题，也就是一个国家国力的测量器：

‘我在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再往日本考察的时候，日本所产的马匹还是很矮小；但是到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我再到日本，相差不过十五年，而日本全国的马匹都高大起来了！不仅马匹如此，所有的牲畜，都比从前精壮。我们如果能改良牲畜，发动兽力，来推进生产事业，就不知道可以发生多大的力量。’（注四）

注一：长冈外史（一八五八～～一九三三年）日本山口县人，陆军中将。甲午战争时任大岛混成旅团参谋，日俄战争时任大本营参谋次长。其后历任第十三、十六师团长。有“胡子将军”之称。退役后，曾当选国会议员，并为日本“国民飞行会长”，推动航空事业的开创发展。

注二：蒋总统—“对从军学生训话”（一九四四一）

注三：蒋总统—“兴隆山军事会报训词”（一九四二八）

注四：蒋总统—“战时内政要务和各级政府办事的要领”（一九四一十二）

军事教育要诀

以“粗粝”著称的日本军队伙食，在质和量两方面，都是中国留学生们所未曾经验过的。但说起来，这也就是军事训练的一部分。

‘日本军队里面，每人每餐规定只许吃一中碗米饭，每星期要吃几餐麦饭。

‘饭的上面，有时是三片咸萝卜，有时是一块咸鱼，只有星期日才能吃到一点豆腐青菜和肉片；无论你吃得饱，吃不饱，每人的饭菜就只有限定的这一点。我在入伍最初的半月之内，这点饭实在是吃不饱，肚子里常常觉得饥饿；白天毫无办法，只有到了晚上才能到军营里的酒保—俱乐部—买饼干来充饥。但是饼干也有定量限制，不能任意购买的，每次最多是两三片，而且去迟了还买不到，饼干的质料又非常粗糙，在平时我们在家庭与学堂里是不要吃的，但在饥饿之余，吃起来就觉得津津有味了。

‘这种生活过到两周之后，就渐渐成了习惯；到了第三星期，虽不到酒保去购买饼干，也就不觉得饥饿了。’（注一）

三一洋食店

在“高田市史”中，也提到了伙食问题。据说：清国留学生不大爱吃鱼，因此，在部队里常会给他们吃点肉；还有，日本士兵虽然吃麦饭，但对于清国留学生则让他们吃米饭，特别加以照顾。每到礼拜天，则由长官率领他们到市内的三友旅馆或三一洋食店，让他们吃点油重的菜肴，安慰他们寂寞的心情。

当时三一洋食店经营者渡边长五郎的长女（现年七十八岁）到今天还记得蒋总统等清国留学生的一些情况，最近谈到她的回忆如左：

每到礼拜天，多数清国的士兵们来到店里，常常带来食油和面粉，自己做菜，像煎炒一类的料理，的确是手艺满高明，我非常佩服。问起他们“怎么会这样能干？”有一位答复我说“我们的国家太大，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会发生内乱，所以要学会自己能够做菜。”

在他们爽朗喧闹的一群人之中，蒋介石总统却有点不同，他很少开口，给予人以一种坚毅的印象。记得他好像画了一幅石兰，并且题了款，说是要赠送给长官。

节制饮食有益身体

习惯于粗粝、食不过量，对身体健康非常有益，更是一种新的知识，这也是在高田时代亲身所受的教育中体认得来——

‘我们一般留学生，原先在振武学校读书的时候，吃饭并无规定，普通人总要吃三、四碗。到了联队里，突然要减少食量，大家岂不是要饿肚吗？事实上在初入伍的时候，大家也都感觉吃得不够，但到了一个月之后，习惯成自然，就都不感觉不足了。而且他们一般士兵，体格非常强健，卫生上并没有发生什么缺陷。这个限制食量的办法，从前我们云南讲武堂也曾试行过，据他们调查的结果，在食量没有限制之前，学生患病的很多；等到食量限制经过三个月之后，患病的人数反而没有了。由此可知我们中国人的患病，多半是由于饮食没有节制，吃得太饱的缘故。外国人吃饭，都是说要吃够，没有听说要吃饱。’（注二）

这是当中日战争正酣、军粮补给问题严重的时候，晓谕军人们的一段谈话；因为节制饮食也就是对于事物的一种忍耐工夫，并且和社会教育、精神教育有其共通性。

精神教育细处做起

在日本军队里的精神教育是极其严格的；兵营内的规律，及于日常生活的每一角度，都充满了紧张感。

‘军队长官检查寝室讲堂的时候，一进门，必先察看室内的四角，是否整洁；再看门的背面有无尘土，并且带了白手套在门的横木上擦拭，如手套沾上尘埃，即是内务整洁尚未作到实在，必须重新作过。

‘其次再检查痰盂，不仅要察看其是否清洁，而且连到痰盂中所盛的水量都要求合乎规定——限定其容积量三分之一，这种常识是他们一般学生士兵人人都知道的，也是人人都能按此切实作到的。

‘这些事情，一般人看起来以为无关宏旨，我看这就是日本军事教育成功要诀之所在。他们施教，凡是越细微、越容易为人所忽略的事情，越加注意。对于细微易忽之处尚且如此，2[227]457则其他一切教育办事之精神贯注，认真务实，就可想而知了。

‘过去我们举行清洁检查，检查官照例只到房中看看，而对于屋角四周，全不注意，所以一般营房宿舍，表面虽然整洁，但实际一切黑暗隐蔽之处，完全成了藏垢纳污之所，试问这种教育，怎么能达成建军的目的？’（注三）

注一：蒋总统—“对从军学生训话”（一九四四一）

注二：蒋总统—“兴隆山军事会报训词”（一九四二八）

注三：蒋总统—“军事教育的要务”（一九四○十）

日本人刻苦勤俭

像这样在日本军队生活的教训中所得到的收获，是很大的。为了要能在中日战争时战胜日军，无论在行动、精神、生活各方面，都要做到以能够超越日军的程度为目标。

一般说来，军队所具备的应有型态，是汇集了一个民族的特性；在日本军队中的阅历，也就是对于日本民族的体察。

2[228]458‘日本人虽然口里没有提出“礼义廉耻”来讲，但是无论吃饭、穿衣、住房子、走路以及一切行动，在有形无形之中都合乎礼义廉耻。他们以这样的教育几十年教下来，然后才造成今日这样富强的国家。我们现在（一九三四年）要建立新的国家，要报仇雪耻，不要讲什么强大的武力，就只看在衣食住行上能不能做到日本人那个样子。

早晚一定洗冷水脸

‘我只举一两件极小的事情来说：

‘日本人全国上下无论什么人，早晚一定洗冷水脸，全国已为一种普遍的习惯；如果有人不如此，旁的人一定目为野蛮，不爱国。常常洗冷水脸，可以使人精神奋发，头脑清醒，又可以使人皮肤强健，不受风寒；还有最要紧的，不致耽误时间。所以这个习惯，事情虽小，益处却极大。所以日本人全国如此。

‘试问我们中国，无论是军队里、学校里、家庭里，有几个人能终年用冷水洗脸？普通那一个不是非热水不洗脸……

‘我们和日本人不必在枪林弹雨之下来冲锋陷阵，就只对日常生活比一比，就可以晓得高低强弱。

‘所以我们要复兴民族，报仇雪耻，不必讲什么枪炮，就先讲洗冷水脸；如果这一件最小的事也不能胜过日本人，其他的讲什么……我从小以来每天第一次洗脸一定用冷水，这并不是我自己要宣传……

一般人每天吃冷饭

‘日本人除洗冷水脸之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普通一般人每天都吃冷饭。普通比较富裕的人家，早晚烧两次饭；穷的人家，就只早晨烧一次，日中出去工作，就带一包冷饭。

‘这些生活习惯，是什么？这就是最基本的军事训练与军事行动。他们从小在家庭里就养成这种刻苦耐劳的习惯，就是一切生活早已军事化了，所以他们的兵能够强。

‘不然，打仗的时候，你要等水烧热以后来洗脸，又要等饭烧热再吃，敌人已经对你包围，还了得吗？’（注一）

治军如治家

更进一步来说，当时日本是“治军如治家一样”，民间一般生活和军队生活比较，在质的方面是没有什么差异的。

‘日本的部队在平时，真是一钱当作二钱用，一时当作二时用，一套服装要穿到三、四年，团长、连长如果看到士兵的衣服有一点破绽，立刻就要他们补好；房屋有一点渗漏，立刻就要修理——可见他们治军，真是如治家一样，何等省俭……

‘在日本联队，士兵星期日出外的服装，一定要到当天吃过早饭才许换上；傍晚归队之后，联队长就来催大家立即脱下收存，惟恐穿着吃晚饭污坏了，这是何等节约，何等惜物！

‘从前我们家庭里面，也是这样，外出的衣服，母亲决不许我们在家里轻易的穿着。可见无论治军治家，第一要注重节俭。大家如果能养成这种美德，那不仅在军队里面可以作一个好的军官，就是将来回到家庭，也可以作一个好的家长！’（注二）

废物利用的习惯

‘日本原来是很小很穷的国家，人口不及我们，力量不及我们，财富更加不及我们，但是何以在很短时间就能有今日之富强呢？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一般国民无论男女老幼都有“废物利用”的习惯。

‘日本人小学教科书中，特别有一课，就是讲“废物利用”。所以日本人无论那一个，统统有这四个字在脑筋里；一件东西坏了，他们随时随地还能想法子利用，所以他们国家能够一天天富强起来……

‘日本人拿“废物利用”的本领，把我们台湾、琉球、东四省都可以侵占去，而我们中国人还睡在鼓里，不知道是什么道理。他们那样小那样穷的国家，因为能利用废物，只有五十年工夫就能如今日之富强。如果我们中国个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我相信只要十年工夫，一定可以比今日的日本还要富强！所以能够刻苦忍耐、能够在“废物利用”四个字上用功，我们就可以兴家、立国！’（注三）

注一：蒋总统—“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一九三四二）

注二：蒋总统—“兴隆山军事会报训词”（一九四二八）

注三：蒋总统—“合作人员的革命责任”（一九三三九）

体验军事教育

蒋总统到高田野炮兵第十九联队入伍的一九一○年，是在日俄战后的第五年，正当日本军队矜夸隆盛的时代。凭藉军事力量的日本，越发显露出侵略中国大陆的野心。她在这一年的七月，和俄国缔结了划分东三省利权分界线的第二次日俄秘密协定；八月，签订了“韩国并合条约”（此时韩国又改称朝鲜）。

于是，在日本军队中受训的中国留学生们所特别关心的一点，当然就是在探索日本军队致于强盛的秘密所在。

‘过去在日本学习军事的留学生们，千方百计想去发现他们的秘密；有人在日本的图书馆里找到一部“巴尔克战术”，就以为是无上的珍宝，最大的秘密；殊不知“巴尔克战术”在德国是早已公开了的一种战术论着，而日本军事教育的秘密并不在此。’（注一）

军队就是完整的社会

日本军队之所以强盛，一如前面已经谈到过，就是在于其基本精神；假定特地要指出他们有什么秘密的话，那就是日常生活所不可缺略的一切事务，都可以由士兵们自己担当起来，而不须要假手于外人——炊事固然不用说，就连理发、洗濯甚至于营舍设备以及装备机械之修理等等，都包括在军队本身的权能范围之内。军队这个组织，可以说就是一个在运行着的完整的社会。

下级干部居枢要地位

因此，其所以能够达成重大任务的条件，乃在于由上而下的组织所具备的应有机能；而在这个组织之中，其下级干部则居于枢要地位。

‘日本士兵的小动作，都由班长负责来训练，所以他们军队的基础是班长。班长是职业军人，并不退伍，所以军历较深。

‘其实外国的军队通常都最注重下级干部的训练。军队重要的技术和动作，都由营、连长召集下士，切实讲授，然后要他们去管理和教练士兵。他们对班长所讲习的动作和业务，都不教外国学生，以致许多留日学生不明白她真正秘密之所在。’（注二）

横暴行为成为弱点

不过，像这样强盛的秘密，实则也就是他的弱点之一；这一点，也是在日本军队生活中所得来的教训。譬如说：上级对于下级在维持规律和实施训练的名义之下，所表现的横暴行为。

‘在进入联队的当时，我只是一个二等兵。二等兵之上，就是上等兵；上等兵之上，有下士，有中士，有曹长，有特务长，特务长之上才是正式的军官。这许多军官士曹，一级一级的管着我们。加之，日本军营里面的习惯相当粗野，新兵要替老兵洗衣服，擦皮鞋，有时还要替他补被服。二等兵就要受上等兵的使唤、当差，稍不如意，他们不是骂就是打；所以在日本军营里面，当时上级的长官打骂低级的士兵，是常见的事。我当时认为日本军队的弱点就是在此。’（注三）

不用说，像日本军队这样的野蛮作风，也算事一种“反面教师”。

‘我看到日本军队的下级干部用对奴隶牛马的方法来打骂士兵，当时就觉得这种军队能够打仗吗？我们中国军队更应严禁官长打骂士兵与虐待士兵，遇事必须耐心教育劝导，使他们受到感化。’（注四）

高田时代的蒋总统，虽说是一个军事留学生，但并非仅止于学习军事技术，而是在学习日本人的精神。一如在本章开始时就已经提到过，他对于“大和魂”、“武士道”，有其自成一家的看法，他指出这个日本精神的来源，得向中国的阳明学去追求。他在后来曾经提到：‘本来是中国的优良精神和哲学，中国人自己不能保存、应用，而被他人（日本）窃取了一部分，就要用它来灭亡中国，这是我们民族最大的耻辱。’

写招牌的故事

蒋总统为了了解日本人，所以在高田和当地人交往的幅度很宽。现在介绍当时为一家“八百屋”（蔬菜水果店）书写招牌的故事：

这家蔬菜水果店名“八百屋”。其旧址在现在新泻县上越市公所的旁边。当时的老板桥场增吉（已故），比蒋总统年长两岁，新婚之后刚刚开店不久。蒋总统好像和他满合得来，不时走到店里闲聊。

这家商店已经不复存在。但据桥场老板的义女桥场（现年五十五岁）说，曾经听到义父在生前谈起过下面的一段话：

某一天，有一位亲戚为了祝贺桥场新婚和新店开张，送来一面榉木招牌。碰巧蒋总统也在楼上，桥场想到中国人的书法一定不会差，便开口说：“替我写个招牌吧！”蒋总统却不肯挥毫。

脾气急躁的桥场大为光火地说：“在日本，招牌就是商人的性命，你真是毫不给我的面子！”

蒋总统重新察觉到桥场的“商人气质”，于是带着有点扞格的微笑说：‘哎！老兄，不要这样生气嘛！为了你，我就写上吧！’含着笑容，拿起笔来，大书“青物杂货”四个字；接着，又把一个大碗倒扣在招牌的正中，沿着碗边划上一个大圆圈，然后再在圆圈内写上一个代表店招的八字。

这块招牌，据说一直到二次大战之后都还存在，但现在已经失去。

注一：蒋总统—“军事教育的要务”（一九四○十）

注二：蒋总统—“整军的目的与高级将领的责任”（一九四六四）

注三：蒋总统—“对从军学生训话”（一九四四一）

注四：蒋总统—“西安军事会议讲评”（一九四二九）

军队精强的要素

一九一○年，是在日本的天空最初出现飞机翱翔的一年。当蒋总统在高田入伍还不到两星期的时候，便看到了由日野熊藏、德川好敏等人试飞成功的新闻报导，由于和军事有关而感到兴趣，于是便很快地把关于飞机资料的日文书籍翻译成中文，这篇译稿于翌年寄给在北京的友人夏尊武，托其校正；但因为接着发生了辛亥革命，译稿被失落了。

在日本的最初试飞，是这一年的十二月十四日，由日野熊藏上尉驾驶格拉第（据日文音译）式单叶飞机升高十公尺、飞行距离六十公尺。继之，在同月十九日，由德川好敏上尉驾驶安利法尔曼式复叶飞机升高七十公尺、飞行距离三公里成功。蒋总统的上司日军第十三师团长长冈外史就是提倡导入飞机的主要人士之一。

最初有飞机参加中国革命，是于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五月在山东省举兵之际，由日本志士萱野长知包租了两驾飞机，飞来中国。当时蒋总统正担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在山东指挥作战。

至于日本方面，则早在二年之前～～一九一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初由海军出动飞机攻击驻在青岛的德军。

蒋总统像这样地在高田的军队生活中多方面得来的体验和教训，不仅在革命军的活动时代，而且直到后来自一九二四年出膺首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养成革命军人、为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乃至于和日本军阀为敌的长期抗日战争，和战后对共产匪军的战争——在连续长时期的军事活动中，都被活用着。

现在，重新就“高田教训”再来作一个总结：

‘由我在日本联队一年中所过的生活和所得到的经验，使我想到一个国家要他军队精强，必有几个要素不能缺少的。

服从命令天经地义

‘第一、是军队官兵须认为服从国家的命令是军人天经地义的义务。因之，他乃能严守纪律、执行命令。如果他不知服从法令、严守纪律，那结果就是一盘散沙；这样没有纪律的官兵，临到作战，没有不失败的道理。

政治伦理认识彻底

‘第二、是政治训练和中心信仰的重要。凡是一个军队的官兵能够勇敢坚强，就是他军事2[238]468教育对于政治与伦理的认识彻底。尤其是要他对本国历史地理的理解正确，使他士兵人人能够增强其对国家的责任心。各国军队决死精神之所以养成，可以说就是这种政治训练的功效。军队里面一般士兵有了这种政治训练和中心信仰，所以他到了战场上面，能够不惜牺牲，不怕危险；能够忠勇奋斗，达成使命。

军队犹如职业学校

‘第三、一般士兵都认军队为他最优良的职业学校。军队本来是一切军事学术的专门学校，联队里的教育训练，就是一般军事学校最基本的学术课，而且比一般学校的教育还要重要，还要实际。因为在普通军官学校里面，所讲授的只是一些战术、战略和战史的理论，至于军事基本常识和动作，以及军队生活的精神与制式，都是要从军队里实际生活上来学习、来体验得到的。而且他们一般士兵在军队里面，一定要就其性之所近，学习一种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技艺。例如他未入伍之前，本来是作木匠的就叫他实习木工，作过裁缝的就叫他实习缝工，作过铁匠的就叫他实习铁工。所以他们军队里面，自从速记、录事一直到剃头、洗衣、炊饭乃至种菜、畜牧以及司号的、看护的和服务的，无一不是由军队的士兵学习以后，挑选出来的。这样，不仅他对已经学过手艺技术的人，因材利用，不使遗忘，就是没有学过手艺的士兵，也要他认定一种技术，利用业余的时间来学习。如此，他一方面军队里面一切生活所需的固然不必假手军队以外的人民，同时士兵退伍之后，更不致于失业，而流为社会的游民。而且一般士兵既受过军队的训练，则其体魄格外强健，常识格外丰富，又明了军队组织的技术，所以他回到社会之后，就可以成为民众的领导、社会的中坚。现在世界列强之所以能成为有组织的国家、和有组织的社会，可以说完全得力于一般退伍的士兵，以军队的精神普及社会的组织。现代国家的基础，就是在此。’（注）

在高田的兵营生活时期，蒋总统就是这样一心一意地把精神用之于“吸收日本”，把身体委之于“军事训练”，而暂行停止了在部队里公开的革命活动。

不过，在中国国内的革命运动，则正与日俱增。至于留学生们无论其是否赞成革命，总之，他们的关心都集中在由新闻报导等方面所传播来的国内动态。

据高田市史“分发在高田的中国留学生，三分之一属于清廷方面的满人，三分之二为汉人，两者感情对立，就连在休息或外出的时候，也都不交谈。”

注：蒋总统—“对从军学生训话”（一九四四一）

第十次起义

在继续作最后挣扎的清廷，为了收揽国内人心，表面上揭橥出所谓“不分满汉”的新政策，于一九○六年宣告“预备立宪”；一九○八年颁布“宪法大纲”，预定九年后召集国会。然而在实质上却没有任何具体作为，民心只有越发背离。

民心背离的表现之一，就是“立宪派”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

清廷加紧中央集权

当清廷发表宪政大纲的不久之后，光绪帝于一九○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下世；七十四岁的慈禧太后也于翌日（十五日）相继撒手。日薄西山的清廷，遭遇到这样的变故，乃更加速了沉没的趋势。

由于光绪帝没有嫡嗣皇子，乃以其胞弟醇亲王载沣的三岁儿子溥仪继承帝位，年号宣统。他是自清太祖努尔哈赤以来的第十二代、也是清朝最后一代的皇帝，在辛亥革命之后被废，后来又被日本军阀立为伪“满洲国”皇帝。

宣统继位之后，以摄政王地位掌握了实权的醇亲王载沣，以过渡到实行宪政为藉口，意图在皇族控制之下，加强中央集权体制。

载沣的作法是首先于十二月二十五日组织“禁卫军”，亲自统率。继之，于翌年～～一九○九年一月二日，以“足疾”的理由将北洋军阀之雄的军机大臣袁世凯（汉人）开缺，着其退隐河南彰德，以这样猛烈的手段抓到了军权。袁世凯自直隶总督时代开始，组训最精锐的新军，自成系统，建筑了以他本人为极峰的“军事王国”，而清廷对于汉人掌握军权，当然会感到恐惧。

各方要求速开国会

一九○九年十月，清廷打出了为过渡到立宪政体的一项措施，就是命令各省设立谘议局（省议会的前身），办理构成谘议局的议员选举；结果，当选者多数是汉人。固然，谘议局的地位实际只不过是总督、巡抚的谘询机关，可是膺选议员的汉族人士们，则以此为立足点，推进“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

在十一月间，迅即由江苏谘议局的张謇发起而有十六省谘议局的代表集会于上海，组成“速开国会同志会”。翌年～～一九一○年一月，派代表三十三人抵达北京，提出“速开国会请愿书”；清廷虽则一度谕令不允所请，但毕竟压制不住群情高涨的国民运动，乃勉强于同年十一月决定一九一三年“召开国会”，并允许设立责任内阁。

在这样混乱的政治局势之下，发动了第十次起义——“黄花冈之役”（一九一一年阳历四月二十七日——阴历三月二十九日）这一次起义，是经过了半年审慎计划，才决定断然实行的大规模行动；虽说归于失败，但却是迈向“辛亥革命”极重要的一步。

黄兴指挥黄花冈之役

“黄花冈之役”的策略，是以黄兴为总指挥，率领“选录”（突击队）八百人，首先占领在广州的总督衙门、水师行台、枪炮局等处；然后和潜伏在清廷新军内部的同志呼应，编成革命军，北上大陆中部地区；进而由湖南、湖北指向南京方面。其准备工作，是先于这一年的一月，在香港设立总机关部，着手制造炸弹。起义经费以十万元为目标，由孙先生在欧美各国，胡汉民、邓泽如在南洋各地分别筹募。以及向日本、安南购买枪械八百余枝及弹药；在广州市内开设两家米店为机关部，并分设了三十八个据点。而且由于开米店的关系，更便于将武器藏入粮袋中搬运。

未料，筹款活动却被清廷所侦知，加以保皇党告密，故而清廷戒备綦严；而经费和武器的筹应也缓不济急。然而由于培育在清军内部的同志们将在四月底期满退役，所以黄兴等人乃在明知准备不够充分的情况之下，到了将届限期的四月二十七日，只得率领了一百三十人去突击两广督署。

革命军虽然攻占了督署，但已经是一所空房子，因为总督张鸣崎得到了情报，早已逃避；并且出动了大部队，反而对革命军采取了包围战术，黄兴等人乃分开三队，打算脱围而出。

以大南门为目标的黄兴等部队，在中途和数百清军遭遇。其实这一支清军的哨长陈辅臣、哨官温带雄等人是决定要倒戈投向革命军方面的，但因保守秘密，故而尚未佩带同志标识的白布臂章，便与革命军碰上了头。革命军方面首先开火，不幸最初发出的枪弹就击中了前来呼应的温带雄，于是，两军发生混战，自相杀伤。

同志牺牲半数以上

预定当城内的选录队开启战端之同时，便由城外攻进来接应的姚雨平（由小北门）、胡毅生（由大南门）、陈炯明（由大北门）三支部队，以及由赵声、胡汉民所率领来自香港的增援部队，也都没有赶得上发难的时机。结果，这一次起义的参加同志牺牲了半数以上，而终告失败。

清廷将这一次战死的革命党人遗体集中在寺庙里，一共七十二具；同志们和寺方谈好将之埋葬在红花冈（其后改称黄花冈），后来才树立了纪念碑，加以追祭。殉难着人数，以后再经调查，又增加了十四人，实际是八十六人。

国定纪念日垂之永久

直到今天，中华民国也还是以这一天～～三月二十九日（将当时的阴历日期作为阳历）定为革命先烈纪念日，又称为“青年节”。每年都有国家纪念日的活动。

“黄花冈之役”的新闻报导，也传播到了日本高田联队。在参加起义而殉难的烈士之中，就包括有曾经在日本留学的同志八人在内。

在高田学习军事的中国留学生们，萦念着在故国河山洒下鲜血的革命先烈，已经悄悄地在沸腾着赶快归国、参加革命战争行列的情绪。

保路运动

黄花冈之役，也给予了清廷以极大的冲击。这一年～～一九一一年五月八日，清廷以庆亲王奕劻出任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但是其阁僚则自总理大臣奕劻到民政、度支（财政）、海军、农工商共五位大臣都是皇族，协理（副总理）那桐等三位为满洲贵族，而汉人则只占了另一协理等四个位置，简直是清廷的傀儡。多数国民为此而失望，自不待言。

当时，推进国会请愿运动的“立宪派”分子张謇，便曾慨叹地说：“政府以海陆军权及主要各部均任亲贵，非祖制也。复不更事……朝野上下不啻加离心力百倍。”像这样的政治改革，当然不能歙服群情，故当责任内阁成立之后，“国会请愿运动”仍然继续不停；后来，清廷逮捕了一个请愿分子，发配新疆，意图用严厉手段将运动镇压下去，但实则反而招来立宪派的反感，使很多人对清廷绝望，转而倾向于主张颠覆满清皇朝的革命派。

所谓铁路国有政策

新内阁在这个当口，更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在新阁组成的第二天所宣布的“铁路国有”政策。这个决定，惹起了民间的“保路运动”，促使汇集了支持辛亥革命的群众力量。这真正是清廷亲手敷设了驶向毁灭前途的路轨。

被宣告为“国有化”的，是当时正在建设中的民营“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两条路线。

推进“国有化”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曾经将汉冶萍煤铁公司的铁砂，以破天荒的廉价长期供应日本，缔接借款条约，可见他是一个主张借贷外债的人。由于“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战争”先后败北而需要支付钜额赔款的清廷，面临了非常严重的财政危机。为了突破困难，所以决定要将主要的干线铁路收归国有，意图强化中央集权体制和增加国库收入。

又进行向列强借债

清廷最初的借款目标，是英、法、德三国（一九○九年）。这三个国家，一向对于日、俄两国在远东的发展投以警戒的目光，故而和清廷的贷款交涉颇为顺利，并且组织了三国银行团，进入具体恰商的程度。

可是，听到这个消息的其他列强国家，便难安缄默；因为借款必然会伴随着与利权有关的相对报酬，要想不让三国独占，就得设法参加一份，才好分享一杯羹。

于是，第一个挤进去的是美国。美国早就主张中国门户开放，曾经有过为谋对抗日本独占“南满铁路”而在一九○九年提议“东三省铁路中立化计划”，但因受到日本政府反对以致未能实现；今后为了加强在中国方面的发言权，自有积极参加这个“借款团”的必要。三国之中，英国虽曾表示反对，不过到了一九一○年五月，还是让美国参加进去，成立了“四国银行团”。又在这个交涉之外，美国单独组成银行团，于同年十月为应清廷整顿币制的需要，借给了五千万美元。

至于日本方面，当然也不会袖手旁观，乃经过单独和盛宣怀的商恰，于翌年～～一九一一年三月，由横滨正金银行（现在的东京银行）出面签约，供给一千万日元的铁路贷款。

四国银行团方面的借款案，附带地要求任用外国人为财政顾问，因之一时停搁；及至见到日本一国抢先应允铁路借款，于是各国都着急起来，乃先后于四月十五日签订以应整顿币制及兴办实业需要的借款一千万英镑、五月二十日签订粤汉、川汉两条铁路国有化的借款六百万英镑。

列强各国，假借款之名而在利权上的斗争，一直继续进行未辍。实则和四国银行团签订的一千万英镑借款，是以在东三省扩展工业为重要对象，故而提供该地区的烟酒税、产销税等收入年额约二百五十万两为担保。日本察觉到这个情况，于是便和俄国共同对于借款契约所订“如借款不敷应用，需考虑再借款时，以四国银行团为优先”一节，向美国提出删除或修正的要求。可是，就在转眼之间，清廷已因辛亥革命而覆亡，这个争执也就自然告一段落。

宋教仁发表责难言论

像这样的借款，对于运退时衰的清廷，不啻落井下石，更不能不说是对中国的间接侵略。宋教仁听到向日本借来一千万日元，便曾在三月三十日的上海民立报发表了激烈的责难言论：

“呜呼！吾国近日发生一极危险之事件，其影响较之俄窥蒙古、伊犁，英占片马，而犹重大十倍，直可使吾国变为埃及、朝鲜……是一以经济力为先驱的变相侵略政策……似此借款，吾国财政将益枯竭……并将进而被其干涉，甚或监督之矣！”

民间租股竟遭强夺

对于铁路国有化政策准备竣事的清廷，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于五月二十二日命令停止四川、湖南两省“铁路租股”。所谓“租股”，是以地主佃租的百分之三按租抽股而累积下来的股权。政府批准铁路民营以来，已历四年岁月，民间筹集的租股和认股已达二千余万元金额，路线的勘察也已经完成，在宜昌方面，且已筑有十多公里路基。然而清廷收归国有的方针，却是对于过去累积的股权，不偿还现金，只发给债券。

民众们虽然还不会详细了解由外国借来的款项，就中国的将来而论，究竟会有何种影响，但对于用自己的金钱和劳力来建筑的铁路，竟被清廷所强夺，当然会不问情由，群起反感——民众运动，乃因而高涨起来。

成都民众请愿

一九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由设于四川成都的川汉铁路公司向护理总督王人文要求奏请清廷撤回铁路国有化的决定为开端；六月六日，广东铁路公司举行股东大会，决议反对国有，坚持民营。

四川组成保路同志会

比较起来，受到国有化打击特别严重的，是租股较多的四川省。六月十一日，四川铁路公司举行临时股东大会，参加者数千人，涕泗横流，诉说：“铁路完了，四川也亡了！”大会之后，为谋有组织地进行反对运动，而组成了“保路同志会”。

在这个时候，值得注意的，是清廷的封疆大吏竟然也有站在民众一边的，抗拒清廷命令。

湖南巡抚杨文鼎，根据湖南省谘议局呈请代向清廷上奏：“湘人力能自办铁路，无须借款。目前因政府亏信用，失民心，以致民心惊疑，罔知所措，尤恐酿成意外之变。”

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也向四川省民表明“为川人负责尽力”；并且奏劾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丧失国权太大，欺君误国”——责难向外国借款，并要求撤回铁路国有的决定。

是则连地方行政机关，也对民众的苦难看不过去，而开始背离清廷。

清廷仍然强行压制

实际说来，由于连续几年的通货膨胀，国民生活已经疲敝至极；列强掠夺、贸易入超、纸币滥发、物价腾贵的恶性循环速度，日益增加，以致人心冷漠，土地荒废。上年由湖南长沙扩展到长江流域各地的粮荒，今年（一九一一年）又在江西发生。日益贬值的纸币，不受民间欢迎，在广州持纸币兑换白银的人们涌到银行，因骚动而派出了军队。加上长江中流一带，六、七月间，淫雨成灾，死人数千。清廷对于极度穷困的民众呼声，充耳不闻；到处张贴着“不听命令，格杀勿论”的告示，强行压制。

外交方面，自四国借款、日本借款开始，连续失败——在云南省和缅甸的国境问题上与英国的纷争，表现出可以将片马地区以租借方式割让给英国的软弱态度。外蒙古方面，也因得到了渗透进来的俄国势力撑腰，而发生了“独立运动”。还有驻英公使刘玉麟、驻法公使刘式训相继报告，就在这一年的四月，日、俄、美、英、法五强代表在巴黎举行瓜分中国之秘密会议的情报。这个瓜分计划是要使清廷的领土只限于陕西、河南两省；东北及福建等四省属于日本，其余由俄、英、法、德四国分割，但因美国反对而打消。

由于在内政、外交两方面这样的失败，于是进行国会请愿运动的“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乃于六月三十日发表宣言（告全国各界书），列举清廷的对外借款、铁路国有、外交政策等六大罪状，向国人诉说清廷不足信赖。

事态已经是演进到了无可收拾的程度。

然而，清廷的强横态度，还是坚持不变，且将倾向于民众的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免职，以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署理，严令不惜凭藉武力，以拒绝保路运动的要求。同时，为防制保路运动扩大，命令各省电报局“禁止收发”有关铁路问题的电报。

成都罢市荣县起义

中国革命同盟会的同志们，目击这些情况，认为是革命的大好时机到来。以铁路股东代表之一的身分进入了成都的同盟会员朱之洪，联络军中同志，并召开民众大会；八月二十四日，更在成都发动全体商店罢市，以及拒绝纳税。此外，又策划以重庆为根据地的独立运动。同时，在荣县则有王天杰率领百余民军，布告起义。

赵尔丰逮捕保路首领

新任总督赵尔丰，感到事态已经严重，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压制下去，乃上奏清廷，建议“暂准继续民营”；不料清廷到了这个时候，还是指示“格杀勿论”——决定极力镇压到底；并且命令督办大臣端方率领军队入川。

唯恐保路运动形成长期化的赵尔丰，得到了支援力量，乃于九月七日，在成都将保路运动的领导人全体逮捕，被捕者有四川省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保路会会长邓孝可、股东会长颜楷等九人。赵尔丰有意将这些人立即处刑，但被成都将军玉昆所劝阻。

得到了这个消息的民众，为恳求释放被逮捕者，陆续不断地聚集到督署门前，达数千人之多，其中夹杂有许多老弱妇孺，现在担任国史馆馆长的黄季陆，那时还是一个小学生，也挤在人群之中。

下午，天上飘着小雨，群众们都浑身湿透，到了天黑还是不肯散去，纷纷跪在光绪皇帝的牌位前，点着香，祈求德政。就是到了如此地步，群众们也都还没有要把清廷推翻的念头。

清兵开枪请愿成血案

夜晚，总督赵尔丰命令赶散群众，但是眼看着他们不仅不服从，而且有拿起牌位前面的香火打算向督署放火的情势，赵尔丰乃命令警卫军队开枪。最初的枪声发自东辕门，接着固守四周要处的卫兵一齐开始射击，群众蜂涌四散，逃进附近的商店等处避难，背后的弹雨猛烈地发射过来。

这一次死难者，确知姓名的有二十七人，包括自十五岁少女到七十三岁的老人。

因请愿而受到以弹雨为答复的群众，终于肇成了暴动，整个成都府城陷入了大混乱的局面。

武汉准备起义

成都民众，将各处的电线剪断，并且设置了关卡，遮断和其他地区官厅的联络。

“水电报”沿江而下

居民们用“水电报”将成都的情势，传达给其他地区民众。这个联络方法，是将流血事件的经过情形及呼吁其他地区戒备的意见等等，写在木片上，涂以桐油，放到河流中流出去。有些内容是：

“请看！请看！官逼民变，制台造反，百姓遭难。”

“赵尔丰先捕蒲（殿俊）、罗（纶）；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

成都的河流岷江，是经由川西南下，注入长江的。秋天水位升高，木片顺流而下；在下游接到水电报的人，就重新抄写在另一块木片上，一块接着一块接力式地传递下去。像这样，成都的情况，很快就传达到了四川省的西、南地区各地。

同盟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人，立即与长江一带的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等联合，在残杀事件的第二天～～九月八日，便组成了“保路同志军”；九日，在成都城外红牌楼和清军对峙，清廷曾下令将他们消灭，但清军官兵却同情他们，虽然向他们发射了数百发炮弹，但都取掉信管，不曾爆炸。在这个当口，加入“保路同志军”的民众逐渐多了起来，声势为之大增。

清廷终于决定了由华中地区最大新军根据地的武汉调派援军入川的方针。

民军蜂起与清军对峙

民众奋起的情势，由成都向邻近地区扩展～～十月三日，在成都南方的荣县，有千余民众宣言独立；井研、仁寿、威远等附近各县，也陆续响应；只是这四个县就编成了超过三万人的民军，在各地和清军形成战斗态势。

民军打着四面一组的旗帜，旗上写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话，很清楚地揭橥出同盟会的口号，这是由于民军的领导分子就是同盟会的会员。

武汉的革命组织

此时，同盟会已经与在湖北的“文学社”（武昌）和“共进会”（汉口）举行了联合会议，决定在武昌互相响应，举兵发难。

“文学社”是于一九一一年一月三十日（阴历正月初一日）在武昌黄鹤楼成立的一个秘密革命组织。以社长蒋翊武、文书部长詹大悲、评议部长刘复基（尧征）为领袖。

“文学社”的源流，可以追溯到一九○四年组成的“科学补习所”。科学补习所成立不久，当黄兴计划在湖南起义时，便准备发动响应，但结果失败；然而其支流则由“日知会”所接续，一再穿越过所遭遇到的弹压困厄，由“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以至于“振武学社”、“文学社”，一路改变名称，继续活动下来。

“文学社”的特征，是在湖北新军中伸展势力。湖北新军以常备军第八镇（师）、常备军第二十一混成协（旅）为主力，根据地在武昌。在各省新军中历史最久，是受过日本式训练的精锐部队。

武昌，在长江和汉水的汇合点，邻接汉口、汉阳，合称武汉三镇，自古以来为军事要冲。唯其如此，所以清廷在这里加紧训练新军；而更重要的是长期间担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热心推动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因之培养出留学的才俊颇多，他们为海外的文明所觉醒，以及受到孙先生等人革命思潮的影响，回到国内就献身于革命阵营。影响所及，在湖北新军中的“文学社”社员便达到了约五千人之多，占了湖北军队一万五千人之中三分之一的力量。这些社员后来在武昌起义中大为活跃，占了为革命牺牲者之中的大半人数；及至革命成功之后，乃与同盟会合流。

另一方面，“共进会”则是同盟会的一个别派，与一九○七年秋季在东京成立。以孙先生为最高领导人，居正、刘公、孙武等人为主要干部，重视和其他会党“共进”，也就是重视协力关系，以显示十八省铁血联合的“十八星旗”为军旗。一九○九年，由日本归国的孙武等人在汉口设立总机关部，与长江流域的革命组织保持着联系。

同盟会考虑到和这两个组织强固地联系起来，乃于一九一一年二月自香港派遣谭人凤到达武汉，和共进会的居正、孙武等协议，并且提供了八百元运动经费，由于有过这一次的联络推动，乃使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组织的协力关系为之强化。

决定以长江流域为重点

阳历四月间（阴历三月二十九日），黄花冈之役失败之后，同盟会再度研讨起义方针。这时，提出了三个方案～～一是和北方新军协力，以东三省为后援，在中枢地区发动革命，攻夺行政心脏部位的北京，号召全国，此为上策。中策是首先在长江中游地区树立政府，以此为根据地，挥军北上。至于像以前在两广、云南边隅地带的革命行动，则属于下策，不再重视。讨论的结果，决定采取中策，以长江流域为重点；而且基于这个决定，由陈其美、宋教仁、谭人凤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统辖湖北、湖南、安徽三省分会。还有，在保路运动中领导民众活跃的四川分会，也是成立于这个时候。

在同盟会中部总会方面，和武汉当地的文学社、共进社团结一致，为建立发动起义的组织，业已准备就绪。

起义计划准备完成

进入九月，文学社和共进社连日举行会议，讨论起义计划。

九月十二日，决定组织“临时总司令部”，推举文学社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共进会孙武为参谋长，以及其他主要任务的负责人选，计算好在二十一日之前将有关起义的具体计划准备完成。

总统归国效命

在日本新泻县的高田，也不断地传闻到在内政和外交两方面都已失掉作为的清廷和喘息于痛苦之下的中国民众的情状。

当四川省掀起保路运动的一九一一年夏季，高田的军事留学生们，正好获得了较长期间的休假。

蒋总统立即回到上海，往见陈其美；虽然假期不多，但在这个时候还是参加了营救被关于牢狱里的同志张恭，和计划暗杀出卖了张恭的刘光汉、何震夫妇。

刘光汉在日本时曾经担任同盟会喉舌“民报”的编辑，看来是热心的中坚活动分子；然而，刘妻何震却首先被两江总督端方所收买，跟着刘光汉也就成了端方的间谍。

一九○八年，陈其美为了要在江、浙两省发动革命而设置秘密机关于上海，筹商起义计划，突然被租界警察搜查，当时，陈其美刚好不在那里，得免于难，但张恭则因而被逮系狱。这是由于刘光汉将集会的情况向端方告密，端方乃要求上海租界的警察当局进行取缔所致。

“暗杀行为”，在革命行动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连带工作。胡汉民等人曾经有一段时间肯定地说：“此不止为复仇计，亦以寒敌之胆，而张吾军。”然而，孙先生则加以否定，他认为，纵使能够杀掉一个敌人，我方也只会是牺牲一个人去拼掉对方的命，并不能打倒敌人的势力；权横之下，因暗杀而牺牲优秀同志，甚且有招致影响其他整体计划的后果的可虑。特别是孙先生当时在美国从事筹款活动，唯恐美国人对于暗杀会发生拒绝反应，故而与同志们联络劝告对于暗杀要慎重节制。

结果，蒋总统由于暑假期限已近，乃中止暗杀计划，于十月间再度回到高田联队。

未料，冲击性的新闻报导，就像追踪一样，也接踵而来。

十月十日，革命军在武昌奋起发难，这是盼望已久的消息——终于点燃了决定中国命运的辛亥革命战火。

革命军占有优势的消息，传播来了！

在一夜之间，夺得武昌，树立军政府；翌日，汉口、汉阳相继光复。

军人效命之时到来

时间迫不及待，上海陈其美发来十万火急电报，催促蒋总统返国，因为革命军亟需要训练有素的实战指挥官。

‘这一年我正是二十五岁，我觉得这是我们军人效命的时候到了，于是立即从日本回国，参加实际的革命工作，开始献身于革命事业。直到现在，都是为了贯彻我当初从军报国的一念。我在青年的时候，能够立志从军，而且千方百计，不顾一切的挫折困苦，达到了我从军当兵的志愿；如今回想起来，实在是我平生最快意的一件事。’（注）

请短假毅然就道

为了归国，向师团长长冈外史提出了请假报告。长冈外史表示：“因受陆军省委托管理，不能许可擅自归国”而予以拒绝。不得已，乃和联队长飞松宽吾恰商。好不容易得到了四十八小时的短假，这是联队长职权范围内所能核准的最大时限。一同请假的同学，有张群、陈星枢（后来在山东从事革命）两人。

正式奉准的假期，虽然只是四十八小时，但从此离营驰赴革命的实情，已为同僚和长官所周知，长官们且曾悄悄地为之设宴惜别，贺其迈向人生的旅程。

主持别宴的日本军人，高举着酒杯说：“日本军人，在道别时，饮水干杯。这种水杯，是日本武士诀别之际，传杯共饮，誓不生还的表现。”

当时的景况，真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概。差不多有将近一年的日本陆军生活，到此结束。

抱有舍生就死决心

在那个时候同行的张群，对笔者（古屋奎二）回忆当时归国情况说：

“由高田乘火车，首先到了东京，总统是浙江人，我（张群）是四川人，分别向本省同盟会的东京支部领取旅费，也都换了衣服，总统穿和服，我穿日本学生服。

“如果在四十八小时内不能归队，便会被当作逃兵，由宪兵开始查缉；为掩蔽身分，故而换了衣服。

“连毒药也都买好了，这是准备在万一之际，就得自杀，的确是有舍生就死的决心。

“然后，再度乘火车前往长崎，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在东京的时候，把军服和佩剑收拾干净，用邮政小包寄回高田连队。这不仅是为免背上“盗走公物”的污名，而且更是对于受教很多的日本军人生活，在最后要作一个很恰当的总结。

日军当局，对于在过了四十八小时之后，未见归队的蒋总统等人，视同逃亡，出动宪兵队查缉。

其后，日本陆军省给予蒋总统等人以“退队”的处分。这次归国的留学生，在野炮兵十九联队方面，有蒋总统、张群、陈星枢三人；此外，陆军炮兵学校学生、陆军经理学校学生、士官学校学生等合计有二十三人，也都被处以“退学”处分。陆军大臣男爵石本新六于十一月八日以公文将处分情形通告外务大臣子爵内田康哉：“似此行动，在我军纪严肃的陆军中，最为嫌忌；彼等虽属清国人，但隶籍于我陆军部内，则不能轻易置之不问。”十一月十一日，又照会了清廷驻日公使。在这个时候，蒋总统是初次出阵，光复浙江成功。

对于蒋总统等人的行动，当地的高田新闻于十一月十二日以“野炮兵决起”的标题报导：“日前请假奉准后回国的三名学生，尚未就归队之途……”

注：蒋总统—“对从军学生训话”（一九四四）

第三章：中华民国之诞生(上)

主题

辛亥革命序幕决定断然发难双十武昌起义一举光复武昌汉阳汉口光复策划沪杭起义民众参加革命东三省的状况国父致力外交争取国际地位汉口苦战黎元洪登坛拜将袁世凯趁机而出发展个人权力议设中央政府南北和议国父返国选出临时大总统协力的日本人各国各有企图日本企图介入坐收渔人之利日阁所定政策俄帝攫取外蒙日图与英勾结英国拉拢袁世凯日本意图难逞袁世凯与英联结国父自居公仆孙大总统就职

辛亥革命序幕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晚间七点多，驻扎在武昌城内的工程第八营，夜晚点名刚过。

在第八营的士兵们之间，总好像是荡漾着有点和平时不大相同的气氛。因此，长官们在点名的时候虽经仔细注意，但却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迹象，点名后，士兵们各自回到宿舍就寝。

逮捕金兆龙的一幕

后队二排排长陶启胜，带了两名护兵来到营房二楼的二排宿舍，脸上浮现着微笑，徐徐地察看了一周，向着躺在床上的部下金兆龙招招手说：“有话要和你谈谈”；金兆龙是参加了革命派的人，在被陶启胜突然招呼的一瞬之间，显得有点紧张，但是看他的表情，不像是有什么盘问的样子，想到他也许是商量参加革命的吧，于是便不存戒心地走到门口。

刚一出门，陶启胜的面色突变，扭紧金兆龙的双腕，大声吆喝地说：

“好小子！你的胆量可真不小，竟敢革命造反？”

陶启胜一面吆喝，一面命令随行的护兵“把这小子给我绑起来。”第二排的士兵们，因这样意外的喧闹，都起来了。

陶启胜的一个弟弟叫陶启元，也隶属于第八营，担任第一排的副班长，其立场和乃兄相反，而是属于革命派，为了避免和同胞骨肉相争，所以在当天曾经向陶启胜透露革命行动快要出现，劝他早点逃避；不料，陶启胜努火中烧，反而向乃弟责问革命派人士的姓名，结果，金兆龙被暴露，而有当晚前来逮捕的一幕。

射出武昌起义第一枪

然而，陶启胜吆喝着“给我绑起来”的命令，却没有人敢于应承，大家都只围绕在旁边看着两人扭成一团，倒是金兆龙在终于将被制服的时候喊叫起来：

“大家都在干什么？现在还不动手，等待何时？”

革命派的同志程定国，抓住步枪用枪托对陶启胜的头部一击，血花四溅，陶启胜啊呀一声，松开了金兆龙，由走廊逃奔出去。

就在这个瞬间，发射了武昌起义的第一颗枪弹——程定国掉转枪口，瞄准陶启胜开了一枪；在隔壁由于听到喧闹而跑过来的第一排熊秉坤，在走廊上和陶启胜碰个正着，熊秉坤也扣动了拿在手里的步枪扳机。

炸裂的枪声，划破了静夜的长空。

程定国的枪弹，擦过了陶启胜的腰部，熊秉坤的枪弹落了空，陶启胜跌跌滚滚跑到楼下，逃了出去。

这是宣告中华民国黎明到来的枪声；辛亥革命的序幕，在这里展开。

中国国民革命对于世界人类划时代的伟大贡献之开始

辛亥革命的成功，不仅是痛苦呻吟在清廷高压统治之下的中国国民恢复了光彩，而且是因为在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的诞生，对于被帝国主义的列强所侵略而苟延喘息的亚洲国家、亚洲民族，也给予了摸索得到独立和自由的希望。

‘所有深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亚洲国家和亚洲民族，看到“中国专制之毒，至二百余年而滋甚，一旦以国民之力，踣之而去，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如是之速”，于是皆幡然觉醒，了解专制原来是可以打倒推翻的，民族原来是可以独立自主的，殖民地的桎梏，原来是可以摆脱解除的，乃使亚洲各国的民族革命运动，一天比一天汹涌澎湃，反帝国主义的浪潮，一天比一天继涨增高——这实在就是中国国民革命对于世界人类划时代的伟大贡献之开始。’（注）

九月廿四日作战会议

武昌起义的发端，是在发难之日稍前的九月二十四日所举行的作战会议。

成为发动革命中心力量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主要干部六十多人，于这一天的上午十时聚集在武昌胭脂巷十一号共进会机关部，协商起义计划，由共进会的孙武担任临时主席，在这次会议中，决定中秋日（十月六日）首义。

初期作战重点，在占领大炮阵地和军械库--首先，在武昌郊外便于眺望的第二十一混成协（旅）所属工程第十一营及辎重第十一营举火为号，各处一齐奋起，拿下城内蛇山和凤凰山的大炮阵地及楚望台的军械库；同时，驻扎在对岸汉口、汉阳的第四十二标（团）也立即行动，攻击汉阳兵工厂等处，一举控制武汉三镇，会议中并决定湖南方面同时由焦达峰等人举兵响应。在会议中而且详细规划了各分队的指挥人及分担攻击任务。下午一时散会。

计划险些败露

这个计划，仅仅在一小时之后就险些败露。事缘驻扎在武昌城外南湖的炮兵第八标（团）第三营一部分同志为休假回乡的同袍饯行，猜拳行令，兴致过高，喧闹过分，受到排长的警告，惹起群情激愤，集合了同志们把大炮托出去，发射了三炮空弹。

这时，有人提议乘混乱之下立即奋起；但是，作战会议刚刚结束，武器等类也还没有准备齐全，结果，依循慎重分子的主张，大家都恢复了平静的状态。而湖广（湖北湖南两省）总督瑞澄也没有察觉到这个施放空炮事件的背后，还隐伏着大规模的计划，只当作是酗酒滋事，开除了少数人的军籍，便了结了问题。

当这个事件之后，革命起义的流言，也不知道从何而起盛传开来；“中秋起义”——连在汉口的报纸上都出现了。

注：蒋总统-“革命历史的启示和革命责任的贯彻”（一九六九）

决定断然发难

察觉到起义行动即将到来的湖广总督瑞澄，于九月三十日（一九一一年）向内阁发出电报：“湖北新军，开拔入川，镇压保路运动；武汉兵力薄弱，请由保定分拨数营来鄂，加强守备。”

十月三日，瑞澄召集军事会议，目的在对于传闻的“中秋起义”，加强警备措施；会议中指示对于交通要道暨督署等重要机关严加稽查和戒备，以及出动军舰巡逻长江，并将满籍官兵较多的第三十标第三营调驻汉口，保护租界。到了中秋前一天～～十月五日，更禁止官兵外出，武汉一带实施特别戒严。

革命军的准备工作有了迟误，被举为临时总司令担负指挥责任的蒋翊武，随其隶属部队四十一标开拔往湖南岳阳，不在武汉；赴上海购买手枪的居正，没有能够赶回来；由同盟会派来支援的黄兴、宋教仁等人，也还没有到达。

在清廷戒备森严、加上重要干部不在的情况之下，要于六日断然发难，的确是困难很多；于是，临时总司令部乃打算变更计划，将起义日期推延到十一日左右，并俟九日举行会议，再作决定。

未料就在九日举行会议的当天，突然发生了意外事故。

火药爆炸干部被捕

上午十时左右，革命军参谋长孙武，在汉口俄国租界宝善里十四号共进会机关部埋头制造最后的炸弹，计划将炸弹由督署隔壁“武汉帽店”仍进瑞澄的寝室，先杀瑞澄祭旗。正当调配火药之际，碰巧革命军临时组织总理刘公之弟刘同来到，不慎落下香烟火，引发巨响而爆炸燃烧，孙武颜面重伤倒地。

由于这一场骚动，俄国租界警察赶来，将刘同以及三十多个干部一网打尽；而且会员名册、军旗、手枪以及准备好了的革命军“中华银行钞票”，各种文告等全部都被查抄而去。

另一方面——汉口对岸武昌，在当天早晨，潜伏于清军内部的同志代表们集合一起，迎接由岳阳回来的临时总司令蒋翊武，会商起义事宜。会后，蒋翊武等人正进午餐，邓玉麟渡江跑来报告了宝善里爆炸事故。

蒋翊武发出举义命令

全体惊愕失色，一致的意见是“名册既已被没收，与其坐以待毙，则莫如断然发难，再也没有计较成败的余地。”

临时总司令蒋翊武发出了两道命令，时间是在九日下午五点钟。

命令：

一、本军于今夜十二时举义，复兴汉族，驱逐满虏。

二、本军勿论战守，均宜循守纪律，不得扰害同胞及外人。

三、凡马、步、炮、工、辎等军，闻中和门外炮声，即由原驻地依左列命令进攻：

甲、工程第八营，以占领楚望台军械库为目的。

乙、二十九标二营，由保安门向伪督署分前后进攻……（下略）

〔注意〕本军一律以白布缠左膀为标帜。临时总司令蒋翊武

命令：

南湖（中和门外）炮队于今日夜晚十二时鸣炮为号，城内外各军闻炮声一齐行动。临时总司令蒋翊武

这个命令，立即用钢板蜡纸书写，印制数十份，派传令分发各标、营代表。

命令未传到总部被破获

然而，瑞澄由于汉口爆炸事故得知起义计划之后，立即将武汉三镇城门关闭，断绝城内交通，彻底戒严盘查；同时，军中发出禁足令，取消一切外出、休假活动。以致蒋翊武的命令差不多是根本没有能够传达出去，但临时总司令部却还不知道这个情况，只顾等待着午夜来到，各处同时发难。

可是，过了预定的深夜十二点钟，在武昌方面并未发出一声炮响。

突然，楼下传来剧烈的敲门声，人语和足音嘈杂，同志刘复基立即拿起炸弹，刚踏着楼梯要下去看看情况，而踢破了大门的军警已经蜂涌进来，刘复基把炸弹扔出去，但仓皇中被楼梯扶手反弹回来爆炸，他自己当场负伤倒地。

蒋翊武等人逃向邻居屋顶，但因人多过重，屋檐塌落，被包围的军警一网打尽——起义行动就在眼前，而总司令部却被毁灭。

落网的人们被送往巡警总局途中，陈宏诰被熟识的警官放纵逃走；蒋翊武到了总局之后，因为留着辫子，穿着土里土气的乡下衣服，看来像个学究，警察未加注意，得以乘隙溜出，逃往岳阳。

此外，在武昌城内的各秘密机关，陆续被搜查，主要干部差不多都被逮捕，其人数据瑞澄向清廷报告是三十二人。

三位烈士慷慨就义

非常重视这个事态的瑞澄，命令武昌府知事陈树屏彻夜讯究，结果于翌日上午八时，将彭楚藩（共进会员、宪兵）、刘复基（文学社、同盟会员、步兵四十一标）、杨宏胜（前步兵第三十标）三人拖到督署门前斩首示众。

三位烈士视死如归，慷慨就义，口口声声痛骂满清政府，呼吁同胞们为革命奋起！他们是“武昌起义”的最初牺牲者。

双十武昌起义

十月十日清晨，武昌城的街道上，遍布追踪革命派的军警，每隔几十步，就有一个担任警戒的士兵站岗，各营训练一概停止。

同志间的联络，只有在交代勤务或是出去采买而偶然碰头的时候，才有悄悄接触的机会。至于城内外的联络，则因所有城门紧闭，完全断绝。

幸免于难的干部们都躲躲藏藏地不敢露面，武器弹药等类也都被没收，作为革命旗帜的十八星旗，也只剩下由邓玉麟逃出时卷在裤腰里带出的唯一的一面。

同志计议死中求活

武昌城内工程第八营一排的熊秉坤同志接到临时总司令部的命令，是在十日早晨，这就是蒋翊武在昨日下午五时所发出的，已经失去了时效。

熊秉坤悄悄地通知同志们在午饭之后举行会议。不少同志目击自昨夜以来的戒备森严程度和彭楚藩等被斩首示众的情况，为之面色苍白，甚至震颤不已；然而，名册既已被抄去，则侦缉的魔掌就会伸展过来，已经是摆在眼前的事实，于是熊秉坤“死中求活奋起发难”的呼吁，当然得到了一致赞成。

关于作战的步骤，虽然已经在九月二十四日的作战会议中有过决定，可是，现在各部队之间都已经联络不上，尤其是能够成为最强支援力量的城外炮队，更是不明动向，只得倚仗有决心的同志来拼死一战。

同志们将隐藏着的子弹拿出来分配，一个人只能得到两颗；而且这么少的子弹之中，还得要保留三颗在发难时速发三枪，作为信号。

发难的时刻，起初决定在下午三点钟；但是因为联络需要时间，所以延迟到七点钟夜晚点名之后。直到这个时候为止，接上了头的只有第二十九标二营第二排和第三十标三营的一个队。

工程营枪声激起奋战

只不过在这么一点部署之下，就爆发了第一响的枪声。

工程第八营的两发枪声，造成了大骚动，激荡开了奋起的呼号。

听到喧闹的代理管代（营长）阮荣发，急忙率领部下赶到现场，碰上腰部受伤由楼上逃下来的陶启胜，一时判断错误，认为是革命军的伙伴而将之射杀，接着就对楼上乱射一阵，大声喊话：

“你们受革命党的骗了，革命党早已在昨天逃跑了，无聊的革命是搞不出名堂的，一家九族都要问罪哟！”

同志们由楼上掷下桌椅板凳应战，这就是最初拉开的战斗序幕。同志吕中秋等人的枪弹打倒了阮荣发，杀开一条血路，大家陆续跑到楼下，熊秉坤吹起哨子，约有四十的同志集合到一起，按照原定计划，以夺取武器为目的，开始朝向楚望台军械库攻击前进。

李鹏升率同志燃起烽火

另一方面，驻扎在武昌城北乡塘角的第二十一混成协所属辎重第十一营，也开始了行动，在李鹏升领导之下的同志们，于下午七时点燃马草，升起举义的烽火；驻在附近的炮兵第十一营虽然奉命加以镇压，可是士兵之中也有参加起义的呼应，部队因而分裂，一部分人投入了革命阵营。李鹏升指挥约一百同志向城内进军，但距离最近的武胜门紧闭，只得沿着城墙向东边绕道，以奔向距离军械库较近的通湘门为目标。

拿下楚望台军械库

在城内，第二十九标的蔡济民也举兵响应工程第八营熊秉坤等人的行动。几路人马或先或后都杀到楚望台的军械库，同时守备楚望台的士兵中也有响应分子陆续出现，于是革命军便很轻易地拿下了最重要的处所——楚望台军械库。

这个地方适宜为新军的城南据点，库存有德国制七九米厘双口毛瑟枪一万多支。日本制六五米厘步枪一万五千支。汉阳兵工厂制六五米厘单口枪数万支。枪弹、炮弹数量甚多。等于是徒手跑步而来的革命士兵们，转眼之间就变成了最新装备的部队，而且集中到这里的同志，已经达到了三百人。

推戴吴兆麟为指挥

同志们推举熊秉坤为代表兼大队长，号称“湖北革命军”。首先决定在蛇山和楚望台部署炮兵阵地；继之，派遣使者通知驻扎在南门外南湖的指挥官，因为熊秉坤在此之前的阶级只还不过是一个班长。刚好在这个时候当值楚望台警备的左队队官（连长）吴兆麟躲在城墙角落，被人发现，吴兆麟曾经是日知会会员，也能得部下的人望，于是便一致推戴他为“临时总指挥”。

吴兆麟一度固辞，但后来提出以严守纪律、绝对服从命令为条件而就任，并决定作战计划大致如次：

一、楚望台附近有三十标及宪兵营，多为旗人，应先发制人，将之扑灭。

二、我军以军械库为根据地，必须死守。

三、到目前尚未发难的其他部队，派同志前往促请举义。

四、步兵援护南湖炮兵第八标入城，在炮击掩护之下，进攻督署。

五、口号“兴汉”……

依据这个方针于下午八时三十分发出第一道命令，开始攻击。

革命军声势大振

不到三十分钟之间，革命军便很快地占领了宪兵营；在观望形势中的各部队士兵们，陆续来到军械库，加入了革命军，迅即扩展到约为二千人的大部队。

炮兵队也在不久之后到来，于是，革命军的完整体制，为之树立。

一举光复武昌

清廷方面没有能够充分地掌握住这些情况。

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于晚间九时，派遣参谋长吴兆骐等四人赴军械库调查情况。吴兆骐是革命军临时总指挥吴兆麟的胞兄，兄长袒护弟弟，不仅不向清廷官署报告实情，反而告诉乃弟督署防卫部署迟缓，现在仅有少数部队，虽有六挺机枪，但零件损坏，不能使用。说万之后，就溜走了。

革命军总攻督署

革命军继占领宪兵营之后，又将步兵第三十标冲溃，晚间十时三十分，分兵三路，向督署展开总攻击～～一、二两路自武昌市街中央突破；第三路则由南边沿城墙推进，指向督署。

抵抗行动最顽强的，是在保安门布阵的清军，第八镇统制（师长）张彪亲自指挥，在保安门上高悬着“回归原队”的劝告文，劝告文内容是：

“尔等（革命军）稍有良心，各归原营，不咎既往，否则玉石俱焚，勿谓言之不预。”

第三路因遭遇张彪反击，致被击退数次。经过两小时以上苦战之后，熊秉坤所率领的敢死队四十人才登上保安门，占守住桥头堡；保安门既已夺得，也就打通了攻击督署的进路。

瑞澄逃亡张彪遁走

湖广总督瑞澄逃亡，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率同亲信数人由督署后面的文昌门逃出城外，登上在长江待命的楚豫军舰，逃往对岸汉口，藏在停泊于英租界江面上的英国军舰后面。

先是瑞澄曾和英国领事葛福密约，倘革命军举义，英舰开炮轰击，协助清军。于是，瑞澄乃据此约定要求英舰协助，但此时英国方面唯恐引起国际纷争，而予以拒绝。

顽强抵抗的张彪，得知瑞澄逃亡，斗志丧失，乃乘船逃亡汉口刘家庙；正当战斗方酣之际，清军竟然失去了指挥官。

不过，防卫督署的教练营却顽抗到了最后。

当这个时候，发挥了威力的是部署在蛇山和中和门的炮兵部队。炮兵起初对于在黑暗中混战的情势，因找不到目标，只得发射空炮，鼓舞革命军士气；但是当第二路部队在接近督署的商店放火之后，把攻击目标——督署照亮起来，炮兵便正式开炮发射实弹轰击。由蛇山面对督署是向西瞄准射击距离二千二百公尺，由中和门面对督署是向西北瞄准射击距离一千八百公尺，都是近距离的射程，故而第三发炮弹便已命中，清军阵脚立即动摇。

革命军敢死队对督署房屋放火进攻，火势猛烈，红透了午夜的长空，清军终于不支溃走。

站在长江对岸的楚豫军舰上，眺望着映照出清廷末路的瑞澄，向北京发出电报作了如下的报告：

“十八夜（阳历十月九日），革匪创乱，正在提讯核办，革匪余党，勾结工程营、辎重营，突于十九夜八时响应。工程营则猛扑楚望台军械局，辎重营则就营纵火，斩关而入。

“瑞澄督同张彪、铁忠、王履康分派军警，随时布置，并亲率警察队抵御，无如匪分路来攻，其党极众，其势极猛，瑞澄退登楚豫兵舰，移往汉口。

“已电调湘豫巡防队来鄂会剿，并请派大员多带劲旅，来鄂剿办。”

国父论武昌之成功

孙先生在他手着的“孙文学说”中，作了如下的评论：

“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澄之一逃；倘瑞澄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以当时武昌之新军，其赞成革命者之大部分，已由端方调往四川，其尚留武昌者，只炮兵及工程营只小部分耳，乃此小部分以机关破坏而自危，决冒险以图功，成败在所不计，初不意一击而中也，此殆天心助汉而亡胡者欤！”

在十月十一日天明之前，武昌城内蛇山南面的主要地区，已完全为革命军所控制，敌人的抵抗据点，只剩下蛇山北面的藩署，革命军在炮兵援护之下，也轻易地将之拿了下来。

武昌城内的清廷官吏，全体逃之夭夭。各城门、各官署都归于革命军掌握，一夜之间，完成了光复武昌的使命。

革命军旗飘扬黄鹤楼

革命军的十八星旗迎风飘荡在蛇山的西北面，俯瞰江流的黄鹤楼上。

在武昌城内战役中牺牲的革命军士兵，有纪鸿钧、王世龙（均为进攻督署的敢死队）等十多人，负伤者有张鹏程等二十多人。

相对地，清军方面则死亡五百多人，被俘的也超过了五百人。

城内治安，在激战一夜的天明之后，恢复平静，倘使要举出算得上是事件的事件——就是旗兵的残党第三十标队长崇光，唆使群众，闯入藩署抢劫银两；当时，革命军立即将崇光射杀，得以防制于未然。

战事结束之后，革命军除分配少数兵力扫荡残敌及担任城内外守备之外，同时派遣军人和学生在城内各地，致力于宣传革命宗旨，安定人心。

汉阳汉口光复

诚如孙先生所曾指出，武昌革命，是在没有领导者的情况之下，万不得已而发难，得到3[22]518意想不到的情势之助，终告成功。可是，直至十一日早晨，在武昌城内也还是缺少足以统驭全局的领导人。因为此时，刘公还隐藏在汉口，孙武因炸弹爆发负伤住在医院，蒋翊武去向尚不得而知，胡锳囚禁在监狱（傍晚救出），居正去上海买手枪未回，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干部都没有能及时赶到。

从权推出黎元洪为都督

蔡济民等革命军干部，聚集在谘议局，筹计当前急务，先得组织军政府，但在军中却未见有力量担当都督的人物。

因此，革命军乃选中了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旅长）黎元洪为对像。黎元洪不属于革命派，但因革命军才只是控制了武昌一地，为了防备清军反击，迫切需要立即巩固体制，故而选择到虽非革命分子，但却在军民间负有人望而能笼罩局面的黎元洪。

这个时候，黎元洪在什么地方，都还没有人知道；不过，很快就被找到是藏在楚望台附近一位参谋刘文吉家中。革命军临时指挥官吴兆麟乃亲往迎接，于中午拥到谘议局，革命军列队吹号欢迎，群众高呼“做都督的人来了！”黎元洪却默然不发一言。

革命军已经用“中和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的名义，准备好了一份“安民布告”。这个布告就是依据同盟会颁发的革命方略而作成，为六言韵文体裁：“今奉军政府命，告我军民知之，凡我义师到处，尔等勿用猜疑……”

当革命军干部李翊东拿着誊写好了的这个布告请黎元洪签署的时候，黎元洪态度畏葸，声调颤抖地说：“只望让我保全性命”，对于被推为革命军首领，流露出恐惧不安的神情。为黎元洪这种态度所激怒的一个同志拿出手枪对着他，李翊东赶快拦住，并代替他签下了一个黎字。就这样勉勉强强地算是决定了黎元洪的都督职位，布告张贴在城内通衢要道。

被强迫当上了都督的黎元洪，实在是意兴索然，闭口不发一言；他是在估量着革命军和清廷两方面情势的推移而意存观望。及至第二天，听到汉口、汉阳也相继光复，加以革命军获得了大批武器和银币，这才剪掉辫子，以都督身分开始活动。然而在革命军而论，虽然说是仓促之间，事非得已，不得不从权抬起这么一位非革命分子来出任都督，但也就因此而为将来遗留下了问题——其后，黎元洪竟然和袁世凯联上了手，有与革命势力作对的意向。

谋略处拟议国名

革命同志们看到黎元洪那样举棋不定的态度，不敢托付全权，于是，乃以蔡济民、吴醒汉等十五人组织了一个“谋略处”，来辅佐黎元洪。

下午八时，谋略处作了历史性的决议，包括有下列几点：

“一、以谘议局为军政府。

“二、称中国为‘中华民国’，年号定为黄帝纪元四六○九年。

“三、对驻在汉口的各国领事明白表示，军政府负保护外国人的责任；同时请承认军政府为交战团体……”

“中华民国”的国名，就是在这里最初举出。

和武昌这边齐头并进，对岸的汉口汉阳的情势，也是在朝着起义的方向发展。

由武昌逃亡出去的总督瑞澄，得知英国等外国不可能给予援助的时候，便呆在楚豫军舰上不再下船，循长江顺流而下，驶向上海。

第八镇统制（师长）张彪在逃往汉口北方的刘家庙之后，和日本军事顾问寺西秀武研商对策，寺西提供以下两点建议，供其抉择：

一、率领驻在汉口的第四十二标，由长江下游渡江，迂回进军，深夜秘密开抵武昌城下，假称参加革命，赚开城门，一口气拿下谘议局，将以前的一切责任都推在黎元洪身上。

二、放出张彪已经死亡的谣言，化名逃亡日本。

张彪迟疑难决，等待着援军。下午三时，有来自湖南的一营抵达刘家庙，但却仍难有展开行动的决心。正当踌躇莫定之际，清廷的命令下达，将他和瑞澄一同免职。

汉阳汉口归入掌握

在汉口、汉阳的同志们，得知武昌革命成功的消息，是在十一日下午四时半左右。清军当局虽然为了极度保持秘密而遮断了和武昌的交通，但仍然有一位同志渡过江去，看到了张贴在武昌城外的“安民布告”，回来报告。于是，在汉阳方面，便决定下午八时卅分一齐发难，届时，革命军首先占领了汉阳兵工厂，将大炮三门运上附近的山顶，压制住在眼底的城内地区，差不多是未经交战就造成了不流血革命的结果。

革命军自汉阳兵工厂获得武器甚多，计有成品枪械八千余枝，在装配中的九万余枝，子弹三十余万发；即将完成的大炮二十余门，炮弹约十万发。这些武器，后来拨给湖南、四川及九江方面使用，获致很大的战果。

汉口方面，于十二日天色未明开始行动，也是轻易的达成了光复任务。不过，曾经发生暴徒在各处抢劫及纵火事件，由武昌派遣援军二百人进入市区，协助恢复治安。

武汉三镇，终于归入了革命军的掌握。

历史的新页，就是从这里揭开。

策划沪杭起义

到了十二日上午六点种，武昌市内的电话线才被修复，军政府立即以黎元洪的名义向全国3[28]524发出通电，宣告武昌光复，并呼吁各地响应，电文大意如下：

“今日是我汉人脱离地狱更生之秋，满奴恶孽贯盈之日矣！今元洪等为我全国父老兄弟姐妹报二百六十年之仇，雪二百六十年之耻。……全国英雄，此时不挺身而起，尚待何日？……其速起哉……”。

继之，又发表对清廷宣告建立共和国，号召清军中的汉族将士归顺等电文。

又继之，派遣胡锳代表军政府照会驻汉口各国领事宣告“所有以前清廷和各国所缔结的条约继续有效”等七项对外方针，要求各国中立。

一月之间十五省光复

武汉三镇的光复，对于清廷权威早已失坠了的中国全土，给予了决定性的冲激；迫切等待着这一天到来的光复浪潮，汹涌壮阔，在震源地的湖北省，接着就有京山（十二日）、汉川（十四日）、沔阳（十七日）、宜昌（十八日）陆续光复；二十二日，更及于湖南省长沙、陕西省西安；自武昌起义一个月之间，已有十五省先后光复，树立了军政府。

蒋总统和张群等人离开日本高田回到上海，是在十月三十日，碰巧正是他虚岁二十五岁的生日前夕。此时，尚在武昌首义之后不到三个星期，革命军方面，担任总指挥的黄兴等人刚才到达武汉；已经光复的省区，也才只有湖北、湖南、陕西、山西四省。

等候着蒋总统归来的，是在家乡浙江省杭州的平生第一次作战。

总统赴杭领导武装行动

蒋总统一回到上海，首先就去拜访陈其美。陈其美所策划在上海和杭州同时举义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完成阶段。

陈其美对蒋总统指示，立即前往杭州，加入当地同志的行列，担负起武装行动的领导任务。旅途劳顿，未暇休息，就和黄郛、陈泉卿等人驰往杭州。

杭州距离出生之地的奉化县溪口镇不过一百三十公里，蒋总统不克归省在故乡的母亲王太夫人和长兄锡侯，但寄去诀别家书，决心身殉革命。

王太夫人特地派遣专人带来复信，勖勉“死生一视于义，毋以家事为念。”

这时，由陈其美所领导的作战行动，已经展开。

陈其美接到武昌发难的密电之后，迅即于十月十二日到达杭州，和潜伏在当地新军内的同志顾乃斌、褚辅成、童保暄等人，交换了具体意见。

接头之后，陈其美为了策划在上海起义的准备工作，暂时回去；过了一星期，又派姚勇忱代表前来，继续协议。

作为起义的主力，是属于潜伏在新军第八十一标（团）和八十二标内的革命同志们。由于这两支部队都驻防杭州城外，所在位置，不够方便；加上防范革命的清军当局控制着武器，每一士兵分配子弹不满五发，而相对地防守城内旗营的满人部队，则火力优裕，并且在军械局派驻多数兵力担任守备，很难期待在一开战时就能将之夺取过来——可见在军力方面，反革命势力实则居于压倒性的优势。

决定作战计划

蒋总统到达杭州之后，便和顾乃斌等人分析战况，决定了起义行动的大致计划如次：

一、以驻屯在城内的宪兵司令部执事官童保暄同志为临时总指挥，开启城门。

二、在杭州北方的第八十一标及马队、炮队，由该标代理标统朱瑞率领，自艮山门入城，攻击军械局及旗营。

三、在杭州南方的八十二标及工队、辎队，由该标标统周承英统率，自凤山门入城，攻击抚署。

四、此外，编组“先锋敢死队”，由蒋总统统率，分为两支，配合南面第八十二标的一支由蒋总统和张伯崎、董梦蛟指挥；配合北面第八十一标的一支由王金发指挥。

蒋总统在这个计划决定之后，立即回到上海，向陈其美复命，并领到经费洋银三千六百元，送给在杭州的褚辅成。

至于在上海的重要工作，则为募集敢死团的兵员，应募者很快的便超过了一百人。

十一月三日，率领这一百多人，回到杭州，分住在奉化试馆及仁和火腿店内待命。

当天深夜，令人兴奋的消息传到了杭州——“陈其美已在上海发难，光复在即。”

沪杭起义是重要关键

上海、杭州的奋起，具有左右革命军全盘战局的意义。因为自从武汉光复之后到这个时候，虽然在长沙、西安、九江等地也已经革命成功，但清军出动全力反扑，十一月一日，在汉口的革命军就已被清军冯国璋部打败，发生了汉口失守的事态。

清军乘势沿长江进袭，更出现了革命军有被全面压制的危机，如其果真那样，则在武昌点燃的革命火焰，势将为之熄灭；是故在上海、杭州的起义能否成功，实际是关键着中国革命的命运，绝对不许失败。

得到上海发难的消息之后，杭州方面便在深夜集合同志，举行紧急会议，结果，预定在第二天（四日）深夜按照既定计划展开行动。

临时司令部设置在清泰车站。

敢死团每十五人为一队，编成五队。由于参加的人过于踊跃，武器不敷分配，每队只能有十人配备手枪，五人携带炸弹。

民众参加革命

起义的时候，一刻比一刻接近。

蒋总统于出发之前，在奉化试馆对队员们激励如左：

‘我们的革命，孰胜孰败，并不能根据数字来决定，革命军应该以一当百，我们这一百个人能够和一万个敌人战斗；还有，时机也是得胜的重要因素，这个时机，现正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终于面临了第一次的战争。

‘出发之际，将配合于第八十二标之三队先锋集合，先述革命宗旨，指示敌人方向，说明一切任务，宣告赏罚条例，然后发布口令（“独立”）暗号，是夕钟鸣句半，由陈泉卿、庄新如、蒋着清、陈钦安诸君分发子弹，配备粮食……’（注一）

第八十二标自营地南星桥出发，以杭州城为目标。敢死团则在先出动，排队进军，纪律整然，由望江门进入城内，立即向抚署进攻。

‘先由陈济汾、沈筱九二君投掷炸弹于署侧，主力部队随即接应攻击，第八十二标队伍亦相继前进，霎时弹声震地，火光烛天，署中卫兵，闻警奔溃，全城克服，在此一战。’（注二）

尹氏姐妹身先士卒

敢死团涌入抚署，此中有尹锐志、尹维俊姐妹等女性，尹维俊手持炸弹，身先士卒，冲进抚署，勇逾男性；抚署卫队，未加反抗，仅有清军教练官施放机关枪一排，立即被其士兵制止而投降。

由敢死队领先进攻的革命军，突破层层门户，一举攻占抚署大堂，巡抚增韫由屋后垣墙间隙逃出，藏身马槽，但被革命军逮捕，囚于市内福建会馆。

另一方面，由市北笕桥出发的八十一标革命军，则拿下了军械局。在天明之前，革命军差不多已经控制住全市。革命军各队在军械局附近会师，转移目的以攻打旗营为目标；城内的商店街则已经插出白旗，书写“欢迎”二字，迎接革命军。

沪杭光复鼓舞人心

由满人编组的旗营，抵抗激烈，战事延续到傍晚，革命军于下午四时在城隍山构筑炮兵阵地，开始发炮攻击，旗营才接受革命军的招降劝告，同意解除武装，已经是在当天的深夜。3[34]530于是，立即推戴汤寿潜为都督，成立军政府，宣告杭州光复。

上海方面，由于陈其美奋不顾身的行动，也已经在前一天（四日）光复。陈其美于三日夜晚攻击重要目标的江南制造局时，为劝说对方投降，一时暂停进攻，竟然不带武器，冒险单身进入制造局，结果反遭拘禁，锁在室外楹柱上，将被处斩；潜伏在制造局内的同志，见到这个情况，乃将围墙捣毁，引进革命军攻占制造局，救下了陈其美。

在上海的革命行动中，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不仅由同志组成革命军，而且有民众所自动编组的“商团”也参加了革命，其人数达到五千之多，虽然只是以短刀等类为武器的集团，但毕竟显示出民意所在，是达成光复使命的最大推进力。连优伶夏月珊等人也率领了同伴数十人，以短刀棍棒为武器，演出了冲进制造局的场面。

上海的“商团”参加革命，创下先例；后来，在各地也陆续出现了“学生军”、“女子北伐队”、“少年社”等义勇军。

浙江、上海的相继光复，对全国人心给予了极大的影响。

以杭州为首府的浙江省，早就是革命活动极其盛行的地区～～一九○七年七月，有“鉴湖女侠”之称的女性同志秋瑾起义失败，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辞世绝笔，然后被处死事件，成为中外迅速传述的话题。又在武昌起义的前一年，剪辫子运动扩展到全省，清廷对之，束手无策。

此外，当时的上海，已经是世界性的交通枢纽，言论机关也相当发达；上海的动向，已成为在国际间衡量全中国动向的重要准据。上海落入革命军之手，在国外也是一个大新闻。

从军事方面来说，上海又是清廷海军的根据地，由于上海光复，海军也表明了为革命效力的态度。

在浙江和上海的光复成功，使革命号召传布到全国的情势，形成了决定性的归趋。

总统功成不居

蒋总统在杭州方面的行动告一段落之后，立即回到上海，协助陈其美整编革命军，维持治安。上海商团捐助了四万元，以这一笔钱为经费，组织沪军第五团，负责训练士兵。这是在革命军之中经过招募、训练的第一支队伍。中华民国成立后，这一支队伍编入正规军，番号为陆军步兵第九十三团。不过蒋总统担任团长的职务，只有几个月，便因为再度前往日本，而交给自保定振武学校以来的同学张群继任。

当时的心境，曾经于写给在杭州生死与共之顾乃斌的信中有如下表示：

‘革命破坏已毕，建设方始，自知才力不逮，因渡扶桑，以就旧案。足下加我以“功成不居”之名，闻之愈不自安也。’（注三）

注一：蒋总统-“为杭州光复记复顾乃斌书”（一九一二年）

注二：（同前）

注三：（同前）

东三省的状况

在这里，又得涉及到一点东三省的状况。

被辛亥革命所震憾的奉天（沈阳），这个时候，有一位“军阀之雄”登场；在后来的中日关系中，背负着复杂的任务——他就是张作霖，以炸弹和恫吓为武器而发迹。

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最初打算响应的，是新军第二混成协协统（旅长）蓝天蔚、奉天省谘议局议长吴景濂等人。当时，奉天省会沈阳是由中路巡防营（中部地方警卫队）担任警备，碰巧其中一部分兵力调往北方的铁岭，沈阳守卫力量减弱；距离最近的部队，则祇有蓝天蔚所率领的第二混成协，颇有一鼓作气占领沈阳的可能。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察觉到这个动向，打算调动驻屯在距离沈阳北方约一百八十公里辽源（郑家屯）的后路巡防营前了增防；后路巡防统领吴俊升，行伍出身，想必信赖得过。

张作霖趁机进入沈阳

然而，在这个命令还没有下达给吴俊升的时候，前路巡防营统领张作霖已经先就得到消息，张作霖的部队驻在必吴俊升更北更远距离沈阳约四百公里的洮南，可是他留在沈阳的心腹部下张惠临打听到这个情报，迅速向他报告。

张作霖认为这是掌握进入东北中心地区沈阳的绝好机会，便立即率领所辖步、骑兵七营的大部队，于十月十三日晚间乘火车连夜赶往沈阳。

火车在中途经过了吴俊升防地的辽源，不了解情况的吴俊升还曾出迎，并且招待早餐；张作霖诿称在沈阳的家里有些私事，要去处理，敷衍过吴俊升之后，迅速赶到了沈阳。

迫于紧急情势而深感不安的总督赵尔巽，对于口称“担心大帅处在危境，故而不俟命召赶来”的张作霖，颇为感激；两天之后，便发表他兼任中路巡防统领。于是自告奋勇抢先一步的张作霖，便成了兼统中路、前路巡防营的地方军之雄，而且受到委任负责冲要之地沈阳的防务。

赵尔巽仍然支持清廷

十月二十二日，赵尔巽召集在沈阳的将领，举行会议，商讨应付时局机宜。在此之前，蓝天蔚以及张绍曾（第二十镇统制）、卢永祥（第三镇代理统制）等新军干部已有集会，协议之后，主张发表“东三省独立宣言”，而赵尔巽则在所召集的会议中提议拥护清廷，以固国本。

蓝天蔚等人沉默不言，不加理睬，会场的气氛非常沉重。

赵尔巽继续地说：

“谁赞成我的意见，就请举手。”

这个时候张作霖走入会场，手里拿着用布巾包着类似两个球状的东西，就像炸弹一样。

他没有放下“炸弹”，就那样举起双手，表示赞成。

尽管这样，可是新军方面各将领还是没有跟着举手的意思。张作霖徐徐地站立起来说：

“今天，我们所有在这里的人，都会成为灰烬；谁也休想逃出去。”

由于他说出这么一句话，全体的手都举了起来。

十一月十二日，谘议局议长吴景濂再行召集会议，议题是组织“奉天国民保安会”，推戴赵尔巽为会长，脱离清廷，宣告独立。

赵尔巽反对独立，拒绝担任会长。吴景濂还是逼紧一步说：“革命没有商量，没有妥协；为了革命，我吴景濂是不计生死的。”

此时张作霖要求发言，他坐到吴景濂的对面，拔出手枪放在桌上说：

“我张作霖是有人就有枪，有枪就有人，为了东北地方的事，我天不怕，地不怕……”

还没有听完他的话，吴景濂就不再坚持了。

“独立宣言”，就这样简单地被埋葬掉了；结果只是做到把清廷的“黄龙旗”降下来，更换了“黄色旗”，既谈不上“光复”，也谈不上“独立”，而产生了一个“奉天国民保安会”。赵尔巽在张作霖的护卫之下，就任了会长。继此之后，吉林、黑龙江两省也接着成立了“保安会”，都是以原任清廷巡抚的人担任会长。

在这个时候，赵尔巽等人还在打算以武器支援清廷，计划对于在河南省的清军运送枪械一万枝，子弹一千万发。

日本方面，也非常注意赵尔巽等人的动向。有关订购武器情形，在当地的日本领事馆曾向外务省提出如下的报告。

十月十九日，驻奉天总领事小池张造第三二六号报告：“赵总督向德国订购以在两个月内送达当地为条件的军械三万五千枝（每枝代价五两）、子弹五千万发。总督方面极端保密。此外，又向日本三井物产订购炮弹一万发，枪弹三百万发，下士用军刀三百把。”

十一月二十一日，驻齐齐哈尔领事井原真澄第三十八号报告：“据俄国领事谈到赵总督和俄方接洽购买五连发枪械三千枝、子弹三百万发；目前，此间并无使用这样多武器弹药之必要，诚属费解……想必其目的是要由此地经过蒙古送达北京。”

张榕蓝天蔚等的活动

在革命党方面，则以曾经策动东北独立运动的张榕为中心，在奉天组成“急进党”；还有，蓝天蔚以大连、烟台为根据地，计划策动在辽阳、长春、沈阳等处发难；但受到了张作霖等人的镇压，张榕终于被杀害。

在这样的混乱情势之下，居留奉天的日本人，编组“外交义勇团”，持有武器，担任自卫。

张作霖就是这样地以武力为背景，在东三省伸展了他的势力；后来，和日本军阀勾结，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之雄。

国父致力外交

当时，孙先生正由美国西部前往中部，从事筹募革命经费的活动。十月十一日傍晚，抵达柯罗拉多州的典华城，住进旅馆。

在十多天以前，曾经接到黄兴由香港打来的密码电报；但因为密码本放在行李中，已先运往典华，于是，在抵达旅馆之后，立即查译，得知是要求从速汇款，其内容如下：

“居正从武昌到港，报告新军必动，请火速汇款应急。”

居正当武昌起义的计划决定之后，为购买手枪前往上海，由上海托同志带信到香港转给黄兴，告知大致的计划，请准备经费，并请黄兴本人也来武昌。

可是，孙先生在译出电报的当时，手头并没有现金能够立即汇出；加以旅途过度疲劳，想到只有等到明天再打电报去劝他们暂缓发难，遂即就寝。

阅报得知武昌光复

第二天早晨醒来，已经是上午十一点钟，经过旅馆走廊，买了一份晨报，走进食堂打算吃一顿过了时的早餐，不料翻开报纸，竟有这样的标题赫然映入眼帘：

“武昌为革命党占领！”

孙先生最初的反应是立即驰赴太平洋岸，还返上海，亲自指挥革命战争；这样的话，则在二十几天之后便可参加战斗行列。然而继又想到革命火焰既已点燃，则可以付托在国内的同志们负责，自己不如从外交方面致力，因此，乃给黄兴打了一个电报，告知前往英、法两国。

对于这次革命，列强国家究竟反应如何——是站在支持清廷那一边呢？还是对革命军有所同情呢？这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而且还得设想到他们或许会藉口维持治安，而有出动驻在中国境内的外国部队干涉革命之可能。在列强之中，最值得警戒的是日本的动向。日本方面，民间人士显示对革命同情；但其政府的态度，则可以从遣送孙先生出国的情形看是偏向于清廷的那一边。为谋对日本有所牵制，所以孙先生意图先说服和日本缔结有同盟关系的英国。不过当时，英国还在观望日本的动态，政府的政策迟疑未定。如果英国能够站到革命军这一边来，则日本也就会从国际关系的力量来考量，而不再对革命军有所阻碍。

国父避与记者见面

由典华城往纽约途中，于十月十五日在芝加哥举行了“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此时，美国报纸频频刊载出孙先生的姓名，报导他将膺选共和政权的中国总统，故而在这个大会时，有记者十多人涌到会场，要求孙先生见面，但孙先生都避开了。

十一月二日孙先生由纽约乘茅里塔利亚轮船前往伦敦。

世界舆论支持革命军

世界舆论，现在已经倾向于支持革命军。十月二十一日的“民立报”（在上海发行的同盟会机关报）曾经介绍欧洲的新闻论调：除“泰晤士报指出列强不得干涉中国革命”之外，其他各主要报纸的见解如左：

每日邮报（英国）：“只要不侵害欧洲人，则不应加以干涉。即使侵害了欧洲人，也应该由列强海军联合行动，没有为满洲政府维护权利的必要。革命是中国的内争，外人不应干涉。”

每日记事报（英国）：“可怕的是再有像太平天国之乱时，追随清廷的高登将军那样的人物。被虐待的人民反抗腐败专制政体，是由于爱国；在满洲政府野蛮政体之下的中国，就连欧洲人也是目不忍睹；正义的欧洲人，决不应该做满洲政府的走狗。”

每日电讯报（英国）：“剥夺了中国人的教育和自治权利的衰老政府，自当消灭。大大欢迎革命党，拯救国家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只要是人类，就不会不表同情。中国人既不是愚昧，也不是无能，在几天之内，就可以看到中国共和政体出现。”

辩论日报（法国）：“列强丝毫不应干涉。如果中国分裂为两国，则两面都不会有好结果。”

孙先生到达伦敦之后，在旅馆卸下行装，便于当晚往友人吴敬恒家中拜访，吴不在家，孙先生在当时的留书中，坦诚地流露出愉悦的心情：“……近日中国之事，真是泱泱大国民之风，从此列强必当刮目相看，凡我同胞，自当喜而不寐也。今后之策，只有各省同德同心，协力于建设，则吾党所持民权、民生的目的，指日可达矣。”

交涉冻结英对清借款

孙先生和英国政府的交涉目的之一，是借款问题。

在这一年的春天，清廷曾和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之间商订了两笔借款。一笔是为整顿币制的一千万英镑，一笔是为铁路国有化的六百万英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就是这个铁路国有化问题，激发了反对清廷的群众运动，并且连锁反应，导致武昌革命成功。

铁路借款，虽已发行债券，但整顿币制借款，尚未动支。孙先生的目的，是要将这些借款就当时现状予以冻结，以切断清廷资金的来源；同时也是保护马上就要诞生的中华民国的权益，存在着双重意义。

争取国际地位

担任孙先生的代表，在英国积极折冲，得以获致成果的人物，是美国的军事学者荷马李。自一九○四年和孙先生认识以来，便成为孙先生在美国的有力臂助。他以军事著作驰誉欧洲，德皇威廉二世委托考察军事演习，又得到英国劳勃特将军（历任驻印度及爱尔兰英军司令官）的信赖，曾为英国的亚洲政策接受谘询。

而且早在那个时候，荷马李就已曾指出日本在亚洲的侵略意图；认为美国如果疏于防范，则最后将被日本所击败。

英同意停止予清借款

和英国外相葛雷交涉的结果，达成了以下三项约定：

一、停止对清廷的一切贷款。

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

三、取消各处英属政府对孙先生的放逐令，以便顺利归国。

于是，四国银行团乃依循英国政府方针，同意停止给予清廷的借款，并决定今后在新政府树立的同时，再进行新的交涉。

孙先生和英国政府交涉的内容，除上述三项之外，还有两项，不为世人所知道，其真相是这样的：

给予新政府一百万英镑借款。建议新政府和英国政府合作。这两项交涉，委由维加兵工厂负责人杜逊为代表，和外相葛雷之间，于十一月十三日、十四日两度磋商，葛雷面有难色，终于未见实现。

不过，停止对于清廷借款的交涉成功，却给予清廷一个致命的打击。清廷苦于战费支出，由两江总督张人骏等在武昌起义的三天之后，一度向西欧列强借到五百万两，但只不过支应了十来天，便马上用罊，到处奔走接洽，希望再谋追加新借款二百万两，其财政窘迫的景况，可想而知。

至于通过和英国的交涉，封锁日本对清廷援助，其作用盖不仅止于日本一国，实则产生了抑制列强各国干涉革命的国际影响。

在法说明新政府方针

孙先生在和英国政府交涉之后，转往法国，和当时的总理克里孟梭及外长毕恭接洽。克里孟梭早就相识，毕恭曾经出任公使，持节北京，精通中国问题，认为同盟会是握有足以推翻满清政府力量的政党。

此外，孙先生还有意晤见刚巧来到巴黎访问的俄国外相柴苏洛夫，但未能实现。

法国的舆论分成两派——左派欢迎孙先生；而在右派之中，则有“中国革命如果成功，将成为西欧黄祸”的中伤论调。针对着这个情况，孙先生在接见新闻记者时，说明了新政府的方针如次，用以答复右派的批评：

“中华共和国拟维持官话（国语），以为统一语言之基础，而使国人研究各种实业科学，尤为新共和国行政之入首方法。英、法文亦可加入各种科学中。中华共和国现当训练国军，及组织民国完全之财政部。新政府于各国通商一层，更当注意，当废除与外人不便之种种障碍物，将海关税则重行改订，务使于中国有益，不能听西商独受其利；但重订税则，亦须与西人和衷商议，决不使中国及债主陷于困难也。”

这是维护新中国独立尊严，和争取国际社会地位平等的呼吁。

如上所述在英、法两国活动的成果，当时孙先生曾经自巴黎致电上海“民立报”表示：“……各国中立之约甚固。惟彼邦人士半未深悉内情，各省次第独立，略致疑怪……”

但求早固国基

在这个电报中，孙先生也曾涉及到总统人选问题：

“今闻已有上海会议之组织，欣悉总统自当推定黎君（元洪），闻黎有拥袁（世凯）之说，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固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我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

后来，震撼中华民国的总统人选问题，已经是在此萌芽。

关于总统人选问题，有一段逸事，足以看出孙先生信念之一端，现在介绍于后：

当孙先生到达伦敦的时候，由中国打来一份电报，受报者的姓名、住址，只有“孙文、伦敦”，电报局查不出投递地点，乃以红笔标明“试送清国驻英公使馆转达”，公使馆收到之后，便转送给孙先生友人，也就是曾经援护孙先生脱出公使馆监禁的康德黎。

孙先生收到电报，在眼前晃了一下，含着微笑，丝毫未动声色，就装进了口袋；康德黎不懂中文，当然不明白电报内容，有点挂在心头，第二天便向孙先生问起：“有什么秘密事情吗？”孙先生淡淡地答称：“要我担任新共和国总统。”

当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毫无愉悦的表情，康德黎追问一句：“有意就任吗？”

孙先生这样地回答：“如果没有适当的人，则由我承乏，也未尝不可……”

汉口苦战

当孙先生尽力于对外折冲的时候，留在国内负责的黄兴，从筹募革命经费到阵前指挥作战，集重任于一身，相当活跃。

及至武昌发难，黄兴在香港拍发电报给孙先生，请汇款接济军费，已经在前面提到；继之，于一九一一年十月十六日致函巴达维亚（印尼雅加达）华侨书报社同人请即汇款，其内容大致如左：

“……十月十一日鄂军又起，克服武昌，川湘皆力相应……因尊处未有密码，借由邓树南兄转达一密电，不知可到否？……想同人等必能竭力筹措，以应急需……今幸基础已立，力图北伐，而南方沿海各省不急起不足以固后路。敢飞书求助，立汇钜款，协谋图粤，弟即日赴武昌……粤事归汉民兄等主持，当必常有消息相告。前尊处两此所寄来之款，共一千五百元，兹由出纳课出具收单呈上……弟黄兴顿首。”

翌日（十七日），黄兴又对设在美国的募款组织“洪门筹饷局”发出一函，提到此次武昌革命，确信必能成功，时不可失，特吁请海外同志尽力相助。

黄兴驰赴武汉前线

这封信发出之后，黄兴便偕同夫人徐宗汉由香港启程，于二十四日到达上海。在上海的宋教仁等人起初建议黄兴留在南京，运动新军第九镇，一力承担起江南方面的革命任务；但因汉口方面，革命军已经遭遇到清军的强力反攻，展开激战，因此，黄兴在和同志们协商之后，决定偕宋教仁驰赴武昌前线，指挥战事。为了瞒过清军耳目，乃混入女医张竹君所组织的“武汉战地红十字会救伤队”出发，徐宗汉也化装为救伤队的护士随行。日本人北一辉也参加了这个行列。

轮船溯长江而上，于二十八日到达武昌，在武昌布阵的革命军和推进到汉口的清军隔江对峙，正展开炮战中。

湖北军政府排列了军乐队在江岸边的汉阳门迎接黄兴。由汉阳门到军政府沿途居民，鸣放爆竹欢迎。

当天夜晚举行会议，决定出兵增援汉口，发动反攻，同时推举黄兴为革命军总司令。反攻部队由选拔自各机关、各部队受过训练的优秀士兵及战斗意志昂扬的学生一千多人所构成，用黄兴的性制作了大书“黄”字的军旗。

清廷派冯国璋等反扑

革命军好不容易有了总指挥官，自发难以来已经过了半个月，革命军的士气虽然因此而为之一振，但战局却进入了颇为严重的阶段。

先是在十八日，清军第八镇统制张彪得到了由河南开拔来的援军，并收容残败官兵，计约二千兵力发动反攻，由东北方面向西南推进，企图夺回汉口，已经侵入刘家庙停车场及度支部造纸厂附近，但革命军经过两天激战结果，将之击退。

然而，清廷更于二十五日任用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段祺瑞为第二军总统，策划反扑。冯国璋指挥大军沿京汉铁路南下，革命军在刘家庙迎击，展开殊死战斗，但因被清军的优势火力以及四艘军舰自江面上发炮所压制，而终于失掉了刘家庙的阵地。

当黄兴到达汉口的二十八日，战火已经迫近到汉口市街北侧沿铁路一带。

在清军压倒优势的兵力之下，革命军逐渐支撑不住，节节败退；乃自武昌方面派来居正、蔡济民、吴兆麟等人，指挥战事，但都不能挽转劣势；三十日，铁路北边已经被清军控制，连汉水对面的汉阳，也都暴露在清军炮火的威胁之下，三十一日，清军企图冲入汉口市区，但革命军拚死遏阻，未使得逞。黄兴亲率敢死队上阵

黄兴在战局如此恶劣的时刻，于二十九日到达汉口，设立了总司令部，视察阵地之后，为了要遏止士兵逃散，稳住阵脚，重整士气，乃试图发动一次猛烈反攻。

可是，比起革命军行动更快的，是清军方面已经抢先于一日上午六时展开了总攻击。

这是决定汉口命运的一战，黄兴亲自指挥敢死队上阵。

他在日本学过剑术，手持日本军人所增给的日本刀，对部下高呼“退者斩！”——实际上曾经手刃数人。

但毕竟是众寡不敌，在清军重炮轰击及机关枪扫射之下，首先是革命军的右翼阵地于上午十时易手，清军冲入市区纵火，革命军全面溃乱。黄兴撑持到下午二时，终于不得不发出撤退命令。冯国璋估量到扫荡潜藏市区的革命军非常困难，于是在全市纵火焚烧，出来救火的市民们，也有被清军射杀的；烈焰延续三天，汉口街道化为焦土。

尽管如此，但革命军的士兵们，还是以市区西边的桥口为阵地，支持到第二天，下午六时才将防线移转到汉阳。

这是一场惨重的失败。

黎元洪登坛拜将

汉口为什么会陷落到敌人的手中呢？

十一月二日晚间，乘轮船经过汉阳回到武昌的革命军总司令黄兴，在当夜举行的紧急会议中检讨失败的原因，做了如下的结论：

新兵太多火力不足

一、革命军新兵过多，难以指挥。加以军官程度太低，多不站在前线指挥作战。

二、革命军士兵多在武汉附近招募，夜晚私自回家，战斗员因而减少。

三、火力相差悬殊，革命军只有步枪，没有机关枪；炮队又只是山炮，炮弹发射出去不能开花；和清军的“管退炮”（德制新式战炮）比较，射程也差得多。

再加上清军是久经训练，着有名气的北洋军，秩序较佳，装备优良，及射击准确，都超过革命军；只是在突击战时的机动性较差，一听到革命军冲锋喊“杀”！便望风披靡——革命军之所以能倚仗之处，也就只有这么一点而已。

然而，在脆弱的革命军方面，却增加了一批可靠的援军。

京沪学生赶来投效

正当汉口被清军夺回的十一月一日，恰好有留日学生和在上海、南京的学生约三百人自动自发的乘日本轮船“大利丸”赶来武汉，他们都剪去了辫子，充满着献身革命的热忱。

这些学生们的从军状况，在陈果夫（注）的著述中留有纪录。陈果夫当时二十岁，肄业于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在学堂里和同班同学三、四十人组织同盟会分会，因被当局发觉，乃往上海，和宋教仁洽商之后，决定到武汉去从军。现在摘录他的纪述如左：

“我们到了武昌，就去军务部看部长孙武，他对我们说，汉口战事不利，汉阳前一天兵变，无兵驻守……你们愿意去汉阳吗？于是，他就给我们一张手条。

“又命该部发给我们一张护照，我们立刻动身……到达汉阳的司令部……晚上点查到汉阳的全部人员，总共不过三十余人……守兵听说汉口失守，哗变而散……”

拜黄兴为战时总司令

汉阳的革命军，面对强大清军，简直可以说是风前之烛。军政府为了重建革命军体制，乃于十一月三日重新任命在汉口战役中曾任总司令的黄兴为“战时总司令”。

军政府都督黎元宏，效法历史上汉高祖拜韩信为大将的故事，举行登坛拜将之礼，将坛上竖立“战时总司令黄”大旗，迎接黄兴登坛，举行盛大阅兵及庄严任命典礼。

于是，黄兴乃掌握了湖北全省军队，负责指挥。司令部设于汉阳西门外昭忠祠内，军事顾问之中，有萱野长知等日本人。

在这里我们得转移一下视线，看看清廷方面的动态。

清廷犹图掩饰苛政

在北京的清廷，得到武昌起义报告，是在十月十一日下午一时。

翌日（十二日），下诏解除自武昌“敌前逃亡”的湖广（湖北湖南）总督瑞澄的职务，并命令陆军大臣荫昌率领陆军两镇（两个师）负责镇压革命军。同时，饬萨镇冰指挥海军、程允和指挥长江水师驶往湖北，协助荫昌的军事行动。

当时，清廷是将失败的责任诿由瑞澄一人肩负，诏命的内容是这样的：

“此次兵匪勾通，蓄谋已久，乃瑞澄毫无防范，预为布置；竟至祸机猝发，省城失陷，实属辜恩溺职，罪无可逭。湖广总督瑞澄着即行革职，带罪图功，仍着暂署湖广总督，以观后效。即责成该署督迅即将省城克期克服，毋稍延缓，倘日久无功，定将该署督从重治罪………”

继之，又于二十六日，下诏指斥担当铁路收归国有任务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违法渎职，激生变乱，加以“罔上欺民”之罪，予以革职，其内容如左：

“资政院奏……据称：祸乱之源，皆邮传大臣盛宣怀欺蒙朝廷，违法敛怨，有以致之。该大臣手握交通机关，不惜专愎擅权，隔绝上下之情，于应交院协议、交阁议决之案，一切不顾……单衔入奏，罔上欺民，涂附政策，酿成祸阶……又将施典章等所亏倒数百万，弃置不顾，怨苦郁结……川乱既作，人心浮动，革党叛军，乘机窃发。该大臣实为误国首恶……盛宣怀不能仰承德意，办理诸多不善。盛宣怀受国厚恩，竟敢违法行私，贻误大局，实属辜恩溺职，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为情势所迫的清廷，就像蜥蜴断弃尾巴一样地陆续牺牲重臣瑞澄、盛宣怀，来掩饰清廷本身积年累月的苛政，以为自保之计。

在牺牲重臣的同时，另一方面又起用了一个人物——就是袁世凯。

实际说来，站在清廷那边，但却对于武昌起义的发生唯一怀有幸灾乐祸心情的人，也就是这位袁世凯。因为这是他多年来企图攘国家为己有的野心得以实现的时机到来了。

注：陈果夫（一八九二～～一九五一年）浙江省吴兴县人，陈其美胞侄，南京陆军第四中学毕业，日本留学；归国后，任黄埔军官学校教官，受知于蒋总统，倚为智囊；其后历任监察院副院长、江苏省政府主席、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一九五一年在台北病故。

袁世凯趁机而出

袁世凯前在一九○九年一月，因拥有重权受到摄政王戴沣的忌刻而被罢职，退隐于河南省彰德府洹上村。可是，军机大臣时代在北洋陆军六镇内所培育的潜在势力，却仍然健在不衰；他经常和在北洋陆军中的部下保持联络，窥伺着再起的机会，对清廷中枢也还有其影响。像荫昌所统驭的南下部队，就是由袁世凯的老部下们在指挥，清廷虽然授权荫昌为统帅，但实则是在袁世凯的遥控之下。

授给冯国璋的策略

当荫昌的部队奉到开拔命令的十月十二日（一九一一年），袁世凯的心腹冯国璋（二十五日膺任第一军总统）便专赴洹上村谒袁，请示机宜。

袁世凯授给的策略是：“慢慢走，等等看。”照着这个话，南下部队以准备出发而拖延时间，并没有遵照荫昌的意旨行动。

然而，面临了燃眉之急的清廷，此时除袁世凯之外，再也没有可以倚为援手的人；所以在武昌起义之后的第四天～～十月十四日，便决定起用原已放逐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的方针，要求他统驭各军对抗革命军。可是袁世凯并不肯轻易受命，他因为看透了清廷处于困境、束手无策的弱点，故而自高身价，以“足疾”为理由辞谢清廷的诏命。所谓“足疾”，也就是在两年前载沣将他“开缺回籍”时的藉口。

在往来电报中作手脚

表面上虽说是辞谢了诏命，但暗地里却在进行着必要的措施，其手法之一，是检查军方的电信。

北京的清廷和荫昌的部队之间，往返电报，都经过了袁世凯所隐居的洹上村，其内容有被增删窜易再发送出去的情况。因为洹上村是位于联系北京和汉口的京汉铁路中途，恰好有做这个手脚的便利条件。

这个事实，到后来才被弄明白——荫昌军中的副官长丁士源对于来自清廷的电报过少颇为诧异，乃和陆军部副大臣寿勋会面，核对双方电报，才发觉到竟有这么一回事。袁世凯深居不出，却对一切情况暸如指掌；而且只要笔底下一转，就左右了战况报告和命令。

袁世凯的用心

关于3[65]561的这种态度，下面还有一个小故事：

袁世凯的心腹杨度（后为袁内阁学部副大臣、民国之后拥袁称帝），由于摸不透他的心理，向他探询，他大笑地说出这么一番话：

“哲子（杨度别号）……你知道拔树的办法吗？马上就用猛力去拔，是不可能把树根拔起来的；过分去扭，树就会断折。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左右摇撼不已，这样做，才能使树根松动，然后不必用大力，就可以拔起来。清朝是棵大树，而且是三百多年的老树，不是容易拔得起来的。

“闹革命的都是些年轻人，血气方刚，但却不懂得拔树的方法；反过来说，主张君主立宪的人，固然懂得拔树的方法，却没有力气。我今天这样，看来是在退隐；但实则一直是在摇撼大树，现在树根四周的泥土已经开始松动，大树不久就会被拔起来了。”

十八日，清廷再度对袁世凯发给敦促就任的电报如下：

“电寄袁世凯：现在武昌、汉口事机紧迫，该督夙秉公忠，勇于任事，着即迅速调治，力疾就道，用副朝廷优加倚任之至意。”

在发出这个电报的同时，内阁总理大臣奕劻更派遣协理徐世昌由北京前往袁世凯的隐居地，迎接他出山。

清廷接受袁世凯六条件

正在等候着的袁世凯，接受了这样的三顾之礼。二十日，便通过徐世昌向清廷提出了以下六项条件：

一、明年即开国会。

二、组织责任内阁。

三、宽容此次参加起义的人。

四、解除党禁。

五、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

六、须支给十足的军费。

前四项条件，是对于立宪派和革命党的怀柔策略；后两项则是袁世凯本人抓军事实权的步骤。

清廷无法拒绝袁世凯的条件，乃将他从当初预定任为湖广总督的职位升格为钦差大臣，于十月二十七日发表任命，把统驭陆海军及长江水师的全权都交给了他。他在一切都依照自己的意图推动之后，这才伸起腰板，站了出来。

宣统的“罪己诏”

十月三十日，清廷以宣统皇帝的名义“下诏罪己”，内容是这样的：

“朕缵承大统，于今三载……而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政地多用亲贵，则显戾宪章；路事（铁路）朦于佥壬，则动违舆论；促行新治，而官绅或藉为网利之图；更改旧制，而权豪或祇为自便之计；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驯致怨积于下，而朕不知；祸迫于前，而朕不觉……区夏沸腾，人心动摇……此皆朕一人之咎也。兹特布告天下，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凡法制之损益，利病之兴革，皆博采舆论……”

大树已经到了自倒的时候了。

发展个人权力

袁世凯于十月三十一日到达河南和湖北交界的信阳，接替在此之前由荫昌所担当的指挥任务。

司令部原来设在汉口西北方约五十公里的孝感；袁世凯鉴于荫昌和孝感地方的官绅们关系非常密切，感到不大相宜，乃将之移设于稍在北方约三十公里的花园。

向武昌军政府游说

在这个当口，袁世凯对于革命阵营，也施展出他的摇撼手段。

选中的目标，是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原来黎元洪根本就的是革命分子，而是被革命军勉强抬举出来的人物。故而袁世凯考虑到设辞引诱黎元洪入壳，好一口气把湖北军政府搞垮。他在决定出山之前，就已经秘密致函黎元洪呼吁和清廷媾和；及至二十九日，又着心腹刘承恩给黎去信，大致内容如下：

“叠寄两函，未邀示覆……刻下朝廷有旨：（一）下罪己之诏。（二）实行立宪，（三）赦开党禁。（四）皇族不问国政——似此则国政尚有可挽回振兴之期也……务宜早见和平了结……暂且和平了结，再看政府行为如何……否则再行设策以谋之，未为不可……”

接到这封信之后，军政府乃于三十日举行会议，商讨是否接纳其提议。当时，孙武、胡锳主张接受和谈；但朱树烈、范义侠等人强烈反对，结果决定予以拒绝。

十一月一日，革命军失去了汉口；也就在这一天，清廷发表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及皇族各大臣载泽、载洵、溥伦、善耆等人引咎辞职。

接着是袁世凯被任命为总理大臣，他终于得偿掌握全权的夙愿。

于是，袁世凯又派遣刘承恩、蔡廷干两人为代表于十一月十日到达湖北，和黎元洪等军政府领导人见面，进行和平交涉。

可是黎元洪等人对于大权在握的袁世凯却更不敢相信，指出袁世凯会在四方安定之后，将满人赶走，篡夺帝位，故而再度予以拒绝。

暗杀吴禄贞

袁世凯攘夺大权的欲望，由暗杀吴禄贞的事件显露出来。

吴禄贞是被称为“北方之雄”的陆军部第六镇统制（第六师师长，驻奉天），素孚人望，对于袁世凯来说，是在北方的死对头，将他铲除，也就是断绝后顾之忧。

吴禄贞自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归国，得据军事要津，但却也是同盟会的党员。

当清军大举南下之后，吴禄贞在石家庄窥伺时机，并与驻滦州（河北省）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驻奉天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等人秘密筹议革命计划。又在河北省西邻的山西省，有革命派的阎锡山也在策画起义，吴禄贞单骑前往两省交界的娘子关，和阎锡山洽商有关发难行动的具体计划，决定一口气拿下防卫军力薄弱的北京。这些动态立即被袁世凯得知，于是袁世凯便收买了吴的部下周符麟（第六镇第十二协协统），于十一月六日夜晚在石家庄正太火车站举兵行刺吴禄贞，凶手们用手枪将吴射杀之后，更残酷地割走他的首级；后来，由山西同志用重金买回，葬于石家庄。

另有一说，刺杀吴禄贞，是出于清廷皇族大臣载涛的阴谋。

袁世凯率军进京

在必要的部署完成之后的总理大臣袁世凯，于十一月十三日率领约二千护兵进入北京。

据当时在上海发行的“民立报”，于十一月十五日（旧历九月二十五日）报导袁世凯入京状况如左：

“袁世凯二十三日（旧历）下午五时抵京，神气颇为清爽，随身护兵二千人，皆系新招之旧部，暂利用某庙作行辕。当其抵京时，中西人士相与欢迎与车站，沿途观者甚众，防护甚严，兵警林立……

“北京的舆论认为，如果袁世凯真正尽力，则能迅速缔结和约，实现和平。二十四日，清帝陛见。据说陆海军都将归其统制……

“各部大臣都曾到车站迎接，但皇族、贵族人士则并未参与其列。”

十一月十六日，袁内阁组成——民政部大臣赵秉钧、邮传部大臣唐绍仪为袁氏亲信；此外，立宪派重镇张謇为农工商部大臣、保皇党干部梁启超为法部副大臣。这是袁世凯拉拢立宪派和保皇派组成的联合内阁，也是反皇族内阁。

袁世凯向新闻界发表他的抱负大意如下：

“我的本意在保全帝位，实行君主立宪，以前满汉偏见，可以自然泯除；希望各党爱国人士牺牲政见，惠予协助。”

但是这个联合内阁，并未能照预定计划组成。

张謇梁启超拒入阁

被任为法部副大臣的梁启超，结束了长期间的亡命生活，十一月六日乘“天草丸”轮船离开日本，刚于九日归国。在日本首途之前，提到“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主张，显示出有和袁世凯接近的姿态；可是抵达国门就发生了变化，拒绝就任副大臣，并向袁世凯提出召开全国人民大会、解决政体问题。同时，立宪派的张謇也拒绝入阁。

这两派意图，都是为了伸张己方的势力，但反而因此造成让袁世凯发挥个人权力的结果。

议设中央政府

在另一方面，袁世凯对于革命军的策略，是既提出和平停战的交涉，同时也临之以武力的威胁。

他自进入北京的十一月十三日开始，便调动压倒性的优势兵力在汉口集结，对汉阳发动总攻击。相对地，革命军也自汉阳出兵反攻，希望夺回汉口，但被清军击退；二十七日，又失去了汉阳；于是，得不到对岸汉口、汉阳为屏障的武昌，便暴露在清军炮火威胁之下了。

然而，和战局失利的情势有所不同的，是在全国各地涌起的革命洪流，已经激荡到了无法遏抑的程度。

革命军终于到了要着手组织全国政府的时候。因为已经有十五省宣告光复，但各省之间尚缺乏联系配合，加上和注视着革命进展的列强国家在交涉方面也有些不便之处。

树立统一政府的活动，在武昌和上海两地分别进行中。

最初向全国发出号召的，是在武昌的湖北军政府。

十一月七日，都督黎元洪向业已独立的各省代表发出如左的电报：

“现在……大局略定，惟未建设政府，各国不能承认为交战团体……若各省分建政府，外国断不能于一国之内承认无数交战团体。兹事关系全局甚大，如何之处？乞贵军政府会议赐教，立盼电覆。”

这个电报，由于长江中流电信线路不通，未能到达南方各省。

黎元洪乃于九日再发电报通告“为建立联邦国家，及对外交涉，请派遣代表来鄂。”但并未能立即实现。

在此之后，以上海为中心的活动，逐渐具体化。

七处代表在上海集会

十一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汤寿潜联名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提议邀请各省代表集会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选择上海的理由，是位居交通枢纽，及为列强耳目集中之地。陈其美乃据此于十三日电请各省派代表来沪；十五日，浙江、江苏、镇江、福建、山东、湖南、上海七处代表集会，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十七日，决议以黎元洪领导的湖北军政府为“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并以中央军政府名义，委任伍廷芳、温宗尧二人为全国外界总代表，担负对列强交涉的任务。

十二省代表商组政府

黎元洪接受了这个决议，乃于二十日电请各省速派代表来鄂，商讨组织政府。于是，聚集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们，都只留下一人在沪担任联络，余人前往武昌。十一月三十日，才开始举行第一次会议，由于武昌在清军的炮火威胁之下，故而选择对岸汉口的中立地区——英国租界为会议场所，与会代表有江苏、浙江、山东、安徽、湖南、福建、湖北、广西、四川、直隶（河北）、河南、贵州等十二省，会中决定推举黎元洪为中央军政府大都督。又在三天之后，议决“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其内容包括“临时大总统”、“参议院”、“行政各部”计三章、二十一条。

依据这个大纲，临时大总统由各都督府代表选举产生，有统治全国、统制陆海军、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之权。至于参议院，则由各省都督府所派参议员（每省以三人为限）组织。而行政方面，则分设外交、内务、财政、军务、交通五部。临时大总统握有可以和美国总统匹敌的权限。至于拟议中推举出任大总统的对象，则为袁世凯。

拥袁气氛浓厚

袁世凯这个人，此时仍旧是和革命军在交锋中的正面敌人；像这样的人物，何以会颖脱而出成为行将掌握大权的临时大总统的候选人呢？这个动向背后，有在同盟会中居于领导干部地位之汪兆铭的策谋存在。

汪兆铭是在上年～～一九一○年四月，意图炸死清廷摄政醇亲王载沣而被捕，判处终身监禁；但在武昌起义后的十一月六日，获得开释。出狱后，便停留在北京，和袁世凯接近；二十七日，与袁的长子克定结为异姓兄弟，在袁府举行的盛大的祝贺宴会。

得知在武汉有各省代表集会的汪兆铭，乃派遣关系密切的朱芾煌（同盟会员）携带书信，前往武昌，书信中提到“南北达成和议，联合要求清帝退位，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这封信在各省代表会议中提出，于是，拥袁的气氛立即浓厚起来。

支持袁世凯的意见，是这样的：

清廷已经是名存实亡，今后为和为战，不在革命军和清廷之间，而是革命军和袁世凯的问题；避免更多流血的最好办法，就是把袁世凯拉到革命阵营这边来。这时，袁世凯在清廷方面已经是位极人臣，故而革命军方面得许以临时大总统的最高地位。

代表会议通过了这个主张，并决议：“在袁世凯舍弃清廷投顺革命阵营之前，临时大总统虚位以待。”

紧接在这些活动之后，南京于十二月二日宣告光复。武汉的代表会议于四日开会时议决将临时政府设置地点由暴露在战火之下的武昌移往南京。同时并决定各代表在七天之内会齐于南京，如到达十省以上，立即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

就是从这些动态中，围绕着新生中华民国领导人的问题，而萌生出了纠葛。

南北和议

在这个当口，发生了又一个问题。

当各省代表们在武汉集会之际，留在上海的陈其美、程德全、汤寿潜等人举行了武汉会议以外的另一个会议。

听到汉阳被清军夺去消息之后，在上海的代表们，认为武汉会议进行迟缓，乃于十二月四日（一九一一年）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大元帅握有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大权。

这个决定，经以电报通告各省。

当然，武汉会议方面对于上海的决定不无芥蒂，因为武汉的决议是大总统虚位以待袁世凯，并以选举方式产生。

于是，上海方面乃表示让步，黄兴辞退大元帅；重行选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可是，黄兴连副元帅也辞不就任，人事问题的混乱情况越发加深，一直继续到国父孙先生归国就任临时大总统为止。

程德全向各省征意见

孙先生原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元首的最有力人选，连外国新闻也都如此报导；至于国内方面，提倡在上海举行代表会议的江苏都督程德全早于十一月十四日便已经通电各省都督主张由孙先生组织临时政府，征询意向，电文是这样的：

“……军政、民政亟需统一，拟联东南各军政府公电恳请中山先生迅速回国，组织临时政府……中山先生为首创革命之人，中外人民皆深信仰，组织临时政府，舍伊莫属。我公力顾大局，想亦无不赞成，即祈速覆。”

各省对于这个提议，多倾向于赞成。

此时，孙先生还在欧洲，不曾因这一类电报而有所歆动，已如前述。

可是，在革命派之中，对于孙先生也有首鼠两端的人，他们放出“功则黄兴，才则宋教仁，德则汪兆铭”的流言。

这样便为袁世凯的谋略所乘，而使中华民国进路闯入了坎坷的途径。

袁世凯一面对于革命派一些人士的动向，暗自高兴，一面凭藉武力为资本，与革命军议和。

不过，清军虽然夺回了汉口、汉阳，但是，长江以南地区，都已在革命军控制之下；面对这个情势，袁世凯所能掌握的兵力不过数万人，也不可能渡过长江，与革命军一决胜负。

袁世凯推动和议

袁世凯所委托进行和议的调人，是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

袁世凯和朱尔典，是十多年前同在朝鲜时代所结识，在一八九四年朝鲜因反对日本侵略而发生东学党之乱时，袁世凯负责清廷的朝鲜事务，朱尔典则为英国驻朝鲜领事。当时，日本人曾有暗杀袁世凯的阴谋被发觉，袁世凯因朱尔典之助，得免于难。自此之后，两人之间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故在袁世凯时代的对英外交，可以说是建立于两者亲切关系的基础之上的；例如：英国在长江流域设定势力范围，中华民国成立后的五国借款，英国对中国食盐政策的监督权等等特权，都是由于朱尔典充分发挥其外交手腕而获得。

受到袁世凯委托的朱尔典，乃命令英国驻汉口代理总领事葛福对革命军展开活动。

十二月一日，清军在汉阳发射排炮，猛烈轰炸武昌，鄂军都督府中弹燃烧，黎元洪逃出城外，革命军司令部的同志们要求黎元洪回到城内，但黎元洪感到恐惧，拖延不回。下午六时，葛福的使者盘恩到达革命军司令部，出示停战条件，于黎元洪不在的情况之下，由孙武、蒋翊武、吴兆麟等人，代盖都督印信，完成停战约定，内容是这样的：

武汉三镇一带两军保持现状，由英国海军加以监视。停战期间，自十二月二日起一共三天；后来，由于袁世凯方面的要求，曾经两度延长。

停战后，接着进行和议。

伍廷芳与唐绍仪

革命军临时政府派外交总长伍廷芳，清廷派邮传大臣唐绍仪，担任双方面的代表。

会议场所，最初决定在汉口；但因对于会议动向注目的各国领事希望移往上海，尤其是英国方面强烈的要求，乃在上海英租界内市政厅举行。

所谓南北和议的第一次会议，于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二时开始。

在第一次会议中，革命军代表伍廷芳提出四项条件如左：

一、废除满清政府。

二、建立共和政府。

三、优给清帝岁俸。

四、优恤年老贫苦之满人。

可是，交涉结果，祇决定了陕西、山西、湖北、安徽、山东、江苏、奉天七省全面停战。

二十日，举行第二次会议，最大的问题是“国体问题”——伍廷芳态度强硬，主张废除清帝，建立共和政府，清廷如不能表示接受，则无法讨论其他任何问题。

面对这个情况，唐绍仪却比较轻易地表示妥协，而不坚持维持清廷，并同意在将来由国民大会决定国体。

实则在唐绍仪如此让步的背后，隐藏着的是袁世凯的企图。

国父返国

袁世凯的企图是这样的：

在和议开始之前，刚到上海的唐绍仪，曾和君主立宪派首领张謇见面。当时，唐绍仪表示：“将来如果袁世凯被选为总统，则清帝退位问题为之消灭”——透露出只要是袁世凯秉国之钧，则可以维护清廷的意向。

此时，在袁世凯方面，鉴于革命派各省代表在武汉的集会中，已经决定临时大总统虚位待己，故而认为南北和议如果进行顺利，必可实现其大欲，所以有必要预先放出维护清廷的空气，好预先博得立宪派的谅解；故而将国体问题，留在后面，作为坚持到以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的交换条件。

正在这个当口，孙先生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归国，受到延跂以待的革命党人之热烈欢迎。

唐绍仪也把握住这个时机，电请袁世凯上奏清廷如左：

“民军（革命军）宗旨，以改建共和为目的……已成一往莫遏之势，新制飞艇二艘，又值孙文来沪，挈带钜资，并偕同泰西水陆军官数十员，声势愈大……且闻中国（清廷）商借外款，皆为孙文说止各国，以致阻抑不成，此次和议一败，战端再启，度支竭蹶可虞，生民之涂炭愈甚，列强之分割必成，宗社之存亡莫卜……唯有吁请召集临时国会，以君主民主，付之公识……。”

这个电报，藉革命军浩大声势，胁迫清廷；清廷乃在御前会议中，决定召集临时国会，并饬唐绍仪继续进行和议——到这个时候，袁世凯的企图，差不多已经是达成了一半。

协商结果尽成泡影

第三次会议，于十二月二十九日举行，协议如下：

一、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多数取决；决定之后，两方均须依从。

二、国民会议未解决国体以前，清政府不得提取已经借定之洋款，亦不得再借新洋款。

其后，在继续会议两天之间，决定每省代表人数，并预定于翌年一月八日在上海举行国民会议。

在进行和议之外，革命派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在南京举行了临时大总统选举会，选出孙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于是，认为已经是虚位待己、而又被夺去了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乃以唐绍仪有越权行为，而对和议结果拒绝认可，唐绍仪愤而辞卸任务，以致所有协商的结果，尽成泡影。

其后的交涉，乃由袁世凯本人和伍廷芳之间电报往返折冲，但已经不可能有进展的希望--决定中国前途的南北和议，就是这样地碰上了暗礁。

在此之前，在欧洲从事对外折冲的孙先生，经由法国走上归途，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到达香港，革命政府广东都督胡汉民偕廖仲恺乘军舰赴港欢迎。

这时，正是由于大元帅问题，造成黄兴和黎元洪的纠纷之后，以及，南北和议在上海进行之中。

国父决意赴沪

胡汉民等人对于上海、南京的情势，认为有欠稳定，因此，建议孙先生留在广东，暂以广州为临时首都，胡汉民的意见是：“现在仍然手握兵权的袁世凯，难以信赖；孙先生纵然当选大总统，但革命党并没有足以和袁世凯抗衡的兵力，莫如留在广东，以修战备，然后再凭实力统一南北。”

对于胡汉民的意见，孙先生则不表同意，而认为不妨利用袁世凯，他的主张是：

“停留广东，以修战备，此为避难就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

于是，孙先生乃偕胡汉民首途北上。

到达上海，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在烟雨濛濛的港口，黄兴、陈其美、汪兆铭等人恭迎孙先生凯旋归来。

上海欢迎国父盛况

十二月二十六日，民立报对于孙先生抵沪情况，有所报导：

“孙中山先生于昨日上午抵埠，本埠欢迎情形汇录如下：

“孙先生乘香港轮入港，沪军都督府派建威兵轮由沈参谋虬齎往吴淞口迎迓，时值细雨如织，海口雾集，致建威升旗时，该舰不及了见停轮。

“孙先生偕美国将军荷马李夫妇同行……

“孙先生登岸，即由黄宗仰先生招待至哈同花园。午膳后，由伍（廷芳）外交总长邀至宅第，互商要政，黄（兴）元帅、陈（其美）都督、及胡（汉民）都督、汪精卫诸君同往。”

选出临时大总统

民立报继续报导，法国租界官方人士对于孙先生热忱欢迎的情形如下：

“法工部局因孙先生来沪，极意欢迎，适当耶稣诞日，西例休沐，仍派通班巡捕（警察）远迎。

“沪都督府先期在宝昌路四○八号，预备住宅一所，并由法界灯（电灯）公司，尽星期日内将电灯线接齐，昨日孙先生自伍宅出，即至该处，颇有宾至如归之乐云。

“法工部局又于孙先生住宅内，特派西捕一人，安南捕四名常川驻守。又派暗探一班，昼夜梭巡门外，岗巡加班逻守，复照请沪都督府派卫兵四名，弁一员，荷枪在门口守望。法人对于中国民党首领极致尊敬之态度，殊可感也。”

带回来的是革命精神

在等待到孙先生归来的上海，传播有这么一个话题——就是孙先生带回来多少钱？由于自上一年以来，孙先生在欧美旅行，乃至于武昌起义之后，立即赶往欧洲；所以国内外新闻报导，都在揣测孙先生携有巨额款项归国。

未料，孙先生向中外新闻记者答复：

“余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

在孙先生到达上海之同时，关于大总统人选问题，立即展露出急转直下的局面。第二天，黄兴、陈其美、宋教仁等人便向各省代表提出选举孙先生为临时大总统的建议，立即得到赞同。在此之前，革命党人士之中，虽以有附带条件则可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之议，但却显得步伍零乱；现在，才因拥戴孙先生而立场一致。

第三天（十二月二十七日，阴历十一月初八日），各省代表集会于设在南京的江苏谘议局，议决下列三项：

一、元月一日起改用阳历。起义时以黄帝纪元，今应改为中华民国纪元。阴历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月一日。

二、按照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采用总统制。

三、阳历十二月二十九日选举临时大总统。

及至二十九日，在南京所举行的选举会中，出席会议者计十七省代表，孙先生获得十六省的赞成票，膺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开年之后的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元年）元旦下午十时，举行宣誓就任典礼。

中华民国就此诞生！

日本的动向

自武昌首义，到中华民国诞生，两个多月之间的中国，吸引了全世界的瞩目。

其中，最表关切的，是邻国日本。

日本的动向，大致可以区别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民间志士的活动；一方面是日本政府的反应。

不过，所谓民间志士，也各有其不同的立场与态度，有些人是对中国革命真心理解，奔走活动；也有不少人企图乘中国革命混乱而进行侵略；就是在革命成功之前的革命之友，当武昌首义发生之同时，也就有了出卖革命派的“志士”。至于日本政府更是摇摆不定，没有始终一贯的态度。

在这里，首先分析一下民间志士的动向：

得到革命的消息，立即驰赴中国，决心豁出性命和清廷斗争的一个人，是萱野长知。早在武昌起义的四年之前～～一九○七年，为谋向革命军输送武器而失败的“幸福丸事件”，就是他所经手。

萱野长知参加作战

萱野自着有“中华民国革命秘笈”一书，对于当时情况，叙述綦详。这是日本人所写出来的辛亥革命纪录，在中华民国也被当作珍贵文献。现在以这本书的记述为中心，对当时日本同志的活动，试作一点追叙。

萱野长知于十月下旬，接到黄兴的电报。这封电报，是黄兴自香港首途经上海转赴武昌途中、在船上所拍发——“希尽可能购买大批炸药带来武昌”。

当时，在日本方面，由于东京市所选出的众议院议员鸠山和夫死亡，举行补选，候选人之一的古岛一雄，属于立宪国民党重镇犬养毅一派，萱野为其助选员，正当竞选运动期中，不克立即分身前往中国；但马上约集同志协商，着手购买炸药，包装待运。

选举于十月二十八日开票，古岛长一当选，萱野长知就在当天夜晚赶往门司，在门司川卯旅馆约集同志金子克己、布施茂、三原千寻、龟井祥晃、岩田爱之助、加纳清藏、大松源藏等人登轮出发，前往上海。在中国地区，并有日本陆军人员幕后支援，像驻上海陆军武官本庄繁、驻汉口陆军武官寺西等人，就是对萱野等怀有好意，在多方面予以方便的人。

萱野一行溯长江西上，经武昌到达汉阳，立即驰赴设立于汉阳第一古刹——归元寺内的兵站，会晤战时总司令黄兴。当时正值汉口一度光复，却又被冯国璋所指挥的清军夺回，因清军纵火而化为废墟的不久之后。

此时，黄兴虚岁三十八岁，萱野年长一岁，两人一直志同道合；在这段期间，萱野是以革命军顾问的身分，在汉阳日夜伴同黄兴指挥作战。

和萱野等人同样直接参加战争的日本人之中，不少是现役军人，他们勇敢战斗，直到十一月二十七日汉阳失守为止。

协力的日本人

现在请看在萱野长知的“革命秘笈”中，具体提到参加中国革命的日本人姓名及其活跃情形：

陆军少校大原武庆和原二吉共同在武昌的都督府附近设置事务所，对于革命军提供军事方面的建议。

陆军步兵上尉野中保教，化名林一郎，随同萱野到达汉阳，和姓小鹰的某日本人合作，在前线到处奔驰。

死于清军炮火之下

还有死伤于清军炮火之下的人：

陆军步兵上尉金子新太郎，在琴断口附近为敌弹命中而战死。石间德次郎在汉水靠岸的渡船上被革命军中的倒戈分子所杀害。

萱野一行中最年青的岩田爱之助，大腿被刺刀贯穿受伤，在炽烈的火网下，得到同志救助而保全了性命。又有甲斐靖，肩头负伤，子弹嵌留在身体中。

再有日本医师垣内喜代松，以军医身分参加革命军阵营，担任伤患官兵的外科手术和治疗工作。

十一月十六日夜晚反攻汉口的战争中，日本军人工兵班长斋藤某在汉水（襄河）上将木船联系起来，搭成浮桥，让黄兴所指挥的革命军由汉阳渡河进攻汉口。

在萱野笔下对于这些日本人的评论是：“想来是受了中山、克强革命精神感召；像那样奋不顾身的心情，倘非当年革命同志，是很难理解的。”

据日本黑龙会所编“东亚先觉志士传记”所载：“金子新太郎死后，被清军割下首级，以盐卤防腐，送往北京，作为日本人参加中国革命的证据，让外国人观看。”

不仅实际参加革命战争，而且更有在组织新的革命政府时，赞襄立法的日本人。

萱野受到黄兴的请托，发电报给头山满，邀请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法学博士寺尾亨前来，协助制订宪法。

当时，宋教仁在武昌已经着手草拟宪法草案，非得专家协助不可，因而选中了国际法学者的寺尾亨。寺尾这个人，早就认为亚洲和平不能缺少中国的安定，故而支持中国革命党，一九○五年（民国前七年），在东京牛込创立东斌学堂，对中国革命青年给予军事教育。

寺尾在接到头山满转去萱野长知的电报之后，立即抛弃了“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职位，偕同头山满来到中国，协助中华民国起草宪法等法案。

后来，寺尾于一九一四年曾和黄兴等人共同在东京设立法政学校，以培养熟谙法律的中国人为目的，对中国留学生教授政治、经济、法律等多方面学问，该校延续到一九二○年为止。据“东亚先觉志士传记”提到：蒋总统也曾经在该校肄业。

比萱野长知还要早一点到达汉口的末永节（当时四十二岁），也担负了革命军临时政府“外交顾问”的任务。末永节首先说服了日本驻汉口领事松村定雄、武官森义太郎等人，不采取干涉革命军的外交活动。

此外，又和新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外交部正部长胡锳协商进行说服列强各国驻汉口领事维持中立。曾经为日知会干部的胡锳，和末永节是老朋友，胡锳在四年前的一九○七年一月，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逮捕，拘囚于武昌府监狱，在革命军起义后释放，负责军政府外交工作。

还有，帮助宋教仁的北一辉、和孙先生友谊深厚的犬养毅，对大陆浪人（无固定职业而侈谈大陆问题的日本人）有极大影响力的头山满等人，也接踵来到中国。

十二月二十五日，孙先生自欧洲归来抵达上海时，犬养毅、寺尾亨、古岛一雄、副岛义一、尾崎行雄等日本人，也齐集码头欢迎。

不过，在这里必须明确交待的是，所有自日本赶来的协力者，并不一定都是真心支持革命党的人。

动机和背景不同

他们的动机和背景相当微妙——有的人是日本军部的情报员，有的人奉有日本外务省的秘密命令，有的人在利用革命党人图谋利益，有的人在策划制造革命党内部的分裂。他们的思想和目的既不一致，彼此之间也没有横的联系。

同盟会的干部们，颇多和这些日本人在个人方面具有深厚的友谊，譬如说：黄兴和萱野长知、宋教仁和北一辉的关系，都是显著的例子。由于日本人之间意见不一致，于是也就影响到中国干部们发生意见相左的现象，颇为不少；宋教仁在革命之后，和孙先生有些不同的主张，其原因也就在此。

据说，在汉阳战争的时候，黄兴统率的军队和黎元宏的部属之间，就曾有过互不协调的现象，而其重要原因，也是由于黄兴周围的日本人，极其专横，造成双方面的不满。

率直地说，其中一部分日本人，当时的确是诚心诚意地在支持革命党；可是，从历史观点看来，其绝大多数都不能说是对中国有利。

以所谓“大陆浪人”为代表的日本民间右翼势力，其意图和作法，虽说是有着程度上的差异，但利用革命混乱时机，藉援助的名义，实际企图培植在中国国内的日本势力；而且，这个企图和日本政府一向所抱持的侵略大陆政策同趋于一个方向，确是事实。

从受到日本政府秘密指示而反对共和政体的犬养义，到策划“满蒙独立”的川岛浪速等人的态度看来，这种情况，非常明显。

各国各有企图

当时，和中国利害关系较深的列强国家，有日、美、英、法、德、俄等六国。这些国家以行将诞生为新面貌的中国为舞台，各有其不同的意图，展开了激烈的外交战，各国所反应的态度和手段，视其在华权益大小和侵略野心程度而定；不过，一般所最关心的，是辛亥革命对于其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会带来些什么样的影响。

日美英法德俄的态度

下面，概略地叙述一下各国的基本立场：

日本，是中国革命同盟会的诞生地，也是中国的邻国，有很多中国革命党人的老朋友；因此，对于日本朝野的期待也就很大。日本的民间志士们，姑不论其真正的意图究竟何在？但对中国的革命，一般可以说是寄予同情。可是，日本政府的想法，则已如前述是以侵略大陆的政策为其背景；这个政策，就是不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安定的共和国家，而企图利用混乱情势，趁火打劫，伸展其在中国的权益；她的方法是，一方面援助清廷，一方面对于革命阵营也表示协力的姿态，同时在另一方面对于有关国家，则不断地在窥伺着他们的意向——展开了最阴鸷的谋略外交。

美国，当时由于其在中国的进展，比其他列强国家落后一步，因此，乃提出保全中国领土的大道理，主张中国对外开放门户、机会均等，以牵制各国；而其朝野人士则对于革命党寄予同情，贯彻严守中立的政策，不久，便率先承认了中华民国。

英国，本来同情革命党，不过，由于革命战争发生在和英国关系最深的长江流域，故而特别关心的是自己的利害，所以她虽然也是标榜中立，但同时则更希望中国政局能够尽快地安定下来。英国在利益上的竞争对手，也就是和她由同盟关系的日本，以及俄国。她在对于袁世凯的支持，以及西藏问题等方面，一直玩弄着虚虚实实的有效手段。

法国的政府和民间，对于中国革命都能有所理解，法国认为其共和政府的理想和中国革命的主义是一致的，故而有意避免干涉中国内政；可是，在后来却转而支持袁世凯。又关于对中华民国承认的问题，则坚持本身在华权益为优先，时隐时现地让人窥测到帝国主义的野心。

德国，为维护她在山东的权益，最初，颇有意支持清廷，曾有供给武器及派遣陆军登陆的计划；但是，随革命进展的同时，察觉到日本有武力干涉的企图，乃与美英各国步调一致，站在尊重中国主权立场，牵制日本的动向。

俄国的态度比较支持清廷，和革命军方面没有接触；表面上虽有和列强协调一致的意向，提倡不干涉中国内政，但其内心则在阻碍中国成为强大的近代国家，并意图乘中国混乱的机会，使在东三省、外蒙、新疆等方面有关中俄两国的悬案，获得于己有利的解决办法。是故在不久之后，便由于这个意图而进展到在东三省方面，和日本分赃；有关外蒙、西藏问题，则和英国有所交易。

如上所述的各国阴谋企图，因武昌革命战火爆发，而随之表面化。

首先展开活动的，是德国。

在武昌起义的十月十日夜晚，逃离武昌，抵达对岸汉口的湖广总督瑞澄，立即派人要求驻汉口各国领事攻击革命军。

德国图抵制革命军

德国领事马上有了反应，将德国军舰调泊长江，摆开了随时可以发炮的态势。

看到这样的情况，革命军政府乃派遣胡锳、夏维松于十月十二日前往汉口，对各国领事提出不会加害于友邦各国的照会，并要求严守中立。

当时，由于清廷和列强各国之间，在“义和团”事件之后，签订有辛丑和约（一九○一年），禁止任何一国不得在中国单独采取军事行动，所以瑞澄的要求，如果未经列强协议，则各国都不能擅自向革命军开火。

于是，德国领事乃提议举行领事团会议，希望得到各国同意之后，便可出头镇压革命军。

十三日，日、英、法、德、俄五国领事举行领事团会议。在这个时候，各国领事差不多都还没有什么具体的意见。

德国领事首先发言，他认为革命发难的组织就是义和团，如放任其蔓延，必将难以对付，故而主张对革命军开战。

所谓“义和团”，是曾经在“扶清灭洋”的旗帜之下，发生过火烧教堂、杀害外交官事件的排外势力。把革命军和“义和团”混为一谈，是受了瑞澄灌输的观点所影响。

法国了解国父宗旨

然而，出席会议的法国领事罗氏，则和同盟会总理孙先生为旧交，他很了解中国革命的目的所在。

罗氏在出席会议之前，得知革命军政府张贴的布告中，有临时大总统孙文的署名，所以他即席对德国领事提出反对意见：

“你的话有欠正确。我们刚才得到报告，武昌的布告中临时大总统署名孙文，孙文是我的老朋友，根据他的言行判断，这个革命是主张共和政体，具有相当的规模，怎么可以和义和团相提并论。”

罗氏介绍了孙先生的平素言行之后，更继续地说：

“孙文所率领的革命党，是以改良政治为目的，决不会有盲目的暴动行为出现，不能视为‘义和团’一般，不应轻率加以干涉。”

日本企图介入

法国领事罗氏的热忱辩论，首先得到英国领事的赞成，继之是俄国领事；日本领事最初同意德国领事的见解，但并未坚持。于是，领事团会议的一致结论乃为“严守中立，不加干涉”。

同时，领事团并曾实地观察在革命军占领之下的武汉情况，的确见到革命军在尽力保护外侨生命财产的安全，以及对于邮政、电报、关税等方面，都没有影响到国际条约。

领事团布告中立

领事团于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之同时，并在十八日正式布告中立，并通告各国侨民。五国领事团布告的内容是这样的：

“为布告严守中立事……查国际公法，无论何国政府与其国民开战，为该国国内法管辖之事，其驻在该国之外国人，无干涉权；并应严守中立，不得藏匿所有关系之职守者，亦不得有辅助何方面之状态。据此，领事等自应严守中立，并照租界规则，不准携带军械之武装人在租界内发现，及在租界内储匿各式军械及炸药等事。此系本领事等遵守公法、敦结交谊上应尽之天职。为此，剀切布告，希望中国无论何项官民，辅助本领事等遵守，达其目的……”。

这个中立布告，不仅粉碎了清廷的阴谋，并且带来了防制外国势力藉口革命动乱而增兵进驻的效果。

日本采取示威行动

然而，尽管宣布中立，日本政府还是摆出了军事性的示威行动，她以确保在武昌对岸汉阳方面的铁矿为藉口，派遣军舰数艘，在长江下游监视革命军的动向。

自甲午战争之后，突飞猛进的日本钢铁业界，为需求原料而对大冶铁矿投进资本；尤其是在一九○七年，该矿自国营变为民营，组成“汉冶萍公司”，由盛宣怀出面经营以来，日本以预付订购货款的方式，供给大量借款，独占其矿砂的收购。就是这位盛宣怀，他在辛亥年武昌起义之后，曾被清廷加以“罔上虐民”之罪，革去了邮传大臣官职；被列举革职的理由之一，就是在借款方面手脚不干净。

日本的军事行动，立即受到列强的排斥，美国提出强烈抗议，就连与日本有同盟关系的英国也不赞成；由于国际牵制，日本乃不得不在十月二十二日发表“出动军舰的目的，仅为保护日本侨民”的声明，一时不便再有所行动。

西园寺内阁的方针

可是，实际上当实日本的第二次西园寺内阁（首相西园寺公望）已经决定了对于中国革命“介入干涉”的方针。支持这个方针的前提是：不论中国内部的激变会有什么样结局，都不能让其造成对日本不利；而且更有野心趁混乱之际，因势利导，扩大其在华的权益。

第二次西园寺内阁，是在武昌起义之先的一九一一年八月三十日继第二次桂内阁（首相桂太郎）登台，西园寺公望首相曾经留学法国，相当倾向于自由主义，不过对于中国问题可以说是比较陌生，不大关心武昌起义的情势，所以内阁在中国问题方面的决策，实际是由内相原敬、外相内田康哉二人做主。内田曾于一九○一年至○六年出任驻北京公使，通晓中国内情，他和日本政坛元老、陆军巨头山县有朋关系密切，颇受山县的影响，当时，陆军方面以“保护在满蒙权益、维持对朝鲜控制”为理由，要求增加两个师兵力等等活动——向大陆进展的野心，颇为坚决。

欲趁机获取新的权利

通过在武昌起义前后的反应和行动，可以将日本政府当时所采取的基本观念，归纳出下列三点：

一、不希望出现统一的中国。

二、不希望中国成为民主共和国。

三、在中国混乱时期，须确保日本的既得利益，固不待言；而且还得要乘机更进一步获得新的利权，为此，即使出动武力干涉，也在所不惜。

民立报的忠告

革命军方面，已经察觉到日本这样的策略，在十月十九日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上，便发表了以“敬告日本人”为题的评论文章如下：

“湖北革命军之起也，各国皆守中立，盖以革命军为公然之交战团体……

“乃独有日本则不然，谓革命军只可自为内乱，而不能认为交战团体。故大阪每日新闻、报知新闻等且谓：如保护租界，只为消极的手段；今宜进而用积极的手段云云……

“吾非谓日人之宜袒革命军也，革命军既已成为有组织、有土地之人民团体，则在国际法上宜承认为交战团体……

“昔日本倒幕之际，官军与幕府党战，欧洲一、二国不尝认幕府为交战团体乎？何日人之善忘耶？明明国际法上的惯例，而故意设辞违背，非别有心肠而何耶？……

“今者，吾友邦之英、美等国，皆深以维持均势现状为主义，固无联合干涉吾国内乱之虑……日人其将何以对天下耶？此岂果为日人之得策耶？吾愿同洲同种之东邻贤明政治家对于此问题，尚其再三深长思之也。”

坐收渔人之利

日本政府这种方针，首先表现于为防止清廷崩溃而给予军事援助方面。

清廷虽然在武昌起义的第三天～～十月十二日，便命令陆军大臣荫昌率领两个师的三万部队沿京汉路南下，镇压革命军；但实际却因财政困难，缺乏武器。

清廷要求日供武器

对于这个问题，荫昌想藉日本政府协助，来求得解决，于是，乃找日本陆军少将青木宣纯洽商，要求供应炮弹三十万发、枪弹六千四百万发，步枪一万六千枝；日方对于这个要求，积极答应。

荫昌的求援，对于正在策划乘中国革命机会而向大陆进展的日本政府来说，真个是求之不得，让中国的动乱拖延下去，再加上对清廷市惠，当然就可以得到其报酬；所谓报酬，就是要清廷尊重日本在东三省的地位。

渴望尽快获得武器的清廷，毫不迟疑地承认了日本的要求。十月二十三日，日本泰平组合的代理商——大仓洋行便和清廷陆军部签订了二百七十三万三千六百四十日元的第一次武器买卖契约。

日本外相的电令

日本外相内田康哉，于十月十六日对驻北京公使伊集院彦吉发出的第二一五九号电令——“清国革命动乱之际有关帝国对清政策”的指示中，对于当时日本政府的态度，表达得很明显，就是一面对列强国家极度保密，一面向清廷市惠，迫使让步；电文的内容是这样的：

“日本政府，顾念清国政府为讨伐革命军，火急需要该项械弹，爰为使我国商人能够供应，故而决定给予充分助力，且已采取各项必要的措施。帝国政府，对清国政府给予这样的援助，本身负担了非常重大的责任。此一事实，以后如被泄漏出去，不仅革命军、即凡与此有直接间接关系之辈，都将会对帝国怀有恶感，甚至会加危害于帝国臣民，或者实行抵制我国商品；以及会不会对于吾人显露出怨恨，也颇难预料。总之，帝国所蒙受的不利必然会很大，应该事先有此心理准备。

“关于为谋使上述情况能够充分让清国政府和摄政王本人彻底了解，希望贵官（伊集院公使）……指出：清国官民一向对帝国态度有失公正。同时说明：他们对于因‘大战役’（日俄战争）结果而造成的现状，不够了解，认为我们就像是不法的侵略者一样，因而企图伤害甚至推翻我方正当地位。并且还要谈到：帝国政府不仅经常对清国政府抱有最深厚的同情，而且在现实情况之下，就有能力可以表现得出来；这一次的措施，正好是足以证明有此能力的一个适当事例。更盼提出建议：务希清国政府翻然捐弃以往误解；今后两国之间，互相信赖，共同致力维持东亚大局的旨趣……”

也卖武器给革命军

实则，日本就在这个措施的前后，对于革命军也有给予援助的考虑。

主张出售武器给革命军的，是日本军部，而日本政府则以默认的方式允许进行。其所以默认的道理，是希图因对革命军支援武器，使中国国内的南北战争激烈化、长期化，而阴谋坐收渔人之利；并且对于清廷和革命军两方面都预为市惠，无论那一方面在内战中获得胜利，和日本的关系都不致恶化。

在日本方面，现在还保存有毫不隐讳地表达出对革命军支援武器理由的电文，这是当时在汉口的寺西中校于十月三十一日向日本陆军省发出的第八十九号密电，内容如左：

“在我国的对清国政策方面，极有必要使革命军抵抗持久。德国极力帮助官军（清军），小官（寺西）则秘密支持革命军，希望准予秘密输入机关枪二十挺、子弹二十万发、三十一年式榴散炮弹五万发。运送方法请与三井公司的山本商洽；其价款能否收到，尚不得而知，必须要有在必要时允许由我政府支付之决心。”

关于支援这一批武器的活动，遭遇了清廷的阻碍，受到清廷要求“严格取缔秘密运入武器”的日本驻北京公使伊集院彦吉，于十一月九日以第二六七号公文向外务省报告：“已经适当作了答复，关于这一点，请赐誓照。”

担当对革命军和对清廷两方面出售武器的日本商家，实际都是泰平组合的大仓洋行和三井物产公司。

大仓洋行出售的武器，最初是在十二月八日，由“云海丸”轮船密运步枪一万枝前往上海，交革命军方面接受，连日本政府的外交机关都被保密。但驻上海的总领事有吉明听到有这个消息，乃向外相内田康哉报告，可是所得到的指示却是“应予默认”。

大仓洋行，又于次年～～一九一二年一月八日，由“巴丸”轮船密运步枪一万二千枝、子弹二千万发、机关枪六挺、山炮六门、炮弹五千发送达南京。

另一方面，三井物产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三日，和革命军政府签订买卖武器契约，价值四十三万九千日元，军政府于一九一二年一月八日向台湾银行缴款四十四万四千日元，三井方面则将武器点交停泊在广东某处的军舰。

日阁所定政策

大仓洋行和三井物产公司不管对象是清廷还是革命军，所卖出的武器弹药，多数都是日本陆军在日俄战争时用剩下来的，日本商家将购自日本陆军清理库存的剩余品，高价出售给革命军和清廷，牟取暴利，其中夹杂有不少扣动撞针不会发射的枪炮，发射出去不会开花的炮弹，等于是废物。

支援武器，虽然是被日本政府当作向中国发展的政治战略之一环，但是听命奔走经办其事的日本商家，则很露骨地发挥了唯利是图的“商业主义”。

德国积极支援清廷

对清廷给予了武器支援的另一个国家，是德国。德国明显地表示出“保清反革”的态度，除了悄悄供给武器弹药之外，并且有德籍军官协助清军作战。

德国的目的，是希望早日平息中国内战。因为清廷如果崩溃，则中国将会陷入群雄割据的混乱局面，俄、日等国当会趁机逞其对中国的领土野心，德国唯恐其在中国的权益将会受到侵害。

德国的方针，固然不能说不是有悖不干涉主义，然而和日本为了唯恐天下不乱而给予援助的动机，是不相同的。

日本内阁会议的决定

日本政府对于中国革命的正式态度，是在十月二十四日举行的内阁会议所决定。

在这个会议中，内相原敬指称“清廷是中国的正统政府”，对于革命军政府则表现出完全抹煞的态度。

后来，阁议所决定的“关于对清政策”，其内容如左：

一、日本的东三省权益，永久保持；为谋在东三省租借地的期限延长以及获得铁路建设权，可以不惜牺牲，俟在适当时期解决之。

二、维持日本在中国的一切优先利益，在中国经营工商业的多数日本人，倘有不测事态发生，当采取断然措施。

十月二十四日的阁议决定，于第二天（二十五日）由首相西园寺公望暨外相内田康哉向天皇上奏，奏文内容如下：

“延长在满洲租借地的租借期限，决定有关铁路方面的各项问题，更进一步确定帝国在该地区的地位——藉以对满洲问题作根本解决，是属于帝国政府一向未尝怠忽的事务。假定有可乘之机，自当讲求及时采取断然手段，固毋待议论……关于满洲情势，一面暂维现状，藉以防制侵害；一面掌握良机，力谋逐渐增进我国权利。至于满洲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应俟其机会最为对我有利．而且其成算确有把握，然后实行，是为得策。

“现在回顾支那本土和帝国的关系，侨居该地的帝国臣民颇多，与我方通商贸易往来甚大，以及我方有关系的企业更在逐渐增加，可见帝国在该地所占优势地位的趋向，已经非常明显。加之，清国事态，极欠安定，今后情势如何，无人敢于逆料，是故一旦在该地发生不测之变，则能以讲求应急手段者，舍帝国之外，尚未见有他人。此一实情，衡诸帝国地理位置及实力，更无庸置疑。另一方面，帝国在东亚的一大任务，也不能不说是正在此处。帝国今后不仅要认清自己处在如上所述的地位，而不能不努力确定这个地位，更且必须有谋求使清国以及各国逐渐予以承认的方策。是故务必要使列强考虑到深远的东亚大势，而终于不能不承认我国的优势地位。”

这也就是说，不仅在满洲，甚至关于整个大陆，也要凭藉武力为背景，在列国之间掌握主导权。

日本多角外交战略

日本政府基于此一方针，表面上避免和列强发生摩擦，所以交织成多角外交的战略。

对俄国——为维护在东三省的权益，谋求协调。

对英国——强调严守日英同盟精神，博得其支持。

对法、德、美国——和在中国利害关系较深的法德两国谋求协调，另一方面意图拉拢美国为后盾。

至于对中国——则首先在谋使对日感情好转，获得其对日信任。

经过“甲午”、“日俄”两度战争而形成固定方向的帝国主义日本，兼有封建主义的领土侵略和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之双重性质，所谓“满蒙特殊化”或“东北、外蒙第二朝鲜化”等蚕食领土的行动，属于前者，在这一方面和帝俄的目标有所抵触；至于在中国国内，则以加强其合法性的经济权益、独占市场为目标，属于后者，这一方面又和英国的利权发生冲突。然而，在“满蒙地区”俄军势力强大，另一方面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英国产业资本也凌驾日本之上远甚；因此，日本乃谋求和俄国互相了解，以交易利权的手段逐渐攫取“满蒙”；和英国则采取在外交方面妥协、有时甚至追随其后、但谋发展经济权益的战略。如上所述的一些政策，自一九○二年以来，在分别先后三次缔结的“日英同盟协约”（一九○二、○五、十一年）及“日俄协约”（一九○七、十、十二年）中，都已经编织进去。

俄帝攫取外蒙

由于日俄战争败北，还没有恢复实力的俄国，对于中国革命的反应，是力谋和其他列强国家协调，不干涉中国内政；并且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将会有怎么样的变化，也并不关心。

当时，俄国在对中国的贸易量方面，虽然仅次于英、日、美国，但实则自中国输入的产品较多，而由俄国输出的工业品较少。所以，俄国也没有表现出积极争夺中国市场的兴趣。

俄目标在中国的领土

俄国真正的目标所在，是中国的领土。她意图趁中国内部混乱的机会，并吞东三省和外蒙古；这个工作，一步一步地在向前推进。是故，俄国也和日本一样，不愿意中国成为强盛的统一国家，而希望战乱长期延续下去。

在中国内部，“南-北”、“革命军-清廷”、或者是“革命军-北洋军阀”的对峙情势，不论其形态如何，只要是能够僵持在胜负难决的状况之下，对于俄国来说，便会越发有利。

使外蒙古假独立之名，而实则置于俄国控制之下的具体工作，已经在这一年～～一九一一年的夏天开始。

七月十日，俄国悄悄地唆使外蒙古的王公们集会于库伦，使他们作成要求俄国援助外蒙独立的决议；然后根据这个决议，由外蒙派遣代表到达俄国首都圣彼德堡，以俄国承认外蒙独立为交换条件，约定将外蒙的贸易、铁路、邮电、矿业等项权利奉送给俄国。

名为“独立”实为附庸

俄国很巧妙地兜了这么一个圈子。它很明白要是突然让外蒙为属国，则会在和列强的关系上于己不利，所以打出由外蒙来要求援助的战术，作为外交上的藉口，暂且先把中国对外蒙的影响力排除出去，故而强迫要求清廷停止其将要在外蒙所进行的行政改革和向外蒙增派军队。于是，清廷库伦办事大臣三多乃停止了行政改革，并且正要和外蒙王公有所协商之际，而俄国已经派来部队八百人侵入库伦，并且还有四千人部署在俄蒙边界，增加压力。

正在这样的情势之中，中国国内爆发了辛亥革命。

外蒙古的王公们，认为这是他们“独立”的最好时机到来，乃乘清廷正为应对革命情势而极度繁忙的间隙中，于十一月三十日举行会议，决定“独立”。

“独立”的藉口是：“蒙古本来是清廷的臣属，而不是中国的臣属；排除了清廷的中国，和蒙古的关系当然断绝。”

十二月一日，外蒙宣告“独立”；同时，颇多俄军、蒙军侵入清军防营，强迫接受了武器弹药。

俄向清廷提出五项要求

这时，俄国还在对清廷做作出抑制外蒙古王公“独立”的姿态；但旋于十二月三十一日突然照会清廷提出有关外蒙问题的五项要求，一方面虽然在回护自己介入外蒙“独立”的责任，一方面却明白地表示出实际要把外蒙攘为其属地的意图。这五项要求内容如下：

“一、中国可与外蒙古在库伦订约，声明不驻兵外蒙古界内。不移民外蒙古界内。不干涉外蒙古内政；惟中国有治理外蒙古之权，仍设办事大臣，管辖蒙人。

“二、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古之主权，俄人均归办事大臣管辖；惟中俄两国关于蒙古之交涉，则仍由北京政府与圣彼得堡政府协商。

“三、中国如将来在外蒙古建设铁路，应先通知俄国，并承认俄国有建设由俄边至库伦铁路之权。

“四中国将来在外蒙古，有何项改革，均应预先得俄国政府同意。

“五、俄国应饬驻蒙领事等官，协助担保蒙人对于中国应尽之义务。”

翌年～～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五日，自称“大皇帝”的哲布尊丹巴，宣言成立“大蒙古国”，组织政府。但实则这个“大蒙古国”的一切，都在俄国操纵之下，连哲布尊丹巴的皇帝即位仪式，也是俄国方式。并且由俄国派来军人训练外蒙军队，武器弹药也都自俄国购入。此外，俄国更给予二百万卢布的借款，但却以外蒙的交通网及金矿作为抵押。

与日英订下交换条件

俄国为了使外蒙“独立”造成既成事实，而策谋取得日、英两国的谅解，于是，乃于一九一二年七月八日和日本签订了第三次“日俄密约”，承认内蒙东部地区为日本势力范围，换得日本的支持，同年九月，和英国协议，以承认英国在西藏自由行动为交易条件，而得到英国同意外蒙“独立”。

在此之后，俄国对于中国，也想以承认中华民国为交换承认外蒙“独立”的条件，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十月，俄国承认了中华民国，然而中华民国当时并没有承认外蒙“独立”。后来，外蒙问题，仍然是中苏（苏联）之间遗留未决的课题。

在另一方面，日本和英国之间，为了争取在中国的经济权利而展开了外交战；不仅清廷、甚至炽烈到连其他列强国家也被牵连进去。

彻底说来，英国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固然可以说是站在不干涉的立场，但她对于自己的权益，却绝对不肯松手。

英国是在中国拥有最大权益的国家。正因为如此，所以有关革命的情报，能够很快地到手。驻汉口代理总领事葛福，早在辛亥年（一九一一年）九月三十日，就获得了武昌新军不稳的消息，立即便于十月三日要求驻上海的英军支援；可见其消息灵通、反应敏捷的程度。

日图与英勾结

当革命军刚一发难之初，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便为确保汉口租界安全，马上要求英国驻华海军司令温斯诺策划必要措施；同时，并以外交团长的地位，和清廷交涉，获得军事行动不得威胁到租界安全和各国利益的保证。

英国只图保持利益

英国对于中国革命的评价如何，姑且不谈；总之，她无论在那一方面，都是唯恐自己在经济上会因而受到损害。

十月十八日，驻汉口五国领事团发表“中立布告”的时候，英国对于革命军还没有承认其为“交战团体”，不仅在“中立布告”上就避免了表现“交战团体”的语气，而且英国外相葛雷还曾特别训令朱尔典“对于革命军认为其具有交战团体地位的看法，不切实际”——明白表示了英国政府的立场；这是由于顾虑到如果进一步承认革命军是“交战团体”，则将招致清廷的抗议。

然而，相反的是，她的实际态度，却有相当弹性。当武昌革命军政府都督黎元洪照会各国领事要求承认“交战团体”地位的时候，英方的反应是并不否认。还有革命军禁止运输军需物资，各国都没有正式接受，但英国却予以遵守。这是基于维护在革命军控制之下的英国人生命财产等所谓实际利益的理由，尽可能地避免刺激革命军。

像这样以实际利益为中心的中立政策，最具有象征性的表现，是后来在十一月十四日所发表的外相葛雷谈话，其内容如下：

“本人希望中国革命的结果，能组织一个使中国强大，不受外国干涉，而能执行政务的中国政府。像这样的政府，不仅能得到我们的承认，而且能得到我们的友好与支持。我们更希望一个强大的中国政府成立之后，在贸易方面保持门户开放政策；至于政府由谁来组织，在我们来说，并没有任何重要性。”

以与列强各国协调为目标的英国外交，循此方针，贯彻执行～～一方面使列强之间不起纠纷，一方面是为了不让某些国家抢先行动，故而对中国不加干涉，是一种三面牵制的外交手法。

例如美国曾经试探要派遣军舰保护美国侨民，法国也曾有计划介入其势力范围内的云南，但都被英国政府所制止。

还有，英国所特别关心的是贸易据点上海、南京的安全，曾经一度打算和美、日、德、法等国协商，各派军队一千五百人“共同介入”；又当十一月四日上海光复之际，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即曾命令英国人所组织的志愿军占领上海车站。

在这个时候，朱尔典也曾一再声明：英国绝无意图帮助那一方面，而只是基于维护投有英国资本的企业和租界一带英国人生命财产的需要，禁止为清军和革命军的军事运输。

日英协商华北派兵

日本和英国的外交交涉，也是在和各国同样所谓“协调”的范围内进行。这两个国家，在自革命发生之初考虑派兵到南北议和等等问题方面掌握情况、迅赴机宜的折冲过程，实为在中华民国开国前后列强活动的焦点。

日英之间的最初协商，是对华北派兵的问题。

当十月末，河北省东北部滦州的清军将领张绍曾表现出有响应革命的动向时，日本唯恐在华北一带的权益会受到影响，因此，驻北京公使伊集院彦吉曾经先后于十月二十七、二十八、三十日三度电达日本政府，要求自日本本土派遣陆海军到天津、大沽、秦皇岛，维持治安。当时，外相内田康哉口头上主张慎重，给予伊集院彦吉的回电是：“日本派兵，将会引起各国疑虑，而且还会给革命党以非难日本政府援助清廷的藉口。这件事，至少要能得到英国政府的同意与谅解，纵使问题国际化，也可以由两国共同负起责任。”实则内田康哉的内心是原则可以派兵，并且已有准备，不过因为顾虑到在英国的注视下，故而采取慎重态度。

据内田康哉外相于十月二十九日致伊集院彦吉公使的第四三五号密电：“我方在目前，为使‘日进’及‘和泉’两军舰务必在不让人注意的情况之下，派遣往旅顺航行一周，业已分别发出必要的命令。又，近日应该执行驻满洲部队的新兵和旧兵交待，已予延期，对于驻军实力，正采取使不致有任何影响的措施。倘一旦发生不测之变，可由旅顺迅派军舰，并由满洲立即调遣陆军一个部队，已有妥善准备……”内田康哉除告知伊集院彦吉已作备战措施之外，更说明：在设想到不致引起有何种顾虑（国际问题）的情况之下，正作增强海陆军进驻的准备。

伊集院彦吉在接到电报之后，打算向朱尔典提出协商派兵问题；所持的藉口，则是“确保铁路安全”。

朱尔典本人也是主张派兵的积极论者，他在得到伊集院要求协商派兵之前的十月三十日，就已经向英国外相葛雷发电报告“联系北平和天津之间的京津铁路颇有危险。为使确保由北京到上海的交通线，请考虑准许在京津铁路沿线驻留英军”——希望予以裁可。

在这个阶段，日英两国派在北京的外交机关，使彼此利害关系，形成了一致的局面。

英国拉拢袁世凯

十一月五日，驻北京英国公使朱尔典，造访日本公使伊集院彦吉，提出有关派兵的具体问题。

朱尔典提出来的方案，是由有关列强国家的联合部队共同防护京津铁路。在北京来说，天津是通往海上的大门；京津之间的交通保障，直接关系到北京的安全。不过，在英国方面，由于唯恐因防护铁路而造成国际问题，故有和有关列强国家协商之后，再行实施之必要，因而首先访晤伊集院彦吉交换意见。

日本外务省接到伊集院彦吉的报告之后，马上电报指示驻英国临时代理大使山座圆次郎，探询英国真实意向；同时建议将防护铁路的范围扩大到东三省，但山海关以北（关外）则不必共同防护，而由日本单独负责。

在正当窥伺着干涉中国机会的日本来说，能以防护铁路为藉口而出兵，当然是正中下怀、顺水推舟的事情。由京津地区沿辽东湾出山海关通达奉天（沈阳）的“京奉铁路”，是直接联系东三省和内地的干线；在东三省南部驻有强大兵力的日本，预想到将来在必要时向中国内地输送兵员，故而希望确实掌握住这一条铁路。

英国外相葛雷，对于日本的提案，显有难色，只是回答：“问问各国的意见再说……”，因为在英国方面的方针是，务必由列强共同防护，而且其范围，在目前以关内为限。

六国签订防护铁路协定

看到日本的活动，俄国自然难安缄默，驻伦敦的俄国大使馆乃向葛雷外相声明“对于日本的独占行动，俄国不能坐视不问。”于是，葛雷终于答复日本“现在还没有那个必要”而予以拒绝。

然而，日本并没有放弃派兵的念头，还是再三强迫要求英国承认关外铁路由日本单独防护；在这个当口，美、德等国家也都唯恐“搭迟了巴士”而向英国提出参加。结果，英国方面表示让步，决定关外地区由日本和俄国洽商之后单独防护；关内由列强分段负责，共同防护。照英国当初的预定，是由英、日、法三国负责；但经过如上所述的一些折冲之后，在翌年～～一九一二年一月间所签订的“防护铁路协定”，便增加了美、俄．德三国而共为六国。根据协定，日本很成功地得到自山海关到滦州一段的六十一公里地区，配置了五百九十九名的防护兵员，差不多可以和各国驻屯部队的总兵力匹敌。

各国均图利用袁世凯

列强围绕着袁世凯登台而施展出来的阴谋策略，也是值得一看的场面。当时，列强都在考虑用什么手段才能把袁世凯拉到自己这边来？因为大家都知道袁世凯即使是在隐居的那段期间，仍然有力量能够左右强劲的北洋军，故而被认为是收拾中国混乱局面的最有力人选。

以英国为首的多数列强国家，都朝着希望由袁世凯来尽快收拾局面的方向展开活动。这是因为混乱情势如果长期延续下去，则各国在华权益，便会受到重大影响；并且打算到如果帮助袁世凯收拾局面成功，则可以在某些方面得到相应的报酬。

可是，只有日本的情况比较不同；日本的意图在妨碍中国变成共和体制的国家，而希望使袁世凯拥护清廷，受其利用。因为意图以天皇制帝国称霸东方的日本，对于近邻中国将会变成与君主国家不能相容的共和体制，总得要尽量设想点办法加以阻止。

朱尔典积极活动

列强国家和袁世凯距离最近的是英国。一如在前面已经谈到过，这是由于朱尔典和袁世凯个人之间，自十多年前以来，就建立有亲切的关系；所以，英国在袁世凯一上台的时候，就立即展开了积极接触的活动。

英国支持袁世凯的方针，从她对于清廷借款的态度，也表现了出来。先是清廷因美、英、德、法四国银行团借款被停止继续支借，以致苦于军费支出，而要求新规借款；但朱尔典判断已受革命洪流冲击的清廷，即使不致被推翻，但也将会从此大权旁落；所以向伦敦建议，与其现在借给清廷，使战事延长下去，则莫如将此款保留，等到将来借给可能会由袁世凯所组织的政府，较为得策。

于是，英国政府便采纳了朱尔典的意见，拒绝新规借款，态度坚定。因之四国银行团也采取同一步调，于十一月八日在巴黎举行的会议中决定中立。这个决定，对于国际间的影响颇大，以致其后清廷所有对外借款活动都碰了壁，在南北统一之前，只借到了来自澳洲的七十万英镑。由于此故而造成的经费困难，乃带来了加速清廷趋向没落的结果。

朱尔典在停战、议和方面，也表现得非常活跃，十一月二十六日，和袁世凯会谈，说服他和革命军停战，十一月二十九日，更对革命军和清廷双方面正式提议举行“南北和议”——英国拉拢袁世凯的部署，就是这样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地在进行之中。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忙着对于袁世凯的工作。

日本意图难逞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刚组阁完毕，日本政府便命令其驻北京公使伊集院彦吉于两天后的十八日，前来拜会。

探询袁世凯的意向

见面的时候，伊集院彦吉表示是“奉本国政府秘密命令特来谒谈”，就有关“均主立宪政体”问题向袁世凯探询其意向如下：

“此次，阁下（袁）荣任，必有切实计划。阁下是否拥护清廷，或别有尊见，请开诚相告。无论阁下意向如何，日本都会尊重，并决定极力援助；此际，特别当面密谈，绝不会对外泄露，敬请惠示真实意向。”

袁世凯答称：“本人现奉朝廷诏命为总理大臣，怎么能说不拥护清朝。”

日本政府根据这个回话，而解释为袁世凯已承诺实行“君主立宪”，乃于十二月一日，饬知驻伦敦的山座圆次郎，要求英国政府为树立中国君主立宪而协力。

对于日本的要求，英国外相葛雷于十二月五日答复：“极其希望中国在爱新觉罗王朝之下实行君主立宪”——表面显示赞成之意；但却同时说出“干涉其内政，并非上策。”实则此时英国已经在幕后斡旋袁世凯和革命阵营进行议和工作。

日本对于橡这样地以袁世凯和英国为主轴的议和工作，当然感到恐慌。

此时，中国国内已逐渐倾向于革命军站在上风的情势，如果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之下进行和平交涉，虽则是袁世凯，但也不得不对革命军让步。而且可以预料得到在让步的条件之中，就会包括有为日本所感到非常不合适的“国体问题”在内。这个问题，就是清廷究竟是存续还是废止？就日本立场而言，如果关于清廷存续一点得不到明确的保证，便不应该让南北和议进行成功。

英国对于日本这样的意向，当然也有所察觉。因此，一度要求日本基于英日同盟共同调停南北和议，但为日本所拒绝。

日本为了对抗英国，乃有和美国联起手来的意图。

当临时政府外交总长伍廷芳和清廷邮传部大臣唐绍仪开始举行第一次和议的十二月十八日，日本外相内田康哉便以共同劝告中国采行“君主立宪政体”的意见对美国加以游说。

在这个游说中，内田康哉提到：“中国即使有采行共和制的意向，但实际问题很多，中国国民甚至能否运用共和制，都成问题。不过，清廷不能有为，已经非常明显；故而此时应该实施一方面在名义上确立清廷统治中国，一方面尊重国民权利的君主立宪制。”

美英一致拒绝日本建议

在当时的美国，由于远东问题对她的利害关系，还比不上日本、英国那么大，故而在有关中国外交方面，大体响应英国的主张；所以美国认为如果接受日本游说，则将引起和英国的摩擦，而且更会处在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所以拒绝了日本的建议。

结果，日本拉拢美国的企图，也归于失败。

日图造成分裂局面

打算维持清廷的日本，在另一方面却对革命军也给予武器援助，其意图是在对袁世凯加压力，具有牵制作用，并且使革命军因而强化，南北对立态势继续下去，可望终于造成分裂的局面。

在当时，伊集院彦吉曾向内田康哉发出两件极机密电报，足以说明这个情况。

十月二十八日电文：

“以武昌为根据地的革命军军政基础，看来业已稍稍稳定，并非言之过早……正好利用此一形势，可使在中清（中国中部）和南清（中国南部）至少兴起两个独立国家，而且应使在北清（中国北部）方面的现朝廷（清朝）继续统治下去……相信此案如能达成，则立即可定帝国百年大计，并兼以奠立远东和平基础，进而能使扰乱世界和平分子绝迹……是则确立皇国永久隆运基础，正在此时……本使（伊集院）认为在北清一角保全清朝，使永远和汉人对峙，就我帝国而论，实为得策。谨当本此认识，与其庙堂（清廷）内部声息相通，密切联系，加强指导诱掖……”

十二月二日电文：

“……对革命党自中清武昌到南清广东给予援助，以防其气势挫折，藉使不致产生与北清中央政府融和妥协之念，务必谋求使之持久对峙……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新内阁成立后之清政府，究竟会持何种态度对待我国，仍然是不得不存疑的问题；为谋于我有利，则基于资以牵制袁世凯内阁之策略，亦有对革命军援助武器之必要……”

尽管日本像这样地在推动其牵制工作，但南北和议中仍然一致同意国体问题由国民会议决定，这个决议，大致含有移转到共和制的趋向，非常明显，可见以阻止共和、实现君主立宪为目标的日本策略，已经是渐趋失败。

日本方面，认为袁世凯轻易对革命阵营让步，因而按捺不住不快的反应；伊集院彦吉为此特地往见袁世凯，愤怒地表示：情势的发展，和前次在十一月十八日会谈时的感受，有所不3[131]627同。

然而，袁世凯对于伊集院彦吉的责难并未加以理会，因为在袁世凯的内心，只要有英国作后盾，则不管日本如何反应，相信是不致于动摇到自己的地位的。

袁世凯与英联结

日本阻止中国共和国体的工作，虽然到了这个阶段，还是在进行不辍；可是袁世凯则和朱尔典联结起来，未使得逞。

窃国意图早已具体化

英国对于中国国体问题表示其具体意见，是在十一月十四日，朱尔典和袁世凯长子克定会谈的时候。朱尔典说明：“关于解决国体问题，外国一般看法，都希望最好是保全清廷作为象征性的存在，而实施宪政改革。我个人也认为建立共和形态的政府，是一种冒险的实验，不适合中国国情。”可见在这个阶段，英国对于共和体制还是持消极态度。

对于朱尔典的意见，袁克定表示：“共和制只不过是一个过渡时期。”他并且提到：“在革命党的一伙人中，早晚也会有拥戴袁世凯正位九五的。”从袁克定的意向可以看出袁世凯取代清廷、窥窃国柄的野心，早在此时，就已经具体化了。

但不久之后，英国的意见有了变化，其原因是，在于盼望中国国内的混乱局面能够很快收拾。

因为英国所希望的是，中国能够出现一个足以保障对外关系、维持公共秩序、促进国际贸易的强力统一政府；至于这个政府将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形态，则是次要问题。朱尔典等人特别担心日本的动向，他认为如果日本介入中国问题，意图维持清廷，则将招致半个中国（革命阵营）的怨恨，反而难免助长了混乱情势；而且，假定日本干涉成功，则对于清廷的影响力将会因之增加，故而对于英国便会有所不利。

基于这些见解，所以英国决定，国体问题由中国自决，外国不应干涉。

至于日本方面的工作目标之一，就是在对如此态度的英国加以说服，这是由驻北京公使伊集院彦吉负责和朱尔典折冲。为了要有能和朱尔典用英语直接交谈的外交官，因而发生日本政府特地紧急调派驻纽约总领事的水野幸吉转勤到北京公使馆服务的一段插曲。

同时，日本对于袁世凯和朱尔典的密切往来，也提高了警觉。十二月十一日，伊集院彦吉见到袁世凯，强硬地叮嘱袁世凯说：为使缔结有同盟关系的日英两国，在中国也能互相合作，希望关于在和朱尔典之间所协商的问题，务必随时通知日本方面。

十二月二十四日，清廷庆亲王奕劻和袁世凯两人分别约见朱尔典和伊集院彦吉，告知将在南北和议中协商决定召开国民会议，议决政体。英国当然表示赞成。

日图谋不成策略转变

但是日本方面，则保留了态度，第二天～～二十五日，日本驻伦敦临时代理大使山座圆次郎奉命向英国政府提出中国应为君主立宪政体的要求，但为英国外交部所拒绝。在这个时候，日本强迫推动的君主立宪工作，已经完全挫败，对中国的外交方针，乃不得不作重大的转变。

十二月二十六日，西园寺内阁举行阁议，过去的策略为之一变，撤回了支持清廷的方针，而决定静观由中国国民会议来解决国体问题。

然而所谓“静观”，实则包含有以支持革命党来对抗袁世凯和英国的意图——这是促进中国南北抗争，好作浑水摸鱼之计的一种阴谋。实则这个阴谋，早在转变方针之前，就已经和阻止共和政体的活动并行不悖地通过民间路线在进行之中。

为了执行这个策略而担任使者的，是日本政界有力分子犬养毅。犬养毅和孙先生是老朋友，对于中国革命有所理解。他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到达上海，赶上迎接孙先生自欧美归来。

犬养毅在首途前往上海之前，曾与外相内田康哉见面，询及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当时3[134]630，内田康哉表示：“像支那那样的国家，能够实行共和政体吗？帝国政府对于革命党的主张绝对反对，并有决心即使是出动武力也要援助满清政府，推进君主立宪政体；希望将这个方针也转达南方的革命政府。”对于革命党所揭橥的民主共和政治有所认识的犬养毅，对内田康哉的想法，虽然显露出不满的辞色，但结果还是不得不体察其政府的意旨，试图和孙先生接洽。

犬养毅传达日本方针

犬养毅于孙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的一九一二年一月八日，在南京的总统府和孙先生会谈，当时，他转达了日本方面的方针，同时建议联合两广总督岑春暄及保皇党康有为等人对抗袁世凯。

孙先生听到犬养毅的一番谈话之后，直截了当地指出日本政府阻止共和政体的方针是错误的；继之并表示：“岑春暄在湖南巡抚时代，残害过无数革命同志；康有为是光绪皇帝的奴仆，只寄望于宫廷改革，两者都不是协助革命的人。”断然予以拒绝。犬养毅看到孙先生的意志甚为坚定，判断出不可能再有协商的余地，于是便在不久之后，返回日本。

到了这个地步，日本的谋略性活动，又以失败而终场。

据犬养毅后来在他的自传中提到和西园寺公望首相谈话时，西园寺的意见是：邻国的政体将会成为什么样，和日本并没有关系。

可是，两三天之后，内田康哉约往晤谈，语气截然不同，内田表示：“我们考虑在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使维持其君主政体。”

关于这一内幕，犬养毅更有如下记述：

“因此，我（犬养）便提出忠告说：‘开什么玩笑！这样混账的传言，能够转达给革命党吗？好不好重行考虑一下？’但是他听不进去；因为他被山县有朋（军阀元老）压制得动弹不得，当然听不进去。”

国父自居公仆

现在将话题转移到中国内政问题。

孙先生膺选临时大总统，是在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十七省代表投票选举

这一天，在南京所举行的选举会中，参加者有湖北、湖南、广东、浙江等十七省代表四十五人，由浙江代表汤尔和担任主席。

各省各投选举票一票，在总投票数的十七票之中，孙先生获得十六票（黄兴一票）当选，决定了中华民国的开国大总统。

这时，还在上海的孙先生，立即向集会于南京的各省代表发出表示接受的电文如左：

“光复中华，皆我军民之力，文孑身归国，毫发无功，竟承选举，何以克当？惟念北方未靖，民国初基，宏济艰难，凡我国民，共有责任。诸公不计功能，加文重大之服务，文敢不黾勉从国民之后，当克日赴宁就职，先此敬复。”

孙先生在对各省代表发电之同时，又致电各省都督及军司令长官，以膺选国家元首的地位而自称“公仆”，这种打破视国民为臣民的专制风气、而转移到民权主义的态度，甚为明显。电文是这样的：

“……今日代表选举，乃认文为公仆，自顾才力，诚无以当……”

继之，接见记者，孙先生指出“各种改革完成时，政府当立即取消领事裁判权。”明白表示现在即将脱离长时期的列强控制，而成为一个具有尊严的独立国家；对于国体问题，则提到：“国会必将赞成民主，固不容疑。”

国父致电袁世凯

接着，孙先生对北京袁世凯发出“随时可以移交大总统职位”的电报。孙先生对于袁世凯绝非信任，但为谋国家赶快安定，故而将迁就现实的心境托诸电文，内容是这样的：

“北京袁总理鉴：文前日抵沪，诸同志皆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问其理由，盖以东南诸省欠缺统一之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祇得暂时担任。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孙文。”

这一个电报，助长了袁世凯在后来的野心。

国父晋京就任大总统

一九一二年元旦，孙先生就任为新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由上海启程，前往设置临时政府之地的南京。

同行者，有担任各省代表会临时议长的浙江代表汤尔和、副议长广东代表王宠惠和军事顾问美国人荷马李等数十人。

此时，在沪宁铁路的上海车站，有都督陈其美等新政府高级官员及驻在上海的各部队、各团体出动欢送。希望一瞻大总统丰采的中外人士蜂涌而至，车站前面马路，挤满人群，转动不得。

据元月二日民立报报导：“华洋商民……脱帽拍掌，声震耳鼓，五色旗飘扬飞舞，各茶肆莫不利市三倍云。”

这样的兴奋气氛，随着孙先生一行所乘专车络绎前进，扩散在沪宁铁路的沿线。

共和万岁呼声沸腾

又据元月三日民立报：“过苏州，共和万岁之声，闻于数里。至无锡，男女学生数百人整列欢呼万岁，与其代表握手而行。常州、镇江欢迎者，均及万人。”

民众的兴奋，不仅是沪宁沿线；在福州有群众万人，提灯游行，还有中国各地都沸腾着“中华民国万岁”的呼声。

迎接孙先生莅临的南京，正下着细雨，寒风砭骨，然而祛除寒冷气氛的欢迎人潮，热烈地在等待着孙先生。

专车抵达南京城北沪宁铁路终点的下关车站，是下午五点钟。

礼炮雷鸣，军乐起奏，各队士兵全体举枪敬礼，驻南京各国领事全体到车站迎接，停泊在长江江面的军舰，鸣放二十一发礼炮，传来隆隆的音响。

总统府已经决定设在南京城内旧两江总督衙门。孙先生由下关车站换乘进入城内的铁路专用花车，市内悬挂欢迎旗帜，沿街商店张灯结彩，到处人潮。下午六时十五分专车抵达旧总督衙门车站。

由车站去总统府，换乘蓝色绣花彩绸马车，前面有高奏凯旋歌的骑兵军乐队开道，后面有护卫队随行。

黄兴和海陆军代表徐绍桢迎接孙先生入府。就任典礼在当天晚上十时，各部队团长及各部司署科长以上均参加典礼。孙先生手持军帽、身着黄色军服，没有佩戴任何肩章或金绶等类。

孙大总统就职

孙大总统庄严地向全国国民宣誓：

“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宣誓毕，由山西省代表景耀月代表各省代表会，致送镌有篆文“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的印绶，孙大总统在就职宣言书用印发布。

在宣言书中，孙大总统对于内政方面揭示民族、领土、军政、内治、财政诸大端之统一3[143]639，为重要任务；至于外交方针大致如下：

“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与我友邦益增睦谊，持和平主义，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

所谓“大同”，一如孔子礼记所揭示，是人群繁荣，共臻永远和平的世界，也是中华民族引以为值得夸耀的世界，更是世界上爱好自由的人们诚笃信仰的理想世界。中华民国的建国理念，就是送这里向全世界表达出去。

明定国号改用阳历

宣言发布之后，孙大总统下令定国号为“中华民国”。同时改用阳历，以这一天——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实一月十三日（阴历）、西历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月元日。

亚洲最初的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在这个时候初试啼声；亘三十年的愿望，终于实现。

临时大总统就任典礼完毕，孙大总统立即着手组织临时政府。元月二日，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设置副总统；三日，各省代表会选出黎元洪为副总统。

政府规模具备

继之，复经各省代表会同意，任命各部总长、次长。在九位总长之中，只有陆军黄兴、外交王宠惠、教育蔡元培三人为同盟会会员；各部次长则全体为同盟会会员。

此外，接着任命胡汉民为总统府秘书长、黄兴兼任总统府参谋总长；并且在总统府之下分设法制、公报、印铸、稽勋、铨叙五局，临时政府规模，大致具备。

作为中华民国“民治基础”的参议院之构成，与组织政府同时进行。组成参议院的参议员，根据在先制订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由各省都督府选派“精通法律、政治，富有经验”者担任，各省以三人为限。这是为了能够将各方面的民意反映中央政府；过去在清廷的高压统治之下，则未曾设置过。

孙大总统于元月三日通电各省，请派参议员前来南京。

经过如上所述的过程，而于元月二十八日举行成立大会，组织“临时参议院”；参加者有十七省所派参议员三十八人。

公布临时约法

参议院最重大的任务，是审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二月七日，组成起草委员会；经过了一个月的讨论之后，于三月十一日公布。

以“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第一条）及“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二条）为始的临时约法，制定了国民主权、内阁制、国民基本权利，形成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所应具备的架构。可是这个临时约法只不过在仅仅一年半之后，便被袁世凯所破坏，改变为对他个人独裁有利的制度。

刚诞生的中华民国，对于列强对策，当然是刻不容缓；而列强各国也正在注视着新生中华民国，眈心孙大总统的新外交政策对于他们的利害关系会不会有所影响。

发表对外宣言

孙大总统在元月五日，发表的“对外宣言”。这个宣言，贯彻了早在一九○六年所制定的“革命方略”同样的精神，列举清廷罪恶，昭示革命目的，希望和世界各国维持平等友好关系，并要求中华民国得到国际承认。

在发表对外宣言之后，和议代表伍廷芳立即致电驻北京、天津各国公使、领事，请求严守中立，并保证保护侨居在中华民国境内的外国人。

在这里必须加以注目的，是袁世凯的动向。中华民国虽说是已经在南京开国，但在北京的清廷仍然存在，袁世凯还是统驭着清军而大权在握。

南京和北京之间，已如前述在逐步进行着南北和议的折冲，关于国体问题究应为民主共和或是君主立宪，俟召开国会决定一点，大致已意见一致，而由伍廷芳和袁世凯之间在继续交涉中。

孙大总统的意向，是务必要废除清帝，统一中国。因此，在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的十二月二十九日，便致电袁世凯，表明已有退让的准备，这是为了避免因大总统的争执造成国家分裂的危险而“让位”。可是袁世凯则于元月二日表示：“君主共和问题，现在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而不肯同意。孙大总统为要求袁世凯翻然转念，乃再度去电：“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

第三章：中华民国之诞生(下)

主题

袁世凯的手法清帝退位问题清朝告终袁世凯取得大权国父锐谋革新日英竞争贷款日亟图控制中国日俄领土野心美德表明立场日俄“分割满蒙”川岛浪速阴谋阴谋再三失败割让东北的流言伪造国父文书各国承认问题美国态度友善美日形成对立日提筑路要求张勋攻下南京挟制袁世凯俄国侵夺蒙古英国攫取西藏

袁世凯的手法

元月五日，袁世凯立即复电伍廷芳：

“……闻南京忽已组织政府，并孙文受任总统之日，宣示驱逐满清政府，是显与前议国会解决问题相背。特诘问贵代表，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设国会议决为君主立宪，该政府暨总统是否立即取消"希速复电。”

伍廷芳于第二天～～六日复电反驳如下：

“现在民军光复十余省，不能无统一之机关。在国民会议未议决以前，民国组织临时政府，选举临时大总统，此是民国内部组织之事，为政治上之通例。若以此相诘，请还问清政府，国民会议未决之前，何以不即行消灭？……设国民会议决为共和立宪，清帝是否立即退位？”

不用说，袁世凯在这个时候，不仅对于革命政府，同时对于清廷也在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摇撼工作。

他在隆裕太后面前，主张讨伐革命军，但如拿不出军费，则以辞职胁迫，强使清廷拨发内帑黄金八万锭；另一方面，对庆亲王奕劻，则劝说：“在革命军已经不可能让步的情况之下，如果勉强用兵，反而危险。为了清廷和满人的安全，只有接受清帝退位的要求。”奕劻被袁世凯说服，开始倾向于共和。

针对奕劻的态度，清廷贵族中的有力分子良弼、载涛等人，于十二日组成“宗社党”，发起务必坚持拥护清廷、阻止共和到底的活动。

革命军已光复徐州

为了打开僵持局面，革命军在各地再行发动对清军的攻击，特别是粤军姚雨平和苏军陈干所率领的革命军，在安徽固镇将清廷倚重的张勋所部击溃，乘胜北上，夺取了江苏徐州。张勋逃往济南，距离清廷的根据地——北京、天津，只剩下不多远的路程了。

孙大总统于十五日经由伍廷芳电达袁世凯，再度肯定表示推荐袁世凯为大总统，藉以迫使清廷退位。电文是这样的：

“如清帝实行退位，选拔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袁世凯的时刻到来

袁世凯看到遂行欲望的时机终于成熟，也就是拔起清廷这颗大树的时刻已经到来，树根完全松动了，而且承袭政权的准备工作也都已经齐备了。

翌日～～十六日，袁世凯率全体国务大臣联名密奏清廷，吁请早顺舆情：

“……若其久事争执，则难免不无干涉（列强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民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何忍久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

在这个奏文上达的前后，清廷收到了两封外交电报，都是驻俄公使陆征祥用驻外公使联名的名义打来，内容略谓：从国际情势看来，已失民心的清廷，必须逊位。其实，这也是袁世凯密令陆征祥所拍发的。

清廷所受的打击，实在是够大了。

当时只有虚岁七岁的宣统皇帝溥仪，后来在他手着的“我的前半生”（一九五一年在天津发表）中，对于袁世凯上奏的情景，曾有如下的纪述：

“在最后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十一月二十八日（阳历一九一二年元月十六日）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内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搐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子就是袁世凯。这是我看见袁世凯唯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正是在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问题。”

刺袁未成三烈士就义

革命党暗杀袁世凯未遂事件，就是发生在上之后的归途中。

袁世凯于午后零时十五分，自紫禁城东华门退出，在他所乘的双头马车前后，都有护卫马队，沿途兵警鹄立，警备甚严。马车奔驰到东华门外丁字街地方，忽有炸弹自道路左侧的茶楼上掷下，在车后一、二公尺的极近距离爆炸，袁世凯幸免于难，牵曳马车的两头马之中的一头受到重伤，但马车仍然继续回到袁的办公处——北洋公所。

在这一次爆炸中，警卫队长等四人死亡，兵士十二人、路人三人负伤。

策划暗杀的人，是杨禹昌、黄之萌、张先培，三人都是“京津同盟会”的革命党员，当场被捕，直认不讳，而被处死。自此之后，袁世凯加强戒心，足不出户；清廷为退位问题，连续不断地举行御前会议，都没有出席。

清帝退位问题

关于清帝退位问题的御前会议，自元月十七日开始，连日不断地开会。

在会议席上，表示不得不实施共和政体的人，是被袁世凯说服了的庆亲王奕劻。而溥伟、载泽等满人贵族及蒙古那王、喀喇沁王等人主张维持君主制度。可是隆裕太后则只知道哭泣，几乎是不发一语。直到二十二日，先后举行了五次会议，得不到结论。

御前会议激烈辩论的情况，在元月二十五日的上海民立报曾有报导如下：

“十九日午后开会，宗社党气甚激昂，奕劻云君主政体虽当维持，然皇位恐不能永保……

“喀喇沁王仍坚持前说（君主政体），且言如不能用其意见，则将归本土，并东部蒙古，离中国而独立，断不受其他拘束。奕劻怒，拂袖起去；其余满人，大都主君主，惟以奕劻已去，不能决议而散……”

喀喇沁王在御前会议中透露有独立之意，是由于有日本军部及民间人川岛浪速所策划的“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阴谋存在。盖当时日本策动喀喇沁王以内蒙古独立的纪画，实际已经在进行之中。

彭家珍刺杀良弼

宗社党在这个趋势之下，于十九日举行秘密会议，开始进行强求贵族人士赞成君主立宪的签名运动。他们于夜晚拜访各王公贵族，如不肯同意签署，便坐候通宵，执拗不走，以谋做到意见统一。

正当签名运动积极进行之际，突然发生了第二个暗杀事件——宗社党领袖良弼于一月二十六日被暗杀死亡。

执行这个事件的人，是京津同盟会主要干部彭家珍。

被炸弹击中的良弼，左腿受伤，虽经日本医生为之锯腿治疗，但仍在两天后死亡。同时有卫兵八人、马弁一人当场被炸死。彭家珍自己也被炸弹破片击中而殉难。

这个时候，正是良弼准备好了要以宗社党的力量排除开始挟革命党自重的袁世凯之际，良弼在临死时喃喃自语：“我死之后，清室也完了！”这句话，确实是说对了的。

失去了领导拥护清廷的良弼之后，王公贵族们都战战兢兢、争先恐后地将财产存入外国银行，逃往天津、青岛、大连，托庇于外国人的保护之下。到了这个时候，能屏障清室的藩篱，已经是完全撤除了。

国父提出五项条件

和上述情况齐头并进的是，临时政府通过交涉和议的伍廷芳和唐绍仪路线，与袁世凯恰商有关清帝退位的具体条件。元月二十二日，孙大总统提出包括自己辞职、由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的最后协议条件五项如下：

“一、清帝退位，由袁世凯知照驻北京各国公使，请转达各国政府。

“二、同时袁须宣布政见，绝对赞同共和主义。

“三、文（孙大总统）接到外交团或领事团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后，即行辞职。

“四、由参议员举袁为临时大总统。

“五、袁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后，誓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乃能接受事权。”

接受了五项条件的袁世凯，并不直接迫使清帝退位，而又玩弄手法，策动心腹部下湖广总督段祺瑞领衔会同清军将领四十二人，于二十六日联名电请清廷“立定共和政体”。电文如下：

“……冒死陈言，恳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以现在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担任条约、国债、及交涉未完各事项，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俾中国人民，咸与维新，以期妥奠群生，速复地方秩序……”

这个电文的署名人，后来增加到五十人。

协商清室待遇问题

受到握有兵权的将军们等于是武力威吓的清廷，最后可走的一条路是只有“退位”。虽经再度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对策，而且多数贵族王公仍在大唱反调，认为退位结果，连皇室禁卫军也得委诸新政府编制，生命安全都值得顾虑……然而隆裕太后终于决心退位，说服了反对的贵族人士，于二月三日授袁世凯以全权，与临时政府协商清室退位后的待遇问题。

据元月二十六日民立报报导：驻在中国的各国外交团，对于清帝退位，也曾给予了压力：

“……上海、汉口、天津及北京之外交团，均不满意北京政府，谓既不能战，又不能让，徒要求民军代表作无终了之展期，甚属无谓云云。

“当由英使朱尔典代表各国意见而诘袁世凯云：贵大臣若不速定大计，将来各国条约上之权利及商业上之经营，必受莫大损失，各国决不耐久守中立……现已议定作正式之宣告，承认南京临时政府为有国家之资格，以便交涉一切。至满清政府则同时宣告断绝关系，唯贵大臣图之……”

不过，在这个时候，外交团还没有协议“承认临时政府、和清廷断绝关系”的事实，上述报导，可以看作是列强在外交上所特有的一种手段。

清朝告终

由临时政府和袁世凯洽商的结果，于二月十一日决定了优待条件八款：

“一、清帝退位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二、清帝退位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三、清帝退位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四、清帝退位后，其宗庙、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五、德宗（光绪帝）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

“六、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七、清帝退位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八、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此外，并有对于清廷皇族待遇四项，及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七项。

翌日～～十二日，清廷接受了这个条件。

清廷宣布退位诏书

当天，袁世凯携带着腾录好了的退位诏书，前往养心殿，晋见隆裕太后，上陈过目；太后读毕文稿，泪流满面；才七虚岁的宣统皇帝溥仪，埋头在太后怀中放声大哭，徐世昌在诏书上盖好玉玺，大臣们极力安慰隆裕太后母子，内监宫女们抱扶着六神无主的太后退往后宫。

旋即宣布退位诏书，内容如下：

“……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碳，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余（隆裕太后）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政体……

“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又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余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自从世祖顺治皇帝进占北京的一六四四年以来，历二百六十七年的清朝，于焉灭亡。

曾经出仕清朝的曹汝霖，在其自着“一生之回忆”中，有过这样的记述：

“逊位诏书，由南方拟定寄来，闻尚是南通张状元（謇）之手笔。至授袁全权组织共和政府一句，则由北方加入者。”

由于加上了这么一句，以致本来只是宣告退位的诏书，变成含有让位于袁世凯之意的微妙文章。

在后来帝制自为的袁世凯，早在这个时候就已经不曾忽略很巧妙地把自己的野心潜蕴在诏书之中了。

袁世凯不肯南下

因清帝退位而统一的新中华民国，接下去是在何处“建都”的问题。本来临时政府已经由孙先生出任临时大总体而在南京成立；然而行将继承孙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却停留在北京，不肯南下。

为了首都问题而相持不下，是因为各有各的意图，在革命阵营来说，南京是已经光复的地区，为革命军所控制；但北京却还没有光复，仍旧是属于袁世凯所统驭的清军天下。对于并不能百分之百寄予信赖的袁世凯，就让他待在北京不动而给予领导权力，是非常危险的。

至于袁世凯，则在清帝退位的前一天～～二月十一日，致电南京孙大总统、参议院以及各部总长，告知退位诏书业经签署，并且提到：

“……世凯极愿南行，畅领大教，共谋进行之法，祇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稍有动摇，牵涉全局……”——是以治安状况为藉口，表示不能立即前往南京。

国父荐袁世凯继任总统

然而，在孙大总统方面，当得到了清帝退位的消息之后，便于二月十三日履行事先诺言，向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并推荐袁世凯继任。

不过，孙大总统唯恐袁世凯为所欲为，所以特地在这个时候附带地提出下列三个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

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就任之时，本总统及国务员乃行解职。

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令章程，非经参议院改订，仍继续有效。

可是，这几个条件，在后来完全被盗窃国柄、利欲薰心的袁世凯所漠视。

翌日～～十四日，参议院接受孙大总统辞职，但却议决临时政府设于北京。总统府方面因为这个决议和孙大总统的主张相反，乃咨请参议院复议，而于十五日决议仍设南京，同时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接着在五天之后的二月二十日，黎元洪再度膺选副总统——于是，以袁世凯为首的领导体制，遂尔构成。

袁世凯取得大权

然而，袁世凯却拒绝到南京就职。

二月十五日——在参议院膺选大总统的当天，袁世凯便向全国通电表示“舍北就南，实有无穷窒碍”，再次拒绝南行。为此，孙大总统乃一面去电促驾，一面于十八日派遣教育总长蔡元培、法制局长宋教仁等八人前往北京，欢迎袁世凯。

袁世凯为蔡元培等人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同时表示出就要南下的姿态，并且决定在南下之后的北方留守人选，以及排定南下路线日程，先乘京汉铁路火车到达汉口，会晤黎元洪，再乘船前往南京。

谁知实际上袁世凯却在悄悄地进行着制造拒绝南下口实的阴谋。

制造“北京兵变”

这个阴谋，就是密令驻防北京的第三镇统制曹锟于二月二十九日所发动的“北京兵变”。袁世凯的谋略是，只要使北京的治安维持发生问题，就造成了必须停留在北京的藉口。

曹锟在袁世凯的左右，有“赵子龙”之称，平素站在袁的面前，总是立正姿势，是一个绝对服从的部属。

曹锟命令所属部队，在北京辇毂之下的东安门外和前门外一带商店纵火，连受到了诱惑的土匪也加入了暴动，北京市内陷入极度混乱的状态；狂暴的掠夺行为，一直闹到天明，有数千家商店蒙受灾难。

兵变殃及蔡元培等临时政府迎袁南下专使的行馆，乱兵持枪，捣毁大门，闯进室内，抢去衣物书籍等类，蔡元培等人逃避到美国友人住宅。翌日，由美国领事馆员招呼住进六国饭店避难。

三月二日，兵变扩展到天津、保定一带，并因而有外国教士遇害，驻北京外交团乃于三日向袁世凯提出抗议，同时决定英国派兵一千，美、法、德、日各二百，由天津开往北京，四日，在北京市内巡行示威。

袁世凯虽然已经在三月一日晚间发布了北京市的戒严令，但却以“各国联军集中在此，恐怕招致误解”的理由，没有及时采取出动军队镇压混乱局面的措施。不仅如此，并且还秘密策动各省都督、巡抚纷纷通电反对袁世凯南下就任。

情势发展，已经拦入袁世凯从心所欲的途径。

临时政府改设北京

蔡元培等人终于不得不放弃要求袁世凯南下的念头，而于四日致电孙大总统报告兵变详情，并建议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将临时政府设于北京。

六日，孙大总统决定接纳蔡元培的建议，咨请参议院认可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并通过“统一政府组织办法”六项：

一、由参议院电知袁大总统，允其在北京受职。

二、袁大总统接电后，即电参议院宣誓。

三、参议院接到宣誓电后，即覆电认为受职，并通告全国。

四、袁大总统受职后，即将拟派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姓名电知参议院，求其同意。

五、国务总理及国务员任定后，即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交代事宜。

六、孙大总统于交代之日始行解职。

袁世凯根据这个办法，于八日发表誓词：

“……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谨掬诚梱，誓告同胞。”

唐绍仪任国务总理

十三日，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唐绍仪与孙大总统协商阁僚人选之后，向参议院提出阁僚名单。

参议院于二十九日，就提名之外交陆征祥、内务赵秉钧、陆军段祺瑞等十部总长中，议决除交通粱如浩之外，九人同意任命。次日（三十日），袁世凯以唐绍仪兼长交通，正式任命各部总长，唐内阁成立。阁僚之中，王宠惠（司法）、蔡元培（教育）、宋教仁（农林）、陈其美（工商）四人则为同盟会会员。

四月一日，孙大总统在参议院行解职礼。三日，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到了这个阶段，中华民国的大权，已经落入袁世凯的掌握之中。

可是，就电报宣誓的办法而论，本来就有欠郑重；何况袁世凯的誓词，还是言犹在耳，他便已经为遂行其窃国野心而悄悄地展开了活动。

国父从无私利观念

后来，蒋总统在他的文告中，有过这么一段评论：

‘国父祇知有救国建国的责任，从没有自私自利的观念，所以辛亥革命一经成功，就让与政权于袁世凯。不意袁氏窃国，民国颠危，国民不能真正表达自由意志和力量，而造成军阀的割据。’（注）

注：蒋总统-“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一九四六一）

国父锐谋革新

虽然只出任了三个月的临时大总统，但孙先生却在这个期间接连不断地推行了若干非常适合于新兴中华民国的社会改革措施，是以破除旧习惯、建设近代国家、进而跻于大同社会为目标的政策。

确立人权平等扫除旧习

第一：是确立人权平等——包括给予女性以参政权，禁止人口买卖，和废除社会身份的差别。

当时，在福建、广东两省有“蛋民”、浙江有“惰民”、河南有“丐户”等在社会上被歧视的国民；又有被称为“猪仔”、卖往外国做奴隶的劳工。孙大总统乃下令禁止此类身分差别及人口买卖的风俗，令文中有：“全国国民，天赋人权，皆属平等，背此大义，与众共弃……”这是基于民权主义的政策。

第二：是一扫满清时代的积弊，其目的是在藉排除旧习惯，而一新民意。

首先是革除对于官吏的敬称——满清时代的官吏，因其官职的尊卑，而有“大人”、“老爷”等特殊称呼，如果称呼不得当，则有失礼帽。孙大总统乃指出“官吏本来是人民的公仆，而非特殊阶级”，下令改以官职相称；同时，人民之间则彼此称呼“先生”或“君”。这种称呼，一直沿用到今天，已经成为被固定使用的代名词。

禁止鸦片革除蓄辫缠足

接着是禁止鸦片——鸦片对于中国人民，已经是绵亘百年以上，流毒无穷的毒品。

还有满清遗产的发辫，也在禁止之列。所谓“辫子”，是强制将男性头部四周剃光，剩下顶部头发蓄长，编辫垂在脑后，以表示服从清廷的一种象征。本来在革命进行期间，就已经开始有过剪辫子的运动；不过在清廷势力之下的华北等地区，留着辫子的人民仍然很多，故而下令禁止。

此外，束缚中国女性千年以上的缠足恶习，也被革除。缠足，是女性在幼小时代，用布条将双脚裹紧，迫使不致长大的一种风俗。孙大总统在三月十一日发布的禁止令中，有这样的说明：

“……缠足一事，残毁肢体，阻阏血脉，害虽加于一人，病实施于子孙，生理所证，岂得云诬？至因缠足之故，动作竭蹶，深居简出，教育莫施，世事罔闻，遑能独立谋生，共服世务……此等恶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国本。”

像这样锐谋内政革新的同时，新中华民国也正在迎候着对外关系的考验。

清廷遗留下来的包袱

孙大总统虽然在很早就曾揭示过废除满清时代和列强之间所缔结的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等治外法权、恢复和列强平等的国际地位等理想，可是在元月五日所发表的“对外宣言”之中，对于清廷对外缔结的条约及所欠的债务，还是保证存续到满期为止。不论清廷如何腐败堕落，但是在对外关系上历史一贯的沉重包袱，新中国还得要明白表示把它背起来。

清廷的国耻，中华民国不得不原封不动地加以承受，其负荷是相当可观的。

就对外关系来说，很快地便在一九一二年一月底，和德国发生了纠葛。德国是根据一八九八年的“中德条约”，租借了青岛，并且约定在青岛周围约五十八公里的面积，划为由德军监视的不设防地区。一月下旬，属于该不设防范围内的即墨县为同盟会所光复，当时，德国派遣一百三十名骑兵前往即墨，以条约为藉口，要求革命党撤退武装；同时，并自青岛发电报给山东巡抚胡廷枢，告知即墨情况。

清廷根据这个消息，乃派遣四百清兵，突击即墨，杀死革命党三十多人，并将附近村庄烧光。当地的革命军乃报告临时政府请与德国政府交涉。在临时政府来说，因为既有条约存在，当然毫无办法，孙大总统不得已乃于二月十日下令革命军自即墨撤退，不能不说是一件值得痛恨的事。

接着在二月十九日，又发生了与荷兰之间的争执：

这一天，是阴历正月初二日，在荷属爪哇岛泗水市的华侨们，因中华民国成立，升起五色旗、鸣放爆竹，举行庆祝，不料突然出现荷兰警察干涉开会，且对群众开枪，华侨三人死亡，十多人负伤，百余人被逮捕；华侨们为表示抗议，乃闭门罢市。荷兰政府更出动军队强迫开市，终于发展成为逮捕了四百多人的大事件。

外交上的首次快举

泗水华侨乃分别向北京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以及上海华侨联合会发出电报，请求保护。临时政府因而电请袁世凯务必和驻北京的荷兰公使交涉，同时要求驻荷兰中国公使刘镜人和该国政府折冲。

结果，荷兰政府接受了下述条件：惩办杀害华侨的荷兰人。已死之华侨，由荷兰政府优礼埋葬，并抚恤其家属。受伤华侨，由荷兰政府负责治疗。赔偿华侨损失财产。对华侨应与荷兰人同等待遇。

在清廷时代，一向是马马虎虎，不会对华侨有这样的保护；而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则是在外交上最初的一次快举。

日英竞争贷款

对于中华民国的诞生，邻国日本寄予了很大的关切。日本的目的，一如在前面所已经叙述过的，希望尽可能地让中国陷于长期混乱状态，好在这时期中，图谋扩张其领土上和经济上的支配力量。

最足以说明其经济进展意图的，是装成像是反对袁世凯的样子，向革命阵营表现出提供各种借款活动。

被日本所看中为给予借款的对象，是“招商局”、“汉冶萍公司”、“苏浙铁路公司”三个事业。这三个对象都是在英国势力较大的长江流域的基干产业。日本要给予借款的目的，不仅是在经济方面有所打算，而且还隐藏有对抗袁世凯和英国路线的政治意图。

招商局的一千万两借款

第一件，是套在招商局头上的一千万两白银借款。

招商局，是以在一八七二年由当时清廷北洋大臣李鸿章所设立中国最初的公营轮船公司为其前身，因为本来是以吸引民间资本为目的，所以由公营转为半公营半民营，乃至于一八九○年改组为纯民营。可是其后经营业绩逐渐恶化，及至一九○八年，官僚资本的盛宣怀出任邮传部侍郎，再度移转于邮传部管辖。

当时；长江流域的航运业，是在英国支配之下；而日本则意图控制招商局藉以独占中国航运事业，俾和英国势力对抗。驻上海的日本总领事有吉明，就是热心推进这个策略的人。

这笔借款，是由以向中国发展为目标的两个日本民营企业——“日本邮船”及“日清汽船”所参加，“大仓洋行”上海支店则为其接洽窗口，自一九一一年秋间开始秘密进行交涉。

日英两方激烈竞争

对招商局动脑筋的，实则不仅日本，还有英、德两国也曾送过秋波。而日本和英国，围绕着借款活动并且演出过激烈斗争。

据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于一九一二年元月二十四日，向外相内田康哉发出第四十一号公电，报告如下：

“据报，招商局应革命党的要求，于元月二十二日举行董事会议决定，同意提供公司所有财产为担保，进行千万两白银借款；革命党已促使该局向英、美、法等国领事开始提出借款交涉……”

继之，于翌日（二十五日）又发出第四十三号公电：

“关于对招商局借款事，英、美方面已展开积极活动，尤其是巴特费尔德·索耶（英国公司，据日文音译）的马凯等，甚为热心尽力……我国‘日本邮船’、‘日清汽船’等公司负责人也迅速向孙逸先、黄兴等人表明我方已有一千万两的准备，积极争取务必促使向日本方面提出借款要求……”

到了二月间，德国也插进了这笔借款的接洽。

英国终于拿出了直接阻碍的手段。英国驻日大使于二月五日向内田康哉提出抗议，其理由是“此项借款的一部分，必然会供给革命军使用，在日本政府立场，应该加以阻止。”英国一面抗议，并且一面继续其借款交涉，意图抢在日本前面成交。据有吉明于二月十三日发给内田康哉的第八○号公电，有如下报告：

“英国方面，自数天前以来，对于招商局借款一事，积极展开活动，向财政总长陈锦涛提出可以照日本条件承担借款一千万两乃至一千五百万两；陈锦涛因此定于二月十三日前往南京。”

日本浪人的活动

革命党内的重要干部，各有被日本浪人所包围的现象。这些浪人，颇多是受日本军阀、财阀所指使操纵的分子，直接或间接地来影响黄兴、宋教仁甚至孙大总统。

日本终于压倒了英国，而在一九一二年二月六日以日本邮船上海支店长为代表，一度和孙大总统及黄兴之间谈妥了临时契约。

然而，来自内外的反对压力颇为不小。除英国的抗议之外，还有招商局股东乃至伍廷芳等革命阵营内部人士，认为是将中国航运事业出卖给日本而强烈反对，结果，契约归于搁置。

在日本方面，对于这些反对意见倒并未在意，只是着重于研判中华民国内部南北问题的动向，而作精细打算。

上海总领事有吉明，于二月二十八日向内田康哉发出第九十五号公电，陈述其意见如左：

“在袁世凯势力日益扩张，孙、黄等实力逐渐减退之际，倘若以要求他们保证履行约定为藉口而逼迫孙、黄，将会毫无结果，只不过使他们更陷于窘境……我方借款，终归不可能再有希望，唯有断绝这个念头。盖过于活动，不仅有伤北方袁世凯的感情，同时也将会招致在南方的伍廷芳以及其他进步党员的反感，而且和英国之间更会产生不愉快的结果，最后会有徒劳无功之虞。莫如赶快放弃，较为得策。”

内田康哉接受了这个意见，乃于三月初下了“中止”的决断。

被当作第二个对象的“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在中国是综合铁矿、煤矿、炼钢的代表性企业，当时该公司的督办就是盛宣怀。

盛宣怀是对外借款的促进论者。汉冶萍公司自一九○二年向日本大仓组举借二十五万元开始，继之，于一九○四年向日本兴业银行、一九○八年向横滨正金银行（现在的东京银行）先后借到总额达四百五十万元的条件。

故当辛亥革命之际，日本方面认为有可乘之机，为策划使钢铁原料之供应更加安定，而希望合作经营汉冶萍公司。

日亟图控制中国

当时，汉冶萍公司和横滨正金银行之间，曾有一千二百万日元借款的洽商；但由于盛宣怀因应付在四川所发生的保路运动，极度繁忙，以致拖延未决，而武昌起义发生，该公司落入革命军的控制之下，盛宣怀本人也被清廷解除其邮传部大臣官职，逃往日本。

在日本来说，为继续维持利权，则有必要谋求中日合营，并加强对于该公司的控制。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孙先生自海外归来，刚到上海，三井物产公司的上海支店长藤濑政次郎便来拜访，提出希望合营汉冶萍公司的计划。

而且日本政府也曾在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二日的内阁会议中秘密决定：“日清合营汉冶萍公司案”，以逃亡到日本的盛宣怀为所有权者，和他在神户进行交涉。

三井物产并通过藤濑政次郎，对革命政府有过金钱方面的援助。据萱野长知所著“中华民国革命秘笈”记述有：“对于黄兴所要求的一百万元借款，藤濑个人做主决定借给三十万元，无须提供担保品。”“孙先生提出借款二百万元的要求，藤濑立即打算先借给三十万元，但孙先生已经决定辞卸大总统职位，故而没有借用。”

又在日本外务省的纪录中，也曾有收到上海总领事有吉明（十二月十七日）及南京总领事铃木荣作（十二月二十一日）先后发来电报：“关于三井物产贷给黄兴三十万美元（原电报“美元”与“两”混用，不知孰是），因有张謇（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保证，不须提供担保品，希望日本政府加以关照。”

在日本政府的立场，希望尽可能不出面，而由三井物产公司为替身，和革命政府发生金钱关系。

盛宣怀私与日签约

一月二十九日，盛宣怀和日本方面的代表横滨正金银行董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签订了临时契约。

这个合营计划，是将汉冶萍公司的组织改为中日合营的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额增加为三千万元，中日双方各出一半资本，至于在人事方面则并非对等，主要职位都由日本人担任，实际是渗进了让给日本方面经营的不平等条件。

还有，附带决定中国政府在对外国出让铁路、电气、矿山等权利的时候，三井物产有最优先权。

然而，中华民国方面对于这样不平等的合营契约则拒绝接受。日本虽然付出了二百万元，迫使实行，但孙大总统于三月十六日和三井物产公司职员森恪（后来曾任田中义一内阁外务次官）晤谈时则表明：“日本如果强迫实行这个合营案，则只有一切解约的一条路可走。”

于是日本方面唯有让这个合营计划白纸还原。不过她想掌握汉冶萍公司的欲望，虽因此而中断，但却并没有死心；后来，在一九一五年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又重新列入了这一个强迫的要求。

第三笔借款案，是在一九一二年一月，大仓洋行对“苏浙铁路公司”提出以沪杭甬铁路为担保而借与三百万日元。这一笔借款，是大仓洋行以出售武器给革命军为交换条件而交涉成功，于一月二十七日签约。

这笔借款，本来是由英国方面和清廷邮传部之间，早在一九○八年就已经有过接恰，现在骤然换给日本办理，故而在事后得到消息的英国驻上海总领事，乃于二月九日向日本总领事有吉明提出严重抗议。

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在得到报告后，却立即回答“该借款只是大仓洋行独自的冒险计划”，并极力解释这件事和日本政府没有关系，无法加以制止，而躲过英国的责难。

日本方面，像这样热心地给予革命军以借款的背景，是出于在中国革命军兴之后，自觉落后于一步一步踏实前进的英国、而产生的一种焦灼感。

日图助长中国内部对立

内田康哉本来的策略，是想利用袁世凯把中国阻遏在君主立宪的体制上，但受到了挫折，而袁世凯则和英国的关系加深。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由英国领导着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和中国进行借款的接洽（后来发展为善后大借款，在后面会有叙述）。在日本的立场来说，为了不让自己被摒于“利益圈外”，所以有谋实现独自对中国给予借款的必要。

日本对于革命军的援助，可以说是由于如上所述和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各国之间经济利害对立而产生；同时，也是助长中国国内政治势力对立，符合于日本政府意图阻碍中国统一的基本国策。

不过，在革命党方面，当然明知日本的真意所在，但却也有其不得不接纳日本援助提议的因素存在——这个因素，就是革命军的财政状况极其窘迫。

革命军最初所寄予希望的唯一财源，是各省军政府的关税收入；可是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却以清廷已将关税提供担保外债，而不让革命军插手，这等于是在对革命阵营进行经济封锁。

列强之所以像这样做，毋宁说其目的是在积极遮断革命军的财源，而加之以非接受外国借款不可的压力。

在这样的处境之下，革命阵营和日本的借款交涉，真正是实逼处此，不容抉择。

当时的苦恼，在孙大总统的一封书信中有所流露，这就是以汉冶萍公司接洽借款时，张謇曾经坚决表示反对，而孙大总统则在复信中提到：

“尊意借款匪宜，仆有同感；唯支应困难，而民军待哺，日有哗变之虞，譬犹寒天解衣裘付质库，急不可择也。”

日俄领土野心

现在，又得提到东三省和日本的关系。在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关系上，经常处于“火药库”地位的东三省，当辛亥革命之际，乃又成为一个重要的焦点所在。

就日本来说，辛亥革命——中华民国诞生，正是她继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来可能达成其一直所觊觎的东三省领土野心之最好时机。

日本与俄密切勾结

当武昌起义之后的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七日，日本外相内田康哉立即通过驻俄大使本野一郎向俄国方面提出照会：为了保障日俄两国在东三省的共同利益，对于双方协力关系之维持，重新加以确认。日本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唯恐因革命军兴，而影响到东北地区现状会发生变故，所以不得不谋求和在东三省北部拥有势力的俄国彼此合作。

对中国北方边境抱有领土野心的日俄两国，在此之前，已经两度签订过“日俄密约”（第一次一九○七年、第二次一九一○年），约定在外蒙方面，承认俄国的特殊权利；在东三省方面，划分界限，由日俄两国割据南北两面，并且同意为维护两国特权，甚至在必要时得采取共同防卫措施。

因革命之发生，而可以预料到对于以中国领土作如此擅自交易（密约）的情况将会有所影响，故而日俄两国在瓜分中国的共同利益之下，也得策谋继续凭藉密约“共同防卫”。

◎请参考《苏俄在中国》第一一四页，◎文中的“我”为蒋中正总统。

日本与苏俄秘密谅解的基础，就是两国瓜分中国领土的计划。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九月，欧战爆发。日本参谋本部驻在上海的特务机关，立即与汪兆铭积极进行其“组府”的谈判。日方所提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说明了日本军阀与俄共分割中国的全盘企图。他们在北方以东北伪满洲国为其大陆政策的根据地，而割取其所谓“[115]蒙疆自治区域”及“华北紧密协力地带”，包括山西、河北与山东各省；对华中以吴越平原为根据地，沿长江而上，直达宜昌；在华南，以台湾与海南岛为其海洋政策的根据地，而以福建广东为其外缘。至于外蒙、新疆、西藏，以及潼关以西之大西北区域，则承认其为苏俄的势力范围。这就是日本所提出而为苏方所谅解的条件。当时我获得这个情报，并不为奇。我相信苏俄之志，决不在此，日本军阀出此一着，徒见其幼稚而已。二十九年（一九四零年）一月，“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秘密文件在香港披露出来，而日苏瓜分中国的阴谋乃大白于天下。三十年四月的“日苏中立协定”不过是这个野心计划的一角。上海苏俄总领事对汪伪组织的支持，更是不成问题了。

◎

内田康哉之所以照会俄国政府的背景，是由于在中国革命军兴不久之前的八月三十日，日本政府刚由第二次桂太郎内阁改组为第二次西园寺公望内阁。唯恐因内阁交代，被怀疑道“满洲政策”也会有所改变，而致共同防卫发生漏罅，所以内田康哉在电文中确认：“两国在满洲的利益完全一致，为维护共同利益，有必要彼此信赖，互相援助”，并强调内阁虽有更迭，但日俄协约的精神不变。

本野一郎大使遵照内田康哉来电，于十月二十二日会见俄国首相郭可华滋；双方都想趁中国革命混乱之际，而有所图谋，故而在分割东北和蒙古方面的基本意见获得一致，并互相理解双方均有迅速出动军队进入中国境内，以“占领满蒙”的意图。

本野一郎和郭可华滋，以坦率到出人意表的程度，互相表明了意向。在日本外务省所保存的“会议要点”中纪述下来的谈话内容，大致如下：

郭可华滋清国发生如此骚乱（辛亥革命），对日俄两国的特殊利益，非常有危险性；

因为过去两国在中国所获利益，都是自清廷方面得来……

本野一郎对于目前的清廷给予援助，就日俄两国来说，确实是利益很大；不过，如期待于清廷最后胜利，却最为危险。我们认为在这个时候，须深入观察事变的归趋，并作适当措施，以免有损两国在中国的既得利益，是为得策。清国的事变，将会有怎么样的结果，固然不得而知；但不管怎么样，相信是需要认真一点考量日俄协约（共同防卫）应否实行的时期已经到来了。

郭可华滋在一九○七年和一九一○年的日俄密约中，两国已经预想到分割满洲和蒙古，如果有适当机会，则希望根据一九○七年协约所设定的界线，将满洲分割；至于蒙古如何分割，也希望互相协商。不过，本大臣颇耽心第三国——美国、德国的干涉。日本可以出动大军，占领必要地区；可是俄国和清国的国境线太长，为了要占领北满洲和蒙古，则势必非要尽到最大同努力不可。又以俄国而论，蒙古更比较重要。而且俄国还不得不耽心出于德国来自西方的干涉。然而事变既已发生，则因而采取必要措施，当然在所不辞。

本野一郎由于预料到在清国会有事变发生，所以缔结了两个日俄协约，诚属可喜；我们为了保护利益，当然不能不因应需要而有适当的策划。

俄国军人跃跃欲试

像以上所述日俄两国政府的方针，也都传达到了国境一带的军事当局。十二月，日俄两国代表在东北当地会商，当时俄国军方人士的发言颇倾向于亟应把握时机、出动军队的“积极论”。

据驻哈尔滨日本总领士川上俊彦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发给外相内田康哉的第八十九号机密电报，报告俄国高级军官的意见如下。

后黑龙护境军考特威洛夫中将表示：

“清国此次动乱，在俄国来说，是最好的机会，毋宁希望纠纷更会延续下去。而且俄国在这个时期，应该和日本协力，获得领土上的权利，并一举廓清多年来在这一方面对清国外交的纷争。”

铁路长官霍尔旺中将表示：

“解决满洲问题，必须依赖日俄两国通力合作；而且日俄两国如欲在满洲扶植其根本势力，最好是取得领土权。盖合并满洲，为日俄两国有待解决的悬案；为解决这个悬案，舍今日之外，别无更可以期待的时机。”

随着如上所述一些活动而来的，是两国密约之存在，当然也就被各国所察觉；于是“满蒙问题”，已经不仅止于日俄两国乃至于和中国的关系，而是登上了国际舞台。

美德表明立场

在一九一一年的十二月，纽约时报指出：

“有关分割清国北边领土之日俄密约的存在，到了今天，殆已无庸置疑。日本占有东三省南部和旅顺，俄国建筑横贯蒙古铁路，手伸到直隶湾（渤海湾），多年来所渴望得到的不冻港，大概会如愿以偿了。”

看穿日本的大陆政策

此外，纽约论坛报也于十二月四日刊载中国新闻驻北京通讯员派顿的报导如下：

“在北京以及远东地区，日本的行动，比任何国家的行动更大为引人注意。

“日本的一些计划中，最耐人寻味的，是料想清廷将会逃亡到东北，接受日本的保护；这个料想如果实现，则是日本的侥幸。因为日本便可以公然得到东北；清廷也由于退归故土，获得安全；至于革命军，想必会由于唯恐和日本发生纠葛而投鼠忌器，不便穷追逃亡东北的清廷，而只有甘于收复本土——倘使这样，则东北就会成为第二个朝鲜……”

这个报导，的确是看穿了所谓“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的企图，也看透了日本凭藉武力而强迫推进的“大陆政策”。到后来，以“九一八事变”开端，到“中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发生在论坛报所料想的路线上延伸出去的。

就日本而论，以东三省和他在上年八月所正式并吞的朝鲜比较，是更具有重要性的地区。

日俄战争之后，依据一九○五年的“朴资茅茨条约”（日俄和约）以及因这个条约而由清廷和日本之间所签订的“东三省事宜善后条约”，使日本在东三省南部获得很多“特殊权利”，在前面早已有所叙述。

㎎日本利用这个“特权”，在辛亥革命前后，已经部署好了侵略东北的实际步骤。

移往东北地区的日本人达七万九千人。

“三井物产会社”包办东三省南部所有贸易和矿业开发：“南满洲铁道会社”独占了辽东地区各种运输事业。

东三省南部虽然比北部面积较小，但大豆、高粱等农作物的生产量，则凌驾北部之上；据一九一一年统计，南部的贸易额占东三省全部百分之六十二，可见这个地区的经济命脉是在日本的掌握中。

不过，日本的真正着眼点，还是基于军事方面的意图。

日本军阀元老山县有朋，早在“甲午战争”以前就强调构成所谓“生命线”、“主权线”，很明显地表示出要把朝鲜及中国东北地区囊括于日本势力范围内的构想。

在“甲午”、“日俄”两次战争中获得胜利的日本，随着自朝鲜向东三省南部的势力伸展，进而向东北部扩张领土的野心，的确是眼前的事实。推行扩张的急先锋，则是他的陆军参谋本部。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地位，如果不够强固，则俄国必然会自外蒙入侵东北；如是，则日俄的均势将被打破，而使日本在东三省南部的势力受到威胁；又如果南部不能确保，则朝鲜便很难防守。”——这个逻辑，就是出自一般日本军阀的构想

日俄图维持势力均衡

至于俄国方面，由于日俄战争败北，国内革命运动抬头，专制体制弱化，因而眼前避免和日本肇生事端，只是将力量集中于外蒙方面。

于是，在东三省的日俄两国，便形成了一面互相警戒，一面却又平分秋色、合作防卫既得权益，以谋维持势力均衡的局面。

这样情势，对于日俄两国来说，所最耽心的，是唯恐第三者的列强国家对于两国共同独占的局面会横加干涉。尤其是在一九一一年四月，清廷和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的一千万英镑借款，就包括有“开发东北”一项在内，使日俄两国更加感到不安。

及至一九一二年一月，中华民国在南京正式开国，日本似乎是迫不及待地立即宣称“革命军要开始北伐”，因而藉口“为维护东三省南部利益及保障衔接南满洲和北京交通的关外铁路”，打算单独出兵，俄国也予以同意。

未料，日、俄的态度反而招致美、德两国反感。

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

美、德两国，由于比英国等列强国家向中国发展的起步较迟，所以是在华权益较少的国家，因而两国乃考虑到要对日、俄、英、法各国有所牵制。于是，德国便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咨文美国，询问对于东亚情势的态度，希望促使美国发出主张对中国“主权尊重、领土保全、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声明。

美国的答覆，是由国务卿洛克斯致函德国驻美大使的方式，于二月八日在华盛顿和柏林同时发表。

这个函件，是美国明确表示其严守中立的方针，藉以制止日本的出兵意图，并且遏阻以经济进展为目的的借款交涉。其大致内容如下：

“自中国革命发动以来，敝国（美国）政府每遇机会与列强交换意见，尤其是法、英、义、日、俄及贵国（德国），商讨如何保护共同利益，无不主张一致行动……

“现在中国方面，清室及革命党皆保护外人生命财产，既不因外力干涉而然，则将来亦无出以干涉之必要；倘若将来不得已而必须干涉，则敝国政府深信可先由列强协商，然后共同行动……

“此外，敝国政府尝觉不宜轻予中国贷款，实为严守中立之当然结论……凡对于其国民向华投资，有与自国政府所循列强协调政策不合者，当加以阻止。”

这个函件的公开发表，对于日俄两国，也是一种强烈的忠告。

日俄“分割满蒙”

列强的中立政策，反而使日本和俄国趋于接近。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六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和俄国缔结新密约的方针，并开始和俄国进行交涉。

交涉的重点，是更明确地划分日俄两国在东三省和内外蒙古的势力范围。

先是在一九○七年所签订的第一次日俄密约中，双方在东三省的东半部（东经一二二度以东），设定两国势力范围的分界线；此外，并承认俄国在外蒙方面的特殊权益。

可是，对于东三省西半部及内蒙古，则尚未有明确协议。

第三次日俄密约

现在，日俄两国预料到列强将积极要求中国门户开放，而会发生干涉两国独占东三省的情况，故有尽快预为确定两国势力范围的必要。盖如日俄之间，万一在未确定势力范围的地区发生纠纷，则会让列强获得介入干涉的可乘之机。故而日本内阁会议所决定的案文中有“为日本帝国将来的发展，抑且为日俄两国永远的睦谊……”之语，可见两国急于要进行交涉。

双方的交涉，于一九一二年七月八日获致结论，签订了第三次日俄密约。

在这个密约中，将分界线更向西方延伸，横贯整个东三省区域，分割为南北两个势力范围；至于内蒙古，则被分割为东西两部分，是即以北京所在位置的东经一一六度二七分为其分界线。

日俄两国，就是这样地在中国固有的领土东三省和内外蒙古，划上了朋比瓜分的界线。

在签订这一次日俄密约之前，日本政府基于事先预防列强干涉的意图，乃在六月二十五日内阁会议决定秘密照会英法两国，说明不会影响到她们的既得权益，并希望两国承认这个密约是对于国际和平增加了新的保障。

和日俄两国政府这样的活动齐头并进的，是日本军部也正在推进着使东三省和内蒙古成为日本“属国”的阴谋。

这就是所谓“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供驱遣奔走者，就是日本的一些“大陆浪人”。

在以大陆浪人为代表的日本所谓“支那通”、“民间志士”之中，大致可以分为两派。

黑龙会的打算

一派如前所述，是赞成中国用革命手段推翻满清政府之黑龙会的代表分子，以头山满、内田良平等为其主脑，立宪国民党的犬养毅也有关系。他们是判断革命可以成功，而以此为前提了衡量对策；他们企图当革命成功之际，在和新政府协商后，使东北和蒙古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在辛亥革命的一九一一年，黑龙会设立了一个援助革命的机关——“有邻会”，然而其设立旨趣，却明白表示出他们对于革命的援助，并非基于单纯的正义感，而是要趁此机会同时解决“满蒙问题”。

他们尽管表现出让人看来是在支援革命的行动，但归根结底也还是遵循着日本的“大陆政策”——首先夺取东北、蒙古，作为根据地，进而向全中国推进侵略行动。

川岛浪速得军部支持

另外一派，是意图以援助清廷为手段，藉市惠以谋掠夺东北、蒙古的“志士”们。

所谓“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就是由后面这一派所策划，扮演主角的人是“志士”川岛浪速；而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则站在川岛背后，全力支持。

川岛浪速这个人，一向是抱有蔑视中国人的优越感，和扩展日本利益的念头结合起来，形成其对中国的侵略论。后来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有东洋“玛他哈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有名的女间谍）之称、而以汉奸罪行被判处死刑的川岛芳子，就是满清皇族肃亲王善耆的女儿，而为川岛浪速的养女。

在日本军部方面的打算，是希望趁辛亥革命混乱之际，一举“解决满蒙悬案”；这里所谓“解决”，含义无他，就是在于“领土的解决”。

川岛浪速的看法是，中国无可避免地要被列强所瓜分。到了那个时候，连日本在中国也必然会处于白种人的联合压迫之下。为了对抗这个趋势，必须抢在列强前面确保优势地位，而其立足点则在满蒙地区。

期待南北分裂趁机出兵

川岛浪速等人最初的看法是，等待中国“南北分裂”，以清廷为北清帝国，统治黄河以北；而对于南方的革命政府，则不予过问，听其自行发展。相信革命政府势必要以统一中国为目标，进军讨伐北清帝国，此时，清室绝不可能独力应战，而会向日本正式要求援助。等到这个地步，日本便可以派遣大军参加清军方面，如果革命军北上，就将凭武力将之打垮。

然而，武昌首义后的情势变化，却和川岛浪速所想像的相反；自清廷巧取豪夺到实权的袁世凯，一面推动和南方议和，一面逐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中国国内秩序恢复，统一国家出现，是川岛浪速等人所最耽心的事——固然统一国家如能够确立，眼前可以避免列强瓜分，而与日本有利；但是日本的目标还是希望能够造成容易分割的局面，倘使会是一个很稳定的施政状态，则对于日本是并不相宜的。

川岛浪速阴谋

当清廷的命运大势已完时，川岛浪速等人便在策划一举卵翼“满蒙独立”。他们的打算是，至少要在袁世凯统一中国之前，攫取“满蒙”统治权归于日本的掌握。

利用清室肃清王善耆

在东三省方面，川岛等人首先利用的是清室皇族、并为宗社党一分子的肃清王善耆。他们企图引诱反对共和政体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及地方部队头目张作霖入壳，拥出善耆在东三省建立继承清室统绪的“独立国”。

这个阴谋，是在得到日本陆军理解、协力之下进行的。川岛浪速在来中国不久之前，就便经过朝鲜，见到朝鲜总督寺内正毅，将日本后备军人投入工作的计划，都完全准备好了。

当时担任日本陆军次官的冈市之助，曾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三十日致电“关东都督府”参谋长星野金吾，有期待在东北地区发生纠纷、才好趁机采取积极行动的指示，电文内容是这样的：

“目前正在讨论将来当满洲秩序混乱之际，要增派若干兵力去那方面，并且考虑到此事将能为帝国带来有利结果；希望贵官此际特别为大局着想，纵使在满洲发生一些酝酿纷乱的事端，务请注意在处置方面不宜过于拘泥避嫌，并望对都督善加辅助。”

川岛浪速得到日本陆军上效高山公通的协助，秘密掩护肃清王善耆在清帝即将退位的一九一二年二月二日潜离北京；五日，抵达日本“关东都督府”管辖之下的旅顺。“关东都督府”已接陆军次官冈市之助的秘密联络，请予照料，故而将民政长官官舍提供善耆居住。

赵尔巽张作霖拥袁

当时，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正积极取缔革命党的活动，甚至再三要求日本方面协助弹压革命党。另一方面，以奉天（沈阳）为中心，掌握着地方军队的张作霖，也显示出对日本更加接近的态度，且曾透露有推戴肃清王善耆依附日本的意向；其实张作霖的本意，是在利用被利用的情势，企图在日本的军事援助之下扩张自己的势力。

川岛浪速等人将善耆留在旅顺之后，便去奉天和张作霖接头。

未料，到了二月十二日清帝一宣布退位，情况即大为不同，赵尔巽、张作霖等人竟被袁方说服，转而拥护袁世凯。

张作霖变卦的原因，据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于二月十四日以第一二○号电报向外相内田康哉报告“是被袁世凯所收买”，报告内容大致如下：

“张作霖以前不时口出大言，现在又公然表示恢复；但实际对于政体的变更，毫无行动。相信多半是被袁世凯用各种方法所说服，据我方警察精确调查，张作霖受到袁世凯数万金的赠贿，态度一变而软化。”

又于二月十七日以第七十五号机密公电报告：

“前次北京袁总理大臣密使（段芝贵、张锡銮）来奉之际，袁总理以奖励张作霖军务精勤的理由，赏赐军刀一把及其他高贵物品，价值一万元以上……”

英国促日停止活动

日本的阴谋，在受到赵尔巽、张作霖等人变卦的影响之外，又被英国所察觉。

英国政府乃命令其驻日大使麦克纳德于二月十六日照会日本政府，促请对于离间东三省的运动再作考虑。英国不仅指出“某些清廷皇族（指肃清王善耆）策动赵尔巽在东三省搞独立运动”，并且明知其为日本政府在幕后操纵而要求日本“通过驻奉天总领事劝告赵尔巽中止这个运动”。

本来，这个阴谋就是出于日本所策动，当然，不便出尔反尔，劝告中止；在被迫处于窘境的日本，只得暂且拒绝了英国的要求，表面所持拒绝理由是“这样的劝告，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然而，内幕既已让外人了解到如此程度，当然便不得不耽心会引起外交上的摩擦。

于是，日本外相内田康哉乃于二月二十二日电令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指示“与宗社党有关的日本人之行动，原为日本政府所认可；但在此际，希用晓谕或其他稳妥方法，加以制止。”这么一来，川岛浪速等人在东三省的运动，便在转眼之间，化为乌有。

川岛无可奈何

据日本黑龙会所编“东亚先觉志士传记”记载：川岛浪速接到陆军参谋次长福岛安正嘱其归国的电报，心里想着大概这个计划会得到陆军方面的有力支援，神气十足地回到日本。不料福岛竟给予了“中止满蒙独立运动”的命令；激愤的川岛，立即去找内田康哉谈判，内田则答覆他说：“这是阁议所决定，如果说是即使抗命也得硬干到底的话，那么只有行使官方的权力加以制裁。”川岛无可奈何，只得和内田取得以下两点约定而告退：永远保障肃清王善耆在旅顺的生活。川岛浪速一伙人，照旧部署在满蒙各地，不加干涉。

尽管拥立肃清王善耆的计划中止，但是所谓“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却并未了结，因为在东三省方面虽然是姑且告一段落，但对于内蒙古则还没有死心。

日本政府和军部，仍然利用川岛浪速等人继续进行其在内蒙的阴谋——这就是煽动内蒙和东北边境的蒙古王公“举兵”的计划。

阴谋再三失败

日本在内蒙古方面的阴谋，是当辛亥革命军兴之初，便和东三省的独立计划分头进行，当初业已预定在两方面同时举事。

密派特务人员活动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即以参谋次长福岛安正的名义下达秘密命令，派遣步兵少校多贺宗之领导步兵上尉田口畅、松井清助、骑兵上尉木村直人等特务工作人员潜入北京、承德（热河省）等地。

他们的任务是一面和已在北京的川岛浪速取得联络，一面和内蒙古王公们接触，策划把独立运动组织起来。

推进这个谋略的第一步，是对在热河省南部拥有势力的喀喇沁王给予借款，意图作为交换条件，获得对于该地区的支配权——日本军部的一贯伎俩，在这里也表演了一手。

以领土抵押日本贷款

借款问题，是由日本陆军参谋次长福岛安正于十二月六日接到川岛浪速自北京打来的电报开端，电文是这样的：

“蒙古喀喇沁王为某一用度所迫，愿将其全部领土作为抵押，贷款二万两，顷向横滨正金银行北京支店提出申请。此一问题，总不至于会有亏损之虞；而且在这个当口，基于对蒙古政策考虑，也以给予借贷为宜。因其需用迫切，盼火速赐覆。”

外相内田康哉对于这个请求，似乎是迫不及待地立即通知横滨正金银行“应予通过”。

所谓“为某一用度所迫”，可想而知就是作为“举兵”所需要的费用。

进入第二年～～一九一二年，借款规模更加扩大，在喀喇沁王所加入的“卓索图盟”属下五旗之外，更有对于在热河北部的“昭乌达盟”（辖巴林王等十一旗）、东三省西部的“哲里木盟”（滨图王）的借款计划，使热河全省及东三省的一部分（现辽北省南部）都包括在借款范围之内。

在日本政府方面的目标，是要以“卓索图盟”境内的全部矿山为抵押，在不超过日金十五3[203]699万元范围以内，予以借款。只是，恐怕这个阴谋会被暴露，故而日本官方在表面上避免介入其事，而用大仓洋行名义，尽量循民间路线加以掩饰。

喀喇沁王的卖国密约

然而，借款的抵偿，不仅止于矿山，实则川岛浪速和喀喇沁王之间，已经交换了预定在“内蒙独立”之后的“卖国密约”。

根据日本方面资料，这个密约（契约书）签订于一月二十九日，内容计有十项，在规定“联合内蒙各盟旗成为坚强的统一团体”的前言之后，订有“喀喇沁王以川岛浪速为总顾问”、“当内蒙团体成立之后，如受他国侵逼，难以自卫时，首先请求日本援护”、“内蒙团体对于俄国的外交事件，务必和日本秘密协商处理，不得未经协商便擅自重新订定条约”等项——强烈地表达出日本方面的支配权。

当二月二十九日，袁世凯所策动的兵变在北京发生之际，多贺宗之等人立即把握时机，实行其任务，由松井清助和川岛浪速的部下村井修等人掩护在北京的喀喇沁王，以及由木村直人掩护巴林王进入内蒙，打算趁北京混乱之际，“举兵独立”。

此时，已经有三万发武器弹药等类，运到了内蒙。

日本方面于三月五日，支付巴林王日金二万元，七日，支付喀喇沁王日金九万元。

武器是在东三省境内调度供应。

不过，当时日本政府唯恐受到各国来自外交上的干涉，故而对于在东三省境内的公开行动，开始采取消极态度。

根据日本方面资料“东亚先觉志士传记”所载，武器等类，集中在长春南方公主岭，已经没有日本官方的援助，而由松井清助指挥其在喀喇沁王府所训练的蒙古兵，并得到日本人土匪薄益三等人协助，开始沿辽河北岸向内蒙输送。

可是，由于有马车四十七辆的庞大运输行列，因而被清廷方面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所悉，赵总督乃命令驻防郑家屯的统领吴俊升，对松井清助等人所率领的此一武器运输队发动攻击。

松井等一行穿越郑家屯的后街，好不容易于六月一日进入内蒙，打起“大蒙古勤王军”的旗号。然而六月八日，在大砂堡（据日文音译）被吴俊升的骑兵部队掩袭，吃了一个大败仗，死亡五十多人，其中日本人十三人，阴谋为之失败。

善耆亦与川岛订密约

尽管是如上所述再三遭遇失败，但在其后日本“志士”和军阀策动“满蒙独立”的野心，还是没有收敛，川岛浪速于一九一二年七月，与肃清王善耆再度签订密约，日本以帮助善耆在东北．蒙古独立，复兴清室为交换条件，获得在该地区的铁路、矿业等各项产业方面的权利；此外并决定让日本在外交、军事、财政等整个行政方面居于“领导地位”，给予攫夺东北和蒙古的可乘之机。及至不久之后的一九一六年，乘革命党反对袁世凯的讨袁运动进入高潮之际，再度煽动蒙古土匪发起“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这一次行动，也是得到日本政府的默许，并且给予支援，但结果仍归失败。

割让东北的流言

关于东三省的问题，当时在日本“志士”之间，传播有各种流言。

其中之一，是说国父孙先生在辛亥革命以前，就已经和日本有了约定——日本对革命给予援助，其交换条件是将东三省出让给日本。

这个流言，是在一九○七年孙先生被日本政府遣送出境前后，以及孙先生在辛亥革命后的一九一三年访问日本前后——两度传播出来。

有目的的捏造传播

实则，这些流言，完全是凭空捏造的无稽之谈，得在这里作一个明白交待。

在日本黑龙会所汇编的“东亚先觉志士传记”中，记述有孙先生曾经在一九○七年前后，到处向日本“志士”们说：“中国革命的目的是灭满兴汉，只要能在长城以南建国，就很不错；至于东三省和蒙古等方面，可以任凭日本拿去。”

这种记述，是意图侵略中国的日本人，为了要使自己的侵略行为正当化，而捏造出来的“事实”。现在只要举出一点证据来，就足以证明其为捏造；这个证据，就是在孙先生的革命蓝图中——不用说是东北，就连台湾都是列在中国的版图之内；台湾是在一八九五年因马关条约，被日本所非法割据，在一九○七年的时候说来，已经是被日本继续统治了十二年，但是孙先生连对于在这样情况之下的台湾，都还是主张属于中国，何况对于中国主权仍然存续的东三省，怎么会说出让给日本？孙先生的目的在谋求“全中国统一”，非常明确、是丝毫不容混淆的事实。

像黑龙会这样的团体，只要印证它后来的历史，就可以明白了解它是专事担任日本侵略中国政策的前锋任务；他们对革命协力，也是为了便于其侵略行动的谋略之一，像那些“志士”们有目的地传播出来的流言，实在是不值得识者一笑。

“东亚先觉志士传记”中的记述大意如下：

“孙文以前只顾要求援助，曾经表示：‘如果对革命给予援助，则支那（中国）可以放弃满蒙，割让给日本。’一九○七年，为清廷所闻，庆亲王奕劻大为震惊，乃亲笔致书伊藤博文，要求驱逐孙文出境，伊藤拿着这封信和内田良平商量，结果让孙文自动离开日本。”

“日本的有心人，由于听说孙文有如果援助革命，则可以割让满洲之意的谈话，因而期待中国在革命成功之后，纵使不会放弃满洲，但至少总可以将之完全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是则可以预期至少在仅止于泯除东亚不安的情势方面，该会顺利获致协调。可是老奸巨猾的袁世凯却反而利用了满洲问题，宣称不要让日本攫夺满洲，应该停止内哄，一致抵制日本。他拿这个藉口，作为要求妥协的工具，抑制住革命党，自己当上了大总统。于是孙文对日本志士们的约定，转眼之间就变成了一张废纸。”

国父与桂太郎的会议

还有一个流言，牵涉到孙先生和桂太郎的会谈。据说是在一九一三年，孙先生访问日本，和桂太郎协商决定：如果日本援助革命党讨伐袁世凯，则可以割让东北——这个流言，自从由宫崎龙介（宫崎寅藏之子）在日本杂志发表以来，传播得相当广泛。

然而，宫崎龙介并非参与过这一席秘密谈话的当事者，而且不能忽略他也是和黑龙会有关系的人。

被指为作这个约定的时期，不用说是正在一九一五年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之前，假定当时确有这个约定的事实存在，那么，当日本在所提二十一条中包括有使东三省南部全面殖民地化的意图之际，孙先生便不可能对之提出抗议；即使提出抗议，则该会被日本指出违反了他自己的约定而受到反驳。然而实际上，孙先生却严正地提出抗议，日本方面也竟未能有一语反击。

这一次孙先生访问日本，有六十天之久，戴季陶以秘书兼翻译身分，经常参加孙先生的对外接触，在他后来手着“日本论”中，回忆孙先生和桂太郎先后两度，有过十五、六小时的会谈。

在会谈中，桂太郎表示：“希望基于我们两人的互相信赖，解决被英国所统治的印度问题，要是能达到这个目的，则日本不愁没有‘移民’和‘贸易’地区。也就决不会作出侵略中国的拙劣政策。至于大陆的发展，应该由中国负责。中日两国如果和好，东半球的和平便可以保持”——这个记述，和传说的割让东三省云云，完全相反。

在日本外务省记录中，留有关于孙先生与桂太郎会面的一项记载，但其资料则完全被烧失。

所谓十五条密约

譬如说，孙先生在一九一五年和某日本人缔结有十五条“密约”。这个流言，揭载在该年度所发行的“民族评论”杂志上，英国学者鲍莱等人在他们的历史研究著作中，也曾加以引用。

这个“密约”中，明白地规定有寺尾亨、大仓喜八郎等人如何提供武器和资金；孙先生用什么样的方法以国家公债为抵押，偿还贷款，乃至于对日本志愿军的补偿，四十万日元定金的支付手续等等。

然而，当被指称签订这个“密约”的一九一五年四月，正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而引起纠纷的时期，孙先生对于袁世凯要以此为交换条件，以谋实现其帝制自为的野心，看得很清楚，怎么还会在这个当口签订超过二十一条内容的对外约定？而且这个“密约”，既未有原件出现，又未见日本方面的当事者为谁，根本是无庸评论的。

伪造国父文书

最后再举出一个流言，这是到了战后才被发现的一件文书。

美军所获机密文件

第二次大战之后，驻日盟军总部的美军官员，在东京霞关日本外务省所保存的极机密文卷中找出了一封信。

这封信是用夹杂有片假名的日文所书写，署名“孙文”，并附有一张“王统一”的名片，发信日期为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三月十四日，受信人为当时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

美方将这封信用微粒胶卷摄影，带往美国；在哈佛大学审阅，发现其内容相当惊人。因为这封信的内容几乎还没有被公开过，现在特就日文原件引用如下：

大正四年（一九一五年）三月十四日

孙文

小池张造殿

谨启

阁下愈益勇健、至为迪吉，式符下颂！

对于当前时局，就不才年来持论及主张衡量，委实难安缄默，用特不揣谫陋，奉陈此书，敢烦明达如阁下者，赐予卓度。（中略）

不才等人，恒以东亚安全暨福利为念，确信舍“日、支（中国）提携（合作）”之外，更无长策。为谋建立巩固同盟，前曾草拟盟约草案如后，密示贵国有司，似此理想，在今日态势之下，固知颇难实现；然当世界大势紊乱、欧洲战局变动极大之秋，益见日、支提携之必要性已属刻不容缓。然而当此时际，却招致同文同种之两国邦交有欠正常；更受异族（西洋）人种侮蔑，复将使其有可乘之隙，惓怀东亚永久和平，深用浩叹！当前，颇冀谋以何种方法挽回局面，而讲求可资真正合作之途径，谨披沥衷诚，敢请阁下勿吝明教……

盟约草案

日本及中华，为维持东亚永久福利，共同体认两国合作之必要，兹特约定如左：

第一条日中两国合作，凡有关他国对东亚重要外交事件，先行互相照会协商。

第二条为便日中协同作战，中华陆海军使用之武器、弹药、装备等，均采用与日本同一型式。

第三条基于与前条同一目的，中华陆海军在聘用外国军人时，以采用日本军人为主。

第四条为期日中政治确实合作，中华中央政府及地方官署在聘用外国人时，以采用日本人为主。

第五条为期日中经济协同发展，在日华重要都市设立“中日银行”及其分支机构。

第六条基于与前条同一目的，在中华方面为经营矿业、铁路、及沿海航线等，而需要他国资本或合营时，应先与日本协议；倘日本无力办理，则可与他国协商。

第七条日本为中华改良币政（调整通货）给予必要援助，俾早日完成。

第八条日本赞助中华改良内政、整顿军备，俾建设为健全国家。

第九条日本赞助中华进行改订条约、自主关税及废除领事裁判权等事务。

第十条在属于以上各条范围内之约定，非经两国外交当局、或在本盟约签署之两国人认可，不得与他人缔约。

第十一条本盟约自签订之日起，有效期间十年，并得依据两国之期望予以延期。（完）

附记＝＝上述盟约草案，乃属吾人私案，务请勿予公开，特此奉恳。

明确研讨几点疑问

这封“密信”的内容，一目了然，中国是要自动地放弃主权，在军事、行政乃至经济方面，都打算做到“日本化”。

倘使孙先生真的写过这么一封信，那么，连他所领导的革命的评价，都会受到影响。现在应该明确地作一个研讨。

首先，举出对于这封信的几点疑问：

第一：当时，孙先生虽然已经退位，但毕竟是担任过中华民国元首的人物；像这样关系到国家兴废的“密约”，怎么会竟以日本外务省的一介官吏为对象而向之提出？纵使孙先生是有接洽这件事的意思，则足为适当交涉对象的人物，还多得很，怎么会找上小池张造？

使用日文伪造签名

第二：孙先生未曾学习过日文，所以，他过去的重要文件——即使是对日本人发出的文件，也都是就用中文表达。可见像这样重大的“密信”，怎么会特地用日文书写？

第三：这封“密信”上的签名——“孙文”两个字，是模仿孙先生的笔迹，而显然不是他的亲笔。

第四：在一九一五年三月的时候，碰巧和日本“民族评论”杂志揭载的十五条“密约”同时，而且也是在袁世凯帝制自为和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的国难期间，孙先生怎么会有这种抛弃三民主义、奉送利益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怪行径？

显然出于日本人之手

其实，甚至于不必等到提出以上这几点质疑，而只要从“密信”中的日文用语和错用汉字的情况看来，就能够判明是出于日本人之手所伪造的文书。日本方面竟然用到了像这样伪造文书的谋略来陷害孙先生，以图有利于其对中国的侵略行为。

这种不择手段、执拗不已的阴谋，使人不寒而栗，真有一种不知从何说起的恐怖感！

各国承认问题

趁着辛亥革命的机会，为谋在中国获得权利的日本和列强国家，利用作为其交易材料之一的，是对中华民国的承认问题。

中华民国当辛亥革命之初，便已在对外宣言中明白表示：凡清廷和各国所缔结之条约上的权利和义务，都照旧承担下来；这就是在宣告中华民国诞生之后，虽然改变了政体，但仍然是完整地继承了与清廷同一领土和国民的统一国家，而且遵守其义务。故而各国便应该认为中华民国和过去的清廷是同一个国家，基于国际公法对之不能不予以承认。

一九一二年元月十七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向英、美两国提出承认中华民国的要求；十九日，再去电英国外相葛雷，请“在清帝退位的同时，立即惠予承认。”

各国态度游离不定

然而，列强的态度却颇为游离不定，他们举出“国会和政府都还只是临时”的等等理由，不愿有积极的反应。

在日本方面，其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于元月十八日得到英国公使朱尔典所转达的袁世凯关于承认问题的意向，据说袁世凯表示：“如果能当上大总统，便要清帝退位；于是，国家主权在名实两方面都会转移给新政府，希望给予承认。”朱尔典并且提到“这些话还没有告诉他国，只是最先转达给日本。”日本政府针对这个传言，由外相内田康哉以第十二号复电指示：“临时政府的大势未定，万一操之过急，承认了袁世凯的临时政权，也许转眼就又会看到他瓦解；或者被袁世凯利用对于他的承认作为对革命党的策略，都是不太相宜的。”所以希望采取审慎态度。

由朱尔典的传言开端，在北京的外交团人士开始互相观察风色、刺探行情，列强国家围绕着承认问题的谋略活动，立即显得火炽起来。

二月十三日，在北京举行各国外交团会议，讨论眼前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因为各国对于还没有加以承认的临时政府，以她为对象而在外交上的实际交涉方法，需要有所协商。

在这个会议席上，美国提议：和临时政府交涉时，称呼其受文人为“外务部首领”，几乎所有与会国家都表赞成，唯独日本和俄国反对，日俄两国的意见是：“外务部首领”的称呼，会被当作是承认了临时政府。——由于日俄两国的坚持反对，结果在会议中仅止于决定：和临时政府的交涉，以“私信”行之。

当时，伊集院彦吉在发给内田康哉报告外交团会议情况的第一一七号电报中，显示他本人颇多狐疑。电文的大致内容是：“对于美国的提议，德、奥、法、英各国立即表示赞成，实在值得怀疑。当天晚间向俄国代办说明疑念，他也有同样的感觉；他并且答称‘他们会不会撇开日俄两国而与袁世凯之间有些互通声息，很难揣测；我们应该充分合作，必须要有不能稍事疏忽的心理准备。’他又曾絮絮叨叨地提到最近法国公使对于俄国好像有点不够坦诚的样子。”

翌日（十四日），俄国向日本提出要求——两国协调一致，对付关于承认中国的问题。俄国是基于在东三省和内外蒙方面拥有和日本所朋比分占的庞大利权，故而要和日本联起手来与列强对抗；可是，日本方面则顾虑到如果日俄联合专擅行动，难免不会肇成和英、美、法等国在外交上发生摩擦的因素，故而拒绝了俄国的提议。

二月二十一日，日本决定了和各国一同承认中国的方针，自美、英、俄三国开始，探询各国政府的意向；在各国政府之间正式提起承认问题，乃自此开始。

日本提出两个条件

日本所提示于各国的承认条件，是这样的：

一、中国信政府必须正式表示继续承认各外国在中国不仅基于条约缔订、而且包括一向惯例所享有的一切权利、特权及豁免之义务。

二、各国对于新政府的承认问题、以及在达到承认时期的过程中，其行动应完全一致。

对于日本这个提案，美、英、法等国立即表明“原则赞成”；然而俄国却在一度同意之后，旋即改变态度，重行提出加重条件——“唯日俄两国的特殊权利，得另行要求之。”

俄国的意图是，不管怎么样都得倾全力迫使中华民国承认“外蒙独立”以交换其对中华民国的承认，而更加扩大其在华既得权益。

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一郎在向外相内田康哉的报告中提到：“俄国在必要时，将不惜诉诸武力，贯彻要求。”俄国之所以将条件加重，是估计法国也可能向日俄看齐。他认为只要日俄两国站在一条阵线、坚持到底、不肯承认中华民国，则列强的步调便会因而紊乱，不至于抢在日俄的前面承认中国。

可是日本却再度要求俄国改变意旨。因为日本的原案既已向各国提出，当然就不可能出尔反尔，和俄国采取同一步调。

在这样的情势之中，袁世凯以临时大总统地位掌握了全权，开始厉行暴政，因之反而使政局有失安定；列强目击如此情况，也就各怀鬼胎，暂时把承认问题搁置起来。

美国态度友善

打破了列强承认中国问题沉滞局面的，是美国。

美国对于中国，自始就表现出友善的态度。

当中华民国开国，孙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三天～～一九一二年元月三日，美国众议院（下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萨尔滋就在国会中提出“祝贺中国的忧国之士获得今天的成功；对于他们废止专制、建设共和国的努力寄予同情，赞成尽速承认中华共和国”的两院联合议案。

接着，美国两院在二月间通过了“庆贺”的议案。这时，是孙大总统已经决定让位于袁世凯之际。

还有，就在这个议案通过的前后，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官训令在中国沿海的美国舰艇，受到悬有中华民国国旗的中国舰艇敬礼时，应该对之还礼——这等于是实际上的承认。

舆论同情革命

美国对中华民国寄予同情，是出于欢迎同为共和政体的“姐妹国家”最初在亚洲诞生的一种朴质的民众情感。以共和先进国自负的美国新闻界，都在报导或论评中提到：“现在的中国人，可真正是世界第一的民主主义者。”

认为在袁世凯领导之下的中国政局，大致开始趋向安定的美国政府，乃于五月六日向其在北京的驻华公使嘉乐恒征询“应否承认”的意见，嘉乐恒当时的答复是：“应该从速承认”。

及至六月间，以国务总理唐绍仪因抗议袁世凯专横恣睢而提出辞呈为开端，陈其美、王宠惠、蔡元培、宋教仁等籍隶同盟会的阁僚，也都对袁世凯感到绝望，相继离职，政局因之动摇。当时，继任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陆征祥，为兼谋安定袁世凯政权，乃向美、日等国提出承认新政府的要求；日本方面未加理会，但美国则根据这个要求于七月二十日照会英、日、俄、德、法等列强，探询有无承认中华民国的意向，美国政府在照会中说明“美国舆论都已经主张立即承认，政府方面如果长此悬宕不决，会受到议会压迫，处于困窘立场。”

然而，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赞成承认”的答复。

各国牵制美国行动

俄国主张“应该等到中国的正式政府成立”；法国除同意俄国主张之外，并且加上一个条件“在新政府对于外国对华权益及条约未给予正式保障之前，不能承认。”英国也以为“袁世凯政府没有履行条约义务的能力”，并表示“不希望一国单独承认”——藉以牵制美国的行动。

至于日本的回答，则更有一番说辞——“当前的政治组织，只不过是临时性的，还没有建立恒久政府制度的基本法规；再就其实际情况看来，也没有臻于稳定的趋向。要是现在就给予承认，将会阻碍了在中国国内所进行的行政改革，并且对于各国的权利也会有所损害。是则给予承认，对中国本身、对各国都会不利。”

其实，列强们尽管喊出各种藉口的“时期尚早论”，但幕后却都在进行着利用承认问题藉图获得特殊权利的阴谋——日俄两国已经签订了“第三次密约”，协调好对于东三省和蒙古平分秋色的准备；还有俄国卵翼外蒙独立、英国插手西藏等行动，都在不声不响地进行之中，不过，有些阴谋还没有表面化而已。由于情势如此，故而以谋求各国步调一致为原则的美国，也就只得暂时敛手观望。

然而，到十一月五日美国举行总统选举结果，前任共和党的塔虎脱被打垮，民主党的威尔逊当选，威尔逊在竞选政见中揭橥有亲中国政策，于是承认问题又为之活动起来。

次年～～一九一三年一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参议院（上院）议员培根“即时承认中国新政府”的提案。

三月四日，威尔逊就任总统，美国的行动，从这里开始一转而积极化。

在北京的美国公使馆，于三月十八日向新任国务卿布莱恩呈报：“为防他国利用承认问题提出过分要求，并谋使中国政局安定，应从速承认北京政府。”布莱恩立即对驻北京公使发出指示：“和袁世凯见面，转达美国政府已经在慎重考虑承认中国政府的问题。”

美国政府到了这个时候，终于下定决心——即使得不到各国同意，也要单独承认中国。

德国与美国同调

四月二日，美国政府将业已决定承认中华民国的政策照会各国。同月六日，向中国表达“在中国召开国会、议院组织完成的阶段，正式承认中华民国政府。”

对于美国的单独行动，表现出反驳态度最为强烈的是日本。四月四日，日本举行内阁会议，决定要求美国暂行延期承认；同时，并策动俄、英、法、德等国，意图张开牵制美国的联合阵线。结果德国与美国同调，而其他国家则同意日本的方针。

继之，日本更于四月十九日草拟“承认条件”，送达各国，除重申在上年二月间的提议中业已提到的“须要中国国内情势安定，以及履行在条约和惯例上的更加义务”两点之外，并包括在手续方面的建议“在北京举行各国外交代表会议，作成各国共同建议的决定之后，予以承认。”

美日形成对立

日本这种对于承认予以拖延的新提议，得到了英、俄、奥、义等国的赞成。

美国承认中华民国

但是，在时间上业经迟了一步，美国于一九一三年五月二日上午十一时，向袁世凯递送了威尔逊总统的国书，走在列强前面，正式承认了中华民国。接着是墨西哥、古巴也递送了国书。中华民国开国以来，将近一年又半，才获得了国际地位。

可是，美国却并没有成为承认中国的第一个国家。

倡导承认，并掌握着主动权的，诚然是美国，不过在进行过程中，却发生了失误。

这是由于在四月六日，美国政府训令驻华公使馆向北京政府转达承认中国方针的时候，巴西和秘鲁两国误会美国政府已定于中华民国召开国会之日（四月八日）正式承认，于是这两个国家便各自指示其派驻北京的使馆“在确知四月八日召开国会之后，便可即时予以承认。”于是两国驻北京代表，乃于四月八日同时履行了承认手续，而走在美国前面。

由于美国承认了中华民国，乃使国际政局的趋向发生了变化。日本和英、俄等列强国家，都无法再抗拒世界大势，而不得不朝着在美国之外的各国同时承认的途径展开活动。

二次大战的绪端

日美两国为承认中国问题而形成对立的背景，还有其争执的因素，也在此时开始表面化。

向亚洲发展较迟的美国，一直在主张中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情形，在前面已经一再地提出来过。

当日俄战争之际（一九○四～五年），美国在背后给予日本支援，也就是基于上述主张。美国希望让日本打击俄国，可以抑制俄国在中国的进展。

可是没有料到日俄战后，日本迅速发展为亚洲的强国，在国际间对于中国的发言权增大，并且向朝鲜和满洲扩张了地盘，显示中国开始落入被日本侵略的状态；在远东地区，日本的力量已经强化到足以成为美国“眼中钉”的程度。故而在美国立场，对于日本如此支配中国的情势乃有加以牵制之必要——诸如“满洲铁路中立化建议”（一九○九年）、“四国（美英德法）借款开发满洲计划”（一九一一年）等等，都是基于上述必要的表现。

在另一方面，日美两国之间又因日本移民而纠纷不已。美国西海岸地区对于日本移民的排斥运动，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发生；及至一向提倡排日论的民主党支持出威尔逊当选总统，排日运动立即表面化。由一九一三年加州议会通过禁止日本移民持有土地法案开始，乃至禁止和美国人通婚、十倍征收渔业税等等歧视日本人的措施，逐渐扩大。

针对这个情况，日本政府打算以强硬外交态度谋求解决，在外交文书中有“不得已则不惜一战”的词句，被暴露于外，反而招致美国反感，受到压抑。

在美国国内，有提倡对日开战的呼声，就是自这个时候开始。

日美两国像这样地在中华民国的对立抗争，后来扩大到太平洋地区，肇成导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端绪。

日本掠夺利权的意图

日本在和列强作外交上的折冲，以谋拖延对中国承认的另一方面，对于袁世凯则隐隐约约地表露出像是有加以承认的意向，以进行其掠夺利权的侵略外交。

其中之一项，是减轻朝鲜和东三省之间货物通过的关税（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签约），又一项是建筑“满蒙五条铁路”问题（同年十月五日签约），尤其是后面一项，成为在东三省留给以后不断纷争的因素，而日本当时是在就要宣告承认中华民国之前不容犹豫之际，提出这个交涉，强迫要求换文。

关于前面一项——减轻关税问题，其演出的场所是衔接奉天和安东的“安奉铁路”。

安奉铁路，是在日俄战争之际，为紧急运输军需品而临时敷设的一条轻便铁路。后来，日本根据日俄朴资茅茨条约（一九○五年签订）将该铁路和“南满铁路”的管理权掠夺到手；不久之后，便托辞改良铁路，而着手改建为宽轨铁路，与南满铁路联接；并且在鸭绿江架设铁桥，打算和朝鲜的陆上交通联系起来。其意图，是要从业已把自己势力培植完成的朝鲜，筑成一条大动脉，直达东三省的心藏部位。

这个改建宽轨工程，实际是违反了清廷和日本之间在一九○五年所签订的“东三省善后协约”。

这个善后协约，是对于朴资茅茨条约的追认，同意由俄国将南满铁路的特权转让给日本；至于对安奉铁路，则只承认可以施行改良工程，而并未允许擅行改建宽轨，可是日本却专擅决定，强行施工。一九一一年，鸭绿江的铁桥也建造竣工，十一月一日开始，衔接朝鲜新义州和中国安东市的铁路开通，因而使朝鲜总督府铁路和南满铁路直接通车，东三省便和已被日本并吞的朝鲜联系起来了。

在这里日本所提出来的交涉，就是如前所述要求减轻东三省和朝鲜之间输出入关税的问题。日本提出要求的根据，是善后协约附的第十一款规定“满韩交界陆路通商，彼此应按照相互最惠国之例办理。”

日本便依据这一个最惠国条款，来强迫要求减轻关税三分之一。

日提筑路要求

关于三分之一的减税，在俄国与清廷之间，已经有过协定的前例——就是一八九六年的“东清铁路合同”。

“东清（中东）铁路”，是由满洲里到绥芬河横贯东三省东西之间和俄国“西伯利亚铁路”衔接起来的一条铁路；乃俄国因清廷“联俄制日”政策而以在一八九六年缔结的“中俄密约”（李鸿章、罗拔诺夫协定）为依据获得建筑和经营。本来，准许俄国经营像这样的一条铁路，已经是咎由自取，招来俄国侵略的清廷，更且在“东清铁路合同”上给予俄国以特权——“在东清铁路运输出入的货品，中国关税减轻三分之一”（合同第十条）。

袁世凯接受减税要求

日本的要求，就是希望在朝鲜和东三省之间经铁路互相输出入的货品，也能援此项前例办理。

先是，日本在建设鸭绿江铁桥之前，就已经提出过这个要求，但当时清廷说明：“东清铁路合同的减税条款，原为陆路通商之规定；东三省和朝鲜之间隔有鸭绿江，并非陆路通商，不能援例减税。”而予以拒绝。

但是到了鸭绿江铁桥既经完成之后，日本方面便又提出东三省和朝鲜之间，已有铁路衔接，则和陆路通商没有任何不同的主张。

双方谈判曾经一时中断。但到了一九一三年二月，终于谈到了最后阶段。

袁世凯在当时，首先为了巩固其本身的领导体制，不顾一切地强硬进行二千五百万英镑的3[231]727“善后借款”，受到国民的猛烈反对；继之，在三月二十日发生宋教仁被刺案，又被揭穿是幕后的主使人——处在四面楚歌的困境。为此，他唯恐触忤日本而更使自己陷于绝地，乃接受了日本的减税要求。

五月二十九日，由日本公使伊集院彦吉和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签订了“中日朝鲜南满往来运货减税试行办法”。经常减轻税率三分之一的关税，成为后来日本侵略东三省的有力武器，因为日本是获得此一优惠待遇，才得以垄断东三省南部地区的贸易。

在这个办法签订之后，日本又表示这个特惠关税是以一九○五年签订的“东三省善后协约”为依据，故而实施减税的生效日期应该追溯到架桥完工后铁路通车的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因此提出覈算退税一年半的要求。尽管日本如此设辞，但还是被外交总长孙宝琦所拒绝。

日本又提“满蒙五路”

日本接下去又有一个强制袁世凯的行动，就是所谓“满蒙五路”问题。

这个问题，也像上述减轻关税的要求一样，尽量利用中国国内政治混乱情势，同时抓紧袁世凯弱点，最后把承认中华民国的问题扯到一起，勒索中国让步。所谓“满蒙五路”，一言以蔽之，就是打算以日本资金，在东三省建设五条铁路网的计划。

这个计划，有下列五条线路：

四平街-郑家屯-洮南（三百公里）。

开原-海龙（一九○公里）。

长春-洮南（二八○公里）。

洮南-承德（七五○公里）。

海龙-吉林（一七○公里）。

这几条铁路的建设，并不仅是基于单纯的交通目的，而是为了经济侵略、军事侵略的预先投资计划。

在一望无垠的东三省内陆地区，由于缺少可容船舶航运的宽大河流，所以铁路的价值革大。像铁路这样的大量交通运输机构，既能促进人群交流，更能担负情报传递和货物输送的任务。在人群交流方面，包括调动“兵员”和“特务工作员”；在情报传递方面，包括扩张“日本帝国主义”；在货物运输方面，包括补给“武器”在内。

还有比上述情况更为重要的，就是这几条铁路，实则是被计划为“南满铁路”的延长路线；日本要把在“南满铁路”所持有的特殊权利，不折不扣地延伸出去，由东三省及于热河省，扩展成一面蛛网的状态，才是日本真正的目的所在。

由线扩张为面

在满蒙地区建设铁路问题，自十九世纪末以来，就是列强之间勾心斗角的主题。在日俄战争中获得胜利之后的日本，一步一步地站稳了脚跟，开始要确立他在满洲的垄断体制；而其他国家也施展出种种手段，图谋插足进来。像美国于一九○五年提出的“新法铁路案”（新民-法库）和一九○八年的“锦爱铁路案”（锦州-瑷珲），都是很好的例子。

及至辛亥国民之后，也还是有各种计划浮现出来，但旋又消失。

据日本外务省的公电纪录中留有一个报告提到：在一九一三年，孙先生想获得日本协力组成中国铁路总公司的前后，还出现有由英国资本建设奉天-海龙之间、法国资本建设吉林省伊通-新城府之间铁路的说法。

列强这样地要插足进来，而日本能够藉以抵制的依据，就是和“东三省善后协约”同时发表的“秘密议定书”中之一项规定——“为保护南满铁路的利益，不建筑并行的线路。”日本方面特定将这个“秘密议定书”公开，作为对列强挡驾的金科玉律。

这五条新铁路计划，是日本要将垄断体制由南满铁路的一条“线”，扩张为“面”，同时兼有防堵列强意图插足的效用。

张勋攻下南京

进入一九一三年，日本方面和中国交通总长朱启钤等非公式地不断接触试探，逐渐将五条铁路的“要求案”设计成熟，而于八月中旬开始正式交涉。负责出面的人，是横滨正金银行董事小田切万寿之助。

就在这个交涉展开序幕之际，袁世凯在政坛上已经是越发陷入困窘的境地。

因“善后借款”问题和宋教仁被刺事件所激起的反袁声浪，终于在被袁免职的江西都督李烈钧于七月十二日举兵讨袁的时候爆发——这就是所指的“第二次革命”的开始。由七月中旬到八月上旬，安徽、湖南、广东、福建、四川各省，接踵响应，在华中各地和袁世凯的部队展开激战。

正在这个当口，连续发生了对于日本人的“不幸”事件。

日以南京事件为把柄

八月五日在山东兖州、八月十一日在湖北汉口，先后发生了日本军官被监禁、拘留的事件；继之，在九月一日，攻下了南京的袁世凯属下张勋所部，大掠三天，杀害颇多已被解除武装的士兵及市民；在遇难者之中，有三名日本侨民。

这一连串事件，使袁世凯在对日外交方面处于相当不利的立场。

日本以强烈的抗议态度，提出下列要求：

（一）惩办南京事件的有关军人。

（二）赔偿损失。

（三）由张勋和中国政府正式谢罪。

日本的政潮

可是，当时日本政局因辛亥革命影响，也正在极度震撼之中。

其导火线，是在一九一二年十一月打算向朝鲜增派两师军队的问题，这是日本陆军因对辛亥革命后的“满州局势”感到不安而提出的请求，但西园寺公望内阁则予以否决。陆军大臣上原勇作因不满这个决定而提出辞呈，内阁为之垮台，造成政府与军部正面冲突的政变。

新内阁由于继任人选困难，迟迟不能成立；直到十二月，才推出已经退休的“长州阀”（山口县）长老桂太郎第三度组阁；可是以“萨州阀”（鹿儿岛县）为中心势力的海军，则对桂内阁表示出不合作态度。于是，政友会尾崎行雄及国民党犬养毅等政党政治家乃对“藩阀政治”（旧封建关系的政治派系）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并在国会中提出不信任案、弹劾案。而激起了政潮。

于是，桂内阁乃捧出天皇的诏书，想用高压手段把反对势力的活动压制下去，致有停开国会等举措；然而，国民们拥护宪政的声浪高涨，终于发生了纵火骚动的事件，结果桂内阁只维持了两个月便被迫下台，由山本权兵卫继任。

继此之后发生的问题，是以军部为中心的“批判软弱外交”运动。军部尤其是希望在中国问题方面采取强硬政策，因而有直接干预外交的动向；外相牧野伸显则以对外交涉应该以外务省为唯一窗口的理由，要加以封锁，但高唱向大陆进展的强硬分子们因而更加激动，极力攻讦外务省态度软弱，甚至发生了外务省政务局长阿部守太真被暗杀事件。

由于兖州、汉口、南京赓续发生不幸，更刺激了这些行动，甚至有举行群众大会要求向中国出兵以及向外务省请愿采取强硬措施等活动——日本对中国的政策，在如此舆论背景之下，乃越发趋于强硬。

关于在中国所发生的日侨不幸事件，日本方面提出的要求是：严惩犯人、支付赔偿费、由政府正式道歉、撤免祸首江苏都督张勋的职务等项。

对这一事件，袁世凯最怕日本不仅会引以为藉口而将对中华民国的承认更拖延下去，甚至还有阻碍他国承认的可能。

在袁世凯的立场来说，虽然好不容易得到美国承认，但其后不断地受到国内反袁运动的摇撼，为了安定自己的政权，急切希望务必要得到各国对中华民国的承认。

此外，袁世凯更耽心日本会不会因不幸事件的契机，而倾向于革命阵营，支援讨袁运动。

由于有这些恐惧和疑虑，结果，袁世凯对于南京等不幸事件的交涉，便完全接受了日本的要求。

看透袁世凯的底牌

尽管如此，但唯有对于撤免张勋职务一点，未能马上实行，是因为耽心撤了张勋会引起军队内部不满，故而不敢断然处置。

于是，日本便很巧妙地利用了这个矛盾。她看透了袁世凯的底牌，乃将“撤免张勋问题”和“满蒙五路问题”搅在一起，迫使袁世凯承认。

日本外相牧野伸显，于九月十七日对驻华公使山座园次郎（六月间接替伊集院彦吉）发出第四六六、四六七号火急机密电报指示：“如果张勋撤职之事，决无希望立即实现，则当在此际转变方向以为善后手段，可就另电所开示之两项，使支那方面承诺我方要求，可认为是使问题告一段落支一策……”这里所谓另电开示之两项，实际是加重条件，其内容为“将关东州（辽东半岛）租借年限再延长九十九年；南满铁路在此期间不还给中国。”以及“将曾经要求过的新设铁路让给日本。”

袁世凯终于进退维谷，只有保证撤免张勋，而于十二月十六日调张勋为长江巡阅使，以谋收拾事态。

挟制袁世凯

一九一三年十月五日，日本驻华公使山座圆次郎与中国外交总长孙宝琪在北京交换了“满蒙铁路借款修筑预约大纲”的公文。

这个大纲内容如次：

所谓满蒙铁路借款

一、中华民国政府承诺借用日本国资本家之款，敷设下列各铁路：

甲：由四平街起经郑家屯至洮南府之线。

乙：由开原起至海龙城之线。

丙：由长春之吉长铁路车站起贯越南满铁路至洮南府之线。

以上各铁路与南满铁路及京奉铁路联络，其办法另行订定之。

二、前开借款办法细目，须以浦信铁路借款合同定本为标准；本大纲议定后，中国政府从速与日本资本家协定之。

三、中国政府将来若敷设由洮南府城至承德府城间、及由海龙府至吉林省城间之两铁路时，如须借用外国资本，尽先向日本资本家商议。

这个借款大纲，是让日本由东三省向内蒙方面伸展势力最初的公文。盖由洮南通往承德（热河省）的铁路，就是贯越川岛浪速在所谓“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时被其操纵的“卓索图盟”“昭乌达盟”“哲里木盟”蒙古王公的势力范围。

在前一年（一九一二年）的七月，日本已经和俄国签订了“第三次日俄密约”，决定将内蒙古分割为东西两半；日本的一切阴谋，由于这个大纲成立，都结合成有机体，迅速朝着具体实现的方向迈进。

丧权辱国不敢公开

根据日本方面的纪录，袁世凯预料到这个丧权辱国的满蒙铁路问题，将会在国内外激起风涛，故而于换文之后，还要求日本方面绝对保密。这是由于它的内容是不能见容于国民万目睽睽之下的。

山座圆次郎在十月九日拍发给日本外相牧野伸显的电报中，对于这件事有如下报告：

“十月四日会谈，叶公绰（交通部次长）表示：‘如将协定发表，必定会引起一部分民间的反对言论，故在事先有必要试探疏通各方面意见；在尚未准备成熟之前，如予发表，则将会对于细则的商订发生窒碍。如果有第三国立即赓续要求同样权利，则其困扰会接踵而来。’……他们以这两点理由，恳切要求暂为保守秘密。据观察，在支那方面对于本借款大纲承认之后，纵使对必然会引发的舆论责难置之不理，但还有本案不仅终归要提付议会通过，而且由于某段路线业已先有满洲地方人民申请私营有案，故在政府立场，实有预先疏通民意之必要……”

日本将铁路问题和对中华民国承认问题牵扯在一起，图谋导致于其有利趋向，在前面已经有所叙述。

一九一三年五月二日，美国领先列强承认了中华民国之后，日本便策划和各国一致在袁世凯于国会膺选大总体之日，给予承认。

这个行动的主导权，由日本和英国所掌握。

提出承认的交换条件

日本等国的意图，是要袁世凯发表宣言先行承诺“遵守清廷业已签订的条约、协定”和“尊重外国人依据国际契约、国内法律及以往成例所获得之特权”——以这两项作为交换条件，各国即可一致予以承认。

要求于袁世凯的宣言书，是由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担任起草，和英国方面协商决定，于五月十八日告知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

列强所提示的宣言文稿，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就是不仅止于要将既有条约、协定明文化，而且还包括有尊重“依据成例的特权”。针对这一个要求，梁士诒于五月二十八日提出对案，只肯以见诸条文的事项为对项，要求修正。

关于这一项，日本方面所提出的日文原稿是：“已成惯行支那于享有权利、特权及免除……”译成中文应为“各项成案、成例已享之权利以及豁免………”而中国方面提出的修正案则为在“成例”的前面加上“公文载有”（英译则为ＯＮＲＥＣＯＲＤ）一语。

由于增加这一个语句，使承认问题发生了波折。

驻北京的各国公使，一再举行外交团会议，加以协商。

大总统就任日期，日益迫近，只有荷兰和比利时两国决定方针——即使袁世凯发表宣言稍迟，也得要在大总统就任的同时给予承认；可是日本和英国则对宣言内容坚持到底，结果，在十月二日的外交团会议中全体一致决定要求仍将“公文载有”一语削除，并即通知总统府。

十月五日，签订了日本所要求的“满蒙铁路借款修筑预约大纲”；次日——六日，国会参、众两院组织大总统选举会，进行选举大总统。

经过两次选举，袁世凯都未能得到法定票数；直到第三次投票结果，才产生了袁大总统。

就在同时，包括日本在内的十三个国家正式承认了中华民国。

以前，在还没有承认的时候，日本的公文书上倒还不时使用过“中华民国”的正式名3[246]742称；然而及至承认之际，却在其政府公报所刊出的公告上避称“中华民国”而称为“支那共和国”。其理由是“以地理名称为确定”。

袁世凯照本宣科

袁世凯于十月十日在大总统就任典礼中，当着列席观礼的外交团面前，朗读了“就职宣言书”。在宣言书中关于外交方针部分，就是照用列强起草的原案。

俄国侵夺蒙古

和日本并驾齐驱对中国发挥其领土野心的列强，有俄国之于外蒙古，英国之于西藏……

首先，从俄国的行动谈起。

俄国煽动外蒙古王公们，以“大蒙古国”名义宣称“独立”，是在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一日在前面已有叙述。

中华民国当然不会有放弃外蒙的意向，而且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承认其“独立”。

中华民国现在还是称外蒙古为“蒙古地方”，包括在中国版图之内；据内政部审定的分省地图说明“居民以蒙族为主，苏俄人侨居者颇多，经济、政治大权由俄人掌握。”

一九一二年一月，中华民国开国之际，孙先生以临时大总统的立场致电蒙古王公，宣告构成中华民国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

袁世凯也于四月二十二日下令五族平等，蒙古为五族之一，由内政部管辖。

继之，在八月间，袁世凯更电达自称“大蒙古国大皇帝”的哲布尊丹巴劝告取消独立，同时派遣使者前往，打算直接谈判；可是来自库伦的复电却为“一切请与邻邦协商”——终于拒绝谈判。

只凭这个答复该可以了解，蒙古已经是完全落入俄国的操纵之下。

当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还没有得到各国承认，内部也有欠安定；假定要用武力去收复外蒙而招致国际纠纷，又未能具备足以应变的体制。因此，唯有电令驻俄公使循外交途径交涉，希望俄国影响外蒙取消“独立”；但实际煽动外蒙独立的就是俄国，当然不会答应中国的要求。

而且就在这一年七月八日，俄国已经和日本签订了第三次密约，以将内蒙古东西分割于两国的条件，而使外蒙古纳入俄国势力范围一节，得到日本支持。接着在九月间，又与英国打成交道，承认英国在西藏的自由行动及其优越地位，交换到英国支持俄国对与外蒙的控制。

外蒙变成俄国的附庸

俄国在对于日、英等列强作了外交上的部署之后，便派遣曾任驻华公使的郭索维慈前往库伦，于十一月三日签订了“俄蒙协约”及“商务专约”。

这两个条约给予俄国人以从心所欲的“特权”。

在“俄蒙协约”中，规定“俄国政府扶助外蒙自治组织及编练国民军，不许华军开入蒙境和中国在外蒙殖民”，并表明给予俄人以最惠国条件。此外，在“商务专约”上，保证俄人在蒙古有以下各项自由权利：

（一）居住及迁移。

（二）租购土地。

（三）建造工厂。

（四）开垦耕农。

（五）建设桥梁渡口，并得向来往路人索取费用。

（六）设立邮政，并享用站台。

（七）矿产、森林、渔业的经营。

（八）免纳入口税。

（九）设立俄国银行。

以及保证俄人与蒙人、汉人争议时的领事裁判权等特权——可见外蒙古已经彻头彻尾变成了俄国的附庸。

情况竟然演进到这样的结果，说实在的话，连蒙古人自己也是出于始料之所不及。他们在当初只顾一厢情愿地相信俄国是真正在支持其“自主独立”，因而其“独立”的规划是寄托在俄国的助力之上。他们有他们的想法——就是保持蒙族的历史疆域和获得完全的独立。

然而，这种想法却自一开始就被俄国所摧毁，在胁迫之下承受了屈辱的“协约”。

中华民国方面，在俄蒙协约签订之前，就曾经照会俄国——“蒙古地方为中国领土，无权和他国缔结条约；俄国要和外蒙签订任何条约，中国政府都不能承认。”此外，中国的舆论更为之沸腾，来自各省呼吁对外蒙出兵的要求，像潮水一般地涌到了北京。

可是这些激烈的反对舆论，却反而被俄国乘势利用，郭索维慈在和外蒙谈判的时候，故意宣称中国内部要求向外蒙出兵的声浪高张，暗示在明天也许就会见到中国兵斩关直入，蜂涌而至，并且威胁地说：“要不要和俄国人合作，已经到了最后决定的关头。”“如果蒙古人再要是发生变卦，则过去一切谈判，都不算数，将来倘有后悔，俄国可不会再予理睬。”

后悔已迟沦为奴隶

站不稳脚跟的“蒙古政府”，除被迫签约之外，已经是无路可走；一心一意追求“独立”的外蒙，得到手的，只不过是形式上的“自治”而已。

曾任“蒙古政府”内务大臣的大喇嘛，在谈判协约过程中，就已经察觉到情势不妙，大声疾呼地说：“俄蒙协约，在蒙古人是毫无所获，只是被置于铁砧之上、铁锤之下，任凭敲击而已！”最后到了被迫签约的时候，他又大喊：“蒙古人成了俄国的奴隶了！”

这类条约，实则只不过是一种“私约”；然而，俄国在后来就把这种“私约”和承认中华民国的问题扯在一起，提到公的交涉场合，图谋迫使中华民国加以承认。

英国攫取西藏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外交总长陆征祥要求俄国废除“俄蒙协约”，进行谈判；但俄方则强硬拒绝，并且隐隐约约地透露出将要承认中华民国，而反过来要求中国得承认他和外蒙的协约。谈判很难进展，互相交换了颇多提案，在经过约半年的时间，举行了三十多次会谈之后，才于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日一度谈妥了全文六条的中俄协定草案。可是由于这个草案大部分承认了俄国的要求，在众议院虽获通过，但被参议院所否决，而俄国却反紧跟着追加了四个新条件。

及至九月十八日，由新任外交总长孙宝琪与俄国恢复谈判，又经过十次会谈，才决定了五项“声明”及四项“附带条件”。

协议未经国会审议

袁世凯对于这样重大协议的外交文书，竟以并非条约的理由，不咨请国会审议，便命孙宝琪于十一月五日签字。

这个声明的内容如次：

一、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古之宗主权。

二、中国承认外蒙古之自治权。

三、中国承认外蒙古人享有自行办理自治外蒙古之内政、并整理本境一切工商事宜之专权。中国允许不干涉以上各节，是以不将军队派驻外蒙古，及安置文武官员，且不办殖民之举……（下略）

在经过漫长谈判的结果，中华民国所争回来的，只有“宗主权”三个字；相对地，俄国则获得了使外蒙古在名义上自治、而实则成为其属国的果实。

被当作掠夺领土对象的另一个地区，是西藏。在这一方面，英国担任主角，俄国则为其配角。

在英国的眼光里，邻接印度的西藏，是军事方面和通商方面的冲要地区。

一九○四年，英国赫荣鹏上校率兵三千入藏，以武力压迫西藏纳入其势力范围。同时另一方面，俄国也在策谋使新疆、西藏俄化，而秘密和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有所接触，并且在英军入藏时，意图促使达赖喇嘛逃往俄国。

达赖由亲俄转而亲英

对于英、俄方面的行动，清廷在开始时并不关心，没有积极保护西藏的适当措施。因此，达赖喇嘛开始亲俄，后来转而倾向于英国。

一九○八年，清廷以加强边境警备的理由，打算派遣北洋新军入藏。针对这个情势，达赖喇嘛乃在英国人的煽动之下，抗拒清廷，宣称“反对弹压喇嘛教”，反而使藏兵侵入四川；清廷于是出动武力镇压，于一九○九年控制了拉萨，达赖喇嘛被清廷剥夺了尊号，在英国援助之下逃亡到印度。

及至辛亥革命军兴，英国马上再度煽动藏人，开始侵入四川省。

一九一二年四月，袁世凯下令声明“西藏为中国领土”，并任命四川都督尹昌衡为征藏总司令，再度策划武力镇压。

英国公然出面干涉

此时，英国竟公然出面干涉。八月十七日，驻华公使朱尔典向中华民国提出对于西藏不干涉其内政、不行使行政权等五项要求，并且毫不隐讳地表示其附带条件——如能同意签订协定，则英国便可以承认中华民国。

在提出这个要求的稍后，英国和俄国打好了交道——以同意俄国在蒙古的行动，交换到俄国承认其在西藏的“自由行动权”。

此外，西藏和外蒙古之间，更在一九一三年元月，互相承认独立，并且签订了“同盟条约”。

英国以这些既成事实为其条件，于一九一三年承认了中华民国；其后，中华民国便和英国及西藏代表进行外交谈判，但直到最后未能达成协议，悬案未决。

总统论边疆问题

‘我在民国元年“军声杂志”中公开的表示说：“征抚蒙藏，不可仅视其形势之难易，状况之利害，拘泥于战术之一隅而已；要当深省英俄之现况与关系与蒙藏之如何而决定……当英俄要求干涉之际，吾国虽无力宣战，亦宜据理力争，要求其归还我国主权……何吾政府计不出此，一再隐忍，甘为退守，丧权辱国，莫此为甚。”这一段话，把当时中国边疆问题，明白的指了出来。’（注）

这是蒋总统在著述中的一段言论，结果，诚属如此。

日、俄、英三国，在蚕食中国领土方面，协调其利害完全趋于一致，三国恃武力为后盾，朋比瓜分东北（日本）、外蒙（俄国）、西藏（英国），步调一致，构成外交上的包围网。

袁世凯只顾一个劲地讨好列强，而将中华民国的领土出卖给侵略者们。

东北、外蒙、西藏问题，在中华民国来说，是丧权辱国的第一页，给后来留下了极大的祸根。

注：蒋总统-“中国之命运”（一九四三）

第四章：袁世凯窃国(上)

主题

唐绍仪内阁导发激烈政争国民党成立残害国民党人宋教人遭暗杀宋案真相大白袁世凯大借款日俄介入借款案借款条件苛刻群情激愤讨袁二次革命肇始创办军声杂志上海举兵讨袁进攻制造局之役国父高瞻远瞩袁世凯变本加厉重建革命组织中华革命党成立部署上海发难到东三省考察日本觊觎山东袁世凯引狼入室日军侵至济南日军攻占青岛

唐绍仪内阁

在一九一二年元旦开国的中华民国，当时的确是奠定近代国家基础极其重要的创制时期。

像这样重要关头，竟然由袁世凯居于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不能不说是最大的不幸。袁世凯为盗窃国柄而骋其私欲、逞其权谋，摧毁了中华民国的立国精神。

助长日本侵略政策

非但如此，如果从历史观点探究其影响，则日本以二十一条要求为开端的侵略大陆政策，就是充分利用了袁世凯窃国的机会，得以迅速地推进实现。

‘我敢断言，日本的军人……尽知我们的一切弱点，因此，他敢大胆来侵略中国；他们对于中国的历史也有研究……历史上最大国贼就是袁世凯，因为他造成自民元以来中国军人争权、夺利、贪污、卑劣、自私、自利的恶习颓风。日本军阀认为袁世凯死后，恶习依然存在……尽可以随便来侵略压迫。’（注）

继孙先生之后出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为加强其个人权力，最初施展出来的阴谋，是更迭内阁人事。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预防大总统有“独裁”之弊，所以规定大总统发布的命令，须经国务总理副署；但袁世凯却视若无睹，在临时政府自一九一二年四月迁到北京之后，还没有经过半年时间，就任意使内阁三度交代。

唐绍仪参加同盟会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最初被整垮的是唐绍仪内阁。唐绍仪本来是仰仗袁世凯庇荫的人，在南北和议中担任北方代表；可是，就在议和过程中，闻知“中国革命同盟会”的理念，意气投合，便于三月间在南京组阁时加入了同盟会。当时，担任过辛亥革命主角的“中国革命同盟会”，甫于三月三日改称“中国同盟会”，变成公开组织，为临时参议院中的最大政党。

唐绍仪组阁方针，是要建设理想的共和政府，其宗旨和同盟会的理念没有多少距离；有些人甚至称呼唐内阁是“同盟会内阁”。

不过，唐内阁自组成时开始，阁僚意见便显然不能一致，有欠安定。

内务总长赵秉钧，和唐绍仪个性不合，加以在思想上也是“保守”与“进步”大有差异。赵秉钧连国务院会议都无意出席，他扬言：“在院会中很少提到内务部的事，目前维持秩序安定事大，无关紧要的院会还是不出席的好。”

海军总长刘冠雄，也和唐绍仪有欠融洽，不大出席院会；交通总长施肇基以治病的理由前往天津，经常缺席；财政总长熊希龄虽出席院会，但每事和唐绍仪意见对立。

唐绍仪对于这些情形不仅毫不在乎，而且常常以责任内阁制的理由，对袁世凯表现出有所抗拒——诸如在袁世凯向参议院发表演说之前修正其讲稿，以及退回总统府命令等举动。以致唐绍仪一去总统府，希承袁世凯意旨的侍从官员们都会窃窃私语：“嘿！整我们大总统的人来了！”

利用王芝祥调任问题

对于像这样的唐绍仪，袁世凯很巧妙地把他赶下台。为达这个目的而利用的手段，是广西副都督王芝祥调任直隶都督的任命问题。

直隶都督相当于前清时代的北洋大臣，是掌握华北军队的枢要职位，袁世凯鉴于王芝祥为南京革命军的军事顾问，对之并不放心，但却向唐绍仪佯示“虽予任命，亦无不可”的态度。

于是，唐绍仪在王芝祥为受任直隶都督而来到北京的时候，便公开表示“大总统已经同意”。未料袁世凯却指使直隶省京津一带驻军预先有了部署，由军界通电“坚决反对王芝祥就任”，而且还擅行制造出“军人任免属于大总统特权”的藉口拒绝发表，并命令王芝祥仍回南京，担任安置遣散部队的任务。

实则王芝祥在当时是受到地方议会——直隶省谘议局所推举的。

唐绍仪认为如因军队反对，就拒绝任命都督，是背信于国民，故而不肯在改任王芝祥职务的任命公文上副署，可是，袁世凯却仍然将没有副署的命令下达给王芝祥。

唐绍仪激愤辞职

这是蔑视国务总理职权的违法行为。激愤的唐绍仪，便于六月十五日告病辞职，离开北京，前往天津。

袁世凯派秘书长梁士诒前往慰留。但唐绍仪向梁士诒作了如下的答复：

“我与项城交谊，君所深知。但观察今日国家大势，统一中国，非项城莫办；而欲治理中国，非项城诚心与革命党合作不可。然三月以来，审机度势，恐将来终于事与愿违，国家大事，我又何能以私交徇公义？”

唐绍仪于六月二十七日正式辞卸了国务总理职务。农林总长宋教仁以及陈其美、蔡元培、王宠惠等属于同盟会的四位阁僚随同进退；此外；和唐绍仪意见不合的财政总长熊希龄、交通总长施肇基也继之辞职。

袁世凯第一次整垮内阁，就这样地得以成功。

注：蒋总统-“抵御外侮，复兴民族”（一九三四）

导发激烈政争

唐绍仪内阁被袁世凯整垮之后，围绕着谁来继任的问题，导发了中国同盟会和其反对势力之间的激烈政争。

中国同盟会为谋内阁政见统一，主张组织“一党内阁”；但是结合了反对势力的共和党，唯恐同盟会独占阁僚席位，而主张成立超党派的“超然内阁”。这个争执，结果又只是给予袁世凯以可乘之机。

在这里，我们先就当时政党的动向来作一个鸟瞰。

中国同盟会成为政党

辛亥革命之后，一时组成有逾百的政党，其中最大的，是领导辛亥革命的“中国同盟会”。

随同革命的成功，同盟会本部由日本东京迁来上海；接着当南京政府成立之时，又迁移到南京成贤街。

由原为革命实行机关的秘密组织——中国革命同盟会，转变为参与国政的公开组织——中国同盟会，是自一九一二年三月三日在南京三牌楼第一舞台所举行的全体会员大会为嚆矢。

这次大会，踊跃参加的会员达四、五千人，临时政府各部总长、次长都齐集会场，全体与会人员一致推选孙先生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胡汉民、宋教仁、张继、田桐等人为干事。可是其中的黎元洪在不久之后便出卖了同志，倒向袁世凯阵营。

大会宣布同盟会的新宗旨为：“（一）巩固中华民国。（二）实行民生主义。”然而，一如“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说法，由于组织活动公开，革命精神乃随之减退。

统一党与统一共和党

亚于同盟会的政党，是“统一党”与“统一共和党”。“统一党”是由章炳麟领导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和张謇领导的“江浙预备立宪公会”所合并组成，在南京临时政府中，其势力仅次于同盟会。在政策方面，譬如说同盟会揭橥“发展民权”，统一党则主张“国权第一”，处处和同盟会对立。

“统一共和党”由云南都督蔡锷和广西副都督王芝祥等所组成，多数党员原为同盟会会员。

此外还有“共和建设讨论会”、“民社”等一时逾百的党派，简直是多如雨后春笋。

反同盟会组织合流

在这些党派之中的反同盟会组织，于五月九日合流组成“共和党”，参加者有“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以及旧保皇党员徐勤所领导的“国民党”（此“国民党”与后来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及现在的“中国国民党”有别）。

被推举为共和党理事长的，就是黎元洪。黎元洪本来不是革命分子，而且此时已经脱离了同盟会。其次，列各理事的，有张謇、章炳麟、程德全等人。至于政策方面，则为国家主义——主张加强国家权力。党员之中，颇多立宪派人士及官僚分子，甚至于有只因赞同其以“共和”为党名而参加者。

虽然党名共和，实则究其根柢只不过是一些旧势力的集合，免不了作为袁世凯的“御用政党”，而将后任内阁当成政争的工具。

推举陆征祥组阁

共和党对于唐绍仪的继任人选，决定推举在唐内阁任外交总长的陆征祥。

六月二十四日，共和党党魁黎元洪致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建议“宜以不隶党籍的陆征祥组织内阁”。

这个建议，在袁世凯是正中下怀，因为陆征祥温顺可用，不隶属于任何政党，比较容易控驭。于是，便迅速于六月二十九日提名陆征祥为国务总理，咨请参议院同意。

同盟会表示反对，但共和、统一、统一共和等各党则予赞成，结果在参议院获得通过。

陆征祥以前任内阁的内务、海军、陆军三阁僚继续留任，同时提名新阁僚六人，于七月十八日征求参议院同意。这次提名的阁僚人选，完全遵循袁世凯意旨，新提名的六人之中，有三人是袁世凯所一手培植起来的亲信。

顾名思义，陆内阁可以称得上是所谓“超然内阁”，因为同盟会也有三位会员入阁；不过，他们都是逢迎袁世凯的人士，而实则同盟会在当时是禁止会员参加陆内阁的。

陆征祥本人，曾经久居国外，擅长外国语文，折冲樽俎，富有经验，被认为是一个优秀的外交家，颇得时誉。不料，这一天他在参议院发表施政方针演说中，只介绍自己不参加宴会、不饮酒、不奉承官场、不偏顾人情……只顾介绍自己，没有一句话涉及大政方针。议员们大为失望，而将六阁僚同意案否决。

袁世凯重施威吓故伎

其后参议院为了应否使陆征祥辞职而分为两派。可是袁世凯则当然不肯让唯命是从的陆征祥下台，于是，重施故伎策动各省纷纷函电参议院，对于否决六阁僚一事表示抗议和责难，甚至更指使北京军警采取威吓参议院的手段。

七月二十四日，北京军警在市区散发带有恐吓性的传单，其大致内容是：“阁员未能通过，实因参议院议员挟持党见，破坏大局……因谬执党见，陷国家于无政府险象，我等厕身军警，熟知祸机将发，不得不先为警告……”

在暗示将会发动“政变”的威胁之下，参议院迫不得已乃于七月二十六日就陆征祥提名的六阁僚之中通过了五人。

这样，陆征祥的“超然内阁”总算是得以勉强成立。然而，在袁世凯方面却是事与愿违，这是由于他所操纵的木偶——陆征祥在一波三折的政潮冲击之下，完全丧失了干劲而称病入院，再三续假，简直没有再行掌理政务的意向。

因此，袁世凯也就无意于继续利用陆征祥，而在不到一个月之后的八月二十日，发表内务总长赵秉钧代理国务总理，并且又开始务色继任人选。

国民党成立

陆征祥内阁，虽然说是在无形中瓦解，但在同盟会来说，由于其反对势力——共和党所推动的超然内阁出现之后，在政治情势上所受的打击颇为不轻。

合并其他四个党派

因此，一向主张一党组阁，实现“责任内阁制”的同盟会，乃基于“舍小异，就大同”的方针，以纠合他党、组成一个大政党为目标。结果在八月间，合并了第三党的“统一共和党”以及“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四个党派——组成“国民党”。推举孙先生担任理事长；列名理事者，有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等原先隶籍同盟会的人士。

国民党成立之后，在临时参议院增加到六十议席，占半数势力，已经达到为袁世凯所不能忽视的程度。

党的实质产生变化

然而，从相反的一面看来，党的实质却产生了相当的变化。这是由于过事争取在参议院增加议席，以谋加强政治势力，便不管是谁都招纳入党，于是颇多国会议员、阁僚、各省代表、各省长官都成了国民党党员，其中不像是适宜于做一个党员的人物，实在是为数不少。

职是之故，同盟会原来所具有的革命精神，也就因而冲淡。譬如说：在国民党党章中，以“励行种族同化”代替了“民族主义”；“平民政治”代替了“民权主义”；“采用民生政策”代替了“民生主义”——三民主义的面貌为之消失。

像这样模棱两可的政治立场，关联到后来二次革命的失败因素。

这时，对于在参议院掌握半数议席的国民党，袁世凯发出了协商的号召。在袁世凯来说，为谋安定自己的政治地位，当然有必要获得孙先生和黄兴等人的合作。

国父首次晤见袁世凯

孙先生自揖让临时大总统于袁世凯之后，便赴上海、武汉、广东等华中、华南地区巡行，曾经再三接到袁世凯的邀请。

孙先生接受了邀请于八月二十四日到达北京，袁世凯特备髹金双马车迎往宾馆，给予最盛大的接待。北京市民们都悬旗结彩热烈欢迎。

袁世凯和孙先生，是在这个时候才初次见面。

九月十一日，黄兴偕同陈其美、李书城等人也来到北京。

孙先生在北京停留了约一个月，和袁世凯先后会谈十三次之多；中途，黄兴也曾参加。

在会谈中所涉及的问题之一，是关于陆征祥内阁的继任人选问题。

袁世凯属意于以代理内阁总理赵秉钧真除，但并不直截了当地在一开始就提出来，而故意先探询孙先生的意向。

孙先生首先推荐黄兴，袁世凯表示同意，但黄兴力辞不就，于是孙先生便改推宋教仁，袁世凯表面同意，但内心深为不满，因为宋教仁极力主张责任内阁制，在袁世凯看来是非常不妥的人物，而宋教仁本人也因为无意在袁世凯的政权之下出任阁揆，所以表示辞谢，以致人选问题延搁难决。

吸收入党口是心非

最后，产生了一个不得已的妥协办法，总理人选一任袁世凯决定；但总理与阁僚预定加入国民党。

九月二十四日，参议院通过袁世凯提名赵秉钧出任国务总理的议案，赵内阁成立；结果，符合了袁世凯的心意。

赵秉钧遵照原先的协商决定，参加了国民党；阁僚之中，除陆、海军总长之外，司法、农林．工商、交通各总长也都向国民党填送了入党申请书。在形式上，由国民党组织的“责任内阁”于焉成立。

然其实情则距离责任内阁还远得很，身为阁揆的赵秉钧本人就曾透露过这样的话：

“我本来就不晓得什么叫做党，不过有许多人劝我进党，统一党也送党证来，共和党、国民党也送党证来，其中还有没曾打开看过的，我何尝懂得什么政党来？”

可是，黄兴为扩张国民党的势力，对于劝人入党颇为积极，他认为“只要一旦加入了国民党，不管他是谁，总会发生点作用。”黄兴的劝诱工作日益起劲，最后劝到了袁世凯的头上。

袁世凯对黄兴的邀请，虽然没有正面拒绝，但根本就无此兴致，他曾以充满嘲笑的口吻向心腹策士杨度表示：

“哲子，你看我像个革命党吗？不过，要是他们不坚持责任内阁的话，我们不也是可以做个革命党玩玩吗？”

当时，对于这些情况深为慨叹的上海民权报，有过这样的评论：

“赵秉钧甫入同盟会，即为此悖德乱道之举，且荒谬尤甚于往昔。以国家言，则为违悖约法；以同盟会言，则为违悖政纲……吾愿吾同志共弃之，吾更愿吾国民共弃之，勿再留此害群之马也。”

内阁落入袁世凯掌握

尽管有过这样的警告，可是一切的一切都遵循着袁世凯的路线在推进；不久之后，连内阁的国务会议也移到总统府举行，袁世凯亲自出席主持，内阁议事，都落到了袁世凯的直接掌握之下。

残害国民党人

孙、袁、黄三巨头在北京的会谈，除上述情形之外，还决定了可以说是中华民国内政方针的“八大政纲”。其内容为：立国取统一制度。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开放门户、输入外赀，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虽然只是些拢统的项目，可是由于取得了孙先生和黄兴乃至黎元洪对这八大政纲的同意，袁世凯便因而站稳了绾毂政治实权的地位。

可是，一只手玩弄政治艺术的袁世凯，在另一只手中却藏着一把血淋淋的匕首，这是为了要让自己的独裁体制更加巩固，因而不惜对敌对者使出谋杀的手段。

黎元洪诬陷张振武

牺牲者之一，是前任鄂省军务司副长张振武。张振武是在武昌起义时与孙武、蒋翊武共有“三武”之称的革命家，在湖北省军界的影响力颇大；但与同以湖北军界为基础的副总统黎元洪意见不合，不听从黎的命令，黎元洪早就在窥伺着整倒他的机会。

一九一二年八月八日，驻在武昌的鄂军第一镇士兵们因抗议薪饷微薄而袭击军营；楚望台军械所守备兵也闻风响应，肇成兵变；黎元洪派兵将之镇压下去之后，却指首谋策动者为张振武，而报请袁世凯处分。

袁世凯下令处刑

袁世凯接到黎元洪的报告，未经任何调查，便立即下令步军统领及军政执法处总长将张振武及其同志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处刑；这个命令上有陆军总长段祺瑞副署，日期是在湖北兵变之后一星期的八月十五日。

实则，当湖北兵变之际，张振武却有其不在当地的证据。张、方二人就是在兵变的那一天～～八月八日，为蒙古边境的调查事宜，要向袁世凯有所接洽而到达了北京，并且有将校十三人及随从三十多人同行，兵变时不在武昌，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却于十五日晚间十时在北京被军队逮捕，带往军政执法处。

总长陆建章脸上浮现着微笑，让他们看一份电报，是黎元洪打给袁世凯报告他们煽动兵乱的罪状，电文中有：“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相济，并乞一并处决，以昭炯戒。”

不容抗辩援救不及

张、方两人极力辩白其为捏造的罪名，但陆建章只是冷冷地出示袁世凯的行刑命令，根本就不加审判。

就在当晚的午夜一时，立即执行枪决，使他们来不及有丝毫抗辩的行动。

听到张、方被捕消息的孙武、邓玉麟、时功玖等人，赶到军政执法处，是在深夜三时，已经于事无补。

陆建章出示了袁世凯的命令，并且表示：“这个命令，是由陆军总长段祺瑞正式下达，有陆军部负责官员监视行刑。我只不过是执行命令而已。”

事后，孙武等人前往总统府请见袁世凯，袁世凯对他们这样地说：

“这件事我很抱歉。但就经过情形看来，诸君想必已有了解，我是根据黎副总统的来电办理的；我救不了张振武的命。”

老奸巨猾的袁世凯，不提他自己发出死刑命令，却机巧地把责任推在黎元洪的头上。

为张振武呼冤无结果

对于这一件事，在参议院方面，由张伯烈、刘成禹等二十位议员于十九日提出质询案，要求据实宣布张振武的罪证；然而，袁世凯政府的复文却毫未提出证据，只是指称张振武的谋反罪行甚大。

二十日，社会人士也有了反应。吴敬恒、王芝祥、蔡元培等十七人发起组成“法律维持会”，聚集了约一千人举行大会，为张振武呼冤，及纠弹未经审判遽行杀人的暴行，同时呼吁：

“今欲保全民国，当先保全法律；如总统可随时以紧急命令杀人，则全国人生命皆有危险。”

其后，在参议院产生了“应该弹劾政府”及“应该弹劾陆军总长段祺瑞与国务总理陆征祥”两种不同的主张。由于步调紊乱，以致对于张案的追究闹得意见分裂，不了了之——结果，又是让袁世凯拊手称快！

于德坤被杀事件

继张案之后，再度发生了于德坤被惨杀事件，乃是更其恶毒的暴行，于德坤不仅冤枉丧命，而且只因为他是一个国民党党员，便被杀害。

于德坤是国民党总务部干事，奉党本部命令前往贵州担当组织黔省支部任务，于九月二十九日由北京出发，途次贵州省思州府玉屏县大鱼塘，被驻防该地的黔军逮捕。于德坤出示国民党委任状，证明身分。不料却发生了反效果，因为贵州军务司长刘显世，一向厌恶国民党，甚至非公开地指挥部属搜捕党人。逮捕了于德坤的部队，向刘显世报告“抓到间谍”而邀功，并请示如何处置。刘显世便下令“就地正法”，于是于德坤就这样地被惨杀分尸，枭首示众了三天。

总算难得的是，贵州都督唐继尧大为震惊，但却致电国民党本部，诡称于德坤在湖南境内遭强盗袭击杀害，将惨案的罪责，推诿给自己管辖范围以外的邻省，以图蒙蔽过去。

宋教人遭暗杀

继两件暗杀暗之后，袁世凯突然变了一副狰狞面目，正面下令弹压革命分子～～十一月十六日，通令各省都督、民政长，指出凡有倡言革命者，都是“国民公敌”，应即“按法严惩，以寒匪胆。”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中华民国于一九一三年二月举行了最初的国会议员选举。

议员选举国民党大胜

新国会制度，是在上年～～一九一二年八月制定，仿造美国二院制。众议院议员按人口比例分配，每八十万人产生一人；参议院议员则按地区分配。

尽管袁世凯如何弹压，但选举结果，国民党仍然获得大胜。众议院五百九十六议席中，国民党占二百六十九席；其次为共和党一百二十席，统一党十八席，民主党十六席……参议院二百七十四议席中，国民党又占了一百二十三席，远过于第二位——共和党的五十五席；再其次是民主党八席，统一党六席……在两院之中，国民党都获得了超过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合计势力的胜利局面。袁世凯对于这个结果，内心当然会感到不安，曾经向他的心腹策士杨度透露：

“我不怕国民党用暴力手段来夺取政权，只怕他们以合法手段赢得政权。”

宋教仁演说抨击独裁

引导国民党在选举竞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的主角，是代理理事长宋教仁。

宋教仁在北京、乃至南京、上海、湖北、湖南各地游说，激烈地抨击袁世凯独裁、无能。

当选举完毕之后，再由湖南经武汉、南京，到达上海，所过之处，仍然不断演说，不放松对于袁世凯的批判；同时并主张施行政党政治的“责任内阁制”、“国务总理应该由众议院选出”——以唤起舆论。

宋教仁这样的言论与行动，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导致国民党的胜利；于是，民间盛传宋教仁将要代表国民党出任国务总理。

在袁世凯来说，像宋教仁这样无论活力、辩才、声望——任何方面，都是最使他头痛的政敌。

袁世凯收买不成

袁世凯起先所考虑的是加以收买。他在上海、汉口、南京等交通枢纽地区都派了人，对于当选之后、前往北京的议员们，代为支付旅宿费用；抵达北京之后，则招待到八大胡同、戏院、餐馆——尽量以钞票铺路，拉拢议员。对于宋教仁，也使用了同样的手法，托人转致银行支票簿，可以任意签字支用，但宋教仁断然予以拒绝。

于是，袁世凯只剩下了最后一个对付他的手段。

就在这个时候，传出了奇怪的流言——“宋教仁要蒙受不利……”可是他本人听到这些话，却一笑置之，坦然表示：

“我光明正大，没有个人仇恨，只有堂堂正正的政治斗争；不能因为反对我，就用卑鄙残酷的手段来对付我。那些传说都是谣言，是想用谣言攻势来削弱我的责任感。”

然而，谣言竟成为事实。

惨案是在三月二十日晚间发生于沪宁铁路的上海车站。

这一天，宋教仁和当选众、参两院议员十多人在一起，为了要赴北京和袁世凯协商选举后的国是，由上海车站登车首途。

剪票之际一声枪响

下午十时四十分，在黄兴、廖仲恺等人伴送之下，到达剪票口，正当要接过被剪车票的一瞬之间，突然一声枪响。

“我中枪了！”宋教仁大叫，并用手按住自己的腹部，摇摇晃晃地走了两、三步，欹倒在长铁椅的靠背上；然后挣扎着又走了几步，栽倒向前面的地上。

接着又是两发枪声，枪弹分别掠过黄兴和廖仲恺的身边，车站里面大起骚动。

就在这个当口，有不少人发现一个穿黑色军服的矮汉子，排开人潮逃走；这个人在雨后的马路上一度失足滑倒，但立即爬起来，在黑暗中消逝于无影无踪。

黄兴等人急忙把宋教仁抱起，坐上汽车，送往就在附近的沪宁铁路医院。

枪弹擦过肾藏、击破肠壁，停留在腹部；经过手术立即取了出来，可是情况迅见恶化；到了二十一日下午二时，虽经再度开刀，将肠子缝合，但实际已经面临回天乏术的境地。

苦心遭误解死不瞑目

宋教仁被送进医院之初，神志还很清楚，他向守在病榻旁边的黄兴、于右任说：

“我为南北和解，前往北京，希望一致协力，抵御外侮，想不到……”又说：“我为南北和解的苦心，被人误解，真是死不瞑目。”

但是，第二次手术之后的不多一会，意识昏迷，终于在二十二日上午四时四十七分，长辞人世。

言犹未尽，心有遗憾的神情，非常惊人——眼睛怒睁，微微地泛起了泪珠。

伴守着他临终的黄兴和于右任，抱着遗体痛哭；陈其美捶胸顿足，连呼：“不甘心！真不甘心！”

撒手尘寰的宋教仁，方当活力最强的三十三岁壮年时代。

因为同志们要求留下历史纪念，所以替他拍摄了一张服装整齐的照片，一张显示被刺伤口的裸体照片。

宋案真相大白

可以说是国民党柱石的宋教仁之被暗杀，给予全国人心以极大的震撼。

国父闻讯自日反国

孙先生这个时候正在日本，他是因为受任筹划全国铁路全权而赴日本考察铁路。前面曾经提到过他和桂太郎会谈，就是这一次访日时期之事。

孙先生在长崎得到宋教仁被刺消息，立即致电北京国民党本部和上海国民党交通部，指示党员合力究明事件真相；同时他本人也立即踏上归途，于三月二十五日回到上海，和黄兴、陈其美、居正等同志协商对策。

在另一方面，袁世凯于事件发生的翌日～～三月二十一日晚间，由北京发电报到上海慰问宋教仁，电文大致如左：

“上海宋钝初先生鉴：阅路透电，惊闻执事为暴徒所伤，正深骇绝……众目昭彰之地，竟有凶人，敢行暗杀，法纪何存？惟祈天相吉人，调治平复……”

在这个电报之中，袁世凯明白表示已经命令江苏都督、民政长等地方长官悬赏缉凶，应该算是交待得非常清白。

然而，宋教仁是袁世凯当前最大的政敌，因而有很多人——尤其是国民党方面的人，都在怀疑袁世凯会不会是幕后的主使人？

面对着这个情况，袁世凯方面则散播宋教仁被刺是起于国民党内哄的流言，想要把自己的罪行转嫁给国民党。

可是，真相已经逐渐在展露之中。

王阿发提供线索

三月二十三日，上海有一个古董商人王阿发向租界捕房提供线索如下：

“十天前，我在文元坊应夔丞的家里兜卖古画，他拿了一张照片，叫我把这个人暗杀掉，给我一千元的报酬。我因为只懂得做买卖，从没有杀过人，不肯承担这件事。当时，我并不知道照片上的人是谁；但今天在报上看见宋先生的照片，正是应夔丞叫我暗杀的人。”

应夔丞自称为是“中国共进会会长”，但实际上是混在上海的一个无赖之徒。

逮捕应夔丞及武士英

上海捕房根据王阿发的密报，当晚在湖北路迎春房一个妓女户中捉到应夔丞；第二天，又在文元坊应夔丞家里逮捕到一个名叫武士英的人。

武士英，二十二岁，曾在云南军中担任过营长，是被裁遣而流浪到上海。他在捕房的究诘之下，爽爽快快地供认自己就是刺杀宋教仁的凶手，只是因为想得到一千元报酬而有此犯行，并不知道宋教仁是何许人。

起出凶器与密码本

捕房在搜查应夔丞住宅中，起出暗杀凶器五连发手枪一把，以及其他一些非常惊人的证据——就是国务总理赵秉君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交付给应夔丞进行暗杀计划的密码本和彼此往返的函电多件。

在此之前，陈其美请托上海电报局局长吴佩璜调查事件前后的电报，也已经从电报局获知应夔丞和北京要人频频有密电往返的事实。

结果，宋案真相为之大白：

出自袁世凯的命令

一月十四日，国务总理赵秉钧致应夔丞手书：

“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赵可也。”

三月十四日，应夔丞致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密电：

“梁山匪魁（以宋江影射宋教仁），四出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

针对这一个电报，洪述祖于三月十七日复电应夔丞：

“电悉，何日缴现兑票？”

宋教仁被刺的第二天～～三月二十一日，应夔丞致洪述祖密电：

“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

以上这些证据，说明了宋教仁之被刺是出于袁世凯的命令、赵秉钧直接指挥、洪述祖则担任对凶犯联络的任务——是重大的政治谋杀罪案。

票传洪述祖与赵秉钧

证据物品，达五十三件之多，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将之全部发表。宋案真相大白于全国，舆论为之沸腾。

程德全非常重视这个案件，建议组织特别法庭审讯；但袁世凯恐惧暴露真相，指示司法总长许世英不准设立特别法庭。

宋案侦讯，在上海地方检察厅进行，但能否公正究明真相，自一开始就值得怀疑——凶手武士英在审讯之前，暴毙狱中；还有，幕后指挥的洪述祖，在被揭发真相的不久之前，由北京逃往青岛，匿居德国租界，以致侦讯工作只得在关键人物不能到案的情形之下进行。

宋教仁遗族要求票传洪述祖、赵秉钧到案，检察厅予以接受，对二人发出传票。

北京做假案淆惑视听

为了对付这个情况，袁世凯方面竟然编造出一个荒唐无稽的暗杀未遂谎言——有一个受袁世凯秘密指使的女人伪称“奉黄兴之命，在北京进行暗杀”袁世凯而跑去自首，军政执法处将此案移送北京地方检察厅办理，该厅也对黄兴发出传票，造成了在上海和北京两地同时票传两个“大人物”（赵秉钧、黄兴）的事态，其目的在制造混乱，淆惑社会视听。

袁世凯大借款

袁世凯在编造暗杀未遂事件，污衊黄兴的同时，并向日、英两国秘密活动，想借重列强压力，帮他把风波平息下去。刺宋案幕后主使人国务总理赵秉钧曾经亲自到驻在北京的日、英两国公使馆拜托，却都因不愿涉及这样的事件——而被拒绝。

赵秉钧托日使帮忙

当时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曾于三月二十九日以第二四七号密电致外相牧野伸显及上海总领事，提到赵秉钧向日本公使馆员表示：

“关于应夔丞的问题，无耐与袁世凯及本人有些直接关联；尤其本人的部下洪述祖有发踪指挥的过程，难免不背上嫌疑；在上海会审的结果，万一株连到袁世凯及本人，而有不利于北方的判决，则将会形成严重问题，有成为袁世凯和本人致命伤的可能。为此，希望由伊集院公使和英国公使大力帮忙，设法在事先把事件平息下去。烦与公使密商，一切拜托。”

伊集院彦吉经与英国公使接头之后，答复赵秉钧“如将宋案勉强打消，则反而会更招来不利。”

不过审讯工作，则一如袁世凯的心意，在含含糊糊进行之中，洪述祖、赵秉钧都没有应传出庭。

如上所述的宋教仁被刺案，和在相同时期袁世凯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的善后借款二千五百万镑两个事件，造成在民间充满了反袁气氛。七月十二日，李烈钧在江西举兵讨袁——第二次革命于焉肇始。

刺宋人犯被杀灭口

当此混乱之际，应夔丞脱狱潜逃，宋案的审讯失去了对象。应夔丞脱狱后逃亡青岛，向袁世凯要求暗杀宋教仁的奖金，袁世凯却派遣刺客，将之杀死灭口。

还有国务总理赵秉钧躲过了审讯之后，出任直隶都督，但在害死宋教仁还不满一年的一九一四年二月暴毙于天津督署，也有人说是被袁世凯所毒毙。

至于很早就藏在青岛的洪述祖，在一九一七年，被为父觅仇的宋教仁之子宋振吕（当时十五岁）和曾任宋教仁秘书的刘白抓到，经过正式审判之后，于一九一九年四月被处绞刑。

现在，得提到一点和宋教仁案同为引发二次革命因素的“善后借款”问题。

借款作为私财运用

一言以蔽之，袁世凯的这笔借款，就是镇压革命党和确立其独裁权力的经济来源；他把借款当作私财，任意支配，得以达成了盗窃国柄的目的。

又由于这笔借款，将国家财政权出卖给列强，并且更招致了列强默认日、俄两国在“满蒙地区”特殊权利的结果。

在袁世凯来说，对外借款是他自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五日继孙先生之后当选临时大总统以来的心愿。借款的交涉对象，最初是选中了两年前组成的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

这个银行团和清廷之间，曾经于一九一一年四月签订了为应其“改革币制”和“振兴产业”需要之一千万英镑、以及同年五月又应其“铁路国有”需要之六百万英镑的两笔借款合同。就是由于铁路收归国有的问题，成为以四川省为中心的民间反清运动之导火线，而连锁反应，爆发了辛亥革命的火花。当革命军兴的同时，由于孙先生在欧洲活动，而使这些借款冻结，停止继续支应。

袁世凯以唐绍仪为负责交涉借款的代表，最初要求是给予和袁世凯有对立关系的南京政府紧急贷款七百万两，四国银行团立即同意，于二月二十八日在上海支付了二百万两。袁世凯的意图是要以这笔贷款用之于遣散革命军等需要，以期权力集中于北京政府。

关于这一点，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曾于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在向外相内田康哉发出的第一五○号电报中分析袁世凯的意图如下：

“袁世凯利用南方在目前的困境给予财政上的支援，使南方感到如果不倚靠袁世凯，则会一筹莫展。目前在当地（北京）可以察觉到和南方代表交涉，已处于有利地位。”

将经济命脉出卖

当时，袁世凯有一个腹案，是提供盐税收入为担保，希望总额达六千万英镑的“大借款”在七月间成立；可是最要紧的还是眼前急需的部分，故在一开始交涉之际，就以从将来的借款中扣还为条件，请预先垫付一百○一万五千两，以及应北京、南京两政府双方需要在四、五、六三个月中，每月各垫付六百四十万两。看透了袁世凯底牌的四国银行团，乃提出下述条件而表示同意袁世凯的要求：

“今后中国如有借款必要，四国银行团有优先供给权。中国向他处借款时，不得比向四国银行团借款的条件有利。中国‘善后大借款’，也应由四国银行团优先供给。”

这样的条件，等于是将中华民国经济命脉出卖给四国，而袁世凯却在当天就予以承认；不仅如此，并且紧接着在三月十二日再度请银行团垫借五百万两，其用途是以二百万两为武昌方面的军费，三百万两抵偿湖北省政府前此发行之债卷。

四国银行团同意借给其中的二百万两，但借款条件却更为加重——由“银行团监督借款用途，以及在大借款实现之前，不得和他国交涉签订任何借款。”

外国人抓住中国财政贫弱的艰困机会，提出如此苛刻无比的条件，袁世凯则再度予以承受。

这种垫款，可以说是“卖国定金”。

日俄介入借款案

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所追求的“优先垄断权”，很快地就见到实现。

本来，袁世凯已经在一九一二年的三月十四日和比利时财团秘密签订了百万英镑的借款合同。这笔借款，是以“京张铁路”（北京-张家口）的收入和财产以及中国政府的一般岁入为担保，年厘五厘，不需要由财团监督等条件。在中国的立场来说，是比四国银行团贷款的条件有利。

四国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即指袁世凯不遵守诺言而表示抗议。并且在四月十八日对中国外交部正式提出带有胁迫口吻的照会——“如果这样的话，则借款交涉无法继续进行。”

袁世凯屈于压力，乃于四月二十七日答复四国驻华公使，应允遵守前诺，并取消了和比利时财团所签订的借款合同。

在这样的威势压迫之下，袁世凯和四国银行团进行了借款交涉。

这时，已经被任命为国务总理的唐绍仪，为谋抗拒银行团的压力，打破其对华借款的垄断行为，故意于四月三十日突然提出总计达八千五百万两的钜额借款要求，其项目是为开支军费遣散军队在五星期内需要三千五百万两，由六月至十月的五个月之间，每月需要一千万两。

未料，银行团的态度却更为强硬。银行团代表汇丰银行希利耶于五月一日晚间提出了为中华民国所不可能承认的条件——就是每月的预算须经外国顾问稽核认可之后才可以支付；军队之解散，也要由外国武官会同在收回士兵缴交武器时发给支票，凭票往银行兑现。这样的条件简直把中国当做是禁治产者。

唐绍仪拒绝了这个条件，并立即举行内阁会议，主张中止向四国银行团借款；但袁世凯则使唐绍仪不再直接折冲其事，而起用对人态度比较和气的财政总长熊希龄，继续进行。

四国银行团拉拢日俄

对于在借款方面已经巩固了垄断地位的四国银行团来说，最耽心的是在中国利害关系极大的日、俄两国的动向。四国唯恐尚未参加银行团的这两个国家自由行动，妨碍四国贷款，故而对他们展开拉拢工作。

这个工作，对于以扩大在中国的利权为目标的日俄两国而言，可以说是求之不得，正好顺水推舟；不过两国在东北和蒙古有其特殊权利，故以不影响上项特权为参加银行团的条件。

日本自一开始就非常注意关于对中国的借款问题。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于一九一二年二月八日以第九十五号呈文向外相内田康哉建议：“中国一定要大规模举借外债。在那个时候，日本有必要和四国银行团一同居于债权者、监督者的地位。”

不过，日本方面所认为成问题的，是在局外的俄国之动向。内田康哉于三月四日发电驻俄大使本野一郎指示：“与其考虑对四国银行团的对抗策略，则莫如以趋向于使列强承认日、俄两国在满蒙的特殊权利，两国一同参加借款团体为宜——希与俄方磋商。”结果，俄国同意日本的提议，决定参加银行团。

三月十一日，四国政府正式向日俄两国政府提出以和四国相等地位参加对华借款的邀请，两国乃予接受。

不过，日、俄两国判断：对于中国的借款，如果没有他们参加，则无法谈得拢，故而在参加时希望获得有利条件，于是，自五月十四日起在伦敦举行的六国会议，只进行了两天便为之决裂。原因是日、俄两国特别耽心因加入银行团而受到拘束，失掉在“满蒙地区”的行动自由，故而主张中华民国在借款时，得保留有自由选择代表机关的余地，不必定由六国银行团经办。

除此之外，日本更特别要求须明白列入大借款之款项不得使用于东三省及蒙古（内蒙）境内……很露骨地坚持维护其既得权利。

变成了六国银行团

然而，亟待使大借款成立的四国，一如日、俄两国预料非得拉拢他们加入不可，乃不得不对他们让步。于是，经由法国代表的调停，于六月初在巴黎重行会商，到了十八日，才签订合作契约。所谓四国方面让步，就是由日、俄两国代表声明“银行团借款不得侵犯两国在满蒙地区的特殊权利”；四国代表则采取“关涉到政治问题，不予置评”的态度，而实际上予以承认。

在经过了这一段折冲之后，于是四国银行团便增加日、俄两国而变成了“六国银行团”。

在日、俄两国之间，也互相为了牵制对方抢先，展开了谋略活动——日本在征得俄国同意加入银行团的方针之后，却马上向英国表示单独参加，以致引起俄国的反感，俄国外相乃于三月十八日对日本驻俄公使本野一郎表示抗议；日本方面只得于三月二十二日向俄国驻日代办表示：今后和俄国协商，采取一致行动。

六月二十二日，银行团向外交总长陆征祥通告六国银行团成立，接着便于二十四日向财政总长熊希龄提出五项大借款条件。借款条件苛刻

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六国银行团所提出的五项条件如左：

（一）大借款总额六万万两（约七千四百万英镑）。

（二）借款在五年内陆续支付。

（三）银行代表为英国汇丰、德国德华、法国汇理、俄国道胜、日本横滨正金、美国花旗六家银行。

（四）借款用途以六银行之权限行之。

（五）提供担保的盐税，当以现在之关税制度整理盐政（由外国人管理）。

银团一再施以压力

财政总长熊希龄对这个等于是百分之百交给列强管理的条件，立即予以拒绝。继之，更于七月一日要求放宽条件并减低借款额；可是不仅银行团不予考虑，而且六国公使更于七月九日与国务总理陆征祥、财政总长熊希龄见面，转达其本国政府意旨——除非照银行团提出的条件，借款不可能实现，以致交涉一时停顿。

于是，袁世凯乃考虑到另辟蹊径——秘密命令驻英公使刘玉麟和伦敦克里斯浦财团交涉，于八月三十日签订了一千万英镑的借款合约。其条件和对六国银行团相同，提供盐税收入为担保，年利五厘，四十年分期偿还。

六国银行团对此提出强硬抗议，尤其指出提供克利斯浦财团作为担保的盐税收入，在银行团方面有优先权。

结果，袁世凯屈服在银行团的压力之下，于十一月间和克利斯浦财团取消合约，向银行团道歉，再度进行借款交涉。

在再度交涉中，银行团将借款额大幅减低为二千五百万镑，用途为应新中国开国的善后措施需要（因此而被称为善后借款），以盐税及关税盈余为担保，借款期限四十七年，自第十一年起开始偿还，年息五厘；唯成问题的是银行团以“保障担保条件”为理由，要求由他们派外国人参加盐税稽核及会计审查——这些条件，虽和当初提出的要求已经比较缓和，可是在财务方面干涉内政的实质，并没有改变，

美国立场单纯决退出

六国银行团对于上述条件，丝毫不肯让步；为银行团后盾的列强政府，极力坚持达成其国家野心，对于侵害中国主权等问题也毫不介意。然而，还有唯一例外的国家——就是美国。美国政府自始就认为借款是纯粹为了援助中国复兴，而反对藉以为政治目的的工具；现在眼看着六国银行团所提出的苛刻条件不会让步，乃于三月四日声明“像这样的借款，侵害了中国行政的独立”而让美国银行退出。

由于美国银行退出，给予其他五国银行的冲击颇大；而且当时有欧洲火药库之称的巴尔干半岛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四年）前夕的一触即发状态之中。因此美国以外的列强国家，都有希望尽快办了对中国贷款手续的必要；就这一点来说，好像对于袁世凯产生了有利的条件。

可是在另一方面，宋教仁被刺也是发生在这个时候（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

由于这一事件，中国国内的反袁声浪突然高涨，袁世凯想凭藉武力将之镇压下去，故而迫切需要“军费”。

于是，袁世凯乃无条件地接受了银行团的要求，决定使“大借款”成立。

国父对各国提出警告

这是出于袁世凯的独断。孙先生在得到“近期将会签约”的消息时，乃往访有关各国领事馆，提出警告：“如果强行签约，中国民间将会发生对有关银行的杯葛运动。”此外参议院议长张继、副议长王正廷等人也向袁世凯及银行团提出抗议。

四月廿六日晚间，终于强行签约。签约的会场，是在为抗议而来的议员和民众包围之下的汇丰银行北京分行。签约手续颇繁，相当耽误时间，一直进行到深夜的二时三十分。国务总理赵秉钧、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征祥等代表于签约之后，恐惧抗议的群众，乃在黑夜混入人丛从后门走出。

关于签约手续延到深夜的原因，据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于四月二十七日第三五三号电文向外相牧野伸显报告：

“应于二十六日下午十时签约的‘维新借款’（善后借款），延至二十七日上午三时三十分（中国资料为上午二时三十分）签订，并非发生任何障碍，而是由于某一文件印刷匆忙，须要改正之处甚多，因而一一盖印，延误时间。不过在进行交涉期间，曾有国民党议员等各方面人士与银行团会谈，表示‘如果不经议会正式审议，即行签约，必然会引起舆论批评，希望予以延期。’这一件事，在南方国民党方面，必将企图妨碍，其结果，难免会发生一些混乱。”

偿还条件骇人听闻

袁世凯所签订的借款，其偿还条件实在是骇人听闻。先就借款额一点来说，利率虽然是年息五厘，但根据契约，中国实际借到的只有借款额百分之八十四的二千一百万镑，而且从这里面还要扣除在借款交涉中所垫借的六百万镑，暨各省向五国银行团所借的二百八十万镑，以及支付各国在革命时期所受损失的赔偿金二百万镑，结果借到手的只有一千四百二十万镑。

对于这笔借款，在将来偿还时，如加上借款期限四十七年的利息，则达到六千七百八十五万镑的钜额，对于刚刚开国的中华民国财政，实在是过于沉重的负担。

再说第二点，是允许外国人干预到中国国内盐业。一个国家，在行政和财政上让外国人插手进来，实在不是独立国家所应有的状态。

群情激愤讨袁

中国国民对于金额高达二千五百万英镑，足以左右国家命脉的大借款，未经国会同意便秘密签约的情形，相当愤怒。

国会议决贷款案无效

签约的第三天～～四月二十九日，参议院在政府首长缺席的情况之下开会，议员提案“善后借款合同，未经参议院审议，应属无效。”表决结果，赞成一百○二票（国民党），反对六十九票（三党联合），获得通过；五月一日，在众议院亦经议决“无效”——袁世凯所签署的约定，在民意代表机关终于未能获得通过。

继国会议决“无效”之后，设在上海的“中华民国省议会联合会”，由会长王建中、副会长容伯挺、书记长魏勋联衔向日本天皇发出劝告中止借款的书信。

据当时担任宫内次官的河村金五郎于六月十三日与外务省联络，这一封致天皇的书信内容如次：

“大日本国大皇帝陛下：贵国慨念敝国建设需财，惠然训示贵国银行代表，由五国银行团以二千五百万镑之钜款见贷……无奈敝国政府此次签约借款，实确未遵据国法，履行法律上重要之手续，冒昧从事，引起参、众两院之否认，及全国各省议会暨全体国人一致反对……贵国为法治之邦，对此不法律、不忠实之国际行为，当然有拒绝之必要。伏恳大皇帝迅赐训令贵国银行团代表，将此条约退还敝国政府，交由国会正式议决，始行交款。否则认为无效，暂勿履行。实纫公谊，不胜盼祷之至。”

国民党的宣言

在参、众两院拥有第一党势力的国民党，也立即发表了如左的宣言，坚决反对袁世凯的不法行为：

“不交国会议决，擅行签字，实为违背约法。政府此等擅断行为，若委屈牵就，无论国会之事权扫地，约法亦被蹂躏。”

被袁世凯出卖了的中华民国，的确是面临了严重的危机。

因宋教仁被刺而由日本赶回国内的孙先生，当善后借款签约的同时，立即主张举兵打倒袁世凯，但黄兴等人则建议慎重，黄兴的意见是中华民国既已成立，便应该避免军事决战，而冷静地听候法律解决。实际说来，问题在于革命阵营向袁世凯兴师问罪，决一胜负的力量，尚感不足。

对于另一方面的当事者～～五国银行团，孙先生也锲而不舍地表示反对借款；并且通过各种途径向各国展开促请中止的活动。

孙先生等人所耽心的，是袁世凯因大借款获得财源，恢复军事专制，巩固个人权力，并为镇压革命党而出之以武力行动。事实上，据黄兴于五月一日发给袁世凯的电报中便已经指出在宋教仁被刺事件的幕后，就有秘密约定——俟大借款成立后，给予凶手巨额报酬。是则，这笔大借款，不仅出卖了中华民国，而且更利用之于摧残国内反对势力，甚为明显。

孙先生于五月二日，向英国友人康德黎发出“告外国政府及人民书”，请代公开于国际，希望藉外国压力，截断袁世凯财源。他在这封书信中说明了袁世凯要以大借款为军费，发动战争。

设在巴黎的五国银行团本部，自始就担心会发生反对运动，故而在四月二十七日签约的当天，就曾指示在北京的代表暂缓支付；这是因为唯恐以在国民党势力强大的南中国为中心发动杯葛银行运动，会给银行带来不利后果，所以汇丰等银行对于孙先生的要求答以“假定在一个月以内，各地有以声讨袁世凯为目的的独立事态发生，当即停止借款。”

国父召集同志会商

银行团这种态度，对于反对借款运动带给了希望。孙先生以此为论据，再度在上海召集各地同志，会商断然采取军事行动；然而，黄兴等还是对诉诸武力有所顾虑。迁延结果，一个月的期限已过，借款见诸实行，大量军费，落到了袁世凯的手中。

在当时，反袁声浪最激昂的，是安徽省。安徽都督柏文蔚早在签约的第二天～～四月二十八日，便通电指斥“政府借款，不由议院议决，擅自签约，无论君主共和，凡世界立宪国家，均无此例。”——这是在签约后的最初一通抗议电报。

其后，柏文蔚在上海陈其美寓处秘密会见孙先生，报告安徽情势，并建议在安徽举兵发难。

孙先生对于柏文蔚讨袁的决心，大为称许；但不同意由安徽率先起事，因为安徽在革命党根据地——南京的西面，北隔江苏、山东通往北京，和袁世凯的势力范围接近，在这样的地理位置举兵，会让袁军居于重兵压境的优势，而于己方不利。孙先生有鉴于此，故而避免在和袁军正面对峙的安徽发动，希望从袁军补给困难、并且革命势力较强的南方各省首义；一俟袁军出动之后，再在安徽乘虚举兵，拊其侧背，较为妥当——于是，说服了柏文蔚按兵待机，而促请广东都督胡汉民、湖南都督谭延闿从速发难；可是，由于准备不够，一再迁延，终于未能迅赴机宜。

二次革命肇始

孙先生考虑到在对袁世凯军事作战的同时，为促始列强取消大借款之实施，希望用外交手段说服日本，藉以削弱国际间对袁世凯的支持，并增加对革命党的援助。在日本有众多友人的孙先生，因而决定亲自赴日访问，谋求协力，但由于同志们的阻止，未能实现；反而让袁世凯抢先一着，派其亲信孙宝琦（其后曾任外交总长）东渡，游说日本政府不支持革命党。

日本政府居心不善

当时，日本政府的态度，是要排除革命党的反对，强行做成贷款。

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在签约的第三天～～四月二十九日，曾向日本横滨正金银行驻北京代表的该行董事小田切万寿之助说明日本政府的态度如左：

“本来，日本对于支那问题，有必要下定决心在某一适当时机以实力解决之。加入借款的理由，也就在此。现在如果耽心受到杯葛，便率先示弱，颇非相宜。纵使将来有危险征兆，但也不要自动倡议中止。”

此一观点，说明了供给这笔借款的目的--并非给予中华民国以援助，而是倚仗武力谋求其经济发展。

袁世凯相信这笔大借款的签订，是列强在实际上对于中国政府的承认，因而自信心大增，意图凭藉借到手的金钱发挥作用，一举而将国内的反对势力摧毁。

袁世凯作高压部署

他在国内政治上的布局，就是收买国会，对于反对借款的议员们，大把塞给钞票，堵住他们的嘴巴。四月二十四日，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组成进步党，以黎元洪为理事长，而成为袁世凯的“御用政党”。在从心所欲地操纵了进步党之后，他的高压姿态，因而越发露骨。

像这样政治高压的同时，在军事方面，袁世凯也在一步一步地展开部署。借到的金钱，流用于军费——收购武器、弹药、食粮；并命统驭其北洋军的部属冯国璋、段芝贵等人进入备战态势，李纯所率领的第六师一个旅推进到湖北、江西省境的长江流域；同时派海军加强长江巡逻；继之，更着李纯部队集结于九江附近，摆开了兵戎相见、一决胜负的态势。

当部署既定之后，袁世凯悍然发动了镇压革命党的战争。

革命党三都督被免职

首先，于五月八日通令“严捕图谋内乱党徒”，取缔革命运动；十五日，更下令取消黄兴陆军上将官阶；接着，于六月九日、十四日、三十日，将革命党三都督——江西李烈钧、广东胡汉民、安徽柏文蔚相继免职。

此时，李烈钧已经接受了孙先生的指示作举兵讨袁准备，国民党曾派遣张继、邵元冲等干部前往李处，并且孙先生本人也有亲赴江西的计划。袁世凯得到风声，乃先由北京派出心腹部属多人，打算收买李烈钧，向李游说，如果去北京和袁世凯谈谈，可得二百万元报酬，并且有官可升；但李烈钧毅然拒绝，遂被免职。

胡汉民被发表调任西藏宣抚使，柏文蔚为陕甘筹边使，都是距离中央极远的边地，等于是谪戍岩疆。

柏文蔚对于这个左迁命令表示了抵抗，他以强硬的态度去电袁世凯——“出任筹边使，需要五千万元经费，如无法筹应，则不能奉命。”袁世凯还想加以笼络，托人转达请到北京面谈之意，但柏文蔚断然拒绝。

由于安徽省的反袁气氛最为浓厚，故而对于柏文蔚之被免职，大受激荡。以在皖北地区的张汇滔发表讨袁通电为发端，省会安庆（怀宁）的青年们也拿起炸弹、手枪，准备作战。

一名师长被袁收买

可是，袁世凯则以十万银两收买了手握兵权的师长胡万泰，把军队拉拢过去，由胡部保护袁所任命的后任都督孙多森进入省城；革命同志计划在孙入城时将之暗杀，但因事机不密，归于失败。

此时，袁世凯踌躇满志、若无其事地说出这么一些话：

“现在，不是什么南北调和的问题，而是地方不服从中央的问题，问题在于如何使中央达成统一。”

他又对着心腹梁士诒等人，以满怀自信的声调表示：

“可以把我的决心告诉国民党人，孙黄一派无非意在捣乱，我决不能容许；我自信政治经验、军事阅历、外交信用不会后人。他们若有力量另组政府，我也有力量把他们讨平。”

李烈钧在江西举兵

当如此扰攘之际，李烈钧终于七月十二日在江西湖口举兵讨袁。

第二次革命，于焉肇始。

李烈钧在被免职之后，从江西省议会以及全省的激愤反应中得到了力量。他召集全省高级官员策画举兵讨袁，接着再去上海和孙先生协商之后，回到湖口，组设讨袁军总司令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通过由省议员杨赓笙所起草的讨袁檄文，通电发表：

“民国肇造以来，凡吾国民，莫不欲达真正共和目的。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灭绝人道，而暗杀元勋；弁髦约法，而擅借钜款；金钱有灵，即舆论公道可收买；禄位无度，任腹心爪牙之把持。近复以兵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实属有负国民之委托，我国民宜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

要塞大炮，发出庆贺讨袁的隆隆巨响……

创办军声杂志

‘我们国父早已看出了袁世凯必推翻约法和他帝制自为的野心，所以自宋教仁被刺案发生之时，立即主张问罪讨伐。可惜当时党中干部同志理解国父主张者又是很少，而且精神沮丧，并无决心；只有坐待袁世凯借款备战，策画完成……’（注一）

‘我现在所要讲的是民国成立以后……我们革命运动失败的经过……

‘民国成立以后，本党革命前后又经过十次的失败。第一次失败，即在民国二年（第二次革命）。先是辛亥年本党领导武昌起义，不到三个月就推倒满清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其时同盟会一般同志，就以为革命已经成功。于是，做官的做官，发财的发财，只图个人的安富尊荣，而不顾本党革命的成败，不肯执行党的决议，不遵守党的纪律，更不知道拥护领袖，服从命令，完全忘记了革命的主义，形成自私自利的各种小集团，几乎使党的组织为之毁灭。于是到了民国二年的夏季，就为袁世凯所彻底消灭。’（注二）

在叙述二次革命失败情形之前，首先得提到一点蒋总统在一九一二年访问日本前后的状况。

曾经活跃于平生初次上阵——光复杭州战役中的蒋总统，当袁世凯刚就任临时大总统的一九一二年春季，前往日本，为准备留学德国而研习德文；一方面创办“军声杂志”，宣扬中国国防的重要性，藉使身为青年军人的自己充实知识，而为将来的飞跃打下基础。

制裁陶成章

在首途前往日本不久之前的一九一二年元月十四日，参与了和同志们策商在上海法租界制裁光复军司令陶成章的计划。陶成章虽然列名同盟会，但却有公然妨碍建立革命组织，以及污衊孙先生等行动；及至武昌首义，复推戴章炳麟，要以光复会取代革命正统，以及策画谋杀陈其美，从内部破坏革命组织；将他这样的人制裁，是为了铲除祸根，导革命全局于成功。

这个事件，据元月十五日上海民立报第六版报导其情况如下：

“昨晚二时许，有二人到广慈医院谓有要事拜访就寝中制陶成章；陶面向内卧，被唤醒转头向外时，二人用手枪击中其太阳穴……”

为了侦查这个事件，浙江都督府悬赏三千元，上海都督悬赏一千元，但没有查出结果。

关于此一制裁事件，后来在毛思诚所著“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中，有如下的记述：

“熟权公私利害，决先除陶，以定革命全局，事后自承其罪。盖其心出于至诚，绝非对人有所好恶于其间，此为辛亥革命成败最大关键；亦即公（蒋总统）革命重要历史之一也。”

总统赴日拟习德语

蒋总统于是年前往日本，将沪军第五团团长职务，交由张群（现任总统府资政）继任。日本在当时，和德国的学术交流关系颇深，学习德语的风气很盛，蒋总统打算暂且先在日本习得留学德国的基础知识。

一方面，则创刊研究军事学术的“军声杂志”。

‘国际和平，世界大同，固我人所馨香祷祝；虽然，此特理想之谈耳！巴拿马运河开，而东西海防愈加其设备；西伯利亚铁路通，而欧亚陆防愈严其守御。各国抱殖民政策，以兵力为后盾，二十世纪以后，太平洋沿岸将成为各国驰骋角逐之场，祸在眉睫，我人必讲求保国之道。

‘夫太平洋沿岸，其为万国竞争之焦点者，独我中华土地耳！西人有言曰：“两平等之国，论公理，不论权力；两不平等之国，论权力，不论公理。”是则俾斯麦所倡之铁血主义，正我国人所当奉为良师者也。

‘我国此次之革命，名为对内，实则对外；对外问题最重要者，为军事。吾国人今日对军事所最宜注意者，一曰鼓吹尚武精神。二曰研究兵科学术。三曰详议征兵办法。四曰讨论国防计划。五曰补助军事教育。六曰调查各国军情。以上诸纲，均为军事之关键；而列强所恃以雄视世界者，其大端不外乎此。本社同仁，编辑“军声”，将欲揭破各国之阴谋，而晓音喑口警告国人以未雨绸缪之计者，意在斯乎！’

发刊词为总统亲撰

以上论文，为蒋总统在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一日发行之“军声杂志”创刊号上，亲笔所撰发刊词。

对于在列强窥伺之下呱呱堕地的中华民国来说，首先必须具备的是“自立自强的力量”。

注一：蒋总统-“中国之命运”（一九四三三）

注二：蒋总统-“本党革命的经过与成败的因果关系”（一九四九六）

上海举兵讨袁

蒋总统和同志们共同创刊的“军声杂志”（月刊），其发行机构取名“军声社”，社址设于日本东京府下代代木山谷一四三番地，并在中国国内的上海棋盘街、北京琉璃厂、汉口花楼底等地设有发行机构，以及委托各省都督府军务司出售。

在上海民立报所刊载的出版广告中说明：“本杂志之体裁，仿效日本偕行社记事之例，而略加变通……当此破坏初毕，建设伊始之际，凡论说、学术、调查、特别记事、特别纪录为最要，故本杂志权重以上五部。”

评论中国和世界局势

在“军声杂志”上，蒋总统每周适当机会便撰述军事评论文字发表。其题材，多属有关当时中国和世界局势问题，特别是对于俄、英两国在外蒙及西藏方面不动声色进行着掠夺中国领土的阴谋活动，敲响警钟。

“征蒙作战刍议”——这篇文章，盱衡俄国煽动外蒙独立情势，引据历史详细论列日俄、中俄战争状态；同时希望对于平定外蒙的筹策能有所裨补。在奋笔为文的当时，脑海里憧憬着跃马横戈、挥师蒙古高原的壮图。

“巴尔干战局影响于中国与列强之外交”--以在当时有“世界火药库”之称、情势日益紧张的巴尔干半岛为主题，论及英、德、法、义、奥等列强与巴尔干之关系，并申论我国所应采取的外交手段。

此后，有设想以军管区制度为军政统一的基础，引据美国军管区制度为例证，而作周详衡论的“军政统一问题”。又有因北京兵变肇端乃至各地陆续兵变现象，而撰述的“革命战后军政之经营”等等文章。

一九一二年冬季，在日本的生活告一段落，回归故乡奉化县。翌年～～一九一三年六月，终于决心启程赴德，为此，特地前往上海晋谒孙先生告别。

国父劝说放弃留德

此时，袁世凯已将宋教仁暗杀，并违法签订了善后借款合同。孙先生盱衡时局，劝说蒋总统再作考虑——打消赴德留学的原意。

孙先生当宋教仁被刺之后，立即主张举兵讨袁，他坚信终难避免于诉之武力以决一胜负，所以希望为准备万一实行军事动员而留在上海待命；于是蒋总统乃遵循孙先生的劝告停止出国，果然就在七月间发生了“二次革命”。

一九一三年七月，在上海。

蒋总统自辛亥革命光复杭州之役时平生初度上阵以来，不到两年，再度荷枪实弹，站上前线，面对的敌人是袁世凯。

暗杀革命元勋宋教仁、漠视民意非法借款二千五百万镑、更继之以镇压革命党……的袁世凯一再倒行逆施，使革命同志到了忍无可忍的境地。

继七月十二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发难讨伐袁世凯之后，十五日，黄兴在南京举兵，第二次革命拉开了序幕。

陈其美宣布上海独立

在上海方面，陈其美也继黄兴举兵的翌日～～十六日，奋起响应。自辛亥革命之后，被推举为沪军都督的陈其美，颇负众望，乃被推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于七月十八日发表独立宣言，通电全国，呼吁打倒袁世凯。电文如左：

“袁世凯违法殃民，逞兵南下，种种罪恶，无非破坏共和。现在，各省继续而起者，如响斯应，江苏已于前日由程都督宣告独立，委黄兴君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并咨委其美为驻沪讨袁军总司令。上海为东南重镇，关系匪轻，业于十八日完全宣布独立。驻沪各军队皆深明大义，地方秩序亦照常安谧，足慰仅怀。深望各省爱国同胞，克日兴师，诛除国贼，俾得大局早定，真缔共和，无任盼祷！”

据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于七月十八日第一四五号电报向外相牧野伸显报告：

“当地军队，由陈其美为主，指挥一切；孙逸仙尚未出面。军舰态度中立，观望形势。”

陈其美于发出讨袁通电的同时，在南市设立了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部。

这是为了恢复中华民国建国理念的战争，在这次战役中，自始就和张群同参陈其美戎幕，赞襄策画。

在举兵之先，陈其美征求同志们对于作战计画的意见。

总统建议攻夺制造局

张群提议先夺取海军，控制上海附近的水路，然后向陆上进攻。但是，蒋总统的意见与张群不同。蒋总统建议首先应该攻击上海制造局（江南制造局），因为这个制造局是中国有数的兵工厂，能否将该局拿过来，是上海战争成败关键之所系。陈其美赞成这个建议，于是上海讨袁军乃以进攻上海制造局为第一目标。

作战部署，分头并进，陈果夫奉命以梅家弄某医院为根据地，组织“奋勇军”，集合了约二百人，以手枪等兵器武装起来。

当陈其美宣布独立的前一天～～十七日，在上海西南方的松江，钮永建部队也已经宣言独立讨袁，与上海的行动应合。

除上述各部队之外，更积极策动担任上海制造局守备任务的六十一团和三十七团以及驻扎上海的各部队，希望他们都站在讨袁军的同一阵线，大举攻夺上海制造局——这是陈其美的构想。

进攻制造局之役

和辛亥革命之能否成功系于楚望台军械库的攻防战一样，进攻上海制造局的胜败，也是决定二次革命的最大关键。如果能将军械库夺过来，掌握库存武器，则应该可以乘势部署好讨袁军事态势。

袁世凯已早作准备

在袁世凯那一方面，当然也是以制造局为上海南面防卫战略的一个根据地，而相当重视；所以在二次革命发难之前，就已经有所策画。

不过，在反袁声浪日益高涨的上海，袁世凯要调派心腹部下，控制防务，却也颇费周折。

因此，乃着眼于制造局背后的黄浦江，意图对海军加以利用，故而命海军中将郑汝成以庞大的报酬收买了海军总司令李鼎新。

然后，又密令徐企文于五月二十八日佯行攻击上海制造局，郑汝成便以制造局被攻为藉口，率领海军部队进入上海，担负起制造局的守备任务——袁世凯曾经在一九一二年二月自导自演制造出“北京兵变”，这手法在上海又派上了用场。

当陈其美刚一宣布讨袁，郑汝成便将有“造反”嫌疑的不稳部队调开，不使担任制造局的守备，并收缴其武器；而以警卫队为中心的精锐部队一千二百人固守制造局。

还有，在黄浦江面，更配置了“海筹”军舰，防卫态势，做到了万全地步。

讨袁军装备居于劣势

相对地，讨袁军则由于匆促举兵，武器装备，都居于劣势。

讨袁军于七月十八日上午十时和钮永建的部队汇合南下，到十九日清晨控制了南市龙华一带。

陈其美一再要求郑汝成退出制造局，但被郑汝成所拒。

二十二日夜间，陈其美指挥奋勇军发动最初攻击，遭遇到顽强抵抗。

次日～～二十三日，讨袁军断然下令总攻。

六十一团、三十七团以及驻上海各部队还包括炮兵，都加入了战争行列，数千人将制造局包围起来，展开勇猛攻势；正当此时，“海筹”等军舰对讨袁军激烈炮轰，在讨袁军说来，最大的失算，是未能估计到海军的动向。

得到海军炮轰支援的敌军步兵，也展开了反击。讨袁军猝不及防，损失了大炮十八门，宝贵的子弹一百七十多箱，蒙受损害颇重，因而败退。

讨袁军总司令部本来设在南市，距制造局不远，但跋扈的郑汝成通知南市民间战斗组织--“商团”，如果不促使陈其美撤退，则发动攻击；陈其美为免南市毁于战火，不得已，而将总司令部移往闸北，重行部署。

讨袁军仍然日夜不停地进攻。但制造局防卫坚强，攻势一再受挫，但凭士气想要打开战局，颇为困难，而有必要再得到装备齐全的正规军助阵。

因此，乃谋进行策动陆军九十三团参加战斗。

九十三团，就是蒋总统所亲自组训的沪军第五团之后身。

集合士兵晓以大义

九十三团在二次革命发动之前，担任制造局的守备任务，但被郑汝成调离制造局，移驻龙华。该部队对于制造局内部情况，了如指掌，最适合担任攻击制造局任务。蒋总统乃于二十八日晚间，秘密迳往九十三团团部，找团长陈其蔚面谈。

可是，陈其蔚已经受了袁世凯的运动，始终没有见到。

因此，蒋总统乃集合了九十三团各部，晓以讨袁大义，结果有相当一营士兵响应号召，参加了讨袁军；乃立即率领这一支队伍自南面进攻制造局，北面则有钮永建部夹攻。蒋总统和钮永建两人都站在最前线指挥作战，一时曾经发生激烈的肉搏战，营长张绍良阵亡，讨袁军官兵伤亡枕藉。

在这个关头，“海筹”军舰的强力探照灯助长了威势，开始发炮援护制造局的守备军作战。讨袁军的炮火虽将探照灯击毁，打瞎了海军的眼睛，但各舰炮火不仅不停，反而更激烈地盲目轰击；不过，讨袁军也并不畏怯，乃形成拉锯战。

战事在南市龙华各地继续进行到第二天～～二十九日。当晚，讨袁军重整行列，由龙华、湖南会馆、陆家滨三方面向制造局进攻，但袁军也相当顽强，直到天色大亮，讨袁军弹药不继，只得撤回闸北。

此时，郑汝成重施故技，胁迫闸北商民，如陈其美等讨袁军不撤走，则发动攻击。

于是，商民、红十字会甚至租界上的外国人，都倒向了袁世凯那一边。接受郑汝成胁迫通知的商民们，一面要求陈其美撤走，一面要求外国人出面干涉。

结果，集结在闸北湖州会馆的讨袁军被英军接触了武装。陈其美只有再退向上海北方二十公里的吴淞、宝山一带，上海完全归于袁军掌握。这是一场叫人不能甘心的失败。

此后，讨袁军以吴淞要塞及宝山地区为根据地，继续作战，但陆续被得到支援的袁军所击破，到了八月十三日，以失败结束。

总统第四度前往日本

这此失败之后，蒋总统在孙先生和陈其美的领导之下，为从事革命阵营的重建，第四度前往日本；其后，便往返于日本和上海之间，继续活动。

据日本资料，蒋总统于一九一三年九月一日，到达日本。

日本外务次官兼外务省政务局长松井庆四郎于九月二十三日将“有关亡命来日之中国人调查报告”送达警视总监安乐兼道等人。该项资料中，有黄兴、孙文、陈其美等人的动态；并提到“陆军少将蒋介石（陈其美之部下）自上海来日，于九月一日到达长崎。”

国父高瞻远瞩

和上海讨袁军败北的差不多时候，各地讨袁军也陆续被装备、兵员都居于压倒优势的袁军所打败。

讨袁军完全败北

在陈其美发出通电的七月十八日，同时宣布讨袁的广东，很快地于八月五日败退；翌日～～六日，安徽省会安庆的讨袁军也相继战败；至于最初发难的江西，在序战中虽然击败了袁军，可是遭遇到汤芗铭率领的海军攻击，而于八月十八日失败。

南京方面，也因袁世凯封锁沪宁铁路等行动被切断粮道，成为“陆地孤岛”，无法防守，黄兴于七月廿九日自城内脱出，一时避上停泊在长江的日本军舰“嵯峨”号，到达上海，换乘客轮“静冈丸”，亡命日本。

其后，由何海鸣等人于八月八日在南京第二次宣布独立，继续抵抗；但在冯国璋、张勋等人的大军猛攻之下，于九月一日陷落。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张勋部队连续抢掠，就是在这个时候，并且发生了给予日本在外交上可乘之机的杀害日本人事件（南京事件）。

不久之后，在九月十二日，以由熊克武所指挥的重庆讨袁军失败为殿后——“二次革命”，便在完全败北的情况下结束。

于是袁世凯乃对兴军讨袁的各省，派出他的心腹干部倪嗣冲（安徽）、李纯（江西）、冯国璋（江苏，一度为张勋）、汤芗铭（湖南）、段祺瑞（湖北）等人为各省都督，使原来为革命党有力根据地的长江流域完全归于北洋军阀掌握。

长江流域各省，直到后来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光复为止，一直落于北洋军阀的蹂躏之下。

锐气销沉之所致

袁世凯背叛中华民国建国理念，并且企图以武力扑灭革命党的情势，党人们虽然都很明了，可是在二次革命中，却力有未逮，完全失败。

这是由于革命阵营的讨袁军缺乏实际战争的指挥系统，不能一致行动，迅赴机宜；及至兴兵之际，袁世凯已经布好万全之阵。以致才不过在两年之前打倒持续二百多载满清专制皇朝、开创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家的“开国政党”，现在便面临了必然失败的局面。

对于失败的因素，陈其美有如下的分析：

‘辛亥革命，手持寸铁，集众数百，武昌一呼，全国振荡者，革命党之精神有以致之也。癸丑一役，据地数省，拥兵十万，贼军猖獗而全局失败者，革命党人锐气销沉之所致也——此陈公英士自日本赴大连时所寄之言也。’（注一）

彻底改造的最好时机

然而，就在阴霾笼罩着中华民国的这个时期之中，孙先生迅速开始了新的行动，盖彻底失败，也正就是彻底改造革命组织的最好时机。

‘我们当时在国内不但毫无凭藉，而且根本没有立足之地。在袁世凯方面，他是继承了满清政府和北洋军阀遗留下来传统的地位，加以当时一般社会对于总理领导的革命运动，没有深切的了解，而且还有帝制思想和封建意识潜在其间，所以很多的人反对本党三民主义。

‘而我们国民党内大多数高级干部都是丧失了自信心，以为袁世凯对本党以压倒的胜利，决没有推翻他的时候。于是自动的脱离的革命的阵营，有的去了欧美，有的去了南洋，对于革命的前途不仅失望，而且绝望了。而人格卑劣的党员，更腼颜事仇，背叛了革命；有的和袁世凯暗中勾结以图保全其个人的身家和地位，有的对袁世凯称臣投降。’（注二）

‘当时党人怯于袁氏的淫威，大多数皆精神颓丧，意志消沉。其间如胡锳、孙毓筠之流，腼颜事仇，认贼作父，反党变节、降敌为荣者，实已指不胜屈。

‘总理所说：“外侮之来，立见摧毁，患难之际，疏于路人。”其惨痛真不是我们所能想像。’（注三）

‘惟有我们总理高瞻远瞩，毫不灰心，并且告诉一般党员，以为本党失败之后，不出三年，袁世凯一定背叛民国，帝制自为，我们从速要改造本党，重起炉灶，复兴革命，来推翻袁贼，保卫民国。’（注四）

‘民国三年，国父乃于一般同志沮丧之余，以严密的纪律，组织中华革命党，坚决的贯彻国民革命的宗旨。’（注五）

孙先生就是这样高瞻远瞩、坚毅不拔地努力达到“中华革命党”成立，其间遭逢了许多和以往相同的苦难。

国父经由台湾赴日

二次革命当时，待在上海的孙先生，一度打算和由广东被迫出来的胡汉民等人同回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八月二日由上海乘德国轮船出发；未料到达福建马尾时，据日本驻福4[77]829州领事馆武官多贺宗之（上校）告知“广东讨袁军失败、陈炯明已逃走，去到那边会有危险。”孙先生尚属疑信参半，多贺宗之乃出示报告广东情势的电报，让孙先生相信之后，更劝说经由台湾，出亡日本。孙先生接受了这个意见，乃和胡汉民同行赴台。

注一：蒋总统-“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一九一六五）

注二：蒋总统-“本党革命的经过与成败的因果关系”（一九四九六）

注三：蒋总统-“为本党改造告全党同志书”（一九四九九）

注四：蒋总统-“本党革命的经过与成败的因果关系”（一九四九六）

注五：蒋总统-“中国之命运”（一九四三三）

袁世凯变本加厉

孙先生到达台湾的时候，日本的台湾总督府指派有关官员严密警卫，下榻于台北市御成町“梅屋敷”（屋敷为邸宅之意），当时曾为房主日人大和宗吉及其弟藤井晤一郎挥毫，分别书赠“博爱”、“同仁”横额各一件。

“梅屋敷”，现在为“国父史迹纪念馆”，在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铁路南侧，当年孙先生所使用的砚池、家具及上述题字，都还保存在那里。

关于孙先生来台湾的纪录，中、日两国资料有点出入。据中国资料，孙先生于一九一三年八月二日由上海乘德国轮船出发；三日，抵马尾，换乘日本轮船“信浓丸”到达台湾（日期及港口不详）；在台北曾经寄宿，其后乘原船离台（日期及港口不详），九日，抵达神户。

但据日本方面资料，当时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内田嘉吉于一九一三年八月五日致内务省警保局长冈喜七郎电报：“孙文化名，自福州乘日本轮船‘抚顺丸’于八月五日进入基隆港，换乘当天下午四时由该港启碇之‘信浓丸’前往神户。”

内田这个报告，与中国资料所记曾在台北“梅屋敷”寄宿一节，有欠一致。

国父抵日几经周折

孙先生所搭乘的“信浓丸”，于八月九日上午七时到达神户。此时，袁世凯已经对日本政府提出“不准孙文在日本上岸”的要求，这是由于唯恐孙先生得到日本人的协助，重建革命组织。

日本政府接受了袁世凯的意向，派遣警察登上停泊在神户港内的“信浓丸”搜查。但船长郡宽四郎迅速引孙先生避于船长室内侧隐蔽之所，装作不明究竟地答称：“我们船上那里有什么姓孙的人？”把警察和记者们的查询搪塞过去。

然后由经头山满派来神户的萱野长知和川崎造船公司社长松方幸次郎以及孙先生友人在神户市海岸街的航运业者三上丰夷等人协助，于当晚九时，在夜幕低垂之下划一小船靠近“信浓丸”，接下孙先生，由川崎制船厂的海边秘密上岸，立即转往神户山区的诹访山温泉常盘花坛之松方幸次郎别墅，深居简出；在那里等到相继亡命的胡汉民、廖仲恺，在数天后赶来会合。

另一方面，犬养毅和头山满则不断和山本权兵卫首相交涉，卒致获得日本政府默许孙先生在日本逗留，才转往东京。

据日本资料，孙先生是在日本官吏的援护之下，秘密到达东京。当时情况，在神奈川县知事大岛久满次于八月十八日致外相牧野伸显的报告中叙述颇详，特摘录于次：

“自门司直驶横滨之大阪商船公司货轮‘襟裳丸’，于通过神户和田岬之际，孙文乘小船秘密移登该船。十七日晚间九时许，到达横滨港外本木冲；神奈川县警察部长暨水上警察署长偕立宪国民党干事前川虎造等人乘水上警察署汽艇出港迎接，孙文即在港外海面移登汽艇，再换乘划船，于当夜在远离村落的富冈海岸登陆，然后乘汽车于十八日中午零时四十分到达东京赤坂灵南坂二十六番地的一所隐匿住宅落脚。”

收买不成即予暗杀

此时，北京袁世凯的暴政变本加厉，对于反对势力的国民党籍议员，第一着是挪动“善后借款”大把撒钱，试图加以收买；第二着则对于仍然不为金钱所动的人，便马上使出逮捕、暗杀等手段——在正当二次革命高潮时期的八月十九日，将率先批判袁世凯的众议院议员伍汉持暗杀于天津；九月一日，又杀害另一众议员徐秀钧于九江。

此外，并在八月二十七日，将国民党籍参、众两院议员丁象谦等八人逮捕。

违法进行总统选举

在此之后，对于已经拔去了背上芒刺的袁世凯来说，所急切希求的是踌躇满志地登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此时，国会已经成立了为取代临时约法而制订宪法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如按照正常程序，则应该经由这个委员会制宪完成之后，才可以决定“大总统选举法”；可是迫不及待的袁世凯竟策动其御用政党——进步党主张不俟宪法颁布便先行选举大总统，而且在袁世凯威迫利诱之下已经变了质的一部分国民党议员也加以同意。于是，国会便在十月四日通过了“大总统选举法”。两天后的十月六日，依据选举法以众议院为会场举行选举。

袁世凯又拿出了威胁手段——他发动数千群众以“公民团”的名义，包围会场，将议员们困堵在里面自上午八时到晚间十时，叫喊“如不能选出为大家所希望的大总统（指袁世凯），便不让出来。”

虽然是在如此状态之下进行选举，可是袁世凯在前两次的投票中，都未能获得多数票；直到第三次投票，才得以当选大总统。

日本就是等到了这一天，才承认中华民国。

掌握到一切实权的袁世凯，更大胆地进行其排斥异己的措施。

袁世凯竟通缉国父

十月十五日，以北京总检察厅名义布告全国，通缉孙先生和黄兴、陈其美、张继、李烈钧、柏文蔚等人。继之更于十一月四日下令解散国民党，并撤消国民党籍等国会议员四百三十多人，以致两院无法集会，国会机能为之停顿。

重建革命组织

翌年～～一九一四年，袁世凯更以各省都督的要求为藉口，于元月十日下令停止参、众两院议员职务，解散国会。

袁世凯制造新约法

接着于三月十八日召集所谓“约法会议”，以孙毓筠为议长，着手制订为袁世凯打如意算盘的“新约法”；经过四十天的审议、通过之后，由袁世凯于五月一日公布施行，并将前经临时参议会在南京所制订内阁制的“临时约法”废止。

在这个“新约法”中，将过去参、众两院制的立法机关改为设置“立法院”一院。立法院的召集和解散权以及法律和预算的提案权等，集于大总统一身，造成袁世凯的权力足以和专制时代的皇帝匹敌。

‘即令有多数党人在国会里面作法律上的活动，也不足以树立责任内阁，更不能支持责任内阁，以对抗袁世凯那样滥用职权的总统。袁世凯所顾忌的不是国会，而却是长江流域及南方各省革命党的势力。故自民国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于赣、粤、闽以后，解散国会者，就是国会所选出的总统；副署解散国会命令者，亦就是对国会负责的内阁总理。待到国会一经解散，那副署命令的内阁也就垮台。从此以后，所谓国会，所谓内阁，乃至于约法本身，在袁世凯手中，任意扮演，任意摆布。’（注一）

国父建立中华革命党

另一方面，在此之前于一九一三年八月抵达东京的孙先生，立即着手重建革命组织，以“中华革命党”为新党的名称，依据对于自辛亥革命到二次革命失败过程的检讨结果，决定以服从总理，严密组织，排除不纯分子的三原则为立党的基本精神。

二次革命失败后，陆续亡命到日本的陈其美、居正等人，也都汇聚在一起。虽然大家的生活极其艰困，但革命精神则非常旺盛。孙先生连日不断地和陈其美等协商，并亲自起草中华革命党的党章及入党誓约。

总统在上海宣誓入党

中华革命党，以浙江籍的王统等五人于九月二十七日入党为开端，在日本及上海申请入党者赓续不断；孙先生并且和东南亚华侨秘密联络，要求协助，讨袁的热情和革命的火种，再度以日本为基地而点燃起来。

蒋总统当时是在上海入党，为中国国内最早的入党人，入党誓约为一百零二号：

‘誓约

‘立誓约人蒋志清（蒋总统学名），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痛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宣誓如左：

‘一、实行宗旨。

‘二、服从命令。

‘三、尽忠职务。

‘四、严守秘密。

‘五、誓共生死。

‘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

‘中华民国浙江省奉化县人蒋志清（捺指模）

‘中华民国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国父对总统的培植

入党后不久，便又东渡日本；十二月间，在东京获得最初和孙先生单独见面机会，得到孙先生关于今后讨袁活动计划以及青年革命同志应有的修养言行等多方面的启诲。自此之后，乃和孙先生建立了更进一步的坚实关系。

‘我是二十一岁入党的；直到二十七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虽然以后总理即不断的对我加以训诲，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并不曾向总理要求过任何职位，而总理却亦不曾特别派我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一直到我四十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从我开始入党，到担任党的中央委员，这中间差不多相距了二十年之久，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就正是总理了解我、砥砺我、培植我的德意……

‘在没有任中央委员以前的那段时间所作的工作，可以说是我从事革命以来，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一段工作。’（注二）

学习曾国藩精神

在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当时，正是蒋总统砥砺身心、充实能力的时期。

并且还能够专心读书，特别是熟读了曾文正公（国藩）全集，受益最多。曾国藩以平定“太平天国”之乱（一八五一～六四年）扬名宇内，儒者而兼名将，是一个毕生坚持谦虚向学心性和自立自强精神的人。蒋总统在这个时期所学习到的曾国藩精神和幼年身受的王太夫人母教，以及日本留学时代潜心探究的阳明学说，都是后来人生旅程中的重要食粮。

‘曾文正毕竟能够转弱为强，转败为胜，打破困苦的环境，消灭顽强的敌人。他之所以能够成功，并没有旁的秘诀，就是他肯学习、肯研究，不惜虚己下人，不吝随时请益，能够罗致一般道义气节之士，来帮助他的事业……

‘我们细察曾文正的一生，可以说很得力于这种“慎独”的功夫。他无论什么事情，不管人家知道不知道，都要问得自己的良心过，惟恐有亏于心。’

注一：蒋总统-“中国之命运”（一九四三三）

注二：蒋总统-“我们的复国的精神志节和建国的目标方略”（一九六三十一）

注三：蒋总统-“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一九四一十）

注四：曾国藩（一八一一～七二年）清末汉人官员的代表性人物，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因功封侯。后来，出任两江总督十年，扩大江南制造局、最早派赴美留学生……为“自强运动”（洋务运动）的率先推进者。

中华革命党成立

决心建立强固组织——“中华革命党”的孙先生，于一九一四年二月在东京神田区锦町三丁目十番地创办“政法学校”，以谋培养革命新血，扩展革命基础。

政法学校培养新血

“政法学校”，是由自中国亡命来日的陈其美、黄兴、戴季陶等人获得日本有志之士头山满、犬养毅等协力创设，聘请前在辛亥革命之后协助中华民国制订临时约法的寺尾亨担任校长。初期只设政治、经济两科，开学不久，学生已达三百多人，乃于九月间增设法律专修科；此外，更有日语专修科，以便学生们在研究正规课程的同时，兼可学习日本语文。

在创办政法学校的同时，又以黄兴为主体设立“浩然庐”于东京大森，实施革命同志的军事教育。

据黑龙会所编“东亚先觉志士传记”，蒋总统也曾在“浩然庐”就学。

另据日本外务省编辑之“日本外交文书”，“浩然庐”在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一日设立于当时的东京府荏原郡入新井村新井宿一二六六番地，由日本陆军备役骑兵上尉青柳胜敏主持教育，学生有七十九人。袁世凯唯恐其为“暗杀学校”，故而通过外交关系再三向日本政府提出予以解散的要求。

及至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有学生赵宇臣等在千叶警察署对面的旅社“松叶馆”制造炸弹，发生爆炸事故，肇成问题——“浩然庐”乃于同年八月被日本政府封闭。

孙先生更为加强革命党的宣传活动，复于五月十日创刊“民国杂志”，社址设在东京曲町区新樱田町，以胡汉民为总编辑。

益励初衷从头做起

像这样逐步进行筹备之后，乃于七月八日在东京筑地精养轩以秘密结社方式举行“中华革命党”的成立大会。参加者达三百多人，孙先生就任总理。就像当年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以及在东京组织“中国革命同盟会”一样，和同志们益励初衷，从头做起。

据东京警视厅于七月九日向外务省报告：当天到会者二百零五人，精养轩会场入口门扉紧闭，门外站有两人担任稽查，戒备森严，凡到会者，须经逐一检查，胸前佩有徽章，才准进入会场。

警视厅的报告书中，还提到孙先生在大会席上的演说内容如下：

“中华民国，将来要怎么样才能够在世界上站得起来，必须和同志诸君共同研究。

“将来的世界战争，终归将出于黄种人和白种人的竞争。因此，问题所在就不只是单纯的中国方面或日本方面的局部情况，而希望能以谋求东亚全体和平为目标。在我们中华民国，当基于时代要求的第三次革命兴起之际，同志们务必团结一致、亲爱精诚、同一步伐，时刻以国家百年大计为念，致力行动。

“然而，事有必须等待，不可一意追求，倘使徒知汲汲于迅立事功，则必然会失之于轻率；希望大家暂且隐忍，等待时机，决不可轻举妄动。”

严订总章及规则

孙先生在这次成立大会中，发表了全文三十九条的“中华革命党总章”，其主要内容为：

一、本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

二、本党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

三、自革命军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时，名曰革命时期。在此时期之内，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党员负完全责任。

“中华革命党总章”，在当时绝对保密；可是，监视着孙先生行动的警视厅，早在总章刚印刷（约五十份）出来时，便已获得其全文，而于成立大会三周之前的六月十五日以乙秘字第一一一九号报告外务省。

八月二十三日，中华革命党本部为树立严格纪律，通告发表约束党员不得自由行动的规则四条：

一、不得以个人自由意志行动，加入其他的团体或集会。

二、不得受外界之摇动，有违背党之行为。

三、不得以个人名义，发表违反党义之言论。

四、不得以违反党义之言论，煽动本党同志。

正为吾党建功之时

九月一日，孙先生发表“中华革命党宣言”，内容如左：

“吾党以宋案、借款之故，促起二次革命，不幸精神涣散，相继败走，扶桑三岛遂为亡命客集中之地矣！……本党党员，协力同心，共图三次革命，迄于革命成功，宪法颁布，国基确定时，均由吾党党员完全负责。……现在全欧战云密布（注：第一次世界大战已于七月开始），各国自顾不暇，无力及我。且世界金融机关已经紊乱，袁贼之财源已竭。……正吾党努力建功之时。”

然而，实际就以“中华革命党”而言，却也未必是像钢铁一般坚固团结的政党。

部署上海发难

‘当时，响应总理的号召，在日本参加中华革命党组织的，只有极少数的干部；而真正信仰总理主义、了解革命真义、始终如一的，更是不多；真能杀身成仁的，只有陈英士、朱执信诸先烈，这几位同志真可以说是我们革命的圣人……

‘中华革命党成立以后，内部还有许多复杂的情形，其在同志之间互相攻讦，各不相下，只争意气，不顾大体，是不待说了。尤其对总理侮衊拔扈，不仅不听总理的命令，而且时时予总理以难堪。有的党员藉各种理由向总理要挟权利；有的党员向党部诈索钱财以供挥霍。

‘我在当时，只有二十七、八岁，在同志中是后辈，但是我对于这些干部的言论行为，实在太看不过去。总理虽然仍能宽大容忍，而我当时就有一种决心——就是这些对总理飞扬跋扈的干部，我既身为党员，若不能为领袖报复此恨，我就不是一个忠实的信徒。’（注一）

国父交付军事任务

蒋总统在参加中华革命党之后，奉到孙先生最初交付的军事任务，是在上海指挥讨袁军事行动。发难时期，预定在一九一四年初夏，距离二次革命失败还不到一年，上海市面对于二次革命的纷纷谈论，还没有冷却。

袁世凯为防范革命运动再起，乃发表海军中将郑汝成为淞沪镇守使，担任由上海到吴淞口的水陆警备总责；同时也是为着酬庸他在二次革命时抵御革命军、防卫制造局有功，而加以擢任。

蒋总统检讨了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审慎研拟作战计划，决定分配同志们的任务如下：

第一路——由蒋总统本人兼任司令，为主力部队，担当潭子湾、小沙渡、曹家渡、梵王渡一带市区的攻击任务。

第二路——司令陈荣廷，担当进攻上海西方真茹一带，并袭击警署等任务。

第三路——司令何元龙，担当破坏铁路及电信设施等游击任务，并突击上海北面长江两岸的南岸宝山及北岸海门，以封锁海军活动。

未料，这个计划在展开行动之前，便被郑汝成侦悉，下令严缉所有革命党分子。

五月三十日夜晚，有陈乔荫、王锦三两同志被闸北巡警逮捕，搜去兵队名单、行军草图等物件；接着设在小沙渡的司令部也受到搜查，被捕党人多名，并没收了械弹、旗帜、印信多件。

被捕的陈乔荫等在西炮台殉难。

这是继二次革命的上海战役之后，遭遇到的又一次挫折。

袁世凯下令各省通缉

袁世凯于六月十五日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命令，严厉追查此一事件。在这个命令中指出“此次谋乱，系蒋介石代表孙文主持一切”，以下内容，是这样的：

“去年（一九一三年）七月，沪宁之乱，首逆孙文等人，……兹复派遣死党，暗设机关，纠约匪徒，分设伪队长名目，希图拦劫银款，夺掠军械，毁坏路电；似此盗贼行为，实为全国人民所共弃。陈乔荫、王锦三二共犯，甘心从逆，罪不容诛，着即一并就地正法。……蒋介石、廖轰、陈荣廷、何元龙等，现均在逃，着各省都督、巡按史及各统兵长官，饬属一体严拏，务获究办，此令。”

蒋总统是领导部署发难的主谋者，成为被袁世凯下令通缉的对象，因而行动必须谨慎，只得不时在上海张人杰的一个隐密寓处，和同志们秘密聚会，商讨待机再起。

但袁世凯则追缉不懈，他花钱收买了解革命军内情的王金发，将之拉拢过去，代为搜集情报。而王金发则是蒋总统在辛亥举义光复杭州最初出阵时、同为指挥敢死团作战的朋友。

蒋总统险落入罗网

在六月间的某一天晚上，蒋总统到达张人杰处。偶尔因为同志们都还没有到来，于是乃转往别的朋友处小坐。过了一会，再走回张宅附近，觉得情况有点不对——张宅周围隐藏有一些陌生人，形成了包围状况。

这些人，就是袁世凯方面的侦缉人员。因为王金发的密探，盯紧着蒋总统走进张宅，立即招来刺客；不过那个密探却没有发现蒋总统已由张宅出来。这些人还以为所盯梢的对象仍在屋内，故而守候在外面窥伺时机。可见蒋总统差一点就落入了袁世凯的罗网。

此时，如果继续待在上海，当然非常危险；而且不仅上海如此，就连原为革命党根据地的东南各省，也都完全被袁世凯所控制，革命活动实在是冒有极大的危险性。

在这个当口，蒋总统接到陈其美由东京发来的电报，催促前往日本。

‘公（陈其美）暂居东京，以望沪事之成；及沪事失败，陈乔荫、王军山、章得高、陈新民等殉难，知事难急进，乃命中正东渡，再定大计。’（注二）

注一：蒋总统-“本党革命的经过与成败的因果关系”（一九四九六）

注二：蒋总统-“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一九一六）

到东三省考察

在日本方面，有新的使命在等待着蒋总统——就是奉到孙先生的指示，前往东三省，时为一九一四年初夏。

东三省邻近袁世凯所控制的北京，居于地理上的冲要位置。不过，以往的革命运动，是以华南各省为中心，东三省则为革命的“后进地区”；这是由于以侵略大陆为目标的日本帝国主义，控制着东三省，阻止革命活动。盖日本自一九○五年以来，掌握住作为其控制东北的

动脉——南满铁路，已经有将近十年的岁月。

为了导致革命成功，在像这样的东三省地区，是有培植革命势力之必要的。

陈其美为前驱

推进这个任务的前驱，是陈其美。他已经在这一年的一月底到过大连，和当地同志接触，

开始建立组织；并且考虑到如果可能的话，便立即展开军事行动。可是，接受了袁世凯意向的日本关东军都督府，则对于陈其美等人的行动百般干涉，逼迫离境；加以陈其美生病，曾入大连“满铁医院”诊治，需要长期疗养，故而此行不到两个月，即不得不折回日本。

‘陈公（其美）尝为余（蒋总统）言：辛亥、癸丑（二次革命）二役，不能贯彻实行三民主义者，以东北各省之革命运动根基薄弱，不能直捣北京，以扫专制恶魔之巢穴也。自今以往，如仍于北方不稍加之意，是犹覆其辙而不自悟也。且袁军密布于东南，防范压制，不遗余力，如不度势量力，固执进行，是无以异于邹与楚敌也——其不成也必矣！故谋第三次革4[102]854命，当于东北数省培植革命根基，以为大规模之运动。……即与戴君季陶等首渡大连，……筹备发动。逗留半载（实际约五十天），袁逆缇骑四出，终不得志，既困于病，又受外交之掣肘，……饮泪回东。……而革命党东北各部之基础，实赖此以立也。’（注一）

日本严密监视

根据日本方面纪录，关东都督府当陈其美到达大连之后，曾不断严密监视，并妨碍其行动。

下面引录一九一四年二月四日关东都督福岛安正向外相牧野伸显提出的报告，可为例证：

“陈其美等来此，业经严密调查其行动；并饬大连民政所长向陈本人严厉传达不得以大连为策源地、进行有关革命等计划之意旨。”

此外，足以说明袁世凯对于陈其美高度警戒的纪录，也颇为不少：

满铁副总裁伊藤大八于二月十三日向外务省报告曾与张作霖晤谈，张秘密表示：“说老实话，大总统（袁世凯）有命令，不论用任何手段，都得要将陈其美逮捕，请教可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三月二日，袁世凯正式照会日本政府，以陈其美有刺杀商务印书馆经理人夏粹芳等嫌疑，要求引渡到案。但日本政府以中日两国尚未签订有关引渡罪犯等条约而予以拒绝。袁世凯方面乃又提出“租借地应与日本领土性质不同”，日本方面则以“不希望因此而讨论到租借地的地位问题”——仍然未肯答应。

蒋总统继续未完任务

孙先生给予蒋总统的指示，就是为赓续陈其美所未完成的任务——重新探索“东北革命”的可行性。

‘当时接东省同志之报，有巴、英二统领者，请其速往主持；公（陈其美）以在东事繁，不克西归，乃命中正与丁景梁至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处，先往视察……’（注二）

然而东北革命气氛之低沉，实在出乎意想之外。经在哈尔滨等处实地视察结果，不仅革命机势尚未成熟，而且是完全在袁世凯和日本势力的压制之下，毫无活动余地。其真相则为某些在东北的同志，对于当地情况故为夸张不实之报告，以图自孙先生或陈其美处诓取经费而已。

推进革命运动的目标，虽然归于虚愿，但此次东北之行，却获得了颇为珍贵的体验：

‘记得我在民国三年到东北去考察的时候，总理曾经对我说：“日本人如果不将东北和台湾交还我们，并保证朝鲜独立，我们国民革命运动是不能停止的。你要将这个意思告诉日本将领。”

‘那时候，日本军阀还意图拉拢我们革命党。我在日本人的掩护招待之下，在东北的满州里、哈尔滨、长春等地住了三个月；最后在长春铁道饭店日本军人的招待会上，我将总理的意思表达出来；并说：日本要协助中国革命，应该作列强的榜样，首先有具体的表示。

‘当时，招待会的主持人是一位日本联队长，听了我的话，大为不满，面红耳赤而去；第二天，就请我离开东北。’（注三）

注一：蒋总统-“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一九一六五）

注二：（同右）

注三：蒋总统-“整军与建军”（一九四五十一）

日本觊觎山东

这个联队长的态度，十足反映出日本军阀凭藉武力攘夺东北为其殖民地的野心。他们的意图，只是要利用中国国民革命造成实现其欲望的机会而已。

客观情势，既属如此，是则停留在东北策进革命运动的计划，势为缘木求鱼，不可能达成目的。

‘我在三十年前去考察东北，曾经作过下面的结论：东北不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而是中国革命的“归宿地”。’（注）

没有成为“策源地”的东三省，如果追溯在后来从九一八事变到芦沟桥事变、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乘日本失败而落于共产党掌握的历史过程，实在是中华民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祸源之地”。

山田纯三郎的回忆

蒋总统这一次视察东北之行，日本人山田纯三郎（一九○○年参加惠州起义殉难的山田良政之弟）曾经同行。

山田纯三郎于四十年之后的一九五四年访问台湾。是年五月三十一日，参加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台北市实践堂所举行的总理纪念周，发表演说（由现任台湾省主席谢东闵翻译），回忆当时的情形如下：

“总理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日本，民国三年，派总裁和我（山田）到黑龙江齐齐哈尔去策动军队，再起革命；但由于那些军队对革命思想认识不够，没有联络好，以致失败。

“总裁回到日本，在报告书中坦白说明经过，勇敢承认失败，使我和其他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朋友，看了都很感动，觉得在总理左右有这样负责热忱的好同志，前途充满光明。”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正当在东北的旅程中，震憾全世界的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奥国皇太子夫妇在其新领土塞拉热窝被塞拉维亚青年所暗杀，乃成为奥国于七月二十八日对塞国宣战的导火线。

这个消息，飞越欧亚大陆传到东北。虽然详情尚欠明了，但蒋总统盱衡以往欧洲情势变迁，判断战乱必然扩大，更必然会影响及于为欧洲列强竞争之地的中国。

因此，乃于八月二日自东北上书在日本的孙先生陈述欧战情势和今后讨袁计划：

‘今奥、塞开战，俄国即首当其冲，则法国万难坐视。……德国对于其同盟奥国之态度，尚未显著；英国之于德国，处心积虑，伺隙待机，以冀一击为快，……虽未出诸极端挑战行动，而其内部实行动员之积极，或不稍减于俄、法。……

‘然察大势，世界大战，已箭在弦上矣！此次欧战时期延长一日，即袁贼之外交势力薄弱一日；范围扩大一部，即吾党之外交关系胜利一步也。吾党应于此袁贼亲西排东之外交失败期内，乘势急进，机不可失。……

‘如全欧纷争一起，则列强对于东亚之外交，必难兼顾，吾知日本必于此期间，竭力伸张其势力，以巩固其将来在东亚外交上之地位，此即其暗排袁贼之阴谋。……’

在分析欧洲战局的同时，并建议在今后宜将革命根据地转移到浙江，以伺机规取南京、上海。

欧洲战乱，一如预测，扩大为全面战争——奥国方面，有德国与土耳其参战；塞国方面则得到英、法、俄国助阵。

日本趁机伸出魔掌

其影响，立即波及到亚洲；于是，日本的动向，也不出意料之外——乘机向中国大陆更伸开了他的魔掌。

成为日本觊觎之焦点的，是“山东半岛”。当时，在山东方面，德国租借有青岛（胶州湾），英国租借有威海卫，各自建设军港，形成要塞。德、英两国之所以能取得青岛与威海卫为其租借地，乃由于在甲午战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因之产生“三国干涉”（一八九五年）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日本在当时要求清廷割让辽东半岛，而俄、德、英三国联合出面干涉，迫使日本放弃要求，然后向清廷需索报酬而巧取豪夺分别获得上述租借地。尤其是德国，更得到了由青岛通往济南的“胶济铁路”建设权，以及沿线采矿权与架设无线电话权；他意图以青岛为起点，进而向内陆地区发展。至于日本，则等到了利用欧战的机会，转谋剥夺上述德国所有权利，攘为己有。

日本图与英国联手

日本由于和英国之间在一九○二、一九○五、一九一一年三度签订有攻守互助的“同盟条约”，故而积极展开活动，意图依据条约行事，和英国联手起来，参加对德国的战争。

八月三、四两日，日本两度通过英国驻日大使葛林照会英国政府：“愿依据日英同盟宗旨，援助英国；如英国参战，则希望也能要求日本参战。”

注：蒋总统-“剿匪战术之研究与高级将领应有之认识”（一九四五十一）

袁世凯引狼入室

日本的要求参战，在英国来说，实在是一份并不欢迎的人情。因为英国在远东的发展，是以经济野心为主，远超过其军事野心之上，故而希望避免战火扩大到中国境内，使他蒙受在商业上的不利；此外，当然也知道日本是为了藉口参战而谋求分得一杯羹——也就是扩展其在中国的利益。

英国于八月四日对德宣战；七日，照会日本政府，请日本“依据日英同盟，出动海军，在中国沿海搜索德国武装商船队，予以击溃。”英国的本意是——并不要求日本全面参战，而只希望能够协力保护其本国商船的安全，最为妥当。

日本决定参战

接到这个照会的日本政府，便于当天晚间十时在手相官邸举行紧急内阁会议。

席上，外相加藤高明提出这样的主张：

“第一：对英国基于日英同盟所提出的要求，应有适当的答复。第二：乘此机会，铲除德国在亚洲的根据地，更进一步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基于这两点理由，应该断然参战。”

阁议一直进行到深夜两点钟，并且得到元老山县有朋、井上馨等人赞同，结果决定了参战的方针。

可是，英国方面仍然希望日本打消全面参战的念头。英国驻日大使葛林再三向加藤高明提出意见如下：

“日本对德宣战，将会给予人以一种使战火扩展到中国大陆的印象，中华民国本身也会为之不安。目前的行动范围，宜限于保护海上的贸易；至于宣战布告，希望俟后再行协商。”

加藤高明立即加以反对：

“日本的参战，不会给予中国以威胁，也不会损害到英国的贸易。日本所希望的，是确立远东和平，并没有领土上的需求。参战行动，本来是应贵国的要求，已经向天皇上奏，不能变更；如果犹疑不定，则将在政治上招致严重后果。”

日英两国之间，其后为了参战问题，多次协商，获得“日本的军事行动范围，限于南中国海、北太平洋、胶州湾地区”的结论，英国才于八月十四日同意日本参战。

先是，唯恐卷入战争漩涡的中华民国，已曾于八月六日向国内外发表“中立宣言”，同时并要求美国政府“转达参战各国不得在中华民国的领土、领海及租借地作战。由美国和日本接洽合作保护中华民国中立。”

自始就怀有参战意图的日本，对于中华民国如此要求于美国，故意提出责难，以牵制美国的动向；至于美国方面，也因顾虑到国际纠纷，故虽答复中国“愿与各国合作，努力维持中华民国中立”，却未见有任何具体行动。

袁世凯提出交换条件

可是，发表中立宣言的袁世凯，在另一方面竟对日本政府提出极其顺从的建议。

八月九日，外交部次长曹汝霖衔袁世凯之命访晤日本驻华临时代办小幡酉吉（公使山座圆次郎于五月二十八日在北京死亡），说出了这样的话：

“袁世凯对于革命分子亡命日本，从事革命活动，颇感不安。如果日本方面能够对于这些亡命者给予断然处置，作为交换条件，则十多年来两国之间含有政治意义之经济上的大问题，不难一举解决。袁世凯表示，就眼前而论，倘使日本方面能将亡命者驱逐出境，则可以承认日本军在山东登陆，攻取青岛，你看如何？”

袁世凯为了要消灭革命党，竟然恬不知耻地以容许日本侵略作为交换条件。

对于袁世凯的提议，日本方面反而感到惊异。小幡酉吉于十一日以第五六二号电文向外相加藤高明报告如下：

“本官所最感奇怪的一点，是支那政府对于我国的态度，竟有如此突然变化，其真正因素何在？”“支那人的心理作用，虽然很难凭常识推断……但可能是过于敏感地忧虑到欧洲战局所给予的影响，对我国未来态度有所危惧……而为支那人一种维持体面的特有表现……乃有此提议……”

日本政府见到袁世凯的态度如此，当然便会乘虚而入。于是，甫于十九日到达北京就任驻华公使的日置益，乃立即草拟答复袁世凯提议的四项交换条件和六相要求条件，于二十五日报请加藤高明外相裁示。

二十一条的滥觞

这些条件的内容是以暂时占领胶州湾租借地以及遣送革命党员离开日本等作为交换条件，而要求袁世凯方面承认“旅顺、大连等地区的租借期限再延长九十九年”，“在上述延长期间内南满铁路（包括安奉铁路）不归还中国”，“由日本援助改善东三省南部、内蒙古东部军政及一般内政，并许可日本人居住营业自由”，“由日本供给借款建设九江至武昌、南昌至杭州铁路”等条件。

日本政府，对于日置益的拟议，虽曾一度予以制止，但实则这些条件，就是后来在翌年～～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提出、而使中日关系至于绝对恶化的“二十一条要求”之滥觞。

袁世凯就是这样自动诱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招来二十一条国耻！！这样情势，对于日俄两国来说，所最耽心的，是唯恐第三者的列强国家对于两国共同独占的局面会横加干涉。尤其是在一九一一年四月，清廷和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的一千万英镑借款，就包括有“开发东北”一项在内，使日俄两国更加感到不安。

日军侵至济南

日本的参战准备，已经有所进展。当接到英国要求援护商船的照会，而于八月八日（一九一四年）在内阁会议中决定参战方针时，日本军舰便立即开始出没于青岛附近海上。

八月十五日，日本向德国提出以下两项内容的最后通牒：

“一、德国舰艇立即自日本及支那海洋方面撤走；如不能撤走，则立即解除其武装。

“二、德意志帝国政府以将全部胶州湾租借地归还支那国（中华民国）为目的，而限于九月十五日以前无代价、无条件交付帝国（日本）官员接收。”

此一最后通牒，限于八月二十三日正午前无条件承诺；如果没有表示承诺的答复，则采取必要的行动——实则，几乎就是一个宣战通告。

真正意图在于盘踞

由于在最后通牒中，日本表明将胶州湾租借地归还中国，于是中华民国政府乃于八月二十一日向日本政府特别表达谢意——“日本以将胶州湾归还中国为目的，主持公道，诚表友谊，尤深感谢；并相信日本尊重中华民国中立。”

然而，日本的本意则与此相悖。他真正的目的是要将德国赶走之后，换上他自己来盘踞下去。这个意图，从当时日、英之间的交涉情况就可以了解得很清楚。

日、英两国基于同盟关系，同意发表“关于中国独立及维护其领土完整的共同声明”，进入了起草文件的磋商阶段。

英国提出“胶州湾在暂时占领之后归还中国”，未料日本方面竟然强烈反对。日本主张“假定德国无条件将胶州湾交给日本，尚有可说；但如有必要付出战斗代价而予以攻占，则岂能轻易归还。”——日、英两国，由于对这一点相持不下，结果，未能发表共同声明。

关于胶州湾租借地归还中国问题，据日本方面资料：外相加藤高明曾于八月十五日以第三五八号火急密电严令驻华临时代办小幡酉吉——“文书固不待言，即使在口头上也不能给予任何保证。”

又在东京和英国驻日大使葛林进行交涉之际，加藤高明表示：“不能轻率论及归还问题，希望英国不要过于把重点放在尊重中华民国的中立方面。”

德国在接到日本的最后通牒之后，立即于八月十九日命令其驻北京公使馆与中华民国外交部交涉，直接将胶州湾归还中国，盖认为没有必要特地交付日本经手归还。可是，日、英两国已经得悉此一动态，立即横加干涉；他们所持的理由是中华民国和德国直接交涉，则违反了本身所声明的“中立”立场；袁世凯乃予以同意，而拒绝了德国的交涉。

对德宣战日军出动

及至最后通牒期限的八月二十三日正午，德国没有答复，日本乃对德国布告宣战。

在宣战的同时，驻华公使日置益向中华民国政府提出要求——指定山东省内黄河以南的大半个省境为“中立外区域”（即交战区域），以及撤退胶济铁路和潍县一带的中国驻军，以便于日本的军事行动

袁世凯对于日本的要求，差不多是完全接受，而只将“交战区域”稍稍缩小为“龙口、莱州及接连胶州湾附近地区”，而许可在军事方面任意行动。这就像当年日、俄战争以中国领土的东三省南部为两国战场一样，在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又在山东半岛发生了和中国风马牛不相及的日、英同盟对德国的战争。

日本军事行动，开始于九月二日。当时，德国在青岛的兵力，只有陆军正规军二千二百人，包括临时召集居住在中国的在乡军人，总计也还不到四千三百人；而且所有的军舰，都已调赴欧洲战场。

相对地，日本所出动的兵力，是以第十八师团（师团长神尾光臣）为中心拥有陆海军约二万人的强劲部队，并且还有英军一千人参加。从兵力强弱悬殊的情形看来，不待开火，就已经可以预卜其胜负之数。

转沿胶济路向西推进

日军的攻势，分两路挺进，主力在远离德国租借地青岛一百五十公里以上的山东半岛北岸——龙口登路；另一路则和英军并肩在青岛附近的崂山湾登陆。

主力部队登陆后，将少数德军击溃，便由龙口南下，指向平度。

可见日军的攻击目标，实则并非仅限于德军所据守的胶州湾租借地。

主力部队到达平度之后，转而沿胶济铁路向西推进，越出交战区域，于二十六日占领了潍县车站；十月五日，到达青州车站；而终于在六日控制了省会济南车站。日军在占领胶济铁路后，强迫担任警备铁路任务的中国军队及警察撤退，并且使铁路工作人员改由日本人担任，以及占据铁路沿线矿业，以致济南以东的胶济铁路完全落于其掌握之中。

日本在开始进攻德国根据地的青岛之前，竟有悍然深入大陆内部、占据广大区域的行动，显然是以对德宣战为藉口；而其真正目的，则在侵略中国大陆，已经表明得毫不隐讳。

日军攻占青岛

日本军队任意扩大交战区域、占领胶济铁路的行动，彻底抹煞了中华民国的主权。

态度横暴行为残酷

可是，日本方面则充耳不闻，只顾继续占领下去。驻华公使日置益诡辩地答复：“胶济铁路，乃正当的战斗行为，也是预定的军事行动，和中华民国政府根本没有关系。”

态度如此横暴的日军，在当时发生过若干残酷凌虐的事件：

占领平度县之后，日军首先向县知事发出征用书，强迫征集牛一千头、鸡二千只、猪一千头，以及食米、面粉、饲草等五十余万斤（每斤六百公分），大车一千五百辆——简直要搜刮到寸草不留；平度县知事当然无法满足其需索，只有走为上计，但结果被日军逮捕监禁。日军更挥舞强权张贴布告：“凡任何人犯有妨碍日军行动的罪行，则将全村民众处斩。”

在进驻即墨、胶县之后，日军又占据县政府及电报局，闯入民宅，强奸妇女；雨天则拆毁窗棂、家具等木器生火，烘干湿衣；以及任意发行军票，公然检查邮件等不法行为。

日军对待中华民国人民，完全是一种战胜国的行为。

日军攻下青岛

九月二十六日，日军开始攻击德军根据地--青岛。二十八日，占领青岛背后高地孤山、巫山；面对日军攻势，德军在海舶川左岸构筑堡垒，挖掘堑壕，张设铁刺网，建立防线。经过反覆进行的小规模战争之后，日军于十月三十一日发动总攻击，并且扬言：“六小时内拿下青岛”；而德国胶州总督华德克则宣称：“日军如来进攻，将会碰到德军顽强抵抗；至少不牺牲四万人，休想拿下青岛。”可是，毕竟寡不敌众，青岛乃在经过八天的战斗之后，而于十一月七日被日军攻陷。

当时战争情况，据日本陆军省于十一月十日发表资料，大致如次：

六日傍晚，开始突击各堡垒；七日上午（六日午夜）一时三十分，第二中央队步兵二中队及工兵一分队占领“中央堡垒”，俘虏德军约二百人。继之，攻击“台东镇堡垒”的第三中央队于凌晨五时十分将该处拿下，随即移师攻击后方炮台，并得英军助阵，截至上午七时，将“伊尔克司”、“俾斯麦”、“毛奇”各炮台陆续占领；其余“小淇山”及“海岸”两堡垒亦经攻占。及至七时半，青岛德军要塞完全归于日军掌握。整个攻防战中，未曾在青岛市区发生战斗行动。

当青岛攻防战进入高潮的十月十七日晚间，德国鱼雷驱逐舰“Ｓ九○号”，将停泊在青岛港外的日本战舰“高千穗”击沉，舰长伊东裕保等官兵二百七十一人死亡；“Ｓ九○号”于十八日夜晚突破日本海军封锁线，脱出重围，当逃避日本军舰追击途中，在青岛西南约一百公里海上触礁；舰上官兵被中国方面根据中立条例解除其武装，送往南京收容。该舰触礁地点，在中立海域，理应由中国处理，但日本海军却将该舰拖进德国租借地范围内；为此，中国方面曾依据国际法提出抗议。

日、德两军在青岛易手之际，签订有“开城规约”，十日，由德国总督华德克与日军第十八师团长神尾光臣授受城池，华德克被送往日本，监禁于东京本愿寺。被俘德军官兵达二千三百人。

强行占领拒不撤走

在中华民国境内的日、德战争，虽然到此结束，然而，日军却在青岛设置守备队，继续其占领状态。原为德国管理的海关，也由日军占据，并将中国职员赶走。日本的意图，是要将德国在青岛的一切权利，不折不扣地掠夺到手。

中华民国，虽曾要求肆行无忌的日军立即撤走，但日方则我行我素，毫不理会；因此，中国乃于翌年～～一九一五年一月七日照会日、英两国，取消原先指定之“中立外区域”。但日本却表示感到意外，并责难“取消交战区域，是漠视国际信义的独断措施”，而且明白表示：“日本德国军队的行动，不会因此受到任何约束”——这就是强占中华民国领土，决不撤退的宣言。

日军的行动，刺激了中国国民感情。据派驻济南之日本公使馆三等书记官船津辰一郎于十一月二十日以机密二十二号文书向外相加藤高明报告受到中国人的冷眼情形如下：

“自占领胶济铁路以来，中国官民态度为之一变。对于攻下青岛的消息，没有一个人向我们表示祝贺之意。”

国耻激起国人革命要求

‘日军复擅自攻取青岛，并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路矿权利。这些国耻，违背我国民的希望，侮辱我国民的自信，激起我国民强烈的革命要求。’（注）

注：蒋总统-“中国之命运”（一九四三.三）

第四章：袁世凯窃国(下)

主题

二十一条要求并吞韩国重演日军阀干预外交日隐匿主要要求揭露后举世震惊日表示赞成帝制国父洞烛奸谋日提最后通牒各国各有所图日本态度蛮横国人视为国耻日本自食恶果袁党鼓吹帝制诛除郑汝成策划肇和起义总统亲自督战日图挟制袁世凯英俄日联合行动各国谋略活动袁世凯布置称帝护国军起义日本突转而反袁袁世凯穷途末路袁世凯取消帝制国父自日归国袁党暗杀陈其美在山东策动讨袁冯国璋的折冲袁世凯忧愧而死

二十一条要求

日本在凭藉其暴力控制山东之际，又着手推动更大的阴谋——就是对华二十一条要求。

当攻占青岛后第五天的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日本政府便令召驻华公使日置益归国。前面已曾提到日置益在日本对德宣战之后，立即打算向袁世凯强硬提出延长旅顺、大连（关东州）租借期限九十九年等六项要求；此次归国，就是为了要全面完成这个任务。

东三省和东部内蒙古，为日本权利最大地区。依照“满蒙善后协约”（日俄战后，日本和清廷签订的条约），旅顺、大连租借地及安奉铁路租借权，将在一九二三年满期；又南满铁路租借权将在一九三九年满期，所以日本一直在窥伺着能有使上述租借权达成永久化的机会。

这时，日军的主力部队还驻在山东，不打算撤走，正好凭藉武力为后盾，希望对于不仅“满蒙问题”、甚至涉及中国全土有关之所谓中日间的悬案，谋求一举解决。

本来，所谓“一举解决悬案”，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而感到震恐的袁世凯先作过表示，于是，日置益乃有乘机提出六项要求的意图；可是其后日本的侵略野心越发膨胀，乃综合各方面意见，由当初的六项演变成“二十一条”的非法要求。

日本决心不择手段

这个“对华二十一条要求”，是于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在日本内阁所举行的临时会议中所决定，得到元老山县有朋、井上馨等人同意，并经奉召归国的日置益缜密研讨之后，才于十二月三日由外相加藤高明以极机密训令指示返回北京任所的日置益把握机会，进行交涉。

此一训令，表示出日本对于中国决心不择任何手段遂行侵略意图的强硬态度，其内容摘要于次：

“帝国政府为考虑时局善后事宜和巩固帝国将来地位，以及永远维持东洋和平，决定和中国政府缔结如附件第一号至第四号（注＝还有第五号被秘而不宣）旨趣的条约……帝国政府具有极其坚强的决心，尽到各种手段，务期达成目的。……”

日置益在接到训令的当天，便以密电（未列文号）呈复加藤高明详细陈述意见，赤裸裸地说出要以武力为后盾而临之以高压手段的决心。内容是这样的：

“无论如何，必须贯彻吾人主张，使对方服从我方要求，特别是以新近的战胜余威为后盾，而以一身代表帝国实力的本使，坚决预期其成功，当抱持充分信念以临其事，不会有任何踌躇。唯从支那方面看来……此乃为日本人的纯粹利己本质，恐轻易不会服从我方主张。为此，对于支那方面，应极尽威吓、利诱，及其他任何手段，不遗余力；同时，对于支那以外各国，亦有充分使用外交手段之必要……”

在这个报告中，更建议将兵力留驻青岛，必要时，可以进军黄河以北；以及花一、二百万金便可以收买袁世凯的亲信，金钱必须预为准备。

这样的意见，只能说是为追求目的而失去理智的胡言乱语。

集不平等条约之大成

‘……所以我常说日寇所提示的“二十一条精神”，实际上乃是集各种不平等条约的大成……

‘举凡中国政治、法律、军事、警察、赋税，交通、矿产、盐务、宗教、教育，一切立国所需文化：国防、经济的要素，在精神与事实上，早已在各国累次所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出卖、断送、分割无遗了。“二十一条”乃是把列强所分享的特权，集中而加强于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手，而由他来独占、来垄断罢了。

‘……“二十一条”，最为凶狠！最为毒辣！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又进了一步；就是他由“瓜分政策”而变为“独占政策”了。

‘现在略举其要目如左。

‘第一号是关于山东问题的各条：

‘第一号的四条，要求北洋政府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即胶州湾和胶济路及其沿线采矿等权利，让与日寇（第一条）。并划山东沿海一带土地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借他国（第二条）。又要求烟台（芝罘）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的铁路建筑权（第三条）。开山东各主要城市为商埠（第四条）。总之，日寇要划山东全省为他的势力范围。

‘第二号是关于东三省南部与内蒙东部的各条：

‘第二号的七条，要求延展旅顺、大连湾和南满与安奉两铁路的租借权九十九年（第一条）。要求日本人在“南满”和“东蒙”享有土地所有权或租借权，及采矿权（第二、三、四条）。要求在两地聘用日人为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第六条）。要求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之权（第七条）。并不许他国在两地筑路或投资（第五条）。总之，他要划东三省南部及内蒙古东部为势力范围。

‘第三号是关于汉冶萍公司的各条：

‘第三号的两条，要求汉冶萍公司由中、日两国合办（第一条）。并要求汉冶萍公司各矿附件的矿山概归日本人独占开采和经营（第二条）。

‘第四号和第五号是关于中国全面的各条：

‘第四号的第一条，要求由日寇独占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

‘第五号的七条，要求中国聘日人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第一条）。在中国内地享有土地所有权（第二条）。合办中国的警察（第三条）。供给中国的军械并合办中国的兵工厂（第四条）。取得武昌与九江南昌、南昌与杭州、南昌与潮州之间的铁路建筑权（第五条）。划福建全省为势力范围（第六条）。及日本人在中国之宣教（第七条）。总之，日寇要获占中国全国为他的藩属和奴役。’（注）

注：蒋总统-“中国之命运”（一九四三三）

并吞韩国重演

“二十一条要求”，简直可以说是战胜国对战败国强制迫使承受的苛刻条件。

这些条件的意图何在？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产生的呢？

军部图先控制山东

第一号有关山东要求四条，是出于日本军部的主张，由右翼人士推波助澜而产生的条件。策划侵略中国的日本军部，首先希望能够完全控制山东省；因此，在接收德国所建筑的胶济铁路之同时，更打算在山东半岛兴建一条由北向南的纵贯铁路，将渤海和黄海的陆上地区联系起来，并且西达济南，近窥中国的心脏部位——的确是公然显露出要将山东造成为“第二南满洲”的野心。

第二号有关满蒙要求七条，是以陆军大臣冈市之助于一九一四年十一月所建议的“日支交涉事项觉书”（备忘录）为其蓝本。“觉书”列有八条，主要内容有“延长关东州的租借期限”、“南满铁路与安奉铁路永远归属于日本”、“日本人在南满、东蒙居住权及土地所有权”、“由日本指导中国政府的军事及武器制造”等项。

冈市之助，是日本陆军元老山县有朋的直系，他的建议，代表着陆军。这是由于一九一二年的第三次日俄密约划分界线，使东三省南部及内蒙古东部置于日本的势力范围之下，故而要将在该地区的外国势力赶出去，以达成独占控制的目标；所以特别在第二号第一条和第七条中提到将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安奉铁路的租借期限延长、以及管理经营吉长铁路，而且都要求为九十九年的长期，所谓“租借”，实则就是变相的“割让”。

侵吞汉冶萍公司

第三号有关汉冶萍公司的要求两条，是以海军军务局长秋山真之根据横滨正金银行董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和三井物产会社（公司）驻汉冶萍代表高木陆郎的中日合营办法而提出的方案为其基础。而小田切和高本之所谓合营，实际就是收买。

关于中日合营汉冶萍公司问题，前于一九一二年元月，已经由逃亡在日本的盛宣怀和小田切万寿之助洽商，草签了临时合约；可是，由于这个合约实际上是将管理权给予日本的不平等约定，故而中华民国予以拒绝，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然而，日本方面还是锲而不舍，再度提出要求。其实自一九○二年以来，日本已经屡次对汉冶萍公司供给借款，总额计达三千五百三十万日元（其中已支付二千六百三十万元）。他是要以合营的名义将该公司侵吞过去。

据日本外务省于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三日发给驻华公使日置益的训令提到：小田切万寿之助早在九月间便曾向外务省提议由日本贷给中国政府一千万两，为收买汉冶萍公司的代价。

此外，高木部郎也于十二月间建议以八百万元收买该公司股份七百六十股，占有其股权总额之半数。并且在八百万元的价款中，对于原经营者盛宣怀所持股权之二百万元部分，不须立即支付现金，只要给予日本银行五年定期存款帐户即可；其余六百万元部分，也由于该公司最近两年连续无红利可分，只要照面额七折便可以买进——换句话说，如果付出四百万现金，就可以实现占有该公司半数股权。

要用日本警察、军械

表现出侵略意图最为露骨的，该是第五号要求的七条。

特别是明记聘用日本人为顾问的第一条，是不啻要将中国变为日本的保护国。此外，指定合办中国警察的第三条和采用日本军械以及合办军械厂的第四条，都是准备并吞中国的条件。

上述第五号七条之中第一、三、四各条，日本方面的正文如左（译注：以下抄录当时的中文译本，仅日文称我国为“支那”，中文译为“中国”，余无不符）：

一、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

三、向来日、中两国屡起警察案件，以致酿成轇葛之事不少；因此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同时筹划改良中国警察机关。

四、由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日、中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

日本并吞韩国的过程

看到第五号这些条件，该会联想到韩国被日本并吞的过程。

日本在一九○四年“日俄战争”开端的同时，以“睦谊永恒不渝”的美言，和韩国签订“日韩议定书”，使建立听从日本“忠告”的体制，接着便根据第一次“日韩协约”，由日本政府推荐财政、外交顾问给韩国政府；一九○五年，又根据第二次协约，由日本政府在韩国设置统监，剥夺了韩国的外交权；再于一九○七年签订第三次协约，拿到了韩国国内法令制订及高级官吏任免等指导权和监督权，以及解散了韩国军队；又自此二年之后的一九○九年七月，依据“日韩觉书”，更连韩国的警察权也夺取过去，由日本宪兵司令明石元二郎出任韩国警察总长，结果有数万日本宪兵、警察部署到韩国的主要城市……经由这样的过程，韩国乃于一九一○年被日本所并吞。盖由最初签订“日韩议定书”一路发展下来，只不过六年的时间。

拿韩国的事实和“二十一条要求”对照横量，可以说是依样葫芦、殷鉴不远。譬如“聘用财政、军事顾问”和“合办警察”，都是重施并吞韩国的故智。

至于供给军械一节，固然是出于得到日本陆军大臣特准的“泰平组合”以及“三井物产”、天津“高田商会”、“大仓组”等军火商家要求扩大武器销路；但日本提出来的条件，是要使中国军队持用的军械半数以上向日本采办，可见其意图是在以供给军械为羁绁，俾能制中国军队的死命。

——————————————————-

《中国近代史教程》第五七○页至五七二页。

二十一条一九一五年

第一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互愿维持东亚全局之平和，并期将现存两国友好善邻之关系益加巩固，兹议定条款如左：

第一款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

第二款中国政府允诺，凡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与别国。

第三款中国政府允准，日本国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

第四款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其应开地方另行协定。

第二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因中国向认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以上第五七○页，以下第五七一页～～）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兹议定条款如左：

第一款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

第二款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为盖造商工业应用至房厂，或为耕作，可得其须（需）要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

第三款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

第四款中国政府允将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矿开采权，许与日本国臣民，至于拟开各矿，另行商订。

第五款中国政府应允，关于左开各项，先经日本国政府同意而后办理：

一、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允准他国人建造铁路，或为建造铁路向他国借用款项之时；

二、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项税课作抵，由他国借款之时。

第六款中国政府允诺，如中国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国商议。

第七款中国政府允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国政府，其年限自本约画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为期。

第三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愿于日本国资本家与汉冶萍公司现有密接关系，且愿增进两国共通利益，兹议定条款如左：

第一款两缔约国互相约定，俟将来相当机会，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并允如未经日本国之同意，所有属于该公司一切权利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

第二款中国政府允准，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以上第五七一页，以下第五七二页～～）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并允此外凡欲措办无论直接间接对该公司恐有影响之举，必须先经该公司同意。

第四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为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之目的，兹订立专条如左：

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

一、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

二、所有在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

三、向来日、中两国屡起警察案件，以致酿成轇葛之事不少，因此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一面筹画改良中国警察机关。

四、由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

五、允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南昌杭州、南昌潮州各路线铁路之建造权，许予日本国。

六、在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国资本之时，先向日本国协议。

七、允认日本国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

录自《中日交涉始末》，《附件》

——————————————————————————————

日军阀干预外交

在第五号之中，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就是从第五条以南昌为中心的三条铁路建造权和第六条在福建省的优先投资权，显示日本为推进其对华南进政策，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关于长江流域的铁路建造权，已经由俄、英两国于一八九九年签订协约，归英国掌握，英国和中国之间并且订有三个契约；故而日本所要求建造南昌与杭州和南昌与潮州之间的铁路，其优先权属于英国，是则日本的欲望，和英国的既得权利已有所冲突。至于对福建省，日本想经由台湾开辟途径，早就急于要在该地区培植其势力，可是，美、英两国资本在那里的港湾和矿山已经有显著进展。

日本虽则明知关系复杂，但却仍然向中国提出了要求。这是把握住美、英等列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欧洲战局所拘限的机会，亟谋达成其向南方进展的目的。

军部和右翼浪人的影响

在“二十一条”中所列出的那些要求，是受了日本军部和右翼浪人的影响。虽然条文是由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所起草，但实际上小池特别重视军部的意见。后来，曾在东条英机内阁担任外相的重光葵便曾提到“小池是受军部所迫而拟订了二十一条条文”；还有，在第二次近卫文麿内阁担任外相的松冈洋右，也曾有过证言——“二十一条要求是以陆军参谋本部所拟订的‘支那问题处理纲要’为蓝本而作成”。在这里，还得特别指出，当时担任“参谋本部附”职务而发挥了影响力的田中义一，后来扶摇直上，跻于陆相、首相的地位，他就是一个积极推进武力侵略中国的人物。日本军阀，自这个时候开始，就插嘴干预外交，加速了日本走上帝国主义路线的进度。

和军部协同策进侵略行动的，是右翼浪人--像黑龙会的内田良平、中正会的大竹贯一、立宪国民党的伊东知也等人，当日军占领山东之后，便立即于一九一四年十月，结成“对支联合同志会”，鼓励“讨论对华问题、鞭挞日本政府”的武力侵略舆论；此外，“东亚同志会”、“黑龙会”等多数右翼团体、大陆浪人，都纷纷向外务省提出意见书，急切希望军事挺进中国大陆，一举解决“满蒙问题”。这些右翼团体，后来又加上头山满等人，共聚合了十二个团体，和隶属于“政友会”（政党）等反对党的议员们共同组成“国民外交同盟会”，攻击政府对外软弱，压迫采取侵略性的外交政策。

再加上当时的外相加藤高明，也正好是对华政策的积极论者。加藤是在第三次桂太郎内阁时（一九一二年）由驻英大使内调外相，当离开伦敦之际，便曾向英国外相葛雷提到旅顺、大连租借期限的延长问题，要求英国谅解。桂内阁虽然只有两个月的寿命，但加藤则于一九一四年四月第二次大隈重信内阁成立时，重作冯妇，所以他的一贯主张，终于因二十一条的提出而见诸实现。

在二十一条要求方面，日本的外务省、军部和右翼，尽管各有其不同的意图，可是，站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立场，则完全步调一致，迈入无可挽回的途径。

日置益与袁世凯会谈

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于一九一五年元月十八日下午四时，和袁世凯直接会谈，面递二十一条要求文件。当时，日置益请求只让外交部次长曹汝霖一人在场，密谈了一小时。一国的公使当面向驻在国国家元首提出外交交涉案件，在国际惯例上实在是前所未有；而日本则是为了提出二十一条的交涉务必要在极机密的状态中进行，便使出了这样的手段。

日置益在提出要求的时候，大致说明了日本政府的基本见解如后，但其谈话内容，则有充满着为外交常识所不能想像的恫吓口气：

“在日本的舆论中，关于对华政策，有很多过激意见，其中甚至有煽动革命党，以谋颠覆袁政府的说法。这个提案（二十一条要求），倘使不能尽快得到同意，恐怕会发生纠纷；如果迟迟不能解决，那么，日本的要求将会越发增大，或许会招致预料不到的事态……”

这是不容分说、而强横地迫使承诺的一种口头通知。

暗示支持袁世凯称帝

然而，日置益的交涉手段，可并非仅止于一味恫吓；他另外还有一套辞令，搔到了袁世凯的痒处：

“我们希望大总统就会迈进一步，跻于高位……”

这种话，无待诠释，就会理解是具有希望袁世凯正位“九五”的意思。实则，日本在攻占青岛时，得到一份秘密文书——是驻在青岛的德国总督华德克承认袁世凯改制称帝的密约。这个密约，是德国在一九一四年因德俄关系恶化，而意图加强和中华民国关系所提出的文书。日本因得到这个文书而获知袁世凯的野心，故而由日置益向袁示意以承诺二十一条为交换条件，则不妨支持袁世凯践祚。

虽然受到日本强横提出企图使中国为其属国的非法要求，但袁世凯的心情却正自不恶。

日隐匿主要要求

袁世凯在受到日本以强横态度交来二十一条要求的元月十八日晚间，召集外交总长孙宝琦、外交部次长曹汝霖、税务督办粱士诒、国务卿（国务总理改称）徐世昌等干部，会商对策。

孙宝琦首先发言：“日本的要求，是在乘欧战期间各国无暇东顾的间隙，和利用中国内部纠纷的机会。而且，日本公使向大总统面递要求文书，可见极其蔑视中国，甚至有用武力来压迫我们的可能。”

这个分析，倒是相当正确；但却未见有人表示“断然拒绝”的意见，可见袁世凯的亲信干部们自始就显得很怯懦。

孙宝琦和曹汝霖都主张就照日本的要求完全接受，但粱士诒则认为总得要交涉交涉。

袁世凯采纳了粱士诒的意见。他的判断是--如果通过彼此折冲然后酌量给予日本以权利，则可以为加强自己权力而要求日本的助力，作为相对报酬，是为得策。

陆征祥要求逐条审议

元月二十一日，日置益公使复将二十一条要求文书持送外交部。二十八日，日置益和外交总长陆征祥（刚在先一天继孙宝琦就任）洽商进行交涉的程序。

以速战速决为目的的日置益，主张“包括礼拜天在内，每天开会”；但陆征祥则拒绝地答复：“礼拜天开会，在外交惯例上未曾有过；至于说每天开会，也不可能抽出这么多的时间。”而日置益则更针锋相对地说：“那么，就夜以继日，通宵进行，不也是可以吗？”像日置益这样超乎常情之外的态度，正就是在暗示着二十一条的交涉前途。

第一次会议，自二月二日下午三时开始在北京外交部迎宾馆举行。

中国方面的出席者，有外交总长陆征祥、外交部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日本方面为公使日置益、参赞小幡酉吉、书记官高尾亨。

在这次会议中，日置益首先指出第一号（山东问题四条），开门见山地要求答复“是否完全承诺”？因为日本方面是要将二十一条提付拢总审议，从速缔结协约。

针对日本的态度，陆征祥则要求逐条审议，并且以刚刚就任外交总长的理由，希望给予中国方面一些研讨的时间。

日本外相加藤高明认为中国这种态度是对于交涉有意加以拖延的策略，乃于二月三日以第五十一号电报指示日置益“严峻要求夜以继日进行会议；倘使如此交涉还不能有所进展，则盼鼓足气势，直接找袁世凯谈判。”

各国探索交涉秘密

日本之所以急于进行交涉，是由于恐惧列强的干涉；而日置益在最初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便曾叮嘱“请对这个要求严守秘密”，其原因也就在此。

其实，日本政府在向袁世凯提出要求之后，便立即于元月二十二日将要求内容秘密地单独照会英国；而对其他列强国家，则拟在和中国进行交涉时，仍然继续保密下去。

未料就在第二天～～二十三日，日本某一报纸探访到这个消息，特别发行号外，报导“日、中之间，有重大秘密交涉在进行中。”于是，各国都展开了探索交涉内容的活动；其中特别热心的，是俄国——就在号外发出的当天，俄国驻日大使马烈威便到外务省拜访加藤高明，打听真相。这个时候，加藤还在答称“那是不正确的报导”，而将那个场面敷衍过去。

袁世凯故意泄露内容

然而，要求的内容，却被袁世凯方面泄露出去。袁世凯的打算是——让自己关系方面的报纸鼓动言论，凭藉为对日交涉的后盾；同时，更极力宣称日本和革命党勾结，以巩固自己的立场。于是，很快地在元月二十二日，便由进步党在北京的机关报——“亚细亚日报”以及和粱士诒关系密切的“北京日报”报导“昨天，日本又向外交部提出蛮横不法的新要求”；以此为开端，全国各地报纸都对日本展开抨击；不过，在这个阶段，其详细的具体内容，则还没有传扬出去。

面对这样的新闻报导，列强的探询也更加积极；结果，日本政府只有放弃继续保密的念头，而于二月五日对俄、法两国，八日对美国先后正式照会，表示“不会侵犯列强既得权利和并无领土野心”，要求各国对于他和中国之间的交涉有所理解。

可是，就在这个当口，日本政府却犯下了无可弥缝的错误。

日本的谎言外交

日本给予各国的照会，是将二十一条之中的第五号（七条）完全隐匿起来，而只将其余的十四条出示，诡称“这就是日本要求的全部内容”；不用说，在最初照会英国的，也只是说明了十四条而已。

第五号的七条，包括有“聘用顾问”、“合办警察”、“供给军械”、“建造长江流域铁路”等最重要项目，其目的在使中国属国化，以及让日本势力南进发展。唯其如此，所以和列强既得权利颇多抵触，而且有悖于列强要求在中国的“机会均等”、“门户开放”原则。日本政府自知如果将第五号公开，则必然会遭受列强的排斥，为此，特地要保密下去。

日本这样的“谎言外交”，在后来，被指出是国际间的悖信行为，饱受到列强的激烈批判。

揭露后举世震惊

很快地就注意到日本对华二十一条要求中，隐匿有第五号的存在，是新闻界驻在北京的特派员们。

首先是北京“亚细亚日报”，在一九一五年元月三十一日以“可惊可骇之要求内容”为标题，揭载出十四条的内容之后，并提到“此外，还有关联到中国全国的其他要求”——暗示有第五号存在。

日本外相承认有秘密项目

二月九日，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通讯员富莱兹（根据日文音译）在东京访问日本外相加藤高明，紧迫不舍地追问：“外界对于此次对中国的要求，揣测纷纭……”结果加藤答称：“在前些天秘密告知英国驻日大使的内容之外，还有一些项目”——这是日本对外透露还有第五号存在的最初发言。

富莱兹的报导，在二月十二日的泰晤士报上登载出来。

于是，日本政府罔顾列强信用关系的“谎言外交”，乃引起了国际性的重大反应。

英国向日提出抗议

经富莱兹告知上述情况的英国驻日大使葛林，立即在翌日～～十日拜会加藤，提出抗议。

据日本外务省留存下来的纪录——葛林稍显激动地责询：“听说在前些天见示的内容之外，还隐瞒有若干项目，深感遗憾。”针对葛林的发言，加藤辩称：“‘要求事项’已经全部奉告；此外，虽然还有一些‘希望事项’。可是‘要求’和‘希望’不同，在‘希望事项’中，并没有和英国权利发生冲突之处。”接着更以反击的口气表示：“就拿英国来说，大概对于中国的交涉也并没有将其内容逐一照会日本；你们（英国）提出有应受秘密通知权利的说法，我们很难理解。”

继泰晤士报导之后，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和每日新闻也相继发表来自东京的消息，认为“日本的要求，威胁到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特地提出警告。

美国舆论责难

至于美国方面——华盛顿邮报早在二月十一日便刊登了美联社自北京发出的通讯稿，以“据中国高级官员透露”的来源，差不多把第五号的全部内容报导出来。继之，芝加哥先驱报更在二月十九日以获自中国某方面消息，而将日本的要求揭载，同时对于日本的悖信行为发出责难性的评论：“日本对美国秘密照会时，节略了最重要的部分。日本虽然说明不侵犯中国领土完整和门户开放主义，但实则正要加以侵犯。”

在中国～～二月十七日的北京英文报以“政治形势转换的契机”为题，主张“日本如果提出在照会各国内容以外的要求压迫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则应该将日本的要求原案提示有关国家，暴露日本的阴谋。如果原案一旦公开于世界，在中国来说，不啻百万援军。”

被迫终将全文公开

在日本——美、英、俄各国的抗议，如雪片飞来，日本政府起初还打算佯作不知，可是，当二月十九日接到英国照会指出“在北京的驻华公使朱尔典已经获得日本要求全文”，才于翌日～～二十日将世人瞩目的第五号所含七条全文向列强公开。

其内容之险恶毒辣，连美、英、俄等列强都为之大吃一惊。其后，列强曾经要求日本改变初衷；但日本政府则表示：“要求既已提出，无法彻回。”“如果彻回，国民将会为之激愤”——藉词推诿，不肯答应。到了最后，日本虽然表示让步，将内容修改颇多，但其固执私利的态度和谎言悖信的行为，已经孕育了使日本国际地位失坠的后果。

第五号的七条，连日本驻外使节都没有接到通知，因此驻伦敦及华盛顿等地的日本大使馆，在受到驻在国政府乃至当地新闻界询问是否确有第五号时，都坚决加以否定。然而在不久之后，得知竟然有第五号的存在，都逼处到最困窘的境地。当时在驻伦敦大使馆服务的外交官补（地位不高的官职）重光葵，后来在自着回忆录中对于连本国驻外大使都被外务省朦骗了的情况，大致有如下的记述：

“在伦敦的使馆，也没曾奉到要求的全部内容。某一天，泰晤士主笔斯蒂德（据日文音译）送来他们报社由北京所得到的日本要求项目，才获知全貌。井上胜之助大使这时才了悟并未奉到全部指示，大为吃惊，而且陷于极其困窘的境地，自此之后，对于外界，无法再作坚持自信的发言；日本政府更受到世界舆论的总攻击，并且失掉了同盟国家（英国）的信用～～二十一条交涉，在日本外交史上留下了一个显著的污点。”

中国不能接受第五号

在如此国际背景之下，中、日之间的交涉形成胶着状态。

二月五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外交总长陆征祥表明中华民国的基本态度：

“关于第一号（山东部分）、第二号（满蒙部分）可以磋商；第三号（汉冶萍部分）属于

民间问题，应予除外；至于第四号（中国沿海不得让于他国）及第五号（秘密要求七条），不仅侵害中国独立主权及内政，并且与他国业已缔结的条约有所抵触，故而不能接受。”

日表示赞成帝制

在一九一五年二月五日的第二次会议中，外交总长陆征祥提议于四天内对于第一号、第二号提出修正案，再据以进行讨论。

陆征祥的提议，对于日本来说颇为有利。因为虽然只提到第一号和第二号，但是由于中国方面既然表示可以磋商的态度，这就给予了日本以乘机而入的罅隙。

日本果然摆出强硬态度～～八日，日置益到外交部拜会陆征祥，向之提出“中国只打算对第一号、第二号提出修正案，不能令人满意；如果不能提出对于全案的修正意见，则无法再行开会。”并且更以胁迫语气表示：“如果拿出没有诚意的修正案，恐怕会引起不太容易解决的麻烦。”

袁世凯立即为勒逼所屈服，翌日～～九日，外交部次长曹汝霖赶往日置益处，对于原来不同意讨论的第三号和第四号，表示也可以磋商，请务必继续举行会议。

不过，对于成问题的第五号，仍然坚持没有讨论的余地，而要求日本撤回。后来，在中、日之间，便围绕着第五号的一些问题，发生争执。

日本的逼人态度

二月十二日，中国方面履行前次会议的约定，将有关第一号、第二号的修正案送达日置益。这个修正案，已为日本的压力所屈，承认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及南满铁路期限延长九十九年。

未料，日置益则以中国方面仍然不同意协商第五号为藉口，不肯正式接受这个修正案，而只表示暂为存置。

就在同一天，中华民国驻日公使陆宗舆在东京与日本外相加腾高明会面，转达不能接受第五号的态度；但加藤则举出中国和他国之间已有聘用顾问、购入军械、合办警察等前例，仍然要求进行交涉。日本外务省的资料，留有两人当时谈话的纪录，在针锋相对的一问一答中，显示日本方面一如宣战前夕的强迫态度，现在特地摘录于后：

陆总之我国政府“决意”不能再让一步。

加藤在我们这一方面，也有我们断然的“决意”。既然双方持相反的决定相对，则贵我两国的冲突将难以避免。阁下果真已有面对冲突的精神准备，而特地用出“决意”两个字吗？

陆“决意”两个字，也许是用的不得当；不过，有许多困难打算奉告……。

双方交涉，直到日本提出第二次修正案的四月二十六日为止，连续进行了二十五次。袁世凯方面每经过一次交涉，便勉勉强强地作一点让步。一次又一次地让到最后，剩下来的争点是第二号之中有关“东部内蒙古”条款和引起世人瞩目的第五号。

日图控制东部内蒙

对于东部内蒙古，日本认为是和东三省南部一样，而要求允许日本人在该地区有土地所有权、营业权、采矿权、建造铁路权以及借款优先权。他基于日俄密约擅自划定分界线而将东部内蒙古列入其势力范围，所以强迫要求中华民国承认这些条件。但是这个地区和东三省南部实则大不相同，因为在地理位置上和中华民国的首都北京邻近，如果允许他国在这里有侵略性的权利，则是关联到中华民国整体安危的大问题，任何人都会看得很明白。正因为如此重要，所以日本更希望能得到这个区域。

通过这些交涉过程，日本玩弄着各式各样软硬兼施的手段。

袁世凯的日本顾问

手段之一，是迎合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而搔到其痒处的幕后工作。这个工作，有担任袁世凯政治顾问的日本人有贺长雄在幕后大为活跃。

有贺长雄是和当时的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声息相通的人物，平素主张“中国以君主立宪政体为宜”，受袁世凯的重用。

当二十一条交涉一经开始，有贺长雄便突然多次往返于东京与北京之间，他想要穿针引线做成一笔交易——中国接受日本的要求，相对的日本承认中国由共和变为君主政体。

站在有贺长雄背后，操纵着他的人，当然就是大隈重信。大隈曾在日本报纸上发表谈话奉承袁世凯：

“日本为君主国体，中国若实行帝制，则与日本同一国体，日本当然乐为赞助。且袁世凯氏事实上已总揽中国之统治权，改行帝制，尤与事实相合。”

先是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之际，日本特地考虑采取维护清廷的政策，其理由并非是同情日薄西山的满清皇朝，而是基于其本国为拥戴天皇制，所以不愿意在东亚的一角出现和其政体相反的共和国家，因而希望能维护清廷的国体。现在像中华民国这样在亚洲最初出现的共和国家，如果能在袁世凯手中，恢复帝制局面，是和日本国策相符合的。

助长袁世凯野心

‘自天津条约之后，满清的专制与帝国主义的侵略，由对抗而转为勾结。辛亥以后，军阀割据，与帝国主义者的关系更进一步……袁世凯的帝制，与日寇的二十一条件，本有交换的意义。大隈重信“赞助中国帝制”的谈话，更显然助长袁世凯的野心，这是我们熟知的一个实例。’（注）

注：蒋总统-“中国之命运”（一九四三三）

国父洞烛奸谋

当时，中国的舆论，一致抨击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可是，差不多都没有看清楚隐蔽在背后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和袁世凯帝制野心的勾结。

袁世凯故作姿态

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本来就有接受日本要求的打算；然而却在交涉过程中向日本提出抗议，表现出像是煞有介事的抗拒姿态。因此，一般不明了内情的人固不待言，甚至连革命党人也都有误认袁世凯是“爱国者”的。

就像黄兴、李烈钧、柏文蔚等人，都一时停止了“反袁”行动，通电全国“在袁世凯和日本交涉期间，暂不从事反袁斗争。”

又有组成革命团体“欧事研究会”的林虎、熊克武等人，也附和黄兴等主张，通电发表使袁世凯闻之冁然的意见如左：“吾人乃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国苟不存，政于何有？政苟有成，何分于党……”

国父号召讨袁

可是，唯有国父孙先生则看透了袁世凯的卖国意图。当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的孙先生（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与宋庆龄女士在东京上野精养轩举行结婚典礼。其后，继续在日本居留。）乃命令党务部长居正于一九一五年三月十日发出通告，揭发二十一条和袁世凯帝制阴谋的勾结关系，号召党员讨袁：

“此次交涉之由来，实由夫己氏（袁世凯）欲称帝，要求日本政府承认。日本政府欲先得相当之报酬要求，夫己氏隐许诺之，故有条件之提出。讵知所提出之条件，即使中国为朝鲜第二。夫己氏亲信之外交部与陆军部颇不谓然，因有磋商讨论之说，交涉一事，始喧传中外。不然，夫己氏早秘密送却，国人咸被奴于不识不知之中也。……吾党冀除卖国之蠹，庶几巨奸授首，……外侮将无自侵入矣！”

当交涉接近结束阶段，孙先生复于四月九日以“中日交涉之黑幕”为题，通告中华革命党各支部，指出袁世凯终将承认二十一条，其内容如左：

“袁世凯原与大隈重信友善，故大隈组织内阁（一九一四年四月），袁氏大喜，遂以二事要求日置益公使还国（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与大隈商议，求其赞助。二事者何？（一）渠欲称帝。（二）代平‘内乱’是也。及日置还国，大隈赞成。然日本元老虽益希望中国仍为帝国，实存以朝鲜视我之心，而又深恶袁世凯，于是强大隈先提出此次条件（二十一条）。故日置公使于开始交涉之初，面见袁世凯，即申言日本国人皆谓足下系排日者，足下今日欲与日本亲近，而求其助，不能不有所表示。足下能将此次二十一条件完全承认，则日本国人皆信足下，而即助足下矣！云云。

“袁世凯本欲承认，而其左右如段祺瑞、汤化龙及外交总长陆征祥诸人皆大反对。渠不得已，乃有此次抗议。

“然综观前后局势，袁终必承认也。”

日采高压策略

日本对于袁世凯，一方面使用怀柔手段，一方面则临之以恫吓高压策略。

日置益鉴于袁世凯方面对于第五条不肯接受磋商，乃立即于二月十七日向外相加藤高明报告：“由于关系到将来日本对中国的威信，希望在此际应断然确立最后的决心”——建议采取强硬手段。但加藤高明在当时却仍以抑制语气对日置益指示：“在交涉尚未尽到最大力量的阶段，即便采取那样的手段，未免为时尚早。”

然此时日本军部则对于日置益的强硬方针加以支持。派驻在北京日本公使馆的陆军上校坂西利八郎，曾于二月九日以第六号极机密电报向参谋次长明石元二郎建议武力解决问题，电文如左：

“以我方武力发挥实际威胁作用，首先不让袁世凯多费唇舌，无论其同意与否，相信使袁世凯其在大致承认我方要求之后，会有必要进行逐条讨论；请即决断施行。”

进入三月间，日本政府已经确立了出动武力的决心。

加藤高明外相于三月五日电达日置益：“正考虑采取威迫手段，使中国承诺我方提案。”

这个所谓威迫手段，就是利用日军“满洲驻屯师团”和“山东守备军”即将在四月底瓜代的调防时机，提前派遣前往两地接防部队各一个师团，同时则让交卸防务的原驻师团延缓开拔归国，藉图实际增加兵力；另以“北支（华北）驻屯军”的名义增加兵力一千二百名，进驻北京、天津一带；此外，更向郑家屯、新民屯等地派兵，以及研讨强迫接受吉长铁路。

日本威胁发生作用

接着，日置益公使于三月八日和外交部次长曹汝霖见面表示：

“由于会议托延，使日本国军民难再忍耐；倘在几天内对于各重要条款没有满意承诺，也许会发生不测的麻烦。”这个威胁，果然发生了作用，曹汝霖立即和袁世凯协商之后，当天便要求和日置益见面，转达了“关于东北问题，在可能范围内接受日本要求”的决定。

日提最后通牒

日本的所谓出动武力，并非口头威胁，而是立即见诸实行。

决定对中国出兵

一九一五年三月十日，内阁会议正式决定对中国出兵。具体的行动是按照当初计划，藉口将将预定应该在四月底为瓜代之期的驻军调防提前办理，出动的兵员达三万人之多。

此外，更派遣军舰驶入渤海湾沿岸，和在租借地大连、旅顺地区发布戒严令，以及开始准备援护日本侨民避难——制造出剑拔弩张的紧迫气氛。

中华民国乃接二连三地向日本提出抗议，要求从缓出兵；同时由于出兵新闻的传来，刺激了中国民心，在天津、南京、上海……各地都开始表现出排日的活动。

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遵奉袁世凯的训令，于三月二十四日与日本外相加藤高明晤谈，要求延缓出兵。当时，陆宗舆提到“人心动摇”；加藤却反而抓住这个话柄表示：“人心动摇，是由于袁世凯不守秘密，泄露了交涉内容而引起，以致造成在上海等地排日运动的后果。在日本来说，为了保护本国国民而有采取适当措施的必要。”——意在说明出兵行为是正当的。

袁世凯对于日本这样的武力威胁，向美国公使芮恩施透露了他的心境：

“营营蚊声，扰我清梦，好在我还可以活下去。”

接着又表示：

“我将准备对日本的要求作可能的让步，但对方不应损及中国的独立；日本的行动，可能逼我采取另一政策。”

直到四月十七日为止，反复进行了二十四次会议，但袁世凯方面唯有对于“东部内蒙古问题”和“第五号”各条不肯接受，交涉陷于停顿。

日本提出修正案

以强权为后盾极尽威吓能事之后的日本，为打开僵局，乃终于在二十六日提出凡二十四款的修正案，声明“这是日本最后的让步”，要求照案承诺。在这个修正案中，日本放弃坚持使“内蒙古东部”和“东三省南部”置于同一条件之下，而将原先要求在“内蒙古东部”准许日本人有“土地租贷权、所有权，以及旅行、居住、商业的自由，和采矿权”等条件（第二号之中的一部分条款）撤回。

又在悬案的第五号之中，将起先所要求的“合办警察”和“寺院的土地所有权”撤回；其余有关“聘请日本顾问”、“向日本购买军械、合办军械厂”、“建造铁路权”等项，则要求列入纪录（即系由双方换文或由中国外长言明），仍然存在。是故其表现方式虽然稍见和缓，但实际上并无多大差别。本来，这个第五号，就是连对各国都有所顾忌而不敢通知的秘密条款；从它引起国际责难一点来衡量，便可知道其本质是根本不能成为条约的。此外，关于山东问题，日本表示在开放胶州湾为商港及设置日本租界等前题之下，可以还给中国。

对于日本这个最后修正案，袁世凯方面于五月一日提出最后对案。在对案中，虽然对第五号再度加以拒绝，以及要求无条件归还胶州湾租借地，但就全面而论，可以说是仍然对日本案有所让步。在这些让步之中，有必须特别指出来的问题，就是在东三省南部给予日本人以居住、营业及土地租贷权——这一项，乃是导发后来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的因素。

当时，担任和日本折冲的外交部次长曹汝霖，后来在他手着“一生之回忆”中，提到“耕地租贷权”与“九一八事变”的关系，大致如此：

“……后张学良废止商租章程，人民有以田亩商租者，以盗卖国土论。日本总领事以张学良片面取消两国依据二十一条要求所定之协议，提出抗议，张学良亦不理，一九三一年七月，适有日人在万宝山租借地因引水问题引起中日两国警察冲突，双方出动军队，就此开火，越闹越大，寻至酿成九一八事变。”

日拒绝接受最后对案

可是，日本方面连像如上所述的最后对案，也没有接受。

外交总长陆征祥，在提出最后对案的时候，特别说明：“关于第五号，在日本政府本为‘劝告条件’（希望条件）。第五号的问题，不仅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而且抵触‘门户开放主义’以及中国和他国的约定之处甚多，不能作成书面协定。”针对陆征祥的说明，日本公使日置益表示责难：“和预期相反，不能满意；而且是没有诚意的答复。”接着又紧叮一句：“这个对案，就是中国方面的最后答复吗？”这时，陆征祥明白地回答，“是最后答复。”于是，日本方面便以这个回答为根据，决定了已经不能再有交涉余地的态度，乃使出最后的强迫手段——对中国发出“最后通牒”。

五月四、五两日，日本连续举行内阁会议，内定提出“最后通牒”；旋即提经六日召开的御前会议作了正式决定。

在“最后通牒”中，日本方面虽仍然强迫要求全面承认其在先提出的最后修正案，但对于第五号各项，除中国已经表示让步之有关在福建省的日本优秀权外，其余则改为“日后另行协商”——盖日本由于恐惧受到国际间的排斥，乃有如此和缓的表现。

各国各有所图

中、日两国环绕着二十一条的交涉，吸引了世界各国的注目。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战线正越发扩大，列强国家都无暇插手于亚洲问题。他们都很耽心日本这种横暴的要求，意图使新诞生的中华民国成为其属国，是对列强在中国既得权利的一种威胁；还有，日本和中华民国之间要是发生新的冲突，将会在亚洲点燃起又一处战火。

英国只顾自己特权

当时，在中国握有最大权利的国家，是英国。他和日本缔订有攻守同盟条约，万一中、日关系恶化，急遽发展进入战争状态，则负有和日本攻守同盟条约义务的英国，便避免不了卷入中日之间的战争，所以对此颇为戒惧。

因此，英国在一九一五年一月，接到日本关于二十一条要求的照会时，便表明态度——“欢迎中日两国通过交涉解决多年纷争”。

不过，在那个时候关于二十一条要求之中的第五号各条，英国还被日本蒙在鼓里；不久，当第五条暴露之后，英国乃责难日本有悖国际信义，并且举出第五号之中包括有要求华中地区铁路建造权的问题，警告日本：“和英国权利有抵触时，应该和英国协商。以及不得违反日、英同盟而侵犯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一如在前面所曾提到，这是由于南昌与杭州、南昌与广州、潮州的铁路建造，英国已经获得了它的优先权的缘故。

对与英国的警告，日本答复尊重英国权利；并约定将建造铁路的要求暂时搁置，容后协商。可见日本方面在向中国提出的最后修正案中，对于第五号某些要求有所让步，实则就是出于对英国关系的反应。

英国而且还在提防着中日之间谈判破裂。

三月八日，英国外相葛雷向日本表示极其期待“本于忍耐而谋说服的手段，打开对中国的僵持局面”。又当交涉陷于停顿的三月二十七日，英国驻日大使葛林更向日本外相加藤高明提议：“可不可以由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侧面促请中华民国政府进行交涉？”

四月二十六日，英国得到日本提示对中国的最后修正案时，乃再度举出第五号问题，于五月三日由葛雷照会加藤高明——“世界上一般的看法，是关于第五号的要求，日本有企图对中国设立‘保护权’之嫌。本来只是‘希望条件’的第五号，如果为了要强行实现而造成中日关系决裂，则日英同盟的各项约定，便很难得其协调。”

后来，日本在“最后通牒”中，对于第五号更和缓到“日后协商”；英国接到通告，乃认为是“日本表现出很大的让步”，故而表示欢迎，并希望中国应该迅速承诺。葛雷并且为此训令朱尔典“极力权告中华民国政府接受”。

在英国的立场来说，当已经看到情况的发展对于他本身的权利（铁路问题）固然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但却仍然耽心亚洲发生混乱，而希望不管怎么样总要使问题尽快获得“圆满解决”。

俄采不干涉态度

至于俄国方面，因为已将东三省北部、内蒙古西部以及外蒙古等地区置于其势力之下，故而也照会日本，对于二十一条要求表示不得侵犯到俄国的势力范围。同时，对第五号之中“聘用日本人顾问”、“由日本供给军械”等条款，虽然也表示关心，但并未采取干涉态度。

俄国的反应，使人特别值得玩味的，是他预料袁世凯一定会接受日本的要求。俄国外相萨佐诺夫曾经再三通知日本政府——“中日之间将不致于断绝邦交。”“袁世凯只是在国内舆论的面前，故作强硬姿态，内心是在等待着最后通牒到来，只要发出最后通牒，他必然就会以之为藉口而表示接受。”

日本方面，对于来自俄国的有关袁世凯“内心”的看法，不大敢相信。加藤高明于四月十八日去电询问日置益，但日置益的答复却是否定的。故而日本乃设想到会发生断绝邦交的最恶劣情况，极其慎重地预作准备，甚至研究到撤退侨民的计划。

但据上村伸一所著“外交五十年”以及其他人著作中，曾经提到当二十一条签订之后，日本政府在议会说明——“中国方面基于压抑国内反对舆论，表示希望日本发出最后通牒。”

美国得不到支持

再说，一向采取希望中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的美国，则怀疑到日本的真正意图，恐怕是在对中国利权的独占垄断。

美国对于第五号条款中“日本在福建省的优先权”一节，向日本明白表示美国一向没有在福建省建设军港的意图。此外，并举出“东三省南部的租税问题”、“合办汉冶萍公司”、“聘用日本人顾问”等条款，认为恐怕是侵犯了中国主权。

又当日本发出最后通牒时，美国政府曾电令其驻英、俄、法三国大使，着向各该驻在国提议由四国共同劝告中日两国“稳健交涉以谋解决”。这个提议，未能得到俄、法两国的赞同，同时，日本也以“如果第三国介入，反而会使事态混乱”，表示反对——以致没有下文。

日本态度蛮横

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携带“最后通牒”，率同书记官小幡酉吉、高尾亨，到达北京外交部，拜访外交总长陆征祥，是在五月七日下午三时，外交部次长曹汝霖也同时在场。

日置益紧绷着脸表示：“奉帝国政府命令，提出最后通牒。”——将一份备忘录面交中国方面。

陆征祥已先由驻日公使陆宗舆的报告中了解了它的内容，只是简短地答覆一句“可惜”！

最后通牒的期限，为五月九日下午六时，只剩下两天。“如到期得不到满足答覆，则帝国政府将采取其认为是必要的手段。”

北京外交部接到日本的最后通牒，立即向袁世凯报告。袁于下午五时召集政界领袖会议，除陆军总长段祺瑞表示强硬意见外，其余的人都主张和平解决。当天未能达成结论，改到翌日～～八日继续会商。

英国落井下石

八日下午，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赶到外交部，会见陆征祥，当面表示：

“中国已经面临到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我到中国四十年，和袁大总统有三十年的交情，今天不能不赶来说几句真挚的话。——日本这次的最后通牒，只能回答‘是’或‘否’，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现在，欧洲各国正忙于欧战，无暇东顾，中国除接受日本条件外，别无自全之道，请贵总长把我这意见转达袁大总统。”

接着，朱尔典更补充了这么几句话：

“中国只有忍辱负重，以避危机；从此整军经武，修明政治，切实预备埋头十年，或可抬头与日本相见。”

在前面已经提到，列强的方针，是图谋使袁世凯接受日本的要求而朝向“圆满解决”的目标推进。

继英国的“强硬劝告”之后，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也转达了美国的意见——“应该避免和日本正式冲突”。

美国原先的态度是要抑制日本的越轨行动，但由于见到日本在最后通牒中已将第五号要求改为“后日协议”，认为实际等于撤回，是故转而深切盼望袁世凯能收拾局面。

由于被袁世凯倚为最后靠山的英、美两国发出这样的劝告，于是事态便急转直下，趋于决定。

袁世凯接受卖国条件

袁世凯立即在总统府召集副总统黎元洪、国务卿徐世昌以及参谋总长、各部总长等主要干部举行会议，决定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

袁世凯在会议席上表示：“东三省南部的权利，虽然损失颇大，但总算是保全了国家的主权、内政以及和各国的条约”。在作了如此文过饰非的“评价”之后，他又挥泪发言如下：

“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最后通牒的要求，是何等耻辱？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但今天的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之后，中国的危险更有甚于今天。”

外交部立即着手草拟覆文。为避免再生枝节，故而决定作内容简单的答覆。

日方强索覆文底稿

未料，日本方面竟然连覆文底稿也要加以干涉。公使馆书记官小幡酉吉在电话中不厌其详地就覆文内容对中国方面有所交待之后，更强迫索阅底稿。这种行为，是蔑视一个国家的国权而将之视同属国。可是袁世凯却能默然承受，由外交部秘书施履本将底稿送达日本公使馆。

到了这个时候，又因为第五号而发生了问题。

盖袁世凯方面的底稿中，有“除第五号外即行应诺”的辞句，就是要将第五号搁置之意；而日置益看过之后，便大肆咆哮：“我帝国能接受这样的覆文吗？”施履本急忙赶回外交部，向次长曹汝霖请示；曹汝霖乃自行决断，在底稿上加书“容日后协商”五字。

将底稿再度过目之后，日置益如愿以偿、踌躇满志，并且作了若干修改。于是，这个惟日本之命是从的覆文及至定稿，已经是午夜时分。

外交总长陆征祥和次长曹汝霖于五月九日下午十一时同携覆文送达公使馆，业已逾限五小时。袁世凯是由于恐惧国民反对，故而算计到在这个不为人所注意的时刻提出覆文。

根据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当时发给加藤高明外相的二六四号公电报告：外交总长陆征祥送交覆文的时间，是在五月九日上午一时（八日夜间）；覆文上填注的日期，则为五月八日。

日使自夸“兵不血刃”

陆征祥一面带着歉意地说：“在这个时候来打搅……”一面将覆文递交日置益。

覆文的内容有：“中国政府今日即行承认者，无非盼望中日间之悬案从此解决，而两国国交可以巩固……”

日置益在接到中国的覆文之后，立即电奏日本天皇——“兵不血刃，获得了外交上的辉煌胜利！”

国人视为国耻

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为外交胜利而兴高彩烈，固属理所当然；可是，袁世凯和他的左右人士的国耻痛泪，不知道挥洒到那里去了；却只顾乐在心头，玩味不置——这是由于他们得到了加速步伐迈向帝制目标的门径。是故袁家的臣仆们都极力吹捧争取到日本对于第五号让步，是袁世凯“元首外交”的成功。

袁政府接受日本“最后通牒”的反应如何？当时日置益曾于五月八日以第二六三号电文向日本外相报告如次：

“据本馆谍报员向大总统府方面探询所悉，中国方面大致认为满意，袁世凯尤其是对于第五号‘留待日后协商’，深为感动，曾经透露日本如果是以这样宽大的度量进行交涉，可不待最后通牒便已得到解决。”

然而，袁世凯的所谓“外交成功”，不用说只是他一个人在自鸣得意。

抵制日货储金救国

中国国民反对二十一条的呼声，在交涉进程中已经是日益高涨——早在三月十八日，就有黄毅、方梦超等为发起人，在上海租界组成“国民对日同志会”，呼吁抵制日货。上海租界工部局在该会组成之际，曾经逮捕黄毅，加以取缔，但抵制日货则扩展成为全国性的行动。

此外，别树一帜的“救国储金团”也展开了活动。该团的宗旨是以五千万元为目标，号召国民向国家银行（中国银行）储金，以这笔金钱作为建设兵工厂、训练陆海军的经费，和振兴国内工业的资本。其目的是在靠国民自己集腋成裘，来加强贫弱的国力。

当得知袁世凯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之同时，新闻界所有的笔锋，都指向日本加以责难，并号召以向日本屈服的这一天为国耻纪念日。

据日置益于五月九日以第二六六号电报向外相加藤高明报告：

“在北京出版的二十几种报纸，今天都刊载了日本最后通牒全文的中文译本。其论调都极其悲愤激昂，大声疾呼地指出五月七日是国民受辱永远不能忘怀的纪念日；今后，同胞们务必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决心期以他日湔雪此一国耻。”

国父揭发袁世凯阴谋

国父孙先生于五月九日对北京学生发出了如左的覆信，揭发袁世凯的阴谋，并号召团结讨袁：

“欧洲战争，列强不遑东顾，袁氏乃乘间僭帝而求助日本。此次交涉，实由彼请之。日人提出条件，彼知相当之报酬为不可却，则思全以秘密从事。迨外报发表，舆论沸腾，所亲如段祺瑞、冯国璋亦出反对，乃不得不迁延作态，俟日人增加强硬之态度，然后承认，示人以国力无可如何……袁氏以僭帝位之故，甘心卖国而不辞，祸首罪魁，岂异人任？”

五月二十五日，中、日双方代表陆征祥、日置益在北京外交部签约。所签订的条约，计为有关山东省、东三省南部及东部内蒙古者二件；此外，换文有山东省二件，东三省南部及东部内蒙古八件，汉冶萍一件，福建问题一件，胶州湾之归还一件——合计十三件。

在以上签订的条约及换文中，所决定的主要内容如左：

山东问题

（一）德国所有在山东省权利之处分，由日、德间进行协定，中华民国概行承认。

（二）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优先向日本借款。

（三）中华民国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开放山东省内合宜地方为商埠。

（四）山东省各地概不让与外国。

东北、内蒙古问题

（一）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归还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

（二）日本人在东三省南部有“租地权”（期限三十年，但可以无条件续租）。

（三）日本人在东三省南部有居住、往来、营业之自由。

（四）日本有领事裁判权。

（五）吉长铁路借款适用对最惠国之条约。

（六）日本人在东三省南部有对矿山的探勘及开采权。

（七）在东三省南部须聘用外国人为教官、顾问时，尽先聘用日本人。

（八）在东三省南部以及内蒙古的铁路借款和以各种税课作抵借款时，优先向日本商借。

（九）开放东部内蒙古合宜的地方为商埠，及允准日本人和中国人合办农业及随附工业。

汉冶萍公司部分

允准中、日合办；并不归国有，及不借日本以外之外国资本。

福建部分

不允许外国或外资建设军事设施——造船厂、军用蓄煤所、海军根据地等。

胶州湾部分

（一）开放胶州湾全部租借地为商埠。

（二）设立一日本租界……

在日本来说——所有的“悬案”，都在这里面获得了明文规定。

自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大陆的路线，在这时候，得以筑成了强固的路基。可是，实际说来——悬案却并非是完全处理干净。因为日本的欲望是永无止境地在不断膨胀，在此之后，又是一个接一个地制造出“新悬案”，而强加之于中国。

在“卖国”和“辱国”的基础上所构筑的解决悬案约定，对于两国友好决不可能发生作用；而相反的，祇是更会招致下一次的“国耻”临头。

日本自食恶果

侨居中国的日本国民，对于袁世凯的卖国行为是加以欢迎的。

他们在北京城内，演出了放歌纵酒通宵达旦的哄热场面，“大日本帝国万岁”的呼声，山鸣谷应；在汉口，更有为示庆祝而举行提灯会的计划。

掀起中国的反日情感

因蒙受国耻而沉浸在悲愤中的中国国民，无法忍受——譬如汉口的学生们，便为反对日侨的提灯会而于五月十三日在市内游行示威；商业区也在晚间全体熄灯，以示抗议。游行队伍并且捣毁了日本商店，在好多处发生斗殴混乱，形成日本水兵们藉口镇压暴动而登陆的喧嚣事态。

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非常重视这些情况。他向袁世凯政府提出警告，要求对于各地所发生的抵制日货运动加以取缔。

袁世凯为此而向日本郑重道歉，并于六月十六日发布“取缔抵制日货运动及革命党煽乱活动”的命令——屈服于日本压力之下的袁世凯，倒是有磨刀霍霍朝着自己国民的威风。

中国同胞的反袁呼声，越发高涨；同时，反日情绪，也非常坚决。随着抵制日货及救国储金运动的扩展，抗日歌曲更响遍了中国全土：

学友们：大家起来，一个八个拼！

在另一方面，日本国内也因二十一条问题导发了政治纠纷——反对党势力，抨击日本政府对袁世凯让步，责难对中国的外交还是太过于差劲。

日本政局震荡

在和进行二十一条交涉的同时，日本国内于一九一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举行了第十二次总选举（众议员选举）。在这一次选举中，大隈重信内阁动员官府助选、撒布金钱贿选，使原为反对党的“立宪政友会”（总裁西园寺公望）由第一党降为第二党；执政党“立宪同志会”（总裁加藤高明）成为第一党。

未料，贿选事件被人揭发，议会为之混乱；于是“二十一条”加上“贿选”乃造成政治问题——“立宪政友会”和“立宪国民党”（总裁犬养毅）两个在野党联合一致于六月三日、八日，在众议院先后提出“关于对华外交的弹劾内阁案”及“关于干涉选举的内阁不信任案”。犬养毅在说明提案的演说中，指谪日本政府自动搁置第五号而使二十一条要求减除了主要部分，“是超乎常理之外的大失败”，结果两件提案虽都在众议院被否决，但因贿选案而被检举涉嫌的内务大臣大浦兼武，终于在七月三十日辞职，内阁因而改组，二十一条交涉的负责人加藤高明也辞卸了外务大臣的职务。

在日本民间，如“黑龙会”等组织，也激愤地指谪二十一条交涉结果是“使帝国威信失坠”；并且有些人闯进赞成派所举行的“国民大会”会场，造成群众斗殴事件。

国际关系发生变化

密切注视着二十一条交涉进展结果的列强国家，当时多表示欢迎；因为在正当极力忙于应付欧洲战局的各国来说，都认为中日纠纷的获得解决，相信是眼前的紧张局势业已有所缓和。所以英国外相葛雷便曾向日本驻英大使井上胜之助表明“祝贺和满足之意”，并称道日本的最后提案是“因宽大而提高了日本的权威”。法国外长戴卡塞也表示过“祝贺日本成功”。俄国的报纸也赞扬日本的措施，并评述“对于扑灭日、俄共同的敌人——德国，是有贡献的。”

唯有主张中国门户开放的美国，则对于日本的意图所在，怀有疑虑。当袁世凯刚对日本屈服的五月十一日，美国便向中日双方政府发出照会，要求确实认定“不得有任何侵犯美国和美国人的条约权利，以及妨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或者抵触门户开放政策的同意或保证。”美国这样的态度，形成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举行的华盛顿会议中所表现的阻止日本向中国进展的政策，而为后来美、日对立原因之一。

日、英关系，也是以此为起因，在开始冷却下去。

日本对于华中地区铁路建造权的要求，威胁到了英国的势力范围。本来，日、英之间所缔结的“攻守同盟”，是以俄国为共同敌人；可是到了这个时候，就英国的立场看来，在远东地区的威胁性，日本比俄国更大。于是，英国也显示出有牵制日本在中国扩张的动向——于华盛顿会议中废弃了“日英同盟条约”。

日本的“误国”污点

如果从结论来说，日本因二十一条要求，诚然是在中国的东三省、东部内蒙古、山东省等方面得到了若干权利；然而，祸福倚伏，相对地也有其无可挽救的损失。

——在日本国内，增长了侵略中国的舆论，形成军阀支配外交的张本。

——在对华关系方面，日本失掉了中国人的感情，使全中国的国民成为敌人。

——还有，失掉了各国的信任，与列强为敌，使自己在国际间孤立。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在这个时候，已经形成世界性的重要问题；自此之后，这个国家便走上了“自食恶果”的道路。

中国的“国耻”，对日本来说，也正是他“误国”的污点。

袁党鼓吹帝制

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是在接受了日本二十一条要求（一九一五年五月签约）之后而迅速具体化。当时，在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方兴未艾，欧美列强无暇顾及中国问题；至于日本，则因二十一条要求得以一举解决悬案，当然会对袁世凯给以善意的报酬。可以说，这是袁世凯实现帝制的最好时机。

袁世凯犹故作姿态

可是袁世凯本人，却在表面上故意做出毫不关心什么帝制不帝制的态度，他在六月间接见美国新闻记者时还在表示：

“吾之国体，既同于美国，以后唯有奋力前进以期发展真正共和之精神。”

此外，又曾对心腹大将冯国璋说：“余在英国购有少许田园，设他日有逼余者，则余唯有迳赴外邦，营菟裘以终老耳！”——好像对于权位荣利丝毫没有留恋的样子。

实则，袁世凯的作法，是不由自己主动改制称帝，而要在造成舆论推动民意拥载的情况之后，再行践祚。

为达这个目的，最初所利用的一着棋子，是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

古德诺与筹安会

袁世凯指使心腹干部财政总长周自齐，收买了古德诺，由古氏撰写中国适宜于君主政体的论文，于八月三日在“亚细亚日报”发表。

命题为“共和与君主论”的这篇文章，是为了替袁世凯制造改制称帝的理论根据。

古德诺列举无论法国革命或美国建国，其共和体制之臻于安定，都需要经过将近百年的岁月；进而申论～～一个国家，从其历史、风俗、社会、经济等方面衡量，可以得出适合于他的国体。以中国现况而论，教育既欠普及，更且在列强外侮之下，共和政体很难维护国家独立；在中国，以君主立宪政体为宜，殆无疑问。

继之在八月十三日，推进帝制运动的“筹安会”，宣告组成。这是由袁世凯的亲信和学者等被世间称为六君子的杨度、孙毓筠、严复、李燮和、胡锳、刘师培等人希承袁氏意旨所组织的。“筹安会”装成是一个学术团体，发表启事，略谓：“本会宗旨，在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孰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尽管如此标榜，但实则为君主立宪制造舆论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担任该会理事长的杨度，并且发表“君宪救国论”等文章三篇，不断呼吁实施帝制。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袁世凯早自两年前就任大总统之初开始，便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解散各省议会，一路打出强硬高压手段，将革命势力排挤出去，以致在这个时候的政坛上，已经不会有人正面断然反对；而中央大员及地方将军们，则争先恐后竞相趋附于筹安会的号召之下。

革命党遭滥捕惨杀

现在，请将话题转回到革命党的动态：

一九一四年九月，中华革命党制订“革命方略”、创设“中华革命军”，在孙大元帅的统率之下，各省分设司令长官。现阶段策动发难的根据地，由东三省改到江．浙二省；但因袁党在这两个省区的镇压行动也是相当激烈，故而同志们乃以日本为指挥作战基地，频繁往来于中、日两国之间。

蒋总统本人，自东三省回到日本不久，便于久月三日前往上海。当时，刚在日军登陆山东之后，日本官方已将蒋总统列为需要注意的人物而监视其行动。

外相加藤高明于九月八日以第三十九号电报通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支那亡命者蒋介石，搭乘于九月三日由门司出港的‘春日丸’，好像是前往贵地。”

在蒋总统归国未久的九月二十日夜晚，中华革命党党员范鸿仙在上海法租界的革命党机关部就寝中，被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所派刺客四人所暗杀。范鸿仙是奉了孙先生之命，正在上海策划起义的人。

郑汝成于刺杀范鸿仙的同时，并将范在军队中所部署的革命组织一齐揭发；有二百多革命同志被逮捕甚至被杀害。以致当中华革命党成立之后还不过两个多月，便因此而使在上海的建立组织工作受到重大打击，而且善后事宜更是煞费周章。

同志吴文龙等人，为范鸿仙被暗杀事件向孙先生提出的报告书中提到：“蒋君介石为范君善后负担银洋七百元”。

继范案之后，在十一月二十三日，由夏之骐所领导的杭州机关又被搜查，同样地有同志三十多人被逮捕乃至被杀害。

‘革命环境异常恶劣，但经过总理的领导和激励，在失败之余，又重振了革命的精神，提高了革命的勇气。

‘当时，在国内任何地区，只要我们有一个人，有一支枪，我们就甘冒生命的危险，与袁世凯作殊死的奋斗。’（注）

在此之后，蒋总统一度回到日本；陈其美则于翌年二月前往上海，交替领导当地的革命活动。其时，日本和袁世凯之间的二十一条交涉逐渐达成协议；袁世凯对于革命党的镇压，也为之日益严厉。是故陈其美虽然尽到了最大的努力，但仍然很难部署好举兵发难的端绪。

注：蒋总统-“本党革命的经过与成败的因果关系”（一九四九六）

诛除郑汝成

陈其美奉孙先生指示，于一九一五年八月一日东渡日本，在东京和孙先生协商讨袁策略。这个时候，正是“筹安会”业已组成，袁世凯的帝制运动开始迅速推进。

由于在江苏、浙江等东南各省，袁世凯的势力过于强大；所以依据陈其美的主张，将原先决定以江、浙二省为重点的发难计划，变更为以云南、贵州等西南内地各省为目标。

决定在上海起义

十月中旬，陈其美携带变更之后的作战计划离开日本，再往上海；可是由于上海同志们的恳切愿望，乃又变更决定仍然在上海起义，陈其美本人也因而留在上海。

‘在沪各同志多以时迫事急，东南半壁，非公（陈其美）主持，决难成事；孙总理亦有留沪之电，坚辞不获，乃留沪主持一切。’（注一）

日本官方对于陈其美的行动也曾加以追踪。首相兼外相大隈重信于九月十三日以政机密送第四十一号电报通知上海总领事有吉明：“据称陈其美为协商上海情势而来日，正和孙文等人研讨革命计划，似乎尚未决定有具体方案。”尽管日本方面监视颇严，可是对于蒋总统在陈其美再度前往上海之后，接踵赴沪的行动，却未能注意得到。

蒋总统在接到陈其美发来“盼即回沪”的电报之后，立即返回上海，参加筹画起义的具体行动。

上海的总机关，设于渔阳里五号。蒋总统和前次同往东北视察的丁景梁以及薄子明等同志，在陈其美的指挥之下，分别担任了工作任务。

第一目标除去郑汝成

陈其美强调：“控制长江的关键在海军。”而海军则在袁世凯心腹干部上海镇守使郑汝成的统驭之下，号称有精兵十万。

‘当以时间迫促，如海军不为我助，则海上交通不便，陆上声威不振，于事殊难有济；若从事于海军，又非自沪入手不可，盖当时最有力之第一舰队练习舰队，皆泊于淞沪一带……

‘且上海为东南第一要区，吴淞要塞扼长江之口，制造局为后方重地，皆为军事上所必争……故海军不得，则上海难下；上海不下，则东南难图。’（注二）

为此，第一目标在除去郑汝成。郑汝成是在一九一三年七月二次革命的上海战役中因镇压革命军立功，受到袁世凯的重用，凭藉海军力量控制上海。如将郑汝成诛锄，则可以一举解决海军和上海两个问题。

暗杀计划，立即着手部署。

刚巧有最好的机会到来——日本大正天皇于十一月十日举行加冕典礼，官居上海镇守使的郑汝成，当然要往日本总领事馆致贺，故而决定埋伏在其经过之地，加以袭击。

这一天，在郑汝成有可能通过的沿途部署了敢死之士十多人，特别是在通往共同租界的外白渡桥，为到达日本领事馆的必经之路；而且马路转弯，须减速慢行，是最便于狙击的地点，所以挑选了精于射击的王明山、王晓峰两人，守候该处，务期达成目的。

陈其美给予两人两支手枪．两颗炸弹；两人镇静地答称：“晓得了！我们一定办到，愿意把自己献给国家……”

大家的心里都很明白，暗杀郑汝成即使能够成功，也必然是不可能生还的。

为民除贼英勇行动

当天，两人埋伏在距离外白渡桥约一百公尺处，等待机会。上午十一时，郑汝成的座车出现，警觉性很高的郑汝成，为了躲开革命党员盯梢，特别绕道并且乘座汽艇，然后由汉口路换乘汽车前来。

汽车刚到桥头，突然引擎出了毛病，速度降低，真正是天赐良机，担任眼线的同志，认清身穿大礼服的郑汝成坐在车内，大叫“就是那一部车！”王明山跃身上前，冲过去投出炸弹，第一颗未中，司机慌忙想开车快跑，而王明山更迫近一步，投出第二颗炸弹，炸坏了汽车后身，郑汝成在车内被震失去知觉，王晓峰跳上车缘，右手持枪自窗口插进去，对准郑汝成头部连发十枪，因为是近距离射击，所以郑汝成的脑袋被打得稀烂。

达成了使命的两人，从容地被赶来的租界巡捕逮捕，在受审讯时侃侃而谈：

“郑汝成助袁世凯背叛民国，余等为民除贼，使天下咸知吾人讨贼之义。”

这是革命党员演出最壮烈的一幕暗杀剧！

注一：蒋总统-“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一九一六五）

注二：（同右）

策划肇和起义

郑汝成被暗杀，给予袁世凯以很大的震撼；他在极度惊惶之余，派杨善德继任上海镇守使。

杨善德是一个平庸怯懦的人，才智远在郑汝成之下，以这样的人来担任上海守备任务，对于革命党来说，应该是非常有利的事。

很快地在军队之中，便开始出现抗拒杨善德的人；江浙同志们也都表示：“如果在上海举事，我们也会响应。”积极地煽动讨袁发难的势焰。

总统作成军事计划

不过，要想拿下袁世凯在水陆两方面已有防卫部署的上海，则非有周详的计划和充分的准备不可；所以经过一再研讨之后，乃由蒋总统作成了“淞沪起义军事计划书”。这个计划，是以攻取上海制造局为最后目标，为达成这个目标，首先要夺得海军为据点。其一部分内容是这样的：

‘敌军以后防备海上，较陆上更严。吾军计画若专注力于海军，恐海军万一不能得手。假能得手，如海军器械运用不灵，不能射击；或陆上敌炮先制舰队，则海军计划全归泡影，而吾军再无立足余地。

‘故占领海军必须与陆上炮队同时占领。如果舰队方面不幸而中以上预言之一，则陆上炮队必可补其缺憾，当不致进退无路。且陆上炮队射击照准，必较舰上迅速，而炮队营占领，亦不甚难。故吾军根据，定以舰队为主，炮队营为副，同时并举，较为得计。惟须准备多数炮手，以为占领后速射之计也。如无炮手，可以购炮兵操典，令攻击炮队营人员预习其射击之法，二星期后必能熟知也……’

计划为陈其美所采纳。在后来被称为“肇和起义”的一页史迹，就是依据这个计划进行。

策反肇和等军舰

当时，有“肇和”、“应瑞”、“通济”等海军精锐军舰在长江停泊，陈其美命令中华革命党干部杨虎（注一）首先进行策反这几艘军舰。

碰巧“肇和”舰长黄鸣球是陈其美的故旧，舰上大多数官兵决定响应革命党，尤其是实习生陈可钧最为积极，主动担负起倡导起义的任务。

同时，“应瑞”和“通济”两舰官兵之中的赞成起义分子，也逐渐在增加中。

另一方面，对于陆地军警的联络策动，也进行得颇为顺利。

发难时期，预定在十二月中旬。

和蒋总统协同参加“肇和起义”准备工作的日本人山田纯三郎，后来于一九五四年在台北的演讲中，曾经介绍了如下一段故事：

“肇和起义的事，是在陈其美先生家中研议多项作战计划，我也参加了。想到当时制造炸弹的事，实在幼稚得可笑！是用香烟罐头，放进炸药破片，拿到郊外池塘里去试验，如果池塘里的鱼被炸死，浮了起来，那就证明试验成功。并将炸死的鱼带回去做菜吃。

“炸弹藏在新民里的一处秘密机关。那所房子距离总裁住宅只有两、三家，可是总裁泰然自若，毫不在意。”

但是，袁世凯却并非是一个脑筋简单的人，当他察觉到“肇和”等军舰有不稳的动向，便立即使出“隔离战术”，命令各舰开往广东，让革命党的策反运动鞭长莫及。

起义日期提前举行

‘十二月三号，有“应瑞”、“肇和”二舰即将驶赴广东之报，于是临时定期，于本月五日，乘各舰长公宴萨镇冰之日，与肇和舰长黄鸣球相约，于是日举事，推其为海军总司令，嘱其暂匿沪寓。’（注二）

于是，起义日期提前于十二月五日下午四时举行，“司令长官”及“海军陆战队正司令”分别由陈其美、杨虎就任。

按照作战计划，杨虎率领一支队伍占领“肇和”，在舰上设置海军总司令部；然后由“肇和”自江面发炮轰击上海制造局，此外，另有别动队攻占“应瑞”、“通济”两舰。

同时并决定以“肇和”发炮为信号，在陆上所有制造局、城内、以及闸北地区军警之中的同志都奋起响应，分头担任进攻警察总局、电话局、电灯厂、警察局第一区以及工程总局等行动。

担负攻占“肇和”任务的杨虎，依照原定计画，买进了一艘汽艇，以备乘艇前往登上军舰。

十月五日下午三时，杨虎率领海军陆战队同志三十多人，乘汽艇由黄浦滩出发，各人暗藏手枪炸弹，表面上则装做只是游客。

途中，悬起“青天白日旗”，由于这个旗帜和当时的海军旗近似，所以“肇和”舰上的高级官员误以为是有人前来校阅，乃集合官兵在甲板上排队欢迎。

注一：杨虎一八八八年出生，安徽省宁国县人，二次革命后，亡命日本，追随孙先生，后在广东大总统府任职。一九二六年，在蒋总统领导下担负清党任务；一九三七年上海“八一三事变”，任淞沪警备司令，抵抗日军。

注二：蒋总统-“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一九一六五）

总统亲自督战

当革命军海军陆战队司令杨虎等人所乘汽艇与“肇和”军舰船舷相接时，舰上的陈可钧便按照计划与同志们奋起响应，未见有人敢于反抗。

杨虎登上了毫无抵抗的“肇和”军舰，宣布讨袁宗旨，舰上的水兵们欢呼赞成。

于是，立即对水兵们发放犒赏金，并作发炮轰击敌人的准备。

不巧的是保管弹药库锁匙的人尚未归舰，只有打破库门，取出炮弹。

下午六时，开始对上海制造局发炮射击。

夺取两舰未克实现

继“肇和”之后，对于“应瑞”、“通济”两舰，也由陆战队副司令孙祥夫担负进行攻夺作战任务。孙祥夫率领部属三十多人，由杨树浦乘另一汽艇出发，以先取“应瑞”，继夺“通济”为目标。

未料，刚要登艇出发之际，被巡警发现，索阅出港护照；护照是由海关所发给，如没有此照，便不能启航，在匆遽中刚买来的汽艇，当然不可能办好护照。

结果，孙祥天等人乃因此被巡警所阻止，未能出发。以致夺取“应瑞”、“通济”二舰的计划不克实现。

在岸上，则由薄子明率领二百多人以警察总局为目标；吴关钧、陆学文等以电话局、警察第一区及工程总局等为攻击对象，分头出发。

最激烈的战争，是对警察第一区及工程总局的攻击。陈其美打算将此处攻占之后，设置总司令部。陆学文率领二十余人冲锋进去，警察人员立即全体溃走，得以一时占领。但袁军旋即大举反扑，企图夺回，革命军对之展开壮烈战斗，结果有冯茂斋等过半数人员死伤，蒙受损害颇大而不得不退却。

进攻警察总局的薄子明等人，也在对峙激战之后，因敌方大量援军赶来助阵，被迫撤退。

攻击电话局的队伍，虽也曾一度加以占领，但因受到袁军大部队反攻而退出。

‘公（陈其美）与中正亲赴……工程总局督战，各方面皆能如计攻取，卒因械弹不及敌军充足，以致败退。’（注）

联络不周发生差误

至于对上海制造局的攻击，却在联络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差误。

开始的时候，“肇和”自江面发炮轰击制造局，未料制造局方面却毫无还击，因此，在“肇和”军舰上的杨虎等人以为制造局已经落入革命军的掌握，故而中止射击。

另一方面，在制造局内的同志们，预定听到“肇和”发炮为信号，奋起发难；可是，由于“肇和”的炮声很快地便停止下去，同志们错以为攻占“肇和”的行动业已失败，因而中止发难响应。

据曾经参加此次起义的山田纯三郎后来于一九五四年在台北的演讲中提到蒋总统本人也参加了对南市警察局的攻击行动。当时的计划是：在警察局内的同志们听到“肇和”的炮声，立即响应，迎接蒋总统等人进入该局，设置大本营。未料，警察局不但没有响应，反而对跑步赶来的蒋总统一行开枪。山田又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总裁非常沉着勇敢，那种沉着情形，仿佛还在眼前；在最危险的时候，总裁用日语大声疾呼：‘山田，日本语！山田，日本语！’

这是要使敌方以为是日本人，而松懈其向这边攻击的一种机智。

岸上的战争败北之后，陈其美和蒋总统等人退回到法租界渔阳里五号的总机关部。

总机关部遭搜查

可是，这个总机关部就在当天深夜被法租界的巡捕搜查，间不容发地从楼上窗口逃出。这是由于邻居法国人看到这边有很多人出入频繁，感到奇怪，而向租界捕房告密之所致。

陈果夫在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有如左的记述：

“当时，黑夜沉沉，寒风至烈。我关上了后门，俄而打门之声甚急，把门一开，见有一大队巡捕前来……巡捕密探五、六人拿着手枪，瞄准我们。

“其时，我临时生出一计，一面抵抗，一面把门窗桌椅推动作声，以便楼上同志们知道。英士先生及蒋中正先生、邵元冲先生等均在楼上，听到声音，便从从容容地从后面的屋顶跑走。”

另一方面，占领了“肇和”军舰的同志们，于五日夜晚发出信号，询问“应瑞”、“通济”两舰“是否赞同起义”？

两舰的回答是——“现正在协商中，将会赞成，请勿攻击。”“肇和”的同志们，乃为之安心等待。

但是，当时待在制造局的上海镇守使杨善德，召集陆海军高级干部协商对策，袁世凯的军事参议杨晟极力主张应该猛烈攻击“肇和”军舰，认为即使予以击沉，亦无不可。于是，便决定了以停泊在“肇和”附近的“应瑞”、“通济”两舰对之发动攻击的方针。

袁党运用钜款贿赂

在发动攻击之前，先使用贿赂战术，自交通银行提出钜额现金运往“应瑞”、“通济”两舰。

这两艘军舰上的革命党同志，本来为数颇多，正在舰内进行说服响应起义；可是，当贿款突然涌到的时候，舰上气氛为之一变，被现金诱惑了的非革命同志官兵们，立即赞成对“肇和”展开攻击。

注：蒋总统-“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一九一六五）

日图挟制袁世凯

十二月六日清晨“应瑞”、“通济”两舰一齐向“肇和”发炮攻击。

“肇和”舰上的同志们，骤然面临意外事态，慌忙还击，但因来不及作周全部署，不能得心应手，命中率甚差，而舰上则死伤枕藉。

因此，“肇和”打算暂且避往吴淞口；可是没想到由于不懂电气起锚法不能开动。

起义顿挫再图进行

于是，革命军海军陆战队司令杨虎乃决定据守“肇和”，应战到底；但被来自“应瑞”的炮弹击中锅炉房，又增加了多数伤亡，终于不得不接受同志劝告，下令撤退，他本人也在弹雨之下移乘舢舨脱险。

在舰内响应起义的陈可钧同志，因负伤未能脱出，和其他同志十多人被敌方逮捕。

自总机关部脱险出来的陈其美，仍然隐处市区。翌日～～十二月六日清晨，听到军舰上的激烈炮击，得知“肇和”受“应瑞”和“通济”猛攻，立即准备小舟，打算前往“肇和”舰上；正当此时，杨虎脱险归来，报告失败经过——起义战争，乃以遭遇顿挫而终结。

‘是役也，海陆各方面死者二十余人，伤者以百计。公（陈其美）受此大挫，维持秩序，办理善后，卒能措置裕余，再图进行，迄无稍馁。’（注）

当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于十二月十六日以机密第一○一号向外相石井菊次郎报告有关“肇和”军舰的事件如左：

“该国最新世的军舰，被数十名革命党掩袭、强制，便立即炮击官军（袁军）——从这个事实衡量其政府方面所谓维持治安能力，其极为脆弱的程度，该可以得到明白证据。是则陈其美等人仅仅依赖极少数人的内应，且无充分准备，便轻易发难的事实，吾人可以认为其并非如一般所想像的鲁莽从事、徒逞血气之勇，而是多少有点自信的。”

这个事件，在当时对于日本政府和中华民国之间，又引起了一次料想不到的纠葛。

问题是因美国的通讯社远东局于十二月九日自北京发出如下的电讯开端——“用于造反的武器，是由日本所供给。此外，根据孙文所签署的文书，显见是以日本为其根据地。然则，日本政府明知其事，却毫不采取任何措施。而且此次事件，确系和孙文同谋的日本人所发动。”

在日本方面，认为该通讯社早就是承受袁世凯意旨的宣传机关，因此以为这个报导是出于袁世凯方面所故意透露的情报，故而要求中国辟谣，但中国则对之否认与该通讯社有关。

其后，自“肇和”殉难的实习生陈可钧行李中发现有孙先生签署的委任状五件，证实与孙先生有关，日本方面才为之罢手。

至于参加过“肇和”事件的日本人，据有吉明向外相报告——“南满铁道会社嘱托（特约人员）山田纯三郎多少有点关系；此外，好像没有别人。”但据黑龙会所编“东亚先觉志士传记”则尚有“志村光治等数人”。

日反转来干涉帝制

现在再看镇压革命党奏功、一意走向帝制自为道路的袁世凯，在他的计算中则有一个很大的失误。

袁世凯相信日本会遵守“二十一条”的交换条件，而对于自己实现帝制能有所协助；殊不知日本的协助帝制承诺，只不过是一种为达目的的交易手法，及至交涉结束之后，什么约定不约定，已经是利用完毕之后的事。而且一当古德诺的论文发表，杨度等人的“筹安会”开锣，帝制运动日益热烈，日本却反而有开始干涉帝制的动向。

袁世凯所倚靠的是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他很早就对大隈寄予信赖，甚至连大隈的亲笔信都郑重地秘密藏起来。

先是当“二十一条”开始交涉之际，大隈重信曾经透过新闻报导表示赞成帝制；其后，在九月初，再度以“中国的国体问题”为题在报纸上发表为袁世凯捧场的谈话如下：“……中国大多数人民，对于恢复帝制事必不反对，袁氏面对中国今日之难局，绰绰有余的显示其统治能力，不失为中国现代一大伟人，其皇帝自为，任何人亦不致引以为怪。”

袁世凯听到这样窝心的话，当然会为之喜出望外。

然而，大隈的赞助帝制，归根结底只不过是装腔作态而已。

及至九月六日，大隈重信接见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便发出了如下的警告：

“中国民主、君主，非日本所问；唯万一因此致乱，有妨碍邻国商务，殊有碍难……”

就在同一天，大隈电令驻北京临时代理公使小幡酉吉加以约束——“关于是否赞成帝制，不宜轻率表示态度。”继之，又于二十七日命令驻中国各地领事调查“如果实现帝制，会不会发生暴动等事态？”二十九日，更训令驻英大使井上胜之助——“盼以个人立场秘密探询英国方面对于袁世凯帝制计划的意见。”

在这个当口，日本已经看透了帝制运动的前途，因而开始打算和对于袁世凯影响力较大的英国联手起来，阻止帝制计划的推进。

注：蒋总统-“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一九一六五）

英俄日联合行动

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之所以倾向于反对帝制，并不仅由于耽心中国国内会发生混乱，而是当时主张对中国积极发展的日本人士们恐怕袁世凯的权力增强，会有碍日本侵略行动的进展。例如在日本政府内部，法务大臣尾崎行雄、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等人，就是站在这种强硬论的立场。

日人所图进行的阴谋

此外，民间人士如内田良平等右翼浪人，也都是积极论的倡导者。内田自八月下旬开始，便向大隈内阁的阁僚们游说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十月间，更向大隈重信提出“支那帝政问题意见书”，建议采取——“对于帝制暂不表明态度，等到其见诸实行的阶段，予以否定，而将袁世凯政权扼杀”的阴谋。

大隈重信的态度，受到这些强硬论者意见的影响颇为不小。

在另一方面，英国的动态也相当微妙。

当一九一五年九月间，日本向英国活动阻止袁世凯帝制运动的时候，英国还是站在支持帝制的立场，其推进者，则是驻华公使朱尔典。朱尔典和袁世凯是三十年的老朋友，袁世凯对他毫无戒心，是无话不谈的。

十月二日，袁世凯和朱尔典就帝制问题，进行密谈，留有如下的纪录：

朱尔典我们外国人所希望的是中国能有永久和平，如果大总统认为变更国体是确保和平的唯一方法，则为什么还不见诸实行？

袁世凯可是，外国的意见，也不能不加以考虑。

朱尔典他国态度如何，固然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是确实的——就是英国和贵国的友好关系。就像在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诚意给予承认一样，如果恢复帝制，也会照样办理。英国对于恢复帝制，是会乐意加以承认的。

这一段期间，在袁世凯幕后操纵之下，帝制派的运动达到了高潮，乃于十月八日公布筹画变更国体——也就是筹画帝制的“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制造出一个托付民意而实际是为袁世凯铺路，以推戴其践祚的“国民代表大会”。

针对这个情况，日本方面于十四日举行内阁会议，正式决定了阻止袁世凯实行帝制的方针；其进行步骤是首先邀同英国对袁世凯政府发出劝告，同时，并拉拢俄、法、美各国也加入劝告国。

日本拉拢英俄

日本驻英大使井上胜之助，遵照阁议决定，于十月十八日向英国政府提出日本的方针，英国政府则一度予以拒绝。

这是由于偏信了在北京的朱尔典报告——“帝制运动在逐步推进中，中国国内不致有因此而发生混乱的危险”之所致。

然而，只不过在三天之后的二十一日，英国突然一百八十度地转变了他的态度，外相葛雷向井上胜之助表达同意日本的方针——英国也看到了如果勉强实行帝制，将造成治安混乱，进而使他在中国的权利会受到损害。

英国方针的转变，是伦敦方面根据判断所决定，而在北京的朱尔典却仍然站在支持帝制的立场，并未改变。据日本驻英大使井上胜之助于十一月六日向外相石井菊次郎发出第五○八号电报报告——“英国政府似已对朱尔典有所说服”，但实则英国政府虽有指示，而朱尔典在其后还是非公开地积极从事促进实现帝制的活动。

就在这个前后，俄国也同意了日本的方针。

十月二十八日下午，驻华日本代理公使小幡酉吉约同英国公使朱尔典、俄国公使库朋斯基，拜会外交总长陆征祥，代表三国作了如左的劝告：

“中国规复帝制，进行甚速；但其里面反对暗潮甚烈，如果一旦实行，恐怕发生事变……万一中国国内有动摇情形，不仅为中国之不幸，即与中国关系较深之各国，亦诚可忧……愿袁大总统出以贤明之措置，将实行帝制之期暂为延缓，以防患于未然，而巩固远东和平之基础。日本政府为此劝告，决非干涉中国内政。”

同席的英、俄两国公使，也表达了同意日本劝告的态度。

袁世凯表明称帝决心

袁世凯政府，针对此一劝告，于十月一日答复如下：

“中国帝制之主张，历时已久，政府曾叠次拒驳；乃近日此项主张日渐增加，如专事压制，恐与治安有碍……

“政府当人民向立法院请愿时，认为不合时宜……本国约法，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国体问题，政府不得不听国民之公决……各省均谓顺从民意解决，则可负治安之责。”

袁世凯在顺从民意的藉口之下，明白地表示出推进帝制的决心，并对于三国劝告采取拒绝态度。

到了这个当口，袁世凯仍然对于大隈重信的友好关系寄予期待；他被帝位所迷惑，认为如果对日本作某些让步，大致不会成问题。

另据当时俄国驻日本大使马烈威透露：中国公使陆宗舆曾于十一月四日向俄国大使馆表示——“刚好又是日本天皇（大正）加冕典礼的时候，中国实施帝制不妨延期一个月举行。像这样的条件，日本会不会予以同意，拜托代为探询。”

各国谋略活动

十一月三日（一九一五年），法国驻华公使康悌，也遵奉其本国政府的训令，向袁世凯政府提出和日本旨趣相同的劝告，于是，劝告国便增加到四个国家。

日本方面的态度颇为强硬，外相石井菊次郎更进一步对驻日公使陆宗舆发出警告——“中国已经表明并无急切改制之意；但如万一突然实施帝制，不啻是对日本的一种侮辱。”

因具有代表日本立场的强硬态度而感到震惊的袁世凯，乃于九日派遣外交部官员到日、英、俄、法四国公使馆，非正式地说明：“帝制一事，暂且延缓，本年内断不实行。”

接着又在十一日，邀请四国公使前来外交部，正式表明态度——“中国变更国体，早决于多数国民之志愿，倘有任何意外，政府自信有足以对付之力量，不过，为尊重各国劝告，兼以筹备费时，所以延期实行。”

五国采取同一步调

十二日，意大利也加入了延期实施帝制的劝告国，至此已有五国采取同一步调。但唯有美国认为帝制是中国美内政问题，只要不妨害他的在华利益，则不予干涉。

五个国家之所以一致劝告帝制延期，是由于各自图谋维护其本国在中国的利益，并且抱有倘使遇得机会再将利益扩大的意图。

其意图之一～～是将德国的势力从亚洲赶出去。在这方面，五国的利害虽然一致，但却各自伺机争着先鞭，互相牵制，其步伐也并非完全协调；是则在表面上，各国虽然携手合作，但实则是以帝制为其交易材料，反覆展开虚虚实实尔虞我诈的外交战术，以谋为其本国获得利益。最足以显示出谋略表征的，是牵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

在前面曾经提到，中华民国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表明过“中立”的立场。在亚洲的战火，由于青岛易手，虽然大致已经平熄，不过，整个世界则二分为德意志、奥地利、土尔其等所结成的“同盟国”，和英、法、俄、日等携手的“协约国”；双方面的战争尚在欧洲继续进行中。“同盟”和“协约”两方面都为了想把“中立国”——中华民国拉进自己的阵营而积极活动。

在前面已曾提到过，当一九一四年十一月，日军攻下青岛之际，曾经发现一件秘密文书--就是德国和袁世凯之间所缔结之承认帝制的密约。

可是，到了帝制运动积极开展的一九一五年十月中旬，德国驻华公使辛慈却表示在欧战结束之前，反对实施帝制的意向。这是由于当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是帝制的推进论者，所以德国要对英国的活动加以牵制。

然而，及至基于日本倡议、英国等“协约国”方面发出劝告帝制延期的阶段，德国的态度突然改变，重新恢复了承认帝制的方针。

图诱中国加入协约国

相对地，在“协约国”方面，则更希望将中国拉进自己阵营，对德宣战，一扫德国在华势力，其中以俄国最为热心。俄国是因为苦于在欧洲战场的武器不敷供应，故而希望能得到由中国的兵工厂供给武器。

由于这些背景，首先是英、法、俄三国大致尚能团结一致，接着则要把日本引为同志。于是，英、法、俄三国驻日本大使乃于十一月廿二日向日本政府提出对华要求事项如左，征求同意。

一、先诱导中国与德国断绝国交，并加入协约国。

二、驱逐在华德侨出中国境外，以消除其在西伯利亚、远东、以及印度等地的阴谋。

三、由中国提供兵工厂给协约国，并供给俄国部分武器。

对于三国的提议，日本政府则于十二月六日以“日本的基本方针是保持中国国内和平安宁使免于战乱惨祸”的理由，予以拒绝。

日本拒绝三国提议的真正因素，实则并非仅为谋求“中国国内和平”，而是由于考虑到假定中国参战，则将来便有参加媾和会议的地位，也许会对日本要求修正二十一条条约，以及收回已经给予日本的某些权利；还有，与其使中国参战，成为协约国的伙伴，则莫如使其中立下去，不让其有所行动——在日本来说，是比较有利的。

一度密商中英同盟

此外，在“协约国”阵营的各国之中，英国则利用驻华公使朱尔典和袁世凯的关系，闷声不响地在幕后进行着独自工作。

朱尔典藉为了策动中国参战的机会，连带地向袁世凯提议——缔结“中英同盟”。这个同盟的期间为十年，内容是由英国负责疏通列强承认中国帝制，以及赞助中国加入国际团体。英国的手法是～～一方面和协约国各国共同劝告帝制延期，另一方面却又使朱尔典讨好袁世凯，以谋在帝制实施之后，得到特别有利的机会。

这个抢先下手的秘密计划，被美国报纸将之揭发。大为吃惊的日本，乃向英国质问其真意所在。于是，英国外相葛雷遂命驻日大使葛林于十一月二十七日拜会日本外务次官币原喜重郎，保证“英国未经和日本协商，不考虑和中国缔结任何协定。”

同时，日本外相石井菊次郎，更曾再三向英国叮嘱“没有得到日本同意和参加，不能和中国成立任何协定”——于是“中英同盟”便因之胎死腹中。

袁世凯布置称帝

面对着各国这些谋略活动，就像是旁观者一样的袁世凯，对于国内体制，则逐渐在强化之中。

制造民意无一反对票

十二月十一日（一九一五年）上午九时，参政院汇查“国民代表大会”的投票，其结果在投票总数一千九百九十三票之中，出现了没有一票反对值得惊异的一致现象；旋即据以向袁世凯上达推戴书——“敬谨推戴袁大总统为‘中华帝国’皇帝，奉献国家至高无上主权。”袁世凯一度表现谦辞姿态，但实则是等到傍晚再度推戴，便欣然接受。

此时，是在上海的“肇和起义”（十二月五日）以失败而终之后，才一个星期不到。

据当时任外交部次长的曹汝霖所著“一生之回忆”提到——在这个时候，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和袁世凯见面，还在劝进。朱尔典是在“推戴”的不久之前秘密见到袁世凯，力说：“对于五国劝告，没有介意的必要，帝制问题本来是内政问题，外国不应干涉。”袁世凯对于朱尔典的劝进，认为就是“英国方针已有改变，朱尔典必定奉有密令”，因而大为得意；殊不知这完全是朱尔典在替他加油，至于英国希望帝制延期的态度却并没有改变。

据说袁世凯就是由于朱尔典此时的劝进，而下定了帝制自为的决心。

袁世凯积极准备登极

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凯在怀仁堂召集高级官员二百多人，举行接受推戴的贺礼之后，发表演说如下：

“大位在身，永无息肩之日；故皇帝实为忧勤惕励之地位，决不可以安富尊荣视之……余为救国救民计，牺牲子孙又不敢避。”

十二月十四日，驻日公使陆宗舆拜访日本外相石井菊次郎，再度表达袁世凯的立场——“国体由国民公决，政府不能反对。但因需筹备，暂行延期实施，这也是对友邦劝告表示尊重。”

此时，石井外相并无积极反对意向。日本这个态度，是由于在先拒绝了英、法、俄三国所提倡的要求中国“参战”，与各国之间发生了摩擦；因而唯恐现在只有日本一国再特地对袁世凯表示反对，将会招致各国的排斥。

在如此气氛之下，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偕同英、法、俄、意四国公使于十五日到外交部提出措辞比较稳健的第二次劝告——“五国政府继续注视将来情势的发展。”

各国的“观望”态度，对于袁世凯来说，是比较有利的。袁世凯积极筹备实施帝制，十九日正式成立了负责筹办“登极”事宜的“大典筹备处”，实际这个筹备处早在九月间就已经秘密设立。

帝制费用六千万元

袁世凯为了筹备践祚，毫不吝惜经费支出。根据革命军在后来的调查，帝制费用总额约达六千万元；如果以今天的货币实质换算，则大致为二亿五千万美元之钜。不过，当时明白记入账册可资稽考的约为三千万元，至于秘密支付的详数不明。

这些费用的来源，有获自银行借款，有挪用救国储金，有各项税款乃至鸦片专卖等类收入。

在可资稽考的三千万元之中，预计以二千万元为大典经费，一千万元为登极犒军费用及战费。

龙椅、龙袍、御玺

“大典筹备处”的最初工作，是将以前清廷的“太和殿”改名“承运殿”，为适合“袁皇帝”御用而加以修建，殿内圆柱都漆成喜气洋溢的朱红色，当中八大柱加髹赤金，饰以天子象征的盘龙云彩。办公房屋都装设新式热水管暖气，旧有板壁全部改镶玻璃——诸如此类的修建改装费用，计达四百七十万元（约为今天币值的二千万美元）。

皇帝的“御座”，豪华到价值四十万元，扶手、靠背，以及黄缎椅套、椅垫等，一律雕龙、绣龙。

“御座”前，有雕龙御案；案前排列象征帝王权威的三座古鼎，三座古炉；御座后面，陈设九面雕龙嵌宝石屏风；屏风左右两边，有日月宝扇一对。

皇帝龙袍，由北京最大服装店“瑞蚨祥”特别定制，用赤金线盘织龙衮，通体缀以明珠，嵌以钻石，有祭天用（五十万元）和即位用（三十万元）两袭。

此外，筹安会方面所支付的运动费，也所费不赀。

自全国赶来的帝制请愿人士，由筹安会发给每人五百元乃至一千元，加以收买；为请愿而花费的电报费约一百万元；以及为制造舆论收买新闻界支出三十万元。更有三百万元为袁世凯的亲信杨度等人饱入私囊。

举行各种典礼的孔子庙，在清朝时代一律采用黄色，现在“袁家朝廷”风尚红色，由拜垫到帐幔都改用红缎。

镌有“中华帝国之玺”和“皇帝之宝”的御玺，是以四寸见方的宝玉新刻；御玺之上，镌有“诞膺天命历祚无疆”八字。又在中华民国国旗——“五色旗”之上加印红日一轮，表示“五族共戴一君”。更有以袁世凯肖像为图案所铸造的银币。

在阳历年底的十二月三十一日，袁世凯下令明年～～一九一六年，也就是中华民国五年，改元为“洪宪元年”。

护国军起义

袁世凯接受推戴为“中华帝国皇帝”，对于讨袁气势，不啻是在火上加油。

成为讨袁最大推进力的是护国军。

“护国军”是在袁世凯被推戴的几天之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由云南将军（即原来的都督）唐继尧和蔡锷、李烈钧等人举兵起义，在云南宣布独立时所编组的部队名称。自此开始，而向贵州、四川、广西等西南地区各省扩大，终于迫使袁世凯放弃帝制，沮丧之余，于次年抑郁而终。

蔡锷李烈钧赶到云南

“护国军”的中心人物之一，是蔡锷。

蔡锷在辛亥革命之际，率领新军，光复云南全省，出任云南都督，在云、贵两省培植有很大的势力。距离北京辽远的西南各省，在袁世凯说来实有鞭长莫及之势；他对蔡锷的势力感到畏忌，故而将之召回北京，形同软禁。

尽管如此，但蔡锷仍然和云南方面秘密联络，策进讨袁计划；由于后任云南将军唐继尧曾经是他的部下，乃以密码电报指示作发难的准备。

蔡锷于十一月十一日夜晚，避过了袁世凯的监视耳目，由北京被软禁的地方脱出，一度称病住进天津日本共立医院，在院中换穿和服、化名乘日本轮船“山东丸”东度日本；然后绕道台湾、香港、河内，于十二月十九日到达云南省会昆明。

在昆明，已有二次革命主角李烈钧赶先一步到达。李烈钧当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亡命日本，转赴新嘉坡居留；因孙先生的敦促，前来云南。

由于蔡、李二人抵步，起义的态势为之齐备，即由云南将军唐继尧于十二月二十三日电请袁世凯取消帝制，并要求将策画帝制的亲信杨度等十三人即日明正典刑；在二十四小时内如无圆满答复，则诉诸武力以谋最后解决——不啻是一个最后通牒。

可是，袁世凯却只叫政事堂答复：“此电想系他人捏造”，袁本人则佯作不知。

十二月二十五日，云南终于宣告独立，废去将军，恢复都督名义，由唐继尧就任都督，定名为“护国军”。

护国军声势浩大

“护国军”命名由来，是因举行会议宣告独立的会场在“护国寺”；而且顾名思义，是为了保护国家。

“护国军”在：（一）与全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二）划定中央、地方权限，图各省民力之自由发展等口号之下，号召各省同时起义。

“护国军”编成三军——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进攻四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指向两广；唐继尧为第三军总司令，坐镇云南。

袁世凯接到“护国军”发难的报告，立即下令解除唐继尧等人职务，任命云南第一师师长张子贞代理将军，令其逮捕蔡锷等人，但张子贞拒不受命。

袁世凯急忙在中央成立“征滇临时军务处”，而“护国军”的声势则日益浩大，接着有贵州、广西、广东、湖南等西南各省陆续发表独立宣言，向全国性的讨袁运动扩展中。

袁世凯就是在“护国军”的攻势之下迎接了一九一六年的元旦——本来应该是“洪宪”纪元的第一天，是他得偿宿愿、正位“九五”的吉日。

袁世凯延期登极

可是，由于“护国军”的起义，给予注视中国动向的列强国家以“国内有欠安定”的印象，于是各国驻华公使馆乃以“内部尚未达成统一”的理由，对于袁世凯的“登极”颇示难色，并且连“洪宪”年号也不予承认；因此，原来预定在元旦举行的“即位大典”，乃决定延期到二月初。

及至一月中旬，各国见到“护国军”的行动愈益活跃，都向袁世凯探询对于地方起义的对策如何？

袁世凯对于这些询问，一概答称自信可以在短期内予以平定。

然而，实际战况却不如理想，袁世凯乃急于要打出一手有效的措施，以谋扭转局势；于是在焦灼之中产生了一个办法——就是派遣特使前往日本。

此时，“中英同盟”等工作已经归于失败，袁世凯所期待于英国的助力，难望实现；至于日本固然也曾有希望延期实施帝制的劝告，然而在袁世凯的揣度中则是——只要让日本体会到能有些利益可图，则日本便会倒向自己这一边。

刚好日本大正天皇的加冕典礼在上年～～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日举行，当时中国只派驻日公使陆宗舆参加，现在虽已为时稍晚，但不妨仍旧以庆贺为藉口而派遣特使——这种举动之含有政治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中、日两国之间，自一九一五年年底开始，秘密磋商关于派遣特使的问题。

袁世凯决定以农商总长周自齐担任特使，打算对大正天皇赠予大勋位。

驻日公使陆宗舆在和日本方面商洽之后，决定了特使于一九一六年元月二十四日到达东京的日程表，日方且已安排接待周自齐特使以亲王之礼。

继之在八月十三日，推进帝制运动的“筹安会”，宣告组成。

尽管如此标榜，但实则为君主立宪制造舆论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担任该会理事长的杨度，并且发表“君宪救国论”等文章三篇，不断呼吁实施帝制。（《秘录》四册一八五页）然而，实际战况却不如理想，袁世凯乃急于要打出一手有效的措施，以谋扭转局势；于是在焦灼之中产生了一个办法——就是派遣特使前往日本。而在袁世凯的揣度中则是——只要让日本体会4[227]979到能有些利益可图，则日本便会倒向自己这一边。中、日两国之间，自一九一五年年底开始，秘密磋商关于派遣特使的问题。

日本突转而反袁

当时，在中国国内，盛传袁世凯由于亟谋践祚称帝，对于劝告延期实施帝制的各国，秘密给予某种权利。袁世凯考虑到此种流言如果传播开去，则对于讨袁行动更会火上加油，因而十分希望将流言平息，特地要求各有关国家声明没有这样的密约。

密约草案被法使盗出

可是，对日本派遣特使，却更增加了谣言的传播，以致各国都在注视中、日之间可能会有密约，而探索其情报；其中最热心的是法国驻华公使康悌，他收买了袁世凯的使用人，从机密文件箱中将中、日密约草案盗出，拍照之后，不动声色仍将原件送回文件箱中。不久之后，则在纽约的报纸上将其内容暴露——这是离间中、日关系的一种手段。

就在这个前后，日本的报纸也报导了袁世凯的祝贺特使将带来如下的赠李和要求：

甲：赠与条件：

一、吉林、奉天两省司法权让与日本。

二、津浦铁道北段管辖权让归日本。

三、天津、山东沿海一带海岸线让归日本。

四、聘日人为财政顾问。

五、聘日人为军队教练官。

六、中国兵工厂归中日合办。

乙：要求条件：

一、承认帝制。

二、代平内乱。

赠与条件，是比日本在二十一条要求中所未能达到的目的，更为加重，简直是把国家出卖到了极限的赠礼。然而，在只顾帝制自为、利令智昏的袁世凯心目之中，这点赠与倒是很合算的交易。

赴日特使突遭拒绝

周自齐特使出发的日期日益接近，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特地于元月十四日（一九一六年）在北京公使馆举行欢送会；不料，就在翌日～～十五日，日本外相石井菊次郎却急电日置益，以“天皇外出避寒，无法接待”为理由，拒绝周特使前往。

这个决定，如何来得这样地突然，可以从下面一个情况看得出来。就是在十五日的当天，日置益还曾致电石井菊次郎外相——“据中国特使随员表示：因革命分子可能会有不稳妥的活动，希望日本方面能准备由奉天（沈阳）开出专车，务请政府迅赐决定。”

石井菊次郎接着就在当天再度发来电报，说明实情如下：

照理特使是为“祝贺”而来，但据北京的新闻和电迅报导，却带有政治色彩。而且据说日本之接受特使，是以承认帝制为交换条件，得到中国的种种赠与。这些传说，徒然刺激舆论，扰乱日本的政策决定。

可见日本是因为和袁世凯交易的秘密外泄，而恐怕惹起国际问题。

趁机踹袁世凯一脚

除上述理由之外，在日本方面还有一个意图——就是要对焦灼中的袁世凯加以摇撼，以便加强日本对于中国的发言权，而等到这个时机突然采取具体行动。这种作法，是由军部在导演的。军部的看法是：当此袁世凯苦于对西南各省护国军的肆应之际，不但不要欢迎他的特使，更毋宁说是踹他一脚的最好机会。

这个时候，日本的军部和大陆浪人要求推进反袁政策的运动，相当积极；甚至在元月十二日发生了大隈重信首相被要求反袁的大陆浪人投掷炸弹（但未曾爆炸）的事件。

关于密约被泄露的问题，大隈重信首相曾经召见中华民国驻日公使陆宗舆加以责难：“这一事件，前次已经和足下约定除你、我和项城（袁世凯）之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像这样不能保守秘密，还有什么好说的！”

陆宗舆观察日本方面在当时的气氛，于十六日向外交部报告如次：

“看彼逐日阁议及元老往来之状态，似不仅谢绝特使而已；彼政府乱暴举动，每出意外，其欲倒我政府计划，已非一日。”

日本突然转而采取了反袁的行动。

十八日，驻华公使馆副武官坂西利八郎大佐以奉参谋次长田中义一之命，要求谒见袁世凯，透露出日本要采取强硬态度的气氛。翌日～～十九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对袁世凯给予警告。

日以出兵为威胁

二十一日，石井菊次郎外相召见陆宗舆公使，再度会谈；据陆宗舆向外交部报告，其内容充满威胁性，原文如下：

“石井报称：英、日向有维持东亚和平之约；日本有维持东亚和平之举，英国当然赞同。法怕安南有乱，驻兵甚少，亦望日本维持。俄则唯日本之命——外交既已妥洽，当再严词警告中国政府延缓帝制；如不听，则出以自由行动，派（兵）驻中国要地。一面认云南护国军为交战团体，一面宣告中国现政府妨害东亚和平。”

日本透露出将要“出兵”的威胁手段，发生了很大的效果。

袁世凯立即为之屈服，向日本表示——将预定二月初“即位”的时期，再行延缓。

袁世凯穷途末路

列强对于在云南起义的护国军，其看法颇为纷歧。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在一九一六年一月中旬判断情势，向其本国政府提出报告，认为云南起义将会被平定。

诚然蔡锷所率领的护国军，只约有三千兵力；而相对地在袁世凯方面由将军陈宦指挥的有两个师及三个混成旅，居于压倒性的优势。不仅是美国，就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忙于肆应欧洲战局的西欧各国，也都对袁世凯抱有乐观的展望。

可是，唯有日本的看法不同。日本正确地掌握到因云南起义而引起袁世凯政权内部动摇的情况，看出其改制称帝已有困难。

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于二月二十一日发出第一四五号电报，向石井菊次郎外相报告：“大势已对袁世凯不利。”“中央政府当局自袁世凯以下，虽然大致都还在故示乐观，但其内部倾向于悲观的人，颇为不少……”几乎认为帝制的实施已经是提都不用提了。

袁世凯陷入财政危机。

在财政方面，袁世凯也面临了苦于支应的境地。

前面已经提到过，袁世凯为了筹备正位九五，毫不吝惜地浪费钜额经费。这些钱都是向银行等方面借来支应的，再加上还得要筹措镇压护国军的军费，由腹地派遣军队前往边远之地的云南，当然需要相当大的一笔数字。

国库的通常收入，已经是超越了限度；因此，袁世凯唯有考虑依赖举借外债。只是欧洲各国正苦于战争，没有供给借款的余力；不用说日本则是站在反袁的立场，故而剩下来唯一可以指望的，就只有美国。于是，乃于一九一五年底通过外交部再三命令驻美公使顾维钧交涉借款。

在命令中有：“……希立即磋商借款，纵使条件稍有出入，总期获得妥协，迅速拨款。”简直是大旱之望云霓；可是，结果却被美国拒绝，而未见实现。袁世凯最后的唯一手段，是只得以烟酒公卖收入为担保，发行二千万元的国内公债救急——财政上的危机，已经进入了崩溃阶段。

日本之所以放弃袁世凯，开始支持反袁活动，就是由于掌握到这一些情势。

中国国内的混乱状况越发严重，在日本来说真正是求之不得

。故而秘密指使驻华各地领事馆和军部等各方面，进行着反袁工作。

日本暗助反袁活动

早在云南起义之前，日本便对反袁活动给予助力。譬如说蔡锷、梁启超、岑春暄等护国军中心人物，就是由日本领事馆积极掩护，得以躲过袁世凯的追踪而被送达云南。当时担任总统府秘书兼机要局长的张一麟便曾在他所著“心太平室文集”中提到日本领事馆使蔡锷等人换穿和服，由日本艺妓同行，瞒过中国警察监视的事实。

及至云南发难的同时，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又特别派遣少校级的军官前往云南，以及调派青木宣纯中将出任驻上海总领事馆武官，都是高阶低就的破格人事部署，赋予特殊任务。

此外，在元月中旬被察觉的暗杀袁世凯未遂事件中，日本军部且曾掩护主谋者北京顺天医院院长江某，由驻广东武官给予介绍信，助其逃亡日本。

袁世凯对于日本军部的暗中活动，深感棘手，特地电令各地将军“严密注意日本武官的行动”。

和军部串通一气的一部分日本政客及大陆浪人们，也群力推动反袁运动。二月下旬，立宪政友会、立宪同志会等政党议员和隶属于“对支（中）联合会”等组织的大陆浪人们，在东京举行大会，决议“要袁世凯立即下台”。

三月七日，日本举行内阁会议，在军部的压力之下，终于正式决定采取反袁政策。

当时，立宪政友会总裁原敬在三月三日的日记中记述：“大陆浪人反袁活动的背后，有陆军参谋本部支持。”“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谈到陆军压迫外务省促成阁议的决定。”

日本的目的在确立优势

日本阁议决定的目的是——“在中国确立优越势力，使中国国民对日本势力有所自觉。”故而指斥袁世凯的存在是达成这个目的的障碍；可是却并不由自己下手去打倒袁世凯，而从推动中国内部的反袁势力造成倒袁的情势着手，于是乃决定采取如下所述的两项具体手段：

一、在适当时机，承认护国军为交战团体。

二、日本政府对于日本民间志士同情反袁势力及提供资金，虽不公然鼓励，但予以默认。

其后，日本政府依据这个方针，不仅对护国军给予支援，并且在山东省半公开地协助革命军，以及推进“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插手于全面反袁活动。

日本政府这样的举措，在袁世凯来说，是受到了决定性的打击。

袁世凯取消帝制

在云南发难的护国军攻势，虽然不够迅烈，但逐渐在向各省扩展之中。继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贵州独立后，三月十五日，广西也发表独立宣言，由陆荣廷担任都督。广西省之加入护国军阵营，大出袁世凯意外。

因为一直到这个时候，在袁世凯的计划中，还是要调遣两广军队去镇压云贵护国军的。

又在广东省方面，更有朱执信．陈炯明等人遵奉孙先生的指示，自二月以来便在各地策动起义，打击袁世凯。

五将军联名密电

看到情势的变化是这样地对袁世凯不利，终于在袁氏的心腹干部之中，也燃起了倒戈的火焰。

三月二十日，在江苏的冯国璋、张勋、江西的李纯、浙江的朱瑞、山东的靳云鹏五将军联名密电袁世凯，毫不客气地“请从速取消帝制，以息云、贵之怒。”五将军在此之前都是袁世凯特加倚任、控驭宇内的大员，现在则更是寄望其为讨平各地中华革命军和护国军的重镇。

在五将军离心之后的袁世凯，这才到了大彻大悟的时刻。

翌日～～二十一日，袁世凯召集政府重要干部，举行紧急会议，一向反对帝制的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等大员都在被邀之列。为了请他们几位到会，袁世凯亲笔写信，并由送信人恳挚致意——“有事奉商，请看在多年的交情，务必劳驾。”

在会议中，袁世凯首先以沉重的语气表示：“立即取消帝制。”出席的人虽然多数赞成，但都沉默不语；而发表意见者则是反对取消帝制的内务总长朱启钤等人。

其中安徽将军倪嗣冲表现出怒发冲冠的神情，扬言：“何物小丑，不自量力，敢以取消帝制为要挟？臣誓死扫荡群丑。”

面对着神气十足、语调激越的倪嗣冲，袁世凯摇摇头沉痛地出示了五将军的密电，倪嗣冲在过目之后，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不再吭声。

取消帝位仍恋栈权位

如果失去北洋军阀一部分主力的五将军支持，则帝制实施已为不可能之事。于是，便在沉郁的气氛之下决定了“取消帝制”而散会。

袁世凯接着便在第二天～～二十二日下令宣布取消帝制：

“……将上年十二月十二日承认帝制之案，即行撤销……万方有罪，在余一人；今承认之案，业已撤消，如有扰乱地方……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

自宣告改元“洪宪”年号以来，只有八十三天的帝制丑剧，便这样地匆匆谢幕。

然而，就从这个命令可以了解袁世凯对于做皇帝虽然死了这条心，但仍旧赖在大总统的宝座上不肯下来。他在会议之后，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段祺瑞为参谋总长，想拉拢住一部分反对帝制的人士种建其统治体制。

袁世凯是这样在力谋延续其权位；相对地，讨袁的活动也仍然在进行之中。

此时，以江苏省为活动重点的中华革命党，在陈其美指挥之下，正争取着发难的机会。

总统领导袭取江阴要塞

被列为第一目标的，是在距离上海西北约一百三十公里的“江阴要塞”。江阴居于长江东流入海、江面陡然宽阔的地理位置；将雄踞在那里的要塞夺取过来，是扼死袁世凯海军活动的战略。

当时，蒋总统虚岁三十岁，是陈其美最信任的同志，奉命担任指挥攻击江阴要塞的最困难任务。

四月十四日，中华革命党以蒋总统与杨虎领导举兵发难，立即发表江阴独立宣言。

对于江阴炮台的突袭进攻，一度得手，守备炮台的士兵们被说服响应起义，追随革命军行动，江阴城区也归于革命军掌握。

未料，在占领炮台的五天之后，内部发生了叛变，以致革命军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当时，一般同我去的革命党员，到了最危险的关头，都纷纷逃跑了，只留我自己一人在江阴炮台上。’（注一）

只有一个人，不顾生命危险置身于敌阵，所获的体验，是颇为珍贵的。

‘为什么我们能始终不懈的干呢？没有旁的，就是不怕死！我们每到最危险的时候，想到自己是为革命而牺牲，便觉得心安理得，死得其所，所以不仅不怕，而且非常快乐！’（注二）

可是，同志们终于没有回到江阴炮台来，追随革命军行动的士兵们也看不见踪影，不久，出现了两个士兵，劝说“要塞里面，已经再没有任何同志了，危险得很，还是离开这里吧！”于是蒋总统便在这两个人的向导之下，自要塞地区脱出，返回上海。

江阴一带的革命军，也遭受到冯国璋属下重兵和海军的夹击，死伤数十人而败退。

注一：蒋总统-“革命军官必具的要素”（一九三三八）

注二：（同右）

国父自日归国

‘肇和兵舰的起义（一九一五年十二月）、江阴炮台的袭击（一九一六年四月），在事前我们可以说毫无凭藉。因为我们奉了总理的命令，义无反顾，所以赤手空拳去干。这两件事后来虽归失败，但在精神上对于袁世凯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注一）

正当中国各地相继举兵讨袁高潮之际的一九一六年五月初，孙先生乘日本轮船“近江丸”返抵上海。自二次革命失败而不得不于一九一三年八月亡命日本以来，历时三年九个月归国，有戴季陶、廖仲恺同行。

其时，日本军部和孙先生有秘密联络。孙先生在归国之际，曾经电达上海，通过日本志士山田纯三郎转达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武官陆军中将青木宣纯派人迎接。

由于孙先生归抵上海，革命军的活动也为之活跃起来。

国父发表讨袁宣言

在山东不断策划发难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见注三）于五月四日在潍县周村举兵起义。九日，孙先生亲自发表讨袁宣言如左：

“……袁氏今日，势已穷蹙，而犹徘徊观望，不肯自归于司败（司败即司寇，掌刑狱之官，意谓不肯自承罪责），此固由其素性贪利怙权，至死不悟；然见乎倡义者之有派别可寻，窃疑党争未弭，觊觎其猜忌自纷，而不能用全力以讨贼……今主义既合，目的不殊，本其爱国之精神，相提携于事实；见仇者虽欲有所快，无能幸也。今日为众谋救国之日，决非群雄逐鹿之时，故除以武力取彼凶残外，凡百可本之约法，以为解决……”

情势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可是，袁世凯犹自使用极其卑劣的手段，来和革命军对抗——就是在五月十八日，暗杀了陈其美。

袁世凯早就对陈其美非常畏惧，为了要将他自革命阵营中除去，用尽了各种手段。

利诱不成图暗杀陈其美

手段之一，是用金钱引诱——当陈其美在东京活动的时候，有一个秉承袁世凯意旨的人对陈劝诱：“送你五十万元（以当时米价换算约合现在的二百万美元），请放弃革命运动，到欧洲去考察工商业，如何？”及至陈其美回到上海之后，袁世凯又差遣陈的一位乡亲加价到七十万元，再度试图收买。不用说，陈其美始终断然予以拒绝。

袁世凯眼看着收买之计不售，于是便派出刺客下手。在上海法租界陈其美的住宅和机关部附近派遣了密探，连人力车的车夫都散布了金钱，买为眼线，窥伺暗杀机会。

不过，陈其美也经常有警卫扈从，不让刺客有可乘之隙。

于是，袁世凯方面乃布置了一个和日本有关支援革命经费的圈套，引诱陈其美堕其彀中。

五月的某一天，有党员李海秋来陈其美处谈到：

“有鸿丰煤矿公司，希望以矿产为抵押，向日商中日实业公司贷款；如果陈先生能够介绍签约，可以提出借款的十分之四补助革命经费……”

为筹经费而中计

由于一再起义、一再挫折，革命党的财源枯竭，陈其美为筹措经费，四出奔走，渴望有钱到手，故而尽管“鸿丰煤矿”的话，虽则是币重言甘，不无蹊跷，但陈其美还是受了诓骗。

‘当时虽疑其事不确，而乃不顾生死，亲冒危险，思得款以达吾党革命之目的……’（注二）

事实果真不出可怕的猜想，所谓“鸿丰煤矿公司”徒有一个空头招牌，实则是有名叫许国霖、程子安的人受袁世凯属下北洋军阀所指使为暗杀陈其美而假设的舞台布景；至于向陈其美传达谎言的同志——李海秋，也是被袁世凯所收买、背叛了革命党、变成暗杀凶手的领港人。

介绍借款的话，立即谈妥。

五月十八日下午，在法租界萨坡赛路十四号陈其美的总机关部进行签约，有担任财务工作的吴忠信（注四）等人在场。

陈其美的总机关部，系用日本志士山田纯三郎的名义所租赁，一楼为客厅与食堂，二楼为山田居住，三楼则为机关总部所在。

注一：蒋总统-“本党革命的经过与成败的因果关系”（一九四九六）

注二：蒋总统-“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一九一六五）

注三：居正（一八七六～一九五一）早岁留学日本法政大学、日本大学，参加同盟会，参与策画武昌起义。二次革命后，任中华革命党组织部长、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旋参加孙先生所组织的广东军政府。一九二四年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孙先生逝世后，为“西山会议派”，一度与蒋总统有欠融洽。一九三二年，任司法院院长。一九五○年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

注四：吴忠信（一八八四～一九五九年）安徽省人。参加辛亥革命之后，与蒋总统同隶陈其美麾下，致力革命。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日本，在明治大学进修，与许崇智结识。其后，以上海为中心积极活动，为时颇久。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安徽、贵州、新疆各省主席。一九四九年以后任总统府资政，在台湾病故。

袁党暗杀陈其美

一九一六年五月十八日下午二时许，陈其美抱病走出上海法租界渔阳里自寓，乘人力车到达同在法租界萨坡赛路的总机关部。

同志吴忠信以及由山东来沪联络的刘基炎等人，已先到此处等候会晤。

陈其美一见到吴忠信就说：“刚才坐来的人力车车夫还没有等我开口，就先问我‘是去萨坡赛路吧？’我说：‘是的！’就这样坐来了……”吴忠信说：“咦！有点奇怪咧！那个家伙会不会是密探？”陈其美接着说：“我也觉得有点怪！”

凶手闯入举枪乱射

不久，介绍人李海秋陪同自称是“鸿丰煤矿”的许国霖等三个中国人和两个日本人，一同来到这个总机关部。

未料，大家在一楼客厅就座之后，李海秋说：“糟糕！忘了把合同带来，我就去取。”立即开门外出。

就在这倏忽之间。

出入交错，闯进来两个汉子，拿着手枪对准陈其美头部连续乱射。陈其美中了数弹，立即殒命，时年四十岁。

在邻室的同志们，一闻枪声，立即奔入客厅。凶手还是见人开枪，同志丁景梁等二人因而负伤，而李海秋引来的中国人之一的王介凡也中流弹丧命。凶手乃乘混乱的间隙逃之夭夭。

‘悲夫！自古无不遭庸众忌畏之志士，亦无安荣善死之英豪，于是公乃齎恨以终矣！’（注一）

总统经纪陈其美之丧

蒋总统听到噩耗，立即奔往总机关部。其时，陈其美的遗体已被放置门外，惨不忍睹。这是由于出面租赁总机关部的山田纯三郎唯恐受到牵连，故而拒绝将遗体安置家中；并且对同志大肆咆哮，与过去态度判若两人，像是完全丧失了理智。

此时，陈其美的亲属戚友，不见一人，无人接受遗体；于是蒋总统乃雇车将之载回法租界蒲石路新民里十三号自己藏身的秘密寓处。

陈其美虽然历任工商总长、上海都督高位，但身家性命一切投注于革命，身后遗留金钱只有二十元，善后费用赖向同志之间东挪西凑，才得筹措出来。

‘……英士遇害于沪滨，中正经纪其丧，中夜不寐，痛哭失声。匪仅以恸其私，实虑无英士在，更难制止大憝之专横。’（注二）

当为陈其美营葬之际，亲撰祭文如下：

‘维民国五年五月二十日，义弟蒋介石致祭于英士义兄之灵曰：呜呼！自今以往，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乎！丁未（一九○七年）至今，十载其间，所共者为何事，非安危同仗之国事乎？所约者为何辞？非生死与共之誓辞乎？而乃一生一死，国事如故，誓辞未践……呜呼！大难方殷，元凶未戮……死者之志未终，而生者终之；死者之业未成，而生者成之。不终不已，不成而不死亦不已，以履去春握别扶桑第二化身之谶语，以守我之信，践我之约而已……’

陈其美灵衬于翌年五月十三日由上海归葬浙江省吴兴县太湖之滨，孙先生亲为题碑——“陈英士先生之墓”。

刺案发生后，租界捕房将许国霖、李海秋以及另一名宿振芳的人逮捕。

幕后主始者为张宗昌

据警方调查结果，判明其幕后主使者为北洋军阀张宗昌（注四）等人。张宗昌曾以“干掉陈其美，赏金十三万元”诱使凶犯下手。张宗昌这个人在辛亥革命之际，原为土匪，夤缘加入陈其美部队，因二次革命机会背叛革命军阵营，率领部队投隶袁世凯属下。

上海地方审判厅初审时，判决许国云死刑，宿振芳一等有期徒刑（徒刑十五年，褫夺公权二十年）；但在江苏高等审判厅二审时，许国云被减刑无期徒刑。

此外，李海秋在法庭矢口否认罪嫌，因缺乏证据，宣告无罪开释；但不久却因其他暗杀事件牵连被捕判处死刑。实则是被北洋军阀所构陷灭口。

失去了杰出的领导人陈其美之后，革命阵营已有重行调整之必要。

‘当英士之死，国父则以期英士者期之矣。’（注三）

注一：蒋总统-“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一九一六五）

注二：蒋总统-“祭廖党代表（仲恺）文”（一九二五八）

注三：蒋总统-“国父百年诞辰纪念文”（一九六五十一）

注四：张宗昌（一八八九～一九三二年）流氓出身，在二次革命及经过一九二二、二四年两度奉直战争中渐露头角，成为以张作霖为首脑的奉系军阀之雄。其后，以山东为其根据地。及至蒋总司令第二次北伐之际，乃勾结日军而与国民革命军敌对，为造成中、日两军最初正面冲突的“济南事件”（一九二八年五月）的因素。

在山东策动讨袁

当陈其美逝世不久的一九一六年六月，蒋总统奉到孙先生命令前往山东省，参加中华革命军东北军，襄助总司令居正军务。在陈其美逝世之后，肩负起更重大的责任。

目的地——山东，虽然和袁世凯“辇毂之地”北京所在的直隶省（河北）是邻省，但却为反袁暗潮不断发生的地区。在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之初，薄子明（肇和军舰起义时曾在上海率领陆上部队攻打警察总局）等人就曾策画在那里发难，但因失去时机而未果；革命党员们逃脱了袁世凯的弹压，以东北和日本为策应地区，继续进行反袁活动。

至于中华革命党以山东为根据地，正式展开活动，则是从一九一六年三月开始。

在这一个月里，孙先生任命居正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派往山东青岛，策进讨袁军事行动。

国父通告鲁冀晋同志

同时，孙先生特地通告鲁、冀、晋各省同志：

“……吾党自癸丑（二次革命）失败，惨澹经营，日不暇给。上海发难而后，云贵踵起，竖讨袁之义旗，作共和之保障，此吾人所中夜欣祝者也。惟是云贵军局限一隅，胜败之机，尚难预决。故欲缩短战争之期间，保全国家之元气，事半功倍，犹解倒悬，非从袁氏根本地推翻不可。加以北方健儿，山东豪杰，并起亡秦，殆指顾间事耳……”

中华革命军东北军的攻击行动，于五月四日展开。

在居正指挥超过一千人的主力部队于当天夜晚攻击潍县同时，薄子明所率领的第一支队约二百人，也由青岛乘胶济铁路夜班火车出发，翌日，控制了周村。

潍县是在约当胶济铁路中间位置的冲要之地，当时驻防潍县的袁军，是以张树元为师长的第五师。

尽管革命军的武器只是以手枪为主，可是由第三支队长吕子人所率领的部队，则一再地奋勇向袁军正规军突击。

据西原龟三调查报告——“山东省革命党和日本人”所载：革命军是购买了日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掳获驻青岛德军的德式毛瑟枪和白朗宁手枪为武装。

革命军进驻潍县

经过冲锋肉搏之后，革命军给予张树元军以重创；张军乃掳掠中国银行库存白银二十余万两及电报局器材等公物、焚毁营舍逃走。五月二十六日，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受到地方民众欢迎，进驻潍县城内。

又在潍县得手之前，抽调进攻该县的一部分兵力吕子人部，于五月十日先将在该县东南的高密攻占。

中华革命军乘得胜之势，向内地深入推进，曾于五月二十五日与六月四日两度进攻山东最重要城市——省会济南。虽都归于失败，但全省除西部济南一带外，均入于中华革命军掌握。

当时，革命军曾经得到日本民间人士的协助以及日本军部的援助。

在总司令居正麾下，有担任相当于参谋任务的日本志士萱野长知等多人志愿参加。

尤其具有特色的，是日本民间飞行员坂本寿一。

东北军是最初组织航空队的革命军，拥有两架飞机，以潍县练兵操场为基地，不断空袭袁军，由坂本寿一领导。

坂本寿一与东北军于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签订了应聘教授飞行技术的合同，在以每一学生学费一千元的条件之下，来到潍县，担任航空队的顾问兼教官长，负责训练飞行人员。

三炮台烟罐做炸弹

坂本寿一，一八九○年出生于日本山口县，现仍健在，居住于神奈川县鎌仓市腰越（地名）自宅。

据坂本谈称：“本人于明治末年（一九一○年前后）前往美国，在福特汽车装配厂工作，同时自己作成装置三十匹马力发动机的单叶飞机，熟练飞行技术。

“一九一六年春间，因头山满、梅屋庄吉（注）介绍，与孙先生结识。孙先生对于可以用飞机发挥战力的设想非常赞成，乃邀请我（坂本）带飞机参战，我痛快承诺，便驾了飞机到达潍县。当地民众由于第一次见到飞机，大为哄动，都说：‘神仙来了！’‘神仙来了！’

“不过，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发明飞机投掷用的炸弹，只有用三炮台香烟空罐装填炸药的手制炸弹，我一手驾飞机，一手向地面投弹，直听到轰咚轰咚的爆炸声音。

“敌方对于这种空袭，好像是有了反应，他们派遣军使前来拜托——‘不管怎么样，就只有一个要求，请不要再从飞机上扔炸弹下来。’”

又据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传记”：革命军有两架飞机，以及数门毒瓦斯发射炮（未使用）等新武器，同时列有参加革命军的日本人八十二人姓名。

注：梅屋庄吉（一八六八～一九三四）出生于日本长崎一米谷商人家庭，后从事贸易致富，并为日本电影事业界的先驱而出名。明治后期（约在十九世纪之末）往来于香港、厦门、新加坡之间，与孙先生结识，其后一贯支援以孙先生为中心的革命党。与蒋总统交谊也颇深厚，一九二七年蒋总统来日，据说曾与其谈到和宋美龄夫人结婚事，并请托为孙先生制作纪念影片。

冯国璋的折冲

当时，进驻山东境内的日军，对于中华革命军东北军颇示好感。日军自一九一四年底，对德军宣战、攻占青岛以来，控制了由青岛到济南之间的胶济铁路沿线大部分地区，继续占领，不肯撤走。

日为倒袁支持革命军

业已决定了反袁政策的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当时由首相亲自密令驻青岛日军司令官大谷喜久藏及参谋长奈良武次——对于中华革命军有计划地给予组织性的援助。其真正目的，当然并非希望革命成功，而是基于在打倒袁世凯的目标上利害一致。

当一九一六年五月四日进攻潍县、周村时，日军为革命军供应胶济铁路车辆，给予输送兵员方便之利；在潍县县城攻防战中，袁军炮火及于胶济铁路车站，日军守备队长乃以“日本兵蒙受伤亡”而向袁军指挥官张树元提出抗议，并压迫开城让革命军进驻。

袁世凯对于日本对革命军的协力，总希望能加以制止。故而派遣代理外交总长曹汝霖前往在北京的日本公使馆，就日军在山东一连串行动向日置益公使提出抗议。可是，日置益却若无其事，振振有词地表示：“（一）火车装送武装革命党员，完全没有根据；乘客中纵有私携武器者，非逐一检查，无从发觉。（二）日军并无逼迫张树元师长开城事，系属误会。（三）铁道守备队越出界外，出于不得已，非如此不能完全保护铁道及侨民。（四）日人以个人资格援助革命党，事或有之；军人确无此种举动。”接着反而指出长树元的军队杀害日本军人、商人，以及损害铁道设施，为此提出抗议。

袁世凯方面，对于来自日军的如此横蛮困扰，已经没有对抗力量。他在南方的护国军和山东的革命军夹击之下，只有越发陷于窘境。

冯国璋开南京会议

五月八日，云、贵、粤、桂各省护国军联合起来在广东肇庆组织军务院，否认袁世凯还有大总统的地位。虽然袁世凯在此之前，曾向护国军提议谈和，但已被拒绝。

在这样的过程之中，居间扮演和事佬的是江苏将军冯国璋（注）。冯国璋要藉调人身分，稳居于第三势力的地位。

冯国璋获得驻在徐州的另一个将军张勋和安徽省长倪嗣冲协力，邀集到中央和未独立的十七省代表共计二十三人举行“南京会议”。冯国璋提议“暂时承认袁世凯为大总统，尽快召开国会，选举新大总统。”这个提议，对于护国军，是约定袁世凯在将来辞职；对于袁世凯，则为留有延续其大总统地位的折衷办法。

冯国璋是袁世凯寄予信赖、一手培植起来的北洋军人，因此，袁世凯对于冯所召集的南京会议，期待其会有好的结果。可是，他的预测却太为乐观了。在南京会议第一天～～十八日的会议上，便有山东代表丁世峄提出要求袁世凯立即退位；以此为发端，各省代表陆续发表赞成意见；冯国璋面临这个出乎意料之外的趋势，只得避免提出表决而草草散会。

倪嗣冲率兵威胁

闻讯大惊的袁世凯，乃着倪嗣冲率领三营卫队到达南京，重施故技又耍出“武力威胁”的杀手鐧。

在十九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中，倪嗣冲亲自出席，大肆讲演一番：

“正当中国攘扰不安的今天，遽然变更元首，军政财政上将会发生很大的危机。”

在以武力为后盾的倪嗣冲反攻之下，“立即退位论”为之销声匿迹；可是，也没有任何足以获致协议的替代主张；直到二十二日连续开了五次会议之后，大总统退不退位的问题，没有交待，就那样含含糊糊地散会了事。

但是，民心终归是业已丧失。就在南京会议好不容易要闯过去的五月二十二日，袁世凯接到他最信赖的忠臣四川将军陈宦的一封电报：“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

电报过目之后，袁世凯当场晕了过去。这是由于一向心神劳瘁，再加上众叛亲离所受的震恐实在太大之所致。

过了一会，悠悠醒转来的袁世凯，脸上红得像炭火一样，滚落下几颗泪珠，对左右说：“人心大变，夫复何言！”

五月二十七日，袁世凯终于病倒在床。

平素体魄健旺的袁世凯，骤然卧病，实在是始料不及的事。他看起来非常健康，食量宏大，尤其喜啖家乡口味的河南烤鸭，有十五个妾侍，经常在晚上就寝前要饮参茸酒一杯，的的确确是一个精力过剩的人。

注：冯国璋（一八五九～一九一九年），河北人，在袁世凯所属北洋军阀中，和段祺瑞、王士珍有三杰之称。辛亥革命时，任清军攻打武汉的第一军司令官；二次革命时，为江苏将军，镇压革命党，在长江流域拥有势力。袁世凯死后，就任副总统，继之代理大总统。为直系军阀首领，与皖系段祺瑞抗争，造成后来军阀混战的因素。

袁世凯忧愧而死

为了治疗病倒了的袁世凯，中西医动员，中西医杂投，可是却找不出他害的是什么病，但病况则毫无起色；到了最后，连罗瞎子、王神仙之流也被请来看病进药。

他虽然卧病在床，但公务也还是不假手于他人，特别是军队的统帅权绝的放松，仍然驱使张勋以及刘冠雄、段芝贵等亲信，意图继续指挥全军。他深知只有掌握住武力才能保全住军阀中的枭雄地位。及至五月二十九日，又收到了一封不啻是催命符的电报，就是另一位心腹干部湖南将军汤芗铭也背叛了他而宣告独立。于是他的病况乃为之更加恶化。

诊段判为尿毒症

六月四日，大总统府唯有尽其最后的努力，请来法国公使馆的医师卜西尔治疗。诊断结果，判明为尿毒症。加以神经衰弱，病入膏肓，卜西尔也是回天乏术。

袁世凯的病况，本来是极端保密，但因卜西尔的诊断，乃被法国公使馆获知真相，转达到日本公使馆。日置益公使于六月六日以第五○七号十万火急机密电报向外相石井菊次郎报告：“据法国驻华公使密告——袁世凯已陷于危笃，何时绝命尚未可料，不过总统府自昨（五日）夜以来，似乎非常混乱，近侍人等，或许是预料会发生动乱，而正在作逃亡公使馆区域的准备，特此报告。”

最后的一句话

五日晚间，在袁世凯陷于弥留状态的病榻之旁，聚集了国务总理段祺瑞、参谋总长王士珍以及张镇芳、徐世昌等人；还有他的长子袁克定侍候在侧。

徐世昌要得到他的最后遗言，乃凑到他的耳边轻声地说：

“万一不测，大总统还有什么交待……”

已经神志昏迷的袁世凯，目不转睛地嘟噜出了两个字——“约法……”

约法是袁世凯亲自毁弃了的中华民国临时宪法。在即将撒手尘寰的刹那之间，他想对“约法”说点什么话？无从索解。

袁世凯在昏睡中捱到了六日的凌辰，突然迸出最后的气力，断断续续地吐出：“他害了我！”

袁世凯留下这最后的一句话，长辞人世，享年五十八岁。“他”，指的是谁？这又是无从索解的。

这一天早晨，英、法、俄、义、比各国驻北京公使，正集会于日本公使馆，协商对于袁世凯身后的对策。正当会议进行中，得到他去世的消息。据日置益公使在当天以五○九号密电向石井菊次郎外相报告：六国公使一致决定偕同拜会国务总理段祺瑞，表达六国全体意见——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收拾时局。

得到袁世凯去世消息的日本政府，立即收敛起反袁政策，转为支持黎元洪，石井菊次郎就在当天便以第一九七号极机密电报指示日置益：“在黎元洪如有危险时，可助其避入日本公使馆，加以保护。”

群众毫无悲戚之情

七日，袁世凯大殓，头戴平天冠，身穿祭天礼服，完全一副“大行皇帝”模样。这一天，国务院规定全国下半旗志哀，学校停课一天，娱乐场所休业一天，文武官员停止宴会二十七天。

可是，多数国民都不理会这个命令。在宣布独立的西南各省，相反地悬旗志庆，云、贵两省鸣放爆竹祝贺；汉口的报纸，以“天然解决～～一人既死，万国咸宁”为标题，有“袁世凯之死，乃黄帝在天之灵呵护人民出死入生”的评论。

二十三日，政府举行公祭之后，移灵归葬于故乡河南彰德。当时参加公祭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在他的著述中留有这样的感想：“丧礼新旧杂凑，有欠调和，正好在新旧交替时代的大总统身上表现出来。路旁鹄立的群众，除静默之外，脸上毫无悲戚的表现；袁世凯并未得到民心，除征敛与刑戮之外，与人民毫无接触。”

‘袁世凯总也算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是他的聪明违背了道义，他一达到了相当的力量，便要实现他的野心来做皇帝，毕竟皇帝没有做成，自己反而因此忧愧而死。

‘这固然是由于他不知利害，尤其是由于不识时势之故。他没有检察当时的潮流，全国国民都已偏向共和，厌恶专制；大势已去，他却还要倒行逆施，结果当然是自取灭亡，作了时代的牺牲者。’（注）

辛亥革命所开创的中华民国第一页光辉历史，就是这样地被袁世凯所玷污了！

导至军阀割据时代

袁世凯死后，他窃国所获遗产，为割据全国的土匪军阀所继承；中华民国在列强新的侮辱之下，进入了政治解体，经济枯竭，社会混乱的黑暗时代。

此后，直到一九二八年国民革命军统一全国的十数年之间，中国国民，是长期不断地痛苦呻吟在泥涂炭火之中！

注：蒋总统-“军人精神教育释要”（一九三四）

第五章：磨炼和考验时代(上)

主题

体验军队整训一切从头做起整军的苦心要有中心信仰日图在东北寻衅郑家屯事件日提狂妄要求军阀割据序幕对德宣战问题张勋演出复辟段祺瑞趁机复出日本劝诱参战段祺瑞堕入彀中中国未获报偿石井蓝辛协定美国急予辨正所谓西原借款密约出卖山东国父组军政府护法作战计划闽南为主战场

体验军队整训

这是民国五年的记录。

‘七月卅一日晴

‘接北京曲同丰（注一）及总统府秘书来电各一件。午后，总司令（居正）出发晋京，许先生（许崇智。注二）到司令部，代理总司令办公。（括弧内文字，为编著者古屋奎二查注，以下同。）

‘接日本守备队电话，因有本军在南流站铁道附近，与敌军对阵，该处果有本军（中华革命军东北军）队伍否，要求查覆。即查孟九浩军队驻扎该处附近，承认该队为本军所统是实。

‘复接济南钟蓬山致总司令来函，以本军有在南流附近各村庄抢劫焚掠等事，似与守备队（日军）今日通报情况相似。即饬第一师师长（朱霁青。注三）查办。

‘六时许，接守备队电话，晚间有该守备队派斥候于城墙附近练习，请总司令通知各团、队，不致彼此误会。

‘晚间，介石出城巡查，自南关（潍县城南门）过白琅河，至东围子操场附近一带视察后，即由东围子过白琅河回城，十一时回总司令部。

‘今日所发命令如左：

‘一、总司令部各处，每日须派一员值日。

‘一、总司令部每日办公时间。

‘一、催送各师、旅花名册。

‘今日所见，拟改正之件如左：

‘一、见各处卫兵口号不明；以后对答者，须唱当晚口号。

‘一、见各处外表名称，仍有未照改编名称张贴者，须限期一律改换。

‘一、枪匠须赶紧雇用，废枪迅即修理。

‘一、测绘人员须整顿。

‘一、卫兵勤务细则须修订。

‘今日伊东知也（注四）过潍，来司令部参观。’

参谋长到任的第一天

一九一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是蒋总统被任命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部（在山东省潍县）参谋长到任的第一天，当天所写的日记如上。

高举讨袁旗帜在山东省发展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由于袁世凯于六月六日死亡之后，乃与山东督理军务长官张怀芝缔结停战协定，以济南为界线将山东省东西划分，而在东部驻屯布防。

因对德宣战、进军山东，便即继续占领下去的日军，对革命军的活动颇予协助，保持着友好关系，双方司令部也有联络。

革命军总司令居正，这时刚为因应袁世凯死后的新情势，前往北京；由许崇智代理总司令，蒋总统和他同时前来，就任参谋长职务。

当时，在全世界是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的动乱时代；在中国国内，则是袁世凯死后军阀割据各争雄长的始动时期。

在如此情势的军阀割据过程中，要真正达成革命目的，革命阵营就非得培植强大的力量不可；是故坚强而有规律的革命军之养成，乃为当前最迫切的课题。

可是，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是在急遽中召募凑合起来的队伍，纪律欠佳，一部分人甚至有掳掠行为，甚至连部队名册都有欠齐全。

据曾经调查日本军队在山东省等地进行反袁活动情形的西原龟三，对于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一部分状况，有过如下的报告：

“属于革命军的中国人，有苦力、车夫乃至囚徒等类，其素质低劣，不难想像。兹举一例以见其横暴情形——在胶济铁路火车上的旅客中，有中国官吏，被他们拉下去，大骂‘你小子一定是袁世凯的间谍’，结果将之枪毙。”

“革命军以山东铁路为中心，对各方面发生过颇为不少的掠夺行为。”

获得宝贵的体验

对于这样的军人，要把他们改造成有纪律的近代化部队，是新任参谋长-蒋总统的急切任务。可是不久之后，就奉调往北京；于是，山东的参谋长职务只在任十三天便为之结束。然而尽管时间短暂，但由于得到这个亲身体验了整训军队的机会，作为在后来建立国民革命军的一步准备行动，倒是相当宝贵的体验。

注一：曲同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毕业，一九一六年当时，在段祺瑞属下，参与有关中华革命军东北军的缩编问题；后为皖系军阀的四大金刚之一，在对直系战争中，担负了重要任务。

注二：许崇智（一八八七～一九六五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留日时期参加同盟会。山东革命军结束后，曾在孙先生属下出任广州军政府的粤军总司令等职。

注三：朱霁青清末，由奉天省派赴日本留学，参加同盟会。一九一五年，奉孙先生之命到达潍县，建立东北军组织。一九二五年，当选中国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九一八事变后，组织东北国民抗日救国军。一九五五年病殁于台湾，时年七十四岁。

注四：伊东知也（一八七三～一九二二年）由“二六新报”记者，当选众议员。经内田良平介绍与孙先生及黄兴等革命党人交往，为日本“有邻会”、“对支联合会”等民间组织之有力分子；当日本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契机而获得向山东发展之后，曾经屡次赴山东、华北、东北方面考察。

一切从头做起

当时的参谋长日记，纪录下了不是在今天所能想像的艰苦心情。以那些连枪是怎么扛法都一无所知的士兵为对象，一切的一切都必须要重新整饬教导，从头做起。

这个日记，以往未曾全部公开，这是革命军建军艰苦草创时期的真实纪录，在这里特将全文发表：

担枪姿势须统一

‘八月一日晴

‘午前，介石奉许（崇智）先生命，往第一师及第一、二各旅司令部视察及往会各司令官。

‘午后，满铁副总裁国泽（新兵卫）氏过潍，派巴（泽宪）参谋赴站迎奉。（注）

‘今日所见，拟改正之件如左：

‘一、担枪有枪身向上及向右者，以后党下令皆改为向右，以归统一。

‘一、骑兵乘马时，须用皮鞋、宜饬因粮局发给。

‘一、征兵身材之长短、及年龄、体格多有不及者，宜令各团、队长认真选择裁减。

‘一、总司令部之护兵及小使，须认真裁减。’

军队卫生宜注意

‘八月二日午前阴、午后雨

‘今日，接第二师长吕子人报告——“攻击景紫（景芝）镇之敌军，已被击退；而胶州方面敌军，在百尺河附近，亦有袭我之势。”当时由代理总司令电质张怀芝，限其二十四小时内答覆。

‘午后，潍县商会及绅士十余人来谒代理总司令，未见。

‘颐寿堂主与前张（汝钧）知事通同作弊，有钱项之嫌，令因粮局传问。

‘今日由参谋处所法通报如左：

‘一、通报第一师长——以大局未定，对于寒亭及流饭桥各处敌军，当作警备，令其东至于河头、西至王家楼、杨家庄一带地形，迅即侦察，每晚派小哨监视。

‘一、通报第一师长——各营、各连分扎地点，限于初六日以前报告。

‘今日所见，拟改正之件如左：

‘一、军械局须整顿。

‘一、副官处外宾及属员，拟选择。

‘一、军队卫生宜注意。

‘一、红十字会医院，开支太大，院址当迁入城内，且须与该会另订规章。

‘一、城外通讯处可撤销。’

革命军虽然和山东督理军务长官张怀芝成立了停战协定，但张怀芝属下部队并非全部都奉到了停战命令，故而与革命军之间不时仍会发生小接触。

军械军装须呈报

‘八月三日晴

‘今日，接总司令（居正）由济南所发手谕——以竭力整顿军队为首要。（总司令）今日当可晋京。

‘羽佐田中尉（日军）来告——山东督军署派任某往高密方面，调查战况，未知其用意如何。

‘午后，饬第一师侦察庞家方面敌情，及警备一切。

‘今日所见，拟改正之件如左：

‘一、总司令部应填侦察员数名，以便临时派达，参谋处当设谍报一科。

‘一、总司令部拟添总值日员一名，由参谋与副官各处长轮流担任。

‘一、各团、队所有军械军装，拟令其限日呈报。

‘一、警卫骑兵、步兵队，当改为卫队步兵为是。

‘今日参谋处所发通报：

‘一、催军械科造表册。

‘一、催经理局造表册。’

教练时间须归一律

‘八月四日晴

‘代理总司令（许崇智）派介石至西操场观操，飞行机试验活走。

‘接孙先生致总司令电一件，商酌晋京事。

‘今日参谋处所发通报

‘一、致第一师师长——查报各团、队起居日课时间。

‘一、致各处司令——发给新兵教练顺序表。

‘今日所见，拟改正之件如左：

‘一、各目兵须令其熟诵本师、旅、团、营、连名号，及其长官姓名。

‘一、各团、队起居教练时间，须归一律。

‘一、师司令部，每日当派值日员一名，定时来总司令部副官处传授命令及报告。

‘一、总司令部卫兵，当设号长及号兵若干名。’

注：国泽新兵卫一八六四年出生于日本高知县。铁路技术人员出身。一九○六年，日本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之始，便出任理事；其后两度担任副总裁。在其任内，参预推进由日本片面施工而闹成问题的“安奉铁路”改换宽轨工程，以及鞍山制铁厂的建设。

整军的苦心

现在，继续从日记中来覆按当时的苦心。

严肃军风纪

‘八月五日晴午后雨

‘午前，代总司令派介石往于河头方面侦察地形。

‘接张怀芝（山东督理军务长官）覆电。

‘午后，令赵（中玉）旅长调查南流孟九浩焚掠之案。

‘今日，总司令部所发命令：

‘一、各独立机关，每日派值日员来部，传授命令及报告。

‘一、令第二师长调查景芝镇当时开战之实情。

‘今日所见，拟改正之件如左：

‘一、总司令部出入人员，拟发出入证为凭。

‘一、总司令部各物持出时，拟发持出证为凭。

‘一、兵卒不得身着军服在各铺户坐谈，及行路时不得向商民恫吓敲骂，总司令当下令痛诫。’

精编目兵教材

‘八月六日晴未刻雷雨

‘第二师长吕子人派璩济吾（注）来潍，见代理总司令，商议一切，及请领饷项。

‘军械科长王任辞职，由吴（藻华）参谋兼理。

‘近有马海龙（后来证实有违命通敌情事，经下令逮捕）谋叛之报，特饬各城门严密检查。

‘今日所见，拟整顿之件：

‘一、总司令部卫兵，每日须由副官处值日员点名检查。

‘一、城门上五色旗，须换新旗，每晚由守门卫兵收下，每朝树立。

‘一、骑兵须用皮鞋、皮带及裹腿，已饬经理局调办。

‘一、目兵教科书须另外编辑，择其紧要简单者，俾得速成。’

各师团队设军医

‘八月七日晴

‘朝六时半，代理总司令往西操场观坂本（寿一）氏之飞行，飞高约八百米突，飞行时间约有十五分钟之久。第一师长亦入场参观。

‘八时，入第三团本部，与朱师长相谈毕，乃回总司令部。

‘探报：张安幼及眷属，昨日将出南门逃避，为守卫兵所阻。

‘吴参谋兼理军械科长。

‘今日所见，拟实施之件：

‘一、总司令部拟设军医科，且须委军医科长。各师、团、队亦宜设军医，以资整顿卫生。

‘一、代理总司令命各队出操时，须先施五分钟柔软体操，以练筋骨。

‘一、各城门须严密防范。’

操法依照操典

‘八月八日晴

‘代理总司令派介石往高密第二师，调查一切。

‘接第二师长占领王家台及对日交涉之电，代理总司令即告日人以我军占领王家台之理由，与之直接交涉。

‘今日所见，拟改正之件：

‘一、各师、旅操法，当照民国二年之操典施行。

‘一、各师、旅所有各式枪械，分别种类，每连当用同式枪械为是。其有不足一连之数者，则每排同式亦可；如仅有数支者，当由军械科收回存储。以免参差不齐，及战斗时补充子弹之复杂。

‘一、现用枪械，均无刺刀皮件。各师、旅军衣，当照第二师式样，腰间添束带一条，代作皮带之用。’

兵士当精选严择

‘八月九日晴

‘午前，介石往第二师各团、队看操，操法较为整齐。

‘第五团约有三连之数，步枪足有一连。第七团约有二营之数，步枪约有一连。其余队伍，闻已出发，派赴景芝镇约有一营，王家台约有三连云。

‘高密营房不齐，操场狭小，内务外场，较难整顿。

‘午后，介石回潍。

‘今日所见，拟改正之件：

‘一、下士学术各科，须格外留意。

‘一、兵士老少不一，当精选严择，须照总司令部所发征兵规则为准。’

注：璩济吾在山东的东北军改编之后，于一九一八年参加薄子明属下在上海的“护法军”。当时上海护军使卢永祥受张树元之意将薄、璩等人逮捕杀害。

要有中心信仰

尽管日以继夜、努力不懈，但是中华革命军的整训工作仍然迟迟不易推进，无法达到完备的目标，甚至有些简直是无可奈何之感！

拒绝日军要求

‘八月十日晴

‘发送第二师三十年式子弹一万颗，以王家台方面战况紧急也。

‘第一师长函催饷项。

‘日本守备军队得其军令部之电，为王家台占领事，劝我军退出。代理总司令据理力辩，万难退出。

‘济南日本领事署之警察长，拟在潍县设立临时警署，代理总司令以此交涉移交济南督署为是，本军不能承认。

‘今日所发规条：

‘一、征兵体格、年龄等之规条。

‘一、各师医官及卫生规条。

‘一、请假规则。

‘今日之所感：

‘本军基础未定，整顿需时，如能上下一致，努力改正，则事尚非难也。

‘军队名册未报，则实员之数难知，饷项无度，其难一也。

‘装械之数不清，则种式难分，战斗力难知；一旦有事，计划难定。

‘以上诸件，为着手整顿之第一要件，而乃再三催报，期限早过，终未实行，甚为焦急，岂所发命令有不当欤？自歉何似！’

谋求军费统一

‘八月十一日乍雨

‘总司令由京来信，为曲同丰来潍，准其检阅事；由代理总司令邀集朱师长、陈副官长（中孚）会议，决议以不受其检阅，请总司令速回潍。

‘当此外交、中央、周村三方面相与为难之际，若不同心一致，危险何似！

‘吾军今日之地位，如能联络中央，则一切难题不难立解。盖吾军之将来无论为改编及解散，非经中央承认不可也。否则，兵力未备，时机不正（原文似属笔误，“正”字当为“至”字。）财政困难，不特不能发展，且不能永久独立，为国为民，终以早日解决为是。况受人胯下，种种肘制，不一而足。延宕一日，即为国家多被一日之患乎！

‘发给第二师之子弹，以日人不许运送作罢。

‘王台事件，日本军令部来电调停，劝令退出，代理总司令却之。

‘接日人电，有总司令不回潍县消息，代理总司令拟派介石赴京迎迓。

‘今日所见，拟改正者：

‘一、兵士有过不准罚跪，以保军人体面。

‘一、因粮局不得自由支出，及征发各款当报告总司令交付经理局；所有支出，非过总司令之印，不准该局先付，则军费方能统一。’

慨叹号令不行

‘八月十二日晴

‘发陈英士先生追悼之电。

‘代理总司令决派介石赴京，迎接总司令来潍。

‘调查经理局现状，食米只足二日之用，秋衣尚未定制，被毯亦未购备，款项缺乏，每日无数百元之存储，收支机关不能统一，代理总司令无权支配；整顿无术，号令不行，奈之何哉！

‘今日所定之件

‘一、拟定总司令部编制表。’

参谋长日记的结论

“参谋长日记”，到此完结。虽然只有十三天的经验，但所得教训颇大——就是有组织的现代化军队，为革命建国所不可缺少的条件。这也是孙先生一向的主张：“会党和地方性的军队，决不能形成建国的力量。”

这个教训，不久之后，就在一九二四年创设的黄埔军官学校得到了收获。这所学校，造就了多数肩负起统一中国的历史任务的革命军人。

‘大家须知——凡是一个革命军人，必须有其中心信仰……而且其革命的行动，必须要有一个中心目标，和一个领导革命的中心组织。’（注）

存在于中心组织之中的中心信仰和目标，就是中华民国的建国理想——“三民主义”。一个缺乏中心信仰的军队，绝对不能形成力量。——这就是“参谋长日记”的结论。

注：蒋总统-“黄埔精神”（一九五九六）

日图在东北寻衅

在“参谋长日记”中，屡次见到有日本军方及其有关人士出现，显示日本对于中华革命军的态度颇有善意，然而究其实情，日本的所谓“反袁”，不用说，祇不过是为了向中国扩张其势力的一种藉口。日本军部假托支援讨袁军的理由，陆续派遣谍报员进入中国；例如受到外务省的经费补助而设在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院长根津一），就是打着“文化交流”的口号在进行着谍报工作。——为数颇多的“大陆浪人”、“记者”、“医生”、“学生”各色人等，频繁往返于中、日之间，担负起为遂行侵略而搜集情报的任务。

川岛浪速等人的阴谋

在如此情势之下再度活跃起来的，是川岛浪速等人所策划的“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由于他们这个阴谋，不久便制造出它的副产品--郑家屯事件，使趋于恶化的中日关系，更加速了它的进度。

川岛浪速在辛亥革命成功初期所进行的“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失败（一九一二年）之后，并没有放弃图谋使东三省和内蒙古地区成为日本“保护国”的野心。他以大连为根据地，拥护前清皇族并为宗社党分子的肃亲王善耆，一直在窥伺着再起的时机。

当袁世凯帝制运动萌芽的一九一五年夏季，川岛浪速等人便与在内蒙北部地区握有势力的土匪巴布扎布联络，利用其为工具，准备制造事端。这个阴谋，获得日本陆军备役骑兵上尉青柳胜敏、备役步兵上尉木泽畅、曾任工兵上尉入江矩等军人以及众议员柴四郎等所谓“大陆政客”的协力。

一九一六年三月，日本内阁会议正式决定反袁政策，于是川岛浪速等人的计划，立即化为趋向实现的行动。这是由于在阁议的决定中有“对于民间有志之士的反袁活动予以默认”，乃使他们获得了支援力量。于是，青柳胜敏便立即偕同肃亲王的第七子宪奎王进入内蒙古。

同时，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并且派遣上校土井市之进及少校小矶国昭（后来曾任首相）到达大连，和川岛秘密联系。

此外，以宗社党组织“勤王军”的阴谋，也在进行之中（但后来勤王军并未用之于战斗）。

外交人员的意见

可是，日本派驻东三省的外交官员-安东领事吉田茂、代理奉天总领事矢田七太郎等人，则对于这些活动投以怀疑的眼光，他们举出--“不仅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有成功的希望，而且徒然有害治安”为理由，要求日本外务省加以取缔。

矢田七太郎于三月十七日以第五十九号密电向外相石井菊次郎报告：备役上尉青柳胜敏和宗社党、土匪等好像在策划些什么活动，然后提出——“为免发生因托庇在我国军宪威力的掩护之下而有近乎越轨行为的掠夺性小暴动，请准由本官裁度，预为取缔防范。”要求石井外相给予授权命令。

然而，业已确定了反袁政策的外务省，对于领事们的意见并未加以采纳。

相反地，石井外相却派遣前吉林领事森田宽藏前往东三省，向驻各地领事传达训令——“关于日本人对反袁运动的支持，希予默认。”

以宗社党为工具

还有，追求利权的日本民间财阀，也开始加以协力。大仓组的大仓喜八郎体会到日本政府的意旨，以获得将来开采吉林省和奉天省境内森林的利权为担保而对宗社党肃亲王善耆提供一百万元借款。其条件是——“事成（满蒙独立）之际，合办森林事业，委托经营。”

及至袁世凯取消帝制的三月下旬，情势又发生了变化。就是袁世凯的心腹担任奉天将军的段芝贵和受其统驭的奉天土著师长张作霖之间有欠融洽，从这里也表现出袁世凯的统治力量业已衰退。

和这样的情况同时发生的，是在日本方面也有两个不同的主张——仍然按照以前方针利用宗社党活动？或是和张作霖拉拢？

代理驻奉天总领事矢田七太郎认为——捧起拥有军力的张作霖搞东三省和内蒙古独立运动，比较切合实际，所以建议“联张工作”，获得外相石井菊次郎及参谋次长田中义一的赞成。

但关东都督中存觉以及由参谋本部派来的土井市之进则加以反对，并固执继续运用宗社党与巴布扎布路线。

正当日本方面还在议论未决的时际，段芝贵已经看出张作霖和日本的动向，乃于四月十九日逃回北京，由张作霖接替了奉天将军兼巡按使职位，掌握到东三省的实权。于是，宗社党方面的活动便立即受到阻碍。

为了打开这个局面，只有一个办法——行使实力。

终于发生血案

获得土井市之进等人为后援的巴布扎布所部，动员了约四千兵力，在青柳胜敏指挥之下，于七月一日由北方向洮南进击，二十四日攻破突泉县，八月十四日到达南满铁路线上的郭家店。

“郑家屯事件”，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

这个事件，是在幕后支援巴布扎布的日军和担任当地守备任务的中国部队正面开火，双方合计被打死了十六个人。

在日军方面，真个是求之不得的纠纷。——正因为有了这个纠纷，乃产生了在中国境内施展军事力量的藉口。

郑家屯事件

“郑家屯事件”，是发生在巴布扎布部队即将进入郭家店之前的八月十三日。

当天下午，在距离郭家店西方约九十公里的郑家屯（辽源县），有一个日本商人吉本喜代吉在经过市场时，和为迎击巴布扎布而进驻该地的中国部队二十八师士兵斗殴，成为事件的发端。

细故斗殴日军逞凶

斗殴的原因和真相不明，但一般的说法是--市场有一个小孩在倾倒腌渍的瓜水时，刚巧泼在经过那里的日本店员吉本喜代吉衣服上，吉本生气乃殴打这个小孩；碰到旁边有一个中国士兵干预，吉本横加辱骂，俩人便扭打起来。无论实情是否如此，总之斗殴之所以发生，想必是出于细故。

据在当时代理日本驻铁岭领事官补酒□秀一于八月二十八日以机密第五十七号向外相石井菊次郎呈报的“调查复命书”——“吉本喜代吉在喧嚷的情况之下，和一名中国士兵发生冲突，当走开约四、五公尺之后，用日本话自言自语地说：‘冒失鬼……’中国士兵听得不舒服，追上前来，抓住前胸，动手殴打。”又据西原龟三的“郑家屯事件真相”记述——吉本喜代吉向中国鱼贩买鱼，对方索价三角，只肯付一角强买，旁边有一个中国兵为之愤慨，乃和吉本发生争吵，以致扭打起来。

当时，吉本喜代吉立即跑去日本领事馆的警察派出所申诉。于是，派出所巡查河濑松太郎便带领吉本来到二十八师骑兵团团部驻扎地的“裕胜当铺”，团部卫兵以长官不在的理由阻止河濑进门，河濑愤然离去。

不多一会，有二十几个日本兵随同河濑大声叫嚷，赶来团部。团长还没有回来，由值日官招待激动的日军进入，打算有话好说，平息事端。

这个当口，刚巧有一个佩了手枪的中国士兵由里面走出来，日本兵乃上前夺其手枪，乱成一团，手枪突然走火。

正在找碴的日本兵，当听到这个枪声的同时，便一齐举起枪来，朝中国兵乱射。

于是，在团部的中国兵十多人，也开枪应战。

互相混战一场的结果，中国兵死亡四人，负伤数人；日本方面包括河濑松太郎在内当场死亡七人，更有重伤五人后来相继死亡，牺牲十二人之多。

听说发生了事件的辽源县知事，马上赶到日本军营，表示慰问，同时并命令中国军队不得对日军有报复行为。

扩大事端占领郑家屯

可是日军方面，则立即一面向驻屯在郑家屯附近的日本部队求援，一面要求二十八师退出郑家屯城外乃至于二十八师以外的所有中国军队都撤退到城外三十华里（约十七公里）。

中国军方，为避免两军冲突扩大，乃接受了日方的要求；但盛气凌人的日本方面，却将驻八面城的大队（营）、公主岭的骑兵二中队（连）、铁岭的步兵一大队、机关枪队一队合计一千五百人的部队调来郑家屯，占领了辽源镇守使署及中国军的各营房。

接着，日军更张贴告示——“由郑家屯至四平街沿路南北两侧三十华里以内，禁止中国人进入。”日本方面显然是为了扩大事件而有此一连串的紧急措施。

日本军队，为了一个店员的纠纷，便引以为藉口而制造中日两军冲突的强暴态度，其因素之一是为了援护巴布扎布部队。当时巴布扎布军好像是长驱南下将要到达郭家店，但实则是在中国军的追击之下艰苦转战迂回逃避而来。日本军为了要解救他们，乃故意和中国军之间制造纠纷，使中国军无暇继续追击巴布扎布。

这个作战策略达成了目的，巴布扎布部队就在第二天便逃进了郭家店附近的南满铁道附属地区。在这里，日本方面握有行政权和警察权，凭着这个挡箭牌，将巴布扎布保护起来，不允许中国军发炮交战。

不过，日本对于巴布扎布的保护，也只是到此为止。因为到了袁世凯死后，日本决定的对华方针是让继任大总统黎元洪收拾局面，所以没有多久便对巴布扎布弃如敝屣。

失去了靠山的巴布扎布部队，其后退往蒙古，巴布扎布本人在林西县城战死，“满蒙独立运动”为之终场。

完全是强暴行为

现在，再以日本兵之进驻郑家屯而论，根本就是一件不合法的事情。

郑家屯在东部内蒙古的哲里木盟，一九一三年改称辽源县，当时属于奉天省洮昌道。

依据早在一九○五年日俄战后中日两国所签订的“满洲善后协约”，日本诚然获得了在东三省南部（南满洲）有守备铁路的驻兵权，然而郑家屯则并非属于所谓“南满洲”的范围，并且也不在铁路线上。

郑家屯的日军，是日本在二十一条交涉时，故意耍出威吓手段擅自出兵进驻，继之并且设立了警察派出所；奉天的中国当局曾经要求其撤走，但日方却置之不理，继续驻屯下去。

当时，中日之间所签订的一些约定，在中国来说，已经是道道地地的不平等条约；可是日本方面连这样不平等的条约范围都还不遵守。——“郑家屯事件”就是由于日本种种强暴行为所导发。

日提狂妄要求

日本在出动军队占领了郑家屯之后，便将这个问题付诸外交折冲，并且倚仗武力为后盾，片面宣称肇事责任在中国方面，而以之为讨价还价的藉口，迫始中国作多方面的让步，意图伸展其在东三省南部（南满洲）的控制力量。

刚于八月间到任的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在九月二日便强硬地向中国提出“郑家屯事件解决案”。这是在八月三十一日的日本御前会议中所决定，所谓“解决”只是徒有其名，而实则列出许多过分的要求：

一、惩罚第二十八师师长。

二、有责任之军官，悉行免黜；其中直接指挥暴行者，处以严刑。

三、严饬驻东三省南部及东部内蒙古之中国军队，嗣后不得再有挑拨日本军队或日本人民之任何言动，并由该处地方官以此项命令布告周知。

四、承认日本政府为保护及管束居留于东三省南部及东部内蒙古之日本臣民，于必要地点派驻日本警察官；中国并于东三省南部增聘日本人为警察顾问。

五、驻扎东三省南部及东部内蒙古之中国各军队，聘用日本军官若干名为顾问。

六、中国士官学校聘用日本军官若干名为教习。

七、奉天督军亲往关东都督署及奉天日本领事谢罪。

八、对于被害者予以相当之慰藉金。

关东都督中村觉，在御前会议之先的八月三十日向陆军大臣及陆军参谋本部建议“善后处分案”，有（一）在郑家屯及郑家屯至四平街之间，日军有自由驻屯权，以及供给营地、操练场、靶场。（二）正式承认日本在“南满”及“东蒙”无限制配置警察等项。日本政府所提出的“解决案”，就是采纳了中村觉等日本军方的此类强硬意见。

等于二十一条重提

在上列几项要求之中，特别要加以注意的是：第四、五、六项“派驻日本警察官”、“军队聘用日本顾问”、“军校聘用日本教官”问题。

这几项，和前在一九一五年二十一条要求时的第五号中所包括的事项几乎没有什么差别。5[36]1056当时，日本在列强众目睽睽之下，有所顾忌，乃秘而不宣；但不久被暴露出来，致为国际非难所阻遏，遂自行撤回或予以搁置，故而在二十一条交涉结果所签订的“有关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条约”中规定有“日本人服从中国警察法令”。

然而，现在又是旧案重提，再事纠缠。——这种藉细故惹事生非，引以为交换条件、强迫中国方面让步的手段，实在是帝国主义侵略外交的一个实例。

就像“郑家屯事件”，照说应该是由中国方面严正要求日本军警退出郑家屯为起点来解决问题；可是，现在却在日本提出非法要求、迫使中国让步的本末倒置情况之下展开谈判。

日本方面，对于军事顾问和警察问题，坚持不让，双方折冲十数次之多，形成了马拉松式的谈判局面。

默认了日本派驻警察

十月十八日，林权助向外交部次长夏诒霆提出说明书——“日本已在东三省南部境内设置若干警署，中国地方官事实上业经承认；又一九一五年签订中日新约（根据二十一条要求所订）之后，在东部内蒙古的日本人增多，日本政府为保护并管束该等臣民起见，认为有派驻警察之必要，请援照承认在东三省南部设置领事馆分馆前例，从速承认此项要求。”

及至一九一七年一月六日，更向新任外交总长伍廷芳提出带有威胁语气的备忘录——“派驻警察官之事，为治外法权的当然措置，毫无侵害中国主权之处；倘中国政府仍事踌躇，不表同意，则日本政府只得自由实行。”简直是公然扬言将以武力进行侵略。

对于日本如此强硬的态度，伍廷芳于一月十二日向林权助面交说明书，内容如左：

“中国与各国所订条约，未有驻警察官之例。在中国领土内驻扎外国警察，无论如何，于中国主权之精神及形式上均有妨碍。现在南满各地设置之日本警察，业经中国政府及地方官迭次抗议、并未承认。

“唯警察问题，与郑家屯事件原无关系，应请贵国（日本）政府毋庸再提。”

然而，中国毕竟是屈服了。——在表面上，伍廷芳像是拒绝了日本的要求，但实则对于日本在东部内蒙古已经设置的警察派出所并没有提出“应予撤废”，而只是表示“毋庸再提”。可见中国政府是对于派驻警察官的问题给予了默认。

于是日本方面乃突然改变了态度，问题便急转直下，趋于解决。

一月二十二日，双方交换照会，不提警察及军事顾问问题，而只协议：（一）申斥第二十八师师长。（二）处罚负责任的中国军官。（三）给予吉本喜代吉慰问金等五项；并决定了在郑家屯驻扎的日军之中，只撤退当事件发生之后调来增援的部队。

此一事件的交涉结果，中国在表面上保持了国家的面子，是仅得其“名”；相反地，日本则将其向东部内蒙古派驻警察官和军队的不法行为迫使对方默认，而获其“实”。

到了这个阶段，日本对于东部内蒙古，显然是已经打开了一个军事进路的入口。

军阀割据序幕

在这里，得对于当时的国内情势，作一些概述：

袁世凯于一九一六年六月死后，他所统驭的北洋军阀，因其主脑籍贯的不同而区别为“直系”（河北派）、皖系（安徽派），揭开了所谓“军阀割据时代”的序幕。

直、皖、奉三系

“直系”以冯国璋为领袖，曹锟、吴佩孚、孙传芳等继踵而起，有英、美两国为其后盾。

“皖系”以段祺瑞、徐树铮、倪嗣冲等领导，得到日本的协助。

初期，两派在表面上还采取一致协力的态度，但只要一有机会，就想排挤对方，好让自己一方面完全承受袁世凯的“遗产”。

此外，在北方又逐渐形成一个别树一帜的新兴军阀，就是以东三省为地盘的张作霖，一般称其为“奉系”。

“直”、“皖”、“奉”三系，后来在北洋军阀阵营中为竞逐霸权而形成斗争。

又在中国南方，则有云南的唐继尧、广西的陆荣廷各据一方。唐继尧在蔡锷等人组成护国军奋起讨袁之际，曾经供给三千人的军队，表示协力；不过其内心则是颇想送走蔡锷，好让自己留守后方，扩充势力。

在广西的陆荣廷，一度宣告独立之后，便只顾力谋保持自己的地盘；及至袁世凯死后，则秘密与直系互通款曲，意图逐渐向广东伸展其势力。

段祺瑞操纵黎元洪

当如此军阀割据的情势之下，北京方面在袁世凯逝世的第二天～六月七日，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黎元洪是在辛亥革命之际，受到革命军的敦促勉强出任湖北都督的人物，现在并没有军事力量为背景，故而虽说是就任一国元首，但实则只不过是被统驭皖系军阀势力的国务卿兼陆军总长段祺瑞所操纵的傀儡。段祺瑞在袁世凯死后，意图囊括军政大权；连黎元洪之就任大总统，也是在段祺瑞表示——“北京秩序由我负责”的安全保证之下，才实现的。

段祺瑞的打算，是依循袁世凯路线，根据一九一四年袁世凯所制订的“新约法”推行政策。“新约法”是大总统集权制，对于他操纵黎元洪任意发挥权力比较有利。

国父号召规复约法

国父孙先生所警戒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他在六月九日致电黎元洪，提倡“规复约法（民国元年“旧约法”），尊重国会。……民国总统，职曰公仆。……与国民从事建设，天下幸甚！”同时并发表规复约法宣言。

孙先生的宣言，得到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的响应，他号召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等人调集舰艇于上海吴淞口；六月二十五日发表独立宣言——“非俟政府恢复民国元年约法，国会开会，正式内阁成立后，北京海军部的命令，断不承受。”

当时，中国海军有三个舰队，但其主力为第一舰队，一旦倒戈，对段祺瑞来说，其威胁颇为不小；加上驻守南京的“直系”冯国璋，因恐惧自己辖境的上海发生动荡，故而要求段祺瑞迅速谋求解决办法。

段祺瑞鉴于情势于己不利，乃于六月二十九日以大总统黎元洪的名义申令恢复旧约法及召开国会。于是，在一九一四年被袁世凯解散了的国会，得以复活。

就在同一天，黎元洪便依据旧约法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次日～三十日，续行任命各部总长；此时，段祺瑞再度兼任陆军总长。

在此同时，护国军也因为达成了预期目的，而于七月十四日废止护国军军务院。此外，四川、广东等发表过独立宣言的各省，也都宣布取消独立。

八月一日，国会在北京正式复会，离开北京的国会议员陆续回到京城。

十九日，黎元洪在国会正式举行大总统宣誓手续。十月三十日，由国会补选冯国璋为副总统。

国会复会，旧约法也已经恢复，可是段祺瑞却根本没有尊重之意。对于存有扩大权力野心的段祺瑞来说，旧约法和国会都只是他的障碍物而已。

所谓“督军团”

段祺瑞在召集国会之后，便立即着手北洋军阀的重行编组，首先打算结成“督军团”。所谓“督军”，就是原来各省的“督理军务长官”于七月六日变更官制所改称，是各省掌握兵权的最高指挥官。而段祺瑞则是要掌握住这些督军，把他们组织起来。

段祺瑞最初留意到的是安徽督军张勋的活动。张勋是主张“清朝复辟”的人，他的部下全体留着辫子，以示效忠清廷。

当袁世凯死后的六月九日，张勋在徐州邀请各省代表集会，煽起发动复辟的气势，同时号召团结北方各省势力。

在段祺瑞方面，当然根本不会理睬什么复辟问题，而只是想要利用张勋“团结军事力量”的意图。

于是，段祺瑞乃秘密派遣心腹干部徐树铮等人和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搭上关系。结果在九月二十一日组成“省区联合会”。

参加这个联合会的人，除安徽省长倪嗣冲之外，各省督军有张勋以及江苏冯国璋、江西李纯、湖北王占元、直隶曹锟等十三省。不过督军们参加联合会的动机各有不同——有复辟派、有拥段派，颇予人以一种“同床异梦”的感觉。

对德宣战问题

对于军阀阵营如此重行编组的政局激起风波的，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问题——也就是“对德断交”、“对德宣战”的问题。

一九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德国政府宣布--“自二月一日起，对于在英、法、义沿海及东地中海一带指定区域内施行无限制攻击，对中立国舰艇也不例外。”

德国潜水艇，自开战以来，屡次攻击中立国船舰，造成国际紧张；美国政府在上年四月便已曾指其违反国际公法，提出抗议，德国因而一度表示保证不攻击中立国舰艇；然而，由于战况趋于不利，乃突然撤回保证，宣称仍作无差别性的攻击。

美劝告中国参战

美国针对这种行为，乃于二月三日以对德国断交为报复，同时由其驻华公使芮恩施促请中国政府采取同一行动。

对于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一贯坚持中立国态度的中华民国，要求其参战的国际活动，早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就已经有过，当时，采取主动的是英、法、俄三国。三国的意图，是要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清除德国在中国及亚洲地区的势力，可是，当时由于碰到日本反对，以致未有结果。日本之所以反对，是基于他的判断——中国如果参战，便会提高其国际地位；相对地，则削弱了日本的发言力。

然而，及至美国对德断交，并劝告中国参战，乃使情势为之一变；到了这个时候，日本唯恐在国际间陷于孤立，因而不得不跟从众意。

于是，在二月九日的日本内阁会议中，乃一转而决定支持美国的劝告，并且便在当天通告英、发、俄三国。

在这一次的阁议中，日本基于国益充分研讨判断：“中德如果断绝邦交，则其必然的结果是——当德国在中国的政治阴谋和经济活动为之断绝的同时，其一向所占有的地位（利益），至少会有一部分归于日本继承。是则对于日本乃为有益无害……”

本来，在当时中国的舆论是反对参战的。国父孙先生等认为：“这个战争的战场是在欧洲，和中国没有关系；如果加入协约国，反而会招致国内混乱。”因此主张维持中立；同时，大总统黎元洪、副总统冯国璋以及外交总长伍廷芳，也都对参战不以为然。

段祺瑞图扩充实力

可是，国务总理段祺瑞则强硬主张参战；于是，这个问题便卷入了国内军阀抗争的漩涡。

段祺瑞之所以主张参战，是有其幕后因素的，在后面还会提到。这时候段祺瑞是以参战为条件，勾结日本，获得其借款及武器，以加强自己一派的军事力量，奢望凭藉武力统一全国。

段祺瑞主张参战极其坚决，黎元洪一表示反对，段便提出辞呈，前往天津，以示要狭；感到为难的黎元洪，乃派冯国璋到段处转达歉意，表示“今后不再干涉参战问题”，促段返回北京。

于是，段祺瑞乃首先向国会提出“对德绝交议案”，经众、参两院先后于三月十、十一日的秘密会议中通过，即由北京政府于十四日照会德国驻华公使辛慈断绝邦交。

可是，当事态进展到“参战”的阶段，便在国会中遭遇到强烈的反对，多数人则保留了态度；而段祺瑞竟因此行使非常手段——就是利用早就准备好了的“督军团”。

四月二十五日，段祺瑞假藉举行“军事会议”的名义召集督军团在北京集会，段即席表明参战目的在藉日本的军事协力以强化北洋军的意图；因此，督军们乃立即转变为“参战派”。

督军团很快地便采取了示威行动，五月一日，有二十几个督军及代表们闯入正在举行的国务会议席上，众口一辞叫嚷“参加协约国”。

五月四日，更跑进总统府，胁迫对德参战抱消极态度的黎元洪——“只有对德国宣战，中国才能立足于国际舞台。”

制造请愿殴打议员

五月七日，参战案提付国会审议；十日，众议院开会。在这个当口，段祺瑞又耍出了第二个非常手段——就是师法袁世凯在一九一三年十月选举大总统时动员“公民团”的故智——发动了大量的“公民”把国会包围起来。

“公民请愿团”、“五族请愿团”、“北京市民主请愿团”……各式各样的名称共约三千群众，陆续涌到国会，要求通过“对德宣战议案”。奉段祺瑞指使的陆军部官员傅良佐、靳云鹏等人也加入指挥。群众拉住来到众议院的议员们，递给呼吁通过参战案的请愿书；对于不肯接受的议员就加以殴打，被殴打的议员有邹鲁、吕复、田桐等二十余人之多。

由于喧闹得太凶，乃激起了议员们的抗拒，反而使参战案的审议停顿。继之，更有外交总长伍廷芳、司法总长张耀曾、农商总长谷钟秀、海军总长程壁光等阁僚于五月十一日辞职；于是更出现了内阁只剩下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一个人的异常状态——公民团的效用，实在是来得过猛了一点。

本来，在当时中国的舆论是反对参战的。国父孙先生等认为：“这个战争的战场是在欧洲，和中国没有关系；如果加入协约国，反而会招致国内混乱。”因此主张维持中立；同时，大总统黎元洪、副总统冯国璋以及外交总长伍廷芳，也都对参战不以为然。

段祺瑞图扩充实力

可是，国务总理段祺瑞则强硬主张参战；于是，这个问题便卷入了国内军阀抗争的漩涡。

张勋演出复辟

虽然蛮干到已经成为“光杆内阁”的国务总理段其瑞，却仍旧要求国会审议他的“参战议案”；多数国会议员面对如此强迫态度，当然会激起反感，因而站在他的敌对立场，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九日，在众议院决议：“现在内阁仅有总理一人，不能达成责任内阁的实际任务；本院对于重大外交案件，应俟内阁改组，再行审议。”——言外之意，就是在促请段祺瑞下台。

段祺瑞为采取对抗行动，乃在同一天再度动员督军团向黎元洪要求解散国会。

罢斥段祺瑞引来张勋

可是，黎元洪的判断，却以罢斥段祺瑞较为得策；为此征得外交总长伍廷芳的副署，乃于二十三日下令解除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并以伍廷芳暂行代理。段祺瑞则发出通电，留下——“……将来地方及国家因此发生任何影响，祺瑞一概不能负责”的威胁话，再度前往天津。

不过，黎元洪断然罢斥了军阀巨擘段祺瑞的大胆措施，却招来了欲益反损的后果。

以仰承段祺瑞鼻息的安徽省长倪嗣冲于二十九日通电和中央脱离关系开端，奉天张作霖、山东张怀芝、河南赵倜、直隶曹锟等八省督军也相继表示出同样的强硬态度，安徽、奉天、山东、河南各省，且有进军北京之势；以致毫无武力为后盾的黎元洪感到束手无策，唯有寄望于尚未宣告脱离中央的张勋为之担任调停。

不料，张勋乃认为这就是他一向意图为满清制造“复辟”的实施时机到来，于是立即率领辫子兵五千人由徐州北上，六月八日抵达天津。在这个期间，段祺瑞系的兵员也陆续向天津集结，设立了独立各省的“总参谋处”。

面对如此情势而感到震惊的乃是黎元洪。因为他托请张勋来做调人，希望藉他的影响力对宣告和中央脱离关系的各省加以说服；岂知他却率领了不必要的大军意图开进北京，显然是抱有调停任务以外的目的。

为此，黎元洪特地发出劝告——“减从入京，以免京师人心恐慌。”但张勋却置之不理，反而对黎元洪提出强硬要求——“限于三天之内解散国会，否则不负调停责任。”

如果连担任调停的人都要弃我不顾，岂非万事皆休？是故黎元洪乃竟然不顾代理国务总理伍廷芳的反对，而易以步军统领江朝宗代理国务总理，副署解散国会命令，予以发布。这样一来，好不容易才重行集会的国会，便又在军阀的压力之下，再度封闭了大门。

满清的“复辟剧”，于是袍笏登场。

康有为备妥复位诏书

六月十四日，张勋偕同李经义、张镇芳、段芝贵等人到达北京，他头戴嵌有宝石一方的瓜皮小帽，脑后垂着辫子，身穿纱袍，外面罩上深色马褂，打扮得大模大样。

翌日～十五日，张勋会见黎元洪，口头提出——“（一）请将优待清室条件列入宪法。（二）请定孔教为国教。（三）请批准‘定武军’（辫子军）增招军队二十营”等要求。

十六日，张勋头戴红顶花翎，身穿纱织马褂，赴逊清皇室居处的故宫请安，在养心殿谒见废帝溥仪和四个皇妃，行跪拜大礼，做出一副“奴才”模样。

二十八日，蜷伏在上海的旧保皇党党魁康有为被请来北京，他已经为这一天的到来预先替“宣统皇帝”准备好了“复位诏书”。

三十日晚间，张勋在自寓邀集陆军总长王士珍、步兵统领江朝宗、警察总监吴炳湘、二十师师长陈光远等人，协商复辟。

在张勋的强硬态度胁迫之下，没有人表示反对的意见。

打铁趁热——张勋连夜命令大开城门，让在城外待命的辫子军蜂拥入城，部署在重要地区，并关闭电报局，封锁对外联络。

进入故宫请出废帝

七月一日上午三时（三十日深夜），张勋身着满清朝服，率领康有为、王士珍、江朝宗、吴炳湘以及满清遗老刘廷琛、劳乃宣等数十人进入故宫，请出废帝溥仪，一干人等匍伏红地毯上，三呼万岁，郑重陈辞——“为收拾混乱政局，恭请皇上恢复大清朝。”当时，只有十二岁的溥仪，根本不懂得是在搞些什么名堂，好歹接受了这个请求，这就算是“复辟”告成。

溥仪后来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以“我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喜事弄得昏昏然”为前置词，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如下：

“我回到养心殿，又召见了张勋。这次张勋说的和他的奏请复辟摺上写的差不多，只不像奏摺说得那么斯文就是了：

“‘隆裕太后不忍一姓的尊荣，让百姓遭殃，才下诏书，办了共和；谁知办的民不聊生……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只有皇上复位，万民才能得救……’

“听他念叨完了，我说：‘我年龄太小，无才无德，当不了如此大任。’他夸了我一顿，又把康熙皇帝六岁做皇帝的故事念叨一遍……”

段祺瑞趁机复出

宣告“复辟”之后的张勋，将当时的中华民国国旗——“五色旗”改为清朝的“黄龙旗”，年号也恢复了“宣统”，满清时代的官职都为之复活。

然而，这一场“复辟剧”实则只不过是张勋等少数人在自导自演，自我欣赏而已。

黎元洪拒绝承认复辟

首先是大总统黎元洪拒绝承认复辟。接着各省军事首长们也有反对者出现。在此之先，张勋在徐州为谋实现复辟召开会议时，段祺瑞、冯国璋等军界领导人物都曾派代表参加，张勋便一厢情愿地认定他们都会站到自己这边来；岂知实际满不是那么一回事，就连被他亲自邀请偕同进入北京城的段芝贵，也都转变为反对他的立场。

国际间的反应更是冷淡，英国人在天津发行的英文报——“京津时报”，在七月二、三两日的报上大张笔阵：“复辟是起于张勋个人的野心，想必在几天之后张勋就会孤立无援。”“张勋是受到德国的煽动，据说他得到了德国的援助，各国应该对张勋采取将硬态度。”

日本也很明显地表示出反对复辟的态度。

先是在四、五月之间，日本曾经派遣陆军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前往徐州，和张勋有过接触，并为支持复辟运动有所策划；可是，没隔多久就看准了复辟前途终究未可乐观，所以在六月初便已经决定舍弃张勋。及至复辟登场之后，乃积极支持黎元洪，对驱逐张勋给予助力。

而黎元洪则当复辟之际的七月二日，通过袁世凯时代的军事顾问日本陆军上校坂西利八郎的关系，向驻华日本公使馆要求援助与保护。

据坂西于七月二日向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报告：“黎元洪于七月二日向上海、汉口、天津、旅顺、奉天等地发出通电——‘闻因复辟而有黎元洪奉还国政之说，绝非事实；元洪受国民付托之重，自当始终民国……’此一电报，系由日本公使馆代为发出。”

段祺瑞开始行动

黎元洪复于当天派遣密使前往天津，再度任命曾被其罢免的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促使讨伐张勋。

接着更派密使⊕大总统印信送给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请代行大总统职权，旋即为自身安全而于当天晚间避往日本公使馆。

段祺瑞在接到黎元洪的任命之后，立即开始行动。四日，与冯国璋联名发表通电，申讨张勋“群力构造之邦基，一人肆行破坏”等八大罪状。同时，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司令部设于天津造币厂，正式通电宣告讨伐张勋，并即派段芝贵为东路讨逆军总司令，曹锟为西路讨逆军总司令，自领驻防天津的第八师，三路向北京进军。

此时，日本方面曾经为段祺瑞调度军费。据当时北京政府顾问（前任外交部次长）曹汝霖着“一生之回忆”提到：“三菱公司经理秋山昱，同意以开滦煤矿股票为担保，即照面额抵借百万元。”此外，日本公使林权助也曾为收买在北京的张勋部属，借给八万元。

复辟十二天曲终人散

复辟派张勋所率领的辫子兵，既无纪律，又乏训练，不足与段祺瑞部队对抗，段军一经出动便立即将辫子兵击溃，于十二日控制了北京。

张勋本人跑进东交民巷荷兰公使馆。由他所上演的复辟剧，只不过十二天，便已曲终人散。

十四日，段祺瑞意气昂扬进入北京，复任国务总理；同日，黎元洪引咎辞职。

十五日，段祺瑞任命汪大燮为外交总长，段自兼陆军总长；十七日，续任梁启超为财政总长，林长民为司法总长……集拢了仰承自己鼻息的人组成第二次段内阁，段祺瑞体制为之具备。

段祺瑞东山再起之后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对德宣战”。此时，国会不复存在，反对参战的黎元洪已经退位，再也没有能够正面反对的人。是故由于对德参战问题而演化出来的一场复辟剧，最后则造成了加速“参战”的结果。

“在复辟运动背后，有德国阴谋策动”的传说，越来越像是煞有介事。

被段祺瑞赶下台的张勋，逃入荷兰公使馆暂时匿居之后，旋即迁往德军营舍存身。自三月间中国对德断交以来，德军营舍便由荷兰使馆代位管理。

张勋的家族，也赓续进入该营舍受到保护；而且援救其家族脱险者，也就是德国人。

得知上情之后，“协约国”方面的态度为之硬化。十三日驻北京的协约国各国公使举行会议，认为张勋的复辟剧是受到德、奥两国的援助，故而决议劝告段祺瑞对德、奥宣战（据日本驻华公使馆少将武官斋藤季治郎于七月十四日第七十六号致陆军参谋次长田中义一极机密电报等资料）。

日本劝诱参战

七月十四日，法国驻华公使康悌依据“协约国”公使会议的决定，拜会刚进入北京城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告知——“如果迅速对德、奥两国宣战，协约国便会给予援助。”段祺瑞乃向之说明：“在本人的可能范围内，贯彻既定政策，决不变更。”

段祺瑞之所以决心参战的最大目的，是在藉此获得日本的借款，从而扩充和强化其属下的北洋军，好对国内采取武力统一政策。

由于美国因德国宣言其潜水艇采取无限制攻击的契机，而在二月间对德断交以来，在先曾经一时反对中国参战的日本，也在方针上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积极劝诱中国参战。

日本的态度，当然并非为了要求中国分担国际任务，而是鉴于世界大势既已倾向于促请中国参战，所以就想做到中国之参战是在日本援引的形态之下出现。

日图接收德国权利

日本像这样做的企图，是要将因参加第一次大战所接收的德国在山东省境内之各种权利--胶州湾租借地、胶济铁路及沿线周围十七公里以内的采矿权，以及青岛至上海、青岛至烟台的海底电缆等，使之永远为日本所占有。

至于英、法、俄等列强，其内心也正在打着同样的算盘，各国都是按照“促使中国参战→赶走德国在中国的势力→扩大本国利益”的公式，彼此施展外交上的谋略活动，而在当事者的中国毫未与闻的情况之下，为之作参战的安排。

其中活动得最起劲、最机敏的，算是日本。

日英竟有秘密约定

奉到外相本野一郎指示的日本驻英大使珍田舍己，迅即于二月三日向英国政府提出要求--“日本承认中国参战的条件是：希望保证德国在山东一切的权利由日本继承，以及由日本接收其业已占领赤道以北的南洋诸岛。”英国同意这个提议，于二月十四日将“保证书”给予珍田大使；同时也很精明地附带提出——“德国所属赤道以南的南洋诸岛归英国接受”的交换条件。于是，双方便做成了以赤道为分界线而将密克罗内西亚群岛（在大洋洲西北面）南（英）北（日）瓜分的密约。

日本在和英国打好交道之后，继之向法俄两国、又继之向义大利也先后提出同样的要求，在三月底取得同意。

在此之前，日本对于中国参战，本来是一直站在反对的立场。

可是，英、法、俄等欧战当事国家，因在眼前正为打倒德国而从事着殊死战，所以亟希望中国能够尽快参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则非要得到日本的协力不可。

日本正因为看准了各国是这样的迫切需要，故而很机敏地图使各国承认他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在这个当口，就各国立场而论，对于日本要在山东扩张那么一点权利，当然也就无暇介意了。

中国事前毫无所知

如上所述日本和四国做成的约定，是被极度保守着秘密的，所以中华民国没有能够得到丝毫风声。直到后来，在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才最初得知有如此使中国屈辱的密约存在。

不过，其中唯有日俄双方的密约，实则已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为俄国新诞生的苏维埃政府机关报——“消息报”所发表，可是当时驻在莫斯科的中国外交官却糊里糊涂未曾注意到这个报导；加上正当国内南北战争极其激烈之际，也没有人留意及此。

日对段祺瑞甘辞重币

在这样和列强折冲的同时，日本双管齐下，对于段祺瑞则用甘辞重币来劝诱参战。

肩负这个任务的“特使”就是有寺内正毅首相“智囊”之称的日本民间人物——西原龟三。

自一九一六年秋天开始，西原龟三两度往返于东京和北京之间；一九一七年一月，谈妥了第一笔的所谓“西原借款”日金五百万元。

西原奉到劝诱中国参战的特殊使命而第三次首途前往北京，则是在美国对德断交才不过十天之后的二月十三日。就只在这短暂的几天之中，日本便对于中国的参战由反对而转变为推进的立场；于是，一方面和列强折冲密约，一方面向中华民国派遣特使游说参战——不能不说是摇身一变，变得非常俐落。

西原龟三是从寺内正毅担任朝鲜总督时（一九一○～一九一六年），便受到寺内的知遇，同时并和朝鲜银行总裁胜田主计交谊深厚。一九一六年十月，寺内出任首相，胜田随同入阁为藏相，因而西原的声价也为之看涨。在当时，社会上统称这三个人为“朝鲜组”。

又在前面已经引用过的有关山东革命军的“调查报告”，就是西原龟三所撰写；当时，曾被后藤新平利用为攻击大隈内阁的资料，一般称之为“怪文书事件”，造成政治风波，促使大隈内阁提早垮台。

在段祺瑞方面，对于具有如此经历的西原龟三寄予了信任。据当时为段内阁顾问的曹汝霖在他的“一生之回忆”中，对于第一笔的“西原借款”大致有如下记述：

“西原龟三系由军事顾问（段内阁）坂西利八郎所介绍。据坂西吹虚寺内正毅在朝鲜总督任内，经济问题，即由西原策划。余适接任交通银行总理，向日本接洽五百万元借款，久无成议；遂与西原相商，西原允电东京，不久即得大藏大臣胜田主计覆电，允借日金五百万元，无需抵押品，且汇款迅速。余遂信西原是有来历的。”

段祺瑞堕入彀中

日本首相寺内正毅的“特使”西原龟三，于一九一七年二月十六日到达北京，翌日～十七日，便首先和曾经因借款有过接触的交通银行总理曹汝霖（当时北京政府顾问、前任外交部次长）作四小时长谈，十八日和财政总长梁启超、二十一日和段祺瑞连续举行会谈，极力游说。

西原龟三的使命，是撇开美国，由日本抢先促使中国参战。据他的自传“七十余年的梦境”记述：

“倘使（中国）倒向德国那边，可不得了；再说，即使是促成其站在协约国这边，但如果让美国去劝诱加盟，则对于好不容易才见巩固的‘日支（中）亲善’基础，将会出现很大的罅隙……（日本）内阁方面，此际已经决定劝告支那参战，故而本野外相委托我跑一趟，担负这个任务。……”

和西原访华之行往返交错的，是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适于此时归国。西原的自传也曾提到：

“林公使的归国之行，是突然奉到外务省命召，原因则为让我（在中国）的活动不要受到干扰，而把他暂时搁在东京，实在有点对他不起。……”

根据上面的记述，可见西原访华所受的托付，是连其本国政府代表的公使，都要被暂时调开、不让预闻的阴谋。

日方的甜言密语

西原龟三所带来的传言是这样的：

“中国如果参战，其补偿是——日本直接给予财政援助，关于庚子赔款和关税问题也可以谋求对于中国有利的措施，并且可为提高中国国际地位不惜予以助力。”

此时，国务总理段祺瑞对于日本和英国等欧洲国家进行有关山东问题的密约情形当然不可能知道，所以便贸然相信了西原龟三的甘言。

倒是财政总长梁启超有点耽心，特地叮问：“一旦中国参战，日本会不会就向中国派遣军队，或要求租借军港？”西原龟三斩钉截铁地答称：“这完全是杞忧！”

据西原龟三自传，在谈话时曾经力说：

“要想达到日支（中）两国互相携手，在五、六年之间，使贵国国政整饬就绪，国力充实，国际地位提高，挣脱多年以来欧美国家的压制，建立永久和平的目的，如果失去了今天的时机，不可能再向他处求得。……”

当传译的人将要译述完毕时，段祺瑞便两手猛拍膝盖，霍然起立，神情紧张，身体颤动，如临敌阵地说：

“知道了！我也有同感，一定要这样做。”

此后，段祺瑞便不顾一切，努力实现参战。

在此之前的段祺瑞，对于日、德两国来说，是比较亲近德国的。他对德国颇为迷信，平素吃西药，非德国药不吃；更深信德国陆军天下无敌，最后胜利必定属于德国。可是，在西原花言巧语的劝诱之下，却突然一转而向亲日途径锐进。

段祺锐提出条件

接着，段祺瑞便电令驻日公使章宗祥，于三月八日向日本政府提出中国所希望的条件如左：

一、庚子赔款（注），对德、奥方面，永远撤销；对协约国各国，展期十年偿还，并在此期间，不加算利息。

二、现行进口关税额，即时增加五成，并由中国政府改正关税价格表，改正后即按实际价格值百抽七五。至中国政府将厘金（清末在地方设立关卡课征的货物税）裁撤后，即将关税加值百抽十二五。

三、解除辛丑和约及附属文书中对于在天津周围二十华里之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的规定，及解除各国驻华公使馆及京津铁路的约定。

日本接到这个要求之后，当时不作承诺与否的表示，但答称：“这几点希望条件，似应在中国实际对德国断交之后，提请各国协商。”而其外相本野一郎则很含蓄地说：“容俟好好研究，总之得现对德国断交。”段祺瑞对于日本这种态度深信不疑，故而未在事先取得各国承认，便于三月十四日宣布对德国断交。

日本宿诺瞬即落空

然而，日本方面鉴于段祺瑞已经堕入彀中听其摆布，乃意图杀价，故而在三月十二日的内阁会议中指称：中国的希望条件过高，并决定对案如左：

“一、庚子赔款，可以延期到大战结束时偿付。

“二、关税问题，得按实价征收百分之五，并同意改订关税价格表。

“三、关于对中国军队的驻扎和行动之限制，同意于欧战期中暂时许可中国军队在天津周围二十华里以内出入。”

可见“不惜给予助力”的宿诺，已经抛弃到九霄云外。——这就是日本的态度。

注：庚子赔款“义和团之乱”，清廷与列将签订“辛丑条约”，对十一国赔偿白银四万万五千万两，年利四分，分三十九年偿付。中华民国成立后，继承偿付义务，由与负担过重，以致国家财政极度困难。

中国未获报偿

日本内阁会议的决定，固然是基于看穿了中华民国的底牌，但也的确是违背了国际道义。

对于阁议决定，连驻华公使林权助也提出了异议。

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林权助向外务省呈报：“日本政府的对案，并未具有能够促使中国参战的内容。中国的希望条件，是以和西原龟三多次折冲的情况为依据而提出；

中国方面相信西原龟三的提议就是日本政府的意向。事到如今，却作否定措施，将使中国怀有疑虑。”

但本野外相则加以拒斥地指复：“对于西原的提议，（中国）何以不经证实便相信其为日本政府5[69]1089的正式意向，实在是段祺瑞方面太欠慎重。”

对于中国所提出的希望条件打算予以杀价的，并非日本一国；盖所有列强都希望能压到最低的代价，换取中国对德宣战。故而都撇开中国，由列强之间进行外交折冲，以致中国的希望便消失于无影无踪。

关税问题错综复杂

列强折冲的焦点，是在于各国利害关系相当错综复杂的“关税问题”。

当时，中国的关税，依据清末对外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压低到按从价（以物品价格为准）课征，值百抽五（百分之五）；虽然也规定有每经十年得照价格变动的实际情况改订关税价格表，可是海关实权被外国人所掌握，一直没有改订。而在这个期间，通货膨胀，物价上升，如按实际价格覈计其税率，则平均已降落在百分之三五左右。

由于关税率过低，乃使本来就已经落后的中国国内产业更失掉了国际竞争的能力，以致中国经济益形凋敝。故而中国特地提出改正如此不平等现象的要求。

然而，列强各国却未肯轻易给予答应。

在关税问题上，日本和英国各因关系到其国家利益而极力争执。在三月三十一日为讨论中国参战条件而举行的驻北京协约国各国公使会议中，对于关税问题决议——“承认按实价课征，值百抽五，但以废止棉花输出税为条件。目前立即就现行关税课征率先提高三成（实际由平均百分之三五提高到四五五）。”分别呈报各国政府核议。

◎。参考《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四讲，◎至于欧美平等的独立国家，彼此的关税都是自由，都没有条约的束缚，各国政府都是可以自由加税。这种加税的变更，是看本国和外国的经济状态来定税率的高下。如果外国有很多货物运进来，侵夺本国的货物，马上可以加极重的税来压制外国货，压制外国货，就是保护本国货，这种税法，就叫做“保护税法”。譬如中国有货运到日本，日本对于中国货物，最少也要抽值百分之三十的税，他们本国的货物，便不抽税。所以日本货物原来成本是一百元的，因为不纳税仍是一百元；日本货物如果卖一百二十元，便有二十元的盈利。中国货运到日本去，若卖了一百二十元，便要亏十元的血本，由此日本便可以抵制中国货，可以保护本国货。这种保护本国货物的发达，抵制外国货物的进口，是各国相同的经济政策。

………

如果要和外国竞争，便要学欧美各国的那种政策。欧美各国对于这种政策，是怎么样呢？在几十年以前，英国的工业，是占世界上第一个地位，世界所需要的货物，都靠英国来供给；当时美国还是在农业时代，所有的小工业，完全被英国压迫，不能够发达。后来美国采用保护政策，实行保护税法；凡是由英国运到美国的货物，便要行值百抽五十或者值百抽一百的重税；因此英国货物的成本，便要变成极大，便不能和美国货物去竞争，所以许多货物便不能运去美国。美国本国的工业，便由此发达，现正是驾乎英国之上。德国在数十年之前，也是农业国，人民所需要的货物，也是要靠英国运进去，要受英国的压迫；后来行了保护政策，德国的工业，也就逐渐发达，近来更驾乎各国之上。

◎

可是英国政府则对此决议表示反对，其所持理由是——关税虽提高三成，但实际课征率仍在百分之五以下，使中国所获利益甚微，不足以成为诱导其参战的因素；同时废止棉花输出税，则唯独日本一国蒙受很大利益。

同时，日本政府却也加以反对，不过其着眼点则和英国不同。日本所反对的，是在“目前立即就现行关税课征率先提高三成”一节。他的策略是——尽可能争取到推迟两年或是一年，再行调整税率，比较有利。

尤其是日本纤维业界，自中国输入大量棉花，加工纺成二十支纱以下的低级棉纱，再对中国输出；关税一旦提高，则日货便会和中国国产品发生竞争，将受到很大的打击。故而日本业界向其政府要求中止提高中国关税的声浪越来越高。

日、英双方争执的结果，日本在中国的“棉花输出税”方面、英国在“目前立即提高税率”方面分别作了让步。

此外，关于供给借款问题，在日本之外，美国也对中国有所接洽。美国向段祺瑞提议以“尊重国会，谋求国内统一”为借款条件；但却招致倾向于援助段祺瑞的日本藉此指出美国的提议是“干涉中国内政”——为之表明遗憾之意。

至于段祺瑞，则期待于日本的援助，而采取对于议会的意见不予理睬的强硬对策。

后来，美、英转而支持冯国璋，和受到日本援助的段祺瑞之间所演变成的“直皖战争”，在诸如此类的国际关系方面也存在有一些因素。

中国对德奥宣战

在这样周折的情势之中，中国政局出现了复辟剧，段祺瑞因之东山再起复任国务总理，新内阁由赞成参战人士构成，于是在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时中国终于对德、奥两国照会宣战。

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大为兴奋，向段祺瑞转达了日本政府的意向如下：

“欣闻中国对帝国暨协约国共同敌人宣战，帝国政府极为欣悦。深冀由于中国政府的措施，促进日、中两国邦谊，愈见密切。”

可是，中国虽然已经参战，但仍然没有得到列强接受中国希望条件的保证；各国对于中国的条件，也还在反覆进行着谋略折冲。而段祺瑞却在还没等得及参战条件明确到手之前，便已经先摊开了自己的底牌——对德、奥宣战。

得到各国的答复，是在参战之后三星期的九月八日，其内容大致如次：

“一、庚子赔款，无息延期五年，但俄国所应受之赔款，仅可延期额度的三分之一；德、奥两国之赔款撤消。

“二、海关输入税率，按实价征百分之五；但税率条整，应由有关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设一委员会研议。

“三、中国军队，限于为监视德、奥国人，可以暂时在天津的限制区域（周围二十华里）内出入。”

然而，上述实征百分之五的关税，实则并没有能够立即实现，这是由于有关国家所设立的委员会在研议时拖延不决；等到见诸实施，已经是参战之后两年的一九一九年八月。

中国方面，却由于参战而对协约国供应了大量粮食，更有十多万劳工送往欧洲，协助协约国作战——总算是尽到了参战义务；可是，这么多中国人的辛劳，却毫未获得相应的报酬。

石井蓝辛协定

就日本筹划建立其在中国“优越地位”的策略而论，一直在阻碍着他的是美国。

美国打着“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口号，一有机会，便对日本的侵略中国大陆政策给予牵制。

日本在此之前，已经和列强之中的英、法、俄三国订有条约，使他们承认了日本在中国的“特殊权利”。这些条约就是——“日英同盟条约”（一九○二、○五、一一年三度签订），“日法协定”（一九○七年），“日俄秘密协定”（一九○七、一○、一二、一六年四度签订）。

至于和美国之间，由于在一九○五年的“桂太郎·塔虎脱协定”（译注一），使之承认了日本在韩国的“特殊权利”；但是关于中国大陆方面，却反而因“高平·鲁特协定”（译注二）而对美国承认其“机会均等”、“维持现状”的要求。

为此，日本打算对美国加以拉拢，于是有所谓“石井·蓝辛协定”的成立。

当中国国内因参战问题而造成纷歧混乱的一九一七年六月，日本决定派遣前任外相石井菊次郎以全权特使的身分前往美国，表面上是祝贺美国参战，洽商协同对德作战事项，但其真正的意图，则是为了使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优越地位”，并使夺取自德国的山东权利以及在“满蒙”的特殊权利得到国际承认。而且关于山东问题，和英国以及欧洲各国都已经订立了密约，剩下来的只有一个美国。

石井所负使命

日本政府，在特使石井菊次郎首途之前的七月二十四日所举行的阁议中，决定了一个“有关协商日美两国重要问题注意事项”，交付石井。

这个文件指出：美、中关系，只是以经济为中心；但日、中关系，则由于地理接近及经济关联性极深，所以认为——“在政治事务方面，帝国所有利益，非欧美各国所能比拟，其特殊而又密切的情况，实与本国安危息息相关。”希望凭这个论据使美国承认日本的“特殊地位”。

可是，在美国方面，对石井菊次郎衔有对于亚洲外交将会发生重大影响的秘密使命，却毫不知情；只认为他是纯为前来对美国参战表达谢意的使节，而予以欢迎。石井菊次郎于八月六日到火奴鲁鲁，然后经旧金山于八月二十二日抵达华盛顿。

在旅途所经各地的欢迎会中，石井菊次郎反覆强调——日本对于中国毫无侵略野心；亦无侵犯“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的意向。

当时，日本的敌国-德国，正到处不断地宣扬日本侵略中国政策的不当；同时，在美国国内，对于日本对中国政策抱有不信任感的人也并非少数，可是由于欢迎石井特使的气氛颇浓，乃冲淡了对日本的疑念。

石井菊次郎于九月六日开始和美国国务卿蓝辛举行会谈。

美未摸清日方底牌

石井以委婉的措辞向蓝辛表达出真正的意图——要使美国承认日本和中国的特殊关系：

“日本对中国的政策，既非侵略，也不想垄断权利；唯因在地理上和中国接近，乃产生出特殊关系，但只不过是积极推进工商业活动而已。希望日本和美国在‘门户开放’的原则之下，从事经济竞争，兼顾保全中国领土与主权。此际，两国似应成立一项协定，俾互相获致根本理解。”

“协力对德战争”这句话，也是石井的一张王牌：

“美国往往对日本的行动有所误解，是出于德国造谣离间之阴谋；为免再予敌人以可乘之隙，故有成立协定的必要……”

蓝辛虽为国际法权威，但外交折冲非其所长；他没有摸清楚石井的底牌，却反而称赞石井是一个爽快、坦白的人物。

据日本方面纪录～～九月六日，石井·蓝辛第一次会议中，蓝辛一再提议发表宣言，声明：关于中国的领土保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日、美意见一致。但石井则主张：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则不过是重申以前的“高平·鲁特协定”，没有什么意义；并进而要求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

其后，双方在协定的用语方面，一度发生争执，其情况是这样的：

日本主张明白记载“优越利益”；但美国则指驳这一个词汇与“门户开放”原则不能相容。争持到最后，日本让步，改用“特殊利益”。

承认日本“特殊利益”

“石井·蓝辛协定”，于十一月二日在华盛顿换文，其中有这么一段：

“美国及日本国政府，承认领土相接近国家之间，所生特殊之关系。因之，美国政府承认日本国在中国有特殊之利益，接壤日本所领的地方殊然也。……”

“特殊利益”这一句话，的确是石井菊次郎倾注全力以谋达成其“条文化”的目的所在。

就由于只有这么一句话编入“日、美协定”，于是日本便获得了推进其对中国侵略垄断的重要藉口。

译注一：“桂太郎·塔虎脱协定”一九○五年七月，日本首相桂太郎与访问日本的美国陆军部长塔虎脱签订了一份备忘录，互相承认日本在韩国、美国在菲律宾的“特殊权利”。

译注二：“高平·鲁特协定”一九○八年十一月，日本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与美国国务卿鲁特交换日美两国关于太平洋问题的文书，表明以和平手段保全清国（中国）独立及其领土，支持商工业机会均等主义。

美国急予辨正

蓝辛签订这个“协定”的真意，当然不是要把中国出卖给日本。诚然，在“协定”开头的部分就记入了一节有欠审慎的话——“美国承认日本国在中国有特殊的利益”；可是“协定”内容大部分贯注的精神，则是对于中国的独立和领土之保全以及机会均等各项，加以确认。

在“协定”后半篇中，继续明白表示——“中国之领土主权完全存在”、“毫无侵害中国独立与领土保全之目的”、“支持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以及日本政府“保证”不藉“特殊利益”的名义对他国通商给予不利待遇。

扩及全面政治权利

可是，日本政府只对“特殊利益”一语如获至宝，特别加以强调。

石井菊次郎在美国各地发表演说，声明日本的政策是“远东门罗主义”（注），假定有第三国对中国有所侵害，则日本必定出面干涉，保护中国。

外相本野一郎也在日本国会表明——美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对中国的诚意已有理解，并且业经承认了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

日本将所谓“特殊利益”解释为扩及于中国全面内政、外交的“政治权利”；甚至曲解连在以前恶声远播的二十一条要求都已予承认，当然这是一种明知不能自圆其说的曲解。

日本官方的言论，对于使中国成为日本“保护国”的目标，就像是因而获得了国际保证一样，欣喜若狂，高唱日本外交胜利。

美国政府急作说明

眼看着日本的动向而大为惊慌的美国政府，乃于翌年～一九一八年二月发表两国交涉颠末如左

“石井特使一行来美，声明日本对于中国之政策，非侵略主义，亦非欺瞒主义，一扫我国人从前之疑惑。两国政府对于中国之态度，已交换公文，得相互之了解。两国政府重行声明——遵守门户开放主义，更进而明白表示无论如何不得侵犯中国主权与领土保全主义。……此美国所当永远记忆者也。”

以上美国所发表的内容，对于“特殊利益”四个字，根本没有提到；而在同时，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为该协定通知中国政府的说明书中，复有如下说辞：

“由于日本特使访美，于美、日两国在远东之利益，得开诚布公讨论之机会。在日使声明中，日本对中国政策决非侵略，不过由地理的位置所生特殊关系，得利用商工耳！

“兹美、日政府宣言：‘当守门户开放政策，其因国境地位接近，在中国经营商工业，较之他国人民，自有种种便利’——照会辞意甚明，无容解释。

“该照会不仅再行保证门户开放政策，且加入不得干犯中国主权及领土保全之主义。…”

这个说明书，明白表示“特殊利益”的含意，只是限于商工业经营，可见美国政府之所谓“特殊利益”乃指商工业之便利；与日本朝野的解释，实在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但在日本方面，却故意对于协定精神所在的“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完全存在”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佯为不知，而只顾断章取义截取“特殊利益”一语，夸张解释到涉及中国内政、外交的全面领域。无非是在不打自招地向全世界表明了日本策划独吞中国的意图。

中国声明不予承认

尽管美国政府对中国方面有所说明，可是这个“石井·蓝辛协定”则是在身为“当事者”也是“主权者”的中华民国未尝预闻的情况之下所缔结的。因此，中华民国在接到这个协定的通告之后，便立即照会日、美两国政府不予承认，并对列强宣言如左：

“中国政府对于各友邦皆取公平平等之主义，凡各友邦条约上之利益，一律尊重之；领土相邻近的地方，虽发生‘特殊关系’，然亦以中国条约上所规定者为限。要之，他国以文书交换互相承认之事，中国政府丝毫不受其拘束，特此声明。”

在此之前，当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美国曾经看穿了他的侵略野心，对之提出严重警告；然而这一次，蓝辛却被石井菊次郎毫无诚意的花言巧语所左右，糊里糊涂签订了这么一个协定；这也可以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异常紧张的国际关系下所孕育的一个“私生子”。

这个协定，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经“华盛顿会议”结果，予以废弃。

注：门罗主义一八二三年，美国第五任总统门罗在对国会所提咨文中，发表：欧、美两洲大陆之间的互不干涉主义。直到十九世纪之末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准绳，亦被称之为美国的“孤立主义”。

所谓西原借款

日本对于讨平张勋复辟，复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采取了更积极的援助方针；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日，在内阁会议中决定——以后的援助，只以段祺瑞为唯一对象，禁止给予革命军等其他方面以支持。这也就是表示以前脚踏两只船的援助政策已经有所转变。

意图凭藉日本援助威力称霸中国的段祺瑞，和企图在中国扶立听其摆布之傀儡政权的日本，利害一致，一拍即合。于是，中华民国落在继承了袁世凯遗产的段祺瑞手中，便再度面临到出卖国家的痛苦境遇。

日本政府于七月二十日阁议中所通过的“对支方针”，是这样的：

“支那（中国）政变，已因复辟运动失败至段祺瑞入京大致告一段落。……以段祺瑞为中心而网罗了北洋派和进步党有力人士的内阁业已组成。……帝国政府，仍当给予段内阁以相当的友好援助，以期平定时局，并谋于此际解决存在于两国之间的若干悬案，是为得策。”至于具体策略，则决定：（一）供给中国方面以必要的借款。（二）对于兵器及其他军需品之供给加以“友好的考虑”。（三）导致南方派（革命军）期待于日本援助的言动，应加约制；对于南方派要求军需品一节，“拒绝为之斡旋，并不得有任何奖励与支援。”

帝国主义习用伎俩

在这个时际，发挥了作用的是“借款”。以借款为诱饵来铺路，再以“解决悬案”为藉口，遂行侵略——是帝国主义者所习用的伎俩。

加上时机正巧，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日本带来了空前未有的景气。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成为战场，加上船舶缺乏，对亚洲输出完全断绝，故而给予日本独占亚洲市场的机会。当欧战开始的一九一四年，日本对外贸易转为出超，输出入合计十二亿四千万日金；及至一九一七年，则达到二十七亿五千万，增加了一倍。

担任和段祺瑞进行借款交涉的人，就是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西原龟三。西原虽然说话是站在民间立场，但实则衔有寺内正毅首相的秘密使命。

关于对中国供给借款，因为前在一九一三年曾经五国（英、法、德、俄、日）银行团约定：禁止各国单独进行政治借款；故而非官方人士西原龟三之被派上用场，乃是一种掩护手段。

由于西原是以私人身分出现，所以不便利用代表日本参加五国银行团的横滨正金银行出面，而另以朝鲜银行、台湾银行、日本兴业银行三家组织“特殊银行团”，供给借款。通过西原路线而做成的所谓“西原借款”，共有八件，金额达日金一亿四千五百万元。后来被指为“卖国借款”，并受到国际责难。

侵入中国财政领域

西原借款的第一号，是在一九一七年一月业已签订的交通银行所借五百万日金。

及至段祺瑞重握政权之后，借款对象乃扩及由通讯电线到铁路部门，陆续一一实现。兹列举于后：

〔第二次交通银行借款〕——日金二千万元。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签约。以交通银行持有之中国国库债券二千五百万元提供担保。

这一笔借款，是对中国参加大战的一个报酬。

借款的交换条件为：（一）交通银行聘日本人为顾问。（二）交通银行以后向外国借款，以日本特殊银行团为优先。

交通银行是奉准发行兑换券而与国库有密切关系的金融机关，日本因此一借款得以侵入中国财政领域。

日本政府为调度必要资金以供应援段政策的新财源，乃于一九一八年三月决定——由政府保证日本兴业银行所发的债券，以一亿日元为限。

当政府保证案，经议会通过成立时，大藏大臣胜田主计有“俳句”一首：

“菊根分日。”

胜田对这一首短诗，自加诠释——“欣见日本经济势力移植大陆之日，近在眼前；爰以丛菊分株为喻，藉抒所怀。”菊花，盖为世人之所周知，正是代表日本皇室的徽章。

（译注）日本俳句，系以五、七、五共十七字组成的短诗，意在言外，颇足玩味。兹按胜田本人之诠释，补足诗意，译为汉诗如左：

丛菊根相连。分株欣有日。负手眄西园。繁金足娱目。

垄断电信修筑铁路

其后，陆续决定的借款还有：

〔有线电报借款〕——日金二千万元。一九一八年四月三十日签约。以中华民国政府所有全国有线电报设备吉暨全部财产及其收入提供担保。

交换条件为：（一）优先聘用日本计师。（二）向日本优先购入电信业所需用之器材。

电信是中国正在发展途中的重要事业，就这样地被日本所垄断。

〔吉会铁路预备借款〕——日金一千万元。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八日签约。以该铁路所有财产及收入提供担保。

“吉会铁路”，为计划建筑之铁路，由吉林横断东北地区，渡图门江，达朝鲜北部的会宁，在会宁与朝鲜铁路衔接。

这一条铁路筑成之后，日本便可用“吉会铁路”-“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构成其铁路网，而将东三省南部心脏地区的吉林、奉天两省包围起来；果如是，则东北的安全便落于日本的威胁之下。就是这条“吉会铁路”，早先在满清末年，日本便已提出要求——由中日两国出资合建。但清廷为防日本势力入侵，决定将之无限期延搁，且曾取得日本同意。

可是，段祺瑞却连清廷已经拒绝过的此一“侵略铁路”也竟然予已承认。这笔借款，不仅让日本在东三省南部的支配力得以强化，而且更为他开辟了向东三省北部伸展的途径。

密约出卖山东

接着又被觊觎的，是金矿。

〔金矿森林借款〕——日金三千万元。一九一八年八月二日签约，以吉林、黑龙江二省国有金矿与森林提供担保。

交换条件为：（一）统一两省金矿与森林行政，设置由中央直接管辖之采金局与森林局。（二）采金局与森林局需要巨额资金时，须向日本洽借，或迳为中日合办事业。（三）采金局、森林局皆聘用日本技师。

两省地方人士鉴于金矿与森林，没有明确区分国有和民有境界，唯恐侵害到民有产权，故而激烈反对，但段祺瑞则予以强行决定。

在此之前，日本由于拜大战之赐，经济景气，但也带来了物价直线上涨的通货膨胀现象，自一九一四年开战以来的四年之间，平均涨到二三倍之多。在这样情势之下，乃发生了所谓“食米暴动”事件（注），寺内正毅内阁因而垮台。九月二十一日，寺内首相提出辞呈，二十九日，诞生了由原敬领导的“政友会”（政党）内阁。可是就只在这新旧交替的短短几天之中，寺内和段祺瑞又订立了三件借款，一件密约。而这些“闪电交易”，都对中国的命运发生了很大的不良影响。现在列举于后：

铁路利权拱手送出

〔满蒙四铁路预备借款〕——日金二千万元。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签约。以四路财产及其收入提供担保。

所谓四铁路是：（一）开源-海龙-吉林线。（二）长春-洮南线。（三）洮南-热河线。（四）洮南至热河线上某一地点-某海港（俟将来调查后决定）。

由于这笔借款，不啻是将通往内蒙古的动脉拱手送给日本，使日本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进展更为方便。

〔参战借款〕——日金二千万元。同日签约。

这是依据一九一八年五月所缔结的“中日军事协定”（后面另有叙述）的一种军事援助。段祺瑞以这笔借款作为编练“参战军”的名义，成立了三个师、四个混成旅的新式装备部队，但实则并非为参加世界大战，而是练成段的私兵，用之于国内军阀自相残杀的内战。

〔济顺、高徐二铁路预备借款〕——日金二千万元。同日签约。以“济顺”（济南-顺德）和“高徐”（高密-徐州）二铁路之财源及其收入提供担保。

预备建筑的这两条铁路，就是根据二十一条要求的结果——原来为德国所有在山东省的筑路权，归于日本继承。

在这笔借款的幕后，还有一份“山东密约”，是在借款的前几天的九月二十四日交换照会。在照会中，段祺瑞同意了铁路由中日合办、日军留驻济南……等于是将山东省出卖给日本的约定。

“密约”正式名称为“山东问题换文”，系由日本外相后藤新平以书信提案，而经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予以答复。

后藤的提案，有下列七项：

一、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分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

二、胶济铁路之警备，由中国政府组织巡警队任之。

三、右列巡警队之经费，由胶济铁路提供相当之金额充之。

四、右列巡警队本部及各要驿（车站），并巡警养成所内，应聘用日本人。

五、胶济铁路从业员中，应采用中国人。

六、胶济铁路归中日两国合办经营。

七、现在施行之民政，撤废之。

对于这个提案，章宗祥在覆文中有——“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议欣然同意”之语。“欣然”两字，是出于日方的要求而见诸明文。

于是，日本乃因这个密约而获得的权利，远超过了他原先所继承的德国遗产。

以清廷原先给予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而论，其军事权和警察权并未曾及于胶州湾租借地范围之外；而且相反地中国方面则在胶州设有警察署，租界内的铁路警察任务也由中国担任，铁路和矿山也都是由中国的山东巡抚负责保护。

再就中日“密约”的内容比较看来，对于日军留驻济南一节，竟未明订撤退期限，便予以承认，并且还决定了胶济铁路巡警队本部及各主要驿（车站）应聘用日本人。

此外，关于胶济铁路归属一节，在中德之间的条约中规定中国在将来有“收买”该铁路之权；而现在的“密约”，却成为“归中日两国合办”。

巴黎和会失掉立场

这个“密约”，后来在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会时被公诸于世。当时，中国在和会中主张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可是由于此一“密约”之公开，以致失掉了立场，造成自己把山东权益拱手交割给日本的结果。

日本兴业银行顾问冈部三郎，后来在一九三一年，根据中华民国财政部资料，对于“西原借款”的使用途径作了一个追踪调查的研究报告：据悉“有线电报”、“金矿森林”、“吉会铁路”、“满蒙四铁路”、“济顺、高徐二铁路”五笔借款（此外各项借款情形，缺乏纪录。）合计日金一亿元，其中被支付偿还内、外债本利占五○四％，军费及购买军械价款占三五三％，行政费占五七％，其他八六％——可见所借到的钱完全是被虚掷于偿还中国以前的欠债和强化北洋军阀而消耗掉了。

注：食米暴动事件日本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通货膨胀，而食米更因粮商囤积及强行输出，造成在一年之内米价上涨四倍的现象。对此大起反感的国民，于一九一七年八月三日在富山县发生的袭击米店事件为开端，蔓延到京都、大阪、名古屋、东京……形成全国性的暴动；更由于对生活的不安而自然发展成为对政治不满的群众行动，寺内内阁因而垮台。

国父组军政府

日本的“日金外交”，并非仅限于“西原借款”一条路线。

此外，还有“第二次善后借款垫款”（日金三千万元）、“吉长铁路借款”（日金六百五十万元）、“第一次军械借款”（日金一千七百万元）、“第二次军械借款”（日金二千二百四十二万元）等项，陆续成立。

以上各项之中的“吉长铁路借款”，是将管理、经营权让给了日本；盖自二十一条以来日本便不断强索，连袁世凯都曾经予以拒绝，而段祺瑞却只为得到六百五十万元的借款便予以同意，助长了日本对东北地区的侵略。

军械借款暗含阴谋

还有，在连续两度的军械借款方面，段祺瑞买进了三八式步枪十二万五千支、三八式机关枪三百七十二挺、六式山炮三百十八门、三八式野炮二百二十八门以及枪弹、炮弹等。他意图用这些武器扫除异己的北洋派和荡平南方的革命军，以囊括宇内；在表面上，他藉口对欧洲派兵参战，但实则是用于后来的内战。至于日本方面，则又是怀着和段祺瑞大异其趣的鬼胎，和前比在二十一条要求中就已包括有供给军械的目的一样，是要使中国的武器由日本来制造，而达到遥控中国军事力量的意图。

军械的供给，是出于中国方面的要求，对于前此在二十一条时未能达到这个目的的日本，则是正中下怀。当时驻华公使林权助向日本政府陈述其意见——“实在可以说是非常有利的事，如果放弃如此良机，显然将会徒贻他日后悔。”

此外，参谋次长田中义一也对驻华公使馆陆军副武官斋藤季治郎发出电报，阐释此举的意义——“这次藉供给军械，成为日支（中国）兵器统一的开端，获得日支协同的成果；并且进而……有希望能使兵器厂问题……也会得到有利的进展。”

寺内内阁所投下的对华借款，只不过在两年（一九一六年十月至一九一八年九月）任内，实则达到了日金三万万元；而在寺内内阁成立以前，日本历任内阁供给中国的借款总额约为一万万二千万元。——由此可见其金额该是如何的钜大。

结果，中国所背负的全部外债，在八个债主国家之中，日本一国便占了四九％的比率。

国父以护法号令西南

面对这些情况，毅然和走上卖国之途的段祺瑞对抗，并为“护法”（约法）而挑战的人，是国父孙先生。

孙先生在他手着的“中国革命史”中写出：

“（民国）六年之秋，余率海军舰队南去广州，国会开非常会议，举余为大元帅，余乃以护法号令西南。西南将帅，虽有险持两端，不受约束者，然于护法之名义则崇奉不敢有异。故其时西南与北方战，纯然护法与非法战也。”

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七日，孙先生偕同朱执信、章炳麟、陈炯明等人率领“应瑞”、“海琛”军舰由上海到达广州黄埔，乃当张勋复辟刚刚失败之后。

两天后～～十九日，孙先生通电国会议员，号召南下，来粤集会。

为响应孙先生的号召，首先是海军总司令程壁光于二十一日向段祺瑞政府发出诀别宣言，即偕同第一舰队司令林保怿率领舰队离上海南下广东。南下舰队计有巡洋舰三、炮舰六、补助舰四。唐绍仪、汪兆铭二人也随舰同行。海军的追随孙先生，对于护法行动的推进，是一支强有力的后盾。

国会议员们也陆续响应了孙先生的号召。

八月十八日，孙先生在黄埔公园宴请国会议员约一百三十人，席上，议员们共同决定在广州组织新政府。南下议员虽然不足法定人数，但在段祺瑞的统治之下，中华民国已经面临了“非常时代”。

国会“非常会议”，于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之间在广东省议会开会，通过了凡十三条的“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

“中华民国军政府”，是为拨乱反正、遵循临时约法，再造中华民国的新政府。

国父当选为大元帅

为担负起军政府的任务，设置海陆军大元帅一人，元帅二人。九月一日，孙先生当选大元帅；翌日，唐继尧、陆荣廷分别膺选元帅。孙先生并于当选之后在黄埔公园所举行的大元帅授印礼中，接受了海陆军大元帅的印信，在答词中表明决心如左：

“……惟当竭肱股之力，攘除奸凶，恢复约法，以竟元年未竟之业，雪数岁无功之耻，责任在躬，不敢有贰。”

九月十日，孙先生任命各部总长，军政府体制为之树立。其人选为：外交总长伍廷芳、内政总长孙洪伊、财政总长唐绍仪、交通总长胡汉民、陆军总长张开儒、海军总长程璧光；此外，又任命了秘书长章炳麟、参军长许崇智、参谋总长李烈钧。

以达成革命为鹄的的军政力量，在这里再度结合起来。中华民国军政府在孙先生领导之下，获得了凭实力和统治北京政府为所欲为的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军阀正面决战以谋国家统一的根据地。

护法作战计划

由于军政府于一九一七年九月在广州成立，孙先生就任大元帅，局势的发展终于迈入了“护法战争”阶段。

在北京政府方面，国务总理段祺瑞为谋武力镇压军政府，已经在作周详的作战准备；作战的主要地区为湖南、四川两省。八月初，将其心腹干部陆军部次长傅良佐调任湖南督军，北洋部队陆续向岳阳方面南下；对于四川，则以另一亲信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部署好了进攻的态势。段祺瑞由于获得来自日本钜额借款的支援，充实军备，对于以武力决一胜负有绝对的自信。

蒋总统提出作战计划

面对段祺瑞的动向，军政府方面则是由元帅陆荣廷、唐继尧分别拥有两广和云、贵的地盘，不过内部步调却有欠一致，不能迅赴机宜。

当时，蒋总统盱衡全国情势，认为要想打倒掌握强劲军力的北京政府，则必须有能够照顾到全国性的、长期性的战略。为此，乃于九月二十日向孙先生提出了一份“对北军作战计划”。

这个时候，蒋总统奉孙先生之命留在上海，主持东南各省党务、军事以及各方面联络、折冲的任务。

这是最初一次的大规模作战计划。

先说他的概要：北京政府由于内部纠纷等因素，不可能动员大军南下；军政府的部队如果能够全面进攻，则预计在十一月底以前可以拿下南京。

判断北军无斗志

对于敌军兵力的判断，则是这样的：

‘北方政府所辖之军队，约在三十万以上，然实际上可为其动员者，即以冯（国璋）段（祺瑞）二派势力合计，其数亦不过六万。……北军虽众，而为段氏冒死南犯者甚鲜。……’

作此判断的根据是——北方政局不安。

首先，最大的问题是“二巨头”——国务总理段祺瑞和代理大总统冯国璋在出动武力方面意见对立，段祺瑞是速战速决论者，冯国璋则唯恐战乱波及自己地盘的南京一带，故而主张南北妥协。

其次，在北方如察哈尔、绥远等内蒙古地区以及晋、鲁、皖、豫各省，也有酝酿独立的活动或地方不靖的情况，在这些区域的驻军，都无法调动；故而段祺瑞所能动员的兵力只有王如贤的第八师、范国璋的第二十师及吴光新的三个旅，就连可望加入支援的曲同丰等部在内，至多也不过四个师而已；此外再加上冯国璋大约有三个师的部队。

相对地，军政府方面则可以从粤、桂、云、贵、川、湘各省动员十师以上。

‘我军……总动员倍于敌军，各师之兵数，或有不足，虽折减至二成，则亦多于敌军三分之一也。至于实力之比较，惟战用器材不及敌军外，其余如给养力、人马之战斗力，不甚上下也。而敌军南来，其地势不宜、气候不惯，则南军较胜一筹也。……

‘敌军对于西南之作战，其集中地当在武汉以南，其主力道出川湘，其对西对南运转之便利，莫过于此也。’

不过，冯国璋的势力，由于部署在可以向南京调集的地区，如为防守南京，则可集中兵力达七个师之多。因此，将来在进攻南京作战时，军政府也必须集中足够运用的兵力。

两期计划会师燕京

‘作战计划分为二期：

‘第一期——中央军由两粤进攻长沙，肃清湖南全境。待左翼军解决四川，东下湖北时，与之合攻武昌。

‘左翼军解决四川后，当派一支队扼守川北，牵制秦、晋之敌军；使第二期作战北伐时，即可道出秦、晋，与本军互相策应，而其主力乘势东下，与中央军合攻武昌。

‘右翼军与海军共同动作，合攻闽、浙，连下淞、沪。待中央军与左翼军克服武昌，然后与之会师南京，肃清长江上下游之敌军。海军与右翼军占领淞、沪时，即以吴淞为根据地，封锁长江门户，扫除长江下游之敌舰，声援上游陆军之作战。

‘待各军会师南京时，与之合力攻城；同时搜捕长江舰队，俾第二期作战时，海上全权归于我有。……

‘第二期——第一期作战成功之期，当在十一月下旬，正为冬营之期。是时当以长江以北为冬营之地，调整给养诸品，补足人马，整备器材、休养兵力，其期间须在二月以上。故第二期作战运动开始，乃在明年之三月间也。

‘各军进发之后，以中央军由津浦路北进，左翼军由京沪路北进，右翼军由海道前进，在辽西登陆——三军分道并进；而左翼军之一支队，则由川北而出秦、晋，以袭敌军之左，为本军之声援；各军会师燕京，为总攻势最后之准备也。’

闽南为主战场

当北京政府段祺瑞派其心腹大将傅良佐为新任督军，调来北洋军的主力部队之后，湖南的情势，立即有了急遽的变化。

一九一七年九月十八日，隶属于北京政府的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暨零陵（湖南地区）镇守使刘建藩对段祺瑞倒戈相向，宣言“赞同护法”。——这是对于前任都督谭延闿被无故免职之不满心理的爆发。

段祺瑞抓住这个机会，乃于九月二十九日对广州军政府孙大元帅及非常国会议长吴景濂发布通缉令，采取行使武力的态度。

到了这个时刻，广东军政府在军事体制方面，还有欠齐备，政府内部的军阀同床异梦，不肯遵循孙先生的指挥。

重拟闽浙作战计划

在这样的情况下，作战计划乃不得不重行加以研讨。于是，蒋总统复于十月一日向孙先生上陈“滇粤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之计画”。

此计划约一千五百字，为因应当时情势变化，将南军（护法军、即滇粤军）主作战地定于东南方面的闽浙沿海一带；对于进驻有敌军主力的湖南，眼前继续采取守势，而以长江口的上海为进袭目标。大致内容是这样的：

‘先以海军为主力，向东南沿海一带之闽、浙两省，扫除北军之势力，击攘淞、沪之敌军；以吴淞为海军根据地，封锁长江之门户，东南之势力，不难完全造成矣！若西南战局能有转机，则与之互相策应，出入于长江沿岸一带，肃清长江上下游之敌军，则第二期作战北伐之基本定矣。……’

湘省南部地势崎岖，守易攻难，加以后方补给于我军有利，故对这一方面只须派遣滇军一师在衡阳设防，作持久作战之计，争取时间。在这个时期，如能夺取上海，则可使形势为之一变；感到有后顾之忧的湖南敌军，将会士气动摇，我军即易于转取攻势。

然而，这样的作战计划，结果未及采用。

十月六日，李右文所率领的湘军第一师推进到衡阳东北约四十公里的衡山附近，和军政府部队初交战火。

翌日～七日，孙先生下令宣告讨伐段祺瑞、梁启超等人，进入了兵戎相见的战争状态。

在绪战时，北军有两个旅长向军政府归顺，李右文单身逃亡，展开了于南方有利的态势。军政府乃任命程潜为湘军总司令，谭浩明（广西督军）为“两粤援湘军”总司令率军入湘，而北军方面也调遣倪嗣冲所属部队增援到达，经过激战之后，衡阳一度被优势的北军攻占；但进入十一月，南军转为反攻得势，十四日掌握了省会长沙。

又在四川，隶属北京政府的川军第五师长熊克武（前同盟会会员）也归附军政府，将北军击破。

看到战况如此，于是直隶曹锟、湖北王占元、江西陈光远、江苏李纯四督军乃于十八日对北京发出通电，要求段祺瑞和广州军政府议和。

就在同一天，孙先生也通电全国，声明恢复约法，召开旧国会，乃议和的最低条件。然而，在军政府方面，虽说在湖南、四川打了胜仗，但内部的困难，却并未消除。

陆荣廷等不听指挥

膺选元帅的唐继尧、陆荣廷，一直没有就任。两人都是以扩张自派势力为目的，只不过是为着要抵抗段祺瑞而加入了军政府。

孙先生虽然位居大元帅之尊，可是并未掌握有听命于己的军队；就连军政府根据地的广东，也是由陆荣廷的部队把持着军政大权，不受孙先生的指挥。

因此，孙先生乃打算创设一支为军政府支柱的陆军，但也因而引起陆荣廷等人的不快，以致受到妨碍；好不容易才得到广东省长朱庆澜拨来警卫军二十营，将之改编为直辖护法军，已经是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事，并且还有附带的条件——不得在广东驻屯。

海军方面，也没有遵循孙先生的意旨。--次年一月，发生了广东督军莫荣新枪杀无辜军民六十余人的事件，孙先生下令海军讨伐，但海军总长程壁光却将大部分军舰调离广州，好像没有这么一回事；孙先生乃指挥留下来的两艘军舰，亲自发炮轰击莫荣新的督署，要迫使莫荣新谢罪。

此外，陆海军之间，也有欠融洽。——就在上述事件之后的二月间，程壁光便被陆荣廷、莫荣新一派所暗杀，原因是程壁光以海军实力为背景，要求广东省长的地位。

援闽粤军进入闽南

像这样好不容易才握有二十营直辖部队的孙先生，乃将该部队改编为“援闽粤军”，于十二月二日任命陈炯明为总司令，邓铿为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许崇智为支队司令，先编成十营，担负讨伐隶属皖系之福建督军李厚基的任务，进军入闽，陆续攻下龙岩、漳州、汀州在闽南地区开辟了为护法而战的主战场。

这一年的十一月一日，蒋总统与张群同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参军，但当时仍在上海；翌年三月，出任孙先生直辖部队陈炯明总司令部的作战科主任，参加闽南战役。

第五章：磨炼和考验时代(下)

主题

蒋总统自沪至粤国父痛斥军阀日出兵西伯利亚反攻大埔之役重回福建战场孤军进攻永泰检讨失败原因巴黎和会五四运动建议整建兵制组成中国国民党王太夫人逝世筹划北伐作战陈吴秘密勾结陈炯明叛变间关赴难大无畏的精神夺回广州派往苏联考察在苏联的见闻对苏维埃的认识已见苏俄野心全国代表大会创设黄埔军校军队生活的训练黄埔精神

蒋总统自沪至粤

在北京政府方面，主战派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和主和的代理大总统冯国璋，仍然处于对立地位。

段祺瑞由于在湖南、四川的战事败北，乃于一月二十日提出辞呈，一时下台，由主和派的王士诊继任国务总理。可是段祺瑞的“武力解决”意志却并没有稍馁。

十二月三日，主战派安徽督军倪嗣冲、山东督军张怀芝和直隶督军曹锟等在天津举行督军团会议，压迫冯国璋下令讨伐西南。冯国璋在压力之下，乃不得不于十八日以处理参战事务的理由起用段祺瑞为“参战督办”；于是，段祺瑞下台还不到一个月，就又掌握了军事上的实权。

可是，推动和平工作的冯国璋，则派遣密使与广东军政府方面的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云南督军唐继尧接洽和平工作。和这个行动相呼应的是隶属于北京政府的主和派江苏督军李纯等所谓“长江三督”（湖北王占元、江西陈光远）也再度提倡和平，冯国璋乃于十二月二十五日正式发出停战布告；然而，护法军方面却并未停止进攻。

在湖南方面，护法“湘桂联军”于一月二十三日向北军在湖南的唯一根据地——岳阳发动攻势。驻守岳阳的北军，都是服从冯国璋的部队，故而自始就无意应战，乃在市街放了一把火撤兵退走。四天之后的二十七日，岳阳归于护法军掌握。

段祺瑞踌躇满志

岳阳的失陷，对于段祺瑞等主战派不无刺激，他们指谪这是和平工作的政治失败，藉以攻击冯国璋，更且招引主战的奉天军阀张作霖入关进驻直隶境内，对冯国璋加以压力；结果，冯祇得为之屈服，决定派遣增援部队前往湖南，并再起用段祺瑞三度出任国务总理。

重新派往湖南的援军，是由曹锟的部下吴佩孚所率领的北洋军精锐部队。从三月十七日夺还岳阳开始，到四月二十三日，连续拿下长沙、衡阳，于是，湖南便濒临了北军的压制。

段祺瑞认为像这样发展下去，只要再推进一步，就可以实现武力统一的愿望，不禁为之踌躇满志。

未料，正在这个当口，吴佩孚却停师不前。——这是由于湖南督军的位置没有论功行赏落到自己的头上，却反而给予了碌碌无功的张敬尧，激起了他的反感，以致湖南的战局便陷入胶着状态。

再说福建方面的战局，援闽粤军在进入闽南距离广东省境只不过约一百公里之处，便停顿下来。其原因是在后方的桂系军阀阻碍对前线的补给，故而不能断然挺进决战。

蒋总统接到孙先生的急电，前往福建前线参加作战，就是为了要打开这种停滞不前的状态。

三月二日，离开上海；五日，到达广州，和孙先生研讨战局。

由于接电匆忙，仓卒首途，蒋总统没有来得及携带必需带的东西。在上海的党机关部，曾于三月三日发电报到广州——“介石乘英轮‘纳富’来港，以忘带旅费，请派人到港接。”

此时，正值吴佩孚所指挥的北军即将在湖南展开反扑之际，蒋总统于前往福建赴任之前，对于湖闽两省今后战局有所研判，其大意如左：

以后北军，当会在进攻衡阳之同时，由江西赣州进窥广东；而现在福建与粤军（陈炯明部）对峙中的北军，将会陡增声势，互相呼应。当北军由赣州侵入粤境，进犯和平、惠州之际，则以潮州为根据地的粤军后方必会受到威胁，陷于孤立，并且军政府所在的广州也将发生危机。因此，粤军必须对正面之敌的福建北军发动总攻击，予以击破。……

蒋总统驰赴前线视察

三月十五日，蒋总统就任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立即驰赴前线黄冈、潮安、三河坝（兵站部）、松口（第一预备队）、蕉岭（第二支队）等地视察。

在这段期间，湖南虽已被北军攻夺，但以海南岛为根据地出兵侵入广东的两广巡阅使龙济光部北军，则被南军击溃，而在福建方面的决战，乃成为战局的关键所在。

四月十一日，举行进攻福建计划的会议，即席决定将司令部由汕头移往三河坝，准备发动攻势。

攻击命令，于五月九日发布，总司令陈炯明自任中路，许崇智、邓铿分任左右翼指挥，沿粤、闽省境展布幅度颇宽的攻势。

‘余拟定作战计划——第一期作战，以主力由左翼蕉岭、松口进攻上杭、永定，即由左翼山地以压迫敌军至右翼海岸线，并威胁其后之根据地。……’（注）

十日，许崇智军击溃闽军第一旅，攻克武平，下坝，更于二十四日攻下上杭，旗开得胜，颇为顺利。

可是，此时在后方广州，由于掌握桂系、云贵系军权的陆荣廷、唐继尧等人的阴谋影响，却发生了军政府的存在都已呈问题的重大危机。

注：蒋总统-“粤军第二期作战计划”附记（一九三一七）

国父痛斥军阀

此时，在广东的非常国会，正推动着藉改组军政府之名，而阴谋排除孙先生的活动。

带头策划者，是由旧国民党分裂出去的所谓“政学会”一系之中的政客——岑春暄。岑春暄前在逊清末业曾任邮传部尚书，两广、云贵、四川总督等职，为清廷重臣；但因与袁世凯对立，故在二次革命之后，参加革命阵营讨袁。及至在广州非常国会中，他的政学会系议员虽然只是少数派，但与握有军权的陆荣廷、唐继尧等人结合，力谋扩张其在国会的势力。

陆荣廷、唐继尧二人，虽则膺选军政府元帅，但却并不服从孙大元帅，而一直不肯就元帅职务；更且与北京的冯国璋有秘密联系，策动南北和议。

军政府改组

当湖南战局趋向于军政府不利的四月下旬，唐继尧曾密电西南各省，提议将军政府改为“军务院”或“国务院”。这个提议，是使广东军政府不复为一个独立的政府，而变成隶属于北京政府之下，承认在北京的冯国璋继续代理大总统，由岑春暄在广东担任国务总理，而让不受他们欢迎的孙先生负责办外交，赴世界各国旅行，等于是放逐国外。

五月四日，在国会非常会议中仅以极微之差的四票多数通过了军政府的改组法案。

孙先生立即在同一天向国会非常会议辞卸海陆军大元帅职务，同时并对全国发出充满愤怒的通电：

“……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法律民意之下。故军政府虽成立，而被举之人多不就职，即对于非常会议犹莫肯明示其尊重之意。内既不能谋各省之统一，外何以得友邦之承认。……个人之去就，其义小；国家之存亡，其义大。……文之效忠于国会，任务本已将尽……”

五月二十日，国会非常会议举行总裁选举会，选出孙先生及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林保怿、陆荣廷、岑春暄七人为总裁。但孙先生无意就任，故而于次日～二十一日下午乘大阪商轮“苏州丸”黯然离开广州。

国父与蒋总统长谈

‘到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因海军受北洋军阀的引诱，而唐绍仪，岑春暄等又处处与总理为难，因此总理不得已辞去大元帅，离开广东。这是（继中华民国开国将大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之后）本党第二次的失败。总理在广东唯一的力量，就是陈炯明的部队，……总理为求联系的密切，一定要本人去主持陈部的作战业务，后来总理亲自到三河坝来看我们……

‘回忆当时……世态炎凉，一般党人对革命的轻蔑，对总理的冷淡，真是不忍卒述。’（注）

心情受到创伤的孙先生，于二十六日下午抵达三河坝，蒋总统迎迓于韩江之滨，见孙先生形容憔悴，甚感痛心，当晚在军营中长谈达于深夜。

二十九日，蒋总统趁江水上涨乘船抵达永定，当时敌我两军正在死拼；及至三十日傍晚，攻下了永定。

永定的胜利，对于孙先生该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激励。

国父经台湾赴日本

孙先生在三河坝停留了一个星期之后，乃由汕头启程，经台湾而往日本。

前此，孙先生已经接到犬养毅、头山满等人再三来信表示：为商讨亚洲大局，希望孙先生前往日本。

此时，日本寺内正毅内阁仍然对于北京政府的段祺瑞继续加以援助；而隐藏在背后的奢望，则是要藉援助手段羁縻段祺瑞，以便自中国掠夺更大权益。这些情况，与西原借款等活动有所关联，在前面已经屡有叙述。

在孙先生的设想之中，一向认为中国和日本是兄弟之邦，他于一九一七年二月所发表的“中国存亡问题”专文，曾有下面一段言论：

“中国今日欲求友邦，不可求之于美、日以外。

“日本与中国之关系，实为存亡安危两相关联者，无日本即无中国，无中国亦无日本；为两国谋百年之安，必不可于其间稍设芥蒂。

“次之则为美国。美国之地虽与我隔，而以其地势，当然不侵我而友我。况两国皆民国，义尤可以相扶。

“中国而无发展之望则已，苟有其机会，必当借资于美国与日本，无论人材、资本、材料，皆当求之于此两友邦。

“而日本以同种同文之故，其能助我开发之力尤多。必使两国能相调和，中国始蒙其幅，两国亦赖以安，羁世界之文化亦将因以大昌。”

注：蒋总统-“本党革命的经过与成败的因果关系”（一九四九六）

日出兵西伯利亚

日本寺内正毅内阁根本漠视孙先生“中国与日本是兄弟之邦”的愿望，但知对北京的段祺瑞给予援助。

国父对日本的忠告

在日本内阁正式决定其援段政策不久之前的一九一七年六月，孙先生曾对寺内正毅发出内容大致如左的手书：

“不幸……贵国政治家……所采手段，不能见信于中国之民，每有国际问题兴起，中国人每疑贵国之‘亲善’为有野心。……

“今中国已以时势要求，成为民国，而旧派武人犹思以武力倾覆之，故变乱反覆无已。在此时期，贵国能彻底援助主持正义之一方，使其革新遂行无阻，自足以收永远和平之效；而人民亦感激了解贵国之诚意，亲善之实自举。……

“今者，北洋军人虽以武力破约法、毁国会、囚总统，有似优势矣！而其非能统一长久，亦已炳然。纵使贵国加以援助，终难使民心悦服。……”

这是对日本的忠告，也可以说是警告。

然而，寺内正毅对于如此忠告，却充耳不闻；诸如“山东密约”、“西原借款”、“石井·蓝辛协定”——一连串的侵略政策越发来的积极。

日谋掌握东北北部

还有，该可以说是经过加工制造出来的侵略行为，就是所谓“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密约，乃至对西伯利亚出兵。由于这个密约，连东三省北部（“北满洲”）也落入日本的掌握，让他达成了多年以来的奢望。

当一九一七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树立苏维埃政权的时候，日本唯恐革命风潮由西伯利亚蔓延东三省北部，并进而影响到在日本势力范围之下的东三省南部和朝鲜等地区；更尤其是当时俄国的苏维埃新政权已和德国缔结停战条约，以致同时失去了在亚洲驱逐德国势力的一角围墙。

为此，日本乃策划和中国军事合作，藉以对苏俄采取干涉行动。

一九一八年二月五日，日本陆军参谋次长田中义一访晤中国驻日公使章永祥，带着恫吓性的语气：

“征闻德国已有阴谋～～一面从西伯利亚侵入东方，一面在甘肃、新疆一带鼓励回教徒肇事。西伯利亚有德军俘虏十数万人，彼等倘被释放，将为顽强敌人，日、中两国必须迅即采取共同防卫措施。”

在此同时，北京政府军事顾问坂西利八郎及日本驻华公使馆，都为了要影响段祺瑞及其左右倾向于缔结中日军事协定而大肆游说活动。

正在盘算着实现由日本购入武器和“参战借款”的段祺瑞，于是便积极表现出同意缔结军事协定的态度。

据坂西利八郎于二月十一日以坂特字第十号电报向田中义一报告段祺瑞的意见如次：

“日本绝不至于利用中国逞其野心，毋宁说其危险性在于中国方面的因循畏葸。相信这个问题是实现多年以来的悬案——‘中日亲善合作’的绝好机会。”

与日签订军事协定

在北京政府内部，当然也有人举出山东问题的前车之鉴，耽心日本出兵之后，便拒不撤走；但段祺瑞则压制住这些反对意见，不惜为日本军部作工具，积极推进协定早日实现。

三月间双方交换公文；五月十六日，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这个协定规定有：中国地方官吏对于在军事行动区域内的日本军队须尽力协助。两国得协同对中国境外派遣军队，以及互派职员联络，共谋便利运输、通信事宜，互相供给兵器及军需品，交换地图及情报等项。

继之，在六月十九日又签订了内容大致相同的“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有了军事协定为其凭藉，日本乃于八月二日宣布对西伯利亚出兵。

表面的理由，是为了救出前向俄军投降的捷克军队及德奥军俘虏等二十五万人。在当时，捷克是奥国的属地，很多捷克人被奥国征召入伍，投入俄国战场，但他们的愿望在谋祖国独立，不乐意受奥国统治，因此无意与俄军作战而陆续投降。及至俄国革命军兴，这些俘虏获得释放，经由西伯利亚铁路向远东运送，但在途中遭遇到苏俄激烈派——布尔什维克党徒的攻击；于是，日本和美、英、法、义等协约国方面，乃在营救这些人的理由之下而有对苏俄共同出兵之议。

日军伸展到贝加尔湖

然而，日本的真正意图，则是在军事占领西伯利亚，因此对于美国所主张的“限定出兵”（出兵地区及兵员都有所限制）乃故找藉口不予理会；结果仅仅在两个月之中，由海参崴及满洲里水陆两方面派遣进入俄境的兵力，便已达到七万二千人之多。岂止进占中国东三省北部，更且伸展到贝加尔湖一带，控制了伊尔库茨克以东的西伯利亚铁路。

同时，反对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北京政府，也根据中日“协定”出兵一千五百人。并且在九月六日续和日本签订了“关于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实施上必要之详细协定”。

依据此项详细协定，在黑龙江及贝加尔州作战区域的中国军队，都隶属于日本司令官的指挥之下。

打着“共同防敌”的旗号，日本乃得堂而皇之地派遣大军进入了西伯利亚和中国国土。

这样一来，东三省北部就变成了日本在西伯利亚作战的“后方基地”，而整个东三省地区都纳入了日本的势力范围，为后来日本攫夺到俄国在“中东铁路”（即东清铁路、由满洲里经哈尔滨到绥芬之间）所有的权利，打好了基础。

反攻大埔之役

留在闽、粤边境的粤军，进入一九一八年六月，遭遇到敌方打着“闽浙援粤军”（总司令李厚基）旗号的北军猛烈反攻。三日黄冈、六日饶平、十三日下洋相继被北军攻陷。接着，北京政府更于二十日任命曹锟为川、粤、湘、桂四省经略使，张怀芝为“援粤”（进攻广东）总司令、吴佩孚为副司令，指挥压倒性的优势兵力，企图展开全面反扑。

在这个时候的护法军，除了置之死地而后生之外，别无可以挽回劣势的善策。

国父归国力促采取攻势

二十七日，孙先生发来指示冒险进攻的电令。孙先生因医治眼疾（结膜炎）归自日本，于两天前的二十五日才抵达上海。其电文是这样的：

“汕头陈（迥明）总司令鉴、并转介石兄鉴：闻张怀芝率大军已到赣，不日恐有攻粤之事。又闻北兵二千余由海道至汕，登陆援龙（龙溪、即漳州），李厚基在闽兵力日日增加，……吾党……地位极为危险。此时敢冒险进攻则生，不冒险则必致坐困。以攻为守，则士气壮，响应多，一进必收奇效。……”

可是，孙先生并未能如愿以偿。

七月五日，原先策划排除孙先生的岑春暄，宣告改组军政府。改组的意图是在和北方军阀进行和议，是故护法精神在广东为之消逝。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蒋总统于七月九日拟具了“粤军第二期作战计划”。这个计划对于挽回福建局势的战略作了如下的想定：

‘第一～～以主力集中于右翼，先收复粤境已失之地（黄冈、饶平），巩固潮汕之根据，期待左翼挺进部队之发展。

‘然后，再用主力取道海岸之捷径，向漳州正面进攻，以策应左翼挺进部队之前进，与其会师闽江下游，以期于最短期间迅速占领福州。

‘第二～～以暂守左翼，唯须出一有力部队，向龙岩方面挺进，威胁其侧面之薄弱而又危险之点，以动摇其漳州之策源地及福州之根据地。’

在黄冈、饶平相继失守之后的我军右翼，虽部署有第三、第四两支队，但其主力处于守势，不能移动；且在左翼的第一、第二支队，因自下洋、永定陷敌，须对抗该方面之敌军，也无法移动。

加以我军弹药缺乏，官兵疲劳，人数又居于劣势，如果像这样继续分散兵力与敌军对峙，则将有被各个击破之虞；故以集中兵力，突破敌阵一角，乃为上策。

‘本军当窥其隙而乘其弊，迅即集中主力于右翼。……取道海岸，由诏安以进窥其漳州之根据地。不然，如敌果实施其中断韩江、进窥我潮汕根据地之毒计，则我亦可固守。’

此一作战计划，是以第一支队司令李炳荣担任以大埔为中心的右翼方御部队长，第一预备队司令熊略担任以峰市为中心的中央防御部队长，第二支队司令许崇智担任以上杭为中心的左翼防御部队长，分别布防。

然而，令人泄气的是大埔竟然轻易失守，以致实际战况的演进和预定的计划相悖。这是由于担任大埔防务的第一支队司令李炳荣于十九日刚一受到敌军攻击，便未加抵抗，立即放弃防地，向三河坝退却之所致。

炮兵知识发生威力

于是，战局便转变为反攻大埔的新情势～～二十三日，调派右翼军主力部队，遏阻住敌军攻势；三十日，蒋总统奉总司令陈炯明委派赶上火线，亲自指挥炮兵占领狮子口一带高山，预先于前一天的夜晚测量距离，安置炮位，得以在炮战时达到了百发百中的效果。这是过去在日本学到的炮兵知识发生了威力，而不了解实情的部下，则都流露出惊佩不置的神色。

‘余草此第二期作战计划，乃在大埔未失之时，犹主集结兵力于右翼，以取攻势也。适于此时，大埔失守，敌军逼近三河坝，此即竞存（陈炯明）束手无措，总部人员准备退却之时；余强制之使不退却。即改变计划，乃调右翼洪（兆麟）、徐（军雁）主力于中央，反攻大埔。余不眠者三昼夜，且亲往火线指导，幸而一战获胜。……’（注）

离去粤军转赴港沪

由于这一战成功，得到总司令陈炯明的倚重，但却反而引起同僚嫉妒，诸多诽谤，因而感到很难再和这些人共事于粤军，乃于三十一日提出辞呈，去往汕头。陈炯明于翌日派专人⊕函前来慰留，遇于潮安车次，函中有“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蒋总统）一人”之语。

八月二日，参谋长邓铿又派代表到汕头强留，因已决心离去，乃于三日到达香港，与老同志廖仲恺、朱执信、居正等位晤面。

回到孙先生当时所在之地的上海，是在十八日的夜晚。

注：蒋总统-“粤军第二期作战计划附记”（一九三一五）

重回福建战场

蒋总统回到上海，向孙先生报告之后，又连续接到陈炯明促请返回前线的信件：

“……所望笃念同仇之雅，早日归来。”（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兄去而（徐）捷卿死（陈炯明部下、下洋之战阵亡）精神上受打击，自以为粤军败征已见……惟望早日回（大）埔，共勷大计。”（八月二十九日）

“……能助我者，实寥如晨星。……枪三千如购得，决定发与吾兄，练一中坚军队。……最好兄能早日回部，即可计划此中坚军队之进行。”（八月三十一日）

加上参谋长邓铿也有信来，敦促回军任事；在这些恳切邀请的感动之下，蒋总统在上海只停留了不到二十天，便再度前往汕头。

在此期间，福建战局展开了于粤军有利的形势，大埔、下洋业已夺回，并乘势追击，拿下了敌军根据地漳州（龙溪）。这是按照蒋总统在先所拟作战计划——攻击敌军侧面的弱点，获得成功。

任第二支队司令官

九月十八日，到达设在漳州的总司令部，与陈炯明再度聚首，检阅各方报告，调查战况，我军与敌军正在厦门附近的灌口展开剧烈战争。前敌总指挥是由在九月一日就任粤军第二军军长的许崇智担任。

二十六日，蒋总统就任第二支队司令官，拨梁鸿楷、丘耀西二统领所属官兵千人编入麾下，司令部设于长泰。

长泰的司令部于十月二十日正式举行成立典礼，亲自为文祭告：

“战必胜、攻必克，统一中华，平定全亚，……完成革命伟大之盛业。”

十一月十九日，由第二支队司令部所在地的长泰出发，开始北上作战，指向敌军根据地福州。

二十六日，抵达仙游；许崇智所统率的粤军第二军业已进驻该处。第二军一度迫近福州，但因受到敌军反扑，乃将司令部设于仙游。

在仙游与许崇智协商决定——第二支队采取由西方山岳地带迂回前进、沿大樟溪冲击敌军侧翼的战术。于是，乃秘密与许军分道，十二月二日，占领了大樟溪上游的嵩口；如果由此地出击，直下约四十公里的大樟溪，则可以到达福州的大门-永泰。

这是新编成的第二支队最初的一仗。

当这个时候，国内外各方面环绕着广东军政府和北京政府之间的和平问题，都展开了积极的活动。

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通过“西原借款”和“武器支援”毫不隐讳地为段祺瑞撑腰的日本寺内正毅内阁，因“食米风潮”的影响于九月底垮台；由号称平民宰相的原敬所率领的政友会（政党）组阁，继之登场。原敬内阁在执政不久之后，便决定中止对中国的政治借款，转变了前任的支持段祺瑞政策。

在中国国内，北京政府由九月间经安福国会（注一）选出的徐世昌于十月十日就任大总统。可是由与国会议员的选举曾有贿赂舞弊情事之被暴露，使段祺瑞受到全国非难，失去内阁总理职位，专任参战督办。因段祺瑞去职之后的北京政坛，和平机运立即日益高涨。

广东的军政府，在岑春暄等人的手里，也显示出接受和平运动的趋向。

列强各国，也插手于中国的和平工作。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十月十二日发给徐世昌的就任贺电中，劝其与国内各派领袖协商，迅谋南北统一；同时，并通过美国驻广州领事，对军政府也有所劝说。

在欧洲方面，德国和协约国于十一月十一日签订休战条约，兵连祸结达三年多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此结束。

徐世昌下令罢战退兵

就像是紧步欧洲和平的后尘一样，徐世昌也于十一月十六日下令各军罢战退兵；同时，美、英、日、法、义五国驻广州领事也劝告军政府息争，军政府乃于十一月二十二日通令各军休战。

继之，五国驻北京公使团复于十二月二日对北京政府发出警告；中国将由于参战所获得的利益——也就是来自日本的借款和军械等类移用于内战，乃为不合理之事。

现在将话题转回到福建战区。

停战命令虽然已经发布，但在嵩口的第二支队则并未及时奉到。

第二支队扼守嵩口，观察战局；四日，并将分布在嵩口前方白杜及文藻各地的地方民军撤回嵩口，调整部署。

‘嵩口离漳州，约有六百余里（三百五十公里），路途崎岖，交通困难，非十余日不能到达其地。当时中正虽闻有停战消息，而未见命令，正在待命之间；不料驻梧桐尾之北军，误以我调回民军为退却，而又不知粤军（第二支队）已到嵩口，以民军为可欺，即于翌日（五日）上午进攻嵩口。

‘幸粤军谍报迅速，早已准备迎战，行至十里程外白湾地方，已遇北军。’（注二）

注一：安福国会一九一八年八月在北京集会的国会，被称为“安福国会”。因为在此之先，举行国会议员选举时，拥段祺瑞的皖系政客所组成的“安福俱乐部”挪用西原借款贿选结果，在国会议席中占有压倒多数的三百三十多席，故有此称。

注二：蒋总统-“粤军第二支队进攻永泰情况始末”（一九一九一）

孤军进攻永泰

‘粤军亦即展开应战，迎头痛击，相持二小时，北军势已不支，纷纷退却；然沿途仍据阵顽抗，及至傍晚，粤军追击至丘演（邱演）附近（离嵩口约四十里），敌犹抗拒不退。

‘粤军列阵环攻，至晚八时（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五日），敌方退走。

‘是晚，中正支队完全占领丘演地方。’（注一）

追击成功，更继之以追击，但战况则未可逆料。盖北军士气颇高，而粤军第二支队所属第三十八、三十九两营，死伤过半；且左翼文藻方面毫无戒备，如敌军由文藻进袭嵩口，则我军将会陷于困境，因此而有开拓右翼之必要；同时也是为了和在右翼方面仙游附近的许崇智军能够确保联络。

半月挺进七百里

‘至六日拂晓，中正支队由丘演出发，进攻二十里前方之梧桐尾，梁（鸿楷）统领所部，由丘演渡河（大樟溪），攻其右翼；丘（耀西）统领所部，直逼其地。

‘敌在梧桐尾前方，犹据险抗拒，后因梁部逼其右翼，其后方路线几为粤军截断，民军一部分亦由其左翼进逼，以助粤军。

‘敌见势绌，因向永泰逃遁；是日正午，粤军完全占领梧桐尾。

‘自此，中正支队与攻兴化之许（崇智）军，联络确实，消息灵通。

‘而半月来挺进七百里程之孤军，至是稍得生气；即进攻永泰之据点，亦由是而始定也。’（注二）

然而，攻向永泰的途径，却并非坦夷；敌军凭藉天险，在继续顽强抵抗之中。

‘自梧桐尾至永泰附近之界竹口（爱竹口）五十里之间，深山穷谷，步步入险，正利于以东防西之地。

‘而北军战栗，望风遁溃，一无抵抗。及至界竹口附近，因其福州之援队已到，乃再列阵抵抗。中正支队亦于是日乘势追击。七日下午，直至离界竹口五里地蜚英地方，对阵宿营。’（注三）

正当这一天，突然接到总司令陈炯明下达的“停战命令”。我军悬师深入，艰险备尝，病者十分之三，死伤者为数甚多，而且正当深山行军最艰苦之际，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遽尔停战，更增加了孤军悬隔之感，实在是非常不利。

‘八日拂晓，继续进攻。北军抵抗数小时，见势不敌，乃再退至永泰城附近之高地，据险扼守。

‘中正支队，继续追击，直逼永泰。丘统领所部攻其正面，梁统领所部攻其右侧，民军亦绕其左侧，以助粤军。于是，三面环攻，势如破竹。敌见势绌，乃以八日下午乘夜溃退，粤军即于是晚入城安民。

‘九日上午，梁统领率其所部，追击至汰口（台口）地方，丘统领所部，亦继续前进，极拟直逼福州，以扫巢穴。

‘盖福州与汰口，相距不过六十里，且其地势以高临下，而永泰大河（大樟溪），直通福州，又顺流而下之一优胜地势也。’（注四）

到这个阶段，按照预定的计划是要继续向葛岭进攻；但因停战命令业已奉到，不能再向前进击。

李厚基使用缓兵计

‘当时，福建督军李厚基惊惶失措，他一面预备乘船逃遁，而一面使用缓兵之计，却向陈炯明求和；因此，陈炯明下令停攻待命。我当时明知陈炯明中缓兵之计，我乃令梁、丘统领向福州进攻，但该统领已接到陈炯明同样停攻电报，就不肯听我命令。’（注五）

无可奈何，只有决心停战；不过有必要获得敌军方面对于停战的确实保证。

‘乃咨送李厚基，叙明停战命令，及问其是否承认粤军之停战与各守原防之约言；而李之覆文，满口承认，并言：“已电漳州陈总司令与之直接交涉。”

‘粤军以其既承认停战，故皆各守原防，再不乘胜攻省（福州），以守信约。’（注六）

于是，乃于十日公布停战命令。

然而，对于李厚基的话加以信任，实在是犯了疏忽的错误，结果还不到五天之后，他便重整旗鼓，悖弃约定，出兵反攻。

‘而李乃毫无诚意，不顾信用，利用停战机会，以为缓兵之计，私令其前降粤军之旅长周永桂反攻汰口。’（注七）

周永桂前在上杭之战，为粤军所俘，因其立誓效忠，故予释放，是一个没有节操的人。

注一、二、三、四、六、七：蒋总统-“粤军第二支队进攻永泰情况始末”（一九一九一）

注五：蒋总统-“参谋长会议训词”（一九四○三）

检讨失败原因

周永桂于十二月十五日（一九一八年）对汰口（台口）展开反攻。

‘尽其福州附近所有之兵力，率步兵五千、炮兵一营，沿途焚烧民居，杀戮无辜，以泄其愤，以助其焰，竭其毕生之力，而与中正支队千人决战。幸粤军防御前线，不稍懈怠，抵抗至是日下午，中正自觉受欺……’（注一）

先是，蒋总统在这次战役之初的十二月三日，就非常不巧身体生病，到了这个时候，病情突然加重，不得已乃委任部下部署前线；及闻敌军突袭，乃抱病往汰口火线亲自指挥，当时见到的情况是——各统领业已退却，最大火力的炮队则安置于无用之地。

加以后方讹传蒋司令官在前线被敌军包围，在永泰的行营人员闻风争先逃遁。

蒋总统急忙返回永泰，重作部署。然而军心一旦浮动，便很难约束；不得已，乃自汰口撤退，缩短防线，决定据守永泰城池。

‘而梁（鸿楷）、丘（耀西）各部，又不遵命令，擅自退却。及至申刻，敌军枪弹猛射入城，乃知前方部队已经逃遁；及敌军攻入城中，中正只身冲围而出。’（注二）

蒋总统已司令官的身分亲自率军进袭，追奔逐北，势如破竹，但却一转而体验到失败的痛苦。——这就是永泰之战的经过。

检讨败因永志不忘

失败翌日～十六日，检讨此次失败原因，笔记下来，永志不忘。

不用说，失败的根本原因在停战命令，但并非仅于此，而是还有以下各点：

第一～～是防线的设定问题。本来应该驱逐敌军于葛岭之外，在葛岭布防；但却不此之图，而将防线设于汰口，地形不良，且距离根据地永泰城太近，汰口一旦失守，则永泰立即濒于危险。

其次——是过于信任停战条约，而不曾设想到敌人会有反攻过来的可能性，疏于多派侦探。这是由于连日以来病况加剧，不能亲自充分视察地形与敌情，深感悔恨。

再有——就是军纪与士气的问题。

我军诚然是一鼓作气，拿下了永泰；但到了这个阶段，却因争夺入城首功而内部不和，及占领城池之后，统领梁鸿楷色迷猎艳，沉迷于居住舒适的盐栈中。

连统驭部属的人物，都是这么样的一副形像，则士兵纪律的紊乱，可想而知。一部分抢掠财物的人，当敌人反攻时，则只顾护卫其“战利品”，不能打仗。

此外——纵然是不曾为非作歹的士兵们，但也因停战令的发表而松懈了斗志。经过长途跋涉进击，而且是在追奔逐北的胜利之后，一旦面临到短暂的和平，要想保持纪律，鼓励士气，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乘胜猛追不可停顿

综合以上的检讨，得到一个结论如下：

‘至此更得一最大教训，即孤军深入，祇有乘胜猛追，达到目的地而后止，万不可中途停顿，更不可对敌守信也。’（注三）

对于敌人的重要根据地应该一鼓作气迅予攻击的重要性，在“永泰战役”过去二十年之后、对日抗战期间的一九四○年三月八日所举行的参谋长会议中，检讨到“冬期攻势”的结果，还曾经举出这个永泰经验为例证，有所说明。

永泰的失败，在战略上和战术上都留下了很大的教训，并且更深切地体认到统驭军队的重要性。

遗失日记及两部兵书

在这一次的战役中，非常遗憾的是遗失了过去六年的日记以及自日本留学以来、在兵学研究方面得到很大启示的两部最爱读而且一直是随身携带的书籍。

‘就我个人的思想来说，有两部书给我的影响最大。第一部是“巴尔克战术”——这部战术书，是德国的一个普通文人所著，而并不是出于有名的军事家之手，但是德国一般军人，对这部书都非常尊重，几乎奉为宝典。所以日本初译“巴尔克战术”书的时候，是保守秘密、禁止出售的。

‘第二部便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这部书由日本士官学校初译，以军事教育会的名义发行时，亦是非卖品；他们每一军人，都视为宝典，并且认为其重要性和我国的孙子兵法相伯仲。

‘当时我在日本，特别把这两部大着觅了来，先后读了数遍，尤其是“巴尔克战术”总看过六遍以上。

‘两书的意义都非常深奥，文字晦涩，看第一、二遍的时候，似觉诘屈难解，枯燥无味；直看到第三、四遍的时候，全盘意义，才能有所领会；以后愈读愈觉有味，终至不忍释手，就是在战场上，也要随时批阅，其引人入胜如此。

‘可惜我爱读的这两部书，都是圈点过好几回的，不幸在福建永泰作战时，竟告遗失。’（注四）

注一、二、三：蒋总统-“粤军第二支队进攻永泰情况始末”（一九一九一）

注四：蒋总统-“对克劳塞维茨著作的感想”（一九五六五）

巴黎和会

一九一九年的新年，在停战中来临。虽然是当永泰战役的严重失败之后，但陈炯明表示“非关吾兄（蒋总统）处置不当”，恳嘱继续留任，乃仍以第二支队司令官的身分留在漳州总司令部。

不过战争业已结束，要做的事，只是营房和练兵场的设计工作；为此，乃于三月间请假返回上海，晋谒孙先生请训。

王太夫人扶病至沪

四月间，母亲王太夫人由故乡奉化扶病来沪，迎养于寓中；虽然只有不过两星期的短暂团聚，但母子朝夕共话家常，回忆不尽。约两个月的假期届满，离开上海时，王太夫人流泪谆告：

“在我还生存人世的时候，务必每年归省一次。……”

接着又对身为一军之长应该注意的事作了如下的训诲：

“在军供职，用人最宜小心。……”

这两句话，在后来一直体会到是非常有道理的教训。

五月二日，返抵长泰第二支队司令部任所。

两天之后，“五四运动”在北京发生。所谓“五四运动”，是国民愤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巴黎和会”中的列强各国、尤其是日本的强横态度，而爆发出来的群众行动。

巴黎和会在这一年的一月十八日开幕，有三十二个国家的代表参加。

在和会中争取平等

中国派遣了南北双方的统一代表团总数五十二人参加这个会议，全权代表以外交总长陆征祥为首，以及驻美公使顾维钧暨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五人。除陆征祥为过去对日本交涉二十一条的卖国外交当事人之外，其余都是新进外交官，持有尊重民意、保护国权的明确见识。

中国在和会中提出的要求是——（一）大战以前，德国在山东所有一切权利，直接由中国收回，不得予日本继承。（二）取消一九一五年基于二十一条要求所签订的中日条约之全部或一部。（三）取消外国在中国享有之一切特殊利益，例如领事裁判权、关税协定、驻屯军营、租借地、租界、势力范围等……

中国站在战胜国一员的立场，想在这一次的和会中争取国际平等，恢复真正的独立地位。

可是，这一些要求，差不多被大国所完全抹杀。

其中最大的争点，是山东问题。日本坚持德国在山东所有的一切权利，无条件让给日本，丝毫不肯让步。

顾维钧义正词严

一月二十八日，在讨论德国殖民地问题的五国会议（美、英、日、法、义）席上，获得发言机会的中国全权代表顾维钧极力表明中国的主张。其大意如左：

“在由于中国对德国开战，中德之间的条约已经无效的今天，中国国民希望胶州湾、胶济铁路以及其他权利都归还中国。如剥夺德国的权利，而将之移交给第三国（日本），实在是不合法、不合理的处置。山东省是孔子、孟子的诞生地，也是军事上和交通上的冲要之地……”

针对顾维钧的发言，日本全权代表牧野伸显提出反论：“日本之占领胶州湾，应该为中国所理解；当依据协定，由日本在和会中取得自由处分权时，再归还中国。”

这一场争论，中国方面是合理的。参加会议的国家之中，美国表示出深深理解中国的立场，而且美国总统在和会的一年之前，曾经发表呼吁保障领土及主权独立等内容的十四条世界和平原则，这些原则和中国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

会场的气氛，一时倾向于对中国有利。

日本暗中施展手段

但日本为谋自侧面扼杀中国的主张，暗中施展出各种手段。

其手段之一，是对北京政府加以压力，以抑制代表团的发言。

据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于二月四日以一七二号电报向外相内田康哉报告：

关于在巴黎的反日言论，经于二月二日向中国代理外交总长提出抗议——“支那（中国）出席和会代表……想援引欧、美列强势力，压迫帝国，以达其目的；结果，不仅给予日本国民以非常不快的念头……有损日本国民的自尊心，而且是漠视我国的名誉和体面，对日本来说，实在是断难容忍的侮辱。……”

小幡的抗议，是基于日本驻法国大使松井庆四郎的要求而提出的。

又一个手段，是牵制美国的活动。

在巴黎和会中，美国提案设置“国际联盟”，为此而举行了宪章委员会。日本则向这个委员会提出了一个“人种平等原则”的议案。

在当时，美国依据他的移民法，对于外国人入境有所限制；尤其是对于中、日两民族则有更差别的处置。于是，日本乃从这个地方下手，因为对于日本这个要求废除差别的提案，中国当然不能不表示赞同；可是在美国方面，由于有移民法的存在，自然也就无法接受。是则日本如果坚持其提案，中、美关系便会因而产生嫌隙；如果中、美之间有了纠葛，则对日本关于山东的要求自会发生有利的结果。

日本代表团把山东问题和人权平等提案扯在一起，公然放言胁迫：“如果这些主张不能通过，日本便会退出和会。”（按：人种平等提案后来被日本撤回。）

注：顾维钧一八八八年出生，江苏人。先后任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全权代表。九一八事变后为参加李顿调查团之中国方面委员。一九三三年任裁军会议中国代表。二次大战结束之际任驻英大使。战后转任驻美大使，及海牙国际法庭法官，为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外交官。现居纽约。

五四运动

在巴黎和会中，日本耍出的最后手段，是暴露“密约”的战术。

第一件——是段祺瑞和日本所交换的“山东问题换文”（一九一八年）。日本宣布：依据这个文书，北京政府已经对于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省的权利“欣然同意”。

其次——是在四月二十二日将日本和英、法、义各国于一九一七年所签订的密约公开。这个密约，就是日本以承认在太平洋赤道以南诸岛屿（原为德国属地）归英国继承为交换条件，而得到在山东的权利。英、法等国基于这些密约乃明确地站在支持日本的立场，可以说是大势已定。

四月三十日，决定了全面接受日本要求的和约案。日本终于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胶州湾、铁路、矿山及海底电缆等，都落入了他的掌握。

这时，中国国民都在注视着自己的国家最初以战胜国的身分所参加的国际舞台——“巴黎和会”的进展情况。

国民愤怒斥责卖国贼

当和会的结果一传到国内，国民们“还我山东”的愤怒呼声，达到了沸点；愤怒的舆论和行动，指向曹汝霖（交通总长）、陆宗舆（前驻日公使、币制局总裁）、章宗祥（驻日公使）三个人，斥责他们是“卖国贼”。

曹汝霖和陆宗舆，替段祺瑞接洽“西原借款”；章宗祥则是在山东问题方面交换“欣然同意”公文的经手人。

“五四运动”是这样开始的——

五月四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聚集了超过一万人的学生们，一面怒吼“反对签署巴黎和约”、“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一面冲往曹汝霖的住宅放火，并且痛揍章宗祥一顿。

据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章宗祥在被学生殴打的时候，有日本人中江丑吉（中江兆民之子）赶去将他救出。”

北京政府逮捕了学生三十二人，打算将学潮镇压下去；但反而更刺激了抗议运动，不啻火上加油。学生们宣言罢课，并上书大总统徐世昌，要求将曹、陆、章三人免职。

同时，抵制日货运动也为之扩大。六月间，在上海、天津等都市，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运动。

断然拒签凡尔赛和约

北京政府终于在六月六日将所逮捕的学生释放，接着，免除了曹、陆、章三人的职务。

六月二十八日，在法国凡尔赛宫签订了“对德和约”（凡尔赛和约），中国代表断然拒绝签约。这是在中国外交史上划时代的表现，是向中外宣示——中国的主权属于国民的意志，决不为强权压力所屈服。

美国上院（参议院）也将批准凡尔赛条约的议案予以否决，“山东问题”就是否决该条约的最大原因。两年之后，在美国主导之下所举行的华盛顿会议中，再度提起山东问题，才决定将之归还中国。‘……日本帝国主义者，初则利用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提出所谓二十一条；继又迎合北洋派的武力政策，成立政治借款；更缔结所谓“中日军事协定”，向中国的领土进兵；日军复擅自攻取青岛，并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路矿权利。这些国耻，违背我国民的希望，侮辱我国民的自信，激起我国民强烈的公民要求。五四运动，就是这种要求最鲜明的表现。’（注一）

被共产邪说所窃乘

五四运动，诚然对国民革命给予了好的影响；不过也有很大缺点——就是缺少中国文化为它的根抵，多数群众是由于一时性的热情激动而喧闹起来。像这样的群众行动，在不久之后便被共产主义者的阶级斗争邪说所窃乘，成了他们滋蔓的土壤。

‘一般倡导新文化的人士，皆崇拜西方民主科学的进步，而对于我们本国自己的文化精神和传统哲学弃如敝屣，不肯回顾反省一下。……所以今日共匪窃据大陆，我们国家遭受到这样无穷耻辱，人民遭受到这样空前浩劫，我以为原因就是在此。’（注二）

山东问题，带来了导致中国民心趋向抗日的决定性结果。

国父痛愤责难日本

孙先生在当时接见日本新闻记者，对于日本的态度作了大意如下的责难：

“美、英等国，已将所有攻占之城市归还原主，何独日本、何独山东不能如是？中国曾有‘卖猪仔’。之言，十余万中国人，不仅如奴隶，实则为‘猪仔’，自澳门卖给外国人。今天日本以中国为猪仔卖与列强，而且又向猪仔本身割取一脔肥肉自享。日本口称同文同种，但却残忍如此，中国人对日本恨入骨髓，即在此等行为。”

日本使一向把日本当做兄弟之国的孙先生说出了这样痛愤的话。后来孙先生又对非常亲近的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寄出了有如下措辞的一封信：

“日本军阀政策，倘仍行其扶旧抑新之手段，则吾人亦不能不亲英美以排日也，而其咎则当归之日本。深望日本民间同志有以纠正军阀之方针。……”

注一：蒋总统-“中国之命运”（一九四三三）

注二：蒋总统-“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题”（一九五五一）

建议整建兵制

正在巴黎会议高潮之际的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九日，蒋总统撰拟了一篇为中国建军指标的“废督裁兵议”。这是鉴于中国内乱纷乘的症结在于为军阀代表的督军们穷兵黩武；为使国家安定，故而建议废止督军、整建兵制。其要点是这样的：

‘裁兵之法，当以征兵之制为则。……

‘使军队皆为国家之军队，则国家对于军队当设“军政检定会”，以监督其军政；而以每省各选一本籍最高而有声望之军官组织之。凡关于增兵、裁兵、调兵、征兵以及其军费、军制与黜陟军官诸问题，皆须由其检定会认可以后，陆军部方可咨请国会表决，而后由陆军部执行，则陆军部纯为军事执行机关。……

‘今以监督之权，授之军政检定会；表决之权，归之于民意机关；执行之权，付诸陆军部

。……庶人民有参与军政之权，而兵权则不为武人所专擅，则国家有永久和平之望也。’

粤军派系意识作祟

在粤军方面，其最大的难题，也正是军制没有“近代化”。

举例来说：就像因籍贯之不同而形成派系一点，在粤军中便有以陈炯明为中心的广东东江、惠州集团，以邓铿为中心的粤东集团，以许崇智为中心的福建集团，乃至响应革命的浙军等区分。由于派系意识作祟，而妨害到部队的领导统驭。

蒋总统为期对此等现象能有所改善，乃暂时耐心留在福建，六月间，接眷属僦居厦门附近的鼓浪屿，精心研拟改革军队的具体计划。

当时，曾于六月二十一日致函参谋长邓铿，函中有这样的一节：

‘自弟组织支队以来，毫无整顿之气象，坐耗饷需，人孰无良，能不愧怍？揆厥原因，计有二端：

‘现成部队，既不能另自选将练兵，又不能如意整顿革新，平时或受抚循，临战则不听指挥；欲图更长，则枝节横生。——以是因循至于今日，而不可收拾者，一也。

‘支队组织之始，旧人难觅，人才缺乏，内部官佐，半系狗尾续貂；及乎职员委定之后，屡思易人整理，而不可复得，故每每措置乖方，不能收指臂之效者，二也。’

蒋总统不属于任何一派，唯知一秉对孙先生的忠诚，以谋达成军事任务，但实则是已经做到了极限。而注重军纪，严禁越轨，一意进行改革的结果，却徒然招致反感，受到排挤。

于是，身心两方面都感到疲累，乃于七月九日再度致函邓铿，倾吐心曲：

‘自愧才不足以御下，德不足以服众，而信又不足以孚人，……犹依依不舍，则谓之素餐尸位。……

‘如一日不退职，精神多受一日苦痛，即职务亦多一日荒废。回防以来，耳鸣、脑晕、胃伤、腹泻不止，偶有思虑，则彻夜不寐，若非及时攻治，必成痼疾。

‘近日又有浙军关系，无论弟赴汕驻漳，双方浙军，皆不安心。……

‘即弟在长泰，亦深为他部所疑忌，故弟在粤军一日，人将以我有粤军为后援，非特弟个人受其排挤，即本军亦大受影响。故弟为公为私，皆不得不离职远避也。’

七月十二日，自鼓浪屿向总司令部邮寄请辞第二支队司令的呈文。但果不出所料——粤军与浙军反目，因而相继发生了两个冲突事件，不能不为之处理，以致到了正式离职、携眷离开鼓浪屿，已经是九月底了。

当告别鼓浪屿的时候，曾在海边口占韵语：

‘明月当空，晚潮汹汹，国事混濛，忧思忡忡，安得乘宗悫之长风，破万里浪以斩蛟龙。’

国父指示不得远离

辞职之后，打算留学欧美三年，已经有所准备；但在上海谒见孙先生，奉指示不得远离。

对于广东军政府已经不再寄以希望的孙先生，于八月七日致电广州国会请辞政务总裁职务，完全断绝关系，在上海致力著述。孙先生向蒋总统表示：“为了重建革命党，必须要有在军事方面的助手，如果让你远适欧美，长期留学，对革命阵营来说，实在是很大的损失。”蒋总统在孙先生的劝说之下，虽则出国留学的志愿再度落空，但孙先生寄予信赖与期待之大，是颇为值得安慰的。

这个时候，孙先生在著述方面，有“孙文学说”（心理建设）、“实业计划”等专着脱稿，都是为达成革命目标的基本理想和信念。

‘总理的实业计划，完全以畅裕民生为出发点，……国民的食、衣、住、行、育、乐等一切民生问题，就可解决，当然能成为一个富强安乐的新国家。

‘更有一点大家应该特别注意的，就是：实业计划一部书，其实就是一个伟大的国防计划——如那里要开辟河道海港，那里要构成铁路网的中心；又应如何开采煤铁矿产，……都是着眼于国防上的需要，为国家民族策长治久安之图。’（注）

注：蒋总统-“国父遗教概要”（一九三五九）

组成中国国民党

由广东来到上海杜门深思的孙先生，为再造新中国在不断地努力策划。

第一件工作，是改革党的组织。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发表通告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自最初的革命组织～一八九四年在檀香山诞生的“兴中会”，后来改组为“同盟会”（一九○五年）、“国民党”（一九一二年）、中华革命党（一九一四年），经过长时间的锻炼、进步，而成长为“中国国民党”；众所周知，直到今天仍然是领导中华民国的中心政党。

国父指示赴日一行

中国国民党成立不久之后，蒋总统便奉孙先生指示前往日本一行。二十五日，携带着孙先生致日本友人的介绍信由上海出发，二十八日晚间抵达神户，踏上差不多睽隔了四年的日本国土；转乘火车，前往东京。三十日下午，代表孙先生探望病中的犬冢信太郎。

犬冢是孙先生于伦敦蒙难的翌年～一八九七年第二次访日时，所结识的日本友人。当时他是三井物产公司职员，后来担任过“南满铁道”理事，一直不断地支持中国革命党。

当到病床边探望他的时候，他已经被宣告是不治之症，在不久之后的十二月十二日，便长辞人世，得年四十六岁。

在东京，还陆续拜会了孙先生的友人山田纯三郎、萱野长知、头山满、秋山定辅（注）等人；也就便购买些书籍，并于十一月五日、八日先后参观了日比谷公园的菊花大会和上野的展览会。

据当时日本时事新报于六日报导：日比谷公园的菊花大会，是正好看的时候。蒋总统对于菊花-尤其是黄菊，特别喜爱，现在的慈湖（台北郊外）灵寝前庭便植有菊花。（译注：当时日本每年秋天在上野举行的美术展览会，系由国家主办，简称帝展。）

在东京旅行参观之暇，曾撰写论文两篇向在上海发行的周刊-“星期评论”投稿。题目是“世界各国政府对付俄国劳农政府的手段如何”及“打破外交的迷信问题”。“星期评论”是用平易浅显的白话文体评论社会问题、劳动问题的杂志，是出于孙先生的指示由戴季陶氏于该年六月八日创刊，发行了约一年。

十一月十一日，前往京都，参观在伏见桃山的“明治陵”，以及宇治川。两地都是丛菊盛开的季节。

不到一个月的旅行结束之后，于十一月十九日返抵上海。接到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派人送来一封信，请回粤军原职；但并未前去而仍然和孙先生同在上海度过了一九二○年的新年。

这个时候，母亲王太夫人常在病中。一月二十七日，太夫人由奉化故乡来到上海，共同生活，每天亲侍汤药，并陪伴在卧榻一旁，乐话家常，甚为愉快。三月一日，太夫人返回家乡，病体已见康复。

这一年的上半年，蒋总统本人也为病魔所缠，一月患眼病；四月，因陈炯明迫切催促，加上孙先生的劝说，乃回到福建漳州的粤军总司令部，又患神经痛，一度在鼓浪屿静养，然后回到上海，接着发高烧；经医生诊断为伤寒，乃在上海篠崎医院住院治疗。及至病愈出院，已经是六月中旬，此时王太夫人扶病来到上海，照顾了五十多天。

康复之后，一时回粤军供职，参加攻克惠州战事（陈炯明的粤军回粤驱逐盘踞粤省的桂军）；但粤军内部仍然派系纷歧，令人烦恼，而于十一月退出第一线，返回故乡奉化。

自此之后到一九二一年春间约半年左右，一方面多次往返于奉化与上海、广州之间，一方面侍奉太夫人疾病，据医生诊断：“今年会有危险”。

成立中华民国政府

此时，在广州方面，为取代业已失去机能的广东军政府而准备成立新的“中华民国政府”，孙先生已经于去年（一九二○年）秋间，回到广州，在进行准备之中。

四月二日，在广州举行国会非常会议，决定取消“军政府”，建立新的正式政府。七日，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非常大总统，在出席议员二百二十多人之中，孙先生获得二百十三票的绝大多数选票当选。

政局已形成在以广州为中心的情势之下，开始迅速展布中。蒋总统于四月二十一日接到孙先生电报——“军事紧急，昨已下动员令，接电速来计划助理一切。”乃不得不告别健康值得耽心的王太夫人，而于五月十日离开奉化，前去广州；在孙先生领导之下与陈炯明、许崇智等人筹商进攻广西的作战计划。因在此时桂系军阀陆荣廷等人已与北方勾结，不尊重非常国会，且倒戈相向，粤军为此出动讨伐。

夜梦雪满山原

蒋总统刚到广州没有几天的二十四日夜间，不可思议地梦见雪满山原，一白无际，惊醒后，身犹寒战。

一个不详的预感——‘会不会是母亲病况的凶兆？’

于是，迫不及待地赶回故乡。

注：秋山定辅（一八六八～一九五○年）原籍冈山县。早岁创办“二六新报”，并当选国会议员。一九○三年，该报曾以独特消息报导日俄交涉内容，被指为有俄国间谍嫌疑，而剥夺议员地位。一八九七年和孙先生结识，支持中国革命运动。

王太夫人逝世

蒋总统于一九二一年五月，赶回到故乡奉化，果然王太夫人病情恶化，极其严重，虽经陪侍病榻，亲奉汤药，日夜不懈，但终究回天乏术。

王太夫人于六月十四日上午七时四十九分逝世。

哀莫哀于亲丧

在哀毁之中，撰写了一篇“哀莫哀于亲丧……”的“哭母文”及“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以写抱恨终天之恸，并述太夫人毕生守节抚孤行谊。这两篇文章，在本秘录的第二章中已经提到过。

守制期间，时时登雪窦寺，沉浸于回忆之中，因为这里是王太夫人生前经常前来的旧游之地。

王太夫人逝世之后，蒋总统每年在自己生日的这一天～十月三十一日，不进早餐。曾经有人请问不进早餐的理由，蒋总统为他说明如下：

子女的生日，是母亲生产子女的痛苦日子。为子女者不仅为自己的诞生喜悦，更应该纪念母亲的痛苦——我为此而不食，是对母亲的追念。

自此之后，蒋总统左右的人都学他的榜样，养成了在自己生日这一天不进早餐的习惯。

国父电促速来相助

可是，并没有充裕的时间能让蒋总统尽到庐墓守制的孝思。六月二十三日，孙先生发来电报——“竞存（陈炯明）、汝为（许崇智）已赴前敌，军事吃紧，望即来粤，墨绖从戎。”七月二十日，再度发来“速来相助”的电报。

邵元冲、胡汉民、汪兆铭、张人杰等人也有函电提到“墨绖从戎，古贤不废。”

为了献身革命，乃不得不断然违弃初衷，走上前线。

在中国有传统的守制古礼，如有怠忽，将会受到乡党的批评。依照当时的“国民礼仪范例”，父母之丧，守制三年；最初三个月，不能参加宴会；在半年内，应着丧服或佩带丧章。

八月十日，叩辞王太夫人灵堂，踏上前往广东的旅途，但在经过上海的时候，碰到暴风雨，各地发生未之前见的水灾。

于是耽心到溪口祖宅，靠近河岸，倘河水暴涨，无法防堵，母柩在堂，恐被水淹，因而连夕入梦。

为此立即返回故乡，果然家中墙壁涨痕，高达五尺，但母柩无恙，得以安心，乃再度出发前往广州。

以往中国风俗，死者灵柩不即埋葬，经过防腐之后暂时停灵自宅。

国父致祭王太夫人文

王太夫人灵柩安葬于自宅附近的飞凰山山腰，是在为孙先生奔走军务告一段落之后的是年（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孙先生派陈果夫代表参加丧礼致奠，孙先生的祭文是这样的：

“呜呼！文与郎君介石游十余年，共历艰险，出入生死，如身之臂，如骖之靳，朝夕未尝离失，因得略识太夫人之懿行。……其于介石也，慈爱异常母，督责如严师，栽其跅弛，以全其昂昂千里之资，虽夷险不测，成败无定，而守经达变，如江河之自适，山岳之不移。古有丸熊画荻，文闻其语，未见其人；及遇介石，念其根器之深，毓育之灵，乃知古之或不如今，幸而见于今，复不令其上跻耄耋，长为闺壶之仪型，是非特郎君辈所痛悼，亦足令天下闻之而失声！呜呼哀哉！尚飨。”

训诲两子承志继先

当丧事完竣之后，再度前往追随孙先生之前的十一月二十八日，对长子经国（现任行政院长）、次子纬国（现任三军联合大学副校长）留下手书训诲之语如左：

‘余葬母既毕，为人子者，一生之大事已尽，此后乃可一心致力革命，更无其他之挂系。

余十八岁立志革命以来，本已早置生死荣辱于度外，惟每念老母在堂，总不使以余不肖之罪戾，牵连家中老少，故每于革命临难决死之前，必托友好代致留母遗禀，以冀余死后聊解亲心于万一。

‘今后既与家人脱离关系，可无此念，而望尔兄弟亲亲和爱，承志继先，以报尔祖母在生抚育之深恩，亦即所以代余慰藉慈亲在天之灵也。余此去何日与尔等重叙天伦，实不可知；余所望于尔等者，唯此而已。特条示经、纬两儿，谨志毋忘，并留为永久纪念，父泐。’

筹划北伐作战

蒋总统于王太夫人葬事完竣之后，即为赶往孙先生处效力革命而离开故乡，时在一九二一年的十二月十二日。

革命行动的下一个目标，是举兵“北伐”、统一全国。故在赴粤途中便在悉心研拟“北伐作战计划”；及至翌年一月十八日，抵达孙先生驻节之地的桂林。

孙先生于一九二一年五月就任非常大总统之后，对受北京政府唆使来犯的桂军陆荣廷所部展开反击，攻下南宁、桂林；陆荣廷于九月底逃亡越南，桂系军阀为之崩溃。

在桂林设大本营

十月八日，广州非常国会依据孙先生的提案，议决：出师北伐，统一中国。十二月，在桂林设“大本营”，筹划北伐作战事宜。

同时，任命李烈钧为参谋总长，并任用各军总司令，计为：滇军朱培德、赣军彭程万、黔军谷正伦及粤军陈炯明等。

但陈炯明则是一个不好驾驭的人，他在后来竟然对孙先生谋叛，阻碍了北伐的推进。

陈炯明的不稳妥行为，在数年之前已有征兆～～一九一八年七月，蒋总统隶陈炯明部队担任作战科主任在福建作战时，曾应召到陈寓餐会，有陈炯明的心腹干部一人（叶举）诋毁孙先生为“孙大炮”，蒋总统乃在别室告知陈炯明注意，陈不但不加制止，却反而为之辩解；蒋总统为此愤然向陈提出辞呈，促其反省。

一九二○年夏季，蒋总统伤寒病愈之后，为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而再度加入陈部；未料，此时陈炯明已经在孙先生交付其统驭的粤军中扩充私人队伍，而且任命仰承其鼻息者多人为旅长、司令、统领等官职，非其亲信者则多被排斥；对孙先生的命令更阳奉阴违。蒋总统深感如此局面岂能栖止，故而仅留了三个星期，便向之告别，回到上海。

正当这个时候，在北洋军阀方面，直系曹锟、吴佩孚和实力最大的皖系段祺瑞形成对立，于一九二○年七月发生了“直皖之战”。

段祺瑞将他麾下夸称无敌的边防军（即原来的参战军）冠以“定国军”的徽号，亲自指挥作战。但各国驻华公使则表明中立态度，连一向支援段祺瑞的日本也和各国同一步调；加以奉系张作霖又追随直系，结成“直奉联军”，以致外强中干的段祺瑞结果败于直奉夹攻，失掉了天下。

直皖之战的结果，对南方也发生了影响——陆荣廷等人和胜利者的直系结合，派军袭击在福建作战中的粤军（陈炯明部）后方。

朱执信在虎门遇害

于是，粤军忽遽由汕头回师，指向惠州、广州。可是参加粤军之中的朱执信，却在占领虎门炮台之后的九月二十一日，被该炮台降兵杀害。

朱执信是孙先生的重要干部之一，为革命积极奔走活动；当其殉难之后，孙先生由上海致函蒋总统，内容如下：

“执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蒋总统）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又过之。兄性刚而嫉俗过甚，故常龃龉难合。然为党负重大之责任，则勉强牺牲所见而降格以求，所以为党，非为个人也。”

在孙先生的指示之下，蒋总统于十月六日复归陈炯明的右翼军；二十日，代理因病请假的许军长（崇智）担负第二军前线总指挥的任务。

粤军乘势攻下惠州，二十九日收复广州，陈炯明因攻被任命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

在此之后，当孙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的一九二一年五月，陈炯明更受任陆军部长兼内政部长，广东的军政实权由其一手掌握。

陈炯明屡次抗命

陈炯明倚仗权力在手，随即密谋把中央政府搞垮。在他的心目中，“护法精神”只不过是聊供利用为扩大权力的一种工具；然而到了这个时候，则毋宁可以说是反而成了权力的障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陈炯明垄断税收肥己，而对于政府则只每月缴纳十万元。他明知中央各机关每月经费必需十五万元，但却故意在财政方面给予压力。

一九二一年十月，“北伐”议案在非常国会通过，陈炯明却竟然又拒不实行。

此时，孙先生对陈炯明说出这么一番话：“粤军返粤之目的，不在光复一省之土地，实负有澄清中国之大责。”但陈炯明对于调动军队却仍然显露出难色。

最后，孙先生更向陈炯明表示：“吾北伐而胜，因事势不能回两广；北伐而败，且尤无颜再回两广。两广请兄主持，但毋阻吾北伐，并请切实接济饷械。”

陈炯明虽然承诺了每月拨给军费五十万元，但其后孙先生在桂林大本营半年，实则竟无一粟一弹之接济。

蒋总统并且曾经去过南宁，晤见按兵不动、无意听命北伐的陈炯明，探询他的真意，谁知却得到了大出意料之外的答复：

“民国二年（二次革命），展堂（胡汉民）一定要我出兵反对袁世凯，实在害了我。如果他当时不反袁，广东由我干到现在，岂不什么都好了吗？你为了什么一定要跟随现大总统孙先生共事呢？”

听到这样的话，岂止是因之愤怒，且更为未来的情势感到不安。

陈吴秘密勾结

蒋总统于到达广西桂林大本营的第二天～一九二二年元月十九日，立即和孙先生及参谋总长李烈钧、军长许崇智等人会商北伐作战的具体计划。

关于北伐作战问题，蒋总统在上一年业已向孙先生提出一份“军事意见书”。其作战计划是——（一）以四川军队平定西北，作为第一根据地，再由陕西出井陉（直隶省）之道。（二）以三个师出湖北，上京汉铁路。（三）以广东三个师平定东南后，即由南京向津浦铁路前进。（四）以其余六个旅由海道开赴渤海湾之秦皇岛登陆。军费——每年三千万元（以米价换算相当于现在约一亿二千五百万美金）。军制——仿效各国兵制，使达成近代化。

会商结果，决定出兵湖南，进攻湖北为第一方案；出兵江西为第二方案。

当时的国内情势，正趋向于对北伐有利。

其一，是北方军阀的内哄——在“直皖战争”（一九二○年七月）中获得胜利的直、奉两系合作局面，已经发生分裂，双方对立情势相当深刻。

以奉系张作霖为后盾于一九二一年一月就任的国务总理粱士诒，一意策谋防堵直系军阀吴佩孚干预中央事务。相对地，吴佩孚则发表通电责难粱士诒——“向日本借款赎回本来就是中国所有的胶济铁路”；湖北萧耀南、陕西冯玉祥、江西陈光远等各省督军也随之众口一词，抨击粱士诒。于是，张作霖则正面提出反论。两派针锋相对，简直是面临到战争前夕。

孙先生的北伐计划，就是在趁北方局面混乱，挥军北上，首先进攻直系曹锟、吴佩孚；如此，则直系便将会遭遇到奉系和北伐军来自南北两的攻势，而腹背受敌。

北伐令于二月三日下达，着李烈钧攻击江西，许崇智进军湖南。

陈炯明与吴佩孚勾结

未料，此时待在广州的陈炯明，却已经先和以北伐军为敌对目标的吴佩孚秘密通款，毫不避讳地对北伐军事行动加以妨碍。

三月廿一日，陈炯明所指派的刺客在广九铁路大沙头车站行刺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枪弹射中腹部，两天后不治逝世。邓铿是负责筹措北伐经费的人，对于北伐军来说，所受打击不谓不大，以致桂林大本营的部队陷于连粮秣都补给不上的困境。为此，孙先生乃将大本营移往广东省北部的韶关，决定改道出师进击江西省。

这时，陈炯明又拿出了更进一步的妨碍手段，企图将驻在广西省南部一带的叶举、熊略等心腹干部所统驭的部队调回广东，阻碍北伐军向韶关方面移动。

可是孙先生却已先行率部到达粤桂交界的梧州，令陈炯明来会；陈则藉词搪塞不肯应召；不过鉴于自己的亲信部队尚在南宁，未克抢先调回，以致其本人在广州势孤力单，自知不敌，乃电孙先生请辞本兼各职；实则，此时面对的敌人吴佩孚等已和陈炯明有所勾结，许以“两广巡阅使”的职位。

孙先生对于陈炯明的公然抗命大为震怒，有意免除其一切职务，但因胡汉民劝谏，乃下令准陈辞去广东省长及粤军总司令，而留任陆军部长。

然而，当时担任第二军参谋长的蒋总统则认为陈炯明意图谋叛，逆迹已彰，莫如尽速予以讨平，俾先巩固广东，再谋北伐，是为上策。为此，乃移动第二军进驻肇庆、三水，自西边迫近广州，给予压力；更且复向蒋总统建议——“先清内患，再图中原。”但蒋总统仍然对于陈炯明的忠诚寄予些微期待，故而未纳此议，加以部队内部，对于这个建议也是意见纷歧，蒋总统感到处境困难，乃于四月二十三日辞卸第二军参谋长职务。孙先生表示：“此时你若走，则我机能全失，人无灵魂，躯壳何用？”蒋总统在受到这样恳切慰留的情形之下，一度同意不走；但终感对军队内部情势无能为力，卒于当天夜晚离开广州，前往上海。

蒋总统力劝陈炯明

当时，蒋总统曾寄书陈炯明，告知孙先生的意志，要求他仍然协力北伐，其内容大致如次：

‘吾公如能深信中正之言，采纳一二，勿听细人之谗，勿堕霄小之计，服从总理，共图北伐，则中正虽守制未终，尚思待罪疆场，执鞭以从，聊供指臂之助。’

可是，陈炯明却没有什么反应。

以进攻江西为重点作战计划的北伐军，在韶关、南雄一带集中了五万兵力，待命出击。五月六日，孙先生抵达韶关，对全体官兵誓师北伐；十一日，开始进击江西。

二十二日北伐军入龙南、虔南，二十五日下南安，二十九日克信丰、南康、崇义，六月十三日攻下赣南重镇-赣州。

这时，陈炯明见到北伐军挥师北上，后方空虚，乃乘机将粤军叶举、熊略等所属部队自广西调回广州，占领附近重要地区。——这个行动，是基于已和北方军阀吴佩孚．陈光远等密通款曲，而意图夺取北伐军的后方基地，自南北两面夹攻北伐军。

陈炯明叛变

此时，孙先生仍想说服陈炯明，乃于一九二二年六月一日亲自前往广州，为了表示没有他意，连护卫部队都没有携带。

可是，陈炯明却调集其部队在惠州，不肯前来和孙先生见面，而且散布流言——“北伐军在前线战败，孙某人跑回来了。”一方面则将其心腹部属叶举、洪兆麟等部调集于广州郊外石龙，策谋叛变。

在此之前的四月二十八日，北方奉系张作霖所部与直系军队在北京郊外发生接触，点燃了第一次奉直战火；不过由于吴佩孚奇袭成功，战事延续了一个星期，便以直系获胜而罢兵。

由于这次战争结果，倚张作霖为后盾的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被迫卸职；六月十三日，得吴佩孚支持的黎元洪再作冯妇。

北京如此政局，对于秘密和吴佩孚通款曲的陈炯明来说，正是乘势而起称兵作乱的大好时机。

陈部袭击国父

陈炯明的行动，开始于六月十六日上午二时（十五日深夜），他命令驻扎广州近郊白云山、观音山所部叛乱，突袭驻节于粤秀楼总统府的孙先生。

这就是被称为“永丰舰事件”的发端。

当时，孙先生正在总统府就寝中。本来在前夕（十五日晚间、也就是当夜）对于陈炯明将发生不轨行动已有所闻，但孙先生仍然对他寄予信赖。

“永丰舰事件”的经过，蒋总统曾在当时（一九二二年九月）亲笔着有“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记述颇详，现在引录于后：

‘六月十五日

‘粤军将领，得陈炯明惠州来电，乃开秘密会议于白云山总指挥处。叶举指授各将领围攻总统府、占领行政各机关、及派兵进驻韶关（北伐军大本营所在地）等各方略。

‘是夜十时，有某军官电话报告总统，言今夜粤军恐有不轨行动，务请总统离府。总统以为谣传，不之信。

‘及至午夜十二时后，林秘书直勉与林参军树巍前后来府报告，言今夜消息险恶……总统言：“竞存恶劣，当不至此。……其所部……不乏明理之人，未必助桀为虐。……请诸君不必猜疑。”……总统即入私室就寝。

‘……迨至二时许，有某军官自粤军营中潜出，特来报告，言粤军各营炊事已毕，约定二时出发，并声言备足现款二十万，以为谋害总统之赏金。且言事成准各营兵士大放假三天（按大放假即粤军抢劫之暗号）等语。

‘总统犹未深信，及闻各方号音，自远而近，乃知粤军已经发动，即令卫队准备防御。此时，约已三时。……’

国父脱险登楚豫舰

孙先生当时坚持戡乱平叛，是自己的责任，万一力不如志，则唯有一死殉国，故而不肯离开总统府。但被数人合力强挽出府。

此时，各马路已被封锁，不能通行，多次碰到盘问，幸得通过，走向海军总司令部。

‘总统单身经过财政厅前，已遇叛军大队由东而来，……总统遂参在叛军队中，从容不迫，履险如夷；叛军以为其同事也，亦不查问。及至永汉马路出口，总统方得脱险，步至长堤，安抵海珠之海军总司令部，与海军温司令同登楚豫舰，召集各舰长，议决应变戡乱之计。’

当时，叛军以为孙先生还在总统府内，乃于上午三时开始发动总攻击；相持至正午，用速射炮瞄射，并用煤油烧毁由粤秀楼至总统府的栈桥，杜绝出路。府内卫士五十多人抵抗大军，颇为善战，及至下午，弹尽援绝，才被叛军缴械。

结果，不仅总统府，连广州全市也都落入叛军之手，只剩下海军是唯一可以依赖的力量。

孙先生率领各舰，集中黄埔，准备由水上进攻广州叛军；同时派遣紧急传令，着远在广州北面二百公里以外的北伐军回师平乱。

革命前途转危为安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陈逆炯明的叛变，乃是我们总理所遭遇的最危险而且最严重的一次失败。当时，陈逆叛部层层包围着观音山的总统府，加以炮击。幸于事变前一刻钟有一位同志向总理告密，并扶持总理离开总统府，革命前途乃得转危为安。否则，那次必为叛军所害，党国亦早已被其毁灭；但总理一切重要著述和参考书籍，都毁于这一次事变，这是本党无可补偿的损失。’（注）

注：蒋总统-“本党革命的经过与成败的因果关系”（一九四九六）

间关赴难

十七日（一九二二年六月）晨，外交总长伍廷芳、卫戍总司令魏邦平来到孙先生驻节的楚豫舰，孙先生命魏邦平将陆地所属部队调集大沙头，策应海军，夺回广州，又着伍廷芳折回广州，赴各国领事馆，要求严守中立。

当天下午，开始由海上发炮攻击叛军。

‘总统即率永丰、永翔、楚豫、楚章、同安、广玉、宝壁各舰出动，由黄埔经过车歪炮台，驶至白鹅潭，乃命各舰对大沙头、白云山、沙河、观音山、五层楼等处之叛军发炮射击。……叛军死于炮火者，约数百人。当时因陆上部队不能如期发动，……其乱卒不克平。各舰乃经中流砥柱炮台，回至黄埔，会议第二次进剿之计。’（注一）

国父急电蒋总统

翌日～十八日，孙先生致蒋总统的加急电报，发到宁波：

“蒋纬国先生：事紧急，盼速来。孙文。”

受电人，不用蒋总统的“介石”别号，而借用其次公子“纬国”名字，是为保守秘密。

继之，于两天之后的二十日，陈炯明在广州叛乱的消息传到上海，得知孙先生已登军舰，正在危难之中。

朋友们有以广东消息混乱，如贸然前往，恐徒然落入陷阱，故而劝告蒋总统宜俟情况稳定之后，再作行动者；但蒋总统以为最重要的是救护孙先生脱险，于是乃以后事托付友人张人杰，决心赴难，虽死不辞～～二十五日，离开上海前往黄埔。

当时，正在江西作战中的李烈钧、许崇智等所部北伐军，闻广东事急，乃回师讨伐陈炯明，但陈炯明则迅于二十日抢先占领北伐军大本营所在地的韶关，迎击回师南下的北伐军，以致陆路援军，也不能马上来得及赶回来。

在当地，孙先生于二十三日由楚豫舰移登较大的永丰舰，以黄埔为根据地，率领尚能掌握的海军军舰十艘，摆开自海上压制广州叛军的态势。盖此时虽然包括广州市区在内的珠江北岸各炮台都已落入陈炯明所部叛军之手，但南岸一带，尤其是扼住广州咽喉的江心洲黄埔及长洲要塞等处，则仍在孙先生的指挥之下。

一人足当两万援军

蒋总统于二十九日潜行穿越叛军严密警戒线，到达孙先生驻节的永丰舰上，孙先生欣然表示“蒋君一人来此足当两万援军。”乃即委以海上指挥全权。

自此开始，四十二日之间，和孙先生生死与共、在酷暑中困守于叛军炮火集中轰击的军舰之上，接受了革命军人极大的磨练与考验。

对于蒋总统的间关赴难之举，和孙先生感到欣慰正好相反的，是陈炯明为之大起恐慌。当时，汪兆铭送来激励函中提到——“陈（炯明）闻兄来，面色发青，说：‘他在先生身旁，必定出许多鬼主意。’”

陈炯明得知海军未见动摇，加上陆路北伐军回师平乱，乃两度派遣使者向孙先生请求和解。他故示无可奈何地以业已被迫辞去粤军总司令为藉口，表示因此控驭不住叛军，颇感苦恼，希望北伐军停止回师南下，孙先生以其只应悔过不能言和而断然予以拒绝。

陈炯明进行收买海军

陈炯明口是心非，一面求和，一面却图谋收买海军，进行其离间工作。被他收买的对象，是海圻、海琛、肇和三艘巡洋舰，都是三、四千吨级的主力舰；如果失去这三艘军舰，则剩下来遵奉孙先生指挥的，只是千吨以下的小型舰艇。

因此，孙先生乃不得不考虑新的作战部署。

‘总统决心将各舰移驻长洲要塞后方的新造村一带，免被叛军之封锁。是夜（七月八日）十一时，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舰果升火起锚，驶离黄埔。总统闻此报告，亦即命其余各舰，由黄埔上游经海心冈、驶往新造村附近，掩护长洲要塞，以防鱼珠叛军之袭击。’（注二）

孙先生的舰队，由于在停泊之地-黄埔的上流有车歪炮台，下流有鱼珠炮台，都已被叛军控制，故而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不过还保持住一个据点，就是长洲要塞。

由于三大巡洋舰既已投向敌阵，则停在黄埔的其余未叛各舰，便陷于鱼珠炮台的瞄准之下；因此，乃打算转移到长洲要塞背后的新造村附近停避。

可是，在迂回躲避鱼珠炮台威胁的路线上，有一个困厄之处-海心冈，在这里水深只有六尺（二公尺），军舰不能通过。

‘殊不料海心冈近来水深至十五尺（五公尺）以上，总统早已派人测定，各舰通过裕如，故临时乃得从容应变，不为叛军所陷。’（注三）

抵达新造村附近之后，最大任务在防守长洲要塞。

‘七月九日下午一时后，鱼珠炮台之叛军钟景棠所部，竟渡河袭击我长洲，当时要塞司令马伯麟所部，开枪应战，叛军死伤甚众，不图海军陆战队孙祥夫所部遽竖白旗，投降叛军，反戈相向，引敌登陆，长洲要塞竟失之顷刻。’（注四）

海军终于完全暴露在叛军威胁、毫无援护的状况之下。

注一、二、三、四：蒋总统-“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九二二九）

大无畏的精神

由于珠江下游是被鱼珠炮台和长洲要塞所钳制，所以除了向上游击破车歪炮台，打开一条血路，往白鹅潭方面脱出而外，别无办法。可是舰长认为车歪炮台居于有利地势，且炮队密布，舰队极难通过该处；但孙先生则以此为死中求活的唯一出路，说服舰长赞同。

七月十日，舰长下令启锚移动；不出所料，果然遭遇到最激烈的战争。蒋总统陪同孙先生屹立舵楼，指挥舰队。

‘十日上午二时，总统命令永丰、楚豫、豫章、广玉、宝壁等舰由海心冈驶至三山江口。拂晓，乃命各舰试射车歪炮台逆军阵地，逆军发炮还击；当时各舰以逆军在车歪炮台布置周密，彷徨无措，进退莫决。总统以“民国存亡，在此一举，今日之事，有进无退。”乃于九时半下令先以坐舰（永丰）表率前进，然后再命各舰鼓勇直前，速向车歪炮台猛击。’（注一）

通过车歪炮火网

当时，敌军炮兵，不止配置在车歪炮台一处，而是在炮台附近两岸部署有两营以上野炮阵地，等候着舰队到来。

永丰舰在来自两岸的交叉炮火中穿越前进。

蒋总统随侍孙先生所站立的舵楼，暴露在弹雨之下。

情势甚为危险，乃劝孙先生移避下舱，但孙先生则表示：“舱房会比这里安全吗？”一步都不肯移动。及至伤者续出，孙先生才同意扶掖伤者移往下舱，代为施治。

永丰舰中弹六发，船身震动激烈，蒋总统守在舵楼，指挥战斗。

此时，必须尽快脱离敌炮射程以内的水域，计算其通过时间需要二十分钟，蒋总统一直注视着时钟。

刚好二十分钟过去，才得脱出险境。

舰上死伤颇重，直接驶入省河白鹅潭，尾随各舰也都各受到轻微损伤。进入白鹅潭之后，永翔、同安二舰也随之来归汇合——舰队力量，反而较前增加。

国父痛斥英籍税务司

永丰舰在白鹅潭停泊时，海关税务司英国人来到舰上，因为当时船舶停泊地点都由海关税务局指定，故而在和孙先生会面时便表示：“永丰舰不能停泊白鹅潭”。——这是受了陈炯明的指使。

孙先生愤怒地说：“白鹅潭是中国的领土，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我在中国有行动的自由，我爱停那里就停那里，岂容你来干涉；我孙某全身是胆，谁也不能威胁我们。”

那个英国税务司听了之后，便默然离去。

‘我到现在，还记得总理讲的这段话。我们作了军人，必须“全身是胆”，我们不怕敌人，敌人就一定怕我们。而且他一定要被我们征服。我们革命军，自总理以来，一贯是本着大无畏的精神来奋斗，所以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注二）

舰队在白鹅潭停泊之后，仍然暴露在陈炯明的顽强攻击之下。

十九日，有叛军水雷在永丰舰附近发现，距离美国军舰甚近，所幸发而未中，且爆炸力甚微。

其后，继续使用鱼雷攻击，并时有飞机飞来示威恐吓，又调集小轮数十艘，图谋袭击海军。

日以继夜地处在防御战的境地，官兵们的疲劳情况甚为显著，加上连日天气酷热，尤其严重；粮食缺乏，淡水也不能充分补给。

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之下，蒋总统和水手们一起从事洗擦甲板等劳动，以鼓舞士气；有时阅读福尔摩斯侦探案等趣味性读物，调剂精神。

又常在夜色掩护中冒险登岸，采购食物，孙先生看到这样的行动，便说：

“我很感激你对我这样作，但是今后我不许你再去冒险采购食物；你是最重要的干部，万一我遭到不幸，今后革命大业要你担当的，你的责任太大了。”

困守在江面上的孤立状态，一直在持续下去，唯一的期待，就是由江西回师驰援的北伐军。

回师驰援不幸溃败

可是回师指向广州的北伐军，在到达粤北的韶关、翁源、马坝等地，便受到了陈炯明部队的抗阻，陷入苦战。最初的接触，北伐军占了优势；但由于陈炯明陆续调兵增援，形势乃逐渐趋向不利——军用物资和食粮缺乏，兵员更得不到适当的补充，战斗延续下去，疲惫的程度也随之加深。

北伐军于七月二十九日，在韶关决战败北；八月三日，许崇智所率领的主力-粤军第二军退往南雄；自此开端，北伐军全面溃败，结果，粤军第二军及福军（李福林部）退入福建；李烈军的赣军、朱培德的滇军、陈嘉佑的湘军退往广西方面。

注一：蒋总统-“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九二二九）

注二：蒋总统-“神秘性与心理战对剿匪作战之重要及其方法”（一九四八二）

夺回广州

八月九日（一九二二年），有人秘报陈炯明袭击永丰舰的计划。

这个计划，是一面贿买永丰舰上的官兵不加抵抗，一面对该舰集中攻击，以谋害孙先生为唯一目标。同时对于其他各舰也进行收买活动，并阴谋由某舰假作还击而炮轰广州市沙面外人局留地，藉以引起外国干涉，俾中伤孙先生的舰队不能再在白鹅潭停泊。

就是在同一天，又得到了回师驰援孙先生而指向广州的北伐军业已败于叛军的确实报告，对于援军已经是难以指望。

‘总统……闻其报告，乃召集各舰长会议，佥称……腹背受敌，战局必危，总统株守省河，有损无益，遂议决离粤赴沪之计。’（注一）

孙先生以即日离粤之事通告各国领事。于是，英国领事乃提出派英国炮舰“摩汉”号送孙先生前往香港。

在出发之前，孙先生对舰队官兵发给一个月的恩饷，以奖励忠勤功绩。下午三时四十五分孙先生率幕僚换乘“摩汉”号，驶离白鹅潭。

国父郑重期勉

此时，蒋总统一如在永丰舰上，始终追随孙先生左右，在由广州往香港舰上，孙先生热烈谈论讨逆计划，不觉将近天曙。

‘国父乃忽而起示曰：“余自知在世之日，最多不逾十年；而尔则至少尚有五十年，望尔勉为主义奋斗，为革命自重。”

‘聆教之下，诚不知何以慰父师之感慨，乃惶然以对：“中正今年亦已三十有六。”

‘国父又重言之：“本党革命，遭此钜变，吾人犹未为叛逆所害；今后倘无不测之事，则尔为主义继续五十年之奋斗，自不多为。”--其音其容，此情此景，至今犹髣佛如在泪睫之前。’（注二）

十日清晨，在香港换乘俄国客轮。十四日上午，抵达上海，在岸欢迎者，约数千人。

‘总理……在陈逆部队四面包围之中，坚忍不拔，昼夜不息的对抗了五十五天之久，最后虽得离开广州，安全到了上海，但是总理百折不回奋斗到底的大无畏精神，感召了我们5[193]1213一般革命同志和军队，加强了对革命的信心，和对于总理的崇敬。’（注三）

紧张之后，疲劳出现，暂回宁波及故乡溪口稍事休养，但为时甚短。

这是由于被陈炯明打败而一时退往江西的许崇智等部队，于九月底和驻在延平的北洋军王永泉取得联络，进军福建；十月十二日，攻克福州。孙先生乃将之改编为“东路讨贼军”，任许崇智为总司令，派蒋总统再度出任许部参谋长。

坚忍耐烦劳怨不避

十月二十二日，到达在福州之东路讨贼军第二军军部。可是，在这个部队中也还是存在有派系斗争的苦恼。

‘当时军中将领，界限甚深，每相排挤，凡对总理亲信者，必欲去之而后快。’（注四）

在受到杯葛、无法执行参谋长职务的情形之下，蒋总统乃于十一月末暂时回到上海。

可是，孙先生则以“坚忍耐烦，劳怨不避”责勉重回福建任所。

‘……离闽回沪，面请任何工作，都不敢违命，惟望准我不再回闽，……然总理再三强我回闽，余乃仍从命返任。……

‘此后数十年间，我每于挫折艰难之际，即常以总理“坚忍耐烦，劳怨不避”的遗训自勉。’（注五）

东路讨贼军在福州建立了强固的基地，结果对革命的进展，发生了重要作用，在经调整态势之后，于十二月十九日回师攻下泉州，平服福建，随即指向广州。

另一方面，在广西有刘震寰桂军也加入讨贼阵营，编成西路讨贼军。西路讨贼军于十二月底控制粤桂两省邻接之梧州，开始向粤省进军。

新年来临的一九二三年元旦，孙先生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表明决心如下：

“护法与非法之争……唯有前进不已，以求最后之成功。”

在西路讨贼军进攻之下，粤军（陈炯明部）内部起而响应者，颇为不少。九日克肇庆（高要），十日下三水，赓续进击，势如破竹，陈炯明遂于十六日放弃广州，逃回其老巢惠州；当天夜晚，西路讨贼军入城，立即电请在上海的孙先生回粤，复任大元帅。

自上年六月十六日以来，刚好七个月的历程，革命根据地-广州，由叛徒陈炯明手中夺回。

注一：蒋总统-“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九二二九）

注二：蒋总统-“国父百年诞辰纪念文”（一九六五十一）

注三：蒋总统-“本党革命的经过与成败的因果关系”（一九四九六）

注四、五：蒋总统-“革命历史的启示和革命责任的贯彻”（一九六九三）

派往苏联考察

孙先生于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回到广州，续行大元帅职权；三月二日，正式成立“大本营”随即任命蒋总统为大本营参谋长要职。

但时候不巧，蒋总统适因治疗眼疾，回到宁波，不能前往广州，乃辞未就任。

广州虽说是回到孙先生治下，但军阀们的阴谋继续不断，当时状态，距离安定的程度还是远得很。

四月十六日，桂军沈鸿英部在江西、北江一带叛变，意图进袭广州。沈鸿英一向仰承早前策划将孙先生自军政府排除出去的岑春暄鼻息，同时和北方军阀吴佩孚也有勾结。当击溃陈炯明逆军，刚收复广州之后的一月二十六日，他便曾阴谋制造“苦迭打”，打算杀害广东省长胡汉明；其后，孙先生接受其输诚悔过，将他的部队调驻西江肇庆（高要）一带。沈鸿英的叛军，迅即迫近到广州郊外的白云山。

蒋总统接到孙先生急电，立即返回广州；抵达孙先生的麾下，是在四月二十日。

此时，滇、粤、桂联军立即动员讨伐叛军。及至五月九日，已将北江方面达于韶关一带完全肃清，沈鸿英逃往江西。

正在这个当口，又发生了陈炯明的再度叛乱，他的背后，也是吴佩孚在撑腰。

在东江流域方面，陈部叛军于九日攻占龙门，进击石龙，西向窥伺广州；又粤东方面之梅县、潮州、汕头，也都被叛军夺去。

五月二十日，讨贼军对陈炯明的根据地-惠州发动总攻击，但陈部叛军出奇迂回作战，攻陷讨贼军背后之博罗讨贼军形势为之不稳。

蒋总统乃请孙先生亲赴前线督战，并随同出发。

正确判断的重要

在即将到达石龙时，碰到一群溃兵张惶失措地喧传石龙已经失陷；可是，蒋总统则判断情况不至于坏到这样的程度，一定是军心浮动，散播着以讹传讹的谣言。

为此，乃想出了一个计策——亲自率领卫队二百人扬言叛军业已溃退，孙先生也率先领导前进，因之立见功效，士兵们气势大增，转退为进。

这个奇计，连孙先生也为之感到惊异；但却绝不是没有根据的行动，因为叛军占领一城之后，必定稍事停留，昨天被其攻陷的博罗，离石龙将近五十公里，不可能在一天之间便迅速迫近石龙。

至于石龙失陷的谣传，是由于在敌我双方战斗力不相上下的战场上有一种紧张气氛，常常因为稍稍有点风吹草动，便会惑乱军心，自行溃散。——石龙的情况，就是险些濒临这种境地的一个实例。因此，一个指挥官所最需要具备的条件，就是正确的判断；经过这一次，重新得到了更真切的认识。

在攻克惠州之前的六月十六日，孙先生重行任命蒋总统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但在参佐军务方面却又受到了一些人的忌刻。因为如果不是同一个地区出身，没有掌握可以自成派系的私兵，跻身于就算是业已阵容一新的讨贼军中，也还是居于劣势。面对现实，为期军中人事关系圆满，实以个人引退为宜，但为了要报答孙先生的知遇，却又不忍离去，颇为苦恼；结果在七月十二日，终于断然辞职，经由香港返回故乡。

后来，在覆上孙先生的函呈中，向他说明理由如左：

‘……倾轧之祸，甚于壅蔽，媢嫉之患，烈于党争，此岂愚如中正者所能忍受哉……’

现在，须将当时国际情势作一点概述：

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

由于第一次大战而发生了很大变化的世界局势，在华盛顿会议（一九二一～二二年）之后，一时进入“安定期”。依据在华盛顿会议中所成立的“九国公约”，中国获得了新的国际地位。

自“二十一条要求”以来，中日之间纷争焦点的山东问题，也由于列强支持中国，迫始日本让步而将山东权益归还中国。

此外，在华盛顿会议中又决定了所谓“五五三”的海军军备限制（即美、英、日三国主力舰吨数之保有比率为五五三之比）。其次，“日英同盟条约”、“石井·蓝辛协定”都同时废弃，使日本称霸亚洲的奢望在列强监视之下，一时受到了遏制。

可是，在东三省方面，日本支配力的日益增强，则是不争的事实。

还有在这个时期，国际间又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就是俄国经过革命而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个马列主义国家的诞生，对后来的世界史给予了很大的影响。

当时，苏维埃政权还没有得到国际间的承认；为此，他特地向中国以及各国派遣使者多人活动给予承认，同时极力宣传马列主义，发展共产党的势力。

在如上所述的国际情势之下，孙先生特地派遣蒋总统前往苏联考察。

这是在辞卸参谋长职务，回到故乡不满一个月的时候。

在苏联的见闻

由蒋总统担任相当于团长地位而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代替孙先生前往苏联报聘，目的是在考察其政治、军事、和党务，而特别关心的是所谓“红军”的长处和短处。

国父考虑设立军校

孙先生在广州虽然位居大元帅之尊，但是颇苦于陈炯明以及各军阀叛乱的困扰，深深地感到要想达成革命目的，则军阀拥兵不仅不能为助，反而是一种障碍；故有必要编练一支在革命精神统率之下的强劲直辖部队-国军。

为培育这样的军队，孙先生乃考虑到设立“军官学校”。是则苏联的军事制度不无可供参考之处。蒋总统以前学过一点俄文，加上计画在将来设立的军官学校预定由他来负责，故而被选中担任这个考察任务。

在苏联停留三个多月，其间曾历访莫斯科、彼得格勒（即彼得堡、现名列宁格勒）等地，和托洛斯基（注一）、齐采林（外交人民委员、即外长）、胡定斯基（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等俄国革命领导人会面；并且碰到一个名阮爱国的越南革命运动分子，据说就是后来的胡志明。

在苏联的见闻，多为有关共产主义的本质问题，从当时的日记、笔记及书信中，所整理出来的印象大致如下：

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六日，乘“神田丸”轮船自上海出发，由大连往东北地区，然后乘西伯利亚铁路列车前往莫斯科。同行者有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三人。

目睹东北日人势力

十九日，到达大连。这是一九一四年之后隔了九年再度踏上东北国土。而在这九年中，中日之间发生了“二十一条要求”（一九一五年）、“郑家屯事件”（一九一六年）、“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一九一八年）、“出兵西伯利亚”（一九一八年）等事件，日本势力在东北伸展的情况，已经和九年前大不相同。

日本租借地的大连市，已经不像中国的地方，而成为同是港口都市的日本横滨之缩影，使人感到这就是日本的领土。

在大连居住的中国人约有七万，诉讼裁判权完全由日本人掌握，连“会审公堂”都没有设置；在所谓“关东州”地区，虽然是中国的领土，却不能派一个中国官吏，甚至不能如在外5[203]1223国设置一个领事，而且也没有一个教育中国人子弟的中国学校，实在是可悲的现象。

在到达大连的这一天，为裒集“哀思录”而撰成“所感”一文，寄往上海附印于卷后。“哀思录”是集王太夫人之丧来自各方面的哀挽文字，由同志叶楚伧代为编辑的纪念集。在这篇“所感”中，有这样的几句话：

‘……从此道途日远，何时复得回乡扫墓，顾前思后，悲戚无异于二十年前初就外傅之日。……及见经、纬两儿来沪远送，此心怦怦，益难恝置，乃知父母爱子之切，尤甚于孺子之慕其亲者。……’

由大连到达长春，沿途从车窗所见所闻，重新得到这里的一切都在日本势力范围之下的印象。火车经过哈尔滨之后，于二十五日越过满州里国境，继之横断西伯利亚而于启程以来的第十八天～九月二日下午一时到达莫斯科。

在莫斯科车站，有苏联外交官员来迎。当前往宾馆的途中，碰到据称有二十二万人挥舞着红旗和标语的示威游行行列。

次日～三日，听说列宁有病，不能见面。

列宁于这一年的三月九日第三度脑溢血症发作，因而病倒，在莫斯科郊外的哥尔克村静养。当蒋总统到达莫斯科的九月间，他的病体恢复到勉强可以扶仗行动的程度；但终于不能回到第一线活动，而于翌年～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死去。

俄国革命的分析

兣七日上午，拜访苏联共产党本部，和该党政治局秘书罗素达克会晤。听他说明俄国革命经过及建党情况，约两个多小时。

与罗素达克见面之后，在笔记中记录下了当时俄国革命原因和现状如左：

其革命成功的原因有以下三点——（一）工人接受革命之煽动。（二）农人亦然。（三）准各民族自治，组成联邦制。

其缺点也有三点——（一）工厂充公后，无人管理。（二）小工厂尽归国有，集中主义过甚。（三）利益分配困难。

在国家建设方面，有三个显著的现象——（一）儿童教育严密。（二）工人皆受军队教育。（三）小工厂租给私人。

‘一九一七年以前的俄国，正是在沙皇暴政统治之下。那时“农奴制”的盛行……以及举世闻名的“秘密警察”的高度压制，早就使“俄罗斯成了多种民族的监狱”，只要从这一句民怨沸腾的话里，就不难体会出人民对沙皇的一种“时日曷丧”的痛恨，又是到了怎样的一种程度。因此，单是这种沙皇暴政，就已经给予了俄共从事暴动，诡称革命，勃然兴起最有利的一就时代背景。’（注二）

注一：托洛斯基（一八七九～一九四○年）犹太人，和列宁同为俄国“十月革命”的主角。革命后，历任外交人民委员、军事人民委员要职；但因和史达林派因革命战略的歧见而发生权力斗争失败，于一九二九年被放逐国外。一九四○年，在亡命地墨西哥被史达林派遣之刺客所暗害。在共产党内遂有“托派”的称谓。

注二：蒋总统-“反共抗俄基本论”（一九五二十）

对苏维埃的认识

考察红军及军队中的共产党组织，也是此行的重要任务。

苏联的军队组织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每一团部由共产党派一政治委员常驻部队中。政治委员当然要参与军中主要任务，而且还具有非经其署名则命令不能生效的体制。加以党员之为军官或士兵者，皆组有党团，在部队中从事政治活动，并为其骨干。

实地观察苏俄军队

蒋总统一行，于九月十七日（一九二三年），参观苏军步兵第一四四团，得以实地观察到在其军队内部“党和军”的实际关系——团长专任军事指挥；行政事务及政治教育则全由党代表担任，权责划分得非常明显。这个制度，在贯彻以党领军方面产生很大的保证。这些观感，对于后来创设黄埔军官学校、国民革命军，不无可供参考之处。

十一月七日，为苏联革命六周年纪念日，曾到“红场”参观约二万红军的阅兵式。

对于苏联的兵器开发，也是关心的项目之一。

在军用化学学校参观了毒瓦斯使用法和防御法的开发研究。在射击学校见到最新式的骑兵用机关手枪，每次可发三十五响，且轻便异常。苏联对于武器研究之热心和进步情形，实在不逊于欧美各国。旅客飞机也曾试乘，感觉到“翱翔天际如履平地”。

九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在彼得格勒（现列宁格勒）。巡游其附近芬兰湾内之克隆斯达军港，对海军设施参观了一些重点所在。

‘……我（蒋总统）的印象是：他（苏联）在莫斯科的陆军学校和部队，组织严密，军容整齐；而在彼得格勒的海军学校和舰队，却是精神颓唐，士气消沉。两年前，克隆斯达军港曾以海军军士为中心，发生革命，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专制独裁和战时共产主义的残暴措施。这一革命，不久即归失败。当我们到彼得堡考察时，其地方当局和海军官员对此讳莫如深；但是我从当地军民的精神上，还是看的出其创痛的痕迹。’（注一）

与三民主义不能相容

‘政治方面，我们访问其政府的部会，考察其村苏维埃、市苏维埃，并参加莫斯科苏维埃大会。我参观他各级苏维埃讨论与决议等情形，并与其党政要员谈话之间，无形中察觉其各部分无论在社会中间或是俄共中间的斗争，正是公开的与非公开的进行着；而且，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像所能及的。’（注二）

列席莫斯科的苏维埃大会，是在十一月十九日晚间。在大会席上旁听一年来的政治报告，据云：工业已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百分之六十，工资比去年增加一倍；苏联政府对于失业工人的救济，已经有所努力。

苏联在革命之后的初期，为了内战和对来自外国的干涉军战争，一时采取极端集体主义的统治经济，即所谓“战时共产主义体制”。但不久便招致经济上的危机，乃自一九二一年开始转变实施以恢复自由市场、个人经济为轴心的“新经济政策”。蒋总统访问苏联时，正是新经济政策已见成效，开始逐渐恢复的时候。

盼苏俄了解中国革命

十一月二十五日，蒋总统在共产党第三国际的会议席上，致答谢词。这一次的会议出席者有主席季诺维也夫、远东局书记胡定斯基，以及各国共产党主席。季诺维也夫当时和史达林、卡门诺夫为“三头马车”，是填补列宁病后的空白，掌握政治权力之一人。

答谢词的要点如下：

‘……我们中国国民党专以三民主义作革命的旗帜，使大多数人民站在被压迫者一条线上，帝国主义操纵的军阀，是我们唯一的敌人。预料在两三年以内，必定有一部分革命成功。我这次来到此地，对于我们中国革命，得到许多教训。不过各位对于中国革命的现在情形及实地工作，还多隔膜的地方；所以，我很希望国际友人多到中国去观察中国革命的现实，研究东方革命问题。’

这个答词，口气很温和；不过也说出了我们对于苏联共产党对中国所持态度的一种危惧，这种危惧，就是苏联共产党诚然在表面上希望和中国国民党合作，但其本心究竟是不是果真在期待着中国完成国民革命，建设独立自主的三民主义国家？实深疑问。

这并非是顾虑太过。因为这一段时间以来，在和苏联党政负责者谈话中，不时听得出他们对于侵略外蒙古的关心。

注一、二：蒋总统-“苏俄在中国”（一九五六十二）

已见苏俄野心

苏联共产党的领导者们，对于蒋总统一行代表团的接待，虽然显得很慇懃，但一涉及攸关苏联利害的问题，便会突然改变态度；尤其显得异常关心的，是“外蒙古问题”。

早在帝俄时代，当一九一一年十二月正是中国辛亥革命的纷乱之际，便已经趁火打劫，卵翼外蒙古“独立”，并且更向演变为其属国的方向推进中。

觊觎外蒙一如帝俄

及至俄国革命之后，在表面上对于帝俄时代的外交方针和行动已经有所修正，苏联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外长）加拉罕曾于一九一九、二○年两度发表宣言“放弃帝俄时代有关中国的一切特权”。又有访问中国的苏联代表越飞和孙先生于一九二三年发表“共同宣言”，声明“绝无使外蒙古脱离中国的意向。”然而蒋总统访问苏联，和其党的领导者及政府负责人谈起来，却可以从他们的语气中听得到对于外蒙古的侵略野心。

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便曾表示：蒙古人希望脱离中国人的支配。于是，蒋总统便在和他会谈之后写了一封信劝告的信给他，内容是这样的：

‘那天，你说“蒙古人怕中国人”这句话，要知道蒙古人所怕的，是现在中国北京政府的军阀，决不是怕主张民族主义的国民党。蒙古人惟其有怕的心理，所以急急要求离开怕的环境。在国民党正想快把他能够从自治的途径上，达到相互间亲爱协作底目的。如果苏俄有诚意，即应该使蒙古人免除怕的状况。’

娩拒加入共产党

在访苏期中，苏联共产党人曾经纠缠不休地劝说加入国际共产党，但蒋总统则以必须俟向孙先生请示为理由予以娩拒。

实则劝诱加入共产党，就是分化国民党的一种手段，而且代表团内部已经被他们所渗透。

‘我们访俄代表团……四人之中，三人都是国民党员。只有张太雷一人是共产份子。访问团一到俄国，他就施展其分化工作，把沈定一诱到他一边，与我们对立起来。

‘于是，代表团各种计划、考察工作、对俄交涉以及一切意见和主张，都不能一致。’（注一）

对于共产党的作风，在这里直接得到了鼎尝一脔的经验。

对于托洛斯基的印象

蒋总统在苏联会见的人物，以人性来衡量，特别留有记忆的，是在当时任军事人民委员的“红军之父”托洛斯基。

‘我在莫斯科期间，与托洛斯基相谈最多，而且我认托洛斯基的言行亦最为爽直。我在离开莫斯科以前，最后与托氏告别的一次谈话时，他与我讨论亚洲各国革命问题，提到了日本、越南、印度与土耳其。……最后，再谈到援助我们中国国民革命的问题。托洛斯基托我回国要口头报告我们国父的一点，就是他们苏俄自一九二零年对波兰战争结束以后，列宁对于世界革命政策，有了新的指示，就是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反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应在道义与物资上予以尽量援助，但不复使用其正式军队直接参战，以避免其在各国革命期间，再对苏俄引起民族有关的问题。

‘所以他又郑重的说：苏俄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之外，其他武器及经济等需要，都当尽力所能，积极援助。’（注二）

当最后和托洛斯基见面时，他曾这样地说：

“革命党之要素，忍耐与活动二者，不可缺一。——以此为临别赠言。”

托洛斯基于翌年丧失其地位，被放逐国外，从而展开对于第三国际和苏联的批判运动，终于走向后来被暗杀致死的命运。

留俄学生令人失望

蒋总统对于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感到很失望。双十节这一天，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差不多都来代表团寄宿的宾馆聚会，并且有苏联共产党及外交部的官员列席。

在这个庆祝国庆的会议席上，蒋总统讲演中国革命党的历史，介绍领导人孙先生；于是，听过讲演的留学生中，便出现了“蒋介石犯了个人崇拜错误”的非难。

此外，更有留俄学生致函孙先生，有“中国革命党员忠臣多而同志少”之语，显然是对于蒋总统在讲演中流露出对孙先生忠诚的一种讽刺。

留俄学生们这样的态度，是出于自负心理过强，根本不懂得对于祖国领导人表达敬意。

旅俄期间，有机会学习俄语，并阅读马克思著作，有时弹弄俄国的巴拉莱卡琴（三角琴），以消遣自娱。

踏上归途，是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循来时相同的路线，于十二月十五日上午九时返抵上海。

苏俄之旅所得印象，一言以蔽之，就是——俄共政权一旦臻于强固，其帝俄沙皇时代的野心复活，则并非不可能。言念及此，不禁耽心到对于我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前途，会不会带给灾祸？

注一、二：蒋总统-“苏俄在中国”（一九五六十二）

全国代表大会

蒋总统访俄归来之后，就所见所感无讳无饰地写成报告书，上达孙先生，坦率地陈述了对于苏联共产党的不安心理。然后，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六日到达广州，晋谒孙先生，更在口头上作了详细补充说明。孙先生的回答是：“未免顾虑过甚”。

答覆廖仲恺的信

当时，有一些相信苏联是真正友好的中国国民党党员对于访俄报告书有所批评。廖仲恺也曾来信表示出同样的意见。

于是，蒋总统乃将在公式报告中所未能尽情披露的本意，毫无保留地写在答覆廖仲恺的手书中。这一封信，不啻是访俄报告的补充文件，故而抄送中国国民党常务委员会各委员。当中有一段内容是这样的：

‘对俄党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信仰，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信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祇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

‘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中之党员也；而我国党员之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唯有诋毁与怀疑而已。’

改组中国国民党

当蒋总统由苏俄访问归来的时候，正是中国国民党的改组活动急速进展之际。

孙先生为谋适应新的内外情势而决心改组中国国民党，是自上年～一九二二年陈炯明叛变时开始，以胡汉民、邓泽如、林森、廖仲恺等九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正式着手筹划改组工作；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发表“于主义组织训练之点，务使上下沟通”的改组宣言。基于这个要求，除规定党的组织要建立省党部、县市党部、区党部、区分部——纵的体制之外，并严格登记党员和统一宣传机构。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值得纪念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的广东高等师范开幕，海内外出席大会代表一百六十五人。

首先，由孙先生致开会词，略谓：

“此次国民党改组，第一是要组织一个有力量而且具体的政党；第二是要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政党中最紧要者，为各位党员有一种精神结合——必须牺牲自己，贡献能力。”

组织国民政府

这一次的大会，有各种重要提案。孙先生特别说明其中最重要的是组织国民政府案。当时，在北方公然收买议员、贿选结果由曹锟当选大总统（一九二三年十月）公布了被一般人訾议的所谓“贿选宪法”，对外仍以正统政府自居。

为此，孙先生特地在中国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上发出创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后来于一九二五年七月创立）的最初号召如左：

“为今之计，惟有组织正式政府，明示与北方脱离关系，使我辈之革命行动，被认为政治行为，而不被认为反抗行为。……现我们有广东、四川数省，土地之大，人民之多，……实有力量可以建国。本次大会之目的有二：一为改组本党；二为建设国家——立即将大元帅府变为国民政府。……”

大会进行了十天。

二十三日下午，通过永垂史册的大会宣言。这个宣言是国民党改组的思想结晶，也是党的精神所寄，其主要内容如次：

救国之道舍此莫由

国民党之主义维何？即孙先生所提倡之“三民主义”是已。本次主义以立政纲，吾人以为救国之道，舍此莫由。……

（一）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二）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免）诸权也。……

（三）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盖酿成经济组织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凡有独占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

国民党之“政纲”，吾人固悉力以求贯彻，顾以道途之远，工程之钜，诚未敢谓咄嗟有成，谨列举具体要求……

〔对外政策〕

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行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

凡自愿放弃一切特权之国家，及愿废止破坏中国主权之条约者，中国皆将认为最惠国。

（至项从略）

〔对内政策〕

关于中央及地方权限，采均权主义。……

各省人民得自定宪法，自选省长。……

（至项从略）

成立中央党部

基于大会的决定，成立中央党部，当时的组织是设置秘书处及组织（部长谭平山）、宣传（部长戴季陶）、工人（部长廖仲恺）等一处九部，孙先生以总理的地位主持一切。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现因大陆失陷而设在台北市。在孙先生逝世后将总理一席保留，以孙先生为永远总理。今年四月蒋总裁逝世后，同样地将总裁一席保留，以蒋先生为永远总裁。

创设黄埔军校

中国国民党，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的重要事项之一，是“联俄容共”政策。为此，在二十四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中有李大钊等、十七席的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有毛泽东、张国焘等中共党员容纳在内。这个容共政策，被中共宣传为所谓“第一次国共合作”，留下后来的祸根。关于这一点，在后面会另有一章，详加叙述。

建立国军之基础

此外，还推动有一个重要政策，就是创设“黄埔军官学校”。这个学校，建立了自完成北伐、统一全国的“国民革命军”开始，直到今天的“国军”之基础。

‘总理内度中国之情势，外审世界之潮流，认为“从根本着想，非整理党务，不足以及时奋起。”“救亡之策，必先事吾党之扩张。”于是，乃于十三年一月召开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其目的，即在使“本党重新担负起革命的责任”～～一方面固然是要打倒“军阀”，一方面则尤其是要驱逐军阀所赖以为祸之烈的“帝国主义”；并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全国人民谋一生路；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于建设。”

‘同时，即着手黄埔建军，培养革命的武力，并要使此革命的武力与国民相结合，赋予打倒军阀、又进而驱除帝国主义的使命。’（注一）

‘我有一个志愿——就是希望我毕生能够办一个军事学校，照我自己的理想来训练一般有志的青年，完成建军、建国的使命。而且当时相信我这一个志愿如果实现，中国军事教育一定可以成功。在这一种军事教育制度之下训练出来的官兵，不仅能够完成北伐，统一中国；并且还可以建立现代化的军队，建设现代化的国家。

‘其时，总理由于屡次革命失败的经验，认为会党和地方性的军队决不能形成建国的力量，坚决的主张要由本党自己来开办军官学校，训练军官，成立党军。……

‘所以，我在民国十二、三年之间，什么事都不愿做，而只要创办军官学校，教育全国青年军人，为我唯一的志愿。’（注二）

一月二十四日，孙先生任命蒋总统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王柏龄、邓演达等七人为委员。

继之，指定在黄埔旧有的广东陆军学校和广东海军学校为新军官学校校舍。黄埔，是在广州的东面，由珠江顺流而下约十公里多一点距离之处的江心洲，一旁靠近长洲要塞，不啻是广州咽喉的冲要之地，为训练军事干部的适当场所。

二月三日，蒋总统又奉到孙先生的任命为中国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会委员。这是在党内最初担任的职务。

招生受到军阀妨碍

军官学校第一次招收学生名额，拟定三百二十四名。其中假定东三省、热河、察哈尔共五十名，其他十四省合计一百六十八名，各军共七十五名，本党先烈家属二十名等区分。

当时，各省多为军阀所割据，不能公开招生，故而委托出席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省代表秘密介绍革命青年前来应试。结果报名投考者将近三千人。

应招投考第一期的学生，以广东省籍为最多，其次为邻近的湖南、福建、云南等省，合计达一千二百人。投考的学生中，有三分之一为中学及大专学校毕业。

籍贯偏于南方各省，是由于虽则秘密招生，但仍然受到军阀妨碍。军阀们唯恐培育出强大的革命军，故而都在瞪着眼睛监视本省青年，不使进入军官学校。举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来说：贵州督军周西成就曾不准本省所有青年出境。

军官学校筹设之初，首先必须实施的是对于要成为学生师长的军官们加以教育；故当开学之前的五月间，蒋总统曾经四度对军官们训话：

‘诸君既是我们的同志，为本党而来牺牲一切。……’

‘本党办这个学校，是要培植基本人材；各位来当干部，是要做成一个基本人材的模范。……’

五月三日，孙先生特任蒋总统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

五日，第一期录取新生三百五十人入校。这一天是孙先生于三年之前的一九二一年就任非常大总统的纪念日。入校学生被编为第一、二、三队；继之，更于七日将入学的备取生一百二十人编为第四队，此后，学生人数续有增加，到六月十六日举行开学典礼时，达到四百九十九人。

阐明做人的意义

八日初次对学生训话：

。我们要做革命的事业，就要先晓得革命的意义，就要先晓得做人的意义。我希望各位从今天起，就要将从前一切旧习惯、旧思想、旧行动一起扫除干净，重新做一个真正的人，来负我们继往开来的责任，来做我们顶天立地的事业。一个人果真明白做人的意义，对于自己生活的目的、生命的意义彻底了解，那不管是在枪林弹雨、人山血海之中，决无畏懦恐怖的心思。我们军人的职分，祇有一个死字；军人的目的，也祇有一个死字。偷生怕死，不单是不能做军人，而且没有人格，就不能算是人。’

建军的行动，就是从这里踏出了第一步。

注一：蒋总统-“革命历史的启示和革命责任的贯彻”（一九六九三）

注二：蒋总统-“过去军事教育的检讨和高级班成立之目的”（一九五一四）

军队生活的训练

当学生入伍的时候，陆军军官学校的人事也已安排就绪。廖仲恺为驻校中国国民党代表，确立了党的领导责任体制。此外，并决定教练部主任李济琛、教授部主任王柏龄、政治部主任戴传贤、总教官何应钦，以及管理、军需、军医各部门人员。

共党分子混了进来

在各部门人事之中，很快地便有共产党分子叶剑英（教授部副主任）、周恩来（政治部副主任）等人混了进来。

创办军官学校的目的，是要用最短期间训练出在将来肩负国军任务的速成干部。为达成这个目的。“军事面”的教育固为当前急务，但尤其重要的，是“精神面”的武装——也就是养成彻底的革命精神。为此，政治教育乃占有重要成分，故而由汪兆铭、胡汉民、邵元冲三人就任政治教官，除讲授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党史等课程之外，并注重使学生认识世界大势及国内社会现状。

军官学校，在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大致可以区分为“统御”、“经理”、“卫生”三方面——

第一：所谓“统御”，是诸如贯彻命令、编组队伍等有关军队基本组织的问题。在此之前，中国国内各地的多数军队，实则都是地方军阀的“私兵”，缺乏全军同心共体的崇高理念；上下之间的命令和指挥系统也不够完备，距离近代军队组织的程度还远得很。是故黄埔建军，就是务必要从彻底改革像那样落后的体质为起点。蒋总统连日集合入伍生，给予适当而必要的训示，这就是学生们最初的日课。

五月十一日，首先宣示教育方针，继廖仲恺（党代表）讲话：军队最需要的是——“统一个精神、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的组织”之后，蒋总统的训话是这样的：

‘你们来这个学校，有一定的目的。……我们学校里，自本月九日起，至三十一日止，这二十三天工夫，完全要用军队的生活来训练你们学生，使得各位晓得军队生活原来是如此的。

‘你们如果觉得很苦，那是以后的功课比现在还要苦几倍；因为现在的功课，还是以你们初入学校的一般体格来定的，不敢十分加多，恐怕你们的身体耐不下去。……

‘然而，你们要晓得，过去这三个月的初学期之后，比现在还要快活几倍。你们到那个时候，才真正领受军队生活的兴趣及意义了。’

加强独立生存的力量

在这次训话中，蒋总统所强调的是——军队生活的出发点，在不依赖他人，而加强独立生存的力量。就这一点看来，军队生活和人生过程中真实生活的正确意义在基本上是并无二致的。

‘军队的生活，什么东西都要独立的，凡是他人不屑做的事，我们军队里都要自己来做，完全要脱了依赖的恶根性。比如你们现在在寝室扫地，总算是学生自己做的一件工作；但是我们在校里的生活，不单是扫地一样，凡是烧饭、煎茶、挑水、洗衣、揩地板、出粪缸这种事，将来都要自己来做。’

绝对服从命令

同时，蒋总统又对于在军中应该绝对服从命令一点，作了如下的训示：

‘若是没有纪律，精神就散漫不能一贯，意志也不能一致，组织更无从统一了。所以在学校里面，只有服从命令，……就是遵守纪律。’

据在黄埔军官学校创立之初担任战术教官继之兼任管理部主任，而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的顾祝同谈话：当时蒋总统连日训话，热情洋溢，话长的时候达两个小时以上。直到今天，在脑海里还留有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就是在天色还朦胧未明的早晨，他一个人便站立在校庭中，凝神沉思，好像是在构想训话的内容。

第二：是“经理”。问题在经费和装备都很缺乏。

成立之初的军官学校，在任何一方面都是荆棘载途，步履维艰。

在外面，有陈炯明、洪兆麟、邓本殷等叛军环伺着军校的一举一动。

在革命军内部，又有杨希闵（滇军）、刘震寰（桂军）等军阀滥施权力，强横支配广东财政，为所欲为。这些内外敌人都因为极端恐惧军官学校训练成功，而一致对此关心；他们或在公开或在暗地扼制着军官学校的经费来源。

在许多困难之中，最困难的是枪械的供应。

当时，广州有石井兵工厂制造枪械，该厂实权被滇、桂军阀控制，所生产的兵器，都落到了他们的掌握之中。军官学校在新生于五月初入学之际，所得到的枪械，还是只有不足半数的二百三十支，子弹也没有，简直是徒手状态。

马超俊暗供枪械

孙先生对于这样的艰困状况实在看不过去，乃嘱石井兵工厂长马超俊（现任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秘密供应枪械。所幸马超俊也是国民党党员，他偷偷地运出五百支步枪移交给军官学校。不过，待全数交齐，差不多是经过了三个月的时间。

黄埔精神

枪械供应，困难到这样的程度，可见在军官学校来说实在是最贵重的物品。蒋总统当时曾对学生们演讲枪的意义与效用如下：

拿了枪就要实行主义

‘你们要晓得军人与普通人民的分别，在什么地方？……一个人带了枪，就叫做兵，也就是叫做军人。……

‘你们要晓得这支枪是什么地方来的？……是由兵工厂制造出来的。兵工厂的经费，是向百姓收捐、收租得来的。……所以枪就是百姓的汗血制造出来的。……我们军人拿枪的目的，是保护百姓与国家的，不是杀害百姓、败坏国家的。

‘你们拿了枪，就要来实行三民主义，来维护正道，保障正义。……拿了枪来实行我们的三民主义，这支枪才算有效用，这就是我们军人拿枪的目的与意义。’（五月二十五日训话）

因供应不足而深感困难的，当然不止枪械一项。据当时在上海为军官学校采办用品的陈果夫所著“建军史的一页”记述：在上海购买了五百套呢制服、呢大衣、皮鞋、帽子、皮件、衬衣等，打算运往广东。但在报关检查时，被认定是军用品，全部扣留；经到处走门路和海关接洽，结果在十多天之后，才将军服等领回，但皮带、枪带、刀鞘等三件终于还是被没收。

养成吃苦耐劳工夫

军校的日常经费，更是窘迫万状，甚至有在头一天晚上还没有张罗好第二天伙食的现象。所谓伙食，也只不过是粗劣的馒头和稀饭而已。

不过，忍受“粗食”和“少食”，倒也是为军人所不可缺少的训练之一。

‘本校的定章，学生每人每月的伙食费预定是六元（按米价换算约为现在的十七美元），后来因为菜蔬不好，由六元加至……八元。外面兵士伙食只有四元，比较起来，已经是增加一倍了。

‘本校长自己做学生在军队的时候，一餐只吃一碗饭，三块萝菔，或是一块咸鱼；打仗的时候，是更苦了，有时带了一块面包、一壶水，要打几天的仗。比较起来，现在学校生活，是如何样子？……

‘现在已经预备麦粉了，这麦食不但可以助消化，而且能够疗脚气病。……’（五月二十一日训话）

第三：是“卫生”问题。生病的学生之多，非常惊人，大多数是“痢疾”和“脚气”；这并不是入学之后就会生病，而是由于过去在生活上不注重卫生的观念。

改善之道，首先是禁止外食和强调卫生观念。

‘如果不讲究卫生，就不能成为军队了。现在校中军医、军需、管理三部，对于这事非常注意，各官长也不分日夜研究学生避疫的方法。……根本上办法，还是你们自己来注意、来研究。现在生病的，差不多都是学生，为什么官长不生病呢？……因为官长都注意卫生。……这是积极的治疗方法，好比是用很严密的布置来防御敌人，或扑灭敌人一样。’（五月二十四日的训话）

这一次的训话，对于洗涤碗筷，吃东西要过细咀嚼，乃至于下痢病人要用隔离厕所，都一一举例做了很详细的指示。

学生们在如此贫困艰苦的环境中，都很能忍受；而吃苦耐劳的工夫，实则就是一切一切的“出发点”。

当时黄埔军官学校的第一期学生、后来曾任国防部长的黄杰（现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曾对笔者（古屋奎二）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受到蒋校长“不能忍受困难就不能战胜敌人”的严格锻炼。学生们很纯朴，穿的都是草鞋；后来北伐和长城抗日，也都是穿草鞋上战场；我们一直凭“草鞋精神”打仗。

学校里没有自来水，都是使用井水，洗澡也就是用井水冲凉。饭碗每人一只，吃饭时只许添一次饭——目的就是在训练我们要能安于这样的生活。

正式举行开学典礼，是在六月十六日，孙先生偕夫人莅临主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胡汉民、汪兆铭、林森、张继以及外交总长伍朝枢、大本营军政部长程潜，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湘军总司令谭延闿等人都来观礼。这一天，正好是两年前（一九一二年）“永丰舰事件”（孙先生在广州蒙难）开端，也就是陈炯明叛变的纪念日。

国父训词成为国歌

孙先生在典礼中的训话，强调不怕死的牺牲精神～～一人当百，百人当万；并发表“亲爱精诚”校训和训词如下：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这个训词，后来在一九二七年定都南京之后，明定为中华民国国歌，现在仍始终被歌唱着。

在这里所诞育的“黄埔精神”，也就是中华民国国民精神的基础。

第六章：共产党的始动

主题

苏俄的糖衣毒药苏俄的对华活动所谓中共成立会共党阴谋“寄生”出发点的差别越飞的活动鲍罗廷施展阴谋共党混入国民党共产党的演技共党攫取实权共党扩展工作监委提出弹劾案阐扬三民主义

苏俄的糖衣毒药

现在，中国大陆沦陷在共产主义者的手里，我们光复大陆的使命还有待完成。

在这一章里，要把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源头所在，和中共背后的苏联活动，以及在中国国内玩弄种种阴谋的一些史实，公诸于世。

‘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的产物，乃是苏俄共产帝国的螟蛉。苏俄的共产主义，不适于人类的生存，更不适于中国的气候，所以他发育的初期，必寄生于中国国民党内，施展其渗透、分化、颠覆的阴谋，透过本党（国民党）的机关来组织其工农群众，并假借本党的名义来隐蔽其阶级斗争，而其目的是在中国国民革命的独立战争过程中，建立其苏维埃傀儡政权，制造其在亚洲等一个典型的附庸。’

上面这些话，是蒋总统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亲笔著述的“苏俄在中国”数中之一节。

一九一七年，由于“十月革命”而在俄国产生了苏维埃政权之后，列宁便立即打算到不择任何手段去实现他的“世界革命”。

“赤化世界”的目标，最初是指向欧洲；但一经碰壁，便马上转向于喘息在欧洲殖民地主义统治之下的亚洲，而最主要的对象，则是中国。

中国为了要挣脱自十九世纪末叶以来所不断受到列强不平等条约的压迫和次殖民地的处境，由中国国民党领导革命，正奔驰在朝向统一全国的艰苦途程中。像这样政局尚未稳定的中国，恰好是适合苏俄撒布其共产主义种籽的土壤。

苏俄成立“第三国际”

一九一八年七月，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外长）齐采林宣布——“放弃沙皇时代所掠夺中国的特权”，这是包藏着“赤化中国”阴谋的“微笑外交”之开始。

一九一九年三月，苏联在莫斯科召集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举行会议，成立了以苏联共产党为首领的共产革命输出机关——“第三国际”。其后，苏联的赤化世界工作，就是在操纵着各国共产党，策进更具组织性和更富积极性的活动。

正当这个时候，刚好在中国由于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处理得令人不平，青年们大为激动，因而发生了五四运动。

于是，便给予了苏联以因势利导的机会。

两次“加拉罕宣言”

七月二十五日，苏联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发表了向中国人民以及在广州与在北京的政府喊话的“对华宣言”。（即所谓“第一次加拉罕宣言”）

宣言的要点如左：

“一、劳农政府废除过去俄国政府和日本、中国及从前联盟各国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

“二、劳农政府将中东铁路及其一切附属权益无条件归还中国，毫不索偿。

“三、劳农政府放弃中国应付给的庚子赔款。

“四、劳农政府废除俄国人在中国国土上的租借地、领事裁判权等一切特权及特殊区域。”

在这个宣言中，更提到——“如中国人民以俄国人民为榜样，愿恢复其自由，并逃免……为‘第二高丽’、‘第二印度’者……舍俄国工人、农民及其赤军外，更无他同盟及他兄弟可寻。劳农政府……邀请中国人民即与吾侪建立正式交涉，并即派代表来。……”

苏联的新政权，在这个阶段还没有得到各国的承认；为了希望获得比邻的中国承认，故而传送来微笑的外交攻势。

这个宣言，传达到北京政府，是在翌年～一九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并且还不是俄文“正本”，而是译成法文由西伯利亚暨远东外务人民委员会全权委员杨松签字的抄本。

由于有以上情节，北京政府颇为怀疑苏联的诚意；加上受到敌视苏联政权的协约国之压力，是故未肯承认苏联政权为合法，而暂时对其呼吁未作反应。

唯在当时中国民间的舆论，则是对于挣脱帝制统治的苏联人民寄予同情的；而且其后英、美、法等国也已经和苏联有所接触。于是，北京政府乃于这一年的六月，派遣陆军中将张斯麟前往苏联考察实际情况。

一九二○年七月，苏联召开第三国际的第二次会议，决定加强赤化世界政策。及至九月二十七日，乃又发表了“第二次加拉罕宣言”。

在第二次宣言中，苏联重申——废除中俄之间的不平等条约，以及无条件而且永久归还侵略中国的领土和掠夺的一切。

不过，对于最重要的一点——中东铁路，却很快地将“第一次加拉罕宣言”所表示“毫不索偿”的话收了回去，而改为“关于劳农政府利用中东铁路一事，中苏两国允许另订专约。”

领土一分也未归还

加拉罕的连续两次宣言，实则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已经有后来的历史作见证。如果从结论来说：领土问题，该是宣言最重点的所在；但实则苏联对于以往帝俄时代凭藉武力恫吓陆续强迫签订的“瑷珲条约”（一八五八年）、“北京条约”（一八六○年）等不平等条约，而据以夺取的中国领土，直到后来连一平方公分都未曾归还，至于中东铁路，则于一九三五年出卖给所谓“满洲国”，而为日本军阀提供了侵略中国的工具。

苏俄的对华活动

两度嵌饰着“友好”辞句的加拉罕宣言，从文章的表面看来，该可以给予很高的评价。苏联所标榜的“解放被压迫阶级”、“解放被压迫民族——从殖民地驱逐帝国主义”，和中国国民革命理想原属一致；假定这个本来是帝国主义大国的俄罗斯，能够真正再生为如此新面貌的国家，则对于和他国土接壤的中国来说，也的确会带来光明的。

故而当俄国革命成功时，孙先生曾向列宁发出贺电，赠言激励，也就是基于以上的理由。谁知共产主义者们的打算，和中国的期待竟然是背道而驰。

优林来华的秘密活动

一九二○年八月，由苏联最初派来的使节优林，经外蒙古到达北京。优林访华的目的，是要建立中苏两国邦交，并缔结重行确定两国关系的新条约。然而不言可喻，这只是表面上的说辞，实在就在当时，苏联还在煽动外蒙古的“独立运动”，而且在苏联红军指挥之下的“蒙古人民革命军”都已经侵入了外蒙古。中国方面鉴于这样的情况，当然没有接受和苏联缔结新条约的道理。

尽管如此，可是优林仍然托辞为了外交交涉而自一九二○年八月至一九二一年十月，四次来到北京，他带来大量工作费、宣传品，致力于共产主义的宣传活动，因而发生了他的秘书曾于八月间在北京车站由于携带有共产主义宣传文件致被警察检查扣留的事件。

优林在华一面从事宣传，一面秘密援引一些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抱有幻想的中国青年前往苏联，俾使在苏联锻炼成为共产党员。这些青年在进入俄境之后，乘坐火车，就可以无须花钱买票。像这样受优林的诱惑而被送往苏联的青年，为数相当多；中国社会党的创始人江亢虎也就是其中之一。

和如上所述的一些活动之同时，在中国国内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阴谋也在进行之中。担负这个任务的人，是后来在中国共产党诞生时为其产婆的第三国际远东局书记胡定斯基。

李大钊与陈独秀

胡定斯基同秘书及译员于一九二○年三月到达北京。由于北京大学俄国文学教授鲍立维的介绍，结识了李大钊。

李大钊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并曾与同盟会有某些关系，因抗议二十一条而自日本归国。其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并参与“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编务，同时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毛泽东就是被他所雇用，在图书馆担任书记。

当胡定斯基向李大钊提起组织共产党时，李大钊乃介绍他到上海和陈独秀接洽。

陈独秀也曾留学日本，是“青年杂志”（后改称“新青年”）的创刊人。一九一八年，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和胡适同为“文学革命”的旗手，在全国青年中颇负“人望”。五四运动之后，因散发“告北京市民”的传单而被北京政府逮捕，嗣经保释，前往上海，住在法租界。他甚至否定国家，倡言“无之不足忧，有之不为喜。”

胡定斯基和陈独秀一见如故，他们和上海的青年、学生组织接触，在同年八月组成“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继之，北京、广州、长沙、武昌等地也有类似的团体出现，乃进一步发展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这个组织，本来只不过是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所汇聚的一个团体，但胡定斯基则运用其为母体召集“组党会议”，阴谋部署，逐渐进展到组织“共产党”。

经过几度会议之后，决定以翌年～一九二一年夏天为目标，创设“中国共产党”，并先设立了“中共临时中央”。当时联名发起者有陈独秀等七人，可是像戴季陶实际上拒绝参加的人也被列名于七人之中。

陈独秀担任临时中央书记，“新青年”变成了中共的宣传机关，以上海为根据地策进活动；另外一个据点，就是李大钊所在之地的北京，故而一般称呼他们两人为“南陈北李”。

共产祸根逐渐蔓延

临时“中央”，遵照胡定斯基的指导，在各地不断秘密展开社会宣传、干部训练和组织工作。

上海方面，设立了一个外国语文学校，是以训练俄国语文为目的，由替胡定斯基担任翻译的杨明斋为校长，担任养成共产党干部的任务。到翌年～一九二一年春间，学生达六十人，后来担任伪政权主席而在“文革”中被斗垮的刘少奇，也就是当时在该校学习俄文的学生之一。

其次是出版“劳动界”周刊，并设立“中国劳工协会秘书处”，由张国焘负责，进行建立劳工组织——结果陆续成立了“机器工人工会”、“印刷工人工会”以及“劳动者联盟”等团体。

北京方面，由李大钊负责，同路人逐渐增加。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在北京近郊长辛店成立了以铁路工人为对象的教育宣传活动据点--“劳动者补习学校”。

看到上海和北京两个据点的组织工作渐有进展，胡定斯基乃派遣他的秘书前往武汉；还有陈独秀则则应陈炯明之邀，专赴广州。

在俄共的播种、施肥之下，共产主义的祸根逐渐地向全中国蔓延开来。

所谓中共成立会

到了一九二一年春天，第三国际希望尽早为中国共产党催生，又派遣荷兰人马林（本名史奈佛烈）来华，加强活动。马林是远东问题专家，有第三国际“民族与殖民地委员会”书记的身分，以前曾经在荷属东印度（印尼）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了一个为印尼共产党前身的“共产主义者联盟”，因而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被当地驱逐出境。第三国际对于他在印尼所运用的策略评价颇高，乃使他担任亚洲方面的任务派来中国。

十三个人的“代表大会”

经过如前所述的筹备阶段，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李汉俊寓举行，出席者有来自所谓七个地区的代表十三人。不过在当时的全部党员也只不过有三十多人，另一说为六十人左右；是则虽然号称代表大会，但实际毫无群众基础，而只是极少数人的一个秘密集会。

代表之中，有李达（上海代表）、张国焘（北京）、陈公博（广东）、董必武（武汉）、陈潭秋（武汉）、毛泽东（湖南）、何叔衡（湖南）、周佛海（留学日本代表）等人；但中心人物陈独秀、李大钊二人缺席，更不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会。

这些出席的代表中，除了后来怙权独裁的毛泽东和居然得尽天年的董必武之外，多数是落得个死于非命的可悲下场。

何叔衡于一九三五年在福建被国军包围，跳落悬崖自尽；陈潭秋在新疆被杀；陈公博于抗战中为汉奸，战后判处死刑；周佛海亦为汉奸，系狱身故；李达在中共政权之下任伪武汉大学校长，但在“文革”中受到红卫兵激烈斗争之后死亡。

毛泽东等人到了上海，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借住法租界的博文女学校；这是因为自五四运动之后“北京大学”的名气马上响亮起来，容易得到人的好感，故而加以利用。

道道地地苏俄产品

这个大会，是道道地地的苏俄产品——有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及胡定斯基（一说并非胡定斯基而为“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尼科罗夫斯基）参加，任意指挥一切。

大会主席，由张国焘担任，据陈公博的回忆录记述——“张国焘被推为大会主席，不免趾高气扬，然而没有主见，一切都唯马林和胡定斯基的马首是瞻。”

譬如说：在会议中提出禁止共产党员参加政治的问题，一度议决甚至连学校校长都不许担任；可是到了第二天，张国焘却又提出取消这个决议，说是俄国代表的意见。

毛泽东的诡诈

在代表之间，也发生了纠纷——毛泽东对于同为湖南省代表的何叔衡以他不懂马克思主义的理由，把他赶了回去。又据张国焘回忆——“毛泽东也脱不了湖南的土气，是一位活跃的白面书生，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来自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常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来。”

会场问题，也成了内讧的因素之一～～当初因为避免被人注意，预定每天变更开会地点；可是自一开始的连续四天都在贝勒路的李汉俊家里开会。陈公博询问张国焘：“为什么不照原先的决定更换会场？”而张国焘的答覆却是：“李汉俊是有问题的，他的主张，不是列宁的理论，而是考茨基的理论（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他是黄色的，不是红色的。我们在他家里开会，他似乎有些恐慌，我们偏要在那里开会。”

这种情形，简直是对于“自己人”不讲道理，强使为难，无怪连陈公博都为之慨叹——“我以为同志间应该相见以诚，……这样……顷轧，以后恶果可想而知。”

法租界的巡捕房，对于他们的活动，已经有所注意，假定不是有马林参加会议，则他们将会被一网打尽。

马林由于多年从事秘密活动的机智经验，在第四晚的会议中表示：

“明天晚上必须换个地方，我们一连几天都在这里开会，一定会引起警察的注意。”

可是，多数与会的人都表示剩下来的讨论问题已经不多，而且另找会场又得增加麻烦，以为不会有什么了不起，故而第二天还是在李汉俊家中集会。

就是这一天的晚间，突然有一个陌生人闯进会场，表示“对不起，我走错了地方”而离去。

毕竟是马林察觉到事态严重，立即指示：“一定是包打听，我们马上解散。”于是，只剩下屋主李汉俊和陈公博，其余的人都纷纷离开。

不久，便有包括三个法国警官在内的搜查队来到李宅。

留下来的李汉俊在答覆巡捕的盘问时，谎称马林是北京大学教授，英国人，利用暑假到上海旅游；陈公博也自称是来旅行的广东法律学者——总算是当场把问题掩饰过去。

共党阴谋“寄生”

毛泽东自李汉俊家中溜出去之后，由于已经料到警察要来搜查会场，故而认定自己所寄宿的博文女学校也一定会被查到，他在惊恐之下，远远地察看博文女校的情况很久，才走了进去，已经是午夜时分。而在当天因为腹泻没有出席大会的周佛海，则丝毫不知情由，正在学校里睡觉。

第二天，被吓破了胆的这一群人，乃开始要找一个新的开会场所。

结果，商量好到李达之妻的家乡、在上海西南方约八十公里之处的浙江省嘉兴县去开会。因为嘉兴有一个南湖，雇了船到湖上聚会，是绝对安全的。

次日清晨，按照计划由李达之妻向导前往，当地人士以为这一群是来乘船游览的，当然不加注意。当游船荡漾在湖心的时候，曾经碰到急雨敲篷。

开始便是俄共的养子

在这次会中所决定的党纲，罗列着“无产阶级专政”，否定私有资产等语汇——只是抄袭了苏联共产党在“十月革命”之际的一套陈腔滥调。

人事方面，推选陈独秀为“书记”（一说为“委员长”）。不过此时陈独秀还在向后叛离孙先生的陈炯明处进行他的工作，故决定暂由周佛海代理。

会中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其目标的决议案”，包括有“劳工组织”、“宣传”等六个项目。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第五项“对现存政党的态度”和第六项“本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在对现存政党的态度方面，明白表示——“应采独立、攻击和排斥的态度。”以及“坚守无产阶级立场，并不准和其他党派、团体建立任何关系。”

至于和第三国际的关系则为：

“本党中央机关每月应向第三国际作一报告；必要时，应派驻正式代表于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局所在地之伊尔库茨克。此外，并应派遣代表至远东各国，促进阶级斗争的联合计划。”——规定了应该“朝拜开山鼻祖”和向亚洲各国“输出革命”的立场，不打自招地表明自一开始就使自己成为俄共的养子，并致力于在后来作为苏联的一个附庸。

然则好不容易才宣告开步走的中国共产党，毕竟还不过是只有几十个党员的小集团。它的决议案虽然倡言“独立”，但实际状态却是仍难独自举步；因此，第三国际为它设想的一条路线——就是钻到既存势力里面去寄生、发育。

马林亟亟于国父接触

照马林所策定的目标，其寄生的母体，就是在中国国内继续进行着长期革命奋斗的中国国民党。

一九二一年年底，马林为谋和孙先生接触而到达广州。不过此时孙先生正为准备北伐已去到桂林的大本营，故而马林便经由陈独秀的介绍和陈炯明见了面；但意见不能投合，仍然极其希望和孙先生晤谈，乃由张太雷（后曾随蒋总统访俄）向导，于十二月二十三日抵达桂林。

马林在桂林停留了三天，曾和孙先生两度长谈；同席者有胡汉民、许崇智等国民党干部。

马林在以中国国民党和苏联联合为前提的见解之下，向孙先生建议：（一）改组国民党，联合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农工大众。（二）创办军官学校，为建立革命武装之基础。（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三点。同时，并特别举出苏联已经移转到实行“新经济政策”为例，力言苏联政策的“柔软性”，目的在缓弛孙先生对共产主义的警戒心理。

孙先生对于苏联改行新经济政策的这一个说法大感兴趣。后来曾发电报给廖仲恺等人说：“俄国经济状况，尚未具实行共产的条件，故初闻苏俄实行共产主义，甚为诧异；今与马林谈，始知俄国实施共产主义，遭遇极大困难，故而采用新经济政策，这与我们的实业计划相差无几，至为欣慰！”

断乎不能行之中国

然而，孙先生对于马林的提议，并未表示具体的反应；只是在第二次晤谈之后作了如下的答覆：

“苏俄革命甫四载，其事迹世罕能言者，……吾侪革命党人也，讵不同情革命。

“顾革命之主义，各国不同——甲能行者，乙或扞格而不通；故共产之在苏俄行之，而在中国则断乎不能。

“吾师次桂林，志在北伐。……直取长江，实侵英国势力范围。英知我联俄，必先图遏我

吾北伐之师，从此殆矣！为安全计，今仅能与苏俄作道义上之联络，一俟义师北指，直捣黄龙，再谋合作，未为晚也。”

虽然双方都以革命为号召，但是共产主义对于中国的“适合性”，孙先生是自始便予以否定的。

出发点的差别

孙先生与马林的世界观，有着绝对的差异性：

‘我记得民国十年，总理在桂林，共产党第三国际有个代表马林曾经问过他：“先生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总理答覆他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

‘那位马林不明白中国政治思想的历史，自然不明白总理答语的意义；他再问总理，总理仍然是这样答覆他。’（注）

为爱人类而革命

继之，马林又发问：“你为了什么从事革命？”

孙先生的答覆是：“为爱人类而革命。”

这个答覆，使马林感到困惑，他在和孙先生谈话之后对张继说：

“为爱人类而革命，其革命将永远不会成功；我们是为阶级仇恨而革命。”

由此可见“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指标，在出发点上就已经是天差地别了。

马林是在他所提国民党与苏联联合的建议未被孙先生采纳的情况之下，离开的桂林；不过，他对于使中国共产党寄生于中国国民党内的战略，却仍然没有死心。

当时，第三国际也曾有以吴佩孚、陈炯明为合作对象的意图。

可是，对于中国实情了解得很清楚的马林，则认为孙先生的领导力远非吴、陈二人所能望其项背，对之评价极高。他认为如果能和孙先生携手，则对于在中国培植共产势力甚为有利，故而一意循着和孙先生“联合”的路线推进。

一九二二年一月，第三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劳动者大会”（远东民族会议），列宁曾与中共代表张过焘谈到中共和中国国民党的“合作”问题。

这一次的莫斯科会议，日本方面有德田球一、片山潜、高濑清等人参加。会后，便在第三国际的指导之下，于是年七月十五日秘密组成“日本共产党”。

中共图寄生于国民党

接受了第三国际此一决定的中共，在是年六月发表了“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表示——“中国现有的政党，只有国民党可称为一个革命政党。他有民主革命的精神；他的政纲虽尚不够完备，但他的三民主义与实业计划，却反映出了国民党的民主精神。”同时，并提议和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斗争。”

接着，中共复于七月间在上海举行“二全大会”（出席代表十二人），决定了要和国民党组成“联合战线”的方针：

“我们无产阶级和贫苦的农民，都应该援助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指国民党的革命运动），……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指国民党）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

中共就是依据他这样牵强的理论，对于一年前所决定的“独立”目标，自食其言，而图谋钻到国民党内去寄生。

但是，世界观迥不相侔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基本上是没有组成“联合战线”之可能的。

先是在中共举行“二全大会”之前，第三国际便已经派遣使者向孙先生提出“联合战线”的建议，但孙先生斩钉截铁地予以拒绝。

当时，孙先生并且表示——只许中共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

马林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他考虑到要中共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的方式。这是他过去在印尼工作时使回教团体变质为共产主义者团体获得成功的一个方法——质言之，就是渗透到对方的内部加以破坏的一种阴谋。

第三国际同意了马林的方式——对中国国民党进行渗透。

马林于一九二二年八月在杭州召集了“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提出此案；但陈独秀等人却表示反对，理由是——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会冲淡了共产党的阶级性和损害了共产党的独立性。

可是，马林则以——（一）利用国民党的名义活动，才能吸收到群众；（二）拉拢国民党左派，可以造成国民党的分裂为辞，加以劝说。最后，更拿出“服从不服从国际权威”的大帽子，迫使中共通过了采取他的方式。

在另一方面，和苏联、中共的谋略并未发生关联的孙先生，也正在考虑着“联俄”的问题。这是由于苏联已有“联合”的提议，加上判断其因实行“新经济政策”而对他的共产主义想必已经有所修正，以及加拉罕的两度宣言冲淡了帝俄时代侵略国家的影像。

孙先生通过他自十九世纪末叶以来长期革命历程的体验，深知要实现革命目标，则国际性的同情和援助必不可缺；尤其是当一九二二年六月陈炯明的叛变（永丰舰事件），逼迫他离开了革命根据地——广州之后，更使他对于外交运用产生了新的考虑。

注：蒋总统-“三民主义的体系及其实行程序”（一九三九五）

越飞的活动

一九二二年夏，孙先生幸得免于陈炯明叛乱的危难，到达上海；马林、陈独秀等人来见，提出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的请求。

孙先生立即予以答应。他的考虑是——如果能让那些人服从国民党、受到三民主义的洗礼，同为国家奋斗，是值得的事情。

九月六日，孙先生指定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为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九人中之一人，实际上对共产主义者开放了门户。

与马林的活动若相呼应的，是待在北京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所属外交官越飞，也来与孙先生接触。

越飞这个人，是在苏联和德国于一九一八年在布芮斯特尼托斯克缔结和约时的首席代表，其后便出任驻德大使，煽动德国革命（德皇威廉二世于一九一八年退位）的人。他是为了谋求和北京政府树立中苏外交关系而于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二日到达北京的，

越飞首先派遣代表来上海拜访孙先生；接着，便由张继带了孙先生的书信到北京和越飞见面。

据张继后来回忆越飞的情形是这样的：

“当时，我带了总理的信去见他，他正害神经痛的病，躺在床上。……

“我猜想总理的信里一定是说……‘你来中国应该来见我，为什么要先去找军阀？’越飞要我带话给总理，解释说：‘苏联革命刚成功后，形势很危险，不能不拉拢；革命是要经过曲折的道路的，不是可以从心所欲地走直线的。’”

翌年～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六日，越飞以养病为由，自北京乘夜快车南下，十七日晚间，抵达上海，和孙先生见面。

越飞向国父保证

双方经过长时间的会谈，于一月二十六日发表“孙、越宣言”。这个宣言，有四项内容；第一项表明中国国民党和苏联建立“联合”基础的见解如次：

“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

“孙博士且以为中国最重要、最急迫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向孙博士保证——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

继之，由第二项至第四项说明苏联在先前表示“放弃对华一切特权”的声明，仍然有效。

在决定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方面，这个宣言，具有历史意义，其中很明确地列有下列两点：

第一～～孙先生认定共产主义不能在中国实行，越飞同意。

第二～～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是为达成民国统一与国家独立；而中国国民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合作，也就是为了这个大事业的成功。

这个宣言，到了后来被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徒们的颠覆行动所踹毁。不过，在当时则是中苏“和平共存”乃至所谓国共“合作”的根据。

廖仲恺受越飞影响

越飞于共同声明发表之翌日，立即去日本养病，孙先生派廖仲恺同行，与之进一步深入商谈中国国民党和苏联的合作问题。越飞在日本热海住了约一个月，在这段期间对廖仲恺详细说明了苏联现状、对亚洲民族态度、为何打算和中国携手等事项；并曾谈到设立军官学校问题。廖仲恺受到越飞的影响，对苏联发生好感，而完全寄予信赖；回国之后，便成为“联5[261]1281俄容共”的积极推进者。

据陈公博的记述，廖仲恺到日本后，曾邀他到热海和越飞一起洽谈国共问题，当时的情况如下：

“越飞告诉我：‘苏联命令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为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而且越飞更郑重的说：‘中国只有实行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绝不能行共产主义。’

“我问越飞：‘苏俄希望共产主义何时在俄实行？’越飞只是摇头不答。我又问越飞：‘六十年共产主义在俄会实行吗？’越飞倒很老实说：‘还是一个疑问。’

“廖先生很滑稽的笑着说：‘公博，你还有什么话说？我们要做革命党，也要做现在的革命党，不要做一百年以后的革命党。我们实行三民主义，不必再讨论了。’”

又越飞之来到日本，是受后藤新平的邀请，非正式地交换有关日苏复交的意见。

鲍罗廷施展阴谋

“孙、越宣言”，消除了国民党员对于共产主义的疑念，从苏联拉拢中国国民党和自己接5[262]1282近的谋略而论，可以说是很大的成功；不过，正当苏联耍出各种手段向中国移植共产主义最盛时期，却由越飞提出保证——“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不能引用于中国。”这一点，在莫斯科看来，毕竟是有点不大对劲。

俄报删去最重要一节

中国各报在“共同宣言”发表的第二天～一月二十七日，都刊载出它的全文；但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机关报-真理报、消息报，却延迟到五天之后的二月一日，才颇为不痛快地以罗斯塔通讯社（塔斯社前身）电讯的形式加以报导，而且将最重要的“共产组织及苏维埃制度不能引用于中国”一节删除，可见是别有企图而特意这样发表的。

可能是由于有上述一些过节，以致签署宣言的越飞本人原先曾经表明：“自日本归国时，当再来中国南方一行，然后北上。”然而后来却中途改变了计划，没有再从中国经过。

不管怎样，总之由于“孙、越宣言”的发表，继而更有廖仲恺和越飞的长时间接触，于是在国民党方面，大致已对苏联的“诚意”有所评价。

另一方面，第三国际在差不多和“孙、越宣言”的同时，正式对中国共产党指示——“国民党是现时中国唯一强大的民族革命组织，他以自由民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学生和工人为基础，因为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居薄弱……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是必要的。”

中国共产党遵循这个路线，于六月间举行“三全大会”，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决定积极“合作”。于是，国民党与中共、中国与苏联“和平共存”的所谓“合作”关系乃逐渐具体化。

识破“和平共存”的阴谋

‘（我希望）共同认识俄共及其傀儡中共对于任何一个自由国家与自由人士所要求的“和平共存”，不过是要你单方面接受他的“和平”，让他俄共独自生存，并听其第五纵队自由发展，而最后任其从外部来武装征服、或从内部和平转变之一个“简单符号”。’（注一）

蒋总统察觉到苏联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阴谋，是自“孙、越宣言”半年多之后～～一九二三年在访问苏联的时候开始。关于这一次访问的情形，在前一章里已经提及。

当访问之初，蒋总统还对苏联抱有很大的同情和期待——

‘当时（中国）革命环境恶劣万分，我更觉得中国革命若不改弦更张，另辟新路，决不容易成功。于是，摆脱一切，决心赴俄。’（注二）

谁知这一趟旅程，所受到苏联的招待，首先是劝说加入国际共产党——他是要从内部来离间分化我们。

再看苏联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可以明了他的领导者们对于外蒙古显然存有和帝俄沙皇时代毫无不同的侵略意图。例如在十一月二十八日，第三国际所通过的“关于民族解放问题和国民党问题之决议”，便以在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之中有实现中国国内各民族平等，乃从而特地曲解为承认各民族之“自决权”，以牵强解释苏联使外蒙古在他控制之下所谓“独立”的行为是和民族主义正相符合的。又在这次决议中，虽然表明和国民党合作，但却自认苏联共产党是“世界革命”的中心。

‘综括我在俄考察三个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无形之中发生一种感觉，就是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及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主义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是危险。’（注三）

蒋总统于十二月中旬由苏俄回到国内，正是中国国民党一全大会的筹备工作进入了紧锣密鼓的最后阶段。这一次的大会，是在“联俄容共”的方针之下所召开。

鲍罗廷势焰嚣张

在这个时期，有一个负有重要任务的人物登场——就是由苏联共产党派来中国、被孙先5[265]1285生聘为顾问的鲍罗廷。

鲍罗廷曾在俄国及西欧国家从事革命活动，在英国坐过牢。这一次是由加拉罕的建议，派来孙先生属下工作。

十月二十五日，中国国民党为筹办一全大会而组成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胡汉民、廖仲恺等人），起草宣言、党纲；同时着手进行改组事宜。鲍罗廷也很快地便跻身于这些活动，开始对国民党的政策参与意见。其后，势焰逐渐嚣张，利用“顾问”地位，极力施展其制造国民党分裂、以及图谋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等阴谋，使国民党遭受到罄竹难书的毒害。

注一：蒋总统-“苏俄在中国”（一九五六十二）

注二：蒋总统-“本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区别”（一九二九四）

注三：同注一。

共党混入国民党

当蒋总统自苏联回到国内之际，看到中国国民党已经下定决心联俄，感到不安，乃向孙先生提出异议。

但孙先生则很有自信。

‘国父认为我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宜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

‘国父深信，并言：

‘“此时只有使中国共党分子能在本党领导之下，受本党统一指挥，才可防制其制造阶级斗争，来妨碍我国民革命进行。如我们北伐军事一旦胜利，三民主义就可如期实行。到那时候，纵使共党要想破坏我们国民革命，亦势所不能了。何况苏俄对中国革命，只承认本党为唯一领导革命的政党，并力劝其共产党员加入本党，服从领导，而又不否认中国并无实行其共产主义的可能呢？”

‘故仍坚持其联俄容共的决策。’（注）

可是蒋总统的不安，并未因而消除，且在容共之后的一九二四年三月写给廖仲恺的信中，也还表达了耽心的意思：

‘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

‘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皆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5[267]1287指之意。……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

‘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直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

然而，容共政策一旦决定，共产党员们便继踵而来，开始混进国民党内。

陈独秀占到重要地位

混进来的方法很多——有的凭介绍，有的互相援引，有的毛遂自荐，又有的是集团加入；而尤其过分的例子，则为隐匿身分，长期潜伏。总之，在当时的中共党员差不多都渗透到国民党里面来了。

这个时候，靠拢得最快的，是被孙先生任命为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的陈独秀。

他在参与改进案告一段落之后，更被孙先生擢任为辅助总理的国民党本部参议，占到了重要的地位。

可是，临时中央执行委员邓泽如等人，则对于陈独秀以及他的后台鲍罗廷等俄国人士的真意认为可疑，指称“陈独秀”为“陈毒兽”，对之颇为警戒。

果然，他们伸出了“毒手”——国民党的组织法、党章、党纲等草案的起草，多出自鲍罗廷指挥；新的政纲、政策，也由陈独秀等共产党所议定，便打算付诸施行。邓泽如等人乃于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向孙先生提出对鲍罗廷、陈独秀阴谋的弹劾案——“此次改组，陈独秀实欲藉俄人之力，耸动我总理，于有意无意之间，使我党隐为彼共产所指挥……”但孙先生则对之批示：“党章、党纲等草案稿，为我请鲍罗廷所起，我加审定。”“陈独秀等……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妻之。”“吾党自革命（辛亥）以后，则日日退步，……不图改良进步也。”表示既定方针不变。

中共的另一位领导人-李大钊，则于一九二三年二月上旬因国民党党员张继的介绍混入了国民党。

李大钊与林祖涵

当时，李大钊曾向孙先生说明：自己是第三国际党员，不能脱离党籍；并问：是否还可以参加国民党？孙先生答复：“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尽管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

李大钊在张继就任国民党北京支部长的同时，复因张继的推荐，担任该支部总干事，马上便露出原形一意扩充共党势力。他利用张继不常在北京的空隙，全力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时以聚集在北京国民党青年党员的名义组织“京津青年国民俱乐部”，而实则由共产党员左右一切，并排斥在北京的国民党老同志。

在国民党本部的干部职员中，也有共党分子混入——就是总务部副部长林祖涵和宣传部干事张太雷二人。

林祖涵是早在一九○六年二月参加中华革命党的老党员，但在一九二一年共产党一经成立，便秘密加入共党，却仍然伪装是国民党党员，而并未向孙先生报告加入共党之事。他在国民党本部担任中央干部会议的纪录，利用其地位，介绍了不少共产党员混入国民党。

张太雷虽然曾经参加过蒋总统访俄代表团，但他本来和国民党毫无渊源，不过因为做新闻记者，经常与国民党人有接触，得以钻进了国民党；他之担任宣传部干事，乃是出于陈独秀的推荐。

又有谭平山，本来是国民党员，但也参加了共产党。他奉孙先生之派担任“广东工界宣传员”，于是便和林祖涵联起手来——阴谋操纵在广东的国民党组织。

注：蒋总统-“苏俄在中国”（一九五六十二）

共产党的演技

在海外的国民党组织，也有共产党分子渗透进来——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人。

周恩来当时在法国留学，隶属于共党组织的“共产主义青年团”；该团团员八十多人，于一九二三年七月集团加入了国民党驻法支部。

周恩来泪珠滚落

“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成分子，不限于法国一处，还包括有在德国和比利时的留学生在内；因此，驻法支部乃改组升格为驻欧支部。周恩了乘改组机会，巴结支部领导人——执行部长王京歧，获其信任，得任执行部总务科主任。其后王京歧返国，周恩来便得意洋洋地代理起执行部长，掌握了驻欧支部的党务活动。

为利用国民党，周恩来所表演的演技，确实很高明。

某次，在国民党会议席上，周恩来被指谪“有野心”，当时，他便泪珠滚落，声音哽咽地一再陈述“没有这一回事”，以博取党员同情。又在里昂的咖啡馆举行驻欧支部成立大会时，他为了显示是一个真正的爱党者，发表演说如左：

“挂名党籍不负责任者，此类人实居吾党最大多数，……用着党时，便自称为老同志；不用党时，便竟一反党议，甚或从人做落井下石之举，是真令人痛心疾手而不得不认为本党内部伏莽之患。”

周恩来所说的“伏莽之患”，实则就是他们这些共党分子的夫子自道，这从后来的历史得到证明。

在日本方面，有“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只不过十几个人，大半也混进了国民党。

共党分子，就是如此这般地在国内国外向国民党渗透，到了一九二三年年底，已经是部署就绪。

施展手段攫取代表

在这样的状态之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全大会）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在广州开幕，这一次的大会，为共产党徒提供了表演跳梁篡窃的最初舞台。

本来，在国民党内，共党分子还只是少数派，如果单凭公平竞争，当然很难获得参加大会的代表；职是之故，他们为了产生代表，乃积极使出各种各样的手段。

在天津选举代表时，李大钊以演讲为名，亲自前往策划，意图支持于树德等四个共党分子；然而天津地区代表只有三个名额，于是李大钊乃写信给张继、汪兆铭等国民党干部，陈述“青年学生希望能多有一、二人参加大会”，要求增加名额。结果在规定名额三人之外，争取到以于树德为总理所指定的代表，终于达成了四个人都能参加大会的目的。

至于北京方面，李大钊也作了秘密部署，他把握住一部分国民党员离开北京的空隙，举行徒具形式的选举，结果共产党徒张国焘被支持获得代表。

湖南省代表的选出，也是不明不白。当上海执行部指示湖南办理大会代表选举时，共党分子便马上答覆——“已经选出夏曦、毛泽东、袁达时三人。”

实则毛泽东回到湖南还没有半年，而且不公开露面，只是搞他的地下活动，当地的国民党组织根本就不晓得有他这么一个党员存在。他之当选代表，究竟是由那些人投票？如何选出？完全不得而知。因此，在广州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席上，乃有湖南籍的国民党员对于毛泽东等人之当选代表，提出抗议，闹成问题；可是，由于林祖涵、谭平山等共党人士的幕后运用，决定了一个奇特的附带条件——“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准许出席大会。

此外，宣中华（浙江）、朱季恂（江苏）、刘芬（湖北）、王尽美（山东）等共党分子都是凭不合法的手段当选代表。又在孙先生所指派的代表里，也有五个共产党员混入；只是其中陈独秀一人因为没有办好入党手续，而不能出席大会。

及至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立即为之表面化。

李大钊声泪俱下

当时，对共产党徒的行为怀有疑虑的广州特别区代表方瑞麟提议——在国民党的章程上增加“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

针对这个提议，李大钊声泪俱下地陈述：“我本来是第三国际的共产党员……”并且对于为什么要参加国民党，事先早就准备好一份声明，当场分发给各代表，大致的内容如下：

“我等之加入本党（国民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有一部分同志疑惑因为我们加入了本党，本党便成了共产党。这亦是一种误会。我们加入本党是来接受本党的政纲，而不是强本党接受共产党的党纲。试看本党新定的政纲，丝毫没有共产主义在内，便知本党并没有因为我们一部分人加入，便变成共产党了。……我们既经参加了本党，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

◎参考《孙中山与共产主义》第二十八页，◎关于李大钊的声明，部分、略异的记录如下：其中最扼要的话是：“我党之加入本党，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员的运动而来的。”“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我们对于本党实应负着二重的责任：一种是本党党员普通的责任，一种是本党联络世界的革命运动，以图共进的责任。”“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见“张溥泉先生全集”第九十三页所引）。◎

李大钊哀哀上告的誓言，使得一部分国民党党员伸出了同情之手来迎接他。

汪兆铭便积极地予以支援。他发表了以下的主张：

“我们的党章上，既已有专条规定本党的纪律，我们只应拿纪律来量度党员的行动——合于本党纪律的，便承认他是党员；不合于纪律的，便予以制裁。有了这一武器，跨党不跨党的问题便毋须重视。”

共党攫取实权

国民党一全大会，对于党籍问题，还在继续争论之中。

不过，会场空气已因汪兆铭的支持发言，而更加趋向于对共党有利。

这时，加拿大支部代表黄季陆（现任总统府国史馆馆长）站了起来，对于刚才方瑞麟提议增加“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一节，发表主张如下：

“共产分子既是为拥护三民主义加入本党，为什么还要保持他们原有的组织？一个党中有双重党籍存在，不是党内有党是什么？”

对于黄季陆的发言，廖仲恺、胡汉民发表了反对的意见。

这个当口，突然在后面的席位上有人大声要求发言：

“主席！主席！三十九号发言。本席主张本案停止讨论，即刻付表决。”

毛泽东蛮横发言

这个代表，穿了一件长棉袍，身材中等，态度倔强，一股蛮劲，像一个才到城里的乡下人，湖南口音很重，他就是毛泽东。

正好是在反对意见连续出现的时候，毛泽东把握住这个机会，强行主张停止讨论，移付举手表决；于是，方瑞麟的提案便被葬送掉了。

像毛泽东这一类的强行发言，在第二天又继续表现出来。

那天，黄季陆有一个“采用比例选举制为国民党政纲之一”的提案，由大会主席林森提付讨论，而毛泽东在一开始便不容分说，发表他的主张如下：

“比例选举制，是给予少数派以当选机会，即是给予破坏革命的机会。本席根本反对本案，因此，本案不能讨论，更不能付表决！”

接在后面，共产党徒们便拿出了那一套独特的“封锁发言”战术，由毛泽东和另一个共党分子宣中华（浙江代表）配合起来，一个人刚说完，紧接着又一个发言，不让他人有插嘴的间隙。

他们发言的内容，真正是蛮不讲理；宣中华毫无道理可说，只知道大声咆哮；毛泽东则表示：“比例选举制，只是被外国社会主义政党在没有当权时所采用；但在取得政权之后，便摈废不用。”“这个制度，是以自由给予反对党，反而危险。”

实则在那个时候，如果说有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政党，则只有英国麦克唐纳所领导的工党；可是工党在野时既不曾有过比例选举制的主张，当然在执政之后也就不会有摈废不用的事实。而毛泽东为使自己的主张通过，竟然捏造出毫无根据的例子。

由于毛泽东和宣中华二人此起彼落大声发言，造成一面倒的反对空气，终于决定——“保留；俟研究后于下次大会再行提案。”然而后来并未能再行提出，直到清除共党之后的一九二八年，才得以成立。

鲍罗廷窜改大会宣言

现在要提到来自苏联的国民党顾问鲍罗廷的阴谋活动。鲍罗廷是“顾问”身分，其职责只是因应谘询，提供建议，并没有决定政策的权限；然而，他却超越了立场，在大会期间，对于国民党的政纲、政策，插言干预，引起纠纷。

例如窜改大会宣言事件——戴季陶和邹鲁两人在校正会中通过的大会宣言时，发现了有和原文不符的字句，乃向廖仲恺查询，廖答：“是鲍罗廷改的，他说这样比原文好些。”这是擅自窜改，于是，戴、邹两人马上就表示：“鲍罗廷那里有删改的权限，”便照原文改回。

国民党干部的选举，结果也有不少共党分子当选。

在二十四位中央执行委员中，有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三人；十七位候补中央委员中，有沈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七人，都是共党分子。依当时情形，候补执行委员与执行委员同样负实际责任，两者总数四十一人，共产分子共占约四分之一，已有足以形成牵制党的会议之力量。

共党窃取实权位置

继之，决定设置秘书处即组织、宣传等九部。共产分子对于组织、工人、农民三部特别重视，派人参加工作，意图掌握其实权。

他们极力掩饰其真意所在，最初只推荐谭平山为组织部秘书、冯菊坡为工人部秘书、林祖涵为农民部秘书，有意避免染指部长职位。

共产分子们攫取国民党实权的过程，在蒋总统手着的“苏俄在中国”中有所记述，现在摘录于后：

‘当时八部（注：最初设置八部，随后增加海外部，成为九部）之中，国父本拟以共党份子一人林祖涵为农民部长，其他七部皆由本党老党员担任，并以廖仲恺为组织部长。后因广东工人组织工作重要，且以广东籍的党员担任其指导者为宜，故廖仲恺自愿担任工人部长，而由他转推谭平山为组织部长。因为谭原是本党党员，当民国九年共党组织之初，廖先生指定他去参加共党的。廖先生认为谭担任这一职务，必能忠于本党，为三民主义来工作。

‘殊不知谭任组织部长以后，他就荐杨匏安为该部秘书。杨是一个纯粹的马克斯主义者，于是组织部就在其共党组织控制之下，由他利用这一关键地位，来执行其共党的渗透工作了。

‘廖仲恺先生担任工人部长之后，以其兼职很多，部务皆交秘书冯菊坡办理。冯是共产份子，于是各地工会和总工会就多被共党份子操纵。

‘林祖涵任农民部长以后，推荐其共党份子彭湃为秘书。他自己乃辞去部长职务，以分散本党党员的注意。其后部长屡次更易，但部务始终由彭湃把持。’

共党扩展工作

一九二四年元月，中国国民党举行一全大会的结果，多数共党分子渗透到国民党的执行部内；其中以农民部秘书彭湃足以为其渗透工作的典型，现在对其活动情形再稍加追述于后。

得到林祖涵托付代拆代行的彭湃，更引用他中意的中共党员罗绮园、阮啸仙等在其左右，掌握了农民部的权力。

及至反共的黄居素出任第三任农民部长，彭湃居然很傲慢地表示他对于这位上司的态度：“若非就我范围，则不能居此部长职。”

黄居素当然要免彭湃的职，但结果被迫辞职的竟然并非秘书，而是部长。

所谓农民运动讲习所

一九二四年八月，彭湃在广州设立了一个隶属于农民部之下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自任5[280]1300主任，一开始就打算以这个讲习所为共产分子的根据地。

在招生的时候，形式上举办考试，由他亲自躲在谭平山的寓处阅卷；可是，只查阅试卷上的考生姓名，大凡不是共产党员的人，则都不予录取。

该所讲师，有毛泽东、周恩来、萧楚女、李立三等共产党员；在二十五门课程之中，与国民党有关者只有两门。

彭湃以这个讲习所培养农民运动指导干部，一意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军团”，于是，土豪、土匪等地方暴力组织率先加入；他们一入农民协会，不仅以前的罪恶免究，而且以后更可为所欲为。讲习所的主持者，两年之后由毛泽东继任（所长）。这是在国民党的组织之中，构筑了共产党的牙城。

共党分子把持工人部

工人部秘书冯菊坡，也是一个共产党员，任意操纵工运，指导罢工。他在工人部门前标出“非工人部中人，不准入内。”使工人部成为一个禁区。因此，工人部里究竟在搞些什么阴谋，非局外人所得而知。

冯菊坡对属于共产党系的工会，随时准其设立；但对于非共方关系的工会，则多方阻碍，并且为此建立了一个“全国总工会”的组织，以吸收及压制个工会；又如有非共系工会始终不向其屈服者，则另立一种同业的工会以破坏之；至于二者相争之时，则差不多结果都是少数派的共方工人借工人部的力量压迫了人数众多的非共系工会。

由于这样搞法，所以广州的工会每天发生纠纷，暴力行为固不待言，而且不时有杀人事件出现。

此外，就连黄埔军官学校，也未能避免不成为共党分子所觊觎的目标。

共党渗入黄埔军校

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管理部卫兵长胡公冕，都是共党所派，渗透进来的；教练部副主任邓演达，则是亲共分子。共产思想便是这样地注入了应该是贯彻三民主义精神的军官学校。

‘本校创办之始，学生与教职员，不过五百余人，然而上下同心，精神一贯，无或问言。

‘唯共产与非共产之分，已有一部分同学之成见，存于其间矣！当时，总理以容纳共产分子，为革命原素之一种；而中正自开校以来，唯恐同学因怀疑而起决裂，是以时时以总理之意为意，务使本校革命之基础，免除共产与非共产之分，但期其精神之团结，完成国民革命之责任。……’（注一）

然而，这样的努力，还是被共产分子所破坏。

‘共匪是自从我们黄埔革命之始，就假革命之名，渗透潜伏到我们革命行列里来了，从事其鼠窃狗偷、挑拨离间、造谣中伤、阴谋奸计，以篡夺本党、出卖民族为其唯一目的。’（注二）

共产党徒首先以“党代表”（国民党）身分混入由军校教师和毕业生所组成的革命军-“教导团”中，教导第一团第一营党代表胡公冕等，就是这样的人。党代表在军中担任的是政治工作，这个职务对赤化军队会发生很大的作用。

教导团于一九二五年元月第一次东征之后，编为“党军”。周恩来便在这个部队里担任前方政治部主任，旋即升任政治部主任。其后出任军校党代表的汪兆铭，更将政治工作职权委之政治部，故而军官学校的政治训练，乃得让周恩来等共产党徒任意操纵。

本来，共产党徒们在开始的时候，毋宁说是有意避免显著的赤化活动，而率先专心做他人所不愿做的事，俟一旦得到上司信赖，付予职权，马上便遵照共党命令，开始从事对部属的离间分化活动。

操纵这些行动的人，就是从苏联来的国民党顾问鲍罗廷。他首先命令在军校站稳地位的共党分子组成“青年军人联合会”，通过这个组织分化军校学生，并谋进而攘窃军校。

‘十四年（一九二五）一月二十五日，共产分子发起青年军人联合会，吸收军校及其他部5[283]1303队中的跨党分子，甚至散布谣言，说我本人（蒋总统）也加入了共党组织，来诱惑军校学生向他投靠。

‘军校学生及部队中忠于三民主义及本党之官生，不堪其组织的压迫，于是陈诚等乃发起孙文主义学会，以对抗青年军人联合会。’（注三）

注一：蒋总统-“忠告军校同学书”（一九二六四）

注二：蒋总统-“黄埔的革命精神和黄埔的革命责任”（一九六四六）

注三：蒋总统-“苏俄在中国”（一九五六十二）

监委提出弹劾案

针对混入国民党内共党分子的破坏活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等人于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八日向总理孙先生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了对共产党的“弹劾案”。

指斥共党分子违纪

弹劾案中说明“并非排斥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以个人身分加入本党”——措词颇为温和；但却对共党分子违反党纪实情指斥如左：

“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加入本党为党员者，实以共产党党团在本党中活动，其言论行动皆不忠实于本党，违反党议，破坏党德，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

邓泽如等并在弹劾文中检附有共党分子的秘密文书——“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议案及宣言”（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刊）、“团刊第七号”即“扩大执行委员会特号”（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一日刊）等件为证。

这些秘密文书，是对混入国民党内的共党分子指示“阳奉阴违”策略的指导文件，为共产党对国民党逞其阴谋的有力证据。

共党文件暴露阴谋

请看下面这几段例证：

“本团团员在国民党中，应赞助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主张，与其言语行动完全一致。”

“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持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具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阻止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运动……并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

“须努力使国民党与苏联接近。”

“我们加入国民党合作，要注意下层切实的工作，宜极力避免无益的竞争。我们于国民党中，高级机关位置之竞争，既已占得完全的胜利，及优越的地位，但此后对内既易发生不良之影响，对外又易引起其他团体的反感，故于不十分妨害本团活动范围之内，表面上应采取容让的态度，而注其全力于区分部、或市党部的实际工作。对于国民党下面各种团体，我们的同志，表面上应注重联络其感情，非必要时，不宜取敌视态度。”

谢持等质问鲍罗廷

以弹劾案揭发共党分子在国民党内违纪行为的监察委员谢持、张继等人，更于六月二十五日到共党分子的黑后台——俄国顾问鲍罗廷在广州东山的寓所和他会晤，对于共党分子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进行破坏活动之事加以追询。

监察委员们首先在鲍罗廷的面前摊开上述的一些证明文件，问他“有没有见过这些小册子？”鲍罗廷摇摇头说：“未见过。”

在谈话中，鲍罗廷态度傲慢，出言不逊。

现在留下来有当时一问一答的纪录，摘要如下：

监委……组织上最重要问题，是否承认“党中有党”？即指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而言。

鲍党中分派，是不能免；党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实际不能做党之中心，当然党内发生小团体，有左派右派之分——如方瑞麟等……可认为右派，共产党则为左派。

监委君以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在党内作党团活动认为合理乎？

鲍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只可说有国民党员，不可说有国民党。

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则党可复活。

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三个月之后，见国民党不振作，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不起来，并有许多右派分子夹杂其中，乃不得不组织党团。

监委依吾辈见解，君所用方法欲令国民党复活者，适足以使国民党死亡耳！使多数小团体在同一范围内相倾轧、相竞争，乃致死之道也。

鲍诚然！或可致国民党死命，惟不希望如是结果；希望左派、右派相争，发生一中央派作党之中心。

监委余个人素来赞成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共同从事革命。此次问题发生，仍主张友谊的解决；今闻君之言论，则不能不变更主意。国民党是一腐败革命党，余断然否认！假如君所说共产党是新生革命团体，如此则两种性质不相容，不如分道扬镳——腐败者团结起来，加以改良；新生者一往直前，两无阻碍。分作两起，岂不更佳？

鲍第三国际认定中国革命只能用国民党党纲，不能用它种主义；故使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全部加入国民党。如有不奉命令者，则认为违反命令。

阐扬三民主义

监察委员和鲍罗廷的舌战，继续了两个半小时之久：

监委吾辈亦非主张绝对分离者，惟党团（共党分子在国民党内活动的组织）作用万不能容许耳。

鲍国民党利用共产党，共产党利用国民党。唯两相利用之结果，国民党更多得利益。

监委此为一重要问题，正愿与君明言——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互相提携，或可得互相利用之好结果；如只有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自今春以来，只见有害，不见有利。……中国共产党原无足轻重，不过第三国际之差遣，……

鲍误解。然吾知国民党人许多反对与俄国共产党合作。

监委如君所说国民党已成待毙之人，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一复活剂，将打注射针而救济乎？

鲍事相类而话不能如此说，我们合作，我们合作。

监委……照此两种印刷物（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决议及团刊七号）观之，共产党持永久之计划，将国民党作一对象，日日以如何对付国民党为切要目的；国民党不能不认共产党团为本党本体上大问题。

鲍无妨。凡党皆有左右派之分。

监委……共产党全体既加入国民党，实行国民党革命主义，又何必另挂中国共产党招牌、保留共产党组织耶？

鲍国民党中央干部尚未能组织完好，不能指挥全体党员。……共产党不能取消自己的组织。

显图从事内部颠覆

就以上的谈话看来，鲍罗廷的目的，显然是在制造国民党的分裂，从事内部颠覆活动。

谢持和张继也就知道没有再交谈的必要了。

邓泽如、张继等人的弹劾共产党案，于七月三日提出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决议：呈请总理孙先生作最后决定。

在决议中并加说明：“以一全大会的政纲和宣言为准，凡入党者，如具有革命决心及信仰三民主义之诚意者，不问其从前属于何派，均照党员待遇；其违背大会宣言及政纲者，均得以党之纪律绳之。”

十月七日，国民党发表党务宣言，重行申明“容共”原则；并指出“三民主义为革命唯一途径”，以解释党内外误会。明白宣示国民党是三民主义政党，不能藉口“容共”便把共产主义带进来。

孙先生所悬示的鹄的，是以和平建设为宗旨的国民革命，不是阶级斗争。

关于这一点，孙先生在这一年（一九二四年）所举行的三民主义演讲中，阐示得非常清楚。

这个演讲，是自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二十四日每星期一次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举行。“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各讲了六次；“民生主义”预定也是六次，但因北伐而只讲了四次——内容相当宏大丰富。

孙先生自怀抱三民主义的基本构想以来，业已经历了将近三十年的岁月，然而将三民主义理论有体系公诸于世，实则自此开端，是非常值得纪念的演讲。

驳斥马克思谬论

‘国父在演讲中，特别警惕的一点，就是共产分子对民生主义的曲解。他演讲民生主义的时候，第一讲就驳斥马克斯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说，和阶级斗争的主张。他认为历史的重心不是物质，而是生存。他认为商品的劳动价值说不合事实，由发明、制造、到交换和消费，都有贡献于生产。他认为社会进化是由于大多数人的合作，而不是阶级斗争。他主张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要用和平方法，而不可使用阶级斗争与群众暴力。’（注一）

孙先生在作有系统的三民主义讲演之际，其主旨还包括有启发混在党内的共产分子，使对于三民主义能有正确的认识，藉以引导他们的思想与行动归于正途；可是，他们终于听不进去。

共产革命以恨为动机

‘我特本个人经验，再强调说明共产革命不适合于中国的理由如下

‘第一：以“恨”为动机的革命，决不适于中国的民族性。因为动机既然是恨，行动一定是残酷和卑污，而且要损人利己的，这完全和中国的民族性相反。……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迭次失败，使帝制复活，就是因为过于残酷，使社会全体发生反感。这种残酷手段，适用于残酷的民族都遭失败，那里能适用于和平的中国民族。共产革命，既然采取残酷的卑污手段，当然受中国全国人民、至少亦要被大多数人民所反对。革命的行动，既然得不到大多数人的同情，就绝对不能采用，这是苏俄共产革命决不适于中国的第一点。’（注二）

注一：蒋总统-“苏俄在中国”（一九五六.十二）

注二：蒋总统-“本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区别”（一九二九.四）

□□□□□□□□□□□□□□□□□□□□□□□□□□□□□□

附录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

刘吉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民国八十年六月第一版。

………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极为关切。一九二一年三月，委派马林作为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六月初，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可尔斯基到达上海，与上海党组织李达（时任上海党组织代理书记）、李汉俊会面，随即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李达分别发信给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要求各地派代表两名来上海出席会议。

各地小组接到通知后立即派代表赴沪参加大会。陈独秀、李大钊当时分别在广州、北京，因事未能参加会议。陈独秀委托陈公博带给会议一封信，提出四点意见：“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权主义指导，三曰纪纲，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其意即发展教育党员，执行民主集中制，注重组织纪律及争取群众夺取政权，这几点意见对于会议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各地来沪的代表有：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旅日的周佛海。此外，陈独秀还指定包惠僧参加了大会。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承担了大会的联络、筹备等会务工作。一大会址设在法租界望志路一百零六号（今兴业路七十六号）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的家里。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三日至八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的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推举的和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共十三人，代表着全国五十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可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一大的中心任务，是对讨论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会议首先听取了各地代表的汇报，交流了经验，接着选举了起草委员会，起草了党的纲领和工作决议。会议在即将结束时，因遭法国巡捕房的干扰，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代表们在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实际工作决议，选举产生了党中央领导机构。鉴于当时党员人数少，各地组织尚不健全，会议决定暂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组织中央委员，负责领导党的工作。因陈独秀在建党中的巨大贡献及威望，会议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选举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以上三人组成中央局。

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了党的奋斗目标和政治主张：“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废除资本私有制”；“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规定了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党的各级委员会必须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党的地方组织必须接受中央的监督指导；党员个人必须承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纪律，不得擅自做官，当议员；必须与那些我们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纲领还提出党“联合第三国际”，并建立密切联系。

这次大会的代表都是知识分子，代表的五十多名党员，除二名属于工人成分，也都是知识分子。因此，说中国共产党是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创建的，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规律的。但是，只有先进的知识分子，尚不能成为一支群众性的力量。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国党的工人成分太少，建议党要特别注意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工会组织，把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因此，一大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中确定党中央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领导工人运动，建立工人学校、成立工会，“灌输阶级斗争精神”，“应该警惕，勿使工会成为其他党派的玩物”，“勿使工会执行其他的政治路线”。

………

□□□□□□□□□□□□□□□□□□□□□□□□□□□□□□

第七章：北伐的进击(上)

主题

广州商团事变黄埔军校第一仗第一次东征棉湖血战演说大亚洲主义国父病入危笃国父逝世誓承总理遗志共党进行离间沙基惨案国民革命军成立惠州之役廖仲恺被暗杀西山会议二全大会共党阻挠北伐季山嘉的毒计中山舰事件解除俄顾问聘约

广州商团事变

一九二四年八月九日夜晚，广东黄埔的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室收到了大元帅孙先生由广州大本营发来的一封信：

“介石兄鉴：截缉挪威商船私运军械事，今晚着邓彦华率同江固舰来长洲，……可协商共同一致行动可也。”

陈廉伯受英国鼓动

当时，在广州有英国银行买办陈廉伯领导的商人们所组织的“广州商团”，拥有私兵，得到英国为之后盾，对革命政府将发动不轨行动，而孙先生则于事前获得他们私运军械的情报。

由这封信开始揭发出来的挪威商船私运军火一事，成了被称为“广州商团事变”的国际事件之导火线。同时，也是由黄埔军官学校创立而初试啼声的革命军所面临的第一次考验。

现在从它的背景说起：

陈廉伯是广州商团会长，并担任英商汇丰银行买办，和英帝国主义者秘密勾结，煽动反政府运动。

先是在一九二四年五月，广州市政府拟实施税制改革时，便曾发生有策动商店罢市、企图打销政府决定的经过，而且与在东江的叛徒陈炯明也有联络。

陈伯廉之组织“商团军”和购入军械，是受了英国方面的唆使：

“如能反对广州政府，英国必可为组织商人政府给予援助；君即为中国之华盛顿。”

英国由于对孙先生加强和苏联的联合颇具戒心，为了对苏联抗衡，故而暗中策动，希望以商人政府代替中国国民党来统治广东。

秘密输入大批枪械

陈伯廉向在香港的德商顺全隆洋行购买了九千枝之多的大批枪械；此外，另在欧洲又采购到大量武器，首先将在香港购到的部分用挪威商船——“哈佛”号秘密输入。

孙先生是由和他私交甚笃的英国领事那里得闻这个阴谋。

蒋总统奉到孙先生的指示，立即登江固舰，和邓彦华会合，在珠江的长洲、沙角及白鹅潭巡弋。这一带，是在一九二二年陈炯明叛乱的“永丰舰事件”时，曾经随侍孙先生出死入生、值得回忆的地点。

发现“哈佛”号的踪迹，是在翌日～十日清晨的白鹅潭附近，乃将之拘押到黄埔军官学校校门外面停泊。

私运的军械，扣留在军校内加以保管；有私运罪嫌的“哈佛”号，则由江固、永丰两舰加以严密监视。

被打破了预定计划的陈廉伯，当然不肯就此罢休；于是，乃于八月十二日指示全市商店酝酿总罢市，要胁释放“哈佛”号并发还军械；十四日，商团更组织了约一千人的“请愿团”，闯入大本营。

孙先生向他们说明输入军械是违法的行为，并指出：“商团军只有一千人，为什么要九千枝枪？如果是为了来攻击政府，当然不能发还，而只有和你们决一胜负；是故武器的处置，须候调查之后才能决定。”——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不过，由于轮船属挪威籍，必须按照国际法处理，爰经调查判明“哈佛”号只是包租来的商船；自船上扣押的物品，除武器之外，其余货品如洋钉、香料等非违禁品，都于十八日发还，并将“哈佛”号释放。

不做假革命军

保管在军校中的没收军械，对于缺乏武器的本校来说，真正是最迫切需要的物品，但是校方毫无染指之意。这个理由，蒋总统曾经向第一期学生说明如左：

‘……我现在特拿这件事和各位同志讲一讲。

‘……现在政府把商团私运的军械拿到学校里来，决不能算是本校的军械，乃是本党的军械。……如果我们……不受本党指挥，军械拿到了，就算是私产，这就是假革命军了。

‘军械到了假革命军手里，就要祸害人民，扰乱国家；如果如此，不但是本党的总理和本校长因此多了一个罪名，本党的前途也因此绝望了。

‘所以我们学校对于这军械如何处置的问题，决没有容喙的余地。我们要服从党的命令，完全做一个革命军的模范给人家看。’

十九日，孙先生对商团发布晓谕书，说明：在没收之私运军械中，一部分实际由商团集资购入者，可依法发还；同时并具体指出陈廉伯的阴谋计划如下，警告商团不得为叛逆之徒：

“陈廉伯有极大阴谋，欲藉商团之力以倾覆政府，而步义国（义大利）墨索里尼之后尘。陈廉伯托香港某西报……声称广州商团为‘法西斯党’，即义大利之资本家顽固党也。……闻其中策划者有外国人，定期八月十四日推翻政府，取而代之，以陈廉伯为广东督军，取消独立，投降北方。……政府宽大为怀，不忍株连，……其知情而悔悟者，政府当宥其既往，不事深究。……”

黄埔军校第一仗

尽管政府如此谆谆告诫，但商团方面完全不肯自承其非，且于八月二十三日提出强硬要求——（一）政府扣留之枪械，无条件全部发还。（二）准商团成立统一的军事组织“联防总部”。……这简直就是非法要胁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域内承认另一个“权力”的存在。孙先生对于如此无理的要求当然置之不理，于是商团便立即于二十五日再度罢市。

英国公然袒护商团

此时，孙先生已经有了不得不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决心，遂即指示蒋总统将扣留之一部分军械拨发给黄埔军官学校的装甲车队。

到了这个当口，原来隐身幕后策划煽动的英帝国主义者，乃公然出面干涉。

英国驻粤总领事于二十七日通告革命政府--“倘中国当局对市区开炮，所有英国海军部队，当立即行动。”

对于中国内政问题的“商团事件”，英国插嘴干预，并且凭藉武力为后盾，表现出公然袒护商团的态度，这种行为，不啻是自行揭露了事件的背景。于是，孙先生乃于九月一日发表对外宣言：

“试观十二年来，帝国主义各强国，于外交上、精神上、经济上始终一致赞助反革命。……今有对我政府之公然叛抗举动，其领袖为在华英帝国主义最有力机关之一代理人。……”

不用说，宣言中所指“英帝国主义最有力机关”，就是汇丰银行，“代理人”就是陈廉伯。

孙先生除发表宣言之外，并致电英国首相麦克唐纳，抗议“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

由于这些措置，使紧急事态得以一时缓冲。

正当这个时刻，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对立情势再度激化，孙先生乃把握机会，将大本营自广州移往韶关，准备向江西、湖南方面出师“北伐”。及至九月十六日，第二次直奉战争在北方爆发，孙先生即于十八日发表宣言，宣布“北伐”和“打倒帝国主义”。

于是，商团方面也趁孙先生督师北上、广州军力单薄的时机，再度掀起叛乱活动。

十月九日，商团又煽动大规模的罢市，广州一带笼罩在不安的气氛之下。

绝不放弃革命根据地

孙先生对于情况如此的广州，已经有了舍弃之意，特地致电在军官学校的蒋总统——“今兄（蒋总统）已觉得广州有如此危险，望即舍去黄埔一孤岛，将所有枪弹并学生，一齐送来韶关，为北伐之孤注。”

‘但是，我（蒋总统）认为广州和黄埔是革命的根据地，无黄埔，则革命军必无立足之地；无广州，则革命政府即无复保障，更无进攻退守回旋自如之根据，所以广州和黄埔断断不可放弃。

‘我当时就报告总理——“埔校危在旦夕，中正决死守孤岛，必不能轻易放弃此一片干净土的革命根据地，致吾党永无立足之地。”’（注一）

结果，政府为了收拾事态，仍和商团进行交涉，谈妥于翌日～十日发还枪枝五千，问题该可以和平解决。

第二天刚好是“双十节”，军校举行庆祝典礼。

由总教官何应钦担任指挥，在斜风激雨的天气中举行了阅兵式。

下午，军校学生和广州各界代表在市区游行，庆祝国庆。

三时左右，行经省河河岸西线。

碰巧商团人员正在起卸被发还的枪械，他们看到军校学生列队前来，怀疑是为抢夺武器，乃瞄准游行队伍，突然开枪，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军校学生方面死亡二十多人，商团将死者胸腹剖开，挖出心脏肚肠示众，极尽其酷虐之能事。

事态终于演变到了决裂的阶段。

商团于翌日～十一日，散发并张贴宣传标语传单，对政府公然侮蔑攻击，且号召全面罢市，同时在市区出动商团武装部队，鼓动决一胜负的势焰。

巷战半日商团乞和

政府方面，由吴铁城于十三日率领警卫军自韶关赶回广州，湘军三千人也开拔回来。

十四日，蒋总统奉到孙先生“全军统归蒋中正指挥”的命令，遂立即下令将各部队部署广州市四周。

晚间七时，商团派出大批部队，政府军则先将其切断，然后采取一一围歼的战术。当晚，在市区西关发生了一些小接触。

十五日上午四时，各处同时发动反攻，巷战激烈，政府军作战奏功，被个别包围夹击的商团部队，立即瓦解，多数投降。

商团的抵抗，只不过半天便已结束。

十六日，商团副团长陈恭受来到黄埔，正式乞和，政府方面允其所请，并下令通缉陈廉伯等九人，事变于焉敉平。

黄埔军官学校的第一仗，打得这样漂亮，在果敢而秩序井然的领导指挥之下所采取的行动，使广州市民为之惊讶不置。

‘黄埔师生以无隔宿之粮、无尺寸之地，训练初成的孤军，终于起而敉平了商团之变，……压制了帝国主义觊觎的野心，成为北伐之师“胜兵先胜”的关键之战。’（注二）

注一：蒋总统-“革命历史的启示和革命责任的贯彻”（一九六九三）

注二：蒋总统-“中华民国六十一年双十节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一九七二十）

第一次东征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孙先生乘永丰舰莅临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孙先生为谋统一中国，决心和北方军阀之雄张作霖、段祺瑞会谈。当首途北上之际，特地经过军官学校视察。

九月间，北方军阀发生“第二次直奉战争”，由于直系冯玉祥倒戈，以致张作霖、冯玉祥等获得胜利，而曹锟被囚，吴佩孚逃亡湖北，段祺瑞则被捧出来作为新的领导人。

孙先生是在新的情势之下受到张作霖、段祺瑞的邀请，而有北京之行。

军官学校全体官兵师生列队欢迎于校门外的码头上，由蒋总统登舰恭迓。

国父欣感后继有人

孙先生莅校巡视一周，并参观一、二期学生演习，然后叹息地说：

“余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况余年已五十九岁，虽死亦可安心矣！”

蒋总统听到这样不吉祥的话，为之愕然，因而追问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孙先生的答覆则是这样的：

“余盖有所感而言也。……今观黄埔军校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吾之革命事业，实行我之主义。凡人总有一死……若二、三年前余即不能死；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志，则可以死矣！”

这个“预感”，不久之后，便成了事实。

孙先生在参加校内的送别宴会之后，于傍晚登舰离黄埔前往上海。——这是蒋总统和孙先生最后一次的见面。

陈炯明图夺取广州

孙先生一经北上离粤，叛徒陈炯明便立即窥伺着这个空隙，再度施展来犯广州的意图。

陈炯明在被革命军自广州驱逐出去之后，以北洋军阀和英帝国主义者的秘密支援为背景，同时和福建、江西、湖南各省军阀互通款曲，更收罗其根据地东江一带的土匪、蓄积有将近十万人的兵力，自称“援粤军总司令”，企图夺回广州。

革命政府为了加以镇压，乃决定出兵讨伐陈炯明，这就是第一次的“东征”。

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粤军、滇军、桂军组成“联军”，由杨希闵（滇军）担任总司令。

当时黄埔军官学校有教导团官兵及学生二千多人，因滇、桂两军唯恐军校抬头而加以抑制，以致未能编入东征联军的正规序列。

于是，乃以“校军”名义自动参加以粤军为主力的右翼军，担任联军的先锋部队，指向淡水、平山。

蒋总统当时是黄埔军校的校长，并兼任粤军参谋长，指挥右翼军作战。

左翼军杨希闵（滇军）以博罗、河源为目标；中路刘震寰（桂军）则指向惠州。

黄埔校军军纪严明

“校军”于二月三日上午九时登福安舰，自黄埔出发，途次河岸炮台鸣炮礼送出阵。

“校军”所参加的右翼军，于翌日～四日占领东莞，继续东进。炮兵队及机关枪队官兵都自行扛抬或推挽枪炮，不征调民夫，以免增加人民额外的负担。

军纪严格保持，没有一个士兵侵入民家。如果发现有任何破坏纪律的人，就会立即执行枪决；这是为了要建立真正的革命军队，故而必须有严正的军队纪律。

对于没有实际战争经验的学生们，蒋总统又作了这样的训迪：

‘见到敌人，千万不要惊慌，要先把自己隐蔽好，沉住气，瞄准射击。’

十三日，向敌军重要据点-淡水进军。教导第一、二两团由平湖、笼冈突击淡水南面，粤军第七旅自东北面、粤军第二师自西北面进击，展开三面包围攻势。

十四日清晨，与前来迎击的敌军遭遇，经过激烈战斗之后，虽得予以击退，但敌军在淡水城内坚闭城门，负隅死守，部署了抵抗到底的态势。

守备淡水城的敌军，是陈炯明部副总指挥洪兆麟属下的翁辉腾所属精锐部队，构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城垣有基层可以伏射、中上层立射的三层射击阵地；为防御夜晚攻击，在城墙高处更有强力照明设备，夜晚照射城外四周，皎如白昼，进攻部队一迫进到二百公尺附近，城垣上的三层枪眼便喷射出火网。此外，他们更用洋铁罐装入爆竹，点火燃放，劈拍连响，是伪装发射机关枪的疑兵之计。

校军初作正规战

这一个战场，在“校军”方面来说，是最初面临的正规战争，士气固然高昂，可是却存在着缺乏战斗经验、地形也非常陌生，加上期待不到后方补给的一些不利条件。

相对地，敌军方面则有坚固城垣为之屏障。且可预料一旦攻防胶着持久，则敌方便可由根据地惠州派遣有力部队驰援前来；而“校军”在敌人顽强抵抗之下，弹药损耗堪虞，故有速战速决之必要。

十五日清晨七时，由在南门外高地布阵的炮兵队发炮掩护，步兵队迫近南门，突破敌军防卫网一角，有一掌旗兵，穿过弹雨，攀上城垣，挥舞军旗为信号；在如此敢死行动鼓舞之下，勇往直前的“校军”，蜂涌城下，陆续缘梯而上，杀进城内。

棉湖血战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五日的淡水巷战，终日不停，校军一时占得优势；但傍晚敌军增援部队到达，反扑过来，我军续有伤亡，陷于苦战，不过学生们尚能坚持下去。

激战到夜晚，战局渐于我有利，敌军终于退往城外。

十六日淡水城在校军戒备之下，恢复平静。这一仗的战果——俘虏敌军官兵二千多人，缴获枪械一千多枝。午间，发电报向孙先生报捷。

淡水之战，对于黄埔军官学校的学生们来说，是在最初的正规战斗中旗开得胜。

严格执行军纪

不过，正因为是最初受到战火洗礼，也难免会有预料不到的情况发生——教导第二团第七连连长孙良，在苦战正酣的当口，擅自退却，即使是也许处置过严了一些，但蒋总统为了必须严格执行军纪，不得已而宣布处以死刑，并对官兵作了如下的训示，以振刷士气：

‘这次打淡水，是我们最起头的第一仗，不过是发展的第一步，我们的大事业还在后面；有了这样的战绩，将来得个天下无敌的美名，实行我们的三民主义，为国为民，做个真正的革命军。’

东征右翼军，在克复了淡水之后，继续东进；途中虽然遭遇到残敌埋伏，顽强邀击，但仍然于二月二十日经白茫花，攻克平山；三月七日，占领潮州、汕头。

此时，得到林虎所部敌军向棉湖、鲤湖方面南下的情报。林虎部队的意图，是在包抄我军后路。

自黄埔出师以来，一个多月的攻击前进，后方补给线已拉长到四百公里之远，万一后路被敌军切断，则右翼军将整个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故而对于敌军此一行动，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非得要将它打垮不可。

于是，蒋总统乃亲自指挥教导第一、二团回师棉湖。

棉湖之役意义重大

十二日清晨，教导第一团的侦察队在棉湖西方与敌军小部队接触，将之击退。

这个时候，显见敌军大部队必在附近，乃向当地民众探询敌情，有云“二、三万人”；有云“前面山地森林一带，布满敌人”。实数固然不得而知，但敌军确已调来大部队一点，应无疑问。当时手头唯有不够精确的地图一份，只得据以作近于摸索的攻击部署。

首先，以教导第一团第一营为攻击队，向正面挺进；在第一营的后方，配置第二营为预备队；第三营则准备为自右翼包抄敌军侧背的别动队。

十二日夜间，下达总攻击令。

十三日上午九时半，第一营在棉湖郊外河南乡与敌军遭遇，展开激战。敌军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兵力，我军第一营立即被围；作为预备队的第二营赓续加入战斗，但不啻杯水车薪，盖正面敌军，实则是多于教导团十倍的一万多人，故而被包围的第一营面临苦战，伤亡达三分之一以上。

于是，教导第一团团长何应钦乃命令右翼别动队的第三营继续增援上阵，而该营也已经陷于敌军反包围圈内，以致我军唯有靠炮兵队援护，勉强撑持。

在敌军包围之下，艰苦战斗近三个小时之后，到了正午，幸好粤军第七旅及时赶来支援第三营；下午二时，教导第二团继续到达，加入战斗行列。

当激战高潮之际，正好来到前线劳军的军校党代表疗仲恺也穿草着鞋帮忙搬运后方输送来的弹药，士气为之振奋。

得到增援之后的我军，立即转采攻势，迫使敌军阵线动摇，于是乃掌握胜机，追击至棉湖西南约五公里的和顺，却又遭遇埋伏在该处布好火线的敌方增援部队的强烈拦击，以致我军损伤甚大，第一营党代表章琰等干部，就是在这里阵亡的。

于是，我军乃避开正面决战，先将和顺一带的高地占领，以教导第二团迂回行动，由鲤湖方面突击敌军侧背，才将敌军击溃。

十四日清晨，蒋总统再赴前线，视察状况——只不过是一天的战斗，而教导第一团阵亡官兵，便超过了三百名以上，的确是极其激烈的一仗。

牺牲固然很重，不过“棉湖之役”胜利的意义，也是非常之大。继此之后，我军连续攻克河婆、五华，而于二十一日凌晨进入兴宁县城。——第一次东征的一连串战事，到此告一段落。

‘士兵之阵亡及因伤残废者，共计六百余人，以第一期随余出征五百之子弟，与教导团三千同志之军，死伤几达三分之一。……呜呼！吾校同志，前仆后继，每于肉搏登城、碧血淋漓之时，毫无悸怖状，浩然捐身，乐如还乡，总理主义之所感也！……’（注）

总理逝世晴天霹雳

当天～二十一日，驰电汕头，向粤军许（崇智）总司令告捷。

下午五时，粤军总司令部行营接到胡汉民的电报：

“总理逝世！”

真是一个晴天霹雳！

注：蒋总统-“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学录序”（一九二五四）

演说大亚洲主义

国父孙先生因肝癌逝世于北京，是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享寿虚岁六十岁。

中央党部唯恐影响前线士气，故而讣报传达到东征战场，是在九天之后。而在这个期间的棉湖血战，非常奇妙正好是成了告慰孙先生在天之灵的战役。

国父离粤北上经过

现在得回过头来叙述一下孙先生的毕生最后之旅——离粤北上过程。

孙先生是在上一年～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由广州乘永丰舰出发，途经黄埔，视察陆军军官学校，然后转往香港，换乘日本邮船“春阳丸”，于十七日到达上海。随行者，有孙夫人及汪兆铭、邵元冲、李烈钧等二十人。

北上目的，一如在十一月十日发表的“北上宣言”之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及废除不平等条约。

北上途径，是由上海取道日本，而非直接前往北京。因为当时津浦铁路不通，同时，自上海驶往天津的轮船客满，订不到两个星期以内的舱位。

不过，孙先生还有一个意向——就是利用此行机会，在日本对中国的时局加以说明，并打算向日本国民就废除不平等条约，有所呼吁。

孙先生一行，于二十一日乘日本轮船“上海丸”首途，经过长崎，二十四日到达神户。

在神户停留了六天。

过日演说大亚洲主义

其间，在二十八日所举行的演讲，就是有名的“大亚洲主义”。这次讲演，是应神户商业会议所等五团体的邀请，在神户高等女学校举行。

在讲演中，孙先生为了整个亚洲的发展，要求日本排除“霸道”，选择“王道”，其要点如下：

“亚洲为世界最古文化发祥之地，东洋为一切文化之源泉。近世以来，欧洲各国压迫亚洲各民族。日本明治维新，废除不平等条约，发愤为雄，为亚洲复兴先驱，使亚洲全部之各国家民族，寄予无限希望；尤其日本战胜俄国，为最近数百年亚洲民族战胜欧洲人之首次，亚洲民族，同感兴奋；若波斯、土耳其、阿富汗、阿拉伯、印度等，闻风鼓舞，遂各起独立运动。

“亚洲东部最大之民族，厥为中、日，实为亚洲种族之原动力。亚洲人之觉醒，大为西方帝国主义者所恐怖。

“亚洲文化，为王道之文化，以仁义道德为中心；欧洲文化，为霸道之文化，以功利强权为中心。东洋物质文明，虽不如西方；而东洋之道德，实高出于西方。

“吾人要造成‘大亚洲主义’，便应以王道为基础，另外又学欧洲科学以自卫。

“日本民族既有欧美霸道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之本质，对世界文化之前途，或为西方霸道之鹰犬，抑为东方王道之干城，是在日本国民慎择之耳！”

就在讲演“大亚洲主义”的同一天，又在神户各团体欢迎宴会上，以“日本应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为题，发表演说，要求日本协力，内容是这样的：

“日本若能真心与中国亲善，务先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回主人之地位，复中国人之自由，两国于是方可言亲善。以数千年之历史言，中国为兄，日本为弟，兄弟之聚会，先求一家和睦。……为弟者，应为兄担忧，助兄奋斗，改良不平等条约，脱离奴隶地位，然后，中、日方能再作兄弟之邦。”

这两次演说，是在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们对中国侵略的图谋，给予强烈警告；同时，也是孙先生毕生最后的演说。

抵达天津肝病转剧

孙先生于三十日乘“北岭丸”轮船由神户出发，十二月四日到达天津。

天津正值隆冬严寒季节，寒风彻骨，对旅途劳累的孙先生不无影响。他在撑持抵达行馆-张园时，身体已在发烧，而且肝也作痛，经德国医生治疗数天之后，热度虽然退去，但肝痛还是过了几天才得止住。

其后，病状稍见好转，体力恢复到可以躺在病榻上和国民党的同志们面谈。

同志们劝请去北京彻底疗养，乃于三十一日到达北京，住入北京饭店。

翌日～一九二五年元旦，迅即延请外国医师六、七人会诊结果，断定肝脏有病，但还不能判明病名。

元月二十日，病情急遽恶化。二十四、五两天，不能进饮食，体温升高，脉搏加快。

二十六日，经医师团决定移往协和医院，施行剖腹手术，肉眼可见肝脏坚硬如木头，经显微镜检验，断定为肝癌末期症状。

至少是在三年前就已经罹患了的癌症，早已超过了药物效率可能治疗的阶段；此时，虽然已有镭锭放射的医疗方法，但为时已晚，终于群医束手，回天乏术！

国父病入危笃

对于病入危笃状态的孙先生，同志和家族们在绝无指望中还寄予一线希望，就是劝他接受中医治疗。

孙先生本人是受过西洋医学教育的医生，内心并不相信中医，只是为让家人安心而接受了建议。

不过，他认为住在医院受西医诊视而并服中药，是对医院方面不诚，所以于二月十八日出院，迁回铁狮子胡同行馆。

中医治疗，也是毫无效果。二十四日，喉内痰阻，神智渐感不清，情势甚为危急。

国父赞成遗嘱原稿

在行馆侍疾的同志们，考虑到万一不讳，希望请孙先生签署遗嘱，于是，乃由宋子文、孙科、孔祥熙、汪兆铭四人承担起这一件事。

汪兆铭挨近病榻旁边，委婉地说：

“当一月二十六日，先生进入病院，诸同志皆责备我等，要请先生留下些教诲之言，俾资遵循。如先生之病迅即痊愈，固无论矣；设或不痊愈，吾人仍可永远听到先生之教训也。吾等固知先生有力量以抗病魔，吾等亦愿助先生以抗病魔，惟亦思趁先生精神较佳时，留下些许教诲，则十年二十年后，仍可受用也。”

孙先生听毕汪兆铭的话，沉思有顷，郑重地答复：

“我何言哉，我病如克痊愈，则所言者甚多，惟先至温泉休养，费数日之思索，然后分别言之；设使不幸而死，由汝等任意去做可矣，复何言哉！”

汪兆铭又说：

“先生之病，不久当可痊愈；祇恐调养需时太久，难以处理公务，而本党又际重要时会，6[28]1340其进行不能一刻停滞，还请先生早赐训诲，以便吾等遵守，以利党务进行为是。”

孙先生再度沉默了好一会，然后这样地说：

“吾若留下说话给汝等，诚有许多危险。当今无数敌人正在围困汝等，我死之后，彼辈更将向汝等进攻，甚至必有方法，令汝等软化；如果汝等强硬对抗，则又必将被加害，危险甚大。故吾仍以不言为佳，则汝等应付环境，似较为容易也。……”

话说完之后，孙先生又闭上了眼睛。

但汪兆铭还是继续地说：

“我等追随先生奋斗数十年，从未巧避危险，此后危险何畏？……”

“汝等欲我云何？”孙先生开口了。

汪兆铭这样地答覆：

“我等今已预备一稿，读与先生一一清听。先生如肯赞成，即请签字，当作先生之言；如不赞成，亦请别赐数语，我可代为笔记。”

孙先生点点头。汪兆铭乃取出一张纸，低声慢读，这是汪兆铭事先写好的稿子：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先生听毕，很满意的样子点点头说：

“好呀！我甚赞成。”

这篇稿子，是孙先生对党员的遗嘱。

接着，汪兆铭又拿出了对家属的遗嘱稿，诵读如下：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孙先生对于这一篇遗嘱也点点头说：

“好！我极赞成。”

汪兆铭马上就取出笔墨，要当场请孙先生签名，但孙夫人在房外哭泣甚哀，孙先生好像是考虑到不忍激起夫人绝望的感情，便对汪兆铭说：

“汝暂时收存可也，今日不须签字，俟数日后再酌。吾总还有数日之生命。”

汪兆铭乃将两张遗嘱摺好，放进口袋，退出病室。

唯凭强烈意志撑持

其后，孙先生的病况，日益恶化，曾经试用过日本发明的新药注射等各种方法，但毫无回天征象，唯有凭强烈意志，延驻着勉强撑持的状态。

国父逝世

对绵惙病榻的孙先生来说，最大的安慰，是东征军在广东势如破竹的捷报，曾逐一向他报告。当攻克淡水报捷时，汪兆铭曾有覆电：“介石兄鉴；接铣午淡水捷报，逐句禀告总理，不胜欣佩。……”其后，在平山的胜利，及克服潮州、汕头报告，也都曾转报孙先生知道。

可是，他的病况则日益恶化，据侍疾德国医师报告如下：

“二月二十五日，第七次报告：病者益趋衰弱，眠食俱减；惟体质虽弱而神智仍极清明，脉搏一百二十五，温度三七五。”

“三月一日，第十一次报告：病者体况因昨夜甚为安好，今日呈较光明之气象，所进滋养品已略增。”

“五日，第十五次报告；病者腹部今日因水分微增略胀，但并未感受若何不适。”

“十日，第二十次报告：病情日益危险，体力渐次消失，水肿亦增剧，现脉搏一二五，体温如常。”

“十一日，第二十一次报告：状况较昨日更恶，腹中水分增加，不得不取出，以减少压迫与呕吐。昨夜颇安静，惟已渐不愿进食。体温如常，脉搏一五○至一六○，呼吸十八。”

在遗嘱上签字

三月十一日早晨，何香凝（廖仲恺之妻）催促汪兆铭说：“现在不能不请先生签字了！”

孙夫人也说：“到了这个时候，我也不愿再阻止……”可是，大家都很踌躇，不忍向孙先生开口。

到了正午，孙先生忽然张开眼睛，向在病室里的家人同志们示意走到面前，他说：

“现在要分别你们了！拿前几天所预备的那两张字来呀，今天到了签名的时候了。”

汪兆铭拿上两张遗嘱和孙科用的钢笔。孙先生手腕无力，颤颤抖抖；孙夫人含泪托起他的右手，使他捏住钢笔，扶着手签了下去，签得很清楚。

当时，围绕在病榻边的，除孙夫人和公子孙科之外，还有吴敬恒、宋子文、孔祥熙、汪兆铭、戴恩赛、邵元冲、戴传贤、邹鲁、张人杰、陈友仁、何香凝等十多人。

正当这个时候，英文秘书陈友仁突然拿出一份英文草稿——是他和俄国顾问鲍罗廷所秘密起草的“致苏联遗书”。

宋子文接过这篇冗长文稿，诵读一遍，它和前面两篇业经同志们郑重讨论的遗嘱不能相提并论，是共产主义者们在不为人所共见的情况之下擅自草拟，并且事先未作说明，却当孙先生临终的时候才提出来的。

是故，孙先生并未在上面签字。中国国民党也没有承认这是孙先生的遗书。至于其内容如何，概未预闻。

有没有英文本的第三遗嘱存在，在后来引起了争论。据中国共产党的说法——这个遗书是写给苏维埃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同志”的，表明国民党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永远联合，是中国国民党应该采取“亲俄容共路线”的根据。

可是在国民党方面，则连它的存在都是予以否定的。

和平奋斗救中国

遗嘱签名之后孙先生和夫人谈话颇久，然后对同志们说：“我此次直上北京，为谋和平统一。我所主张统一方法，是开国民会议，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建设新国家。……甚望诸同志奋斗努力，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达到实现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之目的。如是，我在九泉之下，亦堪瞑目。”

说完这些话之后，孙先生呼吸困难，一面喘息，一面断断续续地微呼“和平”！“奋斗”！“救中国”！……“介石”！“介石”！……

十二日，早晨九时稍过，孙先生唤汪兆铭近前，好像要说什么，但发不出声音来，汪兆铭劝他睡一睡；他的喉咙里阻满了痰，面孔变得灰白～～九时半长辞人世。

‘总理的逝世，原是由于肝病复发，但是总理之所以罹此不治之症，乃由于革命奋斗、积劳瘁忧愤于一身，有以致之。……总理的这种冒险与牺牲的精神，不只是普通的流血牺牲，而乃是发其救国救民之“大仁”，以“死天下之心”，激励全党同志“重新担负起革命的责任”，树立了革命精神懔然万古的宸极！’（注）

注：蒋总统-“革命历史的启示和革命责任的贯彻”（一九六九三）

正当这个时候，英文秘书陈友仁突然拿出一份英文草稿——是他和俄国顾问鲍罗廷所秘密起草的“致苏联遗书”。

宋子文接过这篇冗长文稿，诵读一遍，它和前面两篇业经同志们郑重讨论的遗嘱不能相提并论，是共产主义者们在不为人所共见的情况之下擅自草拟，并且事先未作说明，却当孙先生临终的时候才提出来的。

是故，孙先生并未在上面签字。中国国民党也没有承认这是孙先生的遗书。至于其内容如何，概未预闻。

此时，忽有英文秘书陈友仁提出一英文稿，为致苏俄遗书，系鲍罗廷与陈合起，由宋子文口诵一遍，亦由中山先生匆忙中签字，因而此遗嘱遂成为有争议之件，党内未将其列入遗嘱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孙中山详传》，下册，第一一七七页，有共产党方面的国父遗嘱记录，抄录如下：

中山先生遗嘱：

（一）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着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中华民国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孙文。三月十一日补签。

笔记者汪精卫证明者宋子文邵元冲戴恩赛孙科吴敬恒何香凝孔祥熙戴季陶邹鲁”

（二）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中华民国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孙文。三月十一日补签。

笔记者汪精卫证明者宋子文邹鲁邵元冲孔祥熙吴敬恒何香凝孙科戴季陶戴恩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读者注意◎◎在这本《孙中山详传》中明列了两个遗嘱◎之后，该书没有列出第三个“致苏联◎遗嘱”！◎◎所以到底国父有没有在陈友仁的英文稿◎上签字？◎前面两份遗嘱都是慎重其事的签字，◎◎为什么第三份“遗嘱”是“匆忙中签字”◎？？◎◎为什么第三份“遗嘱”不敢公布？！◎◎第三份“遗嘱”没有笔记者、没有证明者◎吗？◎◎由四人帮垮台以后，中共公然发表其篡改◎过的照片（一排人之中，少了四个人）。◎◎由民国十年至苏联变“苏修”这四十多年◎之间毛共一向是俄共的小弟党，全力为俄◎作猖！◎◎由俄国三百多年以来，始终图谋掠夺我国◎领土的史实，◎◎我们可以结论：◎◎俄国需要这一份“致苏联遗嘱”！◎毛共为俄国的利益办事！◎◎所谓“匆忙中签字”的“致苏联遗嘱”◎是俄国与中共联手伪造的事！！◎◎国父没有签这一篇所谓的“致苏联遗嘱”！！◎◎自由人中国八十八年七月十八日

誓承总理遗志

孙先生的遗体，在协和医院施用了防腐手术，得以永远保存。北京政府拟行国葬，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北京委员则以基于平等原则用国民体制，拒绝国葬。三月十九日（一九二五年）移灵，由同志二十四人舁挽灵榇至中央公园内社稷坛安放，沿途护送民众约十二万人。

四月二日，灵榇移厝北京西山碧云寺，以迄遵从遗言安葬于南京紫金山，则是在完成北伐、统一全国之后的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

各方哀悼伟人之丧

悲悼孙先生逝世的声浪，自世界各地潮涌而来：

伦敦泰晤士报——“凡熟知孙逸仙博士艰难多故之生涯者，对于孙氏如此失败以终，必掬诚哀惜之。”

美国各报——“孙逸仙博士为近代民族自决运动史上独一无二之杰出人物。印度、土耳其、波斯、埃及等国，尤以彼等所理想化之孙逸仙为唤起国民革命之口号。……”

在孙先生生前彼此交谊深厚的犬养毅，也深致悼惜地表示如下：

“先生为中国革命生，更为中国革命死；无先生即无今日之中国。先生凡所作为，实古今中外历史上第一人。此次之死，不独国民党受打击；即全中国、全世界东西民族皆受打击也。”

当时，还在日本人统治之下的台湾，也有很多人表达出发自内心的哀悼。

三月二十四日晚间，由台北有志社发起在台湾文化协会文化讲座（现台北市贵德街）举行追悼大会；可是日本当局则对此横加干涉，将有志社干事传到警署问话，并且禁止歌唱为大会所制的吊歌，以及将吊辞删削一百多字，同时不准在大会上演说。尽管如此干涉，但当天在大雨滂沱之中，到会者约五千人，有二千人挤不进会场，是一次盛大的集会。

至于被禁止的吊歌，则被同胞们一个教一个地歌唱着。

此外，用中文发行的“台湾民报”（在东京印刷、台湾发行）更于四月十一日的社论中有如下的申诉：

“呜呼！中山先生逝矣！民国的元勋，汉民族的领袖，东亚的大明星，世界的大伟人。……追悼伟人一事，何等寻常，而又又一番干涉，什么吊歌不可唱，吊辞要检阅。……唉！一伟人的死，我们台湾人不该放声大哭？……”

蒋总统在前线骤闻噩耗

孙先生的逝世，对于在广东东江作战的革命军，更是给予了相当的冲击。

蒋总统在当时骤闻孙先生的噩耗，茫然自失，甚至想到自杀。

可是军临前线，不容许只顾沉浸在哀伤气氛中，而必须勉抑悲痛，益励初衷。——遂即与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谭延闿等人联名向全国同志发表通电：

“谨承总理遗志，继续努力革命。”

二十五日，在野战医院抚视伤病兵之后，撰感言如下：

‘斩草须要除根，擒贼必先擒王，不诛叛逆陈炯明，不算革命真男儿，剜其心肝，祭我总理神灵，肃清东江余孽，实行三民主义，继续先列生命，完成本党责任。’

三月二十七日正午，在克复之后的兴宁县城东门外集合黄埔军官学校教导第一、二两团全体官兵，为哀悼孙先生而训话如左：

‘总理的死，是本校、本党最悲哀、最不幸的事；也是我们世界人类最大的损失。……总理去年起程北上的时候，经过本校，……他对我说：“人总是要死的，不过要死得其所。我今天能看到黄埔的长官、学生、士兵们这样奋勇的精神，可以继续我的生命，所以我虽死也能安心。”

‘……总理的病，和他的死，全因为主义不能彻底实行。且陈炯明叛党以来，已有三年之久，而党员不能除掉这个区区叛逆；所以忧愤成疾，以至于死。

‘……总理虽死，他的灵魂在上，……一定会来保护我们的。只要我们努力奋斗，终可以不负总理的一番苦心！’

实行革命至死不渝

三十日，复在兴宁县北门外刁屋坝举行“追悼大元帅及阵亡将士大会”，各军官兵以及县属政、学、农、工各团体约共五千人列队参加，在大会中恭读祭文如下：

‘……英士（陈其美）既死，吾师（孙先生）期我以继英士之事业；执信（朱执信）踵亡，吾师并以执信之责任归诸中正。……忆自侍从以来，患难多而安乐少，每于出入生死之间，悲歌慷慨，唏嘘凄怆，相对终日，以心传心之情景，谁复知之。……今唯有教养学子，训练党军，继续生命，复兴中华，以慰在天之灵而已！……’

公祭之后，更在孙先生灵前宣读誓词：

‘我陆军军官学校全体党员，敬遵总理遗嘱，继承总理之志，实行国民革命，至死不渝。谨誓。’

共党进行离间

共党分子们，则因孙先生逝世而抓到了制造国民党分裂的绝好机会。他们在第三国际及国民党的俄国顾问鲍罗廷指挥之下，把失去了孙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分化为“左”、“中”、“右”三派，制造其内部抗争，俾利用其嫌隙来攫夺党的主导权。

共党策略三个步骤

共产党的策略，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联合所谓国民党“左派”及“中派”，以打击“右派”。

第二步——在所谓“右派”势力被打倒之后，则以“左派”为所谓“新右派”，加以打击。

第三步——在将所谓“新右派”打倒之后，再以“中派”为打击对象。

最初为鲍罗廷所属意的，是汪兆铭。首先把汪捧为“左派领袖”，和他拉拢起来。

先是，当孙先生尚且健在时，鲍罗廷和共产党徒们便已经开始物色于他们有利的国民党后继领导人。

据胡汉民在后来透露：他们所推举的标准，是要找出一位具有“相当声望”而又“夙无主张、夸夫死权”的人。最初在鲍罗廷拟议中的有胡汉民、汪兆民、戴季陶三人；但在经过详加考虑之后，认为胡汉民是“难相与”，戴季陶是“拿不定”，都不适合需要；剩下来的汪兆铭，他在以前虽曾反对“容共政策”，但却是“有野心可加利用”。——根据这个理由，乃把汪列为第一候选人。当鲍罗廷向汪表示“今后你将是中国国民党领袖”的时候，汪为之欣然色喜。

可是，在共产党方面，却并没有一下子便把汪兆铭抬上国民党领袖的宝座，而只是主张国民党由“个人领导”转变为“集体领导”——也就是改为“合议制”。他们的意图，是借“集体领导”之名，制造国民党内部磨擦、分裂，然后诞生出于他们有利的领导人。

革命政府，在孙先生逝世之初，首先暂由胡汉民以代理大元帅的身分处理一切政务；而鲍罗廷等人则立即为他扣上“右派”的帽子，并标榜汪兆铭是“左派”。胡、汪二人本为多年同志，友情深厚；可是由于鲍罗廷像这样地替他们画上不同的脸谱，把他们位置在对立的境地，乃给予人以国民党已有左右分裂的印象。

接着，共党分子便更进一步鼓吹左派是“革命的”，右派是“反革命的”，其目的，是在贬抑胡汉民的党内声望。

改组成立国民政府

六月十四日，胡汉民在大本营召集中央政治委员会议，会中决定将大本营改组成立国民政府，国民政府采取委员合议制的“集体领导”制度。

七月一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于广州，选出汪兆铭、胡汉民、张人杰、谭延闿等十六人为政府委员。

委员之中，有汪兆铭等十一人出席最初的会议，互选主席。掌握着这次选举主导权的，则是以顾问身分参与会议的鲍罗廷；结果，汪兆铭获得全票十一票而当选主席。

七月三日，又成立了由委员八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汪兆铭与蒋总统均为委员；在这个委员会中，也是由汪当选主席。

一如鲍罗廷的预定计划——达成了让共党分子所中意的人物站上政、军双方面的最高位置。

在此之后，汪兆铭便在鲍罗廷的指挥之下进入了着手排斥胡汉民的局面。

正当国内政局动荡不安的同时，又连续发生了国际纠纷——就是上海的“五卅惨案”和广州的“沙基惨案”。这些事件，在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不平等条约而导发的民族主义运动方面，发生了极大的作用。

上海发生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肇端于日本人经营在上海租界的纺织工厂中所发生的杀害童工事件。

日本基于“甲午战争”之后和清廷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得以在中国国内各通商口岸设立工厂。

惨案发生的当时，在上海有日本人所经营的纺织工厂达二十二家之多，占上海所有纺织厂总数的三分之二。这些工厂的经营，是建立在利用中国原料和对中国工人给予低微工资及过酷劳动条件的基础之上——工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时，而工资却只有一角五分，只及同设在上海的他国工厂工资的四分之三。而且日本工厂厂主为了束缚工人，不让离厂，更复强迫规定扣留工资百分之五，由厂保管，十年后归还；如果中途离工，则将之没收。如此刻薄的规则，当然激起了工人们的不满。

一九二五年二月，在日本人所经营的内外棉纱厂第八工厂的堆纱间内发现有童工尸体一具，胸部受伤十余处，是被日本管理员用铁棒欧毙，隐藏在那里。

当时工人们大动公愤，所有日商工厂全体罢工，参加者达三万人；而租界当局则意图强迫复工，但工人们不肯屈服，罢工曾达两星期。

结果由上海总商会联合会出面调停，日本厂方让步，答应不打骂工人和每两周发放工资一次，工人们才恢复上班工作。

但是，到了四月间，罢工风潮传染到在青岛的日商纺织厂；五月，上海再度引起罢工。

中国工人的激愤，终于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反日运动。

沙基惨案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导发工人全面罢工的上海内外棉纱厂，竟以工人罢工及原料不足为藉口，将第七厂厂房锁闭停工。

工人方面，乃推出顾正洪等八人为代表，和厂方交涉；此时，厂方日人突然开枪射击，顾正洪身中四枪死亡，其余七人负伤。

顾正洪死亡消息传开之后，在内外棉纱厂所属的第五东厂、第五西厂、第七、第八、第十二各厂群情激愤，一致罢工。日本方面恐怕事件扩大，乃请求租界工部局调派大队巡捕到厂弹压，并逮捕激烈工人；此外，更由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要求中国官厅约束工人行动，并以威吓态度表示——如果中国官厅办不到，日本将派遣军队前来镇压。

英警枪杀游行学生

二十二日，举行顾正洪追悼大会，有参加活动的上海大学学生四人被租界巡捕逮捕；于是，工人和学生们的激愤更为之达到顶点。

五月三十日，上海学生联合会动员了大、中学生二千人到租界内展开抗议演说运动。

租界巡捕立即出动，进行弹压，到了午后，逮捕学生多名，分别拘禁在各处捕房。为了要求释放这些被捕者，约有学生两百人在南京路示威游行；乃有英国巡捕又拘捕其中二人，带

往老闸捕房，学生们尾随前往，以致老闸捕房门前挤满了学生及看热闹的群众数千人，叫嚷“把学生放出来！”

此时，英国人捕头爱伏孙召集印度巡捕二十二人，在捕房门口列成半月形，三时五十五分，爱伏孙终于开枪威吓；接着，命令全体巡捕射击。

四十四发枪弹，发射到毫无防备的学生和群众中，结果，有南洋大学学生陈虞钦等十一人死亡，以及身负重轻伤者二十多人。——这就是“五卅惨案”。

这个惨案，在全国激起了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怒涛。

居于领导地位的，是北京大学学生。当惨案发生的第二天～三十一日，在校内集会，协商对策。共党学生以制造惨案者为英、日两国，主张喊出“打倒英、日帝国主义”的口号；但国民党籍学生则认为当此日、英同盟业已解体、两国在远东利害关系对立的时候，打出这样的口号，则反而会强化了日、英两国的合作，而为革命运动全局带来不利的影响，所以应以只打击英国为目标——于是，乃决定了集中一个方向的反英运动。

在北京大学学生的号召之下，全国各地学生、工人、工商业者，群起发动抵制英国货品的反英运动。

沙基惨案伤亡数百

而英国方面，则打算以武力来加以镇压。--六月十一日在汉口、十三日在九江、二十三日在广州沙基、七月三十一日在南京，发生了连续不断的惨杀事件；其中最严重的，是“沙基惨案”。

六月二十三日，广州的工、农、学生约七万人举行了“五卅惨案”追悼大会之后，在市区示威游行。其中有黄埔军官学校学生约八百人并包括教导第一团第三营及第二团第二、四、七各连官兵。

下午二时四十分，游行队伍到达沙基西桥口之际，突然由珠江对岸的沙面英法租界有步枪及机构枪发射过来，枪弹横飞；同时停泊在白鹅潭的英、法、葡各国军舰，也发炮加入轰击，达数十分钟，当场有工人、民众六十人及军校学生与军人二十三人死亡，约五百人负伤，伤亡情形远过“五卅惨案”。

事件发生之后，在广州的革命政府立即向英、法、葡三国驻粤领事提出严重抗议，但三国领事则答非所问，推卸责任；革命政府因外交途径不能获得解决，乃于八月间宣布对英国经济断交，禁止各国来广东的商船经过香港停泊。

罢工抵制帝国主义

同时，香港和广东的工商业者也组织“省港罢工委员会”，宣告对英国断绝经济往来。罢工自是年七月持续到翌年十二月，达一年半之久。在这一段期间，香港工人大多数回到广东，以致香港居民减少百分之四十，商店倒闭约四百家，形同荒岛。——对于统治香港的英国给予了严重的打击。

“沙基惨案”发生的当时，蒋总统在军官学校接到电话报告，深感国耻惨重，悲痛欲绝。翌年，在“沙基惨案周年纪念大会”中致词督励同志，内容如下：

‘去年今日，有一百多个同胞，为帝国主义所惨杀；于是省港工人坚持罢工，使得香港的经济状况到现在尚未恢复。所以我们对于“六二三”的纪念日，是永不可忘的日子。此后我们的工作，要使省港罢工得到最后胜利，使香港英人屈服于我们，取消帝国主义束缚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我们高呼——沙基死难烈士精神不死！省港罢工得到最后的胜利！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沙基死难烈士精神万岁！

‘各位同志，不可忘记帝国主义去年今日惨杀的纪念日，我们要收回香港，打倒英帝国主义。’

国民革命军成立

在孙先生逝世的悲痛时期，获得战争胜利之后的黄埔军官学校教导团，正式编组为“党军”。

当时，包括“党军”在内的东征军主力，离开广州，正在广东省东江地区。

讨伐杨希闵刘震寰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蒋总统到汕头粤军总司令部行营与总司令许崇智及军校党代表廖仲恺会商军事计划，为谋巩固内部，决定讨伐滇军杨希闵及桂军刘震寰。

此役重要任务，由党军负责，蒋总统于二十九日受任党军司令官。

杨希闵和刘震寰两人，本以友军地位在东征期间担任“左翼”军和“中路军”任务，但却按兵广州，迟徊不前，意存观望，任由“右翼军”孤军奋战。

他们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和北京政府及陈炯明已有沟通，在窥伺着乘广州空虚而将之据为私有的机会。

而且，他们在广州，向老百姓擅自征收军费，破坏革命政府的统一财政措施，为所欲为。

先是，在三月十二日东征军攻克兴宁之际，业经在敌军林虎的司令部搜获杨希闵和陈炯明往来密电多封，是杨、刘二人私通敌人的确实证据，并经调查结果，判明情况如左：

一、刘震寰曾亲往云南，约好唐继尧进攻广东。唐继尧是在孙先生就任大元帅时被任命为副元帅，但不肯就任，乃是一个抗命分子；但到了孙先生逝世之后，却打出副元帅的旗号，调集军队逐渐东向粤省移动，刘震寰则为其内应。因此，国民党已剥夺了他的副元帅名义，通电声讨。

二、杨希闵曾去香港，与英国人勾结，向北京政府活动，希望得到广东督理的任命。

杨、刘所部滇、桂军，陆续向广州集中，到了如此地步，已经不可能再有和他们合作的余地；如果让他们留在革命阵营，则反而只会增加了危险性。

五月二十一日，蒋总统下令何应钦指挥的党军第一旅和陈铭枢指挥的粤军第一旅等部由梅县开拔，回师指向广州。

六月三日，师次平山途中。蒋总统向党军训话，说明此次战斗的意义如下：

‘大元帅几十年辛苦建设的革命政府根据地广州，将被反革命的军阀唐继尧和假革命军杨希闵、刘震寰等勾结危害。……孙大元帅建设的革命政府根据地，就如同我们祖先遗下来的产业一样；我们祖先千辛万苦遗下的产业，无故被强盗夺去，这不是我们做子孙的耻辱吗？所以我们这次回去，一定要打倒那些卖国殃民的强盗军队，打倒阻碍我们实行主义的叛逆，保持我们革命根据地。……’

当我军回师迫近广州时，杨、刘等部慌忙要向前方出军，布防迎战；然而当时“广九”（6[53]1365广州-九龙）、“广三”（广州-三水）、“粤汉”（广州-汉口）三条铁路及水上船舶都因工人罢工，使杨、刘军队无法调动。而发动罢工者，则为军校党代表廖仲恺。

革命军夺回广州

六日晚间，回师的革命军集结于樟木头，部署攻势之后，由党军第一旅为前锋，经过石龙，于九日攻占石滩。敌军则在龙眼洞及广九铁路一带部署了大部队，意图遏阻我军前进；我军即以主力进攻龙眼洞，并派出一部分兵力沿广九铁路攻击前进。

十一日下午，攻克龙眼洞；到次日上午，控制了附近冲要地带。

另一方面，沿广九铁路进击部队，则在瘦狗岭一带遭遇到设有强固防御阵线的敌军反击。

我军方面，海军炮舰发炮射击，同时航空队也出动轰炸。

在这次战役中，敌方防卫广九铁路的滇军师长赵成梁阵亡，全军溃败，退往广州市内。

我军追击溃军，突入市区，迅将士气业已瓦解的敌军武装解除，其人数达两万之多，渠魁杨希闵、刘震寰二人则逃入沙面租界，托庇于外国保护。

在夺回广州的同时，蒋总统受任广州卫戍司令，担负恢复治安任务。此时，曾被敌军狙击兵狙击，幸免于难；又在广州市北部地区，曾有一部分敌军反攻，也被顺利扑灭。——盘踞革命根据地广州的假革命军，到此得以肃清。

国民革命军二次东征

于是，中华闵国国民政府乃于七月一日成立于广州，过去隶属于革命阵营的军队，统归“军事委员会”管辖，改称“国民革命军”；所有冠以地区名称而带有军阀时代遗留痕迹的部队，才为之消失。

八月二十六日，发表改编后之各军军长姓名如下：

第一军（原党军）-蒋中正

第二军（原建国湘军）-谭延闿

第三军（原建国滇军）-朱培德

第四军（原建国粤军）-李济深

第五军（原建国粤军）-李福林

改编之后的“国民革命军”，其最初的战斗任务，是“第二次东征”。

先是在二、三月之间的“第一次东征”中被击败的陈炯明属下洪兆麟、林虎等部，因誓愿向东征军归顺，经许可照旧留驻原地；然而他们只是伪装投诚，他们为了想夺回广州，一俟革命军主力回师之后，乃又有意伺隙蠢动。及至国民政府忙于处理“沙基惨案”善后事宜，暨廖仲恺被暗杀事件发生（后面另有叙述）而内部动摇之际，乃乘机于九月一日再度叛乱。6[55]1367当时留驻潮梅的国民革命军，被超过三万人的叛军所压制，节节败退；叛军终于在九月二十七日伸展到距离广州只有一百五十公里的平山。

惠州之役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匆忙决定再度东征，并且决心在这一次出动大军彻底肃清盘踞粤省东江方面的叛军。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八日，蒋总统受任“东征总指挥”，立即下令国民革命军出师，以第一军和第四军为主力编成三个纵队，由何应钦、李济深、程潜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各纵队长。此时，共产党徒周恩来被任命为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

东征军的作战计划，是采取中央突破行动，一鼓作气，直捣陈炯明的老巢——惠州。

惠州号称东江锁钥

惠州城的南、西、北三面环水，背后枕山，为易守难攻之地，自古以来号称东江锁钥，现在有杨坤如率领三千人婴城固守。

对惠州城的进攻，以第一纵队为主力。

十月十三日上午九时半，东征军野炮首先点燃炮火，展开激烈战斗。

在东征军猛烈炮轰之下，惠州城北门一带楼垛已有崩落。下午二时，第一纵队所属步兵第四团通过北门桥，进逼城脚，力图突破北门；但在敌方弹雨之下，虽经五次冲锋，仍未能攻入城内，伤亡奇重。

下午四时，终于冲到城下，靠起竹梯，但仍旧未达登城目的，第四团团长刘尧宸便曾亲挟竹梯率领敢死队肉搏前进，中弹阵亡。

继伤亡过半仍然艰苦奋战的第四团之后，复有步兵第七、第八团及补充团加入火线，赓续冲锋数次，都未能突破火网；及至夜幕低垂，只得姑且收兵。

翌日～十四日上午，下令各部队继续攻城，而在昨天已经牺牲极大的步兵第四团仍愿站在进攻北门的最前线。

总攻击开始于下午二时，第四、八两团攻打北门；第七团、补充团则疾趋西门。

野炮、山炮发挥全力，轰击北门。

由敌方扫射过来的强力火网，是隐伏在北门城楼旁边草棚中的机关枪，藉着城楼掩蔽，受不到我军炮火威胁；我军察觉此一情况，乃将山炮调移北门附近，第一弹发出，便摧毁了这个机枪阵地。

趁此机会，第四团官兵蜂涌冲到城下，靠起竹梯，一鼓作气，攀登城垣。——是在下午三时左右。官兵们在缘梯爬城之际，纷纷投掷手榴弹，敌军北们防线为之崩溃，我军一个接着一个跃入城内。

此时，杨坤如仍然留在城内的司令部里负隅顽抗；但在东征军乘势猛攻及激烈炮轰之下，很快地便垮下去。

杨坤如本人也负了伤，乃率领残兵向紫金方面逃遁；及至傍晚，东征军控制了惠州。

蒋总统在入城之后，向广州的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发电告捷：

‘……惠城夙称天险，有宋（宋朝）以来，从未能破；今为我革命军一鼓攻克，虽由将士奋勇用命，亦我先大元帅在天之灵，有以佑之。……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总指挥蒋中正叩。’

第二次东征的成败关键，就是系乎此一惠州之役；而旗开得胜并且是突破了最大难关的东征军，乃为之声势大振。

肃清东江各地

东征队伍在稍事整理之后，复于十月十七日再度东进。第一纵队为右路军，循第一次东征相同路线前进，在掌握住海丰等要冲之后，于二十六日到达河婆。

同时，担任中路军的第二纵队，也推进到紫金方面；左路军的第三纵队，则由河源沿东江挺进，攻克了五华

在东征军势如破竹的进击之下，束手无策一再败退的敌军，却于此时在塘湖一带集中主力，反扑过来。

十月二十七日，何应钦率领第一纵队第三师在塘湖附近最初和敌军解除，得悉敌军兵力在五千人以上，乃暂时退回到洋湖脚。但第一纵队第一师则将继续向河婆方面推进前来的敌军击退；继之，更驰往紫金方面支援第二纵队，十月二十八日，在梅林附近将敌方大军四、五千人包围，并解除其武装。

残败敌军，战斗力丧失，士气衰落，东征军遂于十一月初肃清了东江各地。

十一月六日，蒋总统在汕头发表收复东江通电。自永丰舰事件以来，历时四年多，才得将叛逆陈炯明势力驱逐于广东之外，实在是感慨无比的胜利。通电内容如左：

‘中正受命东征，赖将士一心，人民赞助，自上（九）月六日出师，迄本日适为匝月，经将逆军主力完全击溃，先后缴枪六千余枝，大炮七门，机关枪三十余架，俘虏六千余人。……师行六百余里，四民簇拥而观，箪食壶浆以迓；至汕头登岸时，群众欢迎，尤为热烈。自愧无以当此，念我伤亡将士，益为泫然！……’

次日～七日，在汕头市，有数万民众举行“欢迎东征军大会”，爆竹响声彻耳，参加庆祝游行的人群，充塞通衢。

巩固北伐根据地

由于东征奏功，国民政府得以巩固了出师北伐统一全国的根据地。

廖仲恺被暗杀

现在要再度提到共党分子的阴谋活动情形。

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于第二次东征之前的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

汪兆铭受鲍罗廷操纵

汪兆铭就任国民政府主席及军事委员会主席，独据政、军领导地位；但在他的背后，则是来自苏联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在前面已经提过——鲍罗廷认为汪兆铭是最容易被共产党操纵的人物，故而把他捧上主席的地位；因之鲍罗廷乃得在党、政各方面发挥极大影响力，掩护共党分子猖獗的篡党活动。

国民党员的不满情绪，则为之日益高涨。譬如党的青年部长邹鲁便曾责难：“鲍罗廷和汪兆铭这样垄断下去，中央党部等于不复存在。”又邹鲁兼任广东大学校长，为防青年学生们被共产主义所诱惑，故而在校内散发反共传单；于是，共产党徒便诋毁广东大学是“反革命大本营”。

过去，在孙先生领导之下团结一致、共矢达成国民革命的中国国民党，由于共党分子的分化工作而出现了裂痕，逐渐扩大。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于八月二十日发生了廖仲恺被暗杀事件；而共产党徒则利用此一事件制造政治问题。

这一天～～八月二十日的上午九时五十分，廖仲恺为出席中央执行委员会而到达中央党部之际，在大门前遭暴徒狙击，受到重伤，当被舁送广东大学医科医院，旋即不治逝世，得年四十八岁。凶手陈顺则被当场击毙。

‘呜呼！总理逝世未半载，而先生突死于凶徒之狙击；是犹慈父见背，而盗又杀其长兄。国民革命之大打击，中华民族之损失；岂祇三千学子，全军壮士痛失师承！……’（注）

廖仲恺是自一九○五年中国革命同盟会组成以来，在二十年间，追随孙先生生死与共的革命同志。在孙先生与越飞会谈之后，与越飞同行前往日本，固然对于孙先生所倡导的“联俄容共”政策有所理解，但却根本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于国民政府成立之际，就任财政部长，在孙先生逝世之后的国民党内，实在是一位重要人物。

廖仲恺之惨遭不幸，使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受到很大冲击。政府下令各机关下半旗三天，所有公职人员都佩戴黑纱一星期志哀。

廖案真相至今未明

问题在对廖案的处理。

国民政府、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廖案发生之后，立即为调查本案而组织“特别委员会”，派汪兆铭、许崇智和蒋总统三人为委员。

特别委员会于八月二十五日下令拘捕胡毅生、林直勉、朱卓文三人。

胡毅生是党内另一重要人物胡汉民（当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堂弟，为反共团体——“革命纪念会”和“文华堂”的领导分子，平时对于混进国民党内的共党分子批评严厉，反对廖仲恺的容共方针。

林直勉是美国华侨出身，曾任孙先生的秘书工作，也是“革命纪念会”的领导人之一。据情报——在廖案发生不久之前，他曾与朱卓文等谈到“非杀死廖仲恺不可”。

朱卓文则是孙先生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以来的老同志，为凶犯陈顺所使用的手枪之所有人，嫌疑最重。

被缉捕三人之中，胡毅生与朱卓文潜匿无踪，林直勉一人就逮。

林直勉指称：“廖仲恺是共产党，他不应该做国民政府的官吏，所以要推倒他。”——虽然直认对于廖仲恺怀有敌意，但却坚决表示与犯行无关。

至于胡毅生，则于逃抵上海后，发表“告国内外同志书”，也否认与凶案有关。

还有朱卓文，在继续逃亡的一年之后，发表“致海内外同志书”，声称：“廖仲恺骤遭狙击，实为民众最后之裁判。”其后即隐姓埋名，及至一九三六年，始化名朱元鼎，兼任广东省中山县土地、建设两局局长，并创办“中山日报”，在该报提到：“在廖案发生之前的一星期，曾有将鲍罗廷、汪兆铭、廖仲恺等一齐暗杀的计划，但被获得情报的公安局长吴铁城所制止，以致未能实行。”

结果，直到今天廖案真相仍未能大白于世，而为凶犯陈顺独自下手的可能性甚大。至于在上述三人之中，除朱卓文由于和陈顺有关连而难卸责任以外，并没有发现胡毅生、林直勉与凶案有关的证据。

问题对廖案本身的真相如何并不相干，可是却造成了重大的政治事件。

八月卅一日，黄埔军校举行追悼廖党代表大会，蒋总统对学生演说如左：

‘……不要忘了——我们学校里、我们党军里，没有什么共产派与反共产派；完全以三民主义为中心，完成国民革命。以后要使廖先生死在地下瞑目，只有奋斗，达到廖先生生前的愿望。……’

蒋总统的意思，是在晓谕大家不要因为廖案而扩大了党内分裂的伤口；可是，事态则正是循着所耽心的途径在发展下去。

这就是视廖仲恺为“亲共者”的共产党徒们，利用他的被害，大作其文章，阴谋达到削弱国民党内反共势力的政治目的。

注：蒋总统-“祭廖党代表文”（一九二五八）

西山会议

由苏联派来、担任国民党顾问的鲍罗廷，在廖仲恺被暗杀事件之后，便伙同汪兆铭，意图左右为处理廖案而设立的“特别委员会”，以期导向于对共产党有利的形势。

共党趁机大肆蠢动

廖案发生之翌日，鲍罗廷便立即拿出“逮捕名单”，其中包括有邹鲁、胡汉民、邓泽如、谢持等国民党有力人士，他是要假藉追究案情而企图构陷国民党首脑；像这样的非法要求，当然不能答应，故而当场为蒋总统和许崇智所拒绝。

然而，鲍罗廷则还是在用尽一切手段怂恿共产党徒，制造“肃清右派”的高潮。

例如谭平山就是遵循中共中央的指示，发表了一篇以“为廖仲恺先生之死敬告一般革命的民众”为题的文字，他煽动地说：“你们大家现在都是和廖仲恺先生同一样目的而奋斗的人，当然是同一样受帝国主义者及反革命派的仇视。你们不杀他们，他们亦杀你们！”

还有周恩来也利用党军政治部主任的地位，连续发表“告人民书”、“告革命军人”、“告工农朋友们”、“檄党军全体将士”等文，以激烈语调呼吁“勿忘党仇！誓报党仇！”号召凭力量裁决。

至于汪兆铭，则利用这个“肃清右派”的呼号来搞垮其最大的政敌胡汉民。因为在孙先生去逝之后的国民党内，汪兆铭、胡汉民、廖仲恺被视为三大实力者，现在廖仲恺已被暗杀，如果再将胡汉民推倒，岂不就成了汪兆铭一个人的天下。

胡汉民是涉嫌廖案而被通缉之胡毅生的堂兄，且又与林直勉比较亲近、故而被共党分子罗织为廖案的“黑后台”，陷于苦境。

胡汉民遭放逐出国

于是，汪兆铭便抓住这个机会，于九月十五日在中央常务委员会议中提出：“请胡汉民同志往外国接洽。”所谓外国，就是苏联。胡汉民以“赴俄养病”及“协商关于政治经济之一切重要问题”的名义出国；但实则等于被放逐一样，于九月二十二日乘苏联轮船“蒙古”号自黄埔首途。鲍罗廷并且藉口为胡汉民料理行旅事务而派遣其心腹陪胡同行，实则是加以监视。

在胡汉民首途之后的一个月的十月十九日，蒋总统的长公子、现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蒋经国，为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也启程前往苏联；当时，蒋总统正为第二次东征出师，攻下惠州，更向东进追击残敌中。

当放逐胡汉民出国的同时，对于驱除其他反共干部，也在策进之中。

鲍罗廷把握了因自“五卅惨案”以来，全国国民民族意识高昂的机会，在政治委员会提议派遣党的重要人员前往华北，从事宣扬国民革命的宗旨。

被推举为代表的，是在党的中央常务委员中以反共著称的林森、邹鲁二人。这是由鲍罗廷幕后示意汪兆铭所提出，乃“调虎离山”之计。

林、邹二人并不是没有察觉到鲍、汪的阴谋，但却接受了这个使命，实则此时他们也正秘密有所打算。

汪兆铭把林、邹二人赶往北京之后，马上就以人所共知的共产党员林祖涵和谭平山继任中央常务委员遗缺。当时中央常务委员为汪兆铭、林森、邹鲁、丁惟汾、于树德五人，可是丁、于二人已在北京，林、邹二人又继之而去，是以在广州的国民党中枢便完全落到了俄国人和共产党的操纵之下。

被迫离开广州的林森和邹鲁，其决心是在公开揭橥反共旗帜，根本改革国民党的体质。为此，先往上海，与反共的戴季陶、谢持、邵元冲、叶楚伧协商，决定在北京召开“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他们一方面和各地反共同志取得联系，一方面陆续到达北京聚会。

对于上述了活动，共产党徒们特别敏感，倾力注意，而且耍出各种妨害手段，甚至发生有共党分子冲进他们的集会场所、暴力斗殴的事件。

十一月二十三日，林森等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的孙先生零前举行“一届四中全会”。--这个会议，即所谓“西山会议”；参加者，后来被称为“西山会议派”。

西山会议宣言

在会议的第一天，便经决议“取消共产党党员加入本党者之党籍”，并发表宣言如下：

“……向者，本党总理允许中国共产党员之加入也，因其声明系以个人资格而信仰本党主义，愿于革命进程中努力于本党主义及宣传与工作，非以共产党党团加入，而欲于本党中别取作用。

“乃两年以来，凡共产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在本党中一切言论、工作，皆系受共产党机关决议与指挥，完全为共产党之党团作用。……盖其加入之意，系图利用本党，发展共产党党势，且藉以维持苏联。……

“然中苏之历史不同，社会之情状亦异，国民革命与阶级革命势不并行。若共产党员长此隐混于本党之中，使两革命团体之党人，因内部问题而纷扰决裂，致妨碍国民革命之进展，不若分之。……”

依据这个宣言，于十二月二日首先决议：开除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九名共产党徒的国民党党籍。

二全大会

“西山会议”接着在十二月四日（一九二五年）议决：开除主席汪兆铭党籍六个月及开除其中央执行委员身分，同时判决汪兆铭罪状，兹摘录数点如左：

（一）任凭鲍罗廷操纵本党中央，并操纵国民政府。

（二）廖仲恺被戕后，听鲍罗廷之嗾使，放逐胡汉民。

（三）对于在十八个月中请假十四个月，潜赴湖南从事发展共产党运动的毛泽东，特地擢任为中央宣传部长。

继之，更于十二月十四日，接收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上海执行部之办公地点，设立“中央党部”，开始别立门户，处理“党务”。

于是，中国国民党乃面临了“西山会议派”和“广州派”分裂的危机。

蒋总统号召同志团结

可是，蒋总统则鉴于为达成国民革命任务而必须党内更加坚强团结的中国国民党，实不能不力谋避免为共产党的阴谋所乘，导致分裂。

‘总理自信三民主义能兼容共产主义，而决不惧共产主义将蚕食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可垂之百世，推之世界，岂在中国革命尚未成功之时而已惧何种主义之蚕食！

‘……中国革命不成，列将敢于侮我，皆国民勇于私斗、党员徒增意气，团员惯于破裂，明知之而故蹈之。’

以上是蒋总统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以东征军总指挥名义忠告西山会议方面反省——不宜有使共产主义正中下怀、拍手称快之活动，并号召海内外同志“大团结”的一篇文章。

然而，情势已经是无可挽回；因为一九二六年元旦，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蓦然进入非摊牌不可的阶段。

蒋总统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一九二五年阳历除夕，由汕头返抵黄埔，以浙江省代表身分出席二全大会。

二全大会遭共党把持

广州的二全大会，是在共产党徒如意算盘的操纵之下进行。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很明显的已为共产党的空气所笼罩，想把我们多少老同志、有历史的同志，完全排出党外。因此，共产党就用所谓“西山会议派”的名义，想把我们多少老同志统统排除净尽。’（注一）

先是，在大会召开之前，组织有“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委员为邓泽如、林祖涵、毛泽东、谭平山、林森等五人。其中林森业已离开广州，非共产党员则只有一个邓泽如，他因讨厌和共党为伍而不愿与会，以致关于大会代表的资格审查，乃落入林祖涵、毛泽东、谭平山三个共党分子的掌握之中。由于他们的袒护，使颇多共产党徒获得代表资格；在大会代表总数二百五十六席中，共党占了三分之一以上的九十席，其中央和省级地方干部差不多都已经列名其中。

在大会期间，共产党员的代表们，以谭平山、毛泽东、张国焘等十一人为干事，组成“秘密党团”，每天至少集会一次，在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指挥之下，行动一致；故而代表人数虽然只是稍过三分之一，但在议事进行和会场讨论方面则发挥了可以充分左右的势力，实则构成了一个“党内党”的局面。

这次大会的焦点，是对于“西山会议派”的处分问题。而共产党则以此问题为其清除反共势力的最好藉口。

‘在二次大会的时候，我不能不负起责任，使党不致破坏，使多少和总理同生死共患难的有历史的同志不至排出党外，使总理不致在地下流泪痛心。所以我当时在广东欢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时候，就告诉许多代表——那时代表的空气很不好，我不顾一切的说：

‘“诸君现在来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中国国民党是由总理遗交下来的，我们应该以总理之心为心，以总理之意为意，不要使我们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结果，以致使总理天天在天上哭。”

‘我讲出这句话，多少共产党色彩的代表，完全取反对的态度。我仍贯彻主张的继续讲：

‘“我们如果一定要排斥老同志，想由自己去垄断，把持中国国民党，我们中国国民革命功败垂成，就是二全大会所种的因子。”’（注二）

十一日，蒋总统和甫自上海返粤的孙科协商关于党的团结问题，表明态度——有关西山会议的议题保留到三全大会再作决定。

然而，在大会秘书长吴玉章等共产党徒的把持之下，还是于一月十六日正式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决定：（一）邹鲁、谢持二人永远开除中国国民党党籍。（二）林森、张继、居正、邵元冲等十二人由大会书面警告，责其悔过；并限期两个月内，具复中央委员会，倘有不接受警告者，即开除其党籍等项。——党内多数反共同志，就是这样地面临了被割席、或是被迫令全面屈服的境地。

中国国民党在孙先生逝世还不到一年的期间，而俄国顾问和混入党内之共产党徒们的离间策略，便已经达成了从心所欲的结果。

注一、二：蒋总统-“四全大会报告”（一九三一十一）

共党阻挠北伐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处分“西山会议派”之后，接着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和候补执、监委员。共产党的跨党分子在三十六席中央执行委员中有林祖涵、谭平山、李大钊等九人，二十四席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有毛泽东等六人；十二席中央监察委员中有高语罕等二人，候补监察委员中亦有一人分别当选。

然后，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中央常务委员，由下列九人当选：

汪兆铭、谭延闿、蒋中正、谭平山、林祖涵、胡汉民、陈公博、甘乃光、杨匏安。

九人之中，谭、林、杨三人是共产党员；汪、甘、与曾经出席中共一全大会其后脱离共党的陈公博三人是亲共的左派；胡汉民则远在莫斯科；而真正坚持国民党立场的，则只有蒋总统和谭延闿两人。

共产党徒鹊巢鸠占

此外，在党内各工作单位，组织、农民两部长，由谭平山、林祖涵分别担任，且均兼任秘书处秘书；宣传部长最初由汪兆铭兼任，但旋即让给毛泽东。

至于各部秘书，更都是共党分子；而且其中工人部长胡汉民出国未归、妇女部长宋庆龄辞6[77]1389不就任，两部实际权力都为秘书冯菊坡、邓颖超（周恩来之妻）所把持。——可见中国国民党的中枢机构，差不多都已经落入共产党徒手中。寄生在国民党内的这一群跨党者，终于做到了鹊巢鸠占、喧宾夺主的地步。

另一方面，为对抗广州的二全大会，“西山会议派”也于三月二十九日（一九二六年）在上海召集二十七省区代表一百零七人，举行了另一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如上所述孕育着多重“党内矛盾”的二全大会中，蒋总统站在军事负责人立场所极力提出的主张，是实行“北伐”。

此时，革命根据地广东业已巩固，国民政府所必须履行的任务，就是继承孙先生的遗志——统一中国。然而，这个主张却遭受到共党分子的抵制，结果未被采纳。因为如果让经过两度东征锻炼成长的国民革命军在三民主义旗帜之下，进而统一全国，对共产党说来，是极其不利的；故而共党分子无时无刻不在加以阻挠，甚至终于策动“反蒋”，以妨害国民革命军的进展。

蒋总统最初公开提出“北伐”主张，是在元月四日晚间，国民政府公宴席上演说：

‘……我对于今日中国全国的局势，以及本党的前途，都曾仔细观察，深信我们中国国民党必能统一中国，而且在本年内就可以统一……

‘从敌人内部看去，崩溃一天快似一天，本党今年再加努力，即可将军阀一概打倒，收复北京，奉迎总理灵榇至南京紫金山安葬。’

继之，复于六日，在二全大会作军事报告，对于“北伐”的可能性，有更比较具体的说明：

‘……现在的国民革命军，完全在政府管辖之下，一个命令出来，可以动员的人数有八万五千人，枪械也有六万杆；兵士的饷额有一定的预算，兵士的生活也已较有改善；又有各学校陆军学生六千人，足抵一师之数。……我们的政府，已经确实有了力量，来向外发展了。

‘……这两年来，国民革命军小小的成效，实在是三民主义的力量来战胜的。革命军所到的地方，人民都来切实帮忙，不仅表示热烈的欢迎而已。所以革命军实在是人民的军队，革命军的武装实在是人民的武装。’

对于“北伐”的主张，汪兆铭等所有与会人员至少在表面上都表示赞同；就连鲍罗廷也没有提出异议。

然而，就大会中的气氛看来，却也没有接受这个提议的迹象。

‘我大约在开会后的第四天报告。在这四天以前，没有一个人可以提到“三民主义”四个字；如果你提出“三民主义”四个字，大会就以为你是大逆不道了。在这种空气中，我当时就又说：“这一次，我们革命军克服了东江，统一了广东，完全是我们总理的三民主义战胜的，不是那一位可以战胜。”

‘当时，共产党的威逼恐吓，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但我下了决心，早把生死置之度外，还是和他们奋斗到底。后来二全大会闭幕，共产党以我为众矢之的，非打倒我不行。……’（注一）

共党进行个人中伤

二全大会闭幕后，蒋总统察觉到自己周围的气氛，和第二次东征之前比较，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常常会无缘无故地碰到冷笑、蔑视，乃至对个人的中伤。实则蒋总统还在潮汕的时候，广州方面的共产党员和俄国顾问们的“反蒋”趋势，就已经酝酿成熟了。

最初，还摸不清这种情势究竟是从何而起；但不久便显露出了真相——原来“打倒蒋介石”是和“阻止北伐”表里一致的活动。

‘我自汕头回到广州以后，就有一种倒蒋运动，无论本军里或本校里，都造成一种不良的空气，使得军队里的长官来反叛，并且拿利禄来引诱我们的长官。……’（注二）

因廖仲恺被暗杀、胡汉民被放逐，而成功地使权力集中于汪兆铭的共产党，终于又开始把革命军的统帅看作了眼中之钉。

注一：蒋总统-“四全大会报告”（一九三一十一）

注二：蒋总统-“讲述中山舰李之龙事件经过详情”（一九二六四）

季山嘉的毒计

二全大会闭幕不久的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鲍罗廷突然托辞“奉召回国一行”，离开了广东。

其后，俄国顾问团的主角为季山嘉。他们对于“北伐”的阻挠工作，开始表现得极其明显。

季山嘉在军务等会议席上到处不断地宣称“北伐必败”。蒋总统曾经多次和他晤谈，探询他的真意；本来不过认为他大概在言谈之间会带些刺话，但想不到竟然是明目张胆地冷嘲热讽，毫无推诚相见的态度。

这些俄国顾问们，并且用“参谋团”的名义不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决议，擅自削减军校的经费，以及延搁拨发官兵薪饷。这是阴谋破坏党军将士对蒋总统的信赖。

汪兆铭也反对北伐

令人伤脑筋的是，连汪兆铭已经和他们一鼻孔出气，也对于北伐表露出反对的态度。

在此之先，蒋总统于二月一日奉军事委员会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但因对于内部不统一感到危惧，乃于八日表示不就职；九日更呈请辞卸“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广州卫戍司令”两职，愿专任军官学校校务。但由于汪兆铭没有明确的答覆，以致辞职问题悬而未决。

‘我乃于二月二十七日访汪，明告其如不准我辞职，就应令季山嘉回俄。三月八日，又访汪，痛陈“革命实权不可落于俄人之手，即与第三国际联系，必须定一限度，不可丧失自主地位。”但是我们的秘密谈话，季山嘉很快就知道了。至此我才知道汪、共勾结已深，无法使其彻悟俄共阴谋之所在。’（注一）

在这个时候，蒋总统写给汪兆铭一封信，提到这其间的一些情况如下：

‘……自弟由汕回省以来，即提议“北伐”，而吾兄当时极赞成之，并准备北伐款项，以示决心。不料经顾问季山嘉反对此议，而兄即改变态度。……此兄不能自主之一端也。

‘季山嘉提议：派兵由海道运往北方，此为儿戏欺人之谈，实为其根本打销北伐之毒计，弟即知其无北伐之诚意。……弟谓彼用意，于吾总理北伐毕生之志完全相反。……

‘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务、政治、军事限于被动地位，弟无时不抱悲观；军事且无丝毫自动之余地，革命前途，几至濒于绝境。故与兄提议：必先与确实交涉，不可使中国限于被动地位，以违反我总理联合苏俄之本旨，与苏俄扶助中国革命独立之成约。然此不可专为苏俄同志责，兄亦不能辞其责任也。

‘季山嘉劝弟往北方练兵之计，其虚实诚伪，已彰明较着。——盖弟在粤一日，而季山嘉个人之计划总难实现，故其不得不设法使弟离粤，以失去军中之重心，减少吾党之势力。……’

季山嘉煽动叛变

季山嘉更利用到军事将领的功名利碌心理，直接煽动叛变；堕入他彀中的，是第二师师长王懋功。

他们示意王懋功如能叛变“倒蒋”，即可给予第七军军长；并且将军官学校的经费削减三万元，支给第二师。

所幸这个阴谋在即将实现之前被发觉，蒋总统乃于二月二十六日将王懋功免职、逮捕，得以弭患于未然。

进入三月，在俄国顾问的策动之下，共党分子公然对蒋总统进行人身攻击。

‘在学校里面，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每次演讲，有形无形之间，诋毁本校不革命的言论，是公开的。……他的用心，先暗示一般同志，对我失了信仰，并且还彰明较着说：“我们团体里，有一个段祺瑞，要打倒北方段祺瑞，就要先打倒这里的段祺瑞。”

‘……还有一般人，没有话可以诋毁，甚至说：“校长发了神经病了！”’（注二）

三月七日，教育长邓演达报告：“有人散布油印品，作反蒋宣传。”

下定决心留在广东

在这一段期间，蒋总统在精神上的劳累日益加重，夜晚不能安眠，打算脱离苦境、出国游历的心情，颇为浓厚。

十四日，对于蒋总统辞职一事既未认可、又不慰留的汪兆铭，竟暗示蒋总统离开广东。

‘此时，我方知道如我不离粤，不测的事件就要发生；但我辞职而未获准，如果自动离粤，又陷入弃职潜逃的罪名。……’（注三）

蒋总统处于如此境地，乃下定决心——留在广东，遂行职务。

“中山舰事件”，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发生。

注一、三：蒋总统-“苏俄在中国”（一九五六十二）

注二：蒋总统-“讲述中山舰李之龙事件经过详情”（一九二六四）

中山舰事件

‘这种内容（中山舰事变），太离奇、太复杂了，万万想不到的事情。……如果我不是当着这件事的人，我亦不相信会有这件事情。’（注一）

“事变”是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由中山舰出现离奇行动开始。

“中山舰”，就是在四年前因陈炯明的叛变，有随同孙先生共历五十五天患难之缘的“永丰舰”。当时在广东是最大的军舰，孙先生逝世后，为了纪念而改名“中山舰”。

接连出现可疑情况

此时，中山舰正当修理完毕，在装置照明设备中，竟然未奉命令而由广州驶来黄埔。

‘本月十八日酉正，忽有海军局所辖中山兵舰驶抵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官学校改名），向教育长邓演达声称：“系奉校长命令，调遣该舰，特来守候。”等语。

‘其时，本校长（蒋总统）因公在省，得到此项报告，深以为异，因事前并无调遣该舰之命令，中间亦无传达之误。’（注二）

停泊在军校前面的中山舰，卸下了炮衣，锅炉升火，一昼夜不熄，简直是备战态势。

及至十九日，又发生了更加可疑的情况：

。有一个同志——他的名字不能宣布——起初见面时，就问我“今天你去不去黄埔？”我说“今天我要回去的。”

‘后来离别了他之后，到了九点至十点钟模样，那同志又打电话来问我“黄埔什么时候去？”如此一连打了三次电话来问我“什么时候去？”

‘当他打第二次电话，我还不觉得什么；直到第三次来问我的时候，我觉得有些稀奇。

‘为什么，那同志今天总是急急的来问我去不去呢？如果没有缘故，他从来没有这样子来问的。

‘我后来答覆他说：“我今天去不去，还不一定；”他晓得我是不去黄埔了。’（注三）

后来，没有超过一个钟头，代理海军局长的共产党员李之龙便打来电话。

‘他说“要调中山舰回省城，预备给参观团参观。”

‘我问他“中山舰什么时候开去的？”他答“昨晚上开去的。”

‘我说“我没有叫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何必问我做什么呢？”’（注四）

究竟是谁发出的命令，始终弄不明白。

‘我问“中山舰为什么开来黄埔？”他（李之龙）说“是教育长的命令；”又说“是校长的命令。”我要他拿命令来看，他说是电话。’（注五）

当天傍晚，中山舰又开回广州，抵达的时候，已经日暮天黑，其行动，更显得可疑。

‘中山舰回省城之后，应该没有事情，就要熄火；但他升火升了一夜晚，形同戒严。’（注六）

意图强迫蒋总统离粤

像这样的情况，当然可以察觉到是在策进着某种阴谋活动。

‘我知道共党阴谋的爆发，就在于此。但我在当时，只知道他们是要叛变，要害我，还不知道他们的企图究竟是什么。一直到了这一叛乱平定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舰回黄埔军校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威，送往俄国，以消除他们假借国民革命来实行其“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障碍。’（注七）

在当时曾经始终和蒋总统同行的陈肇英（前任虎门要塞司令），后来，对于在中山舰事变时共产党的动向有大致如下的记述：

李之龙将中山舰调到黄埔，并断绝了军校与广州的交通，然后意图胁迫蒋总统把军校交给汪兆明。而且事先已经替蒋总统和他的秘书陈立夫二人准备好了前往苏联的护照。

察觉到阴谋活动的蒋总统，于十九日由黄埔乘小船秘密到达广州（原注＝此点与蒋总统的自述有欠符合）。当天下午，中山舰也开回广州，锅炉升火不熄，随时可以开动，计划在第二天早晨劫持蒋总统及陈立夫出航。

蒋总统面临这种境地，自有必要迅速采取对抗措施——在二十日天色将曙时，乃由广州卫戍司令部发布戒严令。

又据陈肇英记述：蒋总统一度决定前往潮汕，以谋再起，且已买好赴汕头的船票；但在驱车将要到达轮船码头时，最后在车中向随行者说出自己的决心，仍然返回广州市内。

注一、三、四、六：蒋总统-“讲述中山舰李之龙事件经过详情”（一九二六四）

注二：蒋总统-“关于处置中山舰事件之自请处分书”（一九二六三）

注五：蒋总统-“对官佐学生训话”（一九二六三）

注七：蒋总统-“苏俄在中国”（一九五六十二）

解除俄顾问聘约

在发布戒严令之同时，蒋总统下令海军学校副校长欧阳格掌握舰队，将李之龙逮捕，严加讯究。

此外，在广州市区出动部队，解除了受共产党操纵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武装，并将在军中担任党代表的多数共党分子同时逮捕，以及派兵包围各俄国顾问寓处，监视其行动。

未发生流血现象，便达成了防杜共产分子阴谋于未然的结果。

俄国顾问们，因寓处被包围，卫兵被缴械而来抗议；可是，在事变的背后，有俄国顾问存在，则是的的确确的事实。——第一军顾问斯切潘诺夫后来在顾问团有关的会议中，便曾明白表示顾问团直接指挥中山舰驶回广州。

6[90]1402遣送季山嘉回俄

尽管事实如此，但苏联驻广州领事馆代表还是于二十二日（一九二六年三月）来见蒋总统，询问“是对代表团中某些人的问题？还是对苏联全体的问题？”经答复他当然是对人，而不是以苏联全体为敌；他表示安心，于是，乃遣送策进阴谋的主谋人季山嘉及顾问团中的同谋分子返回苏联。

事后，苏联顾问团人士曾经自行检讨，承认失败而有如下的自责：

（一）俄国人对于中国风俗、习惯不知注意，引起中国人反感。

（二）中国共产党不知尽力于组织国民党，默然转移；只知以显明的扩充共产党为工作总方针，欲在各处把持一切指挥之权，招致国民党员之反击。

季山嘉等一部分俄国顾问，于二十四日自广州出发归国；国民政府复于四月十四日解除俄国顾问十余人之聘约。这才削弱了俄国人的控制力。

汪兆铭出国

因这次“事变”而蒙受震惊的又一人，就是汪兆铭。当事变一发生之后，蒋总统立即前往和他见面。汪兆铭对于蒋总统处理中山舰事件未经事前商量，颇不愉快；加以在此之前他有意无意和共党分子携手，而正在这个趋向之下发生了中山舰事变，其结果当然会有损于6[91]1403他的立场。

他于三月二十三日以生病就医为由躲藏起来。但在他致监察委员张人杰的书信中，则透露其真意是感到蒋总统对他怀疑和厌恶，表示不愿再负政治责任。

五月间，汪兆铭离开故国，前往法国。

在另一方面，由于处理中山舰事变是出于独断，从军队的立场而论，蒋总统认为自己也有必要表明负责任的态度。

于是，乃于三月二十三日具呈军事委员会，自请处分。内容是这样的：

‘……此次事起仓卒，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但深夜之际，稍纵即逝，临机处决，实非得已。

‘应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谨呈军事委员会。蒋中正’

对于这个呈文，军事委员会未予处分。

共产党徒暂时让步

和被遣送回国的俄国顾问人员往返交错的，是鲍罗廷于四月二十九日由俄国回到广州。

‘他（鲍罗廷）与我屡次会商“国共合作”问题，订定“整理党务办法”，于五月十五日，提出本党第二届中央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这办法一共八点：

‘一、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改善对于国民党之言论态度，尤其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许加以批评及怀疑。

‘二、共产党应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全部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管。

‘三、中央党部各部长，须不跨党者方得充任。

‘四、凡属国民党党籍者，不许在党的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的名义召集党务会议。

‘五、凡属国民党党籍者，非得有最高党部之命令，不得别有组织及行动；

‘六、中国共产党及第三国际对于国民党内共产分子所发一切训令及策略，应先交国共联席会议通过。

‘七、国民党党员未经准许脱党以前，不得入其他党籍；如既脱党籍而入共产党者，以后不得再入国民党。

‘八、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党籍，并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

‘当鲍罗廷与我会商这个办法时，对我的态度极为缓和。凡我所提主张，都作合理的解决。’（注）

事变之后，在苏联国内的托洛斯基派主张退出国民党，发动暴动；但史达林派则力言应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以避免予国民党以刺激，中共乃接受了这个方针。

结果，在国民党内担任组织部长的谭平山、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等共产党员，都陆续离职。

利用国民党“联俄容共”、打开一条进路，企图篡夺国民党的共产党阴谋，已因中山舰事变一时受到遏制。

然而，他们之所以接受决定，并非出于心甘情愿，而是算计到如果要在这个当口退出国民党，则会是前功尽弃，将蒙受重大损失。——为此，暂时让步，仍然待在国民党内，再徐作攘夺领导权的图谋。

和共产党正面摊牌的决定性冲突，虽然已经告一段落，可是问题还是搁在那里，有待以后解决。而继续混迹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就在此后的北伐期间，便又播弄着花样百出的妨害策略。

注：蒋总统-“苏俄在中国”（一九五六.十二）

第七章：北伐的进击(下)

主题

誓师北伐汀泗桥争夺战肃清长江下游所谓南京事件蒋总司令谈话共党阴谋确证第三国际的手段鲍罗廷的嚣张共党推动“倒蒋”蒋总司令驻沪汪兆铭不听劝告为解除疾苦革命全面清党肃清上海共党以南京为国都再度出师北伐第三国际的密电蒋总司令请辞呼吁宁汉合作“币原外交”田中义一组阁日军图阻挡北伐田中的侵华会议中国国民激愤“田中奏摺”蔡志堪亲笔记述赴日考察忠告日本国民在日访问活动与田中会谈纪录

誓师北伐

中山舰事变之后，最大的任务是继承孙先生遗志——完成北伐。

军阀割据反覆无常

在北方，仍然延续着军阀割据的局面。北京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失去控驭权势，而握有实权之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国民革命军”有别），张作霖的“奉军”、孙传芳的“新直军”、吴佩孚的“旧直军”四派，离合集散，反覆无常，鹰瞵虎视，互不相下；并且列将之中的日、英两国，则分别在背后支持张作霖、吴佩孚，更加助长了军阀之间的权力之争。

张作霖、吴佩孚等结成“奉直联军”，对于在北京的冯玉祥加以钳制。

就在中山舰事变的前几天～～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发生了所谓“大沽事件”，日本军舰和冯玉祥的国民军拉开战火。这是由于日本军舰引导着奉军传舰意图突破国民军布下水雷所封锁的大沽港口，因而导发之事件。于是，日本和列强各国乃引此为藉口，强硬提出要求停止在北京、天津一带内战的最后通牒，压迫北京政府屈服。

对于此一“屈辱外交”感到激愤的北京学生和民众，乃于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前举行抗议大会；未料，段祺瑞竟下令向游行请愿的队伍开枪，肇成了死亡四十七人（一说五十七人）负伤二百多人的所谓“三一八惨案”。因此，在民间“打倒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声浪为之沸腾。

奉直联军对北京的压力愈益加重，冯玉祥被迫出国（苏联），北京即将落入奉直联军之手。

此时，正是荡平地方军阀的最好机会。

蒋总统建议北伐

蒋总统乃于四月三日向中央提出出师北伐的建议：

‘北方国民军退出京津以后，中国形势会有迅速而重大之变化。如奉军占领京、津，则日本在华之势力，愈加稳固；吴佩孚在鄂豫之势力，英必竭力助长之；孙传芳盘踞江浙，英必逼孙与吴联；美国近且有联孙以牵制日本之倾向；法国恐苏俄在华势力之复张，故急欲与英、日联合战线，在滇助唐（继尧），以牵制广东之北伐。

‘总之，列强在华，对于北方国民军处置既毕之后，其必转移视线，注全力于两广革命根据地无疑；且其期限，不出三月至半年之内也。’

是故北伐出师，必须要在未达上述所料状态之前——也就是必须在六月底以前，见诸实行。

这个建议，为中央所采纳～～四月十六日蒋总统被推举为军事委员会主席；继之，复于六月五日奉国民政府之命任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迅速着手筹划北伐事宜。

敌军兵力超过十倍

面临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总兵力，计八个军，约十万人，但其中可能出动的部队，不过五万人。各军军长为：第一军何应钦、第二军谭延闿、第三军朱培德、第四军李济深、第五军李福林、第六军程潜、第七军李宗仁、第八军唐生智。此外，有以八艘军舰构成的海军舰队及拥有飞机三架的空军一队。——整个可供调遣的力量，就是这么多。

相对地，在北方军阀方面——吴佩孚所部，号称二十五万，分布河南、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各省，在两广也有一些残余力量；孙传芳拥有二十万兵力，盘踞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此外，张作霖则在东三省以及直隶（河北）、山东合计部署有三十五万人的实力。

敌军的兵力，超过了国民革命军十倍；加以在装备与财力方面，革命军也远居于劣势状态。

似此情形，革命军正面发动全面战争，看来不啻是以卵击石；为此，乃决定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首先，将虎踞中原的吴佩孚打倒；继之，击败孙传芳；最后，再和张作霖决战，以统一中国。

七月一日，蒋总统以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颁布北伐动员令。计划首先集中兵力于湖南，进而拿下武汉。

四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出师北伐宣言，号召全国各界赞助北伐。翌日～五日，蒋总统被推举为中央党部军人部长，赋以军事全权。

六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于广州，任命李济深为总参谋长，钮永建为总参议。

在广州举行誓师典礼

九日，蒋总统在广州东校场举行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暨北伐誓师典礼，参加军民约五万人，发表誓师辞如左：

‘国民痛苦，火热水深；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本军兴师，救国救民；总理遗命，炳若日星。吊民伐罪，歼厥凶酋；复我平等，还我自由。嗟我将士，为民前锋，有进无退，为国效忠，实行主义，牺牲个人，丹心碧血，革命精神。……’

同时，更对全国发表宣言，在历举革命过程之后，特别宣告如下——

‘中正今兹就职，谨以三事为国人告：

‘第一～～必与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为不断之决战，绝无妥协调和之余地。

‘第二～～求与全国军人一致对外，共同革命，以期三民主义早日实现。

‘第三～～必使我全军与国民深相结合，以为人民之军队，进而要求全国人民共负革命之责任。’

汀泗桥争夺战

蒋总统心愿所系的“北伐”行动，从这里开始。这是国民革命军为统一全国而踏出的第一步。自国父孙先生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致力国民革命以来，已经过去了三十三年的岁月。

旌旆北向的第一个目标，是荡平湖南省；进而乘势攻取湖北省要冲“武汉三镇”-武昌、汉口、汉阳。武汉地区，雄踞长江中游，早在中华民国奠基的辛亥革命时代，就是首义之地；自古以来，为兵家之所必争。

迅速攻占长沙

一九二六年七月五日，任命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统驭第四、七、八各军北上，指向湖南省会-长沙。

吴佩孚部队在长沙南方的河流-涟水布防迎战，不过北伐军轻易地突破了这一道防线，九日克湘湘，十日入湘潭，十一日迅速攻占长沙。吴佩孚所属湘军总司令叶开鑫率部北遁。

蒋总统以总司令身分进驻长沙，是在八月十二日上午三时左右，虽然是在拂晓之前，但还是有五万群众精神抖擞地夹道欢迎，可见大获人民支持。

北伐军赓续北进，势如破竹～～十九日，夺得平江；二十二日，拿下岳阳，差不多是已经控制了湖南全省。

不过，在越过省境，进入湖北省时，则遭遇到顽强抵抗。

吴佩孚图死守仍失败

重整旗鼓的吴佩孚军队，在武昌之南约八十公里的汀泗桥严阵以待。汀泗桥，虽则只是位于粤汉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站，但却为武汉三镇的重要屏障，东边紧傍山势；南、西、北三面为长江支留及湖泽所环绕；仅仅在西南方架设有铁路长桥，为通向外面的唯一孔道。如果突破不了这一个隘口，则自南面进迫武汉乃为不可能之事。

吴佩孚调来陈德麟、刘玉春所部劲旅约二万人开入汀泗桥阵地，力图遏堵北伐军的进攻；且于八月二十六日在武昌与汀泗桥之间的贺胜桥设立前线司令部，由吴本人亲自指挥战斗。于是，决定北伐前途的一场最激烈的汀泗桥争夺战，于焉爆发。

开头，北伐军抢先一步，在吴佩孚尚未到达前线司令部之前，汀泗桥就已经一度被第四军攻下。

可是，吴佩孚并没有认输——他将败下阵的旅长、团长、营长等部属九人枪决示众；命令全军誓必夺回汀泗桥，并以大刀队在前线官兵背后压阵督战，凡退却者，杀无赦！

在“恐怖命令”驱迫之下的吴佩孚军，于二十七日晚间疯狂地反扑过来；北伐军不得已乃放弃汀泗桥后退。

其后，双方便为力争汀泗桥而展开了殊死战～～二十八日，再度为北伐军攻占，但立即又被马济所率领的敌军夺回。激烈的拉锯战，一直进行到革命军总预备队第一军加入作战，才压制了汀泗桥——是在二十九日。

当天上午十时，蒋总统在火车上经过汀泗桥，目之所极，但见死尸累累，惨烈战争的遗迹，还未曾收拾。

这次战役，是越过了和吴佩孚之战的第一个高峰。北伐军继续于三十日攻下贺胜桥，有因退却而被其所属长官手刃死亡的吴军百余人仆倒在桥边。

吴军终于在九月一日退守到最后的据点——武昌。

在武昌侧面的丘陵-洪山，筑有炮台，构成坚强要塞；吴佩孚更增派两师人，加强防务，摆开死守武昌的阵势。

九月三日上午三时，北伐军进围武昌城，趁夜色掩护发动攻击，敢死队多次要攀垣入城，但都被敌方重炮及机关枪所遏阻，无法逼近。

三日晚间，蒋总统乘车抵达武昌附近的涂家湾，准备发动第二次攻击。五日上午三时，伸展左右两翼再度发动总攻，但仍然未能将云梯靠到城墙，致又告失败。

不过，对岸的汉阳则在经过十六小时的激战之后，于六日下午攻下；翌日～七日，汉口也被克服，武汉三镇中的两镇业已归于掌握。

敌军主帅吴佩服，更向北逃遁到河南信阳方面。

此时，武昌城虽已陷于孤立情势之下，但刘玉春的城防部队继续顽强抵抗；北伐军为对城内居民的生命加以保护，不能为攻城而不择目标地发炮轰击，于是，乃留下第四军所属两个师及一部分炮兵继续围困武昌，封锁其出入，以徐谋攻略，其余部队则抽调他处作战。

十月十日攻下武昌

封锁措施，包括其对外所有陆上、水上及通信往来联络。对于武昌城内的商人，也明白宣示禁止供给敌军粮食及金钱等接济，如有违反，按军法处置。同时，并由飞机在飞临武昌城上空轰炸之际，投下“打倒吴佩孚”、“废除不平等条约”、“劝告敌军投降”等标语，对敌军心理进攻，以打击其士气，及策动民心背离吴军。

另一方面，并下令军官学校工兵队，掘凿坑道，进行攻城。

武昌城内敌军，虽在如此情况之下，仍然继续坚持防守下去，及至我军攻下该城，则是在十月十日上午七时半。

这一天，正好是“武昌起义”的十五周年纪念日。

肃清长江下游

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初期战略是这样的：

“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

当前的敌人，暂以吴佩孚为限；至于对孙传芳，则毋宁说是希望通过接洽，使他置身事外。

在开始的时候，孙传芳期待着北伐军和吴军的战争，也许会让他自己坐获渔利，故而乐得袖手旁观。因为在翻云覆雨、互相疑忌的军阀之间，总认为和自己处于竞争关系的对方越是受到打击，便越对己方有利。

蒋总统对如此态度的孙传芳，曾在八月十二日自长沙发电给他一封“希望归顺革命阵营”的电报，内容是这样的：

‘……兄（孙传芳）以苏、浙、皖、赣、闽五省之治安自任，若能顺应革命潮流，以保五省人民之幸福，中正必请于政府，承认兄为五省之总司令。……’

可是，孙传芳并没有接受这个劝告。他鉴于北伐军进展神速，感到自己也有危险，乃转而激励吴佩孚，促请其加强应战；同时，复以保境安民为藉口，策动自己地盘的江、浙二省发起自治运动，想汇合民间力量来阻止北伐军东进。

八月三十一日，派其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卢香亭为援赣总司令，调军进驻江西，与北伐军对抗。

南昌之战

此时，正当北伐军进攻武汉的高潮之际，孙传芳这个行动，对于北伐军的侧翼颇有威胁。

于是，北伐军和孙传芳兵戎相见，决一胜负的局面，已经是无可避免，乃急速调动右翼第二、三、六各军所部趋向江西。

九月六日，北伐军趁孙军的集结部署还没有就绪，便先发制人，展开总攻击——自当天攻下萍乡开始，很快地控制了赣南地区；十九日，第六军的部队进入省会-南昌城。

沿途民众，异口同声地称道“党军可爱！”他们用亲切言辞欢迎国民革命军进展。所谓“党军”，如所周知——就是肩负北伐使命的国民革命军原先的名称。

北伐军之克复南昌，是受到城内民众，尤其是学生们的协力。他们自动自发地破坏敌军设施，帮助革命军进攻。

不过，孙传芳则仍倾其全力反攻过来——他的部队在一度退往九江之后，便重整旗鼓，派出大军，企图夺回南昌。

当时，进驻南昌担任城防的北伐军，只不过有一万人，众寡不敌，乃不得不在二十一日暂时退出。

在这个当口，武昌方面的战事大势已定，主战场转移到南昌。蒋总统为督导作战，特由武昌折返，在经过长沙前往江西的途中，听说南昌已被敌军夺回，乃在十月二日驻节于南昌西南约六十公里的高安，亲自指挥再度进攻。

十二日，将原来担负围攻武昌任务的第一军第二师及第四军部队调来江西，发动南昌包围战；但因敌军炮火陆续击中民家起火燃烧，革命军为不得不谋尽量减少民间的损害，因而一时撤开对南昌的包围，变更作战计划——迂回敌军后方，切断其补给线。此一行动，发生了很大功效，十一月五日，攻克敌军后方据点～九江；七日，南昌复归革命军掌握。

经过这次战役，孙传芳的精锐部队差不多全被歼灭，他本人逃往南京，江西省乃继两湖之后也纳入了国民政府的管辖之下。

又在福建方面，何应钦所指挥的东路军，沿海岸快速进击，扫荡孙传芳系的福建督办周荫人所部，于十二月十八日进驻福州，周荫人逃亡浙江。

北洋军阀全体动员

当初，对国民革命军投以轻蔑眼光的北方军阀们，到了这个地步，乃急速加强团结起来。

首先是逃到南京的孙传芳，亲往天津，求助于张作霖。

张作霖于十二月一日组织“安国军”。设总司令部于天津自任总司令，以孙传芳和张宗昌为副总司令，并且和败退河南的吴佩孚也有所联系；——形成北洋军阀全体动员的反攻态势。

革命军最后的敌人张作霖，现在终于挺身而出。

针对着北洋军阀的动向，蒋总统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六日，在南昌研订作战计划，将北伐军区分为东路军、中央军、西路军～～三路挺进，以谋肃清长江下游的敌军：

一、东路军由何应钦担任总指挥，以杭州和上海为目标。

二、中央军由蒋总统亲任总指挥，下辖由程潜率领的江右军和李宗仁率领的江左军，指向南京。

三、西路军由唐生智任总指挥，与在陕西的冯玉祥部队联络，俟机进攻河南。

一月二十六日，以东路军发动攻势为开端，各军分别攻击前进。

淞沪海军舰队投诚

东路军在迅速攻下杭州之后，于三月间迫近上海。十四日，敌方淞沪海军舰队司令杨树庄向北伐军投诚，就任国民革命军海军总司令，所属各舰艇都升起青天白日旗，响应北伐军作战。

及至二十一日，敌军重要据点“”上海、松江、苏州、无锡都告克复；孙传芳残部及直鲁军的一部分全被消灭。

中央军的进攻，也非常顺利；所属江右军则于三月二十三日到达南京。

所谓南京事件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蒋总统为督攻南京，乘楚同号军舰经长江水路到达南京南方约六十公里的采石矶。

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和第二军为主力的“江右军”（总指挥程潜），在当天傍晚推进到南京城南的各城门附近；敌方城防部队“直鲁军”业已放弃南京，蜂涌渡江，向北逃窜。

江右军于二十四日清晨，举行盛大的入城式——由中华门开进南京城内。

所谓“南京事件”，就是发生在入城之后。

这是国民革命军和列强的正面冲突，也是在北伐过程中最不幸的事件之一。

可疑分子劫掠使馆

上午九时左右，有穿国民革命军制服的士兵们将英国领事馆包围，枪伤走出领馆将回官舍的英国总领事杰尔斯之后，气势汹汹地冲入馆内，杀伤馆员，并随手抢夺金钱及贵重物品；又在这个行动前后，日本和美国的领事馆都遭受到袭击，房舍也被捣毁。参加这些暴行的士兵，虽则的确穿着国民革命军的制服，但显然是分子非常复杂的“流氓地痞集团”。

还有教堂以及外国人所经营的医院、商店等处，也都成了被袭击的对象；外侨住宅被烧毁、财物被掠夺，侨民们仓皇避难，不知道逃往那里才好。

据当时日本驻南京领事森冈正平报告：为预防在北伐军入城时发生情况，约有日本侨民一百人进入领事馆避难。

上午七时左右，约有三十名革命军士兵来到领事馆，查询有没有敌军（鲁军）逃进领馆，经答复馆内只有日本人，他们便很规矩地离去。未料，隔了不多一会，又有约五十名穿制服、戴军帽的“正规兵”，端着步枪作发射姿势，闯进领事馆及馆员宿舍。

在领事馆内，虽有自军舰“桧”号派来的海军上尉荒木龟雄等官兵十人，担任警备，但因森冈领事避免发生冲突，未让他们武装应变。

闯进来的士兵们，开枪射伤领事馆警察，以及用枪托殴打不肯交出保险柜钥匙的领事馆少校武官根本博，并且自办工室向领事官舍食堂发射实弹；从领事室乃至佣人室、库房等处都被彻底掳掠，达三个小时之久。他们大声叫嚷——“打倒日、英帝国主义”、“华俄一家”、“日本人的财产，是抢夺中国人的，把它抢回来。”接在后面，有游民数百人也一涌而至，趁火打劫，甚至连地板、便器、空瓶都被拿走。……

美英军舰发炮轰击

到了下午三时半，停泊在长江上的美、英炮舰未有任何警告性的表示，便开始向南京城内发炮轰击；因为当时所有的外国人差不多都是逃向市内的丘陵地带避难，故而向那一带周围集中炮轰，以遏阻暴徒们跟着涌进。

据日本方面资料：军舰发炮轰击，是基于美国领事戴维斯的请求。——当时，美国侨民们跟随着戴维斯等人离开领事馆，到达接近江边的美孚石油公司避难，但因该处也进入危险状态，故而戴维斯乃请求美国炮舰发炮援护。

至于日本方面，则依据外交方针，贯彻不干涉、不抵抗主义，故而当时同在长江停泊的日本军舰并没有参加发炮，是为有意避免刺激中国方面的行动。以致奉舰长之命甘受暴行、不作抵抗的荒木龟雄上尉曾经在事件之后，以受到了不能忍受的屈辱而意图切腹自杀。

这样的外交方针，在此次事件之后，被军部指谪是“懦弱外交”，受到责难，反而成了其后转变为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的因素。

担任江右军总指挥的第六军军长程潜和第二军军长鲁涤平等人进入南京、出面收拾事态，是在当天傍晚；美、英两国军舰的炮击，则到下午五时之前才见停止。

可是，这一场炮击，已经有了伤亡；小门口农业学校及颇多居民房舍也被炸毁。

据江右军调查南京事件的伤亡情况——官兵死亡二十四人，重伤七人；市民死亡十五人，重伤九人。

又据英国领事馆调查外国人死亡情形——英国人三人，美国人一人，法国及义大利传教士各一人，合计六人。

蒋总统在楚同军舰上接到南京事件的报告，深感诧异，这是违反了在一九二六年八月北伐出师之初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总统）所发表的对外宣言。在该宣言中，曾经声明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而且自出师以来，也从来没有发生过违背这个宣言的事态。

蒋总统为了处理这个事态，迅即派遣参议林石民赴日本领事馆口头传达：

‘刻由中国军舰“利通”前来报告：在南京之英、美军舰向南军（北伐军）开炮，其原因未详；但我军对英、美两国并无敌意，蒋总司令拟亲赴南京，负完全责任，解决此事。’

此时，事件全貌尚欠明白，共产主义者们则宣称是“反动分子的阴谋行为”。

共党导演下的暴行

但真相则并非如此，容俟在后面所举出的证据予以剖明——这是在莫斯科和中共的阴谋导演之下所发生的暴行。由于他们的策动，使国民革命军蒙受了劫掠外国人的污名，并且招致英、美列强海军发炮轰击强烈干涉，以致自北伐出师以来最初面临了极其严重的国际问题。

蒋总司令谈话

列强方面，认为这个“南京事件”是国民革命军正规军有组织、有计划的行为，故而虽然暂时中止炮击，但态度却表现得非常强硬。

中止炮击之后，英国军舰派出使者乘汽艇上岸，邀同世界红卍字会江宁分会会长等人前往舰上接头；红卍字会是类似红十字会活动性质的社会团体，当外舰发炮时，该会长等曾经站在江边，遥作旗语，要求停止发炮；故而英舰乃以红卍字会为交涉窗口，在舰上折冲了约两小时之后，向中华民国政府及国民革命军提出下列要求条件：

（一）由张辉瓒师长（江右军第二军第四师师长）立即下紧急命令，保护外国人。

（二）张师长禁止士兵射击，并亲赴美国军舰商议外侨损害情形。

（三）二十五日（一九二七年三月）上午十时，派兵护送在城内的外侨至江岸。

（四）如上列要求不能实行，即严厉对付，并以南京下关为军事区域。

这是凭藉武力为后盾的强硬要求。

指示保护外侨生命财产

二十五日，蒋总统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分乘军舰最初抵达南京，在舰上召见江右军总指挥程潜予以指示：

‘对于无论中国军队或流氓，损害外侨生命财产，均须负责查明其确实情形，予外侨以满意之解决。’

同时，命令国民革命军将领何应钦、鲁涤平、程潜、贺耀组负责维持南京治安，保护外侨生命财产，如有违反者，予以严厉处分。

又在当天，各国复将前述四项要求用书面送达程潜的总指挥部；这个书面要求，逸脱了公式外交程序，革命军方面虽则对于手续上的问题提出抗议，但大致还是接受对方的要求而给予答覆如左：

（一）关于保护外侨，不待要求，即已下达紧急命令。

（二）交涉应由外交当局进行，张师长没有亲赴军舰的必要。国民革命军方面业已禁止射击，希望贵军舰勿再发炮。

（三）护送外侨至江岸，自可照办；但外侨散居各地，请由领事馆通知其集合一处。

经过上述处置之后，事件扩大的危机得以一时缓冲；外国侨民在护送之下安全抵达江岸，由各国炮舰收容。

当时，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七师师长杨杰曾经至日本驻南京领事馆，表达遗憾之意，并对护送侨民之事有所约定。

日本天皇的照片，经直接送往驱逐舰“桧”号；继之，领事馆员及侨民也都平安到达停泊在长江上的“桧”、“桃”、“滨风”等舰上，包括短期性的旅行者在内，达一百三十五人，被全体送抵上海。

二十六日，蒋总统座舰驶达上海，当地的外文报纸正在夸大报导——“英国总领事业已死亡，外侨死伤数百人”等流言。

这样的报导，会使人们失去对国民革命军的信赖，并且徒然导致国际人士的恐怖与混乱。

陷入恐慌状态的外侨们，陆续归国；列强为预防发生非常事态，调来了数千援军进入上海租界。

当时，美、英两国曾向日本提出共同出兵的建议。日本虽则基于避免增加事态的严重性而予以拒绝，但为有所戒备，还是派出陆战队二千四百人登陆。

招待日美英法记者

三十一日，蒋总统在总司令部招待日、美、英、法等国报社、通讯社派驻上海的记者，发表谈话如下：

‘此次南京事件，各西报及通讯社宣传过甚，致多发生误会。本总司令已指示部属负责调查，予外侨以满意之解决。如查明系革命军所为，自有相当办法；但英、美军舰开炮前，并无提出何项警告，当向南京外人当局提出抗议，要求赔偿损失。’

在发表上述谈话的同时，对于列强肆行无忌的“租界问题”，也表示了明确的见解，目的在说明取消不平等条约及收回租界，是国民革命军一贯主张，但这个主张决不是凭藉武力去实行的：

‘诸君对于中国情形，谅必明了，若各国仍用十九世纪之政策——采用军舰、兵队之武力，对付中国，不但不能有益于租界及侨民之生命财产，而反有害；因现在之中国与十九世纪时之中国不同之故也。

‘我国民革命军所过之地，各友邦均可不必派兵，因我国民革命军对于外侨生命财产负完全保护责任。……取消不平等条约及收回租界，决不用武力及暴动，当由中央政府采用外交正当手续办理；希望诸君转告各国侨民，不必恐惧。国民革命军之革命目的，祇求国际地位之平等；孙总理之遗嘱，主张亦复如是。’

蒋总统接着于四月一日致电在武汉的外交部长陈友仁，嘱其即来上海，处理外交事务。

南京事件，虽然已如上述对外向力求解决的方向推进，不过，其真相的究明，还得自此开始；正因为在事件的背后只要是有着共产党的阴谋存在，所以如不能把这个祸根除掉，总归是达不到正本清源的结果的！

╭════════════════════════════╮

自由人注

对于“中山舰事变”，中共持何种说辞？下面参考两本书：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刘吉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民国八十年六月第一版。

《蒋介石‘清党’内幕》，张锳编，北平国防大学出版社，民国八十一年十二月第一版

以下之节录是与原书行行对应。本卷全部使用全形符号，若参考书中使用较多的半形符号，则本卷之对应行会略长。（半形符号之例：1234567890,.;:"）

首先节录《中国共产党七十年》

〔〔——————————————————————————-

第一一三页：

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二百七十八人，其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代表一百六十八人，中派代表六十五人，右派代表四十五人；吴玉章任大会秘书长。鉴于这样的有利条件，周恩来、陈延年曾和鲍罗廷商议，在会上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开除戴季陶、孙科等右派的国民党党籍，争取在中委选举时中共党员占三分之一，使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占优势，使国民党进一步左倾。这个计划在当时是完全有可能实行的，但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坚决反对，认为当时吴佩孚、张作霖联合已成事实，一旦国民党内部分裂，势必影响广东局面。因此主张在统战问题上向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右派让步，以挽救南方的革命，强调维护国民党统一是绝对必要的步骤。

……………………

第一一七页：

第二次交锋是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一手制造的“中山舰事件”。当时，蒋介石借口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擅自下令逮捕了该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武装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处及住所，下令黄埔戒严，监视各师党代表，扣押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几十名中共党员，并解除了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这个事件是蒋介石要实行分共，强化个人军事地位，排挤苏联顾问的重要步骤。事发前周恩来曾有所发现，并报告苏联顾问，但没有引起重视，未采取措施。事发后，蒋即同第二、第三军军长谭延闿、朱培德谈判，提出把共产党和苏联顾问全部赶出军队的具体计划。谭、朱怀疑蒋另有阴谋而予以反对。蒋摸到了谭、朱的态度后，即向苏联顾问团表示此举“对人不对俄”，提出要撤换季山嘉等苏联顾问，让因健康原因离任的加伦返任。顾问团当即表示同意，并表示与蒋继续合作。四月上旬，蒋又提出中共党员退出军队，不退出要交名单；党代表要完全的国民党员才可担任，第一军党代表统统调回再训练。

——————————————————————————-〕〕

其次节录《蒋介石‘清党’内幕》

〔〔——————————————————————————-

第三十五页：

在国民党右派反共势力不断掀起反共逆流的同时，中共和左派在国民党中的力量也有所发展。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全数代表二五六人，中共代表九十人，中共省级以上的干部几乎均参加了大会的工作。会议通过的宣言进一步阐明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会议选出的中央执监委员中（含候补委员），共产党人占十七人，国民党左派占十五人。在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常务委员当选者九人，其中共产党人三人，国民党左派三人。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及各部负责人选，大都由中共党员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财务审查委员会，四人中有三人为共产党人。一、二、三、五、六、七军的党代表，均为共产党人，整个军队的政治工作几乎完全由中共掌握。

苏俄顾问也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和影响。顾问团在致苏俄驻华使馆的报告中说：

“现存的国民党是我们建立起来的。它的计划、章程、工作都是在我们的政治指导下按照俄国共产党的标准制定的，只不过使它适合中国国情罢了。直到最近，党和政府一直得到我们的政治指导者的周密的指导，到目前为止，还不曾有过这样的情况，当我们提出一项建议时，不为政府所接受和实行。”

……………………

第三十八页：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九日晚，当中山舰从广州顺江而下停泊在黄埔港外时，蒋介石以此为口实，命令其黄埔嫡系部队于三月二十日拂晓发起了进攻。

……………………

第三十九页至第四十页：（文中的“中央”是指共产党中央。）

（二）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由于陈独秀作了妥协退让，致使蒋介石轻易□夺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全部军权。之后，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了“整理党务案”，中共再次妥协退让，蒋介石又□取了党权，这就为大革命的悲剧结局埋下了祸根。

一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妥协退让

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中共对如何对付这一变局产生了争论，华岗回忆说：

‘在这一事变中广东党与中央又有不同的意见：第一，讨论这一事变发生的原因，广东党认为是“当进攻而没有进攻”的结果，中央的主张又确实相反，认为是“当退让而没有退让”的结果。第二个争论，就是对于三月二十号事变的策略问题。广东党认为“退出国民党就等于放弃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放弃革命的国民党旗帜给资产阶级，这就是莫可补救的损失，在这个时候是应该采取暂时让步的政策，以保留在国民党之内，同时积极的准备着新的进攻以继续夺取领导权的争斗”。另外在上海有少数同志的意见，认为三月二十号是莫大的耻辱，应该毫不犹疑的退出国民党。当时中央的主张却是第三种意见：陈独秀在当时提出来的有名的一句话可以完全表现出当时中央的意见、就是“办而不包，退而不（～～以上第三十九页，以下第四十页～～）出”，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三月二十号的事变是共产党的急进政策，是想包办国民党的事逼出来的，所以以后只应“办而不包”；马上退出国民党是错误的，但是一定要向右派退让，所以只要“退而不出”。当时主张退出国民党的固然是错误的；可是陈独秀的名言“办而不包，退而不出”却正十足的表现了专一奴服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精神；

中共内部虽有分歧，但在最后对蒋介石实行了妥协退让，这与苏联顾问的决定密切相关。

事变之后，原在广州的苏联首席顾问鲍罗廷等人不在广州，这是蒋介石选择这一时机发难的原因之一。首先作出对蒋介石妥协决定的是刚到广州不久的以布勃诺夫为团长的布勃诺夫使团。使团于当年二月代表苏联共产党访问中国，三月中旬抵达广州，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三月二十四日，布勃诺夫主持召开顾问团会议，决定处理事变的方针，会议决定撤销为蒋介石所不满的季山嘉等人的职务，以此向蒋介石让步。斯切潘诺夫出席广东苏联委员团共产党分部所作的报告，不仅丝毫未触及蒋介石反苏反共的要害问题，反而检讨苏联顾问与中共双方所犯有的错误，并指责中共“于党务之工作及军队中之宣传，亦铸成许多错误，彼等不知尽力于组织国民党，默然转移，只知道以显明的扩充共产党为工作之总方针，欲在（～～以上第四十页，以下第四十一页～～）各处完全把持一切指挥之权，致使国民党因嫉忌而解体。”

……………………

第四十二页：

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共产国际的政策往往受苏共很大影响，因而中共的政策一般必须与苏联顾问保持一致，中共向蒋介石妥协退让，正是这种关系的表现。

——————————————————————————-〕〕

由以上的中共书籍节录，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

一、所谓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境内的俄国党。

“共产国际”的政策不止受苏共很大影响，“共产国际”根本就是俄国的化名！是俄国推行“世界革命”的工具！“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表示所谓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境内的俄国党！故俄国党的一切作为都是唯俄国“顾问”的脸色是从！

二、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完全被俄国党所把持！

民国十五年一月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二百七十八人（或为二百五十六人），其中俄国党党员和国民党投俄代表一百六十八人，国民党代表一百一十人。中国人为求生存，必须力图争取主导自己的政策！“不可使中国限于被动地位”！不可使中国变为俄国的从属国！不可任由俄国党在中国境内为所欲为！！

三、“中山舰事变”是俄国党所主导的阴谋。

因为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号的（中山舰）事变是共产党的急进政策，是想包办国民党的事逼出来的。”（陈独秀语）所以中山舰事件是由中国境内俄国党的“急进政策”主动制造事件“逼出来的”。（换言之，不是国民党制造的事变。）

因为三月二十四日俄国驻广州代表召开顾问团会议，决定撤销季山嘉等人的职务。

现在反过来思考，如果“中山舰事变”真如同俄国党所称是“蒋介石一手制造的”，

这种故意制造中山舰事变的手段，马上就可以令俄国撤消几个顾问的职务，

那不是太如意了吗？再制造几个事件，就可以让俄国人把所有顾问全部撤光！！

果真如此，有“征服全世界‘志气’”的俄国人，也就不太光彩啦！

事实上，中山舰事变确是由俄国“顾问”策画，及由中国境内的俄国党去执行，但事机不密，被查出真凭实据，在有力证据之下，俄国人才不得不同意撤消若干顾问的职位。

他的谎话说一百遍，于是我家马儿的头上就长出两支角！！哎！！

四、俄国“顾问”利用共产党控制国民党。

苏俄顾问团在致其驻华使馆的报告中说：

“现存的国民党是我们建立起来的。它的计划、章程、工作都是在我们的政治指导下按照俄国共产党的标准制定的，只不过使它适合中国国情罢了。直到最近，党和政府一直得到我们的政治指导者的周密的指导，到目前为止，还不曾有过这样的情况：当我们提出一项建议时，不为政府所接受和实行。”（最后一句话的意思表示：俄国顾问所提出的建议，从来没有被国民政府拒绝过。）

这也就是说，就俄国人的观点视之：俄国人完全控制了中国政府！！

马列门徒是以此为“成就”呢？还是以此为中国人的耻辱？？！！

三流国家的政府都可以有一些自主权！！

请大家张开眼睛看一看！

如果俄国人以这一段相同的语句，讲给英国人听、或讲给法国人听，表示英国政府是在俄国“协助”之下运转，法国政府是在俄国“协助”之下运转，

英国人会愤怒到什么程度！！？？

法国人会愤怒到什么程度！！？？

但是！

今天，俄国这一段欺凌中国的话，在中国境内的俄国党所出版的书上印出来没有一点愧色！！！！！！！！！！！！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我们中华民族还能生存多久！！！！！！

五、俄国“顾问”明言要篡夺国民党。

斯切潘诺夫出席广东苏联委员团共产党分部所作的报告，检讨苏联顾问与中共双方所犯有的错误，并指责中共“于党务之工作及军队中之宣传，亦铸成许多错误，彼等不知尽力于组织国民党，默然转移，只知道以显明的扩充共产党为工作之总方针，欲在各处完全把持一切指挥之权，致使国民党因嫉忌而解体。”

俄国“顾问”指责中国境内的俄国党“以显明的扩充共产党为工作之总方针”，大张旗鼓，引起国民党党员的注意。

俄国“顾问”认为中国境内的俄国党应该“默然转移”，在暗中、不动声色的夺取国民党的组织。

自由人中国八十八年七月二十日

╰════════════════════════════╯

共党阴谋确证

现在举出一个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有关南京事件阴谋的证据。

这个证据，是一件秘密文书，乃莫斯科方面依据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正好是北伐军克复南昌之时——第三国际所举行的第七次会议之决定，发给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武官的训令。

这个文书在落到中国人手里的时候，其上端左角及后半截业已烧毁，原文只留下了二分之一；可是，在烧剩下来的部分之中第五项及第七项则有这样的记载：

第三国际的训令

“五、必须设定一切方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为达此种目的起见，必须设法获得各国对于国民群众之适用武力战斗。为引起各国之干涉，应贯彻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抢掠及多数惨杀，亦可实行；遇有与欧洲军队冲突事件发生时，更应利用此种机会实行激动。

“七、实行此种排斥欧人之运动时保存各国间之不协调，非常重要。日本能于最短期间派多数军队来华，故令日本与各国隔离，尤为特别重要。必须严加监视，务使日本侨民无被害之人。”

这个训令，对于“南京事件”的背后关系究竟在那里？实在是提供了一个很明确的证据。

当时，在中国持有权益的列强国家，对于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的北伐进击，都非常敏感。尤其是以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的英国，鉴于他所支持的吴佩孚战败，唯恐将受到影响而处于不利的立场，颇为不安；至于日本，则支持张作霖，图谋将其势力由东三省延伸到华北地区。

一九二七年一月，国民政府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又有传说上海的租界恐怕也要被接收，因此，列强国家乃计划以保护侨民为名，在主要地区增加兵力。

这些情况，对于共产党来说，该是机会来了。盖因此可以藉题发挥，煽动群众、掀起排外事件；如果能导向国民革命军和列强在华驻军开战，从而搞垮国民党，则有可能一举迈入赤化运动的途径。

据日本资料：一九二七年五月底，列强国家的驻华兵力——在上海方面，有日、美、英、法、义、荷、西、葡八国，合计二万五千人；北京方面，有日、美、英、法、义等五国，共五千人。海军以长江流域为中心，八国共有军舰一百零四艘。在各国之中，英国力量最大，仅在上海便驻有一万六千七百人，以及配置在各地区的军舰有四十二艘之多。

林祖涵与程潜间的交易

在南京事件阴谋的背后，未曾例外，又是站的俄国顾问鲍罗廷其人。做他爪牙的，则为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祖涵和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两个共党分子，而总指挥程潜更是被他们所操纵的傀儡。

而且，林祖涵与程潜之间，还进行了一项交易——当事件前夕的三月二十三日，林祖涵于鲍罗廷在武汉召集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中提案；以程潜为管辖上海、南京等地区的“江苏政务委员会”主席，程潜由于垂涎江苏地区，乃不惜为共产党助一臂之力；而在事件发生的当天早晨，最初进入南京城的，就是李富春所隶属的第二军和林祖涵所隶属的第六军。

经过调查结果，情况已经很明白——请看武汉政府所派担任调查的外交部秘书韦悫的报告是这样的：

“……我军陆续入城，当时敌军大部分虽已退出，残敌尚未肃清，城内秩序一时未能恢复。宁垣反革命分子，乘机鼓动地方流氓及溃兵，事前取得我军被虏兵士服装，假扮革命军，肇生事端。”

这个事件，是出于共产党的阴谋，也被国际间所认定。英国外相张伯伦，于五月九日在下院的演说中，就有这样的话：

“此次南京事件，其组织与鼓动，实系第三国际之指挥。……计划南京暴动者，似有意使列强与蒋介石氏为难。……惟此种事件，已使中国人民不信任共产党人与俄国顾问矣！观察此种事实之发展，我政府对于南京事件之惩戒问题，似有转圜之余地。”

中国人对于苏联的不信任日益强烈，四月六日，掌握着北京实权的张作霖，搜查了中国共6[123]1435产党员藏身之处的苏联大使馆，逮捕李大钊等六十余人，没收秘密文书多宗，其中包括有“在华密探局组织法”、“苏联大使馆指示密探员调查军、政情报之训令”等件。李大钊等主要分子二十人，于二十八日以意图颠覆国家的罪名被判处绞刑。

又在英国方面，当上述张伯伦演说的三天之后，也搜查了驻在伦敦的苏联商务代表处，并没收其文件；英国议会且经议决对苏联断交。

发动全面清除共产党

由以上情况，可知“南京事件”正是在史达林“征服世界路线”之上的一个暴动镜头。

必须蒋总统作最后决定的时刻，业已到来。

四月十二日，终于发动了全面清除共产党的行动。

第三国际的手段

共产党很明显地对于为统一全国的北伐进军肆行其妨害工作，并非自南京事件开始；而是当出师之初，就在进行着有组织的活动——不管怎么样都得要造成北伐失败的局面。

是故在以国民革命为目标的国民党来说，如果第一敌人是北方的军阀，第二敌人是列强的帝国主义，则不能不指出第三敌人就是混在国民党内从事破坏活动的共产党。

鲍罗廷导演破坏活动

指导妨害北伐工作的人，就是苏联顾问鲍罗廷；而在他的背后，则是第三国际。

他们首先对于北伐表示反对态度。在北伐开始的当时，便散播“怎么样也找不出胜算，看来非失败不可”的谣言，打击国民革命军的士气。

谁知，北伐之师却一路势如破竹，和他们的期待正好相反；于是，他们便毫不顾忌地要来绊国民革命军的脚。因为如果国民革命军达成了统一全国的目的，则对于他们来说，是颇为不利的。

鲍罗廷动起脑筋来了——最直捷了当的策略，就是“打倒蒋介石”。他惟恐蒋总统的声望随着军事胜利而日隆。

他们首先阴谋制造革命阵营的分裂，这是自北伐刚刚开始之后～～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在广州所举行的共产党第二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开始。他们通过制造国民党分裂的策略如下：

“国民党内部之分化有四种——反动的右派（冯自由、马素、孙科、古应芬等）代表第一种；共产派代表第二种；左派（汪兆铭、甘乃光等）代表第三种；新右派（即中派如戴季陶、蒋介石等）代表第四种。……我们要联合左派，并逼中派向反动右派的进攻；同时防止中派之发展，迫其离右向左。”

这样的策略，就是要把有历史的国民党同志们区分色彩，使彼此之间发生分裂抗争，以谋抵消其力量。

继之，为了要抬起一位左派领袖，乃有意迎接在欧洲的汪兆铭回国，因而策动共产党所能影响的浙江、安徽、湖北、上海、汉口等省、市党部向中央发出电报，要求促请汪兆铭归国。由于受到来自各地意见一致的电报战术之所影响，于是在十月十五日中央执、监委员和各省、市党部代表的联席会议上，遂正式决定敦请汪兆铭同志销假视事，并发出电报请他回国。

想不到，在这一个决定方面，共产党又耍出了阴险的手段。他们看到汪兆铭因病耽误了归国的时间，于是便放出毫无根据的谣言——“实则是由于蒋介石去电阻止汪兆铭回来。”这是为了进行“迎汪倒蒋”运动，故而编织如此糟蹋蒋总统声誉并破坏其立场的流言。鲍罗廷并且以这样的中伤空气为背景，和代理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张人杰及代理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见面，要求他们劝蒋总统“辞去党政工作，专理军事。”

阴谋“倒蒋”的空气，也被吹向国民革命军内部。

当国民革命军刚刚攻克汉口之后，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便在评论“北伐军没有得到群众的支持”、“党的权威，应该在军事领袖之上，党应该支配一切”以煽动“反蒋”情绪。

史达林在幕后操纵

远在苏联的史达林，也在幕后操纵。他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上作了这样的指示：

“中国共产党人应当以一切可能的方法，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与国民党没有丝毫共同点的各种各样的军阀，现在都归附广东派（国民革命军）了。……使他们中立，或者使他们变为‘真正的国民党人’（原注＝此系指于共产党有利的国民党人）。只有采用加强政治工作的方法和对他们建立革命监督的方法，才能办到。”

鲍罗廷所拟利用的对象，是第八军军长唐生智。

唐生智本来是以湖南省为地盘的军阀，在北伐初期投归国民革命军，编为第八军。当湘、鄂两省已为国民革命军掌握之后，唐生智不肯调他的第八军转战江西，而一意保存实力，和鲍罗廷结纳，意图夺取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位。

在同年十月，总政治部苏联顾问铁罗尼写给鲍罗廷的报告中，就曾提到唐生智流露其野心的谈话如下：

“蒋介石已经很疲倦了，他最好是休息一下，因为他在江西的进攻，已不可能有什么成就；假如让我来指挥，我不但可以攻江西，并且要攻南京。”

唐生智为了垂涎总指挥的权力，乃和当面的敌人孙传芳秘密接触，又和日本军进行蹉商，以及不通过国民政府而直接向苏联要求援助武器。

于是，鲍罗廷乃利用他这个野心，使之加入“倒蒋”阵营。唐生智在不久之后，便号召保定军官学校系统的将领，企图组成“反蒋联盟”；可是，由于他想大权独揽，反而招致将领们的不满，终于失败。

鲍罗廷不仅利用他人，而且还亲自表演制造国民政府分裂的行动——就是所谓国民政府的“迁鄂”一事。

这个“迁鄂”问题，应可说是达成“倒蒋”目的的一项行动。此后形成两个国民政府——“宁汉分裂”，进而导致北伐中断，并且终于促成国民党结束了他的联俄容共政策。

鲍罗廷的嚣张

鲍罗廷在北伐军攻克江西省会南昌一星期之后的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偕同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司法部长徐谦、交通部长孙科、财政部长宋子文等人预为考察政府迁移武汉的问题，由广州出发北上。在鲍罗廷的内心，是要把能够作为“倒蒋”象征的汪兆铭6[128]1440迎来武汉，树立起在共产党支配之下的政府。

以武汉为背叛的据点

二十六日，国民政府正式决定北迁武汉；十二月五日，原在广州的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停止办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张人杰、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等党政最高首脑则于停止办公之后自广州出发，先往南昌，将赓续前往武汉。

紧接在离粤之后，鲍罗廷分裂国民政府的阴谋显露了出来。他拿准了党、政首脑北迁之际的间隙，抢先于十二月十三日在汉口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以下简称“临时联席会议”），以徐谦为主席，同时决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在湖北开会之前，执行最高职权。”

不用说，这个联席会议在根本上就是撇开了首脑部而擅自制造出来的一个机构，毫无合法根据，只应该说是一种背叛党和政府的行为。

针对这样的做法，党的代理主席张人杰乃于到达南昌之后的第三天～一九二七年元月三日，命令正式召集中央政治会议，并停止临时联席会议活动；同时决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暂驻南昌”。

鲍罗廷毫不理会这个正式决定，反而以联席会议的名义提议在汉口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以下简称“三中全会”）。

是则正当北伐战争的高潮之际，却造成了国民政府实际上趋向于分裂局面的如此不幸事态。

蒋总统劝说鲍罗廷

蒋总统感到无论如何总得设法使两方面达成协调，于是乃于元月十一日亲往武汉，和鲍罗廷见面。武汉方面，有数万民众集会欢迎，而鲍罗廷只以恶声相向。——因为正是鲍罗廷心目中所要打倒的蒋总统本人，现在要想来劝说他，当然会是徒劳无功的。

‘当我到达武汉的第一天晚上，在宴会当中，我讲完了话，鲍罗廷是在最好讲话，他居然公开的在宴会中间批评本党不好。最要紧的一点，就说我们革命里面有摧毁农工的行为；而且对于本党领袖（产经新闻原注＝指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张人杰）批谪、诋毁、污衊得无微不至！最后警告我说：

‘“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ＣＰ（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的。”

‘……他是在宴会中最后讲演。他讲完之后，我本想当场起来质问他，不料，主席徐谦宣布散会了，所以当时没有当场反诘他。

‘到了第二天，我就问他：

‘“你所说的话，完全没有根据。你讲出来那一个军人是压迫农工？那一个领袖是摧残党权？”

‘他竟答不出来。

‘我说：

‘“你不能说这种没有根据的话。你是一个苏俄的代表，你就不能这样破坏本党。并且你们苏俄不比前三年的苏俄；现在的苏俄，各国看起来是个强国，并且还有人在世界上说你苏俄是一个赤色的帝国主义者。你如果这样跋扈专行，如昨晚在宴会中间所讲的话，我可以说：凡真正的国民党党员乃至于中国的人民，没有一个不痛恨你的。你欺骗中国国民党，就是压迫我们中国人民；这样并不是我们放弃总理的联俄政策，完全是你来破坏阻挠我们总理的联俄政策。’（注）

然而，鲍罗廷完全不尊重蒋总统的意思，还是做成决议“临时联席会议暂时继续进行”。蒋总统怀着失望的心情，于十八日回到南昌。

这时，已经感到不能再对鲍罗廷如此制造分裂的工作放置不问，乃于二十七日商得谭延闿和戴季陶的同意，提出驱逐鲍罗廷的号召：

‘我希望党和政府一致使鲍罗廷离开。我们不必顾虑外界的议论，应该站在独立的立场确立革命行动。像鲍罗廷那样跋扈的人，如果不能很快地叫他走，怎么还能完成革命任务？’

共党控制三中全会

可是，鲍罗廷并未屈服，他策动党内共产分子仍旧推进他的相反提案——“在汉口召开国民党三中全会”。南昌方面，开始虽然反对，但后来为了党内团结，还是予以忍让，同意在汉口开会。而中央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张人杰则由于对鲍罗廷的忌避，自动不去出席会议。

三中全会，定于三月十日开幕。七日下午，在南昌中央委员八人之中的谭延闿等五人到达武汉，出席预备会议。

谭延闿说明“蒋介石、朱培德二同志纯粹因处理军务，未能赶来”；并提议“延至十二日开会”。可是，吴玉章、于树德、毛泽东等人强烈反对，认为“不必专候一、二人来参加”而坚持十日开会。

于是，三中全会便这样地为共产党所控制而在主要人员尚未到会的情况之下，强行开会。

这是在南京事件发生之后的两个星期。

注：蒋总统-“庆祝国民政府奠都南京欢宴席上致词”（一九二七四）

共党推动“倒蒋”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开始，在汉口南阳大楼强行召开的三中全会，果然不出所料，自始至终都是在共产党的把持之下。

出席全会的中央执行委员暨候补委员三十三人之中，毛泽东、夏曦等共产党员有九人；再加上和他们通同一气的左派分子，则占将近全体出席人员三分之二的多数，形成共产党说怎么办、便怎么办的局面。至于说能够真正代表国民党的，则只有谭延闿等二、三人而已；而这些人的发言，又完全被共党分子所漠视。

削弱总司令军权

在这一次全会中，通过了议案二十八件，但多数是共党分子早就准备好的。他们的目的，是在公然参加政府机构，以及削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总统）的统帅权。

具有代表性的实例，就是所谓“统一革命势力案”。

在这个统一案中，明记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担负政治责任，应由共产党派负责同志，加入国民政府及省政府。”这显然是改变了前次在二中全会（一九二六年五月）所决定之中央党部各部部长“须不跨党者方得充任”的规定，甚至更让共党分子进入国民政府的主要部门。

又在会议中所通过的“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则剥夺了总司令对于军官的任免权及指挥权，使集中于军事委员会；以及在“修正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案”中规定：“总司令的三军统帅权，应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这是削弱总司令的军权，而对其遂行军事作战任务加以限制。

鲍罗廷等共党分子的活动，并非仅止于此，而且在全会期间，更发动了所谓“提高党权运动”；——在表面上藉口防止国民党的党权低落，打出“一切权力集中于党”的口号，而在背后则叫嚷着“党里有独裁倾向”。

普遍策动党的分裂

他们终于毫无忌惮地出之于以实力来进行“倒蒋”的活动。

吴玉章、林祖涵等人公然不断地散布谣言：

“蒋介石滥用军费”、“蒋介石摧残农工”、“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与奉鲁军阀勾结。”……

三中全会闭幕翌日～三月十八日，吴玉章策动了一次大游行，想把群众运动导引向他们“倒蒋”运动的目标；同时邓演达、郭沫若等人更在汉口民国日报连续发表煽动“反蒋”气氛6[134]1446的言论。

鲍罗廷则和上述活动同时并进，发表了“联俄、联共、工农”的所谓三大政策，意图取代国民党的三民主义。

更有进者，他们不止是在党内这样大张旗鼓，而且还策动在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制造党的分裂和“倒蒋”活动。

他们注以全力的重点地区，是上海。

上海-这个国际都市，经常吸引着列强的注目。因为如果在这里制造出一点事端，就会立即引起国际间很大的反响，所以共产党早就以此地为建立其活动据点的目标。他们利用一九二五年英租界巡捕开枪、造成颇多中国人伤亡的“五卅惨案”，以致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情感极度高昂的机会，以工会组织为中心，逐渐在扩张共产党的势力。

这时，在上海有苏联派来的高底柯夫、阿诺、布哈罗夫等活动分子；周恩来也居于指导地位参加策划。

在上海使用破坏战术

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开始之际，共产党便在上海策动工人罢工，同时更设立了“军事小组”。

另一方面，中国国民党也于九月四日成立了“江苏特务委员会”。特务委员七人之中，虽然也包括有共产党员二人在内，但实际驻在上海主持工作的则是国民党的钮永建（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时曾和蒋总统共同指挥攻打上海制造局）和吴敬恒二人。

特务委员会的工作目标，是在发动上海市民群众赞同国民革命，为接应北伐军进攻江苏铺路。可是，共产党的军事小组却策划着诱导武装工人在北伐军到达之前，由共产党为主体拿下上海，掌握其领导权。

钮永建等人于十月二十四日发动了第一次的群众行动，由工会和商团共出动了一千多人，高举青天白日旗作战；但因准备不够充分，遂被孙传芳属下的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

新年之后的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又掀起第二次的行动。钮永建、吴敬恒等计划召集特务委员会、上海市党部、江苏省党部的联席会议，筹议组织“市政府”，统制行动。可是共产党所领导的“上海总工会”之汪寿华（共产党员）则要求设立“市民委员会”。他的意图是要操纵仰承共党鼻息的群众，造成整个上海暴动情势，但被钮永建、吴敬恒等严予拒绝；于是共产党便擅命“建康”、“建威”两军舰开炮，丝毫不顾已经联络好了的其他军舰及陆军来不及响应，而有意始事态陷入混乱。共产党之所以如此搅乱战局，其打算是在于即使打6[136]1448倒了军阀统治，但如不能符合共产党的愿望，则莫如导致革命行动失败为有利。——是一种很毒辣的“破坏战术”。

三月二十一日，国民革命军东路军进迫上海近郊。

敌军指挥官毕庶澄认清了战况对于己方不利，乃派遣代表到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处谈判投降条件。上海可望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之下归属于国民革命军掌握。

于是，共产党似乎是迫不及待地就在这一天便煽动工人暴动起来。

这是在发生“南京事件”的三天之前。

蒋总司令驻沪

在革命军可望不流血占领上海之前的三月二十一日，共产党发动工人以“欢迎北伐军”为由进行罢工。继之，出动左翼工人所组织的“工人纠察队”，首先袭击警察，解除其武装；并进攻业已开始撤退的毕庶澄所属残余部队，想藉以抢先掠收大量武器，组织不受国民革命军指挥的武装部队。

可是，碰到了毕庶澄残部的抵抗，在不可能达成目的之际，刚好薛岳（现任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所率领的第一军第一师于翌日～二十二日赶来加入战斗，才由国民革命军控制了上海。

共党设计夺取上海

白崇禧、薛岳等北伐军迅速拿下上海的行动，使苏联和中共感到震惊。就在克复上海的当天，托洛斯基派便公然承认“对于苏联和中共均属不利”。因为他们总想用尽一切方法以谋确实保持住老早就在悉力培植势力的上海，为共产党的出头发展之地。

南京事件，就是发生在两天后的二十四日，是要使失败于上海的“暴动化”实现于南京；然而这个阴谋结果也归于失败。

此时，鲍罗廷与共产党乃重行设计夺取上海统治权的策略。他们的手段是抢在国民革命军的前面，组成可以为共产党所操纵的行政机关。于是便匆忙召开所谓“市民大会”，选出代表三十五人，并再由其中选出十九人为委员，组织在共产党支配之下的“上海市市民政府”。

在“市民政府”委员之中，为了要利用国民党、国民革命军的声望，所以也列有白崇禧、钮永建的名字；可是钮永建已声明不参加，白崇禧更明白表示反对此举。

所谓“市民政府”，实则就是纯粹的共产政权。共产党的江浙区委员会便曾说明：“上海的市民政府，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苏维埃、巴黎公社。”

为鲍罗廷所支配的武汉国民政府，完全承认共产党以这样的方式统治上海，并给予支持。当上海光复之后，武汉方面立即召集政治委员会，作成“应付上海政治情势”的四项决议。这个决议是把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搁在一边，不给予任何地位和职权；另以白崇禧、钮永建等为政治委员会上海分会的成员之一，抑低他们的地位。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共产党同路人郭沫若则被擢升为“上海军队中之政治工作指导员”，不用说，是赋予了在上海驻军中煽动“反蒋”的重要任务。

蒋总司令亲自坐镇

这时，蒋总统感到上海的情势如再放手不管，将会重蹈武汉的覆辙。

‘我们先要占领上海。因为上海是中国经济的枢纽，如果上海再落在共产党人的手里，如汉口一样，弄得外交、经济、政治都扰乱不堪，使国民革命不能成功，那不但是稍有资本的商人不能安居乐业；就是一般民众，怕也要受他们的压迫威胁，而无可告诉了。’（注）

蒋总统为了亲自坐镇，乃于三月二十六日自九江进驻上海。

翌日～二十七日，各界举行盛大的“欢迎北伐军大会”，庆祝国民革命军光复上海。

可是，共产党则越发肆无忌惮地对蒋总统公然表露出敌对态度。

首先，成为问题的是共产党的私兵——“工人纠察队”的存在。

当时，工人纠察队已经膨胀到了三千人之多。该队总指挥为顾顺章，而幕后操纵他的则是周恩来。顾顺章是一个神枪手，曾充鲍罗廷卫士；他在后来向国民党投诚，家属则被周恩来所指挥的中共军事组织所杀害，尸体埋在其住宅地下，遭致了悲惨的命运。

纠察队在闸北商务俱乐部设立指挥处，任意搜捕其所谓“反动派”，引起市民的不安。

下令解除共党私兵武装

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以及革命军的信誉，都不能容许共产党的私兵在上海横行不法。

首先，下令上海总工会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服从白崇禧节制。可是总工会则以“纠察队不同于军队性质，完全是工人自卫组织”而拒不遵行。当进驻闸北的国民革命军逮捕了共产党的不法分子之时，共党便立即向武汉报告：“蒋介石调查纠察队内容，要加以处置。”

于是在共产党把持之下的武汉中央政治委员会竟接受了吴玉章所提“蒋介石的行动是反革命的，请予严重处置”的要求而于四月一日决议：“在本党（国民党）未组织宪兵维持革命秩序时，承认纠察队为维持革命秩序之合法武力；如军政长官有任意解散者，即为反革命。”

这个决议，是要把对于他们有阻碍的人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加以排除。

注：蒋总统-“国民革命与经济的关系”（一九二七七）

汪兆铭不听劝告

在鲍罗廷导演之下的武汉政府，依据四月一日（一九二七年）“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决议，通告免除蒋总统所担任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

蒋总统表明誓愿

‘如果只是个人的进退出处，不可介意；但这是关系到党与国家的问题。’

蒋总统言念及此，乃向全国同志重新表明：

‘革命责任，不容推诿，誓必自责，完成北伐。’

于是，武汉政权乃和蒋总统完全处于对立状态。

汪兆铭由欧洲归国，抵达上海，刚巧也就是在这一天。他在巴黎接到邀请回国的电报，取道柏林东归，并经过莫斯科稍事勾留，洽得苏联政府和第三国际约定给予全力支持之后，回到国内。

汪兆铭归来，受到宋子文、吴敬恒等人的迎接；他对于共产党似乎比以前提高了警觉，向着吴敬恒说出这么一番话：

“共产党素来不轻变更所定政策，共产党实以国民党为利用品，本人亦不赞成共产党之阶级革命及劳农专政。且据本人观察：国民党与共产党亦不易继续相安；但本人希望暂能维持合作，自己愿负调和之责。”

三日，蒋总统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分，向全军将士发表欢迎汪兆铭归国的通电：

‘汪主席在党为最忠实之同志，亦为中正生平最敬爱之师友。……中正深信汪主席既出，必能巩固党基、集中党权，以底国民革命之全功，而竟总理未竟之遗志。……

‘自汪主席归来以后，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唯有统率各军，一致服从。至军政军令各有专属，军政大计，应归统一；而中正独司军令，俾专责成——同心一德，完成革命。’

蒋总统和汪兆铭在上海数度晤谈，恳切告以为谋自共产主义者手中挽救国民党，必须实行“清党”，并要求汪留在上海。

汪兆铭对于武汉方面之排斥蒋总统虽然也表示愤慨，可是提到清党却颇为踌躇，他说：

“介石：如果这一回东南与武汉开战，如果你失败了，我们国民党必就此消灭，共产党必就此起来；如果你得胜了，武汉被东南打倒的时候，国民党就要恢复到民国十三年以前的状况。要是恢复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无论右派的军队、左派的党员，一定不会同你蒋介石合作，你在党里的生命，怕要从此消灭。”

蒋总统感到汪兆铭去国很久，对于国内情况没有深入了解；况且这也不能计较个人在党里的生命，于是便答覆如下：

‘现在不是这个问题，现在是国民党生存的问题。如果国民党可以生存的时候，那么，无论什么责任我都可以负担起来；绝不能自己不负责任，从中取巧，来做一个好人。现在我们只有不管成败利钝，同共产党分离。

‘如果共产党被我们国民党消灭了，那只要他是纯粹国民党党员，能为本党奋斗争气，我都可以同他合作。总要把共产党消灭了再讲。’

接着，更恳切地对于汪兆铭以后的行动加以忠告：

‘你切不要到武汉去。你去了，一定不能出来，那时，你想不做共产党的工具亦不能了。你如果真正为本党，那就要到南京去，然后再请武汉一般中央执行委员过来。如果你到武汉去，国民党还是不能团结，你还是要做本党的罪人。’

四日，蒋总统和张人杰以及军事将领们同与汪兆铭会谈，决定今后合作一致处理内政、外交问题。

然而，汪兆铭却违背了这个决定。

汪兆铭与共党分子接触

他悄悄地与陈独秀、周恩来接触之后，突然于四月五日和陈独秀发表了所谓“汪陈联合宣言”。

在宣言中表示：“我们的团结，此时更非常必要。”“中国国民党同志，凡是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其对于中国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

汪兆铭突然一百八十度地转变了他的态度。他和陈独秀联名发表的宣言，招致国民党同志对他的失望和愤怒。吴敬恒激动地向他诘问：“这是怎么一回事？中国从此即由两党共同统治了吗？”

因为照道理说：孙先生的容共政策，只是许可共产主义者加入国民党而并非承认共产党来攘窃国民党的。可是汪兆铭并没有向吴敬恒作明确的解答，便于四月六日悄然登上轮船，前往武汉。

武汉人士以及共产党，在这段期间，正和拉拢汪兆铭工作齐头并进地一步一步推进着他们的“倒蒋”计划。

为解除疾苦革命

‘国民革命军自去年（一九二六年）北伐以来，共产党人对于中正个人，早有不满的表示，早有不少的批评和攻击。其中最大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蒋中正将来一定要造成一个资本主义政府”；并且说：“蒋中正已商人化，非防止他、打倒他不可。”这些话，是共产党人攻击中正个人唯一的焦点。

‘我深知商界的痛苦，并没有比农、工差异的地方；并且更明白在国民革命期间，也不能离开了商人而专使一个阶级来统治中国。……

‘我们国民党是本着三民主义、建国方略来革命的，完全承认个人的私有财产；共产党是要取消私有财产的，两党不同的最大一点，就在于此。

‘我们为什么要革命？我们完全是求经济独立而来革命的。我们完全是要脱离帝国主义者的压迫、解除民众的疾苦而来革命的。

‘再明白些说，我们之所以要革命，就是要求农、工、商、学．兵各界的经济有良好的状况，也就是为我们全国四万万同胞有良好的结果，这是我们革命的最后目的。’（注）

这时，共产党一个劲地在做着政治上的乃至心理上的“反蒋”宣传，越来越是明目张胆。

共产党横加诽谤

在上海方面，共产党通告党员：“只顾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是不成的；必须反蒋介石。”“宣传蒋介石的罪恶，使民众攻击蒋介石，并造成蒋介石与其他国民党员的冲突。”又在军队中的共党分子之间，更传播着“黄埔军校第一、二、三期学生统统反革命了！”“凡是蒋介石的学生、部下，都是他的工具、走狗”等类诽言谤语。而在武汉方面，鲍罗廷等人则全力加以呼应声援。

在这个当口的上海，为了处理南京事件，正是和列强之间折冲频繁之际。因此，蒋总统乃急电武汉外交部长陈友仁，请其速来上海主理外交。但武汉方面并未应允，以致国民革命军不得不担负起对列强交涉的事务。故而蒋总统自三月二十六日到达上海之后，便连日和各国有关人士会晤。

三十日，在接见日本领事之后，向宋子文感叹地说：

‘军事难，财政亦难；政治难，党务更难。以一身兼备数难，如何其不疲耶？’

可是，武汉方面，在下令免除蒋总统职务的第二天～四月二日，又发出应即离开上海的追击训令，内容是这样的：“克日离沪赴宁，专任筹画军事。”“对于外交，未得中央明令以前，切勿在沪发表任何主张，并切勿接受任何帝国主义口头或文字之通牒。”

共党蓄意制造暴乱

从心所欲的共产党徒们，决定进而策划暴动，由陈独秀、罗亦农等推动“武力进攻蒋军”的计划，和打算驱使共党私兵——“工人纠察队”袭击上海租界，藉以惹起列强与国民革命军的武装冲突，以谋制造“第二南京事件”。不过，这个计划却被第三国际制止，而未见诸实行。后来，陈独秀曾经提到：“罗亦农看到第三国际命令中止行动的电报，狂愤地把它摔在地上，而不得不服从国际命令。”

这类暴动计划，并非打算在上海一地。四月二日，在江西省南昌有第三军教导团团长朱德等共党分子主使掀起暴动，袭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等机关，拘捕干部，更撕毁孙先生遗像和青天白日旗；接连三天，叫嚷“打倒三民主义”——这就是“四二事变”。

事态已经很快地发展到无可避免要诉诸实力来裁决是非的程度。

吴敬恒报告共党逆谋

当免除蒋总司令职务的“命令”发表和“南昌四二事变”纷至沓来的四月二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正式在上海召集全体会议，出席者有蔡元培、张人杰、陈果夫等八人，由吴敬恒提出内容如下的报告，谋求断然处置：

“共产党敬告同志宣言曰……‘我们根据最近决议的精神，以党团监督政治，以政治监督军事方案，切实督责想做新军阀（诬指蒋总统等军事将领）的人。倘若还要难为我们，那就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痛痛快快的来解决他。’本委员（吴敬恒）按：乱麻指国民党，快刀必是指无产阶级人民的血肉。请大家注意……他们常用借乙打甲、借丙打乙的方法，……现在拥汪倒蒋，过些时又必拥鲍倒汪，再过些时又必拥列宁倒孙文。……这种无产阶级人们，又是他们的猫脚爪，最后打尽了中国大部分人，就实现清一色的共产世界。……

“将来，中国果为共产党所盗窃，岂能逃苏俄之直接支配？乃在变相帝国主义下，为变相之属国。……是以本委员特将亡党卖国之逆谋，十万急迫，提呈本会。……”

注：蒋总统-“国民革命与经济的关系”（一九二七七）

全面清党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议，接受了吴敬恒的请求，认定共产党员是危险分子，备文咨送非共产党员之中央执行委员，请予监视。

解散共党把持的政治部

在和监察委员采取以上措施的同时，蒋总统以总司令名义下令解散东路军第一、二两师政治部。本来在军中设置政治部，是为了贯彻三民主义，以谋思想团结；可是第一、二两师政治部却在总政治部主任共党同路人邓演达的领导之下，成了共产主义者麇集之所，从事煽动“反蒋”、“反何”（应钦）。是故解散各该政治部的行动，就是对于他们采取强硬措施的第一炮。

失掉师政治部的共党分子们，于是便要求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上海办事处之中的同路人为之奥援，于五日召集驻上海的左翼政治工作人员筹议发动叛乱。

属于共产党私兵的“工人纠察队”，也在周恩来的指导之下作策进武装暴动的准备。

他们煽动地宣称：“如果有谁要想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上海的工人要全体罢工来反抗他。”“如果有不利于工人纠察队的行动，要用群众行动来把它压下去。”

同时，上海的各国租界当局则以保护侨民的藉口，遮断交通，实施戒严。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如果共党分子制造叛乱而引起列强干涉，则有酿成“第二南京事件”的危险性。

面对如此险恶动向，蒋总统乃于六日命令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派兵将总司令部政治部上海办事处查封。

继之于四月九日，发布上海戒严令，任命白崇禧为戒严司令。

同时，蒋总统本人则率军赶往南京。

清除南京的共党分子

在南京，本来驻有三师部队，但也被共产党所操纵。而武汉的鲍罗廷等人，则打算将业被共党所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迁往南京。南京是国父孙先生于中华民国开国之初建都组府的枢要地区，绝对不能让其落入共产党的掌握。

由上海进驻南京的第一军所属第一师和第二师，是黄埔军官学校所建立的可靠部队。

于是，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将南京附近铁路切断，使城内三师人陷于孤立；然后很轻易地将其中抵抗分子清除，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南京事件”首谋者的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祖涵乃逃往九江。

在南京市内，原先受共党分子压迫之孙文主义学会的青年们也都站了出来，包围为共产党所操纵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及总工会，并逮捕共产党干部送往公安局。

这一天，正好是共党分子预定在南京市内体育场举行“迎汪大会”；他们面对突然变化的情况，慌忙将标语上的文字改为“迎蒋”，以资掩饰。

此时，有些由共产党控制之下的武汉逃出的学生们，来到总司令部请求保护。他们异口同声地陈述：在武汉的同学们有被共产党枪杀者，有因受不了迫害而投河自尽者。

蒋总统听了学生们的陈述，痛切地在日记上写下：

‘共党叛逆残忍狠贼如此，不知何时能平此乱也。’（四月十日）

进驻南京之后，蒋总统立即通电汉口汪兆铭、谭延闿，南京程潜、何应钦，上海胡汉民，南昌朱培德等人：

‘中正已于本（九）日进驻南京。东南虽已底定，北伐尚未成功，各项进行事宜亟待解决，务请诸同志于本月十四日以前驾临南京，筹商一切，不胜盼祷！’

在这个时刻，共产分子仍然意图抵抗。他们于十日举行“南京市民肃清反革命派大会”，决议：“请将反动分子交由人民审判。”会后，涌往总司令部，提出要求，势焰嚣张。

当天夜晚，共党干部复聚会于纱帽巷十号民宅，密谋“叛乱”。事为军警当局侦悉，突击检查，将十多人一网打尽。在没收之文件中，有决定分担反蒋宣传的会议纪录，以及“同胞们！起来！罢市！罢工！罢课！来打倒叛党的蒋介石！”等标语。

由于这一次的搜查，南京共党干部全被逮捕，市内秩序才见恢复。

自“南京事件”以来，纷争不绝的混乱局面，直到十七天之后的此刻，终于重归平静。

“谤怨沸腾，万口嘲讥”

蒋总统虽在百忙中，仍不忘抽暇接近书卷，在一向奉为师表的曾文正（国藩）集中读到“谤怨沸腾，万口嘲讥”八个字，真有古今同叹之慨！

继南京之后，由白崇禧负责的上海，也迅速展开行动。

在白崇禧指挥之下的第二十六军，于十二日黎明之前，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同时逮捕了共党分子汪寿华等数十人。

这就是“全面清党”。

肃清上海共党

上海戒严司令白崇禧指挥第二十六军，于四月十二日（一九二七年）上午二时许开始行动，对于共产党私兵——“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所在之地的“闸北商务俱乐部”以及为他们所盘据的“闸北总工会本部”、“闸北商务总厂”、“天通庵路天主堂”、“南市华商电车公司”、“南市三山会馆”、“浦东三区警察署”等处同时加以搜查，乃和预料将被搜查而加强戒备的“纠察队”之间，发生枪战，互有伤亡。但到了上午八时左右，各处都被镇压缴械。

吴淞方面，也有“大街西市圣公会”及“政治大学宿舍”等三处，差不多是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之下被缴械。

白崇禧在同时搜查各处进行缴械的当天，发出布告——严禁罢工。凡有违反者，严重处分。

但共产党则煽动工人，于十三日由上海总工会宣言“全面罢工”，并召集所谓“市民大会”，向各方面呼吁支持。

在闸北青云路广场所召开的“市民大会”中，共产党徒们呼号“新军阀和帝国主义者缴了我们工人的枪械，杀了我们工人，我们的委员长汪寿华也被杀死了。”（汪寿华本名何松林，实际是在四月十五日被处死刑。）煽动群众，冲往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发生冲突。在二十六军还击之下，双方皆有伤亡。

暴露了惊人的事实

这一次全面清党结果，暴露出极其惊人的事实：

‘他们（共产党）……用流氓编成的纠察队来挟制我们还不够，还把收买毕庶澄、张宗昌的败兵编在里面，给他们以机关枪等各种利器，来残杀我们武装同志。

‘四月十三日，在闸北袭击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的时候，当场捕获九十余人，其中有四十几个是身带直鲁匪军特别遣派证章的；可见他们只要能破坏革命，什么敌人军阀都可以勾结，什么手段都可以用到。’（注一）

继之，接收了共党分子的巢穴——“上海总工会”，将原有组织解散。这也就是使在相当长时间内呻吟于暴力压迫之下的上海民众，获得解救。

‘用工人血汗或罢工争来之所得，以为招练纠察队饷项，动辄挟纠察队以示威。同时，生活增高，工人所得工资之购买力亦因此减少；厂作倒闭，店主弃产潜逃之事，各处都有；工人失业数目日增一日，工人痛苦亦日甚一日，良好工人至于敢怒而不敢言，比比皆是。

‘中正偕我数十万革命军人转战数千里，其目的，在为我最大多数农工谋解救，减少我农工之痛苦。不意师行所至之地，处处为共产党所把持，使真正之农工反益陷于水深火热之境，可为痛哭。

‘其用农工以作政争之策略，至为恶毒。--凡地痞流氓，一着纠察队制服，即有生杀予夺之权；若政府稍经依法制止，即为摧残农工，罪在不赦。’（注二）

十四日，赓续搜查了共党分子的活动场所--“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上海特别市党部”、“上海学生联合会”等各机关。

在上海的共产党干部，差不多都已就逮；其领导分子汪寿华、罗亦农等人，皆判处死刑。

周恩来誓愿转向投诚

周恩来也被捕获，他化名“伍豪”，一度被宣判死刑，但表示誓愿转向投诚而被开释，且于释出之后，在上海申报、新闻报两家大报上大登“伍豪脱离共产党启事”，欺骗当局。

共产党的反抗，到此结束。～～十五日，自动取消“罢工宣言”，上海恢复平静。

这次“四一二清共”，在蒋总统排除军中共党分子，乃至于掌握实权方面，发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据日本外务省亚洲局第一课在当时所整理的调查报告中，对于情势发展到清共行动的背景，大致有如下的分析：

“反共与共产两派的反目，……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底，由于蒋介石表明反共态度而为之表明化。……共产派凭藉武汉中央党部的决议及国民政府的旗号，力图削减蒋派力量，以致抗争情势更加明显。目前，例如三月二十四日的南京事件，可以想像到实际是共产党企图使蒋介石在国际间处于困境的苦肉计。……”

此外，据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于四月二十一日向田中义一外相所呈报的第三六七号机密谍报，报告上海清党之后的情况比较平静，有如下述：

“因为多数罢工的工人们，本来只是迫于一部分纠察队的暴力恐怖，不得已而盲从；现在鉴于军方严厉取缔，稳健势力渐增，罢工命令已经完全不能实行。……”“和总工会所预期的情况相反，其威令丝毫不能发挥作用。……这无非是一般人对于共产党的横暴施为，已经终于有所觉醒。……”

又据此一报告提到市内公共汽车、电车、电信、邮政等公用事业，都差不多没有任何阻滞。

关于此次清党事件，共产党宣传“几千人被残杀”，但根据日本外务省在当时的调查则为——“截至四月二十二日，有九十人被判处死刑。”

注一：蒋总统-“告全军将士书”（一九二七四）

注二：蒋总统-“告中国国民党同志书”（一九二七四）

以南京为国都

在南京、上海进行清党的同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纷纷到南京聚集，预定于四月十五日举行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第四次全体会议（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日期和地点，本来是出于汪兆铭的提议；可是他本人却去了武汉，没有下文，虽经一再催促，终于未闻有来南京之意。

中央执监委决议

因此，到达南京聚会的中央执、监委员乃于四月十五日改开“谈话会”，提出了包括（一）以南京为国都；（二）取消不合法之中央党部；（三）取消汉口伪政府；（四）取消跨党分子党籍等八项方针。

继之，于四月十七日正式举行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国民政府于本月十八日开始在南京办公。”

国民政府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推举胡汉民担任。

胡汉民于一九二五年廖仲恺被戕之后，被迫前往苏联，翌年四月归国；但因共党分子及汪兆铭等压迫，一直待在香港。

在政治会议中，又决定了国民政府秘书长钮永建、总政治部主任吴敬恒等各部门的负责人。

南京，是在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开国之初，经孙先生决定为首都所在之地，但被袁世凯所推翻，其后，便一直落于军阀统治之下，直到此时，才重行定都于此。

中华民国自一九二七年以后，直到今天，一贯以南京为正式首都。当年中日战争之际的重庆和现在的台北市，都是临时首都。

十八日上午，国民政府在旧江苏省议会举行成立典礼，由蔡元培代表中央党部向代表国民政府的胡汉民授印。

蒋总统继续肩负大任

继之，举行阅兵典礼，胡汉民发表演说，向国民革命军将士呼吁“一致拥护蒋总司令，以巩固革命阵营，打倒反革命势力。”

国民政府同时发表宣言，向国民揭示革命方略：（一）使党军愈与人民密切的相结合；（二）造成廉洁之政府；（三）提倡保护国内之实业；（四）保障农工团体之利益，并扶助其发展。

同一天，国民政府又发表“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文”，要求为完成北伐而“猛进”。

在这篇文告中，特别明白宣示对于党国忠诚之重要性——“总理既逝，本党秉承遗训，出师北伐，而以军事全权托付蒋中正。蒋同志忠贞勇敢，受命以来转战七省，奠定江汉，四十年来本党军事成绩之伟大，盖无过于今日者。虽然，苟无认识主义，效命党国之全体将士，则蒋同志亦一手一足之力耳！”

自北伐出师以来，被共产党或在明地、或在暗中所妨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权威，至此才见完全恢复。而蒋总统继续肩负指挥北伐的大责重任，也获得确认。

于是，蒋总统在接受了国民政府的文告之后立即对全体将士给予训示如下：

‘今天（四月十八日）虽是国民政府成立的一个纪念日，也可以说是我们国民党恢复党权中兴的一个纪念日，并且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开始独立、自由、平等的一个纪念日。

‘各位将士们要明白——现在我们革命的环境，是很恶劣的，是很危险的。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南京地位处在上海、汉口之间，上海是各帝国主义者的根据地，时用强横的手段压迫我们，汉口现在被共产党占据，勾结了赤色帝国主义者，来捣乱我们的后方。所以我们现在正处在赤、白帝国主义者夹攻之下，而奉、鲁军阀又时时向我们进攻。

‘我们四周的环境，既是这样严重，如果我们还不赶紧觉悟起来，向这种恶劣的环境冲出一条血路来求生，那我们的失败比从前还要来的厉害。……’

在这个训示的同时，更发表一篇告全体将士书：

‘南京为总理亲自指定的都城；在历史上，亦为中国民族求独立自由而屡次建立的都城。邦国之基，自是永奠；是非既分，真伪立辨。中正身负党国重任，自当率我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一致效死，拥护我们南京建都的真正国民政府，并且要消灭汉口共产党所操纵的伪国民政府。’

针对着南京定都行动，武汉方面于四月十七日决定“开除蒋介石党籍”，并下令“通缉蒋介石”。——表示出不承认南京的决定，以及继续由武汉“国民政府”领导的态度。此时状况，就是所谓“宁汉分裂”。

各省同时实行清党

南京国民政府为清除反革命势力，乃发表对共产党干部及附共分子的通缉令，通缉名单以鲍罗廷为首，以及陈独秀：谭平山、林祖涵、毛择东、林彪、周恩来、郭沫若、吴玉章、刘少奇、徐谦、邓演达等一百九十七人。同时，国民党则于五月七日成立“中央清党委员会”（主席委员邓泽如），制定排除共产党员的“清党条例”通告各地党部。于是，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安徽、四川各省也同时实行清党。

清党结果，共党分子乃不能再从事公然活动，多数往武汉逃散，或潜入地下工作。

再度出师北伐

在定都南京、全面清党和国民政府基础巩固之后，国民革命军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再度出师北伐，最初渡过长江。计划中的进攻路线，是沿津浦讨论北上。

津浦铁路纵贯华中、华北，是中国最重要的一条干线铁路。在该铁路沿线，有以山东省为根据地的直鲁军张宗昌所属部队约十五万人和五省联军孙传芳部队五万人部署备战；又在该铁路起点，更有张作霖严阵以待。

作战计划，是将全军分编三路，以由蒋总统兼任纵指挥而以白崇禧代理的第二路，和由李宗仁担任总指挥的第三路，自浦口的津浦铁路以西展开，包围敌军右翼；而由何应钦为总指挥的第一路，则俟第二、三两路进展之后，立即渡过长江，北向挺进。

掌握了九省领导权

五月十一日发动进击，第二、三两路分别渡江成功，第二路于十九日占领津浦铁路线上的张八岭，第三路于二十一日克服蚌埠；第一路也于十五日开上火线，二十三日拿下扬州。

第三路赓续北上，指向徐州。而张宗昌的部队军纪废弛，一面不断抢劫，一面北向逃遁，沿途居民多拿起武器袭击张军。国民革命军则于六月二日兵不血刃，进入徐州。

另一方面，第一、二两路差不多控制了江苏全省，孙传芳逃亡青岛。此时，在南京定都之后的国民政府，已经掌握了苏、皖、浙、闽、粤、桂、黔、川各省的领导权。

可是，所成问题的，还是在于武汉方面的动向。他们虽则支配着两湖地区，不过东、南、西三面都被南京国民政府所包围；北面又受到张作霖奉军的威胁，已陷于四面楚歌之境。

因此，武汉方面乃考虑到以军事行动来打开出路。

共党勾结冯玉祥

此时，可资寄望支援的，是在奉军背后而以陕西为地盘的冯玉祥。

冯军在上年被张作霖、吴佩孚的联军打败，冯玉祥出亡苏联，在莫斯科和史达林接触，提出可以为苏联而将日本军队赶出东三省，请求给予援助；史达林大为欣悦，据说给予大炮二百门，机关枪二千挺、步枪二十万枝，弹药二亿发，以及战车、装甲车等武器装备。冯玉祥得到助力之后，便率领其所统驭的全军集团加入国民党，打着“国民军”的旗号，响应北伐，挥师出击，沿黄河挺进，达于河南省开封附近。及至五月一日，遂在西安正式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在武汉方面，鲍罗廷的意图是这样的：

首先，由武汉出兵，北向推进，在河南与冯玉祥会合，并且还可望打开经外蒙达苏联的联络路线；加之更可与在山东的军阀张宗昌勾结，对在国民政府所在地的南京包围作战。他这个打算，得到陈独秀等人的赞成；可是刚刚派到汉口的第三国际代表鲁易（印度人）则提出不同的见解。

鲁易的主张，是向反对方向发展——挥军南下，夺取兵力单薄的革命根据地广东；同时并在势力范围内的两湖地区推进“农民革命”，准备建立独立的苏维埃政权；谭平山、张国焘都同意这个主张。

经过讨论之后，姑且决定采用鲍罗廷的“北进案”。

于是，统驭武汉兵权的唐生智，乃于四月底开始进击豫南，突迫奉军防线，六月一日，在郑州与冯玉祥会师。可是，没有料到冯、唐之间为了收编部队，意见对立，达不成协议；汪兆铭乃赶往郑州，自六月十日至十二日与冯玉祥举行会议，结果以河南地盘让给冯玉祥，唐生智则率军退回武汉。

解除了北方威胁的武汉方面，可以预料到其下一个目标——不是南京，就是广东。

蒋总统在六月十五日的日记中记下：

‘是其（武汉方面）以豫交冯，而以全力巩固两湖；其后南下攻击或东下攻击，皆意中事也。’

蒋总司令邀晤冯玉祥

在南京国民革命军方面说来，对于这样的情势，当然不能不有所措置。于是，蒋总统乃于六月十九日邀冯玉祥到达徐州会商。冯玉祥对于达成国民革命使命同意合作。会后，由总司令（蒋总统）和冯玉祥发表“联合宣言”，重申北伐主张。

同时，冯玉祥并致电武汉方面呼吁统一，内容有——（一）遣送鲍罗廷回国；（二）在武汉之国民政府委员可与南京合而为一；（三）请唐生智率领所部来郑州协力北伐等项。

此时，武汉方面已经完全陷于孤立状态。

第三国际的密电

对于冯玉祥的呼吁，武汉方面不仅充耳不闻，而且还打算蹑国民革命军之后，进窥南京。

六月二十三日（一九二七年），武汉唐生智下令所属进击南京；当时南京方面的国民革命军已经进驻徐州，更向山东挺进，以临沂为目标而展开激战中。

北伐被迫全军回师

可是武汉方面由张发奎、程潜、朱培德各部合组的作乱军队，则沿长江东下，于七月十七日侵入安徽。

‘时局仍以南京为重，以对武汉为焦点——此本党成败之所系也。’

上面几句话，是蒋总统七月十一日的日记。此时就国民政府的安危而论，比北伐更要紧的当前急务，是南京的防卫。不得已，乃下令北上进击的全军迅速回师。

于是，对面的敌人孙传芳、张宗昌所部当然不会不把握住机会，反攻过来。

七月二十四日，徐州被敌军夺回。蒋总统赶紧亲赴前线督战，但劣势已难挽回，终于不得不自徐州战线全面转进。

第一次北伐，原已接近华北，但却由于内敌为患而蒙受了重大的挫折。

不过，在武汉方面，其内部也有欠安定，而共产党的势力则已经面临崩溃前夕。

因为武汉自从产生了共产党所操纵的政权以来，其统辖之地的湘、鄂两省，毛泽东等人正在那里煽动炽烈的“农民运动”。

他们利用“保护农民”的口号，肆行没收地主土地；地方权力，都落入共产党渗透分子的掌握之中。

在武汉政权之下的国民革命军官兵们，亲身目睹共产党如此专横暴虐，也感到不满而愈来愈甚；加上听到上海、南京各地国民党同志已经断然全面清党，当然对他们也会发生鼓舞的作用。

各地纷采反共行动

五月十二日，驻守湖北宜昌的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揭橥“反共”，各地农民协会被陆续封闭；担任指导工作的共产党徒，也多被整肃。

在湖北方面，唐生智系统的何键所属部队，也奋起响应，袭击农民协会，解除共党（赤卫队、纠察队）武装，何键的父母并且在农民运动中被指为“土豪恶霸”，拉出去游街，所以他对共产党的反感日益强烈。

五月二十一日，在湖南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驻守长沙的何键所属团长许克祥同时突袭在长沙的“湖南省总工会”、“农民协会”等所有与共产党有关的各机关团体，彻底清除共党势力。

对于这样的行动，受到过共产党凌虐的农民们也给予了助力。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和“农民运动”虽然是打着“为农民革命”的旗号，但实则是失掉了农民们的支持。

然而，第三国际却没有注意到在群众之间已经酝酿出高昂的反共气氛，而只顾捧着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一味幻想通过“农民革命”，便可以树立地方性的苏维埃政权。他们在所谓“’五月决议”中，还是决定了支持中国共产党急进的“农民运动”。

于是，史达林乃以第三国际的名义，密电在武汉的鲍罗廷，给予新的指示，大致内容如下：

一、没收土地，不要国民政府下令，须由下级没收。

二、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之中，增加新的工农领袖，代替旧的领袖。

三、国民党现在的构造，必须改变。

四、消灭旧的军队，由二万武装共产党员及五万工农分子组织新的军队。

五、由知名的国民党员组织特别法庭，处分“反革命派”。

这个密电，毫无隐讳地指示实行“共产革命”。可见总理孙先生当初提示共产党员——服从国民党，协助国民革命的“容共精神”，连一点形迹都不复存在。

鲁易于六月五日若无其事地把这通密电交给汪兆铭。汪过目后，为之愕然，嘀嘀咕咕地说：

“史达林的指示，随便实行那一条，国民党就完了……”

二十三日，汪兆铭发表“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在国民党”的宣言。他是一向和共产党靠得很紧的人，居然重申“国民党领导”之论，其意义当然颇为重大，不过却仍然没有实行清党的意向。

何键逮捕共产党徒

二十八日，何键再度拿出了他的力量。他发表反共宣言，要求汪兆铭、唐生智与共产党诀别；同时，陆续占领全国总工会等场所，并逮捕共产党员，于是刘少奇、李立三等人乃请求汪兆铭保护工会。汪兆铭想要制止何键的行动，但何键却回敬一句：“中央有什么方法可以使共产党不暴乱？”

正在这个当口，第三国际送来了一道紧急训令，严厉斥责中国共产党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时指示共产党员示威性地退出武汉“国民政府”，但不退出国民党，而仍以国民党员的身分推进所谓“农村革命”。

蒋总司令请辞

当接到第三国际“示威性的退出”训令之后，担任农政部长的谭平山等共产党员便于七月十三日全体自武汉“国民政府”退出。

他们的意图是～～一方面使共产党置身武汉“国民政府”之外，好肆意攻讦政府；一方面以国民党员身分留在党内，好把国民党和他们的“土地改革”拉在一起。

武汉也排除共党分子

另一方面，汪兆铭则于十五日在武汉“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席上，首次提出“分共”主张。不过，他仍然对于共产党寄予一丝信赖，所以不正面视之为“敌”，而只是考虑“和平分手”。故在决议中并未明白指出共产党予以责难，而仅作委婉表示：“中央党部应制裁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而且就是这样的“分共”决议，也还以“发表之后，结果只是使帝国主义者高兴，只是使政治委员会主席团负恶名”的理由，不予公布。

然而，共产党却在退出政府的同时，闷声不响地提出“对时局宣言”，流传市面。这个宣言辱骂汪兆铭——“公然暂助反革命军官”。当汪兆铭在稍后得知有这么一回事，才下定决心，于二十六日通过“统一本党政策决议案”，正式决定自各机关中排除共产党员。

翌日～二十七日，鲍罗廷自汉口乘火车北去，踏上经由外蒙古返回俄国的途径。

自一九二四年一全大会以来，国民党的“容共政策”，实行到这里完全终止。

武汉方面，好不容易才决心割断和共产党的孽缘，这个消息，传到了北伐战场的最前线，是当鲍罗廷出发的第二天～二十八日，蒋总统在日记中，留下了深切的慨叹：

‘武汉崩溃，鲍罗廷驱逐。党国基础，转危为安。一年半来之苦斗，无时不在动心忍性中；今大憝祛除，此志已伸，可以对总理，可以言革命，可知上苍果不负苦心也。’

可是，时间已经晚了一点。在此四天之前，徐州被敌军夺回，北伐战线不得不为之缩小。

共党造成南昌暴动

从武汉被清除出去的共产党，则以“南昌暴动”的行动为报复，从此恢复了他们武装叛乱、暴动路线的本来面目；史达林则重新派遣罗明纳兹和纽曼二人前来中国，指导中共暴动。

七月三十一日深夜，在罗明纳兹和周恩来的策动之下，土匪出身的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及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在江西省会南昌暴动。他们袭击中央银行，掠夺商店，拘捕国民党员。次日～八月一日，假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号，在市内设立了司令部。

八月四日，朱培德等国民革命军一经出动镇压，贺龙等人便立即向南退却；途经汕头、潮州，杀人，放火，掠夺——为所欲为之后，残部逃往海丰、陆丰一带。在那里和彭湃汇合，建立“苏维埃政权”。

大陆毛共方面，将南昌暴动的八月一日定为伪“建军纪念日”。

武汉方面既经决心反共，乃于八月五日下令取缔共产党干部。

汪兆铭策动“反蒋”

然而，此时武汉不仅止于转而反共，同时，更视南京政府为眼中钉并开始策动“反蒋”。汪兆铭致函在南京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时为第三路总指挥），便劝他“打倒蒋某人”。

武汉方面既经明白宣告反共，是则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照理说已经没有根本对立的理由存在，然而情况竟然如此，实在是令人失望。

蒋总统在八月八日的日记写下：

‘余以为对同志应退让，对敌人须坚持，而汪某乃异是，是诚非人类也。’

掌握着武汉兵权的唐生智，且于八月八日发表“倒蒋”通电，表现得更为露骨。他是唯恐南京和武汉携手之后，会削弱了他以前所建立的两湖军事地盘。是故如前所述，他已经出动军队意图夺取南京。

为谋团结决心引退

‘时局纷扰，内部复杂，南北皆同；祇有静镇谨守，持之以定，则待机而动，无不得最后之胜利也。’

这是蒋总统十一日的日记。此时，为谋党、国团结，已经下定了引退的决心。

八月十二日，中央执监委员会议，李宗仁、白崇禧已被汪兆铭的诱说所影响，主张派遣使者与武汉议和，显然表示出为谋与武汉合作，有以“倒蒋”为条件的必要。

此时，李宗仁透露：“请总司令自决出处”，言外之意就是要求蒋总统辞职。

‘余唯有以中央执监委员之主张为依归。’

这是蒋总统的态度；站在总司令的立场，所应说的只是这么一句话。

当天，便向国民政府提出请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呈文；晚间离开南京，前往上海。

国民党的元老吴敬恒、张人杰、胡汉民、蔡元培、李石曾五人，也随同离职而去。

呼吁宁汉合作

八月十三日，蒋总统在上海发表“辞职宣言”，呼吁宁汉合作，翌日，返回故乡奉化静居。

“辞职宣言”内容是这样的——

‘中正自薰沐总理之教训，，即以二义自矢：

‘一、认党高于一切。在党的利益之下，党员个人绝无逞主观、用感情、计利害之余地。

‘二、认捍卫党基为党员最大之天职。苟有逞智弄巧，阳附阴违，篡夺吾党基础，剽易吾党主义，使吾党名存而实亡者，必竭全力以铲除之。

‘由第一义言：进退生死，一以党之利益为依归。……故昔日以党之命令不能不进者，今若认中正一退，可解纠纷，中正固无时无刻或忘归隐者也。

‘由第二义言：苟有侵蚀中国，篡窃本党如共产党之所为，任何党员，决不能以识解小有异同，而稍逭其卫党之天职。……

‘幸赖主义之照临，同志之用命，曾不数月，湘、鄂、赣、闽全告克服，此非中正所敢贪天之功，实中央执委会付托之专，用能集中号令，团结内部，不虞牵挚，以克奏斯绩也。

‘何图包孕本党中之共产党徒，奉鲍罗廷之发纵指示，造作种种蜚语，提出“军阀”、“独裁”等口号，冀直接打倒中正，间接打倒国民革命。而本党本军之一部分同志，不悟其奸，竟被所惑，遂以为中正真有企图军阀及个人独裁之倾向。……中正只自咎信义未孚于同志，言行未见信于朋侪。

掬诚宣告三项愿望

‘中正于此敢掬诚宣告其最后之愿望三事：

‘一、要求双方（南京、武汉）同志悉摒外间挑拨之辞，尽捐意气猜防之念，武汉同志克期联袂迁移东来，共同集合于南京，以谋党国大政之进行。……

‘二、要求分驻湘、鄂、赣武装同志，并力北进，会同津浦线作战之军队，一致完成革命。……

‘三、要求鄂、赣、湘诸省彻底清党。……’

蒋总统领导北伐，至此遭遇挫折，固然甚为可惜。但自出师以来，不到一年之间，造成完全控制长江以南局面，对于入侵中国发展权益的列强各国，引起了各种不同的反应。

各国对华认识改观

北伐的目的，是在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取中国在世界上独立、平等地位。所谓不平等条约——诸如取消外国在华租借地及废除领事裁判权等问题，早在一九二一年华盛顿会议中，中国已向与会各国提出，各国同意研究处理，可是直到北伐开始，仍然未见有一项实现。盖因长期在军阀混战之下的北方政府，实在没有力量能够以列强为交涉对象、从事对等的外交折冲。

实际说来，列强各国根本就在期待着中国国内的不安情势永远持续下去。可是，由于在全国民心绝对支持之下的国民革命军，转眼之间已经统治了长江以南的现实情况，当然也就产生了迫使列强有必要修正其“中国观”的压力。

现在先慨括地分析一下各国的动向——第一、苏联已如前述其目的是在扩展共产党势力而一意为国民革命的行动制造分裂，如果进展顺利，则企图使“国民革命”转变为“共产革命”。其次，英国已经对于国民革命底流的民族主义力量有了新的认识，故其对华政策乃在中途有所转变。此外，美国则自始便对中国怀有好意。至于日本，在北伐开始时尚持慎重态度，然当国民革命军之影响一旦及于华北，便立即拿出强硬压迫的手段，企图将之打垮。

在上述列强之中，首先有积极反应的是英国。英国在中国的既得利益，集中于长江流域乃至华南方面；由于这个区域成了北伐战争的主战场，当然英国便不能坐视不管。

而且，中、英之间在北伐之前的一九二五年，已经先后发生了“五卅惨案”、“汉口惨案6[179]1491”、“沙基惨案”等纷争事件；这些事件，促使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觉醒，而唤起了反英运动。

及至一九二六年九月，国民革命军进驻武汉，英国乃在汉口英租界边界要道偏设铁丝网并堆积沙包，戒备森严；又调集军舰多艘停泊长江，摆出如果革命军有威胁到英国权益的情况，则不辞一战的恫吓态势。可是，这样的行动，却越发刺激了中国民众的反英情感。

至此，英国终于省悟到不能再漠视中国人民族主义的力量，而自知继续采取强迫手段之不智。

就在这一年的十月，英国鲍尔温内阁任命蓝普森为驻华公使，以谋开创新的情势。

蓝普森于十二月初抵达上海，但并不立即前往北京履任，而先于五日专赴武汉，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晤谈。蓝普森是列强国家最初访问北伐进军中的国民政府之一位外交使节。

自此开端，驻北京各国使节团遂即举行会议，研讨对于国民政府的承认问题，并决定派遣代表到武汉考察。

“币原外交”

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到任伊始便先去汉口访问，是为了要和国民政府有关方面接触之后，6[180]1492向英国政府就对华新政策方面有所进言。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此时立即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及承认国民政府问题；可是蓝普森以中国尚未统一，对于这个问题，避免深入接触。

接到蓝普森报告之后的英国政府，很快地便有了反应。

感受到我国民族运动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由驻北京的英国公使馆向参加过华盛顿会议（一九而一年十月至二二年二月）的日、美、法、义、比、荷、葡各国驻北京公使提出备忘录，说明英国要采取新的对华政策，并在备忘录中指出中国情势——“民族运动高昂，已和华盛顿会议当时大不相同。”提议列强发表如左的联合宣言：

“一俟中国成立有订约权之政府时，各国准备立即商谈条约之修改，及了结一切悬案。在此一政府成立之前，各国当推进与华盛顿会议精神相符、而适合于现势的积极政策。法权会议中放弃一部分治外法权之建议，应立即施行；华盛顿会议所定之附加税，应即无条件批准。”

在此之前的英国态度是——“中国如不禁止其排外运动，则不能同意商谈修改条约。”前后比较，可以说是在政策上已经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对于英国的备忘录，只有美国表示赞同，其他各国的反应则颇为冷淡。

先是六月十八日，在北京举行的参加华盛顿会议八国代表会议中，美国已经提议：“中国的现状，与十年前比较，已有显著变化。列强方面还要持续十年乃至十五年以前所缔结的条约，已经不合时宜，必须有某种程度的让步；现在就表现一些让步的意向，如何？”可是，当时由于日、英两国的强烈反对，否定了美国的意见。

翌年～一九而七年一月，美国国务卿开洛格发表声明：“美国政府准备与足以代表全中国的政府，协商关税自主权与领事裁判权问题。”明白表示出积极态度。

此外所成问题的，则是日本的态度。

币原稍稍修改侵略政策

在此之前，自一九二四年六月，第一次加藤高明内阁成立时，币原喜重郎就任外相以来，日本对中国的外交，稍稍修改了过去的侵略政策，而向亲善的方向在推进中。此即所谓“币原外交”。

币原前在华盛顿会议时任日本驻美大使，为日本出席会议的全权代表之一，担负与中国代表折冲交还山东问题的有关事宜。据说他在交涉过程中，深深感到中国方面已经产生了新兴的民族主义力量，而认为以二十一条要求为代表性的日本侵华外交路线，已经是非加修改不6[182]1494可。加上华盛顿会议之后，日本在亚洲的列强关系中已有处于孤立态势的迹象，盖以往和日本联起手来向中国伸展势力的欧美列强，对于日本独自营谋的突出行动提高了警觉，故而要加以牵制。

“币原外交”的着眼点，就是要和如此态度的列强保持协调，以及消除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恶劣情感。

一九二四年七月，币原在日本国会中发表就任外相的演说，提到对中国外交方针的所谓“币原三原则”如次：

“（一）尊重中国主权，不干涉中国内政。（二）中国国民之合理要求，以诚意与同情接受之。（三）日本在中国之权益，以合理方法保护之。”

在日本方面，称之为“币原外交对华四原则”，尚有“（四）日、中两国经济提携，共存共荣。”一项。

日本军阀一意横行

然而，以东三省为立足点而力谋侵略中国的日本军部，却对于像这样的币原外交认为是太不够积极。

当币原就任外相不久的九月间，吴佩孚与张作霖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币原虽然立即宣布不干涉中国内政，可是为张作霖后援的日本军部却反对币原政策，热烈提倡干涉。

翌年（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发生了所谓“郭松龄事件”——张作霖的部下郭松龄倒戈反张，郭军进击到奉天（沈阳）附近。当时，币原仍采不干涉主义，但日本军部却不遵循这个方针，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乃以“保护南满洲铁路沿线权益及日本侨民”为藉口，于十二月十五日派兵三千五百人在东三省武力干涉，使战局导向于张作霖胜利。而币原外交和日本军阀的侵略主义，就是这样地常常发生摩擦，鸿沟日深。

不过，在经济外交方面，则表现得颇为积极。

现在举一个最典型的实例～～一九二五年十月，在北京举行的关税特别会议。这是基于在华盛顿会议的决定，由中国方面为了要求恢复关税自主权及实行提高税率，而呼吁列强召开的一个会议。

田中义一组阁

对于一九二五年十月中国所召开的关税特别会议，在列强之中颇有认为时期尚早的反应。

可是，日本的全权代表日置益（驻华公使），在会议一开头就声明原则上承认中国恢复关税自主权，使踌躇观望的他国代表大感惊异。

这个声明，在和缓中国对日感情方面，确有很大的效果。当时日本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堀内干城（外务省通商局事务官）所著“在中国的暴风雨中”有如下的记述：

“全中国国民，特别是当时正在抬头的青年中国人之间，认为这是日本侵略政策、高压政策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非常表示好感。加以在所有的问题方面，经常都是由日本代表团在引导着会议的进行。……大概是由于这样的结果，让我们不仅在各种场合可以体会得到北京市民对于日本代表团表示出百分之百的好意，而且据说以上海为首各都市的排日气氛逐渐冷淡，亲日气氛已见抬头，——实在是令人感到非常愉快的情况。”

关税特别会议，由于郭松龄倒戈事件而流会。

不过，“币原外交”在中日两国关系上所发生的作用，虽则只是昙花一现，但却的确是朝向雪解冰溶的前景在推进中。

譬如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之后，中国因此而掀起的排外运动，只集中在英国一个目标；而日本则把握了这个矛盾，对中国达成了极大的经济进展。

币原持不干涉原则

“币原外交”延续到“南京事件”（一九二七年三月）之际。当时，币原力持不干涉政策，可是却反而产生了刺激日本军阀越发不满的结果。

‘日本帝国主义者，……当民国十六年，革命军打到南京的时候，他就藉口南京事件，煽动各国来共同干涉，要想瓜分中国；因为他当时还没有独占中国的力量，所以要用瓜分的方式来达到他侵略的目的。当时，他对各国说：“中国国民革命军受了苏俄的指使，乃是赤化的军队；非消灭革命军，东亚就不得安定！”因此，他就在华盛顿联合英国向美国政府提议——要煽动各国共同干涉，实行瓜分。如果他这个计划当时能够实现，我们的国家，早就有灭亡的危险。

‘但是，当时美国要维持对中国机会均等和门户开放的传统政策，反对瓜分中国；其他各国亦洞悉日本阴谋，不赞同日本的提议。’（注）

据日本外务省留下的文献中，币原在南京事件时，一直采取稳健政策，对于列强所提议的“共同出兵”、“最后通牒”都没有参加，而站在劝说列强勿采强硬态度的立场。

币原于三月二十八日告知美国驻日大使马可柏（据日文音译）：“南京事件，是想要搞垮蒋介石的过激分子所制造出来的。列强如果采弹压政策，则只会是在帮助蒋介石的敌人。”又劝说英国驻日大使泰芮（据日文音译）：“如果对中国发出最后通牒，则蒋介石无论接受不接受，他的处境都将会支持不下去；蒋介石还没有站稳，如果把他打垮，中国国内又会陷入混乱。”

田中义一头脑如化石

站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最前列，责难币原对华政策为“软弱外交”的人，是立宪政友会总裁陆军大将田中义一。

田中是出身于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的职业军人；在参谋部门阅历有年，然后跻身于陆军省，一度膺任陆军大臣，继而为“立宪政友会”（政党）总裁，高唱“刷新外交”。他继承了明治时代推进侵略大陆政策的长州军阀山县有朋衣钵，为日本军阀之巨擘。

当时，与田中见过面的国民党同志戴季陶曾经指出“田中头脑就像一块化石。”他一心一意只顾向中国扩大权益，不希望革命党在中国占有优势，甚至称呼国民革命军为“赤化部队”。

据日本外务省所编“外务省百年”一书，田中义一在南京事件时对币原外交的攻击是这样的：

“提到此次在南支（中国南部）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国国旗尊严弃诸泥溷、侨居官民遭受凌辱，国威失坠，实在不忍谈及；然而，当局却毫不介意，反在讴歌所谓不抵抗主义，不知究竟是何心理？……居于东亚盟主地位的帝国（日本），务必基于保障大局的观点，为谋确保帝国自卫的权益，不能不期待于对支（中）外交之刷新。”

当时，在若槻内阁担任陆军大臣的宇垣一成，也对币原外交有所批判。他于四月七日向若槻礼次郎首相进言：“现在不是隐忍自重的时际；必须脱离原来路线，由消极雌伏转为积极雄飞。”——建议与列强协议，出兵山东、江苏．浙江等地。

正在这个当口，刚巧日本又发生了金融恐慌，若槻内阁在群相责难之下于四月十七日总辞。——于是，连续三年的“币原外交”到此闭幕。

接替组阁的，并非别人，就是那位田中义一。田中自任首相兼任外相，并以曾任关东军司令官的白川义则出任陆相。白川又是一个职业军人，前在郭松龄事件之际，对于币原喜重郎的“不干涉”指示，置之不顾，悍然派兵援助张作霖。

此外，外务省政务次官则由众议员森恪出任。森恪是曾在大陆从事贸易多年的“中国通”，一向和军部极端分子们“把东三省自中国割开”的主张相同；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比田中更为积极的侵略论者。此后就是由他这个人来左右着对华外交。

注：蒋总统-“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计划与方式”（一九三八一）

日军图阻挡北伐

立宪政友会的田中义一内阁，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日成立。其时中国方面，正当国民党在上海实施全面清党及定都南京之后。

以批判币原外交过于“软弱”而登场的田中内阁，当然在外交政策上有其反动性而趋向更加强硬的目标。

田中的蝎形政策

田中的对华方针，很快地便在组阁后的四月二十二日施政演说中表现出来。当时，他曾透露出对中国干涉的意向大致如左：

“对我国与远东而言，最重大的外交问题，为支那（中国）问题。吾人对于支那国民的正当要求与愿望，不惜给予适当的援助，且确信自有能够达成的道路存在。但有关此点，希望支那国民也能有慎重的反省与熟虑。至于言及支那的共产党之活动，就最能受到直接影响而又负有维持东亚全局之责任的日本而论，实对之不能不有所关心。”

田中所推进的政策，戴季陶评之为“蝎形政策”，蝎子是有两只螯和一条尾巴，用以为武器打击对方的。日本夺去中国的辽东半岛（旅顺、大连）和山东半岛为他的两只螯，占领台湾为他的一条尾巴；田中首先要把握住这个态势，加以活用。

直到二次大战失败

由于田中的上台，日本乃一个劲地循侵略路线突进。这个路线终于毫无修正的余地，而一直发展到第二次大战失败为止。

‘日本第二次大战中所以失败，他们自己承认是由于他们的国策错误。因为自田中义一以来，日本一直受着少壮军人的控制，推行其侵略的国策。……当然违反世界的公理和正义，不论他有任何强大的力量，其结果必然遭遇失败。这是一定的道理。’（注）

田中积极政策的第一炮，是向其一只蝎螯的山东出兵（第一次出兵山东）。

事缘国民革命军在定都南京之后，挥师渡江，继续北伐。五月二十一日，第三路军占领津浦铁路要冲-蚌埠，进而指向徐州。孙传芳、张宗昌等所部节节败退，面临全面崩溃前夕。眼看着革命军进入张宗昌地盘的山东省，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日本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山东获有很大的既得权益；日本侨民，在青岛有一万三千人，济南有二千人之多。革命军的进击，对于日本的一只蝎螯而言，当然是不无威胁。

日军二千登陆青岛

五月二十七日，田中以保护山东侨民为藉口，决定出兵，并立即下令第十师团步兵第三十三旅团（旅团长乡田兼安少将）派兵二千人于三十一日在青岛登陆。时当革命军攻下徐州之前的两天。

日本政府当出兵之际，发表声明大意如下：

“征于南京、汉口等地之事件，显见中国方面对于侨民不能充分保护，以致不断发生日本人生命财产蒙受危害、日本名誉遭受损伤的暴举。此类动乱，行将波及华北，已有再度肇生相同事件之虞。日本为保护侨民生命财产，不得不出动陆军。……”

日本政府当时将上项出兵声明分别照会列强国家及中国北京、南京、武汉三个政府。

先是列强方面，在发生南京事件之际，已有共同出兵计划；现在日本既已出诸行动，于是，美、英两国立即与日本协调，紧跟着也各出兵二千，增强在北京、天津的力量。

中国三方面的政府，以日本“干涉内政”，都提出了强烈抗议。

在日本国内，也有“时期尚早”、“干涉内政”的反对意见。因此，陆相白川义则特地言明：“在事态未到紧迫之际，军队停驻青岛。”

暗中补充军阀力量

然而，此次出兵的目的，是在阻遏北伐，而对孙传芳、张宗昌，乃至张作霖给予支援。戴季陶在“日本论”中便曾提到：“战斗力消失干净、残余北渡而逃的孙传芳，当时败卒不及两万；而不到几个月工夫，又有了七万以上的军队反攻过来，……岂不是怪事吗？”

田中义一在出兵山东的前后，训令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调查张作霖方面的情势。吉田与张作霖的总参议杨宇霆会谈结果，建议：“在张作霖这一边，没有和革命军对抗的能力。张作霖如被打败，则东北便会失去安定。因此，在日本而言，宜和列强共同占领津浦、京汉、胶济等铁路，对南北两军加以干涉，促使停战。”田中采纳了这个意见，向英国提议共同占领主要铁路，但被拒绝。

六月二十三日，革命军开始对山东进行总攻击，旋即攻克台儿庄、临城、临沂等要隘。

进入七月，驻在胶州的孙传芳属下陈以□部队归顺革命军，遮断胶济路。青岛日军看到此一情况，立即采取行动，派军三千前往济南，打算站在正面阻挡革命军进路，同时因青岛空虚，乃再由旅顺派出支援部队三千前来补充兵力。

此后，日本便不理会中国抗议，停驻山东一带。直到九月，等待北方军阀补充力量、国民革命军转进长江以南之后，才开始撤走。

注：蒋总统-“实践与组织”（一九五○六）

田中的侵华会议

日本出兵山东，激起了中国民众极大的反应。

在上海，有民众大会，抗议日本干涉内政，并决议对日经济断交。其他各地也都展开了反对日本、抵制日货运动。

几年以来，由于“币原外交”的不干涉政策，中国人民比较趋于温和的对日感情，再度为6[195]1507之恶化。

而且更重要的是自此之后，已经使中国民众的感情，不能再有丝毫好转的余地，而更发展向卢沟桥事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境地。

召开所谓东方会议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田中义一的第二着棋子是“东方会议”。这个会议，在具体讨论侵略中国的方法，以谋贯彻田中的对华强硬外交政策，是对于未来的中日关系有其决定性作用的“侵略蓝图”。

应召参加这个会议的人，有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汉口总领事高尾享、关东长官儿玉秀雄、朝鲜总督府警务局长浅利三郎、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集外交、军事、殖民地行政等驻外负责人于一堂；东京方面的出席人，则为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以及陆军次官畑英太郎、海军次官大角岑生等军部首脑。

东方会议，自六月二十七日（一九二七年）开始至七月七日为止，在东京霞关外相官邸大厅先后开会六次，主要是由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领导进行。森恪和军方及政友会（政党）的强硬派人士都有密切联系；这个会议则被宣传为“田中内阁的积极政策”活动。

在会议中发表的主要意见如下：

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南军（国民革命军）北上时，张作霖迟早必失京津之地，……前途不可乐观。”

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井石根——“南京派排斥共产主义，渐趋稳健。……南京、武汉仍难一致。若能一致，则南京派可能加上几分红色，武汉派成为桃红色。若两政府（南京、武汉）合而为红色，日本则应加以防范。在蒋介石、何应钦等领导之下的革命行动，若能趋于稳健，或许于日本有利。

“南京派仍将北伐，奉天派可能据守北京，但难守山东。山东亦难和平转入南军之手。”

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南北决战，胜利的可能性北方三分，南方七分。南军胜利，统一中国时，颇乏长期持续之可能，国民政府及军队内部必起分裂。”

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苏联指导之世界革命，将来必波及日本，日本的对华政策不能不考虑及此。姑不论东北政权在何人之手，但应使其安定，此乃日本国防上的要事。须使东三省政权先确立其在东三省及东蒙古之权力，然后徐徐扩张势力及于外蒙古；同时指导东北官宪，使发达铁路、开发资源，以满足日本国防之需要。”

田中显示强硬方针

田中义一听取了这些意见之后，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七月七日，作了一个“对支（中国）政策纲领”的八项训示。他在前面四项中，虽然堆砌了一些好像是同情中国现状、并对中国出现统一政权表示理解的辞句，可是自第五项以后的语调却为之突变，显示出他的强硬方针如下：

“五、不逞分子往往乘中国政情不安而跳梁，以致有紊乱治安、惹起不幸的国际事件之虞，已为无待争论之事实。……是则在华帝国权益及侨民生命财产有受不法侵害之虞时，将依必要，断然采取自卫措施以保护之。

“尤其在日华关系上，基于虚构、捏造的流言而引起之排日、排货不法运动，为廓清其疑惑及保护权利，当进而采取因应机宜之措施。

“六、关于满蒙，尤其东三省地区，因在国防上和国民生存关系上有重大利害关系，是故我国（日本）不仅要加以特殊考虑，而且基于和平之维持及经济之发展，使成为内外人士安住之地，为其接壤之邻邦，殊有责任所在之感。

“七、至于东三省政情之安定，以待东三省人本身之努力为最善之方策。若东三省有力者能尊重我在满蒙之特殊地位，认真讲求安定该地区政情之方法，则帝国政府当适当支持之（本项不得公开）。

“八、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紊乱，而有侵害我国在该地区特殊地位及权益之虞时，则不问其来自那一方面，将予以防护；且为保持其为内外人士安居发展之地，决不逸失时机，而采取适当之措施。”

就以上内容，可以明了田中义一在第五项中藉口“自卫”，要把他的军事行动解释成为“正当化”；其余六、七、八项是为特意强调日本在东三省的特殊权益，显露出其“分割满蒙”的野心。日本要把满蒙从中国的版图上切开，囊括在他的统治之下，乃是日本军阀自“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来一贯的主张。

日本政府于七月十一日将这个“纲领”用机密文书下达驻华使领馆，其标题是“基于对支根本方针的当前政策纲领”。

中国国民激愤

田中义一宣布“对支政策纲领”之后，继而由森恪对其真意所在作了更明白的补充说明：

“第五项中所谓‘不逞分子’，是指由共产主义者等所煽动的无知浪人乃至学生们——特别以排外运动为目的，而采取恐怖手段破坏秩序、紊乱社会组织的一些人；尤其是对于日本人的生命财产给予侵害的分子，不能置之不问。最近，中国人对于日本人已有轻侮的念头，6[200]1512这就是所以发生暴行的道理所在。我们必须要把如果权益受到侵害、日本便会采取断然措施的观念注入中国人的头脑里面。至于山东撤兵，也应该由日本自行判断，不可以有因恐惧排日运动而撤兵的想法。

“又和‘不逞分子’相对的是所谓‘稳健分子’，是指其主张和共产派反对，而且在经济上也和日本的利益不致有所冲突的人士，日本当给予同情的协助。

“第七项所谓东三省的有力者，非专指张作霖；不过他回到东北（当时尚在北京）如果能够保境安民，我们当然会支持他；此外，其他的人要是能够符合日本的主义、方针，也不妨予以支持。这并不是说对于张作霖给予支持或是加以排斥，而是要坚持日本独自的立场和行动。

“第八项所谓对于日本在满蒙特殊地位及权益之侵害一节，是指来自中国本部、或来自苏联乃至东三省北部方面，都会有其可能；又起于东三省内部的崩坏或出自中国以外国家的行动，也会有其可能。总之，不管其起因如何，为了保障日本权益，就必须要讲求防护手段。”

奉天展开反日活动

东方会议的内容，对于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个冲击。

八月十日，奉天（沈阳）各团体，喊出“反对东方会议议决事项及田中内阁之满蒙积极政策”的口号，展开了反日运动。

戴季陶是这样慨叹地说：

“军国主义者的田中大将……召集在中国的外交、陆军人员会议，而对满蒙决定积极政策；陆军大将、内阁总理兼外务大臣的田中义一，恐怕是要变成第二个塞尔维亚的中学生罢！”

所谓“塞尔维亚的中学生”，是指在一九一四年射杀奥国皇太子夫妇，因而点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炮火的青年布灵齐普。

尽管如此，但田中义一仍然用最大的速度扩展他的“积极外交”。

森恪在旅顺召开会议

继东方会议之后，田中复派遣外务次官森恪前往旅顺，八月十五日，在关东长官官舍召开所谓“大连会议”（一称旅顺会议），出席者除曾参加“东方会议”的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关东长官儿玉秀雄、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之外，尚有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北京公使馆武官本庄繁等人。

在大连会议中，决定有以下三项：

一、日本应要求扩张有关京张铁路（北京-张家口）的权利。凡中国在东三省境内自办铁路，认为对日本利益有冲突者，不许建造。

二、将在东北和朝鲜的三家银行合并，汇集其资金，然后要求张作霖整理奉票（东北地方发行之通货），以便根本整理东北财政金融。

三、在东北三省境内投入钜资，建设大规模的钢铁厂，供应当地所需路轨及其他钢铁材料。

据日本方面资料：大连会议并没有正式决议，会议只进行了二小时四十分钟便告结束；由森恪一手包办，鼓吹强硬政策。又据外务省亚洲局长木村锐一记述：“森恪一个人既是主席兼议事程序的安排人，更是唯一的讨论者。”

芳泽向张作霖提出要求

大连会议之后，驻华公使芳泽谦吉立即返回北京，对张作霖提出为谋一口气解决满蒙问题而进行交涉的要求。

八月二十八日，总参议杨宇霆与芳泽开始交涉。当时，日本方面所提出的要求中最重要者6[203]1515有下列五项，比大连会议的方针更为强横、更为具体化：

（一）“吉会铁路”（吉林-会宁）等六条线路之筑路权。

（二）吉林、黑龙江两省之森林经营权。

（三）实行二十一条之土地商租权。

（四）取消中国计划之“打通”（打虎山-通辽）、“吉海”（吉林-海龙）两条铁路。

（五）取消日侨在满蒙的治外法权，交换内地杂居权。

这些条件，简直是比二十一条更为严重的非法要求，中国国民当然大为激愤，纷纷通电警告杨宇霆不得屈服于日本的要求。杨宇霆乃藉民意压力为后盾，表示：“日本要求过苛，负不起这个责任”而加以拒绝。

国民政府提严重抗议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也于九月间由南京致函芳泽谦吉，提出严重抗议，要点如下：

“日本新内阁田中首相所发表之积极政策，殊足令人激愤。此种政策，似为对于中国经济及政治上的帝国主义新政策，而以对东三省、蒙古为尤急。贵国政府似已向北方军阀伪政府（张作霖）提出秘密暧昧协商广大之铁路让与权、日本人在内地之杂居权、对于该地方之保护权，及其他种种要求。似为复活民国四年所提出、而为世界所不直之二十一条件，甚或变本加厉——势将剥夺中国在满蒙之主权，俾实际上隶属于日本版图之内而后已。贵国方面此种方针，必至引起中国人民之公愤。……”

然而，田中的对华侵略方针，并未因此而有丝毫和缓。

这一点，从田中通过宫内大臣一本喜德郎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向日皇上陈对中国政策的“田中奏摺”中，可以看得很明白。

“田中奏摺”

全文达四万言的“田中奏摺”（一九二七年七月），将日本帝国主义者野心勃勃的非分之想表达的非常明显。

标示征服世界的野心

如果用一句话来指出他的特征，就是明确地标示了日本征服世界的长期展望，而将侵略中国的行动位置在达到那个终点上的一个历程。至于侵略中国的起点，则定在东北。这就是说：由卢沟桥（中日战争）到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路线，乃从这篇奏摺中被当作国策表示出来。

田中奏摺的开场白是这样的：

“昭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内阁总理大臣田中义一引率群臣．诚惶诚恐，谨伏奏我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之件。”

接下去，便说明“满蒙”（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及内外蒙古）土地大逾日本三倍，蕴藏有世无匹敌的天然资源；同时提出以南满铁路为侵略机关之构想而作如左之陈述：

“……我国因欲开拓其富源，以培养帝国恒久之荣华，特设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藉日支（日本与中国）共存共荣之美名，而投资于其地之铁道、矿山、森林、钢铁、农业、畜产等业，达四亿四千万余元，此诚我国企业中最雄大之组织也。

“且名虽半官半民，其实权无不操之政府；若夫付满铁公司以外交、警察及一般之政权，使其发挥帝国主义，形成特殊社会，无异朝鲜统监之第二，即可知我对满蒙之权利及特益巨且大矣！”

这些话，是自动地把“南满铁道会社”所蒙罩的假面具脱了下来，宣称所谓“满铁”，实则就是为了并吞东三省所下的一着棋子。

视美国如眼中钉

还有在这个奏摺中，并且更进一步分析到--当前成为对于日本侵略中国之障碍的第三势力，就是美国：

“我日人为欲自保而保他人，必须以铁与血方能拔除东亚之难局；然欲以铁与血主义而保东三省，则第三国之阿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之煽动而制我。斯时也，我之对美角逐，势不容辞。……向之日俄战争，实际即日支之战；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国为先决问题，与日俄战争之意大同小异。”

征服世界先征服中国

基于这个观点，复明白指出征服世界战略于后：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中、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如欲成昭和新政，必须以积极的对满蒙强取权利为主义，以权利而培养贸易，此不但可制支那之发展，亦可避欧势东渐。——策之优，计之善，莫过于此。我对满蒙之权利，如可真实的到我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而风靡支那四百余州。再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富源作征服印度、南洋各岛及中、小亚细亚及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为其第一大关键也。”

在下面，遂即举出管制“满蒙地区”铁路线的具体方策，和设立轮船公司于大连，掌握海上运输；并在满蒙实施金本位制（当时为银本位），确立对于经济的支配体制。又为策进第二朝鲜化而在日本政府设置拓殖省，以增强控制力。以及排除中国人对满蒙“移民”等建议。

这个“田中奏摺”，在日本未见公式披露。最初是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经在南京发行的“时事月报”杂志用中文刊出，流传于东三省及其他各地。

至于日文方面，则是由日华俱乐部所刊行的“支那人看日本的满蒙政策”一书于一九三○年据中文译载。现在所介绍的，就是根据那篇译文。

蔡智堪抄录公之于世

这个奏摺，当时深藏于日本皇室书库，极度保密；但在一九二八年六月，有台湾籍商人蔡智堪就原文抄录出一分，传递到中国，才得公之于世。

像这样重要的机密文件，竟然完整无缺地泄露于外界，实在是不合常情；可是其外泄的颠末，有蔡智堪本人在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三日和中国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罗家伦的谈话，以及他在香港自由人报发表的亲笔记述，交待得非常清楚。

蔡志堪亲笔记述

蔡智堪是在日本和东三省之间做大豆等买卖的贸易商人。一九二八年六月，受到在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担任外交委员会委员、主持对日外交工作的王家桢（后来曾任外交部次长）秘密委托觅取“田中奏摺”。不过在当时，还不知道是否确有这样的文件，只是在外交圈子里有这么一个话题。

蔡智堪首先通过一向和自己很有交谊的议员床次竹二郎和内大臣牧野伸显伯爵接触。牧野对于田中的对华积极政策素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如果和中国肇成战争，则日本难免会出现革命；要是那样的话，皇室地位便会发生危险。是故牧野等人有意使“田中奏摺”让国际间去宣传，引起美、英等国反对，才好藉以抑制那一帮军人。因此乃答应了蔡智堪的请托，予以协助。

以下是蔡智堪的亲笔记述：

假扮工人夜入皇宫

“牧野伸显当即命令其妾弟山下勇，约妥日皇室书库官，布置本人（蔡智堪）夜间入内，抄取田中奏章。一九二八年六月某日的一个夜间，十一点五十分钟，我携带皇室书库专用的黄色册皮大小型三、四十张，绿色绣线数团，银锥三支，大小针一包，扮作一个补册工人，携带牧野交来的金盾圆形‘皇室临时通行牌’，号码七十二号。书库距离红叶山下门，只要走数分钟。

“‘田中奏摺’共六、七十张，标签‘田中首相奏章’。我将炭酸纸装铺原件上，用铅笔描出。所用炭酸纸，系民政党总裁专用的薄质原纸。

“费时两夜，细心抄毕。

“我把抄件密藏在皮箱夹底里面，亲往沈阳（奉天），到小西关外王公馆，交给王家桢亲收。他为之喜跃，立即送给张学良；次日，他便去南京，我也返回东京。”

另据王家桢也曾经提到过“田中奏摺”是由他（王）本人译成中文，并亲自油印；抄件原本则在九一八事变时失落。

“田中奏摺”被暴露出来的经过，就是如上所述；但日本方面则始终指其为“伪造的文书”，否定有这么一个文件存在。

历史过程班班可考

可是，只要看看日本所进行的自侵略“满蒙”到以称霸世界为目标的政策，便可以从历史过程中对于奏摺内容的真实性得到证明。

“田中奏摺”公开之后，在中国国内固不用说，连在国际间也立即激起了很大的反应。

史达林所耽心的，是日本军阀征服“满蒙”如果成功，则苏联势力将不能不被迫退出东北地区；果如是，则西伯利亚安全也会受到威胁。结果乃促使苏联对中国加紧了他的“赤化攻势”。

美国政府方面，对于这个奏摺虽然也颇为关心，但由于相信日本驻美大使馆的正式否定，所以起初只当做是伪造的文件；然而，及至后来日本军阀果如奏摺所指——征服“满蒙”、控制了大半个中国，而发展到偷袭珍珠港的阶段，这才相信了它的真实性。

按日本方面的固定说法，是指“田中奏摺”出于伪造，其论据乃系文内有若干处与事实不符。

在第二次大战结束之后，远东军事法庭也曾为此一文书的真伪问题，有所争论。曾任田中内阁海军大臣冈田启介及奉天领事森岛守人等人都异口同声予以否定。

还有重光葵在他自着“昭和之动乱”中提到：“本人（重光）当时在外务省任职，曾经调查这个文件的出处，但找不到任何线索；不过从内容上的确可以看出并非田中义一的意见，据推断好像是军部中某些极端论者不负责任的意见书之类，或许落到了什么人的手里，加以改写而被利用于宣传。然而，后来在东亚所发生的事态和伴同出现的日本行动，恰好就像是以‘田中备忘录’（奏摺）为教科书而循序推进的状态，以致国际间对于这个文书的疑念，便很难洗刷得掉。”

又在远东军事法庭中，中华民国方面的观点是：“其为真为伪、都难以证实。”（译注：按当时蔡智堪的资料尚未出现。）

日本军阀一贯的野心

总之，至少是只要从后来历史事实的演进看来，就是“田中奏摺”存在的实证：

‘田中奏摺，……不是田中一人的狂言，而是日本军阀一贯的根本国策。日阀一心一意妄想灭亡中国，辛亥革命以后，对我国之民族统一、经济复兴及国防建设，没有一天不采取一贯的迫害、干涉和破坏。……田中又说到日本必须与美国一战，以及要“以中国富源作为征服印度、南洋、中小亚细亚及欧罗巴之用”。日本军阀的头脑，为这种狂梦所昏迷，他们所说的什么“东亚新秩序”，就是要太平洋上所有国家、以及亚洲一切民族都屈服于他的阴谋野心之下，让他作整个亚洲与太平洋的主宰。——这种中风狂走的冒险，结果无非是他的自杀；然而狂妄的敌人，不到临死是决不觉悟的。’（注）

注：蒋总统-“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国庆纪念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一九四○十）

赴日考察

一九二七年秋天，蒋总统赴日本访问，正好是田中义一开毕“东方会议”，提出了“奏摺”，而对华转趋于积极政策的时期。不过，此时“田中奏摺”还没有暴露于外界。

拟访世界各国观摩

蒋总统在辞卸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之后，曾回故乡浙江省奉化县小休。此际，想到去海外旅行一趟，以日本为第一站，然后一年之间历访世界各国，并观摩他人优点。

当时打算考察学习的是：日本-政治与社会学；德国-哲学与军事学；法国-政治与社会学；英国-政治、经济及海军；美国-哲学与经济；义大利-社会与政治，以及土耳其的革命历史。

九月二十二日，偕同张群由奉化出发，前往上海。

张群向笔者（产经新闻执笔人古屋奎二）提到当时情况如下：

“蒋总统下野之后，我也由南京前往奉化拜访，相与盘桓。九月二十二日，自宁波乘船同往上海，蒋总统在船上说出此行将出国考察，首先要去日本。”

于是，张群乃先行去日，为蒋总统访日预作安排。

到达上海之后，胡汉民、吴敬恒、何应钦等人先后来访，他们一致劝阻出国，并促请再起；但蒋总统外游之念，并未打消。

九月二十八日，乘日本轮船“上海丸”首途，次日中午抵达长崎，立即前往云仙。

据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四日编撰之报告书-“国民党统一问题”记载：“蒋介石于九月二十九日由上海来到长崎，目下去云仙静游；虽然宣称还要去美、德、法等国，但由于正在为将来画策之际，所以欧、美之行，尚难肯定。”

蒋总统在到达日本的时候，发表了简单的谈话如下：

“余此次来日，乃欲观察及研究十三年以来进步足以惊人之日本，以定未来之计划。且余6[215]1527之友人局日者甚多，欲乘此机会重温旧好，并愿藉此与日本名流相晋接。”

在云仙的休憩，很快结束；十月三日乘火车到达神户。虽然是在上午八时的清晨，但已经有很多举着青天白日旗的同志和华侨来到车站，欢呼迎接。于市内某同志家中稍事休息之后，随即与宋子文两人乘车前往有马温泉的“有马大旅社”。

下榻有马大旅社

据当时有马大旅社的经营者增田卯三之助长子增田寮（现在为有马餐巾寝具清洁服务社社长）回忆蒋总统当时住宿于该旅社情况如左；

“那时候，我好像是中学三年级的学生。蒋总统到达旅社那天，马上就拿出三百元的小费，并且说：‘实在太少一点，……’可是，在当时倒的确是一笔大数目，家母和我都为之大吃一惊。

“正因为是革命英雄光顾这里，毕竟气派不同，日常警戒森严，到了晚上，也有随从两人一组佩带手枪，当值夜班。

“因此蒋总统的房间，也只有家母能够进出。他和家母很谈得来，我斗胆说一句极其惶恐的话，他把家母看做姐姐一样，见到家母时，总会说些高尚的诙谐或幽默话，笑声不绝。

“有一天，我倒是想要看一下这位蒋介石的样子，于是便悄悄地跟在家母背后，走进他的房间；他立即警觉地问：‘谁？’锐利的目光扫射过来，盯紧着我，真叫人感到战战兢兢。家母则若无其事地回答：‘我们家的孩子！’他的神情马上转为和悦：‘哦！老板娘，是你的少爷！’接着便发出爽朗的笑声。

“可是我的眼膜被那锐利目光所震眩，急忙下楼，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躲了起来。”

蒋总统住在有马温泉期间，写过“革命”、“宁静致远”、“千客万来”、“平等”等五幅字，送给日本人；其中“平等”一幅，还保留在极乐寺（住持田中大泉）中。

有马大旅社则于一九三八年被风害水灾而半毁，以致废置。

晋见宋太夫人

实际说来，蒋总统去有马温泉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要和宋美龄女士结婚，特地晋见在那里疗养的宋太夫人，请其允诺亲事。

宋美龄女士的尊人宋耀如（查礼）先生为广东出身华侨，在美国实业界奋斗成功，对革命阵营，自兴中会以来便在经济上给予援助。长女蔼龄于归孔祥熙（后来曾任行政院长），次女庆龄就是国父孙先生的夫人，长男子文（当时任财政部长，后来曾任行政院院长），以下还有两位公子，子良、子安，后来在金融、经济界也颇有成就。——是一个名门。

宋美龄女士是耀如先生的三女，幼时赴美，毕业于卫斯理大学之后归国，参加社会福利运动。

蒋总统是在五年之前，在广州孙先生官邸给介绍认识；内心认定可以结为终身伴侣，不断交往，虽在北伐前线戎马倥偬之际，也会抽暇给宋女士写信。

忠告日本国民

蒋总统在有马温泉晋谒了宋太夫人，她很高兴地对婚事表示同意。

欣喜于婚约成功

据一九六四年所发行的“有马案内（导游）”记载有“有马观光协会”嘱托中川龙夫所著“蒋介石总统逸事之地”，有这样的介绍：

“有马大旅社的经营者增田卯三之助的太太千代子捧着下午茶走进去，刚由隔壁宋太夫人房间回来的蒋总统，显露出平常所没有的兴奋神情说：‘老板娘，成功了！成功了！婚约成功了！哦！对了，给你写字吧！来！来！马上替我磨墨。’好像等不及把墨磨好，就乘兴挥毫了。”

又据曾任“有马温泉观光协会”会长的乡土历史家风早恂提到：蒋总统于获得同意结亲之后，便于第三天～五日在该旅社十八号房间将致送宋美龄女士的订婚戒指面交宋太夫人。

和宋美龄女士的婚约决定之后，蒋总统乘暇暂作日本的爽秋之旅。

路线是这样的～～十月四日宝冢，五日奈良，八日神户，十一日大津，十三日箱根大涌谷，十五日小涌谷，十六日汤本，十七日芦之湖，十八日河口湖，二十日热海，二十一日伊东，二十三日东京。

日记所载对日感想

在这此旅程中，见到了很多朋友，也考虑了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当时的日记留有以下一些感想：

‘日本进步之速可惊，社会秩序与教育亦均有进步。未至日本以前，以为其物质进步，精神必衰退；今乃知其兴盛犹未艾也。’（十月四日，游宝冢，见建筑皆已欧化。）

‘日本对华政策之错误：（一）以为中国革命成功，其东亚地位动摇。（二）利用中国南北分裂，从中操纵。（三）利用无知军阀，压制民众。其政治家之识力，乃如是乎？’（十月十一日）

‘研究日本对华方针，归纳其观念共五点：

‘一、满蒙经济发展。

‘二、满蒙为日俄战争牺牲所得来；日俄之战，为东亚存亡之战。日本之侵略中国，即基于此观念之误，而漠视中国革命进步之环境。

‘三、投资满洲交通实业，谓中国人皆受其惠。

‘四、不在政治上吞并满洲，致担负义务。

‘五、须保留其在满蒙之权利。’（十月十三日）

‘其国中到处有公园，可羡也。’（十月十五日，游箱根小涌谷公园）

‘日本建设猛进，不知吾国何日乃能臻此耳！’（十月二十一日，游伊东）

到达东京，是十月二十三日，在帝国大旅社卸下行装，便去拜会头山满。

同时，在这一天发表了一篇“告日本国民书”。

对日本所寄予的期待

这是要求日本方面对于其自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政策要有所反省，以及包含有痛感中日之间的圆满合作，对于亚洲、进而对于世界的和平安定有着密切关系的深切呼吁：

‘……我孙总理尝称“中日两国为兄弟之邦”，无论在任何方面观察，均有唇齿相依之关系。中正深信贵国国民希望我中华民族之独立，必较他国国民尤为真切。……

‘中正尝以为欲期中日亲善之实现，必先扫除两国亲善之障碍；障碍为何，厥为中国国民所共弃之军阀也。……

‘惟其间有不明中国国情之国家，不顾东亚之安危，徒眩惑于目前短小之权利，利用我国民所痛心疾首之万恶军阀，以间接压制我国民众，阻挠革命新力量之膨胀，而连结国际间永久不解之仇恨，以贻我东亚民族无穷之耻辱。

‘明达如贵国朝野人士，……中日两国根本之亲善，非利用军阀所能成功，亦非少数人之互相结合所能奏效。……吾人今后努力亲善之工作，首当扫除国民间以前之误会与恶感，以及其亲善障碍之军阀，并切望日本七千万同文同种之民族，对于我中国革命运动彻底了解，而予以道德及精神上之援助。……否则，……我两国之亲善亦无由实现，其影响于东亚全体之大，固不待言；而最近世界之战祸，亦将胚胎于其间。……’

像这样对于日本所寄予的期待，一直到后来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之后，都没有改变；就是在中日战争期间，也还是常常对日本国民不断呼吁。

然而，日本军阀充耳不闻，毫无接受之意，只顾疾足狂奔，一如预言所指——把全世界卷入了战争的惨祸。

在日访问活动

在东京方面，有近似强行军一般的访问节目正等待着蒋总统的到来。自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开始的活动，现在依据当时的日记列述如左：

致祭国父老友

二十四日——上午，前往曾在中华民国开国之初担任法律顾问而为孙先生老友的寺尾亨墓地（东京港区青山）展祭；继之，访问内田良平及各省（部）次官。下午，拜会宫崎龙介、秋山定辅等人。晚间，宴日本旧友于东京日比谷之陶陶亭，畅叙同盟会时代往事，参加者有头山满、内田良平、佃信夫、萱野长知、梅屋庄吉等多人。

据一九三六年所刊行的“头山满翁写真传”，蒋总统赴寺尾亨墓地祭扫时，头山满同行，在霞町的青山墓地入口附近花店前下车，选购了一束鲜花，和头山满边走边谈寺尾在世的往事，走到墓前，郑重致祭。

二十五日——上午，与萱野长知畅谈。下午，出席外务省招待会，与外务事务次官（常务次长）出渊胜次就亚洲情势交换意见，达三小时。

二十六日——拜访日本实业界大老涩泽荣一。涩泽已届八十六岁高龄，他熟读论语，谈话中多带有道德观念；并且引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格言，有希望日本人对于自己的行动知所戒慎之意。

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往枥木县的日光、盐原等处旅行。

十一月一日——在上野与田中义一首相亲信陆军少将佐藤安之助晤谈。

二日——祭扫孙先生旧友犬冢信太郎墓。上次在一九一九年蒋总统访日时，曾经代表孙先生探望犬冢病况，别后不久他便去世。

继之，拜访政坛元老犬养毅，以及在高田炮兵联队见习时代的长官长冈外史（第十三师团长）和飞松宽吾（野炮兵第十九联队长），相聚欢叙，犹如家人。在长冈家中，曾书赠“不负师教”条幅（在本秘录中曾经提到）。

三日——访问藤山、梅屋庄吉，以及刚就任满铁总裁不久的山本条太郎。并会晤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晚间，应头山满邀宴。

梅屋庄吉之言

据梅屋庄吉长女国方千世回忆蒋总统来到东京目白之梅屋家中访问时的情况如左：

和家父有交谊的中国革命家，都是比蒋总统年长的人。在此之前，家父和蒋总统并没有深厚关系，只是听到孙先生说过：“蒋介石君是可以继承我的一个青年。”

蒋总统也向家父说：孙先生曾经吩咐“将来如有困难，日本的梅屋庄吉可以商量。”故而特别拜访。

不料，在谈话中，蒋总统说出将有远游美国之意，家父愤激地说：

“孙文先生信赖你，把后事托付给你，你说是因为陷于困境，就想远走，怎么可以？”

一面说，一面砰砰地捶着客厅里的桌子--我看到家父生平像这样生气，在后来还有过一次，就是久原房之助对不起革命派的事，也曾惹起了他一肚子的怒火。

然后，梅屋庄吉向蒋总统提到：“和宋女士结婚，一定会在各方面得到很大的帮助。”

四日——出席涩泽荣一招待宴会。访问萱野长知、水野梅晓，此次访日，得水野助力甚大，特地向他深致谢意。

与田中义一会谈

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会谈，是在十一月五日下午一时半造访他在东京青山的私邸，谈了两个小时。这是一次很重要的谈话，是为了探询标榜对华积极政策的田中真意如何。张群以翻译身分同行，而对方为田中担任翻译的人，则是佐藤安之助少将。

据张群对笔者（产经新闻执笔人古屋奎二）谈话——“佐藤安之助是一位所谓‘中国通’，每天清晨与田中见面，详细报告前一天的中国情报。我感觉到田中义一之所以能够了解中国详情，实则是由于佐藤的帮助。”

当时，张群与田中认识，蒋总统则是和他初次见面。蒋总统对于这次会谈，寄予很大期待，曾经对张群透露：“这次访日，最重要的是和田中会谈。”

在中华民国总统府保存的档案中，有此次会谈时一问一答的纪录如下：

蒋总统中日两国将来之关系，可为决定东亚前途之祸福，阁下以为如何？

田中愿先闻阁下来日之抱负。

蒋总统余之意有三、第一：中日必须精诚合作，以真正平等为基点，方能共存共荣；此则胥视日本以后对华政策之改善，不可再以腐败军阀为对象，应以求自由平等之国民党为对象。换言之，不可在中国制造奴隶、应择有志爱国者为朋友。——必如此，中日乃能真正携手合作。

与田中会谈纪录

蒋总统（继上篇）第二：中国国民革命军，以后必将继续北伐，完成其革命统一之使命。希望日本政府不加干涉，且有以助之。第三：日本对中国之政策，必须放弃武力，而以经济为合作之张本。余此次来贵国，对于中日两国之合作政策，甚愿与阁下交换意见，且希望获得一结果，希有以明教之。

田中阁下盍不以南京为目标，统一长江为宗旨，何以急急北伐为？

蒋总统中国革命志在统一全国。太平天国之覆辙，其可再蹈乎？故非从速完成北伐不可。且中国如不能统一，则东亚不能安定，此固为中国之大患，而亦非日本之福利也。

田中闻中国统一而变色

当蒋总统谈到“中国革命志在统一全国”的时候，田中义一突然为之变色。盖抱持着分割中国野心的田中，当然会在涉及中国统一的问题上表现出不快。从他的谈话和态度，可以充分观察得出——日本军阀将会在后来为阻止中国统一而疯狂奔驰的情势。

关于蒋总统和田中的会谈，日本方面曾经由外务次官出渊胜次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将陪同谈话的佐藤少将之纪录送达驻华公使及驻上海、汉口、奉天各总领事，是一份很详细的问答笔记。根据这个文件，则与中国方面的纪录在语气上颇有不同。

在北伐问题方面，田中以“从中国内部分裂状况看来，革命的实行非常困难”为前置词，接着便对蒋总统提议：“为了先要使长江以南的基础巩固下来，似可不必急于北伐，而专心于南方统一，如何？”

对于这一点，蒋总统虽然答覆：“对于不宜立即北伐以及等南方巩固之后，再行北伐的高见，固有同感。”不过同时表示：“如果不继续北伐，则南方反而会有发生祸乱之虞。”说明了急于北伐是有其内部的理由存在。

又关于日本援助军阀问题，中华民国方面的纪录没有具体涉及那些人，而日本的纪录则6[230]1542有蒋总统提出张作霖的名字说：“中国之所以有排日运动，是因为中国国民认为日本援助张作霖。”田中则断言：“日本没有给张作霖任何援助。”又据同席的张群回忆：“田中曾说讨厌张作霖，而支持他的总参议杨宇霆。”

此外，对于共产党问题，双方意见一致，都认为非予清处不可。

断言田中毫无诚意

蒋总统在和田中义一会谈之后，立即在日记中记下感想如左：

‘综核今日与田中谈话之结果，可断言其毫无诚意，中日亦决无合作之可能，且知其必不许我革命成功；而其后必将妨碍我革命军北伐之行动，以阻止中国之统一，更灼然可见矣！

‘日本尝以北洋军阀为对象。自满清甲午以来，凡与日人交涉者，类皆腐败自私之徒，故使日人视我中国人为可轻侮，亦积渐之势然也。

‘余此行之结果，可于此决其为失败。然彼田中仍以往日军阀官僚相视，一意敷衍笼络，而相见不诚，则余虽不能转移日本侵华之传统政策，然固已窥见其政策之一般，此与余固无损也！’

和田中会谈之后，继之访问在这一年刚才组成的立宪民政党总裁滨口雄幸恳谈。

六日——再度访问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晚间，与秋山定辅欢叙。

‘中师（孙先生）甚敬其人（秋山定辅），惜彼邦政治家多不信彼。’（六日日记）

放弃访美决心归国

经过以上一些会谈，访日目的大致达成；但预定继续访美之行，则不得不予中止。

盖访日以来，张人杰、李石曾等留在国内同志一再促请回国，而同在日本促膝商谈的张群、宋子文也建议复职，并且汪兆铭也打来有请即归国的电报。

尤其是失去了统帅的国民革命军，迷惘情况日益严重，为了国家，已不容许再事优游了。

根据日本方面的“蒋、田中会谈纪录”，蒋总统曾说明其归国的决心是：“本来，想周游欧美各国，但在与日本友人会谈之后，感到当前时局，已经不容袖手旁观。”

此外，汪兆铭发来要求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的秘密电报，亦已为外界所知；蒋总统则表示：“自己无意接受，虽然归国，但暂不拟有所活动。”

蒋总统最后下定决心归国，是在石一月七日；当晚八时，乘车到达横滨，转东海道线夜快车前往神户。

八日，头山满等人在码头送行，由神户登船，驶向上海。

╭══════════════════╮

自由人注

《鲍罗廷与武汉政权》蒋永敬着出版者：台北市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一年三月一日再版

第三三八页：

民国十六年六月一日史达林以第三国际的名义，密电在武汉的鲍罗廷，给予新的指示。该指示的详细内容如下：

当两湖反共事件的报告到达莫斯科后，斯大林于六月一日给鲍罗廷和鲁依一项训令，要他们武装共产党员及农工，改组武汉左派的中央，惩罚“残害工农的军官”。训令内容如下：

“没有土地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底可怜的玩具。反对过火是需要的，但不要使用军队，而要通过农民协会。我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地夺取土地。对于谭平山出巡的疑虑是有某些根据的。不应该脱离农民运动，而应该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促进他。不然，就会把事情搞坏。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底几位元老惧怕事变，动摇，妥协。必须多多从下面吸收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他们勇敢的呼声会使元老们坚决起来，或者把他们抛掷出去。目前

国民党底机构必须改变。国民党底上层务必一定加以刷新，而补充以从土地革命中提拔出来的新领袖，并用工会和农会的千百万会员扩大外围。不然，国民党就会有脱离实际生活和丧失一切威信的危险。

必须消灭对不可靠的将领们的依赖。要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五万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的军团，利用军官学校的学生做指挥人员，并且刻不容缓地组织自己的可靠的军队。不然，就不能保证不垮台。这是困难的事情，但是没有其他的途径。

要组织以非共产党员的著名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罚与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军官。不可只从事劝告。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必须惩罚坏蛋。如果国民党人不学做革命的雅可宾党人，那末他们不论对于人民和对于革命都是会灭亡的。”

…………

汪精卫看到史达林给鲍罗廷的信函之后，汪的感想如何？

《蒋总统秘录》第六册第一七一页为：

〔〔鲁易于六月五日若无其事地把这通密电交给汪兆铭。汪过目后，为之愕然，嘀嘀咕咕地说：“史达林的指示，随便实行那一条，国民党就完了……”〕〕

《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四○二页至四○四页有详细的记录如下。

第四○二页：

（民国十六年六月五日汪精卫看到史达林的密函之后，于民国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决定对于违反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的共产党员予以制裁。七月十五日，武汉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主席团所提意见。决定三项办法如下：

“在一个月内，开第四次中央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所提之意见，并解决之。第四次中央执委会全体会议开会以前，中央党部应裁制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派遣重要同志前赴苏俄，讨论切实联合办法。其人选由政治委员会决定。”

在同一会议中，并决定“保护农工”及“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两项训令。

武汉中央之作上项的决定，据汪精卫说：是由于斯大林六月一日给鲍罗廷和鲁依的一项训令（亦称秘密议决案）。鲁依便把这个训令给汪精卫看，汪认为这个训令的内容是对武汉国民党的生命，加以“根本的危害”。又如汪于七月十五日在武汉中央报告云：

“（六）月五日，就是主席团到郑州去的头一天，中央名誉主席第三国际中央委员鲁依同志约本席去谈话，拿出第三国际首领斯大林拍给他同鲍罗廷同志的电报交本席看。本席看过之后，就说这件事很重要，要交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看了再说。……这个电报是训令中国共产党同苏俄在中国工作之人员的，且将他宣读之后，再来讨论（宣读原电译文）。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电报有五层意思，都是很利害的。没收土地不要国民政府下令，须由下级没收。怪不得湖南闹成这个样子！有一般同志还说农工的行为并不幼稚，原来他们是照着第三国际的训令在那里做。但总理在民生主义中说得很清楚，要实行耕者有其田，须以法律同政治的方法来解决；也就是说，要由国民政府下令没收。我们不必批评是由下级没收的好，还是由上级没收的好，苏俄当日就是先由下级没收，然后政府再加以承认。第三国际固应如此，但与三民主义相冲突。国民党就应该怎么办？在中央委员之中，增加工农领袖。本党的中央委员，是由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他们有错误，当然可以制裁，如杨希闵、蒋介石等之受处分。但中央不能任命谁作中央委员。他们要本党在中央委员之中，多增加农工领袖，试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加？如何能干涉代表大会的权限？这简直是破坏本党的组织，要我们违背总章。国民党现在的构造，必须改变，这是何等的大事！中央委员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而且又改变成一个什么东西？由二万武装的ＣＰ同志，及五万工农份子组织新的军队，消灭旧的军队。我们的军队向来不分ＣＰ不ＣＰ，为什么单单要二万武装的ＣＰ同志组织军队？这是根本摇动我们的军队，完全变成ＣＰ的军队好了！组织特别法庭，处分反革命派，不要ＣＰ同志参加，由老党员组织。这就是说：让国民党来作刽子手！综合这五条而论，随便实行那一条，国民党就完了！当初容纳ＣＰ同志加入本党，不想结果竟如此！……现在不是容共的问题，乃是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的问题，国民党的同志想起来，能不痛心！从前ＣＰ同志加入国民党，我们知道他是要受第三国际的指挥，但我们始终不知道第三国际是如何训令他们，一直到现在才晓得。一个党的存在，不外主义与政策，其次是组织，再其次是军队。ＣＰ同志加入国民党，一方面受国民党的指挥，一方面受第三国际的指挥，当然是受第三国际指挥的时多。那末，就是国民党完了！现在所行的不是三民主义，不是建国大纲，是第三国际的训令。我们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赌咒发誓要以至诚接受总理遗嘱！每次开会时，也要恭读总理遗嘱，是否口是心非？如果国民革命成功，是否还要以三民主义为纲领？政治委员会主席团除了谭平山同志因病请假之外，天天讨论，到昨天才有结果。”

…………

以下为民国十六年六月十五日中共的反应。

《鲍罗廷与武汉政权》三四八页至三五○页

第三四八页：

共党决定暂时妥协之后，对于斯大林前项六月一日的训令，必须做一交待。乃由陈独秀于六月十五日发出一项覆电，报告经过及其目的如下：

“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国共产党接受一项关于没收反革命及土豪劣绅的土地议案。共产国际纲领提出没收反革命的土地。中国共产党实行土地没收政策较前更为努力。土地委员会已再三讨论这个问题。最初提出没收全部土地，结果决定仅没收大地主的土地。汪精卫回到武汉后，国民党开始讨论土地问题。国民党土地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案，除小地主的土地外，其他土地全部没收。这个决议案被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所认可。但由于军人的（～～以上第三四八页，以下第三四九页～～）反对，决议案未能公布。大多数军官出身于中等及小地主阶级，因而对于土地革命是反对的。但并非以土地没收为军事的藉口，而是农民运动‘过火’。例如：军官家属的土地及财产被没收，他们的亲属被逮捕，官吏遭受拘捕及惩罚；谷米流通被禁止；向小商人强迫捐款；农民擅自在富人家中取米及吃饭；士兵汇回家中的小款被农民没收及瓜分。这些过火行动是迫使中小地主阶级的军人联合土豪劣绅反共产反农民的起因，特别是那些家属被攻击的军人。湖南农民运动的进展太快。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来自湖南。整个军人对农运过火不满，夏斗寅的叛变与长沙事件就是这种普遍不满的一种表现。在此情况中，不仅国民党，就是共产党也必须决定一项让步的政策。须要节制过火行动及延缓实行土地没收。对于被中小地主所支援的土豪劣绅一种混合攻击应该避免，俾可集中我们的力量以反抗反革命。同时，此将促进乡村自治机关的建立与农民的武装，藉以依据精密的计划实行土地没收并予充分的组织。此外，与大多数反革命军人的一个直接冲突即将到来，与国民党的决裂即将发生，我们即将变为一个反对党。国民党内一般论调要与蒋决斗，并同时压制共产党。在最近的将来我们或不可能留在国民党内。谭平山的就职演说是暧昧的。那是在夏斗寅叛变后发表的。国民党决定延搁土地问题决议案以先行击溃夏斗寅。作为政府一名阁员的谭平山不能公开地抗辩与国（～～以上第三四九页，以下第三五○页～～）民政府歧异的观点。你们的训令是正确而重要的，我们表示我们完全的同意，中国共产党企求一个民主独裁，但在短期内不可能完成。以改组的方式把汪精卫抛掷出去是特别地困难。直到我们自觉能够完成这些任务时，须同国民党与国民革命军领袖之间维持良好的关系。我们必须引诱他们的左派领袖制定一项共同政纲。如果我们同他们决裂，则我们建立自己的军事武力将形困难或甚至不可能。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的土地政策并不停止。农民自行没收土地是不禁止。我们目前的工作是纠正‘过火’，然后没收土地并揭破夸大的反动宣传，藉以平息军官与左派国民党的恐慌，如此方可消除农运的障碍。失业的、无土地的农民是湖南农运的动力。他们不仅要求平分土地，而且分所有的财产；这必然的造成与佃东及自耕农的一种冲突。这必须加以改变，且须以贫农为运动的中心。”

…………

由中共这一份回答可以看出几点：

一、“没收”土地政策遭受巨大的反抗。为说明这一点，占去了大约百分之七十的篇幅！！足以表示共产主义的划分阶级、没收土地、制造斗争等邪说受到普遍的反抗，在共产党占领大陆以后，凭借其恐怖暴力才得以推展阶级斗争、没收土地等政策。

二、关于史达林所希望的篡夺国民党组织、建立工农军队、让国民党员审判国民党员等项，中共的回答是在当时，中共自己尚无法站稳脚跟，所以史达林的希望实际上在短期内是不可能。

三、史达林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底几位元老……，把他们抛掷出去。……”中共领会史达林的真意是要把所有国民党元老“抛掷出去”，所以中共对史达林露骨的点出武汉国民党的首要元老汪精卫等人，如果“以改组的方式把汪精卫抛掷出去是特别地困难。”汪精卫也看出了这一点，终于了解自己是被俄国人利用了，所以在得知史达林的心意之后，汪所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也开始实行“分共”。（南京已经清党）

四、民国十四年七月一日，在俄国顾问鲍罗廷的主导之下，俄国顾问捧出了汪精卫。民国十六年六月一日史达林指令，要把汪精卫等老国民党干部“抛掷出去”。

…………

下面再节录几段，以解答下述三个问题：

一、为什么第三国际代表“鲁易”（印度人）要把史达林的“秘密”训令交给汪兆铭？

二、“鲁易”在什么情况之下离华？

三、俄国顾问鲍罗廷在什么情况之下离华？

——————————————-

一、为什么第三国际代表“鲁易”（印度人）要把史达林的“秘密”训令交给汪兆铭？

《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四○七页：

至于鲁依将斯大林的训令交给汪精卫，而是出于善意。目的在争取汪精卫的信心，申述莫斯科对汪的保证。（注四二）因为他要拉住汪精卫来做左派的“中心”，来扩大左派的武力，所以他把斯大林的训令告知汪精卫。（注四三）

（注四二）RobertC.North,MoscowandChineseCommunistsp.109

（注四三）蔡和森：机会主义史。

——————————————-

二、“鲁易”在什么情况之下离华？

《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四○○页：

根据鲁依的分析，唐生智之反叛蒋总司令，祇是基于他个人的原因；唐之军官们并不愿反对蒋总司令，他们倾向南京远超过武汉；事实上，他们已有一些人与南京方面联络。（注二四）唐生智当时在武汉也直接间接的表示：“对啊！我也是如此想，分共案最好保留到南京打下后再讨论。无奈这些赳赳武夫不听我的话，祇听何键的话。所以最好还是ＣＰ顾全大局，自动的解决这个难题！ＣＰ须知现在也非常危险，我也拿不住我的部下。”这个意思开始还是暗示，后来汪精卫、唐生知公开的说明。汪精卫把谭平山请去，要他与苏兆征立即上辞呈退出武汉国民政府；唐生智则提出优待的办法，送谭、苏出国考察。鲍罗廷对于后一办法表示可以采纳。（注二五）主张“扩大左派武力”的鲁依（注二六）在七月三日的一次紧急会议中与鲍罗廷和陈独秀的意见不合，并失去共党首要的支持，乃黯然被调回苏俄（注二七）。

（注二四）NorthandEudin,Roy'sMission,Document28,p.323

（注二五）蔡和森：机会主义史。

（注二六）蔡和森：机会主义史。

（注二七）RobertC.North,MoscowandChineseCommunistsp.108

——————————————-

三、俄国顾问鲍罗廷在什么情况之下离华？

《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四一九页：

（民国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下午三时，鲍罗廷自汉口乘火车北上到郑州、洛阳去了。（注一一）他经过冯玉祥的防区，又转乘汽车经蒙古而回俄国。这是他不久之前以全力支持冯氏打通了蒙古到华中通路的代价。他的心情沮丧；他的身体也因三年前在华南染了一种热病而重痛苦。一年以后，一位美国作家与史学家霍尔淦教授在莫斯科见着他，这时他已不为人所重视，也失去职业；在苏维埃的首都内，他简直是一个囚徒。（注一二）复据一名留俄的学生报告说：

“鲍罗廷现居莫斯科，极不为人注意。他和他的夫人住在一间小而窄的房子里。我在街上也碰过他两次。他初回俄国的时候，曾有一篇很长的报告，对于中国共产党很有微词，但闻他的意见和斯大林大不同。”（注一三）

（注一一）民一六、七、二七、政速四十一次，汪精卫报告。

（注一二）董显光：蒋总统传上册页一○五。

（注一三）质朴：关于莫斯科的一封信。

…………

以下是节录自

《蒋介石‘清党’内幕》，张锳编，北平国防大学出版社，民国八十一年十二月第一版

第六页

（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中山舰事件的发动，颇为扑朔迷离，诸多史学工作者为揭开该事件之迷，根据大量史料细致地探讨了这一事件发生前后的经过，笔者并不试图探寻中山舰事件本身的具体细节，只把视角限制在国共两党关系的领域之中，并将其置于当时国民党右派不断掀起反共逆流的背景之下，对蒋介石反俄反共的思想基础、他与上海右派集团的微妙关系等诸侧面加以探讨和研究，从而揭示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的历史必然性。

一、蒋介石反俄反共的思想基础

人们的行动是受其思想支配的。然而，蒋介石反俄反共政治思想的产生并非始于中山舰事件，蒋介石本人在谈及其思想变迁时曾自述说：

“当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之初，我个人是极力赞成共产党的革命的，我认为俄国革命在近代革命历史上辟了一个新纪元。当时如有人攻击俄国革命，我必力与之争；或有人咒诅共产党，我必竭力为之辩护。我当时赞成俄国共产党革命的态度，即此一点就可证明，我决无丝毫反对之意；并且自信出于人类的至诚，决没有丝毫偏私之心作用于其间。所以俄国革命之初，我就决心亲赴苏俄实地考察；因为当时国内革命环境不许我离开，所以没有实行。十一年陈炯明叛变，我赴难到粤，后来在由粤到港的船中，和我们总理深谈了一夜。总理也说，中国革命，许多地方须借镜于俄国。准许我照预定计划，前往苏俄，切实联络，后来陈逆虽然窜逃，广州虽然克服，而杨希闵、刘镇寰飞扬跋扈，日益嚣张。当时革命环境恶劣万分，我更觉得中国革命若不改弦更张另辟新路，决不容易成功。于是摆脱一切，决心赴俄，那晓得到俄考察的结果，令我以前对于共产革命的一切希望，全归泡影。就是考察以后觉得共产党所号召的目的，以共产党的方法，决不能达到，所以俄国共产革命，决不能算是成功；即使退一步说，他们的革命可算成功，然而决不能适用于中国。所以回国以后，对于共产党加入本党的问题，曾对总理表示异议。这是胡汉民和汪精卫两先生所知道的。我对于苏俄革命的感想，可分两时期：从苏俄革命时起，到我赴俄之时止，为第一时期；赴俄之后，到了现在，为第二时期。第一时期的感想是同情的；第二时期的感想是失望的、感想之所以变迁，乃是实地考察的结果。”（注一）

注一：蒋总统-“本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区别”（一九二九四）

所谓“实地考察”，即指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六日，孙中山委派蒋介石率领沈定一、王登云、张太雷等，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名义，赴俄考察俄国革命后的“军事政治和党务”。此时，孙中山正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之下开始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孙中山选中蒋介石担当此任；不仅由于蒋懂军事，而且因他对苏俄一向比较关注，对改革党务也抱关切态度。蒋氏曾于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致书廖仲恺、汪精卫，建议：“对人问题，尚请孙先生注意及之。党约不改，党务终难整顿，乘此时机，改正誓书，收容一般有为青年，则党势必能增大”（注二）

注二：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九三六十）

代表团在苏联期间，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蒋介石曾自述其对俄观感说：

‘在这三个月的期间，我们曾对苏俄党务、军事和政治各方面，考察其组织，参观其设备，并听取其负责者对于实况的说明。其党务方面，我们考察俄国共产党中央党部，由其政治局秘书罗素达克（Ｒｕｄｚｕｔａｋ）说明俄国革命的经过，及其当时建党的情形。我们又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我在会议时，说明中国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革命的最高目标，自信其在两三年之内必有成功的把握，并指出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形及实际工作，还有隔膜，希望其国际共党干部多到中国来考察。当我回国的前夕，乃接到他共产国际对我中国国民党的决议文，观其论调，对中国国民革命没有真切的认识，而其对中国社会，强分阶级，讲求斗争，他对付革命友人的策略，反而比他对付革命敌人的策略为更多，殊不胜其慨叹。

军事方面，我们在莫斯科考察红军及其各兵种各级学校及军队党部的组织。我们在彼得格勒，考察海军大学等各级学校，并参观克隆斯达军港（Ｋｒｏｎｓｔａｄｔ）及其舰队。我的印象是他在莫斯科的陆军学校和部队，组织严密，军容整齐，而其在彼得格勒的海军学校和舰队，却是精神颓唐，士气消沉。两年前，克隆斯达军港曾以海军军士为中心，发生革命，反对布尔雪维克的专制独裁，和战时共产主义的残暴措施。这一革命不久即归失败。当我们到彼得格勒考察时，其地方当局和海军官员对此亦讳莫如深，但是我从当地军民的精神上，还是看的出其创痛的痕迹。

政治方面，我们访问其政府的部会，考察其村苏维埃、市苏维埃，并参加莫斯科苏维埃大会。我参观他各级苏维埃讨论与决议等情形，并与其党政要员谈话之间，无形中察觉其各部分，无论在社会中间，或是俄共中间的斗争，正是公开的与非公开的进行着；而且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像所能及的。

俄共的领导者，对于我们代表团的参观和考察，无论其党政军各方面，到处都表示热烈欢迎，并恳切接待。但是我和他们商谈中俄之间的问题，而涉及其苏俄利害有关的时候，他们的态度便立刻转变了。我访问苏俄，正是加拉罕发表其对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言之后，他到中国来与北京政府谈判新约的期间。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共同宣言中越飞亦声明苏俄“决无在外蒙古实施其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离之意”。但是我与苏俄党政负责者，谈到外蒙古问题，立即发现他们对于外蒙古，绝对没有放弃其侵略的野心。这一点不祇使我感到十分失望，而亦是使我充分了解其苏俄所谓援助中国独立自由的诚意所在。’（注三）

蒋介石根据在俄考察所得的印象及与苏联政要的谈话，下了一个结论：

‘综括我在俄考察三个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无形之中，发生一种感觉，就是俄共政权如一但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注三）

‘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地主义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是危险。’（注三）

注三：蒋总统-“苏俄在中国”（一九五六）第十九至二十一页，第二十三页，第二十五页。

不难看出，蒋介石这次出使苏俄，其感受是复杂的，他以实用主义的眼光看待苏俄建军的经验、陆军学校和部队的严密组织以及军队内部党和军的实际关系，对苏联红军因强有力的政治工作而表现出的优秀素质十分羡慕，他后来正是借鉴苏军的上述经验，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反共政治思想的军人，并使之成为他日后发展的基本政治力量。他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看待苏维埃的政治制度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认识，认为“俄国共产革命决不能适用于中国”，因为“俄国共产党革命的动机起于阶级斗争”，“苏俄的共产革命是阶级革命”，苏俄共产革命的方法“是阶级斗争”；“中国民族固有的特性，是和平的，宽厚的和光明的，不愿受别人的残酷的待遇，也不愿以残酷的手段施诸别人”，所以“阶级斗争武装暴动和夺取民众等方法，在中国都不能实行。”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表示异议；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出发，蒋介石反对联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上是《蒋介石‘清党’内幕》第六页至第十一页的大部分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民国十六年四月间国民党开始清党，驱逐混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实在是有几个重要的原因：

一、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是残酷的。“同志”不认，六亲不认，把党外的“资产阶级”扫光之后，开始斗争党内的“同志”，首先从破坏受害人的名誉入手，罗列各式各样的“罪证”，何止党外人士戴“资产阶级”的帽子？甚至连共产党立的“主席”刘少奇也是“最大的走资派”。破坏受害人的名誉之后，便可以用残酷的手段把受害人折磨至死，其后继续破坏死者之名誉。等到当权派易位之后，再替受害人“恢复名誉”，而原凶不必负毁谤他人名誉之罪责！！！

二、俄国可能会继续侵夺中国领土，但是中国共产党并不正视历史上的失土。蒋中正总统在《苏俄在中国》中说当他在民国十二年底到苏俄考察时，“但是我与苏俄党政负责者，谈到外蒙古问题，立即发现他们对于外蒙古，绝对没有放弃其侵略的野心。”三百多年以来，俄国侵夺我国领土总共有五百八十八万三千八百平方公里！！占我国国土的三分之一！！对于这种侵略，凡是中国人都会感到愤怒，虽然在“孙越联合宣言”内俄国代表越飞表示俄国现政府没有侵略蒙古的野心，并尊重中国在蒙古地方的主权，但是，蒋总统访俄期间，察觉到俄国人对蒙古仍然存有野心

参考《孙中山与共产主义》第七章第五节（第七十一页），崔书琴先生说：

“中国共产党自始即主张外蒙独立。据邹鲁先生说，当时的共产党领袖陈独秀要求中山先生以国民党的名义正式宣布外蒙独立时，曾受驳斥。”

三、苏俄、第三国际及中共破坏北伐。此点只有蒋中正总统在《蒋总统秘录》中提及，中共编的《蒋介石‘清党’内幕》没有谈到这一点原因。

四、俄国顾问主导了一切国民政府的决策。参考《蒋总统秘录》第六册第四十一页至第四十二页，知道俄国顾问鲍罗廷选中汪兆铭为国民党的新领袖。民国十四年七月一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于广州，在选举国民政府主席时，“掌握着这次选举主导权的，则是以顾问身分参与会议的鲍罗廷；结果，汪兆铭获得全票十一票而当选主席。”（《蒋总统秘录》第六册第四十三页）

另一方面，在中共出版的《蒋介石‘清党’内幕》第三十五页：“整个军队（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几乎完全由中共掌握。”（中共又被俄国掌握，所以是由俄国掌握中国军队！）

苏俄顾问团在致其驻华使馆的报告中说：俄国顾问“所提出的建议，从来没有被国民政府拒绝过。”

《蒋介石‘清党’内幕》第六十七页：（民国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鲍罗廷偕陈友仁、徐谦、宋子文、孙科、宋庆龄等离粤北上。”（前往汉口）这一段的用词，显然是突出俄国顾问鲍罗廷的领头地位。

《蒋介石‘清党’内幕》第八十一页：“程潜至武汉向鲍罗廷报告了……李富春亦向鲍罗廷报告……鲍罗廷于（民国十六年）四月七日下午在其寓所召集紧急会议……”程潜、李富春到武汉，不向武汉的行政首长汪精卫报告，反而向“顾问”报告，而且“顾问”可以召开会议做成重大决定！

由各种来源可以看出：俄国“顾问”实际上是主宰！由汪精卫、陈独秀等大员，乃至于虾兵蟹将，全部都是俄国人的跑腿！！

这那里是中国政府！！！？？？

根本就是俄国政府支部！！！

为了维持中国人的尊严！！！为了独立执行中国政府的决策！！！必须要清党！！！！！

三十八年，俄国企图阻止共军渡过长江，俄国的企图很明显是要维持中国的分裂，让共产党控制长江以北，让国民党统治长江以南，如此，俄国才能谋得最大利益，反正共产主义是幌子，江南的国民党行不行共产主义无所谓！！

以相同的理由，可以看出：中共以为阻止北伐是为了以共产主义的旗帜统一全中国，俄国顾问要阻止北伐，是为了维持中国的分裂！！

为了完成北伐！！为了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必须要清党！！！！！！！！！！

╰═════════════════╯

第八章：全国统一

主题

在沪举行婚礼与苏俄绝交“广州暴动”惨况再度出师北伐日本出兵济南革命军进入济南日军蓄意挑衅日军蛮横狰狞蔡公时遭惨杀看破日军阴谋誓雪国耻唯有卧薪尝胆日亟图控制东北“关东军”的狂妄张作霖遭日炸毙日已难控制军阀北伐成功致祭总理之灵日威逼张学良“我是中国人”张学良参加国府东北毅然易帜各国刮目相看进入训政时期

在沪举行婚礼

蒋总统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日下午一时半回到上海，当生平最好一次访问日本行程结束之后的此刻，在自己的国家，有着统一全国的大任，正在等待着他的归来。

在肩负起大任之前，更有一位衷心期待着蒋总统归国的人，就是宋美龄女士。经过在有马温泉接谈而允诺了这门亲事的宋太夫人，已经先于一个月之前回到上海，筹划婚礼事宜。

蒋总统和宋女士在举行婚礼之前，商谈了很多事情；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当地报纸刊载结婚启事如左：

‘中正奔走革命，频年戎马驱驰，未遑家室之私。……兹定十二月一日，在上海与宋女士结婚，爰拟撙节婚礼费用、宴请朋友筵资，发起废兵院。……欲为中正与宋女士结婚留一纪念。’

在日本，结婚刊布启事，很少见到；但在中国，则为常例。

十二月一日，举行婚礼，首先于下午三时在宋宅行基督教仪式，由余日章牧师主持，观礼者只有少数近亲；继之，在市内大华饭店举行典礼，证婚人蔡元培，介绍人谭延闿、王正廷。

此时蒋总统四十一岁，新人宋女士二十七岁。

安心尽革命责任

当天上午，蒋总统以“我们的今日”为题，撰写了一篇感想文如左：

‘余奔走革命以来，常于积极进行之中，忽萌消极退隐之念。昔日前辈领袖问余，汝何日始能专心致志于革命？其他厚爱余之同志，亦常讨论——如何而能使介石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凡此疑问，本易解答，惟当时不能明言，至今日乃有圆满之答案。

‘余确信余自今日与宋女士结婚以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余能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即自今日始也。

‘余平时研究人生哲学及社会问题，深信人生无美满之婚姻，则做人一切皆无意义。社会无安乐之家庭，则民族根本无从进步。……家庭为社会之基础，欲改造中国之社会，应先改造中国之家庭。

‘余与宋女士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对于此点，实有同一之信心。

‘余二人今日，不仅自庆个人婚姻之美满，且愿促进中国社会之改造。

‘余必本此志愿，努力不懈，务完成中国之革命而后已；故余二人今日之结婚，实为建筑余二人革命事业之基础。’（注一）

密月旅行，到浙江省北部的莫干山，怡情于山光湖影之间。

蒋总统之信仰基督教，是接受了夫人的晋言。

接受基督教洗礼

在董显光所著“蒋总统传”中，记述有江牧师谈到蒋总统接受洗礼的经过。现在介绍于后：

“民国十九年（一九三○年）之某日，江牧师接到蒋夫人的一封急电，请劝蒋先生接受基督教，设有可能，则为担任洗礼。……

“蒋总统对于江牧师和夫人的劝说答称：‘我现在只读完新约第二遍，正开始读旧约。我要对基督教多知道一点，然后正式接受耶苏为我的救主。’……

“这一年秋天，蒋总统在开封附近被敌军包围，陷于危境。蒋总统祈祷上帝解救，并声言：此次得救援，定即正式信仰基督为救主。上帝对此祈祷即予接纳，骤下大雪，为此季节所罕见，蒋总统得以转败为胜。其后不久，蒋总统便从江牧师受洗。”

又据蒋夫人于一九三四年在美国论坛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我的宗教观”中提到蒋总统在向宋太夫人请允婚事时，曾经表示：研究基督教意，并且诵习圣经。

接受基督教洗礼之后的蒋总统，的确是虔诚信仰耶苏基督，即使在战线上，也没有一天疏忽礼拜。在他的著作、演讲和日记中，也引用着很多圣经箴言或是向上帝祈祷的语句。

蒋夫人内助之功

蒋夫人内助之功，非常之大；尤其是自中日战争发生以来，在对美、对英的外交关系上，完成过很重要的任务——为蒋总统有时担任“翻译”，有时担任“特使”，非常活跃。曾经受任中国军事顾问的德国军人福根霍森在他的回忆录中便留有——“蒋委员长一切工作的圆满成功，也得力于蒋夫人宋美龄的有效协助。”的记述。

在海外，宋女士被称为“ＭＡＤＡＭ蒋”。她的发言，到现在都还时常被美国等报刊所揭载。

蒋总统逝世之后，夫人健康欠佳，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七日赴美国就医；次年四月二日返国，参加蒋总统逝世周年纪念典礼。

注：蒋总统-“结婚感言”（一九二七十二）

与苏俄绝交

蒋总统归国之后的政局，迅速活动起来。虽然他是在新婚密月期中，但却没有轻松舒徐的生活时间，当婚后的第三天～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日，就有中央执、监委员三十多人聚集在他的新居上海拉都路三一一号，举行中国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预备会议。

继续执行总司令职权

这个预备会议，是在国民政府原则上遵循国民党决定的理解之下进行，到十日为止，举行了四次会议，结果全场一致作了要求蒋总统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的决议：

“贵同志（蒋总统）去岁受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其职权为本党中央所赋与，其功绩为全国国民所共知。当此军阀尚在负隅，非同志高蹈之日；为解除党纷之症结，与完成北伐之全功，惟有请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

此时，汪兆铭也随着大势所趋支持蒋总统复职。不过，他本人则不容于舆论而卸除了一切职务，以疗养为名于十二月十七日再度前往法国。

在这个会议中，还决定了另一重要事项，就是和苏联断绝关系。

‘我早已看到——在各地方有苏俄领事馆做共产党的政治机关，又有苏俄银行做共产党的金融机关；这种机关不封闭，共产党的扰乱是不会停止的。

‘在预备会议最后一天（十二月十日），我即提出对俄绝交的议案。我以为在革命未成功以前，一定要对俄绝交；等待我们国民革命成功以后，再来设法恢复邦交。现在急需将俄国领事馆及商业机关一律封闭。’（注一）

关闭所有苏俄机构

此一对苏断交决议案，于十三日发表。十四日，国民政府下令，着各地苏联领事馆撤走，并关闭其商业机构，同时逮捕在汉口俄国共产党人，将之驱逐出境，宣告对俄断交。（苏联方面宣布断交则是在一年半之后的一九二九年七月）

在此之前的一九二七年七月间，将共产党员鲍罗廷等遣送出境，结束了“容共”；现在则是了苏联割席，清算了“联俄”。

自一九二三年元月“孙越宣言”以来，中国国民党和第三国际历时五年的关系，到此完全断绝。

和苏联的关系，发展至绝交的经过如下：

清党后共党暴乱

自全面清党以来，共党分子的暴虐情况，实为笔墨口舌所难罄述。他们在长沙、威宁（湖北）、广州等地肆行暴动，戕害了多数无辜同胞的生命。

先是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发动南昌暴动失败之后的共产党，接着于八月七日在汉口举行会议（即所谓“八七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罢免他所担任的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职务，改由瞿秋白继任，执行“暴动路线”。此时，鲍罗廷虽已回俄，但中共仍然是在第三国际的指挥之下；而实际主持“八七会议”的人，则是由第三国际派来的纽曼。

‘本党（国民党）清党之后，共产党势力大受打击，第三国际方面亦以为中国共产党殆无法复兴矣！而中共分子为表示在中国之力量，以期取信于苏俄计，乃多方策动。……’（注二）

“八七会议”之后，共产党“暴动路线”的开端，是在湘鄂两省秋季收获之际所发动的“两湘秋收暴动”。

在湖南方面指挥秋收暴动的，就是毛泽东。他以“农民运动”的残党为中心组成“工农第一军第一师”，自九月八日至十六日在他家乡附近的平江、浏阳、长沙、醴陵、萍乡各县发起暴动，极尽其屠杀、掠夺之能事。

参加这次暴动的分子，有后来在一九七一年因“林彪事件”而随之不再露面的黄永胜（共军参谋长）及杨得志（现任共军武汉军区司令员）等人在内。

又在湖北方面，有瞿秋白收买的土匪张兆丰所部，在咸宁、通城一带暴动，并将铁路截断。

当时在湖南民间，对共产党的残暴情况流传有这样的歌谣：

“杀！杀！杀！同志杀同志的头！烧！烧！烧！同志烧同志的家！”

暴动终于被政府出动军队镇压下去，瞿秋白化装逃亡上海，毛泽东则逃入湘赣交界的井岗山。翌年，朱德、陈毅、林彪等人也入山汇合，形成共产党的根据地。

共产党的七杀令

“暴动路线”的又一个行动，是成立“海陆丰苏维埃”——以广东海丰、陆丰地区为根据地的彭湃，在共产党的指示之下，于十一月一日占领了海丰县城，宣言成立“苏维埃政府”，自任主席，组织“赤卫军”及“革命法庭”，发布“凡向农民收取田租的地主即予枪决”等七项禁令，依据此一禁令而被杀害的人民达一万多人，农民们称此禁令为“七杀令”。这是共产党在中国组成的第一个“苏维埃”，但旋即于一九二八年三月被政府军所剿灭。

注一、二：蒋总统-“招待记者讲词”（一九二七十二）

“广州暴动”惨况

规模最大、而又极尽其残暴之能事的，是“广州暴动”。正好是发生在国民党决定和苏联断决关系的四中全会预备会结束后的第二天～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这次暴动是和“海陆丰苏维埃”互相呼应的行动，主谋者张太雷、叶剑英；在南昌暴动后逃亡香港的叶挺也参与其事。

此时，广州的国民革命军差不多都已调往他处，只有第四军教导团担任保安任务。于是该团团长叶剑英乃率领业已为共产党所染化的部属倒戈投共。

十一日早晨，有颇多流氓加入叶剑英部队，出动总数约二千人的暴徒，袭击留驻广州的守备部队及公安局，以致在广州市内所有军警机关很快地便落入暴徒手中。监狱中所监禁的犯人，不管有罪无罪全被释放出来，给予武器及红布标识，任凭放火，抢劫。

佩带红布劫掠杀人

又有暴徒拿着红布和手枪到工会去煽动工人们抢劫说：“兄弟！要不要去发财！”

佩带着红布，就是劫掠和杀人的“免罪符”。在广州市内，只要说得上是一家商店，所有的东西都被掳掠一空。连银行、旅馆、餐厅最后乃至于医院，都被放火烧掉。

稍微有点抵抗意图的人，都被处死；连想提点水救火的一位老太太，被共党分子看到，也没有饶她一命。

沈藻修夫妇被剐死

曾任广东大学法学部教授、当时代理司法厅长的沈藻修，被共产党员以“反共”的理由逮捕，剥光了他的衣服绑在省党员俱乐部前的电线杆上，他新婚不久的太太哭叫着要代替他死，请放下他；结果两夫妇都被绑在电线杆上，活活地剐死。

各马路通衢，遍悬以红布书写的共产党标语。

在睡梦中被枪声惊醒的广州市民，相率扶老携幼，仓皇出奔；很多人来不及逃避，便被流氓地痞所杀害。

全市起火十余处，到处掠夺、劫杀，枪声密如爆竹，格斗声、喊杀声、及市民遭害之惨哭哀号，响彻九霄。

占据了广州的共产党，于十一日下午六时，在中央公园举行“工农兵大会”，宣称由工农兵组织“苏维埃政府”。

无秩序的状态，连续三天-到十三日为止。在这个期间，无辜牺牲的广州市民达一万五千人之多。

为镇压暴动而出动的国民革命军第五军李福林部及第四军第二师薛岳部，于十三日攻入广州，激烈巷战；广州机器工会的工人们也奋起响应国民革命军，拿起武器和暴徒作战。激战之后，暴徒遗尸遍地，仓皇败走，市区终于恢复平静。领导暴动的张太雷当场被击毙，叶挺再度逃亡香港。

苏联在背后指挥

在以上所述的一些暴动背后，有苏联和第三国际直接、间接地从事指挥。

例如在广州暴动时，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哈西斯就是直接参加暴动而被国民革命军逮捕的。

策划暴动的总指挥部，设在苏联领事馆。张太雷和叶剑英就是受第三国际派来的纽曼和爱斯拉所指挥。苏联的远东银行等分支机构，也都是重要的暴动据点。

国民革命军有鉴于此，乃在将暴动镇压下去之后，立即封闭苏联领事馆。翌日～十四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对苏联断交。

‘不幸，在国民革命进行中，世界上许多国家不能认清国民革命的真正目的。……

‘苏俄的野心家，竟要想以列宁主义的共产革命来代替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他们不仅是假乎于第三国际，指使中国共产党来破坏中国国民党；并且公然利用苏俄官吏（领事）所享有的地位，作破坏国民革命、危害中国民族的举动。

‘本党至此，为卫护革命目的计，不能不与之断绝关系。由此可知本党昔年“联俄”，是为着革命而联俄；更可知今日“绝俄”，亦是为着革命而绝俄的。’（注）

过年之后的一九二八年元月二日，蒋总统接到南京国民政府发来公电：

“贵总司令……请立即旋都复职，共竟革命全功。……”

再度和同志们并肩奋斗的时候，已经到来，乃决心立即前往南京。

注：蒋总统-“中国国民革命与日本”（一九二八四）

加拉罕的连续两次宣言，实则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已经有后来的历史作见证。如果从结论来说：领土问题，该是宣言最重点的所在；但实则苏联对于以往帝俄时代凭藉武力恫吓陆续强迫签订的“瑷珲条约”（一八五八年）、“北京条约”（一八六○年）等不平等条约，而据以夺取的中国领土，直到后来连一平方公分都未曾归还，至于中东铁路，则于一九三五年出卖给所谓“满洲国”，而为日本军阀提供了侵略中国的工具。

再度出师北伐

一九二八年元月四日，蒋总统与国民政府首脑谭延闿以及杨树庄、何成浚、陈立夫等人乘火车晋京，上午八时自上海出发，傍晚到达南京，沿途各站，人头攒动，挥手致意。

车抵南京，更受到盛大欢迎，沿途站满了民众交通为之阻塞。

谭延闿很诚挚地说：

“看见今天民众这样地高兴，可以想到去年八月你下野之后，该是怎么样地民心惶惶了！”

继续执行总司令职权

元月七日，正式复职，并向国民政府呈报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

在复职之际，特于元月九日发表“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电”，向始终共历患难的同志们布达中途引退的歉意；同时，表示面临再度北伐的决心。——电文是这样的：

‘……回忆去年中途引退，定计俄顷，以中央任命之职责，不及待中央之核准而遽去，固所疚心；以相从有年之袍泽，不能共艰难以终始，尤滋愧戚！所幸吾革命将士，秉主义为先驱，虽在内外交困之中，犹能杀敌致果，屡着战绩，每念勤劳，辄用嘉慰！……

‘今党内团结，渐见端倪，中央会议，举行有日。……

‘中正……秉承中央，齐一军令，集中力量，务于最短期内……歼除奉鲁军阀，实现总理之遗教，早出斯民于水火。……惟我诸将士，同为主义之干城，共负革命之天职。……’

在宣布这个电文的同时，又发表“告全党同志暨全国同胞书”，说明革命的成败，攸赖全国同胞力量，呼吁团结与支持。

为促进党内团结而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二月二日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大礼堂开幕，出席中央执、监委员张人杰、李烈钧、蔡元培、陈肇英、何应钦、宋子文、李宗仁等二十九人。蒋总统与谭延闿、于右任当选主席团，并由蒋总统代表致词：

‘从前共产党来妨害我们的革命及本党的主义，我们已经晓得了他们的阴谋，把他们推翻了。至今纯粹的忠实同志，绝无其他参杂其间来开今天的会。可以说：今天的会是本党中兴的一个会，亦是中国中兴的一个机会。’

四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为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更始而彻底改造，凡以前与“联俄容共”有关的决议案，一律取消，政府和党换了一副新的面貌。

军事委员会改选委员七十三人，蒋总统任该会主席，并续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谭延闿当选国民政府主席。

在新体制之下，开始准备再度北伐。

自去年八月由总司令职位中途引退以来，北伐任务由军事委员会领导，也还是在勉勉强强地继续进行；何应钦所统驭的第一路军，在如此状态之下奋战不懈，于去年十二月再度攻克徐州，向山东省境挺进，和以山东为地盘的张宗昌对峙。

二月九日，蒋总统循津浦铁路北上，赴徐州前线视察。

重新编组国民革命军

继之，于十三日重新编组国民革命军。

此时，何应钦指挥的第一路军，改编为第一集团军，蒋总统自兼该集团军总司令（何应钦调北伐全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当此再度北伐之际，特地莅临最前线鼓舞全体官兵士气。

十六日，在开封与冯玉祥会谈；征得冯之同意，将其所部“国民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

又在山西方面，表明加入国民党的阎锡山所部，则编为第三集团军，也加入了国民革命军的行列。

二十八日，正式决定了革命军的编组如左：

北伐军总司令蒋中正

参谋总长何应钦

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中正（兼）。辖十八个军，二十九万人。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辖二十五个军，三十一万人。

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辖十一个军，十五万人。

海军总司令杨树庄。辖四个舰队。

稍后，李宗仁被任命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辖十六个军、九个独立师。

在敌对的北洋军阀方面，张作霖盘踞北京自称大元帅，统辖由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杨宇霆等所指挥的七个方面军，拥有兵力百万。

三月三十一日，蒋总统为部署二次北伐，渡江北上。

三个集团军分途挺进

四月七日，国民党中央发表北伐宣言，蒋总统则于同时对各军下达动员令。

第一集团军沿津浦铁路、第二集团军沿京汉铁路、第三集团军沿正太铁路，分途挺进。

第一集团军行动迅速，十日，便攻克了山东省南端的台儿庄。

十四日，占领临城、临沂，势如破竹，指向作战目标-济南，继续攻击前进。

日本出兵济南

‘……我国民革命军之对外政策，全在革命立场上以国家利益为主。苟有利于我国民革命，不妨害我国家主权，无论何国，其经济上及其民族国家之利益，吾人必尊重之、承认之。吾人之所以反对帝国主义者，以其对我中国之施行压迫及侵略故耳！日本与我中国关系最深，与我国民党交谊最久，故吾人确信在友邦中必最能谅解我中国国民革命之意义，而不愿加以妨害，且必唯愿其早日成功也。……

‘此次继续北伐，实为我中华民族争生死存亡之举。……日本与我国唇齿相依，休戚与共，故我敢信日本国民对于我之北伐，不特不加阻害，且必进而乐观我之成功。……于是乎亚州之幸福可保，世界之和平有望，尚望诸君为我转达于日本国民与政府。’

以上这一番谈话，是蒋总统在第二次北伐不久之前的三月六日（一九二八年），招待日本新闻记者晚餐会时的演说。

第二次北伐，在军事上已经是胜算在握；然而值得耽心的，则是只要得到一点可乘之隙就会出之以干涉行动的列强动向。

日本意图阻碍北伐

尤其是行将成为第二次北伐战场的山东至华北一带，是日本极力扩张其势力的地区。日本为了维护他的权益，和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等军阀勾结，并给予援助，已是举世周知的事实；而且，在上一年革命军北上进击时，田中义一就曾有过出兵到达济南（第一次出兵山东），公然意图阻碍北伐的表现。

现在，果然不出所料，日本再度出兵前来。

‘日本蓄意侵略，逆敌存心卖国，两相勾结，抵死挣扎。闻日本第二舰队军舰二十二艘于一日午后五时到青岛；十一日，日本田中首相告诫全国，谨防外来之危险主义；十七日，日本阁议，决派陆战队赴青岛，必要时开济南；十八日，日本公然出兵；十九日，日军由青岛入鲁；今日，日兵已开济南。

‘又闻今日日本议会讨论出兵增加预算，田中恐吓议会——如不通过该案，则再解散议会云。呜呼！天下有强权、无公理若是。

‘若北伐被阻，竟至半途而废，则党国前途何堪设想？然吾一以忍辱负重，苦干硬干到底，至于成败利钝，听之而已！’（蒋总统四月二十日日记）

据日本资料——对山东出兵的方针，实则早在上年十二月二十日的阁议中已经做了决定。

出兵的理由，是为保护居留济南的日本侨民。此时，在山东督办公署所在之地的省会济南，以商埠为中心，居住日侨约二千二百人。

当日本阁议决定上述事项阶段，田中义一曾经指示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会见蒋总统，提出：“如果在济南附近发生战争，日本便会出兵，希望北伐军避开济南北上；不过，日本即使出兵，也不会关涉到开战军的作战，更不会援助那一方面。”蒋总统则表示：“保证负责保护日本侨民”，而拒绝了日方的提议；同时，并向矢田说明：“日本如出兵，则与田中义一在东京会谈时的谈话不同，实在感到遗憾。”

但是，日本方面则藉口有共党分子混杂在国民革命军之中，在治安上不能使人安心——坚持出兵方针不变。

四月十六日，驻济南陆军武官酒井隆少校呈请参谋总长铃木庄六出兵。同时，青岛总领事藤田荣介暨代理济南总领事西田畊一也向本国陈述：“出兵时期，业已到来。”

在四月十七日的阁议中，陆军大臣白川义则提出“出兵”议案，其他阁僚都认为已经是既定事实而予以通过。十九日，乃正式发表。

二十日夜晚，自天津驻军抽调三个中队（连）计四百六十人，由小泉恭次中校指挥，为先遣部队开进济南。同时，更命令驻扎日本熊本县的第六师团（师团长福田彦助中将）出发。

左宗棠的一番话

在这个当口，蒋总统考虑到为了避免和日军冲突，唯有一个“忍”字，故而在二十日的日记后面，接着引用当十九世纪末期帝俄入侵新疆时左宗棠的一番话，写出自己的决心。

‘左谓：“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又谓：“彼俄人方思逞，则宜收敛困啬，以收节短势险之效。越勾践于吴，先屈意下之；汉文于南粤，卑词畏之。——反弱为强，诎以求伸，此智谋之士所优为，黄老之术所以适于兵也。”古云：“圣人将动，必有愚色；图自强者，必不轻试其锋，不其然乎！”

‘文襄（左宗棠）之卓见如此，此其所以能有成欤！

‘呜呼！今日之日本，其侵略毒谋必加甚于昔日之俄人也。’

革命军进入济南

于是，国民政府乃于四月二十一日（一九二八年）由外交部长黄郛具名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如左：

“去年五月间，贵国（日本）突有出兵山东之举；本政府以贵国此种举动，实属侵害我国领土主权，违背国际公法，当经本部电达贵国大臣抗议在案。……乃贵国政府……又有出兵山东之议……不独公法条约蹂躏殆尽，更恐因此酿成意外，责将谁属？……”

张群赴日交涉

同时，并派遣张群前往日本，负起和日本政府交涉的任务。

张群料到田中义一的诚意颇成疑问，乃同时策动有私交的日本朋友，通过公私两方面的努力，希望能让日本理解中国革命军的立场。

然而，日本方面却置之不理。

此时，正在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中的中国学生们，也兴起了激烈抗议行动，其中有极端愤慨的曹瑞麟等二十五人，且为之断然退学回国。

在中国国内，一般民众之间的反日情感，更是越发高涨。

四月二十八日，革命军挺进到济南附近，遮断敌军运输路线——胶济铁路。这条铁路，是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自德国手里所接受，但其后归还中国。是故革命军遮断该铁路，日本实在无任何干与的理由；然而，日军竟然提出强烈抗议，因为他们也是以此为主要运输路线。

并且，日本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则正准备把他的师团司令部由青岛移到济南。

关于第六师团司令部之移往济南，连日本参谋本部都感到困惑；田中义一也为了避免纠纷事态，曾于二十四日电令福田彦助应尽可能使司令部在青岛多停留一些时间。可是，福田基于他用兵观点的独断，仍然推进到济南。

蒋总司令进驻济南

五月一日上午九时，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所部进入济南城，敌军张宗昌部队业已放弃济南。城门上高挂“国民革命成功万岁！”的大幅横布标语，家家都挂出青天白日旗，欢迎革命军。

蒋总统在进驻济南途中，见到路旁倒毙的饿殍，乃在日记中记下：

‘战地见将士之死伤，已为之惊魂；而今复见人民之饥容、孩提之饿毙，更不胜悲悯。’（四月三十日）

革命军在济南一带调查敌军防御阵地，见到堑壕堡垒构筑得特别坚固，绝非张宗昌部队的力量所能办到，而显然是日军协助建筑。

二日上午九时，蒋总统进入济南，在城内的山东督办公署设置总司令部。

就在两小时之后，福田彦助也率领了他的第六师团主力抵达济南，其总司令部则设在靠近西门外的商埠地区。

于是，乃出现了只隔一道城墙便有中日两军驻在的异常状态。

日军三千侵占商埠

蒋总统于入城之后，立即巡视城内外，得知日军约三千人分驻在商埠内的日本总领事馆以及日本学校和日本人经营的济南日报、济南医院等处，整个商埠周围设有铁丝网及沙包，架设着机关枪甚至大炮！日军装甲车巡行于商埠乃至于城内，就像是在他的属地一样，显然已经有了战斗准备。此外，更到处张贴“未经许可而接近日军守备区域者，断然取缔。”“如进入日军区域，会招至重大不祥事件。”等挑拨性的标语。同时，据情报——已有三个中国人被杀害，尸体且被日军运走。

中国的一个主要都市，被日军占领而出现如此屈辱的状况，使革命军官兵大为激愤，颇有人高呼不惜一战；但是蒋总统为了北伐成功，此时必须忍耐，故而禁止开枪，禁止接近日人地区，避免冲突。他在五月二日日记记下：

‘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圣贤所戒。慎之！勉之！’

然而，像这样异常状态，总归不能放置不问。于是，革命军方面乃通过日本派驻济南代理总领事西田畊一向日军提出“撤兵”及“开放商埠通行”的要求；可是福田却表示：“我们是奉日本政府的命令行事，不能为你们的意见所左右。”不过对于撤除铁丝网等防御工事，以免刺激革命军士兵心理一节，同意照办。

日军方面对撤除防御工事，漏夜进行，在三日黎明之前，即行撤完。但实则这还是一个便于挑衅的谋略，因为将防御线撤除之后，反而会增加两军接触的可能性，更容易发生冲突。

当时，在革命军中有日本驻南京武官佐佐木到一上校随行，担任对日军之联络交涉。在他的记述中也认为撤除防御工事是造成两军冲突的一个因素：

“冷静看来，革命军的军纪固然很严，但敌忾心则会超越约束而造成冲突机会。撤去防御工事，诚然是绅士态度，但就实际情况而论，是不宜于这样做的。”

日军蓄意挑衅

‘五月三日上午八点钟，驻济南的日本总领事（西田畊一代理）带同他们的宪兵司令到总司令部来要拜会我（蒋总统）。……

‘他说：“进驻济南的国民革命军，军纪风纪都很好，并且都很严肃，很守秩序，所以已派到济南来的日本军队和宪兵，今天就要撤回去。”

‘日本的宪兵司令接着说：“今天是特地前来辞行的。”

‘日本总领事能言善道，极力称赞革命军是优秀部队；比较之下，张宗昌的军阀部队简直不成体统。接着又说：日本人是怎么样帮助中国革命，……讲了半个钟头言不由衷的话。’（注一）

最初的枪声，在他们辞归之后不到十五分钟便响了起来——是联珠一般的机关枪声。

‘很奇怪！为什么现在这时候会有机关枪声音呢？

‘敌人（张宗昌）不是早已狼狈的逃过德州、离此已有几百里路程吗？敌人是决不可能来反攻的。

‘当时便派侍从副官出去调查，……他回来报告：

‘“我们革命军已和日本军队战斗起来了！并且看见路上有我们两个同胞已被日本军队刺死了！”’

到了这个时候，蒋总统想到刚才来访的日本使者意图，原是要来探明总司令（蒋总统）的确还在城内的总司令部中之后，再行挑衅。

他们的企图，在等待着国民革命军还击应战，便好引以为藉口，一举而攻入城内，予革命军以致命的打击。

◎民国十七年五月三日

“济南惨案”，于此勃发。这是中日两国最初正面发生的军事冲突，也是成为中日两国长期战争序幕的不幸事件。

事件的肇端是这样的：

日军阻我兵士送医

当天早晨，有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组）所属兵士一人生病，经同僚送往中华民国外交部山东交涉署对面的基督教医院（在城外商埠区）治疗，日本兵阻止通行，由于语言不通而发生争执。

虽然就只是这么一点小事，可是对于正在等待着挑衅机会的日军来说，就是很好的藉口。——他们不问情由、不待理论便突然开枪，当场有革命军士兵及夫役各一人中弹毙命，其余的人侥幸逃入医院；日军则将医院包围，用机关枪乱射，一经点燃战火，便在全市展开枪击。

根据日本方面资料——陆军省于五月十三日发表的“济南事件概要”，则是这样的说法：

“三日上午九时半左右，日本人吉房长平在麟祥门外的满洲日报代销所中，有中国兵二、三十人闯入，日本领事馆巡查冈田繁一立即前往该处，反而被中国兵殴打，是故乃由粂川好春中尉率领自天津调来济南的一部分日军赶到现场，中国兵则逸入附近兵营，兵营冈哨首先向日军开枪，日军不得已而还击。以此为开端，中国兵乃在各处同时开始攻击。”

‘当时，我就命令各师长，各自约束部队，无令不许外出，避免与日军冲突。

‘一方面，即派联络参谋去将此意通知日本福田司令官，并要求他同样命令日本军队，免生冲突。现在双方军队第一个紧急处置，就是各自撤回，不好再使冲突扩大起来。

‘但我们派去的人，因为日军……使交通完全断绝，没有方法通过到日军司令部那边去。’（注三）

日军意图扩大事态

当最初的枪声响起之后，还不到十五分钟，日军便将其所占据的城外商埠地区之各交叉路口用沙包铁丝网构筑了防栅。

于是，革命军方面乃试图以电话接头，同时，并命令凡在城外的国民革命军一律离开济南附近。盖城内的革命军有城墙和日军隔开，故而耽心在城外再有和日军冲突的事件发生。由于这个命令的下达，城外革命军便在下午五时之前撤离完毕。

然而，在这个时候，枪声却还是没有停止。

‘我一方面通知福田司令官，说我已经命令我们所有济南城外的军队于下午五时以前一律离开济南；同时，请他也约束日本军队不要再乱放枪炮，伤害我们的人民。

‘当时，福田就回了我一封信，说他很愿意同我们开一个会议，来调查今天冲突的经过。……要我们派员到日本司令部去。

‘这时已将近黄昏，但枪炮之声仍没有停息。这些枪炮，当然是日本军队发射的，因为当时我们在城外的军队已离开济南郊区，而其所有枪声，都在城外。

‘这自然是日本军队要想扩大事态，故意乱放枪炮，使我们人民感受威胁恐慌；而他却说是我们军队发射的，还假意的要求我们派人去开会。

‘我就答覆他（福田）说：

‘“日军应赶紧派人到我们总司令部来开会。……”’（注四）

注一、二、三、四：蒋总统-“誓雪五三国耻”（一九二九五）

日军蛮横狰狞

‘到了（三日）晚上十二点钟（五月四日上午零时），日军司令官福田彦助才有回信来，说他不能派人到我们司令部来，要我们派员到日军司令部去。

‘我（蒋总统）就答覆他：

‘“如果要我派员到日本军司令部去，那就是日军没有诚意；亦就可认定今天不是为了小事冲突，而是日军把我们当成了敌人。这样，我就绝不能派代表到你司令部里。”’（注一）

结果，决定由双方派代表在一个中间地点-津浦铁路办公处进行交涉。

熊式辉拒绝日方条件

国民革命军方面的代表是熊式辉，日军代表则为参谋长黑田周一。

‘熊式辉是日本陆军大学的学生，他同福田司令部的参谋长（黑田）和许多参谋都是同学，他又懂日本话。……可是，会议的时候，不仅是同学的话讲不到，当时那种横蛮侮辱的情形，实非言语所能形容！’（注二）

日军所提出的停战条件是：凡济南商埠（在城外）街道，不许中国官兵通过；胶济路（青岛-济南）、津浦路（天津-济南-浦口）不许中国运兵；中国军队一律退离济南二十里之外。

熊式辉表示：“这是重大问题，须向总司令请示，我不能签字。”避开立即答覆；黑田周一等人则强横地说：

“你不是代表蒋介石来的吗？应该可以马上签字的。”

就在这交涉的时间内，日军的挑衅行为越发加强，甚至用大炮射击过来，每两分钟发射一炮，把革命军的无线电台、交通机关统统破坏。

‘这种炮轰，就是他想威吓我们会议代表和一般官兵，压迫我们军队向南撤退，以达到他们阻碍我们革命军不能越过黄河北进的目的，使革命军不能攻占北京，完成北伐，而使北洋军阀仍能割据河北，在日军保护下坐大。——这样就可使华北永远置于日人操纵之下。’（注三）

熊式辉拒绝签字坚持到底。等到他把日军方面的三个要求带回总司令部时，已经是凌晨五时。

熊式辉的报告是这样的：

“照现在的情形看，日本一定要与我们开战。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决心和他决裂，对抗应战；一条是忍辱一时，避免冲突，避免牺牲，将来再作计较。”

‘熊式辉与日军会议后回报历受日人狰狞威逼，不胜愤慨。余（蒋总统）慰而叹之曰：

‘“日本军人之作风如此，日本国家与人民将不胜其忧患矣！岂天将祸我东亚乎？”’（五月四日日记）

黄郛遭日军软禁

和熊式辉的时间差不多、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也满怀愤慨地回到总司令部。先是黄郛在事件发生之后的不久打来一个电话说：“我在日军司令部，请派汽车来接我”之后，便断了消息，去向不明。

‘我（蒋总统）问黄部长：“你怎么会到日军司令部里去呢？”他说他原来是住在交涉署，当日本军队与我们革命军开始冲突的时候，日军首先就要把交涉署包围起来。为什么要包围交涉署呢？因为日本人与张宗昌订有不能公开的密件藏在交涉署，恐怕我们革命军得到了宣布出来，所以他们先要把交涉署包围起来，要将里面所有一切的公文书抢去。’（注四）

长宗昌和日本军的密约，是在革命军二次北伐刚开始之后，由张方参谋长金寿良前往青岛和日本驻军所签订。其内容是以由日军驱逐国民革命军于山东境外为条件，而将青岛和胶济铁路权利让给日本。

‘黄部长对进入交涉署的一个日军排长说：

‘“我是中国外交部长-黄郛。你们不可这样无礼；你要去告诉你们的司令官，中国外交部长在交涉署，不能派兵到此，对我这样横加侮辱。”

‘于是，这个指挥日军的排长乃一度退去；一会儿回说他们的司令官（福田）要请黄部长去和他讲话。

‘黄部长日本友人很多，他与福田司令官也是认识的，他以为一定可以与他们讲和，所以就与回来的排长一同去了。

‘那里知道，到了日军司令部之后，不仅福田司令官不见面，连什么参谋、副官都没有看见，只把他软禁在一间小房子里面，要他在一个文件上面签字。文件上说：今天中国革命军与日本军队冲突，是中国革命军来抢日本的东西，来打日本人，所以冲突起来的。

‘黄部长当然不答应，便在小房间里坐了一个多小时。’（注五）

就在这个时候，黄郛打电话给蒋总统，请派车到日军司令部去接他；但日军没有得到他的签字，便不放他走。日军的态度是不管怎么样都得要迫使黄郛点头同意。

注一、二、三、四、五：蒋总统-“誓雪五三国耻”（一九二九五）

蔡公时遭惨杀

对于被软禁在日军司令部、但却怎么样也不肯签字的外交部长黄郛，有一个日军班长摆出了恐吓手段。

这个班长拿出一枝手枪放在桌上说：

“除非你不要命，如果要命就要签字。”

“我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你不得这样无礼。”

“晓得你是什么东西！外交部长？我会管你这么多！”

当时，正好有一个曾为革命军在济南地区搜集情报的日本人在场，他和黄郛认识，尽管他是日本人，也对这样的情况看不过去，乃责备这个班长太不礼帽，这个班长却回骂他：

“你小子不是日本人？如果你是日本人，为什么倒帮助中国人？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就是我们日本人与中国人开战的日子；少说废话！”

黄郛不屈服地说：

“即令你杀了我，我也是不能签字的。”

到了这个程度，日本兵虽然凶狠，却也无可奈何，只有继续僵持下去。

在此之前，黄郛在外交部交涉署为调查实情，调停冲突，曾经派遣中国人和日本人各一人为一组的调查员到街上去调查情况，希望能得到客观的判断。

这两个人也刚好到了日军司令部。

其中之一的日本调查员，如获至宝地叫嚷：

“刚才看见一个日本兵被中国兵杀死，你们中国人也看见的。”

中国调查员在被胁迫之下，终于当场写了一个报告，日本兵便强迫黄郛签字，并说：“你不能不签字，你自己所派遣的中国调查员也看见的。”

此时，天色已快黎明，黄郛考虑之后，在报告上批了一个“阅”子。这才得以解除软禁，已经是四日凌晨五时。自事件发生以来，他被扣留于日军司令部，实则已达十八小时之久。

‘以上，是黄部长向我（蒋总统）所讲的情况。他说：

‘“日本人没有当我们中国人是人，这种耻辱与残酷，不仅自己从来没有受过，恐怕在历史上都不曾有过。”……’（注一）

黄郛由于此一原因，在事件之后，便辞卸了外交部长职务，由王正廷继任。黄郛曾经留学日本，被称为是一个理解日本的人；但王正廷则为和美国比较接近的外交官，其后王正廷为济南事件派遣特使前往美、英，要求同情，造成了迫使田中内阁陷于困境的国际情势。

日军闯入交涉署

日军在将外交部长黄郛软禁之后，更闯入交涉署，惨杀了外交特派员蔡公时等外交官十六人。

当双方士兵冲突之初，有日本兵两人在交涉署门前中流弹死亡，日军乃藉口这两个人是被由交涉署发出来的枪弹所打死，而等到夜晚袭击该署。

交涉署的职员，都住宿在署中。三日深夜，有日本兵二十余人捣毁交涉署大门，冲进署内，剪断电灯、电话线，大事搜索。

蔡公时当即表示抗议：“我们是外交官，不带武器，没有搜索的必要。”但日本兵毫不理睬，将在署内所有的职员都捆绑起来，集中在一个房间里。

日军的指挥军官，坐在中间，命令蔡公时跪下，蔡公时断燃拒绝地说：

“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能跪在侵略者的日本军阀面前。”

在中国，被人当面强迫跪下，是最大的屈服与耻辱。

“你是说不愿跪下？还有你更好看的咧！”

日本兵边说边将在蔡公时旁边的职员，拖出来用枪打死。又说：

“怎么样？”

蔡公时仍然拒绝。

于是，他同样地杀死了又一个中国人。再说：

“现在怎么样？会跪下了吧？”

日本兵就是这样地依次将全体杀害。

蔡公时不屈而死

对于坚持到最后剩下他一个人还是挺立着的蔡公时，则用枪托将他的腿骨打断，倒在地下，但他还是毫不怯懦地大骂日本军阀；他们撬开他的嘴，割去了他的舌头，最后再用手枪将他打死。

‘日本人那种野蛮行动，简直就是禽兽；对于我们外交官，竟敢施行那样的暴行，谁亦想不到的。本来各国外交官在作战的时候，照国际公法，谁也不能杀害的；他们明明晓得蔡公时是我们中国的外交特派员，偏偏要这样侮辱他，杀害他；并且还将我们外交部长关在一间房子里，逼他签字。——这次日军暴虐的行为，就是世界各国，也都晓得了他们是一种最野蛮的军阀。’（注二）

据日本方面资料——驻济南总领事馆在事件之后，向日本军方调查所获报告：三日早晨的冲突，有日本兵二人被来自交涉署内的狙击而死亡；因此于下午七时许，由第六中队（连）中队长木庭上尉率领第二小队（班）进入交涉署搜查；在地下室有携带手枪类似便衣队的十六人潜伏，突然发枪射击，日军立即冲进地下室，将其全体射杀或刺杀，尸体埋于建筑物背后的空地。署内是否有外交官，则有欠明了。

注一、二：蒋总统-“誓雪五三国耻”（一九二九五）

看破日军阴谋

日本军的意图，是为了要援助北洋军阀，乃制造出以武力来与国民革命军正式摊牌的局面。

‘五月四日侵晨，日军晓得张宗昌的军队还在德州（在济南东北约一百公里），他们就打电报去，说济南已打起来了，要张宗昌的军队赶紧回到济南来；但张宗昌的军队已被我们完全打垮，至少要一个星期才能集合得起来，如当时他们果有一两团兵力能够集合，他一定是会打回来的，这样，日军当然会掩护他来反击我们济南附近的革命军的。

‘但张宗昌没有一个军队可派，所以日本人只好派飞机来向我总司令部轰炸，那天炸死了我们几个卫士，并伤了几个官长；当时我也正在司令部办公，但没有被他炸中。’（注一）

在这样的战况之下，国民革命军仍然连续派遣代表到日军那边，希望继续致力于通过交涉解决问题。

日军图使缓兵之计

本来，奋起应战并非困难，可是一旦点燃战火，则将不限于济南一地，而会扩展及于华北一带；因此中国统一必将为之延迟，而且多数无辜民众也必然会蒙受祸害。是则此时如接受挑衅，则正中了日本军阀的诡计。

‘到了四日下午，他们日军司令的态度，忽然变过来转为和缓了，福田派了一个高级参谋到我总司令部来，说了一套话：

‘“昨天的事情，是部下冲突，发生了误会，只要你蒋总司令不误会，我们以后一定不再扩大，一定可以设法调解。福田司令官对革命军是很好的，而且很愿意帮助中国革命军。”

‘我就对他说：

‘“双方部下冲突，不算一回事。……不使冲突扩大，我当然十分赞成的。今天只看你们日军士兵是不是再放枪炮掷炸弹了，我愿以此来衡量你们日本军有否诚意。”

‘他当即应允不再放枪炮了。但到五月四日夜晚，日军仍在城外从西关到北关一带，连续不断的放枪、放炮、投掷炸弹。’（注二）

这时，蒋总统已经察觉到日军的软化是一种策略——是要使革命军方面认为其态度已有了变化而对之松弛戒备，好让他们争取时间、等待援军到来的缓兵之计。一旦援军开到，想必就会一鼓作气挑动决战。

根据日本资料——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在事件发生的当天～五月三日，便确定采取派遣援军的强硬方针，当时对福田彦助师团长下令：“决由内地（日本本土）尽快增兵。此际，须采取断然措施。”并作了由内地派遣一个师团及一个铁道队、中国东北派出一个混成旅、朝鲜派出一个航空中队立即前往山东的决定，候田中义一裁决。

可是，田中因为其内阁是处于执政党（政友会）未能在议会占有超过半数席位的情势之下，犹豫不决，迟到八日才做了正式决定。

革命军秘密渡河

四日夜晚，蒋总统秘密下令在城外的大部分革命军渡过黄河北进。这是为了在不待日本援军到来之前部署好对于本来的敌人北洋军阀的追击势态，并避免和日军发生大规模冲突，而且更有必要不让日军察觉到有渡河作战的行动。

‘我则仍旧留驻城内，与日军随时交涉，使他们不致怀疑我本人离开济南。……他们日军的侦探遍布在济南城郊附近，而且他们还有几架飞机，可在空中侦察我军行动，如果我们在白天渡河，那他就晓得他的缓兵之计已被我们识破了，这样当然他就会对我军立即动手，施行打击，更要同我们拚命了。……

‘后来他们到了五日下午，才晓得我们军队主力已渡过黄河，而他的计划已不成功，于是他就一不做二不休，又用飞机大炮来轰击，使我已经渡河的部队遭受很大的死伤。

‘我于当夜又令将留在南岸少数部队全部渡河，但预定留守在城内的部队约四营兵力，还是固守不动。’（注三）

蒋总司令移驻党家庄

‘六日早晨，接到我们留在南岸所有部队都已经于昨夜渡过黄河的报告，我乃决心离开济南城，移驻离城三十里的党家庄。

‘一方面，我还是派人与日军福田司令交涉，并写信责备福田，说昨天我军渡河，日军为何要用大炮飞机来攻击我们，你要赶紧阻止。

‘我就在当日～六日晨八时由南门出城，到十点钟他的侦探就晓得我已离开了济南城。

‘其时，我有一个参谋陈韬派去做代表，五月五日夜间给日军关在司令部里头。到六日十点钟，他还在那里，他住的地方刚巧在福田办公室隔壁一间房子。他听到福田一得到我已经出城的消息，就连声说：“糟了！”并同他的参谋长说：

‘“以后事情很难办了！而且简直没有事情可办了！”

‘我既已出城，他们这个迫为城下之盟的阴谋，就被完全打破了。’（注四）

注一、二、三、四：蒋总统-“誓雪五三国耻”（一九二九五）

誓雪国耻

在济南城撤退的时候，仍有李延年团一团步兵及苏宗辙旅之一部分（计三千人）留在城内。

本来，对于中国领土的济南，当然不能轻易予以放弃；而且如果在济南城内没有中国军队，那么日军就一定会以“济南没有军队维持秩序，所以不得不派兵担负维持秩序的任务”为藉口，而曲解其派兵是正当的。

不过，在被日本大军包围的城内，留下少数兵力，当然是非常危险的事；可是为了保护本国国民与土地，是必须要付出不得已的牺牲的。

像这样，日军如果正式发动攻击来夺取济南，那么，他野蛮横暴的侵略行为就会暴露于全世界。

李延年部坚守济南城

‘我告诉李团长，你至少要固守两天以上；并且一定要等到日军真正向我城内来强行进攻之后，你才可自动的与苏部向泰安方面撤退。我留一架无线电报机给你，随时与我直接通电，听候命令。’（注一）

果然，到了六日夜间，日军就对济南城发动了总攻击。

‘我在离城三十里（约十七公里）的党家庄，日军枪炮的声音，都听得很清楚。想到我们的人民和军队有很多牺牲，十分痛心。’（注二）

当日军开始攻城之际，蒋总统便电令李延年自济南城内撤退；可是他们在敌军重重包围之下，退不出来。

李延年的部队打的很好，一次又一次地将逼近城垣的日军击退，不容许攻入城内。而且，只不过是四个营兵力，便阻遏住了日军一个师的攻势。

战斗持续到五月九日，日军终于放弃进攻，派人到李延年处要求停战；革命军也为避免再事流血，乃让出济南城；不料到了这个时候，日军却又表现出极其卑劣的背信行为。

‘日军言明让东关给我军，保证向党家庄方面安全撤退，李团长才于九日晚与苏部由东门出城；可是不到城外三里路的处所，就被日军的机关枪伏兵在两侧乱射，我军到最后只剩得五百余人回来，其余的人统统死在这次撤退的路上。’（注三）

日本兵更极尽其暴虐之能事——住在济南医院的革命军二十六军伤兵二百余人被全体用机关枪射杀，连卖糖的孩童及短发的少女都被刺死。

李延年等留驻济南的部队，到了十一日早晨全部撤离城内，双方正面决战的情势大致告一结束。

何以雪耻，自强而已。

当时，蒋总统留下了这样的日记：

‘如有一毫人心，其能忘此耻乎！何以雪之，在自强而已。

‘有雪耻之志，而不能暂时容忍，是匹夫之勇也，必不能达成雪耻之任务；余今且暂忍为人所不能忍者耳！’（五月九日）

‘吾躬逢其惨，不能不为我部属痛耳！

‘余自定日课——以后每日六时起床，必作国耻纪念一次，勿间断，以至国耻洗雪净后为止。’（五月十日）

事后据调查济南惨案代表团于六月七日在南京所发表的调查报告，在惨案中死亡之中国人达三千二百五十四人（其中男性二千一百人、女性六十六人、不明者一千零八十八人），负伤者一千四百五十人。

另据日本外务省后来在同年十二月向日本国会第五十六次会议提出报告：日本侨民在济南事件中被杀害者十五人（包括失踪一人在内），负伤者十五人。

在当地的交涉，由于恃武力为后盾的日军态度强横，进行甚为困难。

当济南受到总攻击的七日下午四时，国民政府外交部代理交涉员赵世瑄被约往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的司令部，由参谋长黑田周一交来五项条件，其内容为“对于与事件有关之革命军高级军官应予处刑，禁止反日宣传，革命军须离开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二十里以外”等非分要求，而且限十二小时以内答覆；可见一开始就没有打算会等候到满意的回答，不啻是一个“最后通牒”。

尽管日军如此强横，但革命军方面还是于八日派熊式辉为代表，带去答覆条件，其内容是——对于日军的要求，虽然姑予大致承诺，但也同时提出：日军方面暴虐行为的责任者，也应予以处分，在济南城内及胶济铁路要地仍应许可驻留若干部队等项要求。

福田对于这个回答根本不加考虑，而立即送来一件覆文：

“……至回答期限-本日（八日）上午四时，仍未接获贵总司令之正式回答。因此，本司令官认定贵总司令并无解决事件之诚意，为军事之威信计，不得不采取断然处置，以贯彻要求。”

注一、二、三：蒋总统-“誓雪五三国耻”（一九二九五）

唯有卧薪尝胆

在李延年等部队业已自济南城撤退完毕，战火大致停熄的五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时，蒋总统改派总参议何成浚为代表，再度进行交涉。此时向日方提出的答覆是～～四十军军长贺耀组业予免职，济南周围及胶济铁路二十华里（约十一公里）以内暂不驻兵，反日宣传并已禁止等项。

同时，对于日本方面处分其责任者的要求也未提出，表示最大的忍让。然而，福田彦助却以何成浚没有带委任状为藉口，不承认其为代表，拒与交涉。

‘……是可忍，熟不可忍？……中日两国之怨仇因此深结于人民心中而不可拔，东亚和平之基础亦从此动摇。……’

五月十二日，蒋总统写下了这样的日记：

‘据报何成浚晤见福田，福田态度仍甚强横，不可理喻，有必欲解散我第二、第三、第四7[55]1599各军团及对我三总指挥必欲处以严刑之要求云。是可忍，熟不可忍？攻破我之济南，在彼以为得意，不知中日两国之怨仇因此深结于人民心中而不可拔，东亚和平之基础亦从此动摇。是日本军阀之祸国殃民，乃更甚于中国之军阀矣！毒蛇猛兽豢养不除，必至反噬其主人，惜乎日本民众犹未能醒悟耳！大为中日两国民众之前途长太息也！’

情况如此，已不可能寄望于由两军在当地解决问题。因此，蒋总统乃向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报告，请循外交途径交涉，并决心继续北伐。

此际，国民政府已于五月十日致电国际联盟，要求调查事件真象，“济南惨案”大受国际注目。尤其是美国，且于十五日在下院提出“由国务卿出面调停”的议案。

日本政府鉴于对国际舆论不能再事漠视，也于十四日决定方针——不扩大战事，并循外交交涉收拾事态。遂即派遣参谋本部作战部长松井石根中将来到济南，与张群及王正廷之间进行交涉。但日本方面要求蒋总司令陈谢，中国方面要求赔偿损害，意见对立，极难获得进展。

张群回忆交涉经过

张群在当时担任中日之间的联系任务，颇为活跃。

现在据他回忆济南事件前后情况如左：

“在上一年，蒋总司令和田中义一见面的时候，总司令已经从田中的态度察觉到日本是反对北伐的。

“为了北伐进军，势必非经过济南不可。由于日本在先已经有过第一次出兵山东之举，故而总司令非常耽心会发生冲突。

“现在是可以说出来了——当事件发生的不久之前，我们曾经通过日本友人要求日军由济南移往青岛，由我方负担此项军费。因为济南敌军（张宗昌部队）业已向北撤退，只要日军也不在那里驻留，则无须流一滴血；可是日军却拒绝了这个提议。

“总司令乃立即派我前往东京，而我则是在抵达东京的几个小时之前得知济南事件发生。

“到达东京之后，立即会到友人松井石根及有田八郎（外务省亚洲局长），倾谈达于深夜。

“日本军部的主张极其激烈——有‘将革命军彻底打垮’、‘要他们投降’、‘要蒋介石自己来交涉’等等意见。我觉得像这样的情况，那里还能够指望由两国军方解决问题。

“翌日～五日，见到田中义一。向他提出：不要任凭在当地的军队折冲，应该移付外交交涉。可是未能为他所接受。

“不过，稍后田中的方针有了变化，通知我决定派遣松井石根前往当地。于是，我也就迅即归国，代表国民政府和松井进行交涉。

“到达济南之后的松井，起初通知我说在济南交涉，要我前往，我予以拒绝。经过折冲之后，决定在济南南方的党家庄会谈。

“此时，党家庄已在日军占领之下，我一个人徒手前往，沿途见到日军装甲列车行驶在铁路线上，大炮配置在各处，持枪士兵态度都很亢奋，——老实说：我当时的心情是不打算会生还的。

“虽然说是外交交涉，但却是在那样迁就一方面的状态之下开始进行。”

交涉再三发生变化，直到由外交部长王正廷和日本公使芳泽谦吉终于签订协定，则是在翌年三月二十八日。

协定内容没有追究任何一方面的军事责任，而只决定了（一）自签订日起两个月内，日军在山东的驻军全部撤退。（二）双方损害，共同组织调查委员会另行调查等项。

中国外交官蔡公时之被残杀，不再追究，赔偿损失问题实际也予以搁置。——这是由于中国方面片面让步而告终的。

民心一致誓雪国耻

对于这样的让步，中国国内自难免有人提出责难。但在面临统一全国大业之际，除了忍受眼前的耻辱，效法卧薪尝胆历史而外，别无善策；于是，自此之后，“誓雪国耻”、“抵御外侮”、“保障独立自由”的声浪，充满了全国每一角落，民心乃一致趋向于国家统一的目标。

遗憾的是：这个事件在中国，对于民众的反日情势，发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日本，则敝开了军阀专横干政的道路。

同时，更是在日本昭和时代将中日关系搅拌上火药、涂满了鲜血的最初一个里程碑。

日亟图控制东北

国民革命军虽然受到日军的干涉，在济南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但是北伐则仍然继续进行，并未因而有丝毫弛缓。

革命军四路并进

渡过黄河北向进击的第一集团军（蒋总统兼总司令），于五月十三日占领平原；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进展到德州；由山西方面出击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则于击破娘子关之后，进入河北省，拿下了石家庄与正定；第四集团军也挥师北上，加入进攻。

此时，京、津地区，已经在指顾之间，只须等各军配合行动，并力攻向北京。

在发动总攻击之前，蒋总统为视察战况而于五月十九日由徐州前往郑州，与冯玉祥及白崇禧（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会面；继之，更于五月三十日抵达石家庄，与阎锡山会谈。

在被居于压倒优势的革命军自西、南两方面形成大包围的北京，自上年六月组织军政府、自称大元帅、对北洋军阀发号施令的张作霖，仍然坚持不肯离开。

可是，在国民革命军紧迫不舍之下，张作霖已经失去了过去的威势，曾经一时号称百万的北洋军阀部队，现在锐减到四十万人，而且内部意见纷歧，不啻“风前之烛”。

日迫张作霖签密约

不过，日本政府却对处于如此趋势的张作霖还是未肯放弃，其因素，则为垂涎于东北地区建筑铁路权（即所谓满蒙五路）的巨大利权。

关于“满蒙五路”问题，上年十月新任“满铁”（南满铁路）总裁的山本条太郎承受田中内阁的意向到北京访问张作霖，正式提出要求；进入一九二八年便很快地与张作霖成立了密约——由满铁承揽五路建筑，其费用则作为借款。

在五路之中，日本特别重视由敦化接往图门江的路线，这是日本多年来梦寐以求其完成的“吉会铁路”（吉林-会宁）之尚未施工部分。这段路线一旦完成，则可使吉长、吉会两条路线接通南满铁路的安奉线而联系上朝鲜的铁路；如是，则日本便可伸展出两条动脉直达于东北地区。

至于在中国方面说来，如果咽下这个要求，则是具有越发促进“满蒙殖民地化”的意义。故而即使是在张作霖支配之下的北京政府交通部官员们，也毕竟有不甘心做日本工具的人，他们背弃张作霖，向之提出辞呈，甚至弃职而去。

眼看着张作霖的权势已在日渐下降，日本乃急于要将密约正式签订，于是乃向张作霖增加压力：“倘使不将有关五路权利给予日本，则奉军如退回东北，将不许通过南满铁路。”张作霖终于屈服，遂于五月十三日至十五日之间签订了敦化-图门江、长春-大赉等四条路线的约定。

日本田中内阁的意图，是要从张作霖的手里像这样地夺取各种利权之后，把东北自中国割离，使之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最迅捷的道路，就是利用张作霖在东北所培植的权势，牵着他的鼻子控制东北。

为此，日本乃希望张作霖的奉军在还没有和国民革命军接战而受到损伤的时候，便迅速退出北京，撤回东北，巩固防务，以遏阻北伐影响及于东北。

于是，田中义一乃首先派遣曾任陆军大臣的山梨半造为特使，前往北京，劝告张作霖返回7[63]1607东北。可是张作霖却回堵他说：“我是为了日本而特地来到北京，和国民革命军作战的；事到如今，要我退回去，这是什么话？”

日本采取强硬手段

日本政府终于拿出了强硬手段～～五月十八日向张作霖和国民政府两方面提出“觉书”（备忘录）如左：

“战事如进展至京、津，其祸乱或及于满洲之时，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将不得已而采取适当并且有效之措置。”

所谓适当而有效措置，就是日本内阁在两天之前的阁议中所通过的“维持满洲地方治安的有关措置”，其内容为：“（一）在南军（北伐军）尚未到达京、津地区之前，奉军向东北撤退，日本不加干涉；但对于南军进入东北，则予以阻止。（二）南北两军如在京津地区交战，或显然在接战状态之下，北军向东北撤退，则将南北两军解除武装。”暗示如果北伐军越过山海关进入东北，则有行使武力干涉之意。

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携带此一觉书和张作霖会晤，劝说早日撤回；但张作霖表示：“胜败在于天意”不肯接受。

日本军部的狂暴行动，自此开始公然无忌，以扩大对于东北军事控制为目标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竟不待其中央指示，便在着手实行所谓“适当并且有效的措置”。

“关东军”的狂妄

五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发布了极机密的动员令，着分驻东北各地的日军调集奉天（沈阳）。其目的，是要向由山海关进入东北境内的冲要之地-锦州出兵。本来，关东军出动的范围，只是限于“南满洲铁路”附属地区，而锦州则不在其范围之内。可是现在关东军却以采取“适当并且有效措置”为藉口，打算在锦州将凡是进入东北的军队——不问其为奉军或国民革命军，一律解除武装。

如上所述日本的一些活动，不仅引起中国、同时也引起了国际间的责难。

不容损我领土主权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立即指出——“干涉中国内政，且于国际公法上列国相互尊重领土主权之原则显有违背，国民政府万难承认。”对于其觉书，予以反驳。

就连张作霖也发出了——“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的抗议声明。

并且美国国务卿开洛格也在五月十九日招待记者时言明：“东北行政主权属于中国。”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乃于三十一日制止关东军向锦州出动。

根据日本资料——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于十八日下令第十四师团（师团长宫地久寿马）调集奉天之后，向锦州推进。

可是，这个命令只是出于村冈的独断，但却被承田中义一之命的陆军参谋总长铃木庄六所一度制止。

因为向出动范围以外地区出兵，必须经天皇裁断之后，发出“奉敕命令”才能有效。此时“奉敕命令”尚未颁发，不过陆军当局预料必会发下，故而虽已奉命制止，但却仍然于二十一日预为准备。

然而，“奉敕命令”则终未见下达。

业已准备完毕的关东军，因而大为失望。他们对其中央政治、外交的不满，已经到了很难安顿的地步。

不辞惹起世界战争

军方不满的背景，是产生于一九二七年的东方会议。在会议中，田中义一表明对华积极政策之际，关东军方面相信这就是推动武力政策的开始。

当时，与会的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村冈长太郎前任）曾向田中义一追问：“实行如此大方针，就不得不有面对导发世界战争的决断，请问有这样的决心和准备吗？”即席得到了田中“有此决心”的回答。于是，关东军则认为是秉承有自，而确定了即使惹起世界战争，也是在所不辞的态度。

谁知到了此时，田中正指使山本条太郎和张作霖之间进行满蒙五路的交涉，是故在田中立场，对于军方所主张的武力政策，当然便不宜轻率发动。

然而，关东军却认为这就是田中对华政策已有软化的倾向。

譬如说：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便曾在他的日记中流露出不满田中决定的词意：“在我认为，像这样耍政治的现首相，莫如更易为是。”（六月一日）“没有胆识的外交，实在糟糕。”（六月三日）像这样的一些不满情绪，乃更加速了关东军突出激化的行动。

关东军过激分子所采取的直接行动，就是炸死长作霖的“皇姑屯暗杀事件”。

因为在关东军中，颇有耽心张作霖的势力已经过于强大而渐与日本疏远的看法。这从日本再三劝告他退回东北，他却置之不理的情况，便可以了解他已经养成了日本无法继续操纵他为其傀儡的力量。是故关东军的过激分子乃筹计到把他干掉，重行扶植一个比较听话的后继者。

再就一般情势而论，如果由于杀了张作霖而导致东北局面陷于混乱，则更其有利。盖乘其混乱而出动关东军，造成占领东北的状态，也并非不可能之事。

至于张作霖方面，虽然拒绝了日本的撤退劝告，但对国民革命军的战况则日益不利，他的长子张学良和心腹干部总参议杨宇霆都已渐有撤退为宜的倾向。

五月三十日，孙传芳竟至放弃了距离北京一百四十公里的要冲-保定；于是张作霖也就不得不为之舍弃稳坐京师的念头，而于当天在大元帅府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总退却，亲自返回奉天。

张作霖离平返奉

六月一日，张作霖举行告别茶会招待驻北京外交团，即席表明撤离北京，并强调是

本于中国人的立场，为衡虑大局而采取之行动；

同时更神气十足地说：“只是大元帅府由北京迁往奉天，不管怎么样，

我姓张的不会卖国，也不怕死。”

六月三日上午一时，张作霖着大元帅戎装自他的私邸-北京顺承王府出发，到前门东站登上开往奉天的专车；一时十五分，列车在庄重的军乐声中徐徐出站，天际满月皎然，照遍大地。

同行者，有北京政府国务总理潘复和莫德惠、刘哲等主要阁僚，以及日本军事顾问町野武马上校、仪我诚也少校等人。

张作霖当离开北京之际，曾经得到日本人有阴谋不利于他的情报，町野为祛除他的疑心，乃特地要求同行，不过町野却在经过天津时下车，而仪我则随往奉天。

张作霖遭日炸毙

当张作霖由北京返回奉天的列车途次山海关时，黑龙江督办吴俊陛登专车迎迓，随同返回奉天。

列车行驶一个昼夜之后，于六月四日曙光已现的清晨，进入奉天市界。刚过城外西方京奉铁路皇姑屯站，张作霖在此即将抵达省垣之际，踱进展望车，舒徐地吞吐着晨起怡神的卷烟。

列车遭遇猛烈爆炸

五时二十三分，列车正要钻过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的立体交叉点。

突然响起猛烈震憾奉天全市的爆炸声——张作霖所乘展望车只有车轮与车床还剩下原形，车厢四散纷飞，接在后面的餐车与卧车也都被爆炸燃烧成为废铁。

张作霖当即被护送到奉天城内。奉天省长臧式毅为防混乱扩大，仅对外发表被炸负伤；但实则是在上午十时死亡，得年五十五岁。

吴俊升也立即死亡。日本顾问仪我诚也被爆风将衣服吹裂，但却只有足踝受了微伤。

在爆炸现场的附近，有被刺杀的两个中国人尸体，手里握着苏联制的炸弹。

事件发生之后，日本关东军立即发表——“两个中国人的行动可疑，经予刺杀；相信是南军便衣队所为。”

可是，爆炸物是一百二十公斤左右的黄色炸药，被埋设在南满铁路的桥脚下。很多人根据直觉判断，认为像这样规模的爆炸装置，即使是有高度工兵技术的爆破者，其装置工作也得六小时左右，就连日本人也恐怕只有关东军才会是具有如此能耐的真正凶手。

蒋总统是于当天在国民革命军的石家庄司令部得到消息。在六月五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

‘作夜闻张作霖在奉天皇姑屯为日本关东军埋设地雷炸伤毙命。今报载：奉疑日人主使；日人则妄谓我方便衣队所为云。日人之阴狠如此，吾东北国防如何始能巩固也？’

然而，虽则是关东军，也毕竟不能把阴谋隐瞒到底。

可疑弃尸迅即查明

在爆炸现场附近被刺的两个中国人身分，立即被调查出来。他们是被奉天失业军人刘戴明收罗来的有吗啡瘾的游民；而刘戴明则是受到为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所授意的某日本浪人之所指使。刘戴明在六月三日的早晨，带了三个游民到开设在满铁附属地区之内的“福开泉”浴堂，剃头、洗澡，换上衣服，其中有一个姓王的感到害怕，乃在入浴时溜走，剩下的两个就是被刺杀而暴尸原野的人。

姓王的在爆炸事件发生之后，便跑到张学良的部下那里，说出了以上情况。

另一方面，“福开泉”浴堂的老板也因为好奇而去看看两个中国人的尸首，发现就是前一天来浴堂洗澡的客人，为之一惊，便急忙跑到在奉天的日军宪兵队去报告。

两个死者手握的俄制炸弹，则被日本的在野党-民政党查出是日本的奉天宪兵队长在奉天一家旧货店所购买的。至此，已经可以明白推断得出：在事件背后，有着关东军的存在。

二次大战后真相大白

虽然，在当时事件的全部真相是被不明不白地埋葬掉了，可是以上一些推断的正确性，则到了第二次大战之后，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调查审判、乃至日本方面所公布的及新发现的一些资料，得到了明确的证实。

现在就依据这些资料，再稍稍追叙一下事件的梗概。

当时，意图在东北地区掌握军事支配权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因对于没有奉到向锦州出兵的“奉敕命令”而感到不满，乃秘密计划在北京暗杀张作霖，命令派驻北京日军司令部服务的竹下义晴少校执行；当时风闻此事的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则认为北京众目睽睽，犯行容易暴露，故而加以制止，并自告奋勇，另想办法——以张作霖返回东北时的列车为目标，将他炸死。

河本起初所考虑的爆炸地点，是在奉天西方四十公里的巨流河铁桥，但鉴于中国方面戒备森严，因而重新选定在皇姑屯。皇姑屯是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立体交叉之处，张作霖所行经的京奉铁路，虽是属于中国方面的警备范围，但南满铁路则是日本的辖区，所以这里是装置炸弹作业最方便的地方。

在现场直接指挥爆破作业的人，是奉天独立守备队的中队长东宫铁男上尉。

东宫铁男调用当时派来奉天的“朝鲜军”（日军驻朝鲜部队）工兵第二十大队藤井贞寿中尉等专门技术工兵，于六月三日夜间将二百个方形炸药装置在南满铁路的桥脚下，而张作霖所乘京奉列车则必须经过这个桥脚穿过南满铁路的下面，故而可以计算其通过的时间从上面爆炸。

通电起爆的电线，引伸到爆炸起点南边约二百公尺之处，等候着列车通过。并且事先将两个中国人刺杀，陈尸现场，使持有炸弹及伪造的文书等件，装成是犯人的伙伴。

为了要做到一次爆炸就可以炸准张作霖，所以部署的非常周到。——盖因要人在乘坐列车旅行时，常常会加速或减速，故意使车辆的行程不能准时；或是在途中将列车的次序调动，使人不容易发觉所乘车辆在那一节，故而对于张作霖的专车则一直在加以秘密监视中。

日已难控制军阀

监视的部署，是这样的：

首先，由陆军少校竹下义晴在北京确实认明张作霖的专车（七辆编列）出发。竹下的报告并且指出——张作霖第五夫人的专车出发在先，特别叮嘱不要弄错。同样地，在山海关等地也有人监视，都随时向准备爆炸的现场传递消息。

在沿途各个监视地点之中，以对于奉天西方约五十公里的新民站特别仔细。因为车过新民之后到奉天之间，所有各站的月台都比较短，无法调动列车各车厢的顺序。——这也就是说：对于张作霖所乘车厢的位置，在这里可以作最后的认定。

爆破集团就是这样地设下了天罗地网，等待着张作霖通过，便按动电钮。

因此一事件之发生而受到了最大冲击的，却并非别人，而是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和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他们在以张作霖为交涉对手，差不多刚完成了被称为悬案的所谓“满蒙五路”协定的此刻，正打算利用张作霖使东北脱离中国的活动更趋于积极化。虽则张作霖自一九二七年以来对于日本的抗拒态度已逐渐增强，但现在则是不战而败，放弃华北、逃归东北，故而日本估量对于他的操纵会比以往更加容易。

据宇垣一成（当时的前任陆军大臣）的记述中提到，宇垣曾经前往东京青山的田中义一私邸拜访田中，协商善后之策，当时田中很慨叹地一再表示：“怎么会有这么许多糊涂虫？真是儿女不知父母心！”

又据山本条太郎（当时南满铁道总裁）传记，山本也曾表示：“我来到满洲之后所计划的，和今后所要作的，这么一来，全部都归于泡影了！田中内阁想必不久也就会土崩瓦解了！”

日未能严处肇事军人

张作霖被炸的“皇姑屯事件”，在日本爆发了很大的政潮。

对于“是关东军干出来的！”这类嫌疑困惑的议论不能置之不问的日本政府，乃于六月底令召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回到东京，询问情况。河本巧言掩饰，一时认为“与关东军无关”。可是，事件真相日渐显露出来，遂派遣宪兵司令官峰幸松前往奉天，再度调查，结果断定是出于河本等人的犯行。

田中义一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奏呈天皇，决定举行军法会议，严厉栽处与犯行有关的军人。

上奏之后，田中立即命令陆军大臣白川义则遵办。然而军部父母则认为：“如果这样做，会对军方领导发生不良影响，并且更会招致在国际间的不利后果。”表示猛烈反对，以致军法会议未能开成。

后来在二次大战之后的远东军事法庭中，曾任当时田中内阁海军大臣的冈田启介及驻北京武官田中隆吉二人有如下的证言：

据田中作证——炸死张作霖事件，是出于河本独断，关东军司令及参谋长等均毫未与闻其事。爆炸之后，河本曾打算对关东军发布紧急集合命令，与张作霖护卫部队交战，但为参谋长斋藤恒发令所阻止。后来，河本说过：“如果紧急集合见诸实行，则满洲事变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河本的意图，不仅在于炸死张作霖，而是要使事件更加扩大。

又据冈田口供书——关于事件之后的处分问题，陆军大臣白川义则虽有遵循田中命令之意，但在陆军省内有军务局长杉山元和参谋总长金谷范三都表示反对，以致田中无法贯彻决定，从这一点，就可以证明关东军比日本政府的力量更强，其势力足以影响到参谋本部。

及于翌年（一九二九年）元月，日本的在野党-民政党在众议院提出“满洲某重大事件”追究田中内阁对于炸死张作霖的责任。

同时，西园寺公望等元老也提出了肃正军纪的强烈要求。

直到事件发生之后已经过了一年多的七月一日，陆军省才发表了处分情形如左：

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编入预备役。

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停职。

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重谨慎（即禁止执行职务闭门思过）。

满洲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水野竹三重谨慎。

于是田中乃将上列处分上奏天皇。天皇对于只作行政处分而敷衍了事表示不满，因之，田中内阁乃于七月二日总辞。

关于田中此次上奏情形，在冈田启介的回忆录中有如下的记述：

因为田中在先曾经向天皇陈明要加以严重处分，故而此次上奏处分结果时，天皇在听取过程中，脸色渐变，当面问到：“这不是和前次所谈的有所矛盾吗？”田中惶恐地答称：“关于这个问题，容俟一一说明……”天皇很生气地站起来说：“没有再听说明的必要。”……

田中死去遗祸无穷

田中义一在辞职不到三个月之后的九月二十九日，以狭心症死于其在东京的妾侍家中。

但是，他的侵略中国奢望，其后则为日本军阀所继承。而关东军在“满蒙政策”方面的发言权，更以此一事件为其契机而越发强化，一路横冲直闯地奔向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

此外，在中国方面，也因张作霖被炸死事件而掀起了很大的波澜。

张学良化装返奉天

张作霖的长男张学良于事件当天的六月四日、在北京得知其父死亡的消息，但还不明白真相如何，不过凭直感判断一定是出于日本人的谋害。日本人既已下了张作霖的毒手，当然对张学良也不免会有阴谋企图。张学良有鉴于此，虽然接到奉天督署打来“盼立即返奉”的电报，但并未敢贸然行动。

张学良首先命令所属鲍毓麟旅留在北京，维持治安，等候革命军进驻，再行撤退。

然后，他本人则化装为炊事兵，由北京出发；在途中通过有日本人监视的某车站时，非常谨慎地下车步行绕道而过，最后换乘汽车，秘密进入奉天。

北伐成功

奉天方面对于张作霖之死秘不发丧，故而由张学良模仿他父亲的签名，发表捏造的命令，着他代理职务。

于是，张学良便以虚岁二十八岁的青年，就任他父亲所领导的奉军代理统帅地位，并急调嫡系部队返回奉天。

此时，在天津一带河北省境唯赖奉军支援的直鲁军，乃立即面临了总崩溃的境地。张宗昌、褚玉璞急忙向国民革命军第三集体军总司令阎锡山乞降，但被拒绝；走投无路的张宗昌乃胁迫各国领事：“大军绝食，难以保障各国侨民安全。”

革命军进入北京城

国民政府立即于六月四日发表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负责维持治安。

京津卫戍总司令的人选，还有一位冯玉祥，但是他的信用稍稍值得顾虑。

阎锡山所率领之第三集团军的先遣部队，于六日上午抵达北京郊外，而留驻北京的奉军鲍毓麟旅已先在当天早晨九时撤出，市内各处随风飘扬着青天白日旗。

北京终于在不曾流血的情况之下，为革命军所光复。

国民革命军正式入城，是在六月八日。革命军入城路线的彰仪门大街一带，自早晨九时起就挤满了手持青天白日国旗的欢迎民众，维持市内治安的“京师临时治安会”和总工会的代表们分乘汽车四辆出城欢迎，市党部及各学校的代表也都拿着革命军旗早在城外等候，异口同声地高呼“欢迎武装同志！”

上午十时，第三集团军右路军追击队指挥官孙楚乘车由宣武门进入城内；第三十二团、二十八团．二十一团各部队随之陆续入城。

下午，总指挥商震，第七军军长张荫梧及随员等赓续入城，立即在原北京政府参谋部设立警备司令部，任命张荫梧为北京警备总司令。

维持市内治安，是最重要的先决条件。

第一个布告是——保护外侨生命财产；保护敌军（北洋军）眷属；如有收藏败兵军械者，应即呈报。并禁止革命军擅入民间搜查。

十一日下午，京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偕同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由保定来到北京。而留在天津仍然继续抵抗的张宗昌残部徐源泉部队，也于十二日向革命军投诚。至此，京津地区乃完全归于革命军掌握。

蒋总司令功成请辞未准

为统一全国的北伐任务，除东北地区之外，看来业已实际完成。

‘北伐的成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百年来在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重重压迫之下，翻转身来，写成这一页悲痛而壮烈的历史；所以人心的振作，民气的激昂，政治的统一，军事的建立，亦具有初步的基础。’（注）

蒋总统在得知革命军确已进入北京城的六月九日，便向国民政府提出了请辞军职的呈文：

‘……中正本年二月复职之际，经剀切陈明，一俟北伐完成，即当正式辞职，以谢去年弃职引退之罪，息壤在彼。……恳予明令俯准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解除，并准辞去军事委7[84]1628员会主席。……’

然而，此事并未获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于十一日决议——“慰留”。加以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也一致对于辞职之举表示反对，故而不得不打消辞意。

国民政府对内外宣言

民国十七年六月十二日，国民政府发表“对内宣言”。其要点为：励行法治；澄清吏治；肃清盗匪；蠲免军阀所课征之苛税；裁减兵额安置士兵就业等项。号召各部官吏、部队指挥官、各省市政府将在北伐军事时期的一些紊乱制度加以整顿改革，着手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

十五日，继之发表“对外宣言”，表明北伐完成后的外交政策如左：

“中国之统一，因全国人民之奋斗与牺牲，正告完成。……国民政府正准备实践其对中国民众之约言，从事于一切整顿与建设工作。然不平等条约所加于中国之诸种束缚，尚未解除，……国民政府兹所不能已于郑重声言者——今后另订新约，务以完全平等与互相尊重主权为宗旨。……

“不幸，诸友邦中，仍不免有过信武力之效能者，甚至认为外侨所能居住贸易之地，即海外军力所能达到停驻之境。此种态度，如不改变，将使中国政府愈不敢开放内地。国民政府用特敦告友邦，务将其一切在华军舰、军队立即撤退。……

“国民政府对于立即撤退山东日军，以免发生其他纠纷一层，特再严重主张。……”

北京正式更名北平

二十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直隶省改称“河北省”，北京更名“北平”。自清朝将近三百年来所建立的北方国都，从此之后，即被称为“北平”。

按“北平”名称，是直到明朝初期所沿用的古名。一九三七年十月，日军将之改称“北京”。一九四九年，落入中共之手，又被称为“北京”；但在中华民国的正式名称，仍为北平。

注：蒋总统-“中国之命运”（一九四三三）

致祭总理之灵

蒋总统于六月二十六日（一九二八年）由南京出发，途中，先后受到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迎接；七月三日上午七时半，在盛大欢迎中进入北平。到陆军部更衣之后，便立即专诣北平郊外香山碧云寺恭谒国父孙先生灵寝。

孙先生于一九二五年齎志病逝北平之后，遗灵暂厝于碧云寺。蒋总统此刻的心情，最重要的是以孙先生期望完成的统一全国宏愿之实现，告慰于他的灵前。在当天的日记中，留有如下记述：

俯首灵堂百感纷集

‘礼谒总理之灵，含泪言曰：中正不忍骤见吾师遗体，故暂不敢启棺，容候正式祭告时瞻依；惟愿我师之灵之安也！中正此刻，万感交集，不知所怀，惟有忍泪默祷而已。

‘礼谒毕，即留居寺之含青舍，不忍远离我师之灵体也。’

祭典于七月六日举行。是日，蒋总统为主祭，未明起床，澄心静虑，迎接曙光。

上午八时二十分，偕同襄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列集灵堂，祭典开始，奏哀乐、主祭者献花，行三鞠躬礼；继之，由商震代读祭文：

‘维中华民国十七年七月六日，国民革命军既奠北平，弟子蒋中正谨诣香山碧云寺，致祭我总理孙先生之灵曰：溯自我总理之溘逝，于今已三年余矣！中正昔侍总理，亲承提命之殷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诲拳拳，所以期望于中正者，原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

‘乃荏苒岁时，迄于今日，始得克服旧部，展谒遗体，俯首灵堂，不自知百感之纷集也。

‘三年之间，本党基础濒于危亡者，先后五次；革命势力几于覆败者，凡十五次；而军事危机，尚不与焉。每当艰危困厄之来，中正唯一秉遗教，追随先进，勉图靖献，盘根错节，更历已多。溯乎本年（二月）中央第四次全会，方克安渡艰难，重视团结。……中正……今后有生之日……当竭其全力……灵爽匪遥，唯昭鉴愚诚而默相之！’

七月六日的日记是这样的：

‘读毕祭文，为之俯伏恸哭者久之。全堂亦无不泪下。回含青舍，谓夫人曰：方祭告总理时，闻哀乐之声一作，虽欲强抑悲怀，仍泪满襟臆，体力几不支矣！及瞻仰遗容，哀痛更不能自胜，呜呼！悲哉！三年有半之岁月，中正所受之冤屈谗谤，直不知何自而可声诉也。

‘言次，不禁又泪下如雨。’

祭灵之后，仍然留在北平。

当北平、天津业已归于掌握的时刻，最后剩下来的还有东北地区。蒋总统曾经于一九一四年奉孙先生之命前往东北考察革命情势，当时所带回来的结论是：东北不能成为革命的策源地，应该是革命的归着地。必须东北归属于青天白日旗帜之下，中国才会完成全国统一。

东三省决归顺中央

此时，继承其父余荫的张学良，已于六月二十日被奉天议会推举为奉天督办；七月四日，复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大体上已经掌握了东北的实权。

张学良和乃父并不相同，他很快地便对三民主义表示敬意，而且对于归顺中央也有积极的表现。当蒋总统一到北平之后，张学良所派遣的代表王树翰、邢士廉等四人便由奉天前来。

奉天代表提出：“（一）由东三省派遣青年一百人赴南京学习国民党党务之后，开始东三省的党部工作；（二）所有曾在东三省任职者之生命财产，均予保护。”等条件，蒋总统即予以接受。

‘东三省为我重要国防疆地，乃日本势力侵入已久，吾处置方法，非慎重周详不可；否则，东亚战祸之导火线如一爆发，将不可收拾矣！总理所期待之和平统一，吾必以至诚力促奉方将领觉悟，欣然而来归也。’（七月十五日日记）

当时，张学良的代表向蒋总统表示出诚心诚意服从中央与国民政府的态度。

‘中正当答之曰：“能精诚服从本党、统一中国，甚佳；如系勉强作形式统一，不如待瓜熟蒂落。”彼表示绝无二心。’（注）

注：蒋总统-“在中央常会报告北上经过”（一九二八七）

日威逼张学良

东北易帜（更悬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张学良归顺中央，决定在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四日由张学良本人正式发表。

但是，所成问题的，是日本方面的动向。

‘汉卿（张学良字）似属诚意，东（三）省和平统一可无问题，但日本对之必更忌恶，汉卿为人未经危难，意志薄弱，恐不能当大任、持危局耳！然余（蒋总统）必力为扶植之也。’

上面这几句话，是蒋总统在东北预定发表易帜通电之期即将到来的二十日下午，与同志们协商有关东北问题，而表达出来的悬念。

的确，日本在炸死张作霖之后，对于东北的压力，正在日益加强中。

日图操纵张学良

日本军阀所悉心策划的，是操纵张学良和南京国民政府对立，以谋东北分离。

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于六月二十五、六两日连续二度电令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劝告张学7[90]1634良不得与南京方面妥协。林久治郎遵照指示数次与张学良会面劝以“在这个时际，匆遽采取迎合南方的态度，是毫无必要的；应该维持现状，保境安民，以观望形势。”而且在一再的劝告之后，旋即转变为近于警告的高压态度；可是张学良则未予接受。

根据日本方面资料——在张学良方面，最初有以杨宇霆为中心的“易帜派”和以王树翰为中心的“对日协调派”，意见纷歧；张学良本人为谋统一内部，颇为苦恼。

可是，日本方面所表现的强硬态度，反而增长了对日反感，故而到了七月中旬，“易帜派”的意见乃形成了大势所趋的局面。

林久治郎考虑到情势如此，遂有抑制田中政策之意，故而向田中义一呈报：“为确保张学良在满蒙的地位，舍任其悬挂青天白日旗之外，别无办法；如果对于奉天和南京的妥协再干涉下去，甚至会有刺激第三国之虞。”

然而，日本军部的意见，则颇为强硬，连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以及驻北京武官建川美次也分别向陆军省报告：“东北脱离中国本部的时机业已成熟。”有不惜武力干涉的言外之意。

田中义一的信函

此时，田中义一对于张学良的高压外交，越发加强，他着林久治郎于七月十九日以如下内容的一封信转达张学良：

“一、南京政府含有共产色彩，且其地位尚未稳定，东北殊无与其联系之必要。

“二、如南京政府以武力压迫东北，日本愿不惜牺牲，尽力相助。

“三、如东北财政发生困难，日本之银行愿予充分接济。”

据日本方面资料——田中义一在嘱林久治郎转送书信之前，曾有电报作如下之指示：

“由于我方一向对张学良过于表示善意态度，已使其怀有日本不难对付之念；是故，此际有必要表示看对方的态度如何，日本也应表示其强硬的一面。……更须充分说明就东三省而论，最有必要的是保境安民，观望形势。”

这封书信，是倚仗金钱和武力为背景，把东北当作是日本的“保护领土”来处理。

于是，张学良乃反诘林久治郎：“是否可将日本不愿中国统一的意见、或东北不能易帜是由于日本干涉的情形向南京报告？”对于这个问题，林久治郎为之无辞以答。

接着，张学良又曾表示：“东三省政治一以民意为决定。如果人民主张改制，我是难以抗拒的。”不过，田中的书信毕竟还是压力颇大，以致张学良的决心逐渐为之游移不定。

蒋总统指示不可屈服

这些动态很快地传到了北平。

‘二十一日晚间，奉天代表来说：“因日本驻奉领事正式用书面劝告：（一）东三省应保境安民；（二）东三省不宜实行三民主义。”云云。中正则告之曰：“此宜自己觉悟，外人干涉中国内政，勿再为所愚。将来正式与日本交涉时，本诸正义，外交决不失败。俟中央决定方针后，再行通知可也。”’（注）

蒋总统接着更向奉天代表剀切指示：

‘应催张学良不可为倭奴恫吓所屈服，当即决然通电表示服从中央，以救东北、救中国。’（二十一日日记）

然而，张学良还是决定了暂时缓期易帜。他在当时发到北平的电报中提及：日本会武力干涉，深恐会发生“第二济南惨案”。

‘东三省本定明日（七月二十四日）通电易帜，表示服从中央，乃被日人强横阻止，统一之暗礁，在于外人干涉我国内政，中国积弱如此，思之可痛。’（二十三日日记）

注：蒋总统-“在中央常会报告北上经过”（一九二八七）

“我是中国人”

虽然张学良决定延期易帜，但并非就是屈服于日本的干涉。

二十六日，张学良发给在北平的邢士廉等代表的电报是这样的：

“介公（蒋总统）对弟（张学良）诚恳之意，并屡转告以国家为前提合作携手之利益，闻之感涕！即请转达介公——无论如何，愿对国府服从到底；虽是个人只身，亦甘为介公效力。但目前外交方面情形，确实重要，谅介公早有成竹；但求对外有圆满办法，东（三）省一切不成问题也。”

可是，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阻碍易帜的高压外交，则也是更加强横地在推进中。

田中派林权助赴华

八月四日，举行张作霖的丧礼，田中派遣曾经担任驻华公使的林权助赴奉天致奠。

林权助所衔使命，是藉吊丧的机会和张学良碰头，转达田中意向，以打消张学良易帜的念头。

田中义一在林权助出发之际，将他的方针大致告知如左：

“到目前为止，对于中国达成统一的协力，是期待于导致满洲趋向符合日本的理想，而绝无为了中国统一便将满洲牺牲的打算。有人说：张学良如果只是服从三民主义和采用青天白日旗，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但却实在是‘一叶之落，当知天下皆秋’，自不能予以承认。又关于满洲事宜，如与南方政府交涉，则难免会造成国际问题，务必避免。”

此外，在特派林权助为使者之先的七月二十四日，田中义一拔擢前任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继出渊胜次（外放驻美大使）出任外务次官。吉田在当时是一个强硬论者，在他所提出的“对满政策私见”中，便曾提倡“为使日本势力向中国、向满洲发展，则观看中国的风色是不可以的；应该不要害怕他们的排日情感，把握机会甚至向天津、山海关出兵。”吉田之被擢用于此时，显然可见田中义一务期贯彻其分割东北的决心。

林权助于张作霖的丧礼完毕之后，自八日开始正式进行拜会洽谈。

当天，当林久治郎陪同访问张学良，重行转达——东北不应和南京国民政府妥协之意。

翌日～九日上午十时，张学良由王家桢陪同到日本总领事馆回拜林权助。总领事林久治郎和田中义一的智囊佐藤安之助少将也同席参与谈话。

张学良首先向林权助致谢吊丧，继之说明：“本诸共存共荣之旨，以谋加强和日本的亲睦关系，互相提携，实现东三省和平经济政策。”

此时，林久治郎代替林权助发言，开始便摆出胁迫的态度，造成激烈辩论。现在特地将当时的杂志-“国闻周报”（八月十九日）等所报导的情况，引用于后：

与张学良会谈的纪录

林久治郎帝国政府对于南北妥协的反对意志，业经屡盛传达，想必贵总司令已有了解。总之，帝国政府目前认为东三省如与内部统制尚未健全，加以仍然留有共产色彩的国民政府妥协，则势必会侵害日本既得权利之利益与特殊地位。

不幸倘若东三省蔑视日本之警告，擅自悬挂青天白日旗，则日本必具强固决心而采取自由行动。务望决心行所当行，不要为浮言所影响；倘有不逞分子出现，尽可以武力弹压，日本愿以全力相助。

张学良林特使与林总领事屡次给予我个人的忠告，固所感谢；然而对于林总领事的发言，实在难以缄默。

我是中国人，

所以我的想法当然是以中国为本位；我之所以愿与国民政府妥协，是要为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一般人民所渴望的事。在我个人方面，则是无能为力。

我因顾及今后邦交，在个人立场对于日本政府的警告会加以考虑；但是倘以国际关系而论，想必日本政府也决不会甘冒干涉内政之嫌。并且日本政府以种种恐怖之意反对中国实现统一，我颇为不解。

林久治郎理论已经终结，简单地说：帝国政府具有决心反对东三省对南方妥协，就是被指为干涉内政，也在所不辞。请贵总司令三思。

张学良我的决心，以东三省人民的意志为依归，我不能违背三省民心而有所作为。

佐藤安之助田中首相心中已经有了决定。贵总司令如果拂逆田中首相心意，将会发生重大事态。

林权助令尊和我是好朋友，我把你当作自己子孙，我要奉告：你的想法是很危险的。

张学良愤然地说：

我和贵国天皇同岁。对于阁下所奉答的就是这些。

张学良参加国府

张学良于会谈之后，立即召集东三省保安委员会，将在日本总领事馆争论的情形，据实报告；保安委员会为避免刺激日本，乃于八月十三日（一九二八年）决定易帜延期三个月，并通知日本方面。

据日本东亚同文会所编“续对支回顾录”中之“林久治郎列传”；当时，林久治郎在和张学良争论时，由于言辞极其峻烈，为张学良担任翻译的王家桢乃在中途表示：“这样的话，我不能翻译。”因而由佐腾安之助接着译下去。

林权助等人态度之所以如此强硬，是由于田中义一有电报给林久治郎，指示了交涉方针。

这个电报，是在林权助启程前往奉天之后，为提示注意而重新下达的文件。其内容为：（一）再度严厉警告张学良中止南北妥协，如其不肯依从，则予以威吓——日本为自卫将变更或撤回过去所有对于张学良个人以及东北的善意关系。（二）张学良如果接受警告，则询问其对于日本的希望，可约定给予援助。（三）如果张学良不接受警告，即便撤回以前的善意关系；又如日本既得权益受到侵害，则出动兵力采取自卫措施；并且同时在幕后操纵东北旧派分子，整垮张学良、杨宇霆等人，协助树立亲日政权。

实际上加强联系

东北的易帜，就是这样地再度遭遇到阻碍。

然而，就凭日本的压力，是不可能使中国统一的历史潮流为之改变的。业经再三为达成统一而互相确认的国民政府和东三省地方当局，并不拘泥于形式上的立即易帜，而采取实际上的加强联系，藉以为必将到来的真正统一打下基础。这也是为了保护在日本公然压迫之下的东三省当局之一种“迂回战术”。

当决定延期易帜之后，国民政府召派在奉天的代表方本仁回京，奉天代表邢士廉同道南来，继续为有关统一问题进行商洽。

邢士廉途次上海，招待记者，就东北情况发表谈话如次：

“……东三省人民在连年用兵所受之痛苦外，又有日俄两国之垂涎，其情景无可言喻。在事实上，已非妥协无以解民生困难，故张（学良）氏当以民意为归宿，速谋统一，以维国势。至其所持步骤，以日本藉口干涉，不无慎重。……东三省在事实上、精神上早已服从中央，表示一致，所差者不过悬旗之一形式问题耳！”

此时，张学良已经以行动表现服从中央的心情，就是在河北省协助中央军扫荡暨改编直鲁军的残余部队。

国府任张学良为委员

在南京，十月八日举行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决任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当时在会议中，颇有人认为东北易帜尚未实现，张学良对于就任国民政府委员恐怕不会积极；桂系李宗仁等且主张以武力讨伐张学良，平定东北；但蒋总统基于招纳张氏尽速达成统一的见地，站在提案人的立场向同志们说明如下：

‘我认定当以力求统一为前提，故对于张学良应予明令发表之，彼或一时不能就职，即准备其不就职可也。且日本阻碍东三省归入中央之阴谋，因此而得以揭穿其真相，于党国方面亦大有益。——余之主张如此，请诸同志务以大局为重，慎加考虑。’

与会同志也都表示同意，通过了张学良的任命案，并立即发表；当天蒋总统便电达张学良知照。

次日～九日，为盼张学良有积极反应，特再去电如下：

‘昨电谅达。委员既经发表，应乘此时机同时更换旗帜，宣言就职，以十七年双十节为兄完成统一之纪念日也。盼复。’

张学良立即打来覆电，内容是这样的：

“蒋总司令钧鉴：学良才识浅薄，重蒙提挈，得与诸贤共襄国事，感幸已深。又得我公为主席，俾获追随左右，尤慰私愿！各委员就职时，请即加列贱名，不胜荣幸！”

张学良虽已就任国民政府委员，但易帜之事仍无进展。

问题与东北内情也有关联，就是张学良和晋为张作霖股肱的杨宇霆之间有欠融洽。

杨宇霆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之后，得张作霖知遇，信任有加，跻身在东北拥有为张作霖一人之下的权势。

东北毅然易帜

当张学良酝酿易帜之际，国民革命军的白崇禧及背叛国民政府而被整饬的唐生智等人也都派遣代表到达奉天，希望获得奉军协力。这些代表首先拜访实力者杨宇霆，杨宇霆便公然向他们这样说：

“东北的事情有我作主，汉卿（张学良）还是小孩子，不必理他。”

张学良没有见到代表们来拜会，颇为诧异，乃问到杨宇霆：“你会过代表们吗？”杨宇霆老气横秋

地回答：

“不错，会过了！我们可以分开来做——你走中央路线，我和地方派系联系。”

对于张、杨两人这样的关系，日本方面乃有加以利用之意。

当时，有这么一个传说：

某日本人赠送张学良一部“日本外史”，特地将书内丰臣秀吉与德川家康部分用朱笔标出，家康是秀吉的权臣，秀吉死后，家康便灭了秀吉之子秀赖而据有天下。这个赠书给张学良的日本人，其诡计当然就是在以德川家康影射杨宇霆，扩大他们两者之间的矛盾。

张学良与杨宇霆不睦，终于发展到了摊牌的程度。翌年～一九二九年元月，张学良乃指杨宇霆谋叛而将之杀死。

一夜之间三省遍悬国旗

虽然受到内外的妨碍，但张学良的准备易帜工作则一直在继续进行，他秘密地做了数千幅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并预备了很多帧孙总理的照片。

日本还没有察觉到张学良的决心，而张学良则唯恐拖延下去便会受到日本更多的妨碍，故而迅行决定年内易帜。

逼近岁除的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了易帜通电如下：

“先大元帅临终以力主和平、促成统一为嘱。……自应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蒋总统立即对张学良等人发出覆电：

‘诸兄匡扶党国，表示精神，无任佩慰！此后修内对外，建设万端，匡济艰难，纳民轨物，愿与诸公共策之。中正。’

在这一天的上午七时，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天空，同时都迎风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

特别是在奉天，市区都悬起了青天白日旗，这是由公安局在天色未明之际迅速部署，以致日本方面来不及妨害。

张学良在奉天省府大礼堂举行了易帜典礼，由中央派来的代表方本仁监誓；欧美各国领事都应邀参加，唯独日本领事未见来到。

张学良于宣誓之后，引述日本“大政奉还”之例演说如左：

“我们为什么易帜？实则是效法某先进国的作法。某方起初也是军阀操权，妨害中央统治，国家因此积弱。其后军阀觉悟，奉还大政于中央，立致富强。我们今天也就是不想分中央的权力，举政权还给中央，以谋真正统一。”

十七年的苦难岁月

此时，除了台湾等一部分地区尚为日本所占据外，中国全土终于统归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飘扬之下。自辛亥革命、中华民国诞生以来，实则已经消逝了十七年的苦难岁月。

‘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本来我们革命党所产生的国旗，就可以正式采用的；但是因为当时反革命势力浩大，有许多人主张用龙旗，另外有更多的人——如袁世凯、章炳麟、谷春暄等则主张用五色旗。所以，我们革命党虽流了无数同志的鲜血、费了多少气力来争，还未能达到目的，故于十六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未完成以前，仍采用五色旗为国旗。

‘因为我们革命党在总理领导之下，百折不回，始终拥护现在的国旗，而一般反革命分子，亦始终集在五色旗之下，来破坏本党的革命；因此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就成为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与过去的五色旗的斗争。

‘为此国旗之争，我们革命党不晓得牺牲了多少党员和将士的生命！不晓得流了几多先烈的鲜血！’（注）

三民主义战胜一切

蒋总统在好不容易终使全国统一跻于完成之后的感慨，是这样地留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上：

‘自本年五月以来，日本用如此强暴横蛮之压力，尚不足以阻止我东北军民同胞归附中央之赤忱。北伐誓师，未及三年，卒使统一事业克底于成，岂非三民主义战胜一切之效乎！日本侵略者野心虽狂妄无已，无奈我中华民国何！

‘总理与诸将士，先烈在天之灵，幸得告慰矣！’

十二月三十一日，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总司令长官。并且依其所望以热河加入东北，成为东北四省。

注：蒋总统-“剿匪军官须知”（一九三三七）

各国刮目相看

对于张学良之易帜，最慌张的是日本。

因为得到张学良通知延期三个月易帜的期限虽已超过，但却料想不到他会这样快，而且未有预告便断然实施。

日本方面虽然曾经暗示甚至会用武力干涉以威吓张学良，可是一旦易帜之后，也就不可能将之推翻。

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面对这样的事态，为谋有所弥缝，乃集中目标于所谓铁路建筑权等有关在满蒙的权益，要和张学良继续进行交涉。而这个铁路问题，则一直不能解决，并且在后来成了“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线。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傍晚，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秉承田中义一的指示，拜会张学良，会谈两小时。林久治郎捶着桌子责难：“突然易帜，等于宣告断交；日本方面现在看你的态度，必要时有采取断然措施的可能。”

可是，张学良则只是答覆：“没法子！”

林久治郎继之提出有关日本在满蒙的铁路权益，要求张学良让步，逼他“表示诚意”；而张学良则推说：“外交问题是中央政府的权限。”——在一个统一的国家说来，外交一元化，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事。

据东亚同文会编撰之“续对支回顾录”——林久治郎和张学良会谈之后，怒火难熄；当天晚间，曾到汤岗子温泉入浴消气。

然而，除掉如此态度的日本之外，列强各国对于北伐完成后的国民政府，则都表现出好意。

恢复关税自主权

北伐的目的，不仅是要凭军事力量完成全国统一，而是要达到一向所揭橥的废除不平等条约，以恢复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

‘我们革命，要先打倒军阀，使那帝国主义者没有拥护的人，没有工具，然后再谋废除不平等条约。……不平等条约一天没有废除，我们的革命一天没有成功。’（注）

外交上的第一个悬案，就是恢复“关税自主权”。

在这一方面，首先有反应的是美国。美国在革命军光复北平没有多久的七月二十五日，便率先和中国签订了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的新条约。

‘美国与我国签订关税自主之约，其实为平常应有之事，然他国尚多观望，此乃美国对华政策先占一着之胜利；以言平等待我之民族，当以美国为嚆矢也。’（蒋总统七月二十五日日记）

在此之后，美国更是最早（十一月三日）正式承认国民政府的国家。

欧洲各国也继美国之后同意改订条约——首先，由德国于八月十七日开始，接着是挪威、比利时、义大利、丹麦、葡萄牙；及至十二月二十日，则和英国之间签订中英新关税条约，英国并于签约同时承认国民政府，递达英皇国书，英国军舰且鸣放礼炮致敬；二十二日，和法国也签订了新的条约。

在对外改订通商、关税条约的背景之下，国民政府于十二月七日制订“中华民国海关新税7[109]1653则”公布，定于翌年～一九二九年二月一日施行；将之照会各国驻华公使，各国一致表示接受。

可是，唯有一个国家例外——就是日本。

痛愤日本执迷不悟

国民政府于七月十九日向日本提出通告～～一八九六年“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及一九○三年“中日通商行船续约”业已逾期，应予废止；但日本方面则以如不承认旧约继续有效，则不接受关税自主权之交涉而予以拒绝。

直到十一月，才打开了交涉的途径。可是在这个阶段，日本则以承认关税自主权为交换条件，而强迫中国方面承认“西原借款”，并以关税收入为偿还之担保。

西原借款，在以前业已提到，当时日本不顾中国人的反对，向段祺瑞投资，供其挥霍于镇压革命；在国民政府的立场说来，实在是不能加以承认的。

蒋总统在当时的日记中，对于日本执迷不悟的强迫行为，切齿痛恨地留下了下面的一些话。

‘日本之无理，必引起不良之结果。’（十一月二十二日）

‘日本人之不易交如此，其存心叵测，必处处防之；然吾苟能自强，亦何足虑哉！’（十二月二日）

‘国定税则，为我决定实施者，日本人虽反对，我亦必决意行之。特惜日本无高瞻远瞩之人耳！’（十二月四日）

此时，中国方面为谋打开僵持局面，乃提出可以考虑以关税收入中的五百万元作为借款担保的让步案；但是中国民意为之不满，故而在十二月十三日发生了有一些以为政府外交软弱的民众捣毁外交部长王正廷住宅的事件。

此外，在北伐期间，和日本所发生的“汉口事件”、“济南惨案”等交涉，也都还悬而未决。

和日本的折冲，实在是重重地压在国民政府肩背上的难题。

日本之正式承认国民政府，是在此之后半年的一九二九年六月三日；至于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则又在更逾一年之后的一九三○年五月。

进入训政时期

与“统一全国”任务齐头并进的是“巩固国家基础”的工作，也在推动之中。

最大的课题，是由“军政时期”进入“训政时期”。孙先生在他的著作-“建国大纲”中，将革命后的政治形态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的时期。所谓“训政”，则是在到达完全实施“宪政”过程中的一个准备时期。当北伐期间的“军政”告一段落的此刻，中国国民党的使命，就是要把在长期混乱中民生凋敝和丧失社会组织性的中国民众加以训练，并推进建设工作，以尽速奠立全民政治的宪政基础。

颁布训政时期约法

中国国民党于一九二八年八月八日在南京召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遵循总理遗教，颁布“训政时期约法”，并决议设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中华民国政治基础的五权分立组织于焉确立。

十月三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制订“训政纲领”六项，由国民政府公告施行。

“训政纲领”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

“训政时期，中国国民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

“国民政府在中国国民党之指导与监督下，行使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

“国民政府组织法令之制订及其修正，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之。”

继之，于十月八日由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决任命国民政府人事如左：

国民政府委员蒋中正．谭延闿、胡汉民、蔡元培、戴传贤、王宠惠、冯玉祥、孙科、陈果夫、何应钦、李宗仁、杨树庄、阎锡山、李济深、林森、张学良。

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

行政院院长谭延闿

立法院院长胡汉民

司法院院长王宠惠

考试院院长戴传贤

监察院院长蔡元培

国民政府主席就任典礼，于武昌起义纪念日的十月十日上午八时在南京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蒋主席的宣誓词如下：

‘余敬宣誓：余将恪遵总理遗嘱，服从党义，奉行国家法令，忠心及努力于本职，并节省经费，余决不雇用无用人员，不营私舞弊及接受贿赂。有违背宣誓，愿受本党最严厉之处罚。’

列举四端勉励同胞

同时在当天发表“国庆日告同胞文”，这是蒋总统以国家元首身分最初对全体国民所发出的文告，大致内容是这样的：

‘以今日而欲求中国之不亡，达其自由独立之目的，惟有统一全国之革命思想，以排除阶级斗争之邪说；团结国民之爱国精神，以杜绝国内武力之战争。必如是方能促三民主义之实现，亦必如是乃能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

‘敬于此十七年双十节，列举四端，与同胞共勉之：

‘（一）发育国民健强之体力，以挽救萎縻文弱之颓风。

‘（二）保持中国固有之德性，以铲除苟且自私之恶习。

‘（三）增进科学必须之常识，以辟除愚蠢锢蔽之恶习。

‘（四）灌进世界最新之文化，以力求国家社会之进步。

‘上举四端，为我国家存亡之所关，亦民族消长之所系，尤为今日建设新中国不可缺一之要道。愿我同胞一致身体力行，以奠定民国自强之基，发扬我中华民族五千年光荣之历史！’

在国民政府主席就职的当天，美国国务卿开洛格代表柯立芝总统发来贺电。此外，英国公使蓝普森也遵奉其本国政府命令发表准备撤退留驻唐山的英军，并表示好评：“确信国民政府当局能负责保护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

各国政府当局及驻华公使都一致来电祝贺，支持中国新体制的起步。

此时，又是日本的态度冷淡。东京的日本政府毫无表示，只有驻南京总领事冈本一策向外交部口头道贺。可见日本仍然不认为国民政府和他有对等的国际关系。

‘日本狭隘嫉忌如此，余当益自强自奋可也。’

这两句批判日本的话，是蒋总统就任主席之后，在日记中写下的第一页。

继之，国民政府复于十月二十六日发表“训政时期施政宣言”，宣示首先实行安定社会和裁军、整理财政；并以此两大前提条件为基础，再谋发展政治、经济和教育的建设。

十二月二十九日，东北地区也升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

踏出自己的第一步

如愿以偿、完成统一之后的中华民国，在名与实两方面都已经是一个近代国家而踏出了她自己的第一步。

在三民主义的领导之下，开始从事国内的建设。

虽然还有和日本这个国家的交涉尚难推进，但是列强各国对中国的评价日益升高，已经是正在跻于世界一员的地位中前进。

蒋总统在这一年最后的日记中，回顾激动的一年，写下了这样的一页：

‘今年一月四日入京，至今岁云暮矣！幸全国已告统一；列邦除日本以外，其余皆已承认我关税自主与放弃领事裁判权。吾人如能努力做去，则二十年之内，我堂堂中国必能独立、自由、平等于现时代也。’

第九章：孕育危机的东北

主题

进行裁兵工作桂系妄动干戈冯玉祥继起叛乱内忧与外患交压苏联策划暗杀俄军攻我东北各地的投机变乱明是非别顺逆“中原战争”兵连祸结六个月共党采用流寇方法到处抢掠烧杀赣闽边境剿匪准备三次进剿号召安内攘外九一八事变前夕日军部蓄意侵华日密订侵华策略日军方蠢蠢欲动万宝山事件中村被杀风波日乘机出兵侵华

进行裁兵工作

‘大家知道帝国主义者之在东方，或者在中国，其冲突均随时可以发生，他们的利害，无一时不相冲突——英美之于日、日之于俄，其冲突尤觉显然。

‘冲突之焦点，必在中国；第二次大战之起，亦必在中国。中国此时，若不努力奋斗，团结一致，至第二次大战一起，即为亡国之日。因国内毫无准备，既无独立之能，彼时当要听人指挥，国家焉得不亡？

‘我们此时，就应需详察帝国主义冲突的地点与时期，在那个时期以前，国际战争尚未开始的时候，国防上须有确定之布置，不致受人牵制，则国家不但不亡，并可乘此机会完成独立。

‘所以，第二次国际大战的时候，就是我国兴亡的关键。

‘至此机会之来，当在何时，亦属易于观察——盖远则不出十五年，近则随时均可发生。不过，目下彼等无准备、无机会，亦皆不敢轻动；吾人正好乘此余暇，充分准备以待机会之来。’

上面这一席话，是蒋总统于一九二九年七月九日在北平陆军大学以“中国前途与军人责任”为题的讲演中之一节。

缩紧军费以便建设

中国虽说是好不容易终于达成了统一，可是外来的列强压力，非常紧迫；如果中国内部让他们有可乘之隙，就会成为他们纷争的场所，是则其结果不仅中国为之灭亡，也更会把全世界卷入战火。这样的情势，在任何人的眼睛里都会看得很明白的。

因此，内部的团结和国家经济的自强，乃比任何需要都更重要。而在臻于统一之前的一段漫长混乱时期，已经给国家带来了财政上的危机，谁都知道其最大的负担就是“军费”。

当北伐完成之际，国民革命军实则已经扩充到八十四个军、三百个师，兵员总数超过了二百二十万人；而且东北．云南、四川等地方部队都还没有包括在上述数额以内。

是故在推进国家建设的前提之下，军事预算纳入中央统制、加以整理紧缩，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此时，国家年度收入总额为四亿五千万元；但须偿付外债达一亿元，实际可资支用者大约三亿五千万元，而其中八成以上的三亿元则用之于军费。

‘我们现在的军费，明白可算的总数要三万万，而实际上各地军队的支销，除了此明白可算者之外，不知还有多少？就说是只有三万万已经不得了，军费占了全国收入十分之八以上，那国家一定是要破产的；如果到了十分之九，这个国家就像灭亡了一样的了。……

‘现在，我们军费的总数，已经占了十分之八了；我们国家就是不能建设，经济亦没有一点基础，民生问题无法解决，国家完全等于亡了一样。

‘我们拿国家支出最多一部分的军费解决下来，国家经济才可以稳定；经济稳定之后，政治和社会才可以上轨道。’（注）

一九二九年元旦，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国军编遣会议（蒋总统兼任编遣委员长），商讨裁兵计划。

以日本讨幕废藩为例

当裁军之际可资借镜的，是日本的明治维新。蒋总统在最初的讲话中表明如下：

‘……今当开会之始，中正要把日本维新史中长州、萨摩、土佐、肥前四雄藩当时的自处之道、他们改革军制的经过、和他们改革的精神详说一番，……供我们军事同志借彼鉴此。……

‘日本对我实行侵略政策，我们每谈到日本便不胜愤慨，尤其济南惨案发生之后，举国同仇；不知徒然愤慨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要问日本何以能侵略我？……是因为日本维新之初，即能组织健全稳固的统一政府，努力完成现代式的国家的原故。

‘要造成现代式国家的条件是什么？即是：（一）统一；（二）集中。德川幕府的末叶，……以长州、萨摩、土佐、肥前诸藩为中坚，组织联合军，……苦战恶斗的结果，幕军惨败，幕府遂倒。这与我们各集团军一致协力打倒积恶的北洋派颇为相同。

‘……讨幕大功告成，照日本历史的先例，长、萨二藩应代德川氏而兴；可是，长州藩士木户孝允、藩主毛利敬亲、萨摩藩士大久保利通、藩主岛津忠义皆深明大义，……毅然决然奉还大政，归命中央。

‘幕倒了！藩废了！全国统一了！可是日本朝廷依然没有一兵一卒，各藩的藩将，对于藩主久结君臣名分，……维新诸杰到了此时，绝不畏难，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即主张化除藩兵，改编国军。

‘第一、先限制各藩兵力；……第二、设拱卫首都之亲兵；第三、化除藩界，混合改编；分设镇台，集中训练。……国军的基础树立，反动势力镇压下去——全国统一，才能名实相符，中央政府才能着手改良一切政治。……此种惨澹经营的成绩，尤其值得我们模仿的。’

注：蒋总统-“北伐成功后最紧要的工作”（一九二八十二）

桂系妄动干戈

蒋总统在“国军编遣会议”的讲话，有涉及中国和日本的比较，再稍予引录于后：

‘日本的军人，在六十年前，已经是能打破封建制度的；中国的军人，反充满了封建思想。已往带兵的都是想扩私兵、拓地盘，有了一省地盘，又想兼辖数省；有了数省地盘，又想武力统一中国，把持中央；等到把持中央后，便扶植一人一派之势力，想用武力来翦除异己。——这是北洋军阀老祖宗袁世凯的先例，段祺瑞、吴佩孚等承受他的衣钵，……所以每次政变之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忙于地盘的分配，把中华民国当作私产分赃。……这就是我国已往军人所走的路了。

‘日本的长州、萨摩、土佐、肥前诸藩，于讨幕之后，功成不居，不再设幕府，反将他祖宗传来的封土奉还政府。……他们也能勉求新知，善应潮流，……简直与日本国家结成一片，共存共荣。我们该把日本雄藩作一面镜子……’

蒋总统慨叹内外夹攻

此时，最值得耽心的，就是虽然统称为国民革命军，但在各军将领中仍多照旧承袭着军阀的派别，而裁军则是在削减他们所掌握的兵力，也就是在削弱他们的势力。他们对于统一国家的理念尚未成熟，能否安安分分地接受决定，实在是颇成问题。

蒋总统在元月五日的日记中留有感想如下：

‘军阀习惯性成，除不胜除，余乃为内外夹攻之人，思之但有郁闷而已！’

国军编遣会议，于元月二十五日暂且闭幕，决定了（一）全国划分为六个编遣区；（二）全国保留陆军兵力为步兵六十五的师、骑兵八旅、炮兵十六团、工兵八团，合计员额八十万人以下；（三）军费不超过国家总收入百分之四十以下等项方针。八十万人，就常备兵而论，已为当时世界各国中最高的员额；但因为是过渡时期的措施，实在不能再低于这个数目。

继之，在三月间所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又通过了“国军最高统帅权完全属于国民政府”的原则。——裁兵计划看来已经是有了顺利的开始。

可是，所耽心的问题毕竟还是出现了。一些具有军阀割据本质的将领们为之不满，因为他们所崇信的是“地方主义”、“地盘主义”，对于裁减兵员、而且将军权集中于中央，是不会理解的。

尤其是越能控制兵力较多而就对于武力越有自信的人，其因裁军所受到的打击也就为之越大；故而率领部属，揭起反旗，对中央抗命的有力分子乃陆续出现。

最初倡乱的，是参为国民政府委员、并以华中、华南一带为地盘的桂系李宗仁。他是北伐期间的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也是在宁汉合作之后，为监督地方党政而设置的武汉政治分会主席。

在他统驭之下的军队，达四十万人，分驻在为他根据地的两广乃至两湖地区；还有为追击直鲁军而展布在河北省滦东方面的白崇禧（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所部，也是他的直系。

国军编遣会议召集之后，各集团军撤销。李宗仁虽被任命为军事参议院院长，但确对于这一措施心怀不满。

李宗仁公然与国府对抗

二月二十一日，李宗仁突然以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的名义，越权擅将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免职，并且派遣所属叶琪（第五十二师师长）、夏威（第十五师师长）的部队由武汉进军长沙，将鲁涤平赶往江西，公然和国民政府对抗。

因为鲁涤平忠实服从中央，将湖南省的税收按照规定数额直接向中央缴纳；而李宗仁则意图排除中央政府在华中的影响力，所以要赶走鲁涤平。

这是李宗仁对党、对国家长期叛乱史的第一页；他的阴谋作乱，在后来曾经再三地表现出来。

及至中日战争之后的一九四九年，他居于代总统的要职，从事对中共“和谈”，旋即中途逃亡到美国，更且诽谤祖国；到了最后，竟于一九六五年被中共诱回大陆，当初被利用于政治统战，旋即受到冷落，其妻郭德洁自杀，他本人则在失意中病殁于一九六九年。

当李宗仁等人在武汉公然表现出不轨行动之初，蒋总统正好回到故乡浙江省奉化县扫墓，在二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有如下的记述：

‘桂系敝屣法令，妄动干戈，从此恐又多事矣！’

于是蒋总统乃迅即返回南京，研究善后之策。结果，国民政府决定采取断然措施。

冯玉祥继起叛乱

一九二九年元月二十八日，国民政府命令蔡元培、何应钦等人对于桂系部队侵入湖南事件进行调查。蔡元培等为免事态扩大，乃姑以李宗仁事先并不知道叶琪、夏威的军事行动，而期待于他能自动反省。

可是，李宗仁却离开了南京，避居上海，整编所属部队，准备作战。

在武汉方面，将长江交通阻断，封雇民船数百艘，准备载运兵员；又命湖南省测量局着手大量印制湖南乃至江苏、安徽等长江流域各省地图达五万分之多。——其有调动兵力、沿江东下进袭南京的意图，至为明显。

三月十三日，中央政治会议首先决定撤销各地政治分会；继之，于十九日下令擅自进军长沙的叶琪等部队退回原驻地-武汉。

然而，叶琪等人竟抗不遵命，反而更在各地对国军挑衅。

同时，为扫荡直鲁军残兵而率部驻屯于河北省唐山（天津东北约九十公里）一带的原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也有与上述动向呼应之意。

三月十日，白崇禧召集原属第四集团军营长以上军官会议，表明经由山东进犯南京的打算，并准备展开战斗行动。

李品仙通电拥护中央

情况已告紧急，蒋总统乃立即站在国民政府主席立场发表“告原隶第四集团军将士书”，号召自重，勿以一派一系自局，勿为一派一系所利用；于是，原任第四集团军军长的李品仙等将领便响应号召、通电“拥护中央，反对叛乱。”因而摧毁了白崇禧的叛乱计划。白崇禧旋即由天津逃亡香港。

这样一来，自北方给予中央的威胁虽已解除，不过李宗仁的计划却仍然在逐步推进中；并且国民政府委员、前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济深也参加了他们的阴谋。

国民政府乃于二十三日将李济深拘禁；二十四日下令撤免叶琪、夏威两师长职务；二十六日明令讨伐李宗仁：

“当此国军编遣尚在进行、人民渴望统一和平之际，该逆等（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竟敢主使部队，……藉革命之名义以消灭革命。若再姑息优容，将何以对我全国喁喁望治之民众，与为统一而牺牲之将士？……仰前方各军痛加讨伐，以遏乱萌，而彰法纪。”

此时，李宗仁则由上海脱出，经过广东，回到他的根据地-广西，打算反抗到底。

桂系部队陆续反正

在中央政府来说，这是为了保障中国统一而只许胜利不许失败的一场战争。为此，蒋总统亲自乘楚同军舰专赴前线督师。中央军溯江西上，进入湖北省境，一鼓作气于四月五日克复武汉，恢复秩序；接着，未事休息便继续追击前进，四月十八日，近迫宜昌。至此，夏威等叛军将领乃终于通电“出国”；残余部队官兵表示服从政府。

长江流域的战事，虽已胜利结束，但盘据在广西的李宗仁则和广西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等人结合在一起，继续谋叛，加以由天津逃到香港的白崇禧也返回了广西。

五月五日，李宗仁僭称“护党救国军总司令”，通电“继续作战”，出兵入侵广东。在广州附近停驻的“中山舰”等舰艇，也受到煽动而参加叛军。

不过，当中央军一出动讨伐，桂系部队便陆续反正，形成总崩溃的局面。

中央军于五月十日，在海、空军的援护之下，克服广西省会-桂林；旋更进入梧州、南宁，于六月中旬平定了广西全省。

黄绍竑、白崇禧通电“下野”；李宗仁也逃亡出境，桂系叛乱到此结束。

冯玉祥亦发动叛乱

可是，正当这个前后，原在北伐时担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冯玉祥也在黄河中游地区发动叛乱，并且和李宗仁早就有了勾结。

冯玉祥原先固然为北洋军阀的一员，但究竟还是协力北伐、对于统一全国有过贡献的有力分子；此时，并且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军政部长。不过，如果究其率领全军参加国民党、投入北伐阵营的本意，则是在于望风转舵，以谋扩张自己的势力。是故当北伐成功之后，他就控制了势力范围之内的陕西．河南等省税收，并且还不放过向中央需索军费，豢养自己的军队，以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四月二十四日，冯玉祥在河南开封召集所部师长以上干部举行军事会议，会后便撤退驻屯于鲁西的孙良诚部队，将主力集中于豫陕交界的潼关一带。

当桂系叛军的败势渐已明朗的五月十五日，冯玉祥的主要部属孙良诚、韩复渠等人在他的唆使之下联名发表通电，宣称组成“护党救国军”，推他为“护党救国西北军总司令”。

冯玉祥的部队首先将平汉铁路的武胜关遂道及黄河铁桥破坏，并扣留横贯江苏、河南两省的陇海铁路车皮数千辆以及炸毁二十八座桥梁，且拆毁各处电线、路轨，使铁路交通柔肠寸断，已遏阻中央军的追击。

此外，更大量购买武器，招收新兵，故意不发薪饷，宣传“中央政府对我们不加顾恤，迫不得已，祇有采取行动。”以煽动士兵们的反对政府的气氛。

内忧与外患交压

冯玉祥叛变之后，蒋总统屡次去电，劝其服从政府，置国家利益于个人利益之上；可是，他则诿称“并无不忠于政府的行动”，而实则一个劲地在作战斗准备。

蒋总统致电冯部官兵

到了五月二十四日（一九二九年），国民政府才终于下令褫去冯玉祥本兼各职，严行缉办；蒋总统则于同时致电冯部官兵说明所谓不发薪饷原委，并号召归顺中央，电文如左：

‘历来军阀之构成与其覆灭，皆由其视国家军队为私有始；患得患失、以求保其地位终。倒行逆施，以自促其运命。

‘军阀不足惜，独惜将佐士兵皆我国家元气，乃为军阀所挟持，人格资其贩卖，生命供其孤注，生则同受恶名，死则无人怜惜，此真可为痛哭流涕，而不得不谋拯救者！……

‘诸将士原隶第二集团军，但皆中华民国之将士，非冯氏个人之将士也；冯氏与诸将士固有历史之关系，惟此历史必依托于革命而存在。……

‘冯氏所举以激怒诸将士，使之背弃中央者，无非谓中央故存轸域，坐视第二集团军之困苦窘迫而不稍加体恤。不知自北伐以来，鲁、豫、陕、甘各省之税款，平汉、陇海等路之收入，中央悉任冯氏取求；且每月由中央协拨五十万元。讨逆军兴以后，尤特加补助，计四月份所拨发一百五十万元；而本（五）月铣（十六）日中央尚在沪拨付五十万元。以中央今日财政之支绌，实已竭尽能力。……

‘据报：曾由武汉（李宗仁）取得一百万元，冯果稍有减除士兵痛苦之心，何至从不发饷。……诚不知其有无心肝也！’

冯部将士得闻真相之后，乃为之动摇。不久，有力干部韩复矩、石友三便发表通电，服从7[132]1676中央；韩复矩并即率领所属部队由潼关到达郑州。冯玉祥是一个素以反覆无常著称的人物，而这一次却是被他自己的部下倒了戈。

然而，正当冯玉祥进退维谷之际，却出现了一个给予他以援手的人物，那就是原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

阎锡山在责难冯玉祥反抗中央的错误之后，并作了一个奇妙的提议——他自己也辞职下野，以求为冯玉祥撤销通缉，如能实现，则偕同出国。

因部属背离而自知造反不成的冯玉祥，乃于五月二十七日通电宣称“入山读书”，旋即前往阎锡山的根据地-太原。

叛乱的战火暂时得以平熄，国民政府也接纳了阎锡山的要求于七月六日撤销冯玉祥的通缉令。

可是，这个“和平”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局面。松了一口气的冯玉祥，不久之后再度谋叛；至于阎锡山之所以援助冯玉祥，实则也是为了行将必至他自己叛乱局面的预为部署。

舍弃不了割据地盘迷梦的军阀们，是施展出了各种不同手段，和中央背道而驰。

共党买通卫兵行刺

不久之后，蒋总统在就寝中受到刺客暗算，所幸并未受伤。这是出于共产党员的策谋。可见在故态依然的军阀而外，还有共产党都在企图伺机加害于蒋总统。

这个事件发生于上海。当时蒋总统正为治疗目疾，由南京来到上海的寓所。

八月二十四日午夜，蒋夫人被惊醒，说是梦中觉得楼下有小偷进入，心里怦怦不安；蒋总统乃下楼巡视，见有两个卫兵值夜，据说没有异状，乃回到卧室安睡。

可是，夫人的梦境正是符合了实际情况——当夜，两个卫兵已被共产党所收买，引刺客进入楼下，幸好得夫人梦境之助，刺客未敢下手，乃延到三天之后再度出现。

‘刺客潜入余卧室，捩枪机将发时，余转身而又咳嗽，刺客心惊乃止。此事几危！’（蒋总统二十八日日记）

事后，据卫兵报告：当时听到有枪声，乃走出门外察看，致门卫无人而刺客得以进入屋内。然而，经调查得悉——刺客所乘坐而来的汽车，乃卫兵庞永成所雇，并有卫兵陈凤飞与其同谋，连卫兵排长詹子文都已被共产党所收买。

在像这样的“内忧”之外，刚统一的中华民国还承受着更重的压力。——就是来自列强帝国主义的“外患”。

东北成为亚洲的火药库

成为帝国主义者蚕食鲸吞的场所，依然还是东北地区。此时，已经在这个地区分踞其南北利权的日本和苏联，正把握中国的内忧为其绝好机会而在策动着进一步控制东北的阴谋。

由于张学良的易帜好不容易才得为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所照耀的东北，在帝国主义的野心之下，已逐渐被造成一个“亚洲的火药库”。

“中东路事件”，就是一个实例。

此一事件，是统一之后的中国和外国所最初点燃的战火。

苏联策划暗杀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东三省北部特警管理局探悉哈尔滨的苏联领事馆内在举行第三国际秘密会议，乃派兵前往搜查，当场捕获中、俄共产党员三十九人，其中包括有苏联派来的“东三省北部共产党执行委员”三人。

根据当时检扣的文书，得知苏联在策划着非常可怕的阴谋。

往来电报暴露阴谋

其中并且有自一九二九年元月至二月间莫斯科和哈尔滨往来的电报，证实其破坏中国社会秩序的意图。

——元月十六日由哈尔滨发往莫斯科第三国际：

“在南京、沈阳及其他要埠，实行暗杀主义。”

——元月十八日由海参威致中东铁路电务处转第三国际代表：

“希详查具报有关暗杀之执行机关、材料、经费等项。如实行暗杀时，以何种中国共产团体最可靠？并将华籍首领人物曾经实际为反共产工作者暨其物质上之保障具报。”

——元月二十三日由莫斯科发给哈尔滨：

“辽宁（东三省）与南京妥协后，吾人应具秘密强固之战线，反抗南京与辽宁妥协。追加经费三十五万卢布，为施行暗杀工作之费用。至吾党嗣后如有不顺利时，第三国际应组织秘密破坏军，以实行破坏东省铁路各机关之计划。”

——二月二十日由莫斯科发给哈尔滨中东路局指示：

“中俄平均用人一节，宜加以阻碍；其无苏联国籍之人，亦须予以开除，以便尽量补充党员。”

在这些电报里，再三出现有“中东路”的名称。

以中东路为侵略工具

“中东路”是以苏联国境内的赤塔附近为起点、海参威为终点，直接横断东三省北部的一条铁路；系依据满清时代李鸿章的卖国密约（中俄密约）而由帝俄所建筑，在中国境内自满洲里到绥芬和之间的本线长一四八四公里及其支线自哈尔滨至长春之间长二四一公里。另在当时为日本所经营的“南满洲铁道”（长春-大连），本来也是属于中东路支线的延长部分，因日俄战争而出让给日本。

俄国革命之后，苏联政府曾经一度宣称将中东路无条件归还中国；但其后则自食其言，而在一九二四年签订的中俄协定中规定由两国共同经营。

这个协定，表面看来像是符合平等的原则，但实际则由苏联方面左右了理事会，任意管理经营；并且铁路局长也由俄人担任，总揽着财政权和人事权。

本来，中国和苏联之间，已经在一九二七年年底由于共产党广州暴动的契机经中国方面通告断绝邦交（苏联方面并未承认），封闭了在中国境内的苏联政府机关；可是在张作霖支配之下的东北，当时尚非国民政府政令之所能及，故而苏联领事馆等机构仍然存在。苏联并且以中东路的组织为工具，要使东北成为其赤化中国的据点。

此时，中华民国既经统一，则收回中东路归属于中国主权之下，实为自东北易帜以来之一项课题。当如前所述的苏联阴谋活动被揭露之后，在中国的立场，则是关系到国家的威信，自不得不临之以强硬态度。

七月七日蒋总统接见了由东北前来北平的张学良，协商有关中东路对策。在此之前，蒋总统和张学良曾经有多次电报往还，但互相晤对则是从这一次开始。

断然驱逐俄籍人员

十日，有外交部长王正廷参加在一起研讨的结果，决定了为收回中东路而驱逐所有俄籍人员之共产主义者的方针，并迅即付诸实行。

十一日，中东路督办兼理事长吕荣寰将俄籍局长叶穆善诺夫免职，委任华籍副局长范其采代理局长；并将俄籍人员五十九人免除职务，遣送回国。

同时，东北电政监督蒋斌并断然将中东路全线铁路专用之外的电信机关收回。此外，特区行政长张景惠也下令解散苏联远东贸易局、商船局、商业联合会等商业机构以及各职业工会。

对于这些措施，苏联政府的反应激烈，七月十三日向国民政府提出强硬要求取消各项措施的最后通牒；国民政府以“此次措置，纯以防止骚乱治安事件之突发为目的”答复苏联，予以拒绝。

苏联政府遂即于七月十八日通知中国驻俄代办夏维崧——“断绝邦交”。可以说这是对于中国在两年前所提出的断交宣告，此时才作了一个答复。苏联在发出通知之后，即日命令其驻华外交官、商务人员以及中东路职员归国；同时停止与中国的铁路交通，并集结军队在东北国境，准备开战。

七月十九日，中国政府收到苏联断交通告的全文。

蒋总统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

‘文中满纸虚伪狡辩，且藉口为豫宣言先收回中东路权是启衅之罪，而其外长加拉罕对我夏（维崧）代表满口诋毁中正，是乃恨我不中其计使然也。惟吾人深望能达绝交目的，而后对国内共党方有彻底办法耳！

‘下午，仍以对俄为集中精神之点，而日本于此又造开战（对俄）之谣；日本幸灾乐祸，固其本怀。’

俄军攻我东北

在关于“中东路”方面，苏联和日本之间的确有某种默契存在。蒋总统在七月十九日的日记中更有这样的记述：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时，苏俄将中东路让渡于日本消息之传播也，盖其时我国收回中东路之呼声日高，苏俄深恐一旦成为事实，故不惜出此最卑劣之手段。于此益足以显示赤色帝国主义者（苏联）与白色帝国主义者（日本）彼此已谅解其利害之一致，而欲协以谋我。此次苏俄之敢出此恐吓手段，当不外为赤、白帝国主义互相勾结之结果。

‘事情发生以后，白色帝国主义者之日本，颇有不甘沉默之概，报章宣传，动色相告，其幸灾乐祸、欲收渔人之利，盖已昭然若揭。’

就在当天，国民政府决定召回驻俄使领馆人员，并向国际间发表宣言，将搜查哈尔滨苏联领事馆的结果公开于世。蒋总统并于同时发出“告东北将士书”，指示为阻止苏联阴谋，应进入紧急防卫态势。

俄军于七月二十日发动攻击，其进攻地点分为三方面——“中东路”西端满洲里，东端绥芬河，以及东北面边境的黑龙江、松花江合流处。

通电全国号召抗战

统一后的中国，受到来自外国的武装侵略，这是最初的经验。蒋总统当时以国民政府主席立场通电全国，号召彻底抗战：

‘今日舍努力拒俄以外无忿懥，除一致对俄以外无出路，诸将士同心一德，共同努力，誓贯彻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目的，以完成国民革命最后之职责。民族存亡，革命成败，争此俄顷。’

此时，苏联已经在国境一带部署了八万人的大部队。

最初发动攻击的地点是在绥芬河。于七月二十日发炮开始攻击，至十二月之间数度进攻，终因中国军队防御坚强，未能得逞。

在黑龙江、松花江合流处，则于七月二十三日扣留中国船只；及至九月，俄军乃在其远东舰队的援护之下发动总攻击——结果，绥滨（九月十九日）、同江（十月十二日）、富锦（十月三十一日）都被攻陷，侵入沿松花江约五十公里。

韩光第力战阵亡

主战场是在满洲里方面，俄军自七月二十六日开始发炮轰击；继之，动员战车、飞机，数度进攻前来～～十一月，满洲里、扎赉诺尔等国境要冲失陷；是月二十四日，连距国境八十公里的海拉尔也被俄军进入。驻守扎赉诺尔的中国部队第十七旅七千官兵，在一昼夜的激战之后伤亡殆尽，旅长韩光第阵亡。

当进行抗战的同时，国民政府并力谋通过外交折冲，和平解决纷争。

在驻德公使蒋作宾的请托之下，德国政府出面调停，在柏林有所接洽；但因苏联毫无让步之意，以致斡旋工作归于失败。

十一月二十六日，国民政府吁请各国组织调查团，来华调查被侵略的实际情况。

于是，美、英、法三国乃于十二月三日通告中、俄两国，要求停战，准备进行调停；可是，苏联则表示：须由两国直接谈判，拒绝第三者介入。

日本与共匪乘机而动

此时，美国曾经邀请日本共同进行调停，但日本予以拒绝。日本在事件发生之际，便向长春增加兵力，并举行实弹演习；同时拒绝中国军队通过“南满铁路”——不声不响地协助苏联对中国的攻击。因此，中国部队在弹药、军粮方面的补给受到了重大阻碍。

在这一段期间，和俄军的进攻商量好的，就是共产党的活动也积极起来了。十月底，在广东海、陆丰方面开始蠢动；接着由毛泽东、朱德等人所率领的共军在粤、闽、赣边境进行暴动，翌年二月，成立“江西省苏维埃”于瑞金。

正当中、苏冲突的当口，国内并进行着对中央造反的冯玉祥的讨伐战争，是故国民政府乃不得不和来自内外两方面的敌人周旋。

所谓伯力议定书

中、苏直接交涉，自十二月十六日开始在伯力由中国代表蔡运升和苏联外交部代表苏曼诺夫斯基进行谈判，结果，于二十二日签订了所谓“伯力议定书”。

然而，这个议定书的内容包括有：（一）苏联的中东路局理事、局长、副局长复职；（二）互相释放在冲突期间的被逮捕者；（三）取消俄籍职员的免职处分，并发给其停职期间的待遇；（四）由中国官宪将白俄武装解除，并驱逐其首领于东三省境外；（五）恢复在双方的领事馆及商业机构等项——等于是接纳了苏联方面的片面主张。在国民政府立场，自然不能予以批准。

因此，国民政府乃改派新任“中东路”督办莫德惠前往莫斯科，要求重行交涉；但苏联坚持仍以伯力议定书为有效，谈判进行困难，自翌年～一九三○年十月开始，先后经过二十五次会议，毫无成果；而东北便在一九三一年为“九一八事变”的战火所卷没。

────参考资料────┤

请注意，在民国十八年七月十日，中央政府决定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而与侵犯我国主权的邻邦发生冲突，这个维护国家主权的行动转换为国内的“罢工、地方暴动和兵变”，

乳共到底是在为谁的利益办事！！？？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第一八四页，刘吉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华民国八十年六月第一版。

１９２９年８至１１月，在中国东北发生了"中东路事件"，国民党○动派的军队在中苏边境同苏联红军发生了冲突。另一方面，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也越演越烈。在此情况之下，共产国际于１０月２６日又给中共中央指示信，认为"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革命高涨的形势已经到了夺取政权的"第三时期"，要求中共中央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全力发展政治罢工，夺取中心城市，"变军阀战争为阶级的国内战争，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政权"，"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１９３０年１月，中共中央通过《接受国际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２６日指示信的决议》。２月２６日，又发布了一个《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的第７０号通告，认为"目前全国危机是在日益深入"，主张党应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组织工人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和兵变，调动红军"向着交通要道中心城市发展。"５月，中共中央又在上海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各红军代表会议，确定了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行动方针。

◎自由人注：“国民党○动派”中的○是我改为圆圈。当政府为国◎家主权在奋战的时候，乳共接受苏俄指示，在政府背◎后制造地方暴动和兵变，间接破坏国家主权！！

──────┤

各地的投机变乱

虽然已经面临了苏联侵略东北的国家危机，可是中国国内不仅未能举国一致抵御外侮，而且地方军对中央的叛乱行动还在继续之中。

第一个是张发奎，他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担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时，在广东发动政变（由于此一政变引起混乱而成为共产党广州暴动的导因），失败之后，一度解除军职；及至一九二九年春，当桂系叛乱之际，拥护政府，遂被起用为第四师师长，驻军湖北宜昌。然而他当时并非服从国民政府，乃是打算等候着汪兆铭自法国归来好有所举动。

一九二九年九月，退守豫西及陕西一带的冯玉祥军再度有异动的风声，国民政府乃下令张发奎部队调赴陇海铁路担任防务，可是张发奎却抗不遵命，反而通电拥护汪兆铭，并要求改组党务，且即率军南下进入湖南，计划攻夺广东，接应汪兆铭。

九月二十日，政府下令将张发奎免职，同时命四川、湖南军队堵住张发奎回粤。

张军在经过石门、慈利、桃源途中逃脱国军拦击，据守在溆浦、新化、安化一带山区。

对张发奎的行动表示响应的，是广西省主席俞作柏和师长李明瑞突然于九月二十七日背叛中央，宣告独立。

国民政府乃命令陈济棠率军于十月七日出动讨伐，由粤、桂边境的梧州攻入广西；桂军将领杨腾辉立即誓言服从中央，俞作柏则逃亡到远在安南国境附近的龙州。

与此同时，在西北方面冯玉祥系的动态也颇为紧迫，冯部宋哲元、石敬亭等人已下令其部队东进。

蒋总统在十月八日的日记中记下：

‘呜呼！如此投机反动之军队不灭，国家何能统一？’

国庆节的十月十日，宋哲元、石敬亭等二十七人联名通电反抗中央，反对编遣国军；此时，他们的首领冯玉祥还闲居在山西省的五台阎锡山处，当然他和这些作乱的部属是有着联系的。

冯玉祥属下的部队大约有二十万人以上，他们在发出通电的同时，便分兵九路由陕西推进河南，设司令部于洛阳，沿陇海铁路东进，并且别遣一支部队南下，有指向武汉之势。

国民政府立即于十一日下令将宋、石等人免职拿办，并决定武力讨伐的方针。

蒋总统告全军将士

十四日，蒋总统亲自担任讨伐军总司令，并发表“告全国将士书”：

‘汉、贼不两立，革命与反革命不共存，我不消灭逆军，即将为逆军所消灭。各将士……应为党国而牺牲，为生存而团结，以铲除反动势力之根株，而完成革命军人之天职。’

开赴讨伐前线的是唐生智、方鼎英所率领的国军，十月底，挺进到洛阳东南的临汝、登封、黑石关之线，与宋哲元、孙良诚、石敬亭等所部逆军展开激战。

‘中正奉命督师讨伐，于本（十一）月三日驰抵许昌，该逆等悉其精锐，并力东犯，先已夺占登封、临汝镇各要地，旋又进陷密县，意存直冲许昌，郑州，截断我平汉、陇海交通。’（注一）

密县叛军虽被击退，但全线并未后撤，遂即形成大规模的战争。

‘登封由孙良诚统率、临汝镇则由宋哲元亲督各逆部，两周以来，迭次猛扑我军阵地，均经击退，犹复恃险顽抗。

‘为此增调部队、严密包围，部署既毕，并将登封、临汝镇两地附近各要隘先后占领；始于删（十五）日下令总攻击。我军既于铣（十六）日下午克复登封城；临汝镇方面宋哲元犹亲督各部份逆军作最后之挣扎，于铣日晨猛烈反攻，重炮、迫击炮等百余门尽行加入前线，炮火之烈，前未曾有。

‘我第十军杨军长杰、第四十八军徐师长源泉等各将士效死肉搏，前仆后继，血战终日，迄未稍动，并夺获逆军坦克车四架。

‘至晚，宋逆哲元不支，狼狈西遁，遗弃辎重粮秣，溃不成军。

‘我军即于篠（十七）日克服临汝县，俘虏逆军官长、士兵二万余名。逆军经此两役，精锐尽已丧失。……’（注二）

中央军继续追击，于二十日进入洛阳；逆军则更向西方逃亡。——自春间以来冯玉祥系的连续叛乱行动，至此才告一段落。

在这段期间，一直窝藏着冯玉祥的阎锡山，却使他自己的晋军按兵不动，而对于冯玉祥的失利战况作壁上观；阎锡山之所以如此，是有着他的打算的。

注一、二：蒋总统-“上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电”（一九二九十一）

明是非别顺逆

正当中央军和冯玉祥部队展开大激战的时候，南方的叛乱再起，盘踞湖南省山岳地区的张发奎，将所属部队向广西省北部移动，于十一月十六日在恭城发出通电，自称“护党救国军第八路总司令”，声言要攻取广东；于是，广西省主席吕焕炎（因参加叛乱被政府讨伐而逃亡的俞作柏之后任）竟起而追随张发奎，李宗仁的残党也加以响应。

此时，刚好是因中东路事件发生，满洲里被俄军攻占之际。

中央乃任命何应钦为广州行营主任，指挥迎击。

何应钦率领数师兵力于十二月二日抵达广州；十日大破叛军于广州北方约五十公里的花县；十九日进驻广西梧州，将叛军敉平。

在各地发生连锁反应

然而，叛乱活动就像是传染病一样，陆续在各地发生了连锁反应。

跟在后面，就是石友三和唐生智。

国民政府当桂系和张发奎军队入侵广东之际，下令驻军安徽的石友三协防广东，并命唐生智南下，断张发奎后路。可是石友三的部队竟拒绝调往广东而发动兵变，十二月二日石友三自称“护党救国军第五路总司令”，有进袭首都南京之势。

唐生智是当冯玉祥叛乱时受命国民政府指挥讨伐军对冯军作战，驻军于河南郑州一带；十二月五日，突然通电自称就任“护党救国军第四路总司令”，响应石友三，同时表示“拥汪（兆铭）联张（发奎）”，企图沿平汉路南下，夺取武汉。

对于这样的事态，蒋总统在当时曾经招待记者，发表谈话如下：

假革命常自取淘汰

‘石友三部之哗变与唐生智之附逆，固非余始料所及；余待人以诚，对于唐等皆推心置腹。

‘以前，有谓唐生智反覆成性，终必叛变，劝余勿加重用者；余绝不怀疑，始终欲引导其入革命之正轨。——今竟如此，余实自愧！

‘但此亦非绝对意外之事，或竟可认为革命进行中必须经过之程序；尤其是革命将近成功之时，假革命与反革命者常自取淘汰。故为革命计，对于此等叛变，不但不必悲观，竟可认为乐观也。……

‘余受党、国付托，负有重大责任，岂肯为若辈动摇？’

七日，国民政府下令将唐生智褫职，并通缉拿办。

九日，蒋总统发表“告全国将士电”，重申完成革命之决心：

‘……革命政府决不致因一、二武人之叛变而动摇；且革命政府当危急存亡之秋，更当以革命之精神作革命之奋斗——肃清叛逆，整饬纪纲，始能完成其使命。

‘当陈逆炯明叛变之时（一九二二年）仅余中山舰。……况今日革命环境之顺利，远过于昔日；革命势力之雄厚，远甚于当年。……

‘中正不仅具消弭叛逆之决心，且深信有消弭叛逆之把握。望我将士明是非，别顺逆，切勿蔽于谣言而堕奸计。’

十二月二十日，阎锡山、张学良等人响应号召，联名通电“坚决拥护中央统一”。

于是，看到形势已趋于不利的石友三，遂即未经作战便戢兵听命。

唐生智叛军为大雪所困

剩下来的唐生智叛军，受到中央军和阎军南北夹攻，加上当此情势之下的十二月初，河南连续下着数十年来未曾见过的大雪，平地积雪深达一公尺以上，唐军虽曾顽强抵抗，但多数官兵为遥远南方的湖南省出身，被围困在冰天雪地之中，给养断绝，冻伤者日益增加。

一九三○年元月二日，中央军在驻马店进攻得手，饥寒交迫的唐生智所部遂即全线崩溃。

十三日，中央军将唐生智全军一万六千人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之下解除其武装，收缴枪械一万三千余支，炮类一百余门。翌日，连续四十多天的大雪初霁，太阳出现。

唐生智本人化装脱离开封，逃往天津日本租界转赴香港。

对于中央的作乱、反抗，虽然如上所述地已被一一着实敉平，可是这些人却并非就此甘休。

其后，他们打算捧出来的，就是阎锡山。

在此之前，阎锡山对于军权与财政向中央集中统一，固然也是内心不服，但却还没有公然反对的表现，而只是取观望态度，一心一意保存其晋军实力，以坐待中央军的消耗。及至各方面反中央的活动一一溃灭的此刻，阎锡山本人才以“反中央”中心人物的地位出现；为他后盾的，则是过去称兵作乱的联合阵线。

刚由欧洲归国的汪兆铭，也参加了这个阴谋活动。

“中原战争”

一九三○年二月十日，阎锡山致电蒋总统，突然要求下野，内容是这样的：

“山（阎）窃愿追随钧座共息仔肩。……礼让为国，为黄胄民族固有之精神；在野负责，为今日救国唯一之途径。……”

阎锡山以有意“共息仔肩”而要求蒋总统引退，言词动人听闻，虽是一种很巧妙的策略，但实则毋宁说是公开了他的“反中央”立场。其证据，就是他已经在暗中移动晋军南下，开始准备作战。

蒋总统乃于十二日答覆阎锡山，拒绝其所提辞职要求：

‘际此外患内忧正亟，个人进退，一以党国命令为依归。’

随后，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并于二十日发表“告同胞书”。声明中央决定：“如有称兵作乱者，当以武力讨平之。”对阎锡山间接表示告诫。

阎冯李汪汇集一起

针对中央的态度，阎锡山则与冯玉祥、李宗仁等四十五人于二月二十三日联名通电，反对中央，并扬言要求对国军编遣会议，重作决定；汪兆铭也立即响应。

一再离合集散、反覆倡乱的人士，现在汇集一起，燃起了“反中央”的烽火，事态自非简单。

‘时局虽有发展，但策略难定。——联此制彼，或联彼制此，皆非正本之道也。’（蒋总统三月五日日记）

‘已叛而未归，反覆无常者，不必姑息，此辈盖无所谓信义也；无论联甲联乙、与其联人以落边际，不如任其自斗，我则整理内部，充足兵力，或使甲乙皆得归顺效命而不敢斗也。’（三月八日日记）

继之，冯玉祥的部属鹿钟麟等五十七人复于三月十五日联名通电拥护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可是张学良则拒不就任，并向中央表示对于此事毫未预闻。

就在这个前后，晋军侵入北平，将政府所属军、政机关封闭、接收，并沿平汉、陇海两铁路推进及增强兵力。

‘当此反动派联合倒我，而我乃回里，必予反动派以造谣机会。实则我心目中本无敌人，盖吾之所信者为主义，与主义背驰者，其足为吾敌哉！’（三月十九日日记）

至此中央乃决心诉诸武力裁决。

四月五日，国民政府下令通缉阎锡山。

这一次叛乱，从参加的人和所发动的规模说来，都是国民政府前所未有的大敌。

中央布达讨伐令

五月一日，中央对全军布达讨伐令。

在中国近代史上被称为空前的大内战——“中原战争”于焉展开。

首先成为焦点的，为豫省境内陇海铁路的攻防战。中央军对面的敌人，乃是冯玉祥。

冯玉祥在这次叛乱中，受到阎锡山供给八十万元军费及大量最新式武器、弹药；整编部属为三个军团，以鹿钟麟为前敌总指挥，孙良诚、刘郁芬、宋哲元分任第一、二、三军团司令。十七日自陕西潼关出发，迅即沿陇海铁路东向河南推进，占领开封、归德（商邱）等冲要地区，且复近迫江苏徐州。

中央军于五月十二日以第二军团第三师为前锋，自徐州沿陇海路西进迎击。

五月十八日，中央军克复归德，将该地叛军解除武装；六月一日，更压迫叛军后退到开封附近的兰封。

然而，在这里叛军兵力增多，力谋加强抵抗；且阎、冯两军的骑兵也出没扰乱于国军后方，战局陷入胶着状态。

中央军第三军团主力集中于郾城附近，挥师北上，在许昌、临颖一带展开激战。六月六日，中央军飞机空袭许昌，将城内叛军将领樊钟秀炸死，叛军士气受挫，第三军团乃于七日克复了许昌。

不过，在第三军团这一方面，至此也就难以继续推进。

当中央军和冯、阎所部在中原地区持续苦战之际，南方李宗仁、张发奎残余部队约四万人又恢复了实力北上，威胁中央军后方。

此时，担任南方叛军前锋的，是白崇禧。他指挥所部由广西侵入湖南，陆续于五月二十七日、六月三日、八日先后攻陷衡阳、长沙、岳州（岳阳），控制了湖南并进迫武汉。

于是，中央军南北腹背受敌，因而处于困境。

何应钦挥军夹击

不过，正当此时，李宗仁、张发奎两人为了湖南省政府主席人选而发生内讧；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乃把握时机指挥中央军第八路军、第四路军分自粤北、湖北夹击叛军，扭转了情势。

中央军于六月十五日克服岳州；两天之后，更在敢死队与海军的积极行动之下，夺回长沙。

南方的危机，乃为之消弭。

兵连祸结六个月

继中原、湖南战争之后的第三战线，是在北方的山东省。

业已占据了北平的阎锡山所部晋军，于六月二十四日由傅作义率领大军在山东省城附近渡过黄河南下。

中央军以第一军团为主力沿津浦铁路布防，迎击晋军；但因韩复矩所部败退，济南迅即失守。

七月十二日，曲阜城被叛军炮击，中央军于山东全线处于守势。

所谓“扩大会议”

叛军在战况有利的背景之下，乃转采新的政治攻势。——在阎锡山方面，汪兆铭已派遣陈公博到达，进行协商，连西山会议派的邹鲁、谢持等也有所联络；遂由阎、冯、汪等人于七月十三日发起在北平举行所谓“扩大会议”。

情势颇为危急，蒋总统在七月十五日的日记中记述如下：

‘当此之时，唯有忍守镇静，维系军心，以待其定，而期有济。若至万不得已，则唯有一死以殉党国。否则，后退一步，革命大业全归乌有，乃成为民族千古罪人矣！’

八月七日，“扩大会议”在北平举行第一次会议，发表“蒋介石藉党治名义实行独裁”等诽谤宣言，并阴谋另组“国民政府”。

可是，在这个期间，中央军逐渐扭转态势，易守为攻，蒋总统并亲上前线督战。

七月二十一日，中央军攻下了威胁中原战线侧翼的毫州城。

‘以后，我军后顾无虑，军队运用亦可自如矣！唯成功与失败，常在一间，危险反可为安全之本。今后乃可在津浦路速求决战矣！’（七月二十二日日记）

八月二日，中央军在北方战线的泰安展开总攻击，并即将该县克复。

危急之时须有定力

蒋总统在浴血苦战的前线，展读总理遗书，感到战局固然艰苦，但是如果与当年总理在广州时所受之困难相较，还是好得很多。

‘益觉今日环境之优裕，足使人倍增勇气也。战局实已至优胜之境，三年以来，冯军对陇海正面反攻，亦不过多用炮击，而其步兵实皆惜死，不敢接近也。’（八月五日日记）

‘近日所得战报，每多危急，如无定力，未有不为所动者。无论接何急报，须休息五分钟，再加审察，则真相渐明，心神亦定，不为所欺矣！’（八月十三日日记）

八月十五日，中央军终于克复济南。刚逢黄河涨水，退路阻绝的叛军，除极少数人舍弃装备，渡河逃走之外，差不多都成了俘虏或是在强行渡河时溺毙。此役缴收武器——枪，三万余枝；炮，二百多门。

中央军在济南的胜利，对于整个战局大势造成了决定性的作用。继而，又在陇海铁路沿线，击破宋哲元、孙殿英部队于宁陵，将之向西北方面逐退。

不过，当此阶段，汇聚于北平的叛乱领导分子之政治活动也正在进行之中。九月一日，他们擅行公布“国民政府组织大纲”，推举阎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并以阎锡山、冯玉祥、汪兆铭、李宗仁、唐绍仪、谢持、张学良七人为“国民政府委员”。

阎锡山于九月九日就任“主席”，发表所谓“公平内政，均善外交”的宣言。

可是，这个伪政府的寿命实在太短。

张学良出兵拥护中央

叛乱分子们最大的失策，是错估了东北边防总司令长官张学良的动向。

他们极力劝说统驭东北军的张学良，希望他能就任其“国民政府委员”，参加叛乱阵营。同时，日本也对张学良施以压力，要他接受。

但张学良则加以拒绝，而于九月十八日通电拥护中央，并出军入关向北平进击。

见到张学良通电的阎锡山，鉴于大势已去，遂即日通电“下野”，率领所部退回山西，“主席”在位只不过十天。

汪兆铭也于二十日不声不响地离开北平。

‘回忆十二年前，执信之死，胡、汪皆痛哭，是乃党谊，亦为私情也（胡汉民、朱执信、汪兆铭曾在日本法政学校同学）！当时精诚团结，何其亲爱；今汪精卫自走绝路，可叹！如执信在，汪决不致卑污如此乎？弥令人痛念执信也！’（九月二十一日日记）

北平、天津，则由张学良军队进驻。

此时，中央军仍然在追击叛军～～十月九日克洛阳，二十五日下潼关，二十九日到达西安。

阎锡山、冯玉祥二人，于十一月四日声明“释权归田”，阎自天津化装逃往大连，冯亦自山西逃出。

叛乱活动终息

兵连祸结达六个月之久的“中原战争”，到此才算终息。

此次讨伐六十万叛军，中央军动员百万；死伤人数，叛军达二十万，中央军九万五千。

为统一中华民国所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

共党采用流寇方法

对于统一不久的中华民国说来，还有一个敌人，就是共产党。此时的中国，正面临着东北野心勃勃的“日”、“俄”两国“外患”，再加上反覆叛乱的“军阀”和“共产党”两大“内忧”的内外受敌情势。

所谓“立三路线”

“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七年下半年一连串的武装暴动失败之后，潜伏各地继续活动。当时，他们内部首屈一指的实力分子是李立三，在他的领导之下所奔驰的暴动途径，是所谓“立三路线”。

‘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七月，莫斯科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正是史达林于击败托洛斯基“左派”之后，转向布哈林“右派”斗争；为了进攻右派，史达林的政策转向左倾。在他这左倾的动向之下，“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八年七月在莫斯科举行）不仅继续其过去已告失败的暴动政策，并且更加激化。

‘“大会”决议案以“推翻国民政府”、“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和“建立苏维埃政府”为中心的“十大要求”，便是“李立三路线”的根据。……

‘民国十六年，中共“八七会议”的指导者纽曼，乃是苏俄的暴动专家，……十七年以后，纽堡的“武装暴动”乃成为中共的城市暴动和农村暴动的教程。……

‘但是，共匪学会了俄国式的武装暴动方法之外，还采取了中国旧时流寇式的暴动方法。’（注）

流寇，是纠结党羽、游击窜扰、出没不定的盗匪。毛泽东就是最初采用这种方式的首领。

毛泽东盘踞井岗山

在一九二七年“两湖秋收暴动”失败之后的毛泽东，被政府军所追逐，乃盘踞于湘、赣边界的井岗山。

井岗山是海拔一五○○～一七○○公尺、颇为广阔的高原状山地，四周断崖绝壁，天然险要之区，当时，有王佐、袁文才等土匪、土豪啸聚。

毛泽东率领败残的“工农第一军第一师”挣扎到那里的时候，只不过是四百人左右；遂即拉拢王、袁等人入伙，纠结成全体有六百人的一个集团。

毛泽东每伺机出动，劫掠附近农村人民的财产、食粮，以资给养；而且杀害乡镇长，重行编组农民，逐渐赤化各村庄；不久，乃成立了所谓“湘赣边区工农政权”，自称“主席”。

及至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开始不久之前的一九二八年三月，有前在南昌暴动后流动于粤北、湘南的朱德率领陈毅、林彪等到井岗山汇合，此即所谓“朱毛合作”。于是，共产匪军遂超过了三千人，创设所谓“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红四军），朱任军长，毛任“政治委员”。

当时，国民政府虽因二次北伐而不能分出较大兵力来讨伐共匪，但江西省主席朱培德还是在一九二八年六月着师长杨如轩率兵六团会合湖南部队二团进攻井岗山；可是遭遇失败。

当北伐军收复北平，北方情势告一段落的七月间，何键所属湖南独立第五师团长彭德怀突然叛变，打着“工农红军第五军”的旗号，与井岗山的朱毛汇合，共匪的行动半径乃为之逐渐扩大——赣西、湘东的莲花、永新、醴陵等主要城市，时时受到侵害。

朱培德何键指挥剿匪

国民政府遂即于十一月六日任命朱培德为“湘赣两省剿匪总指挥”，着手进剿井岗山；及至一九二九年元月一日，复以富有剿匪经验的何键代理总指挥。

剿匪作战于元月下旬开始，动员十余团兵力，进入人迹不至的山谷中徐徐缩小包围圈。

得知国军入山围剿的匪军，乃立即放弃井岗山，突围逃出，朱毛率领的“红四军”南下逃往闽西；彭德怀的“红五军”则北窜湘、鄂、赣边境。

毛泽东所潜伏的闽西南部，地形险峻，对外交通不便，文化与经济均属落后，对共产党来说，则恰是易于活动的地区。

毛泽东很快地便和张鼎承、傅柏萃等土著共产主义者结合，占领上杭、武平、龙岩，并进袭长汀。

长汀原驻有政府军郭凤鸣旅，不意被匪军突袭而全军覆没，郭凤鸣阵亡。由于此一败仗，颇多武器弹药遂为匪军所掠夺。

此时，在东北方面和苏联之间发生了中东路事件，在中原与南方陆续有冯玉祥、李宗仁的叛乱，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难以贯彻到基层，乃是不得已的情况。

毛泽东等乘此机会，不仅进入了福建，更且又伸展到了江西，占据了兴国、宁都、瑞金等地。

他们的战术是——当政府军赶来讨伐时，并不迎敌而逃入山区；转过身来，便向警备力量薄弱的地点进袭。

他们就是这样地在赣闽边境建立了所谓“中央苏区”。

注：蒋总统-“苏俄在中国”（一九五六十二）

到处抢掠烧杀

当中国共产党徒朱德、毛泽东等人在赣南形成“中央苏区”的一九三○年，以徐向前、张国焘为首领的“鄂豫晚苏区”等大小“苏区”就像脓疱一样在各地出现。

他们或挑动地方人士相互斗争，转移对共产党的压力，或煽起暴动，或策动兵变，或吸收土匪。……用尽了各种手段，以扩张其势力。

以李立三为最高领导者的共产党，于五月间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出席“共党”、“各地工会”、“匪军”及各“苏区代表”计四十九人。

“大会”决定在若干中心都市武装暴动，循此途径造成全国混乱，进而夺取政权。

此时，中原方面发生阎锡山、冯玉祥的叛乱，政府军正在河南省作战之中。

袭击长沙南昌武汉

共产党抓住这个机会，遂选定长沙、南昌、武汉为暴动地点，由彭德怀、朱德、毛泽东、贺龙等人出动攻击，打算先袭取南昌、长沙，再北上进犯武汉。

彭德怀率领所改编的匪军“红三军团”突袭长沙，是在七月二十七日。

先是长沙在六月间被李宗仁、张发奎叛军一度占领之后，旋即为湖南省主席何键所率领之中央军夺回；其后，中央军为继续追击叛军而南下，长沙形成真空状态。

此时，约有三万匪军打着红旗杀到长沙，潜伏在城内的共党分子也起而响应，省政府以下各公务机关以及何键等重要人士的私宅都被一一放火烧毁，连中山路等繁华街道都成了废墟。

彭德怀于二十八日宣称——建立以李立三为“主席”的“长沙苏维埃政权”，但市区实则陷入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攻击外侨

共党匪军对于外侨也给予了无差别的攻击，他们宣言接收外国人资产，各国领事馆也都被侵袭，停泊在流经长沙旁边湘江上的美、英、日等国舰舶都受到炮轰，导致各国炮舰发炮还击。

据日本方面资料～～二十八日，日本驻长沙领事馆被共军纵火焚烧。又据长沙领事糟谷廉二于八月三日报经汉口总领事馆转达外相币原喜重郎的第二八六号特急电报称：七月三十一日下午五时许，日本的小火轮“江南丸”受到共军枪击；因此，在警戒中的“二见”、“小鹰”两艘军舰乃向共军开炮应战，“二见”施放大炮五发，机关枪一千三百发，“小鹰”发射枪炮大致同数，此外，美、英、义各国军舰也在发炮。

于是，日、美、英各国乃因此一长沙事件而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并摆出不惜武力干涉的态势；如果像这样继续下去，则将有造成“第二南京事件”之可能。

此时，国民政府已下令何键迅速收复长沙。

何键收复长沙

何键于八月三日清晨，指挥大军集结于长沙西面的岳麓山，在军舰炮击的援护之下渡过湘江，冲进长沙，两天之后的五日，平定了全市。

彭德怀所部匪军，向东面退到平江、浏阳一带，掳走了所掠夺的武器及多额现金与庞大物资。

另一方面，在和彭德怀袭击长沙的同时，朱毛的“红一军团”则于七月三十一日进犯南昌，被中央军击退，向西逃跑，途经城市肆行抢掠。及进入湘省，乃与平江、浏阳地区的彭德怀部合流。

八月十六日，国民政府命令讨伐李宗仁、张发奎之战刚刚结束的何应钦，进剿赣、湘两省匪军，对之加强警戒。

此际，“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合流之后的匪军，复于八月三十一日再度进犯长沙，但被政府军所击退。

九月二日，匪军三度进攻前来，可是反而被政府军全力反击，受到极大损害，复向东方逃窜。在这次战役中，朱德曾经负伤。

在此次长沙攻防战之际，何键军队进入长沙附近的湘潭县韶山毛泽东的家乡，捕获他最初的妻子杨开慧，以叛乱罪执行枪决。

朱毛等人乃向其“中央苏区”退却，途次攻陷江西中部“吉安”，自十月初旬盘踞达一个半月，城内居民多数被杀害，被掳掠金、银达数千万元。

李立三自此没落

暴动路线失败的李立三，其后被第三国际批判为“犯了极左冒险主义的错误”，翌年，被剥夺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他自一开始就是在第三国际的指示之下行事，但一经失败，第三国际便把责任强加之于李立三来背负。——这就是共产主义者一贯的手段。

李立三后来于一九四五年复任中共中央委员，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批判，再度没落。

共产党在暴动方面固属失败，但却显然逐渐增蓄了力量；他们的力量，虽则还不够攻击大都市，可是已经在边区建立了广大的根据地，随时能够出动上万人数的匪军，肆意侵袭地方小城市。如果听其自然，则对于中国的建国将会是重大的威胁。

是故国民政府决计一俟“中原战争”结束，便着手对于共产匪军进行正规的讨伐。

赣闽边境剿匪

一九三○年十二月五日，蒋总统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义发表“告误入共产匪党民众书”，给予彼等以归顺机会；同时由南京出发，视察各地匪军叛乱情况，九日，抵达江西省南昌，立即召集“剿匪军事会议”，策定第一次剿匪作战计划。

展开首次进剿行动

攻击目标，是盘踞在赣南和福建边境所谓“中央苏区”的朱德、毛泽东匪军。

在这个地区的匪军，是以所谓“第一军团”（总指挥朱德）、“第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为中心，推断其兵力约四万二千人。

国民政府为讨伐这些匪军，决定动员第六路、第九路、第十九路各军及航空队，总计四万四千人。二十六日，任命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指挥进剿。

二十九日，第一次剿共战事开始，第九路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所属先头部队由赣南东固向龙冈攻击前进。

实则，此时第十九路军还在后方泰和，而第六路、第九路军的后续部队，也由于补给困难等因素，尚未完成部署；是在动员未够完备的状态之下发动进攻的。

张辉瓒的部队攻克龙冈时，已经是下午六点钟。龙冈为四面环山的凹地，地形不利于攻击作战；而且季节刚过冬至，夜幕低垂，附近发现不到一个人影，盖居民都已被匪军赶往山中。

好不容易捕获一个匪军斥候，经盘问之后，据供称：“埋伏在东边和北边的山里面”。根据这个供词，张辉瓒乃于翌日～三十日拂晓姑且向东推进。此时，还在搜索前进，实在是有欠审慎。

凭藉地利的匪军，已经远远地将讨伐军包围起来并派出间谍和斥候，盯紧着张军的一举一动，窥伺反扑机会。

凌晨五时，张部先头部队在龙冈东南方与匪军开始接触，起初认为匪军人数似乎不多；可是转眼之间，便有大量援军自东、西、北三面袭击过来。

张辉瓒壮烈成仁

张辉瓒指挥讨伐军奋勇应战，激战两小时之后，毙、伤匪军约千人，俘获四十多人，一度将之击退。

当时，据俘虏供述：朱德、毛泽东、彭德怀等首领都在前线指挥。

张辉瓒得知这个情况，乃意图乘此机会擒贼擒王，而重行发动攻击，可是，只见匪军的包围网越发增强，战况反陷于不利，遂即向停留在东固的部属及其他友军求援，但为时已晚。

讨伐军左右两翼阵线迅被突破，陷入匪军的切断包围之下。

时机不巧，更碰上骤雨下降，视界障阻；相反地对于熟悉地形的匪军来说，则是再也不会有比这样更有利的情况，在匪军波状冲击之下，讨伐军的副旅长、团长等指挥官相继牺牲。

入夜之后，师部阵地复被突破，讨伐军终于在重重围困之下覆没。

张辉瓒为匪军所俘。

张辉瓒籍隶湖南长沙，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与毛泽东曾有面识，故在被俘之后，匪军一再劝降，张辉瓒坚决拒绝，过了一个月，遂被杀害，首级被置于木盒中丢到河里，流入赣江，被居民捞起，葬于长沙郊外岳麓山。

蒋总统在南京得到张辉瓒殉难的报告，写下左列八个字，以志悼念：‘呜呼石侯（张辉瓒别号），魂兮归来！’

前往增援的第九路军第五十师（师长谭道源），得到“第十八师被歼”的报告，乃避免深入，但还是在东韶南方的山中受到由龙冈调来的彭德怀、林彪等匪军突袭，谭道源勉强突围而出，官兵牺牲甚大。

第一次剿匪战役，于元月三日结束。由于这一次的失败，结果被匪军掳去步枪四千枝，机关枪四十余挺。

二次讨伐遭匪拦击

国民政府接着准备第二次讨伐。

二月十日，以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南昌行营主任。

这一次进剿的讨伐军，是将参加第一次战役的第六路、第九路、第十九路各军补训之后，再加上由湖南、山东调来的第五路和第二十六路军的精锐部队，总兵力十一个师，约达十一万三千人。以匪军根据地宁都为目标，构成严密包围网，然后再发动攻击。

在另一方面，匪军也扩充为十一个军，约六万六千人。

在讨伐军第一次进剿失败之后，匪军已经伸展控制到了石城、瑞金等地；为防范第二次进剿，极力构筑阵地，储备食粮。

第二次进剿，于四月一日开始。

讨伐军大致分兵七路，在富田、水南、藤田等地一面战斗，一面向匪军根据地徐徐挺进。

五月十六日，第五路军第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及第四十七师之一个旅向通往龙冈途中的东固展开攻击。

未料在这里竟被匪军拦击围攻，受到几乎全军覆没的损害。

准备三次进剿

讨伐军的兵力，超过匪军一倍，火力也占有绝对优势。如果在正常情况之下作战，当然有击破敌人主力的战斗条件；可是，由于匪军善于利用山岳地区的地形，能够从包围网中钻隙出没，而采取了将讨伐军切断、围困的反击战术。是故第五路军第四十三师及第二十六路、第六路军所属各师，也都又重蹈第二十八师的前辙，被各个击破。

结果，第二次进剿约历时两个月，复告失败。

赣湘受匪荼毒最深

‘受赤匪荼毒最烈而最惨者——厥唯江西与湖南，而湖北次之。

‘今试就赣、湘二省有形之损失言之，其统计已至堪惊人。

‘江西人民被匪惨杀者，约十八万六千人，难民之阵亡者，约二百十万人；各线被匪焚毁之民房，约十万余栋，财产之损失约六万万五千万元，谷米之损失约三千九百万担。

‘湖南之匪祸蔓延，虽不若江西之广，而损失亦不相上下。——计被匪惨杀者约七万二千人，房屋被毁者约十二万余栋，财产之损失约三万万元。

‘当匪祸最炽之时，江西全省八十一县之中，计全县有匪者，有宁都、兴国等十一县；大部有匪者，有瑞金、萍乡等二十五县。……其间，人民之喘息流离幸免于死者，亦势将无以为生。……

‘凡赤匪蹂躏之区，男女八岁以上，十六岁以下者，编为儿童团；十六岁以上，二十三岁以下者，编为先锋队；二十三岁以上，四十岁以下者，编为赤卫队。以甲村而推乙村，以一乡而及一县，日夜胁迫，暴动所至，十室九空。

‘设长此以往，全国国民不再奋起一致引扑灭赤祸为己任，则新中国未来之生命，必将如赤色帝国主义之愿望而中斩。……’

像这样地对全国国民含有警告性的文字，乃是蒋总统在第二次进剿战事正酣的五月十二日向国民会议所提出“剿灭赤匪报告”中之一节。

居住在沦入共产党盘踞地区的人民，其悲惨景况，真叫人不忍卒睹。

匪裹胁人民对付讨伐军

在这里引录一件没收的文书——四川省通江县南一区六乡“苏维埃政府”下达共产党村干部的命令。从这个文件，就可以说明他们打着“苏维埃政府”的旗号来强迫和榨取人民的状况。

“四村负责同志：

“我乡顷接区苏委的通知，叫把各种工作统统限一星期做好完成。特将工作逐一列左：

“自十月二十号（发信日期已经是十月二十四日）每村要扩大红军五名，少年先锋团五名，战斗连四名，运输队四名，担架队二名，工人团二名，宣传队三名，查田队三名。

“再者，每村要硝磺（火药用）三十斤（十八公斤），每村要打棉军服二十套，限十日完成，送交上级。

“再有你村的谷（谷）子，完全集中区苏，乡村不许保存颗粒。

“再有你村的豪绅、地主、及反动派，捉获了好多？跑了好多？于十日内做一详细册子送来，以好呈报。

“刻下急需裁缝、铁匠、炭匠及木板、竹子、大锅，请你村赶快办到。

“这一个星期内各种紧要工作，希你逐一抓紧执行，才免得上级说我们只晓得吃大烟（鸦片）的批评。……此致敬礼。

“本日又来信，叫每村办布八十疋，住学的学生要二名，再要运输队、赤卫军三十名，你村再要担架队四名，限明晨办到，集中区苏为荷。”

凡是过去在村庄上比较有体面的、乃至地主或是做过保甲长的人，连同亲属都被杀害，到处可以发现一个坑里埋着十人、甚至百人。在“死的恐怖”之前，人民除了听从“上级干部”的摆布，还有什么法子？

共产党就是这样地裹胁人民对付讨伐军。在一九三一年六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所发出的第三次训令，指示其下级采取如下的战术：

“各苏区利用自己连次战胜的经验，及敌人可乘的弱点，决定我们的新战略——以巩固根据地的阵营，配合着诱敌深入及击破一方的战术，来摧毁敌人长追的部队；以发动广大群众后方骚动和四出游击的计划，来瓦解敌人堵击、预备的队伍；以广大地组织和应用农民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及加紧邻近苏区的群众工作及兵士工作，来打破敌人的利用民团游击及党、政、军、民合作的计划。……”

蒋总统亲赴南昌部署

国民政府为了拯救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乃即准备第三次进剿。这一次是由蒋总统亲自指挥。

六月二十二日，在南昌举行军事会议，部署好战斗态势——任命何应钦为前敌总指挥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动员兵力约十三万人，由东、西两方面攻向匪军根据地。

蒋总统于六月十三日发表“出发剿匪告全国将士书”如下：

‘中正以为吾全国军人之在今日，应有屹然不摇之决心，方可膺此时代艰钜之使命。

‘下列二义，必须明认笃信：

‘一曰：戒除内战，保障统一。……

‘二曰：剿灭赤匪，安定社会。……

‘中国今日，实不患贫困，而独患内乱；实不患财政之不充裕，而独患国家之不统一，与地方秩序之不安定。……’

号召安内攘外

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下令讨伐军全军出发进剿。

第三次剿匪战役于焉启幕。

攻克宁都匪军溃窜

左翼集团军（总司令何应钦）一路南下，指向匪军根据地，虽曾遭遇匪军反扑，但将之一一击退～～七月十三日，收复广昌；十九日，陈诚所率领的第二路进击军终于攻克宁都。宁都是匪军的根据地，过去两度进剿都是以之为目标，但未能接近该地区。

‘赤匪屡经我军跟踪猛击，其漏网残余者，本已不及万人；其向会昌、汀州狼狈溃窜时，又被沿途民团袭击堵截，所剩更属无几，预计本（七）月以内，必可全部歼灭，以期消除国家根本之大患。不意忽于军中接读朝鲜华侨惨案、与石友三叛变、暨粤桂诸逆进犯湘、赣之报。’（注一）

后方发生不安，对于第三次剿匪而言，实在是很沉重的打击。

粤桂叛离中央

先是，当此次进剿之前，在广东方面，原先于讨平张发奎时曾经有过积极表现而掌握军权的陈济棠，突然叛离中央，纠结张发奎及桂系李宗仁的残党与汪兆铭、陈友仁等联合“反蒋”；五月二十八日，汪兆铭等人在广州自称组织所谓“国民政府”。

这些人除向江西、湖南进军之外，并煽动在河北省的石友三叛变。

‘中正星夜驰回南昌，总阅各方报告，乃知石逆叛变，实受粤中叛徒五十万元之收买；且有帝国主义之军官及赣匪（共匪）首领出入其军中，为之主持，隐与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赣、鄂赤匪之扰乱彼此遥为呼应。

‘又于宁都赤匪之总部，搜获毛泽东致彭德怀之电文，内称：“两广月内出兵湘、赣，接济子弹五十万粒，即可解来；我（匪）军务须固守宁都半月，待粤军入赣，即可解围反攻”等语。其他隐语函电，关于粤、桂与赤匪互相联系者，不胜枚举；又据福建杨主席截获匪方之报告，亦证赤匪与粤、桂早成默契，已无疑义。

‘中正于此，乃了然于粤、桂倡乱、石友三叛变，暨朝鲜肆虐．以及朝鲜侨胞之惨案，四者互为因果。

‘叛徒军阀，唯恐赤匪之肃清也，乃出兵以援之，叛变以应之。

‘帝国主义者唯恐军阀之消灭、中国之统一也，乃惹起外交纠纷，以牵制之。’（注二）

生死存亡间不容发

蒋总统于七月二十三日发表如上所述的文告，指出在叛乱活动背后的事实；同时，并号召全国同胞“安内攘外”：

‘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

‘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此次如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

‘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

所幸石友三叛军在张学良出兵讨伐之下，迅即溃败，石友三本人旋于八月间经青岛逃亡大连。

可是两广叛军则向湖南推进，行动日益积极。

此时，在江西剿匪的中央军，先后于七月二十六日、八月十二日攻克东固、雩都；更向西南追击前进，九月，近迫兴国。未料两广叛军于九月十三日侵入湖南，于是和叛军已有协议的匪军遂即对讨伐军转采攻势，展开激战。

沈阳突遭日军占领

蒋总统得到前线紧迫的战报，乃立即于九月十八日自南京乘舰亲往南昌督战。

抵达南昌，是在十九日的清晨。

可是，就在此时，有更重大而紧迫的报告也送达到这里——昨夜，日本关东军进攻北大营，已占领沈阳市。

这就是“九一八事变”。

胜利在望的第三次剿匪战争，乃不得不为之中止。

注一、二：蒋总统-“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一九三一七）

九一八事变前夕

中国的东北，是日本自明治以来一贯的侵略目标。

日本抱着如果没有东北的铁与煤，他就不能达成工业化，如果没有东北的农产品，他就无法自立的念头，故而认为有必要征服东北，将之置于日本支配之下。

只要是日本怀有这样的奢望，则中、日两国在东北发生冲突，可以说是无可避免之事。

不过，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有一段很短的时间，中日关系倒是有着趋向和缓的情势。

滨口反对对华用兵

这就是被称为“第二次币原外交”的时代。

先是在以“济南惨案”为代表的“对华强硬政策”上遭遇失败的田中义一内阁，于一九二九年七月垮台；继起执政者，是民政党的滨口雄幸。

滨口在对中国外交方面，表示对于以前的田中路线加以修正，不实行武力侵略。

滨口内阁，于七月九日发表其对中国的外交方针如次：

“当前急务，为刷新日、支（中国）邦交、敦睦善邻之谊。……轻率动兵，固非发扬国威之道；政府所寻求者，乃共存共荣，而特别期待于经济关系自由无碍之发展。我国当排斥在支那（中国）任何地方之一切侵略政策；但亦应保持我国生存与繁荣不可欠缺之正当而且紧要的权益，相信为支那国民之所谅解。”

此时，滨口内阁的外相，是由币原喜重郎再度出任。币原在前任田中内阁诞生之前曾经主持外交三年，博得对中国有正确认识的定评。此次重作冯妇，直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在职两年五个月。他在这一段任期中，至少在就任之初，是有意尽可能地避免行使武力的。

“币原时代”日本动态

现在就自第二次币原外交开始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前夕的日本动态，加以追述于后：

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中华民国举行国父孙先生的移灵奉安（自北平迎葬南京紫金山）典礼。

孙先生的日本友人犬养毅、头山满等人也被邀请，受到国宾的待遇，前往参加。

接着在六月三日，日本承认国民政府，但国名仍旧称为“支那”，直到翌年（一九三○年）十月才改称“中华民国”的正式称谓。

进入一九二九年秋天的九月五日，币原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在东京密谈，就有无签订“中日互不侵犯条约”的可能，非正式地请托探询中国政府的意向。

至于其内容，则在由日本外务省顾问小村俊三郎承受币原意向于一九二九年十月五日出版的“外交时报”杂志上所发表之“日支不侵犯条约缔结论”中有较详细的论述。要点为：（一）认定东北属于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二）关于旅顺、大连及南满铁路租借问题及有关二十一条问题，别为交涉解决，本协定单从大局着眼，谋求协调；（三）排除侵略主义暴力外交；（四）于“满洲”之开发，重视中日经济合作，行使合理合法的措施。

据小村见解，所谓不侵犯协定的目的，是“从大局上确立中日两国的和平关系，互相祛除不信与不安；倘使能站在由这样的归趋而带来的和平精神之上，就若干悬案加以协议，想必可以获致解决的途径。”

然而，此一旨趣纵属可行，但是就中华民国立场而论，如果将日本在华权益冻结不变便缔结这个条约，则是办不到的事。并且，虽则说是“互不侵犯”，而其实正在进行侵略的，只是日本；是故所谓“不侵犯”也者，乃是日本本身必须提出誓约的问题。

币原此一提案，是日本唯一的一次为谋避免在后来发生“九一八事变”之后中日两国武力冲突悲剧所作的表示；可是，在中国方面，毕竟是无法接受的。

两国关系一度好转

币原的又一个表现，是任命佐分利贞男为驻华公使。佐分利前于一九二五年在北京关税特别会议中，对中国态度友善，是一个可以寄予期待的外交官。

佐分利公使，于十月七日向南京国民政府呈递国书，蒋总统曾于翌日晚间设宴款待。

在日本外交史第十七卷中，辑录有当时驻南京领事上村伸一记述蒋总统招待佐分利公使的情况是这样的：

新任公使呈递国书之后，立即被招待到汤山别墅茶叙，笔者（上村）陪同前往。这个别墅在南京郊外，富有田园风味；当时，蒋主席的生活非常朴素，所谓别墅，实则毫未经过修整，庭园虽广，但杂草丛生；室内也未加装饰，和山野小屋同样简陋。

在室内简单用茶之后，蒋主席提起一面散步，一面谈谈，蒋夫人说：“主席浙江乡音很重，我来翻译（英语）。”于是，他们三人并肩而行，谈话时间颇长。总之，始终是从大局上讨论两国关系，而未曾谈到具体问题。

日军部蓄意侵华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新任日本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为协商修定中日通商航海条约事宜而返回日本述职。

佐分利自杀带来恶兆

“佐分利贞男在箱根自杀”的报导，映入外交部长王正廷的眼帘时，是在他归国不久之后的二十九日。当时传说：佐分利之自杀，是由于他对中国的稳健外交意见未能为日本政府所接受。——这不啻是中日关系前途的一种预兆。对于寄予期待的佐分利之死，王正廷表示了“非常遗憾”的吊唁之意。

佐分利贞男是在和中国政府方面交换了意见之后，准备对日本政府作重要的进言而回国述职；但这个当口，正因为在伦敦所举行的海军军缩会议而极度繁忙的外务省，分不出时间来和佐分利商洽中国问题。于是他的自杀，乃使日本因而失掉了转变对华政策的机会。

佐分利贞男未留遗言，以致关于他自杀的原因，有各种揣测出现。

佐分利是于十一月二十八日晚间在箱根富士屋旅社寄宿，他曾表示明天要去东京，嘱咐服务人员早一点叫他起床。并且在上午七时叫理发师来。

可是，第二天上午当女服务员去叫他的时候，他右手握着手枪，击穿了太阳穴，死在房间里。

据重光葵所著“外交回忆录”——佐分利就任驻华公使，中国方面颇为欢迎，产生了对日空气已见改善、排日运动趋于缓和的效果。佐分利在和中国方面接洽之后，携带修订通商协定问题返国，和外务省协商，但很难得到结论而延迟返任。于是，对佐分利寄予期待的中国方面，开始为之焦躁不安；好不容易才见好转的对日感情，看来又有冷却的光景。

正因为佐分利是在这个当口自杀，所以中国方面也大为惊诧。至于他自杀的原因，则议论纷纭——有说是在政治夹缝中左右为难；有说是受到胁迫；有说是出于厌世。

又据重光葵在其另一著作“昭和的动乱”中提到：“佐分利公使在东京滞留颇久，其后自杀辞世，颇不乏人认为：是由于政治因素，使他的意见不能实行的结果。”

又外相币原喜重郎则更指出：“右手拿着手枪，射击左太阳穴，说是自杀，怎能相信。”

继任人选发生纠葛

在佐分利贞男自杀之后，关于继任人选问题，中日两国之间发生了一点纠葛。

此时，日本拟调驻土耳其大使小幡酉吉出任驻华公使，征求中国政府同意。小幡过去曾任驻华公使馆参事（公使为日置益），是在交涉二十一条之际，公然有蔑视中国态度的外交官。

在中国政府的立场而言，对这样的人物当然是不能给予同意的。尽管日本政府带点威胁地要求接受，但国民政府还是予以拒绝；而且民间反对声浪高昂，也纷纷电请政府断然抵制。结果，日本政府终于不得不放弃调任小幡酉吉的念头，而于一九三○年元月以驻上海总领事重光葵兼代公使职务。

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旋即与重光代办进行关税协定的交涉，至五月六日才终于协议签约，虽则是给予日本在三年内对于特定商品的税率不予变更的条件，但中国方面则自此恢复了关税自主权，溯自一九二五年在北京举行的关税会议中，中国提出要求以来，已经历时五年之久。

币原外交遭军方排斥

像币原这样外交态度，在日本国内则被认为是“软弱”而形成了问题，盖军部方面以及对华强硬论的人士们，对于币原外交心怀不满，反更背道而驰，趋向侵略路线。

加以当时的世界经济，正遭受着空前不景气的侵袭。——这就是从一九二九年十月，纽约证券市场暴落开始，所造成的世界性恐慌。而日本的对中国输出，则在世界恐慌之下，再加上受到济南惨案以来中国社会排斥日货的影响，以致极度恶化。日本为了要挽转不景气的境况，乃更增加了把富有资源的中国东北当做是“日本生命线”的重视；于是，在日本的军部中便日渐茁长了必以东北为所谓日本的“王道乐土”之论调。

在截至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对“满洲”的投资达十七亿日元，占其国外总投资额的百分之六十；对于整个日本经济具有极大影响力。

又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据李顿调查团报告——日本对中国输出额，以一九二五年的四亿六千八百万日元为最高峰；而其后则一直下降，及至事变前一年的一九三○年，则降落到了二亿六千万日元。

另一方面，在伦敦所举行的海军军缩会议，也是日本军部不满的原因之一。当时，决定美、英、日三国海军舰艇为“五、五、三”比率的军缩协定，是在一九三○年四月签订，对此不满的军部，乃批判滨口内阁对外怯懦，并认为是“干犯统帅权”，酝酿出政治问题，而成为在这一年十一月右翼暴力分子暗杀滨口雄幸首相的背景。

正当这样的情况之下，中日两国在东北又发生了一个颇大的纠葛——就是葫芦岛建港工程问题。

本来，这只是中国国内问题；可是，日本却硬找藉口，说是侵犯了日本在东北的特殊权益，尤其是南满铁路的利益。

日密订侵华策略

葫芦岛筑港，是东北边防总司令长官张学良为了对抗日本经济侵略的一个计划。

张学良进行葫芦岛筑港

一九三○年元月二十四日，由北宁铁路局和荷兰一家建筑港湾公司签订了契约，建筑经费达六百四十万美元，向美国及其他方面洽借。

张学良在考虑葫芦岛建港之外，并打算在东北地区建筑与南满铁路平行的铁路线，其经费亦拟商借美、英资本。

过去向东北运输物资，是在日本租借地的大连港起卸上岸，再经日本经营的南满铁路转运；但如在葫芦岛筑成新港，而又能建好新的铁路网，则以后即可以葫芦岛为卸货起点，好由中国方面经手转运。

谁知认为南满铁路为其“生命线”的日本，则以：“此一计划，将使中国铁路包围了南满铁路，以打击大连港，是有在东北排斥日本之意。”而表示抗议。

当时，由于世界性的经济恐慌，中国东北的特产品大豆、豆油、豆粕价格暴落，输出激减；又与大豆同为东北主要物产的煤炭，也为之停滞。因此，以输送大豆和煤炭的运费占其收入百分之九十的南满铁路遂陷于营业不振，一九三一年，出现了自创业以来的最高赤字～～三百四十万日元。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张学良所采取的对日强硬政策，给日本带来了强烈的危机感；于是在以军部等方面为中心，而强调危机意识的政治运动中，更高嚷出“满蒙是日本生命线”的口号。

板垣策画占领东北

一九三○年十一月，东北的外交、交通、财政移归中央管理；北宁、四洮、长春三铁路改为国有；同时，葫芦岛港湾建设也隶属于中央指导。

至此阶段，日本对于东北的武力侵略计划，更迅速具体化。

其策划中心，为驻扎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而推动者则为该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上校）和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中佐。

板垣原任驻奉天日军步兵第三十三联队（团）长，于一九二九年五月调任现职（其前任河本大作因主谋杀死张作霖而被免职）。自板垣到职之后，他参加的“关东军情报会议”，便开始策划在东北发动全面军事行动的谋略。

在此之前的上年十二月，实则已经有了一个由石原莞尔作成的“解决奉天闪电战术秘密计画”；但板垣则更在作全面战争的想定，打算设计包括东三省北部地区在内的作战计划。

板垣的第一个步骤，是“北满战略旅行”。

一九三○年七月三日，板垣等日军参谋团由旅顺出发，经过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泰来、洮南等地，作了十三天的侦察旅行；特别对于在哈尔滨附近的攻防战，更有缜密研究。

然后，由石原莞尔依据旅行观察，整理了一个完全占领东北的方略——“满蒙占领统治研究”，其要点为：（一）平定阶段＝将中国在东北的政治、经济体制完全覆灭。（二）统治阶段＝使朝鲜人经营水田，中国人经营小商业，日本人经营大企业。（三）国防阶段＝使获自东北的收入，足够扩充占领费用而有余。

按此一研究，是石原莞尔在东三省北部旅行中命令关东军司令部的属员佐久间亮三大尉（上尉）经办，佐久间在一年之间埋头研拟，于一九三○年九月最后定稿。当时，三宅光治参谋长根本未加审核，只是说了一句“会管用吧？”就盖了章；石原莞尔则含笑表示：“管用！还得要两年。”

翌年（一九三一年）五月，板垣更整理了“满蒙问题”处理案，包括有：（一）蒙古独立案；（二）间岛独立案；（三）北满骚扰案等内容。其中“北满骚扰案”，乃是要在东北制造反日大暴动，俾引以为关东军出兵的藉口。——可以说就是“九一八事变”作战计划的模型。

东京亦在进行密谋

不仅在东北当地的关东军如此，并且东京方面也同时在进行着各种阴谋，其中之一就是“灭亡满蒙秘密计划”。

这个秘密计划，是于一九三○年十二月七日在拓务省大臣办公室聚集了拓务大臣松田源治、满铁总裁仙石贡、满铁理事木村锐市暨外务次官、陆军次官、参谋次官等所协商决定。

他们分析东北的情况，认为：“张学良与蒋介石乃一时性吴越同舟之妥协，预料两者之间必将有战争。……斯时，为张作霖第二之张学良政权会为之瓦解；且有第三、第四、第五之张作霖接踵而起，分割东北之地盘。”于是，乃决定计划如下：

“（一）奉方（张学良）欲将满蒙外交权名实皆归之南京，吾人取外宽内严方法以反对之；更强其仍以张学良为外交负责长官，并以其为交涉对象，保持帝国特殊地位及权益。（二）对奉方铁路网之建设，阻其实现；特以迫战求和策略，永保南满铁路与大连港之繁荣，俟天赐机会到来，可达帝国对满蒙最后之目的。”

所谓“帝国最后之目的”，显然是以武力侵略东北与蒙古的意义。

日军方蠢蠢欲动

当武力侵略“满蒙”正在逐渐形成为“既定方针”的过程中，日本军方以中坚将校为轴心之急进分子的活动，也益见显著。

急进军人图发动政变

最好的事例，就是急进将校在一九三一年所发动的苦迭打——“三月事件”。

三月事件，是由以参谋本部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中校）为中心的“樱会”所策划。樱会，是中佐以下的陆军现役军官们为会员的秘密结社。他们的宗旨是——“以改造国家为最好之目的；为达此目的，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

他们觉得一旦在“满蒙”行使武力时，值得耽心的是国际舆论；尤其是苏联的动向。在他们的心目中——“软弱”的币原外交，是不可能突破国际批判的。故而他们所著眼的“国家改造”，乃是要把军事色彩涂布在政治上，确立一个“以军领政”的政权。

对于樱会的急进论，有民间的右翼分子大川周明等人加以赞同。

他们所策划的“苦迭打”，是在打着这样的主意：

三月二十日前后，征求无产政党合作，在东京日比谷公园举行万人大会。会后，全体游行示威，前往国会，同时，以右翼浪人闯入警视（察）厅，造成混乱状态；立即藉此时机，出动第一师团（师）包围国会，在军队的压力之下，由陆军少将小矶国昭或建川美次进入议场，强迫要求现内阁下台，并实现以宇垣一成大将为首相的内阁。

可是，这个苦迭打由于动员群众的计划失败，加以他们所推戴的宇垣一成在即将行动之前改变了态度，以致胎死腹中。

在军方如此冲击之下，“币原外交”也就面临了限界。

治外法权谈判决裂

于是，在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和日本驻华代办重光葵之间所进行的撤废治外法权交涉，卒于四月间决裂。先是，中国曾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向国内外宣布：“取消在中国领土内的一切领事裁判权”，进行收回租界与租借地；但日本方面则一直强硬主张——旅顺、大连及南满铁路维持现状，乃终于达不成协议。

据重光葵“外交回想录”，对于交涉决裂的背景，大致有如下的说法：

“由于张学良所采取的反日政策、葫芦岛建港问题、一连串的排斥日本人运动等因素，使中、日之间的空气，逐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再加上军缩问题等契机，以致日本国内实在欠缺推进币原外交的背景；而相对地，中国方面在旺盛的民族主义思想推动之下，则正进行着革命外交。

“过去，中、日之间的交涉，似乎有一种暗默的谅解，就是不涉及微妙的‘满蒙问题’；而首先修改有关中国本土的不平等条约，使在两国之间造成良好空气之后，从而进行‘满洲问题’之解决。

“可是王正廷的革命外交则非如此，对于日本在‘满洲’的权益，和他国一例看待，并且要在短期内收回。

“一九三一年五月，在南京举行的国民会议中决议：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对各国表示由单方面废除的决心，似乎有迫使实行的态度。由于收回利权、排外思想的鼓吹，排日空气顿见浓厚，不安的情势日益严重。”

关东军伺机行动

对于日趋迫蹙的中、日关系正在侧目注视中的日本军部，于六月十二日成立了以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建川美次为委员长的一个委员会，委员有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及该课课长补佐冈村宁次、参谋本部编制课长山胁正隆暨支那课长重藤千秋、欧美课长渡久雄六人。

这个委员会整理出一个“满洲问题解决方案大纲”，其内容，是在“以一年为准备期间、然后再进行军事行动的方针之下，约束关东军在此期间内应暂时隐忍自重”，并对列强及日本国内进行“军事行动是出于不得已”的游说与说服工作。

同时在六月间，南满铁路总裁更由对华强硬论者的内田康哉出任。内田积极主张：（一）日本负责维持东北治安。（二）日本应依其特殊关系，确保在东北的经济上之自由。（三）南满铁路裁取两大干线主义，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实施吉会铁路的筑路权。

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对于内田的主张也终于予以同意。故在当时日本新闻界一致报导：“币原外交”，已经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而趋向于“积极外交”。

日本实则已经进入了战争的准备状态。

在南满铁路的主要车站，藉铁路运输业务需用仓库的名义建筑军队营房；又在沈阳的满铁附属地工厂及住宅构筑防御工事，使之堡垒化。

日本在大连的警察本署，组织了特务警察队八个队，进行间谍活动；城市和乡村的日本人商店，也都成了关东军司令部的特务机关，或者是由持有武器的在乡军人所经营。

“满洲日日新闻”的主持人佃野繁胜，也发表“满洲之重大化与实力发动”一文，鼓动言论：

“中国的反日政策，是和敌对的行动并无何等差异。所以，循普通外交交涉，以图维护我满蒙权益，求和平发展，实属于事无济；解决的方法，只有一个，是什么？就是实力的发动。”

到了这个程度之后，所剩下来的，就只是等待时机了。

此时，接连地又发生了两个纷争-“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被杀害事件”。

就是这两个事件，点燃了关东军所装置的“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线。

万宝山事件

“万宝山事件”，是以有朝鲜人二百余人移居长春东北方约二十四公里的万宝山山麓三姓堡，拟开渠道，为其发端。

非法筑渠引起事端

意图使东北为其殖民地的日本，是以朝鲜人作为尖兵移居东北，从事垦殖。这些朝鲜人在东北的间岛乃至于其他各地，时时引起纷争，成为中、日之间纠纷的根源之一。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六日，吉林省长春县农民郝永德向三姓堡农民租借熟荒地三○七公顷，租期十年。旋即将之转租给朝鲜农民李升勋等九人，但并未得到县政府的许可。

截至五月上旬，有在长春居住的朝鲜农民四十户，计二百一十人移居该处，立即从事开垦；同时为了自附近的伊通河引水灌溉，乃着手开社一条宽九公尺、长十二公里的渠道。

这是一条有问题的渠道，因为它侵越了为另外的中国农民所有的土地；而且在伊通河筑有水坝，将会遏阻河流水位增高，而使该河两旁中国的数千顷水田有被泛滥灾害之虞。

因此，在五月二十日，有中国地主、农民代表一百余人到长春县政府及长春市政筹办处请愿，要求制止开渠；长春市政筹办处受理之后，于五月二十四日下令停止施工，但朝鲜农民则置之不理，继续筑渠。

五月三十一日，长春县公安局派遣警察二百人前往制止；翌日～六月一日，将强行施工的朝鲜人九人逮捕。于是，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便于当天派领事馆的警察七人到达施工现场，进行干涉。

旋经长春市政筹办处与田代重德协商，日本方面答应双方均将警察撤退，派员会同调查实情，并且签订了临时议定书，决定在问题解决之前，中止施工。

双方会同调查及为解决纷争的折冲工作，于六月八日开始；可是，日本方面却自行违法悖约，声明继续施工，并增派武装警察队六十人，除步枪之外，且备有机关枪，在水渠一带担任警戒。

二十四日，日方片面通知，以农作时期迫在眼前为藉口，强行突击施工，到了月底，渠道和水门差不多都已经完成，即将通水。

这对中国农民来说，真是一个关系到死活的问题，乃终于出之以要凭力量使之恢复原状的举动。

日对我农民滥施暴力

七月一日上午九时，万宝山一带数十个村庄的农民约四百人，大家拿着锄锹，撑起四面大白旗，朱笔大书“迫不得已，实行正当防御手段！”等文字。涌到现场，将堤防掘毁，并将水路填平。

次日（二日）一早，日本武装警察五十多人，便衣十多人，分布在渠道两旁，架好机关枪，严阵以待。上午八时二十分左右，中国农民们到来，正要继续昨天的毁堤作业，指挥武装警察的警官中川义治便下令将走在前面的农民代表孙荣卿、曲湘楼二人逮捕，并和要夺回孙、曲二人的农民们扭成了一团。

在混乱中，日本警察队突然开枪射击。

枪声达三十八响，农民们跳入壕沟逃避。后来在市政当局的劝说之下，双方撤走，但在附近马家哨口某农家，有一少妇正在生产中，因日本警察二人闯入而受到惊恐，母子死亡。

蒋总统是于七月三日在江西行营接到万宝山冲突的消息。

此时，蒋总统为第三次剿匪，亲自在江西指挥作战中。

当时，递达行营的报告中说：农民死二、三人，负伤数十人，被拘受毒刑者十多人。而且日本一方面增派军警，一方面作“中国人袭击朝鲜人”的反宣传。

‘日人如此蛮横，吾国已不成国矣！吾之责任更大。……。（蒋总统七月三日日记）

煽动朝鲜反华暴乱

日本方面的反宣传，造成了更重大的惨剧--受到“朝鲜人被中国人袭击残杀”的谣言所瞒骗、而为之激愤的朝鲜人们，在朝鲜各地掀起对中国人加以报复的暴行。

三日下午一时左右，朝鲜群众涌入在仁川的华侨商店街，杀死二人，并使二十二人受伤。继此之后，暴行更扩及于汉城，元山等地。五日夜晚，侨居平壤的中国人全体受到袭击，死者达一百三十三人。总计在朝鲜一连串暴行中的被害者——死亡一百四十六人，失踪九十一人，重轻伤五百四十二人。

关于万宝山事件，当时日本方面的新闻报导也有问题。譬如“朝鲜日报”于七月二日所发行的号外，便刊载着“在万宝山有多数朝鲜人被残杀”的刺激性文字，煽动朝鲜人的报复感，而实则并无其事。其后，撰写这一篇报导稿的该报长春特派记者金利三曾于十四日在该报上对于错误的报导作了更正声明：“这是日本机关流布出来的谣言，所谓发生死伤情节，毫无事实；谨向中国、朝鲜两民族谢罪。”金利三是表示他作记者的良心，但在翌日～十五日，便为朝鲜人所暗杀。

中村被杀风波

在朝鲜各地的中国人因朝鲜人暴动而被残杀的悲痛消息，接二连三地递达到在江西剿匪作战的行营。

国民政府外交部，于七月七日向日本驻华代办重光葵提出抗议，要求——“立即制止朝鲜的暴行，保留要求赔偿权，并保证嗣后不再有同样事件发生。”

日本驻南京领事于翌日（八日）到中国外交部，口头答覆：“中国政府抗议书，已转达本国政府。关于要求惩凶、赔款、保证安全各项，俟本国政府训令到后始能答覆；日本内阁会议已经决定严惩犯有暴行的朝鲜人。”

日方行为已属侵略

然而，这只不过是口头承诺而已，实则在朝鲜的日本警察并没有负责保护中国人的生命财产；中国在当地的领事馆虽曾进行交涉，但并无效果。是故虽则在日本领事答覆之后，而新义州、釜山等地还是有同样的暴行事件发生。

‘一面严与交涉而制止之，一面当派人密查真相，使我人民之冤得白。’（蒋总统七月九日日记）

另一方面，在纷争肇端的万宝山，日本更是肆行横暴。蒋总统于七月四日在江西临川的剿匪前线继续接到报告——日本自长春增派军警七百余人前往，将中国农民驱逐于数里之外，继续开渠。

本来，日本领事馆的警察进入中国主权地区，就是重大的侵犯行为；而且他们为再度开渠，强占民房，擅伐树木，并有中国农民被胁迫为佚役，受到虐待，更不能不说是武力侵略。

七月十日夜晚，蒋总统在南丰，于日记中自勉如左：

‘德行不修，则退；为人可不自爱乎！立品修行四字，时刻萦怀，此余年来誓雪国耻之基本也。今为万宝山事，而坚我志，断勿稍有懈怠，慎之！勉之！’

万宝山的渠道，于七月十一日完工，通水。

当时，据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发给日本外务省的电报，报告渠道完成时的情况如左：

“鲜农（朝鲜农民）五十余人欣喜莫名，连呼万岁，大叫我等永远死守此地。”

中国人的愤怒，正在全国扩张中。

七月十三日，蒋总统在江西南城接到报告——“上海及国内各地民众集会，对日本造成万宝山事件及煽惑朝鲜排华，准备对日经济绝交。”

可是，如果因激动而意气用事，则反而为日本挑衅所乘，故而蒋总统在七月十三日的日记中记下：

‘吾当慎以处之。’

中村伪装擅入洮南

未料在万宝山事件处理尚未告终时却又发生了新的问题——就是“中村大尉被杀害事件”。

第一个报告，是在八月二十四日清晨递达南昌行营——据日本方面宣称：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部员中村震太郎大尉，在东三省西部洮索路终点，被中国军兴安屯垦队所杀害。这个报告并提到：传闻日本关东军主张出动军队，以武力进行调查，但被外务省所阻止。

中村震太郎与预备役骑兵曹长（上士）井杉延太郎，以白俄人西罗可夫及另一蒙古人为向导，于六月九日，在黑龙江省的中东路伊列克特车站雇马三头，前往辽宁省洮南方面。

据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及参谋本部等机关发表中村等一行是以“游历”为目的。

可是，中村等人前往游历的兴安、洮南方面，由于盗匪横行，治安情形极其恶劣，故而是禁止外国人进入的地区。然而，中村除了在沈阳领有正式护照之外，又在哈尔滨以“黎明会干事、农学士中村震太郎”的名义，领到另一份护照，以伪造的身分潜入兴安地区。

中村不惜犯法、冒险要到该地区“游历”，其真正的目的，是在准备将来的军事作战而对于军队宿营、补给路线等需要预为实地调查，显然是以侵略东北与蒙古为前提的一种间谍活动。

中村一行，横断兴安岭，经过济沁河上流进入索伦，预定在六月下旬或七月上旬抵达洮南。可是在途次苏鄂公府（民安镇）附近，下落不明，届时未见到达洮南。

此时，在中村之外，有关东军佐久间亮三大尉、参谋本部长勇大尉、森纠大尉等人先后被派往兴安岭方面，分担在军事作战上的各部门调查任务。除中村而外，此三人均平安归还。

重视此一事态的关东军，遂即派遣片仓衷大尉前往洮南，以“洮南满铁公所”为搜索本部，追查中村的行踪。

片仓化装为中国人，在兴安屯垦地区探听消息。及至七月二十三日，有满铁公所职员获得有力情报～～六月下旬在苏鄂公府，有两个日本人及俄国人、蒙古人一人，被屯垦队第三团的部队所杀害。

日乘机出兵侵华

日本方面，乃依据这个风闻作为追踪调查的结果，发表于八月十七日的“满洲日报”等内外报章，其内容大致如左：

“在兴安、洮南游历中的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一行，于六月二十七日在苏鄂公府的饭馆用膳中，被东北边防军兴安屯垦队第三团士兵所逮捕。中村虽曾出示护照，要求保护，但被指有军事间谍嫌疑，而在代理团长关玉衡等军官的监视之下被枪毙。事后，关玉衡为谋湮灭证据，特于七月一日在附近山中将尸体焚化，命令全体官兵不得泄露；但因亲日派的中国人告密，事件得以揭露。”

以上发表的情况，与事实有不符之处。

中村被杀真相

据中华民国外交部留存的公文书中，有东北外交研究委员会（委员长张学良）的第二次调查结果，其真相是这样的：

“六月二十六日到达苏鄂公府的中村一行，欲由屯垦队第三团操场附近通过；第三团连长王秉义查阅护照，因无中国通行证，又言语支离，乃引至团部，讯系游历遇匪，追逃至此。为恐该日人等再受匪害，乃留住团部，候请示上官，意在保护出境。

“因团内饭食粗劣，乃请该日人等到街市饭馆食饭四次，且有长官陪食，直至二十七日下午，全以外宾看待。

“迨傍晚，代理团长关玉衡（团长赵冠伍出差沈阳）查防归来，始疑该日人等为奸细，乃下令检查其身体，竟由裤内搜出日、俄文军事地图两张，日记二本，笔记录三张，现洋票一百一十九元，金票两元。一经阅其日记，多系记载调查将来军事上应用各项，知为侦探无疑；即向屯垦公署请示办法，传令略加看守，而仍饬优待。

“迨夜深人静时，守兵因困倦睡去，该日人等竟乘隙由团部后脱逃，不久，守兵察觉，一齐出追。逾时，即闻北山方向有枪声一阵，后乃寂然，追兵亦未归营。该连事务长郭德昌率兵前往搜索，在月光下发现日人尸身，始知追兵因击毙外人，畏罪潜逃。

“代理团长关玉衡，恐惹起国际交涉，乃命将尸体连同马匹及携带物品除地图、日记、笔录外，一律焚毁，以灭形迹。对内外严守秘密，亦未报告上官。”

此一事件，不幸的是在中国方面查出这个真相，相当地费了一点时间。

辽宁省主席臧式毅第一次派往当地的调查队，由于该部队官兵保守秘密，以致未能查问出来。

因为中国方面迟迟未能查出真相，以致中、日两国之间的空气为之恶化。——譬如说：北平晨报（八月二十三日）等报章在情况尚未明确之前，以为“并没有被中国军队杀害的证据，或许是土匪所害。”以及指此事件为日本方面所捏造，并责难中村大尉的间谍行为，向国民诉说日本的横暴作风。

而另一方面，日本则认为是中国方面在作拖延工作、掩护工作，责难中国故意延迟调查，逃避责任，甚至制作宣传电影，煽动舆论。

自万宝山事件发生以来，中、日之间极度恶化的情势，在日本军方来说，正是等待了好久的时机。当时，两国之间未解决的所谓悬案，据说只东北地区便有五十三件之多。

日本军部，特别是在关东军内部，以为“应采强硬决策，不仅对于中村事件。而是要一举解决悬案”的意见，日益高涨。

关于中村事件，关东军在一开始便反对通过外交交涉以谋解决。该军参谋石原莞尔早于八月十二日便致函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表示：“由外交当局严重抗议，以谋迅速解决的办法，只不过是一个幻想；凡有理解的国民，意见正逐渐趋向一致——除凭军部实力解决之外，别无途径。”

陆军省的态度，也颇为强硬～～八月二十四日，向外务省表示：如果中国方面否认杀害事实，不能得到满足解决，则有必要为保障安全而断然占领洮索地区。同时并提出派遣步兵一个大队的建议。

至于中国方面的方针，则是务谋和平解决。

张学良指示臧式毅暨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迅速派遣第二次调查队进行调查；同时并派汤尔和前往东京，向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陆相南次郎转达和平解决的意向。

第二次调查队回到沈阳，是在九月十六日。

依据调查报告，查明了事实的东北边防军当局，乃立即将应负责任的关玉衡免职逮捕，收押在东北宪兵司令部陆军监狱，决定开军法会议，严厉处分。

“九一八事变”爆发

九月十八日下午，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走访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希望循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然而，“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也正好就是在这一天的夜晚。

第十章：九一八事变(上)

主题“九一八”之夜“力避发枪”日军强占沈阳关东军蓄意突袭板垣肆行其阴谋东亚从此无宁日日军阀一意孤行“朝鲜军”越境向国联申诉日本的诓骗之词两点考验树立傀儡政权轰炸锦州马占山炸嫩江桥期待公理伸张国联促日撤兵日制造天津暴动日图利用溥仪溥仪潜赴东北关东军图南下

“九一八”之夜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间十点钟稍过。

沈阳的市街，逐渐归于静寂。

突然，在城北上空，掠过一道细微的闪光；接着，响起了不太强烈的爆炸声。

这个爆炸声被低垂的夜幕吞噬之后，街道上有恢复了一如平素的宁静。

就是这不太强烈的爆炸，决定了中、日两国的命运。

爆炸发生的地点，是在沈阳城北门外约一公里半柳街沟附近的南满铁路线上。和在三年之前炸死张作霖的现场只不过隔着几公里的路程。

爆炸的威力很小-只毁坏了三根枕木并使铁轨稍稍弯曲。在二十分钟之后，时速八十公里的南满铁路快车由这里通过，并没有受到任何障碍。

侵略战争自此开始

然而，虽则是小小的爆炸，但却炸开了日本关东军的妄念。他们自己下手爆破南满铁路，为的是要开启侵略中国东北的战端而制造藉口。——此后，使中国全土卷入绵亘十四年战火的日本侵略战争，就从这里开始。

“九一八事变”，遂于焉揭幕。

在南满铁路东侧，距离爆炸现场约八百公尺之处，是中国军的“北大营”所在。

当时，北大营驻屯有张学良麾下的陆军独立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所属步兵第六一九、六二○、六二一各团。

官兵们也都听到了爆炸的声音，但是，却想不到那就是日本军队发动侵略的狼烟。

因为这些天来，每到夜晚，日军的挑衅性开枪事件，已经是屡见不鲜，所以都以为或许是地雷突然爆发，并没有怎么样把这回事放在心上。此时由于“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被杀害事件”已导致中、日关系愈益紧迫，避免冒冒失失地惹上纠葛，乃安全之道，是谁都了解的。

可是，料想不到纠葛竟会由对方硬是找上门来——北大营突然受到日军的攻击。

这是在听到爆炸声音还不过五分钟之后，约有两百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兵，步枪乱射、手榴弹连投，越过北大营西面营垣，冲进第六二一团营房。

大家抱枪流泪

面对着这样的奇袭，中国军队却不能加以还击。原因是在差不多十天之前奉到过“无论何种情况发生，不得抵抗”的严令。盖坚持不抵抗，以防突发事件扩大，是东北边防总司令长官张学良的方针。

在日军的枪弹衡飞之下，中国士兵紧握着子弹登膛的枪枝，激动到浑身颤抖地要求官长允许应战，但是官长则再三严申不得抵抗的命令；士兵们气愤至极——大家抱枪流泪，挥拳捶墙，以排泄怒火；更有些士兵，手指头没有扣上扳机，就身中敌弹倒毙地上。

来自日军的攻击中，杂有炮声。炮弹以惊人的命中率落到了北大营的各处设施上。

晚间十一时，第六二一团第一营营房开始着火。

十一时半，日军增援部队一队由西南方的围墙冲进营内。

最好，驻军奉到了自北大营撤退的命令，第六一九、六二一两团乃放弃了西边的营房，向东退出。

可是，在北大营东边营房内的第六二○团（团长王铁汉）则由于没有奉到撤退命令而坚持不动。这一个团为了要守卫营地乃开枪还击。——这是在北大营唯一的应战。

王铁汉的回忆

王铁汉（现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对于当时北大营的情况回忆如下：

手榴弹声，断续的步枪声，接着就是炮响。……这时才觉得事态并不寻常，当即叫旅部（第七旅）电话，始知旅长（王以哲）在城内；又叫六二一团（团长何立中）电话，已无人接听；复问第六一九团（张士贤）团长也不在营。

至十一时将过，才得知第六一九、六二一两团已经撤退。但我在未奉到命令之前，不能自由行动，只有就营房及已有的简单工事，作战斗准备。

到十二时，接奉旅长电话指示：“不抵抗，等候交涉。”此后即失去联络。

“等候”，不等于“挨打”。敌人向本团营房进攻时，我决心还击。——这是自卫必要的手段，是“不抵抗的抵抗”。十九日上午一时四十分钟，日军步兵二百余，并有跟进的部队，逐次向本团接近，炮军也开始射击本团营房。

此刻，适奉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电话，询问情况；并严令：

“不准抵抗！”

我答称：

“敌人侵我国土，攻我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现在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击本团营房，本团官兵势不能持枪待毙。”

“力避发枪”

王铁汉的证言，继续引用于后：荣参谋长当即指示：“将枪弹缴库！”我答：

“在敌人炮攻之下，实在无法遵命。我也不忍执行这样命令。”

荣参谋长又问：

“你为什么不撤出？”

“只奉到‘不抵抗，等后交涉’的指示，并无撤出的命令。”

“那么，现在就是下达命令，你就撤出营房；否则，你要负一切责任。”

电话到此中断。

不得已而正在准备撤退的时候，敌人步兵四百余，已开始向本团第二营攻击。

我即下令还击，在激烈枪战之下，毙伤敌人四十余名；本团第五连连长陈顺瑞负伤，士兵伤亡十九人。

忍痛撤出北大营，正为十九日上午五时。

次日，日军公布“日军死伤一百二十余名”，乃是为扩大“中国军队滋事”的反宣传，并不确实。

北大营就是这样地到了十九日上午被日本军所占领。

在北大营北侧的弹药库，也被炮弹击中而爆炸起火；日军更对营房一一防火，北大营整整燃烧了一天。

驻守北大营的中国军所受损害计为：伤亡三百三十五人，失踪四百八十三人。

张学良正在北平养病

中国军队之不抵抗，是东北边防总司令长官张学良在事变发生之前就已经决定了的既定方针。

张学良于一九三一年五月到南京出席三届四中全会之后，便去北平养病；本来打算在九月初返回沈阳，但因得闻土肥原贤二（当时日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将对他有阴谋暗杀的秘密情报，乃继续留在北平。

在这个期间，发生了“万宝山事件”和“中存大尉被杀害事件”，东北方面的中、日关系日益紧张。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不久的关东军，显然是不断地在准备着制造一点纠纷，然后抓住纠纷的机会，便拿出难题来找麻烦。——这是日本一向所惯用的伎俩。

在事变刚一爆发之后，便曾到达沈阳的美国报人鲍惠尔（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持人），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有当时在沈阳增加了数千便衣队的日本军人，内容大致如左：

“我发现了证据——当访寻日本人在沈阳经营的照相馆时，我见到很多照片——上面都是身穿平民服装的日本兵，背着步枪，带着臂章。据住在沈阳的美国人说：事变前，沈阳街上忽然来了很多日本游客。这些日本便衣队，是事前由朝鲜偷偷地运送进来的。

“而且这个报导，在上海刚发表出来不过几小时，日本军方便在沈阳街上搜查各照相馆，没收了所有可为证据的照片。”

曾有密令容忍自重

对于关东军的动向已有察觉的沈阳公安局，曾于八月二十五日发出秘密命令——“日本正在极力挑衅，应各容忍自重，力避发枪。如遇日方发枪，应即退入分局，以避免冲突。”

张学良也曾于事变即将发生之前的九月六日，发电报给东北边防军及东三省政务委员会，重新下达贯彻“不抵抗”方针的指示：

“现在对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健；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遵照注意。为要！”

当北大营受到日军突袭时，在沈阳城内的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及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等人，便立即和在北平的张学良通电话，请求指示；张学良以“务必尊重和平，避免冲突”的理由交待“不抵抗”。

因此，荣臻乃转知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不抵抗”；并且重复告知：“即使被日军勒令缴械，占入营房，都可听其自便。”

据日本资料——当时传说：臧式毅的第一次电话打到北平时，张学良正和英国领事在第一戏院观赏名青衣程艳秋的平剧，未能通话。三十分钟后，再通电话，副官转达指示：“可在当地协商处理，等回去之后，再作商量。”其后电话不通，直到黎明四时，沈阳得到来自北平的联络说：“已经通霄开会商讨，沈阳方面，请臧式毅慎重处理。”

由于这些原委，所以后来被人咏有“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的诗句，传诵人口。

又据曾被张学良谘询的曹汝霖之记述：“张学良当时正在生病，刚自协和医院出院，每天打针服药，精神很弱，实在也无力解决困难问题。”

日军强占沈阳

“九一八事变”的当夜，在沈阳的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暨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等人打算出面和日本方面在当地交涉，以谋解决。

根据荣臻参谋长的报告，可见日方是丝毫没有循交涉途径解决问题的意向。

日领事馆一再推诿拖宕

当日军进入北大营、甚至加之以发炮轰击的时候，臧式毅派员到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询问日军攻击的理由何在？

日本总领事馆的答覆是这样的：

“本馆正向军方查询中，现在还不明情由，所以无法奉答。”

为此，中国方面乃再通告日领馆：“望于五分钟内制止攻击，并将日军行动真意见覆；如逾时未得回答，我方（中国）则将通告驻沈各国领事；不能负保护外侨之责。”

五分钟过去之后，日方答覆：“在进行制止中，请再待五分钟。”然而，经过一小时之后，还是毫无消息。

而在这个时间，日军攻击范围则已逐渐扩大中。下午十一时左右，对沈阳城外东北面的兵工厂发炮轰击，并且侵入西门外商埠地，开枪乱射，将大西边门、小西边门各警察所占领，颇多中国警士在未经抵抗的情况之下被杀伤。

中国方面乃再度打电话给日本总领事馆，催促制止军事行动，而日方的答覆则是：“刻正召集军官会议，商讨办法；会议结果，即行通知。”

过了一会，得到日方的联络说：“现在军队既已出动，制止甚为困难；且军方行动，总领事无权制止，只有向军事当局提出要求。不过该不至于进入城内。”

十九日上午二时左右（十八日深夜），日军进抵沈阳各城门附近，中国方面将日军进攻状况通知各国领事，领事们都预料——“总该不至于侵入城内！”

日军侵入城内滥行射杀

可是，这样的看法实在太乐观了一点。上午四时，日军登上西南角城墙，用机关枪向城内扫射，并即开始侵入城内，连装甲车也都出动了。

上午六时左右，全城被日军占领；中国方面的各机关，都被贴上——“日本军占领”、“日本军之外禁止出入，违禁者射杀！”等标语，并由日军站岗警戒，更任意枪杀行人，尤以着军警制服者为目标；并且收集被他们所枪杀的中国军警人民遗体，将之焚化，以湮灭证据。

天亮之后，臧式毅、荣臻等再三向日本总领事馆探询“日军真意”。

可是日本方面则只推诿地答称：“一切都要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到达沈阳，才能接上头。”

上午十一时，本庄繁率领幕僚人员及增援之步兵第三十联队（团）由旅顺到达沈阳。

谁知本庄繁却表示：“不能与沈阳军、政当局谈判”而片面拒绝，同时并在市内张贴布告，明白表示由日军管制沈阳，布告为中文，其原文如下：

蛮横的日军布告

“照得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午后十点三十分时，中华民国东北边防军之一队，在沈阳西北侧北大营附近，爆破我南满铁路；驱其余威，敢然袭击日本军守备队。——是彼开始对敌行动，自甘为祸首。

“抑我南满铁道者，往年日本帝国依据条约，正当获得，归属我所有，使他国一指尚不敢染；今遇民国东北军，不但敢犯之，更竿头进一步，至于对帝国军队发枪开炮，是彼东北军自对我军来求挑战也明矣。……

“本职（本庄繁）夙负保护铁路之重责者，因为拥护既得之利益，确保帝国军之威信，兹方执断然处置，无敢所踌躇。……”

这是日军不宣而战的侵略战争之开幕辞。

革命对象的转变

蒋总统在事变的两年之后，曾有以下一段讲词：

‘九一八以前二十年中，我们和帝国主义的斗争，都是局部的冲突，没有正式的作战。我们历年来直接的革命对象，始终是国内的军阀，而帝国主义也始终没有正式出兵进攻我们、企图消灭我国的决心。这就是因为当时我们革命军的力量，还不充足，所以帝国主义不大注意；换句话说：就是他在当时看不起我们。但是，到最近几年以来，他们看到我们革命的力量一天一天的发展扩张，快要把整个国家完全统一，就要实行打倒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了，因此遂嫉恨而且恐慌起来，所以不得不趁现在中国天灾人祸相逼而来的时候，赶紧拿军队来压迫我们，并且下最大的决心要来消灭我们。……

‘九一八以来，帝国主义积极侵略的原因～～一则是由于他们恐惧我们的力量，一则是我们国内再无可供他们利用的军阀。

‘这是我们革命力量增长的结果，也就是我们革命的直接对象之转变。’（注）

中华民国和日本的战争，已经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注：蒋总统-“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一九三三五）

关东军蓄意突袭

在日本关东军占领之下的沈阳，无线电台既被占据，电报、电话都为之不通。——对外联络，完全断绝。

九月十九日（一九三一年）上午七时，大东门外军用飞机场也被日军占领，被掳劫飞机六十架。

一夜之间落入魔掌

日军的进攻，并非仅限于沈阳一个地区；东北境内其他冲要之地-安东、营口、长春等十八城市都被日军突袭而失陷。

只是一夜之间，东三省南部的主要地区，就在不明情由的状况之下，落入了日本关东军的魔掌。

虽则自十九世纪以来，中国已长期饱受列强侵略，但在历史上，却未尝有过像这样公然军事占领如此广大区域的先例。

爆炸南满铁路、全面出动日军谋略的编制者，是以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为中心的一个集团。

以“武力侵略满蒙”为既定方针、很早就在悉心策划的板垣、石原等人，抓住“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被杀害事件”导致中日之间益见高涨的紧迫情势，乃油然兴起时机终于到来的念头。一九三一年七月，板垣等人曾有第三次的“参谋旅行”，此时，已经确定了以沈阳郊外的柳条沟为发火点，发动闪电式的攻击战以占领沈阳；其时机则预定在九月底。

七月间偷运攻城炮

有一个情况，是在事变之后才公开出来，就是关东军为了破坏沈阳城墙，早于七月间就在其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营区内秘密装置二十四糎口径的榴弹炮（攻城炮）两门，瞄准北大营、飞机场等主要目标。这样的重火器，在日军本来的目的——“铁路警备”方面，根本就没有必要；当然，这是为了侵略战争。

日军之占领沈阳，是在掌握东北军政中心机构而外，还有防备中国部队反击的意思存在。

当时担任步兵第二十九联队长的平田幸弘，后来在东京军事法庭曾有证言：“当时，日军一千五百人，而对方张学良部队部署有二万人；如受到反击，则日军在城外的防卫阵地不啻是坐待溃灭。因此，曾在事前奉到命令——当非常事态发生的同时，即行夺取奉天城（沈阳）。”

使用攻城炮，是出于当时陆军省军务课长永田铁山的建议，由东京兵工厂通经神户、大连，送往沈阳。大炮经拆卸之后，郑重捆包。伪称“高官棺木”，自神户启运时，特地托交客轮载运，到达大连起卸上陆，日军的兵器部员穿着中国服装，假装当地码头工人。

大炮装置场所，必须挖掘直径五公尺、深度一公尺的大坑，乃故意散拨造游泳池、掘井等流言；又为遮掩炮身，曾建有洋铁皮屋顶的一百平方公尺小屋。

为了让步兵也可以开炮，所以预先准备好对于每一个主要射击目标，在瞄准器上加以记明，只要对准一下，就一定会命中。

当事变发生之后，立即有一门瞄准北大营、一门瞄准飞机场发炮射击。

形成一个“执行部队”而在板垣、石原之下从事活动的人，有今田新太郎大尉（张学良顾问柴山谦四郎的补佐官）、奉天宪兵队长三谷清中佐、奉天特务机关员花谷正少佐、奉天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长川岛正大尉，以及隶属于该中队的河本末守（工兵出身）大尉等。

这一伙人，详细决定了分担爆炸铁路、袭击北大营、占领沈阳等任务，并作成决心实行的“血誓盟约”。

这些阴谋，只是极少数几个人在秘密策划，不仅说不能让中国方面察觉，而且也不能使日本陆军首脑部或外务省方面得知，因为预料他们会下令“中止进行”的。

当“九一八事变”之后，在当地的关东军拒不遵从其首脑部的“不扩大方针”，而独断擅专地把问题闹大，可以说是他们早就立定了这个路线。

王以哲部曾有所发觉

关东军这样险恶的动向，中国方面也已经有所发觉。当时，驻沈阳的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便曾在报告中提到下列一些事实：

～～在八月二十六、七日，由日本内地运到飞机三十余架、野战重炮二十余门，控置于沈阳南郊的南满铁路浑河车站。

～～八月二十七、八日，日军曾发给在沈阳的日本、朝鲜居民枪械。

～～九月一、二两日，在铁岭、辽阳间的南满铁路（以沈阳为中心、南北约一百二十公里）两侧，构筑各个射击用之掩体。

～～九月二、三日，日军在北大营附近施行野外演习。

～～九月四、五日，作大规模包围沈阳城以及东北兵工厂的攻击演习。

～～九月四、五日，于沈阳日本铁路占用地内各工厂仿制中国军第七旅军服二千余套。

～～九月初旬，来自日本和朝鲜的浪人，有悄然侵入中国方面的长官公署、粮秣厂、兵工厂等机关从事间谍活动的形迹。

～～九月十日至十二日，时有日军三、五名，出现北大营附近，向营内窥探。

像这样一连串的活动，很明显地是在以发动战争为目标。

在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对于关东军的专擅行动也有了警觉。

币原曾令制止“狂奔”

当事变发生的不久之前，大连的关东厅向外相币原喜重郎秘密报告：“关东军少壮军官图迫使中国军队与之冲突”；币原乃据此报告于九月五日电令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制止关东军狂奔”。

板垣肆行其阴谋

此时，日本陆军首脑部也颇采制止发生事变的态度。为此，特地派遣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建川美次携带陆军大臣南次郎的亲笔信，前往当地（东北），加以劝阻。

未料，和板垣一鼻孔出气的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得知此一动向，遂即向当地传递了情报。因为在他们这一伙人之间，定有互相联络的密电本，桥本就是使用密码通知了板垣。

桥本发出的密电有三通：

“计划已露，应速断然施行。”

“应在建川到达奉天之前，断然施行。”

“不必耽心内地，应断然施行。”

这是指导他们——最好是先制造成既成事实。

曾经取决于抽签

九月十五日夜晚，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今田新太郎、花谷正等主谋分子差不多全体聚集在奉天特务机关，协商最后态度。当场有“断然施行”和“暂且中止”的两种不同意见，一直讨论到凌晨两点钟，达不成协议；最后采取抽签办法，才获得“暂且中止”的结论。他们对于像这样左右其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竟然是取决于抽签而毫不介意。

然则，抽签结果所指示的道路，虽说是出于偶然，但也显见天意是在于和平的。

可是，板垣、石原等人连这个抽签的决定也置之不顾。

石原在次日清晨，问明了三谷清等强硬派的决心之后，乃告诉他们——在建川美次到此展开活动之前，断然施行，并即进行准备。

灌醉东京的来使

建川美次到达沈阳，正是在事变这一天的九月十八日。

当天，板垣出迎建川美次于来沈阳途中的本溪；下午七时五分，抵达沈阳。这一伙人着奉天特务机关员花谷正担任接待，把建川接下火车，便一直送进了市内的日本料亭（餐馆）“菊文”；建川被花谷灌得酩酊大醉，最后，便头枕美人膝，呼呼入睡。

就在这个时候，一片漆黑的南满铁路柳条沟附近，担任爆破作业的河本末守，率同部下数人，在铁轨上安装好了由今田新太郎所供应的四十二个黄色炸药。

另一方面，在预定爆破地点的北面约三公里之处，有川岛正所率领的驻屯于虎石台之独立守备步兵第二大队第三中队，以“夜间演习”的名义，散开在那里，等待时间到来。

建川沈阳之行的目的，是保守秘密的，因而引起一些谣传，说他并非为了制止关东军的行动，而会不会是去收买王以哲，制造发动事变的肇因。但在陆军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课的机密日志上则于九月二十三日记有：“获悉关东军内有未经与中央部门联系的积极策动之企图，爰奉上司命令——为说服彼等暂时隐忍自重而赴满洲。”

又据其后曾任关东军参谋的田中隆吉在远东军事法庭证言：“事后，建川谈起过南次郎陆相嘱咐务希加以制止；但建川则并无制止之意，故而不打算在沈阳勉强和关东军的一伙人面谈，所以就一直跑进了料亭。夜半，炮声大作，艺妓们战栗失色，但建川则一枕沉酣，直到天亮，前往关东军那里，而事情已经是闹起来了。”

板垣露出满足的微笑

爆炸过后，在十点半钟，河本等人便开始向北大营进攻，并按照预定计划，派遣传令向川岛部队“告急”，使川岛部队立即沿铁路线南下，加入对北大营的攻击。

同时，并和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长岛本正一联络，告知“铁路被炸”、“和中国军队交战中”；不明实情的岛本，便完全相信“是中国方面在挑衅”，乃下令其驻奉天（沈阳）第一第四中队以及在抚顺的第二中队出动。

安装在独立守备队兵营内的二十四糎大炮，也朝向目标喷出了火焰。

另由平田幸弘所率领的第二十九联队，则开始进攻沈阳城。

此时，事变的导演板垣征四郎，则在成为“阴谋总指挥部”的“奉天特务机关”升帐，对于一如预先想定的进行情况，脸上流露出满足的微笑。

板垣随即向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作了大致如下的报告：

“因中国军爆破南满铁路，现已和北大营之敌进入交战状态。如果这样下去，将有受到优势敌军的围攻之虞，因此，步兵第二十九联队（联队长平田幸弘）下令全力攻击沈阳，职（板垣）为身历其境的本军参谋，已予允可，特此报告。”

拔出军刀威吓文官

在事变爆发时，赶到奉天特务机关的日本驻奉天领事森岛守人，目击当时板垣等人的行为，曾有记述如左：

特务机关内，电炬煌煌，皎如白昼。以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为中心，参谋们都在忙碌不停。板垣大佐对我说：“中国军破坏了我方重大权益的满铁线路，我军已在出动中。”并且要求总领事馆协力。

于是，我（森岛）便询问：“是谁发布出动军队的命令？”

他答称：“此系紧急突发事件，因司令官（本庄繁）在旅顺，所以是我（板垣）代行。”

我虽然感觉到日本军队的行动有点怪异，但由于没有证据，所以不便提及，而只得一再强调：“有循外交交涉途径和平解决的必要。”可是板垣大佐则以相当粗暴的语气反诘我说：“眼看着统帅权已经发动，总领事馆还要来插嘴，是不是想干涉统帅权？”而且，同时在场的花谷正（在料亭中将建川美次灌醉之后赶到此处）甚至在我（森岛）的面前拔出军刀，摆起威吓的态度说：“干涉统帅权者，不能宽恕。”

东亚从此无宁日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原任驻日本姬路之日军第十师团长，奉调继菱刈隆之后出任现职，刚于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日到任。

他自九月初开始，沿南满铁路线检阅部队，作战斗准备。事变当天的十八日，曾根据检阅结果，对驻扎东北地区的第二师团长指示如下：

“现在，满蒙情势日益动荡，不容一日偷安；当万一有事件发生之际，宜督饬各队积极行动，下定决心不得疏虞失败，并务期在准备上不能有丝毫失算之处。”

十八日下午十时，本庄由辽阳回到旅顺，入浴之后，接到板垣自沈阳发来的电报，是十一点钟，当时接纳了石原莞尔的进言，下令关东军全面进攻。

在板垣、石原的导演之下，关东军开上了武力侵略的列车，升火出发。

本庄繁在他的日记中，轻描淡写地留了一些如下的记载：

“九月十八日星期五晨大雨

“午后十一时许，接板垣参谋急报——日、支（中国）在奉天冲突，已出动独立守备步兵队及驻札联队。”

“九月十九日星期六晴

“午前零时，到达司令部（已先以电话命令第二师团向沈阳进军），召集各幕僚，命令全线同时出动，攻击奉军。

“继之，决定司令部立即移往奉天（沈阳）。一度回寓，作各项准备；午前三时三十分，率各幕僚及步兵三十联队出发。”

又据在关东军参谋部总务课任职之片仓衷大尉所记“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当初，本庄对于发动攻击颇有踌躇，但经幕僚劝说，乃下定决心。

日军报告掩盖真相

事变发生之后，到达东京日本陆军首脑部的第一个报告，是在九月十九日上午一时零七分，内容是这样的：

“十八日夜十时半左右，暴戾的支那军在奉天（沈阳）北方北大营西侧破坏满铁线路，袭击我守备兵，与赶往之一部分我守备队发生冲突。据报：奉天独立守备第二大队正向该地出动中。”

这个电报，用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名义发出。但当时土肥原正回到日本，是由其属员花谷正所代发。

从这个电报可以明了，他们是一贯地指称南满铁路乃被中国军队所爆破；可是，日本政府当局、尤其是外务省，对之怀疑的人颇为不少，但陆军方面则极力否定怀疑者的意见。

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之后，当时事变的责任者本庄繁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自裁，他在死前不久写下的“满洲事变的本质”中，仍旧坚持——“满洲事变，是由极端排日的爆破铁道行为开端，基于自卫而不得已采取了行动。……”还在打算掩盖真相。

战后军事法庭判决

九一八事变的起因，在直到二次大战后真相大白于世之前，日本方面的定说，一直是照陆军的主张——“由于中国方面爆破铁路而引起”。就连在对外保密的参谋本部所编之“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中也是说：“支那正规军（兵力三、四百名）竟敢突然有在柳条沟附近（南满铁路奉天车站东北约七公里半）爆破满铁本线的暴举。”然而，事件的背后有关东军在策动，在日本也被认为是“公开的秘密”。

及至二次大战后，在东京军事法庭上，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原因，也有所辩论。辩护团方面的清濑一郎律师便曾以本庄繁的遗书为依据，认为“军队为了本身的自卫和他的基本任务，有将中国军击破的必要。”又以被告身分出庭的板垣征四郎在他的口诉书中也曾主张：“显然是中国正规兵对日军有计划的挑战。”但法庭的判决则是——“在共同策谋之下，为制造军事行动藉口而惹起的事变。”

“日军发动攻击”的消息，立即自沈阳报告到南京国民政府。

当时，蒋总统正因为第三次剿匪而驻节于南昌行营，十万火急的电报，接连不断地由南京转到南昌。

“昨（十八日）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

“突占我北大营营房。”

“沈阳已被占领。”

“长春亦被占领。”

……

每一通电报，都是九一八国耻的烙印。

蒋总统的日记

蒋总统当接到这些报告之后，在九月十九日、二十日留有如下的日记：

‘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而来侵略我东（三）省矣！呜呼！痛哉！余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拼以一身报我总理！报我先烈！报我民族！’（十九日）

‘日寇野心既一爆发，必难再收，东亚从此将无宁日矣！’（二十日）

蒋总统于二十日下午中止指挥剿匪战事，由南昌乘船返回南京，在船中又接到报告：外交部于十九日向日本提出抗议，要求日军立即停止战斗；继之复于二十日提出第二次抗议，要求日军立即退出占领地区，恢复原状。

同时，在国际联盟的中国代表施肇基，也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向各国报告实情，要求支持。

此时，在国民政府立场，是打算就不抵抗的状况，循外交途径尽到最大的努力，以抵制侵略。

日军阀一意孤行

试图通过外交路线，消弭在东北的危机，是当事变还没有爆发的时候就已经在进行之中。

接洽的窗口，在中国方面是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日本方面为驻华公使重光葵。

宋子文与重光葵两人已决定同赴大连，和南满铁路总裁内田康哉会谈，日本政府也已予以承诺，并且预定了九月二十日（一九三一年）由上海首途的船票。

外交交涉已难承担

未料，事变却在两天之前爆发，宋子文乃于十九日约重光葵重行协商，决定仍照预定计划前往大连；然而，就在重光葵报候日本政府指示期间，关东军的战火，已经是无止境地在扩大中，于是，在大连进行高阶层交涉的计划，乃未能实现。

当时的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在他的回忆录-“外交五十年”中，有对于重光葵、宋子文的交涉寄予很大期待的记述如下：

九月十九日晨，接到驻南京重光公使的电报报告——当事变一发生之后，公使立即和宋子文见面，提议：“这样的事件，如果不迅谋解决，便会有很多麻烦加进来，将非常困难；故宜赶快派员前往当地调查，再由我们两人来协商解决。”宋子文很乐意地答应。……

我（币原）感到这个作法很好，大为高兴，首先告诉陆军大臣，旋并奏呈天皇之后，即覆电勉励重光公使——“做的很好，盼能努力获致结论。”自此，乃对于重光葵、宋子文的交涉寄予一线希望，一直在翘跋以待，但却没有再见到重光葵的报告到来。……

其后，便由驻南京总领事上村伸一传来停止了直接交涉的消息～～一度回到南京的宋子文，于二十二日向上村表示：“东北的事态，一直在扩大中，已经非个人所能承担得了；南京方面的大势所趋，是诉请国际联盟处理。”

可是，另据重光葵的“外交回顾录”，则指币原外相迄无表示，经多次催促，直到二十一日才示知认可，但为时已晚了。

日阁决议不能贯彻

日本政府在事变爆发之初原采不扩大方针，而且也知道肇事的责任是在日本方面。

十九日上午十时，举行“内阁会议”。其情况，在陆军参谋本部的“满洲事变机密作战日志”（战后被联军没收）等文件中有如下的一些纪录：

在“阁议”开会之前，若槻礼次郎首相曾向南次郎陆相叮问：

“能够相信关东军此次行动，是面对来自中国军的攻击为了自卫而采取的行动吗？”

南次郎答称：“本来就是这样的。”

及至开会中，外相币原喜重郎朗读外务省方面所获得的各种情报，很多是对于日本陆军不利的报告：

——“抚顺独立守备队说是要在十七日出动，曾经事先请求满铁准备列车候用；但到了前一天，又称十七日不出动，请变更准备于十八日使用。”

——“关东军司令部于十八日夜半曾作出动的准备。”

——“森岛守人领事要求关东军停战，受花谷正拔刀威胁；林久治郎总领事也要求停战，但无效用。”

币原手头持有的来自当地的报告，使人推想得到此一事变是军部有计划的发动，同时也透露出关东军在图谋扩大事态。

又关于事变发生的报告，根本就没有送到币原那里；他是于十九日早晨在家中看到新闻报导，才晓得有这样的事情，乃慌慌忙忙地赶到外务省。可是，在陆军参谋本部方面则已于上午五点半发出紧急通知，举行会议，决定“派遣援军”，表现得非常迅速俐落。

再说，在阁议中，南次郎陆相本来打算提出自朝鲜调派援军的提案；但会议一开始就被币原的报告所压抑，失去了说出提案的机会，而阁议则决定——“不使事态扩展到现在的程度以上”。

当天下午，南次郎向陆军转达了阁议决定。

血气方刚的青年将校们，对于不扩大的决定大表不满，代理陆军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的该部第二课长今村均，便曾在部长会议上申述了如下的意见：

“事如箭已离弦射出，若中途加以压制，使之恢复原状，则影响军队士气甚大，相信为军队着想，乃一非同小可之大事。此际，应极力排除万难，保持国家、军队之威信，达成伟大目的。”

对于这样的情况，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先是以劝抚工作自任，但结果却被青年将校们所影响，未能做到对于在东北当地的关东军之抑制。

十九日下午，参谋本部在发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电报中，对于关东军截至目前为止的行动予以肯定之后，并将日本政府的“不扩大方针”之意改变为“关于事件之处理，不超越必要程度。”指示循此主旨“善处”之。

关东军则对于如是云云的指示毫不在意，而一步一步地在造成其既成事实。

土肥原做“奉天市长”

占领沈阳之后的关东军，于二十日通知辽宁省主席臧式毅——治安责任由日军担负，同时将沈阳的行政体制置于其“军政”之下，由土肥原贤二为“奉天（沈阳）市长”。

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在这一天趁日军开城的间隙，手提菜篮，作出城买菜的仆役模样，混杂在人群中逃出城外，乘平奉线列车抵达锦州；在同一列车上，有张作霖的第六夫人携一女、四子，都只是穿了一身衣服，剩得一条性命逃了出来。

自此之后，辽宁省政府迁移锦州，但臧式毅则留在沈阳，以绝食对日军抗议。

“朝鲜军”越境

对于关东军所导发的事变，立即加以响应的是“朝鲜军”（日本驻朝鲜部队）。

在事变之前，关东军便已曾通过朝鲜军参谋神田正种和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约定——当发生非常事态时，朝鲜军迅速即来援。

是故林铣十郎在事变爆发后还未过半天的九月十九日清晨，便按照约定决由驻平壤的飞行第六联队派遣战斗机、侦察机各一中队飞往中国东北，以及出动陆军增援的方针。

林铣十郎并立即打电报向东京报告：

“本军鉴于在奉天附近的日、支（中）交战情势，并基于关东军的要求，派遣混成第一旅团（隶属于驻龙山的第二十师团）前往奉天附近，增援关东军；该旅团已于九月十九日上午十时左右分批自各卫戍地出发，由铁路输送，渡过鸭绿江后，便转隶于关东军司令官指挥之下。”

违反了军队的统制

林铣十郎这一个增援决定，是出于他的独断，而欠缺了必要的手续。

因为在惯例上，日本军队向国外出兵，必须有天皇的命令；如果仅由一个司令官的判断便派兵超越国境，则是违反了军队的统制。

是故东京陆军参谋本部在接到这个报告之后，对于如此非法举动，毕竟还是不能予以默认的。于是，乃立即对朝鲜军发出指示——未奉到天皇的命令，不得超越国境进军中国东北。

据日本方面资料：参谋本部作战课长今村均等人对于朝鲜军的陈请独断出兵一节，主张由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单独帷幄上奏——就是不通过内阁而直接奏陈天皇，取得准予越境的勒命，金谷总长也已经同意。

可是，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等人认为：“增派军队则连带地有支出经费的必要，未经内阁会议承认便遽行出兵，实有问题；且如被阁议否决，则势必要仰候天皇裁决，殊非臣下之道。”而且，据说天皇内心也是反对越境出兵，以致终于决定制止。

另一方面，据关东军参谋部“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中九月十九日的记述：关东军获得朝鲜军增援前来的消息，充满喜色；但旋即接到阻止越境的情报，大为失望。并且留有慨叹的议论：“如朝鲜军不能到来，则结果将只是重蹈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事变（炸死张作霖事件）的覆辙。如果不能设法把朝鲜军拉进来，则是费尽苦心，终归泡影。”在十九日举行的日本阁议中，决定了不让事变扩大的方针，且已下达指示；但朝鲜军却极力以扩大事变、“越境”为目标——载着全副武装朝鲜军的列车，则陆续不断地开向新义州的中、朝国境。

对于多年来阴谋得以实现、好不容易才抓到了占领东北良机的日本驻外军队来说，军的规律乃至于日本政府的不扩大方针，都只不过是一种障碍物而已。

同时，就在参谋本部内，主张事变扩大的中坚干部们也已经决议：“朝鲜军有向满洲出动之必要”，以冲击其上级的“软弱”态度；至于虽然站在抑制立场的上层干部们，在总有一天要使东北成为日本属地的“帝国主义共通意见”上，也是和驻外部队的见地不会有多大差别的。所以上上下下对于要将难得已经出动了的朝鲜军撤回到原驻地的努力，可以说是根本就不会做；故而只下达了一个“在奉到另外的命令之前，应停留于新义州待机”的指示。所谓另外的命令，不用说就是“前进！”而他们所谓“制止”，其本质，只不过是要有一点时间重新履行一个手续——获得天皇的命令而已。

隔了一天之后的二十一日，参谋本部通知朝鲜军——“以向东北出动为前提，正准备发动大命（天皇命令）中。”

朝鲜军就好像是正在等待着这个通知一样，一经到手，便在当天下午渡过鸭绿江，侵入了中国东北。可见这个行动，虽说是出于朝鲜军之“独断”，但实则只是等到酝酿及于一致的“期待”和“支持”而越境的。

关东军侵向吉林

此时，在沈阳的关东军，也来一次“独断”——就是出军吉林。这是造成沈阳兵力因出军吉林而减少，证明朝鲜军之来援是有其“军事上之正当性”的一个掩护手法。

在此之前的二十日正午，朝鲜军曾经通知关东军——“因奉天（沈阳）附近情势已见和缓，政府未承认有增援之必要。”“朝鲜军须等待吉林方面的情况。”这个态度，就是在促使关东军进军吉林。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开始时是反对进军吉林的，但因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坚持进军的意见，乃于二十一日上午三时同意第二师团所属第三十九混成旅团出动。

可是，对东京的报告，则故意延迟到上午六时，其用意，是要在奉命制止之前造成既成事实。故于二十一日在关东军参谋部的“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中记有：“这是唯恐再受中央干涉，故而策划好即使中央有命令到来，但已经是落于部队行动之后。”

此外，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在独断出兵越境时，曾经对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发出如下的电报：

“关东军已至于向吉林方面开始行动，现一再接到其诉说兵力显然不足、切望朝鲜军增援的要求，于义难忍，故已派遣在新义州的混成旅团渡江，以致陷入未克遵照前令之结果，诚属不胜悚惧。”

大错已成

到了这个程度，已经是不会再有回头的可能。

于是，在翌日～二十二日的阁议中，乃以朝鲜军的行动已属既成事实，予以追认，并决定其必需经费准列预算；继之，天皇也向朝鲜军下达了虽已为时较晚但却还是终于发布的命令。

于此，对中国电报的侵略，已经作为是日本的国策而得到正式认可。后来，林铣十郎乃得了一个“越境将军”的徽号。然而，这并非显示对于他的独断有何谴责之意，反之，却是盛誉其能有“决断”的一种称赞。

向国联申诉

面对“九一八事变”之扩大，在中华民国立场，当然必迅谋对策。

蒋总统于九月二十一日由江西剿匪前线回到南京，立即召集党、政、军干部会议，指示如下：

‘余主张以日本侵占东（三）省事实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与签约非战公约诸国，此时唯有诉诸于公理；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以自卫最后之行动。’

决定四点方针

在这个会议中，决定了以下四点基本方针：

（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

（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及剿共计划，悉予停缓。

（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专程前往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

（四）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军民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赖国联公理处断。

当时，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正举行例行会议，中华民国派施肇基代表出席。

施肇基于事变翌日～十九日，即遵照外交部训令将日本军队突然攻击沈阳并加以占领情况通告国联秘书处，要求国联为谋使日军退出而采取最适当的措置。

二十一日，施肇基正式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他照会国联秘书长，请根据国联盟约第十一条（保障和平义务）召开国联行政院会议。照会内容如左：

“……中国代表又接本国政府电告，得悉九月十八日以后之情势发展，较第一次所报告者更为严重。并称：日本正式军队于九月十八日夜无故向沈阳及其附近之我国军队轰击，……嗣后占据沈阳、安东及其他各城市；各地之公共机关均被强占，各交通路线亦被日军夺据。我国军队及人民因遵守本国政府命令，并未抵抗，以免任何可使情势扩大之举动。

“中国为国际联合会会员之一，……认为国联殊有依据第十一条所赋予之权力，阻止危害各国间的和平，并恢复事变前原状，决定中国应得赔偿之性质与数额。……”

在南京方面，当天晚间，宋子文（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偕同国联公共卫生处长拉锡曼谒见蒋总统，商谈收拾事变问题。拉锡曼是出生于波兰的犹太人，奉派视察疫病而来到中国。

熟悉国联内情的拉锡曼，对于情势的分析极其乐观，他提到——“只要是国联采取干涉态度，则日本军队必会撤退，所以问题不难解决。”

可是，蒋总统则认为这样的乐观论调是忽略了日本军部对于代表的野心，故为提醒他认识事态的严重性而对之答覆如次：

‘君须知日军既进占沈阳城，必不肯随便退出。余知日人对我东北之心理——宁使其东京或日本三岛全毁，决不愿自动退出东北也。望君牢记余言，切勿以轻易视之。’

二次世界大战自此肇端

当夜，蒋总统痛心至极，仍然不能入睡。

‘日人侵略实行，世界之第二次大战于是开始矣！不知各国人士能见及此否？’（九月二十二日日记）

依据中华民国的要求，国联行政院于二十二日下午开会。

引人注目的，是日本的态度。尽管全世界的新闻报导都指出是“日本有计划的侵略”，但日本代表芳泽谦吉（曾任驻华公使）还在强辩——“此次事变是由于中国军挑衅而引起的偶发事件。”并且表示反对国际联盟干涉如左：

“……此次事变，显为一种地方事件，我政府业已明令日本军队司令官阻止骚乱之扩大。余向理事会保证——日本并无扩大情势、或对中华民国开战之意。……余确信此次纠纷，定可由中、日两国政府直接交涉，达于和平解决。……国联如干涉过早，徒足刺激日本舆情，有碍和平之解决。”

在芳泽谦吉自着的“外交六十年”中，对于当时国联的气氛大致有如下记述：

九月十九日晨，西班牙代表（当时担任会议主席的国家）见告：“在奉天（沈阳）发生了大事件，国际联盟内部大为轰动。”旋即接到外务省发来公电：“中国军爆破满铁线路。日本军为保护侨民，已向铁路附属地以外出动。经电令不使事件扩大，将可就此收拾。”我相信这个公电，乃向国联行政院解释劝说，一度使喧腾气氛归于平静；可是，接着却又出现了日军占领长春，并向吉林推进的消息，显得问题非比寻常；而越发扩大的事态，与日本政府不扩大的公电背道而驰，遂致引起各国代表的激愤；于是，理事会的情势，乃对于日本颇为险恶。

日本的诓骗之词

在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的国联行政院会议中，针对日本东北芳泽谦吉的辩解，中国代表施肇基提出反驳：“那一方面的报告确实，请由国联派一调查团，负责提出报告。至于解决方法，则必先恢复原状，再直接交涉。”

此次会议，一致决议：“致紧急通知于中、日两国政府，请各防止有使事态恶化或妨碍和平解决的任何行动。”当天，由会议主席勒乐（西班牙外长）将上述意旨通知中、日两国代表。

在这个时刻，还有循外交交涉收拾事态的希望，故而蒋总统在九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记有：

‘此为一外交之转机，亦为我国家内部统一之良机。如天果不亡吾中国，则此次外交当不致失败也。’

二十三日，东北边防总司令长官张学良派其副司令长官万福麟到达南京，请示机宜，蒋总统也对之指示听候国联仲裁如左：

‘外交形势，尚有公理；东（三）省地位，必系整个，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土辱国之约。且日人狡横，速了非易；不如委诸国联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否则亦不惜与日寇一战，虽败犹荣也。’

日本的第一次声明

针对国际联盟的紧急通知，日本政府于九月二十四日发表“有关满洲事件的声明”（第一次），最初披露其公式见解答复国联行政院，大意如左：

“自事变发生之初，日本军队的行动，即限定于确保侨民、铁路及军队本身的安全。日本政府尽力本于防止事态扩大之方针，希望由中、日两国之间交涉，尽速和平解决。

“现在，日军已大都开回南满铁路附属地内。在吉林、奉天（沈阳）等附属地以外地区留置之若干军队，系为保护日本侨民及铁路安全；今后，如事态改善，即行撤兵。

“日本具有诚意的态度，希予信赖。”

此外，在这个“政府声明”中，仍然还在设词掩饰，把爆破铁路说成是出于中国军队所为，朝鲜军出兵越境进入东北，也是在条约限制以内的人数。——是一个满纸诓骗的文件。

次日（二十五日），在国联行政院会议中，中国代表施肇基强调：中、日两国之交涉，应以日本撤兵为先决条件；同时并拿出传达日军在东北暴行的电文，极力主张——“被日军占据地区的状态，是否如日方所言已有改善，不能确知，应请理事会立即劝告日军完全撤退；如果日方不予实行，则请理事会或大会裁决。同时并请国联即时派遣调查员前往当地调查。”可是，日本代表芳泽谦吉则反覆说明其政府声明的内容，主张——“为免事态恶化，请理事会不必干涉。”

当时的世界，正陷于自二年前所开始的经济恐慌高潮之际。聚集在日内瓦参加国际联盟会议的各国代表们，比起对于亚洲一角的中国东北情势还更为关心的，是在对其本国有直接影响的欧美经济问题。这可以说是对中国不利的当口，例如九月二十一日纽约时报的头条国际新闻为“英国停止金本位”；至于中国向国际联盟的申诉，则只被当作第二条来处理。

英国发言偏向日本

在如上所述的情况之下，英国代表薛锡尔遽尔相信了芳泽的辩解，而作了偏向于日本方面的发言：“依据日本的答覆，判明事态已趋缓和，认为已经尽到了国际联盟确保和平的任务。”

英国代表的发言，使国联会议中的气氛倾向于日本有利；其后，赓续举行了几次会议，而于三十日作了如下的决议之后休会：

一、知悉中、日两国对于国联行政院会议主席给予两国紧急通知的答覆，以及依照通知所作的处置。

二、对于日本政府的声明——“对满洲（东三省）并无领土目的之意”，认为重要。

三、知悉日本代表之声明——“日本政府当以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得有切实之保证为比例，仍继续从速撤退其军队。”

四、知悉中国代表之声明——“中国政府对于铁路区域以外日本侨民生命财产之安全，在日军继续撤退、中国地方官吏及警察再行恢复时，当负责任。”

在这个议案表决之先，施肇基提出要求：“……中国政府保留国联盟约上应有的一切权利，和继续向行政院请予援助，以确定九一八事变双方的责任，和确定公允的赔偿。”但因日本代表反对，以致此一意见未能成立。

国际联盟对于九一八事变的严重性，还没有察觉得到。

两点考验

‘……据中正意见，此次日本暴行，可为下列两点之试验：（一）试验国际间有无正义。……（二）试验我国是否能全国一致，发挥爱国精神，以御外患。

‘记得日本人有一本书，书名“满洲问题之重大化”。其间大略述及中国人散漫不关心国事，如甲午、庚子战役，战争地以外之中国人民好似不关痛痒——北方有事，南方人旁观而不关切；南方有事，北方人亦不感觉。

‘日本敢于公然侵略，实在已视我国民如无物，深可痛心。此次严重之国难中，我国民是否能全体一致，举国一心，发挥真正之爱国精神，以救国难，亦为一重大之试验。

暂且含忍决非屈服

‘……此时世界舆论，已共认日本为无理，我国民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恨，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国家存亡，关系重大，此时务须劝告民众——严手秩序，服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之妄动。

‘此刻暂且含忍，决非屈服。如至国际信义条约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忍耐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之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领导全体国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与国家人格。……’

上面一段谈话，是蒋总统于事变刚刚发生之后的九月二十二日在中国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的演说。

自三年前“济南惨案”以来，逐渐在高涨中的中国抗日舆论，更由于“九一八事变”之发生而益见强烈。站在前面的，则是学生、知识分子和言论界人士。

学生们的抗日运动

学生们的抗日运动，于九月二十日开始，全国三十个主要大学在这一天组成“抗日救国会”，推出代表五十人赴南京请愿。二十一日，救国会要求对日宣战及实施军事训练，并自行制订“义勇军编制纲要”。在北平方面，由清华、燕京两大学为中心。此外，在国际都市的上海，也有组成市民义勇军的运动。

像这样的抗日运动，其动机本来是出于纯粹的爱国心，但却也不能说是没有过犹不及的情形，这是由于有些被共产党所唆使运用的青年、学生们掺杂在学生运动的行列里，以外交问题为藉口而目的则是进行对内攻击。他们煽动街头示威游行、搅起社会不安，利用之为图谋颠覆政府的手段。

眼看着到处都是激烈抗日运动的日本公使重光葵，乃于二十三日向其外相币原喜重郎报告：“事实上，已经是面临了等于断绝邦交的严重事态。”

重光葵于二十三日发给币原外相的第一○二一号极机密电报，报告——“反日情感超过了二十一条问题以上”，其内容如次：

“中国方面，已经采取了除军事行动以外之任何其他方法为对抗手段；其为党部、政府所一致指导固不待言，而一向受有训练的所有排日机关都正在展开活动中，恐将不仅止于经济绝交的程度；盖在朝鲜排华事件时都未曾发动的全国学生运动，现在具有极大影响；反日感情，则较诸所谓二十一条问题时的恶化程度尤甚，且相信今后更将恶化。像这样下去，则说不定又会有那一天在满洲以外的地区发生不幸事件，实难预料。”

同时，重光葵在这份电报中曾经强烈地要求日本政府加强对于日军的约束。

学生们的抗日运动，虽经中央一再呼吁自重，但却仍然是一个劲地在扩大之中。

二十八日，终于发生了不幸事件。

当天，南京中央大学等校学生四千余人为要求对日宣战而罢课游行到中央党部及外交部，强行请求外交部长王正廷接见，并且闯入部内，以墨水瓶掷伤王正廷。王正廷乃因此而于九月三十日辞职。

在外侮当前的此一时期，国内如果意见分裂，是难以突破困难的。

蒋总统站在国家主席的立场，要是采纳学生们的希望，对日本宣战，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然而，却不能不审慎考虑到宣战的后果，因为在国内尚有汪兆铭等分裂派（广东政府）和共产党制造叛乱等情况存在，如果正面和日本开战，实在是愚蠢的决策；是故纵使被一部分激愤学生误指为“软弱外交”，备受责难，但一时必须极力忍耐的决心，则不曾为之动摇。

告全国学生书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在当天发表了如下的“告全国学生书”，对于学生们的过激行动加以劝诫：

“……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大难临头，至于此极，人民而犹不信任政府，政府而犹不绝对负责，则诟谇未息，国已不国矣！……”

树立傀儡政权

日本政府在国际联盟对于“停战”与“撤兵”的承诺，其军方根本就不理会有过这么一回事。

日军的最后目的，是要将东北自中国分割出来，使之为日本所领有。

早在事变的半年之前，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便决定了一个“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其所策划的到达领有过程，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劝诱中国人在东北组织“亲日政权”。

第二阶段＝以“满洲国”的方式使之独立。

第三阶段＝归于日本领有。

事变刚一过后，关东军便打算一举闯入第三阶段，因而提呈其武力占领东北全土计划，可是其中枢毕竟还是认为操之过急而予以反对。刚好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建川美次此时来在沈阳，他与关东军参谋之间经过了炽烈议论之后，决定改从第一阶段着手。

决定具体计划的最初谋议，是于事变发生后的第五天～～二十二日，在“沈阳馆”（旅馆）的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居处举行。

参加者有三宅以及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片仓衷五人。

先行划分为五个区域

当时，土肥原提出策立以日本为盟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计划，经过研议之后，决定了一个为他们所认为可能实现的方案，就是抬出逊清末代的宣统皇帝溥仪，使之树立傀儡政权。为实现这个方案，在前提上将东北划分为五个区域，先设镇守使五人分疆而治，其对象则为熙洽（吉林地区）、张海鹏（洮索地区）、汤玉麟（热河地区）、于芷山（东边道地区）、张景惠（哈尔滨地区）五人，都与关东军有勾结，而在日本来说，是容易操纵为傀儡的人物。

吉林省代理主席、吉林边防军司令部参谋长熙洽，在日军占领吉林时曾被逮捕，但旋即释放；熙洽在日军的劝诱之下，同意背离张学良，担任傀儡省政府的“长官”，并约定省政府职员半数采用日本人。

关东军的策谋，并没有逃过国民政府的注意。

九月二十九日，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向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提出照会如左：

“据新闻报导：我国东（三）省地方有企图建设‘独立政府’之组织，此种破坏中华民国领土之举动，在贵国未撤退以前，我国政府无从制止，贵国政府对此应负完全责任。特此请贵大臣查照，并希见复。”

币原于十月一日回答，其内容仍然是充满着虚构的言辞：

“此次日本军为自卫措置，虽一时在满洲地方的南满铁路附属地外占据若干地点，然正随最近中国方面维持地方治安机关之完备，而逐次向铁路附属地内集结，且于此等地点自始并未施行军政。

“又日本政府对满洲中国人树立政权之策动，早经严禁帝国文武官员予以奖励即支持，并取缔日本人参与此种策动；因此，日本政府对于此项中国人之策动，不居于负任何责任的立场。

“但若局部的治安机关成立，使内外住民得以安全及日本军队之便于集结附属地内，则毋宁为帝国政府之所欢迎也。”

于是，被日本政府所“欢迎”的“吉林长官公署”，便以熙洽为“长官”，于十月一日组织成立；继之，在日本劝诱之下，张景惠为设于哈尔滨的“东省特别区长官”，张海鹏为“洮南镇守使”，公然分别宣告“独立”。

蒋总统接获有关以上活动的消息，在十月一日的日记中有如左的记述：

‘余决对外声明：日军所占领各地方城市，在未正式交还中国政府以前，凡在各该地组织之任何团体，中国概不承认；其破坏中国领土完整之责任，应由日本政府负之。’

关东军于进行上述“政治工作”的同时，并在策进扩大行使武力的准备工作。

关东军不顾东京指示

但日本陆军首脑部则对于进行扩大工作的关东军再三加以抑制。陆军大臣南次郎曾经致函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责以：“关东军的组织新政权活动，将会牵连到使陆军自灭的后果。”同时，参谋本部也曾一再对关东军发出电报，督促自重。

不过，这些制止的指示，并非是基于尊重中国主权的大道理，而是出于他们在耽心着会和苏联发生磨擦的军事上之理由。因为苏联在东三省北部和内蒙古西部的势力颇强，日本唯恐会因为出动军队而对苏联有所刺激。

但是，石原莞尔等人则看透了苏联在经过史达林派和托洛斯基派一片血腥的内部权力斗争之后，刚自一九二九年开始才着手其第一次五年计划，所以没有在东北肇生事端的余力，故而判断苏军绝对不会向东北出动。

十月四日，关东军司令部发表了一个公开其树立傀儡政权意图的声明，对于要求其自重的日本陆军首脑部给以摇憾。声明的大致内容如次：

“目前，树立政权运动在各地发生，庶民咸讴歌皇军威仪，而丝毫没有推戴旧首领（指张学良）之倾向。……基于为居住于满蒙之三千万民众设想，而迅期其为共存共荣乐土之实现，实属衷心企盼，不能自已！且本于道义观点，相信尽速促进各地运动之统一，乃为发挥皇国善邻之谊所应履行之紧急救济方策。”

轰炸锦州

日本军部，对于树立其所谓“满洲新政权”的方针，已有迫使日本政府作成正式决定之意。

在十月五日、六日连续举行的日本内阁会议中，陆军大臣南次郎极力提出要求，但都没有得到正式结论。

据二次大战以后盟军总部所没收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之“满洲事变机密作战日志”记载：在五日阁议中，南次郎坚请政府决定方针，但外相币原喜重郎则提出反对。及至六日阁议，重复讨论到这个问题。

当时，南次郎主张：“关于满洲问题，宜建立脱离其中央政府的新政权，与之交涉，俾获解决。”针对这个意见，币原发言反对：“满洲问题，应和中国的中央政府交涉；和地方政权谈判，是不会有效果的。”首相若槻礼次郎也举出“国论尚未统一”而显示难色，遂即散会。

可是，接在会后，举行除若槻首相以外的有关阁僚会谈，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提出比较支持军部的建议：“如果时间拖长，则经费也要为之增加；马上就和地方政权进行交涉，如何？”币原外相虽然表明“不能同意”，但结果则作成了一个有附带条件的决定：“对于满洲新政权的树立，日本人概不参与；关于新政权的性质，也不参加意见。”而实则已让南次郎的主张获得默认。

‘日寇制造傀儡，以图永久占领，其用心之险恶笨拙如此。’（蒋总统十月七日日记）

本庄繁的三原则

至于关东军方面，则急于要对其首脑部进行沟通意见的工作，其可以运用的王牌，是朝鲜总督宇垣一成和满铁总裁内田康哉（曾任驻华公使、外相）二人。

内田康哉为说服其国内政界人士，决定回国一行；首途之前，曾于十月六日在沈阳与关东军交换意见，当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向之提出“树立新政权三原则”如次：

“（一）使满蒙与中国本土脱离关系。

“（二）由关东军一手统一满蒙。

“（三）满蒙表面上由中国人治理。实际上在日本掌握。”

在“三原则”的同时，又提出了为统制东北地区经济与交通、而为“满铁会社（公司）”希望应即实行的“十事项”，包括有——由“满铁”管理四洮、洮昂、吉长、吉敦等铁路；收买金融机关，统一币制；日本人开采之林业应予扶助……等内容。

到了这个阶段，日本政界中的积极论者，逐渐多了起来。十月七日，在东京举行为天皇谘询机关的枢密院会议，枢密院顾问官们一致责难币原外交，江木千之（曾任文部大臣）且曾酷谑地批评币原是在“和布帘较腕力”（意谓所做的是毫无意义，没有成效的事）。

接触到其国内的气氛已是这样的关东军，于是乃对于内田康哉回国说服之行，寄予很大的期待。

十月八日，本庄繁在发给陆军大臣与参谋总长的军机至急电报（参谋第六四四号）中表示：“值此托天之佑的事变之际，加以活用善处之必要性，甚为重大。”同时提到：“现在如采消极政策，则反而会招致外界怀疑是由于军部有什么不光彩的情节，以致政府为之迟疑却步。”此外，更指出：内田康哉归国之行，是为了说服政府要人作“彻底的解决”；迫切企盼军部也能有积极行动，俾免为若槻礼次郎、币原喜重郎等人所左右。

架起伪满的骨骼

（民国二十年自由人注）

十月十日，有国际法专家松本侠到达东北，就任关东军顾问。松本在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的请托之下，开始起草所谓“新国家”的管理与组织方案。

松本于十一月七日脱稿的“满蒙自由国建立大纲”，是将关东军的本意不折不扣地做到了“条文化”的地步。

它的基准就是——“以满蒙为日本领土，自属最理想之策，但如在此时立即实行，则将造成国际问题；为此，乃退而求其次，建立‘满蒙独立国’，使之完全脱离于中国的行政支配。”

至于这个所谓“独立国”和日本的关系，则为：（一）国防委托日本。（二）铁路、航空路等置于日本统制之下。（三）基于指导、监督之需要，设置聘请日本人所组成的顾问府。——差不多已经是具备了在后来所成立的伪“满洲国”的骨骼。

在如上所述的布局差不多完成之时，关东军遂即再度展开在东北全境清除张学良势力的军事行动。

日机突然轰炸锦州

十月八日下午二时前，锦州突然遭受十二架日本飞机的空袭。

由于沈阳失陷，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暨辽宁省政府都在锦州设立了行署，代理总司令长官张作相，以及由沈阳脱出的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等人聚集于此，以之为东北行政的根据地。

日本飞机飞到锦州上空，以上述政府机关及东北交通大学、火车站等重要地点为目标，投下了七十五枚二十五公斤的炸弹，以致居民数十人被炸死。

日本飞机之轰炸锦州，不啻是在将关东军并非仅止于沈阳乃至吉林一带的侵略意图，重新宣告于全世界。

轰炸锦州之举，在事前并未向本庄繁报告而是由石原莞尔擅自专断实行。据说当飞机出击时，石原本人脚踏拖鞋登机起飞；事后，曾受到本庄繁的斥责。

出动轰炸的十二架飞机，除原属关东军者之外，有朝鲜军所属平壤飞行联队的八八式侦察机两架以及掳自中国方面的飞机五架。

马占山炸嫩江桥

日本军队，违反其本国政府在国际联盟“不扩大事变”的诺言，进一步侵略到北部东北地区的黑龙江省。被其利用为工具的，则是和张学良断绝了关系的“洮南镇守使”张海腾。

张海鹏是在承受了关东军意旨的“满铁洮南公所署长”河野正直等人以步枪三千枝，银元二十万的代价所威迫利诱之下背叛国家，于十月一日自称“边境保安司令”，听从关东军的摆布。

张海鹏早就因觊觎黑龙江省的实权，与张学良不洽，梦想着满清复辟；现在得到关东军的支持，乃率军由洮南循着洮昂铁路北上，指向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

很快地便察觉到张海鹏动向的代理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经和在北平的省主席万福麟取得联系之后，遂于十月七日将架设在齐齐哈尔南方约七十公里的嫩江上的铁桥破坏。因为在这一带是广大的沼泽地区，由于将唯一的通路铁桥破坏，则可以遏阻张海鹏的军队前进。

日方藉口修桥进军

未料，这一条洮昂铁路，是向日本贷款所建筑，以铁路为担保，债务还没有偿清；是故日本军队乃以马占山所部破坏铁桥是侵害了日本财产为藉口，公然出面干涉。

此外，关东军更以“土匪扰乱治安”为由，在洮南以南的“四洮铁路”（四平-洮南）沿线增强兵力；同时通过其新设的“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林义秀少佐于二十六日向马占山强硬提出修理铁桥的“要求书”：

“在奉天（沈阳）关东军司令官致黑龙江省政府：务希从速修理嫩江桥梁，修理期限一个星期。其第一日为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八日，第七日为十一月三日。……届期如尚未完成，以后则当由日本方面修理。……为援护施工，并得出动武力。”

这是一个无理的难题，因为在一个星期之内要将铁桥修好，乃是不可能的事；而且，在马占山来说，也不应该特地为对面的敌人——张海鹏的军队来开通这一条进路。这也就是说：关东军明知马占山不会答应这个要求，而只是故意在制造“出动武力”的藉口。

当日本方面要求开始修理日期刚过的二十九日，便再由驻齐齐哈尔领事清水八百一将“由日方在日军援护之下开始修理铁桥”之意通知马占山；同时，日军则由长春、吉林陆续北上，在十一月二日推进到泰来。

马占山为避免冲突，乃于四日上午八时派上校石兰斌向日方传达撤退之意，开始将部队向后移动。

于是，日军便将在警戒中的马占山军步哨三人掳去；然后即有化装为中国人的日军渡过嫩江，于下午二时突然向马占山军开火。

两军终于进入交战状态。

据当时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编辑之“在满州事变中军的统率”文件，录有在当地的日军嫩江支队当时的报告电文，所报战事肇端情况与中国方面的纪录不符，该电内容如左：

“（四日）午前八时半前后，……由于有黑龙江军参谋长等二人以军使身分来到我（日）军第一线（大兴车战南方约三千公尺的第五桥梁），表明并无战斗意向；我第一线中队乃于正午向大兴车站前进，在车站南方二千五百公尺的地点，突然受到敌军（马占山军）步、炮兵包围射击，我军十二名负伤，支队在午后二时许……（以下电文不明）”

马占山进行坚强抵抗

接着，日军便出动飞机，盲目轰炸。当时，连“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林义秀也不知道已经发生了战事，他还在为了调查上午马占山军步哨被日军掳去的事件而由齐齐哈尔前来当地，以致他所乘坐的专车也在大兴车站被炸毁。

五日，日军加上增援部队，约达四千兵力。

面对着挟其四十余门大炮以及出动装甲列车、飞机等优势的火力与机动力而进袭前来的日军，马占山所部虽在大兴车站附近部署防线，坚强抵抗，但终于在六日退守三间房。在不到两天的战斗中，已伤亡约六百人之多。

这个战役，是关东军最初所经历的苦斗。设于五庙子的日军司令部，被马占山军骑兵迂回攻击，差不多是全部覆灭。

八日，林义秀复代表关东军司令部向马占山提出要求：“如果希望避免日军进入齐齐哈尔城内，则应立即投诚。”

接着，在铁桥修理即将完工的十二日，日方复向马占山提出更强硬的三项要求——马占山应下野。黑龙江省军队自齐齐哈尔撤退。为保障洮昂线安全，应让一部分日军推进到昂昂溪车站。

马占山则将日本蛮不讲理的要求宣告于世，不予理睬。

于是，看到胁迫手段达不成目的的日军，乃由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指挥所部不顾一切地出之以武力行动。自十六日开始，使用战车、飞机、重炮再度发动总攻击；十九日，终于杀进了齐齐哈尔城内。

日本陆军首脑部，在尚未得到阁议承认之前的十六日下午九时十分，便已经发出了进攻齐齐哈尔的命令；未料，在阁议中，除陆军大臣南次郎之外，全体反对，次日早晨，南次郎与若槻礼次郎首相直接会谈，才取得同意；乃于十七日上午十时将在先业已发出去的进攻命令延缓十三小时，使合符节。

期待公理伸张

关东军之将事变扩大，于是在国际联盟乃又掀起了议论。

当轰炸锦州的十月八日（一九三一年），蒋总统立即命令国联中国代表施肇基向国联行政院提出再行开会的要求。国联行政院第二期会议原定于十四日举行，但因此而提前一天于十三日召开。对于事变扩大甚为重视的英国外相李定、法国外长白里安都决定亲自出席。

蒋总统在向施肇基发出命令的同时，并下令驻美代办容揆向未加入国际联盟的美国政府说8[73]1839明情况。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声明：“国际联盟如果引用非战公约，则美国有进而履行其规定义务之准备。”

蒋总统在十月九日的日记中记有：

‘世界之公理，已有相当表现；但未知其结果能否得一公平之决议也。’

日一昧诿过于中国

对于国际舆论颇为恐惧的日本，乃打算将其轰炸锦州之举又诿之为中国的责任，于是日本外务省乃于十日发表声明：“对于锦州的轰炸，是由于侦察机在飞行中受到射击，故而予以还击。”

轰炸锦州之举，对于日本外交的立场极其不利。

据日本政坛元老西园寺公望的秘书原田熊雄所著“西园寺公和政局”书中提到——当时若槻礼次郎首相向原田透露：“日军轰炸锦州，使国联空气恶化，对日本非常不利。在十四日（实际为十三日）国联开会之前，对于这一个事实必须有相当程度的解释。老实说：陆军是做了很令人苦恼的事，这实在是连我也应付不了的；如果向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警告，他固然会表示接受，马上就下达训令；然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必为所欲为，真是毫无办法。”

‘国际联盟为我东（三）省事将开会议，如世界公理果得伸张，倭寇强权果能制服，则东亚与人类之幸也！否则，余（蒋总统）必为拥护公理而牺牲一切。盖非此不能保持民族精神与国家人格也。余复何惜哉！’（十月十三日日记）

十三日，国联行政院会议由白里安任主席，宣告开会。

施肇基激烈谴责日军

最初站起来发言的施肇基，首先重申日本撤兵的要求；继之，激烈责难日军轰炸锦州：

“中国已提诉于国际联盟，听候调停，故极力自制，一直不作抵抗；日本为什么无端占领中国领土，杀害无辜的中国人民？”

施肇基并且更向各理事国提出警告：“如果国际盟约、非战公约不能维持，则世界和平、裁减军备、国际安全以及世界经济危机之救济，都必同归泡影。”

日本代表芳泽谦吉则遵照其外务省在先的声明，一再辩解地说：“绝对是出于自卫措置。”并且和以往在会议中的发言一样，反覆强调日本在东北和内蒙古的特殊地位：

“从历史而言，日本在满洲的政治权益，可以说是由日本人牺牲生命和金钱所换来的；日本在满洲投资巨大，是因为满洲在日本的经济上和国家的生存上居于关键地位的重要性。中国不但侵害日本臣民，并破坏条约上的正当权利，九一八事变，就是由于中国过去那样挑衅结果所带来的情况。”

芳泽继之再度要求——“和中国方面直接交涉”；同时声明：“日军的撤退，以日本侨民的安全保障为前提条件。”

施肇基立即提出反驳：“中国人民的反日情感，是导因于日本的军事侵略而完全出于自然，不是政府所可干涉的。”并对日本方面的要求予以拒绝地说：“日军的非法占领仍然继续，加之于中国的损害现在还毫无赔偿的措施，中国绝不同意和日本直接交涉。”

会议进行的情况，由于东、西半球的时差关系，蒋总统是在十四日接到报告；注视着国联活动的英美驻华公使，也都聚集在首都-南京。

‘昨日国联开会，虽尚无结果，而英、美情势则似较前略佳；但事在自强，而不在人助也。’（十月十四日日记）

日本在外交上败退

次日（十五日），主席白里安有一个重要提案——邀请为非战公约的缔约国、但未参加国际联盟的美国列席国联会议。

先是在第一期国联行政院会议中，已经有过相同的动议，但彼时由于日本坚决反对而未有结果；可是，此刻国际情势已倾向于日本不利，于是白里安等人乃压制住日本的强烈反对而提付表决。

表决结果，只有日本一个国家反对，获得以十三票对一票的多数赞成，决定了邀请美国与会。自此之后，美国驻日内瓦总领事吉尔白乃以观察员身分参加会议。

这是日本外交败退和走向孤立化的第一步。

国联促日撤兵

（民国二十年自由人注）

决定了邀请美国以观察员立场与会的国际联盟行政院，到十月十八日前后才进入审议本题的阶段。主席白里安（法国外长）与中、日两国代表分别磋商，总希望能够找出一个坚决办法来；可是日本的侵略行为既然是在扩大之中则中国绝不可能有让步的余地。

‘日寇充分表现侵略军事之进展，吾（蒋总统）且以电请国联紧急制止后再定；如日寇相迫过甚。吾必与之一战，以存我民族正气。决心既定，相机应付，一切成败利钝，早已不在我心中矣！’（十月十七日日记）

国联通过决议案

白里安将中、日两国除外，而以英、法、德、义、西（班牙）五国代表组成“五国小组委员会”，进行幕后审议；并于二十二日向行政院会议提出一个以日本原拟给予期限为附带条件的撤兵案为其主要内容的第二次决议草案，其要点如左：

一、中、日两国政府须重申——不得有任何可使事态扩大的行动，并须采取消除敌对行为的适当方法。

二、在日本的声明中，表明对于东三省并无领土野心，知悉此项声明与国联盟约及九国公约之规定相符合。

三、为恢复双方通常关系：（一）日本军在下次国联开会日期（十一月十六日）以前，完全撤退到满铁附属地以内。（二）中国政府保证在东三省日本侨民的安全；特别是在日军实行撤退之地区，采定保证安全的具体办法。为此，并由各国代表前往当地，视察接收情况是否安全进行。

四、建议中、日两国政府指派代表，商订关于撤兵及接收撤退区域各事之细目，俾得顺利进行，不致延缓。

五、一俟撤兵完成后，中日两国政府开始直接交涉两国间之悬案。为此目的，行政院提议双方设立调解委员会，或类此之永久机关。

此一决议草案，是以撤兵为条件承认日本所主张的两国直接交涉；而另一方面则包括有对于日军撤退时期予以限制在三个星期的内容。

‘先撤兵而后谈判之目的得达，虽劳心，亦不无有得也；但日人必不满耳。’（蒋总统十月二十二日日记）

果然，日本代表芳泽谦吉对于这个议案表示反对；翌日～二十三日，提出了日本方面的“对案”。

日本的对案，是将白里安提案中的“撤兵”与“交涉”的顺序颠倒过来，要规定为“中、日两国在有关撤兵的基本条款达成协议之后，再撤退日军。”

芳泽张皇失措

日本方面的“基本条款”，由芳泽谦吉遵照币原喜重郎的训令秘密出示于主席白里安暨秘书长德留蒙，其中有一项是：“中国须承认日本在东北的条约上之权利。”日本所指的“条约”，是要包括以往的二十一条以及和张作霖所订有关铁路权利的密约，在中国方面是不能够予以承认的。

于是，各国代表乃针对这个“对案”，提出“所谓在基本条约达成协议之后撤兵，是不是说如果达不成协议就不撤退？”“请出示条款内容”等紧迫的质问，以致芳泽无从回答，张皇失措。次日（二十四日），白里安的提案进行表决，日本再度以十三票对一票而败北；不用说，反对者又只是日本一个国家。

据芳泽谦吉“外交六十年”之所记述，则与以上情形稍有出入。

他说：当时在东京方面，已将“基本原则”五项提示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在努力进行解决中，所以有指示不得在国联理事会（行政院）中说出“基本原则”的内容。因此，在会议中虽再三被询问到有关“基本原则”的问题，但无法加以说明；结果，各国代表乃表示：“对于内容都不能说明的解决案（日本对案）无法赞成。”遂即在表决中败北。

国联理事会对日本的情感，日益恶化，日本乃陷于孤立无援之境。义大利代表夏乐耶曾经表示：“在过去十二年的经验中，还没曾见到过理事会全体对某一国家有如此反感的先例。”

十月二十六日，蒋总统在国民政府的国父纪念周上，就国联会议的结果作了如下的报告：

‘……这个通过的决议案，以我们一般国民的立场论，当然还未达到我们所要求的目的；我们政府为尊重国联一致表决的精神，毅然接受这次的决议案。国联既通过这个决议，我们相信：他们一定能够本于这种决心，确实去达到拥护公理、维持世界和平的目的。因此，我们更相信；今后世界的和平，已由此次国际联合会与出席诸国代表的努力而得到更确实的保障了。

‘我们一方面对国际联合会这个决议固然尊重他、接受他，使他能够顺利实现；一方面对于国联为和平奋斗的精神、特别自议长白里安以次的各代表，不避艰苦、不辞劳瘁，为拥护公理、维持和平而努力，不能不表示甚深的敬意。’

就在这一天，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希望国际联盟决议早日实行，并盼日本尊重世界公意，于撤兵期限的十一月十六日之前完成撤退日军。”

日制造天津暴动

中国方面接受了国际联盟的日本撤兵决议案，为期顺利进行接收工作，乃立即成立东三省各地接收委员，迅速考虑其人选。

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特于十月二十七日致函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告知——“中国在遴任接收人员，并已准备就绪；希望日本政府派定适当负责委员，进行协商。”

日不接受国联决议

然而，日本方面则举出国联盟约第五条所规定的原则，认为：“行政院会议决议事项，非经全体一致同意，不能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为挡箭牌，通告国际联盟，指十三对一的决议无效；同时于十月三十一日肆无忌惮地答覆中国——“据理解：在国联行政院会议中并未成力关于设置接受委员会之决议。”

‘日军倘不如期撤退，一切困难，总无法解决也。’（蒋总统十月三十日日记）

中国方面遂即于十一月二日派定接收委员长顾维钧、委员张作相、张群等六人。

然而，在这个当口，日军却更以进击齐齐哈尔为目标，而于十一月四日在嫩江与马占山军冲突，使战线扩展到东三省北部，造成了新的冲击。

施肇基乃立即将此一事件报告于国联行政院；六日，国联以主席白里安名义，要求中、日两国政府——“从速训令各本国军事长官，避免两国有任何流血行动。”

八日，日本政府针对以上要求提出如左的答覆，照例又把肇事责任强加之于中国方面：

“我（日）军尽力避免冲突，今后中国方面如不再采取战斗行动，则事态将不致再行扩大。”

可是，这个答覆也止于是空口说白话，就在承诺“不扩大”的当天夜晚，日军又把事变的花扩散到了天津。

收买暴徒在天津骚动

（民国二十年十一月自由人注）

八日下午，天津市军警机关得到情报——有旧军阀余党的不满分子张璧、李际春等潜伏日本租界，组织便衣队，打算惹起骚乱。

天津市长张学铭，曾经派遣主管官员向驻天津日本领事馆要求对于危险分子予以拘禁引渡，但日方则不予理会。

于是，天津市公安局乃出动马、步警队，加强警戒，下午八时，实行戒严，使通往日本租界的主要马路断绝交通；同时，并调动驻屯天津市郊的一部分部队进入市内，增强警备力量。

下午十点半左右，在日本租界海光寺集结有便衣队约二千人。

十一时许，首先出动百余人袭击警察；继之，余众也自日本租界冲出，以省、市政府及公安局为目标，分头前进。

这些便衣队，一进入华界，便胡乱发射手枪、来福枪，投掷手榴弹——其目的，就是在造成天津市区的混乱。

公安局乃即加以镇压，但由于对日本租界警力难及，戒备困难；并且在整个华界到处发生骚乱，以致甚为棘手。

多数中国市民及军警人员在混乱中被杀伤。

河北省政府主席王树常在接到紧急报告之后，一方面通知各国领事注意，一方面要求日本领事——“负责取缔在日本租界的便衣队。”

但日本方面不仅不予接受，反而出之以干涉行为。

九日上午四时，日本驻天津军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突然打电话向王树常要求——“限中国军队及保安队、警察等在上午六时以前，撤退到距日本租界三百公尺以外地区；否则，日军即自由行动。”

王树常乃以“日本租界有便衣队出入，而且在三百公尺内并无中国军队，只有保安队及警察”而一度予以拒绝；可是，及至五点半钟，日本方面又来强迫要求撤离三百公尺以外，此时便衣队已被暂时击退，市区可望恢复平静，于是王树常便答应了日方的要求。

未料，刚一撤退之后，突然由日本租界发出约三十发炮弹，打到华界街衢。

炮弹落在天津市公安局前，在炮弹破片上可以明白看出有“大正十五年制”字样。

在这个事件的背后，有日本军在作大规模而且有组织的指挥与援助，是任何人都会看得很清楚的。

又缴收自暴徒方面的枪械，除日本陆军三八式步枪之外，还有沈阳兵工厂所造，后者是在日军占领沈阳之后落于日军之手，而运来天津的。据被逮捕的暴徒供称：当暴徒们在日本租界海光寺集结时，由日本方面发给这些武器以及每人现大洋四十元。

此外，日军在日本租界的百货店——“中原公司”屋顶架设有了望台，并且装置军用电话，监视天津暴动情况及指挥暴徒们的行动。

便衣队的游击暴动，自八日之后连日继续进行，日军并且出动装甲车在前面，掩护暴徒们的行动。

十日，多架日本飞机在天津上空飞行，曾投弹轰炸为学生抗日运动根据地的南开大学。

由于交通断绝，食品供应断绝，使天津二十万以上的市民濒临饥饿状态。

目的在掩饰溥仪出关

实则，在不久之后，真相便大白于世——这个天津事件，乃是为了建立所谓“满洲国”傀儡政权而策划的一场暴动。

就是在混乱之中，日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很巧妙地将后来成为伪满皇帝也就是逊清废帝溥仪带出了天津。

日图利用溥仪

逊清废帝溥仪自天津脱出、前往东北，是在天津事变第三天的十一月十日（一九三一年）夜晚。

关东军早有策划

溥仪的“脱出剧”，是由关东军所导演，而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已经进行策划。现在在这里特地根据溥仪后来所撰写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以及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纪录等资料，将他在当时的行踪说明于后。

年号宣统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于一九一二年退位之后，基于中华民国政府所规定的优待条件，每年接受四百万元的生活费，生活在北京紫禁城内。及至一九二四年，因冯玉祥发动政变、占领北京，遂被逐出皇宫，暂时投身于其生父醇亲王载沣寓邸。其后，逃入德国人所开设的医院，旋再被引匿于日本公使馆；继之，于一九二五年二月由日本使馆将他送往天津。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的当时，住在日本租界宫岛街陆宗舆的旧居——静园，有其妻婉容及旧臣陈宝琛陪伴生活。

溥仪受到日本方面的劝诱——“到东北去吧！”是在九月三十日。

这一天，他应日本的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之邀，前往设于日租界内海光寺的日军营舍，被导引到一间很富日本情调的会客室内，见到由旅顺、大连回来的旧臣罗振玉；同时在场的，还有为日本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所派遣的上角利一。

罗振玉必恭必敬的请安之后，立即呈上一个大信封给溥仪，里面装的是做了日军傀儡的所谓“吉林省长官”熙洽的手书。其内容是：“一直等了二十年的良机终于到来，务祈勿失时机，还归‘祖宗发祥之地’，以图大计。——在日本人的支持之下，首先以满洲为根据地，再进窥关内。”

溥仪非常欣赏这个建议，回去之后，便和旧臣们商量；陈宝琛表示：“要达到趁心的目的，就必须先让对方着急。现在宜暂且观望情势，才好抬高条件。”故而劝溥仪不要急着答复。

于是，溥仪乃沉着肆应，对罗振玉毫无回音；过了几天，香椎浩平也问到：“决定了没有？几时可以动身？”但溥仪仍然不动声色。

日方制造暗杀空气

这个时候，溥仪的家中收到了有人送来两篮哈密瓜和水密桃，打开之后，却发现里面藏有炸弹。

经过日本警察署和日军司令部调查之后，在第二天接到日本总领事转告：

“炸弹上有东三省制造字样，可能来自东北方面，恐怕是张学良想要暗杀皇帝？”

接着，溥仪常去的英租界维多利亚饭店也打电话到静园说：

“最近，有东北口音的人再三来饭店查问：溥仪来不来？总好像是在衣服里揣有手枪或短刀等类的凶器。”

这些事件，都是日本人为了促使溥仪早下决心而耍出来的谋略；可是，年轻识浅的溥仪，便相信是张学良的暗杀计划，被吓得发抖。

溥仪的又一旧臣郑孝胥（后来曾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一方面也为这个谋略所骗，一方面更耽心到如果长此踌躇不决，恐怕日本方面会另行抬出溥仪以外的人物，是则好不容易得来这么一个机会将要落空——故而向溥仪进言：为了躲开张学良的暗杀得离开天津。

郑孝胥于是便派遣溥仪家庭教师之一的日本人远山猛雄前往日本，与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及黑龙会的头山满等人取得联络，转达溥仪有去东北之意。

土肥原施展蛊惑

在另一方面，日本对于溥仪的“沉默”，也有点等得不耐烦，所以关东军乃派遣“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前来，负起说服溥仪和导演“天津事变”的任务。

土肥原将他所担任的“奉天市长”交给赵欣伯接替，他本人则于十月二十七日由沈阳出发，秘密到达天津。

迎接溥仪、建立“满洲国”的活动，虽然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已经开始策划，但直到事变爆发的第三天～九月二十日，经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建川美次和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协商，才见具体化。二十二日，关东军在向参谋总长陈述意见的关参四一一号电报中，一开头便表示：“使受我国支持、以东北四省及蒙古为领域，树立奉宣统帝为首脑的‘支那’（中国）政权，为满蒙各民族之乐土。”

土原肥之潜入天津，连对日本陆军首脑部也加以保密，而仅由两地驻军司令官本庄繁与香椎浩平所洽商决定。

然而，此一捧出溥仪的阴谋已在进行中的情节，则被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报告到外务省；外相币原喜重郎唯恐对于预定在十一月十六日举行的国联理事会（行政院会议）有所影响，乃于十一月一日对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发出电信第八十一号密电，指示应中止策进溥仪脱出天津的计划。在这个电报中有：“完全是不合时宜的计划”，“为将来重大祸根”，“南（次郎）陆军大臣也反对”等措辞极其峻烈的语句。

到达天津的土肥原，落脚于日本租界的“常盘馆”（旅社），带有钜额谋略费发挥作用--准备好了出动于天津暴动的“便衣队”。

十一月二日夜晚，土肥原偕同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翻译官吉田忠太郎到达静园，访谒溥仪。

土肥原对溥仪劝说：“关东军诚心诚意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请从速回到祖宗发祥地的东北，亲自领导这个国家。”

溥仪早就在梦想着即使和外国势力勾结起来，也要实现复辟。——于是，便接纳了土肥原的劝诱。

溥仪潜赴东北

在溥仪的内心里，对于由天津脱出之后，给予国内外的影响如何，毫不关怀；而他所耽心的，则只是还能不能当成皇帝。

一心只想做皇帝

溥仪在他自着“我的前半生”中，对当时与土肥原会晤情况回忆如次：

我心里有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我问道：

“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我（土肥原）已经说过——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帝完全做主的。”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这些问题，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

“不！”我坚持地说：“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

“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帝国，我可以去。”我表示了满意。

关于由天津脱出的办法，则由担任中国语翻译的吉田忠太郎代替土肥原和郑孝胥秘密协商。

最初预定十一月八日动身，但后来决定延到十日晚间，并约定只有溥仪单身行动，其妻婉容以及其他侍从人员则等溥仪到达东北之后，再让他们前往。日军方面也安排得非常周到。

八日晚间，按照预定计划发动“天津事变”。

溥仪脱出天津的十日夜晚，疾风冷雨，在戒严令之下的天津市街，显得分外寂静。

乘车逃出登上日轮

此时，在日本租界内溥仪寓处-静园的车库中，悄悄地驶出一辆天篮色的跑车，披着黑色斗篷、戴着黑色眼镜的溥仪，蜷伏在后箱里。

司机是最亲信的一个侍从，不过他的驾驶技术实在不能叫人放心，一开出静园大门，就碰到了电线杆，于是藏在后箱的溥仪，脑袋便被重重地撞了一下。

跟在跑车的后面，就是在等待着溥仪出来的吉田忠太郎乘坐着的汽车。

街头筑有防栅，站岗日军命令停车，但吉田忠太郎递了一个暗号，便立即通行无阻。

两辆汽车，按照计划驶达预定的中途落脚之处——日本料理店“敷岛”。

在这里和正在等候着的日本军官真方勋大尉会合，溥仪穿戴上日军外套和军帽，装成日本军人，换乘日军司令部的军用车，全速开到天津的白河岸码头。

在码头边，有熄了灯的小汽船升火待发，船舱中有郑孝胥父子、板垣征四郎的使者上角利一以及后来成为溥仪侍从长的工藤忠（本名工藤铁三郎）。

这艘小汽船，名叫“比治山丸”，是日军司令部的运输船，船长西长次郎，载有负责护送的军曹（下士）诹访绩及日军士兵十人，由于任务特殊，甲板上堆置有防弹用的土囊、铁板等类东西。

同时，日军更在船上藏有装满汽油的油桶，准备万一被中国军发现而不能逃脱时，就包括溥仪在内连船带人一起烧光，以湮灭证据。

“比治山丸”在航经军粮城附近时，曾被岸上中国军队发现，并受到枪击，但在黑暗中钻隙逃脱。

午夜，抵达大沽，换乘预先准备好的“淡路丸”汽船，直航营口。

溥仪于十三日在营口上岸，当时并未见到一个东北民众出迎，而只有由关东军所派来的甘粕正彦等日本人在等候着。

甘粕暂且将溥仪安顿在汤岗子温泉的“对翠园”旅社休息；一星期之后，迁往旅顺“大和旅社”。

由“南满铁路会社”（公司）所经营的大和旅社，于是便成了策划制造傀儡政权的“大本营”。

溥仪就是在这里和日本关东军及逊清遗老们商讨其“满洲国”的“建国事宜”。

落入关东军掌握

关东军对于溥仪的脱出天津，特地饰词是出于他自发的行动。

在关东军发给“关东厅”（日本设于旅大地区的行政机关）、“满铁”等日本机关的通报中都提到——“溥仪在天津因暴动勃发，感到甚为危险，为求安居之地，自动由天津脱出；十一月十三日上午十时，突然在营口登陆，要求保护；基于人道观点，已接受溥仪的要求，暂时收容于汤岗子，并加以保护。”“为顾虑时局，禁止其一切政治活动，并断绝对外来往。”“在适当机会到来之前，禁止发表有关溥仪行动之一切消息。”

又据后来担任溥仪侍从长的工藤忠在战后表明——溥仪到达“满洲”的第二天早晨，甘粕便向之宣称：“今后行动听关东军的命令。”“未经关东军许可，不得与任何人见面。”就连在约一个月之后跟踪而来的妻子也不能自由会晤，乃是处于一种软禁的状态。

此外，当时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在十七日发给外相的极机密电报中报告——“土肥原用掉五万元策动便衣队，收买保安队，以关东军供给的兵器散发便衣队，使参与暴动计划，已有证据。”同时更指出：“甚为有损帝国威信及国际立场。”“虽已与其本人（土肥原）恳谈，请勿再度进行如斯暴举，但仍有可能诸如继续从事倒张（学良）计划、或于最近在平津地方再次发生某种事变，殊令人耽心。”

关东军图南下

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在天津发动便衣队骚乱，而伺隙将逊清废帝溥仪带出天津，业已达成目的；可是，实际说来，在天津骚乱中还隐藏有另外一个更大的阴谋。因为土原肥所计划的最后目标，是要以天津不安为藉口，使关东军大举南下，进攻据守锦州的张学良军，并向天津方面增派日军。

首先制造骚乱、肇成不安；然后就以维持治安、保护侨民为藉口而出动军队，乃是照例的一套伎俩。

当时，日本分驻在天津、北平以及山海关、秦皇岛、塘沽等地的军队，合计将近一千人。这些地区，为由东北到达中国心脏部位的战略要冲，但却自一九○一年为处理义和团事件而缔结的不平等条约-“辛丑和约”以来，便让日、英、法等列强国家获得了“驻兵权”。

这些驻军，依据条约都有其限定的员额，并不容许擅自增兵；然而，指望扩大侵略的日本，总是在想极力设法增加其所派驻的兵力。

土肥原由于在十一月八日最初发动的骚乱被中国方面击溃，所以虽则已将溥仪带走，但出动关东军增派天津的企图，却以失败而告终。不过，他还是没有放弃这个念头。

据说有这么一个故事——当暴动失败之后，土肥原住在日本租界的“常盘馆”（旅社）中，打算切腹自杀；可是，刚好接到了陆军大臣南次郎和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发来指示继续进行工作的鼓励电报，因而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土肥原再度与关东军、天津军（日本驻军）密切联系，并继续进行准备。

关东军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决定了“对中国军作战计划”以一部分军队沿北宁铁路展开，向中国军挑衅，迅即进窥锦州。

“第二次天津事变”

二十六日下午八时许，土肥原发动了“第二次天津事变”。仍和前次同样地集结便衣队于日本租界海光寺附近，进攻华界，同时并派出突击队在天津市内肆行骚扰。

而日军方面，则又以有流弹落入兵营为藉口，向华界开炮，激烈轰击，因而有中国人四人死亡，二十多人负伤。

枪炮声彻夜未停。

二十七日，日军天津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在日本租界张贴布告，发出“戒严令”；同时，由塘沽方面派遣海军陆战队前来增强兵力。中国方面的保安队为避免正面冲突，乃不得已而向后撤退。

连接两度天津事变，是出于日本方面所策动，已为很明显的事实。二十八日，来到日本租界和华界视察的某德国记者，把这个情况结合上正好在巴黎举行的国联行政院会议而以“在前线”为题，在天津德华日报报导如下：

“在数星期之前，如想到要在天津做战地记者，一定会引人好笑；但现在则真个成了战地记者。……今天，许多大人物都正在巴黎，绞尽脑汁，以谋解决中、日之间的冲突，而在这里的‘世界的历史’，竟对巴黎乃至国联毫无顾忌地在演进之中。这一、两天以来，又有便衣队自日本租界出击，……城市又成战区。……岂真由于所谓便衣队乎？”

关东军沿北宁路西进

至于关东军方面，对于天津事变立即有所呼应，就在二十六日的当天，便展开了行动——其所属第二师团之第四混成旅团及步兵第二大队等部队沿北宁铁路西进，迅速占领沈阳西方的要冲-新民。新民县长魏某誓死不从关东军所要求的在“独立宣言”上签字，因而被日军所拘禁。

继之，日军复于二十七日以装甲车在前掩护，到达绕阳河，与驻大虎山之中国部队十九旅发生激战。

在这个期间，关东军将大量军需物资陆续运抵新民，并派飞机轰炸沟帮子，以及飞到锦州上空侦察。

关东军像这样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得到日本陆军首脑部的指示。就在当天（二十七日），日军参谋本部便以其“违反统制”而发布了措词强硬的“禁止作战命令”，饬该军回撤，以致对锦州的进攻为之一时中止。

日军首脑部表示不满

关东军的进占锦州方针，是在十月底所决定，并曾将其要点呈报日军首脑部。但首脑部方面表示反对，且为对关东军司令官的“独断专行”有所约束，更于十一月五日由陆军参谋总长下达“委任命令”（由参谋总长以承受统帅-天皇委任的方式所下达之命令）。又“委任命令”的第一号，是在关东军向齐齐哈尔进攻时所下达，令其“不得实施对北满积极作战”。

关东军由于对“委任命令”不满，乃有违抗行动出现；于是，日本陆军首脑部乃下令参谋次长二宫治重，畀以“传达中央意旨并指导该军（关东军）在行动及其他方面与中央意旨符合”的重任，派往东北。

然而，关东军之进攻锦州，就是发生在二宫治重待在沈阳的期间，以致东京的参谋本部对于关东军之“漠视中央”甚为愤怒，当时曾对二宫治重发出如左的电报：“中央至感遗憾。……军队妄自蹂躏中央意旨，阳奉阴违而有如斯行动，在中央立场，绝对不能承认。”“万一，军司令官不能服从命令，将会招致重大后果；而在中央方面，也正作重大决断性措置的考虑中。”

第十章：九一八事变(下)

主题

国联幕后活动国联决派调查团中央谋求统一共党趁机作乱日军攻取锦州蒋总统复出日图在上海滋事步步强硬逼迫“一二八”之夜蒋委员长通电日军藉休战增援庙行镇大会战我军声誉顿增日军登陆浏河东北的伪组织日本造成伪满阻碍国联调查义勇军袭击日军侵略野心的扩大日军肆行暴虐日诋毁李顿报告我盼国联修正

国联幕后活动

关东军所意图进行的“增兵天津”与“占领锦州”，在日本陆军首脑部严峻的“禁止命令”之下，得以暂时抑制下去。

不过，日本陆军首脑部虽则有此举动，但却绝非就是表示其内心已经放弃了对于中国东北的侵略，而实则只是为了“保持内外政略关系的微妙端倪及密切协调”（金谷参谋总长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五日上奏天皇之语）的一时停顿。

所谓“内外政略”，一方面是和日本国内的军阀主义势力高涨有关联，一方面是对于在国际联盟折冲情势的影响。

日本过激军人策谋政变

正当这个时候，在日本国内有由过激军人发动政变未遂的“十月事件”被发觉，军方受到很大的震撼。于是乃因此一事件，暴露出日本军方内部存在着过激派的不满情况，而助长了在日本内政方面的军国主义气势。

十月事件，是由过激派军人桥本欣五郎等人所策谋，打算发动“苦迭打”推倒若槻内阁，建立以陆军中将荒木贞夫为首相的内阁。

此一事件，被发觉于十月十七日，据被逮捕者泄露：“对日本政府不满的关东军，有脱离本国、宣告独立的呼应计划。”因而产生了大问题；虽然最后被查明只是一种谣言，但军方内部的不统一，已经是发展到了相信驻外部队真会独立的严重程度。

此外，关东军由于对禁止攻击锦州的命令不服，石原莞尔曾有提出辞呈、向中央抗议的打算。

在另一方面，国联行政院的第三期会议，由日内瓦移到巴黎，于十一月十六日开幕，会场在法国外交部的时钟厅。这个厅，曾经是巴黎和会的地点，美国总统威尔逊就在这里最初宣读了二十六条的“国联盟约”，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场所；还有，一九二八年的“非战公约”，也是在这里签订的。

然而，就在巴黎会议的几天之前所发生的日军进攻马占山（黑龙江）和天津事变等扩大事态的情况，更升高了国际间的危机感，是故日本乃处于不得不谋求避免因攻击锦州而蒙受更大国际批判的情势。

道威斯从事会外折冲

至于在国联行政院第三期会议中活跃的人，则是代表美国以观察员身分与会的美国驻英大使道威斯。道威斯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主持德国的赔偿交涉，颇有国际声望，他衔国务卿史汀生之命参加国联会议，总想调停于中、日之间，设法打开僵持局面。

下榻巴黎近郊“丽姿大饭店”的道威斯，迅即与交谊颇深的日本代表松平恒雄（日本驻英大使）、英国外相西门等人晤洽，从事幕后调停工作。行政院会议主席白里安（法国外长）鉴于前此连续两期会议中的决议未能解决问题，故而也有意通过秘密折冲，先做些为进行调停而减除困难的工作，所以也赞成道威斯的活动。

于是，道威斯下榻之地乃被称为“丽姿办事处”，成了国联幕后工作的舞台。

（民国二十年十一月）

第三期会议的第一天～十六日，主席白里安于宣告开会之后，立即休会，根本没有进行讨论。其后，英、法、中、日各国代表都去“丽姿办事处”进行非正式的交涉。而国联行政院会议，虽则自开幕到十二月十日闭幕达二十五天之久，但正式公开的会议只举行了三次，一切都是通过幕后工作在推进。

会期中，施肇基曾经提出“由国联制裁日本”的主张；但意图进行调停的各国，则不仅将之搁置，甚至英国代表西门反而打算提出——“中国声明保证日本在东北的权利”议案，不啻是要中国承认日本侵略东北的现状以安抚日本，但毕竟此案太欠公理，乃为美国所反对而将之打销。

国际联盟诸如此类的活动，已有助长日本侵略之虞。因此，在中国方面，也就得对于国联将会无力裁处问题而有作心理上的准备之必要。

蒋总统有流血的决心

十一月二十日，蒋总统在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日问题专门委员会中发表警告如次：

‘我（蒋总统）看如果中国自己没有充分自卫的力量，国际又没有很大的决心制止暴力，日本决不会撤兵。……现在中国已经失了东北土地，不光是东北三千万同胞同心协力，非把他收回来不可；就是全国四万万同胞，也都有决心，非把他收回不休的。

‘我们一方面很诚意的信仰国际联盟会，希望国际联盟会拥护正义，主张公道；但是，一方面我们国内须有切实的准备。我们料到日本不肯轻于退出东三省，也料到日本不能把大连、旅顺轻易交还中国，所以我们唯有依赖国民的能力、与世界上的公道；但我们一定更要有最后的决心。——什么是最后的决心？就是流血的决心！……

‘自日本占领了东三省以后，日本外相币原即与他们南（次郎）陆相说：“你要把东三省整个吞下去，无异吞了一个炸弹。币原在外交上是比较有些世界眼光，对中国必先有深刻的研究，才说出这一句话来。

‘我相信我们自己有一个决心，有一个准备，就要运用这句话——以东三省来做日本的炸弹，来收回失地，进一步使日本为东三省而亡。’

国联决派调查团

在国际联盟行政院第三期会议的幕后工作中，日本有一个提议——由国联派遣“调查团”前往当地（东北）调查，但以必须将停战、撤兵问题暂时搁置不问以及不得干涉军事行动为条件。盖在此之前，日本一直不肯接受调查，而现在为了要搪塞国际责难，乃提出此一附有条件、于己有利的提案。

关于日本方面之所以如此提议，当时的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述：

“奉天（沈阳）事件发生之后，列国甚为重视，英、美、法等国新闻记者频频来满（东北），同时，更不断派遣外交官、武官前来。日本政府当初认为让外国派人来观察，会于我方（日本）不利，但继而认为要是向这些人说明过去中国官员‘横暴’、‘不法’情形，则其结果并不一定不利。……大致关于事变之爆发，乃系出于不得已之事，已获有认识，故国联派遣调查员，盖于我有利，而且中国方面大约也不会反对，所以考虑到莫如进一步由日本提出议案，是为得策。”

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国联行政院会议中，日本代表芳泽谦吉正式提案——请派遣调查员前往东北调查。

针对日本提案，中国代表施肇基发表强硬主张——“要是不包括停战与撤兵在内的任何提案，不能接受。如果派遣调查员，则应赋予监视日本撤兵的任务。”

此时，已陆续发生的日军占领齐齐哈尔、天津事变、逊清废帝溥仪被带出天津等等扩大事变的情况，都传达到了国联行政院；而且巴黎的新闻界，更报导了“日军企图侵占锦州”的消息。

可是，国联各理事国却只顾揣想采纳日本提案，是使日本中止侵略行为的捷径。

派遣调查团的决议案

十一月三十日，国联行政院会议，主席白里安依据日本提案，为派遣国联调查员而成立了决议案的起草委员会。

十二月十日，行政院会议一致通过要点大致如左的决议案：

——行政院知悉两当事国相约采取必要办法，防止事态恶化，并避免再有任何发生战争及丧失生命的主动行为。

——就地调查有影响国际关系、扰乱中日两国和平之虞的任何情形，报告于国联行政院，并为此而设置由五人组成的委员会。中日两国政府应予以一切便利，俾委员会所需任何情报，均可得到。

——委员会对于两当事国之交涉或军事行动，无权干涉。

——委员会之审议，对于日本在九月三十日决议中所为承诺（最短期间内撤兵），并无影响。

施肇基在接受此一决议时，再三声明：保留日本撤兵、要求赔偿及保持领土主权之一切权利。

可是芳泽谦吉则宣称：“理解以上决议的旨趣，是并无妨碍于日本军队为直接保护日本侨民生命财产而采取必要的行动的。”这又是预为开脱日军继续其军事行动的责任而找出了一个后门。

于是，国际联盟便依据此一决议，于翌年（一九三二年）以李顿为委员长组成了“李顿调查团”，派遣到东北进行调查。

币原外交结束

在国联通过决议案的第二天～十二月十一日，日本若槻内阁，由于意见不能统一，无法弥缝，而被迫总辞。

因此，虽然做得还不够充分，但却有意采取对中国协调政策的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也终于等不到收拾事变的局面而走下了外交舞台。

关于若槻内阁总辞职的理由，后来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币原曾以证人身分作证如左：

“若槻内阁及其外相——也是我本人，当满洲事变发生之后，为抑制军方，并使不得再扩张领土，曾经尽到多方面的努力，但不能办到。我被指为‘币原软弱外交’，受到报纸以及极端国家主义者、军国主义者的激烈攻击；这些人，要求在满洲采取积极政策，以致若槻内阁感到非常苦恼。

“若槻内阁抑制不了军人，也抑制不了他们的扩张，其结果乃不得不出之以内阁总辞。”

继若槻之后的犬养毅（政友会）内阁，也是无力抵抗军部的压力，而且仅仅在五个月之后，便发生了“五一五事件”，犬养毅首相被军中过激分子所杀害，于是日本的政治便落到了军阀的操纵之下。

另一方面，在如此国难之中的中国国内，则还是处于缺乏统一的局面。

九一八事变的当时，以汪兆铭为领导的一部

分人，在广州自称“国民政府”，进行着反中央的活动。

中央呼吁全国团结

中国国民党在得知事变消息之后，便于九月十九日晚间召集临时常务会议，立即呼吁全国同胞面对国难团结起来。

二十四日，蒋总统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携带内容如下的手书前往香港，促请汪兆铭等人归顺统一：

‘弟（蒋总统）当国三年，过去是非曲直，愿一人承之。惟愿诸同志以党国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见以诚，勿使外间以为中山党徒只顾内争，不恤国难。……’

此时，为谋国家统一，蒋总统提出了最大让步的方案。

中央谋求统一

南京国民党中央为期广州汪兆铭等人的归顺统一得以实现而提出的让步方案，有下列三点：

一、如粤方自忖能应负付国难责任，则全体来京，改组政府，南京同仁无不相让。

二、如粤方自忖不能担此重任，则广东政府应即撤销，粤中同志应即来京，共赴国难。

三、如粤方意在合作，则南京尤为欢迎，即请同志联袂来京，面商参加政府办法。

针对以上方案，广东方面所提出的统一条件，是要求主席（蒋总统）下野；中央方面为挽救党国存亡危机，对于虽则是如此极端的要求，也有让步的打算。

统一会议，循粤方要求于十月二十七日（一九三一年）开始在上海举行。

汪兆铭等只图扩张己势

中央方面出席代表蔡元培、张人杰、李石曾、张继、陈铭枢五人，经过六次会谈；而广东方面则觑准了中央的忍让态度，乃表现得颇为强硬；交涉焦点，则为政治组织的变革和人事问题。

汪兆铭等人接连提出：（一）国民政府主席不得由军人出任的资格限制。（二）主席不负实际政治权责。（三）废除陆海空军总司令职位。（四）军人不得为五院院长（蒋总统当时兼任行政院院长）。

这些提议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反对蒋主席”；而他们的“统一”目标，就是在藉国难之名以谋扩张己方的势力。

此外，他们又提出东北边防总司令长官张学良下野的要求。张学良虽然被日本夺去了东北国土，但在锦州、热河、华北一带尚拥有数十万兵力，如果要张学良去职，则此一大军交谁指挥？他们连这个问题都不加考虑。

南京（中央）东北蔡元培、张人杰等人坚决反对蒋主席辞职；并且，张学良也曾于统一会议开始的翌日（二十八日）非公开地来到南京，劝请留任。

可是，正当统一会议进行期中的十一月四日，日军开始进攻黑龙江的马占山部队，于是，要求合作的国内舆论更为高涨，已经是绝对不能让交涉决裂。

及至七日，乃归纳出一个妥协方案如左：

一、在南京和广州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全大会。

二、双方各在大会中选出二十四名中央执行委员，互相承认。

三、中央委员产生之后，在南京集合，举行全体会议，决定政治组织之改革。

国民党在南京的四全大会，召开于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三日；广州方面则自十一月十八日举行，至十二月五日结束。

在南京的四全大会中，决议——“授予蒋中正同志以北上御侮之责任”，但广东方面却不肯同意，虽然一再敦促他们来京，而只是答覆：“须蒋主席先行下野”。

此时，日军已经开始进攻锦州。当此重大时刻，国内的政治纠纷，更增涨了国民的不安和不满。

鼓动学生过激行动

一时平息下去的学生运动，又开始激化起来。当时传播着一种非常奇妙的、对于学生们大有刺激的流言。这个流言是说新任外交部长顾维钧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向英、美、法三国驻华公使提出“锦州设中立地带，防止两军冲突”的意见。实则顾维钧并未有此发言，但这种谣诼已经传播到了国际联盟的秘密折冲场所。而且越传越多，甚至出现有“天津共管”的传说。

于是，深信流言的学生们乃更为激励。及至十一月底，全国各地学生约二万人聚集南京，连日彻夜不断地围拢向国民政府，要求政府派代表见面，高呼——“立即退出国联”、“一定要对日本宣战”、“统一宁粤政府”等口号。从这些要求，可以明显看出，在学生们的背后，存在有鼓动过激行动的分子。

不过，学生们的激越风潮，则非得要使之平息下来不可。蒋总统于是乃站在政府主席的立场亲自接见学生，否定流言，宣告政府对日方针不变，并呼吁他们回到学校里去：

‘拥护中央，实现统一，各尽其职，勿越法纪，御侮救国之道，尽于此矣！’

学生们接受了训迪，很有秩序地退了回去。

可是，还有一部分反动分子仍然在煽动他们罢课请愿，涌往南京，络绎不绝；他们殴伤站长，驱逐乘客，强占列车，开往南京。并且不断发生拘禁警察宪兵、殴逐教师校长等情事，甚至公然散发“打倒三民主义”、“打倒国民政府”的反动传单，以及高呼共产党口号。

国民政府乃于十二月五日下令禁止学生群众集体来京请愿。八日，更对全国学生发布通告如次：

“青年学生，为敌人反宣传所中伤，变本加厉，举动逾常。……在此国难时期，捣毁秩序、妨碍交通之青年，是否为真能救国之青年？……违国家法令，与卖国反动者以可乘之隙，亦国之罪人也。……深冀吾爱国青年，严守纪律，共御外侮，期达救国之目的。”

共党趁机作乱

在南京的学生骚乱情况，一天比一天激烈。

十二月十一日（一九三一年）下午，来到南京的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学生们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国民政府”，因而有两人被逮捕，但旋即释放；可是要求释放的游行运动立即传播到上海，学生们并且强求市长张群惩办制止游行的公安局长。

十五日，聚集南京的学生总数不下七万人，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外交部请愿，其中更有来自北平的学生约二百人闯入外交部，任意捣毁，并将制止暴行的职员殴伤。

这些人携带棍棒，挟藏手枪，接着又涌到国民党中央党部。

当时，蔡元培、陈铭枢二人出来接见，便被他们所围殴，还要将受了伤的蔡元培硬拉出去。于是，政府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乃出动军队与警察，将暴行学生当场逮捕。

蒋总统解职返回故乡

然而，在如此秩序混乱的重要关头，广东方面还是坚持领导中枢的蒋总统下野。蒋总统为了促成全国统一的大前提，乃牺牲小我而于十五日辞卸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本兼各职。当辞职时，对全国发表通电，表明自己的立场如左：

‘……现在国事至此，若非从速实现团结、完成统一，实无以策对外之胜利，慰国民之期望。……中正许身革命，进退出处，一以党国利害为前提；解职以后，仍当本国民之天职，尽党员之责任，捐麋顶踵，同纾国难。……’

二十二日，蒋总统偕夫人恭谒国父孙先生灵墓之后，乘飞机返回故乡-浙江奉化，为的是既已引退则不拟对于新的国民党领导者有所影响。

就在同一天，国民党四届中央委员的一中全会在南京开幕，直到二十九日结束，推选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

经过这样的过程，南京和广东始合而为一，翌年（一九三二年）元旦，新政府宣告成立。

但是，学生们的骚动，则并未平息～～十二月十七日，又有一千多人手持木棍铁棒包围中央党部，其中一部分带着赤色臂章，拿出红旗，散发“共产党万岁”的宣传标语，并打破门窗玻璃，要闯进中央党部；抑且袭击中央日报印刷厂，纵火焚烧。

十八日，国民政府终于发布“取缔越轨行动令”，于是，学生们的过激运动，才渐趋萎弱。

共党利用国难为契机

站在这些过激学生背后，操纵着他们的，不用说，就是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意图利用九一八事变的国难为契机，给国内带来混乱，以谋扩张其本身势力。

政府军队的剿匪战争，由于九一八事变而中止，以致功亏一篑；而共产党则乘此机会，迅速于事变后两天的二十日下令匪军向政府军展开反扑。

二十二日，中共依据莫斯科的指示，分析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是——“（一）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作进攻苏联的准备。（二）促进国民党团结，是加强剿共的先声。”

他们（中共自由人注）把“九一八”不当作是在侵略自己的祖国，而认为是攻击苏联，威胁共产党。

此时，领导共产党的人，是陈绍禹、秦邦宪等国际派。他们是曾任第三国际驻华代表米夫所教育的留俄学生集团，掌握着共党“上海中央”的实权，完全听命于莫斯科；

他们（中共国际派自由人注）所留意的，只是“保卫苏联”和“颠覆国民政府”。

九月三十日，他们更宣布：“国民党是中共永久的敌人。”

此外，毛泽东等人则于十一月七日在赣南山区的瑞金，举行“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称成立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将瑞金改名为“瑞京”，号称“首都”。

“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其行政机关的“人民委员会”，由毛泽东兼任“主席”，项英于张国焘为“副主席”。

他们（毛派中共自由人注）发表了三个文件，呼喊“打倒南京和广东两个政府”、“拥护苏联祖国”，意图偷偷地将“抗日”目标转变为“反国民党”、“反三民主义”，以煽动面对国难大为激愤的群众情绪，而导向于“反政府”途径。

共党进行内部侵略

还有，共党“红军”的军事行动也为之加强。

十一月二十七日“红三军”攻陷江西会昌，十二月鄂豫皖边区“红四军”又窜入湖北黄安。

十二月十四日，在政府部队第二十六路军中，有为数二万官兵的两个旅在江西宁都叛乱，投入共军。

翌年元月九日，中共更决议：“为争取革命，要在一省或数省求取首先胜利。”

这显然是在和日军的扩大战线互相呼应，以夹击政府军，而陷政府于困境的一种“内部侵略”。

日军攻取锦州

日本关东军的攻击锦州阴谋，在一步一步地推进中。先是在天津事变之际曾经下达禁止进攻命令的日本陆军首脑部，此时也已经决定了进攻锦州的方针，并作派遣援军的准备。

日本陆军首脑部于十二月五日决定的方针是——“通过交涉，要求在锦州的张学良部队向山海关以西撤退；张学良如不肯撤退，则增派一个师团兵力，予以驱逐之。”于是，关东军即遵循此一方针研拟作战方案。

在这个期间，若槻内阁于十二月十三日倒台，犬养毅内阁诞生。犬养毅在要求荒木贞夫入阁就任陆相时，曾经明示：“和军部合作、积极解决问题”的方针。

进入十二月下旬，关东军的离奇行动，越发显著。中国方面所获得的情报，显见其进攻时期业已近在眉睫：

～～十二月二十三日，由山海关北上的北宁铁路列车，行驶到新民附近，被关东军扣不放行，车上乘客数十人都被拘留。可以想见其目的是不让列车进入关东军占领区以内。

～～日人在大连市内各成衣铺定制白色衣帽三万套，限二十三日前交纳。此时锦州一带已经遍地积雪，可以推断关东军是为了在雪地攻击时的掩护之用。

～～在北宁路支线之田庄台附近有土匪约二百人，被关东军收买，以备用于攻击中国军队时协力行动。

～～在营口的关东军，派出碎冰小轮船四艘，一方面在辽河行驶防止结冰，一方面将野炮等重火器运往西岸。又向民间征用大车百余辆，装运枪炮子弹。

中、日双方的小接触，随处都在发生。

二十二日清晨，在田庄台东方出现配备有野炮八门的关东军约五百人，与驻在当地的中国部队交战。

二十三日上午十时，有关东军六十余人并铁甲车一列，向田庄台进攻，被中国方面的铁甲车“中山号”所击退。

二十四日，关东军更由陆空两方面集中炮火向中国军的铁甲车猛烈进攻。

张学良的彷徨

此时，关东军看穿了张学良自蒋总统于十五日下野之后已经丧失了战意。据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在满州事变中军的统率”文件中，录有获自中国军方的下述两件情报为例，分析张学良内心业已动摇：

～～十二约二十一日北平绥靖公署（蒋总统下野后，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撤销，张学良由副司令调任北平绥靖主任）令第二军司令部：“我军驻关外部队，近当日本来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届时，以迁安、永平、滦河、昌黎为其驻地。”

～～十二月二十二日张学良上蒋总统电：“公（蒋总统）今旋里，毋任痛心！日寇近迫锦州，河北局面如何善处，乞公赐予最后指针。”

二十五日，国民政府电令张学良“对于日本攻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

可是，张学良已经显得气馁，他在二十六日呈复国民政府的电报中，只是陈诉困难情形如左：

“对锦必尽力固守。但日军倾全国之力，我仅一隅之师，彼则军力充实，器械精良，陆空连接，大举进犯；我则养饔不充，械弹两缺，防空御寒，均无准备。——实力相较，众寡悬殊，凡此情形，谅为钧府所洞察，战端一开，非一时所能了。……”

二十七日，日本政府发表了要点如下的声明：“（一）九一八事变以来，东北地方官员相率逃走或辞职，日本不得已乃负起保护侨民生命财产的责任。（二）在满铁本线西方，马贼（土匪）等不逞分子显著活动，乃系出于锦州军事当局之策谋。（三）为此，日本乃基于自卫而继续讨伐不逞分子。”

日本政府这一个声明，又是要把他的侵略锦州，说成为“正当的行动”。

二十八日傍晚，中国军的铁甲车在田家镇受到日军炮击及骑兵联队的袭击，乃向盘山后退；二十九日，日军空袭盘山，其兵力并增强到三千人，且出动战车助攻，中国铁甲车更后退到另一个据点-胡家窝棚。

同一天，沟帮子也受到两度空袭。

国民政府于三十日再度电令张学良抵抗：

“各官吏及军队均有守土应尽之责；否则，外启友邦之轻视，内招人民之责备，外交因此愈陷困境，将何辞以自解？……”

蒋总统复出

日军侵略锦州的全面进攻，是自一九三一年逼近岁除的十二月三十日开始。

上午八时，北宁线的白旗堡西方有日本飞机四架飞来；继之，复有铁甲车一列及骑兵二千出现，与当地公安队展开激战。

辽中县城也受到日军攻击。

下午一时，北宁路沿线中国军队向北镇后退，日军一举推进到大虎山（打虎山）。

另一方面，在北宁路支线上的防卫据点胡家窝棚之第十九旅阵地，于上午十时暴露在日军步、骑、炮兵共约三个联队的攻击之下。

空中有飞机八架，陆地有铁甲车及战车计十辆助攻，极其猛烈。

第十九旅虽经勇敢抵抗，但支持到下午七时，终于撤退到沟帮子。

经过这一天的战斗，日军进侵到通往锦州的路程，差不多已经是一半以上。

锦州不守东北全失

中国军和日本军的战斗力，显然有很大的差距——动员了飞机、铁甲车、骑兵部队的日军，在火力和机动力两方面都居于压倒的优势；而中国军则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之下，连补给都陷于难得正常的状态。

三十一日，国民政府重又下令张学良“坚守锦州”。然而，战况则是一面倒的趋势，锦州前线的最后据点沟帮子，也继之陷落，日军已迫近距离锦州只有五十公里的地点。

新年降临～一九三二年元旦，设于锦州的辽宁省政府终于放弃锦州，迁往河北省滦州；驻在锦州的部队也开始向关内撤退。

日军尾随在中国军之后，于翌（二）日下午二时进入锦州城。

至此，东北全境差不多都已陷于日军蹂躏之下，而自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才只不过三个半月的时间。

在南京方面，当锦州撤退的这一天-也就是一九三二年的元旦，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暨各院院长、各部部长，正式宣誓就职。

这原是为大家所期待的“统一”告成，应该寄予祝福的开始，可是新政府的前途，则实在是困难重重。

电邀蒋总统重返南京

元月二日，中央政治会议举行紧急会议。依据会议决定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孙科邀请蒋总统重返南京，共商大计。

蒋总统下野之后，与胡汉民、汪兆铭同经四届一中全会推举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但未就任，而返回故乡。

孙科发来的电报是这样的：

“新政府虽已产生，以先生（蒋总统）及展堂（胡汉民）季新（汪兆铭）两兄均不来京，党国失却重心。……国事不易收拾，先生平昔爱党爱国，想不忍袖手而坐视也。务望莅京坐镇，则中枢有主，人心自安。”

十二日，立法院长张继及前敌剿匪总司令何应钦同到奉化，促请蒋总统复出。

蒋总统乃终于离开家乡，到达杭州，和由上海前来的汪兆铭见面。十七日会谈约一小时半，然后由二人联名致电在香港的胡汉民，请其共赴国难，但胡汉民因在养病中，未能前来南京。

此时，中央委员及各省军政首长、民众团体也纷纷发来电报，恳切盼望蒋总统回到南京。

挽救危机尽我天职

蒋总统当时向夫人表示：‘国事危殆至此，唯余赴京，尚有挽救之望；而个人之毁誉成败，则概不应顾也。’夫人点头称：“是。”十八日，孙科复来杭州；当天晚间，蒋总统招待汪、孙二人晚餐，即席表示：

‘余不入京，则政府必贸然与日本绝交，绝无通盘计划，妄想一时血气，孤注一掷，国必亡灭。故余不顾一切，决计入京，以助林主席挽救危机，本我良心，尽我天职而已。’

二十一日，蒋总统于杭州启程之际，对记者发表谈话：

‘余此次晋京，个人当然苦痛。然国事如此，亦不能计个人之苦痛。……当为公义私交而尽力赞助政府，共纾国难。’

蒋总统回到南京，正是日军在上海制造各种藉口的挑衅之际，中日两军已经面临了一触即发的危险状态。

在如此紧急情势之下，蒋总统于二十五日出席中央常会，常会接到了孙科请辞行政院长的电报，外交部长陈友仁也在先一天辞职前往上海，国家政务再度停顿。

二十六日晚间，蒋总统约汪兆铭晤谈，告以：

‘行政院长不可虚悬，请兄速行组织行政院，主持大政，中（蒋总统）愿不受名位，竭诚相助。’

汪兆铭于二十八日就任行政院长。

“一二八事变”——日军侵犯上海，也就是发生在这一天的夜晚。

日图在上海滋事

“一二八淞沪事变”（一九三二年元月二十八日），是日本海军在中国的心脏部位所发动的军事行动。

这个行动，和在电报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并非没有关联，虽然沈阳和上海之间的距离有一千四百公里之遥，但实则不能不说是出于同一构想，而且有密切联系的一连串事件。

日本军部是以“一二八事变”来转移国际间对于东北方面的注视，而趁隙制造出伪“满洲国”。就这一方面来说，可见“一二八”乃是为了侵略东北而故意策划的一种“佯动作战”。

由于九一八事变之发生，中国人的对日感情日益恶化，尤其是在国际都市的上海，市民抗日运动为之沸腾，逐日不断地举行各种抗日集会。

对于市民如此反日情感更其火上加油的，是居住在上海的日本侨民们的对抗行动。他们以在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一日所举行的“上海居留民大会”为开端，继之召开“长江流域日本人联合大会”、“全支（中国）日本人居留民大会”，猛烈诟责中国；他们高呼着日本侵略军阀所制造的口号——“膺惩暴戾支那”，这是对于本来就已经非常激愤的中国市民越发加以刺激的挑衅行动，惹起了不少次的小纠纷。

于是，看到了这些情况的日本军部，乃反而抓住了恶化的对日感情，以“保护侨民”为藉口，在上海制造一次骚动，好把倾注在东北方面的国际视线转移到上海来。

策划者仍是关东军

策划这个骚动的“作战本部”，说来又是关东军。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之后的十月间，日本驻华公使馆派在上海的陆军副武官田中隆吉少佐，接到在沈阳“奉天特务机关”服务的花谷正少佐邀其赴沈一行的电报。

花谷与田中以及影佐祯昭、林义秀等，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六期的同期同学，也都是在中国各地从事特务工作的同僚。

田中应邀到达沈阳之后，由花谷陪同往见关东军司令部参谋板垣征四郎密谈，板垣对他说：

“日本政府对于国际联盟非常顾忌，以致关东军的计划很难如意推进；现在关东军准备占领哈尔滨，并预定在来年春天实现满洲独立，打算以逊清宣统皇帝溥仪为满洲国首领，土肥原大佐已去天津和溥仪接头。

“只是，这个作法，将会引起国联的鼓噪，而日本政府也就难以赞同。为此，剩下一个最后的办法——就是在上海搞出一点问题来，转移西方列强的注意。……”

板垣给予田中两万日元，将进行这个谋略的任务付托田中；同时，关东军又派遣专田盛寿大尉等人协助田中。

田中隆吉从事鼓动

回到上海之后的田中隆吉，更向设在上海的日本纺织业界借到十万日元，作为工作费，以之收买中国的流氓无赖。在进行收买工作时，被日本人称为“男装丽人”的女间谍川岛芳子也曾为之帮忙。川岛芳子是满清皇族肃亲王的女儿，并为策谋“清廷复辟运动”、“满蒙独立运动”的日本大陆浪人川岛浪速的养女，为日本从事谍报活动。

田中的目标，是要运动一些中国无赖袭击日本人。他设想——如果造成杀害日本人的事件，则可使日本方面抓到责难中国的藉口，而且一般日本侨民也会更为激愤，是则日本军队便可以因而登场。

田中所窥伺的机会，很快地便在一九三二年年初出现。

元月八日，日本天皇在东京樱田门外受到朝鲜人李奉昌的袭击，翌日～九日，上海民国日报以“不幸仅炸副车，凶手即被逮”的标题报导了这个事件。

针对这个新闻报导，日本侨民大起骚动，他们提出——“什么叫做不幸？”“是不是失敬？”鼓动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向刚刚于七日就任上海市长的吴铁城提出抗议。

吴铁城为了姑且平息事故，乃命令民国日报声明取销这个报导。

田中鉴于此计不售，于是紧接着便又发动了一个杀害日本人的计划。

十八日下午四时左右，有日本妙法寺和尚天崎启升等五人为冬季修行，行经上海市马玉山路，受到颇多中国人突袭攒殴，经在附近的日本人所经营之东华纱厂职员将受伤者三人舁入医院治疗；其中一人，于二十四日死亡。

当时，得到报告的中国警察赶到现场，但行凶者业已逃之夭夭。

此一事件，很少有人察觉到是出于田中隆吉所阴谋策动。就连在事后受国际联盟委托担任调查的英、法、义等国驻沪领事团所提出的报告书，也都认为——“行凶的中国人中，有数人大约是最近组织的抗日义勇队队员。”

不明真相的日本侨民，大为激愤，他们气势汹汹地宣称：发生了橡这样的凶杀事件，是由于日本方面对于中国人“抗日”、“反日”所反应的态度太软弱之所致。

事件的第二天，日本的青年们哄起了所谓“复仇”的暴力寻衅行动。

田中的阴谋，毕竟是如愿以偿。

步步强硬逼迫

被日本人选中为“杀害日本和尚事件”的报复对象，是在发生事件现场附近的“三友实业社”。

“三友实业社”是中国民族资本的纺织工厂，生产“三角牌毛巾”。本来，中国的毛巾市场，是由日本产品“铁路牌”所占有，但由于反日情感日益高涨，“三角牌”的国产品乃顿形畅销，而“铁路牌”的东洋货遂无人问津。是故在日本说来，三友实业社乃是集怨所在的厂家。

捣毁三友实业社

和尚事件的第二天～元月十九日，有“日本青年同志会”会员等浪人三十多人，手持刀、棍、火药冒雨涌到三友实业社。他们以“袭击日本和尚的犯人一定是这个工厂的工人”为藉口，在捣毁工商之后，继之纵火焚烧；临去时，更与中国警察冲突，杀伤三人。

及至二十日下午，又有日本侨民二千人，集会于蓬莱路日本人俱乐部，决议：要求日本政府出兵压制中国的排日运动。继之，更在市区示威游行之后，并赴日本总领事馆及日本海军陆战队本部提出请求，气势汹汹。

他们的示威游行队伍，行经闸北虬江路及北四川路一带，殴打过路的中国人，并捣毁颇多中国商店及电车、公共汽车，更将执行制止其暴行的公共租界外国巡捕殴伤。

眼看着暴动化的状况而暗自高兴的田中隆吉，更在继续着他的工作～～一方面向日本公使馆及“支那派遣军”游说出兵的必要性，一方面进行侧面活动，他以手枪胁迫“三井物产”（贸易公司）的上海分公司负责人致电东京三井财阀的最高负责人团琢磨，请其主张出动日军。盖出于三井财阀的派兵要求，是可以促使日本政府拿出决心的一张王牌。

当时担任“三井合名会社”（三井财阀的总公司）理事长的团琢磨，在此事不久之后的三月五日，便被和日本海军青年将校有联系的右翼暴力组织“血盟团”团员以手枪暗杀而亡，此外，血盟团并曾在二月九日将前任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射杀。

五项蛮横要求

此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的态度也颇为强硬，就在日侨示威游行的同一天～二十

日，村井便向上海市政当局提出五项要求：（一）市长道歉。（二）逮捕凶犯。（三）赔偿损害及医药费。（四）取缔抗日运动。（五）解散抗日团体。

对于这个要求，上海市长吴铁城所提出的答覆是——“（一）（二）（三）项可以考虑。关于（四）（五）两项，因此类团体是由民众基于自动的爱国的赤诚而组织，他们行动只要是不妨碍秩序与安宁，市政府是不能加以压迫的，而且也没有那样的权力；但如有越轨行动，则当依法制裁之。”

与此同时，吴铁城针对日本人纵火焚烧三友实业社的事件，也向日方提出抗议；而村井仓

松则向吴铁城表示遗憾，同时言明——查缉纵火浪人，依照日本法律从严惩办。

日本海军介入

可是，到了二十二日，日本海军突然介入交涉，其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发表了胁迫性的声明，送达上海市公安局，内容是这样的：

“上海市长如不能给予满意答覆，并立即实行日本方面的要求，则海军司令官决采相当手段以保护日本的权利和利益。”

此时，在黄浦江上，陆续有日本海军舰艇到达，向中国方面示威；及至二十四日，已有航空母舰“能登吕”号，以及巡洋舰二、驱逐舰五、炮舰一、敷设舰一，计共十艘。

巡洋舰“大井”号，约有陆战队员二百人离舰登陆，开赴设于江湾路的日军陆战队本部。

据当时情报，日本海军有占领上海郊外的真茹无线电信局之意。

村井仓松也于二十四日以海军压力为后盾，向吴铁城提出——“如果在相当时期之内得不到满意答覆，则保留采取必要行动之权。”--暗示可能使用武力。

接着，村井更于二十七日强硬地提出“限二十八日下午六时前回答”的最后通牒。

对于日本的最后通牒，吴铁城下定决心，招集上海各界代表会议决定“忍辱负重”的原则。因为无论如何都得避免为日方挑衅所乘而使中国的经济商业中心-上海卷入战火。

在回答期限之前的二十七日晚间，上海市政

府下令解散自去年九月以来担负领导抗日运动任务的“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并派警察将会址封锁。

对于上海紧迫情势放心不下的参谋总长朱培德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决定由南京调派宪兵第六团前往上海，担任接近公共租界的闸北一带防务，即于当夜出发。因为此时驻防上海的是第十九路军七十八师的六个团；而调派宪兵部队到达上海的目的，则是配置在中日两军战斗部队的中间地带，使发生缓冲作用以防范不测事态。

然而，日方对于中国方面所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不能满意，坚持要将所有抗日团体一概解散。盖中国方面避免冲突的关注与措施，毋宁说是为日方所不能欢迎之事，因为他们的立场是——不管怎么样，总得要在上海酿造出一个危机来。

“一二八”之夜

（民国二十一年元月二十八日，日本通知公共租界工部局--“如果中国方面不能在期限内提出满意的答覆，则行使武力。”工部局遂即决定于下午四时发布戒严令，通告各国领事馆知照。

当天午后，黄浦江上的日本舰艇又有陆战队员六百人登陆，部署于闸北华界和日本租界的邻接地区，进入战备状态。

日本的意图，显然是要以得不到满意答覆为藉口，寻衅开战。

接受要求竟起冲突

上海市长吴铁城为使上海免于战火，乃更决

定作最后的让步，下午一时，答覆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对于其原先提出的五项要求完全接受，同时并下令取消所有抗日团体，由警察一一予以封闭。

对于中国方面之完全接受日本要求，村井仓松表示“满意”。

这样一来，任何人都会想到——日本采取军事行动的藉口业已消失，是故上海市政府于二十八日夜晚发给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行政院的电报乃是这样的：

“……此案谅可告一段落，惟沪市民情愤激，幸防范严密，尚未发生事故。”

到了这个阶段，所耽心的毋宁说是中国国民的情绪难以平息下去。

未料，紧迫在前一封电报后面的续报，却是事态竟告突变：

“万急。限三十分钟到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行政院钧鉴：艳（二十九）日午前零时三十分据公安局温局长面称：日本海军陆战队于俭（二十八日）晚十二时分在闸北一带开始军事行动，向我军进攻；我军已经抵抗，在交绥中。……上海市政府叩。”

这是“一二八淞沪事变”发生的第一个报告。

蒋总统接到第一个报告之后，便未暇就寝而忙到了天明。

‘闻昨日对上海日领要求已承认，彼亦满足，且表示傍晚撤兵，何乃至午夜又冲突也？’（元月二十九日日记）

事变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

二十八日下午十一时二十五分，上海市政府和公安局突然接到日本舰队司令盐泽幸一的公文，内容如左：

“帝国（日本）海军认为居住邦人（日侨）众多的闸北一带，治安可虑，因此，配置兵力，使负起维持治安妊d任。本司令官兹要求支那方面对于支那军队在闸北地区的敌对设施迅速撤退。”

在租界范围以外的闸北，毫无问题是中国管辖区域；然而竟在如此深夜突然送过来这样自执一词的通告，于是，上海市政府乃试行和日方接触，谋探明其真意何在。

想不到，接着就在还没有过三十分钟的十一点五十分，全副武装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便侵入了闸北一带。

日军首先进袭警察机关。继之，向中国驻军开火，除使用野炮、曲射炮等火器之外，并经确认已动员装甲车十余辆，是正规的作战行动。

据日本方面纪录——元月二十八日当时，在上海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现有兵力九百零八人，加上由日本国内之佐世保镇守府及吴镇守府两处军港增派前来的九百二十五人，合计为一千八百三十三人。

日军的进攻，在三方面同时展开——由北四川路指向淞沪铁路的天通庵车站。由虬江路攻往宝山路。由北四川路向宝兴路进攻。

十九路军奋勇歼敌

此时，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正在市区西郊真茹的该军指挥部中。蔡廷锴得知日军攻击闸北的消息之后，立即下令驻守闸北地区的该军第七十八师所属第六团（约千人）将日军击退。

上海市区终于成了战场。

熟悉地形的第十九路军士兵们，由这个街巷转到那个街巷，敏捷机动，迎击日军，战况展开了于中国军队有利的情势。

于是，宝兴路则成了日军装甲车的坟场，有的中国兵跳上正在奔驰中的装甲车，从车窗口将手榴弹投入车内；又有的士兵藏在屋上，瞄准通过下面马路上的装甲车，丢下手榴弹——日军的装甲车乃一辆又一辆地被炸毁。

又在三义路上的中国军，将一部分日军包围，给予了差不多悉数歼灭的打击。

二十九日午前四时许，日军由航空母舰起飞海军飞机二十多架，盘旋于市区上空，对闸北地区投下大量照明弹与炸弹，援助其地面部队作战。

中国军队死守闸北，一步不退。

到了天明之际，日军陆战队受到损害颇大，地面攻势渐弱。

为了援护地面部队，日军飞机终日不断猛烈轰炸，宝山路一带烈焰腾空。

这一天上午天晴，下午阴雨。

蒋委员长通电

元月二十九日，日本海军飞机对于上海市区的盲目轰炸，使许多市民的生命财产为之丧失。

毁我珍籍为全人类损失

其中很遗憾的，是设在宝山路、发行“东方杂志”等书刊而为中国最大出版社的“商务印书馆”及其附属的“东方图书馆”之遭受劫火和被日军掠夺，以致“东方图书馆”收藏的宋版、元版图书十多万册、和四库全书等珍籍都被焚毁或劫走。据当时新闻报导——日军以卡车搬运烧剩下来的书籍达一星期之久。似此流传古代文化的善本书籍之被毁灭，应该说不只是中国人、而是全人类的损失。。

据在兵燹九个月之后复刊的东方杂志，刊载有何炳松所撰“商务印书馆被毁记略”一文，记述被灾情况如次：

“二十九日……十时许，接连向本馆总厂掷下炸弹六枚，第一弹中印刷部，第二弹中栈房，当即爆炸发火，救火车无法施救，祇得任其延烧。火起后，日机复继续掷弹，于是全厂皆火，浓烟弥漫天空。又因总厂堆积纸类甚多，延烧更易，厂中各种印刷机器全部烧毁，焚余纸灰，飞达十数里外。”

又在四天之后，“东方图书馆”也全部被焚。该馆自一九○四年以来，所收罗的数百万卷书籍资料，都被烧毁。

又“商务印书馆”现已移在台北，易名“台湾商务印书馆”，继续营业，为在中华民国最俱权威的出版社之一。一二八当时的该社总经理王云五（八十九岁）现任董事长，并为总统府资政。

得到空中攻击为之支援的地面日军，乃三番四复地进行突击；但中国军则一一予以击退，给予重创。

十九路军决心抗战

此时，十九路军辖有三个师，计三万兵力，担负上海以至于南京方面的防务。总指挥蒋光鼐依据日军攻击规模判断必将面临大会战，故而决定除在南京等地留驻部分兵力外，差不多已将全军投入上海战场。

二十九日傍晚，蒋光鼐与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联名发表通电，表示决心澈底抗战，以鼓舞十九路军全军士气，电文如左：

“……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

事变发生时，蒋总统因孙科、汪兆铭等人的敦促，由故乡来到南京，但尚未正式复任公职。

事变翌日，中央政治会议任命蒋总统与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四人为军事委员。其后，蒋总统复于三月十八日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兼参谋总长。

军事委员会的实际职务，就是在统辖对日军事作战。

国民政府迁往洛阳

首先着手的部署，是将国民政府临时迁往河南省的古都洛阳。这是因为已经成为战场的上海，距离南京不到三百公里，而且有一条大动脉-长江连贯两地。在日本军阀的战争意图已经明显的此刻，为避免党政中枢暴露在日军的直接攻击之下，故而向内陆地区迁移，实为当务之急。

‘余决心迁移政府，与日本长期作战，将来结果不良，必归罪于余一人。然而两害相权，当取其轻，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此害之大，远非余一人获罪之可比。余早有志牺牲个人，以救国家，他复何所惜哉！’（元月二十九日日记）

同时，更以最精锐的中央警卫部队第八十七、八十八两师编成第五军，决定投入上海战线。

翌日（三十日）清晨，蒋总统为亲自表明本人决心并号召全国官兵奋起抗战，特发表通电如左：

‘……沪案发生，对渠要求，且已茹痛接受，而倭寇仍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军进攻；轰炸民房、掷弹街衢，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忍？

‘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

‘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日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

就在这一天，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兆铭等首脑，由南京出发，经开封而往洛阳。

南京受到来自长江上的日本军舰之炮击，是在两天之后的二月一日深夜。

日军藉休战增援

二月一日，蒋总统在徐州召集军事会议，讨论长期性、全面性的抗日作战计划，经过连续两天会议的结果，决定了划分为五个防卫区的“全面防卫计划”——

第一防卫区-黄河以北。司令官张学良，副司令官徐永昌。统率东北军及晋绥军。

第二防卫区-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司令官蒋中正（兼），副司令官韩复渠。指挥鲁豫及苏皖北部军队。

第三防卫区-江苏南部及浙闽。司令官何应钦，副司令官陈铭枢。除指挥第十九路军及第五军外，并由江西抽调五师增援淞沪，隶属指挥之下；另由湖南调二师及由广东出兵一部入赣，监视中共匪军。

第四防卫区-广东广西。司令官陈济棠，副司令官白崇禧。统率粤桂军队。

预备区-四川。司令官刘湘，副司令官刘文辉。应准备五师以上兵力，集中鄂东待命。

这五个区的兵力，总计有二百四十万人。在淞沪战线，除由第三防卫区负责外，并动员第二防卫区兵力为后继部队。同时计划以第一防卫区部队向东三省挺进，牵制日军，使其不能有在上海扩大侵略的余裕。

二月八日首先将新编的第五军调赴上海。

政府为实现这个战略部署，并派遣专使赴各地与军事首长接洽。

防卫计划未能完全实现

照说，此一计划，如果能够有效运用，则应该是足以使日本的侵略遭受严重挫折的。可是，各地军事首长虽则是国家面临了如此关头，但却仍然存有旧时军阀的意识——把国家军队视为己有，唯恐会受到损耗，而不愿有所行动。

派到北平去会晤张学良的，是陈公博与李济深，而张学良只是回答了几句象征性的话——“巩固后方，推进前方；保护地方，拥护中央。”

广东方面，本来是对于中央的“忍耐”有所责难，甚至曾经高唱“对日宣战”；可是到了此时此刻，却马上变得反应迟钝，对于政府“出兵江西”的命令置之不理。

至于四川的刘湘，则更表示不能保障政府使者张笃伦的安全，而阻止其入川。

“全国防卫计划”，由于各地首长之不能同心协力，以致未能完全实现。

英美总领事调停

于是上海方面，则由市长吴铁城通过英美两国驻沪总领事调停，中日双方乃于元月二十九日下午八时开始一时“休战”。

三十一日，再经两国总领事居间，举行中日双方负责人会谈。英国驻防军司令即席提出调停建议：“（一）日军退至租界线内。（二）退出区域由中立国军队驻防。（三）中国军队亦同时退至相当距离。（四）事变之解决，待外交交涉。”日方则表示：“俟向本国政府请示”，而当场未作承诺，只是暂时决定“休战”延长三天。

然而日本方面竟会如此轻易答应休战，其用意何在？是颇为费解的。

‘最须注意其军部之动态，免被所欺。

‘祇要不丧国权，不失守土，日寇不提难以忍受之条件，我方即可乘英美干涉之机，与之交涉；不可以各国干涉，而我反出以强硬，致生不利影响也。’（蒋总统二月四日日记）

果然不错，日军只是出于“缓兵之计”而停战。

盖当时指挥作战的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起初意存轻视，他认为：只要日军一出动武力，中国军队便会自上海撤出。

可是，他却没有料到在闸北的中国军队竟然会一步不让；日本的陆战队反而遭遇到很严重的反击，以致蒙受了重创。而且中国军队还在增援之中；如果像这样地继续作战下去，在兵力上显然会迫使日军越发陷于不利的情况。于是，感到焦灼的盐泽乃向东京方面求援。

东京的日军首脑部，对于如此情况当然不能置之不顾；他们以为万一败于上海，则是涉及日军颜面问题，所以决定派兵增援。不过，由日本国内出兵，并非可以朝发夕至，故而盐泽幸一遂藉“休战”以争取时间。

日本续调大军赴沪

接着，日本海军方面，便先后于一月三十日、二月一日分别由佐世保镇守府调派第三特别陆战队四百七十四人，横须贺镇守府调派第一特别陆战队五百二十五人，赓续投入上海战线。

二月二日，复以野村吉三郎中将为司令官新编第三舰队，派往上海。该舰队系以派遣在中国长江流域的舰队为中心，计配属有航空母舰、战舰、驱逐舰等四十九艘。其旗舰“出云”号于二月六日驶达吴淞港外。

日本陆军，也为支援淞沪战事而动员～～二月五日，以驻金泽的第九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及第三、第五、第十二，近卫各师团的一部分部队合编为“上海派遣军”。

战火之扩大，已经成了定局。

庙行镇大会战

在能够获得增援的情况之下，上海的日军于二月二日再度发动攻势。尤其是在二月四日，整天被密集炮火射击以及飞机投下烧夷弹轰炸，以致闸北青云路、宝兴路一带化为一片焦土。

二月七日，上海北面的吴淞要塞地区，也受到日军攻击。但布防在蕴藻滨的中国部队虽则在一个星期之间被反覆进攻多次，但都能一一将之击退。

另一方面，为日本陆军“上海派遣军”主力的第九师团，则于二月九日、十日两天，由其本土广岛县宇品港口出发，自十四日至十六日之间在上海登陆，陆续部署于闸北等地。

中国军队为戒备日军全面进攻，积极构筑防御工事。二月十七日午前零时，驻在南翔的总指挥部设定沿吴淞、江湾、闸北、南市一线布防；在防线上掘有多重散兵壕，纵深配置兵力，部署迎击日军态势。

江湾车站南方——以由第十九路军为主力之右翼军、北方——以由第五军为主力之左翼军分担防守任务。总指挥由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担任，右翼军指挥官为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左翼军指挥官为第五军军长张治中。

‘……沪上地形复杂，敌方（日军）或将舍正面之攻击，而向我侧背着眼。我阵地附近河流纵横，到处便于扼守；日军若取攻势，则其牺牲，非有十与一之比，决难奏效。……中正铣（十六日）戍（时）’（注）

强横威胁战火重燃

十八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日军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分别向上海市长吴铁城、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提出内容相同的照会，要求：“中国军队须在二十日上午七时以前，将第一线撤退完毕；同日下午五时以前，完全撤退至距离租界二十公里以外地域；以及即将该地域内之炮台及其他军事设施撤去，并不得再行建筑。”“如不接受此项条件，日本军队则将采取自由行动。”——照例又是充满胁迫语气的一纸“最后通牒”。

翌日（十九日），吴铁城覆函指出：“日本之要求，为应属于外交交涉处理之问题。”同时并站在上海市长立场表面如次：

“贵总领事来函所述上海方面严重之情形，均系贵国（日本）军队违反公约公法，任意进攻吾国领土，惨杀吾国人民所造成。贵国军队现仍实行挑衅、攻击、轰炸、无所不为，以致本国国民之愤慨日见增加；在此情形之下，所谓抗日运动自难消灭。凡因此而发生一切责任，贵国自应完全负担。”

同时，中华民国外交部也向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提出抗议书，说明：“种种不可能之要求，实属无理已极。倘日本军队再行进攻，中国军队仍必竭力抵抗。”

实则，日军就是在等待着中国方面表示拒绝的答覆，好像已经等到不耐烦而于二十日清晨便开始了总攻击。

上午九时，在江湾方面，日军以久留米混成旅团的四千余人及第九师团一部分兵员所组成的攻击部队，由十多架飞机援护和十辆战车开路，猛攻江湾车站，终日激战不已；但为中国军所遏阻，未能得逞。

吴淞方面，日本军舰不断发炮轰击吴淞炮台，并有步兵约千人，三度冲锋进犯；也被中国军给予重创，将之击退。

闸北方面，在八字桥附近展开激战，八字桥北面的朱家宅一度陷落日军之手；但中国军增兵驰援，于当天晚间夺回。

翌日～二十一日，日军继续对闸北、江湾、吴淞三方面进行总攻击，中国方面放弃了江湾车站，但在其他地区则仍将进犯日军击退。

当天，在击落日军水陆战斗机“八四六”号的飞行员尸身上发现佩带有“除厄保身”的铜牌，中国士兵们感到这是日军畏死的证据，因而信心大增。

佯攻江湾突破庙行

二十二日午前三时左右，日军六千余人进犯八字桥；另一方面，一万多人猛攻江湾。然而，在这两方面的攻势实则只是佯动作战；至于其主要目标，乃是出动三十多辆战车、超过两万人的主力军向庙行镇方面进攻，意图中央突破中国军的防御阵线。

这一个战斗，是“一二八淞沪战役”中最大的一次会战。

在靠近江湾镇南面的张家桥、前郭家宅、后郭家宅、金家塘等处为中国军第五二三团所驻守的最前线阵地，受到日军猛烈炮轰，差不多已被完全摧毁，官兵伤亡达四百人；但士气高昂，不肯后退一步。

可是，到了上午九时，在日军主力集中攻击之下，北面麦家宅的第五二七团第三营阵地则因日军陆空两面炽烈轰击而全毁，终于被其地面部队所突破，营长陈振新阵亡。

于是，在麦家宅与庙行镇之间与来自另一方面的日军交战中的第五二四团，乃因五二七团防线之被突破而陷于侧背受到日军主力威胁的处境。

不过，中国军方面迅速由第八十八师副师长李延年率领第二五九旅第五一八团（缺第三营）立即驰往增援，在麦家宅西边迎击日军，遏阻其西进攻势。

注：蒋总统-“致张军长、俞师长电”（一九三二二）‘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

‘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

我军声誉顿增

中国军旋即转守为攻。

反攻的主力-第五军，虽则缺乏飞机援护，但却是火力极强的精锐部队。该军第二六一旅在日本海军飞机的轰炸之下，由蕴藻滨方面钻隙南下，突破多重防线，向停留在中心巷、南孙宅、金母宅一带的四千日军挑战；这一场反攻战的结果，中国军获得胜利，日军委弃其国旗军旗及多数武器弹药败走。

自此开始，中国军在各处出动反击，压迫日军后退。

二十三日以后，日军仍然反复顽强进攻，但每次都被中国军所击退。

“一二八战役”中，中日双方都产生了一些牺牲的故事。

在中国方面，有一个老百姓胡阿毛，是卡车司机，他在被日军强迫征用运输军械的途中，开足马力将所载的一车日兵和武器弹药驶入黄浦江中，自己也与敌偕亡。当时诗人王拯即咏有“拚倭共溺申江”的西江月词，歌颂其人。直到今天，还以“舍身取义”为题，被收录在中华民国国民中学的教科书中，作为教材。

日本方面，则有“肉弹三勇士”的故事，二月二十二日，在庙行镇战争中，有一等兵作江伊之助等三人，抱着炸弹冲向中国军阵地的铁刺网，炸开一个突破口，被当时日军称为“第一昭和军神”，经与谢野铁干制成歌词，播之众口。

把日军摸得很清楚

此时，中国军已经逐渐把日军的攻击模式捉摸得很清楚——日军在每次进攻时，总会先集中轰炸与炮击；这在中国军来说，却反而是很有利的“事前通知”，当受到轰击的时候，大家都匍伏在深掘的壕沟里，只要不被敌弹直接打中，是不会有危险的。不久之后，敌方的轰击停止，接着便会有步兵冲锋过来；而在这一方面，由于已经预先知道，所以早就准备好了等候敌人的态势，让他们近接到阵地前面，再行迎击。并且在白刃相接的时候，日军的飞机、战车乃至大炮等重火器就都不能发挥作用了。

还有，大家在白天都躲避在战壕里，形成胶着状态；到了晚间便在夜幕掩护之下，摸到日军战壕边投掷手榴弹——像这样短兵肉搏，在熟悉地形的中国军方面，则是居于绝对优势的。

摸清了战术、产生了舒徐之感的中国士兵们，在战壕里唱起歌来，把歌声传送到日军阵地。

‘……自经二十二日庙行镇一役。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赞我军精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一落千丈也。……中正宥（廿六日）酉（时）’（注）

二十五日昧爽，日军再度对江湾至庙行镇一线发动猛攻，有九架飞机飞行炸射，更有百门以上野炮喷出战火。

暴露在最炽烈轰击之下的地区，是位于江湾镇背后的小场庙，被射中炮弹达千发以上，防守该地区的第八十八师独立旅第二团坚强抵御，但连长等官员阵亡踵接，牺牲惨重，不得已而于上午十时前撤守。

由小场庙之陷落，判明江湾镇的防御已有困难，乃于翌日（二十六日）上午放弃该镇，后8[166]1932退到西边的杨家桥，重整防线。此时，江湾镇的房屋都被战火所吞没，成为一片废墟，到处死尸散乱，血满沟渠。

日军再调两师团增援

与战线扩大之同时，日军的迫切需要，是自其本国增调援军前来。

当总攻庙行镇失败后的第二天（二十三日），日本内阁举行会议，决定续派两个师团援军，由曾任关东军司令官的白川义则大将为司令官，率领以驻屯于日本国内善通寺的第十一师团和宇都宫的第十四师团编成“上海派遣军”赴援。

就战术观点判断，将成为日军再增援部队的登陆地点、也就是中国军特别需要警戒的地点，是在上海西北四十公里面临长江的浏河方面。这一带河岸，是杂有碎石子的沙滩，最适宜于登陆作战。日军如果在这里构筑桥头堡，则吴淞要塞地区以及成为主战场的左翼一带之中国军队，便将会暴露在腹背受敌的危险态势之下。

蒋总统有鉴于此，乃于二十五日致电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指示注意浏河方面的戒备，电文如下：

‘第二次决战之期，约在艳（二十九）、东（一日）各日，我军后方援队，全已运来前线；其他非到鱼（六）日后不能参加战斗，务望于此数日内尽量节省前线兵力，抽调部队，厚集各地区预备队约在总兵力二分之一以上之数……对于浏河方面尤应准备三团兵力为要；如何部署，盼详复。中正有（廿五日）酉（时）。’

但是，这个指示，蒋光鼐和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并未加以重视。

日军司令官白川义则于二十九日率领其第十一师先遣兵团及司令部幕僚人员，乘重巡洋舰“妙高”号进入长江，这些不惯航行的陆军军官，被海浪颠播得摇摇幌幌地登陆指挥淞沪攻击战事。

这批援军开上火线参加正规的战争，是在三月一日拂晓。

注：蒋总统-“致张军长、俞师长电”（一九三二二）

日军登陆浏河

三月一日昧爽，第八十八师防御据点的竹围墩、杨家桥首先受到攻击，此处距离日军登陆地点颇远，实则日军只是为了掩护登陆的佯动作战。

不多一会，在浏河附近的长江上，出现了日军的大舰队。以二十多艘军舰，百多艘小艇所组成的这一支舰队，满载着其第十一师团一万多增援官兵，并有八十多架飞机出动，轰炸沿岸中国军的防守阵地，弥漫着一片硝烟。

蒋光鼐疏忽浏河防务

对于浏河一带，蒋总统虽曾预先下令第十九路军特别戒备，可是总指挥蒋光鼐却一时怠忽，以致仅有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的一连人担任防务，在敌人登陆部队的压倒优势兵力之下，立即被歼。上午七时，日军在七丫口及六滨口登陆，构筑了滩头阵地；张军长匆遽调拨左翼军一旅赴援，可是汽车仅有十一辆，以致增兵不足，未能堵住敌人，挽回颓势。

轻易让日军在浏河登陆，实在已经是最大失策；而且在这个关头，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指挥部又犯了一个更重大的错误——就是日军的登陆部队实际只是第十一师团一个师团，但蒋光鼐等却误以为包括第十四师团在内的两个师团援军都已经全部到来；于是对于日军兵力作了过大估计的第十九路军指挥部，乃为避免正面决战而于一日下午九时下达了撤退命令。

据日本方面资料——导演“袭击日本和尚”事件的田中隆吉少佐（驻华公使馆派驻上海副武官），运用川岛芳子散播了“日军第十一、十四两个师团全部登陆”的谣言。据说

，就是这个谣言影响中国军撤退。实则当时第十四师团还在日本作出发准备中。

第十九路军的撤退命令，并未能及时递达到第五军。

于是第五军乃在孤立状态之下继续作战，牺牲甚大。及至翌日（二日）下午二时，才得知十九路军业已撤退，乃继之后退。

三日，中国军队退至在西方约二、三十公里的太仓、安亭一线，战斗暂时告一段落。

在上海战役中，中国军的牺牲为：死亡第十九路军二千四百十三人、第五军一千五百六十六人，包括其他死亡合计为四千零六十七人；负伤七千七百零三人。此外，一般市民死亡一万一千余人，失踪、负伤四千三百多人，毁坏民宅一万六千户，受害甚重。

关于第十九路军的撤退命令，在董显光所著“蒋总统”传中有如下的记述：

“战事之失败，实为第十九路军漠视蒋总统劝告之结果。……此为五星期抵抗之转捩点。蒋光鼐与蔡廷锴不待政府准许，亦未通知第五军，遽行下令第十九路军撤退。……

“同时，蒋总统假定十九路军能听从劝告，固守浏河，遂主张调遣援军，以期挽回危局。这些援军的前锋，已按时到达上海附近，但已经是在蒋光鼐、蔡廷锴下达撤退命令的两天之后。”

又据日本资料——驻华公使重光葵在其所着“昭和之动乱”一书评述：“第十九路军不完全服从中央威令。是富有排日色彩的过激军队。”

蒋光鼐、蔡廷锴等于翌年（一九三三年）秋在福州发动叛乱，自组“人民政府”，曾受中央军讨伐。

此外，在淞沪战役中，截至三月十七日统计：日军死亡五百九十一人，负伤一千一百七十三人。

达成停战协定

对于日军侵略上海，国际舆论掀起了激烈责难。

三月四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联盟全体会议上，挪威、墨西哥、希腊等各国代表纷纷发言：“反对武力侵略”、“国际联盟应有主持公道制裁暴力的勇气”。于是，大会乃决议：（一）中日两国应在上海停战。（二）由两当事国及有关各国协商决定停战及日本撤兵方法。

停战会议于三月十四日在上海英国领事馆举行，中国代表为外交部次长郭泰祺，日本代表为驻华公使重光葵；此外，英、美、法各国公使及义大利代办都参加了会议。

中国坚持立场，贯彻会议议题只限于“确实停止敌对行动”、“日军无条件完全撤退”的原则。

针对中国的态度，日本打算把“撤兵问题”和“排斥日货问题”绳在一起，以及意图以“扩大上海公共租界”、“上海自由港”等策谋来拉拢调停各国，使问题拖延下去，但结果还是在国际压力之下，于五月五日成立了“撤退日军，恢复事变以前状态”的停战协定。

正当停战交涉之中的四月二十九日，在上海有朝鲜独立党党员尹奉吉投掷炸弹于日本人庆祝日皇诞辰的会场，将日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炸死，日方代表重光葵公使也负了重伤。

又中国代表郭泰祺次长，也于五月三日被高呼抗日的学生殴伤住院。

是故，在五月五日签订停战协定时，是送到中日两国代表所住的医院中署名。不啻为“兄弟阋墙，两败俱伤”前途的朕兆。

东北的伪组织

现在，请再把视线转移到东北。

在东北方面，趁着“一二八上海事变”的纷乱之际，已经有个重大的阴谋化为既成事实，这就是侵略东北的作业告成——成立了傀儡政权的伪“满洲国”。

（民国二十一年

当元月三日占领锦州的同时，日本的所谓“东北新国家构想”，由关东军带头加速进行，这是预计国际联盟依据决议将会派遣调查团于二月下旬乃至三月上旬前来当地调查，故必须策谋在调查团到达之前捏造一个“新国家”出来。

此时，在新登台的日本犬养毅内阁中，正好是由对华强硬派的荒木贞夫出任陆相，遂即要求关东军派遣参谋归国报告；于是，本庄繁司令官乃派参谋板垣征四郎于元月四日前往东京。板垣在获得本庄的同意之下，作成了关东军的最后草案-“建立满蒙新国家方案”，收藏在他的皮包中提回到东京。

方案的内容如下：

一、机构采逐渐中央集权制度，其首领用“大总统”等类名称，以避免有复辟倾向，并以溥仪为首领。

二、时间大致在二月中旬，至迟在国际联盟调查团到达之前实现。

三、以长春为“国都”。

四、“中央政府”设“参议府”、“参议”为满、蒙籍各一人，中、日籍各三人。日本的意向通过日籍参议转达“满蒙中央政府”。

五、“新政府”管辖区域为奉天（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蒙古五省。

这个方案，更为一意做到“此际，为使明显脱离支那（中国）本部，需要在名实两方面都成为独立国家。”因而列有——“（一）如果日本直接出面策动满蒙独立，则于九国公约、国联盟约有所抵触，故而须伪装为中国人本身的内部分裂。（二）国防军以日军充任，其费用则由‘满蒙中央政府’负担。（三）在满蒙的日本机关，不妨采‘都督’或‘总督’制，但如不可能时，则在关东军内设置‘政务部’，并由军司令官掌握产业、交通”等事项。揆其实际，显然是在朝向“满蒙属国化”的目标推进。

日本侵华国策的基础

另一方面，东京的日本政府也在进行研拟有关“新国家”的方针。元月六日，在陆军、海军、外务三省的课长联席会议中决定了“支那问题处理方针要纲”的名义被正式承认，成为日本侵华国策的基础。

此一要纲，首先叙述其根本方针：“关于满蒙方面，期其于帝国威力之下，使该地区在政治、经济、国防、交通、通信等各项关系上，显现具有为帝国永远存在的重要因素之性能。”同时还包括有——“（一）在满洲新政治机构，应有日本人以顾问或其他方式参加。（二）目前在满洲关于贯彻日本政策，得在军的威力之下进行。（三）断然排除国际联盟及诸外国之干涉”等具体事项。

从这些内容，可以说这个纲要的目的，百分之百是为了日本人而由日本人来制造这个傀儡政权。

板垣于六日到达东京，立即前往陆军省，向荒木陆相陈述当地情况：“满洲的大势所趋，是建立独立国家，曾经探询重要人士以及实力分子的意向，都是如此。”荒木当时虽然答以：“新内阁匆遽成立，政府的政策还没有决定。”但同时也谈到：“在方针上尊重当地意向。”表达出有容许建设“独立国家”之意。

在所谓“东北新政权”方面，已经获得日本政府同意的关东军，为着表面上要让人看来是“中国人在搞独立”，故而不断地施展出各式各样威迫利诱的策略。

所谓“东北行政委员会”

策谋之一，是组织所谓“东北行政委员会”。其构想在拉拢业已唯关东军之命是从的旧军阀及土豪们，先组成一个“新政权”的母体。

元月七日，以业已投降于关东军的张景惠为“黑龙江省主席”，使其“独立”。

继之，更经张景惠斡旋，由板垣征四郎往见据守海伦的马占山，过了一夜，便自黑龙江省迅即撤退关东军，而以承认马占山军回驻齐齐哈尔来劝说其协力。同时，主谋攻击马军的“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林义秀，也往马占山处道歉，故示奉承，以资拉拢。

另一方面，对于反对侵略的人，则毫不留情地加以镇压。

当时，发表“抗日宣言”、激烈抵抗的吉林义勇军李杜、丁超等部，在双城附近与关东军激战，一度得胜；但关东军则出以强硬手段，展开反击，而于二月六日占领哈尔滨，有将李、丁义勇军击溃之势。

此外，关东军复组织了“自治指挥部”，发动“促进开国示威运动”，以封锁反对意见。

二月十六日，关东军召集臧式毅（辽宁省伪主席）、熙洽（吉林省伪主席）、张景惠（黑龙江省伪主席）以及马占山“四巨头”于沈阳；十八日成立所谓“东北行政委员会”，以此一委员会之名义宣称东北“独立”。

在关东军参谋部任职的片仓衷大尉，于二月十六日在其所纪录的“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中，有如左的记述：

“午后，马占山乘飞机来奉（沈阳）。四时，张景惠、马占山、熙洽、臧式毅四氏按照预先的安排来军司令部访问司令官。这是历史性的会面，是东北更生的第一步。”

中华民国外交部于二月二十一日发表宣言，否认东北“独立”及一切伪行政组织之设立。

日本造成伪满

伪“东北行政委员会”所发表的宣言，举出三项“使命”——（一）除“苛政”。（二）维持门户开放与机会均等。（三）泯除阶级斗争。此外，更加入“与党国政府脱离关系”的语句，是出自日本方面的要求。

（民国二十一年自由人注）

这个所谓“新国家”，自称“满洲国”，决定于三月一日成立，其“领域”为奉天（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后来于一九三三年再加上热河省），人口约三千万；“国旗”为“新五色旗”，年号“大同”。其政体是依照日本的意向决定暂采“共和制”。但希望“帝制”的溥仪及其左右则加以反对；郑孝胥、郑垂父子以及罗振玉等人向板垣征四郎坚持要求“帝制”，而板垣则于会见溥仪时，告知“新国家采共和制，你（溥仪）可以执政名义居于元首地位”，溥仪大为不满；于是板垣乃约集郑孝胥父子暨罗振玉等人说出“军部的要求绝对不能变更。如不接受，就是与关东军为敌。”——最后拿出这样胁迫的手段，使他们只有忍受了“执政制”。

在这个决定之后，板垣又与郑孝胥父子密约——（一）关东军保证“满洲国”成立后，在一年内改为帝制。（二）溥仪对外称执政，但在宫中仍用皇帝体制。（三）日本在短期内承认“满洲国”。（四）任用郑孝胥为“国务总理”。

溥仪本人所希望的“帝国皇位”得到了保证，亲信郑孝胥也获得“总理”的位置，至于他们对于出卖东三省则是毫不吝惜的。

‘土肥原、板垣和郑孝胥等互相勾结所制造的伪政权（满洲国），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略国（日本）利用奸细和傀儡来渗透、瓦解和操纵被侵略国（中国）的前奏。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在华北和华中利用王克敏（在北平自称中华敏国临时政府）和梁鸿志（在南京自称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组织傀儡政权；后来合并为汪伪组织（汪兆铭在南京自称国民政府）。……’（注）

关东军更运用傀儡机关的“自治指挥部”着手操纵舆论，他们集合各地民众及日本、朝鲜侨民于沈阳，举行“促进全满建国运动联合大会”，决议“建设新国家”及“推戴溥仪执政”，并派代表前往旅顺，促请溥仪出任“领导”。

三月一日，体承日本意旨发表了“满洲国建国宣言”，其内容则为诋毁国民党及表明与中华民国断绝关系。

和上述行动的步调似乎是配合一致的，就是在三月一日这一天，日军对淞沪战场第二次增援部队的一个师团在浏河附近登陆，和中国军决战。

溥仪签署卖国文书

三月五日，再度由沈阳派遣代表二十五人，向溥仪陈情，请其就任“执政”。——显然这是一种制造出来的“民意推戴仪式”。

三月六日晨，溥仪由旅顺乘快车出发，前往在沈阳南方约一百公里的汤岗子，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在汤岗子等候见面，对于傀儡政权的人事方面作了最后决定，计为：

“参议府议长”张景惠，“国务总理”郑孝胥，“民政部总长”臧式毅，“军政部总长”马占山，“财政部总长”熙洽，“外交部总长”谢介石等人。

此时，溥仪在板垣所带来的以他的名义致本庄繁的一个卖国文书上签了字。这个文书就是在三月十日所发表的“溥仪、本庄繁交换公文”，其内容是将“国防及治安之维持全面委任日军”，同时表示“选任日本人参加参议府”，以及“中央及地方官吏并采用日本人。日本人之选定、保荐、解职，须在日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同意之下行之。”

在汤岗子温泉休息之后的溥仪，于八日乘专车前往长春。

三月九日下午三时，举行溥仪的“就任执政典礼”，地点是在改称“新京”的“长春市政公署大礼堂”。

本庄繁趾高气扬

郑孝胥、罗振玉等前清遗臣们悚立于会场西侧；对面的东侧席位，则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等人，南侧有张景惠、臧式毅等，参加者百分之七十为日本人。

溥仪由“侍从武官长”张海鹏引导入场，国务总理郑孝胥代替溥仪宣读“执政宣言”：

“……今吾立国，以道德仁爱为主，除去种族之见、国际之争，王道乐土，当可见诸事实。凡我国人，望共勉之。”

这个执政宣言，大致说来用的是中文体裁，但一眼看下去就可以知道，其用语及特殊口气，为过去一些中文书之所未有，显然是由关东军司令部的日本人代笔，在此时的溥仪，只不过是宣告自己当成了傀儡而已。

宣言之后，溥仪走下礼台，向来宾们答礼，首先面对着本庄繁鞠躬，本庄繁趾高气扬，并未还礼，他已经是很快地当众把“满洲国”当作是日本的属国了。又在这次“典礼”候本庄返回沈阳时，曾经要求溥仪送行，但在郑孝胥的劝解之下，毕竟未能如愿。

次日（十日）公布了“满洲国组织法”，政府各部首长在形式上虽由中国人出任，但重要的位置多系任命日本人——例如总揽军事、民政、文教各部业务的“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次长”阪谷希一，“主计处处长”松田令辅，代理“法制局局长”松本侠，“总务司司长”星野直树等人。

注：蒋总统-“为何汉奸必灭侵略必败”（一九五○十）

阻碍国联调查

三月十二日，国民政府对内外发表宣言，宣告溥仪傀儡政权乃叛乱机关，中华民国绝对不能承认：

国府指斥非法机关

“自上年九月十八日以后，日本非法侵占东北各地，威胁中国人民，利用少数叛徒为非法之组织，复将清废帝溥仪挟持赴东省，令其就伪职，成立傀儡政府。……所有一切伪政府之组织，皆为日本方面胁诱而成，其实权则操诸所谓日本顾问、谘议及其他日人之手；是此种8[184]1950非法行为，完全出于日本之主动，此为举世皆知、不容掩饰之事实。……所有该处政治组织，中国始终认为叛乱机关，同时并认为日本政府之变相的附属机关；对于其一切非法行为，绝对不能承认，并应由日本政府负其全责。”

这个“不承认叛乱机关”的原则，直到现在，中华民国还在践行。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在大陆宣告成立“政权”，蒋总统特地举出九一八的事例，将中华民国的严正态度向内外宣示如次：

‘回忆九一八事变以后，我中华民国政府和人民不承认伪满洲国至十四年之久；最后失败者，乃是无耻汉奸制造的傀儡组织，我们中华民国终获得最后的胜利。

‘今天（一九五○年），暴俄匪共亦导演北平的傀儡戏剧，我中华民国全体人民，也就以否认伪满的精神，来贯彻反对朱毛伪组织的立场。’（注）

在日内瓦方面，国际联盟依据行政院会议的决议于元月十四日决定了派往东北的调查团人选为：

团长李顿（英），团员克劳德（法）、马柯迪（义）、希尼（德）、麦考益（美）五人，秘书长则以国联秘书处交通组长哈斯担任。中日两国，为协助调查团工作，由中国派前任外交部长顾维钧、日本派驻土耳其大使吉田伊三郎参加。

◎８８０９０１１２３５电话五响后电脑接◎传真，但无结果。

8[185]1951调查团于二月二十九日到达东京，在日本停留九天，正好是日本向上海再度派遣援军的时候。

李顿等一行和日本天皇乃至首相犬养毅、外相芳泽谦吉、陆相荒木贞夫等人见面，日本政府为了要尽可能地使他们留下一点好印象，特地连日设宴款待，并导游东京近郊及京都等名胜。

调查团接着于三月十四日到达上海，与中国代表顾维钧汇合，以两个礼拜的时间调查了有关“一二八事变”的情况之后，于三月二十六日抵达南京。

三十日，蒋总统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身分和调查团见面，恳切说明：中国尊重国际条约，绝无任何违反人道、正义的行为。

四月十日，李顿等一行在北平与张学良会谈之后，二十一日到达沈阳，正是伪“满洲国”刚成立不久之后。

日军百般阻碍调查工作

在沈阳除视察为“九一八事变”导火线的柳条沟附近南满铁路爆炸地点及北大营之外，并与日方有关人士——代理驻奉天总领事森岛守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桥本虎之助、独立守备步兵第二大队长岛本正一～～晤谈，听取情况。其后，即在东北各地视察至六月四日为止。

在这个期间，日本政府及关东军虽未公然拒绝调查，但却找出许多藉口阻碍调查工作，使不能充分进行。

最初，调查团于四月十九日自北平乘火车出发时，预定途经锦州视察之后，再去沈阳；但日本方面唯恐其在锦州及山海关一带军事侵略的痕迹被调查出来，因此谎称由北平到沈阳的北宁铁路因先前的战事破坏，尚未恢复通车，提议由水路前往大连转赴沈阳，而实则此时全线业已修复。

当时，参加调查团的中国代表顾维钧认为视察锦州乃为重要行程，调查团也予同意，故而再行要求乘火车出关，可是日方却又藉口“满洲国政府反对顾维钧入境”，以及“由山海关到沈阳全线，属于满洲国管辖区域，日本保障不了调查团的安全；若由大连乘南满铁路火车，则在日本的势力范围以内，可保无虞”而再度拒绝。结果，只有美、义两国委员麦考益、马柯迪二人获允由陆路前往，其余各人则只得乘军舰绕道大连。

还有，调查团在要想调查东三省北部重要地点的齐齐哈尔之际，又同样地受到了妨害。调查团本来将视察马占山抵抗日军之处的嫩江桥梁和四洮铁路事项列入重要日程，可是担任向导任务的伪“满洲国”外交部次长大桥忠一则又以“不敢保证安全”而拒绝调查团前往。

8[188]1954顾维钧遭不断监视

调查团去到任何地方，都受到日本方面五十多人监视团的包围，他们以一人缠住一人，不让自由接触一般民众；尤其对于顾维钧的警戒特别严重，显然可以看出是宪兵乃至特务工作身分的人员进入宿舍，每天二十四小时不断监视，以致顾代表连和调查委员都不能自由见面。

在妨害调查工作之外，日方对于调查团酒色招待，则极尽其奢侈铺张之能事。当调查团一行于二十一日到达沈阳的当天晚间，调查委员及国联工作人员便受到日方代表吉田伊三郎及其随员南满铁路职员等人在“高级料亭”——金龙亭设宴款待；乃至于在哈尔滨、大连等地所到之处，都准备有豪华宴席，并有艺妓数十人陪侍，并且这些艺妓，都是由“满铁总裁”内田康哉特地自东京招来。

注：蒋总统-“中华民国三十九年国庆节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一九五○十）

义勇军袭击日军

8[189]1955在国联李顿调查团的所到之处，都有为日本捏造出来的陈情团体蜂涌而至，这些陈情团体异口同声诋毁中国政府，要求承认“满洲国”，而且还有穿着中国服装的日本人夹杂在群众之中，加以鼓励。

调查团曾经和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郑孝胥、“外交部总长”谢介石、“财政部总长”熙洽见面，但都有为伪政府职员或顾问的日本人同席监视，调查团虽有发问，而他们的回答则是千篇一律。盖关东军为了准备李顿一行来访，特地于四月三十日做好了一套“想定问答集”，迫使“满洲官民”众口一词；如果被问到有超出“想定”以外的问题，他们便会一个字也答不出来。

据当时代理驻沈阳总领事森岛守人在后来所著回忆录-“阴谋、暗杀、军刀”书中记述：“当李顿调查团来访之际，和东京方面配合起来做了各种准备工作。为了要做到两方面的说词能够一致，所以整理资料、决定工作人选，撰写文件并作文字翻译，日夜赶工，极度忙碌；而特别费力的，则是对于满洲官民及日本侨民的指导，不啻有为准备考试而通宵开夜车的感觉。”

马占山继续抗日

但是，由于国联派遣李顿调查团之行，乃使在东北被强迫而隐忍服从敌人的中国人得到了鼓舞。

马占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马占山虽然受任伪“满洲国军政部总长”兼“黑龙江省长”，但这只是表面上的屈从，实则他的“抗日精神”一直是沸腾不息，而在等待着机会到来。及至李顿调查团来到中国开始调查之际，马占山乃自齐齐哈尔秘密脱出，于四月八日在靠近中苏国境的黑河举兵反正，并发表通电“继续抗日”。

他所率领的兵力，虽只不过是一个旅计三千六百人，马八百八十头，旧枪四千五百枝，根本没有重武器；可是，他们有在嫩江打击日军的经验，士气颇为旺盛。接着，马占山更连续两度通电，揭穿所谓“满洲国”乃是在日本的策谋之下所制造出来的傀儡政权，此后，马占山本人遂被中国朝野赞誉为“抗日英雄”。

马占山部队采取游击战术及对抗优势日军，于四月二十九日进抵哈尔滨北面的淞浦镇。

关东军乃终于不能不出动其第十四师团的主力部队，追击马军至于海伦。在作战过程中，马军曾经两度给予日军以重创之后，突破重围；而日军则动员了飞机和山炮野炮，穷追不舍，但马军却能一再机敏地将之摆脱。

及至六月底，关东军搜索到一具貌似马占山的尸体，乃发表“马占山业已死亡”；可是，他实际已经越过中苏边境，绕道德国，翌年六月率领随员十四人经由香港返国。

就在马占山抗日活动的前后，又产生由朱霁青所领导的“东北国民救国军”等义勇军，在各地展开游击战。这些义勇军在极盛的时候，达十六万人以上。

犬养毅被军人射杀

另一方面，当李顿调查团逗留在东北期间，日本国内发生了“五一五事件”。

五月十五日，日本首相犬养毅被侵入首相官邸的海军中尉三上卓等人所射杀；同时，内大臣牧野伸显寓所及东京警视厅、政友会（政党）本部、三菱银行等处也被海军青年将校和右翼分子所袭击。

犬养毅在最后面对暴徒时留下“有话不妨好好商量”的招呼，当时传播于日本社会。而犬养毅之被暗杀，乃是日本自加藤高明内阁（一九二四年六月至一九二六年元月）以来的政党政治之终结。自此之后的日本政治，便转向于任凭军部专横暴虐的途径；同时，中日之间仅有的一丝接触路线也为之切断。

犬养毅本来是中国国父孙先生的友人，对于中国的国民革命是大体有所理解的。

“九一八事变”，是发生在他就任首相之前，他曾进行秘密活动，以谋迅速解决问题，促进两国关系。当他刚就任首相的一月间，便曾派遣也是孙先生友人的萱野长知为密使，到达南京，和行政院长孙科接触，探寻打开局面的线索。

当时他的构想，是将东北的宗主权还给中国，以换取中国政府平息民众的排日运动，使中日两国之间进行平等的经济合作。

然而，日本政治趋势，已经是倾侧于无可挽回的方向，犬养毅内阁不可能遏阻军阀的势焰，而一直在与军部妥协；他尽管如此，但还是为军部所不满。

犬养毅被暗杀的直接原因，是五月五日在上海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下手的人，则为属于过激团体“血盟团”的海军青年将校，由于不满上海停战而有此犯行。

当时在犬养毅内阁担任外相的芳泽谦吉，其后在他的回忆录-“外交六十年”中，对于暗杀的原因有如下的叙述：

犬养毅为谋矫正陆军的纲纪紊乱，打算将过激青年将校三十人免官；可是，军人的免官权归陆军大臣掌握，而不属于首相，因此乃与参谋总长闲院宫（皇室）载仁商量，但被泄漏出去，而招致军方不满。至于泄漏的人，则为内阁书记官长森恪。森恪前在“东方会议”时，为田中内阁的外务次官，是对华外交的强硬分子，与陆海军中的极端派声息相通。在犬养毅被戕后的第二天，森恪曾经对于免官问题提到“总理错了！”

又据芳泽记述：

犬养毅对于“满洲国独立”一直表示反对，不肯予以承认；但结果被军方压倒，而为他们所左右。

侵略野心的扩大

犬养毅被暗杀之后，在日本已经是没有再能抑制军部狂奔的人物。

五月二十六日，前任朝鲜总督、海军大将斋藤实继犬养毅之后出任首相，并暂兼外相；而“五一五事件”的责任者陆相荒木贞夫则仍然留任。

斋藤在组阁之后不久的六月三日所举行的日本国会第六十二届临时会议中发表外交方针演说，提到：“新国家的存在，乃为当前的事实，不容漠视。”显示出早期承认“满洲国”的意向。

8[195]1961继之，在众议院正式会期中，遂于六月十四日一致决议：“政府应从速承认满洲国”。

在截至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本来对于军部采取某种程度批判态度的日本新闻界，到了这个时候，也连日不断地大书特书“守住帝国的生命线——满蒙。”

七月六日，为众所周知的积极论者——满蒙总裁内田康哉就任外相。在内田到职之后，李顿等国联调查团人士为听取日本新内阁的意向而再度到达日本；内田于十二、十四两天在外务省接谈，对于李顿所提“在国联调查报告提出之前，希望对承认满洲国之事加以慎重”一节，答以：“当由日本自行判断，第三者没有介入的必要。”简直是摆出一付毫不理睬的态度给顶了回去。

八月八日，日本政府任命陆军大将武藤信义为“关东军司令官”、“关东长官”及“派驻满洲国临时特命全权大使”。赋予所谓临时特命全权大使的任务，就是在为承认“满洲国”而签署“议定书”。

日本自趋“焦土外交”

八月二十五日，斋藤实首相在国会第六十三届会议中正式表示了承认“满洲国”的意向。同一天，外相内田康哉在答复政友会（政党）籍众议员森恪的质询时说明：“当承认满洲国之际，纵有若干议论，但我国行动之被公认为公正合法，可无疑问。对于满洲问题，须举国8[196]1962一致。——即使化国家为焦土，也得贯彻主张。”

日本的所谓“焦土外焦”，就是从内田这一句话所产生。

针对内田言词，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罗文干乃于八月二十九日在外交部国父纪念周演说，予以严正驳斥：

“八月二十五日，日本内田外相之演说，……诚日本政府对全世界正论挑战之行为也。日本政府不顾人类和平之呼吁，藐视国际联合之组织，践踏一切神圣条约之义务，竟复公然露布演词，其词不啻向世界宣示日本有侵略中国之权，有攫夺东（三）省之权，有制造傀儡而谥之曰独立国家、操纵之、玩弄之、乃至最终并吞之而后已之权。内田之词，直中古黩武主义之演述，而饰以二十世纪之文字者也。”

不惜毁掉自己的国家、牺牲自己的国民、以遂行其侵略意图的“焦土外交”，自此绵亘十多年之后，终于为日本招致了“全国焦土”的败战后果。

作为日本承认“满洲国”正式文书的所谓“日满议定书”，是由日本“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和“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在九一八事变周年即将到来的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所签订。

这个“议定书”，除在前言中宣称：日本承认“满洲国”、“满洲国”继承中华民国所有8[197]1963之国际条约外，并作了以下两点协定：

“一、满洲国于将来日满两国间未另订约款之前，对于在满洲国领域内，日本国或日本国臣民，依据既存之日支（华）两方之条约、协定、其他约款及公私契约所有之一切权利利益，概应确认尊重之。

“二、日本国及满洲国确认对于缔约国一方之领土及治安之一切威胁，同时亦系对于缔约国他方之安宁及存在之威胁，相约两国共当防卫国家之任，为此所需之日本国军队，可驻扎于满洲国内。”

日本就是以这一个“议定书”在向全世界公然宣告其使中国东北为之殖民地化的多年宿愿实现。

“独霸东亚以征服世界”

‘我全国同胞更须知道，敌人侵略中国的野心，并不是开始于“九一八”的一天，也不是开始于甲午年的一战，敌寇贪残掠夺的本性，与独霸东亚的野心，在我们明朝时代就已暴露无遗。

‘当时（十六世纪），丰臣秀吉在他致高丽国王的信中曾经说过：“超山越海，以入于明，使其四百余州尽化我俗。”后来，副岛种臣一班人更曾狂言：“得土地于清廷”以及“取8[198]1964清一省，置根据地于大陆之上”，可见其对我国眈眈逐逐的欲望，实已植根于三百余年以前。

‘敌寇当时的侵略韩国，其野心就已在于我们的东北；到了一九○四年掀起俄日之战，他的目的也无非是要争夺我们的东北。……

‘倭寇整个侵略的野心，到了“九一八”的前后，乃更显露而扩大，像田中奏摺中所说，是要“征服中国以及于中小亚细亚与印度南洋”，是要“独霸东亚，以征服世界”，而我们的东北就是他所要首先占据，以作他侵略世界的“司令塔”。’（注）

注：蒋总统-“‘九一八事变’十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一九四一九）

日军肆行暴虐

所谓“日满议定书”，实则只是出于日本方面所强迫签订，就连在文书上签名的郑孝胥本人也显露不赞成之意而一时杜门不出。

8[199]1965据为日方随员之一，列席签署仪式的日本外务省书记官米泽菊二在其所记“日满议定书签署纪录”中，报告当时情况如次：

“上午九时，到达执政府所设举行签署仪式的场所，双方全权代表对坐，武藤代表首先开口，说明帝国（日本）决心承认满洲国，并指出议定书之签署乃为可喜之事；对方代表郑孝胥像是要赶快致答辞的样子，但却说不出话来，而只见嘴巴嗫嚅，强烈牵动颜面神经，一幅欲哭无泪的表情——五秒、十秒、三十秒过去，还是要说而说不出来。使人感觉到他的心底犹如被暴风所摇撼，激荡着复杂的情绪。”

我向日严正抗议

（民国二十一年自由人注）

中华民国外交部，在翌日～九月十六日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照会，严正抗议：

“……日本政府不顾友邦之忠言与警告，不顾国际联合会之决议与训戒，不顾人类之公论，现更对于其黩武主义所产生之傀儡组织，悍然加以正式承认。……

“国际联合会依照去年十二月十日行政院通过而经日本接受之决议所委派之调查团，以日本政府代表之协助，从事工作。今当该调查团工作甫竣，国际联合会尚未加以讨论之际，日本遽行承认伪组织，此项举动，一面适足以增加其罪戾，一面无异对国际联合会之权威为侮辱性之挑战。

“日本悍然施行其暴力的、残杀的与征服的政策，其责任之重大，在近代国际关系之历史上，罕与伦比。……”

对于在东北地区的中国人，日本所肆行的许多暴虐行为，实非笔墨口舌所能罄书罄述。

据陪同李顿调查团前往东北的顾维钧报告--只要是稍有表示反抗的态度，其整个城市就会被纵火焚毁，人民就会被任意屠杀。

在“满洲国”成立之后，走在路上的人，不论是谁都会被叫站住，问“你是何国人？”如果答称“是中国人”，便会遭受殴辱，非要承认“是满洲国人”不可。

有一封信提到：日本兵常常会侵入各小学，命令学生们同呼“满洲国万岁！”有一天，某一个学生高呼“中华民国万岁！”便被立即枪毙。

教科书也被删改，是凡国父学说和中国地理、历史课程都被禁止讲授，并增加日语为必修科。

身受痛苦最深的是农民。农地被强迫租借，期限三十年；或勒令变卖，给予廉价。又日军为其行动上的便利，并禁止在铁路附近种植高梁。

有一农民，和老母弱妹三人共同生活。九一八事变翌日，日兵侵入其家中，将其妹掳走，并将他上前拦阻的母亲杀死。

和东北范围以外的地区通信，也会受到日本人的严密检查。如果在信中稍有讲到日本的坏话，寄信人便会被逮捕或杀害；如果用隐语或为检查员所不认识之文字，则那一封信便会被没收。像这样的检查，连国联调查团的往来信件，也不能幸免。

另外，据中华民国东北外交研究委员会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所提出的调查报告——自事变以来，东北所受损失达十八亿三千五百多万元。

要使我亡国灭种

‘就敌人在沦陷区内的种种暴行而论，比之于宋、明末季之祸，更要惨痛。

‘敌人对我平民滥施轰炸，恣意屠杀，焚劫奸淫，已打破了人类历史上黑暗的纪录；更复实施毒化政策，奴化政策，鞭策我同胞上前线作战，采取用中国人杀中国人的毒计；并掳掠占领区内的儿童，大批运回其本国，以供日后之奴使。敌人的用意，显然是不仅要使我亡国，而且要使我灭种。

‘在沦陷区域以内，文化教育设施被压迫、被箝制，语言文字被替代、被消灭；“王道乐土”等谰言，猖狂流行，伪教科书大量散发，以及用发行伪钞、勒派公债等等方法来吸取我同胞仅有一些最后的膏血。’（注一）

8[202]1968‘老实说，中国的老百姓一提到日本，就会联想到他的特务机关和为非作恶的浪人；就会联想到贩鸦片、卖吗啡、制造白面、销售海洛英、包赌包娼、私贩军械接济土匪，豢养流氓、制造汉奸～～一切扰我秩序，败我民德，毒化匪化的阴谋。’（注二）

国联发表调查报告

李顿报告书——也就是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九月四日在北平完成，九月三十日送达中、日两当事国；十月二日，在日内瓦与南京、东京同时发表。报告书内容计十章，达一百三十九页之多。

该报告书，确认——“满洲是中国的领土”（第二章）；并断定：“九一八事变，不能认为日本军是出于合法的自卫手段”（第四章）。

关于“满洲国”问题，则确信“满洲国之构成，其最有力的助成因素，为有日本军队之在场及日本文武官员之活动。”以及“现有的政权，不能认为由真正及自然之独立运动所产生。”（第六章）并斥责日本的行动是“未经宣战而强使中国领土分离、独立。”“违反了国联盟约及非战公约等条约义务。”

一切都是出于日本有计划的武力侵略，已经在国际间得到了证实。

8[203]1969注一：蒋总统-“八一三周年纪念告战地民众书”（一九三八八）

注二：蒋总统-“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一九三八十二）

日诋毁李顿报告

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诚然是断定

“日本违背公理”；但却还有另外的一面，即系认为在东北有其“特殊情况”。至于解决方法，则以为“即使恢复九一八以前原状，不过徒使纠纷重见，无济于事。”同时提到“维持及承认现时组织（伪满洲国）也并非适当。”（第九章）

是故，报告书的建议乃为：“由原有的组织毋须经过极端的变更，产生一种满意的组织。”——就是要赋予东北以“高度自治权”。基于此而在报告书中举出以下十项解决原则：

一、适合中日双方利益。

二、并考虑苏联利益。

三、遵守现行条约，任何解决必须遵守“国联盟约”、“非战公约”、及“华盛顿九国公约”的规定。

8[204]1970四、不能忽略日本和东北的历史关系，承认日本在东北的权益。

五、树立中日之间的新条约关系，将中日两国之权利、利益与责任，重加声叙，以防止未来冲突，及回复相互信赖与合作。

六、为补充上开办法，以图便利迅速解决随时发生之轻微纠纷起见，有特定办法之必要。

七、“满洲政府”应加以变更，俾其在无害于中国主权及行政完整的范围内、获得“高度自治权”，以适应该三省地方情形与特性。

八、东北内部秩序，应以地方宪警维持之。至对于外来侵略之保障，则须将宪警以外之军队，扫数撤退，并须由关系各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

九、中日两国宜订“新通商条约”，将商业关系置于公平基础之上，并使其与政治关系之改善相配合。

十、中国政局不安，既为中日友好之障碍，并为其他各国所关怀，须待中国具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并以暂时的国际合作，促进中国内部建设。

李顿报告主张东北自治

依据上列十项原则，报告书乃于第十章要求“在国联行政院的协助之下，于东北召集中日两国政府之代表，暨当地人民代表，举行顾问会议；中国政府待此一会议之建议，宣言在东8[205]1971北地方成立特别行政组织。”

这一分报告书，在前半段肯定了其“非”在于日本；但在后半段则迫使中国作重大的让步——就是要在东北成立“自治政府”，而中央政府保留的权限只有：条约及外交关系，关税、邮政、税务之管理权，行政长官之任命权，以及履行国际协定之命令权；其他均归属于“东北自治政府”。这样的原则，等于对日本所制造的“满洲国”现状，差不多是要完全加以追认，且使之“固定化”。

蒋总统在十月九日（一九三二年）夜晚，再度仔细审阅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日记上记下：

‘李顿对于调停之主张，亦太怕日寇矣！但报告书中前八章调查之日本责任尚属公道，余对此认为有修正或保留之接受，而不拒绝。呜呼！以弱国而谈外交，又欲于外交中图自主自强之道，乃非此不可，余于是又知昔者郑子产之慎于辞命之用心苦矣！’

蒋总统当时正在汉口指挥剿匪军事。

日本方面，对于李顿报告书则持反对态度。

8[206]1972十月四日，在日本内阁例会中，除未到会的大藏大臣高桥是清之外，全体阁僚都诋责“李顿报告书是认识不足。”反对最激烈的是日本陆军，故而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大骂“报告书只是一纸旅行记”。又据十月五日“满洲报”刊载东京电讯——日本陆军对于报告书中所指“九一八事变是日军有计划的行动”一节，大为愤激，表示：“这是对皇军的一种侮辱，是越权行为。”“要对该报告加以痛击，使至于体无完肤。”

随后，蒋总统接到驻日公使蒋作宾发来两份电报，报告：日本有坚持贯彻其承认伪“满洲国”的打算，日本以李顿报告书“十原则”的第十项中所指“中国政治不安定”为论据，肆言“如将满洲还给中国，则只会是治丝益棼。”又据驻东京各国使馆人士观察，日本即使拒绝李顿报告书，国联对之也无可奈何，问题将会拖延下去，并深为中国叹息。

十二日，据外国电讯——日本政府对于李顿报告书将向国际联盟提出如下的意见：

一、国联宜静观今后“满洲国”之发展。

二、日本的国策为——假使国联、第三国有介入“满洲国”之事，即一概予以排斥。

三、调查团之调查，应对解决满洲问题有所贡献，乃其报告则“认识不足而有欠公平”，以致对于问题的解决更增加了纠纷。

深感整顿内部之重要

8[207]1973至此，中国国内更须有所觉醒，实为当务之急。蒋总统在十月十九日的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

‘鲁事未了，川战又起，闽、粤、桂、黔皆酝酿内讧，陕、甘二省亦不能安定；而强邻日、俄则眈眈虎视。——我国局势，殆哉！危乎！至我中央如能专心整顿内部，确定防止内战政策，则对内对外皆有余裕；不仅反动内奸不敢跋扈，即强敌暴寇亦无如我何也。……吾唯患我国人仍在醉梦中耳！’

我盼国联修正

世界各国对于国联李顿代表团报告书的反应，纷纷不一。

据华盛顿报导：美国政府对于报告书中肯定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予以好评；并且认为其精神是和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不承认凭藉武力获得权力、领土”的方针一致，为之大致表示满意。

英国的执政党-保守党，一向对日本持妥协态度，因此对于报告书中建议中日双方互相谅解、进行协商，并促进两国交涉之点，表示满意。但反对党-自由党，则持严厉的见解，认为调查团应对日本采取断然态度；而报告书则表现得很软弱，顾虑太多。

8[208]1974苏联始终是依据其本国利益为中心而作评价。其政府机关报-消息报，指摘报告书“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竞争者互相妥协的产物，表面上承认中国主权，但实则不是以满洲为日本单独的殖民地，而是要使之成为日本与国际帝国主义者共有的殖民地。”暗示报告书的意见是对苏联在东北的野心有所不利的。

法国政府当局，对于李顿报告书表示称赞；但舆论则都持批判态度，甚至有酷评：“报告书本身不免有两个矛盾之处——其一为一方面主张中国完全自立，一方面又认为应受监护；其二为既认中日两国不能融洽，又以为两国应互相妥协。显然从报告书中可得一证明，就是恢复旧日状况，乃为不可能之事。”

德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深受国际压力之苦；因而其国内新闻言论，异口同声批判国联，同情中国。其论评有谓：“徒托空言，毫无政治上的意义。”“日本业经造成满洲国的既成事实，报告书已毫无价值。”“是国联的一个骗局。”

蒋委员长提出意见

十月十七日，蒋总统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地位，正式对李顿报告书提出意见如下：

‘在目前情势之下，中国政府为取得国联及一般国际舆论之同情起见，对于报告书自宜采取温和态度，不可表示过度之反抗；但同时不能不注意次列几项事实：

8[209]19758[210]1976‘第一、调查团报告至少尚须经过两度审议（十九国委员会及国联大会之审议）。在未达最终决定前，中国政府自尚须为最大之努力，以期改正。

‘第二、就目前情势观察，除非列强对日有执行经济或武力制裁之决议、或日本国内有不利于军阀之重大变化发生，日本决不接受调查团报告。但以上两种情事，现时均无实现之希望；因此，中国纵表示愿意让步，仍无补于中日纠纷之解决，徒为将来交涉或行动上增加拘束，且将引起国内重大攻击。

‘第三、国民党对外政策，在求民族之解放，对于东三省事件之解决，如完全不顾此种立场，则本党信用与本党所领导之不平等条约废除运动，将受重大打击。

‘第四、调查团报告书在前八章陈述事实时，虽属公允；在九、十两章建议解决方案时，则几完全注重日本之希望与其在东三省之实力，而将九一八以来事变之责任弃置不顾。为国联公约、非战公约及九国公约之尊严计，为国联之威信计，为远东及世界永久和平计，吾国均不能不要求国联为必要之修正。’

至于必要之修正，乃为‘防制中国在东北的完整主权及行政受到国际拘束，以及不能默认日本凭恃武力所造成之情势。’

为此，在对策方面，建议应提出：

‘成立保障中国国境的公约。

‘设立中日和解委员会，如有纠纷，经裁判解决。

‘中国声明改善东三省行政。’

在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于十一月二十日发表意见书，对于李顿报告书提出反论。其内容只是反复搬出其过去那一套毫不讲理的说法，大致要点如次：

“张学良自与国民政府接近以来，对于日本在满洲权益的压迫，愈益激烈，招致严重紧张状态。九月十八日事件，乃在此紧迫气氛之下所产生，日本军队的行动，并未超越自卫权；就公平判断，倘置其他任何国家于和日本同一之境地，则亦将出诸同一行动。满洲国之创设，乃基于满洲居民的自发行为；日本对于满洲国之建设所持态度，毫未违反国际约定。

“在报告书第九章之中，一般原则第十项之规定（对于中国的国际合作），将终有置整个中国于国际管理之虞；复次，第十章中有关满洲之诸项建议，亦将为满洲招致近似国际管理的情况，乃为满洲国、亦为日本之所不能接受。”

国联召开会议审议

及当国际联盟召开会议审议李顿报告书时，日本方面特派前任“南满铁道会社”社长．属于政友会的众议员松冈洋右为首席代表。松冈前在同一年（一九三二年）的二月间进行“一8[213]1979二八淞沪事变”的停战交涉时，也曾为日方代表之一员。虽对于达成协议不无贡献，但实则是一个著名的对华强硬论者。

中国方面，决定派遣首席代表颜惠庆，加以顾维钧、郭泰祺为其助手。颜惠庆为驻美公使，顾维钧为前任外交部长，曾参加李顿调查工作团，郭泰祺为外交部次长，并曾为上海停战交涉代表。

于是，东北问题乃被再度提到国联舞台进行讨论。

蒋公言论：拥护公理与抗御强权

拥护公理与抗御强权

——中华民国二十年十月十二日在国民政府总理纪念周讲——

日本军队占据我东北辽宁吉林各地方，迄今已逾三星期了，上月三十日，国际联合会决议通知日本撤兵，希望他在两星期内撤尽，期限也快要到了！国联要日本撤兵，本希望此次兵祸，不再扩大，此案能和平解决；但是日本非但无撤兵的准备，其军事行动，反更加积极，尤其本月八号，日军用许多飞机，在锦州——我们辽宁临时省政府所在的地方，抛掷许多炸弹，使我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很重。日军此种举动，完全欲凭藉其强大的武力达到他们侵略的目的，这不但是我国的莫大耻辱，难以忍受，即世界各国，也必视为公理人道之敌，不能长此容忍的。国联行政院在上月未闭会的时候，本定本月十四日再行开会，如在十四日以前，日兵完全撤退，即不再开会。但照近日日兵行动，尤其是轰炸锦州，国联认为形势非常严重，已决定提前于十三日开会。我们相信这一次开会，一定能依照公道的主张，找得和平的路径，使东亚和平，以至世界和平，不致被日本一国所破坏。照最近数日的情形，侵入东北的日军，不但未遵照国联的通告，不使事件扩大，且更到处骚扰，日日扩展其军事行动。不仅如此，即在我国南部沿海口岸及长江一带，也纷纷派遣军舰，运载陆战队，到处示成。且在上海侨居的日本人，昨天开居留民大会，也于散会后集合数十人列队游行，闯入中国商店，击伤中国孩童，撕毁标语，肆意辱骂，其有意挑衅，更属明显；所幸我警察严密防范，民众亦持沉着镇静的态度，所以他们虽有挑衅的决心，结果还是无衅可开。我们这种坚忍镇静的表示，并非即是屈服，乃是知识程度进步的表现。我们中国人的知识程度，现在已非三四十年前可比，外族武力决不能轻易威胁我们的。日本此次无故占领我国土地，必自恃其强大的陆海空军，以为中国必非其敌，我若稍与抵抗，彼即可藉口开战，必使我割地赔款，方肯罢休。我国也有一部份人，也有此种心理，深怕得此结果，欲图恢复，非数十年，或至百年不可。不知此种心理，在我国三四十年以前的情形，是可以通用的，现在却完全不同了。我相信以国人现在知识程度的进步，到了万不得已而至和平破裂，我们一定不会失败的。我们现在固要尽力避免战事，且在未至战争的时候，仍要镇静持重，无暴其气。但我们国民知识程度的进步，实可以和强敌决一死战，这不仅我们自己要认识，世界各国在这一回事中，都可认识的了。前清甲午庚子两次战事，中国有两桩最可耻的事。第一在甲午年与日本开战时，北洋舰队已被日军战败，南洋舰队依然袖手旁观，而且宣告中立，这显然表示中国人无民族思想与国家观念，使外人视我中国人无团结一致的精神。在此种情形之下，如何能不受人欺侮？如何可免失败？第二庚子年的义和团，不辨国籍，不分恩怨，一味仇视，充分表示中国人民没有知识，自然要给外国人轻蔑欺侮。不过这是三四十年以前国民知识程度的象征，绝不是现在民族心理的表现。日本军人不明此理，犹抱持其三四十年以前的目光，来看民国二十年的中国人，他们这种错误，可断定就是他们失败的先兆。现在我们人民已经都知道国家是人民共有的，不像以前视作皇帝一个人所有了。因为以前视国家为皇帝所有，所以与日本开战时，便也看作皇帝一人的事，百姓是不必管的。到了今日我们已经把这个心理，完全更改了。知道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无论日本欺侮我们那一处人民，或者侵占我们那一处地方，人民就立刻觉得这是欺侮我们全体人民，与侵占我们整个国家。人民对国家观念，不但十分热烈，且在极热烈之中，依然能保持很明白的理智，不作无意识的行动，不中敌人的狡计，这就是我们立国的基本，也就是御侮的基本。日本此次出兵，占领我辽吉两省，全国同胞，立刻一致起来反抗。不仅长江一带如此，即最南部的广东人民的表示，也十分激昂。这种全国一致的精神，真是卫国的至宝，比什么力量都大。照上述理论看来，现在我们的军备武力，虽然不如日本，但因为我们人民知识程度提高，所增加的卫国的力量，实在足以保卫我们国家的存在。这种精神的表现，决不是军国主义的国家所能压倒的，所以此次事件，固希望能够和平解决，但若万不得已而须以武力自卫，就必定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我们必要为拥护国家民族的生存，维持公理人道的尊严，坚持到底，决不屈服。全国国民总力量的表现，不但不为敌人所畏吓，而且要为世界公理国际公法，来尽其所应尽的责任。我们有坚忍的力量，无论异族用什么陆海空军的暴力，来压迫我们，我们全国仍能以极悲痛沉着的精神，抵抗此莫大的凌侮。现在的国民，已与三四十年以前的国民，大不相同，日本人的眼光应当变更，我们自己更要认清此点，我们更要知道世界上任何国家或任何个人，都不能离开世界而独立。就国家论，立国于世，必有与国，国与国间自必有其相安相助之道，决不能只顾自己的权益而妨害甚至侵犯他国的权益，如果如此，则此只知为自己的国家，决不能得与国的同情，而安然并存。我国是世界国家之一，即不能离开世界，同样既是国际联合会的一分子，即不能离开国际。任何国家，离开国际，都不免失败，都要自取灭亡。现在日本即陷于此种境地，军人只晓得自己的陆军强大，只想一脚踢进我东三省腹地，即可踞为己有。殊不知世界还有公理，决不容许他这样飞扬跋扈，来破坏世界的和平。世界非仅一日本，国际非仅恃强权，日本占领东三省，就是破坏东亚和平，日本军阀不明此理，无异自绝于世界。国际联合会本希望日本侵入东省事件不要扩大，而日军惟恐其不扩大，日本飞机轰炸锦州事件，远在国联训令日军撤兵之后，故其暴行，使全世界各国，都不能承认。政府当此大难，鉴于国民知识程度的提高，以及国际公道的犹存，所以决不存畏惧之心，无论日本武力怎样强大，都不在我们眼中。我们只要自问有无众志成城的意志？有无誓死革命的精神？是否遵依世界的公理？是否拥护国际公法的尊严？以及是否维持非战公约的存在？我想我们是世界的一国，又是国际的一分子，无论如何，都有拥护公法与维持公约的青任。且不但我国有此责任，就是世界各国，也都有这个责任的。今日我们固甚愿以和平的方式，来保全非战公约的尊严，虽日本侵占我们领土，我们仍不对他宣战，是为了要维持公埋，为公法公约而竭力忍耐，但到万不得已时，公法与公约，都不能维持的时候，也决不惜任何牺牲，以尽我拥护国际公法维持非战公约的责任，非战固是神圣，但为维持公法公约而战，无论牺牲怎样重大，也是有价值的。全国同志同胞，我们知道现在已是文化日进的世界，决非那野蛮武力可以制胜一切的。中国民族已不是三四十年以前的情形，忍耐与奋斗，都能依着时势的必要，以表现我们的人格与决心。我们在精神上已有最大的胜算，无论敌军怎样强大，怎样来威胁我们，我们总是处之坦然，不为屈服的。我们更应相信国际有公约，人类有公道，我们要以和平的心理去遵守，以牺牲的精神去拥护。横暴不足畏，威武不足屈，我们要和平奋斗，以捍御此次的国难，以拥护国际的公法。

□□□□□□□□□□□□□□□□□□□□□□□□□□□□□□

《中国与门户开放－清末民初外患史》二七三页至二七九页。陈世昌着，台北海国书局印行，中华民国六十六年六月初版。

废战公约与中苏军事冲突

废战公约的由来：中国统一后，在外交上所面临的第二种冲突就是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因为中东路事件所引起的中俄军事冲突。就中国来讲，这是国民革命军完成北伐统一国家后，中外之间所点燃的第一把战火，就国际来讲，这又是一九二八年世界各国签订废战公约（Ａｎｔｉ－ＷａｒＰａｃｔ）以来，这个国际公约所遭受的第一次考验。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各国因为需要美国的富力，所以都想拉美国来参加欧洲政治。尤其法国一直害怕德国重行强大，更想拉拢美国。可是法国也深知美国是不肯和欧洲国家缔订军事同盟的，所以它就想用其他方式，使美法两国站在同一战线上。一九二七年三月，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萧特威尔（ＪａｍｅｓＴ．Ｓｈｏｔｗｅｌｌ）游历法国，向法国外交部长白里安（ＡｒｉｓｔｉｄｅＢｒｉａｎｄ）建议，由美法两国订立条约，宣布废弃战争。白里安非常欣赏萧氏的意见，就在七月正式向美国政府提出条约草案。美国的柯立芝（ＣａｌｖｉｎＣｏｏｌｉｄｇｅ）总统和克洛格（ＦｒａｎｋＢ．Ｋｅｌｌｏｇｇ）国务卿对此事并不热心，但是舆论非常赞同，参议员们也表示，美法两国订约没有多大意义，如果能扩大为多边公约，参议院可以通过，克洛格就以此意答覆白里安。到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就由十五个国家的代表，在巴黎签订一个废战公约（注十一）。废战公约，又称巴黎公约（ＰａｃｔｏｆＰａｒｉｓ），或克洛格白里安公约（Ｋｅｌｌｏｇｇ－ＢｒｉａｎｄＰａｃｔ）原签字国包括美、英、法、意、日、德、加等十五国，后来中国、苏联、和其他重要国家也都陆续参加进去，到一九三六年底为止，加入的国家已达四十八国。（注十二）

废战公约规定签约国放弃以战争为执行国策的工具，并且谴责用战争来解决国际争端。签约国间一切争端都必须以和平方法处理。美国当时有许多理想主义者，天真地认为全世界文明国家都放弃战争，谴责战争，那末世界和平自然可以永保。一九二九年胡佛（ＨｅｒｂｅｒｔＨｏｏｖｅｒ）总统索兴宣布废战公约签订周年纪念日为和平节，举行庆祝。不料就在这时候，废战公约就在中国东北遭到第一次考验。（注十三）８７１１１４２１１０加入止

注十二：参考雷崧生：国际法原理，下册，页五五至五六。

注十三：参考程天放：美国论，页六六。

□□□□□□□□□□□□□□□□□□□□□□□□□□□□□□

九一八事变与“不抵抗”

前言

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东北日本占领军发动侵略战争，其目的是并吞东北，由此导致了“九一八事变”。当时，中央政府的决策是“不抵抗”！

为什么会有这个“不抵抗”的决策？！“不抵抗”是最好的选择吗？！

本文试参考各种资料以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陈述两点非常重要的背景：

一、中国及日本都是“非战公约”的签署国。

二、民国二十年，国内有分裂国民政府的李宗仁、汪精卫集团，国外有苏维埃联邦（苏联）正全力在中国境内处处树立“苏维埃”政权！！

非战公约

“非战公约”又称为“废战公约”，或称为巴黎公约（ＰａｃｔｏｆＰａｒｉｓ），或克洛格白里安公约（Ｋｅｌｌｏｇｇ－ＢｒｉａｎｄＰａｃｔ）原签字国包括美、英、法、意、日、德、加等十五国，后来中国、苏联、和其他重要国家也都陆续加入签署，到民国二十五年底为止，参加的国家已达四十八国。

民国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有十五个国家的代表，在巴黎签订一个非战公约，此公约的精神在于：

所有签约国承诺在有国际纠纷发生时，废弃以战争解决纠纷的方法，而以非战争的和平方法解决问题。

日本图谋东北

民国前四十五年（西元一八六七年）日本明治天皇开始实行新政，促使日本工业化，此后日本以工业国面貌出现于亚洲，中国及韩国都仍然为农业为主的国家。工业国家需要自然资源，例如煤、铁、铜等矿产。我国东北地区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于是船坚炮利的工业化日本便把注意力放在我国的东北。为了利用东北的自然资源，日本以武力为后盾，强迫清廷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攫取东北自然资源的利权，为此，日本还曾经与俄国发生“日俄战争”，战胜的日本更是垄断东北的矿、林、交通、港口等经济命脉。日本，特别是日本军阀，最后决定要把东北自中国版图挖出去，故而等待机会。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本发动芦沟桥事变，全面侵略中国，此后为日本图谋中国，不过在民国二十年时，仍然是日本图谋东北。）

俄国图谋中国

西元一五七九年（明万历七年）俄帝伊凡四世差遣耶尔麻克率领骑兵八百四十人，越过乌拉山，向东进入西伯利亚。以此为开端，俄国占领了大片北亚洲的土地。相对于工业国俄罗斯，清廷是一个积弱的政府，俄国利用外交手腕，诱使、迫使清廷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割地条约。四百年以来，俄国侵占我国五百八十八万三千八百平方公里之国土！！占当时全国面积三分之一！！

民国十年前后，俄国以共产主义的“理论”骗取了多数中国人的信仰，俄国所利用的“理论”，造成一个阶级对立的社会，在我国社会投入了动乱的祸源，因为所谓的“无产阶级”是中国人，而所谓的“资产阶级”也是中国人，把一批“资产阶级”斗完之后，在“无产阶级”中再找一批“资产阶级”继续斗，这种永无止境的“阶级斗争”若能持续下去，则中国社会的元气会被消耗殆尽！此时俄国人进入中国，只需弹指之力，就可以镇服所有“斗争为纲”下的幸存者。

犹有甚者，连弹指之力都不必花费。俄国自命为“苏维埃联邦”，找一批“中国人”为代理，在中国境内四处树立“苏维埃”政权，并且令使其代理让中国人咒骂自己的祖先、让中国人改口叫俄国人为“祖宗”（列宁）及“爷爷”（史大林）。如果这些计划都“顺利”推行，则将来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会自动投入“苏维埃联邦”！

（随着俄国力量的减退，俄国失去了对中共的绝对控制能力，所以，

“继续斗争论”唱过了，现在不唱了，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过了，以后不使用了，“祖宗”、“爷爷”叫过了，现在少叫了，中国历史、文化破坏过了，现在不破坏了，

虽然目前看似中共不受俄国控制，但是，我们中国人仍然要担心：

如果将来有一天，俄国对中共的控制力再度加强，那么，中华民族的命运会如何！？）

民国二十年前后的国内情况

日本于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在东北制造九一八事变，为什么日本军阀选在这个时间推展其阴谋？位于东北地区的近因有“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被杀害事件”。东北以外的情况有军阀另树旗帜的叛乱和苏维埃联邦在中国境内四处树立苏维埃政权！！

“万宝山事件”

民国前二年，日本并吞韩国，所以日本以韩国的监护人自居。

民国二十年四月至七月，吉林省长春县爆发了中国农民及韩国农民争夺灌溉用水的纠纷，因为韩国农民所建的渠道侵越了中国农民的土地，并且在伊通河筑有水坝，将会遏阻河流水位增高，而使该河两旁中国的数千顷水田有被泛滥灾害之虞。

五月二十日，有中国地主、农民代表一百余人到长春市政筹办处请愿，要求制止开渠；长春市政筹办处受理之后，于五月二十四日下令停止施工，但韩国农民则置之不理，继续筑渠。五月三十一日，长春县公安局派遣警察二百人前往制止；翌日～六月一日，将强行施工的韩国人九人逮捕。于是，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便于当天派领事馆的警察七人到达施工现场，进行干涉，并强制继续施工。六月底，渠道完成，七月一日中国农民前来把渠道填平。七月二日，日本武装警察赶往渠道现场，和中国农民发生冲突，长春市政府出面劝告，并使双方撤走。

这本来是一件有惊无险的事，韩国农民并没有伤亡，但是，日本要利用这一事件，故意在报上反宣传，因而造成了更重大的惨剧——日本报导谣言“朝鲜人被中国人袭击残杀”，致使韩国境内暴动，韩国人对中国人攻击，造成死亡一百四十六人、失踪九十一人、重轻伤五百四十二人的惨案。

“中村大尉被杀害事件”

民国二十年六月初，驻东北的日本侵略军派出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伪称“游历”，向中国当局申请了护照，前往黑龙江、兴安一带，搜集将来日军进犯至该地时，军队宿营地及补给路线等情报。

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六日，中村震太郎到达苏鄂公府（民安镇），可能为窥视中国军队驻扎状况，乃欲由屯垦队第三团操场附近通过，被中国军队查询，因为该地盗匪很多，中村又是外国人，中国军方乃留中村住于团部，并以外宾之礼相待，请示上级，意在保护出境。因为部队之饭食粗劣，二十六日及二十七日遂四度招待中村等人至街市饭馆用餐。

二十七日傍晚，由中村的言行，屯垦队第三团代理团长关玉衡怀疑该日人等为奸细，乃下令检查其身体，竟由裤内搜出日、俄文军事地图两张，日记二本，笔记录三张等，一经查阅其日记，多系记载调查将来军事上应用各项，知为侦探无疑；即向屯垦公署请示办法，传令略加看守，而仍然给予优待。

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八日凌晨，中村震太郎及其同伴乘卫兵困倦闭目时逃离团部，卫兵察觉后，追赶中村一行，勒令回营，但中村等人只顾逃离，卫兵乃开枪射杀中村及其同伴。卫兵畏罪，而弃职潜逃。代理团长关玉衡擅做主张，把中村等人之遗体焚化，图灭形迹。

虽然中村震太郎是军事间谍，虽然中村是在逃脱时被卫兵射杀，但是，日军仍然不认为是自己理亏，而成为日军侵略东北的近因。

军阀另树旗帜的叛乱

民国十六年四月一日，汪兆铭经过莫斯科返抵上海。“中途经过莫斯科，曾向俄共当局允诺全力支持共党。”（《中共编写‘中华民国史’真相探讨》第一八五页）

民国十七年六月八日，国民革命军正式进入北平，北伐军统一了华南、华中及华北。

民国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蒋中正总司令提出一份“呈请设立裁兵委员会文”，说明：“北伐已告完成，军事应谋结束，裁兵之举，斯其时矣……中正筹思所及，爰拟设裁兵委员会”，“庶几化兵为工，可期早日实现。”（《蒋氏家族全传》上册第二九三页）

民国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东北易帜，全国统一。

国家统一之后，需要裁减军费，把国家财力投入民生、经济建设。

民国十八年元旦，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国军编遣会议，商讨裁兵计划，决定由全国二百二十万人兵员裁至八十万人，使军费预算占国家财政百分之八十六减至百分之四十以下。但是，有拥兵自重思想的军阀们不愿意自己的武力被裁减。

民国十八年九月，张发奎发表通电，拥护汪兆铭，并要求改组党务，且即率军南下进入湖南，计划攻夺广东，接应汪兆铭。

民国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广西省主席俞作柏和师长李明瑞突然背叛中央，宣告独立。

民国十八年十月七日，国民政府命令陈济棠率军出动讨伐，由粤、桂边境的梧州攻入广西；桂军将领杨腾辉立即誓言服从中央，俞作柏则逃亡到远在安南国境附近的龙州。吕焕炎继任广西省主席。

民国十八年国庆节的十月十日，宋哲元、石敬亭等二十七人联名通电反抗中央，反对编遣国军。冯玉祥属下的部队大约有二十万人以上，他们在发出通电的同时，便分兵九路由陕西推进河南，设司令部于洛阳，沿陇海铁路东进，并且别遣一支部队南下，有指向武汉之势。

民国十八年十月底，唐生智、方鼎英所率领的国军挺进到洛阳东南的临汝、登封、黑石关之线，与宋哲元、孙良诚、石敬亭等所部逆军展开激战。

民国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央军继续追击，并进入洛阳；逆军则更向西方逃亡。——自民国十八年春间以来冯玉祥系的连续叛乱行动，至此才告一段落。

民国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盘踞湖南省山岳地区的张发奎，将所属部队向广西省北部移动，并在恭城发出通电，自称“护党救国军第八路总司令”，声言要攻取广东；于是，广西省主席吕焕炎竟起而追随张发奎，李宗仁的残党也加以响应。

民国十八年十二月二日，石友三自称“护党救国军第五路总司令”，有进袭首都南京之势。

民国十八年十二月五日，唐生智突然通电自称就任“护党救国军第四路总司令”，响应石友三，同时表示“拥汪（兆铭）联张（发奎）”，企图沿平汉路南下，夺取武汉。唐生智是当冯玉祥叛乱时受命国民政府指挥讨伐军对冯军作战，驻军于河南郑州一带。

民国十八年十二月九日，蒋总统发表“告全国将士电”，重申完成革命之决心。

民国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阎锡山、张学良等人响应号召，联名通电“坚决拥护中央统一”。于是，看到形势已趋于不利的石友三，遂即未经作战便戢兵听命。

民国十九年元月二日，中央军在驻马店进攻得手，饥寒交迫的唐生智所部遂即全线崩溃。

民国十九年二月十日，阎锡山致电蒋总统，突然要求下野。

民国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阎锡山则与冯玉祥、李宗仁等四十五人联名通电，反对中央，并扬言要求对国军编遣会议，重作决定；汪兆铭也立即响应。

民国十九年三月十五日，冯玉祥的部属鹿钟麟等五十七人联名通电拥护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可是张学良则拒不就任，并向中央表示对于此事毫未预闻。阎锡山所部侵入北平，将政府所属军、政机关封闭、接收，并沿平汉、陇海两铁路推进及增强兵力。

民国十九年五月一日，针对阎锡山集团，中央对全军布达讨伐令。在中国近代史上被称为空前的大内战——“中原战争”于焉展开。

民国十九年五月下旬，当中央军和冯、阎所部在中原地区持续苦战之际，南方李宗仁、张发奎残余部队约四万人又恢复了实力北上，威胁中央军后方。此时，担任南方叛军前锋的，是白崇禧。他指挥所部由广西侵入湖南，陆续于五月二十七日、六月三日、八日先后攻陷衡阳、长沙、岳州（岳阳），控制了湖南并进迫武汉。于是，中央军南北腹背受敌，因而处于困境。

民国十九年六月十五日，中央军克服岳州；两天之后，更在敢死队与海军的积极行动之下，夺回长沙。南方的危机，乃为之消弭。

民国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业已占据了北平的阎锡山所部晋军，由傅作义率领大军在山东省城附近渡过黄河南下。

民国十九年七月十二日，曲阜城被叛军炮击，中央军于山东全线处于守势。

民国十九年七月十三日，阎锡山、冯玉祥、汪兆铭等人发起在北平举行所谓“扩大会议”。

民国十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央军攻下了威胁中原战线侧翼的毫州城。

民国十九年八月二日，中央军在北方战线的泰安展开总攻击，并即将该县克复。

民国十九年九月一日，汇聚于北平的叛乱领导分子擅行公布“国民政府组织大纲”，推举阎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并以阎锡山、冯玉祥、汪兆铭、李宗仁、唐绍仪、谢持、张学良七人为“国民政府委员”。

民国十九年九月九日，阎锡山就任“主席”，发表所谓“公平内政，均善外交”的宣言。

民国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张学良通电拥护中央，并出军入关向北平进击。

民国十九年九月十八日，见到张学良通电的阎锡山，鉴于大势已去，遂即日通电“下野”，率领所部退回山西。

民国十九年九月二十日，汪兆铭也不声不响地离开北平。

民国十九年十月九日，中央军仍然在追击叛军，克服洛阳，二十五日下潼关，二十九日到达西安。

民国十九年十一月四日，阎锡山、冯玉祥二人，发表声明“释权归田”，阎自天津化装逃往大连，冯亦自山西逃出。

“中原战争”至此结束。

民国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第一次剿共战事开始。

民国二十年一月三日，第一次剿匪战役以失败告终。

民国二十年四月一日，第二次剿匪战役开始，第二次进剿约历时两个月，复告失败。

民国二十年五月二十八日，汪兆铭、李宗仁、陈济棠、张发奎、陈友仁等人，突然叛离中央，在广州自称组织所谓“国民政府”。这些人除向江西、湖南进军之外，并煽动在河北省的石友三叛变。

汪兆铭曾经在莫斯科与俄国有协定，俄国支持汪兆铭、汪兆铭支持中共，所以民国二十年五月间粤桂的叛乱与中央政府第一次剿匪及第二次剿匪相关！以下节录自民国二十年七月二十三日蒋总统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号召：

‘又于宁都赤匪之总部，搜获毛泽东致彭德怀之电文，内称：“两广月内出兵湘、赣，接济子弹五十万粒，即可解来；我（匪）军务须固守宁都半月，待粤军入赣，即可解围反攻”等语。其他隐语函电，关于粤、桂与赤匪互相联系者，不胜枚举；又据福建杨主席截获匪方之报告，亦证赤匪与粤、桂早成默契，已无疑义。’

所以，迄至民国二十年，国内一直是军阀叛乱、动荡不安。让日本军阀有可乘之机！

苏维埃联邦在中国境内四处树立苏维埃政权

民国六年十月，列宁在俄国发动政变成功，建立共产党政权。（《苏俄在中国》第一篇第三章第二十七节，第一一四页）

民国八年三月，第三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号召全世界劳工拥护苏俄，为“无产阶级的祖国”而团结起来，从此以后，苏俄与第三国际的言行，就相互联系而不可分了。（《俄帝侵略中国史》吴相湘着台北正中书局，民国四十六年五月台二版，第二八○页）

民国九年春间，共产国际东方部长胡定斯基（即胡定康ＧｒｅｇｏｒｉＶｏｉｔｉｎｓｋｙ）来到中国，与李大钊及陈独秀等筹备中国共产党。

民国十年七月二十三日至八月初，苏联所控制的第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及尼可尔斯基到上海，“指导”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十三人，组成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中国共产党”。

民国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国父与俄共代表越飞发表“孙越联合宣言”。声明：“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

民国十三年一月二十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开始容纳共产党徒加入国民党，这些共产党徒直接受第三共产国际指挥，实质上是直接受莫斯科指挥！

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国父逝世。

民国十四、十五、十六年间，苏联派驻广州的“总督”鲍罗廷一再指使中共篡夺国民党的军政大权，并处处干扰中国政府的决策。

民国十六年四月十二日，中国国民党清除共产党。

民国十六年六月一日，史达林秘密训令，要苏联驻武汉“总督”鲍罗廷及中共把武汉国民党首领“抛掷出去”。

民国十六年六月五日，驻武汉的第三国际代表鲁易（印度人）把史达林秘密训令交给汪兆铭。

民国十六年七月十五日，以汪兆铭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实行“分共”。武汉分共事件迫使史达林改取托洛斯基的主张，就是采取苏维埃路线。史达林派遣纽曼（ＨｅｉｎｚＮｅｕｍａｍ）和罗明纳兹（ＢｅｓｓｏＬｏｍｉｎａｄｚｅ）来到中国，指导中共并展开暴动工作。我们中国并没有向俄国输出暴动！俄国向中国输出暴动显然是一种侵略行为，因为暴动者是“中国人”，所以俄国对中国的侵略行为，绕过了俄国所签署的“非战公约”！而以中国的“内战”形式出现！使世界舆论对俄国的行为无从谴责！

民国十六年八月一日，共产党南昌暴动。

（《毛酋秘闻》，李忠道着黎明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华民国六十四年六月初版第四十七页：“中共自民国十六年南昌‘八一’暴动时起，即采用苏俄旗帜，直至二十七年输诚抗日，为要伪装成民族形式的党，始停止使用。”）

民国十六年九月九日，共产党湘赣交界秋收暴动。

民国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共产党广州暴动。这次暴动由纽曼及爱斯拉（ＧｅｒｈａｒｔＥｉｓｌｅｒ）等从苏俄领事馆中策动指挥。这次暴动中，苏联在华代理-共产党组织其所谓“工农兵苏维埃”。

民国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第五军李福林军及第四军薛岳皆赶回广州，而广州机器工人会亦组织敢死队，参加作战，所有中国人共同消灭了俄国人企图在中国建立的“苏维埃”政权！！

民国十七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召开其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到莫斯科开会是当时的乳共向俄国表示认同及投降的宣告。

民国十七年七月，湖南独立第五师团长彭德怀突然叛变，打着“工农红军第五军”的旗号，与井岗山的朱毛汇合。

民国十七年十月，福建崇安地区建立了苏联式的“苏维埃”政权。

民国十八年一月下旬开始，中央政府动员十余团兵力，进入井岗山，在人迹不至的山谷中徐徐缩小包围圈。得知国军入山围剿的匪军，乃立即放弃井岗山，突围逃出，朱毛率领的“红四军”南下逃往闽西；彭德怀的“红五军”则北窜湘、鄂、赣边境。

民国十八年一月，投俄分子毛泽东、朱德等人在赣南、闽西设立了“苏维埃”政权。这是俄国在华培植的最大的一个“苏维埃”政权。

民国十八年一月十六日由哈尔滨的苏联领事馆发往莫斯科第三国际电报：“在南京、沈阳及其他要埠，实行暗杀主义。”苏联企图制造动乱以颠覆中国政府，建立俄国式的苏维埃政权。

民国十八年五月，投俄分子徐子清等人在河南设立了“苏维埃”政权。

民国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东三省北部特警管理局探悉哈尔滨的苏联领事馆内在举行第三国际秘密会议，乃派兵前往搜查，当场捕获中、俄共产党员三十九人，其中包括有苏联派来的“东三省北部共产党执行委员”三人。根据当时检扣的文书，得知苏联在利用东北的“中东铁路”策划着非常可怕的阴谋。

民国十八年七月十日，国民政府决定收回东北的“中东铁路”，并驱逐所有俄籍人员。

民国十八年十月十二日，俄军大举进攻黑龙江省的同江，中国守军虽然英勇抵抗，仍不免丧师失地，扎兰诺尔和满洲里相继失陷。

（民国十八年八月至十月间，为东北“中东铁路”，中国与俄国发生军事冲突，中共书籍称俄国侵略军为“苏联红军”，并称中国军队为“国民党○动派的军队”！！中共到底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讲话？还是站在俄国人的立场讲话？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第一八四页，刘吉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华民国八十年六月第一版。

１９２９年８至１１月，在中国东北发生了"中东路事件"，国民党○动派的军队在中苏边境同苏联红军发生了冲突。）

民国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苏联经由共产第三国际给中共中央指示信，认为"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革命高涨的形势已经到了夺取政权的"第三时期"，要求中共中央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全力发展政治罢工，夺取中心城市，"变军阀战争为阶级的国内战争，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政权"，"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

民国十八年十二月，投俄分子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雷经天等人在广西百色设立了“苏维埃”政权。

民国十九年一月，中共中央通过《接受国际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２６日指示信的决议》。

民国十九年二月二十六，中共又发布了一个《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的第７０号通告，认为"目前全国危机是在日益深入"，主张党应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组织工人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和兵变，调动红军"向着交通要道中心城市发展。"所以中国政府为维护国家利益而决定收回东北的“中东铁路”，并驱逐所有俄籍人员，此项政策转变成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和兵变！因为俄国在中国境内树立了“俄国党”，才可能从事内部颠覆！！

民国十九年五月一日，中央对全军布达讨伐令阎锡山集团。在中国近代史上被称为空前的大内战——“中原战争”于焉展开。

民国十九年十一月四日，“中原战争”结束。

民国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第一次剿共战事开始，攻击目标，是盘踞在赣南和福建边境所谓“中央苏区”的朱德、毛泽东匪军。

民国二十年一月三日，第一次剿匪战役以失败告终。

民国二十年四月一日，第二次剿匪战役开始，以匪军根据地宁都为目标，构成严密包围网，然后再发动攻击。第二次进剿约历时两个月，复告失败。

民国二十年五月二十八日，汪兆铭、李宗仁等人，突然叛离中央，在广州自称组织所谓“国民政府”。这些人除向江西、湖南进军之外，并煽动在河北省的石友三叛变。汪兆铭曾经向莫斯科保证协助中共，在剿共战事进行期间，汪逆找了一批人分裂政府，其目的就是为中共解围，也就是向苏联讨好。

民国二十年七月一日，下令讨伐军全军出发进剿匪军。第三次剿匪战役于焉启幕。

民国二十年七月间，韩国境内暴动，韩国人对中国人攻击，造成死亡一百四十六人、失踪九十一人、重轻伤五百四十二人的惨案。

民国二十年九月十三日，汪、李叛军侵入湖南，于是和叛军已有协议的匪军遂即对讨伐军转采攻势，展开激战。

眼看着苏联代理在中国境内四处暴动的日本军阀，极思蠢动。

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日军进攻北大营，占领沈阳市。

日军的说词

驻东北日本侵略军，自己爆破南满铁路，反而栽赃诬指是中国军队所为。侵略军偷袭北大营中国驻军，但是反而宣称中国军队先攻击日本侵略军。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之后，当时事变的责任者日本军头本庄繁于三十四年十一月写下的“满洲事变的本质”中，仍旧坚持——“满洲事变，是由极端排日的爆破铁道行为开端，基于自卫而不得已采取了行动。……”还要把发动九一八事变的责任推到中国军队头上。

中共的说词

参考《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王秀鑫、郭德宏主编，北平中共党史出版社，民国八十四年八月第一版。节录如下：

第十页

……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电令张学良“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东北军接到命令：“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对此，爱国士兵极为愤慨；“持枪实弹，怒眦欲裂，狂呼若雷，群情一战。甚有持枪痛哭者，挥拳击壁者”。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近二十万东北军不战而退，大片土地很快沦陷。日军于十九日侵占沈阳、长春、鞍山、抚顺等城市。二十一日，驻朝鲜的日军第三十九旅渡过鸭绿江，侵入辽宁、吉林。从九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一周之内，辽宁吉林两省基本丢失。

……

《日本侵略华北史述》梁敬錞着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七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初版第一五五页至一五八页

九一八事变的内幕■并论日本篡改教科书之可悲■

在叙述九一八事变内幕之前，我想说一下我和东北关系的起源，和对张作霖父子的看法。

我自大学毕业，就参加了北京司法部收回法权的工作。不久东省特区法院成立，我随罗文干先生前往哈尔滨，收回中东路帝俄时代遗留的各级法庭，因此认识了张作霖父子、王永江、杨宇霆等人。张作霖绿林出身，人所共知，但他卫护疆土、热爱国家，宁可杀身，而不肯负国，这也有史实可以证明。民国十六年第一次北伐时，日本政客久原房之助，正在莫斯科献策于史太林，欲将中国满洲连同东蒙、北韩以及贝加尔湖一带的地区造一缓冲国，由日本、苏俄、中国各派监理人一人，共同执掌新国事务。中国首领拟推作霖担任，史太林同意，久原归商东北当局，而作霖不可，此事距皇姑屯之变，仅有数月。尚非外间所能共晓，故我特为辟出。

至张学良之爱国，更不待说。东北易帜时学良年尚未满三十，远受东京田中义一之压迫，近受林权助专使之威吓，身家性命，危如累卵，而学良不为所动，卒使东三省倾向中央之同心力，战胜了东京分离满蒙之离心力，赢得中华民族最荣耀之一页。至于其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之不抵抗，事关国策，中央地方均有忍辱负重勿挑祸衅之警戒，亦无抵抗防御之安排，并且那时外交财政货币金融也毫无准备，与其后芦沟桥事变发生时之情形大不相同。故不能以七七事变之抗日，比诸九一八事变之不抵抗。特学良身负地方之重任，未能事前筹维戒备，自另有可议之处，但若使其全负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之责任，则非公允，此点我曾在“九一八事变史述”一书叙过，今可不赘。

九一八事变日本称为柳条沟事件，此事经过李顿调查团之审定与“东京裁判”之判决，铁案种种，而内幕重重。原来日本自大正以后西原借款，内阁涉及贪污，少壮军人满怀怨愤，此辈外受法西斯思想之刺激亟思以崛起革（～～以上第一五五页，以下第一五六页～～）命手段，内除国贼，外拓国土，取威定霸，恢展昭和维新之大业。所谓国贼，指的是日本各政党的长老，三菱、三井的财团。所谓拓疆辟土，目的在臣服满蒙，驱逐苏俄，阻抑英、美，实现社会主义，重新分配贫富。

不独少壮军人如此嚣张，高级日本将领亦复目空一世。我在东京裁判资料中发现一九三○年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曾致陆军大臣南次郎密函一件，劝其于一九三一年建立两个新国，以树立日本的基业。一是满蒙王国、二是远东独立国。满蒙王国，包括支那的满洲与东蒙；远东独立国，包括东西伯利亚、上乌丁斯克、后贝加尔湖洲、阿穆尔州而至于白令海峡。本庄函谓两独立国创设之后，不但鄂霍次克海、日本海，成了日本的内湖，支那之东三省，大逾日本内地三倍，后贝加尔湖大逾日本七倍，加以松花江平原，嫩江平原、黑龙江沿岸，都是膏腴之地，矿藏之富，取之不竭，十年之内，日本国力，将超美国以上。

本庄又说此种经营八表之大业，一九三一年确是日本绝好的机会。因为华盛顿军缩条约，美国对日有西太平洋不设防的约束，日本海军强于美国，故日本行动，美国不敢干涉。英国与日本还有旧时英日同盟的余情，也绝不肯对日为已甚之举。至于欧陆诸国，则一九二九年经济恐慌之创痛方深，也无实力足抗日本。日本所虑，固有苏俄，然苏俄五年计划，现在刚及一半，如果日本毅然发难，苏俄亦不敢单独作梗，是诚日本时乎不再之机会，万勿错失。

南次郎如何裁答，我苦无以奉告，但少壮派之秘密结社与阴图革命，则有文献可征。远在一九二一年左右，求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陆军三少佐于留德时，已在某温泉会合中宣誓，返国整顿陆军人事，共订排除长州军阀之密约，其后十五期生、十八期生之“双叶会”，廿一期生至廿五期生之“木曜会”，廿五期生联络大中少佐各级四十余人之“一夕会”等等相率成风，“以下克上”之革命潮流，已澎湃而不可遏。

当时革命计划有国内先行论，与国外先行论两说。一九三一年之三月事件，少壮派军人藉“樱花社”之结合，拟联络民间团体一万人，在日比谷公园会合召集示威游行大会，由小矶国昭、建川美次两少将，宣布不信任内阁，请闲院宫亲王、西园寺公望推荐陆相宇垣一成出掌政权，则国内先行论之一派也。此事件因宇垣临时变意，遂至失败。而柳条沟九一八事变继起，则国外先行论之抬头也。国外先行论虽有柳条沟之成就，而锦旗革命之计划终不可（～～以上第一五六页，以下第一五七页～～）止，于是有十月事件之发生。是故在中国言，九一八之事变，自系关东军对华之侵略，而自日本言，九一八之事变，只是日本一九三一年革命三事件之一。“东京裁判”证件中西园寺公望政治秘书原田熊雄有日记，曾载其事。他说：

诸君如以为九一八事变只是国际的事件，则君等观察，尚未精确。九一八事变乃日本革命之一部分，他们以为能得志于国外者，必亦能得志于国内。我们今日之危机在此。九一八事变我们今知系石原莞尔所策划，坂垣征四郎所执行，本庄繁所特准。事变发动前数日，沈阳日本总领事馆已早得消息，总领事林久治郎、领事森岛守人，各以密电报告币原外相，币原亟提出阁议，责令陆相南次郎派出专使，持天皇诏敕，戒关东军勿得擅动。乃南次郎所派专使，适为革命同谋人之建川美次，伊密以奉敕消息通知坂垣，使其于建川抵沈之下午，赴站迎接，安排艺妓与食宿，并于约谒本庄司令官之前夕，提前起事。建川有意迟延敕令之投递，使外务省失去防止事变之功能，柳条沟事件遂至爆发。我在东京裁判资料中，又发现当年日本参谋部主管课所预定之程序，“满洲事变”原拟在一九三二年发动（今村均日记二卷页一九四），距九一八尚有九个月，按照关东军幕僚所预定之柳条沟举事日期，为九月廿八日，距九一八亦尚有十日，（“太平洋战争之路”卷二）按照重光葵与宋子文同赴东北，商讨悬案之约，其日期为九月二十日，向使三种安排，有一成就，则历史上便无九一八之事变。是九一八之名词，以事变论，固是预谋；以日期论，则系突发。论九一八事变者之所宜知也。

命，十月革命于此开始。迨十月革命再受波折，东京盛传关东军将次独立，参谋部复遣使向坂垣、本庄个别敷衍。军人为社会之花，战争是文明之母，以军篡政，视为维新；以下克上，认为忠悃。宪纲堕地，军纪沦亡，识者早知日本必有大乱之局。自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六年，东京发生白昼暗杀案竟有五次，井上准之助、团琢磨、犬养毅，皆被杀。直至二二六事件起，近卫师团叛变，纠合士兵至一千四百人袭击首相官邸，冈田启介首相与西园寺公爵亦几不免，相持三日，叛兵虽被镇压，而少壮佐尉军人仍然得（～～以上第一五七页，以下第一五八页～～）势，我芦沟桥之事变，即于翌年爆发，盖实九一八之余波也。

我尝谓九一八事件，上结一八九五年三国干涉还辽之余绪，下迄一九四五年东京湾联军会盟之新局，直是一单极之绳梁。莫利逊史学家亦谓自柳条沟、而芦沟桥、而珍珠港、而广岛、长崎（原子弹下落地）东京湾，亦只是一来回起讫的旅程，而日本已自挑战侵略而至与惨败，国几不国，军国主义之炯戒，何等昭昭。今日日人倘尚不知警悟，反悍然以窜改南京屠杀、伪满建立之史实为掩丑之方，其识见之低下，亦正可悲。试思五十年之往事非遥，诸在事之人证犹在，即以“东京裁判”而论，其资料类皆日本霞关三宅坂原始之档案，其证人类皆当年在职之首相、军官或当事人，其审问之笔录、控诉书、证件、辩护书、自白书，皆已缩制胶卷，分藏于美国各大学之图书馆中，供人阅览。综其页数在四万八千页左右，岂区区一日本文部省核定之教科书所能篡改而掩饰，窃恐其徒见作伪心劳，贻人耻笑而已。

——原载中华民国七十一年九月“传记文学”第四十一卷第三期

□□□□□□□□□□□□□□□□□□□□□□□□□□□□□□

中共对“九、一八”之态度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即于九月二十二日作成决议，指日本侵略东北有两重意义∶一方面是各帝国主义者开始进攻苏联的信号，另一方面将帮助加深国民党内部危机，使国民党各派加强团结，更努力的反共战争。因而中共号召革命的群众武装起来保卫苏联，并且推翻国民党的统治。

中共中央所作决议如下∶

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

一、日本帝国主义驻满军队，于九月十八日晚，藉辞南满铁路破坏的口实，紧急的以武力占领沈阳、营口、长春与南满、安东两铁路线上的各重要城市，炮毁重要的要塞建筑、兵工厂及繁盛的街市，屠杀无数的中国兵士与劳苦群众；同时，更在次一日占领吉林。延边、新民各地，并向青岛、天津、北京、葫卢岛、秦皇岛各地增兵，并委任沈阳及其他地方的行政长官，拆毁沈阳兵工厂，移动大队的驻鲜军队入满，而日本全国的整个军队亦是在整个动员备战的状态之中。这严重的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殖民地政策的产物，是日本武装占领整个满洲及东蒙的企图最露骨的表现，是将满洲更殖民地化，而作更积极的进攻苏联的军事根据地的实现。日本帝国主义所以能够而不得不采取这个政策的原因是∶

１、剧烈的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用极大的力量打击着日本帝国主义。日本的经济危机，猛烈发展着，浸及一切的生产部门与国内外的贸易，广大的群众失业，无产阶级与劳苦群众的生活的极端恶化，并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群众斗争的日益紧张与革命化。（失业争斗之严重，罢工争斗的开展与朝鲜、台湾的骚动。）所有这些促使日本帝国主义者不得不采用更急迫的帝国主义政策，以巩固掠夺，加紧殖民地的剥削，加紧战争的准备，企图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中来找得经济危机的出路。

２、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惊人的成功，五年计划的完成与超过，引起一切帝国主义者的愤懑与仇恨。因之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加倍的积极准备反苏联的战争。而最近五年计划的成功，使苏联在西伯利亚东部的社会主义力量亦大大的增厚与巩固，这更加厉害的使日本帝国主义恐慌惊怖，尤其是苏联的存在给全世界无产阶级与劳苦军众的一个最大的刺激，而成为他们革命争斗的大本营，在日本国内阶级争斗日益紧张的现在，不能不使日本的资产阶级更加坐立不安。远东海参威朝鲜银行支行的停业，日俄无（？）区卢布贴现律的争执，驻日俄大使之被刺等等，都明显的表现日本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政策的变化。目前日本的武人已经明白宣言，反苏联的必要准备是正在加紧进行，占领满洲一切军事战略上的要点自然亦是这进行中之一个主要步骤。

３、中国革命运动的开展。苏维埃和红军的巩固与发展，国民党军阀的进攻苏维埃的屡次溃败与覆灭，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高涨与灾民斗争风起云涌，城市工人争斗的浓厚的反攻与进攻的成份政治性质之日益显露，农民游击战争之发展，兵变潮流之勃起，以及北方农民群众的实现土地革命与建立苏维埃政权之最初的行动（红军二、四军的成立），国民党统治的经济的财政的危机及其部份的分崩，这些都使得帝国主义感觉得在中国的半殖民地奴役制度的危机，以及国民党没有力量压迫革命运动的勃发，因之更积极地进行组织公开的军事武装干涉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与苏维埃运动。满洲的占领与武备的增加是使日本帝国主义更能便利的调动大队的陆军来干涉北部及中部的游击战争与苏维埃运动。

４、而促使日本这个政策通行无阻的不能不归功于国民党的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及出卖民族利益。国民党政府事前参预了日本武装占领满洲的计划，命令自己的军队无条件的缴械与投降，将千百万的劳动群众给日本帝国主义者蹂躏、虐杀、奸淫与剥削，而事后亦只有空口的抗议，“镇静的”外交，向强盗机关（国联）乞求，希望美国主持公道或者在纪念周上大哭一次，而实际上更加紧对于群众的民族自觉和反帝国主义争斗的残酷压迫。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帝国主义与无耻出卖民族利益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与武装占领作开路先锋。

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武装占领满蒙是在上述的背景之上实行的。他们真实的意义是以军事和武装的力量将中国屈服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奴役之下，巩固他们在满洲的统治，加倍的压榨剥削中国的劳苦群众以找求本国经济恐慌的出路，并依据着满洲的战略上的各要点准备反对苏联的进攻与帝国主义的争夺市场和殖民地的强盗战争，准备直接武装干涉中国的革命战争。所以满洲事变是瓜分中国为各个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开始，是反苏联战争的序幕，是世界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

二、在世界经济恐慌剧烈发展与革命危机日益成熟的情势下，日本公开的以武装占领了满洲，日本利用着各个帝国主义反苏联战争的一致和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的机会，进行了满洲的武装占领，这个占领与军事行动是最露骨的反苏联战争的序幕。军事战略的重要之各地的占领，日本军队向北满的推进，中东（路）南段的强占与铁路员、工的屠杀，到处表露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反苏联挑衅的军事冒险。日本军事主要指挥者反苏联的狂言，英国帝国主义停止现金兑现的决议，德国总参谋之活跃，这些都告诉我们实际反苏联战争已经准备妥当。东方线的开始爆发将是极大的可能的前途。同时，我们必须估计，在世界经济恐慌与市场问题态度紧张的现象，在瓜分中国问题的周围，在发展巨大的帝国主义间的冲突与矛盾，首先是日、英、美、法的斗争，所以帝国主义强盗间的强盗战争，在满洲问题周围爆发的危险一样地威胁着。现在全国无产阶级及劳苦群众身上放着伟大历史任务∶这一任务便是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反对日本的殖民地屠杀政策，用革命争斗的力量消灭反动的在帝国主义怀抱中献媚乞怜的国民党政府，实行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以求民族的与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澈底解放。

三、满洲事变对于中国事变发展的前途将给予决定的影响。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的暴行，毫无疑义地将激起广大的劳苦群众的民族觉醒，在党的正确的领导之下，这个民族的觉醒能够很迅速的转变到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争斗，正在急剧高涨中的反帝运动的高涨将以更大的力量向前开展。农民运动与土地争斗的紧张，城市工人运动争斗进攻与政治性质之日益明显，士兵群众情绪的动摇与不安，给苏维埃运动与红军的争斗以极大的顺利，造成了全国革命危机先决条件更进一步的成熟。这事变给予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以新的重大的打击∶群众的民族的觉醒与革命争斗的剧烈，北方军阀的巨魁张学良的军事的财政上的丧失，民族的武断宣传的破产，国民党政府对于帝国主义的投降、屈服与无耻的揭露，这些将更加促进国民党统治的崩溃与破产，及胜利的革命争斗的顺利的客观环境，正是这个客观环境将使得国民党的各反革命派别企图在革命及苏维埃争斗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更加残酷的进攻苏维埃和红军（国民党告同志书上说明这是应付满洲事变的第一等的任务），压迫一切群众的革命争斗与反帝国主义运动，以博取帝国主义者的欢心而维持自己行将没落的统治。然而由于帝国主义在华矛盾和冲突是不会消灭的，反而会更加紧张起来。虽然国民党民族的武断的宣传的破产和它的投降帝国主义的面目在群众面前更进一步的揭露，但是国民党必然要更利用民族主义及一切武断宣传来阻滞群众运动的革命化。

四、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的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无情的革命争斗上来。抓住广大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失望与愤怒，而组织他们，引导他们走向消灭国民党统治的争斗，抓住一切灾民、工人、兵士的具体的切身要求，发动他们的斗争，走到直接的革命争斗。领导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政策，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侵略，反对进攻苏联，和苏区的拥护苏维埃，武装保卫苏联，反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而争斗。为着这些任务的实现，中央责成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以布尔塞维克的坚决性与无限的革命热忱来进行下列的工作∶

１、进行广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的运动。丝毫不要害怕群众的民族主义热忱，相反的，必须加紧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到反帝争斗上去，同时坚决的反对一切国民党的武断宣传。向广大的群众指出∶只有群众自己的力量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求得民族的解放，只有苏维埃政权才是唯一的能够澈底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估计着群众的仇恨和热忱，提出武装群众的口号；使这些武装的群众团体变为游击队与工人自卫队。同时必须指出∶只有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才能真正地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使武装群众的口号很密切地与武装暴动口号的宣传密切的联系起来。

２、组织各色各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公开组织，或者参加一切已经存在的反帝组织而夺取他们的领导。经过这些组织，正确实行反帝运动中的下层统一战线和吸收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阶层参加争斗。在各大城市中公开的出版群众的反帝日报，抓住国内重要工厂——尤其日本工厂，进行组织反日的罢工、示威。同时各地党部、团部他应该注意学生中的工作，使一部贫苦学生群众离开民族主义武断宣传的影响而作坚决革命争斗。

３、广大的进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宣传鼓动工作。在苏区与非苏区之内组织“苏联之友”协会。积极地进行拥护红军苏维埃的工作，动员工人到红军去，募捐援助红军，很广泛地把苏维埃政府的宣传以及全国苏大会的各种法令草案散布到群众中去。

４、估计在这次事变后士兵情绪的动摇和不满，这些士兵在经常军官的保国卫民的欺骗宣传之中，而一旦地身历了国民党的卑鄙无耻，反抗与愤懑的情绪是必然增涨内。党应该加强士兵中的工作，各省委应该派大批的同志到白军中去发动他们的争斗，组织他们的游击战争，这是真正的武装拥护苏联及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方法之一。

５、在灾民争斗中（不论在城市与农村中），必须加紧把他们与反对帝国主义争斗联系起来，经过反帝的口号及他们切身要求来发动广大的灾民争斗，必须说明反帝国主义运动与土地革命的关系。不推翻地主的土地占有，不能根本的消灭帝国主义在乡村的支柱；不根本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土地革命胜利无从巩固。

６、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的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争斗（北宁路、中东路、哈尔滨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他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

７、必须估计行将来到的战时的地下党的困难的环境，各省委必须有专门的计划来改善党的秘密，使他能够在严重白色恐怖与战争状况之下来继续工作，这是应该看做目前的战斗任务之一。

中央一九三一年九月廿二日。

中共中央首领之一，任宣传部长之张闻天，以洛甫笔名撰“满洲事变中苏联的和平政策与反苏联的斗争”一文更露骨的表明“武装保卫苏联”的态度。文中列举三点证明各帝国主义准备反苏战争∶

一、各帝国主义国家报纸，于日军进攻东北后，一致强调苏俄将出兵东北之北部。二、法国、英国与美国在国联呼吁日本北进，勿再南进。三、随之而来是法国与美国及德国集中于商讨对苏经济封锁问题。

实则当时各国对日军之突然发动东北侵略，无不为之震惊，而张文故意歪曲事实，以转移国人视线；至所谓法、英、美在国联要求日本北进，攻击苏联，全系白日梦呓，无任何事实根据。

摘自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三卷

□□□□□□□□□□□□□□□□

‘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一文之用词统计如下：

苏联易为共二十次苏易为共十六次（苏就是苏维埃）俄易为★共两次

中国易为共十次

日本进攻中国，但是，中共却嘶声力竭的呼号：“保卫苏联”！！

我们中国人要等到那一天才能看见

日本进攻苏联，但是，俄国人嘶声力竭的呼号：“保卫中国”？？

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

一、日本帝国主义驻满军队，于九月十八日晚，藉辞南满铁路破坏的口实，紧急的以武力占领沈阳、营口、长春与南满、安东两铁路线上的各重要城市，炮毁重要的要塞建筑、兵工厂及繁盛的街市，屠杀无数的兵士与劳苦群众；同时，更在次一日占领吉林。延边、新民各地，并向青岛、天津、北京、葫卢岛、秦皇岛各地增兵，并委任沈阳及其他地方的行政长官，拆毁沈阳兵工厂，移动大队的驻鲜军队入满，而日本全国的整个军队亦是在整个动员备战的状态之中。这严重的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殖民地政策的产物，是日本武装占领整个满洲及东蒙的企图最露骨的表现，是将满洲更殖民地化，而作更积极的进攻的军事根据地的实现。日本帝国主义所以能够而不得不采取这个政策的原因是∶

１、剧烈的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用极大的力量打击着日本帝国主义。日本的经济危机，猛烈发展着，浸及一切的生产部门与国内外的贸易，广大的群众失业，无产阶级与劳苦群众的生活的极端恶化，并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群众斗争的日益紧张与革命化。（失业争斗之严重，罢工争斗的开展与朝鲜、台湾的骚动。）所有这些促使日本帝国主义者不得不采用更急迫的帝国主义政策，以巩固掠夺，加紧殖民地的剥削，加紧战争的准备，企图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中来找得经济危机的出路。

２、社会主义建设的惊人的成功，五年计划的完成与超过，引起一切帝国主义者的愤懑与仇恨。因之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加倍的积极准备反的战争。而最近五年计划的成功，使在西伯利亚东部的社会主义力量亦大大的增厚与巩固，这更加厉害的使日本帝国主义恐慌惊怖，尤其是的存在给全世界无产阶级与劳苦军众的一个最大的刺激，而成为他们革命争斗的大本营，在日本国内阶级争斗日益紧张的现在，不能不使日本的资产阶级更加坐立不安。远东海参威朝鲜银行支行的停业，日★无（？）区卢布贴现律的争执，驻日★大使之被刺等等，都明显的表现日本帝国主义对的政策的变化。目前日本的武人已经明白宣言，反的必要准备是正在加紧进行，占领满洲一切军事战略上的要点自然亦是这进行中之一个主要步骤。

３、革命运动的开展。维埃和红军的巩固与发展，国民党军阀的进攻维埃的屡次溃败与覆灭，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高涨与灾民斗争风起云涌，城市工人争斗的浓厚的反攻与进攻的成份政治性质之日益显露，农民游击战争之发展，兵变潮流之勃起，以及北方农民群众的实现土地革命与建立维埃政权之最初的行动（红军二、四军的成立），国民党统治的经济的财政的危机及其部份的分崩，这些都使得帝国主义感觉得在的半殖民地奴役制度的危机，以及国民党没有力量压迫革命运动的勃发，因之更积极地进行组织公开的军事武装干涉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与维埃运动。满洲的占领与武备的增加是使日本帝国主义更能便利的调动大队的陆军来干涉北部及中部的游击战争与维埃运动。

４、而促使日本这个政策通行无阻的不能不归功于国民党的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及出卖民族利益。国民党政府事前参预了日本武装占领满洲的计划，命令自己的军队无条件的缴械与投降，将千百万的劳动群众给日本帝国主义者蹂躏、虐杀、奸淫与剥削，而事后亦只有空口的抗议，“镇静的”外交，向强盗机关（国联）乞求，希望美国主持公道或者在纪念周上大哭一次，而实际上更加紧对于群众的民族自觉和反帝国主义争斗的残酷压迫。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帝国主义与无耻出卖民族利益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与武装占领作开路先锋。

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武装占领满蒙是在上述的背景之上实行的。他们真实的意义是以军事和武装的力量将屈服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奴役之下，巩固他们在满洲的统治，加倍的压榨剥削的劳苦群众以找求本国经济恐慌的出路，并依据着满洲的战略上的各要点准备反对的进攻与帝国主义的争夺市场和殖民地的强盗战争，准备直接武装干涉的革命战争。所以满洲事变是瓜分为各个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开始，是反战争的序幕，是世界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

二、在世界经济恐慌剧烈发展与革命危机日益成熟的情势下，日本公开的以武装占领了满洲，日本利用着各个帝国主义反战争的一致和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的机会，进行了满洲的武装占领，这个占领与军事行动是最露骨的反战争的序幕。军事战略的重要之各地的占领，日本军队向北满的推进，中东（路）南段的强占与铁路员、工的屠杀，到处表露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挑衅的军事冒险。日本军事主要指挥者反的狂言，英国帝国主义停止现金兑现的决议，德国总参谋之活跃，这些都告诉我们实际反战争已经准备妥当。东方线的开始爆发将是极大的可能的前途。同时，我们必须估计，在世界经济恐慌与市场问题态度紧张的现象，在瓜分问题的周围，在发展巨大的帝国主义间的冲突与矛盾，首先是日、英、美、法的斗争，所以帝国主义强盗间的强盗战争，在满洲问题周围爆发的危险一样地威胁着。现在全国无产阶级及劳苦群众身上放着伟大历史任务∶这一任务便是武装保卫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反对日本的殖民地屠杀政策，用革命争斗的力量消灭反动的在帝国主义怀抱中献媚乞怜的国民党政府，实行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以求民族的与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澈底解放。

三、满洲事变对于事变发展的前途将给予决定的影响。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的暴行，毫无疑义地将激起广大的劳苦群众的民族觉醒，在党的正确的领导之下，这个民族的觉醒能够很迅速的转变到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争斗，正在急剧高涨中的反帝运动的高涨将以更大的力量向前开展。农民运动与土地争斗的紧张，城市工人运动争斗进攻与政治性质之日益明显，士兵群众情绪的动摇与不安，给维埃运动与红军的争斗以极大的顺利，造成了全国革命危机先决条件更进一步的成熟。这事变给予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以新的重大的打击∶群众的民族的觉醒与革命争斗的剧烈，北方军阀的巨魁张学良的军事的财政上的丧失，民族的武断宣传的破产，国民党政府对于帝国主义的投降、屈服与无耻的揭露，这些将更加促进国民党统治的崩溃与破产，及胜利的革命争斗的顺利的客观环境，正是这个客观环境将使得国民党的各反革命派别企图在革命及维埃争斗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更加残酷的进攻维埃和红军（国民党告同志书上说明这是应付满洲事变的第一等的任务），压迫一切群众的革命争斗与反帝国主义运动，以博取帝国主义者的欢心而维持自己行将没落的统治。然而由于帝国主义在华矛盾和冲突是不会消灭的，反而会更加紧张起来。虽然国民党民族的武断的宣传的破产和它的投降帝国主义的面目在群众面前更进一步的揭露，但是国民党必然要更利用民族主义及一切武断宣传来阻滞群众运动的革命化。

四、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的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无情的革命争斗上来。抓住广大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失望与愤怒，而组织他们，引导他们走向消灭国民党统治的争斗，抓住一切灾民、工人、兵士的具体的切身要求，发动他们的斗争，走到直接的革命争斗。领导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政策，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侵略，反对进攻，和区的拥护维埃，武装保卫，反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而争斗。为着这些任务的实现，中央责成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以布尔塞维克的坚决性与无限的革命热忱来进行下列的工作∶

１、进行广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的运动。丝毫不要害怕群众的民族主义热忱，相反的，必须加紧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到反帝争斗上去，同时坚决的反对一切国民党的武断宣传。向广大的群众指出∶只有群众自己的力量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求得民族的解放，只有维埃政权才是唯一的能够澈底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估计着群众的仇恨和热忱，提出武装群众的口号；使这些武装的群众团体变为游击队与工人自卫队。同时必须指出∶只有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才能真正地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使武装群众的口号很密切地与武装暴动口号的宣传密切的联系起来。

２、组织各色各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公开组织，或者参加一切已经存在的反帝组织而夺取他们的领导。经过这些组织，正确实行反帝运动中的下层统一战线和吸收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阶层参加争斗。在各大城市中公开的出版群众的反帝日报，抓住国内重要工厂——尤其日本工厂，进行组织反日的罢工、示威。同时各地党部、团部他应该注意学生中的工作，使一部贫苦学生群众离开民族主义武断宣传的影响而作坚决革命争斗。

３、广大的进行武装保卫的宣传鼓动工作。在区与非区之内组织“之友”协会。积极地进行拥护红军维埃的工作，动员工人到红军去，募捐援助红军，很广泛地把维埃政府的宣传以及全国大会的各种法令草案散布到群众中去。

４、估计在这次事变后士兵情绪的动摇和不满，这些士兵在经常军官的保国卫民的欺骗宣传之中，而一旦地身历了国民党的卑鄙无耻，反抗与愤懑的情绪是必然增涨内。党应该加强士兵中的工作，各省委应该派大批的同志到白军中去发动他们的争斗，组织他们的游击战争，这是真正的武装拥护及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方法之一。

５、在灾民争斗中（不论在城市与农村中），必须加紧把他们与反对帝国主义争斗联系起来，经过反帝的口号及他们切身要求来发动广大的灾民争斗，必须说明反帝国主义运动与土地革命的关系。不推翻地主的土地占有，不能根本的消灭帝国主义在乡村的支柱；不根本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土地革命胜利无从巩固。

６、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的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争斗（北宁路、中东路、哈尔滨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他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

７、必须估计行将来到的战时的地下党的困难的环境，各省委必须有专门的计划来改善党的秘密，使他能够在严重白色恐怖与战争状况之下来继续工作，这是应该看做目前的战斗任务之一。

中央一九三一年九月廿二日。

□□□□□□□□□□□□□□□□

第十一章：敌乎？友乎？

主题

内外敌人相配合组织民众剿匪注重守土责任恢复农村安定了解剿匪重要日军进犯长城张学良辞职日图攻取热河侵扰山海关山海关遭攻陷蒋总统判断敌情日军进攻热河汤玉麟军腐化长城攻防战二十九军扬威美国态度坚决国联维护正义日本退出国联长期抗战策略日军突又后撤包围兴隆日军北平内外受敌黄郛交涉停战塘沽协定准备第五次剿匪决定具体战略匪军迭受重创陈铭枢等叛国政府敉平“闽乱”三面围攻“苏区”广昌会战大胜消灭“中央苏区”新生活运动礼义廉耻伪满的“帝制”日蓄意制造藉口敌乎？友乎？检讨双方错误仍为我基本精神

内外敌人相配合

现在将话题转移到第四次围剿共产党的战争。

第四次剿匪，是以在“一二八事变”告一段落之后不久的一九三二年六月讨伐华中地区豫、鄂、皖三省共党匪军开始，而继之于翌年元月对于共党根据地——江西一带所展开的围剿行动。

内在敌人——共产党的叛乱，和外在敌人--日本军队的侵略，其步调配合得非常一致。当中国政府出动军队讨伐共党的时候，日军便乘虚肇事；又当为对抗日军而极度紧张之际，共军则伺机蠢动。上年（一九三一年）第三次围剿共党已将成功，就是由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而中途停顿；以致让濒于覆灭的共军得有喘息机会，再度猖獗。未料，这一次的第四次围剿，又是由于日军进攻热河的妨碍，不得不为之中止。

像这样的模式，一直反覆进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使得中华民国深受其苦。

共匪扩大扰乱

当“九一八”之后一个半月的十一月七日，共产党在江西瑞金组织所谓“中华苏维埃政府”，毛泽东自称“主席”，朱德自称“红军总司令”，打着“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士兵哗变”的口号，加强其反政府活动。在瑞金指导之下制造出来的“苏区”，有以下各处：

“鄂豫皖苏区”（湖北、河南、安徽边境）＝徐向前、邝继勋等。

“湘鄂西苏区”（湖南、湖北西部）＝贺龙、段德昌等。

“湘赣苏区”（湖南、江西边境）＝井岗山一带残党。

“湘鄂赣苏区”（湖南、湖北、江西省境）＝彭德怀等。

“赣东北苏区”（江西东北部）＝方志敏、周建屏、邵式平等。

“左、右江苏区”（广西）＝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

“闽西苏区”（福建西部）＝罗炳辉等。

‘其扰乱范围，遍及于湘、赣、浙、闽、鄂、皖、豫七省，总计面积至二十万方里以上，社会骚动，人民惊惶，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这时候，朝野人士看清了国家面临此两个战争，为了挽救这严重的危机，又一致要求我（蒋总统）复职，继续承担国难。’（注一）

在瑞金的共产党“中华苏维埃政府”于四月二十六日（一九三二年）宣告对日本“宣战”。

蒋总统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是在三月十八日。而日本傀儡政权的“满洲国”，已在十天之前宣称“建国”；又“一二八事变”的停战会议，则是在蒋总统就任的翌日举行于上海。

攘外必先安内

就任之后，蒋总统首先着手的计划，是对于共党匪军的讨伐。由于为求举国一致抵御日本军阀的外患，首先必须安定内部，是故“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实为当务之急。

‘现在，我们国家正是内忧外患相逼之时，一方面国内有狂暴的土匪，天天拚命的杀人放火；一方面国外有日本帝国主义，天天向我们猛烈地侵略。日寇敢来侵略我们的土地，甚至公然要来灭亡我们整个国家，就是我们国内有土匪扰乱，不能统一。……

‘我们由内乱而招致外侮，是必然的。反转来说：只要能够正本清源，先将这个心腹之患彻底消除，那末外面的皮肤小病，一定不成问题。……

‘各位都知道，无论我们有怎么强大的武力，若是遭到腹背受敌，内外夹攻，前后方都告危急，那是没有不失败的。所以我们不先安内而要求攘外，在战略上、理论上说，都是居于必败之地。

‘日本人侵略是外来的，好像是从皮肤上渐渐溃烂的疮毒；土匪捣乱是内发的，如同内脏有了毛病，这实在是心腹之患。因为这个内疾不除，外来的毛病就不能医好，而且即算医好，也还是无济于事，到了最后，病人还是要断送在这个心腹内疾。’（注二）

当时，赤祸最为严重的地区，是在河南、湖北、安徽边境。

在这一代，有三个“苏区”——徐向前所率领的“第四方面军”八万、贺龙的“第二军团”四万、孔荷宠的“湘鄂赣军”二万，合计二十四个师、约十四万匪军，对于枢要都市的武汉地区，有远远合围的态势。

他们遵循“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叛乱方针，各军互相联系呼应，发动自卫队和游击队在山岳地区、农村地区到处窜扰。

这些匪军，虽然武器不足，但却拥有“马克思号”及“列宁号”飞机两架，可见已有相当实力。

亲兼三省剿匪总司令

五月二十一日，蒋总统亲自兼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着手剿匪，副总司令李济深，动员兵力二十五个师、七个旅（包括骑兵旅），以及川军王陵基所部。

注一：蒋总统-“苏俄在中国”（一九五六十二）

注二：蒋总统-“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一九三三五）

组织民众剿匪

六月七日（一九三二年）上午九时，蒋总统由南京乘军舰出发，前往汉口，途经江西胜地庐山，于十八日召集河南、湖北、安徽以及湖南、江西五省剿匪会议，何应钦、何成浚、陈诚、熊式辉等人自南京前来参加，并有“三省剿匪总司令部”高级干部数十人与会。

七分政治为剿匪方针

蒋总统以总司令的立场在这个会议中宣布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第四次剿匪方针。

从过去三次剿匪战争的经验看来，仅凭军事力量根绝共党武力，是颇为困难的，因为他们所习惯的手段是煽惑或胁迫盘踞地区的居民作其爪牙；政府为了要争取民心，则足以使民情翕服的政治工作和宣慰工作是比枪弹更为重要的。

‘讲到宣传，这是非常要紧的一种精神上的战争，也就是战斗精神之所由生。照现在的情形看来，土匪宣传实胜过了我们。他们一方面能够把那些幼稚兽化的共产主义思想，再装上富于煽动性的东西，利用或制造种种的情势，想出种种的方法，甚至很强暴的手段，来灌输给一般士兵和民众，使得他们在极悲惨的黑暗生活之中，憧憬着一种和神话一样不可靠的骗人的幸福，竟使他们精神兴奋、战斗勇敢。

‘另一方面，他们又能利用一般士兵、民众的愚闇、近视，和种种浮薄浪漫的劣根性，诡称自由平等来迎合他们的心理，或故意施点小恩惠让点小便宜给一般民众，使得兵士和民众完全迷惑，说他们好，于是跟着他们来杀人放火，到处帮他们的忙。……

‘目前，我以为最急要的，是对匪区民众的宣传工作。一定要想种种方法转变他们的心理，不仅使他们不倾向匪化，而且要倾向我们，能够帮我们一同做剿匪工作。’（注一）

是故“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目的，就是在谋求改变共产党蔓延的土壤。

推行保甲制度

其具体措施，是在豫．鄂、皖三省开始推行的“保甲制度”。所谓“保甲”，是从前在十一世纪的北宋时代施行过的各村落以每十户编组为一个单位的自治、管理组织。其目的在清查各户人口，使负连保责任，以防制共党对村落居民的煽诱。

‘土匪无论是军队的组织、政治的组织，都很严密；尤其是民众的组织，我们最不及他。……今后我们更应努力的，就是民众的组织。

‘曾国藩说过：“用兵不如用民”，就我们现在剿匪情形而论，这话实在很重要。

‘以后，我们剿匪不要再专门依赖兵。在我们有把握能够照正式计划来进攻土匪的时候，当然要用正式的兵力；若在其他任何情形之下，最好能够统统用民。用民，就是要组织各地方的保卫团，要把各县保甲办好，使各地民众都有组织、都能武装起来，足以自卫，足以帮助剿匪。

‘这个工作，一时或因种种原因不能普遍地做好，但我们很可以就要紧的地区内，选定几个更关重要的地点先行试办；俟有成效，我们要尽快地将他推广，使全省民众能够普遍地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共同努力剿匪。’（注二）

此外，并制定剿匪地区农村的“屯田条例”，以及军民共组“农村合作社”，以防阻共党势力侵入；又为因赤祸而受到牺牲的农民，新颁“农村土地处理条例”暨“农村金融救济条例”，予以救济。

还有在民政措施方面，于省、县之间设置行政督察专员，督导地方政府彻底推行政府的政令方针。

剿匪兵力分编为三路

至于在军事作战计划方面，是将剿匪兵力分编为三路：

右路军＝司令官李济深（兼）、副司令官王均。

中路军＝司令官蒋中正（兼）、副司令官刘峙。

左路军＝司令官何成浚、副司令官徐源泉。

蒋总统亲自统驭的中路军，负责围剿盘踞豫、鄂两省的匪军主力徐向前之“第四方面军”；右路军进攻在安徽霍邱、六安、霍山一带匪军的侧背。

另一方面，左路军则迎击由鄂中进窜武汉的贺龙所属匪军“第二军团”。

同时，更准备好了以航空队散发宣传标语--号召在共党压迫之下的民众复归政府怀抱、和共匪官兵向政府投诚的计划。

蒋总统此时刚好患了感冒，在牯岭稍事勾留。就在这个时候，共党匪军业已展开了攻势。

六月二十六日，匪军进犯到河南省的信阳、柳林一带，在信阳南方将平汉铁路破坏，他们胁迫民众，拆走路轨，纵火烧毁车站，捆绑铁路员工，使联系北平和武汉之间的陆路动脉一时为之停顿。

注一、二：蒋总统-“剿匪技能之研究”（一九三三四）

注重守土责任

平汉铁路被破坏之翌日～六月二十七日，蒋总统由牯岭出发，到九江乘应瑞军舰，溯江9[11]1991西上，二十八日下午，抵达汉口，有何成浚等军政官员百余人分乘三舰出迎。

登岸之后，首先下令恢复平汉铁路交通。

次日（二十九日）政府第十五路军及第十四路军各部夹击平汉铁路共党匪军，匪军立即向东南退却，平汉铁路于当天夜晚通车，象征着顺利的开始。

为了进入正规的剿匪作战，蒋总统兼任中路军司令官的主力部队，分编为六个纵队及一个预备队，每一纵队配属一至数师兵力。至于编列为纵队的理由，则是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发挥最灵活的机动力。

在另一方面，并督导地方行政负责人员加强政治工作。

七月二日，召集湖北省政府委员会议，指示：（一）注重守土责任。（二）县长应具与县城共存亡的决心。三日，召见鄂省地方耆绅，垂询意见。

召集各县县长训话

十二日，复召集湖北省所属各县县长于汉口剿匪总司令部，督饬决心剿匪而训示如左：

‘今天，集合湖北的县长于一堂，就是希望湖北最近能剿灭赤匪，并且今后要做一个模范省。……

‘我近来看湖北地方，详细观察的结果，见到一般军政长官对于地方有土匪，以为是很平9[12]1992常的事，并不算是倒霉的事，觉得很奇怪。地方县境的人民，给土匪烧杀掳抢，县城失了，县长一个人便跑出来，似乎没有一点耻辱。……

‘现在，我们要试问自己有没有血性。有没有牺牲的精神？有没有认定赤匪是我们的仇敌？我们的仇敌，如能在县境之内横行，就是我们最大的耻辱。各位县长是不是有这样的觉悟、有这样的诚意去消灭共匪？……

‘赤匪的伎俩，不过是虚声恐吓，我们看见他宣传的纲要说道：“我们（赤匪）军队在未到一个地方之前，先要派人去宣传，并制造恐怖，使当地人民、官吏、警察统统先发生恐慌的心理，我们一到的时候，那地方的警察、县长以及一般民众，便统统可以屈服。”

‘赤匪的伎俩，不过如是。……他们用这一种宣传力量，来使我们官吏、民众恐慌；无主张的人，一见赤匪来到，就要投降，听其宰割。……如果我们怕匪，匪就不怕我们，匪就会来打我们；如果我们不怕匪，匪就怕我们，我们就可以消灭匪。……

‘如果县长平时组织得力，实心实力的组织一般保卫团，实心实力去训练、考察民众，不仅是土匪不能夺取县城，并不能在县境范围之内有丝毫活动。……

‘很希望各位注意，以后不要注重到军队，完全注重人民；要拿地方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来维持地方，剿灭赤匪。除了这个方法之外，就没有第二个方法。……’

在这一演说中，更说明了清朝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及湖北巡抚胡林翼如何平定太平天国之乱，指示效法曾胡精神，并督饬立即见诸实行。

组织民团

至于其方法，每县以“民兵”五百人组织“民团”，民团指挥官则由政府在县内遴选有力人士予以任用，并由政府发给民团武器，以及派遣军事教官担任训练；更以五县为一组制定共同防卫计划。

继之，布告悬赏缉拿匪军首脑，以及颁布“自新悔过条例”，除对于证据确凿之匪军首脑处以死刑外，其余被胁从参加者，得由同族或同村父老三人担保，准予自新。

和这些工作并行的，是军事方面也在顺利推进中。七月一日，中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官陈继承率领第三师抵达信阳，又隶属该纵队的第二师一部分兵力集结罗山，由西北面压迫盘踞于三省边境所谓“鄂豫皖苏区”的匪军，并以第一、第三两纵队为之支援。八月六日，克服了匪军据点宣化店。

克服后的宣化店，阒无人烟。盖匪军胁迫居

民，将服从者悉数纳入匪军，反抗者则予以屠戮，然后逃窜。

第六纵队包抄匪军西侧，于八月十日拂晓进攻河口镇，经于匪军六、七千人激战之后，将之击溃而进占该镇。

另一方面，李济深所统率的右路军，由安徽省方面展开攻势，与中路军协力夹攻匪军，七月十二日克霍邱，八月十六日收复郭家店；在此两地激战中，匪军被击毙四千余人而后溃走。

及至九月初，主力部队的中路军渡过徒涉河，直捣匪军最后据点新集（现河南省经扶县），于八日晚间克复，俘匪军五千余人。

在这次战役中，楚毁匪军“马克思号”及“列宁号”飞机两架，消灭了共党“鄂豫皖苏维埃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等机关。

随后，又克复了为共党六年老巢的金家寨，改名为立煌县。

恢复农村安定

共党匪军所擅长的宣传战术，在“鄂豫皖苏区”也曾惯常使用。

八月十六日，在郭家店的战役中，匪军将妇女宣传队部署在附近山边上，高呼：“穷人不打穷人，赶快放下你的枪，到我们这边来。”以图挫折政府军的士气。

当这种方法不发生作用时，就拿出了更卑劣的手段——派出许多少女不顾羞耻地向着这边9[15]1995阵地喊话：“同志！你来！我爱你！我疼你！”

对于共党，政府方面“七分政治”的方针，随时随地加以活用。

克复霍邱的右路军第一纵队指挥官徐庭瑶，对于俘虏先加抚慰，然后每人发给银洋二元予以释放。继之，更协同地方政府召集佃农，散发所耕田地的永佃执照，承认其永佃权，以及实行二五减租，又进行调查户口，发给良民证、灾民证，使各安所业，迅速恢复地方秩序。徐庭瑶的部队因此而受到蒋总统发给奖金一万元。

盘踞三省匪军溃灭

另一方面，何成浚统驭的左路军，则担负进剿在湖北省中部的“湘鄂西苏区”贺龙所部匪军。

左路军自应城、天门．岳口一线向西进击～～七月十四日，克复京山及下洋港；二十四日，攻下潜江。贺龙率领残兵流窜各地，于八月中旬一度进窥沙市，但在左路军追击之下，只剩下五千人逃向鄂省西北的保康。

于是，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乃下令追击在各地败逃的匪军。及至九月中旬，盘踞三省匪军差不多全部溃灭。徐向前等残部逃窜到四川、陕西方面。

在剿灭匪军之后，最迫切的工作，是恢复农村的安定。

八月三十一日，蒋总统颁布“被匪各县田赋减免办法”。九月十三日，复指示湖北省政府筹划救济办法，以及对于土地制度作根本上的改革。

处理农村土地

‘此次，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对于剿匪区内土地问题，曾经颁布三种法规。

‘第一种叫“农村土地处理条例”，关于土地限额分配及业佃关系等项，都有相当规定。第二种叫“屯田条例”，关于荒废地区及农村安全，都有切实的补救和永久的保障。第三种叫“农村合作社条例”，关于农村组织及生产促进，尤有精密的设计和实施的方法。

‘土地处理及合作社两种条例之中，一方根据国情，采取小农制的方法，逐渐推进到佃农变为自耕农，以期达到总理“耕者有其田”的目的；一方又鉴于我国小农耕作之困苦而不合理化，更于合作条例中采用现代集产农场的精神，实行利用合作社制度，来扩张生产的效能。’（注）

很长的一段期间，在共产党控制之下的民众们，这才获得了自由、平安，乃至于自己的土地。

豫鄂皖三省剿匪战争，就是这样地为之告一段落。但在江西、广东、福建等东南各省，则还有所谓“中央苏区”等共产组织存在，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陈毅等所率领之匪军出没各地。

先是政府方面，已经于四月十九日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为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五月二十五日，更将在一二八事变时对日抗战的蔡廷锴所属第十九路军于日军自上海撤退之同时调往福建剿匪，继之并任命该军总指挥蒋光鼐为福建绥靖公署主任，负责治安任务。

围剿赣闽边境匪军

何应钦将进剿部队分编为九路，以余汉谋（第一路军在赣南）、陈诚（第二路军在赣西南）、蔡廷锴（第四路军即原十九路军在闽西南）三支劲旅对赣闽边境匪军根据地的“中央苏区”进行围剿。

“中央苏区”所盘踞的地区，南北约四百公里，东西约二百公里，政府军自其四面八方严密包围，计划将之全部歼灭。

察觉到如此情势的匪军，乃意图突围而开始蠢动～～六月南窜，八月北窜，继之又企图向东打开一个缺口；但政府军每次都将之堵截击退，包围网逐渐缩小。

进入十一月，匪军活动越发积极。月初，毛泽东自率匪军第一、五两军企图突破北面包围网，但被政府军第八师所击退。

匪军为戒备政府军进剿，乃大事掠夺附近村落，囤聚食粮，喊出“保乡”、“参军”、“扩军”口号，驱策其盘踞区域的民众全面动员，不问男女老幼，一律纳入军事组织，少年编9[19]1999组“少年先锋队”，女性则编入“缝洗队”、“慰劳队”。

注：蒋总统-“整理土地是我们国计民生一个关键”（一九三二十一）

了解剿匪重要

当一九三二年底政府军包围“中央苏区”之际，在匪军之中，毛泽东（伪主席）与周恩来（伪总政治委员）因战术问题发生了对立情况。

毛泽东主张持久战术，首先巩固防务、坚壁清野，待政府军进攻“苏区”，诱引深入，使之行动缓滞，再针对其弱点迎击。

而周恩来则持积极进攻、先发制人之说，他主张不待政府军部署完成，便在“苏区”以外将之击破，以抗拒对方的包围战。

两人意见不一，相持不下，乃委诸第三国际代表团裁决。结果，采行周恩来的意见，准备选择有利地形，出奇突袭，将政府军各个击破。

日军趁机觊觎热河

此时，中华民国在“内忧”之同时；再度面临“外患”到来——就是日军又发动了侵略行动。

在“一二八事变”之后，暂时未见嚣张的日军，窥伺着中国政府军为剿匪而向华南出动的机会，乃更对热河省伸出了侵略的魔掌。

于是，蒋总统遂又因而站在——是北上对抗日军、还是南下首先歼灭共党的“两路口”。

‘倭寇之侵热，早已料定，今果不幸而言中矣！余（蒋总统）再料定倭寇以后之行动，非至强逼我与彼直接解决东北问题终了之后，彼决不肯罢休。

‘然彼之处心积虑，乃企图亡我整个之中华民族。世人无识，但求苟安，以为承认割让，乃可了事；殊不知倭人绝无信义，断非条约可恃。今日得满洲，明日占平津，得寸进尺，欲壑难填。

‘彼之毒计，不惟不使中国内部有统一之日，而且必趁机打击政府，伤害领袖信用，使我堂堂中华永作彼之附庸而后止。

‘余今剖视倭人心肝，了若观火，今日唯有牺牲一切，与之周旋，祇求保全本党主义，维持政府威信，以期拯救民族于万一而已！

‘然非至最后关头、及确有把握可以得到相当价值，且必可保存党国之时，则不作无益之牺牲。故在今日谋国急务，非健全内政、先巩固基本地区及强固基本军队不可，是故不到最后时期，决不放弃基本之谋，以顾其他。

‘总之，剿除长江流域之赤匪，整理政治，为余之工作中心；如至不得已时，亦必先肃清赣匪以后，乃得牺牲个人以解决东北。——此余深思熟虑经千百回而决定之方针也，国人知我心否？吾亦不暇计焉！’（十二月九日日记）

勉励将士完成剿赤抗日

蒋总统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决心，于十二日由汉口回到南京。

二十五日，发电报给留在汉口的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曹浩森，示以决心，并勉励将士，电文如左：

‘请以中正名义分别代电前方各军师旅长努力清剿。倭寇不久必侵犯热河，进犯华北，甚望我剿赤将士如期肃清残匪，俾得候令抗日，克竟大功。否则，残匪一日不肃清，则吾军一日不能脱离匪区，如此，倭寇进犯，虽抵抗，亦不能双方兼顾。不先安内，何以攘外，必陷进退两难之境。希各深明此义，耐冻忍苦，完成剿赤、抗日之全功。’

对于共党“中央苏区”的包围，在十二月大致完成，动员兵力三个军、十七个师、两个旅，计十五万三千五百人。

匪军方面，为第一军团（林彪）、第三军团（彭德怀）、第五军团（董振堂）、第七军团（罗炳辉）、湘赣军（张启飞）、赣军（陈毅）等十七个军、三十个师、八个团，计兵力六万四千八百人。

匪军在数量上、在装备上都比政府军差得很多；但地形则于匪有利，故而对于其游击式的突袭反攻，必须加以注意。

中路军遭匪突袭

新年降临的一九三三年元旦，政府军之中以陈诚为总指挥的中路军，遵照剿匪总司令部的计划——在“中央苏区”的北方展开行动，首先肃清金溪附近匪军，巩固临川；继以主力南下，向政府军桥头堡之一的南城增援。

此时，匪军则严阵以待，元月四日夜晚，在南城北方的黄狮渡集结兵力万余人，乘风雨之际，突袭政府军第五师周士达旅侧翼。在这一次的突袭中，旅长周士达失踪，该旅官兵伤亡过半，损失甚重。

五日，金溪被匪军攻陷；六日，拟夺回金溪的政府军再遭突袭，被首尾切断，更失掉了浒湾。

继之，匪军主力三万人更于九日进袭中路军根据地临川（抚州）；翌日（十日），被中路军邀击而退往金溪方面。其后，政府军重整态势、夺回金溪，已是在元月底之事。

日军进犯长城

（民国二十二年自由人注）

元月二十七日，蒋总统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分为督饬剿匪战事，由南京前往江西。三十日，在南昌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演讲，分析战况并说明内心的准备如下：

‘今天，本席到南昌来和各位共同清剿赤匪。……关于最近剿匪情形，据今天早晨接到的报告，我们的军队，昨天（二十九日）已经占领了金溪，来降的匪众、以及他们的官长都很多，今天我们可以继续进到黄狮渡。……最近他们知道我军将要全线开始出击，所以匪军自二十六日以后向南溃退。

‘打败赤匪，本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不过能不能根本消灭他们，这就要看我们本身，尤其是江西各地方的民众以及地方政府和本党同志有没有与赤匪作殊死战的决心。……完成剿匪任务，才不愧做一个江西革命的青年。’

翌日（三十一日）在南昌举行剿匪军事会议，重新决定围剿匪军的作战计划。

二月六日，蒋总统决定自兼江西省剿匪总司令。旋于南昌设置行营，统一指挥剿匪军事。

处于两面作战苦境

可是，在这个期间，日军侵略华北的“外患”，日益显露。元月三日，关东军攻陷山海关；二月中旬，开始作进犯热河的准备。

中华民国的确是受到了内外敌人的夹攻而处于两面作战的苦境，以致不得不自剿匪战区抽调多数政府军，前往北方参加抗日战事。

这么一来，于是共党匪军就像是和日军彼呼此应一样地立即展开反扑，其第一、第三、第五军团主力约四万人，于十二日进犯政府中路军的最前线据点南丰，将留驻该处的政府军第八师（师长陶峙岳）包围。

中路军总指挥陈诚遂即以第一纵队为援军，由乐安疾趋南丰，以谋解围。

但匪军则埋伏在为政府军经路的东陂、蛟湖、霍源山一带山地，严阵以待。

遭遇到此一伏兵突袭的政府军，是由李明率领的五十二师及陈时骥率领的五十九师。

五十二师所属两个旅，于二十七日上午十一时许抵达南丰西方约六十公里的蛟湖，简直看不到村民，但民家备而未食的午饭甚多，颇感可疑，乃一面报告师部，一面戒备前进。

这一带，山势陡峭，羊肠曲径，极其险峻，加以在当天浓雾弥漫，细雨濛濛，虽然知道对于匪军设伏非常有利，但五十二师则因急于驰援南丰，仍然冒险前进。果然，在进路两侧有彭德怀的第三军团等部匪军一万多人密集埋伏。

继两个旅之后，五十二师的主力都堕入了陷阱，受到林彪第一军团匪军二万多人的袭击。战事持续了两天，五十二师损失干部三分之二，士兵六千，师长李明负伤之后，以手枪自戕。

另一方面，在五十二师北面挥师并进的五十九师，于二十七日下午到达蛟湖北方约二十公里的霍源附近，也受到了埋伏山中的匪军第五、第七军团突袭；及至二十八日拂晓，又有由蛟湖转战而来的林彪、彭德怀部匪军加入战斗，以致五十九师官兵又损失了三分之二。

二十九日，政府军由宜黄派遣援军南下，突破匪军包围圈，但五十二、五十九两师几乎全部死事，仅仅救出一团官兵。

剿匪被迫半途而废

围剿匪军的战事，是在为主力的中路军自北面进攻的同时，南面更有右路军，东面复有左路军一齐参加攻击；可是都难以掌握到决定性的胜利。

右路军在赣南信丰附近的赣江沿岸虽然收复了若干村落，但并未能盯紧匪军，给予重创。

左路军虽则在绪战中克复了闽赣边境交通要冲的光泽，以及击溃了闽省境内的泰宁、清流等地匪军，但后来匪军展开反扑、光泽又被其夺回。

及至三月间，日军的武力侵略，越发扩大，热河省会承德于四日失陷；三天之后，更进犯到北平重要屏障的万里长城，与中国守军激烈冲突。

在紧迫的华北情势之下，剿匪战争自不可能坚持继续下去。

蒋总统乃不得已而于六日离开南昌行营，前往河北保定，指挥抗日军事；围剿匪军的政府军，也颇多调往华北。及至四月底，第四次剿匪战争遂又半途而废。

日军趁机武力挑衅

至于日军方面，其对热河省的武力侵略，系始于一九三二年七月，正好是与第四次剿匪战事的时期相同。

日本之进一步侵略华北，自始就为其既定方针，早在制造其傀儡政权“满洲国”时，便已有决定“将热河置于支配之下”；此后，只不过是窥伺着武力挑衅的机会而已。

刚好在七月十七日，有自热河北票开往辽宁锦州的列车在经过省境的南岭-朝阳寺之间，突然出现一队抗日义勇军，命令停车，将乘坐火车上的从事日军联络任务之“关东军嘱托”石本权四郎带走。

事后，中华民国热河军一○九旅（旅长董福亭）派驻北票之第三营，为拟加以制止，乃向朝阳寺出动；但在此前后，日本关东军第八师团（师团长西义一）所属驻锦州部队，便以救出石本为藉口，由装甲列车运过省境抵达朝阳寺车站。

于是，热河军方面为谋阻止日军侵略，乃向之提出协商的要求。

张学良辞职

对于侵入省境朝阳寺的日本军队，热河军指挥官诘问其理由何在，讵料日军不加理睬，便突然开火。

北票三营遂即还击，抵抗约两小时，营长负伤，加以弹药不足，乃退守南岭。

其后，日军攻势毫未弛缓，并即有飞机轰炸朝阳寺，更且出动其步兵第三十一联队之一部将该地区占领。

热河军为避免冲突扩大，特地派遣使者向日方说明：石本权四郎之被掳，与正规军无关，完全是一种偶发事件；于是，日军便摆出一付不容协商的面孔，要求限七天以内找到石本，将之救出，以及驻在朝阳的一○九旅旅长董福亭亲赴锦州道歉；否则，继续采取军事行动。

电令热河抵抗日军

当日军进犯热河的报告，递达在汉口的豫鄂皖三省剿匪司令部之初，蒋总统考虑到这究竟是日军在作有计划的侵略，或只是局部性的冲突，一时尚难捉摸；但仍先行电饬张学良派兵增援热河，以遏阻日军进犯。

同时，国民政府也于七月二十一日（一九三二年），电令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全力抵抗日军进攻。

此时，在东北各地，到处有抗日义勇军揭竿而起，关东军应接不暇，以致并未握有足以肆行热河战争的兵力；蒋总统有鉴于此，认为如果中国方面能够增派兵员示以反击决心，则日本便可能敛兵罢战，问题也就会止于局部性的纠纷。

实际上，不久之后，日军便自朝阳寺撤退，事件得以免于扩大。

据日本资料——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助曾于七月二十二日以关参一电第二一九号极机密加急电报致陆军参谋次长植田谦吉，报告对于热河作战，兵力不够支配，要求增援。电文是这样的：“绝对需要至少增派一个师团及一个骑兵旅团，希望中央预为计划，以作准备。……”

对于这个请求，植田以第二九一号电覆：“鉴于当前内外诸般情势，不宜立即对于热河方面进行武力解决，此事可期之他日。”

又石本被掳之后，行踪不明，翌年于热河作战之际，发现了他的尸体。

张学良汤玉麟无意行动

然而，张学良和汤玉麟都无意于采取实际行动。

汤玉麟拥有为数超过二万人的正规军和非正规军，君临热河一省，一方面对于日本所制造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表示协调，甚至列名于伪满“建国宣言”；而一方面又对中央及张学良逢迎，态度摇摆不定。至于他的目的，则是在于维持热河的地盘，同时也要保住其最大的财源，那就是贩卖鸦片的销路-东北。

当时，张群正好为了对苏联的复交问题奉派到达北平，蒋总统乃于八月五日致电张群，嘱其促请张学良省悟，电文如下：

‘请告汉卿兄（张学良），既决心进兵热河，即当速进。否则，时期一过，必致败亡。弟对此事迟延实属焦灼万分，总望汉卿兄当机立断，先发制人，毋为人制。为要！’

对于张学良的举棋不定，行政院院长汪兆铭大为恼怒，六日，致电张学良要求其辞职：

“……中央军队，方事剿匪，溽暑作战，冒诸艰苦。然为安定内地，巩固后方计，义无可辞。此外惟兄拥兵最多，军容最盛，而敌兵所扰，正在兄防地以内。故以实力言之，以地理上之便利言之，抵抗敌人，兄在职一日，断非他人所能越俎。……今兄未闻出一兵，放一矢9[31]2011，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向中央要求军费），……惟望兄以辞职谢四万万国人。……”

汪兆铭在发出这个电报的同时，好像是激动异常，他自己也请辞行政院长的职务。

因此，张学良即于八日覆电中央，表示辞卸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简直是针锋相对地互相顶撞起来。

正当剿匪战争逐渐进入正规决战、加以北方更须积极巩固国防的重要关头，领导阶层同仁由于个人感情的冲突，竟至造成中枢解体的局面。

‘余（蒋总统）意汉卿应一面辞职，一面带兵入热河奋勇抗日；否则不辞职，亦须带兵入热河抗日，以表决心。此事惟有出此一途，以为自救救国之道，否则无有第二条出路矣！特未知汉卿能出此否？为公为私，皆可忧叹！’（蒋总统八月八日日记）

‘近日，东北义勇军攻击牛庄，截断南满铁路之军输，而日军海陆并进尚不能抵抗，当此日寇手足无措之时，正张学良收复热河、策应义勇军最佳机会，亦所以表明心迹，为国为民也，复何惧他人狂言哉！而张学良乃犹豫依违，不敢前进，是诚不足与共事。’（八月九日日记）

日图攻取热河

对于汪兆铭和张学良之先后赌气辞职，各方人士虽曾奔走调停，但却难以挽回。

八月十日（一九三二年）晚间，蒋总统与江西剿匪军中路军总指挥陈诚及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唐有壬协商收拾局面之后，留下了深为慨叹的日记：

‘今思汪兆铭、张学良二人之言行，皆为私而不顾大局，令人愤慨，然汪尤不如张也。惟徒愤无益，须勉强支持，为国相忍，决令张辞职，嘱其顾全大局，而以另组北平军事委员会，嘱张推举人选报核，对汪则嘱唐有壬转告北方及出兵热河计划之实情。如鱼（六）日能略加忍耐，不发表攻击电文，则出兵之计可成；今竟激成北方将领之怨愤，而使此计划中阻，未审汪氏能自悔卤莽否也？呜呼！汪氏终非可共谋国是之人耳！’

国民政府与十六日准张学良辞职。次日（十七日），撤销北平绥靖公署，另新设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由蒋总统兼任分会委员长。

可是，北方将领们却认为这个决定是袒护汪兆铭，压抑张学良，因而大为不满。宋哲元等人且发表通电，表示要和张学良同进退。蒋总统乃于二十日电告：“本人虽兼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但不能常驻平，仍请张学良代理。”这才得以平息。

在这样重要关头，政府中枢和北方军事首脑部如果解体，是非常值得惋惜的。

义勇军渐趋微弱

当时，东北义勇军对于各地的攻势日益强烈，在沈阳曾经突击飞机场，破坏日本飞机二十七架，甚且一度将长春包围。可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则未曾给他们以有组织的援助。

结果，义勇军逐渐趋于微弱。相对地，日军方面则亦渐无后顾之忧，而得以推动其侵略华北计划臻至实现。

十二月三日，蒋总统接到张学良详细报告关于日本方面险恶的动态如下：

“南京蒋委员长钧鉴：顷据探报，日本急欲行其满蒙政策，连日派出熟谙中国语言文字之日人多名，附以华人潜入各王旗（蒙古各旗），秘密运动，以便将来攻热之时，用为内应。库伦之白喇嘛确已受其联络，并闻已派有专人在奉天（沈阳）接洽。

“据近日消息，日本因热河交通不便，故缓进攻，现由辽宁兵工厂及其本国各厂赶造载重汽车五千辆，每辆可载陆军二十名，并装设机关枪二架，新式七五公分口径炮一门，车之周围护以钢板，以防枪弹，准备为将来攻热之用。……

“十一月十九日，锦州车站运到给养十余大车，又载重装大米十五车，又十余车用草包蒙盖，不知何物，均卸至日军团部。

“又有匪民曹庆云、李孟春二人，往锦州日军宪兵司令部，皆充攻热指挥，往石山站大凌河甸招队，每名骑兵二十五元，步兵十五元，意想招成六旅，连同日军三旅进攻热河，此系探得确实。……”

危机显然已经迫在眉睫。

一息尚存，竭力抵抗

‘倭寇攻热，必不能免，恐不出此三个月之内，甚或进占河北，捧溥仪入关；或另觅汉奸，作为傀儡，以伪造华北之独立，使我中国分块离立，不得统一，而统属于倭寇卵翼之下。

‘其狂妄之欲，且得陇望蜀，不征服我全中国必不休也。

‘吾（蒋总统）于此，惟有为国牺牲，尽忠报党，尽瘁保民，勿使生我之父母、教我之总理，有所玷辱。

‘万一留有此身，则一息尚存，亦惟竭力抵抗，巩固中原极小之根据地，甚或被逼退至边区之一隅，亦必力图巩固，以为将来恢复之基。如天不相助，中道而殂，亦可使后人有立足复兴之地，堂堂炎黄之胄，自信其必不致灭亡也。’（十二月二十三日日记）

在紧迫情势之下，特别需要加以警戒的地点，是山海关（临榆、榆关）。

山海关，是在宛延达于渤海的万里长城东端，其位置，大约为沈阳和北平两大都市的中间。

万里长城，是在两千多年古代以来，中华民族为捍卫北方匈奴侵略而筑成的若干防守城堡，其中山海关，被称为是“天下第一关”；一般所谓“关内”、“关外”的地区称谓，也就是以这里为分界。

日本军队要想遂行他侵略全中国的奢望，首先必须突破这个战略和政略上的要冲。

侵扰山海关

华北一带，自二十世纪初期开始，就有外国军队驻屯。这个驻兵权，是由更早一点的义和团之乱开端。当时，情廷和八国联军开战失败，乃于一九○一年和英、日等十一个国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承认外国军队得以保护铁路的名义驻屯于北平附近的天津、塘沽、山海关等军事上的冲要之地。

日本方面，当时基于对抗帝俄的意识，要求驻兵于通往东北的孔道，因而在山海关、秦皇岛等地都有他的部队驻扎。

派驻山海关的日军铁路守备队营房，设在北宁铁路的南侧，有步兵百名及少数工兵常川驻屯，并建有四个炮台。

秦皇岛，在山海关西南方十五公里，由于是近接东北地区的不冻港，因而受到重视，在这里驻有日军守备队约五十人，对于这个港湾虎视眈眈。

在这两处，虽然都只驻屯着极少数的兵力，可是当日本军队业已控制东北地区的此刻，却产生了成为侵略中国前进据点的作用则颇为不小。因为他们就是站在这个最前线策划进攻华北的。

至于，中国军队方面，当时由张学良的直属将领何柱国所率领的第九旅戍守着山海关。

由于在一九三二年元月，日军侵占锦州，东北军撤进关内，所以中国方面对于山海关的防务，也就重视起来；同年七月，设置“临永（山海关、卢龙）警备司令部”，由何柱国兼任司令，巩固冀东地区的防卫。

相对地，日军方面为了要制造行使武力的藉口，乃时时出之以诸如袭击附近村落、抢夺武器、夜间举行实弹演习等挑衅行动。

两次冲突

第一次冲突，发生于十月一日。当天下午五时左右，有伪“满洲国”警察十多人藉口追缉可疑分子，要闯进山海关之东罗城，中国哨兵闭门禁阻，但却另有一批伪警十人由南门混入城内，打开东罗城门锁，放入城外伪警，强登东罗城门楼，意图进占这个“天下第一关”的城门，而向中国军开起霍来。

这次冲突，双方各死亡一人。

日本驻山海关的铁路守备队，也在枪声初起之际便开始行动。何柱国遂即与日军守备队长落合甚九郎少佐交涉，结果双方同意“事出误会”，对于死者，互相给予补偿费，解决了纠纷。

及至十二月八日下午十时，关外日本关东军第八师团的装甲列车突然开到山海关的长城缺口处，以第九旅司令部附近为目标发射了四发炮弹；接着继续南进，侵入关内，到达石河铁桥附近，又对山海关城内连射十余炮。

于是，中国军方乃向日军落合队长提出抗议，并经交涉结果，日军铁甲车才于九日午前二时停止发炮，一度撤回。

但至翌日黎明，武装日人多名涌到设于秦皇岛之山海关海关，有殴打中国卫兵、强夺货物、毁坏财产等暴乱行为。

在这个期间，中国方面为防止事件扩大，禁止应战，故而未曾还击一枪；并寄望交涉，以谋解决。

十二月十一日，中国外交部长罗文干为此一事件向日方提出抗议。日本外相内田康哉于二十九日答称：“装甲列车因添装炭水，向山海关车站前进，贵国（中国）方面无故开枪射击，故而还击。”这个答覆，和事实完全相反，毫不承认日军的责任。

终于扩大事端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刚好进入一九三三年的新年，便又发生了第三次事件。日军终于扩大事端，达成其占领山海关的野心。

一九三三年元旦下午九时半，在山海关南门城外日军宪兵分遣队及日本守备队车站哨戒所附近接连有手榴弹爆炸；继之，中国军警在南关的哨所也受到十多发枪弹的射击。

中国哨兵立即退入城内，关闭城门，并监视日军行动；而此时日军装甲列车及载有军队的列车业已开到南关城外待命。

毫无疑问，这是日军在有意挑衅，制造战端。事后据了解，手榴弹的爆炸，就是日军山海关守备队长落合甚九郎指使日军投出的。——简直和“九一八事变”肇端的柳条沟铁路之被爆破出于同一手法。

而且，落合曾在当天中午很礼帽地亲自到达设于西富店的临永警备司令部拜年，这是一种使中国方面松弛戒备的小花招。此时，刚好司令（兼第九旅旅长）何柱国前往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落合于了解了何柱国不在防地之后，遂即发动了他的谋略。

当日军开枪之初，中国方面立即派外事秘书前往日军宪兵队查询为何攻击？想不到日军却不仅反咬一口说是中国军队先开的枪，更且于二日午前一时提出下列四项要求：

一、南关一带让日军警戒。

二、将南关一带的中国部队撤入城内。

三、将南关一带警察及公安部队全部或一部撤入城内。

四、南门及城墙上的中国军队即须撤除。

日军明知要求中国军队撤让，根本就是谈不拢的条件，但却故意提出来，其目的就是在于如果被拒，便好引为藉口，以扩大军事行动。

山海关遭攻陷

山海关的南关一带，是有日本人居住的区域，如果再发生新的纠葛，将会给予日军以武力挑衅的更大藉口。

临永警备司令部有鉴于此，为谋避免冲突，乃决定接受日军一部分的要求，遂即对之答覆如次：

“日军如有解决诚意，我方当承认要求中之一部——即在未查明事件真相以前，为避免夜间冲突起见，对南关日人居住区域，可暂由日军警戒；南关我稽查兵一排，本夜可暂时撤回城内；南门城墙上哨兵，由我方派遣参谋前往监视，担保如日军不射击，我军决不射击。

“本事件，俟天明调查真相后，再开始交涉。”

可是，日军方面却是一意要造成开战的局面，故而于元月二日（一九三三年）午前三时，又将四项要求中的第四项改得更为苛刻：“将南门开放，门里及城墙上均须归日军警戒。”同时更摆出强迫态度表示：“事件真相，没有调查的必要，中国方面应立即承认日本的要求；否则，即以武力夺取南门。”

于是，中国方面乃拒绝予以答覆。

日军终于发动攻击

及至天色欲曙之际，由锦州方面开来的日军装甲列车陆续到达，步、炮兵合计兵力约二千人以上。

此时，在山海关城北的五眼城、馒首山一带高地，已有日军开始构筑工事；又在二里店、吴家岭也有日军步、骑兵出没。

上午九时许，日军终于发动了对山海关的攻击。

首先，有三十多名日兵以木梯攀登南关城墙，中国军为了自卫乃不得不开枪射击，将之击退，当场死伤日军官兵三名。

日本方面，事后便举出此一情况为狡辩的根据，硬说是中国军队开枪在先。于是，日本政府遂即通过其驻华公使有吉明于元月十二日以“中国方面同意将南门临时委由日本处理，而日军正为实行上述协定时，突被中国军射击”的说法，向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罗文干提出抗议。直到今天，在日本已经是被视为定论。

然而，这种说法显然与事实不符。盖中国方面当时对于日本的要求是予以拒绝，并非同意；而且日军如果是前来实行协定，则绝无用木梯攀城墙的必要。

现在姑不论是非如何，总之是当中国方面击退了日军的最初攻击之后，日军遂即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上午十时，日军在石河铁桥～南关～二里店～五眼城～吴家岭一线所配列的三十余门战炮，向城内发炮轰击；并有八架飞机飞临城内轰炸，一般居民颇有伤亡。

守军奋战全体牺牲

日军的火力，集中射击南门一带。

中国军士气旺盛，面对企图攀附城垣的日军沉着应战，又将之击退。

翌日～三日上午十时，日军又有新的增援部队到来，再度发动攻势。

暴露在弹雨之下的地区，还是南门以及东南城角。～～十多架飞机飞来，投下百余发炸弹；并出动战车在地面部队的先头，发炮轰击；而工兵部队数百人则随之冲进，企图爆破城门与城墙。

又在秦皇岛待命的“平户”号等日本军舰两艘，也驶近山海关的海面上，展开了陆海空的联合攻击行动。

中国军队曾多次将进攻日军击退，但支持到正午稍过，南门终被日军突破；同时，东南城角也被摧毁，守御该处部队全军覆没。

此后，中国军出动逆袭，一度将侵入南门的日军击退；但旋即再度受到猛烈炮火密集轰击，南门城楼完全被毁，烈焰腾空，守军官兵全体牺牲，以致再度被日军攻陷。

山海关的通信网，此时已经是柔肠寸断，中国军业已无法保持灵活联络和协同作战的态势。

接着，西门和北门也落于日军之手，城内发生巷战，日军增援部队源源涌入，中国军只得一再后退。

下午三时半，中国军终于放弃山海关，向石河右岸撤退。

日军乃即渡过石河，更向南孟店、五里台方面攻击前进，但被重整部署之后的中国军所击退。

中国军为确保滦东地区，乃在北戴河等地增强兵力，形成隔石河与日军对峙的态势。

蒋总统接到山海关被日军猛烈攻击的报告，是当在豫鄂皖三省剿匪胜利之后，继续为督师进剿共匪“中央苏区”而刚由上海抵达杭州的元月三日。

于是，便立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权致电张学良，指示如下：

‘无论倭寇行动如何变化，我军速入热河计画，万不可稍有变更；惟寇计极狡，如果有何条件，务须预商中央为要。’

紧接着，又收到山海关失陷的悲痛报告。

日记“雪耻一则”

翌日（四日）清晨，在自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济南惨案以来，从未间断地每天所记“雪耻一则”中作了如下的记述：

‘余终必使倭寇敉平，国耻湔雪也。倭既制造伪满，但野心未足，又惧我报复，故急欲强我屈服。

‘敌之所最惧者，即我之最有利者也。对倭当于此中求得其关键。’

蒋总统判断敌情

正为扑灭“内乱”——对“中央苏区”的剿匪战争而操心的蒋总统，当面临到“外患”9[47]2027——日军夺去了战略要冲山海关的情况，当然就不能在杭州继续停留。

元月七日，返回首都-南京，赶急研讨有关山海关事变的对策。日军目标，在于热河乃至华北一带，已经昭然若揭；到了这个地步，如果对之让步，则不啻是在帮助他达成奢望。

‘倭此次（进攻山海关）目的，乃为牵制我派军进驻热河之计。及见我军如计入热，不为所制，则彼之企图已为我粉碎。此后，彼必恼羞成怒继续扰乱华北；或见机而止，以期了结榆案。如后之说，除其自动退出榆关外，不能迁就，惟此时终须先使平津安全为第一也。’（蒋总统元月七日日记）

日对国际故作遁词

在此之先的元月四日，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向美、英、法、俄、义五国驻日本大使说明山海关事件经过，并声明日本不愿扩大，认为是局部问题，已指示在当地交涉，以谋解决。然而，据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报告：日本担当外务省采访任务的新闻记者分析——“迟早必攻热河”。是则内田的“不扩大声明”，只不过是为了堵塞列强干涉的一种遁辞，而决非真心话。

此时，日军已在积极增强山海关的兵力，作对于热河省境以及平津方面的战斗准备。

七日，外交部接到来自北平的密电，据报：（一）驻天津日本总领事桑岛主计与日本司令官中村孝太郎秘密会商，计划在天津、北平制造骚动，以帮助侵犯热河。（二）天津日军有待9[48]2028命出动之准备。（三）有大量军需品运入天津。（四）日方拟以飞机轰炸北平，迫某要人离平。

九日，有日军陆战队在秦皇岛登陆。其兵力向山海关以及绥中、锦州、义县方面集中，并各配备有战车数十辆。

十日，日军推进到山海关北方万里长城关门之一的九门口要塞，安设大炮。

日军第四旅团长铃木美通（少将）于十六日在山海关商会演说，虽然表示：“将来山海关成为中立地区，然后日军撤到绥中一带，正在交涉中。”但又同时夸称：“山海关日军弹药充足，可供数年战斗之用。”

防务首须专对热河

清势日益紧迫，现在打开蒋总统在当时的日记，有如下记述：

‘倭（日本）有以主力攻凌源之势，或料其必攻热河也。余以为倭如不调其国内五师以上兵力，不敢迳取热河。彼殆犹欲利用我国内部变动，或汉奸扰乱后方，然后乘机图逞。’（元月十七日日记）

‘日本军阀于国际及国内皆为人所嫌恶。彼既避免国际干涉，当不敢直入我国内侵扰，则我最近防御工作，首须专对热河方面。以意度之，无论战争至如何程度，彼倭以上海事件（一二八）为鉴，最近期间，当不敢再来南方侵扰也’（元月十九日日记）

元月二十一日，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在贵族院所作外交方针的演说中提到热河问题，其内容大致如左：

“……满蒙与中国系以长城为境界者，由历史而言，亦无议论之余地。尤以热河省之属于满州国之一部者，征诸该国建国之经纬，当可明了。

“最近热河省内，不仅时受扰乱治安之策动，而张学良属下之正规军，亦逾越国境侵入热河省。根据日满议定书之规定，对满州国领域内之治安，两国有共同维持之责任。因此，所谓热河问题，纯粹为满洲国之内部问题；同时，日本基于条约上之义务，对该问题甚表关切。”

内田的发言，竟然是不以热河为中国的固有领土。

邀张学良段祺瑞会谈

蒋总统在面临如此“外患”之际，为谋统一国内意志，遂命召在北平的张学良并邀约曾为北洋军阀实力者的段祺瑞南下，于二十三日在南京交换意见。——当天上午与张学良会谈，下午偕同段祺瑞拜谒中山陵。

据日本资料，当时陆军参谋本部所编“满洲事变史”，谓曾举行“三者会谈”，并为热河、华北防务，决定派遣中央军参谋团（杨杰等人）及中央军六师北上。

在如此匆忙的活动之中，蒋总统当时对于日本留下了这样的观感：

‘倭寇之目的敌，实在美俄；如其果与我国大规模正式开战，则其无的放矢，虽胜必败。此为其最大之弱点，吾惟有与之持久战斗耳！

‘观倭今日之骄横，其真欲与世界各国为敌。彼不自量力，必欲以其为亚洲之主宰，而效法美国门罗主义，不问其地与时之能否，如此倒行逆施，殆自取灭亡耳！’（元月二十五日日记）

日军进攻热河

为期处理业已紧迫的热河情势，颇多同志要求蒋总统尽速前往华北，可是在这个当口的中华民国，实有“攘外必先安内”之必要，故而对于江西一带的剿匪战争，实在不容半途而废。

西园寺公望之言不足信

元月二十七日（一九三三年），蒋总统接到驻日公使蒋作宾来电报告——日本元老西园寺公望派人来称：“日本内阁将有变动，政权将不致复操于少壮军人之手，期望与中国接近。”但是，蒋总统研判：到了这个时候，像西园寺所说的“缓和局面”，是难望实现的。

‘侵略乃倭之传统政策。如彼未受大打击，决无变更之可能。特其手段或能缓和，如不急攻热河，或有可能，然何足置信！’（蒋总统元月二十七日日记）

就在同一天，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训示其所属——“热河的情势日益险恶，对于确立满洲国基础而言，现在已是处于不容放任的境地。关东军在作战行动上，已经临近了画龙点睛的重大时机。”翌日，遂即下达了准备出动的命令。可见日军之进犯热河，只不过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

当此时际，中国方面的善策，是尽可能地迁延日军的进攻时期。

‘滞延时日，乃为我之上策；但不能不急急准备。’（二月六日日记）

故宫文物南迁

在这里要特别提到一笔，就是将汇集中华文化精华的故宫文物护迁南方的行动。

故宫文物，当时是存置在北平，如日军的战火由热河燃烧到华北，则将有被破坏、散失之虞。因此，国民政府乃决定迅速采取行动，将之疏迁南方。二月六日夜晚，开始自故宫秘密搬出，运往南京朝天宫山洞库房收藏。在两个月之间运出约一万箱。

这个紧急措施，实在是非常明智之举。后来，当中日战争的战火扩散全国之际，这许多文物木箱原封不动地疏运到四川省的乐山、峨嵋等安全地区，得以防止损害。及至中日战事结束之后，一度运回南京，旋因戡乱战事恶化，复于一九四八年底移送台湾。

为中华民国之所继承、而以故宫文物为其象征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就是如上所述地得以免于战火，并且更得免于后来共产党破坏文化的魔掌。

故宫文物，现由设于台北市士林外双溪的国立中山博物院（院长蒋复璁）所庋藏。

由大陆运来的珍藏，约二十五万件之多，现在每三个月更换一次展品，据说全部文物如果继续轮流展览一周，则需二十年以上的时间。

一九七五年，国内外的参观者达一百十三万人。

宋子文赴平鼓舞士气

国民政府旋即派遣代理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前往北平，督导加强对日抗战的准备。

宋子文于二月十二日到达北平，在接见新闻记者时表示决心如次：

“热河是中国的一部分，和广东、江苏各省完全相同；对于热河的攻击，和对于首都的攻击没有不同。日本如果进攻热河，我们将会以全国力量对抗。”

宋子文在和张学良等军事首长会谈之后，复于十七日偕同张学良赴热河视察，会见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等人，鼓舞士气。

在此之前，日本方面的关东军已于二月九日提出“经略热河计划”，并于二十日左右开始进入战斗部署。

关东军动员的部队，为第六师团（师团长坂本政右卫门）、和第八师团（师团长西义一）；第六师团以天山、下洼、朝阳方面为攻击目标，第八师团由北票附近向凌源及其以南一线进攻。

但当初由于日皇的意旨，决定作战行动务必止于热河省境，不得越过万里长城向河北省进攻。

关东军发动进攻

二月二十一日，关东军发动进攻，迅即在朝阳、开鲁等地发生冲突。热河省主席汤玉麟通电全国报告“战争开始”，要求国人援助。

二十三日，日本外务省向中国方面提出：“中国军队退出热河省”的要求，中国外交部立即予以拒绝。

当天，日本驻华公使向中国外交部长罗文干提出以下三项节略，表示日本侵略热河的藉口9[56]2036是这样的：

“一、热河省内张学良军及其他反满军队之存在，不但与‘满洲国’主权抵触，且与热河省治安之恢复不能两立；故此次‘满洲国’实行肃清该省内匪贼及兵匪余党，日本军系站在基于‘日满议定书’而应与该国军队协力之立场。……日本军即使与张学良军及其他反满军队冲突，乃因张军不接受‘满洲国’向关内撤退之要求，其责任应由中国方面负之。

“二、日本军之行动，只以确保热河省之治安为目的，张学良军及其他反满军队如出于积极行动，则难保战局不波及于华北方面。

“三、‘满洲国’对于反满军之归顺，向以宽大态度对待，汤玉麟等如果归顺，则将按照一向方针予以宽大处理。”

汤玉麟军腐化

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罗文干立即将驳斥日本主张的照会送达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照会内容大致如下：

一、中国政府派兵往热河防御外国之武力侵略，乃系行使其固有之主权。……东三省伪组织，为日本一手造成之傀儡，乃举世皆知之事实，其所为之一切非法行为，日本政府尤应负9[57]2037其全责。中国政府因东省伪组织及所谓“日满议定书”，业经迭向日本方面严提抗议，概不承认。

二、日本军队之行动，据称将及于华北，足证日本方面蓄意侵略，毫无觉悟。……如日本军队侵及华北，中国军队必行其自卫守土之权。

三、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为中国地方军政首长。……日本政府对汤主席所称各节，殊属有意侮辱，中国政府特此抗议。

对于罗文干的答覆，好像已经是迫不及待，日军即向热河省展开了正规的侵略行动。

日军进攻热河，系分兵三路同时并进。

北路由通辽向开鲁，中路自锦州攻朝阳，南路出绥中趋凌源。

汤军全线败退

面对日本来攻，守备热河的汤玉麟军简直是毫无抵抗而一路后退。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地方军阀，根本就没有彻底抗战的精神。

汤玉麟在上年（一九三二年）夏季日军显示侵略热河的意向时，受到中央政府和张学良严厉督饬，才表示出要和日本侵略者不惜一战的样子；可是却又由于唯恐外人插足他的地盘，而拒绝张学良属下东北军进入热河加强防务，以致自与辽宁接壤的省境一带乃至于省会承德等所有重要地区，都只有让汤军戍守。

像汤玉麟这样的态度，从他的部队中所反映出来的，就是干部腐化、士气低落、纪律废弛。这种军队，对于日军的全面侵入，当然难望其能有号令严明、组织健全的抵抗行动。

譬如说：驻防热河北部第一线-开鲁的崔兴武旅，便和日本方面互通声息，当日军进逼时，即不战而退；又配置在朝阳一带的董福亭旅所属一部分队伍，甚至腼颜投敌。

由于热河战线全线连续败退，以致还能够寄予期待的，则只有张学良军。为此，蒋总统乃于二月二十五日自南昌行营致电在先为协助张学良而派遣北上的杨杰，指示如左：

‘中（蒋总统）意宜专力固守于凌源、平泉、赤峰三据点。如处处设防，则必处处力弱。在朝阳唯以现有部队守之，何如？’

可是，像这样的据点防卫，看来的确也是有其限度的，事已如此，则毋宁说是设想“热河失陷以后”的对策，更为重要。盖在热河事后，日本的野心想必会是自华北扩张到长江流域，乃至于全中国。

蒋总统谋巩固华北防务

在二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上，蒋总统留下了这样的记述：

‘今日而后，长江各省亦已严密戒备矣！迫余北上时期，第一、为支持现在战局。第二、为收拾败后残局。第三、为部署华北继起之战局。

‘此后，对日作战，唯有以运用外交为重心，使倭寇时受精神上之打击为第一要义。今其行动，必更积极，以后如占领热河、封锁海口与正式宣战，挟溥仪入北平以侵华，皆有随情势发展之可能。

‘吾人应有具体应敌之准备，必使倭寇陷入重围而不可自拔。’

战事失利的报告，继续到来——在凌南、凌源方面，张学良所属各部队虽颇为善战，但还是受制于日军挟有飞机、战车的“物量作战”，而被迫后退，于三月二日失去了凌源。

于是，由于兆麟所率领的第一三○师，乃为夺回凌源而冒风雪出击，但却在日军的飞机炸射和大炮轰击之下，于兆麟本人阵亡，卒未能达成目的。

日军很快地便近迫热河省会-承德。如果省会陷落，热河被其宰割，则北平、天津等华北要冲便会立即濒于危境，是故必须设法在热河反攻，同时巩固华北防务。

指示何应钦北上

（民国二十二年自由人注）

三月三日，蒋总统终于致电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指示其北上：

‘此时成败关键，在使汉卿（张学良）赴热河。请兄（何应钦）务于今晚乘车北行。’

同时，蒋总统本人也已经决心在准备到了适当程度时，便亲自北上。

9[61]2041然则，“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匪战争，便又因日军侵略之故而不得不为之中止。

‘此时，惟以国家与民族为有益而赴之，至个人之利害生死，本非余所计也。然以对内、对外关系，此行拟以极秘出之。’（三月三日日记）

长城攻防战

正当派遣何应钦北上，以谋加强在热河的反攻部署之际，却发生了出人意表的事态。

汤玉麟弃承德而逃

这就是坐镇在热河省会-承德的省主席汤玉麟，竟然自前线征集大批汽车，积载鸦片和财产，于三日（一九三三年三月）下午自称赴前线督战而一走了之。

获得汤玉麟逃亡情报的日军，紧跟着便派遣“挺身队”（第八师团所属川原挺身队）翻山越岭，漏夜前进，于四日清晨进入承德，控制全市，实则只不过是一百二十八人的小部队。

此时，指挥系统陷于混乱的汤玉麟所部，已经是零零落落。就在当天，赤峰、平泉便赓继失陷，而日军则迫近热河西境的滦平。

热河差不多已完全被日军压制。

于是，中国军方乃将包括业已北上之中央军在内的在华北部队编组为八个军团，部署好以万里长城为防线的态势。

对于热河全境轻易失守，中国全国舆论为之沸腾，“张学良应即辞职”、“请委员长从速北上”的电报，如雪片一般地递达南昌行营。

蒋总统自南昌北上

六日下午三时，蒋总统由南昌乘飞机首途，飞往汉口，换乘平汉路夜车北上。

七日下午十时，行抵郑州，发表谈话如下：

‘热河失守，东北沦陷，愿负全责。失地一日不复，抗日之责任一日不敢放弃，誓为国人前驱，图报党国，以慰军民之望。’

就在这一天，张学良致电中央，呈请辞职。

蒋总统到达何应钦前来迎候的河北省石家庄，是在八日下午五时。当时协商结果，准张学良辞职；同时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置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直接指挥之下，并在北平、天津、察哈尔设戒严司令部。

九日进抵保定，与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商谈张学良辞职问题。宋子文认为张学良如果脱离军职，则北方军队的指挥调度将会发生困难，故对于准张辞职一节颇有难色；但蒋总统鉴于为使责任分明，只有让张辞职，当天的日记是这样的——

‘此时情形，固使余心难堪，而此后之事，又不能直说，更觉难过。然处此公私得失成败关头，非断然决策不可，利害相权，惟有重公轻私，无愧于心而已。’（三月九日日记）

翌日（十日），在保定召集的会议中决定准张学良辞职，张学良遂即于十一日通电下野；十二日，以何应钦兼代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职务。

日军进攻长城

在这个期间，日军以长城为目标，仍在继续进攻中。三月四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下令夺取长城重要关口，局面已经进展到长城攻防战。

首先，最主要目标，是在北平东北约一百公里的古北口。这一带山峦起伏，形势险峻，绵延到古北口岭脉陡降，下有潮河流经其处，是由承德到北平交通孔道的长城关口，如果被敌方攻占，则北平便会受到威胁。蒋总统在北上之前，已经电令杨杰、何应钦自古北口方面反攻热河。

王以哲军力战

当初部署，是以杨杰为总指挥的第八军团所属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为在九一八事变时驻屯北大营的旅长）担任古北口防务，并以隶于该军的第一○七师（师长张政枋）推进到长城北面的青石梁，预定遏阻日军于关外；但由于日军进展快速，以致一○七师乃不得不在劣势情况之下赶上去应战。

第一○七师的前锋第六二一团为前敌部队，于五日晚间进抵距离青石梁还有相当一段路程的老虎山、马圈子、黄土梁一线，便受到了配属有战车二辆、装甲车二、三十辆的日军之攻击，六二一团立即将该二辆战车击毁，并将日军击退；但日军陆续增援上来，相持到七日上午五时半，展开了大规模的战斗。

中国军在后方的第六二○、六一九两团也调赴前线增援。两军激烈的山岳战，持续三天，短兵肉搏，阵地多次失而复得，终于遏阻住日军的攻势。

不过，一○七师在这一役官兵伤亡三分之一以上，牺牲甚大，因此，军长王以哲乃于九日将该师撤入关内，另调一一二师沿长城以北布防，战线乃为之后移；而蹑随一○七师之后的日军，则于十日进迫长城附近。

下午三时许，日军对古北口东方约五公里之处的长城关口之一～将军楼发动总攻击，中国军虽经浴血死守，但翌日凌晨受到了十多架飞机密集轰炸，阵地终被突破，长城一角遂被攻陷。

关麟征军调上前线

在这个当口，中央军第十七军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由徐州调来前线，在古北口南门附9[67]2047近高地设防，并以一部分兵力挺进将军楼东方长城边的龙儿峪，试图反攻将军楼；但被日军猛烈炮火所阻，为免徒然牺牲，乃向古北口南面撤回，于是，古北口又继而陷落日军之手。

二十九军扬威

中日两军长城之战的最高潮，是在古北口东方约一百公里的重要关隘-喜峰口的攻防战。

驻防喜峰口的中国军，是宋哲元所指挥的第三军团第二十九师所属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与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

当三十七师开到喜峰口的三月九日（一九三三年）下午，在喜峰口东北方长城的最高地点，已经被由平泉南下的日军第八师团第十四混成旅所占据。

三十七师二一七团团长王长海当即率队急袭，一度将该高地夺回，但遭遇日军反扑，旋又被攻陷。

晚间十一时，师长冯自安调派一一○旅增援二一七团；同时并派遣两个营迂回敌后，出动突袭。

这一支奇兵，放火焚毁日军补给物资，并卤获十多挺机关枪之后，回到关内。

翌日（十日），两军近接激战，战况极其惨烈。十一日，喜峰口正面北侧高地约有三公里幅度之处被日军所压制。

迂回日军背后夜袭

第三军团副总指挥秦德纯与冯治安、张自忠两师长会商之后，决定遴选两个旅精锐部队由喜峰口侧面的潘家口迂回日军背后，再度出奇夜袭。

这一次的突击战，再度奏功——晚间十一时半，由潘家口出发的一支队伍，沿滦河北上约三公里，转向东方疾进，十二日午前五时挥动大刀突袭尚在睡梦中的日军，克复了蔡家峪一带高地，并夺下威胁中国军的敌军炮兵阵地。

当曙光渐露时，日军大举反扑，但中国军已将敌方野炮、弹药破坏之后，卤获颇多机关枪及军用地图等文件凯旋防地。

此外，另有一支突击队疾进掩袭在潘家口东北方露营中的日军，几乎是未容许对方有丝毫抵抗的余暇，便将之包围歼灭。

这一支部队，在行进到三家子附近的时候，日军才发觉受到奇袭，但中国军立即将之压倒，杀得日军尸横遍野，并炸毁积载着弹药的十多部车辆，于十二日下午回归原队。

两支突击队击毙日军约八百人，卤获归来的大炮达十八门之多。

还有，从卤获的日军文书中，对于敌方的编制、装备等内情也得到了详细的了解，对于战局颇为有利。

自此开端，中国军压倒了日军。十六日，在喜峰口西南方约三十公里的罗文峪虽受到日军攻击，但为二十九军刘汝明师所拒，血战三昼夜，将之击退。喜峰口一带的长城关塞，差不多仍都为中国军所坚守。

喜峰口之战，是中国军最初的正规胜利。

蒋总统电宋哲元慰勉：

十三日，蒋总统特地致电宋哲元予以慰勉：

‘鼓勇却敌，竟至赵旅长（赵登禹）在前线指挥突击负伤、王（凤芝）营长阵亡，激烈可想，佩甚！念甚！’

此外，天津益世报在十九日的报导中赞扬喜峰口之战：

“法国人忘不了凡尔登英雄，中国人永世万代亦不能忘记喜峰口的英雄。喜峰口的几仗，使我们中国人又抬起头来了。”

在战斗告一段落的三月十九日，蒋总统于保定召见宋哲元以及张自忠、冯治安，对二十九军官兵加以慰勉。原来是属于冯玉祥属下将领的宋哲元，在全国统一之后的一九二九年虽曾反对中央，但当此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为民前锋，卓著战功。

抗拒侵略者培育信心

日军诚然是训练精强，而且更富于物质条件；但是，中国军经历了上年的“一二八战役”和这一次的“长城之战”，对于抗拒日军侵略，也培育了牢固的信心。

翌年（一九三四年）七月，蒋总统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时，举出这两个实例作了如下的讲话：

‘……我可以举我们最近抗日的实例来证明敌人不足畏，与我们的精神战胜他们物质之可能。……

‘我们由两次抗日的实例，可以知道我们死伤一个半人至两个人，日本一定要死一个人。但是，我们有四万万同胞，他最多只有六千万人口，我们还拼不过他吗？何况土地、物产、历史、文化和其他种种条件，我们都要胜过他。只要我们全国的国民、全国的军人能够真正觉悟起来，协同一致，敌人还在我们眼中吗？

‘何况过去在淞沪和长城一带抗日，还并不是正式作战，只可说少数部队临时接触，他尚且受了很大的损失；将来我们如果有相当的准备，和他正式作战，还有我们的敌人吗？’（注）

注：蒋总统-“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一九三四七）

美国态度坚决

日本的侵略扩大及于热河、长城之线，自然会召致国际舆论的炽烈批判。

然而，日本对于这些国际良识，竟然是无动于衷；而且被舆论穷诘到最后，更自行退出国际联盟，选择了自以为是、一意孤行的道路。

在前面已经叙述过，日本对于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很快地便表示反对；同时，更认为这个报告书如果被提出于国联会议中讨论，显然会于己不利，故而打算用强硬手段来突破此一难关。

日以退盟作为威胁

将李顿报告书提付审议的国际联盟行政院会议，是召开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当时，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向国联秘书长德留蒙表示：“日本如对联盟的行动和言论有所不满时，则将会退出。”他的意图是要以“退出国联”为威胁，以封锁其他国家对于日本不利的意见。

这个威胁态度，倒是发生了一些效果。在经过三天的行政院会议中，各国都因避免表明立场而没有发言，只让中日两当事国论战。

是故对于李顿报告书未经讨论便移付由行政院代表及其他小国代表所组成的“十九人委员会”审议。继之，则提出于由十二月六日开始举行的特别大会讨论。

大会开会时，有五十一国代表出席。中国代表颜惠庆首先发言：（一）大会应认定日本是侵略者。（二）日本应将军队撤退至南满铁路附属区域。（三）大会应宣布不承认“满州国”。

针对中国代表的发言，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则主张日本在“满洲”有其“特殊立场”，并强调：“解决纷争的方案，必须切实可行。”大会进行到第三天，松冈在发表的演说中竟然举出耶稣基督为例，他说：“现在世界责难日本在满洲的行动是很大的罪恶；但耶稣在古时也是为众人所误解，被钉于十字架上，可是千余年之后的今天，却被大众奉为上帝之子，受到崇敬。相信不出数年，世界人群对于日本当有正确认识。”如此荒唐无稽的譬喻，使各国代表，尤其是基督教国家的代表，都嗤之以鼻。

爱尔兰等国力斥侵略

在大会中特别显著的，是小国代表的发言。

爱尔兰、捷克、瑞典、挪威等各国代表都堂堂正正地主张：“假藉自卫之名而实行侵略之例，决不可开。对于李顿报告书之处理，乃国联生死的考验。”

翌日（七日），西班牙、捷克、爱尔兰、瑞典四国提案——（一）否认在九一八事变中，日军的行动为自卫。（二）断定“满洲国”是日本军人的产物。（三）确定不承认“满洲国”的宗旨。（四）邀请美、俄两国参加十九人委员会。

可是，英国外相西门等大国代表则因各有其意向而唯恐国际联盟迫使日本至于绝境，乃主张求得“实际的解决”；于是，西班牙等四国提案遂未经表决，而将报告书一案再交由十九人委员会审议。

十二月十五日，十九人委员会向中日两国代表提示包括以下几点内容的决议草案：（一）以李顿报告书九、十两章为解决本案之原则。（二）请美、俄两国参加调解。（三）限翌年三月一日前达成结论。针对此议案，日本则提出不同意美、俄参加等意见的修正案，以拖延时间。

在此一十九人委员会中，也是有大国——特别是英国——和弱小国家步调不能一致的现象；尽管弱小国家都主张国际联盟应该主持正义，但英国却毋宁说是在袒护日本。

在这样一些动态之下，关于报告书的审议便达不成结论而进入了耶诞节的假期。

罗斯福的远东政策

打破了这个沉滞局面的，是美国。美国在这一年的十一月选举第三十二任总统，民主党候选人佛兰克林·罗斯福当选，将于翌年（一九三三年）三月就任。

罗斯福和他的前任——当时还在任的胡佛总统政见完全对立，政权交替并非顺利；不过，罗斯福对于“远东政策”仍有意沿袭在其前任胡佛总统任内的国务卿史汀生之主张。

罗斯福于十二月下旬托人和史汀生接头表示：“关于远东政策，希望详细商谈。”

史汀生在得到胡佛同意之后，于翌年（一九三三年）元月九日访晤罗斯福于其在纽约郊外海德公园的私邸。

二人的会谈，超过了六个小时。

会谈之后，史汀生立即向伦敦挂长途电话，通过美国驻英国使馆参赞转告英国外相西门：

“美国远东政策不变。”

这就是说，将罗斯福继续贯彻不承认“满洲国”和支持李顿报告书的美国立场，告诉了英国。

次日，史汀生更以电话告知以观察员身分参加国际联盟的美国驻瑞士公使威尔逊转告大会主席希孟（比利时代表）：

“我们现在虽无力量足制日本，但亦不当为日本力量所制服。”

正好在这个当口，日军攻占山海关，更意图进窥热河、华北的新闻，传播到了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

由史汀生传达过来的美国态度，乃使国际联盟的空气为之一变。

国联维护正义

此时，国际联盟内部虽然还有调节的意见在推进之中，但大势所趋，则于日本不利。

国联秘书长德留蒙及副秘书长杉村阳太郎为期避免发生日本代表松冈洋右所通告的“日本将会退出国联”事态，故而作成一个对于李顿报告书内容避重就轻、并容认日本侵略立场的“德留蒙·杉村试案”。但各国代表则予断然拒绝。

英国对于日本的态度也有了变化，转而支持罗斯福的方针。

英国外相西门，于元月十二日（一九三三年）晚间约见日本驻英大使松平恒雄，询以：“如果将国联调查案内的邀请美、俄两国参加一项取消，日本是否就会接纳全案？”这是西门为了日本而伸出的最后一度援手，但松平则只能回答：“不可能！”

此后，日本曾经两度向国联提出修正案，但都只是迫于无奈而耍小手法，故被各国所拒绝。尽管情势已经如此，但日本代表团仍然相信只要有“退出国联”的一张王牌在握，则逼到最后，各国还是会让步的。然而，这个估计，却是很大的错误。

十九人委员会终于放弃对日本的调节工作，而于二月十四日通过了“大会报告书”草案，并建议于二十一日召开大会。

大会报告书指责日本

此一十九人委员会所提出的“大会报告书”，是造成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的历史文件，内容大致包含有下面几点：

一、东三省（满洲）主权属于中国。

二、日本在东三省所获得的权利，每足限制中国主权之行使。

三、日本违反盟约第十条规定，占取中国领土并使之独立。

四、九一八晚间之日军行动，并非自卫。纵认其当地军官自信为自卫，而其在沈阳城内与他处之行动，亦决非自卫。

五、“满洲国”之组织，出诸日本参谋本部之援助与指导；其所以能存在之原因，盖由于日本军队之在场。故“满洲国”之成立，非出自民族自决之运动。

六、九一八以后，所有情势发展，中国不负责任。

七、中国并非排外。

报告书接着并提出以下几点具体建议：

一、“满洲”主权属于中国，因此：南满铁路附属地以外的日本军队应予撤退。鉴于“满洲”地方的特殊情况，保障日本特殊权利利益，使“满洲”隶属于中国主权之下，成立一广范围的自治组织。

二、中日两当事国争议，须遵照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中所提出的十项原则谋求解决。

三、以上建议，当事国双方以对方接受为唯一条件而予以接受。当事国之间的交涉，应由大会组织一委员会予以辅助。委员会由若干联盟会员国家组成，又美、苏两国如果同意亦得参加。

报告书再度指出：“并非仅事恢复九一八以前原状，亦非维持及承认满洲现在的制度。”而且声明：“本报告书通过之后，国联会员国应避免对于实行本报告书建议有任何足以妨碍或延宕之行动，并在法律上或事实上不承认满洲国的制度。”

这份大会报告书的主要内容，是大致表明了认定“满洲”属于中国主权，以及不承认伪“满洲国”；但日本的反应将会如何？尚难预料。蒋总统在二月十四日的日记上留有这样的记述：

‘倭不知能改变态度、缓攻热河否？至望其变更侵略政策，则决非其时也。’

可是，被国际关系所迫的日本，竟至与世界良议背道而驰，自己选择了“覆灭的道路”！

日本退盟弄假成真

日本的退出国际联盟论调，是当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之后，便有一部分强硬派在大喊大叫，而斋藤内阁也在其“对国联方针”中明白表示出不惜退出的态度；但实则只是表现在外交上的威胁意图颇浓，并未有坚持退出的决心。

及至在十九人委员会审议报告书的议案中，日本的主张被摈斥之后，才终于作了退出的决定。

当时，以松冈洋右随员身分参加国联大会的陆军参谋本部部员土桥勇逸中佐在他所撰“退出国际联盟管见”中，曾经提到日本代表团在接到十九人委员会大会报告书一案时的动态如次：

二月十五日午夜，日本代表团所收买的法国记者裴迪纳克以“在天明以前交还”为条件、送来十九人委员会的报告书案及建议案。我们看到内容之后，为之愕然失色。盖在此之前，代表团所得到的情报是～～十九人委员会的结论，似会容纳日本的主张在内。

于是，我们遂即研讨对策。随员石原莞尔满不在乎地表示：“管他国联怎么办，当作没有这回事好了！”土桥便走进松冈洋右的房间说：“到了这步田地，也就不得不分手（退出国联）了吧！”松冈当时好像很烦脑而又很迷惘，没有作任何表示。

后来，松冈和另外两位代表长冈春一（驻法大使）、佐藤尚武（驻比利时大使）商量之后，乃于二月十七日发出电报向政府报告：“事已至此，只有断然退出。”

斋藤实首相接到电报之后，于十九日访问元老西园寺公望，征询意见。西园寺说：“除了采纳代表团的意见，还有什么办法？”

日本退出国联

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的方针，是在二月二十日（一九三三年）紧急内阁会议中作的决定；即日，密电在日内瓦的代表团知照，电文大意如左：

“根据国际联盟此次所提示的大会报告书案，可见虽经帝国（日本）代表之努力，但仍然与我国对满方针大相枘凿，并对我有所劝告，然我方自非坚持遂行既定方针不可。是则该案如见提出大会表决，帝国代表应自临时（特别）大会中撤出。”

在这里必须注意到的乃是：日本之退出国联与进侵热河，简直是在同时决定。

盖日本内阁与二月十七日的阁议中正式决定进攻热河，二十日决定退出国联方针并提经枢密院于二十二日承认之后，即于二十三日开始进军热河，发动战争，而日本代表团则于二十四日退出国联大会会场。

日本打算退出国联的消息，各国都已有所风闻，但都预料其实际不会有退出的行动。就连作成九一八调查报告的李顿爵士以及著名的新闻评论家李普曼都作了错误的估计。

国联特别大会，依照十九人委员会的建议于二月二十一日开始集会，有四十四个会员国代表出席；对于大会报告书案的讨论和表决，则是在二十四日举行。

中国接受国联报告书

首先，中国代表颜惠庆于表达了“报告书之本身，在吾人观之，虽不免有遗漏之处，且难事事尽表同意，然中国为国联忠实会员，深信第三者之判断，乃公平之基础”的前置词之后，继之，说明中国接受报告书的方针如左：

“国联坚持不承认满洲国，乃极正当之办法，中国代表团深为钦佩。各会员国业已表示不承认以和平以外之方法所造成之局势或协约，现又继续在事实上、在法律上均不承认满洲国，并与有关之非会员国（美、苏）同力合作；此种决定，甚为重要，实与国联之目的日趋接近也。中国政府对于美国及苏联政府与国联合作解决中日争端，极表欢迎。该太平洋两大国9[83]2063参加，实于维持远东和平有莫大利益。余请向大会正式宣言：中国政府对于报告书，将投票赞成之。……”

针对报告书的内容，日本代表松冈洋右的发言是一开始就加以批判，他说：“看到报告书的全文，可以明白地指出～～十九人委员会未尝明了远东的实际情势和日本的困难，更不认识日本不得不采取最后行动的目的所在。”同时并强调：“日本在满洲曾经两度战争，并且是曾以国民的生存孤注一掷。日本今已不愿再事战争，而国际和平唯有以互让为基础才可获得，固属诚然；但一个国家为了生存，终有其不可能退让、妥协之死活问题存在——满洲问题，就是这种问题。”他这一席广长舌的肆言雄辩，达四十六分钟之久。

表决的结果——赞成四十二、反对一（日本）、弃权一（暹罗即现在的泰国），以压倒的多数通过了大会报告书。

日本代表退出会场

在表决失败之后，松冈立即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日本政府认为：当前对于达成远东和平之方法，已经面临了日本与其他联盟国家见解各别的结论。是故日本政府乃不得不感觉到——关与中日纷争问题，我们愿意和国际联盟合作的努力，已经到了极限。”最后说了一句日本话——“撒哟拉啦”（再会）退出会场；长冈春一、佐藤尚武两代表以及随员们都跟着鱼贯而出。

‘国联不承认伪满，倭恼羞成怒；国联之报告书，昨已通过，从此倭更蛮横无忌矣！吾人于此，因为中国革命前途忧，乃亦更为东亚全局与倭之本身虑，此时实吾人对敌、对友运用最后之时机，或亦转祸为福之基也。’（蒋总统二月二十五日日记）

日本之退出国际联盟，是在此之后的三月二十七日正式通告秘书长德留蒙，这是在日军侵略热河全省已经完结之后。

‘日本乃适在这个时期退出国际集团以外，而愿意孤立起来，溯其原因，由于欲贯彻占领满蒙、混一东亚．与独霸太平洋的政策所致，而不知完全陷于违反时代趋势的错误。’（注）

注：蒋总统-“敌乎？友乎？”（一九三四十）

长期抗战策略

在江西等地的共党匪军，显示出一如和日军之进侵热河，配合得恰到好处，又恢复了活力，扩展窜扰区域。

三月二十六日（一九三三年），蒋总统离开河北保定，回到南京，与汪兆铭、孙科、戴季陶等人会商在日本退出国联的国际新情势之下的对内对外政策。

汪兆铭于上年八月因和张学良龃龉而辞卸行政院院长出国；此时，则是刚于三月十七日回到上海，复任行政院院长职务。

御日剿匪同时加强

蒋总统在会议中提出的方针是：对日防卫及对匪进剿同时加强——

‘此时以稳定抗日战线，加强北方防御，为目前之急务；至对江西剿匪，则只有付诸湘、粤各军，逐渐紧迫而扑灭之。其根本问题，乃在整理部队，培植地方民团，消灭反侧，严防变乱。

‘于寇患及匪祸二者，对前一项，加强防御；对后一项，应准备速剿也。’（三月二十八日日记）

将热河攫夺到手的日军，其后在长城各关口的战役中，受到中国军颇为严重的打击，而被遏阻了进路；于是乃变更由热河一举突破长城的正面作战计划，准备改从业已为其占据的山海关方面越过长城，继续进犯华北。

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为对如此行动的日军有所戒备，乃以第二军团第五十七军（军长何柱国，原为第七旅旅长）部署于长城附近的石门寨等地，以石河为防卫线，巩固阵地；同时更在后方的滦河部署第二道防线，将主力集结于以滦州为中心的滦河右岸。

正好在蒋总统回到南京的三月二十六日，日军的攻击开始，其第八师团所属第四旅团大举出动飞机、战车，由山和关北方的九门口杀到石门寨。四月一日，石门寨线落。

日军越过长城，扩大军事行动及于华北地区，因而引起了国际间的关怀。于是，驻在北平的各国外交团，乃于四日匆遽举行对策会议，向日本公使馆提出要求——保护外侨生命财产及不得超越辛丑条约所规定的驻兵权。

但是，业已退出国际联盟的日本，对于外交团的要求置若罔闻，四日夜晚，攻陷屏障秦皇岛背面的要地海阳镇；五日，更对滦东各县肆行轰炸。

这实在是值得耽心的情况。当时蒋总统在四月二日的日记中留下如左记述：

‘政治与军事，由小而大，由近而远，不可躐等，事事必以公平处之，不急近攻，不求速效，则国家虽乱虽弱，必有转危为安之道，徒急无益也。对倭宜卧薪尝胆，朝夕于斯，亦非可矫强。’

越能持久越是有利

十二日，在南昌举行“军事整理会议”。会中，蒋总统宣示了抵抗日军侵略的决心如下：

‘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

‘日本把我们第一线部队打败之后，我们再有第二、第三等线的部队去补充；把我们第一线阵地突破之后，我们还有第二、第三各线阵地来抵抗；这样一步复一步的兵力、一线复一线的阵地，不断的步步抵抗，时时不懈。

‘这样长期的抗战，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得三年、五年，我（蒋总统）预料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将有新的变化，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有死中求生的一线希望。’

在此前两天的十日昧爽，日军在长城全线发动了总攻击～～十一日，位于滦州北方约六十公里的冷口失陷；十三日，界岭口也在经过三昼夜的激战之后，被日军突破。日军旋即经过抬头营向抚宁进攻。同时，据传闻防守喜峰口的中国部队也陷于苦战局面。

此时，在北平城内，有以英国公使蓝浦森为桥梁而出自中日双方都要求停战的活动。

十九日，日本公使馆员中山祥一与蓝浦森面谈，要求其对于停战交涉协力。

当天，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以及学术界领袖胡适等人也在北平与何应钦会谈。其后，由蒋梦麟依据会谈结果，于二十日以私人资格洽由蓝浦森进行停战协调工作。

华北面临紧迫局面

然而，日军的进攻却一点也没有停止的迹象。他们继续进犯北宁铁路，在二十日之前，又攻陷了冲要之地的昌黎、北戴河，占据了整个滦东地区，由此地到天津的直径距离不到二百公里，华北业已面临了紧迫的局面。

究竟是停战呢？还是决战呢？中国方面已经到了必须作一重大抉择的时刻。

四月二十二日，蒋总统接到何应钦来电，陈述蒋梦麟和蓝浦森所接洽的停战交涉，请予备案；在中国立场，当然不能接受强迫性的屈辱停战，不过本来就是出于“应战”而非“求战”，同时汪兆铭也和蒋总统为此有所联络，于是乃姑且允许停战交涉的进行。

日军突又后撤

当华北进行停战交涉之际，蒋总统于四月二十二日（一九三三年）对于在北平的何应钦覆电指示如次——

‘蒋梦麟与英使所谈调停问题，自属可行，其进行步骤，如何乃能适当，已加电汪（兆铭）院长妥筹详示。但下列四点应加注意：

‘一、此事可任由社会有力分子先与国际方面酝酿，政府中人不宜参加。

‘二．大体方针，应先征询华北军人之意见。军长以上，可先行个别召其试谈。

‘三、经社会领袖与军人接洽后，应由彼等建议于中央，中央务必处于被动。

‘四、凡好名者，不必直接约谈，可让酝酿此事之社会有力分子间接接洽。’

此一电报，并非指示务求停战，而是任由民间接触，进行交涉，俾争取时间，加强抗日体制。

二十二日当天，蒋梦麟访晤英国公使蓝浦森，表示中国方面对于英国调停上海停战的谢意；同时告知在北平的外交部次长刘崇杰代表中国官方，并由行政院院长汪兆铭负一切责任。

蓝浦森将情况一方面向伦敦报告，一方面通知美国驻华公使詹森转达华盛顿。

此时，外交部长罗文干并不以中日之间直接交涉为然。二十二日晚间，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沈觐鼎与蓝浦森谈到：“蒋梦麟进行之事，此间尚未奉到外交部训令。”于是，蓝浦森遂即将调停工作暂时搁置。

准备固守北平

在此期间，中国方面对于军事上的防御部署，正积极进行之中。蒋总统于四月二十二日日记中记有：

‘对倭唯有固守北平，以为背城借一之计。此最后之一着，不可不力为准备也。’

这个固守北平的方针，立即于当天两度电达何应钦，指示如下：

‘北平城之工事，务请积极限期完成，以备万一。倘密云（北平东北面的据点）失陷，东路不保，则非有此最后一着，决不能解决一切。现在缓和方法，不妨进行，但恐难生效，或时不许可，故必须有此准备，则缓急皆可有恃也。’

‘万一发现倭有取平津之征象，则准将古北口方面之精锐秘密抽入北平城中，以为背城借一之计。请兄（何应钦）从速准备，中（蒋总统）并电京抽调第八十八师（一二八淞沪抗战时的中央精锐部队）密运北来矣！’

在这个当口，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就是日本军队突然转回头去，开始向关外撤退。在此之前，一意扩大战线的日军，竟然有如此奇突的行动，故而天津大公报乃报导：“日军兵力不足，加以恐惧招至国际干涉，所以中止进攻平、津。”

日军突如其来地撤退，在当时曾引起各种揣测；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真相公开，乃是由于关东军之向关内进兵，并未得到日本天皇的许可，军部受到天皇诘问，遂于十九日匆遽发出撤兵命令。

板垣在津策划内乱

然而，关东军虽则一时撤退，可是进行侵略的谋略工作则并未停止。

担当此一谋略的人，又是那个板垣征四郎。

当时，在日本参谋本部任职的板垣，于二月间关东军进攻热河的前后，潜入华北，以天津为中心，极力策划制造中国的“内乱工作”，这就是“天津特务机关”的开始。

这个工作的目标，是要扶植日本的傀儡在华北制造“反中央政权”。日本之所以要这样做，是顾虑到如果不顾一切地进军攻击北平、天津等国际瞩目的大都市，则将会受到全世界的指谪，加以如果攻占平津，则必需出动大量兵员，关东军却未能拥有如此力量；而且军部在先向天皇报告进攻热河时，当面说明以不越过长城为限。基于这些因素，所以设想到最好的办法是不用经过战争以达到控制华北的目的。

板垣首先意图把段祺瑞或孙传芳拉拢出来，但结果失败；接着则找到早年曾任湖南督军的张敬尧乃至石友三等旧军阀接头。

张敬尧自吹自擂说和宋哲元有深厚关系，向板垣卖弄，板垣深信不疑，曾经给予三十万银元的工作费。

四月十八日，板垣密电关东军报告：“张敬尧预定四月二十一日发动政变，宋哲元同时响应。”并且要求关东军为援护张敬尧的行动，加紧南下进攻；可是，关东军则于十九日奉到撤退命令，以致此一策谋未见实现。

继之，板垣又提出报告：“四月二十六、七日左右，中国军第一一二师（师长张廷枢）发难，宋哲元会响应，已有确实联络。”但结果又都是泡影。

民国二十一年

蒋总统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是在三月十八日。而日本傀儡政权的“满洲国”，已在十天之前宣称“建国”；又“一二八事变”的停战会议，则是在蒋总统就任的翌日举行于上海。

包围兴隆日军

日军虽则一时自关内撤兵，可是必然会再度入侵，是非常明显的情况。

四月二十五日（一九三三年），蒋总统致电何应钦，再行指示加强戒备：

‘无论能否缓和，我军不能不积极筹防。其范围、中（蒋总统）意只可以中央军在北方之兵力为度，切勿过大。盖危急时，各部未必皆能听从指挥，故只可以能切实指挥之部队，使之同生死共存亡，为我民族求代价之最后一战。即使不幸而败，亦可使敌寇落胆，不敢深入无忌耳！

‘否则，范围愈大，配备愈难，兵力愈多，性质愈杂，指挥愈无把握，非至托泥带水同趋于崩溃而不止。城内粮弹，须急准备。’

进行平津军事布置

何应钦立即于二十七日覆电报告：“昨（二十六日）召集高级将领密谈，诸人均表示军人只有服从命令，并决定以保存平、津为对日长期抗战之根据。所取手段如下——（一）极力准备平、津方面之军事布置。（二）用外交手段，使敌人之进攻迟缓，俾我之准备得以完成。”

在这个期间，长城一带仍然有激烈战事。

由黄杰所率领的第二师，布防于古北口的南天门，自二十二日以来，连日连夜浴血苦斗，坚强守住阵地；继为增加援军，第二十五师再度开上火线，新调来的第八十三师亦加入战斗。因为南天门是屏障北平东北面的关门，在这里的防卫战，是决定北平命运的一战。

‘此役或足以挫寇气而振革命之士气也乎！’（蒋总统四月二十八日日记）

黄杰回忆长城战事

关于长城战争，黄杰向笔者（古屋奎二）作了如左的回忆谈话：

“我们于二月下旬奉到蒋总统‘迅速北上’的命令，在洛阳集结之后，连御寒装备都来不及准备，就穿着草鞋赶往长城。三月十二日，接替第二十五师的南天门防务，在两个多月之间，连日不断地和日军交战。

“我们所感到苦恼的，是日军拥有大量的飞机和重火器，而长城一带，山多岩石，很难挖掘战壕，只得用由北平携来的铁棍，在露出泥土之处捣出一些掩体，躲避日军的飞机炸射和重炮轰击，等到敌人的步兵充分接近我们的防线时，才一齐开枪还击。”

又在古北口东南约四十公里的河北省兴隆县方面，则有中国军越过长城反攻，将占据该县的日军包围，进行歼灭战。

此时，再度出现了停战的接洽。

这次路线，是军政部次长陈仪日日本驻上海武官根本博的接触。

实则当时希图停战者，毋宁说是攻势顿挫的日本方面。根本博在四月二十七日会晤陈仪时表示：“如果中国方面解除对兴隆县的包围，并自南天门后撤到永平、玉田、顺义一线，则有停战希望。”

何应钦乃通过陈仪于二十九日告诉根本博：“可以进行停战的接洽。”同时，将南天门的中国军后撤，并解除对兴隆县的包围。

然而，日本军部中的强硬派仍然坚决主张决战。

日本特务态度强硬

强硬派的主角，是主持天津特务机关的板垣征四郎和驻北平武官永津佐比重。

板垣站在他策动傀儡组织的立场，于四月三十日以抗议的口吻致电关东军司令部，略谓：“反中央运动，正在河北酝酿中。国民政府要求和日本妥协，无非是在争取时间，一俟反中央运动平息下去之后，仍将恢复其抗日政策。现在风传日本将与国民政府妥协，以致反中央的活动受到极大影响。”

永津则更为强硬，他曾向关东军进言：“增派一个师团进攻平、津。”

永津是一个长期在北平从事谍报工作的人，他对于日本军方颇有说服力。

蒋总统在日记中也曾提到过像永津这些人的谍报活动：

‘倭寇动作及倭国政情，我方报告未详细；而倭之侦察我者，则如入堂奥，思之能不寒心。是当设法扑灭其间谍，而善用我之间也。’（四月十一日日记）

永津佐比重居留北平甚久，在华北中国军队的内部有其情报路线；他所提出的“北平特别情报”，其内容和天津日军所侦收中国北平军分会发出的无线电报，一字不差，而且都会早一天到手。

由于永津等人的强硬反应，关东军参谋部所属作战课乃首先由“停战”转变为“决战”；继之，情报课也被煽动而再度发动侵略战争。

北平内外受敌

国民政府于五月三日（一九三三年）设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任命熟悉日本情况的黄郛为委员长，准备交涉停战。

在同一天，日本方面归国述职的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返回大连任所。他在东京获得了天皇和陆军首脑部允许其进军滦东地区。

关东军下令关内作战

小矶国昭受了作战课参谋远藤三郎的进言，劝说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进军决战。武藤终于同意，当天便下达了“关内作战”的命令。

关东军在战略上的转变，可以从前线日军的动态中窥测得出来。

日军原来自请停战的活动归于沉寂，而战斗准备积极起来，当然其大规模的攻击已经是箭离弦上，势所必至。

蒋总统熟虑敌我战力，不能不确立最后的决心：

‘我军固守古北口、南天门，倭寇猛攻不下；今又加添大炮三十余门，准备续攻。期迫矣！我军唯有向后撤退，划为缓冲地带；如此，则自古北口至榆关，皆为倭寇铁蹄横行之区。明知其最后之必陷落，然非我所能忍自放弃一步也；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其痛心为如何！’（五月五日日记）

在滦东方面，日军发动其所谓“关内作战”，是始于五月七日。

首先点燃战火的，乃是关东军第六师团，这一支部队是由山海关出发，进犯抚宁。

诛杀汉奸张敬尧

刚好就在这一天，为天津特务机关板垣征四郎所收买、而准备在北平发动叛乱的曾任湖南督军张敬尧，被爱国志士诛杀于北平。从搜获的秘密文件中，得到证实他是要在北平收买军警起事，制造唯日本意向是从的所谓“新政权”；而且，日军之发动“关内作战”，很明显地就是为了侧面援护张敬尧等汉奸的暴动。

日军于十一日夜晚到十二日，迅速渡过滦河，十四日进占滦州。

在长城一带的古北口等关塞，则受到关东军第八师团所发动的总攻击；十二日傍晚，新开岭华军阵地被突破，而密云东方三十公里的石匣镇也继之陷落。中国军伤亡超过三千人。

平、津上空，也有日本飞机盘旋，以示威吓。

在日军攻击之下，中国方面并没有放弃和平解决的努力。

黄郛在上海，与根本博不断接触，试探关东军的真意；关东军乃通过根本博转达：“日军并无进攻平、津之意，但望中国军队能撤至日军守备区域炮程不及之地点。”所谓“守备区域”究竟是指那些地方，并不明确；但总之首先可以窥测得到日本是想在华北设立不让中国军队驻屯的区域。

于是蒋总统乃致电黄郛指示如次：

‘倭寇得寸进尺，吾人求近反远，如无诚意保障，决不能轻于退让。盖入关内攻，乃其既定方针，根本绝不转变。’

何应钦也于五月十五、十六两日三度派遣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总参议熊斌和日本武官永津佐比重见面，探究停战真意，未料日军却反而加紧进攻。

永津此时曾强硬主张：“华军应撤退到芦台、宝坻一线”。当熊斌接受了这个条件，以示让步时，而永津却立即通知关东军：“中国军心不稳”，要他们更加强攻势。

十七日，唐山陷落，十八日至十九日密云、三河、蓟县赓继易手，日军前锋进迫到距离北平市区只有五十公里之处。

日派军开入北平

此时，板垣征四郎所主持之天津特务机关的谋略工作，又积极起来。他煽动在以前曾经叛离中央的石友三旧部于十八日在滦州宣称“独立”，继之，又唆使无赖之徒向天津日本租界的海光寺投掷炸弹，以及炸毁在北平的日本海军武官室之菊花纹章。这些做法，都是在制造社会不安，好为日本增兵的藉口。

二十日，发生了有一个中国青年刀刺日本公使馆卫兵的事件。这在日军来说，真正是求之不得。于是天津日军遂即引据辛丑和约打出“出兵防卫”的招牌，调派炮、步兵等共六百人9[104]2084开进北平城内。

此时的北平，已经是处于内外同时受敌的情势。

‘倭寇此次欲得平津，乃为外势唆激成，我固先受其祸，而倭进退不由自主，其亦危殆矣哉！’（五月二十三日日记）

黄郛交涉停战

全世界严峻的目光，投注于日军大举侵犯华北的局面。

五月十九日（一九三三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与在美访问的宋子文发表共同声明——希望迅速恢复远东和平。

可是，在国际间一意孤行的日本，已经是撕破了面皮，肆无顾忌地加速了他的军事行动。

‘倭奴因美总统声明书发表，恼羞成怒，连日积极进攻，前线各军皆损失甚大，其未参加战斗者，仅余少数部队。

‘养日（五月二十二日），新河村至马驹桥方面，以万福麟、王以哲两部纷纷溃退，不知何往，致宋哲元右翼空虚，无法守御；复因杜家坞方面有一部敌人渡过河西，东北突然紧张。……

‘事已至此，唯重整阵容，坚守平、津之东北前线，与敌相持死拚，以促国际形势之变化，而徐图转机。

‘第列强所谓助我者，仅予日本以一骂，而日本必即还我以一刀。立国不能倚赖他人，全仗自己努力。……’（注）

然而，就在五月二十二日午夜，事态急转直下，出现了趋向“停战”的情势。

接触停战交涉的人，是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他的秘书李择一在当夜报告：来自日本公使馆海军武官藤原喜代间的要求——“请不要带任何人立即惠临一谈。”

黄郛便如约到达藤原喜代间那里，看到有藤原本人以及日本公使馆书记官中山详一、驻北平武官永津佐比重在等着他，向他提出停战交涉。

日军行动已达极限

日军之所以突然主动要求停战，是由于其军事行动已经到达极限；而且板垣征四郎等人在北平制造内乱的策谋也没有发生作用，于是，日军乃省悟到：和坚决死守北平的中国军力拚，实属愚蠢行为。

黄郛和永津等人交涉到二十三日拂晓的午前四时半，作了下列四点条件的结论：

一、中国军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以南以西，今后不得有一切挑战行为。

二、日军亦不越过上述之线进击。

三、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何代理委员长应钦派正式任命之停战全权员往密云，对日本高级指挥官表示停战之意。

四、以上正式约定后，定某日某时作关于停战成文之协定。

这一条停战线，是要中国军撤离山海关以南约达二百公里的地区，实在是相当屈辱的内容；但黄郛鉴于日本以军事压力摆开在眼前的此时此际，是不得不有所忍耐的。

黄郛离开藤原那里，便去到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会悟何应钦，说明和永津交涉的内容，并表示：“如果能够同意，我便马上电话通知日方中止攻击。”

忍辱保全文化古都

何应钦立即邀集张群、熊斌等人会商。熊斌提出：“北平为文化古都，必须保全；倘轻易放弃，责任太大。似宜忍辱负重，姑且派员试行接触。”这个意见，获得大家同意，乃决定接受黄郛和永津所交涉的结果。

于是，何应钦便通过黄郛转告藤原喜代间--“同意”；同时，并写了一封给黄郛表示同意的信，由他出示永津一阅。接着，便派遣北平军分会参谋徐燕谋前往密云，磋商停战事宜。

在南京方面，以行政院长汪兆铭为中心，连续于二十三、二十四两天举行国防会议，商讨停战对策，决议在仍然坚持可和可战的两面肆应原则之下，指示何应钦“与日方洽商停战，以不用文字规定为原则。如万不得已，祇可作军事协定，不涉及政治。”

可是，在日军枪口之下的第一线-北平，已经是处于很难完全顾到中央指示的境地。

“当时，何应钦在发给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总统）的电报中陈述此次交涉的苦衷如下：

“熟权利害轻重，与其放弃平、津，使傀儡得资以组织伪政府，陷华北于万劫不复，何若协商停战，保守华北，徐图休养生息，以固党国之根基，较为利多害少。”

‘余前既电告：只要不使片纸只字落倭手，不派军使进入其哨线，为有形之交涉，则余皆可尽心力而为之。今闻竟接受其要求矣！前途交涉，艰难必多。惟敢毅然承当此任，其心苦矣，亦甚可嘉！故余覆电：仍由余负责，勿使其为难。’（五月二十四日日记）

注：蒋总统-“致剿匪军南路总司令陈济棠电”（一九三三五）

塘沽协定

中国军队自五月二十四日（一九三三年）开始，向协议所决定之线撤退。

翌日（二十五日），徐燕谋、李择一和永津佐比重、藤原喜代间四人同往密云，会晤日军9[111]2091第八师团长西义一，正式表示停战之意。

在这一天，蒋总统致电黄郛，再度表达非常关心和日方的交涉，并提醒其注意：

‘弟（蒋总统）始终不信倭寇有休战诚意，尤在威胁吾人使之自动撤退，俾其垂手而得北平也。

‘至于协定一节，总须避免文字方式，以免将来引以为例，其端由吾人而开也。

‘否则，万不得已，最多亦不可超过去年淞沪之协定，绝不能涉及伪国（满洲国）事实之承认，以及东四省之割让与界限问题。……

‘以后，周折必多，应付甚难，故于谈判时期，城防设备尤应加紧。……弟以为不有一北平死战，决不能满倭奴之欲，亦不得国人谅解也。’

悼念为国捐躯将士

停战交涉终获成议，战火难得平熄，但在此刻蒋总统所感到痛心的，是当调赴华北时勖勉大家马革裹尸、誓不南归而终于为国捐躯的将士们，是故在正式停战交涉之前的二十九日，留下了这样的日记：

‘此次战斗结果，第二、第二十五、第八十三各师所余官兵，不过三分之一，而各团反攻时，有只余六人生还者，其因伤自戕之官长，不可更仆数（此语出礼记，谓多至难以计算）9[112]2092。激烈至此，总理之灵，当可慰矣！惟何以慰我阵亡忠勇将士之灵？勉之！’

中日两军第一次的正式停战谈判，是于五月三十日下午四时在塘沽日军运输支部举行。

中国军方代表为熊斌、徐燕谋等六人，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永津佐比重等七人出席。

双方只是交换全权证书，并且相互介绍之后，便于四时半散会。

第二次会议，于翌日（三十一日）上午九时半开始。

冈村宁次提出草案

此时，日方突然提出一分印刷好的“停战协定草案”，由冈村宁次说明：

“这是关东军最后案，一字不能变更，中国代表应在一小时半以内（上午十一时以前）作允诺或不同意的答复。”

“协定草案”列有五项内容：

一、中国军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的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线前进，并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确认第一项之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以行视察，中国方面对之应加保护及予以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确认第一项所示规定中国军业已遵守时，即不越该线追击，且自动一概归还于长城之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由中国警察机关任之。

五、本协定经签署之后生效。

熊斌在首先认明这个草案纯属军事性质的条文之后，相对地，也提出事前准备好的一分意见书，希望对于中日两军撤退后区域有关保障治安等问题能先有所协议。

可是，冈村宁次则表示毫无商量的余地。他说：“对于停战协定案，只能有‘诺’与‘否’的回答。至于其他意见，须俟协定签字之后，另行协商。”

在这个时候的冈村宁次，当然怎么样地也没有想像得到～～十二年之后，他会以日军“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的身分，解除武装、向何应钦呈递“降书”的命运正在等待着他。

在有限时间的压迫情况之下，中国代表已经不可能有选择的余地，只好拖延到时间极限的上午十一时十一分，乃依照原草案签署了这分协定。

当会议进行中，日本海军派驱逐舰“朝颜”、“夕颜”两艘停泊于塘沽，将炮口对准会场，以示威胁。

由于这个塘沽协定，乃在冀省东北地区划定了一片广大的不设防地带，以致北平、天津便和日军只是隔着徒有距离的空间，等于是比邻而居。

就是这样的协定，如果日本方面能够诚实遵守，则也还会具有保障华北和平的性质；然而，要是日本在签订之后，只顾于自己有利地断章取义，曲解内容，则难免不会被利用为其压迫华北的工具。

卧薪尝胆湔雪此耻

‘协定成立，停战政策得告一段落，人民暂可安息；国际情势，当有进步。对内对外，得此整顿准备之余豫，其足为复兴之基乎！’（六月五日日记）

‘于此停战蒙耻之时，使吾人卧薪尝胆，而不自馁自逸，则将于建设计划，确定步骤，切实推行，以期十年之内，可湔雪此耻乎！’（六月六日日记）

准备第五次剿匪

现在再将话题转回到剿匪战争。

由于塘沽协定之签订，中华民国又掌握了“攘外必先安内”——也就是为御外侮，必先专心统一内部——的机会。

可是，从以往四次剿匪过程看来，有欠周密地向匪军盘踞区域孤军深入，则难免会徒然增9[116]2096加政府方面的损失。

‘平时多流一滴汗，战时少流一滴血。’

这是蒋总统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在以“革命军人成功立业之道”为题的一篇演讲中所提到的两句名言。

政府军遵循这两句话，一再精研战术，周详准备，得以进而达到了第五次剿匪战争（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六日至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四日）的大获全胜、和二万五千理追剿的结果。

共匪扩展与日军相呼应

当时，匪军最猖獗的地区，是江西省。在这里建立其所谓“中央苏区”而以之为根据地的匪军，乘日军侵略热河华北、以致第四次剿匪战争为之中断的空档，又恢复了势焰。五月初，在朱德、周恩来指挥之下集中主力于赣中宜黄、崇仁、乐安一带山区；就像是在和日军里应外合一样，意图将其“苏区”范围向北面伸展扩大。

五月十五日，也就是日军在华北攻陷滦州的翌日，蒋总统（当时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在国父纪念周作了如下的报告：

‘江西完全匪化者六县，人口三十万，民国十八年以来，战死者十万，被匪杀死者五、六万。匪在经济、武器及其他方面均败坏，惟组织严密。剿匪战争非武器战争，乃组织及精神战争。’

是故对于第五次的剿匪战争，蒋总统决定亲自指挥。

南昌行营指挥剿匪

五月二十一日，作为剿匪最高司令部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正式成立，赋予处理江西、广东、福建、湖南、湖北五省军政全权及剿匪总指挥的任务。

六月八日，蒋总统在南昌行营召开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军事会议，研讨剿匪战争经验、分析匪军状况，指示对匪彻底封锁的作战方针。

这就是策定“战略攻势，战术守势。”和“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碉堡公路，连绵不断，经济封锁，滴水不漏”的策略。

自第四次剿匪时所采行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政略，也继续施行。盖当剿匪战争之际，政治工作毋宁说是比军事行动还更值得重视，在前面已经有所叙述。——就是尤其曾被匪军盘踞的收复区，其政治改革，是要在实施复兴农村、建立保甲制度和普及教育的同时，并以三民主义教导民众，俾免为共产主义的宣传所迷惑，实在是最要紧的工作。

庐山训练培养干部

培养指挥剿匪战争的优秀干部，也是当务之急。为此，遂于江西庐山设立“庐山军官训练团”，以陈诚为团长，于七月十八日开训。

此一训练团，举办了三期，受训结业学员七千五百多人，为国民党以及政府和军队的干部，担负重要任务。

在开学典礼中，蒋总统以“庐山训练之意义与革命前途”为题发表演讲，要求效忠党、国，发扬勇敢奋斗精神：

‘……在这次训练中，我们每天早晨一定要向国旗党旗敬礼，唱代表党和国家的党歌，以养成敬爱国家和党的心理与习惯；也就是我们对“国家”、“党”、和“主义”一种诚敬的精神之表示。……

‘我们这次召集大家到这里来训练，其目的是要练习打赤匪的本领来消灭赤匪，并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新国家。……

‘无论是和一个人打，和敌军全部打，或是和敌国来打，我们要想战胜敌人，一定要自己有力量。……

‘我从前在广东也和一般军官讲过：

‘和敌人拚命到底’

‘我们做一个军人，就要有“宁死不屈”的战斗精神，和敌人拚命到底！我们每个人有一条枪。枪，本来是用子弹打死敌人；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子弹的时候，是不是就不能打呢？不然，我们子弹打完了，枪上还有刺刀，我们可以用刺刀来杀死敌人；刺刀用坏了的时候，我们还有枪杆可以打敌人；枪杆也打断了的时候，我们还有两个手、两个脚，可以用拳来打敌人，用脚来踢敌人。——这都是天地父母为我们生来打敌人的！

‘我们如果两个手、两个脚都断了，或不能用了，我们还有一个口，口里有牙齿，可以咬敌人；有舌头，可以骂敌人。

‘所以，我们既要做一个革命军人，一定要把这些天生的武器用尽。——牙齿掉了，舌头断了，然后才可以去死，才可以成功一个真正的革命军人和总理的信徒。……

‘以后，我们要想到剿灭土匪，湔雪大家的耻辱，唯一要紧的事情，就是要培养全军的信仰。所谓信仰，即我们做一个革命军人，一定对自己要能自信，对部下要能信任，对主义和上官，尤其统帅，格外要能信仰。……

‘所以，这次训练期间，一定要注意恢复并培养大家的“自信力”、“信任力”与“信仰力！”’

决定具体战略

庐山军官训练团开训的时候，正是一九三三年的长夏盛暑季节。

蒋总统尽可能地抽出时间来再三亲临讲堂，对学员们耳提面命。因为预定在十月间开始的第五次剿匪战争，是攸关国家、民族存亡兴衰的一仗，所以要使干部们能有充分的了解。

团训内容，有“剿匪手本”、“剿匪训练要旨”、“民众组织”、“战时政治工作”等要目。

七月二十三日，在总理纪念周以“现代军人须知”为题，发表演讲，提示——当长官的人能得兵心的四个要诀：

一、赏罚严明，恩威并济。

二、为国家、为民族、为革命．为主义而牺牲，是军人最大的目的。——要明白告诉部下。

三、个人生命，与整个民族历史的生命交流合一，要继续发扬这个共同的生命，并且要将这个生命的真义向部下讲明。

四、军人的责任，是保护国家、发扬民族、安定社会、实行主义。——要使部下彻底懂得目前最近、最大的敌人，就是江西的赤匪。

改编部队建设空军

部队编制，也有所改革。在第四次剿匪之前，政府军一师辖两旅，一旅辖二、三团不等；为了简化指挥系统、提高效率，乃将师和团中间的旅取消，每师均辖三团。并为山地作战，加强斥候及运输部队，俾前方的警戒和后方的补给都有改进。

这个改编工作，于八月底实施完竣。

建设空军的三年计划，也是在此时制定，为援护地面部队剿匪作战，并建成了三个飞机场。

空军部队很快地飞临“苏区”上空侦察照相，发现了匪军在各处配置的机枪阵地；但匪军在白昼则潜伏于森林中，从空中很难侦知他的主力所在。

作战计划，有由塞克将军所率领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参加意见；但具体战术则颇多师承于从前平定太平天国和新疆的领导者曾国藩、左宗棠诸贤。

十月二日，蒋总统在南昌行营召集剿匪部队的师、团长、参谋长等干部举行剿匪会议，决定作战计划，并在会议上要求干部们要具有剿匪作战的决心如下：

‘现在，已经是我们个人、我们革命军和我们国家的成败生死到了最后关头，也就是我们挽救危亡、复兴民族的最后时机，而目前一切的一切其最重大的关键就在乎剿匪。

‘我们这一次剿匪的准备，无论是那一方面都异常充足，消灭赤匪可以说毫无问题。但是最要紧的，我们计划的三年剿匪工作，一定要能于半年以内打破其主力，捣毁其巢穴，使初步计划能告一段落。因为国际环境之险恶，整个大局之危急，已经不容我们再有三年五年来剿匪了。’（注）

在这次会议中，依据“战略攻势，战术守势”的基本原则决定具体战略如次：

〔严密封锁〕

封锁“苏区”，使不能有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的补给，并得不到任何情报。如是，则其经济枯竭，便自然会生存不下去。

〔交通政策〕

切断匪方交通线，同时修筑政府军方面的道路，使运输补给畅通便利。

〔构筑碉堡〕

政府军推进到任何地方，便构筑碉堡，形成封锁线；而沿线碉堡为梅花形，可向四面八方构成火网，使匪军无法通过；而且只要是匪军没有重武器，则虽受到他的攻击时，也可以凭藉碉堡抵抗。

以碉堡构成的包围网，一步一步地推进缩小，则在一年之内必然可以将“苏区”完全收复。

动员兵力八十万人

在五次剿匪时，政府军所动员的总兵力，达六十五个师，计约八十万人。

其在江西当地乃至于湖南、广东、湖北各省部队，则分编为西、南、北三路军，任命何键为西路、陈济棠为南路、顾祝同为北路各军总司令。

剿匪主力的战斗部队为北路军，自“苏区”北方的南城、南丰、临川方面南下进攻；其他部队则构筑碉堡形成封锁线，围堵匪军行动，并援护北路军攻势。

此外，在福建方面部署有自上海调来的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本名“楷”、一二八抗日战后改名“锴”），加强了包围网。

当此时期，共党“中央苏区”啸聚的匪军约十五万人；又在四川北部有徐向前的“第四军团”，湖北中部有贺龙的“第二军团”。而“中央苏区”的匪军主力，则号称“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由共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分别兼任该方面军的“总司令”和“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其所属部队编制如次：

“第一军团”（总指挥林彪）、“第三军团”（彭德怀）、“第五军团”（董振堂）、“第七军团”（萧劲光、每一军团各辖三个师）和“江西军区”（“总指挥”陈毅、辖五的独9[126]2106立团及为地方部队的七个独立团和五个营一个游击队）。

注：蒋总统-“剿匪成败与国家存亡”（一九三三十）

匪军迭受重创

盘踞“中央苏区”的共党匪军-“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其装备据估计有：步马枪约九万余枝，驳壳枪、轻、重机关枪各约三百余枝，迫击炮四十八门，山炮八门；此外，尚有飞机五架，但因在政府军封锁之下，没有燃料。

匪军方面，在政府军的第五次剿匪战争发动之前，便已经进行着“反围剿”的准备工作。

匪军最急切的工作，是征集兵员；他们虽然早就胁迫其盘踞地区居民，采取强行征兵加入匪军办法，但成绩显然很差；所以“第一方面军政委”周恩来八月间（一九三三）在“政治干部会议”上说：“七月分扩大红军计划为一万八千人，但只达到一万四千；现在要求江西红军要扩大一倍。”

匪军征兵民众深受其苦

为了扩军，“共产党中央”于七月二十四日通过了“关于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打出“创造百万红军”口号，加强征集农民参军的活动。

八月一日，首先组织了为驱策工人的少年参军的所谓“工人师”、“少共国际师”两个新的部队，设定征集兵员的目标为在四个月之内由江西提出五万．福建提出一万士兵，并且决定了摊派各县每月应该征集的人数——规定为基层共产党员的重要任务。

像这样的强迫征兵，使民众深受其苦，因而产生了很多悲剧：

在长胜圩，有农民数人因拒绝参加匪军而投河自尽。兴国县的女性，不愿嫁壮丁，因为壮丁会被征召参军，故而宁肯嫁老年人或残废兵。

又在兴国附近的农村，发生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农民被征加入匪军，他因为如果参军则一家五口无以为生，乃拒绝参加。于是，其母与妻便被共匪所逮捕。他迫不得已，表示愿意当兵，请释放其母妻。及至二人获释，他便以菜刀自斩右手四指，说：“我手指已断，不能当兵了！”共产党干部以他“自残身体威胁政府”，就罚他做苦工。

第五次剿匪战事，发动于十月十六日。

当出击命令下达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之后，该路所属第三路军（总指挥陈诚）即向匪军展开攻势。

第三路军先头部队，首先于翌日（十七日）解除了匪军对正面硝石的包围；接着，陈诚即为巩固在前线的黎川，而迅速派兵进驻黎川北面的硝石和资溪桥。

十九日蒋总统由南昌行营出发，到达临川（抚州），亲自督师。

共党方面，则于十八日发布了“为粉碎五次围剿紧急动员令”，命令其下级组织——“用全部力量来进行战争的动员”、“完成扩大红军的计划”、“保证红军的物资供应”、“对于执行命令不够积极者，必须立刻给以严厉的行政制裁。”

匪军同时更拚命发动反攻——潜伏在硝石西北方山区的“第五军团”董振堂部两个师，于十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之间，向资溪桥的政府军展开反扑。

碉堡战术发挥威力

但政府军的碉堡业已构筑完成，遂将匪军在三天之间的反复攻击一一予以击退；于是，匪军只有乘黑夜再度逃窜山区。

资溪桥之战，是在第五次剿匪战争开始后最初一次的重要战役，也是发挥碉堡战术威力的一仗。

在这里大振军威的政府军，确保了南丰、南城之间的交通补给线；同时，碉堡封锁线也逐渐有了伸展。

十一月一日，林彪的“第一军团”和彭德怀的“第三军团”进犯政府军在南城东南的各据点，企图切断南城与黎川之间的联络，以孤立进驻黎川的政府军；但此时不仅碉堡群丝毫未被撼动，且在反击之下，使匪军于六日败退，未能达到其目的。

匪军的第三次攻击，系指向南城北方的浒湾。驻守浒湾附近的政府军，只有三个营的兵力，正在构筑碉堡向南推进中；十一月十日，有匪军“第三军团”和“第七军团”（总指挥萧劲光）的主力来袭浒湾，双方兵力悬殊，政府军处于不利态势，乃据守碉堡应战；旋因在临川之第二路军预备队——邢震南所指挥的第四师——迅速赶来支援，并经空军助战，乃将匪军攻势击溃，此役匪军死伤达三千人。

继之，政府军又在盖云山、大雄关等地将匪军击败。战况已经展开了于政府军决定性的有利形势。

本来，匪军方面是不采用构筑阵地、部署防线的“阵地战”，而只侧重于当遭遇优势政府军时便逃匿山区，但旋即向政府军兵力薄弱的方面游击突击、将之切断、包围的“机动战”。这种战术，直到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时都曾生效，常常陷政府军于苦境。

然而，这一次的情况则有所不同，那一套老办法，对于踏踏实实地构筑碉堡、一步一步推进攻势的政府军，简直就不是对手了。

自十月十六日发动第五次围剿后的一个多月之间，经过了几度战斗，匪军所受损伤极大，只得放弃前线，向南撤退，打算重整体制。

在这个期间，政府军更乘机极力构筑碉堡，逐渐将包围网着实收紧。

正当此时，想不到在福建方面，受任剿匪的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却竟然和匪军搭上关系，发动了叛变。

陈铭枢等叛国

一般所谓“闽变”的叛乱事件，是曾任交通部长的陈铭枢和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等人受了日本与中共的诱惑而发动的。是要在政府内部对于第五次剿匪战争给予严重打击的一种阴谋。

中心人物陈铭枢，当一九三二年元月南京和广东两方面进行统一之际，担任交通部长兼京沪卫戍司令，因受贿案连坐而辞职，一时出国远游欧洲，归途滞留香港，与反国民党人士暨桂系首脑李济深以及共党分子都有所联络，窥伺着反抗中央，组织所谓“新政权”的机会。

当陈铭枢感觉到在香港的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的时候，于是便转赴福建省的福州、龙溪等地，探求同路人。此时他所接触的，乃是因一二八抗日驰名的现任福建省主席蒋光鼐及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

蒋光鼐等人竟然忘记了在福建所负剿匪全责的本身任务，而为陈铭枢所倡建立反中央政权的构想所煽惑。

暗与共匪及日本勾结

当一九三三年十月剿匪战争开始之际，陈铭枢乃把握住这个机会策划与共产党合作；他派出蔡廷锴的秘书徐名鸿为代表，携带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联署书信密致毛泽东、朱德，要求合作。

此时，正为政府军围剿所苦的共产党，不啻大旱之见云霓，乃予以同意，并即于十月二十六日签订了一个“初步协定”，其内容为“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尽速另定反日、反蒋具体作战协定。”

政府方面在察觉有这些活动的迹象时，极希望弭患于无形，故曾一再予以晓喻劝说，但他们则执迷不悟。

蒋总统于十一月十五日留有日记如下：

‘陈铭枢在福建阴谋，以理度之，不致如此；但以今日各方之消息观之，已成事实，唯有尽我心力，竭尽人事，相机应之。’

实则陈铭枢等人的阴谋，不仅是在和共产党拉拢，而且表面上高嚷“抗日”，却暗地里受着日本的支援。

蒋总统是在接到驻日公使蒋作宾于十一月十九日自东京发来的电报，才得悉这个情节。

蒋作宾的报告是这样的：（一）近有人欲在福州作溥仪第二。（二）中日浪人——如张鸥、山田纯三郎等，奔走甚久，似以台湾为策动地。（三）台湾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前晤报界，谓：“满洲工作已了，应向南部进行，尤以福建为重要。”

此时，在福建方面，蔡廷锴等人所属部队业已有险恶的行动出现。

信寇联敌背叛中央

‘闽逆接收中央银行，强占要塞，叛迹已着，不久当必公开。彼辈冥顽不灵，受倭寇之利诱而不知。……一面受共匪煽惑，与之妥协，以为可以互不侵犯。呜呼！信寇联敌，而背叛中央，尚自称为得计。于吾讨逆，虽无问题，而剿匪已受影响矣！’（十一月十九日日记）

十一月二十日，陈铭枢等人在福州举行所谓“人民代表大会”，自称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宣告叛国，连年号都擅自改称“中华共和国元年”。

陈铭枢等人，复纠结在国民党、共产党以外的所谓“第三党”等各派以及其本人属下的“读书杂志社”、“孤军社”人士暨一部分十九路军与福建省政府干部组织“生产人民党”，于二十一日通电脱离国民党。在这群人中，并且包括有旧西北军失意将领在内，真正是一个五方杂处的“游杂部队”。

及至二十三日，日本在幕后的活动，越发浮现出来。

‘顷据报——闽变确与日方取得谅解，先经沙面日领与真如（陈铭枢）磋商，由台湾总督给陈三百万为发动费，日海军在华当局已与陈订立条件如次：

‘（一）保证消灭抗日排货运动。

‘（二）保障日本人及伪满人生命、财产、经商、住居之绝对安全与自由。

‘（三）废止美国与南京政府订立在闽建筑之机场。

‘并约“独立政府”成立后之进展，须随时接收日方询问，但日方不得干涉各事之处置；驻闽之日海军亦不以兵力干预或阻止独立政府之行动。’（十一月二十三日日记）

国民政府立即向驻上海日本领事馆查询是否有此事实。领事馆承认福建与日本海军之间确有协定，但对与台湾总督资助三百万元一节则予以否认。

可是，福建的伪政府总之已由某一方面得到多额金钱，且将其中一部分分送中共，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顷据报——（一）共党派彭德怀妻及罗炳辉在福州与伪府商量结果，伪府以九十万元接济共党，三十万现款，三十万购买枪械，三十万购其他军用品。’（十一月二十九日日记）

此外，由福建方面运送的粮食，也连接不断地进入了共党所盘踞的“江西苏区”。

政府敉平“闽乱”

蔡廷锴所指挥的福建叛军，有五个师，兵力四万余人，其主力部署在闽北地区，一部分则驻扎于福州及漳州（龙溪）附近。

下令出师讨伐叛逆

在陈铭枢等宣称“独立”的翌日（十一月二十一日），蒋总统下令第二、第四、第五路军（十一个师）讨伐叛军，并亲自指挥。

同时，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亦决定永远开除陈铭枢等五人党籍。

当出师讨伐叛逆之际，蒋总统特地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发表“告剿匪将士及各军事长官书”，说明闽变实情如下：

‘陈铭枢企图反叛中央，本蓄谋已久，世所共知。……中正虑其误入歧途，念其前劳，于陈等抵闽之初，两电劝谕，冀戢逆谋；林（森）主席在闽，亦谆谆告诫。讵陈等罔知悔悟，一意孤行，于二十日在福州由黄琪翔、方振武等为主席，开伪“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及所谓“人民革命政府”之伪组织遂以出现。……各军改称为“人民革命军”。宣布废除国9[137]2117民党。改用上蓝下红中嵌黄色五星为旗徽，废青天白日旗。高叫“联俄”、“联共”，实行“农工政策”、“打倒中国国民党”等口号。凑合社会民主党、第三党、国家主义派及共产党之分子，一炉共冶，另组一党，定名曰“生产党”，聚蛇蝎于一寓，矛盾复杂，不可究诘；前途如何，变幻虽不可预料，然彼辈实毁党害国，藉抗日以与日妥协，藉剿共以与共合作，则事实昭然。’

此时，驻日公使蒋作宾曾向日本方面提出：日本政府及日本人对于“闽变”不得有所干预之要求。

日本外务省唯恐日方支援中国叛乱的情节被正式暴露，故而表示：“我们认为闽变将如昙花一现。”同时承诺：“日本政府决不给予援助，日本人也不致参与其事。”这样一来，陈铭枢等的后盾之一，便被撤除掉了。

在讨伐军全面进攻之前，蒋总统先派飞机飞临叛军驻地上空，散发传单，号召官兵反正来归；然后，政府讨伐部队则自江西金溪、南城临川、崇仁一带同时出发，越过省境，进击闽北。

共产党的作风

因政府军入闽讨伐而大为慌乱的叛军，虽曾依据在先签订的“初步协定”，约好共党来援，但实则共党竟然是对之坐视不救。

盖起初共产党佯称派遣匪军第三、第五、第七军团赴援，但旋于中途折回。十二月十二日且发出指谪陈铭枢等的宣言，大意说：“这一（福建）政府还不是人民的，而且还不是革命的。……是欺骗人民的新把戏。……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第三条出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惨酷的失败。”

共产党的作风，就是将人利用到了最后之后，便像丢弃垃圾一样地弃之不顾。

完全孤立了的叛军，根本就没有能作什么抵抗，而政府方面各路讨伐部队很快地便在十二月底推进到顺昌、建瓯、东游、屏南之线。

新年（一九三四年）元旦，政府军展开总攻击。

五日，第五路军所属第九纵队指挥官刘和鼎率领第四、第三十六、第五十六各师进攻为通往省会福州之闽江要冲的南平（延平），叛军被解除武装。继之，第四纵队指挥官李延新所属第三、第九师更沿闽江而下，七日收复水口，近迫福州仅距八十公里。在水口的叛军指挥官谭启秀则乘装甲轮船逃亡闽江下游。

最顽强的抵抗，是在福州西北约一百公里的古田。此处为叛军右翼据点，由赵一肩率领三团兵力自上年十二月初在此布防，利用险要地势负隅抗拒。

自五日至六日之间，第二纵队指挥官王敬久率领第八十七、八十八两师，进攻古田。

蔡廷锴为期死守古田，拟亲率援军赶往增援；但此时南平、水口相继易手，而古田在他到达之前也陷于孤立，于视赵一肩乃于十二日归顺中央。

蔡廷锴于十三日渡闽江南窜。当时，停泊在闽江口未曾附逆的海军部队乘势进攻福州，立即将之收复；同时，厦门也被海军所克复。

陈铭枢等逃亡香港

“闽变”的主谋者陈铭枢、蔡廷锴以及李济深、蒋光鼐等人旋即相率逃亡香港，伪“人民政府”烟消云散。在这段过程中，始终袖手旁观的共产党，更于元月二十六日指明陈铭枢等人加以批判，并讥评他们“冒充革命，向美国和日本献媚，是骗人的儿戏。”

受蔡廷锴等人所操纵利用的第十九路军，在叛乱平定之后，被政府将之改编为剿匪军第七路军，任命毛维寿为总指挥。所谓“闽变事件”，不到两个月便归扑灭。

三面围攻“苏区”

福建叛乱平定之后，蒋总统于元月二十二日（一九三四年）自建瓯乘飞机回到南京，出席中国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

全会推举林森再任国民政府主席，于二十六日举行宣誓就职典礼。

此时，首都各界并举行了“庆祝国民党四中全会”及“欢迎蒋委员长讨逆凯旋大会”。

国军完成包围网

政府方面的次一目标，是再度动员主力进行第五次的剿匪战争。在江西的剿匪地区，除公路之外，并已建筑了二千九百个碉堡，对匪军的包围网业已完成；此后，只是需要一步一步地缩小包围而已。

在这一段期间，剿匪主力部队——就是由陈诚率领的北路军第三路军，已开始自江西黎川南下，其他各军也出动进击。

陈诚所部由黎川向共党“中央苏区”的北部纵贯而下，进攻在直径距离约七十公里南方的福建建宁。

元月二十七日，政府军挺进到赣闽两省交界处的邱家隘、赛头隘，这一带为山谷地区，羊肠曲径，形势险要，果然不出预料，遭遇到匪军第九军团及第一军团第二师的激烈抵抗，经过苦战之后，终于二月二日攻克这两处；于是联系横村、樟村及赛头隘、邱家隘的碉堡线乃得构筑成功。匪军则于此役死伤千余人而后向南逃窜。

蒋总统续亲自指挥剿匪

二月九日，蒋总统处理闽变之后的福建局面完毕，回到南昌行营，继续亲自指挥剿匪战事。

首先，和行政院长汪兆铭联名发表通电，重申剿匪要旨；随即任命陈诚为北路前敌总指挥，又任命在福建讨伐闽变任务刚毕的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加强进攻部署。

另一方面，共产党在瑞金的“中央苏区”则于元月十五日开始举行其“六届五中全会”，元月二十二日接着召开其“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伪“福建人民政府”瓦解、政府军再度进剿的消息到达“苏区”，是在他们会议高潮之际。元月二十九日，正当林伯渠作“经济报告”时，毛泽东突然提出“紧急报告”：“国军（政府军）已经平定闽变。现在，东路国军已经由福建沙县攻下归化、清留、泉上，指向石城、瑞金；中路以北路军的第三路军为主力，自黎川向广昌、宁都进击；另一路则以北路军的第六路军为主力，由永丰经沙溪向兴国推进。”

当时参加“苏区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六百九十三人、候补代表八十三人，骤闻闽变业已失败，“中央苏区”即将受到来自三方面的围攻，都为之惊惶失措，于是，便缩短“大会”日程为五天，于二月一日草草收场。

毛泽东受严厉批评

在这两个会议中受到最严厉批评的，是毛泽东。而站在反毛立场的，则是秦邦宪（又名博古）等留俄派；他们批判毛泽东的理由是——“毛泽东在进行调查、没收地主富农土地的所谓‘查田运动’中，任意包庇，犯了右顷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的错误。”

又对于过去在“反围剿战争”中毛泽东所采的游击战术提出批判：“是退却逃跑，是三国志式的战术。”

结果，毛泽东的伪“人民委员会主席”地位被剥夺（仅保留“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名义），由张闻天继任，主要职位都归于留俄派掌握。

毛泽东的战术，也被“短促突击战术”所取代。

这个新的战术，是由第三国际派遣前来担任中共军事顾问的德国籍共产党员李德，为谋对抗政府军优势火力与碉堡战术而设想出来的。其方法是：首先构筑适合于攻防的支持据点或堡垒阵地，以防御飞机和大炮的轰击；同时，瞅准了政府军自碉堡出击时，便进行闪电式的“短促突击”，以图在政府军增援部队尚未到达之际一举解决之。并且尽可能地利用夜晚、雨天、雾天、森林等掩护，接近敌人（政府军）进行白刃战。

“短促突击战术”，立即付诸实行；可是，在优势政府军的凌厉攻击之下毫未奏效。匪军被迫往广昌退却，政府北路军衔尾疾追，也指向广昌。

另一方面，政府东路军则由福建西向推进中——第十纵队汤伯恩所指挥的第四师，于二月二十四日进攻闽变期中盘踞沙县的匪军，在匪军被击毙四百多人、政府军伤亡二百多人的激战结束之后，政府军将该县收复，更继之进占将乐、泰宁、明溪（归化）各县，匪军终于崩溃。三月底，第十纵队与由北南下的北路军第三路军在德胜关会师，福建省内的匪军，差不多已完全被驱逐离境。

广昌攻略战

四月九日，陈诚率领的北路军着手进行广昌攻略战。

广昌为共党“中央苏区”瑞金的大门，是故共党对于广昌的防卫，乃为第五次剿匪战争的决战之役。共党厚集主力于此，并且仿效政府军战术，构筑极多堡垒群，决心在此一决胜负，以图突破包围网。

广昌会战大胜

四月九日，陈诚以罗卓英指挥之第五纵队为河西纵队，樊崧甫指挥之第三纵队为河东纵队，延通往广昌的盱江两岸并肩南下。

匪军方面，采“短促突击战术”，企图遏阻政府军前进；而受到其相当困扰的则是河东纵队。

匪军以“第三军团”为主力，由彭德怀的第四、第五师在大罗山构筑防御据点。四月十九日，河东纵队进攻大罗山克之，匪军为争夺该处阵地，拚死反攻过来。

此时，正逢春雨连绵，阴云四合，彻夜激战。及至二十一日拂晓，在三天两夜之中白刃交挥，浴血肉搏，阵地五度失陷，六度夺回，实在是一场最激烈的战争。其结果是匪军败北，彭德怀等向广昌遁逃。

大罗山的胜利，已经决定了战局的趋势。

共党实行“赤色恐怖”

共产党及匪军首脑秦邦宪、周恩来、朱德、李德、彭德怀等人聚集广昌，急忙商讨防卫计画，遂即发表“给战地党和苏维挨的指示”，要求：“动员群众武装起来”、“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实行赤色恐怖”，以谋加强防卫广昌的工作。所谓“实行赤色恐怖”，就是凭非法暴力行为为压制手段，以肃清反对派，并驱策群众参军参战。

伪“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在四月二十七日的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发表“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的论文，可见他们是要倾全力决之于此一战役。

四月二十七日黎明，广昌一带刮起一阵使人有初夏季节温暖感受的强劲东南风，朝向攻击9[147]2127前进的政府军扑面吹来，虽则在如此恶劣条件之下，但河西纵队与河东纵队仍然互相呼应，会攻广昌。

广昌四周，高山环峙，实为一天然要塞，加以匪军构筑之堡垒林立，遏阻着政府军的进路。

展开行动的河西纵队，首先进击匪军第三军团两个营据守的巴掌山。当时，有空军及炮兵协同作战，即将巴掌山最高地点的匪军堡垒十余座摧毁，乘匪军张惶失措的空隙，出动步兵突击，获得胜利。

突破了这一道阵线之后的河西纵队，接着进攻西华山、摇篮寨，拿下了西华山东北面各高地。当时西华山的匪军，是由彭德怀所直接指挥，他调来匪军步兵学校学生数百人冲上火线，但受到政府军的反击，伤亡殆尽。

此外，在反复多次阵地争夺战之后的清水塘、莲花山方面，也由于炮兵与空军的助力，终于将之攻下。就在当天，屏障广昌附近的匪军阵地，都被政府军解决。

冒雨冲锋攻入广昌

翌日（二十八日），第三路军总指挥陈诚下令进攻广昌县城，政府军冒倾盆大雨，冲锋前进。

9[148]2128匪军凭藉多数堡垒负隅顽抗，但政府军以山炮、迫击炮集中轰击，步兵奋勇冲杀，将堡垒网陆续突破，及至上午九时卅分，第二七三旅攻进广昌县城。

同时，政府军各部全线进击，并将广昌东南、西南要地全部占领。

于是，在第五次剿匪战争中决定成败的这一役-“广昌会战”，政府军已获得了彻底的胜利。

与广昌会战同时并进的，是北路军右翼部队也发动了攻击，截至四月九日，将善和、招携一带匪军先后逐退，五月一日，收复了龙冈。

另一方面，自福建西向挺进的东路军，由汤伯恩指挥第十纵队进入泰宁之后，即与北路军第八纵队并力于五月十六日克服了匪军大根据地之一的建宁。

至此，剿匪部队已经东及建宁，中克广昌，西达龙冈。

自五次剿匪战争开始以来，不过在七个月之间，便使原来窃据范围甚广的所谓“中央苏区”被压缩到只剩下了宁都、兴国、石城、瑞金、雩都、长汀之地，给予共产党以极大的冲击。

“广昌会战”失败之后的五月上旬，共党举行紧急会议，研讨当前战局与今后作战方针。

当时，毛泽东在会议中提出主张：“把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分作四路，向福建、浙江、江苏、湖南进军，吸引政府军分散兵力，然后再收兵回赣，恢复苏区。”但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支持他这种等于是自杀的意见。

对于德国军事顾问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术”，也有人表示疑问；但李德本人却摆出一付懔不可犯的面孔说：“失败的原因是敌人的力量过大，并非战术运用错误。”

在会议中，有人主张放弃“苏区”，流窜湖南；也有人主张死守“苏区”，意见分歧，得不到结论。

最后，采用了共党“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的折中意见——就是在石城以北建筑坚强的防御工事，构成瑞金的防卫线，以阻延政府军的进攻，俾争取时间，扩充匪军兵力，打破围剿。

消灭“中央苏区”

照着共产党新决定的战略，匪军即行展开准备工作。

一方面，在石城北面的驿前构筑防御工事；一方面，所有“苏区”各机关都集中全力紧急征集兵员。同时，并派项英去闽赣边区，刘少奇去福建，分别指挥征兵工作。

当时，伪“中央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在五、六、七三个月之间有六万三千人编入匪军；可是这些新兵实则多数在中途逃跑回家。

共匪搜括民食

对处于迫蹙情势之下的共产党来说，粮食的供应也是一个重大问题。他们以六、七月为“粮食突击”期间，向农民强征谷子二十四万担；尽管如此，还是不够满足，更于七月二十二日决定到秋收时再“借谷”六十万担，并且还加上征收“土地税”。

像这样地“借谷”和“征收土地税”，合计强征粮食达百万担之多；而此时的“中央苏区”已经缩小到只有六、七个县，从这么一点地方征收百万担食粮，岂不是等于迫使民众挨饿？然而，困穷达于极度的共产党和匪军，毫不考虑民众的苦痛，而只顾括尽他们最后的一粒谷子。

在政府军方面，为乘匪军动摇情势加以打击，已在作赓续进攻的准备。

五月下旬，北路军序列的陈诚所指挥之三路军自广昌指向石城，薛岳所部六路军由龙冈进取古龙冈，蒋鼎文的东路军则向长汀挺前，--分别下达进击命令，对共军根据地瑞金，形成三面合围的态势。

七月九日，六路军攻占天府山，近迫匪军防御据点驿前；匪军第一、第三军团之一部及第七军团赶来增援，赤帜红巾漫山遍野，大举反攻，企图夺回天府山；当时，守备该山的政府军第十四师一度退却，但旋即获得援军，转采攻势，又将天府山夺回，匪军则败退驿前。

驿前被李德、周恩来等人部署为保卫“中央苏区”的最后据点，构筑有坚强防御工事；是故对于政府军来说，乃为第五次围剿战争最后决战的一役。

匪军两师长归顺

匪军改变了以往的“游击战术”，采用“阵地战术”——在自驿前北面的大岭格到驿前一带高地的纵深二十里（约十二公里）地区构筑有堡垒棋布、网状堑壕的工事，严阵以待，准备死守驿前。

八月十四日，政府军第六十七师在炮兵与空军掩护之下进攻大岭格。匪军抵抗激烈，该师所属两个团陷入匪军火网，伤亡殆尽。

于是，攻势一时受阻，等殆自南昌行营运送十二门山炮前来。

山炮于八月二十八日运到前线，立即再度发动攻击。由于山炮集中轰击及飞机十二架出动轰炸，将匪军堡垒阵地攻破，而于三十一日克服了驿前。

自二十八日到三十一日的战斗中，匪军阵亡达二千余人以上；政府军伤亡四百多人。

北路军继续南进，十月四日抵达石城。

此时，匪军已经濒于溃灭状态，其第十三师师长孔荷宠、第四师师长张翼等人都先后向政府归顺。

匪军向西方逃窜

十月十四日，共产党终于决定了放弃瑞金，西向逃窜的方针。

朱德、周恩来等所率领的匪军主力约十万人，以林彪的第一军团、彭德怀的第三军团为前锋，开始突围；十月二十七日，在信丰附近突破南路军的包围网，向西方逃窜。

自此之后，他们漫无目标地乱窜了二万五千里（约一万四千公里），逃到了陕西延安一带。

东路军第十师由长汀挺进，继续扫荡游击化的残余匪军，及十一月十日克服瑞金，已是在共党匪军逃窜之后。

至此，在江西省的共党“中央苏区”已归于彻底消灭；只是共党主力漏网西窜，乃在中国历史上遗留下重大祸根。

政府重建新收复区

多年以来，陷于共产党暴政和掠夺之下的江西许多村庄，实在是惨不忍睹。逃难四方的村民们，听说政府军业已收复了他们的村庄，便陆续回归家乡。此时，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让他们恢复心理安定，安度有新希望的生活。

‘我们当前要改革政治，要发挥我们的革命力量，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应当从那里做起呢？或者说从什么地方做起最容易成功呢？当然就是在我们革命武力所达到的地方——新收复区。……因为在匪区以内，整个的社会已被土匪破坏无余，成为荒凉废墟，人间地狱，我们革命军一到，一般民众就等于重见天日。同时，一切的一切要从头做起，而且亦必须从新做起，这样一种情形，就是最利于我们革命建设的一个新时势和新环境。’（注）

被称为“中华民族精神武装”的“新生活运动”，就是从这个构想中产生出来。

注：蒋总统-“革命成败的机势和建设工作的方法”（一九三三十一）

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是在精神方面一个重大的战争。

当日本军阀侵略和共产党叛乱-内外夹攻的艰难时刻，须得改造国民性以适应新时代；质言之，就是树立新国家基础的一种“树人运动”。

新生活运动的肇始，是在第五次剿匪地区的江西。由于共产党的叛乱活动而有欠安定的江西省，青年们的散漫情形，颇为显著。

改造社会并非难事

‘我（蒋总统）去年初来（江西）的时候，看到的几乎无一个不是蓬头散发，有扣子不扣，穿些不合式的衣服，和野蛮人一个样子；在街上步行或是坐车都没有一个走路坐车的规矩；更不晓得爱清洁，甚至随地吐痰。还有，看到师长不晓得敬礼，看到父母也不晓得孝敬，对于朋友更不知要讲信义。——这样的学生，这样的国民，如何不要亡国？

‘前几天，我还在街上看见一个小学生吸纸烟，这样还得了吗？他做学生的时候就要吸纸烟；再长大，不会吸鸦片烟吗？

‘当时，我因为车子走得太快，未能加以告诫；你们一般教职员或警察应当也看见，就该告诫。一个地方有这种现象发生，还没有人来管，就是我们所有负有教导国民的人的责任。

‘如果我们平时能留心管束，并以身作则来教导，我想决不会有此现象。

‘转移风气，改造社会，并不是什么难的事情，实在还很容易，只要我们各界领袖能够以身作则。……’

这一段故事，是蒋总统于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九日在南昌行营举行的扩大总理纪念周席上以“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为题所作的演讲。这就是新生活运动的开端。

当时在中国常常被举为国家大患的例子，是“贫”、“愚”、“私”、“弱”四个字；但9[157]2137是，中国的资源并非贫穷，中国人的天赋更非愚拙，盖贫由于奢，愚由于惰，私由于不知耻，弱由于不自强。新生活运动就是要将这样的日常习惯作革命性的改造。

以德国为例

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讲中，蒋总统更举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败北后经过十几年之间复兴起来的德国为例，督勉国民奋起：

‘我们要改造社会，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是用武力能成功的。要如何才可以成功呢？简单的讲，第一、就是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道德；第二、就是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知识。道德愈高、知识愈好的国民，就愈容易使社会一天比一天有进步，愈容易复兴他们的国家和民族！

‘比方讲：德国的复兴，就是一个最好的先例。德国自从欧战失败、签订凡尔赛和约以后，整个国家在各个战胜国压迫干涉之下，一动也不许动，尤其是关于军备更受严格的限制。——即如陆军就限定最多不得超过十万，拿来和列强比较，可以说他们的武力等于零；虽然他们没有武力，但是还不到十五年工夫，居然能够复兴起来，和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并驾齐驱。

‘这是什么道理呢？……

‘再拿德国的情形来和我们中国比较——德国没有大的武力，而我们的陆军比德国要多几9[158]2138十倍，海军、空军也有；德国的人口仅有六千万，我们的人口四万万；再讲德国的土地，格外不能和我们比。

‘但是，人家要求军备平等就是军备平等，要想取消赔款就能取消赔款；而我们中国不要讲不能根本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连到提议修改也没有人理；我们几十年或百多年的赔款，现在还是每年要照付。

‘总之，德国也是一个国家，中国也是一个国家，德国没有武力而能够与各国平等，中国虽有武力依然不能求得平等，这是什么道理？

‘没有旁的，完全是由于我们一般国民的知识道德不及人家。……

‘所以，今后我们要求平等，要想复兴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一定要根本上先从提高国民的知识道德这一点来做。……

‘外国人对于一个文明的国家和民族，才肃然有所敬畏。德国之所以要求平等而各国不敢拒绝他，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中国何以不能获得平等，而且还要一天天被帝国主义者侵略压迫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一般国民无论衣食住行都不能如同我们的古人和现在外国人一样合乎礼义廉耻！’

人要懂得做人的道理

所谓“生活革命”，并非是徒事除旧革新。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人之所以为人，就是懂得做人的道理——明礼义，知廉耻。

‘从实际生活上讲，就是要做到“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如此的生活，才可以叫做“新生活”；过新生活的人，才配做一个新时代的人！’

“礼、义、廉、耻，”是先贤管子所揭橥的为人之道，是构成中华文化的骨骼。从这个意义说来，新生活运动，也就是复兴中华文化的运动。

礼义廉耻

当宣示“新生活运动纲要”的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九日，同时在南昌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蒋总统亲自担任会长，率先领导推动运动。

首先以江西省为重要地区，目的在对受共产党蹂躏最甚的江西人心加以改革，再以之为示范，推广及于全国。

为了让民众对于运动的意旨能有所理解，特地为运动的中心规律“礼、义、廉、耻”立下定义如左：

‘“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

9[160]2140‘“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

‘“廉”是清清白白的辨白。

‘“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

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

同时，又举出“三化”的原则为具体的实践目标：

军事化并非武装全国同胞走上战场，而是重组织、尚团结、严纪律、守秩序；一洗从前散乱、浪漫、因循、苟安的习性。

生产化养成节约、刻苦、勤劳、自立的精神；一洗从前豪奢、浪费、怠惰、游荡的习性。

艺术化期于持躬节物、容人处事能肃仪循礼、整齐清洁、活泼谦和、迅速确实；一洗从前粗暴、鄙污、狭隘、昏愚、浮伪之习性。

要从实际生活做起

为达成这些目标，首先由眼前的、浅近的问题着手。

‘新时代的人，绝对不是吸烟、拍香水、随地吐痰、蓬着头发、拖着鞋子、扣子不扣，帽子歪戴的这一类的人

‘现在，我们要救国，要复兴民族，并不需要讲求怎么高深奥妙的道理；就是要从实际生活起做到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几件很平常、很粗浅的事情；就是要从“家常便饭”做起。

‘古人云：“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希望大家抱此决心与精神，将过去不适于现代的一切野蛮生活彻底改革；一切新的生活、新的运动、新的事业，统统要从今天开始！’（注一）

对每天生活行为的准绳，则提出“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六个标的。

在南昌，有二百组以上的学生团体展开大众宣传工作。南昌一地设有十三个讲演站，由这些新生活运动的指导员逐日不断地从事大众启蒙的工作。晚间则举行提灯游行，在街角到处张贴“不要吐痰”、“清洁可以防病”、“消灭蝇鼠”、“戒酒戒色戒赌”等标语，市民生活一片新生气象。

全国各地响应

三月十一日，南昌举行了一个十万人的民众大会，决议把新生活运动普及为全国性的规模；于是，全国各地立即有响应活动，相继设立分、支会。

三月十七日，首都南京也举行了包括行政院长汪兆铭等都出席的规模盛大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大会；又在北平、广州等地也纷纷有同样的集会。

很快地，这个运动便扩展到国内二十省、一千一百县；国外，则在日本、朝鲜、爪哇、马来等地的华侨社会也设有支部，中国同胞的精神为之一新。

还有，新生活运动对于自一九二八年开始的禁止鸦片运动，也发生了进一步雷厉风行的效果。

中央政治会议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将剿匪地区的禁烟（鸦片）委员会工作委任军事委员会指挥监督，军委会决定对于吸鸦片之烟毒犯处以包括死刑的严重处罚，同时更致力于督导染有烟瘾者戒绝毒瘾，重新做人。——结果，使中国社会多年来最大病根之一的烟毒危害，一举而迈向被扑灭的途径。

蒋总统新生活运动构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日本留学时代的体验。

‘日本人以前也是随地吐痰的，但是自从明治维新以后，一般国民都晓得非改革这一种习惯，不足以与各国国民讲平等，所以统统能改过来；以后他们吐痰，就吐在自己随身所带的纸头内。

‘他们（日本人）一切的行动，在有形无形之中都合乎礼义廉耻，他们这样的教育几十年教下来，然后才造成今日这样富强的国家。’（注二）

蒋总统早年在新泻县高田的炮兵联队见习时代（一九一○～一二年），从用冰冻的冷水洗脸、天色未明的时候饲马，每餐一碗冷饭等严格的军队规律生活中所学习到的东西颇为不少。

再往前追溯，则王太夫人严格的母教，更是最初身体力行的准绳。

因新生活运动而焕然更生的中国人精神，对内——足以杜塞共产党的可乘之隙；同时对外——也成为坚持贯彻在不久之后所兴起的对日全面抗战的支柱。

蒋夫人协助推进

特别不能遗忘的，是蒋夫人宋美龄女士的功劳。她极力主张：妇女是改造家庭生活的原动力，她向全国女性呼吁：“知识较高的妇女，应当去指导她们的邻舍，如何管教儿女，如何处理家务，并教导四周的妇女读书识字。”并且在妇女中也推进了组织性的活动。及至对日抗战时，无论在前线或后方，不断从事对官兵慰劳、治疗等服务团体——“战地服务团”、“奖励荣誉官兵委员会”、“战地之友”，都是以蒋夫人为中心而推动的工作。

蒋夫人并且将为西欧人所不易懂得其意义的“礼、义、廉、耻”四字译成英文——“礼”译作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ｙ，“义”译作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ｎｅｓｓ，“廉”译作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耻”译作Ａｓｅｎｓｅｏｆｓｈａｍｅ，俾供外国人理解。

注一、二：蒋总统-“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一九三四二）

伪满的“帝制”

走向称霸亚洲途径的日本，在退出国际联盟之后，胁迫中国签订塘沽协定，急急于加强侵略华北的部署。

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更指使在其卵翼之下的伪“满洲国”施行“帝制”。

日本在中国东北制造这个傀儡组织——“满洲国”，已经是届满两年，但由于其阴谋被揭穿于国际联盟，所以除日本之外，在国际间没有一个国家对伪满给予承认。日本为了要造成“满洲国”的既成事实，煞费苦心，而使之公然改行“帝制”，也就是为了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因此才要原为“执政”的溥仪僭称“满洲国”的“开国皇帝”，年号则改称“康德”。

成了日本的“儿皇帝”

施行“帝制”，固然为一向意图清廷复辟的溥仪所梦寐以求的目标，然而，日本所打算的、和溥仪所希望的，却完全是各异其趣。

盖日本所给予的“帝制”，充其量只不过是以日本的天皇制为范本。使之成为类似日本政体的一个分支机构而已。

溥仪对于他的“登基大典”本来主张采行中国历代皇帝的传统仪式，故而派遣他的“御用挂”（类似侍从武官长的职务）吉冈安直秘密前往北平他的父亲醇亲王载沣家中，取来清朝皇帝即位时穿着的大礼服-“龙袍”。

但却没有料到日本方面竟然不允许他那样作，以致在“郊天祀典”中虽然穿上了“龙袍”，但继之举行的“即位仪式”则不得不换着因袭日本天皇服式的所谓“满洲国陆海军大元帅正装”。关东军是要在服装方面强制溥仪认清自己已经不是“大清国皇帝”，而是日本属国的“满洲国皇帝”。

关东军并且更命令溥仪和伪“国务总理”郑孝胥说：“满洲帝国的一切仪注，应以日本皇室为规范；大清帝国的旧制，绝对不可以因袭。”其后，日本更强迫要求溥仪奉祀为日皇祖先偶像的“天照大神”，并且为天照大神建造所谓“国庙”；此外，日本更将为日皇表征的“三种神器”之中的“剑”和“镜”之模造品分授给溥仪。

在溥仪“即位”的当天，和日本交换了两份公文，一份是互相庆祝的公开文书，另外一份则是秘密文书。这份秘密文书是基于前在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签订之“日满议定书”的旨趣，重申“满洲帝国的外交、军事等有关事项，充分坦诚地和日本帝国进行协商。”也就是再度确认其属于日本控制之下。

国民政府发表公告

对于伪满之施行“帝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特地于三月十一日发表公告，宣布惩处溥仪等的卖国行为——

“……比者，伪组织改称帝制，群情愤激，环请讨伐。惟政府始终认定：此等傀儡，初无独立之人格，不成为讨伐之对象；而迹其卖国行为，自应与危害民国同科；其他败类，如有附和伪组织、阴谋扰乱等情事，政府必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及惩治盗匪条例，从严处置，决无宽贷。……”

此时，孤立于国际之间的日本，所最恐惧的，是中国和美、英乃至其他国家加强在经济方面的合作。

因为饱受日本侵略的中国，已曾陆续接到西方国家有关经济援助的建议，而且在上一年，已和美国签订了五千万美元的棉、麦借款。

日本对于国际间给予中国这一类的援助，也插进手来加以妨碍。外相广田弘毅于四月十三日密电驻华公使有吉明予以指示：“对于外国方面目前对中国的策谋活动，无论其为联合行动、即或为个别关系，总以循破坏方针有以策进，至为紧要。”这是要以阻碍中国和外国亲善关系，以保其所一向主张的——“东亚特殊地位和利益”，俾居于独占的地位。

所谓“天羽声明”

广田的意向，在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于四月十七日向日本国内及外籍记者团所发表的声明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个“天羽声明”，等于是在宣告日本独霸亚洲，招致了国际批评。声明内容大致如左：

“中国方面，如有利用他国排斥日本，有悖东亚和平，或采以夷制夷之排外行动，日本则不得不予反对。又在列强方面，如对于中国有何联合行动，纵使藉口为财政性或技术性的援助，但必然含有政治意义，终于会形成在中国设定势力范围，或将成为国际管理乃至分割中国的开端；此不仅为中国之大不幸，且对于东亚之保全、甚而对于日本，均有带来重大后果之可虑，是故日本乃不得不持反对主义。

“至于各国如各别与中国进行经济贸易上之交涉，日本认为对之并无实行干涉之必要；但如有危害东亚和平之性质，日本则非加以反对不可。

“以上日本态度，衡诸日本一向方针，应可明了；但最近列强正以共同援助等藉词，在华积极活动，故特于此际重新申明日本之立场，应无不合。”

这个所谓“天羽声明”，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以胁迫手段，阻隔中国与列强的关系，使中国孤立于国际间，才好由日本来垄断一切。

日蓄意制造藉口

四月二十五日（一九三四年），日本驻美大使斋藤博在接受华盛顿星报记者采访时所发表的谈话，比“天羽声明”表现得更为露骨：

“日本政府较世界任何他国更其理解中国；中国目前之纷乱状态，乃为一种对日本的直接威胁。

“日本之所要求者，是为中国政府在与外国商人订立任何重要契约时，务必于事前商诸日本。如外国商人漠视此种要求，则中国政府乃不能不负忽视我国警告之责任。譬如中国新近购买之飞机，或为意图于最后以之对付日本者，是故日本终究不能容忍此类情事。……

“任何对华援助，日本认为其适足以助长中国内乱、或为对日本作战之准备，日本必须予以制止。”

我驳斥日方声明

中国政府外交部遂即于四月十九日发表驳斥“天羽声明”的声明如次：

“中国深信——国际和平之维持，端赖世界各国之群策群力；国际间苟欲维持长期之和平，尤须以促进互相谅解之诚挚精神，铲除可成争端之根本原因。世界无一国家，得在任何地方主张有独负国际和平之责任。

“中国既系国联会员国之一，对于提倡国际合作、促成国际和平与安全，认为乃其应有之

义务。中国于努力达到此项目的之际，从无欲中伤任何他国之意，更无扰乱东亚和平之念。

“中国尤须说明者：中国与他国之合作——不论其为借款或技术援助，当限于不属政治之事项；至购买军用品如军用飞机等，及雇用军事教练官或专家，亦仅为国防上之必要，大都为维持本国之秩序与安宁。他国对中国苟无野心，则对于中国力谋建设及安全之政策，殊不必有所顾虑。”

二十五日，外交部更发出第二次声明，再度宣布——不承认日本在远东之任何特殊地位。

至于在国际间，由于“天羽声明”而激起轩然大波，自为必然之事。

美国赫斯特系报纸连日大标题报导此项新闻，并以责备语气批评：“天羽声明，不啻东亚门罗主义的宣言，更是二十一条重演。”

英国方面，反对党-工党-议员立即于十九日在下院质询政府对于“天羽声明”的见解；西门外相也对于这个国际问题颇表重视，特地于二十五日命令驻日大使林德芮查证日本政府的真意。

日政府采推诿态度

日本对于超过其预料程度的国际反应，相当惊恐，于是，外相广田弘毅乃在答覆英国方面的查证时表示：“尊重国际间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藉资弥缝。

对于美国方面，广田则于二十六日将“天羽声明”的英译抄件面交美国驻日大使格尔，并有所解释；而且这份声明原文中的刺激语气，在英文译本中也改用了一些比较温和的措辞。

“天羽声明”是经过日本外务次官重光葵认可之后才发表的。但在发表之后对于国际反应感到惊恐的日本外交当局，乃诿称此为天羽个人擅自发表的文件，并非日本官方见解。

制造藏本失踪事件

就在此时，又连续发生了刺激中国人对日感情的事件。

其一，是日本驻南京副领事藏本英明的失踪。

藏本于六月八日晚间说是到南京下关车站送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登车，而出门之后，便断绝了消息。

中国方面的警备司令部及首都警察厅接到日本领事馆有关藏本失踪的报告之后，便全力展开搜索，并宣布对于发现藏本者悬赏一万元。

但藏本踪迹杳然。于是，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乃电达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指示：“外国公使馆员在中国首都失踪，竟然寻觅不到，殊为近代国家所不应有之不幸事件。如果南京政府不能具有查明此一事件真相之能力，日本政府则对于其警察职能难以信赖，爰是为保护公使馆员之生命财产，乃不得不为重大之考虑。”

须磨奉命之后，遂即向中国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汪兆铭提出强硬照会：“国民政府处理此一事件如有迟误，致发生不测情况，其责任应由中国方面负之。”

日本陆军当局，则更举出在九一八事变前所发生的“中村大尉事件”，两相对照，指称：“此乃中国官宪横暴作风之再度表现”，并摆出“不惜诉诸武力”的态度。海军当即派遣驱逐舰驶达南京江边，采取示威行动。——盖此时的日本，是要以藏本失踪为其武力侵略之藉口的。

未料，藏本却在其失踪第五天的十三日下午被发现隐藏于南京城外明孝陵后山洞穴中。据藏本向中国警察当局自供其失踪真相，乃是“受日本政府之命藏身灭迹，以制造攻击南京的藉口。”实在又是为达目的不择任何手段的谋略。

侮辱压迫我国侨民

又在藏本事件之先的五月二十三日，有侨居日本长崎的中国学生叶木花，由于成绩优秀被日本学生妒忌，横加侮辱之后再行刺死，犯人却获得从轻发落，并且对于叶木花之父叶修仪所提最低限度赔偿费的要求都没有答应。

此外，日本国内对于中国侨民的压迫更与日俱增，当时有在山形县米泽市经营中华料理店的华侨十六人被遣送归国；接着，又有七十二人被迫离开日本。

敌乎？友乎？

指出中、日之间应为“唇齿相依”关系的，是中国国父孙中山先生。盖两国不啻“兄弟之邦”，如启衅端，则为同室操戈，必然招致两败俱伤的后果。

然而，实际上的两国关系，却的确正在逐渐恶化之中。

往年，对于中国国民革命曾经给予助力的日本，不久之后，便站在妨碍中国统一的立场，而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在山东济南揭开了流血历史的第一页（五三惨案）；自此之后的中日关系，一如急坡陡降地奔落向恶化途径，“九一八”、“满洲国”、“侵略华北”——日本军阀的野心奢望，毫无止境一路扩张下来。

在日本——蔑视中国的言论，横行无忌；在中国——反日抗日的憎恶心理，激荡腾沸。拦搁在眼前一触即发的危机，已经是任何人都能看得很清楚。

作一番忠实的检讨

就中国立场来说：像日本这个国家，究竟是敌人呢？还是友人？

结论非常明白：

本来应该是友人，然而，日本却要成为中国的敌人。

‘世上论述中日问题论文，已经很多；就是中日两国政治家及学者所发表的意见，不论专门的或一般的，也已经不少。但我最断言一句，真能从国家终极的利害上打算，不为情感或意气所驱使，或一时错误所蒙蔽的，实在太少；对于问题正面的认识，实在太不够。

‘国际间许多悲剧，都是起因于一时毫厘之差，致酿成万劫不复之祸。

‘为打开中日两国彷徨的僵局，免使愈走愈趋绝路，也为确奠东亚和平、消弭世界战机起见，对于中日问题，实有作一番忠实的检讨、无避忌无隐讳地下一番坦白的批判之必要。’

上面这一段文字，是蒋总统于一九三四年十月所撰成的一篇论文“敌乎？友乎？”的引言。下面接着说：

‘首先，我敢说：一般有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这是就世界大势和中日两国过去、现在与将来（如果不是同归于尽的话）彻底打算的结论。我想日本人士中间怀抱同样见解的，当亦不在少数。但至今为止，不仅没有打开僵局，以更新两国关系的征象，而且也找不到一点曙光，只是苟且迁延，得过且过，任令自然变化。’

蒋总统口述陈布雷笔记

“敌乎？友乎？”这篇文章，在当时，乃蒋总统所口述，由担任相当于幕僚长任务的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陈布雷笔记，以法律学者徐道邻的名义，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在南京发行的“外交评论”杂志。蒋总统发表这篇文章，不用自己署名，而托以他人名义，是要让中日两国读者不为先入观所囿，来阅读其内容；同时，“外交评论”被视为是中国外交部传达党、政中央意旨的机关刊物，发表在这个杂志上，则为表示其立论是符合于国民政府的意旨的。

论文内容，大体可以区分为“情势分析”、“中日两国以往的错误”、“将来的途径”三部分——

为日本借箸代筹

第一部分的重点，是为日本借箸代筹，客观展望日本对华政策的前途：

‘论到日本对中国关系，我们必须将其对俄、对美（与对英）之错综关系连带讨论。

‘盖在一方面，因为日本欲遂行其大陆政策与独霸太平洋的理想，打倒劲敌，混一东亚，所以引起俄、美的嫉视；在另一方面，日本当局所持以欺骗其国民者，谓如不取得满蒙，无以解除日本国防安全之威胁；换言之，就是日本为对俄、对美备战，所以必须经略满蒙。

‘我们以纯客观的态度替日本打算一下。现在，日本如欲东向美国启衅，中国即在其背面；如欲北向苏俄开战，中国即在其侧面。所以，日本如欲对美、对俄备战，如不消灭侧背方面的顾虑，岂但没有制胜的把握，直无开战的可能！

‘但消弭侧背方面顾虑的方法，本来也有两途——一种是以力量绝对控制住这个邻国，使无能为患；一种是与这个处在侧背方面的邻国结成协调关系。’

‘现在，日本人既不从协调方面与中国提携，则日本的打算，显然是采取以强力控制中国的办法。

‘然日本能否绝对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呢？’

无论从战略上或是政略上看来，这个目的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实在太为巨大。

盖要想控制全中国，首先必须以海军封锁中国的海岸线。可是，与中国持有经济关系的欧、美各国，当然不会同意；是则日本便将造成不能不与全世界为敌的立场。

再说，如果用制造“满洲国”的同样手段，在华北或蒙古制造傀儡政权，则至少须要派出二十万陆军。……像这样的动员规模，则势非征召预备役及后备役不可，其结果等于是全面开战。

注：文内‘……’中之文字，均系引用自“敌乎？友乎？”（一九三四十）

检讨双方错误

日本为图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其最后手段，是只有和中国全面开战。

‘日本如以任何理由对中国正式用兵，中国的武力比不上日本，必将大受牺牲。这是中国人所不容讳言。但日本的困难，亦即在于此，中国正唯因为没有力量，即是其不可轻侮的力量所在。

日本不能消灭中国

‘战争开始，在势力相等的国家，以决战为战争的终结，但兵力绝对不相等的国家——如日本同中国作战，即无所谓正式的决战，非至日本能占尽中国每一方里之土地，彻底消灭中国之时，不能作为战事的终结。

‘两国开战之际，本以占领政治中心为要着，但在对中国作战，如以武力占领了首都，制不了中国的死命。日本至多也不过能占领到中国若干交通便利的都市与重要的海港，绝不能占尽四千五百万平方里中国全土。中国重要都市与海港全被占领时，在中国诚然将陷于极度的困苦与牺牲，然日本亦何尝能彻底消灭中国之存在？’

不幸的是，自此之后的历史，正就是走在如上所述的道路上。

此后不久，在由“芦沟桥事变”开始的中日战争中，日本付出了百数十万人的生命，但终于未能使中国消灭。

‘国际上大错的铸成，有主因，也有副因；往往不止一方有错误，而必是双方均有其错误。我们综观自九一八前后以迄于今，不论中国方面或日本方面，均有其对大势及对彼我认识之错误，以及措置上的错误。这些错误，有已成过去的，有继续仍循着错误之路，而还不断制造新错误的。’

蒋总统对于中日两国所犯错误的检讨，是“敌乎？友乎？”这篇文章的第二个重点。此一部分，约占整篇文章百分之六十的篇幅。

中国之错有七

对于当面情势之造成，在中国方面固然绝不应和日本负有相等的责任，但却也不能说是没有错误。

在“敌乎？友乎？”中所举中国的错误，有以下七点：

一、失却解决问题的时机＝譬如说，当九一八事变之际，过于拘执于“日本不撤兵便不交涉”的原则，失去直接交涉的时机。

二、不彻底实行革命方略＝事后论人，或不免失之太苛；但应刚则刚，应柔则柔，能伸则伸，当屈则屈。革命外交贵在弹性运用、当机立断，但缺少了这样的勇气。

三、判断对方的错误＝以为日本会屈服于排拒日货运动、会不能背弃对国际条约责任的看法，不切实际；不晓得日本是由军阀把持一切，是一个不守国际信义的特殊国家。

四、审察自力的错误＝祇判断敌人的缺点；无暇反省，亦无意承认自己的弱点；在日本侵入热河时，过信有相当防御力量，殊不知东北军精神、实力相当颓败。

五、观察第三者错误＝对于日本，以为国联会加以制裁、各国会起而作有力之干涉，但未见事实。盖不知美英诸国方各有其本身困难，而且世界经济凋敝，乃无暇对日干涉。

六、内部凌乱＝不能保守外交秘密，往往政府尚未决策，民间已经喧腾起来，而为世界所周知。且在中国国民党内部，更因外交主张而显现分裂，于是内乱外患乃益见严重。

七、感情用事的错误＝现在要打开僵局，必先日本有觉悟的诚意和放弃侵占的表示。中国一向深受屈辱与侵侮，当然群情激昂；但总该抑制感情以重理智，为国家民族作久远之计。

日本之错误有五

至于日本方面的错误，如果和中国的错误比较，则当然是更其严重得多。

日本根本错误之所在，是对于中国的认识。可是他却没有能够察觉得到，且进而在错误之上更加重了错误。

日本的错误有以下五点：

一、对中国当前国情认识的错误＝中国现在方在革命期间。在革命未成期间的国家，与通常已有强固而确定组织的国家完全不同。近世革命史例已昭示我们，在革命期中的国家，其要素为“主义、领袖、群众”。只要主义普遍深入，领袖健全存在，群众一致拥护，一时政府的成败或土地的得失，转成为次要问题。即使占领了中国的首都，但领袖所在之地，即中国政府与国力中心之所在，是故只要领袖存在，则中国便不会消灭。可惜日本的中国通，对于中国事情，平时一切调查观察，异常精密周到，而独忽略了此一重要之点。

注：文内‘……’中之文字，均系引用自“敌乎？友乎？”（一九三四十）

仍为我基本精神

二、对中国历史时代认识的错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人至少已经了解了民族主义的意义。在三、四十年前，对于日本并吞台湾、朝鲜尚不知有怎样关系的国民，今天都知道东北四省被侵占的事实。不管日本武力如何强大，总不能除尽具有充分民族意识的中国国民。

三、对中国国民党观察的错误＝日本以为中国国民党是发动排日势力的中心，非打倒中国国民党则中日问题无法解决。但在中国，讲明中日两国唇齿相依的道理，是中国国民党；说得最彻底的，是总理孙中山先生。国民党的存在，是基于历史的使命、时代的使命、和民众的心理；即使把国民党推翻，但中国必然还会有领导民族的新组织出现。

“蒋氏之为蒋氏”

四、对中国当代人物认识之错误＝这是蒋总统借托他人的文章，试对自己论评如左：

即以日本对于蒋氏的论评为例，日本人常以之与中国过去的人物如袁世凯、李鸿章等相提并论，这真是拟于不伦。蒋氏之为蒋氏，完全是在革命环境中成长出来，可说其血液、其脑筋中没有一点前期帝制时代的意识习性之遗留。日本人因为没有认清时代与人物，遂欲以从前所施于帝制时代遗留人物的方法，施之于现在，而希望得到同样的效果。蒋氏对日本用兵，有其一贯精神，至少可以表示革命军力量所在之地，不使日军付出代价是不会放弃的。再者，他的对日本外交，是“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这个外交政策，也是始终不变的。日本如明白这个道理，应知若再欲以武力威胁中国而得到屈服的结果，可说是不能达到目的。

五、忽略中国国民心理的错误＝中国没有百世不可解的仇恨观念。若说二十一条以来对日本交恶，实乃日本占领中国土地、极端损伤中国感情与尊严。日本如真能放弃土地侵略的行为，则中国对于同洲同种的日本不会不愿引为朋友。

在论列日本对于中国的五点错误之外，更指出其外交上的三点错误，即为：（一）退出国际联盟而处于孤立。（二）高唱亚洲门罗主义，与世界为敌。（三）自造危机错觉。

这篇文章的结论，说得更其明白：

‘在中国方面：只要日本有诚意谋解决，则只须要求放弃土地侵略，归还东北四省。其他方式，不必拘泥，过去悬案，应以诚意谋互利的解决，一扫国交上的障碍。人民应洞明大义，不作苛求；当局应忍辱负重，掬示忠诚。唯一要求，即为保持国家独立与完整。’

日本应有的认识

‘在日本方面：所应认识者，第一、应知有独立的中国，始有东亚人的东亚。日本应彻底协助中国真正的独立，才为日本百年不敝的国策。

‘第二、应知时代变迁。明治当年的政策，不复适用，应抛弃武力而注重文化的合作，应舍弃土地侵略而代以互利的经济提携，应唾弃政治控制的企图而以道义感情与中国相结合。

‘第三、应知中日问题的解决，只须日本一念之转移——即应切实表示其“保全中国统一”且“对于中国之独立或利益，绝不予阻碍且无加害意思”（日本外务省声明及广田谈话中语）两语的诚意，断然归还东北四省，一面解决中日两国之间的悬案。这种交涉，当然应由日本率先提议，但无妨由两国直接谈判。’

‘中国古语说：“解铃还须系铃人”，所以打开难关的责任，毕竟还须日本了承当。总而言之，中日两国究竟是相互为敌，以同归于灭亡呢？还是恢复友好，以共负时代的使命呢？这就要看两国，尤其日本国民与当局有没有直认事实、悬崖勒马的勇气，与廓清障蔽，谋及久远的和平。’

终为日本军阀所毁

“敌乎？友乎？”发表之后，不仅在中国国内、就是在日本，也有颇多新闻、杂志予以转载。而受到启发的日本有识之士则是大有人在。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于一九三五年元月二十二日在国会所表示对中日亲善的愿望，也就是受到这篇文章的影响颇大。

然而，“敌乎？友乎？”所表达的一些愿望，最后则被日本军阀所彻底踏毁，结果却竟反而成了日本在后来走上毁灭过程的一个预言。

可是，时至今日，尚须特别一提的，是“敌乎？友乎？”仍然为当前中华民国在对日关系，或是在应对亚洲局势方面的基本精神之所系。

当一九七二年，日本表现出要与大陆共产政权“建交”、中日关系为之紧张之际，中国国民党的机关刊物-“中央月刊”，又曾将这篇文章摘要刊出，可以看出中华民国希望日日本友好关系的态度，丝毫没有改变。

注：文内‘……’中之文字，均系引用自“敌乎？友乎？”（一九三四）

第十二章：西安事变(上)

主题

共匪长途逃窜斗倒秦邦宪毛、张汇合毛匪窜至陕西所谓“统一战线”我盼日道义相交中日使节升格日军强横寻衅我政府一再忍让何以雪此奇耻中日外交密谈中国力护主权日分化阴谋未逞日军一再逼迫五全大会绝不轻言牺牲何应钦奉派赴平冀察政委会“二二六”事件走私破坏我财政日增兵华北所谓“成都事件”日本提出要求丰台与汉口事件日本“威迫外交”国人献机祝寿

共匪长途逃窜

政府军第五次围剿共产党“中央苏区”的战事，由于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日克复瑞金，乃以获得全面的胜利而结束。

但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所带领的“中央苏区”匪军主力-“第一方面军”所属第一、三、五、八、九军团约十万人，则已在先突破包围网，西向脱逃。

政府军遂即尾随其后，进行追击战。

当“中央苏区”溃灭之际，在匪军方面，尚有分布于湘西北的贺龙所部“第二方面军”（“第二军团”等三个师），以及川北的徐向前所属“第四方面军”（“第四军团”等五个军）。

这些匪军，遵循共产国际指示，互相呼应，同时开始西窜

——南经贵州、云南，西达西康、甘肃，跨越十省，流窜二万五千里（一万四千公里），为时两年以上，的确是一次“大逃亡”。

追击进剿的政府军，虽曾在各地给予匪军以严重打击；但结果毛泽东、周恩来等匪酋还是成了漏网之鱼。嗣当政府军穷追不舍、将他们赶到延安之际，不料由于张学良变卦而发生了“西安事变”，以致到了最后阶段功亏一篑。

当放弃“中央苏区”、开始逃亡的时候，匪军和“共党中央”机关人员包括家属等五千人在内，号称十万人。

匪军在逃窜时，尚携带有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大型无线电台，以及个人随身行李等，从行列的起头到末尾，长达数十里。

十万人只剩三万五

他们通过湘、粤、桂边境，一路西行，背负着笨重机器、物资，挣扎在丛山间道上，行动极其迟缓；加以长期夜以继日地奔驰不停，饥寒交迫，虽于沿途袭击村落，掠夺食粮，但仍然不敷供应。

流窜行列，极度疲惫，途中有因伤病而不能行动者，同伙无人可予援手，只有弃之不顾，听其死亡。

逃窜的目的地，究竟是在那里？谁也不知道；颇多士兵因过度疲劳与完全绝望而自杀。

毛泽东在开始时，虽则也曾徒步出发，但走不到三里路，便因足茧难动，坐上担架，由被拉夫而来的农民们抬着他走。周恩来也是同样地坐着担架，他自称夜间工作不能睡觉，故而躺在担架上昼寝。其他共产党干部们，也就是这样地在担架上摇幌着躯体，一程又一程地走在漫长的旅途上。

政府方面，于十一月十三日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设总司令部于湖南衡阳。又下令贵州省剿匪总指挥王家烈（贵州省主席）及广西省剿匪总指挥白崇禧协同追剿，自南北两面压迫共党的逃窜行列。

然而，对于翻山越岭、利用险峻地势逃避追剿的匪军，实在是很难捕捉其踪迹而一举将之歼灭的。

十一月底，当匪军在广西省全县附近渡过湘江时，政府军给予大规模的打击奏功，在全县与兴安一带，匪军伤亡三千余人，但其主力则穿越广西苗区北上，于一九三五年元月五日窜抵贵州省遵义县。

自江西出发以来，才不过两个多月的时间，当初的十万匪军，此时只剩下了三万五千人。所携带的笨重机械等类，差不多已在沿途逐渐丢光，连与共产国际通讯联络而不可或缺的大型无线电台也被毁弃，而其后便曾在一年之间与共产国际失掉了联系。

像这样逃窜和惨败的行军，当然在共产党的内部便会发生纷争。

所谓“遵义会议”

在此之前，掌握党内实权的，是共党中央总书记秦邦宪（博古）等所谓“国际派”。但毛泽东则在此际将失败责任套在秦邦宪的头上而打倒了“国际派”。——这就是所谓“遵义会议”。

自元月六日至八日的三天之间，在遵义旧城所召开的“遵义会议”（共党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陈云、朱德、何克全，“中央委员”毛泽东、刘少奇、李维汉（罗迈）、彭德怀，以及指定参加者刘伯承、林彪等二十余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也列席了会议。

由秦邦宪主持的这次会议，是为了讨论匪军今后的动向。未料在周恩来的军事报告之后，彭德怀便首先发难对秦邦宪等提出批判：“西进途中搬家逃跑，行动迟缓，招致红军重大损失。”

这个批判，同时也是代替疲惫极点的兵士们对于漫无目标的流窜发泄不满情绪。

毛泽东当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他立即指谪：“在反五次围剿时所采取的短促突击、单纯防御的错误战术，断送了中央苏区，迫使红军不得不作战略转移，而遭受了严重损失。”--这是对共党的领导方针发出攻击。接着，刘少奇也和毛泽东一鼻孔出气，他责难：“四中全会以后的白区（非共党盘踞地区）工作，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

这一场争论，整整进行了两天。

对于毛泽东等人的批判，倡导“短促突击”的李德则始终不承认错误；他认为反五次围剿之所以失败，是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以及军事干部对短促突击有所误解和执行新战术偏差所致。

秦邦宪则表示：“不应因为未能粉粹五次围剿的结果，便抹煞全党的功绩。”他坚持自己所主持的中共“中央总路线”是正确的。

斗倒秦邦宪

在共产党“遵义会议”的激烈争论中，最会望风转舵的是周恩来；他在争论将要结束时，感觉到情势于己不利，便立刻转变态度，承认自己在反五次围剿及西窜途中的军事指挥失败。刘伯承也改变了一贯反对毛泽东的态度，转而加以支持，并表示了直认秦邦宪等错误的意见。

最后，张闻天站在调停的立场，强调党内团结；他以为“四中全会”以来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但在反五次围剿及西窜期间的军事路线是错误的。这个错误，应由党的主要负责人-党“军委主席”和国际军事顾问同负其责。后来，张闻天这个意见便成了“遵义会议”的结论。及至会议的第三天，乃通过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决议的副题是“检讨博古（秦邦宪）、周恩来、李德同志军事路线的错误”，并作了决定如下：

“一、免除秦邦宪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改由张闻天继任。

“二、撤除周恩来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改由毛泽东接任。

“三、补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委员及政治局常务委员。

“四、调秦邦宪为总政治部主任，李维汉为总政治部组织部长，何克全为总政治部宣传部长。”

毛泽东的夺权自此开始

秦邦宪等人，就是这样地被打下去了。虽然共产国际仍然支持中共的“国际派”，所以党的总书记仍不得不推举为“国际派”一员的张闻天继任，但毛泽东则因此而掌握到了共产党中央领导权的契机。

共产党内“神化毛泽东”的基础，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据日本资料——“遵义会议”十年之后，中共在党内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件中，对于“遵义会议”作了如下评价式的扬言：

“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机的关头挽救了党。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遵义会议”之后，充当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对于军事一知半解，只能在战略原则上或是军事方针上作些概括的决定，并不能实际指挥作战；因此，乃以周恩来为“中华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继续指挥军事。

在遵义喘息了十多天的匪军“第一方面军”，丢弃了由瑞金带出来的笨重辎重，减轻装备，于元月十五日开始再度向西北移动。毛泽东的意图，是要和在川北建立“苏维埃”的匪军“第四方面军”汇合。当时，“第四方面军”兵力约有七万，其“军事委员会主席”为张国焘，“总指挥”为徐向前。

民国二十四年

元月七日，共产国际以轰炸机及战斗机各六架自西伯利亚对“第四方面军”实施空运，以谋增强其战力。而自瑞金西窜以来蒙受到重大损害的毛泽东所属“第一方面军”，乃打算向“第四方面军”乞求支援。

元月十五、十六日，匪军窜占仁怀、茅台，近迫四川省境。

据日本资料——由于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在北平干杯而为日本人所闻名的茅台酒，就是贵州茅台的出产。在共军西迁之后，曾经去过延安的美国记者史诺，在他所著“中国的红星”一书中，提到共军发现茅台酒的故事，内容大致如下：

共军到达茅台时，发现在一座西式房子里摆着百余口大缸，士兵们起初伸腿进去洗脚；及嗅到香味扑鼻，才知道是酒。

嗜酒贪杯的军事顾问李德，遂即一尝佳酿而当场醉倒。其后，赓续经过茅台的士兵都去喝上一杯，最后连洗过脚的酒，都被喝得涓滴不留。

又最近在台湾，也可以制造茅台酒。

委员长行营移设武昌

此时，政府军对于匪军“第一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的汇合，自有务须加以阻止的必要。

于是，乃立即派遣在南昌行营赞划五次围剿着有绩效的参谋团前往四川重庆。并即将四川省政府设于重庆，任命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为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调派四川部队南下，迎击北上的毛泽东等匪军“第一方面军”于川黔省境。

二月二十一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由南昌移设于武昌。蒋总统亲自通盘指挥剿匪军事，并起用新近由欧洲归国的张学良为武昌行营主任。可惜却反而成了后来西安事变的伏线。

毛、张汇合

占领了茅台，想由贵州北上，以进入四川省境为目标的毛泽东等所属匪军“第一方面军”，于一九三五年元月二十三日被刘湘所部川军邀击于贵州土城，受到严重打击；虽有一部分人窜入川境的古兰、叙永附近，但终究未能突破封锁线而于二月二十八日折回遵义。

在黔南方面，则有黔军堵截其后路，剿匪战事的进展，看来颇为顺利。

蒋总统于三月五日在二月分反省录中记述如下：

‘朱德回窜，遵义与桐梓再陷；但陕南徐（向前）匪击退，汉中无恙，川南、川北各区皆处被动地位。如善处之，或易为力也。’

放弃了由四川北上的匪军“第一方面军”，此时突然转而由贵州南下，意图经过云南来一个大迂回前往西康。

蒋总统亲赴四川督励

三月二十四日，蒋总统由重庆乘飞机抵达贵州省会-贵阳，督励黔省剿匪战事。

然而，贵州的地方部队官兵，颇多染有鸦片烟癖，军纪废弛，连对于政府军的动态都不能保密，以致匪军能够轻易躲开追击，窜入云南。

‘朱毛残匪不能在龙里与盘江歼灭，失却良机，是无线电不慎，被其泄露之故。以后更当注意严防其狡狯，则必可获胜也。’（蒋总统五月二日反省录）

凡匪军窜扰所经之地，剩下来的只是一片荒凉。

‘豁免贵州田赋，与民休息半年，对国对民之尽心竭力者，惟此而已！’（同上）

窜达云南的匪军“第一方面军”，分兵三路，于五月初费时九天九夜渡过金沙江，进入西康，经康省东端北上；五月底，先后在安顺场及泸定桥渡过长江上游支流的大渡河，遂即越过夹金山，沿途倒毙颇多，而终于窜入四川省境，于六月十六日在懋功县与张国焘、徐向前的“第四方面军”汇合。

自逃出江西以来，被政府军蹑尾追剿已达八个月之久的匪“第一方面军”，此时，包括非战斗人员在内剩下来不满一万人，服装破烂，有的甚至连草鞋都没得穿，所以自称为“叫化军”。

蒋总统于五月二十六日移节四川成都，继续亲自指挥追剿汇合之后的匪军。

六月三十日，蒋总统回顾一九三五年上半年的经过情形，在反省录中记述如下：

‘本年已过半年。此半年中，赣匪完全肃清，但朱毛残匪乃于六月中旬与徐匪（向前）合股于懋功；虽朱毛不得赤化于川、滇、黔边区，亦未得达其窜入甘（肃）、新（疆）之谋，而其人数亦减少十分之九以上，然而未得完全歼灭，恐遗后患。是乃智虑学识不精之过。

‘然而，川、滇、黔因此得以统一，完全入于中央范围之中，国家地位与民族基础，皆能因此巩固。’

毛泽东等人虽然漏网，但政府军之紧迫追剿至于此一地步，其劳绩不为不大。

七月中旬，蒋总统召集追剿军连长以上干部训话，勖勉更加奋发努力：

‘你们由江西出发，追剿赤匪，经过湖南、贵州、云南诸省，现在来到四川成都，盘旋曲折，纵横驰驱，综计走了一万余里的路程；而且沿途所遇，多半都是最险要、最艰难，他人所不敢到的地方。……像这样不怕劳苦，不避艰险，驰驱于边荒的地区，作万余里长征，自中国有史以来，你们要算是第一次。……

‘因为我们穷追的勇猛，匪军除伤、亡之外，病死、逃走的与落伍的格外多，到现在还只剩下五、六千人；比起他窜出江西的时候，差不多十分之一的力量也不够了！你们过金沙江不怕热，过大渡河不怕冷，所以土匪的力量被我们消灭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得到现在这样的成功！’（注）

窜达懋功才终于汇合的匪军，虽然稍获喘息，但没有多久便发生了内讧。

毛泽东与张国焘对立

和八个月之间连续逃跑的毛泽东等匪军“第一方面军”比较，张国焘所带领的“第四方面军”则在装备和阵容方面都要整齐得多。“四方面军”的干部们对于弃甲曳兵、狼狈达于极点的共党“中央”和“一方面军”，都投以轻蔑目光，而以“领导者”自居的毛泽东对于这样的看待当然会发生反感。于是，毛泽东与张国焘的矛盾便从这里开始。

六月二十五日，在两河口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中，张国焘和陈昌浩（“四方面军政委”）马上便提出了“遵义会议”改组“中央”是否合法的问题，批评毛泽东等人，并主张以张国焘为总书记。又关于此后行动的方向，毛泽东力主北上陕北，与刘志丹所部汇合；但张国焘则主张南下，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然后相机攻夺成都平原。——双方意见对立，此时，是由朱德居间调解。

注：蒋总统-“中央军追剿赤匪之意义及其经过之成绩”（一九三五七）

毛匪窜至陕西

促使毛泽东和张国焘的矛盾至于决裂的，是一九三五年八月五日在毛儿盖举行的中共“政治局会议”。

在前次的两河口会议中，悬而未决的毛泽东北上论和张国焘南下论再度提出，争持不下，乃付诸表决，结果北上论获得通过，张国焘只好服从多数，跟从北上。

于是，共军乃将意见纷歧的第一、第四两个方面军官兵揉合在一起，编组成右、左两路混杂队伍——“右路军”包括“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及“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左路军”则有“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及“四方面军”的九、三十一、三十三军。毛泽东与徐向前、陈昌浩参加“右路军”行列，张国焘则与朱德指挥“左路军”。

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等“右路军”自毛儿盖出发，张国焘、朱德等“左路军”由卓克基北上。

匪军在大草原上摸索

“右路军”遂即进入自川北一带延伸到甘肃、青海、西康省境的大草原。这个草原，南北三百公里，东西更达数倍之广，有些地方在夏天则成为“沮洳地”。

此时，正巧碰上阴雨连绵，匪军在泥泞草滑、寸步难移的湿地上摸索前进。到了夜晚，找不到一块干土，便只有倒卧在泥浆上，想要休息，却又受到传染疟疾病菌的蚊虫侵袭。这样经过了六天，才得爬出沮洳地，已经有五百多人病死；侥幸生存者，也都已疲惫达于极点，

在这个当口，更遭遇到政府军第四十九师的突击。

匪军前敌部队，为“右路军第三十军”，乃原属张国焘“第四方面军”的主力之一。

这一役，双方投入战斗的兵员各有一万三千人，冲锋肉搏，战况激烈，经过一昼两夜的战争之后，匪军死伤在五千以上，溃不成军。

张国焘得知其珍爱的部队被毛泽东投入最前线而蒙受严重打击的消息，大为不满；加以他判断——如果照这样继续北上，势必招致全军覆灭的危机，于是，乃找毛泽东商量，仍拟率军南下。

然而，毛泽东坚主北上的念头并未打消，他竟然瞒着张国焘以及同行的“右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和“政治委员”陈昌浩等人，只带领党的干部和所属部队六千人悄然北向出发，追随他一起的有周恩来、林彪、彭德怀、叶剑英、张闻天、董必武等人。

毛泽东与张国焘决裂的状况，在当时的报纸上有如下的报导：

“……据目击者谈：毛泽东与张国焘在靠近白龙江的天山中小路上，激烈争论着，军队都站在路上等待解决。然而，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意见却愈来愈趋对立。

“毛泽东遂着人对士兵宣传：张国焘、陈昌浩等动摇、怕死、反党、反中央、害怕甘肃的骑兵和飞机！

“张国焘、陈昌浩等也扬言：毛泽东失掉了进行中国革命的勇气，只盼望到苏联平稳过日子！

“张国焘等更乘士兵们畏惧草原的心理，乃宣传：从白龙江到甘肃还要走二十一天；同时声明：

“第四方面军脱离毛泽东的指挥，返回毛儿盖去；凡是愿意继续中国革命、而且不愿意走二十一天草地者，请跟随四方面军。

“当时因双方互相攻击、互相宣传，争夺群众，一时呈现大混乱状态。有人说：曾看到毛泽东痛哭流涕。……”

张国焘旋即率领“左路军”全部及“右路军”中原为其属下的四军、三十军计六万多人回转头去仍经沮洳地回到毛儿盖。其后，便发出“打倒毛泽东”、“打倒逃跑主义中央”的口号，并以张国焘为“总书记”而成立了另外一个“中共中央”。

在毛泽东率领之下只有六千人的匪军，继续北上，于九月间在草原出口的腊子口突破了政府军的包围网，十月，翻越六盘山，于十月二十日前后窜抵陕西省的吴起镇，才得和刘志丹所部汇合；继之，更于十一月七日挣扎到在延安南边五十公里的象鼻子湾。于是，历时年余的二万五千里西窜，于焉告终。

设立西北剿匪总部

面对这个情况，政府军方面乃在十一月一日设“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于陕西省会西安，蒋总统兼任总司令，副司令张学良全权代理，策进清剿匪军的最后计划。而一年后的“西安事变”，就是发生在这个地方。

另一方面，折回毛儿盖的张国焘等人，沿川康边境肆行骚扰，他们喊出“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的口号，意图进犯川西平原，一时攻陷通往成都的冲要之地-荣经；但旋即为薛岳所指挥的追剿军所击溃。

此后，张国焘带领所部匪军便在川康边境的山岳地区流窜，好不容易进入西康甘孜、宣称建立“苏维埃”。翌年（一九三六年）六月，原在湘西被政府军追剿的贺龙，带领其“第二方面军”绕道云、贵，窜抵甘孜汇合；旋即放弃甘孜，经甘肃、宁夏而以窜入陕西为目标。及至十一月，决裂后的张国焘和毛泽东在宁夏同心城再度会面，张国焘要求援军，但被毛泽东所拒绝；其后不久，“第四方面军”便在甘肃靖远附近为政府军所大败而溃灭。张国焘于十二月结束了两年多的流窜，才抵达延安；但终于还是和毛泽东意见不合，而于一九三八年脱离共产党向政府投诚。

所谓“统一战线”

在西窜之际的共产党，其所策动的政治谋略，就是所谓呼吁“抗日救国”，建立“统一战线”。

‘朱毛匪军在国民革命军围剿之下，到了最后，只有分股流窜。他们在军事已走到绝境的时候，乃假借“国共合作，抗日救国”的口号，求作政治的解围。’（注一）

共产党的企图，是要利用“合作”的要求来减轻政府在军事上对他的压力；并藉“统一”的口号来破坏国民党的组织。

不过，不能忽略的，是在共产党背后还有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存在。他们的目的，是要更加扩大中日之间的矛盾，使双方关系更趋恶化。

前面已经提到过，在这个当口，以蒋总统提倡中日两国互相理解而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发表的“敌乎？友乎？”一文为契机，正是中日之间缓和紧张局面的萌芽时期。

可是，共产势力则不愿见到中日关系的平稳化，而是希望其愈益险恶，则中国政府能够用之于剿匪的力量便会为之减弱，而他们便可以在这个时期中扩张其势力。

史达林指示路线转变

其具体的行动，是从自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日（一九三五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开始，此时正好是毛泽东、朱德的“第一方面军”和张国焘、徐向前的“第四方面军”已在西窜途中的川北边区懋功汇合，而毛、张对立、分裂的不久之前。

共产国际的第七次大会，是基于认定在欧洲德国的纳粹主义和在亚洲日本的帝国主义为其最大威胁，故而在路线上作了很大的转变——号召建立“反帝国主义、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

在此之前的苏联，当史达林在权力斗争上战胜了托洛斯基之后，便倾注其主力于个人独裁地位的建立和国内的建设，因而在外交上采取温和政策。及至九一八事变日军夺取东北之际，苏联还是贯彻其不干涉主义。但其后日本卵翼为其傀儡的“满洲国”政权成立，日军更入侵热河、华北，苏联乃开始感觉受到日本的威胁；同时，在欧洲方面，又有义大利墨索里尼政权的“法西斯主义”和德国希特勒政权的“纳粹主义”都在叫嚷反共反苏，而对共产势力加以压迫。

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的呼吁，就是断定有如上述的国际情势而产生。

‘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总书记）在大会上提出“统一战线”的报告，对于中国主张建立“广泛的抗日反帝统一战线”。这当然是史达林的决策，也当然成为大会的决议。中共此后的工作，就是依据这一决议，在史达林指使之下，执行其“统一战线”与“中立主义”的新战术了。’（注二）

于是，出席国际大会的中国共产党驻国际首席代表王明（陈绍禹）乃即遵循史达林的意图，在大会中作了以“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和共产党的战术”为题的报告，表示：“中国共产党为了对帝国主义断然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要使所有的人民总动员，组成统一战线。”

托词抗日以阻剿共

八月一日，复依据共产国际的方针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名义，发表了一个“八一宣言”——也就是所谓“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

这个宣言，一方面诽谤国民政府的“安内攘外”政策；一方面要求中止剿共，并提议“组织抗日的统一国防政府”、“组织抗日联军”。不过在宣言中虽则仍然反覆攻讦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负责人，但表面上已不再提出“打倒国民政府”的激烈口号。

这样的态度，是共产党的一种战术转变。在过去，他们也曾喊出“统一战线”的口号，但那是所谓“下层统一战线”，是先从下层分化群众，以图颠覆上层；可是自发表“八一宣言”之后，乃转变为所谓“上层统一战线”。就是改变方式——直接对其所要打倒对象的上层做拉拢或离间的工作，以破坏对方的上层组织。这个“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仍然是沿袭着“捧上层、打中层、拉下层”的口号，继续进行。

此外，“八一宣言”在关于对日战略方面，则列有“没收日帝在华一切财产，充作对日战费”等极具煽动性的口号，对于中国人的反日情感火上加油。像共产党这样激烈口号的对日战略，实则在后来反而被日本利用为促进侵略中国的藉口。譬如说：这一年的十二月，在北平所进行的大规模学生抗日示威游行（即所谓“一二九”运动），便有潜伏的共产党徒从中煽动。

共党篡改本身史实

又所谓“八一宣言”，有说是在西窜中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发表的，但实则这是共党篡改史实的手法。因为在发表这个宣言的当时，正是匪军逃窜到毛儿盖、毛泽东和张国焘尖锐对立的时期；而且和莫斯科之间交通断绝，连电信也联络不上。

实则，共产国际于十一月间派遣张浩（林毓英）自莫斯科回国，到达陕西，才传达了第七10[23]2193次国际大会的方针和“八一宣言”的内容。而接到国际指示之后的中共“中央”，才立即于十二月十五日召开“政治局会议”，确认了所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

注一、二：蒋总统-“苏俄在中国”（一九五六十二）

我盼日道义相交

现在再将视线转移到中日关系。

在中国第五次围剿共匪的高潮之际，使伪“满洲国”擅行“帝制”、并且发表“天羽声明”公然表明侵略中国的日本斋藤内阁，在不久之后，便因“帝人事件”（“帝国人造绢丝株式会社”股票低价出售之官商勾结事件）倒台，而由海军大臣冈田启介于一九三四年七月八日组阁执政。冈田乃是一个比较属于稳健派的分子，广田弘毅则留任外相。

此时，在日本国内正流传着“一九三五、六年危机”的说法。

日本所耽心的危机之一，是认为中国为了要使日本卷入国际纷争而可能会不惜和日本一战。

蒋总统对日记者谈话

关于这个问题，当时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总统曾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南京接受日本新闻记者的采访，明白予以否定：

‘中国一部分之国民，不免有此思想；但明了世界形势与东亚大局之人，决不愿世界有战争之危机。盖世界之和平，乃东亚之福，亦即中国之利。中国不仅不希望有此危机，亦不愿有此危机也。

‘中日本为东亚兄弟之邦，应以道义相交。’

至于“战争的危机”，毋宁说是由日本军阀所造成。试举日本军事预算为例——自九一八事变之翌年（一九三二年）开始迅速膨胀，到了一九三四年，陆军四亿五千万圆（日元）、海军四亿九千万圆，与一九三一年相较，增加两倍以上。可证日本是在作战争准备。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三日，冈田内阁决定：日本单独废弃华盛顿海军军缩条约。实则，日本此时已在秘密建造超过条约限制吨位的舰艇；这个行动，是继退出国际联盟之后，又一度选择了在国际间走上孤立的道路。

接着在十二月七日，更制定了其所谓“对支新政策”：“国民政府的指导原理与日本国策根本不能相容。将国民政府在华北的势力减到最小限度。将山西、山东、西南反国民政府的势力扶植到最大限度。”这是将其逐渐吞噬华北的基本构想再度提出，也就是对于其前任斋藤内阁的政策表示萧规曹随，继续不变。

广田的议会演说

不过，广田外交也还显露出些微协调线索--就是他于翌年（一九三五年）元月二十二日在议会的演说：“中国政局，近年显得稍稍平静，日本基于关怀东亚和平，认为是非常可喜的情况。两国之间的悬案可以逐渐解决；中国国民也逐渐有了解日本真意的倾向。希望在今后能越发促进这个倾向。”这一席话，是含有暗示改善中日关系之意的。

二十五日，广田在国会答覆质询时更断言：“在本人担任外相任内，绝不会发生战争。”

中国方面，对于日本没有放弃侵华政策的实情，固非不知；不过，上述情况毕竟是有转变向可喜方向之趋势；姑不论其进展如何，总之对于改善两国关系并不反对。

于是，乃立刻姑与接触。元月二十九日、三十日，蒋总统在南京先后接见了日本驻华公使馆陆军武官铃木美通和驻华公使有吉明，交换意见；二月一日，在官邸接见中央通讯社记者，发表谈话如左：

‘此次，日本广田外相在其议会所发表对我中国之演词，吾人认为亦具诚意；我国朝野，对此当有深切之谅解。中国人民因迭受刺激，发生一部分反日运动，政府曾不断予以合理的弭止。

‘中国过去反日之情感，与日本对华优越之态度，皆应共同改正，方为敦友睦邻之道。我全国同胞亦当以堂堂正正之态度与理智道义之指示，抑制一时冲动及反日行动，以示信义；余信日本亦能以信义相应也。’

在这个时候，正好担任国际法庭法官的王宠惠回荷兰海牙，蒋总统乃与汪兆铭协商之后嘱王宠惠以个人身分取道日本，和广田弘毅接谈，以探询日本政府的真意。为了在王宠惠和日本接触之前，更明白地表达中国方面的意向，蒋总统乃于二月十四日在牯岭接见日本新闻记者表示：

‘中日两国，不仅在东亚大局上看来，有提携之必要；即为世界大局设想，亦非提携不可。因东亚只有中日两个国家；同时，这两个国家亦是世界之重要分子。

‘至于中日提携，首当以道义为出发点，则提携不难具体实现。余（蒋总统）始终认为——道义两字是解决中日两国现在难局之根本原则，中国不但无排日之行动与思想，亦本无排日必要的理由。但中国人民实普遍的具有深刻的反清思想，即排斥清室统治之思想，积三百年之不断奋斗，始得解脱满清恶政之羁绊，全中国人民至今尚有极沉痛之回忆。自东北问题演变至现阶段，创痛愈深；如东北问题一如今日之现状，则此种反感心理日见深刻，史实所积，非任何力量所能消灭。故研究中日提携能否实现，万不能忽略此种国民心理的重要因素。

‘此次广田外相对华政策之演说，虽极抽象；但吾人对之感想颇深，至少可说是中日关系好转之起点，余想广田外相必能以此后事实证明其演说之内容；同时，我国民众亦可因此而得一番对日之新认识。’

中日使节升格

国民政府的使者王宠惠，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九日到达东京，迅即和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会谈。

王宠惠在日进行会商

王宠惠指出：中日两国有速行解决东北问题之必要；同时，并要求日本政府与国民实行以下两大原则：

一、中日两国完全站在平等立场，互相尊重对方的独立地位，所以日本应该首先取消对华一切不平等条约，尤应先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

二、为维持中日两国真正的友好关系，诸如破坏统一、扰乱治安等行动不得施之于对方。

王宠惠并且提到：为使中日外交交涉走上正轨，不应使用和平手段以外的压迫和暴力。

面对王宠惠的意见，广田弘毅答称：“对于两大原则及外交交涉走上正轨，自属同意；至于东北问题，希望中国方面暂勿提起，倘使以解决此一问题为中日亲善的先决条件，则幸见好转的两国关系，将转而恶化。”盖当时日本军方的一致意向是要“确保并发展满洲”；如果通过外交途径来谈东北问题，则无论采取任何方式，都会对其军方有所刺激，因此，广田意图将之暂时搁置不提。

接着，王宠惠又陆续访晤日本首相冈田启介、陆相林铣十郎、海相大角岑生、外务次官重光葵等人，促膝恳谈；二十六日，再度与广田弘毅会商。

日本当政人士，对于东北问题的顽固态度，虽然毫未改变，但上述一连串的会谈，则是在和平气氛中进行，似乎双方关系有进展向迅速接近的趋势。

‘发表对日本新闻与对中央社记者谈话，表明对日外交方针与态度，实为余政治生活之一大重要事项。国民已有谅解，并多赞成，一月之间，外交形势大变；欧美亦受影响，自信所谋不误。’（蒋总统三月五日记二月分反省录）

十年来悬而未决的两国公使升格大使一案，也在此时达成协议，由两国政府于五月十七日同时发表。中国首任驻日大使蒋作宾，于六月二十日呈递国书；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于六月十四日呈递国书。

双方使节的升格，象征着两国在促进友好关系。于是，其他国家也颇效法而在对于中日两国的外交态势上有所加强。

据曾任广田外相秘书官的加濑俊一在其所著“日本外交的主角们”一书中提到中日两国公使升格大使的当时，曾有以下一段插曲——

驻华公使升格大使之际，军部少壮幕僚以联络有欠充分为辞，甚为激动；于是，便有两个陆军军官血脉偾张地闯进了外相办公室。

广田让手按军刀刀柄、汹汹逼人的军官坐到沙发上，徐徐地抽吸着烟斗说：“不须请问有何贵干，我已经晓得你们的来意。好啦！将来如果你们当上了军队司令官，在指挥困难的战役时，要是有局外人来说长道短地干涉作战事务，你们作何感想？我广田是奉陛下交付外交任务，所以外交上的一切问题要由我来判断、策进。懂得吗？懂得的话，就替我回去！”

这两个人就像顽偶一样目瞪口呆地跳起来向广田敬礼，说：“阁下，对不起！”

苏俄、中共、日本军部

对于中日两国这样接近的趋势加以妨害的，照例又是苏联和中国共党分子，以及日本的军部。

苏联不顾中国的反对，于三月二十三日竟将东北的中东铁路以一亿七千万日元的代价卖给伪“满洲国”。中国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和苏联恢复了邦交，而苏联这种行为，实则是违反了和中国之间的信约。

至于共产党，此时正在西窜途中，他们为了要使政府军的追剿目标有所转移，乃不断鼓噪着抗日的声浪。

另一方面，日本关东军也对于其“广田外交”不满，并于一九三五年元月在大连召集驻华各地武官及关东军幕僚开会，讨论对中国的策略。

在这个会议中所得协议是——以武力为背景推进分割华北的政策；同时，支援西南反中央势力以助长“反蒋运动”等项。会后，迅即循此方针派遣“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前往香港，向胡汉民等游说，但被胡汉民所拒绝而终于失败。

三月间，土肥原回到东北，再度开会，认定对于广田所推进的“中日亲善”政策应从根本上加以破坏。盖意图凭藉武力迫使华北为其属地的日本军部，是不愿有“中日亲善”情况出现的。

“关东军”续推动阴谋

三月三十日，关东军决定了他的“对支（中）政策”如次：

“对于华北——（一）依据塘沽协定暨附带协议事项伸张日本既得权，导引华北政权绝对服从。（二）为使将来以民众为对象、在经济上造成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即须迅速促进棉、铁等产业的开发和交易。

“对于西南——（一）秘密给予物质援助，使能与中央（国民政府）对抗。（二）为期在将来能由日本控制华南经济界，其第一步是为之建立必要的经济设备。”

到了这个时候，关东军乃又耍出了一仍故技的阴谋手段，为其发动武力制造“正当化”的藉口。

日军强横寻衅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夜晚到三日早晨，在天津日本租界有两个亲日派的中文报社社长被暗杀。这是在中日两国发表公使升格大使之前的两个星期。

日军设计暗杀事件

10[34]2204被暗杀者之一的胡恩溥，为“国权报”社长，住宿于日本租界寿街北洋饭店，于二日下午十一时左右被手枪射击而在翌日死亡。

另一人为“振报”社长白逾桓，兼任伪“满洲国中央通讯社”记者，系逾三日午前四时在日本租界自宅就寝中被枪杀。

两案的凶手为谁？都不得而知。

至于被暗杀的两人，虽然发行的是中文报纸，但实则都是受到日军的津贴，一直在对中国人作亲日宣传；尤其是白逾桓在被杀时还带有致关东军司令官的密函，可见其与日本陆军的关系颇深。

这两个人被暗杀事件，在第二次大战之后揭穿真象，又是日军所设计的谋略。据说其幕后人就是日本的“支那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而至少与被日军所利用的中国不良分子则的确有关。

可是，日本却还要把这个责任加之于中国方面。

五月十一日，日本驻北平公使馆武官高桥坦少佐会见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在一夜之间，有两个人被暗杀，必有极其周密的计划，乃系国家组织或有力团体之所为；河北省政府和天津市政府当知其情况，为什么却不加取缔？”接着他又指称：“事件的幕后，与秘密组织-蓝衣社有关；”并且更捏造出一个毫无根据的藉口说：“蓝衣社”是与中国国民党有关联的特务组织。

原来日本军方的目的，是要藉这个事件向中国政府寻衅，以图攫夺华北，故而有必要把问题牵扯到与国民政府或是国民党有关。

‘当时，我们中国并未和他（日本）发生一点纠葛，他只藉口说：“在日租界的报馆有一个姓白的和一个姓胡的被蓝衣社的人打死了。”所谓蓝衣社，根本就是日本人捏造的东西，我们现在且不必讲；但是，这件事情是在他日租界发生的，中国的权力不能及于租界，租界里发生什么事情，和我政府是不发生关系的。为什么会酿成去年撤退中央军、撤消党部这一回事呢？这个原因很简单明显——就是他们为实现传统的大陆政策所必然的一种阴谋。’（注）

捏造出一个“蓝衣社”

日本资料有谓：“蓝衣社”是以蒋总统为社长而由黄埔军校出身的军人国民党员于一九三一年所组织的特务机关。但根据中国国民党资料，实际并无“蓝衣社”的组织存在。当九一八事变之后，黄埔出身人士曾组织有“力行社”（或“复兴社”），乃民族运动团体，而非具有特务机关的性质。至于所谓“蓝衣社”的名称，乃在当时担任何应钦主任秘书的刘健群发表过一篇论文，提议“在国民党内组织蓝衣社，穿上人人都穿的国产蓝布衣服，到群众中去加强群众工作。”由于刘健群在不久之后也参加了“力行社”，于是日本军方与共产党便捏造出一个空中楼阁的“蓝衣社”名称来中伤国民党。

日本军方，在上述暗杀事件的同时，又提出一个藉口——就是热河省的“孙永勤义勇军”问题。

孙永勤是在日军侵略的热河省南部地区率领三千义勇军抗日的人。

日军指其为盗匪，在白、胡暗杀事件发生之后，对之展开彻底的攻击；于是，孙永勤乃被迫越过长城南下，进入为塘沽协定所设定的“停战区域”，要求遵化县长何孝怡补给其弹药；何孝怡已依据塘沽协定予以拒绝，然而日军却以“遵化县政府违反塘沽协定，援助孙永勤部队，妨害停战区内之治安”——故意找上麻烦。

威胁我党政机关

五月二十日，高桥坦以一份有“中国官吏庇护匪徒，致不能剿灭，应追问责任”等语的书面通知送达何应钦。

同时，驻天津日军对于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中国国民党市党部等机关都展开威胁、挑衅的行动。

二十四日，日本军官们强行要求会见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大声辱骂：“你就是杀人犯！”“马鹿野郎（混蛋）！”并且扬言：“逮捕于学忠、张廷谔（天津市长）。”

二十九日，日本驻天津的“支那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偕同高桥坦会见何应钦，提出“预先通告”两点：

“一、对日、满支扰乱行为，如仍以平、津为根据地，继续发生，则日方认为乃系破坏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及辛丑条约，停战区域或将扩大至于平、津。

“二、胡、白之被暗杀，日军认为系中国之排外举动，及向驻屯军的挑衅，如再发生扰乱日、满行动，日军则会随时出动，中国方面不可不知。”

此外，酒井隆更仍意列举出几项要求如下：

“一、蒋委员长对日阳表亲善、暗中仍做抗日准备的对日二重政策，须作根本的改变。

“二、于学忠为扰乱日、满之实行者，乃张学良之爪牙，中国政府应将其解职。

“三、宪兵第三团、河北省党部、天津市党部、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政调处、蓝衣社，以撤退为宜。

“四、中央军最好撤离。”

注：蒋总统-“对全国中等以上学校校长及学生代表讲话”（一九三六一）

我政府一再忍让

五月三十日（一九三五年），驻屯天津的日军开始了示威行动——多辆装甲车及机关枪队、炮兵队排列于河北省政府门前；同时，日本飞机也飞临平、津两市上空，低飞盘旋。

国民政府为防止发生不测事态，乃尽到最大忍耐，于三十一日决定将河北省政府由天津移往保定；继之，又决定更迭省府主席于学忠及天津市长张廷谔。

就在三十一日这一天，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会见日本外相广田弘毅，要求外务省对于日本军方的行动有所约制；但广田则诡称：“这是属于军事统帅权的问题”而避开答复。实则广田对于狂奔的军部已经是无可奈何。

酒井隆提出要求

六月四日，日本“支那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再度会见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除要求中央军撤退之外，并且提出：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撤走河北省、市党部。调走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政训处及宪兵第三团。撤消抗日团体。调走驻平津地区的五十一军。

六月九日，何应钦、酒井隆第三次晤谈，何应钦说明：各项要求大致都已经接受，同时并表示：“中、日必须亲善合作，方足互维东亚和平，此为我中央既定之方针，亦即蒋委员长之方针，迄今并未变更，凡此皆有事实可以证明。”

但酒井则充耳不闻，且以更加强横的态度又提出以下要求：

“一、河北省内一切国民党部完全取消。

“二、撤退五十一军。

“三、中央军必须离开河北省境。

“四、禁止全国排外、排日行为。”

酒井并且表示：“如果不立即执行，则日军将采取自由行动；一、二、三项绝无让步的余地，限十二日上午答复。”——这样的要求，简直是和最后通牒毫无二致。

据日本资料——在此之前，陆军、海军、外务三省曾经决定了一个“北支问题处理要10[41]2211纲”，在这个要纲中，列有“必要事项”--宪兵第三团、军委会北平分会政治训练处，与事件有关之国民党部及排日团体自平、津地区撤退，暨罢免此等团体之负责人，以及于学忠。又有“希望事项”，则只包括“第五十一军及中央军调驻保定以南”；此外对于取缔排日运动的希望，亦仅指平、津地区，至于全国性的取缔，“则为通过外务省进行交涉”。

但在当地的军方则擅自把范围扩大向中国提出要求。

此时，日军更在古北口、山海关等地增强飞机及骑、步兵部队，显出有向平、津推进的态势，以示威胁。

而中国方面，则唯有致力于和平解决的一条途径，是故国民政府终于决定了不得不接受日本要求的方针。

政府发布睦邻敦交令

六月十日，国民政府发布了为禁止全国排外、排日的“睦邻敦交令”，要求国民隐忍自重，其内容如次：

“我国当前自立之道，对内在修明政治，促进文化，以求国力充实；对外确守国际信义，10[42]2212共同维持国际和平，而睦邻尤为要着。中央已履加申诫：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其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

于是，中国方面乃决定将国民党在河北省的党部关闭；并将两年前在长城反击日军侵略的第二师、第二十五师等中央军，调往陕西、河南、安徽等地。

何应钦遂即根据中央决定，于十日傍晚面告高桥坦——“全面承诺日方要求”。高桥表示“满意”。

未料，翌日（十一日）高桥突然又携带了一份“备忘录”草案来到军委会北平分会，强行要求中国方面照缮一份由何应钦盖印后送交日方“支那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

在“备忘录”中，除须表明中国方面实行承诺事项之外，并新增加了附带项目如下：“中国方面与日方所约定之条款，应于规定时间内完全履行；对于有妨碍中、日关系之虞的人物或组织，不得重新进入河北。日本希望中国于任命省、市职员时，应选择不致妨害中日关系的人物。对于约定事项之履行，日方得采取监视及纠察的手段。”

此一附带项目，是毫无顾忌地表达出要进一步完全控制华北军事和政治的意向。

何应钦拒绝签章

十二日，南京举行中央政治会议和国防会议，当然决定指示何应钦拒绝签章。何应钦乃将10[43]2213那份“备忘录”置之不理，而于十三日午前三时离开北平南下。

于是，高桥坦乃慌忙于十四日找外交部特派员程锡庚晤谈，一方面出言威胁：“日军对于如果中国方面拒绝签署，因而发生严重情势时已有所准备。”一方面抱怨：“这个备忘录是奉在东京的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皇族）之命办理的，如不能实现，则无法复命。”

然而，在中国坚决拒绝的态度之下，高桥坦终于感到难以达成其一贯横行无忌强迫要求的目的，遂即放弃索取“备忘录”，不再提“附带项目”问题，而只是央请中国方面“至少请给予一个表示承诺的书面通知。”

就是这个通知，后来遂变成一如镜花水月的所谓“何梅协定”（何应钦、梅津美治郎协定）。

何以雪此奇耻

中国方面，在得到行政院院长汪兆铭的同意之后，于七月六日（一九三五年）送出一件内容如左的通知——

迳启者：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

此致

梅津司令官阁下

何应钦

这个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一纸通知，就是在交涉过程中给予日方的唯一文件。

而日本方面则擅自为之取名为“何梅协定”，并且宣传为就像是签订了正式性的军事协定一般；实则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而是坚主“自主实施”，根本就没有所谓“何梅协定”的存在。

绝对没有“何梅协定”

‘我（蒋总统）可以对各位说：绝对没有这个“何梅协定”。这件事怎样讲起来的呢？就是日本向何部长提出要求中国撤退河北境内的中央军队，并撤消所有平、津、冀、察党部和特务机关；何部长回一封极简单的信答覆他（日本）说：这些事不待你要求，我们中国已经自动办好了。信中只说这几句话而已；但是，他拿了这封信就无中生有、张大其词，说是成立了什么“何梅协定”。’（注）

何应钦回忆当时交涉情形，向笔者（古屋奎二）表示如左：

“梅津司令官是一个规矩人。但是，他下面的参谋们-像酒井隆、高桥坦这些人，为求表现，便极尽其为非作歹的能事，而梅津则无法加以抑制；他们瞒着梅津做了许多坏事。

“至于什么‘梅津、何应钦协定’，根本就是造谣。当时，交涉的结果固然是于中国不利；但在日本来说，又是怎么样？只要看后来的结果，该会明了毕竟是做错了。……”

按酒井隆于战后被中国以“战犯”逮捕，于一九四六年九月在南京判处死刑。

在此后不久，所谓秦德纯和土肥原贤二之间的“秦土协定”，又复如出一辙。日军就是根据这个“协定”迫使中国军退出热河西邻的察哈尔省。

日军所引以为藉口的，是发生于六月五日的所谓“张北事件”，这次是有日本特务机关员四人潜入察哈尔张北县城，被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所属第二十九军所逮捕，于八小时后释放。但当时在北平伺机逞其谋略的土肥原贤二便抓住此一事件为藉口，声称：“是对于日本军人的一种侮辱”，遂即通过日军“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中佐于六月十一日向中国方面提出“惩办直接负责人以及由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道歉”等项要求，限五天答复。

此时，国民政府鉴于日军一贯的作风，料到如果置之不问则其要求必然会越来越高，故于十八日先免除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以民政厅厅长秦德纯代理。

于是，要以宋哲元为交涉对象而落了空的土肥原，便转而找定了秦德纯的麻烦。

秦德纯当场吐血

二十三日晚间，土肥原以私人拜会的性质迳行闯进北平秦宅，和一直拒绝接见他的秦德纯会了面，提出“撤退宋哲元部队、解散排日机关”等五项“要求事项”以及“援助日本特务机关在察哈尔之活动”等六项“特别期待事项”。

在会谈到最后时，土肥原更且态度蛮横地说：

“秦将军，你知道外交的后盾是什么？”

这是在炫示其武力，加以胁迫。

秦德纯气得浑身发抖，大声地回答：

“那么，你们就派军队来进占察哈尔好了！二十九军就是剩下一兵一卒，也要拚战到底！”

此时，秦德纯揎起了袖子，想要痛揍土肥原一顿，但转念如果揍了他则难以善后，乃极力按捺住冲动，因而便当场吐出血来，倒卧在沙发上。

国民政府在接到秦德纯报告和土肥原见面的情形之后，认为要防止日军“自由行动”，则只有选择进行交涉解决问题的途径，乃指示秦德纯和对方折冲。结果，由秦德纯提出一个文件，内容有“中国军队撤出察哈尔中北部的宝昌、沽源等地区，国民党党部自察哈尔退出，禁止反日组织及其活动”等项。——这就是所谓“秦土协定”。

于是，稍见改善曙光的中日关系，便又被先后在河北、察哈尔所发动的此类日军策谋所摧毁。

蒋总统的愤慨

六月三十日，为指挥剿匪战争而驻节成都的蒋总统，在反省录上写出了愤怒与慨叹的心情如下：

‘呜呼！国势至此，何以为人？凡有血气之伦，黄帝子孙，其将何以雪此奇耻！若不图自立，复有何颜立于天地之间！志之！志之！

‘倭王

昭和当蒋作宾呈递国书时，特提出“此次华北事变，实对不住；对汪、蒋二公之苦心深表敬佩，烦为转达”等语。此国王面示道歉之例，实所罕见。彼或深愧不能制止军人非法行为。倭政败乱，亦可见矣！’

中日外交密谈

虽然日本军阀在河北和察哈尔接连扩张其行动，但循外交途径改善中日关系的努力，也着实在继续进行之中。

和日本的友好，是中国不变的愿望，以“敌乎？友乎？”之发表为契机，两国关系方才看到有趋向缓和的朕兆；而一连串的日军扩张行动，则是意图加以离间的一种挑衅手段。是故为了要牵制日军的行动，乃更有加强外交交涉的必要。

七月二十八日（一九三五年），在四川峨嵋筹备创设军官训练团的蒋总统，乃邀约归国述职中的驻日大使蒋作宾前往晤谈，嘱其向日本政府传言：

‘只有强者事弱，然后乃有真正之同盟；无威胁而成之同盟。’

这是要告诉日本政府——只顾以武力为背景，则绝对不会产生真正的友好关系。

蒋作宾遂即通过新闻报导表示：“中国政府不因一些不愉快的事件而变更改善中日邦交的政策。”随后，乃于八月三十日返回东京任所。

日本国内伦纪废颓

当蒋作宾离开日本的八月十二日，在日本陆军中有所谓“统制派”中心人物之称的陆军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少将，于白昼在陆军省内被对立的“皇道派”分子相泽三郎中佐所砍杀。

这是显示日军内部纪律紊乱、精神颓废的事件。

‘日本军务局长永田被其现役军官所刺，其内讧之端渐现。吾知其老成谋国者已悔其侵略满洲之所得，不偿其国内伦纪之废颓。——从此日军气焰或将稍杀乎？’（蒋总统八月分反省录）

在永田铁山被杀害的这一天，导演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大佐就任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又“支那驻屯军司令官”则由多田骏少将出任。其后，多田与“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少将、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少将被称为“支那通三人小组”，积极推动日军的华北工作和策进“反蒋”战略。

蒋作宾提出三大原则

（民国二十四年自由人注）

返回任所的蒋作宾，于九月七日访晤广田弘毅外相，秘密会谈。蒋作宾即席提出调整中日邦交三项基本原则如左：

“一、中日两国彼此尊重对方在国际法上的完全独立，日本应取消在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租借地、租界、领事裁判权在内；军队和军舰非经对方许可，不得在对方的领土和领海驻屯或通过、停泊；此外，并互相享有及遵守独立国家在国际法上所规定的一切权利与义务。

“二、今后，中日两国彼此维持真正友谊，凡非友谊行为——如破坏统一、扰乱治安或毁谤诬蔑等行为，不得施之于对方。

“三、中日邦交恢复正常轨道，今后一切事件与问题，均须用害怕外交手段解决；凡外交机关以外分子的行动或其任意采取的压迫手段，应立即停止。”

蒋作宾更且表明：“如果日本承认以上三项基本原则，并撤消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以及军方有关华北的约定，恢复九一八以前状态，则中国方面将会同意——（一）设法停止排日及抵制日货。（二）不谈满洲问题。（三）在平等互惠、贸易均衡的原则下商量两国经济合作，凡于两国有利者固当为之，即使于日本有利而于中国无害之事亦可商量。（四）倘经济合作成绩良好，两国国民不会再有猜疑，并可以商量军事问题。”这在中国来说，实在是最大限度的善意提议。

当时，广田虽然避开立即答复，但也表现出相当积极的态度，他在十八日再度和蒋作宾会晤时，且曾透露：“中国政府的希望，日方总愿尽量地做；但如何实现，目前正和军方研究中。”

“广田三原则”

未料，到了十月七日，广田弘毅又约晤蒋作宾，表示：“中国方面所提出的三大原则可望实行，但必须中国先同意下列三点——

“一、中国须绝对放弃以夷制夷政策，不得再藉欧美势力来牵制日本。如仍旧阳与日本亲善而阴结欧美，则中日两国绝无实现亲善的可能。

“二、中、日、满三国须常保持圆满关系，这才是亲善的根本前提。中国如能正式承认满洲国，日本才可认为中国确有诚意。唯在中国方面或许有其不能及时承认之困难存在，然无论如何中国必须尊重满洲国存在之事实，应找出办法——第一：使满洲国及与满洲国接近的华北地区之间不起争端。第二：使满洲国及与满洲国接近的华北地区之间保持密切的经济联络。

“三中国为防止赤化，须与日本共商一有效的方法。赤化运动发源于某国（指苏联），自北南下，故在中国北部边境一带，有与日本协议防止赤化之必要。”

这就是所谓“广田三原则”，也就是此后中日两国外交上的焦点所在。

中国力护主权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向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所言明的“广田三原则”，是日本政府在十月四日（一九三五年）所决定对中国邦交的“调整原则”。

这是日本政府为了要确立一个统一性的基本政策，乃由外务省次官重光葵为中心进行研究；再以外务省的方案为基础，与陆军、海军两省协商，并特别照顾到陆军的意向，然后筹计出这样的原则。至于其具体内容，在告知蒋作宾之后便一时列为外交秘密；及至翌年（一九三六年）元月二十一日，广田在国会作外交政策演说时，才将之公开出来。

在日本方面，“广田三原则”的正式名称为——“外、陆、海三相关于对支（中国）政策之谅解”。其所标榜的目的是：“依据以日本为中心的日、满、支三国提携共助，确保东亚安定，并谋求其发展，乃为我国对外政策之根基。……当遵循道理，并采用缓急制宜方法，使支那方面之中央及地方政权调整其对帝国（日本）及满洲之关系；俾期日、满、支三国之间的根本关系克臻于确立应有的状态。”并从而要求中国在“彻底取缔排日言论与行动、实际上默认满洲国、经济文化合作、排除苏联在外蒙古的威胁”等方面予以合作。

广田弘毅在向蒋作宾说出其“三原则”之际，一再表示：“中国政府如能完全同意此三原则，日本便可以逐步商议中国所提出的三大原则。”

蒋作宾当时的回答：关于第一点（与日本亲善），请看今后事实，不必怀疑；至于第二点（伪满问题）、第三点（防止赤化），须报告本国政府研究。

盼日恢复外交常轨

蒋总统在接到“广田三原则”的概略报告时，正好是在为了指挥剿匪战事及与宋哲元、阎锡山等北方负责人士会谈而乘飞机巡行于陕、豫、晋各省之间。十月十三日，在由开封飞往太原时，抽空致电在对日外交方面直接负责的行政院院长汪兆铭，表达意见如下：

‘蒋大使原电文至今尚未接到，如其为所传要求“放弃以夷制夷之外交、尊重伪满与联盟防赤”之三节，则形式似较减轻，而其内容则为“退出国联、承认伪满与联盟对俄”之变相，亦即实施此内容之第一步也。故其意义深重，不得不郑重考虑。

‘惟弟意我方应立对案之原则，无论施行何事，欲求其切实有效，必须尊重中国之主权、与不妨碍中国之统一，先使两国国民去其疑窦，恢复情感，方为根本之办法。故对方（日本）应先恢复外交之常轨，尤其对于华北之战时状态，更须首先解除，以立两国政府之信义，则事事当可讨论，而期其有效。……’

二十一日，蒋作宾再与广田晤谈，传达中国方面的答复如左：

“（一）中国本无以夷制夷之意。中国在与其他各国关系方面，决不使中日关系受到不良影响，尤其不使有排除日本或妨害日本的意思。

“（二）今后，中国虽不能和满洲进行政府间之交涉，但中国对于该地方之现状决不用和平以外方法来引起变端，且将设法保持关内外人民之经济联络。

“（三）中国北边一带之境界地方应如何防范赤化，若日本完全实行中国所提中日亲善之三大原则，则中国在不妨碍本国主权独立原则下，拟与日本协议有效之办法。”

中国方面的主张极其简单，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站在完全尊重主权与领土的立场，和平解决问题。

广田坚持不能让步

可是，广田则闪烁其词，使人感到交涉前途极其困难。他对蒋作宾大致这样地说：

“贵大使说是需要日本先实行中国的三原则，然后才能接受我方所提出的三原则，这和日本的意见正好相反，恐怕永远解决不了；中国方面究竟是想用怎样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呢？”

不多几天之后，蒋作宾因须归国出席中国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及五全大会，故于行前的十月二十八日再访广田告辞。在此次谈话中，广田首先就中日亲善问题作了“彼此均已明了两国政府意见，今后宜谈具体办法”的提议；同时表示：“广田三原则是经外务、陆军、海军、大藏四省会议所决定的基本方针”——坚持不能让步。

结果，中日双方乃决定通过外交路线进行交涉；十一月初，由驻日大使馆参事丁绍伋与外务次官重光葵开始商谈有关两国交涉之手续问题及准备事项。

可是，中国方面的“三大原则”与日本方面的“广田三原则”在根本上有其不能相容的性质，中国拒绝全面接受“广田三原则”的方针毫未动摇，但对此有所曲解的广田，则于翌年（一九三六年）元月二十一日在日本国会宣布“广田三原则”时，却称：“中国方面也表示赞同之意”；中国外交部对于这种诬罔之词立即发表声明，予以否定。

日分化阴谋未逞

在华北方面的日军，根本不理中日之间的外交交涉，而积极策进其所谓“华北自治”的活动。

日军之所以采取这个手段，当然并非放弃武力侵略，而只因当时日本军部是把重点放在推进对苏联的战略准备方面，故须尽可能地用流血最少的方法来把华北变成其“第二个满洲国”。

攫取华北三个步骤

关东军为了要攫取华北，其所策划的谋略大致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要求中国国民党和中央军撤离，造成华北的真空状态。第二，是要捧出傀儡来，实现为日军所操纵的“自治”。第三，是要迫使中国政府承认日本在华北五省（冀、鲁、晋、绥、察）的“指导地位”。

关东军先后以何应钦、秦德纯为交涉对象而强迫获得的承诺，算是第一个步骤的完成；而下一个步骤，就是物色傀儡。

最初被关东军属意的人，是曾为北洋军阀巨头的孙传芳。他们首先着手制造“拥孙倒蒋”的空气，六月十四日（一九三五年）在北平城内散布印有这种口号的传单。可是，孙传芳本人则向新闻记者表明：“利用我的名义乱发传单，一定是日本人的阴谋，我对这件事毫无兴趣。”于是，日军的谋略乃未能得逞。

接着，在六月二十七日，又发生了由曾为吴佩孚旧部白坚武所领导的暴动事件。——他纠合了中国流氓及日本浪人共三百多人袭占北平近郊的丰台车站，夺得装甲火车，驶达永定门外，开枪乱射，制造事端。

白坚武是受了伪满“军政部顾问”大迫通贞及日本浪人组织“北支青年同盟会会长”志村正三的收买，并得到日军“支那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的默许。

在这个当口，正好中央军与于学忠部队由于所谓“何梅协定”而自华北撤离，开始南下，是故白坚武等人的最初计划乃是要和潜伏在北平城内的同路人内外呼应，夺取北平，然后即以“东亚同盟军”名义发表“反蒋倒党”宣言，组织“华北国”的“自治政府”。可是却在发动之初便被刚就任河北省主席兼津沽警备司令商震和万福麟的部队在北平城内以及丰台将之镇压下去。

事件发生之后，立即被查明其幕后有日本人策动，以致日军在驻北平的各国外交使节交相指谪之下感到颇难处置，遂即下令将“北支青年同盟会”解散，并命志村正三归国。

此际，日军对于华北五省当政者的政治工作也还是进行得颇为起劲。

日方所寄予期待的，是山西省的阎锡山。日方认为他是旧时代的军阀，并在全国统一之后，曾有背离中央的经验，故而对之颇为看重。

六月下旬，日本陆军省担当“满蒙工作”的负责人前往阎锡山所在之地的太原访问；其后，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高桥坦以及在天津的“支那驻屯军”干部都曾陆续赴晋。可是，阎锡山不仅没有为他们所动摇，反而在报端发表公开信，将日本阴谋揭穿，并且更致函孔祥熙道出：“看到来太原访问的日本军官所持军事地图，显示日本最初只想利用黄河以北作为日苏交战时的补给基地，但现在已扩大及于长江以北地区。”呼吁中央提高警觉。

宋哲元获青天白日勋章

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前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也是为日本所重视的一个对象。日本军人、尤其是“支那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等一帮人，忘记了宋哲元是在长城抗日战争喜峰口之役种立有惊人战功而被誉为抗日英雄的人物，只顾想到他曾经是“反蒋”的冯玉祥旧部、并非中央嫡系部队，便认为有被利用的可能。

未料，国民政府特地于七月二十七日将中国最高荣誉的“青天白日勋章”授予宋哲元本人及其部下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等将领，以表扬他们抵抗外侮，功在国家，同时也是对于日本给以颜色的一手绝招。接着，又将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撤销，并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显示日本的阴谋活动尽管继续下去，但毕竟是徒劳无功的。

于是，黔驴技穷的日军，乃终于透露出将会出动武力，以示威吓。～～九月二十四日，新任“支那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少将竟然向日本记者发表所谓“多田声明”，狂言：“为自华北排除阻碍此地区成为日、中、满共存基础之明朗化的国民党与蒋政权，仍将不得不行使武力。”同时，并散发标题为“北支（华北）基础观念”的小册子，攻讦中国方面为改善中日关系的努力乃是“敷衍一时的手段”，公然对于国民政府肆行中伤。

多田的狂悖言论，即使是日本政府，也认为其言之过分，故而声明予以取消。

‘日寇多田宣言，詈骂诋毁，对我党国侮蔑极矣！……日情上下既背离，内外又矛盾，其乱亡将不旋踵而至。’（蒋总统九月二十九日日记）

应该欢庆的一九三五年双十节，在忧虞的气氛中来临。这一天，蒋总统的日记留有如左记述：

‘民国至今二十四年矣！东北与外蒙被侵，日寇凶横，国既不国，民亦不堪其命。国庆乎？国耻乎？余能不力行以新子之国乎！’

日军一再逼迫

十月十三日，关东军在大连召集驻中国各地武官以及“支那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冈村宁次等人举行会议，再度确认“分离华北”方针。接着，冈村更前往天津、上海，向驻在当地日军转达其军方的方针。自此之后，分离华北的活动乃更趋积极。

在天津方面，收买中国流氓及汉奸，组织了诸如“华北人民自救会”、“华北人民急进会”等所谓要求“自治”的“请愿团体”。十二月二十一日，在香河县城内有莠民约千人发生暴动，这是由伪满“军事顾问”大迫通贞所煽动，并有日本人混杂在暴徒行列中。

日军对于中国内政的干涉，已是公然肆行无忌。首先被引为藉口的，是八月四日在滦州车站有河北省政府战区特警第三总队长刘佐周被暗杀的事件。

日本方面称之为“滦州事件”，据谓有驻唐山日军守备队长温井亲光少佐遭手枪狙击未中，流弹打死了两个中国人。

于是，日军乃指此事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指挥之下的“手榴弹队”所为，并以违反塘沽协定为藉口，谓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参议陶尚铭与事件有关而将之逮捕，且监禁十日以上。实则陶尚铭是因前在唐山行政督察专员任内不肯做日军傀儡，所以招致嫉视。

外交部为此乃向日方提出严重抗议，陶尚铭终得释放；但日军则仍然打算再找麻烦。

要求撤销军分会

在事件业已过去两个多月的十月二十九日，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高桥坦及“支那驻屯军”参谋中井增太郎突然向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口头表示：“滦州事件乃中国方面有组织的抗日行动。”遂即提出

要求：“（一）商主席应代表华北各机关向日方表示遗憾。（二）从速逮捕犯人。”同时请劝告国民政府：“（三）撤废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并将北平市长袁良免职。（四）将来不许策动反对日、满的机关北上”等项。此外，高桥坦更强迫声称：“何梅协定的解决时间仅有十天，此次也希望从速解决。”

据日本资料——高桥、中井两人原拟将（三）、（四）两项也列入“要求事项”，但日本陆军首脑部以“恐有干涉内政之嫌”而未予允许；因此，高桥等乃拟采“内部指导”方式劝告中国方面自动实施。

当时，蒋总统在十月三十日的日记中留有这样的记述：

‘日寇又向华北提出“撤消军分会与撤换北平市长”之要求，闻之不胜气愤；舍备战外，更无第二条路矣！’

继之，更在十月份反省录中记下左列两点：

‘一、日寇在华北策动五省自治独立，必欲于六中全会（十一月一日～六日）或五全大会（十一月十二日～二十三日）时达成其目的，对各省主官威胁利诱，无所不至；鲁（山东）韩（复渠）尤为动摇，而百川（阎锡山）则深明大义也。

‘二、由川飞陕、豫入晋，访问阎百川，商谈国事；彼面允入京，参加大会，并表示拒绝“华北自治运动”。此实为华北局势转危为安之先着也。’

国民政府对于日本的非法要求，即以“罢免北平市长袁良等项乃属中国内政”而予以拒绝。

于是，高桥坦、中井增太郎二人复于十一月一日夜晚往见商震，口头通告：“为尊重贵国政府体面，故特劝告自动实行；既如此，则我军唯有立即以自由行动谋其实现。”由于有这些过节，所以北平市长袁良乃于十一月三日自动辞职；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也于十一月二十六日撤销。

我国发行法币

又一个干涉中国内政事件，是关于中国的币制改革问题。这个改革，是中国政府在十一月四日出其不意公布实施的，其办法是将原来流通的各种银币禁止使用，只准以中央、中国、交通三家政府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定货币（法币）。

同时，使过去的银本位制转换为管理货币制，设定法币一元折合英镑的比率为一先令二便士半。此一比率，衡诸当时伦敦的白银市场汇率，中国元的贬值百分之四十。

币制改革的直接因素，为中国的白银外流不已，以及同时所产生的经济停滞。

中国自一九二七年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以来，颇为币制紊乱与财政困难所苦；而更促进其严重性的，则是美国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日所制定的购银法案。美国依据这个法案为增储国库准备而开始大量购入白银；于是，国际市场银价乃因之立即高腾，而中国国内白银遂迅速流出甚钜——自美国新法案施行之后到十月中旬的三个半月之间，中国流出白银达二万万元以上，甚至国内通货的银元也都为之感到缺乏。

是故，财政部乃于十月十五日（一九三四年）实施征收白银出口税，以期遏阻外流，但仅能收效于一时，反而却导致大规模的白银走私出口，而钱庄、商店乃有陆续倒闭的情况出现。

币制改革，就是为了断然挽救如上所述中国经济危机的一个外科手术；同时，也是在中国的金融政策与管理方面具有“全国统一”的划时代意义。

然则，日本就连对于这一方面也要求插嘴干预。

五全大会

中国国民对于新货币的实施一致支持。中外银行都主动地将过去的银元向中国政府提出。于是，不断暴落的上海外汇市场的混乱状况乃为之平稳下来。行情趋于安定，产业复苏，输出增加，眼看着景气好转。至此，在币制改革方面获得成功的中国，不仅严重的金融危机得以渡过，并且，也是向国内外显示了政府业已具备应付紧急情况的能力。是故，此后由长期抗日战争，到战后的混乱、乃至于最近的石油震撼，都能适时不断地调整金融、安定物价，给今天的中华民国带来坚实的经济繁荣，也都是以在那个时候的经验为之基础。

像这样的币制改革，日本则始终反对，而且意图妨害。

其因素是：第一、由于通货的统一，将会使中国国家的统一愈益强化，恐怕在华北的分离工作做起来比较困难。第二、由于这个改革，是在英国的协助之下进行，故而意图防堵英国会因此而增加了对中国的发言力。

我国币制改革极为成功

先是英国在这个改革之前，曾向中国表示了可在财政上给予协助之意；并且决定派英国政府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为访华经济使节。于是，日本政府乃立即通过其驻英、驻华两大使展开打消李滋罗斯成行的活动。

李滋罗斯为了取得日本的谅解，乃在到中国访问之前的九月六日（一九三五年）先抵东京，与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外务次官重光葵等人会谈，试探共同对中国提供借款的意向，并表明有计划向中国建议改革币制。针对李滋罗斯的意见，日本方面则藉口“为期尚早”而表示反对。

至此，李滋罗斯乃断定英国只得单独和中国接洽，遂于九月二十二日到达南京，即与财政部长孔祥熙、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等人一再协商，表示为协助中国挽救当前财政危机，英国有同意提供借款一千万英镑的准备。结果，币制改革遂断然付诸实施。

而日本军方则毫不避讳地出面干涉。

在币制改革刚才实施的十一月八日，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矶谷廉介少将便发表声明：“站在驻外军部的立场对于国民政府此次币制改革断然反对。日本政府应向国内外明白表示反对态度，并使其中止进行。”翌日（九日），日本陆军首脑部也以非公式见解表明态度：“币制改革，必然归于失败。白银国有，乃给予中国民众以不幸，尤其依赖英国援助，等于是卖国行为。”

可是，币制改革，和日军的“期待”恰恰相反，竟然极其成功。对此感到焦灼的日军，于是便隐约透露出要凭仗武力来进行妨害。

据日本资料——关东军认为币制改革是他们行使武力的最好藉口。司令官南次郎在十一月十二日致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皇族）的电报中，有如下的陈述：

“此次，南京政府突然坚决实行白银国有及币制改革，将使与日满两国有密切关系的北支（华北）地区经济枯竭，更且进而形成对满洲国经济基础之威胁。

“是以本军确信南京政府此次之暴举，实则为日本久萦怀抱的北支工作给予易于断然实行的绝好而且难得再有之机会。”

同时，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高桥坦也以这个币制改革问题为题目对宋哲元威胁地说：

“白银国有与现银集中上海，是陷华北经济于绝境，并阻碍日本利益。如贵方不能自动防止，则日本将以实力期其实现。”

宋哲元坚拒日要求

十一月十二日，土肥原贤二到达北平，向宋哲元开出毫无道理的难题，他要宋哲元“树立华北五省自治政府，限十一月二十日以前宣布，否则，日军便夺取河北、山东。”

与土肥原活动的同时，关东军并且出动配属有战车、重炮的部队，向山海关、古北口等处增加了兵力。

在大沽口海面上，由旅顺、青岛调来巡洋舰、驱逐舰；在北平上空，不断有日本飞机示威盘旋。

宋哲元对于连日不请自至的土肥原所带来的胁迫，一直坚强抗拒，直到限期即将到来的十九日下午一时，更离开北平，避往天津，沉默抵抗。

被宋哲元置之不理的土肥原乃大为着慌，也就跟在后面去了天津。他所谓发动武力，毕竟未见断然出现；而“自治宣言”的策谋，遂亦未再有下文。

此外，日军对于山东的韩复渠并另有策动，但结果也归于失败；同时，河北省主席商震则在保定住进医院，躲开了土肥原的纠缠。

这一段期间，在南京方面，中国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于十一月一日开幕；继之，自十二日起，更在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之中。

在十一月一日六中全会开幕的当天，行政院院长汪兆铭被南京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以手枪狙击，身负重伤，致卸职就医。而另一方面，日本想拉拢之作为“反政府势力”的阎锡山、冯玉祥等领导人都参加了会议，显示国内趋于团结。

十九日，蒋总统向参加五全大会同志提出“对外关系之报告”，重申中央的基本方针如左：

‘苟国际演变，不断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的国家与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叶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最大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

绝不轻言牺牲

蒋总统在国民党五全大会所作“对外关系之报告”中，虽然特别强调“当为最大之忍耐”，但毕竟自有其限度，故而蒋总统又说：

‘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绝不轻言牺牲。以个人之牺牲事小，国家之牺牲事大；个人之生命有限，民族之生命无穷也。

‘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深信此必为本党救国建国唯一之大方针也。’

在作这个报告第二天的十一月二十日上午（一九三五年），蒋总统致电在保定住院中的商震，给予指示：

‘如平津自由行动，降敌求全，则中央决无迁就之可能，当下最后之决心；望兄毅然拒绝，切勿赴平，与中央共同存亡为盼！’

蒋总统接见日大使

当天（二十日）下午五时，蒋总统在南京接见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并有湖北省主席张群、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参加，就华北情势及中日外交交换意见达二小时以上。

此次会谈的主要内容，在中国外交部留有纪录如下：

有吉明华北问题，现在非常紧张；中央处理华北问题，若不顺应地方现势，而加以实力之压迫，必为华北地方当局所反对，日本关东军将抱不安，其结果则纠纷必现。

蒋总统华北人民皆拥护中央，华北军队皆听命于余，余可随时赴华北各地，华北本无问题，中央自无以实力压迫之事。

有吉明华北自治运动，乃是事实；若中央不顺应现势，则华北地方治安不能维持。

蒋总统自今年二月间会晤贵大使后，瞬将一年，回忆当时之谈话甚为圆满；但六月间华北忽又发生意外之事，本人甚感遗憾。

有吉明请问委员长（蒋总统）对广田三原则之意见如何？

蒋总统个人意见赞成，无有对案。但三原则中之二、三两项关涉华北问题，故必须中央派大员赴华北主持军民两政，方能与日方负责人进行商讨。

有吉明由中央派大员前往处理，惜嫌稍晚，但固属佳事。

蒋总统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多是日方策动，中国方面并无策动。

张群只要土肥原不作“总顾问”，即无事。

有吉明华北与日“满”关系密切，地方觉有自治需要，关东军从旁加以援助则有之；若说全是日本策动，中国方面绝无其事，则未必然。

蒋总统本人对于华北问题在两星期前已定有办法——拟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取消，改派大员代表中央坐镇北平，办理一切。请转告贵政府。

在这一次会谈中，蒋总统对于广田三原则表示“赞成”的发言，后来成为双方争论的原因。日本方面希望以“赞成”为前提从速进行调整邦交之交涉，但在会谈一个月之后就任外交部长的张群向有吉明表明：“所谓赞成，乃赞成三原则之商讨，并非无条件赞成。”

于是，日本方面乃以此为非蒋总统口头承诺之初意。加以翌年元月外相广田弘毅在国会报告“中国方面也赞同三原则”时，中国外交部为之发表否定声明，以致后来在交涉方面有欠融洽。

另一方面，土肥原贤二在天津仍然对于宋哲元紧迫不舍、纠缠不休，想说服他宣布“自治”。

还有，“支那驻屯军”参谋中井增太郎也闯进住在医院的商震病榻之旁，连哄带骗地谎称：“宋哲元、韩复渠已经同意；你如果迟去北平，便会有破坏自治的嫌疑。”然而，宋哲元也好，商震也好，不用说都是充耳不闻，置之不理。

冀东的傀儡组织

被华北的实力者们所拂袖不理、因而陷于窘境的土肥原，于是便只有找上了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

殷汝耕竟然一拍即合，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天津日本租界的旅馆中和土肥原共举“卖国”的香槟之杯，约定了背叛国家，投靠日军。

二十四日，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宣言脱离中央。其“自治范围”虽然只限于冀东一隅之地，但也有五百万人口；又该地区税收及交通机关收入，则占河北省岁入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二，殷汝耕即派遣其属下汉奸，扣留着这些收入。

这就是日本人在关内所最初卵翼的傀儡组织。

何应钦奉派赴平

就像是和冀东殷汝耕宣布“自治”的行动互相呼应一样，在天津方面，有被日本所操纵的一部分反动分子及汉奸，也于十一月二十五日武装示威游行，要求市政府“还政于民”，并在各处肆行扰乱。

‘日寇诱惑殷汝耕在滦东叛变独立，并促使汉奸领导匪众迫逐天津市政府与司令部，虽由日宪兵干涉分散，但仍集合市内图书馆示威作乱。国既不国，人亦非人，耻辱实甚于九一八之时也。’（十一月二十五日日记）

土肥原贤二一帮人的诡计，显然是要以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先打开一个窗口，然后更进一步扩大“华北自治”的范围。

此时，宋哲元由天津回到北平，土肥原也在北平。为避免发生意外情况，蒋总统乃在二十五日的当天致电宋哲元，指示如次：

‘滦东、津市、相继发动，其他地方亦必有所策动，望兄严密戒备。’

二十六日，国民政府对于宣称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的叛徒殷汝耕明令通缉。

日军强占电台车站

但日军的行动则越发肆无忌惮。

他们以管制交通为词，出动军队进占丰台车站与天津车站；同时在另一方面，土肥原则仍然盯紧着宋哲元，限他在十一月三十日以前宣布“自治”。

‘平津间车站被日寇所占，天津中航公司机场亦被占据，并要求取消华北新币制政策。-重重威胁，不可再耐，几无迁就余地矣！’（十一月二十七日日记）

然而，这还不是最后关头。

‘每遭非常祸患，应泰然自处，凡事皆主于上帝，由我信心而生耐心，耐心而获成全也。

‘日寇横暴状态，已无和平之望，故毅然断行～一面抗议其日军在华北之暴行与土肥原之胁迫，一面准备如“华北自治”发表，则明示为日寇以军力所逼成，而规戒华北之主管。筹维再四，另无他道也。’（十一月二十八日日记）

大学教授发表宣言

北平各大学的校长、教授们，此时曾发表宣言，指斥“脱离中央，乃卖国的阴谋。”于是，日军乃于二十九日将在宣言上签名的代表性人物-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带往日本兵营。这简直是“占领军”的行为。

十一月三十日，宋哲元致电蒋总统陈述：“情势危迫，民情愈益愤昂；议论纷纭——倡导自治者有之，主张自觉者有之。一一阻遏，有所不能。……”

国民政府为谋打开局面，乃派军政部长何应钦于当天晚间北上。

和日军压力苦斗的宋哲元等人，因何应钦之到来而增加了勇气，表示决不向日本屈服。

何应钦进驻北平之后．遂致不能再将攻击目标集中于宋哲元一身的日军，乃派遣十五架飞机飞临北平低空盘旋，投下由殷汝耕具名的传单，要求“响应自治”；又发动七十多人的示威游行队伍，涌到为何应钦行馆的居仁堂前，演出伪装民意的“请愿运动”——要求“实行自治”。

蒋总统兼负军政重责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于十二月七日决定接受因被狙击负伤的汪兆铭辞职，以蒋总统继任行政院院长，同时并担任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胡汉民）暨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兆铭）副主席，兼负了军、政重责。

十二日，任命蒋作宾、张群、何应钦等人为内政、外交、军政等部长，都是通晓日本情况的人士。

华北问题四原则

当天，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蒋总统报告最近处理华北问题经过，并说明了四个原则：

‘照当时华北的情势看，本来已经很少挽救的希望；不过，大家认定——无论如何，政府必得竭其所能尽到自己的职责。于是，决定请何部长迅速北上，力图挽救；并且决定了处理华北问题的四个原则，请何部长到华北之后，再斟酌情势，负责办理，这四个原则就是：

‘一、如情势许可，何部长即就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职；否则，参酌西南政务委员会现状，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

‘二、冀察政务委员会组织，以适合北方情势为标准，其委员由中央委任，并以宋哲元为委员长。

‘三、冀察一切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必须保持正常状态，不得越出中央法令范围以外。

‘四．绝对避免自治名义与独立状态。

‘当何部长领受上述意旨北上的时候，北方有许多人——尤其是日本人——当然不满意，想种种方法来阻止他，甚至已经到了半途，还有人来阻止他，不要他到北平去。

‘但是，我（蒋总统）看当时情势不好，决心督促何部长——无论有效无效，必须不顾一切，直到北平，照原定方针积极处理。’

冀察政委会

在何应钦的努力之下，冀察政务委员会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成立，国民政府任命了包括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在内的委员十七人，其中有与日本人关系较深的王克敏等七人；但委员长宋哲元以及委员秦德纯、张自忠、万福麟等十人，则属于曾有抗拒日军侵略作战经验的第二十九军（旧西北军）或东北军。——至少在这个委员会中，是由非亲日派控制了多数。

同时，在旧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离开之后的河北省，还驻有阎系商震等及冯系宋哲元等不相隶属的部队，为期在军事上归于统一起见，中央更任命阎锡山、冯玉祥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加强联系与团结。

‘同时，调整我们自己的内部——将商震调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河北一带专责宋哲元主持，并调萧振瀛（宋哲元嫡系）为天津市市长。因商与宋如同在北平，日本人易于挑拨离间。现在中央如此处置，日方是很不愿意的，因此他们又谋使萧振瀛不能到达天津接事而要求不要调动；而我们明白此事与日本无利，便立刻发表。’（注一）

对中央政府负责

设立这个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目的，乃是衡虑到暴露在日军直接威胁之下的冀、察两省特殊情况，以谋一面避开日军压力，一面便于行政上的运用，俾遏阻日本对于所谓“华北自治”的策进。这是在无损于领土、主权完整的范畴之下，不拘于形势、而能确切作实质上的维护。

‘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实际上是对中央政府负责的一个行政机关。一般人却看作是自治独立的政府，实在错误。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实际上是中央的军队，宋哲元是我的部下，他绝对服从中央的，听我的命令的。现在日本人当然是企图在华北造成第二个“满洲国”，但是绝对没有那样容易。

‘殷汝耕在滦东设立“自治政府”，是因为那里没有国军，政府的力量不能贯彻，所以他在日本势力卵翼之下，造成现在这个汉奸组织。这种卖国的汉奸，政府当然是要讨伐的；不过，要讨伐他，就一定会直接和日本冲突；我们现在力量不够，不得不暂时容忍。这并不是政府怕他，实在是实力的问题，时间的问题。

‘我们革命的政略和战略，是可进可退、有伸有屈的，我们现在要忍受暂时的退屈，来谋将来最大的进展。’（注二）

一九三五年国历除夕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晚间，蒋总统回顾一年过程，在反省录上留下这样的记述：

‘今年统制中、交两银行，实施法币，发展川、黔、湘、陕、甘、豫连贯之公路，安定川黔，召开本党全国代表大会，团结内部，冯、阎皆得以诚相感召。——此皆成功之特点。

‘倭寇阴狠险阻，虽云已极，卒不得逞。最后华北自治亦未发现，皆为我精神战争之胜利。甚矣！国人徒觉抗倭之难，而不知伐谋之战为更难也。’（注二）

救国全在国人努力自强

一九三六年元旦，担任行政院院长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总统，以身兼政、军责任的地位通过无线电台广播向全国同胞发表救国的号召：

‘我们国家的情势，现在很危险急迫，时时刻刻都在危急存亡之中。但是，国家民族的命运完全是由我们全体同胞自己来决定的。我们要挽救四万万同胞共同所有的中华民国，复兴历史文化最悠久、最光荣的中华民族，我相信一定是有方法的。这种方法，并非其他，就是在我们中华民国本身的努力；换句话说，就是在我们四万万同胞个个人能够努力自强。’

这一年的世界情势，正逐渐趋于急迫。

在上一年的十月，侵略阿比西尼亚的义大利，更显出有进攻阿尔巴利亚的态势，极有扩大战线之虞。

此时，在伦敦正举行着美、英、法、日四国参加的第二次海军军缩会议，在国际间竞逐霸权的日本，主张其海军力量应和美、英平等比率，以致会议停滞。

同时，苏联也以外蒙为基地，意图向中国进展。

‘世界战事，自日本侵我东北以后，义阿遂接踵而起，德苏亦日形不稳，而英、法与美尚不觉悟，岂第二次大战终不免乎？吾甚为世界人类悲也！’（元月四日日记）

日军不断挑衅

在华北方面，日军的挑衅行动则反覆不停地出现。

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乃派秦德纯及天津市长萧振瀛等往晤土肥原贤二，洽谈撤销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但日本方面则置之不理。

元月九日夜晚，发生了日军要由北平朝阳门入城而殴伤中国守卫士兵之事，盖日军已视不受其策动宣布“华北自治”的宋哲元为“抗日拥蒋色彩甚浓的人物”，乃图制造事端迫使宋哲元陷于困境。

注一：蒋总统-“在中央政治委员会报告最近处理华北问题经过”（一九三五十二）

注二：蒋总统-“接见全国中等以上学校校长及学生代表之讲话”（一九三六一）

“二二六”事件

一九三六年元月十三日，蒋总统在南京官邸接见日本政界人士中野正刚，向之表明中国方面有通过协商解决中日两国悬案之意如次：

‘余以为解决中日问题，必先祛除两国之间现存两种不应有之心理——即日本人怕中国人，中国人疑日本人。此两种心理不打破，则此猜彼忌，种种不幸之事端，均将发生，而两国之嫌隙，势将永结不解。

10[89]2259‘中日间之问题，虽甚复杂繁难，且已至此严重之关头，但两国国民苟能以东亚人之哲学、道德思想为依归，各输诚意，则以极平庸简单之通常合理的方法，即可解决，非难事也。

‘中日间问题之解决，必须有确能负责之人，此意余极表同情。在中国方面，本人即可负责。一般人以为如由本人负责，日本必特别压迫中国，无论此言之不足信，即或可信，余亦无所畏惧。盖余已决心解决中日问题，余实有此抱负，且认定当前实为解决中日一切问题、建立两国永久和平之良好时机。’

希望通过协商以撤消华北伪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于二月十四日在北平与土肥原贤二会谈，向之提出取消该“自治政府”的要求；可是，日军方面却对此提出了以那个所谓“自治政府”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合流”的对案。

日方这个对案，其目的无非是要冀察政务委员会也脱离中央，为其傀儡；是即对于协商解决问题的要求，根本予以否定。

在这样的情势之际，日本国内又发生了大的事件——就是所谓“二二六事件”。

日军少壮派叛乱

二月二十六日拂晓，在大雪纷飞的东京，有日本陆军步兵第一、第三联队及近卫步兵第三联队的青年军官们带领约一千四百名的士兵发动叛乱，杀害了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内大臣斋10[90]2260藤实、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占据了东京市区的官厅街道，要求以属于皇道派的前任陆军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大将组阁执政。

‘倭变为叛者胜利，达成其少壮派之目的，则祸乱日亟，侵略必益暴烈。然俄方或亦更为着急。我则唯务自力更生，竭力准备，以为自救之道可也。’（二月二十七日日记）

日本的叛军，虽在第四天的二月二十九日被平定下去，但冈田内阁则因之总辞；三月九日，由外相广田弘毅出任首相，成立了新内阁。

‘日本少壮派与元老派斗争，其结果，当归少壮派胜利。我若不于其胜负未决之前求得自立，则国危而亡矣！’（三月三日日记）

“敌国不能整饬纪纲”

（民国二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自由人注）

“二二六事件”，成为日本军阀控制其政府的跳板，对于中国命运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敌国-日本-为什么到今天要陷于泥淖的深渊，不能自拔？就是因为他一般军人目无国法，军纪扫地；而他的政府又没有维护国法、执行纪律的能力，以致陷其国家整个命运于今天这样溃乱自杀的境地。他们发动“九一八事变”，全是由于一般少壮军人自由行动，不服从他天皇的诏令，不遵守他政府的指示，肆行侵略，漫无忌惮，而他们的政府，亦没有制止的能力。因此，继续地有他所谓“五一五”的事件，演成现役军人惨杀他内阁总理的罪行。军人坏法乱纪到了如此地步，而他的政府仍不敢执行法纪，不敢照律枪决他的罪犯。因此，更有他所谓“二二六”的事件，竟在他的首都东京发动叛乱，杀害元老重臣与重要阁员，乃至占领他的议会，捣乱他的政府。到了最后，就酿成“七七事变”（“芦沟桥事变”），挑起东亚从古未有之战祸，来摧毁文明世界的基础。——这都是由于敌国军队败坏军纪、敌国不能整饬纪纲之所致。’（注）

张群与有田会谈

广田新内阁的外相，为有田八郎（四月二日就任）。有田在入阁之前为驻华大使，曾到华北一带考察，其间并曾与中国外交部长张群在南京会谈中日关系。

他们的会谈，自三月十六日开始，连续四天。张群提出：“首先应自东北问题谈起，使中国完全恢复领土完整。”并主张：“关于冀察及内蒙古的行政方面，必须撤除对中国主权的障碍。”

可是，有田八郎则以解决东北问题尚非其时，不肯谈下去；至于其他问题，也只是止于重复申述日本方面过去的一些主张。

有田内调就任外相之后，遂由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川越茂升格继任驻华大使。

注：蒋总统-“整饬军纪加强抗战”（一九四一一）

走私破坏我财政

和日本的侵略华北就像是亦步亦趋地，苏俄对于中国外蒙的侵略，也已经逐渐现实化。

三月十二日（一九三六年），业已擅称“独立”而实则只是苏俄傀儡的外蒙，竟公然与苏俄签订了一个“互助议定书”。

在“议定书”中，订有“为避免并防止武装攻击的威胁，互相全力援助。”其用意，则是为了对抗由东蒙古西向发展的日本。

日本和苏俄两个侵略国家，都是为了对于未来会发生值得耽心的大战有所准备，而想在中国的国土上竞占战略性的优势地位。这两个侵略国家在还绕着外蒙乃至东北、内蒙方面的争执，当然是不可能不使中国卷入漩涡的。

四月七日，中国政府向苏俄政府提出——“外蒙系中华民国之一部，任何国家自不能与之缔结任何条约或协定”的严重抗议；同时，并声明：断难承认该“议定书”。

‘二月二十六日（日本“二二六事件”）以后，倭（日）俄与蒙伪边境冲突较前加紧，其激烈形势，为从来所未有。倭国政变，二月二十六日开始，至此适满一月；不知其再过一月，将发生如何变态也。

‘倭国政变之启其端，俄蒙协定之结其局，此四十日中之东方变局，其影响于中华之国运甚大。是固忍辱负重之效，而转危为安之机亦在于此，可不慎乎？但危险未过，困难更多矣！’（四月一日日记）

许世英出使日本

当日本广田新内阁成立的同时，中国方面召令驻日本大使蒋作宾回国担任内政部长，并起用许世英出使日本。

许世英和新任日本首相广田弘毅、外相有田八郎都是在二十多年前认识于奉天（沈阳）的老朋友，中国政府对他和广田折冲樽俎的期待甚殷。

三月二十六日，许世英呈递国书，他向天皇说：“天皇为生物学的权威者，一国君主又为人类幸福之主宰者，稍有摧残之念，则群伦生命、世界和平皆受影响。”这是为了挽救濒临危机的中日关系而要求天皇致力于此；天皇当时对之答称：“当如言尽心，还期大使努力。”

尽管外交上是这样地在努力进行，可是日本的侵略工作，却也正在越发加强。

自伪满向冀东走私

在这个时期的最大问题，是为了破坏中国经济而以冀东为根据地进行着极大规模的走私贸易。

当一九三三年签订塘沽协定、将冀东设为非武装地区之时，日军便片面地禁止中国海关的缉私巡逻船舶进入冀东沿海；于是由东北伪满循海、陆两路向冀东走私，便成了完全放任的状态。

对于这种走私情形，日本军部给予默许，置之不问；私枭们自伪满运来人造丝及白糖等类，再将较国际价格低廉的白银或银元运往关外，获致暴利；他们购买一艘小型机帆船，只要往返三趟便赚回了本钱。

走私活动，自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冀东地区为关东军所控制之后，乃益形猖獗。及至一九三六年元月，关东军更进一步与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重新商定权宜办法——只要向伪政府缴纳手续费，便可以公然承认。

至此，乃确立了关东军、日本私枭、伪“冀东政府”三位一体的走私状态。

由芦台到秦皇岛的海岸一带，大型轮船满载私货往返行驶；这些私货则公然运入河北省，贩卖到中国全国各地。

私货数量甚为庞大，自一九三五年八月至一九三六年四月之间，中国关税便因而损失了二千五百万元以上；尤其在一九三六年四月的一个月，即损失达八百万元，相当于全中国关税收入的三分之一。

中国方面，本来是以关税为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而关东军的阴谋，则是要利用这种走私来破坏由于币制改革正在逐渐改善中的中国财政；同时，因走私而缴纳的手续费，并可充实冀东伪政府的经费，更且将其中一部分移充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等人的谋略经费，供应侵略华北的资金。

我提出严重抗议

中国外交部为此一走私问题，迭次向日本提出抗议。并且，美、英、苏等列强国家也纷纷表示责难——“这是使中国的市场和财政受日本帝国主义支配的新方式”、“是使华北关税脱离中央独立，及其货币与日圆联系的计划。”可是，日本则一概不予理会。

‘呜呼！日本之贪而愚，不仅非东亚之祸，实为世界之害群马也。’（五月十日日记）

中国外交部于五月十五日向日本提出第六次严重抗议。继之，外交部长张群更于二十五日在外交部总理纪念周演讲，对于日本的态度表示责难如次：

“日本对于经济上唇齿相依之中国，遇有可以摧残其经济基础之情势，自应深感同情，而乐见此种情势之改善。

“譬如现在中国北部因受大宗漏税货物输入之影响，经济基础为之动摇，国库损失重大，我国海关当局虽已尽其全力防止私运，而阻碍横生，未能收效。

“倘日本真欲与中国提携，则一转念之间、一举手之劳，此种情势，立可改善。”

可是，日军所转动的念头，却并非朝着改善的方向，而是又要拿出武力来威胁、压迫。

日增兵华北

急于要控制华北的日军，正打算着要其天津驻军增加兵员。因为看到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不为其压迫所屈，无法使之傀儡化，故而考虑到以军事压力来赶走宋哲元。

三月下旬（一九三六年），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矶谷廉介致电陆军大臣寺内寿一，陈述意见如次：

“宋哲元惟听从南京（国民政府）命令，致我方威令不能完全行使。……为谋恢复我方自治工作的轨道，实有压迫宋哲元服从吾人之必要。为此，增强支那驻屯军（天津驻军）乃其先决条件。至祈将对天津增兵之时期提前，并务请于四月中旬实现。”

日本并无片面增兵权利

日本之派兵驻屯天津，是在清末由于义和团事件签订了“辛丑条约”因而予以承认；不过有员额之规定，日方并无片面增加兵员的权利。

然而，受到驻华军人迫促的寺内，乃自说自画地指称：“山东省有共党部队侵入，华北濒于危机，为防共及保护日本侨民，亟有增兵的必要。”遂即提出计划，经日本内阁会议于四月十七日通过增派约六千人，连同原有之约二千二百人合计驻屯天津之兵力达八千四百人。

派驻天津之“支那驻屯军司令官”，则发表田代皖一郎中将担任；五月十四、十五两日，派遣三千人在秦皇岛登陆。

日本军方在部队登陆时，发表声明谓系“为维持华北治安，而作最小限度之增兵。”

于是中国方面，乃由驻日大使许世英于五月十八日向日本首相广田弘毅面致——“现在日军增兵，不仅毫无必要，而且显然违反国际条约，并有悖于阁下前任外相时宣布的不威胁、不侵略政策”的备忘录，提出抗议。可是，日军则毫不顾忌，除天津驻屯军主力之外，并以两个大队派驻北平，一个大队部署于天津与山海关之间。

‘倭寇在华北增足一旅兵数，北平乃为其无形之占领，将来收复更费心力矣！北平文物或将由此为倭毁灭矣！徒然忧痛无益，余将急起挽救之也。’（蒋总统五月十四日日记）

日本军部因增兵而力量加强，遂即更积极策动华北分离工作。当时，据中国外交部驻北平特派员程锡庚于五月二十六日向南京报告——田代皖一郎的方针是这样的：

一、“冀东政府”取消，给予殷汝耕以伪满相当地位。

二、驱逐宋哲元、董振瀛，排除第二十九军系统，由曹锟另组“华北政府”。

三、关税、盐税、统税均脱离中央。

四、迫使山西阎锡山、绥远傅作义势力退到汾河以南。

对于像这样侵略性的增兵，在平、津乃至中国各地的学生们，纷纷不断举行抗议示威运动，并且发生了天津与塘沽之间的铁路被炸事件。

五月二十九日，国民政府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到达北平，与宋哲元、秦纯德等人协商。宋哲元尽管是在日军压力之下，但他的意志则甚为坚强。他于当天晚间召集第二十九军将领会谈，听取意见，各将领都主张对日本采强硬态度，就连在当时目为亲日分子的萧振瀛也支持宋哲元不对日本妥协。

循协商途径解决问题的办法，已经是到了限界。

盖日军之对华北增兵，显然是在作准备开战的部署。

走上军阀控制政治道路

当决定增兵之后，日本旋即恢复了业已停止二十五年之久的“军部大臣现役制”，规定陆、海军大臣之任用范围以现役大将、中将为限。是故军阀乃成为足以制日本内阁政治于死命的武器。（译注：陆、海军大臣改现役制后，军方如不派员入阁，内阁便无法组成。）

此时，虽则正好是在日本第六十九次特别国会的会期之中，但政界人士对于这个制度的修改在政治上会有若何影响都毫未注意，不曾有片言论评便予以默认。于是，因“二二六事件”撤除了外线屏障的日本政治，现在更愚蠢到因此而撤除了内线屏障，一往不回地走上军阀控制的道路。

继之于六月八日，复修订了“帝国国防方针”暨“用兵纲领”，规定——“以美、苏为假想敌，并对中、英加以戒备。”从而设定了大规模扩充陆、海军的目标。

八月七日，在首相广田弘毅、外相有田八郎、藏相马场鍈一、陆相寺内寿一、海相永野修身的“五相会议”中，更通过了一个“国策基准”。

这个基准，确认：“外交、国防相辅相成，以确保在亚洲大陆的日本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进展。”为因应这个需要，在国防军备方面的方针则须——“（一）陆军方面，充实满洲和朝鲜的兵力，俾面对苏联在远东的武力，要能于开战之初便予以迎头一击。（二）海军方面，整备充实，俾面对美国，能确保在西太平洋的制海权。”

至此，日本并非仅在侵略中国为已足，而终于开始明确地标举出在整个亚洲竞逐霸权而南北同时并进的方向。

所谓“成都事件”

日本在通过他公然要向整个亚洲地区进展的“国策基准”之同时（一九三六年八月七日），并决定了一个“帝国外交方针”。

日本对各国的方针

这是为了在强硬推行积极性的国策方面谋使各国消除其对于日本的猜疑心或是危惧心而设定的一个引导原则。至于对各国个别的外交方针，则大致列举如次：

对苏联＝谨慎将事，不由日本主动肇生事端，而以和平手段解决悬案，并防制苏联的赤化思想入侵。

对中国＝使之“修正”其对日态度，实现以“共存共荣”为基本方向的中日提携（合作），进而使整个中国“反苏依日化”。

对美国＝增进亲善关系，使不致趋向于援助中国，并牵制英、苏两国。

对英国＝英国是在中国有最大权益的国家，积极与其增进亲善关系，并牵制苏联；同时提高警觉，俾免有英、美、苏、中联合压制日本的情况出现。

对德国＝与日本利害一致，在增进友好关系的同时，并得因应必要实现日得提携，牵制苏联。

南洋方面＝乃日本在产业上和国防上的必要地区，在避免刺激有关国家的同时，和平而渐进地向该地区推进发展。

继之，更于八月十一日制定“第二次北支（华北）处理纲要”，认定——“有成华北分割的自治政府”、“使国民政府承认华北的特殊性”等项；又关于所谓“自治工作”之范围，则新加上山东、山西、绥远，连同河北、察哈尔五省为对象。

如上述一连串的政策决定，应该说是已经把对于中国的侵略编列为其对全世界侵略构想的一部分。

‘如果太平洋问题没有解决，全中国是占领不了的。所以他（日本）早已认定——要把与太平洋有关系的几个国家统统征服之后，才能达到独吞中国、独霸东亚的目的。所以他现在陆军的目标是苏联，海军的目标是英、美。日本为要并吞我们中国，而须先征服俄罗斯，吃下美国，击破英国，才可以达到他的目的。’（注）

日图派领事驻成都

当这个时候，中日之间又发生了新的问题～～八月二十四日，在四川省成都有日本新闻记者等四人被中国民众施以殴击，其中二人死亡，这就是所谓“成都事件”。

事件的起源，是日本未得中国政府的承认便拟派遣代理总领事进驻成都。

在中国国内，原则上只限于通商口岸得让各国设置领事馆，成都并非通商口岸，当然不能允许设馆；然而，日本却于一九一八年六月未获中国政府许可便擅自在成都设立了总领事馆。后来于九一八事变之后，总领事馆一度封闭；但及至今年（一九三六年）五月，日本竟又任命岩井英一为代理总领事，向中国申请再度开设驻成都总领事馆。

中国方面当即先后两度照会日本政府——“按照条约，不能承认在成都派驻外国领事。”促请日本政府撤回申请案。但日本外务省则倚仗“既得权”，漠视中国抗议，而拟派岩井强行赴任。

日本之所以这样固执要在成都设馆，是因为当时的成都为追剿共匪的根据地，极具政治和军事上的重要性，日本政府故而打算重设总领事馆，好在那里搜集各种情报。

岩井英一于七月二十七日到达上海，旋乘长江轮船溯江而上，八月十八日行抵重庆。但因岩井强行赴任的新闻经报章大事报导，于是成都市民的抗议运动乃为之激化，以致岩井不能迳赴成都，而滞留于重庆的日本总领事馆。

然而，和岩井同行来到重庆的大阪每日新闻上海特派员渡边洸三郎、上海每日新闻记者深川经二、南满铁路上海事务所员田中武夫、汉口濑户洋行老板濑户尚四人则走在岩井的前面而于二十一日由重庆乘汽车出发，二十三日下午五时抵达成都，投宿大川饭店。正好就在这一天，成都市内举行反对设置日本领事馆的大会，参加群众达一万人；会后，在市区示威游行。由于四个日本人的到达，乃更加刺激了反日气氛。

成都治安当局为防止发生不测事态，派来便衣警察十多人，劝告四个日本人——为了安全，最好不要走出旅馆。可是他们却在第二天跑出去参观名胜，购买物品，到处游历。

群众冲进大川饭店

到了下午五时左右，激愤的中国群众陆续聚集到大川饭店门前。

成都警备司令蒋尚朴、公安局长范崇实为加强戒备，特地调派一连兵力前往支援警察，并且属于中央的宪兵队也出动了一班人。

可是，来势汹汹的群众，终于冲进旅馆，肆行捣毁，并准备放火。四个日本人抡起棍棒应战，但毕竟寡不敌众；旋经警备机关好不容易将负了伤的田中武夫及濑户尚二郎救出，但渡边洸三郎和深川经二两名记者则下落不明。

次日早晨，在大川饭店附近的正府街发现了他们两个人的遗体，衣服都被剥光，面孔也变了形，连是不是日本人都辨别不出来。

上午，群众们又聚集到已被破坏得面目全非的大川饭店门前，再度和军警冲突起来。军警采取强硬手段开枪镇压，颇有死伤。警备司令部即于当天（二十五日）将捕获的主谋苏德胜、刘成先二人处决，以期收拾事态。

注：蒋总统-“抵御外侮复兴民族”（一九三四七）

日本提出要求

蒋总统于八月二十五日接到在成都发生对于日本人暴行事件的报告，得知虽然事端乃由日本人所引发，但在混入有一些反动分子所煽动起来的群众盲目行动，造成多数人伤亡，实在是极其不幸的事件。

‘反动派之险恶煽动，民众之愚顽，而使引起外交上问题，正中倭寇之所欲，可恨孰甚！’（蒋总统八月二十五日日记）

果然，日本便以这个事件来造成外交问题。

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立即于二十六日请见外交部长张群，表示：“我方的要求，俟调查实情之后再行提出；关于本案，中国方面责任重大。”

蒋总统为避免发生误会，并谋早日解决问题，遂迅行命令外交部于二十七日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如次：

“川省匪患未靖，致此次暴动中发生殴毙日人情事，本部极为重视。本部对于外人来我国游历向甚注意，各地方当局亦均能加以注意保护，乃此次忽发生此种事件，殊深惋惜！除已电知地方当局严厉弹压，加紧缉凶究办、切实保护外侨外，并派专员杨开甲、科长邵毓麟前往实地调查真相，以凭核办。尚望中日两国人民当此两国外交当局正在努力调整邦交之际，能体察大局，勿为偏激之情绪所左右，致生枝节。……”

二十九日，国民政府复对国内重申睦邻命令，呼吁国民自重

这个事件，实则只不过是一个偶发性的地方事件，但中国政府为谋圆满解决，已有周到处置；然而，日本却的确是抓到了乘机而入的最好藉口。

‘成都事件至今犹未了结，倭寇其将藉此要求于成都实行设馆之外，更扩大华北经济独占之权利乎？’（九月一日记八月反省录）

政经侵略双管齐下

实则日本外务省与陆海军首脑部当事件一发生之后就已经决定提出下列新的要求：

“一、使承认‘广田三原则’，并促进实际的经济提携。

“二、使完全接受‘华北明朗化’的计划，并强迫具体实施。

“三、要求开放长江上游航路，以及承认日本人在沿岸内地有侨居、贸易、购买土地、设立工厂的自由。”

在这里，对于日本之所谓“实际的经济提携”之本质，须得略加诠释：当时，日本已经在大藏省（财政部）设立了“东亚经济调查课”；同时“南满铁道会社”亦已在天津设置“事务所”；驻屯天津的日本军部也设有“经济顾问部”——部署了若干“经济提携”的据点。而新任驻华大使川越茂更是相当积极的“经济提携”论者。至于“经济提携”的目标，则是以中国为棉花、煤炭、铁矿、羊毛等原料“供应国”，而日本乃为工业制品的“供应国”。可以说，“提携”的目的就是在以中国为其经济殖民地的一种“经济侵略”。

又第二点所谓“华北明朗化”的语汇，实则也就是树立华北傀儡政权的另一个说法。至于第三点，乃是进而向中国的中、南部扶植日本势力的一种意图。

翁照垣部击毙日商

正在这个当口，却又发生了日本人被杀害的事件。

九月三日下午七时左右，在广东钦州北海珠海中路有日本人经营的“丸一药房”被凶汉闯入，将店主中野顺三杀害，造成了所谓“北海事件”。

“北海事件”与“成都事件”有所不同，它是由反政府势力所制造出来的问题。

当时，在北海一带驻有旧十九路军系统而现在属于桂系的翁照垣部队，反抗中央，政府军在戒备之中；于是，翁照垣等人为图在中、日之间制造出纠纷以困扰政府，乃肇成这么一个杀害日本人的事件。

‘桂系翁照垣部又在钦州北海击毙倭商，希图引起交涉；此种遗毒，非根本肃清不可也。’（九月七日日记）

就在七日的当天，蒋总统便对外交部长张群指示——对于日本须作周详准备，慎重交涉。

但日本方面，则已于四日的阁议中依据外、陆、海三相会议的结果决定——对于成都事件，首先提出下列几项要求，并即于五日电令驻华大使川越茂进行交涉：

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根绝排日政策。

二、国民政府与四川省政府表示道歉，并处分负责人暨犯人，以及对被害者给予赔偿。

三、国民政府负责排除重新开设日本驻成都总领事馆的一切障碍。

张群坚决答覆日方

在川越采取行动之先，由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请见外交部长张群，试探反应。当时，须磨表示：

“我国（日本）一部分有力人士，以为贵国排日思想甚难改变，现在两国空气恶劣达于极点，苟处理失当，则中日关系难免恶化，甚至会发生正面冲突。”

张群则斩钉截铁地回答：

“我方分内之事，无待贵方之要求，自当一力负责处理，请勿过虑。至于贵方常谓排日思想云云而责难我方，实则排日思想之根源一在贵国——例如沈阳事变以及最近张北（察哈尔）、内蒙、华北等各方面贵方之侵略姿势，莫非刺激我方排日思想之资料，实为调整邦交之最大障碍，希望贵方切实理解此点。”

丰台与汉口事件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日，蒋总统得悉日本军部有制订其“国家总动员计划”的企图。可见日本已终于开始在进行其全面战争的准备。

‘近代战争内容复杂，凡物的与人的国防资源之消耗，为几何级数的增加。倭寇小国，资源贫乏，虽竭蹶而驰，决不能免于失败。呜呼！我中国处此环境，非益自努力不可矣！’（蒋总统九月十日日记）

同时，并亲自对于中日之间的问题细加分析，列出七点注意事项：

‘一、倭寇逼我对俄之军事同盟。

‘二、倭寇逼我取消军训。

‘三、倭寇逼我承认华北五省势力。

‘四、倭寇逼我聘请日人为顾问。

‘五、倭寇竟以种种苛刻无理者向我直接提出条件。

‘六、倭寇之所欲，与其制命伤之所在，余应细为研究。

‘七、对桂事、及其他叛逆之徒，在此倭寇紧逼之际，更应忍耐到底，以期不损国力。’

忍于国内，忍于外交

十二日，又在“雪耻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记述：

‘先慈教我以“忍”字。尝喻之曰：宰相度量宏大，故俗语称“宰相肚里好撑船”也。小子勉之！忍于国内，以求统一；忍于外交，以求不辱国体。’

此时，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遵照东京的训令，在南京再度与中国外交部长张群就中日两国调整邦交问题进行交涉。

在九月十六日所举行的第二次张群、川越茂会谈时，川越即以调查北海事件为藉口，用胁迫语气表示：“日本海军考虑对于海南岛或青岛作保护占领。”实则，此时日本海军已向广东方面派遣舰队，故而双方会谈是在紧张气氛中进行。

未料，交涉刚刚开始，就又于十八日在北平郊外的丰台发生了日军与中国二十九军冲突事件，以及紧接着于十九日又有日本驻汉口领事馆警官被枪杀等新纠纷，挡住了交涉的进路。

日军与二十九军冲突

丰台的两军冲突，是于十八日傍晚在丰台车站附近的演习场有中国第二十九军所属第五连和刚增派到北平的日军一个中队迎面碰上，互不让路，因而肇生事端。当时，日军小队长岩井策马驰入中国军行列，日军并即散开将中国军包围，中国军连长孙香亭挺身趋前，意图制止冲突，遂被日军掳去。

在天津接到报告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立即电话命令师长冯治安防止冲突；同时，并与日本“支那驻屯军”派驻北平的旅团长河边正三交涉，到十九日才得避免了冲突。

‘更知倭军之横暴不可救药矣！’（蒋总统九月二十二日日记）

至于汉口事件，则为日本领事馆巡查吉冈庭二郎不知被何人以手枪射杀于日本租界的日信码头。此事发生在日本租界，既非中国警察力之所能及，且亦无法调查；尤其吉冈被射中的枪弹，乃发射自最小口径的白朗宁手枪，这种枪械，中国没有输入过，犯人是否为中国人，尚属疑问。

可是，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在事件发生之后，便立即藉口保护侨民，以两艘驱逐舰载送陆战队员数百人在汉口登陆。该陆战队连续随便指称中国人有嫌疑，被逮捕拘留者达二十三人之多。

东京方面，也特意小题大作——外务省与陆、海军首脑连日集会商讨，在每次会议中，都是对华强硬论占有优势。

川越提出七项要求

二十三日，中国外交部长张群学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举行第三次会议，川越即席强硬提出甚为严厉的七项新要求：

一、以河北、察哈尔、山东、山西、绥远五省为缓冲区域。南京政府在以上各省内仍保留宗主权，惟一切其他权利与义务——如官吏之任免、赋税之征收及军事之管理等，皆须移交当地自治政府。

二、仿照华北经济提携方式，在中国全境进行中日经济合作。

三、订立共同防共协定。

四、建立中日间的航空交通线，特别是上海至福冈航线。

五、中国政府聘用日本顾问。

六、订立特别优待日本货物的关税协定。

七、完全压制排日宣传，包括修改各级学校教科书。

张群提出对案

面对着川越，张群指出日本的提案乃属无理要求，断然拒绝；并即席提出对案如左：

一、废止上海、塘沽停战协定。

二、取消冀东伪组织。

三、停止包庇走私。

四、华北日军及日机不得任意行动及飞行。

五、解散察东与绥北匪军（德王军队、俟后叙述）。

张群并且表示：“我所提出的五项，是目前两国纠纷的症结所在；若不能解决，则中日邦交无从调整。”

日本“威迫外交”

对于张群在第三次会谈中所提出的五项对案，川越根本拒绝讨论，而强行要求采纳日方提案，谈判终于陷入决裂状态。

张群、川越茂会谈详情，由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迅即乘飞机前往广州，向蒋总统报告。盖日本方面以为：如果用武力胁迫，则不论怎么样蛮不讲理，都是能够行得通的。是故在中国立场，对于日本的要求，也必须临之以强硬态度。

‘倭使川越与我外交部谈判形势，昨已等于决裂，彼只有片面要求，而我方所提之五条件，则概谓不得提出。——是可忍，孰不可忍！’（蒋总统九月二十四日日记）

‘我对倭提五条件，遭倭使严峻拒绝。彼以成都与北海倭侨被杀，藉词图赖；而其海军且令汉口、宜昌一带妇孺离华，以表示其战争之决心。此种外强中干之丑态，实不值一笑也。’（十月一日反省录）

此时，在日内瓦参加国际联盟大会的驻法大使顾维钧、驻英大使郭泰祺等人致电外交部报告：

“川越提出的共同防共与经济合作，果然坚持包括中国全部，其范围超越二十一条之要求，真是日本灭亡朝鲜的故技。”

顾维钧并于九月二十九日在国际联盟大会以中国代表身分发表演说，呼吁注视远东危险局势；同时提出警告：“日本野心如不戢止，将会有重大影响及于欧洲。”

上海发生日水兵被杀

在此之先，当张群、川越茂第三次会谈的九月二十三日夜晚，又在上海发生了日本水兵被枪杀的事件。事缘有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的水兵四人在上海公共租界吴淞路口突被暴徒枪击，其中一等水兵田港朝光当场死亡，另有两人负伤。

以此为肇端，驻屯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遂即出动装甲车，封锁上海交通，岗哨的枪械都装上刺刀对准通行者，一一检查，凡是认为可疑的人，都不问青红皂白便予以拘留。

蒋总统日记指出，日本“乃未料及启衅之后，决无谈和之时……”

‘倭寇水兵在沪租界内又被击毙一名，倭必藉此更加一番恫吓。察倭素性之横暴，决不能避免战争。而倭寇乃未料及启衅之后，决无谈和之时，非我亡，即彼亡，此亦理势之所当然也。’（九月二十四日日记）

接到上海事件报告的日本海军省，当天便彻夜开会，旋即于二十四日一早电令第三舰队司令官及川古志郎对上海增派海军陆战队。

继之，更于二十六日决定采取强硬方针——以兵力为背景，对中国进行“威迫外交”，如不接受要求，则诉诸武力。

于是，自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之间，日本海军调集了巡洋舰五艘、驱逐舰二十四艘、炮舰十艘、特务舰二艘于上海，并派遣陆战队约二千二百人登陆，进入备战态势。

日本决定动武

据日本资料——此时，海军所决定的“对支（中国）时局处理方针”是“以武力为后盾，要求和蒋介石直接交涉。”按当时蒋总统为说服李宗仁归顺中央而去到广州，是故该方针的内容有：“促其返回南京，和日本直接交涉。如果不回南京，则发出最后通牒，并将日本侨民撤往上海、台湾、青岛等地；至此，如不接受要求，便与陆军协力对青岛作保护占领，并封锁中国中、南部要地，以及轰炸其空军基地暨军事设施。”

在日本来说，当中国如此高涨的反日气氛之下，已经了解难以指望纠缠外交部长张群对日本让步，故而想和蒋总统作高层交涉，迫使退让。

九月二十八日，日本内阁会议接受了海军要求，决定：“向中国提议和行政院院长蒋介石直接交涉。”会后，外相有田八郎接见各国记者团，说明：“调整日中国交的交涉毫无进展”；并且还以一种指出其责任就像是在于中国方面的口吻表示：“此际，中国与日本携手乎10[123]2293？否乎？实已立于应择其一之重大歧途。在余个人，仍希望中国排除万难而与我方握手。”总归是片面地要求中国让步。

艰苦之情并世绝无

就在当天，蒋总统由于在广东业已解决了李宗仁的问题，乃飞往南昌，在策划军事上的新部署之同时，并详细研讨对日政策。

‘综核本月（九月）内外情势，倭寇之强迫，诚如报上所载“对外不能肆应横逆，对内又岂易求谅民众？”处境之难，立场之苦，并世国家绝无其匹者；余以为求之古今中外之历史，亦无其例也。然余深信必能凭我天佑，冲破此无上最后之难关也。’（十月一日日记）

日本之要求直接交涉，就国际贯例而言，也正是前例未有之事。

但是，站在为谋打开攸关整个亚洲安危的艰难局面之立场，蒋总统则决定答应和日本直接交涉。

国人献机祝寿

十月八日上午十时，蒋总统以行政院院长的立场在南京官邸接见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

虽然说是“直接交涉”，但并未提到具体问题，而只是就有关中日两国前途及亚洲大局的情势向川越作了以下的说明：

要求尊重我领土主权

‘就东亚大局着眼，两国国交之根本调整，在今日实有必要。我方所要求者，重在领土之不受侵害，及主权与行政完整之尊重。故中日间一切问题，应根据绝对平等及互尊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之原则，由外交途径，在和平友善空气中从容协商，则国交之调整必可有圆满之结果。’

继之，并对在各地所发生的不幸事件表示：

‘此等事件，虽因有些地区中国政府不能充分行使警察权，未便一概而论；但在中国领土内发生此等不幸事件，则不能不引为憾事。对于业经调查之成都与北海事件，中国政府准备依照国际惯例，即时解决。

‘关于其他外交问题，仍应由外交部张部长与贵大使继续商讨。张部长之意见，即系政府之意见。’

会谈超过两个小时。在临别之际，蒋总统更郑重提到：

‘华北之行政，必须及早恢复完整。’

川越的态度也甚为友好。在接谈之后，蒋总统应中央社记者之请，发表感想，并表明希望通过交涉解决问题之意如下：

‘双方谈话精神，完全立于平等基础之上，川越大使之精诚与态度，其诚挚坦白实足欣佩，并完全本于广田首相去年在彼国会议中发表之方针——即在“不威胁、不侵略”之原则下，力谋调整国交之实现是也。

‘以今日川越大使所表现之精神推而言之，则中日两国间问题，皆可不采外交正当途径以外之方式、而依外交常轨以平等基础解决一切困难，一扫过去之纠纷与黯淡之阴霾。

‘盖人类本富于感情，惟有精诚可以感召一切。如一方果能以精诚相示，则彼方必有以精诚相应之一日。深信余之抱负与期望，不难贯彻始终也。’

川越也发表了谈话，他说：“交涉前途固然非常困难，但并非绝望，仍在继续折冲。”日本外务省并表明：“至少目前决裂之危机可以避免；现在已有打破继续谈判难关之希望。”

于是，张群与川越茂乃于十月十九日又举行了第四次的会谈。

在洛阳度五十岁诞辰

二十二日，蒋总统为部署剿匪战争，自南京飞往西安；二十九日，转到洛阳。

十月三十一日，在洛阳度过五十岁的诞辰。

‘中正半生忧患，革命报国之志未遂百一，而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慨自弱冠以前，革命从戎，即受国家教养，迄今三十余年；凡吾所食所衣与夫生活所需，无一不仰给于国家，亦即无一非民众之脂膏与血汗。——中正蒙恩被泽，可谓深且厚矣！……

‘党国多艰，民生日瘁，复兴之业，前路方遥，维岁月之不居，愧天职之未尽，抚兹时序，尤为彷徨悖息。’（注）

献机六十八架

（民国二十五年）

蒋总统五十初度接受到最有价值的礼品，是新式军用飞机六十八架。这是由国内外各阶层同胞普遍发起的“献机祝寿”运动所募集的金钱向美国所采购。

诞辰前夕，在洛阳、南京乃至其他地方，民间都有盛大的提灯会表示庆祝。

当天（三十一日），蒋总统照常办公；公毕，行邸举行简单朴素的宴集，由蒋夫人持刀切开了插着五十支腊烛的大蛋糕，分享亲朋。

在南京方面，举行了献机仪式，六十八架飞机编队作首航飞行，翱翔上空；地面的市民们则燃放鞭炮，以示响应。洛阳街道上的爆竹声音也是终日不绝。

‘民生凋敝，而庆祝如此热烈，不仅洛阳，闻全国如此，吾心甚觉不安。吾唯有益自奋勉，为国家民族尽其心力而已。’（十月三十日反省录）

回顾自一九二八年六月北伐成功，全国统一以来的建国历程，实以此际为最艰难的时期--外有日本和苏联挑衅，内有怀抱野心的旧军阀和继续叛乱祸国的共产党。蒋总统忧劳国事，真正是席不暇暖。

“黄金的十年”

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则这段历程也正是中华民国建立现代国家的辉煌飞跃时期。

在重重困难之中，国民政府遵循国父孙先生建国大纲、建国方略的规划，踏踏实实地促进国家建设，自全国统一到七七事变（芦沟桥事变）的十年之间，曾被担任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的魏德迈将军称誉之为“黄金的十年”。

注：蒋总统-“报国与思亲”（一九三六.十）

第十二章：西安事变(下)

主题

黄金的十年收复百灵庙毛匪利用机会共匪进行煽动张学良遭匪利用驻节临潼事变经过张学良愧悔周匪等进入西安蒋夫人冒险至陕脱险返回南京共匪得利共党伪装归顺共党内部文件日军进行挑衅

黄金的十年

克服苦难、锲而不舍地从事国家建设的“黄金的十年”，正逐渐在更新中华民国的面貌。其后由于发生“七七事变”（一九三七年），建设工作虽不得不为之中断，但在十年之间所培养的力量，则成了其后贯彻了八年抗日战争的原动力。

交通建设大力扩展

最显著的成绩，是铁路、公路、航空、邮政等交通建设的进步。

首先拿铁路来说：十年之间，由八千公里发展到一万三千公里。在全国统一之前，中国的铁路差不多都集中在华北、东北；但将新的重点置于华南的铁路建设五年计划实施之后，粤汉路（广州-武昌）、江南路（南京-宣城）、浙赣路（杭州-南昌）等七条路线全线开通。

公路方面，在北伐之前，全国总计不过一千多公里，但在十年之间完成路线达十一万五千七百公里以上，其中四万零二百公里已铺好路面。伸展到腹地农业地区的公路，为农产品的运输带来了革命性的改进。

此外，在航空方面，于一九三○年八月与美国合资创办中国航空公司，为最初的民用航空交通事业。

邮电方面，也有长足进展，在一九二八年时，全国邮务分支局所不到一万处，但到了一九三六年则已增加到一万五千三百余处。又原来只有沿海各都市和各省之间的电报业务，也已经发展成为可以笼罩全国主要都市的电信网。

普及教育，也被列为重点施政之一；各种学校和研究机关之建设，课程内容的整理，白话文运动之推进、标准注音符号之普及都在策划进行中。结果，大专学校由一九二八年的七十四所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一百零八所。义务教育也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普及计划。

推动国民经济建设

与“新生活运动”并举、而同为民族复兴运动两翼之一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是继一九三二年施行的三年经济建设基本政策之后于一九三五年开始推动。其实施要点为：（一）振兴农业；（二）鼓励垦牧；（三）开发矿产；（四）提倡征工；（五）促进工业；（六）调节消费；（七）货畅其流；（八）调节金融等项；是已巩固工业化社会的基础为目标。其中对于水力发电、开采新煤矿、探勘石油、扩张矿业等天然资源开发工作大力推动；在甘肃开发了蕴藏颇丰的油田，在四川、新疆两省也有开发新油田的计划。

此外，为了“国之大本”的农存复兴，对于农村合作社的扩充也有所规划。在此期间全国的合作社达到二万六千二百二十四所，而其中的一万二千五百十七所乃是在一九三五年的一年之间所设立。并且在一九三三年创办中国农民银行，对农民及合作社贷款，以供偿债、购地、购置农业机械或肥料等需要。以二十五万美元资本开始营业的农民银行，随同贷款额的逐渐增加，及至一九三六年遂增资到一千万美元。

统一之后仅仅十年之间、而且是在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情况之下，能有这样程度的国内建设成绩，在全世界几乎都是未见前例。中华民国已经是具有自信——站稳了现代国家的地位。

日蓄意妨害我富强努力

在这里又得提到日军对中国的侵略，也就是对于像这样的中国富强化要加以妨害。

当一九三六年十月，为了调整中日邦交而由张群与川越茂重新举行第四次会谈的时候，蒋总统对于两国之间正在趋向于避免不了诉诸一战的情势已经有所预感。他在十一月一日的反省录中记有：

‘对倭之政策，彼以不战而屈来，我以战而不屈破之；彼以不宣而战来，我以战而必宣备之。如是，则倭寇外强中干之丑态毕露矣！’

果然，日本在通过外交路线的交涉方面，丝毫没有让步的迹象，不仅张群和川越茂的会谈未有进展，而且日军更在华北开始举行大演习等等一意挑衅的行动。

十一月十四日，终于在内蒙古发生了军事冲突。

‘自十一月十四日晚，蒙伪匪军受某方（日本关东军）策动，犯我桃林境、红格尔图后，绥远战争即正式揭开。匪方虽用飞机、大炮向我阵地进攻，然因我绥省军民早具誓必死守之决心，故屡扰而不得逞。’（注）

这就是所谓“绥远事件”的开端。

这个事件，是在关东军唆使之下藉口要求“自治”的内蒙伪军向政府军寻衅进攻；政府军乃急袭叛乱军根据地-百灵庙，获得大胜，打破了日本想要制造为其傀儡的“大元帝国”的奢望。

由于“绥远事件”之发生，乃使刚才勉强重新开始的调整中日邦交之交涉因而中断；并且中国国内的抗日情势也为之越发强烈，甚至进而成为导发“西安事变”的原因之一。

注：蒋总统-“在洛阳军官学校的讲话”（一九三六十一）

收复百灵庙

日军对于内蒙古的侵略，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益露骨；尤其在入侵热河之后，关东军是以之为对苏联战略的重要地区，而在推进着他的控制内蒙计划。

日军利用李守信、德王

一九三三年八月，关东军唆使土匪出身的蒙族人李守信，以其部队自热河省侵入察哈尔，在多伦制造所谓“察东特别区”，即以李守信为行政长官兼军长，打下了向察、绥推进的基础。

继之，于同年十月又觑上了在绥远省内的蒙古王公逐渐高涨的要求“自治”运动，乃操纵锡林郭勒盟苏尼特旗的德王及乌兰察布盟的云王在百灵庙组织“内蒙自治政府”。——这是假藉“自治”之名来从事“分割”工作的一种惯用方法。

针对这样的活动，国民政府乃同意各盟旗在察哈尔、绥远设立自治区，在政府派遣的自治指导长官指导之下，给予除军事、外交之外的幅度颇宽的自治，而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成立了以何应钦为指导长官、赵戴文为副长官以及以德王、云王等二十四人为政务委员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

可是，关东军的所谓“蒙古自治”，则必须是使之成为他自己的傀儡。故而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参谋田中隆吉乃笼络德王于一九三五年十月退出“蒙政会”。及至十二月，关东军又使李守信突袭察哈尔宝昌，继之陆续占据沽源、张北、商都等察省冲要之地六县（被称为“察东事件”），协助德王扩大势力。

于是，国民政府为抑制关东军和德王的进展，乃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在绥远境内新设“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以沙克都尔札布为委员长，以谋团结蒙古王公。

另一方面，关东军则于五月二日（日本资料为二月）在化德县（嘉卜寺）制造出以德王为“主席”、李守信为“副主席”的“内蒙军政府”。这个组织乃是一个被日本顾问操纵其军政实权的傀儡政权。不久之后，又组织了约有二万人的“兴亚联合军团”，在日军新任“内蒙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的阴谋之下，窥伺着在绥远省发动骚乱的机会。

自此之后，绥远方面便曾连续不断地出现了挑衅性的小纠纷。

进入八月，中央陆续接到“伪内蒙军集结于百灵庙并运入大量物资”的情报。蒋总统乃于八月四日电嘱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加强戒备如下：

‘一、张北县之公会庙滩、石柱梁等处所驻杂军约共五千人。现李守信部拟进攻绥东，其战略系现以便衣士兵及地方流氓组织暴动团队，占据各处官署，并袭击驻军，视其功效如何后，再定正式部队行止。

‘二、化德伪军政府下令扩大化德城东南之飞机场，准备容纳飞机两百架。

‘三、德王、李守信、卓世海等于上月（七月）十三日飞往长春时，曾与关东军商妥编练蒙古骑兵三千名，编制费由关东军发给；一俟款项领到后，即派员分赴各旗购马五千匹。’

其后，获得日本援助的李守信、王英等内蒙叛乱军，乃自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四日陆续侵入绥远，进攻陶林、红格尔图等地，其兵力有骑、步兵二千人及飞机八架，山、野炮十多门。

全国上下奋起振作

十一月十五日夜晚，初冬之际已经是大雪纷飞，内蒙草原一片银色世界，在酷寒的天气中点燃战火，战局则趋向于政府军有利，及至二十四日，政府军追奔逐北，克复了伪军根据地的百灵庙。

‘……因此一胜利，全国上下无不奋起振作而愿以全力贡献国家，各地纷纷捐款制衣，以为慰劳。……

‘自我军收复百灵庙后，某方（关东军）阴谋组织之所谓“大元帝国”亦行宣告失败。闻其企图组织之费用已耗去五千余万。其对百灵庙之经营，本拟作为绥北唯一之军事交通根据地，故两月以来不断由平津购办大批煤炭、面粉转运百灵庙。此次，国军收复该庙，上项燃料食粮已被尽数截留。……’（注）

据日本资料——内蒙军之进击绥远，有日军预备役官兵若干人暨现役军官四人、以及“满洲航空会社”之独立义勇飞行大队飞机十三架参加。又“满洲电（信）电（话）会社”提供有无线电设备，“南满铁道会社”提供汽车一百五十辆。田中隆吉为此一工作花费掉冀东走私利润暨关东军机密费等共计六百万日元。

中日交涉一笔勾销

绥远事件，乃使刚刚上轨道的中日交涉为之一笔勾销。

十一月十七日，国民党发表了-今日中日交涉关键所在，完全系乎日本方面“的谈话，对日本表示警告。

十八日，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明白告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要是绥远工作继续下去，则中日交涉无法成立。

针对中国方面的态度，日本外务省于二十一日发表谈话，作了一个非常艰涩的辩解如下：“绥东战争，纯系中国国内事件，与日本无关，纵有日本人民参加蒙军作战，亦应认为个人行动，与日本政府及日本军渺不相涉。”

注：蒋总统-“在洛阳军官学校的讲话”（一九三六十一）

毛匪利用机会

和日本军阀“分割华北”的狂奔，心照不宣的是共产党的阴谋活动也不断地在进行之中。

毛泽东在历时年余、跋涉二万五千里的西窜结果，带了六千败残兵卒挣扎到陕北，是在一九三五年的十一月。

攫取陕北土共势力

到达陕北之后的最初活动，就是权力斗争。——毛泽东诡巧地操纵了在当地土共内部业已激化的左右两派对立情势，首先将被称为“钦差大臣”的朱理治（原先派到陕北的共党“中央代表”）和“土皇帝”郭洪涛两个有力分子扣上“左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把他们整倒；然后将被指为“右倾分子”且在监禁中的刘志丹和高岗释放出来，使之就范。这两个人当时是在当地掌握土共势力的要角，于是毛泽东乃得以控驭所带来的“红一方面军”和这些土共汇合之后一万七千兵力，造成了归他统辖的局面。不过，因此而做了毛泽东部下的刘志丹则在不久之后战死（一说被毛泽东所暗杀）；而高岗也于一九五五年被毛泽东所整肃，走上了自杀的命运。

汇合之后的这些匪军，其武器装备极其窳劣，食粮及医药品尤为缺乏，颇为饥饿与疾病所苦；而在山岳地区的陕北一带，要想粮食自给自足则是非常困难的。

口称抗日实为掠夺物资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发表“宣言”，扬言“东征抗日”，带领匪军出发，以刘志丹为先锋，渡过黄河，侵入山西省。而其目的，却是在掠夺粮食物资及强征兵员。

二十二日，匪军以一部围攻中阳、石楼县城，一部北指离石，其主力则南下向隰县方面推进。

此时在华北方面，则刚好是殷汝耕的伪“冀东自治政府”宣称“独立”、以及“察（哈尔）东事变”发生不久之后。是故正在应付日军的政府军，乃处于腹背受敌的形势。盖共党匪军之侵入山西，只是徒藉“抗日”之名，而实则毋宁说对于日本侵略倒是有利的。

于是，在山西省的太原绥靖主任阎锡山乃立即调遣所属部队迎击匪军。又在陕西省的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及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各部也展开进击匪军后方的态势。

三月八日，由河南省趋援山西的政府军在孝义西郊捕捉到匪军主力，激战三日，匪军溃败，被击毙三千多人。三月二十二日，政府军更在离石之北的冀家原夜袭匪军刘志丹部，将之歼灭，刘志丹本人战死。

三月二十七日，蒋总统接到阎锡山的告捷电报：

“我军于二十四日攻下各要隘。据俘匪供称：毛匪泽东见各要隘不守，即率匪五百余西窜，中途被我军截击，毙匪三百余人，毛泽东及其妻（贺子贞）暨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仅以身免……。”

毛泽东等匪军，在山西境内一面继续掠夺，一面到处逃窜，至五月三日退回陕西。凡匪军所过之处，掳掠一空，每个村庄的住户都已家徒四壁。

企图藉抗战而坐大

在这次“东征”中受到重创之后，毛泽东的策谋乃由“反蒋”转变为“联蒋”。盖自知军事力量终究不能与政府军为敌，故而花言巧语地提出“停战讲和”的要求。——这就是由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出的所谓“五五通电”。在通电中，毛泽东将过去直呼“蒋介石”的称呼改称“蒋介石氏”的客气语调；并提议——在一个月内实行“停战议和”，以组成所谓“抗日统一战线”。

这个“抗日统一战线”的目标，实则只是在拉拢呼吁“抗日”、“救国”的“中立民众团体”，使堕入共产党所操纵的壳中。

‘单在北平、天津和华北各省，就有所谓“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北方人民救国大同盟”、“平津学生救国联合会”、“平津文化界救国会”……三十个以上的团体，出版各种报刊，千篇一律为共产党国际指使的“人民阵线”作宣传活动。上海等城市也是同样的不能例外。

‘“人民阵线”受共匪指使，更在各地挑拨地方与中央军的情感，唆使地方军在“抗日不剿共”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之下，对政府与匪军采取“中立阵线”，来破坏政府剿匪安内的政策。

‘“人民阵线”的作用，是孤立国民政府与中央军，让共匪得以生存和发展，重整武装，准备下一次叛乱的进攻；而其所标榜的主张，却是“抗日救国”，更显然是企图引起中国抗日全面战争，使共匪在抗战阵营的背后，扩大武装，乘机坐大，达到其颠覆政府、控制中国的目的。’（注）

然而，徒然呼号救国，轻举妄动，是救不了国家的。盖面对国难必须要有不惜任何牺牲的决心；而下定决心的条件，则必须是能对国难极限临头的时点有所认识。

七月十三日，蒋总统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以“御侮之限度”为题发表演讲，表明见解如次：

‘……这个最低限度，就是去年全国代表大会中决定的“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这句话。……

‘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再明白些说：任何国家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

注：蒋总统-“苏俄在中国”（一九五六）

共匪进行煽动

蒋总统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所作“最低限度”的讲话，共产党立即藉机表示响应。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共产党在陕西保安发表了拿掉“反蒋、反国民党”口号的所谓“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内容大致如左：

“蒋委员长的报告，曾经对贵党五全大会的政策作了新的解释，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是非常需要的，因为中国人民始终不了解如何方可称为‘和平的绝望时期’与‘牺牲的最后关头’的最低限度。我们承认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较之过去有了若干进步，我们诚恳的欢迎这种进步。……”

这封信，当然还是充满着诡辩的宣传老调；但其中表明承认国民党的御侮救亡政策和响应军政、军令归于统一。——显然意味着共产党的策略有所转变。又前在五月五日要求“停战议和”通电中所用的“蒋介石氏”称呼，现在更改为“蒋委员长”，表示尊重政府的正式官衔。

表面约定服从政府

另一方面，共产党所派遣的周恩来与潘汉年（共产国际代表）则到达南京，与政府接触，由陈立夫与潘汉年谈判，提示政府四项条件如左：

一、遵奉三民主义。

二、服从蒋委员长指挥。

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

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

潘汉年等人接受了这四个条件，约定服从政府。

然而，如上所述“服从政府的约定”，实则完全是共产党为其私利而运用的策略，他们的目的只是在争取时间，以谋恢复匪军势力；他们的工作只是在极力拉拢中间派，假藉“抗日”之名，诱导反政府的活动。

十一月九日，日本人在上海所经营的“上海纺织”、“东华纺织”等八个工厂约一万名华工联合罢工。这是由毛泽东和朱德致信煽诱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邹韬奋等“抗日救国会”干部所发动。这些人虽然并非共产党员，但在罢工事件之后，被共党捧为“七君子”，成为没有党籍的共产主义势力，继续活动。及至战后，共党伪政权出现，复以所谓“民主党派”成员的身分参加伪“政治协商会议”，献身于共产党为掩饰其一党专政的伪装活动。但其中章乃器、王造时二人则于一九五九年被扣上“右派”的帽子而受到批斗，剥夺了职务。

分化张学良军

共产党的拉拢、煽动工作，不仅施之于都市群众，同时对于军队方面更做得起劲；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在陕西省担任剿共任务的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以次的东北军。

‘余（蒋总统）对张（学良），尝念其十七年（一九二八年）自动归附中央，完成统一之功，因此始终认其为一爱国有为之军人，故不拘他人对张如何诋毁，余终不惜出全力为之庇护。

‘当西北国防重地全权交彼时，与之切言曰：“望尔能安心作事，负责尽职，以为雪耻救国之张本！”原冀其为国家效忠也。’（注）

然而，由于共产党的工作，张学良却逐渐发生动摇。

对于出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之后的张学良首先给予的最大冲击，是他的直系部队接连败北。盖正当他就职前后，由江西流窜而来的共产匪军在陕西与土共汇合，先后打败了东北军第一一○师及一○七师、一○九师。

尤其是一九三五年九月第一一○师在甘泉之战被匪击溃，师长何立中战死，被俘数千人，而何立中更是在东北军中特受张学良赏识的优秀干部。

东北军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不得不撤离沦陷在日军铁蹄下的故乡而退驻关内，几年以来，一般官兵怀乡与抗日的意向特别强烈。

共产党于是乃机巧地把握住这个心理，拿“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抗日”等口号来分化东北军。

一九三六年元月，共产党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白军（政府军）工作委员会”，加强对东北军的工作，把所俘虏的东北军官兵释放回去，使之宣传停止剿共；并且将在甘泉对东北军的包围自动解除，伪装出“友好态度”。

面对共产党这样的“微笑工作”，东北军的士兵们丧失了战意。就连理应和张学良合作剿共的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甚至也引用了留英归国的共产党员王炳南为私人秘书。战后，王炳南为共党伪政权驻罗马尼亚“大使”，以及中共与美国在日内瓦会谈的“代表”。

杨虎城并且相机促请张学良“向蒋委员长进言停止剿共”。

张学良在军事上与心理上都陷于苦恼的境地，而被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所动摇。

注：蒋总统-“西安半月记”（一九三七）

张学良遭匪利用

‘对张（学良）、杨（虎城）进行策反工作的，除了极少数的共产党分子之外，其他如公开作反动宣传的，并不是共产党，而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所谓“第三党”与“救国会”以及所谓“学生联合会”等“中立分子”。

‘可是，这些“中立分子”确实不是共产党员，而共产党亦不要他们加入其组织、取得党籍；只要他们采取中立态度，或以第三党名义发言就够了。

‘正因为他们不是共产党，所以都能够明目张胆的在西安散播谣诼，煽惑军民，并对张学良及其部下竭力施展其包围挑拨的伎俩，发动其攻心战术，时时予张以不断的刺激。

‘最后，张学良卒以其“剿共”与“抗日”的矛盾心理弱点，竟被他们攻心战术所突破。’（注）

张学良与周恩来的密谈

是故张学良乃为谋与共产党直接接触而有所策划，遂即在上海与潘汉年、在洛川与李克农见面；并终于与周恩来在为东北军所守备的延安碰头，秘密会谈。

据张学良所撰“西安事变反省录”，他和周恩来会谈情形大致如左：

“某夜，在延安天主堂同周恩来会面，约谈二、三小时。……周承认蒋公忠诚为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领导之。又力言彼等亦蒋公旧属，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

又据“反省录”，张、周两人在会谈中为谋实现“共同抗日”，协议有关共产党的条件为：“（一）共党武装部队，接受政府点编集训，准备抗日。（二）取消红军名称，同国军待遇一律。（三）共产党不能在军中再事工作。（四）共产党停止一切斗争。（五）赦放共产党人，除反对政府、攻击领袖外，准自由活动。（六）抗日胜利后，准共党为一合法政党”等十项。张学良并且表示：“当向蒋公竭力进言，以谋实现。”两人更以互不食言相约。于是，张学良便想到：“尔后国内可以太平，一切统可向抗日迈进。”为之甚感得意。

张学良就是这样地成了共产党统战工作的工具。

张学良与周恩来会谈的确实日期不详，但据在当时为张学良幕僚之一的苗剑秋（现住台北）曾经告诉美国记者史诺说：“六月或是七月”；另在其自着文章中又曾提到：“在八月十日前后”。

据苗剑秋所云——周恩来主张：“倒蒋抗日”；于是，张学良便答以：“那么，就请送我回去或是杀了我，”周反问：“为什么？”张说：“日寇不会等待我们是‘倒蒋’呢还是‘剿匪’的。单凭我的部队，抵抗不了日本。在中国抗日的日子到来之前，我除了站在势力强大的中央军一起和你们战争下去之外，没有别的路可走。”他说到这里，为民族的悲运哀伤而哭了起来，据说周恩来也感动得流泪。于是，张乃提议“拥蒋抗日”，周对之答称：“没有这样的心情”；于是张又紧接一句：“那么就联蒋抗日，如何？”周答：“好！”

在此之后，张学良又曾与叶剑英接触，并给予匪军以食粮、棉衣及巨额私款，与共产党关系日益加深。

为张学良无识痛心

像张学良这样的一些活动，蒋总统从他在西北方面不热心于剿共的态度已可察知梗概。

十月二十二日，蒋总统由南京飞抵西安，亲自督剿共匪。二十八日在与张学良会谈时，张露出希望与共产党妥协的意见，他说：“军事家只有三个处置——即胜、败、降是也。”

在西北全权负责剿匪的人，能从嘴里吐出一个“降”字吗？这是从那里学来的？蒋总统大为忿怒，严加斥责，张学良乃满脸通红地退了出去。

‘汉卿（张学良）乃如此无识，可为心痛。’（蒋总统十月二十八日日记）

会谈之后，蒋总统乘火车去洛阳，旋飞太原晤阎锡山。在这个期间，传闻关于东北军的动向都是令人增加悬念的材料。

‘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顾剿共，此其作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亦其不知作事应有段落，告一段落后，始可换一段落。始终本末与节次之理，何其茫然也。可叹！’（十一月二十八日日记）

在东北军之中，“抗日不剿共”的宣传已经相当普遍，并且风传杨虎城部队实际上也已和匪军进入休战状态。

‘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镇摄，而挽危局，盖余个人之生死早置诸度外矣！’（十二月二日日记）

注：蒋总统-“苏俄在中国”（一九五六）

驻节临潼

十二月二日，蒋总统与张学良在洛阳再度见面，询问实情；张学良说明西安情况紧迫，或将生变，请务必往西安一行。

轻装简从毅然二次入陕

‘中正于二次入陕之先，即以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者。……

‘东北军痛心国难，处境特殊，悲愤所激，容不免有越轨之言论；如剀切诰谕，亦必能统一军心，使知国家利害之所在。’（注一）

‘余（蒋总统）二次入陕，……左右劝阻，争欲尼之。余就所负之责任言，国家统一始基已奠，身为统帅，教导责任，万不敢辞。……

‘即就余之宗教信仰言，当我主耶苏末次入耶路撒冷城时，明知危机四伏，犹昂然骑驴直入，不稍规避。……

‘余何人斯，退缩不前，矧余之爱部属，一如爱子弟，决不计及其他，于是轻装简从，毅然赴陕。’（注二）

由洛阳飞往西安，是在十二月四日。遂即驻节于西安市东郊临潼之华清池。附近有秦始皇陵墓；又自唐代以来流传杨贵妃曾经于此入浴，而为白居易长恨歌“温泉水滑洗凝脂”所咏的温泉之地。

此时，西安方面的气氛显然有点异乎常态。

当飞机降落于西安机场时，即已有军官数百人群集，声言要陈述有关剿匪军事意见。蒋总统乃告诉他们：如有意见，可通过隶属长官张学良转陈。

在西安，蒋总统召集高级干部，告以剿匪已达最后五分钟成功的阶段，应加强作战，并说明抗日作战的时机尚未成熟。

七日，再度命令张学良、杨虎城加紧进剿残匪。

在这个当口，有大公报主笔张季鸾来华清池行辕谒见蒋总统。张季鸾是辛亥革命以前的老同志，已来西安十天，观察当地的气氛。他在谈话中对于“张学良和周恩来会谈”的流言认为是共产党的离间阴谋，不相信会是真的；同时报告在西安社会上弥漫着“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空气。

十二月九日，有受共党煽动的“救国会”、“学生联合会”等游行队伍涌到西北剿匪总部及陕西省政府，然后喧嚷“向蒋委员长请愿”，冲过警察的阻止，沿陇海路向临潼前进。张学良接到报告，乃赶赴灞桥附近和游行请愿者谈话，虽得以制止，但张学良的方法，不是在说服那些人，而是迎合他们的心意，当场敷衍了事。

翌日（十日），张学良到行辕，向蒋总统作了报告。

‘汉卿（张学良）向余（蒋总统）报告在灞桥对请愿者说话，曾谓：“我可为你们的代表，有话可以代达；同时，我亦可为委员长的代表，可酌量考虑你们的要求。”彼自以所言甚得体，言时甚得意。余当即纠正其谬，谓：“一人决不能做两方面代表而站在中间。所谓信仰领袖，应如此乎？”’（注三）

张学良在受到责备之后，其消沉的状态，是颇不寻常的。

‘对张学良说话，不可太重。张学良为人小事精明，而心志不定，可悲也。’（十二月十日日记）

翌日（十一日）清晨，有军用汽车多辆自西安向临潼开来；不久，有在张学良下面担任政治工作的黎天才未经事前约定便来请见蒋总统。

‘黎谈话时，对剿匪方针表示怀疑，与汉卿昨日所言者如出一辙，知其受毒已深，痛切诫斥之。’（注四）

据当时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秘书的李金洲在后来所撰“西安事变亲历记”中记述--黎天才事后谈起蒋总统曾对黎严加申斥说：“西安已成红城，政工人员所司何事？闹到这种地步。……”

预感有意外事件发生

当天晚间，蒋总统召宴张学良、杨虎城、于学忠及各将领，但杨、于二人未到，据张学良说明他们两人在西安先有宴客的约定。

‘今日汉卿形色忽遽，精神恍惚，甚觉有异。——此殆以彼昨来见时受余责斥，因而不快欤？或彼今日已闻余训责黎天才之言而不安欤？’（十二月十一日日记）

这个晚宴，是蒋总统在西安所有日程的结束，预定次日（十二日）返回南京。但在就寝之前想到这一天的气氛，总觉得有点放心不下：

‘余思汉卿今日形态之奇异，但终不明其故。余其召慕尹（钱大钧、侍从室主任）嘱以行辕警卫加严乎，但时已达十时，余之寝时已到，且余心坦白，亦何必加以防范也。’（十二月十一日日记）

或许会有意外事件发生的一种预感，荡漾在蒋总统的心头。

注一、三、四：蒋总统-“西安半月记”（一九三七一）

注二：蒋总统-“耶苏受难节证道词”（一九三七）

事变经过

一夜过后，到了十二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预感竟成了现实。

‘凌晨五时半，床上运动毕，正在披衣，忽闻行辕大门前有枪声，立命侍卫往视，未归报，而第二枪又发；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后枪声连续不止，乃知东北军叛变。盖余此来仅携便衣卫士及卫兵二十人，而行辕大门外之司警戒者，即张（学良）之卫队营也。

‘少顷，侍卫官竺培基及施文彪来报：

‘“叛兵已蜂涌入内，本已冲过第二桥内，被我等猛射抵御，死伤甚多；叛兵知我内卫线已有防备，刻已略退，请委员长从速离此。”

‘竺、施等报告方毕，毛区队长裕礼亦派传令来报曰：

‘“叛兵已冲入二门，但接后山哨兵所电话，称该处并无异状，亦未发现叛兵。”

‘余问：“毛区队长在何处？”

‘答：“区队长正在前院第二桥头前假山旁率队抵抗，速请委员长先登后山。”

‘余问“叛兵如何形状？”

‘答曰：“戴皮帽子，皆是东北军官兵。”’（注一）

“西安事变”，便这样地拉开了序幕。

就是这个事变，将进入最后阶段的剿共工作自根基上推倒，给予中国前途留下了无可补偿的祸根。

事变概况，早在一九三七年元月发表的蒋总统自着“西安半月记”及蒋夫人所撰“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已有详细记述，在下面，就以这两件资料为主要依据来覆按一下当时的经过。

出登后山陷入岩穴

当事变发生之初，蒋总统还认为是少数人的叛乱，想必会迅速收拾：

‘乃携侍卫官竺培基、施文彪与随从蒋孝镇出登后山。经飞虹桥至东侧后门，门扁，仓卒不得钥，乃越墙而出。此墙离地仅丈许（约三公尺），不难跨越，但墙外下临深沟，昏暗中不觉失足，着地后疼痛不能行。约三分钟后，勉强起行，不数十步，至一小庙，有卫兵守候，扶掖以登。’（注二）

经过约三十分钟的摸索攀援，走到将近山巅的一个稍稍平坦之处，但仅稍事休息，四周枪声大作，同行卫兵都中弹倒地。

‘余乃知此身已在四面重围之中，此决非局部之兵变，而为东北军整个之叛乱，遂亦不再作避免之计，决计仍回行辕，再作计较。乃只身疾行下山，及至山腹，失足陷入一岩穴中，荆棘丛生，才可容身。

‘此时，身体已觉疲乏不堪，起而复仆者再，祇得就此暂息，以观其变。’（注三）

到了上午九时左右，枪声停止，叛兵开始搜索。

‘闻岩穴上叛兵相语曰：

‘“此间有一服便衣者，或即为委员长也。”

‘另一叛兵曰：

‘“姑先击以一枪再说。”

‘又一叛兵呵止之曰：

‘“不要胡闹！”

‘余乃抗声答曰：

‘“余即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如尔等以余为俘虏，则可将余立即枪杀，但不得稍加侮辱。”

‘叛兵称不敢，向天空发枪者三，高呼：

‘“蒋委员长在此矣！”

‘旋孙铭九营长（张学良之卫队第二营营长、直接指挥叛军）前来，向余长跪而泣，连言：

‘“请蒋委员长下山。”’（注四）

被劫持至西安城内

于是，蒋总统乃在孙铭九等人伴同之下，前往西安城内西安绥靖公署所在地的“新城大楼”（杨虎城的办公处）中之一室，于上午十时到达。

蒋总统被劫持的房间外面，站有以“护卫”为名的监护兵，房门不让关闭。

旋有西安绥靖公署特务营长宋文梅前来招呼，蒋总统遂即命令找张学良来见。

‘约半小时后，张始来，对余执礼甚恭。

‘余问：“今日事，尔事前知之乎？”

‘答：“不知。”

‘余谓：“尔既不知情，应立即送余回京或至洛阳，则此事尚可收拾。”

‘张谓：“事变实不知情，但我有意见欲向委员长陈述之。”

‘余谓：“尔尚称余为委员长乎？既认余为上官，则应遵余命令——送余回洛阳；否则，汝为叛徒，应即将余枪杀，此外无其他可言也。”

‘张谓：“委员长如能听从余等之意见，则当然遵委员长之命令。”

‘余斥之曰：“尔今究自认为部下乎？抑敌人乎？如为部下，则应服从命令，送余回洛；如为敌人，则立毙余可耳！二者，任汝择一行之。他不必言；即言，余亦不能听也。”……’（注五）

注一至五：蒋总统-“西安半月记”（一九三七一）

张学良愧悔

‘张（学良）遂自述其此次行动之动机，非叛变而为革命。

‘余（蒋总统）厉声斥止之曰：“然则尔尚诿称今日之叛变为不知乎？”

‘张言：“即是敌人，亦有谈判余地。”

‘余愤极，诘之曰：“敌人尚有话可说乎？尔以余为何如人？余岂能屈于叛逆？……”

‘张气稍馁，谓：“此间事，非余一人所能作主，乃多数人共同之主张。余今发动此举，当交人民公断。……”

‘余闻其“交人民公断”一语，乃怒诘之曰：“尔妄想国内民众舆论能赞同尔等叛乱乎？尔自谓为革命，叛逆亦可称革命乎？……”

‘张闻言，顿时变色曰：“尔尚如此倔强乎？”

‘余反诘之曰：“何谓倔强？余为上官，汝为叛逆，国法军纪对汝叛逆均应执行惩罚。余身可死，头可断，肢体可残戮，而中华民族之人格与正气不能不保持，余即代表整个民族四万万人之人格。……尔小子何知，乃视余今日之正气为倔强乎；尔如有勇气，则立时毙余。……”

‘彼闻言，低头不语，移时，问：“真无考虑余地乎？”

‘余挥之曰：“去休！”’（注一）

陈诚等均遭监禁

张学良等人在发动事变的同时，并将来到西安的陈诚（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蒋作宾（内政部长、前任驻日大使）、蒋鼎文（福建绥靖主任）等政府官员一齐监禁，中央委员邵元冲则中枪殒命。

在当天清晨的西安城内，杨虎城的部队突袭宪兵队及警察机关，解除其武装，并肆行枪杀。狂乱的士兵在市内到处掠夺，西安车站有军粮等价值一百五十万元的物资被劫。此外，兰州方面也发生叛乱，中央政府机关多被占据。

蒋委员长被劫持的第一个报告到达南京，是在十二日下午；到了傍晚，张学良的电报继之到达。

电文略谓：“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不忍坐视，因对介公（蒋总统）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同时并提出八项主张如左：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切实遵守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在这分通电上列名者十九人，有主谋的张学良、杨虎城，以及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等东北军及陕军将领；此外，张学良等更擅自将在西安被监禁的中央政府高级官员姓名也列入其中。

南京方面，在接到张学良的通电之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即于十二日晚间十一时集会，决议褫夺张学良一切官职并缉拿严办。同时决定由何应钦指挥军队讨伐叛乱。

关于劫持蒋总统的动机，张学良于十三日下午五时召集西北剿匪总部全体职员，作了如下的讲话：

“我内心不愿作剿匪工作，在外侮日迫的时候，用枪来打自己人，我万分的难过！我曾同蒋委员长讲过几次，可惜我的嘴太笨，总未能尽其辞。

“我同蒋委员长意见上的冲突，非告一段落不可，于是我决定三个办法：第一、我辞职。第二、作口头谏诤。第三、兵诤。……

“最后，采取第三种办法的近因是——第一、上海七位‘救国’领袖被捕，他们犯了什么罪？只好说像他自己所说的‘爱国未遂罪’。有一次，我对蒋委员长表示上项意见，他说：‘全国人只有你这样看……’第二、‘一二九’西安学生游行，……我挺身而出，幸而把学生劝回来，而委员长反怪我不弹压。……

“我们对蒋委员长绝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

张学良承认观察错误

被劫持的第二天（十三日），蒋总统因腰部及腿膝疼痛，没有起床。自被劫持以来，一直拒进饮食，甚为疲劳。张学良甚色仓皇地多次来到房间探视，蒋总统没有和他谈话。

及至十四日（第三天），张学良的态度转变了。

‘早晨，张又来见，立门后，对余流泪，若甚愧悔者，余未与之言，半晌，彼无言自去。

‘正午，张又来，谓：“委员长之日记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阅读。今日始知委员长人格如此伟大；委员长革命之盅城与负责救国之苦心，实有非吾人想像所能及者。然委员长以前对部下亦太简默。如余以前获知日记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则此次决不有如此轻率鲁莽之行动。现在深觉自己观察错误，觉非全力调护委员长无以对国家。”’

注一、二：蒋总统-“西安半月记”（一九三七）

周匪等进入西安

满脸浮现着后悔神色的张学良，说是另外准备了比较安全的地点，频频劝请蒋总统移居。

‘余乃力拒其请，并明白告曰：“除非送余回京，否则，余决不离此。

‘张曰：“我欲委员长移居者，乃欲设法秘密送委员长回京而不使人知也。

‘余曰：“余如离开西安，必须正大光明堂堂正正的出去，决不能鬼鬼祟祟随尔潜行。人格重于生命，已一再为汝言之矣！”’（注）

端纳带来蒋夫人信函

此时，张学良突然转了话题，出示一纸电报，乃是蒋总统的客卿端纳（澳洲人）电告即将来陕。

端纳是蒋总统的老朋友，并且担任过张学良的顾问，曾经伴同张学良游历欧洲，适宜于担负南京和西安之间的联络任务。

这次用到端纳，是蒋夫人的意思。她主张在以武力讨伐西安之先，应该尽力于和平解决，故而派端纳前往西安。

下午五时（十四日），端纳乘飞机抵达西安，带来了蒋夫人慰问蒋总统的手书。在他的劝说之下，蒋总统接受了移居的要求——由新城大楼迁往东北军的师长高培五住宅。

移居之后，张学良才向蒋总统说起业已通电提出八项要求，请考虑酌予采纳；蒋总统当然不能再理睬这些话，而相反地指出他谋叛的错误，要他知所反省。

“蒋委员长被劫持”的消息，传到国内外，激起了轩然大波。

在国内，“拥护蒋委员长”和“责难叛乱”的声浪，为之沸腾。在事变发生前和蒋总统曾经晤谈的大公报主笔张季鸾连日发表社论批判叛军，并向之呼吁：“你们把全国政治外交的重心、全军的统帅羁禁了，还讲什么救国？”

在国际间也引起了很大的注意——日本新闻界预想到“中国的分裂”，乃大事报导：“这个事件是在苏联共产党和张学良勾结之下所发动”；苏联的新闻便还以颜色地说：“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所炮制。”

至于美、英两国则极具善意。当由于西安事变的震撼而将出现公债暴落等市场混乱的兆候之际，便迅速声明对于中国的稳定金融给予援助，使得市场安定。

在这个当口，所成问题的是共产党的动态。

毛泽东欲杀害蒋总统

西安事变的第一个报导，传播到陕西保安共产党干部们所困守的窑洞中的时候，是在十二日的深夜。他们算是接到了“好消息”，高唱“人民公审”的人颇为不少，毛泽东的意见是“杀蒋抗日”，他扬言和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许城的西北军“三位一体”组织“军事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对抗；不过，

（中共）首先决定还得要致电莫斯科，仰承后台老板苏联共产党的指示。

另一方面，张学良则对于事到如今的发展趋向感到极其苦脑。据他自己后来自述：听到政府下达讨伐令，遽然加重了恐怖心情，而希望求助于共产党，遂即于十四日派飞机往迎共党代表来西安协商合作。同时，并将张学良本人担任副总司令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撤销，采取共产党的主张，组成所谓“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

张学良所派出的飞机，因为保安所急造的临时飞机场赶工不及，无法降落；于是，毛泽东所派遣的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三人乃冒大雪乘马出发，前往西安。当时，毛泽东指示他们“要把蒋介石解来保安”。

然而，料想不到接获中共报告的史达林却反对毛泽东“杀蒋抗日”的意见。盖史达林唯恐为其爪牙的中共军队将会因而和政府军在决战中蒙受到被消灭的大损害。

另有一说是史达林此时叶已接获塔斯通讯社派驻柏林记者的情报——在欧洲养病的汪兆铭已和希特勒会面，约定中国加入在本年十一月刚刚签署的“德日防共协定”之后，迅即首途归国。史达林鉴于汪兆铭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甚为恶劣，唯恐如果让汪兆铭掌握到政权，则张学良将难以立足；而且亲日分子的汪兆铭殊有参加日、德结合在亚、欧两方面展开反共、反俄行动的可能。

史达林遂即于十四日午后电令中国共产党：“采取联蒋抗日政策，限十日内释放蒋介石。”

史诺在其所著“中共杂记”中记述有宋庆龄谈起毛泽东在接到史达林电报时的情况是：“气得满脸通红，跺足大骂。”

于是，中共乃将“释放蒋委员长”的史达林命令，转达给已到西安的周恩来。

周恩来俨然谋王

“西安事变”，原系张学良、杨虎城所轻率发动，但自此之后，事变的主导权便为共产党所掌握。

张学良在他的反省录中有这样的记述：

“周（恩来）至此时，俨然为西安之谋主矣！周等遂即参加已成立之委员会；当时西安所谓‘三位一体’——东北军、西北军和共产党也。讨论当时情况，决议：坚决实现八项要求，勿再使变动扩大，早日和平解决。……同时调动共党军队，集中耀县、三原，以备万一。”

注：蒋总统-“西安半月记”（一九三七）

蒋夫人冒险至陕

被劫持的第四天～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蒋总统写了一封“遗书”给蒋夫人，交付与端纳同来西安的黄仁霖转达。在“遗书”中，告诉夫人：决心为革命而牺牲，无所愧怍，但以经国、纬国两公子的将来托付夫人；同时，并嘱咐夫人切勿冒险来西安。可是，张学良已经在前一天致电蒋夫人请来西安一行。

当时蒋总统的长公子经国（现任行政院院长）在苏联留学，次公子纬国（现任三军联合大学校长）在德国学军事。

十六日，中央方面由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正式部署对西安的讨伐行动，空军开始轰炸西安近郊，地面部队在华县与杨虎城军对峙。

当天早晨，张学良神色苍白地来对蒋总统说：“昨夜我已将此间之委员会说服，原定四天至七天内可送委员长回京；但中央空军开始轰炸，致昨夜之议又将不能实行。”

及至晚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蒋方震来见蒋总统，请求考虑民众苦难，下令中央军暂停进攻、轰炸。

蒋方震是为了要向蒋总统报告赴欧洲考察旅行见闻而来到西安，故当事变发生时也被张学良所拘禁，因而在此刻受张学良之托来见蒋总统。

翌日（十七日）蒋总统接纳了蒋方震的请求，手令何应钦停止轰炸三天，交蒋鼎文（福建绥靖主任）携往南京；第二天，刊载于京沪各报，使国民都为之安心。

十九日，蒋总统身体疼痛益感剧烈。晚间，张学良来见，表示将八项要求中之后四项删除，请只承诺其余四项，蒋总统则仍予拒绝。

二十日，一度返回南京的端纳又偕同宋子文来到西安。蒋总统得和宋子文单独谈话三十分钟，给予其转达中央可以在五天以内围攻西安的具体指示。宋子文即于翌日返回南京。

二十二日，已经是被劫持的第十一天。蒋总统期待着政府军的总攻击，虽然凝神倾听，但终归是听不到炮声和爆音。

乍见惊讶感动悲咽

下午四时，蒋夫人突然走进房间。

‘乍见惊讶，如在梦寐。余前日切嘱子文，劝妻万不可来西安，不意其竟冒万险而入虎穴。感动悲咽，不可言状。妻见余强作欢颜，而余则更增忧虑。盖旬日以来，对自身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而今后乃更须顾虑余妻之安危。’（注一）

在南京方面，以武力讨平叛军的意见颇盛，甚至有人怀疑到蒋总统交蒋鼎文带来的“停止进攻手令”的真伪问题。但是蒋夫人则依据端纳和宋子文的报告，相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故而毅然前往。

蒋夫人到达西安之后，即和张学良见面。

张学良虽向蒋夫人承认自己的错误，但也辩称：杨虎城等人说八项要求如未获承诺，则不同意释回委员长。

此外，蒋夫人还会见了一个重要人物。在蒋夫人自撰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提到这个人对大局能有影响，但为蒋委员长所不愿见的“有力分子”。

这个人在第一次见面时，虽然指称中央抗日不够积极，但同时表明：“我们并未参与劫持委员长之事，对于委员长的崇敬心情并未改变。”蒋夫人乃对之劝导：“凡事不宜躁急。若真信委员长为全国领袖，即当对之自矢忠诚，遵从其主张之政策。”结果，这个“有力分子”约定劝告杨虎城送委员长回南京。

第二天，蒋夫人再与此人会谈，嘱其转告西安各方面——“即使对共产党，委员长也是宽大为怀，如能悔过自新，作安分良民，决不究其既往。如为真正之爱国者，应即放弃其不能实行之政策，各尽其在中央领导之下诚意协作之任务。”

这个“有力分子”的姓名，在中华民国的官方纪录中直到现在还是未经披露；但据日本资料一般都推断其为周恩来。

据史诺记述和秦邦宪．张国焘等当时共党有关人等的回忆——周恩来除见过蒋夫人之外，还在二十四日晚间谒见过蒋总统。据说，当时周恩来对于蒋总统是用在黄埔军官学校时代的“校长”敬称，极其郑重地报告共产党的方针是：“希望事件和平解决；拥护校长为全国领袖。”

蒋夫人劝告张学良

二十四日是圣诞夜，蒋夫人一再劝告张学良“送委员长回南京，是赠给国家以最贵重的圣诞礼物。”张学良则表示：由于城门被持反对态度的杨虎城军队所把守，很难送出城；并且提议：“请委员长化装，用汽车送往洛阳。”但蒋夫人则以“委员长绝对不肯化装潜行，我也宁愿留此同殉”而毅然拒绝。

宋子文也和西安各集团分别折冲，劝说“无条件”送委员长返回南京。

‘西安诸人中，有声明中央军未撤退潼关以前，决留余在西安；余坦然置之，不以为意。……一日之间，变化数起。至夜间，又闻杨虎城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与张争执几决裂，究不知其真相如何。’（注二）

注一、二：蒋总统-“西安半月记”（一九三七）

脱险返回南京

被劫持的第十四天（十二月二十五日），事态急转直下。

早晨，宋子文来到蒋总统的房间，说：“张学良决送委员长回京，但拟先送夫人上飞机，然后使委员长化装到张的部队中，再设法登机飞出。”

‘未几，张亦以此言达余（蒋总统）妻，谓：“迟则无及。城中两方军队万一冲突，将累及夫人，张某之罪戾益深矣！”

‘余妻即直告张曰：“余如怕危险、惜生命，亦决不来此；既来此，则委员长一刻不离此，余不离此一步。余决与委员长同生命、共起居。而且委员长之性格，亦决不肯化装潜行也。”

‘张闻此语，深有所感，即允为设法。’（注一）

时间已经是迟了一点，因为要于日落以前飞抵南京，则必须在上午十一时半以前由西安出发。可是，直到时间已过，还是毫无消息。中午前后，宋子文来告：杨虎城态度已渐有转变，但尚未决定。

中午十二时半，张学良来说：“飞机已准备，但一切仍未决定。”言毕，匆匆离去。

直接飞往南京，在时间上已经没有可能；不过，比南京近得多的洛阳，则虽在午后四时起飞尚能赶到，故而仍有启程的希望。

‘下午二时，子文复来告：“预为准备，今日大约可以动身离陕矣！”

‘旋张亦来言：“虎城已完全同意，飞机已备，可即出城。”’（注二）

行前对张杨二人训示

蒋总统在出发之前，嘱张学良稍待，并着约杨虎城来见。半小时后，杨虎城到来，蒋总统命张、杨二人坐下，自己靠在床上静静地对他们训示：

‘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无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我中华民国转危为安之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

‘尔等过去受反动派之煽惑，以为余待人不公或对革命不诚。……以言此次事变之责任，当然尔等二人应负其责；但论其原因，余自己亦应当负责。余身为统帅，使部下有此灭法坏纪之事，余当然应先负责，向中央引咎请罪，并以尔等悔悟之意呈于中央。……

‘尔等均已明了——余生平作事，惟以国家之存亡与革命之成败为前提，绝不计及个人之恩怨，更无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

张学良坚请同行

训话毕，到达飞机场，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张学良命工役拿着他自己的提箱，他也跟随走上飞机。

‘临发时，张坚诸同行；余再三阻之，谓：“尔行，则东北军将无人统帅，且此刻到中央，亦不便。”张谓：“一切已嘱托虎城代理，且手令所部遵照矣！”遂登机起飞。’（注二）

下午五时二十分抵达洛阳。为避免偶发性的冲突，蒋总统乃立即下令正转向西安方面的政府军停止一切作战行动。当夜驻节于中央军官学校洛阳分校。

对于这一次的无条件送回，叛军和共产党在后来却一直扬言：“蒋委员长接受了要求条件。”

譬如说：西安发行的“解放日报”（原西京日报）于十二月二十七日报称：“蒋委员长在起飞之前，向杨虎城言明：回南京之后，实行（一）停止内战。（二）释放救国会领导人等六项承诺。”又在共产党方面，由毛泽东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发表声明：“蒋介石氏虽未签字，但是否实行他所允诺的六项条件，我们将于今后考察之。”此外，曾为杨虎城军队政治处长的共党分子申伯纯在战后所发表的回忆文中，谓“蒋委员长允诺四项”。这些所谓六项、四项，其内容参差不一，即此一端看来，便可知道他们的说法是出于杜撰。

全国各地庆祝欢呼

“委员长脱险”！这个消息传播到全国各地，自动自发的庆祝欢呼，响彻云霄；街头挤满着手执“蒋委员长万岁！”“中华民国万岁！”旗帜的人群；爆竹店卖到无货继续供应，鞭炮响声彻夜不绝于耳。

上海的马路上，在大放鞭炮之后，纸屑堆积如山，以致连电车也不能开动。

当时，虽则还在日本统治之下的台湾，也有些人们为蒋总统的返回南京而秘密庆祝

。事缘在西安事变之前，因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之曾道经台湾提倡组成有着中国人亲睦团体的“蒋氏宗亲会”。这些宗亲们听说蒋总统脱险，乃聚集于台北市内的中华会馆礼堂，举行庆祝大会。于是，得知消息的日本警察乃将宗亲会会长蒋渭川逮捕，并将该会热心活动分子蒋子敬驱逐出境。

翌日（二十六日），蒋总统由洛阳出发，于中午十二时二十分抵达南京。在飞机场，受到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以次众多同志的欢迎。

注一、二、三：蒋总统-“西安半月记”（一九三七）

共匪得利

蒋总统在回到南京的第三天～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为表明西安事变的责任，特呈请辞去行政院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务；经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加以慰留，但给假一月藉资疗养。于是，一九三七年的新年，乃在故乡奉化度过。

张学良判刑后获得特赦

另一方面，对于随同到达南京的张学良，则交由军事委员会处分。三十一日，军事委员会军法会审，判处张学良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但在四天之后的元月四日，蒙政府明令特赦，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张学良之获特赦，是出于蒋总统的请求。特赦之后，由国防部严加看管，与外界断绝交往，现已与其第二夫人赵一荻正式结婚，居住于台北市郊北投。

去年（一九七五年）四月，蒋总统逝世时，张学良曾在灵柩奉厝之先，前往国父纪念馆瞻仰遗容。

‘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措。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全隳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力，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变乱，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恢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国进程，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至此！’（注一）

毛共由保安进至延安

因“西安事变”而蒙受意外幸运，更且获得莫大利益的——不用说，就是共产党。

在事变发生之初，共产党只不过盘踞在延安东方约七十公里的保安等四个山区小镇；且当张学良的东北军为戒备政府军的进攻而调动南下之后，共产党便踵接其后一举而将控制区域扩大了四倍之多，并且包括陕北重镇延安在内。毛泽东等人自从在事变之中的十二月二十日左右推进到延安以来，直到中日战争时期乃至战后，延安一直成为他们策谋颠覆国民政府的根据地。

作为西北地区防卫主力的东北军，在张学良去了南京之后，因有些不愿将蒋总统平安送归南京而心怀叵测的青年军人于二月二日发动兵变，将王以哲、蒋斌、徐方等将领杀害。由于这些内讧，力量遂为之削弱。

这个事变，也是对于中国民众之能否一致团结做了一次考验。

当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地位的国家领导人被叛军所劫持的两个星期之间，完全没有出现起而响应、发动叛乱的动向；而全国国民更能一心一德懔然维持纪纲，度过危机。

‘西安事变，后来影响所及，反而更加强了全国军民对军事领袖的信仰，而奠定了后来八年抗战全国军民意志统一的基础。’（注二）

日本侵略更为紧迫

对于中日关系，西安事变所给予的影响也是颇为不小。

日本所注视的，在于一点——就是国民政府会不会与共产党妥协？当时据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密电报告：日本外相有田八郎于十二月十九日向许世英表示：“中央政府如果以抗日容共为条件和张学良妥协，日本当会强硬反对。”

接着，日本首相广田弘毅也于二十三日在枢密院会议报告：“对于西安事变，决定采不干涉方针；倘国民政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将断然排击。”

西安事变，结果虽未作任何妥协，但日本方面则从事变过程判断国民政府的抗日政策必将越发加强，因而对于侵略华北的速度也更为之加紧。至于日本基于他自己的奢望而有所耽心的日俄关系，他也已经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前便以苏联为假想敌，而和德国缔结了可以称之为攻守同盟的“日德防共协定”，凭力量来逐步巩固其封锁苏联的路线，是故此时日本已无须对苏联有所顾忌而可以任意向华北伸展其魔掌。

于是，料想不到在“西安事变”的七个月之后，便发生了“七七卢沟桥事变”。是则“西安事变”的后果，乃是产生了促进日本对于中国正规侵略的行动。

其后，当西安事变一周年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蒋总统在日记上留下了这样的感慨：

‘余虽幸获出险，愧未能使国家转危为安，而反陷国家于今日危险地步，不死何益？

‘虽然，设余当时因事变而死，内则共党窃国，军阀割据；外则倭寇入侵，列强攘利。——中央覆亡立待。

‘犹幸留此身，以挽救今日之残局，而完成复兴民族之使命也。’

在日本海军军令部于一九三七年元月六日所整理的“支那特报第一号”中，对于西安事变的结果有如左的分析：

推察蒋介石对于八项要求，即使是一时权宜办法，但至少已接纳了“抗日”的意见。

因蒋张的妥协，国民政府内部各派抗争将为之激化，其结果对于汪兆铭的影响力会有微妙的影响。

剿匪战事将会终止。

今后，共军及叛军（特别是杨虎城所部）的活动颇成问题。假定彼等合作，则对于与华北、内蒙有密切关系的日本，将会有很大的威胁。

英国对于解决事变的幕后活动最为积极。英国将会更深入中国的经济界。中国的大势所趋必将依赖欧美，特别是倾向于亲英。

注一：蒋总统-“西安半月记”（一九三七一）

注二：蒋总统-“本党革命的经过与成败的因果关系”（一九四九）

共党伪装归顺

因“西安事变”乃得由保安推进到延安的

共产党，遵循史达林的指导，

积极地表示出向国民党“归顺”的姿态。当蒋总统在被劫持中的十二月十九日，他们便已经发表通电，列举“双方军队停止进攻、在南京召开和平会议”等四项建议，向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以及西安方面喊出“一致团结、抗日救国”的口号。

新年之后的一九三七年元月，政府军中止剿匪，撤销设于西安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强原属张学良统驭的东北军东撤，并另行任命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掌西安行营主任。

一九三七年二月五日，在西安事变中身体上所受伤痛才见痊愈的蒋总统于日记上记有当前的五项方针如次：

‘一、对内避免内战。然一遇内乱，则不放弃戡乱安内之责任。

‘二、政治、军事仍应渐进，由近及远，预定三年至五年内为统一时间。

‘三、不说排日，而说抗战。

‘四、加强军队之训练。

‘五、分省物色品行方正之人才。’

共党要求收编

收编共军的接洽，是于元月底开始。交涉窗口——政府方面为顾祝同，共产党方面为周恩来。

元月三十一日，顾祝同向蒋总统电话报告：“周恩来要求派代表来，其意在协商共军接受政府收编事宜。”蒋总统予以指示：

‘在政府立场，姑且每月支付二、三十万元军费，由杨虎城间接颁发；共军番号暂时照旧，其驻军地点及收编事宜，视情况再作商量。’

经过两次交涉之后，蒋总统于二月八日以下述最重要事项指示顾祝同，着其征求共产党的同意：

‘最要注意之一点，不在形式之统一，而在精神实质之统一；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简言之，要其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不作赤化宣传工作。若在此点同意，则其他当易商量。如彼（周恩来）与兄（顾祝同）面谈，可以此言切实直告。盖以总理与越飞之共同声明（一九二三年）中，越飞已承认中国不能施行共产主义，而赞成三民主义也。’

结果，共产党表示遵从政府的要求，于二月十日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誓约“归顺”。

在这个电报中，共产党首先提出五项前提请求——“（一）停止内战。（二）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释放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四）准备对日抗战。（五）改善人民生活。”这些请求如能被确定，则共产党保证做到四项约定。

共党的归顺保证

这四项“归顺保证”，在第一章“战争结束前后”中业已提到，其概要为——（一）停止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领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

本来，在国民党方面，对于共产党的“归顺”也并非是不加考虑地予以接受。蒋总统在这一段期间的日记中便留有如下见解：

‘编共而不容共，抗日而非排日，外交以独立自主为基础。’（二月十六日）

‘共党非人伦、不道德的生活，与无国家、反民族的主义，必须根绝净尽。’（二月十八日）

国民党通过根绝赤祸案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于十五日在南京开幕。二十一日通过了一个“根绝赤祸案”，以答复共产党的“誓约”。在这个决议案中，首先举出共产党以往行动实例予以批判：“十三年，共产党员个人加入本党之后，对本党（国民党）多方分化；又复伪立政权，结集叛乱，毒害人民，尽力破坏。”不过，接着又表明：“今者，共产党人输诚授命，本党以博爱为怀，决不断人自新之路，”显示再度宽容共产党员的意向；并为此而提示四项最低条件如下：

“一、断无一国家可许主义绝不相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

“二、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

“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对不能相容，即与吾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

“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雠。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

这四项处置，和共产党四项保证的誓文措辞虽则不同，但实质乃是针对其保证事项而发的。

至于共产党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报中所请求的开放言论及赦免政治犯等，则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发表谈话，差不多都予以接纳。

自一九二七年全面清党以来，历时九年，容许了共产党的投诚。

共党内部文件

在国民党三中全会接纳了共产党的投诚之后，接着便开始进行取消所谓“苏区”及改编“红军”的交涉。

不过，在这里必须交待明白的是——国民党的这个方针，在三中全会的决议案中已经表明：决非“容共”，而只是允许共产党人“输诚授命”。

但是在共产党方面，其归顺誓约实则乃是为谋伸展势力及自内部破坏国民党的一种伪装手段。

共党目的在扩张势力

四月十五日，共产党中央在其党内下达“告全党同志书”已经是将那一纸誓约视如无物。

这份“告同志书”的内容大致如左：

“——今后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

“——解放中华民族，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责任；并且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力争自己政治领导的责任。

“——本党给国民党的四项保证，不能解释为所谓‘共产党的投降’，而是一种让步。为取得民族解放，需要各党各派间的互相让步与妥协，是本党两年来的主张。让步与妥协，决不是等于取消或降低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与批评的自由；是为了要使本党取得全国范围公开活动的机会，千百倍的去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与组织力量。

“——不承认过去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努力是白费或错误的。

“——国民党对于本党‘国共合作’的提议，也并不表示拒绝，证明国民党的政策已经有了开始的转变。‘国共合作’，是全国人民的要求，是重振革命三民主义的精神。

“——要把马列主义的原则具体化，作为行动的指针；中华民族的最后解放，依靠我们中国共产党。”

这个文件，当时对外保密，后来才予公开。看他的内容，该可以了解共产党的归顺，是充满着赤裸裸的阴谋。像这样表面做出归顺的姿态，而目的在渗透自己势力以颠覆国民党的手段，和用在当年总理“容共”时刻的阴谋，毫无二致。

就是这个文件，乃为尔后共产党在抗战期间投机宣传，以至于抗战胜利之后全面叛乱的“经典”。

中日关系奔向破裂

在这一段期间，中日关系也是毫无疑问地颠簸在奔向破裂结局的道路上。

调整中日邦交的交涉，则因伪蒙军进犯绥远事件及日军陆战队在青岛登陆而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日停止。

此时，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甚至有将日方片面纪录的“会谈备忘录”强迫外交部长张群接受的举动出现。

‘倭使川越以其片面自制之谈话录强要张群接受，虽经张群拒绝，而川越乃置于案上自去，后由我外交部送还其大使馆。此种卑劣伎俩，世界外交上所无，而倭竟以无耻出之，人格扫地，国焉能不亡。’（蒋总统十二月三日日记）

两国交涉在中断状态之下过了新年。

民国二十六年

新年之后的元月二十日，张群接见了因调职回国而来辞行的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告知中国的意向如次：

“东北问题虽暂可缓谈，但华北现状急须改善。——此为我方最低限度之调整，关键全在日本之对华态度如何。我国一方面决由外交途径进行调整交涉，而同时在他方面也不能放弃抗日之准备。”

元月二十三日，日本广田内阁总辞。其原因为议会追究“军人干政”而形成问题。

继任首相，指名陆军中之元老宇垣一成。宇垣与政党人士颇多交游，可望采取对华亲善政策。可是，日本陆军则对之极表反对，乃凭藉“军部大臣现役制”而拒绝推举陆军大臣人选，以致迫使宇垣组阁不成。

‘倭军阀横行，此为无政府之表征。’（元月二十九日日记）

宇垣内阁流产之后，日本改以曾任“朝鲜军司令官”的林铣十郎为首相，于二月二日成立新内阁。林内阁是没有包括一个政党人士的军部、官僚内阁；其中值得注目的，是日本兴业银行总裁结成丰太郎之入阁担任大藏大臣，盖为日本“财界”和“军部”结合的预告。

林内阁的外相，起初由林首相暂兼，三月三日以驻法大使佐藤尚武担任。

此时，中国方面也已任命王宠惠接替张群的外交部长。

政府对共党政策不变

三月六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为表达对西安事变的慰问而晋谒蒋总统。川越对共产党问题寄予关心，在谈话中问起：“报载中国政府已与共产党妥协，究竟如何？”蒋总统答以：

‘我国政府对共产党之政策，并未有何变更；此点可于前次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证明之。’

三月十五日，日本大使馆武官喜多诚一也来晋见，提出同样的问题，蒋总统断然答覆：

‘余敢以一语告君，即中国有余负责一天，无论共产党或第三国际用何阴谋诡计，余自信皆有办法应付。请贵国勿庸耽心。’

在这次谈话中，蒋总统对喜多强调：

‘尤其两国军事当局所应特别努力者，在以东方道德精神作基础，融和两国国民感情。’以促其反省。

日军进行挑衅

三月十六日，蒋总统举行欢迎茶会，招待来在南京参加“中日贸易协会总会”的“日本经济考察团”。该团团长儿玉谦次为横滨正金银行总经理，并担任“日华贸易协会”会长。儿玉在往年曾任正金银行上海支店长，与蒋总统系属旧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蒋总统在茶会谈话中，回忆十年前访问日本时与涩泽荣一见面的情况如次：

‘我在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旅居日本时，会见了日本实业界泰斗涩泽子爵。子爵送给我一部他自己精心校印的“论语”，特别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他生平最服膺这两句格言。并且时常提示给日本的青年，认为这是我们东方精神的特点。可惜涩泽子爵今日已经去世了；但他的话使我们留着很深的感谢与回忆，直到如今都不能忘怀。

‘今天见到各位实业界的先进，正如见到涩泽子爵一样，所以旧话重提，现在请大家起立，对故涩泽子爵默念致敬。’

这一番寄托于回忆的寒喧话，呼吁“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使儿玉一行颇受感动。其后，考察团和中国实业界重要人士及政府有关方面会谈，加深了中日经济提携有与华北问题同时解决之必要的观念，而于回国之后向外相佐藤尚武有所建议。

然而，像这样一些对日本的盅告，却终于未见发生效果。

四月初，日本外务省训令驻华大使川越茂--用各种方法解决中日之间的基本政治问题，其要点如次：

一、中国应承认“满洲国”存在之事实，并承认“满洲”为已失之领土。

二、中国应与日本签订特殊协定，保证于将来不侵犯日本在华权益。于远东发生战争时，中国应对日本保持亲善之中立态度。

三、中国应同意日本在华北享有之特权。关于内蒙问题，中国应注意日本意旨。

以上任何一项，对于中国都简直是一种侮辱，其不可能为中国之所接受，应该是自始就非常明白的。然而这种训令之下达，正自说明了日本的对华政策已经是钻进了死胡同。

‘倭寇向外侵略，已至满溢时期。物极必反，其败可立而待也。’（蒋总统四月十一日日记）

四月十六日，日本林内阁的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四相举行会议，决定了“对支（中国）实行策”和“北支（华北）指导方案”。其作法，是在华北避开政治工作，积极加强经济工作，并“内面指导”华北傀儡自治政权，要国民政府确认华北的“特殊地位”。

长公子自俄归国

正当这个时候，去苏联苦学十二年的蒋总统长公子经国听到国家危难日亟，乃于四月十九日回归国内。

日本的林内阁为期短暂，五月三十一日因屈于两党（政友会与民政党）的压力而总辞。继任阁揆者，为居于“五摄家”（日本古代有资格摄政的五个门第）之首而在当时担任贵族院议长的近卫文麿。

‘近卫组阁，结城（林内阁大藏大臣）辞绝，是财阀与经济界不合作之表示，其以后经济之难关颇堪注意。又此次内阁必较历来强固，对华之政策，亦当更坚决与积极也。’（六月四日日记）

近卫内阁的外相，由广田弘毅重作冯妇。广田虽则不再提起他在上年所标榜的“对华三原则”（广田三原则），但却仍旧打算使外交独立、脱离军事牵制，并揭橥谋求改善中日关系的外交方针。然而事到如今，外交折冲已经陷于毫无回旋余地的状况。盖日本既然是坚持继东北之后又得造成华北的“特殊地位”，则中日之间的平等交涉便不可能存在，是故站在中国立场也就谈判不下去了。

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活动

此时，日军在华北的挑衅行动，正日益露骨。日军以北平郊外的卢沟桥附近为演习场所，逐日不断地训练、示威。更且计划以由丰台到卢沟桥一带的六十多公顷土地建造飞机场，执拗不休地要求中国方面卖给这些土地，并开出令人难以置信的高价诱惑地主，但大多数地主都不肯理会；于是，大为冒火的日军乃一方面向中国地方行政当局施压力，一方面更增加了在卢沟桥一带挑衅演习的频度。

据曾在当时担任卢沟桥守备任务的二十九军二一九团所属第十连三排排长祁国轩和笔者（古屋奎二）谈起事变前夕的气氛如次--

事变前，日本兵对中国兵的挑衅行为令人非常讨厌。

日本兵三、两个人一起，跑到中国军营房前面，叉开了两条腿站在那里，一只手拍着胸脯，一只手伸出来翘起大拇指，用中国话大声叫嚷：

“我们皇军大大的！”接着便伸出小指头：

“你们支那兵小小的！”总之是想尽方法要挑动中国兵生气。

在这个当口，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于六月九日向日本陆军中央呈报：“如由日本方面主动谋求亲善，则徒然助长其排日、侮日态度，故毋宁说是有加以一击之必要。”

六月十六日，蒋总统得悉日军已向东北增兵二万人。

在非比寻常的紧张气氛中，日军更于卢沟桥一带自六月二十五日开始了长期演习。

————————————————————————————————————-

西安事变蒋介石对张杨训词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西安讲——

此次西安事变，实为中国五千年来历史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不仅有关中国之存亡而已。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我中华民国转危为安之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中国向来以知过必改为君子。此次事变，得此结果，实由于尔等勇于改过，足为我民族前途增进无限之光明。以尔等之人格与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为我之部下。尔等所受之感应，尚能如此迅速，则其他之人更可知矣。尔等过去受反动派之煽惑，以为余待人不公或对革命不诚。现在余一年以来之日记，约有六万余言，两月来之覆私文电及手拟稿件，亦不下四五万言，此外余手草之各种建国计划及内政、外交、军事、财政、教育等各种政策与方案，总共不下十余万言，尔等均已寓目；在此十余万言中，尔等必已详细检阅；其中是否有一言一字不为国家而为自私？是否有一丝一毫不诚不实负欺欺人之事？余自兴学带兵以来，对部下与学生训话时∶尝以二语教人，尔等亦必闻知。此二语者∶即（一）如有丝毫自私自利而不为国家与民众之心，则无论何人可视我为国家之罪人，即人人可得而杀我；（二）如余之言行稍有不诚不实虚伪欺妄而不为革命与主义着想，则任何部下，皆可视我为敌人，即无论何时可以杀余。此二语为余平时所以教部下者。今余之日记及文电等，均在尔等手中，是否其中可觅取一言一字足为余革命罪状者？如果有之，则余此刻尚在西安，尔等仍旧可以照余所训示之言，将余枪决。余于今益信平日之所以教人者，自己能实践笃行，无论对上对下，觉无丝毫愧怍也。

以言此次事变之责任，当然尔等二人应负其责；但论究其原因，余自己亦应当负责。余平日一心为国，一心以为精诚与教令可以贯彻于部下，绝不重视个人之安全，防范太不周密，起居行动太简单，太轻便，太疏忽，遂以引起反动派煽动军队乘机构害之祸心。天下事一切均有造因，此次事变之造因，即由我自己疏忽而起，以致发生如此毁法荡纪之事，使中枢忧劳，人民不安，国家受其损失。余抚躬自问，实无以对党国，无以对人民，不能不向中央与国民引咎请罪。须知国家不能没有法律与纲纪，尔等二人是直接带兵之将官，当然应负责任，应听中央之裁处；但舍己明了尔等实系中反动派之宣传，误以余之诚意为恶意，而作此非常之变乱。尔等在事变之始，即已自认为卤莽灭裂贻祸国家之举动，深表忏悔；现在尔等已自知受反动派之宣传，知我对尔等不仅无恶意而且时加爱护，业已确实觉悟，而愿送余回京。余平日教诲部队，常谓部下不好，即系上官不好，要罚部下，应先罚上官。余身为统帅，教育不良，使部下有此蔑法坏纪之事，余当然应先负责，向中央引咎请罪，并以尔等悔悟之意，呈于中央。尔等此次觉悟尚早，事变得免延长扩大，中央当能逾格宽大也。尔等对于部下应告以此次事变受反动派煽惑之经过，以及余只知有国不知其他之态度，切实安慰彼等，使彼等不因中央处置而有所恐慌。余平日教人以“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之四语；上官对部下教率无方，即应负责。故此次事变，余愿以上官资格负责，尔等应听中央之裁处，而尔等之部下则不必恐慌也。

吾人无论何时应视国家之生存高于一切；应认定国家必须生存，个人不足计较；尤须知人格必须保全，民族乃有基础。故吾人之生命可以牺牲，而国家之法律网纪不能迁就；身体可以受束缚，而精神之自由绝不能受束缚。余对中央与国家之责任，余一息尚存，决不敢丝毫推诿或放弃。尔等屡次要求余签字与下令，余始终拒绝。以人格事大，生死事小也。余之言行，不仅要留垂于后世，且欲以事实示尔等，使尔等亦知人格之重要甚于一切。余当时屡言∶如余在西安允许尔等，签署苹字于尔等之要求，则国家等于灭亡；盖余为代表中华民国四万万人之人格，如余为部下威力所屈，临难求免，则余之人格扫地，即等于中华民族之人格扫地以尽。无论个人与国家民族，如人格丧失，则虽生犹死，虽存必亡。余平时既以“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之四语宣告国民，视为救国唯一之要道，当然应不惜任何牺牲，而维持人格与发扬正气；对不能行不顾言，使我部下与民众无所适从，而陷国家于灭亡。自经此次事变，尔等应得到一确实之教训，尔等必须知人格重于一切，国家利益重于一切。错误应坦白承认，过失应切实悔改，责任应明白担负，并应以此意告知部下也。总理昔日训示吾人，必须恢复民族道德，方可以挽回民族；所谓信义和平，均系民族至要道德。余十余年来所致力者，全为团结精神，统一国家以救国，而尤重于信义。余向来所自勉者，即“言必信，行必果”二语。凡与国家民族有利益者，余决不有丝毫自私之心，且无不可以采纳，亦无不可以实行。中央数年以来之政策方针，亦唯在和平统一、培养国力、团结人心，不忍毁捐民族之力量。故此次事变，尔等将余留居西安，则引起战事之责任，即应由尔等毁坏纲纪之举动负之。现在尔等既表示悔悟，则余可请求中央；中央必仍本爱惜国力之精神，自有妥善处置，以挽救国家之危机也。

总之，现在国家形势及余救国苦心，尔等均已明了；余生平作事，惟以国家之存亡与革命之成败为前提，绝不计及个人之恩怨，更无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且余亲受总理宽大仁恕之教训，全以亲爱精诚为处世之道，绝不为过分之追求。此次尔等悔悟之速，足见尚知以国家为重。如此，即应绝对服从中央命令，一切唯中央之决定是从，而共同挽救我垂危之国运，此即所谓转祸为福之道也。

□□□□□□□□□□□□□□□□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四五页～二四七页

“关于蒋介石声明之声明”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蒋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抗日的要求，首先命令进行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这是蒋介石氏转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这对于指挥内战、制造分裂、并欲在这次事变中置蒋氏予死地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的阴谋，给了一个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的失望，已显而易见。蒋氏此种觉悟的表示，可以看作国民党愿意结束其十年错误政策的一种表示。

蒋介石氏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声明，即所谓《对张杨的训词》，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么，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

蒋氏声明中有一段是值得赞扬的，即他所说“言必行，行必果”的那一段。意思是说他在西安对于张杨所提出的条件没有签字，但是愿意采纳那些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要求，不会因为未签字而不守信用。我们将在蒋氏撤兵后看他是否确守信义，是否实行他所允诺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这些条件的实行，首先需要确守信义，并且需要一些勇气。我们将于蒋氏今后的行动表现中考察之。

然而蒋氏声明中又有西安事变系受“反动派”包围的话。可惜蒋氏没有说明他所谓“反动派”究系一些什么人物，也不知道蒋氏字典中的“反动派”三字作何解释。但是西安事变的发动，确系受下列数种势力的影响：（一）张杨部队及西北革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二）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三）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四）各省实力派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五）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六）世界和平阵线的发展。这些都是无可讳言的事实。蒋氏所说的“反动派”不是别的，就是这些势力，不过人们叫作革命派，蒋氏则叫作“反动派”罢了。蒋氏在西安曾说了将要认真抗日的话，当不至一出西安又肆力攻击革命势力，因为不但信义问题关系蒋氏及其一派的政治生命，而且在实际的政治道路上，在蒋氏及其一派面前横着一种已经膨胀起来而不利于他们的势力，这就是在西安事变中欲置蒋氏于死地的所谓讨伐派。因此，我们劝蒋氏将其字典修改一下，将“反动派”三字改为革命派三字，改得名副其实，较为妥当。

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设使内战扩大，张杨长期禁锢蒋氏，则事变的进展徒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在这种情形下，共产党坚决揭破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汪精卫、何应钦等的阴谋，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这和张杨二将军及宋子文氏等国民党人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这就是全国人民的主张，因为现在的内战是人民所痛恶的。

蒋氏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蒋氏倘能一洗国民党十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军事上政治上俱能实际采取救国步骤，则共产党自当给他以赞助。共产党早已于八月二十五日致国民党书中将此种赞助的诺言许给蒋氏和国民党了。共产党的“言必信，行必果”，十五年来全国人民早已承认。全国人民信任共产党的言行，实高出于信任国内任何党派的言行。

□□□□□□□□□□□□□□□□

《中共编写“中华民国史”真相探讨》陈木杉着，国立编译馆主编，中华民国八十三年五月初版。

一、国立编译馆，中华民国台北市舟山路二四七号。

二、销售代理：红蚂蚁图书有限公司中华民国台北市内湖区文德路二一○巷三十弄二十五号

第五章中共对抗战以前（民国十六年至二十六年）民国史实的篡改之驳正

第三节对西安事变的曲解

壹、前言

治中国现代史者，无不认为西安事变，是历史上一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关键性事件。但其真相究竟如何？则人言言殊，莫衷一是。外人有视其为一滑稽之喜剧；（注二九）国人有将其比作明英宗土木堡之变，（注三○）也有人以之比作后魏尔朱荣高诸之变。（注三一）傅斯年先生认为国人以上两项比法似属不伦，但也无以名之，姑且说其“不特是民国史上空前的怪事，恐怕也是中国史上未有之奇谈”。（注三一）

盖先总统蒋公在当时即云其“实为中国五千年历史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注三三）蒋夫人亦说其为“决定我国命运最后一次革命正义之斗争”。（注三四）观之五十多年后的今日，经过许多史家之研究，以及当时亲历其事者晚年之回顾，又无不认定西安事变乃中国现代史上之一大转捩点：自好的方面言，西安事变发生后，促成全国上下空前之大团结，蒋委员长之声威加隆，进而形成全国统一之坚强领导中心，使往后抗日力量扩增，终而获得最后胜利；但从坏的方面言，由于西安事变，安内攘外之国策到此碰壁，政府采纳了“攘外亦可导致安内”之主张，接受中共输诚之请求，收编其军队，供给其枪械饷项，使其绝处逢生。更利用八年抗战之机会，力量日渐坐大，驯至神州陆沉，政府退处海峤，由剿共而转成反共，其盈虚胜负之数，皆肇端于斯！

近年来中共大肆输出史料，并拍摄电影，夸张其在西安事变中的地位，突出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的影响力，为免历史事实被曲解，本节就中共曲解西安事变之处，加以驳正澄清。

贰、国内外学者对西安事变研究之重点

近年来海内外学者，分别在美国与中国大陆召开“西安事变五十周年”等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观与会学者之观点，可分成右派与左派两种论调。从右派方面说，有三个重点是他们十分强调的。

第一，他们认为在蒋中正先生被释放前，没有作任何承诺。对于左派史家认为，蒋有八点承诺，不外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救国会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上述八项主张，皆属内政问题，无一堂堂正正的抗日主张，重心显在为中共及其外围份子说话。因此右派学者认为蒋从未在纸上签过任何承诺，这是事实，所以蒋自己总说他未作任何承诺。第二，右派认为蒋本来就要对日作战，不是因西安事变才打日本的，宋美龄的日记也这样说。第三，右派认为，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就被消灭了。西安事变是共产党得势的开始，最终占领整个大陆。（注三五）

另从左派学者及中共史家的看法，也有三个重点：分别如下：

第一，左派至今，在所有正规刊物中，完全不提苏联对中共政策的决定性之影响。第二，认为张学良是因中共提出和平解决和释蒋，才导致西安事变的最终化解。第三，在张学良护送蒋回南京时，孙铭久得到卫士的报告，赶忙去找周恩来，这一突然的情况，使周恩来不禁吃了一惊，他们当

即乘车去追赶，但赶到机场时，飞机已起飞了。（注三六）

而历史学者司马长风在‘中国现代史纲’一书谈到中共对西安事变的立场，有三次不同的转变：

在西安事变前，中共与东北军统帅张学良，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已经协议休战，并缔有“张杨共三角联盟”。这个联盟的共同主张是反蒋抗日。当时以蒋为重心的国民政府，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微妙阶段，弱点是不能立时公开抗日，张学良突于十二月十一日午夜对蒋实行兵谏，并非预谋，而是临时决断，这由九日、十日，西安连续发生反蒋示威，张学良实暗中同情，遭蒋面斥，激起了张的冲动。中共事前并未预闻。十二日毛泽东在保安接获张的电报，初犹惊疑不定，继而大喜过望，据张国焘‘我的回忆’说，毛在覆电中曾主张杀蒋：“诚如来电所云，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中共对蒋氏的立场，乃由反蒋抗日，转变为杀蒋抗日了。因十三日深夜接获上海宋庆龄转来的史达林电报，痛斥西安事变乃“日本间谍所为”，要求中共释蒋，并还要获得蒋的谅解。史达林所以这样要求，因苏俄当时正处于德义及日本腹背受敌的困境，极需中国有人领导抗日。而当时除蒋以外，再无统摄全局的人物。促成释放蒋氏不难，要获得蒋的谅解，便难如登天了。可是精于外交艺术的周恩来，竟举重若轻，完满达成了。二十三日周蒋晤谈，二十五日蒋即离西安回到洛阳。蒋氏获释之后，国共两党即开始进行谈判，中共红军静候收编，拥护蒋氏领导全国抗日。这里所说“拥蒋”当然属于策略性。综计西安事变前后，中共立场三变：即由反蒋、杀蒋、释蒋转为拥蒋。（注三七）

总上所述，无论是右派或左派史家对西安事变皆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而各种不同的说法，都离不开一个复杂的因素，而这个复杂的因素则包括有间接性的与直接性的原因。（注三八）诚如前立法院院长刘健群云：

真要全盘了解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不是容易的事。身经其事的当事人，未必便是无所不知。从旁观察，更当然免不了见其偏而不见其全。谁也知道张学良不是一个无知识的粗人，其决心劫持国家领袖，也不是凭空忽然的冲动。其后翻然改图，护送领袖回京，束身自败，甘愿受罚认罪而无悔，更绝对不是轻率而未经深思的行动。单从表面上看，实在是有点滑稽而且近乎戏剧化。稍加思考，此中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当然不很单纯。可以想像得到一定是辛酸苦辣，兼而有之。（注三九）

职是，西安事变其所产生之结果，是否即如现代史家所言那般直接与明析，有必要再作深入研究，兹先自探求中共如何曲解西安事变并加以驳正其谬论，以为研究之始。

参、对中共曲解西安事变之驳正

中共史家曲解西安事变主要有释放蒋委员长是有条件的，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得之于中共之力，西安事变完全为中共所为，与张学良杨虎城无关。（注四○）

事实上，中共史家的叙述是与史实相违背的，首先从西安事变的经过看来，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十二月，正当共军准备分散游击，亦即四散逃窜期间，突然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关于这一事变的经过，蒋中正先生的‘苏俄在中国’曾作如下的记述：

————《苏俄在中国》“西安事变”全段节录始————

第一篇第三章第十节西安事变

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我对于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民国二十三年底，五次围剿初告成功，中央即指派陈立夫担当这一政治任务。

民国二十年，中共特务工作领导人顾顺章向我政府自首，因而共匪在京沪的所有机关和组织，先后被我们完全扑灭。他们的所谓“中央委员会”亦整个瓦解，而不得不移至赣南匪区，重新组织。到了二十四年的秋季，陈立夫向我报告，周恩来在香港与我驻香港负责人曾养甫，经由友人介绍见面，希望我政府指派代表与他们进行商谈，而且他们只要求从速停战，一致抗日，并无其他条件。周恩来又于九月一日致函陈果夫及立夫，申明中共要求停战抗日的立场。

二十五年五月五日，中共发出“停战议和”通电。随即由周恩来代表中共，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到上海与张冲会商。当时我得到这个报告，对于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一节甚为怀疑。但据立夫考验后，知道潘持有他与共产国际通电的密码，及其来往电报无误。我认为此事真伪虚实，对本案不甚重要，故亦未再追问。潘汉年乃即到南京与陈立夫谈判。政府对中共所提的条件为下列四点：

一、遵奉三民主义；

二、服从蒋委员长指挥；

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

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

经过了长时间的谈判，最后他们终于接受这四项原则。一切条件大抵都达到协议，只待我回京后作最后之核示。

在这同一时期，共党在各省亦开始发动其“和平”宣传攻势，而以陕西为其第一目标，并对张学良与杨虎城积极勾结。而且张学良所部的东北军中，发现其“抗日不剿共”的宣传品，并有张杨皆与共党已发生直接关系的情报，所以他们在西安竭力掩护共党分子及其外卫组织的活动，于是“第三党”与“救国会”公开作反动宣传，亦毫无顾忌。这一事态的发展，如不设法防止，势将演成叛乱。我乃亲往西安坐镇，并准备在年终召集一般将领开会，宣布中央对剿共与抗日的方针，说明共党和平攻势，及其所谓“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口号的作用所在，使之不为共党煽惑。就在这个时候，即十二月十二日，我在西安忽被张学良和杨虎城以暴力劫持。我当时就断定这是张杨二逆受共匪欺诈，甘心被其利用，不惜予国家以致命的一击。所以张学良前来见我时，我就简单明了的训斥他说：“无论其为个人利害，或国家安危，只有立即彻悟痛悔，送我会京，勿再自投魔鬼共匪的陷阱，及今悔悟，尚未为晚。”他在这样情势之下，就不敢提出其所预定的八项条件，只说内容复杂，没有如我所说的那样简单，反要求我先行息怒，容他尽言。我就斥止他，不许其提任何政治有关的事。直至第三日，他才含糊其词，半劝半求说出他们所共同议决的八项条件，并说只要我应允签一个字，他就立刻亲自送我回京。（注）我乃对他说，无论你说得任何动听的请求，在你西安劫持威胁之下，绝无商讨余地。但是我也知道，即使张等有悔悟之意，而其主谋之共匪，必认为千载一时的良机，也就是他匪党的一个生死关头，非迫我接受他的条件，即必制我的死命。我在此时，只有下定舍生取义的决心，对叛徒始终拒绝与他们商谈任何政治条件。国民政府亦不理张杨的荒谬要求，立即下命讨伐。

二十二日，蒋夫人突然来到西安，我见面第一句话告诉他说：“十日来叛徒每日用各种手段，只要求我在其条件上签字，就可以送我回京。你来共患难，是为公而非为私，一切须以国家为重。如有叛徒以任何条件，托为转劝，必严厉拒绝。我们宁死，亦不可答应。”蒋夫人此行下了决心，他回答我道，他重视我的人格，甚于我的生命，他决不劝我有违背素志的行为，他只愿与我同生死。过了三天，到了圣诞节二十五日下午，我们终于无条件脱险回京。

但是这件震动世界的事变之真相，到了事后才得完全明了。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为张学良的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且其事前，并未与共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不过当时张学良与共党直接的接触，已有半年之久，故共党与张之关系，亦自到了相当程度，又因为他们在西安勾搭，恐易被我中央发觉，故张与共党的秘密接洽，乃在陕北的延安举行（当时延安守军还是张的所部）。

我记得当时有一位报馆主笔，亦是我们辛亥前的革命老同志张季鸾，来华清池见我，谈及陕北共党勾结东北军的不稳消息，他认为这恐是共产党使用反间的一种手段，须加注意。我就对他说：“你是陕北人，关于你家乡问题，自必格外关切，请问你们在延安的记者，最近有什么重要消息么？”他说，谣言很多，但是他不相信这些无稽之谈。其他就吞吐其辞，欲说复止，他只说这些谎言，不要说他，自然会止息的。我乃自动的问他说，“你所谓谣言，是否亦听到了张汉卿与共产党在延安面商拥护中央，一致抗日的消息么？”他忽现惊骇之色，但是他很直率的答道：“是的”。接着他又说，他不相信这个消息会是真的，他且对我分析的说：如其他们是真是拥护中央，一致抗日的话，那张汉卿必会坦率的报告中央，决不会越过了中央，与共党私自勾结。所以他认为这个谣言，至少亦是共党的反间阴谋作用，然而最近谣言太多，亦不能不小心防范。我听到他这番话，更觉此事严重了。他乃又继续的谈下去说：目前倒是另有一种情势，不能不特别注意的。就是西安社会上弥漫着“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空气。他此次来西安视察已有十日，感觉这个问题严重，比其他一切问题更为紧要。他就问我对于这个“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意见如何？我对他说：“一致抗日，是中央一贯的政策，而且亦是去年江西剿共完成以后，既定的方针。但是大家应知共党的用意，其目的并不在“一致抗日”，而是以“停止剿共”为其唯一目的，而其所谓“一致抗日”，不过是其过渡的手段而已。所以今日吾人不能不加以研究的，就是如何乃可使共党真能一致抗日的问题。你们报馆主笔，应该将这个意思彻底阐明给一般社会了解。”他说可否将你的意思，先告诉他在西安的一般朋友呢？我答道：“当然是可以的，而且我亦就要在本月中旬召开高级将领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后来西安事变发生时候，大公报在西安上空所散发劝告张杨与东北军的传单，其大意就是当时我在华清池与张季鸾谈话的要领。这是在西安事变约一星期以前的事。现在回忆，更增感慨。

至于其在事变以前，对张杨作反动宣传，进行策反工作的，亦并不是共党，而是其共党的外围组织，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所谓“第三党”与“救国会”以及所谓“学生联合会”等中立份子。可是这些中立份子，确实不是共产党员，而共产党亦不要他们加入其组织，取得党籍，只要他们采取中立态度，或以第三党名义发言就够了。正因为他们不是共产党，所以都能够明目张胆的在西安散播谣诼，煽惑军民，并对张学良及其部下，竭力施展其包围挑拨的伎俩，发动其攻心战术，时时予张以不断的刺激，最后张学良卒以其“剿共”与“抗日”的矛盾心理弱点，竟被他们攻心战术所突破。但张学良并不承认他被共党所煽动，而其初意，是他抗日复仇的心切，乃想利用共党力量来一致抗日。从张学良自述其事变以前的经过，分析他被共匪诱惑生效的原因，并不是共党有什么真正伎俩，而其根本还是在我们内部有了矛盾，自己心理发生动摇，所以他共党才得乘机而入，针对我们的矛盾与弱点，来尽量扩大为其利用而已。他又自述其从二十余岁起，单当方面军任务以后，参加内战，已是不少，乃用他自身过去的经历，来判断其利用共党抗日的看法。例如于学忠原系与他敌对作战的，但由他收编以后，乃成为他忠实的部下；宋哲元亦是同他对战很久的敌人，后来和谈后，就成为他的良友；而且他自己对我中央国民革命军亦曾对抗作战的敌人，但一旦为了国家的统一，归向中央，他本人就是很忠诚的服从中央，完成了统一。因之，他认为与共匪停战以后，亦必如过去各种内战情形一样，他总觉得共党亦是中国人，今日在某一问题上，虽已成为敌人，但明日在某一目标下，亦尽可为良友。他且说这种错误心理，不只其一人如此，恐怕过去好些将领，犯了这个错误的人，亦不在少数。他又接下去说，当时对共党实无深刻的研究，只认他们所说“停战抗日”是出于一片爱国的诚意，那里知道对共党根本上认识已错，自然亦就拟于不伦，所以其他一切推断，亦就大错特错了。

最后据张学良又自述其在事变期间的心境，最初发生事变之后二日内，与我数次谈话所得的结果，及见我的态度与决心，无法转移，自知其预定的计划已无实现希望，其内部亦发生问题，并不如其在事前所想像那样容易；而当时特别增加他刺激的，就是他接到南京下令讨伐的电报，更觉情势险恶，已成为不可收拾之局。乃于第三日才决心派机接共党代表来西安，商讨合作，参加他们所谓东北军、西北军（杨虎成）与共产军三位一体的军事委员会。至此西安事变乃就完全变了质，而其中共本身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其外围组织的中立主义活动，互相策应，乃构成其所谓“一面联合，一面斗争”的作战方式，来达到其对张杨所预期的目的。

（注）张杨通电所提的八项条件，就是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救国会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六）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这八项条件显然就是当时共匪及其同路人的政治口号。其实质的意义就是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剿共军事，放任共党及其外围团体的活动，采取联俄容共政策，召开所谓党派会议，改组国民政府为联合政府。

其次从西安事变中共之关系观之，诚然，西安事变的主动者为张学良、杨虎城，事前并未与共党有任何商量，即共党在事前毫无所悉。但张杨之反抗中央与发动事变，则系受中共统战的流毒与影响，这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上，中共自执行统战策略开始，即处心积虑的进行瓦解国军的工作，在陕北，以东北军为主要对象；中共认为东北军入关后，背井离乡，家仇国恨，满怀抗日复土情绪，最易挑拨煽动，接受抗日统战政策；因而中共中央通过十二月决议之后，即于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一月成立白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张浩（林毓英）分任正副书记，民国二十五年五月，共军窜扰晋西失败后，复成立北线白军工作委员会，派蔡干任书记，全力对东北军进行策反工作，其所采步骤，主要为开办俘虏训练班，将被俘之东北军军官加以训练说服，然后再派返东北军，替共党担负统战策反工作。

郭华伦先生在‘中共史论’一书，引述陈然转据蔡干先生告称：

一九三五年九月底，共军在陕北甘泉之劳山及榆林桥击溃东北军一一○师与一○七师，击毙一一○师师长何立中，俘虏东北军官兵三千余人，其中有一○七师团长高福源，他曾任张学良的警卫营营长。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下旬，共军在直罗镇击溃东北军一○九师，师长牛元峰被俘。这两仗所俘东北军军官，成为中共俘虏训练班的主要成员；中共对这些被俘军官做了许多宣传说服工作，当这些被俘军官训练成熟准备释放时，毛泽东曾先后和高福元、牛元峰谈话，要他们返回东北军后，向张学良转达中共抗日统战政策，希望东北军与共军并肩作战，共同抗日。（注四二）

在共党的统战攻势下，张学良终于跌进了共党的陷阱。中共对蒋氏的立场。乃由反蒋抗日，转变为杀蒋抗日了（注四三）

郭华伦先生引述共产国际影响中共最后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之例证说：

第三天（十二月十四日）深夜，莫斯科共产国际的电令到了，电文中批评中共对西安事变所持的报复主义与内战方针的错误，指斥这一方针正符合日本军阀和中国亲日派的愿望，对中共与苏联都是不利的，且违背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要求中共中央即刻改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据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涂振农说，中共中央各负责人，对于共产国际指示电有两派不同的意见，以张闻天、秦邦宪为首的国际派，力主完全接受国际的指示，即刻改变方针，发表和平通电，派出和谈代表；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派则认为南京政府在军事上已积极部署，准备进攻张、杨，和平解决恐不可能，必须采取两套办法，一面执行国际指示，一面在军事上积极行动支援张、杨。因此，除原定派赴西安之代表团以国际指示为依据，执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方针外，并在军事上把红军主力即刻开赴三原、咸阳、西安一线，配合张、杨部队向潼关进发，另派红十五军团经咸阳出商县，作翼侧防御。（注四四）

到了十二月二十五日，蒋委员长之飞离西安，以及张学良之随行，完全出乎中共代表团的预料。据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说：

中共原定步骤是召开和平会议，讨论国策与蒋委员长之处置问题，殊不知张学良因受感召悔悟，竟突然释放蒋委员长，并亲自随行护送；当周恩来、叶剑英闻讯赶至飞机场时，已经无法制止亦无法挽救了。（注四五）

另王建民先生在其‘中国共产党史稿’一书对西安事变之说法，也可导正中共史家的论调，首先对于蒋委员长脱险，有无条件交换之说法，王建民先生认为：

根据‘西安半月记’及‘西安事变回忆录’所载，此次蒋委员长脱险原为无条件的。而解放日报二十七日记载竟谓委员长接受其条件，并谓起飞之前，委员长示杨虎城以六项允诺。另据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冀中日报所载申伯纯“回忆双十二”一文，谓委员长所示者为四条，前后两歧，各条内容，除将西北交张、杨负责一条外，亦全不相同，不足采信。申伯纯者，据冀中日报载，原任杨虎城十七路军政治处长，抗战后任中共之八路军总部秘书及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议长，显为共党份子，于西安事变时已潜伏虎城军中矣。（注四六）

其次王建民也举了‘苏俄在中国’一书之记载，说：“西安事变发生，举国几无不以为中共参与其事，事后证明，此事完全为张、杨所为，与中共无关。”（注四七）中共史家往往宣称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实中共之力，而对史达林之指示，往往只字不提，让人觉得中共有邀功之嫌。王建民先生对当时史大林对西安事变之态度也引述‘消息报’及‘真理报’社论，来证明共产国际对中共之影响力。当事变消息传至莫斯科时，当日消息报社论称：

西安叛乱，不论以任何口号方案为藉口，这一行动……代表一项危机，不仅危害南京政府，而且危害整个中国。张学良虽高举抗日旗帜，其行动显然只与日本帝国主义有利。只要南京政府推行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政策，抗日的统一人民阵线便不应反对南京，而应与南京合作。（注四八）

当日真理报社论称：

日本军部正确计算到；中国以蒋介石政府为中心的团结进展，实为其论中国为殖民地计划的致命危机。这便是他们怂恿中国将领反对南京政府的理由，在必要时并且不惜使用抗日的口号。（注四九）

在张学良为中共之统一战线效劳，在中共领袖阶层感情冲动之际，而史大林之言论机关居然指之为受日人怂恿，此对于西安事变真有釜底抽薪作用。史大林所以要求中共释蒋，是因苏联当时正处于德义及日本腹背受敌的困境，极需中国有人领导抗日。而当时除蒋以外，再无统摄全局的人物。

肆、小结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天翻地覆的巨变。是时国家正处多难之秋，内乱频繁，学潮迭起，尤其是日本军阀，欲图在我国力未茁壮之前先征服之，自九一八沈阳事变以来，强占我东三省，复向关内华北进攻不已，凡有血性之炎黄世胄，无不悲愤填膺，充满“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激动情绪。加以面临殄灭之共产党，为了转移被追剿的困境，解除其覆灭之命运，于是要求全面抗日，在全国各地，以“抗日救国”、“停止内战”等口号，尽力鼓动风潮，并以“打回老家去”，动摇了东北军之剿共信念。民国以来，频年内乱，干戈日滋，国库为虚，先总统蒋公深知对日战争一旦全面爆发，必将抗战到底，庞大之师旅战费难筹，且对日寇之图谋，与敌我双方之实力，至为了解。为免一时感情冲动，陷国家前途于危境，故一再宣示“和平未至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注五○）之决心，其目的即在争取时间，充实抗日战力。所不幸者，蒋公这种忍辱负重，深思熟虑之苦心，既不便于口说，亦显然未得一般热血沸腾之群众、慷慨激昂之舆情所谅解。

张学良朝夕面对着一群思家情切，满腔救国热忱，而对国策全然不解之东北少壮军人（事实上张本人在未阅读蒋委员长日记前，亦未明了中央抗日之决心），在共产党联合抗日，打回老家去的美言蛊惑下，情感上实在很难控制。而一些或为个人出路，或被共产党所利用的知识份子，不断对国策发表其似是而非的危言深论，张又遭逢各种错综复杂之恶缘，与一些人谋不臧之误会，遂终致激荡成此一不幸事件。兹引傅斯年先生在“西安事变之教训”一文中的一段话，作为结语，傅先生说：

近些年来（指西安事变时）地方上的政治远赶不上中央政治之改进，也是西安事变中痛切暴露在外的事情。秦始皇以来，封建是早该绝除的东西，偏在乱世一次一次的重现。在革命的军政时代，每每才下一省，便是某一军的地盘，若干大纠纷即由此起。总而言之，这样变形的封建制不除，中国政治永远不能上轨道的。以西北局面之重要而托之于张、杨，究竟是因为他们人格忠良或才力弘大？人谓此辈之用或亦有其不得已，我们为国家的福利，决不能这样“不得已”。这将如何收拾西北局面，我不知晓，但我以为在这样的外患迫切之下，军队必须是国家的军队，才有用处，否则只是我们对外作战的障碍。至于他们抗敌的口号，参看一下他们过去及现在的行为，尤其不值一笑了。诚然，政治要宽大，但是纪律决无所谓宽大。纪律愈严峻，政治愈宽大，因为可少所防备。纪律一有松，政治必宽大不成的，因为不能不有所顾忌。所以还是趁这次大变，一改若干年来政治紧而纪律松的习惯，务必以后再不“封建”了，使得我国的政治正轨化、近代化吧！（注五一）

五十多年后的今日，张学良欢度九十大寿的生日，面对国人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在有生之年盼能为人民、为国家，贡献心力”。（注五二）相信西安事变的真相，将随着史家的继续研究及张氏本人提供的第一手史料，有拨云见日的一天，而不是隔靴搔痒之言！

注二九：萧良章，“西安事变原因之研究”，‘国史馆馆刊’复刊第二期（民国七十六年六月出版），页一○一，转引自蒋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注三十：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南京中央的重要人物，在思想上似乎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是熟读明史，知土木堡之变失君得君的利弊得失的人，他们主张立刻正名讨逆，临之以威，才可以达到营救蒋委员长出险的目的。另一方面，有若干人却认为蒋委员长既已被人劫持，当尽力婉商，以策安全。深恐激怒张氏，使蒋委员长的生命更陷于危险。

注三一：尔朱荣，后魏秀容人，明帝时以讨贼有功，授六州大都督。会灵太后毒明帝，立幼主钊，荣统兵入洛阳，以靖内乱为名，杀灵太后及幼主钊与王公以下二千余人，功至大丞相、天柱大将军。后阴有异志，入谒时帝亲刺杀之。

注三二：傅斯年，“西安事变之教训”，（民国二十六年二月），此引自李云汉着‘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近代中国出版社出版），附录，页三五三。

注三三：同注一，引自蒋中正，“西安事变对张杨训词”（蒋宋美龄笔记）。

注三四：同注一。

注三五：杨漫克，“专访朱永德教授：西安事变纵横谈”（‘中国之春’，总第四十四期，一九八七年二月出版），页三七～～三八。

注三六：同注七，页三九。

（注七：同注六：王健民着‘中国共产党史稿’台北，民国五十四年出版。）

注三七：司马长风，‘中国现代史纲’（香港：波文书局，民国七十七年七月增订版），页二六九～～二七○。

注三八：同注一，萧良章，“西安事变原因之研究”一文中举出事变之间接原因有全国性者：战祸连年，农村破产。安内攘外孰先问题。与东北军或张学良有关者：父仇不共戴天，毅然归顺中央。中原大战，进占平津。沈阳、热河失守遭谤。不愿统兵剿共，幻想联合抗日。东北沦陷，东北军减俸。政府疏于防范：蒋委员长自认之疏忽及孔祥熙之劝告。西安流传之不当言论。其次事变之直接原因，有内在原因：西北剿匪总部人事不调。东北军阵亡将领抚恤问题。东北军未获补给。双十节张未受勋。定张为抗日后备长。洛阳进言，未蒙采纳。西安会议与撤换张学良，改编东北军之谣。外在原因：阎锡山之言辞费揣摩。共产党之蛊惑离间。杨虎城献策挟天子以令诸侯。

注三九：同注一，引自刘健群，“窥测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传记文学’第九卷、第三期）页一○二。

注四○：李新，“西安事变初探”（‘历史研究’，第十一期，民国六十八年〔一九七九〕十一月十五日出版），页一七～～三五。

注四一：郭华伦，‘中共史论’第三册（台北：政大国际关系研究所、东亚所印行，民国六十二年六月增订版），页一六五～～一六八。

注四二：同注一三，页一六九～～一七○。

（注一三，同注四：郭华伦，‘中共史论’第二册。）

注四三：同注九，页二六九。

（注九，李云汉，“上海中央与北伐清党”（台北，‘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民国七十七年八月十三日、十四日），页一～～二六。）

注四四：同注一三，页一七○～～一七一。

注四五：同注一三，页一七一。

注四六：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民国七十七年二月出版），页九七～～一○○。

注四七：同注一八，页一○○。

注四八：同注一八，页九九。

注四九：同注一八，页九九。

（注一八：同注一四。注一四：张玉法，‘中国现代史’（台北：东华书局出版，民国六十六年七月初版））

注五○：同注一，页一三○～～一三一。

注五一：同注一，页一三一。

注五二：民国七十九年六月一日张学良九十大寿生日，向新闻界公开露面之谈话。

□□□□□□□□□□□□□□□□□□□□□□□□

下面留录“西安事变”策动者张学良、杨虎城之声明，以求各方论点之完备。

《蒋氏家族全传》上下两册朱小平等编著北平，中国文史出版社民国八十六年二月第一版下册，第五六二至五六五页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变乱，劫持前往西安巡视的蒋中正委员长。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张学良、杨虎城发表“告东北军、西北军将士书”如下：

双十二抗日救国运动，酝酿了许久，现在已经揭开七八天了。我们为什么发动这样的运动？为争地盘吗？不是。为泄愤吗？也不是。我们反对政府的屈辱外交，国家都要亡了，还在这里出死力相残杀。所以才提出抗日救国运动八项主张。我们主张的核心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

也许有人在那里怀疑绥远军队已经在那里抗日了，听说也有些中央军队在那里参加，很是胜利。可见中央已在那里抗日，为什么还要我们这样发动？不！不！事实绝不是这样简单。中央军是摆在晋军与绥军中间，而且只有两师。阎副委员长所要求的二十万大军援绥，中央答复无法抽调。然而到西北打红军的内战却源源来了几十万大军。由这样的事实，他们所说抗日，不过是欺骗民众的一种办法，绝对没有真正抗日的决心，这不是很清楚吗？

双十二运动发生的一天，中央飞机数十架一齐发动到西安了侦察，而在绥远的抗日血战中，中国飞机却半架也没有。据他们说是因为天气太冷，飞机发动不容易，但敌人的飞机怎么能发动呢？也许我们的飞机不好，那我们为什么必要买那样不好的飞机呢？而且到寒冷和绥远差不多的西北的飞机怎么就能发动使用呢？这种欺骗情形，凡是有知识有眼睛的人，谁看不清楚。我们全是中国人，谁不知飞机献寿为的是抗日。因为有抗日作目标，群众才那样的热烈。而现在我们有飞机却不去对外，使我们的抗日战士无可奈何地受着敌人飞机的时时轰炸。这是抗日吗？这是真心抗日吗？如果这样就算抗日，试问我们的东北四省、我们的察北六县、我们的冀东二十二县，什么时候才能收复回来？这是敷衍欺骗的抗日，绝对不是我们要求的彻底抗日。

也许还有人相信抗日的“准备论”，这更是大错。我们不要把日本当傻瓜，认为我们会准备人家不会准备。老实说，我们准备得还不到五分，人家已经准备到十分了，试问这样准备有什么用呢？这岂不是等人家准备好了来整个吞并我们中国吗？再说，人家也绝对不许可我们准备，在我们准备过程中，人家已经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各种各样的锁枷把我们束缚得死紧，教我们动不得身、抬不得头。试问我们又如何能够准备起来？这不是梦想吗？

我们因为不信任变相汉奸的、至少也是犯恐日病的抗日准备论，我们因为看破了南京抗日是欺骗，至少也是敷衍民众的一种手段，所以才以极大的热诚劝蒋委员长变更他的错误政策。但我们大胆的赤诚劝谏，都一次一次的失败了。我们为服从全国潜在大多数民意，我们为贯彻我们的也是全民的抗日救国主张，所以才有这一次双十二事件的发动。

我们的希望，只是集合全国的力量去抗日救国，是绝对纯洁的，是绝对发自内心的，无一毫私心，无一点背景。凡是同情我们主张的，不管他是哪党哪派我们均愿意谒诚欢迎。我们的目的在对外，绝对不造成内战，并且极力避免内战。但是如果有违反民意的汉奸，用武力压迫我们，使我们不得贯彻主张，那我们为扫除误国误民的分子，争取民族的最后生存，当然我们要起而自卫，并且要粉碎这种恶势力。这不是我们造成内战，而是实行抗日救国的清道工作。

亲爱的将士们！事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国家，已到了生死关头，真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我们必须巩固我们抗日救国的战线，去与一切破坏我们的恶势力相拼，方能实现我们的主张，才能收复我们的失地，才能湔雪我们的一切国耻。这是我们由理论而实行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团结，我们需要奋斗，我们必须不辞一切光荣胜利的牺牲。我们的基础是民众，必须用尽我们的智慧爱护他们。我们所要贯彻的是我们的主张，所以必须确信我们的基本理论。我们需要以不顾一切的精神来冲破我们的一切困难，这才是我们抗日救国战线上忠实同志所必要的精神和勇气。

亲爱的将士们！我们热血沸腾的将士们，我们一定要不辞一切艰险牺牲，去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去达到我们最后的胜利。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张学良、杨虎城发表“告东北军、西北军将士书”结束。

□□□□□□□□□□□□□□□□□□□□□□□□□□□□□□

由我手边的参考书另外找到一些与“西安事变”有关的文献，留录于此，供读者参考。

《蒋介石和他的密友与政敌》上卷王朝柱着北平，中国青年出版社民国八十四年七月第一版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清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劫持蒋中正委员长。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傍晚张学良、杨虎城致国民政府电报：（第四○八至四○九页）

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暨各院、部会勋鉴，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均鉴：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骤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石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石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符命之至。

张学良、杨虎城。

□□□□□□□□□□□□□□□□□□□□□□□□□

由《蒋总统秘录》第十册第一七三页，可以推算出在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张学良致电蒋夫人，其内容参考《蒋介石和他的密友与政敌》上卷，第四一七页如下：

蒋夫人赐鉴：

学良对国是主张，当在洞鉴之中。不意介公为奸邪所误，违背全国公意，一意孤行，致全国之人力、财力，尽消耗于对内战争，置国家民族生存于不顾。学良以待罪之身，海外归来，屡尽谏诤，率东北流亡子弟含泪剿共者，原冀以血诚促其觉悟。此次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介公以国家最高领袖，当有以慰全国殷殷之望，乃自到西北以来，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青年救国运动反横加摧残。伏思为国家、为民族生存计，不忍以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大义当前，学良不忍以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妥为保护，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学良平生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曰。敬请夫人放心，如欲来陕，尤所欢迎，此间一切主张，元已文电奉闻。挥泪陈词，伫候明教。张学良叩。文。

□□□□□□□□□□□□□□□□□□□□□□□□□

《蒋介石和他的密友与政敌》上卷，第四一八页底有一句：“她（蒋夫人）当即给张学良发去如下一则电文：”所以推算在日期上为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蒋夫人致电张学良，其内容参考《蒋介石和他的密友与政敌》上卷，第四一九页如下：

西安张副司令汉卿兄勋鉴：奋密。

昨在沪上，惊悉西安兵变，即晚来京，接奉电文，深以为慰。吾兄肝胆照人，素所深佩，与介兄历共艰危，谊同手足。在沪未接电前，已知其必承吾兄维护，当决无他；来京获读尊电，具见爱友之赤诚，极为感慰。惟精诚团结，始足以御侮抗敌：沉着准备，乃足以制胜机先。介兄自九一八以来，居处不宁，全在于此。吾兄久共军机，素所深悉。凡吾兄有所建议，苟利国家，无不乐于采纳。介兄以地位关系，不得不加以慎重，藉避敌人耳目。吾兄贤明，当必深谅此意。我国为民主制，一切救国抗敌主张，当取公意。只要大多数认以为可，介兄个人，当亦从同。昨日之事，吾兄及所部将领，或激于一时之情感，别具苦衷，不妨与介公开诚协商，彼此相爱既深，当可无话不说。否则别生枝节，引起中外疑惧，不免为仇者所快，亲者所痛，想吾兄亦必计及于此。至如何安慰部曲消弥事端，极赖荩筹。介兄一切起居，诸祈照拂，并盼随时电示一切为荷。蒋宋美龄叩。元。

□□□□□□□□□□□□□□□□□□□□□□□□□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在“西安事变”被劫持期间，蒋总统写了一封“遗书”给蒋夫人，该“遗书”如下：

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对余妻，亦决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

□□□□□□□□□□□□□□□□□□□□□□□□□

第十三章：卢沟桥事变

主题

夜半枪声电令固守国土日决扩大战火最后关头演说步步留神宋哲元下定决心平津沦陷宣布抗战到底八一四空战上海血战八百壮士南京沦陷各国作壁上观苏联背弃约定唤起国际舆论日拒绝国际会商英德从中调停日提苛刻要求我坚拒日方条件日本自陷绝境共党攫取机会共党“一分抗日”平型关之役真相共产国际的操纵共党的渗透

夜半枪声

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深夜。

在盛暑的季候里，北平市长秦德纯沐浴之后，穿上一件短衫，当即将就寝之前的片刻，静静地堕入沉思。

突然，电话响了起来，时钟指着十一时四十分。

电话是由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宗瀚和专员林耕宇所打来：

“刚才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来说：在卢沟桥附近演习中的日军某中队，受到中国军的射击，日军一名，去向不明；日本军官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检查。”

这就是迫使中国八年对日抗战的“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之第一个报告。

此时，刚好华北的负责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离开北平，由秦德纯奉命代理其军政权责。

在稍经考虑之后，秦德纯这样地回答：

“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日本士兵失踪，我方不能负责，日军更不得进城检查；但考虑到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中国军警代为寻觅。”

吉星文团负责戍守

在北平前门外西方十五公里、横卧永定河上的卢沟桥，长二三五公尺，于一一九○年完工，马哥孛罗游记“东方见闻录”中曾经称赞它的壮观，是一座大理石砌成的名桥。乃由保定北上北平的交通孔道，当时由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戍守。

桥北的荒郊，就是日本军队每隔一天举行一次夜间演习的地方。在这一天夜间演习的日军“支那驻屯军”第一联队（团）三大队（营）八中队（中队长清水节郎），隶属于在上年（一九三六年）九月“第二次丰台事件”之后进驻靠近宛平城的丰台之日军部队。

这一天的夜间演习，和一向的情况大不相同。盖日军的目的是在向中国挑衅，所谓“一名士兵失踪”，根本只是出于捏造作为武力攻击的藉口。

据日本方面说法——在当天夜晚十点半左右，受到来自龙王庙方面数发、堤防方面十数发的枪击，遂即集合点名，察觉有骑兵斥候一名失踪，乃立即请求驻丰台的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出动主力部队。然而，实则这个所谓失踪的士兵则是因解手而离队，二十分钟之后便已经回到队上，但日军却隐瞒着这个事实，坚持非进入宛平城内不可，以造成开火的藉口。

排长祁国轩叙述

关于最初枪声的情况，直到今天都还是一个迷团。

据清水节郎亲自的记述，当时根据“直感”，枪声是实弹射击，但未曾目击发射闪光，并且没有提到是出于中国军所发射。

另一方面，当年守卫卢沟桥而驻屯在该桥北端路边白衣庵的中国军排长祁国轩向笔者（古屋奎二）谈称：

“那天夜晚，时时听到日军的枪声，并没有听到中国军的枪声。日本枪的声音‘噗通！噗通！’比较低沉；中国枪‘卡科！卡科！’（据日文音译）响声激越。——两者不同，谁都能够听得出来。

“不过，那些枪声，是朝天发射的声音，和水平射击不同，听惯了的人也能辨别，所以我们很放心，就像没有听到一样。

“到了晚上十点稍前，没有脱卸军服，正想和衣而睡，来了一个日军使者，用中国话发问：‘有我们的人来过这里吗？’答说：‘没有！’那人便回去了。可是在这个时候，日

军对我们所驻守的这个小庙已经作了能够攻击的部署。

“当夜，日军的演习和平时显然不同。--在演习中，日本兵一接近中国军的岗哨时，中国方面便喊出口令（当夜的口令是‘国家’），平时，日本兵必然会闻声退走；可是，在这天夜里他们却答称：‘日本人’！毫不在乎地走进我们的阵地。看这个光景，实在是非比寻常。”

还有，“第一枪”由哪一方面射出？有人推测是共产党的便衣队所发，藉以肇生事端；但祁国轩说：“共军的枪声又是一种声音，马上就会听得出来，当时不像那样的声音。”

八日午前二时（七日深夜），松井再度要求进入宛平城内检查，并表示：“如不接受，日军便包围宛平县城。”秦德纯为避免武力冲突，乃派宛平县长王冷斋及魏宗瀚等人在北平和松井交涉。

此时，松井才说出失踪列兵业已归队，但却又提出新的要求：“有查明失踪情况的必要，望双方会同调查。”王冷斋反诘一句：“是怎样失踪的，只要问那个失踪的兵本人不就可以了吗？”但因松井坚持，乃同意会同调查。

会同担任调查的人员，中国方面为王冷斋、林耕宇等三人，日本方面为北平特务机关顾问樱井德太郎等二人，双方合计五人。

当王冷斋和林耕宇为了调查正准备由北平返回宛平县城之际，日军“支那驻屯军”第一联队长牟田口廉也突然邀他们前往一谈。于是，王林两人便去到日本军营，牟田口对王冷斋说：“你有没有处理问题的全权？”

这种说法，令人很难理解。盖失踪列兵业经归队，在这个阶段，已没有必须处理的问题存在。

附注：“卢沟桥”一般通称为“芦沟桥”，本文系按照地方志的正式名称。

电令固守国土

当接到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再度要求检查之后，秦德纯和防守宛平县城的吉星文（二一九团）及拱卫北平一带的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兼任河北省主席）联络，告知加强戒备。

不久，北平和宛平之间的电话线便为日军所切断而不能通话。

八日午前三时半，在宛平城内的吉星文确实侦知日军有步兵四、五百人附山炮四门及机枪队由丰台向卢沟桥方面移动。

此外为会同调查而由北平回宛平的王冷斋也目击有三百人左右的日本军乘大卡车出动；又在宛平城东北沙岗附近遭遇到多数日军作伏射姿势。

秦纯德判断情况已经是进入了颇不简单的程度，乃立即命令吉星文：“应固守卢沟桥和宛平城。保卫国土是军人天职，宛平城与卢沟桥就是我军最光荣的坟墓。”同时指示：“但在日军未开枪之前，绝对不要射击；他们如果开火，便予以迎头痛击。”

凌晨四时四十五分，王冷斋回到宛平城内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同时乘另外一辆车出发的日方代表已在先到达，乃立即商量调查事宜。

而日军全面开火，就是在这个时候～～八日午前四时五十分。

中国军乃奋起应战，终于开始了正规的战斗。

据日本资料——在“列兵失踪事件”发生之后，驻屯丰台的日军第三大队长一木清直便与驻北平的第一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取得联络，遂即将留驻丰台的本队开往卢沟桥东方约一公里的一文字山，在午前一时许与清水节郎的第八中队汇合。牟田口的意向是要进占宛

平县城的东城门内，俾使在当地的交涉趋于有利的情势。

午前三时半左右，在卢沟桥北的龙王庙方面，发生三声枪响；接到电话报告的牟田口廉也于四时二十分下达“立即还击”的命令。于是，第三大队便在卢沟桥北面散开，进入攻击态势。

此时，由联队派来调查的森田彻中佐到达了一文字山，森田由于不晓得业已发出攻击命令，故而使攻击中止，于是第三大队乃于午前五时半停止前进，正当开始早餐之际，受到中国军的攻击，遂进入战斗状态。

宛平城内弹落如雨

日军当即集中进攻与卢沟桥架设在同一河流上的平汉铁路铁桥，展开了地面部队加上炮兵助阵的猛烈攻势；于是，龙王庙以及卢沟桥北侧的中国军阵地在受到了几乎全被摧毁的损害之后，被日军所占领。

宛平县城内，也是弹落如雨。

双方持续交战约一个小时。

于此同时，约有日军三百人由龙王庙渡过永定河，试图夺取对岸的长辛店；但中国军奋力反击，经过四小时战斗之后，遏阻住日军的攻势。

至此，战事暂停，两军一度在宛平城外进行交涉，但因日军坚持要求中国方面撤兵，以致决裂。

及至正午，日军方面续有联队规模的增援部队到来，有装甲车六辆援护，数度反覆突击，但仍被中国军一一击退。

下午五时，日军第一联队长牟田口廉也致信王冷斋、吉星文，要求——“限即日下午八时止，中国军撤退到永定河西岸，日军撤退到河东，否则就用大炮攻城。”

王冷斋予以拒绝，而等得不耐烦的日军便在六点钟对宛平城内再度开炮，专员公署及其他主要建筑物多被破坏，居民亦有死伤，情况已经进入最恶劣的程度。

入夜，中国军转守为攻，以两连步兵每人手持手枪和大刀并携带四个手榴弹，突袭铁桥附近日军阵地，将之歼灭。

在这一段时间，北平方面由秦纯德与松井太久郎进行交涉，及至八日深夜，达成了三项口头协议如左：

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

二、日军撤退丰台、中国军撤回卢沟桥以西地带。

三、宛平城内防务由中国的保安队担任，人数约二百名至三百名，于九日上午九时接防。

然而，这却是日军为了重整攻击部署并使中国军疏于防范的“缓兵之计”。

九日清晨六时，正当宛平城内中国军准备撤退之际，日军突然又对城内发动了大规模的炮轰。

这个攻击命令，是由日军旅团长河边正三所下达。因为当时日军“支那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正患重病（十六日死亡），由河边正三代行其指挥权，事变发生时，河边适出差在山海关，闻讯赶回北平，对于停战约定置之不理，立即发动攻击。

其后，两军虽曾暂时撤退到商定的停战线内，可是日军却在五里店和大井方面活动频繁，显见一触即发的情势继续存在。

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八日，蒋总统在卢山接到秦德纯等人关于卢沟桥事变之发生与经过的报告，当天的日记是这样的：

‘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成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

‘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这是在中日之间外交交涉停顿之际，加以更是在日军反覆举行挑衅性大演习之后的交战；是则对于全中国开始其正规军事侵略，已有极大的可能性。

蒋总统并在当天立即致电宋哲元，指示如次：

‘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日决扩大战火

为因应事变扩大，自不能不积极有所准备。

七月九日，蒋总统下令在四川的何应钦立即驰赴南京，着手编组部队，准备全面抗战。并且指示来在庐山的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火速下山，率领中央军两个师北上平汉铁路的保定或石家庄。此外，更令调山西太原、运城方面的部队向河北省石家庄集结。

同时，又命令各军事机关准备总动员，并加强各地戒备体制；至于对负责河北军事的宋哲元，更电令促其坚定决心及加强警戒如左：

‘守土应其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须防其奸狡之惯技，务须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

我采取军事紧急措施

十日，中国政府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日军是有计划的挑衅行为，极其不法”的书面抗议。同时，令所有军事机关活动都进入战时体制，并采取紧急措施如左：

一、编入战斗序列的部队——第一线为一百个师，预备军约八十个师，在七月底以前秘密组成大本营及各级司令部。

二、现有六个月用量的弹药，屯置长江以北三分之二，长江以南三分之一。又考虑到兵工厂万一被敌机轰炸，可向法国与比利时洽商购办，并确保经由香港或越南的输入路线。

三准备兵员一百万人、军马十万头的六个月粮秣。

在这个期间的华北当地，中日双方是在两军对峙敌视的状态之下进行交涉。

九日，日本“支那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由天津到达北平，和驻北平武官今井武夫等人一再洽商之后，于十日向秦德纯提出“第二十九军负责人道歉，中国方面撤兵”等内容的要求；接着，交涉中心移往天津，由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为中国军方代表继续交涉。张自忠正在病中（肠炎），卧于病榻之上折冲，结果，他未向中央请示便遽行于十一日下午八时与松井太久郎签署了如左的协议：

一、第二十九军代表向日方表示遗憾，并处分责任者，将来负责防止再发生类此事件。

二、和丰台日本驻军过于接近的宛平县城及龙王庙，不驻中国军队，改以保安队维持其治安。

三、彻底取缔抗日团体。

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对于这个协定已经予以同意；但中国政府方面则由外交部长王宠惠以备忘录一份通知驻南京的日本大使馆——“任何谅解或协定，未经中央核准者无效。”

此时，宋哲元由于还没有摸清楚东京方面已在进行着使日军扩大事变的动向，故而擅自同意成立协定。

日军方高唱强硬论

东京的日本陆军首脑部在事变之初，认定其为小规模的局部纷争，乃由参谋总长于八日晚间电令当地驻军——“防止事件扩大，避免进一步行使兵力。”

于是，当地日军于九日早晨举行的幕僚会议中也已经决定了“不扩大．就地解决”的方针。

可是关东军以及参谋本部第三课、陆军省军事课等部门则高唱强硬论，而陆相杉山元也在九日的内阁会议中要求：“由内地（日本国内）派遣三个师团前往增援”，不过，阁议则以“时间尚早”，未予通过。

陆军首脑部中，虽有“不扩大派”与“扩大派”的持续议论，但及至十日，得到中国军开始北上的情报，“不扩大派”因而屈服，而肯定了增援三个师团的方针。

七月十一日，在东京日本首相官邸举行五相会议，决定派遣内地三个师团，朝鲜一个师团、“满洲”两个旅团的兵力，并即下令朝鲜和“满洲”方面部队向华北出动。

日本政府意图扩大

当天傍晚，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如下：

“此次事件，完全出于支那方面计划性的武力抗日行为，已属无可置疑。因此，政府在本日之阁议中已下重大决心，关于对北支（华北）出兵，政府业已决定为其应行采取的必要措施。”

在发表此一声明的同时，并决定称此次事变为“北支事变”，公然表示出有在华北一带扩大战火的意图。

十二日，更任命香月清司中将接替卧病中的田代皖一郎为“支那驻屯军”司令官。同时，参谋本部也研订了“对支作战计划”。

日本政府在声明发表之后，传闻当地业已成立协定，于是，陆军首脑部乃决定将内地派兵一事暂延，以待尔后情况推移。可是，这个声明则对于军方的强硬论业已有所推进，同时也刺激了中国方面的感情。

‘倭关东军到津；内阁昨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对华政策，全国政党与产业界宣言拥护其阁议。以余观之，皆为其外强中干之表现；但战事势必扩大，不能不亟谋应付之方。’（七月十二日日记）

十四日，蒋总统接到外交部转据驻日大使馆报告日本国内显示有趋向扩大事变的动态如下：

“此次日本派兵，系以和中央军一战为目标。……舆论显见统制，平津消息，十九来自军部。其新闻记事，集中于国民政府态度与中央军北上；对地方成立之协定，则不予重视。……其政府意向，初不主张扩大，此次决定出兵，系受军部牵制，尤为受驻外军部牵引无疑。……十二日，外务省当局公言：今后为军人对军人交涉，非外交当局时期云云。”

最后关头演说

七月十四日（一九三七年）日军“支那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派该军参谋专田盛寿向冀察政务委员会强硬提出为解决事件的七项协定细目。

日提政治条件

其内容则一如中国方面之所预料——非仅止于军事的停战，而扩大到包括有政治性的条件在内：

一、彻底镇压共产党之策动。

二、罢黜排日之要人。

三、有排日色彩的中央系统机关应从冀察撤退。

四、排日团体如蓝衣社、ＣＣ团等，应撤离冀察。

五、取缔排日言论、宣传机关及学生与民众运动。

六、取缔学校与军队中的排日教育。

七、北平市之警备由保安队担任，中国军队撤出城外。

在此之先，蒋总统已于十三日致电在当地负责交涉的宋哲元予以指示：‘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与敌方以可乘之隙。’并命令其彻底抗战；可是，宋哲元虽然已到了这个阶段，还是执持希望“当地解决”，并让张自忠等人进行交涉。十九日，由张自忠签署了大致照日军要求内容的“协定细目”。

十一日的“停战协定”和十九日的“协定细目”，都未报经中央承认，而且连在当地的交涉原委，宋哲元也毫未向中央报告；地方当局像这样地擅自进行交涉，使后来的事态解决为之棘手。

致电宋秦提高警觉

七月十六日，蒋总统致电宋哲元和秦德纯，要他们冷静而严谨地面对现实，提高警觉，不要在对日交涉方面发生差错：

‘连日，对方（日本）盛传兄等已与日军签订协定，内容大致为——（一）道歉；（二）惩凶；（三）（卢沟桥）不驻兵；（四）防共及取缔排日等项。此种协定条款，殆已遍传欧美。综观现在情势，日本决以全力威胁地方签订此约为第一目的。但推其真意，签订协议为第一，俟大军调集后再谈政治条件。……今事决非如此易了，只要吾兄等能坚持到底，则成败利钝，中（蒋总统）愿独负其责也。如何？盼复。’

但却未见复电到来。

七月十八日，乃再电宋、秦二人促其警觉。

‘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当上海一二八之战，本于开战之前已签和解条约，乃于签字后八小时仍向我沪军进攻。此为实际之经验，特供参考，勿受其欺。’

宣布中国抗战决心

至此，必须认清当前的事态已经不是地方性的局部问题，而是涉及到中国主权和国土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问题。

对于日本、对于全中国的军民，现在都是到了必须宣示中华民国的决心的时候。

蒋总统的“最后关头”演说，也就是正式宣布中国抗战决心的“对于芦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就是发表于七月十九日。

这个文献，是于十七日在庐山谈话会演说“对于日本的一贯方针与立场”的笔记，中央隔了一天才公开发表的。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

‘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日本）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

‘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

‘今日的北平，如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

‘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

‘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方法。……

‘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

“人以为危，我以为安”

蒋总统于发表上述文件的这一天（十九日），在日记上留下感慨如左：

‘政府对和战表示决心，此其时矣！人以为危，我以为安。立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对倭最后之方剂，唯此一着耳！

‘书告既发，祇有一意应战，不再作回旋之想矣！’

步步留神

蒋总统于七月十九日发表的“最后关头”演说，也是为了要解决事变而向日本提出的最后忠告。现在继续引录于左:

‘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

‘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

‘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

‘如果对方（日本）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

日方“已有重大决意”

然而，日本方面，却正在窥伺着这个最后关头的到来。

就在同一天，外交部收到日本驻华大使馆送来一件照会，反而责难中国政府的态度是挑战的；并要求“中央政府对于华北地方当局解决条件之实行勿予妨碍。”外交部遂立即复文反驳：“我国政府愿经由外交途径与日本政府立即商议，俾得适当之解决。倘有地方性质可就地解决者，亦必经我国中央政府之许可。”

又在当天，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喜多诚一访谒军政部长何应钦，喜多以胁迫态度表示：此刻中国增派三○师、三九师、一○二师、一○师及其外军队共五、六个师，进入保定、石家庄，日本不能漠视。如中国方面不将新进入河北之军队撤退，则局势必急变，必致引起中、日军全面之冲突，此乃最后友谊的进言，并非威胁恫吓。

针对喜多的说法，何应钦立即予以驳斥：“中国军队之移动，全系出于自卫，日本新增加之军队如撤退，中国方面亦可考虑将新增加之军队撤退。事态之扩大与否，在日方；不在中国。”于是，喜多乃留下了几句疙瘩话而去：“日本对于此非常时局，已有重大决意。”

七月二十日，蒋总统由庐山回到南京，召集军、政负责人研讨对策。

同一天，日本驻华大使馆参事日高信六郎拜会外交部长王宠惠，反覆要求——（一）南京方面应承认在华北当地的一切协定。（二）立即停止煽动反日，并停止中央军北上。王宠惠则一再主张：任何协定都必须在事前得到中央的承认。中国政府绝无扩大事变的意图。

诚然，事态已相当复杂——中国政府业经表示决不容许日本扩大侵略，如果对方向天津北平出动军力，那就是意味着“最后关头”的到来。可是，在另一方面，虽然是未报经中央容许，但在当地的二十九军和日军之间已有“协定”及“协定细目”之存在，则是事实。

就该“协定细目”看来，在当地的军队不经战争便放弃平津的最后事态，也是会不难发生的。

急电宋哲元严防

七月二十二日，蒋总统急电宋哲元：

‘闻三十八师阵地已撤，北平诚内防御工事亦已撤除。如此，则倭寇待我北平城门通行照常后，彼必有进一步之要求，或竟一举而占我平城，思之危险万分。务望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算。与倭所商办法，究竟如何？盍不速告？俾便综核。’

但宋哲元的复电只是简单地陈述了十一日张自忠和松井太久郎的“协定”内容。

蒋总统乃在七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记述：

‘明轩（宋哲元）只报告十一日与倭方所协商之三条，而对十九日所订“细则”，尚讳莫如深，似以不加深究为宜，使其能负责也。’

当天，又对宋哲元发电如下：

‘中央对此次事件，自始即愿与兄同负责任。战则全战，和则全和，而在不损害领土主权范围之内，自无定须求战、不愿言和之理。所拟三条，倘兄已签字，中央尚可同意，与兄共负其责，惟原文内容甚空，第二条之不驻军（宛平县城、龙王庙），宜声明为临时办法，或至某时间为止，并不可限定兵数；第三条之彻底取缔（抗日团体）必以由我自动处理，不由彼方任意要求为限。此点应明加区别。

‘至此事件之真正结束，自应以彼方撤退阳（七）日后所增援部队为重要关键，务希特别注意。’

宋哲元下定决心

为了要将中央意旨传达给被日方要求“就地解决”所牵制的宋哲元，蒋总统特地派遣参谋次长熊斌秘密北上。

密晤熊斌体会中央意志

熊斌约了在天津的宋哲元于七月二十二日会晤于北平，向他剖析：为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千万不要被日军甘言所惑，必须坚持抗战信念。宋哲元这才逐渐体会到中央的坚定意志，而下定了抗战决心。

想以就地交涉获得既成事实，并积累起来扩张其华北势力的日军，就怕宋哲元和国民政府接触，以致增加他的勇气。

据“支那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回忆录——日军虽曾不让宋哲元离开天津，但宋于二十一日表示：“须赴北平一行，使部下遵守协定。”乃予以同意。在当时，香月如果晓得熊斌已衔蒋介石之命到了北平，就不会让宋哲元去了。

和熊斌晤谈之后的宋哲元，态度马上硬化，故而于二十一日开始自北平撤出的中国军第三十七师，便突然在二十三日停止。

至于日军方面，虽然在先所成立的“就地协定”中业已约定撤兵，但到了二十三日，不仅卢沟桥、宛平城东、大井村一带并未撤退，并且有些地方还在增兵和加强构筑阵地。

日军的作战部署，虽然保持高度秘密，但根据中国方面所获情报，得知有八个师团约十六万人已经在向平、津地区集结或在输送途中；满载战车、重武器、弹药等军需品的火车连日由山海关驶入河北省，继续西进。

‘日来运用军事与外交，费尽心力；而倭寇迫我形势之险恶，亦于昨今两日为甚——以彼恐我反对宋哲元所订条约而不肯撤兵耳。’（蒋总统七月二十四日日记）

根据日本资料——在这个时点的动员（第一次动员于七月十一日决定），为关东军一个旅团和在朝鲜的第二十师团以及航空队十八个中队，较诸中国方面所推断的八个师团差距颇大。又第二次动员（七月二十七日），则是由内地（日本本土）派遣三个师团。

二十四日，天津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要与香月清司见面，想询问日军撤兵情形，但香月则称病避不见面。

一再让步的当地中国军方面，至此也已经体察到过去所有的就地交涉没有起任何作用；而宋哲元对于日军徒托空言的所谓“当地解决”当然也不会不有所察觉。

为了对抗业已增强的日军，一度撤退的中国军也开始再行进驻于阵地。又为防御空袭，更将河南省的高射炮部队调驻河北保定，归宋哲元指挥。

军政部并命令各处补给基地支援对河北省的物资补给，且即将三百万发弹药紧急输送河北。

全国舆论支持抗日

自蒋总统“最后关头”的演说发表之后，全国舆论一致倾向于抗日，对于曾经是“喜峰口英雄”的二十九军给予充满着期待的激励。青年学生们更自动自发地协助二十九军构筑防御工事。

北京大学全体教授更于二十四日发表宣言：“我们为人道正义、为自由、为和平而牺牲，自所不惜。惟望全世界明达认清这个破坏和平、摧残文化的罪魁是日本，而不是中国！”

蒋总统复于二十四日致电宋哲元：‘以中（蒋总统）判断，不久后（日本）必有进一步之动作，我北平城内及其附近尤应严防。若我能积极准备，示人以无机可乘，随时可起而抵抗，则或可消弭战端，戢其野心也。兄有否准备？盼详复。’

果然，日军又挑起衅端。

日军占据廊房车站

七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时，从东北方面调来的日军约一百人，由天津乘装甲列车到达天津与北平之间的廊房车站，藉口修理电话，将该站占据。当时，驻守廊房的中国军第三十八师一一三旅（旅长刘振三）要求日军撤走，日军不理，双方僵持，至于午夜。

二十六日午前零时，日军突然向中国军开火，进入战斗状态。及至黎明，有日军飞机十四架来袭，这是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最初的轰炸。继之，在上午七时，由天津赶来的日军增援部队并有战车助战，发动猛烈攻击，中国的营房及车站一带都被完全摧毁；上午十时，中国军不得不终于放弃阵地。

廊房的冲突，决定了事变的扩大。

虽然在此之前，当地已曾不断有小规模的接触情况，但日本的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等“不扩大派”正在军方内部从事疏解，并抑制日本内地动员；但当廊方冲突之后，“不扩大派”的态度也为之改变，石原即于二十六日午前一时打电话给留宿在陆军省军事课长室的该课课长田中新一（大佐），告知：“现在只有动员内地师团，如果有所迟延，则一切完蛋，希望火速处置。”此后，便趋向于扩大途径。而石原本人则于九月间军部决定对上海增兵之同时离职。

平津沦陷

七月二十六日，攻夺了廊房的日军，继之又占据了平津之间的北仓、落垡各站，将铁路交通切断。同时，日本“支那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遂即向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军长）提出内容有：“（一）卢沟桥及八宝山附近配备之第三十七师须于二十七日正午以前撤至长辛店。（二）北平城内之第三十二师、西宛（北平郊外）之第三十七师部队亦须于二十八日正午以前移至永定河以西”之要求；并于文末言明：“如不实行，日军则采取独自行动。”实则就是一件最后通牒。

这一天（二十六日），蒋总统致电宋哲元指示：

‘此刻兄应下定决心如下：

‘一、巩固北平城防，立即备战，切勿疏失。

‘二、宛平城防，立即恢复戒备，此地重要，应死守勿失。

‘三、兄本人立即到保定指挥，切勿再在北平片刻停留。

‘四、决心大战，照中（蒋总统）昨电对沧（县）保（定）、沧（县）石（家庄）各线从速部署。’

就是同一天傍晚，在北平又发生了新的冲突。

当时，有分乘军车数十辆的日军，驶达北平城的广安门，伪称“野外演习归来的日本总领事馆卫兵”，企图闯入北平；实则乃是驻屯丰台的战斗部队。担任广安门城防的第二十九军独立二十五旅六七九团（团长刘汝珍）识破诡计，乃打开城门诱引日军入城之后，一齐开枪射击，日军陷入混乱，死伤十多人。这就是所谓“广安门事件”。

‘廊房、广安门之挑战，是倭必欲根本解决冀察与宋哲元部也。……遭必不能免之战祸，当一意作战，勿再作避战之想矣！’（蒋总统七月二十六日日记）

翌日（二十七日），日军已不再等待他自己所定的“期限”，便全面发动了攻击——午前三时，突袭驻扎于北平东方二十公里之通州的中国军；继之于五时又有在十八架飞机掩护之下的骑兵进袭北平南方的团河，该地中国守军牺牲千人以上。

及至午后，北平北方的高丽营、昌平、汤山、沙河各地都陆续受到攻击。

卢沟桥边所点燃的战火，终于在华北中枢的北平四周全面扩散开来。

佟麟阁赵登禹成仁

二十八日拂晓，第二十九军司令部所在地的北平城外南苑，受到约四十架日军飞机的反覆轰炸，以及约三千机械化部队的猛烈攻击，阵地都被摧毁，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等多数官兵壮烈成仁。

同时，西苑、北苑也在日军激烈攻击之下。

当天午后，宋哲元在北平城内召集北平市长秦德纯、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等人举行紧急会议。面临的道路是死守北平呢？还是放弃？本来中央和全国民众都希望他们死守北平；但当地绝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不忍使文化古城因战火而化为灰烬。于是，紧急会议乃终于决定退守保定，而以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北平市长，留在当地；宋哲元与秦德纯则于下午九时离平出发，前往保定。

继之，第二十九军官兵也在夜半怀着痛惜的心情、默默地离开了古城北平。

‘历代古都，竟沦犬豕矣。悲痛何如！然此为预料所及，故昨日已预备失陷后之处置，此不足惊异也。’（七月二十九日日记）

此时，在天津方面的中国军，则谋作最后之抵抗——由第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所率领的部队，于二十九日午前二时，反攻企图占领天津警察机关的日军，一度夺回为日军所占据的飞机场及火车东站、西站，但在日军的飞机轰炸与炮击之下，不得不于三十日放弃了天津。

冀东伪军反正

在通州方面，于二十九日昧爽，有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保安队三千人奋起反正，投入抗日战线，他们将日军特务机关人员及守备队员约三百人歼灭，逮捕伪主席殷汝耕，打算押送北平，但碰到日军反攻，殷汝耕又被日军所夺回。

据日本资料：“通州事件”的牺牲者有日本人一○四人（其中“冀东政府”职员暨关系者八十人）以及朝鲜人一○八人，差不多都是非战斗人员，因此，日本方面称之为残杀事件，曾经大事宣扬。

二十九军在北平、天津的战争中，伤亡官兵超过五千人。

由于居于河北心脏部位的平、津易手，战局乃进入新的阶段。二十九日，蒋总统在南京接见新闻记者，发表谈话如次：

‘军事上一时之挫折，不得认为失败；而且平津战事不能认为已经了结。日本既蓄意侵略中国，不惜用尽种种手段，则可知今日平津之役，不过其侵略战争之开始，而绝非其战事之结局。国民只有一致决心，共赴国难。’

宣布抗战到底

七月三十一日，蒋总统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

‘……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为的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

‘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齐心努力杀贼，驱逐万恶的倭寇。’

中国方面为挽回局势，乃将驻扎绥远省平地泉的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移驻察哈尔省要冲的张家口，其所属八十九师主力则于八月六日从为北平北方大门的居庸关越长城南下进驻南口，由北面南向北平推进。

又在孙连仲指挥之下的二十七师，则于八月十日挺进到北平西南方五公里的宝店，由南而北逼近北平。

空军也截至八月十一日完成河北作战的准备。

日在上海制造事端

在像这样地逐渐部署夺回平津地区的军事体制之际，战火却突然飞燃到了上海。

演出的主角是日本海军。

当“七七事变”爆发时，以上海、长江方面为其所谓“警备区域”的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中将）正在台湾方面演习之中，听到事变发生，立即赶回上海。

长谷川清于七月十六日向日本海军军令部报告：“如果局限战域，则有利于敌方兵力之集中，深恐将始我方作战困难。……为制中国于死命，须以控制上海、南京为最要着。”故而促请在上海方面也发动战争。

于是，日本海军乃考虑到和在卢沟桥所耍出的同样手段来制造开战的藉口。

七月二十四日，驻屯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表示：“队员宫崎贞雄在北四川路与狄思威路口被中国人带走。”一面要求上海市政府暨公共租界工部局调查，一面在闸北一带实施戒严。

于是，中国的保安队也为之加强戒备，双方对峙达三天之久。

当一触即发的紧张情势之下，二十七日有中国船夫在距离上海约三百公里之遥的镇江附近救起一个将要溺毙的人，就是那个所谓“被带走”的日本兵。

据宫崎供述：“因为违反军纪去娼寮游荡，过后，恐怕要受处罚，就潜登日本轮船，溯江而上，途中投水自尽，未能死成。……”

就是这么一回事，日本方面便要利用之为战争的导火线。

当在北平方面日军全面发动攻击的第二天（七月二十八日），日本政府便下令撤退汉口上游的日本侨民，显然是考虑到全面战争而预为采取的措施。

在日本舰艇护航之下的最后撤侨轮船，是于八月九日到达上海。就在这一天，又发生了“虹桥事件”（大山中尉事件）。

九日下午五时，有日军上海特别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长大山勇夫中尉乘坐由一等水兵斋藤与藏所驾驶的汽车，强行突破中国方面的警戒线，驶往虹桥飞机场，意图窥探该机场附近的军事设施；中国保安队命其停车，他们置之不理，并且开枪打死保安队员一人；因此，保安队乃开火还击，将二人射杀。

这个事件，经由上海市长俞鸿钧通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约定通过外交方式处理，遂即进行交涉。

然而，日军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则藉口“事态恶化”，作备战部署。由长江到黄浦江排开舰艇三十艘以上，并派遣陆战队三千多人登陆。

近卫进行和平交涉

就在大山中尉事件发生之前，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以曾任上海总领事的船津辰一郎为使者派往上海，打算和中国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进行和平交涉。即所谓“船津工作”。

船津此行，虽为私人身分，但所携带的“停战案”及“国交调整案”，是在东京经陆、海、外三相会议所决定，并由外务省电达驻上海总领事的公式文件。其内容则为：华北非武装化、日军兵力恢复事变前状态、废止塘沽协定等项。

此次交涉，本应由船津与高宗武之间进行，可是驻华大使川越茂漠视日本政府训令而迳自出面折冲。八月九日晚间曾举行第一次会谈，但正好在这一天发生了“大山事件”，因而一切无可再谈。

又关于大山事件，在日本资料中有：海军以大山并未携带枪械，不可能先开枪，乃向中国方面提出抗议；次日，由中日双方会同调查，日方主张被肯定的说法。

日军集中一万余人

此时，日军业已以其设于虹口的陆战队本部为中心，正构筑阵地约八十多处，其兵力为原有之三千二百人，又新登陆三千余人，以及在乡军人三千六百人，此外，包括在舰上可能动员的部队，合计推算约为一万二千人。

至于中国军方面，由于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战役”之后所签订的停战协定之规定，上海市内仅有在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指挥之下的上海市保安总团、上海市警察总队、上海市保卫团等少数维持治安的武装力量，此外并未驻有正规战斗部队。然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则于十一日向上海市长俞鸿钧提出“撤退保安队”及“拆除保安队防御工事”之要求。

在中国立场，当然不可能将维持治安人员撤走而使上海置于无警察状态，是故俞鸿钧乃对日方的要求予以拒绝。

八一四空战

为对抗时时刻刻在向上海市内增强兵力的日军，中国军乃于八月十一日（一九三七年）将由京沪警备总司令张治中所指挥的第八十七、

八十八两师部署在上海近郊。这两个师都是曾经在五年半之前的“一二八事变”中和日军激烈交战过的劲旅。

在上海周围，为戒备日本再度侵略，已经自一九三五年冬季开始施行防御工事，自龙华、虹桥、真茹、闸北、江湾、大场等处利用纵横无数的河汊沟渠构筑阵地，对上海形成远远合围之势。

‘对倭取胜之要诀，在于深沟、广壕、坚壁、厚盖、固守、坚拒，乘机袭击，大敌则避，小敌则战，制敌死命，全在于此；而临战之时，则须负伤不退，宁死不屈，操胜之道，如此而已矣！’（蒋总统八月十一日日记）

上海攻防战展开

十三日，中日两军终于冲突起来。

上午九时十五分，日军陆战队的一个小队冲进横滨路、宝兴路地段，对中国军开火，战事在二十分钟后即行停止；但到了下午四时左右，又在八字桥、天通庵、宝兴路、宝山路一带全面燃起战火，待机于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也一齐发炮轰击上海市区。

为时一百天的上海攻防战（淞沪会战）乃自此展开。

“七七”（卢沟桥）之后，继之以“八一三”（上海），这就是在宣告以全中国为战场的“全面战争”的开始。以“八一三”为发端、悍然扔掉了过去所谓“不扩大主义”的假面具、而自动于九月二日起将“北支事变”改称为“支那事变”的日本，正就是从此踏入了灭顶的泥沼。

‘以前我早曾说过：“敌人要亡中国，只有蚕食和鲸吞的两种方法；我们不怕他鲸吞，而怕他来蚕食。”现在，敌人用的却正是鲸吞的方法。敌人要鲸吞中国，不曾吞下去，反把自己咽喉塞住了。’（注）

十三日深夜，蒋总统下令张治中发动总攻击，毅然进入全面抗战。十四日，第八十七师进攻日本俱乐部及日本海军操场；第八十八师在八字桥一带展开激烈的肉搏战。

‘对倭作战，应以战术补武器之不足，以战略弥武力之缺点，使敌处处陷于被动地位。’（八月十三日日记）

中国空军首建战功

十四日，发生了暴风雨圈达三百公里的台风在上海东方海上朝西北方向移动，华中沿海一带阴霾四合，但中国空军仍然冒恶劣气候出动，于上午十时，轰炸日军起卸物资的上海汇山码头以及陆战队司令部、纺织工厂，还炸伤了日本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

继之，并于当天下午在上海西南方的杭州笕桥上空和日本飞机演出空战，树立了最初的战果。

当天下午五时，由河南省周家口飞来杭州的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二十七架飞机在即将降落于笕桥中央航空学校之际，和日本海军航空队所属九六式轰炸机十八架遭遇。

第四大队立即对日机展开急袭，高志航首建战功写下了中日战史上最初击坠日机的纪录，结果在这次空战中合计击坠日机六架。

其余日机在阴霾中向南方逃走。当天晚间，日方广播：“十八架飞机之中，十三架失去联络。”

中国空军则未受损害。

‘倭寇空军技术之劣，于此可以寒其胆矣！’（八月十五日日记）

当时的中国空军，仅仅在两年之前才开始正规建军，向德、义等国购入战斗机、轰炸机三百架（按日本在此时已有各种飞机共约一千五百架），因为国家财政困难，而出于全国各界捐款支应颇大。其后，由于领导募捐活动的蒋夫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建议，乃以八月十四日为“空军节”。

又在此次空战中，率领九架飞机参加的毛瀛初，现任中华民国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长，在三十七年之后的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日，曾以断绝中日航空路线的通知面交日本航空公司台北分公司经理。

据日本资料：八月十四日飞往杭州的十八架飞机，是属于台北基地的第三空袭部队鹿屋队。

有谓该队此次出动，系为轰炸杭州及广德（安徽），损失三架飞机，其中两架因天气恶劣在实施轰炸之前失踪；一架因中弹而燃料用罄，于归途落入基隆港。

日赶调两师团增援

上海方面的激烈战斗，在继续之中。

日本在八月十三日迅即决定调派两个师团增援上海，十四日以第三、第十一师团编成“上海派遣军”，并以松井石根为司令官。

面对在上海登陆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国方面所投入的陆军在兵力上局于相当的优势，逐渐迫近日军加以压制，十九日还切实掌握着闸北、虹口、杨树浦一线；但由于缺乏重武器，乃不能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

至于日军方面，其舰炮射击及飞机轰炸日益加强，以争取时间等待由其本土调来增援部队。

蒋总统在八月十七日的日记中记下：

‘惟信仰可以移山也。’

注：蒋总统-“八一三周年纪念告战地民众书”（一九三八八）

上海血战

八月十五日，首都南京受到轰炸；二十日，连内陆武汉也被空袭。——日本扩大战火的意图，至此越发露骨。

中国方面，于八月二十日将江苏南部包括浙江省在内划为第三战区，由蒋总统兼任该战区司令长官，确立了因应全面战争的初期综合作战计划。

二十一日，为期驱逐在上海的日军而发动总攻击；但在二十三日由于来自日本本土的援军第三、第十一师团分别在吴淞、川沙镇登陆，日军势力增强，以致罗店、吴淞两地先后于八月二十八日及九月一日失陷。

‘近日战局渐转劣势，人心动摇。此次战事本无幸胜之理，惟冀能得持久耳！’（八月二十八日日记）

九月六日，中国军停止攻击，部署持久抗战态势，转变为以确保上海市区和加强南京防卫为主眼的第二期作战计划——对于日军的包围线照旧维持，但避免牺牲过大的正面攻击，采机动作战，以谋各个击破，消耗敌人。

‘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皆为我国所有，敌国焉得而不败乎！’（九月七日日记）

九月十七日，中国军退守上海北站、江湾、庙行镇、罗店之线。二十一日，调整抗战部署，改编为右翼、中央、左翼三个作战军，任命张发奎、朱绍良、陈诚分别担任总司令。

日军增至三十万人

相对地，在日军方面，除在先业已调来的两个师团之外，更由其本土续调第九、第十三、第一○一计三个师团暨野战重炮兵第五旅团以及由台湾调动一个旅团（重藤支队）投入上海战线，加强全面攻击。九月二十五日，先后五次共派遣九十四架飞机轰炸南京。

‘敌以为反覆轰炸可以逼我迁都或屈服，其实惟有增强我国抵抗之决心而已。’（九月二十五日日记）

十月初，日本的“上海派遣军”已达三十万人。

中国军也投入了五十个师。

十月七日，日军开始总攻击——强渡蕴藻滨，向大场镇猛攻；中国军将之遏阻了十天以上，十八日，更以第二十一集团军开上战线，发动了寄望于挽回战局的总反攻。

然而，日军的炮击与轰炸极其猛烈，中国军虽经一连几天的反攻，但无法前进；终于在二十三日撤下攻击部队，作战略性的转进。二十五日，大场镇失陷，中国军放弃了上海北郊，撤退到苏州河南岸。

中国军人士气高昂

在这个期间的战斗，是上海攻防战中的最高潮，其炽烈达于极点，中日两军都有极大的损失，而中国军的士气则甚为高昂。

当时据报告：受到日军猛烈攻击的六十七师所属某连，在激战之后，只剩下四个人，而由其中之一人将连长的遗体送往后方，其余三人则仍旧死守阵地，等到援军赶来转守为攻；又有某连，只剩下连长一人生存。——的的确确是死拚到底。

‘闻此消息，忧患为之尽释，而精神胜于物质之效，庶于此可见。最后胜利必归于我矣！’（十月三日日记）

蒋夫人劳军途中受伤

十月二十二日，蒋夫人赴上海前线慰劳将士，受了重伤。盖日军侦悉夫人在赴前线途中，遂集中炮击与轰炸，汽车司机为躲避炮火，乃以接近时速一百公里的速度飞驰于颠簸不平的公路上，一个急转湾，翻落到水沟中，夫人肋骨折断数根，同乘的友人端纳也受到重伤。

最酷烈的一次战争

日本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在其所撰“支那事变纪录”中记有——至九月底日军在上海方面伤亡达一万二千三百三十四人，为华北方面的两倍，同时并提到中国军的斗志甚高，其内容如次：

“在上海战役中，中国军的抗战意志和战斗力，推翻了三宅坂（陆军省）一向的判断。……中国的步兵虽在日军毫不留情的炮击与轰炸之下，仍坚守阵地，绝不后退。”

又在当时参加上海作战、属于中央作战军的第八军军长黄杰，告诉笔者（古屋奎二）如下：

“约一百天之间的上海战役，是在我的经验中最酷烈的一次战争。

“这个战争的另一方面，是在和‘水’作战，因为在上海的周围，除水田之外，就只有池沼和河汊，无处可以藏身，泡在水里面作战一星期以上，并不算稀罕，以致很多士兵两脚麻痹，不能行动。

“日军除侦察机之外，还使用载有兵员的气球，搜索我军动态，用无线电通报情况，发炮射击，尤其是在长江上的军舰立即炮击过来。

“因此，我们在白天只有隐藏不动，连做饭的炊烟都不能升起，也没有携带口粮，真正11[54]2428是艰苦作战。

“日军的损失固然很大，中国军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特别是中国最精锐的部队两万人中未受伤者只有五千人；在抗战一开始之际，最珍贵的军队便受到了如此严重的损害。”

上海的最后抵抗据点，是位于闸北区、在公共租界苏州河对岸的“四行仓库”。

该仓库原为大陆、金城、盐业、中南四家银行联营的仓库，六层楼钢骨水泥建筑，在高层建筑不多的闸北区，特别显目。

十月二十六日夜晚，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下令该师五二四团团附谢晋元中校固守四行仓库，吸引住日军，迟缓他们的进攻速度，掩护闸北地区友军撤退。

悄悄部署伏兵突出

二十七日午前二时，谢晋元率领该团第一营（营长杨锐符）八百官兵悄悄地集合在四行仓库内，作了强固的防卫部署。

从这一天的清晨开始，日军循苏州河边对沿途房屋纵火，搜索前进。下午二时，日军大部队接近四行仓库，还不知道内有伏兵。谢晋元等到日军的距离充分拉近之后，一声令下，众枪齐发，日军陷入大混乱，遗下了八十多具尸体退去。

自此发端，一连展开了四昼夜的生死搏斗。

日军出动大炮、战车，无分昼夜地进行波浪式的攻击。

厚实的钢筋水泥墙壁，到处被炮弹轰开了洞眼，但守军士兵们则以存放在仓库中的成袋黄豆和面粉等堆积起来加以堵塞。并自屋上投下手榴弹甚至迫击炮弹反击日军，使仓库四周的日军尸体堆积如山，连其战车也被烧毁三辆，倾覆四辆。

孤军奋斗中外感动

八百孤军固守着闸北最后阵地的奋战情况，在隔着一条苏州河的对岸公共租界可以看得很清楚。对岸麇集着不仅中国人，而且有很多外国人都在为他们呐喊助威。

此时，曾和蒋夫人见面的租界上的英军司令噙着热泪谈起战况，对于中国军死守四行仓库的精神赞扬不置。

‘我军留守闸北之谢晋元团，孤军奋斗，中外人士均受感动，且表示崇高之敬意；以与敌军野蛮残忍、受世人之唾弃两相比较，则不啻有霄壤之别。此战虽退，犹有荣焉！’（蒋总统十月二十七日日记）

二十八日夜半，有一个中国少女穿越过横飞乱舞的枪弹，连游带趴地蹿进了四行仓库。她，就是年方十八岁的女童军杨惠敏。

她从浸透汗水的制服下面，取出了卷在身上的一块布——是长达四公尺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

二十九日清晨，这面国旗升起在四行仓库的屋顶上。此时的闸北到处都悬挂了日本旗（中国人称之为血腥的膏药旗），而特别飘扬在最高处的就是唯一的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给予上海市民以极大的鼓励。而日军则视其为眼中钉，对之瞄准射击，但却不可思议地未见命中，不能将它击倒。

杨惠敏（现住台北）和国旗的这段史事，现在还以“国旗的故事”为题编录在中华民国的小学国语课本中。又四行仓库的攻防战，也以“八百壮士”为片名拍成电影，定于今年（一九七六年）夏天上映。

荣誉撤退

及至三十日，英国方面唯恐战火波及租界而出面调停，提议谢晋元部队撤进公共租界。中国方面接受了调停，乃于三十一日清晨放弃四行仓库，渡过苏州河，进入公共租界。

经过四天的战斗，中国方面所受的损害，仅只有死者三十七人。

‘为主帅者，爱惜所部与牺牲所部皆有一定限度。今谢晋元死守闸北一隅，任务与目的已达，故令其为荣誉之撤退，不必再作无谓之牺牲矣！’（十月三十日日记）

本来，租界当局承诺谢晋元的部队，撤经租界之后，仍然回到中国军的战线上去；但因受日军压迫不履行约定，将谢晋元等八百人扣留在租界上。

后来，谢晋元于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四日被受日军收买的叛徒所刺死。

及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租界，谢部官兵乃成为日军俘虏，被带往各地充苦工：及至战争结束之后，平安返回上海者不过一百多人。

争取了长期抗战准备

十月三十一日，是蒋总统五十一岁诞辰，他检讨将近四个月的抗日战争形势，留有记述如下：

‘此次抗战，实被迫而应战；与其坐而待亡，忍辱受侮，不如保全国格，死中求生，与敌作一决战。如我再不抗战，则国民精神亦必日趋于消沉，民族生机毁灭无余矣！

‘设或与倭妥协，即或答应其要求、甚至承认伪满，但其一遇国际矛盾冲突之时机，彼必不顾信义，继续侵略不止。’

上海战役结束，虽说中国军是向后方转进，但却已使夸称“在两星期内实现占领中国”的日军战略计划大为混乱；盖中国方面藉在上海抵抗之际，已将长江下游的重要生产设备及物资移转到后方，争取了为长期抗战充裕准备的时间。

‘保持战斗力，持久抗战；与消耗战斗力，维持一时体面，两相比较，当以前者为重也。此时，各战区应发动游击战，使敌于占领各地疲于奔命也。’（十一月七日日记）

南京沦陷

当在上海战线的中国军主力转进到苏州河南岸之后的十一月五日，日军三个师团（第十军）在杭州湾的金山卫登陆；接着在十三日，又有一个师团在长江的白茆口登陆。于是，被来自东南北三面夹击的中国军乃更西向转进，致力于防卫南京的部署。

‘苏州河南岸，以兵力用尽，不能不令撤退，但并非为金山卫登陆之敌所牵动。惟藉此战略关系，使敌知我非为力竭而退，不敢前进，此乃于将来之战局有利。’（蒋总统十一月八日日记）

另一方面，在华北的日军，于占领北平之后的八月三十一日，编成“北支那方面军”，以寺内寿一（大将）为司令官，自九月中旬开始南下，经保定、石家庄而于十月底侵入豫北。又在山西方面，由察哈尔进攻的日军，也于十一月八日攻陷太原。战火扩展得非常迅速，而且是漫无际限。

此时中国方面为谋长期抗战，必须有盱衡全局的战略部署。

‘抗战最后地区与基本战线，将在粤汉、平汉两铁路以西。’（十一月十三日日记）

蒋纬国谈抗战战略

蒋总统之次公子蒋纬国将军（现任三军大学校长、战略家。）对于当年蒋总统的持久抗战战略对笔者（古屋）有如下的分析：

“当时料想到日本在作战方面所能给予中国的最大危害，是沿平汉铁路南下，首先迅即攻占武汉，对长沙、醴陵（浙赣铁路要冲）一带形成威胁。于是日军在控制了中央地区之后，如果对留在东边的中国主力部队加以压迫，则中国军便只有背海决战；同时，在中国东南地区最具战略价值的人力和物资就要落入日军的掌握，而使中国军处于决定性的劣势地位。

“父亲（蒋总统）为了避开这样的危险趋向，所以采取能够相机立于有利态势的持久战略。

“这个持久战略构想的要点如次：

“以中国军一部对华北之敌持久，确保山西；相机集中主力于华东，对上海之敌取攻势，以迫诱日军转变其作战线为沿长江由东向西。中国军基于此一构想，先调集有力部队在察、绥、晋方面，向将会由华北南下的日军右侧发动攻势，并确保山西，以牵制或迟滞日军南下；继而藉八一三事件集中精锐部队于华东方面，主动向淞沪之敌猛攻，迫诱日军大本营自东北基地、日本本土以及华北原主作战方面相继增援淞沪，其侵华之作战线遂形成沿长江自东向西。

“此一战略指导，获得了下列战略效果：

“第一、日军仅能压迫中国军沿通往大后方之补给线撤退，无法迫其决战，因而日军‘速决战略’被否定。

“第二、使中国军不仅能确保其补给线之安全，且获得余裕时间，将东南地区之人力与物力迁移于大后方，从事整备建设，因而为后来的转移攻势奠定基础。

“第三、使日军补给线延长，且无法发挥其海上优势，增大其作战之困难。”

国民政府于十一月十九日举行国防最高会议，正式决定将首都迁移到西方的四川重庆。

十二月七日清晨，日军由东、南两面迫近南京城，对城外中国军阵地展开总攻击。

当天，凌晨五时四十五分，蒋总统依依难舍地离开了南京，乘飞机飞往江西。

‘应迁移之物品，皆能如数运完，若早十日离京，则大局更不堪设想矣！’（十二月七日日记）

南京在日军机械化部队猛攻及飞机波状轰炸之下，其南郊最大防御据点雨花台于十二日失守；十三日，日军自光华门、中山门等处冲入城内，经过激烈巷战之后，终于沦陷。

自一九二七年在和国内军阀以及共产党的战争之中建都以来为时十年的南京，落入了外国侵略部队的铁蹄蹂躏之下。

号召同胞不屈不挠

当退出南京之际，蒋总统于十二月十七日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如左：

‘……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致敌之死命。……

‘敌愈深入，将愈陷于被动之地位；敌如必欲尽占我四千万方里之土地，宰割我四万万之人民，所当兵力，当为几何？诚使我全国同胞不屈不挠、前仆后继、随时随地皆能发动坚强之抵抗力，敌之武力，终有穷时，最后胜利，必属于我。……’

在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伤亡超过了六千人。

南京惨遭兽行屠杀

然而，更惨痛的悲剧却是在日军占领之后才发生的-就是“南京大屠杀”。

日军首先将未及撤退的中国军人接触武装之后，使列队于长江岸边，用机关枪扫射，悉数杀戮。

继之，残杀的对象更及于妇孺老弱。设置在金陵女子大学内的“国际难民委员会”所属“妇女收容所”收容了七千多妇女，被日军用卡车载运出去，加以强暴之后，再行杀害。

更有日本军官两人，以砍杀一百人、一百五十人为竞赛的消息，为日本的新闻所大事报导。

屠杀的手段，越来越残酷——有将人下半身埋于地中纵军犬狂噬的“犬噬之刑”，又有用铁锁贯穿下颚将人全身吊起来的所谓“钓鱼之刑”，更有将人缚于铁床放在炭火上的所谓“烤猪之刑”……许许多多令人想像不到的、极尽其残忍之能事的杀人方法。

像这样地不管战斗员、非战斗员和不问老少男女的大屠杀，达两个月之久，有说是屠杀了三十万，有说四十万，直到今天都还未能明了其确实数字。

‘倭寇在京之残杀与奸淫未已，似此兽类暴行，彼固自速其灭亡，而我同胞之痛苦极矣！’（一九三八年元月二十二日日记）

由侨居南京的外国人为救济难民而组织的“国际委员会”，曾经向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举出放火、掠夺、强暴、杀人等具体事例一百十三件，先后提出严重抗议达十二次之多；但谷寿夫不仅不屑一顾，且反而将血淋淋的南京惨状摄成电影及照片，表彰日本皇军的战果。

据东京军事法庭判决，在南京屠杀的军民合计至少二十万人以上，被掠夺、放火的民居约为全市的三分之一。

谷寿夫则于一九四六年三月以战犯判罪在南京郊外雨花台被处以死刑。

各国作壁上观

自卢沟桥开始的日军大规模侵略，被提出于国际舞台。

国民政府于七月十三日向国际联盟递送第一次声明；九月十二日，复提出补充声明，诉请国联对于日本侵略采取必要的行动。又于其间当淞沪战争开始之后的八月十四日，并向全世11[68]2442界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指出：日本的行为，是在对世界和平挑战。

可是，说老实话，各国在当初的反应是不能符合中国的期待的。因为列强的注意力大多被欧洲紧张局面所吸引，对于在卢沟桥点燃的烽火将会燃烧到全世界的情势并无认识。是故，中国的初期抗日战争，就只有在国际间作壁上观的状态之下进行。

蒋总统当听到七七事变发生即由庐山回到南京之后，便以行政院院长的立场与各国驻华大使恳切会谈，以期获得各国的理解。

首先于七月二十一日接见英国大使许阁森，提出希望如次：

‘现在局势，只有英美两国努力从中设法，或可变为和缓，而东亚和平亦可维持。此意请即转达贵国政府。’

英国忙于应付德国

接到许阁森加急电报的英国外相艾登，反应很快，他在下院答覆质询：“在华北目前局势之下，欲举行英日亲善关系之交涉，尚非其时。”表示出英日谈判须告停止的态度。盖当时日本方面为谋改善由于在中国的利权问题以致渐趋恶劣的日英关系，乃筹划缔结新的日英协定，正由驻英大使吉田茂在和英国当局折冲之中。

艾登继之约见吉田，并向日本提出忠告：“英国政府重视中日之间的和平解决。日本为了远东全局之利益，应该自我节制。东京似乎认为中国的抵抗不过嚷嚷而已，这种看法实则大错特错；我（艾登）深知中国极愿和平，但蒋介石委员长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超过了限度，是不能忍耐的。”

话虽然是这样地说，不过英国政府正迫于筹谋对策以应付在欧洲窥伺侵略机会的德国，故而对华态度是只要其在长江流域的权益不被侵犯，则力谋避免和日本发生摩擦。

美国抱着孤立主义

美国方面，当事变之初是抱着不希望被卷入亚洲问题的消极性的孤立主义。

七月十六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其要旨如下：“武力的敌对行为，对于美国在中国的权益亦有影响。美国在过去屡次主张——应避免遂行政策而行使武力，并通过和平协定调整国际关系，以及尊重他国权益。美国政府相信通过和平的、实际的方法力谋协调，应可达成上述诸原则。”只是，在声明之中，并未指出中日两国，也没有言及国际条约，实在是一个抽象的声明。

七月二十五日，蒋总统在南京接见美国大使詹森，力言：美国是表明尊重中国主权的“九国公约”之发起国，在国际法上、在道义上都有协助制止日本行为的义务。

接受了这些话之后，美国国务卿赫尔于八月十二日又发表第二次声明，这才提到国际条约，并希望中日两国不要诉诸战争；只是在此时，还在强调“美国所关心的是保全在华美国人的生命财产”，仍未涉及具体的制止行动。

七月二十六日，复与德国大使陶德曼、法国大使那齐雅分别晤谈。

那齐雅指出：“在百年战争时代（十四、十五世纪），英国意图征服法国、扩张势力于欧洲大陆，但最后终于失败，缩回三蹈；今天，希冀征服中国的日本，也将必然会失败而退回到海岛上去。”至于对具体的解决方法，则只是答称：“日本军部意见不能统一，其前途并不光明。”

各国都各因其国内情况及基于其本国利益之意图，虽则倡言反对日本侵略，可是都趑趄不前，拿不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像这样的一些态度，反而为日本军部助长了气焰。

在这个期间，派遣到英国去的中国特使孔祥熙则展开了积极性的活动。

订购军火竟未履约

七月三十日，在伦敦和英国银行团签订了二千万英镑的偕款契约，用于购买铁路机材及财政基金，同时并洽妥了购买英国制飞机三十六架的契约。又和比利时及法国也签订了信用借款的契约，并向法国定购轰炸机三十六架；十日，也和义大利签订了购入兵器的契约。

可是，日本为了阻隔中国自外国购入武器，乃于八月二十五日宣称：封锁由上海到汕头的海岸线；继之更于九月五日封锁中国整个海岸线。于是，各国为避免与日本冲突，竟先后取消对中国出售武器的约定。

中国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只有经由香港的铁路勉强转运一点武器进来。

八月二十六日，英国大使许阁森由南京乘汽车前往上海途中，被日军飞机扫射，因而负伤。

‘此事未知英国取何种态度，或于全部战局之胜负有关也。’（八月二十六日日记）

九月十九日，日本更片面要求各国外交机关退出南京，二十日开始空袭南京。美、英、法三国虽对日本提出抗议，但日本则置之不理，继续轰炸。盖日本已经看透了英美各国是决不会对之采取强硬手段的。

苏联背弃约定

在各国对于日本侵略中国袖手旁观的情况之下，唯有苏联的行动不同。

七月十三日（一九三七年）苏联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对于日本的侵略行动激烈责难；并着其正在归国述职之中的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迅速返回南京任所，二十三日，与外交部长王宠惠会谈甚久。

苏联暗自高兴

苏联的提议是迅速缔结“中苏不侵犯条约”，这个提议是隐藏着各种意图的。她虽然对日本表示责难，但实则毋宁说是对于中日冲突暗自高兴，因为如果中日开战，则苏联在侵略外蒙方面便会坐享渔人之利的。

中苏之间，自九一八事变之后进行恢复邦交的交涉，及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正式复交。其背景，显然是为对付在东北发展的日军所给予的威胁，而有意和中国握手。

和中国复交后的苏联，实则是在推动其对外蒙的侵略工作；但到了一九三六年初，日本发表“广田三原则”，并即和中国进行调整邦交的交涉之际，苏联乃再度对中国投以微笑——就是要签订“不侵犯条约”。其目的乃在希望中国不为日本压力所屈，而希图拉拢中国和她站在一边。

是故，苏联一面和中国拉拢，一面却对外蒙工作毫不放松，竟然背弃信义于一九三六年三月签订了使外蒙属国化的“俄蒙互助协定”。

及至七七事变发生，在苏联来说，正是牵制日本的好机会到来。在苏联的考虑中，就是协助中国，使中日战争长期化，好趁这个期间谋求在外蒙问题上的中苏对立得以疏解；同时，更图伸长为其爪牙的中国共产党势力，藉以达成赤化中国的目标。

‘俄提互不侵犯条约，我与之交涉时，外蒙问题与不宣传共产主义问题，应特别注重。’（蒋总统八月六日日记）

此时，在自由主义的列强国家断绝了援助之际的中国来说，如果是站在中苏两国平等的基础上订立条约，而有裨于集中抗日力量，则也是应该加以考虑的。

于是，中苏之间的交涉乃有了进展。八月二十一日，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和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遂即签订了“中苏不侵犯条约”。

中国政府并于公布条约时（八月二十九日）由外交部发表谈话如下：

“此举不独对于中苏两国间和平多加一重保障，且为太平洋各国以不侵犯之保证共谋安全之嚆矢。……

“中国今日虽受外来极度之侵凌，不能不以武力抵抗武力，然酷爱和平为我国人之特性；今日以武力侵凌我者（日本），苟能幡然觉悟，变更其国策，则我人亦深愿与之签订不侵犯条约，共维东亚之安全，而谋人类之幸福。……”

这个条约，还附带有一项口头约定——就是在条约有效期间（五年）内，双方承诺：“苏联不与日本缔结不侵犯条约”和“中国不与第三国签订共同防共协定”。

‘联俄本为威胁倭寇，如倭果能有所觉悟则济矣！’（十二月二日日记）

同时，并签订了由苏联购入武器的借款协定，先后签订合计约三亿美元。

此为在对日抗战初期来自外国的唯一支援，有助于抗日战力则属事实。

十月间，苏联国防部长伏罗希洛夫向中国驻苏大使馆参事张冲表示：“战事如于中国不利时，苏联也可以出兵参战。”

然而，及至十二月，史达林却说出：“苏联如果参战，会被视为有赤化中国之野心，反而于中国不利。”

‘倭俄均欲以中国为战场，以中国为牺牲品，我国又焉能不亟图自强哉！’（十二月四日日记）

究其终极，苏联对于中国的好意，也无非是在为她自己的利益打主意。其后，在一九三九年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之后，立即大幅减少对中国的援助；而且更继之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竟然背弃和中国的约定，与日本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至此，眼看着日本对苏联进攻的危险已成过去，乃立即完全停止了对于中国的援助。

史达林建议杀人四百万

只是，在这一段期间中，史达林给予中国的进言，是可以作为衡量共产主义者思维法则的一个标准，特地在这里加以提出。

史达林当南京失陷之后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请中国驻苏大使杨杰向蒋总统转达其意见如下：

“如想在战争继续进行时消除人民对政府所表现的不忠行为，则委员长必须枪杀至少四百五十万人；否则我（史达林）恐怕他终无力使此次抗战达到胜利的结果。”

此时，在苏联刚好是以判处总参谋长杜哈契夫斯基六个月徒刑为开端，刮起了所谓“史达林大整肃”的狂飙，而正当多数“反史达林派”的分子未经判决便被整肃的高潮之际。史达林继续对杨杰说明他是怎样地掌握了苏联的权力：

“我对于任何有嫌疑的俄国人都要予以逮捕，解交内政部；这些人一进内政部就只有两条出路～～一条是到西伯利亚，一条是进入坟墓。”

当时，日本对于中苏接近极度提高警觉，极力张开情报网，以图调查苏联对中国援助的实际状况。据所获情报：“截至九月四日为止，由苏联经库伦运送中国战斗机七十二架，轰炸机五十四架，侦察机二十架，以及多数战车、大炮、弹药。”此外，日本唯恐因中苏接近而强化了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影响力，对此也有所警戒。

唤起国际舆论

民国二十六年

九月四日，蒋总统接见了美联社记者，强调列强各国坐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有责任，并要求唤起国际舆论：

‘日本侵华之目的，乃在建立一大陆帝国，进而作威胁世纪和平之根据。

‘我国抗战，非仅为中国本身之存亡而战，亦为维护世界之和平而战。制止日本之侵略行为，乃为九国公约与凯洛格条约（非战公约）签字国及国联各会员国之责任。’

蒋夫人的呼吁

在形成国际舆论方面，蒋夫人也的顾身体受伤而尽力协助。她于九月十二日在南京通过美国广播网直接向美国民众诉说中国艰苦抗战的状况，呼吁美国支援，其内容大致如左：

“世界上的人们，忽略了当前正在中国逐渐扩张的灾祸实况。列强曾订立巴黎非战公约，防遏战争；并且组设国联，用这双重的保障来制止侵略国家向弱国作无理的侵凌。奇怪的是，这些条约今竟荡然不存；更奇怪的是，积年累月逐渐形成的战时国际法，它复杂的结构，原是节制战时行为，保护非战斗人员的，竟也和这些条约同化了灰烬，所以我们今天重复回返到了弱肉强食的野蛮时代。”

在这个阶段，美国仍然为孤立主义所闭关自守，不仅无意于积极行动，而且美国政府更于九月十四日声明对于中国和日本适用“中立法”。关于中立法，美国在这一年的五月间西班牙内乱之际，也曾宣告适用——就是对于美国籍船舶为对方运输武器弹药之事予以禁止或限制。

这样的措施，受害较多的，则是依赖自海外输入军需品的中国。于是，国民政府乃立即向美国提出抗议，同时，蒋总统并以行政院院长立场于九月二十四日在南京接见外国记者，要求美国转换政策如次：

‘中国此次抗战，不仅攸关中国本身之存亡，且亦为九国公约及国联盟约伸张正义。因此九国公约签字国及国联会员国均应遵守其义务，对于中国之奋斗加以援助。尤其美国为华盛顿会议之召集者，而九国公约及国联盟约之订立，胥属美国之力，故其责任尤为重大。’

这一天，刚好在北平西南方的要邑-保定被日军攻陷，记者们发问：“中日战争会要经过多少时间？”蒋总统答以：

‘中国抵抗日本之侵略，并无时限。在日本侵略继续进行中，战争势难中止。中国已不能容许日本军队之以压力加诸中国，故战争期间之久暂，全视日本及列强之态度。

‘不论此次战争延长至何日，中国已有无限制抵抗之能力，因中国实一潜力无穷，财力无尽之国家也。日本对中国海岸之封锁，或将给予他国极大打击，但于中国则影响极微也。’

国联断定日本违约

另一方面，接受了中国控诉的国际联盟，乃于九月十日召集第九十九届行政院会议。此时，已经是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后的两个月。以中国代表身分出席的驻法大使顾维钧，向国联秘书长提出申请书，请求国联采取适宜而必要的行动。

虽然日本已经退出国际联盟，但行政院还是接受了中国的要求，决定将中日问题交付二十三国远东谘询委员会审议。

谘询委员会于廿一日开会，首先自日本飞机滥行扫射与轰炸问题开始讨论。

二十七日，该委员会通过对于日本滥肆空袭的谴责案。在该委员会审议过程中，顾维钧再三主张：对于日本的行动，应认定其侵略性；但英国等慎重派国家迟疑不决。

十月一日，日本明白摆出拒绝国际调处中日纷争的强硬方针，以示答复国际联盟所给予的谴责。于是，国联各会员国的活动都为之越发软弱。十月六日，在国联大会中所通过的决议，虽然断定日本违反公约，但毫未提及抑制措施，而只是表示“对中国给予精神上的援助。……”

罗斯福斥责侵略

但美国之转为强硬态度，则是在这个时期。

十月五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演说，将侵略行动譬喻为传染病之蔓延，呼吁为防护国际社会之健康，应加以隔离；并且指出：世界上有百分之十的人极其好战，干涉他国内政，侵入他国领土，正逐渐在破坏世界秩序与国际法律。同时强调：“任何国家不能孤立于危急的世界情势之外，爱好和平诸国之和平意愿必须明白表现，以期彼冀图违反现行条约与他国权利之国家幡然改变其行为。”——显示美国将脱离孤立主义。

就是以这个演说为契机，自由诸国对于日本的“制裁论”乃为之勃然兴起。

由于美国政策突然转变到和过去的方针大有差距，以致英国等方面甚至有“罗斯福总统失言”的论评。

日拒绝国际会商

国际联盟大会的决议，虽没有具体涉及对日本的制裁问题，但却提议召开九国公约会议以资商讨。这和美国之脱离孤立主义同样地对于在国际旁观情况之下的中国而言，总是一个希望。

接着，美国更于国际联盟大会作成决议的十月六日，由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指斥：“日本的行为，违反了规律国际关系的原则，抵触了九国公约与非战公约。”

‘此皆于我精神助力甚大；惟以军事局势不能转入主动地位为可虑耳！’（蒋总统十月七日日记）

另一方面，日本对于国联大会的决议则毫不尊重，且于十月九日发表政府声明，表示：“事变之发生，只是由于合法演戏的日军遭受攻击而行使其自卫权；对日本挑衅的中国方面，才是违反了非战公约。”——藉以责难国际联盟和美国。

九国公约会议

九国公约会议，决定于十一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会。十月十六日，比利时政府对包括中日两当事国在内的最初签订公约之九国和在后来继续参加的国家共计十九国，以及未参加签约的两国（德国、苏联）发出邀请书。

中国政府立即决定出席，但日本则经十月二十七日的内阁会议决定不参加，并以“关于中日两国纷争他国没有干涉的权利”而再度发表声明，其大意如次：

“国际联盟根据中国片面虚伪报告，通过了支援中国奸策的决议。此次受到邀请的九国公约参加国，当然要受国联决议的约束；是则日本即或参与会议，也难期有公正妥当的结果。包括有和东亚毫无利害关系的国家在内之此一会议，会徒然刺激中日两国的民心，反而使事态益趋纠纷。”

日本并且同时要求德国杯葛此一会议，德国遂亦决定不参加。

十一月三日，九国公约会议开幕，于是到会的参加公约国家除日本之外有十八国以及未参加公约的苏联一国计十九国。

会议一开始，便由美国代表戴维斯发表演说：“中日两国的冲突倘越发扩大，则世界和平将大受危害。美国政府考虑应由参加各国共同努力，觅致适当方法，以维持远东和平。”同时，英、法、俄代表也都赞成美国代表的见解。

义大利袒护日本

但唯有意大利代表却发言袒护日本：“没有日本出席的九国公约会议，纵使作了维持和平的协议，但也不能顺利推行。现在，我们所能做的，是只有邀请中日两国直接交涉。”义大利是由于刚刚决定参加“日德防共协定”（十一月六日签订）为了维护“日德义三国轴心体制”，故而预先和日本协商好了在会议席上做日本的代言人。

九国公约会议在开幕之后，决议再度向日本发出邀请书，要求日本翻然转念。但日本则以“没有再度考虑的余地”而又予以拒绝。

此时，更有一个使会议进行困难的因素，就是掌握着收拾事态关键的美国和英国之间的互相推诿。

英国希望和美国亦步亦趋，如果美国拿出强硬态度，则英国便会跟随上去。

可是，美国罗斯福总统则对其代表指示：“不必采取主动”；因为在美国国内，工人们反对罗斯福的“隔离演说”，发动了“不介入战争”的请愿，故有其困难情势存在。

可见美英两国都不愿意介入纷争。

对日宣言语气软弱

十五日，九国公约会议通过了如左的对日宣言，而其内容则有意避不提及日本是否违反公约的问题。

“中日两国现在之敌对行为，影响到各国之权利及物质上之利益，全世界对之均有一种不安之忧虑。

“各国代表仍信当事双方倘同意停战，俾乘机试行解决，或可达到成功之目的。中国代表团具有此种准备；但对于日本坚决拒绝讨论之态度，各国代表殊难理解。

“国际公约之一方（日本），如固执其与所有其他签字国相反之见解，则各国对之不得不考量其共同应取之态度。”

这样的宣言，是不能使中国满足的。

‘九国公约会议宣言，虽语气软弱，仍不足为虑；其后，共同行动必能实现也。’（十一月十五日日记）

十一月二十四日，九国公约会议最后集会，中国代表顾维钧对于会议没有获致满意结果即席提出抗议。

此时，淞沪方面的日军已在向南京进攻中，各国代表无词以答，只有法国代表喃喃地说：“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

中日问题攸关世界和平

‘自九一八以来，不幸各友邦未能充分发扬各国际公约之实效，制止日本之侵略，以致在东亚则侵略战争日益扩大；在欧洲则受东亚之波动，而崇尚武力侵略之风遂亦大起，今日欧战之发生（德国进攻波兰），其受东亚之影响者，盖甚大也。

‘中国具有世界四分之一之人口，实为世界和平之一大柱石，尤其东亚未来之治乱兴衰，全以中国为其枢钮，深望英美法苏各国当认识中日问题实为世界之中心问题。’（注）

注：蒋总统-“出席国民参政会以四事昭告中外”（一九三九）

英德从中调停

日本也正在摸索“和平之路”。

话虽然可以这么说，但是，日本所指望的“和平”却并非是“有好的和平”。他的目的是要在停战议和中迫使中国让步；他之所以顽固地拒绝九国公约会议，坚持两国直接进行交涉，乃是认为这样才可以强迫中国屈服，于己有利。

最初，有意在中日两国之间担任鲁仲连的，是英国。

在华中持有颇多权益的英国，殊不愿在上海乃至长江流域的战火扩大。

广田的个人意见

当一九三七年九月，淞沪战争越来越激烈的时候，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即向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探询日方的谈和条件。

广田答以“个人意见”为：（一）在天津、北平一线以南设非武装地区。（二）停止排日、侮日。（三）共同防共。（四）在华北方面对外机会均等。

这个“广田个人意见”，由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于十月初传达中国方面。

然而，由于日本军部的反对而将之立即打消。因为日本军部以英国也和美国一样都是中国的友好国家，颇予敌视；甚至为此扬言要把委托英国调停的广田弘毅“宰调”。

不过，在日本军部之中，有根据日本军事力研判、对于一举而将战线扩大以致感到不安的人，也并非少数。尤其是以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等人为中心的“不扩大派”，基于确保对俄战备的观点，希望只要是可能的话，不妨通过交涉使对于中国的战事告一段落。

是故他们乃着眼到自从“日德防共协定”签订以来，和日本迅速接近的德国。

首先，由参谋本部第二部德国股的马奈木敬僧中佐通过德国驻日陆军武官奥特对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有所策动。当时的德国，是以苏联为其主要的假想敌，他认为如果中日战争长期化，则必然会把中国逼到和苏联一条阵线，结果则于德国不利，故而早日结束战争也正为其本身之所希望。

于是，马奈木乃陪同奥特赶到上海，直接向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说明日本方面的意图。

日本的所谓议和条件

经过这样的工作之后，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乃于九国公约会议即将开幕的十月二十一日约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正式表示希望德国或是义大利斡旋和平；继之，更于十一月二日将下列议和条件告诉狄克逊：

“一、在内蒙古组织类似外蒙古的自治政府。

“二、华北不驻兵区域，须扩大至平津铁路以南，缔结和约时，华北行政权仍全部属于中央政府，惟希望委派一个亲日的行政首长；如现在不能缔结和约，而华北又有了新政权，则应该让他存在，但截至今日止，日本尚无在华北设立新政权之意。

“三、上海停战区域须更扩大，由国际警察管理。

“四、停止排日，依照一九三五年川越茂向张群提出的要求办理（修改教科书等）。

“五、共同防共。

“六、减低日本货进口关税。

“七、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

以上议和条件，由狄克逊转达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所谓“陶德曼调停工作”于焉开始。

蒋总统严正表示

十一月五日，蒋总统在南京接见陶德曼，向之表示不能受理日本所提出的议和条件，并告知中国方面为进行和议的必要原则如左：

‘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中国如同意日本的要求，国民政府将会被舆论浪潮所冲倒。

‘日本正在执行错误的政策——现在不对中国采取友好的态度以奠立日后的友善基础，却但顾提出要求。假如日本继续作战，中国也不会放下武器。

‘假定国民政府因日本采取的政策而倾倒了，则结果是共产党在中国占优势。

‘中国不能正式承认收到日本的要求。因为中国正是布鲁塞尔的九国公约会议各国关切的对象，各国是要在九国公约的基础上觅取和平的’

陶德曼乃表示：“我现在的步骤仅仅是极秘密地同志中国政府。”于是这一天的谈话便到此结束。

这一次会谈的结果，由狄克逊于十一月七日转达广田弘毅；同时，陶德曼向德国政府报告：“南京方面反对妥协，但主张由英美调停，先成立停战协定。”说明了依据日本提案的议和希望甚微。

可是，九国公约会议对于日本之侵略中国，则并未能决定有任何具体措施而闭幕。并且另一方面，在华北，则太原沦陷；在淞沪，则由于日军自杭州湾登陆而迫使中国军不得不为之转进。

此际，广田弘毅判断正是日本诱引中国议和的有利情况，乃再度促请德国进行。

于是，陶德曼即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与业已迁移汉口办公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晤面，接着在二十九日与外交部长王宠惠会谈，提出日本的议和条件并作试探之后，要求“再次和委员长（蒋总统）见面”。

蒋总统乃姑且答应接见。

‘为缓兵之计，不得不如此耳！’（十一月二十九日日记）

日提苛刻要求

在蒋总统和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第二次会谈之前的十二月一日，德国外交部长牛赖特向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劝说：“为中国利益着想，不宜拒绝日本的和平提议；如果迟延下去，中国国家解体的危险也会越大。”

十二月二日，蒋总统在听取了外交部次长徐谟的报告之后，召集军事长官会报，征询对于日本军部所提和案的意见。

在会议中，白崇禧、徐永昌、顾祝同、唐生智等人表示不妨同意进行交涉，遂即决定了两项原则——（一）不拒绝德国的调停。（二）华北政权须要保存。

当天下午，蒋总统与陶德曼第二次会谈，特别指出以下几点：

‘——中国政府愿以德国所提出的各点作为谈判的基础。但我们有两个极重要的条件：（一）在恢复和平的全部过程中，由德国通过调停予以帮助。（二）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

‘——在敌对行动继续进行的时候，是不可能进行任何谈判的。假如贵国总理向中国和日本提议停止敌对行动，中国愿意接受。

‘——在谈判完成以前，一切不要公布。

‘——虽然贵大使提出来的各点可以做为谈判的基础，但不能被认为是像最后通牒一般地不可改变。’

陶德曼在告别时透露出“能有希望”的口气。

‘倭寇对德大使所提调停办法，以我不能屈服，彼已决绝乎！’（蒋总统十二月六日日记）

十二月七日，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遵照其本国政府训令，将所颁自十一月二日至十二月二日的调停经过备忘录，递达日本外相广田弘毅。这是德国要在调停开始之际依据中国所表明的条件，询明日本方面有无进行谈判之意。

日本图藉军事压力

未料，广田弘毅却表示出“是否还能以一个月之前的条件为基础来进行谈判，颇成疑问”的态度。因为在这一个月之间，日军已在杭州湾登陆，攻占南京将在眼前，故而有藉军事优势的气焰以加重条件之意。

此时，认为胜算在握而志得意满的日本，对于列强也摆出了威风～～十二月十二日，在芜湖的长江上有英国军舰“瓢虫”号及其附近的商船受到日本陆军的炮击；又在南京的长江上流有美国军舰“潘纳”号也被日本海军飞机炸沉。

（民国二十六年自由人注）

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十四日在日本策划之下的新的伪政权——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后面续有叙述），出现于北平。

此时，认为胜算在握而志得意满的日本，对于列强也摆出了威风～～十二月十二日，在芜湖的长江上有英国军舰“瓢虫”号及其附近的商船受到日本陆军的炮击；又在南京的长江上流有美国军舰“潘纳”号也被日本海军飞机炸沉。

亡人之国的新条件

在日本方面，为研商加重议和条件，自十四日开始举行日本政府和大本营（十一月二十日成立）的联络会议，与会的内务大臣末次信正、陆军大臣杉山元、大藏大臣贺屋兴宣等人都陆续提出新条件，旋即依据这些意见于二十一日的内阁会议中决定四项新的要求如次：

一、中国放弃容共、抗日、反“满”政策；与日、“满”两国合作，实行反共政策。

二、在必要地区设立“非武装区域”，并在各该区域分别设立“特殊机构”（政权）。

三、日“满”中三国之间缔结密切的经济协定。

四、中国对日本给予必要的赔偿。

这简直就是一种亡人之国的苛刻要求。狄克逊在由广田处接获这四项条件之后，甚至也曾慨叹地表示：“照这样的话，将不可能有达成交涉的希望。”

绝无接受余地

上述条件经由陶德曼于十二月二十六日转达中国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

‘倭新提条件如此苛刻，决无接受余地。’（十二月二十六日日记）

翌日（二十七日），孔祥熙对陶德曼表示：“日本提出了可以说是无所不包的条件。日本也许要十个特殊政权和十个非军事区，没有人能够接受这样的条件。日本应该想到将来——会自取灭亡的。”其意在希望日本知所反省。

遗憾的是，对于日本这样的活动，在中国方面也出现有迎合的动向。盖由于军事上的连续后退，以致在党和政府内部感到恐慌因而寄望于和谈的人并非少数。这些情况，则反而会给予日本以可乘之隙。

‘近日，各方人士与党中重要负责同志均以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殊不知此时求和，无异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而内乱益甚，彼辈只见其危，不知其害；不有定见，何能撑此大难也。’（十二月十六日日记）

及至接到日本的四项苛刻条件之后，都还有人在二十七日举行的最高国防会议中主张谈和。

‘今日除投降外无和平，舍抗战外无生存，彼等实昧于大势，不知国家利害，此革命之所以未能成功而一至于此也。’（十二月二十七日日记）

为此，蒋总统乃于正在感冒发热的二十八日仍然约集汪兆铭、孔祥熙、张群等主要同志在寓所会谈，以谋统一意见。此时所得一致的结论是：对于日本所提条件一概不予理会。

我坚拒日方条件

一九三八年元旦，中央机构改组，蒋总统辞卸行政院院长兼职，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建立了使能尽其全力领导抗日战争的体制。行政院院长则由副院长孔祥熙升任，并以熟悉对日关系的张群继任副院长。

断不作依赖谁何之想

‘国之祸患，有隐有急——倭祸急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

‘国际正各自扩张军备，而表面则竞言和平。当此之时，我人对于外交，断不宜作依赖谁何一国之想，务必力图自存自主。’（元旦日记）

这是面临了在中国五年年历史上空前未有之危机时代的新年感想。

由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非正式地转达日本四项条件的补充说明给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也就是在元旦之夜。实则所谓“非正式”的转达，在后来发生了问题。

补充说明的内容是这样的：

第一项，首先是要中国承认“满洲国”，并表示有积极排除共产党的证据，不过并非要求中国参加防共协定或废除中苏不侵犯条约。

第二项，所谓“非武装区域”，是指：内蒙、华北、上海附近已为日本占领区之一部（约为自市区至湖沼之地段）等三个区域。所谓“特殊机构（政权）”则为——内蒙方面，须具有和外蒙相同地位的“自治政府”；至于华北方面，就连转达要求的陶德曼本人也不明了日方的意图；而上海方面，则是在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以外之地区设立“特殊政权”。

第三项，关于经济协定一节，是指关税与商务方面。

第四项，所谓“赔偿”，一部份为战费赔偿，一部分为日本财产损失的赔偿；又日本军的占领费用亦须由中国负担。

此外，关于停战一事，日本参谋本部更主张：由中国派遣代表赴日本议和；须俟提出相当保证之后，始可考虑停战。

与其屈而亡不如战而亡

这是一再加重的亡国条件，中国方面当然只有严峻拒绝，并以中华民族四亿人的鲜血来捍卫国家。

‘倭寇所提条件，等于征服与灭亡我国；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当即严词拒绝作答。’（元月二日日记）

“元月”为民国二十七年

元月九日，据报导——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在上海发表谈话：“国民政府未有和平交涉之意，现在情势须考虑两点——即压迫国民政府与树立占领地区之新政权。恐怕日本将会否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中央政府。”这正自表明日本的真实意图是在扩大侵略，而流露出急切盼望中国“拒绝议和”的语气。

及至十一日，中国方面又接获报告——日本内阁和参谋本部连日举行联席会议及紧急会议，研讨长期对华侵略政策。

‘倭今始知对华战争非长期不可乎？祇要我能抗战到底，则国际形势终必转变，倭寇终必失败。’（元月十一日日记）

十二日，陶德曼再度访晤王宠惠，询问对于日本的答复已否决定。

这个时点，在前面所提到的补充说明之“非正式”转达方式就有了问题。盖日本是要在未经正式向中国提出补充说明的情况之下就要中国接受他的四项条件，这是外交交涉上未见先例的卑劣手段；是要含含糊糊地先将四项条件强迫中国接受，然后再运用补充说明任意需求的一种阴谋。

王宠惠当即答以：“如果日本政府将详细办法正式通知我方，则可以考虑答复。”陶德曼乃表示：“恐怕日本方面不会将细节明白表达。”继之，并透露来自东京的情报——日本军部坚持须中国迅速有明白答复；如果中国的答复不能为日方所满足，则其稳健派将会屈服于急进派。御前会议也许会决定对中国宣战，否认国民政府，承认北平傀儡政权以及继续军事行动等问题。

王宠惠与陶德曼的会谈，在第二天的十三日又连续举行了两次。

在正午稍过的第一次会谈中，陶德曼提到：日本外务次官堀内谦介于十二日要求德国驻日大使馆转促中国政府急速回答；同时并有：“倘在十五日之前仍无回答，日本政府则须保留自由行动。”可见东京的空气已告逐渐硬化。

德使调停到此为止

下午四时二十分，第二次会谈。王宠惠宣读了一份备好的文件，指出在这个时点中国政府所能表明的态度是这样的：

“……经过适当考虑之后，我们觉得：改变了的条件太广泛了。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提出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仔细研究，再作确切的决定。”

总之，就是要求日本将详细项目作公式的通知。

陶德曼再将这份书面文件过目之后，表示出遗憾的神情问道：“这个通知就是答复吗？”

王宠惠说：“我方所要知道的是四项条件的内容。”陶德曼又问：“如果日方认为这是一种躲避的答复（ＥＶＡＳＩＶＥＡＮＳＷＥＲ），将如之何？”

王宠惠则明白地回答：

“如果我们有意躲避，又何必再询问其内容与性质？”

“陶德曼工作”就是到此为止。

日本自陷绝境

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的通告，由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转经驻日大使狄克逊从达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认为这就是“拒绝的答复”，乃于元月十五日（一九三八年）决定“陶德曼工作”结束。这也就是日本试图不经战争而使中国屈服的工作归于失败。

‘此一星期中，敌人以宣战、否认我国民政府与继续军事行动等等威胁逼迫，无所不至，可云极矣！以余视之，不值一笑。无论其出于如何举动，皆不能动摇我抗战之决心及最后胜利之信心。

‘彼求和不得、进退维谷之丑态，日益毕露矣！盍不早日觉悟，明言撤兵之为得也。

‘日本无政治家，无领袖，其国之危，亦可惜哉！’（蒋总统元月十五日日记）

国际惯例未之前见

元月十六日，日本政府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第一次近卫声明）如次：

“帝国政府尔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并期待真足与日本提携的新兴支那政权之成立与发展，俾与之调整两国邦交，以协助建设更生之新支那。……”

像这样不以一个国家的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又是在国际惯例上未之前见的行为，只有一句话可以形容——简直是发了狂。

‘此项声明，早在意料之中。彼倭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手，而未明言否认二字，此乃无法之法，但有一笑而已。

‘惟彼所谓“期待新兴政权之成立”，则意在扶植傀儡政权，以破坏我领土主权之完整。我当以严正立场昭告于世界也。’（元月十七日日记）

对于这个声明，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向日本外相广田弘毅表达“遗憾”之意，并且说明：“日本应负断绝今后交涉途径的责任。”

日本政府接着又在十八日对于有关上述“声明”发表了“补充说明”如左：

“所谓不以之为对手，是比否认具有更强意义。就国际法而言，只要承认其新政权就可达到否认国民政府的目的；唯由于可予正式承认的新政权尚未成立，特在国际法上开此新例--否认国民政府并抹杀之。”

国民政府遂即针对前述近卫声明向国内外发表指斥日本是侵略者的宣言如下：

“……日本不顾一切，调遣大批陆海空军攻击中国之领土，屠杀中国之人民；中国迫不得已，起而自卫，抵抗侵略，抵抗暴力。数月以来，中国未有一兵一卒侵入日本领土之内。……”

继之，在宣言中更对和平问题表明于次：

“中国和平之愿望，虽始终未变，……然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力以维持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同时，任何在日军占领区域内，如有任何非法组织僭窃政权者，不论对内对外，当然绝对无效。”

令召驻日大使归国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民国二十七年一月中日断交）

二十日，国民政府令召驻日大使许世英归国；二十八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也撤回日本。中日两国之间的协商途径，业已完全关闭。

就是这个近卫声明，使日本陷入泥淖，无法拔足；并使战争的主导权自此转移于中国，乃亦为日本方面之所自行承认。

‘敌人的兵力，总共预备了五十个师团来作基础，其中预定用在中国的是十五个师团，用以对付俄国的共三十五个师团。……但是现在用之于我国的正式部队，共有十六个师团，还有补充师十个师团，总共二十六个师团，可见他的兵力已经用尽，不能再派多的部队来到中国。

‘敌人预定的计划，就是想以少数的兵力在最短的时间一举而消灭我们的军队，迫使中国屈服，然后应付世界大战。……但我们发动全面长期抗战，……到现在他愈陷愈深了，他的兵力愈要作无限的消耗。……他原定的计划，已被我们所打破了。’（注）

二十四日，日本政府更宣布四点——“（一）不论在任何情况之下，日本均不与国民政府交涉。（二）日本为阻止外国军事援华，仍可对华宣战。（三）日本对华北之“新政权”居于监护人地位。（四）绝对不容许第三国出面调解。”

这么一来，日本已经把自己赶进了毫无缓冲余地的处境，也更增加了他的孤立情势。

‘敌国对华不许第三国干涉之政策，已明白宣布，故英法空言调和，决无效果。

二次大战迫近

‘二次世界大战之机日益迫近，吾人将在大战中准备如何牺牲，大战后之结果与我国之地位如何，均应预作详细之研究也。’（元月二十八日日记）

二月五日，蒋总统将在三年半之前的一九三四年七月于庐山军官训练团所讲演的“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讲词交付报章发表。在这篇演说里，除详述对付日本全面侵略战争的防御战略之外，并预言日本必定会吃败仗。

现在特予公布，正就是中国方面对于近卫声明最好不过的答复。

‘“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一篇讲词发表后，敌必对我恨入骨髓。彼梦想我屈膝之意可以休乎！’（二月六日日记）

注：蒋总统“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一九三八）

共党攫取机会

对于国家发生了“七七事变”的重大国难，在延安的共产主义者们，毋宁说是怀着喜悦的心情加以欢迎。

他们认为——对日抗战会使衰弱已达极度的中国共产党复苏；是让共产党能够扩张势力的好机会。

共党以抗日作幌子

共产党一直是在一个劲地高喊抗日，煽动群众；但其真正目的，则一如在前面已经提到的，就是藉“抗日”的幌子转移一般人的视线，以缓弛对于他们的追究。

果然，当抗日战争揭开序幕之后，共产党并不曾自动开上前线，而始终是在后面绕着弯子，施展其花样百出的阴谋。

现在，稍稍复按自七七事变爆发以后共产党的活动情形于后。

事变翌日（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共产党“中央”立即发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的通电”，向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及全国军民喊话，其大意如下：

“本月七日晚间十点钟，日军进攻卢沟桥中国军，……现在双方仍在战斗中。

“平津、华北有被日军武装侵略的可能，情势紧迫。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同日，共产党的头目毛泽东、朱德等九人联名对蒋总统发出电报如左：

“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已定步骤。……平津为华北重地，万不容再有丧失。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亡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惶恐待命。”

九日，又由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等人率领所谓“人民抗日红军”电呈蒋总统表明：“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这是蒋总统在西安事变之后接到誓言归顺的共产党之再度陈情，乃于自十六日起在庐山召集各界所举行谈话会中，召见周恩来晤谈，重新肯定共产党纳入政府的指挥之下。

在庐山谈话会中，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率先提议：“我们应该不分党派，团结在一起，服从蒋委员长的领导。”于是，到会人士全体签名发表拥护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宣言。此时，受到张伯苓征询意见的周恩来也签了名，并在旁边加上“拥护蒋委员长”几个字。

周恩来作小旦状

周恩来的字，有点像女性纤细的字体；会场中有些人晓得他早年在南开中学念书的时候，扮饰小旦，演过戏剧，便故意问他：“看你的字体，哪里像个多年革命斗士？这几年还演不演小旦？”于是，周恩来便站了起来，装模作样地扭了几步，引得哄堂大笑。

民国二十六年

七月二十三日，共产党“中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而毛泽东更在其演说中表白：“蒋介石先生在庐山发表了谈话（即七月十七日的最后关头演说），确定了准备抗日的方针，受到我们的欢迎。”

只从以上这些表面言动看来，好像共产党是具有诚意服从国民政府；但如果回顾一下以往的实例，则是不能安心寄予信任的。

‘共党思乘对外战争之机会，发动其阴谋，当设法防制之。’（八月十三日日记）

阴谋破坏统一团结

这个不安，果然未出意料之外，直到后来才得明确了解——实则共产党早在八月十二日就在其党内传布了“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阴谋破坏国家统一和团结，其要点是这样的：

“一、利用一切旧政权的武装组织形式——如民团、保安队、壮丁队、义勇军等，实行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取得其中的指挥地位。

“二、共产党员应该以抗日积极分子的面目参加到政府与军队中去，并取得其中的领导地位。

“三、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场所都不能放弃同各党各派的斗争。

“四、用一切方法争取党的公开与半公开，但同时应该巩固和扩大党的秘密组织。”

共产党这些秘密指示，对外一字不提；及至淞沪抗战开始两天的八月十五日，更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对日绝交、驱逐日本官吏、逮捕日本间谍、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否认对日外债、收回一切日本租界”等项，助长其声势。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接纳了共产党的希望，于八月二十二日给予共军主力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番号，纳入了政府编制之下。

第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任命朱德、彭德怀担任。其兵力二万人编为三个师——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第一二○师师长贺龙，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该军划归阎锡山指挥，开赴晋北战线。

此后，复于十月继续将在江西地区的共军游击部队编为新四军，军长叶挺，隶属顾祝同指挥之下。

共党“一分抗日”

共产党的朱德与彭德怀，在就任新编入政府军序列的第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之八月二十五日发表通电，再度矢誓忠诚如左：

“奉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任命……遵即将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部队现已改编完毕，东进杀敌。德等愿竭至诚，拥护蒋委员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

这个电报，照例又是信口诓骗。

阳奉阴违的八路军

在同一天，发表上述电报之前，共产党“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于陕西洛川。此次会议中，讨论了第八路军如何改编的问题。

周恩来与朱德认为：“应该接受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薪饷补给，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照政府军的编制和制度加以改编；并应有限度地接受军事委员会派遣的参谋人员。”

而毛泽东和任弼时则主张：“名称虽然改变为第八路军，但一切组织仍维持红军原有制度；并拒绝军事委员会派人前来，以保障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权。”

争论的结果，作了一个妥协的决定——形式上照政府军制度，但红军政治部组织与职权仍旧维持原状，执行对军队的监督指导。至于军事委员会派来的参谋，可使常驻延安，担任联络，但不接受其进入部队。这就是说政府的经费可以接受，而不能接受管理。

另一个重要的决定，是在山西方面的作战方针问题。

朱德以为：应在军事委员会统一的战略意图之下，与政府军并肩对日作战，以逐渐扩大八路军的影响。

可是，毛泽东则唯恐和日军正面作战消耗兵力，故而主张：“今后第一要义——就是要全力壮大自己。至于作战地区和范围，不必受战区之限制，不能打阵地战，而应分散钻隙转入敌后，进行游击战，努力发展根据地。”

此时，毛泽东曾强调：“国民政府的抗战，必然失败；所以，共产党现在对于国民党不应再有任何让步，必须在统一战线中采取独立自主的政策，积极夺取领导权。”

基于毛泽东的主张，共产党中央所秘密指示八路军的战术，乃和上述朱德所发表的通电内容大不相同。这个指示大致如左：

“进入山西之初，应按照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和战区之战略意图统一行动，争取若干表现，以扩大宣传和影响；但当日军进攻过来，战局逆转与混乱时期，应即采取单独行动，以山西为基地，分散向河北、山东、河南、热河、绥远、察哈尔，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在敌后争取民众，扩大武力，建立根据地。”

避免和日军正面作战

共产党这一种表面上呼号“抗日”，但实则避免和日军正面作战，而潜入地下致力发展组织、并对国民政府予以掣肘的战术，在自此之后的抗战时期，是一贯地在进行着的。

“阳奉阴违”的共产党，更以周恩来为窗口进行着伪装的投诚工作。九月十二日，为着和政府联络需要，在南京设立共产党办事处，叶剑英为处长，布置了伸向中央的端绪。

（民国二十六年自由人注）

九月二十二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准许共产党投诚效命，同时将共产党在此之前所提出的“共赴国难宣言”予以发表，政府并表示接受。在这个宣言中，共产党向政府提出四项诺言：

“一、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政府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翌日（二十三日），蒋总统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依据共产党的宣言发表了谈话。这篇谈话的内容在本书第一章“战争结束前后”中业已提到（请参阅单行本第一册第六十九页），那就是“不咎既往，给予效忠国家的机会。”

由于国民政府采取如上所述的一些措施，于是共产党乃开始获得了公开的立场。

这次的“公开化”，就是共产党所谓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据共产党方面的资料--“共赴国难宣言”，是于七月十五日在庐山向国民党提出，国民政府则于九月二十二日将之发表。

毛泽东的阴谋策略

然而，想不到这又是毛泽东对国民党所布下的一个骗局——就在九月二十六日，朱德率领第八路军从陕北出发时，毛泽东召集该军连长以上干部讲话，指出：“中日战争，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毛泽东并在当时表明了对于国民党的阴谋策略，分为：妥协、竞争、反攻～～三个阶段，以期逐渐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

平型关之役真相

毛泽东的意图，在“共赴国难宣言”发表之后，由八路军政治部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四日编11[118]2492发的“几个问题的解答”油印小册子中表现得很明白。

“问：国共两党重反合作的双方让步，事实是怎样？

“答：国民党改变过去的政策，作了最大的让步；所以共产党就给予他们停止推翻国民党的武装暴动等几项保证。这种让步，我们（共产党）并没有吃亏。说共产党是投降了国民党的人，不过是汉奸亲日派的造谣与破坏联合战线的阴谋。

“问：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是不是变成了国民党的军队？

“答：红军虽然在名义上是改变了，但实际上还是照红军一样的办法，仍然是共产党的领导，外面虽是白的，内面还是红的。

“问：为什么要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

“答：并不是拥护他个人，而是拥护他实行抗日主张。假使他不抗日，那我们还要打倒他。”

攘窃政府军抗日战果

又在此际，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更开会商讨“抗战前途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问题”，展望中日战争结果，作了明晰凸出专为共产党自私自利而逞其谋略的决议，其内容如左：

“抗日战事如果胜利，国民党军队的实力将减为最小限度；同时，红军的势力将不断扩张11[119]2493。所以抗战的胜利，就是达到‘十月革命’胜利的途径。

“如果抗战失败，中国分为三部份——日本占据东北和华北，国民党占据西南，共产党占据西北。

“如果战事全部失败，国民党将全部崩溃，共产党将变成一个地下政党。

“在中国政治上，武力是决定的一个因素。我们在抗战期间，必须尽力扩张武力，俾能建立夺取革命领导权的基础。”

注入了如此毛泽东思想的八路军，当然便不会认真地从事抗日战争，而只顾攘窃政府军抗日的战果，极力为他自己宣传。

在山西五台山东北的平型关战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九月中旬，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由察哈尔南下，进迫为晋北门户的平型关。

在平型关迎击日军的中国军主力，是属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第十五、十七、十九等各军；而林彪所指挥的第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则为协同政府军参加右翼战斗序列，是共军最初参加对日本军队的战争。

二十三、二十四两天，配属有战车部队的日军自正面向平型关口、团城口以及东跑池西北高地严阵以待的中国军挑启战端。中国军第十七军之八十四、七十三师等部队奋勇抵抗，利用山岳错综复杂的羊肠曲径，自左右两翼合围日军主力，给予严重打击。此役，中国军对抗优势日军，艰苦奋战，遏阻住敌方攻势；战事持续到三十日，才转进五台山、代县之线。

掩袭一个辎重队

可是，由林彪所率领的第八路军一一五师实则并未在主战场的正面露面，而只是潜伏于平型关右翼山区，当二十四日凌晨觑准了日军主力倾巢出动之后，才掩袭留守在蔡家峪和小寨的日军辎重队，使之稍受损伤，便宣称业已达成目的而退却。

然而，林彪竟然藉此夸大宣传，向上面报告“歼灭敌军步兵一营，破坏其车辆八十辆”；而第八路军参谋处则更立即于二十六日向全国通电宣扬一一五师“战果”说：

“第八路军在晋北平型关和万余敌军激战，反覆冲锋，将进攻的敌寇全部击灭。”

就是这样地把一次出击说成是反覆攻击；把敌军一个辎重队变成了师团级的大部队。

这个电报，刊载在全国报纸上，使一般不明真相的国人认为平型关的胜利，只是共军立下战功。

‘共产党之投机取巧，应切实注意；然此辈不顾信义之徒，不足为虑，祇要晓之以利害，动之以正义，则可矣！吾当一本以正制邪、以拙制巧之道应之。’（蒋总统十月二十五日日记）

据日本陆军“北支那作战史要”记载：在平型关被林彪的八路军袭击之日本军队，为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所属混成补给部队约五百人。覆灭之后，只剩下了几十个人。

此后，第八路军对于中央命令置若罔闻，且擅自行动的情况，日益显著，成为贯彻执行抗日战争行动上的一大障碍。

极力渲染远离史实

及至战后，共产党更极力将平型关之役乃至于其他抗日战役渲染成就像是只有共军在打仗。根据他们的宣传——“共军担任对日军作战百分之六十九，对汪伪军作战百分之九十五，大小战争超过十二万五千次；歼灭日军及汪伪军一百七十一万多人。”这完全是一种“创作”。

据留下的正式战史∶中国国军和日军的战役为∶小战斗三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重要战斗一千一百十七次；大会战二十二次，合计达四万零七十次；但第八路军所参加的战斗，则只有平型关这一役（一个师）及一九三八年春间的晋南游击战（两个师）。此项史实，在联军参谋长魏德迈的报告中也曾加以确认。

‘……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致敌之死命。……

共产国际的操纵

这个期间，在幕后操纵着中国共产党的，照例又是共产国际。

当“七七事变”爆发之后，苏联虽然以签订“中苏不侵犯条约”及相约给予军事借款达三亿美元等行动来和中国接近，但揆其真实意图，则是出于为防日本进攻其本国（苏联）而谋一时于己有利的机会主义。

是故，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也就依循着同样的路线；他们在表面上强调所谓“国共合作”，而实际目的，乃是要从内部钻天觅缝地破坏国民政府，以谋扩展共产党的势力。

俄机送王明到延安

此时，中国共产党派驻国际的首席代表并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的王明（本名陈绍禹）遂被派返中国。

王明在淞沪战役接近尾声的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偕同陈云、康生、曾山等人乘坐苏联大型专机飞抵延安。这架飞机还带来了大型无线电台和高射炮等武器，受到共产党干部们的盛大欢迎。

面对着身为后台老板——共产国际重要分子的王明，毛泽东便矮了一大截。在当天晚间的欢迎会上，毛泽东致词，大捧特捧地说：“中国有句形容喜出望外的俗语，叫做喜从天降，今天王明同志乘飞机从天上飞来，不就是喜从天降吗？”

王明首先向共产党干部们转达了史达林的意旨：

“史达林说：毛泽东有许多缺点——如不懂马列主义，没有世界眼光，只以狭隘的经验来解决问题，指导革命。……”

用严酷的语气先出其不意地让大家吃一惊的王明，接着又说：

“不过，毛同志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所以史达林要由苏联派遣许多干部回到中国来，在理论上、思想上和其他各方面帮助他，并克服他的弱点，使他成为健全的领袖。”

继之，王明又对“中共总书记”张闻天和前任“总书记”秦邦宪等国际派分子的党内权力斗争，也有所评论。

“共产国际认为张闻天不适于任中央总书记，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曾任党的支部书记，结果全支部的党员都是托派；虽然没有事实证明他也是托派，但很难洗刷他本人的嫌疑。”

王明的意图，是要先踹住毛泽东的痛处之后，再把他捧为徒尸其位的领袖；然后把张闻天赶下台，让自己来控制党的大权。

在奉到了等于是“如果不听话，随时会叫你下台”之指示的毛泽东，当然就不能不屈服于凭藉共产国际权威的王明之下，像有关所谓“抗日统一战线”领导权的论争，就是一个例证。

当太原和上海先后于十一月九日、十一日沦陷之后，毛泽东便立即大肆抨击国民政府；并对于其“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态与作法表示不满。他诋毁：“国民党的抗日战争，不是全面抗日。”并说：“八路军也受到这种影响。八路军应拒绝国民党员来担任干部，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和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

这正是表现出对于国民政府“阳奉阴违”态度已逐渐有到此为止的倾向。

对于毛泽东的主张，王明等国际派分子则批判他是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他们强调：“今天改造时局的关键，是在于更加团结全民族的抗日力量。”

此一论争提出于自十二月九日至十三日在延安所举行的“政治局会议”。这个会议是自一九三四年元月中共举行“五中全会”以来最初一次有“政治委员”全体出席的会议。

王明的一套诡计

席上，王明报告：“我们当前的任务，在如何坚定国民党长期抗战的决心。”并要求：“（一）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拥护国民党在政府及军队中的领导权力。（二）在国民政府基础上，以谋加强为共产党所主张的统一的国防政府，但加强并不是改组。（三）在现有国民革命军基础上，加强与扩大统一的国防军。”

这个报告，虽则是对于毛泽东路线正面加以批评，而毛泽东却也不能不表示赞同，于是便得到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致通过。

基于这个结论，会议决定：“由驻汉口的共产党代表团（王明、周恩来、秦邦宪所组成）向国民党当局说明共产党目前的统一战线方针，以消释国民党及各方面对于国共合作的疑虑与误解。”

还有，在此次会议中，又为担任总书记的张闻天扣上托派帽子，将他降为书记。

十二月二十五日，共产党发表了副题为“巩固国共两党的精神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表示：“蒋介石先生告全国国民书中所提出的‘贯彻抗战到底’、‘争取国家民族最后之胜利’的主旨，与本党（共党）目前对时局之基本方针，正相符合。……共产党不仅诚意与国民党并肩携手地共同救国，而且决心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和衷共济地建国。……”

单从字面上看来，这个宣言是再次肯定其对于国民党的协力，而否定了毛泽东所提倡的“和国民党绝缘”的论调。

可是，共产国际的真意则并非如此，他们只是为了要把露骨的、急进的毛泽东路线浓妆艳裹地遮掩起来，并更进一步推动其“阳奉阴违”的政策，而又开出了一张照例不会兑现的空头支票。

共党的渗透

新年来临的一九三八年元月，共产党在汉口创刊机关报-“新华日报”，为其有力宣传武器，积极活动。

在这个机关报上，共产党反覆宣传：“有人诽谤我们和国民党的合作是伪装的，这是对我们造谣中伤。”

在另一方面，国民政府虽则接受了共产党投诚，但是对于是否容纳共党势力加入政府，则尚持保留态度。

而共产党方面，对此倒也并没有表现着急的样子。

此时，王明在和美国美联社记者谈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全力帮助国民政府抗战。当前并不要求参加国民政府。”接着，毛泽东依循这个说法更显露出全面服从的语调说：“我们共产党员虽然自己不参加政府，但我们对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绝对拥护。”

周恩来等作出归顺姿态

于是，周恩来以及叶剑英、秦邦宪、王明、徐特立等共产党头目，陆续来到武汉，表现出束身归队的姿态。

国民政府旋即决定接纳共产党员参加中央政治机构，并首先于二月一日任命共产党驻汉口代表周恩来为在军事委员会之下新成立的政治部副部长。部长为国民党员陈诚，另一副部长则为第三党的黄琪翔。

以此为发端，共产党乃通过周恩来的援引将其党员送入中央。

渗透共产党人最多的部门，是政治部第三厅（主管宣传业务）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像亡命日本归来而出任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和为该厅处长的作家田汉、科长的剧作家洪深等人，差不多都是共党分子或其同路人。

各地组织死灰复燃

共产党在各地的组织也开始复苏起来。本来自一九三四年被赶出瑞金之后，南方各省的共产党组织已被扑灭；但此际则以“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联络站”、“新四军通讯处”等名义掩护其组织，由延安派出干部，加强在大后方的活动，其地区则达于鄂、湘、川、黔、赣、粤、闽、浙、苏九省；又在华北各省日军占据区域内，也派遣有八路军的工作员潜入，从事对民众的赤化工作。

三月初，共产党在延安举行政治局会议，作了两项重要决定：

其一、为对预定在三月下旬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建议，于三月一日发出。

在这个建议中，共产党要求恢复所谓“第一次国共合作方式”，就是让共产党员保留其党籍而以个人身分参加国民党。这又是显示出要搞“党中党”的分化工作来侵占国民党。

第二、是大量发展共产党员的方针。规定在各地复活的组织应发展一定数量的党员，重点对象为吸收重要产业工人、知识分子，以及政府军内部的所谓“左倾军官”。像这样的“后方工作”、“军运工作”（破坏政府军工作）在其后抗战过程中一直继续不断进行下去，结果是煽诱民众反对政府，抵消了一致抗日的力量。

国民党推举总裁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中国国民党为期巩固一致抗日的形势，自三月二十九日开始在武昌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国民党确立了党的最高领导体制的总裁制。蒋总统被推举为总裁。

自此之后，蒋总统一直担任国民党总裁。去年，蒋总统逝世后，国民党中央保留党章的总裁一章。现在党内仍称蒋总统为总裁。

临全大会更通过：“确定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抗战救国的最高准绳。全国抗战力量应集中在本党及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奋励迈进”两大原则为支柱的“抗战建国纲领”。其中并决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

国民参政会发表宣言

（民国二十七年自由人注）

根据这个决定，新设国民参政会。六月十六日，由国民党中央发表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一百五十人的名单，其中为共产党员者有毛泽东、王明、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颍超七人。

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于抗战一周年纪念日的七月七日在武汉开幕，由汪兆铭担任议长。

蒋总裁以国民党总裁身分在国民参政会议演说，表明如下：

‘敌人之所以敢于轻视我国，其最大的理由，还不在军事方面；而是他看到我们国家内部不团结，政治不统一，没有形成现代国家的基础。……但是，现在已表现我们全国一致抗战的组织和行动，使敌人不得不从新认识我全国国民的力量已团结集中于政府指挥之下，来排除侵略，这实在给予敌寇以致命的打击。’

共产党方面，除毛泽东外其余六个该党党员都参加了国民参政会。他们都鼓其如簧之舌称赞大会成功，例如：“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亲密团结因此加强”（王明）。“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能比得上国民参政会的大会，奠定了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基础”（林祖涵）。

大会的最后一天（十五日），发表宣言，大意有：中华民族并不敌视日本民族，但对于暴虐的侵略者长期抗战到底，以达最后胜利。否认国民政府，就是否认中国国家；仇视蒋委员长，就是仇视全中华民族的国家意识。

‘国民参政会发表宣言，强调拥护政府团结御侮之诚意，此无异答覆敌寇一月十六日“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之声明，使其知所畏惧，亦可见我政治力量大增矣！’（七月十六日日记）

这是当共产党的阴谋尚在秘而未彰的情况之下，中华民国开始了“大同团结”的端绪。

□□□□□□□□□□□□□□□□□□□□□□□□□□□□□□

╭════════════════════════════╮║║║蒋介石对于芦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出席庐山第二次谈话会讲——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部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翼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

╭════════════════════════════╮║║║蒋公言论：准备全国应战║║║╰════════════════════════════╯

准备全国应战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八月一日在南京出席中央军校扩大纪念周讲——

各位同志∶

上周我们国家遭受了非常之大的耻辱，我们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们要拿上周蒙耻受辱的经过，作为今后奋斗牺牲的教训，所以今天特别要将这个道理，当这战争的时候，提出来和大家说一说。

我常常和大家说∶“平时要作战时准备，战时要如平时镇静。”“我们人生在世一天，就是战争一天，我们无时无刻不要生存，即无时无刻不在战争。”大家不好以为敌人飞机大炮打了进来，才是战争，在敌人没有打进来的时候，早就要作战时的准备。现在平津失陷，敌人侵略不已，国家已临到了战争时候，我们就要和平时一样镇静，格外加紧工作，并且人人要知道我们以往的准备不够，甚至有许多事情还没有准备好，现在最后关头已到，更要特别加倍努力，来补充过去准备的不足。

此次平津战争，我们佟副军长和赵师长督战阵亡，其余旅长团长以及下级官兵战死的，到现在为止，虽然还没有统计，但至少总在三千以上。似此战争不到两天，我们廿九军及各保安队官兵殉国的有这样多，实在是忠勇壮烈，但战争的结果不能不说是失败，这失败的原因在那里呢？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不讲信义，我们平津一般将领受了敌人的欺骗，以致缺乏准备，没有作战决心。明明敌人遣兵调将，要来占领我们的城池，驱逐我们的军队，却一再要和我们讲和，我们还以为他是有诚意的，遂不加紧防御坚筑工事，一旦敌人准备好了，打了进来，我军就不能持久应战，固守阵地，平津就是这样失掉的。这是我们最可痛心的一个教训。到了今天，大家一定要觉悟，不是日本灭亡我们，就是我们灭亡日本，我们再不能受敌人的欺骗，再不能以企求和平的苦心反而招致敌人的欺侮。今后我们只有全国一致，发动整个应战的计划，拼全民族的力量，来争取最后的胜利，以保障国家民族的生存。

我们要获得最后的胜利，第一、要有作战的决心。大家要知道这次战争，就是我们黄帝的子孙人人要救国自救死里求生的唯一最后的战争，我全国上下，无论男女老幼，官长士兵和全体民众，都要抱定牺牲决心，同仇敌忾，抗战到底。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只有共同一致与敌人拼命，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只要我们抱定作战决心，人人应战，处处抗战，不要说他们派一二十师的兵力，我们要消灭他，就是他再派多些军队来，我们都可以打败他。大家不要以为我们的武器不如人，就只有挨打而不能打败敌人，要知道锐利的武器，不过是现代战争要素之一，而正义与决心，才是最后战胜的精神要件。即如此次宛平城的一战，敌人以两营兵力来攻我不及本校地区一半大小的城池，打了两周还打不下，而北平天津两大重镇，敌人仅以两天的攻击，就陷落了，就可证明不是因为我们的武器不及人而致失败，而是我守宛平和守天津的指挥官，一有准备，一无准备，一有作战决心，一无作战决心缘故。我们知道了这个教训，从今以后就要人人抱定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随时随地与敌人拼战，我们要有不成功即成仁的牺牲决心，才能够获得最后无上光荣的胜利。

第二、要有充分的准备。古人所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战争有准备则胜，无准备则败。现在敌人侵略我们，如果我们政府人民都有了充分的准备，敌人必不得逞。反之，如我们准备不够，甚至毫无准备，则战争必归失败。我们在平时要有准备，到了非常时期，尤其要有准备，全国军民以及一般公务人员，人人要负责尽职，尽量准备，在这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一切工作要快当要紧张，一天要当作两天用，一分精力要有十分精力的效果，才能够充实抗战的力量，获得最后的胜利。大家要知道这次平津失败，就是由于我们的准备不充足；如果我们负责守土的军事将领，事先稍有准备，也不致失败如此之快。即如当初卢沟桥的战事，因为我们的指挥官，事先有了准备，无论敌人如何用大炮飞机来攻击轰炸，我们都能够坚守相当时期，使敌人攻不下来，由此可见准备的重要。又如此次平津战争，外边一般民众，不免怀疑到中央空军和陆军为什么不增加上去，这件事对外我们不必辩白，但我们政府机关学校一般官兵学生各同志，大家应该知道，所谓空军不是说能够飞行就够了，空军要有空军的组织训练和设备，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功的。我们在黄河以南的基本飞机场，已经尽了三年努力的准备，敌机才不敢成队飞到我们的领空上来，黄河以北，不仅地方政府平时毫无防空设备，就是中央要去训练空军，按地设防，也感受许许多多的困难，譬如敌人的破坏，便我们要准备也无从下手，就是一个证明。我们在黄河以北既无坚固适用的飞机场，中央空军要想北上作战，也不是万全必胜之策，为什么缘故呢？因为我们的飞机只有六小时的油量，即从徐州郑州加油起飞到平津一带，亦有四小时的航程，来往已赶不及，如何还能作战？并且空军作战，不是有一二架或十数架就可以济事的，至少要有五十架以上才能够发扬威力，所需汽油也不是几十桶或百余桶而能应急的，凡此机械化武力的设备，必须平时有充分可靠的准备，才能够收到冲锋陷阵克奏肤功的效果。当时平津的战事如果能够坚持到一二周的时间，我们的空军就可以出发前线来驱逐敌人的飞机，无奈平津的抗战不到两日即告退却，时间如此急促，如何能赶得及？由此大家就可以知道，战争的胜败不是决之于战争的当时，而是决定于未战之先，即在平时要有充分准备，我们这次平津的失陷，就是我们平时准备不够的结果。

说到陆军增援，我们在卢案发生的当时，就派了二十六路等各部队北上，这些部队到达河北以后，我们北方一般负责将领，以为此事还有和解希望，不仅不愿中央军队前进，而且希望后退，等到敌人通牒进攻，我们在保定的部队要想运输到平津前线；至少亦需三天，但不到两天，平津又告陷落，救援亦来不及，这也足以证明我们平时太缺乏准备。这些话我们不好为外人说，但我们一般同志应该痛记于心，切实反省，作为我们今后抗战救亡的教训。

第三、要有整个计划。这次平津战争失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负责将领，没有整个作战计划，人家以整个计划，发动整个部队来攻击我们，我们却以一旅一团去零零散散的对付他，因此我们要遭敌人各个击破，归于失败。如果我们当时驻冀察的军队，事先有整个计划，没有奉到命令，就坚守不动，一旦奉了命令，就勇往迈进，在战斗的时候，强者不燥进，弱者不后退，如此我准备十师兵力，就不难抵御二十师的倭寇，无论敌人如何进攻，我们都不怕他。可惜我们事前没有这个计划，卒使北方重镇的平津陷落到敌人手里，这个失败的教训，是大家要永记不忘的。

以上是说明这次平津失陷我们所得到的惨痛的教训，第一是无作战决心、第二是无充分准备，第三是无整个计划。今后我们要在政府一个命令之下，发动整个一致的抗战，必须牢记这些教训。全国上下，人人要有抗战的决心和准备，人人要在政府整个计划之中尽到各人的职责，达成一定的任务。尤其我们一般军政高级官长，特别要忠勇沉毅，淬励奋发，领导全体军民一致奋起，为生存而战，要与敌人持久周旋于疆场，来争取最后的胜利。

但是我讲了上面一段话之后，各位现在试反躬自问，究竟大家有无抗战到底的决心和计划。特别是有没有充分抗战的准备？敌人来了我们怎样办？敌人飞机大炮轰炸起来，如何使秩序不乱？敌人刀枪杀了过来，我们如何从容应战？我们如何指挥一般民众，来实行人人抗战，处处抗战？我们如何协同军队，整齐进退？我们一切有没有准备？我们如何能够使敌终究尽数歼灭于我们阵地之前？我可以代答一句，对于这些问题，大家恐怕都还没有十分把握，如此则战争必败，国家必亡。从今天起，希望大家一致兴起，切实猛省，根据过去失败的教训，激发自动奋战的精神，迅速充实各种必要的准备，将来在敌人飞机大炮轰炸之下，枪林弹雨射击之中，我们官吏学生和人民，都能够服从命令，严守秩序，从容赴敌，镇静应战，使战时一如平时安定，这就是我们全民族应战的精神，也就是取胜的最大力量。我们不要以为此次平津失陷而气馁，要知道一时一地的胜败进退，原是兵家常事，何况平津两地几年以来，久已在日本威胁侵蚀控制之下，敌人这次不顾信义，而尽诈伪欺骗的手饮，来对付我们北方一部份的将领，这种不义之战，不仅没有光荣，而且虽胜犹辱，在此一战，我们虽然牺牲了三千忠勇战士，但敌人亦至少战死二千以上，那就是我们死一人也得拼死他一人，如果我们今后真正决心与倭寇战争，我们一定可以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使敌人于正义人道之前，制止他们贪得无厌的侵略野心。

这一回平津失陷，我们一般无辜的同胞，受到敌人惨酷无情的残杀，田稼房舍，受到敌人的蹂躏烧毁，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竟被敌人夺去，我拥有四十年历史之文化机关的南开学校，亦被敌机炸成焦土，这些充分表示日本野蛮残忍的兽行，我们受了这样的奇耻大辱，将何以洗刷干净？将何以复此仇雠？将何以尽到后死的责任？凡属黄帝子孙，具有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的人，是必不能忘记，必能够为人类正义灭此朝食的。

我们廿九军这一次虽然失败退却，但他们在平津一战所表现的壮烈牺牲的精神，和卫国抗战的忠勇，实在不愧为中华民国的军人，他们虽然处在敌人重重包围之中，知道不免失败，但仍要勇敢的与倭寇拼一拼，他们忠勇爱国的精神，充分表现出来了。大家要知道，平津能够守到今天，已很难得，在两三年以前，以敌人谋我之亟，敌军已入幽燕之后，今日的平津，早应失陷于敌人之手，然而竟能在重重艰困挫折之中，保持我们的领土主权，作我们这几年后方建设的屏障，和国防准备的掩护，这实在是我们政府和人民共同一致埋头苦干的结果，尤其是当日廿九军自宋哲元军长以下，全体官兵忍辱含垢，苦心应付的功劳，是不可抹杀的。我们这一次的失败，是受了日本人的欺骗，但敌人诈伪欺骗的手段，以后再不能得逞。我们从今以后，要认定不是我们失败，就是他们灭亡，只要全国同胞大家照看我的一贯方针和精神，作继续不断的奋斗，日本人必不能灭亡中国，反转过来说，我们必定能够打败日本。在民国二十年的时候，我曾在此地对大家说过，我们一定要坚忍苦干，到民国廿五年，就是西历一九三六年，我们国家民族才有出路，所以在民国廿五年以前，无论敌人如何侮辱压迫我们，我们都要忍受。现在过了民国廿五年，到了廿六年的今天，国家已经有了整整五年的准备，我们的平津不但不能让敌人随便占去，而且要排去敌人的威胁挟持。现在敌人既然无故占去我们的平津，我们还不下最后的决心吗？还怕与他来拼战吗？我们现在的准备，当然不算充实，但是较之五年以前，我们的国力已超过二十倍还不止，只要大家从此下决心，拿平津失败作教训，在一个命令之下，共同一致，沉着应战，愈挫愈奋，愈奋愈进，持久不懈，拼战到底，我相信最后的胜利终属于我们的。

□□□□□□□□□□□□□□□□□□□□□□□□□□□□□□

╭════════════════════════════╮║║║中日初次之空战║║║╰════════════════════════════╯

《陈纳德将军与中国》陈纳德着，陈香梅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印行民国六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出版

第四章战争，战争

山雨欲来风满楼

星期天有一个台风的尾巴袭击上海，带来了暴风雨，于是这个流血过多的都市，才有一个舐敷伤口的机会。空战也转移到南京，那时日本的轰炸机都以台湾北部为根据地，他们的第一个任务是：在礼拜六那天炸毁杭州的空军学校。在这时候，他们的无线电就大事宣传说是炸毁空军学校之后就要轰炸南京了！同时又警告各国的外交使节，及早退出南京，以免受无妄之灾。

当时的美国大使是纳尔逊·詹森，他对于这些事最敏感。南京第一次发出警报，他就和外交人员下军舰躲避，因为他曾接到美国政府命令，叫他竭力避免卷入漩涡。所以他自然不敢稍事疏忽，以免被日机伤害。否则将违反了美国政府力求避免国际纠纷的本意，就难免受到华盛顿方面的责难了。

那时有不少的美国新闻记者到南京来，想看看日本如何威胁中国。我就在首都饭店的屋顶上为他们预备好一个很好的看台。有一天我们刚吃完中饭，第一声警报响了，这是报告说日机已自台湾出发飞向南京了。这时我们就在屋顶上，远眺四方，灰白的城墙，绿色满地的机场，紫金山麓下的中山陵，都历历在望。天气是闷热的，浮云离开地面只有五千公尺，中国的飞机，却在白云之上一万公尺的高空，看起来就像飞翔在花丛上的大蜜蜂呢！

从北面来的日本鸿炸机是双引擎，单尾的，共有十八架。他们窜出云层即将队形散开，直扑向目的区，机上装着的机关枪，不停的向各方扫射，距我们的头顶仅两千尺左右而已。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漆着红色太阳的银翼，这种肆无忌惮的态度，我相信不论任何联合国的机师见了都会惊异。他们对自己的战略这样自信，竟是藐视一切防御的样子呢！

这些日本飞机在轰炸了空无一物的飞机场之后，就不见了。看起来好像是消失在云端，毫未受损。于是同观的记者都转向我，现出轻视的样子，当我正在为他们解释说日机的袭击，得助于低厚云层的掩护时；忽听得一阵开足马力的引擎咆啸，其中又夹杂着重机关枪声。我们才回到旅馆的会客室，就接到中国空军总部的来电，说日本的七架轰炸机已被击落了！这个消息，使在座的美国记者群怀疑万分！于是我们就马上跳上汽车，上机场看个究竟。千真万确，出城只一哩，我们就看见三架轰炸机向上直冒的黑烟了！于是这些记者们才心满意足，回去写他们的新闻去了。我则继续数下去，结果找到八架被击毁的机骸。这时候，中国的战斗机环绕着城东飞翔，日本的轰炸机则窜入云霄，直向台湾而去。

其实在事实上，中国对于类似的袭击，可说是足堪应付。七月底，我已在南京、上海、杭州这三个恰成鼎足之势的据点装设了空中警网，保护首都。这是一个澳洲的电讯工程师麦雷，以老式的马斯威尔计划，利用电话和电报，助我装成的。这就是著名的中国空中警报网的雏形，后来发展到须雇用百万以上的男女工作人员服务来保护这自由的中国。这个装置，在南京上空，效用显著，使日机无法施展。

当我们逗留在南昌的最后期间，比利麦唐纳和威廉生曾选出一批杰出的中国机师，特地施以如何抵抗轰炸机的训练。这些日本人似乎都读过杜赫所着的书，并且完全相信上面所讲的每一句话。所以我们敢于肯定，日机来轰炸是不用战斗机保护的。日本的战略家们对于战斗机老是十分藐视，就像从前我在马斯威尔机场的同事们一样。可是我可以证明，不论杜赫将军，不论日本人们，不论我的老朋友乔治·威尔逊，以及华客诸人，他们都完全错了！路克与比利，训练中国空军时，是以我们的飞行技艺团的战术来训练他们的。就是说以三架战斗机来围攻敌机，一架在上，一架在下，第三架则养精蓄锐，以从事最后攻击。并且教他们对敌机不必太注意机身，而应注意对方的引擎，因为引擎一有所失，油箱就会起火，殃及机身。

日本轰炸机在五天之内来了三次。浓烟消失之后，有三队最好的轰炸机被消灭。～～五十四架飞机以及飞行人员。其中有四十架的残骸在中国境内陆续发现，其余的则都被损伤，狼狈飞返台湾。于是日本无战斗机护随的白昼轰炸就此告一段落。

◎上面是民国二十六年八月间，日本轰炸机没有◎战斗机护航，前来轰炸，日本轰炸机之损失惨◎重。◎下面是民国二十六年十月间，日本轰炸机伴有◎战斗机护航，前来轰炸，其情况如下所述：

《陈纳德将军与中国》第五十五页：

夜间轰炸损失几乎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这在日本人的眼光中，是一个颇为可观的损失。所以在这以后六个星期中南京一直相安无事。直到十月，他们又来了！这时我觉得他们已讨论研究过杜赫的学说了。因为这次是二十七架战斗机率领着九架轰炸机。他们的九十六型的单翼机，在十六架中国战斗机迎击中，打下了中国飞机十一架。这样他们就易于轰炸了。

╭════════════════════════════╮║║║南京保卫战及南京大屠杀║║║╰════════════════════════════╯

《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王秀鑫、郭德宏主编八十四年八月北平第一版八十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自由人购于美国洛杉矶。该书全部七百六十四页。

第二章全国性抗战的爆发第七节南京保卫战与日军的南京大屠杀第二○六页至第二一五页，节录于下。

╭════════════════════════════╮║║║南京保卫战║║║╰════════════════════════════╯

七、南京保卫战与日军的南京大屠杀

淞沪会战，中国军队苦苦支撑了三个月，最后不得不从上海撤退。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中旬，日军乘中国军队溃退之机，分三路向南京进逼，企图水陆并进，从东西两面合围南京，占领中国的政治中心，从而迫使中国政府投降，尽快解决所谓“中国事变”。

中国军队设置的三道国防线接连失守，日军节节进逼，南京的防守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南京保卫战。

为了解决南京的防守问题，十一月中旬蒋介石连续在他的陵园官邸召开了三次高级幕僚会议。多数将领认为南京易攻难守，日军利用其在上海会战后的有利形势，以优势的海陆空军和装备，沿水陆交通线前进，将南京置于立体包围形势之下，守是守不住的。但南京是国民政府首都，不作任何抵抗就放弃，当然不可。不过不应以过多的部队争一城一地的得失，只应进行象征性的防守。唯有训练总监唐生智主张南京非固守不可。他说，南京是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总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在最后一次会议上，蒋介石表示应防守南京。当问到由谁负责时，唐生智自告奋勇，并向蒋介石保证做到“临危不乱、临难不苟”，没有蒋的命令决支部撤退。

十一月二十日南京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军事委员会迁往武汉。二十四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

唐生智到任后，尽量要求增加兵力。蒋介石把可以调得动的兵力即调来防守南京。其中多是从淞沪撤下来的部队，共达十多万人。唐生智为表示破釜沉舟、拼死一战的决心，让交通部长俞飞鹏把下关到浦口之间的轮渡撤退。其后，又命驻浦口之第一军禁止任何部队及军人由南京北渡，如有不听制止的，可开枪射击。蒋介石在离开南京前夕，一方面于十二月四日召集守军师以上干部训话，要大家同心同德抱定不成功即成仁的决心，克尽军人守土卫国的神圣职责；另一方面，通国德国驻南京大使陶德谩出面调停，准备与日本谈判。

南京城的防守分为复廓阵地与外围阵地。复廓阵地以第八十八师任右地区雨花台及城南守备；教导总队任中央地区紫金山及城垣东部之守备；第三十六师任左地区红山、幕府山及城北守备；以宪兵部队任清凉山附近之守备。外围以第二军团在栖霞山、乌龙山占领阵地，并接防乌龙山炮台、封锁长江；第七十四军任牛首山至淳化镇附近防守，并向秣陵关、湖熟镇派出前进部队；第六十六军任淳化镇附近至风牛山之守备，并向句容镇附近派出有力之前进部队，构成半环形外围防御阵地。

十二月五日，日军已到达中国军队外围防线附近。当晚，日军第十六师约三个联队向第六十六军句容阵地正面进攻，并从土桥镇、牧马场两翼包抄，另以一部断六十六军后路。句容守军被围，与日军苦战，损失极大。六日敌军正面部队已经到宣城、秣陵关、淳化镇、汤水镇、龙潭一线的外围阵地。七日拂晓开始向主阵地发起总攻，南京处于敌军三面包围之中。

唐生智鉴于外围阵地已被突破，于八日晚下令各部队退守复廓阵地。当晚，日军向守军阵地发起攻击。九日拂晓突进至南京光华门外。中国守军在城北道路上配置了反坦克炮，在城门内配置了机关枪，并从城墙上大量投掷手榴弹。日军伤亡惨重，在自己的作战报告中说：“在血战三日的猛攻中，部下死伤颇多，疲劳困苦至极点”。

日军为掩护地面部队攻城，以六七十架飞机在南京城内外反复轰炸，投弹数百枚。总司令松井石根在当天用飞机掷下给唐生智的所谓最后通牒，劝唐投降。

对此，唐生智置之不理，拒绝投降，并于当晚下达命令：“一、本军目下占领复廓阵地为固守南京之最后防线，各部队应以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固守，决不许轻弃存地，动摇全军。若有不遵命令，擅自后移，定遵委座命令，按连坐法从严办理；二、各军所有船只，一律交运输司令部保管，不准私自扣留。”

十日，日军大批集结，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第二峰一线同时猛攻。在光华门附近，日军一支小的敢死队，为教导总队的工兵排所阻挡，展开了白刃战。

战斗愈演愈烈，光华门又复被日军突破两次，冲入城内的百余人，全部被守军歼灭。卫戍司令部令第一五六师前往通济门、光华门增援城墙防守。由于火力扫射不到已潜入城门洞圈里的日军，第一五六师挑选数十名敢死队员，由城墙上坠下去，将洞圈里的日军用手榴弹、汽油全部焚毙，并猛袭通光营房，将那里的日军全部驱逐，数十位壮士也英勇牺牲，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使光华门和通济门方面转危为安。这一次的激战，连敌人也不得不叹服。但是，就在同一天，雨花台的第八十八师右翼，由于日军冲击的猛烈，失去阵地前要点数处。教导总队紫金山第三峰阵地因较为突出，守军在日军陆空强大火力攻击下伤亡甚众，不得不撤守第二峰阵地。

日军鉴于进攻光华门、通济门的失败，十一日又以精锐部队猛攻中华门。中华门外的守军第八十八师，因日军飞机三五成群来回轰炸，被迫退入城内。日军紧接着跟踪冲来，使守军陷于混乱状态，来不及关闭城门，撤走云梯，竟放入约三百名敌军。副司令长官罗卓英亲至第一线指挥，在中华门一带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将攻入的敌人全部击毙，才得到喘息之机。同日，东线敌人猛攻紫金山；另以一支部队迂回偷袭大胜关至江心洲地区，向第七十四军右侧背射击，企图围攻守军后方，使通浦口之江面受到威胁。下午二时，第八十八师雨花台左翼阵地被敌人全部炸毁，敌军乘机突破守军；阵地；同时，第二军团因银孔山失守，与城内联络中断。

十二日从拂晓起，敌人的飞机、大炮密集地向各城门轰炸，坚固的城墙被炸的石块乱飞、四壁倒塌、城墙洞开。至正午十二点，第八十八师雨花台的主要阵地全部被敌军占领；紫金山的第二峰也失陷；第二军团被压迫到乌龙山至吉祥庵的背水阵地。

当日，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率部两千多人向下关方面溃退，企图渡江，被第三十六师阻止。日军又以重炮猛轰中华门，并从倒塌的城墙处蜂涌而入，第八十八师抵挡不住，再次败退，南京城防被打开了一个缺口。日军一部队从中华门突入后，中日双方军队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接着，光华门、中山门亦被敌军突入。此时日军国琦支队亦开向浦口，切断南京退向长江北岸的去路。

下午五时，唐生智接到蒋介石电令：“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随即召集师以上将领开会，传达了蒋介石的指令，宣布放弃南京，实行突围。

随后，唐生智率长官部少数人员在第三十六师掩护下渡江而去。他所下达的突围命令，只有第六十六、第八十三军两部遵照执行，当夜分由紫金山北麓和栖霞山附近突围成功。其他各部都不顾命令，涌向江边。挹江门内部队拥挤，争先恐后抢出城门，秩序混乱不堪。而丢弃的车辆、驮马使道路更为狭窄。负责把守挹江门的第三十六师一个团因阻止败兵通过，与之发生冲突，枪声四起。

随着败兵潮水般拥来，下关也陷于极度的混乱之中，下关至浦口之间两艘较大的一次可载七八百人的轮渡已撤往汉口，仅剩数艘小火轮及两百多条帆船。船少人多，秩序全无，人人争渡，任意鸣枪，以致船行至中流有的被未渡部队以枪击毁而沉没，有的因装载过重而沉没，惨不忍睹。

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南京一战，日军乘胜猛进，以八个师的兵力分进合击，使南京守军处于三面被围、背水一战的困难境地。中国军队以疲惫之师仓卒应战，一些部队虽作了英勇的抵抗，但军事当局在战前、战中以及最后突围时组织指挥上又出现不少错误，以致十几万守军除少数突围成功外，多数部队困于城内而渡不了江，城破之后惨遭日军杀戮。

╭════════════════════════════╮║║║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

（二）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

南京沦陷后，端着带血的刺刀的日本兵，开始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

当时城内剩下的居民和外地逃来的难民大部分已避入“安全区”。这个“安全区”，是十一月下旬由留在南京的少数外侨组织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划定的。该委员会向中日双方要求承认难民区的中立地位。中国方面对之完全承认，卫戍司令唐生智下令将区内军事机构全部迁出。日军当局也保证，难民区内倘无中国军队或军事机关，则日军不致故意加以攻击。“安全区”内难民最多时达二十九万人，另有几千名中国军人到国际委员会缴枪，要求保护。委员会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允许进入“安全区”。

“安全区”人满为患，一部分进不去的难民和伤病士兵便涌向江边，希望渡江。但是挹江门、和平门都被守城部队堵塞，通往下关码头的中山北路和通往燕子矶的中央路上挤满了人群，城破之后他们首先成为大屠杀的牺牲品。十三日上午，日军谷寿夫第六师由光华门、雨花门入城，立即将马路上的难民当作目标，以各种火器射击，顿时街巷内、马路旁血肉横飞、尸体成堆。十四日，日军大部队涌入城内，继续搜捕中国军民，并开始了空前残酷的大屠杀。十五日，中国军民及俘虏九千余人被押往鱼雷营屠杀。雨花台、水西门外、上元门、和记公司等处，都是日军集中杀人的屠场。躲入“安全区”的老百姓也毫无安全可言。日军完全不讲信义，对集中在这里避难的大批难民肆意屠杀。十六日，从“安全区”搜捕的数万青年被绑赴下关煤炭港枪杀，尸体被投入江中，鲜血把江水染得殷红。被国际委员会接受进入难民区的中国军人也遭日军杀戮，就连安全区副总干事费区都愤怒之极、后悔不已。他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来不及逃出的士兵都避到难民区来要求保护。我们忙着解除他们的武装，表示他们缴枪后就可以保全生命。可是抱歉得很，我们失信了。不久，他们有的被日军枪杀了，有的被戮死了。他们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拼命到底啊！战后《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确认：“那些中国士兵在城外放下武器投降了，在他们投降后七十二小时内，在长江江岸被机枪扫射而集体地屠杀了。这样被屠杀的俘虏，达三万以上。”

十二月十七日，日军为庆贺占领中国首都南京，举行入城式。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地踏着成千上万中国人的尸体和血迹入城，并大加奖励入城后纵兵杀人放火，奸淫抡掠罪恶至极的第六师师长谷寿夫，这更助长了日军屠杀罪行的升级。十八日，日军将城郊难民及俘虏五七万余人驱至下关草鞋峡，用机枪猛扫，然后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浇洒煤油纵火焚烧。

日军如此疯狂地对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俘虏进行血腥屠杀，又害怕自己的丑行暴露引起世界公愤，于是在集体屠杀后又毁尸灭迹，企图掩盖杀人真相。但是，杀人的鲜血是永远也洗不掉的。

在长江岸边参加毁尸灭迹的日军少校太田寿男在成了中国人民的阶下囚时供认：“我在十二月十五日晚到达南京下关第二碇泊场司令部之后，司令部的司令官命令我说：‘安达少佐正在处理尸体，现在命令你和安达少佐共同完成这项任务。’当我奉到命令之后，就在南京下关码头上，分东西两个区域执行任务。……从十二月十六日开始，至十八日两天的时间，经我处理的尸体有一万九千多具，安达处理一万六千多，加上头两天安达自己处理的六万五千多具，碇泊场司令部共处理了十万以上尸体，其中除有三万多具是掩埋、烧毁的以外，其余的都投到扬子江里去了。我想其他部队自己处理至少也有五万人，共计有十五万人。被杀害的人们绝大多数是市民，有男女老少，还有一部分抗日军，估计约三万。当我刚到下关的时候，还看见日本军队仍用机关枪向他们扫射，我记得被扫射过的许多人之中，还有很多带活气没死过去、而仍在呼吸着的人；”“经我们处理的将近二万个尸体里边，就有三百五十多的是被扫射后仍在呼吸未死的。处理这些活人的时候，我命令部队先用装货的钩子将他们打死，使其绝命后再用钩子搭到船上，投到扬子江里去。”这些罄竹难书的罪行，再没有比杀人者的自白更令人触目惊心了！

《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中写道：“据后来估计，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十九五万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

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到一九三八年十月的十个月中间，经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崇善堂、同善堂等各慈善团体及群众自发组织收殓掩埋的尸体总计是十五五万多具。连同日军处理的尸体，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总数在三十万人以上。

经过日军浩劫的南京城，完全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坟墓。星罗棋布的大小不一的湖泊池溏里，几乎没有一个不见尸骸的。有的全部被尸体堆满，有的则沉尸浮出，遍布水面。堆积或浮泛在湖泊池溏里的骨肉同胞，有的咬牙切齿，有的死不瞑目，有的血肉模糊，有的断腿剖腹。被砍头、剖腹、挖心、火烧、割掉生殖器、肢解、刺穿阴部或肛门的，各种惨绝人寰的死法应有尽有，让人难以想像这竟是同为人类的所谓“人”能干得出来的。

日军在南京除了疯狂屠杀我国同胞之外，还有一项令人发指的暴行，就是对成千上万的中国妇女的奸淫。战后的远东国际法庭认定，在日军占领后的第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三万起左右的强奸事件；全城内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妇人，多数都被奸污了。所以有人称日军在南京的罪行是“南京大屠杀事件”，有人则称之为“南京强奸事件”。事实上，对于毫无人性的日军来说，强奸和杀人是分不开的。这群野兽在疯狂地泄欲之后，通常都是把被强奸的妇女甚至连同她们的家属子女一齐杀掉。奸后必杀几乎成了日军的一条规律。幼女丁小姑娘，被日军十三的人轮奸后被割去小腹致死。市民姚加隆的妻子被日军奸杀以后，八岁的幼儿和三岁的幼女被日军用枪尖挑着肛门投入火中，活活烧死。年近古稀的老妇谢善真被日军奸后用刺刀戮死，阴户被插入竹竿。民妇陶汤氏在遭轮奸后，又被剖腹断脚逐块投入火中焚烧。有一位妇女一天之内竟被日军强奸三十七次！被日军奸后的妇女，不是被割去乳房，就是开膛破肚，割鼻剜眼，这类令人发指的奸杀暴行，每天不知要发生多少起。

伴随着屠杀和奸淫的是大规模的抢劫和有计划地破坏。日军驾驶着汽车，冲入各大公司、商店，将各种货物抢劫一空，然后付之一炬，将房屋烧毁。她们三五成群，挨门逐户搜索居民住宅，无论金银、衣物、食品、家具、车辆，见什么抢什么，甚至剥去八十多岁老妇身上的衣服。抢劫之后，日军四处纵火，城内黑烟弥漫，中华门、夫子庙、太平路、中正路（今中山南路）、国府路（今长江路）、珠江路等主要街道两旁的高大建筑物均被烧毁，到处是残垣断壁，遍地是废墟瓦砾。南京这座江南美丽的城市，失去往日的繁华，完全变成了一座尸横遍野、满目凄凉的人间地狱。

据抗战胜利后的不完全统计，日军在南京抢劫器具三十.九万余件，衣服五百四十万件，金银首饰一.四二万两，书籍十四.八六万册，古字画二.八四万件，古玩七千三百件，牲畜六千两百头，粮食一千两百万石。这里还不包括工厂设备、原料、车辆、铁器、破坏的房屋和商店等。

南京大屠杀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残酷最野蛮最疯狂的一次灭绝人性的暴行，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欠下的一笔永远无法偿还的血债。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遗址纪念碑文║║║╰════════════════════════════╯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遗址纪念碑

段月萍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即制造了举世震惊、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遗址，遍布城郊内外。为悼念遇难同胞，教育后人，永远不忘这段屈辱的悲惨历史，南京市人民政府在建纪念馆的同时，在当年日军屠杀人数众多或埋尸集中的一些遗址，也建立了纪念碑，在江东门、上新河、挹江门、中山码头、煤炭港、鱼雷营、草鞋峡、燕子矾、清凉山、汉中门、北极阁、普德寺、中山陵西洼子村、正觉寺、五台山等遗址，共立碑15处。

198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日，全市各碑与纪念馆同时落成揭幕。所立各碑，分布如下：

下关区，当年日军在长江边屠杀的人比较多，故在挹江门，中山码头、煤炭港、鱼雷营，立碑四块。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挹江门丛葬地纪念碑

建于挹江门外绣球公园内。该碑位于个小山坡上，左边靠城墙根，右边是绣球公园沿湖边道路，四周绿树环抱，风景秀丽。沿小径拾级而上，即见个由半圆形的约米长的矮墙环绕，中间是一个约一米高的方形墓冢，墓顶刻有一个大花圈覆盖其上。碑文刻于墓背面。日军当年在挹江门及城墙根附近姜家园、石榴园等地屠杀数以千计放下武器的士兵及平民百姓，仅崇善堂、红十字会等慈善团体收尸即有五千一百余具，故于此立碑纪念。碑文如下：

挹江门附近，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我遇难同胞尸骨丛葬地之一。从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南京崇善堂、红十字会等慈善团体先后六批，共收死难者遗骸5l00多具，埋葬于挹江门东城根及其附近之姜家园、石榴圆等地。特立此碑，以志其事，藉慰死者，兼励后人，牢记历史，振兴中华。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山码头遇难同胞纪念碑

建于下关中山轮渡码头与1号码头沿江路边路岛碧草丛中。背靠长江大堤，面对南京电厂。碑型独特，碑底座为三层红色台阶，碑身呈三米高立体三人字形，立于底座上。寓意三十多万同胞被屠杀，仅中山码头即被害10000余人，血流戍河，染红了长江。碑的中上部正面镌刻一个大花环，花杯内刻写碑名和日期，背面刻写碑文。碑的四周种植长青柏树、绿草，肃穆壮观。其碑文如下：

中山码头乃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遗址之一，当时避居国际安全区之青壮难民，在此惨遭杀害者，共达万人以上。其中，1937年12月16日傍晚，日军从避居于原华侨招待所之难民中，搜捕所谓有"当兵"嫌疑者5000余人，押解于此，用机枪集体射杀后，弃尸江中。12月18日，日军又从避居于大方巷之难民中，搜捕青年4000余名押解于此，复用机枪射杀。在此先后，日军还于毗近之南通路北麦地和九甲圩江边，枪杀我难民800余人。悲夫！其时码头顿成鬼域，同胞悉罹枉死，惨矣！鸣呼政暗国弱，何可安全？欲免外侮，唯赖自强。今虽时殊势异，仍当"前事不忘"。爰立此碑，勖勉后人：牢记历史，振兴中华。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煤炭港遇难同胞纪念碑

建于当年日军屠杀的煤炭港长江汉河口遗址桥头上。右边是当年日军抓捕关押放下武器士兵及平民的仓库遗址。该碑背靠滔滔长江，面对江边马路。碑型不大，水泥底座中间斜卧着一个雕刻的白玉石花圈，碑底座上是黑色大理石长方形碑身。其碑文如下：

煤炭港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主要遗址之一。1937年12月17日，日军从各处搜捕我已解除武装之士兵及平民3000余人，拘禁于煤炭港下游江边，以机枪射杀；而伤未死者，悉被押往附近茅屋，纵火活焚至死。内有首都电厂职工45人，即死于此难。兹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特立此碑，悼念死者，永诫后人，铭念历史，振兴中华。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鱼雷营遇难同胞纪念碑

鱼雷营位于下关"和记洋行"以东，老虎山下，上元门一带。1937年时是国民政府在长江边的海军基地码头，现为金陵造船厂。日军占领南京后，在这一带抓捕放下武器的士兵和平民百姓9000余人，用机枪射杀而死，后又在鱼雷营、宝塔桥一带屠杀三万多人。为悼念遇难同胞，原拟在此立碑。因该地现属金陵造船厂辖区，该厂准备结合厂区建设统一规划选建地点，目前只做了一个碑形模型，尚未立碑。该碑文如下：

1937年12月15日夜，侵华日军将被其搜捕之我市平民和已解除武装之守城官兵9000余人，押至鱼雷营，以机枪集体射杀。同月，日军又在鱼雷营、宝塔桥一带再次杀害我军民3万余人。死难者之遗骸，直至次年2月，犹曝露于军营码头等地，惨不忍睹。后由红十字会就地掩埋，仅2月19日、21日、22日三天，埋尸即达5000余具。惨史难忘，忆往志慨，特立此碑，正告方来。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草鞋峡遇难同胞纪念碑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草鞋峡遗址，位于幕府山北麓江滩与八卦洲之间长江中的一条狭长江岸，弯多水急，其自然形状如同一只鞋，故名草鞋峡。日军在这一带江滩屠杀我被俘士兵和平民百姓五万余人，并弃尸江中。纪念碑建于上元门以东200米幕府山北麓山脚下，面对长江。碑形为机枪子弹壳形。碑高12.13米，寓意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底座为红色，上刻碑文。碑身题写碑名，碑身上铭刻着一个花杯，以示悼念。碑身周围砌有半圆形白石栏杆，其碑文如下：

1937年12月13日，日华日军攻占南京后，我逃聚在下关沿江待渡之大批难民和已解除武装之士兵，共5万7干余人，遭日军捕获后，悉被集中囚禁于幕府山下之四五所村。因连日惨遭凌虐，冻俄致死一批；续于18日夜悉被捆绑，押解至草鞋峡，用机枪集体射杀。少数伤而末死者，复用刺刀戳毙；后又纵火焚尸，残骸悉弃江中。悲夫其时，居刀所向，血染山河；死者何辜，遭此荼毒？追念及此，岂不痛哉？！爰立此碑，谨志其哀。藉勉奋发图强，兼资借鉴于古。

栖霞区在长江边燕子矶和东郊中山陵西洼子村立碑二块。

燕子矶江滩遇难同胞纪念碑

建于燕子矾公园内江边石矶山上。碑体长方形，竖立于石矶山上新建三角形碑亭中。该亭与公园内民族格调相辉映，碑亭三角形顶下由三根石柱支撑，寓意日军屠杀三十万同胞。其碑文如下：

围，继之以机枪横扫，悉被杀害，总数达五万余人。悲夫其时，尸横荒滩，血染江流，罹难之众，情状之惨，乃世所罕见，追念及此，岂不痛哉？！爰立此碑，永志不忘，庶使昔之死者，藉慰九泉；后之生者，汲鉴既往，奋志图强，振兴中华，维护世界之和平。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东郊丛葬地纪念碑

建于中山陵风景区东南西洼子村空旷的菜地之中。该碑前竖立一高大的中式牌坊，上书碑名。由长约50米墓道通向墓碑。墓碑低矮，斜卧于形状为三层台阶叠落的多角圆形墓冢上，上刻日军从中山门外至马群一带屠杀我无辜同胞，并丛葬于此一带的史实。

墓碑冢周围是低矮的圆柱间隔。该碑形状中西合璧，十分壮观，很远即可见到。其碑文如下：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疯狂实施南京大屠杀，我东郊一带，惨遭杀害之无辜同胞，尸蔽丘陇，骨暴荒原，因久无人收，而致腐烂腥臭。迨至翌年四月，始由崇善堂等慈善团体从事收殓，计于中山门外至马群镇一带，收尸3万3千余具，就地掩埋于荒丘或田野。越数月，察及于丘壑丛莽间尚遗其余，故时或恶气四溢。1938年12月，复经伪市政督办责成其卫生局，又于马群、前山、马鞍、灵谷寺等处，收集死难者遗骨和残骸3千余具，丛葬于灵谷寺之东。嗣于1939年1月，立"无主孤魂墓碑"为志。考其碑文拓片犹在，惜乎原碑久已湮没无存。爰特重立此碑，以示悼念，且告方来。

雨花区在江东门纪念馆内和普德寺、上新河立碑三块。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江东门遇难同胞纪念碑

日军在江东门一带屠杀我无辜同胞万余人，纪念馆即建立在当年日军大屠杀"万人坑"遗址及丛葬地之上。由于已在此建立了纪念馆，故不另立碑，只在纪念馆院内，鹅卵石广场路边，竖立一小石碑，将日军在江东门一带屠杀的史实刻于石碑上，让观众了解日军在江东门一带的暴行，以及在此建馆的立意。其碑文如下：

1937年12月16日，日至将被解除武装之中国士兵和平民万余人，囚禁于原陆军监狱院内，傍晚押至江东门，藉放火焚烧民房照明，骤以轻重机枪向人群猛烈扫射，受害者众声哀号，相继倒卧于血泊之中。遗尸枕藉，盈衢塞道，直至蔽满江东河面，且抛露风日之下，久无人收，情至惨烈。迨逾数月，因天暖尸腐，始由南京慈善团体收尸万余具，掩埋于就近两大土坑内，故称"万人坑"。爰立此碑，藉志其哀，悼念死者，兼勉后人。热爱祖国，奋发图强，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普德寺丛葬地纪念碑

建于雨花台烈士陵园左侧，原普德寺遗址，现为共青团路边的一个小山坡上。四周绿树环绕，拾级而上，即见一高大的，状如一双巨手合十的灰色石碑，立于山坡上。此碑建于原寺庙处，故其碑形寓意僧众双手合十诵经，超度日军大屠杀遇难者的亡灵。其碑文如下：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惨案，震惊寰宇，血沃钟山，水赤秦淮，我无辜同胞不幸遇难30万人。普德寺系我遇难同胞尸骨丛葬地之一，经南京红十字会先后埋葬于此者共达9721具，故亦称"万人坑"。附录其年月日埋尸记载如下：

1937年12月22日，葬280具12月28日，葬6468具1938年1月30日，葬486具2月23日，葬106具3月25日，葬799具4月14日，葬1177具5月26日，葬216具6月30日，葬26具7月31日，葬35具8月31日，葬48具10月30日，葬62具

兹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特此刻石纪念，旨在告慰死者于地下，永励后生于来兹：不忘惨痛历史，立志振兴中华。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上新河地区遇难同胞纪念碑

该碑建于上新河棉花堤江边丛葬地遗址，背靠滔滔长江，面向东方。四周绿树环抱。其冢是一座多棱圆形白色墓冢，拾级而上，在平顶墓上，由一红色底座，托竖着一黑色大理石墓碑。此寓意日军屠杀我无辜同胞，鲜红色的血，染遍大地及长江，黑白相间之色，表示后人对遇难者悼念之情。其碑文如下：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我大批解除武装之士兵和群集上新河一带之难民，共28730余人，悉遭日军杀害于此处。日军屠杀手段极其残酷，或缚之以溺水，或积薪而活焚，枪击刀劈，无所不用其极。对妇女乃至女童，均先强奸而后杀害，惨绝人寰，世所罕见。致使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劫后，湖南木商盛世征、冒开运两先生目睹惨状，于心不忍，曾由私人捐款收埋一批遗尸。嗣于1938年1月至5月，又经南京红十字会在上新河一带收埋死难者遗尸计14批，共8459具，分记如下：

l月10日葬于黑桥998具。2月8日葬于太阳宫457具。2月9日葬于二道埂子850具。2月9日葬于江东桥1850具。2月9日葬于棉花堤1860具。2月14日葬于中央监狱附近328具。2月15日葬于规音庵空场81具。2月16日葬于凤凰街空场244具。2月18日葬于北河口空场380具。2月20日葬于五福村217具。3月15日葬于甘露寺空场83具。3月23日葬于甘露寺空场354具。4月16日葬于贾家桑园空地700具。5月20日葬于黑桥57具。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爰本此旨，特立此碑，藉慰死者，兼勉后人：爱我中华，强我祖国，反对侵略，推护和平。

鼓楼区在汉中门外、市内清凉山立碑二块，1988年又在五台山立碑一块。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汉中门外遇难同胞纪念碑

建于汉中门外秦淮河边桥头遗址。日军当年曾在此集体屠二千余人。此处由于受地理条件限制，碑身较小，仅竖立一块文物遗址标志形石碑。该碑上端刻一花圈，周围用铁栏杆圈住。此处是交通要道，过往行人，来来往往都能伫立观看，了解日军在此屠杀的史实。其碑文如下：

1937年12月15日下午，避难于"国际安全区"之本市平民和已解除武装之军警共2000余人，遭日军搜捕后，被押赴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杀害；其伤而未死者，或乱刀补戳，或纵火活焚。尸骨蔽野，惨绝人寰。至次年2月11日、18日两天，始由慈善团体南京红十字会收殓，得遗骸共1395具，掩埋于汉中门外之广东公墓及二道埂子一带。悲夫，今人孰料于此熙来攘往之地，曾是往昔日军肆虐之场，而有众多同胞罹难于此者乎？！爰立此碑，嗣志其事。庶我国人，牢记惨史，国难毋忘，居安思危，奋发图强，同心同德，振兴中华。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清凉山遇难同胞纪念碑

建于清凉山当年日军屠杀遗址，现河海大学校园内树丛中。该碑碑形别致，碑的底座为三层红色台阶，碑身是立体白色三个人字形，碑顶上刻置一大古鼎，上刻"居安思危"四个大字。其碑寓意日军屠杀我同胞三十万，血流遍地，并告诫人门生活安乐，不忘历史。其碑文如下：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我数以千计的无辜同胞在本院境内，即清凉山附近之吴家巷、韩家桥等地遇难。为纪念死者，激励后人，振兴中华，维护和平，特立此碑。

侵华日军南京大居杀遇难同胞五台山丛葬地纪念碑

1988年建于五台山体育场西南角树丛中。该碑立于五级台阶塔形平顶墓冢上，墓碑为红色条石，斜卧于台阶上，碑名由幸存者王如贵撰写，碑文刻于碑底座红色石块上。墓冢周围用石柱铁链条相圈。其碑丈如下：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血腥事件中，五台山一带是我受害同胞尸骨丛葬地之一。据崇善堂、红十字会等慈善团体埋尸记录记载，于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曾先后四批埋葬我被害同胞尸骨共254具。特立此碑，以志悼念。

玄武区在北极阁立碑一块。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北极阁附近遇难同胞纪念碑

立于当年日军屠杀遗址北极阁山南麓山脚下。日军在市内鼓楼至北极阁、太平门、富贵山、珠江路等地，见人就杀，尸横遍地，血流成河。后由崇善堂将各地尸体收殓葬于北极阁山及近山城墙根附近一带，故立碑于此处。

该碑依山呈半圆弧形，碑体白色，碑名刻写于黑色长条弧形大理石上，上涂金色，十分醒目。碑文刻于右下角红色大理石上。碑座下三个圆形体，并筑有花台，表示日军当年屠杀三十万人，血流遍地，后人献花悼念之意。整个碑体肃穆壮观，十分引人注目。该碑背依北极阁山，绿树环抱，面对北京东路和进香河路，西是鼓楼，东面是鸡鸣寺，交通方便，车水马龙，人流熙攘，人们过往于此，必注目观瞻凭吊。其碑文如下：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屠杀我南京同胞达30万众。仅此北极阁毗近之处，惨遭杀害者即达两千余人。其时，鼓楼至大石侨，北门桥至唱经楼，太平门、富贵山及蓝家庄等地，伏尸残骸，盈街塞道；涂膏凝血，触目生哀。翌年一二月间，罹难同胞之遗骸经南京崇善堂收殓，丛葬于此山之麓及近山之城根等处。爰立此碑，永志不志，藉勉后人，奋发图强，振兴中华，国运其昌。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正觉寺遇难同胞纪念碑

立于秦淮区武定门正觉寺遗址，现新华玻璃厂门前，1987年日军南京大屠杀五十周年时立。日人多信佛教，但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践踏佛门，和尚、尼姑均遭杀害，有的尼姑被日军奸淫后，惨遭杀害。为悼念遇难僧侣，教育后人勿忘国耻，振兴中华，故于此立碑。正觉寺遗址，位于武定门与长乐路交岔口。由于地理条件限制，该碑立于长乐路人行道上。碑身较小，是文物遗址标志形石牌。正面刻写碑名，背面刻着碑文。其碑文如下：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在武定门正觉寺，将该寺僧人慧兆、裕才、宽宏、德清、道禅、刘和尚、张五、源谅、黄布堂、晓侣、慧璜、慧光、源悟、能空、倡修、广祥、广善等十七人集体枪杀；与此同时，日军还在中华门外将尼姑真行、灯高、灯光等杀害。兹值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五十周年，特立此碑，悼念死者，永诫后人，铭念历史，振兴中华。

（作者单位：南京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平型关大捷之真相║║║╰════════════════════════════╯

《中共编写“中华民国史”真相探讨》陈木杉着，国立编译馆主编，中华民国八十三年五月初版。

一、国立编译馆，中华民国台北市舟山路二四七号。

二、销售代理：红蚂蚁图书有限公司中华民国台北市内湖区文德路二一○巷三十弄二十五号

由第二二五页至第二二六页讨论“平型关大捷”，节录于次。

第五章中共对抗战以前（民国十六年至二十六年）民国史实的篡改之驳正

第四节对抗日战争的曲解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分三路进攻华北，沿平汉、津浦、平绥等铁路前进。十月攻陷归绥和包头，同时进攻平型关。中共史家说：

九月二十五日，刚刚开到山西抗日战线的八路军一一五师首战告捷。该师利用平型关附近险竣地形，经过一天激战，一举歼灭坂垣师团辎重队一千多人，击毁汽车八十余辆，缴获九二式野炮一门，炮弹二百多箱，各种枪三百多支，还有大量辎重。我军伤亡六百余人。平型关战斗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胜利，打破了所谓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和必胜信念。八路军从此声威大震。（注六四）

按：所谓“平型关大捷”，乃中共一贯对外吹虚的样版战例。中共曾先后有三次不同的说法：

１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八路军参谋处发出的告捷宥电：“大公报鉴：九月二十五日，我八路军在晋北平型关与敌万余人激战，反复冲锋，我军奋勉无前，将进攻之敌全部击溃……敌军被击毙者尸横山野……现残敌溃退至小赛村，我四面包围中。”（注六五）

２胡华着的参考资料说：“据统计，这次战斗歼灭敌军三千多，毁汽车一百多辆，缴获九三式野炮一门，轻重机枪二十多挺，步枪一千多支，掷弹筒二十多个，战马五十三匹，日币三十万元，其余军用食品无数。单是日本大衣，就够我师每人一件，八路军伤亡近千人。”（注六六）

３民国七十四年（一九八五）八月十一日，中共“新华社”通讯：“八路军首战平型关，夺得了对日作战的第一次胜利，歼敌一千多名，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注六七）

从上述三项资料看，从“与敌万余人激战”，到“歼灭敌人三千多”、“歼敌一千多名”，到底何者是对，恐怕中共也弄不清。由此可见，中共公开宣传的“平型关大捷”，全与事实不符。而实际参与平型关战役的军队，有国军，亦有受编为国军之共军。国军实为主力，有云：

为第十七军高桂滋的八十四师高哲、第二十一师李仙洲；第十五军刘茂恩的第六十四师武庭麟和刘茂恩自兼师长的第六十五师，以及刘奉滨的第七十三师，共计六个师。中共部队，其时刚刚成立不久，所有林彪的第一一五师，贺龙的一二○师，刘伯成的第一二九师，毫无战斗能力。九月二十六日的平型关之战，中共第一一五师主力曾参加对日辎重的截击，也是他大吹大擂对外宣传的第一次战斗。（注六八）

因为，平型关战役的目的，是要确保晋北要地，战况如下：

（日军）自九月下旬完成攻击准备后，以约一师团兵力向平型关团城口之线进攻，因受我两方包围夹击，敌即向蔡峪口溃退；敌因攻击未能成功，遂积极增加兵力，二十五日敌得援，继续向平型关攻击，迄二十九日敌另以大部兵力由茹越口直冲铁角岭，我移调北楼口突出之一部抗阻之，但时机稍迟，敌遂由铁角岭直驱繁峙，我平型关正面以退路被遮断，乃于三十日夜分向五台山地岱县之线转进（注六九）

因此，从整个战役看来，中共一一五师只是担任对敌辎重伏击任务，无论战果如何，其在整个战役之地位及价值，与其他六个师相比，是不能等同的。而中共史家把平型关战役写成共军的“大捷”，并谓“打破了所谓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和必胜信念，八路军从此声威大震。”这完全与历史事实不符。

注六四：同注一○，页三七二。

（注一○：同注六：王健民着‘中国共产党史稿’台北，民国五十四年出版。）

注六五：王健民着‘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三编延安时期（台北，国立政治大学王健民教授发行，一九六五年十月出版），页一七九～～一八三。

注六六：同注四，页四五，引自胡华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页四一○～～四一六。

（注四：郭华伦，‘中共史论’第二册（台北：政大国际关系研究所、东亚所印行，民国五十八年））

注六七：“新华社”通讯（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一日）

注六八：第八路军参谋处分送军事委员会军政部中央各院队暨全国各大报馆夸大宣传平型关大捷情形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民国七十年九月），页五五，引何应钦上将对共军参加抗战的见证。

注六九：何应钦，“平型关战斗”，‘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民国七十一年九月），页三五。

□□□□□□□□□□□□■

第十四章：泥沼战线

主题

台儿庄大捷空袭日本投纸弹日军溯长江进攻国军退出武汉日本陷入苦境第二期抗战在各地制造傀儡日本的谋略个人间的活动日军部破坏外交高宗武潜赴日本汪兆铭卖国条件私离重庆开除汪兆铭党籍汪兆铭到上海签下卖国条件卖国密约揭发日承认汪伪政权

台儿庄大捷

到了“七七事变”爆发半年后的一九三八年年初之际，日军在华中业已攻陷南京、杭州；在华北亦已夺去济南；在山西并已占据太原；——自三方面进窥大陆内地。

此时，据推断日军兵力为：南京方面十四个师团，华北十个师团，山西一个师团，合计超过三十四万人。

另一方面，中国军的兵力共有二百一十个步兵师，三十五个步兵旅，十一个骑兵师，六个骑兵旅，十八个炮兵团，八个炮兵营，以及其他特种部队，部署于各战区；此外，尚有二十六个步兵师在整训中，十四个步兵师、七个步兵旅未经调动。

在这个阶段，中国军最艰钜的重点任务，是防卫武汉地区。武汉位置于大陆中央，有长江畅达东西，复以平汉、粤汉两铁路衔接南北，为水陆交叉的交通要冲，并且在历史上，也是点燃辛亥革命火花的中华民国诞生之地。

元月十一日，设置武汉卫戍总司令部，任命陈诚为总司令；将最精锐部队部署于武汉外围，同时在邻接湖北省的河南、安徽两省驻守有力部队，加强防务。

磁性战术诱敌深入

为防卫武汉而使用的战术，是由蒋总统亲自命名“磁性战术”。

这是以游击战诱引日军深入，使之堕入预先部署的中国军之包围网中，再进行歼灭战。

包围网是张设在沿津浦铁路以徐州为中心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部署有包括军事委员会直辖部队十个师在内的约二十万兵力。

徐州位于均已沦陷的南京与济南之间。中国军的战术是要把指向武汉的日军诱引到这一方面，俾为防卫武汉的军事部署争取时间。

韩复渠抗命伏法

在山东方面，中央命令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渠所指挥的部队固守在济南北面以黄河为防线的阵地；但该军却节节后退，几乎未经作战便先后放弃了济南乃至泰安、济宁等地，将黄河阵线拱手让给日军。旧军阀出身的韩复渠，当此存亡所系的抗日战争之际，仍然有军阀时代保存私兵的旧观念，避免作战。于是，乃经军事法庭治韩复渠以抗命之罪，判处死刑，整肃军纪。

因陶德曼工作受挫，以致希望不经战斗而使中国屈服策略失败之后的日军，于二月十八日将其在南京方面的“中支方面军”和“上海派遣军”合编为“中支那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以进攻汉口方面为目标。

然而，日军却料想不到，作为诱饵的中国游击部队自北面对其攻击之后，便佯示退却；于是，日军遂即尾追北上，越过安徽蚌埠，推进到淮河一线。

同时，在济南方面的日本“北支那方面军”，也被中国游击部队所诱引，沿津浦铁路蹑踪南下，其第十师团一部分部队于三月二十五日进抵鲁苏两省交界的台儿庄。

由孙连仲所率领的第二集团军正好在这里严阵以待。

歼灭日军三万人

二十六日，中国军由徐州、开封开来重炮及对战车炮队增援，同时以汤恩伯所指挥的军事委员会直辖部队第二十军团则猛冲台儿庄北面，将日军后路切断，形成对台儿庄合围局面。

日军为支援已成瓮中之鳖的第十师团，乃派遣第五师团驰赴台儿庄，但也被诱入中国军的包围网。动弹不得。四月六日夜晚，中国军终将日军第十、第五两个师团击溃，树立了歼灭其三万人的战果；落入重围中的日军，生还者只有三分之一，这是日本最初大规模的败北。

日本资料有谓：在台儿庄败北的日军，为属于第十师团的濑谷支队，山濑谷启少将指挥步兵四个半大队，于三月二十七日冲入台儿庄之后，受到包围，陷入苦战。四月二日，第五师团坂本支队的四个大队驰往救援，也是激战甚苦。及至五日，坂本支队奉到误以为战斗大致已告结束的第五师团长之命令而撤回，以致遗留在台儿庄的濑谷支队至六日夜晚才得脱离战场。

按日本参谋本部所编“支那事变陆战概史”所记：“由于联络欠周，不得已而折回，并非被击退。”但指挥官濑谷启旋即被追究责任，退为备役。

又日本资料谓：日本方面的损失，合第十、第五两个师团计战死二千三百六十七人，负伤九千六百十五人（三月至五月包括徐州作战在内）。

“台儿庄大捷”的消息，给予全中国军民以莫大鼓舞。在武汉举行了盛大的火把游行，并由外国新闻特派员发出电讯，将战况及中国的抗战决心报导于全世界。

‘此次鲁南会战，迭获胜利；尤其台儿庄一战以后，敌军声势大挫；我军同心协力，服从命令，极为国际所称誉。敌增援津浦线部队，乃由第二（山西）、第三（苏南、浙江）两战区抽调而来，而该两战区敌军因受我军牵制，已无法再调，故其今后增援兵力极为有限。

‘今敌在台儿庄大败以后，必愈而向我报复，但其实力有限，仍是投机战略；只要我能首先堵住，再予迎头痛击，终必更获大胜。’（注）

注：蒋总统-“在车辐山车站对出迎官兵训话”（一九三八四）

空袭日本投纸弹

在台儿庄大败日军之后的中国军，预料敌人必将沿津浦铁路反击，进犯徐州，这又是适合于中国方面“磁性战术”的期待。盖将日军吸引在徐州地区，正就是在防卫武汉方面产生了充裕的时间。

作战部署是首先自武汉抽调一部分防御部队开赴徐州；同时，以黄杰、桂永清等精锐兵团部署于豫东的归德（商邱）、兰封一带，巩固徐州侧背。又派军令部次长林蔚率领参谋团到徐州督导联络，以待日军动向。

‘倭首相近卫于对华、对俄两大问题必有新决定，以理度之，倭对俄似无开战之可能，而对华则必重新增兵，积极进攻，以求得战局之早结；或仍消极维持现状，待适可而止之时。然后者之可能性较少。’（四月二十二日日记）

日军方面由于台儿庄之役，才得知中国军第五战区主力（推断有四、五十个师）集结在徐州附近。

为此，大本营乃立即于台儿庄战役之后的四月七日发出徐州作战命令，投入主力部队“北支那方面军”四个师、“中支那派遣军”两个师，自南、北两方出兵夹攻，意图一鼓作气，决一胜负。不过，此举虽说是主力决战，但在兵力上日军只有中国军的三分之一，可以说是冒险的行动。

又按火野苇平所著“麦子和军队”的小说，就是依据此次徐州战役的从军经验所撰写。

钉牢日军主力

在徐州北面战线的行动，是自四月中旬开始，日军“北支那方面军”的半数兵力由北而南进迫徐州；另一半部队则由徐州西方的归德、永城以及陇海铁路线上的兰封等方面东向进攻。

此外，在南面战线，并以其“中支那派遣军”由蚌埠北上，这一支日军不仅沿津浦铁路推进，而且更以强力机械化部队攻向蒙城方面，其目的是在控制徐州西侧，以配合来自北面的攻势而合围徐州。

五月九日，蒙城失陷；十二日，距徐州西南二十多公里的萧县受到攻击；十四日，在郝寨的陇海铁路大铁桥被炸毁——中国军的退路已有被切断之虞。

此时，日军的包围网逐渐收紧，及至十八日，徐州外围的宿县、萧县、沛县相继失陷。

支持到这个阶段，中国军防卫徐州的任务已经完成，盖已将日军主力钉牢在徐州地区一个月以上，使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十九日夜晚，中国军避免决战，撤离徐州，第五战区各主力部队连同大量机械化兵器机敏地摆脱日军包围，向西南转进。

于是日军决一胜负的意图为之落空。

‘此次我军撤退愈速，敌进将更迟缓。在长期战争中，不可以一时之进退定其胜败，战略之撤退，如能达到预期之结果，即胜利也。’（六月三日日记）

当第五战区部队自徐州撤退之际，防守平汉、陇海铁路的第一战区部队为援护友军而在兰封方面佯动作战，待徐州撤退完成后，也继之西向转进。

徐焕升驾机袭日

就在中国军自徐州转进的十九日下午三时二十三分，有两架马丁式Ｂ１０轰炸机自汉口升空飞向日本。长机由中国空军第十四队队长徐焕升驾驶，飞机上搭载的不是炸弹，而是二十万张传单。

传单上的文字是：“中日两国有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亲密关系，应该互助合作，以维持亚洲和全世界了自由和平；日本军阀发动的侵略战争，最后会使中日两国两败俱伤，希望日本国民唤醒军阀放弃进一步侵华迷梦，迅速撤回日本本土。”

这两架飞机在飞经宁波加油之后，于二十日午前二时四十五分到达九州上空，向长崎、福冈、久留米、佐贺等主要都市以及四国某些地区散发了传单；及至二十日正午稍前，安然返回汉口。

像这样地对日本本土不流一滴血的“纸弹轰炸”，后来被称为“人道飞行”。蒋总统当计划提出的时候曾经将这个行动的意义写在日记上：

‘空军飞倭示威之宣传，须早实施，使倭人民知所警惕。盖倭人夜郎自大，自以为三岛神洲，断不被人侵入，此等迷梦，吾必促之觉醒也。’（五月八日日记）

徐焕升的回忆

徐焕升向笔者（古屋奎二）谈到“人道飞行”的回忆如下：

“奉到蒋委员长的命令，是在四月中旬。

“当时，日本的防空哨戒能力相当幼稚，我们侵入日本上空时，并未被发现；直到完成任务离开日本，俯视眼底的都市才刚刚在实施灯火管制。

“及至天色通明飞回到我国东海岸上空之际，接到地面联络，得知在上海、杭州一带有多架日本飞机升空拦截我们，但我们则掩蔽在云雾中安全返航。”

按徐焕升于一九六八年至七五年担任中华航空公司董事长，其间中日航线中断（一九七四年），徐焕升于复航之前退休。

日军溯长江进攻

日军推进到徐州之后，可以料想其下一个目标是河南省的开封和郑州。这里是平汉、陇海两条铁路的交叉点，为东西、南北的交通要冲；自古代春秋战国以来，就是英雄逐鹿、争战不绝的中原之地。

由河南省只要循平汉线垂直南下，就可以直达武汉三镇。故而日军必然会来攻击此一地区，俾据为进窥武汉的前进基地。

六月上旬（一九三八年），日本“北支那方面军”主力攻陷开封；八日，进达中牟、尉氏，一部分骑兵更伸展到郑州南方的平汉铁路附近。

黄河决口阻敌南下

此时，中国军准备了一个秘密策略——就是掘开黄河堤防，以人工洪水遏阻日军进攻。

六月四日，在中牟县境的赵口进行掘堤作业，预定在当天下午使河流决口，然而该处水量过少，虽经连续三昼夜作业，但未达目的。

于是，乃将掘堤位置移到花园口进行，九日上午九时，打开了缺口，河水遂即流出堤外。

横决的河流，淹及豫省东南大平原的中牟、尉氏、扶沟各县以及皖、苏两省的一部分地区，使日军的车辆、战车、重武器等类陷入泥淖，进退维谷。

黄河治水，自有史以来向为中国为政者的最大事业之一，建筑的堤防宽度达三百公尺，极其坚实，现在由中国军自行决口，实在令人思之断肠。

诚然，洪水淹没了田地，民众生活难免受到影响；不过，当时黄河水量不多，水流速度每小时不过三公里，浸水地区最高水位不到一公尺，农民都还可以步行往来。

假定对决堤之举有所踌躇，则日军机械化部队便会由郑州一鼓作气冲到武汉。是故面对暴虐侵略而谋保卫国土，有时乃不得不采取有牺牲决心之非常手段的。

实则，由于此一洪水得以遏阻日军向武汉推进达半年的时间；又在淹水一带的以西地区，在此后的六年之间，得以一直未许日军侵入。

据日本资料：当时，中国方面曾指黄河决堤是被日军所炸毁。

被河水障碍所遏阻的日军，于是便放弃了自中原南侵武汉的意图，而改取东侧陆路及溯江西上的进攻途径。不过，如由安徽陆路进军，则非得穿越鄂、豫、皖边界的大别山区不可。

中国军方面，除了在大别山区各要隘部署兵力，安设重炮，俾迎击陆路进攻之敌军外，同时，在长江敷设水雷，并于沿江两岸的庐山、九江、田家镇、马头镇等要塞布防，阻挡日军循水路进攻。

至于日军方面，则是以畑俊六大将为司令官将“中支那派遣军”重行改编，并将由“北支那方面军”抽调而来转属该派遣军的第二军司令官东久迩稔彦中将所属三个师取道陆路，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所属四个师及一个支队配合海军第三舰队溯江仰攻，两路进军。

日军的进攻，首先在长江方面展开行动——第十一军由安徽循水路进入江西境内，七月二十六日，在海军炮舰轰击援护之下，于长江南岸的九江突袭登陆。

‘观察敌势，在直接溯江而上，仅占要塞据点，而不作野战，以期先占武汉，为唯一目的。余对防守武汉，决不作无谓之牺牲，必须保持相当兵力，待机应用，以作最后胜利之基础。’（七月二十六日日记）

‘沿江配备相当兵力，与之节节抵抗，使之无法直入。——总之，此次保卫武汉战略，当取韧性，无论攻守进退，皆可立于自动地位，而决不致陷于被动形势也。’（七月二十九日日记）

日机轰炸武汉

八月十一日，武昌与汉阳被日军飞机七十二架空袭，因轰炸而伤亡者约达五百人之多。

‘倭欲以狂炸为施行威胁恐怖之愚计，孰知其徒使我民众雠恨愈甚而益加增敌忾心而已。’（八月十一日日记）

八月二十二日，日本大本营发动汉口作战，其命令如下：

“中支那派遣军应协同海军攻占汉口附近要地。”

于是，集结于九江、太湖一带的日军第十一军乃于当天在江西省境内长江南岸的湖口、星子一带登陆。

此时，蒋总统的长公子经国正在南昌，担任江西省保安处副处长，得到紧急报告，驰赴德安前线，督励战地工作。

二十三日，日军进占瑞昌，但中国军凭据庐山等天险之地部署防卫，阻止日军深入；日军虽曾反覆尝试突击，但每次均被击退，损失颇重。

‘倭最后十日间之总攻击，长江南岸大受顿挫。……今武汉守备渐臻就绪。’（八月三十一日日记）

庐山一带的防御坚固，日军三个师团自十月底被牵制于该地区达两个月之久，而不能参加武汉战役。

不过，在自长江军舰发炮射击援护之下的日军，则强行西进，于九月二十九日攻陷屏障武汉最重要的据点田家镇要塞；中国军约坚持了二十天，但在日军地毯式炮轰及卑劣的毒瓦斯攻击之下，阵线终被突破。

国军退出武汉

日军第十一军在攻陷为屏障武汉三镇江防要塞的田家镇之后，沿长江北岸、循大别山区南侧西向，进攻汉口。

此外，由大别山区北侧循陆路指向汉口的日军第二军，分兵两路～～一路强行突破大别山，取最近路线攻击前进；一路自山区北侧绕道于平汉铁路线上的信阳方面。这两路日军遭遇由张自忠、孙连仲、胡宗南等所率领的精锐部队之迎击，其第十三师团在大别山区再三激战，受到几乎悉数被歼灭的打击，但信阳一路却得以紧迫推进。

‘本月（一九三八年九月）战争最烈，亦为成败最大之时期。长江北岸广济，大别山北面商城、潢川、罗山各县及田家镇虽皆先后失陷，然我军仍照原定计划阻制敌军于国防工事线之外；南岸之敌，虽向南突窜，然多受我军重大打击，庐山南麓，终不能越隘口一步，其死伤惨重，约计九月间敌军死伤必在十万人上下；我军伤亡，反较敌军为轻。大体言之，消耗战之目的已达，然而将士之牺牲与痛苦，诚不忍言矣！’（九月三十日日记）

十月十二日夜晚，中国军放弃了在武汉北方的据点-信阳；日军沿平汉路南下，进窥汉口。

日军突击攻陷广州

另一方面，秘密集结于台湾澎湖岛的日军第二十一军（辖三个师团，司令官古庄干郎中将）乘用三百余只登陆舟艇，突击广东大亚湾登陆，将战火扩展到华南地区，也就是在中国放弃信阳的十二日天色欲曙之际。

‘日寇在大亚湾登陆的目的：

‘一、表示其非达到使中国屈服不可。

‘二、对英国示威，欲中国不借重英国而向其屈服。

‘三、希望分化广东，不加抵抗。

‘四、至于截断广九铁路之目的犹在其次。’（十月十二日日记）

日军所指向的广州，是在业已被其封锁的中国海岸线中剩下来唯一通往海外的门户。中国购买自国外的大部分武器弹药，就是自香港运经广九铁路由广州进口，再经粤汉铁路输送内地。

不过，在此际，武汉也已经陷入危机，中国方面没有分兵援粤的余力，而日军正就是乘虚一举突击，乃得于十月二十一日攻陷广州。

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

由于广州沦陷，乃使粤汉铁路的战略价值产生了变化；因之，对位于该铁路北端之武汉地区的防卫意义也不得不重加考虑。

‘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全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

‘对于敌军心理，若其果求和平，则我军自动放弃，反能促其觉悟，并可表示我抗战之决心，与毫无所求，且亦所不惜，使其不敢有所要挟。

‘否则，如我军冀其停止进攻，则彼更将奇货可居矣！故决心放弃武汉。’（十月二十二日日记）

此时，蒋总统仍拟暂留武汉，继续指挥；然因夫人和幕僚们的一再苦谏，始于二十四日晚间偕夫人乘飞机前往湖南省衡阳北面的南岳，但由与飞机迷失降落方向而折回汉口；二十五日午前四时换乘飞机再度出发，才到达目的地。当起飞之际，日军已经迫近汉口城外仅有十五公里的路程。

二十五日，自南岳电令留驻武汉部队——在撤离武汉之前，将凡有可被敌军利用之虞的设施均予破坏：

‘对敌行动，切不可留有余地，对敌态度，亦不可稍有消极缓和之意；必须坚定、简单、明白，而示我对和战一定之限度则几矣！否则，无异示弱，则败亡矣！

‘武汉之爆烈破坏，不仅使敌一无所得，失其攻汉之目的；且示其同归于尽之决心。’（十月二十五日日记）

武汉经过两天的燃烧，留驻部队在完成目的之后撤退。

西部已有基础

（民国二十七年自由人注）

十月三十一日，蒋总统发表了“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军民书”：

‘……保卫武汉之军事，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积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西北、西南之建设。……

‘今者，我中部工业及东南人力、物力多已移植于西南诸省，西部之开发与交通建设已达初步基础；此后抗战乃可实施全面之战争，而不争区区之点线。……故我守卫武汉之任务已毕，目的已达。……吾同胞应知此次兵力之转移，不仅为我国积极进攻、转守为攻之转机，且为彻底抗战，转败为胜之枢纽。……’

日本陷入苦境

由于武汉失陷，中国的七大都市-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都已经沦入日军的占领之下。

可是，日本却并未能察觉到自己在战略上已经犯了很大的错误。盖蔑视中国的日本，此时正盛行着“占领七大都市便可制中国死命”的乐观论调，故而以为只要这样下去，中国就会屈服。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正因为是占领了七大都市，却使日本陷入苦境。

蒋总统认为：日本为期征服中国而断然挑起全面战争，但所能得到的则是必然与胜利无缘的、陷入泥沼的战争。这在抗日军兴两年半之前所撰的“敌乎？有乎？”论文中业已提出了警告。

就是说：国土面积差距悬殊的两个国家发生战争，小国绝不可能将大国的国土全部占领；而凭藉武力所能占领的地方，至多不过是若干都市和联系于其间的交通网——只是所谓“点”和“线”而已。

长期抗战战略

‘……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人民两个条件，就是我们抗战必胜的最大武器。

‘我们有了四千万方里的国土，如此广阔辽远的山河，如此绵亘浩荡的幅员，不仅一个日本倾他所有全部的力量，不能全部侵占，就是两个三个日本以两倍三倍于现在日本的力量，也不能侵占我们全国的土地。只就这一点来说：就可以证明日本无论怎么样凶横强暴，也不能够灭亡我们国家！所以广大的土地，就是我们战胜敌人的第一个最大的条件。

‘其次，我们是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民族，拥有全球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有四万万五千万的同胞！以如此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伟大国家，一个小小日本要来并吞我们，要想全部消灭我们，是绝对做不到的事。凭我们四万万五千万的人口，前仆后继的来拚死抗战，该能发生怎么样的一种力量！只就这一事实来看，就可以证明日本绝对不能灭亡我中国！所以众多的人口，就是我们抗战必胜的第二个最大的条件。’（注一）

盖充塞于日本军队在这个广阔地域所占领的“点”和“线”的四周，都是中国的国民，是则日军虽能攻夺许多城市，但实际却只是被困闭在城垣之内，陷于动弹不得的状态。

‘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

‘本来，战争的胜败，就是决定于空间与时间。我们有了敌人一时无法全部占领的广大土地，就此空间的条件，已足以制胜侵略的敌人。……我们所有一切的土地，不作生产上的利用，就要作军事上的利用，要讲求种种有效的方法，使地能尽其利，这是我们抗战必胜的最大武器。

‘……我们现在与敌人打仗，就要争时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注二）

这就是被称为：“以空间换时间，以敌前变敌后”的长期抗战战略。

日军无法速战速决

日军是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做好了侵略的准备之后，才来发动快速战争；而且是在中国主要都市集中所在的滨海地区和长江流域，更有利于机动力的展布与补给运输，可以让他们纵横驰驱；所以，他们的打算乃是在于“速战速决”。

当初，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日军以压倒兵力开始沿平汉、津浦两铁路南下；可是，此时的中国军，则以黄河为防线，自南方支持住这一线，并以山西为根据地，由侧面对行将南下的日军加以压迫，结果，日军更在淞沪点燃战火，而使战线的正面乃不得不转变为自东徂西的方向。

至此，中国方面乃一举投入五十万精锐部队，在河川沼泽交错、而不便于作战的长江下游牵制日军达三个月之久。

继之，又以“磁性战术”将原拟溯江而上的日军诱引到徐州地区，使之不得已而兜了一个大圈子。

日军好不容易才推进到武汉，则已经是自七七事变以来经过了将近十六个月的时间。

日军所进展到的华中、华南，乃是在七七事变之前“黄金的十年”时代之国家建设中有显着发展的地区；而武汉更是在这个地区中以长江航运畅达东西、以及平汉粤汉两铁路陆运联系南北的枢纽之地。

不过，现在中国虽然失掉了这些重要地方，但至此所经历的十六个月，则极有价值；因为在这段期间，长江下游和东南地区的重要设备与物资，已经向西南部内地移运完毕，这就是由于中国有广大的空间而产生出充裕的时间。

中国还有百万以上的正规军队，更有以“天府之国”四川为首的潜力无限的后方基地。

相反地，只是控制了“点”和“线”的日军，则在兵员和物资两方面都没有足以继续不断推展向中国内地大规模作战到底的能力；并且由于落在“点”和“线”中对环绕四周的中国军民长期作战，则只有趋向逐渐遭受压迫而徒事消耗的前途。故而战事愈拖延下去，显然中国会转为优势，日本则居于劣势。

所以，就中国而言，虽然七大都市已被敌人所蹂躏，但其战略却已成功，就是掌握了往后战争的主导权。

注一、二：蒋总统-“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一九三八二）

第二期抗战

由于武汉保卫战之结束，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由过去第一个时期的“守势作战”进入第二个时期的“持久战”。不仅能坚持防御、遏阻敌人进攻，而且是增强了后方的生产力，转变为反攻形势的进境。

长沙大火

在武汉撤军之后，统帅部预定移设于湖南长沙，但就在其时发生长沙大火，于是乃将统帅部置于南岳。

长沙大火，是由防守该地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之部下所犯下的错误。

张治中决定：如果日军进攻前来，则采行“焦土战术”之后撤退，为此而将士兵三人一组变成放火组，命令如见市内起火，便以之为信号，对市内重要设施一齐纵火。

未料，十一月十二日（一九三八年）晚间，南门外的伤兵医院刚好失火，兵士们误认为就是“信号”，乃照预定计划放起火来；加上对于市民们的预告和指导疏散措施又做得不够，以致火舌席卷了整个长沙城，直到天明，市区烧毁了三分之二。

十六日，蒋总统由南岳到长沙视察火灾状况，市内遍地瓦砾，步履困难。在一个教友家里邀请居留长沙的外侨们茶会，亲自表达遗憾之意。当时，在长沙城内连茶叶都买不到，还是由那位教友拿出招待客人。

为了明示责任，蒋总统下令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三人交付军法审判，处以死刑。

长沙以往在一九三○年七月曾被彭德怀叛军焚掠；想到民众们的焚余之苦，实在是痛心不置。

此时，日军刚刚进占到在长沙北方约一百三十公里的岳阳便停留下来，而进攻长沙则是三年之后的一九四一年九月。

长沙大火，在后来曾被和日军勾结的汪兆铭等人藉题发挥作为攻讦蒋总统的口实。

十一月二十日，蒋总统由长沙回到南岳的统帅部。

‘上星期处理广州失守重案之后，不料又有长沙失火重案之处理。……南北奔走，难关重重，何日得已！但只要所发生不测之困难皆能为我所克服，则胜利更近矣！’（十一月二十日日记）

南岳军事会议

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南岳召开第一次军事会议，检讨第一时期和展望第二时期的抗日战争形势。对与会将领训示如次：

‘在第一期战斗过程中，我们虽然失了许多土地，死伤了许多同胞，表面上我们是失败了；但从整个长期的战局上说，是完全成功。最大的成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争取最后胜利战略上一切布置的完成，亦就是我们已经依照预定的战略陷敌军于困敝失败莫能自拔的地位，这就是孙子所说“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最高原则，今日我们已做到了。……

‘第二期抗战，就是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照敌人的理想，他何尝不想，一鼓挺进攻占我们的长沙和南昌；然而他进到岳州（岳阳）以后，就不能再攻进来。……这可以证明不是他的战略上没有算到这一着，而是事实上他的力量已用尽，没有余力再侵略进来。’

这一年的夏天，蒋总统在汉口一面指挥长江沿岸的军事，一面熟读孙子兵法。

‘读孙子地形篇。今日长江之敝，已入挂形与险形之地矣！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此倭寇之所以必败也。’（八月三十一日日记）

日本犯了军事上三大忌

‘从战略上看来，他（日本）犯了军事上三个大忌：

‘一、不知己不知彼。他始终没有梦想到我国抗战到十八个月之久，不但不为所屈，而且愈战愈强；他也没有知道他自己的兵力使用到某一程度之后，要疲竭到以他五个人来拚我们一个人的地步。

‘二、他一味希图取巧侥幸，妄想以轻巧取胜。而结果适得其反，完全违背了孙子“兵贵拙速”的原则，弄到政潮迭起，反战空气日浓，他们所自夸为唯一战时内阁的近卫文麿乃不得不因此下台（一九三九年元月）。又证实了孙子所谓“兵久而国不利”的名言。

‘三、古人所谓“顿兵深入”的大忌，原为对强者而说的，现在他从东海边头深入到几千里外我国的内地，使得他已占领的地区，都变成了我们正规军和游击队活动的势力所在，处处要受我们的控制，时时遭到我们的打击，欲进则愈陷愈深，要退则到处荆棘，这真是走到了孙子所谓“钝兵挫锐、屈力殚货”的地步。’

在这一段时期，中国所争取到的时间，也正是国际情势变化的时候。

‘外交与国际形势，亦在转变动荡之中。敌军占领武汉以后，国际对其压迫更形显著，是敌之害，即我之利也。’（十一月三十日日记）

注：蒋总统-“以事实证明敌国必败及我国必胜”（一九三九一）

在各地制造傀儡

在中国大陆的辽阔战线上陷身泥沼、动弹不得的日本，这才对于只凭军事作战不可能使中国屈服的道理有所察觉，转而又在政治阴谋上打起主意。阴谋之一，乃为卵育傀儡政权；另一，则是所谓和平工作。

日本所搞出的傀儡政权，自九一八之后的伪“满洲国”开始；直到七七事变之前，已陆续出现了德王的“内蒙军政府”，和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而在七七之后，仍由其军部在积极策进中。

所谓“治安维持会”

首先，日军一经占领平、津，便在其指使之下成立了“北平临时治安维持会”（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和“天津地方治安维持会”（八月一日）。

这两个“治安维持会”，只是日军占领行政的协力机关，北平负责人乃袁世凯时代的步军统领江朝宗，天津负责人则为直隶系政客高凌爵——都是过了时代的人。

日军因其占领区域的扩大，随即在各地制造出此类“治安维持会”。但还是不够满足，而有意将各维持会合并起来，新成立一个脱离国民政府的华北傀儡政权。

日本方面，担任这个卵育傀儡政权任务的人，是于九月四日就任“北支那方面军”特务部长的喜多诚一少将。在他的筹划之下，于十月二十八日作成一个文件——“关于树立北支政权的研究”，其构想为：“新政权，并非作为华北地方政权，而是以之代替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使其政令普及于日本军势力范围所属全部地区。”并即向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提出建议。

日本陆军首脑部也采纳了此一方针，且对喜多诚一有所督勉。

北方的伪组织

被喜多诚一选为“新政权”对象的一伙人，是以曾任北京政府财政总长而在当时为冀察政务委员会一分子的直隶系王克敏等人；他们都是失意的、北洋军阀时代的老政客。日军拉拢到这一批人之后，便在攻陷南京的次日（十二月十四日）使他们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北平中南海居仁堂，竟然妄自打出了“中华民国”的旗号。

参加这个伪组织的汉奸们，有汤尔和（议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行政委员会委员长）、董康（司法委员会委员长）等人。

这个所谓“临时政府”，管辖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各省以及察哈尔一部分地区，宣称统一了各地的对日军协力机关（维持会等）；翌年元月底，更合并了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以北平、天津为“直辖市”。

于是，国民政府乃于十二月二十日发表否认该伪组织的声明如下：

“日本自侵略中国以来，占领我城市、屠杀我人民，凶焰日张；近复袭用在我东北四省与冀东各县故技，胁诱不肖之徒为其爪牙，在非法占领之北平设立伪组织——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该项伪组织完全为日本之傀儡，其参加此项组织人等自应依国法惩处。而组织之存在与其行为既全在日本控制之下，自应由日本负责，而非寻常叛乱可比。

“日本此举，实系侵犯中国主权与领土、行政之完整，为日本侵略中国日益扩大的重要证明。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兹特郑重声明：在日本军队占领之北平或其他地方发现任何伪政治组织，皆为日本侵犯中国主权及行政完整之暴行；其一切行为，对内对外当然无效。”

同时，国民政府更明令通缉王克敏等人。通缉令昭示：“凡在日军非法占领区域，甘心附敌、参加伪组织者，决按汉奸治罪条例查明通缉严办。”

一九三八年元月十六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其所发表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之中有谓“期望真能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成立与发展，与之调整邦交，并协助建设新中国。”就是由于已有上述的背景存在。他们为意图制造出唯命是从的所谓“新兴政权”尽到了最大的努力。元月二十日，将其司令部由天津迁移到北平的“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也表示：“支持新政权，共同努力推进明德新民政策。”

“日本顾问”控制一切

实则，日本的真正目的，是在操纵傀儡政权来控制中国，俾便以榨取到的人力与物资支援其战争，好更加扩大侵略。质言之，就是利用之为“以华制华”的一种手段。

日本役使傀儡政权最先所实行的，就是对于输入日本商品撤废其限制和降低其关税；继之，组成所谓“日华经济协议会”，由日军和伪组织掌握华北的产业经济权力；更继之，于六月间设立了可以称之为“满铁第二”的“北支开发会社”，将华北的交通、通信、矿业、盐业、电力等重要产业，都纳入该会社的管理之下。而华北经过这么一来，也就成了日本的经济殖民地。

傀儡政权人事，也被日军所掌握。开始的时候，还只由“北支那方面军”特务部长喜多诚一、总务部长根本博等人以非正式的顾问身分出面“指导”；但到了四月间，经寺内寿一和王克敏签署了关于招聘顾问的约定之后，接受喜多诚一所推荐的行政、军事、法制三个日本顾问。于是，任凭日军播弄的一群汉奸，便完全成了日军的工具，没有丝毫职权，甚至连王克敏都曾经慨叹地说：“像这个样子，新政府还有什么必要呢？”

这就是近卫声明所指称的“真正提携”、“协力建设”的本质。

日本的谋略

日本军阀和在华北制造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同时，更策谋在华中和内蒙也卵育同样的傀儡组织。

华中方面，于十二月五日（一九三七年）在上海成立“大道市政府”，翌年元旦在南京成立“自治委员会”，若干沦陷区城市都陆续制造出类似的傀儡组织。及至元月下旬，在华中各地较大的“治安维持会”已达二十六个之多。

日军的意图，就是要将各地的“治安维持会”合并起来，制造一个所谓“新政权”。策划这件事的中心人物，则是“中支那派遣军”特务机关长臼田宽三。

臼田宽三首先以上海为目标。因为上海是一个国际都市，更是中国的经济中枢，要是在这里出现“新政权”，会引起国际间的注意。

日军的阴谋，是由号召上海财经界人士组成“市民协会”开始。这个“协会”虽然打着复兴上海经济的旗号，实则是对于日军经济协力的团体。由于利之所在，故而在商人们之中也就有人参加，打算要和日本人勾结起来捞上一笔。可是，上海本来就是民族意识最高昂的地方，加上日军在上海、南京有过层出不穷的暴虐行为，民间反日意识炽烈。故而对于“市民协会”的活动群起反对，以致发生了首谋者陆伯鸿（闸北水电公司总经理）被人刺杀的事件，这个组织也就终于胎死腹中。

此后，又打算抬出隐退于上海法租界、曾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初担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这是出于在上海的政客李国杰、周凤岐等人的幕后活动。上海市民对之又掀起反对运动，抗议的书信像雪片一般地寄到唐绍仪处，使得一时不甘寂寞的唐绍仪不敢妄动，以致日军的阴谋乃为上海民众的力量所压制；而唐绍仪、周凤岐、李国杰三人后来也都没有逃过被暗杀的命运。

南京的伪组织

由于两度失败而放弃了在上海打主意的日本，乃将舞台移往南京，继续策动。及至三月二十八日，才在南京成立所谓“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管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以曾属段祺瑞派的政客梁鸿志僭称行政院长，但实则是由日军派其“中支那派遣军”特务部长原田熊吉（少将）等二十七个日本人为顾问，实际控制一切政务。

在此之先，有自东北出击侵入察哈尔、山西、绥远方面的日本关东军，也在各该地区进行着同样工作，并已于一九三七年九月至十月之间先后出现了“察南”、“晋北”、“蒙古联盟”等三个“自治政府”；及至十一月二十二日，复在张家口成立了为以上各地之联合政府的“蒙疆联合委员会”，并以前任伪“满洲国间岛省长”的日本人金井章次为最高顾问，掌握实权。

至此，日本就是通过上述一些作法，得以在华北、华中、内蒙三处占领区域分别造成了他的傀儡政权。

这三个甘为日本工具的“新政权”，更互相联系，展开活动。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三日，“北平”与“南京”之间签署了有关关税、盐税、统税（货物税）的协定；接着又在日军攻占徐州而使南、北两沦陷区联成一线之后，即行实施优待日本商品的统一关税，以帮助日本经济侵略。

日本近卫内阁，一方面对于这三个傀儡组织承认各为适应其地区特殊情况而实行“自治”，一方面并考虑以他们组成联合性质的“中央政府”。这种不伦不类的“自治”，实则只是为了要他们遵照各地日军的意图就地签订协定，好成为被日军操纵的傀儡；更且是对于预定成为其联合组织的“中央政府”也不会让他有较大权力集中的一种手法。

日本的“五相会议”

至于日本方面，在这一段期间其战时体制越发加强。四月一日，实施国家总动员法；五月底至六月，近卫内阁改组。——新任陆相为陆军中将板垣征四郎（前任杉山元），外相为陆军大将宇垣一成（前任广田弘毅），而板垣则是一向以“倒蒋”为其宗旨。继之，更于六月十日设置由首相及陆军、海军、外务、大藏所组成的“五相会议”，作为“最高国策研讨机关”。

“五相会议”先后于六月二十四日、七月十二日、二十二日决定了“今后支那事变指导方针”、“因应时局的对支谋略”、“支那政权内面指导大纲”三个文件，并即根据这些决定，加速进行制造为日本傀儡的“中央政权”。

据日本资料——“指导方针”，为“集中国力于本年（一九三八年）内达成战争目的”及“对于第三国的友好调停得视条件情形予以受诺”两项。

“对支谋略”，是以破坏中国抗战能力，“使中央政府崩坏、使蒋介石下台”为目的；并决定：（一）起用“支那一流人物”，酿成“新中央政权”的机运。（二）利用并操纵“反蒋实力派”，在敌中树立“反蒋、反共、反战政府”。（三）使中国法币制度崩坏，取得中国在外财产，使中国财政自行溃灭……等六项要点。

至于“内面指导”，则是标示日本对于“新政权”自其内部加以指导的基准——从军事、外交．经济．文化各方面基于“新政权”和日本、“满洲”之结合而确定其地位。要求内容为：“促进中国军归顺及反蒋、反共化”“地方自治政权之分治合作”、“由日本顾问担任内面指导”、“共同防共”、“完成日、满、支三国经济圈”等项。

九月九日，日本五相会议又决定了“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树立要纲”，召集北平的王克敏、南京的梁鸿志等人在大连开会，商量结果，采取协调体制，于二十二日在北平勤政殿成立“联合委员会”，负责沦陷区一般政务、租税、交通等业务。

个人间的活动

日本一方面发表“近卫声明”（第一次），宣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在沦陷区推进其制造新傀儡政权的阴谋，另一方面却仍然没有忘记悄悄地向国民政府送出微笑。因为他知道卵育所谓“新政权”，是和中国的民心结合不上的，故而同时通过“和平工作”的名义推行其“怀柔政策”。

在一九三八年元月，“陶德曼工作”虽则停止，但日本对于循第三国调停的途径使中国接受其条件、对之屈服的工作却并没有死心；而想承揽这个调停工作的人，则是义大利驻华大使柯莱。

柯莱自七七事变爆发以来，便向国民政府劝说：“这个战争，等于是阿比西尼亚想要抵抗义大利，中国必然会失败；中国纵使进行长期抗战，但不可能有什么收获。应该赶快和日本坐下来谈和。”

柯莱的行动，在陶德曼工作失败之后，遽然活跃起来。

义大利这个国家，当卢沟桥战火点燃后，便参加了日德防共同盟，并且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九国公约会议讨论日本侵略中国之际，为日本作代言人；继之，更于十一月抢在其他国家的前面对日本所卵翼的伪“满洲国”给予承认。可见义大利的背后有日本在策划导演，是非常明显的情况；故而中国对于柯莱所建议的和谈当然不会搭腔。

‘世人祇知战时痛苦，妄想速和，殊不知和后之痛苦更甚于战时；而况为屈服不能得到平等之和乎！’（蒋总统三月二十二日日记）

此后，柯莱的调停工作还曾一再出现，但为中国方面所拒绝，以致消失于无形。

西义显与高宗武

此外，又有一个路线——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驻南京事务所主任西义显，利用中国留日同学的关系和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及该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接触，锲而不舍地探寻和平线索；西义显这个工作是得到了满铁总裁松冈洋右的同意，并且拨款给予资助。

由于西义显的工作，董道宁乃于一九三八年二月秘密前往日本，与日方陆军参谋本部担当谋略工作的第八课课长影佐祯昭晤谈。影佐在参谋本部中居于“不扩大派”的中心势力，当近卫文麿要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之际，影佐强烈反对，曾有运动参谋本部向日皇直接陈诉、谋使中止发表那个声明的行动。

董道宁在日本停留约两个星期返回中国，影佐托其带回一封致旧识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的书信，其内容略为：“近卫声明将致东亚命运陷于穷途末路。董道宁来日，转达贵国政府之诚意，大为感动；希望继起有人，以解日本朝野之惑。”

这些活动，由高宗武于四月五日向国民政府报告。

四月十六日，高宗武和西义显在香港晤谈。

据西义显回忆录，当时，高宗武曾经这样地说：

“蒋委员长对于影佐大佐的书信颇为感动，请口头向日本政府转达以下意见：

“向敌方致送书信，等于是将武士自己的生命托付给敌方，对于影佐大佐和平外交的诚心，特别致意。

“我们想像得到：日本对中国作战的意图，第一是为了对苏联关系之安全保障，第二是为了保护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及依存关系。

“但关于第一项，东北四省和内蒙可留待他日协议；唯河北、察哈尔绝对须还给中国，日本必须尊重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主权的确立与行政的完整。

“若对上项意旨能有了解，则日军便应先行停战，然后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细则的交涉。”

西义显立即将高宗武的回话带回东京。可是在这段期间战事已更有变化，日军对于四月六日在台儿庄的大败大为激动，故而倾其全力进攻徐州。

于是，西义显的和平工作遂未被参谋本部所采纳，以致徒劳无功。

然而，高宗武和董道显的活动，在后来却产生了被日本为抬出汪兆铭而加以利用的结果。

所谓“宇垣工作”

五月初，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强硬演说：“在达成彻底膺惩蒋政权并使之崩溃的目的之前，决不休战；帝国所决定的方针，即使费时数年也不会变更。”这个态度，像是正式否定了“和平工作”；但另一方面却还有一条路线——“宇垣工作”，仍在秘密进行之中。

六月三日，陆军元老宇垣一成出任改组后的近卫内阁外相。此时，正当徐州会战过后，入侵大陆的日军即将因黄河决堤而陷入名副其实的泥淖之际。

宇垣一成在日本军人中对于中国情况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并与国民政府的某些要人有其私交。

他在就任外相之际，向近卫首相提出四项条件：（一）加强内阁统一。（二）对华外交一元化。（三）迅速决定和平方针。（四）不拘泥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获得近卫的完全同意。

此时的近卫，也正寄望于藉起用军人出任外相，好统一国内意见，并期待宇垣和国民政府的人事关系，或许会接得上打开局面的路线。

日军部破坏外交

宇垣一成被起用为外相，将推动日本在和平工作上的加速器，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事；不过，假定是凭藉武力来强迫进行屈服式的和谈，则决非中国之所能接受。

‘敌国至此方知吾不可以威胁与利诱，而其果能断其灭亡中国之念，是即吾之第一步胜利也；但恐其仍不能断念耳！’（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日记）

‘敌国舆论似渐转向和平之路，然敌阀阴谋在“讲和”时更增险恶，不可不慎之又慎。’（六月七日日记）

宇垣透露议和可能性

六月十七日，宇垣外相第一次接见外国记者。他的谈话虽然不够具体，但有“大局根本变动时，可以重行考虑日本态度”的说法，流露出两国之间有议和的可能性。

成为所谓“宇垣工作”之发端的，则是当他就任外相时，中国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以私人身分发给他的贺电。

张群是在宇垣以往担任陆军大臣时和他相识于东京，曾经商讨过亚洲的将来和中日两国携手合作的重要性。而这一次的贺电中，也流露出希望实现中日友好亲善的素愿。

宇垣立即有了复电，并建议可否请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赴日本洽商。于是，交涉的端倪遂如春云乍展。

为了预作接洽，六月二十六、二十八两天，孔祥熙的秘书乔辅三在香港和日本驻港总领事中村丰一晤谈。

当时，近卫文麿（首相）和板垣征四郎（陆相）都坚持要“蒋介石下野”，乃成为和平交涉的一个重要问题。

据曾担任外务省东亚局长的石射猪太郎自传-“外交官的一生”记述：

六月二十六日中村丰一和乔辅三会谈之后，向外务省报告：“中国方面问到日本是否以要求蒋委员长下野作为和平的条件？”

宇垣乃亲笔起草指复文稿，其中有“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之语；我（石射）便向他进言：“这样的话，和谈一开始就不会有希望了。”宇垣说：“最后的态度，是不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的；但鉴于日本国内的反蒋感情，不宜在一开始就露出底牌。”结果，乃将指令中的文字改为：“日本国内对蒋氏反感相当强烈，是否以其下野为条件，目前不遽为决定，留待后日商量；至其他各点，则希望与乔氏进行会谈。”于是，交涉乃开始进行。

乔辅三与中村丰一自七月十八日起再度在香港会谈，大致谈到可由孔祥熙前往长崎，和日本方面直接谈判。

可是，日本军部对于宇垣工作的妨碍活动，则来的更快，陆相板垣征四郎等人不断地鼓吹强硬意见，煽动国内舆论。

‘敌陆相板垣近又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及反对谋和之言论，是即反对宇垣之外交政策也。’（七月二日日记）

‘敌陆相板垣见倭王后，复向外国记者发表倒蒋之声明。然余终不屈服，则敌只有加紧军事进攻之一途。

‘敌国以不战而胜为上策，其次则速战速决；今久战而不能决，是其致命伤也。’（七月三日日记）

‘倭首相近卫昨忽销假视事，而倭王又先后召见板垣、宇垣、近卫、及参谋总长闲院宫，其必对华和战方针已有决定。

‘板垣态度忽变强硬，明白反对宇垣与我求和及由第三国调停之外交方针；但其实仍外强中干，试探我是否为其威逼而屈服耳。’（七月五日日记）

企图利用汪兆铭

日本军部之所以要破坏通过外交路线的宇垣工作，是因为当时军部方面另有一条路线正在进行着谋以汪兆铭制造傀儡政权的活动。

中国方面，被这个活动所利用的，是在先通过西义显关系和日本参谋本部为谋和平而接触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高宗武在和日本参谋本部交涉失败之后，上了对方军部人士花言巧语的当，转而为抬出汪兆铭的工作盲目奔走。对于高宗武的活动，日本板垣陆相和近卫首相都用上了力量；七月间，高宗武悄悄东渡日本，并且直接和近卫见了面。于是，在日本军部来说，扶植一个唯命是从的所谓“新政权”，当然为优先选择的对象；至于循外交途径的解决方法，则只不过是隐藏住自己的野心，让他人表演一场而已。

对于高宗武工作怀有信心的板垣，于八月三十日发表其“对华政策”的谈话如左：

“对华政策，仍循元月十六日近卫声明之路推进；但蒋介石如能有参加新政权之意，则亦未尝没有再行研究的余地。

“关于中国新中央政府之树立，宜由蒙疆自治委员会、临时政府（北平）以及维新政府（南京）分别派出代表组成中央政府筹备委员会，然后诞生政府。

据说宇垣，在打算孔祥熙来日之前，特地在内阁会议中详细报告中日之间接触经过，并提出赋予和平交涉全权的要求；而陆军人士却立即群起反对，并着手于把宇垣拉下台来的谋略活动。

高宗武潜赴日本

日本军部利用为拉垮宇垣外相的工作，是所谓“对支院”的设置问题。

所谓“对支院”，是日本政府打算新设立的一个中央机关，统一处理所有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推进这个设立工作的，是日本陆军，其目的，是为了要想把外务省对中国外交的职权夺取到军方的手中。

宇垣一成彻底反对这个谋略，乃提出“对支院”的职权只限于日军占领地区的修正案，加以对抗；但因首相近卫文麿同意军方的主张，所以宇垣乃终于在九月二十九日提出辞呈，走出了外务省。于是，“宇垣工作”也就随之消逝。

‘昨日，宇垣外相辞职，其内阁顿呈混乱惶惑之象，推察其原因，可约言之：

‘一、所谓对华中央机关权限之斗争，宇垣为军部所排斥。

‘二、对英外交方针之不能贯彻。

‘三、国联通过第十六条盟约（对于发动战争国家予以经济制裁），其外交显然失败。

‘四、军部欲向华南进兵，外务省不能同意乎？

‘总之，倭阁命运已遇最大难关。’（九月三十日日记）

宇垣辞职后，日本内阁于十月一日阁议中正式决定设立“对支院”；后来改名“兴亚院”，成立于十二月二十六日。

日本最后一着棋子

和“宇垣工作”告终之同时，抬出汪兆铭的工作乃更为积极。

‘……正因为敌人对内对外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处处都是绝路，所以他在迟回却顾以后，终于叫汪兆铭继承王克敏、梁鸿志之后在南京组织傀儡政府。汪逆他们丧尽廉耻，甘作奴隶，出卖祖国，自然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是我们抗战过程中的莫大污点。

‘但是这种伪组织，何尝能对我国抗战发生丝毫影响？……所以汪逆伪组织丑剧的出演，是日本最后一着棋子，也就是加速日本崩溃最重要的一着棋子。……’（注）

汪兆铭在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居于重要地位，但却自抗战开始以来，不断力倡和议，反对全面抗战，且被视为有私通日本，使停泊在长江上流的日本军舰逃出中国封锁线的行为。他又在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从事和平工作之际，毋宁说是有点采取偏向日本的态度。

还有，当广州沦陷时，更传播“中央将军队拉到武汉去了”的流言；后来在武汉沦陷乃至长沙大火之后，又藉口责难政府军的焦土战术，其反政府的言行颇为显著。

而日本的近卫内阁，乃正在考量着像这样的汪兆铭则是他们所要引为其傀儡的一张王牌。

至于为抬出汪兆铭而最先从事活动的人，则是在前面业已提到过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

高宗武在经由日本南满铁路公司南京事务所主任西义显所进行的和平工作失败之后，仍在香港与西义显保持接触。本来高宗武的任务，是从日本人方面获取情报向国民政府呈报；可是当他和西义显会面的过程中，却逐渐受了对方的影响，而成了被日军所利用于为汪兆铭抬轿子的脚夫。

高宗武除对汪兆铭通消息之外，并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副主任周佛海也有秘密联络。他当宇垣工作尚在进行之中的六月二十三日，为了要和日本当政者见面，竟未报经政府核准，便首途前往日本。

‘高宗武擅自妄动，可谓胆大妄为矣！’（六月二十四日日记）

七月五日，高宗武抵达横滨。旋经日本陆军省军务课长（前参谋本部第八课长）影佐祯昭引介与首相近卫文麿、陆相板垣征四郎会谈，当时，高宗武有这样的说法：

“蒋委员长对于日本的所作所为甚为愤怒；但愤怒只是一时的，不能因之放弃永远大计。若蒋委员长不接受和议，则汪兆铭必定接受；汪的意志已很明白，如果日本表示诚意，则以汪为首的中国内部的和平势力便会接受停战的调停。汪已对蒋委员长作了数十次的进言；若时机成熟，汪立即会实行计划。

“日本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因此，连汪兆铭也为之无计可施。在国民政府中，既有汪兆铭内应，日本应该先进行和议。”

由于高宗武的这些行动，乃使日本军部增强了以汪兆铭为傀儡的信心，以致外交路线的宇垣工作为之失败。

高宗武此次更从板垣处得到“日本政府愿以汪兆铭为和平运动中心”的保证函。本来，高宗武是要求由近卫写给这封亲笔信，但日本方面以未有一国首相写出这种书信的道理而予以拒绝，并改由板垣出具了这么一个文书。

将文件寄到汉口

高宗武回到香港之后，将他的日记及会议纪录等文件整理之后，于七月二十一日寄到汉口上陈蒋总统。他在这封信中解释如下：

“委员长钧鉴：职于六月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会谈纪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赎职擅越之罪于万一也。”

七月二十五日，蒋总统约汪兆铭、张群讨论高宗武报告。当然高宗武对于重要之处，是没有在这个报告中明白交待出来的；而汪兆铭则神情颇不自然地阅读了这个文件，似乎是有所愧怍的样子。

注：蒋总统-“集中力量推进政治经济建设”（一九四○四）

汪兆铭卖国条件

汪兆铭所差使的又一个联络关系，是梅思平。当时梅思平借用上海文化团体名义从事和平运动，得到汪兆铭的深厚信任；乃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前往香港，与日本参谋本部支那班长今井武夫中佐秘密会谈。

十月二十二日，梅思平乘飞机抵达重庆，转告汪兆铭：“日本希望汪脱离重庆，另组政府，谈判和平条件。”

此时，在汪寓有梅思平、周佛海、陈公博、陶希圣等集会，连日进行密议。就在这个期间的二十五日，武汉沦陷，而他们的会议则很难达到结论。

催促接受日本意向的人，是汪兆铭之妻陈壁君，遂于最后决定依从她的主张。

汪兆铭的意图，旋即于十一月二日经由香港转达到日本。

翌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向国内外发表了所谓“日本此次战争的目的，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第二次近卫声明”。

这个声明，将前次“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说法有所修正，表示，“以日、满、支三国相提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树立互相连环关系，……倘国民政府能转换政策、变更人事，参加建设新秩序，日本并不拒绝。”其用意，是在促成中国内部的分裂。

‘敌国声明及其谬论，五光十色，矛盾百出，意在内欺其国民，外欺世界友邦，更对中国国民妄想肆其迷惑、麻醉、恫吓之毒计。’（注）

然而，汪兆铭在重庆的报章报导出这个声明之后，便有表示：“应该根据日本政府的声明，和日方开始和平谈判。”蒋总统曾对汪兆铭指出：日本的声明含有怎么样的阴谋毒计，希望他能有所理解；但却没有察觉到他已经私通日本而开始了背叛活动。

双方在上海密谈条件

由重庆回去的梅思平，于十一月七日抵达香港，和高宗武会晤之后，复于九日，人不知鬼不觉地搭乘外国轮船前往上海。十一日，高宗武也同样地离开香港，到上海和日本方面具体磋商和平条件。

日本方面，则有今井武夫和满铁公司嘱托伊藤芳男等在上海，后来又加上陆军省的影佐祯昭。

十九、二十两天，双方在上海虹口新公园附近的一处空屋中会谈。后来这栋房屋成为土肥11[188]2562原贤二的住宅，被取名“重光堂”，故而这次的会谈被称为“重光堂会谈”。当时，四周毁于战火，室内没有电灯，只得秉烛密谈。

二十日傍晚，双方获致结论计有：“日华协议纪录”、“日华协议纪录谅解事项”、“日华秘密协议纪录”等文件。当中为其中心文件的“日华协议纪录”则差不多已把以往日本的一些要求不折不扣地罗列在内，例如：“（一）缔结日华防共协定，（二）承认满洲国，（三）承认日本在经济提携方面的优先权”等项，都是使中国沦为日本殖民地或是租界的卖国条件。

在这次会谈中，对于此后的进行步骤与方法也交换了意见，决定由日本和汪兆铭双方面对于“协议纪录”再加认定之后，汪兆铭即于十二月五日前后自重庆脱出；在他到达昆明的同时，日本政府便发表声明，汪兆铭也马上响应，发表与国民政府断绝关系的声明，并呼吁国民给予支持。

梅思平与高宗武并且提出：“在汪兆铭采取行动之后，希望日军能迅速进击贵阳，以牵制国民政府的中央军。”但今井武夫与影佐祯昭则表示：“进攻贵阳恐难办到。”但约定“努力轰炸中国后方。”

二十二日，梅、高二人离开上海，经由香港飞往重庆，向汪兆铭报告会谈结果。

影佐等人也将协议事项带回东京，向陆相板垣征四郎及参谋本部提出报告。这个报告并且在获得五相会议及内阁会议备案之后，更以之为要点作成了一个“日支新关系调整方针”，提经三十日举行的御前会议决定。依据这个调整方针，日本遂认为汪兆铭的傀儡政权乃为今后中国的“正统政府”，也就是这样地确定了使中国为之奴隶化的大前提。

日临时更调驻港领事

十二月二日，高宗武通知日本方面——“汪兆铭已承认上海协定（“日华协议纪录”），预定十日到达昆明，并赓续取道河内转飞香港。”继之，又于七日派遣为其属下的外交部情报司科长周隆庠前往香港，和等候联络的西义显接头，告知：“汪兆铭可能由昆明前来香港，届时或许需要日本总领事馆保护；现在的总领事（中村丰一）不太熟识，希望能在十日之前调派比较了解情况的田尻爱义（当时任外务省调查部长）出任总领事。”

日本方面接受了这个要求，由外相有田八郎亲自将待在汤河原温泉的田尻爱义召回东京，使立即乘陆军飞机前往广州，换乘“宇治”号炮舰，于十日正午到达香港就任，表演了一次极其迅速俐落的手法。单凭这一个行动，该可以看出日本方面对于汪兆铭之脱离重庆是寄予了多么大的期待。

可是，在这个当口，汪兆铭的计划却乱了步骤。

因为，蒋总统当时为了策划华南抗日战事，去广西桂林设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汪兆铭为谋趁蒋总统不在重庆的时候伺隙脱出，故而将这个日子定在十二月八日；想不到就在这一天蒋总统提前由桂林回到了重庆。

此际，比蒋总统早一天（七日）返回重庆的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得知副主任周佛海已于五日前往昆明，乃立即往访汪兆铭。当时汪兆铭感觉到自己的态度已经被陈布雷怀疑，乃放弃了趁隙脱出重庆的行动。

注：蒋总统-“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一九三八.十二）

私离重庆

接到汪兆铭延期脱出重庆的消息因而张皇失措的人，是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盖近卫业已将汪兆铭的脱出计划向日皇详细报告，并且准备好了在汪兆铭采取行动的当天～十二月八日前往大阪，发表和汪兆铭呼应的声明。及至接到香港急电，得知预定计划有所改变，乃只得通过宫内大臣松平恒雄向日皇解释，同时并伪称急病取消大阪之行。近卫不仅怕阴谋败露，而且更耽心会不会是受了汪兆铭的骗？据说：他在和松平的谈话中就曾透露——“如果是受了汪某的骗，政府应负重大责任。”又外相有田八郎也对此事表示出悲观的论调说：“这是一场非常危险的赌博，困难可多着啦！”

九日，蒋总统在重庆约集孔祥熙、汪兆铭、王宠惠、叶楚伧等主要人士听取关于今后抗战大计的意见。这是在武汉沦陷以后，到达战时首都-重庆以来，最初的一次首脑会谈。

孔祥熙等人屡屡地谈到国际形势，蒋总统加以阻止说：‘不论国际形势如何，我国必须作自力更生、独立奋斗的准备。’这一番话的内容大致如下：

‘只要我政府不与倭言和，则倭无法亡我。只要不言和，则我政府即使失败，国家必可因此复兴；况政府至今决无失败之理，且革命政府只在主义成功，而不怕一时失败也。’

汪兆铭几乎没有说什么话，只表示：“敌国的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争；我国的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争。”

十二月十六日，汪兆铭单独来见蒋总统，刚好蒋总统微恙，在休息中，和他接谈约三十分钟。

此时，汪兆铭没有提到议和的话。

汪兆铭之脱出重庆，则是在这次和蒋总统见面之后两天的十二月十八日。

这一天，蒋总统预定前往西安主持军事会议，但因西安方面天气不好，沿到两天之后首途；而准备好了飞机票要趁蒋总统离开重庆之际逃脱出去的汪兆铭，感到在重庆再待下去，将有败露的危险，乃以“赴成都军官学校演讲”为藉口，如期上了飞机，其妻陈璧君及秘书曾仲鸣也随同出发。

飞往昆明龙云变卦

离陆之后的飞机，虽曾经过成都，但马上向南飞行，降落地点则为云南省会昆明。

汪兆铭所依赖的对象，是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他的计划已经先告诉了龙云，并且准备好了在到达昆明的同时，龙云便发出拥汪反中央的通电，并打算到第四战区（华南）司令长官张发奎也可能会响应。未料，龙云在汪即将来昆明之前变了卦，忽然称病不与汪见面，反而派部下卢汉见汪，忠告他“回重庆去”。

于是，大为恐慌的汪兆铭，乃于十九日晚间跳上滇越路的火车，转往法属越南的河内。

二十日，汪兆铭抵达河内。当时在香港等候消息的今井武夫便立即拍发密电给近卫文麿，内容如次：

“接获边君（高宗武）电话：竹中君（汪兆铭）来电，已于本日（二十日）到达河内；衡诸一般情势，希望藤原（近卫文麿）谈话至迟能在后天（二十二日）之前发表。”

近卫不谈撤兵承诺

按照这个要求，近卫的声明乃于二十二日发表，在这个所谓“第三次近卫声明”中，表明了卵育傀儡政权以及同时制造出“以日满支（中）三国建立东亚新秩序”为名，而实则是搞的日本支配圈之作法如次：

“政府（日本）始终一贯对于抗日国民政府期予彻底的武力扫荡；同时，与支那同忧有识之士相提携，向建设东亚新秩序之途迈进。

“今者，支那各地，更生势力澎湃兴起，建设机运亦渐感高涨，爰于此际，将政府与更生新支那关系所应行调整之根本方针，昭告中外。……”

此一声明，除上述内容而外，尚举出有对于傀儡政权的具体要求：（一）承认“满洲国”。（二）与日本缔结防共协定。（三）承认日本人在中国内地居住、营业自由等项。

这些要求，是依据影佐祯昭和高宗武在上海“重光堂”会谈的结论并经日本政府与汪兆铭所同意的“日华协议纪录”之规定。但于此必须加以注意的，就是在该项纪录中还明明记有“日本于两年以内撤兵”一节，而现在近卫声明却只字不提。盖日本只是在以甘言诱引汪兆铭，当汪兆铭一旦上钩，日本便不再遵守过去的话了。

蒋总统得知汪兆铭脱出重庆，是于二十一日在陕西武功旅次接到了龙云的电报报告。他因为主持军事会议而在前一天由重庆出发来到武功。

‘此事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恤一切，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是岂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惟望其能自觉回头耳！’（十二月二十一日日记）

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五时，蒋总统由西安回到重庆，当天晚间，即通过顾问端纳转告美、英两国驻华大使：“汪兆铭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中国不但没有意思和日本谈和，而且现在正准备作大规模的抵抗。”

因为汪兆铭的脱出重庆，已经引起了各方面议论纷纭，其中甚至有任意推测——“汪兆铭受了国民政府的密命，是和战两面工作的一个使者。”为此，蒋总统乃首先向美、英两国作了止息谣诼的说明。

开除汪兆铭党籍

十二月二十六日，蒋总统主持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发表讲演，对于和汪兆铭脱出重庆相呼应的“第三次近卫声明”加以驳斥如下：

‘近卫谈话所谓“东亚新秩序”，系以中国“新生”后，日“满”“支”三方面合作为基础。他所谓“新生中国”，是要消灭独立的中国，另外产生一个奴隶的中国，世世受其支配。而此“新秩序”，则是根据于中国已变为奴隶国家后，与日本及其造成之“满洲”伪国紧密联络而成的。……

‘所谓“东亚协同体”，他们公言：日“满”“支”应该是立体关系，而不是平面关系。又说该是家长制，日本为家长，而“满”“支”为子弟。换句话说：前者为治者、为主；后者为被治者、为奴。这不是并吞是什么？……

‘他所谓“经济集团”，不仅是要操纵我中国关税金融，垄断我国生产和贸易，独擅东亚的霸权；他逐渐推演下去，势必至于限制我们中国个个人民的衣食住行，都得不到一些自由，生杀予夺，唯其所欲，整个的中国民族做奴隶、做牛马，在鞭笞吮吸之下，整个消灭我们民族的生存。

‘所谓“兴亚院”（十二月十六日成立），是执行一切灭亡中国计划的总机关，也可以说是集日本从前在中国到处制造罪恶的种种特务机关之大成的一个总特务机关。……现在索性揭破面幕，正式的成立起来。……

并我国家灭我民族

‘综观近卫的这个声明，我们可以断言：日本真正之所欲，乃在整个并吞我国家，与根本消灭我民族，而决不在所谓中日合作或经济提携等等的形势。……

‘我们记得：日本人也常以“日韩一体”、“日韩不可分”等等语调麻醉、眩惑朝鲜的人民，今日他又盛倡“日满支不可分”的“东亚协同体”，干脆就是“中日合并”，就是“日本大陆帝国”之完成！……

‘现在，他灭亡中国之计划与工具已经一切齐备，其侵略并吞之手段与心事已毕露无遗；所缺者，只待中国受其欺朦、受其威胁而向之屈服、上其圈套罢了。……’

在这次演讲中，蒋总统对于汪兆铭之与日本勾结而自重庆脱逃，却并未提及。这是由于不忍见到汪兆铭之自趋毁灭，所以给他留下余地，希望他也许只是一时糊涂，而能在国人群起戟指、竞相责难之前，迷途知返。

翌日（二十七日），蒋总统致电汪兆铭，劝他从速返回重庆；可是，他根本没有这个念头。

十二月二十八日，汪兆铭竟致电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暨国防最高会议，毫无根据地指称：“蒋总裁在陶德曼工作之际，曾允以日方条件为和平谈判之基础。”其用意，是为了要把他自己的行为也说成是正当的。

所谓“艳电”

接着在二十九日，汪兆铭更对国民党中央发出所谓“艳电”，建议同意谈和。

在这封“艳电”中，汪兆铭对于日本声明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等甜言密语，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并且强调：“国民政府应即接受日本声明，以此三点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而“日本军队因而全部由中国撤去，以保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然而，在这个阶段，汪兆铭对于“第三次近卫声明”还是有欠了解，他只相信近卫会忠实地依循所谓“日华协议纪录”发表声明，而好像是没有注意到最重要的日本撤军一点竟然在近卫声明中被“失落”掉了。

国民党临时中常会决议

一九三九年元旦，国民党召集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汪兆铭的“艳电”。蒋总统以党的总裁地位亲临主持，为谋给予汪兆铭以再一度的悔悟机会，而希望加以宽大处理；但中央常务委员们尤其是林森、吴敬恒、张继等人极端愤慨，讨论到最后终于议决：“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并通过由吴敬恒起草的决议文如下：

“汪兆铭承本党付托之重，值抗战紧急之际，擅离职守，匿迹异地，散发违背国策之主张。艳（二十九）日来电，竟主张以敌相近卫根本灭亡我国之狂悍的声明为根据，而向敌求和；一面腾之报章，广为散发，以建议中央为名，逞摇惑人心之技。而其电文内容尤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不惜颠倒是非，为敌张目；更复变本加厉，助售其欺。就其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求降；充其影响所及，直欲动摇国本。……”

这是蒋总统和汪兆铭的诀别。

汪兆铭这个人，本来是总理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组成同盟会之时的老同志，但在总理逝世之后，某些时候，受共产党引诱在武汉组织政权，又于某些时候，和旧军阀勾结在广东从事反中央活动，反覆无常。及当抗日战争开始，再度回到党内，膺任副总裁要职，但却又去投奔侵略者-敌国日本。

‘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之讲演词与本日开除汪兆铭党籍案发表，已克服困难，奠定国基矣！’（元旦日记）

在同一天，蒋总统伉俪接到英国牛津大学各学院院长及教授联名来函赞扬中国抗战并有所鼓励。函内有：“吾人今所企望者，世界民主国家必有一日决定尽力协助中国，而敌人必将屈服于忠勇的中国人民之前。”

汪兆铭到上海

由重庆脱出的汪兆铭，暂时留居河内。

当时，和汪兆铭一起行动的陈公博（前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陶希圣（前任北京大学教授）等人对于“第三次近卫声明”所表露的日本政府态度颇为耽心，爰向汪兆铭劝说：不要去沦陷区而就此出亡欧洲；可是，周佛海、梅思平则主张：前往上海，组织“新政权”，俾和日本进行和平谈判。争持不下，以致一时难定行止。

此时，自日本派来的陆军省军务课长影佐祯昭等人，已经由台湾抵达河内，从事联络。

近卫内阁倒台

正在这个当口，却发生了料想不到的情况--日本的近卫内阁突于一九三九年元月四日总辞职。盖由于在对华问题、日德同盟问题等外交政策方面受到坚主强硬路线的军部压抑，以及因军事预算膨胀导致物价上升，对之束手无策等困难，使得近卫意兴索然，掼了沙帽。此外，又有一说是：军部对近卫不理不睬，举凡在中国大陆的战事等情况，事先都毫无报告，简直把他搁在一边，当成是局外人。

‘近卫为中倭战争之内阁，今竟不能维持而倒台，此为我抗战之一收获也。’（蒋总统元月四日日记）

继任阁揆者，为平沼骐一郎（枢密院议长），此人乃日本国粹派头目。

虽然，陆相板垣征四郎和外相有田八郎均获留任，但汪兆铭则是失掉了在日本的最有力“保护者”近卫文麿。又来到河内的影佐祯昭等人，也因为国内政变而返回日本。

元月十七日，香港南华日报发行人林柏生被一不知姓名的人袭殴受伤。林柏生是汪兆铭的同路人，自汪脱出重庆以来，便在港鼓吹拥汪论调；此次被殴，可以想像得到是出于愤恨汪兆铭卖国的人之所为。汪兆铭乃因而感到恐慌，打算出亡欧洲，而向德、英、法各国申请入境签证。

国民政府自德国驻东京大使馆获得此项情报，蒋总统对于汪兆铭不忍弃之不顾，乃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谷正鼎前往河内，面交中华民国护照，劝汪暂事外游之后，回来再为国家服务。

可是，汪兆铭对于日本仍然恋恋不舍，遂即派遣高宗武于二月二十一日再度东渡日本，与首相平沼骐一郎、外相有田八郎等人会面，探询日方态度。

日本政府在五相会议中决定利用汪兆铭，而对汪进行联络，则是在三月十八日。在此之前，让汪兆铭干着急，实则是为了使汪易受操纵的一种手法。

曾仲鸣遭志士诛杀

三月二十一日，汪兆铭的秘书曾仲鸣在河内高朗街汪的隐秘住宅中被爱国志士所诛杀。

因为刚好就只在这一天的夜晚，汪兆铭和曾仲鸣偶然换了卧室就寝，刺客误认曾仲鸣为汪本人，对室内射击了数枪。

此时，汪兆铭所携带的金钱，都是以曾的名义存在银行，故而重伤危笃的曾仲鸣撑持起坐，于病榻上将所有的支票全部签字，以致流血过多而死。

一说这个刺客名叫王鲁翘，是射击能手，与中国情报机关有关。他于战后来到台湾，曾任台北市警察局长，于一九七四年退休，旋因车祸不治。

翌日，接到这个事件之报告的日本政府，举行五相会议，决定使汪兆铭脱离河内，并派影佐祯昭及“政友会”（政党）党籍的国会议员犬养健等人于四月初前往河内。并由日本政府租赁好了一条法国小汽艇备用。

于是，便依照汪兆铭的希望，决定了他的去处为上海。

四月二十五日深夜，在越南当局的严密保护之下，汪兆铭登上法国小艇离开了河内。

当时预定是在海上和日本的“北光丸”轮船会合，但由于天气恶劣，经过四天还联络不上，颇使等在“北光丸”上的影佐等人为之不安。

到了四月三十日，两条船才在海面碰了头，汪兆铭遂即移登“北光丸”，一度驶到台湾基隆港暂行停泊；旋于五月八日抵达上海，秘密登陆，藏身于法租界愚园路的隐藏住宅。

很快地，汪兆铭便着手于制造他的傀儡组织。

虽然如此，但是汪兆铭倒也还是怕人戟指他的“新政府”是在日军的压力之下出现，他竟然想出一个变通的办法，就是说他的傀儡政权不是新的组织，而是在重庆的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他这个“新政权”也是以“三民主义”为其领导理念，名称更僭用“国民政府”，国旗也要盗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无非是想藉以骗骗中国人的观感。

无奈他这一套却是和日本的方针配合不上的。因为日本仍然是和前此卵育的北平及南京地方傀儡政权一样，只是要产生一个唯日本之命是从的“新中央政权”就可以了。

汪兆铭赴日

汪兆铭为了谋求日本方面对于他的新政权构想有所谅解，乃率领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周隆庠等人于五月三十一日赴日本访问。

可是，日本方面已经在五相会议中再度认定方针——“（一）新中央政府以汪兆铭、吴佩孚及其他脱离重庆分子构成之。（二）新中央政府预先在原则上同意日支新关系调整方针。（三）将来的政治形态，采分治合作，并以华北为日、中两国国防上和经济上的强度结合地区。”

因此，日本对于汪兆铭的一些如意算盘，从根本上就没有搭讪的念头。

签下卖国条件

抵达日本访问的汪兆铭，于六月十日与平沼骐一郎首相会面，并曾与前任首相、现任枢密院议长近卫文麿、外相有田八郎、陆相板垣征四郎等人分别晤谈。

此时，都还不了解日本政府的意图只是要以他为傀儡的汪兆铭，于六月十五日再度和板垣会谈之际，向之提出“关于尊重中国主权之希望”，内容分为内政、军事、经济各项，要求日本方面从速给予回答。

在这个表达希望的文件中，包括有——“（一）中央政府中不设顾问，以免予人有日本干涉内政之疑念；与日本接洽事项，可循外交常轨，透过驻华大使行之。（二）在中央最高军事机关设立顾问委员会，顾问不仅限于日本人，并聘用德义两国人。（三）日本在占领地区所接收的中国公私有资产应即发还等项。”

这些要求，实则根本就不能和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针相容，所以在汪兆铭留日期间没有得到任何一点答复。

为日本政府所正面反对的，是“三民主义”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日本方面提出要求：“三民主义由日本方面加以修正”，“国旗须采用新的图案”。结果作了妥协的决定——修改三民主义问题暂且搁置，至于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则在上方加了一个“和平反共建国”布条。

对于汪兆铭如此卖国降敌的行为，国民政府乃于六月八日明令予以通缉。

吴佩孚拒绝出面

十八日，汪兆铭离开日本，前往天津，为的是要和日军有意拉拢出来的吴佩孚见面，要求吴的协力，打算把军事交吴负责。吴佩孚虽然一度答允面谈，但旋即取消了约定，拒与见面。其后，汪更去函给吴絮聒不已，仍被严峻拒绝；日军也再三拉吴出马，但却被吴回敬一句“只要日本先撤兵，我就可以出来”所驳倒。于是，在岁聿云暮的十二月四日，吴佩孚遂因牙疾而被日本军医强为施行牙科手术后在当天晚上不明不白地去世。

六月二十八日，汪兆铭回到上海，得到日本“南支那派遣军”参谋副长佐藤贤了的协助，从事于在华南设立其所谓“新政权”的活动。他曾策动张发奎、邓能光等粤籍将领参加，但张发奎他们大义凛然，不为所动，以致汪兆铭乃不得不放弃了树立“华南新政权”的企图，而改弦易辙着手在南京制造政权。

他首先以中国国民党的“正统领袖”自居，于八月二十八日在上海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前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的公馆召开其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个“大会”开了三天，出席“代表”二百三十三人，始终只是汪兆铭一个人在表演，完全为他所任意操纵，选出他为“主席”，以反共为这个冒名的“国民党”的“政策”，并决定“调整日华关系，促进两国邦交正常化。”

九月十二日，日本为统一指挥所有在中国的陆军部队，新设“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于南京，调日军教育总监西尾寿造大将为总司令官，并任前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中将为总参谋长。这是为谋因应汪兆铭树立其伪中央政府工作之推展而采取的措施。

太平洋战争导火线

日军“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任务，在为早期解决中日战争，并准备对于第三国的战争。因此，为谋挫抑中国的长期抗战意志，除对汪兆铭加以援助，并对重庆方面进行“和平工作”之外，并赋予切断由法属越南通往重庆的“援蒋补给路线”任务。这就是日本南进政策的开始，并从而加深了和第三国的对立情势，成为进一步爆发太平洋战争的导火线。

十月二十四日，日本政府向汪兆铭提示“中央政治会议指导要领”，并要求——以此为基础进行协商组织新政权事宜。这是对于汪兆铭在先访问日本时向日方所提“关于尊重中国主权之希望”的一个答复，其内容有：除中央政府之外，在财政、经济、科学技术各部门都设置日本顾问；至于军事顾问团内亦不得聘用德、义等第三国人等项，差不多将汪兆铭的希望全部否定。连担任和汪方交涉任务的影佐祯昭都埋怨地说：“这简直就是傀儡政权嘛！”

日本方面和汪兆铭这一派人的协议会，于十一月一日在上海愚园路汪兆铭寓处开始。

日方的出席者为所谓“梅机关”的影佐祯昭（陆军少将）、须贺彦次郎（海军少将）、犬养健（国会议员）、谷荻那华雄（陆军大佐）、矢野征记（外务省书记官）、清水董三（同上）等人。这个机关是日本对汪兆铭工作的窗口，因为其工作地点设于上海一幢名叫“梅花堂”的住宅中，故而被成为“梅机关”。

中国方面，有汪兆铭本人及周佛海、陈公博、高宗武、梅思平、陶希圣等人参加。

一开始，影佐便提出罗列日方要求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日华新关系调整有关的基本原则”、“日华新关系调整有关具体原则”等文件，其中包括有在前面业经提到过的聘用日本顾问以及合营铁路、在海南岛设日军基地等极尽其所能设想得到的许多要求。

可是，在汪兆铭方面对于日本假协议之名而强制的要求，是毫无抵抗之力的，他终于在十二月三十日咽下了如此卖国条件而在“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上签了名。

自认为是卖身契

参加协议的陶希圣坚决反对对日本屈服，忠告汪兆铭和陈璧君打消签约的念头。

汪兆铭则流泪辩解：“中国这样大的国家，不是我能卖得了的，即使我签了字，也只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了。”

卖国密约揭发

汪兆铭所签署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谅解事项”，承认了日本的许多权益如下：

“〔军事〕——（一）防共驻屯权。（二）治安驻屯权。（三）驻屯区域内所有铁路、航空、通信、主要港湾、水路在军事上的要求权及监督权。（四）日本军事顾问团在中国军内的指导权。

“〔经济〕——（一）全中国航空支配权。（二）开发和利用国防上必要的特定资源之企业权（在华北日本有优越地位，其他地区中日平等）。（三）在蒙疆的经济指导权及参与权。（四）掌握华北铁路实权。（五）中日共同经营华北无线电通讯权。（六）在华北的特定资源、特别是国防上必要的蕴藏资源之开发利用权。（七）在华北的国防上必要特定事业之合办参与权（日本占优越地位）。（八）有关华北政务委员会（伪临时政府）经济行政的内面指导权。（九）承认满洲国。”

数十年来，日本所梦寐以求的奴化中国目的，正好由这个约定的签署而在沦陷区实现。

高宗武陶希圣揭发密约

新年开始的一九四○年元月四日，内心反对汪兆铭所签署的此项“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之高宗武与陶希圣对汪兆铭绝望，遂即抄录了“要纲”自上海脱出，前往香港。

在重庆的蒋总统，接到有关这个文件内容的报告，于元月二十日过目。

‘敌阀与汪逆订立“中日新关系调整要纲”之密约，阅之令人发指。汪逆万恶一至于此，痛甚！’（元月二十日日记）

翌日（二十一日），香港各报都以头条新闻报导的密约内容，这是由高宗武和陶希圣两人去信各报馆附致文件摄影予以揭发，并在信中指出：“其中条件之苛酷，甚于民国四年之二十一条不止倍蓰，直欲夷我国于附庸。……”

二十二日，汪兆铭的发言人虽然辩称：“高陶公布的文件，是最初试案，与签订的文件内容不同。”可是，就在同一天，东京刊行的英文“日本时报”则报导其真相说：“这些文件是上年（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协议所决定，并已经日本内阁批准。”

汪兆铭窃用国府名义

民国二十九年

元月二十三日，汪兆铭为谋获得业经为日本所卵育出来的“临时政府”（北平）王克敏和“维新政府”（南京）梁鸿志之合作，在青岛和他们举行会谈。得到同意废除“临时”、“维新”两个地方傀儡政府，纳入汪兆铭所组织的伪“中央政府”；不过，在北平的“临时政府”则仅变更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承认其在“中央政府”之下实行“自治”。这是由于日军要直接操纵华北而作的决定。在这次会议期中，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宣称“适因公务”也来在青岛，以资镇慑。

三月二十二日，在汪兆铭于南京召集的伪“中央政治会议”中，通过了汪兆铭的提案——傀儡政府的名称为“国民政府”；并决定于三月二十六日举行其“还都典礼”。

伪政府“主席”，则盗用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名义，由汪兆铭就任“代理主席”并兼任“行政院院长”。

翌日（二十三日），汪兆铭在南京发表广播，强称自己是“正统政府”，并说：“关于国民政府的组织，我们商量了很久很久。我们现在盼望在重庆的林（森）主席早一点回到南京来，在他没有回来之前，我们照着中央政治会议的决议努力去做。”

针对这个广播，林森主席发表了驳斥汪政权的严正声明，号召国民不要受汪兆铭的欺骗。

汪兆铭在南京举行他的“还都典礼”，成立伪中央政府，是在三月三十日，比当初的预定晚了四天。据说这是由于日本和重庆方面在香港进行着所谓“桐工作”，日方对于这个工作有所期待，所以使汪政权的“还都”延期实施。

当汪兆铭发表其“还都宣言”的同时，重庆国民政府的外交部照会各国驻华使节——“日本所捏造的南京伪组织完全无效。”并即明令通缉参加汪政权的陈公博、温宗尧、梁鸿志等七十七人。

实则各国无须等到外交部的照会，就已经对于个中真相一清二楚。美国国务卿赫尔在中国发出照会的当天便声明：“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国绝不承认南京汪伪政权。”

所谓“桐工作”

再说，关于使汪兆铭伪中央政府延迟出现的“桐工作”，在中国方面则毫无可资覆按有此事实的纪录。在日本方面，据说是“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今井武夫等人曾和重庆方面进行交涉，但完全不足凭信；想必只是日本方面为煽起和平气氛而自导自演的一个插曲。

日本资料：据今井武夫所著“支那事变回忆”一书，对于“桐工作”，有很详细的记述；又在中华民国的出版品中也有以此为“事实”的著述，并且有解释是出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系被称为“军统”的情报机关，负责人戴笠）的谋略。但此次则为中华民国政府当局第一次表示“没有这个事实”。

据今井武夫著书及其他著述，“桐工作”的经过大致如下：

“桐工作”是由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中佐）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下旬在香港和一个自称是“宋子良”的人接触开始。据这个“宋子良”透露：“我是蒋夫人的弟弟，与重庆有密切联络，准备和日本进行和平交涉。”

于是，正在探索和平交涉绪端的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乃接纳了铃木卓尔的报告而上了这个当。

日承认汪伪政权

所谓“桐工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姑且不论；总之，在这个时点，日本方面想派谍报人员前往重庆和国民政府直接接触，则是事实。

可是像这样的接触，国民政府则是不会予以理会的。一九四○年三月二十一日，蒋总统在日记上留有这样的记述：

‘倭寇一面成立汪逆伪中央政治会，宣言卅日成立伪组织；而一面又派陌不相识之陈治平者来求和谈，以试探我方。其愚真不可及。’

据日方资料：“桐工作”的具体开始，是在一九四○年二月。

“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第二、第四课长今井武夫被派往香港，于二月十四日在东肥洋行和自称宋子良的人晤谈。

晤谈结果，经报告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乃由参谋本部派遣谋略课长臼井茂树（大佐）来到当地。

三月七日至十日，在香港举行预备会谈，中国方面有那位“宋子良”及曾任驻德参事章友三、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他们提出由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签署的身分证明书，使日本方面加以相信。

在预备会谈中，双方协议有“中国承认满洲国、国民政府与汪兆铭合作”等事项，并交换了备忘录。

这份备忘录的内容，对于国民政府在此之前的主张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日本方面乃对此发生怀疑，而希望能和重庆直接接触。

但是，一直联络不上，而“桐工作”则是在被那位宋子良牵着走的状况之下继续进行。

六月间，在澳门举行第二次预备会谈，双方同意建议：“蒋介石、汪兆铭、板垣征四郎举行高阶层会谈”。虽然这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而日本方面却信以为真，研究其实现方法，并且还通知了汪兆铭。

日本方面，由于这次交涉过于有利，因而感到可疑；于是，才逐渐察觉到所谓“宋子良”乃是冒充的人，遂即于十月间停止了“桐工作”。而在这段期间，汪兆铭所制造的南京政权，则被日本所搁置未即给予承认。

又据今井武夫记述：所谓宋子良其人，乃是中国军方情报机关“军统”的干部“曾广”。今井在接触之初就怀疑他不是真的宋子良，曾经由旅馆房间的钥匙眼中拍下他的照片，给陈公博和周佛海鉴别真伪，但也无法确定；结果，只得在将信将疑和不愿舍弃保持和重庆一线关系的希望之下继续接触。

所谓“钱永铭工作”

当所谓“桐工作”接近尾声之际，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又通过“南满铁路公司”的西义显打算进行另外一条路线的和平工作；这条路线在中国的接洽者为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故被称为“钱永铭工作”。

在西义显的回忆录中，记述有“钱永铭工作”自开始到结束的经过如左：

“西义显因钱永铭的斡旋，偕同前铁道部财务司长张竞立及张的外甥盛沛东于九月十七日回到日本，与松冈洋右见面。

“张竞立等人向松冈洋右提出钱永铭的提议为：（一）国民政府统一（重庆和南京合并）（二）日军全部撤退，（三）日本和中国的统一政府订立防守同盟条约。

“松冈同意以钱永铭提案为基础进行交涉，并于十月下旬开始由日方西义显、田尻爱义（驻香港总领事）、船津展一郎（伪上海特别市顾问）和中国方面钱永铭、周作民（金城银行总经理）、张竞立在香港交涉。

“十一月七日，中国方面出示——‘日军全面撤兵和撤销对南京傀儡政权的承认’两项条件，松冈洋右也予以承认，国府乃于十一月二十九日以电报通知：可以派前驻日大使许世英前往日本。

“然而，在此之先，日本已于十一月十三日内阁回忆中以‘极力削弱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迅图使之屈服’为目的而决定了一个‘支那事变出来要纲’，打出除使中国单方面屈服以外不可能获致和平的方针。继之，更于十一月二十八日的大本营联络会议中决定：对于因和平工作而延迟承认的汪政权，即予承认。于是，钱永铭工作乃为之停止。”

十一月三十日，日本派遣前任首相阿部信行为特使到达南京，和汪兆铭签订了所谓“日华基本条约”。

基于此一“条约”，日本正式承认了汪兆铭的傀儡政权，而中日两国的一线接触遂即完全截断。

蒋总统指出日本错误

十二月二日，蒋总统主持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纪念周，驳斥日本的错误如下：

‘敌阀于前天承认汪逆伪组织，并发表敌伪所签订的伪约，这是敌人于最近和平谣言攻势失败之后，一种倒行逆施荒谬绝伦的行动。……这种形同废纸的条约，及其对于毫无自由意志甘为日本奴隶的伪组织之承认，根本没有一顾的价值，但在中日两国仇恨史上，则将成为一种重要之资料。而且由于这一张伪约，要使中日两国延长了无穷的战祸，并使中日两民族结成百世不解的仇恨，这是近卫内阁最大的罪恶。’

蒋总统并在这一天的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记述：

‘近卫无智无能，承认汪伪，使中倭酿成不解之仇，既为敌国惜，更为东亚危也。’

第十五章：大东亚的奢望

主题

日本南进的起点日俄之间德俄签约欧洲战起中美“酮油借款”美采取强力行动日机滥炸制胜之道第二次近卫内阁日德义三国同盟史达林阴谋考虑国际战略中美英三国合作

日本南进的起点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拂晓，日军台湾混成旅团与海军陆战队在其第三舰队及飞机支援之下，突然在海南岛的海口附近登陆。

守备该岛的中国军保安第五旅团立即予以迎击，但由于兵力不足，阵地陆续被突破，到下午三时海口陷落；接着，日军更在榆林、新英等港口登陆。

由于海南岛和大陆本土隔有海峡，已知难望自大陆迅速出兵来援的中国守备军司令王毅，乃下令部队化整为零，退入该岛中心部的山岳地带（海拔一三五○公尺）固守。

海南岛与广东省的雷州半岛隔有十八公里的琼州海峡，全岛面积约三万三千五百平方公里，是在中国仅次于台湾的大岛。

侵占海南岛的意义

当时，日军之在海南岛登陆，很多人都以为是他对于中国漫无止境的侵略行动之一个新的场面；然而，在那里响起的隆隆炮声，实际乃是日本“南进政策”的出发点，是显露出他奔向“东亚新秩序”、乃至于“大东亚共荣圈”的奢望。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海南岛的侵略，该可以算是太平洋上的“九一八事变”。

‘敌军今晨在琼州海口登陆，声明占领该岛。此为开战以来对英法美最大之威胁；此后，战局必将急转直下。倭寇狂妄，盖已决心向民主世界开战矣！’（蒋总统二月十日日记）

当日军登陆海南岛的第二天（十一日），蒋总统在重庆接见外国记者，说明其严重性如下：

“蒋总统海南岛日军登陆问题，吾人应就远东海洋整个局势上观察，乃可认识其意义与影响之重大。盖海南岛在东亚为太平洋印度洋之间战略上主要之重心，敌军若占领该岛，不仅可完全阻断香港与新加坡间之交通、切断新加坡与澳洲间之联络，而且始菲律宾亦受其控制；此不仅直接威胁法属安南，实为完全控制太平洋海权之发轫。该岛若归日军掌握，则日本海军向西印度洋以窥地中海，而在东面即可以断绝新加坡、夏威夷岛、珍珠港英美海军根据地之联络。故日军此举，显系对于去年美舰访问新加坡之一种答复。

“记者何以日本此举，为控制太平洋海权之发轫？

三个最重要的战略据点

“蒋总统日本有三个最重要之战略据点--在北为桦太岛，在西为海南岛，在东为关岛。日本欲取得整个制海权，对此三地皆不能忘怀。如三者皆落于日本之手，则菲律宾与夏威夷即等于为日本所占领。现在桦太岛日本已据有其半；今天已占领海南岛，以遮断英国海军向东与美国之联络；若此种计划不受阻止，则日本进一步势将更谋控制关岛。如此，不仅可阻止美国海军之向西，且将隔绝与菲律宾之联络线。……要知道在日本整个海军形势上说来，海南岛是日本在太平洋西面第二道门户，而关岛则是其在太平洋东面之第二道门户。

“记者日本占领海南岛，将影响远东和平至何种程度？

太平洋形势必将突变

“蒋总统日军之进窥海南岛，即等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之占领沈阳；换言之，日本之进攻海南岛，无异造成太平洋上之九一八；地区容有海陆之分，影响却完全相同。回忆沈阳事变发生时，除美国当时国务卿史汀生以外，其他各国当局均不予措意；日本乃得继续扩大其侵略，迄今八年，竟造成其悍然独霸东亚之形势，增长其征服世界之气焰。今日本又进攻海南岛，如任其占领盘踞，吾料不及八月，其设计中之海空军根据地，即可初步完成；于是，太平洋上之形势必将突然大变。法国纵欲在安南设置海军根据地，美国纵欲从事关岛之设防，亦将时不及待。故日本之决然南进，并非欲藉此以求中日战事之结束，而实证明其不惜最后之冒险，以造成太平洋战局之开始也。”

作为日本向海南岛等亚洲太平洋地区扩张的一致口号，并成其后强有力的心理武器的，是当日军占据武汉之后日本政府立即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所发表的“东亚新秩序”声明（第二次近卫声明），略谓：“帝国断不收兵。帝国之冀求者，在于建设能够确保东亚永远安定之新秩序；今次征战之终极目的，亦即在此。”于是，在日本国内“东亚新秩序”这一句话，就像是中了热病一样被狂热地传播开了。

‘日本的政策，现在已经由他的大陆政策扩张到海洋政策，由他的北进政策推进到南进政策。简言之，日本现在的侵略政策，是大陆与海洋同时并进、双管齐下了。在吞并中国的企图中，同时更要推翻国际秩序，独霸东亚，驱逐欧美的势力。’（注）

近卫所说的“东亚新秩序”，其真正的目的，不仅在以中国为其奴隶国，乃是要制造以日本为“盟主”的“大陆帝国”、“亚洲帝国”，——不仅此也，而是“世界帝国”。

注：蒋总统-“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一九三八十二）

日俄之间

当时，日本的世界战略，是表现出巩固北方，以图南进的计划。

就他的北方安定而论，最重要的，乃是苏联的动向。

日本和苏联，是把中国这个被掠夺的对象放在和他们等距离的位置，而他们彼此之间则居于互以对方为假想敌国的关系。所以，日本一将东北攫夺到手，苏联便紧跟着在外蒙扩张势力，并致力于开发西伯利亚，俾图对日本加以压迫。又如日本和纳粹德国缔结防共协定，从欧洲方面牵制苏联，于是苏联便找中国签订不侵犯条约，以谋巩固其在亚洲的境况。

在“九一八”当时，苏联由于其国内政情尚欠安定，故对日本侵略东北未能加以强力干涉，但不久便在东北和西伯利亚的国境线以及和外蒙的境界线上有了非常敏感的反应；及至“七七事变”之际，已在西伯利亚等地部署了数倍于东北地区日军的兵力，又在海参威方面的海空军也有所增强。

于是，在苏联和伪“满洲国”的境界线上对峙中的日苏两军国境警备队，乃不时发生了小规模的纷争。以日本而论，在这里的防卫如果不能巩固，则是难以致力于南进的。

“张鼓峰事件”

日本和苏联之间，最初正规的军事冲突，是一九三八年夏天的“张鼓峰事件”。

七月十一日，苏军占据了在伪“满洲国”东端的苏联和朝鲜国境附近的张鼓峰山顶，构筑阵地。

张鼓峰虽则只不过是一个海拔一百五十公尺的丘陵，但站在山顶便可以一眼望到朝鲜的铁路和罗津港。——是战术上的冲要之地。

此时，在中国战场方面，刚好是日军正在大规模进攻武汉之际；他对于张鼓峰的情况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则是在判断日军侵略行动的整体战略方面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俄军之推进到张鼓峰，在苏联而言，是为了要了解日本对俄备战情形的探测行动；在日本而言，则也是考量苏联会不会介入中日战争的试金石。

日本的参谋本部，最初考虑到眼前正是发动武汉战争的时期，故而决定循外交交涉途径将军问题，并对当地的日军有所抑制。

然而，在七月二十九日，派驻当地的日军第十九师团（师团长尾高龟藏）因见俄军伸展到张鼓峰附近的沙草峰构筑阵地，乃擅自出动部队，因而发生了战斗。

又有一种看法——在战事即将发生之前，因有苏联远东“格别乌”（特务组织）长官尼修可夫（据日文音译）上将逃亡“满洲”，苏联方面为挽回威信而采取了行动。

七月三十一日的天色未曙之际，日军对张鼓峰出动夜袭，迫使俄军一度后退；但俄军旋即大规模反攻，日军反而陷入苦战局面。

战火点燃之后，眼看着难以止于局部冲突，而将会扩大为全面战争的情势，日本政府乃大起恐慌，遂即通过外交路线向莫斯科提出由日军单方面撤退一公里的让步建议。

八月十日，日本驻苏大使重光葵与苏联外长李维诺夫会谈，才成立了于八月十一日正午停止战斗的协定。

此时，苏联的态度的确非常巧妙，就是在停战协定成立之后，苏联表示无须日本撤兵，补救了日本的面子。这是为了缓和日军的反俄感和警戒心，而使他们的枪口指向武汉的一种交易手段。

‘实际日本所谓缔结协定、共同防共者，目的本不在防共，也不在于防俄，而实在于借此名义以亡华。不然他如果为了国防或真是对俄关系，那末，当张鼓峰军事冲突时，何以他的驻苏大使重光葵向苏俄外长如此卑下却步而最后终于屈服？就可见他今日对我国提出所谓共同防共云云，祇不过外欺世论、内欺国民，而要向中国要求得华北、内蒙驻兵的一个幌子罢了。’（注）

“诺门坎事件”

其后，在一九三九年五月，更发生了大规模军事冲突的“诺门坎事件”。

诺门坎，是在伪“满洲国”西端和外蒙境界附近的边地。五月中旬，以骑兵联队为主力之日本关东军意图将推进到诺门坎的外蒙军击退，但却陷入了俄军战车部队的包围而全军覆没。此即所谓第一次诺门坎事件。

于是，因吃了败仗而气冲牛斗的“关东军”，乃不顾其陆军首脑部的慎重论，而于六月二十七日大举空袭外蒙塔穆斯克，以示报复；继之，更于七月一日开始动员第二十三师团（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出之以大规模的反攻行动。

起初的战况，一时于日军有利；但俄军旋即得到飞机助战，在朱可夫（后来曾任国防部长）的指挥之下编组了机械化的大部队，于八月下旬全线展开总反攻，以致日军第二十三师团在各地被俄军截断，全军溃灭，最后有联队长二人烧毁军旗，自刃而亡，伤亡一万一千多人，约为全部兵员的百分之七十三。此即所谓第二次诺门坎事件。

不过，俄军却不再采取进一步的攻势，而于九月十五日在莫斯科成立了停战协定。盖苏联虽则在张鼓峰和诺门坎两度略显身手，而获得大胜，但却仍然对日军不为已甚，表示“共存”之意。

在两度败战中，目击苏联炫耀了其武力的日军，事后，便将驻屯在边境的部队向后撤移，极力防止军事磨擦，以谋在北方的安定，而致力于其南进政策。

然而，苏联的让步，是有他的打算的。

这是由于欧洲方面风云紧急，要是日本为了准备南进而希望和苏联加强关系，则苏联也就会为了对欧洲的戒备而抑制在亚洲的纠纷。

注：蒋总统-“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一九三八十二）

德俄签约

因“张鼓峰”、“诺门坎”等事件而产生的日苏紧张情势，得以止于局部问题，而未致酿成重大冲突，则是由于欧洲台风之眼-纳粹德国的威胁。

自一九三三年由希特勒掌握政权以来，德国很快地便具备了他的军国主义体制，而走上在欧洲征逐霸权的道路；他和东方的日本帝国主义互相呼应，形成威胁世界和平的态势。

德国在过去曾为中国的友邦，中国招聘自德国的军事顾问，且曾参与过剿匪战争；但当希特勒于一九三八年二月承认伪“满洲国”之后，两国关系便迅速趋于冷淡。六月间，中国接到德国单方面的要求——废止军事顾问团契约，撤回顾问人员。

当时，蒋总统的次公子纬国刚好在德国留学军事，蒋总统不允许顾问团违约撤走，并且预料到德国也许会采报复手段，故在日记上留有记述如下：

‘余不准德顾问擅自离职，是为国也，德如因此束缚纬儿之行动，以为报复，则为私也；私不能害公，吾于纬儿之安危，听之而已。’（六月二十日日记）

在欧洲方面，希特勒的侵略行动也是一步一步地在推进中～～一九三八年三月，并吞了奥地利；十月，自捷克割取苏台德区；接着更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占领捷克，将之合并。

‘德国于本月十五日并吞捷克，不费一弹，不流滴血，此为历史上未有之创例。推究其原因在于去年割让苏台德区所贻之祸患。

‘如果我国于七七以前，以为割让东北或承认伪满可免于战祸者，观此，可以醒矣！余更自信所为决无误也。’（三月十八日日记）

德提议轴心同盟

此际，德国外长里宾特罗甫向日本提出：在业已签订了防共协定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缔结日德义三国军事同盟。这就是所谓“轴心三国”的世界侵略构想。

在一九三九年元月登台的日本平沼内阁，由于国内舆论对于是否参加此一三国军事同盟而形成分歧，以致很难决定其态度。

‘倭寇不欲参加欧洲战局，亦不敢与俄国开衅，计在妥协列强而专事侵略我国，乃其最毒之政策。’（四月二日日记）

‘敌国连日召开五相会议，协商对德义军事同盟之方针。其目前尚犹豫未决，然其最后必参加同盟无疑。盖日本军阀之逞强好战，实无可救药也。’（四月三十日日记）

五月二十二日，德义两国超前一步缔结了未包括日本在内的军事同盟（钢铁协约），完成了柏林和罗马的轴心关系。此时，正好是在日俄诺门坎冲突刚起之后。

‘倭势将加入德义同盟，以缓和其内部之冲突；然其外交必更陷于绝境，德义决不能因其同盟而远助东亚也。’（六月三日日记）

日本方面，强烈主张加入德义同盟的，乃是陆军。盖在中国陷入泥沼和经过诺门坎苦战的陆军料想：和德义缔结同盟便可以牵制苏联。可是，同为军部一分子的海军则持反对论调，他们耽心因加入军事同盟，以致情势紧迫，将使日本卷入欧洲战争，从而与美国为敌。

八月三日，日本陆军三长官会议决定：“在八月下旬以前，有决定必要无条件缔结三国协定。”

‘昨敌国陆军三长官会议后，又召开五相会议，商讨对欧外交政策，就美倭关系恶化、满蒙边境冲突、及英倭会议等问题交换意见。虽其内容不详，但余以意度之；此后，倭军部必更鞭策其政府加入德义同盟之运动。’（八月四日日记）

此时，情势发生了大的变化——就是在诺门坎方面，俄军于八月二十日大举反扑，在其强大机械化部队的进击之下，日军第二十三师团濒于溃灭。

德苏突然签约

紧接着在二十二日，苏联更突然发表：业已缔结“德苏不侵犯条约”。

这个条约，对于日本而言，简直是晴天霹雳，大受冲击。因为想不到和日本共谋对策、煞费苦心、签订“德日防共协定”、而以苏联为共同假想敌的希特勒，偏偏却突然会在日苏纷争最高潮的时机，竟和史达林拉起手来。

于是，日本的对德接近论乃消逝到九天云外，政局亦陷入大混乱状态。平沼内阁表示：“欧洲的天地里，产生了怪异复杂的新情势。”并即于八月二十八日总辞。

可是，日本军部却仍然在虚张声势。

‘敌国军部对俄德于日前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之宣言称：对处理中国事变之方针，决无丝毫变更，且以此为基调，一意在“东亚新秩序”建设之途迈进云云。观此，可知敌国军阀在未受重大打击与损失以前，决不变更其对华之侵略政策也。’（八月二十八日日记）

日转向对苏妥协

由于“德苏不侵犯条约”之出现，乃迫使日本由“对德接近、对苏牵制”转换到“对苏妥协”；而对于欧洲方面意存不安的苏联，也对此欢迎。是故，自五月以来一路纷争不已的诺门坎之停战问题，竟然急转直下，得到日苏双方之互相让步而成立，就是基于这样的“外交力学”。

欧洲战起

日本方面，在平沼内阁倒台之后，乃以陆军大将阿部信行为阁揆于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日成立了新内阁。陆军大臣一席，则由畑俊六接替了板垣征四郎。

‘敌内阁改组，新继任者为阿部，其阁员亦全部更换，此又倭内政外交失败之事实也。

‘去年俄倭在张鼓峰冲突，板垣任陆相，尚能制止前方部队之行动，以后恐不能矣！’（八月三十一日日记）

德苏不侵犯条约，对于相当紧张的欧洲情势，发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德军突然进攻波兰

当条约发表之后还未过十天的九月一日，德军便突然进攻波兰。盖由于不侵犯条约之成立，消除了在波兰背后的苏联对于德国方面的威胁，于是，德国乃无所顾忌地着手其对于波兰的侵略。

战火终于在欧洲大陆燃烧起来。

‘德国竟于一日向波兰进攻，从此战端既起，人类劫运不可设想，然犹望其能停战调和也。

‘欧战期间，倭必行动，不北攻俄，必南攻英。

‘我国对欧战政策之唯一主旨，端在参加民主阵线，以为他日讲和时，必使中倭战争处于与欧战问题联带解决之地也。’（九月二日日记）

英法两国对德国发出了最后通牒，九月三日下午开始，乃进入战争状态。

日本首相阿部信行于四日发表“日本不介入欧洲大战，专心向解决支那事变之途径迈进。”说明了日本的意图是要在全世界的目光为欧洲情势所吸引之际，独占亚洲。

九月十日，蒋总统出席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发表演说，指斥阿部信行的意图如下：

‘须知今日世界的战乱，完全是由日本侵略中国、破坏国际公约、扰乱世界和平的强暴行为所引起来的。我们中国抗战，一方面固然是为保障本国的独立生存，而一方面实在为要制裁这个世界侵略战争的祸首-日本，维护世界的正义和平。因为如果中日战争一日不了，世界和平亦就永远不能恢复。简单说，中日战争就是世界战争的起点，亦就是世界战局的重心。……

‘敌国的表示，是不干涉欧洲战事，自称要专力解决“中日战事”。他所谓不干涉欧洲战事，换句话说，就是不许欧美干涉中日战事，让他可以独霸东亚，建立他所谓“东亚新秩序”。……

‘敌人至今还在那里说这些“东亚新秩序”的梦话，于此更可见敌人趁火打劫的心理分外明显了。……“赶快结束中日战争”这一类的话，实在是等于痴人说梦。……

‘敌人现在兵力早已疲惫，而且已陷于不能自拔的绝境，以后除了军事以外，他自然要加紧进行他所谓政治进攻和经济进攻，实行他所谓“助长支那新政权”，和造成其所谓“更生的支那”的汉奸傀儡，奴隶中国的丑剧。除此之外，更没有第二个办法了。’（注一）

与世界战争连接起来

十月二十九日，在湖南省南岳举行的第二次军事会议中，蒋总统又作了如下的训词：

‘我们认定——中日问题，实在是世界问题之一环；只有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才能获得彻底的解决。所以我们这次抗战既发动以后，一定要与势在必起的世界战争连接起来，并且要与世界战争同时结束，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现在欧战已起，而我抗战转胜，东亚西欧的两大战争，已经连接起来，可以说：我们第一步目的已完全实现，我们对国际外交的政略，已获得一个最大的胜利与成功！此后，第二步目标就是争取最后的胜利；就是要勇猛坚定的抗战下去，以承接欧战结束的新局势。因此，我们的战略亦就是要使中国抗战能达到与世界战争同时结束的目的。……

‘我们现在还只战到胜利的中途，在欧战没有结束、世界问题尚未解决之前，我们若急求速了，妄想日本妥协讲和，这就是自取失败、自取灭亡！……

‘日本外交，始终陷于孤立。当初，一般人以为欧战一起，苏德既已妥协，苏日又在远东签订诺门坎停战协定，日本必可乘此机会全力侵略远东。

‘然情形适得其反，不但他在大陆上不能松弛他对苏俄的防备，即在海上，自从美国太平洋安全巡逻制度确立，并在夏威夷、菲律宾等地一天一天增强其空军海军力量以后，暴敌已不能如前之横行无忌，而实际已到不能安枕之时。’（注二）

在欧洲升起来的烽火，已使中日战争扩展为世界性的规模。

在这个当口，所成问题的，乃是美国的动向。

美国当德国进攻波兰之后，虽然立即宣告“中立”；但另一方面也预测到战火将会更向太平洋扩散，于是，为了形成对日本的抑止力，乃秘密着手对于太平洋防卫的“彩虹计划”。

美国的这一些动向，对于一向在国际旁观之下孤军奋斗的中国来说，适足为一种鼓励。

注一：蒋总统-“欧战发生后我国抗战的三大要务”（一九三九九）

注二：蒋总统-“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一九三九十）

中美“酮油借款”

美国对于日本侵略中国投以严厉的目光。

一九三七年十月，罗斯福总统在芝加哥发表了指斥侵略者（日本）譬如是传染病源的所谓“隔离演说”，并明显地表示改变其“孤立主义”。

这个趋向之成为具体行动，则是始于其后的一年左右。

任胡适为驻美大使

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七日，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胡适并非外交官，而是在中国有代表性的著名学者，在国际间也有极其崇高的声望，自他持节驻美以后，由于他的活跃，使中美关系更趋于紧密化。

中国在任命胡适出使美国的同时，并派遣上海商业银行总经理陈光甫赴美接洽借款。盖为了要使持久战贯彻到底，而希望自美国方面得到支援。

中国拟提供为涂料及绝缘材料之原料的特产品桐油为担保，希望向美国商借四亿美元。此事曾和美国财政部长毛根韬等人不断洽商，但由于美国在法律上和制度上有些限制，故双方的立场颇有距离，难得进展。

为打开借款交涉的困难局面，蒋总统于十月十五日致书罗斯福总统如下：

‘中国人民深觉在此患难之时，至少美国总统可引为我之挚友。兹代表此流血之人民，愿再请阁下惠予吾人更大之援助，俾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得告成功。吾人因急需抗战之资力，自渴望美国予以此项财政上与经济上之援助。如予以相当钜额之贷款，则吾人抵抗日方之攻击亦必获有更大之实力与效果。因此，现在美国进行中之商议，鄙人深愿赖阁下之助而得早告成。’

十月二十五日，美国提出二千余万美元的借款案。金额虽不多，但总是最初表明答应给予借款的意向。

可是，刚好在此时，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美国对借款的实施，还像是有踌躇不定的样子。

最后，成为美国断然实行借款的契机，乃是蒋总统于十月三十一日所发表的“为武汉撤退告全国军民书”。

罗斯福理解我国战略

在此之前，罗斯福透露：“中国如能阐明广州与武汉撤退之战略目的和今后抗战的意志，我将乐于批准此一借款。”于是，胡适乃将适于此时所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之要旨译成英文，致送罗斯福。罗斯福因而对于中国“以空间换时间”的大战略获得理解。

十一月十日，罗斯福致电重庆给蒋总统说：“对于中国人民的勇敢抗战及其苦难遭遇，深表敬佩与同情。”接着，又于十九日送来回答蒋总统在先给予他的书信之复文。

在这个复文中，罗斯福虽然表明：“美国政府之行动，须符合美国法律与美国人民随时表现之公意，及美国对于可以实行事项之估量。”但也同时强调：“美国极度同情于中国，切望远东早日得到公正的和平。”

结果，“酮油借款”增额为二千五百万美元，于十二月十二日经美国进出口银行董事会通过。十五日，得罗斯福总统批准。不过，此时美国还是唯恐被视为政治性借款，故而以陈光甫为董事长，在纽约新设一个民营事业-世界贸易公司，采取由该公司向美国进出口银行借款的方式，于翌年二月八日签立了合同。

这一笔酮油借款，是在“七七事变”之后美国最初答应的借款；其金额姑且不论，总之是业经显示出——美国已由徒事道义上的对日本责难而开始转变到实质上的对中国援助。

获得助力的胡适等人，把握住诸如参加讲演会等多方面的机会，向美国国民倾诉中国的立场。一九三九年元月，由和胡适留美同学的张彭春教授发动组成“不参加日本侵略的美国委员会”，聘请美国前任国务卿史汀生为名誉会长，加强了国民外交路线的活动。

美国国会也对于日本方面接连三度的近卫声明之真正意图业已逐渐有所理解，于是，对其在先所决定适用的“中立法”（限制对中国输出军需品）认为应予修正的议论也为之抬头。

给予日本以经济制裁的活动，也逐渐显著。一九三九年元月，在道义上禁止对日输出飞机及一部分零件与器材；二月，禁止对日信用贷款。这些措施，虽然只还是局部性的，但总之是见诸实行了。

继之，罗斯福又向国会提出为防卫太平洋、关岛等地的增加军费计划，获得通过。这是由于美国相信日军之在海南岛登陆（二月十日），是对于太平洋的威胁。

‘美国会毅然以大多数通过“太平洋设防案”，此为九国公约复活之实现，乃我抗战一年半牺牲所得之实效也。’（二月十八日日记）

由于美国打开其对中国的援助之路，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国际效果。

英国予我钜额贷款

在罗斯福总统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正式核准“酮油借款”的五天之后，英国宣布也供给信用贷款五十万英镑，为中国购买卡车之用。此项贷款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签约。

这些卡车，是应滇缅公路运输物资之用。因为在海岸线已被日军封锁的此时，中国还保持着滇缅路这一条巨大的运输路线。

英国同时并另行对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贷款五百万镑，以稳定中国的法币价值。盖日军虽然占领了主要都市，中华民国且已迁都重庆，但国民政府的通货还是以租界为基地，在沦陷区发挥了基准货币的作用。

美采取强力行动

对于美、英两国援华政策，日本有所排拒。

首先是将目标对准了英国。英国起初是在欧洲对于纳粹德国采取妥协主义。他于一九三八年将强硬派的外相艾登更易，以温和派的哈利法克斯继任，并承认德国割据捷克苏台德区。——显然是一种但求平安无事的消极外交政策。

一九三九年四月九日，刚巧有北平伪临时政府的“天津海关监督”程锡庚在天津英租界被人刺杀，日本乃向英国驻天津总领事杰梅逊要求引渡犯人；六月十日，更满布通有电流的铁刺网封锁英、法两国租界；对于通过检查哨的英国女性，也都很严格地施行周身检查。

于是，英国外相哈利法克斯乃召见日本驻英大使重光葵，向之提出抗议；但日本方面明知英国不会有强硬行动，却反而摆出了毫不客气的架势。

自七月十五日起，在东京举行日英会谈。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单方面地极力压抑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结果，迫使克莱琪对于日本提议原则接受，于七月二十二日达成“英国已确知在中国的现实事态，并无意于对妨碍日军达成其任务的行为与措施给予认可”的谅解。于是，日本乃以此为凭藉，提出禁止中国法币在租界内流通等过分要求，要迫使英国接受。

美国废止与日商约

由于英国受到如此压迫，美国立即采取了强力“援护射击”，对日本还以颜色。

七月二十六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对日本驻美大使堀内谦介提出“废止美日通商航海条约”的照会。这样一来，该条约则将在半年之后的一九四○年元月二十六日期满失效。

这是给予日本一个致命打击。因为日本对外贸易是以美国为最大的对方，尤其石油、角铁、飞机材料、机械等军需物资，几乎是完全依赖自美国输入；其所以能够保障安定供给，就是由于在一九一一年所缔结的该项条约。这个条约如果失败，则是丧失了日本经济保障，不仅对战争会发生影响，就连国民生存也要蒙受威胁。

‘美国对倭商约，宣告六个月后无效，此其表示乃对英国承认倭寇谈判为不当，以显明美国外交独立之精神。美国有此一着，其或可挽回英国对倭之妥协乎！’（七月二十七日日记）

果然，克莱琪在二十七日的日英会议席上对于交涉的焦点问题——禁止中国法币在租界内流通的要求，予以拒绝。

‘美国对倭取消商约后，我外交与金融皆得转危为安，相差不过数日耳。是益可证明余以“政治当努力今日，不是明日”之哲理为不误也。’（七月三十日日记）

继之，美、法两国也于八月初照会日本：“对于中国法币问题，寄予重大关心。”而日英交涉，乃于八月二十一日决裂。

在前面业已提过——世界情势发生突变，就是继此之后，接踵而来。

俄军在诺门坎进攻日军之后，德苏不侵犯条约即于八月二十三日宣告签订；九月一日，德军侵入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幕，英、法两国对德宣战。又在其间的八月三十日，日本平沼内阁倒台，阿部信行组阁，急于对苏联进行和解，乃于九月十六日签订日苏诺门坎协定，而日本的南进政策遂更为之坚定。

（民国二十八年九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自由人注）

世界局势大分为二

于是，这个世界乃大致可以二分为：日、德侵略国家集团，以及和该集团对抗的中、英、法国，并包括抛弃了孤立主义之美国在内的自由国家集团。而在东西两半球点燃的两把战火，则是“正义”和“邪恶”的战争；究其根底，乃是归结于以人类未来命运作为赌注的一场大战。

只是，还有一个微妙之点，就是和日德妥协的苏联之动向；至于能够加以约制的，则是在于美国今后的态度。

蒋总统为唤起美国的注意，乃于九月十八日电达驻美大使胡适表示：

‘俄日停战协定订立后，继之必有互不侵犯条约之订立，而俄必促成日本之南进政策，一面或将劝我与日妥协。英、法不知其阴谋，犹思与日妥协，求保其远东权利。国际形势至危，若非美国有重要之表示与行动，则英、法在远东势必退缩，我国全处于孤立，而日本所谓“东亚新秩序”即可实现。美政府在最近期内，如对日有一坚决表示、或禁运日货等动作，以壮英、法之胆，勿使其与日妥协，方可挽此危局。务请加紧进行。’

九月二十五日，日本阿部内阁任用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为外相。野村是被称为罗斯福知己的亲美派，他之所以被起用，就是要在面临美日通商航海条约即将失效的非常事态之前，谋求打开对美关系。

可是，美国业已坚定了他的决心。

十月十九日，一时返国述职而又回到任所的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向日本暗示：“日本如果侵犯美国权益，则美国便会采取禁运措施。”其意在再次要求日本反省。

罗斯福总统或可语此

‘改造世界，奠立永久和平之基础，不可不为之预筹。在今日，唯罗斯福总统或可语此，惜尚无机缘晤面耳！

‘美驻倭大使格鲁在东京痛斥倭“东亚新秩序”之妄念，此予倭以当头一棒，其关于中倭事变之影响必甚大也。’（十月二十一日日记）

此后，野村吉三郎虽曾为调整和美国邦交的交涉有所奔走，但终归失败。

日机滥炸

在中国大陆占领了“点和线”的日军，正喘息于泥沼战争中。

一九三九年四月下旬，中国军对于占据江西南昌的日军展开反攻，日军出动大量飞机乱投毒瓦斯弹，虽能勉强抵御，而南昌则陷于中国军的重围之中，其他日军占领地区也多处于被中国军远远合围的情势，日军为维持其随时会被切断的线路，已经尽到了最大的力量。

日军想尽方法要想挫抑中国的抗战意志，因而加强轰炸。在盲目狂炸之下，非军事区域的住宅都被毫不留情地投下了炸弹。

特别被当作目标的，是战时首都-重庆。在五月三日和四日的大轰炸中，被毁房屋一千二百余栋，市民死亡四千四百余人，负伤约三千一百人，蒙受了极其惨重的损害。

蒋总统关切难民

‘敌逞凶残酷，诚卑劣无耻之尤者。此实为余有生以来第一次所见之惨事，目不忍睹。天父有灵，盍不使此残暴之敌速受其应得之咎？’（蒋总统五月四日日记）

‘昨夜为救护难民事，通霄筹划督行，观我民众遭此惨痛，仍无一句怨恨抗战之言，余思之更难自安。对此纯洁同胞在苦难中之行动，神情可爱，使余铭感无涯！遭此凶残不能忍受之艰难，见我民众如此，更增余之乐观与勇气矣！’（五月五日日记）

‘连日救济难民，不遗余力，于此稍得自慰寸心。然悲惨与忧患并集，不得不特别努力也。’（五月六日日记）

轰炸反覆不已。八月二十八日，蒋总统伉俪在重庆郊外长江对岸的别墅接待来华访问的印度尼赫鲁，从中印合作谈到亚洲问题。而这一天也有日本飞机反覆空袭，在会谈过程中，曾经三度进入防空洞避难。

及至欧洲大战爆发，日军立即与之呼应，于九月十二日设置“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以西尾寿造为总司令官，为期一鼓作气结束中日战争而谋挑起决战。

日军首先选择的进攻目标，是湖南长沙。

第一次长沙大捷

九月中旬，集结在南昌方面的日军十万人，开始西向进击，穿越山岳地区指向长沙；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所率领的二十万中国精锐部队，在修水附近迎击日军，展开大激战。

另一方面，在湖南岳阳集结的日军别动队，于九月底在海军支援下由洞庭湖，溯湘江、浏渭河，一举而推进到长沙附近之永安、桥头等地；中国军则于诱敌深入之后，自十月二日展开总反攻，给予日军以歼灭性的打击，迫使败退。在修水方面，经过二十四昼夜的长时间肉搏战争之后，也将进犯日军歼灭。

日军伤亡超过四万人，第一次长沙会战乃在中国军大获全胜的情况下结束。

这个捷报，为这一年的双十节带来了光辉。

‘际此双十国庆，适值湘赣告捷，宜乎欢欣鼓舞之情无逾于此者；然而余内心之痛苦，实非笔墨所能言喻。十五年以来，部下与学生之死伤积累，日增不知凡几？缅怀革命先烈之创造民国，与总理付托之重任，以及抗战前途之艰钜，若不努力尽职，将何以对总理以及为革命而死之先烈在天之灵乎？’（十月十日日记）

继之，为日军所觊觎的，是广西南宁。

南宁在当时是由越南运抵广西物资的集散地，盖在海防上岸的物资，由铁路运经河内转达谅山，再由该处用卡车运到南宁。在亮的方面，约占中国总输入的百分之三十左右。

日军称这条交通线为“援蒋路线”，一直在窥伺着将之截断的机会。

十一月十五日，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今村均中将）在广东钦州湾突袭登陆。这个师团，在先参加过广东大亚湾登陆，继之，调往诺门坎，现在更为进攻南宁而调回，是一支精锐部队。

日军于二十四日攻占南宁，分途向昆仑关及中越国境附近龙州推进。

面对来犯日军，中国军在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指挥之下于十二月下旬开始反攻，夺回昆仑关，包围了南宁；而困留在南宁的日军补给线已被切断，只有靠空运勉强维系生存；等到翌年（一九四○年）元月底，得到两个师团的部队来援，才脱离险境。

日军补给寸断

当反攻南宁的同时，中国军在北自绥远、南至广东的全面战线发动了冬季大攻势，使延伸达于极度的日军补给路线为之柔肠寸断，而在各地的日军更被迫只能采取防御性的应战。

并且在这个期间，将原由谅山到南宁的物资运输路线向内地迁移，而改行开辟由百色及老街到达昆明的路线。于是，日军所觊觎的切断中国补给线，便完全扑了一场空。

而且，从战略观点就物资补给一点来说，居于困境的，却是日本。

被美国宣告废止通商条约的日本，正由外相野村吉三郎继续和美国驻日大使格鲁交涉。野村表示：“实在不然的话，好不好订一个临时协约？……”但美国则置之不理，以致双方条约到了一九四○年元月二十六日届满期限时宣告失效。因此，在战略物资方面几乎完全依存于美国的日本，已经是被美国捉住了他的生杀予夺之权。

‘美倭商约，今日起失效。如美坚拒与倭续订新约，则敌必受重大打击；而对我抗战则为一有力鼓励也。’（一九四○年元月二十六日日记）

制胜之道

一九四○年二月二十二日，蒋总统为检讨上年的冬季攻势而在广西柳州召集军事会议之际，受到日军飞机的瞄准轰炸。看来日军大概是获得了中国方面在柳州举行军事会议的情报。

‘午睡初醒，二时十五分，闻机声，命卫士审其方向，旋忽警觉敌机必来炸余，乃急披衣整装外出，其匆促之情，殆不啻于西安事变之初焉。

‘当余外出时，侍卫长王世和称：“敌机已由头上飞过，似不紧要。”余知敌机如来炸柳州，其目标必在余，乃急入后山之上层防空洞；少顷，敌机二十余架齐向洞上投弹，……旋又来袭，低空俯冲投弹，……弹皆着洞上右方五十米突至百米突之山巅，计伤卫士十二人。……’（二月二十三日日记）

蒋总统分析敌我战术

蒋总统在这一次的军事会议席上，对于日军的长处和短处作了如下的概略分析，并指示：利用敌军的短处使为我军的长处，大意是这样的：

‘敌人战术的长处，有以下四点：

‘第一就是“快”。善于运用快速突击，乘人不备攻击过来，真是“始如处女，后如脱兔。”

‘第二、就是“硬”。坚守阵地，不易动摇。

‘第三、就是“锐”。惯用锥形突击战术，勇往直前。

‘第四、就是“密”。行动保持秘密，令人莫测。’

可是，在辽阔的大陆全面战线上，日本所能投入的兵力和补给，都已经到了极限。

‘敌人的弱点（短处），也有四点：

12[37]2635‘第一、就是“小”。以后只有小兵力来侵犯扰乱。

‘第二、就是“短”。只能有短时间的战斗力。

‘第三、就是“浅”。不能深入内侵，只能作近距离攻击。

‘第四、就是“虚”。预备兵力用罄，其后方完全空虚。

‘今后，我们克敌制胜的方法是：

‘（一）利用敌人的弱点——敌人只有小部队作战，而我们可用大部队进攻；敌人只能作短时间的进犯，而我们尽有长时间来周旋；敌人只能作浅距离的进攻，而我们可用纵深配备来击破他；敌人后方一定空虚，而我们可断行全力攻击以制胜！

‘（二）打破敌人的长处——以我之稳定，足制敌之“快速”；以我之坚韧，足克敌之“强硬”；以我之“纵深伏兵”，可挫敌之“锐利部队”；以我之谍报“严明”，可破敌之“秘密”伎俩！’

德军席卷欧洲大陆

另一方面，欧洲战局暂时出现小休止状态；但及至四月，转趋激动。

四月九日，德军突然北上，侵入丹麦、挪威，未曾流血，便将丹麦占领。英、法等联合部队虽曾出兵协防挪威，但旋被击破，挪威国王哈康七世于四月三十日出亡伦敦。

12[38]2636五月十日，德军转采西线作战，侵入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十五日，迫使荷兰投降；继之，突破英、法联军所凭藉的马奇诺防线；五月底，更使被压迫在敦克尔克的英、法部队向英国撤退。而比利时与挪威则相继投降。六月十日，义大利参战；十四日，德军长驱进入巴黎；十七日，法国投降（提议停战）。——势如破竹的德军，席卷了欧洲大陆。

和德国行动相呼应的，是在中国大陆日军的再度积极活动。

这一年的三月，和汪兆铭自称“还都南京”的同时，日军一方面扩大战线，一方面则打算对于在重庆的国民政府迫和。

日军的目标，是长江上游的湖北宜昌。

五月一日，日军自信阳、钟祥方面移动兵力，和守御着以枣阳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之中国军近接激战达一个半月。

张自忠英烈千秋

中国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就是在这一战役中壮烈殉国。

五月十四日，张自忠在枣阳南方与敌军主力遭遇，大挫敌锋；但十六日在宜城县南瓜店被拥有二十门战炮的四千日军骑兵所包围，自凌晨至傍晚，短兵相接，白刃交挥，冲锋达十多次之后，部属伤亡殆尽，张自忠本人身被五弹，最后在日军围聚而来之际，誓不苟活被俘，12[39]2637乃在日兵之前拔出短剑，自刃殉国。

张自忠的夫人李敏慧，其时留居上海，得到丈夫的讣报，便决心绝食，于七天之后也继之与世长辞。

蒋总统对于张自忠的壮烈殉国，致赠“英烈千秋”挽额；并且在后来将他殉难的宜城县改名“自忠县”，其遗体则迎往重庆北郊北碚县的梅花山麓隆重安葬。

枣阳战役，虽然在六月四日因中国军胜利而结束，但宜昌则于六月十四日陷落日军之手。

张自忠的生平，曾于一九七四年在台湾被拍成以“英烈千秋”为片名的一部电影，上演时盛况空前。

在此之前，日本又发生了政变。这是出于陆海军暗斗的结果。元月十六日，海军大将米内光政出组新阁。而日本海军则一向是南进政策的推进者。

欧洲的情势，也趋向于日本的南进有利。盖法属越南和荷属东印度（印尼）等处，都是领有国已被德国所攻占的殖民地；缅甸所隶属的英国，也正在艰苦作战中。——就是说，都已经失去了靠山。

因此，日本乃揣度：只要炫示武力，加以威吓，就必然会使之屈服。

但却没有设想到像这样地“南进”，则是把中日之间的战争扩大为“世界大战”。

‘倭如南进，则其必介入欧战，并与美发生冲突，于我有利也。’（五月二十五日日记）

第二次近卫内阁

日本之南进，存有两个意图。

一个是确保资源。由于和最大贸易对手-美国之间的通商条约会在期限届满时废止，并且对日禁运的经济制裁亦已迫近眼前，以致日本不管怎么样都想要得到南方的资源。

还有一个意图，就是要切断由法属越南和英属缅甸通往中国的运输路线，以截断自由国家对中国的支援。

当时，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推断：运往中国的补给量，每月由越南路线一万五千吨，缅甸路线一万吨，来自苏联的西北路线五百吨，以及包括钻过日本海军封锁而运抵中国沿海者在内，每月共约三万一千吨以上。

掌握荷印泰越

日本首先从荷属东印度（印尼）下手。一九四○年五月十三日荷兰向德国投降，日本马上便向美、英、法等国取得“荷属东印度现状不变”的谅解；继之，更使荷印当局接受了他所提出的安定供给石油、铁矾土、橡胶、废铁等十三种战略物资的要求。

六月十二日，日本又与泰国签订了“日泰两国任何一方面受到第三国攻击时，互不援助第三国”的条约，乃是以“互相中立”为圈套，把对方箍紧。

在达成如上所述的一些协议之后，便开始着手对越南、缅甸的行动。

实则自上年十一月以来，日本业已再三迫促法国停止经由越南通往中国的运输路线。及至法国刚向德国投降之后的六月十九日，复对法国驻日大使安里提出抗议，取得由法国的越南总督卡特禁止将武器、弹药、汽油、卡车等物资输往中国的约定；并且使之承诺由日本派遣监视委员前往查证已否有效实施禁运，旋即有以西原一策少将为团长的监视团四十人于六月二十九日到达河内。

另一方面，日本并于六月二十四日向英国也提出了封锁滇缅公路的要求。

此时，正要把全力投注于欧洲的英国，遂对日本的压力游移不决；七月十四日，通过在新加坡的广播表示：“正为解决中日问题而努力，并避免助长战争之行动。”

‘其言完全为偏袒倭寇，且藉此以委卸其停止滇缅路运输之责任。’（七月十四日日记）

面对这样的状况，蒋总统复于七月十六日发表谈话，对英国提出警告如次：

‘如果以滇缅路运输问题与中日和平并为一谈，即无异英国帮助日本、迫中国对日屈服，其结果必牺牲中国之友谊，且必牺牲英国在远东之地位。……如英国果有此种行动，余可断言：英国必获极端相反之结果，其本身必遭无穷不测祸害。

‘如英国视为停止滇缅路运输可以缩短远东战争者，余复断言：其结果必更助长远东之战祸，而扩大远东之战局。’

英国封锁滇缅路

尽管如此警告，但英国还是于七月十七日发表封锁滇缅路三个月。

‘昨夜，倭英停止滇缅路运输协定已在东京发表，倭寇封锁之计已售；但余以四川为中心，尚有百万基本军队，可战可守，倭岂奈余何！’（七月十八日日记）

在发表封锁滇缅路的前一天～七月十六日，日本米内内阁因陆军之不予合作而总辞职，是在任只不过七个月的短命内阁。

海军出身的米内光政及其外相有田八郎，在外交上说来是比较想采取和英美协调、而对于陆军所主张的和德国同盟则持消极态度；故而陆军乃抨击米内内阁瞻循却顾，不够干脆。

六月二十九日，有田八郎发表了“谋求与亚洲各国共存共荣”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演说，想藉以安抚陆军；而陆军则坚主和德意合作，并使出要陆军大臣畑俊六单独提出辞呈的强硬手段倒阁。

继米内之后组阁的人，为近卫文麿。他是在七七事变当时的日本首相，早就曾呼号“建立举国一致的新体制”。

‘近卫组阁，其对南洋与侵华，皆将取军部积极政策；此非于我不利也，惟战事必更延长。’（七月十七日日记）

这个第二次近卫内阁于七月二十二日成立，由崇拜德国的松冈洋右出任外相兼拓务相，陆相则为东条英机（中将）登台。就是这个三人小组（近卫、松冈、东条）迈开齐一步伐，把日本托曳向毁灭的境地。

蒋总统对近卫的评价

‘近卫阁员名单发表，人物平庸，极无人望。近卫好虚名，又无决断，八面讨好，无中心思想，缺斗争经验，更无贯彻到底之毅力，前曾徒唱国民再组织，近又唱新政治体制，仍无定见，此何能组织统一全国之政党与建立新政治体制也。’（七月二十三日日记）

‘综其（日本内阁）所言，不外为结束中日战争与实行总动员法案而已。

‘倭寇所倡新政治体制，为以强化经济统制，建立其高度国防，对内榨取其国民之血汗，再供其向外侵略而已。’（七月二十四日日记）

日德义三国同盟

日本新首相近卫文麿在组阁之先，约集内定出任外、陆、海三相的松冈洋右、东条英机、吉田善吾三人举行所谓“荻洼会谈”，对于内外政策协调意见，以谋趋于一致。

会谈结果，决定：（一）强化战时经济政策。（二）强化日德义轴心关系。（三）对苏联互不侵犯。（四）将英法荷殖民地（越南、印尼、缅甸等地）纳入“东亚新秩序”。（五）排除美国的实力干涉等项。

“八纮一宇”

一九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日本内阁会议依据荻洼会谈的上述结论决定了一个“基本国策要纲”，内容仍以“八纮一宇”为其国是，并以“集中国家全力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为其“根本方针”。这就是将近卫以前所倡言的“日满支东亚新秩序”扩张到包括南洋各地区在内的“大东亚新秩序”。

‘近卫内阁之新政纲将促使敌国内外崩溃加速，决难能实行也。观此可以知近卫外强中干12[48]2646，力求自圆其过之说；彼明知其不可能，而又不能不出此也。’（蒋总统八月二日日记）

翌日（二十七日），在东京皇宫举行大本营和政府的联席会议，审议陆海军首脑所研拟的“因应世界情势推移的时局处理要纲”。

在这个要纲中，列入了“在促进支那事变解决之同时，把握好机解决南方问题”的侵略方针。所谓“南方”，据参谋次长泽田茂在作提案理由的说明中指出：“以日满支为骨干，指在印度以东、纽西兰以北的南洋地区。”

为谋“好机南进”，更在纲要中揭橥其政策如左：

“（一）对于中国，集中政、战两略的全力，尽到所有手段，策使重庆政府屈服。

“（二）加强和德义政治关系，并谋和苏联邦交有飞跃的调整。

“（三）和美国的关系，倘在日本遂行其政策措施之同时，以致自然恶化，则属事非得已。

“（四）对于法属印度支那（越南），使其承诺切断援蒋路线、允许日军过境及使用其飞机场；又对于香港及租界方面，应消除其敌视意识。

“（五）在对南方行使武力时，限以英国为对手；不过也有难以避免对美开战之情势，故应作开战之准备。”

就是这个要纲，对于日本奔向世界战争之路发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根据审议这个要纲时的会议记录，海军方面曾经为对美开战表示不安；但外相松冈洋右则为此力言：“在除此而外别无途径的时候，则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日军进占越南

松冈洋右遂即依循“时局处理要纲”，在军部驱使之下展开了对越南的工作。

八月一日，松冈向法国驻日大使安里提出“日军在越南过境及使用其飞机场”的要求。安里则指出“这等于是要法国对中国宣战”而表示反对。但松冈更强硬表示：“在军事上有其绝对必要”，迫其承认。

‘敌军以后军略——如为其南进计，必先取滇越，以隔绝我对英、印之交通，此为其最大之要着；如其攻川，则为敌最不利之战略也。故吾断敌此时必取滇越而不攻重庆也。’（八月三日日记）

在这个期间，先是苦战于南宁、继之更因补给困难而勉强撑持的日军第五师团，已集结于中越国境，藉口须假道越南撤退而对法方加以压力。

于是，唯恐交涉决裂的法国，乃终在八月三十日和日本交换了有关日军进驻越南的“松冈、安里协定”；至于其细节，则授权在海防当地继续进行交涉。

海防交涉仍难达成协议，于是日军乃片面发出“九月二十三日零时武力进驻”的通知；以致越南当局在即将到达日方所定时限的二十二日下午终于屈服，答应了日军过境路线及使用飞机场的协定细则。

可是，日军第五师团却已在协定生效之前便由广西方面开始越过国境，并对加以阻止的越南境内法军进攻，实行其“武力进驻”。

此外，又有由日本派出的“印度支那派遣军”（司令官西村琢磨少将辖三个步兵大队），本来可以和平进驻，但却于二十六日轰炸海防市区，杀伤市民数十人之后，在该地俨然采取了“敌前登陆”的行动。

日本就是这样地终于达成派军入越的愿望。

当第二次近卫内阁登台之后，日德义三国同盟问题，也迅速有所进展。

由德国国内派到日本的特使史塔玛，自九月九日开始和松冈洋右秘密交涉，只经不到三个星期的过程，便于二十七日进展到三国同盟的签约阶段。

德国曾向日本提出：“日美战争已经是无可避免。当日美开战之际，德国愿以飞机、战车、武器等类援助日本，旅居美国的二千万德裔居民也将会和日本合作。”而日本方面则也认为：“为了在法属越南和荷属东印度获得特权，当以和在欧洲得胜的德国同盟为有利。”

日德义三国同盟，是在所谓互相尊重德义两国在欧洲、和日本在亚洲之“领导地位”的基础上约定：“三国之中，任何一国如受到现未参加欧战或介入日支（中）纷争之某一国家的攻击，则互相为经济、军事之援助。”

此所谓“某一国家”，当然指的是美国。这显然就是在以美国为假想敌。

抗战必胜之局已定

由于三国同盟之成立，于是便使日德义轴心和中、美、英、法等“民主主义国家”的对立情势很情晰地浮现出来。

‘德、义、倭三国同盟，果已实现；此在抗战与国际形势上于我实求之不得者，抗战必胜之局已定矣！’（九月二十八日日记）

史达林阴谋

在国际间，对于日德义三国同盟（一九四○年九月）的反应态度所最引人注目者，是美、苏两国。

幕后导演分裂世界

尤其苏联，可以说是三国同盟的幕后导演。盖让世界分裂为“帝国主义”和“民主主义”两个集团导发抗争，从而因势利导，以谋向全世界渗透共产主义的局面，正是他们所衷心期待着的。

‘今俄虽未加入同盟，而主动促成者，则为俄之史达林也。此后，如倭不速南进，则史达林将以俄倭互不侵犯协定促倭南进，自在意中。如此，则美倭战争又为史达林“世界帝国主义大战”之阴谋所促成。’（十月二日日记）

但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对于史达林这种计谋策略却并未能察觉得到。当时，他在日本枢密院就缔结三国同盟一事作了乐观说明如下：

“由于轴心关系的成立，德国当会对于推进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方面给予助力，并且对于美国该能给予牵制，使不致轻举妄动。”

德国则更策划着将苏联也拉进三国同盟，此即所谓“四国协商”。

十月十三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致函史达林表示：

“我国元首（希特勒）考虑到一个永久政策——由苏、德、义、日四国就全球利益范围加以商定，并引导其人民正确发展，乃四国之历史性任务。”

这个提议，就是为了要使全世界归属于这四个国家，而预先定下瓜分的界线。

史达林对此也表示同意，于十月二十二日发出复信，并命令莫洛托夫前往柏林接洽。

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的“苏德会谈”，是于十一月十三日开始。

在这个会谈中，首先成为问题的，是日苏两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之点。

莫洛托夫唯恐日本之侵略中国会独占其利益，故而强调：“日本须先明确表示其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

在划分利益范围的“界线”方面，日德之间先已有所协议，就是：日本为东南亚，德国为中非洲，义大利为北非，苏联为印度方面。

里宾特洛甫以上面的协议为依据，和莫洛托夫约定：“如果日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日本会承认外蒙和新疆划入苏联势力范围。”

希特勒准备对苏作战

可是，苏联却一再提出贪心不足的要求——“（一）在博斯普鲁斯和鞑靼尼尔海峡（由黑海经爱琴海通往地中海的海峡）设置海军基地。（二）由巴统到波斯湾地区（现在的伊朗以东地区）归苏联领有。（三）日本放弃北桦太的煤矿、石油矿权。（四）德军自芬兰撤退。”于是，希特勒乃对苏联的要求置之不理，并在交涉破裂之后，立即下定对苏作战的决心，于十二月十八日秘密下令全军准备和苏联开战（翌年六月宣战）。

对于以上情况毫无所悉的日本，为谋安全南进，仍然和苏联继续接触；及至一九四一年四月，单独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

美国积极援华制日

说到这里，还剩下一个大国——就是对于欧战宣告“中立”的美国。

美国自一九三八年开始采取积极性的援华制日政策，在对于中国答应了二千五百万美元的桐油借款后，更于一九三九年七月照会日本废止“美日通商条约”；继之，又在欧洲点燃战火半年之后的一九四○年三月，再度对中国提供以锡为担保的二千万美元借款。

美国显然已着手于太平洋战争的准备。

‘美国会通过扩军费三十余亿美元，此必为倭寇最大之打击。倭如能知机，则其必改变侵华政策。’（五月二十五日日记）

七月二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了“加速及巩固国防军事法案”，并下令对于东半球除英国之外有四十多种军需物资之输出须领许可证；接着在七月二十五日，更追加高级石油及一部分废铁亦须先经许可，始能输出。

当时，日本是自美国大量输入废铁，在一九四○年一至七月占美国总输出额的三分之一，故美国此一措施给予日本打击颇大。

‘此举虽晚，然亡羊补牢，仍于我有益也。’（七月二十七日日记）

‘自近卫登台后，美对倭关系益趋恶化。以此，英美在太平洋似有合作之可能，以遏止倭寇南侵之趋势。’（八月五日日记）

日本之于九月进驻法属越南北部，乃刺激美国更趋强硬。

在日军即将进驻之前，美国驻日大使格鲁访晤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予以警告：“日本的行动，是自行破坏其维持远东现状的约定。”又在华盛顿方面，并由助理国务卿韦尔兹代表病中的国务卿赫尔以严厉语气指斥日本：“这等于是完全占领法属印度的要求，竟以最后通牒强迫对方；如不为接受，则立即派兵侵入。实与侵略中国之步调配合一致，更侵略及于法国之殖民地。”

美国在等到日本实行进驻越北时，即于九月二十五日决定对中国追加二千五百万美元借款。翌日（二十六日），更扩大规定各等级的废铁输出都必须取得许可证。

这个措施正好是在日德义三国同盟宣告成立之日的前一天。

‘英美表面虽故作镇静，但其对南洋之准备，必已恐不及而失之晚矣！然余不能不警告：倭寇进攻新加坡、菲律宾之期在即矣！’（九月二十九日日记）

考虑国际战略

美国对日本的态度，由于日德义三国同盟而更见明显。

一九四○年十月二日，美国政府决定了他的基本方针：“应以明确的行动，表示不因日本之恫吓而后退一步的坚强决心。”

继之，美国更命其为巡逻太平洋而出动的海军舰队留驻于夏威夷的珍珠港；同时，国务院并于十月八日向在远东的美国人初次发出“倘非因紧急事务希即归国”的警告。

十月十二日，罗斯福总统表明：“美国援助被侵略者；无意屈于胁迫、威吓而走向独裁者们所开示的道路。”

美国的对日强硬态度，还产生了影响到英法两国也因而打消对日本让步念头的效果。

英国重开滇缅路

十月十七日，英国首相邱吉尔不顾日本的执拗要求，再度开放滇缅路；于是，通往中国西南的动脉，又开始输送血液。

此外，日本与荷属东印度（印尼）在进行中之石油安定输入的交涉，虽经派遣商工大臣小林一三驰赴当地折冲其事，但也由于荷印当局的态度强硬而终于决裂。

一九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是蒋总统的五十四岁生日，在这一天，他再次考虑到中国今后所应采取的国际战略如下：

‘一、日德义三国同盟以后的局势：

‘（一）中倭媾和为“下策”。——以倭对华侵略之野心，及其对中国积极移民之状况，决非一纸和约所能令其履行与撤兵；而且世界战争未了之前，何能使其对海南岛等沿海岛屿之交还？我能巩固西北及西南之根据地，倭寇亦无力西侵。

‘（二）参加英美战线为“中策”。——如新加坡或昆明失陷，则我国战线固不能与英美取得联系，完全陷于孤立；而一面又遭俄国忌恨，更促其对我断绝关系，甚至转使倭寇与中共协以谋我，此于我最不利也。如果我西南昆明坚守不失，而新加坡、马来西亚与印度等地依然无恙，与我国仍可联成一气，则待美倭战局展开以后，英美当要我陆军对倭参战，届时如俄不阻难，甚或俄已在英美战线上联合作战，则我自可相机参战。

‘（三）独以倭寇为敌，而对英美、对德义皆采中立政策，以待俄国表明态度，或其参加战争以后，我乃决定取舍。如此则对美、对德、对俄皆有进退自如之余地，而且皆可由我自动抉择。——此卓立自主政策，乃为目前唯一之“上策”也。

‘二、中倭战争，势必为世界战争之一环。故余自去年欧战发动时，亟望加入英法阵线，而英法反置余于不顾；今则英法既败，而美俄仍未有行动，且倭已加入德义阵线后，余料其必败。倭既参加欧战，则中倭战争自可包括于欧战之内，而我反可无急求参战之必要；此则去年今日中倭两国之地位完全相反，我则可渐入主动地位，而敌则反受束缚，无法脱离其桎梏矣！以后，我国如何能操完全主动地位，是我今日最大的思虑，亦我今日唯一之要务也。

‘三、如俄倭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倭寇所能抽调东北兵力亦极有限；如其所抽调兵力全部用于攻华，则仍不能达其南进之目的。故其抽调兵力亦必为南进，于我无大害也。

‘四、倭攻昆明或缅甸，此余早有准备，当可照预定计划进行。若万一滇缅交通完全断绝，我亦有自主自保之实力，以待美倭海战之结果。彼时，当可反守为攻也。

‘五、将来倭寇实施南进政策与发动美倭战争之时间。第一、在倭本身非南进与非攻美不可之因素与事实俱已存在。第二，在俄允倭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后，方能促其南进也。故美国欲缓和倭寇，决不能生效，其主因全操在俄与倭也。

‘六、我如实力再损，则俄必助中共组织中国苏维埃人民政府，令其与倭妥协，以遂其消灭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之阴谋；但只要我能维持既有实力，则俄亦不能积极为害于我。’（十月三十一日日记）

罗斯福三度当选总统

十一月五日，美国民主党候选人罗斯福击败共和党威尔基，三度当选总统。这是他以强硬态度贯彻对抗德国和日本侵略的政策，受到了美国人民的支持。

‘此虽为美国之内政，然有关于世界之安危与人心之振靡者极大。

‘美国之民主，令人羡慕不置，特电罗斯福总统，祝其成功。此乃出余之至诚，而非可以普通应酬之电文视之也。’（十一月六日日记）

中美英三国合作

十一月九日，蒋总统于上午接见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继之又于下午接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面交中、英、美三国合作方案。

此项方案中，举出以下三个原则：

‘一、坚持九国公约之门户开放与维护中国主权、领土、行政完整原则。

‘二、反对日本之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或“大东亚新秩序”。

‘三、认定中国之独立自由为远东之和平基础，亦即太平洋整个秩序建立之基础。’

继之更提出“相互协助之具体项目”四点：

‘一、发表宣言后，英美两国即共同或各别借款与中国，以维持中国之外汇与法币信用。此项借款为美金二亿元至三亿元。

‘二、由美国每年以信用贷款方式售给中国战斗机五百至一千架；但本（一九四○）年内先运华二百架至三百架。此外，并由英美两国供给中国以其他之武器，其数量及种类另行商定之。

‘三、英美派遣军事与经济、交通代表团来华，组织远东合作机关。此项代表团之团员，得由中国政府聘为顾问。

‘四、英美与日本，或英美两国中任何一国与日本开战时，中国陆军全部参战，中国全国空军场所，联军亦可使用。’

这是再度表明中国有和英美并肩对侵略者作战的决心；同时，并要求英美两国认清中国的地位。

其后，英美两国对于中国，大致是依循“合作方案”所指出的路线在做——就是增加军事援助，以及针对日德义三国联盟而组成中美英联军，乃至实现了为中国所企盼的废除中美、中英不平等条约，也都包括在这个“合作方案”所标示的进程中。

‘此为吾国外交史上极重要文献之一也。’（蒋总统十一月九日日记）

美供我一亿元借款

十一月三十日，日本和南京的汪伪政权签订了所谓“日华基本条约”。就像是对之还以颜色一样地，美国国会立即在十二月二日通过了提供中国一亿美元的借款。

‘美国借给我一万万美金，其中五千万元为币制借款，尤为难得。此实为美罗斯福总统协助我之精诚表现，抗战以来，国际助力以此为最大。’（十二月七日日记）

接在后面，英国也于十月借给中国一千万英镑。

‘英倭与美倭关系，皆无法改善，美参战时期将日近矣！’（十二月十四日日记）

‘倭外相松冈在日美协会饯送野村席上，发表恫吓美国之演说。敌国有此外相，实予我国以不少利益也。’（十二月十九日日记）

欧洲战局转变

另一方面，在欧洲战线，英军已遏堵住德军进攻其国土，并扭转形势于十一月十日在大兰多海战中打垮义大利海军，控制了地中海，更且自十二月九日开始在北非战线对义军展开攻势。——至此，战局已在徐徐转变之中。

‘英国在北非击败义国，此为倭寇最大之打击；以倭之制英根本计划，始终以义国为唯一之与国，期能在地中海与印度洋东西双方夹击英国。今义既大败，则其计划势将成泡影矣！’（十二月二十一日日记）

十二月二十一日，近卫文麿将其内阁局部改组，平沼骐一郎、及川古志郎分别就任内务大臣与海军大臣。又为其国内治安中枢的警保局长暨东京警视总监也同时易人。

‘是可知其国内社会人心之极端不安与恐怖，及其右翼分子之冲动与枭张，实为崩溃之明征也。’（十二月二十二日日记）

此时，日本已经进入全面战时体制。在近卫文麿首相所倡导的“举国一致体制”号召之下，于十月十二日组成“大政翼赞会”，原有各政党一律解散。至于国民生活，则在泥沼战争的耗费之外，加上美国的经济制裁，以致日益恶化。然而，这个涂满了军国主义色彩的国家，已经是落入了不容许发泄不满情绪的统制之下。

日本国民生活，自一九三八年开始便为缺乏物品所苦恼。

一九三八年，实施限制棉制品的制造贩卖，和公定价格制度，以及因汽油缺乏而出现了木碳汽车。一九三九年，开始收集铁和金银制品，因推行“国民精神总动员”而缩短游乐事业的营业时间，禁止烫发，废止过年消费以及在门前结扎松枝等——“浪费就是敌人”的气氛，弥漫于全国。

一九四○年，“报国公债”发行，“火柴”、“糖”凭配给票购买，实施米粮配给制，餐馆已经看不到米饭。

“在举国一致体制”之下的诸如“邻组”（类似保甲组织）、“大政翼赞会”（代替政党的政治组织）、“大日本产业报国会”、“文艺铳（枪）后运动”（战斗的文艺）等活动，争先恐后，产生了“不要搭迟巴士”的流行语。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的庆祝，也是在这一年举行。

日本国民经济枯竭

‘敌国-日本虽然年来竭力缩减普通工业的生产，集全力于军需工业生产的增加，但他到现在就已经感到弹药缺乏、武器质量减低了；而且国内到处米荒、煤荒，国民经济枯竭，生活日渐困难，不能支持。’（注）

十二月二十九日，罗斯福发表“美国将成为民主国家兵工厂”的炉边谈话，表明美国已有凭藉物质力量对抗日德义轴心国家侵略，而迫使决一胜负的决心。

注：蒋总统-“柳州军事会议训词（一）”（一九四○.二）

第十六章抗战的破坏者

主题

毛共窜改历史共军袭击政府军蒋总统告诫共党共党含血喷人共党的离间破坏共党武装扰乱统帅部提示案共军夸张战果新四军违法犯纪制裁新四军苏俄的反响共党充满敌意

毛共窜改历史

七七事变一年之后的一九三八年七月，在武汉举行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表面上看来，像是可以确实认定中国共产党业已归顺中央，达成了团结一致的局面。

可是，共产党尽管嘴里高嚷着“合作”，而实则一如过去，丝毫没有放松其颠覆国民政府的阴谋活动。

共军根本不遵中央命令

在七七事变之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隶属于第二军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之下的共军主力，奉命担任晋、陕地区防务。但他们根本不遵守命令，而于一九三七年末越出其防区，以山西省的山岳地区为中心，擅自连续成立“晋察冀军区”及“晋冀豫军区”。进入一九三八年，更行东进，其一部分势力达到冀鲁豫平原，一心一意从事于赤化民众的工作。

另一方面，在长江以南的共军，则被收编为“新四军”，划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指挥。在这个地区的共军，以往曾经政府军五次围剿，差不多已经溃散四方，化为一些只有几十个人的小集团藏匿于山区，对于被政府收编之事不敢相信，以致发生了传达命令的共党干部陈毅等人都曾被他们抓起来、差一点就被枪杀了的纷乱事件。是故，改编工作延迟到命令下达之后半年之久的一九三八年五月才告完成。

“新四军”奉令以安徽乃至江、浙地区为其对日军作战区域。但是他们却毫未和日军交战，而专致力于攻击地方团队及政府军的游击部队，将掳来的士兵并入自己军中以扩充兵力。

至于共产党内部的权力斗争，也是照旧在进行中。

被共产国际指为“缺点颇多的领袖”的毛泽东，以“第十八集团军”（一九三八年二月变更番号，但一般仍称“八路军”）为主力掌握着北方。

此外，国际派的王明（陈绍禹）、秦邦宪等人以共产国际的威势为背景，并和周恩来、叶剑英、叶梃（新四军军长）、项英（新四军副军长）等联起手来控制其南方势力。而共产国际在这个阶段则由史达林直接领导对中共的联络，以加强其影响力。

（“在这个阶段”是指民国二十七年前后。自由人注）

由于在权力斗争之下，陈独秀被批判为托派，张国焘也被打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烙印，且被开除了党籍，自一九三五年西窜途中“两河口会议”所开始的毛泽东、张国焘对立，到此才算告一段落。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六届六中全会”，会期达四十天之久。是自西窜之前在江西所举行的“五中全会”以来已历时四年多才有的一次集会。

毛泽东的“誓愿归顺”

派驻武汉的共党代表们，都因出席这次会议前往延安；但唯独周恩来却在会议刚开始的九月二十九日便突然离开陕西返回武汉。

周恩来这个行动，是受了史达林的命令。因为当时在欧洲方面希特勒正要求捷克割让苏台德地区，局势紧迫，史达林感到需要稳定对中国的关系，故而对毛泽东指示：要表示坚持“合作”的姿态，以免使国民党的印象有损；于是，毛泽东乃于九月二十八日急忙写了一封向蒋总统表示“誓愿归顺”的书信，交周恩来带回武汉。

这封书信的原件，业经在本书单行本第一册第六十五页发表，其内容在列述“凡我国人无不崇仰于介石先生”等敬佩语句之后，更强调“全民团结于先生统一领导之下”，措辞极其恭顺。

在扩大“六中全会”席上，毛泽东发表了以“论新阶段”为题的长篇演说，也充满了同样的旨趣。

他说：“全中国在民族领袖与罪高统帅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之下，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抗日大团结。”“十五同月的抗日战争，是完全成功的。”“国民党有光明的前途。”

然而，真实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呢？

共匪通敌，勾结苏俄，恶意进行宣传，诽谤诬陷国民政府。

共产党在表面上说是放弃了共产主义的组织和叛乱活动，但实则在八年抗战的整个过程中从没有积极参加战斗；非但如此，而且在军事、政治各方面，阴谋从事发展共产势力和反政府的活动。

在军事方面：将国军部署或作战计划供给日军，通敌利敌；并制造各种藉口向国民政府强索装备、经费，只顾作充实本身力量的打算。在这个以“一致抗日”为掩护而获得国军停止剿共战争的时期，对于共产党来说，实在是他的势力复苏乃至成长的绝好机会。

至于在政治方面，则勾结苏联等外国力量，恶意进行国际宣传，对于国民政府极尽其诽谤诬陷之能事。

共军像这样表面归顺，而实际上自一开始就怎样地在充分玩弄着欺骗的把戏，从下面的事实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共匪的“一分抗日”

在前面叙述过的“协定”刚刚成立之后，由朱德担任总指挥的八路军部队以国民革命军一分子的身分准备出发之际，毛泽东集合官兵早就作了如左的讲话：

“中日战争，是共产党发展的绝好机会，共产党决定的政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党），一分抗日。’现在特别要向大家说明的是：我们的同志要好好地认清自己的职务，即使和组织失去联络，也还是能够朝向共同的目标前进。在现阶段，我们放弃苏维埃运动和赤化政策，只是战术的转变，而非战略的转变。”

共匪的“三个阶段”

毛泽东进一步并就将来的政策，分为三个阶段，作了更详细的说明：

“第一阶段对于国民党，应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迎合其上层，打击其下层，造成其内部互相嫉视，利用他们上下争论是非的期间，进行策略运用。”

在这个阶段，共军分为两路由山西省西北部向前发展；然后一路横断雁门、五台，深入河北省中部；另一路由山西省南部的太行地区，经河南、河北，深入山东，分别截断中央军的联系，建立山地平原根据地。

“第二阶段为继续努力阶段，需要两、三年工夫在各地建立军事、政治根据地；清除国民党在黄河以北（华北）的势力。这个阶段，虽给予日军一些便宜，也未尝不可；因之，就得要能把握住日军的动态，才好决定我们（共军）的斗争方式。

“第三阶段就是本党（共党）的势力向华中伸展，在各地建立像华北地区一样的根据地

蒋总统是在中共“扩大六中全会”召开期间由周恩来带呈毛泽东“誓愿归顺”的书信时，便已经看穿了毛泽东的内心。

‘毛泽东这封亲笔手书的措词，开口是“两党长期合作”，闭口是“中华民族统一团结”，完全不是共党素来的口吻，反使我（蒋总统）发生疑虑。而且他所谓“长期合作”，另有其实质的要求，周恩来这时向我们国民党建议四点：

‘一、停止两党的斗争。

‘二、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或令其一部分先行加入；如情形良好，再全部加入。

‘三、中共取消一切青年组织，其全体分子一律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

‘四，以上参加者，均保持其共产党籍。

‘于是我知道这是中共企图第二次大规模渗透本党的阴谋。我们依据民国十三年到十六年的惨痛经验，是不能再上当的了。’（注）

在毛泽东“自主独立”路线之下，特别是他的影响力较强的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不遵守政府命令的擅自行动甚为显著，他们竟敢枪口朝向政府军而有袭击掠夺等行为，等于是在为日军的侵略行动给予协助。

鲁、冀两省的报告

在中共“扩大六中全会”结束未久的十二月十六日，蒋总统接到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电报，报告八路军开始采取对政府的敌对行动如下：

“津浦路以东、冀鲁边境之盐山、庆云、吴桥一带，驻有八路军，于月之三日向盐山民团所在地进攻，经民团指挥刘陆桥等率部抵御，八路军惨败；旋又大举来攻，并以老幼民众持蹈枪任前锋，士兵在后，我方不忍射击，遂为所乘，孙（仲文）指挥等殉难，民团瓦解，枪枝被缴，村庄被焚，民众伤亡无算。

“同时，鲁省无隶、阳信复以八路军进迫，人心惶惑。……谨电驰陈。”

又在这个前后，冀中地区也发生了八路军与政府为敌的行为。

在业已被日军占领之下的冀中博野一带，有张荫梧所组织的抗日民军正进行着抗日自卫的策划部署，未料投入共党的旧东北军吕正操也率领共军侵入此一区域，展开了赤化工作的攻击行动。

蒋总统于十二月二十日接到张荫梧的电报，报告八路军在冀省专横情形如次：

“查八路军利用吕正操等及土匪流氓在冀一年以来，对日寇游而不击，对地方假合理担负之名，行阶级斗争之实，自省府及民军到冀，彼即视为眼中钉，分化鼓惑，造谣生事；鹿主席（钟麟）一再退让，几无容身之地，但始终抱和平手段。

“乃八路军视冀省为赤化之区，不许吾党拦入，刻已由暗潮变为明斗，此其一贯政策，不惜甘冒不韪，破坏统一。”

蒋总统乃立即将这个电报抄交周恩来，转送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要求其反省。

未料，彭德怀却于十二月二十九日签呈蒋总统，拿出他们的要求如下：

“一、为正确的解决华北指挥关系，建议在八路军任主力的地区，友军及地方武装应受八路军指挥。

“二、华北划分为六个行政区，各行政区主任由军事指挥官兼任之。

“三、弹药补给困难，请发给制造弹药机器。

“四、八路军所辖三个师请准扩编为三个军；并请增编一个炮兵团及一个特务团。

“五、八路军现有人数十二万，原有四万五千人经费不够支配，请增加月费至一百万元。”

三十日，蒋总统召见彭德怀，当面严令其制止八路军的破坏活动，但他们却是毫无遵守命令的诚意。

国府面对两大内敌

这一天，正好是汪兆铭发出他的“对日和平声明”（艳电）的第二天。

国民政府乃是面对着两大内敌——做了日军傀儡的汉奸和不服从命令的共产党。

注：蒋总统-“苏俄在中国”（一九五六.十二）

蒋总统告诫共党

进入一九三九年，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的破坏活动越发严重。

刘伯承、徐向前所率领的八路军侵入冀中、鲁西地区，解除地方部队武装，占领村镇，以致河北、山东两省行政为之瘫痪。

元旦这一天，蒋总统又接到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来电报告八路军为所欲为的叛乱情况如左：

“据驻第六区之廖参谋长安邦报称：自刘伯承一二九师开入鲁西后，各县所驻八路军人数激增，约达万余人。又据临清第四区报告：八路军击破王来贤部后，入据馆陶；其吴作秀部袭占邱县，县城警察局保安队枪枝均被缴械，公私财物掠夺一空。又据第二区报告：八路军冀鲁支部进驻定陶城东四十里姬楼、王集一带各等情。”

及至三月，山东共军更侵入江苏省，掀起暴动；同时在晋南地区也煽动政府军叛乱。

另一方面，共党在所谓“陕甘宁边区”更擅自组织边区政府，不理会中央政府，而发布法令课税征粮，并征及壮丁参军。

他们在建立一个根据地之后，便连续不断地向邻县伸展，其手段是首先派军队进驻，立即在地方上制造争端，接着更藉口维持治安，出动武力，将当地保安队解除武装，然后再将国民政府派来的官员赶走，由共产党员来把持县政。

以陕西而言，在西安事变之后共党推进到延安之际，其所控制的县分，才只不过十三县；但到了一九四○年春，则已增加到将近一倍的二十三县之多。

又在三月间，共党并对在江南的新四军发出命令，要他们由华中北上，和在山东的八路军联系起来。这个命令是由在重庆的周恩来藉口返回故乡绍兴省亲而直接前往浙江，在金华与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会面，给予指示。

项英提出“如果渡江北上，必将与政府军发生磨擦”的疑问；但周恩来则强行要求说：“这是党中央的决定，必须坚决执行。倘有问题，到时再说。”

项英骂毛泽东下流无耻

此时，项英指出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问题，破口大骂。盖毛泽东当时刚和他的第三个妻子贺子贞离婚，与江青结婚。由于遭遇到共产党内很多人的反对，乃向各地发出电报解释“合于婚姻法，并合于离婚结婚自由及一夫一妻制的原则。”而项英则把毛泽东批判得一钱不值，他指谪毛泽东“把同患难共艰苦的贺子贞丢了，和一个下贱戏子结婚，喜新弃旧，下流无耻，这样缺德的人，怎能领导全党？真不知史达林从那一点看上了他，要他做我们党的领袖。”此后，项英反毛泽东的言行甚为显著，故而在他于一九四一年死亡之后，还受到过毛泽东的彻底批判。

在这个前后，共产党的指挥系统除延安之外，还有设在重庆的“南方局”（王明）和安徽径县的“东南局”（项英），河南确山的“中原局”（刘少奇），互相秘密联系；同时并在若干主要地区设有秘密通讯联络据点，不过这些联络据点的任务主要在于刺探政府军方的情报工作。而最重要的，则是设在重庆的南方局，有王明以及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廖承志（香港）等人在进行着反政府的活动。

蒋总统召见周恩来等

蒋总统为期如此行为的共产党能知所反省，乃于六月十日晚间召见周恩来、叶剑英予以告诫如次：

‘一、关于共党问题之症结，目前不在陕北几个县，而在共党应有根本的进一步之真诚--服从中央命令，执行国家法令，而不自居于国家体制之外，造成特殊关系。

‘二、余为全国革命领袖，完全以理智的及持平的态度处理国事，绝不偏听任何人或某一人之报告而有所偏倚。余之权衡一切，完全以国家民族整个利益为前提；余为革命计，决不能有所迁就或姑息。

‘三、共党为求解决问题，辄先造成特殊事实，以强迫的态度对余；余为革命领袖，一切皆当本革命立场持平处理，自不许有此种态度加诸余也。

‘四、欲求目前各地纠纷之适当解决，必须共党首先恪守中央命令，执行国家法令，使事态平复；如此，余决不致亏待共党。

‘五、余对事对人，向以仁爱为本，对共党亦无不如此。

‘六、吾人今后一切实施与行动，皆应合乎国家之统一与独立为唯一原则。如国家不能统一，便决不能独立；故吾人之求统一，实为整个国家民族之利益着想，此种利益，自亦为共党所共有也。’

可是就在这次指示的后天，便在湖南发生了政府军与共产军冲突的“平江事件”。

共党含血喷人

“平江事件”，是于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在湖南平江县所发生的政府军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所部和新四军平江通讯处卫队的冲突，以致有共产党江西省委员会组织部长曾金声等六个干部被射杀的事件。

这个事件之所以发生，也是由于共产党的反政府活动所引起。

当时，新四军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为了在平江一带建立湘、赣边境山岳地区的游击根据地，所以不断裹胁民众加以武装，并进行策动政府军的士兵投共，而且极尽其胁迫手段，凡不依循共党意旨的人，都毫不留情地予以处杀。

正当这样的情形之下，有政府军第二十七集团军少数部队进驻平江县嘉义镇，要求民间协力防备日军进攻；但想不到新四军却煽动一些民众予以杯葛。

此时，适有第二十七集团军一三四师士兵数人被共产党员带进该党平江通讯处，因此，师长杨干才乃派部属五人到该通讯处检查，但新四军则纠集暴徒加以阻止，因而发生枪战。

共党“假抗日、真作乱”

于是，共产党便将这个事件取名“平江惨案”，宣传为政府军片面肇事。不仅此也，接着在河北省方面又于二十一日出动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所属贺龙的一二○师及吕正操所部，攻击在河北省北马庄的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残杀民军旅长李侠飞等二百人；且又于七月间，由山东省西南部南下，接应新四军。

‘共军窜入鲁西南，乃图打通其冀鲁皖与新四军联系之大阴谋。共党之假抗战、真作乱，又一例证也。’（七月五日日记）

在抗战二周年的七月七日，蒋总统发表“告全国军民书”，重申一致团结、抗战到底的号召如下：

‘在敌国已宣布“东亚新秩序”狂论以后，很显明的他对我们中国除了要整个灭亡成为他的奴隶以外，再没有和平的余地了。我们对敌人今天只有胜利，只有完全达成我们抗战的目的，除此以外，亦绝没有其他第二条可走的道路；否则，中途投降，就是“汉奸的和平”。换句话说：便是奴隶的和平，灭亡的和平。……

‘我们更要巩固统一，加强团结，发扬敌忾心，提高自信心，我们要有“我不怕敌，敌必怕我”的认识。’

共党滥作诽言

就在同一天，共产党也发表了“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其内容，除了反覆空嚷抗战到底之外，就是诬指抗战阵营内部有“投降妥协分子”存在，而充满了无的放矢的诽言如此：

“国内投降妥协分子，暗藏于抗战阵营之中，乘隙抵间，便利私图，呼朋引类，奋其魔力。……加紧阴谋活动，以分裂国民党；伪造情报，散布流言，以破坏共产党；制造事端，挑拨感情，以离间国共两党之团结，并引起国内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间的嫌隙与裂痕。凡所作为，或直接受命于日寇，或间接而被其利用。一言蔽之，以分裂达投降之目的而已。”

还有毛泽东本人也在七月七日发行的共党机关刊物“解放”杂志的纪念特辑中发表了一篇专文，提到：“在抗战阵营中，现有主战派和主和派之争。主和即为达成投降之目的；我们始终站在主战派的方面，拥护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历次宣告的抗战国策。我们坚决反对那些所谓主和派。”此外，朱德、王明、周恩来、刘少奇、秦邦宪等也都发表了攻击“投降妥协分子”的论文。

当时，毛泽东并没有具体提到这个所谓“投降妥协分子”的姓名，而只说“是和汪兆铭唱双簧、装红白脸的准汉奸。”这种话，影射的是谁？在翌年（一九四○年）十一月七日共党中央书记处所发出的秘密指示中，有如下的说法：

“目前最危险的，是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集团，全党应从口头上揭穿何应钦的罪状，仅仅暂时避免文字上提出何应钦的名字。”

更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十二年之后的一九五二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又将“投降妥协分子的主要头目”由“何应钦”换成了“蒋介石”；而且还把毛泽东这篇“抗战两周年纪念论文”中原有的“拥护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的一节删除。因为对于不合其逻辑的历史得加以窜改，所以在这里又动了一次手脚。

“右手联合，左手斗争”

不用说，像这样的指摘，完全只是一种诬蔑。他们的目的，一方面是只要栽上国民党内某一些人不管他是谁便替他扣个主和派的帽子，藉以对国民党分化离间，从而逞其为图共产党发展的所谓“右手联合，左手斗争”的阴谋；一方面则是使民众对于八路军、新四军之破坏活动集中责难的目标为之转移，俾陷国民党于苦境。——乃是他们所惯常使用的伎俩。

为了要达到上述目的，所以便最先以军事中心人物、而且被公认是纪律严明的参谋总长何应钦为攻击对象。

共党的离间破坏

平江事件，为促成中国共产党潜入地下活动的契机。

七月下旬，共党南方局发出秘密命令如下：

“一、现在，各地党的组织应该从半公开的形式转到基本上是地下党（秘密）的形式，及与此相适应的工作方法。

“二、建立完全秘密的接头、会议、通讯等机关，严禁无工作直接关系的同志出入这些机关，并改以个别联系方式。

“三、违反秘密工作原则的组织与党员，必须受到处罚，必要时把整个组织解散和开除党员出党。

“四、同志被逮捕后，不许轻易承认自己是党员，应以抗战分子和一般公民的资格来替自己辩护，不要希望由组织上去保释；在万不得已须承认自己是党员时，绝不能暴露任何党的秘密和组织情况，绝不能供出其他同志。”

这是共产党自行否定本身是“公开了的政党”，而再度躲在暗处专心搞他们的阴谋。

他们的阴谋，就是用威胁或诱惑的手段使民众听其摆布，并煽动政府军的士兵叛乱，藉以扩张地盘；同时，更伺机袭击政府军，掠夺武器弹药和食粮等物资，自然是以颠覆政府为其目的。

他们并且将对政府军寻衅的行动，称之为“反磨擦斗争”。

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延安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的三个记者谈话，用煽动语气说明要加强“反磨擦斗争”如下：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也就是中国古圣人说的：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以礼待人--这就是我们的态度。”

毛泽东竟引用古人的话，来公然形容其武力袭击之事。

共党的“工作策略”

此外，共产党中原局也在此际向各地发布了一份“友军工作策略”。这个秘密文件指出：“友军，是指非共产党领导下的国民党部队。”下了这个定义之后，接着便指示对于“友军”的破坏工作如次：

“友军主要的工作对象，是向着国民党政治领导最弱的一环进攻，是向着对现实、对政府、对国民党怀有不满的一环进攻。因为这样的部队，最容易离开政府与国民党的领导，最容易受本党宣传的引诱。……

“把和本党关系较好的队伍，引导到我党的方面，以便将来万一分裂时的准备；在和我党关系不好，进行反共方针的部队中，加强秘密工作，发展组织力量，适当的实行瓦解与毁坏的方针。”

根据以上文件，可知在共产党心目中的敌人已经不是日军，而是政府军了。

像这样的离间、破坏工作，在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方面尤其显著。

各地向蒋总统报告

十一月二十日，蒋总统接到第十七军军长高桂滋来电，报告共党阴谋如次：

“近查共党对我阴谋逐渐暴露。据报：最近共党由陕北调大部工作人员分赴苏鲁、冀察、冀鲁、晋察各边区，建立特区；先秘密进行民运工作，离间军民感情，使我感受困难，自动退出；如有少数游击队，则利用民众解决之，以引起民众与我之斗争，必要时，利用倭寇打击我军，亦所不惜。其在晋东南，则促使牺牲救国同盟会与我磨擦。职（高桂滋）怵目危机，未敢缄默，谨电密呈。”

十二月一日，又接到山西省黄树芬的报告：

“共党在山西成立五台晋冀察绥边区政府，建立红军，把握政权，发行纸币、公债，威胁组织民众团体；以太行山北起榆社南迄壶关十九县为根据地，扩充军队（约在十万人以上），凌虐百姓，排除异己，暗杀本党同志，阻挠本党工作。其抗日大学、陕北公学与各训练班以及新华日报华北版，均移设于此，为共党在华北主要根据地。共党并运用党团，操纵牺牲救国同盟会，视为外围组织，以图夺取阎氏（锡山）政权。

“共党更提倡阶级斗争，实行拒租减息，宣传赤化，藉名合理负担，或诬假汉奸，抢掠百姓，提出富农即汉奸口号，以达其所谓土地革命目的。”

所谓“陕甘宁边区”

共产党扩张势力的重点地区，乃是陕甘宁边区。

他们于十一月十五日至十二月十日，举行了边区共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认为：“边区内部商业资本和富农经济的发展，开始发生着资本主义思想。资产阶级营垒中的投降分子与反共分子，正在有组织、有计划的企图混进我们党内来，破坏我们的党。”并扬言要“使边区成为抗日的、民主的模范根据地”，更决定以特务活动来加强检举反共分子及发展群众工作。

共党武装扰乱

及至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在陕西、甘肃、宁夏的共产党一齐发动了武装扰乱。

庆阳、镇原、宁县、合水各县先后受到共军攻击（即陇东事件），保安队官长被杀，武器被夺，政府机关被占领，政府所派职员也被掳走。

十二月二十四日，蒋总统接到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报告：“八路军继续增强其步炮兵，阻断各处交通，似有大举侵犯企图。”

二十五日，又接到报告：山西省主席阎锡山属下之山西省决死团十余团受到煽动，叛投共党。

而共产党却打算把这些纠纷责任推诿到政府军的头上。是故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改称）总司令朱德于二十九日、三十一日两度电陈国民政府，表示抗议，想藉以将他们自己的非法行为说成是正当的。

难养有甚于小人

‘昨夜，接朱德等通电，要求政府惩办反共人士、取缔反共言论等；其乱迹已显，但其用意仍在乘机扩充地盘，巩固其边区，甚恐我军进剿也。此种乱党叛徒，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其难养，实有甚于小人也。’（十二月三十日日记）

‘共匪朱德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名义通电要胁我惩办反共人士与废除防止共党办法，宜置之不理，以其虚声恫吓，有意捣乱也。

‘共党进扰甘肃宁县与镇原各地，乱党必叛，固无疑也。’（十二月三十一日日记）

翌年（一九四○年）元月四日，国民革命军参谋总长何应钦召见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指示：中共违令扩充之部队及非法设立之军区应加纠正。但叶剑英却反而要求将十八集团军（八路军）三个师兵额扩充为三个军辖九个师，并扩大其“陕甘宁边区”，以致交涉陷于停顿。

元月十九日，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替国民政府扣上“反动”的帽子，公然加以诋毁。并要求在三民主义中纳入“联俄、联共、工农”三大政策，就是要强求改写中华民国的国是～三民主义。

继边区扩张之后，共党又在华北一带全面活动起来。原在陕北的汪震（旅长）旅所属一部分部队渡过黄河，进入山西省，援助山西叛军作战，以晋北地区为其势力范围。在河北省方面，省主席鹿钟麟及朱怀冰的九十七军，受到贺龙、林彪等八路军的封锁，粮道断绝，终于只有退出省外。

此外，山东省方面，散在各地的八路军“联防办事处”、“抗日行政委员会”等机构都出动武力，袭击政府军政机关及地方机关。从这些一连串的行动中，显示出——共产党的意图，是要将陕北、晋北和河北、山东联接起来，造成一个大势力圈。

蒋总统手拟训示

为了约束共产党的如此不法行为，蒋总统特地于三月七日晚间手拟对第十八集团军代表训示要点如左：

‘一、不应认防地为私有，不应掩护叛军与袭击友军。

‘二、应言行一致，协力互助，建立共信。

‘三、不应擅委官吏，更不应残杀政府官吏。

‘四、不应尽征民粮，断绝民食。

‘五、不应擅发私钞。’（三月七日日记）

此际，日军忙于制造汪兆铭的伪政权，暂时停止了大规模的攻击行动。

‘军事如常，无变化，惟共党作祟为可恨耳！’（三月九日日记）

对于共产党如此动用武力，为之大伤脑筋的，乃是共产国际。

在前面曾经提到过，共产国际的意向，是在于和国民政府“共存”的王明路线，而不是毛泽东的暴动路线。盖共产国际唯恐引起国民政府的严厉取缔，会使共产党受到很重的打击。

三月一日，苏联间接向国民政府转达“共产党问题如不解决，则不能继续接济”的意向；像这样的提议，国民政府当然不能对之屈从。

‘共党如不安分守纪律，我政府决不能听其叛国。至于俄国是否接济，乃不在我心中。吾人决不对外有所希求，更不可迁就外援而贻内患也。’（三月一日日记）

共产国际同时也对中国共产党有所要求。派驻延安的国际联络员斯发诺夫，于四月间在中共某一会议上曾经提出“停止和国民党武装斗争”的要求如左：

“此时，中国共产党倘不考虑时局，而与国民党引起战争，势必演成远东发生反苏之不幸国际变化，则中共无异自取失败。目前中共除运用极巧妙之方法以谋发展外，当以中苏邦交如何，再定方针。”

但是，毛泽东则对于共产国际的指示颇不以为然，他甚至于反对苏联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

自此之后，苏联与中共之间可以说已经不能算是团结一致的了。

统帅部提示案

一九四○年四月，在重庆的共产党秘密训练班中泄露出一份共产党的秘密刊物“共产党人”第一期。这个刊物是创刊于上年十月份的月刊，毛泽东在为该刊所撰写的发刊词中有这样的几句话：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我们党的三个基本问题。”

毛泽东称这三者为“三个法宝”，谓三者之间互相有其密切关系。他并且指出：“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武器。”“可以使党巩固起来”。这就是说，在他们的心目中，是把“抗日”当作颠覆国民政府的一种工具而已。

由山西推进到河北、山东的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破坏了国民政府穿越过日军占领之“点”和“线”所构成的网眼而建立的抗日组织，在各地制造出许多非合法的“边区”（即所谓“解放区”）。于是，在这些边区中的抗日工作便立即成了虚有其表。盖共产党打着抗日的标语口号，向民众征粮敛钱，为扩大组织而疯狂奔逐；不仅如此，甚至只要是于共产党有利，即使和日军勾结也是在所不惜的。

共军与日军彼此呼应

四月二十二日，在晋南地区，日军突然发动攻击。中国政府军于翌日歼灭日军五千余人于晋省东南部的高平，继之又于二十六日击溃日军千余人于中条山，才遏阻住敌人的攻势；而日军之发动此次战事，实则是由于共产党之“诱导”而来。

‘中共幸灾乐祸，暗示敌军南攻国军之意甚明。’（四月二十二日日记）

及至五月，日军侵入晋南，使在山西中部政府军通往河北省的路线为之切断。

‘晋北公路为敌军把持，如不能设法击破，则晋冀两省无法联系，共党在敌侧背坐视不顾，且时来阻扰，斯诚汉奸之不若矣！’（五月十一日日记）

在此之后，八路军旋即有攻击政府军之举，是不折不扣地和日军此呼彼应。

（民国二十九年自由人注）

五月十三日，由贺龙所率领的八路军一二○师及一一五师计约一万三千人进抵联系晋陕两省的汾（阳）离（石）公路一带，于是处于被南面的日军和西面的八路军夹击情势之下的政府军两个师乃受迫陷于苦战，以致师长樊钊战死，终于被八路军击败。

自六月至七月间，在山东又发生了问题。--就是在河北的八路军渡黄河南下，攻击驻屯鲁西的政府军孙良诚、高树勋两部，激战数十日，孙、高两部不得已而退往黄河北岸；于是占领鲁西之后的八路军乃更向豫东、皖北推进；这个当口，江南的新四军正好在渡江北上中，八路军是要加以接应，以图伸展其势力由山东及于江苏、安徽、河南的华中一带。

毛泽东口中的“团结”

八路军的利敌行为，毕竟受到了舆论的反击。面对这个情况，共党中央乃于七月四日发表“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宣称：“我们将始终执行三民主义的政策。暴动政策与破坏政策是绝对不许可的。中国共产党声明始终拥护蒋委员长。”同时，毛泽东也发表论文，强调“团结到底”。

然而，这只不过是“一打一拉”的一种手段而已；就在三天后的七月七日，便在其党内发布密电诋毁：“国民党内部面临分裂危机，新的汪精卫的产生已经不可避免。……”并指示：“现在强调团结，并不是意味着停止对国民党斗争；我们的火力，应该向着投降派。……”

共产党的这种军事行动，显然是于中国全面抗日战争力量有损，而只是于日军有利。

政府军统帅部为避免如此自相侵扰的愚蠢纠纷，乃于七月十六日提出一个防止案，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提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及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

‘统帅部的提示案要点如下：

‘一、划定“陕甘宁边区”范围（此时准其包括十八县），改称“陕北行政区”，暂隶行政院，但归陕西省政府指导。

‘二、划定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境。将冀察战区取消，其冀察两省及鲁省黄河以北，并入第二战区，仍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以朱德为副司令长官，秉承军事委员会命令，指挥作战。

‘三、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于奉命一个月内，全部开到前条规定地区之内。

‘四、第十八集团军准编为三军六个师，三个补充团，另再增两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为两个师。’（注）

这个提示案，是以对于八路军擅自扩张的势力范围差不多照其现状予以认可的条件，再次要求新四军调往黄河以北，并服从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是政府方面很大的让步。

周恩来和叶剑英对于本案立即表示同意，并由周恩来于七月二十四日飞往延安，转知朱德与彭德怀，促其遵照实行。同时，何应钦也曾电令各部队，饬与八路军、新四军避免冲突。

可是，想不到自延安返回重庆的周恩来却突然自食前言；他不仅表示不能接受政府提示，而且提出调整游击区域及游击部队办法等新的条件。同时，共军并在各地再度出现侵犯行动，和政府军之间挑动武装冲突；在共军根据地的陕西省，甚至省会西安市都受到了他们的威胁。是故政府方面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也就只有指示陕、甘两省军政长官在共党边区附近构筑碉堡，巩固防务，以备对抗共军的进犯。

注：蒋总统-“苏俄在中国”（一九五六.十二）

□□□□□□□□□□□□□□□□□□□□

《中共编写“中华民国史”真相探讨》陈木杉着，国立编译馆主编，中华民国八十三年五月初版。

一、国立编译馆，中华民国台北市舟山路二四七号。

二、销售代理：红蚂蚁图书有限公司中华民国台北市内湖区文德路二一○巷三十弄二十五号

ＩＳＢＮ９５７－００－３６２７－３（平装）ＩＳＢＮ９５７－００－３６２７－５（精装）

由第二五九页至第二六九页讨论“磨擦事件”，节录于次。

第六章中共对抗战时期（民国二十七年至三十四年）民国史实的篡改之驳正

第二节对磨擦事件的曲解

壹、前言

抗战期间，在敌后共军与国军游击队不断发生冲突，被称为“磨擦事件”。磨擦事件之起因，由于中共所持对抗战之态度，违背其服从政府及军事委员会指挥之诺言，不听政令军令，越出其规定战区，攻击并吞噬敌后民团及国军，阻碍并消灭敌后合法政府，以扩张武力，建立伪政权所引起，亦即毛泽东所谓“先斩后奏”及“斩而不奏”所引起。时至今日，中共史家仍将此一磨擦事件，归咎于政府及国军，以致是非颠倒，真伪莫辨，本节针对此一问题，加以驳正。

贰、中共对磨擦事件之曲解

中共史家张宪文所著之‘中华民国史纲’一书中之第五编第二节有一段题为“国民党制造反共磨擦”谈到：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至一九四○年初……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活动日益加剧，制造许多磨擦事件掀起了反共浪潮。……蒋介石先后制造了山东博山、河北深县、湖南平江、河南硁山等一系列反共惨案，残杀共产党人，袭击抗日军民。有些惨案是国民党当局精心策划的。如平江惨案，早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蒋介石就密令军令部长徐永昌……密电陈诚、薛岳：速将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处人员黄耀南、徐正坤等一一解决。于是六月中旬发生了残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大惨案。……在这同时，国民党调兵遣将，部署兵力，进攻解放区，他们进攻的矛头指向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一九四○年二月，冀南地区的国民党军石友三部，袭击八路军。三月，蒋介石又命令朱怀冰部进攻太行山的八路军。……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发表谈话，所持态度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军事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注三八）

以上所述，是中共将抗战时期的磨擦事件，诿过给国民党军队之说法。

参、对中共曲解磨擦事件之驳正

事实上，此等磨擦事件，在山西、河北、山东等地者，由十八集团军所引起，在江苏、安徽等地者，由新四军所引起。（注三九）例如在山西这方面，由于八路军经统帅指定其在晋北敌后游击，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之指挥，于是该军首先在山西境内造成磨擦事件：新军叛变。（注四○）王建民着‘中国共产党史’一书有详细的谈到：

抗战既起，阎锡山在山西组织“牺牲大同盟”，引用左倾份子，于同盟之下，设决死队。决死队成立于民国二十七年二月，其最高组织为纵队。……牺盟与决死队均有共党份子所渗透，故一俟武装建成，第一着即为消灭所谓“旧军”。其进行方法为将本身所统帅之决死队、游击队、人民武装自卫队及工人自卫队等一律均称之为“新军”，原为晋绥军之王靖国、赵成绶等部则称之为“旧军”，划分壁垒，互相对立，同时极力宣传“新军”为政治化、主义化之军队，惟有新军才能抗日，旧军完全无用，进而号召“必须接触顽固份子（指旧派）之武装，发扬新军之优长，方能作到无条件之存在”。民国二十八年三月，锡山在陕西宜川县境之秋林镇，召开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思对共党在新军中之猖獗，予以遏止。秋林会议决定将“新军”重行编制，牺盟共党份子遂公开发表宣言，以反对“顽固份子”，反对“合法汉奸”等名义，攻击王靖国、陈长捷等，并反对集中训练，“新”“旧”军之冲突，由是不断发生。牺盟县长并鼓动牺盟群众举行反“顽固份子”示威运动，企图反抗。其中以独立二旅政治部主任韩钧为最积极，酝酿叛变，调动队伍，作军事准备，企图一举而占领六区。布置完竣后，即开始解决六十二军及十九军之补充营，最后张文昂、韩钧即公然叛变，影响所及，晋东南及晋西北之牺盟共党武力遂乘机打成一片，在各地不断异动，山西全境遂呈现整个变乱。……十二月七日，韩钧以“受教学生”名义向锡山发出虏电，公然叛变，锡山即予以撤职查办处分，旋以叛军势甚猖獗，乃令第三十三军之两旅，十九军之全部，及七十七师之两团，合力进剿。二十一日，将叛军盘踞石楼根据地之康城、石口克复，叛军六团之众，北窜招贤镇，藉十八集团军一一五师林彪部之掩护，与赵承绶部对峙，其另一部共四团，则由张文昌率领窜至渊源一带，与晋东南三区行政专员共党份子薄一波会合。由是晋东南及西北各地之不稳部队，即相继响应叛变，而八路军亦公然与之勾结声援，在各地进行骚扰。此一明显事实为中共违抗命令，族令国军叛变，且其结果为新军十二个团被共军兼并十个，无可争辩。而中共居然指控阎锡山“背信弃义，发动内战”，甚至诬之为“中日提携”。（注四一）

中共见晋省驻军力量雄厚，牺盟会份子复杂，乃百端勾引牺盟份子韩钧与三区专员薄一波等，勾引军队叛变者达十二团之众，阎主席派军平乱。中共始则鼓吹叛军为进步份子，进而公开援助叛军，贺龙部三五九旅，未奉命令开往陕北缓德，复自动开返晋西北，与叛军合流，倡言打通陕北晋北冀北，急图排斥中央在晋鲁政权，逼使友军脱离晋冀察境界。

中共曾声言“华北为十八集团军自艰苦奋斗中取来”，其弦外之音，可以想见“磨擦事件”是中共所制造。

兹从“阎锡山将军告晋省全体牺盟同志”一文中，亦可知磨擦问题真相。阎将军说：

自绥东抗战以来，我牺盟在全国抗战历史上，有它光荣伟大的功绩，这都是我全体牺盟同志艰苦奋斗的收获。不幸隐藏于我牺盟组织内部之别有阴谋的伪装分子掀起晋西事变，以致一部军队被劫持叛变，各地民运工作多陷停顿被叛变分子欺骗宣传所蒙蔽，或为其武力所胁迫，致形成混乱之局，大敌当前，遭此变故，实所痛心！事实如何，不能不为我全体同志道之：

一、晋西事变爆发之后，我陆续从背叛牺盟分子所发之一切言论文件，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他们已经赤裸裸自招了他们的立场，和他们对牺盟的企图，充分证明了这些别有组织背景的伪装分子，一向在牺盟内部所进行的各种阴谋活动与政治企图。我为抗战排除万难成立牺盟会，并为适应抗战紧急需要大量提拔青年干部，原期对国家民族尽最大力量，不意此等伪装分子混入内部，只为部分利益，不顾民族利益，际此抗战进入千钧一发的阶段，脱离国家民族立场，捏造事实，进行分裂……此不惟是我牺盟的叛逆，亦乃国家的罪人，应为全体牺盟同志所彻底认识者。

二、事变一开始，此少数阴谋分子所捏造之唯一口实，第一是山西已局部投降妥协，第二说我被顽固分子包围，在事实证明我全体军民依旧在前方与敌浴血苦斗……始终不渝！但对一切危害抗战制造分裂的阴谋活动，决不予宽容，阴谋分子之欺骗宣传，绝不能掩盖铁的事实于永久。

三、事变发生以来，使我多数牺盟同志蒙受其害。或不明真相盲从附逆，或迫不得已，被其裹胁，加之各地情况遽变，一时未复常轨，致彷徨歧路莫知所措者亦属不少。兹所告者，我牺盟政治立场与路线，始终不变，团结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一举抗敌，是我国的基本精神，今日牺盟的恶运，乃少数分子背叛牺盟所造成，我全体同志应认清是非与利害，勿为无稽谣言所动摇，要百倍的坚定自己的立场，一本以往精神，站在牺盟的旗帜之下，奋斗到底，我已告知各地军政当局对各地牺盟同志加以保护，对于明了事实真相后觉悟归来的同志，尤予以切实之保护，望我全体牺盟同志，明辨是非，负起拨乱反正的责任，勿为奸谋所迷惑，是所至盼。（注四二）

另外在河北、山东、江苏方面由于十八集团军违令越出其作战区域，进入河北、山东，而新四军违令进入苏北，侵犯留置敌后之国军及保安队，并破坏当地合法行政机构，于是在各该省亦发生磨擦事件。据民国三十年三月四日军事委员会对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所提军事报告，其经过如下：

民国二十七年，十八集团军已自由开入河北，是年十二月，集中贺龙、赵成金、吕正操等部，及时进纵队、青年纵队，用围攻袭击方法，在博野、小店、北邑、冀县、北马庄、武靖、安次、赞皇、元氏、赵县、隆平、武安、上焦寺、锁金寺等处地区，次第解决河北抗日民军张荫梧部、乔明礼部，及丁树本、张锡九、尚中业、杨玉昆、赵天清等部，于是中央所编成在河北之抗日民军，悉被摧残。民国二十八年，十八集团军徐向前部窜至山东，遂在山东到处围攻地方团队，如长清之第一区保安司令部，寿光之第十四区保安司令部，鱼台、钜野、莱芜、蒙阴等县团队，不被解决，即遭袭击。九月以后，鲁东保安部队，被其解决者，计有博兴保安第八旅，鲁东九梯队，招远保安第二十七旅，邱县、莱芜、东平、泽县等保安队，及郓城区常备队，此外各地之民众自卫组织，被解决者不可胜数，

山东省政府驯至无法行使职权。

民国二十九年一月，十八集团军在河北方面，又集中一二九师、一一五师，并分调徐向前、贺龙、吕正操、杨秀峰等部，分途向冀中、冀南之国军猛攻，三月中旬，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及朱怀冰、高树勋等部，均以被攻不已，更不忍同室相残，乃忍痛退出冀察，高树勋等向黄河以南鲁西转进，鹿钟麟、朱怀冰等向晋东南转进，而十八集团军仍复节节进逼，经统帅部迭电制止，乃为时无几，而孙、高两部，又复被其数度围攻，

此该军（共军，自由人注）力谋消灭河北省政府，使之不能行使政权之暴行也。

……据此事实，该军用意，不外袭击友军，发展其势力，而实为敌作伥，自残手足，结果所至，不仅破坏整个抗战计划，且实际上仅为协助敌军建设其占领区而已。（注四三）

观以上所列事实，明明为共军侵入国军防区，攻击国军，而毛泽东于民国二十八年九月十六日对中央社等记者谈话中，竟称张荫梧在河北，秦启荣在山东“无法无天”，并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可谓武断已极。兹节录河北民军领袖张荫梧为河北磨擦真相覆毛泽东之说明，以驳斥毛之谬论。张荫梧说：

……自卢沟桥事变爆发以来，河北民军奋战华北，其所给予敌人的打击，及整个华北抗战的作用，已有铁的证据摆在这里，尽管毛泽东先生用如何样的“谣言攻势”来诬蔑，绝掩没不了所有的事实。如果我们不是健忘的话，大家还记得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所发表有历史意义的共赴国难宣言，和历次中共负责人堂堂正正的“精诚团结”“抗战到底”的口号，但是出人意外的，正当全国抗战处于最艰巨阶段的今日，毛先生却盛气凌人的以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与“礼尚往来，来而不返非礼也”云云的态度向全国人民挑战，使一切爱护祖国的人都不得不担心到共产党再演长城抗战之故智，予正在进行中的抗战建国伟大事业以莫大危害！而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汪精卫等叛徒，却以热烈欢迎的态度，扩大“谣言攻势”，以毛泽东的谈话作为他挑拨离间的唯一机会。毛泽东说：“张荫梧、秦启荣是两位磨擦专家，简直是无法无天，同汉奸行为很少区别”什么事实呢？“打八路军的时候多，打敌人的时候少”。毛泽东是多么善于攻击异己！自然，在全国一致，一心一意的和敌人作战的时候，唯有“汉奸”二字可以制人于死地，假使我不是一个中国国民党党员的话，也许中国共产党更会加以“托匪”的头衔。因为这是他们用以与排斥攻击异己唯一工具，全国人士，尤其在战区曾受屠害的民众，都早经深切了解。但是，我今天提出所有这些问题，绝不是如毛泽东的观点来找“磨擦”，同时也不是辨别是非（因为整个的是非，国人早已了解，用不到我多解释）。中国的抗战已经快将三年，在这空前未有的民族危机时期，稍有天良，也会知道：只有举国一致，争取民族解放，完成抗战建国的神圣事业，才能求得个人的生存，没有国家，没有民族，仅有一个党也不会有什么出路。唯其如此，我们必须牺牲个人的，一党的利益，在全国人人所信仰的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求大中华民族的胜利，反对割裂统一的一切特殊组织，反对破坏团结，拥护中央政府，拥护蒋委员长，为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中国共产党内有许多热烈爱护祖国的，他们的党员，对于目前抗战形势，自然有不少和我们具同一的认识，他们当不顾一切惨杀自己兄弟的事件：然而可惜他们所听所看的尽是些相反的宣传，像在河北被策动进攻民军而死的八九百战士，如果英灵有知，死怕也不会瞑目的！（注四四）

毛泽东指张荫梧为“磨擦专家”，其主要原因，自然由于河北民军坚持抗战，未能俯首贴耳以受其屠杀，未能依共产党之意旨，听命帮助其宰割河北人民，窃夺华北政权，实现其一切阴谋，所以八路军总司令部驻冀代表朱瑞，在陵川时，对河北民军工作数月，因鉴于“分化”“争取”之困难，乃致函于张存实等，批评荫梧“专门向右看齐”！于是拉拢不成，便施之以分化瓦解。打了别人，回过头来还反诬人为“磨擦专家”。此种颠倒是非，阴险毒辣的狡计，断难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荫梧对于自命为中共负责人毛泽东之诬衊，卒不愿多费唇舌，但为抗战前途计，为个人名誉计，不得不略加辩正。

另据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由尖兵半月刊社编之‘磨擦问题真相’一书，针对毛泽东诬指张荫梧“无法无天”之论调，提出十大问题请全国同胞公判：

一、割裂中央在华北之行政系统，设立“晋冀察边区政府”，违抗中央命令，不取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及“冀中政治主任公署”等，是否不是破坏统一之封建割据，是否不算“无法无天”？二、擅自印发边区银行钞票，发行救国公债数百万，是否不算“无法无天”？三、拒绝河北省政府行使职权，擅自颁布法律命令，委派专员县长，是否不算“无法无天”？四、强迫征收河北地方抗日武装，掠夺民间财富，绑票勒捐，复加托派汉奸帽子，擅肥噬人，损罚之外，暗杀活埋，使河北生灵涂炭，冤气冲天，是否不算“无法无天”？

五、以诱骗威胁手段，解决了段海州部、赵棣华部、孟阁臣部、窦同义部、邵北武部、史省三部等，并将抗敌最有成绩军纪最好的赵棣华，史省三，及史之旅长愚忱，政治主任安克贞割鼻砍头，难道这几位抗日英雄也是“磨擦专家”？这种行为是否不算“无法无天”？

六、在冀中一区，惨杀及活埋了国民党员二百余人（其余各处，尚无法统计）此种残暴非法行为是否不算“无法无天”？七、勾引敌人，消灭抗日友军（友军消灭之余，则其收拾人员械弹，以为己有。）此种行为，是否不算“无法无天”？八、扶植地方氓痞，鼓动阶级斗争，搜括食粮，屯集深山，利用减租减息口号煽惑暴动，加深农村困难，减弱抗战力量，阻碍建国进行，此种行为，是否不算“无法无天”？九、对敌人游而不击，敌人走后，则冒人之功，以为己有，蛮横强暴，截夺友军所获敌人械弹，并以解决友军枪械捏报为战利品，此种行为，是否不算“无法无天”？十、表面高唱“统一战线”“拥护中央”，实际则阴谋反对，禁止悬挂党国旗及总理遗像（各种民众集会场所，只悬挂马列像及朱毛像），赤化太行民众，高唱打倒国民党，反对三民主义等口号，是否不算“无法无天”？（注四五）

事实上，以上十问，可说是中共抗战期的十大罪状，而毛泽东却嫁祸他人，时至今日，相信全国同胞，自有公正评判，历史真实，是不容任何人窜改曲解的。

肆、小结

卢沟桥事变发生，蒋委员长领导全国同胞，展开了历史上神圣的八年抗战，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军民浴血沙场，前仆后继，写下了中华民族血泪斑斑、可歌可泣的一页。中共党徒却值此国家生死存亡关头，伪装输诚，表面宣称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辖，待命行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责。实际上，仍保持独立系统，私设造弹场，不服军令，擅移阵地，狙击国军，煽动叛变，围攻省县政府，自由扩军。在陇东、河北、陕北、山西、山东、察哈尔、安徽、湖北等地，夹袭我军、地方团队及游击部队，其大规模行动，有军事长官直接向军委会报告者，迄民国三十三年九月止，在五十次以上，规模较小之不法活动，亦在三百次以上。

然而中共却将责任嫁罪国军，提出所谓“反磨擦斗争”口号，毛泽东更发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共党诡辩言论，指示“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原则，共党中央且下达秘密训令，认为“磨擦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在统一战线中不能消灭阶级斗争，因而就不能避免磨擦”。其手法是先散播谣言，谓某部队即将予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不利；继而化装成其他部队制造事端；乘我军宿营行军，或与日军久战疲乏之际，加以围攻袭击，胜则诬国军先行挑衅，败则大事渲染，指国军枪口对内制造磨擦。

在抗战期间，中共此种枉顾民族大义，几近于叛国之非法军事行动，不但消蚀了政府抗战的实力，亦且助长了日本军阀的凶焰，揭穿“磨擦事件”真相，有助于吾人更深一层了解中共破坏抗战的真实面目。

注三八：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十月第一版），页五五三～～五五六

注三九：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民国七十七年二月），页一九四。

注四○：同注二，页一九五。（可能为：同注三九，页一九五。自由人注）

注四一：同注二，页一九五～～一九六。（可能为：同注三九，页一九五～一九六。自由人注）

注四二：“阎锡山将军告晋省全体牺盟同志”，（‘共党问题研究’五卷十期，民国六十八年十月），页一一六～～一一七。转录自尖兵半月刊社编‘磨擦问题真相’，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出版。

注四三：同注二，页一九七～～一九八。（可能为：同注三九，页一九七～一九八。自由人注）

注四四：“河北民军领袖张荫梧为河北磨擦真相覆毛泽东”，（‘共党问题研究’五卷十期，民国六十八年十月），页一一○～～一一一，转引自尖兵半月刊社编‘磨擦问题真相’，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版。

注四五：“几个请同胞公判的问题”，（‘共党问题研究’五卷十期，民国六十八年十月），页一一四。转引自尖兵半月刊社编‘磨擦问题真相’，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版。

□□□□□□□□□□□□□□□□□□□□

共军夸张战果

在这里，得提及所谓“百团大战”的真相。

这个所谓“百团大战”，被共产党扬言为“震动全国，使敌人胆寒”，而与“平型关大胜”并称的对日战争。

这个战争，据说是自一九四○年八月至十二月在华北战线所展开的对于交通通讯网之破坏战，投入了一百个团以上的兵力，因此名之曰“百团大战”。

参加的部队，谓有八路军一二○师、一二九师以及“晋察冀军区”聂荣臻等各部队主力计一○五个团。

据共产党发布的消息，八路军有两个团于八月二十日攻击在正太铁路（石家庄-太原）线上的娘子关，翌日占领该关。同时，动员了十万以上的群众，只在数天之内便将正太铁路井陉至寿阳段的大铁桥、石桥以及路轨破坏。

在华北一带，也同样地到处展开行动——同蒲铁路（大同-永济）、平汉铁路北段、北宁铁路的北平至天津段都予以破坏，以及使若干干线公路为之不能通行车辆。

共产党把这个“百团大战”说成是“中国抗战史上空前的大规模进攻”，并夸大宣传毁灭了各路沿线的日军守备据点及部队。

可是他们所破坏的地段，实则乃仅限于为日军守备兵力稀少或是毫无日军之处；而且破坏之后便为日军所立即修复，就连为共产党所号称攻克的最大据点-娘子关，也是旋即被日军所夺回，而且火车的通行差不多是未发生什么阻碍，只不过在敌人后方给予一些扰乱，不可能说是对于战局有所影响的“正面作战”。

究其实际，所谓“百团大战”，不过是共产党为故示其抗日而表演的一种姿态；其目的盖为闪避国民对于“共军不抗日”的批判而已。

所谓破坏交通并无效果

就在这一年的十二月八日，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暨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便曾复电朱德等人予以规诫如下：

“一面兄等……正渲染百团大战之时，一面敌人横断河北之德石铁路（德州-石家庄）自本年六月中旬动工，未受丝毫碍障，竟得迅速完成，亦于十一月十五日大事铺张，举行开车典礼。”

据中国共产党扬言关于百团大战说是：“经过大小战斗一千八百二十四次；伤亡日军二万零六百四十五人，伪军五千一百五十五人；俘获日军二百八十一人，伪军一万八千四百人；击破日军据点二千九百九十三个；破坏在正太线、京汉线、同蒲线等铁路九四八华里（约五五○公里）以及公路三千华里（约一千七百公里）的桥梁等设施二百六十处。”

另据日本资料：日军守备队分散配置于各车站，差不多每处都是以分队（排）为单位，多的地方也只不过是中队（连）为单位；因此，在八路军的突袭之下便马上受到包围。

但日军立即转而予以反击，火车通行并无障碍，平汉、同蒲、正太各线铁路分别于八月12[102]2700二十五、九月八日、九月二十日照正常行车时间表恢复行车。

至于铁路之被破坏情形，据当年十月十五日调查，计有：铁桥七十三处、铁路一百十四处、隧道三处，以及烧毁车站建筑三十所。其累计被破坏之线路总距离为四十六公里。

日方人员损失，缺乏完整统计，但被损害最大的独立第二、第四混成旅团计战死四百○九人；而在晋冀两省边境曾有一个中队覆没，以致“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中将等有关人员后来引咎离职。

在“百团大战”之后，日军对共军的警戒加强。

关于这个“百团大战”的“战果”，当时指挥战斗的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曾于该年八月三十一日向共党的新华社记者表示：“有伟大的意义”；总司令朱德复于五年后的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在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军事报告——“论解放战场”中加以“称赞”。

然而，奇怪的是事隔二十七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之际，却以“百团大战”为朱、彭两人的罪证而加以批斗。

这是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出版于北平的“战报”第六期，以“大军阀、大野心家朱德的滔天罪行”为题，举出朱德、彭德怀的五大罪状，其中有这样的一些说法：

“朱德、彭德怀违反党的组织纪律，擅自搞百团大战，完全违背了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把日寇的兵力吸引过来了，减轻了日寇对蒋介石的压力，使我八路军和地方游击队都受到很大的损失，造成我军力量的下降，得到蒋介石的勋勉，这是朱德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又一重大罪恶。”

毛泽东歪曲事实

毛泽东是将“百团大战”利用于自己的权力斗争，指白为黑，歪曲事实，以谋斗臭朱德等人。盖所谓“百团大战”，在当时是依据身为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命令行事；夸大宣传战果也是共产党中央所做，而朱德发表的“论解放战场”，则更是经过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所决定的。

还有，所谓“把日寇的兵力吸引过来了”的说法，也是与事实完全不符，而且毛泽东本人早就承认过“八路军的任务，只是在担负辅助的游击战。”

对于毛泽东这种“利己主义”在“文革”爆发之后的莫斯科广播中，曾经提出批评：“毛泽东只是发布抗日口号，实则足不出户地深居在他的窑洞里，唯一的目的，只是苟且偷生保存自己的军队。这个行为，是使日军最为高兴的。”

新四军违法犯纪

“新四军事件”（皖南事件），发生于一九四一年元月，是刚在共产党所宣传的“百团大战”告一段落之后。

这是在中国革命过程进行中应该特别加以提及的一个事件。在表明其真相之先，首先必须追叙一下前此的经过情形。

采取横暴手段

由在长江以南的八千共党游击队向政府投诚而编成的新四军，仅仅在一九三八年六月与日军接触过一次，以后便避免与日军战斗，而只顾吓唬民众，招纳土匪，专事扩张自己的势力。到了一九四○年，号称已发展到十万人；其发展的情况是凌驾于华北的八路军之上。其手段，则只有“横暴”两个字能够加以形容。譬如说：他们藉口民间枪枝应该登记，而向他登记之后便被没收（安徽）；他们规定每一村庄征送壮丁的名额，美其名曰“自动参军”，并擅自发出“志愿兵役证明”，破坏政府的征兵工作（江苏、福建）。

又对于遗留在未经日军占领地区从事抗日工作的政府军和保安队以及政府机关，采取敌对行动，简直是家常便饭。他们的目的，是在获得武器、兵员与地盘。他们以武力为背景，胁诱各地属于政府的保安团、常备队等“叛变”，并将之并吞；所以，在安徽当涂县即有不听唆使的常备队长被其暗杀。据一九四○年三月统计，仅安徽一省在一个月之间就有约一万人被共党用上述方法并入新四军，以及步枪六千八百支、机关枪三十三挺落入共党之手。

攻夺地盘自派县长

武装袭击，也是连续不断。

自一九三九年六月所发生的为共党组织转入地下活动之肇端的“平江事件”开始，十一月间又在豫南地区发生“竹沟事件”，杀伤了政府方面的军人和农民。

一九四○年三月七日，新四军攻入定远县，赶走了国民政府所派遣的县长吴子常。后来，据新四军师长谭希霖问刘少奇：“把吴子常打跑了，国民党会有好县长派来吗？”

刘少奇答称：“自己派嘛！我们有一个县，派县长；有几个县，就派专员；省长我们也能派出来呀！”

“人家会承认吗？”有一个人插问。

“要谁来承认？”刘少奇说：“党承认你，人民承认你。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大刀阔斧地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建立我们的政权；如果不把政权掌握到手，建立根据地是不可能的。”

于是，便这样地派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统战科长魏文伯为伪定远县县长；接着，又攻占邻接的滁县、凤阳，成立了所谓“抗日民主政权”的伪组织。

五月四日，共产党中央对该党东南局发出由毛泽东所决定的命令，指示：“要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

在这个命令中，并提到“不受国民党（政府）的限制，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实则就是命令攻击在日军包围之下作战的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军队。

进入苏北攻击韩德勤军

由陈毅、管文蔚等人率领的一部分新四军，在受到毛泽东的命令之后，立即和刚盘踞在山东的八路军取得联络，于七月间渡过长江，涌入苏北地区，对韩德勤所属陈泰运部队发动突袭，占据了江北三角洲的如皋之古溪及泰兴、黄桥等地，将联系长江南北的政府军补给线截断，并到处设卡收税。

就是在这个当口，政府方面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乃向中共代表周恩来及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提出如前所述以黄河以北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作战区域的中央提示案。此时，周恩来虽曾一度接受，但为延安方面所拒绝，而新四军的反政府活动也就毫无止息的动向。

自十月四日开始，渡过长江，进踞北岸的新四军，再度对韩德勤的八十九军发动偷袭。

经过两天的战斗，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被冲落水，下落不明；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瑞体以下官兵数千人被俘，更有多数人阵亡。六日，又有自山东南下的八路军参军攻击，受到两面夹攻的韩德勤军乃陷于被围状态。而此一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合作战，则是由刘少奇所策划、经共产党中央指示实施的。

国民政府对于共党如此暴行，乃于十月十九日由何应钦、白崇禧联名向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以及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出“皓电”，命令如次：

“……历次不幸事件，其症结所在，皆缘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以上四端，实为所谓磨擦事件发生之根本，亦即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非法行动之事实。若不予以纠正，其将何以成为国民革命军之革命部队？……

“兹将前经会商并奉核定之中央提示案正式抄达：

“第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之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七月间）所规定之作战地境内（黄河以北），并对本问题所示其他各项规定切实遵行，静候中央颁发对于执行提示案其他各问题之命令。……”

可是，新四军则对于命令其调往黄河以北的“皓电”置之不理，并且成了“新四军事件”（皖南事件）的发端。

制裁新四军

共产党方面，对于政府命令八路军与新四军向黄河以北调动的“皓电”，由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四人联名于十一月九日以佳电辩称“……对于江南部队，正拟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

又在政府发出皓电之后，负责指挥新四军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即派遣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前往新四军驻地安徽省泾县，和叶廷、项英磋商，叶等提出条件如左：

“一、预发五个月薪饷，并发给开拔费二百万元。

“二、一律换发新式枪枝，及子弹一百万发。

“三、留一部武装部队于铜陵、繁昌一带。

“四新四军抗属应予慰劳及优待，其所组织抗战团体，应加以保障。

“五、在江南的新四军只开至苏南为止。”

叶挺等这些要求，实则和军事委员会命令背道而驰，乃是拒绝北调而故意提出来的无理难题。十一月中旬，叶挺本人谒见顾祝同，再度提出同样的要求，顾祝同允许拨发五万元，并指示该军应于十二月底开拔完毕。

实则，共产党方面在奉到“皓电”的时刻，已经决心要和政府军冲突。十一月一日，共产党中央对内发布“对机要工作的指示”：“在目前政局下，可能遭受极大危险与困难，立即将所有一切密码全部焚烧，并将使用法记在脑子里。”

十二月八日，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复对朱德、叶挺等五人发出“齐电”，予以警告，大意是：“虽经再三命令，但仍违背军纪。如继续专以扩地凌人为目的，中央当采断然态度。”

继之，蒋总统更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立场下令共军调动，令文如下：

‘前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各部开到黄河以北作战；兹再分别地区，宽展时限。

（“本年”指民国二十九年。自由人注）

‘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一月三十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

‘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

‘希即遵照参谋总长十月皓电所示之作战地境内，共同作战，克尽职守，毋得再误。此令！’

项英图自建根据地

在共党方面，最反对将部队北调的，是该党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他和毛泽东素有宿怨，打算在长江流域造成一个足以和延安分庭抗礼的大根据地。是故中共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之际，还重新提出当年项英这种态度，加以批判。

及至“新四军事件”之后，顾祝同审讯了新四军参谋总长赵凌波，得悉：该军于十二月十六日在泾县云岭举行高级干部会议，结果决定照项的意见拒绝调赴江北，并采取向苏省南部的江南三角洲地区推进的战略如次：

“以日舰封锁长江为藉口，拒绝在皖南渡江，力争由苏南渡江，而使部队沿长江南岸开到苏南地区。

“建立新根据地于京、沪、杭三角地区，先以政工人员、地方干部及武装工作队等开赴该地区（金坛、丹阳、郎溪一带），待全部到达候，展开攻击，消灭政府部队。”

同时，新四军并依循此次会议决定，亟谋扩充部队，遂即在其盘踞地区，肆行强迫参军，所有壮丁都被裹胁入伍，当时匆遽扩编的部队达四个团之多。

接着，新四军便向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提出“拟由苏南渡江”的申请，获得核准。

袭击四○师挑起战火

截至十二月二十三日止，新四军的政工人员等非战斗员约八千人由皖南向东北方面移动，但战斗部队却待在原地不动。

政府命令新四军调动的期限是十二月三十一日，同时已预定在新四军调开之后，由政府军第四○师自江苏调来皖南接防。

可是新四军却伪装开拔北上而将其战斗部队埋伏于某些地区，等待第四○师到达。

第四○师当然不知道会有这样的事，而于一九四一年元旦到达皖南乡桥镇附近。而新四军则全神贯注地在侦察着四○师的一举一动。

元月四日夜晚，新四军将其主力南移，潜伏于茂林、巧峰镇、铜山等村庄，等待着四○师到来，他们为防泄露消息，并特地禁止民众外出。

新四军发动对第○师的偷袭，是在元月五日夜间。同时，并分兵袭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上官云相）。

新四军是分兵三路企图把四○师切断，再加以歼灭的大规模袭击。

第四○师迫不得已乃点燃了战火，形成激烈战斗。

接到报告的顾祝同，决心采取毫不姑息的制裁措施，乃迅即出动援军反击，及至八日清晨新四军分头退散，在各地被解除武装。

有些窜入山区凭险顽抗的叛军，直到十五日才被平定。

苏俄的反响

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以及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退至云岭，亲自指挥第一支队第一团及特务团对政府军激烈抵抗；但结果叶挺被俘、袁国平毙命，项英及参谋长周子昆逃亡，却在途中被其副官刘厚忠射杀。

项英之死，共产党一直宣传是被国民党打死，但在“文革”之后的一九六八年才公开了真相。

据“文革”资料说：项英是在元月八日（一九四一年）晚间感到情势不利，声称“干部必须保存”而伙同参谋长周子昆逃走，途中指伤病饥饿的新四军士兵们为“累赘”而将之杀害，连妇孺都被毫不留情地用刀砍死。

像这样好不容易才挣扎到一个山洞里藏身。

可是由于项英带有巨款，被他的副官刘厚忠看到，刘厚忠是土匪出身，因枪法很准被项英所看重而用为副官，此时见财起意，乃于某夜将熟睡中的项英和周子昆射杀，拿着他的钱财和武器逃走。

又据说：战后，刘少奇在南京郊外为项英做了一个墓，但在“文革”之后，共产党为项英扣上叛徒的帽子，将他的墓铲平。

至于被掳获的叶挺，则经军法审判之后，监禁于重庆，后来于一九四六年释放；但在该年四月由重庆飞往延安途中，和同行的秦邦宪等人因飞机失事死亡。

军委会下令解散新四军

元月十七日，军事委员会下令解散新四军，决定取消其番号，并通令如左：

“据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电称：新编第四军……危害民族，为敌作伥，丧心病狂，莫此为甚！……瞻念前途，痛愤无已！职为应付危机，伸张纲纪，不得不为紧急处置。……据此，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撤销。……”

于发出此一通令之同时，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并说明：“此次处分，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事件非出偶然，而实本于该新四军一贯之阴谋，据该军参谋处处长赵凌波之供词，即可明了其真相。”

‘一、决定发表撤销新四军番号命令，与惩处该军正副军长案，文人多主缓和，而军人皆赞成。

（“此事”表撤销新四军番号自由人注）此事对俄关系最大，然为国家民族之独立自由计，若严肃军纪而遭外人之干涉，则以后国权旁落，比抗倭失败尤恶。故决心下令严处，即使俄已运到我边境之武器与飞机停止不来，亦所不惜。此正可以测俄助我抗战之诚意为如何也。

‘二、此事对内、对外与对敌国皆可发生有效而良好之反响也。’（元月十七日日记）

的确，立即有反响到来。

俄使出面质问

（民国三十年自由人注）

元月二十五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抱病来到蒋总统官邸，探问何以会发生新四军事件？

当时的一问一答是这样的：

“潘大使今日晋见，欲有所陈。贵国中央军队与新四军之冲突与斗争，苏联政府非常关怀，深恐由此引起内战，因而损及贵国抗战之力量。

“蒋委员长关于此次事件，本欲与贵大使一谈。此次，中央处理新四军，完全在整饬军纪之一点上，……绝非政治问题，更非党派问题。必须在军队能树立森严的纪律，维持统一之指挥，……否则，军不成军，国亦不国，何能抗战？何能革命？四年以来，贵国及各友邦对于我国始终援助，原期我国抗战胜利，民族解放，国家独立，革命成功。……惟一旦军纪废弛，命令无效，必无以抗战，更无以答副友邦援华抗战之盛意。

“潘大使闻此次新四军系被顾司令长官所部大军所包围。

“蒋委员长此与事实完全不符。新四军首先进攻邻近之友军。……

“潘大使意者：新四军为数不过六、七千人，何敢进攻邻近之大军？

“蒋委员长新四军之干纪抗命，已非一日，由来已久。余可保证：新四军之种种宣传，纯为谣言，绝不可信。贵大使如欲知其详，余当派贺主任详加说明。新四军违抗命令、伤害友军与妨碍抗战之事，自去年春季以来，先后在江北袭击友军，指不胜数，中央一再宽容，冀其终能觉悟。……

“潘大使请问委员长今后将如何把握大局？

“蒋委员长我保证大局绝不因此次事件而有任何变动。中国当继续抗战，直至最后之胜利为止。

“潘大使请问今后新四军在江北之部队，将如何处置？

“蒋委员长新四军已经解散，再无新四军问题可言。余已为贵大使言明，此决非政治或党派问题。例如第十八集团军之一部，如能遵照余两月前所发之命令，如期北调至冀察战区，则中央仍以国民革命军之一部待之，自当一视同仁。……总之，更无损及抗战力量之顾虑，此乃余所能自信者也。”

‘新四军案，余波未息，共党与苏俄皆对国际宣传甚烈，此应早日发表其罪状，粉碎其阴谋；俄使今正式质问，实为变相之压迫与恫吓，余以严词正色对之，彼乃技穷。’（元月二十五日日记）

共党充满敌意

对于新四军番号之被撤消，共产党中央于一九四一年元月十八日扬言：“这次事变，是亲日派阴谋家及反共顽固派有计划的举动。”并向国民政府提出下列等项要求：

“（一）严惩阴谋消灭新四军皖南部队的罪魁祸首。（二）释放所有被俘之新四军，保障叶军长等军政干部之生命安全。（三）抚恤新四军皖南部队死伤者及其家族。”

同时，共产党对于解散新四军的命令则更置之不理，并擅自发表陈毅代理新四军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也就是编成了未经国民政府承认的“私兵”。

极力作中伤宣传

新四军事件之后，共产党展开了“政治上的全面进攻”，极力作中伤国民政府的宣传。他们到处散播“新四军事件是政府军的挑衅”、“政府军勾通日军夹击共产党”等凭空捏造的谣言；共产党的“新华通讯社”更传布伪造的情报，诬指：“政府军和日军呼应，要攻击八路军和延安”。而在这些谣言的背后，则更隐藏着日军方面企图动摇中国一致抗日的阴谋。

日本的“北支那方面军”，依据其一九四○年三月所决定的“肃正计划”，加强了对共产党的对策。据该方面军在当时所颁发的秘密文书-“思想战指导要纲”的“对敌工作”项目中，便有“尽到宣传谋略等各种手段，对国共两党之磨擦相克加以煽动，使之激化，以破坏两者之合作，导致其抗日救国统一战线之崩坏；更藉适当的谋略，做点工作，期使国民党军进一步扑灭共军。”

民国三十年元月二十七日，蒋总统在国民政府扩大纪念周说明处罚新四军的理由如次：

‘这两周以来，敌人（日本）假借新四军案件造出许多离奇怪诞的谣言，恣意挑拨中伤，不仅企图动摇我们抗战的精神，而且妄冀迷惑国际间对我国抗战的视听，求逞其侵略中国的迷梦。……

‘即就我们此次处置新四军事件来说，无论中外人士大家都知道，这完全是我们整饬军纪的问题，性质很明白，问题很单纯，事情也很普通。凡违令乱纪的军人，在所必惩，至于称兵作乱，袭击友军，侵占防地，妨害抗战的军队，更必然的须解散。这是抗战治军的天经地义，除非像无法无纪的敌国（日本）少壮军人，才会把这件事看做一种特殊而不寻常的事件，故意来作夸大的恶意宣传。……’

在元月的反省日记中，蒋总统并留有这样的记述：

‘解决新四军案，撤销其番号，此为国民革命过程中之大事，其性质或甚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也。自觉决心坚强，不为外物所诱，不为谣诼所动。经此一举，威信树立，而内外形势，必更为好转矣！’（元月三十日日记）

周恩来密电称内战开始

但共产党的态度，则是充满着对于国民政府的敌意。二月四日，在重庆的周恩来密电各地共党组织：“目前情况，已是内战开始，绝无好转可能。”并指示：在军事上暂取守势，争取时间，扩充战力，以应付决定性破裂的时际到来。

二月十五日，毛泽东等人致电国民参政会，表示共产党中央对政府处置新四军事件严重抗议，并提出：“（一）制止挑衅。（二）取消一月十七日（撤销新四军番号）的命令。（三）惩罚事变的负责人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等十二项要求。

共党参政员拒不出席

同时，共产党的七个参政员更拒不出席自三月一日开始在重庆所举行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逞其政治搅乱工作。

蒋总统乃于三月四日约集国民党籍参政员训话，表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方针如次：

‘中共七参政员此次不出席会议，为其自暴自弃，自绝于参政会，自绝于中国国民，而于本党毫无损失。本党于国内政治、军事皆已立于主动地位，目前中央仍采取过去宽大态度，促其改过自新。’

继之，复于三月六日在参政会说明政府态度，其要旨如下：

‘……中国共产党同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不料在此对敌抗战作生死存亡斗争的时期，竟向我们国家及全国民意机关的国民参政会提出这样的条件，这岂不是他明明与我们本国政府和国民参政会立于敌对的地位。……

‘我们政府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有关的军队，希望他们和参政会一致拥护全体共守的抗战建国纲领，并望第十八集团军将领能彻底反省，要以国家民族为重，而打破党派观念，服从军令……使国家能早日获得自由平等。……’

在这一天的参政会中，对于自此之后共产党籍参政员之不出席会议一节，议决“不应为本会造成不良之先例”，加以责难，促其反省。

于是共产党的阴谋，乃被粉碎于全国国民的公意之前。

‘中共以不出席参政会为要挟手段，余以严正处之，并宣布其中真相，使国内外人士皆明了是非曲直之所在，乃能转危为安。’（三月八日反省录）

第十七章：美日战争

主题

ＡＢＣＤ包围网日本中苏俄诡计分析苏日条约美国积极援华蒋总统对美建议美日间的交涉松冈洋右的狂妄德军攻苏美英冻结日资产美英责难日侵略日准备对美战争东条组阁日派来栖赴美中国外交的胜利蒋夫人的助力日偷袭珍珠港对日德义宣战联合军事会议魏菲尔的短见中国列四强之一蒋总统访印度缅甸作战美机轰炸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英拒归还九龙蒋夫人访美增进中美合作

ＡＢＣＤ包围网

一九四一年-中日战争进入第五年。

‘敌军部发布小册，训诫其前线士兵，说明对华不可能以武力征服之道，是其已丧失自信心矣！’（蒋总统元月九日日记）

日本虽罄其国力侵略中国，但只不过勉强保持住“点”和“线”的占据，而到了这个阶段，已经是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中国大陆的广大空间，轻易地吞下了由日本所陆续开进来的大军，而且还有充分宽裕的余地。

‘敌首相近卫在其议会中发表演讲，对中倭战争引咎自责，略称：“中日战争现已进入第五年，尚无结束之象，所有一切责任，皆应由余（近卫）负之，自问此罪，应无可赦免，今决以全力解决现局以自赎”云。由此可知敌国之困难日增，与近卫内心之悲哀矣！’（元月二十八日日记）

日本走上南进途径

可是，日本军阀为谋解决现局所选择的方法，则是扩大侵略。因此之故，他们以武力攻夺到某一地区，就得为了维持该地而必须再攻夺其邻近地区；加以受到国际经济制裁，更苦于物资消耗之一路增多，是则为了确保资源供给，又被迫而有侵略新地区的必要。于是其侵略奢望乃因而像堆雪人一样地愈堆愈大。

至此，日本的“南进政策”，更愈来愈增加了速度，也愈来愈见明显，而终于推进到在这一年的十二月八日偷袭珍珠港，走上了美日战争的途径。

（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袭珍珠港）

先是，在上年的十一月，刚好发生了泰国和法属东印度之间的国境纠纷，而随着新年的到来趋于激化，泰国军队侵入高棉地区（当时法属东印度包括今天的越南、高棉、寮国）；而泰国一艘主力舰在海上被击沉，有升高向全面战争的趋势。

这个纠纷，对于日军来说，倒是一个好机会。业已派兵进驻了越南北部的日本军部，乃打算以调停纠纷为藉口，来加强其对于泰、越等中南半岛地区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影响力。盖如能控制中南半岛，则不仅止于法国，而且对英国（马来、新加坡）、荷兰（印尼）都能发生威胁作用，也更是向中国主要补给路线的云南省进行侵略的经路。

对于在日本的调停之背后所存在的危险性，越南与泰国当然有所察觉，故而一度婉拒。但日本则炫示将以武力介入纠纷，而非做一个不请自至的“调人”不可。

‘泰越将接受倭之调节而停战，并将于东京举行会谈，可知倭阴谋操纵两国之计已成，则敌南进之期亦必不在远矣！’（元月二十七日日记）

泰越停战交涉，自元月二十九日开始在停泊于西贡海面的日本军舰上进行；三十一日，签订了停战协定。

在这个期间的三十日，日本大本营与日本政府举行联席会议，决定了一个“对于法属东印度及泰国的施策要纲”。

其内容则是“藉调停之契机，加以威压，得视情况在法印行使武力，以确立日本对法印及泰国指导的地位。”这就是说要通过强迫的调停工作，硬把越南和泰国拉进他的“大东亚共荣圈”。

越南和法国就是这样地被拖上了日本所布置的舞台。接着便改在东京继续交涉，于三月十一日签约。

‘倭、泰、法越协定成立，东亚祸乱又增一层，惟于我国此时之利害，尚不甚大也。’（三月三十一日日记）

美英荷提高警觉

对于日本如此毫无顾忌的南进动向，美国、大英联邦（包括印度、澳洲、纽西兰在内）、荷兰等国也都为之提高了警觉。

美国总统罗斯福于元月十六日召集国务卿暨陆、海军部长三幕僚举行会议，商讨如果日德两国突袭美国时的对策。元月二十九日，在华盛顿举行美英两国幕僚会议，讨论到包括印度、澳洲、纽西兰、菲律宾在内的远东地区安全问题。

二月二十二日，英、荷、澳举行防卫远东协同作战计划会议于新加坡，以日本进攻新加坡、荷印（印尼）的可能性甚大，而商定协力防卫。这就是所谓“ＡＢＣＤ包围网”（Ａ美国、Ｂ英国、Ｃ中国、Ｄ荷兰）之形成。

‘英海军宣布封锁新加坡海港，美国亦宣布警戒太平洋上各战略要区，尤其于关岛设防，美国国会全场一致通过。——此为三年来余（蒋总统）所殷切期望者，而今已得实现；乃我国同胞十年来牺牲忍耐所获之最大代价，亦为余苦心焦虑所计划而得之成果也。

‘今我中华民族已开辟胜利之坦途，而敌人“东亚新秩序”之迷梦亦从此粉碎矣！此我抗战第一步之成功也。’（二月二十二日日记）

期美国作世界和平柱石

然而盱衡国际关系，美日如果发生战争，则将有让苏联坐收渔人之利的顾虑。

‘美倭战争如得以暂避，而不使第三国际之阴谋得逞，此虽于中国目前之战局不利；然为世界永久和平着想，则美倭之战决不能在倭俄之先也。

‘余始终不愿美国加入此次战争，盖期彼作确保世界和平之柱石，而为恢复世界和平之重心，此则又全视敌之能否迅速变更其侵略政策而定耳！’（二月二十二日日记）

日本中苏俄诡计

日本在亟谋强行南进之际，为了要保持北面和苏联的关系能够平安无事，乃尽力于对苏邦交的协议。故而相当期待于在一九四○年九月缔结的“日德义三国同盟”所产生的轴心国压力能在这一方面发生大的作用。

于是，日本乃于一九四一年元月，通过其驻苏大使建川美次向苏联提议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可是，对于日本因中日战争之消耗乃至疲敝的状态业已有所了解的苏联，则反而狮子大开口向日本提出过分的要求，因而谈不下去。

松冈洋右访苏

不过，日本却仍不死心，他在作成越南、泰国调停工作的第二天（三月十二日），便派遣外相松冈洋右前往苏、德、义三国访问。

‘松冈之目的，在加强轴心国之勾结，并期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协定。我应对德外交积极运用。’（三月九日日记）

三月二十三日，松冈抵达莫斯科，与史达林、莫洛托夫会谈，为准备正式交涉而作铺路工作。此时，松冈表示：“日本人虽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不相信共产主义，但从个人家庭传统看来，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是精神上的共产主义者。”以取悦于史达林；可是，史达林却并不理会他这种低声下气的外交态度。松冈遂即转赴德国。

‘俄倭订立协定，正在进行中，对于暴日终当有害无益也。’（三月二十九日日记）

自三月二十六日至四月五日，松冈在柏林和罗马，与德、义两国首脑再三会谈。

德煽动日本南进

德国总理希特勒和外长里宾特罗甫对于日苏交涉表示反对。他们并大言不惭地向松冈作煽动日本积极南进的说辞：“如果日本攻占新加坡，则世界大部分都在轴心三国的控制之下，美国将完全孤立。要是这样的话，则德国便会将其大部分军队集中于东线，假定苏联攻击日本，德国立即进攻苏联，相信只要几个月，就可让你看到他们屈服。”

实则，希特勒此时业已下令实行其准备进攻苏联的“巴巴罗刹”工作。为此，乃有必要使日苏关系停滞于不安定状态，俾造成苏联不能放松其在西伯利亚方面的防卫部署；并且，日本如果南进作战，则会使德国正面的敌人-英国也不得不分兵于亚洲方面，故而能导致情势发展于德国有利。

然而，松冈却绝没有想到德国已在作对苏战争的准备，他于四月七日再度到达莫斯科，要求苏联正式进行互不侵犯条约的交涉。

在交涉过程中，双方对于苏联领土北桦太岛的日本利权问题意见对立，停滞不前，松冈为之束手无策。

‘松冈由德经俄返国，归途滞留莫斯科，超过其预定之期，是倭俄必有特殊重要之交涉；但俄于此时，对松冈定有其作用，故留松冈多住数日，是其必有之手段，松冈又多受俄国一度玩弄而已。’（四月十二日日记）

史达林态度突然改变

在这个当口，史达林业已接到其“索尔治间谍团”报来“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情报；而美国也已经两度向之提出“希特勒有进攻苏联之危险性”的警告。

因此，史达林的态度乃突然改变。——盖为了对德国应战，自有必要赶快谋求西伯利亚的安定局面，故而即使要由苏联来低声下气转脸央求日本，也是在所不辞的。

“日苏中立条约”正就是如此急转直下地达成了协议，而且即于四月十三日在克里姆林宫签订。

这个条约的内容有：“（一）相互尊重领土的完整和不可侵犯性。（二）缔约国之一方面在成为第三国的军事对象时，他方的缔约国须守中立”等项，期限则定为五年。

“日苏中立条约”，因苏联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对日宣战而单方面地予以毁弃，并促成了日本早日投降。

所成问题的，是这个条约在附带发表的一项宣言中声明：“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们共和国（外蒙）、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东北）的领土完整与不可侵犯。”——这是日、苏两国又在拿中国主权作为互相交易的材料。

‘倭俄在莫斯科于十四日（下午二时）签订中立协定，闻其内容有互相承认外蒙与伪满领土完整之条文，此乃俄损人利己之一贯惯技，如果属实，则为俄国在国际信义上最大损失。’（四月十三日日记）

对于这个问题，国民政府立即于十四日由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加以严正驳斥：“中国政府和人民绝不能承认第三国之间损害中国领土与行政主权完整的任何协定。”

‘对俄倭协定我政府立即发表声明，宣布无效，以示我自立自强之决心，而不予俄国以丝毫可乘之隙。’（四月十四日日记）

在“日苏中立条约”成立之后，更演出了一幕丑陋的“余兴”。

‘俄倭协定签订后，松冈由俄起程时，史达林亲赴车站送行，而史且向松冈拥抱接吻——此实为苏俄自来所未有。但决非俄有意谄倭，其用心在离间德倭关系，倭愚而不知其个中诡计也。’（四月十九日日记）

分析苏日条约

四月十九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谒见蒋总统，就“日苏中立条约”作了如下的说明：

“在日苏中立条约中，没有涉及任何中国问题。苏联对中国的政策与态度始终一贯，毫无改变。”

潘友新是要把日苏两国以“外蒙”和“伪满”作交易之事说成“与中国没有关系”。

作为“假想敌”而相对立的日苏两国，却突然会拉起手来，对于世界情势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蒋总统的通告

四月二十四日，蒋总统向各地军政长官发出通告，分析“日苏中立条约”的利害得失，提醒大家注意。这个文件的要旨如次：

‘第一、此约之订立，其主动全在苏联，亦可谓为苏联对日计划之成功；其于敌寇，实有害无利，且适足以增加其失败之因素。

‘盖苏联订立此约之用意不外四点：

‘（一）为欲消灭敌国（日本）之海军，而策动其南进。

‘（二）为欲消耗敌国在我东北之整个陆军，不得不鼓励其南进，或转用于中国之战场。

‘（三）为预防德国攻击苏联，而解除苏联本身东顾（西伯利亚）之忧。

‘（四）其最深刻之用意，则在以此一举而动摇德义日三国同盟之基础，使德国认清日本之不惜背盟弃信，因而加深对日之疑忌。（注德国反对日苏条约）

‘第二、今后，敌人无论先以全力侵华，抑或发动南进，而太平洋联系之防势（ＡＢＣＤ包围网）已成，敌国陆海军实已处于包围之中而陷于被动之地位。

‘至就敌国在此约中实质上所得之利益言之，至多为其驻屯我东北陆军之一部分自此可有抽调之自由；然即使苏联之远东红军大部西调，但敌军为维持东北治安与防止朝鲜革命，仍不能不驻防相当军队，故预计其能抽调之最大数额，不能超过在六个师团以上。以此六个师团用于中国之战场，当然不能解决中国之战事；若以之用于南进，亦无济于事。

‘反之，因此次“苏日中立条约”之订立，已使英美对日备战益亟，敌视益深；是敌国为换取其六个师团抽调之自由而不惜在太平洋上造成最强大之敌势，其得不偿失，又不待言而自明。

‘第三、就我国在外交上及对敌政略上而论，苏日条约其最为遗憾者，当然为苏联与我敌国承认所谓“外蒙共和国”与“满洲国”领土完整、不侵犯性的共同声明，此乃我国始料所不及。但此事纯为目前问题，只要我能独立自强，战胜暴敌，则收回失土、恢复主权，势所必至。

‘今日远东之形势，英美之联防已成，太平洋上对日整个之警备至此实已完成。而且敌国陆军实力，已在我国战场消耗大半，而我中国在太平洋上所占军事地位之重要，更非昔比；此项“苏日中立条约”订定于今日，祇有增加我在太平洋上地位之重要，而绝无妨害于我国抗战之全局也。

‘第四、日本在东北所能抽调之六个师团，如实行移调，以其兵力进窥川省，其所需之消耗与时间，固将数倍于攻击武汉之时也；我陪都（重庆）可固若金汤。将见敌人全力犯川、方在与我鏖战之中，而太平洋之形势必已丕变，则各国皆乘隙以袭其后矣！

日必投机南进

‘第五、苏日条约订立之后。敌寇可能之动向，以余观之，约有三途：

‘（一）彼必投机南进。惟日本海军决不能与英美相敌，而其陆军则早已深陷于中日战争之泥淖，日见消耗；是则其海陆军即有全部覆灭之危机，而岛国命运自必归于整个之灭亡。

‘（二）待德国在欧得势而进攻苏联时，彼（日本）则对苏乘机夹击，是则“苏日中立条约”在改善日苏国交之根本关系上，可谓不能发生任何之作用。

‘（三）此外又一可能，即敌寇既不北进，亦不南进，而专用兵力以先对我中国，以达其全力解决“中国事变”之目的。然我国四年间之抗战，已牵制其陆军兵力四分之三，今即再加上其残余未用四分之一，而以我作战准备之充实，国际援助之日见增多，彼如倾国而来，亦明为行险而无可徼幸。……

‘综上五点，苏日条约对于我国抗战与其谓为有害，无宁谓其有益矣！盖苏联自有苏联一贯之政策，与其整个的打算；惟日寇已陷于最大之困境而犹不自觉耳！

‘吾人今日所尤应特别注意者，即美国自在远动设防以后之立场。若非达到其恢复国际正义与中国门户开放之目的，决不对日妥协，此又可以断言。……’

促成民主国家团结

对于日苏条约缔结之后的世界情势，掌握着其最大关键的是美国。而美国国务卿赫尔则已于四月十四日发表声明：“美国政策不因日苏中立协定而有任何变更”。正如蒋总统的预料——日苏两国之握手，却产生了促进自由民主各国团结的结果。

美国积极援华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刚发表炉边谈话表示“美国要做民主国家兵工厂”之后的一九四一年元月六日，便向议会提出“军火租借法案”。这是由于英国首相邱吉尔要求援助，而为了无偿供给英国以大量武器所制定的一相法案。不过此一法案之范围并非局限于英国，乃是敝开了对于和日德义侵略者战争的国家给予一切军需品、食品而无须索价的途径。对于这样的作法，罗斯福总统说明：“在邻居失火、火舌要延伸到我家来的时候，我在庭院草坪上浇水，却不把水管拿给邻居，还不应该被人家指为傻瓜吗？”

中国方面，此时刚好发生了新四军事件，共产党正传播着中伤国民政府的恶意宣传。共产党的这种中伤行为，自战时到战后，反覆纠缠喧嚣，不断地在拉着国民政府的后腿。

‘新四军问题，余波未平，美国因受共党蛊惑，援华政策，几乎动摇；子文（宋子文当时为中国政府代表正在美国）甚以此为虑，余乃以千虚难当一实，泰然处之。’（二月一日日记）

罗斯福派居里到重庆

二月七日，罗斯福所派遣的白宫行政助理居里到达重庆。居里来华的目的，在考察中国军事、经济情况，可以说是为“中美合作”预为调查。

居里在中国待了二十一天。其间蒋总统和他会议十次以上，向之详细说明——建设轰炸机基地、管理滇缅公路、接受美援武器等事项之在中国方面的计划与情势。

居里于三月十一日回到华盛顿，向罗斯福提出访华报告。正好在这一天，美国国会通过了“军火租借法案”，罗斯福立即予以签署。

继之，罗斯福更在三月十五日发表演说，表明：“亿万中国苦难人民，在抵抗割裂其国家的奋斗中，已表现出非常的意志。他们经由蒋委员长要求美国的援助，美国已经说：中国应当获得我们的援助。”

‘美国国会通过军火租借法案，罗斯福总统正式声明积极援华，此为抗战中一大事也。’（三月十五日日记）

‘美总统罗斯福十五日晚广播明言：“必援华获得最后胜利而后已”，此有助于我抗战军事者尚在其次；而对敌国精神之打击则更大。从此敌寇不惟其灭华之野心消失，而且其胜我之信心亦必粉碎无余。

‘溯自九一八以来，十年之国难，七七以来，经四年之苦战，乃始由美国关岛设防，继至军火租借法案之通过，而至最近罗斯福援华声明，不惟我恢复失土，已有把握；而太平洋上之和平，亦从此巩固。然要仍在我之能奋勉自强耳！’（三月三十一日日记）

宋子文接洽军事援助

于是，乃由派遣在华盛顿的中国代表宋子文和美国陆、海军部之间开始具体洽商军事援助事宜。三月三十一日，宋子文正式提出以下列三点为中心的要求事项：

“一、扩大由中国航空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毛邦初和美国退役军官陈纳德所提的志愿航空队计划；并替中国建立有一千架飞机的现代化空军，由美国提供技术与训练的援助。

“二、训练并装备中国陆军三十个师。

“三、帮助中国修整及建设滇缅路等对外交通补给路线。”

在这个要求的第一项中所提到的“志愿航空队”，事由在七七事变之前（一九三六年）聘请担任中国空军战术指导的陈纳德为中心所推动的计划。这个计划，是打算在美国政府的公式援助之外，募集美国志愿飞行员（退役军人）以加强中国空军，而由陈纳德和毛邦初到达美国接洽策动，得到海军部长诺克斯和陆军部长史汀生的善意表示，罗斯福与财政部长毛根韬等也给予支持，结果乃于一九四一年元月在美国购买到Ｐ４０战斗机一百架，但志愿飞行员的问题未得解决，因为就当时的美日关系看来，虽然说是业已退役的美国军人，但总还不便公然加入中国战场。

陈纳德组成飞虎队

但是，接受了宋子文所提要求的罗斯福，则于四月十五日秘密下达准许美国备役航空官兵参加志愿队的命令。不过为了尽可能表示是“民间事业”，故由美国方面的中央飞机制造公司出面，以陈纳德为该公司“坚理人”，志愿飞行员则作为该公司担任飞机制造、修理、管理任务的员工。

由于采取这样的办法，该项计划乃立即展开行动，趋向于实现。

其后，招募来的第一批人员，于七月十日由旧金山乘荷兰轮船前往新加坡。他们扮成学生、音乐家、农民等各种不同的身分，但还是被日本情报机关所侦悉，日本在广播中恐吓地说：“美国的空军志愿队已经启程前往中国作战，但这艘船永远到不了中国。”因此，美国海军乃派出两艘巡洋舰护送到夏威夷，再由荷兰军舰接任护航送达到新加坡。

这些人在缅甸仰光北方约二百七十公里的开道飞机场集合，于八月一日正式成立了美国空军志愿队。

（民国三十年自由人注）

该志愿队在经过严格训练的不久之后，便自十二月开始对日军采取作战行动。机翼上印有“青天白日”徽章；机体前部漆有像鲨渔那样尖锐的牙齿和眼睛。这一支空军被称为“飞虎队”，是“中美合作”的一个象征。

蒋总统对美建议

四月十六日，蒋总统召见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请其催促美国对于中国的军事援助早日实现；詹森立即向国务院报告：“中国是和我们并肩作战的朋友，应该受到和其他国家平等的待遇。”

四月二十六日，罗斯福总统电达重庆，略谓：“业已批准四千五百万美元的对华援助，包括有铁路、交通机材、卡车、汽车、兵工器材等类。至于飞机和其他项目正在研究中。”

五月六日，罗斯福宣布：“中国的防务，对于美国国防是很重要的。”并正式发表军火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两星期之后，依据该法案所供给的第一批物资便开始向中国运送。继之，复于五月二十五日又批准总额为四千五百万美元的对华军事援助。

此时，欧洲的情势益见紧迫。

三月间，屈服于德国压力之下的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都先后加入德义日三国同盟。南斯拉夫虽则在三天之后便发生政变而转采中立政策，但却因此受到德国的进攻，于四月投降，同时，希腊也为之降伏。

但另一方面，在非洲战线出动反攻的英军，则于四月初收复了阿比西尼亚（衣索匹亚）。美国对英援助也积极增加，大西洋上满载武器弹药的运输船队，舳舻千里，驶向英国。

此时，德苏之间正逐渐产生了新的危机。进入五月，德军集结于两国国境，苏联也戒备森严，而史达林之就任苏联总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的五月六日。

判断德苏必有战事

关于德苏间的危机，蒋总统于五月十二日致电美国总统行政助理居里，告以德苏开战之期日迫，促美国提告警觉如下：

‘最近得悉，六月中，如美与德关系仍能维持现状，不加恶化，则德决于一个半月内对俄发动战争。此息有便请转达贵总统参考。’

在这样的国际情势之中，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调任驻澳洲大使，于五月十三日谒见蒋总统辞行，蒋总统与其谈到中美合作乃是世界大同的基础；同时，并请其转达对美国之建议如下：

‘美国如能不参战，是为上策；否则，亦须待俄国参战后，始能达到世界人类共享民主自由正义和平之目的。对于德俄关系，更望美国能密切注意。’

五月十四日，蒋总统接到报告：被视为希特勒继承人的德国纳粹党（国社党）副总理赫斯，于十日驾驶梅塞希密特战斗机飞离德国，在英国跳伞降落。赫斯之往英国，是衔有希特勒的密令，想要对英国进行和平工作。这说明了希特勒的意图已经是放弃跨海进攻登陆英国，而打算和英国停战，另行向东面开辟对苏联的战线。

于是，美英两国的动向也显得有点匆忙。罗斯福总统预定在十四日发表演说（蒋总统接见詹森的翌日），突以身体不适的理由宣告延期；英国虽则本身已处于困难之中，但也声明积极援华。

‘（一）赫斯驾机飞英，其必影响于德国对英、对俄之政策。（二）美总统罗斯福对时局之讲演忽宣告展延致二星期以后发表，此或受余（蒋总统）转告德俄关系而有所考虑。果能转变，实则于世界全体人类百世之祸福也。’（五月十四日日记）

‘美国务卿赫尔于十四日接见苏俄驻美大使。此为一年半以来赫尔第一次接见俄使，其性质之重要，非比等闲，或亦余之建议所生之效也。

‘饯别美使詹森演词发表以后，英政府立即声明积极援华；对倭亦发生大影响。此种浩然正气，足以慑敌胆，而使其勿再存有威胁利诱之妄想也。’（五月十七日日记）

五月二十七日，罗斯福宣布：“美国已进入紧急状态”；同时，并发表第二次“炉边谈话”，重申保卫海上自由及应付侵略之决心，并强调对于中国英国之遏阻侵略，美国必须增加作战工具之供应。

‘美总统对我抵抗侵略所予世界之贡献，已有充分认识；而对我援助之表示，亦甚适宜也。’（五月二十八日日记）

‘美总统二十七日发表广播演讲，完全与余之意见相符，可知余对彼之建议已生效矣！’（五月二十九日日记）

美决放弃在华一切特权

（民国三十年自由人注）

六月一日，中美之间正式宣告同意“美国于战争结束之后，放弃在华一切特权。”这是由中国外交部长郭泰祺和美国国务卿赫尔所会商决定，于五月二十五日换文，使中国完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愿望迈进了一大步，实在是一个划时代的协议。

‘美国此种友好表示，实是令人感奋。’（六月一日日记）

六月二十二日，德国终于进军苏联。

‘果不出余之所料也！’（六月二十二日日记）

‘美总统罗斯福对余观察德苏必战之情报，表示钦佩，将益见尊重与信赖矣！’（六月二十八日日记）

美国所担任的“兵工厂”任务，已越发增大，于是在大西洋的美-英、苏和在太平洋的美-中援助路线，乃因之极其繁忙。

美日间的交涉

中美协力关系，有了长足的进展。

七月二十五日，在重庆举行中、美、英三国军事合作会议，协商确保滇缅路交通。八月二十六日，罗斯福决定派遣援华军事代表团前来中国。这个代表团，系担任由美国租借给中国武器的使用方法给予指导等任务，由马格鲁德为团长，于十月十日到达重庆。

当时，决定在九月间建筑由仰光运输物资进入云南的铁路线，其材料的百分之九十～～约为二百公里的路轨系由美国供给，运来仰光。惟此一铁路的建筑计划后来由于日本进攻缅甸而中断。

十月二十二日，有七点五米厘口径大炮四十八门及机关枪一万一千挺自美国装船，运往中国。在这一段期间，由滇缅路运送的援助物资，已自元月份的四百吨增加到十一月份的一万五千吨。

在一九四一年内，美国依据军火租借法案计约供给中国物资达二千五百八十二万美元，但实际就其对各国援助物资总额而言，则仅占其中的百分之一点七；至于美援中国之大量增加，则是在美日战争开始之后。

据美国资料：在美日开战之前，美国重视欧洲战局，大部分力量用于对英国的支援；嗣当德苏战起，再加上援助苏联；而对中国的援助则放在次要。故一直是虽经约定援助，但实际并未能如约将物资运往中国。

当时，以蒋总统代表身分在华盛顿接洽的宋子文曾于十月二十四日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一份备忘录，叙述中国的艰苦处境，并指出美国未能履行其约定说：“十四个月以来，未曾运到一架具有装备弹药而可以用之于战斗的飞机。”

另一方面，最后的美日交涉也在试图进行之中。

一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日本任命曾任外相的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为驻美大使。这是日本基于野村与罗斯福为旧识，因而寄望于由他来打开美日关系。

罗斯福表示对日戒心

野村吉三郎于一九四一年元月二十三日自日本首途赴任，经过火奴鲁鲁，二月十一日抵达华盛顿。十四日，罗斯福接受野村呈递国书之际，在以“旧友”态度对野村表示欢迎之同时，坦率表示对日本的戒心：

“现在美日两国，处于恶化状态。日本之南进，殆为既定国策。美国之援助英国，系本于美国独自之意志；至于日本既有三国同盟之约定，其行动就不会充分独立自由，而有受德义两国强制之虞。”

据说野村当时答称：“我彻底相信日美不应战争。”

美日关系，的确是阑入了难望恢复的途径。不过，其因素则非仅止于美日两国之间的问题，而恶化之源实在于日本之侵略中国，更且以称霸于亚洲为指标。是故，所谓美日交涉，必须首先解决的乃是中国问题；这也就是说，美日之间能否挽回到融和状态，则须端视日本之是否停止其对中国的侵略。

可是，野村的观念却并非如此。盖在他的策划中，毋宁说是希图通过日美交涉而将日本对中国之侵略导向有利的途径。

三月十四日，罗斯福与野村第二次晤谈，马上就提到了中国问题。野村坚称：“一切危机的责任，在于中国之抗日；希望美国不要积极援助中国。”这是日本要把自己侵略中国问题搁置不谈的一种谬论。于是，罗斯福乃反击他两句：“有数千年悠久文化的中国，日本是不可能加以统治的。”

此时，在野村交涉之外，另有民间关系的美日交涉也在进行之中。

美国方面的接头者，为天主教海外布道协会会长华尔西主教及该协会秘书长德劳特神父。

这两个人于一九四○年十一月来到日本，和曾任大藏省（财政部）官吏的日本产业组合（公会）理事井川忠雄接触，并曾和松冈洋右外相见面，探索交涉美日和平的端绪；近卫文麿首相对此一路线也寄予希望，乃派遣井川忠雄与陆军省军事课长岩畔豪雄前往美国，并由日本驻美大使馆参与策划，和德劳特神父继续协商。

提出所谓“日美谅解案”

结果，他们起草了一份“日美两国谅解案”（第一次试案），由德劳特于四月九日向赫尔国务卿及野吉三郎大使两方面提出。

这个谅解案，是以日本方面的要求为基础，在其第三项“两国政府对支那事变的态度”中，将侵略中国的意图明明白白地表示如左：

“美国总统承认下述条件，且在得到日本政府之保障以后，美国总统即依据此条件向国民政府劝告和平。

“一、中国独立。

“二、根据日中之间即应成立的协定，日本军队自中国领土撤退。

“三、中国领土不被兼并

“四、无赔偿。

“五、恢复门户开放方针。

“六、国民政府与南京汪政权合并。

“七、日本向中国的大量移民应加以自制。

“八、承认满洲国。

“当国民政府承诺美国总统劝告之时，日本政府应与新统一的中国政府或其构成分子开始直接和平交涉。

“日本政府在上述条件范围内，依据善邻友好、防共共同防卫及经济合作诸原则，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具体和平条件。

“如国民政府拒绝罗斯福总统的劝告，美国应不再援助中国。”

松冈洋右的狂妄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二日，对于由民间交涉路线所提出的“日美两国谅解案”，美国国务卿赫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述：

“在以后数天内，我和国务院内的远东事务专家们细心地审阅其内容。我们越研究越感到失望，那些建议，比我们想像其可能会提出的问题还更难有协调的余地；大多数的条款，都是一些狂热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们的要求。”

然而，虽则是如此内容的“谅解案”，但美国方面却还是为谋防止日本侵略行动之扩大，而想要无论如何都得继续交涉下去。

这个“谅解案”于四月十六日再度修正，删除了“美国停止援助中国”等部分内容，当天便提出于赫尔和野村的非正式会谈中。

当时，赫尔力言：“在美国政府立场，只有一个最高前提——就是日本放弃征服和侵略的政策，回到和平的原则上去。”并且提示四项原则：“（一）尊重每一个国家的领土主权。（二）不干涉他国内政。（三）包括商业机会均等的平等原则。（四）不得用和平以外的手段搅乱太平洋的现状。”

赫尔并表示：美国方面在对于条款可以修正、删除乃至可作新提议的前提之下，同意以这个“谅解案”为美日交涉的草案。

又据赫尔回忆——当时野村错会了“谅解案”一定已为美国所接受而喜形于色。因为野村英语能力较差，未能充分理解美国方面所提示的前提。

得到野村的报告，日本政府遂即为可能一举而能达到闪电妥协的主观推测所囿。盖此案是依循日本的要求，当然日本陆海军两方面都不会有异议。

只是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此时正为交涉“日苏中立条约”和加强“日德义三国同盟”而不顾野村吉三郎等人的反对已去德、义、苏三国访问中，所以日本政府要等到松冈归国再作最后决定，乃去电苏联催促松冈早日回来。

倒向德义敌视美国

松冈于四月二十二日返抵东京立川机场，对于在自己出国期间日美交涉有所进展情况深感不悦。他认为“日德义三国同盟”比对美关系重要，因此估量着要使太平洋上的不安定状态持续下去，以牵制美国参加欧战；他并且判断要是以三国同盟为后盾，美国将不致于对日本有强硬的行动出现。

于是，松冈乃在当天晚间日本政府和大本营联席会议提出日美“谅解案”时表现得非常激动，强调必须对德义两国守信义；同时指称：“我认为这个谅解案是美国的七分恶意、三分善意。请让我考虑两个星期。”遂即退席。

其后，松冈乃托辞感冒，闭居静冈县之御殿场，为的是一方面争取时间，一方面掌握为日本政府研拟新方案的主导权。

拖到五月三日，松冈才回东京，在联席会议中提出对“谅解案”大事修正的要求。但联席会议并未采纳松冈的意见，而松冈却训令野村向美国政府致松一份“日本由于三国同盟的友谊，不拟有损害德义的行动”之谈话纪录。

日本政府修正案之由野村面交赫尔，是在五月十一日，其内容为：（一）日本表明三国同盟乃防御性的合作，是为了防止现未加入欧战的国家参战；不过，日德义三国之中的任何一国如有被第三国攻击的情况，则采取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互相援助行动。一方面，美国也表明将来不得援助某一方面国家而攻击其他方面。（二）美国承认日本“近卫声明”以及和汪政权所签订的“条约”暨“日满华（汪）共同宣言”之原则，立即向国民政府劝告和平。（三）改善日美通商关系，确保必要物资之相互流通。（四）美国对于日本在西南太平洋需求资源之生产和取得，给予协助。这些条件，都只是对于日本有利的方面加以扩大。

在提出此一日本政府修正案的同时，松冈洋右并致电赫尔：“日本应允和美国会谈，是以美国不参战及对蒋介石劝告和平为前提。”而赫尔等美国首脑对于如此态度的松冈则毫不隐讳地表示出不相信的观感。

外交方针失去自主余地

松冈一方面拖延日美交涉，一方面将交涉经过通知为其同盟的德、义两国。

德、义两国当然表示反对。五月十七日，德国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日本与第三国缔结条约，是使三国同盟弱化，而且美国已为轴心国的敌国。”同时要求日本拒绝与美国交涉，并牵制美国使勿参加欧战。

接受德国抗议之后的松冈，乃向美国驻日大使格鲁表示：“如因美国援助英国而发生战事，日美也就会有战争；是则被责难为侵略国的该是美国。”因之使美国更加激愤。而此时松冈更命令野村向美国试探可否以“日苏中立条约”为蓝本签订“日美中立条约”，美国简直是毫未置理便断然予以拒绝。

‘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会谈（六月二日）之后，倭国外交与军事上之措施遂行慌乱，其必随德、义之政略与军略而作根本改变之计也。倭寇外交方针至此已失去自主之余地矣！

‘美国拒绝与倭缔结互不侵犯协定，是敌在外交上又一失败也。’（六月七日日记）

德军攻苏

在华盛顿所进行的美日交涉，关系到中国之处极为重大，故而其演变和趋向也颇为中国所注意。

美国对于中国这个立场当然有所理解，并且遇事也会将其交涉经过告诉中国，并征求意见。

五月二十三日，美国国务卿赫尔约见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就美国对美日交涉的见解有所说明。赫尔在指出：“欧洲战争虽越来越危险，但欧洲和远东乃是一整体问题”之后，并表明美日交涉没有达成任何一项协议；同时更保证：“关于美日和平的任何问题，在没有事先充分和中国方面商讨以前，不会作结论性的交涉。”后来，美国一直恪守这个诺言；而到了最后，中国的意见乃产生了使美国坚持不对日本妥协的效果。

五月三十日，赫尔向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提出美国的对案。在这个对案中，美国对于“美日谅解案”的内容更加以修正，将日方所要求的“德义日三国同盟之得以互相援助”、“承认满洲国”、“国民政府与汪政权合并”等项一概删除；并主张：“中日之和平，以日军撤退为前提。”在日本说来，其严厉程度，实则大大超过了意料之外。

这个美国对案（赫尔非正式提案），是以六月二十一日为发文日期，连同谴责日本外交政策的口头声明一并面交日方。

欧洲战局之突变，则是发生在第二天的六月二十二日。——集结于东部战线的德军，全面出动进攻苏联。

松冈洋右张皇失措

德苏战争的爆发，对于日本来说，也是一个超乎预料之外的情况。当时，正好是南京伪政权的汪兆铭在日本访问中，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是于陪同汪兆铭在东京“歌舞伎”（日本旧剧）剧场观剧时得闻消息，慌忙入宫奏报日皇，简直是过去平沼内阁当听到德苏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时为之不知所措的情形再度出现；盖此时距离松冈访问德国见过希特勒之后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德苏关系虽然已有恶化之说，但日本却万想不到与自己有轴心关系的德国和刚刚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的苏联竟会开起火来。

以“轴心外交”为指针的日本，面临了如此想像不到的情况，狼狈不堪，为之拿不定主意。

松冈洋右的主张是：依照三国同盟的互相援助条款和德国协力进攻苏联（北进）。为松冈后盾的德国，也积极劝诱日本攻击海参威。

但在军部方面，却以当此全世界注意力被德苏之战所吸引之际，应即乘隙采取南进政策的意见颇多；而近卫文麿首相则以德国不守信用为理由，打算废弃三国同盟。

南进北进相持不下

于是，在自六月二十六日开始举行的日本政府和大本营联席会议的第一天，就首先决定了侵略越南南部的“南进”方针-“有关南方施策之促进事项”。其内容是：“为设定和法属印度的军事结合关系，在法印南部驻屯必要军队；如法印当局不予同意，则以武力达成目的。”

可是，松冈等人的“北进论”也甚为强硬，很难作成决定。在差不多是接连日夜不断的联席会议中经过激烈争论之后，才在七月二日举行御前会议时决定了一个“随情势推移的帝国国策要纲”，原则上“首先南进，相继北进”。其要点如下：

“一、为促进蒋政府屈服，更进一步加强对南方各地区的压力；并因应情势变迁，适时对重庆行使交战权，并接收在支那方面有敌对性的租界。

“二、做好对英美作战的准备，首先依据‘对法属东印度施策要纲’及‘有关南方施策之促进事项’，达成对法印（越南）及泰国的各项方案，并从而加强向南方推进的态势。帝国为达成本项目的，即使对英美开战也在所不辞。

“三、秘密做好对苏联在武力方面的准备，自主应付；视德苏战争的变化，设其进展于帝国有利，则行使武力以消除北方问题，确保北边安定。……”

在“北进论”方面，是期望能够一举而攻破为日本多年“假想敌”的苏联，但却也不能不顾及同时有其弱点存在——就是必须投入比陷于中国泥沼战线的兵力还要多的大量军队。

而另一方面，“南进论”是有可以将东南亚资源攫夺到手的诱惑性；可是也不能忽略其对美国开战的危险性太大。

面临这些问题煞费抉择的日本，乃终于选上了既对南、又对北——也就是对全世界为敌的战略。

着手准备两面作战

于是，立即着手于两面作战的部署——在南进方面，为派军进驻越南而下令新编成第二十五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北进方面，藉“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名义，在东北伪满地区集聚七十万大部队及庞大武器，对苏联备战。

在国际方面，美国对于德军之进攻苏联也采取了行动——立即声明援助苏联，并派兵进驻冰岛。

至此，不辞和英美一战的日本与趋于强硬的美国之间，已经是进入了难望达成通过交涉解决问题的状态。

再说，在这个时候，却还有一个问题在摇憾着日本政府。这就是和六月二十一日的美国对案同时送达日本之美国国务卿赫尔的口头声明。

这个声明的内容有：“在日本政府的领导者之中，有倒向纳粹德国征服政策的人，只顾想到当美国卷入欧洲战争的时候，便和希特勒站在一条战线；像这样的领导者在公职的地位上如果一意继续采取如此态度，则将招致美日交涉的幻灭。”这样的措辞虽然没有指明其人，但实则是暗示对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之不能信任。

美英冻结日资产

被美国国务卿赫尔口头声明指斥不可信任的日本外相松冈洋右，认为那是世界外交史上未有前利之事，相当激怒。他对于与口头声明同时送达的美国对案，彻底加以抨击，并主张结束美日交涉。但首相近卫文麿则仍对交涉寄予希望，而在日本政府的联席会议上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支持松冈结束交涉的意见。松冈愤慨之至，乃擅自电令驻华盛顿大使野村吉三郎对美方的口头声明予以拒绝。美国方面，赫尔虽然在稍后已表示有可以撤回之意，但在此之前的七月十二日，松冈已曾于联席会议上对于由陆海军所共同研拟的促进日美交涉案拒绝审议。乃使近卫感到极难处置，终于在七月十六日晚间决心为排除松冈而提出内阁总辞职。

‘敌国昨日内阁总辞职，今日倭王仍命近卫重新组阁，是敌国已难于物色组阁之适当人选，即使对美、对俄作战，亦不得不仍以近卫继任首相为宜。

‘时至今日，倭寇已非单独解决中国问题即能达其独霸远东之目的。现英、美、苏在远东对倭包围之势已成，而中国苦战四年亦已脱离险境；然而以后我国内政外交之困难必倍于昔者，自当戒慎恐惧，以完成国家所赋予之使命。’（七月十七日日记）

第三次近卫内阁于七月十八日成立，外相则由前任商工大臣丰田贞次郎（海军大将）转任。

在近卫文麿的记述中留有：“奏荐丰田海军大将担任外相，此乃表示余对日美交涉务期成立之热忱。”

‘敌阁改组，外相松冈引咎去职，是敌国外交方针有转变之趋向。但其投机取巧阴谋欺诈之心决无变更之理也。’（七月十九日日记）

此时，日本陆海军统帅部对于其新内阁提出了下列三点要求事项，束缚内阁行动。

（一）依据七月二日御前会议中所决定的“帝国国策要纲”，对法属印度支那实行军事行动。

（二）促进南方、北方两面战备。

（三）在日美交涉方面不得违背三国同盟精神。

日军占领越南

关于越南方面，日本已于七月十四日片面通知法国维琪政府“无论是否同意，日军都得进驻越南南部。”二十三日，更迫使越南当局接受了进驻细则。并于二十八日派兵进驻。

日本这种暴行，是为整个太平洋地区招致战争危机。蒋总统即于七月二十六日指示外交部长郭泰祺发表政府声明如次：

“日本此项行动，乃对于越南征服之扩大，及其南进政策之推进。自今以往，越南全境实应视为日本之军事占领地区。此种发展，不仅继续威胁中国西南边境，抑且危及西太平洋其他诸国之权益与领土。

“中国政府必以全力尽其本责，厉行反抗侵略之国策，以促日本冒险行动之失败。中国政府与人民并深信其他有关各国亦必不致纵容日本扩大其侵略，而使整个太平洋局势益趋恶化，甚或陷于不可收拾之境地。”

美英荷印施经济制裁

美国总统罗斯福也终于下定了决心采取彻底制裁日本的行动。七月二十四日，罗斯福向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提出日军自越南撤退的劝告，并提议越南中立化。继之于翌日（二十五日）晚间，发表冻结日本在美资产；英、荷两国也跟着向美国看齐。而且英国、印度、缅甸、加拿大、纽西兰各国都宣告废弃对日通商条约。

‘倭寇悍然占据越南南部陆海空军根据地，帝国并声明赞助其举动，此乃表示轴心同盟密约已付诸实施矣。

‘美英两国封存倭之资金，英且废除英倭通商条约，此事之影响，政治重于经济，以后美英与倭妥协之公算更少矣；而倭则惟有追随德义之绝途而前进矣！’（七月二十六日日记）

‘英除封存倭之资金以外，并宣告废除英倭商约，荷、印与英各属地亦相继宣告废约，此乃出于倭意料之所不及也。故自二十七日以后，英美对倭经济压迫开始，而倭所谓北进攻俄与南进胁美之计划皆完全粉碎。

‘此若非由余告美以倭与德义订立秘密条约之阴谋，则美国不致下此决心；而若非余之诚信所孚，则罗斯福总统亦未必信余言之为真也。故欲期外交运用有效，余在平时以诚信为其基础。’（七月三十日日记）

美派麦克阿瑟指挥大军

在军事方面，美国也采取了措施～～七月二十六日，编组远东陆军，将菲律宾部队列入其远东军司令部指挥之下。

‘美国将菲律宾陆军十五万人正式编入于其统辖范围之内，并特派麦克阿瑟为平远东军总司令以指挥之，此可证美有逐渐加强远东防务之决心也。’（八月二日日记）

以美国为首的自由民主国家这些因应措施，是在日本强制进军越南南部之后不到一星期之间便连续出现；封锁日本的“ＡＢＣＤ包围网”，已臻于极强固的程度。

美英责难日侵略

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美国终于全面禁止对日本输出石油。

石油！是日本制命的资源。日本之南进，说来其根本原因就是在谋求荷属东印度（印尼）的石油；可是，荷印方面则因在七月底冻结日本资产，于是也就断绝了石油的供给。

完全失去了能源供应的日本，其所面临的情势，不仅是战争能不能持续的问题，而是连国家的生存也将值得耽心。

当时，日本海军辛苦忙碌存储下来的石油约为六百万吨，如在平时撙节使用，约可支应三年；但如在战争状态之下，则不够维持一年。至于陆军的存量则尤其贫乏，据估计如果再用九个月下去，则连战车与飞机都将无法发动。

‘美国禁运汽油赴日，至今方得实现。

‘敌国（日本）受英美之经济压迫，而其国内舆论并不激愤，其政府犹望有妥协之可能；然敌内心之烦躁与苦闷亦可推知矣！’（八月二日日记）

是故日本陆军乃主张对美英开战。他们估量着以德军在欧洲战线的得胜形势为支援，可操胜算。但海军以并无获胜的自信而希望继续对美交涉，而近卫文麿首相则也是有意选择交涉的途径。于是日本政府遂于八月五日以“不派兵进驻越南以外地区”的让步案训令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野村且于七日向罗斯福总统提出直接会谈的要求；然而由于受到反对进行交涉的日本陆军之所排拒，乃又决定日本的基本态度不变，坚持其要求美国让步与妥协的一贯立场。

“大西洋宪章”

另一方面，美英两国领袖罗斯福与邱吉尔则在加拿大纽芬兰岛的海洋上举行会谈，于八月十四日发表“英美共同宣言”。

英美两国在宣言中列举：“没有扩张领土的野心。对于领土之转移，反乎当地人民自由愿望者，不予赞同。尊重人民选择其本国政体之权利。在纳粹暴虐侵略被摧毁之后，希望建立和平状态，并提供全世界人民以无恐怖、无匮乏的保证”等八项主张。这个宣言，后来被称为“大西洋宪章”，为重建世界秩序的准则。

‘英美两领袖联合发表宣言，其对象为全世界的侵略国家，无形中对倭寇与德军已视作同恶相济之辈矣，实于远东形势之影响甚大，可断美国对倭往日妥协政策已根本改变矣。

‘敌国舆论对英美联合宣言之反应，似均抱强硬之敌对态度。此乃必然之势，倭亦决不因此而中止其侵略也。’（八月十六日日记）

和邱吉尔的海上会谈结束之后，罗斯福于八月十七日召见野村吉三郎，面交两件声明。

其一为：“日本如为军事支配邻近国家而再有任何措施，则美国将立即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这等于是“最后通牒”的一种警告。

其二为：“日本如果进而实行太平洋和平政策，则同意重新举行美日交涉。”显示出仍然留有美日交涉的余地。

‘美国于二十二日向倭提出抗议，不许其侵略泰国、荷印与马来亚，远东整个反倭形势已完成矣。

‘敌机迭于我后方各地狂炸，尤其轰炸江上运输，使我对前方接济困难。但我国幅员广大，彼虽到处轰炸，而仍难奏效也；况其飞机与汽油有限，决其不能持久！’（八月二十三日日记）

邱吉尔也于八月二十四日发表演说，激烈责难日本侵略中国和占领越南，并强调必须阻止日本侵入新加坡与菲律宾；接着更表示：“我们衷心希望美日交涉成功。但万一无望，当然我们便会毫不踌躇地站在美国的一边。”

‘英首相邱吉尔于昨日发表广播演说，誓必制止侵略狂焰，并对倭提出警告，是即此次罗邱海上会谈着重远东政策之表现。’（八月二十五日日记）

中国抗战的重要性

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作为对日本的抑制力方面，乃更增加了它的重要性。

‘美总统罗斯福于二十六日宣布派遣军事代表团来华之消息，此必（美日）谈判决裂之证也。

‘自本月十四日罗邱联合宣言发表以后，经二十二日罗斯福总统对倭提出说帖；再由二十四日邱吉尔首相对倭提出“非和则战”之警告，以促成美倭之交涉；现美国终于派遣军事代表团援华，至此乃可断言美倭交涉之失败。……’（八月二十七日日记）

与全世界为敌的日本，其国内意见之统一，也是相当地艰苦。

‘敌国内，近卫与丰田于二十七日分别晋见倭王；二十八日，其陆相东条、海相及川又先后入宫晋见倭王。

‘而其国内一般舆论对美亦相当激昂，其内阁内部又争辩不置，是倭寇今日对内、对外之形势皆非常紧张，有不能不作最后决定之势，近卫何能渡此难关也。’（八月二十九日日记）

日准备对美战争

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再次建议举行首脑会谈；同时提出“日本政府的态度及计划”，其内容有：“如果中日战争解决，远东和平确立，日军便自越南撤退。日军之进驻越南，并非欲以武力进入邻近地区的准备行动”等项。

罗斯福对于首脑会谈一时颇感兴趣，但因国务卿赫尔表示反对，乃经重行考虑，于九月三日约见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面交覆信，略以“为保证首脑会谈成功，有必要对于基本性的重要问题先作预备讨论。”同时，并口头说明：前此美方所提示的“赫尔四原则”，乃在预备讨论时必须意见一致之点，询问日本在根本上究竟有没有改变侵略政策的意思。

美日之间这样的交涉，是与中华民国有很深的关系的；其交涉经过，都陆续告诉了在华盛顿的中华民国驻美大使胡适。

九月四日，美国国务卿赫尔与胡适会晤，公式地说明：美国和日本进行试探性会谈，但并未能觅致可以进行谈判的共同基础。胡适则认为：“日本在若干时间内，可能放弃武力，觅求和平。”赫尔乃就美国方面的观察指出情况发展有下列四个可能性：日本崩溃。日本接受美国的基本原则。日本面临抉择的歧路，在若干保留下成立协议；并主张在某种情势下用武力对方他国。在目前，拒绝与美国成立任何协议。

在中国关于美日交涉的演变和趋势，有着各种不同的情报和揣测，颇为纷歧；其中多数认为美日之间的妥协是有其可能性的。

蒋总统认为美日绝无妥协

但蒋总统的观察则是没有妥协的可能。九月十日，蒋总统接见美国合众社记者，重新表明中国的抗战决心毫不动摇，并且指出美国对日本的禁运不应放松。

‘据各种情报，美倭似有妥协在即之势，中外人士对此均甚忧虑；惟余穷究此事所得之结论，美倭绝无妥协之可能。

‘余以为今日之美倭交涉，决无须十分顾虑者。以中国之抗战为主动、为独立者也，决非甲午年三国干涉与上次巴黎和会时为列强所出卖之可比也。而且我国抗战牺牲之大，由道义而言，实过于任何国家之上。故能操诸在我，而非英美各国所能强制者也。

‘其次，美国要求于倭者，第一、退出三国同盟。第二、退出越南。第三、退出中国。

‘倭对以上三个退出之要求，其中任何一个皆不可能允诺也。

‘然而，美国对第二个退出之要求已用正式书面提出，美国对此决不可能让步；至对于第一个要求倭退出三国同盟，实为美国目前对倭政策惟一之基本立场，美国亦焉能放松而随便与倭妥协？

‘故余可以断定——美倭之谈判绝无结果也。最多乃为彼此间虚与委蛇、拖延若干时日而已。

‘然而美国万一对倭妥协，而以中国问题作为让步，以为倭退出三国同盟的交换条件时，则我国虽在国际形势上至为不利、而于精神上之打击尤大，自无疑义；但我国仍惟继续抗战，以待国际局势之演变，与英美被倭进攻时间之到来。……’（九月十二日日记）

果然，日本在九月六日的御前会议中决定了“帝国国策遂行要领”，认定：“外交交涉虽继续进行，但以十月下旬为目标做好对美战争的准备。”

日力量薄弱信心动摇

置身于ＡＢＣＤ包围网中的日本，其所持有的物资，是一天一天地在消耗之中，是故美日交涉如果拖延下去，则那一点物资将坐吃山空，而会陷于活动不得，进退维谷的状态。

‘从武器物资方面来讲，敌人除掉海军还未曾消耗、保持相当实力之外，其他如飞机、汽油以及各种武器等已经一天一天的消耗。即如他现在空军轰炸，每投一个炸弹，就无异于消耗了他自己一分的生命一样，决不能再和从前那样随便乱投了。他现在真是到了“一滴汽油一滴血，一片钢铁一片肉”的时候了！……

‘大家看到他现在用的是杰克机枪，就可以知道他国内钢铁的缺乏，许多武器都无法自制。这就是在武器方面，他已经被我们逐渐的消耗了。

‘至于讲到他的士气，自从武汉会战之后，也是逐渐的低落；到了现在，无论从教育训练与技术体格那一方面说，都是远不如前——不仅质的方面，比从前差；而且量的方面，他现在也已经使用到了最大的限度。……

‘他最近每次取攻势来进犯我们，最多不过十天或两周的战斗力，在此期间，如攻不下我们的据点阵地，他固然要退却；就是攻下了我们的据点，他也没有确实固守的力量。……

‘他现在不仅无力扩张战区，而且也不敢再存消灭我们野战军的妄想，由此可见他力量的薄弱与信心的动摇了。’（注）

注：蒋总统-“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二）”（一九四一十）

东条组阁

（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日军侵略东北。本节属于民国三十年期间自由人注）

九月十八日，是日本武力侵略东北的第十周年。

‘……临到今天这样沉痛的国耻纪念日，我愿我们东北同胞与全国军民再一致三思：自“九一八”以来，这十年中间，我们动心忍性，恶战苦斗的经过是怎样？从“七七”至今，四年抗战，我全国同胞-地区无分前方与后方，民众亦不分男女和老幼-每日所流的鲜血，每人所洒的热泪，一点一滴，实已积成和如江如海的民族怒潮，要洗净太平洋上侵略的寇氛，要澄清一切障害东亚与世界永久和平的厉气。……

‘我们可以明白告诉我们的友邦，亦可以明白警告我们的敌人，我们流血的目的-自始至终，就是要保障我们中华民族的独立生存和领土主权与行政的完整；亦就是誓万死、排万难，来洗雪“九一八”以来的仇恨和耻辱，使我们东北和一切沦陷区域都脱离敌人的蹂躏与劫持，才算达成了我们抗战的目的。否则，如在中国境内还残留着敌军之一兵一卒，我们的抗战，就一日不容停止。……’

如上所摘录蒋总统在这一天发表的“告全国军民同胞书”，是对友邦-美国、和敌国-日本表明了中国人的决心。

第二次长沙大捷

可是，日本却仍然继续对中国采取恫吓的姿态～～九月下旬，日军再度出动，进犯长沙；但中国军却对之展开包围，加以反击，造成歼灭日军四万一千五百人的大胜战果，此即“第二次长沙会战”。

对于美国，日本还是打算出之以强硬的态度。

九月二十五日，日本外相丰田贞次郎向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提出包括有所谓“日中和平基础条件”的“日美谅解案”之日方最后提案。其内容有：“为防止共产主义对于日中两国安全上之威胁和其他扰乱秩序运动以及维持治安，得在内蒙及华北之一定地区及必要之期间留驻日本军队；又在依据以前约定和惯例的地点（海南岛、厦门）得停驻日本舰艇及军队”-这简直是公然宣称继续将其军队留在中国不撤；此外，还有“承认满洲国”、“重庆和南京合并”等条件，只是把日本一向的主张照旧重提。要求美国为之作中日和平的桥梁。

美拒绝日最后提案

对于这个“最后提案”，美国国务卿赫尔断然予以拒绝。他于十月二日约见在华盛顿的日本大使野村吉三郎，告以不可能靠一时性的弥缝掩饰来维持太平洋的和平；并且在重行强调“赫尔四原则”之后，表示强烈反对日本继续在中国驻兵。其结论则为：为期实现日方所要求的罗斯福、近卫会谈，则希望在有关这一些根本问题的讨论方面要能有所进展。盖已明白表示出：“日本的态度如不能改变，则拒绝首脑会谈”之意。

又在这一次告知日方之先，赫尔曾于十月一日约见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告知：美日首脑会议之实现，将不会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

日本首相近卫文麿，虽则仍然在探求继续进行美日交涉的途径，可是，陆相东条英机等人却强硬主张：即使拚上对美开战，也要拒绝自中国全面撤兵。于是，进退维谷的近卫，终于只得在十月十六日扔掉了他的内阁；而继任阁揆者，则是原任陆相的东条英机。

军人组阁势必扩大侵略

‘敌阁改组，近卫引去，东条继任。是敌国崩溃之期更加速一步。’（十月十八日日记）

‘东条英机已奉命出而组阁。这件事，不仅对于中日战争有很密切的关系，就是对于整个世界局势，亦将发生很大的影响。

‘我们四年多抗战以来，有一个最大的希望，可以说：就是希望日本有一个军人内阁出现，使他们一般文治派组阁不成，而直接由军人出来担当国政。如此，他们势必扩大侵略，从单纯侵华的战争，进一步冒险侵犯国际，来参加世界战争。这就达到了我们抗战政略最重要的目的，我们就可以联合世界反侵略的各友邦，共同一致制裁日本，很快的就可以击溃日本，来消灭远东侵略的罪魁祸首！……

‘新任外相东乡茂德，原是日本前一届驻苏大使。苏联朝野对他的批评，认为他是日本一个优秀的外交官，为现任大使建川美次郎所不及的。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东乡出任外相以后，东条内阁不一定就要对苏联作战。……必采用外交攻势，如能达到不战而屈的目的，那他就不必北进攻俄。

‘对南太平洋问题，他也显然要想用和平方式与美国外交谈判，以求获得南洋经济权益，如此也更可以全力实行大陆政策来侵略我国。

‘但是，我们可以深信——美国是一个保持正义的民主国家，决不致违反其外交基本原则和他对远东一贯的政策，故他亦决不能与倭寇侵略者来妥协，这是可以断言的。

‘日本新阁的政策——第一、就是处心积虑要想解决中国问题。第二、就是与轴心国家更密切的联合，要想解决世界问题。但就整个世界局势来判断，他这样阴谋野心，绝对不能得逞；他们所企图建立的“东亚新秩序”与“世界新秩序”，亦终成为泡影。如他在陆上海上能与德国打通一路，使欧亚两打侵略势力联系起来，那他就可以与轴心伙伴在经济上交换物质，在军事上东西策应，那他就毫无忌惮的来参加世界战争了。这样，今后世界的局势，就更形尖锐化，更要急转直下了。’（注）

注：蒋总统-“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二）”（一九四一.十）

日派来栖赴美

日本政府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五日的御前会议中，确定了对美开战的决心。

在这一天所决定的“帝国国策进行要纲”，是以十二月初为对美、英、荷三国的开战时期。并将对美交涉的时限定在十二月一日午前零时。

至于对美交涉案，则重新决定为“甲”、“乙”两案，这是名副其实的“最后案”。在御前会议的前一天（四日），便已电知驻华盛顿的野村吉三郎大使，并给予“最后训令”说：“在不能达成协议时，则只有决裂。”

日本方面这个“甲”、“乙”两案，都是将九月二十五日的“最后案”多少作了一点让步，计划先以“甲案”试探反应，如果不成，则在最坏的情况之下再拿出“乙案”来，以谋求一时性的妥协。

在“甲案”中，日本的主要让步之点有下列各项：

一、通商问题＝将过去“日中通商，应以彼此之间有其特殊的密切关系为原则”的主张，改为：“如果全世界适用通商无差别之原则，则日本承认在日中之间也适用此一原则。”

二、三国同盟问题＝更加表明没有极端扩大自卫权范围的意图。

三、自中国撤兵问题＝害怕成立以后，得于华北与蒙疆之一定区域和海南岛在“必要期间”驻屯军队；其余日军则于两年内撤退。所谓必要期间，乃予人以并非“无限制”的印象，而大致是以二十五年为目标。

四、自越南撤兵问题＝在日中战争解决或远东和平确立之后，立即撤出。

五、赫尔四原则问题＝极力避免将其列入正式协定事项之中。

至于“乙案”，则是只提出使美日关系一举而跻于险恶状态的直接原因之越南问题，希望姑且成立协定，以解除危机。其内容为：“（一）日美两国确实约定——不向法属越南以外的东南亚及南太平洋地区伸展武力。（二）日美两国互相协助在荷属东印度获得必需的物资。（三）日美两国恢复到冻结资产以前的通商关系，美国供给日本以石油。（四）对于日中两国和平之努力美国不得有给予妨碍的行动。”可见“乙案”是要将美日之间原则上的最大争点-“中日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以谋收拾危机的一个提议。

日准备对美英荷作战

然而，日本方面实则就是以御前会议的十一月五日为分界，其开战准备，便进入了“读秒”的阶段。

当天，日本大本营下令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准备对美、英、荷三国作战。又在翌日（六日），下令南方日军作攻取重要地区的准备。

十一月七日，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向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甲案”；继之，十日谒见罗斯福总统，进行最后交涉。

同时，日本政府为支援野村对美交涉，更派老练外交官来栖三郎为特使前往美国。来栖于十六日晚间抵达华盛顿。

‘敌派其前驻德大使了栖三郎乘机赴美，其必另提妥协条件。然其对侵略中国之野心如不放弃，则美必不能容忽。以其如统制中国，即独霸太平洋，无异驱逐美国于太平洋之外；而且今日美在菲岛防务已固，更无退让之必要。倭之愚，实不可及也。

‘自本周英美情报与其对倭态度观之，可以断定英已有制倭之决心，而且其时必不出于下月。英美对倭不久当共同有明朗之表示，只要我军能在滇支持到下月中旬，则抗战最后目的当可实现矣！

‘倭之商船“气比丸”与“白里丸”接连被俄之漂雷所撞没（十一月五日），然倭对俄之态度并未作强硬之表示。——是其一则对美有所顾忌，一则对俄之战争尚未敢发动之故也。’（十一月八日日记）

美国方面，对于日方的提案（甲案）完全不予理睬。盖以日军之留驻中国不走，根本是不能考虑的；又关于三国同盟问题，美国也以强硬态度表示：美日之间将要缔结的协定，其实是和三国同盟不能两立的。

看到美国如此坚持原则的野村和来栖，于是乃判断——即使提出“乙案”，也不会有希望；遂即匆遽改提比“乙案”更有妥协性的意见，就是首先使日军恢复进驻越南南部以前的状态，并以自越南南部撤军为交换条件，要求美国解除冻结日本资产命令，以及重新开放对日本输出一定数量的石油。然后，才于二十日再将“乙案”提出。

做到这样，在日本方面已经是最大限度的让步。

罗斯福与赫尔慎重地研究“乙案”，认为特别有问题的是第四项。这一项等于是在要求美国停止对中国的援助。美国如予接受，则是对日本之侵略中国给予承认，也就是出卖了中国，并进而让日本控制太平洋，更尤其关联到招致对美国安全的威胁。

美倾向暂时妥协

不过，在国务院方面，为了要争取时间俾作和日本构衅的准备，则不妨对“乙案”作有期限的接受或和日本缔结临时协定的意见颇为不少。盖美国正极度忙于援助欧洲战线而兼顾不及也。

原已有决心对日本案予以拒绝或不予理会的罗斯福，也受了上述一些意见的影响，而有提议作三个月乃至六个月临时协定的倾向。

于是在华盛顿方面，美日已经达成妥协的观测乃盛传一时。

假如这种看法果成事实，在日本来说，当然是正中下怀。

因为苏联方面已于十月二十四日照会中国停止给予援助；当此之际，美国如果和日本妥协，迟缓对中国援助而有使中国孤立之举，则不能不说是造成整个自由阵营的危机。

中国外交的胜利

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接到美国国务卿赫尔通知有紧急商谈，乃应邀前往会晤。此时，最初听到赫尔谈起美国有意和日本签订临时协定。

赫尔所出示的协定草案，其内容有下列等项：（一）日本撤退在越南南部的驻军，并将越南北部驻军减少到七月二十六日进驻越南南部之前的员额～二万五千人。（二）有限度的恢复美日通商。（三）中日间任何问题之解决应基于和平、法律、秩序、公正的原则。

此时，美国已经能够译破日本外交电报的密码，充分了解日本有对美国开战的决心；不过美国之所以要和日本缔结临时协定，乃是为了至少争取三个月的时间，俾做好作战准备。

对于美国由过去的态度转变到如此超乎想像的程度而感到困惑的胡适，乃指出：如果让日军在北越留驻二万五千人，则滇缅公路将有被攻占之虞；同时并逼紧一句：“在临时协定的三个月期间内，会约束日本不攻击中国吗？”赫尔则含糊其辞地答称：“这是在将来讨论长期协定时再作决定的问题。”

这个草案，并经赫尔在当天同时告知英国大使哈里法克斯、荷兰公使劳顿、澳洲公使凯西三人；除胡适之外，他们都没有表示反对。

面对如此棘手的动态，胡适在当天立即急电重庆报告如次：

“美国邀商者为：倭撤退在越南驻军之大部，保证不南进、不攻滇，而由美国放松经济封锁事。其对中国撤兵问题，毫未提及。”

向美英表示意见

于是，蒋总统便立刻电复胡适，指示其阻止美国妥协，电文如下：

‘此次美日谈话，如果在中国侵略之日军撤退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以前，而美国对日经济封锁政策无论有任何一点之放松或改变，则中国抗战必立见崩溃。以后即使美国对华有任何之援助，皆属虚妄，中国亦不能再望及友邦之援助，从此国际信义与人类道义皆不可复问矣。请以此意代告赫尔国务卿，切不可对经济封锁有丝毫之放松；中（蒋总统）亦万不信美国政府至今对日尚有如此之想像也。’

同时，并电尚在美国的宋子文代表嘱向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诺克斯转达：

‘任何放松对日经济压迫的措施，都将会严重打击中国军队的士气。’

又对英国首相邱吉尔也发出电报，要求其对美国拟和日本签订临时草案一事严正反对。

二十四日，赫尔再度约见胡适等四国大使，出示临时协定草案的美方定稿。胡适反对容许日本在越南北部驻兵五千人以上，但赫尔则转述参谋总长马歇尔的意见为：“二万五千名日军并不足以构成威胁。”并且说明：“美国是不会容许有一名日军留在越南的，但为争取时间而不得不如此。”不过又补充一句：“在明了各有关国家的意见之前，美国不会将这个草案送给日方。”

除胡适之外，其他三国大使对于这个临时协定表示大致满意。当天，胡适急电重庆报告：“情势紧迫，难以遏阻。”

此际，中国方面对于美日交涉，是抱有危机感最严重的时刻。

邱吉尔致电罗斯福

但在国际方面，首先是英国有了反应——邱吉尔很快地便致电罗斯福，反对临时协定。他说：“中国如果崩溃，将大大增加英美共同的危机。”于是，赫尔也终于因加上邱吉尔的强烈意见而改变了念头，他和国务院的幕僚们在重作商讨之后，决心放弃成立临时协定的打算。

被称为“赫尔备忘录”-也就是美方提出以九大原则和十项要点为内容的“和平方案”之面交野村吉三郎和来栖三郎，乃是在二十六日的夜晚。

“赫尔备忘录”首先举出在政治方面的原则四点——（一）一切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不可侵犯。（二）不干涉他国内政。（三）通商机会与待遇平等。（四）用和平方法解决纷争。

又在通商方面原则五点——（一）无差别待遇。（二）废止国家主义。（三）无差别的获得原料物资。（四）在国际商品协定之运用上，应充分保护消费国家及民众利益。（五）树立国际金融机构及协定。

接在后面，又提议美日两国政府应采取之十项要点。其中第三、四、五、九各项关系到中国问题及日德义三国同盟问题的内容如下：

（三）日本撤退在中国及越南的陆海空之军队与警察。

（四）美日两国，除对以重庆为临时首都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以外，不用军事的、政治的及经济的力量支持在中国之任何政权。

（五）美日两国放弃在中国的一切治外法权，包括租界及居留地内有关权益与一九○一年义和团协定（辛丑议订书）的所有权利，并设法得到英国也同样地放弃上述权利。

（九）美日两国同意：任何一方与第三国缔结之协定，对于确立太平洋之和平方面不得作有所抵触的解释。

日对美交涉失败

这几项内容，是意味着要日本的侵略军队无条件撤退和否定汪伪政权，并恢复中国完全平等的国际地位，

以及使三国同盟在实质上空洞化；而且

不仅在于处置七七事变、九一八事变的问题，乃是追溯到中华民国建国以前列强侵略时代所有问题要作根本的、理想的解决。

是则在以侵略亚洲为目标的日本而言，此一赫尔备忘录毕竟是为其所不能承诺的。

日本终于在美日交涉上败下阵来。这也就是中国在外交上的胜利。

翌日～二十七日上午，赫尔在电话中对陆军部长史汀生这样地说：

“局面已经转移到你们陆海军的手里了！”

蒋夫人的助力

十一月二十七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见了日本大使野村吉三郎和特使来栖三郎。

此时野村表明：日本对于美国案（赫尔备忘录）感到失望。罗斯福这样地答复他说：

“在赫尔国务卿和贵大使的会谈中，未曾听到贵国领导者有任何和平的表示，使交涉的进行非常困难；美日两方面的根本方针如果不能一致，虽则有一时性的解决，但其结果还是不会有什么意义的。”

罗斯福的意思，就是在明白表示：日本政府要是不改变他的态度，则外交上的僵局是没有途径可以打开的。

‘倭派专使来栖三郎赴美交涉，彼仍抄袭甲午之战迁就列强、唯独胁迫中国之故智，以售其狡计。

‘果尔，美国务院几乎为其所算，且其势已成百分之九十八，只差其妥协条件尚未提交来栖而已。

‘幸赖上帝眷佑，得运用全神，卒能在最后五分钟当千钧一发之际，转败为胜。内助之力，实非甚少也。’（十一月三十日日记）

曾经在美国留学、而且颇多知友的蒋夫人，尽到凡有可能的各种途径，对于美国的政、学、财经界人士做了很多互相了解的工作。

两度对美国广播

十一月十日，蒋夫人通过无线电广播对美国呼吁：“……我觉得美国这一个国家，决不会因势乘便，以作便利自己的打算的；美国决不像法西斯国家那样认为牺牲弱小是正当的行为。我们中国为了正义与人道，流血斗争，迄今已四年有半了。因此，我相信我中美两国的友谊是建基于一致的理想上的。……”这是在忠告美国——不要轻率地倾向于妥协方面。

十二月四日，再度对美国广播，强调：中国是拚上了民族生存和人类自由而站在民主国家的最前线，她说：“……反侵略的各国、各民族，为了共同的目标，分担着责任，寻求着和平与自由的鹄的。”——以唤起美国的舆论。

日舰队悄悄出动

另一方面，日本业已预料到了美日交涉之会归于决裂。

当赫尔备忘录提交野村和来栖的十一月二十六日，在担任偷袭珍珠港任务的南云忠一（中将）指挥之下的联合舰队机动部队，便已经自集结之地-南千岛群岛的择捉岛之单冠港悄悄出发。

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日本政府和大本营的联席会议中，认定赫尔备忘录就是“最后通牒”。于是，黩武好战的日本军部乃即利用之为跃向对美国开战的跳板，藉以压抑日本国内对于开战的慎重论。

十一月三十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在“日汪（伪政权）条约一周年纪念”中致词，指英美为“敌性国家”，声称：“必须断然加以排击。”

这个发言，给予美国刺激甚大。正在休假中的罗斯福为之提前返回白宫，而来栖三郎且受到了美国新闻记者的群相责难。

‘倭使来七等在美答复记者之谈话，乃为其首相东条英机于上（十一）月二十九日所发表之演说攻讦英美“在东方之剥削势非驱逐不可”之语竭力辩解，言词卑下，可怜极矣！’（十二月四日日记）

十二月一日，日本御前会议终于对于“开战”作了最后决定，开战日期定于八日。

山本五十六密码电令

十二月二日下午五十三十分，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对正在开向夏威夷的机动部队发出电令：“登新高山、十二○八”，这就是说“按照预定计划于十二月八日发动攻击”的密码隐语电报。所谓“新高山”，乃是台湾的最高峰——玉山（海拔三九九七公尺）在日据时代的名称。

同时，日本决定进攻泰国的日期也是八日。又为准备攻击马来亚与菲律宾，所以有大批运输船队驶向越南南部。

‘美罗斯福总统已要求倭政府解释在越南集中兵力之理由，以及向其所提之方案如何迄今尚未作答？最后并询其将来之目的究竟如何？

‘惟设如美国当日提出暂时过渡办法，则其今日之形势，必已逆转矣！罗斯福总统对此若有回顾，当知吾之不惟不误，而且亦足以代其挽救彼国之危机也。’（十二月三日日记）

由于日本联合舰队的行动极其秘密，所以但凭日本在表面上的动态观察，乃预料其“开战地点”当在东南亚之一角。

‘倭答复罗斯福总统对其增兵越南之质询覆牒，乃藉口为我国在滇越边境增兵之故，是其遁词搪塞之所为，美必不以此答复为满足也。’（十二月六日日记）

六日，罗斯福致电日皇，要求其撤退在越南的日本部队。——这是对日本最后的忠告。

另一方面，英国于一日在新加坡发布戒严令，二日，派“威尔斯亲王号”、“却敌号”两艘战舰及其他舰艇到达新加坡；当天，邱吉尔在下院演说，发出警告：“战事正要波及到远东方面。”

‘英主力舰威尔斯亲王号及其他等舰艇多艘驶抵新加坡，此乃予倭以最大之威胁。’（十二月四日日记）

十二月六日，蒋总统通过美籍政治顾问拉铁摩尔将中国方面的决心转达罗斯福如下：

‘中国决不能放弃东北。否则，更引起日、俄、英在中国之利害冲突与斗争，是使远东与世界之战争循环不已。如欲求太平洋上以后长期之和平，惟有辅助中国独立，而不被他国侵略之一途。’

日偷袭珍珠港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午前四时许（中国时间），在重庆郊外黄山乡居中的蒋总统，接到紧急电话：“日本海军机动部队的舰载飞机突然偷袭夏威夷珍珠港，停在港内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受到严重损害。”

这是来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对美日开战的最初报告。

日本之对美国开战，固然已在预料之中，不过对于珍珠港的攻击却是出其不意的偷袭行动。

在此之前，美国总统罗斯福曾于六日下午九时（日本时间则为七日上午十一时）经由美国驻日大使格鲁转电日本天皇，告知热望美日继续谈判。可是，这个电报却被东京的日本军部延搁到八日午前二时半才送达天皇，而此时已经是在日本的海军飞机一齐自航空母舰起飞出击的一个小时之后。

赫尔国务卿的愤慨

另一方面，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虽将停止交涉通知送达罗斯福，但也是在发动攻击珍珠港之后的五十五分钟之后。而且，这份通知既非宣战布告，也非最后通牒；美国国务卿赫尔大为愤怒，扬声责骂：“我从事公务五十年来，还没有看到过像这样充满了野蛮、虚伪、歪曲的文件。”

日本是照例悍不履行国际法所规定的手续，便发动了侵略性的攻击。

当时，日本外务省指示驻美大使馆在开始攻击珍珠港的三十分钟之前将停止两国交涉的通知送达美国政府（按预定在日本时间八日午前三时半发动攻击，但实际为三时十九分开始）；而大使馆则因翻译密电及打字颇费工夫，未能赶得上在指定时间转达美方。

其实，美国先已截获日方密电，并经译解出来，所以在日方指定时间的三小时之前其内容已为罗斯福总统所知，而且在日军开始攻击的八十分钟之前电令驻夏威夷陆海军司令官严防偷袭，但此一电报发生迟误，是在遭受攻击之后才到达夏威夷。

日本终于对美国开战。同时，中国长期孤独的对日抗战也就面临了新的局面。盖自这一天开始，这个世界已经很明显地二分为日、德、义侵略国家集团和自由国家集团；而中国乃和世界盟邦并力进行着反侵略的战争。

蒋总统在接到电话之后，立即下山。回到重庆，又接到了香港、菲律宾、马来半岛已受到日本飞机空袭的电报。

蒋总统决定中国政策

当天上午八时，蒋总统召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举行特别会议，决定中国应采取的政策如次：

‘我国对日宣战，已无问题，手续亦甚容易。……且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我们中国的地位特别重要。我国军事力量，虽不能说有左右战局之势，但被侵略各友邦今后对日态度能否一致，我国实可操决定性之影响。因此，在对日宣战以前，必须将我国对于此次战争所采取的政策事先通知英、美、苏各友邦，并征询他们的态度与主张。

‘我国的政策，可归纳为三点：

‘一、太平洋反侵略各国，应即成立正式同盟，由美国领导，并推举同盟国联军总司令。

‘二、要求英、美、苏与我国一致实行对德、义、日宣战。

‘三、联盟各国应相互约定：在太平洋战争胜利结束以前，不对日本单独媾和。

‘我们这个政策的三原则，乃是为被侵略各国共同的利益而决定，必须求其贯彻，然后反侵略的战争，始能获得完全的胜利。’（十二月八日日记）

向美英苏提出建议书

下午，分别召见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高思、卡尔、潘友新谈话，告知：中国决不避任何牺牲，与各友邦共同作战，以促轴心国家之崩溃；同时并分别面交建议书，内容如次：

‘一、最近美日谈话，美国虽以诚意进行，而日本于谈判中突行袭击。于此，可见日本侵略计划早经预定。

‘二、中国决定不避任何牺牲，竭其全力与英、美、苏及其他诸友邦共同作战，以促成日本及其同盟轴心国家之完全崩败。

‘三、中国政府现决定向日本宣战，并对其同盟之德、义同时宣战。

‘四、中国政府以为反侵略阵线各个国家必须对于各个轴心国家认为共同公敌；因之，中国建议：美国对于德、义两国与苏联对于日本皆请同时宣战。

‘五、为谋军事胜利起见，中国政府建议：各友邦（中、美、英、苏、澳洲、荷兰、加拿大、纽西兰）应成立军事同盟，并推举美国为领导，指挥共同作战之军队，实为必要。

‘六、中国提议：中、美、英、苏、澳、荷、加、纽订立一不单独媾和之条约。’

就在八日这一天，日军分别登陆于泰国和马来，扩大进攻，当天便侵入了曼谷。

独立不倚之精神

‘抗战政略之成就，至今已达于顶点。物极必反，居高临危，能不戒惧！

‘本日闻倭袭击英、美后，余对美、英、苏俄三国即提出共同作战之建议；同时即对倭与德、义分别宣战，而且对德、义宣战尤先于美国。此皆可见我政府独立不倚之精神也。’（十二月八日日记）

□□□□□□□□□□□□□□□□□□□□□□□□□□□□□□

抗战期间，美国援华的空军飞虎队，其战绩如何？请参考《陈纳德将军与中国》第三六三页（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至次年五月十五日之统计）及第三八三页（民国三十一年至民国三十四年，三年作战期间之统计）

《陈纳德将军与中国》陈纳德着，陈香梅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印行民国六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出版第三六三页记述如下：

我们十二月份的击毁敌机二百四十一架的纪录在正月分升至三百三十四架。后来，为了中国天空里的敌机逐渐稀少了，三月份的成绩降至仅得四十七架而已。在四月里，我们在空中只遇过三架日本飞机，——全部都是老式的俯冲轰炸机。由五月十五日至七月一日，十四航空队虽然深入敌区，由东北至越南，仍然没有报告过发现半架敌机的消息。十四航空队自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被日本人认为无力再战的时候起。至一九四五年五越十五日止，共击毁敌机一千六百三十四架，美国在空战中的损失只十六架而已，在中国上空的日本空军可说已被消灭了。

当我的Ｃ－４７开上昆明的跑道时，数百云南人站立起飞区域的两旁，燃放爆竹，替我祓除不祥。当我的私人机师：卡尔登中校，把那架满载的Ｃ－４７飞离机场的时候，我能够看到矗立在昆明湖彼岸的老人峰的红脸正在阳光下闪着光辉。极目而南，黑色的大雷雨正在缅甸那边鼎沸着。下面，昆明山谷间的黄绿稻田，正波涛起伏。后面留下一个在第二次大战的空战史里未被超越过的纪录～～一个由二百五十人和一百架飞机而增至二十万人和一千架飞机的航空队，把它的翅膀的阴影横扫整个亚洲大陆。

在三年出动中，它因作战而损失五百架飞机，同时却击毁敌机二千六百架，可能击毁的有一千五百架强；击沉及损坏二百二十三万吨敌人商船，四十四艘海军舰艇，和一万三千艘一百吨以下的内河船艇；击毙六万六千敌军，和摧毁五百七十三座桥梁。

它的最好的证明书来自在我们手上受苦最重的人——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高桥中将。——战后，高桥中将说：“就我的军队在华所遭受的一切困难而论，包括游击队，地面军队，运输缺乏，艰险的山区，中国人的不合作，我认为十四航空队的活动构成在中国对我们最有效的敌对势力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五，没有遭遇空军，我们会能够随意所之，绝不忌惮。”云云。

这是每一个佩带飞虎肩章的人，所引为骄傲的！

抗战期间，美国援华的空军飞虎队之战绩，结束。

□□□□□□□□□□□□□□□□□□□□□□□□□□□□□□

“新四军事件”（皖南事件）中共的论点如何？以下是中共的论述。

《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王秀鑫、郭德宏主编八十四年八月北平第一版该书全部七百六十四页。

第三章相持阶段前期两个战场的作战（第二八一页）第八节晋西事变和皖南事变（第三七二页）第三七八页至第三八九页（皖南事变），节录于下。

（二）皖南事变

国民党顽固派对华北八路军的进攻被打退后，逐渐将其反共磨擦的重点转向了华中。一九四○年三月，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总副司令韩德勤、桂军李品仙等部，在津浦路两侧进攻皖东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直逼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区，企图割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中原局和新四军领导机关一方面申明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一方面紧急组织力量，先后进行了定远、半塔集两次自卫战。经过一个多月的作战，打破了围攻，镇压了屯仓等地反动地主的暴乱，为巩固和发展皖东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在华东地区的反共磨擦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于五月四日指示中共中央东南局，要敢于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无理限制，放手发动群众，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抗日政权。陈毅为首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迅速传达中央指示，部署渡江北上，贯彻执行中央发展苏北的战略方针。这时，国民党军队在苏北的力量，除韩德勤部外，还有苏鲁皖边游击军李明扬、李长江部和属于宋子文系统的税警总队陈泰运部。六月底，泰州的李明扬、李长江受韩德勤唆使，攻击郭村一带的新四军挺进纵队，新四军奋起自卫。为打开苏北局面，扩大统一战线，指挥部确定联李、击日、反韩的策略方针。七月五日，陈毅到郭村与二李联系，重申团结抗战主张，并让出郭村，释放俘虏，归还枪支，二李表示与新四军恢复已初步建立的合作关系。七月下旬，北渡长江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下辖三个纵队，共八千余人。随后该部东进，十月上旬举行黄桥战役，歼灭韩德勤部主力第八十九军、独六旅，占领江北重镇黄桥，建立了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当华中磨擦日益紧张之际，中共中央为维护团结抗战的局面，力争国共长期合作，于一九四○年六月派周恩来、叶剑英到重庆同国民党代表何应钦、白崇禧举行谈判。谈判的内容有：（一）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问题；（二）陕甘宁边区的承认问题；（三）八路军、新四军的扩编问题；（四）作战地区的划分问题。其中，中心是作战地区的划分问题。七月十六日，国民党向中共方面提出了所谓“中央提示案”的书面文件，主要内容是：（一）划定陕甘宁边区范围，并改称陕北行政区，暂隶行政院，但归陕西省政府指导；（二）将冀察战区取消，其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山东省黄河以北地区并入第二战区，仍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以朱德为副司令长官，秉承军事委员会命令，指挥作战；（三）八路军及新四军于奉令一个月内全部开到前条规定地区之内；（四）八路军准编为三个军六个师，三个补充团，另再增二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为二个师，此外所有纵队、支队及其他一切游击队，一律限期收缩，不准自由成立部队。这个“中央提示案”的核心是紧缩八路军、新四军的编制，并全部集中在黄河以北狭窄的冀察地区。中共中央认真研究分析了这个“提示案”后，一面派周恩来继续与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交涉，一面提醒全党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剧变要有精神准备。九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指出对待时局的政权态度是，一方面准备迎接时局好转，一方面又准备对付投降派的突然事变。

这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因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更加复杂化。九月二十七日，日本与德国、意大利在柏林签约，结成军事同盟。同时，日本在德国帮助下，迫使法国政府同意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日本的意图是利用欧洲战争的时机，对南太平洋英、美殖民地发动军事攻击，实施“南进”计划。为此，日本急欲结束中日战争，以便从中国战场抽出身来。德、意也极力促使日本“南进”，以便分散英、美力量。日本和德国都加紧了诱劝蒋介石对日妥协媾和的活动。德、意、日三国结成军事同盟和日本实施“南进”计划，还加剧了日本与英、美的矛盾。英、美为了自身的利益，需要中国继续抗战，拖住日本。为此愿对中国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十月十八日，英国宣布重新开放滇缅公路。美国国会通过提供国民政府一亿美元贷款的决定。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顽固派以为局势对自己有利，终于又制造了大规模的武装反共磨擦事件。

十月十九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皓电，诬称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并将“中央提示案”以最后决定形势通知共产党，限令八路军、新四军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的冀察地区。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密令汤伯恩．李品仙、韩德勤、顾祝同，准备向华中新四军和八路军大举进攻。

面对空前严重的内战危险，中共中央从维护抗战大局出发，采取让步政策，决定将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北移。中共中央还提出了挽救危局的方针和对策，强调军事上要采取防卫立场，政治上要强调团结抗日，并要准备对付最黑暗的局面；要积极加紧统一战线工作；坚持长期的独立自主与自立更生的抗日战争，同时准备应付任何严重的反共战争。

十一月九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出致何应钦、白崇禧的佳电，答复何、白皓电。电文据实驳斥皓电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婉言拒绝强令华中新四军、八路军全部集中黄河以北的无理要求。同时表示，为顾全抗日大局，相忍为国，挽救危亡，决定新四军皖南部队将开赴长江以北，但须宽限时日。佳电发出后，中共中央连电新四军领导人叶挺、项英，要求皖南部队务必于十二月底以前全部北移，并认清形势的严重性，提高警惕，做好充分的自卫准备。新四军皖南部队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进行了北移的准备工作。

但是，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呼吁和新四军皖南部队准备北移的实际行动，步步紧逼。十二月八日，何应钦、白崇禧再次发出致朱、彭、叶、项的齐电，声称“军令法纪之尊严，必须坚决维持”，要求八路军、新四军迅即“遵令”，将黄河以南部队全部调赴河北。九日，蒋介石发布命令，限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十二月三十日前全部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一月三十一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限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所有部队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十日，蒋介石密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按照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新四军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仍不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十二月下旬，顾祝同根据蒋介石的密令，调集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兵力，任命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为“前敌总指挥”，准备围歼皖南新四军部队。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官云相在安徽宁国召开作战会议，确定了进攻部署，并限定各部须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秘密完成作战准备。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皖南部队九千余人编成三个纵队，由云岭驻地出发，先向东南行进，绕道泾县茂林北上。由于连日大雨，部队行动受阻，到五日十五时才到达茂林地区。从七日开始，皖南部队突遭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袭击。在叶挺等指挥下皖南部队宁死不屈，浴血苦战十一日，终未能突出重围。十二日，国民党军队五个师队被围的皖南部队实施向心合击。新四军官兵不怕牺牲，顽强战斗，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战至十四日，除二千余人突围外，其余六千余人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军长叶挺在前往和国民党方面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被叛徒杀害。一月十七

◎与上面一段中共说词平行的一段《蒋总统秘录》◎之记述，其内容如下：◎◎◎政府命令新四军调动的期限是十二月三十一◎日，同时已预定在新四军调开之后，由政府军◎第四○师自江苏调来皖南接防。◎◎可是新四军却伪装开拔北上而将其战斗部队◎埋伏于某些地区，等待第四○师到达。◎◎第四○师当然不知道会有这样的事，而于一◎九四一年元旦到达皖南乡桥镇附近。而新四军◎则全神贯注地在侦察着四○师的一举一动。◎◎元月四日夜晚，新四军将其主力南移，潜伏◎于茂林、巧峰镇、铜山等村庄，等待着四○师◎到来，他们为防泄露消息，并特地禁止民众外◎出。◎◎新四军发动对第○师的偷袭，是在元月五日◎夜间。同时，并分兵袭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上官云相）。◎新四军是分兵三路企图把四○师切断，再加◎以歼灭的大规模袭击。◎◎第四○师迫不得已乃点燃了战火，形成激烈◎战斗。◎◎接到报告的顾祝同，决心采取毫不姑息的制◎裁措施，乃迅即出动援军反击，及至八日清晨◎新四军分头退散，在各地被解除武装。

日，蒋介石令中央通讯社发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和发言人谈话，反诬新四军“危害民族，为敌作伥，丧心病狂，莫此为甚”，宣布新四军“抗命叛变”，“着将”该军番号撤销，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坚决反击，在军事上严守自卫，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当局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和一月十七日命令的反动实质。强烈要求：严惩阴谋消灭新四军皖南部队之罪魁祸首；释放所有被俘之新四军将士，保障叶军长等军政干部之生命安全；抚恤新四军皖南部队死伤将士及其家属；停止华中数十万大军之剿共战争；平毁西北之反共封锁线；停止全国各地残杀逮捕共产党员及爱国人士的犯罪举动，释放一切爱国的政治犯；肃清何应钦等一切亲日分子；反对一切破坏抗战、破坏团结之阴谋计划，严整抗日阵容，坚持抗战到底。

十九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军发出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利用各种形式，揭露和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罪行，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政治上、军事上做好反击顽固派的准备；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组织，开展坚持抗战、反对内战的群众运动。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举行各种活动，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径，八路军并做好了随时配合新四军反击国民党军队武装进攻的准备。

二十日，中共中央军委会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并号召新四军全体将士继续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坚持长江南北抗日阵地，坚持抗战。同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发表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揭露国民党当局的阴谋，抗议其反共暴行。他严正宣告：“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他要求国民党当局以大局为重，处理好皖南事变，并且提出了十二条办法：悬崖勒马，停止挑衅；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撤退华中的“剿共”军；平毁西北的封锁线；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二十三日，陈毅等新四军将领通电就职，呼吁全国人民“拒绝内战，一致对敌”。二十五日，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为基础组建的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随即将全军整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以苏中部队编为第一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炎；以淮南部队编为第二师，师长张云逸（兼），政治委员郑位三；以盐阜、皖东北部队编为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以淮北、豫皖苏边部队编为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以鄂豫边部队编为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以苏南部队编为第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以皖中和原皖南部队编为第七师，师长张鼎丞，政治委员曾希圣。全军共九万余人，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

皖南事变发生后，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也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谈判斗争，并在舆论宣传方面展开了猛烈反击。一月十七日，周恩来打电话给何应钦，怒斥说：“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

◎此处的□□□□是自由人删除的文字。◎◎共产党为俄国向中国社会灌入阶级仇恨思想，◎为俄国以“阶级斗争”制造中国社会的动乱，◎以为俄国制造下一次掠夺中国领土的机会！！◎所以，◎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随后，又驱车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处，当面提出抗议。当《新华日报》关于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导被国民党当局检扣后，周恩来于当天深夜写下“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刊登在十八日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在重庆广为散发。十八日下午，叶剑英主持起草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一文，经周恩来审阅后印成传单散发。周恩来、董必武和南方局工作人员还通过召开座谈会、个别谈话等方式，向各界人士介绍皖南事变真相，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与此同时，廖承志也在香港公布了皖南事变真相。

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和妥善处理皖南事变的合理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海外侨胞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国民党军队在皖南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在香港的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即于一月十二日致电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提出：“今者日寇欲置我国于殖民地，日寇不独为我党的敌人，亦正为共产党之敌人，敌人之敌人，即为我之良友，故吾党不得以如何消灭共产党为决定政策之出发点。”要求“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势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在港的参政员张一麟等四百名各界人士联名致电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柳亚子打电报指责国民党中央：“此次新四军不幸事变，中枢负责人士借整顿军纪之名，行排除异己之实。长城自坏，悲道济之先亡；三字埋冤，知岳侯之无罪。”他提出应“严惩祸首，厚抚遗黎，然后公开大政，团结友党”。邹韬奋主持的《全民抗战》和胡愈之主持的《国民公论》，都发表了揭露事变真相，谴责反共内战的言论。沈钧儒在重庆文化界的集会上谴责破坏团结抗战的行为，呼吁团结抗日。陶行知在桂林文化界的一次演讲会上，驳斥了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攻击。黄炎培表示：“不论事情经过之是非，当局如此措置绝对错误”，“请蒋把眼光向外”。章伯钧、左舜生等拟发起民主联合运动，要求与中共联合以抵抗国民党的压迫。全国绝大多数民主人士都“非难政府的举措”，“表现了从来没有的好”。

其他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也对国民党的反共行径表示了不满和愤慨。冯玉祥、卫立煌等国民党军队将领都表示不愿内战，愿推动时局好转。张治中向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对中共问题处理失策。阎锡山、傅作义、邓宝珊、龙云、余汉谋、马鸿逵等地方实力派均取中立态度。文化界数百名著名人士联名发表宣言，反对枪口对内。华侨领袖陈嘉庚、司徒美堂等分别致电国民参政会或通电全国，呼吁团结，谴责蒋介石的□□□□。

◎◎此处的□□□□是自由人删除的文字。◎◎如果在民国二、三十年代，◎中央政府就消灭了中国境内的俄国党——共产党，◎那么，以后就不会有共产党的倒行逆施！！！◎也就是，◎不会有三反五反、三面红旗、斗争为纲，◎不会有文化大丧命运动，◎更不会有强迫我们中国人叫他共产党的老大哥为“祖宗”、“爷爷”的事发生！！

为表示抗议，皖南事变发生后，“汇丰银行停止挂牌，陈光甫等银行家停止向内地投资”。“广大民众及进步势力表示对国民党愤恨，对共产党同情，认为国民党破坏团结抗战，中国内战就要亡国，许多青年学生、工人、职员看到这个消息时，有留泪的，有苦闷的，有愤怒的”。

国际上，苏联对国民党当局制造皖南事变表示严重不满。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于一月二十五日会见蒋介石表示“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英、美等国因为要中国继续抗战，也不赞成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转告蒋介石，英国政府认为，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劝蒋停止国内冲突。二月中旬，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会见蒋介石时正式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种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强大政治攻势和国内外的压力之下，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境地，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活动。一月二十七日，蒋介石在重庆中央纪念周的演说中称皖南事变完全是“整饬军纪”问题，除此以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企图缩小皖南事变的严重性，推脱责任。二月，蒋介石加紧筹备第二届国民参政会议，并千方百计要求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企图以此粉饰太平，欺骗舆论。二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决定以中共参政员毛泽东、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林祖涵（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七人的名义致函国民参政会，将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谈话中提出的“善后办法十二条”正式送上，要求讨论，以期恢复国共团结，重整抗日阵容，坚持对敌抗战。否则，中共参政员将不出席参政会。十八日，周恩来将七位参政员的公函送交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同时将副本抄送各党派参政员二十余人，引起震动。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多次找到周恩来，希望中共能撤回公函，出席参政会，遭到周恩来的严正拒绝，明确表示：“非十二条有满意解决办法并办理完毕确有保证之后，决定不出席参政会”。

三月一日，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开幕。是日晨，张冲又奉命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遭到拒绝。二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来致函张冲转蒋介石，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表示如能采纳，并有明确保证，中共参政员届时必能报到出席参政会。“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的内容是：（一）立即停止全国向共产党的军事进攻；（二）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及各地被捕人员；（三）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的命令；（四）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的一切压迫；（五）承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六）承认敌后的抗日民主政权。（七）华中、华北及西北的防地均维持现状；（八）中共领导的军队，于十八集团军之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应共辖六个军；（九）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者的家属；（十）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兵员，发还所有枪枝；（十一）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个党派派遣代表一人，以国民党的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国民参政会主席团。同日，董必武、邓颖超也写信给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表示十二条如蒙采纳，并有明白保证，必可报到出席。“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虽然未被接受，董必武、邓颖超也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决立场，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又一次遭到打击。

在这种形势下，三月八日蒋介石在参政会上演说时表示：“决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更不忍以后再闻有此种‘剿共’之不祥名词，留于中国历史之中”，保证“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同日，国民参政会选举董必武为驻会参政员。十四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答应提前解决国共间的若干问题。至此，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皖南事变得以解决。

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特别是在打退两次大规模武装反共事件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从维护抗日大局出发，妥善地处理了历次磨擦事件，维护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临危不惧，善于应付，处置得当，从而既赢得了国内外进步势力和中间势力的同情和支持，又孤立和打击了顽固势力，并保持和发展了自己的力量和阵地。这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成熟和斗争艺术的纯熟。中国共产党更加成为全民族团结抗战的重要支柱。

在反磨擦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对在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存在的情况下国民党顽固派的两面性，即

一面与日本对立，一面与中共

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又不愿意最后破裂的特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规律有了更深刻的把握。这期间，毛泽东先后写下《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论政策》、《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等重要文件，系统总结抗战以来党在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反磨擦斗争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全面阐述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和各项基本政策。毛泽东指出，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根本指导原则是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党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策略方针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在对顽固势力的斗争中，必须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有理即自卫原则；有利即胜利原则；有节即休战原则，分别体现了斗争的防御性、局部性和暂时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政策，是坚持团结抗战的重要指针。中国共产党妥善处理反磨擦斗争，特别是妥善处理晋西事变和皖南事变，正是坚持和运用这些策略和政策的结果。

《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第三章相持阶段前期两个战场的作战（第二八一页）第八节晋西事变和皖南事变（第三七二页）第三七八页至第三八九页（皖南事变）。结束。

□□□□□□□□□□□□□□□□

对日德义宣战

当日本对美国开战的同时，日军便将在中国大陆沦陷区各地的美、英侨民一齐逮捕，同时攻击留驻北平、天津、上海的美、英军队，并进占上海公共租界、天津英租界以及有法国租界的福建鼓浪屿，更且由大陆出兵进攻香港。

被称为“最古人类”的“北京人”化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失落。当时，中国方面为期将“北京人”暂时送往美国，以避开战火，乃通过在北平的美国领事馆托由美国海军部队保管，未料在运送途中美军被日军解除武装，自此之后直到今天，北京人一直下落不明。

据说：“北京人”是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在北平协和医院分装为二箱，作为美国海军部队的军用物品，委托北平美国领事馆交由驻北平的美国海军部队，预定装入自秦皇岛出港的美国轮船“哈里逊总统”号。但该轮船因在长江搁浅等事故迁延，以致在“北京人”即将装船之前，美日战事便已爆发。此时将“北京人”刚刚运到秦皇岛霍尔科姆营地的美军突被日军解除武装，于是“北京人”乃从此下落不明。

击破日本侵略大陆政策

日本之所以鲁莽灭裂地以世界为敌而悍然发动战争，乃是因为其自从明治以来对大陆的侵略政策，已在中华民国四年五个月的抗日战争之下被完全打破之所致。

‘我们此次抗战，并不是要消灭日本这个国家，也并不是要消灭敌国所有的军民；而是要打破他一贯侵略的政策。——这是我们唯一的目标，也是我们抗战政略的基本。……

‘到了七七事变发生，我们第一步就决定要打破敌人的蚕食政策，所以发动了当时上海的抗战，吸引敌人的兵力南下，不许他从容不迫从东北而华北、而华中、华南一步一步的侵略我们。……

‘我们第二步的计划，就是要打破敌人的大陆政策，要使敌人不单纯以中国为作战对象。因此，我们的目的，就要压迫他走向海洋方面。为了贯彻这一个目的，我们一直和他们斗争了四年多的工夫。

‘在敌国一般军阀，他们自己也经过了四年多的考虑——究竟是北进还是南进？如果南进，就不能不放弃他的大陆政策，也就不能不和英、美冲突，不能不参加世界战争；因此，他想坐收其利的不参加欧战政策就要同时打破！’（注一）

十二月九日（一九四一年）下午七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由主席林森署名发布文告，正式对日本及德、义宣战。而实则乃是自九一八中日开战以来忍耐了十年之久，才终于宣战。

十日，日军在马来亚的海面上对英国海军给予打击，并攻占为美军据点之一的关岛，同时开始在菲律宾北部登陆。

‘英驻新加坡主力舰“威尔斯亲王”号及“却敌”号两艘，本日在马来亚海面被敌机炸沉；檀乡山美主力舰八艘，八日，亦被敌机炸沉者三艘，炸伤者三艘。可说太平洋上英、美海军总力量已消耗十之八矣！以目前形势而言，英、美在军事上太无准备，且徒虚张声势，致遭此败，势所必然。

‘但由世界整个局势与远东战争最后结果而言，反可因之转祸为福。以英、美以后则不能不集中全力先解决远东之倭寇；否则，英、美仍以远东与中国为次要也。’（十二月十日日记）

盖从日本的国力审察，只不过是在初战中凭仗出其不意的突袭而获得一时性的战果；但终归是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的。

日寇饮鸩止渴

‘日寇这次发动太平洋战争，正用得着我国一句古语——所谓“饮鸩止渴”。这就是说，他拿烈性的毒酒，来求片刻的兴奋，而实际是自取绝灭。……

‘自经英美对他实行经济封锁以后，他海上运输力一天天的减退，原料、燃料以至劳力、机械处处感到缺乏，重要的产业半陷于停顿；这种种危机，都反映到他国内一切岌岌危殆、不可终日的险象。但是他现在还要继续他荒谬绝伦的侵略思想，扩张他侵略野心，由东半球以至于西半球，要与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类作战，这明明是他行险儌幸、失了理智的疯狂行动。祇看日寇对英美宣战诏书中所谓：“旷日持久，经济上军事上之威胁日增”以及“帝国生存将濒危殆”，这就是他全国上下焦渴欲死的心情之自白。他因为熬不过“焦渴”，所以不得不“饮鸩”；至于“饮鸩”之后，在短暂时期内自然回“止渴”。

‘今天，日本军阀所夸耀的战争胜利，正是日寇“饮鸩”以后得到“止渴”功效的一刹那；但是他最后结果如何呢？他腹中所饮下去的毒药不久就会发生作用，日寇最后必然惨败，正像“饮鸩之狂夫”，必定是毫无疑问的了。’（注二）

‘敌如进驻南洋各地，则其兵力分弱；如此，其战区扩大，战线延长，再加为时较久，则人力物力皆不足以支持，其结局之惨，必非所能想像者也。’（十二月十三日日记）

这一条奔驰向覆灭深渊的道路，在日本来说，到了此刻已经是回车乏术了。

注一：蒋总统-“本党抗战之成就与干部同志革命建国之要道”（一九四一十二）

注二：蒋总统-“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一九四二一）

联合军事会议

此时，中国方面的当务之急，是要和美、英等国家共谋确立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协同作战态势。

中美加强团结

当中国对日、德、义三国宣战的十二月九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总统，为中国抗战四年半而重申敬意，并呼吁共同努力打倒日本。

翌日（十日），蒋总统发出肯定友谊与团结之意的覆电如次：

‘际兹文明遭遇悲剧之时，美国亦受狡诈侵略者之攻击。中国对于美国所曾给予之援助与历史传统之友谊，重申其永志不忘之感。

‘现时我两国已对共同之公敌而作共同之奋斗，中国自当贡献其所能及其所有，期与友邦美国以及各与国团结一致，奋斗到底；必使太平洋以及全世界人类正义在野蛮暴力与无穷诡诈之空前劫运下获得解放而后已。’

（民国三十年十二月自由人注）

十一日，美国与德、义两国互相宣战。于是欧洲大陆的战局和亚洲太平洋的战局，已经是名符其实地形成“一个战争”；而中国的单独对日抗战，也就自此开始具有了对轴心国联合战线的性质。

蒋总统遂即致电罗斯福总统以及英国首相邱吉尔、苏联总理史达林，提议在反轴心各国间组织某种联合军事会议。

对于罗斯福，并特别托由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转达下列四点意见：请美国提出五国联合军事行动的具体计划，并以华盛顿为联军政治与军事中心。在苏联未对日本宣战以前，请美国提出香港、菲律宾、新加坡、缅甸、荷印（印尼）之间的联合军事行动具体计划。五国初步谈判的地点应为重庆，其永久地点待讨论决定之。由美国提出五国军事互助协定方案。

罗斯福积极接受此一提议，很快地便发来希望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的覆电如下：

“立即发动步骤，准备一致行动，以抵御共同敌人，应视为异常重要之举。为达成此项目的起见，本人（罗斯福）敬建议：由麾下（蒋总统）最迟于十二月十七日在重庆召集联合军事会议，交换情报，并讨论在东亚战区最有效之陆海军行动，以击败日本及其同盟国。

“本人并建议：参加该会者，应为英、中、荷、苏及美国代表；同时本人可立即派勃兰德将军为美国代表，由马格鲁德将军副之。本人并希望——此等初步会谈，或可产生一永久机构，以设计及指挥我等共同之努力。”

对于联合军事会议之提议，邱吉尔也覆电赞成；唯史达林则态度消极，他表示：“苏联现负对德抗战之主要任务，不宜将力量分散于远东。”是故无意派遣代表前来。至于荷兰的态度也是如此。

蒋总统亲自主持会议

二十二日，美国军事代表勃兰德及英国代表印度军司令长官魏菲尔都抵达重庆。

二十三日开始，联合军事会议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官邸举行，由蒋总统亲自主持，再度体察到在现实联合作战方面的许多困难；特别感到伤脑筋的，是英国只重视他自己的利益，并且表现出轻视中国防务的态度。

当会议一开始，英国军事代表魏菲尔便以在预备会议中所讨论之结果提出三点要求：加强在缅甸的空军力量。请将美国根据军火租借法案已运到缅甸援助中国武器中的一部分拨供保卫缅甸之用。请中国军队协助保卫缅甸。

关于加强空军力量方面，请将现驻昆明作战中的美国志愿空军一个中队调驻仰光，拨用武器方面，包括电话器材、高射炮、汽车、飞机、修理卡车工具及零件等类。

在中国来说，缅甸是补给基地，自有其重要性，魏菲尔的三项要求固然可以理解；不过，英军方面却忽略了对于在整个亚洲太平洋区域所展开的日军攻势，联军应该如何肆应的重大战略考虑，而只顾注意着缅甸一隅的防守问题，并希图勉强得到运往中国的租借物资。

而且，在仰光业已发生了美国供给中国的卡车一百五十辆，未经照会中国方面，便拨交英军的不愉快事件。

可是，这个联合军事会议如果演变成争夺武器的会议，当然是愚蠢的事，故而在会议席上虽然由于英国贪图物资的态度以致何应钦深为气愤而有“中国愿将所有在缅甸的租借物资全部退还美国，停止中、英、缅合作”的发言；但蒋总统为顾全大局，还是采纳了魏菲尔的提议，并重行说明联合军事会议的意义如次：

‘魏菲尔将军报告之三点，皆属专门技术问题，余兹同意其原则。盖余主张集中器材与集中人力为致胜之必要条件。英、美之战争，即为中国之战争，反之亦然。

‘此次开会动机，系最近由罗斯福总统来电建议，今该会已正式在重庆成立矣，此实为太平洋各国代表第一次之正式会议，此次集会之主题，则为“研究在东亚最有效之陆海军行动，以击败日本及其同盟国。”此即为罗斯福总统来电最后之一句。

‘故除业已讨论之三点（魏菲尔提议）而外，本会主要任务为按照罗斯福总统建议——拟定整个计划及组织永久机构。’

魏菲尔的短见

中、美、英三国代表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重庆所举行的联合军事会议中，中华民国主张：规划足以兼顾整个亚洲地区的战略，向美国罗斯福总统提出报告。

但英国代表魏尔菲对于这一点也有反对意见，他希望将军事协力的范围，止于紧急措施，其地区则亦限于缅甸。以致会议拖长到十一个小时之久，当达成结论之际，则已经是天色欲曙的二十四日午前三时。

关于通盘计划方面，首先是美国代表勃兰德提出有四项内容的长期战略计划；但魏菲尔则认为只要限于一、两个月的短期计划而表示反对美方提案。

联合军事会议辩论情况

现在就中华民国总统府所保留下来的纪录中国于此次会议的辩论情况摘要引录于后：

蒋委员长于报告罗斯福总统之前，拟具全盘计划，实有必要。

魏菲尔余反对。报告罗斯福总统之计划，应注重当前紧要问题。

蒋委员长中、英、美三国今既并肩作战，自需一全盘整个之计划。我人试检讨过去之行动，大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待事件发生，始仓卒应付以与我共同敌人周旋。此后我人计画，自应着限于整个战区之防卫。如是，则不作六个月之计划，必将犯目光短浅之嫌。

缅甸之防守，固属重要；香港、新加坡之保卫，亦岂容忽视？此皆为本会所应兼筹并顾之处。……

蒋夫人委员长之意，本会应明白通知英、美两国，凡致罗斯福总统电文中，皆应详细说明中国之地位。

蒋委员长余可赞成勃兰德将军所提四点。无局部计划，全盘计划自亦失其拟订之根据；然于实施局部计划以前，亦应先知全盘计划之概要。或者可将各项建议尽向罗斯福总统报告之。

魏菲尔本人反对此举。盖目前根本尚无可以报告之资料，应组织小组委员会详加研究决定之。……

马格鲁德我人当早具计划送去，俾总统能明了此间紧迫之需要。

蒋委员长迄今为止，讨论中心皆集中于保卫缅甸，未闻一言及于支持中国战线者。余愿确知此后中国战线究将如何支持？

勃兰德委员长可向总统声明继续抗战之决心，此即为需要新增供给之表示。惟缅甸如入敌人之手，美国供给亦无从运华，此点亦应细察。至本人所提建议，拟加入“应考虑支持中国战线”一节。

蒋委员长中国如不能支持其战线，全部保卫缅甸之计划亦将瓦解。余确认保卫缅甸自有其价值，惟租借法案器材，中国自有其应享之权利，亦望勿加忽视。

魏菲尔如觉得按租借法案供给中国之武器为我方所拨用，而对中国国防有不利之影响，本人愿竭自有之物资以卫缅甸。

蒋委员长拨用租借法案器材，余早作愿以相助之表示；所顾虑者，惟以后之接济耳！总之，致罗斯福总统电中应列入“支持中国战线”一节。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终于达成协议——将勃兰德的草案修改为“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六项（密件），向罗斯福总统报告。其主要内容如下：（一）仰光与缅甸和中国继续抗战关系重大，使免受敌方攻击为当前要着，目前应尽现有实力，对日军发动空军攻势。（二）继续以器材供给中国。（三）中国军队继续对日发动军事行动，牵制日军于其战线。（四）希望在美国组织之总机构能早日实现。（余略）

翌日（二十四日）上午九时，蒋总统约美英军事代表同进早餐，当时向英国魏菲尔提及：

‘中英两国，不可有一国失败。因此，如果贵国需要，我国可以派遣八万人入缅甸作战。’

而魏菲尔则立即答称：

“如由贵国军队解放缅甸，实在是英国人的耻辱；我们只要请贵国能惠允拨借美援物资就可以了。”

这种语调，是和前此未经中国同意便将一百五十辆卡车拨去使用的态度是一样的。

于是，蒋总统便说出了这样的一段话：

‘我们中国有句格言“人无信不立”。中英两国此时可算得上是患难之交，理应彼此互助互谅，运给中国的援助物资像前次的卡车，贵国如需借用，不妨与中国商洽。’

魏菲尔胀红着面孔说：“卡车之事，我实在不知道，等回去后一定查处，请委员长谅解。”

切望美国有整个方案

最后，蒋总统嘱美国代表勃兰德向罗斯福总统转达意见于次：

‘远东地区对日作战，端赖中国之陆军与英、美海空军协同一致为主体。务望美国有一中、美联合作战计划；尤望美国对于在远东与中国所有的空军，以及可到的时间，必须有一整个具体的方案。’

经过如上所述的过程，中、美、英三国的联合作战乃踏出了第一步。

香港英军之竖起白旗，就是在这次会议的第二天。

中国列四强之一

在华盛顿方面，美、英两国首脑罗斯福与邱吉尔自十二月二十二日起连续举行会议，制订同盟国合作体制，并拟就联合国宣言草案。

签署联合国共同宣言

一九四二年元旦，在华盛顿发表了有中国在内二十六个国家签署的“联合国共同宣言”。在宣言中相约：“加盟诸国，应各尽其兵力和资源，以打击共同之敌人，且不得与任何敌人单独媾和。”这和中国在美、日战事爆发当天便向美、英、苏三国所提建议书的内容是一致的。

宣言是由美、英、苏、中四国领衔签署。--当罗斯福、邱吉尔、苏联驻美大使李维诺夫、中国代表宋子文率先署名之后，其余二十二国便按照国名的字母顺序签字。现在的中国，是在经过长期单独抗战之后，已经赢得了四强之一的国际地位。

接着在元月三日，蒋总统因罗斯福的提议被正式推举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肩负起中国及泰国、越南地区联军部队的总指挥任务。

‘我国签字于共同宣言，罗斯福总统特别对子文表示：欢迎中国列为四强之一。此言闻之，但有惭惶而已！’（元月三日日记）

‘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发表后，中、美、英、苏四国已成为反侵略之中心，于是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越南、泰国亦划入本区内。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虚名之害，能不戒惧乎哉。’（元月份反省录）

为了加强和联军之联系，蒋总统特电嘱在华盛顿的宋子文要求罗斯福派遣一位可资付托的高级将领来华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于是，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乃依据此一要求于元月十九日推荐陆军中将史迪威出任此职。

史迪威曾在美国驻华大使馆担任武官有年，能通中国语文。美国除推荐其为中国战区参谋长之外，并派任为（一）美军驻华军事代表。（二）在缅中、英、美军队司令官。（三）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四）滇缅公路监督人。（五）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给予了很大的职权，但却成了在后来发生不幸纠纷的因素。

在这个时期，日军曾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起第三度进犯长沙，出动以阿南唯几（中将）所率领的第十一军，是超过十万人的大部队。

二十四日，日军开始渡过新墙河南下；二十七日，突破在长沙北面约八十公里的汨罗江防线。

面对日军之来犯，中国方面在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之下，以第十九（罗卓英）、二十七军（杨森）、三十（王陵基）计三个集团军为主力，巩固长沙防务。

长沙大捷名扬于世

此时，中国军的作战计划是先以小部队接触日军，诱引其深入长沙附近之后，再以主力将之包围歼灭。果然，日军一如预料被诱尾追后退的中国军不舍，而于一九四二年元旦发动了对长沙的总攻击。

此时，担任长沙城防的精锐部队-第十军（李玉堂），沉着应战，遏阻住日军的猛烈攻势。

战至四日拂晓，部署在长沙外围待命的中国部队一致出动，自三方面对日军形成反包围，重武器都喷出了火焰；于是，过于深入的日军，立即支持不住，转而败退。

‘敌人此次……不仅要占领长沙，而且希望进一步侵占衡阳，打通粤汉铁路。……

‘现在，敌人对于香港、越南、泰国等地军队补给，都靠海上运输，将来必然遭受英、美各友邦空军的威胁；如果他打通了粤汉路，就可以从朝鲜的釜山由火车直达广州、香港，就不怕补给被截断，这是敌人最高的战略。……

‘赖薛（岳）长官以下各军、师长及一般官兵人人抱定必死的决心，卒使敌人始终不能窜进长沙市区一步

‘现在，我们增援各部队亦已经在长沙东南北三面开始攻击敌人的侧背；同时，在敌人后方我军更有强大部队布置就绪，准备随时袭击敌寇。到昨天为止，敌人的阵线已经全部动摇，今后在三百公里以内的地区，他要想退出去，决不是容易的。……

‘当此反侵略各国战事初期失利之时，我们在长沙方面能获得如此空前的胜利，不仅可以告慰全国民众，而且可以告慰于世界友邦。’（注）

中国军对于想要逃脱的日军彻底追击，中国空军也自天空撒下弹雨。

‘此次长沙胜利，实为七七以来最确实而得意之作。’（十一日感想）

元月十五日，第三次长沙会战在中国军胜利的情况之下结束。日军的伤亡，实则达到五万六千人之多。

据日军当时发表：战死一千四百六十二人，负伤四千零二十九人；但已为同时进攻香港所受损失的一倍以上。

长沙会战，是在珍珠港之后亚洲太平洋地区联军方面的最初全面胜利；也是蒋总统担任中国战区最告统帅的最初胜利。故而英、美舆论对于这个胜利纷纷赞扬，伦敦每日电讯报报导：“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惟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蒋夫人说明中国军人魂

其后纽约时报于四月二十三日刊载蒋夫人所撰“如是我观”一文，更举出长沙会战为例说明中国的军人魂于次：

“西方人往往以为中国是一个富于美术及哲学风度的民族，必不会表现战争所需要的斯巴达式尚武牺牲精神；我们的行动和事实，已证明此种观念的错误。成仁取义这句话，深深地铭刻在我中国每一个国民的心中。”

蒋总统访印度

一九四二年二月，蒋总统访问了印度。

当时，在印度方面，为向英国争取解放、独立的国民大会（全印国民党）派，发动了对英国的不合作运动，民间也正弥漫着反英情感。

日本方面乃乘此宣称：“把英、美赶出亚洲”、“亚洲是亚洲人的”等口号，对印度人民施展怀柔策略，故而在印度国民大会一派的人士中提倡“亲日反英”者，实在是并非少数。

针对着这样的国情，如果日本移兵攻击印度，则失掉民众支持的英国军队，将会有立即瓦解之虞；甚至如果印度民众脱离同盟国或是站到反同盟国的立场，则对于同盟国来说，实则是一个很严重的打击。

蒋总统之访问印度，其目的是——除了加强在印度方面的中、英协调之外，更站在同盟国领导者之一以及同为亚洲人的立场，要劝说英国和印度国民大会人士双方冷静地促膝会商，一致协力抗日。

二月四日，蒋总统偕同夫人暨国防最告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等十多人自重庆乘专机起飞，经加尔各答于九日到达新德里。

对于蒋总统在这一方面的劝说，印度总督林里资哥等英方重要人士拒不接受，不肯变更其一向的对印政策。

另一方面，印度国民大会派主席阿柴德暨该会执行委员尼赫鲁等民族运动领导人则列举英国自统治印度以来的各种迫害事实，认为对英国不合作乃是印度革命（独立）唯一有效的力量，是故坚持此一主张不肯让步。

蒋总统的态度是：对于英国，劝说其承认印度为属于大英联邦的自治领之一；劝说印度人暂时搁置完全独立的主张而采取比较和缓的革命战略。可是，英、印两方面都毫无趋于妥协的迹象。

与甘地晤谈五小时

最后的希望，是在说服揭橥不抵抗主义而为印度国民众望所归的甘地。

对于蒋总统之要求甘地见面，英国方面不表赞成，甚至邱吉尔都有电报打来表示反对。

但由于甘地本人希望能和蒋总统见面，于是乃得于十八日正午在加尔各答的一个公园中晤谈。

甘地首先详细说明其“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起源及成效，并表示：自此之后，仍将坚持此一主义，斗争到印度获得自由为止。

蒋总统乃对之劝说如次：

‘中、印两大民族，占全世界人口之半数，故欲求世界人类完全解放，则必须先获得中、印两民族的自由与解放。

‘惟革命有两个因素～～一为争取时间，一为争取世界同情。前者有赖于中、印切实合作，后者则完全在印度是否实行参战。

‘我（蒋总统）以中国革命党员资格前来印度访问，与印度革命友人会谈，主要目的，就是在联合反抗侵略势力，以奠定中、印两民族求得自由的基础。’

蒋总统和甘地经过五个小时的长谈，甘地最后表示：“不妨碍中、英之间的合作，并愿接受委员长（蒋总统）的忠告，不打算特地制造纠纷。”至此，遂即取出他的纺车，坐在地上，纺起纱来。

当时，蒋总统感觉到：甘地是只顾在考量着印度的问题，而没有放开眼光观察广大的世界情势。

发表“告印度人民书”

访问印度的最后一天（二月二十一日），蒋总统发表了临别增言-“告印度人民书”，全文由蒋夫人以英语代读，对全印度广播，其要点是这样的：

‘余（蒋总统）敬向我兄弟之邦印度建议：吾人在此人类文明存亡绝续之交，惟有各尽其所能，以取得人类整个之自由。……

‘在太平洋战争开始以后，已随时代而有一甚大之转变，各民族求得自由之方式，今昔实亦有所不同。现在，各反侵略国家无不要求印度国民在此新时代中尽其应尽之责任。……同时，世界大多数人士皆已同情印度之自由。此种宝贵难得的同情，应特加珍重而使之勿失也。’

最后，蒋总统和尼赫鲁共进午餐，告诉他说：

‘余发此告别书，完全为协助印度之解放，英国政府或不甚谅解，但余深信于英国实有益也。……’

由印度归国的第二天（二十二日），蒋总统便通过驻英大使顾维钧将意见转达邱吉尔首相，略谓：‘如不转移印度政治现状，则难以防止日本之侵略。’接着，更于二十四、五日两度电嘱在华盛顿的宋子文向罗斯福总统进言：‘……印人对英积恨愈深，背道而驰，是无异驱印以资敌。……为盟邦及东方共同作战计，以为此时惟有改变印度之政治现状，予印度国民以政治上之实权。……’并建议--由中、美两国对英国共同劝告与保证。

其后，英国与印度国民大会派之间在当地举行谈判，虽经多方折冲，但终于四月十一日决裂。

英国自私之心

‘英印交涉，已经破裂。英人宁让倭寇侵印，而不许印人自由，以为于战后我同盟国胜利时仍可无条件统治印度，是不愿印度自由参战以增加同盟各国之实力，此种自私之心，恶劣极矣！’（四月十二日日记）

蒋总统之访问印度，加上所述未能立竿见影即刻发生效果，但却使虽为比邻之邦但却交往不够的两个民族之间加深了认识，而成为在战时开通中印公路的起步，更且与战后印度之独立有着很大的关系。

缅甸作战

蒋总统于归自印度之后不久的一九四二年三月一日，为视察缅甸战线，由昆明飞往缅北要冲-腊戍。

在由仰光北上通往云南的滇缅公路上，每月有二万吨军需物资运送中国，是中国还保持着的最大补给路线。这条路线的防卫，在中、美、英三国来说，乃是一个重要课题。

日军方面，对于此一路线也相对重视，由饭田祥二郎中将担任司令官的第十五军，自元月二十日开始越过泰国边境，侵入缅甸。

在此之先，虽然中国已曾向英国表示可以派遣八个师协防缅滇，但一度为英方所拒绝；及至英国要求救援，则已经是为时已晚，不过中国还是以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一军编成远征军，由罗卓英担任司令长官，急速由云南南下入缅；但捷足先登的日军业已于二月下旬越过仰光东北约一百公里的西汤河防线，一举而形成了进窥仰光的态势。

蒋总统在腊戍接见了英国印度军总司令魏菲尔，并与由美国派来取道印度抵达该地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最初接谈；其后，即命令史迪威指挥入缅中国军队。

由戴安澜师长所率领的中国入缅先遣部队第二百师，赶到仰光北面约二百五十公里的同古，是在三月七日；而防守仰光的英军已经支持不到中国军的来援，便于八日轻易地放弃了仰光。

于是，由中英两军共同防卫中国南面联络口岸-仰光的构想，便为之打破。

为遏阻日军北上，乃由中国军防卫通往滇缅路的同古及平满纳一带，英军则担任伊洛瓦底江流域的普罗美以北地区防务。

然而，中英共同防卫却并非进行得很顺利。一个是指挥系统的问题——中国军为史迪威，英军为魏菲尔，互不统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英国所考虑的主要防卫目标，乃是印度重于缅滇。

防守同古的中国军第二百师，面对日军的进攻，在经过长时间的遏阻之后，始于三月三十日撤退到在平满纳预先构筑的防线，部署好迎击态势；然而在普罗美方面的英军则于四月一日放弃该地，拖拖拉拉地一路退却下去。

蒋总统当战况恶化中的四月五日，再度飞往腊戍，且更乘车南下到达曼德勒附近的梅庙，接见英方缅甸军司令官亚历山大，且要求英军固守着普罗美北方的泰陀庙（据日文音译），但亚历山大却反而坚主放弃。

座机遭日机追袭

蒋总统第二次的缅甸之行，被日军谍报网所侦悉，因而在腊戍受到二十架日本轰炸机的空袭，有一枚炸弹落在距离极近之处，但所幸没有爆炸。又自腊戍飞返昆明的归途中，复有十八架日本飞机追袭蒋总统座机，在危机间不容发之际，幸得中国空军飞机飞来援护。

此时，在继续退却中的英军，于四月十六日退到缅甸石油产地的仁安羌之际被日军所包围，中国军立即派遣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的一个团驰援，救出英缅军七千多人、车辆百余辆。

可是，由于分兵救援英军，以致中国军在平满纳战线上的战斗力因而减弱；日军乃即乘隙以战车开路自同古经毛奇、罗衣考，而迂回平满纳的东侧北上，于四月下旬直扑滇缅路最重要的地点-腊戍。

这是出乎中国方面意料之外的突击行动。因为在中国军所使用的地图上，并未记载有毛奇通往腊戍的公路可以通车。

四月二十九日腊戍终于失陷。

‘这一次，我们左翼空虚，使敌军得以窜进腊戍，实在是一个最大的遗憾！

‘但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教训——对于地图，必须特别注意研究，而且地图绘编时日要愈新愈详细愈好，举凡一切地形、地物、水、陆交通都不好有一点疏忽。……总之，地形不熟，交通通讯不灵，这就是我们最吃亏的地方。’（注）

戴安澜壮烈牺牲

其后，蒋总统指示史迪威迅调中国主力北上，使集结于接近中国国境的密支那及八莫方面。但史迪威则率领数万中国部队尚在缅北地区徘徊不定时，而八莫与密支那却已于五月九日相继失陷，遮断了中国军的退路。

于是，史迪威乃擅自撤往印度，而中国军第二百师师长戴安澜则留在缅北壮烈牺牲，一部分官兵正当雨季攀越泥泞路滑的山径回到云南境内；一部分迷失在密林丛莽中，直到八月才退往印度雷多，其间颇多因饥饿疫病而死。

中英联军在缅甸的抗日作战，就是这样地一再纷歧扞格而终于失败。

邱吉尔、史迪威之流

五月十日，邱吉尔发表演说，在战局方面，对于苏联和美国所肩负的任务加以称道，但却未有一个字及于中国军救援缅甸的战争，简直是完全抹煞。

‘邱吉尔的态度，对我国等于唾弃，以怨报德，徒有势利而无信义，固无论矣；而史迪威对我在缅军队亦掉头不顾，对余无一请示，亦无一报告，独自退避印度，此实出于人情之外。……’（五月十日感想）

于是，向中国输送物资的动脉-滇缅公路，乃被阻断。自此之后，则唯有依赖于由加尔各答经丁苏卡到昆明的航空路线，而必须要非常困难地飞越过有“驼峰”之称的喜马拉雅山。

注：蒋总统-“国军入缅作战经过和决心与我军对世界战局演变应有之认识和准备”（一九四二.五）

美机轰炸日本

在东南亚及西南太平洋一带的初期战争中，日军一路攻击前进，势如破竹。

一九四二年元月二日占领马尼拉，继之在婆罗洲及西里伯斯登陆，更继之进占关岛、威克岛乃至新不列颠岛的拉布尔。

二月间，攻陷新加坡，再侵入苏门答腊、山合里岛、帝汶岛；三月，更攻下爪哇、新几内亚、布干维尔岛；五月，及于瓜达康纳尔；六月，向北伸展登陆于阿留申群岛中的吉斯卡、阿图两岛。

在这个时期，日本海军机动部队更于四月间进展到印度洋，空袭锡兰西海岸的可伦坡及东海岸的亭可马里，炸沉英国航空母舰一艘、巡洋舰三艘。

至此，得以免于日本侵略的，只不过是澳洲和纽西兰等屈指可数的几处；而澳洲北部的达尔文港也自二月以来便已受到轰炸。

判断日军必败

‘从敌人袭击美国檀香山（夏威夷）和英领马来亚、南洋开始，到现在将近五个月了。在这五个月之中，可以说敌人天天在打胜仗，而我们同盟国家，则处处陷于劣势的地位，蒙受很大的损失！而且到了最近，敌人已经由太平洋发展到印度洋，印度、锡兰等地都被他轰炸，可以说敌人这五个月中真是一帆风顺，所向无前，获得了很大的胜利。

‘但我们仔细研究起来，就可以知道：敌人这种胜利是有限度的；而且他这时候占地愈广，则其将来失败愈快！……

‘敌人的侵略发展，顶多到今年（一九四二年）九月为止；过了九月以后，他必然就要失败。为什么会失败呢？因为无论就精神、物质与科学来讲，轴心国都比不过同盟国。——在精神方面，我们是被侵略的国家，是为反抗侵略而战，是为独立自由与和平正气而战，公理与正义完全是在我们同盟国方面，公理必可战胜侵略，这是决无问题；物质方面，德、日、义所有的土地人口与资源，不仅比不上同盟国，而且也远不及我们中国一国；讲到科学，日本与义大利赶不上英、美，德国的科学，虽然在学术上也许可以与英、美媲美，但因为物质缺乏，其制造发明的力量，也都赶不上美国。

‘敌人现在以空军侵扰澳洲，但每次遇到美国空军的截击，每次都归失败。因为他不能夺得制空权，所以他的海陆军不能作进一步的发展；不然，他必早已侵入澳洲了。

‘又如去年敌人利用他的零式飞机在我们后方到处轰炸、扰乱，我们的空军原有Ｅ十五、Ｅ十六式飞机，不能与他对抗；但到现在，我空军、美志愿队所用的四十号改良战斗机，与他零式机作战，一经遭遇，即被我军击溃。

‘现在，我们空军的数量虽少，但质的方面，我们早已超过他。最近我们又有一批四十五号驱逐机已经运到，其性能较四十号飞机更为优越，将来训练成功之后，对于敌人的零式驱逐机格外不难制服。所以，依我们同盟国空军进步的情形来看，敌人失败的时期已经提早，不必等到今年年底，只要到了九月以后，他就无法与美国海空军对抗了。……

‘总之，敌人现在最大的缺点——就是野心无餍而实力有限，占领的地区如此广阔，兵力愈益分散，必然无法防守。……’（注）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下午，重庆全市民众突然听到重大新闻而为之欢腾，这是截获到日本同盟通讯社的电报简单报导东京、横滨遭受空袭；继之，又报导名古屋、神户也被轰炸。

美机返航获我军民救助

最初轰炸日本壮举者，是美国陆军中校杜立特，他指挥十六架Ｂ二十五型轰炸机自航空母舰“大黄蜂”号起飞。

轰炸指挥，Ｂ二十五飞机全体飞向中国浙江省境内的中国军守备区域，机上人员跳伞降落，在八十人之中有六十四人为中国军队和民众所救助。

这一次的轰炸，是对陶醉于连战连胜的日本给予了痛击；同时，更是再次暴露了日本防卫力的脆弱程度。

此时，中国政府为应外国记者的要求发表声明如下：“此次空袭，当使日人深知——日本本土有被进攻之可能与联合国力量的强大，由此可以否定日本军部保证之言。”

‘闻敌国防卫司令部对于上（四）月十八日东京被炸之布告有：“被空袭而崩溃之国家世上实无先例可寻”之语，此殆指中国受其三年惨酷残暴之轰炸，而毫无动摇之象欤！

‘然吾料倭国之崩溃，必由轰炸开其端也。’（五月二十五日日记）

由于来自空中的突袭而狼狈不堪的日本军部，乃在惶遽中发动对两方面的作战计划～～一方面是在中国大陆亟谋打通浙赣铁路，一方面是在太平洋上的中途岛开辟战线。

在浙江方面，由于尚保留金华等数处中国飞机场，作为美军飞机空袭日本的返航基地，所以日军要打通浙赣两省的目标，就是在摧毁这些基地。

至于中途岛，乃是美国海军机动舰队极为重要的前哨基地。在这一次的中途岛作战，日本海军虽则是集中全力以赴，但却打了一场大败仗，成为决定在以后日本趋于败势的一个转捩点。

注：蒋总统-“国军入缅作战经过和决心与我军对世界战局演变应有之认识和准备”（一九四二.五）

废除不平等条约

为图攻占中国方面在浙江省所保有的飞机场，日军调集了以其第十三军（司令部设于上海）为中心的十万兵力由杭州向奉化方面进展。五月十五日（一九四二年），出动大部队并使用毒瓦斯进袭临时省会金华，于五月二十八日将之攻陷；继之至六月底，先后占领筑有飞机场的衢州、丽水、玉山（江西）等县。

日军同时并由江西南昌方面出兵东犯，夺去了浙赣铁路。

这一次的作战，日军扬言系对于轰炸其国土采取报复行动，故而滥施轰炸与破坏，以致中国官兵及一般民众之被屠杀者，达二十五万人之多。

可是，日军业已失去了维持其新占领地区的力量，所以只不过是在一个来月之后，便因受到中国军的反攻而后退；及至八月末，衢州、丽水等地飞机场又回到了中国军的掌握之中。

中途岛之战日军大败

另一方面，日本海军所发动的中途岛之战，则的确是生死存亡的决战。

中途岛是一个只有直径约十公里的环状珊瑚礁，但在地理位置上则是由夏威夷到东京的中站，设有航空、潜水艇、无线电通信等各种基地，为美国海军机动舰队要想接近日本本土的重要据点；也是可以直接进攻业已为日军所占领之威克岛的唯一基地。

日本大本营为谋确保在太平洋的制海制空权，早已立有“中途岛作战计划”，以期消灭在该岛的美军机动舰队及其基地。及至东京遭受空袭之后，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乃急遽将此一作战计划付诸实施。

这一次的作战，山本动员了联合舰队的全力，投入舰艇三百五十艘计一百五十万吨、飞机一千架、官兵十万人，在日军来说，是空前绝后的大战。

在对方，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由于在事先业已破译日本海军的电讯密码，乃以“大黄蜂”号、“企业”号、“约克郡”号等航空母舰为主体的机动舰队埋伏于中途岛附近的海上，等候日舰来攻。

六月五日，日本海军在不知美方已有埋伏的情况之下发动进攻；于是美国海军航空队立即果敢出击。这一场海战的结果，日本联合舰队损失了甚为珍贵的“赤城”、“加贺”、“苍龙”、“飞龙”四艘航空母舰，吃了一个大败仗。

‘日寇在浙赣尽力进攻，虽占有几个城市；而其最近在中途岛海军之损失如赤城、加贺各航空母舰均已沉没重伤，其所有之主力母舰几乎丧失殆尽矣。此岂得浙赣数城市所能偿其损失于万一乎！据此一点，日寇之失败可立而待也。’（六月二十六日日记）

东条隐瞒失败真相

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对于在中途岛打了败仗的真相一味加以隐瞒。东条一向以为“政治必须把群众当作愚人，如果让大家晓得了真相，就会使士气沮丧”。故而将实情遮盖起来。

但战局则以中途岛会战为转捩点而有了很大的变化——就是日本败北的趋势已成定局。然而，日本当局对于像这样的问题却仍然不让其国民有丝毫闻悉，便一路奔驰向毁灭结局的陡坡坠落下去。

此时，在太平洋掌握了主动的美军，已逐渐转移到反攻的态势。

六月对威克岛、七月对吉斯卡岛加以轰炸；八月七日在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康纳尔岛及屠拉吉岛突击登陆——点燃了反攻的火焰。

珍珠港之后还不到一年之间，日本侵略的锋镝便受到挫折，而胜负之数已经是无待蓍龟了。

中国国际地位升高

和日本的败势成反比例的，是居于四强之一的中国国际地位的升高。

最重要的一件事，乃是废除了早在中华民国建国之前就成为中国脚镣手铐的不平等条约。

在中国来说，废除租界及领事裁判权等侵犯中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乃是百年来务期实现的愿望；自从兴师北伐、统一全国之后，便再三和各国进行交涉，但因九一八事变等等因素而不能不为之停顿。但现在的中国，已成为联合国之一员而使各国改变了对他的认识；刚好在此刻的四月二十三日，纽约时报刊载出蒋夫人所撰“如是我观”一文，提到外国在华持有领事裁判权等特权。以此为发端，中国与美、英两国之间协商的废除不平等条约乃有了进展。

美、英两国送来有关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通告，正好是在双十国庆节前夕的十月九日。

‘接获美、英自动放弃治外法权之通告，此为总理（国父）革命以来毕生奋斗最大之目的，而今竟得由我亲手达成。中心快慰，实为平生唯一之幸事。’（十月十日日记）

十日下午四时，蒋总统在重庆夫子池精神堡垒广场举行的国庆节纪念大会上检阅青年团及国民兵，宣布这个可喜的消息说：

‘我国百年来所受各国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至此已可根本解除。国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亦完全实现。我全国同胞自今日起应格外奋勉，自强自立。’

同时，并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表达谢意：

‘几十年为中国争自由的奋斗中，继续不断地梦想中国终必成为一独立并且是民主的国家；今日理想已成事实。谨自内心感谢阁下卓越的领导、鼓励和协助中国在盟邦取得平等的地位。’

自由钟为中国而鸣

这一天，在美国费城独立厅的自由钟敲响了三十一下，对于真正走上独立之路的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国庆节遥致祝福。

英拒归还九龙

‘际兹不平等条约取销、外交胜利之时，应不失机宜推行战时生活，改造民众心理，转移社会风气，革除政治习性；至于发展经济，平定物价，健全新县制各级组织与省县各级参议会，亦宜同时进行。使人民能为国家服务，不失为现代国民，而得能与联合国各国之国民并肩作战，对世界战争能有所贡献，如此方不愧为独立自由国家之国民也。’（蒋总统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七日日记）

此时外交部将不平等条约的原文送呈蒋总统重行过目，他深深地感到每一条都是国耻的烙印。

‘北京政府之昏瞆，一至如此！百年积耻，桎梏重重，皆欲由吾一时代负责解除之，未知后之视今，作何感想也。’（十月二十三日日记）

中国和英美两国的谈判，终于达成废除了下列等项在中国一切特权的协议：（一）领事裁判权。（二）使馆界及北宁铁路沿线等区域所有的驻兵权。（三）租界。（四）租界内的特别法庭。（五）外籍引水人等特权。（六）在中国领水内行驶军舰特权。（七）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权。（八）影响中国主权之其他问题。

不过，在进行到改订平等新约的阶段，却碰上了阻碍——就是英国不肯放弃其在一八九八年所租借之九十九年期限的九龙租借地。

‘英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方案，闻已送出；照英大使函意测之，则九龙等租借地尚不肯放弃；而西藏之特权，当更不愿提及矣。然余决促其同时撤销也。’（十月二十九日本周反省录）

英国拒绝九龙租借地之归还中国，一直到预定签订平等新约之日～一九四三年元旦即将届临时，还是未能解决。

采取暂时搁置方式

中国方面终于只得决心让步，以将九龙问题暂时搁置的方式收拾局面。盖为避免因为九龙一个问题而使新约的缔结发生枝节，甚至是影响到联合国的团结。

‘晨五时醒后，考虑与英国订新约事。我虽不要求其对九龙问题作任何保留之约言，而彼反要求我声明九龙不在不平等条约之内，否则，彼竟拒绝签订新约。果尔，我政府惟有自动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声明，以不承认英国在华固有之权利；一俟战后，用军事力量由日军手中取回，则彼虽狡狯，亦必无可如何。此乃为最后之手段。如彼无所要求，则我待签字以后，另用书面对彼说明：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以待将来继续谈判，为日后交涉之根据。’（十二月三十一日日记）

‘对英外交，颇费心神，以九龙交换问题英坚不愿在新约内同时解决，余暂忍之。此实为对英政策与技术一大改变也。’（十二月三十一日日记本月反省录）

如上所述，中国方面虽则以将九龙租借地暂时搁置，作为让步，但英国方面却仍然片面要求延期，而美国也亦步亦趋。于是，平等新约乃不得不为之延期签订。

‘美英新约不能在元旦如期举行，乃为平生遗憾，更知外交被动之苦也。’（一九四三年元月三日日记）

当新约延期签订期间，日本和汪兆铭伪政权又演出了一幕滑稽剧——元月九日，伪政权对美英两国“布告宣战”；日本则与伪政权之间发表了徒具形式的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之所谓“新条约”。

‘美国对新约一再搁延，以致日汪先行发表伪废除不平等条约消息，殊为遗憾。一般人士虽明知伪组织为儿戏，然而中美新约继其后发表，未免因之减色。’（元月十日日记）

民国三十二年

中国与美国之间平等新约的签订，是在元月十一日。

在新条约上，对于原为中国领土的九龙租借地问题悬而未决；不过，国民政府则于签约的同时正式向英国提出照会，声明保留收回九龙的权利。

九龙（租借地）和香港（割让地）在地理上有着毗连关系，是必须同时解决的问题，而寄望于在将来解决。这的确是新约的一点缺憾，但总之平等新约于焉成立，中国已是和列强平等的独立国家，对于全世界的和平安定方面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关于这一点，在蒋总统于这一年三月所撰行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曾有详细阐述。

太平洋日军连连败北

另一方面，在太平洋地区的日军，随着一九四三年新年的来临，越发走向下坡。

二月间，日军在瓜达康纳尔岛遗留下战死、饿毙的二万五千具尸体而撤退；其后，在联军反攻之下，所罗门群岛及新几内亚东部的日军都陷于挣扎在死亡边缘的苦战境地；而且由于美国海空军之封锁，日军补给断绝，太平洋占领地区的食粮、弹药都已毫无存储。

四月十八日，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所乘飞机在所罗门岛上空被美军飞机击坠毙命13[44]2842。五月二十九日，阿留申岛和阿图岛的日本守备队全军覆没。

联军在太平洋一带恢复了制海、制空权，逐步夺回为日军所占领的一些岛屿，缩小了对日本的包围网。

蒋夫人访美

蒋夫人之赴美国访问，是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自珍珠港事件以来，已将一年；而日本之在太平洋战线，则正转趋于败北的情势。

青少年时代曾经留学美国的蒋夫人，是精通英语的中国第一夫人。在很多美国要人来访重庆而反映出中美关系日益加深的时候，蒋夫人替蒋总统传译，并且代表蒋总统与贵宾会谈，完成了许多重要的任务。

美国罗斯福总统对于蒋夫人的任务也加以重视，在这一年的九月、十月已经两度邀请她赴美国访问；盖衡诸时局，部署蒋总统和罗斯福的会谈比较困难，因而希望和蒋夫人直接交换意见。

这当然也是中国方面的希望。于是，蒋总统乃决定由夫人赴美，于十一月十六日致函罗斯福，请视同本人惠与洽谈如下：

‘内子非仅为中（蒋总统）之妻室，且为中过去十五年中，共生死、同患难之同志，对中意志甚明了，当非他人所能及。故请阁下坦率畅谈，有如对中之面罄也。’

先至医院治疗旧伤

蒋夫人于十一月十八日由重庆秘密乘飞机首途，取道阿斯马拉（伊索比亚）、阿克拉（加纳）、纳塔尔（巴西）迂回赴美；十一月二十七日抵达纽约，进入长老会医疗中心就医。盖夫人在五年之前的一九三七年十月自南京赴上海前线慰劳作战官兵，鼓舞士气，受到日军飞机的空袭，座车颠覆，当时负伤迄未完全治愈，自此之后健康欠佳；此次乃因罗斯福安排医院，故先迳行入院，彻底检查。

翌日，罗斯福夫人来院拜会，转达罗斯福总统“希望和为蒋委员长代表的蒋夫人对于战后问题多多交换意见”之意。

据医生检查结果，蒋夫人因多年辛劳而健康欠佳程度，出乎意料之外，须有较长时间的疗养。

慰问函一日千封

在住院期间，不断有来自美国各界的慰问，多的时候一天收到函件达千封以上，而邀请讲演的信，简直如雪片飞来。同行的董显光为接听电话处理函件忙不过来，甚至得雇用临时秘书帮忙；而且在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和纽约的总领事馆等处，也不断地有美国人登门，要求拜会夫人。

在美国国民如此热烈的友情之中，经过了七十多天住院治疗的蒋夫人，于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二日出院的同时，便以罗斯福夫妇的贵宾身分被迎往纽约郊外海德公园的总统别墅小住，准备赴美国各地访问的计划和演说的草稿。此时，蒋总统因夫人自美来电请示，曾于十二、十三两日连续去电指示演说要点及应向美国朝野呼吁之处。

二月十七日，蒋夫人在迎候于华盛顿车站的罗斯福夫妇响导之下访问白宫，遂即留居华盛顿十一天。

访问美国会发表演说

二月十八日正午，由罗斯福夫人陪同应邀访问美国国会，在参议院作十五分钟、众议院作三十三分钟的演说，大意如左：

“当一九三七年，日本军阀发动其全面对华战争时，各国军事专家咸认中国无一线之希望；但日本并不如其所曾夸称——迫使中国屈膝。于是，举世人士乃谓当时对于日本武力估计过高。

“虽然，自日本对于珍珠港、马来亚以及南洋一带加以背信无耻之袭击后，战争的贪狂火焰，弥漫太平洋上，而各该地域相继失守；一时观察，遂又趋向另一极端。世界人士由此遂视日本人为尼采所称之超人-在智力上和体力上均超越其他国人。……

“不宁唯是，就现行之流行意见而言则又似认为击败日本，为目前比较次要之事；而吾人首应对付者，则为希特勒。

“但事实证明，并不如此。且即为联合国家整个利益着想，吾人亦不宜继续纵容日本，使其为德玛克利斯头上之悬剑，随时可以降落。”

蒋夫人这次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说中，并强调：“中国四年半孤独无援的抗日战争，已经在中途岛和瓜达康纳尔岛的胜利得到了收获。”且力言：“盟军应改变偏重欧洲战线的观点，而以彻底摧毁日本之武力，使其不复能作战，始可解除日本对于文明之威胁”为结语。

受到举世尊敬

中国女性在美国国会演说，是以蒋夫人为第一人。

演说完毕之后，会场中的议员及旁听者全体起立，报以达数分钟之久的欢呼和鼓掌，送蒋夫人步出会场。当时从头到尾的情况，通过四家主要广播电台同时向全美国广播，报章也刊载讲稿全文。纽约时报的评论说：“不断的掌声、欢呼和赞美的评论，证明中国的第一夫人已经感化和无数人士倾心于中国。”罗斯福夫人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评述：“由此演说，可知蒋夫人不但因为是蒋委员长的夫人，而是由于她本人有其伟大性格和卓越劳绩，作为其人民的代表，受到举世的尊敬和重视。”

增进中美合作

蒋夫人在美国国会的演说，使美国对于中国的友好气氛大为升高。

二月十九日，蒋夫人出席白宫记者会，罗斯福同席说明：“如果美国人民了解中国情形，能够如蒋夫人了解美国情形一半的程度，则实在是可喜之事。美国将以更多的飞机供给中国，同时将要以中国为作战根据地，以打击日本本岛。”

此后不久，美军当局依照军火租借法案所设立的管理军需物资机构中，便增加了担任对中国方面的工作人员；又在众议院更有废除限制中国人对美移民的提案，且于十二月成立。

英国邀请蒋夫人往访

蒋夫人的演说，在英国也加以转播，博得很大感动。于是，英国驻美大使哈里法克斯乃衔英皇乔治六世及皇后之命于二十三日拜访蒋夫人，洽请可否赴英国访问；继之，英国外相艾登复于二十四日在下院正式宣布希望蒋夫人访英。

二十八日，蒋夫人离开白宫，前往纽约。三月二日在麦迪逊广场，三日在卡内基大会堂对满场听众发表演说；继之，更到卫斯里学院（蒋夫人母校）及波士顿、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各都市演说，呼吁重视欧洲战线的美国人要把目光投向亚洲太平洋-特别是中国大陆。这些演说，都是通过无线电广播传遍全美国。

六月十四日，赴加拿大访问四天，在加国国会发表演说，并与总理金氏会谈。

与罗斯福总统会谈

在访美期中，蒋夫人和罗斯福总统以及其阁僚多次会谈，就中美合作、战后世界秩序、国际防卫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

当时在欧洲战场，同盟国军队正要转为卷土重来的态势，故而在优先的次序方面，中国更被推后一步，尤其是美国陆军，对于在当前策划大规模反攻缅甸之举甚为消极；因此，中国方面乃派遣蒋夫人的胞兄-外交部长宋子文赴美交涉，而蒋夫人即便协助宋子文向罗斯福促请加强中国空军和缅甸战区以及增加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空运数量。

会谈结果电达重庆

关于战后问题，罗斯福表明了他的方案：（一）硫球群岛、东北、台湾将来应归还中国。（二）关于香港，其主权应属于中国，但似可划为自由港。（三）朝鲜之独立，可由中美两国共同担保等项。在后来，联合国处理战后问题的方案也就是以此为骨架。

六月二十四日，蒋夫人向罗斯福总统辞行，并作最后会谈。二十六日将谈话结果电达重庆，向蒋总统报告如次：

“一、罗斯福允派美军二师，赴缅作战，于九月准备完毕。

“二、邱吉尔对于由缅甸发动总反攻之事未必履行。

“三、关于大连、旅顺、台湾由中美海空军共同使用事，罗斯福表示同意。并谓俟中国方面准备完妥后，美军即可退出。

“四、罗四福之意，朝鲜可暂由中、美、俄共管。

“五、前国际联盟交由日本管理之太平洋各岛，罗斯福意，战后可由联合国接收，组织暂时共管。”

蒋夫人于六月二十八日结束访美事宜，自佛罗里达洲乘美国政府特备之专机，经巴西、南非返国。

在由喀喇蚩飞往重庆的最后一段旅程中，突然由地面发来一个很奇怪的电波信号，诱导飞机飞向日军占领的缅甸境内，但幸未上当。又在七月四日飞到重庆嘉陵江边的珊瑚坝机场降落时，碰巧蒋总统接到联络消息，说夫人的座机要在成都降落，故而自珊瑚坝乘机起飞到成都去迎接，以致两架飞机此起彼落，险些在空中互撞。

为“开罗会议”铺路

当天，蒋总统接到罗斯福电报：

“鄙人与蒋夫人交换之各种圆满谈话，蒋夫人当将告知于阁下。蒋夫人知鄙人之切望与阁下于今秋相晤与谈话也。鄙人深信吾人相见殊为重要，倘蒙俞允，鄙人将建议吾人相见于重庆与华盛顿之中途地点。尊见如何，并乞惠复。”

实则，罗斯福已先在六月间提议举行中、美、英、苏四强会谈，并邀请参加。蒋总统以时机不宜，未即应允。但此刻由于蒋夫人和罗斯福再三交换意见之后，罗斯福乃重行提出与蒋总统直接会谈的要求。

蒋总统在听取了蒋夫人访美的详细报告之后，遂于七月八日电复罗斯福如左：

‘阁下与内子谈话详情，已由内子见告。其谈话结果与所交换多数问题之意见，殊令人欣慰。

‘中（蒋总统）雅欲于最近将来与阁下相晤觌，盖多年以来中即望能与阁下聚首共商互有利益之各种问题。中兹建议：其时间则在九月以后任何时日皆最为适宜。其地点定为渝、华（盛顿）间之某中途地点亦完全同意。倘有提早会晤必要时，甚望能于中离华（中国）前至少十日惠予知照也。’

在这一年的十一月，蒋总统和罗斯福、邱吉尔为厘订大战后的基本方针而举行了历史性的“开罗会议”。这个会议就是由蒋夫人访美而敷设了路轨。

第十八章：美国的失策

主题

共党加强叛乱苏俄之狠毒毛泽东开始整肃中共种毒贩毒中美关系受伤害史迪威存心不良增强陈纳德力量史迪威之卑陋美国所获情报四强宣言中国准备提案开罗会议与罗斯福会谈美英观点的差距史达林阴谋得逞最艰苦的一年日海军濒于溃灭东条内阁垮台华莱士来华史迪威图取大权史迪威的鄙行美召回史迪威魏德迈直谅勤敏日军士气丧失日亟图讲和赫尔利的奔走苏俄伸出魔掌

共党加强叛乱

以颠覆国民政府为目的的共产党，利用太平洋战争的局势，发挥演技，加强了他的叛乱工作。

共产党有时和日军勾通，有时和苏联携手，更有时和美国左倾主义者拉拢，反覆不断地捏词宣传，专门从事于破坏国民政府的内外威信。其结果，连当时的友邦美国政府也受到迷惑，而肆应失策，表现出决定性的错误。

举凡中国大陆之落入共产党魔掌，乃至战后的南北韩问题、越南问题等亚洲和平所受到的威胁，都是从太平洋战争时期的共产党阴谋发端。

策谋离间，消耗战力

当珍珠港事件刚一发生之后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日，共产党便发表了“为太平洋战争宣言”如次：

“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固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合作。解决国共两党间的争论。恢复新四军、发给八路军饷弹。……加强南洋及各地华侨同胞的内部团结，反对日本法西斯的进攻。”

在这个宣言中，共产党虽则强调“和英美同盟”、“和国民党合作”，但实际上他们的所作所为，却都是在策谋离间中国和英美的关系，消耗中国一致抗战的力量。

现在，先从共产党的对内破坏工作来提起话头。

关于毛泽东在这个时候的搞法，请看后来在一九七○年五月五日莫斯科广播对他的论评如何：

“毛泽东利用他生活在延安的十多年中，来完成他独霸中国共产党的大权。他力图把全党的抗日行动冒为己有，保全力量，以便对国民党继续进行战争；因而他在实际上帮助了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数的牺牲，破坏了在那个时候迫切需要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

共军的援助日军，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便已经开始。

一九四一年五月，日军在晋南向中国政府军发动总攻击。在攻防焦点的中条山，政府军第十四集团军及第六十一军曾于上年十二月十度击退过日军的攻势。

此时，八路军（十八集团军）集结在晋北地区，对于政府军之被日军攻击却不仅只顾袖手旁观，而且还和日军并力夹攻，使政府军蒙受了很大的损害。

观火态度日军也感惊讶

对于这种情况，日军也大为惊讶，故而日军的广播中曾经提到：“八路军主力，于我军（日军）攻击重庆军（政府军）主力时，不但始终持隔岸观火态度，且出动游击队威胁重庆军侧面，并乘机解除败残军武装。”又在十六日自上海发出的合众社电讯中也有：“日本陆军发言人宣称：此次晋南作战，日军与共产军彼此并未攻击。”

这个情形，在美国国内也引起了话题。华盛顿明星报发表社评说：“中国共产党可以背弃蒋委员长，转而帮助汪兆铭。”

是故重庆大公报乃于五月二十一日发表社评，指出：“八路军何以不和政府军协同作战？”而对共产党表示疑问。想不到周恩来却致函该报主笔张季鸾、王芸生，指其报导与事实不符，藉示抗议；并捏造八路军的“战果”，大事宣传，以掩护其叛乱工作继续进行。

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共产党仍复勾结日军，频频袭击政府军的侧背。

‘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底，湘西及鄂西之战，三十三年平汉路南段之战，中共将我国军的军事部署与作战计划通过日军特务机关交给日军。中共企图诱导日军深入中国抗战大后方之华西，使共军得以乘机突破国军的封锁线，向西北扩张其地盘；并且再进一步，与日军夹击我川黔抗战根据地。’（注）

毛泽东感激日本皇军

日军之侵略中国，给共产党带来了什么样的利益，在毛泽东本人的谈话中曾经有所表明。～～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他在北平和日本社会党籍国会议员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人谈话，透露了他的内心如下：

佐佐木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非常抱歉。

毛泽东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

佐佐木谢谢！……

可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却是处于必须不为共军的挑衅所乘而避免与之正面冲突的立场。

‘共匪猖狂之目的，在引起内乱，破坏抗战局势，减低政府威信与丧失国家在国际上之地位。故其唯一阴谋，在激怒我向匪进攻；如我进攻时迁延不决，则匪势更张，国际舆论对我更劣；如我速战速胜，则匪不过迁移地区，不能根本消除其匪党，而我国内战既起，复不能根本解决，则国家威信仍有损失。无论胜与不胜，而一经用兵追剿，则彼之目的达矣！

‘故对匪决策仍取守势，围而不剿，必须用侧面与非正式方法矣制之；万不宜公开或正面的方式以求解决也。’（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一日日记）

注：蒋总统-“苏俄在中国”（一九五六.十二）

苏俄之狠毒

和中国共产党并驾齐驱而自日军对中国的侵略中获得利益者，乃是同盟国一分子的苏联。

苏联对于外蒙古一直抱有领土野心，在前面已曾屡次提到。他自从一九四一年四月和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片面地漠视中国主权，而对于由他们所各自割据之外蒙古和东北四省制造出来的伪国家互相予以承认之后，复藉六月间德、苏战争爆发的机会，更进一步将原已占据外蒙古一部分的唐努乌梁海予以并吞，满足其控制外蒙的奢望。

可是，苏联的野心却并非以囊括外蒙为已足，而是更在向中国西域的新疆省继续扩张。

企图支配新疆的阴谋活动，是始于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之际的一九三一年。及至一九三三年，侵入新疆的苏联军队策动政变，拥立盛世才为督办，派遣俄人以顾问为名进入各政府机关；其后，更要盛世才赴莫斯科，加入了国际共产党。

继之在一九四○年十一月，复胁迫盛世才签订“新疆锡矿租借条约”。其内容包括有铁路、公路的筑路权和采矿、居住以及武装警备队的驻留权，是一个骇人听闻的不平等条约。

在做好了如上所述对于新疆的一些侵略步骤之后，便于偷袭珍珠港五个月之后的一九四二年四月发动“苦迭打”，准备搞垮盛世才。这个苦迭打是由苏联驻新疆领事巴克宁（据日文音译）和其特务机关所策动，盛世才的胞弟盛世骐（新疆机械化旅旅长）乃被暗杀陨命。

盛世才归顺中央

（民国三十一年）

于是，感到自身已有危险的盛世才乃于七月七日具函通过第八战区（甘、宁、青三省）司令长官朱绍良转达中央，向政府归顺，请求保护。

‘本日中午，由朱（绍良）长官转呈盛世才来书，叙述彼与俄国一切秘密交涉之经过，详尽无遗。于是俄国在新疆全部阴谋根本暴露，而其一九四○年十一月间迫盛签订之“新锡协定”，比之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者尤有过之。此种举动，昔日倭寇对东北张作霖所未能为之者，而俄竟为之，其狠毒可谓帝国主义之尤者矣！

‘我国何不幸而至此——东受倭患，西遭俄毒，而英国在我西南百年来杀人不见血之阴谋13[62]2860（控制西藏），早已根深蒂固。

‘若不有此五年来之对倭血战，则今日之新疆决不能使盛世才忏悔归诚，于此可证明公理与正义必能战胜一切矣！’（七月十一日日记）

国民政府于是便立即将新疆省纳入第八战区，派军援助盛世才；同时，蒋总统并于七月十六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告以凡关涉新疆与苏联之间的政治、经济事项，应由中央交涉的方针。

蒋夫人赴迪化宣慰

继之，由蒋夫人于八月二十日前往新疆省会迪化宣慰，对盛世才指示：（一）调派甘肃境内政府军由兰州进驻安西、玉门，牵制在哈密俄军。（二）委派新疆外交特派员，将外交权收归中央。（三）肃清新疆共党。（四）着俄军退出新疆等项。

继之，由蒋夫人于八月二十日前往新疆省会迪化宣慰，对盛世才指示：（一）调派甘肃境内政府军由兰州进驻安西、玉门，牵制在哈密俄军。（二）委派新疆外交特派员，将外交权收归中央。（三）肃清新疆共党。（四）着俄

蒋总统本人也于此时莅临西北巡视，八月二十八日在邻接新疆的青海省会西宁接见马步青、马步芳兄弟，他们原在河西（甘肃境内的黄河以西地区）的驻军，已撤回到青海中部的柴达木盆地，从事屯垦。蒋总统指示他们合作共济，开辟公路，建设飞机场。

于是，和新疆邻接地区防卫与开发的基础乃为之确立。

其后，新疆的收复工作进行得颇为顺利。正在这个当口，欧洲战线方面德军进攻俄军，追奔逐北，展开了所谓“史达林格勒攻防战”。虽则此一战役相持到翌年（一九四三年）归俄军获得最后胜利，而决定了德、义轴心集团的败势，但在苏联方面，却是因而无暇兼顾到新疆的问题。

国民政府最大之成功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蒋总统在这一年的总反省录中记述如下：

‘新疆省主席兼督办盛世才于七月间公开反正，归顺中央，河西走廊马步青军队亦完全撤回青海。

‘于是，兰州以西直达伊犁直径三千公里之领土（古代亚欧主要交通路线所经过之地区）全部收复，此为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其面积实倍于东北三省也，此不仅领土收回而已，盖新疆归诚中央以后，我抗战之后方完全巩固，日本更不能再有消灭我政府之妄图；而俄国与中共之态度亦大为转变，不敢复为我抗战之害。此非上帝赐予中华民族之恩泽决不至此也。’

一九四三年四月，苏联政府同意将驻在哈密的红军第八团与武装警备队撤走；六月，中国政府军进驻哈密。

在这个期间，莫斯科并且发生了另外一个重要事件——就是于五月二十二日宣告解散为各国共产党司令台的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之所以解散，是受了美国力量的影响。因为美国注意到在共产国际指导之下的中国乃至各国共产党所策动的叛乱工作，故而以对苏联给予军事援助为交换条件，压迫史达林将共产国际解散。

‘此次俄国取消第三国际，乃积极与美合作之表示，日本必知之甚明也。’（五月二十六日日记）

解散共产国际，在形式上是削弱了莫斯科的领导力；但这个时候的中国共产党，实则已在推行“整风运动”，而逐渐形成为共产国际所难以控制的状态。

毛泽东开始整肃

中国共产党的所谓“整风运动”，是从一九四二年二月开始连续进行了三年的整肃斗争工作。

是年二月一日，在延安共党中央党校所举行的开学典礼中，毛泽东以“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为题所发表的演讲，是为此一运动的发端。他说：“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他是以“马克斯思想中国化”和“思想革命”为藉口，发动了整肃反毛泽东派的行动。

整倒王明等国际派

整风运动的最后目标，是要集中权力于毛泽东一手掌握。盖所谓“思想革命”，就是要把毛泽东思想强迫加诸他人；也就是要整掉王明等国际派。

当时，苏联正忙于应付欧洲战局，共产国际对于各国共产党的影响力逐渐微弱；加以由共产国际派回中国的王明，又非史达林的直系，而且被视为王明后台老板的布哈林（前共产国际主席）已经于四年前被史达林整肃处死，以致王明业已失掉靠山。是故毛泽东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对莫斯科反抗，是不会有问题的。

在演说中，毛泽东极力挖苦知识分子，批评留俄归来的舆论家们是——“只要认得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一不会耕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并指责：“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不如狗屎。”

实则，这些留俄学生，就是王明等国际派的中心势力。

此时，毛泽东的整风运动，是由刘少奇和操纵特务机关的康生作其爪牙，为之推进。

“言者无罪”成陷阱

据共党中央秘密发行的“延安防奸经验介绍”等文件，整风运动的进展经过如下：

在整风学习第一阶段的一九四二年三月至六月间，举出“自由想、大胆讲”的口号，向基层号召“议论纷纷，言者无罪。”

于是，对此号召信以为真的共产党员们，乃各抒所见，畅所欲言，诸如伪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王实味作家丁玲、萧军等人都尽情发泄了对共党和对生活的不满。

王实味、丁玲、萧军

六月间进入第二阶段，展开了对反党集团的批判斗争，指王实味等人为“反革命知识分子”，立即举行斗争大会。结果，王实味被囚禁到一九四七年而后枪毙；丁玲在集会中自我批评，虽得幸免于难，但到了一九五七年还是被下放劳改，有一时期被派在北平人民大会堂擦地板，以后不知所终；至于萧军则在后来被流放到东北的露天煤矿做苦工，折磨到一九五八年死亡。

接着，毛泽东又发动了“坦白运动”，强迫所有党员要将自己的祖宗三代作交待，反省自己的历史与思想，坦白自己的错误。因此，许多知识分子、青年学生都被逮捕处刑。

整风运动的第三个阶段，是以“反奸斗争”为藉口，审查党的干部。

为了这个“反奸斗争”，只延安一地就训练出八千特务人员参加工作，自一九四三年四月至十二月中旬，以群众运动的方式雷厉风行，奖励党的干部们互相告密，将被告发的人拖到群众集会上，软硬兼施，胁迫认罪。

毛泽东就是通过这些运动将对他不满的党员扣上“外国特务”、“国民党特务”、“托派”等各种各样的帽子，予以整肃。其人数，在延安一地便有二千多人，而整个边区则达数万人之多。

坦然自承残杀干部

如此大量整肃的事实，共产党虽然是一意加以隐瞒，但却料想不到会由毛泽东的嘴里滑了出来，使他的残酷事迹传遍了全世界。这就是印尼共产党书记长艾狄于一九六九年访问北平时，毛泽东劝他“消灭一些反动的军官与将领”，所以现身说法向他夸耀自己的经验说：“我在陕北时，一下子就消灭了两万名干部。”

又在一九六九年的七月二十六日，莫斯科的华语广播对毛泽东曾有论评如左：

“历史上所有暴君的残酷性，都比不上毛泽东的罪行；而最令人惊奇的是——毛泽东认为：没有必要掩盖自己的罪行，逃避自己的残酷性。

“一九五八年，他在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上讲话时说，我肯定的说：我们比秦始皇强大，他埋葬了四百六十人，而我们埋葬了四万六千人，比秦始皇多一百倍。我同某些民主人士争论过，他们称我们为秦始皇暴君。总的来说，我接受他们的指控。”

和如此腥风血雨的整肃同时在进行中的，是毛泽东强迫其全体党员进行整风学习，以谋改造其思想。他在各机关中组织学习委员会，指定以四个月为一期，学习他所讲述论着的二十二个文件，并且要在期终举行考试。

毛泽东通过“整风学习”所要贯彻到底的图谋，就是注入他本人的思想，而将他自己“绝对化”与“神化”。是故在等到整风运动告一段落时所举行的共产党七全大会中，便向刘少奇提案修改党章，把毛泽东捧为“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在党章中插入了一句——“以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针”。

整风运动在上述过程之后，复继之于一九五四、一九五七年反覆进行，乃至于一九六五年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以及“批林批孔”，也都是一种“整风”，换言之，就是一种权力斗争。在每一次的运动中，都有很多反毛泽东派被搞垮，被杀戮。结果，在共党政权下的中国人民，则都是被“批判毛泽东就是犯了死罪”的高压统制所闭锁着。

不如狗屎的教条主义

还有更奇怪的事，乃是在整风运动的当时出自毛泽东亲口批判为“不如狗屎”的“教条主义”，现在却是公然肆行无忌——这就是“毛泽东语录”。只要是毛泽东的一句话，就超过了上帝的金科玉律，而强制着人民照他的话行事。

中共种毒贩毒

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是对于人民注入毛泽东思想，一方面却是从人民那里肆行经济榨取。

在他们根据地的延安，从旁观的立场看来，表面上好像是颇为热闹——盖将征敛自人民的钱财分配于军事优先而洋溢着一种军需景气；至于一般人民则是为极端的物质缺乏所苦。

搜刮农产滥发伪币

布满共党势力的陕、甘、宁边区一带，土地贫瘠，气候恶劣，在农工业发展方面都是非常困难的地区，人们生活本来就并非优裕；而共产党却是以“公粮”的名义向民间尽情搜刮微薄的农产品。据共产党所发表的数字～～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年之间，粮食生产增加百分之一百三十，而征收公粮却高达百分之七百以上。农民越努力增产，则其被搜刮的粮食越发是超过了比例，其生活也就越发陷入苦境。

尽管如此，共产党还是不能满足，他们擅自印刷纸币流通市面，实则只是一种在财政上毫无准备金为之保障的纸片。其所经营的“光华商店”也都印行一种所谓“光华票”，在搅乱着社会经济。

共产党最大的财源，是秘密贩卖鸦片。

鸦片的毒害，在这里毋须再加赘述，国民政府业经下令严禁，然而共产党却在其各根据地内施行“烟土税征收与管理暂行办法”，设置秘密贩卖机构，奖励种植罂粟。

二十七县种植烟苗

被选择为种植烟苗的地区，是晋北、陕北等交通梗阻的内地，达二十七县之广，不过，毕竟也还是要避免为外人所看到。

单是靖边县内种植面积即达三千六百多亩（一一四公顷），杨桥畔一带烟田连绵三十公里。

自烟苗之种植到鸦片之贩卖，都归共产党直接经营，每一个村庄都设有管理人员，罂粟种籽由共产党无限制收购，以备下年增产的需要。但所谓“收购”，却很少是拿现钱收买；例如在靖边县，每收缴一升烟籽，则折算为抵缴五升米的“救国公债”。

种植鸦片时，连共军都被动员——在葭县的倍子镇、亚水坑镇派有第四纵队大量种烟；而延安方面，更将老弱残废士兵组成“种烟工作队”，担任作业。

共军为运毒作保镖

还有确保鸦片贩卖路线，也列为军队的任务之一。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派遣兵队，负责为商人护运鸦片，以防土匪袭击掠夺，商人因此向共军缴纳保运费每两烟土九十元，而共军则每月向边区伪财政厅缴纳一百二十万元。此外，伪财政厅更征收每两烟土登记费七十五元，过境税二十元。

这些鸦片，在共军援护之下运到华北日军占领的沦陷区销售。据在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馆于一九四三年九月四日向其国务院报告：

“在山西共产党地区种植的鸦片，差不多都是向敌人（日军）控制区域出售，所得之金钱，用以垫支共产党的岁收，维持共产党发行的货币，和购买日军占领区的物品。”

一九四三年四月，国民政府内政部为调查陕北种植鸦片的情况，两度通知萧劲光要派遣调查团前往，但萧劲光却在复文中硬说是“早已禁绝”；并且表示：“边区查禁之责，应由边区自负，贵团如专派大员，恐系徒劳。抗战人力，自宜用俭，是否之处，尚祈鉴谅。”而拒绝调查团进入边区。

其后，在共党区内种植鸦片，更日益旺盛。当时，被派在延安担任共产国际联络员的伏拉狄米洛夫（中文名宋平）于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在他的日记中记述如下：

“外国记者将要来访延安，中共领导阶层面临了未曾预料得到的困难——就是‘解放区’正在致力于鸦片的生产，到处是烟田，播种既已开始进行，那里还能掩饰得了？几百公顷的烟田都已经下了种，罂粟花就要盛开了，这可不是庭园中的花朵！

“三五九旅已经被派去铲除由旅部驻地到延安沿途的罂粟园，第一旅也在做同样的作业；黄河东岸的第一二○师管辖区域，在匆遽中止种烟。那里也是预定受外国记者团访问的地区，正大事匆忙地在为欢迎仪式和答覆问题作准备。”

在整个的对日抗战期间，毛泽东所一直考虑的，是如何加强自己的力量，如何尽其可能颠覆国民政府。他勾通日军，一意保全自己的军队；他藉整风运动，夺取党内权力；他种植鸦片，榨取人民。——这一切的策谋和暴行，都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尽力中伤国民政府

对于局外人，毛泽东也是极其巧妙地做得面面俱到。

在国内，尽量拉拢所谓中立者，诸如左倾知识分子、地主、民族资本家、失意政府官吏、旧军人等有力人士；在国外，则为谋增加对于共产党的同情分子而大事宣传。

其宣传重点，在于中伤国民政府及鼓吹共产党有理。譬如说，即使是毫无根据的流言，只要能对国民政府的形像加以糟蹋，则相对地就可提高共产党的评价。还有，为了使在其控制之下的人民对于共产党的不满能够转移目标，也有必要把别人形容成丑陋不堪。

共产党所选择为其对外宣传谋略的对象，当然是美国。他们多方活动，为坚固团结的中美关系制造嫌隙，伤害美国对国民政府的信心。反覆不断地恶毒宣传，给予美国舆论影响匪浅，因而产生了导致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发生偏差的严重后果。

中美关系受伤害

企图伤害中美关系的共产党阴谋，是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着手。

美国的“太平洋学会”

被共产党利用为工具的，是美国太平洋学会（成立于一九二五年）及其关系团体。后来，在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中，曾经公开指出——太平洋学会的本质，乃是国际共产党的宣传机关。

在这个学会成员中，引人注目的是包括有身为罗斯福总统行政助理、而多次到过重庆的居里，以及由国务院派来中国供职的外交官范宣德和谢伟志等人；又由美国推荐给蒋总统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也是该会的一个会员。至于中国人则有共产党的冀朝鼎，日本人则有因索尔治间谍案而被检举为苏联间谍的尾崎秀实与西园寺公一等人，也都参加了该会。

太平洋学会人士，利用“太平洋评论”以及三十多种传播工具发表了五百多篇论文，反覆宣传：“中国共产党是土地改革者”，“不是所谓马克斯政党”，“与苏联无关”；以及“延安是民主中国，重庆是封建中国”。这些宣传，乃是他们的惯用伎俩。如果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本质业已大白于世的今天，当然就不会为人所理睬；可是在当时，对之信以为真的人，倒是不在少数。

罗斯福亦受其影响

一九四一年初，美国罗斯福总统本人，就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受了他们宣传的影响。

在这一年的元月间，罗斯福派遣居里来华访问时，便曾交他转致蒋总统一封信，其内容是这样的：

“在万里外的我们看来，中共似乎是我们国内所谓的社会主义者。我们赞同他们对农民、对妇女、对日本的态度。据我看：这所谓共产党与国民政府之间，相同之点殆多于相异处。我们希望双方消泯歧见，更密切地合作，俾有利于对日本作战的共同目标。”

蒋总统的忠告

此时，居里表示希望和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及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会面；因此，蒋总统乃在他与周恩来等人见面之先，告诉他不要被共党分子的花言巧语所骗，并为之说明共党的本质如左：

一、各国共产党的作法不同，并利用种种策略以推行其政策；但第三国际对于他们一切都加以控制，毫无例外。各国共产党的工作，不是为自己所属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第三国际的利益。一旦中国的政策和第三国际的目的发生冲突，则中共必会尽其全力背叛其祖国-中国，破坏中国的政策。

二、第三国际反对中国对于英、美俩国的密切合作，特别是他们不愿见中国与英、美两国立于同一战线上，这是他们不可变易的政策。

蒋总统并曾叮嘱居里，希望他将上面两点转达罗斯福总统。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三日，蒋总统因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调职归国前来辞行之际，也在临别谈话中向之说明共党实情，并请忠告罗斯福如次：

‘中共决非如其在英、美所宣传者——为如英美之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者然，此乃其欺世之言。须知中共自抗战以来，借抗战为名，一面发展其组织，一面削弱我政府之实力，同时力谋我政府抗战之失败；而其目前之策略，则专欲为离间中、美之感情，使美国援华不力，而使中国对美忽怼，彼乃从中施挑拨之伎俩，先使中国孤立，转而倾向俄国。中共实为第三国际在中国之第五纵队，完全为一卖国之汉奸集团。’

可是，像这样的忠告，结果并未能为美国方面所听得进去。盖美国之重新认清中共本质，则是为战后之事；而在当时的白宫中，居里自认为“中国通”，居于能够发挥其影响力的地位。

至于希望美国推荐政治顾问一事，蒋总统原属意于美国驻苏联大使蒲立德，认为是最适当的人选；但居里则意见不同，结果推荐了太平洋学会的拉铁摩尔。拉铁摩尔曾以“太平洋评论”编辑人的立场从事过反中国政府的活动，而罗斯福则连这些情况都不知道，便接受了居里的推荐，于六月二十九日派他来担任蒋总统的政治顾问。

在拉铁摩尔背后站的是共产国际，乃属确切不移的事实，其证据是在这个人事公开之前的六月十八日，苏联驻美大使乌曼斯基已经在华盛顿的拉铁摩尔共进午餐，密谈两个小时，转达共产国际指示的事实。

范宣德和谢志伟

共产党更向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外交官员展开活动。据后来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所提出的“太平洋学会调查报告”中，根据当事人之一的谢志伟供词而有以下的记载：

“美国外交官范宣德和谢志伟，大约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和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林彪会晤。会谈时，这两个共产党告诉范宣德和谢志伟，他们希望美国对中国情势采取行动如下：

“（一）运用美国对国民党的影响力，以改变情势。

“（二）重申美国希望看见中国‘有真正的民主’。

“（三）承认中共是对抗法西斯作战的‘参战者’。

“（四）美国对中共的补给品拨一部分给中共。”

在这样的活动之下，于是，美国驻重庆大使馆便成了“反国民政府”外交官的根据地。以致在一九四四年出任大使的赫尔利乃不能不将已成为共产党利用工具的十一个驻华大使馆官员调回美国。

史迪威存心不良

由美国派遣前来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也就是被共产党所欺骗的一个人。像能这样在盟军方面握有很大职权的人，竟然未能认清共产党的本质，就这一点而论，即使说是为中国大陆在战后之被共产党所攘窃做了打底子的工作，也并非是过甚其辞。

史迪威和中国的渊源颇深。

他最初踏上中国的土地，是在一九一一年，也就是中华民国开国的辛亥革命之年。那时，他在中国虽然只停留了短短的两个星期，但目击革命情况而对中国寄予关心。自此之后，直到被派来中国膺任战区参谋长，其间曾经三度在驻华美国大使馆以及驻天津美军服务，在中国生活先后总计十年，能说中国话，成了一个所谓“中国通”。

早与共党有接触

他之和共产党有所接触，是始于一九三八年担任美国驻华大使馆陆军武官时代。替他搭线的人，是属于苏联间谍组织“索尔治机关”一员的美国女作家史茉特莱，和狂信共产党的美国陆军少校卡尔逊。史茉特莱颇为向往朱德，曾经长期逗留在延安，撰写过一篇朱德传记-“伟大的道路”。至于卡尔逊，则是后来于一九四五年由美国共产主义者所推进之“让美国青年复员”运动的远东领袖，是对毛泽东之占据大陆帮了大忙的人。

及至史迪威死后的一九四八年，才有一件事大白于世——就是他早在一九三八年当时便已有“称赞共产党”的报告送到华盛顿，并不断地在中伤国民政府。

及至一九四二年，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对于国民政府自始就存有侮蔑性的偏见。

史迪威在中国战区的最初作战-缅甸战役，便遭遇了失败，一度撤退印度，旋于一九四二年六月三日回到重庆。

翌日，蒋总统即予接见，研究缅甸战局失败的因素。史迪威却只顾说“空军不足”，并把中国军队的指挥官贬抑得一钱不值，而自始至终没有让人看到他是站在战争大局方面有所检讨。

滥用职权处处为难中国

像这样的史迪威，美国除以之为“中国战区参谋长”之外，更赋予“美军驻华代表”、“租借物资监督管制”、“美国驻华空军指挥官”等任务，给予极大权限。而他则滥用其职权，沸腾着要将中国军队置于一己指挥之下的权势欲。

本来，美国供给英、苏等国的租借武器，都是交付各该国家的负责人自己管理的；可是对于中国却另作规定而交由史迪威担负其管制权责。其因素，盖系出于置身美国政府的亲共主义者们藉口“如果将管理权限交给国民政府，则其物资或将不会被分配给共产党”而表示反对之结果。是故在中国方面自始就未曾被征求过同意。

就长期战略而言，武器的分配与补给，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最大因素之一。然而将这个权限据为私有的史迪威，竟然至于做到了中国为难的地步。

在这一方面最初造成问题的，是配属于中国战区而驻在印度的美国第十航空队之被调往埃及。对于这个调动，史迪威未经报告战区统帅（蒋总统）便遽行给予许可，而于全部飞机起飞之后的六月二十六日，才作“事后报告”。蒋总统对于他这种越权行为加以责询，史迪威于是便张大其辞去电罗斯福报告：“蒋委员长甚为愤怒。现在盟邦对于中国战区是否尚有兴趣？他希望对于此点有一是或否的答覆。”

宋子文的愤慨

这个当口，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刚好在华盛顿作促请运交武器的交涉，这是因为美国允许供给租借物资实际运到中国的还不到十分之一。然而，相信了史迪威说辞的美国军部却向宋子文表示：“在印度堆积物资甚多，自七月份起停止续对印度输送。”宋子文毕竟忍无可忍而愤怒地答以：“既然如此，我们在华盛顿已经没有意义，当将中国在美有关机构关闭，所有人员立即命令回国。”出现了中美关系颇为紧张的一个场面。于是，罗斯福乃亲电蒋总统，略以：“保证美国及其同盟国均确信中国为共同作战之重要分子，美国第十航空队飞机之调赴埃及助战，乃一临时措施，不久即当调回。”问题始得解决。

可是，史迪威却仍然是存心不良，故意为难。～～六月二十九日，蒋总统命令他转达罗斯福三项要求：“请调美军三师到印度，和中国军协力夺回缅甸交通线；自八月初将中国战区空军飞机增加到五百架；自八月起中印空运每月应保持五千顿之数量。”而史迪威却无意申请，将之搁置一旁。

此外，蒋总统又曾命令中美合办的中国航空公司将由美国拨给中国空军使用的运输机拿出两架来移交政府机关航空委员会，但又为史迪威所拒绝。他的主张是：“美国租借物资之移转，是我的职权；蒋委员长是在所有权移转之后，才有对是项物资的处分管理之权。”

有损中美合作的荣誉

还有，紧接在此事之后，史迪威更密电马歇尔报告：“为使我们的任务有真正的成效，必须限制蒋介石的权限。”并提出：“未经史迪威主持之教练处（设于印度蓝伽之训练所）所推荐的中国军官皆应解职”等六项条件；同时建议：“蒋介石如不予承认，则应采取调回美国在华军事人员、停止华军装备，将在印度的援华物资移送英国等强硬手段。”这样的建议，就连马歇尔毕竟也感到未免过分，而未予采纳。可是，史迪威这种想藉租借物资的压力来攘夺中国军政大权的意图，不能不说是使中美合作的荣誉为之蒙受了一层耻辱。

在罗斯福总统方面，也由于有关史迪威问题的困扰，感到头痛，结果乃派遣其行政助理居里再度前来重庆，谋求协调。

增强陈纳德力量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一日，美国总统行政助理居里抵达重庆，停留了十六天。

此际，居里向蒋总统提出：“史迪威是参谋总长马歇尔的亲信人员，惟中国如有要求，则可以考虑更迭。”蒋总统则答以：

‘史迪威为我的参谋长，总是我的幕僚，而他动辄行使总统（罗斯福）代表职务，使我不知应以何种身分相待。

‘至于申请五百架飞机之事，他不遵令申请，又不将不能申请之事由向我报告。我对物资向不重视，如果重视，则早予日本以可乘之隙。总之，我请美国推荐联军参谋长，自始即无藉是猎取美国物资之意，此点望君（居里）报明罗斯福总统。至史迪威应否调回，则是美国政府之事，我决不表示意见。’

居里了解了实情，乃在返美之后，于八月二十四日向罗斯福提出更迭史迪威的建议。

这段期间，在太平洋战线的美军已因六月间中途岛海战为契机，扭转战局，开始反攻。于是，美国陆军方面乃拟具反攻缅甸计划，定于十二月为发动时期。故当罗斯福以更迭史迪威之意商诸马歇尔之际，马歇尔则以行将反攻缅甸的理由而表示反对，结果只得作罢。

史迪威所中伤的对象，不仅止于中国军队；就连在中国战区有空中英雄称誉的人，就是由美国退役空军人员所组织的飞虎志愿队指挥官-陈纳德，也被他当作一个眼中钉。

威尔基访华方知真相

飞虎队遵循华盛顿的方针于一九四二年七月四日改编为“美军驻华空军”，陈纳德本人也恢复了现役，并晋升为准将，以美国空军高级指挥官的身分留在中国。可是，在史迪威的方针之下，陈纳德部队的增援与补给都被置于缓办，而且更使他隶属于驻印度美军第十航空队，不得自由行动。陈纳德虽曾屡次要求加强战力，但史迪威都是以对缅甸方面的陆军为优先的理由予以拒绝。

而且料想不到这些实情史迪威都壅于上闻；而在他向华盛顿送出的报告中，则是说：驻华美国空军业已加强。

一九四二年十月，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威尔基来重庆访问，陈纳德毅然决然地向威尔基陈述了驻华空军的窘困状况，这才表明了真相。

威尔基得知驻华空军力量比他在华盛顿所听说的要弱小得多，感到非常惊异，便要陈纳德向罗斯福实情实报；于是，陈纳德即面交威尔基一份上陈罗斯福的说帖，其内容有：“如果让我有指挥在华空军的全权，而给予一○五架驱逐机、五十架中型轰炸机、十二架重轰炸机，并配属以足够的补充及补给，可在六个月到一年之内将日本击灭，使战争结束。”

由马歇尔处得知说帖内容的史迪威乃对陈纳德颇为不满。他于二月九日（一九四三年）向马歇尔建议：“美国对华援助须采取交换手段，对蒋委员长应表示严厉的态度。”

罗斯福总统裁决

可是，罗斯福在收到由马歇尔所转呈的史迪威建议之后，则于三月八日对马歇尔告诫如下：

“我深觉史迪威所提对待蒋委员长的办法大有错误。……

“我们要知道——蒋委员长经历过多少艰辛，才得为四万万人民的领袖。……他是一位行政首长而兼统帅，岂可用对待摩洛哥和苏丹首长的办法向其作严厉声口。……”

此时，罗斯福并电告重庆——将陈纳德的空军扩编为第十四航空队，使之独立，并使其早日增加到五百架飞机的数额。于是，第十四航空队遂即于三月三日正式成立，陈纳德晋升少将，握有指挥权。

但掌握着物资管理权的史迪威，则坚持对缅甸陆军应予优先的主张；他和陈纳德的对立，到了最后只有让罗斯福总统来作裁决。

四月底，罗斯福召史、陈二人回到美国，听取双方的意见。

于是，他们的对立乃被提出于五月间在华盛顿所召开的美英参谋团会议。中国代表宋子文和史迪威、陈纳德也都参加了这个会议。宋子文说明中国的见解，比较支持陈纳德；他提议：“（一）在自六月份开始三个月之间飞越喜马拉雅山的空运吨位，请悉数载运空军器材。（二）九月份以后，使第十四航空队维持五百架飞机，因此，每月须有四千八百吨的运输吨位供应空军。”

然而，史迪威还是固持应以供给缅甸陆军物资为优先，而对之表示反对。

但罗斯福则终于支持陈纳德的意见，于五月十八日将他所决定的四点告知宋子文如下：

“（一）自七月一日起，经由印度对中国的空运，每月增加到七千吨，其中五千吨供应陈纳德的空军，其余二千吨属于陆军。

“（二）印度阿萨姆机场如能按期修筑完成，则每月空运应增加到一万吨。

“（三）五、六两个月的空运物资，除每月以五百吨供应陆军外，其余悉数分配空军。

“（四）反攻缅甸计划，决定年底会同英军实行。”

陈纳德遂因此而充实了力量，对日军转采夏季攻势，自七月二十日起在汉口、广州、衡阳等处上空向包括有零式战斗机在内的日本空军挑战。结果在这次攻势中，建立了击毁日方一百五十三架飞机的战果。

但是，在参谋团会议的争执之后，史迪威竟称罗斯福为“老糊涂”，傲慢到连总统的命令也不大理睬。

史迪威之卑陋

一九四三年五月，在华盛顿举行的美英参谋会议中，决定了中国陆军分别自制印度、云南出击北缅甸，以打通滇缅路为重点目标的反攻缅甸作战方案。其要点，是由罗斯福总统于五月二十五日电告蒋总统。但其指挥权谁属？以及英国是否出动海军在南缅甸配合作战等问题，却都没有提到。

因此，蒋总统乃派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向史迪威索取美英参谋团会议全部纪录及海军使用兵力之预定表；此事虽经再三催促，但史迪威的态度则只有一句话可以形容——就是“不合作”。

‘今日（六月二十八日）下午约彼（史迪威）来见，问其所说海军兵力数量等之文件带来否？彼答：“此不能交任何人，译文故未带来。”后复转口称：“回去可交商主任代陈。”及商携其所交来之译文，即罗斯福总统前月寄我电报之同样文字，而未将余（蒋总统）所索之海军兵力表呈报。可知此人无常识、无人格，实难令人想像者，阅之痛恨。余令商前往斥责，彼方将此件随函送来，但仍未完全。史之愚顽、卑陋，实世所罕有；美国有此军官，而其长官马歇尔且视为一等人才，岂不怪哉！’（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日记）

以廿年前目光看中国

对于史迪威这种态度，蒋总统乃电在此之先赴美访问中的蒋夫人，嘱便中不着痕迹地让罗斯福明了其情况，电文是这样的：

‘史迪威在华，如只对余个人之不能合作，则余为大局计，必能容忍与谅解，不足为虑。但其态度与性格对中国全体之官兵与国民成见太深，彼始终以二十年前之目光看我今日中国革命之军民，不只动辄欺侮凌辱，而且时加诬陷与胁制，令人难堪。……

‘彼根本不信华军能作战，更不信华军能有胜利之望。彼之心理既对华军绝无信心，若再欲其指挥华军，以求胜利，岂非缘木求鱼？……

‘然余为史事对于一般军官严加劝诫，令与史氏合作，且尊重其意旨，俾史氏工作得以顺利推进，自当用尽心力，维持友谊；惟长此以往，若时时发生此种误会，则有不胜防制之苦。故余为大局之前途，为作战之胜利计甚望罗斯福总统明了此中真相与现状。’

实则问题的核心，是在于史迪威内心对中国的偏见。

在他送达华盛顿的报告中，曾做过这样的文章：

“中国人在军事上犯有最基本的错误——首先，他们忽视战略战术的基本原理；并不懂得援助武器的用法；轻视军事情报；司令官与幕僚之间没有明确的命令系统；没有建立情报网；运输车辆和武器都未具有备战状况。”

不应忽略的是——像这样的中伤，简直和共产党所一向诽谤国民政府的腔调如出一辙，也正就是美国共产主义者和左派分子们所宣传的一套。他们这些偏见，乃是从共产党制造出来的谣言所构成。

为共党阴谋加劲

在这里，还可以举出一个中伤的事实如次：

当时，为共军势力正在扩张之中的陕西、甘肃方面，政府派驻有胡宗南所统驭的精锐部队。这样部署的目的，是为了防范在华北的日军由西方加来压迫，以巩固战时首都重庆的北面防务，同时，并阻隔共军与日军勾通。

是故，共产党为了要把胡宗南的部队撵开陕西，乃策划出国际性的谋略——发动苏联的新闻、杂志向美国散布“国民政府限中共于八月十五日以前归顺，否则即予讨伐”的谣言，肆行中伤。

‘此一谣言，耸动美国当局。美国参谋首长马歇尔果被其煽动，电询子文以此事之究竟，劝我勿用武力。可知俄国谋我之切。’（八月十一日日记）

史迪威也为共产党的阴谋加上了一把劲～～九月六日，向蒋总统提出一份备忘录，以强烈语气要求将胡宗南等部队调往山西。殊不知如果胡宗南所部竟然调走，则共产党便可以肆无忌惮地和日军勾结了。

‘此其（史迪威）必受共匪所主使，而且其语有威胁之意。余（蒋总统）不屑驳复，乃置之不理，表示拒绝其干涉之意，但可知中共之欲毁坏中央之宣传方法，已无孔不入、无所不为矣！余唯一以正气主之，毫不为动。’（九月十二日日记）

在此之先的八月一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享寿七十七岁。

蒋总统任国民政府主席

为了适应新的情况，在九月六日开幕于重庆的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委员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中，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为陆海空军大元帅；并于九月十三日选举蒋总统为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连同继续担任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务，是以一身肩负起政、军方面的最高责任。

美国所获情报

自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九日开始，美国罗斯福总统和英国邱吉尔首相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高峰会议六天。这次会议，虽未邀请中国参加，但却对于一再迁延的反攻缅甸之举决定于一九四四年二月发动。惟中国所主张的全缅反攻则由于英国态度消极而打了折扣，只限于反攻北缅。同时，并新设东南亚战区，以英国蒙巴顿勋爵为统帅，史迪威兼任副统帅。

十月十六日，蒙巴顿携带邱吉尔手书偕同代表美国的美空军补给司令索摩维尔中将抵达重庆，举行战略会议。

对史迪威隐忍已极

乘此会议之际，蒋总统和索摩维尔细细地谈到史迪威的问题。

‘余（蒋总统）直告其（索摩维尔）一年半以来，为史（迪威）隐忍已极，然总不能使其（史迪威）与我军精诚合作，殊为遗憾之至。’（十月十六日日记）

蒋总统忍耐着史迪威的侮蔑言行，已经是到了极限；纵使再忍耐下去，不仅毫无用处，而毋宁说是会影响到中国军队的士气，于贯彻抗日战争反而会发生障碍。

于是，乃于七月十七日傍晚和索摩维尔作了约一个小时的商谈之际，蒋总统终于下定了决心，告以有可能要求美方解除史迪威的职务。

但史迪威则因此一言而突然改变了态度。

当天晚间，蒋总统召见史迪威谈话，史迪威立即坦承过去的错误，誓言今后绝对服从。

‘最后允史悔改留任，重加信用。此乃中美关系与战局影响一大转机，乃知安危成败之机，全在最后五分钟几微之间也。’（十月十七日记上周反省录）

翌日（十八日），蒋总统再与索摩维尔见面，告以原谅史迪威之事。

‘与索摩维尔续谈史迪威事——准其（史）悔过自新，取销昨日之议；彼（索）乃欣然，甚感余对史宽大为怀之精神。’（十月十八日日记）

然而，史迪威的反省，只是表面上的态度。盖共产党要是得到了一个猎获物，就会把他抓紧，而不肯轻易舍弃；至于被抓住的人，则更非史迪威一人。

史迪威的政治顾问

设在重庆的“中、缅、印区美军指挥部”，经常聘用有政治顾问多人。这些顾问，都是由美国大使馆的官员兼任，利用外交官特权，时常出入于中国政府机关和高级官员住宅，以及美、苏大使馆暨共产党驻重庆办事处之间，刺探情报，向设于印度新德里的史迪威总部或华盛顿提出报告。

在这些顾问之中，成为共产党爪牙的人颇为不少，据战后美国国务院整理出来的资料，便曾提及二等秘书戴维斯、卢登，三等秘书谢伟志、伊默森等都是那一路的人。

在他们之中，最得史迪威之信任而为活动中心者，乃是戴维斯。此人是在史迪威到达重庆不久的一九四二年三月便被聘为顾问；继之，在一九四三年六月，谢伟志也被罗致。当时，美国国务卿赫尔是以应由驻重庆的美国外交代表加以查核为条件而同意他们就任顾问；但戴维斯则连大使也不放在眼里，擅自从事着情报活动。

戴维斯自抵重庆之后，便和周恩来、董必武、林祖涵等往来频繁；通晓中国语的谢伟志，则担任罗斯福致中国政府密电的翻译，并曾为在后来到中国访问的华莱士副总统等美国高级官员的译员。

还有更重要的，就是除海军以外的美军，凡由重庆送回美国的情报，都是由他们经手作业和管理。

后来据美国国务院的调查，戴维斯集团自一九四二年六月开始的三年之间，送往美国的重要情报，就有一百零六件。

撒天下之大谎

这些情报的内容，请看以下所举出的几个实例，都是在称赞共产党和中伤国民政府。

“周恩来说：蒋介石将与日本讲和。”（一九四二年六月戴维斯）

“国民政府囤积租借物资，以备内战。”（一九四三年七月戴维斯）

“苏联攻日时，中共部队将显出战略价值。美国宜要求国民党解除对共产党的封锁。”（一九四三年元月戴维斯）

“中共并非真正共产主义者，毋宁说是农业民主党（土地改革者）。国民政府如讨伐中共，中共将向苏联要求协助，中国将至赤化。”（一九四三年六月戴维斯）

“毛泽东不想制造共产主义国、社会主义国；也不打算推翻国民政府。毛泽东不与苏联或第三国际有关联。”（一九四四年七月谢伟志）

“共产党欲经资本主义以提高其经济水准，而美国比苏联更能予以协助，本人相信中共目前正以美国之支持作基础，努力寻求中国之统一。”（一九四四年九月谢伟志）

“美蒋如合作，中国将起内战；美国如援共，可免中国内战；美国如援蒋，中共将仇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戴维斯）

要是拿后来的历史演变，来对照戴维斯等人当年这一些情报，该可以证明所有的内容都是闭着眼睛在撒天下之大谎。

但是，当时在美国政府的国务院、陆军部、财政部以及各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中，连续阅读这些情报而被迷幻了的人，倒是不在少数。

共产主义者们像这样的情报战略，在战后也还是反覆不休地在进行着，他们导致美国政策失误，而终于出现了大陆沦陷的悲剧。

四强宣言

一九四三年夏季，在欧洲、太平洋、中国所有各战线上，同盟军都加强了对轴心国的反攻，战局业已有了决定性的转变。

欧洲方面，盟军于五月间在北非得胜之后，艾森豪所统驭的部队于七月十日登陆于义大利的西西里岛，约经一个月，将该岛占领。在这个期间，义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垮台，由巴多里奥元帅继任；九月八日，无条件投降。进入十一月，联军开始空袭柏林。

太平洋方面，美国的麦克阿瑟于六月三十日就任西南太平洋战区统帅，盟军在所罗门群岛及新几内亚展开了被称为“跳岛作战”的战略。

此时，处于守势的日本，已经对于为其一时所占领的南方岛屿防卫不了，乃于九月间后退到所谓“绝对国防圈”的加罗林群岛和马里安纳群岛一线。

这一年的秋季，盟军进而逐岛北上，十一月，占领中太平洋的吉尔贝特群岛，同时攻向日本在太平洋最后据点的新不列颠岛也完成登陆。

‘太平洋战争，由所罗门群岛进至俾斯麦海面，日寇在太平洋上第二道防线，完全为盟军所突破，所以他在今天不能不直认“战局重大化”了。

‘在我们中国战场上，日寇这一年来，对粤、闽、浙、赣，对苏、鲁、冀、皖、晋、绥各地断断续续的攻击，不仅毫无所得，而处处遇到我们严重的打击。至其大举向我湘鄂间发动的三次攻击，都遭受我军的惩创；尤其是最近常德会战（十一月至十二月）更领略了我军的威力。而滇西怒江方面的四次进犯，至今无法摇撼我军屹立怒江西岸的阵地。

‘日寇在过去这一年中，真是“以攻则必败，以守则必摧”。……’（注）

至此，对于业已能够望见将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该如何使之结束？以及战后世界秩序之应如何重建？乃成为在同盟国领导国家首脑们之间的重大课题。

可是，交织着列强各为其私的意图和彼此折冲的谋略，已经在这一方面投下了阴影；驯至发展为战后冷战的对立情势，正就是从这里萌生了新芽。

中华民国在收回被日本所强行侵占的失地和恢复主权与领土的完整方面，当然就必须要能赢得列强的保证。而就这一点来说，其在同盟国内部的外交，也正是一场重要的战争。

美国构想四强合作

再说美国方面，罗斯福总统早就在构想着--使中、美、英、苏在战时的合作关系继续维持下去；并由此四强在战后发挥警察力量，来维护世界和平。特别是在亚洲，他想把苏联拉进来，以牵制英国．荷兰和法国，解除殖民地主义的桎梏。

针对美国的考量，而英国则图谋——帮助法国，封锁苏联，孤立中国并削弱其力量，好继续保障“大英帝国”圈牢其殖民地。

至于苏联，在一九四三年五月宣告解散共产国际，摆出放弃赤化世界野心的姿态；但实则是在策划着等待盟军的胜利，以期得到新的猎获物。

在像这样各国各自打其如意算盘的国际漩涡之中，美国罗斯福总统于一九四三年八月在魁北克会议时向英国首相邱吉尔提出——“在战后以中、美、英、苏为中心，设立国际和平机构”的建议，得到了英国的同意。

苏俄反对中国列名

这一年的九月，美国国务卿赫尔向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提出同样的计划，但立即被莫洛托夫所拒绝，其因素，就是不愿中国列入四强之一的地位。盖在策谋操纵中国共产党，而由内部制造中国为其附庸的苏联来说，如果让中国抬起头来，在国际间跻于和苏联对等的领导国家地位，总归是于己不便的。

于是，赫尔乃向之指出中国六年以来对日抗战的实绩，并极力劝说：“在日本失败后，中国当然是亚洲的主要强国，邻接着极长国境线的中苏两国，如果立于平等地位，则双方关系必将有所改善。”但莫洛托夫还是不肯同意。

十月十九日，为商讨战后欧洲问题，在莫斯科举行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会前，罗斯福总统下了决断：“全力支持四强的观念，即令因此而使三国外长会议不能达成协议，也是在所不惜。”

于是，到了三国外长会议席上，美国国务卿赫尔乃提出号召设立战后国际组织的宣言草案，主张作为“四强宣言”；英国外相艾登表示支持，同时，这个草案已曾分送给中国，中国方面业经同意。

但唯独苏联的莫洛托夫反对，他提议：“这次会议只讨论三强宣言，而不涉及四强。”

赫尔乃再次说明：“排除中国是错误的”。并且告以：“美国的决心是——如果不以四强名义发表，则不惜流会。”在美国如此强硬的态度之下，莫洛托夫才为之屈服，而于二十六日表示让步，不再反对中国参加签署；其后，苏联虽然还想在手续问题上杯葛中国，但“四强宣言”毕竟于十月三十日获得通过。

四强宣言的内容

这个宣言的内容包括有：四国以其在作战时之联合行动，共同继续维持战后之和平与安全；对共同敌人之投降及解除武装有关一切事项，当共同行动；在可能的最早时期，建立一般性之国际组织，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战争结束后，不得在他国境内使用武力，并促成一限制军备之一般协定……等项。由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和美、英、苏三国外长一同签署。

战后，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地位，就是此时所协定。

注：蒋总统-“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一九四四）

中国准备提案

当莫斯科所举行的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接近尾声的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八日，蒋总统接到罗斯福总统的来电如左：

“莫斯科会议，至今进行甚速，极望其会议结果得能有俾于各方，余（罗斯福）正促成中、英、苏、美同盟之团结也。余尚不知史达林能否与吾相晤，但在任何情况之下，余极望与阁下（蒋总统）及邱吉尔能及早会晤于某处，时间定为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之间，余思亚历山大（埃及海港）当为一良好地点，……会议日期约为三日，……并祈极守秘密为盼！”

先是，蒋夫人于七月间访美归国之际，罗斯福已有举行会谈的建议到来，现在才见有举行“四国高峰会议”的具体接洽。于是，蒋总统立即答复“同意”。

四国会议变成三国会议

继之，在十一月一日又接到罗斯福来电，却显示情况有微妙变化，电文是这样的：

“余尚未接获史达林元帅之明确回答，但邱吉尔与余仍有晤彼于波斯湾附近之一机会。余望阁下能决定于十一月二十六日约在开罗邻近之处，与邱吉尔及余相晤。……”

在这里，必须注意的，不仅是最初的“四国会议”变成了没有苏联参加的“三国会议”，而且另外又有一个“三国会议”则是没有中国参加的。

苏联对于中国，本来就怀有领土野心，不愿中国为四强之一；而且，他对于美国则更持有一张王牌-就是对日参战。盖在广大的太平洋战区作战中的美国，为了要能从北面威胁日本，所以渴望苏联参战；然而苏联却一直是闪铄其辞，对于美国的要求拖延置答。是故史达林如果在没有中国参加的“三国高峰会议”中打出他的王牌，则将予中国以不良影响-这是在蒋总统预料之中的事；而这个预料，后来乃是不幸而料中了。

于是，蒋总统乃考虑到：此时有必要在美、英、苏会谈之前，姑且就战争结束之有关中国的问题，先行取得美、英两国的同意。因此，乃即转知罗斯福，希望：中、英、美三国会谈需要在美、英、苏会谈之先举行；如果不可能的话，则希望另作决定。

十一月九日，罗斯福发来第三通电报，提议如次：

“余（罗斯福）于二、三日内，即将前往北非，望于二十一日抵达开罗，邱吉尔将晤余于此。余于邱吉尔拟于二十六或二十七日在波斯与史达林相晤。故余殊愿阁下、邱吉尔与余得先此相晤，盼阁下能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抵达开罗。”

历史性的“开罗会议”之举行，就这样地决定下来。

十一月十二日，曾任美国陆军部长的赫尔利以罗斯福总统特使身分，为就开罗会议预先交换意见而来到重庆。赫尔利除解释罗斯福的用意之外，并说明：关于亚洲问题，中英两国如有分歧，罗斯福可以第三者的地位从中调解。

美国疏忽对共党的警戒

蒋总统和赫尔利两度会谈，向之强调：中国与美、英合作毫无疑问，但问题在苏联方面。并托他转达罗斯福总统：在和史达林会谈时，请勿忽略对于苏联企图赤化和并吞中国的警戒。但赫尔利则乐观地表示：“史达林已摈弃了赤化世界的基本政策。”这样的观点，让人大致看出美国是受了共产主义者的宣传、以及苏联和美、英联合作战与解散共产国际等情况之所惑，而疏忽了对于共产党的警戒。

在先后会谈了共六个小时之后，赫尔利向罗斯福报告如次：

“蒋主席与中国人民赞同民主自由原则。

“蒋主席与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与共产主义。

“蒋主席相信：罗斯福总统当然赞同民主与自由，但为了联合作战，或许暂时须与帝国主义及共产主义国家合作。

13[108]2906“蒋主席了解：未来联合国的合作与团结，端赖罗斯福总统同化而非消除不同思想的能力。罗斯福必须找到能为四强所一致同意的原则；在寻求这些原则时，罗斯福必须有广大的活动自由。……”

一本开诚交换意见原则

‘余此去与罗、邱会谈，本“无所求，无所予”之精神，与之开诚交换军事、政治、经济之各种意见，勿存一毫得失之见则几矣。’（十一月十三日日记）

十四日，中国方面对于将在开罗会议中提出的问题整理就绪，其概要如左：

“甲、战略方面之主要提案：反攻缅甸海陆同时出动之总计划。成立中、美、英三国联合参谋会议。

“乙、政治方面之提案：东北四省与台湾、澎湖应归还我国。保证朝鲜战后独立。保证泰国独立及中南半岛各国与华侨之地位。

“丙、筹建战后有力之国际和平机构。

“丁、对日本投降后处置之方案。

“戊、中、美经济合作之提议。

“己、对美租借物资之提案。”

又讨论之问题，以中、美、英三国有共同关系者为限，决定避免提出香港、九龙、西藏等中、英两国之间的悬案。

开罗会议

蒋总统和美国罗斯福总统及英国邱吉尔之间互通函电，已有多时；但直接晤对，则还是第一次。

‘余此去与罗、邱会谈，应以淡泊自得、无求于人为惟一方针，总使不辱其身也。对日处置提案与赔偿损失等事，当待英、美先提，切勿由我主动自提；英、美当知敬我毫无私心于世界大战也。’（十一月十七日日记）

蒋总统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时自重庆乘飞机启程，飞往开罗。随行者有蒋夫人及王宠惠、董显光等十多人。途经阿格拉、喀拉蚩各留宿一夜之后，自喀拉蚩夜间飞行，于二十一日上午七时五分在开罗郊外的培因机场着陆，遂即乘车穿越开罗市区，抵达在金字塔旁边的会场-米纳饭店。在该饭店附近新设有高射炮阵地及雷达基地，并驻有英军一旅，戒备森严。

先访邱吉尔

当天下午三时半，邱吉尔也抵达开罗，立即派人联络要来拜会；但蒋总统以行客礼应先拜坐客，乃于下午六时半先往拜访邱吉尔。当时，有盟军东南亚战区统帅蒙巴顿在座，谈话约三十分钟，除初次见面的寒喧之外，并对国际情势交换了一些意见。

罗斯福是在二十二日上午到达，开罗会议乃于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时正式开幕。

首先，由罗斯福致词。继之，由蒙巴顿报告英国方面在拟议中的反攻缅甸计划。

英国的计划是——在一九四四年元月中旬，中国军向缅甸北部、英军向缅甸西部同时进攻，预期在四月间收复北缅。

提议海陆夹攻缅甸

但中国方面，早就主张应夺回包括仰光在内的缅甸全境，以恢复滇缅路，确保对中国的补给路线。因此，蒋总统乃向邱吉尔提议：在陆军反攻缅甸的同时，英国宜采行向孟加拉湾出动海军，夺得制海权，切断日军补给线，自南北两面夹攻缅甸的海陆协同作战。

蒋总统的发言是这样的：

‘余（蒋总统）之意见：如海军未集中，则陆军虽已集中，仍乏胜算。吾人须知：敌人决不轻易放弃缅甸，盖敌人如在缅甸失败，则彼在华南、华中皆将不守也。……敌人之生死战场有三～～一为缅甸，二为华北，三为东北。缅甸之重要于此可见；是故陆军与海军必须同时集中。’

邱吉尔当即以积极态度答称：“英国海军集中时期，当在春夏之间。”接着他又说：“海军集中，事关机密，不便在此宣示，其详细内容，容俟面告。”遂即散会。

反攻缅甸，是在开罗的一项重要悬案。会后，蒋总统曾继续三度与邱吉尔晤谈，以谋早日见诸实现，但邱吉尔却终于对“陆海军同时行动”一节未给予确切约定。

邱吉尔的晚宴

十一月二十四日邱吉尔举行晚宴，其情况，蒋总统留有这样的记述：

‘当宴会之前，彼（邱吉尔）曾导余至地图室，告予以攻缅时期及其海军各舰艇数字之大略。余问其海军登陆时期，彼乃告余须待至五月间，不禁大失所望。

‘宴后，邱又导余至地图室，指示各战区海陆空作战之现况；其实，此等语皆余所熟闻者，而彼乃津津乐道，约有一小时之久，最后谈至反攻缅甸时海军登陆预想之各地点，而未肯明确告余。……

‘邱氏为英国式之政治家，实不失为盎格鲁萨克逊之典型人物。虽其思想与精神气魄不能与罗斯福总统同日而语，而其深谋远虑，老成持重，则现代政治家中实所罕见。’（十一月二十四日日记）

继之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再度见面。

‘上午十一时，邱吉尔首相、蒙巴顿勋爵、艾登外相来访，先谈反攻缅甸计划，余（蒋总统）力劝邱氏提早其海军登陆时间，彼虽未如前日之覆绝，然亦未能明允也。’（十一月二十五日日记）

邱吉尔对于反攻缅甸之所以如此消极，是有以下两点因素：

第一、在先，邱吉尔是想和罗思福单独会商，决定了以欧洲战局为优秀的对德战略之后，而将缅甸战事置于次要，再作研究；未料，罗斯福却将邱吉尔放在后面，而先要和中国会谈，因而使邱吉尔感到不满。

再有一点，是在后来才为中国方面所听到的，就是英国正在准备夺取孟加拉湾的安得曼群岛，进而攻向苏门答腊，以谋收复新加坡的大规模海军作战计划。这个计划已让美国知道并得其赞同，但对于中国则秘而不宣。邱吉尔曾经在会议上向蒋总统说“容俟面告”，就是指的这一件事。

反攻缅甸成空头支票

关于反攻缅甸问题，最后由居间调停的罗斯福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向蒋总统保证“在陆军反攻北缅时，英国海军必能在南缅同时行动。”看来中国的希望已被采纳，未料，继此之后，罗斯福因和史达林在德黑兰会谈的结果，竟于十二月五日致电蒋总统，略谓：“因须在欧洲大陆发动一大规模的战役，致不能调用足数舰艇于孟加拉湾。”于是，开罗会议的反攻缅甸约定便成了一张空头支票。

与罗斯福会谈

对中国说来，在开罗会议中最具意义的日程，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晚间蒋总统和罗斯福总统的会谈。同席者，有蒋夫人和罗斯福的秘书霍浦金斯，于下午七时半共进晚餐，一直谈到深夜十二时，气氛融洽。

提出日本天皇制问题

这次会议的话题之一，是日本天皇制问题。

罗斯福提到：美国国内已在传播着对日本天皇追究战争责任的舆论，不容忽视；日本的天皇制应予保持还是废止？特地征求中国的意见。

‘我（蒋总统）坦白地答覆他（罗斯福）说：“这个问题，我以为除了日本军阀必须根本铲除、不能再让其起来预闻日本政治以外，至于他国体如何，最好待日本新进的觉悟分子自己来解决。”我又说：“如果日本国民能起来对他战争祸首的军阀而革命，推倒他现在侵略主义的军阀政府，彻底消灭他侵略主义的根株，那我们就应该尊重他们国民自由的意志，去选择他们自己政府的形式。”’（注一）

因为战争胜利，便去过问一个国家的国体，实在并非上策。而且，日本的天皇制在其民族的精神构造上自有地位，西方人未必会有认识，而同为东方人的中国人则是比较了解的。

‘罗斯福总统也深以为然。我们这个主张，完全是根据于一九四二年联合国宣言的精神。我今天发表这一段谈话，就是要我们军民认识——我们这一次战争的胜利，不但要解放所有被敌寇侵略奴役的民族，同时要拯救日本国的善良无辜的人民。’（注二）

于是，罗斯福总统乃进一步问到：“那么这个问题，是否应该提出明天的会议中讨论？”蒋总统答以：似乎不必列入正式议题。

关于天皇制的问题，在蒋总统秘录一开始的时候（中文译本第一册第十六页）便已经提到过；而自开罗会议之后，当时在太平洋学会等团体中也还有人往往提起这个问题，但由于业经蒋总统与罗斯福会谈而达成协议——“日本国体由其民族自决”的方针，终于贯彻不变。及至战后，日本国民们自己选择了维持天皇制度，在这个国体之下，统一其国论，而成为战后复兴的精神支柱，是无须于此再多论列的。

对于日本的占领问题，在蒋总统和罗斯福这次的谈话中也曾提到。

罗斯福的提议是：派军进驻日本一节，应由中国为主体；但蒋总统的态度则为：

‘对日本本土驻军监视问题，余首言：此应由美国主持，如需要中国派兵协助亦可；但彼（罗斯福）坚主由中国为主体。此其有深意存焉。余亦未便表示可否也。’（十一月二十三日日记）

这个占领问题，在战后也成了重要课题之一，容俟后面再行叙述。

东北与台澎应归还中国

领土问题，也在讨论之列。

‘日本攫取中国之土地，如东北四省与台湾、澎湖群岛，应该归还中国；惟琉球可由国际机构委托中、美共管。此由余提议，一以安美国之心，二以琉球在甲午之前已属日本，三以此区由美国共管实较我专管为妥也。

‘朝鲜独立问题，余为此事特别注重引起罗斯福之重视，要求其赞助余之主张，使朝鲜人民达成独立之目的。’（十一月二十三日日记）

以上一些问题，双方获至将近百分之百的同意；但终难趋于一致的，就只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问题。

美对共党问题有误解

在二十三日晚间的会谈中，蒋总统向罗斯福说明了政府军为什么非监视共军不可，但罗斯福对于此点则是很难有所理解。

‘共产主义与帝国主义为问题之重心。余嘱其（罗斯福）尚须注重俄国今后之行动与事实为要，明告其余对俄不敢深信也。’（十一月二十三日日记）

据和罗斯福总统同行的其子艾里奥特罗斯福记述——在二十四日下午，蒋总统和罗斯福总统复曾有会谈关于国、共问题及香港问题（中国方面未有纪录）。

当时，罗斯福建议：国民政府容纳共产党组织“国、共统一政府”。蒋总统答以：如果苏联不插手东北，则可予同意。罗斯福遂即表示：当和史达林洽谈。

至于香港、广州、上海等地之英国割据地及租界之归还中国问题，罗斯福也以组织国、共统一政府为条件，尤为努力促其实现。

对于共产党问题，美国之所以存有决定性的误解，乃是认为那只不过是中国的内部问题。殊不知在当时虽则共产国际业已解散，但史达林乃是以毒化波兰和中国为其世界战略的第一目标。他并且业已指示各国共产党“彻底攻击蒋介石”，这个指示，美国方面虽然已有所闻，但却还是重视被共产党所迷惑的史迪威以及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们的“重庆情报”。

美国就是这样地被共产党狡黠的“离间中、美工作”之所乘，因而发生如此误解，已经使人预料到战后中国大陆将会出现困难局面。

注一、二：蒋总统-“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一九四四元）

美英观点的差距

决定了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处理事宜以及为战后世界秩序树立大方向的“开罗宣言”，是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定稿。

“寸衷唯有忧惧”

‘与罗斯福会谈至四时半，邱吉尔、艾登（英国外相）、贾德干（外次），哈里曼（美驻苏大使）及王秘书长宠惠（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皆到会。

‘彼等已将公报（宣言）草案商讨修正，乃即由艾登在会中朗诵一遍，余与罗、邱二氏皆同意，遂作为定稿，惟须待罗、邱与史达林于德黑兰会谈完毕后，再约期公布；余允之。乃即与罗斯福总统作恳辞道别。’（十一月二十六日日记）

“开罗宣言”于十二月三日正式发表。其内容有：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使朝鲜自由与独立；获得日本之无条件投降等项，以中、美、英三大同盟国的名义提出。

‘昨日发表开罗会议公报以后，中外舆情无不称颂为中国外交史上空前之胜利。寸衷唯有忧惧而已。’（十二月四日日记）

诚然，开罗会议是给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来了很大的成果。盖对中国来说，一些极其重要而又极其困难的问题，都已经在几天的会议中一举解决；然而，同时也就是在这次的会议中，更使人重新体认到——还是有许多非解决不可的难题搁置在前途。

最大的症结，乃是美、英两国“世界观”的差距。

英国唯图维持帝国权益

关于战后的世界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在美国的考虑是：建立民主的国际组织，藉以廓清十九世纪的殖民地主义。而英国则大异其趣，他是在打算：凭藉大国均势以维持大英帝国的权益。

英国这个打算，在他对反攻缅甸问题以及对其他各方面问题的态度上表现出来。即如在讨论开罗宣言的草案时，英国便曾对于“东北四省、台湾等归还中国”以及“使朝鲜独立”等措辞表示反对，而坚主改为“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及“脱离日本之统治”就可以了。对于英国这种态度，罗斯福总统曾于二十五日下午在茶会中向蒋总统深致慨叹。

‘彼（罗斯福）对余（蒋总统）慨然叹曰：“现在所最令人痛苦者，就是邱吉尔的问题。”又称：“英国总不愿中国成为强国。”彼且郑重表示其对于殖民地政策极不以为然。言下对于将来东西间民族问题颇有忧色；余因慰之曰：“这是时代问题，时代总是前进的，只要时间到来，总是会解决的”。请其不必悲观。’（十一月二十五日日记）

‘此次在埃及所经各地最大之感想为——英国在世界之势力强固与远大，得窥一般；而亚、非二洲之回教国民，皆使之服从听命，其魔力实不可思议，不能不令人惊叹。东方民族欲求自身独立自由，言之何其易也。……

‘开罗会议之经验，英国决不肯牺牲丝毫之利益以济他人。彼对于美国之主张亦决不肯有所迁就，作报答美国救英之表示；其于中国存亡生死，则更不值一顾矣。

‘是以罗斯福总统难保证其（英国）海军在缅甸登陆、与我陆军一致行动，余（蒋总统）明知其不可能而姑且信任之，并不愿以“英海军如不同时登陆，则我陆上部队亦停止行动”之语出诸吾口，以为其他日推诿之口实。

‘然而缅甸反攻时期，此心断定其非至明年秋季决无实施之望也。英国之自私与贻害，诚不愧为帝国主义之楷模矣。’（十一月三十日记本月反省录）

对俄各怀不同观念

再有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美、英两国之对于苏联的形像又各怀有其不同的观念。

美国已经看到：苏联会在战后成为强国，但却没有能够认识到他的强大会为国际间带来如何程度的紧张情势；而英国则相信：苏联成为强国，欧洲均势便会被其所破坏。

这种观念上的差别，在继“开罗会议”之后由罗斯福、邱吉尔、史达林三人出席的“德黑兰会议”中，很鲜明地浮现出来，而其结局则是于苏联有利。

本来，这次的德黑兰会议，就是出于美国迁就苏联而举行的。

盖在当时，美、英和苏联之间并不怎么融洽。其原因，则是出于一直酝酿了两年以上的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

自一九四一年六月开始，受到帝国攻击的苏联，曾于向美、英两国要求援助武器的同时，并央求他们在西欧发动攻势、开辟第二战场，以威胁德军的侧背。

但邱吉尔认为这是不可能做得到的事，乃一时予以拒绝；而罗斯福于一九四二年五月接见访美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时，则对之表示准备开辟第二战场，且应莫洛托夫之请给予书面证13[123]2921明。莫洛托夫于归途经过英国，将证明出示邱吉尔，重申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但邱吉尔则避开正面答复而只说：“在准备中，不过尚难遽作约定。”可是莫洛托夫却于返国后将证明之事公开于国内外，并宣称：“美、英已允诺开辟第二战场，此事能否实现，将为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诺言有无价值之侧验。”

邱吉尔听到这些话，遂流露出不悦之意。

史达林阴谋得逞

一九四二年八月，英国首相邱吉尔和苏联总理史达林最初会晤于莫斯科，进行会谈。

此时，自美国经由英国运去的援助物资，不断受到德国潜艇的攻击，史达林对英国甚为不满；而英国又由于在利比亚方面战事失利，不可能有余力应史达林之请开辟第二战场。所以这次的会议，只是徒事争论，反而加深了英苏之间的隔阂。

其后，英军的战线由北非转移到西西里方面，第二战场很难着手开辟；及至一九四三年元月与五月在卡萨布加和华盛顿先后两度举行的美、英高峰会议中，都仍未能决定其确实日期。为此而终于感到愤怒的史达林，曾于六月间召回其派驻美、英两国的大使。及至义大利投降，英国的优势已定，但却拟自爱琴海向巴尔干半岛方面开辟战线，倒反而是牵制了苏联在13[124]2922东欧的势力，更使史达林的不满增大。而直到开罗会议之际，第二战场问题仍然被束之高阁。

另一方面，美国因为对日作战之需要，希望在西伯利亚建立空军基地，乃以对苏援助物资为条件，至一九四三年二月先后四次向苏联提出要求，但史达林则坚予拒绝；不过至十月间，在莫斯科举行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时，史达林则曾经表明：“苏联迟早终将对日作战。”

苏联之对日作战，乃是美国所企盼的。罗斯福的秘书霍浦金斯便曾于同年八月在魁北克会议时表示出——美国“纵使委屈一点，也希望能够获得苏联对日作战”的意向如左：

“苏联既是决定战局之因素，故宜予以一切援助，并用一切方法，取得其友谊。苏联不但在轴心国家被击破之后，取得欧洲之宰制地位；……且亦为太平洋战争中之重要分子。美国如得苏联为对日作战之伙伴，则可减少美国士兵生命与金钱之损失。……反之，如苏联采取对美不友好或消极之态度，则美国将增加不可计算之困难，甚至战事亦有失去效果之可能。”

美英对苏低声下气

此后，罗斯福曾经再三向史达林提出会谈的要求；但史达林则藉口军务缠身或是为选择会晤地点等问题，避不应允，以致很难如愿。最后，罗斯福亲自致电史达林：“彼此同为一国13[125]2923之执政，我今愿出国门六千公里以图相会，若君不愿出门六百公里，以致会议中阻，恐后世历史有所批评。”这才办到了依据史达林的指定在德黑兰会晤。

继开罗会议之后所举行的德黑兰会议，是经过了如上所述的历程才作成决定。是故，中国对于其议案既欠明了，至于最重要的“苏联对日参战”问题，事先也未曾与闻。

而且，不仅如此，尤其是在这个没有中国参加的会议中，美、英始终对于苏联低声下气，以致连在开罗会议时已经决定了的有关中国的事项，都作了于中国有所不利的更改。

德黑兰会议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开始，史达林对于中国的抗战加以诽谤地说：“中国人对日军作战非常坏，这是因为领导阶层的错误。”接着表示：“在德国溃败后，苏联将增加西伯利亚的军力，协力打击日本。”

于是，邱吉尔乃以史达林的承诺，作为其欧洲优先的最好藉口。——这就是说，不管怎么样盟军应以打垮德国为第一目标。同时，英国方面并极力主张：应将用于反攻缅甸的兵员与物资转移于欧洲战线；罗斯福对此虽曾一度反对，但结果还是接受了邱吉尔的意见。于是，在开罗所约定的反攻缅甸计划，还没有经过十天便为之一笔勾消。

开罗会议决定多半落空

开罗会议所决定的事项，的确都是决定战后世界历史方向的重大问题；然而，在经过德黑兰会议的过滤之后，结果竟然是暗淡无光。

盖在开罗所约定的事项，虽有十八项之多；而其中见诸完全实行的，则不过为其三分之一的下列六项——“剥夺原属日本托管之太平洋岛屿”、“台湾、东北四省等归还中国”、“朝鲜独立”、“军事占领日本”、“天皇制度由日本自决”、“中国以四强的地位参加战后国际机构（即联合国）”。

此外十二项，诸如“反攻缅甸”、“香港归还中国”、“苏联尊重中国的东北四省主权并不得支持中国共产党”、“装备中国军队九十个师”、“十亿美元借款”等，都完全落了空。

和上述情形正相对照的，则是史达林获得满载而归。美、英两国以欧洲为优先锦上添花，决定在法国西部海岸的诺曼第实施大规模登陆战，使苏联的负担大为减轻。而且比这一点还更重要的，乃是增长了同盟国内部战略上的纷歧，也就是史达林图谋离间美英、中美、中英三国关系的策略大为成功。尤其是以对日参战为交易手段，在一年多以后的雅尔达会议中再度演出，更作成了美、英两国将中国出卖给苏联的雅尔达协定。

另一方面，在和英国以欧洲战线为优先的同时，美国在亚洲也正转变到以太平洋战线为优先的态势。盖由于“跳岛作战”成功，和艾塞克斯（ＥＳＳＥＸ）级航空母舰诞生，乃确定了由马利安纳方面直接进窥日本本土的战略；是故中国大陆基地在战略上的价值遂被轻视。譬如说，中国耗费巨赀在成都建设的Ｂ二十九长程轰炸机的基地，旋即无须使用。

中国的国际地位，因开罗会议而在政治方面上升；但在战略方面却为之下降，以致中国乃再度被迫处于苦境。

为导致大陆沦陷的开始

特别是关于对苏联和对中共的问题，乃是以开罗会议为中美关系的分水岭。可以说是：为导致战后大陆沦陷的开始。

最艰苦的一年

一九四四年，是中国在长期抗日战争过程中最艰苦的一年。

抗战进入第八年，这一年的军费支出达一千零十二亿九千六百万元，为一九三八年军费支出的一百三十八倍。国库极其支绌，国民为高腾的物价所苦恼。

为了改善如此困难的国家财政，中国曾在不久之前的开罗会议中向美国提出十亿美元借款的要求，并且获得罗斯福总统善意的答覆；但想不到美国财政部长毛根韬以及受亲共分子们所影响的驻华大使高思等人却以政治藉口坚决反对，以致借款案未能实现。

日军发动“一号作战”

13[129]2927当如此情况之下，日军于一九四四年春季开始在中国战场发动了“一号作战”，又称为“打通大陆作战”的大攻势。

‘敌人的战略，就是东条所谓“陆主海副、分区作战”的战略；这就是敌人要竭尽他的陆军力量来弥补他海空军的缺陷，想以中国陆上的进攻补偿其太平洋上所受的挫失，想以空间换取其最后挣扎的时间。

‘他这一次大举进犯的目的，显然有三点：

‘第一、是要打击我们中国的野战军，减弱我们反攻的主力。

‘第二、是想破坏我们粤汉与湘桂沿线的空军基地，减少他本土所受空中反攻的威胁。

‘而其最主要的是在第三点，就是要打通粤汉与湘桂两线，为他在缅甸，在越南，在中南半岛，以及孤悬在南洋海岛上的各处寇军，开一条败溃时逃生的退路。’（注）

日本之所以实施“打通大陆作战”的直接动机，是由于以江西遂川为基地的Ｂ二十五重轰炸机于上（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空袭在台湾新竹附近的日军，日本大本营就空袭达于新竹的行动半径判断，认为由中国大陆基地进一步轰炸日本本土已经是为期不远，故而于元月二十四日下令“支那派遣军”进行其“一号作战”。

在兵力方面已是捉襟见肘的日军，是从保留在东北，对苏联备战的关东军及华北的“北支13[130]2928那方面军”中，共抽调出十个师团，投入这一次的战役。

郑州洛阳长沙失陷

日军首先指向的攻击目标，是河南省。当时，河南的三千万省民正苦于连续两年的旱灾，甚至有些村庄已阒无人烟，而不顾人性的日军则乘此天灾发动攻势。

四月十七日，日军“北支那方面军”第三十七师团（师团长长野祜一郎中将）在河南省开封西方的中牟县附近渡过黄河南下。

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伯恩所指挥的中国军，立即加以迎击；但日军居于压倒性的优势，于四月二十日攻陷郑州。

一开始就以打通平汉铁路为目标的日军，一方面由郑州沿铁路南下，另一方面别遣一支部队由信阳北上，及至五月八日乃控制了平汉铁路。继之，更由郑州西进，于五月二十六日攻下河南的古都洛阳。

此后，日军更谋打通粤汉铁路，而将战事移入湖南。

五月二十七日，以横山勇率领的第十一军为主力，由洞庭湖附近大举南下，指向长沙。

长沙是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统驭中国军，曾经三度击退来犯日军，获得大胜的地点。但此次担任防御的第四军军长张德能，对于日军的总攻击心怀畏惧，竟于六月十八日撤守，以致长沙终被日军夺去。其后，张德能经军法会审，判处死刑。

Ｂ２９轰炸日本本土

当此日军的疯狂侵略正在继续之中，但由中国本土出动飞机最初轰炸日本本土，则是自六月十五日开始。

‘昨晚，美超级空中堡垒（Ｂ二十九）由成都起飞，轰炸倭国北九州之八幡制铁炼焦厂，惟四十七架之中有二架失踪，余皆安全返回基地。

‘又美海军在中太平洋倭委任统治地塞班岛登陆，是美已直向倭之心脏地区进攻矣！’（六月十六日日记）

对八幡钢铁厂的攻击，是美国空军第二十航空队的超重级轰炸机群，显示出盟军的反攻已经达到日本本土，是一次划时代的轰炸行动。

继此之后，不断由成都出动飞机轰炸日本本土，以及东北鞍山等工业地区。

在日军方面，则当攻陷长沙之后，更指向湖南要冲的衡阳。

六月二十七日清晨，日军占领了在衡阳近郊可以起降Ｂ二十九的飞机场，并对衡阳发动总攻击。

方先觉力守衡阳

衡阳的防务，是由方先觉所指挥的第十军担任。方先觉面对压倒优势的敌人，坚持抵抗，一步不退，直到八月八日，一再击退日军，死守衡阳达一个半月之久。

七月十一日，在第二次总攻击失败之后的日军，放弃正面进攻，而采取持久的包围战。

‘敌军对衡阳之战术，是用分散与牵制之法，使我守衡阳之军久困城中，待弹尽援绝，而后垂手以得，此应设法粉碎之。’（七月二十五日日记）

当时，驰往增援的第六十二军（军长黄涛），则被日军所遏阻，受到很大的损害而退回，以致方先觉军难获救出重围。

‘衡阳保卫战已一月有余，第十军官兵死伤已过十分之八，而衡阳城屹立不撼。此次衡阳之得失，其有关于国家之存亡、民族之荣辱至大。’（七月三十一日记本月反省录）

注：蒋总统-“抗战建国七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一九四四.七）

日海军濒于溃灭

八月三日，日本空军肆行轰炸，同时展开了对衡阳的第三次总攻击，战况极其猛烈，衡阳市区已被重炮火彻底破坏。

经过连续一个月以上坚守城池的浴血战斗，方先觉军的抵抗力，已降到极低的程度，而面临了最后的时刻。

八月七日下午三时稍前，蒋总统接到方先觉发来电报如左：

“敌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生平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

当天夜晚，蒋总统三度向上帝祷告；天色欲曙的午前四时再度祈祷。衡阳电台彻夜不断告急，及至八日午前五时十五分电讯连络忽告中断。于此，衡阳守军乃结束有组织的抵抗。

方先觉力尽被俘，但在三个星期之后，自衡阳脱出，回到重庆。

方先觉谈衡阳之战

方先觉（现任国民大会代表、居于台北近郊）向笔者（古屋奎二）说明衡阳战役的情况如次：

由于长期作战，医药品和食品缺乏，极感困苦。没有止血药剂、没有绷带，负伤官兵的伤口有发炎生蛆的现象，本来可以救治的官兵，很多都死亡了。我们给予敌人的打击也非常之大（据日本资料：是役日军伤亡一万九千三百八十人），每天可以望到敌阵在举行火葬的烟焰。整个衡阳城被死尸臭气所笼罩，实在是很悲惨。

八月七日下午，向蒋委员长发出电报之后，便决心自戕，当手枪对准太阳穴之际，被两个副官打落地上。

翌晨，有自称为日军第十一军使者的竹内参谋来接洽停战；当即告诉他：我们绝没有投降之意，同时提出：（一）保证生存官兵安全，并让他们休息；（二）收容伤兵，并郑重埋葬阵亡官兵等条件。竹内说：“中国军勇敢作战的情形，不仅在此地的日军、就连日本天皇和大本营都已有所闻。”特地表示敬意，并对我方的条件完全同意。而日本纪录说我们投降，甚至有说是举行了投降仪式，是绝对错误的，我以军人的名誉发誓没有那回事。

我在衡阳郊外的教会中暂时存身，但在约三个星期之后瞒过日本兵的监视逃脱出来，经由芷江回到重庆，晋谒委员长。

委员长就像是看到自己的孩子回到身边一样，非常高兴地对我说：‘回来啦！好！好！我每天在为你们祈祷，希望你也崇信上帝。……’谈话之后，留我共进午餐。委员长的饮食很朴素，只是一碗饭和一些简单的菜肴而已。

衡阳攻防战，是抗战后期最大的战争，日军虽然攻陷衡阳，但实则是受了很大的打击，重整态势颇费时间。及至九月以后，才由衡阳、广州两方面攻向广西。

九月二十二日，攻陷梧州；十一月十日，设置有美国空军基地的桂林、柳州也相继沦陷。

‘桂林既陷，军事受挫至此已达极点乎？此后，对于军事、政治应有彻底改革之决心，并速求实行，为要。’（十一月十二日日记）

日军伸展到了极限

十一月二十四日，南宁继之易手。继续南下的日军，终于十二月十日和由越南北上的日军在绥渌会师。新年后的一九四五年元月，衡阳和广州之间的粤汉铁路，也落入日军之手。

日本的目标——由华北经湖南、广西而和越南联系的交通线，业已打通。

不过中国军虽则接连失利，但整个战局却是的确朝向胜利的方向在推进。

‘此心现虽以部队脆弱为忧，但对战局前途则仍抱乐观也。’（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日记）

虽然说是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日军终究不过是只控制着“点”和“线”，而其兵力和补给都已伸展到了极限，不可能再进行新的战争。故实际自此之后，在大陆的日军，就已转而一直立于守势地位，面临着中国军的反攻，逐渐在缩小战线。

此外，日军虽然攻夺了中国的一些飞机场，但由于美国空军的增强，制空权也逐渐易手。

另一方面，在太平洋战区的盟军，则自一九四四年初开始更收紧了对日军的包围网。

太平洋及欧洲战况

二月一日，美军在马绍尔群岛的瓜加林、鲁特两岛登陆，在岛上的日军守备部队约七千人全军覆没。继之，美军机动舰队于二月十七日大举空袭日本联合舰队最重要的前进基地特鲁克岛，炸沉其舰艇四十三艘，毁掉其飞机二百七十架，制空、制海权落到美军掌握之下。

六月十九、二十日，在马里安纳的海战，美军机动舰队对于日本舰艇一面倒的予以击沉，日本联合舰队残存的三艘航空母舰及大部分飞机都在此役损失。

十月二十四日开始的雷伊泰海战，日军“神风特攻队”最初出现，但还是吃了大败仗，其联合舰队已濒于溃灭状态。

使太平洋战局趋于决定性的情势，乃是七月七日塞班岛日军的全军灭亡。盖美军进占该岛之后，迅即建筑航空基地，于十一月二十四日自该基地出动Ｂ二十九最初轰炸东京。此后，日本的主要都市与工业基地便都成了塞班岛Ｂ二十九的轰炸目标。

至于欧洲方面，以美、英军为主力的盟军，于六月六日在法国西部的诺曼第海岸登陆，和东战场的苏联军夹击德军，八月二十五日，克复巴黎；十月，苏军突破德国国境。至此，德军败势已成定局。

东条内阁垮台

塞班岛之被盟军占领，使日本大为震骇。东条英机内阁被课以连战连败的责任而于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八日总辞职，东条本人退入陆军预备役。他已将日本领导向世界战争，并且也自掘了坟墓。

‘此为敌国不能维持现局及崩溃在即之朕兆，不能不认为吾人之又一胜利也。’（七月二十日日记）

‘本周倭东条内阁已倒，敌方之命运失败在即，固为可慰；然而敌国败后，如我不能自立自强，则虽胜犹败，究有何益乎？因之焦灼更甚矣！’（七月二十二日记本周反省录）

小矶组阁谋略无功

继任内阁，由朝鲜总督小矶国昭和曾任首相的米内光政陆海军两大将合作，采取联合内阁的形式，小矶任首相，米内任海相、杉山元任陆相，于七月二十二日组成，外相重光葵留任。

小矶内阁于八月十九日起举行“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由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改称），检讨战局，其结论为：预料在八月之后，日本本土会遭受大规模空袭，自夏徂秋，战局将趋于“重大化”，而决定了对苏进行“中立工作”、对华进行“和平工作”的方针。这是为了要集中全力肆应业已直接威胁到日本本土的对美战争，乃希望和苏联拉起手来，并对中国谋求和平，以期减轻负担。

‘倭外相重光宣称：不仅不与中国军队为敌，而且不与中国政府为敌。倭寇至今日而作此声明，岂非已后悔莫及乎？’（八月二十二日日记）

最高会议继之于九月五日决定了利用苏联对中国展开和平活动的方针。

这个决定的内容包括有：“（一）中国与美、英关系，以中国之善意的中立为满足；（二）蒋介石回南京，树立中国统一政府；（三）废弃日本和南京（汪伪）政权的日华同盟条约，从新缔结友好条约，对中国内政一切不加干涉；（四）不变更满洲国的现状”等项，仍然是罗列着一厢情愿的要求。而且所谓“满洲国问题”，在九月十五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中，竟有“为防止苏联对日参战，以之作为交易材料出让给苏联如何”等狂暴的议论出现。

翌日（十六日），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尚武向苏联外相莫洛托夫表示：“希望策进日、苏邦交之好转”，并提出“派遣特使”的意见；同时，更以此为藉口而要苏联来做中、日和平的仲介。但莫洛托夫则以：“目前苏、日关系在向正常而良好的方向发展，无须再派特使”而予以婉拒，于是日本的对苏工作乃归于失败。

盖苏联在此时毋宁说是因此看穿了日本的窘困状态，反而在考虑到参加对日作战，藉谋夺取中国的领土。

又被日本所利用的汪兆铭傀儡政权，也已面临了崩溃的境地。伪主席汪兆铭自这一年的三月起因病赴日本疗养，十一月十日，在名古屋的帝国大学附属医院死亡。

小矶内阁的政治（和平）工作，终于徒劳无功。

至于战局方面，在缅甸的日军，也已经开始后退。

先是在德黑兰会议中虽已使盟军的反攻缅甸联合作战延期实行，但史迪威则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强行发动反攻北缅甸的战争。这是没有英国海军支援的单独作战，而且东南亚战区最高统帅蒙巴顿更表示反对；但史迪威由于上一年在缅甸一败涂地，为了挽回名誉而急于反攻。他将在印度蓝伽接受美式装备和训练的两师中国部队调入缅甸国境，到一九四四年三月，肃清了胡康河谷一带的日军。

中美军夺回密支那

继之，特别编组的中美混合突击队于五月十七日突袭缅北最重要地点的密支那飞机场，予以占领；并即展开对密支那的总攻击。史迪威亲上前线，担任指挥，经过两个多月的激战之后，于八月三日夺回密支那。

此外，自云南方面出动支援缅甸战争的中国远征军，截至十一月底，也先后克复了腾冲、龙陵、芒市等地，而与由密支那南下的中美混合突击队在芒市会师。于是，由印度经缅北到云南的地面运输路线（中印公路）之开通，业已在望。

这个期间，驻扎在缅甸的日军第十五军计十万人，自三月到七月越过缅、印国境，侵入印度阿萨姆省，进攻印坊；但在英印军和中国军的迎击之下，反而整个溃败，受到阵亡三万人、伤二万五千人的致命打击而退却。

打通滇缅路

一九四五年元月二十八日，满载物资的五百辆卡车由缅甸开入云南省境，驶向昆明。自滇缅公路失守以来，实则是经过了两年八个月之久，才再度见到以卡车运来补给物资。

中国将这一条中印公路命名为“史迪威公路”。

‘决命名此路为“史迪威路”，以志其劳绩，以示余决不以其过而掩其功也。盖是非功过不能不分耳。’（元月二十四日日记）

但实则由于史迪威不顾中国方面的反对而强行发动这一次的北缅作战，已导致蒋总统和他的关系发展到了最坏的状态。

其一，是史迪威将运在印度的援华物资悉数移用于对缅甸作战，停止了对中国的补给。刚好在这个时候日军为打通大陆而在中国各地发动了大攻势，是故断了补给的中国军乃处于极艰苦的境地。

华莱士来华

关于援华物资之被挪用，蒋总统在胡康河谷获胜之际的一九四四年三月曾对史迪威加以警告。

‘下午五时后，史迪威来谒。对缅战获胜特致慰勉，并严正警告其拨发租借法案之武器，须遵照指示办理。——切不可只限于远征军之局部，而不顾其他战区也。’（三月二十八日日记）

及至湖南战局陷入危机的六月五日，蒋总统电召史迪威来到重庆，嘱以紧急拨给汽油等空军物资，并暂先调拨防卫成都机场的驱逐机攻击日军；可是史迪威对于汽油的紧急运输虽能遵照办理，但对于驱逐机的调用则毫无积极意向表示。不仅如此，并且反而将由印度对中国空运物资的运输机调拨于缅甸作战之用，以致罗斯福承诺的“九月之后每月空运一万吨”的约定，差不多是完全停止供给。

由于史迪威之被一己名誉欲所驱策的结果，乃使中国付出了因其反攻北缅而换来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代价。

共党与史迪威中伤政府

另一方面，被共产党所操纵的史迪威，在反攻缅甸获胜而志得意满的同时，对于国民政府的中伤，也越发严重起来。

此际，决定由美军派遣考察队前往共产党根据地-延安考察，也是出于史迪威之所导演。他于二月四日致电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带有煽动性地说：“中国军队五十万人在华北围堵共党部队，对于抗日战争有很大损害。”马歇尔也是一个没有能够看清共产党本质的人，于是便策动罗斯福促请中国政府同意美军考察队前往延安。

此际，决定由美军派遣考察队前往共产党根据地-延安考察，也是出于史迪威之所导演。他于二月四日致电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带有煽动性地说：“中国军队五十万人在华北围堵共党部队，对于抗日战争有很大损害。”马歇尔也是一个没有能够看清共产党本质的人，于是便策动罗斯福促请中国政府同意美军考察队前往延安。

此外，共产党更向美国放出中伤国民政府的恶毒宣传说：“在云南的中国政府军，不将美援用于对日作战，而秘密转运到后方藏匿起来，准备内战使用。“共产党这种毫无根据的谣言，美国的新闻竟为之大事渲染，史迪威甚至据以向中国提出抗议。但经过中美军方会同检查，结果是完全没有那样的事实。

（民国三十三年六月间自由人注）

可是，因共产党的宣传而感到不放心的罗斯福，于六月间派遣副总统华莱士到重庆访问。中国方面对于华莱士之来访，曾经侧面向美方预作警戒之表示如下：如有为中央与共党调节之意，则中国抗战局势不仅因之动摇，而以后共党势力必更枭张。

华莱士自美国首途，经过苏联，于六月二十日抵达重庆。

蒋总统与华莱士会谈

蒋总统与华莱士自六月二十一日晚间首次会谈开始，以共产党问题为中心先后五次交换了意见。

华莱士首先表示美国和苏联对中国的看法如下：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听史达林说起：苏联对国民政府不满，希望国民政府容纳共党力量共同抗战。史达林并且明言，中国共产党无理论之立场，并非真正共产主义者，且与苏联无甚关系。史达林又表示：希望美国介入中、苏关系之改善，但此仅为从中疏解，而并非希望其居于仲裁地位。

“美国不轻易放弃对苏联的关系。但美国已向苏联表明美、中关系为美国远东政策的基石，决心承认蒋委员长所领导的国民政府为惟一政府，援助到底。

“关于共产党问题，罗斯福总统决无偏袒之意；如果国民政府同意，彼当不惜一试——以公正态度进行国共间之调节。”

蒋总统说明共党本质

蒋总统感到华莱士的共产党观，显然是受了共党宣传的影响，于是乃向他说明共党的本质如次：

‘国民政府原望与共党合作，但共产党不愿如此，到处非法乱行，反而宣传“中央歧视共党”；且到处袭击政府军，而喧嚷“被中央军攻击”；不听中央命令，为所欲为，却叫嚣“中央不民主”。

‘共产党的阴谋目的，有下列四点：

‘一、乘抗战未胜之前夺取政权。

‘二、抗战失败，就是共党成功。

‘三、破坏国民政府信用，使中国孤立，以达其俄国独占之目的。

‘四、使美国政府与舆论压迫国民政府满足共党要求。’

接着，并向华莱士说明国民政府对共党方针如下：

‘一、中共军队接受政府指挥，归政府统辖，不准另有其他名目之军队。

‘二、陕北地区，不得擅设违背中央之别种制度，应于其区域内之商民营业、教士传教不加阻碍。

‘只要实行以上二项，则中央保障共党之地位，保障其受编之军队与其他军队同样待遇，而且亦可同其他军队派遣美国军官为之训练。

‘三、只要共党无独立之军队，无割据之区域，此等军队与区域归还中央以后，则中央可提前实行宪政，不必待至战后一年之内。’

听了这样的说明，华莱士则仍劝请接受调节工作。

史迪威图取大权

蒋总统在和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的会谈中，所特别强调，并要求美国理解之点，有下列五项：

‘一、中国人民之心理，视共党为国际化之第五纵队，而非真正本国之军民。

‘二、中共无信义，惟欺人以达其目的。罗斯福总统在调节方面，应充分考虑其所带来之利害。

‘三、我政府必委屈求全，对中共达成政治解决之方针。

‘四、甚愿美国不为共党之宣传所迷惑，借美国舆论及政府力量，以压迫我政府对共党迁就或屈服之阴谋。

‘五、对中俄关系，甚愿美国从中斡旋，如能促成中、俄或中、俄、美会议，自所希望。’

华莱士对此表示满意。旋于六月二十四日，由外交部长宋子文陪同飞离重庆，赴昆明、桂林、成都访问。但他在各地所接触了人，则只是些被共产党宣传所影响的驻华美军有关人士。

‘据其在各地观察及所得之报告认为：中国行将绝望。其悲观心理一至如此，此乃受共党反动宣传之影响；而我军事之失败，更足增加其失望也。

‘困处逆境已有半年，而以本月为最甚，不知尚有不测之患乎？推其主要原因，实由于罗斯福总统被亲共分子所包围，以致其态度突变；因之，我国政治、社会心理动荡，继之以军事节节失利，遂致陷今日窘蹙之境也。’（六月三十日记本月反省录）

不过，华莱士对于史迪威倒是有了正确的认识。他在归国后向罗斯福进言：“史迪威已失去中国政府对他的信赖，不宜继续在中国工作。”

然而，事态却朝向出人意料之外的方向发展。

要求全部中国军队指挥权

正好在此际，由于缅甸战事使东南亚战区最高统帅蒙巴顿认为“史迪威不能合作”，便通过英国当局向马歇尔提出予以更迭的要求。于是，马歇尔乃反而利用英国对史迪威的厌恶，13[150]2948决将他调离缅甸，予以晋升上将，使专任中国战区工作，先征求他本人的意见，史迪威乃答以：“此事有必要采剧烈手段，或可迫使蒋委员长不能不畀予全部中国军队指挥权；何应钦将军（参谋总长）则应退出。我如无实权，则不能担任。如给予我以指挥权，则中共部队也可以听命，可使之攻向汉口，扭转战局。”

因此而加强了决心的马歇尔，乃立即向罗斯福提出报告，罗斯福也轻易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于七月七日致电蒋总统，要求赋予史迪威以指挥权。

‘本日为七七事变七周年纪念，美罗斯福总统虽仍来电祝贺，不料其又突来一电，即以中国战局危急，欲派史迪威在我直属之下指挥中国全部军队，并以一切租借物资置于史支配之下，言明共党军队亦在其内；是其必欲干涉中国之心，昭然若揭矣！余于此不外拒绝、接受与缓和之三种方针，以为应付之道；后来决心以缓和处之。

‘局势至此，若不自立自强，国家民族亡无日矣！今日之事，惟有奋斗图强方能挽救也。’（七月七日日记）

于是，蒋总统乃于翌日（七月八日）电覆罗斯福总统如左：

‘所提史迪威指挥全部华军与美军，原则赞成；但中国军队与政治内容不若他国之简单，全部统率之情形，亦非缅北少数军队所可比，故非有一准备之时期，不能使史将军指挥顺利以副尊望。

‘余甚望阁下能派一富有远大政治见解而得阁下完全信任之全权代表来渝，调整余与史迪威间之关系，以增进中、美之合作。孔祥熙博士现在美国，关于此类案件，此后可与直接商讨。’

罗斯福对于蒋总统此一提议，原则赞成，但仍表示希望将史迪威统率中国军队之事迅付实施。

其害洞若观火

然而，如果畀予被共产党所玩弄的史迪威以统率中国军队之权，则是极其危险的。盖如将不仅不抗日，而且勾结日军专心从事对国民政府叛乱活动的八路军都交付给史迪威，则岂但是对于抗战毫无助益，甚至反而会招致有害的结果，这是比洞若观火还要明彻的。

何应钦等军事将领也对此议强硬反对，都主张：如美方坚持迁就史迪威，甚或竟以停止援助手段逼使畀予统率权，则应断然予以拒绝，并不管美国给不给予援助而单独抗战到底。

史迪威的鄙行

以罗斯福总统个人代表的身分、来华协商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的美国前任陆军部长赫尔利（少将），于九月六日（一九四四年）抵达重庆。

赫尔利此行，途经苏联，和莫洛托夫外长会谈；然后转赴印度新德里，和史迪威晤商后即偕史迪威同来中国。

赫尔利态度恳挚

赫尔利是罗斯福深予信任的军人外交官，他向蒋总统说明：“罗斯福总统竭诚拥护阁下。”

‘综观其（赫尔利）谈话大意，罗斯福总统所嘱代达者，并非罗斯福有任何要求余来做，而乃是听取余要其所做之事来做云。且语气甚为恳挚，与往日美员所表现者完全不同。’（九月七日日记）

在截至十二日为止的会谈中，初步达成协议之点如左：

一、史迪威的职务名称为：中华民国陆空军前敌总司令。

二、其职权范围为：受最高统帅（委员长）之命令，商承军事委员会之同意，指挥中国陆空军对日作战。作战计划之制成，须经军事委员会之核议。对于所辖部队，有依据中华民国法令执行奖惩任免之权。

除关于中共军队之使用问题及租借物资配给手续尚待协议外，以史迪威为“前敌总司令”之事项，总算是达成了结论。

然而，正在这个当口却发生了枝节——就是史迪威向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发出中伤国民政府的电报。

事缘此时在缅甸战场失去了密支那的日军，正向云南省的龙陵展开反扑。因为驻防龙陵附近的卫立煌所部远征军，已在缅北作战一再牺牲，兵力不足；是故蒋总统指示史迪威调遣密支那中国军南下，进攻日军后背；并告知：如果出动迟缓，则为免败衄，唯有将在龙陵的远征军向怒江东岸撤退。

九月十五日，自桂林前线视察军务返回重庆的史迪威，对于上述指示表示异议，他毫无道理地说出：“密支那的中国军必需休养。如需援军，可调在陕西方面监视共军的胡宗南部队来援，云南的远征军也不宜撤回。”因而发生了争执。因为这一件事而怀恨于心的史迪威，乃致电马歇尔如次：

“蒋委员长要将缅甸远征军调回到昆明。如果这样，则多年来为打通滇缅路的血汗，将无法保持，而会前功尽弃。蒋委员长意在避免战争，保全实力，等待美国击败日本。”

马歇尔盲信史迪威

当时，马歇尔正在加拿大魁北克参加罗斯福和邱吉尔的会议。

马歇尔盲信史迪威的电报，不求证实便起草了一份指责重庆的电稿，请罗斯福总统签署发出。

罗斯福这通电报，不啻美国方面的最后通牒，其大意如次：

“……因阁下（蒋总统）延搁委派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全部军队，致损失、影响之大，殊非吾人所能臆测。日军陷桂（林）后，吾人之昆明空军站将受直接威胁；而中印之空运吨数亦将不免因而锐减。

“……阁下必须立采行动，方能保存阁下数年来英勇抗战所得之果实，与吾人援助中国之效果；否则，政治上军事上种种策划，皆将因军事之崩溃而完全消失。……

“余深信——惟一破坏日军对华计划之方法，即系阁下立刻补充怒江方面之部队，并饬加紧推进；同时，必须立即委任史迪威将军授以全权指挥中国全部军队。此步骤之实现，将更增美国援华之决心。……”

这个电报，是发给史迪威亲递，于十九日到达重庆；史迪威不禁欢欣雀跃，立即请谒蒋总统。

此时，蒋总统正好和赫尔利、宋子文、何应钦以及担任翻译的朱世明在商议任命史迪威为前敌总指挥的发布手续。侍从报告史迪威来见，正要邀其入座，但史迪威则要求先与赫尔利一谈。

赫尔利看到罗斯福的电报，为之一惊，盖当此业已达成协议并即将发布命令之际，却送来了如此咄咄逼人迹近胁迫的电文。于是，赫尔利便说：“不应该对于一国元首面致这样的电报”而加以拦阻；但史迪威并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蒋总统引为平生耻辱

在相对无言、众目环视之下，这封电报送到了蒋总统的眼前。赫尔利恐有伤蒋总统尊严，乃制止翻译朱世明译读电文。

于是，蒋总统亲阅所附译文之后，只徐徐说了一句：“知道了！”遂即散会。

‘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九月十九日日记）

十九日晚间，蒋总统与赫尔利共进晚餐，告知已命宋子文请罗斯福更迭史迪威。

另一方面，史迪威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却写有：“这是平生最愉快的日子。在我一生的日历上，这一天得打上红印。”并写了一首表达庆祝之意的诗，寄给其妻。

翌日（二十日），蒋总统接见赫尔利，在谈话中未提罗斯福的来电而仅仅表示：

‘中国军民恐不能长此忍受史迪威等之侮辱，此殊足为中美两国合作之障碍也。’

美召回史迪威

‘史迪威欲夺取中国军队之全部指挥权，已无所不用其极；以其自私之一念，竟置中美合作政策于不顾。’（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日记）

九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时，蒋总统再度召见赫尔利与宋子文，嘱赫尔利将下列意旨转达罗斯福总统：

三点不能稍事迁就

‘来电所言，自当尊重尊意，但有三点不能稍事迁就：

‘一、我国之立国主义，即三民主义，不能有所动摇；故不能任共产主义之赤化中国。

‘二、立国命脉，即国家主权与尊严，不能有所损伤。

‘三、国家与个人人格不能污辱，即不能接受强制式之合作也。否则，任何牺牲均所不恤。’

随后，蒋总统更以备忘录一分送请赫尔利转电罗斯福，大意如左：

‘今事实证明史迪威非但无意合作，且以为余反为伊所指挥，故此事（任史迪威为前敌总指挥事）因而停止。……如罗斯福总统指派任何美国将领富于友谊合作精神者，以接替史迪威将军，余必竭诚欢迎，且将以全力支持其作战。’

接到更迭史迪威要求的华盛顿，反应出两种不同的意见——白宫幕僚们认为：“史迪威的行为，有污辱友邦元首之嫌”，主张应该表明遗憾之意；但陆军部长史汀生与参谋总长马歇尔则反对将史迪威调回。罗斯福为之踌躇莫决；及至十月四日在华盛顿与孔祥熙会谈之际，乃大致商量到解除史迪威的职务，并以陈纳德为中国战区参谋长。

十月六日，罗斯福正式电覆蒋总统，但其内容却比四日对孔祥熙所表示的态度大为不同，这是因为受到军部的压力而又发生了变化。电报大意如次：

“中国大陆情势，已如此恶化，使余感觉目下美国政府不应再冒派遣美国军官统率贵国全部陆军之责任。……余接受阁下之建议，解除史迪威为阁下参谋长之职务，并已决定不再使其担负有关租借物资之事务；但中国驻印军与远征军之训练指挥，则仍交史迪威管理。……。”

可是，在过去史迪威乃是以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身分统辖在缅、印方面的中国军队；故而当参谋长解任之后，自不应继续畀予中国军权。

十月九日，蒋总统再以：“务须能与中国合作，而得余之信任者，方能授以统率指挥中国军队之权，史迪威将军显已缺乏上述必要条件”之辞意电达罗斯福；同时，并以一分备忘录托由赫尔利转送罗斯福，促其了解现况。备忘录的内容大意为：（一）史迪威不顾中国之不同意而强行北缅战事。（二）在北缅作战期间，因史迪威的抑制而将对中国的物资供给完全停止，直到六月，始补来一月分之供应。（三）结果，中国国内战场因缺乏补给而遭受败衄。

在此期间，史迪威曾经致电马歇尔谓：“如华盛顿再加压力，蒋主席或仍能接受。”又在重庆的美国大使馆员戴维斯更提出建议：“将在欧洲战场掳获的武器拨给共军使用，令其攻夺江南地区，而以承认中共独立政府为报酬。”这个所谓“戴维斯计划”，正就是要造成为共产党所企求的内部混乱的情势。

赫尔利毅然上电罗斯福

此时，以罗斯福私人代表身分还待在重庆的赫尔利对于收拾事态感到苦恼，他在十月十二日晚间不能成寐，经过彻夜考虑之后，终于下定了决心。

天亮之前，他口授秘书录出向罗斯福建议更迭史迪威的电文，等到太阳出山，将电稿持赴史迪威处，交其过目并征询其意见之后，稍加修改，便交美方海军电台发往华盛顿。这是因为陆军方面颇有左倾分子，故而交由海军代为发出。

赫尔利的电报是这样的：

“蒋主席对史迪威谋合作，史迪威对蒋主席则谋屈服；史迪威之误，在想屈服一革命家，而此革命家，乃能率带装备陋劣之军队对日本抗战七年之领导人。窃以为如我总统（罗斯福）支持史迪威将军，则将失去蒋主席，甚至还可能失去了中国。……请另派与蒋主席能够同心协力之年轻将领。”

赫尔利的进言，促进了白宫的行动。罗斯福于收到电报之后，乃下定调回史迪威的决心。此时，马歇尔虽然还在反对，但终于决定在柏区、魏德迈、克劳治三名将领中遴选一人继任。

十月十九日下午，赫尔利谒见蒋总统，转达罗斯福总统最后决定的电报如下：

“余现正颁发命令，将史迪威自中国战区召回，及指派魏德迈将军。目下美国驻中、缅、印战区应分为二～～中国为一方面，印缅为另一方面。印、缅区由索尔登中将指挥，中国区由魏德迈指挥，陈纳德将军之第十四航空队仍留中国，受美军司令魏德迈之指挥。……”

于是，中、美关系的隔阂，乃为之消除。不过自史迪威到职以来，已经是过去了将近三年的岁月。

魏德迈直谅勤敏

十月二十日（一九四四年）下午五时，史迪威由赫尔利陪谒蒋总统辞行，谈话约二十五分钟。蒋总统对史迪威这样地说：

‘余不能与君共事到底，殊为无上之遗憾。但我二人之性格各有所长，不如分地工作，互展其长，继续为打倒共同之敌人而努力也。’

当天下午，史迪威离开了重庆。

‘史迪威果已得美政府之撤回，此为本年内对内对外各种困难之征结；且对此事之隐痛，亦可谓极人生之所未有也。……中、美国交不因史迪威而败，中国抗战亦不因史迪威而败者，殊为莫大之幸运。中、美已误之国交、抗战已颓之形势，皆得由此启其机钥；此后军事、外交与内政各要务，乃可按计划实施矣！’（十月二十一日记上周反省录）

史迪威返美尽力诋毁

史迪威之归国，本来奉命保守秘密，但他却在启程之前函告朱德，以“不得共事为歉”，并且更向美国记者大发牢骚。记者的新闻稍后发表于纽约时报，提供太平洋学会等方面亲共分子以攻击中国政府的材料；唯纽约前锋论坛报发挥相反的评论，指出：“如果武装中共，则势必削弱国民政府，而使中国赤化，是于美国不利的。

‘史迪威回美以后，其反宣传，不仅诋毁我个人，且必欲推倒我政府。其各种诬篾诋毁，以纽约时报爱金生之专论为代表，可谓污辱已极；而共匪乘机煽动，美国之舆论更不待言矣！

‘惟余寸衷泰然，不为其所动，盖早为预料所及也。’（十一月四日记上周反省录）

史迪威事件的处理，的确已使美国政府内部的亲共分子大为不满，而助长了反国民政府的言行。

副总统华莱士就曾在国会秘密报告：“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将失去领导地位，对于重庆只能视为短期投资之对象，故对华不宜只限于援蒋。”此外，戴维斯及亲共记者史诺等人也有同样的意见，向罗斯福提出；而史迪威复曾向陆军部报告：“支援重庆政府，所得甚微，尽可与其他分子合作。”

不良的后果

像这样的一些中伤，对于在开罗会议之后开始趋向冷淡的中、美关系带来了不良影响。后来，在雅尔达会议中罗斯福牺牲了中国的主权以换取苏联参战，不能说与此无关；还有在战后马歇尔在调处国共关系时所采取的亲共态度，后来赫尔利也曾批评其是对于史迪威事件的报复。

至于史迪威本人，则在一度退居故乡之后，复于一九四五年六月前往琉球出任美军第十军军长。此际，他还不满意，而有调遣美军在苏北登陆，协助共军的计划，但为中国所反对，未能实现。

一般说来，如果仅就抗日立场而论，史迪威盖为中国的友人；但就共产党问题，就中、美邦交而言，则史迪威该是一个很大的负号。

魏德迈愿共患难

（民国三十三年自由人注）

继任者魏德迈，于十月三十一日到达重庆，翌日（十一月一日）下午五时初次晋谒蒋总统，晤谈约一小时。五日，蒋总统邀请他和宋子文、赫尔利共进午餐，他即席谈到可否由赫尔利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蒋总统表示同意。

‘此人（魏德迈）直谅勤敏，可说毫无城府，与史迪威之性格适属相反。而其办事精神之积极紧张，我国军人应效法之也。’（十一月十六日日记）

十二月初，魏德迈建议：为防贵州省会贵阳万一陷落，应预作由重庆迁都昆明的准备。

然而，战时首都重庆已经是中华民族抗战精神之所系。蒋总统乃答以：‘余纵在渝被敌包围，亦决不离渝一步。’于是，魏德迈接着便表示他的决心说：“如委员长不离渝，我也决不离开左右。”

‘中、美合作之误会与困难虽多，然近日以赫尔利、魏德迈等对华渐具诚意与热忱，故遇事多能谅解。而魏德迈且以余守重庆，则彼亦愿共患难、同生死、决不离左右之言相约，更史余有得道多助之感矣！’（十二月九日记本周反省录）

由于得到魏德迈这样优秀的参谋长，以致克臻于中、美一体的中国战区之整理和准备，乃有了顺利的进展。

号召知识青年从军

在此之前的八月二十七日，已经号召以十万人为目标的知识青年从军，而实际报名应征的爱国青年达十二万五千五百人，于十二月陆续入营。同时更将整个战斗部队改组，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云南昆明成立由何应钦担任总司令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魏德迈并计划将其中的三十六个师施行美式装备与训练，以培成抗战胜利的原动力。

日军士气丧失

一九四五年，蒋总统五十九岁，是在战时首都重庆迎接了这一年的新年。而抗日战争则进入第九个年头。

‘今年这一年，真是我们励志雪耻，配合盟邦发动反攻的最后时机。……’（注）

此时，盟军在整个战线上展开了最后的总攻击。

德国投降

在欧洲的东战场，元月波兰、二月匈牙利、三月南斯拉夫、四月奥地利接连被克复，四月二十二日，苏联战车部队终于突破了德国首都柏林。

西战场方面，美军于三月七日渡过莱茵河，四月二十五日和苏军在易北河的托哥实现了历史性的会师。

‘德国广播——希特勒于一日在柏林战死。而未明言其死因，此必其自杀无疑。

‘又据罗马电称：墨索里尼于上（四）月二十八日在义大利北部被处死刑，并陈尸于米兰市之广场云。’（五月二日日记）

实则希特勒是与前一天刚和他结婚的秘书伊娃布朗同在柏林的地下室服毒而亡。这个真相，是在战后才传播世界的。

德、义两个轴心国家，都已经丧失了他们的独裁者，于是德军乃赓续于五月七日在法国的理姆斯、八月在德国柏林签下了向盟军无条件投降的文书。

美军登陆吕宋

至于太平洋上的美军，则于元月九日登陆于菲律宾吕宋岛，二月三日攻入首都马尼拉市。

‘此乃一大事，倭寇命运决定于此矣！’（二月四日日记）

美军机动舰队紧接着便使用了一千二百架的舰载飞机，自二月十六日到十七日大举轰炸日本关东（东京附近）各地。

以塞班岛为基地的Ｂ二十九型飞机对日本本土的空袭也为之加强～～三月九日东京大轰炸，十四日大阪大轰炸，日本的两大都市都成了一片废墟。

二月十九日，美军在硫磺岛开始登陆，二万三千人的日军守备队经过浴血苦战而全军覆没；三月十七日，美军完全控制了该岛。

四月一日，美军发动对日本本土登陆之前的最后一场大战-就是琉球本岛的登陆战。接着在七日，编成为海上特攻队打算突入琉球的日本最巨大不沉战舰-大和号（六万九千一百吨），在驶达九州西南方之际，受到美军三百架飞机的攻击而葬入海底。日本之所引以自豪的海军联合舰队，至此差不多已全部消灭。

芷江战役

（民国三十四年自由人注）

此外，中国战场上的日本陆军，也在作垂死的最后挣扎，制空权已经完全归于盟军掌握，对于来自天空的攻击无法招架，乃意图以地面部队攻占湖南芷江的盟军空军基地，而于三月下旬轻率地发动了芷江战役。

‘美军已在琉球登陆，而敌寇犹向我战区发动攻势，但已成强弩之末，不足为患也。’（四月一日日记）

日军以第二十军（坂西一良中将）为主力，出动八万大军自衡阳西方的邵阳（宝庆）西进。

事前业已侦悉日军动向的中国军，在空军援护之下，早就部署了无懈可击的防线。

于是，要想勉强突破中国防线的日军，乃在所到之处都被切断、包围，受到了歼灭行的打击，终于在五月上旬丢下了约两万阵亡者的尸体而败退。

这个芷江战役，是日军所发动的最后一次大战。在这次战役中，很显然地证明了敌我战斗力业已逆转。

中国军大规模反攻

有了自信的中国军，以此为契机而转采大规模的反攻。

最初目标，在广西的桂林和柳州方面。

四月二十七日，由张发奎任司令官的第二方面军展开了攻势；五月二十七日收复南宁，并即尾追遁逃的日军北上。

另一方面，汤恩伯司令官指挥的第三方面军自桂西进攻，五月十九日夺回河池，六月十四日克复宜山，进而和第二方面军协同作战，于六月二十九日进入柳州城，更继之于七月二十八日光复了重镇桂林。

在闽、浙两省也都展开反攻，继五月十八日收复福州之后，及至六月中旬，东南沿海的长乐、乐清、黄岩等县都次第克复。

日军完全丧失了士气，呈现出已临末期的症状。

曾在汤恩伯麾下担任第十三军军长、参与反攻广西战役的石觉（现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和笔者（古屋奎二）谈到日军在末期素质低落的情况如下：

我指挥的部队自参加长城战役而转战于台儿庄、武汉、广西各地，到了一九四四年前后，看到日军战力显著衰落下去。

在战争初期，日军有“绝不投降”、“死不缴械”的精神，我曾见到有失去机关枪的射手被他的长官砍死的情形。

然而，到了战争末期，则都是些未曾受过充分训练的军队，多数排长级的军官，好像是不懂得指挥战斗。我们询问俘虏：为的是什么要来打这个仗？他们表示也是不能理解。一九四五年八月上旬反攻梧州时，日军只支持了一天便败逃而去，使我们都感到惊讶。

蒋总统告全国军民

在总反攻高潮之际的七七事变八周年纪念日，蒋总统发表了“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其中有这样的几句：

‘到了今天，我仍觉得敌国民众追随他军阀错误的指导以殉葬送死，是极可怜悯的一件事。然而，以八年战斗的经验，我可断言：敌国民众在军阀驱迫欺骗之下，是祇认得力量，不认得是非，也不知道利害。所以我们即使要为拯救日本的人民，也非彻底消灭他所有侵略的武器，不能望他们的觉醒而归附于正义和平之下。’

注：蒋总统-“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一九四五元）

日亟图讲和

业已被迫处于困境的日本，乃用尽了各种手段探索进行和平工作。

首先想要利用的人是缪斌。他曾经做过江苏省民政厅长，但背叛国家参加了汪兆铭的伪政13[173]2971权，担任其立方院及考试院副院长，可是由于和伪政府的一般人合不来，而待在上海混日子；和日本人交往频繁，向他们自称：“和重庆有特殊联络”。

日本病急乱投医

一九四五年三月，缪斌被日本首相小矶国昭邀往东京，要他担任谋和工作；但实则和中国政府根本就没有联络，而只是由小矶国昭大演其独脚戏之后，便未见有下文，适足为日本焦灼情形之象征的一幕闹剧。

据战后公开的日本资料-“缪斌工作的始末”如次：

缪斌是由日本军方推荐给汪兆铭录用的人，日军相信他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情报机关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有联络。

缪斌于一九四五年三月十六日由上海飞往日本，住入东京广尾的迎宾馆，和日方进行交涉。

缪斌的“和平方案”，是以立即解散南京伪政权为主体。

小矶国昭对于缪斌工作颇感兴趣，乃于三月二十一日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恳谈会中提议：“以缪斌案为基础正式进行和平交涉”，和“允许缪斌使用无线电与重庆联络”。

但陆相杉山元与外相重光葵认为缪斌不足置信，并批评小矶的行动“轻率鲁莽”，加以反对；天皇也表示：“不应该采取这种谋略性的手段”，遂即中止。

战后，缪斌以叛乱罪被国民政府逮捕，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为首先被判处死刑的汉奸。

因缪斌工作而失掉了信用的小矶内阁，于四月五日总辞职；遂即由铃木贯太郎出任首相，组成新阁。

铃木就任后，连日听取重臣及枢密院元老们的意见，大多主张停战讲和，爰即依据这些意见，一再多方面进行其和平工作。

五月十四日，对于日本情势有所分析的调查统计局长戴笠向蒋总统提出报告如次：

“五月四日，曾由敌驻沪公使上田丰及大本营高级军官数人要求在沪之颜惠庆、李思浩等一同来渝，晋谒钧座，企求谈判和平。颜等婉辞。”

像这一类的工作，简直是在病急乱投医。

雅尔达密约的阴影

看清了日本的失败趋势，而在行动上毫无疏漏的，乃是苏联。

在许多活动之中，有于一九四五年二月在黑海沿岸之雅尔达所举行的罗斯福、邱吉尔、史达林三国首脑会议，竟然得与美、英缔结了决定中国命运的密约。

由于这个“雅尔达密约”而牺牲中国主权给予共产主义者的事事，在蒋总统秘录开始连载之际（单行本第一册）就已经作了详细的介绍；现在就美、英、苏三国所关涉到中国的大国外交活动，再作一点说明。

雅尔达会议是不是会给中国带来不幸的结果？这一个危惧，蒋总统是在那个会议揭幕之初就有预感。

盖邱吉尔固持其殖民地主义的本国利益，而受了共产主义者的宣传之所欺骗的罗斯福也正逐渐有对中国冷淡的趋向，这样的两个人，将受到充满着攘夺利权野心的史达林之所影响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今日见罗、邱、史黑海会议第一次公报，一如所预料，其果与英、俄协以牺牲我乎？’（二月八日日记）

‘俄国对我交涉迁延，中共态度转劣，当受三国会议之影响也。但余毫不动心，无论其态度好坏，必待罗斯福之来报，详悉其内容而后再定方针；此时不必臆测，更不必焦灼也。’（二月十二日记上周反省录）

雅尔达会议之后，罗斯福于三月一日在国会作报告。他说：雅尔达会议中所商讨的问题，只是有关于欧洲方面，与太平洋战局无关。然而，这乃是欺世之谈，实则他已闷声不响地在使世界历史拦入歧途的密约上画了押。

这个密约的内容有：“外蒙古现状应予保持（即在苏联卵翼之下独立）；大连商港应辟为国际商港，苏联在该港优越权利应获保障；苏联并得恢复租借旅顺为其海军基地；中东铁路以及通往大连之南满铁路应由中、苏双方共组之公司经营”等项，而罗斯福则是以得到“苏联对日参战”为条件，予以接受。

罗斯福由于对日本的战斗力估计过高，耽心进攻日本本土作战时美军会蒙受很大损害，故而一意期盼苏联早日参战，遂致落入史达林的圈套。

密约签署之后，罗斯福虽则极端保密，甚至连对副总统杜鲁门都未曾透露，可是，“好像签有密约”的情报，则自各方面传到了中国。

蒋总统首先过目的，是驻英、苏两国大使顾维钧、傅秉常的密电报告。

‘闻傅大使秉常来电，以美驻俄大使通知其罗、史谈话大意，俄史之对华方针到此完全明了；其中尚有难言之内容，未能明以告我者，证诸顾大使之言，俄国对东北与旅大特权恢复之要求，当非虚传也。国势之危已极，不知何日有济？’（二月二十一日日记）

赫尔利的奔走

（民国三十四年）

三月十五日，蒋总统收到驻美大使魏道明报来有关“雅尔达密约”更详细的情报。

‘上午，批阅魏大使道明来电，得悉罗（斯福）史（达林）对于远东方面的谈话：

‘（一）满州铁路，史提国际代管而主权属华。

‘（二）欲旅顺或大连为其出口之不冻港。罗对史嘱其不必急急于此，而对我则主张旅顺为俄长期租借，其主权属于我云。

‘闻此，但有痛愤与自反而已，“雅尔达”果已卖华乎？惟如此可以断定此次黑海会议俄国对日作战已有成议。果尔，则此次抗倭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矣！’（三月十五日日记）

其实，苏联早在一年多以前的德黑兰会议中，就已经和美国约定要对日本宣战；可是，直到此刻连这样的情况都还没有告诉中国。

四月三日，苏联突然将其驻华大使潘友新更迭。

‘俄国发表彼得罗夫为其驻华新大使之任命，此为其对华突变之行动，用意何在？而且近日新疆匪势亦已渐缓，岂其对华政策已转变乎？’（四月四日日记）

彼得罗夫之任用，是为了行将到来的中、苏交涉的一步棋子，在蒋总统秘录开始连载之际（请参阅中译本第一册第三十五页）就已经提到过——彼得罗夫于六月十二日以“雅尔达密约”为后盾向蒋总统要求进行中苏交涉，并强硬提出租借旅顺等五项先决条件。

赫尔利力求补救

最早察觉到“雅尔达密约”的严重性、而采取行动想予以打消的人，乃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他听到已有密约的传说时，便于二月底托称述职而回到华盛顿，说服了卧病在床的罗斯福，并阅读了雅尔达会议的所有公私往来文件。

赫尔利在找出了密约副本之后，为太过离谱的内容而大吃一惊，乃抄录了原文，在空白之处写出下面一些话送呈罗斯福过目：

“美国是否有权割让另一个主权国家的一部分领土？是否破坏了美国参加第二次大战所宣告的一切原则和目标（联合国宣言等）？是不是否定了总统自己三月一日在国会的演说？……”

罗斯福于是便向赫尔利坦承错误，并即指示赫尔利飞往伦敦、莫斯科，谋求对中国背信行为有所补救的善后方策。

然而，事到如今，要想把经过三国最高首脑签了字的“密约”恢复到一张白纸的状态，已经是几乎没有可能；是故赫尔利乃考虑——循遵守“大西洋宪章”的原则（不扩张领土、民族自决等项），使“密约”的实效有一个限制范围，以谋保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

赫尔利于四月五日在伦敦首先会见邱吉尔，他说：如果英国不遵守大西洋宪章而要继续据有香港，则苏联便会提出相同的要求。盖赫尔利认为英国如果将香港放弃，则对于苏联对旅顺、大连的要求会有很大的抑制力量；然而，邱吉尔却以坚决拒绝的语气回答：有关殖民地的事，英国不受大西洋宪章的约束。

罗斯福去世

四月十二日，罗斯福突然去世。

‘今晨六时后，得罗斯福总统脑充血症已于四时半逝世之报，甚为世界与今后国际局势忧也。

‘罗斯福虽对俄姑息与对中共袒护，但其尚有限度与一定主张，并非徒恃强权之霸者。今后，美国政府恐将受英之操纵，有所变更，而不能如罗之自主矣！中、俄关系，因罗之死，更应审慎出之。’（四月十二日日记）

此时，正当赫尔利与邱吉尔晤谈毫无结果之后继为劝说史达林而在转赴莫斯科的旅途中。由于罗斯福之逝世，乃致赫尔利的奔走失去了后盾。

赫尔利于四月十五日和史达林会谈，不仅没有得到良好的反应，而且同席谈话的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于其后回到华盛顿，且向新任总统杜鲁门极力建议不要废弃密约。

四月二十四日，蒋总统接见历访英、苏之后回到重庆任所的赫尔利大使，听取其详细报告。

国不自立能不戒惧

‘美国恐俄国乘机占领东三省一点，似已引起其深切注意矣！

‘赫尔利此次访英、俄，征询其对华统一政策之同意，形式上虽皆赞成，而事实等于徒劳也。赫尔利用意甚美，且出于助我中国之精诚，故为之深谅。

‘但中国之独立统一、自由民主政治之建立，而烦友邦劳心，且劳其征求英、俄同意，殊为我国耻辱。国不自立，人不自强，宇宙之大，其尚有为我民族生存之地耶？能不戒惧乎哉？

‘邱吉尔对香港交还中国问题，谓：“誓死不愿”；又谓：“美国对中国之政策，为一大幻想”云。——其蔑视我国盖如此也！’（四月二十五日日记）

苏俄伸出魔掌

由于雅尔达密约而使其所据有的一分巨大利益获得保障的苏联，乃朝向对日参战的道路踏动了加速器。

在小矶内阁总辞职的同一天～一九四五年四月五日，苏联向日本政府送出“不延长日苏中立条约”的通知。

约定“互不侵犯”的这一个条约，是在一九四一年四月由于彼此承认日本控制东北、苏联掌握外蒙古而成立，有效期间还有一年（约定五年），现在苏联发出这个不延长的通告，就是说到了一九四六年四月期满的同时，日苏之间乃自然成为无条约的状态；但实则苏联并没有等到期满，而在发出通告五个月之后的八月八日便对日本宣战。自那一天之后直到今日，日苏之间因北方领土问题（二次大战后被苏联占领的岛屿）未能解决，以致日苏和平条约为之搁浅。

俄准备对日作战

由于苏联送出不延长日苏中立条约的通告，显示其已在准备对日作战。是则在中国来说，也就不能不为之寄以重大的关怀。

四月六日晚间，蒋总统召集干部，研讨日苏中立条约不延长的情势和日本内阁改组所产生的影响，结论如左：

‘铃木内阁如组成，必为表示其求和态势；如求和不成，再组蛮干到底内阁。

‘俄之废约（不延长）声明，其语气为宣布日本助德攻俄，已违反中立协定。故俄必于最近期内对日宣战也。

‘我应该积极准备事项：

‘（甲）俄对倭宣战之态度与手续。

‘（乙）倭于提出求和条件时，我之态度与手续如何。’（四月七日日记）

翌日（七日），举行军事会报，设想苏联对日参战之情势，指示军事干部应有所准备如次：

‘俄国必于最近期间以攻倭为名，垂手而占我东北，对倭战局实有急转直下之可能。我国军事各部主管如不能彻底觉醒，力图自强，则所有革命基础与希望完全绝灭。

‘故在此半年内，必须照预定计划整军，裁编机关、军校与部队至三百五十万人为最高额，则国家尚有建军机会也。’

日本也急于在考虑对苏联的对策。新任首项铃木贯太郎连续于五月十一、十二、十四日的三天之间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构成员会议，但是他们把苏联看得太好相与，以为还有商量的余地，故而决定：“防止苏联对日参战；争取苏联的善意中立”两项方针，以及策动苏联为之仲介，以导致战争之终结于日本有利。

于是，外相东乡茂德乃请托曾任首相的广田弘毅和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接洽。广田于六月三、四两日在箱根和马立克会谈，提出：希望寻求维持日苏和平关系的方法，试探有无签订条约等的可能性；但马立克则以广田的提议有欠具体而延不置答，且托病不再与广田见面。

六月十一日，日本国会通过了为准备“本土决战”而订立的“战时紧急措置法”，赋予内阁以专断大权。

‘敌国会临时会议授其内阁总理以天皇特权，是为其投降之准备乎？然已难矣！’（六月十七日日记）

六月二十三日，琉球日军守备队全军覆没，牺牲了九万名官兵及十万居民。

七月十日，日本举行“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为请托苏俄斡旋结束战争，决定派遣曾任首相的近卫文麿为衔有天皇密旨的“特使”，前往苏联。

然而，此时已经只是在选择对日宣战日期的苏联乃于十八日拒绝近卫特使前往访问。至此，日本对于苏联的乐观期待，遂已完全绝望。

强迫我国让步

再说苏联，一方面在加紧准备对日开战，一方面则对于中国强迫要求进行友好条约的交涉。

苏联凭藉为交涉的后盾，就是雅尔达密约。这个密约，中华民国毫未与闻，在国际法上当然不受任何约束；但由于是既成事实，其压力是相当沉重的。加以苏联已在向东北边境调集兵力，而且美国的对苏、对华政策也不容漠视。

‘正午，与赫尔利商谈越南、香港及朝鲜、东北之军事、政治方略，余亟欲知美国对南满有否登陆之准备，以定我国对俄交涉之要领也。彼答：有此准备云。彼并报告其昨日与俄使谈话之经过，表示其美国对旅顺问题，仍守其对华主权、行政完整之一贯政策。而我国亦不能放弃革命之原则，即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必须确保之宗旨也。’（五月二十四日日记）

‘下午五时，与俄大使谈话，关于东三省及军港、商港等主权行政必须完整之意见，明白对其表示；并说明中、俄利害关系，不可为小而失大也。’（六月三日日记）

这个时期，自六月十二日起蒋总统与彼得罗夫接谈，六月二十七日起宋子文、蒋经国和史达林在莫斯科会谈（已发表于秘录第一册）的中、苏交涉，就是如此充满着痛苦；最后，中国被迫乃不得不按照雅尔达密约的内容作了让步。

极其严重的后遗症

而其结果，则是在后来产生了大陆赤化，韩战、越战继起，已无须再事赘言。

被共产主义者之宣传所迷惑的美国，舍弃不了殖民地主义迷梦的英国、以及燃烧着赤化世界野心的苏联——这三个国家的“大国外交”所留下来的后遗症，实在是极其严重的。

这个密约的内容有：“外蒙古现状应予保持（即在苏联卵翼之下独立）；大连商港应辟为国际商港，苏联在该港优越权利应获保障；苏联并得恢复租借旅顺为其海军基地；中东铁路以及通往大连之南满铁路应由中、苏双方共组之公司经营”等项，而罗斯福则是以得到“苏联对日参战”为条件，予以接受。

□□□□□□□□□□□□□□□□□□□□

《俄帝侵略中国史》部定大学用书吴相湘着国立编译馆出版台北，正中书局印行中华民国四十三年三月台初版中华民国四十六年五月台二版

由第四三七页至第四四九页为“割裂新疆阴谋的败露”，节录于次。

下篇第二七七页第四章对日抗战期间的乘火打劫第四○五页第四节割裂新疆阴谋的败露第四三七页

自民国二十三年俄寇制造新疆叛乱，乘衅入据新省要津，即以红军踞守迪化城郊，全省各重要地区文武机关亦均布满其特务人员，而美其名曰新疆省政府特聘“顾问”，以加强控制自盛世才以下的新疆行政人员；同时又将其机械化陆军第八团（世称红八团）穿着我国军服，并用“地质考察队”名义作伪装进踞哈密，紧扼新省与中原交通的咽喉，防阻我中央政府人员势力影响及于新疆，妄图逐步予以兼并——据民国二十五年七月十日，我驻新西伯利亚领事李芳上外交部密呈，报告新省当时的情形有云：

“省政府财政厅及各地方行政机关皆驻有俄顾问，不经俄员签字不能动支一文……复因屡次借款以全省生产税收作抵押之关系，故俄人得以把持全省财政支配用途，复赞助省府滥发纸币，以集中现金，故现金悉输入俄境，而纸币日落千丈。

“新省商务完全为俄人所独揽，新苏贸易公司设总公司于塔城，分设机关于迪化等各城市，经办进出口贸易，所用工业品，农用器具，日常用品，甚至粮食，无一不购自俄境，出口乃皮毛矿砂，贵重药材牲畜及一切原料，以制造品易原料，以纸币换取现金”

据此可知：当时史达林对新疆的操纵与榨取，已不是如沙皇时代俄人的“客商”地位，而是俨然以“行政首长”身份运用其无比的非法权力了。

先是：盛世才既中马克斯邪说之毒甚深，在新省又公然以“亲苏”“反帝”政策为标榜，以便利俄寇的侵略，但迄以未取得共产党党籍为憾；“七七”抗战发生，共匪头目陈绍禹任弼时等常取道新疆往来莫斯科延安间，世才即一再要求加入“中共”，当经匪酋毛泽东彭德怀等通过，但呈报第三国际时竟未得核准，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世才乃藉口就医，前往莫斯科面见史达林，请求入党，史达林当表示赞成其先加入联共（即俄共）再转入中共（但其后始终未为其办理转移手续）；很显明的暴露史达林心目中早已不认新疆是中国的领土，故不以属“中共”活动范围，对于盛世才也不过是视作其暂时管理新疆的一个工具，更是不愿其头脑中丝毫存有“中国”二字观念的，不幸世才未能及早憬悟，反以为荣；而俄人即利用这一约束，对新省权益任意予取，甚至不经签订任何协定或合同的手续，仅一与世才口头商谈，即非法开始经营新疆独山子的石油矿。

一般人都知道：石油是现代工业及国防的生命源泉。我国石油储藏量，据我地质学家在民国二十六年的估计：全部储藏量约为二亿零六百万公吨，而新疆一省的储藏量，约有一亿二千万公吨，即占全国总储藏量的百分之五十八，关系我全国工业及国防需要的重大可以想见！但不幸即在同时苏俄政府根据派赴各处探矿远征队的报告，也发现同样的结论：即俄境巴库石油的产量，逐渐衰老枯渴，经专家寻逐矿脉，一致认定中国新疆甘肃一带，地质上是中东油矿的来源，亚洲油矿的总汇。同时根据在基齐尔科姆（Ｋｊｌｌｋｕｍ）沙漠区新发现一古代火成岩岛，跟踪追寻的地质化学带子，又是深入中国西北的天山山脉才是各种金属矿脉的真正龙头！而地质探测结果估计：苏俄工业资源除煤铁差可自给外，其他主要金属如锡缺少百分之八十，铜缺少百分之六十，钨锑缺少百分之百；为着医治这地质经济的异常贫血症，迅速充实侵略战争的需要，于是俄寇更亟于如何一举囊括我地大物博的新疆省！

独山子油矿的非法经营，既轻易达到目的，因之，俄寇行动更见急进：民国二十九年春，盘踞哈密的“红八团”，即开始经常由哈密向迪化侦察地形，修整道路，同时国境上空又时有俄机飞行侦察，省内各地俄“顾问”更展开拉拢我国军官的活动，逮造成一严重恐慌形势后，是年十一月，史达林又派一密使至迪化，以一绝对秘密文件即所谓“租借新疆锡矿条约”面交盛世才，并告语世才说：

“你一方面是联共党员，一方面马仲英马虎山变乱时期，苏联在新疆流过很多的血，我们没有得着什么代价”！

“你一个字都不能修改，你系联共党员，应该服从党的命令，更应该为苏联的利益作斗争”！

俄罗斯帝国主义者的嘴脸如此！世才既已接受其支援，又自动要求入党于前，在当时环境下，当然没有反悔迟疑余地，只有一字不改的签字了；是月二十六日遂签订这一有效期限五十年，一经签字立即生效的“租借条约”，其内容要项如左：

第一条：新疆政府予苏联政府以在新疆境内探寻、考查、与开采锡矿及其副产有用矿物之特殊权利。

第三条：苏联政府有权将其由开采锡矿及其副产有用矿物之产地而得之制成品，或半制品，由新疆无阻碍的运出，并免缴关税及他项捐税。

第四条：为实际施行本租借条约起见，苏联政府设置考察与开采锡矿及其副产矿物产地之托拉司，简称为“新锡”。

“新锡”在新疆全境内享有无阻碍的开设分所、事务所及代办所之权。

第五条：新疆政府在本条约有效期间，应保证“新锡”获得为举办本条约所载各项工作所需之土地，其中包括森林采伐、煤炭开采、及获取建筑材料之区域，同时新疆政府应将居住于划拨“新锡”土地区域内之人民一律迁出。

土地区域，由新疆政府按照新锡之请划拨之，划拨土地区域时，不应迟延，并须与所提申请完全相符。

第九条：新疆政府应协助“新锡”实现本条约所规定之目标，并不得干涉“新锡”之业务。

第十一条：“新锡”在保卫房舍、建筑物、工厂、作坊、仓库等等，以及保证转运安全所必须之范围内，有权设立武装守卫。

第十四条：苏联政府同意由居住新疆境内之公民中选就熟练干部，其人数与计能种类由苏联及新疆政府代表议定。

只要是一个稍明中国近代史实的人即可知这一条约完全“一面倒”的严重性，即在进百年来不平等条约中都是很少见的！而其阴险毒辣处尤在于假租借锡矿之名，轻易带出“及其副产有用矿物”，是其范围毫无限制可知。至于藉口业务工作需要，而攫取在新省全境划拨土地、设置武装警卫、自由行动居住等权，尤其是在划拨“新锡”土地区域内之人民一律迁出种种规定，不但其所采掘的究为何物，无可稽查，其他一切阴谋活动也更难防止了。但既经盛世才签字，条约立即生效，俄寇即据为已得的特殊权利，其地质考查团及技术人员旋即携得各种机器设备来新，四处采掘，每日均有成批卡车载运钨砂锡等矿质小布袋西去，国防上最重要的工业原料，遂全为俄寇非法攫去，而新疆全局也因俄人密布四处而益趋严重了。

根据民国三十一年七月七日，盛世才反苏后上蒋委员长的报告说：当苏俄密使来迪化迫签这一密约时曾对盛云：“就这样作，你以后见史达林就知道了”！其后，民国三十九年三月四日世才发表回忆谈话中又云：“苏联之真意似不在密约之实行，而在因签订密约可以防止余与中央之接近”，更足见这一密约内涵的严重性质；而世才上蒋委员长报告续有云：

“此次（民国三十一年七月）苏联外次迪卡诺索夫（Ｄｅｋａｎｏｚｏｖ）亲自向职送交苏联政府文件一封，其内容不但荒谬绝伦，而且包含着其他不良恶意。

“该文件内称：一九四一年（民国三十年）曾‘建议苏联政府在新疆成立苏维埃政府’一节，其实并非职之真意请求，而正是职藉以测探苏俄政府对新疆是否有领土野心和是否真正执行马克思主义？原因在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之间，曾破获了新疆维吾尔族、塔塔尔、归化族、回族的大阴谋暴动案，该案之目的，是要把新疆脱离中国，成立维吾尔斯坦，该案之参加者，均系新疆各族中最有名望之人物，而该案之策动者，则系苏俄前任驻迪化总领事欧杰阳克……该案破获后，职为了测验该案背景，是否苏俄政府之行为，所以去了上述信件……但迄今未得复。

“综合……苏联政府所送达文件，一面是恫吓，一面是挑拨，而另一方面是防止职与钧座之接近，已昭然无疑矣”。

世才这一自我辩护状，支离错杂，前后矛盾，不但不能自圆其说，反以自暴其过失；但由于这一当事人的自述，俄寇运用各种手段以图割裂我新省阴谋的全貌，是暴露无遗了。简要的说：当民国二十九、三十年，我国抗战最艰巨的时期，俄寇是已决心乘我之危，实行割裂我新疆省以去的——按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莫洛托夫与希特勒在柏林会谈时，即曾论及由德国保证日本必承认新疆为苏俄独享势力范围，足见俄寇在当时并已取得国际上的支持。（见本章第一节）但民国三十年六月，德苏战争的突然暴发，俄寇为着争取美英的同情援助，一时不便再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新疆采取行动了；不过军事上石油的需要更感迫切，因此对于独山子石油矿的榨取工作益加积极，驻迪化的俄总领事且于一年之内数次前往油矿工厂考察，督导工作的进行，同时又思染指其他油矿，民国三十一年七月三日，俄政府因又特派外交次长迪卡诺索夫携带进一步侵占独山子以及其他石油矿问题的秘密文件，要挟盛世才签字，而对于支持新疆独立的计划则毫无明显表示（这当然是其时国际环境使然），世才心怀觖望，又愤恨是年春其弟世骐（时任新疆机械化旅长）被刺身死一案，与苏俄顾问有关，遂决心“叛党反苏”投诚中央，七月七日因上呈蒋委员长详陈过去“亲苏经过”（即上录盛函），十七日，并函复俄外长莫洛托夫表示独子山油矿应由中国中央政府与苏俄政府合办，八月二十日，莫洛托夫复函表示同意，以求和缓局势，但世才已准备遣回全疆俄籍“顾问”了。

按照俄寇一贯作风，对于任何一中途叛离的个人或团体，是必竭尽一切手段以予整肃的，但其时德军攻势猛锐，俄境情况紧急，国际间又极注意中俄关系，以及俄人在新省的行动；客观情势如此，不容俄人对世才采取严厉对策。民国三十二年一月，俄驻迪总领事普式庚遂正式宣告：“新疆当局之反苏行为，迫使苏联决策撤回对新疆之一切支援，包括军事支援”。未几，“红八团”即开始自哈密撤退，其中一部经由独子山拆除油田机器，满载而去，一部经由头屯河拆卸铁工厂机器装车运走；四月十日，普式庚又往新省督署口头声明：“奉到苏俄政府命令：（一）所有在新疆地质考查团（新锡）工作完全停止；（二）将所有考查团人员一律撤回及一切机器运回”。五月十一日，俄籍地质专家及考察员等遂开始先后出境返俄；同时，驻重庆的俄大使与我经济部外交部代表举行将近十个月的“中俄合办独子山油矿”谈判，也由于五月十七日俄大使的突然通知——申明苏俄政府已决定将独子山油矿设备全部拆卸运苏——而戛然中止。

就独子山油矿谈判情形看来：自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开始会谈，以迄三十二年五月十七日以前，俄方是始终坚持其喧宾夺主比较民国十三年中俄有关管理中东铁路协定更不平等之要求的，足见其企图控制我新疆经济资源的野心，是并未因盛世才个人态度的转变而有所改易的，而今突然采取这一撤退所有人员机器的决绝态度，显然是另有重大阴谋已在酝酿了。

先是：盛世才主政新疆之初，采取严厉不排除异己政策，因之引起境内各少数民族的不满，二十九年二月间，遂有阿山哈萨克族头目乌思满领导的反盛暴动（世称阿山事变），幸世才迅速应用怀柔安抚手段，平息动乱，嗣三十年四月，因苏俄地质调查所专家数人前往阿山区探查矿产，经行承化至青河各地，又使东山牧民大为不安，是年六月，复发生第二次暴动，世才改取武力手段，但自七月至十一月数次进剿，均未获胜，直至山雪大降牧民始被迫投降，乌思满等则潜逃至新疆蒙古边界；逮世才公开反苏，俄寇既不能公开采取严厉对策，为牵制待机计，遂支持乌思满使其死灰复燃；但为迷惑国际间注意，乃于民国三十二年九月假手外蒙派员邀请乌思满派代表至蒙卡会谈，并赠予匣枪望远镜各二（是年五月，苏联地质考查团已先送若干礼物予乌思满），同月十三日，乌思满即以马匹砂金毛毯往外蒙交换枪枝弹药，十二月，外蒙军官马吉克至乌思满新驻地青河库尔土地方协助其组织“阿尔泰哈萨克复兴委员会”，并征兵四百人，成立司令部，旋又自外蒙易来连珠枪三百五十支，机枪三十挺手提机枪七十挺，积极训练。

民国三十三年春，乌思满部编练既成熟，乃于三月二日，率众并杂以一部外蒙军队，在苏俄飞机掩护侦察、轰炸、扫射下，向我青河南部及乌河设置局进犯，虽经我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向苏俄总领事一再提出抗议，要求制止，终无效果；四月三日，俄寇为迷惑世人视听，又利用其传声筒塔斯社发出反诬我国的文告说：“中国在外蒙边界有军事行动，苏联根据与外蒙缔有攻守同盟之关系，有援助外蒙之义务”——事实上，当时我抗日军事正亟，何有余暇“进犯外蒙”？俄寇颠倒是非，固不足辩，但美国罗斯福总统深恐这就是俄人故意制造中俄间重大问题的信号，遂派遣副总统华莱士来访中国，并特嘱其先取道俄境再来重庆，以图从旁协助改善中俄关系——据当时奉我国政府命令前往迪化欢迎华来士的新疆监察使罗家伦氏回忆当时情形说：

“苏俄做得太笨拙却是太明显了！华莱士飞机一到，所谓叛徒（乌思满）的进攻，立即停止，华莱士一离中国，则边境上小型的冲突又起。

“因为苏俄最不能容先亲共而后反共的人，所以华莱士主张调换盛世才主席以缓和苏俄……

“最后，中央宽大为怀，和平处理，而新疆各族同胞，也都倾心内向，新疆内在矛盾，可以算是平顺的解决（是年八月二十九日盛世才内调，以吴忠信继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照常理说：苏俄也该满足了，可是新疆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这件事断绝苏俄侵略的野心，是他不能容许的……于是，伊犁大规模的事变又起”。

所谓“伊宁事变”，原是民国三十二年夏，俄人策动乌思满叛乱时同时进行的，但因俄人寄于这一伊宁叛徒的希望，远较乌思满为大，预定叛乱的范围也较广扩，因此发动迟于乌思满的行动。

自民国三十二年五月，俄寇采取决绝态度，撤退在新一切人员机构后，既嗾使外蒙策动乌思满部死灰复燃，同时即在西部中亚细亚哈萨克共和国首府阿拉木图，组织一“新疆突厥民族解放委员会”，罗致民国三十一年以前曾在新疆阴谋活动多年的若干俄籍人员；如前任迪化维文天山日报社长乌兹别克人满素尔，前任伊犁实业公司总经理白俄人格里别肯，及二三退伍军官主持其事，而由苏俄驻新省境内的五处领事馆，与各处贸易机关作掩护，利用外交职权，偷运武器入境，以招揽地痞流氓，组织地下武力，发展为地上别动队组织，相机暴动为主要工作目标。

民国三十三年九月。盛世才交卸省政后，飞往重庆，新任主席吴忠信抵迪化订期十月十日正式就职视事，青天白日国旗飘扬全疆，全省人民都以兴奋心情迎接这一新时日的来临，但在侵略者阴谋家看来；这一新旧交替之际，却是掀起暴动叛变的最好机会也是最后机会，因此，九月底，俄寇即嗾使其俄籍塔塔尔族人法哈提，经由霍尔果斯窜入巩哈县西部乌拉斯台，啸聚暴徒，发给枪枝，胁迫牧民骚动；十月八日，法哈提又在苏俄红军官指挥下率领暴民千余人，由乌拉斯台进攻巩哈，占据县城，十日，伊宁市区突出现印制精良的俄文传单及标语甚多——其中有“打倒中国政府”，“杀回（汉回）灭汉”，“建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等……俄驻伊宁领事馆亦散布谣言，张匪声势。

十一月七日，伊宁俄领事又藉庆祝“十月革命纪念”机会，在城内发动暴动，同时巩哈暴民亦赶到城外，里应外合，猛攻警察局等机关，大砍大杀，声言杀尽汉人，而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也就同时出现了——但我国军仍固守城郊其他要地，俄寇恐暴民力量不足，又调其红军炮兵两团前来助战，我国军预七师所部两团浴血守土，孤军奋斗八十三日，弹尽援绝，三十四年一月三十一日，伊宁九城遂告不守；三月，俄空军又支援暴民围攻精河，守军不支撤退，于是伊犁全区均为暴民占据。同时，乌思满部亦在俄军协助下，乘隙南扰迪化区，攻陷吉木乃县城后，旋又进陷富蕴、福海两城。七月，乌思满助手达力汗夺得领导军权自为阿山暴民领袖后，又与俄寇嗾使的枪械齐全的白俄股匪五百余人会攻额敏、裕民、和丰等县，因我守军坚强抵御，苏俄红军第八团（即原驻哈密的红八团）骑兵三千余人又加入匪股作战，七月三十一日，塔城全区均告失守，于是俄寇百余年来梦寐以思，企图将矿产最富牧畜极盛而又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伊、塔、阿三区攫为己有连成一气的阴谋终告实现，而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声势也益浩大，居然陈兵玛那斯河西岸，威胁迪化，并在南疆阿克苏、蒲犁、拜城、库车等县骚扰，且声言要将汉人赶回嘉峪关内了。

这一情势的发展，很显明的说出：民国三十二年春，俄寇之采取撤退人员机构的决绝态度，原来是其侵略方式大转变的开始：即从此放弃其利用汉人作侵略工具的一贯策略，而改取扶植新疆境内突厥语系民族以与汉人斗争的手段：充分利用少数民族的凶悍本性及多年以来被压抑的不满心理，而予以金钱武器的支持；一发不可收拾，四处冲突的结果是可以想见的。这显然是比较以前更凶猛更毒辣更露骨的手段。并且伊宁事变发动时，盟军已登陆法国，德军集中西线，攻苏战争已将近尾声；“红八团”协助叛军攻陷塔城时，则德国已向盟国无条件投降。国际情势既属有利，俄寇当然就无所顾忌了。

当塔城不守时，我宋子文院长一行，正在莫斯科进行改善中俄关系的重要谈判，八月十四日，遂有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在条约正文第五条订明：“缔约国顾及彼此之安全及经济发展之利，同意在和平再建以后，依照彼此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与不干涉内政之原则共同密切友好合作”。同时，又由苏俄代表致我国照会中特别申明：“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同盟友好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内政之意”——据参与这一谈判的外交部亚西司司长卜道明氏的指陈：“在民国三十三年（苏俄）暗中发动并援助伊宁叛乱份子，成立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等事实以后，上述换文规定的成立，在当时实费不少交涉，亦实特别重要”。简单的说：俄寇这一“此地无银三十两”的申明，伊宁事变的责任是确定了，但这一条的墨沈未干，八月二十二日，伊宁暴民伪组织的骑兵二百余人，又经俄境越帕米尔进攻我蒲犁，并有俄机三架协同轰炸我军阵地。

九月七日，我外交部甘乃光次长因召见驻重庆俄大使，抗议苏俄飞机协助匪部作战、轰炸、扫射乌苏、精河、蒲犁等地，并要求迅将此种不幸事件转达苏俄政府注意；十五日；俄大使到外交部答覆：“伊犁暴民代表数人，前往苏联领事馆称，愿请俄人居间调停”等语——表面看来：这一答覆似乎是解铃还是系铃人！事实上，这却是俄寇另一新阴谋的开始；因为伊、塔、阿三区失陷后，暴民已据有进退自如的优越形势，足以胁持省政当局，不必再采取武力手段，惹起国际间的注意即可以达到其目的了，因此，当俄寇嗾使毛匪泽东前往重庆，高唱“联合政府”口号的同时，俄使即表示愿调停伊宁事变；于是，一个具体而微的“联合政府”阴谋也开始在新疆酝酿了。

□□□□□□□□□□□□□□□□□□

《反攻缅甸》香港，现代出版公司印行抗战期间中国远征军扬威异域的辉煌战史民国五十九年二月编订、十月香港初版。全书一五四页，这是一本以照片为主的书

自序（第五页）

一

我们为什么要编印这本书史？

第一、为着保存抗战史料，和纪念缅甸战役中英勇为国捐躯的先烈。

第二、将一枝远征军生龙活虎的镜头和悲壮激昂的场面，作有系统的排列出来，使在抗战中没有直接参加过作战的人士，得以明了我军英勇搏斗的真实情况；虽然本书只是记述一个战场中一个部队的作战经过，但其他各战场各部队的战斗事迹，是不难举一反三的。

第三、抗战胜利后，人们在欢欣鼓舞之余，心头又渐渐被国内不宁的局面压得沉重了，神圣悲壮的抗战场面已慢慢的为一般人所遗忘，黄色书籍，反被采用为麻醉读者的精神食物，这是何等危险的倾向！日本帝国主义者不能打败中国，中国人自己决没有自断国家民族生机的理由，我们希望目前不宁的局面，不要长久的拖宕下去！如果因为本书问世，而引起若干人士对抗战深切回忆，恢复胜利时的热情，从而有补时艰，那便是我们的奢望了！

二

中国驻印军反攻缅甸之战，是东亚战场上辉煌的战役，同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光辉的战役之一。中华健儿在没有人烟的丛林山岳地区，过着传奇式的生活，进行着传奇式的战争，吃尽了人类所难能吃受之苦，耐够了人类所难能忍耐之势，创造在人类历史上绝难想像的悲壮、热烈，英勇的可歌可泣的历史。这一战斗，不仅说明中国军队勇敢善战，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军队；即在智能上，也证明中华民族不输于世界上任何民族。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号的美国“皇冠”杂志中，刊载过一篇关于国军在缅甸作战的报导文字，作者乔治Ｈ．琼斯登，他是美军战地记者，曾经跟随新三十八师作过战。在他的报导中说：

中国军队是世界上极优秀的军队。我可以立誓说：他们精神饱满，道德（战斗的道德）高尚，纪律优越，干部都是机警而聪明的青年。一九四三年五月间，新三十八师创立了惊人的纪录，他们于短短的七十二小时中，在厚密的树林中和山峰间，前进了一百五十英里，祇休息了三小时，就参与大战，表现出中国军人忍受无限艰难的伟大，世界上任何军队都望尘莫及！

他声明他写这篇文章，是表示他个人对于“中国兵”的敬仰。最后，他结论说：“这次大战之后，假使中国有十年的和平，你可以看见她长成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国际友人这样的敬佩我们，这样的期待着我们，我们就更应该有这样的自信力！

胜利不是淌得来的，它是八年抗战中全国军民血汗牺牲和无比努力的代价，对于这样艰苦悲壮而得来的伟大成就所具有的历史意义，我们必须有普遍而深刻的认识，才不致妄自菲薄，而共同于建国大业上发挥其牺牲为国抗战所同具的热情！

驻印军缅甸作战经过（第八、九页）

一、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

抗战中，中国有两次远征军和一次驻印军。

第一次远征军，是在一九四二年春间，从云南沿滇缅公路进入缅甸，参加保卫缅甸之战，它的正式称呼，是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因为当时日军南进攻势如火如荼，国军为配合盟军作战，有另出第二路远征军去泰越，甚至有出第三路远征军渡海去参加南洋各岛战争的可能，所以第一次的远征军便加上了一个第一路的头衔。但是一般人对于这个头衔往往加以忽略，只称之为中国远征军，或中国入缅远征军。司令长官是罗卓英将军。

中国驻印军是紧接着中国第一路远征军的结束而产生的。因为当时印度没有战争，中国军队驻在与国不能称作远征军，故改称驻印军（Ｃ．Ａ．Ｉ．）。本书所纪的新一军，便是这枝劲旅的主角。驻印军后来虽反攻入缅，但它的名称依旧不改，一直到打通中印公路，班师回国，它仍然保持着原有的字号。

第二次远征军，成立于一九四四年驻印军反攻缅甸的初期，任务是从云南西部向缅甸反攻，与驻印军里外呼应。司令长官起初是陈诚将军，后来是卫立煌将军。报章上多称之为滇西国军或滇西远征军，他们在怒江两岸，腾冲、松山、龙陵等处，立下许多光荣的战绩，并且光复旧滇缅公路，与驻印军在芒友会师。

二、第一次入缅远征军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军阀为深陷泥淖的“中国事件”寻谋出路，不顾一切发动狂猛的南进攻势，一种赌注性的闪电攻势，使太平洋上风云色变！次年二月十五日星加坡陷落以后，日军铁蹄便踏入了中南半岛，长驱入缅。它这一战略的目的，在彻底打击英国殖民地军队，并割断当时我国唯一的对外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故以三十三、五十五和第十八三个师团的兵力分路北犯，来势凶猛！

三月七日，仰光失守，国军应英军的邀请，即以驻滇的第五军，第六军及第六十六军开入缅甸增援。内中新三十八师和新二十二师，便是后来转入印度，组成驻印军的基本部队。

三、驻印军的产生与新一军的成长

第一次缅甸之战，由于英国的作战准备不够，和我国远征军入缅过迟；虽然有我第五军扼镇中路迭摧顽敌，新三十八师更于仁安羌建立奇勋，破敌万众，援救英军七千余人出险，使敌攻势顿挫；但大势所趋，对整个战局的发展亦不能挽回，缅甸终于沦陷。

当时缅甸英军和国军分入印和入滇两路撤退，新三十八师乘仁安羌大捷的余威奉命殿后，掩护全军后撤。它在色格，温早，米咱，卡萨，旁滨等地，经过十几次的浴血苦战，渐渐孤军落后，弹尽援绝！后来全师官兵忍饥挨饿从深山密林中取捷径向印度兼程转进，于六月八日全部到达东印度边境的英法尔，才算是脱离战场。

六月十四日，为联合国纪念日，印度首府德里举行盛大阅兵典礼，各联合国驻印军队均被邀参加，新三十八师亦奉派以步兵一排代表中国军队出席。我军为新离战场而立有特殊战功的部队，故大受各方欢迎与重视，中国官兵的声音笑貌为联合军民另眼相看。检阅中，中国队军容壮盛，步伐整齐，精神奋迈，表现成绩为全场之冠，阅兵官讲评列为第一。印度总督即晚在总督府欢宴中国代表队，席间对中国军队的精神与训练备极赞扬。印度各报均以显要地位着论，一致认为中国军队初入印度，以一久战疲师，征装未解，竟能在检阅中压倒十一个国家，独露锋铓，具见中国军队素质优良，无怪其在仁安羌能以一千人的兵力，击败七倍的敌军，救出七倍的盟友，诚为世界上第一流的军队。从此以后，英印军民均对国军表示敬慕和爱戴，立下了中国驻印军光荣的基石。

新三十八师在东印度休整月余，即开驻比哈尔省的蓝伽军区。原来取道回国的新二十二师，因敌军已深入云南，便亦转道入印，在蛮荒的野人山中辗转三月，饱受艰辛，他们到达列多后只稍事休息，亦即转往蓝伽集中整训。

八月，中国驻印军正式产生，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受命为总指挥，罗卓英将军为副总指挥。

一九四三年春，罗卓英将军调任国内要职，统帅部将新三十八师，新二十二师，及在印度成立的新三十师合并编成一军，是为陆军新编第一军。以郑洞国将军为军长，孙立人将军为副军长兼新三十八师师长，胡素将军为新三十师师长，新二十二师师长仍为廖耀湘将军。步兵之外，又从国内调去及在印度成立了几个炮兵团，工兵团，汽车兵团，骡马辎重兵团，独立步兵团，战车营高射炮营，兵工营通信营特务营，宪兵营，和人力运输部队等。胡康河谷进军后，新一军又增加了第十四师和五十师两支劲旅，阵容益形强大起来。

四、反攻缅甸战斗经过

反攻缅甸之战，实际上在一九四三年三月间即已开始。新三十八师以一部兵力为先锋队，负有消灭或逐走侵入东印度边境和盘踞在野人山上的敌军，以掩护工兵修筑中印公路初程的任务。十月底，先锋队结束了这一序幕的战斗，将号称精锐的日军第十八师团赶下野人山，杀入胡康河谷。当时因为我军兵力单薄，后方没有交通路线，补给困难。虽然续有空投，而天时气候限制了飞机的活动，空投粮弹也不十分可靠！作战部队除掉顾虑敌情而外，还要预防毒蛇猛兽蚂蝗疟蚊的侵袭，和迷途绝粮的危险。森林中没有路，大家都仗着刀斧在那里开天辟地，其艰苦情形，真是无法说出！

除夕前夜，新三十八师于恶战后攻下于邦，后续部队才陆续增加上来。

一九四四年二月，新三十八师取得太柏家，新二十二师也攻克太洛，两下夹击孟关。三月九日，瓦鲁班大捷，结束了胡康河谷的战斗。

孟拱河谷地形狭隘，两旁又是悬崖绝壁高不可仰的库芒山，敌军深沟高垒，以逸待劳，使我军攻击遭受相当阻滞，四五两月进展比较迟缓。五月下旬我军变换战术，出奇致胜，使战事有了飞跃的进展。新三十八师一一二团在雨季中江水陡涨的时候，一举偷渡过南高江，截断加迈敌军后方交通，夺获敌军在孟拱河谷所有的补给仓库，使孟拱河谷的敌军整个动摇，加速崩溃；这便是有名的西通之役。这一仗，日军曾用三个联队的兵力；向该团三面进攻，反被击灭大半。我军乘胜猛进，于六月十六日取得加迈，二十五日占领孟拱，前后不到十天，连克两大重镇。

与孟拱河谷战事同时进行的密支那攻城战，自五月十七日起，我军第五十师，新三十师和十四师的一部，与美军一团组成的中美混合部队，开始攻略市区，日军施行“自杀防卫”，以致街市战延长达八十多天。八月四日，我军攻下密支那，反攻缅甸的第一期攻势作战，至此告一段落。

在攻势暂停的两个月中，驻印军的人事和组织都有重大的变动。史迪威将军奉调返美，索尔登将军继任驻印军总指挥，郑洞国将军为副总指挥。新一军亦于此时划分成两个军，新一军及新六军。新一军统辖新三十师，和新三十八师，新六军统辖第十四师五十师和新二十二师。孙立人将军任新一军军长，廖耀湘将军任新六军军长。各师师长除五十师和十四师仍为潘裕昆龙天武两将军外，第一一四团团长李鸿和新二十二师副师长李涛分别升任新三十八师和新二十二师师长，新三十八师副师长唐守治继胡素将军出长新三十师，各师副师长和各团团长也有一番更动和调整。

十月初旬，缅北雨季终止，驻印军发动第二期攻势作战。新六军于加迈出兵占领瑞姑之后，除五十师改隶新一军外，其余全部空运返国，参加国内战场反攻；新一军继续挺向八莫，挥戈南下，完成打通中印公路的任务。

十一月十七日，新三十八师猛攻八莫，日军据险死守，再以“自杀防御”战术阻止我军，我军紧密包围，逐码前进，于十二月十五日突入敌阵，将守敌完全歼灭，继续南下。新三十师在向南坎挺进途中，于卡的克高地与日军新自朝鲜调缅的四十九师团主力遭遇，激战五日，敌军以密集队□疯狂冲突，被我军盛炽火力，消灭过半。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新三十师攻占南坎，二十七日，新三十八师克复中印公路与滇缅公路的交叉点芒友。二十八日，驻印军与滇西远征军在芒友举行会师典礼，史迪威公路至此全程畅通。

史迪威公路打通后，新一军又为策应英军在下缅推进，和确保国际通路安全的任务，再向缅中进军。二月二十日，新三十师克复新维，三月八日，新三十八师攻下腊戍，同时，由卡萨南下的五十师也一连取得万好，南杜，西保等重要据点。三月三十日，最后一仗，攻克乔美，结束了国军远征的战斗。

反攻缅甸作战时间，整整两年，拿抗战八年来比较，并不算长；但两年间健儿们一直都是在战场上苦拚恶斗，除在密支那休息两个月之外，其余便从没有丝毫休息的机会，造成世界长程不断作战纪录！在那些没有人迹的丛莽里，不知世面，少见天日，以森林作帐幕，以荆棘污泥作战场，爬高山，渡深水，从际遇的艰苦，因而倍觉岁月的悠长！

综计前后两次攻势作战，新一军先后击溃日军第二，第十八，（曾补充十五次），第四十九，第五十三，第五十六等五个师团，和三十四个独立旅团，及其他特种兵部队。毙敌三万三千零八十二人，其中包括三个联队长和其他高级军官。伤其七万五千四百九十余人，俘虏田代一大尉以下官兵三百二十三人，敌军几乎是等于全军覆没。我军和敌军的伤亡比例是一比六强。卤获步枪七千九百三十八枝，轻重机关枪六百四十三挺，大炮一百八十六门，汽车五百五十二辆，火车头及车箱四百五十三节坦克车六十七辆，飞机五架，仓库一百零八所，金属器材二万余吨。占领公路六百四十六英里，铁路一百六十一英里，解放被日军占领的区域在五万平方英里以上。

□□□□□□□□□□□□□□□□□□□□□□２４

《中共编写“中华民国史”真相探讨》陈木杉着，国立编译馆主编，中华民国八十三年五月初版。

一、国立编译馆，中华民国台北市舟山路二四七号。

二、销售代理：红蚂蚁图书有限公司中华民国台北市内湖区文德路二一○巷三十弄二十五号

第六章中共对抗战时期（民国二十七年至三十四年）民国史实的篡改之驳正（第二三九页）

第四节对壮大阴谋的曲解（第三一一页）

壹、前言

民国二十七年以来，中共变本加厉，利用抗战形势以壮大自己，使共军实力由政府改编时的三万人扩充到胜利时的十多倍，另一方面发动宣传攻势，硬说国民党要投降、分裂、倒退，而共产党要抗战、团结、进步；硬说抗战是共产党打的，胜利自然是共产党争取的。对其壮大阴谋史实则讳莫如深，一再掩饰，本节就中共壮大之真相加以列举，以驳斥中共之谬论。

贰、对中共曲解壮大阴谋之驳正

中共史家亦民在“抗日战争胜利”一文中谈到：

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之际，国民党统治区政治腐败，经济凋敝，以致军队战斗力辑遽衰减，人民生活十分痛苦。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胜利发展。到一九四五年四月，已经建立起来的十九个解放区共有正规部队九十一万人，民兵二百二十万人，人口达九千九百五十万。解放区和人民武装不仅成为抗日反攻的主力，并且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能够成为人民的胜利。（注五一）

事实上中共藉抗战表面服从，暗地壮大，阴谋夺取政权，擅自移防，对中央命令置若罔闻，第八路军及新四军始终是遵照毛泽东指示“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党）、一分抗日”，在抗战期间已成为我政府贯彻全面抗战行动上一大障碍。其渲染抗日战绩，攘夺抗战成果，欲使中外人士误认为抗战系中共军独所进行，从而掩饰其壮大阴谋之史实。（注五二）迨日寇投降后，举国人民莫不欢欣鼓舞，意图太平，重返家园，再建中华，而中共则包藏祸心，违抗军令，四出蠡动，阻扰复原，破坏交通，恶意诬衊我政府官吏，宣传美军干涉内政，冀图混淆国内舆论，扰乱国际视听，观其居心言行，完全暴露了其对日抗战之真实面目。

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演说，题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这就是中共阴谋坐大并布置全面叛乱新任务的开始。他首先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口号。他说：“不论在大后方，沦陷区、在解放区，都要为此目标而奋斗。”（注五三）所谓“联合政府”者，是让中共、失意党派和政客们渗入政府组织，以便削弱国民党领导力量从而分化之。中共向各地共军提出“一九四五年的新任务”，其重点如后：

动员一切力量，抵抗敌人进攻。帮助人民组织起来，准备举行武装起义。扩大与建立“解放区”。整训并扩大正规军、游击队、自卫队与民兵。（注五四）

此项“新任务”宣布后，各地共军头目皆纷纷研讨，如何建立、如何扩充、如何发展等问题。以下是各地共军重要会议所作出的决议方案：

晋西北地区军事会议之决议：

１调集十个团兵力，以一部由离石、方山、交城，向第二战区挺进；以五个团兵力，由延安向宜川挺进。

２部队配合化学兵器参加作战。（注五五）

“晋绥边区”联防作战计划：

１组织联防指挥部，要达到统一领导，统一制度，统一纪律，统一办法。

２以地雷为主，与各地武器相配合，明暗进攻相配合，军事政治相配合，以发展一切力量。

３民兵与军队作战相配合，指挥要统一，发扬民主作风。（注五六）

“陕甘宁边区”军事活动准备：

１积极扩军，整训“边区”各正规部队，并扩充民兵，所有体格健全之壮丁，一律参加军事训练，并继续由延安密运枪枝至马兰等地，武装民兵，充实防务。

２派得力干部打入西北各地团队及杂牌部队，并大量争取编遣官兵与团队人员。

３发动知识分子从军活动，“陕甘宁边区”共为一万二千名，集中延安训练三个月，分发部队服务。

４准备在大后方发动武装骚动，并利用陕甘人民生活疾苦，及我方防务空虚等条件准备待机蠢动。（注五七）

“豫鄂边区党政军联席会议”关于军事决议：

１“国共谈判”成功，新四军应坚持原有防地抗战，编为国军六个师，受十八集团军指挥。

２“国共谈判”如果破裂，新四军迅速集中苏北与鄂中，采取轻装游击战略，向有利地带积极活动。

３积极援补兵员三万人，按四个军分区各配增五千人，并通令各县，凡年满十岁至十五岁者，限一个月内分别集训。

４派遣便衣人员潜入敌区，散布谣言，蛊惑人民，密令各县组织民兵大队，为军行先锋队，并布置武汉外围根据地。

５密令各县政府速向乡、保证筹粮食。

６采取被动姿态，保守实力，以加强树立中心之军事防御。

７在大悟山区加设一个小型兵工厂，地方自卫队与正规团队，在可能范围内，扩充为正规军。（注五八）

淮北地区中共通饬所属各地，规定本年（三十四年）度努力方向，其关于军事者如下：

１武装部队立订计划、步骤，向敌后挺进。各县、区、乡武装民兵与主力团队，均应按照已定计划一致推行。

２加强边线区工作，以配合军事发展，边线区应正确执行政策，最强的干部应派至边线区工作。

３加强沦陷区工作，在据点与其外围布置秘密工作区，使沦陷区逐渐变为游击区，游击区再逐渐变为根据地。

４完成十万民兵的组训工作，在淮北边境及津浦铁路路西地区，共有八百万人口，按照“毛泽东百分之五标准计算”，就可有四十万人受训，本年应先训练十万民兵，打下以后扩大的基础。（注五九）

广东共团扰乱南路计划大纲：

１以雷州三县及东莞、惠阳、宝安三角地带为补充游击队地区。

２所有地区内的村民及枪枝子弹，尽量收集，以扩充游击区的实力。

３所到乡村尽量搜劫食粮及金饰、法币，尤其对地主与资本家应尽量收用，充裕军粮军费。

４运用游击战术，打击敌军。（注六○）

上述共军利用各种方面扩充武力，并非是要与日军作战，其真正目的则在于培养庞大武力，作为发动全面叛乱的资本。抗战期间，中共遵照毛泽东的“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之指示，全力扩张自己的势力。就兵力而言，民国二十六年七月抗战爆发时，共军总数仅三万二千人，至民国三十四年八月日本投降时，其兵力即增到一百二十七万人。兹根据中共自己发布的资料，将抗战八年期间中共兵力增长的情形列表于附表九。（注六一）

附表九：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兵力增长统计表

年份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合计民国二十六年八○○○○人一二○○○人九二○○○人民国二十七年一五六七○○人二五○○○人一八一七○○人民国二十八年二七○○○○人五○○○○人三二○○○○人民国二十九年四○○○○○人一○○○○○人五○○○○○人民国三十年三○五○○○人一三五○○○人四四○○○○人民国三十一年三四○○○○人一一○九六○人四五○九六○人民国三十二年三三九○○○人一二五八九二人四五○○人四六九三九二人民国三十三年五○七六二○人二五一三九三人二○七三○人七七九七四三人民国三十四年一○二八八九三人二六八五八一人二○八二○人一三一八二九四人

附注：本表所列数字均以每年年底为准。除上述正规军外，中共控制区内尚有民兵，据统计，其人数：民国三十三年有一、六八五、三八一人，民国三十四年有二、六八七、六九八人。

再就中共控制的地区及人口而言，其扩张的情形如下：民国二十六年中共控制有三万五千万平方哩的土地，一百五十万人口；民国三十二年扩张为十五万五千平方哩的土地，五千四百万人口；民国三十四年再扩张为二十二万五千平方哩的土地，六千五百万人口。（注六二）战后中共就是利用这些力量发动全面叛乱的。

另外，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共欲夺取抗战胜利果实，乃由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向各处发出命令及函电，要求参加受降，以便壮大军力。朱德以“延安总部”名义发出七道命令如下：

第一道命令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盟国在波茨坦宣言基础上将会商受降办法，因此我特向“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下列命令：１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军及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依优待俘虏条例，给予生命安全之保护。２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伪政权送出通牒，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听候编遣，过期即须全部解除武装。３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４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乡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收，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总司令朱德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一日四时。（各分社各部队注意收到此命令后应立即印出广泛散发，）（注六三）

中共此一“命令”分明不顾国家军令统一之体制，企图趁火打劫，混水摸鱼，搞乱政府受降体系，充分显示中共目无法纪，自私狠毒的真面目。

第二道命令

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我命令：１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２原东北军张学诗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３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４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总司令朱德三十四年八月十一日八时。（注六四）

此一命令是中共选择熟悉东北情形的党徒，开入东北，为苏俄作向导，为虎作伥，掠夺日本在东北各种工矿业设备，及抢劫我东北的丰富物资，其出卖国家利益之居心，远过于它所谓的汉奸。

第三道命令

为配合外蒙古人民共和国军队进入内蒙及绥、察、热等地作战，并准备接受日“蒙”敌伪军投降，我命令１贺龙所部由绥远现地向北行动。２聂荣臻所部由察哈尔、热河现地向北行动。总司令朱德三十四年八月十一日九时。（注六五）

此道命令，中共完全承认外蒙古是一个独立国家，没有任何根据，居然把军队开入我国领土，中共还郑重其事的派兵助它，当然这是完全听从苏俄的命令，中共还知道有国家民族吗？

第四道命令

为廓清同蒲铁路及汾河流域之敌伪并准备接受敌伪军投降与进入太原之任务，我命令：１所有山西解放军统归贺龙指挥，统一行动。２在达成任务时，应克服一切困难，击破前进路上一切敌伪之阻碍，如遇抗拒，应坚决消灭之。总司令朱德三十四年八月十一日十时半。（注六六）

第五道命令

为肃清中国境内交通要道两侧之敌伪军队，并准备接受日伪投降，我命令，所有沿北宁路、同蒲路、平热路、平汉路、沧石路、正太路、白晋路、道清路、津浦路、陇海路、粤汉路、沪宁路、京芜路、沪杭路、广九路、潮汕路等铁路线，及其他解放区一切敌占交通要道两侧之中国解放军抗日军队统应积极举行进攻，迫致敌伪无条件投降，在执行上项任务时，应克服一切困难，击破前进路上一切敌伪之阻碍，如遇受阻，应坚决消灭之。总司令朱德三十四年八月十一日十一时。（注六七）

第六道命令

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及朝鲜境内作战，解放朝鲜人民，我命令，现在华北作战之朝鲜义勇队司令岁入、副司令朴孩三、朴一禹，立即统率所部，随同八路军及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兵，消灭敌伪，并组织在东北的朝鲜人民，以便达成解放朝鲜之任务。总司令朱德三十四年八月十一日十二时。（注六八）

第七道命令

当我解放区抗日部队进入敌侵占之城镇要塞后，我命令各部队司令员负责实施下列军事管制：１规定管制区域，指定警戍部队，委任卫戍司令，负责实施军事戒严。２划出安置俘虏及日本居留民区域，实施军事管制。３登记及逮捕战争罪犯和卖国奸贼。４管制一切军事性质的机关、仓库、工厂、学校、兵营及要塞，严禁自由出入。５管制一切轮船、火车、军用汽车、水陆码头及邮政、电话、电报、无线电机关，实施严格军事检查。６控制一切军用和商用的飞机场及其仓库，派兵驻守，严行保护。７维持秩序，保护居民，严防反动破坏分子及残留敌探汉奸进行破坏活动，如有发现应行军事制裁。８居民中如有抗日武装组织，应令其报告人数、武器，归该地区卫戍司令指挥。９通告居民不得藏匿敌伪分子及敌枪、武器，一经发现，即予严惩。管制粮食、煤炭、水、电，严禁汉奸商屯积操纵。总司令朱德三十四年八月十一日十六时。（注六九）

朱德的“七道命令”，除第二、三、六道“命令”是为苏俄作伥以外，其余皆是要乘机接收日军武器弹药及军需物资，并妄图在国军尚未开到前，先占领若干重要城市，扩张其割据地盘。

又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七日，中共更以朱德名义，向国民政府提出六项要求，其要点如下：

１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协定和条约时，须事先和解放区抗日人民武装力量商得一致意见。２中国解放区、沦陷区一切抗日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坦宣言条款及同盟国规定受降办法，接受所包围的日伪军投降，收缴其武器资财。３中国解放区及沦陷区一切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有权派代表参加接受敌人的投降及处理敌人投降后的工作。４解放区及一切抗日武装力量，有权宣出代表，参加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５请蒋委员长制止内战，其办法是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日伪，

由解放区军队接受投降，国民党军队所包围的日伪，由国民党军队接受投降。６立即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实行一切政治经济等民主改革。（注七○）

可见朱德的前述七道命令和随后提出的六项要求，其企图极为明显，那就是破坏国家统一，破坏军令系统，采取自由行动，收缴日伪武器，占据及破坏交通要道，扩大地盘，特别是依附俄蒙军队，割据东北及热、察、绥，更以“联合政府”口号，向国民政府展开政治斗争与颠覆活动。

参、小结

总之，中共自参加抗战以来，从来就没有真正与敌军作殊死战，它所宣传的战果，均系它自己捏造出来的，如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中共真正的目的，是要凭藉它的少数武装部队，盗窃抗战名义，进入敌伪地区，全力进行扩张壮大，从而割据地盘，扩充武力。在六、七年时间内，由万余名残兵败卒，饥疲困敝的破烂部队，发展到数十万所谓正规部队，其数量甚为惊人。而共党惯以夸大实力，虚张声势的手段，来吓呕其对方，迫使其妥协求全，并让第三者误认它有一定的实力，不可予以漠视。在抗战后期，中共就是运用这种手法，向政府敲诈勒索，向盟邦宣传它的武力强大，坚决抗日及和平民主，实质上它是逃避对日作战、破坏和平统一、玩弄蹂躏民主和全力扩充武力；还提出“联合政府”口号，诱惑美国误认它拥护民主政治而寄予同情与希望，劝导国民政府与它进行“和平谈判”，铸成大错！让中共有时间布置全面叛乱和掠夺抗战果实。

注五一：亦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学点民国史’（北平：‘人民日报’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一月出版），页二一六～～二二○。

注五二：王健民着‘中国共产党史’（台北市：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民国七十七年二月出版），页四三八。

注五三：邹一清，“共匪企图虏夺抗战胜利果实”，‘共党问题研究’六卷一期（民国六十九年一月十五日出版），页五四。

注五四：毛泽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中共“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中的报告（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注五五、五六、五七：同注三，邹一清，前引文，页五六。

注五八、五九、六○：同注三，邹一清，前引文，页五七。

注六一：胡华主编，‘中国革命史讲义’，下册（北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年五月出版），附录，页七六四。

注六二：张玉法着，‘中国现代史’，下册（台北：东华书局，民国七十六年九月），页六八二。按：每平方哩等于二点五八九平方公里。

注六三：“抗战胜利后中共动态资料汇编”，‘共党问题研究’，六卷八期，（民国六十九年八月出版），页九四～～九五。

注六四、六五、六六、六七、六八、六九：同注一三，页九五

注七○：蒋中正，‘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民国七十年十一月出版），第四章第三节所述。

═════════════════════

第十九章：“对日宽大政策”

主题

日本投降台湾光复放弃索偿及占领

日本投降

中国和美、英两国共同发表促使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宣言，是在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这个宣言，是依据美国总统杜鲁门、英国首相邱吉尔、苏联总理史达林自七月十七日开始在柏林郊外波茨坦会商的结果所起草，于获得中国政府同意之后而发表的。至于苏联则因当时他和日本之间的“日苏中立条约”尚在有效期间，故当宣言发表时未曾列名；但于两星期之后的八月八日对日宣战的同时，也参加了宣言的行列。

波茨坦宣言

波茨坦宣言列举号召日本投降的条件是：铲除军国主义，占领日本领土，实施开罗宣言之条件，解除日军武装，惩处战犯等项；并警告日本政府——是保证“所有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还是使“日本毁灭”？必须二者择一。

此时，日本已经丧失了有组织的抵抗力。以马利安纳群岛及琉球、硫磺岛为基地的盟军飞机反覆出动轰炸；再加上美国机动舰队业已压制了日本言海，开始对其本土展开舰炮射击。但日本政府却仍在逞强，首相铃木贯太郎于二十八日对记者团发表谈话：“抹煞波茨坦宣言，向战争之途迈进。”作为其对同盟国的答覆。同时，并于卅日再度通过驻苏大使佐藤尚武请托苏联为之斡旋，俾谋获致有条件的和平而作最后的极力挣扎。

投下第一颗原子弹

（民国三十四年）

八月六日清晨，由泰里安岛起飞的美国第二十航空队第五○九混合联队所属Ｂ二十九飞机，到达天气晴朗、气候闷热的广岛市上空，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聚居有三十四万人口的城市，在闪光和蕈状云层之下化为废墟。

紧接着，杜鲁门再度对日本发出警告：如果不立即投降，则将会投下第二颗原子弹。但日本方面还是没有答覆，于是，长崎也于九日受到了原子弹的轰炸。两地加在一起蒙受牺牲的非战斗员约达三十万人。

‘此原子弹不仅为解决此次世界大战之唯一动力，亦为十年内解决世界战祸之要素，科学之力如此其大！然无上帝赋予人类如此之神智，亦决不能有此发明也。’（八月三十一日记本月反省录）

眼看着日本马上就要崩溃，而苏联也就会为了瓜分利益赶紧参战，自属必然。

在中国说来，其最大的问题就是东北。盖预料得到——军事占领东北之后的苏联，必然会拿出难题来找上麻烦。

于是，蒋总统乃于八月七日致电在莫斯科折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宋子文，给予指示如下：

‘关于东北原有各种工业及其机器，皆应归我国所有，以为倭寇偿还我国战债之一部分。此在订约之前，应与之切商或声明也。’

苏俄宣战投机取巧

果然一如预料——苏联于八日晚间对日本宣战，苏军蜂涌进入东北。

‘苏俄对日宣战，极尽其投机取巧之能事。’（八月三十一日记本月反省录）

到了这个时候，中国方面虽然并非情愿，但却不能不答应缔结中苏条约。盖为谋防范侵入东北的苏军盘踞下去不肯撤走，致侵害中国的主权，所以无论如何得有一个条约作为加以遏阻的根据。

是故在停滞中的莫斯科交涉，乃终于由中国方面让步而于十四日缔订了条约，这也就是雅尔达密约获得了追认。

‘在莫斯科中、苏谈判中，我们对于下列的国家权益，不得不作重大的让步。

‘一、承认外蒙的独立自治。

‘二、东北长春铁路的共同经营。

‘三、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于长春铁路直运苏俄及由苏俄直运出口滞货物，免除关税。

‘四、旅顺口由两国共同使用为海军根据地。’（注）

同时，苏联则向中国承诺：给予国民政府以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重申承认中国在东北的领土、主权完整；在日本投降三个月内撤兵完毕等项。

然而，史达林对于这些约定完全没有遵守。这个情形，在秘录开始连载的时候，就已经有所叙述。

八月十日，日本对国际广播，表明附有条件接受波茨坦宣言。

其条件，就是“天皇制”的问题，是说：“在不包括对于以天皇为最高统治者的皇权有所损伤的谅解之下”投降，以求维持天皇体制。

对于这一点，同盟国方面乃按照先前中国所提“最后的政府体制，依据日本国民自由表示的意志以决定之”的主张予以答覆。由于这个答覆，乃使为日本人精神支柱的天皇制得以保留，对于日本的战后复兴大有帮助。

八月十四日，日本决定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宣言。

于此，自七七事变以来已历时八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更达十四年的日本对华侵略，乃完全终止。

“以德报怨”的宣言

八月十五日，在日本天皇向其国民广播接受波茨坦宣言的一小时之前，蒋总统亲临重庆中央广播电台，面对着麦克风发表了“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广播演说”，传播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

在这个演说中，蒋总统回顾八年之间中国人所遭受的痛苦与牺牲，希望这是世界最后的战争，同时禁止对日本人施予报复，强调人道——“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这个广播，在后来被称为“以德报怨”的宣言，且成为中华民国对于战败国-日本之处理政策的基本信念。

在亚洲，中国与日本是同舟共渡，如果不携手互助，则会是同趋灭亡。中华民国是期待着日本赶快从战败的环境中重行站起来，作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兄弟之国，担负起战后世界安定的一份任务。

注：蒋总统-“苏俄在中国”（一九五六.十二）

台湾光复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米苏里军舰上举行了日本向同盟国的投降典礼。

日本代表外相重光葵、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首先在降书上签署；然后同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美国代表尼米兹、中国代表徐永昌以及各同盟国代表相继署名。

雪耻日志十五年

‘雪耻之日志（一九二八年济南惨案以来逐日记述），不下十五年。今日，我国最大的敌国-日本已经在横滨港口向我们联合国无条件的投降了。五十年来最大之国耻与余个人历年所受之逼迫与污辱，至此自可湔净尽。

‘但旧耻虽雪，而新耻重重，不知此耻何日可以复雪矣？勉乎哉！今后之雪耻，乃雪新耻也。特志之。’（九月二日日记）

就在这一天，中国部队由航空运输抵达南京、上海。

（民国三十四年）

中国战区的受降典礼，是于九月九日上午九时在设于南京原中央军官学校的陆军总部大礼堂举行。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签署降书递呈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

受降之日感忧辱

‘本日为革命第一次在广州起义纪念日，而日本在南京投降典礼正于今日举行，实为本党五十年革命光荣与胜利的一日。

‘然而，东北失地犹在俄军之手，而且新疆各重要地区亦皆为俄国傀儡哈匪着着叛乱而丧失，迪化已演成风声鹤唳朝不保夕之局，而且外蒙问题亦未解决，故人人为荣，而余则万分忧辱。

‘呜呼！抗战虽胜，而革命并未成功；第三国际政策未败，共匪未清，则革命不能曰成也。勉乎哉！’（九月九日日记）

新国耻的根源

对于经过长期艰苦战斗、才获得胜利的中华民国来说，苏联和中共乃是新国耻的根源。

苏联很快地蹂躏毁弃了中、苏同盟条约，显示出占据东北地区的态势；并且轰炸新疆省乌苏、精河等地的中国军阵地，开始对华侵略。

中共也意图掠夺胜利的果实，而凭藉苏联力量策划行动。

他们所最垂涎的，是日军的武器弹药，其目的，乃是在于对国民政府进行武装叛乱，自不待言。

关于日军之解除武装，依照盟军最高统帅部第一号通告，在除东三省以外的中国、台湾以及法属印度支那之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的日军一百二十八万余人均向中国军投降。

于是，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乃将上述整个区域划分为十六个受降区，由各战区或各方面军分别接受日军投降。可是，共军却不遵守这一命令，意图擅自在各地解除日军武装；同时并破坏交通，以谋妨碍政府军到达接收地点。

‘党国之危机，九一八以来未有甚于今日者也。如果偶一不慎，为俄史（达林）、共毛（泽东）所藉口诬陷，则个人失败之事小，而民族之存亡前途事大，甚至陷于万劫不复也。

‘此时唯一政策，在接收国内各地区敌军之投降与缴械，其次为接收东北之失地，使俄国不能不履行其条约义务为首务；否则，敌械未缴，西陲起衅，反为俄共与毛共所利用，使中国纷乱不可收拾，则革命乃真整个失败矣！’（九月九日记上周反省录）

国军在基隆登陆

关于台湾之收复，早在一九四四年四月便已在重庆设立台湾调查委员会，研拟收复计划，并训练了行政干部一百六十人．警察干部九百三十二人。

及当日本投降之后的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复在重庆成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十月五日，设前进指挥所于台北。

十月十七日，第七十军在基隆登陆，受到民众夹道欢呼，进驻台北。

受降典礼于十月二十五日在台北市公会堂（现为中山堂）举行，由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接受日本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长官安藤利吉投降，签署了将台湾版图归还中华民国的降书。

台湾自一八九五年割让日本以来，过去了半个世纪，才正式回归祖国怀抱。

在中国各地投降的日本军民，约达二百十三万人，中国对于他们并没有采取强制劳役等报复措施；而且到战争结束后十个月的一九四六年六月为止，除了其中极少数战犯之外，全部被送还日本。这个情形，在秘录开始连载时已曾提到。

‘本年受降工作，幸已达成预定目标，颇足自慰。回忆当时共党争取受降情形，诡谋百出，险象环生，但终能突破艰难，顺利完成任务者，实因去年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余立即发表广播演说，说明中华民族传统至高至贵之德性为——“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决不以日本人民为敌，亦决不对敌人以前之暴行加以报复，使敌伪安心受降，而共党遂亦无煽惑之机矣！其卒能顺利执行投降条款，固可谓由于平时威信之着，然亦未始非精诚之所感也。’（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记本年总反省）

放弃索偿及占领

在这里，特地对于中华民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及中止派遣占领军赴日本的情形作一点叙述。

日军所侵略的区域，自东北四省开始，乃至山东河北到广东、广西，达二十二省，而没有受到轰炸等兵灾的，则只有新疆省和西藏、外蒙等边区。

所受损害难偿万一

在八年抗战之间，所经过的战役——包括二十二次大会战在内，计为三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伤亡官兵三百三十一万一千四百十九人，非战斗员八百四十二万人以上；再加上流离失踪，沦为饿殍等的被害者，则其人数更为庞大。

至于公私有财产的直接损失，仅就可以掌握的数字而言——诸如被掠夺的银行金银、和被破坏的产业、交通设备等，以一九三七年七月的美元币值换算，即达三百十三亿三千零十三万六千美元之钜。而该年度的日本政府一般会计岁出乃为七亿七千多万美元，如以此金额充抵赔偿，则需要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才能偿清这笔巨债。

一九五二年，美、英等四十八国（中华民国未参加，俟后面再加叙述）在美国旧金山缔结对日和约，其中有对日本要求赔偿权（提供服务及没收在外资产）的规定。

但唯有中华民国则在是年和日本签订的中日双边和约中，除仅没收其在外资产（台、澎地区另行决定）外，自动表明放弃一切赔偿的要求权。

在当时，中华民国方面的考虑是这样的：中国所受的损害，真正是天文数字；尤其是丧失了骨肉的人们，其悲痛乃是无论多少金钱也不可能补偿的。而在此际，如果索取巨额赔偿，则等于是剥夺了战后日本的生命。当此赤色帝国主义正以日本为目标的时刻，为了亚洲安定，不能不避免有使日本益趋贫弱的举措，俾日本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反共国家。

此外，还有一段经过，就是当菲律宾总统季里诺表示要向日本要求八十亿美元的赔偿之际，蒋总统也曾将上述旨趣告知，其后菲律宾的对日要求，卒以五亿五千万美元获得解决。

是故由于最大的被害者-中华民国之率先放弃赔偿要求，乃给予联合国各国以很大的影响，而对于日本战后复兴大有帮助。

为遏阻苏俄而放弃占领

其次，是中止派遣中国军占领日本的原委。

对于由美军单独占领日本而一贯反对的，乃是苏联。

早在战争结束之稍前，苏联便已推荐其远东地区总司令官巴提里耶夫斯基为占领日本的盟军最高统帅候选人（参阅秘录中译本第一册第二十页），并在策划着务期实现派遣俄军进驻日本。盖苏联的目的，是要藉派兵进驻而将日本分割统治，使其成为和德国、朝鲜同样的分裂国家。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日，中、美、英、法、苏五国外长在伦敦举行会议，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突然在会中提出这个问题，要求改由中、美、英、苏四国共同占领日本。

此时，中国外长王世杰和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商讨之后，强硬反对，遂将莫洛托夫的要求予以搁置。

其后，苏联继续策划此事，其驻日代表团曾经恫吓麦克阿瑟：“不管麦克阿瑟将军如何，苏联军队都得进驻日本。”但却反而受到麦克阿瑟的警告：“如果那样做，就将苏联代表团所有人员逮捕下狱。”

另一方面，美国对于中国则在战争结束之后便洽请派兵前往日本。

起初，由魏德迈提出派遣陆军十个师及部分空军的请求，而中华民国则决定姑且先以陆军青年军三个师编为日本派遣军。嗣并根据魏德迈的备忘录于一九四六年三月正式决定在六月间派遣一万五千人前往；但当要出发之际，中国方面重行决断，中止派遣。

中止的因素，乃是为了遏阻越发露骨的苏联占领日本的野心。盖经判断：如果中国军进驻日本，则苏联必然引为藉口，也会派其红军进驻。而在当时，盘踞东北不走的苏联，正对其占领之下的北韩进行制造傀儡政权的赤化工作；下一目标，即为日本。是故，对于策谋赤化全世界的苏联，是不能给予占领日本的藉口的。

这样一来，苏联无隙可乘，乃只得由史达林于一九四六年八月直接向杜鲁门总统正式提出“苏军占领北海道北部”的要求，但仍被杜鲁门所拒绝。

尽其在我不欲人知

行政院长蒋经国曾在所撰“中日关系追记”（在中日断交前发表于日本杂志）一文中，对于中止派遣驻日占领军及放弃赔偿有如下的记述：

当时，美军曾经洽请我国派遣占领军，我们如果照办，当然不会有人反对；可是，苏联也就会坚持主张其为交战国，应有权利派兵进驻。这样一来，则日本便会像东西德、南北韩之形成分裂，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局面；为此，我们乃建议由美国一国的军队占领日本。我想：这是战后日本极其重大的一个问题。

此外，包括放弃赔偿等在内，回顾这二十多年来的演变，两国如此友好合作的时代，乃是在这一百年来的中日关系之中所未曾有过的。

二、三年前（一九七○年），我去日本访问时，曾经稍微谈过这些事，回国后，向父亲（蒋总统）报告，受到了严厉的斥责：东方的道德观念乃是对他人做了好事，不声不响，过去的事，不要再挂在嘴边。

□□□□□□□□□□□□□□□□□□□□□□

抗战期间，自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大量增加，美国并派有空军来华扫荡日军。陈纳德将军及史迪威将军都是美国援华的将领。

陈纳德将军与中国政府相处融洽，合作无间。史迪威将军受共产党迷惑，并与中国政府不睦。

以下是陈纳德将军眼中的史迪威将军。文中的“我”是陈纳德将军的自称。

《陈纳德将军与中国》陈纳德着，陈香梅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印行民国六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出版

第十四章史迪威在中国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陶潜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之间中国人民对于盟国忽略了在中国抗日之战表示非常的愤怒和失望，由于这项原因引起了美国对于亚洲的政治及行动有了一个新发展，这在威尔基来华时的演说中可以看到，同时蒋夫人也亲自到华盛顿向白宫和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亲自报告当时的情形。由于以上的原因，给与我一个唯一的机会将我对于中国的空中攻势计划向盟国最高当局报告，同时有一个机会使我亲自与史迪威把问题开诚布公地讨论。这项讨论在华府的三方面会议中举行，罗斯福总统、英国首相邱吉尔，以及华府美英联合参谋部人员都在场，一九四三年五月间举行。这个特利登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商定进攻欧洲的时间与地点，其次就是把盟国对亚洲的政策来一个首次的总检讨。

对于亚洲的政策早就应该讨论了，在这会议以前的一年间，中国方面的军事情势因为盟国在亚洲的败绩时有变更。当时蒋委员长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因为缅甸失守，已经不能再用了。中国在空间上的损失已经太大；盟国对于中国一直没有决定性的行动。原因是英国和美国一直拒绝检讨亚洲的军事方针，因而将一年多的时间也都浪费了。中国在陆海双方都已受了日本的控制，而同时驼峰的运输又受阻挠，中国那时真是进退维谷，简直找不到出路。

缺乏有效的援助，没有决断的措施，使中国的力量一天弱似一天；时间，在中国方面更是不断地损失，而在相反的方面却使日本尽量地利用时机。

因为日本对于亚洲的陆海封锁政策，使中国的经济状况陷于危殆。经济脱节造成了通货膨胀，这种情形简直是把中国毁了，以致虽在大战结束之后，这种情形仍不见好转，而且是每况愈下。抗战之前三块中国银元换一块美金，至一九四三年是八十对一，日本投降是三千对一，一九四七年是一万二千元对一。一九四八年初却是六十万对一了。

中国西部的农民不能够生产足够的食粮，以供给大后方自由区不断激增的人口。于是饥荒就成为常事，而且愈演愈可怕。粮食的缺乏情形因为囤积居奇和黑市买卖的产生而更形显著，这种趋势的造成完全是因为币值的跌价。当一九四三年二月我巡视中国东部各基地时，许多灾情严重的地方有些人民已嚼食泥土、草皮、树根等等，而且灾情是一天严重一天。在政府机构工作的公务人员眼看所拿到的不值钱的薪津都受了通货膨胀的影响而贬价，他们都是在饥饿线上挣扎，面临危机而不知所措，于是因为经济危机而造成的贪污之风竟无可挽救。

中国的军队由于长期的没有出战，营养不良，以及疾病，其情况日见恶化。即使是最优秀的队伍也食不饱，没有充足的装备。守在怒江前线的中国两个军仅有十二尊法国一九○七年出品的七十五耗野炮。整个东战场中国军队所存的炮食六十尊来自四个不同国家的出品。由于交通工具的缺乏，以及没有中央供应机构的接济迫使军队就食于地方，这对于那些根本已食不饱的人民，实为一项无法忍受的负担。在自由区最严重的是军队与农民之间争夺粮食供应。而同时在怒江前线又流行着疟疾与霍乱等症候，影响作战至大。于是受了上述各项不良影响，优秀的军队失去了战斗能力，不良的部队则成为掠夺的暴徒。

黑市、非法牟利、操纵金融以及普通一班的贪污相率成风，这种情形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更为剧烈。

日本的侵华政策是非常精明的，它利用自由中国的日渐涸竭，并且以推倒英美为号召。同时对于人民一反以往的强暴态度而以怀柔术收买人心。日本的宣传是“亚洲为亚洲人所有”，又说“结束白人的统治”。日本对于争取人心不遗余力，并极力向那些对于美国援助失了信心的人民采取攻势，使他们归服。日本还扩大了敌伪军队的组织，并且首次利用傀儡军队作战，使中国人打中国人。此外日人又纵容走私，使日本货物源源流入中国，甚至流入中国的自由区，利用中国人民的金钱来补助日本的战时经济。中国的特产钨矿、水银、铜、桐油、米粮等都被用来换取日本物资。这种买卖无分占领区与自由区，经常进行。

在那个时候日本在宜昌的军队有增加的现象，这就是取道长江，进攻培都重庆的先兆。差不多直到大战结束之日，日本人仍做着征服中国，控制整个亚洲的好梦。到了一九四五年日本仍对中国发动攻势，希望使中国的中央政府垮台。

日本的压力和盟国的意见纷歧，使中央政府的性质遭受重大影响。中国国民党一党专政统治中国已十有八年，可是它决不是一个政治上纯一色的组织。其内部意见的参差，一如美国民主党内南部诸州的议员与工业区的议员。中国国民党当时为了抗日，大家一同作战，然而在这期间国民党的新旧派仍是明争暗斗，了无已期。新派分子大都是留美学生，说得一口流利英语，他们相信中国的前途系于中美两国的长期亲善，他们主张促进教育，发展工业技术，改革政治等等。旧派是属于中国政治上的旧人物，他们任用私人，主张政府有绝对权力，并利用地位增加个人财产与势力。并且激烈排外，其中有一部份曾主张联合日本，抗拒西方势力。

国民党的新派的命运大部取决于美国对华政策，他们可以算是沟通中美的桥梁，而他们在国民党内取得地位也就是因为他们能为中国向美国取得援助。当美国的租借法案在中国发生效力，而美国的志愿队组织成立的时候，他们是甚为得志的，当美国不能照诺言一样地执行工作，而又因为史迪威与毕塞尔的影响而把美国供应物资滞留在印度不继续运到中国来的时候，这批新派在党内的地位就一落千丈，而且他们的主张言论也毫不被重视和注意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不能支持这部份在国民党内的革新份子，这对美国造成很大的不利。为了要利用美国的供应物资来巩固他们的地位，国民党内的新派不得不群起反对史迪威把供应物资运到缅甸的措施。当一九四三年十月他们一致主张把史迪威调走的时候，史迪威竟与国民党中的旧派携手，赶走批评他的新派。他在驱逐中国陆军与政府中的新派势力之后，才要求中国在经济上与军事上，实施澈底的改革国民党。

一九四三年春天当我去华盛顿开会之前，蒋委员长就对我说中国人民的民气与士气都在低降，其情形是抗战展开以来所未曾有的，只有在中国立刻计划采取决定性的军事行动，才可挽救这个危机。

史迪威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消除人们对他在中国、缅甸、印度战区的诸种批评，然而没有成功。自从他自缅甸返回重庆之后。他除了把志愿队改编为驻华空军队之外对于如何进行盟国在中国的作战计划，根本毫无准备。他唯一的目的是赶快攻回缅甸，其唯一的努力是使蒋委员长多派军队去协助他完成此项冒险。

早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三日我就向史迪威提出了警告，指出在中国立即行动是如何的必要。我的电报说：

“整个东方的情势似乎非常危殆。印度是在动乱中，日本又阻挠了我们缅甸方面的运输，麦克阿瑟在南太平洋各岛的攻势遭受坚决的抵抗，中国无法作战都是因为我们不能给予空中支持和租借供应，这一切都包含对于美国作战努力的重大危机因素。

“轴心国家在各前线节节胜利，盟国则未能在任何地区发动攻势。我相信一个有效的，规模不大的，美国空军组织在中国作战，可以使当前局势好转。这支美国空军一方面可以摧毁很多日本经由台湾及其附近运往南方各岛来打击麦克阿瑟的作战物资；又可鼓励中国地面部队攻击日本占领区；使日本在缅甸与越南的空军失去作用，同时解除日本对印度的眼前威胁，保护我们通中国的空中供应线，接济一次成功的攻势，以鼓舞所有盟国。

“我相信除此地之外，无论在那儿，没有一架美国飞机能击毁八架至十架敌机，同时又破坏了这么多敌人行动的。为了上述诸种原因我请求增加在华飞机的数目至轰炸机与战斗机五百架，运输机一百架，于五个月内到齐，这是我们非常急切需要的。

“请以此种事实急电马歇尔将军及安诺德将军，以作最后决定，应采取必要行动。”

史迪威对于这种电报是很容易加以搁置的，他有权检查一切自中缅印战区发出的邮电，必要时就禁止拍发。

就在这个时候他下了一个命令，禁止驻华美空军队司令部对于空军，发表任何报告。一切新闻情报须由战区总司令部发表，这就是或由重庆或由新德里发出。这不但使新闻迟发了一日至三日的时间，同时史迪威的助手还可以任意加以改削。

当我们的飞机出炸汉口、香港、广州、河内和缅甸之时，史迪威曾大事宣传，想藉此造成一般认为美国在中国的空军机构远较实际为大的印象。凡是提到美驻华空军队规模小得可怜的新闻都被慎密删去。日本人也乐意利用这一点来掩饰他们的连续失败，其实那时我们的空军有多大，他们一目了然。只有我们自己美国人则反被蒙在鼓里。

陆军部里自马歇尔将军以下，除了来自史迪威者之外，自然收不到任何情报，史迪威歪曲事实的报告便成了官方的报告，若有人敢说实话，反会遭受申斥。我底参谋长古柏上校有一次写了一封私人信给罗斯福总统的挚友，战略情报局长杜诺万少将，把中国的战斗情形告诉他，杜诺万将军把这封信给在华府的官员们传阅，于是美国军政部马上采取行动，以“健康有问题”为托词立刻把古柏上校从中国调走。更坏的就是马歇尔把古柏以后在军队中的出路根本断绝，使他以后根本没有擢升的机会。

还有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上校詹美·麦肯，当时任美国海军驻华情报员，他也把中国一九四二年的艰苦情形详细地向美国海军军令部长金氏将军报告，在报告中他非常激烈批评史迪威的对华政策和史迪威对美驻华空军的忽视。当这份报告在参谋会议中被提出时马歇尔马上要求把詹美·麦肯自中国召返。马歇尔对麦肯歧视到极点，以致当他作了国务卿之后竟连麦肯以公民资格来中国的请求他都设法阻止。同时马歇尔更拒绝接见麦肯，毫不给他一个机会来说出他自己的观点。到了最后麦肯不但不擢升并且因为马歇尔那种顽固的成见使他在退休时仍只保持上校官阶。

史迪威封锁新闻，掩盖事实的措施，到了威尔基以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访问全球抵达中国时便给打破了。威尔基给予中国人民一个很好的印象。他底个子以及举动谈吐等都合乎中国人的胃口，使中国人觉得他确是美国的重要人物。同时他与中国人交谈时以一种非常诚恳的态度，用一些切实的措词，使中国人都能够了解。他特别提到扩充中国的交通运输，开发中国的天然资源以及增加中国粮食生产等问题。当威尔基逗留在重庆的当儿，他打电话到白市驿美国驻华空军队司令部去，希望能到空军队司令部参观并和我作单独谈话。我告诉威尔基我不能见他除非他取得史迪威的许可。到了第二天，是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一日，史迪威和威尔基一同坐了史氏自己的车子到白市驿来。史迪威对我说他准许我向威尔基申诉任何我所想说的话。当我和威尔基在办公室内作两小时的谈话时，史氏就独自坐在外面等候。

当威尔基发现我们那种经过扩大宣传的杰作只不过是比一打还少的轰炸机在做的；而我们用来保护中国上空的飞机也不过是五十架战斗机时，他简直非常地惊奇。由于我们作战范围的广泛，以及能以一架飞机抵抗敌人的八架飞机这种事实看来，威尔基以为我们一定是一个供应充足的空军了，其实刚好相反。威尔基叫我把实际情形写成一封信，他将亲自把这封信交给罗斯福总统。为了这事我和我底参谋长古柏上校几乎整个晚上没有睡觉，我们要把那封信赶着寄到成都，以期在威尔基未离开成都到西伯利亚及阿拉斯加之前可以收到，现在我把原信照录如下：

“总统特使威尔基先生：

你对我说过你不但是总统兼美军总司令的政治代表同时也兼负军事方面的使命。因为你曾命令我把中国境内抗日军事活动行动的开展情形向你作一直接的报告，所以我把一切分析如下：

在中国境内是可以击败日本的。

我们能以规模这样小的空军来把日本打败，在别的战区会被认作可笑，而在中国却是可能的。

我若有全权来指挥空军的话，对于击败日本我绝对有把握。我更相信假如我这样做的话千万美国陆军与海军都能保存性命，而美国所出的代价将是一个很小的数目。

我所说的一切都是有根据的，而不是虚构。我底自信是因为以下的一切事实：自从一九二三年开始我就觉得日本对美国有开战的可能；在军队时我曾利用最宝贵的时光来研究这个问题；我担任中国空军的非官方顾问已有五年之久；也就是以中国空军顾问的名义我与日人作战已有五年之久；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最先是指挥美国志愿队后来是美驻华空军队，我们对日本从未打过败仗。还有我们的成绩，我们这个不到战斗机五十架的小小的空军曾击毁日本飞机三百架，一共加起来可能是六百架，我们只损失了十二的志愿队的飞行员和四个驻华空军队的飞行员。驻华空军队的轰炸机实力只有中型轰炸机八架，而我利用了这八架轰炸机曾经出征廿五次，分别轰炸日本的仓库、军队、船只等，而我们未曾损失一架，未曾损失一人。

当我初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空军是由意大利人来做顾问，但在美国未参战以前我已很成功地把这些意大利人请出去，因为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和轴心国开战的。我自信得到蒋委员长和中国高级官员的信任，因为（Ａ）我是一个常胜将军（Ｂ）我从未向中国人说过半句谎话，同时我不愿意许诺，我只答应他们为他们做我能力所及的事情。

我绝对相信我若有权来主持驻华军事，我不但可以击败日本，同时可以使中国人永久做我们的朋友。我相信即使在商业上中国在以后也是一个好市场，可与我们作商业上的往来。

本来军事工作是简单的，可是却被那难调度，不合理的军事组织和那些不明了中国境内空战情形的人来把这事情搅坏了。

为了击败日本，我只需一个很小的美国空军～～一百零五架新式设计的战斗机，三十架中型轰炸机，同时希望以后能有十二架重型轰炸机。这个空军实力要经常保持。我们将有损失，那些损失应当马上获得补充。我认为战斗机需要补充的为百分之三十，轰炸机为百分之二十。

我说我能够把日本人赶出去的原因是因为我自信我底空军有把握把日本空军击败，时间可能在六个月内，至多也不过一年。我是一个以飞行为专业的战士，而我能够强迫这规模并不大的日本空军向我们挑战，随着我的计划。这步骤若成功的话我可以很收效地把日本空军粉碎。假如日本的空军被击败，我们的海军就能够运用自如，同时麦克阿瑟将军也能如愿地把全力去应付西南太平洋。再说利用中国东部的空军基地我担保可以自那儿出发去把日本的工业击中区破坏。我敢说没有一个国家是像日本这样易于被袭击的。把自日本到她刚刚征服了的土地之间的海路切断并不是一件难事。一旦上述两件事功能够实行的话，对于日本军事方面的控制就非常容易了。

为了使上述的虽是很小的空军机构能够保持作用之故，一条空运供应线一定要在中印之间建筑起来。显而易见的这空中供应线对于我们的空军是有很大的协助，我们底成败也有赖于此。这条空运线的维持比起其他自美国至南美或是大西洋、太平洋之间的航线的维持是简单而轻便得多了。中印之间的供应和他们相比真是大巫见小巫。我们所需要的是良好的主管，良好的处理。我们所需要运来维持我们的空军的物资数目并不大，我们研究之后将可说明其简单性质。

目前用以保卫这条空运线的计划是标准正统、顽固的军人头脑提出来的。它完全缺乏真正利用空军实力甚至基本军事战略的观念。我将以古代迦太基大将汉尼拔攻罗马城时罗马大将阿斐加奴保卫罗马的精神来保卫这航空线。我将打击日本通到西南太平洋的供应线，然后直捣东京。到了那时日本就会被迫在中国东部及东京上空作战。日本空军绝对没有在同一时间内力量兼顾印度、缅甸、云南和东京。有史以来从未有一个名将不试用这种方式来支持军队的供应线。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格兰特将军命令薛尔曼将军的军队横贯南方的心藏，击毁李将军的供应，同时又把李将军的供应线切断，格兰特将军则亲率军队把李将军在浮琴尼亚洲所部的全军覆没。一旦李将军的军队供应受损，供应线被切断，那么他是被打败了，而他底威信也因此破产。我想在中国利用同样方式来打击日本空军。我们知道日本一定要守住香港、上海，和长江流域的。这些地区就是日本靠以活命的，我可以利用这一点使日本人被迫在上述地区作保卫战，这就是说我将利用空军去轰炸这些地区，激使日本与我们作战。这计划得行，我自信能以十或二十对一之数来把日本空军歼灭，假如日本空军不肯到我们的地区来作战的话，我将出动我底中型轰炸机来破坏日本西南太平洋的海上供应线。不数月间日本必定损失大量飞机，日本的领空将失去了保障。到那时我们将以重轰炸机从赣州和丽水去炸日本。我底空军可以把日本的工业区——东京、神户、大阪、名古屋等炸毁。到了那时日本将无法供应他在中国、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群岛等。达到了这项目的，中国的军队在中国，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麦克阿瑟将军自澳洲都有路可走了。而我们也接近胜利了。

一方面我又将保持云南省昆明以及沾益、云南驿各地的供应，假如日本自缅甸出发，攻击中印之间的供应线，我们也可以把他们击退。

我上述的计划是非常简单的，不过是经过深长的思虑的。我用了五年时间来发展中国的防空警报网，我对于自己的成功是没有疑惑的。

为了完成上述等工作，无论如何，我需要有作战上的自由，同时我也能直接与蒋委员长和中国军队接触。而蒋委员长的意思也希望我直接接触。我如果没有信心，也不会说上面的话，我在美国志愿队的作战期间，在地面部队先行撤退之前，从未退后一步，所以我的空军基地常暴露于敌人的地面攻击之下。地面部队撤退之后我才撤退，而且志愿队每损失一架飞机，便得换取日本的二十架飞机。甚至在那时，如果我有必需的轰炸机与侦察机，也可以不致被迫撤退。

假如我有权直接向蒋委员长报告一切，我愿进行中国方面陆空双方的联合作战。

最后我愿重覆地再说一遍，我底计划若成功不但帮助麦帅及海军在太平洋的进展，而且使中国

做我们永久的友人。

Ｃ．Ｌ．陈纳德”

威尔基把我底信呈给总统，罗斯福总统把那封信转到陆军部去，就在那儿引起了莫大的风波。

中国一直就请求美国增加援助，这些请求都是由宋子文和蒋委员长的电报来传达。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首相会谈时，议定最先以援助欧洲为重，这一点中国也同意。可是当一九四三年一月卡萨布兰加会议召开时，大家对于中国，或是说亚洲的问题都漫不关心，甚至有关在亚洲作战的问题都没有列入议程，中国对此表示非常失望，他们底呼吁一直被传到摩洛哥。于是不得已，美国就派了安诺德将军和索姆维尔将军到中国来，自卡萨布兰加到了重庆，允诺了蒋委员长的许多要求，以平他底气愤。蒋委员长坚决要求设一个独立的驻华空军司令部，并要求供给这空军五百架飞机和自驼峰每月运来供应品一万吨，以支持这个空军。安诺德答应了尽力而为，中国方面则是已非诺言所能满意了。蒋夫人当时感到口头允诺的无凭，她要采取行动。于是她在同年二月就离开中国到华盛顿去，把中国的情形向美国总统、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报告。

她到了美国后只不过几星期中国的情形就开始不同了。就在一九四三年三月三日我被擢升为少将，七天之后十四航空队就正式成立，而我底机构也再不与毕塞尔连在一起了。在三月中旬一大队四个引擎的Ｂ－２４型机到了印度将参加十四航空队作战。三月廿七日格伦准将也到了中国，做我的参谋长。自从战事开始以来他是第一个人把大量的参谋人员带到中国来。格伦将军同时也带来了陆军航空队总司令安诺德将军的命令给史迪威，告诉他罗斯福总统说驼峰的运输应交由我管理。安德诺将军提出这意见后罗斯福总统才发下了手令。这真是一个好消息，由于一向的痛苦经验，一个战地司令官无权过问供应是非常痛苦的事。所以这项消息很使我高兴。格伦把总统的命令交给史迪威，史迪威大大地不高兴，对总统的命令也不理睬，好像根本就把那件事忘记了似的。驼峰的运输仍在毕塞尔的控制下。

三月底罗斯福总统致电蒋委员长，告诉他新的飞机将尽快运到中国来，假如我能担保一切供应能够维持这些飞机作战的话。

但随着而来的不幸就是驼峰运输的完全阻断，这使我们非常痛苦，并且不得不把四月的一切活动停止。我们仍然勉强维持，但得不到驼峰的供应。我们靠以维持的只是那经过了史迪威与毕塞尔所批准的一、九八六吨物资。可是这些物资经过史迪威的部队之手后只剩下了一千吨，而真正送给我们的实数只有六二五吨而已。雨季似乎比以前早来了一个月，四月就开始下雨了，这样对我们真是莫大影响，毕塞尔的驼峰运输也就藉此停顿下来。他所筑的六个飞机场只有一个是可以勉强使用的，其他五个都成为一片淤泥之场。亚力山大上校在一九四二年做了美空军运输队司令时，也只得使他的运输机及第三○八重轰炸机大队利用查普亚的机场，利用那硬面的单条跑道，也是在阿罗密唯一的这种跑道。驼峰的运输为此更形迟慢了。在四月的头十天，原定有物资二四五吨运给第十四航空队，但只有四十五吨到手。我束手无策，惟有把许多活动停顿，静待供应情况好转时再继续工作。

当我仍忙于指导那些新到人员有关亚洲的地理时，四月二十日我接到史迪威自重庆的来电，说是他将于下午五时到达昆明。我于是到机场去接他。当他从飞机上下来时他嘲弄似地看着我然后说：

“你的行李呢？”又说“你可以起程了吗？”

我真有点莫明其妙就问他：“上那儿去？”

我们两人相对无言了好一会儿，然后史迪威把我带到飞机的翼后，避开了其他官员的耳目。我最后告诉他我实在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于是他解释华盛顿当局召我们马上回去，他并怀疑这是因为我不断地在背后批评他的结果。他准备马上自昆明飞印度，并希望我能与他一同起程。

我对此表示莫大的惊奇，我得到了史迪威的允许到重庆去一次与蒋委员长面谈，并与他约定两日之内在喀拉蚩会合。我第二天一早就飞往重庆，可是蒋委员长也没有办法帮忙。他嘱我将中国需要立即采取军事行动，同时要充足的美国供应以及不受新德里方面控制的空军要求提出。我告诉他我们已有一个独立的空军，如今所欠缺的只是供应品和供应品的运输。我当日下午就飞回昆明，第二天又飞了二八○○哩在喀拉蚩与史迪威会面。当我飞越阿萨密时我有几会详细端详毕塞尔在那儿所筑的机场，那机场淹了好几寸深的水。

史迪威有一架Ｃ－８７型飞机在喀拉蚩等候着我们起程到华盛顿去。我因为匆匆起程对于中国的空军情况还未写下任何报告。我细想不如在未到华盛顿以前先把这报告拟好。

当我们的飞机经过非洲、大西洋和南美洲时我就开始书写我的报告，我用那因在高空而漏墨水的钢笔在笔记纸上工作，一个手提箱就作了我底临时书桌。有好几次史迪威从那副带边的眼镜中斜望过来，我自己忙着也没空去管他计划什么。当我们到了华盛顿的时候，我已把报告大纲拟好。我把艾索普找到，他那时在中国国防供应公司服务，我就请他代我把我底稿全部打出来。两天之后我底报告就被送往三方面会议，同时我也因此获得了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首相的信赖。

到了华盛顿候不久，我就找到了刚到华府的摩根中校，他以前在驻中国的第十一轰炸机中队工作，我就把他叫来权充我底随员。在华盛顿开会的时候摩根是唯一给我帮忙的人，每到秘密会议的时候摩根只好站在门外等着，把我独自一个人留在里面。在陆军部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大员中我和摩根成为非常尴尬的一对。我当时是以美国志愿队的资格而加入美国陆军，所以我连正式的制服都没有。我尽最大力量把自己打扮起来就是穿一件战前做的棕绿色紧身外衣，一件灰绒衬衫，打一条黑色领带，一切都是不和规定的。至于摩根呢，他是在驻华空军队里做了很久的人，也只有破旧的裤子。我们和史迪威以及他底随员等共用一个办公室，大家遥遥相对。史迪威的随员之多可说比我在中国的办公室内人员规模还大。双方的对照是非常的不调和。一方面是史迪威和他底办公人员，他们所穿的制服光且滑，胸前又满带了奖章。在这声势雄壮的对面坐着那衣衫简陋的十四航空队代表。

（民国三十二年四月下旬）

当我们离开了中国还在飞越非洲途中日本人乘机潜入云南驿，向停在地面上的十四航空队飞机袭击。这一次的不幸，炸死了两百个在跑道上工作的苦力和两个美国人；此外又有Ｐ－４０型的轰炸机五架，Ｃ－４７型的战斗机一架被焚，十一架Ｐ－４０型机损坏。这种不幸事件的发生完全是因为缺乏供应的缘故。日本飞机每天都来，对我们窥伺很久，可是每次在中途都因为我们的飞机起而迎战把他们吓走了。不过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汽油的缺乏，中队长心理明白这样过几天之后飞机汽油就用完的，所以索性等日本飞机临近时再起飞。岂知电讯失灵，日本飞机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闯了进来。

当我到了华盛顿那一天正是四月廿九日日本天皇的生日，日本人又到昆明来，那一次我们又因为失去联络而误事，我们那位新任军令官唐·李昂上校和一位飞行员都殉难，我底参谋长格伦将军也受轻伤，汽车场完全被炸毁。当我接到格伦将军的来电时几乎马上就想回到中国去，可是那冗长的会议把我拖住了一个多月。除了会议忙之外，还有宴会、鸡尾酒会、演讲、被人画像，以及设法摆脱那些慕名来访的人，想写我底传记的作者等等使我无法分身。我底约会纪录中包括了许多要人的名字如罗斯福总统、邱吉尔首相、马歇尔将军、菲律宾总统奎松、罗斯福私人秘书霍金斯、英国参加华府美英联合会参谋部代表狄尔、美国战时生产局长纳尔逊、宋子文博士、飞机厂商莱特、名专栏作家李普曼、前驻法驻苏大使蒲立德、前驻日大使格鲁、海军部长诺克斯、次长福莱斯特尔、老政治家巴鲁枢、财长摩根索、陆长史汀生以及大批高级将领。一九四三年的华盛顿对于那些自前线归来的将军真是备极崇敬，在社交上更是忙个不了。我自己唯一引以自慰的是当六年前我离开华盛顿时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退伍上尉，如今返里，我已是尽人皆知的少将了。同时在陆军部里那些从前反对我的人那时对我都另眼相看，而且他们对我的礼遇看起来还有点可笑。在三方面会议中亚洲问题得到清楚的剖析。英国人对于亚洲的问题毫无兴趣，他们觉得在英国若未有充足实力向新加坡反攻之前，亚洲方面不愿有所行动。史迪威对于中国方面的问题其看法与邱吉尔一样，他以为不先反攻缅甸，中国问题无讨论的必要。

为了以上的观点不同，我与史迪威之间引起了莫大争执，我这种行动使陆军部非常难堪，因为这似乎是违反军队里的规定的。你们知道在当时和那些人相比只是一个初级将官，在中缅印战区我不是领头人物。在一般的传统习惯中有高级长官在前我是不容多说话的。他们把我底坐位排到一个角落里，这使我很难听清楚会议的进展，史迪威因为官阶比我高，有关方面总是先征求他底意见然后再来问我底意见。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因为要表白自己的意见所以累累得罪了我的上峰，使史迪威和他底好朋友马歇尔将军都大大地不高兴，我是吃力不讨好。说到英国方面呢，他们有自己的问题，所以对我们所讨论的事情极难引起兴趣。

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应当先向缅甸进攻，还是先把中国的日军击溃。在缅甸方面的日军是有准备的，而且阵容强大，准备随时应战；在中国方面的日军是没有准备的，并且不愿作战的，我们的急速行动可以随时把他们消灭。史迪威底计划是用美国方式来在印度训练中国步兵，然后予以美式装备让他们到缅甸去作战，把日人击溃，然后长驱直入中国。他又献议英国以全力来反攻仰光，而那些受过美国训练及有美式配备的中国军队则越过怒江而向缅甸北部推进。因为日本在缅甸的推进，史迪威主张献议在华东方面增加训练中国军队的数目，同时设法开一港口使美国海军能西向太平洋推进。史迪威底全盘计划听来非常动听，可是再来详细预算一下则这计划的完成最低限度也要十年的时间。在他底计划中他没有半个字提及航空，他底军队供应计划非常荒唐可笑，他想靠驴马与大卡车来运输供应，而我们都知道这样做法连供应一师美国军队的需要都办不到的。这位老头子的意思大概是仍想以他的壕堑战的观念来从事陆地上的战争呢。

说到我当时的计划基本上和提交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威尔基的计划差不多，这就是说以中国为基地，对日本展开进攻的空战。全部的空战需要是一百五十架战斗机，七十架中型轰炸机，三十五架重型轰炸机。供应方面在头三个月内四、九七○吨，以后每个月希望能够有七、一二九吨，这些供应都是用来维持十四航空队的。照以上的数目字看来，在欧洲只一次重轰炸机出袭的供应就要比我们多呢。这个不大的投资我相信可以与太平洋方面的作战打通一气，与沿太平洋西进的海陆空军取得联络，互相合作。

当一九四三年夏天我正在计划实现我们底战斗之时，日本对华作战的地区略有改变。中国仍是盟国可以利用来打击日本的唯一的、最直接的地区。这种情势一直维持了两年。直至一九四四年的秋天，大局才有一点变动。那时我们已袭击长江各口岸。我们袭击香港、汉口、广州以及越南的煤港及前进基地，日本军队的生命线从台湾海峡开始连贯到中国的南海都在驻于桂林的我们中型轰炸机的航程范围内。日本的工业区如大阪、东京、长崎、神户、名古屋、横滨等都在由华东出发的Ｂ－２４型机的航程范围内。那时第三○八重轰炸机大队已经抵达中国。

在军事战略方面来说，争取时间是军事行动的主要关键，凭着当时战士的冲锋精神及对于驼峰供应物资来源的信赖，就在那个夏天，当飞行的气候已很有利于华东时我们就可以开始空中攻势的。那时还有充分时间来等候天气的好转，以及修建跑道等等，在我的预计中一九四三年年底我们的Ｂ－２４型轰炸机是可以开始向日本的城市投弹的了。那个时候离开Ｂ－２９型机开始攻势还有半年，而去Ｂ－２９大规模空袭还有十五个月呢。

在我底计划表中，我预备自七月开始以两个月的时间来对驻在中国境内的日本空军展开攻势。日本本来不准备在中国作过多的空军防御，不过假如情势不得已时他们也只好忍痛去做，这对于他们战时的经济来源是很受影响的。我们的计划若能达到的话，在战略的后期我们底Ｂ－２５型机将会去轰炸中国的沿海，海南岛和东京湾日人的基地将受到袭击。这是第一部计划。第二部攻势将于一九四三年九月开始，空中攻势将扩展到台湾以及中国南海；并准备把第三○八轰炸机大队调到华东基地去以便开始轰炸台湾、上海、南京等地区，用的则是Ｂ－２４型机。那么到了十一月底，在最迅速的时间内，将以开始轰炸日本的海上运输线，那就是说轰炸日本自朝鲜到越南的海上航线，同时开始轰炸日本本州和九州的工业城市。假如这种计划是有点近乎异想天开的话，请大家不要忘记，第十四航空队虽未得到其要求的最小供应量，但除了炸日本之外，其他一切都做到了。

要实现这计划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我只需要添加三个战斗机中队和三个Ｂ－２５轰炸机中队，同时每月准时自驼峰运到足够的供应品四、七○○吨。

史迪威对于我底计划的批评是什么呢。以下就是他对我的主要批评：

第一、他说驼峰运输不能满足我底要求，不能运这么多的供应来中国。其实这是废话，不到八个月之后空军运输队即打破史迪威的反对而以每月一三、○○○吨的供应运进来。

第二、他说我们若是在中国展开了扩大的空中攻势这会使日人加速进占十四航空队所有的华东机场。在史迪威的计算中以为需要五十师中国部队才可以把那些基地守住。我对于史迪威的种种计划都有点莫明其妙，譬如说他后来准备反攻缅甸时他只要两师中国部队和三千个美国兵，——而那种工作最后是需要十万名中国官兵，加上英国第十五军以及美国的第十与第十四航空队，和英将温盖特的剽袭队和美国第一空中突击队。我对他说假如有美国的空军和中国的部队合作我们是绝对有把握把守住这些基地的，除非日军会发动主力攻击。假如日本要发动大攻势的话，必须自其他战线调军，这在中国即令失败也还是值得的。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三方面会议中争辩良久，后来史迪威和马歇尔大发雷霆。不过蒋主席也很明显地对罗斯福总统和我说过，中国方面马上就要采取军事行动，不然的话将无法挽救当前局势，其主要问题就是要在三方面会议中解决以何种军事方式采取行动而已。

三方面会议决定采取我底计划，总统亲自下令要空军运输队每月自驼峰运送八千吨供应品到中国，同时十四航空队有优先权每月取得四、七○○吨作实施第一项计划之用，史迪威将军可每月得有两千吨的供应，用来装备在云南的中国军队以备将来怒江之战，响应缅甸的反攻。剩下来有余的吨数由空军与陆军共用，使用权由战区总司令（史迪威）处理。

史迪威一直没有遵守这项决议，而且只当自己从来没有接到罗斯福总统的命令，对于第十四航空队应得的权利置之不顾。同时陆军部长，史迪威的支持者亨利·史汀生还在他最近出版的回忆录中，坦护史迪威。他这样写着：“虽然经过了多方面的反对，在一九四三年华盛顿的会议中陈纳德底提议竟被采纳。史迪威当时也参加会议，然而他底辩护是失败了。他那建立中国陆军的计划一再被延搁，这一次是被罗斯福总统所阻了。”不过这是不对的，因为史迪威的建军计划是在印度而不是在中国，并且也没有受阻。而史迪威故意忽略罗斯福总统的命令，对于上峰的指示不遵照执行，已非第一次了。

除了三方面会议并在白宫开过两次会议之外，我与罗斯福总统有三次的个别谈话；和邱吉尔首相也有一次的谈话。当我和罗斯福谈话过了一小时之后，他底参军华生将军就来打扰，因为等在白宫里要见总统的人还很多，我和总统的谈话超过了预定的时间。罗斯福总统对于中国的情势很关心，对于把中国在太平洋区的军略政略地位提高很表同情。他同时觉得不应当把中国的重要性忽略，因为这是征服日本的胜利之门，所以他主张无论花任何代价都要把中国在战时的地位保持。他底政策是使中国成为美国在东方的友国，我相信假如他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战后的所谓马歇尔使华将永不会产生。

对于中美合作的基础应当建立在一切工作阶层而不单以最高级的接洽为对象这一点罗斯福深深强调。当我提到组织中美空军混合总队，使中美人士并肩作战，同时亦可协助中国建立强大的空军使中国能即使不受美国的帮忙，也可单独对日作战，直至战事完结。以上种种见解陆军部强烈反对，因为陆军部的目光太浅，对于当时的情势也看不清楚，更不愿作战后的任何投资。这是我第一次清清楚楚地看到总统与陆军部尖锐摩擦，总统底政策的宽大的，而陆军部的政策是狭隘的。由于这种情形的发展使我明白了为什么美国能够打胜仗，为什么不能取得战后的和平。

当罗斯福知道我们在中国的组织是这样小得可怜之时他简直呆住了。经过几次谈话之后我知道他有许多事情是被蒙在鼓里的，因为他很难在他底左右之中找到真正的事实，尤其是军事当局从来不把真情告诉他。

他对于驼峰运输本来就寄予无限的希望，可是他底军事顾问对他说驼峰运输是非常不实际之举，在一九四四年正月美国空军运输队自驼峰运了一三○○○吨物资到中国来，这使总统非常欢喜。我知道当他嘉奖中印运输队时是很高兴的。

此外关于把自台湾至中国南部一带的日人海运断绝这计划总统表示非常赞赏，我告诉他日本的作战靠海上的供应很大，假如我们能把这条路切断，效果一定很大。他问我驻在中国的空军能不能够在一年之内击沉一百万吨日本船只，我回答说假如我们每月有一万吨的供应，我底飞机可以在一年之内击沉和损坏一百万吨以上的日本船只，他对此很是满意。于是马上拿起笔来写道：

“假如你可以击沉一百万吨日本船，我们可将日本底背脊打断。”

我底计划并不是大言不惭，我们马上实行了。每一个月我们所得到的供应是不足一万吨的，可是在三方面会议之后的两年中，十四航空队共击沉击伤二、二七○、六八九吨日本商船，此外还有三十二艘军舰包括两艘巡洋舰在内。这都是两年之间的事。

罗斯福对于蒋委员长的为人如何感到非常关心。当有一次史迪威也参加会议之时，罗斯福就突然问他道：

“你对蒋主席的印象如何？”

“他是一个游移不定、诡谲、而又靠不住的老家伙——他从来不守信……”史迪威咆哮着说。

“陈纳德，你底意见如何？”总统不等史迪威说完就转过头来问我。

“先生，我以为蒋委员长是当今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军政领袖。他对我从来没有失信，而且坚守诺言。”我这样回答。

那是我在华盛顿的最后的一个早晨，当我正忙于收拾我在陆军部办公桌上的东西的时候，白宫的秘书打电话给我，告诉我罗斯福总统希望在我未走以前见我一面。我因此把我的行程延迟了一天，在

当天下午再与罗斯福总统会面。罗斯福想知道我在会议中是否获得了我所希望的东西，于是我告诉他说，假如我能如期得到应得的供应，十思航空队的工作将可以进行无阻。罗斯福又很详细地要我在地图上把我底作战计划解释，于是我又重新将我底计划说了一遍。他对于我们如何进行工作，在那个海港投弹，Ｂ－２５轰炸机将在那些海岸扫荡，那些海峡将由Ｂ－２４来布雷等问题都感到很大关心。这是很少有的事情，有人对于我作战技巧上的步骤如此关心。最后他像是感到满意了，于是把背靠到椅子上说：

“好吧，今后我希望你不时给我写信，报告你那方面的情形。”

“你的意思是说要我写私人信件给你吗？”我这样问道。

“是的，我正是这个意思”他回答。

回华以后的十八个月内为了实行诺言，我曾写了差不多半打私人信件给罗斯福总统。其中有几封又被转到陆军部去，为了我对于陆军部有许多坦白的批评，马歇尔将军就永不原谅我。在他的眼光看来以为我是有意和他底老友史迪威作对。

在我离开华盛顿的早晨，邱吉尔首相约我和他共进早餐，他邀我和他一同到英伦一行，参考一下英伦人士对于这次大战的看法。然而中国方面的情势很不好，日本空军在五月十五日又大炸昆明，同时我又接到报告说一切情势很容易马上就展开长江上游的保卫战。为了我担心中国局势的转变，因此婉谢了邱吉尔的邀请。我带着一种非常混乱的心情回到中国去——从一方面看来好像三方面会议已把我所有的艰难解决，而在另一方面看来事情又似乎不会如许简单。在那些高级首领的会议桌上战争纯粹是工作的技巧问题，一切计划都由他们拟定，然后自他们底公事包中取出。不幸美好的计划决定后常被现实所损坏，当计划不能如理想般实行的时候（而且这是常有的事），战地司令就要负责去把未了的工作完成，他将要尽力而为，无论胜负他都要硬着头皮去抵挡，这就是因为军事计划人与作战军人两者的隔膜太深所造成的结果。计划与行动两者都不可缺一，不过以我底经验来说，作战者有时也可以成为军事设计者，不过要一个从事心计的人去作战则败多成少。而不幸的是有许多战争的机会主义者竟常常被派去做作战的工作。

三方面会议中的诺言从未完全实现，不过总算把在中国的空军基础奠定了。假如没有了它，在中国的空军之命运更不堪设想，尤其是在一九四四年那严重的情势之下，真的不知如何度过难关。

当中国方面逐渐完成了三方面会议中的计划时，四方面会议（一九四三年）已在魁北克召开，而中国的事情在四方面会议中全没有被提及，它是被那些计划者完全遗忘了。那一次会议十四航空队没有代表参加，好在有些参加的官员是十四航空队的朋友，他们尽力为我们争回一点权利。四方面会议三个月之后，在开罗举行会议（一九四三年），重新讨论四方面会议中的议决案。陆军部在上一次的三方面会议中获得了教训，因此不准我参加会议。不过由于蒋主席固执地主张要我同去，所以我才有机会参加。在这次的会议中我可说毫无成就，他们对于我的观点毫不同情。这使我感到他们和日本人一样对待我，因为每一次在日机轰炸昆明之后，日本就播音说我被炸死了。

《陈纳德将军与中国》陈纳德着，陈香梅译。第十四章史迪威在中国结束

□□□□□□□□□□□□□□□□□□□□□□

《中共编写“中华民国史”真相探讨》陈木杉着，国立编译馆主编，中华民国八十三年五月初版。

一、国立编译馆，中华民国台北市舟山路二四七号。

二、销售代理：红蚂蚁图书有限公司中华民国台北市内湖区文德路二一○巷三十弄二十五号

由第三二九页至第三三七页为“对二二八事件的曲解”，节录于次。

第七章中共对抗战以后（民国三十五年至三十八年）民国史实的篡改之驳正（第三二九页）

第一节对二二八事件的曲解（第三二九页）

壹、前言

民国史上台湾“二二八”事件，距今已有四十余年，近年来舆论界所热切探究的是，此一事件是偶发或自发的，是赤色的（指由台共、中共所主导）或非赤色的，众说纷云，莫衷一是。然而所共同指涉的，都是事件“起因”问题，平心而论，不管是自发的、偶发的，赤色的或非赤色的，它都是一个时代的悲剧，而这个悲剧背后都是隐含了各种色彩复杂的因素。在中共编写中华民国史之际，也将“二二八”事件首次编入正史，可是中共史家却加以曲解，因此本节针对中共曲解“二二八事件”部分，予以驳正，使历史真相大白。

贰、对中共曲解“二二八事件”之驳正

中共史家张宪文在其所著‘中华民国史纲’一书，首次将民国三十六年台湾的“二二八事件”，特别列入第六编第二章第三节，大体叙述如下：

台湾光复后，蒋介石为了使其成为国民党统治的一块新基地，规定了两项治台基本政策：“实行政治建制的特殊化和政治、军事的绝对独裁统治，实行台湾经济建制的特殊化，实行统治经济和内地隔离的政策。”台湾国民党当局按照蒋介石的旨意进行统治，把台湾搞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台北市的二二八起义，……燃遍了整个台湾岛。……三月八日，国民党军在基隆、高雄登陆，然后杀向台湾各地。这种镇压，持续了一个多月，百姓遭殃。据台湾旅宁沪七团体四月一日给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的呈文中说：国民党“使用武力，以清乡为名，无辜民众横被枪杀，将尸首抛入海中，或抛弃田野者，为数五万人以上。”台湾二二八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严重地打击了南京国民政府在台湾的统治，有力推动了国统区的人民运动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注一）

中共史家言下之意，认为台湾“二二八事件”之发生是归罪于蒋中正先生统治台湾失当之故，国民党军队镇压杀害无辜的民众，更称此一事件为“起义”。而对于暴民暴乱的史实及本省人杀外省人等行为，中共则只字不提，字里行间只强调仇恨斗争，忽视了此一事件仍有发挥同胞爱的感人史实。

平心而论，不管是自发的、偶发的，赤色的、非赤色的，它都是一个时代的悲剧，而这个悲剧背后却是隐含了各种色彩复杂的因素，有些错误因素，不能全归咎于国民政府，民国七十七年三月十日监察院公布前闽南监察使杨亮公、监委何汉文对“二二八事件的调查报告”。（注二）共列举了十大事变原因，显见其复杂多变的因素，不能由国民政府全部承担，兹列举民国三十六年五月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编印之‘台湾省二二八事变记事’所列举五项远因，四项近因，加以印证如下：

远因部分：

日据以来潜伏的共党余烬未灭，乘机作乱；日据时代的台共，受日共和中共的指挥，台湾光复后，台共再度抬头，俟机活动，在此事件中扮演煽风点火的角色。日据时代皇民化教育的遗毒；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教育，从根斩断台民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遂使一般台籍青年，只知有日本不知有中华民族。日人利用“台湾浪人”与“御用绅士”，扰乱治安，妄想搞台湾独立；光复后日人大量释放台籍浪人，造成各地治安暗流，而一些受御用的台籍绅士，由于既得利益，妄想协助日人搞台湾独立，希望继续受日人的庇护。光复前后台湾经济萧条，造成民怨；日军因战事连连失利，对台湾的经济资源，乃采竭泽而鱼的政策，导致国民政府来台接收之时，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一切百孔千疮，百姓生活困苦不堪，不少台民将怨气发泄在国民政府的接收上。光复后国民政府接收工作与宣传教育未令人满意；胜利后，政府为遣返日俘与安抚流民重回故里，可说力不从心，因此接收工作招致民众诟病，加上中共的全面叛乱，更增加对台湾的鞭长莫及，而来台接收人员中，难免良莠不齐，因此乃影响台胞对国军的敌视与误解。其次，一般人士因台湾与大陆间交通困难，来台后待遇菲薄，因此大都裹足不前，加上政府在文宣教育上，未能有效宣传，造成台胞对祖国认识不清，致无法激发爱国的情操。（注三）

近因部分：

民国三十六年中国大陆经济风暴影响台湾政经；民国三十六年二月左右，上海美钞及黄金风朝后，各地物价上涨，台湾自不能免，政府采取紧急措施；一方面拨发公粮实行平粜，一方面清查大户屯粮，严加取缔，一般大地主及粮商，遂怨谤丛生，惟恐天下不乱，以图幸免处分，当烟酒专卖局查缉员警误伤人命时，彼等随声附和，认为良机难得，即暗中嗾使流氓、地痞，作为事件爆发的引力；在缉私烟事端中，缉私者和走私者直接冲突，其所以形成众多的群众追打查缉员，有不少黑社会人物的介入。当时，黑社会分子为数众多；其中有台籍征夫、刑事犯人，他们大都久受日人训练，残忍成性，遇有机会彼等即发泄其仇恨报复之积怨。台人从日人手中占得公私房地产，光复后被政府接收，心生不满；过去日人均利用旧农、工、商“仲介者”之台民为爪牙，居间牟利，而在国民政府决定收回直接放租予自耕农等，取消中间剥削时，一些大地主自知势将丧失既得利益，怨恨又益加深。由于政府戡乱剿共，精锐驻军调往前线，致台湾防务空虚，给予不法之徒有机可乘；本省接收之初，担任防务者为两军，旋因戡乱剿共，精良部队乃内调大陆前线，后虽二十一师来台接防，但军力到台者，仅一团一营而已，形成警备空虚，予不法之徒有机可乘，导致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注四）

其次，中共史家夸称二二八事件中的死亡人数在五万人以上，旨在加重政府军队残暴之印象，事实上，左倾的“台湾旅京沪七团体赴台调查团”，他们仅来台停留两天，返南京招待中外记者说：

我所报告的国民党人以上，连轻重伤计入，至少有三万余人；如手段之残酷，在基隆他们用铁丝穿过人民足踝，每三五人一组抛入海中，在高雄则对千余集会群众用机枪扫射，全部死亡；在台北，将所捕平民四五十名从三楼窗口推下，跌成肉饼，高雄许多人被钉在树上，听其活活饿死……。（注五）

上述资料估计死者一万，伤者三万，由于其所形容国军杀人残忍荒诞，故此资料显不可信。而报告人陈碧笙所属的“闽台建设协进会”，据判断已被中共份子渗入掌握，陈碧笙本人现为中共“台联会”成员之一（注六），当时他已是中共份子及同路人。（注七）然而陈碧笙这个仅费时两天的调查数字，相对重要且具影响力，经中外记者引用后，隔天全世界各报普遍登载台湾大屠杀的消息。到了民国四十一年，中共纪念二二八的活动，把前国民党的台湾省党部书记长张兆焕在福建公审后执行枪决，消息中说要他为国民党在二二八“一次屠杀三万余无辜人民的流血惨案而负责”。（注八）如此把过去包括死者和轻重伤的三万人，说成死亡三万余人，强化了血债形像。此后中共和台独人士就习惯以两三万以上做为最起码的死亡数字，江浓说：“国民党实行残酷的军事镇压，平民百姓两三万人惨遭屠杀，受株连不下数十万。”（注九）叶纪东说：“台湾同胞被杀害人数，二万到五万，众说不一。”（注一○）史明说：“仅台北一处即达万人以上，当时，台北的人口只有三十余万，换句话说，三○人中就有一人，或六户之内就有一人被杀害。”（注一一）因此，如今中共史家宣称被杀的民众，为数在五万人以上，似乎随着时间的久远，中共有愈来愈夸张二二八事件死伤的趋势。

另外从二二八事件的过程中，可以发现所谓“无辜民众”已失去理性，成为暴民，政府为顾及社会安定及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出于不得已之绥靖，绝非所谓残酷军事镇压，当时事件的经过大致如下：

民国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台省专卖局派叶德根等人，赴淡水缉私烟；下午六时左右转回台北，遇妇人林江迈于万里红酒店附近，携带私烟五十余条，当被叶德根、钟延洲二人扣留，该妇人哀求放还，正争执之际，群众围集，情势汹涌，该妇人被击受伤，市民睹状，乃进而围殴查缉人员，查缉员赵子健等人被殴伤，另一查缉员傅学通逃至永乐町时，因前有拦阻，后有追逐，遂鸣枪示警，流弹伤及路人陈文溪，不幸当场死亡，于是群众益愤，即涌至台北警察局，要求交出肇事人员，予以惩办；结果将叶德根等六人移送宪兵队看管，旋即转解台北地方法院侦办。二月二十八日上午，群众复鸣锣敲鼓滋事，致台北全市骚动，社会情势紊乱，翌日起逐渐波及各省各县市，乃造成公务人员及民众多人伤亡及公私财产之损失。二月二十八日至三月八日为事件初期，政府一方面宣布台北市实施戒严，一方面抽调基隆、凤山军队开往台北拱卫省会，并电请中央增调部队，以防万一。三月九日至三月二十日为事件中期，台北市继续戒严，通令全省搜捕不法之徒。颁布绥靖计划，其要旨为待二十一师到达后，先期巩固基隆、台北、新竹之防务，逐次向中南部各县市展开绥靖工作，直到三月二十日，全省秩序始恢复。三月二十日以后，二十一师全部到达，政府乃调整部署，分区清乡，追剿不法的散徒，至五月十五日顺利完成绥靖工作。（注一二）

事实上，政府也以宽大和平的原则，来处理此一不幸的事件，首先政府的处理情形如下：

三月一日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接受缉烟血案调查委员会所提要求，对死者由政府发给抚恤金二十万元；受伤妇人林江迈发医药费五万元；长官公署并派民政处长、警务处长、农林处长、工矿处长及交通处长五人，代表参加二二八事件官民处理委员会。三月二日长官公署复接见全体调查委员，并决定四项办法：１对参加事变者不加追究。２被捕人民可免保领回。３死伤者不分省籍，一律抚恤。４处理委员会准增加各界人民代表，并于同日下午，由长官公署广播公布。三月六日长官公署再度广播，宣布尽可能采纳民意要求：１改组行政长官公署为省政府。２各厅处长尽量任用本省人，并希望民意机关推选适当人员。中央政府派遣当时闽台监察使杨亮功先生等来台调查处理，并派国防部长白崇禧莅台宣慰，社会秩序乃逐渐恢复。（注一三）其次政府对于案犯处理，也一本宽大为怀之态度，情形如下：

暴动分子：参加暴动首要者，不论为共党、流氓、学生、公务人员或人民，均从严从办，其附和者可由主管机关斟酌情形，从宽办理。共党分子：共党而参加暴动者，依法严办，如无意参加暴动而愿自新者可施以感化教育，由主管机关办理。流氓：原系流氓而为共党分子或参加暴动者，从严处办，其未参加者，可施以感化教化，由主管机关斟酌处理。学生：参加暴动者，念其年幼无知，减轻处刑，其盲从附和者，一律予以保释。（注一四）

根据民国三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新生报报导，事件发生后共逮捕人犯五八五人，其中判决处罪六十八人，保释者二九一人，情节较轻交付感化一○九人，亦由原送机关查明办理及送法院者一一七人，（注一五）此种说法，应是较合乎历史事实。

参、小结

综上所述，“二二八事件”起因之种种说法，都离不开一个复杂的变数，而且是具有各种色彩的导火线，无论伤亡与损失是否有详细的数字，都不是重要的课题，而是在这历史的悲剧中，政府与民众都是受害者，民众中本省人与外省人都是受害者，很难界定孰是孰非，经过四十余年，时间正渐渐愈合彼此的伤痕。于此吾人愿提出下列几条浅见，盼与国人建立共识，以平常心来看待“二二八事件”，不要被中共史家的谬论所煽惑。

“二二八事件”开始原为台北市查缉私烟偶发事件，但其后在有心人士鼓煽下，演变为各地串联之暴乱，在当时政府乃以“和平宽大”的原则处理，其间因事态扩大，乃适时调派国军二十一师来台参与平乱，追捕逃匿山区暴徒武装组织，以维持社会安定及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

按当时引起此一事件之肇事者，政府均依法处理，而幕后鼓煽之主谋者中虽有些已潜逃，政府亦依法通缉。在暴乱过程中，军、警、公务人员及民众均有伤亡。至暴乱中暴徒攻打军警，抢夺枪械，胁迫投降，而遭军警抵抗，双方互有伤亡，军警系出于维护治安，所采必要至当防卫行为。

“二二八事件”中，有人说：“外省人杀本省人”，有人说：“本省人杀外省人……国军杀民众……”等不一而足的说法，事实上这只是少数暴徒的所做所为，大多数的同胞仍然向往和平而厌恶暴力血腥，从民国三十六年五月台湾正义出版社编印之“台湾二二八事件亲历记”（注一六）一书中，叙述当时台湾各县市台胞如何发挥舍己为人及雪浓于水的同胞爱，救护大陆来台同胞的真人真事，读之令人感动，益加证明同是炎黄子孙，彼此血肉相连，任何的天灾人祸，彼此休戚与共，一起承担；任何的错误，只有彼此容忍，历史告诉我们，只有民族的情、同胞的爱是高于一切。

注一：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十月出版），页六九三～六九五。

注二：杨亮功、何汉文，“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联合报’第三版（民国七十七年三月十日出版），共列举了十大事变原因。

注三：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编，‘台湾省二二八事变记事’（民国三十六年五月印），页一～三，共列出五项远因、四项近因，可印证杨亮功、何汉文之调查报告正确可靠。

注四：同注三，页一～三。

注五：陈木杉着，‘二二八真相探讨’（台北市，博远书局出版，民国七十九年二月出版），页八四。

注六：陈碧笙，福州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撰写台湾地方史，曾任中共厦门大学教授，民盟五届中委，民盟五届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

注七：若林正丈着、吴密察译，“一位战前来台湾的中国学者——访陈碧笙氏”，‘自立晚报’，（民国七十七年六月二十七、二十八日副刊版），从文中显示陈碧笙早已是共党的身份，因此他对二二八事件的调查报告，必然是倾共，无庸置疑，由于自立晚报的刊载，因此对陈之身份更加证实。

注八：‘人民日报’（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九日第一版）

注九：江浓，“汲汲教训，继续前进”，‘台声月刊’，第二期（一九八七年二月出版），页三二。

注一○：叶纪东，“对历史作出解释，促进民族团结”，‘台声月刊’第二期（一九八七年二月出版），页三二。

注一一：史明，‘台湾人四百年史’（美国加州圣荷西，蓬莱岛文化公司，民国六十九年九月中文版），页七八三

注一二：“二二八事件专案报告摘要”，（台北市，行政院新闻局辑印，民国七十八年八月出版），页五～六。

注一三：同注一二，页七。

注一四：同注一二，页八。

注一五：同注一二，页八。

注一六：‘台湾二二八事件亲历记’（台北：台湾正义出版社编印，民国三十六年五月出版），全一册共二○六页。本书叙述各县市台胞如何发挥同胞爱，救护大陆来台同胞之感人史实。

□□□□□□□□□□□□■

第二十章：胜利的后遗症

主题

共党的政治陷阱政府一再迁就谢伟志等的勾结共军扩大叛乱毛泽东至重庆“会谈纪要”共党无信义人格马歇尔来华政治协商会议中英关系俄军霸占东北苏俄援引共军马歇尔一误再误第二次停战令马歇尔迁就共党共党全面叛乱召开国民大会要地相继失陷国家民族危机检讨受措原因李宗仁自取其辱巩固台湾基地

共党的政治陷阱

抗日战争的胜利，使苏联和中共活跃起来。

他们加强了政治阴谋，以图促进对中美关系的离间和对国民政府的颠覆工作。

“联合政府”的阴谋

其典型之一，就是所谓组织“国共联合政府”的活动，他们的联合政府论调，乃是为了再度迷惑美国而准备好的一套花团锦簇的美辞丽句，藉以掩饰共产党的本质。

联合政府的阴谋，是自抗战胜利前一年～一九四四年秋季开始。

这一年的十一月七日，以美国罗斯福总统特使身分待在重庆的赫尔利，曾应共产党再三要求偕同共党代表林祖涵飞往延安，和毛泽东晤谈，受到毛泽东所提出的“联合政府”等五项要求，希望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成立协议。五项内容如左：

一、统一中国所有军队。

二、改组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组织包括所有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代表的联合政府，及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政府拥护孙总理之主义，建立一民有、民治、民享政府，事实各项政策，以资促成进步及民主，树立正义及信仰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

四、联合军事委员会承认所有抗日军队，供应物资应公平分配之。

五、联合政府应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抗日团体之合法地位。

赫尔利答应将这个协定案转达政府，并居间协调。

在美国内部，其驻华大使馆中的亲共分子戴维斯、谢伟志等人早就在致力于“联合政府”的宣传，而国务院也为这些宣传所惑，甚至赫尔国务卿都曾向罗斯福总统进言：“应该劝导蒋委员长摆脱党派门户之见和充满偏见的反共主义，组织一个联合政府。”像这样满口“民主主义”，搬弄些“自由”、“进步”等动人听闻的语汇，装点门面，而实则尽力挥舞其“非民主”、“非自由”的独裁权力，乃是共产党的惯用伎俩。然而，能够察觉到这一点的美国人却是少之又少。

赫尔利于十一月十日偕同周恩来带着毛泽东已经签了字的“合作条件”回到重庆，向国民政府提出。

政府有惨痛经验

但在政府方面，由于有过一九二四年到二七年的“容共”和自一九三七年以来接受中共“投诚”的两度棘手经验，知道所谓“联合政府”乃是含有如何危险性的一个陷阱。盖就共产党的作风来说，联合政府只不过是要从政府内部加以分化破坏，以达到其侵占目的的一个幌子而已。实则毛泽东早在抗战军兴之初的一九三七年九月，就已曾对内指明——共产党在抗战时期阴谋的最后阶段，就是组织所谓“民主统一战线政府”。

不过，为了军队的指挥统一，对于共产党之参加军事委员会，则是不宜予以拒绝的。

因此，国民政府除对“联合政府”一点之外，其余各点差不多都予接纳，而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对周恩来提示如次：

一、国民政府为达成中国境内军事力量之集中与统一，以期迅速击溃日本及战后建国之目的，允将共产党军队加以整编，列为正规国军；其军费饷项军械及补给，与其他部队受同等待遇。国民政府并承认中国共产党为合法政党。

二、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政府之抗战及战后之建国，应尽全力拥护之，并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军事委员会管辖。国民政府并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事委员会。

三、国民政府之目标，本为中国共产党所赞同，即为实现孙总理之三民主义，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并促进民主、文化、政治之进步及其发展之政策。除为有效对日作战之安全所必要者外，将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对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及其他人民自由加以保障。

周恩来对此提示虽曾表示不能撤回“联合政府”之主张，但同意继续交涉，遂即为了和毛泽东等人交换意见而返回延安。

此后，便一直没有消息。

此际，在战局方面是桂林、柳州相继失陷，日军近迫贵州独山、都匀，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正在一意传播攻讦政府军事失利的消息，是故共产党对于交涉兴趣不大，而是在坐待中央政府失败。

共党节外生枝

十二月十六日，才接到周恩来的电报，果然不出预料——对于政府的提示案表示拒绝。

二十一日，赫尔利致电周恩来，催促前来重庆进行会商，而毛泽东则支吾其词，有意拖延；周恩来且更于二十八日致函赫尔利，提出四项条件：（一）取消边区封锁。（二）释放政治犯。（三）取消限制人民自由法令。（四）特务警察停止活动。

对共产党丝毫未存戒心的赫尔利，打算再亲赴延安进行协商；及至一九四五年元月六日，政府方面终于决定让步，接纳了赫尔利的建议。

‘上午，与赫尔利商谈对中共继续谈判方针，决定彼与子文、雪艇（王世杰）、文白（张治中）亲飞延安协商，以为最后之试谈。如其能有效，则军事乃可统一指挥；否则，其责在彼而不在我，且我已尽其诚意，再无其他方法矣！’（元月六日日记）

政府一再迁就

元月七日，赫尔利致函毛泽东，告知拟偕同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院长）、王世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人赴延安商谈。

可是，毛泽东却仍迟迟没有回答。

部分美军官图指挥共军

这是因为此时共产党与驻华美军内部的共党分子之间正在策进使用降落伞部队的武装叛乱计划。这个叛乱计划，是从毛泽东秘密要求和罗斯福见面而公开出来。当时情况，在赫尔利于元月十四日上陈罗斯福的报告书中大致有如下的说明：

“在魏德迈将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离开重庆的中国战区司令部时，他属下一部分军官草拟了一个使美军降落伞部队到共党控制地区的计划，他们企图将共党部队置于美国军官的指挥之下进行游击战。

“这个计划，是依据一部分美国军官和共产党之间的协议而制定的。他们是想瞒过国民政府而将物资供给共军，并打算直接加以指挥。这个军事计划，也满足了中共所求之不得的几点愿望——就是承认了中共、由中共接受美国租借法案物资，藉使国民政府瓦解；是要使我们不断支持国民政府的努力，全功尽弃。

“这个阴谋，是因共产党突然向魏德迈要求让毛泽东和周恩来前往美国的总统（罗斯福）会谈而露出了端倪。他们要魏德迈瞒着国民政府和我（赫尔利），可是在魏德迈的合作之下，乃使他们的阴谋完全揭露。

“现在，我们还没有将我已获悉这项军事计画的情形通知共党，直到我们能使共党体认到他们绝不可能利用美国颠覆中国国民政府为止，我仍将竭尽全力使和谈继续。

“虽然如此，我们仍将尽量要求国民政府让步，使中共参加国民政府。”

阴谋暴露之后，共产党的态度也有了变化。

元月二十三日，赫尔利得到毛泽东的通知：周恩来即来重庆商谈。

周恩来于二十四日抵达重庆。他在延安启程时，发表声明：“须召开包括共产党及各党各派所参加的党派会议及国是会议，及正式协商联合政府的组织。”表明了共产党是在坚持其“联合政府”的目标。

‘中共周恩来此来，以要求召开“国是会议”与改组“联合政府”及废除党治为其口号，绝无妥协之意。余告赫尔利——“吾人抗战革命，全为遵奉国父遗教，实现三民主义；如余一日不死，则必贯彻此旨。”对于破坏我国家法律与革命制度者，决不能再有迁就也。’（元月二十四日日记）

政府和共党会谈

政府和共产党的会谈，旋即开始。政府代表为宋子文、王世杰以及张治中（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三人，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赫尔利则以受双方邀请的形式列席。

在会谈时，首先由王世杰说明：除以前三项原则的提示案之外，政府并准备实行下列三项办法：

一、在行政院设置战时内阁性之机构（其人数约为七人至九人），俾为行政院决定政策之机关，并将使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党派人士参加。

二、军事委员会指派中国军官二人（其中一人为共军将领）暨美国军官一人，随时拟具关于共军之编制及军械补给等具体办法，提请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核定。

三、在对日作战期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将指派本国军官二人（其中一人为共军将领）暨美国将领一人，为原属中共军队之指挥官，并以美国将领为总指挥官、中国将领二人副之。该总指挥官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直接负责，在其所属战地之军令、政令，皆须统一于中央。

但周恩来则立即表示拒绝此案。他说：“此次来重庆，非继续国、共两党之会谈，而是为了召开党派会议及讨论共同纲领。”并提议召集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党派会议。盖周恩来的目的，是要将这一次的会谈，自始就扩大为包括各党派在内，并使对于“联合政府”的讨论造成既成事实。

虽然这样，政府方面还是接纳了周恩来的一部分主张，将“党派会议”改称为“政治谘询会议”。并提示：此项会议应研讨——（一）结束训政与实施宪政之步骤。（二）今后施政方针与军事统一之办法。（三）国民党以外党派参加政府之方式。对于这个提示，周恩来表示：“须向延安请示”。

‘共匪骄横猖狂，鼓吹“党派会议”、“国是会议”与“联合政府”谬论，中央概置不理。社会公论不直其所为。自彼拒绝我派子文等赴延安谈判，与我提以美军将领任共军总指挥，彼亦表示反对以后，交涉形势乃有利于我矣。’（元月三十一日记本月反省录）

及至二月，接到来自延安的答复，内容是：“不能接受政府提案。先决条件为必须国民党取消党治。”

在进入实际讨论之前，便企图以“联合政府”为前提而硬行要求的共产党策略，已经使这个会谈失去了意义。

周恩来接着便片面发表了诋毁政府的声明，于二月十六日飞回延安，于是会谈遂即到此为止。

谢伟志等的勾结

刚好在这个时期，驻重庆美国人士之间的意见对立逐渐表面化。

其发端，即为在前面业已提到过的共军要和美军伞兵部队共同进行游击战的阴谋。

自这个阴谋暴露之后，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对于其所统驭的官兵加强了约束。他于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二日在重庆招待记者，明确宣布美军方针：“我们的政策是在中国战区内不援助任何个人、任何活动或任何组织。我们美国军官、美国军事人员常常接到各方面请予协助的要求。但我受命支持中央政府，并继续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做。”

然而美国驻华大使馆内的谢伟志、艾默森等亲共集团则对之有所排拒。

谢伟志于二月十四日向国务院建议：“以外交手段解决问题，业已失败。我们如能逼蒋委员长让出权力，达到联合政府政治，则他们各派必会感激我们，我们亦自此始有真正统一之盟邦。”

艾默森也于二十八日进言：“对国、共两方面同时加以压力，先取得具体的军事合作，才有政治的合作。”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赫尔利与魏德迈于二月十九日回国述职。蒋总统向赫尔利表达国民政府的意向，希望得到罗斯福的理解如下：

‘一、我政府不问共党是否就范，必照预定方案进行——召开国民大会，组织民选政府。

‘二、俄国对中国与中共之政策与行动所表现之事实，证明只要美国对华政策坚定，则其决不敢对中国甘冒不韪，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或接济中共武器。

‘以上二点，明告以安其心，以罗斯福总统最顾忌者惟此也。’

谢伟志去延安

谢伟志更于三月中旬到达延安，与毛泽东接触，并连续向国务院呈送替共产党吹嘘的情报如下：“中国共产党期待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届时，共军将在东北地区之南部与苏军配合活动。”“美国如援助共产党，不必征求蒋委员长同意。”“除非美国根本改变其对国民政府之政策，则共党不会盼望战后与美国合作。”

‘自从上年十一月中央与共产党开始协商以来，中央深信各方意见有争执时，果为诚意谋取解决，便不应互相攻讦。因此，竭力劝告国内舆论，不应有攻击共产党之论调。乃不意共产党即藉此次商谈机会，在国内外广事宣传，并且对政府及

国民党肆意毁谤；因之国内外人士所听闻者，祇为共党片面之词。本席（蒋总统）在代表国家的人格与地位，认为此种诬蔑之言实在不值一驳。’（注）

四月十四日，谢伟志奉调回到华盛顿，这是出于对谢伟志言行感到可疑的赫尔利所提出的要求。

查获间谍罪证

不久，经过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发现了出人意表的事实——自左翼分子发行的美亚杂志社的保险柜中搜出多件美国政府机密文件的复印本，而且证实这些文件已由谢伟志经手转送延安的毛泽东。

联邦调查局乃以间谍罪嫌于六月六日将美亚杂志编辑主任杰菲等六人逮捕、审讯。当时联邦调查局没收的文件达八百件之多，其中包括有自美国战略情报所盗出的“中国陆军战斗序列之变更”二件及由美国国务院取出的“中国空军之改组”等绝对机密文件。

关于这些文件的重要性，在一九七○年二月十四日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中曾经提出：“战斗序列变更的资料，其价值和一般资料是不能等量齐观的。在当时，乃是毛泽东和他的党徒们最感兴趣而又最有价值的情报。”

同时更被查明谢伟志、戴维斯、艾默森等人不仅向共产党提供情报，而且还送给苏联。他们在文书中使用许多隐语——以“白雪公主”代表蒋夫人，“哈佛”代表共产党，“精神病医院”代表华盛顿。

‘美政府昨日已将勾共排华专事攻讦我政府者六人以泄露机密罪逮捕。其中有旧为驻华使馆之三等秘书谢伟志，此为勾共最力之人，而去年史迪威与共党接纳，亦为其所主持者也。此六人逮捕以后，美国对华政策乃可渐次明朗，其阻碍亦可逐渐扫除乎？而其对俄政策之坚强，亦可于此窥见矣。’（六月八日日记）

助长亲共分子气焰

虽然是如此重要事件，但不久之后在美国便没有了下文。盖由于有与谢伟志关系亲近的华盛顿政府高级官员用了压力，对于间谍案加以掩饰，而举发此案的代理国务卿格鲁却竟然被解职，而相反的则是谢伟志且于胜利之后更被重用为麦克阿瑟司令部的顾问。至于谢伟志、戴维斯等人之被免除外交官职务，乃是到了一九五三年杜勒斯就任国务卿以后之事。

像这样处置此案，乃使美国内部的亲共分子更为猖獗，而结果只是替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制造了可乘之隙。

注：蒋总统-“宪政实施协进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讲词”（一九四五三）

共军扩大叛乱

当国共会谈停止之后，一度返回华盛顿述职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公毕历访英、苏两国，于一九四五年四月间回到重庆任所。赫尔利此次返美期间，奉有罗斯福总统密令为雅尔达密约的善后工作奔走。可是，当他尚在旅途中，罗斯福骤然去世，因而未有结果。

四月二十四日，蒋总统在重庆曾家岩官邸接见返回任所的赫尔利，听取报告。

史达林的欺骗之词

赫尔利报告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莫斯科和史达林的谈话，据他追述谈话情形如下：

“赫尔利苏联是否以中国共产党为非真正共产党，而为假牛油式的共产党？

“史达林是这样的。

“赫尔利苏联曾否援助中共？

“史达林没有

“赫尔利苏联是否愿有一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之中国，自选其领袖人物，自作主张，自对其人民负责，并愿与此中国密切合作？

“史达林当然是这样的。现在中国有派宋（子文）博士来莫斯科之议，因苏联方面的原因以致迟缓其行，但苏联仍愿与中国密切合作，并愿协助中国统一国共两军的军令。”

赫尔利更提到史达林还有一项意见：

“史达林说：阁下（蒋总统）尽可在政治方面让步，以求得军令统一。”

史达林的“苏联与中国共产党无关”、“中国共产党不是真共产党”等论调，乃是一向遇有机会便背诵出来的宣传口号；至于他所谓仍愿与中国密切合作，则不过是要把雅尔达密约使中国所受牺牲造成事实，作为其侵略中国的一个手段而已；他并且更打着这种“友好”的幌子，意图迫使国民政府对共产党让步。盖这一类“无关”、“友好”、“让步”等辞汇，只是遮掩其赤化世界工作真相的假面具；然而，美国方面许多有关人士却漫不经心地受了那种宣传的欺骗，直到后来还是没有能看清他的真面目。

当蒋总统听取赫尔利报告的同一天～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共产党七全大会（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上发表以“论联合政府”为题的政治报告，这个全文达四万多字的报告中，毛泽东主张“抗战中国所应选择的路线，除树立联合政府以外，绝对没有第二条路。”并极力中伤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同时宣称：国民党如不同意组织联合政府，则共产党便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凭力量和国民党对抗。这样的报告，等于是对国民党的一纸“绝缘状”。

毛泽东支持雅尔达密约

同时，毛泽东更明白表示支持卖掉了自己国家的雅尔达密约，他说：“我们认为克里米亚（雅尔达）路线和中国共产党关于解决东方问题与中国问题的基本方针是一致的。”这种腔调，不能不说是和史达林在前面所讲的话有其密切的关联。

自此之后，共军的叛乱攻势益见强烈。

在这个当口，中国大陆的日军，面临中国军的大规模反攻，已经撑持不住其所占据的“点”和“线”，而在徐徐退缩中，共产党乃把握此一情势，找到机会便袭击政府军；同时并谋抢在政府军的前面，进驻为日军所放弃的城市。

他们夸大宣传拥有正规军六十五万，民兵二百余万，由华北一带向南推进。

‘共匪近日又向伏牛山、嵩县（河南省）一带我军袭击；并窥伺皖省府所在地之立煌，不断侵犯。而其有力匪部，且由江北向江南、浙西大量侵入，此其不仅为扰乱我军与盟军接应之计划，而另一目的，乃牵制我黄河以南各军不能向华北前进。故此时我军必须准备有力部队向华北挺进，以直接打破共匪向南之各种企图也。’（六月九日日记）

‘对共匪通过敌寇阵地，窜扰我豫西、浙、湘各战区，乃证明其受敌寇指使，以牵制我军反攻之事实，应随时发表。’（六月十日日记）

在如此叛乱活动的情形之下，面临了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当日本投降前后的共党动态，在秘录连载开始时业已提及，现在再概略叙述于后：

共军意图颠覆政府

就是在日本宣告接受波茨坦宣言的第二天～八月十一日，共产党对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发布之“原地驻防待命”的命令便置之不理，并以“延安总部”的僭称连下七道命令，着中国各地共军及在东北、朝鲜的地下组织全面暴动。

继之，朱德复于八月十二日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名义对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发出“向共军投降”的命令；同时，再度命令全体共军——占据东北、华北一带，和侵入东北的苏联军呼应。

八月十七日，朱德更强硬地向国民政府提出“共军接受日本投降”等六项要求。

他们很快地要在东北、华北和苏联联起手来掠夺日军武器，破坏军令统一，以谋建立颠覆国民政府的“赤色根据地”。

毛泽东至重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在延安所举行的干部会议中，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说，大骂国民政府并煽动武装叛乱。

在这个演说中，他用恶毒到不能再恶毒的话侮辱蒋总统。他说：“大家知道，蒋介石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又说：“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以教唆发动内战。

由于日本业已投降，使共产党已经不能再假藉抗日的大道理来袭击政府军；于是，乃终于撕掉了假面具，露出狰狞面目，公然以国民政府为敌。

然而，共产党虽则进行着诽谤和破坏工作，但国民政府却并没有舍弃说服毛泽东的希望，盖为使战后的国家建设走上成功的道路，容忍还是有必要的。因此蒋总统于八月十四、二十、二十三日三度电报呼吁毛泽东来重庆会谈；而结果还得要由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作毛泽东的安全保障、专程乘美军飞机亲往延安迎接，毛泽东这才挪动了他沉重的腰板。

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五时，正当蒋总统召集各院院长会谈之际，毛泽东抵达重庆机场，周恩来、王若飞（均为共党中央政治局员）同行。

‘正午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以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八月二十八日日记）

自二月以来，因意见决裂而终止的国、共会谈，等毛泽东来到重庆之后，复于九月三日再度开始。政府电报张群（四川省主席）、王世杰（外交部长）、张治中（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邵力子（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四人，共党代表周恩来与王若飞。

在会谈之前的八月二十九日，蒋总统决定方针如次：

‘一、不得于现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

‘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

‘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八月二十九日日记）

会谈进行至十月十日为止。其间，蒋总统和毛泽东并曾九度见面，直接交谈。

扩充共军僭取行政权

问题的焦点，是共军的整编和共党控制区域的行政问题。

国民政府的计划是：将在抗战期间扩充到三百五十四个师的中国军，包括共军在内统一改编为八十至一百个师。基于此，政府起初提议以共军编为十二个师；而毛泽东则一度要求二十八个师，但却马上又自食前言，强硬主张保留四十八个师。盖共产党的要求在使缩编后中国军兵额之半数为共军缩占有，实在是大到离了谱。

至于地方行政权，共产党主张在他们所谓“解放区”任命由共党所推荐的省主席与县市长，但违背了现行法治的体制，盖行政首长及官吏任用权应该是属于国民政府的。

交涉很难进展，多次濒于决裂。

现在摘录当时蒋总统的日记数则于下：

‘今晨五时，未晓，起床祷告，愿共毛之能悔悟，使国家真能和平统一也。

‘上午约岳军（张群）、文白（张治中）、力子（邵力子）等谈话，听取其昨夜与周恩来等全部谈话经过，脑筋深受刺激，何天生此等愚劣根性，徒苦人类乃尔也。以余之意，应将其提议从速公布，而文白等以为太早也；乃嘱彼等继续研究商谈之法。’（九月四日日记）

蒋总统示以至诚与大公

‘正午约毛泽东谈话约半小时，余示以至诚与大公，允其所有困难无不为之解决，而彼要求编其二十八师之兵数。’（九月十二日日记）

‘正午约毛泽东、赫尔利照相谈话。据岳军言周恩来向其表示：前次毛对余言可减其所提军额之半数者，实乃指其四十八师之数，已照共匪总数减少一半之意也。果尔，则共匪诚不可与言矣！以当时彼明言减少半数为二十八师之数字也，其无信不诚，有如此也。’（九月十七日日记）

‘召见驻延安联络参谋胡自立，听取其报告——共匪在日本未投降前之阴谋，满拟将全部沦陷区归其所有，并以沦陷区民选政府名义召集人民代表大会，以对抗我国民大会。阴毒极矣！’

毛泽东信用的诈术

在这段期间，毛泽东口头表示：“中国今日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的。”“在蒋主席领导下，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又在某些时候，甚至高唱“三民主义万岁！”

但这只是共产党所惯用的诈术，而共军则乘毛泽东待在重庆、使会谈造成胶着的间隙，已经出现了占领华北二百多个城市的叛乱行动。

“会谈纪要”

由于共产党的强迫纠缠战术。使在重庆进行的国共会谈阻滞不前。盖毛泽东和共党代表们不仅根本没有和国民政府通力合作的意向，而且是以之为敌人。

毛泽东怕死取巧

‘共党今日提公告稿，最后两条乃述共毛来渝安全问题及美使赫尔利保证问题，此与会谈全无关系，仅为其贼胆心虚之表示。彼全不思本国商谈要由外人保证之耻，亦不思赫尔利即14[22]3020使为之保证，亦已失败也。盖赫尔利保证共党接受统一团结者之安全，并未保证其通敌卖国反动派之生命。而且赫尔利已对共党声明：“今后国、共问题，全为中国之内政，不能如往日敌军未降时可由盟国共同作战之关系，参加调节，今后应由中国双方自动解决也。”彼辈不能自信，而独信外人，其何能革命？怕死取巧，实不值一笑也。’（十月一日日记）

十月十日，国、共双方会谈的代表张群与周恩来等人将过去会谈内容整理为“会谈纪要”发表，即所谓“双十协定”，其内容如次：

“一、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一致认为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避免内战，彻底实行三民主义。

“二、关于政治民主化；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

“三、保障人民自由。

“四、承认一切党派的合法地位。

“五、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特务机关）禁止拘捕和处罚人民。

“六、原则上释放政治犯。

“七、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普选。

“八、惩处汉奸，解散伪军。”

具体问题未能协议

但关于下列四项具体问题，则未能达成协议，只得将双方主张一并列入纪录：

一、关于国民大会

共产党——重选国民大会代表，延缓国民大会召开日期，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五五宪法草案。

政府——已选出之代表，应为有效，代表名额可以合理增加，宪法草案原曾发动各界研讨，贡献修正意见。

双方同意将此项问题提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二、关于军队国家化

共产党——愿将军队缩编至二十四个至二十个师。调华南共军向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解放区”移动。

政府——考虑编共军为二十个师，驻地问题，另行解决。

双方同意组织三人小组（军令部、军政部及第十八集团军各派一人担任），进行具体化的计划。

三、“解放区”地方政府

共产党——维持现状。

政府——为统一政令，尽速协商具体解决法案。

四、关于受降问题

共产党——重划受降地区，共党参加受降工作。

政府——在共军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

根据上述情形，可知共产党对于所谓“长期合作”的大原则，虽然摆出赞成的姿态，但当涉及比较具体的各个问题上，则一概反对，令人看不出有丝毫合作的诚意。

重庆的国、共会谈，至此告一段落。毛泽东于十月十一日返回延安，在即将首途之前，蒋总统曾和他三度见面，仔细商谈。

果能动其心于万一否？

‘毛泽东今日来作别，与之谈约一小时，先问其国、共两党合作办法及其意见如何？彼吞吐其词不作正面回答。余乃率直告他——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唯一之出路。第一期建设计划如不能全国一致努力完成，则国家必不能生存于今日之世界。如此，吾人不仅对国家为罪人，而且对今后人类之祸福亦应负其责也。彼以为是。果能动其心于万一否？但余之诚意，或为彼所知乎？’（十月九日日记）

‘上午，主持国庆典礼。下午，召见北平、台湾党务人员后，往访毛泽东于桂园，送行也。彼忽提议：今晚来宿林园。余知其必另生问题，乃欢迎其来宿；约谈十分钟，即辞出。九时四十分，见毛泽东，约谈半小时。’（十月十日日记）

毛泽东忽又翻案

毛泽东提出来的问题，乃是延期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按此类会议之须早日召开，已在当天发表的会谈纪要中表现得很明白；然而，毛泽东却突然要求翻案。

这实在是有悖信义的要求。毛泽东的意图乃是要使政治协商会议迟延下去，藉以联带要求缓开国民大会，更在此期间使共军向各地推进，以谋制造其既成事实。

共党无信义人格

对毛泽东之于十月十日晚间自食前言，重新提出要求，蒋总统在十一日的日记中留有这样的记述：

‘昨夜与毛泽东谈话，彼忽提政治协商会议以缓开为宜。并称：“回延安准备召集其所谓解放区民选代表会议，再定办法。”又称：“国民大会提早至明年召开亦可。”余闻之，殊为骇异，乃觉共党不仅无信义，且无人格，诚禽兽之不若矣。余于此不能不和婉明告其果如所云而行，则国民大会会期延误，我政府势必因此失信于民；但如政治协商会议能在本月底开会协商，则国大会议，政府可迁就其意，改期召开，然至十一月十二日不能不下召集明令，确定会期，示民以信也。余亦明示其政协会即使不能如期开会，则政府亦不能不于十一月十二日下召集令也。余谈至此告辞，约期明晨再谈而别。’

按照约定，蒋总统与毛泽东于十一日早晨作了最后的会谈。

‘今晨八时，约毛泽东早餐后，余再与之恳切对谈，阐明数次谈话要旨，明告其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能再有迁就，否则不成其为国家之意，坚决表示望其了解也。彼去后，散步林园一周毕，记事．批阅公文，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十月十一日日记）

毛泽东于这一天的下午按照预定日程飞返延安。自兹之后，蒋总统没有再和他见面。

毛泽东撕毁会谈决定

毛泽东回到延安之后，各地共产党的叛乱立即扩大。

十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共产党的干部会议中作秘密报告，他说：“……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只要国民党的政策有所转变，我们就愿意同他们谈判。……”他就是这样地把经过长期会谈所决定的“会谈纪要”当做了一张废纸。像这种利用会谈争取时间、在会谈中故示意见接近使对方疏于提防、而最后则片面地撕毁会议决定，攻其不备的手法，在此后的国、共会谈中，曾经再三反覆玩弄过。

就在这个时候，共军业已华北为中心占领了二百个以上的城市，在胶济（青岛-济南）、津浦（天津-浦口）、陇海（海口-潼关）、平绥（北平-绥远）、北宁（北平-山海关）、平汉（北平-汉口）、道清（道口-清化）各铁路的若干地点都受到了妨害，并威胁了山海关到杭州的海岸线，以及自垣曲到武陟的黄河沿岸，暨苏皖两省的长江沿岸和运河线。而且推进到这些地区的共军，更以武力阻碍政府军接受，冲突事件层出不穷。

‘共毛返回延安未及旬日，而各种横逆叛乱较前尤烈，此乃意中之事。但平津与胶济为我接受，重要据点之部署已妥，统一初基既定，惟政治协商会议未能如期召开，因之国民大会亦不能不延期，此固为对内政治上之一大损失，然无图大计也。’（十月三十一日记本月反省录）

毛泽东回延安之后，在重庆方面由张群（四川省主席）与周恩来再度举行会谈，但由于连繺o生军事冲突，协商情形毫无进展。

抗拒政府提案

十月三十一日，政府方面为防范在各地的军事冲突会发展成为正规的内战，所以提议：“政府军与共军暂各驻守原地，互不攻击”、“共军撤退到铁路沿线的十公里以外，铁路之警备由警察担任”、“从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项。这些议案提出于十一月三日的国、共会谈，但共党方面却反而提出由其接受日军投降及政府军退出其所谓“解放地区”等要求，以抗拒政府的提案。

国、共会谈就是这样地濒临绝裂边缘，但惟有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一节共党也表示同意，政府方面遂即提经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国防最告委员会联席会议之后，决定了参加协商会议的代表三十八人，计为政府代表八人，共产党代表七人，青年党代表五人，民主同盟代表九人，无党无派人士九人。但旋因开赴东北接收的政府军，被共军拦截登陆推进，致发生大规模的战斗，而政治协商会议之召开，乃迁延到新年之后。

共军叛乱计划

此际，据驻防西安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于十一月一日向蒋总统报告有关共军的叛乱计划如次：

“毛泽东自渝返延后，召集高级干部会议，指示：

“（军事方面）现有部队十分之八向辽、吉、黑、热、晋、绥、鲁、皖、冀等地分布，进行游击战，阻止国军前进；以十分之二部队保卫边境。

“（政治方面）（一）新占领之地区，应先建立政权，并以阻止民众为首要工作。（二）对登陆来华之盟军（美军）表示友好，并尽力协助，以争取国际之良好印象，伺机散布对国民政府的恶评。（三）对占领区之士绅及帮会应极力拉拢，予以利用。（四）收买国民党军政失意人员，而使之投效共党。”

马歇尔来华

在重庆斡旋国、共会谈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为了和国务院有所接洽，乃于九月底归国，但突然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向杜鲁门总统提出辞呈。

赫尔利遭中伤辞职

这是由于在中国共产党问题方面，中了亲共分子宣传毒素的国务院和赫尔利的意见相左已经到了无法调处的程度，于是被亲共分子中伤所迫的赫尔利乃愤而辞职。

当辞职之际，赫尔利发表了严厉批评国务院对华政策的声明，大意如下：

“吾人曾促进（国、共）两党进行团结协商，乃为对中国共产党偏向的驻重庆美国大使馆官员之所妨害。职业外交官们和武装的共产党取同一立场，彼等并向共产党建议——如能获得管辖权，则拒绝将共军编入国民政府的军队内。”

杜鲁门总统立即批准赫尔利辞职，同时并任命前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以总统特使身分前往中国。

杜鲁门在发给马歇尔的训令中指示：“运用美国影响力之所能及，希望中国依和平、民主的方法及早实现其统一，并敦促停止国、共双方军事敌对之行为。”嗣更授予向中国政府及其他领导人士率直转达：“如继续有军事冲突，则停止一切军、经援助”的职权。

十二月十五日，杜鲁门就对华政策发表声明：“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应即作停止敌对行动之安排。美国之援助，应不使其发展到军事干涉内争之形势。”同时仍强调：承认国民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呼吁中国和平统一。

以参谋总长地位，承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规划，以致声望甚高的马歇尔，其衔命来华，受到了世界的注目。

可是，从马歇尔在史迪威事件时的态度，则可以知道他是受了中共宣传之所蒙骗而对国民政府不无偏见。其后，马歇尔的调停，乃一贯地对共产党颇为天真而对国民政府则很严峻，是为大陆赤化的直接原因之一。

马歇尔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到达重庆，与中国政府进行商洽。

‘晚约政治干部研讨对内对外形势。至于对共方针，若准其成立地方政权，不如准其参加中央政府，只要其共军受编与恢复交通，至其政治上之要求，决尽量容纳也。’（十二月二十三日日记）

马歇尔提出调停案

十二月二十七日，国、共会谈在马歇尔参加之下再度举行。

马歇尔为谋实现停战，首先向双方提出调停案如左：

一、一切敌对行动之安排立即停止。

二、中国内部及东北境内所有军队立即停止调动。但为收复东北主权，政府军向东北之调动不在此限；又为补给、行政及维持治安之需要而且纯属地方部队之调动，亦不在此限。

三、停止在各交通线的破坏、妨害活动，并完全撤除在陆路交通线上的障碍。

四、目前，所有部队均留驻原地待命。

对于这些提议，政府方面当然不会有意见，在新年到来的一九四六年元月四日，共产党也同意政府军向东北调动；于是，乃于五日即行达成“停止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一切交通”的协议。

同时，为协商细节，并于当天成立由马歇尔和政府代表张群、共党代表周恩来组成军事三人小组。即所谓“马歇尔三人委员会”。

三人小组举行了六次会议之后，于元月十日正式发布“一切战斗立即停止，军队调动一律停止”的命令。两军均定于元月十三日午夜十二时（十四日午前零时）停战。

元月十三日，实行停战的机构——军事调处执行部成立于北平，其构成人员为美军代表罗柏森（上校）、政府方面郑介民（中将）、共党代表叶剑英三人。此后，所有必要的训令及命令，应由三人一致同意，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名义经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布之。

于是，停战形式乃为之具备。

政府军遂即依据协定于十四日午前零时在各地区停止了军事行动。

共军不守停战命令

可是，共产党却自始便对于协定不予遵守，而觑准了政府军兵力不足的各地，续行攻击不辍。

政府军忠实遵守命令，禁止一切开火行为，因而对于来自共军的攻击不能应战，以致东北重要港口-营口于十四日被共军攻占。

思之，真是令人痛愤切齿。

‘今共匪仍在各省有积极向我国军侵犯，反诬国军向彼进攻。余惟有逆来顺受与沉机应变以处之。’（一九四六年元月十七日日记）

‘共匪自十三日停战令以后，反在华北发动攻势，而马歇尔尚不觉悟共党之失信背约也。’（元月十九日日记）

‘近日心神痛悔交集，乃知往日对共党宽容之误事也。’（元月二十一日日记）

所成问题的，是调停者马歇尔未能察觉到共产党这种背信行为乃是他们的惯用伎俩，故而对于其破坏协定竟加以宽容。于是，共产党便以此为有利的趋向而得寸进尺，为所欲为。

政治协商会议

通过马歇尔三人小组所提出的停止军事冲突协议，于一九四六年元月十日成立。同时，政治协商会议则集合有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各党派代表在重庆开幕。

这是依据上年国、共会谈结果的“双十会谈纪要”，商讨为实施宪政程序的国民大会之召集问题而举行的超党派会议。

蒋总统在会议开幕时致词，宣告停战令业已下达；并希望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担负起国家复兴建设的任务。会议遂即进入讨论。

政协五项协议

政治协商会议到三十一日为止，得到以下五项协议：

一、国民政府委员名额增加为四十人，经国民政府选任，其中半数由国民党人员充任，其余半数由其他党派及社会贤达充任，其分配另行商定。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政府之最高国务机关。

二、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国民大会代表定额由现在的一千二百名增加到二千零五十名。宪法之通过，须经代表四分之三的同意。

三、和平建国纲领之要点为：遵奉三民主义为建国之最高指导原则，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建设统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国。

四、军队属于国家，任何党派及个人不得利用军队为政争之工具。

五、组织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起草立法、司法、监察、考试、行政分立的“五权宪法”。

在这个决议案通过之后，蒋总统特别说明如左：

‘本会议所通过之各案及施政纲领，乃具有全国性，全国各地不分区域、不分党派，均须共同遵行。不论在各省区或在中共军队所驻在地方，应一律有效，以实现军令、政令之统一，确实奠定和平建国之基础。’

在决议案之中，有设置超党派的“国民政府委员会”，也就是接纳了共产党的所谓“联合政府”的要求。政府打算将四十席委员名额分配国民党二十席，此外，共产党、青年党、民主同盟、社会贤达各五席；但共产党则强硬主张给予共党及为共党应声虫的民主同盟共十四席。盖十四席即超过三分之一员额，依照国民政府委员会的议事法规便可握有否决权。此一关于员额分配的协商，在后来乃成为国、共无法协调的原因之一。

军队整编统一原则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马歇尔和政府代表张治中（担任军事折冲）、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所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再度开始折冲，二月二十五日，对于军队整编、统一的基本原则达成协议如左：

一、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国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最高统帅有任免所属军官之权，但在整编军队过程中，撤免中共军队之高级军官，应派在政府中之共党代表所提名之军官递补。

二、陆军之编制，在一年之后，全国军队整编为一百零八个师，其中共军占十八个师；一年半之后，缩编为六十个师，其中共军占十个师。

此外，更明白规定编余部队的复员计划以及各地区的军队配置计划。依照配置计划，在一年后于代表方面配置六个军（政府军五、共军一，每军辖三师），华北方面十一个军（政府军七、共军四），华中方面十个军（政府军九、共军一），其他地区（西北五个军、华南四个军）均为政府军。

马歇尔受共党蒙骗

可是，共产党根本就没有遵守此一决议的意思，他们只是为了削弱政府军、并为制造“联合政府”的肇端而利用马歇尔；但马歇尔却为周恩来的笑容缩蒙骗，相信共产党会遵守决议。

‘周恩来自延安返渝，态度大变，并高唱军、党分离与国、共长期合作之口号；且对马歇尔表示-中共有亲美疏俄之意。此中必另有阴谋也。惟马歇尔与中共商谈已有月余，其对中共欺人之手法，或已逐渐了解乎？’（二月二日记本周反省录）

‘马歇尔对余之认识虽渐增加，然其受共党之麻醉日甚；美国民族之易受人欺诳，其老练如马氏者尚且如此，其他更可知矣，不禁为世界前途忧也。

‘与中共商定统编其所部为十八个师之方案，业已签字，此为政府最大之损失。’（二月二十八日记本月反省录）

三人小组自二月二十八日起赴北平、张家口、延安、汉口等地视察，为时六天。

‘马歇尔等军事三人小组视察华北归来，尤其马氏在延安与毛泽东会晤之后，彼对共党之阴谋，似有略进一层之认识矣。余告其在今后十八个月内，共军未统编完成以前，如果万一中、俄发生军事冲突，或俄国对中、美作战时，共军必效忠苏俄，听从俄共之命而向我攻击。马氏对此亦不能加以否认也。’（三月九日记本周反省录）

实则共军对于军事三人小组的协定和决议根本置之不理，到处在调动部队，不断攻击政府军。问题最多的是东北地区，盖共军和俄军正联起手来在妨害政府军的接受工作。

因此，三人小组乃计划去东北视察。但在即将出发之际的三月十一日，马歇尔奉其本国电召，回美述职，以致三人小组暂停活动。

中英关系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亚洲，美国虽然受了共产党的宣传所惑，但也还是在为其门户开放主义之实现，及谋求亚洲和平的确立而继续努力。

可是，美国以外的两强-英国和苏联，则各为其意图所拘执；英国不肯打破其旧有的殖民地主义迷梦，苏联则任意伸展其红色帝国主义，阴谋侵略中国领土。

现在，首先谈一谈英国和香港的问题。

英欲重占香港

香港乃是早在一八四二年清廷时代的屈辱外交中割让给英国，它和邻接之地的九龙（英国租借地）都是中、英之间有待解决的悬案。

当珍珠港事件之后，中、英两国进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交涉，即曾为其归属有过议论，但由于英国态度固执，以致在签订平等新约时将之搁置未提；不过在当时中国曾经照会英国，声明：为使香港与九龙的归属在将来同时解决，保留收回九龙之权。

由于有如此过节，故而在关于香港日军的受降方面乃发生了争执。

按照盟军方面最初的规定，香港日军划归中国战区统帅部受降；然而以香港为割让地而主张持有其主权的英国，则打算由他派遣海军来单独接受日本投降。

‘英军舰已驶到香港海附近，有重占香港之企图。’（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日记）

可是，在并未承认香港是英国领土的中国而言，乃是不能许可英国擅自在中国战区内接受日军投降的。

关于这个问题，美国杜鲁门总统也对英国有所偏袒，他致电蒋总统说：“英国在香港的主权是没有疑问的。倘为投降仪式而发生麻烦，似乎将抵偿不了其恶劣影响。”于是中国乃不得不在失掉对于香港主权立场的范围内作了最大限度的让步。遂由蒋总统于八月二十二日电达麦克阿瑟，告知：“可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名义，授予英军司令官以接受香港日军投降的权限。”同时，并将在香港、九龙方面的中国军后撤。

然而，英国仍旧以其对于香港的主权不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中、英和平新约的影响，坚持受降权限本来属于英国，而拒绝接受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授权。

坚守中国战区统帅权责

‘与赫尔利、魏德迈商谈英国拒绝我委托英军官接受香港日军投降之提议，决定仍坚持委托方案。如其拒绝，则违法怀纪，责在英国，余则不能不守定中国战区统帅之权责也。’（八月二十六日日记）

‘召见英国大使薛穆，明告其余（蒋总统）委托英军官接收香港之主张，必须贯彻。并即委其所派之哈可尔提少将代表余中国战区统帅接受香港日军之投降，嘱其通知英政府。如其不接受此委托而擅自受降，则破坏联合国协定之责任在英国，余决不能放弃应有之职权，且必反抗强权之行为。’（八月二十七日日记）

‘英国强欲重占香港，不许我接收，并拒绝我委派其英国军官接收香港之指令，痛愤无已。’（八月三十一日记本月反省录）

此际，同盟国在米苏里军舰正式接受日本投降（九月二日）的日期业已迫近，英国面临此一情况，已不容再事蛮不讲理，遂终于承认了接受委托受降的方式。

‘英国对余委派英军官接受香港敌军投降之指令，最后仍承认接受，是公义必获胜利之又一明证。惟英国侮华之思想，乃为其传统之政策，如我国的能自强，今后益被侮辱矣！’（九月一日日记）

九月十六日，在香港举行受降典礼，由哈可尔提少将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接受日军投降。

中国方面派罗卓英参加，但英国在典礼中以其本国为优先，对中国代表则故示冷淡。

似此“蔑视中国”、“割让香港”的策谋活动，真正是不胜列举。

譬如说，中国决定自九月一日开始全国一律实施车辆靠右行驶，香港也应该包括在内，但英国却以有损商业利益为藉口，拒绝在香港施行。

在香港盘踞不走的英国，于一九五○年元月六日更做出抢在西方各国的前面承认北平共产党政权的背信行为。当时的大陆，还有很多政府军正在和共产党叛乱匪军作战，而英国只顾维护其在香港的既得权益，便很快地向共产党政权送上秋波。

这个行为，乃使自由国家的团结关系发生了裂痕，给世界带来了新的紧张情势。

蒋夫人指斥英国无耻

三天之后的元月九日，正在纽约的蒋夫人向全美国广播，严词批评过分贪婪只顾自己利益的英国；并要求为自由民主主义堡垒的美国对中国加以理解与支持。广播词大意如次：

“英国为了几块银子的代价，出卖了一个民族的灵魂。我说她太无耻了。这几块银子所生的利息，就是他日在自由战场所付出的血汗和眼泪。大凡在道义上是邪恶的，就永远不会在政治上是有公理的。”

中华民国遂即与英国断绝邦交。目前在文化、经济上的交流，虽仍然有些在继续中，但没有正式外交关系。

俄军霸占东北

在日本就要投降之前而对日宣战的苏联，于转瞬之间便控制了东北全境。

关于苏军之占领东北，史达林前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已和中国约定——“三星期内开始撤退，其撤退期限至迟不得超过三个月。”

期限已过拒不撤兵

然而苏联却不遵守约定，一直坚持继续盘踞不撤。他这样的行为，乃是战后东西方对立紧张的出发点。

国民政府在日本投降后不久，便任命熊式辉为军事委员会东北行营主任，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到达长春就任，和苏联方面在当地交涉；但苏联确毫无诚意，在交涉停滞不前的状况之下，政府军排除了共军的阻挠于十一月二十五日进抵锦州。此时业已超过了史达林所约定的三个月撤兵期限。而且在这个期间，苏联已将共军引入东北，十一月十一日且有共军窜进长春。

十二月五日，蒋经国特派员暨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在长春和苏联驻东北红军司令官马林诺夫斯基会谈，向之提出：“（一）中国政府将空运军队一师至长春，陆运两师至沈阳。（二）请苏军解除驻区内非法武装，协助中央政府”等项要求。马林诺夫斯基虽然并未表示异意，但对于苏军撤退问题一直是态度暧昧，经交涉结果，重新决定撤退期限延至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

史达林图离间中美

此际，史达林邀请蒋经国特派员前往莫斯科访问。史达林在当时盖深恐美国将会介入业已形成困难局面的东北问题，是故中国方面也料想得到史达林之邀蒋经国前往访问，乃是意图离间中、美关系的一种谋略；不过为了要和苏联的交涉能够顺利进行，蒋经国遂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以蒋主席私人代表身分奉派前往莫斯科，和史达林直接交谈。

关于访苏的情况，蒋经国特派员留有记述如下：

“当时史达林曾经对我说：

“‘你们中国人要明白——美国人想要利用中国作为满足他的利益的工具，他必要的时候，是会牺牲你们的！苏联愿意把本国的生产机器、汽车、以及中国所没有的东西供给中国；同时，也希望中国能把自己出产的矿物、农产品供给苏联；苏联又可以帮助中国在东北建立重工业，并发展新疆的经济。但是，我再三声明，也是我最大的一个要求：你们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从蒋经国的报告中，显示日益尖锐化的美、苏对立，已在中国的东北投下了浓厚的阴影。

‘经国访俄归来，详报史达林之意见与态度，彼对余所提门户开放与中、美、苏三国合作问题，口头难不能拒绝，而勉强应之，但其内心定不欲也。

‘本周心神悒郁，既受政协会中共党及其外围之压迫，复受俄军之威胁，而其在东北延不撤兵，最足使人焦虑也。’（元月十九日记本周反省录）

国民政府为配合苏联所约定的“二月一日撤退”之期，对于整个东北的接收工作积极准备。元月二十二日，蒋夫人代表蒋总统到达长春，宣慰东北民众暨政府军队。

可是占据了沈阳、长处、哈尔滨三大都市以及东北各地的苏军，却以缺乏车辆及燃料为藉口，没有一点撤退的迹象。不仅如此，而且进入沈阳的政府军都被苏军限制驻扎地区。又在长春方面，甚至还发生了国民政府所编组的保安团队被苏军解除武装的事态。

苏联对于二月一日的撤退期限，根本就没有当作有过这么一回事。他以“中、苏经济合作任务尚未完成”、“美国如自中国撤退，苏联也撤退”等等藉口延宕下去。

‘东北俄军逾期未撤，并发表声明藉词与驻华美军同时撤退，乃已不惜与美国公开为敌矣！’（二月二十八日记本月反省录）

在这个当口，美国国务院于二月十一日最初发表了雅尔达密约。于是，对于本国之被出卖而为之愤怒的中国民众乃掀起了抗议雅尔达密约、要求苏联军队撤出中国东北的群众运动，情势遂致越发紧张。

苏俄两点目的

苏军之所以盘踞东北不撤，有两点目的。

一点是为了任意劫掠；另一点，是要把东北交给中国的共军。

在这里，首先要说明苏军在东北巨细无遗的劫夺情况。

最初的劫夺，是一般士兵，他们闯进民居、商店、工厂，是凡值钱的东西都被洗劫一空；连在沈阳、长春、哈尔滨搭乘火车的中国人，都被强索金银饰物，拒绝之者即被枪杀。苏军的纪律怀到极点，他们所到之处，立即都变成无法地区。

随后到来的苏军后续部队，更展开了大规模而且有组织的劫掠。

自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十四年之间，日本在东北超过百亿美元的投资，建设了庞大的发电设备以及铜、铁、煤的开采和水泥、纺织、石油、化学工业等最新场矿设备，在三千五百万东北同胞血汗的基础上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军事工业体系。

规模政府曾经照会苏联，说明在东北的这些日本工、矿业资产均抵充对中国的实物赔偿。

可是，苏联方面却充耳不闻，硬指其都是苏联的战利品，将之悉数拆卸劫走。

苏俄援引共军

十月十七日，苏联向中国提出：“（一）日本在东北所经营的工厂企业，应作苏军的战利品。（二）伪满洲国及中国人所经营的工厂企业，交还中国政府。（三）日本和伪满合办的工厂企业，由中、苏两国政府正式谈判解决之”等要求。

继之，苏军全权代表马林诺夫斯基复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向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表明其所谓战利品价值在一百亿美元以上，同时并列举一百五十四种企业清单，建议应中、苏共管。

十二月七日，马林诺夫斯基再度提出同样要求，并且很严厉地表示：“除非此一经济合作问题获致解决，否则苏军自东北撤退之日期将不能预料。”这是名为“合作”，而实则在迫使对于苏联之劫掠东北加以承认。

张莘夫等八人遇害

新年之后的元月十七日，前往接受抚顺煤矿的经济部接收委员张莘夫一行八人被业已占据该煤矿的共军所逐回，在归途中全体被杀害，使中国民众大为激愤。盖张莘夫等一行的安全保障，苏联方面负有责任，而此一事件正足为苏军与共军勾结事实之佐证。

二月一日，马林诺夫斯基再度发表关于“中苏经济合作”的声明，要求共同经营，并表示不希望“第三者”参加。已是毫不隐讳其独占东北的企图。

对于这个声明，美国的反应也颇为敏感——贝尔纳斯国务卿认为“苏联以东北企业为其战利品，实为逾越国际公法范围以外”，即于二月九日照会中、苏两国政府，表示：“（一）东北工业由中苏共管，乃违反门户开放原则。（二）日本在国外的财产，应由盟国组织日本赔偿委员会作最后分配之决定。”藉以对苏联加以牵制，英国方面也与美国同一步调。

二月十六日，贝尔纳斯又发表声明：“并无承认苏联运走东北工业设备的协定。”

可是苏联却对于国际反应毫不顾忌，更于三月二十七日向中国提出“中苏经济合作建议草案”，仍然要求共同经营东北工业，但为外交部长王世杰所峻拒。

工业设备劫掠一空

‘俄军在东北之行动，假借演习为名，极尽其威胁之能事，尤以夺取前已交还我国之长春电气总公司，停止我锦州附近各矿厂之发电，使我在经济上受莫大之损失。’（三月九日记本周反省录）

刚好在这个时期，发生了有来到沈阳、长春一带从事采访获得的美国记者被苏联赶走的事件。

‘美记者被苏方驱逐返回后，俄军在东北之阴谋与暴行已完全揭露，美国舆论对俄之谴责，亦已日渐积极；加以邱吉尔在美演说，主张美、英同盟，强调英语民族间合作之力量，准备对俄作战，几使人有第三次大战其将来临之感矣！’（同前）

在电力工业方面，相当于东北总发电量百分之六十五的电力供应设备被苏联拆运而去；此外，鞍山、宫原、本溪等钢铁工厂设备的百分之八十被搬走；抚顺、本溪、阜新、北票等处煤矿都被劫掠而受害甚大。

根据美国国务院在当地调查之后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发表：“估计在苏军占领期内，东北工业蒙受损失约达二十亿美元。”

掠夺武器交给共军

苏联之掠夺，并非仅止于生产设备，而包括有日本关东军的大量武器装备。在数量上，关东军曾经夸称：“足可维持十年的战争”。

这些武器，由苏联交给共军。那些原来由日本军阀所准备用以屠杀中国民众的子弹，战后仍然被使用于同一目的，只是扣动扳机的人不同而已。

二月十三日，延安“新华社”报导了如下的事实：

“共产党在东北已组成有近三十万人的东北民主联军，成立了各县民主政权，党中央派去的彭真、陈云、林彪等人到达以后，并建立了党在东北的最高领导机关。民主联军包括有张学诗、吕正操等部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原在冀、热、辽边区的李运昌部队。

“东北治安，有这些部队维持，国民政府开入东北的部队应限制在一定数量以内。”

此时，经马歇尔参加的三人小组协商决定由政府发出停战及禁止军队调动的命令业已一个月，而共产党却是毫不顾忌地擅自破坏约定，向东北集中兵力。

在禁止调动军队的命令中，对于政府军之进驻东北并未限制，可是苏军却极力妨害政府军开入东北；而在这个期间共军之能顺利进入，则是由于苏军的援引。

果然，在看清楚了共军业已部署完毕，苏军才开始调动起来。

‘周末，俄军在东北调动频繁，颇向北撤，未知其作用何在？’（三月九日记本周反省录）

这个作用，旋即真相大白，盖苏军已将盘踞之地悄悄地移交共军接管而撤退；并且安排好在事后才通知政府方面，迨政府军前往接受，便遭受到共军伏击的布局。

最初的事件是发生在沈阳。

‘上周，俄军在东北调动频繁，不宣布其原因，且避与我驻长春之联络人员见面，使我无法洽商接防手续，今始公开宣布其驻沈阳俄军决定全部撤退，由我军进驻。而沈阳附近之共军，始则四面袭扰，亟图于我接防之间，乘机侵据；卒因我军准备充分，故全部驱退，今日沈阳始完全收复矣。现虽达成接受东北第一步目的，但今后艰险更大。’（三月十三日日记）

马歇尔一误再误

继之，在四平街也发生了同样的混乱情况。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三日晚间，苏军突然撤出四平街，政府军立即派遣少数行政人员先行前往接收，但共军则将该市四面包围，全面发动攻击，四平街乃于三月十六日被共军占领。及至政府军收复该市，已经是延迟到两个月之后的五月二十日。

至于在四平街更北面的东北心脏地区-长春，其接收之困难，更达于极点。

主要都市被共军占据

国民政府虽则在先业已派遣一师人进驻长春，但苏军将沈阳以北的中长铁路路轨拆除，并藉口鼠疫流行，以阻止政府军的增援部队向长春推进；而另一方面则陆续招引共军进入，增强其力量。

等到共军准备妥贴，苏联乃于四月十四日突然自长春撤兵。当其撤退三十分钟之后，共军三万人即使用俄制战车、重炮，发动进攻，使政府军不得不因而撤退。

‘共军攻陷长春，阻碍国军接收东北主权、破坏停战协定，此已明目张胆发动叛乱。且俄国亦公然派飞机接济共军，并以哈尔滨至长春之铁路供共军运输南下。——是俄国已决心在北满制造共党伪政权，割裂我东北矣。’（四月二十日记本周反省录）

在哈尔滨方面，苏军并让共军抢在政府军的前面于二十六日入城；齐齐哈尔也在苏军撤退之同时让共军进入。于是，东北地区的中部和北部各主要都市差不多都已被共军所占据。

俄将掳获武器供给共军

苏军更将掳获自日本关东军的武器供给共军；对于近代兵器颇为陌生的共军士兵们，起初还不知道如何使用那些武器，乃由苏军派遣军事教官予以训练，终于在一九四六年年底培育出共军的“精锐部队”。

中国政府依据中苏条约再三向苏联方面交涉移交此项武器，但苏联却在拖到不能再拖的时候才这样地答覆：

“对不起，关东军的武器原来是放在火车站，因为装车装错，运到莫斯科去了。”

中国方面再以公文提出质问：“这么多的东西，怎么会装运错误？”

苏联方面竟正式送来复文：

“你们的信，我们收到了。现在根据同盟友好的关系，我们把关东军的武器交给你们。共计步枪三千枝，马刀一百四十八把，东西现存于哈尔滨，你们自己去取回。”

函内所指的哈尔滨，当时是在共军盘踞之下。

马歇尔迫政府让步

由于东北情势如此恶化，一时归国述职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于四月十七日匆遽再度来华。他直接飞到北平，听取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的报告之后，十八日到达重庆。

翌日～十九日，马歇尔谒见蒋总统商谈，主张应与共军妥协。蒋总统遂即向其率直表示：

‘当直告以非先改变其（马歇尔）对共党之态度与方针，决不能达成调解之目的；唯有美方坚持积极协助我政府之政策，方能达成消极“容共”的目的。若仍采取过去对共党怀柔与妥协之方案，则将贻误大计，必至根本失败而后已。’（四月十九日日记）

四月二十一日，蒋总统分析美国对共产党的政策如下：

‘美国必反对俄国垄断东北，并反对共党组织傀儡政权，而愿协助我政府收复东北主权。如马歇尔果有卓见，则应以客观态度认识俄、共乃绝无诚意者；但马歇尔非至绝境，必不愿放弃其妥协绥靖政策。’（四月二十一日日记）

翌日～四月二十二日，蒋总统与马歇尔再度会谈。

未料，马歇尔竟说出：如果不与共军妥协，则美国将停止对于运输政府军前往东北的支援。盖临到了苏联全力支持共军的此际，而美国却要停止对政府军的援助。

‘我中央军须由美军代为运输，一切计划皆受其牵制，且彼时时以撤退其海军、中止其运输以为胁迫，使我不能不迁就彼对共党妥协之建议；殊不知此时对共党妥协，实无异对俄国屈服，当共党气焰高张之时，其要求条件之苛刻决难忍受。故应对马歇尔直说之，以促其觉悟也。’（四月二十二日日记）

四月二十四日，蒋总统在与马歇尔会谈之际向之提示东北停战之条件如次：

（一）本年元月十日之停战协定（第一次）及其附件，应全部实行于东北。

（二）在东北所有各军及各军附属单位之调遣，应根据本年二月二十五日之整军方案予以规定。

（三）东北境内之长春铁路全线及其两侧三十公里以内之地区，皆应由政府军接收，共军不得妨碍政府军接收。

（四）除第三项以外，共军所驻地区之政治事宜，由政府及中共双方代表协议解决之。

以上提案，只不过是要对当初业已达成的协议再加以认定而已；可是马歇尔却声色颇厉地表示不同意见，要求政府单方面让步。

第二次停战令

担任国、共调停的美国特使马歇尔，显然是转而站在对共产党加以安抚的立场。

‘近察马歇尔之心理及其态度，乃极以对共交涉之破裂或停顿为虑，时现恐惧与无法应付之情态，其精神几已完全为共党所控制，一惟共党之要求是从，无敢或违，凡与共党心理抵触之条件，皆不敢向共方试谈，其畏共之心理竟至如此，余不得不加以剀切开导——若美国不改变已往之消极政策，而以实力积极支助我政府，则美国在东亚之声望，亦将因此丧失殆尽，无法挽回矣！马歇尔若果有政治眼光与国际正义，明辨其美国自身之利害，当能领悟余言之不谬也。’（四月二十八日日记）

四月二十九日，马歇尔向蒋总统报告其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交涉经过。据马歇尔说：“曾向周恩来表示——东北停战条件，必须共军退出长春，归中央军接防，并由军事三人会议派小组前往监视。否则，我（马歇尔）不愿再作调人。周恩来对此并未表示具体意见，但称必电告延安。”

蒋总统分析东亚前途

蒋总统听取上述报告之后，乃向马歇尔表示劝告美国对于东北问题须发挥其影响力如次：

‘美国对东北之政策与对俄、共之态度，必须重加考虑，且须从速决定。以此实为美国对东亚整个问题之关键；消极退出，抑积极参加与领导，应有所抉择也。切不可再蹈过去“九一八”时代覆辙，以致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祸患。如果当时美、英对日能稍用压力，表示积极行动，则日本当不致如此猖獗，战祸自可消除矣。今日俄、共在东北之形势，亦复如是。此时对共党既非空言所能制止，惟有准备实力、积极行动——协助我政府并明示其决心；则俄、共皆将摄服。否则，美国在东亚领导之声望决难维持，而第三次大战亦必以此为起因矣。’（四月二十九日日记）

五月五日，国民政府于西迁八年半之后还都南京。蒋总统偕夫人先于五月三日由汉口飞抵南京，自飞机场至市内，市民夹道肩摩踵接，高呼万岁，欢声雷动。

毅然拒绝史达林邀约

翌日～五月六日，史达林命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请蒋经国特派员转达蒋总统邀请赴莫斯科访问。

‘史达林邀余访俄，此乃离间中、美关系之最大阴谋。史惯玩弄他人，而余则不受其欺诈也。惟此事婉拒后，彼将以所谋不遂，恼羞成怒，盖可断言。’（五月十一日记本周反省录）

‘此次婉拒史达林邀约赴俄会谈，为我外交成败之重大关键。若以马歇尔最近对余之态度而言，诚令人绝望，然余深知俄国扶助中共赤化中国之一贯政策，决不能因余之赴约而有所转移，且徒增马歇尔之疑忌，是适中史达林离间中、美之阴谋耳。故对美、对俄之外交政策，决不能以马歇尔个人一时之好恶而变更我基本国策。’（五月三十一日记本月反省录）

在这段期间，政府军于五月十九日接收了四平街，进而指向长春。

‘自我军克服四平街后，共军主力溃败，故其态度又为之一变。且因我拒绝史达林邀请访俄之约，故共党乃不能不仍赖美国马歇尔为之调停。’（五月二十一日日记）

蒋总统偕夫人到达问题的焦点之地-东北，是在五月二十三日。自从一九一四年奉孙总理之命前往东北调查革命情势，实则已经是相距三十二年之后旧地重游。

就在蒋总统到达东北的当天，政府军完全收复了长春。继之，又接获苏联的照会：“苏军已于五月三日自东北完全撤退。”此外，根据前线的报告，共军已蒙受彻底打击，形成不可能再起的状态。东北问题，看来已渐可顺利解决。

六月六日，蒋总统接受马歇尔的再三建议，发布了由七日正午开始为期十五天的第二次停战命令。

‘共匪果能实践停战协定，仍可予其（共党）悔过自新、效忠国家另一次之机会。……

东北失败的关键

‘但这第二次停战令之结果，就是政府在东北最后失败之惟一关键。当时已追至双城附近之追击部队，距离哈尔滨不足一百公里，若不停止追击，直占中东铁路战略中心之哈尔滨，则北满的散匪，自不难次第肃清，而东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满立足，而苏俄亦无法对共匪补充，则东北问题自可根本解决，共匪在东北亦无死灰复燃之可能。故三十七年冬季国军最后在东北之失败，其种因全在于这第二次停战令所招至的后果。’（注）

注：蒋总统-“苏俄在中国”（一九五六十二）

马歇尔迁就共党

第二次停战令的期限，是截至六月二十二日为止的十五天；但因马歇尔再三要求，乃延长到三十日正午为止。

这个期间，共产党对于停战命令视若无睹，在东北松花江方面对政府军展开攻击；同时在山东、热河、察哈尔、山西、绥远各省也集结兵力，陆续侵入政府军兵力单薄的地区。

共党的拖延政策

另一方面，参加三人小组的周恩来则提出些诸如共军向东北增加驻军及拒绝进入所谓“解放区”等推翻在先的协议等难题，以妨碍调停工作之臻于成功。

蒋总统对于共产党这种折冲斗争的阴谋手段有如下的分析：

‘分析中共之阴谋——（一）先主张全面与长期之停战。（二）各种协定分别先后解决。（三）政治与军事同时解决。（四）牵入俄国加入调处。（五）对美国代表之仲裁权，只允限于局部事件或某一特定事件，而不允赋予其对于全盘事件与在三人会议中之最后决定权。凡此皆为其拖延时间，使各项问题无法获得解决，彼乃得乘机坐大也。’（六月二十二日日记）

‘共党策略盖企图在不战不和、与似战似和之局面下继续拖延不决，使国家陷于混乱状态，政治动摇，经济破产，以达其颠覆政府、赤化中国之目的。’（六月二十四日日记）

六月三十日，面临了停战命令的限期。这一天，政府发表声明：“政府对共党问题，仍本和平、统一方针，力求政治解决。”

‘无论对共交涉有无结果，目前军事行动，仍不宜用正式讨伐方式。’（六月二十七日日记）

对于政府的声明，共产党于七月七日发表“七七九周年纪念宣言”，大意是说：“反动派如敢挑战，我们会做一切的准备，给予迎头痛击。”——这等于是一个宣战布告。同时并指称：“马歇尔、魏德迈采取集团的武装干涉政策”，并激烈攻讦美国干涉内政，要求美国“撤退在华驻军”。

马歇尔对我施用压力

‘马歇尔因中共发表“七七宣言”，颇受刺激，彼明知欲使共党接受其调处，已无希望，但仍一意对共党迁就，并不断对我施用压力，始终坚持其不用武力之主张，而置我国存亡绝续于不顾。至可痛惜也！’（七月十三日记本周反省录）

马歇尔所耽心的，是在于如对中共加强约束，则恐刺激苏联，而招致其介入干预。

‘彼（马歇尔）最大之心病，甚恐局部冲突引起全面内战，又恐短期内不能获得解决，以致引起俄国之干涉，而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七月十四日日记）

果然，莫斯科于二十二日广播攻讦美国，并明言：“苏联不能坐视美国对华政策”。同时，中共也对美国官员表示：“中共不能不接受莫斯科的指导”，而有要求由美、苏共同调解国、共问题之意。

‘美俄关系日渐恶化，俄国赤化世界之野心，亦为世人所认识矣。’（七月三十一日记本月反省录）

司徒雷登任驻华大使

在如此情况之下，马歇尔推荐久住中国的北平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为美国驻华大使，以谋打开停滞中的调停局面。

起初，美国所内定的新任大使，乃是为中华民国信赖颇深的魏德迈。未料在即将发表之前走漏了消息，被共产党获知，于是周恩来乃向马歇尔表示强烈反对，以致翻了案而决定由司徒雷登出任。

司徒雷登是一位纯正的教育家，对于凭藉武力意图夺取政权的共产党强权政治的实情并不理解。而且他的秘书傅泾波就是共产党派在他那里的间谍，把美国方面的情报完全泄露给共产党。

为共党所侮而不自悟

美国对共产党纵容的程度，可以从他处理七月二十九日在北平郊外安平镇所发生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袭击的事件得到了解。这个事件，就是叫嚣“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并要求美军撤出中国的共军，对于由天津调往北平的美军陆战队施予攻击，以致美军三人被杀害，十二人负伤；可是马歇尔等人对于共产党却并无强硬反应，反而表现出好像是一种奉承的态度。

‘美国民族性之率直，乃至令人难解；以马歇尔如此重要人物，竟为共党所欺侮，而不自悟。甚至美军在平津道上遭受共军袭击，大损其国誉与军威，亦不之顾；而反于我政府在直接间接有形无形之中，施以压力，彼以为惟有如此，方能达成其调解之目的；殊不知共党与俄国决不容许其调解之成功也。’（八月三日记本周反省录）

毛泽东对访问他的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不可怕。”就是在这个时期。

共产党像这样地一面以协定束缚政府军，一面借苏联的力量使美国畏缩，并且在这个期间派聂荣臻为攻太原“总司令”，刘伯承为平汉线“总司令”，陈毅为津浦线“总司令”，杨成武．陈赓为包围平、津“总司令”，开始一步一步地加强部署，准备发动全面叛乱。

共党全面叛乱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蒋总统发表“抗战胜利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于重申实施宪政、遵守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之同时，对于共产党问题说明方针如次：

‘关于停止冲突，仍必遵守原议，忠实履行。并不要求共军全面退出停战后所攻占之地区，祇要求其撤出若干已经构成和平威胁和阻碍交通之地区。关于政治纷争，仍采取政治解决之方法，只要共党军队忠实执行停止冲突，遵行调处，实施统编，使军队国家化，不致徒托空言。’

然而共产党则于八月十六日自延安广播号召所谓整个“解放区”军民总动员，以为答覆。这个“总动员令”，就是全面叛乱的宣言，片面宣告关闭调停之门。

杜鲁门停止售我军火

到了这个时候，美国的中国政策仍在继续错误下去。

八月十日，杜鲁门总统将致蒋总统的一封书信面交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转达，告以：“如果和平解决中国国内问题的协商，在短期间内还没有进展，美国则将不得不重订对华政策。”

继之于十八日，杜鲁门发布行政命令制止对中国出售美国剩余军火。

政府军的武器装备，几乎全部为美国制品，由于此项禁令，乃使被封闭了补给之源的政府军战力大为减弱。盖美国这样的措施控制了政府军的武器，使之无法戡定共军叛乱，对于往后战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美国务院对我以现款购买其军火事，竟拒绝发给出口证，此乃马歇尔对我更进一步之压力；可知美国对华政策已因马歇尔之调解不成，更趋恶化。果尔，则马歇尔纵容共党，其将不仅有害我国，而适足以自害美国矣。’（八月三十日日记）

在这个当口，共军对晋北要冲大同，正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因此，连在当地担任调停任务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大同小组，也不得不于八月十六日撤回北平。

于是，政府乃再三要共军停止进攻，并提出警告：共军如不停止攻击大同，政府军则对共党根据地的承德、张家口乃至延安进攻。但共产党却置之不理。

迫不得已的政府军，遂于八月二十九日攻下承德，九月十四日驱逐包围大同的共军，十月十一日收复了张家口。

同时，在东北、山东等地也进行扫荡，至十月底，收复了通化、安东等地。

蒋总统伉俪巡视台湾

（民国三十五年）

蒋总统偕夫人首次视察台湾，正是在此际的十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

‘台湾尚未被共党分子所渗透，可视为一片干净土。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则俄、共虽狡诈百出，必欲亡我国家而甘心者，其将无如我何乎！余此次巡视台湾，在政治上对台湾民众之心理影响必大也。’（十月二十六日记本周反省录）

‘巡视台湾之收获，较诸巡视东北之收获尤大，得知全国民心之所向。’（十月三十一日记本月反省录）

政府颁第三次停战令

十一月八日，国民政府充满着期待共产党改变其态度的最后愿望，发布“自十一日正午起，全国军队一律停止战斗”的第三次停战令。可是，共产党的态度则并未因此而软化。

对于预定在十一月十二日开幕的国民大会，共产党竟拒绝出席。民主同盟也随声附和。国民政府为等待他们参加，特地将会议延期三天；然而周恩来却于十三日向马歇尔表示拒不参加大会。

马歇尔终止调停

至此，马歇尔终于决心终止调停。

十二月十八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马歇尔也于一九四七年元月八日留下“和平障碍在国、共两党”的声明返回美国，旋即就任国务卿。

美国禁止中国购买武器和终止调停的疏远态度，对于中国大陆情势的恶化更加速了马力。

其后，马歇尔受到美国国会的责难，杜鲁门总统乃派遣魏德迈为其特别代表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再度来华访问。魏德迈归国之后，向杜鲁门提出报告，建议：“将东北置诸国际管理，恢复对中国军、经援助，派遣军事顾问团”等项，但杜鲁门因对苏联有所顾忌，未予接受。

此后，美国国会屡次提到恢复对华援助，但由于马歇尔以及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坚持反对，直到一九四八年四月才得恢复。可是，就在这一年，东北已陷落于共军之手，大陆战局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甘迺迪批评美对华政策

后来在一九四九年元月，美国甘迺迪众议员（后曾当选总统）在他的演说中曾经批评美国对华政策错误如左：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我国（美国）曾经明白宣示：远东政策的目标，在于维持中国统一与国民政府之稳固。……

“然而战后期间，在我国外交家心意中，开始发生重大歧见——即是否仍应支持国民政府？抑或迫其容纳中共，以为接受我国援助之代价？

“我国对华政策，现已自召恶报。盖我国坚持中国必须成立联合政府，否则不予协助，已使国民政府遭受惨重打击。中国之未能免于赤化，实与我国重大利益息息相关。吾人不惜一战以保持其自由之中国，今已为我国外交官和总统断送殆尽。”

召开国民大会

为制订中华民国宪法而召开的国民大会，延期三天之后，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开幕。

这次大会，有各党、各界代表一千三百五十五人出席。而缺席者则只有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两派。

‘国民大会开幕，此实为革命史上最艰难之创举，与划时代之新页也。……革命大会今已开会，共党一年来联合其他党派以孤立本党、围攻政府之阴谋，已被我完全击破。’（十一月十六日记本周反省录）

通过中华民国宪法

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华民国宪法经国民大会通过，并决定于明年（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实施。

宪法乃是基于国父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的遗教，并恪守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直到现在仍然是中华民国的础石。

宪法全文凡十四章一百七十五条，其第一条：“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在说明立国精神；以下为主权属于国民、保障各民族一律平等及国民之自由与人权。此外，设置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五权分立，乃为其特色所在。

‘国民大会圆满完成制宪任务，国内外对本党之信誉为之大增，此为三十年来奋斗之结果。’（十二月二十八日记本周反省录）

此时，为准备实施宪政而改组国民政府，有各党各派人士参加；可是唯有共产党和民主同盟更加强了叛乱活动，至此，政府才终于下定了戡平共祸的决心。

在此之前，共军八十万人，政府军的兵力则为其四倍的三百二十万人，数额和装备上都居于优势。

‘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那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控制在我们的手中，无论就那一方面的实力来比较，共产党绝对不能打败我们。’（注）

政府军的重点战略为以下三点：

一、在东北方面，以主要都市及铁路为中心采取防守和持久的态势。

二、进攻延安，夺取共产党的军事、政治神经中枢。

三、在共党显著猖獗的山东方面，集中兵力予以歼灭；并向黄河以北推进，平定平、津、保（定）三角地区，以统一河北平原。

政府军克服延安

指向延安的政府军，乃系胡宗南指挥之下由华中转战而来的七个师，该部队排除顽强抵抗，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突入延安，使十万共军伤亡一万六千人，被俘二万人，余众败窜；毛泽东一度乘汽车逃走，后来换乘马匹瞒过了追击者而逃脱。

‘奸党之老巢延安，固世界之所视为赤都者，而竟于其谋叛二十周年（一九二七年三月中山舰事件）之前夕，为我胡宗南部克服，亦云幸矣！’（三月三十一日记本月反省录）

至于山东方面，则有陈毅在鲁南、刘伯承在鲁西乃至豫东一带进行叛乱活动。

政府军于二月间自江苏北上，向山东挺进，收复临沂等地，刘伯承共军西退，陈毅共军向北后退到沂蒙山区。

四月一日政府军克服了共党所盘踞的泰安，确保津浦铁路的徐州-济南一段交通；八月，恢复胶济铁路通车。

东北陷于苦战

可是，在东北方面，政府军则继续陷于苦战。盖共军因获得日本关东军的武器，业已武装齐备；而相反的是美式装备的政府军则因美援停止，而为武器的补给和运输不继所苦。

一九四七年二月，林彪所部共军由东北北部渡过松花江南下，五月攻陷怀德、公主岭，使长春与四平街陷于孤立。又在东北南部，共军由北韩方面进攻，凤城也为之陷落。

在这一些战斗中，有苏联军队加以协助；同时并有原属关东军的日本俘虏也被开上前线。

‘共匪猛犯四平，更番进扑，有苏俄代表团十五人与日俘三万人参加。’（六月十三日日记）

‘据报：“东北日侨俘在匪军工作者，有技术官兵五万人。匪党虽对日人待遇力图改善，然大多数日人均厌恶共党所为，切盼早日归国。”’（八月十日日记）

通缉毛泽东

六月二十八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检察署下令通缉毛泽东。当时，最高法院检察长郑烈发表谈话如次：

“毛泽东意图颠覆政府，其为内乱犯，早为世人共知；近更勾结韩共，利用日俘等，来戕祖国。于法不容搁置不理。”

此一通缉令，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死亡为止继续有效。

七月四日，国民政府国务会议更通过：“厉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方案”。十八日，14[77]3075复公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正式认定共产党为中华民国国贼，为使用武力平定内乱，而采取倾注国家全力的措施。

‘国务会议通过总动员令，实为对共匪重大之打击，不仅军心一振，而民心亦得一致矣。’（七月三十一日记本月反省录）

讨伐共产党的战争，终于面临了最后阶段。

注：蒋总统-“国军将领的耻辱和自反”（一九四七六）

要地相继失陷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以后，共军的攻势逐渐加强。

‘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尤以榆林（陕西）、运城（山西）被围日久，无兵增援；十二日，石家庄陷落之后，北方之民心士气尤完全动摇；加之，陈毅股匪威胁徐州（江苏）拆毁黄口（江苏）至内黄（河南）铁路，而后进逼徐、宿（安徽）；陈赓股匪窜扰豫西，南阳、安阳震动；江南各省几乎遍呈风声鹤唳之象；两广、湘、豫、浙、闽伏匪蠢动；李济深、冯玉祥且与之遥遥相应，公然宣告叛国，此诚存亡危急之秋也。’（十一月三十日记本月反省录）

十二月二日，国民政府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匪总司令，统一指挥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绥远五省军事。而运城则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失陷；陇海、平汉两铁路交叉点的郑州、许昌、开封也完全被切断、破坏，运输网受到了严重打击。

共匪之狡计

新年之后的一九四八年，政府军总兵力减少到二百七十万，共军则仍为一百十五万，由以前的四与一之比降低到二与一之比稍强；并且政府军为保卫共军出没不定的各地民众，不得不分散驻守于各收复地区，而共军的战术，则是对准分散孤立的政府军之最弱地点集中其力量加以攻击；又当政府抽调援军赴援时，则复对准调出援军的地点发动新的攻击。

‘阅地图所示共匪扩张之色别，令人惊怖，若对匪作战专重对付其军队主力，而不注重面积之原则，亦将陷于不可挽救之地步。

‘共匪之狡计乃在：（甲）尽量在我外围扰乱，以加重我经济困难，并掠夺我物资。（乙）对我避作主力战。（丙）以山地为其根据地。而（甲）项尤当注意也。’（元月七日日记）

东北方面，林彪所部也自元月以来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攻势。

‘东北新立屯与沟帮子各要点相继失陷，共匪紧逼锦州，沈阳形势更形孤立，国军若不积极出击，作破釜沉舟之决心，则沈阳二十万之官兵皆成瓮中之鳖；故分致各军、师长手书，望其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以九死一生之志冲出一条血路。’（二月二日记一周反省录）

接着于二月七日辽阳、十九日鞍山、二十六日营口、二十八日开原相继失陷；三月十四日，四平街亦落入共军之手。

于是，政府军则只剩下了长春、沈阳、锦州三大要冲。陆路交通已被切断，补给唯有依靠空运，其运输量极为有限，以致三个都市的粮食与燃料极度缺乏，不久之后，长春便出现了连日饿死有一百人以上的现象。

此外在河南方面，洛阳于四月四日易手，共军更向黄河南岸扩展了控制地区。

当选首任总统

为实施宪政而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大会，于三月二十九日起在南京举行，并于会期中选举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

国民大会代表，乃系上年（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经全国普选而当选的贤良之士。此次选举，有选举权的公民达二亿五千万人，是中华民国自开国以来最初的大规模普选；惟在共产党叛乱地区则无法进行，结果，到十二月为止，共选出了总额三千零四十五人之中的三分之二代表。

在大会中，蒋总统虽经坚决辞让，但还是和居正同被推举为总统候选人。四月十九日，经出席代表二千七百三十四人投票结果，蒋总统获得二千四百三十票，当选第一任总统。居正则获得二百六十九票。

继之，于四月二十三日选举副总统。国父孙中山先生哲嗣、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暨武汉行辕主任程潜以及桂系领导人李宗仁三人形成激烈竞争，都未能得到法定当选票数；及至四月二十九日第四次投票，李宗仁才勉强击败孙科，当选副总统。李宗仁乃是利用战局之恶化，机巧地操纵了幻想和平的失意分子，争取选票，徼悻得胜。他在不久之后，便为共产党所侮弄，趋向所谓谋和的活动，而背叛了中华民国。

只有前进方是生路

五月二十日，总统就任宣誓典礼举行于首都南京。与国家进入宪政实施总统制之同时，“国民政府”自此改称为“中华民国政府”。蒋总统在就任伊始的致词中宣告：对内施政方针为：遵行宪法，巩固国权，保障民权；对外政策则强调：维护联合国。

‘深夜静虑，此时只有前进，方是生路。凡事不能必其成功，亦不能过虑其必败。’（五月十日日记）

六月二十三日，刘伯承共军攻陷河南省会开封；政府军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驰赴反攻，于三天后将之克服，并经十多天的战斗，追奔逐北，给予共军以伤亡八万人的严重打击。

另一方面，陈毅所部共军则于九月十六日发动十一万大军包围济南。

在两天的战斗之后，政府军第八十四师师长吴化文突然叛投共军。吴化文部原系据守济南城南方的山上，于是共军即在该处安设炮位，对准由吴化文所指点的城内防御设施密集轰击；二十三日，共军在战车前驱之下侵入城内，激烈巷战，至二十四日下午五时，济南政府军的对外通讯终于断绝。

联系华北与华中的最重要据点于焉失守。

国家民族危机

和攻击济南的步伐一致，在东北方面林彪所部共军也于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出动兵力二十多万人，缩小了对于锦州的包围网。

锦州乃是联系东北与华北的最重要据点，如果沦陷，则遗留在东北最新装备的新七军，便会被切断退路，完全陷于孤立。

不过，要是能将共军吸引在锦州，而自其背后予以突击，则会把握能够歼灭共军的机会。

蒋总统有鉴于此，乃即于九月二十五日电令在沈阳的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速派遣增援部队驰赴锦州，与该处守军协力夹攻共军；但卫立煌并未立即采取措施，延至十月八日，增援部队始行出发。而在此期间，共军的迎击部署业已完备。

两度亲飞沈阳

九月三十日，蒋总统亲飞北平；十月二日，更飞临沈阳，举行军事会议，激励将领。可是，及至九日回到南京，所看到的乃是锦州已受炽烈攻击的报告。十三日，城垣被突破，发生巷战。十五日，蒋总统偕夫人再度飞到沈阳。

‘（一）为商决规复锦州之计。（二）为督促长春守军限期突围南下。（三）为严督沈阳与锦（西）、葫（芦岛）两兵团赴援锦州，以期救护我范汉杰、卢浚泉等忠勇将士。’（十月十五日日记）

然而，就在这一天的晚间，锦州沦于共军之手，政府军丧失了七万精锐部队。

此际，被围已近半年的长春守军，正为饥饿所苦，加上燃料用罄，为了煮食些微余粮，甚至要将马路上的柏油掘起来燃烧。

对于这样的情况，共军加强了政治宣传，并对内应者秘密供给粮食，以谋制造守军的内部分裂。

十月十九日，守军第六十军叛投共军；第一零二军也答应解除武装，并将共军引进长春市内。副总司令郑洞国只率领了残余部队两个营继续抵抗，但终被歼灭。于是长春在二十日晚间也被共军攻陷。

另一方面，虽则出发迟误但仍由沈阳驰援锦州的廖耀湘兵团五个军，于途中得悉锦州沦陷，正拟撤回之际，受到埋伏的共军围攻，于十月二十六日全军尽墨。

至此，东北只剩下沈阳一个最后据点，战局业已绝望。

‘东北全军，似将陷于尽墨之命运。寸中焦虑，诚不知所止矣。’（十月二十六日日记）

东北落入共党控制

孤悬关外的沈阳，也于三十一日暴露在炽烈炮火攻击之下。未料，在这里又发生了第三十师、第五十三师叛变，终于也为共军所占据。

在东北剩下来的政府军十三万八千人，于十一月四日开始由营口、葫芦岛循海道向华北撤退。于是，脱离了日本军阀掌握的东北，只不过三年多的时间，便又落入了共产党的控制之下。

此时在华中方面，自攻陷济南之后，由刘伯承、陈毅、陈赓等所率领的共军计八十万大部队以徐州为目标蜂涌而来。为对抗此一攻势，政府军在徐州、蚌埠集结了四十五万兵力。

徐蚌会战

战斗自十一月八日开始，至翌年元月十一日为止，达六十五天之久，实为战后政府军和共军最大规模的战役，也是决定战局前途的一次大会战。

政府军虽然给予共军以伤亡四十六万人的极大打击，但政府军本身也伤亡及失踪三十万四千人，终于不得不自徐蚌地区撤退。结果，共军迫近长江，南京安全也受到了威胁。

在徐蚌会战中，共军采取了“人海战术”，他们利用星罗棋布的村落地带，作纵深五公里的面的部署，向前推进。政府军的炮兵射击、飞机轰炸、战车攻击面临了如此庞大的人海，都为之不忍而失去效果；至于用步兵迎战，如攻入其阵营，即被包围，如向后退，他们便蜂涌而上，在人数上居于劣势的政府军，终于未能遏阻“人海”的攻势。

进入一九四九年，政府军与共军的战力业已逆转，在数量上共军也占有优势。

平津沦陷

攻占了东北的共军，在林彪指挥之下折回华北，南下近逼平津，与聂荣臻、贺龙等部汇合，兵力将近百万，于元月初包围了北平、天津两地区。

元月十五日，天津被共军人海战术所攻陷；继之，在华北的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因共军胁迫而于元月二十二日接受“和平”，允许共军兵不血刃进入城内。

自济南沦陷之后四个月，东北撤退之后只两个月，大部分的华北地区都被共军所攻占。

‘在去年一年之中，自济南失守以后，锦州长春、沈阳相继沦陷，东北九省重演“九一八”的悲剧。华东、华北是工商事业集中的区域，学术、文化荟萃的都市，今日皆受匪患威胁。政府卫国救民志职未能达成，而国家民族的危机更加严重。这是中正个人领导无方，措施失当，有负国民付托之重，实不胜其惭惶悚憟，首先应当引咎自责的。……

历史空前未有的使命

‘中正个人自参加革命以来，迄今几四十年，我在每一长期战役之中，都是备历艰辛，饱经挫折。我始终持有必胜信念，而最后也必能达到成功的境域。要知道我们所倚恃者为民族精神、人类正义与世界公理；共党匪军的暴力能劫取我东北，却不能征服我们的民族精神；正义，就是决胜的力量；公理，终必胜过暴力。我们这一代，遭逢了中国五千年历史空前未有的变局，也就是担负着五千年历史空前未有的使命。’（注）

注：蒋总统-“民国三十八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一九四九元）

检讨受措原因

拥有四倍兵力的政府军，竟遭遇了一败涂地的挫折，其原因何在？

‘当抗日战争发动之初，我们确定“抗战建国方针”，要在抗战中加强精神动员，进行建国工作，并预期抗战胜利之后，建设三民主义富强康乐的现代国家。当然俄共及中共也看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这长期战争之中，始终与日军的侵略战争互相呼应。一面对我军乘虚蹈隙，内外夹击；一面更在社会各阶层乘机渗透，潜伏煽惑，运用其伪装欺诈之反宣传，无形中损害我政府信誉，沮丧我国军士气。

散布失败主义毒素

‘到了抗战结束之后，竟不惜倒行逆施，更以其卖国残民，全面武装叛乱的行动，摧毁我国家一切建设事业，阻绝我政府一切复员工作，破坏经济，扰乱社会，特别针对人民久战厌倦的心理，散布失败主义的毒素；卒致一般社会是非颠倒，利害莫辨，只求苟安，不计后果。于是三十年来国民革命之传统精神被其斫丧，民族固有的德性几乎毁灭。所有伦理、道德立国的基础，乃完全动摇，而反共意识亦就随之瓦解。此为中国反共战争之所以惨遭挫折的一个基本原因。’（注一）

就军事方面而言，起初政府军的人数以及装备、训练，和共军比较，都居于压倒的优势。

但在心理方面处于不利状态，则是不能否认的。

第一，以抗日为唯一目标而经过八年之间继续战争的政府军，欠缺对共军作战的心理准备；而与此相较，自始就已经预定等到抗战胜利之日即为其内乱开始之时的共军，则早有充分的准备。

加以马歇尔的居间调停，也是政府军心理上的一层负担；接连三度的停战命令，结果是丧失了战机，松弛了士气，削弱了战斗意志。盖八年长期抗战的疲劳，产生了只要能够调停就对之寄以希望的心情；但共军则自始就毫无接受调停、服从停战命令之意，至于其摆出同意调停的姿态，则只不过是颠覆政府的一种手段而已。

心理上的溃败

政府军这种松懈的士气，乃成为共产党最好的攻击目标；官兵们被心战反宣传所摇撼，加速了发自心理上的溃败。加以在制度上担任内部监察和政治训练的党代表制之早被废止，也为加速失败的一个因素。

‘我们国民革命军初期所以设置党代表者，一方面在监察各级部队长贯彻革命主义，达成作战任务；一方面在加强士兵政治认识，以充实其战斗力量，提高其战斗精神。北伐时期，因为党代表能负起这双重的任务，所以革命军摧坚陷阵，所向无敌；后来由于各级部队长都受过党的教育，同时为求军队事权统一，乃将党代表制改为政工制。而这个制度实行之后，最大的缺点，就是各级部队长的工作无人负责监察，又由于政工人员本身程度的低落，对于主义的认识不够，于是官兵皆缺乏政治训练，对敌作战就意志薄弱，战斗精神完全丧失。这种没有灵魂的军队，自然非走上失败的道路不可。’（注二）

战后的恶性通货膨胀

共产党的心理作战，也渗透到了一般民众的心中。他们所利用的，乃是民众对战后的恶性通货膨胀之不满。

八年抗战消耗给中国带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在胜利初期，似乎一时平稳下来，但不久之后，由于共党叛乱而再燃。就通货发行额而论，战前只不过十四亿元；而一九四六年末则为三万五千亿元。一九四八年八月竟至一千二百万元兑换美元一元，食米一斗二千万元，香烟一盒二十万元。

一九四八年八月，政府发行金圆券，实施以每元金圆券兑换法币三百万的币制改革，并连续采取各项平抑物价的措施；但通货膨胀仍未戢止，民众颇为生活所苦。而共产党则利用这个机会，煽动民众，并在各地掀起“反内战”的学生运动，甚至有抢夺粮食等事件，造成社会不安。

中了反宣传的毒计

‘在我们后方，尤其是在华中华南各大都市，还有许多人没有认识国家民族的根本危机，没有看清共党穷凶极恶的暴行，或儌幸姑息，或苟且偷安。……

‘共匪就利用社会上苟且偷安、因循姑息的心理，指使其反动工具提出——“反对征粮”、“反对征兵”、“反对内战”等各种口号，来颠倒黑白，麻醉人心，蛊惑社会，摇动国本。追本溯源，不能不说是我们社会人士中了共匪反宣传的毒计。’（注三）

‘最近军事与经济形势，皆濒险恶之境，一般知识人士，尤以左派教授及报章评论，对政府诋毁污蔑，无所不致。盖人心之动摇怨恨，从来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然此为共匪造谣中伤之一贯阴谋，以期毁灭余个人之威信，不意今竟深入我党政军干部之中。所谓浸润之谮，其由来渐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惟此一毒素，实较任何武器尤厉。’（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五日日记）

注一：蒋总统-“苏俄在中国”（一九五六十二）

注二：蒋总统-“国军失败的原因及雪耻复国的急务”（一九五○一）

注三：蒋总统-“七七十周年纪念词”（一九四七七）

李宗仁自取其辱

共产党的攻心工作，也正在向政府内部及军中渗透。其中如副总统李宗仁在东北危机日迫的一九四八年八月招待新闻记者时，便曾有“希望恢复和共产党的和平谈判”等发言，使政府内部步调紊乱，颇为显著。

政府军在东北、徐蚌的相继失败，更给予这些败北主义者以攻击政府的藉口。十二月二十四日，蒋总统接到在汉口的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请求“停止对共军作战，并请美、苏两国调处停止内战”的电报；继之，湖南省主席程潜、河南省主席张轸也要求“总统下野，重启和谈”。此外，和李宗仁、白崇禧同为桂系的立法委员黄绍竑也和李济深等人在香港组成“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伪组织，开始与共产党接触。

毛泽东的“八项条件”

得知这些动态的毛泽东，于一九四九年元月十四日通过无线电广播发表其所谓“八项和平条件”，向政府内部的败北主义者喊话，其八项内容为：“（一）惩办战犯。（二）废止宪法。（三）废止中华民国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政府军。（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这等于是要政府无条件投降。

接着在天津业已沦陷、北平也落入共军包围之下的元月十九日，行政院终于为败北主义者的主张所屈，决定再行议和；翌日（二十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也予以同意。

现在，就只剩下了一条路。

‘当徐蚌战役失败之后，我就决定与共匪在京沪线上决战。我当时认为：这一次战争是国家民族生死存亡最大的博斗。——如果决战获胜，使军事形势转危为安，当然是国家之福；如果不幸而失败，南京为首都所在地，我是国家元首，就决定以身殉职，死在南京，以尽我个人的责任。……

‘但当时有一部分意志不坚定的动摇分子，听信共匪挑拨离间的谣言，一定要我去职下野。我在当时不得不离开这我亲自建立的首都，和总理陵墓所在之地的时候，内心所不堪忍受的，就是自感“今后我无死所了”！’（注）

蒋总统宣布引退

（民国三十八年）

元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时，蒋总统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虽然同志们声泪俱下地慰留，但不得不正式宣布引退；并即恭谒国父陵墓之后，首途前往故乡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自此与南京诀别。

李宗仁于元月二十三日代理总统，遂即采取了“撤销总动员令”、“停止戒严法之执行”、“释放政治犯”等伺候共党颜色的措施；并经其独断于二十七日致电毛泽东，表明接受其“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

关于以“八项条件”为基础的承诺，李宗仁并未得党中央和行政院的同意；为此而愤怒的行政院院长孙科坚决反对，于二月一日让李宗仁的代总统办公处留在南京，其他政府机关都疏迁广州。其后，孙科于三月八日辞职；三月二十三日由何应钦组阁，又在三个月之后的六月三日改由阎锡山继任。

对于继续作无止境让步的李宗仁，共产党却白眼相加，一直没有答应正式谈判的意思。

‘共匪于今日广播，明白表示：“不承认李宗仁所代表之南京政府”。未知李宗仁与邵力子、张治中等人当作何感想也。彼等腼颜至此，尚计其革命历史与人格乎？’（二月五日记一周反省录）

二月二十六日，共产党竟发表其所谓“战犯”名单，其中包括蒋总统、蒋夫人、张群、何应钦、宋子文、陈立夫、汤恩伯、蒋经国等四十五人。

四月一日，在北平开始“议和”，政府方面的代表为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章士钊、李燕、刘斐六人。而这六个人在后来都变节投靠共产党，可见乃是一个不能信赖的代表团。

在“议和”开始之先的三月三十日，中国国民党决定：“（一）停战须在和谈以前实现。（二）国体不容改变。（三）修改宪法须依法定手续。（四）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必须保障。（五）土地改革首先实行，但反对以暴力实行土地改革”五项和谈基本原则；且更于四月十二日致函李宗仁，嘱其勿为共党的胁迫所慑服。

共党根本否定政府法统

四月十五日，周恩来提出所谓“国内和平协定”，声称为最后修正案，将毛泽东的“八项条件”详列出“二十四款”，根本否定政府法统，而要将国家置于共党统制之下。

于是，在北平交涉中业已取屈服态度的张治中等人，乃要求李宗仁予以接受。李宗仁也正要表示这个态度时，但行政院院长何应钦等坚决反对，故于二十日予以拒绝，“和谈”遂致决裂。

‘四月份最重要之事，莫过于共匪对政府所提“国内和平协定”条款，使李代总统等主和求降甚至谓“投降即光荣”之投降派亦无法接受，而不得不宣告和谈决裂，重新作战。此因最近时局中遭遇重大之艰难；然中华民国生机与国民革命之复兴，亦即在于此也。……

‘其（共产党）所用之方法虽有不同，而其非得余而不能甘心，以及其非彻底毁灭我国家之基本不可之目的，则完全相同。’（四月三十日记四月份反省录）

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与朱德下令全面进攻，共军立即渡过长江南下。

政府贯彻对匪全面作战

于是，政府乃向国民明白宣告：贯彻对共产党的全面作战。但前途则已经是布满了荆棘！

注：蒋总统-“军人魂”（一九五○.）

巩固台湾基地

蒋总统离开引退后居住之地的故乡溪口镇，是在四月二十五日。启程之先，谒别祖先茔墓，并站在飞凤山顶对故国山河作了最后一次的眺望，誓言一定要再度归来，真是伤心的诀别。

离开奉化时，乘太康号军舰直驶上海。而政府军则于前一天撤离南京；上海的危机，也已经是近燃眉睫。

视察上海防务之后，于五月七日乘江静舰出发，经舟山群岛及澎湖各地，然后驶往台湾。此时的计划是——大陆纵使失败，当仍以舟山、马祖、金门、台澎一线为反攻复国的途径和国家建设的出发点。

到达高雄之后，接着转赴台北，于六月二十四日定居台北市郊草山（现名阳明山）。

七月，访问菲律宾；八月，访问韩国。盖大陆之赤化既已无法防制，但如果共产主义更向整个亚洲扩张，则东方和平为之搅乱，恐将难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菲律宾总统季里诺、韩国总统李承晚都是对于共产主义的威胁痛心疾首，同意共同结成反共国家联盟，并力对共产主义作战。

美国发表白皮书

此际，美国仍然对共产党大送其秋波。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留在已为共军控制之下的南京不撤，继续和共党接触。

美国这一类对华错误政策之集其大成的，乃是国务院于八月五日所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在这个文件中，历叙自清代以来到一九四九年为止的中、美关系，尤其是在涉及一九四四至四九年的对共产党问题时，则对中华民国政府加以过甚其辞的抨击，而以专事偏袒共产党为重点。实则是再也没有像这样一种文书之足以和盘托出美国国务院内有亲共分子存在的事实。

‘马歇尔、艾契逊因欲掩饰其对华政策之错误与失败，不惜彻底毁灭中、美两国传统友谊，以遂其心，而亦不知其国家之信义与外交上应守之轨范；其领导世界之美国总统杜鲁门竟准其发表此失信于世之“中美关系白皮书”，为美国历史上留下莫大之污点，此不仅为美国悲，而更为世界前途悲矣！’（八月十日日记）

对于美国的白皮书，中华民国外交部于十六日发表郑重声明，表明严重异议。盖中国的友邦-美国，在如此重大时期，却竟然有此落井下石之举，致使中国在国际间的威信蒙受损伤，在国内则使政府及军队士气都受到严重打击。

中美继续保持团结

但美国的态度，则是到此为最低潮而开始有了转变。当是年十月一日共产党在北平宣告成立其伪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际，美国则声明：“继续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翌年，更自大陆撤退其所有外交机构。此后，美国和中华民国都是站在捍卫自由世界的地位，坚实地团结在一起。

及至十一月，政府军所控制的地区，只剩下了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等省区。

十一月十四日，蒋总统由台湾飞往重庆。此时，政府业已自广州迁来重庆，可是最高负责人代总统李宗仁却未见来到；虽经蒋总统再三派人前往劝说，他还是以“赴美国治疗胃疾”为由而于二十日逃往香港。

‘德邻（李宗仁）出国，既不辞职，亦不表示退意，仍以代总统而向美求援，如求援不遂，即留居国外不返，而置党国存亡于不顾。此纯为其个人利害打算，其所作所为，实卑劣无耻矣！’（十一月二十一日日记）

李宗仁于十二月五日逃亡美国。其后，竟然成了共产党的工具，为其对中华民国的反宣传作了帮手之后，更于一九六五年投降了北平。

十一月十五日，贵阳易手；共军遂更以进窥重庆为其目标。

二十九日晚间十时，蒋总统离开了重庆的林园官邸。此时，共军业已迫近距离市区只有十二公里之处，在炮声清晰可闻的白市驿机场起飞成都。当天（三十日），重庆沦陷。

十二月七日，政府决定迁移台北，同时在西昌设置大本营，成都设置防卫总司令部。

成都西昌沦陷

十日，已经断绝通讯的云南省主席卢汉竟然自昆明发来电报给在成都的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要他扣留蒋总统，可成为“人民政府第一大功臣”。

由于卢、刘等人变节，西南地区已经绝望，乃终于面临了离别大陆的时刻。

此际，蒋总统驻节的中央军官学校分校附近已有刘文辉的便衣队出现，侍卫人员建议由后门秘密走出，但蒋总统则明白地说：

‘我从大门进来的，还是从大门出去。’

在离开军官学校之际，蒋总统和蒋经国二人曾合唱“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国歌。

下午二时，自凤凰山乘飞机升空向台北飞行，俯视眼底大陆山河，中心怆然。

其后，胡宗南所部向西昌移动，奋斗到最后；及至一九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西昌终于沦陷，在大陆有组织的战斗乃为之告终。五月，海南岛与舟山群岛赓续撤退，留下了台湾、澎湖、金门、马祖为对共产党作战的根据地。

蒋总统复职

由于立法院的决议和国民大会代表建议，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议以及各方面的恳切要求，蒋总统允诺于三月一日复职，再度行使总统职权。

复行视事之际，揭橥四项重点施政如次：

一、在军事上——巩固台湾基地，进图光复大陆。

二、在国际上——先求自力更生，再联合民主国家共同反共。

三、在经济上——提倡节约、奖励生产，推行民生主义。

四、在政治上——保障民权、励行法治。

□□□□□□□□□□□□

附录:

《苏俄在中国》第三编、第四章、第三节（文中的“我”是蒋中正总统）

第三编第四章第三节自由而统一的中国与世界和平的关键

………

以上各编曾经检讨了政府和我个人在反共斗争中的错误和缺失，及其对国际国内所发生的形势与影响。我许身国民革命，已四十九年，从来不计个人的毁誉，亦决不推诿自己的责任。一九四九年美国政府发表其中美关系白皮书。当时我已经宣布下野，离开政府已有六个月了，惟闻政府亦要计划着一个白皮书，指责美国政府自雅尔达会议以后，在中国局势演变中，所应负的责任。我极力反对这个作法。我当时就告诉来台征求我意见的外交部代理部长叶公超说：我们中国在美国还有多数的友人，并不因白皮书而对中国国家的前途感觉失望，亦不因此而对中国政府的信誉有所怀疑，现在我们政府如果为此，要与美国来作无益的辩论，这不止使我们两国人民百年来所建立的传统友谊，将受到莫大的损害而无法补偿，而且其结果，惟有增强俄共离间中美阴谋的助力，达成其所预期的目标，更使其称快而已。

我们中国立国处世的道理，是“厚于责己，而薄于责人”。若要追问过去大陆上反共斗争失败的责任，只怪我们国民革命尚未成功，国家建设没有基础，因之对强权侵略者，没有维护我们领土主权的力量。更只有怪我个人自己，在这长期反共斗争中，应该见到的，未能预见，已经见到的，又未能取信于人。然而“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只要我们全体同胞能保持自己国家的人格和民族的正气，只要我们能维护民族崇高的文化和悠久光荣的历史，只要我们能痛定思痛，提高警觉，埋头苦干，雪耻图强，向三民主义国民革命建国的目标，直前迈进，深信我们必能践履自己的责任，掌握自己的命运，完成我们反共抗俄复国建国的使命。

□□□□□□□□□□□□

《中共编写“中华民国史”真相探讨》陈木杉着，国立编译馆主编，中华民国八十三年五月初版。

一、国立编译馆，中华民国台北市舟山路二四七号。

二、销售代理：红蚂蚁图书有限公司中华民国台北市内湖区文德路二一○巷三十弄二十五号

第七章中共对抗战以后（民国三十五年至三十八年）民国史实的篡改之驳正（第三二九页）

第二节对国共和谈的曲解（第三三七页）

壹、前言

国民政府曾不断和中共和谈，大别之为两次，一次为民国十三年北伐时期孙中山先生的联俄容共政策下所产生的纠纷与和谈，第二次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接受中共的投诚时期所产生的纠纷与和谈。本节针对抗战以来，中共曲解历次国共和平谈判史实，加以驳正。

贰、中共曲解国共和谈之驳正

自中共窃据大陆以后，为配合统战行动，大肆窜改历史，对过去国民政府与中共历次谈判，曾编印‘重庆谈判纪实’（一九四五年八月至十月）一书，于民国七十三年（一九八四）由重庆出版社印行。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同年四月，出版‘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一书（注一七），综观全书，即可发现编者选用资料方面动了许多手脚，对中共一面之词的文件，一体全收，对政府有利的资料，则避重就轻，选用甚少，难以反映出当时国共谈判的整个过程，例如，‘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共有五四五页，约四十余万字，收录文件二三九件，就内容方面统计分析如次：

１中共方面发表者一三九件；２国共双方同意发表者七件；３政府方面发表者二一件；４民主同盟及附共分子发表者二九件；５三人小组会议及军事调处执行部发表者二一件；６美国政府及马歇尔特使发表者一四件；７其他八件。（注一八）

由此可见全部资料，三分之二以上几为中共及其帮凶民主同盟所有，且均以该党新华日报及其他报刊为出处，其中处理态度有失公正公平者，如：

１军事调处期间，共军违反停战协定，仍在各地攻城夺地，破坏交通，扩大叛乱。当时军事委员会及国防部军事发言人多次发表谈话，以事实说明中共罪行，报纸均有披露，本书即全未采用。２苏军进驻东北，延不撤军，引起全国各界公愤，为维护国家主权，纷纷发出通电，要求苏联早日撤出东北，以便政府接收，这些电文，本书未见片纸只字。而中共策动的反对美军驻华与反对美国援助国民政府的文件，则连篇累牍，钜细无遗。３中国策动国内外许多附共团体，发表通电呼吁政府停止内战争取和平的文件，本书亦多选用，而把破坏和平的责任全部诿之政府，极尽歪曲事实颠倒是非之能事。（注一九）

本书既名‘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其内容即应含盖国共谈判的整个部分，撇开抗战前夕及抗战初期的国共谈判不谈，自民国二十九年一月至三十六年三月，国共谈判共计七次，而本书所用资料，其起讫时间为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至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三月，仅只包含国共谈判的第六次（重庆会谈）与第七次（马歇尔调处），而不提及前此的五次谈判，可谓名实不符，蓄意避免。盖过去五次谈判失败的症结所在，全由于中共之毫无诚意谋求问题解决。尤以一个国家之内，居然有政党拥有武力，且数量日益膨胀，割据地盘，范围日益扩大，不仅破坏国家军令政令之统一，且向政府提出之要求，一次比一次多，一次比一次苛刻，当然得不到何种结果。中共因而不敢将过去五次谈判经过情形让国人明了真相，一味加以曲解诿过国民党政府。

事实上中共对国共谈判的基本态度是：１不断谈判，旨在拖延时间，争取国人及国际同情。２凡中央不能接受之条件，都尽量提出，使永远不得解决。３如谈判无结果，即向盟邦宣称“国民政府蓄意为难”。在历次谈判中，中共代表周恩来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有人形容周在谈判中：

劣势时他是笑脸，优势时他是凶样，不只是今天的条件比上年高，甚至有时今天否认昨天的条件，后天一点钟不承认上一点钟的诺言。共产党人绝不认为背约弃信是不道德的行为，而只是利用谈判作为它不断讨价还价对敌斗争的工具。（注二○）

总之，中共在谈判时的诡谲多变，都一一通过周恩来的脸谱，显露无遗。兹就政府与中共历次谈判的经过，简要加以说明如下：

第一次国共谈判：

民国二十九年一月，由参谋总长何应钦与周恩来、叶剑英谈判。中共提出第十八集团军的兵额扩充为三军九师，并增加“陕甘宁边区”的范围。同年七月，政府提出提示案，以解决争端，中共全未遵行。（注二一）

第二次国共谈判：

民国三十二年三月，周恩来、林彪晋谒何应钦总长时，又提出四项新的要求，包含共党取得合法地位，其军队增编为四军十二师，其陕北边区改为行政区以外，又增加几个边区（中共称“解放区”），希望政府承认。（注二二）

第三次国共谈判：

民国三十三年五月，由政府代表张治中、王世杰与中共代表林祖涵，先后在西安及重庆商谈。林祖涵提出十七条及十二条“关于解决目前急切问题的意见”，其中关于共军数额要求再增为五军十六师，同时要求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根据地民主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并承认其为抗战所需要的各项设施”，更提出“关于全国政治”的条件。因为中共的条件日益增多，反覆无常，迫得张治中、王世杰向蒋委员长提出“终以中共一再反覆，职等复乏肆应之能，任务未达，实深愧惭。”的报告，谈判又归徒劳。（注二三）

第四次国共谈判：

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中共不断邀约美国赫尔利将军赴延安，携返毛泽东与赫尔利签署的协定，提出组织“联合政府”的要求，经政府予以拒绝，并表示其他一切尽可一一商谈。结果周恩来返

回延安后，致函赫尔利谓中共中央对所商各条，都不同意。（注二四）

第五次国共谈判：

民国三十四年一月下旬，中共又派周恩来到重庆与政府商谈，除了高唱“联合政府”的高调之外，因为赫尔利大使有“美国不以武器资助中国拥有武力之政党”的表示，于是中共对赫尔利反目成仇，随之配合美国大使馆的附共份子，从事赶走赫尔利之阴谋，谈判自亦停顿。（注二五）

第六次国共谈判：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抗战胜利，毛泽东应蒋主席之召到重庆会谈，中共竟提出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及委员由共党推荐；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河北、广东六省亦由中共推荐副主席；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直辖市亦由中共推荐副市长，并参加东北行政组织。同时，中共部队要求改编为十六军四十八个师。这些无理要求，真是狮子大开口，欲壑难填。政府为亟求战后的和平建设，委曲求全，百般忍让，经过四十一天的谈判，于十月十日发表“会谈纪要”，可是毛泽东回到延安以后，即于十月十七日在干部会议中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他首先说明谈判是“针锋相对的斗争”，指“会谈纪要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特别指出“我们的方针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可见毛之到渝谈判，全无诚意。（注二六）

第七次国共谈判：

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至三十六年一月，美国马歇尔特使之调处，马氏一味偏袒中共，压迫政府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十二月十五日，美国杜鲁门总统发表对华政策声明，特派马歇尔使华，调节国共纷争。马特使于同年十二月二十日飞抵上海，国民政府蒋主席特派何应钦将军代表前往欢迎，并陪同于二十一日抵达南京，当时刚由华北巡视归来道经南京之蒋主席，亲往机场欢迎，并设宴款待，开始初步会谈。马氏旋于二十三日转飞战时首都之重庆，展开调处活动。政府特向马氏提出“中国共产党问题节略”一份，供其参考。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之独立军队；日本投降后中共之军事活动；政府与中共之商谈；毛泽东抵渝后政府之努力；中共之企图等五部分，使其明了共党之本质及政府之苦心。但马氏对中共本质毫无认识，其无法达成任务，可谓早已注定。马氏抵重庆后，中共代表原驻重庆主持统战工作之周恩来，即对马氏敷衍得很巧妙，他常以弱者姿态，把共党的歪曲意见，不断提供马氏，同时利用中共的外围组织民主同盟张澜、罗隆基、沈钧儒、章乃器这些人，常去拜访马氏，攻击政府，并为中共说话。马氏调处初期，其所预期之三大目标停止冲突，政治协商，整编军队等问题，在表明上项已于一月十日达成协议，项政治协商，已在政协会议中达成五项协议，项已签订“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故马氏认为彼之三大目标，均有良好之开始。上述三项协定，原为达成和平统一的步骤，中共表明赞成，但在其本质上是根本反对的。因为中共以武力夺取政权，需要战争来拖垮国民政府，不要和平来维持现状，可见中共之参加和平谈判，在利用马歇尔压迫政府下令停战，因停战令仅足约束国军，而共军则不遵守，反而可以藉此攻击国军，扩大叛乱。军事委员会发言人于民国三十五年六月一日发表谈话，指出三十五年一月十日第一次停战颁布后至同年五月二十日，中共违反停战协定，曾经攻占城镇二八处，包围城镇五三次，袭击国军地点一三八处七四四次，破坏交通六六次。中共素无信义可言，周恩来在军事整编协定上断然签字，不过表演给美国人看，而绝无履行之决意。盖当时国军与共军之比例为七比一，经协议后政府终于让步，承认第一期（十二个月）改编国军保留九十个师，共军保留十八个师；第二期（六个月）国军保留五十个师，共军保留十个军，成为五比一之比例，于是中共之要求完全达到目的，因此国军与共军之比例，已由七比一成为五比一，即政府兵力日减，而共军之兵力日增矣。当民国三十五年三月马特使回国述职之际，东北方面情势即更形恶化，是时辽宁、安东、辽北、热河等省之苏军，正陆续向北撤退，共军则在苏军默许下，开始夺取各重要城市，四月二十四日国军新一军与七十一军三面包围四平街，以十五万之精锐，与三十万之共军，作三星期之苦斗，共军遭受严重打击，周恩来乃向马歇尔特使表示接收停战小组进入长春之建议，企图藉停战时期恢复其战斗力，马氏竟于五月二十六日，以退出调处逼迫我方，请蒋公立即下令东北国军停止攻击及追击。蒋公乃依马氏之请，于六月六日颁布第二次停战令，自六月七日正午起以十五日为限。因东北之停战，共军得以喘息，遂致东北局势日益恶化。马氏为急于达成其调处任务，惟一意求得中共之妥协，竟迁怒政府，电请杜鲁门总统自三十五年七月起，断绝一切对华援助，杜氏复于八月正式命令，实施对华军火禁运，而国军之补给遂颇感困难，共军却源源自苏俄获得它所掳获的日军战利品及美国援俄的抗日军援品。同时，苏俄又替中共收编数十万精壮的伪满军队，使共军数量日益壮大。其后马氏八上庐山，无非压迫政府迁就中共而已。迄至同年十一月八日，蒋主席又应马氏要求颁发第三次全面停战令，自十一日正午十二时起，全国军队一律停止战斗，以示政府和平忍让之意。惟因政府早已确定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制宪国民大会，为迁就中共，特延期三日开幕。中共阻挠无效，而其本身军事力量已有相当把握，且已明了国军军火供应中断，乃视美国之调处如敝屣，断然于十一月十九日以撤退中共代表团相威胁，使马歇尔之调停努力，尽成泡影。马氏不得不于民国三十六年一月八日锻羽返国。（注二七）

从上述国共历次害怕谈判史实，可见和谈之未能成功，全由于中共缺乏诚意。中共利用抗战机会，伪装输诚，接受政府改编军队，实则暗怀鬼胎，以“一分抗日、二分应付政府、七分发展实力”的政策，扩军壮大。而我政府在此期间，既受拘于国内之政治协商，复被美国调处所牵制，并且还须迅谋复员，遂致不但失去了作战歼共的有利时机，功亏一篑，尤以时战时停，边谈边打，戡乱战志被瓦解，反共民心被动摇，乃卒使中共“经济波动政治、政治拖垮军事”之阴谋得逞，酿成大陆沉沦之悲剧，马歇尔调处不公，实构成误我国家大事之重要因素之一。

除了马歇尔调处不公外，民主同盟也扮演帮凶角色，由抗战时期以至大陆沦陷之间，中共所收买吸收者应为民主同盟。根据中共联秘处于民国三十七年编述“中国民主同盟概况”中，列举民盟与中共勾结之事实如次：

１在政治协商会议举行时及会后各种协议，该盟与中共无不取一致态度，坚持国民大会通过议案，应有四分之三以上人数赞成，欲根本推翻“五五宪草”，否认旧有国大代表，并共同要求国府委员十四席，以便取得否决权。２中共邀请民盟在所谓“解放区”建立总支部，民盟分子并出任中共所委派之伪职，中共则派遣训练有素之宣传组织人员为民盟工作，谓之交换人材。３中共地方党部协助民盟在“解放区”建立总支分布，并于各地会同组织各种所谓民主运动团体，藉以笼络人心，吸收青年。４中共对东北问题，主张以政治协商方式解决，要求扩大停战调处执行部至东北，限制国军开入东北名额，承认东北“民主联军”及“民主联合政权”等，该盟则完全附合。５该盟与中共联合组织所谓世界和平促进会，发动反美运动，要求在华美军撤退，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以阻挠政府遣俘、接收及复原工作。６该盟与中共在宣传上不仅采取一致态度，以双方之机关报刊互为宣传，互为吹捧，双方之发言人亦互相呼应，此唱彼和，并交换情报及资料。７该盟受中共指使，发动内战运动，将各地国共军事冲突之责任，完全加诸政府身上。在国共谈判中，又为中共张目，要求立即停战，全面停战，再行协商，以阻挠改组政府及召开国民大会。８中共利用民盟拉拢各小党派以为呐喊，如鲜英、郑初名、吴玉章等分别引诱中国农民自由党之何鲁、王日屿及中国民主党之萧日瑶等，与之合作。９中共利用民盟发动和平运动，以为缓兵计。每至中共兵力枯竭及军事失利时，民盟即高唱和平，要求停战，并出面促成继续和谈，以缓宕时日，使共军有喘息的机会，从容部署。１０中共在各地人员撤退后，委托民盟代理一切财物，中共人员潜入地下活动，并伪装为民盟盟员，民盟则力为掩护。如中共份子有被捕情事，民盟则发动保障人权运动，力予救援。１１中共利用民盟各地组织，布置地下交通网，从事传递消息。１２中共授意民盟，要求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讨论中国问题，以达到国际干涉中国内政之目的，并极力反对美国之单独援助。１３中共派李诺夫（李济深之侄）为华南特派员，与民盟南方总支部负责人李章达、彭泽民，诱惑前十九路军旧部即退伍军人，组织华南民主联军，阴谋发动叛乱。（注二八）上述种种，均足以证明民盟不但与中共勾结破坏国共和谈，而且完全听命于中共，成为中共的帮凶。尤以抗战后期以至抗战胜利以后之数年之间，中共除扩大军事叛乱之外，即到处制造学潮工潮，以扰乱社会秩序，民盟分子无不插手其间，煽风点火，极尽翻云覆雨之能事。民国三十六年春，中共关闭和谈之门，并加紧军事行动，政府以和平业已绝望，乃于七月四日毅然颁布全国总动员令，实行戡乱剿共。民盟分子竟公然反对动员戡乱，并指使其盟员在各地作破坏动员反对戡乱之活动。

参、小结

回顾国共和谈史实，我们发现：

和谈是共产党统战的手法，而统战的目的不是和解其对方，而是消灭其对方。民国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中共于二万五千里流窜，喘息于陕北之际，广泛发起统战运动，造成和谈形势，输诚壮大。迨八年抗战发生，共军一意扩军，把抗日诺言，抛到九霄云外。

为制止共军所造成的磨擦，希望联合一致抗日，政府与中共多次和谈，中共藉机敲诈，不断要求扩军。

谈判正在进行，毛泽东忽然将要求升高，要建立联合政府，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美国赫尔利将军亲赴延安与毛面谈，同意建立联合政府，这虽然违背了政府“还政于民”的政策，仍勉强同意，均无结果。

抗战胜利，毛泽东应蒋主席之召来渝商谈，而公布了所谓“双十会谈记要”，把和谈推向高潮。十一日毛返延安，珊瑚机场送行者二万人，国人对于和平期望之殷也达于极点。但是一返延安即秘密通知进行内战，且内战迄未中止。所谓军事停战，虽经民国三十四至三十六年马歇尔之调处，政府三度下令停战坐失戎机在所不惜者，终被共军与俄军勾结破坏无遗，而造成大陆的遍地烽火。

至于民国三十八年李宗仁所主持的和谈，毛泽东只是要求李氏投降，已无平等及共存可言矣。至此，中共以和谈为消灭其对方的目的几乎完全达成。在目前中共窜改和谈史实之际，我们再温习一下国共谈判史实，可为殷鉴。

□□□□□□

第七章中共对抗战以后（民国三十五年至三十八年）民国史实的篡改之驳正（第三二九页）

第三节对共党暴行的曲解（第三四七页）

壹、前言

抗日胜利以后，全国民众莫不欢欣鼓舞，期望国家重建，而中共则包藏祸心，四出蠢动，阻挠复原，破坏、诬衊我政府官员，宣传美军干涉内政，其暴行暴露无疑，而中共在编写民国史时，则诬指国民政府发动内战，不管人民死活，只知剿共，终于失败，宣称这是国民党的暴行所致。对中共的暴虐罪行

则避而不谈，甚至加以扭曲后嫁祸于国民党军队与国民政府，兹针对毛泽东及共军在民国三十五年至三十八年所犯的暴行，加以列举，以驳斥中共之谬论。

贰、中共曲解暴行罪行之驳正

中共史家对共党暴行，一向避而不谈，而且一味窜改，尤其是对毛泽东的罪行，更是涂脂抹粉，只知神化毛泽东，对其人其事则冠以“伟大的毛主席”或“人民解放军的首领”、“无产阶级的领袖”等等，事实上国共斗争期间，仅毛一人所犯下的罪行，即以罄竹难书，兹以民国三十五年至民国三十八年毛泽东之暴行为例，即可知中共窜改历史之居心。仅按年月列举如下：

民国三十五年

一月

毛泽东强迫日俘参加对我政府军作战，组织协会，利用日侨，吸收日籍青年及技术人员，从事军火生产和进行破坏杀戮之工作。自一月至十月底，在华北、东北及冀、察、豫、晋各省，被共军利用之日俘人数，前后共计约四万六千余人。（注二九）

一月十三日

毛泽东利用停战协定为掩护，令共军自偏僻的山地，进出于各铁道线，破坏铁道，以一月十三日至二月二十一日较为剧烈，继则围攻城镇，到四月底止，则以控制各铁路线及据点来争取有利之地位，在共军中成立“交通控制队”，从事破坏铁路及公路，以平汉、津浦、胶济铁路为其破坏之重点。截至十一月十五日止，共计破坏车站一百五十三个，桥梁二百十四座，铁轨四万六千八百七十九节，枕木十六万多根，电线十一万九千多公尺，火车机车七十九辆。（注三○）

一月十六日

毛泽东命令手下，将抚顺煤矿接收委员张莘夫杀害。（注三一）

二月十五日

毛泽东藉口为保留割据区内之人员，破坏邮政计有：自设邮政机构，自行发行邮票；在冀、豫、鲁、热、察、苏、皖、鄂、甘、宁、青等省，以及北平、上海、锦州各邮区，武装强迫接收邮局，计三百二十七处，威胁强迫原任局长副局长参加工作者有六十一个局。擅自成立邮局及邮政代办所计八十八所，发行毛泽东列宁像的邮票。阻断邮路：共军以武力对邮路横加干涉者，计三百一十三处，驱逐绑捕枪杀中央政府邮政人员，被迫撤离之人员计一百三十一个局，原有邮政员工被共党拘押捕杀或下落不明者，不计其数。（注三二）

二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阻碍铁路修复工作，并非法破坏铁路设理。他擅自下令共党在割据区，成立铁路管理局，委派负责人员，驱逐或屠杀中央政府交通部员工，阻挠中央修复铁路，使修铁路之工作无法进行，至四月十八日完全陷于停顿，截至六月七日，仍未能继续进行。

三月十四日

毛泽东令共军在东北进行叛乱，当俄军撤出四平街时，共军即包围该处，辽北省政府被围，十八日主席刘翰东突围逃出，二十日共军林彪入城，俄称其地鼠疫流行，阻国军进入，是月，共军自华北入东北者三万人，自鲁境入者八万人，盘踞东北，扩大叛乱。（注三三）

三月二十三日

毛泽东违背中央命令，射杀及扣留各地派遣小组协助完成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人员。四月十五日监禁赤峰第二小组、承德小组之政府及美方人员，五月六日调离泊头第十八小组人员至南皮予以扣留，共军并对泊头发动攻击。六月十日共军于孙庄击毙晏城第二十三小组雷奋强少校，六月十九日于修武击毙第十小组郭子祺少校。截至十一月二十日止，共计有六十九次之多。（注三四）

四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令共军侵占煤矿，杀害员工，四月二十七日将枣庄矿场机器破坏。运走焦作煤矿，擅自成立所谓“新华煤矿公司”，枪杀矿务科长魏国忠及员工。（注三五）

五月

毛泽东令共军破坏公路，他密令共军以藉口或以武力阻挠中央政府交通部公路总局的测勘队员，前往华北六条公路干线抢修公路，使该项工程停顿。在公路线上强迫人民将公路挖断，并将沿路居民移开。（注三六）

五月三日

毛泽东指令共军包围城镇，使被围城镇粮食断绝。国际救济总署的救济物资被共军阻难扣留或抢掠一空，目的在使城镇中的人员饿死。五月三日，善后救济总署美代表郝金斯那约翰二人及政府代表谷自立，携带面粉一千袋，牛乳二十桶，盐、油及贷金数十万元，由济南运至被共军围困四月之久的聊城途中，在高唐县南唐庄时，遭共军袭击，中美代表被共军非法扣留，五月四日在聊城附近又被扣留整日，并经非法检查，所运救济品贷金等悉数被共军没收。（注三七）

五月三十日

毛泽东属下之共军之苏北，进行所谓“惩奸运动”，从事暴力统治，高邮自四月十五日起至五月三十日，斗争六百六十人，公审枪决十七人，并大量没收土地，六月三十日起进行清算斗争。（注三八）

六月七日

毛泽东令共军破坏水路交通。截至十一月中旬，毛乘国军遵守停战命令未加防御之际，令共军利用各河涨潮期间，破坏水路交通。在苏、冀、鲁各地，挖河掘堤，洪水泛滥，使千万生命财产遭到空前浩劫。其破坏之河道，计有：运河、呼陀河、大清河、永定河、沐河、卫河、蔷薇河、诚河、府河、子牙河……等等。（注三九）

六月二十三日

毛泽东在上海发动“反内战”游行。（注四○）

七月一日

毛泽东令共军在苏北、华北进行叛乱行动。自七月一日至八月二日，他利用中央政府“为争取和平，不惜再忍让，避免战争，以求团结一致”的弱点，竟调集大军攻击苏北、华北各地，一面想完成华北割据，一面威胁首都。（注四一）

八月三日

毛泽东令共军在晋北进行叛乱行动，自八月三日起至十一月十一日止，他为打通其陕北与东北的联络线，令共军开始围攻晋北之战略要点大同，并策动共军十余万人攻击陇海县各城镇。（注四二）

八月十七日

毛泽东在延安发布第二次总动员令，加强全面叛乱。（注四三）

九月十九日

毛泽东发动“反美”运动。他在延安“解放日报”刊登社论文章：“你是骗子”——攻讦美国。（注四四）

十月十七日

毛泽东破坏和谈并推卸责任，他在延安发表声明，将和谈破裂的责任归中央政府。（注四五）

十一月十二日

毛泽东为了分裂国家，以达到割据卖国残民的阴谋，宣布在延安召开所谓“陕甘宁边区动员大会”、“另组政府”。（注四六）

十二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令属下在北平大学制造沈崇事件，藉以发动大规模反美运动。（注四七）

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

一月二日

毛泽东令共军在南京等地制造反美示威，鼓动南京学生二千人举行反美游行。（注四八）

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

四月

毛泽东令所属制造“反破坏、反饥饿”风暴。（注四九）

五月十七日

毛泽东发动共党在重庆市制造抢米风潮。（注五○）

十一月九日

毛泽东发动共党在京沪制造抢米风潮。（注五一）

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

一月十四日

毛泽东提出所谓“和谈八条件”，利用和谈期间积极准备军事进攻，扩大全面叛乱。（注五二）

四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利用和谈破裂，向共军发布扩大叛乱命令，四月二十二日，共军强渡长江，扩大地盘。

（注五三）

七月一日

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公开宣布“一面倒向苏俄”。（注五四）

九月二日

毛泽东令共党秘密纵火焚烧重庆市。（注五五）

十月一日

毛泽东建立政权，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国三十四年至三十八年十月毛泽东杀害了约一百二十五万人。（注五六）

从上述民国三十五年至民国三十八年毛泽东个人之罪行，已不胜枚举，再证之民国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检察署发出通缉毛泽东的训令，训令中指出：“毛泽东，窃据国土，称兵叛乱，祸国殃民，罪大恶极，自应依法缉办。”（注五七）其罪恶滔天，人神共愤，实不虚也。除了毛的罪行以外，再观之共军袭击我第五战区之事实，更加证明共党的穷凶极恶，历历在目，是中共史家所不能抹煞的。

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五日中央日报记载“共军暴行”如下：

决堤

河堤被共军决者，系在扶沟属白潭集北附近太康境内，于十月七日被掘泛滥区域，黑旺营贺寨东北，稷子冈西南、港寨，芝麻洼楼以东，清香集以北，斧头西南至太康县城四周东往马厂一带，地区宽约三里，长约一百余里，又消遥镇东北十二公里阜土黄河泛滥区临时河堤，亦于十月初被掘，民房数千间荡然，居民四百余被淹毙，家畜损失两百余头，其他农具大部被漂没。城垣被毁者：□十月间共军窜西平酒店合水一带，对各该处原有碉寨，强令地方人民破坏，十月十一日共军豫东副专员杨义民，率部八十余人，轻机枪一挺，步枪七十余支，督工拆除。至被奸淫掳杀刻已清查者：七月二十日舞阳武功镇林之用之妻，八月三十一日官城五沟营吴任华之妹，八月十五日舞阳五沟营午行铁王施，均因拒共军强奸被击毙命，林妻系被共军豫中军区陈光瑞部便衣兵三名杀死。（注五八）

掳掠

七月二十五日舞阳武功镇雷太保身带钱货，被共军陈光瑞部便衣兵三名抢后击毙。八月十二日舞阳唐老大阻止共军抢劫财物而遭枪杀。八月间共军李士奇部盘踞鄢陵扶沟一带，将五女店东四里庐庄居民卢觉檀架去苦刑拷打，劫索小麦百石，自卫枪四枝后释放。九月十四日共军豫中兵团黄林部盘踞西平之查牙山中合水槐树等村，不时派出小股部队，向西平北乡之权案、三寨、仪封等村掳掠粮、盐、棉花、现钞、民枪等。九月间共军十二军分区司令克勒等部攻陷太原时，其第二纵队司令王昌杰及分队长阵亡，遗体无下落，乃竟将该县三民主义青年团区团长郭大同及李县长之眷掳去，至今消息不明。十月间共军窜鲁山分布四乡，占据寨垣抢掠财物，人民不堪其扰。十月六日共军二万于，窜至沙河南岸，攻占婆婆街等地，当晚复攻陷我鲁南乡公所，将该乡积存之枪械军粮劫抢一空。（注五九）

暗杀

十月九日共军将叶县东北五十里盛家乡包围，该乡公所马队长、孙队副及职员四名均受伤，并被劫去步枪十余枝。十月十一日共军千余在叶县七里岗一带掳去过路客商及军人眷属架子车百余辆，并冒国军番号逃去。……十月十四日共军李卓英部人枪百余，盘踞于正阳熊寨西北三里宋庄，向民间拉夫，每甲五名，并拉车运粮往淮南。又派出便衣队十余名为暗杀团，窜到正阳毛庄一带打劫行商，并实行暗杀。近复查得共军李士奇便衣李盘石将临颖县城关镇第六保长李林，良民王清波之兄王汉三等五人，于三月间活埋，事先并勒索五十万元。（注六○）

以上中央日报所载均属铁的事实，不容任何人任意颠倒者。

参、小结

中共之祸国殃民虽不完全始于毛泽东，而毛却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尤其是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逃入井岗山以后，毛搞农民暴动，把中国式的流寇主义付诸实施。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三年（一九三一～～一九三四）他在赣南所建立的“中央苏区”，成为中国的毒瘤。毛且自立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经过政府五次围剿，而远窜陕北。在赣南、在其他苏区，以及在共军流窜二万五千里地区，分田杀人，扩军造反，伏尸百万，流血千里。这是毛共的历史暴行之一也。

其次抗战是关系国家存亡，民族绝续的大事，而毛泽东为了准备满足其封建帝国欲望，竟然主张一分抗战，两分应付国民党，七分发展，一意破坏抗战大业，袭击国军，杀害百姓，不计其数，这是毛共的历史暴行之二也。

最后抗战胜利，全国正准备复员建国之时，中共却勾结外寇，篡夺政权，为所欲为，数十年来罪行暴政，可说罊竹难书，这是毛共历史暴行之三也。

注一七：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编，‘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一九四五年八月～一九四七年三月），（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四月出版），全书共五四五页。

注一八：同注一。页一～五四五。

（自由人注：“同注一”应视为“同注一七”）

注一九：吴伯卿评：“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编‘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一九四五年八月～一九四七年三月）’”，‘中国现代史书评选辑’（民国七十八年四月，国史馆出版），页二四九～二七四。

注二○：同注三，页二五三。

注二一：王健民着‘中国共产党史稿’（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民国七十七年二月出版），页四四四。

注二二：同注五，页四四四。

注二三：同注五，页四四四～四五三。

注二四：王健民，“抗战时期中共的统战与。和谈。”，‘共党问题研究’，五卷二期（民国六十八年二月十五日出版），页七。

注二五：同注八，页七。

注二六：同注八，页七～八。

注二七：同注五，页四九一～五二九。

注二八：同注三，页二六二～二六四。

注二九：陈丰义、蔡廷俊、汪孝先．姚礼荣、张陌珍合编，“毛泽东罪行年表”，‘共党问题研究’第二卷第十期（民国六十五年十月十五日出版），页三八～三九。

注三○、三一、三二、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同注一，页三九。

注三九：萧三编述，‘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新华书局，民国三十九年四月初版），页六○八。

注四○：同注一，页三九。

注四一：同注一一，页六八一。

注四二：同注一，页四○。

注四三：同注一一，页六八一。

注四四：同注一一，页六八四。

注四五：同注一一，页六八六。

注四六：同注一一，页六八七。

注四七：同注一一，页六八八。

注四八：同注一一，页六八九。

注四九：同注一一，页六八九。

注五○：王思诚着，‘毛泽东与红祸’，（中国国民党中六组印行，民国四十八年十月出版），页七一。

注五一：同注一一，页七○一。

注五二：同注一一，页七○五。

注五三：同注一一，页七○七。

注五四：同注一一，页七○九～七一○。

注五五：同注一一，页七一二。

注五六：同注一一，页七一三。

注五七：同注一一，页二九○、四九五。

注五八：“抗战胜利后中共动态资料汇编”，‘共党问题研究’第六卷八期（民国六十九年八月出版），页九四～九六。

注五九：同注三○，页一○五。

注六○：同注三○，页一○五。

第二十一章：从忧患中新生

主题

建设台湾努力的成果对日媾和问题金山和会中日签订和约韩战与越战日与共匪贸易岸信介访华共匪对日渗透池田一意孤行吉田书简佐藤内阁共匪暴虐残杀人民受尽摧残从文革到批孔联合国失其意义庄敬自强必能光复大陆

建设台湾

在中华民国居于领导地位的蒋总统，经历了三度的“下野”和“复职”。

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七年八月，由于共产党的策谋出现宁汉分裂局面，因而辞卸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第二次，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为收拾汪兆铭等的广东分裂，而由国民政府主席退位。

当此第三次复职之际，特于一九五○年三月十三日向党、政、军干部昭告反共复国的精神准备并号召如次：

‘我每一次复职时所预定的目标，亦无不按照计划完成。我在第一次复职以后，不到八个月的功夫，北伐即告成功。第二次复职以后，虽然经过十四年的长期奋斗，但终于促使日本投降。现在是第三次复职了，这一次复职以后，我们革命的目标，是恢复中华民国，消灭共产国际。……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完成我第三次复职的使命。’（注一）

自由民主的基地

在五年前回到祖国-中华民国怀抱中的台湾省，此时，业已展开了新的建设工作。

自大陆的撤退颇为顺利，一九四九年元月，排除了李宗仁的阻挠，将存放在上海中央银行的黄金（准备金）五十万盎斯安全疏运到台湾，赖以支持台湾建设的经济基础。

荟萃中华文化精华的故宫文物，也是在同时疏运到台湾。这些由中国历代皇朝流传下来的二十五万件文物，现在展列于台北市的中华民国国立故宫博物院，灿然呈现中华文化五千年历史的光辉。

不过，在台湾这个地方也曾难免有共产主义者的魔掌悄悄地伸展进来。其一，就是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所发生的军民冲突事件（二二八事件）。

这个事件，是自大陆经由海南岛渗入台湾的共党分子煽动群众肇成骚乱。后来，据共产党发表：这是基于毛泽东在那一年的二月一日所发出的“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命令。——自动地暴露了企图从内部制造混乱的阴谋。

当时，蒋总统曾亲拟电文，指示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严禁对民众报复。陈仪在两年之后，图谋叛投共党（事发在台北判处死刑），可见其被共产党所利用。

‘陈公洽（仪）主持台湾政事，不自知其短阙，而唯虚矫粉饰是尚，肇此剧变，犹不引咎自责，可为太息痛恨也。’（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六日日记）

事件之后，政府更迭陈仪，任命人品温厚的外交官曾任驻美大使魏道明为台湾省主席，一新人心；其后，复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以陈仪继任省主席，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于是军民一致建设台湾的体制乃更为巩固。

的确，广大的中国大陆，已经落入共产主义者的蹂躏之下；但台、澎、金、马各岛仍然坚守着自由民主阵容的基地。

反共复国的支柱

回顾一九二四年，国民革命军的摇篮-黄埔军官学校刚刚诞生之处，只不过是隆起在广州市附近珠江上的一个小岛。

‘面积不过五方公里，全校学生不过五百人，而且今天没有明天的粮食，加上四面皆敌的环境；但是卒能扫荡军阀，统一中国。今天，我们尚拥有台、澎、金、马的广大基地，单以台湾一省而论，其人口面积何啻千倍于黄埔！再加上政治、经济．军事条件的优厚，我们为什么还要忧惧？’（注二）

那么，反共复国的支柱究竟是什么？

‘中华民国的反共复国大业，决不是单靠有形的军事力量来完成的。许多外国友人常从此角度来看我们这个基本问题，自然觉得这是一件万分艰巨、甚至是短期内不易达成的任务；但是，要知道——革命战争主要是靠社会民众和主义思想的力量来支持和成功的。’（注三）

‘我们这次反共抗俄的战争，不仅是民族战争，也是社会、文化的全面战争。——这样一个划时代的战争，是不能不有其中心思想作基础的；否则，大家都会不了解我们究竟为何而战。

‘我们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那就是三民主义！我们当前反共抗俄战争，就是为着坚持三民主义而战，为着实现三民主义而战！’（注四）

为了要以台湾成为反攻大陆的基地，政府的方策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这本来就是三民主义的精神，尤其是在和共产主义的战斗中，政治意义重大。盖共产主义经常是摇惑人心、乘机而入；至于三民主义的目标，则是要从政治、经济、教育各方面造成一个能使每一个国民都会感到安心满意的社会——就是礼记礼运篇中的“大同社会”。这也正是克服共产主义的大道。

三民主义的模范省

‘建设台湾，是反共抗俄的根本工作。无论国际局势有何变迁，大陆上共匪有何作为，我们不怕不能光复大陆，扫除匪伪极权主义的暴力；我们只怕不能脚踏实地，在台湾树立收复大陆以后的楷模。……我相信台湾必能建设为三民主义的模范省，为收复大陆以后建国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注五）

注一：蒋总统-“复职的使命与目的”（一九五○.三）

注二：蒋总统-“今后军事教育的方针”（一九五○.元）

注三：蒋总统-“接见日本记者团答词”（一九五八.二）

注四：蒋总统-“时代考验青年，青年创造时代”（一九五一.八）

注五：蒋总统-“本党今后努力的方针”（一九五○.八）

努力的成果

‘三民主义，是以伦理、民主和科学融合而成的；而且是一贯相连、不可或缺的。但其轻重缓急，则是随国民革命时期之需要，而有先后不同之别。

‘所以对满清革命时期，我们乃是以民族主义为其重心；对军阀革命时期，则是以民权主义为其重心；在今日对共匪戡乱复兴的国民革命时期，乃是以民生主义为重心的革命。’（注一）

土地政策成功

实践民生主义的起点，是自一九四九年“三七五减租”开始之后的一连串“土地改革”的施政。

“三七五减租”，是从佃农的收获中减除肥料等实际费用二五％，其余则由地主与佃农各分三七五％的平均分配方式。因此而使过去缴纳佃租五○％乃至七○％的标准大为降低。

继此之后，复于一九五一年实施“公地放领”，将十二万公顷的公有土地放领给二十六万六千户佃农。

及至一九五三年，更进一步实施“耕者有其田”的改革政策，限制地主保留地为水田三公顷（旱田六公顷），超过此限的土地，则由政府收购，然后放领给农民。

在都市方面，自一九五六年开始施行“都市平均地权条例”，对于土地持有者就其地价上涨部分课征地价税，藉谋土地之持有臻于平均化。

像这样一连串的“土地改革”，乃是以树立公平的土地制度为目的的三民主义“平均地权”政策之实践。由于生活基础得以确保，所以农民的耕作意欲高涨，造成在亚洲屈指可数的繁荣的农村，和建立起能够自给自足的国家。而共产党所控制的大陆地区，因其施行没收私有土地及“人民公社”等榨取暴政，以致虽然拥有广大土地但直到今天还始终做不到自给自足而使人民濒于饥饿的程度，双方实则成为强烈的对照。

经济发展进行顺利

在土地政策业已成功的基础之上，经济发展也是进行顺利。自一九六○年以来，进入工业化和拓展对外贸易的阶段；尤其是自一九七二年开始以建立大炼钢厂（年产量六百万吨）、高雄造船厂（五十万吨级）、石油联合工厂、原子能发电厂等为内容的“十项建设”，乃是使中华民国的产业构造大为改观的施政。

继承文化传统

经济发展，为反攻复国的物质方面的支柱；至于其精神方面，则着重在文化、教育上的建设。

被赤化了的大陆，已因“文化大革命”和“批孔”而完全抹煞掉中华文化；但在中华民国则实施着继承五千年传统的教育。尤其是自一九六八年开始的九年国民义务教育以及大学奖金制度等，乃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重大改革。

反攻复国的理念，更使“文武合一”的教育方针为之恢复——初中开始实施童子军训练，高中施行军训。此外，在一九五二年组织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以青年为对象而举办学术研修、团体训练、海外交流等活动，都着有坚实的成果。

至于在民权主义方面，当台湾回到中华民国怀抱中的第二年～一九四六年五月，便成立了台湾省议会；一九五○年实施地方自治，县、市首长及议员均经直接选举产生，足以反映民意的政治，早已上了轨道。

国军不断革新充实

光复大陆的先锋-国军，也不断地在革新、充实。

和共军的较大战斗，自一九五八年“八二三”炮战以来未再发生。那一次的战斗中，金门岛受到在两小时之内五万七千多发、四十天之间四十七万多发炮弹的猛烈轰击，并且被来自海、陆、空三方面的进攻；但由于政府的反攻，建立了击坠敌方飞机二十九架，打沉舰艇一百零七艘的战果，将之击退，自此之后，直到今天，在金门、马祖的两个前线还继续进行着隔日射击的定期炮战。

现在，政府军的常备兵六十万人，经常保持着随时出动的态势。以截至一九六五年为止的美国军援为基础，火力业已增强；现在和美国洛斯诺普公司合作，已有由国内生产Ｆ５Ｅ喷射战斗机的能力。

政治作战

在这十多年对共军作战中，以政治和军事比较，其重点乃在政治方面。其方法是通过广播和汽球空飘传单以及散布生活用品等行动，号召大陆上的每一个人投归自由、民主祖国-中华民国，和奋起消灭共产党暴政。

‘台湾光复二十五年，农工业生产突飞猛进，都市、乡村普遍繁荣，地方自治基础巩固，国民教育日益加强，无论是消极的除弊与积极的建设，一切都是为了三民主义的实践，都是为了中华文化的复兴，使我们的社会走向均富、安和、乐利的境地。

‘我们多年来努力的成果，不仅人民生活水准不断提高，并且遏阻了毛共匪帮的对外蠢动，屏障了亚太地区的自由安全，使这个光复基地成为太平洋上的光明灯塔。而这种辉煌的成果，乃是政府与人民密切合作共同创造的。……

进而光复大陆

‘国父在开国时曾训示我们：“改革之任，人人有责”，今天推行全面革新，不止是政府的责任，同时也是全体国民的责任，人人必须在建设台湾、光复大陆的要求上，献出智慧，提供力量。……

‘今天，大陆同胞正陷于水深火热、暗无天日的毛共匪帮奴役之下，他们都是与毛匪具有血海深仇的死敌，其要求生存与自由的愿望，是何等的迫切！我们必须认识——今日受苦、受难、受整肃、受屠杀的大陆同胞，也正是当年争取抗战胜利、光复台湾的弟兄及其亲属，他们和我们是血肉相连、荣辱一体；因此，我们要在一个目标之下，团结一致，携手迈进，由台湾建设成果的扩大，进而早日完成光复大陆的神圣使命，以宏扬历史意义，开拓国家民族的光明前途！’

注一：蒋总统-中华民国五十七年“青年节告全国青年书”（一九六八三）

注二：蒋总统-“对台湾省光复二十五周年纪念颁词”（一九七○.一○）

对日媾和问题

为使日本重新回到国际社会，其工作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告终两年之后的一九四七年。

但当时由于美苏对立，苏联和大陆共党政权勾结、英国对大陆接近等障碍，发生了各种纠葛；结果，中华民国竟未能参加旧金山和平条约之签订，以至于不得不和日本成立双边和约。

最初提倡对日媾和的国家，乃是美国。一九四七年七月，他在构成远东委员会的十三国会议中提议：审议对日和约草案，得经三分之二的多数赞成予以通过。但苏联则表示反对，坚持召开中、美、英、苏四国外长会议，并须经全体一致决定之。

中华民国虽曾在形成对立的美、苏之间再三协调，但苏联态度强硬，只得暂时作罢。

及至一九五○年，出现了两大国际事件。

一个是在二月间，大陆的共党政权和苏联签订了“中（匪）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这个条约中明白表示出：以日本为“假想敌”，其目的之一，乃是在于制造将对日媾和的中国代表权给予大陆共党政权的国际情势。

另一个事件，就是在六月二十五日爆发的韩战。这个战争，使美国对于共产主义的威胁重新有了憬悟；于是为了防范不设防的日本被共党势力侵略，并拉牢他成为自由阵营的一员，故而要急于进行对日媾和。

十月二十日，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在纽约郊外成功湖（联合国旧址）与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会谈。

杜勒斯的提案

此时，杜勒斯最初表明了传说中的对日和约七项原则内容，包括有下列各点：

（一）凡参加对日战争之任何或全体国家，同意媾和者，均得为缔约国。（二）考虑日本加入联合国。（三）日本承认韩国独立。（四）日本同意以琉球群岛及小笠原群岛交联合国托管，并以美国为治理国。（五）关于台湾、澎湖列岛、南库页岛及千岛群岛之地位，接受在将来由英、苏、中、美四国决定。

杜勒斯此一提案，对于台湾及澎湖列岛的地位有欠明确表示。这些岛屿在历史上、种族上、法律上、事实上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且早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的“开罗会议”共同宣言中已有“归还中华民国”的明文规定，嗣后并经为日本所接受的促使其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宣言”中再加认定。

顾维钧乃为此提出质问，杜勒斯则对之说明如次：

“美国的用意，是要将台湾的地位暂予冻结。因美国虽切望世界大战不再爆发，但并无把握；深不愿台湾落入仇视美国者之手，尤不愿为苏联所利用。美国人力不足对太平洋防卫，只能利用海军、空军树立强固防线。倘一旦有事，美国能控制亚洲大陆沿海，而台湾岛正在防线之内。是故冻结台湾岛地位，即是维持中华民国政府地位。”

当时，中国大陆的共党政权盖正在策划攫取包括台湾在内的代表中国的地位，而苏联则为之支援推动；并且属于自由阵营一员的英国也已经承认了中共政权，大英联邦各国都已有尾随效尤之意。由于在世界分为东西两大壁垒的冷战局面中，“台湾问题”业已成为焦点之一，故而美国有将其冻结的意向。

于是，顾维钧乃在十二月十九日与杜勒斯的第二次会谈中明确指出：“关于台湾等领土问题，在波茨坦宣言中业已表示得很明白，毋须日本各别追认拨归何国”之后，复于一九五一年元月二十二日提出一份节略，转达中华民国同意缔结对日和约的意向。

三月底，美国将和约草案的初稿分送五十三个有关国家。

英俄的荒谬主张

可是，及至四月中旬，传闻英国政府向美国提出对案，主张：“邀中共参加对日议和”。

按自七七事变以来，和日本作战的是中华民国，并且日本投降的对方也是中华民国，乃属历史事实。无论共产党将在大陆如何扩张其势力，而中华民国之应为缔结和约的当事国，应属毫无疑问。像英国这种态度，对于中华民国，乃是一种毫无理由的侮辱，实在是不能予以容忍的。

至于苏联，也在五月和六月两度主张：“关于对日和约，应由美、英、苏及大陆共党政权举行四外长会议。”

杜勒斯对于苏联的主张根本不予理会，但为谋求和英国协商，乃于六月中旬赴英国访问，与工党内阁的外相莫礼逊等人折冲，六月十五日将结果告知顾维钧，其内容则极令中华民国失望：

“此次在英与英外相等商议对日和约，余对英主张邀中共参加，坚决反对；而英对美主张中华民国政府参加签字，亦反对甚力。最后，余提折衷方案——即由若干国家与日签订多边条约；另由日本自主决定与何方中国商订大致相同之双边和约，英国已表同意。此虽未能满贵国（中华民国）希望，然十之九成当如贵国之意。……

杜勒斯更且以严守秘密为词对顾维钧负责承诺如左：

“余知日本政府对贵国态度甚好，必愿与贵国签约，而反对与中共成立关系。”

金山和会

杜勒斯对英国的妥协案，是关系到中华民国主权的问题，当然不能予以接受。

六月十八日（一九五一年），蒋总统发表阐明中华民国立场的声明如次：

‘中华民国参加对日和约之权，绝不容疑。中华民国政府仅能以平等地位参加对日和约，任何含有歧视性之签约条件，均不接受。任何违反中华民国上述严正立场而订立之对日和约，不但在法律上、道义上丧失其力量，即在盟国共同作战之历史上永留不可洗涤之错误。其责任之重，影响之大，诚有非余所忍言者——因此种丧失真实性之对日和约，不但使第二次大战不能获得真正的结束，并将加速远东局势之混乱，更种下世界未来之无穷祸患也。’（注）

中国未参加

七月六日，杜勒斯在美国国务院将最后的和约草案面交顾维钧，但其条文中已未列入“中华民国”的名义。

在经过了如上所述的历程之后，对日媾和会议于九月四日在旧金山歌剧院开幕，出席者为对日参战五十五国之中的五十一国和日本；未参加的四个国家为未被邀请的中华民国，以及因对和约内容不满而拒绝受邀的印度、缅甸、南斯拉夫。

在会议中，苏联代表葛罗米柯仍然提出邀请共党政权参与会议等要求，以妨碍和会进行，但均被否决。

日与美缔安全条约

日本代表（时任首相）吉田茂，在七日晚间发表接受和约的演说，并经提及：“对于中国未能参加和会，感到遗憾。”同时更公开表明其反共立场：“以共产主义的压迫、专制相伴随的阴险势力，加深了远东的不安与混乱，并公然肆行侵略；面对此集体性的侵犯，日本为谋自由国家的集体防护，将与美国缔结安全保障条约。”

九月八日，日本与同盟国家四十八国签订了“金山和约”；只有苏联与波兰、捷克三国拒绝签署。

同时，在美、日两国之间所进行交涉的美日安全保障条约，也在当天晚间签订。

与是，战败国日本遂因而解除了被联军的占领，并作为自由阵营的一员，投归国际社会。

其后，在日本国内虽有社会党和共产党主张全面媾和（与所有的国家同时签订和约），而强烈反对批准“金山和约”，但还是先后于十月二十六日、十一月二十六日经众、参两院通过，承认了此一和约及美日安全保障条约。

中国的三项基本原则

至于中华民国与日本交涉缔结双边和约，乃是由美国居间协调、于金山和会之后迅即开始。

中华民国对日媾和的基本原则，有下列三项：

一、中华民国必须维持与对日作战各盟国平等的地位。

二、中、日双边和约，应与金山和约内容大体相同。

三、日本必须承认中华民国对中国全部领土的主权。

九月十七日，美国驻华代办蓝钦与外交部长叶公超晤谈，告知：“美国已促使日本政府派员以贸易代表身分来华，洽商两国之间的双边条约，日本政府业已同意。”

可是，日本政府在行将进入具体交涉之际，却甚为消极。

十月二十五日，和董显光（在后来出任驻日大使）晤面的吉田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其态度不着边际，两人谈话情形大致如左：

“董显光贵方是否由于英国方面之干涉，遂对与我国签约的问题，不得不采取审慎的态度？

“冈崎胜男不然。我国即将成为自主国家，此后我国外交政策，必须以我国本身利益为先决条件。

“董余意贵国国内政治情形与此有关。--例如社会党即反对与苏联或中共不友好之外交政策。

“冈崎我国深恐与贵国订立双边和约后，势将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我之仇视。

“董除重要共党人员外，实则其他中国国民均反对共产主义，而以一○○％之热忱倾向中华民国政府。余意贵国如循与我政府亲善之途径以行，中国国民必完全赞成，而对贵国更形亲善。

“冈崎共产党对政治极为狡猾，渠等颇可利用我国与贵国签订双边和约为挑拨全中国人民仇日之良机，届时我国不易忍受。

“董贵国领袖对于与我国签订和约之观念如何？

“冈崎我国现在政策即为徐待时机，至少在已签订之和约未批准之前，不致有何行动；俟我国独立自主后，自将充分研究于何时与中国以及与何一中国政府签约。我国固极敬重贵国政府，所惜者目前领土仅台湾耳。”

日本首相吉田茂的态度，仍旧是颇为暧昧。

他于十月二十九日在参议院条约委员会发言：“如果中共要我国在上海设置驻外事务所，则为了通商，我们可以设置。”接着在三十日答复羽仁五郎的质询时更提到：“日本现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关于如何行使此权，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

这样的发言，正自显露出日本对大陆共党政权开始有所顾虑的一种征兆。

注：蒋总统-“就对日和约发表郑重声明”（一九五一.六）

中日签订和约

日本首相吉田茂在国会的发言，使中华民国和美国为之感到惊愕。因为吉田曾经和杜勒斯有过“与中华民国缔结双边和约”的谅解，而这样的发言，则是和原先的谅解相悖。

外交部长叶公超遂即于翌日（三十一日）约见美国驻华代办蓝钦，向之提出警告：“吉田的言词，已构成对于自由世界的一项挑衅行为。美国使日本立于自由阵线，竭力设法使中、日间早日媾和；但如任吉田长此以往，则金山和约业已完全失败。”

蓝钦答称：“余不以为华府有任何人故意欺骗贵方，余将以贵方正当之愤慨忠实报告华府；余并将以余之电文副本一份送往东京，以供彼等参考。”华盛顿的答复，于十一月五日到达台北，美国国务院重申：“美国政府反对日本与中共拉拢关系之任何企图，并反对日本政府与中共之间交换海外代表。”

十二月十日，美国国务院复派遣特使杜勒斯抵达日本，与吉田茂会谈。

杜勒斯在东京两度与吉田会谈之后，吉田遂于十二月二十四日致函杜勒斯，正式表明和中华民国缔结和约。在这封吉田书简中有：“中国的共党政权，现被联合国判定为侵略者。日本赞同该项措施。日本准备与中华民国之间缔结条约。”

英国再度介入干涉

可是，在这个当口，英国再度介入干涉～～一九五二年元月五日，杜鲁门与邱吉尔在美国会谈之际，英国外相艾登表示：反对日本和中华民国建立外交关系。

但在元月十六日吉田茂致杜勒斯的书简被公布之后，情况的进展乃颇为顺利。

元月三十日，日本政府发表曾任大藏大臣的河田烈为对中华民国媾和首席全权代表；中华民国方面也于二月十五日任命叶公超为全权代表。

中日和会在台北举行

河田烈等日本代表团一行，于二月十七日抵达台北。

中、日和会于二月二十日在台北中华民国外交部会议室正式揭幕。叶公超即席表明中华民国的基本立场如次：

“蒋总统说过：‘本人于日本投降未几，则一再声称：中国对日本不采报复主义，而应采合理的宽大政策，并谋对日和约的及早观成。’……

“我们今日所希望以金山和平条约的精神来商订的两国和约，即足为将来两国人民所愿望的进一步合作的基础。我们不能不预料——在谈判过程中，双方将有若干歧见，但在本国政府方面，对于这些歧见，将不致于缺乏与贵方共商解决之意愿。当会谈结束时，本人希望在中、日关系史上将翻开崭新的一页，而合作与互相尊重，亦将成为将来双方一切关系的基本精神。”

在和谈中，是以中国方面所提出的草约为基础进行交涉。

最大的争点，是和约“适用范围”的问题。盖大陆落于共党政权之手，中华民国在国际法上虽然握有主权，但未能遂行统治。

在吉田茂致杜勒斯书简中，对于此一问题，是以：“应适用于现在在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之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的语句为表达；而在中华民国的立场，则以“或”字有二者择一的文意，故而要求在条文中改正为“及”字，因而与日本方面僵持不下。嗣经交涉结果，乃在双方交换照会中对于“或”字取得“了解”，并相对地在同意纪录中明记：认为具有“及”字之意；因此，而使中日和约确认中华民国对于中国整个领土的主权。

此外，关于“赔偿问题”，中华民国将金山和约第十四条所规定的“服务补偿”予以自动放弃。是故在中日和约中未见有一个赔偿的字眼，乃是未见前例的条约。

四月二十八日，两国全权代表在台北宾馆签订了中日和约；就在同一天，金山和约生效，日本被正式许可回归国际社会。

期盼中日诚意合作

七月间，行政院院长陈诚在立法院说明和约的意义，大意于次：

“日本的侵略，使中、日两国都受到惨重的损失。亚洲的安定，也因而蒙受严重影响。但胜利之后，中国对于日本不采报复主义，并以种种直接间接的方法，以期对日和约及早观成。这是基于国父孙中山先生早已指出：‘要确保亚洲安定，惟赖处于亚洲的中、日两大邻国的诚意合作’的对日基本政策。在这自由世界面临共产侵略的威胁的时候，中日和约的实现，尤有其特殊的意义。本人深切希望贵院在审议中日和约时，特别注意。”

中、日和约于八月五日生效，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遂于此告终。回溯历史，自一八七一年签订“清日修好条规”以来，成为威胁亚洲安定的癌细胞的“中日不正常关系”，经过八十年的岁月到此告一结束。

在和约即将生效的八月二日，中华民国派遣总统府资政张群为总统代表前往日本，考察两国友好关系。继之于八月九日，战后日本第一任驻华大使芳泽谦吉赴台北就任；中华民国方面，也于十六日任命董显光为驻日大使。芳泽在战前曾任驻华使节颇久，并曾为犬养（毅）内阁外相，是一位资深望重的外交官。

外交关系趋于断绝

然而，这个“安定”关系，只不过有二十年的期间，一九七二年九月，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承认大陆共党政权之际表示：“中日和约已失去了它的意义，业已终了。”于是，中华民国和日本的外交关系乃趋于断绝。

韩战与越战

以赤化世界为目标的苏联和中共，意图将朝鲜半岛也纳入其势力范围之下而发动的侵略行为-韩战，自一九五○年延续到五三年。这个战争，使美国乃至自由世界对于台湾防卫的重要性重新有了认识。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清晨，北韩军三个师突然越过三十八度线进攻南韩。二十八日，攻占了汉城。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于二十五日判定北韩为侵略者。继之，又于二十七日通过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出兵援助韩国逐退北韩军的议案。依据这个决定，美国陆军即于二十八日在釜山登陆，更于七月八日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援韩军最高统帅；有十六国派兵参加，组成联合国援韩军。

杜鲁门下令协防

和北韩军南下相呼应的，乃是中共军在台湾对岸的福建省集结了十五万人。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过去对于台湾的防卫态度暧昧，但此刻则明确表示决心，于六月二十七日发表声明：“此一情势，直接威胁到太平洋的安全”，而下令派遣第七舰队协防台湾海峡。同时，并向中华民国要求暂时停止对大陆攻击。中华民国在表明不影响反攻大陆的原则之后，姑且予以接受。

七月三十一日，麦克阿瑟率领其幕僚人员来台湾访问。蒋总统和他在三十一日及八月一日的两天之间举行会谈，对于为对付共产主义威胁而协防台湾及中、美军事合作等问题，双方意见完全一致。

在麦克阿瑟来访之先，中华民国外交部已于六月二十九日向美国政府提出：愿派遣三万三千陆军精锐部队参加联合国军援助韩国。此时，正是汉城业已沦陷，韩国部队全线溃败，向釜山退却之中。而中华民国政府军距离韩国最近，是能够赴援最快的友军。

英国反对中国派军援韩

于是，麦克阿瑟乃向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提出接受中华民国出兵的建议。可是由于业已承认了大陆共党政权的英国以“不能和中华民国的军队并肩作战”而表示反对，乃未能实现。

此时韩国的战况，曾经一度恶化，联军被迫败退到朝鲜半岛的南端；但由于联军于九月十五日在仁川登陆，遂即扭转局面。十月，联军越过三十八度线，反将北韩军驱逐到接近中国东北的国境一带。

此时，中国大陆的共军业已出兵越境，进入北韩。

由林彪指挥的“第四野战军”主力，自称“志愿军”，于十月二十五日渡过鸭绿江，对联军展开反击。

认定中共为世界公敌

于是，朝鲜半岛的战争，遂已演变成由联合国所统率的自由主义国家阵营和大陆中共政权在作战，是故联合国乃于一九五一年二月通过“谴责中共为侵略者”的议案，认定其为“世界公敌”。

在经过了因由大陆增派部队而加强了战力的共军再度攻陷汉城、继之又被联军夺回的拉锯过程之后，双方一时对峙于三十八度线附近，形成胶着状态。直到一九五三年七月才成立停战协定，熄灭了战火。

在韩战期间，中共军的伤亡计达一百五十四万人，其中约一百万人为以往属于政府军的士兵，他们是被共产党干部胁迫“立功赎罪”而驱遣来韩参战。

反共义士投奔自由

在这些原属政府军的士兵之中，有不少人投奔自由，为数超过一万四千人。他们高举青天白日旗，用自己的鲜血书写“反共抗俄”，誓愿投归中华民国阵营。中华民国当然欢迎他们来归。

‘此一壮举，使我们更确信我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民族气节、民族大义、民族精神和我们国父三民主义深植人心，决不能为任何残贼暴力所可浸没屈服的！而且侵略必败、汉奸必亡，更从这里得到了确切不易的保证。这不就是我们一声反攻大陆以后，奸匪的残暴武力必然崩溃的确证吗？而其内部所暴露的精疲力尽、民不聊生，与民怨沸腾、不断反抗暴政的各种破绽，更是指不胜屈了。’（注一）

由于韩战的发生，使自由国家加强了团结关系。

一九五三年元月，美国总统由艾森豪就任，对中华民国的政策表现得更为积极。

二月二日，艾森豪在致国会的咨文中说明：“解除台湾中立化，不再限制中华民国武装部队对大陆的行动。”

蒋总统遂于二月五日发表声明，指出：

‘此一决定，无论其在政治与军事上以及在国际道义上言，实为美国最合理而光明的举措。’

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及至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更由叶公超与杜勒斯在华盛顿签订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至是作为维护亚洲和平枢轴的自由中国的防卫，在国际法上于焉确立。

不过，当时美国亚洲政策的内在情势，乃为“围堵政策”与“和平共存政策”，而对于共产主义者缺乏彻底措施，则是不容否定的。譬如在韩战中，建议轰炸在共党政权控制下的中国大陆的麦克阿瑟之被杜鲁门总统解除其联军最高统帅职务，即为反映其政策的表现之一。

后来，共产主义者的野心奢望转向越南，侵略激化；而美国对于越南问题也还是不断地谋求循谈判途径解决，但却招致了整个越南被赤化的结果。

美国应有坚定反共政策

‘本人（蒋总统）坦白认为：自由世界在亚洲冷战中，正遭遇失败。很不幸的，至少在亚洲，自由世界的外交已造成一种支持与鼓励中立主义的印象。……今日所谓中立主义，一方面使共产集团之收获益臻巩固，而另一方面使俄、共政治经济的邪恶势力之渗透发展，较前更为容易。而其最大作用，就是可使自由亚洲人民对于西方国家对共产主义所持之最后意向究竟如何？更感惶惑。故在亚洲赢得冷战之主要措施，为美国应有一坚定反共政策之表示。’（注二）

注一：蒋总统-“中华民国四十二年国庆纪念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一九五三十）

注二：蒋总统-“接见美国合众通讯社社长答问”（一九五六三）

日与共匪贸易

中、日和平条约于一九五二年缔结之后，日本与中华民国的关系，仍然是风波重叠，未见平稳。

如果追究其原因，则是由于日本一方面虽然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为唯一代表中国的正统政府，但另一方面却又不断地在向大陆共党政权送出秋波。这样的态度，只不过是在自动投入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罗网；于是在不久之后的一九七二年便急转直下与共党政权搞出其所谓“关系正常化”，乃致断绝了中日邦交的不幸事态。

日本之和中共接近，最初是以经济关系为主要藉口。

左派势力积极活动

日本与中国大陆的贸易，是在一九四九年底获得盟军总部的许可而开始。及至一九五二年四月，当日本恢复独立的同时，以左派势力为中心的促进贸易活动，乃趋于积极。

这一年的四月二十二日，在日本成立了所谓“日中（共）贸易促进会议”；继之，遂有左派社会党籍之国会议员帆足计等三人因出国参加会议之便而由莫斯科秘密前往北平，于六月一日签订了相互输出入总额各三千万英镑的“第一次日中（共）贸易协定”，乃为所谓“民间协定贸易”的开始。

一九五三年，韩战的停战协定成立，于是因供应韩战军需品以致生产得以呈现盛况的日本经济，遂一转而面临了严重的不景气。在这样的情势之下，拥有众、参两院议员三百人的“促进日中（共）贸易”的议案。

在另一方面，共党政权则乘此加强政治攻势，邀日本执政党-自由党国会议员池田正之辅等十人前往大陆，于十月二十九日签订了“第二次日中（共）贸易协定”，其规模与第一次协调相同。

对于有关日本与共党政权的贸易活动，中华民国在原则上是一贯地坚持反对。

盖大陆共党政权，乃是颠覆中华民国的叛乱集团，日本既然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是唯一正统的中国政府而确立了外交关系，是则当然不能容许有任何助长叛乱集团势力的行为。可是，以四个海岛拥有将近一亿人口的日本，亟谋藉贸易立国，加以美国也因为国内经济不景气，不希望日本产品流入其本国，是故毋宁说是有鼓励日本与共党政权推动民间贸易的态度。

‘现在日本生产成本增高，共匪对外贸易统制严密，匪区内购买力又极薄弱；日本欲冀对匪作有利之通商，未免近于幻想。共匪如果允对日贸易，亦必附有政治条款，以便进行其渗透工作、颠覆活动。’（注一）

日本对“民间协定贸易”所寄予的最大幻想，是“不涉政治，只管经济”的“政经分离”目标；可是，以共党政权为对手，像这样的如意算盘则是打不成的。因为在共产党方面，根本就没有什么“民间”的存在，他的经济、贸易、文化、人事往来等一切对外措施，都只不过是在以制造日本分裂、赤化，俾谋达成其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

超越民间协定范围

最足以表明其此一图谋的，乃是“第三次日中（共）贸易协定”。

这个协定，是由共党政权所派遣以雷任民为“团长”的“贸易代表团”来到日本，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村田省藏）及“促进日中（共）贸易议员联盟”（代表池田正之辅）于一九五五年五月签订。在协定中所定贸易商品与金额仍然与第一次、第二次协定相同，但此外并附带有协议如次：

一、互相举办商品展览会，并各取得本国政府同意——对于事务之执行与人员之往来，给予各种方便及安全保障。

二、互相在东京与北平设置通商代表部，对于各该代表部及工作人员给予外交官待遇的权利。

这样的协议，实在是超越了民间协定的范围，而等于是在承认大陆的共党政权。

在签订这个协定之先，中华民国驻日大使馆业已闻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对于由大陆来日的一行在其国籍栏内填入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予以签证，是故于四月二十二日向日本外务省提出强烈抗议；同时并加以警告：“如果准许设置通商代表部，则共党政权必将扩大在日本的政治活动，破坏日本与自由国家的友好合作，是为中日两国之间发生摩擦龃龉的根源。”继之，更由于给予“外交官特权”的条款表明化，以致日本政府乃在中华民国抗议之下，终于同意不许设置“通商代表部”。

蒋总统再三警告

不过，日本朝野则正逐渐被共党政权的步伐在牵着走，因此，蒋总统乃再三发出警告，促其觉醒。

‘日本若干方面曾一再主张开放对大陆贸易，但余（蒋总统）不信渠等能代表大多数日本人民或日本政府之态度。日本私人贸易商曾与匪帮签订若干贸易协定，但无堪称有何成效。日本经济之未来发展，实在于与自由亚洲国家及我忠实华侨合作，扩充其与东南亚地区之贸易。’（注二）

尤其是大陆地区在一九五四、五五两年连续大灾荒，大半农村正为饥馑所苦，而没有工业原料和产品输出的共党政权，却还在向农民搜刮农产品对日本输出。

‘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日本一定会了解这种与共产地区的往来，就日本国家以及人民的利益来讲，都是得不偿失的。我希望日本国内人士、尤其是商人，要能够目光放远，不要图近利而予共党以渗透与颠覆国家的机会。尤其我们大陆人民在饥饿交迫之下，为共匪所榨取的血汗余沥-粮食，而加以采购，为日本所吮吸，使在中日两民族长期友爱的关系上，留下不能忘却的余痛。’（注三）

注一：蒋总统-“答美国广播评论家鲁易斯问”（一九五五二）

注二：蒋总统-“答法国记者杜利安问”（一九五六九）

注三：蒋总统-“答日本记者山口虔问”（一九五七.三）

岸信介访华

一九五六年四月，中华民国派遣由立法院院长张道藩所率领的亲善访问团前往日本；日本旋即于同年八月以石井光次郎（后为众议院议长）为团长率团访华。于是通过这一次的交流，决定由两国民间有力人士组成“中日合作策进会”（日本名为“日华协力委员会”）。

该策进会于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在东京举行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正式成立。

参加会议者，在中华民国方面有亚洲人民反共联盟中国总会理事长谷正纲等人；日本方面则为东京商工会议所会头藤山爱一郎、大阪商工会议所会头杉道助等政界及财经、学术界人士；共申：“促进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亲善友好，互助合作。”

同年六月二日，日本首相岸信介来华访问。这是中华民国自一九一二年开国以来第一次接待日本的现任首相。

岸信介声明：“在厘定亚洲政策方面，尊重中华民国意见，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其外交方针。这是修正了过去三年之间在“中立外交”的名义之下对共产国家接近并和苏联复交的前任鸠山一郎内阁的路线，使中日关系再度趋向密切化。

蒋总统与岸信介谈话

蒋总统和岸信介连续于六月三、四两日，就亚洲与世界情势及中日两国合作关系交换了意见。

下面所引用的资料，乃是六月四日上午十时在台北士林官邸由总统府秘书长张群担任翻译的蒋总统与岸信介的谈话纪录中之一部分：

“岸信介日本人对中国之观念，渊源甚深，中国有五千年之历史，中、日有两千年之关系，故日本人一谈到中国，即有十分亲切之感，初未计及思想问题。因之，日本谈到对中国大陆贸易、尤其以大阪为中心之中小企业，以原来与大陆有生意往来，只要现在大陆有生意可做，即群趋若骛。故现在日本在政治上决定不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亦不在联合国内对中共作何帮助，但对于日本人民断绝与大陆往来，不做贸易，认为在理论上固可如此说法，而事实上绝不可能。此点希望予以谅解。

“蒋总统昨谈东南亚开发及经济合作问题，是很现实的问题；顷谈日本对大陆贸易，也是现实的问题，我保留置评。但如日本容许共匪在日设立贸易代表机构，任其公开活动，则共匪在日有此渗透活动之凭藉，阻碍日本反共政策之实行，其害甚大。故余以为贵国对于共匪此种要求，决不能予以许可。

“现在，本人再就昨今两天的谈话作一结论。

中日两国必须合作

“中华民国政府在大陆失败，播迁到了台湾，地位较弱，固不容讳言；而在日本除了有远见、有抱负的大政治家仍能了解台湾今日之重要性外，一般的人或已不甚重视。现在面谈中日合作，若仅就此观点而论，余甚感慨然，

“不过，我们须得知道：现在苏俄对亚洲，有两个最紧要的目标，一为消灭台湾，一为赤化日本。此二目标如能达到，则其统治亚洲即无问题。所以中、日两国，断无一个灭亡而另一个尚能存在的道理。故此两国家必须衷心合作，日本得到安定，中国又能反攻收复大陆，两国合作，方有真正的力量。

“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共同认定：

“第一、苏俄是日本与中国共同的敌人。

“第二、日本与中国一定要共同反共。

“因为中国大陆在苏俄控制之下，我国不反攻、不打倒共匪、不收复大陆，单靠日本的力量，对于苏俄是不够的；必须中国收复大陆，联合中国与日本的人力物力，共同对俄，才能成功。阁下之意以为如何？

“岸信介很同意这种看法。

收复大陆安定东亚

“蒋总统二次大战以后，本人有一深刻的感想，即法国在战争中失败，已投降德国，战争结束，法国地位很弱；而英国必须帮助法国恢复其地位，并竭力在联合国内抬高法国的地位，使之列为五强之一，这很可见英国政治家的远见和深算。我因此联想到了我们东亚——此次战争，日本失败，中日两个国家在亚洲是需要彼此扶助合作的；一个亡了，一个决不能存。故就我们此种关系，中国反攻大陆，日本在精神上、道义上、国际政治上、国内政策上均应予以协助；待大陆收复以后，我们的合作，才能真正达到对抗苏俄、安定东亚的目的。

“岸信介方才听到总统的话，我得到深刻的印象。此来亲聆总统高见，得益甚多。总统此时不可能亲自访日，希望今后中国有人——如张秘书长或其他要人——常来日本，俾日人增进了解。

“蒋总统阁下意见甚好，将来要请张秘书长来贵国答访。

“岸信介（起立告辞）

“蒋总统此次承见访，甚为感谢。请代候贵国天皇健康，并向大野（伴睦）、石井（光次郎）诸君致意。”

共匪对日渗透

为对于日本首相岸信介访华之答礼，中华民国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奉派为特使，于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六日赴日本访问。

张群以日本国宾身分，除谒见日本天皇之外，并曾与日本朝野颇多重要人士晤谈，他在访日期间，一直强调：“和大陆的贸易，乃是给予阴谋赤化日本的中国共产党以可乘之隙，会成为自由世界的祸根。”这个观点，被活用于在十月二日和岸信介发表的共同声明中，措词是这样的：“特使与首相并承认：日本经济之安定，系于对外贸易者甚大；然于其扩大对外贸易之际，应有注意勿使其阻碍与自由国家协调之必要。关于此点，双方见解亦已一致。”

此时，蒋总统手着为剖明苏联在亚洲侵略真相的“苏俄在中国”一书，在日本业经有日文译本发行，为有识者之所推重。蒋总统并在该书序言中提到：“他们所施于中国的政治、社会、心理战术，今日亦已施之于日本。”——藉以对日本之暴露于共产主义的威胁之下提出警告，并促使和自由阵营长远合作。

日商继续与匪勾搭

然而，为眼前利益所蔽而昧于察及大局的日本经济界，对于这样的警告则是未能听得进去。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日本钢铁代表团（团长八幡制铁公司常务董事稻山嘉宽，现任新日本制铁公司董事长）在北平缔结了总额二亿英镑的“钢铁五年贸易协定”，约定对共党政权大量供应战略物资的钢铁材料；继之，第四次“日中（共）民间贸易协定”也于三月五日在北平签订。

该“协定”中，再度列有设立“通商代表部”，并在“备忘录”中规定：“（一）对通商代表部所属人员之出入境给予方便，和优惠关税及以贸易活动为目的的旅行自由等特权。（二）准予悬挂共党政权之国旗”等项。

中华民国当即对于此一贸易协定提出抗议，并于三月十四日中止正在台北举行中的中、日贸易交涉，以及停止对日采购；同时于十七日向日本政府提出备忘录：“（一）日本政府声明：不承认中共，中共商务代表未有公务身分，不给予外交特权。（二）不准悬挂中共旗帜。”

爱知揆一谈话

日本政府虽曾一度拖延，但毕竟还是在四月九日由内阁官房长官（秘书长）爱知揆一发表谈话，承诺：“（一）日本政府现无承认中共意向。（二）对于民间通商代表部无承认其有公务地位的特权。（三）尊重日本和中华民国的关系及其他国际关系。（四）不承认中共之所谓在民间通商代表部有悬挂其国旗的权利。”于是，共党政权所觊觎的“制造既成事实以积累渐进”的目标，乃被一一打破。

此后不久的五月二日，便发生了“长崎扯旗事件”——就是有一个日本青年将悬挂在长崎市某百货公司的中共邮票剪纸展览会场中的“五星红旗”扯了下来。

于是，共党政权乃对日本政府对于此一事件之处理找上麻烦，断绝了对日贸易，盖为对于因中华民国抗议而使“民间贸易协定”之空洞化发泄怒火。

不过，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共党政权和苏联之间的关系正在趋于冷却；加以大陆上刚刚开始推行设立“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民间弥漫着不满气氛，以致共党政权简直无暇顾及对日本的贸易，乃属实情。

这个“大跃进”，遭遇了彻头彻尾的失败，使大陆人民堕入饥饿穷困的绝望深渊。另一方面，苏联和中共政权的矛盾，也因苏联于一九五九年六月片面通知由大陆撤退所有技术人员而进入了决定性的阶段。及至一九六○年，中共对苏联的批判乃极其盛行。

既已失去了苏联的后盾，而又内部问题严重的共党政权，乃复重新打算到要对日本接近。

池田勇人倾向共匪

一九六○年六月，岸信介内阁因修订“日美安保条约”导发国内政潮而总辞职。继任者池田勇人在关于对共党政权的关系方面表明：“以前进态度并保持弹性和对方打交道。”

于是，中共方面乃故示有所反应而由周恩来向日本提出：“政府协定、民间契约、个别照顾”的所谓“贸易三原则”。这是要使过去所进行的“民间贸易”升高到公式认可的地位，同时并由中共指定为其所中意的日本工商企业为“友好商社”从事贸易。这样诡谲地操纵着日本企业的竞争意识，实则是隐藏着制造日本国内分裂的策略。

然而扛着“所得倍增”旗号的池田勇人，则搭上了这个列车。

所谓“政治三原则”

一九六一年九月，由自民党亲共派领袖松村谦三和周恩来之间对于“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加以确认；并以此为基础，由高碕达之助与廖承志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九日签订了所谓“觉书（备忘录）贸易”（又取廖、高二人英文字头称之为“ＬＴ贸易”）。

所谓“政治三原则”，乃是：“（一）不敌视共党政权。（二）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三）不妨碍共党政权和日本关系正常化。”质言之，就是在强迫日本政府采取承认共党政权的路线；而池田内阁却不顾中华民国的抗议，对于“ＬＴ贸易”给予了解与支持。此外，日本方面的“日中（共）贸易促进会”等三个对共产集团的贸易团体，更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和中共方面的南汉宸签订了所谓“友好贸易”的“日中（共）贸易议定书”。而历时一年之后，贪图小利、接受指定的“友好商社”便超过了两百家。共党政权对于这些“友好商社”的活动严格考查，彻底控制，操纵其为渗透日本的工具。

共匪遂行对日渗透

另一方面，作为“ＬＴ贸易”共方窗口的廖承志，并担任了于一九六三年十月成立的所谓“中（共）日友好协会”的“会长”，不仅在经济上，并且在包括互派新闻记者在内的所谓“文化交流”名义之下，致力于对日本渗透的政治工作。

池田一意孤行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日，日本池田内阁批准仓敷螺萦公司对大陆输出分期付款的维尼龙工厂成套设备，决定由输出入银行给予二百万美元的融资周转。输出入银行乃是日本国家金融机构，利用到了这个机构，当然要被看作是超越了民间贸易范围的一种“经济援助”。

于是，中华民国政府便立即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停止进行；但池田勇人则仍然以“这是依循政经分离原则的贸易”为藉口，一意孤行。

继之于九月十九日，池田在招待美国赫斯特报系总编辑等人时，更约略透露了他的真心话。他说：“中共在三、五年内不会有变化；台湾的反攻大陆政策，没有依据，近乎幻想。”这是对中华民国内政的干涉，乃是一种侮辱。

池田昧于历史教训

因此，蒋总统于二十一日接见由东京来到台北的赫斯特报系人士时，便向他们作了驳斥池田的发言如次：

‘九一八事变以前，池田是在中国东北的一名低级官员。当时，日本军阀曾夸口说，他们只需要三师军队对付我们，在三星期内“就可使中国屈服”。但是那三星期变成一个更长的期间——变成一场自一九三一年一直进行到一九四五年的战争。

‘池田像一九三○年代初期的一些日本人士一样，预言非其所长。池田对于我们在战争结束后对其战败的人民所表现的以德报怨、宽大为怀的态度，似乎未有所悟。

‘自战争结束以来，日本由于美国的慷慨援助，已获得一种可观的经济成就。显然的，那种成就已使日本产生虚骄的自负心理。

‘遗憾的是，诸位未曾向池田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可能是：“当九一八事变时，你在何处与所作何事？”第二个问题是：“你们军方夸称将在三周内击败中国一节，不是真实的吗？还有，在那次行动中领导中国人民的不依然还是同一蒋介石吗？”这是池田原可从历史中获得的教训，但他并未领悟。’

中国召回驻日大使

就在这一天，中华民国召回驻日大使张厉生，明确表示对日本的抗议。

于是，社会舆论大为激愤。九月二十四日在立法院全体委员会议中便提出了：“对于日本经济援助共匪，政府应有不惜断绝邦交的决心”的强硬主张。

周鸿庆事件

正在这个当口，又发生了另外一个事件。

十月八日下午一时五十五分，外交部接到驻日大使馆一封特急密电，内容是这样的：

“台北外交部：（一）匪访日油压化机械代表团团员周鸿庆，于十月七日晨藉词散步，逃出旅馆（皇宫大饭店），乘街车拟赴我使馆，但因路途不明，转道逃经苏联大使馆要求庇护。日外务省以该员超过居留期限、违反日本出入国管理法为由，向苏联大使馆要求引渡。俄方曾一度拒绝，但至当晚终表同意，迄十月八日晨，将该员移交东京警视厅麻布警察署，现在该署扣押中。（二）周员原籍山东，现年四十四岁，此次来日，系担任译员工作，随该团曾赴大阪、名古屋、福冈、广岛、静冈、神奈川等地考察，原定十月七日离日，该员即在启程前乘隙逃出者。（三）本馆除嘱山东同乡会馈以果品，对记者要求会面，并向外务省正式要求外，谨先报请鉴察。”

这就是“周鸿庆事件”。

周鸿庆要逃出共党政权奴役之下的奴隶社会，投归自由中国的意志，是很明显的。

他于十月十四日、十五日，三度写信给中华民国旅日东京华侨总会会长周祥赓、日本华商贸易公会理事长薛本贵，表示：“今后务请尽力援助”；又在十月十六日，驻日大使馆一等秘书吴玉良（现任亚东关系协会秘书长）偕律师藤井五一郎并有日本入国管理局官员会同和他见面时，他当场表明“绝对不回大陆”，并将用中文书写的“请吴秘书代办入台湾手续”的便条一纸面交吴玉良。

于是，中华民国方面乃依据周鸿庆本人的意志向日本方面交涉引渡其人。

周鸿庆遭匪特胁迫

可是，受到共党政权压迫的日本，却想尽方法要把周鸿庆强制送回大陆，故而入国管理局乃让共党特务吴普文多次和周鸿庆见面，终于使他表示了“要回大陆”的态度。

但这个态度实则是被胁迫而并非出于周鸿庆的愿意。及至十月二十六日，日本政府下达强制送回大陆的命令，周鸿庆便拒绝进食，以示抗议。

这么一来，入国管理局便以给予“治疗”为藉口将周鸿庆移住医院，而他所住的病房则落入共党特务的彻底监视之下，使中华民国方面的人士根本无法接近；直至十一月底，周鸿庆受到共党特务八十七次的会谈，被强迫“学习”，加以洗脑。

中华民国外交部以及驻日本大使馆虽曾多次提出使周鸿庆和共党特务隔离的要求，但日本方面则置之不理，而终于在一九六四年元月九日将周鸿庆强制送回大陆。

日本政府媚共亲匪

在此之前，业已再三抗议的中华民国，乃即于当天发表严正声明：“日本政府媚共亲匪的态度，破坏了中日友谊。今后可能产生之后果，日本政府应负完全责任。”

‘我们要澄清日本的态度——究竟是已经完全倾向共匪？抑或是仍然保持其反共立场？我们外交部一月十日最后的一次声明，其在外交上的意义，实在就是对日本的一种“哀的美敦书”。……须知中日邦交的恶化，我们固然有若干不利的地方，而将来受害最大、尤其是将要自食其共匪颠覆扩张的恶果的——都是日本。’（注）

注：蒋总统-“巩固台湾与反攻大陆的要务”（一九六四一）

吉田书简

由于周鸿庆事件之发生，中华民国除准许在先业已召回国内的驻日大使张厉生辞职之外，同时并将大使馆高级职员差不多全部撤退回国。

中日关系，自恢复邦交以来还不到十二年，便面临了最大的危机。

当外交部发表声明的前后，有一百人以上的群众涌到位于台北市中山北路的日本大使馆，在围强上张贴反日标语；并有十多个人进入大使馆，破坏了玻璃和电话总机，有女性接线生曾受微伤。

吉田茂访华达成协议

使这个危机得以避开的人，乃是曾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他衔有现任首相池田勇人的密意于二月二十三日来华访问与蒋总统三度促膝交谈。

会谈结果，协议达成五项“中共对策要纲”，其内容要点如次：

“一、解放现在共产主义控制下之中国大陆民众，使其参加自由国家阵营。

“二、日、华两国应具体提携，藉使大陆民众离弃共产主义，并诱导之将共产主义自大陆驱逐。

“三、日本对反攻大陆予以精神上、道义上之支持。

“四、日本反对所谓两个中国之构想。

“五、日本与大陆之贸易，以民间贸易为限，避免给予政府援助。”

这个协议，是由该年四月四日的“吉田书简”（受信人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加以确认，重新明确表示日本政府对中华民国的友好态度，成为中日和约的补充文件。

此一文件，和在日本一般所传说的“吉田书简”内容完全不同，在这里须加以交待明白。

以此为转机，中、日关系遂得趋向于恢复。

六月十一日，曾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台湾省政府主席的魏道明被任命为驻日大使。

大平以外相身分访华

七月三日，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访问中华民国。大平是以现任外交负责人的身分，为公式说明日本外交方针，藉谋疏通中日双方的意见而来华。

蒋总统于七月四日上午十时四十五分在总统府接见大平正芳会谈。

“大平正芳早拟恭访中华民国，但一再拖延，至今始能实现。……天皇陛下特嘱代向总统致候，谨此转达。

“蒋总统天皇陛下政躬如何？请代为转达致候之意。

“大平新泻地震时，承蒙慰问，至为感激。谨代表日本政府及人民衷心之谢意。

“蒋总统往年余在高田联队时，周末常去新泻，昔日之长官及友人在该处者甚多，新泻为余之第二故乡，故对之特别关心。

日本应分担的任务

在经过上述寒喧之后，蒋总统与大平谈到了日本在亚洲应分担的任务如左：

“蒋总统东亚之问题，实乃共匪问题。共匪问题不解决，东亚即无安定和平之可言。日本经济虽然发达，但共匪问题如不解决，则其社会与经济基础随时将发生动摇。盼池田首项及日本之政治家悉心研究共匪问题。因中日两国不仅为近邻，而且利害与共；现韩国、越南、缅甸、印度均受共匪之威胁，对于此种局势，至希慎重注意。吾人乃亚洲国家，绝不能脱离亚洲，对亚洲之友邦，必须扶助合作，生死成败与共，日本为亚洲最富庶之大国，自应特别负起责任。目前，日本之经济虽不依靠大陆，但共匪问题解决之后，日本经济与我合作，非仅可获安定之繁荣，即前途之发展，亦未可限量。

“大平承蒙阐示有关东亚安定繁荣等重要问题之卓越正确见解，至深铭感，并完全同感。……亚洲必须为一自由之亚洲，绝不可沦为奴役之亚洲。……

“蒋总统……日本必须与亚洲各国同时共谋上进，不可先冀单谋一国之安定；日本对中国或对亚洲须有一具远见之中心政策。现亚洲之问题即共匪问题，如共匪不消灭，今后五至十年内，亚洲各国均有被赤化之危险。……共匪乃中、日两国共同之祸患，希转告日本池田首相及其政治家，日本今日既不能积极援助我国反攻大陆，消灭共匪，但至少亦不可助桀为虐，以增加我大陆人民痛苦，危害我反共力量。

“大平承蒙赐示宝贵真实之卓见，茅塞得开，至深铭感！总统阁下所示各节，均系基于多年之经验，启发甚多；遵当代为转达日本政治家，藉以促请其努力并注意。”

接着在当天下午七时半，再度会谈，大平说明日本政府的见解是这样的：

“大平日本愿见整个中国在自由世界之一边，换言之，日本甚盼中华民国反攻复国之成功。日本在本质上是反共的，……对中华民国作精神及道义上之支持，自属日本所乐为者。日本过去作为，容有不为中华民国所喜者，但亦有各种不得已之原因，并非故意如此，今后当更注意。”

大平是确认了日本当取“自由”“反共”的立场，并承认过去在政策上有欠妥当，更对中华民国之反攻大陆明确地给予支持。

谁知在这次会谈的八年之后，竟会对中华民国背信，而向共产政权匍伏参拜，真令人想像不到那是从大平嘴里所说出来的话！

佐藤内阁

成立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九日的佐藤荣作内阁和其前任池田内阁有所不同，中、日之间保持了颇为顺利的关系。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日本和中华民国签署了贷给一亿五千万美元金额的日圆借款契约；又于一九六六年十月在台湾的第二大都市-高雄开设了总领事馆。

增进交流关系

在这个期间，中华民国外交部长沈昌焕于一九六五年八月、副总统严家淦（现任总统）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先后访问日本，增进交流关系。

佐藤荣作首相来访中华民国，是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

九月八日上午十时半，蒋总统与佐藤荣作在总统府会谈，首先就亚洲问题、美国问题交换了意见。

“蒋总统日本之前辈，了解中国较深，而后一代人士则急于功利，眼光短浅者居多，甚为可惜。现在所谓亚洲问题，不外乎共匪问题。但西方人士不了解东方，更不了解中国，因循姑息，遂致养成今日之局面。吾人认为：解决共匪问题，绝非难事。日本乃亚洲之支柱，为亚洲之安全，日本有主张之义务。共匪之存在，不仅为妨害中国，抑亦威胁日本。

“佐藤荣作日本在世界上曾扮演丑恶角色，所作所为诸多错误，今后自不再如此。”

继之，谈到美国的亚洲政策，并涉及美国对于大陆共党政权的核子试爆评价过小之后，交谈如次：

“蒋总统美国人总认为共匪政权是一个整体，此是绝大错误。须知共匪政权与中国七亿人民是截然两事；中国历史背景、传统文化如何能与共匪相容？中国人民无一不是反共的，只要我们吊民伐罪，大陆人民都会揭竿而起。……目前，匪俄关系之坏，已达极点。苏俄内心愿见毛匪之早日灭亡；吾人此际反攻，不必恐惧苏俄之驰援，至少我军收复中国南部，决不致引起苏俄之介入。美国总以为中华民国如实行反攻，必将牵涉美国，美国不愿卷入漩涡，于是乃有两个中国之想法，藉以苟安于一时，殊不知两个中国办法，固为我所绝对反对，而亦非共匪所能接受，仅系一种幻想而已。至于我政府之反攻，不但不须美国之人力援助，且美国果介入，是授共匪以口实，反而对我不利，盖中国事自可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也。”

共匪为祸源应及早消灭

当天下午八时，在台北市郊外阳明山中山楼举行晚宴并继续会谈，佐藤荣作提到了日本防卫问题。

“蒋总统国家必须有自我防卫之力量。在目前之情况下，美国虽可依据安保条约保卫日本，但共匪制造核子武器成功时，美国自顾不暇，日本危矣！此点应密切注意。又日本必须注意北方被俄侵占之领土（千页群岛），苏俄与美国不同，有领土野心，恐甚难放手将四个岛屿交还日本耳。

“佐藤闻匪、苏关系恶化，鸿沟日深，甚愿此项消息确实可信。日前，日本三木外相（三木武夫现任日本首相）访苏时，柯锡金曾谓共匪已无可救药。

“蒋总统阁下深知苏俄有领土野心，而共匪则野心更大，举凡韩国、缅甸等邻接国家，无一非其扩张之对象，此一祸源如不及早消灭，自由世界何以生存？”

蒋经国访日

在这次佐藤访华两个月之后的十一月十七日，蒋总统的长公子国防部长蒋经国（现任行政院长）接受佐藤邀请，前往日本作公式访问。

蒋经国部长除谒见天皇之外，并曾与佐藤荣作及日本政界首脑会谈，说明“中华民国光复大陆的决心不变”；并促请对动辄屈服于共党政府的日本气氛须有所觉醒。

可是，虽则有这样的一些交流，但中、日关系的阴影却逐渐浓厚。

由于所谓“文化大革命”而陷入混乱的共党政权，自一九六九年四月的“九全大会”之后，为了要把内部危机转嫁到外面去，而对民主国家的渗透统战活动开始加强。

日本企业界的短视

一九七○年四月十五日，周恩来对日人提出其所谓“四条件”，表明了是凡和中华民国有交易关系的工商企业，不许与大陆往来；而一部分被大陆宣传工作所惑的日本大众传播业界，更在这个当口推波助澜、鼓吹对大陆接近论调，以牵制佐藤内阁。

为此，中华民国乃于七月二十三日发表：对于凡接受周恩来“四条件”的日本企业，拒绝与其贸易往来。这是迫使日本企业对于循守正义、抑或屈于胁迫，作一明确抉择。

然而，昧于眼前小利的日本企业，慌忙接受周恩来条件而表明自中华民国撤退的颇为不少。这从在后来有相当多的企业又回过头来哭丧着脸希望和中华民国重开贸易关系的情形看来，该可以明了他们是多么样的轻举妄动。

可是，如此向共党政权献昧的“土下座风潮”，和“不要搭迟了巴士”的焦急感，业已流行到日本的各行各业之中。（译注：“土下座”为跪坐于地之意，日本有识之士讥评逢迎共匪的贸易为“土下座贸易”。）

共匪暴虐残杀

中国共产党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成立了僭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伪政权，将北平改称“北京”，作为“首都”。

所谓“主席”，由毛泽东自任，并以朱德、刘少奇等六人为“副主席”；伪“政务院”则由周恩来任“总理”并兼“外交部长”，伪“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毛泽东自兼。

‘共产匪徒为了贪得无餍地建立它的独裁政权，毫不犹豫地用刀剑和饥饿的方式，使中国大陆上亿万的人民剥削了自由，完全被其奴役，……屠杀了四千万人口。’（注一）

高压统治的过程

共产党骑在人民的头上，肆行其高压统治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自一九四九年共党政权诞生到一九五五年，是所谓“社会镇反斗争”（镇压“反革命”）阶段。

‘当一九五○年中共窃踞大陆时，其残酷统治政策，激起人民之普遍愤怒和反抗。在短短的时间内，愤怒的人民汇合遗留国军及地方团队，形成庞大的游击武力。据当时统计，人数达一百六十万。是年冬，中共参加韩战，彼等为巩固其残酷之统治，施行所谓“镇压反革命运动”，予我游击部队以严重打击。’（注二）

由于这次的镇压，遗留在大陆上的国民党党员以及反共力量被大肆屠戮。

又在这个时期的一九五○年六月颁布其所谓“土地改革法”，实施“土改”。

这个暴政，打着将地主的土地分配给佃农与小农的旗号，而实则是在地方社会掀起阶级斗争。

在实施“土改”的第一个阶段，提出“穷人翻身”的口号，狂吼“打威风”，对地方上有声望的士绅发动批判，并予以逮捕。第二个阶段为“划阶级”，将农民和地主划分为许多等级，对地主或予杀害，或予拘禁。第三的阶段叫做“毁契约”，发动农民退租毁约，剥夺地主的权利。

榨取农产输俄抵债

像这样将地主悉数清除之后，乃进入第四阶段——组成“农业合作社”，由共产党派其干部来担任“合作社社长”，控制农民，使之成为共产党的生产工具，并榨取其劳动所获的农产品。

榨取的农产品，主要是对苏联输出以抵偿购入武器等的价款。其对苏输出量为：一九四九年九十万吨（八千万美元），五○年三百万吨，五一年三百六十万吨，五二年四百五十万吨，五三年达六百万吨。此外，为换取外汇，对东南亚方面也有大量的输出。于是乃使农民无论怎么样地辛苦劳动，但总归是自己得不到果腹的“饥饿输出”。

‘共匪以阶级斗争挑拨人民与人民之间矛盾，他就在这矛盾和斗争的中间扩张其暴力，建立其对于人民的控制。大陆上的同胞，在俄帝和共匪双重压迫和欺骗之下，无论任何阶级人民，皆已一律陷入奴隶牛马、痛苦无告的境地。所以我们大陆全体人民与人民之间都是一贫如洗，真已变成了“赤贫”，再无阶级可分；所以人民的内部亦再没有什么矛盾可言。

‘大陆人民今日只有一个矛盾，就是与共匪势不两立的一个敌对矛盾；他们今日也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中华民国政府支持他们的反共抗暴运动，恢复他们的自由，解决他们与共匪敌对的矛盾。’（注三）

共匪公布的杀人数字

单在此一“社会镇反斗争”中的牺牲者，便超过了五百万人。

‘我在下面只举出共党自己已经公布过的两套数字：

‘第一套数字，是根据各地共党军政委员会在一九五一年十月初所作的正式公布。北平政权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与一九五○年十月一日之间所清算的“反革命分子”，为数达一百一十八万五千人。

‘第二套数字，系从四种共党机关报纸所发表的新闻中统计得来。这四种报纸，是北平的“人民日报”，上海的“解放日报”，广州的“南方日报”和汉口的“长江日报”。在一九五一年二月与一九五二年二月之间，它们所发表被清算的非共人士，共为三百八十二万五千八百三十九人。这与第一套数字合计，共党自己承认的被屠杀人数，已在五百万以上。’（注四）

共党暴政的第二阶段，是自一九五五年至五七年，通称“肃反斗争”阶段。在“三大改造运动”的名义之下，对于不仅是农业，而且包括私营工商业及手工业，都加以“改造”，即为收归所谓“生产大队”所有。

“鸣放”转成大整肃

于是，农民和工商业界当然都大为不满，起而反抗，加上又受到匈牙利抗暴运动发生（一九五六年十月）的刺激，新疆、西藏、青海等地都发生了反共抗暴行动。至此，深恐这个影响会波及到整个大陆的共产党，乃一转而倡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鸣放运动”，要求人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于是，对于共产党的批判与不满言论，充满了整个大陆。

等待着这个情势出现，共产党却又一转将这些不满分子扣上“右派”的帽子，再进行其腥风血雨的大整肃。

‘共匪叫知识分子和人民放胆批评伪政权，但批评的结果，使共匪感到了恐慌，而不得不撤销其言论自由的虚伪诺言，立刻发动所谓“整风运动”和“反右派运动”，接着又是加紧残害和压迫。’（注五）

在这第二阶段，被逮捕、处死、劳改的总人数达二百三十万四千人，而共产党干部、党员之被下放者，也达三百二十三万八千人。

注一：蒋总统-“共党是人类最大的敌人”（一九六一.十二）

注二、四：蒋总统-“答美国新闻及世界报导书面询问”（一九五二.六）

注三：蒋总统-“反攻复国的基本条件和当前准备工作的重点”（一九五七.三）

注五：蒋总统-“答美国ＮＢＣ电视记者访问”（一九五八.五）

人民受尽摧残

第三阶段，是自一九五八年以后通称“三面红旗”的阶段。

“人民公社”

在这个时期，扛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旗号。而迫使人民生活堕入痛苦深渊的，乃是“人民公社”。

最初一个“人民公社”，在一九五八年四月设立于河南省遂平县；及至年底，各省农村共组成了二万六千五百七十八个公社。同时在城市也开始设立，至一九五九年七月底，达一千○六十四个公社。

“人民公社”是合作社（生产组织）和地方行政机关（政治组织）的一体化，控制了农业、工业、商业、教育、军事一切机能，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点：

一、生活集体化没收人民一切财产，接连家屋，打通墙壁，使家族解体，男、女分别编住大房间，整天自劳动到休息都由共党干部统一号令指挥。

二、组织军事化全社社员按军事体制编为“生产队”，规定男子二十五岁至五十岁皆为民兵，命令从事生产劳动；妇女则编为“煮饭组”、“制鞋组”、“下田组”、“缝纫组”等。

三、生产战斗化打出“挑灯夜战”、“扎营在田头”等口号，延长作业时间自清晨至深夜，在“战斗化”的强迫之下，图景冲锋。

其后，人民公社逐渐扩大，所谓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都须参加公社组织。

“人民公社”的最大问题，是根本破坏了中国传统的家庭制度，把每一个人都赶进了强制性的集中营中过活。

‘中国人民所信守之伦理法则，以仁爱与和平为中心，以家族制度为基础。中共对人民之压迫，今已进入其拆散人民家族组织之残酷暴虐之顶点。吾人深信：“人民公社”运动乃是中共自掘其坟墓，同时亦即为人民反共革命之温床，共产主义自中国消灭之开端，即在于此。’（注）

“大跃进”

又在“大跃进”号令之下所进行的“全民大炼钢”，是在一九五八年。这是用手制的土高炉炼钢，民间任何铁器都被搜刮出来当原料，乃至埋在坟墓里的棺材也被挖出来做燃料，而不用说，又是归于失败。

“大跃进”的结果，是造成全国规模的“大破坏”。人民的不满越发高涨，都失去了劳动意欲，生产一落千丈，终于使共党首脑部也不得不承认做得太过分；于是毛泽东乃被迫于一九五九年四月将伪“国家主席”让给刘少奇。不过，毛泽东的独裁却并未因此而结束，反之其内部的夺权斗争更为激烈，又使人民受到更大的痛苦。

一九五九年三月，共产党又命令学生们发动了“上山、下田、进工厂”的运动，将学生赶往农村和工厂，妄想扭转过去的失败局面，但还是归于失败。而且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华南地区发生了百年来所未曾有的大水灾，灾民二千四百余万，饿死者在三百万以上。

翌年～一九六○年，饥荒遍及全国，各地人民公社纷纷发生抢公粮、杀共干事件，造成了出动共军四处镇压的状态。

及至一九六二年五月，更发生为求食和投奔自由的大逃亡潮。当时，不顾生死冲出铁幕、由广东逃往香港的难民，日以万计。

搞到这样的程度，尽管是共产党也不得不承认其“人民公社”的失败，而自一九六三年至六八年着手修正。

可是，自一九六九年三月左右开始，各地农村公社又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特别拿山西省昔阳县荒地的“大寨公社”当作“模范”，再度向全国推行。

如上所述自一九五八年开始的第三阶段暴政，就是这样地夺去了二千万人以上的生命，而又归于失败。

“劳改”

助长这种暴政的，乃是共产党的“恐怖统治”。

最大的“恐怖”，就是“劳改”。凡不满分子，都被送往强行“劳动改造”、“思想改造”，使人人害怕“下放”；只要是触犯了共党干部的不悦，就会不经法院审判，马上被扣上“反动”、“特务”、“走狗”等等的帽子，下放到边远地区的劳动场，穿上劳改字号的衣服，每天劳动十三小时，以稻草代替被褥，以菜根、甘蔗粉、蕃薯藤糕等代替食粮。

这种“劳改”，特别是以知识分子为对象，有一时期曾达五千万人之多，现在还经常有二千万人左右被强迫劳动中。

“文革”

继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不断的失败之后，而还要再掀起的运动，就是“文化大革命”。它的目的，是要彻底消灭和共产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的中国传统文化，妄图染红中国的民族精神；同时也是在共产党内利用之为夺权斗争的一种手段，而尤其是神化毛泽东的加工、总结。

最初的斗争，是由姚文元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批判历史家吴唅（匪伪北京市副市长）所著“海瑞罢官”开始；继之，吴唅和邓拓（匪党北京市党委书记）、廖沫沙（匪伪北京市委统战部长）所谓“三家村”集团成为攻击对象，被批判为“亲国民党、崇美、反共”、“礼赞孔子”和“走资产阶级的学术路线”。

接着，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北平“解放军报”的社论中，出现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名词；而在后来被改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五月十六日，毛泽东以“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发布命令，在“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之下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和江青负责，于是，“文化大革命”的腥风血雨便狂卷了整个中国大陆。

注：蒋总统-“会见巴西记者”（一九六○.六）

从文革到批孔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最初是打着“破四旧，立四新（文化、思想、风俗、习惯）”的口号，进而显露出正面否定中华民族历史遗产和现代文化思潮的立场。

不过，在毛泽东心意中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打倒党内的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当权派”。

当时，共党组织、共青团、工会、妇联会等团体都被“当权派”所掌握，毛泽东、江青、林彪一派没有群众组织支持，如果不能将“当权派”打倒，则毛泽东本身的地位都会受到威胁。

毛泽东等人为了对抗“当权派”所掌握的群众组织，乃制造出“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以“反右派斗争”为名，指示如左：

一、自六月起，各级学校“停课闹革命”。

二、废除考试入学制度，改用选拔推荐办法。

三、号召青少年“敢想、敢说、敢做、敢革命”、“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

四、马列主义千条万条，祇有一条——“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五、实行“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大串联”。

于是，北平的大、中学校纷纷出现了“红旗小组”、“战斗小组”等组织，以共党高级干部和其所谓“红五类”（工、农、干部、军人、复员军人）子弟为主体而组成。

在自八月一日到十二日共党所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中，这些“红卫兵”组织被承认为“合法团体”，并由林彪担任“总司令”，贺龙为“参谋长”，周恩来为“顾问”。

极度的破坏活动

“红卫兵”因之乃得在“拥护毛泽东”的口号之下，肆行其达于极度的破坏活动。

‘毛泽东对于你们这一代从党政军领导干部到党员团员及其所谓工农兵群众，根本上都不敢相信，认为都已不可靠了；所以他不得不寄望下一代无知的孩子们组训“红卫兵”，来保卫他独夫暴政、生杀予夺的淫威特权。’（注一）

‘大陆上所有青少年，都成了毛贼毁灭的对象，亦成了毁灭其被毁灭者的工具！知识分子更成了毛贼的刍狗！中华民族所有文明也都成了瓦砾余烬的废墟。

‘大批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教授学者，都被掌掴、被脚踢、被剥光、戴纸帽、挂纸牌牵着游街血斗——极尽其侮辱惨害之后，迫使自杀。’（注二）

“红卫兵”的批斗对象，及于共党当权派高干刘少奇、邓小平乃至朱德、陈云、罗瑞卿、陆定一等人，甚至在后来连“红卫兵参谋长”贺龙也成为被斗者之一。

一九六七年元旦，毛林派透过“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对红卫兵、知识分子、机关干部发出号召：“走向工厂、农村，与工农联合，彻底摧毁刘邓派主要阵地。”于是首先便有王洪文等在上海对反毛派开始全面发动总攻击，而且瞬即扩展到各大、中城市。五月以后，总攻击形成武斗局面，六、七月间达到斗争的最高潮。到了十月，共党中央对“红卫兵”发出返回原地的命令之后，风暴才稍见压抑下去。

林彪的下场

因“文化大革命”而抬头的人，乃是林彪。他一手控制了“国务院”，并伸展其所属第四野战军一系势力，在整个大陆二十九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中独占了十三人，而各“军区司令员”也多属于他的直系；以致林彪乃得在一九七○年四月的共党“九全大会”中取得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

这么一来，再度感觉到威胁其地位和生存的毛泽东，乃一转而将攻击的矛头指向林彪。结果，据共党对外发表：林彪于一九七一年九月“企图逃出大陆，飞机坠毁。”乃与其妻叶群及黄永胜（匪军参谋总长）、吴法宪（匪空军司令员）、李作鹏（匪海军政委）等人同被消灭。

此后，毛泽东更谋肃清刘少奇及林彪的残党，以巩固其个人在党内的独裁地位；但在共党内部围绕着权力的明争暗斗，则反覆出现，永无止境。

而且“文化大革命”更演进到对于孔子也发动了批判。

汉奸独裁的罪孽

‘毛贼的批孔扬秦，不止是对民族文化的诬篾毁灭，而是在酝酿并激起对大陆同胞生存生活“新文革”之巨变；而更是对民族道德、民族命脉的悍然斩绝！共匪原本企图掩饰其汉奸的独裁的本质，现在却不得不赤裸裸地供认它汉奸的、独裁的罪孽。’（注三）

现在，中华民国的反攻复国的指标，就是在如何复兴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与历史，并拯救在大陆共产政权之下受苦难的人民。

‘要知道我们今日对共匪的斗争，乃是文化与思想的斗争，亦即精神与物质、道德与罪恶、自由与奴役、人性与兽性、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中正耿耿衷心所惟一切望者，就是如何保卫我们伦理道德，如何复兴我们文化历史，务使三民主义的体系，真能随反共之进展而笃行实践；三民主义的本质，乃能由复国之成功而发扬光大！’（注四）

注一：蒋总统-“中华民国五十五年国庆纪念前夕告中共党人书”（一九六六.十）

注二：蒋总统-“中华民国五十六年青年节告全国青年书”（一九六七.三）

注三：蒋总统-“中华民国六十三年元旦告全国同胞书”（一九七四）

注四：蒋总统-“对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致词”（一九六○.二）

联合国失其意义

一九七一年十月，中华民国退出了联合国。因为联合国犯下了背弃维持世界和平与正义的原有理想、而容许奴役大陆人民、和在韩国进行侵略战争的中共政权参加的过错。

我为创始者之一

中华民国原本是联合国的创始者，并且在中华民国宪法第一四一条明定：“中华民国之外交，……尊重条约及联合国宪章，……确保世界和平。”世界上在本国宪法中载入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国家，是以中华民国为第一。

第一次大战之后，在这个世界最初出现的国际组织-“国际联合会”，当时是如何地缺乏力量，可以从她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对于日本军阀侵略中国之丝毫不能制止看得很明白。中国国民党有鉴于此，故而在一九三八年三月所决定的“抗战建国纲领”中便订有“对于国际和平机构充实其权威”的条文，目的在呼吁各国确立新的世界组织。

这个构想，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九日于莫斯科所举行的美、英、俄三国外长会议中臻于具体化。十月三十日，中国和美、英、苏共同发表“四国宣言”，宣告：“四国承认有于最早可能实现之日期内成立一普遍国际组织之必要，依据以各爱好和平国家之主权平等原则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翌年～一九四四年十月，乃由四国代表起草为联合国宪章之基础的“战后国际组织草案”。

及至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六月之间，举行了经美、英、苏、中四国发起、而有五十个国家参加的旧金山会议，才终于正式成立了联合国。当时中华民国组成一个超党派的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首席代表为外交部长宋子文，代表有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胡适以及吴贻芳（女教育家）、李璜（青年党）、张君励（民社党）、董必武（共产党）、胡霖（大公报）等人。

此次会议，中国和美、英、法、苏四国同被选出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担当了世界和平的重要责任。

共产集团企图排除我国

至于共产国家以这个联合国为舞台策动其所谓“中国代表权问题”的阴谋，则是始于一九四九年。

在这一年十一月的第四次大会中，苏联提出排除中华民国而将议席给予共党政权的议案，但于翌年元月在安全理事会被否决。而自此之后，苏联以及印度、阿尔巴尼亚等国家在每年的大会中都在进行其企图打击中华民国的阴谋。

另一方面，中华民国政府也向一九四九年的第四届大会控诉苏联“违反中苏友好条约、侵占东北地区、支持中共叛乱”。此一控诉案，在一九五二年二月的第六届大会获得通过，苏联的背信行为于是乃受到国际责难。

‘联合国的存续于今五年，然而这新世界的希望黯淡如昔，这是本人所深引以为憾的。……

‘世界各地的共产侵略是整个而不可分的，欧洲许多国家已为所害，而亚洲则以我国首当其冲。……中国所受的侵略尚未解脱，而大韩民国又成另一牺牲品（韩战），其他如越南等国家所受侵略阴影的威胁，也日益增长。

‘联合国各爱好和平的会员国，值此严重关头，必须下更大的决心，来护卫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更须在联合国之下，设置有充分能力的警察力量，俾便随时随地遇有侵略发生，即可加以扑灭。

‘我中国人民一贯支持联合国，始终不渝，刻正以全力抵御企图奴役我们并摧毁联合国的暴力。……’（注一）

在联合国再三提出的排除中华民国议案，虽则每次都被否决，但其表决票数的差距，却是一次比一次接近，盖和中共政权有勾搭的新兴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参加联合国者日多，以及早先参加国家之承认中共政权者也逐渐加增，乃为其原因所在。

‘主张联合国容纳共匪者，除少数明显系共党工具者外，大多均系对共匪及整个共产党集团的本质缺乏认识，而误以为姑息政策可以导致和平。本人同时也深信——多数自由国家对此已有认识，决不会容许共匪入联合国的。我们要知道，共匪混入联合国，受害者决不限于中华民国，即联合国本身亦失其存在意义。’（注二）

蒋总统决定基本方针

对于将来迟早会有最坏的情况到来，蒋总统也已经有了精神上的准备，故而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举行的七届八中全会席上，曾经有过这样的讲词：

‘记得民国四十年的时候，我政府派在联合国的蒋（廷黻）代表问我：“万一共匪羼入联合国，则我们将采取何种态度？”当时，我即答复他说：“我们的复国基础有二～～在国际上、法律地位的凭藉，则为联合国；在内正上，则为复兴的基地台湾。这两个基础，皆甚重要，但其根本，还是在台湾。如两者不可得兼，则我宁可放弃联合国，而确保台湾。这是我政府到了最后不得已时之唯一政策。’

‘今日我们反攻复国的基础业已建立，相信自由世界对于我们在反共阵营上的地位和力量，自不敢估计太低或熟视无睹。万一国际上不顾一切正义和公理的原则，而竟让共匪羼入联合国，我们仍照原定政策，自必毅然退出，以发扬我民族的正义，保留我独立的国格。这是我们始终一贯的方针，今后对联合国进退的政策，亦必依据这一基本方针，来处理一切问题。’

注一：蒋总统-“联合国五周年纪念文告”（一九五○十）

注二：蒋总统-“接见美国新闻记者谈话”（一九六一十）

庄敬自强

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自一九六一年第十六届大会开始，采取由美国提案“视为重要事项”的对抗办法，即非经三分之二多数赞成票，不得改变代表权。可是，形势则显然逐渐趋向于中华民国不利。及至一九六五年的第二十届大会，阿尔巴尼亚“排除中华民国，纳入中共政权”的提案，竟获得赞否同为四十七票（弃权二十票）的表决结果。

尼克森的暧昧态度

一九六九年元月，尼克森就任美国总统之际表示：“对中国大陆的政策，将为美国新的外交政策的主要部分。”继之，又于二月指示美国国家安全会议——重行研讨美国对华政策。

当时，在美国有由“联合国协会”所组成名为“罗沙小组”等游说组织，这也可以说是一个亲共分子的发言机构，他们向尼克森提出：“两个中国都应该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以及“取销对大陆禁运，给予大陆援助，和大陆进行贸易、文化交流”等建议。

尼克森的对大陆接近，是有意耍出的手段。他在一九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和访美的罗马尼亚总统希奥塞古会晤时，便曾故意提到中共政权的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名称。

美国这种暧昧态度，在联合国也起了反射作用。一九七○年第二十五次大会，阿尔巴尼亚的提案竟然出现五十一票对四十九票的多数的表决结果，虽则由于视为“重要事项”而使代表权未发生变动，但从上述表决数字可见形势业已逆转。

一九七一年四月六日，在日本名古屋参加世界桌球冠军赛的美国代表队突然接到中共方面邀赴大陆访问的招待函，此即所谓“乒乓外交”。接着，尼克森于六月十日宣布解除历时二十一年的对共产政权的禁运，并且派遣总统特别助理季辛吉于七月九日至十一日之间前往大陆，会晤周恩来，使全世界为之惊愕。

蒋总统勉励国人

在这样的国际逆境之中，蒋总统于六月十五日对中华民国国民发表“庄敬自强”的文告如次：

‘古人常言：“天下之事，在乎人为，决不可以一时之波澜，遂自毁其壮志。”……

‘如果今天看到某些国家短视近利，违反理性，篾视正义，侈言和平而实在葬送和平的作为，吾人即为其所激怒，或为其所沮丧，那就正是在“自毁其壮志！”

‘只要大家能够庄敬自强，处变不惊，慎谋能断，坚持国家及国民独立不挠之精神，那就没有经不起的考验。……’（注）

联合国第二十六次大会，于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开幕，阿尔巴尼亚等国又提出了“邀请中共加入，排除中华民国”的议案。

国际情势的变化，业已使得视为重要事项的对抗手段都发生危险，于是美国乃对于共党政权之加入与否姑且不问，而但为阻止中华民国之被排除，提出排除中华民国议席应视为重要事项的议案，希望在大会获得通过。日本当时参加连署为共同提案国，也表现了援助中华民国的态度。

我国退出联合国

可是，在十月二十五日的大会中，美国提案经表决结果，赞成五十五票，反对五十九票，弃权十五票，仅以极少的差距未能获得多数而失败。

中华民国代表、外交部长周书楷在上述议案表决结果之后立即声明：“联合国已自行破坏了宪章，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遂即率领代表团走出会场。此时在纽约是二十五日下午十一时九分，台北时间为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时九分。

其后，大会以七十六票对三十五票通过了“容纳中共政权，排除中华民国”的提案，美国和日本都投了反对票。

翌日～二十六日，蒋总统发表了“为联合国通过非法决议告全国同胞书”，内容大致如次：

‘本届联合国大会竟自毁宪章的宗旨与原则，置公理正义于不顾，可耻的向邪恶低头，卑怯的向暴力屈服，当年我国所参与艰辛缔造的联合国，今天业已成为罪恶的渊薮。历史将能证明——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的声明，实际上就是联合国毁灭的宣告。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坚持正义，爱好和平。现在，我国虽已退出我们所参与艰辛缔造的联合国，但是我们今后在国际社会中必当仍以联合国宪章之宗旨与原则为准绳，继续为维护国际间公理正义与世界和平安全而勇敢奋斗。

中国绝不动摇妥协

‘在此，我要严正声明：恢复大陆七亿同胞的人权自由，乃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意愿，乃是我们决不改变的国家目标和必须完成的神圣责任。

‘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对于主权的行使，决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扰；无论国际形势发生任何变化，我们将不惜任何牺牲，从事不屈不挠的奋斗，绝对不动摇！不妥协！’

这篇文告，美国众议院以其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献，于十二月十日的议事录中决定列入正式纪录。

联合国在中华民国退出之后，变质为运动多数纵横捭阖的狂暴跋扈集团，已丧失原有机能。一九七五年三月，蒋夫人发表一篇以“不要说它，但是我们要说”为题的论文，予以批判：“联合国的一批会员国，乃可以听任感情驱使，……采取集体行动，再度嘲弄联合国。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极成功地敲响了这个国际和平组织的丧钟。”

注：蒋总统-“我们国家的立场和国民的精神”（一九七一.六）

必能光复大陆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美国总统尼克森访问大陆，和毛泽东、周恩来会晤，并在上海和周恩来发表“共同声明”，表现出对大陆接近的意向。

美国这样的意向，刺激了日本的焦灼感，在七月六日继佐藤荣作出任首相的田中角荣便急忙图谋和大陆接近。

田中接受周匪条件

七月二十四日，田中出席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的“日、中（共）国交正常化协议会”，宣称和中共政权“关系正常化”的时机成熟，并表示理解周恩来的“三原则”。所谓“三原则”，乃是：“（一）以共党政权为代表中国的唯一政府。（二）台湾省为其政权的一部分。（三）废止中、日和约。”田中在这个时点表示接受“三原则”，等于是在外交上对共党政权投降。

在此之先的七月二十日，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蒋经国、外交部部长沈昌焕对日本提出“不要为毛共政治阴谋所乘”的警告；二十五日，驻日大使彭孟缉与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会面，告以反对日本与中共政权进行所谓“国交正常化”；又在八月二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宝树因访问韩国归途便经日本，亦拟劝说自民等政要，促其变更意图。

八月八日，蒋经国院长发表谈话，严峻促使日本政府反省。谈话内容如左：

“最近，日本政府首长一再声称将与共匪进行所谓国交正常化，并表示日本与共匪关系正常化时，将与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日本首相及外相并计划于九月间访问大陆匪区。此乃对于中华民国政府与人民最不友好之态度。

“中华民国政府乃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保有中国大陆地区之主权，且三十余年来，对台、澎、金、马及其他领土有效行使主权。凡此，决不因其他国家采取之行动而受任何影响。我政府自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卫国家主权及人民利益。

“兹警告日本政府：停止一切损害两国邦交与危害亚太地区和平安全之行动，以免造成历史上之重大错误。”

八月三十一日，田中角荣飞赴夏威夷，与尼克森会晤，为其本人之将赴大陆访问希望取得美国方面的谅解。

另一方面，日本自民党的“日、中（共）国交正常化协议会”于九月四日议决了“日中（共）国交正常化基本方针”，其中有：“在交涉之际，应使和中华民国之向来关系（包括外交关系）得以继续。”此一决议，经自民党总务会于当天审议通过，并确认其为党的决定，基以与共党政权进行谈判。

九月十七日，以日本政府特使身分来华的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向总统府资政张群表示：“自民党的决议，对日本政府也有约束力。”

蒋院长提出警告

蒋经国院长复对椎名提出警告：“日本政府必须重视中日和约的尊严与保持日本的国际信用，不得片面撕毁这个和约。……希望日本的政治家将眼光放远、放大，明辨敌友、利害，千万不可蹈过去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军阀之覆辙，又铸成历史性的错误，再度伤害中国人民，并陷日本民族本身于另一劫运。”

可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内阁秘书长）二阶堂进却于九月二十日宣称：椎名访华结果，对于田中访问大陆并无影响。二十五日，田中与大平照预定的安排前往北平，可知他们根本就没有遵守党的决议的意向。

二十九日上午七时，外交部政务次长杨西昆接见日本驻华大使宇山厚，宇山说出田中与周恩来定在当天签署的“共同声明”的内容以及日本即与共党政权建交之事；同时并将田中角荣“感谢蒋总统在战后长时期对于日本的好意”的传言转达；又说大平正芳将在“共同声明”宣布之后发表“日、华和平条约（中日和约）即行终止”的谈话。

一如预定计划——日本和共党政权的“共同声明”在当天上午发表，大平便于下午宣布了他的谈话。

中国声明对日断交

当天深夜，中华民国外交部声明对日本断交如次：

“……今田中政府竟片面背弃中日和约，承认中共匪伪政权而与中华民国政府断交，不仅忘恩负义，为日本民族之耻，实亦违反日本最大多数国民之意愿，且更严重损害中、日两国与整个亚洲之远大利益。

“中华民国政府深信：田中政府的错误政策，并不影响日本国民对蒋总统深恩厚德的感谢与怀念；我政府对所有日本反共民主人士仍将继续保持友谊。”

中、日关系八十年的历史，乃是在错误之上更加错误的历史。

尽管是这样，但中、日两民族的联系，还是越过了重重错误，绵延不辍。

在这八十年中，两国之间有过许多问题，但大致可以区分为两个时期：

一个是日本军阀侵略中国的阶段；一个是日本对自由中国抑或共产中国抉择的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国民切实憬悟了第一个阶段的错误，希望和自由中国真正地“关系正常化”。

可是，在这第二个阶段，日本又犯下了选择共产中国的错误。盖颇多日本人还没有察觉到：日本民族要和中国民族达到真正的“关系正常化”，而以共党政权为对手，则只是在“缘木求鱼”。

期待真正的正常化

将来的历史必然会证明——在中国民族居住的土地上，共产主义是绝不可能长远统治下去的，而三民主义的大同思想一定能够光复大陆。

唯有到了那个时候，中、日关系才会达成真正的“正常化”！

《蒋总统秘录》全文终■

《蒋总统秘录》全书至此结束，谢谢阅读中国近代史：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

《蒋总统秘录》，一本出自中国立场并由日本认可的真实中日关系史。

执笔者结语

“蒋总统秘录”自中华民国六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开始在日本“产经新闻”连载，至中华民国六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结束。“产经新闻”于连载结束之日，以两版的版面，刊出由原执笔人古屋奎二所撰之结语，以下为其译文。

蒋总统战斗一生是为了实现三民主义

对共党了解最深反攻大陆是以正胜邪

前言

蒋总统秘录，在今天刊出最后一篇。现在一面回顾两年四个月以来六百五十篇的长期连载过程，一面站在执笔者的立场，就个人所见的“蒋总统观”等项，试为记述如下。

编辑委员古屋奎二于台北

蒋公逝世,风云异色遗嘱四事,毕生之志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

在历书上恰逢“清明节”-是一个晴空万里、适合时令的早晨。这个节日，在中华民国称为“民族扫墓节”，为国定假期，让大家去打扫祖宗坟墓，安慰在天之灵。

此时，在日本还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而台湾已经进入初夏，记得早上起床之后，便打开了室内的冷气机。

这一天的上午八时，蒋总统在台北士林官邸起床。

“昨夜，蒋公睡眠安稳，故精神颇佳。”这是侍疾医疗小组的一位医师在病历表上记入的纪录。

长公子蒋经国氏（行政院院长）和平常一样来到官邸请安。蒋总统已经盥洗完毕，坐在床侧的躺椅上。

当时蒋总统对蒋经国氏给予如下的叮嘱：

“你自己以后要多休息！”

听了这句话之后，蒋经国氏觉得受了一种说不出的特殊感触所侵袭，整天为之不安。

在健康方面一向很有自信的蒋总统，感到为病痛所苦，是始于一九六二年春天。自这一年三月因摄护腺肥大施行割除手术以来，转为慢性摄护腺炎的宿疾。一九七二年七月，因感染感冒而转为肺炎，住院生活达一年四个月。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台湾发生流行性感冒，蒋总统也受到感染，以致再度发生肺炎；并且由于治疗慢性摄护腺炎而长时期使用各种抗生素药剂，以致抗药性细菌增加，治疗颇为费事。如此至于翌年元月九日夜晚睡眠中，发生心肌缺氧症，虽经急救得以转危为安，但其后肺炎仍未能完全治愈，不时发热。

蒋经国氏的不安，成了现实。

这一天的下午，蒋总统突然感到腹部不适。

此后的经过，在医疗小组的报告书中有如下的说明：

“腹部不适，同时小便量减少。医疗小组认为蒋公心脏功能欠佳，因之血液循环不畅，体内组织可能有积水现象；于是授以少量之利尿剂，此使蒋公排出五百西西之小便。下午四时许，小睡片刻。”

病情的变化，发生在下午八时一刻左右。

侍疾医师发现刚刚入睡的蒋总统“脉搏又突然转慢，当立即施行心脏按摩及人工呼吸，并注射药物等急救，一、二分钟后，心脏跳动及呼吸即恢复正常；但四、五分钟后，心脏又停止跳动，于是再施行心脏按摩、人工呼吸及药物急救，但此次效果不佳，心脏虽尚时跳时停，呼吸终未恢复，须赖电击以中止不正常心律，脉搏、血压已不能测出。

“至十一时卅分许，蒋公双目瞳孔已行放大，急救工作仍继续施行，曾数次注入心脏刺激剂，最后乃应用电极直接刺入心肌，刺激心脏，但回天乏术。”

台北夏令时间下午十一时五十分，蒋总统与世长辞，享寿八十九岁。

此际，台北市天空突然雷声激震，大雨倾盆。在这个季节，极少有这样的雷雨，正如蒋经国氏日记中记述的“风云异色，天地同哀。”台湾的人们到现在还在传说：蒋总统的灵魂已经乘风雷而升天。

蒋夫人宋美龄女士及蒋经国氏在枕畔照料注视，直到临终。

要人们应召陆续赶到官邸。

遗嘱业已先有准备，蒋总统好像是预知将要离开人世，所以在一星期之前的三月二十九日口授国民党副秘书长秦孝仪笔记下来。

在蒋总统的面前，打开了遗嘱，内容是这样的：

“……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

首先由蒋夫人、继之副总统严家淦氏、行政院长蒋经国氏以及立方院长倪文亚、司法院长田炯锦、考试院长杨亮功、监察院长余俊贤各氏都颤抖着手提起毛笔在遗嘱上签了字。

全民哭祭矢服心丧

一夜过去。天明之后，台北市上空覆盖着一层浓密的阴霾。

早晨的报纸，都将平时红色的套版改为一律黑白的版面，报导蒋总统逝世。电视也停止播出彩色录影和娱乐节目。主要的公家机关，铺有红色地毯之处都覆上黑布，表示哀悼。街头布店自动免费供应黑色丧章，红色领带和鲜艳服装都见不到踪影，连印鉴用的印泥都改用了蓝色。

在中国，红色被当作是庆祝的表征，人们因心情哀伤而将之摒弃，以致一夜之间大街小巷都消失了红的颜色。这在我们外国人看来，总会感觉到有一种非比寻常的反应。

蒋总统遗体，停于台北市的国父纪念馆，供一般人公开瞻仰五天。每天有五十万以上民众涌到那里，围绕着纪念馆排列成四、五匝，从天色黎明赶去排在末尾，要等到傍晚才能走近遗体之前，瞻谒致敬。

很多人热泪夺眶而出，不肯揩去，匍伏灵前，痛哭失声；更有不少老年人伤心晕厥，被救护员抬送离开。

年轻的三军仪队，手持上有刺刀的步枪，肃立护堂，站在那里就像雕像一样，纹风不动；但两串泪珠沿面颊下流，前胸为之湿透。

有一个美国新闻记者，向群众的一人发问：“你得了多少钱在这里哭泣？”于是这个记者便受到了群众的围殴。

奉厝典礼，于四月十六日举行。有为美国总统特使的副总统洛克菲勒、韩国总理金钟泌等二十三国的代表团来华参加。

已经没有邦交的日本，也有佐藤荣作、岸信介、滩尾弘吉几位来台。中华民国对于日本代表给以准国宾的待遇，在旅馆内及专车上都悬以日章旗。自一九七二年断绝邦交以来，在台湾还是第一次看到日本国旗。要是将那就在一年之前因日本政府表示“不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而肇成中日航空中断的情形联想起来，则实在是对照的处遇。

佐藤荣作氏所奉献的花圈，只有他的名字，未加任何头衔；他当初预定为“自民党代表”，但因大陆方面的介入，而改为“友人代表”。

在这里所提到的日章旗或是花圈的事，都象征着所谓“中国问题”的困难情况。

蒋总统遗体施行防腐之后，暂行奉厝于台北南方约六十公里的慈湖湖畔。此处是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大陆撤退前蒋总统来台之时驻节过的，风景很像故乡浙江奉化的溪口镇，蒋总统为怀念王太夫人亲自命名为“慈湖”，并设了一处行馆。现在蒋总统穿着长袍马褂的大礼服、胸前佩戴勋章，安眠在行馆正厅的黑色大理石棺廓的浮厝之中。

接连着正厅的厢房，保存着蒋总统寝室的原状，在侧面茶几上留有用红铅笔在便条纸上行书的几个字：

“能屈能伸”。

意思是说：顺应环境，当忍则忍，应屈则屈，以待未来伸展之意。

完成了中国统一的大业，但最后在国际逆流中寿终，从这四个字可以看出蒋总统遗憾的心境。

今年十一月，在距上次大会七年的国民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决议：“总裁一日未奉安南京，我们就一日不解除心丧。”

现在，到慈湖谒灵的行列，仍然是继续不断。安眠在这里的蒋总统，还是为念念不忘光复大陆的中国民众们的人心之所归向。

蒋总统的世界观

自由世界团结消灭共产始有真正和平。

蒋总统的生涯，乃是战斗的一生。

自从剪掉辫子，参加打倒清廷的革命战争以来，和割据大陆各地的军阀战斗，和侵略中国的日军战斗，乃至和中国共产党战斗，他的心情大概未曾得到过片刻的安宁。

他在和共产党的战斗中，虽然一时失去了大陆，但是最初统一中国、建立和列强平等地位的现代国家、更在坚持和日军长期作战终获胜利的历程，是不可能在世界历史上被抹去的。

他的战斗，是为了实现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而战。

获得和外国的平等地位以及排拒外来侵略的战斗，是为了实现民族主义；打倒封建帝制和建立民主国家的战斗，是为了实现民权主义；战胜了这两个阶段的蒋总统，乃使曾被孙中山先生慨叹为“一片散砂”的中国民众汇集成为统一的现代国家。

至于和共产主义的战斗，则为的是实现民生主义而战。

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有其形似实非之处。这就是说：其理想都可以说是在建立“没有贫富差距的社会”，此为极其相似之处；可是民生主义乃致力于“调和”社会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而共产主义却以凭藉阶级斗争的“对决”（对立裁决）为指标。——这一点，实为双方面绝对不能相容的本质上的差异。

主义的差异，已属如此；而蒋总统的反共，还更有一种超越了主义差异的惯恶感。就说这是他的本质，也似乎未尝不可。

蒋总统的反共，是从反苏（联）开始的。

在第一次“容共”（一九二四～二七年）前夕，他奉孙中山先生之命赴苏联考察，虽然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但却正是他反共的原始体验。

当时，他向孙先生提出的考察报告原件虽然不复存在，但在他写给廖仲恺的书信中则曾经提到：

‘对俄党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

这个不信感，就是中山舰事件（一九二六年）、上海清党（一九二七年）的结点。

后来，又经过西安事变（一九三六年）、新四军事件（一九四一年）、毛泽东到重庆协商（一九四五年）、马歇尔调停（一九四六～四七年）等历程，更使蒋总统再三体会到共产党根本是无可商谈的对象。所以在蒋总统的字典里，特别关于共产主义，乃是没有妥协和商谈的辞汇的；就连对于缓和东西的紧张情势，他也一贯拒绝。这样的“绝对反共”，乃是和其他民主国家领导人的理念颇有径庭的。

以共产主义为“邪”、三民主义为“正”的二元论，乃是蒋总统的世界观的根基。

蒋总统将这个世界二分为“自由世界”和“共产世界”。他期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和在亚洲的日本、韩国、菲律宾、东南亚各国都是站在自由世界的这一边，也就是说应该站在中华民国这边的国家。他并且认为全体人类本来就应该是属于“自由世界”；在地球上只要是还没有把“共产世界”消灭，则真正的和平是不会来到的。

故而，“反攻大陆”乃不仅是止于一片乡愁的光复故土之意，而是坚持“正”与“邪”的战斗到底，更是“正”必定要战胜“邪”的信念的具体实现。

蒋总统对日本有感情而常以理为前驱

对于蒋总统的日本观，是不能和他的世界观分开来加以衡度的。

一谈到他的日本观，在很多日本人的脑海里便会浮现出当战争终结之际的“以德报怨”这一句话，并且还会想到——放弃赔偿、天皇存废由日本人民自决、尽速遣返日侨日俘归国、反对分割占领日本等事项。

对于这些事，很多人都相信是领受了他所给予日本的“恩惠”。故当日本和中华民国断交之际，在日本、在台湾都纷纷议论日本是在“以怨报德”。

不过，在这里所要强调的，乃是在秘录的连载开始之际，他转告我的几句话：

‘关于以德报怨的话，到了这个时候希望不必大事张扬；以往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中国人的伦理，就是这么一回事。’

把蒋总统的“以德报怨”当作只是一种单纯的“怜悯”和“同情”，尚有欠恰当，实则这是导源于他的世界观的理则的归趋。

从他的“共产”对“自由”的二元论所描绘出来的战后亚洲模式，乃是在美国援助之下，以中华民国和日本、韩国、菲律宾、中南半岛构成强有力的反共战线，而钉牢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使之转动不得。为此，乃必须要使日本早日复兴成为自由阵营的一员。

蒋总统在青年时代赴日本留学军事，日本友人众多，自日本所学习到的东西也不少，他并曾屡次提起：“日本是第二故乡”。

在这里还要举出这样一件事实：

战后，刚撤退到台湾的中华民国军队，如他自己之所慨叹——纪律不振，士气低落。为了重建革命队伍，他于一九四九年底召请原为日军的高级军官数十人为教官，训练军事干部。据当时以主任教官身分来台的富田直亮（中国名白鸿亮，在战争结束时为少将，现住台北）说，为了对蒋总统报恩而将家业抛弃，前来参加；蒋总统曾告诉白鸿亮“首先替我从精神上锻炼起来！”要他完全负责。像这样的话，对于曾为敌军的军官，是很不容易说出的。

然而尽管这样，可是蒋总统的日本观却决对不是黏在感情上的；和喜爱或厌恶的“情”比较，实则经常是有一种冷静的“理”为其前驱。而这个“理”的根源，则还是出自他独特的世界观。

日本缺乏正确认识，中日之间经常误于片面之见

对于蒋总统这样的世界观、日本观，笔者觉得在日本方面殊乏正确认识。

日本和中国八十年的关系，如果说是一部“蔑视中国”和“相互误解”的历史，似非言之过当。

因明治维新而迎头赶上强国之林的日本，对于邻接的中国的落后性，乃投以一种轻蔑的目光，不以中国为友人，而视之为掠夺品；这是和当时在亚洲发展殖民地政策的西欧列强的观点相同，也就是要和西欧列强为伍，以中国为攘夺利权的场所。

于是，其所到之处便是侵略战争。这和因利害冲突或意见对立而发展下去的武力冲突道理不同，因为这是只顾征服欲所驱策的战争。

对于这样的日本，蒋总统曾经再三再四呼吁“为亚洲和平而携手”，甚至在卢沟桥事变之后还在不断地宣告“中国不以日本民众为敌”；可是这样的号召，却并没有能为根本就看不起中国的日本之所接受。

日本和中国在谋求共存共荣的机会和方法上的选择，是落在侵略者日本手中，但日本则经常是做了错误的选择。

当此“蒋总统秘录”连载完结之际，笔者的心头留下了两点深深的遗憾。

一点是：“假定在那个时候，日本选择了别的方法……”虽然有一句众所周知的话——“历史没有假定”，但这种痛恨却是经常徘徊在我的脑子里，不能离去。

另一点是：我慨叹中、日之间的历史，经常只是被片面的光线所照射，好像历史正就是为当时潮流有利的方面所写成的。就以笔者（古屋奎二）本人来说，在战时所知道的中国，乃是日本军阀片面的光线所照射的中国，是充满了差别语和偏见的中国。至于现在，日本的光线则更是只照出了大陆中共的一方面。

相对地，由中国来看日本，也同样地只是片面光线照射的日本像，而且是常有特地强调的倾向。

笔这认为：给予我这两点深憾的根本原因，乃是在八十年来的中日关系上所贯穿着的令人难以想像的“似通非通的消息和情报”。

现在不妨举出一个最近的例证：

当笔者在从事“蒋总统秘录”的取材期中，中、日航空路线断绝。当时，我们待在台北的人都看得很清楚：如果日本的发言涉及到中华民国国旗，则中华民国一定会切断空路；可是东京方面却以“空路如果断绝，则对于中华民国的经济打击甚大”的理由，判断断航的可能性在五成以下。彼时虽然有很多重要人士为了这个问题频繁奔走于东京、台北之间，但探索的结果却是传达了令人怎么样也想像不到那会是台北的正确状况。

率直地说，中、日两民族互相都有点偏欹于“同文同种”、“兄弟之邦”等语汇所产生的“天真想像”和“漫不经心”的感觉。诚然中、日两民族渊源于同一文化，现在也还是使用着同样的汉字；然而，隔着汪洋大海的数千年以来的潮流，已经使两民族的表达思想方式大不相同。对于在这一方面的分歧，互相不大注意，乃成了“似通非通”的发源处，是则正因为使用相同文字的民族，而互相之间却有了误解。

毋忘在莒充满反攻大陆自信

在台北的国际机场，每天有二千人以上的日本观光客降落。

他们都会睁大着眼睛看到台湾的繁荣——鳞次栉比的高楼，衣着鲜丽、表情爽朗的人们，洪水般的车辆，入夜霓红灯的光彩，热闹场所的混杂，……而治安安定，夜间单身步行，总不会碰到可怕的目光。

但是，中华民国则不会忘记自己现在还是豁上国家的命运在和共产主义搏斗。

大陆的中共在吼叫“解放台湾”，中华民国则揭橥“光复大陆”，这是终必要有一个了结的问题。

蒋总统称当前的状况是：“毋忘在莒”。莒，是在战国时代被燕国攻七十二城之后的齐国所最后固守的城池，齐国以这个莒城为反攻基地，在五年的艰苦岁月之后逆袭成功，收复了失地。蒋总统就是要以莒城来譬喻台湾。

中华民国对于反攻大陆的自信，是基于“共产主义绝对不能和中华文化融合，最后必然不会为人民所容受。”中国共产党在大陆所施行的一连串所谓“革命”，乃是在制造“不似中华民族的中国人”；可是五千年的民族性，无论施之以任何强权，都不可能自中国人的心底深处将之挖走。中华民国认为：大陆人民的不满正在不断发酵，共产政权必然会从它的内部崩溃。

现在的台湾，就是定位于面临到那个时候作为模范省；同时也是卫护正统中华文化继往开来的基地。

自一九七一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以来，陆续有承认大陆中共政权的国家出现。现在，和中华民国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为美国、韩国、沙乌地阿拉伯等二十六国。另外像今年在加拿大蒙特娄的世运会这种政治以外的领域，中华民国之受排斥情形也渐有增加。

可是，中华民国正在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她有着在全世界为数不多的粮食自给自足国家的自信，而且还构筑了“工业立国”的地位。不管外交关系的有无，而中华民国现在正和世界上一百二十八个国家有着实质上的交流；即以日本而论，仅次于美国而居于日本第二位贸易额的对手国家，就是中华民国。这个现实的存在，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

对于中华民族，性情躁急的日本人是想像不到他们“百年以俟河清”的时间观念的。就像“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三分敌前、七分敌后”这种具有耐心的长期战略，也显得并非急躁。

到了晚年，对于离开中华民国的一些国家，在蒋总统的内心里想必是会沸腾不已的；但是他处变不惊，深信那些国家“为共产主义所惑，自动落入敌人的圈套，是可悲的国家。”他很冷静地目送他们走开，日本也就是其中之一国。

在六百五十篇的连载中，笔者丝毫无意要把蒋总统描绘成一位英雄；而只是写下唯恐我不写则或将会隐而不彰的“事实”。

中国有一句古语——“盖棺论定”。如今，蒋总统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笔者只是在静静地注视着今后的历史对于他将会给予如何的评价。

——————————————————————————————————————